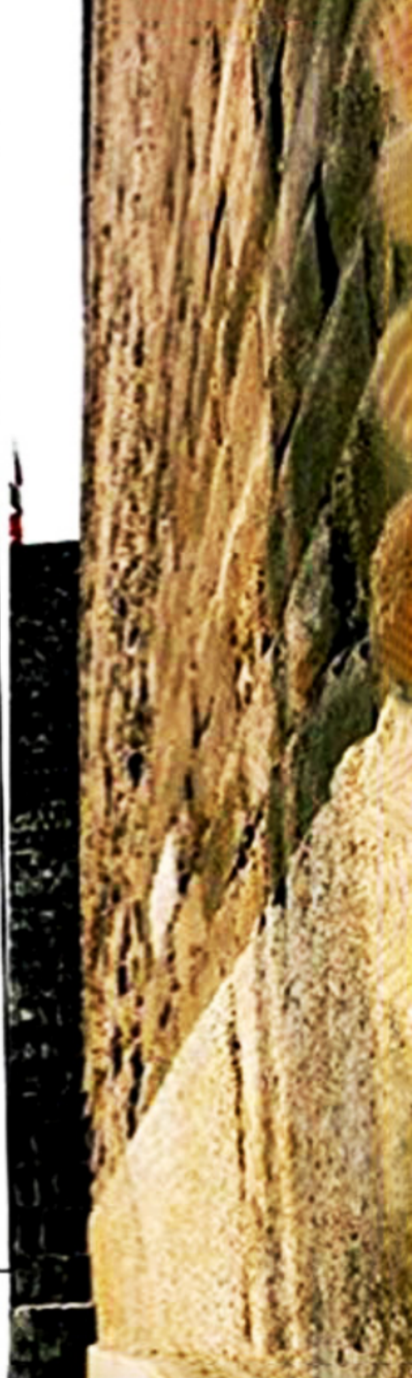
不可不知的战争系列（共10册）

冯先知

吉林文史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不可不知的战争系列（共10册）

冯先知

吉林文史出版社



总目录

近代战争史（上）

近代战争史（下）

秦汉战争史（上）

秦汉战争史（下）

清代战争史

三国两晋战争史

宋代战争史

隋唐战争史

元代战争史

远古战争史



近代战争史（上）

目录

第一部分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
第一节 英军首次北犯与清军定海抗战（1840年6月～9月）
一、英军封锁珠江口与首次北犯
二、第一次定海抗战
三、英舰北犯渤海湾与中英大沽口交涉
第二节 广东军民的抗英作战（1841年1月～5月）
一、广州谈判破裂
二、沙角、大角清军抗击英军的侵犯
三、英军霸占香港
四、清廷对英宣战
五、英军侵犯虎门，清军浴血奋战
六、广州清军的抗英作战
七、三元里等地人民的抗英斗争
第三节 英军再次北犯与清军浙东反攻（1841年8月～1842年3月）
一、英国决定扩大侵略战争
二、厦门清军的抗登陆作战
三、第二次定海抗战
四、镇海、宁波的抗英作战
五、清军浙东反攻
第四节 英军侵入长江下游，沿江军民英勇抗战（1842年5月～8月）
一、英国增兵及其新的侵略部署
二、乍浦清军的抗击战斗
三、吴淞清军的英勇抗战
四、镇江保卫战
五、《南京条约》的签订
第二部分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上）（1851年1月～1856年8月）
第一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国内形势
第二节 金田起义与太平军转战广西（1851年1月～1852年6月）
一、金田起义
二、转战广西
第三节 北攻湘鄂与东取金陵（1852年6月～1853年3月）
一、道州决策
二、进攻长沙
三、攻克武汉
四、东取金陵
第四节 定都金陵后的军政决策
第五节 北伐（1853年5月～1855年5月）
一、长驱北上，挺进京津地区
二、驻止待援，被迫转入防御
三、援军的北上与覆没
四、北伐军的最后失败及其教训

第六节 西征（1853年5月～1856年4月）
一、胜利进军
二、被迫退却
三、转败为胜
四、乘胜反攻
第七节 一破江北江南大营（1856年2月～6月）
一、打通天京与镇江的联系
二、攻破江北大营
三、击败镇江外围之敌
四、摧毁江南大营
第三部分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1860年11月）
第一节 英国制造借口，挑起战争（1856年10月～1857年1月）
一、“亚罗船事件”
二、英军进犯广州
三、广东军民的英勇抗战
四、清廷“息兵为要”的方针
第二节 广东军民抗击英法联军的进犯（1857年12月～1858年1月）
一、英法联军的组成
二、英法联军陷广州
三、广东军民继续打击敌人
第三节 英法联军第一次北犯（1868年4月~6月）
一、联军策划北犯，清廷置若罔闻
二、联军进逼大沽，清军仓卒布防
三、联军大沽登陆，清军抗战失利
四、联军威胁津京，迫签《天津条约》
第四节 英法联军第二次北犯（1859年6月）
一、上海修约谈判
二、清廷加强大沽防务
三、英法联军再次北犯
四、清军大沽抗战获胜
第五节 英法联军第三次北犯（1860年4月～11月）
一、英法扩大侵略，清廷疏于戒备
二、联军北塘登陆，大沽天津陷落
三、联军侵入北京，迫签《北京条约》
第四部分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下）（1856年9月～1866年2月）
第一节 石达开率军远征与最后失败（1857年5月～1863年6月）
一、进军江西
二、转战闽浙
三、围攻宝庆
四、回师广西
五、辗转入川
六、石达开部的覆灭及其教训
第二节 二破江北大营与三河镇大捷（1858年8月～11月）
一、枞阳会议

二、再克庐州与二破江北大营
三、三河镇大捷
第三节 二破江南大营与东征苏常沪（1860年2月～8月）
一、二破江南大营作战方针的提出
二、奔袭湖杭与回师天京
三、摧毁江南大营
四、东征苏常
五、进攻上海
第四节 安庆会战（1860年9月～1861年9月）
一、“五路救皖”计划的落空
二、安庆的失守
第五节 李秀成部回师江浙与再攻上海（1861年7月～1862年6月）
一、攻占淅江
二、再攻上海
第五部分 捻军起义战争（1852年11月～1868年8月）
第一节 捻军的兴起（1852年11月～1855年8月）
第二节 转战皖豫边，与太平军南北呼应（1855年9月～1857年2月）
一、雉河集会盟
二、积极进攻守备薄弱之敌
三、雉河集争夺战
第三节 接受太平天国领导，与太平军并肩战斗（1857年3月～1864年11月）
一、主力南下淮南与太平军联合作战
二、淮北捻军向河南、苏北、山东出击
三、退出淮北，与西北太平军并肩战斗
第四节 与太平军余部合编，继续坚持反清战争（1864年12月～1868年8月）
一、高楼寨歼灭战
二、粉碎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
三、东捻军转战湖北
四、东捻军在山东被围及其最后失败
五、西捻军转战陕西
六、西捻军的覆没
第六部分 天地会起义战争
第一节 上海小刀会起义战争（1853年9月～1855年2月）
一、起义的爆发与发展
二、上海城市保卫战
第二节 大成国起义战争（1854年6月～1864年5月）
一、广东天地会发动武装起义
二、围攻广州之战
三、转移广西，开辟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
四、被迫转入防御，根据地日益缩小

第一部分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

1840～1842年，英国殖民者对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其导火线是由于英国强行向中国推销鸦片，故称鸦片战争，也叫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以后，中国由封建社会一步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1840年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第一节 英军首次北犯与清军定海抗战（1840年6月～9月）

一、英军封锁珠江口与首次北犯

英国侵华远征军由舰队司令伯麦率领，以舰船三十艘，载陆军四千人，在新加坡集结后，向中国南海进发，于1840年6月下旬陆续抵达广东海面，与先期到达的舰船会合。侵略军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宣布从6月28日起，封锁珠江口。“都鲁壹”号等四艘军舰和一艘武装轮船，被指定执行此项任务。

6月28日，英国全权代表、侵略军总司令懿律率领由英国本土和好望角舰队抽调的三艘军舰赶到广东。懿律会见义律后，决定按照英国政府既定的对华作战部署，除继续封锁珠江口外，立即启程北上，夺占定海，并相机北上渤海湾，以武力逼迫清廷就范。6月30日，懿律和义律率领军舰十艘、武装轮船三艘、运输船二十八艘，由广东海面出发，开始了第一次北犯。

7月初，英舰队驶经福建海面，懿律以递送《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副本为名，派舰长包诅率“布朗底”号军舰闯入厦门港。

厦门是福建的重要门户，远控台澎，近接金门，水上交通相当发达。厦门及附近各岛驻有清军水师八百五十名，陆兵八百名，另水勇三百余名，在新筑炮墩及旧炮台内共安有火炮二百八十余门。

7月2日，当英舰“布朗底”号由青屿强行入口，并派出一名少尉军官偕翻译划着小船递交照会副本时，遭到岸上清军拒绝。次日，包诅再次派出舢板强行靠岸投送，又遭清军拒绝，英舰遂发炮轰击，使厦门炮台和民房数处受损。包诅见厦门守军拒绝接收照会，便将它留在沙滩上，退出厦门港，北上追赶舰队。（留军舰及运输船各一艘封锁厦门港，不久又调往定海。）

二、第一次定海抗战

舟山群岛是英军北侵计划中的主要目标，其最大岛屿舟山岛南部的定海，被认为是最适于作司令站的地方。因此，英军舰队于1840年7月3日驶抵舟山海域后，立即派出轮船二只，进至定海城南之道头港水面，进行测量和侦察。

定海县城东、北、西三面都有山峦环抱，城南二三里即道头港，其吉祥、竹山、大渠三口，为外洋入港门户。道头港以南，有大小五奎山、大小盘峙山、大小渠山等岛屿罗列海中。清军在定海设有水师镇，共有水陆兵勇二千八百余人。城东南设有炮台一座，安设火炮八门，配兵五十名防守。

7月4日，伯麦率英舰数艘闯进定海水域。清军水师竟毫无戒备，不仅未予拦截，还由知县姚怀祥登舰询问来意。伯麦交给姚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中文照会，限次日下午2时前投降，将所属海岛、炮台一律交出，否则开炮轰城。姚怀祥返回后，即会同文武官员商讨对策。多数人认为英军所长在于船炮，宜将水陆部队的一半撤至离城一里的半路亭一带堵击，一半撤至城中防守。姚怀祥则主张撤兵入城，坚守待援。他向总兵张朝发建议："夷未知我虚实，宜坚壁待外援；我兵毫无纪律，若浪战一败，城破矣。"张朝发却认为守城不是水师的职责，水师的本分是扼守海口，不让敌兵登岸。由于意见不一，只好水陆分守：张朝发将城外各营及水师齐集港口防堵；姚怀祥则率兵千余守城。二人并约定："在外者主战，战虽败不得入；在内者主守，守虽溃不得出。"

5日下午2时，伯麦见清军无献城投降的迹象，便令"威里士厘"号等四艘军舰发起进攻。张朝发率水师进行抵抗。由于英军舰大炮多，射程较远（一千至两千米），清军船小炮少，射程又近，交战不久，清军水师损失甚重，张朝发也受伤，即率部向镇海方向退却。英军便在舰炮掩护下登陆，攻占了定海城东南的关山（亦名东岳山）炮台，并连夜炮击定海县城。6日凌晨，英军攻破东门，知县姚怀祥出北门投水自尽，守城兵勇溃散，定海遂告失陷。

第一次定海之战，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丧师失地的战斗。此次作战失利原因，主要在于清王朝对外敌入侵缺乏警惕，以致除广东外，沿海戒备不严，给了敌人以乘虚袭取的机会。诚如当时人夏燮所说："当日之娱，误于浙洋之全无准备，豕突而来，措手莫及"。其次，定海清军事先既疏于戒备，临战又互不协同，水师不顾彼己船炮悬殊而与敌正面对阵，结果迅速溃败，陆师则单纯守城，没有依托有利地形节节阻击敌人，也没有采取防敌炮击的有效措施，以致一遭炮击即兵溃城陷。

定海失陷后，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于7月9日赶到镇海，会同浙江提督祝廷彪布置该处防务。此时，镇海各营汛仅有官兵二千余名，乌尔恭额急调湖州兵三千加强镇海防御，并建议粤、闽两省各派水师二千"星飞来浙，会同浙省各镇并力痛剿"。7月24日，清廷以定海失守，将乌尔恭额和祝廷彪革职留任。8月6日，命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驰赴浙江查办和主持军务。

英军攻陷定海后，委任管理军民事务的官员，准备长期占领。同

时，派出军舰、轮船各一艘，封锁甬江口；另以舰船五艘，前往长江口进行测量侦察，其余舰只则进行北犯渤海湾的准备工作。英军在定海四郊张贴布告，引诱逃匿民众回城，甚至诱以鸦片，但回城者寥寥无几。侵略军粮食困难，便组织抢劫队，搜抢粮畜，抓捕群众。定海附近的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岑港守军也始终坚守港口及附近岛屿未退，伺机袭扰敌人，给了侵略军以一定的杀伤和牵制。

三、英舰北犯渤海湾与中英大沽口交涉

1840年7月28日，懿律和义律率"威里士厘"号等舰船八艘，驶离舟山群岛北上，8月5日过山东半岛成山角，6日越过大小竹岛、高山岛和候鸡岛，侵入渤海湾，9日进泊大沽口外。

道光帝已于8月3日接到林则徐的奏报，得知英舰可能北上天津。他满以为天津海口防范严密，"果有夷船驶入，自可有备无虞"，因而态度比较强硬。他谕令直隶总督琦善：英舰"倘驶至天津，求通贸易，……断不能据情转奏，以牡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但当8月9日接到琦善的真奏，得悉天津炮位陈旧、兵力不足时，态度便立刻软下来，当日又改谕琦善："督饬所属严密防范，临时仍相机办理，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8月10日，琦善接旨，次日即派游击罗应鳌前往大沽口外，探询英方企图。经道光帝批准后，琦善于8月15日（一说17日）派千总白含章前往英舰取回《巴麦尊照会》，并立即呈送北京。

道光帝接到《巴麦尊照会》后，得知英国侵略者要求赔礼道歉、偿还烟款、割让岛屿等。他对外慑于英舰的威胁，对内偏信"弛禁派"琦善等的谗言，便将"办理不善"的责任强加于林则徐、邓廷桢身上。他以为只要惩办林、邓二人，英国侵略者便会从此息兵。8月20日，他要琦善向英方表示："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8月21日，又在林则徐的一份奏折上批道："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这不仅是对严正的禁烟运动和林则徐等"严禁派"的打击，也是对中国军民反对英国侵略的正义行动的否定。

8月30日，琦善与义律在大沽口举行会谈。他对英方所提无理要求，含糊其词地表示"定能代申冤抑"，多方劝说侵略者尽快"返棹南还，听候办理"。

9月15日，英方表示同意将谈判地点改到禁烟所在地广东，并即日起碇南返。英国舰队之所以在谈判未获任何结果的情况下同意南返广东，而不在渤海湾采取军事行动，主要由于当时"季节的将近终期，北季候风的到来，岸上部队和舰队水手间流行的病疫等"原因。懿律等认为，在来年春季到来之前，是不宜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的。

英军舰队的暂时南撤，道光帝竟认为是外交上的一大"胜利"。他在伊里布的奏折上得意地批道："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好在彼

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正是在这种愚蠢侥幸的心情下，他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兼署两广总督，前往广东“查办”，对为严禁鸦片而建立了历史功勋的林则徐、邓廷桢，则都给予革职处分。与此同时，道光帝命令琦善“将应留应撤各兵，分别核办”，接着又谕令沿海各督抚山酌量裁撤防兵，以节饷糈。这种自拆藩篱的愚蠢行径，无异于开门揖盗。

第二节 广东军民的抗英作战（1841年1月～5月）

一、广州谈判破裂

1840年11月中旬，懿律和义律率领“麦尔威厘”号等四艘军舰和一些辅助船只离开定海，于直11月20日抵达澳门。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对大沽谈判的结果十分不满，责令懿律等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

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不久即与英方代表开始谈判。义律（懿律因病回国，全权代表由义律接任，远征军总司令由伯麦接任）遵照奥克兰的指示精神，坚持其偿还烟价二千万元，割让香港，开辟厦门、定海为商埠等无理要求，并一再以开战相威胁。

琦善对禁烟态度一贯消极，此次奉命赴粤，原只准备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在赴粤途中就公开扬言：“现在办理夷务，在柔远不在威远”，“英夷强横，非中国可能敌”。他到广州后，非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广东防务，反而将数千名义勇解散。虎门内外各隘口原有防兵万余，琦善抵粤前，林则徐在道光帝严斥下已被迫撤去二千名，琦善到任后，又大加裁撤，并将水师水勇船只或撤或裁，又拆除江底暗桩等障碍物，以迎合英国侵略者，求得早日达成和议。琦善还向道光帝谎报情况，说什么广东“船炮不坚，兵心不固”，“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战阵之人，即水师提臣关天培，亦情面太软，未足称为骁将”，企图以此争取道光帝同意他在谈判中所持的妥协求和态度。琦善的所作所为，不仅打击了清军的士气，而且给了英国侵略者进行军事讹诈以可乘之机，加速了广州谈判的破裂。

英国侵略者为了加强其在谈判中的地位，于12月上旬，出动兵船二十余艘陆续驶抵虎门外，进行武力威胁。琦善见事出紧急，不得不把义律要求割让香港等事上报清廷。12月30日，道光帝在琦善奏折上十分恼怒地批道：“看此光景，该逆夷反复鸱张，恐难以理喻。必当一面论说，一面准备，多方羁绊，待其稍形疲惫，乘机剿戮，方可制伏也。”于是又下令琦善及沿海督抚严密防范，命四川备兵二千，湖南、贵州各备兵一千，听候调遣，令伊里布准备收复定海。在此情况下，琦善不得不抽兵二千分布于广州以东江岸。但义律认为，只要对琦善施加军事压力，便会取得满意的结果，因而在谈判过程中，悍然对虎门要塞区的沙角、大角炮台发起进攻。侵略者的大炮，宣告了琦善“柔远”政策的破产。

二、沙角、大角清军抗击英军的侵犯

沙角炮台位于虎门口东侧的沙角山上，安有旧式铁炮十二门，大角炮台位于虎门口西侧的大角山上，安有旧式铁炮十七门。山上筑有了望台，炮位沿山环绕布置。炮台围有石墙，并有外壕环护，有些地方埋设了地雷。琦善撤兵以来，两台均仅驻有防兵数十名。虎门形势紧张后，才由副将陈连升率兵六百余名，临时加强两台的防御。

1841年1月7日上午8时，一千五百余名英国侵略军以及临时招募的流氓、游民数百人（一说二千人），分左右两支队，向沙角、大角炮台同时发起进攻。

英军以右支队担任主攻，计有一千四百余人，由“加略普”号等三艘军舰和四艘轮船运载，负责进攻沙角炮台。当三艘军舰驶达预定水域后，立即对沙角炮台进行炮击。与此同时，登陆部队在川鼻湾登岸，抄袭炮台侧后。由于守军大部集中在炮台及其周围，四周要隘和山顶兵力薄弱，因此，两小时后，英军即占领了各制高点，并安好了野战炮，俯击沙角炮台。在敌人水陆夹击下，守军腹背受敌，伤亡甚众。不久，英军突入炮台，守台清军英勇抵抗，大部伤亡，陈连升父子也英勇牺牲，沙角炮台途被英军占领。停泊在沙角附近的清军水师船十余艘亦同时被毁。老将陈连升年过七旬，曾在反击英舰挑衅的战斗中屡立战功，此次又督兵坚守沙角炮台，直至以身殉国，是清军中突出的爱国将领之一。

进攻大角炮台的英军左支队，主要由“萨马兰”号等四艘军舰组成。它们锚泊在距大角炮台很近的地方，用舷侧炮压制炮台火力，摧毁胸墙、炮洞、围墙多处。与此同时，部分兵力从南北两侧登陆包抄炮台。守军被迫将大炮推入海内，突围撤退，大角炮台随即失陷。英军放火烧毁营房，拆毁炮台，然后全部撤回舰上。

沙角、大角之战，清军伤亡六百余名，英军死伤百余人。在这次防御战斗中，清军凭借有利地形和要塞工事，给了进攻之敌以一定的杀伤，但由于防守兵力不足，战术呆板，炮台侧后暴露，经不起英军正面炮击与侧后登陆的包围攻击而陷入被动。当时，水师提督关天培和总兵李廷钰等各率兵数百防守横档、武山各炮台。关天培深感前线兵力单薄，派李廷钰回广州“哭求增兵”，全省文武亦请求派兵往援，而琦善却以有碍“抚议”为由，按兵不动，坐视沙角、大角两炮台被英军攻占。

三、英军霸占香港

沙角、大角陷落后，琦善非但不从中汲取教训，反而把它作为妥协求和的借口，更加强调敌军船炮的厉害，并胡说什么广东地势无险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与敌交锋实无把握。1841年1月中旬，他照会义律，表示愿意“代为奏恳”，在尖沙嘴或香港地方择一隅（并非全岛）供英人寄居（并非割让）。然而，义律不待琦善“代为奏恳”，迫不及待地于1月20日单方面发布“公告”，诡称“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六天之后，即1月26日，英军便强行占领了香港。第二天，琦善与义律会于莲花城

（今广东番禺县莲花山）。义律出示他拟定的条款，琦善不敢应允。对此，英方记载也很明确：“他们毫未达成具体协议”。2月10日，琦善与义律又会于穿鼻洋蛇头湾。琦善拿出了自己的“章程”草稿，其中包括“准就新安县属之香港地方一处寄居”。义律不满足于寄居一隅，“坚求全岛”，以致会谈仍无结果。英国殖民者声称义律和琦善签订了《穿鼻草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纯属讹诈。

四、清廷对英宣战

1月27日，沙角、大角炮台失守的消息报到北京，道光帝甚为恼怒，当即决定对英宣战。他一面命令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等将英国侵略行径“通谕中外知之”，一面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令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并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加意巡查，来则攻击”。接着，又令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前往广东主持军务。除催促湖南、四川、贵州、江西各省所派之兵共六千人迅速启程赴粤外，又增调四川兵一千、湖北和贵州兵各一千五百、云南和湖南兵各五百，兼程开赴广东。2月26日，道光帝接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英军强占香港的奏报，立即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并查抄其全部家产。同时，补授原刑部尚书祁为两广总督，未到任前由怡良署理。道光帝著怡良等“一俟奕山、隆文到粤，即行大张挞伐，极力攻剿”。

五、英军侵犯虎门，清军浴血奋战

早在2月中旬，义律在获悉清廷向广东调兵遣将和对英宣战的消息后，便立即命令英军备战，准备进攻虎门和广州，以先发制人。2月19日，英舰开始向虎门口集结。25日前，英军完成了进攻虎门的临战准备。

英军经过侦察，发现下横档岛没有设防，遂于2月25日下午派出炮兵分队，携带臼炮三门，在一百五十名步兵护卫下，由“复仇神”号轮船拖运至该岛登陆，并连夜选择阵地，安设炮位。

26日清晨，占据下横档岛的英军炮兵猛烈炮击上横档岛，压制横档、永安两炮台的火力。与此同时，英军派舰船阻断清军增援上横档岛的水道，另以四艘军舰由西航道驶入，对上横档岛形成半月形包围，用舰炮轰击，以掩护另外三艘大型舰船和三艘火箭船进攻东岸的南山。一个多小时后，上横档岛守军被压缩于炮台内，英军乘势在西端的永安炮台附近登陆。经过激战，守军阵亡三百余人，一部被俘，少数突围，上横档岛遂被英军占领。进攻南山的英舰由于风潮不顺，直到上午11时半，两艘最大的军舰“伯兰汉”号和“麦尔威厘”号才乘涨潮冒着炮火驶抵距南山一里左右的水域，以右舷炮向威远、靖远炮台轰击。关天培在靖远炮台亲自指挥守军沉着应战。不久，英军三千余人在炮台翼侧登陆，威远、靖远、镇远三炮台守军在敌炮猛烈轰击下，坚持抗击一个半小时，镇远台守军不支先溃。在靖远炮台的关天培受了重伤，仍坚持战斗，最后英勇牺牲（一说见大势已去，自刎而死），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靖远炮台守军筋关天培阵亡者数十人。英军攻下南山各炮台后，用汽船拔除水中木桩，破坏铁链，疏通航道，以备溯江直犯广州。当日下午4时许，英军另一部进攻西岸南沙山下的巩固炮台，守军未予抵抗即四散溃逃。英军将炮台和营房毁坏后，撤回军舰。至此，虎门要塞各炮台除大虎山台外，全被英军攻破。

英军攻破虎门横档地区六座炮台之后，2月27日即由“加略普”号舰

长率领军舰五艘、轮船二只溯珠江而上，进攻离广州仅六十里的乌涌。该处由署湖南提督详福等率领湖南兵九百名（2月22日才赶到广东）和广东兵七百人驻守。由于工事尚未就绪，加之江水暴涨，炮位多没水中，只有东南角一炮，可以射击，但炮架笨重，土质又松软，不能转动，以致不能命中。英军立即换乘舢板登陆，直扑炮台。祥福等率部奋勇抗击，用鸟枪毙敌二百余人。后因火药将尽，清军且战且退。英军乘势猛攻，占领炮台。祥福以下五百余清军阵亡，其余溃散。3月2日，英军又西陷猎德炮台，逼近省城广州。

　　此后，英舰游弋于二沙尾、大黄内外，“或三五只，或六七只，距省二十余里之间，零星停泊，聚散靡常”。

六、广州清军的抗英作战

（一）英军缓兵待援，清军布防广州

春季是广州进行中外贸易的旺季。自1月上旬英军攻陷沙角、大角以来，英国和其它国家的商船停泊珠江口外，迫切要求开市贸易。同时，英军也急需增加兵力，然后才敢进攻广州。清军方面，参赞大臣杨芳虽于3月5日到达广州，但主帅奕山和另一参赞大臣隆文尚未抵达，从各省调集的兵勇也未到齐。在此情况下，义律与杨芳出于各自的需要，达成临时休战协议。从3月20日起，广州恢复贸易。但是，杨芳等“先通商暂作羁縻”以待大军的主张，有违道光帝的本意。4月18日，道光帝大加斥责说：“现在各路征调兵丁一万六千有余，陆续抵粤（按：杨芳于4月3日奏称：奉调之贵州、湖南、江西、四川等省官兵，陆续到粤者已有八千余名），杨芳何以不痛加剿洗，乃迁延观望，有意阻挠，汲汲以通商为词，是复蹈琦善故辙，变其文而情则一，殊不可解。”并令奕山等到粤后“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逆片帆不返，俾知儆畏。倘夷船闻风远遁，空劳兵力，惟该将军等是问。”

兵力不足是英军面临的最大问题。为了集中兵力于广东，定海英军遵照义律的命令，于2月25日撤离南下，3月初先后抵达广东。这时，新任英国远征军陆军总司令卧乌古也率兵七百名赶到。即使这样，英军能参战的人员仍不过三千余人，不敷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为此，侵略军总司令伯麦于3月31日离开广东，前往印度加尔各答，向奥克兰报告广东军情，并争取援军，以便加强进攻广州的力量。

广州城分新城和老城（或称外城、内城），均系明代建筑。它南濒珠江，北依白云山，沿江傍山筑有大小炮台十五座，防卫相当严密。

4月14日，奕山、隆文、祁抵达广州。林则徐向奕山提出六条御敌措施，未被重视。奕山与隆文、杨芳等计议，判定英军进攻广州，“必由东南、西南两路而入。东南一带，水面较窄，中流亦浅；西南由白鹅潭直接大黄，水面宽阔，中流水深三四丈不等，此路最当贼冲”。接着，将本省和外省调来的清军，作了如下部署：除原广东兵仍分守城垣及各炮台外，派江西、湖南、广西兵共一千一百名，在城上分段协防；派四川兵六百名，扎于外城西南靖海门外，以固西炮台后路，并在城南之东西两炮台安设新铸八千斤大炮二门，控制江面；于城北之东西得胜炮台等处，布置四川、江西等省兵四千名，以为犄角；以贵州、湖北兵四千一百余名分置于城东北与西北两处，以策应东、西、北三面的作战，以湖南兵一千二百名扎于城北，联络旧城北面守城兵，以壮声威；截留广西兵一千五百名于佛山，以保护粮台重地。同时，从广西购买大木，于韶关、肇庆制造木排，从江西、广西催造大炮，在香山、东莞一带招募水勇二三千人。此外，尚有两湖、四川、广西兵共约四千余人正在赴粤途中。

（二）英舰沿江上犯，清军三路反攻

在道光帝的严令催促下，奕山等决定于5月10日以后选择月黑潮顺之夜，对侵入广州附近的英军发起一次反攻，企图以夜袭取胜，进而收复各处炮台。当时，英军舰船早已占据大黄、二沙尾二要隘，并经常游

弋于白鹅潭一带。

由于连日大雨，河水骤涨，清军未能“克期进剿”，而英军舰船却乘水涨之机，自大黄、二沙尾两路驶进，谋攻省城。奕山等“不敢坐失机宜，遂决计先发以制之”。5月21日，奕山等令陆路兵并“加意防堵”，令都司胡俸仲、守备孙应照、千总杨泽等率领熟悉水性的义勇一千七百余名，暗藏火箭火弹，手执钩镰，于傍晚潜出城外，分伏三处：一伏西炮台为中路，一伏东炮台为左路，一伏城西北之泥城为右路。约定于三更后一齐出动，利用夜暗乘驾小快艇靠近敌船，用长钩将其钩住，抛掷火箭火弹，火攻泊于二沙尾和白鹅潭一带的英军舰船。英军对清军的反攻早有察觉和准备，21日白天，义律即通令住在广州的外国人于日落前秘密离开广州。当晚11时许，清军发起攻击。英军立即开炮还击，由于舰船较高，火炮死角较大，打不到附近水面，因而有的英船受创，少数侵略军跳水溺死。与此同时，清军西炮台和东炮台也向江中的英船射击，给英军舰船以一定杀伤。但整个战斗的战果不大，英舰未沉一艘，而中国民船却被烧掉不少。同时，当晚清军冲入商馆区搜捕义律等人时，也一无所获。次日黎明，英舰乘顺风发起进攻，对西炮台进行猛烈炮击，守军溃退。英军接着进攻泥城，数十只民船、木筏及大批造船材料被毁。奕山等筹划多时的广东反攻作战，由于谋划不周、敌已有备等原因，遂以失败告终。

（三）英军围攻广州，迫签《广州和约》

清军三路反攻失利，英军决定乘势进攻广州城。义律等根据侦察所得的情报，选定城西北为主攻方向。在此方向上，首先夺取西炮台，尔后绕道城西直插城北越秀山，夺取山上的炮台，控制俯瞰全城的制高点。同时，以一部兵力进攻城西南的商馆区，吸引清军注意力，保证主攻部队的行动。攻城英军共二千七百五十三人，其兵力部署是：以英军第26团为右纵队，配属炮兵二十人和工兵三十人，共三百六十人，担任进攻商馆区的任务。以英军第49团、第18团及水兵、炮兵等共二千三百九十三人为左纵队，在广州城西北清军防备薄弱的泥城、缯步一带登陆，担任主攻。左纵队分为四个大队：步兵大队由英军第49团、马德拉斯步兵团和孟加拉“志愿军”各一邮编成（共六百四十六人）；炮兵大队由马德拉斯炮兵和皇家炮兵、印度工兵各一部编成（共四百一十七人），携各型野战炮十三门；水兵大队由“威里士厘”号和“宁得罗”号舰的水兵编成（共四百三十人），预备大队由皇家海军陆战队和英军第18团编成（共九百人）。

5月24日下午3时，英军右纵队开始在商馆附近登陆，未遭任何阻击就占领了商馆区。该区紧靠城南，对广州城威胁甚大，但广州城高兵多，进攻不易奏效。在右纵队登陆一小时后，左纵队搭乘的三十只船在铁壳轮船“尼米斯”号（即“复仇神”号）拖带下，溯江而上，于下午6时到达登岸地点。当晚，步兵大队和炮兵大队一部先后登岸，遭到当地壮勇的阻击，死伤数十人。但湖南兵为了争功，竟在后面乱放排枪，由伤壮勇多名，引起混乱。英军后续部队趁势大批上岸，占领了附近一座庙宇和一些高地，布置了警戒。25日凌晨，英军全部上岸，经由西村、流花桥直扑北门外各炮台。

广州城北的越秀山一带，筑有炮台六座，自西至东分别为拱极、保

极、耆定、永康（即“四方”）和东西得胜炮台，由四千一百名贵州、湖北兵防守。25日上午8时，英军炮兵开始炮击最西端的拱极、保极炮台。9时半，步兵开始进攻。英军第49团负责袭取炮台北侧的一个高地；第18团从左面迂回到炮台侧后，占领另一高地，以切断拱极、保极炮台后路，并掩护第49团的进攻。从正面进攻拱极、保极炮台的任务，则由水兵大队担负。

防守城北各炮台的清军，稍事抵抗，即放弃炮台和阵地，纷纷退入城内。广东按察使王廷兰欲乘敌立足未稳，带兵出城夺回炮台，奕山不允，清军只得依托城墙不断地炮击敌军。英军占领城北四座炮台和山冈后，居高临下，俯瞰广州全城。万余清军收缩城内，满城大吏惶惶无主。

26日，英军正准备攻城，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次日，即与义律达成了屈辱的广州停战协定，即《广州和约》。条约规定：奕山、隆文、杨芳以及全部外省军队，六日内撤至离广州城六十里以外的地方；于一周内交出“赎城费”六百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全部撤至虎门口外。条约没有涉及香港的地位问题，但义律却于6月7日单方面宣布香港为“自由港”。

清军在广州城下打了败仗，并与义律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奕山等竟编造一套谎言，诡称英军乞和，“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等等，欺骗清廷。昏聩自大的道光帝，也明知打了败仗，却于6月18日下谕，以“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为词，默认了《广州和约》。

七、三元里等地人民的抗英斗争

英军侵入广州地区后，清军节节败退，而广州城郊的人民群众，却自动武装起来，用简陋的武器和农具等不断打击侵略者。广州北郊三元里一带人民轰轰烈烈的抗英斗争，更是成了百余年来中国人民武装抗击外国侵略军的先声。

英军攻占广州城北各炮台后，连日四出骚扰，无恶不作，激起北郊人民的极大义愤和反抗。三元里附近一百余乡的村民，在菜农韦绍光等的联络和号召下，纷纷拿起武器，组成义军，进行武装自卫。他们以北帝庙中的三星旗为“令旗”，相互约定，一村有事，各村支援，共同抗击英国侵略者。

5月30日凌晨，卧乌古亲自率领英军第26团和马德拉斯第37步兵团约六百人，分左右两路向三元里一带进犯。在敌军进攻面前，义军主动撤向山冈，当英军停止前进时，则鸣锣击鼓，一齐向敌人进逼。英军复进，义军再退，最后将英军诱至牛栏冈附近。此时，伏众四起，漫山遍野，杀声震天，英军被迫转入防御，处境十分狼狈。下午2时，雷雨将至，英军为摆脱被动，再次发起进攻。义军依然不与敌军正面交锋。不久，大雨倾盆，英军火药尽湿，枪打不响。义军乘机从两翼包抄，迫使英军后撤。义军趁势追击，刚长矛和钩镰枪刺死刺伤敌人十四名。在追击过程中，一路义军截住了英军第37团的一个连（共六十人），将其包

围于稻田中，用刀矛毙伤三十四名印度雇佣兵。后英军派出两个水兵连，带着“雷管枪”前来增援，这个被困两小时之久的连队才抬着伤员，狼狈逃回营地。接着，抗英群众重重包围了四方炮台。

在三元里一带人民围歼英国侵略军的同时，三山村人民也拿起武器，毙伤另路英军多人，缴获火炮二门及枪械一部。广州附近其它各地的人民群众也纷纷自动参加抗英斗争。5月28日，佛山镇义民圈歼占据龟冈炮台的英军，伤敌数十人，击毁舢板数只。新安县武举庾体群等亦组织群众，于5月24日深夜袭击泊于虎门的英船，烧毁一艘。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精神。

5月31日，英国侵略者以进攻广州城相威胁，迫使奕山派余保纯出面诱骗和威胁抗英群众，解散了义军。6月1日，英军根据《广州和约》的规定开始撤离广州，6月7日全部撤至珠江口外。

英军此次沿珠江北进，孤军深入百余里，进犯广州，本为清军提供了极好的歼敌机会。当时，集中于广州附近的清军不下二万人，占有很大的兵力优势，又有纵横交错的江河港汊和山冈林木可以利用，有坚固的城池和众多的炮台可资依托，有广大民众爱国武装的自动支援，完全可以利用以逸待劳、以众击寡的有利条件，多方袭扰和打击敌人。特别是英军在广州登岸之后，基本上不再拥有“船坚炮利”的优势，清军更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给敌人以重创。但清军不仅在水上敌不过英军，在陆上同样不能取胜，这是清廷昏庸、将帅无能的表现。清军军事思想保守，筑城落后，战法呆板，加以临时从各省抽兵参战，非但兵将互不熟悉，而且互相对立，互不支援，虽然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却形不成一支组织严密、指挥统一、行动一致的军队，这些都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即使如此，仍有部分爱国官兵在战争中表现了不屈不挠的英勇牺牲精神，特别是手持简陋武器的三元里等地人民，凭着一腔热血，有勇有谋，使拥有良好武器装备的英军多次陷入重围，遭到重大杀伤，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第三节 英军再次北犯与清军浙东反攻（1841年8月~1842年3月）

一、英国决定扩大侵略战争

1841年4月，义律关于签订所谓《穿鼻草约》的报告送到伦敦。英国政府嫌义律勒索太少，责备他违背了政府的训令，在已经获胜的情况下，“同意了极其不够的条件”，尤其是不该同意撤出舟山。4月30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召回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主持和扩大侵华战争。

璞鼎查于6月5日离开伦敦，途经印度孟买，会同新任侵华海军司令巴加，于8月10日抵达澳门。璞鼎查离伦敦时，巴麦尊除了重申原给义律的训令依然有效外，要求他抵达中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占领舟山。因此，璞鼎查到达澳门后，就立即准备北犯。8月21日，他会同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率领军舰十艘、轮船四般、运输船二十一艘，装载陆军二千五百余人，驶离香港，开始了英军的第二次北犯。以军舰六艘和轮船二只，以及陆军一千三百余人留守香港。

二、厦门清军的抗登陆作战

英军退出虎门后，清廷误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乃于7月28日通谕沿海将军督抚，酌量裁撤各省调防官兵。8月上旬，专办浙江军务的钦差大臣裕谦接奕山、祁等咨文，获悉英军即将再犯闽浙，乃要求清廷暂缓撤退江、浙两省防兵。道光帝竟于8月19日作了如下批复：“如果逆夷别有思逞，断无先行传播透漏之理。著裕谦仍遵前旨，会同刘韵珂、余步云体察情形，于镇海、定海紧要处所，酌量暂留弁兵外，其余调防官兵，即著奏明裁撤归伍。……不必为浮言所惑，以致糜饷劳师。”可是，事隔数日，英国军舰的大炮就在厦门开火了。

厦门的防务，自上年7月英军第一次侵扰以后有所加强：东面的白石头至沙坡尾一带，改沙囊为石壁，高一丈，厚八尺，长五百丈，每五丈留一炮洞；其它滨海之处，也增加了炮位和兵力，以防敌人登陆。鼓浪屿是咽喉要地，有数座坚固的石砌炮台，安炮七十六门，并环以沙墩炮台，以加强主炮台的防御能力。英军再次进犯前，整个厦门地区共安设大小火炮二百七十九门，有水陆防兵二千八百名，并有近万名水勇、乡勇可资调遣。

8月25日晚，英舰队自广东驶抵厦门南之青屿附近碇泊集结，随即给福建水师提督窦振彪发出限期献出厦门城的最后通牒。这时，窦振彪正率水师出巡外洋，闽浙总督颜伯焘便督同道员刘耀椿，传令清军据守各要隘，准备抗击敌人。

26日晨，英军先以火轮数艘对鼓浪屿和厦门实施火力侦察，接着，大队兵船闯入。白石头、鼓浪屿、屿仔尾等炮台守军，以猛烈炮火三面环击。英军采取各个击破办法，集中七八艘舰船的二三百门火炮对各炮台逐一猛轰。下午1时，英舰三艘对鼓浪屿和厦门沿岸各炮台继续进行炮击之后，英军一部乘舢板首先在鼓浪屿登陆。由于敌人“势甚猖獗”，守军稍事抵抗，即行溃散，鼓浪屿遂于下午3时落入敌手。与此同时，另几艘英舰进攻厦门以东各炮台，守军坚决抵抗，有的击退敌登陆兵达三五次之多，副将凌志、总兵江继芸等牺牲，守兵伤亡数百名。下午4时左右，白石头及其以西各炮台被英舰炮火击毁，英军便由此登陆。此后，英舰延伸火力，轰击厦门城，守城清军向虎山退却。傍晚，厦门被英军占领，颜伯焘、刘耀椿等退守同安。

道光帝接到厦门失守的奏报后，急调江西兵二千援闽，并严令颜伯焘收复厦门。此时，道光帝才意识到战事并未了结，英军既占厦门，“难保不乘风北驶，扰及沿海各省”，同时，也感到英军并非只习水战，因而“陆路亦不可不加严备”，于是下令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奉天各省将军督抚停止撤兵，“悉心筹画，以固疆围”。

9月5日晨，英军撤出厦门，以军舰三艘、运输船三只，以及陆军四百名留守鼓浪屿，其余舰船全部北驶。

厦门之战，是一次岛屿要塞的登陆与抗登陆作战。清军从英军第一次进窥厦门之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使该处防御工事有了明显的加强和一定的改进，火炮数量也有增加，并新添了少数八千至一万斤的大口径炮。此外，还制定了水师与岸炮协同配合，夹击敌舰，歼敌于近海的

作战方案。但是，由于对敌情缺乏不间断的侦察，以致英舰进犯时，水师提督正率队出巡外海，使防御兵力减弱，加之缺乏纵深设防，因而尽管颜伯焘亲临前线督战，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厦门最终仍不免失陷。

三、第二次定海抗战

早在1841年2月10日，道光帝以定海未能及时收复，命伊里布回任两江总督，以江苏巡抚裕谦接替伊里布为饮差大臣，驰赴镇海，办理浙江军务。

裕谦主持浙江军务之后，亲赴定海，勘察地形，督饬该处守军采取措施，加强防务。定海城三面环山，前有稻桶山、东岳山为屏障，左右有晓峰、青垒诸山为辅翼，形势颇为险要。裕谦督令守军于东岳山顶筑炮城一座，周长一百三十一丈，并于南面接筑半圆形月城一座，长二十一丈；东自青垒山经道头西至竹山脚，沿岸横筑土城一道，长一千四百余丈；又在青垒山、晓峰岭等山择要安设炮位。至英军再次进犯前，定海城周各山及土城上共有铜铁大炮二十二门，城垣周围有大小炮四十门，另拨给兵船铁炮十门。守军总数增至五千六百余人，由三个总兵分段负责防御：郑国鸿率部防守竹山；王锡朋率部防守晓峰岭；葛云飞率部防守土城。此外，在镇海、定海等地招募水勇一千二百名，并造买各种船只百余艘。

裕谦获知厦门失守及英军继续北犯后，下令浙江各地于炮台四周挖壕，以备守兵防炮之用，并增设铁蒺藜、木栅等障碍物，以加强防御。裕谦是旗人中少有的主张坚决抗英的大员，且具有一定的政冶军事跟光，他曾建议再次起用林则徐参与浙江战事，赞扬林则徐“向为兵民所悦服，逆夷所畏惮，其一切设施，亦能体用兼备”。他在向道光帝奏陈敌己情况时指出：英兵船、货船四十余艘北犯，人员逾万（按：实际不到一万），而定海、镇海两处防兵总计不及万人。敌军飘忽不定，随时可集中兵力进攻一地，我则必须扼要分守，时刻防备。这就形成了“彼众我寡，彼聚我散，彼逸我劳之势”，且“我兵本皆未历战阵，又各存一炮火难御之见”。因此，对浙省防御，不无忧虑之处。但他坚决表示：“城存俱存，以尽臣职，断不肯以退守为词，离却镇海县城一步，尤不肯以保全民命为词，接受逆夷片纸。”并说明这样做，并非匹夫之勇，孤注一掷，“盖因镇海地方稍有疏虞，则逆胆愈张，兵心愈怯，沿海一带，必将全行震动”。

9月23日，璞鼎查、巴加和卧乌古等率领英舰七艘、轮船四艘、运输船十九只，装载陆军二千一百余人，到达舟山附近海面，接着于舟山、镇海一带探测航道，勘察地形，侦察清军设防情况，选择登陆地段。27日，英军火轮船、军舰各二艘，乘潮进入竹山门水道。葛云飞督军发炮，断其大桅一根。英舰当即由吉祥门窜出，后又绕入大渠门，复被守军击退。28日，英舰炮击晓峰岭，发炮数百发，并派兵乘舢板登陆，被王锡朋率兵击退。29日，英军携带臼炮三门，登上距道头最近的大小五奎山，并构筑了炮兵阵地。

10月1日上午，英舰队驶入定海城南海域，用舷炮向定海前沿阵地

轰击，大小五奎山上的英军炮兵也发炮配合。随后，英陆军在炮火掩护下，分左右两纵队登陆。

左纵队由英军第55团和第18团共一千五百人组成，在道头港以西至竹山一带登陆，进攻竹山和晓峰岭。当面清军在王锡朋、郑国鸿指挥下，进行了顽强抵抗，连续击退敌人数次进攻。但清军的抗击终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不久，竹山、晓峰岭即为英军占领，王锡朋、郑国鸿先后阵亡。

右纵队由英军第49团和水兵、海员组成，在道头以东至东岳山附近登陆。这一带的清军，同样表现得很英勇。总兵葛云飞身先士卒，不幸牺牲。连侵略者也承认：葛云飞阵亡后，“他的僚属和我们的军队短兵接战，都英勇地与他同时殉节。高地上的旗手选了一个最显著的地位，站着摇旗，丝毫不怕落在他四旁的从轮船打来的炮弹。”经过激战，清军的左翼阵地也被英军突破。

由于守军连日苦战，伤亡甚众，虽击沉英军舢板数只，并击伤英舰“布朗底”号，终因风大浪险和英舰的封锁，镇海清军难以支援，定海城于10月1日下午2时陷入英军的包围。接着，英军登云梯入城，知县和守军撤离县城，定海再次被英军侵占。军需库中的大量物资落入敌手，其中有三十六门新造的铜炮，被敌人搬上运输船，后用以轰击清军。

第二次定海之战，守军官兵坚守阵地，顽强御敌，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但在组织指挥上，有不少失误之处。如：敌人以数百门舰炮进行有效压制和步兵火器占优势的情况下，仍以密集队形与之对阵，致遭重大伤亡；在工事构筑上，不懂得构筑防炮掩蔽部，也未在城周围利用山地构筑第二线防御阵地，以掩护县城；尤为失策的是，没有事先作出前沿阵地和县城失守后的作战方案，只有一手准备，没有第二手准备。舟山本岛面积较大，附近岛屿甚多，又大部为山地，即使县城失守，仍可利用有利地形，不断袭扰和牵制侵略军。但守军将领虑不及此，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情况下，单纯地依靠阵地战同敌人硬拚，结果将士大部阵亡，兵溃城陷，无人招集溃散兵勇继续与敌周旋，使英军得以迅速转移兵力进犯镇海等地。

四、镇海、宁波的抗英作战

镇海位于甬江人海口西岸，东濒甬江，北临大海。甬江口西岸之招宝山与东岸之金鸡山夹江对峙，形势十分险要。裕谦在加强定海防务的同时，对镇海的防务也颇为重视，在招宝山、金鸡山加筑了炮台和工事，增设了炮位，并于甬江口填塞巨石，暗钉木桩。英军进犯前，各炮台共安设大小火炮八十六门，连同定海溃兵，共有防兵五千余人。其部署是：提督余步云率兵千余防守招宝山及其以西之东岳宫，总兵谢朝恩率兵一千五百防守金鸡山；总兵李廷扬率兵数百防守东岳宫以西之拦口埠炮台（该台控扼江口，与金鸡、招宝两山之炮台互为犄角）；沿江两岸停泊火攻船只，凡可登陆之处，均挖掘睛沟，密布蒺藜，分驻兵勇。裕谦率兵千余坐镇县城指挥。

英军攻占定海后，供应困难，急谋进窥镇海、宁波，为其冬季驻军夺取营地。

10月8日，英军在镇海外海黄牛礁附近集结，9日完成了临战准备。其进攻计划和部署是：以舰炮摧毁金鸡、招宝两山的炮台和工事，并阻止镇海县城清军增援，掩护陆军登岸，攻占上述两山（以金鸡山为主要进攻方向）；尔后水陆并进，夺取镇海。登陆部队由陆军、水兵和海员等二千四百余人组成，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左纵队由英军第55团、第18团以及炮兵、工兵等一千一百七十三人组成，携山炮四门、臼炮两门，由卧乌古指挥，担任攻占金鸡山的任务。中央纵队由英军第49团以及炮兵、工兵等五百零五人组成，携榴炮、野战炮各二门，由马利斯中校指挥，协助左纵队夺占金鸡山。右纵队由水兵、海员以及炮兵、工兵等七百九十七人组成，携臼炮两门，由荷伯特舰长指挥，负责攻占招宝山。

10日晨，英军左、中两纵队在三艘军舰的掩护下开始攻击。中央纵队在金鸡山东北的突出部登岸，占领竺山，随即向金鸡山前进。左纵队乘舢板驶入小浃江登陆，绕攻金鸡山侧后。守军在腹背受敌，并不断遭到英军舰炮和野战炮猛烈轰击的情况下，顽强抵抗，多次同进攻之敌展开肉搏战。终因伤亡甚众，总兵谢朝恩也受伤落海阵亡，金鸡山遂为英军所占。与此同时，英军“威里士厘”号等大型军舰四艘，以二百余门舰炮的优势火力，对招宝山实施猛烈炮击。浙江提督余步云贪生怕死，率先弃台逃跑。裕谦指挥镇海城守兵发炮拦阻，余步云仍率部绕山逃往宁波。上午11时许，英军右纵队在招宝山西北麓登岸，不久即占领了招宝山炮台，居高临下，俯击县城。守军登城抗击，英军以排炮猛轰，掩护其步兵缘梯登城。裕谦见金鸡山、招宝山相继失守，镇海城危，为实践其与城共存亡的誓言，投水自尽。守军伤亡惨重，余部弃城逃走，镇海遂于当天下午落入敌手。

英军攻占镇海后，其海军司令巴加于12日乘轮船溯甬江而上，进行测量和侦察，他发觉宁波甚为空虚，即于次日晨率“摩底士底”号等军舰四艘和轮船四只，载兵七百余名，直犯宁波。当时，提督余步云和知府邓廷彩所率清军尚有两千多人，但他们不作任何抵抗，即率部逃往上虞。英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浙东重镇宁波，夺获城中大批物资。

12月底和次年初，英军派出小部队窜至余姚、慈谿和奉化，进行骚扰劫掠后又撤回宁波。

英军侵占定海、镇海等地并四出抢掠的罪恶行径，激起了浙东等地人民和爱国人士的强烈反抗。宁波、镇海等处人民自动组织各种群众武装，神出鬼没地打击侵略者。宁波“黑水党”屡出奇计，“四散隐伏，两月之中，擒斩数百”，引起“英人大恐”。同时，台湾人民也组织起了众达数万的自卫团体，抗击英军的侵扰。1841年9月30日，英国运输舰“牛布大”号炮击鸡笼港（今台湾省基隆港）时，当地军民发炮回击，使其桅折索断，仓皇退出港口，触礁破裂，舰上人员大部被歼。同年10月，英兵船一般再次窜扰台湾鸡笼并在三沙湾鼻头山登陆时，当地人民群众配合守军奋力抗击，经两日激战，将敌人逐往外洋。人民群众这种可歌可泣的抗英斗争，与某些清军的望风溃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五、清军浙东反攻

英军第二次北犯以来，相继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地，不但东南沿海形势紧张，江苏、山东、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等省也纷纷告急，要求增加兵力、枪炮和经费。同时，朝廷内外交章奏议，有的评论失败的原因，有的陈述今后“剿夷战法”，有的名为奏报战防情况，实则认为一切防御皆无能为力，惟有妥协求和。京口副都统海龄把战败原因归于没有“跟踪追剿”，并认为南方各省军队锐气已失，应另调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等省官兵，才能“一以当百，足敷堵剿”。御史黎光曙则认为，“前定海、镇海之所以失利者，由于兵阵单薄，未能层层设伏故也”。他主张海防炮位应分三层布置，“第二层务使坚于第一层，第三层务更坚于第二层”。浙江巡抚刘珂则道出了统治集团中妥协投降派的失败主义心声，他奏称：“伏查自古制驭外夷之法，惟战守抚三端，今战守不利，抚又不可，……实属束手无策。”言外之意，惟有妥协乞和一途了。

虽然前线处处失败，朝臣众说纷纭，浙江大吏束手无策，道光帝为维护其统治利益，仍决定再实行一次“大张挞伐，聚而歼旃”的大反攻，以挽回败局，显示“天朝兵威”。

早在1841年10月，道光帝即已任命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副都统特依顺、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并下令从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四川、山西、甘肃、陕西等省调兵遣将，驰赴浙东。

奕经离京后，一路游山玩水，蓄意迁延，直至1842年1月21日，才到达嘉兴，与文蔚等筹划反攻事宜。当时，浙江各处防御兵丁，已有四万余人，另有义勇乡勇九万余人。奕经、文蔚等表示，一俟各省援兵到齐，即克期进剿，“以正兵明攻其前，以奇兵暗袭其后”。奕经也和奕山一样，不信任当地人民群众。其幕僚左臧纡青曾建议：从山东、河南等地招募勇士万人，于沿海及本地招募渔、疍、盐民二万人，分伏宁波、镇海、定海，“人自为战，战不择地”，袭扰敌人，使其“步步疑忌惊惶，所在皆风声鹤唳，俟其魂飞气绥，然后蹙以大军，伏舟港口，内外交逼而尽歼之”；同时，派当地绅士各率兵勇分伏于定海、镇海、宁波三城，“预为内应”。对这样一个颇有见地的“敌攻之法”，奕经虽奏报道光

帝批准执行，但他们毕竟不敢依靠人民力量抗敌，因而只采纳了臧纡青关于里应外合的主张，而对于散战疲敌、先疲后打的方案，则摒弃不用。

2月10日，奕经等移驻浙江省城杭州。3月上旬，各省援兵到齐，共计一万一千余人，另有水勇、乡勇二万余人，陆续开赴浙东前线。奕经等认为兵力已厚，决定采取“明攻暗袭，同时并举”的方针，一举收复宁波，镇海和定海。其具体部署是：水路（即东路）以乍浦为基地，陆续渡海，潜赴舟山各岛及定海城内外，预为埋伏，候期举动。陆路（即南路）分为两支：一支以二千四百人在慈谿（今慈谿县憨城镇）西南三十里之大隐山集结，准备进攻宁波，另一支以一千九百余人在慈谿西门外的大宝山集结，准备进攻镇海。此外，还在宁波、镇海之间的梅墟预伏勇壮三千余人，准备中途截击英船。另由余步云率兵二千驻奉化防堵，文蔚率兵二千进驻长溪岭（慈谿西北）督战，奕经率兵一千三百余人驻于绍兴以东的东关居中调度，特依顺率兵一千二百余人驻万松岭（杭州南），作为后路应援，兼顾省城和乍浦等地。

奕经等计划虽较周密，但英军已有所察觉，“五日不水陆四出，远近搜掠，拆坏民房，捉拿乡民，追究屯兵处所”。3月6、7日，英军又分头搜索。奕经等鉴于“兵勇距敌较近，惟恐稍迟，致有漏泄”，便决定于3月10日夜发起反攻。

从大隐山出发进攻宁波的一路，由总兵段水稻负责指挥。10日夜，都司李燕标带领前锋又勇四百余人，潜赴宁波南门，在内应配合下，杀死守门英兵，冲入城内，直奔府署。途中遭到英军阻击，不支后退。这时，段永福率领的大队赶到西门，由于英军已有戒备，城门紧闭，只得爬城而入，沿街进攻。英军从楼房上面抛掷火球、火箭，使清军进攻受阻。不久，天色已明，清军不得不陆续撤出战斗，反攻宁波遂告失败。

从大宝山出发进攻镇海的一路，由副将朱贵负责指挥。10日夜，都司刘天保率前锋数百人进抵镇海西门外，见城楼起火，知是内应，即冲门而入。由于守门英军拚死抵抗，清军三次冲锋，均未能攻入城内。时天色已明，而朱贵所率大队尚未赶到，刘天保恐英军断其归路，即撤出战斗，于是反攻镇海的战斗也告失败。

水路进攻定海的计划，由于风潮不顺等原因而一再推迟，直至4月14日，才由熟悉定海情况的郑鼎臣（已故总兵郑国鸿之子）主持，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夜袭。由于英军事先已有准备，因而亦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清军反攻失败后，主力集结在慈谿大宝山和长溪岭一带。英军决定乘胜发动新的进攻。

3月15日晨，卧乌古和巴加率领三艘轮船和数十只舢板，载兵一千二百余人，携带四门小炮，溯姚江而上。中午，行抵慈谿以南的大西坝，留下一艘轮船和少量兵力，以防清军断其退路，另两艘轮船载部分兵力继续上驶至余姚东面的丈亭一带，威胁清军后路。大队英军则由大西坝登岸，直扑慈谿南门，城内守军不战而逃，英军遂穿城而过，出北门，分路进攻大宝山清军营地。刘天保率兵五百余人，防守大宝山左侧，由于进攻镇海时火器大部丢失，稍事抵抗即行溃散。朱贵率兵四百余名防守大宝山右侧，与敌英勇激战多时，伤亡过半，请求驻长溪岭的

文蔚派兵支援。文蔚畏敌犹豫，未及时派兵前往，待到傍晚才派出三百人，而此时英军已进至大宝山之西，切断了守军后路。最后朱贵父子阵亡，部队溃敌，大宝山营地于当晚8时落入敌手。次日中午，英军开始向长溪岭清军大营进发，下午3时许抵达长溪岭。文蔚拥兵数千，在长溪岭“阻险而阵”，竟不敢与敌交锋，于15日夜即丢弃营地和大批军械给养，仓皇率部退往曹娥江以西的绍兴。英军将工事和火药库全行毁坏之后，撤回慈谿，17日又全部撤回宁波。

英军长于海战，定海地处海岛，清军欲一举驱逐该处敌军，确有困难。而镇海毗连大陆，宁波更属内地，清军如果指挥得当，同心协力，是有可能将其收复的。可是，清军浙东反攻的结果，不仅未能攻克定海、镇海和宁波，就连大军云集的慈谿营地也没有守住。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统兵将领指挥无能。宁波、镇海都是比较大的城镇，各驻英军千余人（当时英军已从印度新调来两个团的兵力），并控制着招宝山、金鸡山等炮台，浙东清军可用于反攻作战的正规部队仅一万余人，且大部从外省调来，人地生疏，装备和战斗力均差。而这万余兵力，又未集中使用，大部留在数十里之外，仅以少数兵力采取轻装奔袭的战法，企图同时攻克浙东三城，实属轻率鲁莽之举。如此指挥反攻作战，焉能取胜?宁波、镇海反攻失利之后，清军主力损失不大，战事仍有可为。当英军以千余人冒险深入慈谿时，清军在数量、地势和社会条件诸方面都此英军有利，如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集中使用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不难将侵略军赶出浙东地区。但文蔚畏敌如虎，当英军进攻大宝山之际，他非但不派兵增援，反而闻风丧胆，未战先逃，致使清军又一次遭到失败，伤亡溃散千余人。

浙东反攻失败后，奕经以应援靠近省城的尖山为名，带领江南兵千人，于3月20日渡过钱塘江，逃回杭州。为推卸战败责任，他在奏拆中除强调英军“船坚炮利”、诡谲异常外，还大肆诬蔑浙东“到处汉奸充斥”。刘韵珂则露骨地宣扬投降派的观点，在所谓“十虑”的奏折中，大谈什么清军“锐气全消”，“其势必难再振”，即使“续行添调，亦恐无济于用”，而英军火器精良，“猛烈异常，无可抵御”。他还特别提醒道光帝注意国内人民可能趁机揭竿而起。道光帝鉴于广东和浙东两次反攻均遭失败，又害怕人民起而推翻其封建统治，于是在对英态度上，由过去的忽战忽和变为一意求和。他起用投降派，任命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署理杭州将军，会同已被革职的伊里布赶赴浙江前线，办理乞和事宜，并准备释放英俘。而此时璞鼎查正野心勃勃地准备进军长江下游的镇江和江宁（今南京），对清廷的乞和根本不予理睬。

第四节 英军侵入长江下游，沿江军民英勇抗战（1842年5月～8月）

一、英国增兵及其新的侵略部署

早在1841年9月英军从厦门北犯舟山时，英国政府即决定再次增加兵力，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以迫使清政府尽快签订一项满足其侵略要求的条约。清军在浙江的节节失败，更加助长了英国的侵略气焰。但是，其侵略野心又不能不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约。同年11月4日，英国新任外相阿伯丁在给璞鼎查的信中说："虽然女王陛下的军队可能已奏肤功，可是并不见得战争会宣告结束，……女王陛下政府已决定作必要的准备，以便继续从事于强有力的和决定性的战役。"他要璞鼎查向清政府勒索一大笔赔款，但是不能因此而使谈判破裂，或使战争无限延长。信中还指出，英国政府拟改变原训令中关于长期占领舟山或其它沿海岛屿的打算，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考虑到"把这些占有地永久保留在英国国主领域之内，却会使庞大而固定的开支随之而来"，而且会使英国人"在政治上同中国人发生更多全无必要的接触"。这既暴露了英国政府贪得无厌的海盗面目，又反映出英国侵略者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它吞不下中国这块大肥肉，特别是害怕占领中国领土后，引起中国人民长期的反侵略斗争，正是其侵略野心不得不稍加节制的根本原因。

基于上述各点，英国政府决定从英国、印度增派陆、海军来华，以期通过"决定性的战役"，尽早结束战争。由于这些军队是陆续抽调增运来的，需要时间，所以，从1841年10月起，侵华英军有半年多时间停留于浙东地区，没有大的军事行动。

在此期间，英国侵略者为寻求尽快实现其侵略目的之途径，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等情况，作了进一步的调查分析，认为：（一）北京虽为京师要地，但比较贫瘠，清政府的物资银财主要仰给于南方各省，并经由运河输送。如进攻北京，清政府必迁都于更远的内地，届时难以找到谈判的对象，势必迁延时日，达不到迅速结束战争的目的。同时，清政府正全力加强北京一带防务，对长江的防御则未予重视。（二）只要沿着长江攻入江苏、安徽，占领南京，控制大运河，并占领乍浦和上海，扼住主要的航道，清政府就无法拒绝英国的各种要求，这样，"不但所有作战的实际目标可以迅速达到，而且可以产生同等深刻的精神效果"。英国政府根据以上的分析，确定英军在增加兵力后，沿长江西进，封锁运河口，夺取南京。进攻发起时间选在春夏之交，因为那时正是粮食等物资北运的季节。1841年9月底，英国政府训令其驻印度的殖民当局，在1842年4月间，集中一切可能调动的海陆军于新加坡，以便随时行动，这批奉调来华的海陆军，计有军舰七艘和陆军约七个团，从而使侵华英军共"拥有军舰二十五艘，载炮六百六十八门，轮船十四艘，载炮五十六门，医院船、测量船及其他船舰共九艘，运输舰还没计算在内。地面部队，除了炮兵以外，有步兵一万余人"。为集中兵力从长江口入侵，英军于1842年5月上旬主动撤出宁波，并将镇海守军减至二百人，主要控制招宝山。

1841年冬，道光帝即风闻英军可能进犯上海，曾谕令新任两江总督牛鉴加以防备，但牛鉴却认为，“下游之堵御既严，瓜洲之防护又密”，英舰“断不敢飞越数百里重兵驻守之地，冒险入江，阻我漕运”。牛鉴这种轻敌的估计，严重影响了长江下游的设防。

二、乍浦清军的抗击战斗

乍浦位于钱塘江口，是江浙两省的海防重镇。该城南临大海，东南有绵延的小山作为天然屏障。清军原有一名副都统率旗兵一千八百余人驻此。浙东战事吃紧时，增建了炮台，添设了炮位，并增加了兵力，总数达到六千余人。

1842年5月13日，英宾舰队离开甬江口外黄牛礁海域，开始向长江口进犯，并决定于北上途中顺便摧毁乍浦港。

5月17日，英舰驶抵乍浦海域，随即派出轮船侦察乍浦设防情况。次日，即派军舰七艘，载陆军二千二百余人，对乍浦发起进攻。英军以三艘大型军舰对西山咀（灯光山西端）等炮台实施炮击，登陆兵在四艘小型军舰的掩护下分三个纵队登陆：右纵队九百余人首先在陈山西面的唐家湾上岸，遭清军抗击；左纵队八百余人由西山咀登陆，向清军阵地进攻;中央纵队三百余人由灯光山一带登岸，沿着山麓迅速推进，企图切断守军与乍浦城之间的联系，并协同左纵队夺占乍浦城。唐家湾等处清军抗击约二小时，发现乍浦城方向起火，以为城已失守，即向平湖方向撤退。驻守乍浦东南天尊庙的三百名旗兵，在退路已被敌左纵队切断的情况下，仍进行顽强的抵抗，连续击退英军数次冲锋，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并毙敌中校军官一名。英军炮击无效，最后使用火箭和火药包才将该庙攻下。守军苦战三小时，大部阵亡。英军占领天尊庙后，各纵队会合，直抵乍浦城下，由东门缘梯而入，占领了乍浦城。

三、吴淞清军的英勇抗战

英军在乍浦休整十天后，将该城焚掠一空，于5月28日全部登船北驶，6月8日抵达长江口外的鸡骨礁一带集结，并派出轮船探测航道，侦察吴淞口设防情况。

清廷虽一再谕令加强长江口的防御，但在朝廷上下一意求和及牛鉴轻敌思想影响下，并未认真落实。时至6月3日，牛鉴还奏称：“惟夷目性多畏个，又不志存疆土，故江省海防，止须扼定吴淞一口，由吴淞而入扬子江，逆夷虽有内犯之书，然相距数百里水程，亦不过虚词恫喝。臣反复体察，逆夷不犯内河，竟属确有把握。”前敌主将如此麻木，对英军的战略意图竟毫无所知，这就势必严重影响长江下游的防御作战。

吴淞位于宝山县境黄浦江与长江汇合处，是长江的第一道门户。自吴淞镇至宝山县城六七里长的江岸上，“筑有土塘，高约两丈，顶宽一丈七八尺，……缺口处安设大小炮位，既能御敌，亦可藏身，自外视之，俨如长城一道”。土塘上共安炮一百五十四门，统称西炮台。在吴淞口东岸，筑有一略呈圆形的炮台，安炮二十七门，称为东炮台。整个吴淞口，由江南提督陈化成和徐州镇总兵王志元等率兵二千四百名驻守。其中五百名由总兵周世荣率领驻守东炮台，其余则防守吴淞镇至宝山一线。战前，牛鉴也率兵千余驻于宝山，以为后援；宝山知县则带乡勇二千在东炮台后面接应。另在吴淞与上海间的东沟两岸添设了数十尊大炮，驻兵四五百名，防止英军进窥上海。

6月13、14两日，侵华英军陆海军司令率舰船六艘、运输船十二艘至吴淞口外进行临战侦察。6月16日晨，英军开始向吴淞发起进攻。针对清军设防情况，英军确定以“皋华丽”号等三艘重型军舰从正面进攻西炮台，以“摩底士底”号等四艘轻型军舰突入黄浦江，进攻吴淞镇炮台和东炮台，威胁清军的侧后，并掩护登陆部队于吴淞镇附近登陆。

当两艘重型英舰进入西炮台附近作战水域时，陈化成下令开炮。守军以猛烈的炮火阻击英舰，激烈的炮战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英旗舰“皋华丽”号及其它各舰被击中多次，死伤二十余人。英国一军官后来追述说：“我方舰队自与中国军队作战以来，中国人的炮火以这次为最厉害。”陈化成虽年已七旬，在近两年的战备中始终坚守职责，威望较高。在此次炮战中，他奋不顾身地亲自操炮轰击敌舰，与士卒一起战斗。牛鉴三次派人持令箭要陈化成退避宝山，都遭拒绝，不得已从宝山率兵增援吴淞，但一见敌弹落于身旁，即返身后退，继而率兵西逃嘉定。王志元也跟着弃阵而逃。

当西炮台正面激烈炮战时，四艘轻型英舰驶入黄浦江，逼近吴淞镇南面的蕴藻浜，以猛烈炮火压制吴淞镇炮台（安有十门大炮）的火力，掩护登陆兵占领了该炮台。不久，吴淞镇清军实施反击，迫使英军退回堤岸。正当吴淞镇激战之际，西炮台正面被英军突破，大队英军随即登陆。接着，从吴淞镇登陆之敌也从侧后袭击西炮台。陈化成在敌军前后夹击下，仍率兵百余名坚守炮台，最后全部阵亡，表现了英勇顽强的牺牲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英军占领西炮台后，随即占领了宝山县城。吴淞东岸的东炮台也被英军两艘轮船上的海员和陆战队占领。

吴淞口失陷后，该地区的大小火炮，一部被毁，大部为英军所获。这些火炮中，不少装有炮车和简单的瞄准具。英军对其中某些火炮质量的改进，甚感惊讶，而对于吴淞口的防御工事，则认为较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均差。

吴淞失陷，上海大震，官吏和富豪纷纷出逃，引起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怒。6月16日晚，英舰“戴窦”号护送运输船队载着从印度来援的英军二千五百人到达吴淞口外，使英军兵力又有增加。于是，英军派出第18团和第49团以及炮兵、工兵分队共约千人，于19日由吴淞南下，另以八九艘舰船溯黄浦江而上，水陆两路向上海进犯。由于守军事先即已撤离，英军未遇抵抗就侵占了上海。上海制炮局新铸的铜、铁炮一百七十一门及大批存粮，均落入敌手。21日，英军一部乘火轮船二艘、舢板四五只进犯松江，在距城八里处遭到总兵尤渤率领的二千陕甘兵的阻击。英军发炮轰击，守军隐蔽不动。待敌接近时，枪炮齐发，予敌军以杀伤。激战半日，英军被迫撤退。22日，英军再次进犯，仍未得逞。英军在大肆抢掠之后，于23日损出上海，集中于吴淞口外，扬言北上京津，实则准备溯江西犯。

四、镇江保卫战

英军攻陷吴淞口后，清廷一面催促耆英、伊里布等由浙江驰赴江苏，会同牛鉴“办理夷务”，加紧议和，一面继续从华北、东北调兵遣将，并命工部尚书赛尚阿为钦差大臣，驰赴天津，会同直隶总督纳尔经额加强天津地区的防务，防止英军北犯。而对于长江下游的防务，仍未予以足够重视，只是同意由浙江调兵二千，协助江苏驻军（五六千名）防守沿江要隘及江宁府。耆英、牛鉴等一意求和，对防务只是虚应故事而已。

7月初，英军援兵全部到齐，璞鼎查、巴加和卧乌古随即于7月6日率领十一艘军舰、九艘轮船、四艘运兵船和四十八艘运输船，装载陆军一万余人，驶离吴淞口，溯长江而上。所有舰船编组成先锋舰队和五个纵队，每个纵队有八至十三艘运输船，由一艘战舰率领（第三纵队由一艘运兵船率领），并接受该舰舰长的指挥。每纵队之间保持三至五公里距离。沿途以测量船为先导，边测量，边前进。另外，英军在吴淞口留有军舰两艘，用以封锁长江口，保证后路安全。英军西犯过程中，福山、鹅鼻咀和山等长江险隘处的炮台守军，因兵力薄弱，稍事抵抗，即弃阵而走。

7月14日下午，英军摧毁镇江东面五十里的山关炮台（有炮二十门）。之后，因风小暂停西进，只派测量船继续上驶，进行侦察。17日，大队英舰进入镇江江面，随即封锁瓜洲运河北口，阻断漕运。

镇江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会处，是运河的咽喉，江宁的屏障。镇江城雄峙长江南岸，西北有金山，东北有北固山、焦山、象山。战前，由副都统海龄率旗兵一千六百名、绿营兵四百名驻守。城内大炮因已大多调运吴淞，仅留下数门。英军侵占吴淞后，四川提督齐慎（4月授参赞大臣，赴浙防英）带江西兵千余名、湖北提督（6月署江南提督）刘允孝带湖北兵千余名仓卒赶到，驻扎城外，协助防守。但在英军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将领间互不协同，各自为战，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海龄未派部队控制金山与北固山等制高点，而将全部旗兵收缩城内，紧闭四门，不准人民出城。

巴加和卧乌古曾亲自登上镇江西北的金山寺，察看周围地形。侵略者所见到的是：坚固的城墙上没有士兵守卫，只有城西南的半山坡上新建了三座军营。于是他们认为，清军主力可能已经撤至城外，进攻镇江城将不会遇到什么抵抗。

英军进攻吴淞时，主要由海军担任，这次进攻镇江，则主要由陆军负责。参战的陆军共六千九百一十五人，编为第一、二、三旅和炮兵旅。进攻部署是：第一旅（二千三百一十八人）、第三旅（二千一百五十五人）和炮兵旅担任主攻，矛头主要指向镇江西南郊高地的清军，第二旅（一千八百三十二人）祖任助攻，指向镇江东北，主要任务是牵制和分散清军兵力。

7月21日晨，英军开始进攻。右翼的第一、第三旅和炮兵旅在镇江西北的金山附近未遭抵抗即顺利登陆。第一旅上岸后，为分割城内外清军，直指西南山坡上的清军兵营。经过数小时激战，清军不支，齐慎、

刘允孝率部退往新丰镇（今江苏丹阳北）。英军第三旅登岸层，则沿着西城根，直指西门。

与此同时，英军第二旅在北固山一带登岸，直薄城下，冒着清军的炮火，蜂拥爬梯登城。守城旗兵誓死抵抗，有的把敌人推下城去，有的扭住敌人一起跳下城墙。上午10时许，北门被打开，大队英军冲入城内，向西门方向进攻。

进攻西门的英军第三旅遭到清军的顽强抗击，城门久攻不下。中午，英军一个爆破小队在炮火掩护下，用三个火药包（火药一百六十磅）将瓮城门炸开。此时，由北门冲向西门的英军已将内城门打开，于是大队英军由西门蜂拥而入。

守城清军节节抵抗，与敌人展开巷战和肉搏战。许多旗兵宁死不屈，有的杀死自己的妻儿，然后与敌人拚死搏斗，直至牺牲。海龄督战到最后时刻，也自杀身亡。英军破城后，大肆奸淫烧杀，全城大火弥漫数日，繁华的镇江城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镇江保卫战是鸦片战争中清军以劣势的兵力，落后的武器，打得最为英勇悲壮的一战。英军在这次战斗中投入的兵力，是鸦片战争开始以来最多的一次，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死三十七名，伤一百二十七名）。事实再一次表明，只要清军将领决心抵抗，有敢于牺牲的精神，部队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英国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在英军西侵过程中，江苏沿江一带人民和东南沿海各地人民一样，对侵略者的入侵进行了英勇的回击。英军侵入吴淞口，占领宝山、上海等地后，曾多次派遣小股部队向内地探路搜索，当地人民自动组织起来，伺隙袭击侵略者。太仓州皋桥一带农民曾预设埋伏，诱敌上岸，以锄头等击杀敌人，侵略者终于不敢再行上岸。靖江人民也用抬枪等袭击英舰，迫使敌人撤走。镇江、扬州、瓜洲、仪征等地盐民和渔民疍户，也纷纷拿起武器，杀鬼子，破洋船，狠揍入侵之敌。长江北岸人民在短期内就组织了八九万人的团练义勇，群众争献钢铁铸造大炮，准备迎击侵略军。

五、《南京条约》的签订

早在7月16日，道光帝就密谕耆英，只要英国息战退兵，便同意割让香港，并增开通商口岸。镇江失守后，道光帝次心专意“议抚”，授权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并令奕经所率援军暂缓由浙赴苏，“以免该逆疑虑”。然而，英军仍然不理睬清政府的“羁縻”，他们决心打到江宁，逼签城下之盟。

8月3日，英军留兵一部于镇江，舰队开始向江宁开进，9日抵达江宁江面。11日，英军在观音门附近登岸，军舰摆开了轰城的架势。当天，耆英自无锡赶到江宁，在英军大炮的威胁下，派人与英方开始了可耻的“和谈”，14日即全部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苛刻条件。接着，道光帝先后发出了“不得不勉允所请，借作一劳永逸之计”和“各条均准照议办理”的谕旨。29日，耆英、伊里布、牛鉴等在侵略军旗舰“皋华丽”号上与英方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外国侵略者强加于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

约——《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等于当时清王朝全年财政收入总数的36%，相当于全国旗绿各营岁饷用银总数的70%）。签约后，美军舰船陆续撤往定海一带，第一次鸦片战争遂告结束。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法等国也趁火打劫，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

第二部分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上）（1851年1月～1856年8月）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终于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反侵略的人民大起义，其中尤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战争规模最大，影响也最深远，成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大体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1851～1856年）为革命战争爆发和胜利进军时期，后期（1856～1866年）为革命战争由进攻转入防御以至最后失败时期。在战争后期，还发生了英法联合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后果之一，是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人民起义，加速了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失败。据此，本书对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叙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将后期战争列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第一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国内形势

清王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耗费了数千万两白银的军费，战后又要负担巨额赔款，财政更加拮据，于是大幅度增加地丁、漕赋（清政府两项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人民负担更加沉重。《南京条约》及其它几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敞开了大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向中国不断倾销商品，使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受到打击，一部分农民、手工业者和运输工人因之陷于破产和失业，乃至一些中小地主和商业主也受到破产的威胁。同时，鸦片的输入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继续增加，由四十年代初期的每年两万余箱增到五十年代初的每年五六万箱，以致白银大员外流，银贵钱贱的现象更加严重（银价为十九世纪初叶的两倍多），鸦片烟毒更加泛滥于全国。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卖产品和劳动力所换得的是铜钱，而缴纳地租赋税却要以银两折算，这样一来，劳动人民除遭受直接剥削之外，又要承受新的变相盘剥。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迫展开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到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八年间，各族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反对清王朝的斗争风起云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广州城乡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企图在广州河南地区强行租地的斗争（1844年），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的斗争（1843～1849年），以及广东、广西和湖南等地的天地会起义和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安徽一带的捻军、白莲教起义等反抗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这些起义和斗争，表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后，社会阶级矛盾更趋尖锐，预示着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大风暴正在来临。

人民起义和反抗斗争声势最大的广东、广西、湖南等省，是当时全国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地区，而广西又是三省反清力量的汇合点。广西地处南陲，历来赋税苛重，封建剥削特别残酷。太平天国起义前，广西连年天灾，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纷纷起来反抗。鸦片战争后，不少被裁撤的兵勇流入广西，湖南新宁等地天地会起义武装失败后也大都转入湘桂边界地区，他们和当地人民群众结合，成为一支强大的反清力量。对于两广地区，清王朝历来以广东为统治重点，在广西的统治力量则相对薄弱，两广总督、八旗将军均驻于广东，广西兵力仅及广东三分之一，加以广西吏治更加腐败，这就给了各种反清势力以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至1850年，散布于广西各地的天地会等反清势力，遍及全省十一个府中的八个府，多达三十股，使当地统治阶级惶恐不安。但是，天地会等旧式会党，组织松散，互不统属，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因而易被统治阶级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而洪秀全（1814～1864）等创立的“拜上帝会”，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旧式会党不同的特点，既有较明确的纲领，又有较严密的组织，因而能在全国日益高涨的反清斗争形势的推动下，崛起于广西，终于把分散的人民反抗斗争汇集成一股革命洪流，迅速发展成震惊中外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

第二节 金田起义与太平军转战广西（1851年1月～1852年6月）

一、金田起义

1851年（咸丰元年）初洪秀全、冯云山等领导的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开端。洪秀全，1814年1月1日（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出生在广东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年青时的洪秀全，用功读书，并曾参加农业劳动，十八岁开始在家乡当塾师。他曾多次赴广州应考秀才，均未考取。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他第四次到广州应考，结果又落第。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广东及其它各地人民反对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以及洪秀全自己在科场中的一再失意，激起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严重不满，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思想。他研究了基督教传教士散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便利用基督教的一些宗教教义和仪式，加以附会解说，进行“传教”工作，并和他的同学冯云山等共同创立了后来名为“拜上帝会”的革命组织。1844年5月，洪秀全与冯云山去广西贵县等地传教。同年底，洪秀全回到广东花县，以教书为业，从事拜上帝会教义的创立工作。他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等诗文，奠定了拜上帝会的理论基础。这些诗文，表面上似乎是些关于基督敬的迷信说教，但实际内容却包含着要求平均、平等，反对压迫剥削，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等朴素的农民革命思想，因而为尔后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同一时期，冯云山则转入广西桂平县的紫荆山区，同样利用教书之便，进行深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耕山和烧炭为业的贫苦农民中，发展了二三千名拜上帝会会员，其中不少人如杨秀清、韦昌辉和萧朝贵等，后来都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

1847年夏，洪秀全前往广西紫荆山区，与冯云山会合，共同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在附近各县积极发展拜上帝会成员。参加者除贫苦农民外，还有不少失业的矿工等。

1850年7月，洪秀全下令“团营”（集中结营组军），各地会众纷纷向桂平县北五十里的金田村集中。会员们脂行前将田产屋宇变卖，所得钱银悉数缴纳公库，衣食费用都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这就是“圣库”制度的开始。到同年底，远近前来“团营”的约达二万余人，均编入军事组织。这时，在拜上帝会内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包括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和石达开在内的领导核心。他们决心为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而斗争，在军事方面，仿照《周礼》，制定了军队的编制，规定以军为基本单位。军设军帅，下辖五个师帅，师帅下辖五个旅帅，旅帅下辖五个卒长，卒长下辖四个两司马，两司马下辖五个伍长，伍长下辖四个圣兵。军帅共辖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人。军帅以上，依次设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主将、军师。另设御林侍卫（直辖），职位在指挥、将军之间。此外，还规定了五条军纪：“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同时，在金田村以制造农具为掩护，赶

制火器、刀矛等。至此，起义准备基本就绪。

当时，广西各地天地会起义武装活动频繁，吸引了清廷和广西当局很大的注意力，这对洪秀全领导起义是一种很好的掩护。

广西驻有绿营兵二万二千余人，大部星散于全省各营、汛，能机动作战的部队很少。为了镇压广西各地的起义，清廷不得不从外省调兵遣将。到1850年底，先后调往广西的有两广总督徐广缙与前云南提督张必禄（率兵一二千人）、陕西提督向荣（接替闵正凤为广西提督）、前云贵总督林则徐（授以钦差大臣头衔，因在赴任途中病殁，改由前两江总督李星沅继任）、前漕运总督周天爵（接替郑租琛为广西巡抚）以及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兵勇共八千人。这样，连同原有驻军，广西清军的兵力达到三万以上。另外，还在广西各州县组织了大批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天地会等起义军。

拜上帝会力量的壮大和活动的加紧，逐渐引起了广西地方当局的注意。他们不断派兵"搜剿"，妄图把这股革命势力扼杀于摇篮中。1850年12月底，浔州协副将李殿元等率部包围了洪秀全和冯云山的驻地——平南县花洲山人村。杨秀清在金田闻讯，立即派众往援，把洪秀全、冯云山等接往金田村。1851年1月1日，总兵周凤歧和副将李殿元、伊克坦布等又率兵进攻金田村。洪秀全、杨秀清于村东五六里的蔡村江边设伏，击败清军，杀死伊克坦布。

洪秀全等在起义准备过程中打了两次胜仗，大大鼓舞了会众的斗志，接着，便于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的生日）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公开举起了推翻清朝、武装夺取政权的义旗。

二、转战广西

（一）西进武宣，北上象州

金田起义后的第三天，洪秀全即挥师东向，一举夺占广西浔江边上的大湟江口（今江口镇），准备向东南方向发展。不久，又接受了天地会罗大纲、苏三娘等部众二千余人加入太平军，声势更加壮大。

金田起义引起了清政府的震惊。钦差大臣李星沅急令广西提督向荣率兵二千，从横州（今横县）赶赴桂平一带，对太平军实行"围剿"。咸丰帝（清文宗奕）多次下谕，提出"围剿"起义军的方略：一是"聚集精兵全力攻剿"，各地团练"分段兜擒"，以期迅速就地歼灭；二是"解散胁从"，以便瓦解起义军。同时，决定从贵州再调兵一千进入广西，妄图乘太平天国发难之初，将其一举扼杀。

1851年2月18日，向荣会同总兵李能臣、周凤歧，率部自东西两个方向向大湟江口进攻。太平军暗设地雷，佯败诱敌，并出奇兵抄袭清军后方，共毙清军守备以下数百人。但是，清军继续取包围态势。太平军向东南方向发展的企图受阻，便于3月10日夜撤出大湟江口，向武宣县的东乡一带转移。19日，太平军与敌战于东乡西面的东岭村，击败清军。此后，太平军与清军在三里圩一带对峙。3月23日，洪秀全在东乡自称"天王"，并分封了五军主将：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

4月3日，广西巡抚周天爵伙同向荣督军六千余人向三里圩进攻。洪秀全、冯云山亲自指挥太平军奋勇杀敌，再次打败清军。5月12日，钦差大臣李星沅因兵败于武宣忧郁而死（一说畏罪自杀）。5月16日，太平军乘机自东乡突围北上，后进占象州中平一带。清军尾随赶到，以新从广东调来的广州副都统乌兰泰所部千余人驻中平西北的梁山村，向荣部驻中平东北的界岭，堵截太平军的北进道路。独鳌岭（梁山村北）一战，太平军予乌兰泰部以迎头痛击。但太平军多次向西北、东北方向突进均未成功，不得不于7月初撤离象州境，经原路退回桂平紫荆山根据地。在西进武宣和北走象州过程中，太平军招集了不少没能赶往金田参加起义的拜上帝会会众，起到了扩大队伍的作用。

（二）官村伏击，大败清军

早在同年4月，清廷以广西将帅不和，剿办不力，命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前往湖南广西交界地方督办防堵，并声援广西；同时，派都统巴清德、副都统达洪阿随同协助，又从湖南调兵千名，四川调兵三千名，统归赛尚阿节制。7月初，赛尚阿到达桂林，随即派巴清德、达洪阿率部赶赴紫荆山地区，增援尾随太平军的向荣和乌兰泰所部清军，企图就地围歼太平军。清军的进攻部署是：向荣和巴清德部从西北方向进攻紫荆山区，乌兰泰和达洪阿部沿黔江而下，绕至紫荆山区东南，直扑莫村、新圩等地。

7月25日，清军发起进攻，展开了激烈战斗。太平军于各重要隘口挖断道路，垒石架木，严密防堵，多次击退进犯之敌。至8月底，清军相继占领了紫荆山区西北部要隘双髻岭、猪仔峡、风门坳等处，对太平军的紫荆山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9月11日夜，太平军向东北五峒山方向突围，后转移至平南县思旺一带。

清军发觉太平军突围后，由乌兰泰部尾随东进，向荣部则经大湟江口、佛子村、横岭，于9月15日进至思旺东南之官村，企图拦截太平军南下。当时，萧朝贵、冯云山已率部在此设伏，乘向荣部扎营未稳之际，突然发起攻击。向军措手不及，加之火药被大雨淋湿，枪炮失效，在太平军猛烈冲杀下，四处溃逃，军械辎重尽失。其后，向荣率残部逃入平南县城，托病不出，太平军得以从容地向永安州（今蒙山县）转移。

（三）占领永安，粉碎围攻

官村获胜后，太平军即北上大旺，然后分水陆两路向永安州进发。陆路为主力，由萧朝贵、罗大纲等统率，抄近路轻装急进；水路主要是辎重和妇孺，由冯云山、杨秀清等统领，沿大同江东下，再溯蒙江北上。洪秀全随水路前进。太平军北进过程中，沿途不少贫苦农民踊跃参军，太平天国后期的优秀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就是这时参加的。

1851年9月25日，太平军一举占领永安城。这是太平天国起义后夺取的第一座州城。

永安是个小州，人口很少。州城位于南北东西长宽二十里左右的平坝中，四面崇山峻岭。太平军分兵防守城外各要隘：南守水秀（俗名水窦）、莫家村；北守上阳村、龙眼塘；并于各险要处竖木栅，筑土垒，掘壕沟，建炮台，埋地雷，准备长期固守。这时，太平军已达三万七千人，其中精壮能战者约六千人。

太平军占领永安的次日，乌兰泰率领其本部及别部清军共约六千人追至城南二十余里的文圩，28日又进至佛子村一带。接着，总兵刘长清、李能臣等率云、贵等省兵四千余人赶至永安西北的古排塘一带。以后，清军又大量增加，众达三四万人，四面包围永安，主要取南北夹攻之势。向荣自官村大败逃往平南后，不久经藤县、梧州绕至昭平，当时已被清廷革职，但仍“随营效力”。10月19日，向荣派总兵李瑞率兵一部由昭平向永安逼近，在永安城东二十里之古苏冲遭到太平军伏击，大败而逃。向荣闻讯，丧魂落魄，不久即托病逃往桂林，所部各军暂由巴清德统率。

由于太平军防守十分严密，清军围攻永安数月，仍然不能得逞。1852年（咸丰二年）1月15日，咸丰帝下谕斥责赛尚阿“旷日持久，尚无制胜之谋”，令他亲赴前线，采取“层层逼近，前剿后应”的部署，聚歼太平军于永安。同时，令其严明赏罚，以“申纪律而振军威”；随时酌量裁撤勇团，以节饷糈；注意收买太平军中的动摇分子，以为内应。此外，还明令向荣复职。咸丰帝的上述谕令，既反映了清廷妄图围歼太平军的急迫心情，也反映了清军战斗力不强和清廷财力不足的困难处境。

太平军在永安一面抗击敌人的进攻，一面进行军政建设。1851年12月17日，天王洪秀全下诏分封五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诏令还规定，“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此外，在永安还颁行天历，并进行了内部肃奸工作，揭露和打击了内奸周锡能等人的破坏活动，进一步巩固了革命队伍，提高了太平军的战斗力。

太平军在桂平、武宣、象州等地与敌转战大半年之后，在永安停下来进行休整固然必要，但是，长期聚集于四面环山的小城市，很少积极出击，这在军事上是不足取的。当时，包围永安的清军众达四万余人，如果他们利用四周的有利地形，严密封锁各隘口，太平军就有被围歼或困死的危险。幸清军统兵大员赛尚阿是个“来历行阵”的蒙古贵族，优柔寡断，缺乏主见，而前线主将向荣与乌兰泰又意见不一，以致南北两路清军各行其是，互不协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才得以在条件并不有利的永安停留半年之久。

1852年2月中旬，赛尚阿在咸丰帝督舍下，由广西阳朔赴永安前线督师，命令南北两路清军日夜轮番进攻。太平军顽强抵抗，与敌人鏖战月余。清军伤病交加，减员甚多，进展甚微。但太平军也因长期困守，“粮草殆尽，红粉（火药）亦无”，食盐更为短缺，决定突围。

永安的南北大道都有清军重点把守，但城东古苏冲仅有一千余团勇驻防，是清军包围圈的薄弱环节。4月5日，太平军冒着大雨从古苏冲突破清军的包围，向昭平西北之仙回前进。乌兰泰和向荣闻讯，立即提兵追赶截杀。太平军后队损失千余人。为了摆脱被动，太平军决定利用龙寮岭大峒山谷地的有利地形，以重兵设伏，歼灭清军追兵。8日上午，清军进入伏击圈，太平军乘大雾迷漫，从四面八方突然向清军发起攻击。由于道路狭窄，天雨地滑，清军人马拥挤，不能列阵，枪炮亦无法施放。太平军将敌人前后围裹，左右冲杀，半日之间，歼清军总兵四人及兵弁二三千人（一说四五千人）。事后，赛尚阿受到降四级的处分，向荣和乌兰泰则被革职留任。

太平军永安突围成功，为以后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条件，因而在太平天国前期战争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四）北攻桂林，进占全州

大峒山伏击战胜利后，太平军取道山间小径，过牛角瑶山，然后出荔浦之马岭，经阳朔之高田，临桂之六塘，前锋于4月18日进抵桂林城下。桂林是广西的首府，城墙高厚，但当时清军守兵仅千余人。向荣自大峒山败后，判断太平军将进攻桂林，急率清军千余，日夜兼程，抢在太平军之前进入该城，督饬守城兵勇团练紧急设防。5月3日，乌兰泰也率前队数百人驰抵桂林南门外之将军桥，被太平军炮火击伤，8日死于阳朔。不久，清军各处援兵赶到，城内外兵力增至二万余人。太平军使用了大炮和吕公车等攻城器具，围攻月余，水陆二十四战。但因城坚，始终未能攻破，便于5月19日夜撤围北上，向湖南进军。

5月22日，太平军攻破兴安。25日路过全州时，南王冯云山被守城清军炮火击中，身受重伤。于是，太平军决心攻下该城。这次战斗中，太平军首次成功地使用“穴地攻城法”，于6月3日轰塌全州西门城墙二丈余，乘势攻入城内，杀知州曹燮培以下千余人。

全州为广西湖南两省交通孔道，在太平军围攻期间，广西清军约二万人（一说一万五千，一说七千人）陆续往援。湖南巡抚骆秉章也闻讯告急，咸丰帝命赛尚阿加强湖南衡州（今衡阳市）、长沙防务，以水路为重点，控制要地，以阻止太平军进入湖南。

6月5日，太平军撤出全州，分水陆两路沿湘江北进。全州北面十里之蓑衣渡，是湘江上游的一个险要渡口。这一带重峦迭嶂，树木参天，河床狭窄，江水湍急。湖南永州（今零陵）知州江忠源为阻扼太平军北上，在渡口北面三里的水塘湾江中竖木栅，构筑木堰，以楚勇千余在西岸设伏，并飞函在后追赶太平军的总兵和春派兵在东岸阻击。水路太平军在此遭到伏击，船队受阻，不少船只被击沉。幸和春没有派兵赶到东岸，水路太平军得以弃船登岸，但辎重尽失。陆路太平军亦于西岸遇伏，一面力战，一面夺舟东渡。太平军与清军在蓑衣渡附近激战两昼夜，彼此均有较大伤亡。这时，冯云山伤势恶化，10日不幸牺牲。太平天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在广西境内转战了一年半的时间，攻城夺邑，屡败清军，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洪秀全、冯云山等选择阶级矛盾特别尖锐、反清力量相当活跃，而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广西为发难地，以偏僻的山区为基点，秘密地宣传和组织群众，并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起义的领导核心，进行了较充分的军事准备，趁清军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对付天地会起义武装之际，不失时机地点燃武装革命的火炬，这是金田起义所以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起义后，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扩大革命声势，解决粮食军需等问题，决定立即向外发展，这也是正确的。不足的是，起义的领导者没有及时制定一个明确的战略计划，缺乏进一步动员和武装群众的有力措施，也没有主动联合天地会起义武装共同对敌。特别是全军在四面环山的永安小城停留了半年之久，与愈集愈多的清军就地对峙，以致丧失了在群众条件和地理条件很好的广西地区打开局面，创建革命根掘地的有利时机，造成战略上的失着。尽管如此，太平军在转战广西各地的过程中，经受了战争的锻

炼，队伍日益扩大，战斗力不断提高，为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北攻湘鄂与东取金陵（1852年6月～1853年3月）

一、道州决策

太平军撤出全州后，原拟沿湘江北进，直取长沙，因在蓑衣渡受挫，遂东渡湘江，由陆路进抵湖南永州城西。由于潇水阻隔，未能攻克永州城，只得挥师南向，取道双牌，于1852年6月12日占领湖南道州（今道县）。该地“四面山险，惟一线可通，鸟道崎岖，人力难逞”，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太平军占领道州后，广西布政使劳崇光与总兵和春虽带领清军一万二千余人尾随而来，但均系屡为太平军所败的疲惫之师，仅能围堵，不敢强攻。于是，太平军在此得到一个休整补充的机会，开始进入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

早在广西全州时，太平军的领导者们对进军方向就有各种议论，占领道州后，对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问题再次进行了商讨。洪秀全主张下广东，杨秀清主张出湖南，石达开主张入四川，还有一部分将领主张回广西，经过议论，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决定进军湖南、湖北，然后东取金陵（今江苏南京）。这就是所谓“道州决策”。当时，清廷从各省调集的重兵，大部仍在广西，而湖南则清军兵力空虚，且会党盛行，进军两湖，既可避实就虚，又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因此，道州决策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在道州，太平军领袖们除了决定进军方向外，还由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联名发布了三篇檄文，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列举其民族压迫和封建剥削的种种罪行，号召有志之士，同举义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道州一带是天地会频繁活动的地区，在革命檄文的号召下，当地人民踊跃参军，使太平军迅速补充了二万余人，总数达到五万以上。太平军在这里整顿队伍，增修战具，制备军火，铸炮三百余门，军事实力较前有很大增强。

二、进攻长沙

清廷为实现其四面堵截，一举歼灭太平军于道州的企图，屡命钦差大臣赛尚阿、两广总督徐广缙等加强长沙、衡州及湖南水陆要隘的防守，在粤、桂、湘、赣边界要地派兵控扼，阻止太平军向北、东、西突进，又从河南、陕西、四川、江西等省调兵进入湘、鄂。

太平军明确了战略进攻方向之后，便积极准备向长江流域进军。8月10日弃道州，经宁远、蓝山、嘉禾、桂阳州（今桂阳），于17日攻占了湖南重镇郴州（今郴县）。太平军在这一带又扩军二三万人，并将其中数千挖煤工人集中编组为“土营”，专门担负挖地道、埋地雷、炸城堡和掘壕筑垒等任务，在以后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太平军占领郴州后，和春、江忠源率清军二万余人尾随而来。赛尚阿也自永州移营衙州。由于他调度无方，清廷严旨斥责：“该大臣奉命出征一年有余，历次奏报军情，不过派兵尾追，并未迎头截击，出奇制

胜，所谓调度者安在？”随即撤治其钦差大臣职务，改命两广总督徐广缙接替。

太平军探悉长沙守兵较少，乃于8月下旬由西王萧朝贵率总制李开芳、御林侍卫林凤群以下二千余人，由郴州奔袭长沙。为避开清军主力，奔袭部队不走耒阳、衡州大道，而绕经永兴、安仁、攸县、茶陵、醴陵，于9月11日进抵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一带。这时长沙守城清军约仅四千人（后即增至万余），不敢出战，紧闭城门。太平军未能收到奇袭的效果，只得连日强攻，但因兵力不足，难以奏效。在第二天的攻城战斗中，萧朝贵中炮受伤，不久牺牲。太平天国又失去了一位重要领袖。

洪秀全、杨秀清等得悉萧朝贵等奔袭长沙受挫后，便于9月25日弃郴州，率大队往援。10月13日赶到长沙时，清军和春、江忠源和向荣部已先期到达，加上其它各路援军，敌人兵力已达五六万人。由于长沙城守渐趋稳固，太平军失去了乘虚攻取的战机。加之，清军拥有三千斤、五千斤大炮，置高处轰击，更增加了攻城的困难。清廷为加强统一指挥，命新任钦差大臣徐广缙立即赶至长沙，统筹军务，先解省围，然后并力“进剿”。

太平军大队驻扎南门外，北阻省城，西滨湘江，前有和春、江忠源部阻拦，后有赛尚阿部尾随，形势十分不利。10月14日、15日，太平军连续出动六七千人发起进攻，遭到清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众。17日，石达开率领二三千人渡过湘江，控制西岸龙回潭等要地和湘江中的水陆洲（即桔子洲），并在江上搭造浮桥，使东西声势联络，初步改变了兵力密集城南一地，难以展开的被动态势。但向荣也跟着率部过江，并于10月31日率兵三千余人从西岸渡江进犯水陆洲，企图截断太平军的东西联系。太平军埋伏于洲南树林中，而以零星骑兵佯败诱敌，待向荣部深入后，伏兵旁出，抄袭敌后。清军大败溃逃，死伤千余人。向荣乘马凫水过江，幸免于死。11月10日，湘江东岸的太平军采用穴地攻城法，轰塌长沙南门附近的城墙数丈，突击部队二三千人蜂拥而上。负责防守南门的清军副将邓绍良率部拚死抵御。太平军伤亡数百人，只得后撤。其后，太平军又多次穴地攻城，由于仅限城南一面，以及突击部队组织欠佳和清军防守顽强等原因，均未得手。太平军在长沙城郊旷日持久地与敌相持，形势日趋不利，乃于11月30日主动撤围北上，守城清军并未及时发觉。

三、攻克武汉

太平军撤离长沙后，于12月3日占领益阳，获船数千只，并吸收许多船户、水手参军。9日，太平军乘船出湘阴临资口，越洞庭湖。13日占领两湖咽喉要地岳州（今湖南岳阳），缴获大批粮饷、军械（其中有清初吴三桂部所遗大批火炮），武器装备得到了改善。在这里，又有五千船户带着船只参军。太平军将船户编组成“水营”由“典水匠”（职同将军）唐正才统率。这时，太平军总数达到了十余万人。

咸丰帝闻岳州失守，严厉申斥徐广缙，将其革职留任，并命令他以重兵在岳州北面堵截，防止太平军进入湖北。但太平军已于12月17日撤离岳州，水陆并进，直趋武昌，其势甚盛，“艨艟万艘，帆帜蔽江，所过城镇，望风披靡”。前锋于12月19日进至距武昌仅六十里之金口。清廷深恐太平军占领武汉水陆要冲，然后北上河南或东下皖、苏，立命徐广缙亲率大军绕道援救武昌。

武昌是湖北的省会，西枕长江，东依洪山，城高墙厚，形势险要。当时武昌清军仅三千余人，湖北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以城内兵少，将城外兵勇全部撤入城内。12月21日，自湖南来援的总兵常禄、王锦绣所率千余名清军赶到，也全部入城，准备依城固守。为了防备太平军“潜挖地道”，常大淳等以“有碍炮路”为名，下令尽毁城外民房，大火延烧七昼夜，引起人民极大愤恨。

12月22日，陆路太平军六七千人由蒲圻直逼武昌城外，未遇任何抵抗即占领了城东洪山、小龟山、紫荆山诸要点，并向南北两翼展开，包围武昌城，同时挖沟筑垒，阻击敌人援军。水路太平军也于22日抵鹦鹉洲，经一昼夜激战，于23日占领汉阳，29日又占领汉口。攻占汉阳后，典水匠唐正才率部于汉阳、武昌间以船只相联，用直缆横缚大木，上铺木板，架起两座可通人马的浮桥（是年长江水小，为数十年少见，更便于架浮桥），沟通汉阳、武昌间的联系，以便进攻武昌城。

向荣于12月24日率万余援军赶到武昌附近，随后对围城的太平军多次发起攻击，但始终无法突破太平军的包围线，与城内清军取得联系。

太平军自12月25日开始进攻武昌城，先后使用了大炮、火箭云梯等武器。清军则用炮火、唧水筒、滚木、礌石等抵御。太平军攻城未下，决定采用穴地攻城法。1853年（咸丰三年）1月12日凌晨，埋在文昌门附近的火药轰发，炸开城墙，太平军先头部队立即由缺口冲入，大队相继突进，其余太平军也缘梯而上，纷纷攻入城内。守城清军丢下武器，四散逃跑，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等丧命，武昌为太平军占领。这是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攻下的第一座省城。

攻克武汉的胜利表明，太平军已经成为一支能攻克坚城的军队。它的编制内已区分为陆营、水营、土营，具备了正规军队的规模。两年内，清廷先后调集滇、黔、川、粤、桂、湘、鄂、皖等省三四万兵力，耗银千余万两，结果非但未能将太平军消灭，反而被太平军牵着鼻子，出广西，越湖南，趋武汉，一直陷于被动。

四、东取金陵

太平军进军湖北，尤其是攻克武汉三镇后，湖北及其邻近各省纷纷告急。咸丰帝不顾财政经济困难，进一步调兵遣将，妄图阻止太平军的前进，并进而将其歼灭于长江中游地区。由于摸不清太平军下一步的进军方向，只得分兵防堵，并企图把扼守要地与主动进剿结合施行。他接连任命三名钦差大臣，指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作战：以向荣代替徐广缙为钦差大臣，指挥二三万清军紧随太平军不舍；任命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会同直隶提督陈金绶等，指挥从陕甘、直隶、山东、山西等省调来的清军一万九千名和从吉林、黑龙江调来的马队四千名，于河南南部的南阳、信阳、商城一线防堵太平军北上，任命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统筹苏、皖、赣三省军务，自金陵率兵赶赴九江一带，防堵太平军沿江东下。此外，命原云贵总督罗绕典与荆州将军台涌合力筹防襄阳；命署四川总督裕瑞选派将领酌带精兵，进至四川、湖北交界一带防堵。以上总兵力约计七八万之多。同时，还命令南北各省普通组织团练，凡在籍官员和地方豪绅，均须筹银募勇，以镇压风起云涌的人民起义。

此时，在太平军内部，对下一步的进军方向又产生了争论：有人主张建都武昌，“遗兵迈襄樊”，北进中原，有人主张东取金陵，“踞为根本，徐图进取”。两种意见一时统一不起来，最后杨秀清假托“天父降凡”，坚持其进军金陵的一贯主张，才结束了这场争论。当时，太平军无论“北走信阳，东下九江，西上荆襄，南回岳州之路，（清军）俱属空虚”。但从清廷的决心和部署看，河南方向兵力较强，长江下游则相对薄弱。从太平军本身来说，由于在益阳、岳州、武汉一带获得了数以万计的船只，并已编成“水营”，成为太平军的一支重要作战力量和运输队伍，因此，顺江东下，不仅可以直接威胁清王朝赖以生存的南北水陆运输线和江南财源要地，而且能充分发挥水营的作用（如果北上中原，就不能发挥水陆配合作战的特长）。所以，从双方实力和天时、地利等条件来看，太平军顺江东下的决策还是较为可取的。

在武汉，太平军又吸收大量群众参加自己的队伍，形成了湘南扩军以来的第二次扩军高潮。据称，太平军离开武汉时，武昌城中“男子从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一二”。

经过短期休整之后，太平军于1853年2月9日（咸丰三年正月初二日）放弃武汉。洪秀全、杨秀清等率领号称五十万之众（兵力约十余万）、船万余艘，水陆并进，浩浩荡荡地顺江东下。陆路由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等率领，沿长江两岸推进；水路由东、北、翼三王及秦日纲、罗大纲、赖汉英等率领，顺流而东。天王洪秀全随水路行动。

2月15日，秦日纲、罗大纲所率先锋水师于鄂东广济县南的老鼠峡一带大败陆建瀛的江防军（约三千人），毙其翼长寿春镇总兵恩长。陆建瀛在九江闻败，仓皇弃师先逃，返回金陵。沿江防兵纷纷溃散。此后，太平军长驱直进，先锋水师于2月18日占领九江，24日攻破安徽省城安庆，杀巡抚蒋文庆，并缴获大批军需物资。2月26日至3月7日，又连克安徽池州（今贵池）、铜陵、芜湖、太平府（今当涂）及和州（今和县）。由于水路太平军进展神速，陆路太平军也未遇多大抵抗即顺利地进抵金陵城下。在进军途中，各地人民纷纷参军，使太平军的人数大增，号称百万。清廷在得知九江、安庆失守后，急命向荣率兵赶赴江

苏，命琦善、陈金绶率兵急趋安徽（后又令其由皖北进兵江南），协助防守，并保卫南北漕运。

金陵当时称江宁，是江南的名城大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城墙高厚，周长九十余里，西北两面濒临长江，东依钟山，附近丘陵环绕，形势险要，向有“龙盘虎踞”之称。江苏清军共有绿营兵三万余人、八旗兵数千人，分守各要点，能机动之兵不足万人。太平军攻占武昌后，陆建瀛从全省抽调绿营兵四千八百人，其中三千名带赴上游防堵，一千八百名留守金陵。金陵设有江宁将军，辖旗兵三千余人。太平军进攻时，城内共有旗兵、绿营兵五千余人，另有江宁布政使祁宿藻临时募集的勇壮八九千人，协助防守。

陆建瀛于2月25日自上游逃回金陵后，数日不理政事。江苏巡抚杨文定借口防守镇江，也离城而去。江宁将军祥厚、江南提督福珠洪阿等将上述情况上奏参劾，结果陆建瀛被拿问冶罪，杨文定被革职留任。可是，未等清廷的谕旨到达，太平军的先锋部队已进抵城下，陆建瀛、祥厚乃尽撤城外兵勇，依城防守。

3月7日晚，太平军陆路前锋部队进抵江宁镇的板桥。3月8日，大队太平军在李开芳、林凤群等率领下，抵达金陵城西南的善桥一带，扎营二十四座。次日，李开芳率数百人占领雨花台，并乘势奔过吊桥，直薄城下。当天，水师前锋亦至，分泊大胜关至草鞋峡一带江面。3月12日，太平军水陆大队继续赶到。同日，分兵占领浦口，并完成了对金陵的包围。金陵城垣南北略长，太平军陆师攻南端的聚宝门（今中华门），水师攻北端的仪凤门，以便发挥水陆两军的优势，并迫使清军分散兵力。

陆建瀛于太平军到达前即将城外防兵尽撤城内，以土袋堵塞十三个城门，企图负城顽抗；同时，向清廷火急求援。清廷获悉金绫被围，大为震恐，不断催促向荣、琦善率南北两路清军兼程向江宁、浦口急进，另令山东、河南加强黄河各渡口的防务，严格控制公私船只，防止太平军北上。

太平军选定北面的仪凤门为突破口，并决定采用行之有效的穴地攻城法。仪凤门外约半里有静海寺，太平军以此为掩护，挖掘地道，埋设火药，准备攻城。与此同时，南面聚宝门外的太平军安炮于报恩寺塔上，猛烈轰城，夜间则搬出寺内五百罗汉，以为疑兵，诱使清军彻夜打炮，不得休息。其它城门外的太平军则派出小部队进行袭扰，掩护北门外的太平军进行攻城准备。

3月19日拂晓，太平军将火药点燃，炸塌仪凤门附近城墙约二丈，数百名将士冲入北城，然后分成两支，一向鼓楼方向进攻，一循金川门至神策门（今中央门），经成贤街直指小营，杀陆建瀛于黄家塘。此后，攻入城内的太平军遭到满洲旗兵的猛烈乒击，力战不胜，只得后撤，并由北门缺口退出城外。然而，防守南城的清军闻北城已破，总督被杀，便纷纷逃遁，不战而溃。于是，进攻南城的数千太平军在林凤群、赖汉英率领下，乘夜缘梯登城，打开聚宝门、水西门、汉西门。次日黎明，大队太平军进入城内，直奔满城（明代内城，今城东南部）。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等率旗兵及满人拚死抵御。太平军奋勇战斗，终将满城攻破，祥厚等被杀，金障全城遂为太平军占领。

太平军自金田起义后，两年多时间内，转战六省，所向披靡。这次又一举攻占金陵，全歼守敌，取得了继攻占武昌之后的又一重大胜利。这一胜利，粉碎了清廷歼灭太平军于长江中游的计划，沉重地打击了清军的气焰和信心。在这两年内，清廷耗银二千五百余万两，动员近十万军队（不算团练），结果损兵折将，弃城失地，一无所获。太平军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主要是采取了乘虚捣隙的方针，发扬了革命军队英勇善战的特长，特别是善于运用穴地攻城法，使不少坚城计日而下，加以太平军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其革命行动又反映了劳苦群众要求变革现状的愿望，因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而清王朝方面，不仅兵力不敷分拨，而且士气低落，派系之间矛盾很大，统帅不和，事权不一，加之军队纪律败坏，军民之间势如水火，这就为太平军取得胜利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但是，太平军在向长江下游进军时，却将沿途攻占的九江、安庆、芜湖等重要城镇一概弃之不守，这从发展与巩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来说，是失策的；再者，太平军自武汉东下的过程中，对于尾随的清军，未能象撤离紫荆山区和永安时那样，有计划地组织几次伏击，寻机将其歼灭或给予歼灭性的打击，这也是作战指导上的不足之处。所有这些，均与道州决策“专意金陵”的指导思想直接有关，它对于尔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第四节 定都金陵后的军政决策

太平军攻占金陵后，迅速肃清了城内残敌，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1853年3月29日，天王洪秀全进入金陵，以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并改金陵为天京，定为都城，从而正式建立起与清王朝南北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

太平军对天京的防卫工作，进行了严密的部署。在全城遍设望楼，派兵日夜观察警戒，白天和夜晚分别以旗帜和灯火为信号，一方有警，城内指挥机构能迅速得知，及时作出处置。城上分兵驻守，各段设有巡守将军，日夜巡防。在各城门外建立营垒，营墙上开设枪眼炮门，营外挖有一至数道深壕，内竖竹签、木栅，离营一里半左右设有警戒哨，战士携带兵器、海螺守正，并规定有口令，每日更换。

为了更好地拱卫天京，太平军于3月下旬发兵二支：一支由指挥罗大纲、总制吴如孝率领，于3月31日占领镇江；一支由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天官副丞相林凤祥、春官副丞相吉文元率领，于3月22日克江浦，31日占仪征，4月1日占领扬州。镇江、扬州等地的占领，既屏蔽了天京的东面和北面，又切断了南北漕运，予清王朝以严重威胁。太平军占镇江后，原拟乘势攻取常州、苏州等地，由于向荣已率军追至金陵城外，乃停止东进，分军一部回援天京。

金陵城大而坚，形势险要。它地处江南富庶之区，供应充足，加之傍临长江，交通便利，利于水军活动。元末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是以金陵为基地进行灭元战争的。太平军胜利地占领金陵之后，正可效法朱元璋，据金陵以匡天下。况且太平军在转战两年多以后，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需要建立一个有利的巩固的基地，以便继续发展。因此，洪秀全、杨秀清等决定久据金陵，是符合当时客观条件和主观需要的。但过早地宣布建都，却未必有利于尔后革命战争的发展。

清廷对太平军占领金陵后的军事行动，一时无法判明。它既怕太平军东下苏浙，占领其财赋之区，更害怕太平军北上豫鲁，进而威胁其京畿重地。在此情况下，咸丰帝严令向荣、琦善率所部迅速东下，截击、防堵太平军。3月28日，向荣部赶至金陵城外板桥，31日绕至城东二十里之沙子冈，4月7日移营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共有兵勇一万七千余人。3月30日，琦善的先头部队四千人抵达江浦，4月4日攻陷浦口。16日，琦善、陈金绶率部进至扬州城外，扎营雷塘集、帽儿墩一带，建立“江北大营”，计有兵勇一万七八千人，清军建立江南、江北大营的目的，正是为了阻扼太平军向东、向北发展，并伺机夺取金陵。

太平军当时号称百万，实际上能战之兵不过十余万人。以这样一支部队对付近在咫尺的江南、江北大营，在兵力上自然处于压倒优势。但与全国八九十万清军相比，太平军仍处于劣势。其次，这时清王朝仍控制着全国政权和绝大部分人力、物力与财力；而太平天国仅控制金陵附近一隅，人力、物力、财力都极其有限。因此，就全国形势而言，敌强己弱的基本态势并未改变，太平军仍然处于被“围剿”的状态。可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秀全等缺乏战略头脑，在面临重大战略转变（即由长驱直进、流动作战到奠都立业）的时候，过高地估计自己，过低地估计

敌人，对形势作出了错娱的判断，竟认为“我天王奉天伐罪，除暴救民，迅扫群魔，妖氛几尽”，因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作出了一些不正确的决策，采取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措施。

一是大搞封官晋爵，加速了农民政权的封建化。太平天国的军制官制，在起义之初就粗具轮廓，在永安期间又作了增订。定都金陵后，洪秀全等为胜利所陶醉，大肆论功行赏。同时，扩充天王府和各王府的机构，增加礼仪、保卫和生活保障等各类人员。随着各王府的设立，天京城内大兴土木，建造宫殿。由于机构的扩充，各种礼仪称谓更形繁琐，内部的等级制度更加森严。天王洪秀全从此幽居深宫，更加神秘化，而军政实权则日益集中到东王杨秀清手中。总之，建都天京之后，太平天国上层的封建色彩与日俱增，领导集团日趋奢侈铺张，甚至腐化，以致日益脱离群众，内部矛盾也日渐突出。

二是对以后的军事行动作出了不正确的战略决策。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不久，洪秀全等在骄傲轻敌的思想指导下，决定采取固守天京，同时分兵北伐与西征的战略。于是将全军分为三大支：东王为全军统帅，总管全部军事，领重兵留守天京，并在镇江、扬州等地分兵驻守，与天京互为犄角；二是编组北伐军，企图以劲旅疾趋北京；三是组成西征军，拟迅速夺取皖、赣、两湖等地。这个战略是不符合当时主客观条件的，它使太平军在多个遥远的战略方向和漫长的战线上分兵与强敌作战，往往顾此失彼，为清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三是不适当地将太平军的内部制度推广于金陵全城。建都金陵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主观地将太平军内部的一套制度在广大群众中普遍推行。例如，将全城民众分别男行女行，实行男女分馆，夫妻分居。男子除参军者外，均分别编入诸匠营和百工衙，年老体弱者则入牌尾馆。妇女也大致与男子相同。这样一来，家庭制度实际上被废除了，全城民众全都过着军事供给制的生活。早先在太平军内部实行的圣库制度，也一度推广到金陵全城，城内各店铺的货物一概被收缴入库，商业也实际上被废除了。后由于种种不便，这些制度和规定才陆续有所更改。

当然，天京当局于1853年冬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则是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创举。这个文件对农民的理想社会作出了具体的规划。它是在早期太平军内部生活秩序的基础上，吸收了进驻金陵半年多来的社会实践经验而制成的。它既是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纲领，也是以太平天国理想改造中国的蓝图。它否定封建土地制度，主张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还对农村组织形式、农副产品的分配原则、司法制度、农村官吏的保举升迁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如婚丧、礼俗、教育、民事纠纷的处理等）作了规定。《天朝田亩制度》体现了广大农民群众渴望获得土地和改变贫富悬殊的社会现状的强烈愿望，也反映出在小生产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制度有它正确的进步的一面（在当时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有着强大的鼓舞作用），但也有它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面。《天朝田亩制度》基本上未能实行，其中部分内容如乡官制度等在太平军占领区实行了，而土地政策等则或未实行，或根据当时情况作了修改。

此外，天京当局还初步阐明了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太平军挺进长江流域，特别是占领金陵后，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英、法、美等国的

驻华代表，接连前往天京，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进行接触，企图摸清太平天国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初步阐明了自己的对外政策。总的看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对外国侵略者缺乏应有的认识。他们对外国人一概笼统地认为，“既系同拜上帝，皆系兄弟”。但在与这些驻华代表的接触中，他们坚持了独立平等的立场，毫无媚外的表示。经济贸易方面，表示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倍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候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明确表明了严禁鸦片的态度。对外国人屡次提出的是否承认鸦片战争以来所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问题，天京当局未予正面答复，这是比较策略的。由于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和太平天国初期采取较灵活的外交政策，西方列强在一段时间内采取了“中立”观望的态度，这就使太平天国革命获得了较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第五节 北伐（1853年5月～1855年5月）

从1853年5月中旬太平军自浦口开始北伐，到1855年5月31日北伐军余部覆灭为止，太平天国为了夺取京津，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北伐作战。其过程大致分为长驱北上、驻止待援、最后失败三个阶段。

一、长驱北上，挺进京津地区

1853年5月上旬，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军自扬州西进（扬州防务交由指挥曾立昌等负责），5月13日，会合自天京出发的春官副丞相吉文元、检点朱锡琨所部，由浦口北上，向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北京进军。北伐军共有九个军的番号，约二万余人。临行前，“秀全诏之曰：‘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糜时日。”洪秀全等还决定，待北伐军进抵天津后，再派兵增援。

（一）由皖入豫，抢渡黄河

北伐军没有自扬州沿运河北上，而经由皖北进军。清廷对太平军的北进意图一时判断不清，不知北伐军是牵制和吸引进攻扬州的清军兵力，还是挺进黄河以北。咸丰帝只得施展其前堵后追的故伎，仓皇调兵南下黄河一线堵截，并把苏皖地区的作战行动交给琦善“统筹”。

林凤祥等率北伐军自浦口出发，在乌衣镇一带击败察哈尔都统西凌阿率领的黑龙江马队（由浦口败退者）后，一路长驱北进，连下安徽滁州（今滁县）、临淮关、凤阳、怀远、蒙城，于6月10日到达亳州（今亳县）。蒙亳一带是捻党活动的中心地区，北伐军路过时，吸收许多劳苦群众参军，扩大了自己的队伍。6月12日，北伐军放弃亳州，于次日攻克清军兵力薄弱的河南归德府城（今商丘），缴获火药四万余斤以及大量铁炮。之后，便北上刘家口（归德北），拟由此北渡黄河，取道山东北上。由于山东巡抚李已在沿河布防，并将大小船只一律集中北岸，太平军无法北渡，只得沿河西走，连下宁陵、睢州（今睢县）、杞县、陈留，于6月19日进逼开封；因攻城未克，乃撤往中牟县之朱仙镇。林凤祥等在此发给北王韦昌辉一份禀报，告以归德战况及未能渡河的原因，以及北伐途中所遇到的谷米甚缺、通信不便等情况。这时，北伐军由于沿途大量吸收捻党和淮北各地群众参军，声势更大。

由于清军前线将领开始对北伐军的兵力和行动企图判断不清，以为不过二三千人，意在牵制扬州外围的清军，故仍以重兵围攻扬州，这就为北伐军的长驱北进提供了有利条件。及至北伐军进抵蒙亳地区，清廷才察知北伐军将渡河北上，并“已成蔓延之势”，便陆续令各路清军驰援河南：急调江宁将军托明阿率兵二千余人由江苏清江浦北上，并由都统西凌阿率滁州的残兵败将尾追；令山东、直隶督抚查禁河防，防堵太平军北渡，并继续从山西、陕甘等地调兵八千，开赴河南协防；命直隶布政使张集馨率兵一部驻扎临洺关（今河北永年），相机南下；命江北大营帮办军务胜保带兵一千九百名北上追击。胜保迟至6月18日才自扬州附近启程，而此时北伐军早已攻破归德，正沿黄河西进中。

北伐军于6月23日撤离朱仙镇，经中牟、郑州、荥阳，26日到达汜

水、巩县地区。这里是洛河归黄入口处，停有不少民船。北伐军利用这批船只，从28日起开始抢渡黄河。7月1日，托明阿率盛京（今辽宁）、吉林马队数千赶到汜水。北伐军一面阻击敌人，一面继续抢渡。7月4日，北伐军主力全部渡过黄河。担任阻击任务的数千人被清军截断，未及渡河，后转战于河南、湖北、安徽，损失大半，最后于8月中旬攻下安徽太湖，东向与西征军胡以晃部会合。

（二）围攻怀庆，贻误战机

北伐军渡过黄河后，于7月2日攻破河南温县，7日进围怀庆府（今沁阳）。当时城内仅有清军三百人，连同团勇壮丁，总计不过万人，由怀庆知府余炳焘等督率，死守待援。林凤祥等本以为怀庆清军单薄，可以迅速攻克，补充粮食弹药后继续北上，不意屡攻不下，于是将怀庆城团团围住，在城外建营立寨，加筑木城，挖掘深壕，一面阻援，一面继续攻城。

对于太平军北渡黄河，清廷极度震惊，乃于7月13日任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饮差大臣，以理藩院尚书恩华和江宁将军托明阿帮办军务，所有黄河南北各路清军，统归节制。7月中下旬，托明阿率部六千人，胜保率部一千九百人，恩华率部五千余人，李率部二千余人，先后赶到怀庆外围。讷尔经额也由彰德（今河南安阳）移营怀庆东北的清化镇指挥。

北伐军久攻怀庆不下，消耗很大，而增援的清军却越聚越多（约近二万），为了摆脱被动，不得不于9月1日主动撤围西进。北伐军由于在怀庆滞留了两个月，使清廷得以在黄河以北厚集兵力，加紧布防，从而增加了进军京津地区的困难。

（三）绕道山西，转攻直隶

北伐军撤离怀庆后，便绕道济源，翻山越岭进入山西，连下垣曲（今垣曲东南）、绛县、曲沃，于9月中旬进至平阳（今临汾）、洪洞一带。清廷急命胜保和山西巡抚恒春等迅速率兵赶到霍州（今霍县）一带，迎头堵截；命讷尔经额调兵控制正定、井陉等要地，防止太平军东进直隶；命陕西、河南巡抚等控制黄河各渡口，妄图把北伐军消灭于山西南部地区。但北伐军自洪洞转而向东，经屯留、潞城、黎城，复入河南，攻破涉县、武安。9月29日，北伐军由山间小路突袭河南、直隶交界的临洺关，击溃立足未稳的讷尔经额所部清军（由怀庆回防直隶）万余人。接着，连下直隶沙河、任县、隆平（今隆尧）、柏乡、赵州（今赵县）、栾城、晋州（今晋县）、深州（今深县）。

北伐军绕道山西插入直隶的行动，使清廷满朝震动。北京城内的官僚豪绅纷纷逃散。咸丰帝立即将讷尔经额革职，以胜保为钦差大臣，随后又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胜保“进剿”。10月15日，僧格林沁率领京营禁兵、蒙古马步军共四千五百名屯驻涿州（今涿县），屏蔽京师，并策应胜保军，企图在滹沱河南合击和消灭北伐军。

林凤群、李开芳等在深州一带稍事休整后，于10月22日率军东走，连破献县、沧州，于29日占领天津西南的静海县城和独流镇，前锋进至杨柳青，从而使清王朝围歼太平军于滹沱河南的计划又告落空。

北伐军原想占据天津，以便进行休整和待援。当时，天津清军甚

少，天津城内的官僚豪绅立即组织团练武装，并破坏运河堤岸，引水环城，阻碍太平军的行动；加之在北伐军占领静海的当天，胜保即率队赶到，并于11月5日进入天津，僧格林沁也移营于天津西北之杨村（今武清），因此，北伐军占领天津的计划未能实现。

二、驻止待援，被迫转入防御

（一）静海、独流之战

静海县城和独流镇均位于子牙河以东的运河线上，两地相距十八里。北伐军既无法占领天津，便退出杨柳青，在静海、独流两地驻扎下来，由林凤群、李开芳分别率部固守，同时报告天京，要求迅即派出援军。他们在这里筑木城，挖堑壕，建望台，埋地雷，竖木桩，坚守待援。

北伐军自1853年5月中旬从浦口山发，到10月29日占领静海、独流，近半年中，一直保持着进攻姿态，掌握着作战的主动权，队伍也扩充至四五万人。但到达静海、独流后，在远离后方接应的情况下驻止下来，等待援兵，从而陷入重围，被迫转入防御。这是北伐军进军中的一个明显的转折。至此，进攻北京的计划实际上已无法实现了。

围攻静海、独流的胜保军计有两万余人。胜保设大营于良王庄，以主力围困独流镇，由西凌阿带领少量部队围困静海县城。僧格林沁也自杨村移营独流镇以北三十余里的王庆坨以为声援，同时防堵太平军进袭北京。此外，在天津及其附近各县尚有二万七千余名团练武装，配合清军作战。

开始，胜保军凭借优势的武器（包括八千斤至万余斤的重炮）和充足的给养，连日进行围攻，企图迅速消灭北伐军。但北伐军依托木城、堑壕顽强抵抗，使胜保军屡攻屡挫，以致束手无策。北伐军有时也抓住有利战机，对清军实施反击，并击毙率领火器营的副都统佟鉴和天津壮勇统领谢子澄等。由于久攻不下，胜保多次受到清廷申斥，最后不得不要求僧格林沁移营前线，与之合力围攻。

北伐军在静海、独流一带凭借临时构筑的工事，忍受着严寒和饥饿，抗击三四万清军和团练的不断围攻，整整坚持了一百天，充分表现出坚韧顽强的战斗精神。但终因被围日久，粮食、弹药均感困难，援军又无消息，不得已于1854年（咸丰四年）2月5日突围南走。

（二）束城、阜城之战

北伐军自静海、独流突围后，经大城县，于2月6日到达河间府之束城镇，并占据附近的桃园、西成、辛庄等六七个村庄。这一带村落稠密，树木丛杂，太平军就地取材，迅速建造土垒、木城等防御工事。

僧格林沁和胜保企图歼灭北伐军于撤退途中，率领马队紧迫不舍，当天就追到束城。不久，大队清军赶到，对北伐军继续实行包围。清军在四周挖掘深壕，设置鹿砦、木栅，防止太平军突围，并不时发起进攻。太平军凭垒固守，一俟清军接近，便施放枪炮，投掷火罐、火球，大量杀伤敌人。

束城是个小镇，粮弹给养难以补充，因此，北伐军在这里驻守一个月后，又于3月7日乘着大雾再次突围，途经献县，于3月9日抵达阜城。

阜城也是一个小邑，城内积水很多，房屋甚少。太平军除据有全城外，还占领城北的连村、对村、杜家场和城西南的塔露头村、红叶屯等村落，周围密布鹿砦、树栅，有的地方多达五六层，准备坚守。

北伐军到阜城后，很快又被三万多清军包围。不久，城北各村落入敌手。在3月25日的战斗中，吉文元受伤牺牲，北伐军的处境更加严酷。幸好这时北伐援军已过黄河北上，清廷为不使其与北伐军会合，即命胜保带领万余清军（内有马队二千），赶往山东防堵。这就减轻了对阜城的压力，使北伐军得以在此坚守两个月之久。

三、援军的北上与覆没

按照预定计划，天京当局于得知北伐军抵达天津后，应立即派出后续部队，北上增援。由于天京外围及西征战场的形势均较紧张，援军未能预先筹组和即时派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临时决定放弃扬州，以便腾出部队北上增援。但扬州被江北大营清军所困，守军曾立昌部难以撤出，于是由天京派出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部前往扬州外围接应。赖汉英于12月2日出发，26日才接出曾立昌部，放弃扬州。之后，留兵一部迟守瓜洲、仪征，主力前往安庆，准备北援。北伐援军原拟由燕王秦日纲统领，秦日纲将这一艰瓦使命交给了曾立昌等人，自己仍留守安庆。

北伐援军共十五个军，七千五百人，由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宗扬、夏官副丞相陈仕保等率领，迟至1854年2月4日才从安庆出发，经桐城、舒城、六安、正阳关、颍上，于3月1日到达蒙城。援军在这一带吸收了大批捻党和游民等入伍。3月上旬，北伐援军入河南永城、夏邑，中旬转至江苏萧县西北的包家楼、蔡家庄一带，就地取材，扎木筏渡过黄河，并占领丰县，3月19日入山东境。但担任掩护任务的二三千人未能渡河，退回河南永城，尔后转入安徽六安一带活动。由于山东清军正集结于北部地区，防堵北伐军南下，鲁西地区兵力空虚，故北伐援军进入山东后，如入无人之境，连下金乡、巨野、郓城、阳谷、莘县、冠县，于3月31日直逼距阜城仅二百余里的漕运咽喉要地临清城下。这时，援军兵力已扩充至三四万人。

奉命阻击北伐援军的胜保率部自阜城出发后，经故城入山东，于4月4日到达临清外围。北伐援军一面阻击南下的胜保军，一面猛攻临清城。12日，用地雷轰塌西南城墙两处，攻入城内，但粮秣弹药已被清军全部焚毁，仅得一座空城。在援军攻临清期间，清廷调兵遣将，很快集结兵力一万六七千人（内有马队四千余名），加上团练等约有二三万人。援军入城后，清军随即对临清形成合围，并不断用重炮猛轰援军营垒及城垣。援军展战不利，不得不于4月23日放弃临清，南退至李官庄、清水镇一带，部队伤亡逃散者万余人。

北伐援军如果坚持北上，很快便能与北伐军会师。当时清廷甚为恐慌，咸丰帝惊呼“将毙之虎，又添双翼”。但援军在临清作战失利后，领导层中对下一步的行动发生了激烈争论。曾立昌认为清军已经疲乏，又屡胜而骄，主张“乘势趋阜城，僧营不虞后路之变，此转败为胜事也！”但许宗扬和陈仕保等置北伐军数万将士的安危于不顾，说什么“众心欲南趋，北行恐多逃亡。我则深入，不如南行，明旦迅发，官军未能追也。”双方争执不决，最后南返的主张占了上风。4月27日，援军南退冠县，在清军的追击和地主武装的袭击下，被杀二三千人，新附之众纷纷溃散。曾立昌渡黄河时淹死（一说自杀）。陈仕保渡河后在安徽凤台县境内阵亡。许宗扬只身逃回天京，杨秀清将其投入东牢。

北伐援军的失败，固然与本身兵力不足及同样是孤军深入有关，但主要是缺乏坚强有力的领导和集中统一的指挥。当援军进至山东、直隶之交的临清时，竟在清军已经逼近的情况下，强攻州城，不仅劳师费时，而且陷于被围的境地。撤出临清后，援军的主要领导者不敢绕道运

河以东清军防守薄弱而又不便骑兵行动的地区，继续北上接应北伐军，而是迁就某些领导成员贪生怕死和新附之众留恋乡土的情绪，卷旗南返，结果非但未能达到驰援北伐军的目的，反而先于北伐军而覆灭了。

1854年5月，天京方面又决定派燕王秦日纲再次组织增援，但秦借口“北路官军甚多，兵单难往”，不愿北行。天京当局终因金陵、庐州（今安徽合肥市）以及湖南方面战事十分紧张，无力抽兵而作罢。此后，北伐军只得依靠本身的力量作最后的奋战了。

四、北伐军的最后失败及其教训

1854年5月5日，北伐军由阜城突围东走，占领东光县的连镇。连镇横跨运河，分东西两镇，分别由林凤祥、李开芳率部据守。当天，僧格林沁即率马队追来，不久步队也赶到，又将北伐军紧紧包围。北伐军为了“另择一处”牵制清军，便商定由李开芳率领经过挑选的健卒六百余人骑马突围南下。5月28日，李开芳率队自东连镇突围成功，过吴桥，入山东境，29日袭占高唐。胜保在歼灭北伐援军后，于5月19日返抵连镇外围，得知北伐军突围南下，立即率马队跟踪追击。

此时，留守连镇的太平军仅有六七千人，而僧格林沁则拥军二三万人。清军在连镇四周挖掘深壕，构筑土城，壕深宽各二丈余，土城高一丈五六尺，厚八九尺，上安抬枪、火炮，每隔一丈支帐篷一座，设兵十名，严密围堵，企图将太平军困死。可是围攻数月，清军不但未能取胜，反而损兵折将，士气越来越低，以致僧格林沁不断受到清廷申斥。太平军方面，也由于久据连镇，粮食匮乏，仅以黑豆充饥，及至年底，粮食几尽。于是，僧格林沁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乘机开展诱降活动，北伐军前后出降者达三千余人。1855年（咸丰五年）2月17日，太平军放弃西连镇，集中力量防守东连镇。林凤祥利用僧格林沁的诱降阴谋，于2月18日派萧凤山（原系清朝县丞）等九十余人诈降清军，以便联络降众为内应，配合守军出击，打破清军的围困，但这项计划被清军识破，诈降的九十余人全部被害。3月7日，清军对东连镇发起总攻，集中炮火轰击木城，北伐军将士拚死抵抗。林凤祥在督战时身受重伤，士气大受影响。不久，木城被攻破，清军纷纷突入。太平军将士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大量杀伤清军。最后，太平军大部阵亡，其余或被俘，或从运河潜逃。林凤祥受伤后藏于地道深处，后被清军搜获，解送北京，慷慨就义。

李开芳率领的六百余人（突围途中扩充近千人）占据高唐的当天，胜保即率马队三百名赶到，不久大队清军集高唐城外，使这支太平军又陷入重围。李开芳得知援军溃败，早已退出临清，而高唐城高池深，粮草尚多，遂组织居民在城外立栅筑垒，开掘壕沟，并在城内挖掘地道多处，直通城外，准备依城固守。这时，胜保拥兵万余，先后用云梯、吕公车攻城，均未得逞，便改用临时铸造的重炮轰击。太平军利用壕沟地道作掩护，保存自己，并于黑夜抢修被敌人轰塌的城墙。以后，清军又改取挖地道、埋地雷的办法，也未能破城。太平军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利用夜暗袭击敌营，前后三十余次，毙伤不少清军。

高唐久攻不下，胜保先后受到拔去花翎和革职留任的处分。留守连

镇的北伐军被歼后，清廷便命僧格林沁移师进攻高唐，胜保被解京问罪。

僧格林沁于3月11日选精兵八千余名，抵达高唐外围，使围城清军增至二万余人。此时，李开芳得知林凤祥部已覆没，决意突围南返。僧格林沁从俘获的太平军人员中得到李开芳等急欲突围的情报后，便于3月17日夜密令南面清军分开队伍，故作疏防之势，诱使太平军由此突围。李开芳没有识破敌人的诡计，于当日午夜率部突出，向南急走。僧格林沁以马队五百余名衔尾紧追，李开芳部途入据离高唐约五十里的茌平县冯官屯。

冯官屯有三村相连，外有高墙。太平军占据后，又掘壕立栅，严密防守。18日，僧格林沁率马队赶到，首先占据西边二村，然后在四面安放大炮，向冯官屯轰击，将房屋尽行轰塌。太平军在屯内挖掘纵横交错的壕沟、地道和地窖，待敌人进至鸟枪射程以内时，通过工事射孔开枪射击，清军始终无法攻入屯内。最后，僧格林沁决定采用恶毒的水灌法，强迫大批民工挖一条全长一百二十余里的水渠（历时月余），引运河水至冯官屯。4月20日，开始放水浸灌，屯内平地水深数尺，壕沟地洞被淹，粮草火药尽湿。这时，僧格林沁一面用大炮轰击，一面对太平军展开诱降活动。5月31日，清军围攻益急，太平军粮弹告罄，陷于绝境。李开芳率八十余人突围，被清军俘获（一说降于清军），后解送北京，于6月11日遇害。

至此，这支由数万精锐组成的北伐军，经过两年多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全军覆没。

北伐军及其援军的全部覆没，这是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在军事上所遭到的最严重的失利和挫折，对整个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所带来的影响甚大，教训也极为深刻。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战略决策错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刚刚占据金陵一隅之后，就以区区二三万之众，远离后方，进军数千里，深入清王朝的腹心地区，冀图控制一二个外围要点，坚守待援，然后再增兵攻占北京，这完全是一种轻敌冒险的战略决策。战略上的这种错误决策，又未能及时察觉和改正，以致前方将士虽然英勇善战，也难以挽回失败的命运。

第二，援军派出过迟。洪秀全等决定待北伐军到天津扎住之后，再发援兵，这在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下，显然失之过迟。如果后续部队早日派出，与先遣部队互相策应，即使不能直下京津，也可与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蓬勃发展的人民革命运动相结合，建立革命基地，与敌人进行争夺中原的斗争。这样，北伐军和援军仍有获胜的希望。

第三，机械执行指令。北伐军打到天津外围之后，即遵照出发前洪秀全等给予的指令，在静海、独流停止待援，从而失去了根据实际情况机动作战的特长，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在从静海到冯官屯十五个月的被迫南撤过程中，一味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作战，虽然善于迅速构筑各种野战工事，但毕竟经受不住清军大炮的连续轰击，以致始终处于被敌军追赶、包围的不利状态。林凤祥、李开芳等如能根据前线实际情况机断行事，并通过机动作战，有计划地伏击尾追之敌，给敌军以歼灭性的打击，北伐军或不致全军覆没。

北伐军是失败了，但这支远离天京孤军远征的队伍，在地形、气

候、民情均不适应的情况下，忍着饥饿和寒冷，与优势的敌军进行了近两年的艰苦奋战，大部分将士最后英勇牺牲或慷慨就义，发扬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英雄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长驱北伐，不但在政治上扩大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推动了北方人民的起义，而且牵制了数万清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天京周围和西征战场的军事压力。

第六节 西征（1853年5月～1856年4月）

从1853年5月中旬太平军自天京出发西征，到1856年4月石达开由江西率军回援天京，为太平军西征时期。西征的战略意图，在于夺取皖赣，进图湘鄂，控制安庆、九江、武汉等军事要地，以屏蔽天京，并解决天京军民的财粮供应问题。其过程大致可分胜利进军、被迫迟却、转败为胜和乘胜反攻四个阶段。

一、胜利进军

（一）占安庆，围南昌

1853年5月19日，即北伐军出发几天之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又派出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和夏宫副丞相赖汉英，率领战船千余艘、步军二三万人，由天京溯长江西征。

西征军首先占领安徽和州，继经太平、池州，于6月10日占领长江北岸重镇安庆。此后，胡以晃即坐镇安庆，指挥西征战事。赖汉英率检点曾天养、指挥林启容以下万余人进军江西，于13日攻占彭泽，接着连克湖口、南康（今星子）、吴城镇，前锋于6月24日直抵南昌城下。

江西巡抚张芾率兵勇六千余人驻守南昌。太平军围城前夕，新任帮办江南大营军务、湖北按察使江忠源自九江率楚勇一千三百人先期赶到南昌，与张芾共同据城防守，并焚烧城外民房，防止太平军穴地攻城。

太平军进抵南昌外围后，稍事准备，即行攻城，为敌军炮火所阻。江忠源等多次督军出城迎战，并炮轰太平军船只，企图打退太平军的进攻，均未得逞。7月9日，太平军用地雷轰塌城墙，随即冲入缺口。由于江忠源已先督楚勇数百人于缺口处堵击，来能攻入城内。7月28日，太平军再次轰塌城墙，发起冲锋，因遭清军堵截，且受绕出城外的清军背后袭击，攻城又未成功。由于僵持不下，双方都向南昌增兵，准备进一步展开争夺战。

8月初，国宗石祥祯（一作石贞祥）、石凤魁、韦志俊等率增援部队万余人、船只近千艘，自天京抵达南昌城外。赖、石等部联合发起进攻，又未得手，便决定一面围城，一面进攻外围各州县，以孤立南昌清军。于是由曾天养率领一支部队，于8月上旬至9月中旬先后攻占了南昌外围的丰城、瑞州（今高安）、饶州（今波阳）、乐平、景德镇等州县。沿途征集了不少粮食，用以支援进攻南昌的太平军和接济天京。在进占瑞州时，曾击溃自湖南来援的训导江忠淑所部楚勇二千余人。

8月中下旬，清军各路援军亦陆续到达，计有从江南大营派来的云南兵一千二百人（由总兵音德布率领），从湖南派来的湘勇三千六百人（由知州朱孙诒、训导罗泽南等率领）。8月28日，清援军在南昌守军的配合下，对围城的太平军发起反攻。太平军先则佯败诱敌，继则两翼包抄，将敌击退。此后，双方又处于相持状态。

由于久攻不下，杨秀清决定撤南昌之围，转攻皖北和湖北。9月24日，太平军撤离南昌。

其实，太平军如能审时度势，及早采取围城打援战法，着重歼灭清

军援兵，不仅可以改变长期顿兵坚城之下的不利态势，而且可以在不断歼灭援敌的情况下攻克南昌。根据当时双方实力对此以及清军援军到达时间不一等情况，太平军是有可能做到这点的。可惜，太平军南昌前线的指挥者计不及此，只一味强攻坚城，以致钝兵挫锐，并陷入两面应敌的被动处境，以致围城三月，终于被迫撤围。

（二）取九江，克庐州（参见附图三）

太平军自南昌撤围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石祥祯率领，西取湖北；一路由曾天养率领，回安庆并入胡以晃部，进攻皖北。1853年9月25日，天京派石达开率兵五六千人至安庆，主持西征事宜。

石祥祯等所率太平军约万余人于9月29日攻占九江，留林启容率部分兵力驻守，大队继续西进。署湖广总督张亮基急令前武昌府同知劳光泰统率炮船前往鄂东田家镇（今广济西北）扼守，并派署按察使唐树义前往督师。清军编造巨筏，上置火炮，横列江面，妄图阻止太平军船只西进。10月8日，太平军一举占领田家镇对岸的要隘半壁山，为突破清军江防创造了条件。10月15日黎明，太平军水陆并举，猛攻田家镇清军，半壁山上的大炮居高临下地轰击敌人。守军近万人（连同前一日由南昌回援的江忠源部）死伤逃亡几尽，战船炮位全部为太平军所获。田家缜既破，入鄂之水陆门户洞开，于是，太平军乘胜攻克湖北蕲州、黄州（今黄冈），直趋武汉。当时，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以武昌“官弁仓皇无计，众心涣散”，只得闭城株守。“存城兵千余名，不敷分布”。由于武汉清军兵力空虚，西征太平军于10月20日即轻而易举地第二次攻占汉口、汉阳。为了集中兵力于安徽战场，太平军在汉阳、汉口一带仅停留了半个月，11月6日即主动撤离，由石祥祯、韦志俊等率一部兵力留守黄州、蕲州，主力随即转向皖北。

西征军除以部分兵力留守安庆、九江和黄州等地外，集中了一万余人，由胡以晃、曾天养率领，向安徽北部进军。11月14日占桐城，29日占舒城，斩督办安徽团练、工部侍郎吕贤基，直退庐州（今合肥市）。庐州当时为安徽临时省城，太平军如攻占该城，不仅可以成为天京的西部屏障，而且可以北出鲁豫，西进湖北，南援安庆。庐州城垣周长三十余里，守城清军不满三百，乡勇不满五千。由南昌跟踪太平军至湖北的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自汉口经安徽六安，急驰庐州，于12月10日率兵二千七百余人进入城内。同时，清廷还从河南陈州（今淮阳）、江苏徐州、安徽定远等地调兵万余增援。江忠源入城后，按照防守南昌的办法布置庐州城守，但城内兵力、物资均不及南昌充足，只得寄希望于援兵的到来。

太平军进抵庐州后，先行围城。从12月12日开始攻城，连攻数日，均未得手。到12月18日，由东关援庐的清军寿春镇总兵玉山等部二千余人接近庐州。太平军迎击于威武门外，阵斩玉山，并歼其所部大半。次日，又击溃由六安出援的总兵音德布等所部清军四五千人。从此，清军其它各部援兵均裹足不前。自陈州出援的陕甘总督舒兴阿所部四千余人，迟至1854年1月4日才进抵庐州西北的冈子集；自徐州出援的新任江南提督和春部一千人，则于1月12日才赶到庐州东北的梁园。但各路援军均不敢逼近城池，因此，太平军得以从容部署攻城。太平军以城外民房为掩护，挖掘地道。江忠源督军从城内对挖，先后将太平军攻城地道

破坏九处。太平军虽曾两次炸塌城墙，但均未能攻入。其后，太平军改用新法，“于南门月城之旁，另掘数处，形如曲突，又叠为上下层。戒曰：初发时，闻声不必相应，俾其用力堵之；堵而后发，则无及矣。”1月14日夜，大雾迷漫，咫尺不辨，上层地雷轰发，毁城墙五六丈，守城清军连忙抢堵，不久，下层地雷又发，乡勇争相下城，投奔太平军，清军惊恐大乱。太平军攻击部队乘势由缺口冲入，守军纷纷溃退。与此同时，小南门、小东门方向的太平军也缘梯而上，攻入城内，与清军展开巷战。至15日晨，守城清军全部被歼，知府胡元炜降，庐州城为太平军占领。自广西起一直与太平军为敌的江忠源投水自杀。清廷予救援不力的舒兴阿以革职处分。之后，各路援军全归和春统带。

太平军攻占庐州后，没有乘胜追歼清军援兵，扩大战果，仅留胡以晃率近万人驻守，而将曾天养部调往湖北战场，急于开辟新区。2月20日，石达开又派国宗石达英等率部由安庆过长江，经东流、建德（今东至东北）占领祁门。这样，清军得以逐渐集结了三万兵力，对庐州进行长围久困，使太平军无法与当地的捻军结合起来，扩大占领区，在皖北开创新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西征军作战指导上的一次失策。

（三）进军湖北

1853年底，当西征军集中主力攻打庐州时，留驻湖北黄州等地的太平军基本上采取守势。1854年1月29日，湖广总督吴文镕率兵七千进驻黄州以北二十余里的堵城，并命唐树义督水师扼守上游，妄图攻占黄州。这时，由国宗韦以德、地官副丞相黄再兴、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丞相张子朋等率领的水陆大军已由下游开到，曾天养所率太平军也已由庐州到达黄州，连同原有守军，共约四万人。2月初，正值太平天国天历新年，黄州城内举行祝贺活动，吴文镕以为有机可乘，遂连续三次督兵进攻，但均未得逞。堵城“滨江临壑，三而皆水，（清军）大营十一座，排比屯扎，已犯兵家之忌。”加之连日大雪，清军斗志甚低。太平军派出部队，绕至清军大营之后，荫蔽埋伏，敌人毫无察觉。2月12日，黄州城内太平军全部出动，从正面猛攻清军，同时伏兵齐起，纵火焚烧清军营寨。清军前后受敌，纷纷溃逃，湖广总督吴文镕、总兵德亮、知府祭润深等皆被杀。唐树义见陆路覆灭，急率水师上驶金口（后被太平军全部歼灭）。

太平军取得堵城之捷后，便乘势沿江发动进攻，于2月16日第三次攻占汉口、汉阳，并进围武昌。同时，又分兵两路，向湖南和鄂北进军。南路军二万余人由石祥祯及林绍璋指挥，直指长沙；北路军万余人由曾天养指挥，进逼荆襄；留下攻武昌者仅万余人。

湖广总督吴文镕被击毙后，清廷立即命荆州将军台涌接任（暂驻德安府——今安陆县），并以青麟为湖北巡抚，率兵千余据守武昌。同时，从四川调兵四千东下援鄂，并一再催促两广总督速调红单船进入长江，以威胁太平军的长江航道和天京安全。

1854年3月至4月，北路太平军连下湖北孝感、云梦、安陆、随州（今随县）、钟祥。5月2日，攻破荆门，准备由此南下，进围荆州。荆州城内仅有旗绿兵丁二千人，适有奉调援鄂的云南兵一部（由游击王国才等率领）路过该地，新任荆州将军官文便截留协守。太平军向荆州进逼时，官文派王国才率兵一千二百人及练勇五百人迎战。5月9日，双方

战于龙会桥，太平军稍退，清军随即分三路夹攻。太平军不支，曾天养等率部转趋上游，经当阳，于5月18日攻占宜昌。官文立派副都统贵升等率兵千余前往，会同宜昌镇总兵纳钦等率部反攻。5月27日，太平军弃宜昌，接着连下宜都、枝江，拟再攻荆州。6月8日，在离府城数十里处遭王国才等所部清军堵截，乃南下进入湖南境内，以便与南路太平军会师。

（四）挺进湖南

南路太平军水陆并进，挺进湖南，于2月27日占岳州，3月4日占湘阴，7日占靖港，11日占宁乡。这时，新建的地主武装湘军已经组成，太平军南下，受到了湘军的阻击。

1.湘军的兴起

早在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进湘鄂，所向披靡，清廷深感绿营和八旗兵已不足用，便饬令各省举办团练，以助"攻剿"。1853年1月21日，因母丧回湖南湘乡守制的礼部右侍部曾国藩奉命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督办湖南团练。后来，曾国藩认为团练不足恃，决定组建一种新的军队，这就是"湘军"（也称"湘勇"）。

湘军大体上仿照明朝戚继光的营制，以营为基本单位，直接受"大帅"统辖（后增设统领，各统率若士营）。每营编营官一、哨官四、勇丁五百人，另配长夫一百八十人，合计每营六百八十五人。每哨设八队，火器队与刀矛队各半。火器主要有抬枪、鸟枪。全营有劈山炮队二，直隶于营官。湘军水师筹组的时间略晚于陆师。水师每营编快蟹船一、长龙船十、舢板船十，共二十一只，员额为四百四十七人。每只长龙船安炮七门，舢板船安炮四门，均为六百斤至千斤的洋炮。各船还配有火枪、刀矛，以备近战。此外，湘军还设有营务处和粮台，分别管理全军的军务与后勤。

针对绿营兵的流弊，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一是薪饷较高，并专配长夫，自带帐篷，以利于加强训练和作战。二是实行募兵制，采用自上而下的办法，首先选定统领，然后由统领挑选营官，由营宫挑选哨弁，由哨弁挑选什长，由什长挑选勇丁，以便相互熟悉和层层控制。勇丁挑选的对象主要是年青力壮的农民。应募者须有人具保，并编造清册，填写籍贯、住址和父母、兄弟、妻子姓名。它实际上是把"连坐法"应用于对军队的统治。这样，在伍时可以防上勇丁逃亡，解散时可以各有所归。此外，曾国藩所选将领除所谓"诚朴"的读书人外，还从绿营中挑选少数精于武艺的将弁为营官，以便训练水陆兵丁，教会他们掌握技艺和阵法。曾国藩还强调"严刑峻法"，并建立严密的稽查制度，以申军纪，同时，向兵士灌输"忠勇奋发"、"尽忠报效"、绝对服从官长等思想，鼓励湘军士卒大肆屠杀起义人民，为封建统治阶级卖命。

至1854年初，曾国藩已练成湘军陆师十五营、水师十营（拥有战船二百四十只、坐船二百三十只），官弁、勇丁、长夫等共一万七千余人。这支军队实际上是只听命于曾国藩的私人武装，它开创了近代军阀拥兵自重的先例，表明清王朝已经衰朽到难以维护其统一军权的地步。

2.湘潭、靖港之战

自西征太平军进军皖鄂以来，清廷展饬曾国藩率湘军赴援。曾国藩

以战船尚未办齐、在广东购置的火炮（千余门）尚未解到为由，迟不应命。当西征太平军再次溯江而上，进军武汉时，清廷又催促曾国藩率湘军出湖南，迅抵武汉，以阻遏太平军的攻势。曾国藩随即复奏，坚持必俟粤炮解到方可起程，并提出必先扫清湖北江面方可援皖，必力保武昌上游方可进战的方略。

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督率全部湘军分水陆两路自衡州起程，到湘潭集结，随后开赴长沙。3月上旬，陆路湘军自长沙开赴靖港、乔口，阻截南下的太平军。由于湘军陆续北上，太平军难以抗衡，因而一度放弃岳州等处，自湖南撤回湖北。4月初，太平军加强兵力之后，由湖北蒲圻方向重新发起进攻，7日再克岳州。曾因藩在湘军“陆路既已失利，水军亦无固志”的情况下，不得已“乘风上驶，退保省城”。太平军乘胜进至乔口、靖港等地，逼近长沙，并在4月21日、22日于靖港击败曾国藩派出的湘军水师。鉴于长沙防守严密，南路太平军决定由石祥祯率部分兵力扼守靖港，由林绍璋率主力近二万人由陆路绕经宁乡，疾趋长沙西南数十里的湘潭，以便南北夹击，围攻长沙。22日，林绍璋所率太平军大败扼守宁乡的三营湘军（共一千八百人），歼其营官三人及勇丁五百余名。当补用副将塔齐布率湘军一千三百余人驰援宁乡时，太平军已由间道直赴湘潭，并于24日占领了湘潭城，对长沙湘军后路构成严重威胁。林绍璋等督饬太平军于城北赶筑木城，防敌进攻，又收民船数百只，编组水营，控制湘江江面。

4月25日，塔齐布率部赶到湘潭城外，营官江忠淑等率部二千六百名继至。塔齐布认为，太平军“每用以守为战、反客为主之法，若不及时速剿，埃贼背垒既定，攻克为难”，于是立即对太平军展开猛攻。太平军出城迎击，双方在湘潭北郊连日激战。塔齐布令兵勇闻炮即伏，炮止即进，直冲太平军营垒。面对湘军的疯狂进攻，太平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由于初到湘潭，扎营未稳，且又孤立无援，渐呈难以抵御之势。

27日，曾国藩又派湘军水师总统、知府褚汝航等率水师五营驰援湘潭，在湘江内与太平军水营展开激战。湘军水师凭借船炮的优势，庄返冲击。由民船仓卒组建的太平军水营，难以抵挡湘军水师的进攻，三天之内被毁大小船数百只，伤亡逾千人。

由于连日接战不利，加之太平军内部新老战士之间相互埋怨，甚至发生械斗，林绍璋等决定留兵一部守城，自率大队向湘江上游转移。29日，在击退湘军的进攻后，立即集中船只，装载财物，乘风上驶。次日午间抵达下湿司时，不意为湘军水师追及，因拒战失利，便弃船登岸，由陆路拆回湘潭。这时，湘军已在湘潭城外设下伏兵，5月1日，当守城太平军战士缘梯而下，准备接应城外太平军入城时，湘军伏兵骤起，将出城之太平军战士砍死，乘势夺梯登城，打开城门。大队湘军立即冲入，夺占了湘潭城。自下湿司折回的太平军见城已失守，只得分道撤退：林绍璋率部北返靖港，另一部经醴陵东走。湘骤之战，太平军伤亡和逃散甚众，损失惨重。

此前，曾国藩得悉湘军在湘潭水陆初胜，即于4月28日亲率水师五营（大小战船四十只）、陆勇八百人，由长沙进袭靖港，企图使太平军首尾不能相顾。当天中午，南风骤起，水流迅急，湘军战船顺风闯入靖港，遭太平军岸上炮火猛烈轰击，指挥船被击伤，各船连忙降下风帆，

到靖港对岸之钢官渚躲避。太平军立即出动二百余只小划船，对湘军水师发起攻击，毁敌船中余只。湘军水勇不支，纷纷弃船上岸。这时，坐镇白沙洲（距靖港二十里）指挥的曾国藩，急率陆师向靖港方向增援。但湘军陆勇见水师失利，又见太平军大批出动，便纷纷后退，曾国藩执剑督战，也不能遏止。靖港一战，湘军水陆皆败，战舰损失三分之一，炮械损失四分之一。曾国藩羞愤交加，两次投水自杀，皆被随员救起，最后狼狈逃回长沙。

太平军虽在靖港获胜，但无法抵偿湘潭之战所遭受的损失。湘潭失利的直接原因，首先是对战斗力较强的湘军尚缺乏了解，因而在思想上和军事上都缺乏与强敌作战的准备；其次是孤军冒进，立足未稳，遭敌猛攻，措手不及；再就是临时编组起来的水营，抵挡不住经过训练和装备有洋炮的湘军水师，以致连连失利，影响了整个作战。

西征军自1853年从天京出发，到进军湘潭，前后不足一年，先后攻占了安庆、庐州、九江、汉口、汉阳、岳州等重填，有效地保障了天京上游的安全和粮食物资的供应，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且不懂得巩固既得阵地，只顾长驱直进，以致既未能有计划地大量歼灭敌人，骤遇强敌时又不能集中优势决战决胜。此后不久，西征军便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在湘军的进攻下，节节后退，几至不能遏止，对整个西征作战影响甚大。

湘潭、靖港之战，湘军损失也很严重。曾国藩承认：水师仅存湘潭五营二千余人，陆师仅存湘潭与留防平江之勇二千余人。因此，急需招募兵员，修造战船，购置枪械，进行休整补充。太平军方面，自湘潭战败后，不得不于5月4日自靖港等地退守岳州。后由林绍璋率部西向，连克湖南龙阳（今汉寿）、常德、桃源。6月中旬，林部与由湖北南下的曾天养部在常德会师，后乘船越洞庭湖回到岳州，于是西征前线的兵力才得以相对集中。

南路太平军在湘潭失利后，率军围攻武昌的韦志俊等恐湘军长驱北上，湖北难保，便将分散于鄂北各地的太平军调回，并力进攻武昌城，而由石祥祯、林绍璋分军活动于通城、岳州、常德等地，牵制和阻遏湘军。当时，武昌城内清军由于被围日久，饷绌粮尽，巡抚青麟束手无策；总督台涌仍然株守德安府，不敢南下救援；荆州将军官文则受北路太平军牵制，无暇东顾。在此情况下，太平军终于在6月26日攻克武昌，青麟等侥幸突围，绕道逃往荆州。在攻城战斗中，年仅十八岁的太平军将领陈玉成率五百壮士，奋勇当先，表现非常突出。清廷以武昌失守，将台涌革职，青麟军前“正法”。

二、被迫退却

（一）岳州争夺战

湘军经过两个多月的休整补充后，战斗力又得到恢复。1854年7月上旬，曾国藩以二万之众，自长沙北上，水陆并进，再次对太平军发动进攻。水路以水师总统褚汝航等率水师四营二千人进泊岳州南六十里的鹿角，扼岳州太平军南进之路。陆路以署提督塔齐布所部为中路，增派知州罗泽南、魁联之湘勇二千人为助，由新墙直趋岳州；以道员胡林翼

所部为西路，由常德向北推进；以同知林源恩、江忠淑等部为东路，出平江，取道通城、崇阳，直逼武昌。湘军以湖南为大后方，其兵员、粮饷的筹集与供应事宜，均由湖南巡抚骆秉章和左宗棠等负责，基本上无后顾之优。

7月16日，当塔齐布率陆师自新墙向岳州前进时，曾天养率部迎战不利，仍退守岳州。23日，太平军水师在东洞庭湖君山、雷公湖一带遭湘军水师伏击，损失不少船只。太平军水陆连败，形势十分不利，遂于25日主动放弃岳州，退守岳州以北二十余里之城陵矶。

湘军进占岳州之后，太平军决定乘其立营未稳，组织反攻。7月27日，曾天养等督战船四百只，在陆路配合下反攻岳州。湘军分五路迎战。太平军水陆皆败，失战船七十六只，炮二百八十余门，伤亡逾千人，曾天养只得率余部退守临湘。7月30日，韦志俊率部自武昌来援，与曾天养、林绍璋等率战船五六百只，再次反攻岳州。湘军水师迎击于城陵矶。开始胜负未分，后由于湘军水师营官杨载福率舢板绕至太平军水师之后，乘风纵火，太平军战船被焚百余只，伤亡千余人，不得不撤出战斗。

8月8日，曾国藩亲率总兵陈辉龙所部广东水师四百余人自长沙进抵岳州（道员李孟群所部粤桂水师一千人不久也由长沙开到）。8月9日，陈辉龙督队进击太平军。出发前，曾国藩告以“下游水急，进易退难，如遇南风，不必开仗，且沿江港汊，虑有埋伏，获胜后仍勿穷追”。陈辉龙深以为然。及至城陵矶，与太平军相遇，双方前锋开始交战。此时，南风忽起，湘军水师船只顺流而下，难以自控。曾天养见此情景，令大队战船埋伏于旋湖港，另出小舢板诱战。湘军水师中计，陷入重围，进退两难。陈辉龙见风势愈大，急欲收队，但恐前队有失，不得不亲自赶往救援，由于坐船笨重，激战中搁浅。太平军将士蜂拥而上，当即阵斩陈辉龙。湘军水师总统褚汝航牵船救援，也被太平军击毙。同时被歼的还有同知夏銮、游击沙镇邦、千总何若澧以下数百人。陈辉龙一营船炮尽失，其余各营亦损失不少战船。曾国藩闻报，“伤心陨涕”，哀叹经营多时的船械一天之内损失将半。

8月11日，曾天养率兵三千由城陵矶登岸，准备据险扎营，牵制湘军北上，不意塔齐布率兵猝至，来势凶猛。年近花甲的曾天养单枪匹马冲入敌阵，直奔塔齐布。塔连忙躲闪，仅伤坐骑，而曾天养反为湘军所伤，落马牺牲。塔齐布乘势挥军冲击，太平军因主将阵亡，且战且走，从水路撤回，伤亡数百人。曾天养骁勇善战，夙有“虎头军”之称。此次作战，其勇敢精神诚属可嘉，但作为一军主将，脱离部队，单骑陷阵，则是一种鲁莽行为。曾天养阵亡后，太平军在韦志俊率领下，于城陵矶一带与敌相持十余日，接战五次，败多胜少，遂于8月25日撤往武汉。

（二）放弃武汉

太平军撤离城陵矶后，湘军水陆并进，直指武汉：水师于9月4日占嘉鱼，15日进抵武昌西南六十余里的金口；陆师由塔齐布等率领，9月5日从岳州出发，因沿途受到太平军阻击，迟至10月6日才抵达武昌南六十里的纸坊（今武昌县）。曾国藩于10月2日抵金口，不久，与塔齐布、罗泽南等共同商定了进攻武汉的计划：先以水师控制江面，隔断武昌与汉阳之间的联系；以陆师塔齐布部四千人由纸坊进攻洪山，罗泽南

部三千人由金口进攻武昌花园，副都统魁玉、已革总兵杨昌泗率荆州兵四千三百人进攻汉阳。

太平军于6月26日克武昌后，由韦以德、石凤魁、黄再兴等率军约二万人防守。三个多月来，在外围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于花园一带立大营三座，掘深沟宽二丈，长约三里，沟的内侧立木城，实以沙土，中开炮眼，沟外侧立木桩，交互连钉，桩外密布竹签，环以荆棘。木城之内，又有砖城内壕，安炮百余门。汉阳的防御工事也相当坚固。

10月12日，清军开始总攻。当日，曾国藩督水陆两军自金口沿长江三路齐下：李孟群等率水师为中路，其前队闯过盐关，直抵鹦鹉洲，出现于太平军水师之后；当盐关太平军战船回援鹦鹉洲时，湘军水师后队又至，对太平军水师实行前后夹击，烧毁其战船三酉余只。罗泽南部合荆州派来的李光荣部川勇共四千人为右路，进攻花园。他们分路扑向太平军营垒，纵火焚烧，太平军不支败退。魁玉等所率的荆州清军为左路，进攻汉阳虾蟆矶，冲进土城，并破鹦鹉洲太平军营垒。同日，塔齐布部湘军也进扼武昌城东的洪山。

13日，湘军水师直下武昌塘角等地，又焚太平军战船三百余只，前锋进至青山。罗泽南等部破武昌鲇鱼套附近太平军营垒六座。汉阳方面，魁玉、杨昌泗部毁太平军晴川阁木栅及大别山（即龟山）木垒。至此，武汉江面无太平军船只，城外无太平军营垒，武汉三镇暴露在湘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太平军守将石凤魁、黄再兴等（当时韦志俊、石祥祯、韦以德等已东返天京）匆忙决定放弃武汉，于14日展开始撤离。撤退过程中，武昌太平军在城东的洪山遭湘军塔齐布部截击，损失千余人；泊于汉水中的太平军水师战船千余只，因来不及下驶，被湘军焚烧殆尽。

武汉地处天京上游，南控湘赣，北扼荆襄，它的失守，对西征战局的影响甚大。武汉失守的主要原因有三：首先，当太平军在城陵矶阻击湘军时，武汉方面一再派出援军，损失精锐不少，使防守武昌、汉阳的兵力逐渐减少。其次，自曾天养阵亡后，西征战场前线缺乏适当的统帅人物，负责驻守武昌的国宗石凤魁，“粗通文墨，不谙军务”，协助防守的地官副丞相黄再兴，系办文案出身，同样不长于军事，而石达开则一直远离前线，鞭长莫及，无法进行有效的指挥。再次，西征太平军自湖南败退后，士气大挫，一时失去了与湘军作战的信心。在湘军水师前锋刚刚占领金口时，国宗韦以德即托故先回天京;待湘军水师进至武汉江面并战败太平军水师时，武昌太平军仓皇撤离，驻防汉阳、汉口的太平军也随之弃城而走。此外，曾国藩注意到了沿江作战的特点，先以优势的水师从中路突破，取得江面主动权，将两岸太平军分隔开来，以便陆路各个击破，这也是设防坚固的武汉之所以迅速易手的原因之一。

（三）田家镇、半壁山防线被突破

湘军占领武汉后，声名大噪。清廷赏曾国藩兵部侍部街，办理军务。曾国藩于得意之余，即筹划大举东犯，并决定以夺取九江为第一目标。他与新任湖广总督杨霈商定了一个水陆并进，夹江而下，首先突破太平军田家镇、半壁山江防，进而夺占九江的三路进军计划。其兵力部署是：南路由新任湖南提督塔齐布和知府罗泽南分统湘军兵勇沿长江南岸进攻鄂东大冶、兴国（今阳新）；北路由杨霈督陕西提督桂明率绿营

兵进攻蕲州、广济（今蕲春东南）；中路以水师顺江而下，由参将杨载福、同知彭玉麟率部先发，曾国藩与李孟群率后队继进。预定三路会师于田家镇，总兵力约万余人。

太平军方面，杨秀清已于10月15日将湖北军事委托给燕王秦日纲统理（秦奉命巡查河道，当时已到九江），命其在湖北田家镇、半壁山一线加紧设防。太平军在田家镇至蕲州一段四十里之江岸修筑了一些土木城，安置炮位；在田家镇与南岸半壁山之间横架铁链二道，两链相距约十余丈，铁链之下排列小船数十只，配以枪炮；在半壁山扎大营一座、小营四座，山下挖掘三四丈宽的深沟，内侧建立木栅、炮台，外侧密钉竹签、木桩。为了加强该处防御，场秀清还专门派人从天京送来一座木，作为江中堡垒。此时，从武汉退回和从下游来援的太平军总数又达数万，号称十万人。他们设防虽较严密，但在作战指导上却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

1854年10月底至11月初，清军自武汉分批出发。自武昌起程的南路湘军分为两支：一支由塔齐布率领，经武昌县（今鄂城）趋大冶；一支由罗泽甫率领，经金牛镇趋兴国。11月11日，两支湘军分别陷大冶、兴国。不久，罗泽南部进扎半壁山下，塔齐布部进扎半壁山东南十里之富池镇。

半壁山孤峰峻峙，俯瞰大江，北麓尤为陡峭，形势险要，是太平军重点守备之地。曾国藩认为，“先攻田镇对岸之半壁山，夺其要隘，则铁锁（链）一岸无根，当易拔去。”11月20日起，双方于半壁山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攻防战，太平军作战不利。23日，秦日纲亲自督军二万，与罗泽南等部湘军再战，复大败，伤亡数千人，余部退至田家镇，半壁山随即失陷。湘军派百余人缒崖而下，将横江铁链砍断。适国宗韦志俊，石镇仑、韦以德等自芜湖率援军赶到，24日配合秦日纲督军自田家镇分路渡江，进攻占据半壁山之敌。鏖战竟日，太平军各路俱败，石镇仑，韦以德等千余人阵亡，秦日纲和韦志俊率余部退回长江北岸。次日，太平军又将江中铁链钩联于南岸半壁山下。

湘军水师东下时，太平军检点陈玉成部将敌前锋阻截于蕲州。半壁山被湘军攻陷后，陈玉成于11月29日令水营突围下驶，于是湘军水师得以顺流而下。12月1日，杨载福与塔齐布等商讨进攻田家镇的计划，鉴于太平军江防坚固，确定将战船分为四队：一队专管斩断铁链；二队专管攻击太平军炮船，三队待铁链破除后直趋下游，焚烧太平军船只；四队守卫老营，防太平军袭击。12月2日，湘军战船出动，塔齐布督同罗泽南等率陆师六千人，排列南岸，以助水师声威。湘军水师傍南岸惫桨而下，直至铁链之前，“以洪炉大斧，且熔且椎，须臾锁断”。当太平军炮船前往救护时，湘军水师第二队随即上前发炮轰击，毁太平军炮船二艘。待湘军水师第一队将江中铁链破坏后，其第三队舢板船飞桨下驶，太平军水师阵势遂乱，纷纷败退。湘军舢板船疾驶武穴（今广济）、龙坪一带，从下游纵火焚烧太平军战船。时值东南风大作，太平军上游之船无法下撤，被烧毁不少。12月3日，秦日纲、韦志俊等自焚田家镇营垒，率部东退黄梅。至此，太平军苦心经营的田家镇，半壁山江防被湘军彻底突破。

太平军从湘潭作战失利到田家镇，半壁山防线被突破，以水师的损

失最为惨重，前后有近万艘船只被敌军焚毁、击沉，从而使湘军水师得以在天京上游江面横行无忌。这不仅直接影响了西征战场上的陆路作战，而且使天京受到愈来愈大的威胁。

三、转败为胜

（一）九江之战

湘军攻占田家镇、半壁山后，水师前锋在彭玉麟率领下于12月8日进至九江江面。这时，太平军主力大部集中于长江北岸，清军仅凭魁玉、桂朗的部队无法取胜，曾国藩乃命南路之塔齐布，罗泽南所部湘军于12月9日渡江。曾国藩亦于次日抵田家镇，指挥北岸的作战。当日，太平军冬官正丞相罗大纲也由江西饶州率军近万人渡江至九江对岸之小池口，支援秦甲纲等部，抗击清军的进攻。12月20日至31日，太平军先后与敌军战于鄂东双城驿、黄梅、濯港、孔垄驿，接连失利，只得退入安徽境内。

1855年1月2日，罗大纲率部渡江，返守湖口。这时，石达开已带领胡以晃等自安庆抵湖口，曾国藩也由田家镇进抵九江城外。双方主帅俱临赣北前线，战事逐渐由江北移向江南。

湖口位于鄱阳湖入长江口之东岸，依山傍水，形势险要。湖口之西对岸为梅家洲，再西五十里，即为古城九江。石达开等鉴于湘军气势正盛，水师更占优势，便决定扼守要点，伺机退敌。具体部署是：石达开坐镇湖口，林启容仍率部守九江，罗大纲率部守梅家洲。

为了集中力量进攻九江，湘军加紧从江北向南岸转移兵力。1月6日，塔齐布部从上游琵琶亭渡江，次日移驻九江南门外。8日，新任湖北按察使胡林翼也率黔勇二千赶到，分扎要隘。9日，罗泽南部从下游白水港渡江。曾国藩又调副将王国才所部三千余人为预备队。这样，围攻九江的清军总兵力达到一万五千人。

九江北枕长江，东北有老鹳塘、白水港，西南有甘棠湖，西有龙开河，湖汊纵横，东南多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太平军守将林启容督军于四周严密设防，东南尤为坚固。1月14日，塔齐布、胡林翼率部进攻西门，三战皆败，死伤甚众。18日，清军发起全面进攻，塔齐布部攻西门，胡林翼部攻南门，罗泽南部攻东门，王国才率兵七百由长江水路登岸攻九华门。太平军沉着应战，待塔齐布部进抵城西时，“众炮齐放，子若飞蝗”。敌人冒死进攻，“奈地险而路曲，难以仰攻”，终未得逞。进攻其它各门之敌，也“因城上枪炮木石交施，屡次抢登，不能得手”。于是，曾国藩轻取九江的计划宣告失败。

曾国藩攻九江不下，改取“舍坚而攻瑕”的方针，留塔齐布等部继续围攻九江，派胡林翼、罗泽南等率部进驻梅家洲南八里之盔山（今灰山），企图先取梅家洲，占领九江外围要点。太平军守将罗大纲在这里“立木城二座，高与城等，炮眼三层，周围密排；营外木桩、竹签广布十余丈，较之武昌，田镇更为严密；掘壕数重，内安地雷，上用大木，横斜搭架，钉铁蒺藜其上。”1月23日，清军分路向梅家洲发起进攻。太平军凭借工事奋勇抗击，毙敌数百人，击退了清军的进攻。

（二）湖口大捷

由于清军进攻九江和梅家洲均未得逞，曾国藩等决定改攻湖口，企图凭借水师优势，先击破鄱阳湖内太平军水营，切断外援，尔后再攻九江。

1855年1月3日，当湘军陆师尚来南渡之际，李孟群，彭玉麟即率湘军水师进抵湖口，分泊鄱阳湖口内外江面。罗大纲鉴于湘军水师占优势，难以力胜，决定采用疲敌战法。1月8日夜，“用小船百余号，或二三只一联，或五只一联，堆积柴草，实以硝药，灌以膏油，分十余起，纵火下放，炮船随之。两岸出队千余人，呼声鼎沸，兼放火箭火球”，对湘军水师实施火攻。由于湘军预有准备，未能取得多大战果。此后，太平军常以类似战法袭扰和疲惫敌人，使其“彻夜戒严，不敢安枕”。太平军还在鄱阳湖口江面设置木簰数座，四周环以木城，中立望楼。木簰上安设炮位，与两岸守军相犄角，严密封锁湖口，多次击退湘军水师的进犯。1月23日，湘军水师乘陆师进攻梅家洲之机，击坏太平军设于鄱阳湖口的木簰。石达开、罗大纲等将计就计，令部下用大船载以沙石，凿沉水中，堵塞航道，仅在靠西岸处留一隘口，拦以篾缆。1月29日，湘军水师营官萧捷三等企图肃清鄱阳湖内太平军战船，贸然率舢板等轻舟一百二十余只，载兵二千，冲入湖内，直至大姑塘以上。待其回驶湖口时，太平军已用船只搭起浮桥二道，连结垒卡，阻断出路。湘军水师遂被分割为二：百余“轻捷之船”，二千“精健之卒”，陷于鄱阳湖内，留于长江内者，“多笨重船只，运棹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致使曾国藩“实觉无以自立”。太平军乘此有利时机，即于当晚以小船数十只，围攻泊于长江内的湘军大船，并派一支小划船队，插入湘军水师大营，焚烧敌船。岸上太平军数千人也施放火箭喷筒，配合进攻。湘军大船因无小船护卫，难以抵御，结果被毁数十只，其余败退九江附近江面。

在湖口大捷的同一天，江北秦日纲，韦志俊、陈玉成所部太平军自安徽宿松西进，击败清军参将刘富成部，占领黄梅。2月2日，罗大纲派部进占九江对岸之小池口。曾国藩以“水师既陷于内河，陆军复挫于小池口”，遂调胡林翼、罗泽南二部由湖口回攻九江，驻于南岸官牌夹。为了给湘军水师以进一步的打击，罗大纲乘势于2月11日率大队渡江前往小池口。当夜三更，林启容自九江，罗大纲自小池口以轻舟百余只，再衣袭击泊于江中的湘军水师，“火弹喷筒，百枝齐放”，焚毁大量敌船（其余敌船纷纷逃至武穴以上），并缴获曾国藩的坐船。曾国藩事先乘小船逃走，后入罗泽南陆营，复欲寻死，被罗泽南等劝止。

太平军取得湖口之战的胜利，打破了曾国藩夺取九江，直逼金陵的狂妄企图，开始扭转了西征战场上的被动态势，从而成为西征作战的又一转折点。西征军自湘潭战败后，弃岳州，失武汉，节节退却，直至九江、湖口，形势十分不利。但另一方面，由于清军的进攻，太平军被迫缩短了战线，集中了兵力，加强了指挥，消除了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弱点。湘军虽然节节胜利，却预伏着种种危机：由于掳获甚多，“饱则思飏”；由于屡胜，骄傲轻敌：由于长驱直进，离后方供应基地越来越远，运输补给日益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等坚守要点以疲惫敌人，并利用有利地形，抓住有利时机，机智果断地分割湘军水师，进而立即主动出击，取得了重创湘军水师的重大胜利，使整个西征战场的形势为之一变。

四、乘胜反攻

（一）再克武昌

西征太平军取得湖口大捷之后，石达开、胡以晃等决定乘胜发起反攻。

2月16日，秦日纲、陈玉成等乘清军后路空虚，率部西进，击溃湖广总督杨霈所部清军万余人于广济。接着，连占蕲州、黄州，于23日第四次占领汉阳，杨霈逃往安陆。韦志俊率部自田家镇渡江，25日进占兴国，不久又进占通山、崇阳、咸宁，与秦日纲部会攻武昌。3月下旬，罗大纲牵部复占江西饶州府，不久又回安庆，与皖南太平军范汝杰部会合，进占徽州府（今歙县）等地。

湘军水师自遭太平军打击之后，又于2月20日遭暴风袭击，沉船二十二只，毁坏二十一只，曾国藩令其余七十余只全数撤往武汉，“名为速剿上犯之贼，实则修整已坏之船”。这时，曾国藩的湘军已被分割于五处：水师之一部开赴武汉整修；一部困在鄱阳湖内，由曾国藩坐镇南昌，亲自督造大船，添募水勇，准备配合江西水师伺机出击，陆师塔齐布部五千人留驻九江外围，准备继续攻城，李元度部三千人留驻湖口外围，罗泽南部三千人往援赣东。此外，胡林翼部二千余人和王国才部三千余人则先后回援武昌。显然，曾国藩所统清军由于兵力分散，已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由主动陷于被动。

从3月21日起，秦日纲、陈玉成部太平军围攻武昌。困守武昌的二千清军由新任湖北巡抚陶恩培督率。武昌被围后，清军急抽兵增援。数日内，城外援兵已达万人。4月3日，秦日纲与韦志俊等督军猛攻武昌。城内清军“争缒城走，外兵亦走”，而“水师固不任城守事”，仅“自保而已”。太平军直奔城下，“用缒城绳引而上”，占领武昌城，杀陶恩培等多人（一说陶赴水自杀）。

1855年4月18日，清廷以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以李孟群为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统率湖北清军，“屯金口，倚永师自保”，并“增募二千六百人，合王国才等军，号六千。”

太平军占领武昌后，陈玉成立即率兵一部进军鄂北，于4月上旬攻占安陆（后又失守）和云梦。5月12日，再次攻克安陆，杨霈退守随州。17日，西安将军札拉芬及副都统常亮在清廷一再督促下，率援军自河南抵随州。31日，陈玉成率军往攻，大败札拉芬等部于随州东南之五里墩，阵斩札拉芬。杨霈经枣阳逃往襄阳。6月11日，清延将杨霈革职，湖广总督由荆州将军官文接任。14日，又命曾与北伐太平军作战的西凌阿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军务，并从山东抽调镇压北伐太平军的所谓“得胜之师”四千五百人至湖北，一千五百人至河南，加强这些地区的“堵剿”兵力。

6月10日，署湖北巡抚胡林冀督军四千余人分三路反攻武昌，与此同时，王国才率部反攻汉阳，彭玉麟部水师则助攻两岸。太平军略有损失，但击退了敌人的进攻。20日，秦日纲自武昌派太平军绕袭金口，抄胡林翼部后路，迫使胡部回援。其后，双方又多次交战，互有伤亡。9月7日，韦志俊率部自武昌出发，在通城、崇阳等地太平军的配合下，于9月12日攻占金口，同时击败李孟群部水师，迫使其退守新堤（金口西南）。9月18日，湖北太平军自汉阳分兵八路围攻胡林翼和王国才部于汉阳西南之奓山。清军大溃，经大军山退往新堤。太平军没有乘胜追

击，致使胡林翼得殿置整旗鼓，卷土重来，实属失策。

（二）转战江西

当西征军在湖北战场上捷报频传之际，活动于安徽、江西边境的太平军范汝杰部，于1855年4月中旬连占安徽婺源和江西弋阳，后又连克江西兴安（今横峰）、上饶、玉山等地。4月14日，湘军罗泽南部三千余人自九江经南昌驰援赣东，于5月6日陷弋阳，12日陷上饶，并在这一带与太平军周旋，直至7月18日才回驻南昌，质又奉命西援武昌。

10月上旬，罗泽南率湘军五千人（除罗部外，曾国藩加拨参将彭三元等部一千五百人随往）由江西义宁州（今修水）进入湖北，于中下旬占领通城、崇阳，直逼武昌。当时，秦日纲已奉命由湖北返回天京；石达开、胡以晃、黄玉昆率领的太平军二万余人正自安庆进援湖北。11月1日，石达开军在武昌县之樊口登岸后，经金牛镇前往咸宁，以阻截罗泽南所率湘军。4日，石达开亲率二万人大败罗泽南部于崇阳壕头堡，彭三元等所部千余人全军覆没。5日，太平军克复崇阳。罗部退至蒲圻西南之羊楼洞，并与胡林翼派去的援军取得了联系。14日，石达开军复通城。

当石达开军进攻崇阳时，韦志俊率军近二万人由纸坊进抵蒲圻。石、韦二人约定分路攻取湖南，抄袭湘军的老巢。但是，石达开不久便改变上述计划，他见湘军全力救援武汉，江西兵力空虚，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策，进军江西，威胁曾国藩的南昌大营，以调动湘军，减轻湖北太平军的压力。石达开把对付罗泽南部湘军的任务交给韦志俊（韦部不久即败退武昌），自率三万人于11月24日折入江西。

12月9日，石达开军进占江西新昌（今宜丰），与从广东北上的天地会起义武装周培春，葛耀明等部数万人会师，声势更壮。接着，分兵连占上高，瑞州，新喻（今新余），峡江、樟树镇（今清江）等地，威逼南昌。坐镇南昌的曾国藩，因石达开部逼近，于12月下旬急调围攻九江的周凤山部湘军（塔齐布于8月30日暴病而死，由副将周凤山接统九江外围湘军）五千人回援南昌，并调鄱阳湖内水师防守赣江。于是，被敌人围困几近两年的九江得以解围。

鉴于南昌敌军兵力增强，石达开所率各部继续进攻南昌周围各府县，先后占领新淦（今新干），奉新、分宜、宜春、吉水、永丰等地，以切断南昌清军与外围的联系，断绝其后方供应。

1856年（咸丰六年）1月11日，湘军周凤山部攻占樟树镇。2月9日，由武汉经街州潜行至江西星子的道员彭玉麟也率内湖水师赶到樟树镇。22日，湖南巡抚骆秉章派补用知府刘长佑、同知萧启江分别率部自醴陵，浏阳增援江西，3月18日占萍乡，准备继续东进。“樟树炉者，西近瑞（州）、临（江），东接抚（州）、建（昌），（赣江）两岸之关键，省城（南昌）之咽喉”。因此，曾国藩“用全力扼守樟树镇，以保东岸，以卫省垣”。有鉴于此，石达开集中兵力，从3月22日起，向樟树镇发起攻击。24日，太平军四路围攻，尽破周凤山所部湘军营垒，杀敌千余。周凤山率残部逃奔南昌。曾国藩惊恐万状，再次奏请调回罗泽南所部湘军，力言‘罗泽南在鄂，一时尚难得手”，“与其顿兵坚城，攻遥遥无期之湖北，又不如移师腹地，救岌岌将殆之江西。武汉两岸，三万余人，即无罗泽南一军，亦尚足敷防剿；江省西南与湖南，广东接壤，若

不迅速殄除，实系三省无穷之患”。

石达开率军由湖北转战江西，先后攻占数十座城镇，使西征战场上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但是，正当南昌指日可下，曾国藩“呼救无从”，“魂梦屡惊”之际，洪秀全、杨秀清等从西征战场大量抽调太平军回救天京。4月，石达开率部二三万人经江西安仁（今余江东北），万年（今万年西）、乐平出江西境，取道皖南，回援天京。太平军江西军务由卫天侯黄玉昆主持（后由韦昌辉接替）。此后，江西太平军基本上停止了进攻，从而给了困处南昌的曾国藩以绝路逢生的机会。太平军的西征作战，至此也就告一段落。

太平军历时三年的西征，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占领和保住了天京上游的安庆、九江、武汉三个重镇，以及安徽、江西、湖北的部分地区。这不仅在军事上使天京有了可靠的屏障，而且在经济上保证了天京的粮食供应，为尔后坚持更艰苦的斗争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西征作战之所以出现由胜到败和转败为胜的曲折过程，既有其客观原因，也与双方前线将领的作战指导密切关联。西征之初，太平军连战皆捷，便产生了轻敌速胜思想。武昌未下，即急于分兵，北攻荆襄，南下湘岳，将仅有的三四万军队，分向三处作战，结果南路军在湘潭骤遇强敌受挫，被迫节节后退，整个战局为之变坏。直至湖口之战，太平军集中了兵力，加强了指挥，并利用了湘军指挥上的错误，才得以转败为胜。

太平军在西征作战指导方面所产生的一些失误，自然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定都金陵之后所作出的战略决策有关。仅以数万兵力，就想一举夺取皖、赣、湘、鄂四省，明显地存在着战略目标过大与兵力不足的矛盾。在轻敌思想支配下，必然产生分兵冒进的错误。而西征总指挥部又设在安庆，远离前线，不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情况，实施正确有力的指挥，使多路分兵的后果更为严重；加之某些前敌将领缺乏独当一面的指挥才能，因而自湘潭战败后，便节节败退，几至不可收拾。转入反攻后，仍未克服多路分兵的缺点，虽然在湖北，江西战场上取得了不少胜利，但击溃敌人多，歼灭敌人少。由于以上种种失娱，以致未能给尚处于初建阶段的湘军以彻底歼灭的打击，终于使这支凶狠的地主武装得以不断发展，成为尔后致太平军以死命的劲敌。

第七节 一破江北江南大营（1856年2月～6月）

1853年5月以后，太平军的精锐部队分别调往北伐、西征战场，天京附近兵力大为减弱，以致经常受到江北、江南大营清军的威胁。1854年7月，清廷从广东所调的五十只红单船陆续驶抵镇江一带江面，太平争的“龟船”和部分背垒相继被其击毁，对天京的水上运输威胁甚大。1855年，形势更趋严重。继北伐军于当年5月全军覆没之后，天京西翼重镇太平府和芜湖又于7月被清军攻占。11月，皖北重镇庐州失陷，天京的东方屏障镇江及其对岸的瓜洲，也屡遭清军进攻，使天京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好在自1855年初起，西征战场转败为胜，太平军又重新夺回了武汉以及湖北，江西部分地区，湘军陷入了兵分数处，被动挨打的局面。这就使天京当局有可能从西征前线抽调大军东援，摧毁江北、江南大营，改善天京处境。

太平军击破江北，江南大营之战，历时四月有余。整个作战过程大致分为打通天京与镇江的联系，攻破江北大营、击败镇江外围之敌、攻破江南大营四个阶段。

一、打通天京与镇江的联系

清军于1853年5月就开始围攻金陵下游的咽喉要地镇江。1855年4月，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在镇压了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清军七八千人到达镇江外围，加紧对镇江的围攻。镇江城内米粮、火药渐感缺乏，形势十分严重。所以，太平军调兵回援后，首先东援镇江。

镇江城内有太平军约万人，守将为检点吴如孝。太平军东援时，由吉尔杭阿统领的镇江外围清军兵力已增至万余人，分别驻扎于城西南之九华山和城东之京岘山一带，另由提督余万清率兵一部驻于下蜀街，总兵虎嵩林率兵一部驻于高资，准备阻截由天京东援的太平军。

1856年初，冬官正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奉命自皖西率部返回天京。2月1日，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率太平军数万人自天京分两路东进：一由天京东北的观音门沿江至栖霞一带，直趋镇江，一由神策门至紫金山东面的仙鹤门，以为掩护。清军一面在仙鹤门一带迎战，一面由镇江方面派兵防堵。双方连日接战，不分胜负，后相持于龙潭、下蜀之间。镇江守将吴如孝得知天京派兵东援，曾多次派兵出城接应，均被清军堵回。

为了打破僵局，秦日纲等商定由陈玉成北少数精兵于夜间乘小船顺长江“舍死直冲到镇江”，“与吴如孝计及抽军由内打山”，以便东西两面夹攻清军。4月1日晨，秦日纲等率大军由仓头一带向东直进，清军迎战。至午间，战斗正酣，先一日抄小路迂回至下蜀清军后路的李秀成所率三千人突然发起攻击。清军腹背受敌，阵势大乱。这时，陈玉成、吴如孝也率镇江守军赶到，两支太平军胜利会师。次日，太平军又大败吉尔杭阿等部清军，连破敌营十六座，直抵镇江，屯扎于金山、金鸡岭、九华山脚，与九华山的吉尔杭阿大营对峙。

太平军会师镇江后，连夜调集船只，载大部军队由金山渡江至瓜

洲，另留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一军扼守仓头后路。

二、攻破江北大营

1853年底，太平军为筹组北伐援军而放弃扬州之后，瓜洲一带仍由赖汉英等率兵一部驻守。由于这一带地势平坦，驻该处的太平军全恃木城、深壕，引水环绕防守，多次击退江北大营清军的进攻。1854年秋，琦善病死于扬州军中，清廷以江宁将军托明阿继任钦差大臣，而以真陈金绶、雷以諴帮办军务。清军为防止瓜洲太平军北进，西自仪征的新城，东至运河边的施家桥，筑长墙一道。盾为了进攻瓜洲，又在长墙以南，从八里铺向东西两侧延伸，加筑土墙一道，绵亘四十余里。土墙筑成后，江北大营也前移至八里铺，并沿土墙修筑营盘和炮台各二十余座。

1856年4月2日，吉尔杭阿派人向江北大营通报了太平军将渡江北上的情报，但来引起托明阿等的重视。当晚，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率大军渡江，到达瓜洲。4月3日拂晓，太平军对土桥发起猛烈进攻，清军大败。秦日纲等督军乘胜猛进，连破虹桥、朴树湾等清军营盘。敌人望风披靡，争相逃命，溃散大半，炮械旗帐尽弃，托明阿等逃疥三汊河。太平军一鼓作气，次日又大败三汊河之敌，连破敌营一百二十余座。清军余部千余人退守秦家楼，蒋王庙一带。托明阿仅带数十骑连夜逃往扬州东北的邵伯镇。5日，太平军乘扬州城防空虚，兵不血刃地再克扬州。至此，经营了三年之久的江北大营被太平军一举摧毁，万余清军作鸟兽散。

秦日纲等率军北攻扬州，主要目的在于征集粮食，以济镇江、瓜洲守军的急需。因此，在攻破江北大营并完成粮食征集任务后，为了回军天京进攻江南大营，随即率部南返，仅留少数兵力驻守场州，致使这个江北米粮集聚要地又于4月17日被清军江南大营所派援兵及江北大营的败兵再占。

秦日纲等本欲率军自瓜洲南渡，因得悉据守仓头的周胜坤部被清军所败，由南岸返回天京之路已被切断，乃于4月14日率兵自扬州西进，前队于16日攻占浦口，准备由此渡江南返。但就在当天，钦差大臣向荣派总兵张国梁率兵勇二千四百名由南岸栖霞附近之石埠桥渡江，配合北岸清军于4月22日攻陷浦口，27日又进占江浦，致使太平军由浦口南渡之路被阻。秦日纲等只得于28日折而东返，经仪征至三汊河，并在此休整二十余天，于5月27日由瓜洲渡江，屯驻金山。于是，大江以北仍仅有瓜洲一地为太平军所据守。

清廷因扬州之败，将托明阿等革职查办，任命副都统德兴阿为钦差大臣，统率江北诸军。

三、击败镇江外围之敌

秦日纲等率太平军南渡之后，5月29日攻占黄泥洲，并乘胜猛攻高资清营，拟打通回京之路。吉尔杭阿闻警，自九华山大营率队往援。6月1日，太平军大败高资清军，并击毙吉尔杭阿（一说吉自杀）。3日，太平军围攻九华山，清军见主帅已死，不战自溃，三十余座营盘全部瓦解，提督余万清负伤后逃往京岘山大营。6日夜，太平军从地道攻入京岘山清军西营，守敌早已溃逃。次日，太平军继续进攻东营。由于镇江告急，向荣派署江宁将军福兴和总兵张国梁率马步兵三千人自龙潭出发，经上塘、河阳绕至镇江以东的丹徒镇，于6月10日向围攻京岘山的太平军进攻。秦日纲等见防守龙潭的清军主力已前来镇江，不积极打击援兵，反而尽弃九华山营垒，于13日经高资、下蜀、龙潭返抵天京东北的燕子凯、观音门，给镇江的防御带来了不利影响。

四、摧毁江南大营

当秦日纲等率军东援镇江之际，石达开率领的二三万太平军于5月2日占领安徽宁国府（今宣城），11日克芜湖，18日进攻秣陵关。向荣见江南大营受到威胁，急忙派总兵张国梁率部前往阻截。

这时的形势对太平军十分有利。江南大营原有兵力二三万人，由于太平军东援镇江和进攻江北大营时向荣已从江南大营抽兵往援，石达开部取道皖南回京时，向荣又分调清军数千进行防堵，因而其部队被迫分布于孝陵卫、镇江、广德、溧水、宁国等宽广的地区，各处兵力都很薄弱。向荣在奏折中诉苦说：“臣军精锐，尽已调出，存营不满五千，除去疲病守营，出队仅一千余人……。”向荣为了要求迅即增兵，难免夸大其词，但江南大营兵力空虚，确是实情。

为了调动敌人，石达开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令其南路部队于6月13日攻占溧水。“溧水咫尺东坝，接连溧阳，均系入苏常要道”。而屏蔽苏、常，是江南大营的主要任务之一，太平军攻占溧水，向荣认为“大局攸关”，立即调兵遣将；令江长贵部一千四百人由句容前往堵截，“先遏内犯之路”，令明安泰部“星夜拔队，由湖熟赶往援剿”；并由大营抽调亲军千名，义勇五百名“先往助仗”，随后又令得力干将张国梁选带精兵，“驰往统领督剿”，“迅图克复”。这样一来，天京附近的清军兵力更形空虚。

秦日纲等率军回抵燕子矶、观音门后，本欲进入天京，但东王杨秀清见清军江南大营已危如累卵，严令他们必须攻破孝陵卫江南大营后方准入城。陈玉成、李秀成等进京当面向杨秀清申述：“向营久扎营坚，不能速战进攻。”杨秀清厉声说：“不奉令者斩！”于是陈玉成等“不敢再求，即而行战”。

太平军选定孝陵卫东北的仙鹤门为主攻方向，西北的龙脖子（地保城）为助攻方向。6月17日，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瘁部自燕子矶移营仙鹤门。天京太平军一队数千人越过龙脖子，另一队七八千人自神策门、太平门出城，占据大小水关及冯家边一带，离仙鹤门数里筑垒，

与秦日纲军相呼应。向荣派总兵王浚统带马步兵二千人前往仙鹤门防堵。18日，双方接战，未分胜负。当天，另一队太平军三四千人自龙脖子冲出，摇旗呐喊，牵制和吸引清军注意力。同日，石达开军北支队也赶到仙鹤门、尧化门一带，筑垒数十处，前锋抵达柴金山东面的黄马群，切断了江南大营赴仙鹤门的必由之路。向荣见大营危在旦夕，急令张国梁抽带兵勇千余名由溧水星夜赶回大营，并从丹阳、秣陵关调兵一千三百人回援，同时，严令王浚等“加意固守待援”，密令都司冯于材带广勇五百名，“多带火弹，夤夜潜赴黄马群”，焚烧太平军新筑各垒，以便“与仙鹤门之营通气”。

6月19日拂晓，太平军四五千人直扑仙鹤门敌营，接着又出动数千人分七八队进行包抄，王浚等部清军溃退。与此同时，龙脖子方面的太平军也出动二三千人，排立山脚，向荣不得不从大营抽兵六百前往抵御。当天，张国梁率兵一千二百名赶至大营，但慑于太平军的声势，不敢应战，只是连夜在青马群（黄马群南）一带筑垒，妄图阻止太平军的进攻。

6月20日晨，各路太平军发起总攻。仙鹤门方向的太平军多路齐出，将敌营团团围困，另一路太平军二三千人翻过紫金山，从后路直播清营。与此同时，天京城内又派数千人出通济门，直扑七桥瓮。向荣亲率大营兵勇一千二百名赶赴七桥瓮，名为抗击，实则为逃跑作准备。这时，紫金山上又一支太平军四五千人由灵谷寺下山，攻破满洲马队营盘，纵火焚烧，同时，洪武（今光华门）、朝阳（今中山门）等门太平军亦分路出击，连下清军营寨二十余座，进而攻破孝陵卫大营，清军大溃，死伤副将以下千余人。向荣，张国梁等连夜败走淳化镇，21日又经句容逃往丹阳。至此，威胁天京达三年之久的清军江南大营也被太平军彻底摧毁。

摧毁江南大营之后，杨秀清即令秦日纲统军追击残余清军，韦昌辉主持江西军政，石达开前往湖北，解武汉之围。

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等率部于6月27日占句容，7月3日进抵丹阳城外，与清军相持月余。8月9日，向荣恐清廷治罪，自杀于丹阳营中（一说忧郁而死），钦差大臣由江南提督和春继任。

太平军先后攻破江北、江南大营，打破了清军对镇江的围困，拔掉了威胁私的两个钉子，大大改善了天京的处境。太平军这一重要的军事行动，是集中了各战场的主力进行的。它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但从战争全局来看，在进攻时机的选择上并不十分恰当。因为，在西征军正由节节退却转入胜利反攻的时候，骤然将主力抽出，使湖北，江西战场停止了对敌人的进攻，特别是放过了处于垂败状态的曾国藩湘军，这不能不说是指导上的失策。此外，太平军在作战过程中大部是打的击溃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多，特别是在击溃江北大营和解镇江之围的作战中，都放过了追歼逃敌和攻歼援敌的有利战机，因而江北大营不久就又恢复，镇江则仍处于敌军包围之中，并于次年年底被清军攻陷。

自1851年初金田起义到1856年夏季天京解围，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也遭受了几次大的挫折。从战略指导上看，在占领金陵之前，太平军基本上是集中兵力向着一个战略方向实行进攻的，而其所选定的战略方向，是关系着敌人的要害而又是敌人防御薄弱的方

向，是可以得到广大群众支持和易于取得人力物力补充的方向，因而能比较顺利地打破清军的围追堵截，长驱直进，势如破竹，取得了一连率的胜利，并迅速壮大了革命队伍。占领金陵之后，迅速攻占镇江、扬州，切断北京的粮运孔道，取得拱卫灭京的屏障，这一决策也是正确的。但洪、杨等对跟踪包围自己的敌军却未及时予以歼灭，而听其建成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同时，违背集中兵力的原则，分兵北伐与西征，冀图以有限的兵力，在两个互不联系的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致一支军队全军覆灭，另一支军队也遭受很大挫折，使整个战局陷入被动地位（如果没有西征军的湖口之捷，则局势将会迅速恶化）。这是太平天国领导者在定都金陵之后滋长了骄傲轻敌情绪的结果，也是缺乏通观和驾驭全局能力的表现。军事战略上的这种失策还是可以改正和弥补的，而革命领导集团内部自相残杀，才是致命的。1856年秋开始的天京内讧，终于导致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太平军从此在战略上山步步地陷入了被动应付的不利地位。

第三部分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1860年11月）

1856年，正当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江中游及天京外围激烈搏斗，各地各族人民武装起义风起云涌，严重威胁着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时候，英国侵略者向中国发动了新的武装进攻，第二年扩大为英法联军的侵华战争。侵略者发动这次战争的目的，在于攫取此《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更大的殖民特权。它实质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的继续和扩大，因此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侵华战争的直接出面者是英国和法国，卖力支持和趁火打劫的则有沙俄及美国。它们狼狈为奸，相互配合，以战争手段迫使既自大又软弱的清王朝作出让步，满足其侵略要求，进而彼此勾结，共同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主的人民起义。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中外反革命结合过程的具体表现”。

第一节 英国制造借口，挑起战争（1856年10月～1857年1月）

一、“亚罗船事件”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国以所谓“亚罗船事件”为借口首先发动的。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广州海珠炮台附近码头检查装有走私货物的“亚罗”号船，并逮捕了船上两名海盗和十名有嫌疑的中国船员，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为挑起事端，胡说“亚罗”号是英国船，并造谣说中国水师在该船捕人时，曾扯落船上的英国国旗，有损英国的权利和荣誉，向广州当局提出赔礼道歉、释放人犯等无理要求。

“亚罗”号是中国人苏亚成于1854年8月建造的商船。苏亚成非法弄到一张港英执照，并雇用了一个叫亚罗的外国人在船上工作，便称“亚罗”船。1855年6月，该船转卖给另一中国商人方亚明。方又领取了一张自当年9月27日起有效期为一年的港英执照，并雇用一个英国人为名义上的船长。该船雇用的水手中隐藏着海盗，他们凭借港英执照作掩护，从事鸦片走私和抢劫等犯罪活动。广东水师上船搜捕时，该船执照已经过期，而且船上根本没有悬挂英国国旗。逮捕船上海盗，纯属中国内政，英国根本无权干涉，因此，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了巴夏礼的无理要求。然而，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和巴夏礼等竟以此为借口，蓄意扩大事态。英国驻香港海军司令西马糜各厘立即命令驻港海军捕捉中国船只，进行无理挑衅，决计挑起新的侵华战争。

二、英军进犯广州

对于英国侵略者的蓄意寻衅，负责筹办“夷务”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竟然冤动于衷。他曾大量屠杀广东起义人民，对迫在眉睫的外敌入侵却不进行任何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当时，广东清军总数约七万四千人，其中八旗兵五千六百余人，绿营兵六万八千余人。广州城内外约有清军一万三千人。城郊建有炮台十座，每台防兵二十至六十人不等。珠江内河一带除修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毁的十六座炮台外，又新建了六座，共计二十二座。防守城郊和内河沿岸三十二座炮台的兵力共约二千余人。但由于叶名琛毫无战备观念，不采取任何防御措施，“惟日事扶鸾降乩，冀得神佑”，因而“亚罗船事件”发生后，虎门要塞及广州捕军都没有及时转入临战状态。

1856年10月22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率军舰三艘、划艇十余只、海军陆战队约二千人，向虎门口开进，揭开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序幕。英军的企图是：以武力胁迫叶名琛屈服，乘机进入广州城。

当英舰强行闯入时，广东水师提督吴元猷因事先未加防范，又来接剿叶名琛的命令，不敢下令开炮拦击。虎门各炮台守将有的等待观望，有的未战先逃，防兵纷纷溃散。因此，英舰未受任何抵抗即颇利驶过虎门要塞，进入内河。

英军舰船突入珠江内河，直接威胁着广州的安全。当日上午，英舰

开始进攻猎德炮台，守军奋勇还击，双方展开炮战。叶名琛接到战报后，仍以为英军不过是虚声恫吓，竟然说："必无事，日暮自走耳。"并下令"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猎德等炮台防兵被迫停止抵抗，致使英海军陆战队顺利登陆。当晚，英军舰船进泊广州城西南的十三洋行码头。

第二天，英舰沿珠江南水道下驶，进攻广州河南凤凰冈等炮台。防兵"遵令走避"，炮台被占，大炮被毁。在部属一再要求下，叶名琛才勉强同意派兵一千五百人防守北门外的四方炮台。25日，英军又攻占海珠炮台，五十门大炮全部落入敌手。至此，珠江内河一带的主要炮台均被英军攻占。

10月27日，西马糜各厘除集中三艘军舰的炮火外，还利用海珠炮台的五十门大炮，轰击广州外城，并以总督衙署为主要目标，企图胁迫叶名琛屈服。28日下午，英军继续炮击，并派海军陆战队登岸，纵火烧毁靖海门外的民房，延及城楼。29日中午，英军以猛烈炮火将外城城墙轰开二丈多宽的缺口，并击毁督署。下午，英海军陆战队登岸，约有二三百人从缺口攻入外城。清军参将凌芳率抚标兵英勇抵抗。两小时后，凌芳中弹牺牲，抚标兵退入内城。南海县大浦乡团勇主动增援，杀敌数十人，终因武器简陋，势不能敌，亦退守内城。英军因兵力单薄，未敢深入，便将靖海门、五仙门及附近民房尽行烧毁，于当日傍晚撤回军舰。这时，叶名琛才派武弁梁定海、谭蛟等率兵千人，前往被毁的猎德炮台防守。

自10月31日起，英坚连续炮击广州城，但仍未达到入城谈判的目的，便于11月6日派出军舰三艘，沿珠江主航道东进，炮击位于竹横沙的东定炮台。该台有炮三十六门，守军约七八十人。在台外的江面还停泊着广东内河水师的红单船二十三只。英舰发起进攻后，炮台防兵开炮拒敌，水师战船也主动参战，击中一艘英舰，毙敌百余人。但终因弹药不继，水师战船又先后被敌舰击毁，东定炮台遂失陷。10日，英舰三艘，划艇两只再次轰击猎德炮台。这时，该台除有防兵千人外，台后还有陆路乡勇应援。但因火炮射程近，打不到敌舰，而敌之舰炮却能击中炮台，致栏石碎飞，伤守兵甚众。随后，英海军陆战队在炮火掩护下登岸，绕道抄袭炮台后路。当时，梁定海和谭蛟正在台后村庄中赌博消遣，闻警仓皇逃遁。守台兵受到英军前后夹击，又无人指挥，便一哄而散，猎德炮台再次失陷。

11月12日，英舰为打通广州与香港的联系，解除后顾之忧，便沿珠江东南水道南返，从侧后袭击安有二百门大炮的横档炮台。守台兵四百余人与敌展开炮战。一小时后，英军陆战队从炮台西侧登岸，由西，北两面攻击。防兵不支，纷纷溃散。英军遂占领炮台，掠获全部大炮。翌日，英军又攻占横档东岸的威远、镇远和靖远炮台。

英国侵略者仅凭三艘军舰，十几只划艇和不超过两千人的兵力，竟敢闯入设防严密的虎门海口，直抵广州，无疑是一种冒险的军事行动。当时，防守虎门要塞与广州的清军八倍于敌，结果不但没有击败敌人，反而先后丢失大小炮台十余座。英军摧毁了总督衙门，并一度突入广州外城，尽管未能达到入城谈判的目的，但其军事冒险竟获得了成功。这种异常情况的出现，主要由于叶名琛昏庸愚昧到了极点。他先则抱着侥

幸心理，主观地认为英军不敢动武，因而在“亚罗船事件”后仍不进行备战，使英舰得以乘虚闯过虎门，进入珠江内河。敌舰向珠江内河炮台发起攻击后，他依然坚持不抵抗主义，以致出现了战争史上罕见的只挨打不还手的怪现象。最后，虽然被迫还击，但因准备不足，指挥不当，加上各台守兵过少，火炮落后，弹药不足，终被敌人各个击破，造成重大损失。

三、广东军民的英勇抗战

与叶名琛的不抵抗主义相反，广东人民和部分爱甲官兵，目睹侵略者的种种暴行；激起了无比的愤怒，采取各种形式，机智勇敢地打击敌人。

1856年10月，英国侵略军开始进犯广州时，广州市民便相约剿杀敌人，反英揭帖随处可见。12月，群众满怀义愤，放火烧毁了城郊十三洋行商馆，迫使侵略者全部逃回船上。

英军虽然攻占了珠江内河及虎门的主要炮台，但由于沿江军民不断采用夜战近战袭击敌舰，使侵略军无法保障水路交通安全，与香港的联系经常受到威胁。12月22日，英国“提斯特尔”号邮轮拖着一只满载从广州抢劫来的珍宝玉器的划艇，企图经虎门口驶往香港。半夜，于虎门口内突然受到上百只中国划艇的拦击，便开足马力向出海口方向直驶，不料又被另一队中国划艇截住，不得不抛弃拖曳的划艇，突围而逃。30日，该邮轮又从广州驶往香港，广东乡勇十七人化装潜入船上，于中途杀死舶主等十一人，将邮船开到岸边捣毁。1857年1月4日下午，广东水师调集约三百余艘船只，从不同方向围攻珠江江面上的三艘英舰。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广东水师舰船才分头退入小河汊内。与此同时，香港及其附近地区人民也曾自动组织对英国侵略者实行封锁等斗争，反抗英军的入侵。

在广东爱国军民的反抗和打击下，英军被迫于1857年1月20日退出珠江内河，撤往虎门口外，等待援军的到来。

四、清廷“息兵为要”的方针

英军撤出虎门后，叶名琛向咸丰帝谎报军情，吹嘘“防剿英夷水陆获胜，现在夷情穷蹙”。处于内外交困境地的咸丰帝，早就希望结束对外战争，以便全力镇压几乎遍及全国的农民起义。英军窜入珠江炮击广州时，他就声称“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因此，当他接到“水陆获胜”的谎报后，立即谕令叶名琛与侵略者议和，“以息兵端”。咸丰帝主张息兵媾和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国库空虚，军饷难筹；他在1857年4月23日的上谕中说：“当此中原多故，饷糈艰难，叶名琛总宜计深虑远，弥此衅端，既不可意存迁就止顾目前，又不可一发难收复开边患。”此外，咸丰帝认为英军攻打广州，无非是提出更多的利益要求，而不会推翻他的封建统治，因此谕令叶名琛，如果英国新任使臣到广州谈判，只要条件不甚苛刻，“即应以礼相接”，以期两国息兵和好。6月15日，正当英国远征军源源向香港集结的时候，咸丰帝在叶名琛《密陈近日夷情》的奏折上作了批示，明确提出了“息兵为要”的方针。批示中虽有“仍当密为防范，勿存轻视之心”等语，但最后强调的则是“总宜息兵为要”。这一妥协求和的错误方针，助长了外国侵略者进一步武装侵华的野心。

第二节 广东军民抗击英法联军的进犯（1857年12月~1858年1月）

一、英法联军的组成

为了扩大侵华战争，英国巴麦尊内阁于1857年3月强行通过了一项增加军费和增援远东英军的提案。4月20日，巴麦尊任命原驻加拿大总督额尔金及其弟普鲁斯为正副全权专使，率特别外交使团来华。同时，从本土和毛里求斯、新加坡，印度等地共抽兵二千九百余人，组成远征军（以阿希伯纳姆为远征军海军司令），开赴中国。英国还照会法，美，俄等国，约其联合出兵。

当时，法国正在加紧侵略越南。法皇拿破仑第三等认为，和英国联合侵华，既可以换取英国对其侵略越南的赞同，又可以在中国捞到好处，因而欣然接受了英国政府的邀约。接着，法国政府以所谓“马神甫事件”为借口，打着“为保卫圣教而战”的旗号，任命葛罗男爵为特命全权专使，率领一支法国远征军开赴中国，并训令其远东印度支那舰队司令里戈?德热努依里海军少将率舰队配合葛罗的行动。

美国本想通过侵略战争扩大其在华特权，猎取更大的利益，但由于其南部和西南部正在开展废除奴隶制的斗争，国内政局不稳，因此在接到英国的照会后，表示美国的全权代表愿意与英法代表一致行动，但不直接出兵。

沙俄趁英国挑起新的侵华战争之机，进一步加紧其侵占中国北方领土的罪恶活动，同时，派海军上将普提雅廷出使中国，以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军为诱饵，要求割让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中国西部的大片领土。交涉失败后，普提雅廷悻悻而去，径赴中国南方，与英法代表合谋侵华。

1857年7月初，英国特使额尔金抵达香港。他的主要使命是：迫使清政府赔款和“在广州以及其它口岸完全履行几个条约的条款”，并同意英国公使驻京及修改各种条约等。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给他的训令称：如果清廷拒绝英国的要求，就立即使用武力，采取以下一项或几项行动，即：封锁白河；占领扬子江口大运河的入口处，占领舟山群岛，封锁芝罘和其它中国口岸；切断大运河通过黄河的出入口，在广州上游登陆，占领城垣上方的高地，并切断其供应；在广州城的上方安置一支部队。额尔金遵照英政府的训令，与包令、西马糜各厘等进行了谋划。包令等一致主张首先给广州以打击，迫使叶名琛屈服，从而消除同清廷谈判的困难，额尔金接受了包令等人的建议，决计先犯广州，取得讨价还价的条件，再向中国勒索。但因印度的人民起义（1857~1859年）正在蓬勃发展，额尔金于7月16日亲率其远征军一部赶赴印度（9月下旬才返回香港），因此，进犯广州的计划未能立即实行。

10月中旬，法国特使葛罗抵达香港。英法特使及双方海军司令等经多次协商，确定英法组成联军，采取一致行动，首先攻占广州，尔后北上白河。10月底，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列卫廉到达香港，与英法公使会晤。11月初，沙俄公使普提雅廷也由天津窜到香港，正式加入了以英国

为首的侵华集团，为英法武装侵略中国出谋划策。

12月上旬，英法侵略者拼凑了一支由五千六百余人组成的侵华联军（其中法军一千人），集结于香港、澳门地区，加紧进行战争准备。

二、英法联军陷广州

在清廷“息兵为要”的方针指导下，叶名琛不仅不加强广州的防务，反而大肆裁撤团练兵勇。广州人民烧毁十三洋行商馆之后，叶名琛竟下令把所有团练乡勇赶出省城，原陆续聚集于广州周围的三万余兵勇，凡非坚守要隘者，全部被裁，陆路壮勇原约一万余人，被裁撤十分之八，所存者不及二千人。广东内河水师战船大部损失，非但不予添造，反而大加裁撤。虎门要塞被英军破坏的几座炮台，既不修整，也不重调水师驻守。直至获悉英国，远征军开抵香港时，他才仓卒抽调部分兵力在珠江水路要隘布防，并派八旗兵防守广州城及城北炮台。

1857年12月12日，英，法公使分别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入城、修约和赔款，并限十日内答复。对于英法等国相互勾结以及迫在眉睫的战争形势，叶名琛仍然茫无所知。他认为英国孤立，为法、美所不齿，并轻信谣传，说什么英国女王已命令其在华官员力求与中国“好释嫌疑，以图永久相安，毋得任仗威力，恃强行事。……断不准妄动干戈”，认定英国不会再行开战。尽管英法公使已发出最后通牒，叶名琛依然不做任何战守准备。

在英、法公使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时，英法联军舰队便从香港出发，进犯虎门。因未遭广东水师的任何拦阻，故得以迅速突入珠江内河，兵临广州城下。12月15日，数十艘敌舰集结于珠江主航道上，集中舰炮火力轰击与广州城隔江相望的河南地方。接着，敌海军陆战队登陆，顺利地占领了该地，为攻打广州城夺得了立足点。

20日，联军舰队进泊广州五仙门外的珠江水面。额尔金和葛罗分乘炮艇从香港赶到；次日，他们与两国海军司令在法舰上召开作战会议，决定于24日正午再次照会叶名琛等，限其在四十八小时内交出广州城，并将军队全部撤到城外三十华里的地方，否则武力攻取。

与此同时，英法侵略者完成了攻击广州的作战计划。计划规定：

1．27日至28日夜间，联军工兵连和爆破连登陆并占领二沙尾岛靠航道的登陆点。

2.28日拂晓开始，联军舰队的一百二十门大口径炮同时向城墙开火，在西南角、东南角和正南三处打开缺口，并以持续而缓慢的射击压制守城清军。

3.28日晨，海军陆战队登陆，分三路进攻广州城。中路由斯特罗本泽少将指挥英军和一部分法国水兵，主攻东固炮台，占领后派出云梯队乘夜抵近城墙，架设云梯；左路由里戈?德热努依里海军少将指挥法军，阻击从东门和郊区增援的清军；右路由西马糜各厘海军上将指挥英国水兵，阻击从城北各炮台支援的清军。

4．29日晨，全部大炮集中轰击城墙，摧毁城上的工事，尔后攻城。

在英法联军临城下的威胁面前，叶名琛对战守问题仍漠然置之。26日，其部属纷纷建议添调兵勇，加强广州防务，他却以敌军不过是恐吓迈和为由，拒不采纳。番禺县令李星衢、南海县令华廷杰请求招募两县乡勇数千人，防备突然事变，叶竟说什么“谁添兵，谁给饷”。广州绅民

有的自告奋勇，愿意自备粮饷军械，守城杀敌，叶名琛一概不准。27日晚，联军工兵连、爆破连占领二沙尾，攻城迹象已十分明显。就在这时，叶名琛却要全城文武官员到督署为他祝寿。他迷信扶乩，宣称乩语告知，十五日（12月30日）后便可无事。

12月28日晨6时起，三十二艘联军舰艇（英二十五艘，法七艘）的一百余门大口径火炮同时炮击广州城。叶名琛逃至内城粤华书院。清军乱成一团。广州城内大火熊熊，督署也成为一片废址。

炮击开始后不久，英法联军约四千人，分别从二沙尾以及猎德炮台与东固炮台之间登陆。中路约二千人进攻东固炮台。驻防广州东门外的清军千总邓安邦率东莞刃一千人奋勇抵御。他们士气高昂，分散隐蔽于竹林和灌木丛中或坟墓后面，以各种火器打击敌人。防守东固炮台（有炮三十一门）的约七十名清军，在东莞勇的配合下，也发炮轰击登陆的联军。邓安邦统一指挥东莞勇与炮台守兵，同超过自己一倍的敌军鏖战大半日，最后在弹药耗尽和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才被迫于日暮时放弃东固炮台。当晚，联军以舰炮及东固炮台的大炮继续轰击广州城。

29日晨6时，占领城东一带的联军在炮火掩护下，向城东北运动。防守城北五座炮台的总指挥、乍浦副都统来存率旗兵一部，坚守四方炮台。联军“冒死扑台，为长蛇阵直进，将近二千人”。守台兵居高临下，发炮抵御，毙伤不少敌军。联军进攻炮台受挫，便转而攻城。斯特罗本泽指挥中路英军第59团，成散兵队形攻击小北门，西马糜各厘指挥右路英军水兵攻击大北门，里戈?德热努依里指挥左路法军攻击东门。广州守军依托城上工事阻击敌人。不久，联军中路主力攻入小北门。守城清军纷纷溃散，致使敌军迅速占领了观音山，控制了城内的制高点。接着，联军右路和左路部队相继攻占了大北门和东门。城墙上的清军退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下午2时以后，全城战斗停息。30日，广东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在广州西北城墙上竖白旗投降，在侵略军的威逼下，强令撤出城内兵勇。

1858年1月5日，叶名琛为联军所俘，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次年在囚禁中毙命。这是他坚决执行清廷“息兵为要”方针的可耻下场。联军占领广州后，组成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投降卖国的柏贵等在侵略者的监督下继续“任职”，为敌效劳。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由外国侵略者用大炮制造的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

三、广东军民继续打击故人

在英法联军的蹂躏下，广州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侵略军烧杀掳掠等暴行，激起了广东军民的英勇反抗。具有抵抗外来侵略传统的三元里一带群众，重建和扩大了原来的社学组织，募勇团练，并联络南海，番禺两县人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总局，集义勇数万，坚壁清野，与侵略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东莞、花县、顺德等县人民，也纷纷组织团练武装打击侵略者。广州城外军民实行秘密分散的游击战，每于夜间以壮勇数百人，分路潜至城下，鸣锣呐喊，向城内施放火箭，惊扰和打击敌人。城内市民则经常三五成群地埋伏在侵略者出入之处，出其不意地袭杀敌人，1858年2月18日，佛山团练武装数万人，决定反攻广州，被柏

贵破坏。但爱国军民的反抗怒火是扑不灭的，伏击和袭扰敌军的行动接连不断。6月3日，侵略军千余人分两路进攻广州城外的团勇：一路进攻驻榕树头的东莞勇；一路进攻驻三宝墟的新安勇。东莞勇在邓安邦率领下奋力迎战，毙敌军官一人，迫使敌军逃窜。新安勇与敌军激战数小时，毙伤敌军百余人。随后，东莞军民向侵略者发出挑战书："我东莞勇，现驻榕树头，尔外人敢到此与我打仗，定杀尔片甲不回。"6月6日，巴夏礼亲率英军千余前往，结果遭到伏击，死伤甚众，巴夏礼也几乎被俘。侵略军胆战心惊，龟缩城内，不敢轻易再出。佛山团练总局还发动香港大罢工，号召在香港、麦高（澳门）等处为外国人教书、办理文案以及雇工杂役人员，概行辞职回家，使洋人各项经济活动陷于停顿。香港同胞还以极其秘密巧妙的方法劫杀英人，使其不得安宁。

第三节 英法联军第一次北犯（1868年4月~6月）

一、联军策划北犯，清廷置若罔闻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额尔金、葛罗等又在香港密谋策划，确定联军舰队先开往上海，威逼清廷签订新约，若不能达到目的，便北犯白河口，对清廷直接施加压力。美、俄公使完全赞同英、法的图谋。

1858年2月，英、法、美、俄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于3月底以前派全权代表到上海举行谈判，否则，即向白河口进发。3月底，侵略者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四国公使便决计率领由香港集中到上海的英舰十余艘、法舰六艘、美舰三艘、俄舰一艘，分批北上。

对于侵略者贪得无厌的野心，清廷缺乏清醒的估计。广州沦陷后，仍认为英法只是借端要挟，不会继续入侵，因而命令柏贵“以情理开导”，劝说侵略者退出广州，然后“相机筹办”。同时，任命刑部右侍部黄宗汉为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由京赴粤，与英法侵略者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咸丰帝接受某些人的建议，要柏贵等借助广东绅民之力，利用各地团练乡勇将联军逐出省城和内河，“使知众怒难犯，……不致诛求无厌”。不久，咸丰帝接到两江总督何桂清关于英、法、美、俄四公使欲赴天津的奏报。但他仍然置若罔闻，不立即采取对策，直至3月21日，才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于海口各要隘，不动声色，严密防范”，以防意外。

二、联军进逼大沽，清军仓卒布防

1858年4月20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在白河口外会齐，24日即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在北京或天津举行谈判。英、法公使竟限令六日内答复其要求，否则即采取军事行动。美、俄公使则打出“调停”的旗号，劝告清廷尽快会谈。与此同时，联军舰队陆续驶抵大沽口，随即进行了进攻大沽炮台的各种准备。他们派出侦察船，探测水深，侦察海口的地形和炮台设施等；派遣侦察人员化装登岸，侦探清军部署;派舰艇抢劫民船商船，掠夺财物粮食，在水边立标打靶，进行临战训练，并对清军巡洋哨船鸣枪挑衅等等。

大沽口是天津的门户，近口三十余里有拦江沙一道，称为“口外之险”，大船不便航行，海口南北两岸建有炮台四座（北岸一座，南岸三座），仅有守兵七百人。海口距大沽村五六里，距天津一百八九十里，中间有新城、葛沽，为商船进口后停泊之处。谭廷襄认为，敌军“长于水，而不长于陆，狡猾性成，未必肯舍长就短”，因而提出了“设防仍以水路为主，兼备炮台后陆路”的方钟，4月19日，谭廷襄与直隶提督张殿元，布政使线炘和等率兵约八千人，并携带神机营大炮，仓促前往大沽口设防。其部署是：谭廷襄率督标各营驻防海神庙（大沽东、西二村之间），张殿元率提标兵一部防守北岸炮台，天津镇总兵达年率镇标及提标大沽协兵防守南岸各炮台，钱炘和总办粮台，清河道崇厚总理营务处。层募海船、盐船四十余只，于海神庙前搭浮桥一座，便于两岸联

络，协同作战。此外，清廷还调派刑部左侍郎国瑞、护军统领珠勒亨、副都统富勒敦泰等率京营马步各队及火器营、健锐营兵二千余人，携炮三十门（内有万斤大炮数门），赶赴海口，统归谭廷襄节制。潭便令国瑞率马队五百人驻新城以东离海口十五里处，令珠勒亨率马步兵千余人，富勒敦泰率器营五百人守海口北岸及新河，均作为南北两岸炮台的后路接应。

三、联军大沽登陆，清军抗战失利

英、法、美、俄公使照会清廷后，咸丰帝令谭廷襄与其谈判，要求英、法、美公使返回广东，听候黄宗汉办理，俄使则仍到黑龙江等处会办。他把希望寄托在打出“中立”旗号的美、俄公使的“调处”上，企图以美、俄牵制英、法。经过多次交涉，清廷的希望完全落空，侵略者决心使用武力迫使清廷屈服。

截至5月19日止，陆续驶抵大沽口外的英、法、美等国舰船共约三十艘。当日傍晚，联军“斯莱尼”号、“复仇者”号等十六艘舰艇和二十余只舢板，载海军陆战队约二千人，驶入拦江沙内，待命行动。美舰和俄舰各一艘相继跟进，为英法联军壮胆助威。

5月20日上午8时，额尔金和葛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四国公使前往天津，并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否则武力占领。在此以前，联军拟定了如下攻击计划：首先以六艘炮艇分成二队，同时发炮攻击南北两岸炮台;然后，两支登陆部队分别向南北两岸发起攻击。第一支由四百五十七人（英军二百八十九、军一百六十八）组成，攻取北岸炮台：第二支由七百二十一人（英军三百七十一、法军三百五十）组成，攻打南岸炮台。

20日上午10时，联军两队炮艇开入口内，同时轰击南北两岸炮台。当时，北岸炮台由游击沙春元率部防守；南岸的主炮台由总兵达年和游击德魁率部防守，左炮台由都司讷勒和等率部防守，右炮台由游击陈毅等率部防守。四座炮台的防兵已增加到三千人，大炮二百余门。面对敌人的进攻，各台守兵奋起还击，击沉敌舢板四只，毙敌近百名。法炮艇“霰弹”号遭到重创，艇长被打死，十一人被打伤。与此同时，守军从海口施放了约五十只火船、火筏，顺流而下。联军舰队立即派小艇将火船，火筏拨开，保护两队炮艇继续轰击炮台。接着，口外的联军旗舰“断莱尼”号及其它主力舰只的大口径火炮也向炮台轰击。北炮台的三合土顶盖被击毁，南炮台炮墙亦被轰塌，有的火炮被炸坏。守台兵遭敌炮轰击，伤亡甚众。11时，联军的两支陆战队乘舢板强行登陆，向炮台接近。守军冲出炮台，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他们的顽强抗战精神使敌人大为震惊。连目击此次战斗的一个美同人也承认：“中国兵械虽不甚精，而兵弁大都忠勇”。正当炮台防兵与敌艰苦鏖战之际，谭廷襄、钱炘和等却从大沽村乘轿逃跑，致使士气大挫。当敌陆战队进至炮台附近时，后路清军不仅不及时增援，反而讹传前军失利，以致兵勇惊溃。炮台守兵孤军奋战，沙春元、陈毅等中弹牺牲，各炮台遂相继失守，所有火炮、器械，全被敌军掠获。联军陆战队占领南北两岸炮台后，其炮艇沿白河驶向东沽，烧毁浮桥，占领东、西大沽二村。

这次作战，大沽清军数倍于敌，但仅仅按战两个多小时，四座炮台全部落入敌手。其所以如此，主要是清廷动摇不定，缺乏抗战决心。当联军从上海北上时，咸丰帝一面命令在天津，大沽暗地设防，一面又令谭廷襄等“平心静气”地与侵略者“理论”。前线指挥官谭廷襄虽然奉旨设防，但也根本没有打的决心，战前既无周密的防御计划，战时又不亲临前线指挥，危急时刻则带头逃跑。大沽炮台的陈旧落后，也直接影响了

战斗的进行。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驻守虎门的关天培就采用增减木垫的办法调整火炮的射程，可是，大沽炮台连这样的土办法也未采用。固定在炮架上的火炮无法调整射程，结果，敌舰趁落潮时发起进攻，各炮台发射的炮弹便大多成为远弹，不能命中目标。加上仍然采用老式的木制炮架，一旦遭敌火箭攻击，木架着火燃烧，火炮随之浪落地上，无法继续射击。此外，炮台后路部队畏缩不前，有的望风而逃，也加速了炮台的陷落。

四、联军威胁津京，迫签《天津条约》

5月24日，谭廷襄逃回天津，张殿元等各率所部退守天津城外。英法联军炮艇八九艘溯白河而上，于26日驶抵天津城下。不久，四国公使也率主力舰只赶到。侵略者宣称，如清廷不立即派全权代表前往天津谈判，就先取天津，再攻北京。

谭廷襄在大沽炮台失陷后立即声称：“统观事态，细察夷情，有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者”。当联军兵脂天津城下时，谭更加惊恐万状，认为“时势危急，战守两难”，唯一出路是向侵略者妥协求和。咸丰帝以天津迈近京城，急忙于5月28日派大学士桂良、吏郎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议和。

从6月4日起，桂良等与英、法、美、俄代表进行了多次交涉。在英法代表骄横要挟下，桂良等被迫接受了全部要求，分别于6月26日和27日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扩大领事裁判权；对英赔款四百万两，对法赔款二百万两，修改税则等等。条约规定第二年在北京交换批准书。

当桂良等与英、法代表谈判时，美、俄公使扔演“调停者”，的角色，玩弄阴谋诡计，竟抢在英、法之前，诱逼清廷分别于6月13日和18日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在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以前半个月，黑龙江将军奕山在沙俄武力威胁下，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了非法的《瑷珲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沙俄侵吞了中国黑龙江北岸，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第四节 英法联军第二次北犯（1859年6月）

一、上海修约谈判

《天津条约》签订前后，清廷内部在是否全部接受侵略者的要求方面存在很大分歧。桂良等以英法联军“枪炮迅利”、“直隶库款支绌”、“天津以北，道途平坦，无险可扼”、“国家内匪未净，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等为由，主张迅速订约，以期息兵停战。吏部尚书周祖培等则反对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特别不同意外国公使驻京，认为公使“一入京师，则一切政令必多牵制”。咸丰帝一贯害怕外国公使驻京，只是由于侵略者兵真兵天津，京畿难保，为顾眼前利益，才被迫同意订约的。因此，当英法侵略军于1858年7月陆续南撤后，其态度又有改变。他深感大皇帝的尊严受到损害，特别是对外国公使驻京颇感不安，于是，要桂良等利用去上海同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之机，以全免进口税为交换条件，取治《天津条约》中关于公使驻京、内河通商、内地游历及赔偿军费等条款。10月4日，桂良、花沙纳到达上海，经过多方哀求，额尔金才故作让步姿态，答应英国公使驻于北京以外的地点，但可定期或按公务需要前往北京。于是，桂良等分别于11月8日和24日与英，法代表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主要内容是：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将鸦片改名“洋药”，一般进出口货物，一律只征5%的关税；洋货运销内地或输出土货，一律只征2.5%的子口税；海关税务邀请外国人“帮办”等等。

二、清廷加强大沽防务

英法联军南撤后，咸丰帝接受惠亲王绵愉等人关于“天津海口一带，急应妥为布置”的建议，谕令以填压太平天国北伐军而得宠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会同礼部尚书瑞麟（署理直隶总督）前往天津一带，加强海口防务。僧格林沁率京营及东三省蒙古马队各一部，自通州到达天津后，便会同瑞麟亲往海口查勘，决定加强大沽、双港等地的设防。同时，奏请清廷分别从吉林，黑龙江、绥远、直隶北部和京城抽调兵力前往天津地区，并重新恢复直隶海口水师。到1859年3月，大沽口共有兵丁三千名。僧格林沁等恐新募兵丁“难期得力”，“将京旗京营官兵抽出八百名，拨赴海口，分扎两岸炮台，即于新募兵丁抽出八百名，纺赴双港屯扎”。此外，尚有副都统成保所率的哲里木盟马队五百人驻新城，头等侍卫布尔和德、二等侍卫舒明安所率的昭乌达盟马队五百人驻新河。整个大沽海口地区共有防兵四千人。

经过重建的大沽口炮台，由四座增至六座，每台守兵约四百人。海口南岸炮台三座，高自三丈至五丈不等，北岸炮台二座，一高五丈，一高三丈。各炮台的高度、宽度和厚度均较前有所增加，另在北岸石头缝地方新建高三丈的炮台一座，作为后路策应。六台共安设火炮六十门，其中有一万二千斤大铜炮二门，万斤大铜炮九门，五千斤铜炮二门，西洋铁炮二十三门。所有炮台周围均坚筑堤墙，堤墙之外开挖壕沟，竖立

木桩。又在海口排列三道拦河铁链，配置铁戗，安设木栅，连成巨筏，以便拦阻敌舰。僧格林沁督饬各营官兵，“排列队伍，演放炮位，严密设防”。

鉴于距天津三十余里的双港地势较高，河身狭窄，便于拦击敌人，僧格林沁等特在该处沿河两岸设兵营九座，驻兵六千人，修建炮台十三座，安设一万二千斤以下大小铜铁各炮八十一门。对于从大沽至山海关一线众多的海口，也本着“择要分布”的原则，分别在北塘海口，丰润的涧河口、乐亭的清河口和老田沟、昌黎的浪窝口和蒲河口以及山海关内的白塔岭、秦皇岛、小河口等处，部署了相应的兵力。其中北塘有一千六百人，山海关有三千人。另外，天津道府及沿海各县，还招募了团练乡勇共五万余人。

三、英法联军再次北犯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政府仍不满足于从中国攫取的种种特权，叫嚷“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条款不能令人满意”，蓄意利用换约的时机，重新挑起战争，向清廷勒索更多的权益。

1858年11月，英国以普鲁斯接替包令为驻华公使。1859年3月，英政府训令他把对华事务管理总部由香港迁往上海，尔后视情况在北京设立使馆，并拒绝清廷可能提出的阻止公使进京换约的任何企图。普鲁斯来华途中，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与从中国回国的额尔金共同议定了以一支雄厚的舰队“护送”公使进京的计划。4月26日，普鲁斯抵香港，6月6日到达上海。随后，与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等进行密谋。双方都拒绝同等候在那里的清朝全权大臣桂良、花沙纳会晤，决定再次北犯大沽，“不惜用武力来打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向京城挺进”。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也抉定随同英、法公使北上，进京换约。

6月20日，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与17日即已到达的英法联军舰队会合。

英法联军舰队由新任侵华英军海军司令贺布少将率领，共计舰船二十一艘。其中有英国“复仇”号等蒸汽舰七艘、炮艇十艘、运输船二只，载海军陆战队、工兵队一千二百余人，法舰“迪歇拉”号和蒸汽供应船“诺尔扎加拉”号，载海军陆战队约百人。另有“托依旺”号等美国舰艇三艘，随同行动。

6月21日，普鲁斯把打通白河口的任务交给贺布。在此以前，贺布已派人知照清军，要求将安设在海口的铁戗、木筏等尽行撤去。清军未予理睬。联军舰队便连日进行侦察，破障，并抢劫商船、渔船，鸣枪发炮，态意挑衅。

四、清军大沽抗战获胜

早在1859年春，僧格林沁得悉外国公使执意要进京换约的消息后，就向咸丰帝提出了如下防御建议：“倘夷船一二只驶进海口，谨遵训示，由地方官派员迎至拦江沙外，与之理论”；“设三五只以上蜂拥而至，是决裂情形已露，自未便专恃羁縻。……似宜以拦江沙内鸡心滩为限，……设竟闯入鸡心滩，势不得不慑以兵威，只可鼓舞将士，奋力截击，开炮轰打”。咸丰帝基本同意这一建议，令僧格林沁“相机酌办”。不久，僧又提出：大沽海口布置均已周密，公使进京“不特不可令其经由，且不可令其窥伺”。他建议让公使由北塘登岸，从陆路进京。这一建议也得到了咸丰帝的同意。

6月22日，咸丰帝得知英法联军舰船陆续驶抵大沽后，立即谕令僧格林沁严守海口，但“勿遽开枪炮，以顾大局”。同时，令新任直隶总督恒福等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海口登陆，进京换约，不能随带兵船武器，不得多带随从人员。可是，侵略者并不理睬清政府的要求，坚持要以舰队沿白河上驶，武装护送公使进京。他们骄横地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大沽炮台的防兵在直隶提督史荣椿及大沽

协副将龙汝元等督率下，早就不动声色地监视着敌人舰船的动向，“炮台营墙不露一人，各炮门俱有炮帘遮挡，白昼不见旗帜，夜间不闻更鼓”。

6月25日拂晓，贺布率联军舰艇十三艘，从拦江沙内距炮台约十三公里的水域向海口开进，炮艇都停泊在离铁戗不远的水面。海军陆战队已换乘从海湾抢劫来的帆船，待命行动。工兵队被配属到各炮艇上，分别组成特种小队，准备执行射击炮洞的任务。贺布的作战计划是：炮艇冲过横江铁链，在炮台的上方占据一个位置，以便两面夹攻，然后，在舰炮火力掩护下，海军陆战队从正面登陆，迅速夺取炮台。

联军舰队在完成开进任务后，贺布便派英舰“负鼠”号和几艘炮艇强行拆除海口铁戗和木栅，开辟通道。这时，大沽海口两岸的清军怀着愤怒的心情，注视着敌人的行动，并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下午3时左右，海口第一道障碍物被拆毁，贺布立即令“负鼠”号导航，旗舰“鸟”号及其余舰只随后跟进，向横锁海口的铁链进逼，并发炮轰击两岸炮台。炮台守军忍无可忍，立即开炮还击，由于“围墙深厚，尚足抵御”，且“各炮台口门，适当夷船，与之相对轰击”，守军炮火得以充分发挥威力。史荣椿，龙汝元指挥南北两岸炮台集中火力轰击贺布的旗舰。交战不久，联军旗舰“鸟”号舰长拉桑上尉等多人被打死，贺布也身负重伤，改乘大型汽艇“鸬鹚”号继续指挥战斗。

激战至下午4时，参战的联军舰艇差不多全被击伤。旗舰“鸟”号被击毁，舰上的四十名水手仅一人跳水逃脱。炮艇“茶隼”号和“庇护”号被击沉，“鸬鹚”号等几艘炮艇搁浅，贺布被迫逃到法舰“迪歇拉”号上。这时，史荣椿、龙汝元又指挥炮台守军集中火力轰击搁浅的炮艇，将“鸬鹚”号击毁。守台将士越战越勇，史荣椿、龙汝元等奋不顾身，亲自督战，不幸相继阵亡。

当战斗激烈进行之际，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达底拿乘快艇前往战区，看望受伤的贺布。在返回停泊水域时，遭到清军炮火的袭击，达底拿幸免于死，但陪同他的美国旗舰“托依旺”号的副舰长被打伤，舵手被打死。他目睹英法联军的惨败情景，认为贺布“已经无法逃脱并退出这场绝望的战斗了”，遂派“托依旺”号从集结地域开进战区，去拖曳搁浅的炮艇，以便让英国舰艇重新投入战斗。他还命令美国水兵登上英国炮艇，参加作战，从而彻底撕下了“调停人”的假面具。

下午5时，贺布仍不认输，下达了登陆作战的命令。英军勒蒙上校率联军陆战队千余人，分乘帆船，舢板二十余只，由美舰“托依旺”号和联军的两艘炮艇拖曳，至海口铁戗以外不远的水面集结，尔后在舰炮掩护下，向海口南岸强行登陆，企图先夺取南岸的三座炮台。南岸炮台外为一片泥泞地，并有三道水壕。侵略军登岸后，一方面遭到炮台炮火的杀伤，一方面要在没膝的泥泞中艰难地匍匐爬行，处境甚为狼狈。这时，僧格林沁立即调集火器营等的抬枪队和鸟枪队前往攻击，北岸炮台也发炮支援。联军登陆部队死伤枕藉，不得不停止前进，潜伏于沟壕中和土堆后面。黄昏时分，侵略军利用夜暗“伏地抢进”，炮台守军施放火弹、喷筒，借着亮光瞄准射击，杀伤敌人。联军陆战队只有少数人爬到了炮台下面的第一道壕边，但由于步枪已塞满泥浆，几乎都不能使用，运来的便桥又太短，无法架设，云梯也大都折断，无法攀登。守军集中火力向隐蔽在壕沟边的敌军射击，终于迫使其向海口撤退。直至半夜，

联军陆战队余部才陆续爬上舰艇，撤出战场。

激战一昼夜，联军遭到惨败，不得不再次南撤。此次参战的十三艘英军舰艇中，有六艘丧失了战斗力，有四艘被击毁或击沉。参战英军约一千二百人，死伤五百七十八人。参战法军约六十人，死伤十四人。联军惨败的原因，客观上由于兵力不足（其参战兵力仅及清军的四分之一），但主要是由于骄横轻敌，情况不明。贺布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仍象上年一样，大沽海口设防简陋，清军斗志不高，不足为惧。联军发起攻击前，虽然进行了侦察，但因清军隐蔽良好，无法窥探虚实。在情况不明及骄傲情绪支配下，贺布制定的作战计划，必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以致水陆攻击均未得逞，夺取炮台的尝试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清军在这次抗击作战中仅伤亡三十二人，大沽炮台只遭到轻度破坏。这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侵略军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表明，尽管清军军事技术落后，战斗力不强，但在保国御侮的激励下，广大士兵和下层官弁还是能够勇敢抗战的，只要指挥得当，预有准备，是能够打败装备有洋枪洋炮的外国侵略者的。此次获胜的原因，还由于清政府接受了上次大沽作战失利的教训，在英法联军南撇之后，一面与之谈判，一面加强了战备，特别是改善了大沽海口的设防。此外，统筹津沽军务的僧格林沁亲临前线，史荣椿、龙汝元等将领沉着应战，待敌舰接近后，突然开火，集中轰击联军旗舰，使敌指挥失灵，南北炮台守军主动协同配合，打击登陆之敌；人民群众积极支援，等等，对于保障这次作战胜利，也部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五节 英法联军第三次北犯（1860年4月～11月）

一、英法扩大侵略，清廷疏于戒备

联军惨败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立即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伦敦《每日电讯》报公开扬言：“大不列颠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出于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还声称在夺取北京之后，要永远占领广州，把它变为英国在远尔的商业中心，以便“奠定新领地的基础”。1859年9月，英政府举行了四次紧急内阁会议，在巴麦尊的策划下，决定再次扩大侵华战争。同伦敦一样，巴黎也煽起了新的战争狂热。虽然英、法两国曾因意大利问题等弄得关系紧张，而且两国在扩大侵华后究竟打到何等程度，各出多少军队等问题上也一度分歧很大，但经过协商，最终还是达成了协议，决定继续联合侵华。

1859年11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次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并分别以陆军中将格兰特，陆军中将孟托班为英、法远征军总司令，组成一支新的侵华联军。其中英军约一万八千人，法军约七千人。

1860年春，格兰特、孟托班分别率英，法舰队驶达上海集结，随后即开始第三次北犯。4月21日，联军占领舟山。5月27日，英军占领大连湾，6月8日，法军占领烟台，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此后，联军即以大连湾和烟台两处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

关于联军的战略企图，英国陆军大臣赫伯特曾于1859年11月26日训令格兰特，为了使英国在中国的通商口岸的商业利益不致受到影响，这衣军事行动应尽量局限于清廷，英国远征军可以从北直隶湾和白河登陆，如攻占海口炮台后仍不能使清廷屈服，则沿白河进攻至天津，有可能强迫中国皇帝妥协。法国政府对葛罗也发出了类似训令，要求法国远征军“在白河进行登陆，然后再向天津进军，并在那里巩固自己的阵地”。英法两国再次扩大侵华战争，并非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相反，它们都害怕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导致清王朝的覆灭。它们的目的是迫使清廷“赔礼道歉”，互换和履行《天津条约》，并勒索更多的战争赔款。

1860年7月9日和11日，额尔金和葛罗分别乘军舰抵达大连湾和烟台。美使华若翰和新任俄使伊格纳切夫也随同北上，再一次打出“调停者”的旗号，企图从中渔利。7月19日，英、法公使和两国侵华陆海军司令等在法旗舰上召开作战会议，根据贺布的建议和俄使伊格纳切夫提供的关于北塘毫无戒备的情报，决定从北塘登陆，并决定两国舰队于7月28日在北塘河左岸入口处宜于停泊的地方集结，经过现地侦察，再决定登陆和入侵的方式。7月26日，英、法舰队于渤海湾会齐后，向北塘方向开进。英军出动各种舰船一百七十三艘，兵力一万零五百人。其中有装备精良的骑兵一千人和炮兵两个中队。法军有舰船三十三艘，兵力六千三百人。29日，联军舰队在大沽口与北塘口之间距海岸约十三公里的海面集结，并完成了对北塘海口的侦察以及登陆地点的选择。

从清军大沽获胜到联军第三次北犯渤海湾，有近一年的时间，清廷

既不了解英法侵略者的动向，也不认真加强防务，只顾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当时正是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前后）。在英法联军已经封锁渤海湾的严峻形势下，咸丰帝仍认为海口布置周密，联军上年进攻受创，“未必不心存畏忌”，此衣再来，“实则以兵胁和”而已。因此，谕令僧格林沁，恒福等，“总须以抚局为要”，“不可因海口设防严密，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虽图快于目前，而贻患于将来”。这既表明他对海口设防盲目乐观，也表明他把对付外敌侵略的侧重点放在“抚”上，而不是立足于“战”。僧洛林沁在取得大沽反击作战胜利后，同样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他认为侵略军遭此挫败，“非处万全，必不肯轻动”，“即使该夷舍命报复，现在营垒培厚加高，密布大炮，各营官兵无不奋勇，足资抵御”。为了让英、法等国公使从北塘登陆进京，他竟撤掉北塘的守备，专守大沽口。熟悉北塘一带地形的山西道监察御史陈鸿翊认为，英法联军如从北塘登陆，必北阻驻营城（北塘河北三十余里）之清军，南攻大沽北炮台后路。他向咸丰帝建议：调回从北塘撤走的部队和大饱，并将驻营城的油军移驻北塘，严为防守。山东道监察御史林寿图也指出，“北塘弛防非计，宜层层设伏，以策万全”。然而，僧格林沁等一意孤行，拒不恢复北塘设防，这就为侵略军的登陆作战造成了可乘之隙。

二、联军北塘登陆，大沽天津陷落

1860年8月1日，格兰特和孟托班率联军舰艇三十余艘、陆战队五千人，驶抵北塘口，趁该处守备空虚，顺利登陆，并占领北塘镇。接着，后续部队相继登陆。驻守大沽口的僧格林沁，没有及时抽兵反击，仅严“饬派马队遥为屯扎”，且“不得先行迎击”，以致坐失战机。北塘被占，咸丰帝感到事态严重，急令恒福妥善筹办和议。8月7日，恒福照会英、法公使，要求约定时间地点举行谈判。额尔金、葛罗复照拒绝，并无理要求清军交出大沽炮台。

8月12日拂晓，联军万余人从北塘出发，中途分左、右两翼，向新河一带前进。上午9时，驻守新河的清军马队二千人，主动向联军出击，企图分割敌军右翼部队，并将其驱往新河东北的沼泽地带，尔后加以歼灭。联军集中炮火轰击清军马队，并派出陆战队七百人迎战。清军马队见联军出战的兵力不多，便冒着敌人炮火继续冲锋。联军随即变换队形，以步兵合围清军马队，而以骑兵为预备队。清军马队陷入重围，战不多久，便伤亡近四百人，只得突围。联军骑兵立即追击，在大部歼灭清军马队之后，乘胜占领了新河。

8月14日凌晨4时，联军由新河向塘沽逼进。塘沽与大沽相距八里，仅一河之隔，是大沽口北岸炮台侧后的重要屏障。清军在塘沽筑有周长近四里的围墙，墙高七米，上面开有枪眼、炮洞。当时，塘沽由副都统克兴阿、侍郎文祥等率部驻守，连同从新河撤来的马队，总兵力约三千人。凌晨6时，联军进抵塘沽近郊，停泊在白河上的水师战船立即开炮拒敌。双方炮战半小时，清军水师战船被迫撤走。7时半，联军炮轰塘沽，随后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总攻。塘沽守军发炮还击，奋力抵抗。双方激战两小时，守军伤亡很大。9时半，联军分兵一部泗水从苇塘迂回

到塘沽侧后，守军腹背受敌，力不能支，退至大沽北岸炮台，塘沽遂为联军攻占。至此，大沽口北岸炮台的侧后完全暴露在敌军面前。

联军攻占新河、塘沽后，其舰队便桀结于大沽海口，准备与逼近大沽北岸炮台的陆战队水陆协同，夺占大沽。此时，清统治者已丧失了保卫海口的信心。僧烙林沁声称。能否扼守，实无把握”。咸丰帝非但不严令他坚守大沽炮台，反而说什么“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载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公然要僧格林沁放弃大沽海口，保命逃跑。他还相继谕令恒福等照会英、法公使，要求息兵议和，并告以清廷已派使臣前来迎接公使，“进京换约，以期永敦和好”，但遭到侵略者的拒绝。

8月21日清晨5时，联军集中所有野战炮和舰炮火力，猛烈轰击大沽北岸炮台。北岸炮台总指挥乐善（新任直隶提督）督率炮台守军开炮拒敌。由于各炮台的弹药库陆续中弹起火，守军炮火逐渐稀疏下来。上午8时以后，炮战停止，联军万余人分为二支（左翼为英军、右翼为法军），向石头缝炮台发起冲锋，乐善督率守军用鸟枪、拾枪和长矛、弓箭等奋勇杀敌。9时许，由于炮台被炸，乐善阵亡，守军大部牺牲，石头缝炮台陷落。其它两座炮台的守军也。以难以描述的勇猛精神，寸土必争地进行防御”，抗击敌之进攻，直至炮台陷落为止。这次战斗，清军损失近千人；联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死伤四百余人（法军二百人、英军二百余人）。

僧格林沁见北岸炮台失守，认为南岸炮台“万难守御”，便按咸丰帝的旨意，于当晚尽撤南岸守军，向天津退却。恒福随即在南岸炮台挂超免战白旗，把三座炮台拱手交给了侵略军。

联军控制大沽炮台后，便由贺布率炮艇五艘，海军陆战队八十余人为先头部队，溯白河长驱直入。这时，逃到天津的僧格林沁又以必须与敌军“野战”，而不能“株守营垒”为借口，命令双港及天津一蒂防军一律撤退，加上从大沽地区撤由的清军，总计一万七千余人（其中马队七千、步队万余），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一带。

由于天津地区完全撤防，白河两岸亦无清军阻击，贺布率领的五艘炮艇于8月24日顺利驶达天津城郊。接着，联军后续部队陆续抵达，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了天津城。

三、联军侵入北京，迫签《北京条约》

（一）外交谈判的破裂

联军侵占大沽炮台后，咸丰帝极度惊恐，急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亦授予钦差大臣头街）向英法侵略者乞和。

1860年8月31日，桂良到达天津。英、法公使提出必须全盘接受1858年的《天津条约》，增加赔款。增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等先决条件，方可议和。桂良等被迫答应全部要求，从9月2日起，与英、法代表巴夏礼等举行会谈。侵略者提出停战的主要条件是：赔偿军费，先付给两国现款各三四百万两，撤走通州守军，以便两国公使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并由巴夏礼随带数十人先行入京，察看沿途及京中住房，增辟天津

为通商口岸，立即开市贸易等。咸丰帝感到停战条件过于苛刻，认为公使进京。拥兵而来，显怀莫测”，因而谕令桂良等“莫顾决裂”，拒绝侵略者所提无理要求。9月7日，朱谕军机处和王大臣绵愉，载垣、端华、肃顺等，表示要与英法“决战”，并提出决战时机“宜早不宜迟”，“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同时，令军机大臣等迅速调兵前赴通州，“以资攻剿”。

英法侵略者由于所求不遂，便中断谈判，决计进犯北京。9月10日，联率先头部队三千余人，自天津向通州方向前进。在此之前，咸丰帝得悉英、法公使坚欲带兵径赴通州的消息，“决战"的决心又开始动摇，急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等为钦差大臣，由通州前往天津，与侵略者继续谈判，企图挽回“抚局”。载垣、穆荫接连照会英、法公使，先则要求联军退回天津，然后进行谈判，继则请求侵略者止于河西务，在通州进行会谈。额尔金等考虑剃联军进军北京，需补充大量军需物资，因此，表示愿意在通州举行会谈，以便争取肘间，进行作战准备。9月14日，联军先头部队抵河西务，着手筹建兵站。与此同时，额尔金派巴夏礼等到达涵州。谈判中，巴夏礼除坚持原先提出的条件外，又增加了瓦换和约时须面见皇帝亲递国书，以及将张家湾的清军全部撤退等苛刻要求，以致通州谈判于17日彻底破裂。9月18日，咸丰帝再次下谕与侵略军决战，并令恒福等“广集民团，多方激励”，“一闻张家湾开仗，即令津郡民团截其后路，痛加剿洗”。

（二）张家湾、八里桥之战

9月18日，联军先头部队自河西务越过马头，推进到张家湾附近。僧格林沁得悉通州谈判破裂，便按照载垣等的通知，将巴夏礼等一行三十九人扣押送京，并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

当时，清军在通州一带的部署是：僧格林沁的督师行营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由他统率的马步兵一万七千人，驻扎于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扼守赴通州及京师广渠门（今建国门）的大道，其中驻张家湾的兵力仅有步队千人。副都统格绷额督带马队三千人驻于张家湾的东面和南面。署直隶提督成保率绿营兵四千人防守通州。原驻防逊州的礼部尚书瑞麟所统京营万人及副都统伊勒东阿督带的马步队四千人防守八里桥，作为僧军的后援。僧格林沁还派副都统克兴阿统带祭哈尔马队一千人，防守张家湾西南的马驹桥；又令总管那马善统带察哈尔马队一千人，防守马驹桥东南的采育，以防敌军从马头直接西进，绕道趋京。总计通州地区的防军达三万余人。另外，副都统胜保率京营五千驻齐化门（今朝阳门）以东的定福庄，以便声援僧、瑞两军，保卫京师。

18日中午，联军向张家湾阵地发起攻击。僧格林沁挥军抵抗，给敌以重大杀伤。当调派马队抄袭敌平时，联军炮队突然发射火箭数百枚，以致“马匹惊骇，回头奔驰，冲动步队”，清军阵势顿时混乱，马步兵自相践踏，纷纷溃退。僧格林沁率所部退守八里桥，驻防通州的绿营兵也慌忙随僧军撤走。联军占领张家湾，并乘胜追击，一举占领郭家坟和通州城。

21日凌晨4时，联军从郭家坟一带向八里桥推进，骑兵在前面探路。八里桥位于北京城东二十余里，是由通州入京的咽喉之地。清军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临时构筑了战壕和土垒。自张家湾一带撤退

的僧军与从通州撤退的绿营兵抵达后，总兵力达三万人，其中马队近万人。上午7时，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清军阵地发起攻击。东路为雅曼指挥的法军第1旅；西路为格兰特直接指挥的英军，南路为科林诺指挥的法军第2旅，担负主攻八里桥的任务。由于此次作战以法军为主，故由孟托班担任总指挥。

战前（9月19日），清廷曾告谕僧格林沁等："拿获奸细，据供，逆夷用兵，马队在前，步卒在后，临阵则马队分张两翼，步卒分三层前进。前层踞地，中层微俯，后层屹立，前层先行开枪，中层继之，后层又继之。我军若迎头轰击，马匹一经受伤，必然惊溃，惟有斜抄横击，轰毙必多等语。夷情凶悍，深知兵法，是在该大臣等审度形势，妥筹应敌，以操必胜之权。……若仅用正兵与之相角，恐夷人诡谲，不足以尽其变。"清廷还一再强调必须派出马步劲旅，绕至敌后，于夜间轮番出击，使其自相惊扰，进退两难。但是，僧格林沁等未予重视。

为对付联军的攻击，僧格林沁和瑞麟商定，令马队首先出击，尔后以由定福庄移至八里桥的胜保所部迎击南路联军，瑞麟部迎击东路联军，僧部迎击西路联甲。所有步队均隐蔽在灌木林中和战壕里，待机杀敌，马队则向联军的左翼到右翼的宽大正面实施反冲锋。战斗打响后，清军马队立即冲向前去。他们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敌，用长矛和弓箭迎击敌人，企图冲乱和割裂敌人的战斗队形。一部分骑兵冲至离敌人四五十米的地方，有的冲到敌军指挥部附近。激战一时许，毙伤敌军千余人。但是，清军马队因遭到据壕作战的联军步兵密集火力的阻击和敌炮霰弹的轰击而大量伤亡，被迫退却。随后，南路的法军第2旅将大量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使胜保部遭到重大伤亡。当法军第2旅的两个前卫连冲到桥边时，守卫石桥的清军与敌军展开肉搏战。后因胜保中弹受伤，遂率军退至定福庄。法军追至，胜保又率军逃往北京。在胜保部与南路敌人战斗的同时，僧格林沁指挥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企图分割敌人，尔后以步队配合胜保部包围南路之敌。由于胜保所部败退，僧格林沁的企图来能实现，遂与西路之英军展开激战，双方伤亡甚众。上午9时，英军分兵一部向于家卫（今于家围）进攻，企图抄袭僧军后路。僧格林沁甚为惊恐，便"于酣战之际，自乘骡车，撤队而逃"，以致军心动摇，纷纷退至齐化门以东的皇木厂。迎击东路敌军的瑞麟部则"于未阵之前，先已溃散"，致使法军第1旅颠利地占领八里桥以东的几个村庄，并协同法军第2旅攻占八里矫。瑞麟郎也逃至皇木厂，与僧部会合，后又一齐退至齐化门。中午时分，联军停止前进，迅速占领八里桥附近的咸户庄（今咸宁侯庄），三间房、于家卫一带地方。

张家湾、八里桥之战，是关系到北京安危的关键性一战。英法联军由海口孤军深入，战线拉长，兵力相对分散，粮弹供应困难，加之人地生疏，又失去了舰炮优势，存在许多不利因素。清军在兵力上占有较大优势，且地形熟悉，通州平原地带便于马队驰骋冲杀，同时，又有大量人民群众和团练乡勇积极开展敌后活动，具有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但战斗的结果，却是清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清廷的和战不定。从天津陷落到八里桥之战，咸丰帝忽而主和，忽而主战，时而不准清军"衅自我开"，时而又要清军"相机进剿"，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使得前线将领无所适从，严重影响其抗战的决心和战备。其

次，在兵力部署和作战指挥上存在不少失误。僧格林沁把马步一万余人分散配置在从张家湾到八里桥纵深约二十里的大道两侧，前沿阵地的兵力异常单薄，又没有控制必要的预备队。因此，当联军向张家湾发起进攻时，该处没有足够的兵力迎战，以致一开始就处于不利态势。当马队遭到联军炮火袭击而冲乱步队时，又没有采取严厉措施，制止溃乱，稳住阵脚。在八里桥战斗中，没有集中兵力先打对八里桥威胁最大的南路敌人，又不汲取新河作战的教训，仍令骑兵从正面冲击敌人，而不采取向敌后侧击的战法，都是很不恰当的。此外，僧格林沁在战况紧急、军心动摇的情况下，不是坚定沉着，督队奋战，反而随军溃退，直至率先逃跑。瑞麟拥兵近万，竟也不战而逃。所有这些，都必然导致战斗的迅速失败。

（三）联军侵入北京

张家湾、八里桥败北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极为震惊。咸丰帝立即撤去载垣，穆荫钦差大臣的职务，以其六弟恭亲王奕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拜谕僧格林沁竖立白旗，知照英、法“停兵待抚”，自己却于9月22日带着皇妃等逃奔热河。

奕是个“畏夷如虎”的软骨头，他认为形势危殆，战守两难，如“尚有一线可为，不惜委屈迁就”，就是说，除了屈膝求和，别无它路了。他照会英、法公使，要求停战谈判。联军经张家湾、八里桥战斗，伤亡很大，部队疲惫，兵员粮弹均需补充，因此同意恢复谈判，借以做好进攻北京的准备。谈判近半个月，并无结果。联军却争取了休整时间，然后开始了向北京城的进攻。10月5日，其先头部队向城北安定门、德胜门附近逼进。6日，联军近千人抄至德胜门土城外。僧、瑞两部已成惊弓之鸟，“马队则望影而逃，步队亦闻风而窜，以致逆夷如入无人之境”。坐镇圆明园的奕、桂良等急忙逃往常新店（今长辛店）。联军接着由黄寺、黑寺直趋西北，进攻圆明园。僧、瑞两部向京城西南溃逃，守园的步军统领中营官兵约二千人也逃散一塞。侵略军进入圆明园后，大肆抢劫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放火焚烧殿宇及附近民房。

北京是金、元、明、清四朝的都城，经过历朝特别是明，清两朝的不断修建，已成为一座坚城。当时城上安设大小火炮数千门，外城、内城均挖有较为宽深的护城河。城内尚有八旗骁骑营、护军营、左右两翼前锋茸、步军营、内火器营等满汉军十三万三千余人，仓谷钱粮均有储积。城外又有由胜保统率的各省已经赶来的勤王之师六千五百余人及都统绵勋、伊勒东阿统带的马步万余人。同时，内地诸省的勤王之师，还在陆续赶来。尽管事先缺乏防御准备，但只要文武大员具有誓死坚守的决心，认真筹划战守之策，激扬士气，稳定人心，是可以据城一战的。侵略军指挥官孟托班也承认：“对这样的城市进行围困，特别是在全然没有攻城大炮的情况下，就很可能旷日持久。”无奈留守京城的大臣们均以为“城不可守”，完全丧失了抵抗的信心，根本不进行抗击准备。于是英法侵略者乘战胜之余威，照会清廷，限令于10月13日中午将安定门交给联军把守，否则即行攻城。城内的清廷大臣们不敢违抗，如期开门揖盗。英法联军遂不折一矢，不损一兵，安然进入北京外城。

（四）《北京条约》的签订

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外城后，随即于安定门城墙上安设大炮，对准内

城、紫禁城。10月17日，英、法公使再次照会清廷，要求于23日签字换约，并借口俘虏问题，要求赔偿英国白银三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限期付款。奕全部予以答应。10月18日，联军再次闯进圆明园，在洗劫一空之后，为销毁罪证，竟把这座世界闻名的壮丽宫苑放火烧毁，各种精美建筑和无数珍贵文物化为灰烬。其后，侵略军又劫掠了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处的大量金银珠宝与历史文物，并焚烧了许多著名建筑物。

侵略军的残暴罪行，激起了北京人民的无比愤慨，他们纷纷拿起武器抗击敌人。一次，英军一百多人骚扰西郊谢庄。当地群众在猎户冯三保率领下，拿起简陋的武器，坚守石寨、土堡，连续两次打败侵略军的进犯。联军出动五六百人，企图报复。当敌人接近谢庄时，冯三保的女儿冯婉贞率领埋伏在离村四里处的青少年猎手，“挟刃奋起”，与敌人近战搏斗。侵略军猝不及防，纷纷败退。

与人民的英勇抗战相反，清廷完全屈服于英、法侵略者的武力威慑，于10月24日和25日，分别与英、法侵略者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中英、中法《天津条约》批准书亦同时互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1）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2）辟天津为商埠；（3）准许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拐骗、贩卖人口出洋做苦工；（4）割让九龙司为英国殖民地；（5）交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并听任法国传教士在内地各省租买土地，建筑教堂；（6）赔偿英，法的军费各增加到八百万两。10月28日，咸丰帝批准《北京条约》。英、法侵略者从中国攫取了更多的殖民特权后，便于11月9日先后将军队撤出北京，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威逼清廷签订新约之后，沙俄公使再次借口“说合”有功，逼迫清廷于11月14日与之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不仅迫使清政府承认了《瑷珲条约》的内容，而且把上述条约规定的由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一口吞掉，并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中国的内湖斋桑湖和特穆尔图淖尔（今苏联伊塞克湖）硬指为界湖，为进一步侵吞我国西部领土制造“根据”。此外，还强迫清廷开放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市）为商埠，准许俄商于中国的库论（今蒙古乌兰巴托）、张家口等地进行免税贸易。

美国公使因国内爆发南北战争，当联军在北塘登陆时，应召回国，未及趁火打劫。但事后借口“利益均沾”条款，照样掠取了许多新的殖民特权。

第四部分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下）（1856年9月～1866年2月）

第一节 石达开率军远征与最后失败（1857年5月～1863年6月）

1858年（咸丰七年）5月底，石达开自天就出走，率领听其指挥的数万部队，在苏皖交界处的铜井镇渡江，途经无为，于6月中旬抵达安庆。一路上，他到处张贴布告，阐明离京出走的原因，并表示要继续忠于太平天国的事业。石达开出走后，天王洪秀全曾派人将“义王”金牌一道及合朝文武要求他返回天京的表章送达安庆，争取他回朝辅政。这时，石达开理应从太平天国的全局利益出发，立即返回天京，与洪秀全同心协力，共挽危局；即使暂不回朝，亦应协同在江北的陈玉成部对清军进行反击，或进军江南，打击围困九江等地之敌，以解天京上游之危。但石达开不顾全局利益，竟南进江西，招集旧部，独立进行新的远征。

一、进军江西

1857年10月初，石达开率部离开安庆，由安徽建德（今东至东北）进入江西，在景德镇会集各部，分路南进，经乐平、万年（今万年西），于10月21日占领安仁（今余江东北）。11月10日，石部与由闽入赣的杨辅清等部（约四五万人）会师于贵溪，联合攻城未下，遂西走东乡，于11月底到达抚州，与原驻该处的余子安部会合。12月初，派兵一部经进贤、丰城，西援临江（今清江西南）和吉安。吉安位于赣江西岸，1856年冬即遭湘军围困。石部到达之前半月，东岸的吉水已落入湘军手中，故要解吉安之围，须先攻下吉水。石部对吉水先后发起三次进攻，均为湘军所败。这时，石达开听取元宰张遂谋的意见，决定放弃西援临江和吉安的计划，准备东进浙、闽。1858年（咸丰八年）1月初，石部经永丰、峡江、新淦（今新干）退回抚州。原驻江西各地的太平军，也陆续的来会合。2月26日，石部由抚州东进，3月19日败清军于上饶，进围广丰。因久攻不下，于4月15日撤围，经玉山入浙江，占领江山。杨秀清部则仍入福建，与石部分道而进。

石达开部南进之初，太平军在江西的兵力仍占很大优势（约十余万人），如坚持西援吉安、临江，给湘军以沉重打击，即可在江西开创新的局面，无如石达开轻率地放弃西援计划，东进浙江，结果继1858年1月22日临江失陷之后，九江、抚州、吉安等地也于同年夏秋先后失守，以致江西局势急转直下，使天京上游太平军的作战增加了困难。

二、转战闽浙

石达开率军占领浙江江山后，从4月20日开始，自统大军围攻衢州

（今衢县），另由国宗石镇吉率兵一部连占常山、开化、遂昌、松阳（遂昌东南），处州（今丽水），缙云、永康、武义、云和，宜平（遂昌东）等州县，控制了浙西南大片地区，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清军。

石达开部由江西东入浙江时，江南大营清军正在围困天京，清廷判断石部入浙的主要意图是抄袭苏常，回救金陵，于是命在湘守制的曾国藩（曾于1857年春由江西返湘奔父丧）统率在赣湘军，东援浙江。其实，石达开并无回救金陵之意，在衢州久攻不克的情况下，于7月14日撤围南行，越仙霞岭南趋福建。石镇吉部也奉命由浙入闽。8月中旬，石达开与石镇吉、杨辅清、杨义清等部会师于福建浦城。但杨辅清，杨义浦随即率部返回江西，脱离石达开，后取道皖南回援天京。

8月底，石部继续南进，于30日攻占建阳，不久又西占邵武。石达开的战略目标是经赣南、湘南西入四川，因此，9月22日又撤离邵武，分军两路前进：石达开自统大军于10月中旬抵达福建汀州（今长汀），18日占领江西瑞金，石镇吉等率部直趋赣南，于江西新城（今黎川）为湘军刘长佑郎所阻，不得已退回福建。经建宁、宁化到达汀州。此后，石朗吉等也率部脱离石达开单独行动（后经广东、湖南进入广西，1860年4月在广西百色被清军消灭）。

曾国藩自受命统兵援浙之后，7月中旬离湖南湘乡，8月底到达江西南昌，9月中旬抵赣东河口镇（今铅山）大营。随着石达开部向南推进，曾国藩又于10月中旬移驻江西建昌府（今南城）

12月2日，石达开部由瑞金南进会昌，后经安远、信丰，于1859年（咸丰九年）1月3日攻克江西南安府（今大余），11日又克崇义。

当时，陈玉成、李秀成两支太平军主力，先后取得了二破江北大营和三河镇歼灭战的胜利，杨辅清部已攻克江西景德镇，长江南北又出现了对太平军较为有利的形势。但石达开部却孤军南趋，“势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战斗力已大不如昔。曾国藩命道员张运兰部由赣东之建昌驰援景德镇，命道员萧启江部四千余人继续尾追石部。萧部于2月18日进至南康，随即向南安府逼进。月底，石部弃南安，崇义，进入湖南境内。

三、围攻宝庆

石达开部由江西进入湖南后，于1859年3月2日占桂阳（今汝城），中旬连下兴宁（今资兴）、宜章、郴州（今郴县）、桂阳州（今桂阳），嘉禾，准备取道湘西进入四川。

湖南是湘军的后方老巢。石达开率领号称二十万人（实约十余万人）的大军由江西大举入湘，不仅震动了湖南当局，也影响了各地湘军的军心。湖南巡抚骆秉章等急忙从本省各地征调兵勇赶赴湘南防堵，湖北巡抚胡林翼还从湖北派兵往援。

石部攻占郴州、桂阳州后，本欲北攻衡州（今衡阳市），由于清军在常宁，耒阳一带防堵，乃转兵西向，由嘉禾经宁远北上，从4月6日开始围攻永州府（今零陵），因连连受挫，只得撤围，分兵两路北趋宝庆府（今邵阳市），于5月10日和24日先后到达宝庆城外。

宝庆是湘南重镇。太平军抵达时，清军已作了布防：城东由总兵周宽世部和道员赵焕联部防守，城南由副将田兴恕部驻守；城西的资江则由水师巡防。

石达开到达宝庆后，设大营于城南十里之澄水桥，傅忠信部配置于城东十二里之泥湾，赖裕新部配置于资江西岸之神滩渡，从东、南、西三面构成对宝庆城的包围。直至6月中旬，才切断北面通道，完成合围。

从6月下旬开始，清军各路援军陆续抵达宝庆外围。25日，知府刘岳昭率部抵达城东四十里的洪桥。7月4日，道员刘长佑亦率江忠义、刘坤一所部到达宝庆城北三十里的严塘。两路援军自东北方向节节推进。不久，胡林翼从湖北派来的道员李续宜所率湘军五千余人（共十一营）也经益阳，兰田（今涟源）、新化进抵宝庆，使宝庆地区的清军总数达到近四万人。7月24日，奉命总统宝庆东路军务的李续宜与刘长佑等于高家冲（距城九里），商讨解围之策。刘长佑认为“东路势厚，且岩壑幽辽，不可用武”，李“乃定计由北路进攻”。

石达开得知清军援兵大至，于7月25日督率各部包抄清军高家冲大营，与敌大战于蓝江铺，清水塘等处。27日，李续宜趁东路鏖战之际，率所部自高家冲西渡资江，在水师配合下，攻陷了太平军在田家渡至清水塘一带的营垒和哨卡。28日，西路的赖裕新所部太平军向北路湘军发起反击，又被李续宜等部击败，伤亡数千人，遂纷纷撤至资江东岸。西线既破，宝庆城内外的清军得以联成一气。此后十余日内，双方休战对峙。

8月10日，清军再次发起进攻，前锋推进到贺家坳、龙王桥一线。石达开鉴于清军兵力已厚，宝庆难以攻克，决定改变进军路线，南下广西，乃于13日一面派兵进攻贺家坳的湘军营垒，以掩护退却，一面命宰制陈亨容等率部南趋新宁，准备退路。8月14日晚，石部全线撤离宝庆外围，经白仓（今邵阳县甫）南趋东安（今东安西南）。8月22日，各部由东安、新宁分别退入广西境内。

宝庆之战是石达开自天京出走以来所进行的规模最大历时最久（三个月）的一次作战。结果劳师费时，撤围而去。究其原因，一是敌已有

备，而且援军大至，兵力相当雄厚，二是长途转战，部队攻击能力减弱，三是没有及早合围，尽快发起攻击；四是没有在城北部署打援兵力，阻止敌人增援。

石达开部从江西进入湖南，既属过境入川性质（这里姑且不论其入川是否可取），就应师行间道，不攻坚，不恋战，力求行动迅浊，争取早日入川。可是，由于贪攻永州、宝庆，结果迁延时日，使清军得以在湖南集结兵力，实行围堵，从而丧失了进军四川的时机。

四、回师广西

石达开率军退入广西后，经兴安，义宁（今灵川西）、永福等地，于10月15日轻取庆远府（今宜山）。由于清军兵力不足，没有立即进逼，石部得以在此安然度岁，进行休整补充。但庆远一带是人口稀少的贫瘠山区，大军（由于沿途扩充，此时约有二十余万人）久驻于此，军需给养发生严重困难，因而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不断发生分化。1860年（咸丰十年）1月，先有傅忠信、谭体元等率部出走，继有郑乔等所率“花旗”部（即1855年底于江西参加太平军的原广东天地会部分起义武装）离桂返粤。不久，又有余忠扶部杀余入黔。山于敌军迫近，石达开于5月底弃庆远，率部南下，后进驻宾州（今宾阳东北）、武缘（今武鸣）一带。同年秋，彭大顺，童容海，朱衣点等又率部东走（后在江西会合复由广东北上的郑乔等部，众达二十万，1861年9月在江西河口镇并入李秀成部，重归天朝）。

鉴于众叛柒离，良将精兵尽去（当时仅剩万余人），石达开一度产生隐退的念头，但无安身之处。在无可奈何之中，他只得勉力支撑。幸好当时新任广西巡抚刘长佑等部清军正集中兵力进攻陈开领导的大成国起义军，为石达开继续在广西活动和重整旗鼓提供了机会。1861年（咸丰十一年）8月下旬，大成国的京城秀京（即桂平）失陷，不久陈开被俘遇害，其余郎约三万人即投奔石达开麾下。于是，石达开的队伍得以扩大，号称十万，但战斗素质已远不如前。为开创新的局面，石达开决定重新打起远征四川的旗号。不久即率全军离开广西，北进湖南，伺机西入四川。

五、辗转入川

1861年10月下旬，石部自桂北进入湖南，进攻绥宁（今绥宁西南），后沿湘黔边境北进，经靖州（今靖县），会同、沅州（今芷江）、泸溪、永绥（今花垣）、于1862年（同治元年）1月底经龙山进入湖北来凤，2月中旬又经湖北利川进入四川境。

在石部入川以前，清廷除责令新任四川总督骆秉章饬令川东镇道督率兵勇严密堵剿外，又责令湖广总督官文，新任湖北巡抚严树森督饬在防将弁，会同新任湖南巡抚毛鸿宾等所派各部，实行“三面兜剿”，企图将石部一举歼灭于湘鄂于湘黔边界。由于四川清军主力未能及时赶到川东前线，清廷的上述计划未能实现。

石达开率军入川后，于1862年2月20日占领川东石砫厅（今石柱）。因北有大江阻隔，只好沿长江南岸向西推进。4月上旬攻涪州（今涪陵）不下，5月上旬攻綦江又不下，乃西走合江，入贵州仁怀厅（今赤水），复折入四川，于5月26日占叙永，6月16日克长宁（今珙县东）。由于沿途扩军，石部总数又达十余万。不久，各地清军赶到，北进之路受阻，不得不折而东走，于8月中旬再经贵州仁怀厅境趋遵义、黔西，10月20日进围贵州大定府（今大方）。这时，一度曾随石镇吉行动的宰制曾广依部也来会攻，但终未攻克大定。于是，石达开率部西走毕节，入云南境，为了牵制清军，派宰制李福猷会同曾广依率部南走水城、郎岱（今贵州六枝西南），然后西入云南。

石部进入云南后，又分兵三路入川：宰辅方元祥等率数万人从川边屏山县进入，东趋叙州府（今宜宾市），宰辅赖裕新率二三万人经昭通、东川（今会泽），西渡金沙江，北攻四川宁远府（今西昌），“使官兵不能兼顾；马石达开自率本部大军由镇雄北进四川，于11月18日占领筠连，22日进占高县，并前出到横江镇，双龙场、玉黄楼一带，与方元祥部夹横江为营，伺机由横江顺流而下，抢渡金沙江，进图叙州府。不久，李稻献、曾广侬郎也前来会合。四川总督骆秉章为阻止石部入川，急调各路清军密集横江两岸，先调云南提督胡中和及总兵何胜必、萧庆高督军由犍为驰赴叙州以南，“相机截剿”，继调总兵唐友耕部由江安疾趋庆符，按察使刘岳昭部由綦江驰赴长宁，珙县。云南巡抚张亮基在叙州闻警，也派参将杨发贵率部赴安边铺（叙州西南）协防。12月下旬，清军连续向石部发起进攻，双方互有伤亡。1863年（同治二年）1月1日，清军进逼横江镇，同时大败横江西岸的方元祥部。1月8日，清军又大举进攻双龙场。石达开挥军迎敌，将清军击退。此后，战事呈胶着状态。1月30日，刘岳昭、胡中和等再次率部猛攻双龙场。由于石达开的部将郭集益等曙中通敌，石部大败，伤亡掺重，不得不于次日全部撤离四川，复入云南，驻扎于昭通一带。

六、石达开部的覆灭及其教训

1863年3月，石达开决定兵分两路，再次进军四川。自统西路，沿金沙江西行，伺机渡江北进，李福猷统率东路，绕道贵州北上入川。

3月24日，李福猷率队分路入黔，一由镇雄趋毕节，一由昭通趋威宁、水城。5月初，全部由仁怀东趋遵义。5月底，又自遵义、桐梓一带东进，经绥阳抵婺川（今务川）。7月，自婺川西攻正安不下，乃入四川境。8月下旬，经酉阳、彭水，进至黔江。

石达开于5月12日率三四万人自云南昭通进入四川宁远府境。四川总督骆秉章与布政使刘蓉早已沿大渡河严密布防：署雅州府（冶今雅安）知府蔡步钟就近募勇，配合总兵唐友耕等部扼守北岸安庆坝至万工汛大小渡口；松林地（今石棉西北）土司千户王应元率"士兵"扼守松林河，并调胡中和部驻扎于化林坪（今泸定南）一带，以为声援；都司谢国泰部守猛虎冈，控制通打箭炉（今康定）之路；邛部（今越西东北）土司岭承恩率兵控制越巂大路各隘，以逼迫石部"入夷地小径"，然后"从后路包抄"。清军如此层层设防，对不熟悉当地地形而又孤军深入的石达开部来说，几如陷阱。

石部由宁远北进时，侦知越巂大路有敌军扼守，便以"土人"为向导，绕经冕宁，抄小路北上，直抵大渡河边的紫打地（今安顺场）。紫打地在崇山峻岭之中，大渡河横亘于前，松林河及祭罗河分隔左右，又逢大雨，河水骤涨，敌军严守对岸渡口，石部实难飞渡。石达开只得命令部队搭棚驻扎，赶造船筏，准备强渡，5月21日，以四五千人强渡大渡河未成，船筏全毁，伤亡甚众。后决定西渡松林河，冀由泸定桥直趋天全，因遭土司王应元等部的阻击，西进计划又告落空。嗣后，清军四面逼攻，石部弹尽粮竭，陷入绝境。石达开曾致书王应元等，许以重金"买路"，但遭拒绝，乃于6月3日令所部分两队突围。一队抢渡大渡河，一队抢渡松林河，均来成功。他见大势已去，令妻妾五人，幼子二人投河自尽，自带五岁幼子石定忠及宰辅曾仕和等四人于6月13日前往清军营垒，幻想牺牲自己，保全部众。岂知反动派决不刀下留情，他们将石部所剩七千余人全部处死，并将石解往成都。8月6日，石达开于成都从容就义，时年三十三岁。

进至黔江的李福猷部得悉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消息，乃放弃入川会师的计划，东入湖南永绥，然后沿湘黔边境南下，经会同。绥宁重入广西，于10月9日攻占龙胜。10月17日，又经兴安东趋灌阳；此时，李福猷与其弟李福忠发生分裂。李福猷自率一部由灌阳东入湖南道州、江华，活动于粤桂边境，年底被清军消灭。李福忠则率部经湖南城步、通道入贵州，后在湘桂黔边区坚持斗争，直至1871年8月失败。

石达开于1857年率部出走后，行程数万里，进行了历时六年的远征，最后终于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这个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石达开率军他走，不符军心民意。随着其错娱行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加上孤军远征，困难越来越大，广大将士感到前途渺茫，以致分化和投敌事件屋山不穷，直至在广西境内发展到众叛亲离的地步。

石达开率军远征的目标是进入四川，这是他在起义初期就提出过的进军方向。四川是清王朝的战略要地之一，又利于割据，倘能入掘该省，实行正确的方针政策，反抗清王朝的统治，对全国革命自然是有利的。但石达开在当时形势下，以其所处的战略位置（远离四川），不依靠革命势力强盛的江、浙、皖、赣、而孤军远征四川，胜利的把握是不大的。在进军过程中，石达开在作战指导上又缺乏一个正确的方针，东

奔西走，强攻坚城，以致劳师费时，给了敌人以部署防御的时机。经过广西大分化之后，老部队所剩无几，而清廷已调骆秉章及万余湘军加强了四川的防御，石达开不能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放弃进军四川的计划，改取联合西南各族人民起义军共同反清的方针，以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再图大举，而是不顾主客观情况，执意进川，结果一败再败，造成全军覆没的可悲结局。

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前期战争中不愧为著名的战将，但自率部脱离天京之后，孤军冒进，没有后方的支持，没有友军的配合，成了流寇式的草莽英雄。尽管一度拥有号称数十万之众，却没有打过多少象样的胜仗，一直摆脱不了被动的处境，最后终于陷入绝地，被数量有限的清军和土司部队所歼灭。石达开这位“绝世英物”，竟成了清军的俘虏，这决不是什么“恶运使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不幸，而是他政治上不顾大局，军事上实行流寇主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第二节 二破江北大营与三河镇大捷（1858年8月～11月）

石达开出走后，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掌握了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由于他们毫无军政才能，朝中文武大臣不服。1857年10月，洪秀全改以蒙得恩为正掌率，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代替安，福二王执政。次年，洪秀全又提拔了一些年青将领，恢复了早期的五军主将制，封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理朝政。这些措施，对稳定政局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在军事上，太平天国当时面临的形势仍然是十分严酷的。继1857年底镇江、瓜洲失守之后，1858年1月，江南大营的清军进扎天京高桥门、龙脖子，进逼秣陵关；江北大营则于1858年春移驻天京对岸之江浦，浦口，会同江南大营，缩小对天京的包围圈。同年5月，九江失守，天京的西面屏障安庆也受到湘军的直接威胁。直至同年9月和11月太平军取得二破江北大营与三河镇大捷之后，形势才为之一变，基本上扭转了天京内讧以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萎靡不振的局面。

一、枞阳会议

为解天京之围，李秀成于1858年3月底请命出京，途经芜湖，与其弟李世贤商定，“一人敌南岸，一人敌北岸”。不久，李秀成自率部将陈坤书等五千余人，分别由芜湖和东梁山渡过长江，齐集含山，于5月8日再克安徽和州（今和县），接着又连占全椒，滁州（今滁县）、来安。

由于天京被围日紧，南郊板桥、大胜关已被敌攻陷，七桥瓮、印子山、雨花台也处于敌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李秀成日夜焦虑，在全椒加紧操练部队，准备先扫清江浦、浦口之敌，以安定天京人心。6月5日，他率兵五千余人自全椒进扎江浦大刘村，拟取道桥林进攻江浦，浦口。次日，江北大营统帅德兴阿督军万余进攻大刘村。时适大雨滂沱，太平军疏于戒备，以致寡不敌众，初战失利，损失千余人，新旧营垒十三座尽失。这使李秀成意识到，单凭一军之力，难解天隶之围，于是行女各路将赖，约定在安徽枞阳举行会议，共商救京办法。

8月上旬，李秀成与陈玉成，李世贤等将领于枞阳商定：先由陈玉成、李世贤等率部攻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然后由吴如孝率部在庐州东北一带活动，牵制胜保所部清军，陈玉成则率主力速进滁州东南的乌衣镇一带，会同李秀成部全力进攻江北大营。

枞阳会议使李秀成、陈玉成等人“各誓一心，订约会战”，并制定了较正确的作战方针，为再破江北大营以解京围奠定了基础，因而在太平天国后期战争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二、再克庐州与二破江北大营

1858年8月11日，陈玉成，李世贤、吴如孝三邮联合行动，由舒城

三河镣向庐州逼进。当时，新任安徽巡抚翁同书尚未到任，庐州城内仅有清军数千，由副都统峨麟瑞督率驻守，另由新任安徽布政使李孟群带勇万人驻守南郊。8月23日晨，太平军两万余人从西、南两个方向直逼城垣。清军未及交锋，即纷纷惊溃（李孟群部西逃六安）。当天中午，太平军即进占庐州城。

太平军再克庐州，清廷上下为之震动。咸丰帝立即任命胜保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所有皖境各军均归节制。同时，谕令湖广总督官文从沿长江东下的鄂军中分派劲旅，赴援庐州；谕令德兴阿从江北大营中酌拨马步官兵，前往庐州“协剿”。清廷严仓胜保及各路将领务必将庐州即日收复。

太平军的主要进攻目标并非庐州，而是江北大营，因此，未等清军援兵赶到，陈玉成早已挥军由界牌直趋滁州，于9月中旬抵乌衣一带，与自全椒进抵该处的李秀成绍会师。在此之前，吴如孝按约率部自庐州北进，占店埠镇（今肥东）及其东北之梁园，进逼定远，以牵制胜保军。

当时，江北大营统帅德兴阿拥有兵勇一万五千余人，以浦口、江浦之间的陡冈，安定桥，小店（今永宁镇）一带为重点，分驻于西至江浦石碛桥（今桥林）、高旺，东至瓜洲，三汊河，北至来安，施官集的广大地区内，绵延二百余里，长江内则有水师巡船往采游弋，以资接应。战前，德兴阿得意地说：“各路马步兵勇，或多或少，择要分布，有警则奋粥向前，贼多则添拨援应；海全一军驻扎石佛寺，无论何处紧急，酱可策应。”他认为攻守都有把握，但作战结果表明，清军的这种分散部署，正好给了太平军以各个击破的极好机会。

李秀成、陈玉成两郎太平军会师乌衣之后，众达数万，与江北大营清军相持。9月26日，德兴阿派出部队由小店进攻乌衣。太平军奋起迎战，大败清军，歼敌三四千人。27日，太平军乘胜向小店发起猛攻，击败由江南大营来援的总兵冯子材部五千人。陈玉成部于是冲破清军陡冈军营，直下浦口，在从九袱洲渡水前来的太平军配合下，再衣大败敌军，并将浦口一带的清军营垒全部烧毁。清军见后路被袭，阵势大乱，纷纷夺路而逃。德兴阿先逃六合，后由水路逃往扬州。陈玉成部随即于29日占领江浦。至此，江北大营再次被摧毁，清军前后损兵万余人。太平军攻破江北大营之后，恢复了天京与江北的联系，保障了对天京的供应。同时，大大地鼓舞了士气，为夺取三河镇大捷创造了条件。

二破江北大营之后，李秀成率部东进，于10月4日占仪征，9日占场州，清军不战而逃，德兴阿北逃邵伯镇。15日，江南大营帮办军务张园梁率兵六千余人由镇江渡江北援，李秀成以兵力单薄，于21日弃守扬州，继又退出仪征。在李秀成率部东进的同时，陈玉成率部由浦口北攻六合，由于道员温绍原据城死守，直至24日才攻克。

江北大营惨败后，清廷将德兴阿革职，并决定撤去江北大营建制，江北军务由江南大营统帅和春统一节制。

三、三河镇大捷

1858年5月，浙江布政使、湘军悍将李续宾率部攻陷九江后，湖广

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等即拟订“东征计划”，准备乘胜东援安徽。不久，李续宾即率部渡江，返回湖北。同年8月，太平军攻克庐州，官文便命令。李续宾迅速进兵，攻克太湖，即乘势扫清桐城、舒城一路，疾趋庐州，会图克复，兼扼贼匪北窜”。所以，当陈玉成、李秀成部挥师东向，进攻江北大营时，江宁将军都兴阿和李续宾等即率兵勇万余人自湖北东犯安徽，9月22日陷太湖，然后分兵为二：都兴阿率副都统多隆阿和总兵鲍超所部进逼安庆，李续宾率所部湘军北指庐州。

李续宾部于9月27日陷潜山，10月13日陷桐城，24日陷舒城，接着指向舒城东面五十余里的三河镇，准备进犯庐州。

三河镇位于界河（今丰乐河）南岸，东濒巢湖，是庐州西南的重要屏障。该镇原无城垣，太平军占领后，新筑了城墙，外添砖垒九座，凭河设险，广屯米粮军火，接济庐州、天京，因而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居重要地位。时太平军守将为吴定规。

10月24日，陈玉成刚克六合，即接到湘军大举东犯安徽的报告，便毅然决定回兵救援。并启奏天王，调派李秀成部同往。

11月3日，李续宾率精兵六千进抵三河镇外围。11月7日，分兵三路向镇外九垒发起进攻：义中等六营进攻河南大街及老鼠夹一带之垒，左仁等三营进攻迎水庵、水晶庵一带之垒，副右等二营进攻储家越之垒。李续宾则亲率湘中等二营为各路后应。太平军依托砖垒顽强抵抗，大量杀伤敌人，但由于己方伤亡亦众，便放弃镇外九垒，退入镇内。

在湘军进攻三河镇外围的当天，陈玉成率大队赶到，扎营于三河镇南金牛镇一带。11月14日，李秀成也率部赶到，驻于白石山。至此，进抵三河镇一带的太平军众达十余万人，军势大壮。

在太平军强大援军的威胁下，李续宾的部将曾建议退守桐城。但李一意孤行，认为“军事有进无退，当死战”，竟于11月15日深夜派兵七营偷袭金牛镇。次日黎明，当行至距三河镇十五里的樊家渡王家嗣堂时，与陈玉成军遭遇。太平军且战且走，将敌人诱至设伏地域。当时大雾迷漫，咫尺莫辨，湘军偷袭部队经太平军勇猛冲杀，死伤过半，队伍星散。李续宾闻报，亲自率兵四营往援，连续冲锋数十次，均不得入。驻扎于白石山的李秀成部闻金牛镇炮声不绝，立即赶往参战：驻守三河镇的吴定规也率部出城合击清军。李续宾见势不妙，逃回大营，并传令各部坚守待援。实则这时守垒的湘军有的已经逃散，有的被太平军阻截在外，因而有七个营垒迅速被太平军攻破。接着，李续宾的大营也被太平军包围。他督军往来冲突，终不得脱，当夜被太平军击毙（一说自杀）。之后，太平军继续围攻负隅顽抗的残敌，至18日，全部肃清。这一仗，太平军一举消灭湘军精锐近六千人，是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后期一次出色的歼灭战。

陈玉成、李秀成于三河大捷之后，即乘胜率部南进。时舒城之敌已退守桐城，陈、李两部便共同往攻，于11月24日夺取该城。都兴阿所部清军于太湖与李续宾部分军后，即进逼安庆，10月15日攻占安庆北面门户集贤关，继而配合杨载福部水师，围困安庆。及至李续宾大败于三河镇，接着舒城，桐城又被太平军占领，都兴阿恐太平军从侧后抄袭，遂于11月27日撤安庆之围，经石牌（今怀宁）退驻宿松。太平军随即克复潜山、太湖二城，扩大了占领区，改善了安庆的防御态势。

湘军三河镇之败，主要原因是孤军犯险。李续宾仅率八千余人自湖北东犯，入皖之后，连陷四城，处处分兵驻守，结果，“兵以屡分而单，气以屡胜而泄”。进至三河镇后，仅剩六千人，当太平军大队赶到时，已无阻援之兵可派。加之李续宾刚愎自用，拒不接受部将关于退守桐城的建议，终于全军覆灭。对于湘军的这次惨败，咸丰帝闻之“不觉陨涕”。曾国藩“哀恸填膺，减食数日”。胡林翼则哀叹说：三河败后，“军气已寒，非岁月之间所能复振”。又说：“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可见此战对清廷和湘军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

太平军之所以能打这样漂亮的歼灭战，主要由于决心正确果断，兵力集中，战术比较灵活。当湘军进抵舒城、三河时，陈玉成果断地决定兼程回援，并奏调李秀成部同往，形成了兵力对比上的绝对优势。在对敌发起进攻时，太平军采取正面迎战与伏击、抄袭相结合的战法，各部之间密切协同，主动配合，迅速分割包围敌人，打得湘军前后左右不能相救，终将李续宾及其所部彻底歼灭。

通过三河大捷，太平军粉碎了湘军东犯的图谋，保卫了皖中根据地，对鼓舞士气，稳定江北战局，保证天京安全和物资供应，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 二破江南大营与东征苏常沪（1860年2月～8月）

太平军于1858年下半年取得二破江北大营与三河镇大捷两次重大胜利后，战争形势有了较明显的好转。1859年洪仁玕到达天京后进行的某些革新，又使太平天国的政治局面有了某种程度的改进。正是这些条件，促成了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与东征苏常等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胜利。

一、二破江南大营作战方针的提出

1859年6月，当石达开率军围攻湖南宝庆时，清廷为阻止太平军入川，曾命曾国藩亲自统兵前往四川扼守。8月，石部自湖南退入广西后，清廷又命曾国藩暂缓入川，改援安徽。10月，曾国藩与官文、胡林翼等共同制订了一个。四路图皖”的计划，准备再次进攻安徽。同年底，曾国藩自湖北移营安徽宿松，胡林翼移营安徽英山，向皖西太平军根据地步步进逼。

在天京对岸，当1858年冬陈玉成、李秀成会师三河镇之际，留守滁州、全椒的李秀成部将李昭寿（原系捻军，后加入李秀成部）被钦差大臣胜保招抚，于11月1日献城降清。1859年2月底，与李昭寿关系密切的江浦守将薛之元又投降清军。不久，浦口等地也落入敌手。这样，皖北与天京之间的联系又被隔断。为了打通联系，陈玉成、李秀成于1859年3、4月间曾先后两次率军进攻江浦、浦口，但均未得手。其后，陈、李两军转战于六合，仪征、扬州、天长、盱眙、来安、滁州间，企图诱使清军分兵，乘隙夺回浦口，江浦。直到11月间，在击败署湖北提督周天培等部清军后，才占领浦口，并围攻江浦，稍解天京之围。此后，李秀成率军留守浦口一带，陈玉成则率军返回皖西战场，对付东犯之湘军。

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由香港抵天京，颇为洪秀全所器重，不久即被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洪仁玕总理朝政后，撰写了《资政新篇》等著作，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使太平天国的领导力量有了某种程度的加强。但洪仁玕的被重用，引起了一些“老兄弟”的不满。洪秀全便加封前军主将陈玉成为英王，加封李秀成为忠王，使这一矛盾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在同年10月，又发生了右军主将韦志俊于皖南池州（今贵池）降清的事件：幸其部将纷纷反对，被他带走的人马不多。

综观1859年的形势，太平天国既出现了新的希望，也存在不少困难，特别是天京仍处于江南大营清军的包围之下，总的形势依然相当严酷。

面对上述情况，李秀成一再向洪秀全“强奏”，要求率军离开浦口，设法攻打江南大营，以解京围。这一要求最后得到了洪秀全的应允。关于如何解围问题，李秀成与洪仁玕进行过三次面商。洪仁玕认为：“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

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李秀成同意这一计谋，便与洪仁玕共同确定了如下作战方案：（一）由李秀成、李世贤率部。伪装缨帽号衣，一路潜入杭、湖二处”，攻敌之所必救，以吸引和调动江南大营清军，当出现上述情况时，立即放弃浙江杭州和湖州（今吴兴），由小路回师天京，围攻江南大营。（二）由英王陈玉成执行“虚援安省”的任务，在皖北实施佯动，以掩护江南之作战行动。整个作战由李秀成负责组织实施。

二、奔袭湖杭与回师天京

1860年1月底，李秀成将镇守浦口的任务交给部将黄子隆，陈赞明后，即前往芜湖，召集将领会议，说明天京被围的危急形势，宣布攻杭救京的计划，明确进军路线和各将领的任务。2月10日，李秀成率陈坤书、谭绍光、陆顺德等部二万余人到达南陵，后经清弋江镇和马头镇，绕过宁国府，于24日攻占广德，留陈坤书，陈炳文率部守城，以备接应，自率谭绍光，陆顺德、吴定彩等部轻装疾进浙江。为掩护李秀成主力的进军，李世贤率部由南陵经泾县，进占旌德、太平（今太平东），留新任右军主将刘官芳在这一带活动，自率大军东入浙江，29日与李秀成部会师于安吉（今安吉北）。3月4日，李秀成、李世贤两军大败清军于长兴西南的虹星桥，并进占长兴。然后分军为二：李世贤率部佯攻湖州，以牵制清军；李秀成则率领精兵六七千人冒充清军，日夜兼程进袭杭州。

3月11日，李秀成所率精兵进至杭州城外。时杭州城除满营外，仅有兵勇二千八百余名。19日太平军轰塌清波门城垣，由一千三百五十人组成的先锋队立即冲入城内，攻占杭州，杀死浙江巡抚罗遵殿等多人。惟杭州将军瑞昌等踞守的满城；未能攻下。

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得知太平军入浙，即于3月10日派总兵张玉良等率兵二千由六合往援。咸丰帝深恐失掉浙江这个财赋之区，严令和春增调劲旅赴浙（后又命和春兼办浙江军务）。和春只得遵旨加拨援兵，江南大营“先后调援者不下一万三千人”，统归张玉良率领。太平军攻陷杭州四天之后，即3月23日，张玉良所率援兵才到达杭州城外。

李秀成见调动江南大营清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便于3月24日在城内遍插旗帜以为疑兵，连夜撤出杭州，率军疾驰北返。28日过赂安，循天目山走小路北趋孝丰（安吉西南），4月4日抵广德。4月8日，于安徽建平（今郎溪）召开了有辅王杨辅清、侍王李世贤（4月3日率部由湖州撤围西返），右军主将刘官芳、定南主将黄文金、平西主将吴定彩，求天义陈坤书等参加的军事会议，共同商定了解救天京之围的详细计划。会后，即分东西两路进援天京。

西路由杨辅清、黄文金等率领，从安徽宁国府东面的洪林桥一带出发，于4月12日占江苏高淳，18日占溧水（浙江提督郑魁士败走镇江），23日占秣陵关。29日，分兵两支：一　由杨辅清、黄文金率领指向雨花台，一 由刘官芳，陈坤书率领进逼高桥门。

东路又分左右两翼：右翼由李世贤率领，于4月13日占领溧阳，15日攻宜兴，16日迫常州，以牵制东面清军，尔后回师西向，于23日占领

句容。左翼由李秀成亲率本部，经溧阳进占赤山（句容西南）。27日，李秀成部自赤山、李世贤部自句容分进合击淳化镇（今江宁东），次日大败帮办江南大营军务、江南提督张国梁郎清军，克复该镇。

当李秀成率军回师天京之际，在皖北执行佯动任务的陈玉成、吴如孝等率军由全椒南下，于4月底渡江，经江宁镇抵板桥、善桥一带。

三、摧毁江南大营

清军江南大营于1858年初重建后，统帅和春设大营于沧波、高桥两门之间。不久，强征数万民夫，于天京城外挖掘深阔各约丈余的长壕，绵亘百余里，经年始成。1860年1月底，李秀成离浦口后，江南大营清军水陆并进，攻陷了浦口沿江一带太平军垒卡二十余座，并于2月1日占领江浦和九洑洲，进一步围困天京。

4月底，各路太平军抵达天京外围，众达十余万人，在扫清清军外围据点后，随即准备总攻江南大营。总攻部署是：李世贤部自北门洪山、燕子矶，李秀成部自尧化门，刘官芳、陈坤书部自高桥门，杨辅清部自雨花台，陈玉成部自善桥方向，五路并进。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则由城内出击，配合援军夹攻清军。

5月2日，太平军发起总攻。是日天气晴朗，但从当晚开始降雨，连日不止，太平军冒雨连续进攻。

5月4日，陈玉成部于上河镇，毛公渡一带搭造浮桥数道，进攻天京西南清军营垒外墙。城内太平军也纷纷出击。5日，陈玉成部突破敌军在天京西南所筑长壕。当天，城内太平军抛掷的火罐落入清军副将雷安邦营内，引起火药轰发，该部随即外逃。附近清军闻之大惊，也纷纷撤出营外。太平军乘敌人混乱之机，前后夹攻，半日之内，将江南大营西半部的五十余座营垒全行攻破，歼灭清军总兵黄靖以下数千人。张国梁闻西路有变，率兵往援，见营盘已失，只得仓皇退回，破坏上方桥，企图固守小水关以东各营垒。太平军突破敌西南长壕，内外会师，重围已解，士气更高，便连夜乘胜猛攻。清军军营四处火起，江南大营总部所在地小水关大营也被攻破，和春等率残部经石埠桥乘船逃往镇江。江北及九洑洲一带清军也随即逃遁。于是，重建后围困天京两年多的清军江南大营又被摧毁。太平军缴获了大量枪炮、火药、铅子，以及白银十余万两。

二破江南大营，是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最为“得意之笔”。洪仁玕、李秀成等正确地选择杭州作为“攻敌必救”的目标，调动和分散江南大营清军的兵力，然后回师急攻，内外夹击，使数万清军陷入被动挨打地位，这一着是颇为成功的。

太平军在此次作战中不仅有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的正确方针，而且有周密的计划。在进军浙江和回攻江南大营之先，都召开了作战会议，统一了各将领的认识，明确了各自的任务，因而在作战过程中能做到齐心协力，所向披靡。确如李秀成所说：“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先须联万心而作一心。”

此战成功之处，还在于集中了优势兵力。清军江南大曹，筑有号称真“万里长壕”的坚固工事，即使在分兵援浙之后，仍拥有较为雄厚的兵力。为歼灭这股清军，太平军集中了天京周围可能集中的十余万军队，因而在四五天之内，即彻底摧垮了和春、张国梁苦心经营了两年多的江南大营。

洪仁玕、李秀成等在作战指挥上此较灵活，注意了主攻、助攻、掩护、佯动相结合。进军浙江时，由陈玉成部在皖北佯动，以迷惑和牵制

敌军；由皖南进军杭州时，先则由李世贤部分兵活动于旌德，太平一带进行掩护，继则由李世贤率军进攻湖州进行牵制，以保证李秀成部进攻杭州的胜利，由浙江回师天京时，一度派出一支部队进占溧阳，摆出东攻苏常的架势，以迷惑敌人，保障进攻江南大营之战的顺利进行。

在这次作战中，太平军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作战目标只图解围，因而进攻江南大营时，既未注意切断敌军的退路，又未能在敌退却时迅速组织截击和追击，虽然攻破了大营，但仅毙敌三五千人，基本上打了个击溃战。由于太平军只注意迅解京围而没有大量歼灭卧有生力量，因此和春、张国梁等逃至镇江后，又得以收集残兵败将二万余人，防守镇江和丹阳。

四、东征苏常

1860年6月1日，洪仁汗、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等在天京庆贺解围作战的胜利，并商议下一步进兵之策。陈玉成主张救援安徽。李世贤主张南取闽浙。洪仁玕和李秀成则主张先取长江下游，他们认为：“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四（西）距川，陕，西（北）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洪秀全采纳了洪仁玕、李秀成关于先取苏常、后攻天京上游的主张，命令李秀成率军东征苏常，并限期一个月完成任务。李秀成会同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联合东进。与此同时，陈玉成率部渡江往攻扬州，以牵制江北清军，使其不得南渡救援苏常；刘官芳等则率部拆回皖南，屏障天京西侧。

5月15日，东征大军数万人由天京出发，当天占领句容，19日大败清军于丹阳城外，并攻占该城。清军死伤万余人，湖北提督王浚等被击毙，和春等逃往常州，张国梁在逃跑时于丹阳南门外落水溺死。

太平军攻克丹阳后，继续追歼溃敌。5月22日，开始逼攻常州。当时，由浙江拆回的总兵张玉良驻扎常州城外，所部不满万人。由于两江总督何桂清未战先逃，清军“胆气愈寒”，只顾劫掠，毫无斗志。26日，太平军攻克该城，和春述至苏州西北的浒墅关，愧惧交集，自杀身死。张玉良率残兵退守无锡。5月30日，太平军占领无锡，张玉良等败退苏州。6月2日，太平军进抵苏州城下，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内应和群众的配合下，太平军轻取苏州城，杀江苏巡抚徐有壬，署按察使朱钧等多人，收降清军五六万，并缴获大批洋枪洋炮。

在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部进攻常州的同时，陈玉成督军进逼扬州，因作战失利，旋即挥师西向，于6月2日再攻安徽全椒，中旬又撤围南返天京。

东征太平军占领苏州盾，即向周围扩大战果：李秀成分兵一部继续东进，于6月间连占昆山、太仓、嘉定、青浦，7月1日攻克松江，李世贤部于6月13日攻克吴江后，继续南进，于15日攻占浙江嘉兴，准备进军杭州，杨辅清部也子6月中旬一度占领浙江长兴，后经江苏宜兴西入

皖南。

太平军自5月15日从天京出发，在一个半月内，即占领了长江三角洲除上海等以外的大郎地区，取得了开辟苏常根据地的重大胜利。太平天国将这个经济上最富庶的地区置为苏福省，建立了地方政权，鼓励发展生产和贸易，使之成为尔后数年间源源供给天京财粮的重要基地。

五、进攻上海

太平军攻占苏常之后，李秀成决定乘胜进图上海。他认为："今有挑选勇将千余，勇兵数万，势如山岭之坚"，攻取上海，"犹如囊中取物"。其实，进攻上海，不仅有军事问题，而且有外交问题，情况十分复杂。

上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列为五口通商回岸之一。1843年《虎门条约》又规定，英国可在上海设"居留地"，即所谓"租界"。其后，美、法租界亦相继设立。租界自设"工部局"，不受中国当局治理，俨然成了"国中之国"。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已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商埠。因此，外国侵略者必然竭力将它控制在自己手中。

当太平军进军苏常，兵锋渐渐逼近上海时，英法侵略者即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亟谋对策。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尚来结束，过往上海的英法侵略军甚多，英法公使有恃无恐，便于5月下旬居然以维护商业为名，宣布"保卫"上海。与此同时，以道员吴煦和上海巨商杨坊为首的一批买办官僚，一方面向英法积极求救，一方面雇用美国流氓华尔出面组织"洋枪队"，公然与太平军为敌。6月初，华尔在上海募得外籍水手，流氓二百余人，经过短时间的训练，便于7月初进袭刚被太平军陆顺德部攻占的松江。华尔本想利用黎明进行偷袭，但洋枪队均系无赖之徒，抵达城外仍酗酒喧哗，走漏了风声。太平军严阵以待，当敌人接近墟墙时，伏兵骤起，奋力攻击。洋枪队大败，华尔率残部狼狈逃回上海，不得不重新组建。7月16日，洋枪队在七千名清军的配合下，依仗洋枪洋炮，攻陷了松江。8月2日，华尔又率洋枪队三百人，携大炮二门、小炮数门，进犯青浦，并有清军万人（由参将李恒嵩率领）在后接应。此时，李秀成已率精兵自苏州来援，守军斗志倍增。因此，洋枪队虽然在炮火掩护下一度登上南城，终因众寡悬殊而败退，共计死伤一百人（三分之一），华尔也五处受伤，全部火炮及炮船均被太平军缴获。华尔裹伤赴沪，补充兵员和军械后，又回到松江。8月9日，洋枪队和清军再犯青浦，太平军兵分两路，冲出城外进行包抄，迫使其丢下枪炮，逃往松江。李秀成督军追击，于8月12日夺回松江，并决定乘胜进攻上海。

在此以前，洪仁玕和李秀成在外交方面进行过一番努力。李秀成曾于6月下旬致书英国驻华公使，说明进取上海之必要，阐明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表示愿与各国友好往来，并邀请他来苏州面商。其后，洪仁玕也致书英、法、美各国驻上海领事，告以他将于苏州与各国公使会晤。但英法侵略者决心以武力阻挠太平军接近上海，因此，其驻华公使对李秀成，洪仁玕发出的照会，竟未予拆阅，拒不答复。

由于英法侵略者如此无理，李秀成等决定乘战胜洋枪队之余威，夺取近在咫尺的上海。这时的上海，人口三十余万，驻有清军万余人，英法军二千人左右。8月16日，太平军由青浦、松江两路并进，前锋于17

日进抵上海西南的七宝、虹桥一带。18日，李秀成再次致书上海各国公使，声明太平军到上海后，不扰外人，并请悬挂黄旗，以便识别。随后，李秀成仅率随从三千人亲抵徐家汇，准备去“接收”上海。李秀成对外国侵略者决心与太平军为敌这一情况估计不足，加上寄希望于驻沪两广兵勇的投诚内应，故有如此轻率之举。当天，风雨大作，太平军随即占据附近之罗家湾。蔡元隆、郜永宽两部进至上海城外之九里桥，大败清军。于是，李秀成督军直逼上海县城西，南两门。正准备入城之际，突遭英法军的猛烈射击。太平军未予还击，只是摇手示意，请勿放枪，要求通话；但侵略者不予理睬，继续射击。太平军前进受阻，伤亡数百人，只得后撤。19日，太平军再次抵近县城，又遭英军射击，依旧未予还击。20日，后续太平军三万人进至上海域郊，李秀成督军由西门外转向英租界，于跑马场附近又遭英军袭击。同时，停泊在苏州河中的两艘英舰也发炮轰击。在此情况下，太平军只得后撤徐家汇。

太平军多衣进攻受阻，且发觉内应无望（准备起事的两广兵勇事前即被江苏巡抚薛焕镇压），乃于8月24日撤离上海。当时，张玉良所部清军反攻嘉兴甚急，守将求援，李秀成便率全军往援。

洪仁玕、李秀成决定进攻上海，以为可以轻取，反映出当时，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和外交斗争的复杂性缺乏认识，因此，在没有调集足够兵力，进行必要准备与合理部署的情况下，便贸然行动，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中立和清军内应的配合上，结果两者落空，唾手而得上海的愿望顿成泡影。这样，不但长了敌人的志气，而且耽误了以后攻鄂救皖的时间。在英法侵略者尚未撕下“中立”外衣，并未主动向太平军进攻的情况下，太平军本应暂缓进逼上海，在占领苏常之后立即回师西进，集中力量打击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湘军，发展和巩固天京上游的根据地。果如此，则尔后形势的发展将会有所不同。

第四节 安庆会战（1860年9月～1861年9月）

安庆是天京上游的重要门户，它的得失，对太平天国后期战争的全局关系极大。按照1860年5月天京军事会议作出的决定，太平军东取苏常，是为“合取湖北”准备条件；而“合取湖北”，实际上又是为了保卫以安庆为主的安徽根据地（最终是为了保卫天京）。所以，从1860年9月以后，尽管战场很宽，烽烟遍及大江南北，但从全局来看，争夺安庆乃是战局的重点所在。安庆争夺战持续了一年之久，成为直接关系着天京安危的一场大决战。

一、“五路救皖”计划的落空

（一）陈、李“合取湖北”半途而废

1．陈玉成部的作战行动

陈玉成是救援安庆的积极倡议者。他于9月30日率军自天京北渡，10月10日即占领皖北定远之炉桥，14日西围寿州（今寿县），15日又分兵一部攻六安。20日从寿州撤围南走，一方面加强进攻六安的兵力，一方面进攻舒城，但均未奏效。11月26日，陈玉成联合捻军龚得树，孙葵心等部（共约十余万人），进至桐城西南的挂车河一带，扎营四十余座，试图直接救援安庆。12月5日，陈玉成部遭到多隆阿部鄂军万余人的进攻，稍有损失。以后，连续数日闭垒不战。12月10日，多隆阿部与新任安徽按察使李续宜所部湘军近万人（屯于新安渡）向陈玉成部联合发起进攻，南北夹击。正酣战间，都司雷正绾率领的步队七营、副都统温德勒克西率领的马队，“均由后路抄出”。“诸路并进，枪箭齐施，……围杀三时之久”。陈玉成部遭敌围攻，伤亡数千人（孙葵心也伤重身亡），损失惨重，不得不北走庐江，进行休整。1861年1月初，陈玉成又派兵一邓进攻枞阳，被湘军水师总兵李成谋和游击韦志俊（太平军降将）所部击退。至此，陈玉成企图直接救援安庆的努力完全失败。

1861年2月，南岸的李秀成部已由浙入赣，正向西挺进中。陈玉成便按照“合取湖北”的既定方针，开始向湖北进军。2月26日，他先遗捻军孙葵心余部前往河南固始，汝阳（今汝南）等处，以牵制清军，掩护入鄂之师，然后于3月3日亲率数万大军西进。中旬，连下霍山、英山和湖北蕲水（今浠水）、黄州府（今黄冈）。22日，陈玉成在黄州府会见了英国参赞巴夏礼。巴夏礼借口维护英国的商业利益，危言耸听地“劝告”陈玉成不要进攻武汉。陈玉成果然上当，决定中止向武汉进军。除留赖文光率部驻守黄州府外，分兵数路，于3月下旬至4月中旬先后占领湖北蕲州，黄安（今红安）、德安府（今安陆），孝感、黄陂、随州（今随县），云梦、应城、麻城等地，但大都旋取旋弃。由于曾国藩等坚持“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远与之争得失”的方针，鄂省后方空虚，因而太平军分兵攻取各地时，如入无人之境。当时，武汉及其附近的清军仅有一万人左右，如果陈玉成决心果断，坚决进军武汉，是有可能达到预定目的的。无如陈玉成一时失策，轻信外国殖民主义分子的讹诈，以致功亏一篑，铸成大错。

1861年4月下旬，陈玉成鉴于安庆被由日紧（其眷属俱被困城中），又不见李秀成部如期入鄂，遂决计放齐“合取湖北”的计划，亲率所部东下，复直接驰援安庆。

2．李秀成鄙的作战行动

1860年9月下旬，李秀成率部解嘉兴乏围，班师苏州后，接到天王洪秀全令其提师赶赴上游的诏书。他随即将苏福省的军政事务交给陈坤书接任，自率大军于10月初旬回到天京受命。

10月下旬，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出发，经安徽太平府（今当涂）、芜湖、繁昌、南陵、石埭（今广阳），于12月1日越羊栈岭进占黟县，离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仅六十里。正在进攻休宁的湘军鲍超、张运兰两部（共约万人）见后路被断，急忙回师反攻，2日，太平军稍却，退守黟县北面的卢村。3日，又与鲍、张两部战于休宁柏庄岭，阵亡数百人（曾国藩谓“毙贼四千余人”），尽管李秀成部进入黟县对曾国藩震动极大（他当即给曾国荃等写了遗嘱性的书信），但李秀成根本无意进攻祁门，只图过境，因此，既受阻于湘军，便率部改道徽州，过屯溪，到婺源，继又折入浙江境内，在常山过年。

1861年2月中旬，李秀成部自浙江进入江西，经玉山、广丰、广信府，于3月中旬进攻建昌府未克，下旬进攻抚州府又未克，乃南趋崇仁，宜黄，4月4日又由乐安北占新淦，次日进占樟树镇（今清江）。由于赣江水涨及清军和地方团练的防堵，未能过江，便沿江南进，于19日自吉水一带渡过赣江，20日占吉安。22日，弃城北进，5月2日攻临江府不克，继续北上，连下奉新、瑞州府（今高安）、武宁、新昌（今宜丰），于30日占领义宁州（今修水）。6月上旬，分三路进入湖北：右路由武宁北攻湖北兴国州（今阳新），中路由义宁州北攻通山；左路西攻通城。鄂东南一带群众约三十万人争相加入太平军，使李秀成部兵员大增，号称五十万。

李秀成部进入鄂东南后，前锋于6月中旬一度占领武昌县（今鄂城）。此时，李秀成接到赖文光发自黄州府的禀报，得知陈玉成部早已回师东援安庆，他对攻鄂本不甚积极，便于7月上旬令所部撤出湖北，折入赣西北地区，就这样，太平军又一衣失去了一举夺占武汉的良机，两路，“合取湖北”的计划至此彻底落空。

（二）杨、黄进军赣北失利

太平军攻克苏常之后，杨辅清率部经江苏宜兴进入皖南，于1860年6月23日占领广德，29日弃之，进攻宁国府。曾国藩根据清廷命令，于9月中旬派张运兰部湘军由祁门取道旌德前往救援。与此同时，李世贤部亦自浙江进入皖南，协同杨辅清围攻宁国府，终于在9月26日再次攻下该城。

同年12月初旬，杨辅清部自宁国府循长江南岸西进，于12月8日开始围攻建德。15日，与自芜湖西来会师的定南主将黄文金部数万人共同攻下该城。建德是曾国藩祁门大营与江北之间的交通孔道。建德一失，祁门与江北湘军主力之间的联系受阻，因此，曾国藩急忙派副将唐义训等率部往攻。太平军猝不及防，建德于12月28日复陷敌手，其后，杨辅清率部退回宁国府。在此以前，黄文金和营天义李远继等率部进入赣北，于12月20日攻占彭泽，22日李部占景德镇东北的浮粱，24日黄部

攻湖口不下，次日南占都昌，李部则由浮梁西占饶州府（今波阳）。以上所占各地除饶州府外，不久即被湘军玫陷。

1861年1月5日，黄文金、李远继率军二万余人自饶州分数路东攻景德镇。由于左宗棠督军力拒，未能得手。7日再攻浮梁，又为左部击退。2月18日，湘军鲍超郎（1月8日自皖南休宁经祁门来援）和左宗棠部与黄、李两军战于景德镇西北的洋塘谢家滩。湘军分三路进攻，太平军也分三路抗击，双方鏖战四小时之久。由于平分兵力，太平军伤亡甚众，黄文金等只得率余部退回建德境内，一部占据县城，大部据守金家村、黄麦铺一带。3月7日，鲍超商请皖南镇总兵陈大富率部列阵于建德城外，牵制城内太平军，自率所部湘军及左宗棠军一部，分三路向黄麦铺发起进攻。太平军再次失利，建德县城也于当日失守，遂被迫继续东撤，迟到芜湖休整。

黄文金等率军进入赣北，“连陷数城，意在断祁门之粮路，解安庆之重围”。由于进攻景德镇和浮梁受挫，复有洋塘及黄麦铺之败，以致计划落空。

（三）击破曾国藩祁门大营良机的丧失

1860年9月下旬，李世贤郎协助杨辅清部攻下皖南宁国府，随即南下，于10月6日攻占绩溪。10月8日，李世贤等督率四万余人进攻徽州，大败新任皖南道李元度所统湘军三千人及来自祁门的湘军援兵三千余人，于次日占领该城，12日又占休宁。10月16日，李世贤突然率部由徽州折回浙江，似欲牵制浙江清军，掩护刘官芳等部的行动。10月20日，李部占淅江严州府（今建德东）。11月下旬，又北占临安、富阳，一度进逼杭州，旋又北攻湖州。12月7日，因攻湖州不克，又西进皖南徽州，后与刘官芳部联络，作战乎祁门附近地区。12月底，李世贤部自休宁逼近曾国藩祁门大营。刘官芳部则自北路破禾戌岭、羊栈岭，入黟县卢村，向祁门进逼，后为湘军鲍超部所败，退出羊栈岭外。1861年1月4日，李世贤部也被湘军张运兰部击败，退守黟县东面的兰田。6日，李世贤又分兵两路猛攻黟县东南的渔亭，仍未得手。

刘官芳部退出羊栈岭后，屯于石埭一带。2月15日，探知鲍超部自大营援景德镇，便分兵二路，攻破祁门北面的大洪岭（距祁门六十里）和西北的大赤岭（匝祁门八十里），次日，西路进至距祁门四十里的历口，给曾国藩以极大震动。17日，太平军继续向祁门进逼，前锋进至离祁门仅十八里的石门桥，但遭到湘军副将唐义训部的伏击，败退至大赤岭外。

李世贤由于进攻祁门未果，乃于3月8日进占婺源，准备绕道江西，切断皖南湘军粮道，伺机回攻祁门。22日，败左宗棠军王开琳等部于婺源甲路，4月9日攻占景德镇，阵毙总兵陈大富等多人。左宗棠率部退走乐平，李世贤即传令东攻祁门。4月15日，李世贤在东进途中闻留驻江西的部队遭到左部反击，便不分主次，立即回军进攻乐平。在此以前，左宗棠“饬各营傍乐平县城东南，加修外壕，周十余里，令南乡团练入城固守，以作疑兵”，湘军则分守外壕。4月22日午刻，当李世贤部逼近外壕时，湘军“排枪轰击”。太平军“屡却屡前”，奋勇环攻，与敌相持至夜，并利用城外烧毁来尽的民房“穴墙开炮”，但终未攻克。23日，李世贤拟集中兵力攻敌一隅，乃调主力由城东北绕攻城西，予敌以大量杀

伤。不意湘军以攻为守，分三路越壕出击，拚死力战，太平军不支撤退，于高桥阻于小溪，人马“自相滔藉”，伤亡甚众。由于进攻受挫，李世贤随即率军东返浙江。于是，李世贤部和刘官芳部所担负的进军赣东和攻击曾国藩祁门大营的任务都未能完成。

本来，1860年底至1861年初，曾国藩祁门大营已陷于太平军的四面包围之中：西南的浮粱，景德镇一带有李远继部；东北的黟县山岭间有刘官芳等部，东南的休宁一带有李世贤部；南面有李秀成部方抵婺源。曾国藩势孤力单，岌岌可危。他在倌中哀叹：“自十一月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特别是李世贤部攻占景德镇之后，皖南湘军米粮无继，曾国藩感到“无日不在危机骇浪之中”。他曾移营休宁，亲自督军进攻徽州，企图打通浙江粮道，又告失败。在绝望中，他不得不写下遗书部署后事。其幕僚们也都惶惶然不可终日。及至左宗棠部湘军败李世贤部于乐平，曾国藩才感到“心绪略舒”，宛如绝路逢生。当时，皖南湘军不过三万人，其中半数为新募之勇，战斗力不强，而太平军在皖南的兵力总数一度十倍于敌，如果天京最高当局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指挥，及时协调前线各军的行动，对曾国藩的祁门大营步步紧逼，不断缩小包围圈，力求将其全歼或给以歼灭性的打击，则对整个战局将起重大的影响。可惜，各路太平军非但没有统一的作战指挥，而且根本没有会攻祁门大营的计划，以致丧失良机，使曾国藩及其湘军逃脱了在皖南覆灭的命运。

二、安庆的失守

（一）战前态势

自1860年夏初湘军围困安庆以来，守城太平军约二万人在谢天义张朝爵、受天安叶芸来率领下，坚守城池，以待援兵。

1861年4月下旬，陈玉成弃鄂回皖，率军三万人由黄州等处经宿松、石牌，于4月27日进至安庆集贤关，逼近围城的曾国荃部湘军。4月29日，陈玉成与城内守将叶芸来分别率部扎营于城东北的菱湖南北两岸，连夜筑垒十八座（北岸十三、南岸五），并以小艇沟通两岸联系。与此同时，天京当局鉴于“合取湖北”以救安庆的计划未能实现，决定由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自天京率兵直接救援安庆；定南主将黄文金也率部自芜湖西援。1861年5月1日，洪仁玕、林绍璋等会合桐城，庐江一带的吴如孝部，共二万余人，进至安庆北面的新安渡、横山铺、练潭一带，连营三十余里，谋与陈玉成部会师，共解安庆之围。曾国藩惊呼：“所有安庆官军曾国荃等各营，城贼扑之于前，援贼扑之于后，势殊危怨。”他决心投入更大的兵力，与太平军决战于安庆，声称“贼以全力救安庆，我亦以全力争安庆。……迅克安庆，大局乃有挽回之日，金陵乃有恢复之望”。于是，一场争夺安庆的殊死搏斗展开了。

5月10日，曾国藩自祁门移营至长江边上的东流，就近指挥；同时，将鲍超部六千人自景德镇调往江北（5月15日抵石牌）。坐镇太湖晌湖北巡抚胡林翼也调总兵成大吉部五千人赴援安庆。为对付陈玉成和洪仁玕、林绍璋南北两路援军，胡林翼提出了一个“南迟北速”的作战方针。他说：“打璋（林绍璋）、玕（洪仁玕）宜速，打狗（对陈玉成的诬

称）宜迟、宜持重，（集贤）关内外无米粮，迫而蹙之，彼必求战，彼求战而我应之，必大捷。”

（二）直接救援安庆失利

5月初开始，太平军与敌人在安庆城外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1日，陈玉成及叶芸来部与湘军曾国荃部及杨载福部水师战于菱湖，未分胜负。2日，多隆阿以所部近万人（4月30日由挂车河进至安庆北面的高河铺）分四路向练潭和横山铺猛扑。太平军营地不坚，旋被攻破。驻新安渡的太平军一万余人前往救援，多隆阿以三营步兵迎面接战，以五营步兵从侧翼攻击，以马队绕到后面攻击。太平军前后受敌，伤亡甚众，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率余部退守桐城。3日，自芜湖来援的黄文金部太平军七八千人及捻军二万余人赶到，扎营于桐城东南的天林庄一带。6日，黄文金会同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等督率三万人，分兵两路，主力直趋新安渡，一部（约五六千人）进攻鄂军挂车河老营。多隆阿由高河铺调步队十三营驰援新安渡，并调驻挂车河的记名副都统金顺率马队往援。待太平军接近新安渡时，多隆阿部从左右两翼进行包抄，金顺则率马队绕至香铺街，从后路截击。太平军以为中了埋伏，纷纷败退，撤回天林庄。进攻挂车河的太平军也被协领穆图善等部清军击退。黄文金等部为多隆阿部听阻，无法与陈玉成部会合，便撤出天林庄，退至桐城东面的孔城镇。

陈玉成见洪仁玕等所率援军受阻，而湘军总兵鲍超，成大吉两部又将来到，知安庆解围不易，便于5月19日留郡将刘琳、李四福、朱孔堂等率部据守集贤关内外各垒，自率马步五六千人绕道赴桐城，以便与洪仁玕等会商进军事宜。多隆阿闻讯，即派兵追击，使负责断后的黄金爱部太平军伤亡千余人。

5月20日，陈玉成抵达桐城，与洪仁玕、林绍璋等会晤，商定于23日分三路进攻挂车河之敌：陈玉成率四千人出挂车河之左，洪仁玕率七千人自江家桥由中路进攻，林绍璋、孙葵意率太平军和捻军共万余人由棋盘岭出挂车河之右。多隆阿事先得到了上述情报，决定“乘其布置来定，先发制人”，当即派出马队多起，分路设伏。24日黎明，太平军发起进攻，多隆阿亲率马步各营，“分兵五队，扬旗而出”，前三队三路迎战，后两队为预备队，“列队不动”。正酣战间，多军伏兵从太平军后方冲出，太平军阵脚遂乱，纷纷后退。多军乘势进击，太平军伤亡较众，不得不退回桐城。

在此以前，湘军援兵鲍超，成大吉两部共万余人已于5月20日抵达集贤关外，并立即进攻关外赤冈岭的四座太平军营垒，被刘琳所部击退。此后，湘军改变战法，在赤冈岭附近修筑炮台数十座，从6月2日开始，不断对赤冈岭四垒实施轰击。8日，太平军三垒被毁，守将李四稻，朱孔堂以下千余人或战死或被俘，惟刘琳所在的第一垒仍顽强抵抗。9日，成大吉部奉调回援湖北（当时李秀成部正向鄂东南进军）；鲍超部继续围攻刘琳部。

当日午夜，刘琳等冒死向北突围，鲍超率马步兵追击。由于溪水泛涨，突围北走的太平军大多被湘军擒杀，刘琳也被敌人俘虏，肢解处死。赤冈岭四垒守军（共约四千人）均系太平军精锐，此次全部被歼，使陈玉成部的战斗力大受影响。

7月1日，太平军平西主将吴定彩部（由苏北来援）自菱湖北向湘军发起攻击，被同知曾贞干所部击败。7月8日，曾国荃督军对菱湖南北两岸的十八座太平军营垒发动进攻，太平军因接连受挫，士气低落，以致数千人出降（结果均被杀），吴定彩率残部退入安庆城内。至此，安庆完全成了一座孤城，战局更加被动。

（三）安庆失陷及其教训

太平军继“合取湖北”间接救援安庆的计划落空后，直接派兵解围的努力又告失败，安庆城内守军被围年余，粮食告罄，出城降敌者与日俱增，形势极度恶化。

陈玉成在进攻挂车河受挫后，6月下旬于皖北无为会晤杨辅清，约其出兵共解安庆之围。7月下旬，杨辅清率部自宁国府出发，渡江后，经无为西进，会合陈玉成部，绕经六安、霍山、英山、宿松，于8月6日攻太湖不下，取道小池驿，黄泥港东趋清河、三桥头、高楼岭，直至马鞍山，由南面威胁挂车河多隆阿部营垒。与此同时，林绍璋、吴如孝率六七千人，自桐城西趋挂车河，黄文金率五六千人，自吕亭驿一带绕至姬公庙，麻子岭，以为策应。多隆阿自率马步各营迎战林。吴两部太平军，并派总兵雷正绾率队迎击黄文金部。8月7日，双方鏖战三小时，太平军不支，退入桐城。其后，太平军以一部驻桐城，牵制多隆阿军，以大部趋安庆，进攻湘军围师之背。8月21日至24日，陈玉成、杨辅清等部约四五万人，陆续进抵集贤关内，在关口、毛岭、十里铺一带扎营四十余座，安庆城内的太平军也列阵于西门一带，遥相呼应。25日和26日，陈玉成、杨辅清等督军向曾国荃部湘军后壕发起进攻，轮番冲锋，西北方向的进攻尤为激烈。曾国荃督率各营坚守营壕，待太平军逼近时，枪炮齐发，使太平军伤亡甚众。8月28日至9月2日，太平军每夜都对敌营进行袭击，并在菱湖北岸陆续建起了十余座营垒。9月3日夜，又发起猛烈进攻，同时用小船运米入城，但被湘军水师全部抢去。城外太平军无法攻破湘军的包围圈，城内太平军米粮枯竭，军心进一步涣散。

9月5日凌晨，湘军于北城用炸药轰塌城墙，纷纷登城，攻久城内，会同长江水师，南北夹击，滥肆屠杀。守城太平军全军覆没，叶芸来、吴定彩殉难，张朝爵乘船突围，不知所终。

安庆失守，标志着自1860年9月开始的太平军“五路救皖之策”的彻底失败，从此，太平天国后期战争形势更加恶化。洪仁玕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

在长达一年的安庆会战中，太平军动员了数十万兵力，与以湘军为主的清军进行了反复激烈的搏斗，最终归于失败，教训极为深刻。从战略上看，太平军处于一种被动保守地位，为安庆一城的得失所左右，被迫同敌人进行战略性的决战，失掉了独立自主地组织使用自己力量的自主能力。同时，在会战指导上又犯了一系列错误。

第一，主要将领缺乏一致而坚定的决心。除陈玉成积极主张救援安庆外，其他主要将领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对于“五路救皖之策”的态度并不十分积极，以致西进的行动相当迟缓。当安庆极度危急之际，拥众数十万的李秀成由鄂返赣后，不主动配合陈玉成等部进攻安庆

外围之敌，竟率部东返，更是严重影响了整个战局。

第二，主要将领决心不果断。陈玉成率部进入湖北后，竟轻信巴夏札的讹诈，中止进平武汉，以致功败垂成。李秀成中部逼近武昌时，同样不坚决果断地夺取武汉，见陈玉成部东返，便折回江西。陈、李两部长途跋涉，徒劳往返，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其实，尽管曾国藩和胡林翼都声称不论武汉能否保住，决不撤安庆之围，但如果陈、李两部坚决执行会攻武汉的既定方针，进而积极向湘，鄂腹地发展，直捣湘军和鄂军的老巢，还是能够调动安庆围敌的。李秀成部逼近武昌时，先则有成大吉部由安庆前线回援，继则有胡林翼自太湖率部沿江西上，亟援武昌，就是明证。

第三，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太平军最高当局虽有“合取湖北”以救安庆的总的战略意图，但既无详细的作战计划，又不指定前线最高指挥官，以致各路将领基本上处于各行其是的状态。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等部虽然同属江南战场，但也互不统属，以致不能协调一致地给危如累卵的曾国藩祁门大营以歼灭性的打击，最后反被敌人各个击败。在江北战场，后期集中了较多的部队，身居要职的干王洪仁玕也一度亲临前线，但同样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状态，因而始终未能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解安庆之围。

第四，作战指挥主观急躁，不能根据敌人的特点采取适宜的战法。曾园荃等根据曾国藩不攻坚，不出战，坚守勿撤，长期围困的指示，一直深沟高垒，静待战机。太平军方面，则由于安庆被围日久，陈玉成等解围心切，作战指挥上表现出急躁莽撞。太湖、潜山未下，就攻桐城挂车河之敌，桐城外围之敌未除，又攻安庆围敌，结果徒劳兵力，一处也未能攻下。太平军没有稳固的后方，也没有可靠地控制通道，因而供应得不到保证，难以持久作战。敌军见其“意在速战”，于是采取“深沟高垒，姑作如不欲战之状”，“待其逼近求战，而后从容应之”的方针，使太平军屡攻受挫。陈玉成等不注意认真侦察和研究敌人的作战企图，不能针对敌人坚守长围和积极增援的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只是从迅速解围的愿望出发，多次仓促发动进攻。结果安庆之围未解，解围之兵先溃，终至城陷军灭，彻底失败。倘若能审时度势，有计划有准备地集中优势兵力（当时太平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使用一部兵力以围制围（从围敌外面筑垒包围），主力则集中打援，力求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包围歼击之，待大量歼灭援敌而又疲困了围敌之后，再内外夹击，则安庆会战的结局可能大不相同。

第五节 李秀成部回师江浙与再攻上海（1861年7月~1862年6月）

1861年7月中旬，李秀成中止进军武汉，率部由湖北退入江西义宁州和武宁一带后，竟置安庆和天京上游的严重局势于不顾，倾全力回师江浙。加之天京最高当局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出现的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军的新形势认识不清，在李秀成部攻占杭州之后，决定再次进攻上海，最后上海未下，湘军却乘势进逼天京，以致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形势勉速恶化。

一、攻占浙江

1861年4月，李世贤部在江西乐平战败之后，即回师浙江，于5月初占领常山、江山，而后分路东进，连占遂安（今淳安西南）、寿昌（今建德西南）。龙游（今衢县东），金华。6月，又连占遂昌、松阳、处州、永康。7月下旬，一度占领严州。9月底，前锋进抵诸暨、东阳一线，浙江西部和中部的大部地区已在太平军的控制之下。

同年7月19日，从湖北退入江西义宁州和武宁一带的李秀成部进占靖安，逼近南昌。曾国藩在东流闻讯，急调原拟援鄂的鲍超部七千人由宿松南渡长江，经九江驰援南昌。8月14日，李秀成率部由瑞州府进向临江府。24日，鲍超率部经瑞州南下，李部随即东渡赣江，屯于樟树镇一带。27日，李部分三路沿赣江北攻南昌，在丰城为鲍部所败。李秀成不敢恋战，于30日率部东趋抚州府，围城多日不克，而的部将至，乃于9月8日撤围东走。16日，在河口镇一带会合自广西东返的石达开旧部注海洋、朱衣点、童容海等部及天地会众共约二十万人。之后，李秀成便率领号称七十万人的大军，进入浙江。

10月5日，李秀成部开始围攻浙江衢州，不克，11日撤围东走，过兰溪北上严州，与正在围攻该城的李世贤部会合。随后，李秀成率部北进，连下新城（今富阳西南），临安，于20日占领杭州西面的余杭，进逼省城。接着，陆顺德部自富阳东进，于10月27日占萧山，11月1日占绍兴。未几，李容发（李秀成之子）、李容椿（李秀成之侄）也率部赶到绍兴，协助守城。至此，李秀成部完成了对杭州的包围。11月4日，李秀成督令陈炳文、童容海等率部攻占城外要点馒头山，连破望江、候潮、凤山各门外清军营盘，切断了守城清军与外部的联系。7日，广西提督张玉良率兵万余自上游援杭，被太平军击败（张玉良也于21日被击毙）。从此，清杭州将军瑞昌，巡抚王有龄，提督饶廷选等率兵数万人困守孤城，食粮渐趋枯竭。12月10日，武林、钱塘，清波门外的各营清军投降太平军。29日，清军兵勇纷纷溃散，太平军各部乘势缘梯而入，打开凤山、候潮、清波等门，大队入城，占领杭州。王有龄等自杀，布政使林福群，总兵米兴朝等被擒。杭州既破，李秀成命暂停进攻满城，允许杭州将军瑞昌率部退走。瑞昌顽抗，李秀成乃于31日下令攻破满城。瑞昌以及副都统杰纯、关福等自杀。

在李秀成部进攻杭州的同时，李世贤部于10月20日再克严州，随即

向浙东发展，连占嵊县、新昌、上虞、天台、奉化、慈谿（今宁波市西北）、镇海、仙居、台州（今临海）、黄岩、太平（今温岭）等府县，对宁波形成包围之势。宁波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辟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太平军进逼宁波，外国人甚为恐慌，多方进行干预。11月28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从日本赶回上海，即派军舰一艘开赴宁波，企图阻挠太平军的进攻。同日，驻宁波的英、美、法领事会商保护外人办法，并派人前往余姚、奉化会晤太平军主将黄呈忠，范汝增。黄、范均答允入城后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但同时指出，外国人不得援助清军。12月9日，太平军分南北两路向宁波推进，守城清军纷纷溃逃，因而未遇任何抵抗即占领了宁波府城。

二、再攻上海

（一）李秀成部挺进上海与英法联军进攻太平军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侵略者为了攫取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开埠、赔款、割地、内河航行。海关特权等一系列侵略权益，希望中国有一个象清王朝那样既软弱无能而又相对稳定的政权：而清王朝也早已意识到太平天国是其致命的威胁，迫切需要借助外国侵略者的力量来镇压太平军。中外反动势力这种反革命利益的一致性，成为它们相互勾结起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客观基础。1861年3月，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曾向天京当局提出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吴淞三十英里之内的无理要求。天京当局经过反复斟酌，同意了上述要求，但以当年为限，期满作废。年底，英国方面又派人到天京要挟，天京当局明确予以拒绝。

1862年1月7日，即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的第八天，李秀成督令谭绍光、郜永宽、李容发等部向上海进军。与此同时，原驻苏州一带的太平军也在刘肇均率领下，经嘉定进逼宝山、吴淞。至1月20日，各路太平军分别占领了青浦、奉贤（今上海市奉贤县奉城镇）、南汇、川沙。西路前锋抵达宝山县吴淞镇一带，东路前锋抵达高桥镇，基本上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

清廷认为，上海“僻处一隅，于用兵固为绝地，而海关为饷源所出，自应亟筹保护。”当时，上海由江苏巡抚薛焕等统带四万兵勇驻防（城内只有八千人），多数为残兵败将，战斗力不强。而这时湘军正欲进逼金陵，也难以抽兵增援上海。清廷渴望英法侵略者给予援助，于是，同冶帝（清穆宗载淳）谕令薛焕等：“与英法两围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

2月13日，驻沪英法侵略军头目会商防务，大致确定：由英军防守英，美租界，兼守北门及附近城墙，由法军防守法租界和上海县城。其时，英、法驻沪海陆军为数不多，各约九百余人；但就在当天，英军一部由天津开至上海，使其实力得到加强。此外，以华尔为头目的洋枪队经过改组，已扩至一千二百人，仍以松江为基地。不久，英法侵略者公然以太平军进军上海影响租界的供应和贸易为借口，明目张胆地与清军一起向太平军进攻。他们首先企图肃清距上海百里之内的太平军据点，并根据其兵力不足而火力较强的特点，决定采取集中力量逐个攻占的方针。

2月21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率水兵三百五十人，携带六磅火箭炮一门，法国驻华海军司令卜罗德率法军一百六十人，携带野战炮二门，华尔率洋枪队五百六十人，搭乘轮船炮艇，自上海开抵吴淞口登岸，在清军配合下，向驻于高桥镇的太平军发起进攻。当时，高桥镇由数百名太平军“老兄弟”及数千名新战士防守，他们以简陋的武器，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由于敌军火力较猛，最后被迫撤退。侵略军攻下高桥后，即交由清军防守。

2月28日，贺布率英国水兵和水手三百五十人、炮兵三十五人（携榴弹炮四门、野战炮一门），卜罗德率法军二百人（携榴弹炮二门），另有洋枪队七百五十人，由上海搭乘十一只轮船，溯黄浦江而上，开抵上海以南约五十里的闵行镇，3月1日黎明在南岸登陆，向宵塘镇进攻。太平军凭垒抵抗，使华尔七处受伤。终因侵略军火力猛烈，太平军工事被毁，难以守御，不得不放弃肖塘后撤。3月14日，进攻泗泾的太平军又遭侵略军攻击，被迫撤退。

李秀成在苏州得知进攻泗泾受挫后，对进攻上海的计划作了如下调整：由驻青浦的李明成（李秀成之弟）等首先“合兵力攻七宝”，然后进攻泗泾，得手后，“于沿江连营，以为相持固守之计”；陈炳文率部由青浦南面的天马直取松江，并由李明成派兵助攻；松江攻克后，交李明成等驻守，陈炳文部则“赴吴淞口相地安营，屯兵驻扎，以逸待劳，而为缓步进兵之计”；刘肇均部“由嘉定境出野鸡墩，于吴淞江、黄渡等处安扎营盘，深沟高垒”。总的方针是：“四面云屯，将上海包围定叠”，以待敌人“内中自变”，“乘机计取”，“缓步进兵”，避免强攻。

七宝与泗泾是由上海去松江的必经之地，太平军一旦攻占，就可切断松江与上海之间的通道，使松江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当太平军准备进攻七宝时，敌军方面也决定发动进攻，以防止太平军攻占上述两处。当时，原驻天津的英军已调至上海，使驻沪英军总数达到近三千人。侵略军实力倍增，气焰更为嚣张。

4月3日，贺布率一千四百九十七名英军（携大炮九门），卜罗德率四百一十名法军（携大炮四门），另有“常胜军”一千二百人，在侵华英军司令士迪佛立统一指挥下，由上海出发至七宝，次日凌晨乘大雾迷漫向王家寺太平军营垒逼近，前队进至距大营仅六十码的地带。驻守王家寺的太平军约四五千人，大营以木栅围筑，实以泥土，外有深沟环绕，相当坚固。上午8时45分，侵略军开始以大炮三面环攻太平军营垒。双方交战约半小时，太平军不支，被迫撤退。接着，侵略军又转攻泗泾方向的龙珠庵太平军营垒，遭到迎头痛击，死伤七十余人。5日，侵略军全部出动，向龙珠庵发起猛烈攻击。此处约有八千太平军据守，在武器装备远占优势的外国侵略军疯狂进攻下，不得不撤出阵地。至此，太平军攻占七宝、泗泾的计划落空了。

4月17日，侵略军二千四百余人又分乘英法军舰，溯黄浦江而上，对上海东南四十里的周浦进行袭击。太平军猝不及防，弃垒东走川沙。

（二）嘉定、青浦相继失陷

正当外国侵略军在上海附近疯狂进攻太平军之际，曾国藩应江苏官绅之请，将原拟派往镇江以威胁天京的李鸿章所部淮军六千五百人调往上海。在七艘外轮的接运下，从4月5日起分三批由安庆出发，5月2日全

部抵沪。淮军的到来，给太平军进攻上海增加了新的困难。

在淮军赴沪期间，英法侵略军头目贺布、士迪佛立、卜罗德等于4月22日共同商定了进一步进攻太平军的计划，决定立即占领嘉定、青浦、南桥（今上海市奉贤县城）等地。

4月27日，侵略军近四千人携火炮三十门，在李恒嵩所部清军五千人的配合下，自上海向嘉定发动进攻，在南翔鹤查山为太平军所败。29日，侵略军用大炮轰毁控制嘉定水道的两座营垒，太平军败退。侵略军随即包围嘉定，采取“围三阙一”的部署攻城：由英法军攻南门；“常胜军”攻西门；清军攻东门，虚留北门，以清军设伏。守城太平军五六千人，非但没有城防大炮，连抬炮、火绳枪等火器也为数极少，大部为竹矛等冶兵器。5月1日晨，侵略军火炮齐发。太平军牺牲数百人，不得已留百余人坚守南门，掩护全军由北门退出，嘉定遂陷。退出北门的太平军遭清军截杀，又牺牲二千人，损失惨重。

5月6日，侵略军与清军近万人（内英法军二千六百一十三人、华尔“常胜军”一千八百人、清军数千人）携大炮四十门，由上海出发进攻青浦。12日，敌军用大炮将城墙轰两个缺口，随即冲锋。守城的太平军约四千人依托城上工事，冒着枪林弹雨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城墙。敌军乘势蜂拥入城，青浦县城遂陷。太平军牺牲约千人，二千人被俘。

5月17日，英法军二千六百余人和“常胜军”二千余人自青浦出发，向南桥太平军进攻。新任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也派参将程学启等率淮军自浦东南汇、周浦前来，会同外国侵略军作战。南桥是个小镇，太平军守军不满千人，但周画筑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当天下午，敌军先用大炮轰击两小时，然后冲向土墙。这时，隐蔽在土墙后的太平军突然用抬炮、火绳枪和少数欧制武器猛烈射击，将卜罗德击毙，并打退了敌人的冲锋。当敌军再次炮击和冲锋时，太平军才撤出南桥镇。

5月20日，敌军又攻占南桥镇南面的柘林。21日，太平军主动放弃奉贤县城。此时，敌军获悉太平军正反击嘉定，于是匆忙撤回上海。

（三）李秀成率军反攻半途而止

嘉定、青浦等地相继失守，李秀成感到局势严重，便亲率精兵方余人，自苏州出发，进行反攻。

反攻作战首先从太仓开始。此前，在外国侵略军向嘉定、青浦进攻的同时，江苏巡抚薛焕就派知府李庆琛率兵五千余人，进扎太仓东门外板桥地方，准备伺机夺占太仓。1862年5月14日，李秀成到达太仓，次日开始与清军接战。17日，清军大败，死伤过半，李庆琛也被击毙。此战，太平军缴获不少洋枪和大炮。

李秀成率军击败太仓清军之后，即分兵进逼嘉定、青浦。嘉定由英法军四百人和清军参将熊兆周部据守。士迪佛立、格尔森等英法侵略军头目得知嘉定被围，即率兵千名，携炮十三门由上梅驰援。25日，侵略军在南翔遭到阻击。26日，士迪佛立等分兵五百人突入嘉定城，救出被围英法军，逃回上海。嘉定重新为太平军占领。

围攻嘉定的同时，陈炳文、郜永宽部太平军进围青浦，但不久又被调往嘉定助战。5月28日，李秀成以嘉定既克，便会同陈炳文等部共二万五千人转攻青浦，并乘胜连占泗泾，七宝等要地。青浦驻有“常胜

军”千人和英军六百人。华尔曾几次率兵由松江往援，都为太平军所阻。6月9日，青浦敌军冒死突围，逃回松江，但“常胜军”副领队法尔斯德被俘（后被华尔以大批军火赎回）。

太平军于5月底开始围攻松江。由于久攻不下，李秀成于6月17日撤松江围，督率谭绍光、陈炳文、郜永宽等部五六万人进逼上海。首先围攻扎于新桥的淮军程学启部营垒，进至法华寺、徐家汇、九里桥一带。由于程学启部拚死抵抗，太平军反复冲杀，营垒终未能破。18日，李鸿章督牵参将张遇春，郭松林等部三路驰援，与太平军激战于九里桥，虹桥等处，结果太平军不支，退回泗泾。这时，李秀成已接到洪秀全回救天京的诏旨，遂放弃泗泾、塘桥等处营垒，将嘉定、青浦、太仓等处的防务交由谭绍光负责，自率大队回到苏州，与各将领会商救京之策。

李秀成亲率精兵反攻上海之敌，虽未能攻下上海，但收复了嘉定、青浦，给了英法侵略军和“常胜军”以应有的打击。外国侵略军数量有限，侵占的地方越多，其兵力就越分散，这就使太平军能够以数量上的优势和勇敢精神，弥补火器落后的短处。太平军攻克嘉定、青浦，曾使英法侵略军为之丧胆。李鸿章奏称：“西兵为贼众所慑，从此不肯出击”。左宗棠也说：“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这就打破了英法侵略军和洋枪洋炮不可战胜的迷信，也证明了太平军只要善于在战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是能够找到一套对付洋枪洋炮的战法，并进而夺取洋枪洋炮，以武装自己，战胜敌人的。

当然，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在战略上是失策的。上海是中国的领土，太平军自然完全有权攻占，但是，在湘军正准备席卷金陵，天京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从战争全局考虑，太平军当以集中力量对付湘军为宜。另一方面，这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中外反动派已勾结起来镇压太平军，再次进攻与外国侵略者利益攸关的上海，正好为他们直接配合清军作战提供了口实。

除了战略决策错误以外，太平军在作战指导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决心不果断，兵力不集中等。当英法侵略军赤膊上阵，公开进攻太平军时，李秀成不是增兵反攻，而是继续采取“缓步进兵之计”，寄希望于敌人“内中自变”，“乘机计取”，结果事与愿违，希望落空。太平军虽发起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进攻，但每次参战的兵力不过三五万人，数量上不占绝对优势，这就很难给装备上远占优势的敌人以致命性的打击。

第五部分 捻军起义战争（1852年11月～1868年8月）

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苦难深重的中国各族劳动人民，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高潮。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坚持斗争时间较长，在军事上有一定意义的，有兴起于豫皖苏鲁边的捻军起义战争，两广天地会领导的大成国起义战争，上海小刀会起义战争，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战争，云南回民起义战争，川滇李永和、蓝朝鼎起义战争和陕甘回民起义战争。这些起义战争，对太平天国革命战争起了直接和间接的配合作用，有的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仍然坚持着斗争。对于这些起义战争的始末及其经验教训，在本章和下两章中，将分别进行叙述和探讨。

捻军起义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仅决于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一次农民起义战争。它前后历时十六年，战场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河北、陕西、湖北，山西等省。由于捻军纵横驰骋于中原大地，与太平军南北呼应，顽强地打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牵制了大量清军，因而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军的革命斗争。不仅如此，捻军还与太平军有着密切的组织关系。在它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以前，以后和太平天国失败后，三个不同阶段各有其不同的情形和特点。为此，本章基本上按上述三个阶段来叙述捻军起义战争的发展过程。

第一节 捻军的兴起（1852年11月~1855年8月）

十九世纪初，在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等省的某些地区就有捻党的活动，而以安徽北部的亳州（今亳县）、雉河集（今涡阳）、蒙城、宿州（今宿县）、颍州（今阜阳）和河南东部的永城等地尤为活跃。当地的一些贫苦农民和无业游民，为饥寒所迫，自发地结成一个个分散隐蔽的集团，进行反抗封建压迫，寻求生活出路的斗争。在皖北一带的方言中，称一部分，一支、一股为"一捻"，因而习惯地把这种分散活动的小集团称为"捻子"。

皖北河流纵横交错，具有较好的运输和灌溉条件。但长期以来，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和地方官吏日益腐败，水利失修，河床淤塞，每周大雨，便洪水横溢，泛滥成灾。1841年至1844年间，黄河连续三次决口，洪水经涡河奔腾下泻，使亳州、蒙城一带几度成为泽国，不少人流离失所，生活无着。1851年和1852年，又是久雨成灾，以致饿殍遍野，甚至出现以死人肉充饥等惨不忍睹的景象。然而，当地的官吏不但不采取抢险灾、休养生息等措施，反而勾结豪绅、地主，强迫农民照旧完粮纳税，并通过放高利贷、兼并土地等手段，敲骨吸髓地盘剥农民。苛捐杂税多达数十种，连耕畜，农具、树木、房屋、家禽，以至婚丧嫁娶等都要纳税。官府横征暴敛，凶狠异常，"差役横行，甲于他省"。

残酷的压迫与剥削，迫使皖北广大劳动人民进一步地起而反抗。许多城镇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船夫、码头工人以及被裁撤的兵勇，纷纷结捻而起，开展"打粮"、"吃大户"、抗粮抗差和杀富济贫的斗争。由于皖北的亳州、雉河集、蒙城、寿州（今寿县）、宿州以及河南的永城、夏邑处于安徽、河南、江苏三省交界，属于"三不管"的地方，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这就为捻党的活动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此外，皖北一带有不少人结捻进行贩盐活动，组织了不少保运私盐的武装集团，和盐巡作斗争。这些集团经常往返于皖北各地，甚至远及河南、山东、江苏三省，与那里的人民发生联系，对当地的捻党起义起了推动作用。

1851至1852年，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并向两湖胜利进军，影响所及，使北方捻党活动更趋活跃。"河南之归（归德府，冶今商丘）、陈（陈州府，冶今淮阳）、南（南阳府，冶今南阳市）、汝（汝宁府，治今汝南），光（光州，治今潢川），江苏之徐（徐州府，治今徐州市），山东之兖（兖州府，冶今兖州），沂沂州府，治（今临沂）、曹（曹州府，洽今菏泽），所在有之。而安徽之凤（凤阳府，冶今凤阳西），颍（颖州府，冶今阜阳），泗（泗州，治今泗县）为甚，凤、颍所辖蒙、亳、寿为尤"。当时，比较著名的捻党起义武装有：河南南阳的乔建德和李大，李二部；安徽合肥的高四八和寿州的程六麻子部等。在豫皖交界处，有张乐行、龚得树（龚得）等于1852年11月以雉河集为中心聚众起义，而与张乐行有联系的永城冯金标、亳州朱洪占、蒙城胡元众、寿州刘洪立、宿州李殿元等十八人也各自率众起义，号称"十八铺"，并推张乐行为其总首领。此后，捻党起义武装多以"捻军"称之。

1853年夏，太平天国北伐军先后占领凤阳，蒙城、亳州、进而占领

豫东重镇归德府。当时，安徽、河南和江苏北部又有一批捻党举旗起义，和蒙亳地区的起义武装一起配合太平军作战。其中比较大股的有：永城的苏添福部和李月部，夏邑的王贯三、宋喜元部，固始的任二皮、刘疙瘩部，阜阳的李士林郎，霍丘、固始边界的李昭寿、薛之元部，倆山的雷六部等。此外，山东的曹县、城武（今成武）、菏泽、嘉祥、郓城等地捻党也都爆发了起义。这些起义武装，有的参加了太平军，有的给太平军当向导，有的单独攻城夺地。从此，揭开了轰轰烈烈的捻军反清战争的序幕。

当时，捻军的斗争还处于初始阶段，其活动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远大的战略目标。各支捻军即使在同一地区，也互不统属，分别由“趟主”（首领）带领，各自独立行动。“居则为民，出则为捻”，处于半农半军状态。另外，不少地区的捻军，有的为时不久即被清军镇压（如雷六等部），有的叛变投敌（如李士林等部），有的时降时反（如李昭寿、薛之无等部），而豫皖交界的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领导的捻军，则逐渐发展成为坚持反清斗争的主力。

第二节 转战皖豫边，与太平军南北呼应（1855年9月～1857年2月）

一、雉河集会盟

1853年初，清廷命工部侍郎吕贤基督办安徽团练，给事中袁甲三为帮办。同时，起用前广西巡抚周天爵为安徽巡抚，带兵千余分驻宿州、颍州。因兵力不足，安徽清军对捻军基本上采取守势。10月，周天爵病死于颍州，旋由袁甲三负责安徽军务。袁手中兵力很少，便加紧筹办团练，驻守临淮关一带。河南方面，巡抚陆应谷拥有的兵力也很少，临时调集的数千清军，在商丘宋家集破太平天国北伐军打得溃不成军。10月，陆应谷被清政府撤职，遗缺由山东按察使英桂继任。英桂接任后，既要防止进至湖北的太平军北上，又要镇压豫北的“联庄会”军，也无法集中兵力攻捻。这就给豫皖边捻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854年3月，太平天国北伐援军由皖北进入豫东，张乐行、苏添福等部捻军配合太平军攻克永城县城，受到当地人民热烈欢迎。太平军北上后，负责办理归、陈二府团练的太康知县祝塏纠集豫东各县团练，进攻苏添福的家乡永城苏平楼，并乘机侵入亳州境内，烧杀抢掠。当地人民极为愤慨，纷纷参加捻军，保卫家园，一举打败了祝塏的团练和永城的地主武装“老牛会”，继又进攻蒙城等地的地主武装，于是捻军的声势日益壮大。1855年初，龚得树率领亳州捻牢进入河南夏邑，与当地捻军王贯三部联合作战。这些行动，取得了两方面的成果：一是有力地打击了地主武装；二是使一些捻军领袖通过战争实践逐渐认识到了联合起来的必要性。

1855年秋，豫皖边的捻军首领齐集亳州的雉河集，举行了著名的“雉河集会盟”。会上，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并决定建立五旗军制，推举了各色旗的总首领：黄旗由张乐行自兼，白旗龚得树，红旗侯士维，黑旗苏添福，蓝旗韩奇峰（又称韩老万）。五旗之外，还有各种锁边旗和八卦旗、花旗、绿旗等。会后，张乐行发布告示，痛斥泥政府地方官吏“视民如仇”，残酷搜刮民脂反膏，阐明起义的目的是为了“救我残黎，除奸诛暴，以减公愤”，并宣布“禁止抢掠，严缉奸淫”，“贫民衣粮，不准扒运”。此外，还制定了行军作战条例十九条，以严明军纪。

雉河集会盟，对捻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会盟、多少改变了一部分捻军互不从属，各自为战的局面，为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提供了条件。由于制定了不侵犯群众利益的纪律，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有利于依靠群众坚持斗争。但这时的捻军没有固定的编制，大旗之下的小旗，人数自几十人至数百人不等。旗中的成员也不固定，这次跟这一旗出战，下次可以跟另一旗出战，内部组织很松散。特别是各旗捻军基本上是按地域和宗族、亲戚关系结合起来的，因而彼此之间有很大的排外性，严重影响了在组织上和作战行动上的集中统一。在武器装备上，仍然十分简陋，除少量鸟枪、土炮外，主要是刀矛等冶兵器，加之各旗捻军并非脱产的专门武装，缺乏必要的训练，因而战斗力不强。由于皖北地势平坦，适于战马驰骋，所以捻军一开始就有少量骑兵。作战时，往

往步兵在正面冲阵，骑兵从两翼包抄。这种作战形式，当对付装备较差、数量不多的清军和团练乡勇时，尚能奏效。

二、积极进攻守备薄弱之敌

雉河集会盟后，捻军很快发展到五六万人，斗志更加高昂。而这时皖北、豫东的清军兵力仍较薄弱。在豫东，只增加了道员张维翰率领的清军一千八百余人，在皖北，除原周天爵，袁甲三所部二三千人外，其余为颍州知府陆希湜、亳州知州绣纶率领的少量清军和团练乡勇。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捻军首领便乘此有利时机，发起进攻作战。

1855年9月27日，张乐行、苏添福等率三万余人首先打败陆希湜部于庙集，继败张维翰部于亳州东面的泥台店。随后，挥师北入河南，攻破夏邑，并西攻马牧集（今虞城），乘胜进围归德府城。正在进剿豫北"联庄会"的河南巡抚英桂急忙派遣驻陈州的道员王建泰等率部往援。张乐行等闻汛后，即转旗南返，于11月7日攻占安徽蒙城。

捻军四处出击，引起了清廷的不安。当时安徽巡抚福济和江南提督和春所部清军正被皖南的太平军所牵制，无力北顾。清廷遂提升曹州总兵武隆额为湖南提督，令其从山东南下，统辖总兵兴庆，道员张维翰、游击武全等所部清军数千人和地方团练，对付十倍之众的捻军。这时，捻军正集结重兵围攻亳州，河南按察使余炳焘率乡团万余人，于12月7日乘虚袭占了捻军根据地雉河集。张乐行等随即撤围亳州，率部沿涡河南下，旋又拆向东北，在麻种集打败由徐州来援之清军兴庆部，进而围攻河南永城，迫使余炳焘乡团撤出雉河集而驰援豫东。张乐行等主动从永城撤围，于17日与武隆额部和乡团战于麻种集，首先将乡团击溃，进而包围武隆额部。激战约四小时，武隆额部大溃，军火尽齐，经马牧集向归德城逃跑。捻军乘胜攻占夏邑，再围归德府城。清政府斥贵武隆额"恇怯无能"，将其撤职，命英桂急赴归德，督办豫、皖、苏三省剿捻事宜。同时，命江北大营派遣侍卫伊兴额、协领德昌率马队五百名取道滁州（今安徽滁县）入豫，命总兵朱连泰统带兖州、徐州清军千余人进驻亳州，均归英桂调遣。英桂还调南阳总兵邱联恩部及都司保英部约三千人驰援归德，使豫皖边的清军总兵力增至万余人。张乐行等得悉清军援兵纷纷赶至，便率部返回雉河集。

1856年3月，张乐行等集中四五万人，再次分路进攻豫东清军，分别击败参将成龄，道员张维翰等部，并包围归德城。这时，归德城内清军甚少，英桂惶恐不安。但捻军未能乘此有利时机，一面加紧围城，一面待机攻歼前来解围的清军，也没有抽调兵力分别攻歼豫东溃败的清军和地方团练，而是又一次撤回雉河集，使豫东清军获得了喘息整顿的机会。

张乐行等返回雉河集不久，又率部南下作战。4月15日，配合宿、怀、凤地区的捻军仟乾、夏白部围攻涡河与淮河交汇处的怀远城。该城由总兵郑魁士部千余人及乡勇驻守。捻军轮番攻击，一度由城西南方向冲进城内，焚毁清军营盘，重伤郑魁士，击毙参将以下多人。后因蒙城等地的清军赶来增援，捻军便从城内退出。这次作战虽未最后攻占怀远城，却取得了重创清军的胜利。不久，捻军主力北返雉河集。

三、雉河集争夺战

1856年3月下旬，清政府令袁甲三随同英桂剿办河南捻军，后又“屡降严旨”，令豫军进攻雉河集。英桂认为：“雉河周围三四百里皆贼党屯踞，须渐坎疏通，免为所袭”。据此，他确定了分进合击、稳步前进的作战方针。其部署是：以袁甲三、邱联恩等部为主力，从亳州以北向东南进攻，以傅振邦、伊兴额等部从永城、宿州向西南进攻，夹击雉河集。由于捻军事先缺乏防御作战的准备，因而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不利的地位。

4月25日，清军傅振邦部四千余人和伊兴额马队千余人，从宿州向永城东四十里的茴村发动进攻（步队从两翼包抄，马队从正面进攻），捻军六千余人迎战。激战数小时，捻军损失二千余人，向南败退。初战失利后，张乐行命韩奇峰，苏添福等部三四万人进至宿州西北的濉溪口（今濉溪）和永城苗村桥一线阻击清军。4月30日，清军以傅振邦，伊兴额郎奔袭濉溪口北面的丁家楼，捻军损失二千余人。接着，苗村桥方向的捻军也被清军击溃。其后，清军又乘胜占领了宿州的铁佛寺，临涣集等捻军据点。

当宿州方向的清军向南推进时，英桂命亳北方向的清军同时发起进攻。5月13日，邱联恩等部与捻军战于亳北之界沟获胜；22日再战于界沟南面的小柰集，又获胜；接着于5月31日与驻亳州的袁甲三等部会合，然后沿涡河向东南进攻。6月8日，捻军二三万人在亳州东南的翟村寺地区阻击袁甲三、邱联恩等部清军。激战半日，被清军击败。其后，捻军主力又在翟村寺东南四十里的白龙王庙一带沿涡河两岸列阵阻敌。张乐行，韩奇峰率黄，蓝两旗在涡河北岸，龚得树、王贯三率白、黑两旗在涡河南岸，掘壕立栅，用车辆树木堵塞路口，冀图阻止清军的进攻。袁甲三派出马队抄袭捻军后路。捻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再次撤退。清军乘胜推进，于6月19日攻占雉河集。

雉河集失守后，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捻军首领，为了调动敌人，毅然率部南下，于7月16日乘虚袭占了淮河流域的商业重镇三河尖（颍上西），获得了大量物资，补充了大批人员，士气复振。英桂害怕捻军西占河南的固始、光山，即移营陈州，就近调度，并令邱联恩部由雉河集移驻固始，袁甲三移驻颍州。河南的一些地方武装也纷纷向豫东南集中，准备拦截捻军西进。张乐行等乘清军南调，蒙亳一带守备空虚之际，便以船只满载大批胜利品沿淮河东行，在汪家集登岸后，经蒙城向雉河集挺进，于8月24日重返雉河集，处决了当地反动地主豪绅与乡团头目，为死难的将士和群众报仇雪恨。

捻军北返后，袁甲三、邱联恩等随即率部尾追，再次向雉河集进攻。9月10日，在亳州西面的十八里铺作战中，捻军黑旗首领王贯三不幸牺牲，部众伤亡二千余人，余部退往雉河集。张乐行等仍然冀图用外线出击的办法调动敌人，解雉河集之围。于是将捻军分为两路，一路东攻江苏的萧县、徐州，一路西攻太和等地。由于没有攻克要地和痛歼敌人，未能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11月28日，雉河集再次为清军攻占。张乐行等率捻军主力东撤，经曹市集退守监涣集。清军崇安等部追及，与捻军隔浍河对峙。崇安以连日进展顺利，疏于戒备。11月30日夜，龚得

树率勇敢善战的敢死队，分四路袭击崇安军营。清军仓促应战，慌乱溃逃，西窜二百余里，退往亳州城。但是，捻军后来在庙集、尹家沟、赵旗屯等地的作战中接连失利，无法扭转被动局面。有鉴于此，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除留部分捻军在皖北坚持斗争外，率领主力再次南下淮河流域，于1857年2月中旬重占三河尖等地。此后，捻军开始了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新时期。

捻军从雉河集会盟到再次南下淮河流域，在一年半的时间内，随着参战清军的兵力由少变多，经历了由进攻作战转入防御作战的变化。在进攻作战期间，由于清军兵力薄弱，捻军“进退绰如，纵横跌宕；所向无前”，处于主劫有利的地位，部队也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但这一时期的作战，除给少数清军和地主武装以歼灭性打击外，多数打的是击溃战，清军的有生力量没有受到重大损失，团练乡勇反而有所发展。在整个淮北地区，出现了捻军占领区与地主武装所控制的圩寨犬牙交错的局面，一些实力不大的捻军圩寨，不断遭到清军和地主武装的围攻。捻军的数量虽然迅速扩大，但组织程度和战斗力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和提高，战术上也没有多大改进，只注意击溃敌人而不注意追歼溃敌。这些，都给后来雉河集的防御作战带来了困难。在防御作战中，只有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几支捻军主力从正面阻击清军，其余分散的各支捻军只顾据寨自保，极少配合作战。当时，在永城、夏邑、亳州、蒙城、宿州地区有许多旗色不同，人数不等的捻军，如果他们积极主动地从侧后袭击和牵制清军，势必使敌分散兵力，顾此失彼，即使集中了兵力，也因有后顾之忧，不敢放开手脚向雉河集推进。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在未能阻止清军进攻的情况下，没有与清军死拚硬打，而是跳出包围圈，进攻三河尖等清军必救之地，从而调动了敌人，保存了有生力量。这是捻军初期作战中的成功之处。

第三节 接受太平天国领导，与太平军并肩战斗（1857年3月～1864年11月）

一、主力南下淮南与太平军联合作战

张乐行、龚得树等捻军首领鉴于在淮北屡战失利，南下三河尖后仍然受到清军的沉重压力，迫切希望取得太平军的支持和帮助。而太平天国继1856年内讧之后，石达开又率部出走，太平军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也迫切需要团结友军，共同对敌，因此，洪秀全决定实行联合捻军的方针，使其“能掌北门锁钥”，成为“南国之屏藩”。正是这种共同需要，促成了两支农民起义军的联合。

在捻军第一次占领三河尖时，双方曾商谈过联合作战问题，因敌人进逼，捻军很快回师北上，故未能实现。1857年3月初，捻军自三河尖南围霍丘。在击败道员金光箸所率八百清军后，即由龚得树、苏添福率部南下迎接太平军。这时，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在解桐城之围后，乘胜占领了舒城、霍山、六安，便北上会合捻军。两军在霍丘、六安交界处胜利会师。经过协商，捻军以“听封而不能听调用”为条件，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张乐行被封为征北主将，其他捻军将领也各有封号，部队蓄发易帜，但仍然保持原有的领导系统和制度。为适应联合作战的需要，双方互派代表，随时联络会商。

（一）转战三河尖、正阳关

两军会师后，太平军和捻军各有十万左右，士气旺盛，军威大振，立即在淮河沿岸发起攻城作战。太平军薛之元等部和捻军张乐行部围攻河南固始城，太平军陈玉成部和捻军韩奇峰等部于3月11日攻占霍丘东北的正阳关，13日东进包围寿州城，太平军李秀成，李昭寿部和捻军龚得树、苏添福部于3月18日占领霍丘城，后又北渡淮河，围攻颍上城。

清廷得悉捻军南下后，曾多次谕令豫、皖清军扼要堵截，防止其与太平军会合。在此前后，清廷还调整了攻捻前线的统兵将领，加强进攻起义军的力量：察哈尔都统西凌阿被召回北京；崇安被革去总兵职务；因围攻北伐太平军不力而被革职的胜保，又被授予副都统衔，并署理河北镇总兵，帮办攻捻事宜。此外，还命山西汾州营参将保衡，直隶密云都司马翰忠率部开赴安徽亳州，听候调遣；命徐州副都统德勒格尔率领马队南下怀远；命英桂将在湖北遗撤的陕甘官兵截留河南，参加攻捻。胜保抵达亳州后，即与英桂、袁甲三等会商，确定了首先防止捻军主力重返雉河集，“再行相机节节进剿”的作战方针。据此，由责甲三督饬总兵朱连泰部约三千人及亳州地方团练于亳州一带，透剿留驻淮北的捻军；胜保以颍州为基地，率马步三千余人进攻南下的捻军，另有王庭兰，金光箸等部约二千人其统辖，在淮河流域配合作战，负责三省剿捻事宜的英桂率河南清军千余人驻太和等地，策应胜保部，并保护清军后方粮道。

胜保因兵力过单，一再奏请清廷调兵支援。清廷责备他“由亳至颍，尚未与贼见仗，而调将请兵纷纷不已，驻守颍州，不思急挫贼锋”，命令他“赶紧进兵，不得再有耽延”。胜保只得硬着头皮率部南下。当时，太

平军和捻军正三路出击，强攻坚城，以致力量分散，给了胜保以可乘之机。胜保于3月中旬南下后，首先集中兵力解固始之围。张乐行、薛之元等部因连日围攻固始不下，又见清军援兵赶至，便于3月下旬撤回三河尖。围攻寿州的陈玉成、韩奇峰部遭到金光箸部清军顽抗，也主动撤围（韩奇峰部退守正阳关，陈玉成部回守六安）。李秀成、龚得树等部于22日包围颍上后，虽几次轰塌城墙，但始终未能攻进城内。而胜保在解固始之围后，便率部回救颍上。在此情况下，李、龚所部也于5月3日撤至淮河南岸。至此，捻军和太平军第一次联合作战，未能取得理想的战果，即告结束。

捻军和太平军联合后出现的一个新情况，就是捻军在淮河流域的作战常常受到太平军长江中游战场形势的影响。由于安徽战场上的太平军既要抵御从湖北东进的湘军，又要牵制天京外围的清军，经常流动作战，而捻军基本上战斗在淮河流域一带，因而出现了捻军与太平军时而联合作战，时而单独作战的情况。为了阻击从湖北东进的湘军和鄂军，陈玉成于5月12日率数万太平军和部分捻军进入鄂东地区作战（9月中旬才折回皖境，驻太湖、潜山一带）。李秀成部则驻六安、霍山一带，随时准备东进，对付天京外围之敌。于是，在淮河沿岸独立作战的捻军，便采取守势，收缩兵力，挖壕筑垒，集中力量防守三河尖、正阳关、霍丘等据点。

太平军离开淮河沿岸后，胜保乘机向捻军发动进攻，第一个目标就是三河尖。三河尖周围河渠纵横，捻军跨河而阵，清军步骑兵不易展开，难于强攻。胜保便实行围困战法，控制通向三河尖的水陆通道，强令居民提前割麦，并在出产硝磺的地区设卡稽查，严禁出境，以断绝捻军的粮弹接济，同时，实行政治攻势，瓦解捻军士气。捻军坚守了六十余日，终因粮弹不济，于6月16日撤出三河尖，沿淮河东下正阳关。其后，由韩奇峰率部驻守正阳关，张乐行、龚得树则率部转移至霍丘。

胜保占领三河尖后，决定集中兵力先攻正阳关，得手后再攻霍丘。为防止正阳关，霍丘捻军西进固始，他命总兵邱联恩等会同王庭兰和固始知县张曜等扼守固始东部地区，自率步马数千人进攻正阳关，并令金光箸由寿州率炮船西进，配合进攻。金光箸见清军云集，有恃无恐，竟于6月25日首先攻关，结果遭到捻军伏击，兵败溃散。金光箸因坐船被捻军炮火击中，落水淹毙。这一仗打击了清军的气焰，使胜保所部不敢接近正阳关。8月，连降骤雨，河水猛涨，关外的捻军据点先后被清军攻占，关内粮食缺乏，形势危急，韩奇峰派人向霍丘求援。张乐行，龚得树率部往援正阳关，胜保趁霍丘城内捻军兵力空虚，派人收买了守城头目张金桂，旋于8月29日将该城占领。这时，扼守正阳关的捻军粮食已尽，只得杀马充饥，加之瘟疫流行，军民饥病而死者日增，处境异常困难。后李秀成从六安派出的援军五六千人赶到，击败关外清军，于10月12日接应关内捻军冲出重围，沿淠河南下，撤至六安。

（二）控制淮河中游

由于驻守镇江的太平军遭到围攻，天京外围形势吃紧，李秀成部于1857年10月中旬由六安，舒城一带东进救援。张乐行等率捻军一部配合太平军打通进军道路，待太平军绕过庐州（今安徽合肥市）以后，便又返回六安。11月，龚得树率部击败安徽布政使李孟群部清军，占领独山

镇。李孟群率部反扑，占领霍山。后驻潜山、太湖的陈玉成部太平军前来支援，李部慌忙退走。

这时，捻军中的地域观念和宗派观念抬头，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蓝旗旗主刘永敬、刘天台等主张返回淮北家乡；张乐行、龚得树等则主张继续留在淮南，配合太平军作战。前一补意见对于联合抗清的人局显然是不利的。但张乐行、龚得树在处理内部分歧时，采取了错娱的做法，竟于12月间将刘永敬、刘天台杀害，致使矛盾激化。不久，蓝旗首领刘天福、刘天祥、刘天月等率部由六安返回淮北，其他旗首如任乾，陆连科等也率部陆续北返宿州地区。从此，捻军便分别在淮南淮北两个战场作战。

1858年2月，太平军陈玉成部联合捻军韩奇峰等部约五万人再次围攻固始。守城团练顽强抵抗，胜保和李孟群也分别率部前往解围。捻军和太平军依托土垒，一面挖地道炸城，一面阻击援军。但战斗持续了两个多月，未能破城和击退援军。不久，湖北的清军又开始向东进攻，太平军和捻军遂于4月6日从固始撤围，返回六安。胜保和袁甲三分别率部由固始、正阳关向六安方向集中，伙同李孟群部围攻六安。这时，陈玉成部已向湖北进军，无力东顾，李秀成部正在皖东一带与清军鏖战，也无法西援。5月24日夜，六安捻军正同清军激战时，早被胜保收买的捻军头目许原如、杨邦本等伦开城门，清军蜂拥而入，张乐行、龚得树等率守军勇猛拚杀，突围出城。

六安失守后，张乐行、龚得树等乘淮河沿岸清军兵力空虚，沿淠河北上，渡过淮河。6月2日，在先行到达淮北的捻军配合下，一举攻占淮河北岸要地怀远城，全歼守军数百名。这时，集结在徐州以南，怀远以北的捻军有苏添福、李允、李大喜、张隆、任乾、陆连科等部约八万余人。他们以怀远为基地，沿淮河东进，在当地捻军张隆等部配合下，于6月14日攻克临淮关，道员黄元吉所部清军千余人突围西逃。15日，捻军攻占凤阳府县两墟，三千余名团练作鸟兽散。

捻军攻占怀远、凤阳后，切断了清军的水上交通，并使淮河南北两岸的抗清力量联接了起来，成为淮北清军南下的重大障碍。于是，太平军得以专力打击天京东西两面的清军，捻军也更便于与太平军配合作战，战略上处于此较有利的地位。

1858年9月，龚得树率部分捻军南下，协同太平军贝如孝部围攻定远城，牵制了部分清军，配合陈玉成、李秀成部太平军取得了击破江北大营的胜利。

1859年3月，陈玉成部在庐州西面的官亭击溃李孟群部清军后，乘胜东进，于同年夏先后攻占安徽天长、盱眙，进攻滁州、来安，迫使钦差大臣胜保所部退守盱胎东北的蒋坝，切断了驻定远的安徽巡抚翁同书与胜保部的联系。捻军龚得树部万余人遂由怀远南下，配合太平军吴如孝部再次围攻定远。定远的东西粮道分别被捻军和太平军切断，翁同书在“官军久已绝食，兵勇皆啖草根充饥”，“待援不至，待饷不来”的情况下，于7月17日弃城逃往寿州，所部纷纷溃散。捻军占领定远后，进一步扩大了淮南的控制地区，与庐州太平军的辖区联成了一片；同时打击了捻军内部在李昭寿、薛之元叛变后出现的投降暗流，逼使曾想献山风阳和临淮关降清的张隆重又换上捻军的旗帜，不敢公开投敌，暂时稳定

了内部。

（三）重返淮北

捻军控制淮河中游，切断了安徽清军的粮饷通道，加上淮北的捻军四出活动，引起了清廷的震惊。1859年10月底，清廷命袁甲三署理钦差大臣，接替胜保督办安徽军务，并告以“怀远一城居凤、颍之交，久为贼踞，亟宜迅图攻克，与翁同书下军合而为一，以便进攻淮南，兼顾北路”。与此同时，胜保趁捻军主力集中于淮南，淮河北岸的怀远守军力量减弱之机，督令副都统穆腾阿和总兵滕家胜等率清兵三千余人乘机进攻怀远。从定远、庐州派出的捻军和太平军援军被阻于淮河以南。张乐行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于11月8日退出怀远，率部南渡淮河，退守临淮关和定远。清军占领怀远后，立即沂向临淮，在北岸扎营。胜保亦折回距临淮关三十余里的张家沟大营，以便就近督攻临淮，后又进至距临淮关十五里的三汊沟驻扎。12月4日，袁甲三到达胜保大营，接署钦差大臣职务，并将大营移往张家沟。袁甲三迅速集结兵力，并将苗沛霖练勇八千人调往临淮，总兵力由三千余人猛墙至一万余人。1860年1月上旬，袁甲三乘捻军配台陈玉成部太平军在潜山、太湖一带与湘军作战之际，督水师炮船和马步队进攻临淮关，连日发炮轰击，将关内炮台击毁。守关捻军与清军激战两昼夜，伤亡甚众，被迫于1月10日南撤定远。

1860年1月下旬，清廷对攻捻部署又作了调整：革去胜保钦差大臣的职务，调往河南，督办该省攻剿事宜，以副都统关保为其帮办；命云南提督傅振邦督办徐、宿一带攻剿事宜，以总兵田在田为帮办，袁甲三仍署理钦差大臣，督办皖省军务，除巡抚翁同书仍为帮办外，加派副都统穆腾阿帮办军务。

袁甲三在占领临淮关后，又督军围攻风阳。张乐行率部往援，在凤阳南梁家冈遭苗沛霖团练和穆腾阿马队袭击，损失五六千人，被迫后退。2月13日，守卫凤阳县城的捻军首领张隆被袁甲三部总兵张得胜所诱擒。次日，守卫府城的首领邓政明为求活命，缴出全部枪炮马匹，并将十四名拒不投降的捻军将领捆送敌营杀害，致使凤阳府，县两城相继丢失。

清军攻占怀远、临淮、凤阳三城后，打通了淮河的航道，隔断了淮北捻军和淮南捻军及太平军的联系，张乐行、龚得树等在淮南只据有定远一个孤立据点，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5月16日，袁甲三派兵夜袭定远，毁城外营垒九座。6月1日，龚得树率捻军一部出敌不意攻占定远以东的来安，企图调动袁军，但未达目的。定远捻军只得坚守待援。8月初，清军对定远形成合围。后太平军陈玉成部和吴如孝部分别从天长、庐州来援，捻军白旗旗主孙葵心也由河南固始率万余人赶来支援，夹击袁甲三部。袁见捻军和太平军势众，害怕造成“全军坐困，终成溃裂”的危险局面，便慌忙将所部清军从定远撤退至淮河北岸。可惜太平军和捻军没有乘胜追击，将其歼灭。

定远解围后，捻军和太平军转攻凤阳、寿州，均未奏效。随后，龚得树、孙葵心率数万人随陈玉成部南下，谋解安庆之围。12月10日，太平军和捻军与敌大战于桐城西南之挂车河一带，孙葵心不幸牺牲。1861年3月，龚得树也在湖北罗田松子关中炮身亡。孙葵心在脱离张乐行领

导期间，曾企图降清，但未成事实。后来转战河南、山东，屡败清军；返回淮南后，重与太平军协同作战，最后把鲜血洒在太平天国的战场上。龚得树是捻军中仅决于张乐行的重要首领，不仅作战勇敢，“所领黑旗队枭猛耐战，势与张落刑（乐行）相埒”，而且较有政治头脑，是坚持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核心人物，他的牺牲，是捻军的重大损失。

1861年9月安庆失守后，陈玉成率部退守庐州，旋又遭清军围困。捻军在定远的孤立据点也难于长期坚守下去。而当时淮北捻军的力量还相当强大，河北、山东等省人民起义此伏彼起，陈玉成为了“广招兵马，早复皖城”，再援天京，先派太平军马融和部北上，继派捻军首领张乐行等率部北渡淮河，后又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祜王蓝成春等率部向西北远征。张乐行和苏添福等将定远据点移交给太平军后，于12月间率全部人马返回淮北颍上地区。至此，捻军和太平军在淮河沿岸的联合作战宣告结束。

二、淮北捻军向河南、苏北、山东出击

张乐行、龚得树等率捻军主力于1857年春南下与太平军联合作战后，淮北只有少数捻军就地坚持斗争。1858年初，蓝旗等捻军从六安返回淮北，兵力骤增，声势复振。以后，各旗捻军进一步挖壕筑垒，依托圩寨，抗击清军和团练的进攻，并经常伺机袭击清军据点，使当时负责江苏、安徽、山东三省“剿匪”事宜的袁甲三发出了“兵疲粮尽，势处万难”的哀叹。同年底，袁甲三向清廷建议由河南，山东出兵南下，与皖北清军联合攻剿淮北捻军。清廷表示同意，令新任河南巡抚恒福，山东巡抚崇恩“各就本境防军遴员统率，并力进剿，捣捻巢穴，以保北路完善之区”。1859年初，袁甲三进一步提出豫军由亳州东进，山东军由永城南进，本部诸军由宿州西南进的分进合击计划。清廷令崇恩、恒福将要隘严为布置（防止捻军绕袭其后），即行发兵合剿。崇恩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出境远征，有三不可胜，一是捻军众清军寡，地广数百里，难于合围，二是捻军以逸待劳，清军进攻则守垒不出，清军退却则伺机出击，三是如果清军日久不克，则饷缺兵哗，必为捻军所乘。清廷坚持原案，催促山东、河南迅即出兵合剿，但议未果行，淮北捻军便开始分道出击了。

（一）北舞渡、马埠、野猪冈歼灭战

1859年3月上旬，捻军二三万人在孙葵心，刘添福等率领下，集中于太和王市集，佯称西攻河南禹州（今禹县）。正驻鹿邑的总兵邱联恩（统率豫军六千余人）立即派兵防守豫皖交界的沈丘（今沈丘城）。3月14日，捻军突然进至河南商丘南面，次日分三路出击：一路进据商丘。宁陵交界的观音堂，一路西攻睢州城（今睢县）；一路由沟香集进占宁陵县城。21日，三路联合攻下睢州城，全歼知州王联升所率乡团，继又分兵西攻杞县。邱联恩急率三千余人赴援，与捻军战于睢州东南的张公堡。捻军失利，于23日退出睢州，经太康东北的杨庙西进吕潭一带。3月25日，捻军南下围攻西华城。26日，邱部追至，捻军又撤围西走，一部驻郾城东南的五沟营，主力驻舞阳以北的北舞渡。邱联恩命参将穆特布率部分清军往击五沟营捻军，自率三千人于3月29日赶到北舞

渡。捻军早在该地沿沙河两岸设防，步队配置在吃虎桥附近，马队分扎两翼，操刀持矛，严阵以待。是日下午，邱联恩将步马分为三队，向吃虎桥进攻。捻军步队坚决抗击，两翼骑兵突起，将邱部紧紧包围。黄昏发起总攻，捻军将士们呼啸猛冲，刀劈矛刺，将被称为“邱老虎”的邱联恩杀死于吃虎桥头。邱的部将二十余人同时毙命，三千人马大部被歼，少数逃往许州（今许昌市）。捻军携带大批胜利品，经西华，商水，项城等地返回淮北。

1860年春，捻军首领孙葵心，刘天祥，王怀义等率淮北捻军三四万人，分两路再次向河南出击。一路经夏邑，虞城到达山东单县地区后，又西入豫境，进至禹州，密县等地，另一路经鹿邑、柘城进击太康，通许，直指开封。胜保和新任河南巡抚庆廉匆忙布置城守。4月7日，捻军与胜保部在离开封二十五里的白酒店遭遇，作战失利，折向陈留。当捻军二三万人由尉氏、鄢陵、扶沟等地东返时，其先头部队于5月4日在柘城、太康交界的马埠（今马铺）与奉命拦截的总兵王凤祥。副将王庆长等所部三千余人遭遇，被迫后退十余里。此时后队人马赶到，使整顿队伍，进行反击。敌军大部被歼，王凤祥、王庆长等被杀，于是，捻军胜利重返淮北。清廷责胜保“剿贼下力，畏葸无能”，将其调回北京，改由巡抚庆廉督办河南军务，副都统关保仍为帮办。

庆廉督办河南军务后，鉴于在防豫军不满四千，其余皆系练勇，加上关保两营，总计不过一万数千人，而张乐行、龚得树、孙葵心、王怀义、姜台凌等各部捻军不下数十股，每股各有数万人不等，宿、亳、蒙、怀、庐、寿一带及豫省边界所在皆有，便向清廷提出由豫军与酸甲三、傅振邦部清军合力攻剿，并由苗沛霖部练勇驻扎萧县、永城边境，“力扼西北，进剿东南”的作战方针，得到清廷的批准。但就在这一方针提出不久，捻军又一次越过豫军防线，向河南大举出击。

1860年8月，蒙亳地区大雨成灾，捻军粮食供应发生困难，而河南秋收在望。捻军首领刘玉渊、雷彦、宋喜元、苏添才等便率四万余人，由亳州再次挺进河南。8月21日，捻军进攻薛庙清军大营，关保由鹿邑派兵往援。捻军立即绕攻鹿邑东关，迫使清军回顾城防，后在五里庙与敌军交战，杀游击罗忠保等多人。9月15日，捻军兵临陈州城下，因清军防守较严，便直薄周家口镇（今商水）。后因清军来援，南下商水（今旧商水）、上蔡、汝阳（今汝南）等地。庆廉命总兵承惠率八千余人追击，并令游击孙之友部为后援。但孙部为雷彦所率捻军牵制，无法前进。9月20日，承惠部进抵汝阳城南三十五里的野猪冈。捻军事先在此布阵，清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激战间，一部分捻军迂回至大石桥，切断了清军的退路，正面的捻军又将清军分割为二，展开白刃格斗。结果，承惠等十余名清军将佐及大部士卒被歼，捻军再次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北京的胜保后来哀叹：“野猪冈之役，全军遇伏，精锐胥亡，元气遂不可复。”清廷因无正规军可派，只得命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等整顿和加强河南乡团。

（二）袭占苏北重镇清江浦

1860年2月，捻军首领李大喜、魏希之、张宗禹等率步队二万余人、马队万余人，在江苏萧县宝安山集中后，佯攻砀山，摆出北进山东的架势，忽又挥戈东进，在徐州越过黄河故道，经邳州（今邳县北邳

城）再长驱南下，于18日占领桃源（今泗阳南），然后直趋苏北的政治中心和商业重镇清江浦（今清江市）。当时，河道总督庚长，漕运总督联英等正置酒观戏，昼夜不辍，闻捻军将至，才仓皇派兵堵御。2月21日，捻军击败都司德兴部清军三百人，乘胜进抵清江浦，庚长等逃往淮安。清廷闻清江浦失守，急忙调兵往攻。捻军在获得大量钱粮物资后，于3月5日撤离清江浦，返回淮北。

（三）进军山东，三败僧军

捻军在出击河南、苏北同时，还不断深入山东境内，打击清军。1860年9月下旬，张敏行、姜台凌等率四万余人由宿州北进至山东峄县（今峄城）、兰山（今临沂）等地。10月下旬，捻军又进至山东鱼台、金乡、巨野等地，26日直逼济宁城。旋又分兵三路：一路经汶上北进东平的戴庙，又经梁山南下占领巨野，后由定陶、曹县返回淮北，一路经滋阳（今兖州）北占宁阳，进围泰安不克，由大汶口南下曲阜等地；一路东北经泗水，转至新泰，攻占蒙阴，复由沂水、莒州（今莒县），日照南下至赣榆、郯城地区。三路捻军在获得大量粮食牲畜后，胜利返回淮北。

清廷害怕捻军由山东进入直隶，危及京畿安全，便于1860午11月5日，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仍任钦差大臣）统带清军一万余人（内马队三千五百人、步队二千人、绿营兵五千人），由直隶开赴山东剿捻，命文渊阁大学士瑞麟以侍郎衔帮办军务。清廷规定滑军的任务是，“前往剿办北路各匪，先由河间一带，次及山东、河南，权其缓急，以次进剿”。12月17日，僧格林沁率部进驻济宁。

僧格林沁率部南下山东后，袁甲三曾向他指出，“河南之兵名为万余，多系新募，宿、徐之兵本不满万，近因饷缺，大加裁汰，所存无多，山东之兵又不能越境会剿，此贼所以到处窜突，如入无入之境也。”并向僧建议：“以山东兵为中路，由曹、单直趋虞、夏，以河南兵为右翼，以徐、宿兵为左翼，声势联络，互相策应。步步为营，与民寨相犄角，逐渐而进，不求速效。”僧格林沁没有采纳袁的建议。他急功近利，孤军在山东境内作战，因而屡战屡败。

僧军进驻山东不久，亳东捻军四万余人（其中马队万余）在刘玉渊等率领下，又一次进入山东，经鱼台、金乡北上。僧格林沁急忙率骑兵二千余人前往追击，于12月25日由嘉祥驰赴巨野。时值大雪，军行甚疲。26日，僧军在巨野东南的羊山集与捻军接战，僧格林沁率主力从东面进攻，瑞麟率部从西南进攻。捻军分路抵御，首先将僧格林沁部击退，进而包围瑞麟郎，将副都统格绷额等击毙。瑞麟突围逃到离金山二百余里的汶上。僧格林沁溜回济宁后，参劾瑞麟突围后。不在巨野扎营，复越过嘉祥、济宁退至汶上，……以致后路官兵涣散，实属怯懦无能”。清廷革去瑞麟侍郧职衔，饬令回旗，改由镶蓝旗蒙古都统西凌阿、工部右侍郎国瑞帮办僧格林沁军务，并将原先革职的副都统伊兴额和徐州镇总兵滕家胜的步骑三千人交僧调遣。不久，清廷又将陕西巡抚谭廷襄补授山东巡抚，令其带领步骑兵一千五百名增援山东。

僧格林沁在羊山集战败后，下令从河南的考城（今兰考东北）至山东鱼台的南阳湖长四百七十余里地段，浚壕筑垒，由曹、单、菏、城四

县民团分段扼守，郓、巨、济、金、嘉、鱼六县民团闻警协守，企图遏阻捻军北上。但捻军向山东的进攻并来因此受阻。1861年1月底，捻军首领赵浩然、张敏行、李成等率黑、蓝、白三旗四万余人，由砀山、虞城进入山东，接着分兵两路：一路伺曹县南部游动，一路进入巨野东南六十余里的羊山集。2月2日，僧格林沁及副都统舒通额分率骑兵包抄羊山南麓的捻军，捻军即北上嘉祥之纸坊，又南下至金乡以西，城武以东地区，后又北上菏泽东北之关李家庄，筑垒布阵，准备抗击追击的清军。2月20日，僧格林沁不顾部队连日奔驰和饥疲不堪，下令分南、北、中三路进攻。捻军以逸待劳，步队居中，马队从两旁抄袭，号角四起，奋勇迎战。清军南路的黑龙江马队及陕甘步队首先溃退，接着中、北两路也纷纷败逃。此战，捻军歼灭清军近千人，缴获枪炮马匹甚多。

僧军败讯接连传到京城，清廷斥责僧格林沁。“奔驰数日，率饥疲之卒，当方张之寇，后路既无援兵，左右亦少策应，以致为贼所乘，勇往虽有余，惜尚未能持重也”，并告诫他“总不宜轻进，再蹈覆辙”。同时，命袁甲三委派得力将领与田在田、伊兴额等“合力兜剿，牵制后路”，使捻军“有所顾忌，不敢径行北趋”。但是，捻军很快又深入山东腹地，迫使僧格林沁不得不再次率部迎战。同年3月，数万捻军突入曹、巨、郓境，挥戈北上，由东平之戴家庙、安山等处渡过运河。僧格林沁令副都统伊兴额及徐州镇总兵滕家胜率二千余人追击。捻军在汶上、东平之间的杨柳集利用村落布置伏兵，待机歼敌。3月17日，先在卧虎山与清军接仗，佯装败退，待清军迫至杨柳集时，捻军伏兵四起，将敌人层层围裹。伊兴额、滕家胜几次突围，均未得逞，终被捻军斩杀，僧军伤亡惨重，溃不成军。

捻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三败僧格林沁军，狠狠打击了僧军的嚣张气焰。此后，捻军利用“甚雨泥淖，高禾蔽野”的有利条件，与敌人周旋，使其“疲于奔救，刍粮不继，士马疲羸”。僧格林沁无可奈何地对其部下说：“不能再与野战，惟当严固直北藩篱。”便命西凌阿回军济宁，力扼北路，自统全军扼东平之安山，凭河而守。于是，捻军在山东的活动区域日益扩大，一度进逼省城济南，山东巡抚谭廷襄龟缩城内不敢出战。捻军又转至胶州半岛，到达福山、烟台沿海地区。外国侵略者以军火接济清军，英、法海军还在烟台地区参与了屠杀捻军的勾当。

淮北捻军挺进河南，苏北、山东，推动了当地人民的武装起义，使上述地区先后爆发了捻党首领陈大喜领导的汝宁起义，郜永清领导的商丘金楼寨白莲教起义，苏皖边的幅军起义，菏泽地区的长枪会起义，曲阜、邹县、泗水等地的文贤教起义，鲁西的白莲敬起义（其中宋景诗的黑旗军发展最快）。这些起义武装和淮北捻军互相配合，给清军和地方统治机构以沉重打击，客观上支持和配合了淮南的捻军和太平军。但是，由于淮北捻军向外出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生活资料，虽然歼灭了相当数量的敌人，但主要是击退敌人的追击和堵截，没有有计划地寻歼更多的敌人。特别是由于一再外出作战，致使淮北的基地反而有所缩小。在这期间，一些重要捻军首领如宋喜元、任乾，陆连科、李大喜等的圩寨，相继被清军和苗沛霖团练攻占，任乾、陆连科、李大喜等先后牺牲，这就给尔后进行的保卫淮北基地的作战造成很大困难。

三、退出淮北，与西北太平军并肩战斗

1861年底，张乐行率领捻军自定远返回淮北后，进驻颍上，次年（同治元年）1月中旬开始，与太平军马融和部，原在颍州的捻军姜台凌部以及苗沛霖的团练共同围攻颍州城，将安徽布政使贾臻困于城中。不久，胜保（1861年春曾奉命驰赴直隶、山东，督办防剿事宜）奉命由豫入皖，以解颍州之围，苗沛霖又接受招抚，配合清军袭击捻军和太平军。捻军、太平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于4月中旬撤离颍州，退入太和境内。5月中旬，陈玉成撤守庐州，率太平军三千余人北走寿州时，被苗沛霖诱捕，解送颍州胜保军营。尚在淮北的张乐行、马融和率此凶讯，率部往救，因被清军击败，未能成功。后清廷得悉陈得才、赖文光等率领的西北太平军已兼程向南进发，前来搭救，遂于6月4日将陈玉成杀害于河南延津县。陈玉成牺牲后，马融和率部西走河南，投奔西北太平军；张乐行则率部返回雉河集，同其他捻军一起，与夹攻淮北的清军展开了一场血战。

（一）雉河集失守，余部退出淮北

庐州失守，陈玉成牺牲，太平军在皖南的根据地丧失殆尽，使淮北捻军的处境更加困难。不久，僧格林沁率马步数千南下，并于1862年6月26日攻占了河南商丘县马牧筑以南的金楼寨，镇压了白莲教起义军。原来对付皖南太平军的李续宜、袁甲三等部也转旗北上，协同僧军以及豫，苏、鲁清军共同对付淮北的捻军。

8月2日，清廷向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湖广总督官文、安徽巡抚李续宜、湖北巡抚严树森、河南巡抚郑元善、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署漕运总督吴棠等文武将领发出了大举进攻淮北捻军的谕令。其具体部署是：僧格林沁部马步两万余人和李续宜部湘军万余人，南北对进，夹攻雉河集；袁甲三因病歼缺后，其所部二万人由李续宜派员统领，从怀远向北进攻，吴棠扼守江苏清河、淮安，并由僧格林沁拨兵若干，并力扫荡邳州，宿迁、海州（今连云港市西南）。沭阳一带；由僧格林沁派员接统总兵田在田所部，防守南北要冲徐州、宿州地区；郑元善出新蔡，毛昶熙出归德，配合备军向东进攻；官文、严树森派兵深入豫境，由正阳、息县援应；皖、豫等省的团练，分别协同各路清军进攻。

8月20日，清廷把各路攻捻清军统交僧格林沁调遣，不但令其统辖山东、河南军务，而且授权调遣直隶、山西和蒙、亳、徐、宿的防宾，节制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各省督抚提镇以下各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鉴于僧军以往多次失利的教洲，清廷告诫僧格林沁“务宣逐渐进取，步步为营，不可孤军深入”。

张乐行等捻军首领在清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面前，未能避实就虚，把捻军主力转移到山东或河南，结合当地农民起义军，袭击清军的后方，或攻敌必救之地，以调动和分敝敌人，而是“悉其五旗首，集众二十万，陈雉河”，依托圩察打防御战，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

10月18日，僧格林沁由河南夏邑移大营于黄仲集（今商丘南），随即分兵向亳州以北的庐庙、邢大庄发起攻击。捻军首领李廷彦率部抗击，因寡不敌众，坚守了十余天，庐庙、邢大庄先后失守。李廷彦被诱捕杀害。接着，僧格林沁命翼长全顺、承先、苏克金、恒龄和总兵常山

保等率部南下，分别占领了丁花园、王路口、颜集、五马沟、岳楼、高阁、八里庄等圩寨。清军占领亳北地区之后，僧格林沁又于11月初督师进攻亳东地区。黑旗首领苏添福在刘集率部坚守圩寨，抗击清军。清军发炮猛攻，寨内房屋多被炸塌，苏添福于11月6日率部退守蒋集。20日，马村桥捻军来援，遭国瑞部清军阻击，随后，张乐行也由庙集率部驰援，27日在下张桥遭到清军翼长舒通额、苏克金部骑兵袭击，败退涡河南岸。以后，张乐行等部捻军又多次往援蒋集，均为清军所败。12月20日，捻军首领陈万辐突围南走，其弟率部投降清军。1863年1月底，僧军攻占涡河南岸的韩楼，2月23日又攻占马村桥，苏添才率捻军余部退守雉河集。

一系列战斗的失利和圩寨的丢失，引起捻军队伍中某些动摇分子的叛变投敌。在僧军进攻亳北时，黑旗首领宋喜元等投敌叛变，并无耻地带领清军攻打捻军。2月26日，僧军包围张家瓦房，赵浩然又率部投降。随后，宿州、蒙城的一些捻军首领也纷纷投敌。接连数次率部进军大半个山东的捻军首领刘天祥，也向宿州知州英翰屈膝投降，充当清军鹰犬。但是，绝大多数捻军将领和战士，没有被僧军的猖狂进攻所吓倒，仍奋不顾身地与清军展开圩寨争夺战。

这时，苗沛霖根据僧格林沁“剿捻立功”的指令，从背后袭击捻军，占领了一些捻军圩寨，进而配合僧军向雉河集推进。

张乐行在清军重兵围攻的艰危情况下，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命张宗禹率部突围，由太和、颍州入豫东南与陈大喜等部会合，自己则率部东走宿州，拟北上与早已进入山东、苏北一带的李成、任化邦（又名任柱）等部会合，因在符离集遭清军阻拦，便又折回雉河集。

3月16日，僧格林沁移大营于亳州涡河北岸的庙集，随即命舒通额、苏克金等部向捻军发起进攻，于19日占领尹家沟、雉河集。张乐行等率部南走。20日，张村堡（今利辛西北）一战，捻军死亡将士一千余人。21日，再次失利，又伤亡二千余人，韩四万、刘玉渊、苏添福、苏添才等被俘遇害。3月23日夜，张乐行仅率二十余人逃至蒙城、宿州交界的西洋集，为叛徒李家英等出卖，不幸被捕，押往僧格林沁军营。不久，张乐行及其子张喜、义子王琬儿等被清军杀害。姜台凌、孙葵文等向清军乞降，结果仍被处死。

捻军在这次防御作战中，由于实行消极防御，结果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不仅丧失了蒙、亳基地，而且张乐行等许多捻军重要首领以及将士二万多人英勇牺牲。蒙亳一带的捻军圩寨几乎全被摧毁，当地人民惨遭祸殃。雉河集到处是断壁残垣，一片凄凉景象。但是，捻军并没有被完全消灭，突围出去的张宗禹，任化邦等部以流动作战方式，继续坚持斗争。

（二）转战豫、鲁，调动打击清军

张宗禹、李成、任化邦等部捻军从蒙亳地区突围之后，分别转战于河南、山东等地，结合当地农民起义军，积极打击清军。

张宗禹等部捻军与豫东南捻军陈大喜部会合，活动于新蔡、汝阳、息县、罗山、光山一带。新任河南巡抚张之万命总兵张曜、余际昌率军追剿。1863年4月初，张宗禹、陈大喜率部进入湖北，总兵余际昌率豫军五千余人越境追击。捻军经麻城、罗田、蕲水（今浠水）进至蕲州、

广济（今蕲春东南）一带。后由于湖北清军竭力堵截，而余际昌部豫军已撤回河南，捻军途回军北上，于5月中旬复入河南，由光山、罗山、息县等地渡过淮河，5月26日在正阳县方案设伏，重创跟踪追击的豫军，毙余际昌及游击以下官弁三十九人，使该部清军死伤过半。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捻军士气，增强了坚持斗争的信心。

李成、任化邦等部捻军在山东幅军、教军等农民起义武装的配合和支援下，活动于兰山、费县、沂水、蒙阴、泗水等地，并进入曲阜、泰安，逼近省城济南。山东巡抚潭廷襄惶恐不安，忙向清廷告急："东境外匪与内匪交讧，实属弗遑兼顾"，"贼边马已至汶、宁，湖路可达东平，山路可逼省会，事机危迫"。当时活动于鲁西堂邑、冠县、馆陶（冶今馆陶东北）、临清、高唐等地的宋景诗黑旗军，也威胁着清廷畿辅重地。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急调僧格林沁军由淮北返回山东。僧军转回山东后，在新任山东巡抚阎敬铭率领的防军配合下，疯狂地镇压各支农民超义军，使淄川的刘德培起义军，邹县、泗水，曲阜交界的文贤教军，以及末景诗黑旗军都遭到重大损失。宋景诗在刘贯庄战败后，便参加了捻军。

当僧军于4月底北返山东后，蒙亳地区转入地下的捻军又纷起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清斗争。与此同时，苗沛霖再次叛清，于5月初占领颍上、怀远、寿州，围攻蒙城。不久，张宗禹、陈大喜等亦率军从豫南经颍州回到雉河集，惩办了出卖捻军领袖，为虎作伥的叛徒，并夺取了敌人的粮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斗志，不少人踊跃参军。

蒙亳一带捻军的重斩活跃以及苗练的再次反清，使正在围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曾国藩颇有后顾之忧，急忙上奏清廷，请求僧军再次南下进攻淮北。1863年11月9日，僧格林沁遵旨由直隶大名率军南下，经河南许州于11月下旬进抵安徽蒙亳地区，设大营于高炉筑（今涡阳东南）。

张宗禹等得知僧军再次南下，即主动撤离雉河集，西走河南。僧军占领雉河集、西洋集一带后，便于12月6日向正在围攻蒙城的苗练发起进攻。在僧军和蒙城清军的夹击下，苗练四处败逃，苗沛霖在乱军中被杀。以剿捻起家、作恶多端的苗练武装从此烟滑云散，清军在重占蒙亳地区后，大肆平毁圩寨，收缴武器。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滴廷把雉河筑改为涡阳县，在县北的龙山镇驻扎一营清军，以防捻军再起。随后，僧军奉命进入河南，追击捻军。

（三）与西北太平军并肩作战，突破重围

张宗禹等率军西走河南后，准备进入陕西与西北太平军会合。这时，由扶王陈得才统率的西北太平军为解天京之围，正在东返途中。1864年4月下旬，陈部在河南西南部的浙川、内乡等地先后与捻军张宗禹、陈大喜、任化邦等部会师，众达数十万，随即分四路向东南进发。清廷为阻止西北太平军和捻军援救天京，令僧格林沁的马队及鄂军，豫军、皖军竭力拦击。不久，聚集于鄂、豫、皖交界地区的清军不下十万人。

太平军和捻军在东进过程中给了拦截的清军以应有的打击，但本身也受到一定损失。当得知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于7月19日失陷之后，"人

心离散”，士气大挫，尽管后来在河南的罗山、光山和湖北的蕲水等地几次击败清军，但这些局部胜利并未改变被清军围遍堵截的不利局面。11月5日，安徽霍山黑石渡一战，太平军和捻军损失惨重。接着，马融和等屈膝投敌，蓝成春被俘遇害，陈得才服毒自杀。其后，赖文光、邱远才等部太平军和张宗禹、任化邦、陈大喜等部捻军先后进入河南，经过合编和整顿，迎着险恶的局势，再接再厉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1857年到1864年，是捻军反清战争的关键时期。由于实行了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正确方针，张乐行、龚得树等部捻军主力得以控制淮河中游，镇守淮河腹地；淮北捻军的积极出击，也牵制了相当的清军，从而使淮南战场保持相对稳定，陈玉成，李秀成部得以在湖北和天京外围的往返征战中不致有后顾之忧。这些都是具有很大战略意义的。

这一时期，由于清军在安徽以及河南、山东、江苏等省的兵力比较薄弱，而捻军数量众多、占地较广，这就为捻军进一步壮大自己和扩大占领区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1859年秋，河东河道总督黄赞汤，河南巡抚瑛棨、前山东巡抚崇恩在给浦廷的奏折巾指出：“皖捻滋事以来，窜扰河南、江南、山东三省，蔓延愈广，裹胁愈多，而攻剿数年，迄难扑灭者，则以官军兵分力弱，不足制其命而捣其巢也。”进而指出：“近日定远不守，捻、粤联为一片，南抵安庆、舒、桐，北通滕、峄、曹、单，东界徐、宿、青、阳，西邻归、陈、光、固，纵横千余里之内，实已民贼不分，而翁同书一军仅保寿州，胜保一军扼扎蒋坝，岌岌乎无驻师之地，徒恃傅振邦，关保两军，以区区之师，当数十股凶悍之众，前后左右，纷至沓来，虽毕力进攻，亦岂能制贼死命?”这些描述说明了当时捻军确实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但是，为什么时隔不久，捻军在淮南战场和淮北战场的作战均遭失利，最后不得不撤离蒙亳基地，突围他走呢?从作战指导方面考察，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雉河集会盟后，实际上没有建立起真正集中统一的领导和作战指挥。捻军主力南下六安后，张乐行，龚得树对内部的意见分歧处理不当，更增加了各股捻军的离心倾向，以致难于集中兵力对付进攻之敌，给了清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二是不重视歼灭清军的有生力量。淮南捻军在淮河中游占领几个城市后，便分兵守点，消极防御，不注意在流动作战中歼灭敌人，结果所占据点反被数量虽少但能集中兵力作战的清军各个攻占。淮北捻军热衷于向外出击以获取生活资料，丧失了更多地歼灭清军的有利时机，特别是没有把侧重点放在消灭盘踞淮北的清军上面，使自己有个稳固的后方，以致当僧军南下向雉河集等地大举进攻时，处于非常不利的被动境地。

三是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蒙亳地区的各支捻军仍然据寨自保，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防御部署和作战指挥，最后终于被清军各个攻破。张乐行等退守雉河集后，企图以武器装备低劣、内部组织很不严密的捻军与清军打堂堂正正的阵地战，而不是及时跳出清军的包围圈，这是很大的失策。后来，在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决定一些部队突围出走，才保存了一部分有生力冕，得以继续坚持斗争。

第四节 与太平军余部合编，继续坚持反清战争（1864年12月～1868年8月）

一、高楼寨歼灭战

（一）捻军和太平军余部的改编

天京陷落以后，全国革命形势走向低潮。在这危难之际，捻军和太平军余部，没有被清军的血腥镇压所吓倒，而是不畏艰难险阻，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成为继太平军之后的抗清主力军。

1864年11月下旬，遵王赖文光和淮王邱远才两部太平军二三千人，于鄂北地区与张宗禹、任化邦、陈大喜、牛宏升、李允、张禹爵等部捻军二三万人会合，扶王陈得才余部及其他一些被打散的太平军，捻军将士，也陆续前往集中。接着，他们在豫，鄂边境进行了合并和改编，组成了一支集中统一的新捻军。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等"誓同生死，万苦不辞"，并共推赖文光为最高领袖，赖亦毅然负起领导责任，"以期复国于指日"。赖文光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和封号，称张宗禹为梁王，任化邦为鲁王，李允为魏王、牛宏升为荆王、张禹爵为幼沃王。军队沿用捻军的编制，仍以五色旗区分，下分大旗小旗。但也作了一些变动，如将一些小旗改编成营，在任化邦率领的部队中，就有内五营和外五营的建制。

通过整编，提高了郎队的军政素质，有利于继续坚持斗争。在政治上，明确以复兴太平天国为斗争目标，在领导上，加强了集中统一，隶属关系明确了，组织较前严密了，在军事上，根据捻军骑兵较多和北方地势平坦等特点，决定"易步为骑"，增加骑兵，减少步兵，在步兵中也增加马，骡，驴等牲口，加强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在作战方式上，随着骑兵的增加，发展了快速流动，盘旋打圈以疲敌，声东击西以误敌，设伏围裹以歼敌等灵活的战术，成为一支"善战善走"的部队，但是这次改编，没有解决部队主要行动方向和建立革命基地等重大问题，这对于以后的作战影响很大。

清军方面，自黑石渡之战后，某些将领滋长骄傲情绪，认为太平军，捻军已是"屡败之众"，只要"僧格林沁就近调度，必能就地殄除"。同时，派系矛盾突出，特别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军与僧格林沁的满蒙旗兵之间，表现尤为明显。就在黑石渡作战之前，僧格林沁连吃败仗，日益暴露出这位王爷的无能。清廷为了支撑这支"王牌"军队，调两江总督曾国藩及其湘军前往湖北东郎参战。曾国藩却以"大帅三人（按：指曾国藩，僧格林沁，官文）屯驻四百里内，恐群盗轻朝廷"为由，拒不应命，只愿派部分湘军归官文调遣。黑石渡之战后，清廷又下令抽调部分湘，淮军（湘军刘连捷部和淮军刘铭传部）给僧格林沁，以加强攻捻兵力。曾国藩、李鸿章都以种种借口拖延部队的调动。而盲目自大的僧格林沁，则认为所调之湘、淮军"守则有余，战则不足"，拒绝湘，淮军的支援，仍然妄想独吞攻捻的"胜利果实"。清军之间的这种矛盾，对于捻军来说，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二）邓州、鲁山大败僧军

12月初，僧格林沁亲督翼长恒龄、成保及副都统常星阿等部进抵湖北枣阳，旋即西进。12月7日，赖文光等督军败僧军于襄阳，然后挥军北上，进入河南邓州（今邓县）境。赖文光，张宗禹等选择邓州西南的唐坡，挖壕筑垒，部署兵力，准备迎击僧军。12日，僧军分左、中、右三路发动进攻。捻军将士首先打败僧军右路步队，然后从侧后抄袭敌人的中、左两路，大败僧军。僧格林沁退入邓州城。捻军与太平军余部合编后接连取得胜利，士气复振。

12月13日、14日，捻军围攻邓州城未下，便北攻南阳府（今南阳市），旋又西趋镇平，复北经南召至鲁山。僧格林沁率部取道郏县，于1865年1月6日进抵宝丰，堵截捻军北上山西，西进陕西。1月中旬，捻军与僧军交战失利，由鲁山西走。僧格林沁恐其北上洛阳，率部经汝州（今临汝）前往洛阳堵截。后探知捻军集聚于嵩县西北一带，便于1月下旬由洛阳取道宜阳，进至永宁（今洛宁）东面的韩城镇。捻军随即经伊阳（今汝阳）折而往南，返回鲁山。僧格林沁便督队由韩城镇经宝丰县的大营镇奔向鲁山。这时，捻军已在离鲁山十余里的地方布好阵势，待机歼敌。1月28日，僧格林沁命恒龄率骑兵在左，常星阿部居中，成保部在右，同时向捻军阵地冲锋。捻军佯败，将敌军诱过滍水（今沙河），然后回军猛击，并以马队从后抄袭。僧军大恐，营总富克精阿，精色布库等率部先逃。捻军乘势奋勇杀敌，先后毙敌翼长恒龄、营总保青、副都统舒伦保、营总常顺等多人。僧格林沁在总兵陈国瑞援救下，才幸免于死。

僧格林沁在鲁山大败之后，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将首先败退的富克精阿、精色布库等在军前处决，借以镇慑所部。他决心猛追捻军，寻机报复。

（三）盘旋打圈，疲惫僧军

鉴于清军防守严密，捻军只得放弃入陕计划，决定在河南境内与僧军继续周旋，伺机歼敌。

鲁山获胜后，捻军经叶县北走襄城，禹州，复经长葛，新郑，转入尉氏县境。捻军游骑四出，边马直抵河南首府开封城下，城内清军一日数惊，附近各州县官吏慌作一团。1865年2月11日，跟踪尾随的僧军到达尉氏县城，捻军已南下下鄢陵。僧军先头部队三千余人孤军冒进，当追至鄢陵县北阎寨坡时，捻军得知追军兵力单薄，便以少数部队诱敌，大队回马力战，将其击溃。2月13日，僧格林沁率大队赶到，亦为捻军所败。僧军连战皆败，损兵折将，不得不在鄢陵休整，仅派出部分兵力跟踪捻军。2月中下旬，捻军由临颍，郾城南下，攻西平，围汝阳，僧格林沁只得于3月5日亲督马队南下。捻军见僧军追来，便挥军南下，进攻信阳州城南关，待敌军到达信阳时，又举旗北上，经确山、遂平、西平到达郾城，然后攻扶沟，入睢州境。3月29日，捻军自河南考城进入山东境内。

两个月来，僧格林沁尾随捻军之后穷追不舍，从豫西、豫中，豫东、豫南一直追到山东，行程数千里，所部被拖得精疲力竭，“将士死亡者数百，军中多怨言”。他自己也“寝食俱废，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贼”，清廷曾告诫僧格林沁“未可一意跟追”。老奸巨猾的曾国藩看出了这样追击的危险性，指出：“兵法忌之，必蹶上将。”但

僧格林沁刚愎自用，并未从失败中汲取教训。

（四）高楼寨全歼僧军

1865年4月初，捻军进入山东后，经曹县、定陶、城武、嘉祥、汶上、宁阳进入曲阜。时僧军仍紧追不舍，山东巡抚阎敬铭也派布政使丁宝桢率本省防军进入兖州，妄图夹击捻军。为了继续疲惫敌军，捻军北趋宁阳、东平。途中击败总兵范正坦部后，继续北上东阿（今东阿南）、平阴、肥城，威胁省城济南。僧恪林沁率军追至东平，丁宝桢部则进抵泰安北面的张夏镇。捻军见敌有备，便南下宁阳，兖州、邹县、滕县、峄县，旋经兰山、郯城进入江苏的赣榆、海州、沭阳。5月3日，又由邳州返回山东郯城，西走峄县，在临城（今枣庄市西薛城）附近击败丁宝桢部后，北上宁阳、汶上。5月10日由汶上以西的袁家口渡过运河，进至范县（今河南范县东）南面的罗家楼、濮州（今河南濮城）东南的箕山一带，最后进至邪城西北的黄河水套地区。

黄河水套是1855年（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省考城县属的铜瓦厢决口以后，在濮州、范县以南和邪城西北一带形成的一个河汊众多的地地区。捻军进入该地区后，荫蔽在那里的许多被清军击败的山东各地起义军的失散人员，纷纷参军，使捻军人数又众达数万。而这时僧军已被捻军拖得疲惫不堪，僧格林沁本人也因“辄数十日不离鞍马，手疲不能举缰索，以布带束腕系肩上驭马”。就在这种情况下，捻军与当地起义人民一起，在菏泽的高楼寨一带，布下了歼灭俏军的天罗地网。

从菏泽县城到黄河南岸（约四五十里）有一条经吴家店、高楼案的大道。高楼寨北面，有许多道防堵黄河泛滥的河堰，河堰上下柳林密布，捻军主力就埋伏在高楼寨以北的村庄，河堰和柳林中。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率军追至菏泽之西、高楼寨之南的解元集地区。捻军派山少数部队迎战，且战且走，诱使僧军步步向高楼寨地区深入。18日中午，僧军进至高楼寨，顿时号角齐鸣，声雳原野，埋伏在那里的捻军将士们奋勇出击，挺矛持刀，袒臂鏖战。僧格林沁分兵三路：翼长诺林丕勒、副都统托伦布等率左翼马队，总兵陈国瑞、何建鳌各领本部步队，是为西路；副都统成保、乌尔图那逊等领右翼马队，总兵郭宝昌率本部步队，是为东路；副都统常星阿、温德勒克西等各领马队，是为中路。捻军亦分三路迎战。西路鏖战二小时左右，捻军稍却。适中路捻军将常星阿部清军击溃，立即支援西路捻军向敌人发起反击，将西路清军歼灭。与此同时，东路捻军亦将敌军击溃。在后督队的僧格林沁只得率残部退入高楼寨南面的一个荒圩。捻军乘胜追击，立将该圩团团围住，并在圩外挖掘长壕，防止敌人突围。当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冲出，当落荒逃至菏泽西北十五里的吴家店时，被一青年捻军战士砍死在麦田中。

高楼寨之战，捻军全歼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使清军的精锐骑兵损失殆尽。副都统成保奏称：“我军失利后，马步兵勇收集无多”。曾国藩也说：两年来僧军屡挫，捻军“夺官马至五千余匹之多，自此不可复制”。薛福成在《科尔沁忠亲王死事略》中称：“陈国瑞所部步队四千覆溃几尽，国瑞仅以身免，……总兵何建鳌、内阁学士全顺，皆死于阵。”这次作战，是捻军在抗清斗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也是运用运动战取胜的一个典型的战例。捻军发挥快速流动作战的特长，牵着僧

军盘旋打圈，使其精疲力竭，同时伺机反击，消耗敌之兵力，挫伤其士气，最后在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对捻军有利的地区，一举全歼穷追之敌。僧军方面，由于僧格林沁盲目轻敌，一味穷追，后方供给不继，部队饥疲交加，士气日益低落，加上得不到豫、鲁清军的有效配合，遂为捻军提供了打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二、粉碎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

（一）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

僧格林沁军覆灭后，清廷深恐捻军渡过黄河，北攻直隶，威胁京畿，从1865年5月下旬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新的部署：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携带钦差大臣关防，统领所部各军，前赴山东，于北面驻扎“督剿”，继又令其督办山东、河南、直隶三省军务，所有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归节制；命直隶总督刘长佑驻军大名一带，扼守黄河天险；催调提督刘铭传所部淮军迅速北上，“力固畿南门户”；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领经英国人训练的天津洋枪队，进驻景州（今河北景县），堵截捻军；命署两江总督李鸿章于所部各军内拨派精锐若干，由上海乘轮船前往天津，增援直隶，命醇郡王奕环统领京城旗绿各营，“密筹布置”，守卫北京。

曾国藩在接到清廷的命令后，一方面故作姿态，力辞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之命，并以种种理由拒绝迅速北上，以免仓促上阵，重蹈僧格林沁全军被歼的覆辙；另方面积极进行作战准备，并向清廷提出了新的攻捻方略。他认为捻军骑多步少，行动迅速，“飘忽靡常”，因而主张重点设防，“以静制动”，即所谓“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后来他又一再重申采取这种攻捻方略的必要性，声称“细观贼情，已成流寇行径，若贼流而官兵与之俱流，则节节尾追，著著落后。……虽终岁奔波，终无大损于贼”。强调要在捻军“必经之途，驻扎重兵”，“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据此，曾国藩提出如下具体方案：由他坐镇徐州，负责捻军经常出没的四省十三府州（即安徽庐州、凤阳、颍州、泗州，河南归德，陈州，山东兖州、沂州、曹州、济宁，江苏淮安、徐州、海州）的攻剿事宜，四省的其它地区则由各省巡抚负责。四省分别以临淮、周家口、济宁、徐州为“老营”，驻扎重兵，多储粮草弹药，以为重镇。他认为这样一来，就可做到“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军之粮药，即取给于受援之地，庶几往来神速，呼吸相通”，“四省有首尾相应之象，而诸军无疲于奔命之虞”。

曾国藩煞费苦心制定的攻捻方略，其用心非常狠毒，但是，这一方略并不能解决地广兵少的矛盾。且不说捻军可以避开这十三府州的重点设防区，即使在上述重点设防区内，捻军依然可以在乡村纵横驰骋，摧毁地主民团的圩寨，并伺机伏击由城市出援的清军。此外，清军重兵集中于主要城市，广大地区的兵力就相对薄弱了，加上奉调北上的湘军、淮军与各省防军之间矛盾重重，使捻军仍有继续流动作战的条件。

1865年6月18日，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而被封为“一等毅勇侯”的曾国藩，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离开金陵，沿运河北上，踏上了镇压捻军的反革命征途。

（二）捻军继续流动作战

高楼寨之战后，山东清军兵力空虚，仅有丁宝帧所部三千人扼守济宁，“能守而不能战”，而捻军新胜，士气大振，兵强马壮，“纵横自便”。如果捻军此时不失时机地挥军北上，不但济南指日可下，而且可以更加沉重地打击清军，开创新的局面。但是，当时由于捻军首领们对尔后的进军方向“争言不决”，有的主张“先陷济南”，有的主张“北趋直隶”，有的主张“渡黄由豫入陕”，以致在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数万部队徘徊于黄河以南、运河以西的菏泽、曹县、城武、定陶、郓城、巨野、濮州、范县、金乡、济宁地区，虽然队伍有所发展壮大，但较长时间无所作为，失去了乘胜进攻的良好时机。及至得悉“京师有备”，自知难以渡河北上，赖文光等才于6月1日率部自汶上袁家口等处渡过运河东进。由于此时济宁，济南等地清军防守已经加强，捻军随即回到运河以西的嘉祥。这时，张宗禹已率部南下安徽，赖文光，任化邦等便接踵南下，谋与张宗禹等会合，恢复蒙亳一带的捻军基地。

张宗禹、赖文光等部捻军先后返回蒙亳地区后。即向当地清军发起进攻，相继占领了一些乐镇和圩寨。6月18日，捻军攻占高炉集，切断驻涡阳（即雉河筑）的安徽布政使英翰所部的粮道。6月21日，捻军三四万人乘胜进围涡阳城。这时，奉调开往徐州的总兵易开俊部清军三千人已行抵蒙城，曾国藩也于6月30日到达江苏清江浦。英翰接连消援于曾国藩，曾即命提督黄翼升率所部水师由高良涧（今江苏洪泽县）入洪泽湖，沿淮河西上，命总兵周盛波等部由徐州赴宿州以援蒙亳，命提督刘铭传部自济宁驰回徐州“以拯皖北之危”，自率部分湘军进驻临淮关。接着，漕运总督吴棠命总兵姚广武率部由濉溪口、临涣集出发，河南巡抚吴昌寿命总兵张曜、宋庆两部豫军由商丘出发，安徽巡抚乔松年命总兵张得胜、副都统克蒙额等部皖军由颍上、太和出发，驰援被困于涡阳的皖军，对捻军形成包围态势。捻军久攻涡阳不下，粮药将尽，在各路清军步步逼近的情况下，不得不于7月25日撤围，西走河南。

捻军分南北两路深入豫境：北路由张宗禹等率领，经商丘、柘城、太康，扶沟、鄢陵、许州、襄城、郏县、宝丰、鲁山，南走南阳府，南路由赖文光等率领，经沈丘、淮宁、周家口、西华、临颍、郾城，复折往东南，趋西平、上蔡等地。

曾国藩在捻军分两路进入河南后，仍坚持其专办十三府州攻剿事宜的方针，他认为张宗禹一路已进入豫西，“万难追及”，而赖文光一路进入陈州，属于十三府州，便派刘铭传等部跟踪追击。9月23日，曾国藩自临淮移营徐州。其时，赖文光一路捻军已由河南新蔡进入安徽阜阳县西部的瓦店集、迎仙集一带，刘铭传等部淮军以及豫军、皖军等正从周家口、徐州、颍州、固始等地压来，妄图多面夹击，一举消灭捻军。10月1日，凹张寨一战，捻军失利，赖文光及时率军撤出，由周家口北趋西华、太康、睢州，从考城入山东，活动于曹县、定陶、郓城，菏泽等地。

曾国藩唯恐捻军进入山东半岛富蔗地区，便一面命驻防济宁的潘鼎新部淮军扼守运河，一面命总兵张树珊的步队，副都统色尔固善的马队以及徐州的清军北上山东，跟踪捻军；并从苏南调总兵杨鼎勋、郭松林等部进驻宿迁、徐州，以为后援；还命刘铭传、周盛波两部淮军分别进

驻周家口、归德，防备捻军南下。清廷对曾国藩在山东围堵赖文光部的部署虽感满意，但对进入豫西的张宗禹部却忧心忡忡，认为该路捻军“不西趋秦境，必北扰晋疆”，而曾国藩所率清军多在东路，实有鞭长莫及之势。为此，拟命李鸿章率总兵杨鼎勋等部驰赴河洛一带，进剿张宗禹部，兼顾山西、陕西门户。接着，又令正在赣南镇压太平军余部的鲍超所部湘军赶赴豫南。曾国藩深知，如果李鸿章督师豫西，必然从东路将淮军调走，使他失去依恃，于是上奏清廷，建议暂勿令李鸿章赴河洛。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就在反动派频繁调兵之际，赖文光等已率捻军由山东进入江苏丰县、沛县、砀山、徐州一带，取得粮食和兵员补充后，又西进河南，于11月底与从鲁山、宝丰东进的张宗禹所率捻军会师于扶沟，随即西趋襄城、叶县、舞阳一带。

（三）曾国藩“以静制动”方略的彻底失败

捻军不断深入河南流动作战，而湘、淮军一般只守据点，不积极攻剿，使新任河南巡抚吴昌寿兵饷两绌，一筹莫展。他在给清廷的奏报中，一方面诉说“豫省军务种种棘手，势处万难”，另方面对曾国藩名为督办三省军务，实仅株守十三府州之地，表示不满。12月14日，清廷谕令曾国藩。统筹全局，前往应援”，并告诫他“未可株守一隅，致误事机”。与此同时，曾国藩也因捻军主力全部进入河南，不得不对其攻捻方略进行一些改变，表示“不复拘泥十三府州之说”。他一面坚持仍在济宁、徐州，临淮、周家口四处驻扎重兵，以备“迎头截击”，一面令李昭庆部淮军万余人奔赴河南，与原驻周家口的刘铭传部淮军万余人“同作两支游兵，仿照僧格林沁之法”，与捻军“纵横追逐，使之不得休息”。曾国藩还准备将其大营由徐州移往周家口。

在曾国藩尚未变更部署以前，捻军即已分路疾驰南下：赖文光等率部自临颍、郾城走西平、遂平、确山、正阳、罗山、光州；张宗禹等率部自襄城、叶县走裕州（今方城）、唐县（今唐河）、邓州。1866年1月，捻军各部先后进入湖北，赖文光一路在麻城、黄州（今黄冈）一带活动，张宗禹一路在襄阳、枣阳一带活动。1月18日，赖文光，任化邦郎乘清军提督成大吉部哗变之机，发起进攻，成大吉仅率少数清兵从麻城逃往滠口。捻军遂占黄陂筹地，威胁武汉。2月18日，捻军又于黄陂东南的街埠一带大败清军，毙总兵梁汉胜等多人。

捻军在鄂东连打两次胜仗，湖广总督宫文急忙消求援兵。曾国藩命总兵喻俊明等率水师驰赴武汉，令刘铭传率所部淮军由周家口驰赴湖北黄州，令浙江提督鲍超率所部湘军进驻豫、鄂交界地区，听候调遣。当援鄂清军刚到湖北，捻军又甩掉敌人北上，经河南进入山东。4月11日，张宗禹郎在安兴寨（今菏泽东北）击败总兵杨飞熊部八营清军，13日，又在龙堌集（今巨野西南）大败总兵王心安部八营清军，20日，在郓城西北的柳条圈又败潘鼎新所部淮军。26日，赖文光部也到达郓城境内，两支捻军重又汇合。

4月29日至5月7日，捻军三次抢渡黄河，运河均未成功，遂又分兵两支南下：张宗禹等率部走河南虞城、宁陵，归德等地；赖文光等率部南进江苏丰县、砀山，邳州、宿迁等地。6月15日，两支捻军在徐州汇合，旋又分开。张宗禹部由丰县、砀山走河南虞城，宁陵、睢州、杞

县，又南下太康、陈州，从周家口渡过沙河，由郾城西进：赖文光部走安徽宿州、怀远，渡过涡河趋凤台、太和，然后入河南境内。捻军一直在曾国藩所圈定的重点防区内往返穿插，流动游击，使其“以静制动”的方略彻底失败。

（四）曾国藩“聚兵防河”计划的完全破产

“以静制动”的方略破产后，曾国藩于1866年夏又提出了“聚兵队河”的方略，企图以此遏阻捻军的流动，经与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面商，确定了运河、黄河的设防部署：在运河防线上，从济宁长沟到山东、江苏之交的韩庄，由潘鼎新部防守，韩庄以下山场鼎勋部驻防；长沟以上至黄河由山东军防守。在黄河防线上，范县豆腐店以西至东明、长垣由直隶军防守，豆腐店以东的张秋、东阿一带由山东军防守。捻军渡过沙河进入豫西南后，曾国藩又设沙河、贾鲁河防线。沙河地段：从周家口到槐店（今沈丘）由刘铭传部防守，槐店到正阳关申乔松年部皖军防守，正阳关以下系淮河，曾国藩派水师和皖军防守。贾鲁河地段：从周家口到朱仙镇由潘鼎新、张树珊部防守；从朱仙镇北四十里到开封，又北三十里到黄河南岸，没有河流，由李鹤年的豫军构筑堤墙防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跨鲁、豫、皖三省的三角形防线。此外，为了攻守结合，又命鲍超、刘秉璋、杨鼎勋、刘松山、张诗日所部为“游击之师”，跟踪追击捻军。

曾国藩“聚兵防河”的主要目的，先则企图阻止捻军进入山东、江苏，在捻军渡过沙河以后，则企图将其局限于豫西南的多山地区，使之不能发挥骑兵的优势，然后集中兵力聚而歼之。显然，这种设防漏洞仍然很多。首先，由于清军内部存在着派系矛盾，曾国藩难于做到统一指挥，特别是经常受到淮军头目李鸿章的掣肘。其次，曾国藩的“防河”战线太长，势必造成兵力分散，处处防守薄弱。此外，还有不少人对曾国藩的防捻计划持反对意见，认为“宜于速剿，不必为防河之谋”。

就在曾国藩紧张地部署河防时，捻军发觉了清军的诡计。9月中旬，赖、张两支捻军在河南禹州、许州一带会师，侦知朱仙镇以北堤墙尚未筑成，随即经尉氏、中牟北上，决定跳出河防圈。9月24日，捻军先示形于开封以北的黑埋，佯作抢渡黄河的态势，然后急速南下进至开封南的芦花冈，乘皮击溃豫军，再次突入山东境内。

沙河、贾鲁河防线被捻军突破后，曾国藩自称“闻信之余，实深焦愤”，不得不承认防线太长，兵力不足，称“防守沙河、贾鲁河，本系策之至拙者”，但又声称“无奈马队远不如贼，……专恃步队追剿，断不能制流寇，不得已乃出于防河之下策”。不管曾国藩如何巧于言词，事实是由他主持攻剿捻军一年零五个月，“毫无成效”。为此，清廷决定换马，12月7日，改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各军，专办剿捻军务。曾国藩则回任两江总督。

三、东捻军转战湖北

（一）捻军分为东西两支

捻军冲破沙河、贾鲁河防线，进入山东菏泽、曹县、巨野、金乡一带地区后，于10月上旬抢渡运河未成。这时，淮军潘鼎新部已进抵济

宁，刘铭传部进入城武、巨野，刘秉璋、刘松山、张树珊等部也先后到达山东，进入运河防区，对捻军实施包围，捻军随即回军西向，于10月13日进入豫东地区。

两年以来，捻军纵横驰骋于苏、鲁、豫、皖、鄂数省，取得了歼灭僧格林沁和粉碎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攻捻方略等一系列胜利。但是，由于长期不停顿地流动作战，没有一个可以立脚的基地，部队得不到休整，粮食、弹药的补充十分困难，同时又得不到任何友军的支援，战略上的被动态势日益明显。捻军领袖赖文光等深感“独立难支，孤军难立”，试图改变这一不利态势，遂决定将捻军一分为二，由张宗禹、张禹爵、邱远才等率部分捻军西进陕甘，联络那里的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之势”，是为西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部分捻军留在中原地区，与敌周旋，是为东捻军。

（二）东捻军转至湖北与李鸿章的攻捻方略

1866年10月下旬，东捻军三万余人在赖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领下，由河南中牟返回山东，拟攻破运河防线，进入较为富庶的运河东部地区，以扩充兵员和筹集粮垧，后因在郓城东北的袁家口、开河、安山等处几次抢渡均未成功，而淮军刘铭传、潘鼎新等部又已跟踪返回山东，为避免遭敌围攻，便南下江苏丰县、沛县等地。不久，复入山东，再次进攻运河防线，又没有成功。其后，赖文光、任化邦等遂放弃进入运河东部地区的计划，决定向湖北转移，拟渡过汉水，进占荆州、宜昌，然后主力入川，并留一支部队于湖北以为声援，以一支部队入陕西与西捻军取得联络。“倘各路皆不得手，……则共档案中”，联合回民起义军，在陕西建立基地。这一计划，得到东捻军广大将士的拥护。1866年12月初，东捻军由山东进入河南，下旬进入湖北。

清军方面，李鸿章鉴于曾国藩所确定扼守的“贾鲁河、沙河地段太长，人力难齐，终办不成”的教训，提出了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齐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的“扼地兜剿”方略，并准备采用“离间”、“招抚”等伎俩，妄图从内郎瓦解捻军。

1867年1月，李鸿章调集共部不下十万部队，分“堵击之师”和“兜击之师”，在河南、湖北集中。共部署是：在北部，命李昭庆部二十余营驻河南信阳，扼捻军北上的通道；在西部，命鲍超三十二营由南阳移驻襄阳，豫军总兵宋庆十营、副将蒋东才六营扼守枣阳，荆州将军巴扬阿统领提督蓝斯明、水师总兵左光培扼守汉水沿线；在东部，命新任安徽巡抚英翰、总兵张得胜等率皖军分扎六安、霍山一带；在南部，由湖广总督官文驻守武昌，彭玉麟统领水师驻守黄州。上述各部清军均为“堵击之师”。李鸿章又命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张树珊等部淮军共三十余营，由豫东南分道入鄂，和新任湖北巡抚曾国荃统领的郭松林、彭毓橘、伍维寿、熊登武等部湘军共三十余营，组成“兜击之师”。李鸿章等妄图一举治灭捻军于鄂东地区。

（三）罗家集、杨家河两败敌军主力

东捻军进入鄂东北不久，即由麻城南下黄陂，接着进至滠口，威胁武昌。随后，折而向西，连克云梦、应城，进攻德安府（今安陆），旋又经宋河镇入京山，南占天门县。提督郭松林率领九营湘军尾追而来，捻军采取兜圈子的战术疲惫敌军。郭松林不顾士卒疲劳，紧迫不舍。

1867年1月11日，郭松林分兵三路向钟祥东面的罗家集进攻，捻军的步马队早已设伏以待。待敌发起攻击时，捻军首领任化邦率部正面接战，李允统领马队从两侧包抄，赖文光率部袭敌后路，将清军四面包围。激战半日，歼灭清军二千余人。郭松林身中七枪，被捻军生擒，因伤重不能行走，被弃掷路旁，幸免于死。

罗家集胜利后，东捻军在钟祥与旧口之间结筏抢渡汉水未遂，便东走应城、云梦。淮军周盛波、张树珊等部在后尾追，捻军仍采用打圈战术，伺机歼敌。1月26日，捻军在德安府杨家河东岸屯扎，淮军总兵张树珊所部六营孤军追来，渡河进击。捻军佯装败退，张树珊恃勇轻进，被捻军分割包围。激战至深夜，捻军阵斩张树珊及副将刘登朝、郭有容等数百人，使李鸿章的淮军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

（四）尹漋河先胜后败

东捻军两败敌军之后，士气高昂，声威大振。为了实现西进川陕的战略目标，先后在旧口、丰乐河、流水沟及王家集、霸王山等处抢渡汉水，但均为清军所阻，被迫回到旧口地区。

就在东捻军抢渡汉水的半个月中，清军各部已分别向旧口方向集中，准备围歼东捻军于旧口地区。其部署是：湘军彭毓橘、谭仁芳、熊登武、刘维桢等部驻九里冈、永兴、皂市、天门一带，屏蔽东路，豫军蒋东才等部驻茅茨畈，扼守北路；淮军刘秉璋、周盛波等部扼守京山，李昭庆部由信阳移驻宋河镇；以淮军主力刘铭传部万余人由北而南，湘军主力鲍超部二万六千余人自西向东，夹击捻军。赖文光等见清军米势迅猛，便率军逗守尹漋河（今永隆河）一带，准备与清军决战。

2月19日拂晓，刘铭传为了争功，自行改变与鲍超军共同进攻的计划，提前由下洋港向尹渡河抢先发动进攻。他见捻军扎营于司马河（今天门河）对岸，便留二三营兵力护卫后路辎重，以十七营兵力渡河攻击。捻军以步队正面阻击敌军，以千余马队向北绕袭敌军后路。刘铭传恐后路兵单，辎重难保，便抽出步队三营、马队二营加强后路，自率十二营兵力分三路进攻。捻军亦分三路迎击：任化邦敌左路，牛喜敌右路，赖文光、李允敌中路。任化邦率部全力围攻刘盛藻的左路军，“刘盛藻鏖战多时，渐不能支”。刘铭传恐左路有失，忙从中路抽出黄桂兰、张士元、李锡增三营兵力往援。在捻军的锐利攻势下，刘盛藻部过河溃逃，李锡增则中枪丧命。接着，任化邦率部转援牛喜部，将右路淮军一举消灭，击毙总兵唐殿魁、记名总兵田履安、副将吴维章等。捻军左右两路取胜后，任化邦、牛喜便率部与赖文光、李允部一起围攻刘铭传亲自督率的中路军。捻军将士挥刀斩杀，淮军一败涂地，退至司马河彼岸。刘铭传失魂落魄，与其部将、幕僚“俱脱冠服坐地待死”。

可是，正当捻军追过司马河，即将歼灭刘铭传所部淮军时，鲍超率所部湘军从旧口由西向东侧击杨家泽捻军侧背。杨家泽与尹漋河同在司马河东岸，相隔十余里。赖文光在鲍军进入杨家泽后，没有仔细侦察敌情，便仓促率领中军步队向的军冲锋。但鲍军阵势严整，左、中、右三路，每路八九营兵力，分主攻和策应，稳扎稳打，步步前进。激战两小时，捻军中军步队受挫，虽有马队驰前接应，但后路又为的军马队截断，于是军心动摇，阵势大乱，由胜转败。又因连日下雨，河港水深，道路泥泞，捻军慌不择路，阵亡和溺死者近万人。杨家泽、尹漋河等处

数百村庄据点，全被鲍军占领。

尹潍河之战，虽然歼灭了刘铭传所部淮军半数以上，但东捻军自己也遭到惨重损失，伤亡万余人，被俘近万人，损失马匹数千和辎重无数，不但元气大伤，而且使西进的计划受挫。尹潍河之战最后遭到失败，首先是由于东捻军在取得罗家集、杨家河两次胜利后，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对于在武器装备上占很大优势的敌军没有予以足够重视，以致在与刘铭传部作战时，竟没有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对近在旧口的鲍超部进行警戒，特别是当鲍部来袭时，赖文光等不作周密部署，仓促反击，结果受挫。其次，捻军在作战不利的情况下，缺乏坚韧顽强的意志，稍遇挫折，就撤离战场。此外，尹潍河一带河汊纵横，使捻军骑兵的活动受到限制。鲍超说：这次“擒斩溺毙之多，则由彼之先失地利耳”。

（五）被迫放弃入川计划

东捻军在尹潍河战败后，余部即北上河南，从唐县、桐柏东走信阳、罗山、光山，然后经湖北麻城，黄冈、蕲水、蕲州、广济，进入安徽西南边境，因遇淮军刘秉璋、周盛波部阻击，又折回湖北蕲州一带。这时，湘军彭毓橘部驻扎于蕲水。3月23日，东捻军由兰溪、董家河一带沿浠水河北上时，彭毓橘亲率湘军十三营由六神港至溪潭坳堵截，捻军将其击败，阵毙总兵彭光友，并乘胜包围六神港，取得了击毙彭毓橘以下营哨各宫三十余名和歼敌三千余人的胜利。

之后，东捻军又西经孝感、应城、京山等地抵达汉水东岸，在旧口至岳口一带筹船结筏，希图西渡汉水，为清军炮船所阻，未获成功。后经钟祥北上枣阳、随州（今随县），5月初进入河南桐柏、信阳境，因遭淮军周盛波、刘铭传部截击，由平靖关折回湖北应山，旋又东走黄安。5月14日，捻军在黄安的王家冈设伏，大败刚从河南光州赶到麻城的淮军杨鼎勋部，杀总兵张遵道。接着，捻军再次进至汉水东岸，由于刘铭传和鲍超部相继追来，不得不放弃西渡仅水进入四川的计划，经枣阳北上，拟从河南西进入陕，与西捻军会合。

四、东捻军在山东被围及其最后失败

（一）进军山东半岛

1867年5月下旬，东捻军进入河南新野、邓州、镇平、内乡一带，还来不及休整补充，淮军刘铭传等部就从枣阳、襄阳跟踪追来，豫军宋庆部和淮军周盛波等部也分别由南阳、唐县前来堵截。而当时捻军内部对于行动方向问题意见不一。赖文光、任化邦等本主张进军西北，但从山东郓城、梁山地区参军的将士认为山东连年丰收，粮食充裕，而陕西连年战乱，粮食缺乏，极力主张东进山东。赖文光、任化邦等为了尽快摆脱敌人的包围，同时，“恐西路山多，难于翻越”，也就改变主意，采纳了东进山东半岛的意见。

6月上旬，东捻军由考城进入山东曹县，疾趋郓城，甩掉尾追之敌，于6月12日晚直逼运河，以一部强攻沈口，吸引附近各段守河清军驰援；以另一部袭击由山东军防守的此较薄弱的戴家庙一带防线，于坎日黎明突破。当时天旱水浅，捻军全部三四万人涉水过河，进入运河东部地区。

东捻军进入山东腹地后，日行百余里，忽尔忽西。新任山东巡抚丁宝桢虽僭军尾迫，只能望尘兴叹。6月19日，东捻华东走章丘，后经邹平、寿光等地进入胶东半岛，6月底兵锋直指烟台。道员潘霨勾结英法侵略者联合防守烟台，通商大臣崇厚则从天津派出洋枪队渡海增援。

胶东半岛虽然比较富庶，但捻军进入这三面濒海的地区，易被清军包围，而东捻军首领们虑不及此，最终招致失败。

（二）李鸿章坚持“扼地兜剿”方针

东捻军突入山东后，清廷令李鸿章从河荫移营山东，“择要驻扎，居中调度”。李鸿章根据刘铭传、潘鼎新等将捻军。挤入登（州）、莱（州）海隅，趁势围逼”的建议，立即奏称：“断不敢谓蹙贼海隅之议遂有把握，但与其任令长驱各省，流毒无穷，似不若诱令盘旋偏隅，得办且办”。6月20日，李鸿章抵达济宁，随即以刘铭传部由济宁、泰安、莱芜径趋青州（今益都）为中路，以潘鼎新部由潍县（今潍坊市）、昌邑赴莱州（今掖县）为北路，以总兵董凤高、沈宏富马步十五营由郯城，兰山进莒州为南路，“三路兜截而前，欲逼（捻军）入登、莱绝地，会合（山）东军相机扼堵”，“扼之于胶莱河一带，使其不能复出”。不久，李鸿章又声称：“欲灭此贼，计惟有觅地兜围之一法”，“与其驰逐终年”，“不如弃一隅以诱之”，“与其往复运东”，“不如专弃登、莱以扼之”。他决定“先固守局而后进兵”。其具体部署是：以运河为外圈，胶莱河为内圈，进行布防。决定调皖、豫，鄂、苏和直隶的清军，分段防守运河，在西岸修筑长墙，并以邮分兵力就东岸旧墙修缮炮台，“犄角护守”。鉴于胶莱河是扼捻军西突的咽喉，决定配以重兵，以一营守三里，在近三百里的地段上，共部署兵力近百营，由淮军主力刘铭传、潘鼎新、董凤高、沈宏富、王永胜等部及豫军宋庆等部和丁宝桢的山东军划段防守，并筑长墙壕沟于河西。同时，以黄河为北部防线，由崇厚和刘长佑负责防守;以江苏北部的六塘河为南部防线，由漕运总督张之万和由浙江北援的部队共同防守。此外，另派部队跟踪追剿。

（三）东捻军突破胶莱河防线

1867年7月中旬，东捻军正在福山、宁海（今牟平县）一带就粮，得知清军在胶莱河西岸修墙筑垒，分段扼守，才急忙回军西向。7月31日，赖文光、任化邦率军自即墨向胶莱河南部的麻湾口发起攻击，但未能突破，只得转兵北上。8月6日，又向淮军潘鼎新部驻防地段的新河突击，仍未成功。后侦知胶莱河北段入海处沙滩无兵驻守，而潍河北段自下营至海口一段只有已革山东军总兵王心安部二千余人驻防，且“营垒初成，河墙未筑”，便于8月19日集中兵力从这一地段的海神庙等处发动进攻，歼灭了王心安所部清军，进入潍县、昌乐，然后由安丘、临朐疾驰南走。李鸿章费尽心机策划的“扼守胶莱之策”，成为画饼。清廷大为震惊，将李鸿章、潘鼎新交部议处，丁宝桢革职留任。

胶莱河防线被捻军突破后，李鸿章将防守胶莱河的各部清军调至运河防线，并将大哲由济南（8月下旬由济宁抵济南）移至台庄（今台儿庄），居中调度。当时，多数清军将领对防守运河丧失信心，特别是丁宝桢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今胶防隳守，运河之防非独无补于事，抑恐有碍大局”。曾国藩也悲观地说：“胶莱三百余里尚难堵御，沿运千有余里更觉毫无把握。”清廷则明确指出“河防不可恃”。李鸿章面临朝野的谴责和攻讦，仍然认为扼守运河虽没有十分把握，但舍此别无良策。他在9月19日的奏折中说：捻军“正急欲出运”，“若先撤运防，是示贼以弱也。守运各军早夜修防，尚无疲倦，较穷年追逐者劳逸饥饱略殊。忽令守，又忽令不守，是使军心惶惑也。”“今使罢运防而另有制贼之法，臣必速罢，若更无可制贼，似不若得守且守，能战即战，尽人力以待事机。”李鸿章继续加固河防，后来还组织了三支各拥有万人以上的“游击之师”，紧追捻军。

（四）东捻军的最后失败

东捻军虽然突破了胶莱河防线，但仍局处于运河与胶莱河之间，由于地域狭小，无从发挥流动作战的长处，粮食也日益缺乏。赖文光、任化邦等为摆脱遭十余万清军拦阻追击的不利局面，决心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但缺乏明确的方向，行动慌乱。先是由莒州、日照南下江苏赣榆、沭阳等地，企图抢渡运河和六塘河。由于清兵防守严密，进军受挫，遂于10月初复入山东，并派人由间道入陕，向西捻军求援。11月初，东捻军突至章丘，准备北渡战河，又被清军水师所阻。在寒冷缺粮的情况下，东捻军只得东走乐安（今广饶）、寿光、潍县就粮，刘铭传部淮军尾随其后。11月12日，东捻军在潍县松树山仓促应战，结果大败，损失惨重。赖文光、任化邦等只得率军南下江苏，拟再次抢渡运河和六塘河。11月19日，当刘铭传部尾追至赣榆时，捻军再坎进行反击。由于淮军绕袭后路，捻军复大败。鲁王任化邦被叛徒潘贵升枪杀，使东捻军元气大伤。任化邦是捻军重要首领之一，英勇善战，尤其擅长指挥骑兵作战，他与赖文光一起，勇谋结合，带领捻军屡败湘淮军，为敌人所畏惧。他的牺牲，是东捻军的重大损失。

赖文光在任化邦牺牲后，率部折回山东，继续战斗，企图突破清军的围困，但因连遭失利，力量大减，加上饥寒交迫，人困马乏，士气日益低落。12月，当赖文光率军北上，徘徊于寿光、昌邑、潍县避敌就粮时，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部又相继追来，东捻军屡战屡败。12月

24日，东捻军在寿光的北洋河与弥河之间的滨海地带与清军背水决战，结果惨败，伤亡近二万人，被俘近万人，精锐丧失殆尽，首王范汝增等壮烈牺牲。之后，赖文光率余部四五千人由昌乐南下诸城，日照，走江苏赣榛、宿迁。12月31门，在抢渡运河失败后，即转兵东向，前队于次日皮由沭阳城南张家湾突破了六塘河防线，进入清江浦境内，但后队未及渡河即被清军歼灭。渡过六塘河的捻军由于不断遭到清军堵击，减员愈来愈多。1868年1月5日，余部千余人在扬州东北的瓦窑铺被道员吴毓兰部淮军击败，赖文光不幸被俘。至此，东捻军最后失败。赖文光在太平天国失败后，领导捻军继续坚持反清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被俘后，他严词拒绝敌人的劝降，英勇不屈，就义于扬州城外，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气节，不愧为农民革命军的一个杰出领袖。

五、西捻军转战陕西

（一）灞桥大捷

1866年10月捻军分为东、西两军后，西捻军约有三万余人（一说五六万人），以“前进甘陕，连结回众”，建立新基地为目标，在张宗禹、邱远才、张禹爵等率领下，由豫东经许州、洛阳，陕州（今三门峡市西）、阌乡（今灵宝西北），于11月9日进入陕西华阴县境。

自1862年西北太平军和滇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后，有力地支援了当地回族人民的大起义。之后，由于西北太平军援救天京离陕，而清廷又抽调多隆阿、刘蓉等部入陕，回民起义军遂遭到镇压，余部退入甘肃，与当地回民起义军一起坚持反清战争。西捻军的入陕，大大鼓舞了陕甘回民起义军，他们纷纷在甘肃的宁州（今宁县）、泾州（今泾川）等东部地区袭击清军，配合西捻军在陕西的作战。这时，署理陕西巡抚刘蓉正率一万四千余名湘军在陕甘交界处堵击回民起义军。当他得悉捻军入陕后，感到形势严重，忙向清廷告急说：“西回东捻，两路同窜，欲防则无迎击之旅，欲剿则无守隘之兵”，请求速派援兵。

清廷在西捻军入陕前，已改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乔松年为陕西巡抚，西捻军入陕后，又命鲍超率所部湘军人关追击。可是，左宗棠借口筹备粮饷，停兵湖北，踌躇不前；鲍超则通过曾国藩转奏清廷，沥陈入陕有“米粮之难办”、“饷银之难解”等等困难，要求“俟马队练成，陕省米粮转运等事布置周妥，再行入关”。鲍超所部湘军虽然战斗力较强，但抢掠成性，西北地瘠民贫，自然难于满足其掳掠的欲望。清延只得改令提督刘松山部湘军替代。清军援兵不能很快入陕，为西捻军的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西捻军进人陕西华阴后，立即西进华州（今华县）、渭南。刘蓉不得将清军东调，对付捻军。11月14日，提督刘厚基率兵三千余人由渭南东进，在赤水镇与捻军遭遇，一触即溃，败退渭南。25日，知府唐炯指挥湘军各营，分兵三路再次发动进攻。捻军设伏于华州敷水东面的树林里，又大败湘军，斩杀七八百人。

西捻军初战获胜后，便于12月中旬乘胜西进，14日前锋进抵西安东面的灞桥镇。清军回顾省城，捻军却又折向东南，接连占领蓝田县属的泄湖、蓝桥等地。为了调动西安清军，后又佯趋商州（今商县）、雒南

（今洛南）。清军果然东向追击，西捻军遂又北走渭南，并处造东攻潼关的声势。当湘军北上堵截时，捻军又迅速西进，摆出攻打西安的架势，并在灞桥十里坡左右村庄设下伏兵，布好口袋，等待敌军的到来。

1867年1月23日，当疲惫不堪的湘军追至临潼东北的新丰镇时，捻军派少数部队与敌接触，且战且退，把敌军诱至十里坡。待记名提督杨得胜、总兵萧德扬、提督刘厚基、道员黄鼎等部敌军相继闯进伏击圈后，捻军诱敌部队立即回马反击，埋伏在十里坡左右的马队同时出击，左右包抄，将湘军四面包围。时值风雪交加，湘军士卒冻饿，无心作战，枪炮又被雨雪沾湿，影响点放。捻军勇猛冲杀，展开白刃格斗，不到半天时间，阵斩总兵萧德扬，提督杨得胜、萧集山、萧长清、布政使街候补道萧德纲等湘军将领，歼灭敌军三千余人，收降数千人，取得了入陕以来的一次大胜仗。这是捻军运用流动战术，先诱敌眼追，拖垮敌人，然后设下埋伏，出敌不意地围歼敌人的又一成功战例。

（二）捻军、回军联合作战

灞桥之战后，清廷将刘蓉“革职回籍”，命新任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并催促总兵刘松山部湘军和郭宝昌部皖军兼程入陕。当时，西捻军已乘胜进入西安东门外的三府洼、西门外的火神庙、南门外的小雁塔、北门外的红庙，包围了陕西省城。与此同时，甘肃东部的陕甘回民起义军亦东进陕西，与西捻军声势联络。巡抚乔松年依托西安高厚的城墙固守待援。2月初，湘军刘松山，李祥和部及淮军张锡嵘等部到达西安郊外。2月10日，西捻军向敌发起进攻，激战数小时，阵斩张锡嵘，但最后为刘松山部湘军所败，退守秦渡镇、花园铺、梁家桥一带据点。西捻军围攻西安月余，未能攻克，打援又遭失利，遂撤离西安，沿渭河南岸西走，3月24日在郿县以西渡过渭河，进入扶风、岐山交界处的益店，与由凤翔东来的回民军取得联系。

西捻军和回民军共同拟定了作战计划：捻军东攻同州（今大荔）、朝邑，回民军进攻西安。但正当捻、回军准备分路东进之际，总兵郭宝昌部皖军已从三原向咸阳西进，刘松山等部亦已渡过渭河，向捻军、回军逼近。4月19日，临平镇（今乾县西南）一战，捻、回军失利，被迫改变原定作战计划，一同经三原、富平向蒲城、同州前进。5月初，两军扎营于同州北的许庄一带，横亘二十余里。刘松山率部赶来，捻、回两军将其包围，杀死副将胡理明等多人，毙伤清兵甚众。5月下旬，捻、回军又挥师西进，从兴平南渡渭河，再次进攻西安。清军紧闭城门，固守待援。5月27日，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援兵赶到，捻军在西安城南的山门口、木塔寨等处作战失利，损失较大。张宗禹遂率军东走蓝田，继又转战于临潼、渭南、华州一带。

西捻军与回民军取得联系后，由于有着共同的反清目标，因此能够互相配合作战，对于清王朝在陕西的统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尤其是民族、宗教信仰等不同，在政治上未能建立起巩固的联盟，在军事上也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处于时离时合的状态，没有达到捻军与太平军那种程度的联合。

（三）左宗棠进攻捻、回军的方略与部署

1867年2月22日，清廷授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专办陕甘军务，以按察使刘典为帮办。左宗棠在清廷的一再催促下，率楚军近二万

人，从6月中旬开始，分三路陆续入陕：左宗棠亲率一万一千人由樊城北上，西入潼关，以防西捻军东返河南；刘典率军三千余人由樊城进荆紫关，经商州进入蓝田，阻拦西捻军南下湖北；提督高连升率军四千由樊城溯汉水西上，于蜀河口登陆，防止西捻军由陕入川。早在入陕之前，左宗棠就确定了进攻捻、回军的方略。他认为“以用兵次第论，非先捻后回不可，非先秦后陇不可”。从左宗棠的入陕兵力有限，西北地瘠民贫，粮饷运输补给困难，捻军、回军又缺乏紧密联系等情况来看，左宗棠的上述作战方略，是此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7月19日，左宗棠抵达潼关，所部诸军也先后入陕，即以主要兵力对付西捻军，以部分兵力对付回民起义军。其具体部署如下：以先期入陕的刘松山所部老湘军、郭宝昌所部皖军，刘厚基所部湘军和高连升所部楚军共二万一千余人，为“剿捻之师”（高连升部为回民起义军所牵制），以帮办刘典所部楚军和黄鼎所部川军共八千余人驻陕甘边界，为“剿回之师”；其余楚军万余人，分驻凤翔、宜君、华州、华阴、渭南、临潼等地，策应各军，为“兼讨回捻之师”。左宗棠企图割断回民起义军和西捻军的联系，把西捻军围困在渭河北岸的泾、洛两水之间，将其歼灭后，再向回民起义军进攻。

（四）西捻军转移陕北

左宗棠率军入陕后，在陕清军兵力增至约四万人，装备有洋枪洋炮。西捻军虽有数万之众，但除老弱妇孺外，能战之兵只有万余人，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都居于劣势。当时，西捻军正盘旋于蒲城、富平、三原、泾阳一带。这一地区南有渭水，西有泾水（今泾河），东有洛水（今洛河）、黄河，出面则是山区，很不利于捻军骑兵的纵横驰骋。为了摆脱左宗棠所部各军的包围，西捻军决定向陕北转移。

10月上旬，左宗棠与刘典、刘松山、李祥和、郭宝昌、高连升等进一步“商议方略”，策划将捻军消灭于泾水、洛水之间的具体部署。西捻军见各路敌军日逼，便于10月24日由蒲城东南一带北上白水，以马队猛攻渭北山区的清军，突破包围圈后，向中部（今黄陵）、洛川进军，进入陕北地区，使左宗棠的围歼计划顿成泡影。

陕北高原塬、梁、峁、沟、壑相间，人民生活十分贫闲。西捻军进入这一地区，作战和补给都遇到不少困难，但毕竟摆脱了敌人的围攻，加之当地清军力量此较薄弱，便于休整。其次，陕北是回汉农民起义军主要活动地区，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和支援。再次，即将进入初冬季节，黄河冰冻，一旦左宗棠的重兵追来，可以渡河入晋。所以，在当时的形势下，捻军北上陕北，对于保存自己和尔后的行动，还是比较有利的。

西捻军进入陕北后，甘肃东部和南部的回民起义军仍积极向东发展，配合作战。10月底，西捻军一部进攻州（今富县）不克，北攻甘泉。11月上旬，一部进占安塞，主力活动于宜川、延长之间。刘松山，郭宝昌“亟思催队紧追”，便率部由中部东渡洛水，向宜川进发。11月14日，回民起义军在中部大贤村截击尚未渡洛的刘松山部后队，杀其部将李祥和。11月17日，西捻军北占延川，进向清涧，接着于22日配合回民起义军占领绥德州（今绥德）。

西捻军在陕西的活动，促进了这一地区革命形势的高涨。12月3

日，左宗棠在奏折中惊恐地说："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而东亦千有余里"，"现在局势艰危，州县城池叠陷"。可是，就在这时，张宗禹收到了被困于山东的东捻军求援的急信。为了实践"誓同生死，万苦不辞"的誓言，张宗禹等决定立刻离开陕北，去援救自己的战友。

六、西捻军的覆没

（一）挺进直隶

张宗禹等原拟率军南出潼关，由河南转赴山东援救东捻军。后来又决定进军河北，威胁京畿，把清军吸引到自己周围，以达援救东捻军的目的。这个类似围魏救赵的计划，在当时来说，还是可取的。可惜东捻军很快失败了，结果西捻军非但未达目的，反使自己陷入清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而不能自拔。

1867年12月上旬，张宗禹率西捻军二万余人由绥德急速南下，于17日进到宜川境内的黄河西岸。当晚，张禹爵率五百人为先锋，张宗禹率大队随后，乘北风大作之际，在宜川东面壶口一带履冰抢渡黄河成功，乘胜占领了山西吉州（今吉县）、乡宁，接着南下河津，围攻稷山县城。

这时，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清军已渡河跟踪追击。为了迷惑和摆脱敌人，张宗禹等决定率捻军北上，佯作进攻太原之势，便于12月24日撤稷山之围，由绛州（今新绛）北进临汾、洪洞。当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清军亦跟踪北上时，西捻军突然转兵南下，途经曲沃、绛县，于1868年1月初越过中条山，进至河南济源城下。河南巡抚李鹤章急忙调兵驰援，并从山东迅速调回张曜、宋庆两部豫军。张宗禹立即率军经修武、新乡、汤阴、临漳，于1月27日渡过漳河，进入直隶境内。接着，经磁州（今磁县），鸡泽、隆平（今隆尧），新河北上，于2月1日在束鹿所属的周家庄渡过滹沱河，复经定州（今定县）、望都北进至保定、满城一带。

西捻军突然出现在直隶南部，使清廷慌了手脚，连下谕旨，调兵遣将，防卫京师，于是各地"勤王"之师接踵赶来。山东巡抚丁宝桢率军进入直隶雄县一带，河南巡抚李鹤年率军抵磁州。已从陕西出潼关进入山西南部的左宗棠也率部于2月15日抵达直隶获鹿，接着，扎大营于定州。清廷仍任命他为前线总指挥。李鸿章因未能总揽攻捻大权，心怀不满，借口休整，行动稍缓，经清廷严诏催促，才命潘鼎新、周盛传，周盛波、善庆、郭松林、杨鼎勋等部先后进入直隶景州、安平。此外，安徽清军也进入直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枪队布防天津；直隶总督官文中部率部往援保定；连警卫上圆明园的马队也调往涿州（今涿县）防剿。集结在直隶中部、南部的清军共约十余万人。为了弥合左宗棠与李鸿章间的矛盾，清廷于2月底命恭亲王奕为大将军，左宗棠、李鸿章为参赞大臣。各路统兵大臣及督抚等均归恭亲王节制，以一事权。

西捻军的行动确实调动了清军，但也使自己陷入了孤军作战的困难局面。2月5日，西捻军于满城为道员余承恩部所败，东南走祁州（今安国）、饶阳。2月中下旬，西捻军在饶阳、献县一带活动时，即陷入了湘军刘松山、郭松林部，淮军杨鼎勋部，皖军郭宝昌，程文炳郎，豫军

张曜、宋庆等部的包围之中。3月16日，捻军因连日奔驰，疲惫不堪，疏于戒备，结果在饶阳东北一带遭清军袭击，部队伤亡很大，特别是邱远才、张禹爵两员为敌人所害怕的战将同时牺牲，使士气大受影响。

（二）转战豫鲁

为了摆脱敌人重兵围困，张宗禹率军南走，于3月18日从晋州（今晋县）西南的桃园、相古村等处渡过滹沱河，后经宁晋、新河、巨鹿，于3月23日在成安渡过漳河，进入河南，然后经滑县、新乡、获嘉进至清化镇（今博爱）。在这里，捻军进行了短暂的休整，把步兵全部改为骑兵，使部队行动更加迅速，同时，伐竹为矛补充军械物资。

这时，淮军已赶到豫北，李鸿章正想北依太行山，南据黄河，实施其围困计划，幸好张宗禹等已经察觉到“怀、卫一带，阻山（太行山）面河（黄河），地势至狭，恐被围困”，很快离开清化镇，东出延津平原。4月1日，在封丘大败湘军刘松山部、皖军郭宝昌部，重伤郭宝昌，毙记名提督周盈瑞。4月12日，又与潘鼎新、杨鼎勋、郭松林等部战于滑县，杀淮军提督陈振邦，副将刘正同等。之后，经浚县，内黄、直隶清丰，南乐之交进入山东莘县。活动于东昌府（治今聊城）一带的沧州下洼，高家口盐民起义军数千人，在其首领高岩率领下，参加了捻军，并充当向导，引导西捻军于4月17日从东昌府南李海务渡过运河。4月下旬，经德州、沧州，兵锋指向天津。

西捻军临近天津后，恭亲王奕即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洋枪队加强防卫，命绥远城将军定安，副都统富和，提督郑魁士各率所部增援天津，命侍郎恩承，副都统玉亮所部赶赴武清（今杨村）设防；并无耻地指使崇厚通知英国，法国炮船协同防守天津。

西捻军在独流镇、杨柳青等处用船搭桥抢渡运河，因遭洋枪队密集炮火封锁，无法前进，遂于4月末南下山东就食。

（三）最后覆没

西捻军进入山东海丰（今无棣）、阳信、武定（今惠民）地区后，虽然便于解决粮饷问题，但从地形上看，这一地区东濒大海，南有黄河，西有运河，易被敌人围困。当时张宗禹等早已得到东捻军失败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及时率部跳出清军重兵集结的直鲁边区，向敌人守备比较薄弱而又适于骑兵作战的地区转移。张宗禹等之所以虑不及此，除了急于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外，主要是轻敌思想作怪。他们认为清军虽“千里连营”，但指挥不统一，等到“秋高马健”时，只要振臂一呼。就可突破清军的的河防。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没有及早突围，脱离险境，结果造成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

这时，清军务部十余万人，先后到达运河东部的直鲁地区。清廷命李鸿章为前线总指挥，调度各军。李鸿章按照其“设长围以困之”的“就地圈制”计划，作了如下部署：北面，将沧州以南的捷地坝挖开，运河水入捷地减河，并沿河兴筑长墙，由崇厚洋枪队和潘鼎新部防守，阻扼捻军再次北上威胁津京，西面，于张秋一带引黄河水入运河，并沿运河赶筑长墙，由河北、山东、安徽等省清牢分段负责，附近州县的民团协防，又调总兵丁长春部水师炮船进驻德州，加强水而巡逻，严密防守；南面，封锁黄河各渡口，将船只一律调至南岸，由山东地方官吏带队把守；东面，严禁渔船下海，防止西捻军渡海而走。同时，调战斗力较强

的湘淮军为“游击之师”跟踪追击。

5月中旬，张宗禹由于不知沧州捷地坝已被挖开，且有重兵把守等情，仍然企图强渡捷地减河北上，结果受阻而返。下旬，张宗禹又率军抢渡临清、东昌等处运河，仍为驻防清军所败。为了摆脱追军和出敌不意，捻军东进海丰。5月29日，疾驰至直隶东光的下口镇再次抢渡运河，由于丁长春部水师及该处清军把守严密，仍然无隙可乘，不得已又南返山东。

西捻军被围困在方圆六七百里的地区内，忽而北上，忽而南下，几次抢渡均遭失败。虽然把清军拖得疲累不堪，甚至李鸿章、左宗棠等也因未能完成清廷下达的一个月内消灭捻军的任务而被“交部议处”，但整个形势对西捻军愈来愈不利。由于连续下雨，河水猛涨，道路泥泞，使以骑兵见长的捻军行动更加困难，而清军的炮船却更便于行驶，配合步队围攻捻军。同时，李鸿章又实行“缩地围扎”的方针，把捻军压缩在马颊河以南、徒骇河以北的高唐、商河、惠民等地的狭长地带，并进一步施展“招抚”伎俩，加上当地地主豪绅实行坚壁清野，强迫村民搬入堡寨，使捻军的食宿发生困难。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捻军士气日益低落，以致接连发生投敌事件。

7月16日，西捻军在直隶吴桥（今吴桥东）遭周盛波、周盛传部伏击，伤亡千余人。26日，与郭松林，潘鼎新部战于山东商河东北的沙河锁，被杀被俘三四千人，张宗禹也中弹受伤。31日，在济阳玉林镇、鸿福寺与豫军张曜、宋庆部和淮军潘鼎新部发生激战，因地处黄河弯曲部，骑兵行动不便，结果又遭惨败，将士阵亡六七千人，损失马匹上万，辎重丢弃殆尽，张宗禹率余部突围。威震一时的西捻军，至此已成强弩之末。

8月4日，张宗禹率领余部在德州的桑园、二屯、老君堂等处抢渡运河，均未成功。8月15日，在东昌的李海务口再次抢渡，又被清军所阻，退往茌平西南广平镇。8月16日，在向东北方向转移途中，与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袁保恒、张曜、宋庆等部遭遇。经过激战，张宗禹的爱子张葵儿、兄张宗道、弟张宗先等数千捻军将士全部英勇牺牲。太平天国灭亡后，领导捻军坚持抗清斗争达四年之久，被称为“沉静好谋”的新捻军重要首领张宗禹，率领十八骑突围而出，来到徒骇河边，“穿林凫水，不知所终”。

西捻军在徒驻河边的覆没，标志着捻军起义战争的最后失败。

第六部分 天地会起义战争

天地会系清代民间秘密结社之一，大约始创于乾隆年间。最初活动于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后来逐步扩大到长江流域各省及广西一带。因“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故名天地会，又称“三点会”，“三合会”等。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对内称“洪门”。其支派有小刀会、红钱会、哥老会等名称。各派独立活动，互不统属。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天地会在两湖、两广一带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各地天地会纷纷响应，发动反清武装斗争，如1853年黄德美等领导的福建小刀会起义、林俊领导的福建红钱会起义、何贱苟领导的湖南天地会起义、刘丽川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1854年陈开和李文茂等领导的广东天地会起义（大成国起义）、朱洪英和胡有禄领导的广西天地会起义（升平天国起义）等。本章仅就其中军事上较有特色的上海小刀会起义战争和大成国起义战争分别予以叙述。

第一节 上海小刀会起义战争（1853年9月～1855年2月）

一、起义的爆发与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上海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从此，上海及其附近各县人民；深受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榨，日益陷于贫困破产的境地。早在明末清初，这一地区的棉纺手工业就相当发达，生产的土布畅销各地，成为劳动人民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但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英，美等国棉纱、棉布的源源输入，土纱、土布的销售日益受到排斥。上海开市三年以后，松江、太仓的土布市场消减大半，某些以纺织为业的农村，甚至陷入无纱可纺的境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危害，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上海是中国沿海“商贾云集，帆樯如织”的重要商业城市，水上交通历来比较发达，但自对外通商以后，外国轮船穿梭往返，逐渐排挤了长江和沿海一带木帆船的航运，使大批船夫失业。

与此同时，清政府为了填补鸦片战争的巨大消耗和大量赔款，满足封建官僚的挥霍浪费，不断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作为清政府主要财政收入的漕赋、地丁税普遍加重。鸦片战争期间，上海一带地区的漕赋已经很重，而战后又增加了二三倍。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也不断加重。一亩田最多能收米三石，少的不足二石，但地租额竟高达一石五斗。农民每年的收获所剩无几，终岁过着啼饥号寒的悲惨生活。

面对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上海及其附近各县的劳动人民不断进行反抗。1848年，失业的漕船水手一万三千人在青浦集会示威，反对外国殖民者的侵略。1849年，嘉定农民冲进县城，开展反对大户和米商囤积居奇的斗争。在上海，则掀起了反抗外国侵略者为开马路、游洋房、建跑马厅而强迫人民迁移的斗争。1852年，青浦农民在当地小刀会首领周立春领导下进行抗粮斗争，烧毁官府的催粮船，并冲进县衙，活捉知县余龙光。苏州知府钟殿选率清军千余前往镇压，被数千农民用锄头、木棒击退。与此同时，嘉定、太仓、松江、南汇等县人民也不断掀起殴官，拒差、焚毁仓衙等斗争。这种日益高涨的反抗斗争，成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先声。

上海小刀会由广东、福建、浙江和上海等七帮联合组成，会员以小刀为标志，对外用“义兴公司”为代号，首领有刘丽川、李咸池、陈阿林、林阿福、潘起亮等。刘丽川原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县），初在家务农，后赴香港谋生，于1845年加入天地会，1849年到上海为一家外商洋行当通事（翻译），不久辞去这一职务，抄录医书，为人治病。由于刘丽川仗义疏财，名望渐高，加之上海小刀会中以粤帮人数最多，势力最大，他遂成了该会的总领袖。小刀会的成员有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船夫、搬运工人和城市贫民、游民等。当上海及附近各县农民和失业水手等展开反抗斗争时，小刀会的组织有很大的发展。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上海及其附近各县的官僚，豪绅惊恐万状，刘丽川等

便趁机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他们一方面组织小刀会众加紧练习枪棒，一方面乘苏松太道吴健彰等通过福建，广东、宁波、上海等七会馆联名捐资和招募团练之机，派会员打入敌人内部，在反动武装中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青浦，嘉定一带农民反抗斗争的日益发展，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条件也就日趋成熟。

1855年8月17日，嘉定县南翔农民在该地小刀会首领徐耀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一度占领县城，捣毁县署，驱逐知县，放出被监禁的群众。之后，徐耀与青浦县的周立眷联合，并取得上海小刀会的协助。9月5日，在周立春的领导下，发动第二次起义，再次占领嘉定县城。起义军纪律严明，获得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整个形势对上海小刀会的起义十分有利。同时，刘丽川等又得知吴健彰企图把四十万两白银运走，作为进攻太平军的军饷。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小刀会便毅然改变原定于冬季起义的计划，决定于9月7日乘上海城内举行祭孔大典的机会，提前发动武装起义。当日清晨，头包红巾，腰缠红带，手持武器、旗帜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在守城卫兵的内应下，以突然行动从北门冲入城内，与城内会员会合，经过短时间战斗，即攻入县衙，杀死了知县袁祖德。接着，又占领炮台，包围了苏，松、太兵各道衙门。吴健彰“象一只哀怜的小狗一样乞求饶命，拿出了他的官印”，成了起义军的俘虏。但是，美领事金能亨却出面请求刘丽川“加意优容，准吴链彰还里”，并由外国人帮助吴乔装逃出上海县城。吴健彰奔赴镇江后，便请兵围攻上海。成了镇压起义军的刽子手。

起义军占领上海后，即以文庙为总指挥部，依据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建立了“大明国”。公推刘丽川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李咸池为平胡大都督，陈阿林为左元帅，林阿福为右元帅，潘起亮为飞虎将军。其他首领也封以将军、先锋等名号。刘丽川等发布告示，揭露清朝官吏的种种罪恶，表明起义的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同时，严申军纪：“不听号令者斩，奸淫妇女者斩，掳掠财物者斩，偷盗猪狗者斩。”起义军的主张和行动，得到群众的拥护，不少人自带刀矛参加革命队伍。

刘丽川、周立春为巩固革命政权，扩大革命势力，立即由上海，嘉定分兵小击，于9月9日占宝山，10日破南汇，13日克川沙，17日占青浦。从9月5日起，在十二天内，起义军即攻占了六座县城，声威大振。起义军原拟乘胜占领太仓，向苏州方向发展，后因苏州的天地会起义组织遭清军镇压，而进攻太仓又为清军所阻，故折回嘉定，转取守势。为了取得太平天国的领导与支援，刘丽川等遗专使携带给天王洪秀全的公文，分由水陆两路前往金陵，要求天京当局速派大员前往上海主持军政大事。同时，宣布上海小刀会起义军是。太平王的部属，在太平王的指挥下一致行动”，革命政权“奉行太平王的法令”，并于9月下旬改用太平天国年号，竖立太平天国旗帜，刘丽川也改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

这时的小刀会起义军，包括嘉定，青浦两县起义军在内，总数万人左右。这些初起的义军由于没有战斗经验，武器又多为小刀长矛，仅有少数鸟枪，因而战斗力较弱，但是，他们凭着勇敢的革命精神，却能屡败清军。

二、上海城市保卫战

（一）起义军退保上海

起义军占领上海等县城后，不仅影响江浙漕粮的海运和清军江南大背军饷的供应，而且使江南大营清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因此，引起清廷及江苏督抚的震惊。他们急忙从各地抽调兵员，捐资募勇，企图一举消灭小刀会起义军。在周立春等率众第二次占领嘉定后，钦差大臣向荣即从江南大营清军中派出刑部主事刘存厚、云南参将秦如虎统兵一千六百名，前往苏州，归两江总督怡良调遣。上海小刀会起义后，怡良随即调兵六百五十名，由署理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统带，署江南提督和春也由镇江分兵六百，交游击长桂率领，另由吴县知县丁国恩带勇一千三百余名，前往围堵。不久，向荣又抽调官兵一千人，由新任总兵虎嵩林管带前往增援，并由江南大营帮办、署江苏巡抚许乃钊节制围攻起义军的各部清军（共计五千余人）。

清军的作战方针是首先夺取上海附近各县，最后集中力量进攻上海县城。1853年9月20日，丁国恩部兵勇由太仓向嘉定进逼，潜伏在嘉定城内的地主豪绅乘机纠集反动武装充当内应，配合进攻。起义军与敌人进行了激烈巷战，于22日撤离县城。之后，一部分在嘉定以西农村坚持斗争，一部分在徐耀、周秀英（周立春之女）率领下，经南翔退入上海。周立春在掩护部队撤退时，力竭被俘，于苏州英勇就义。22日至27日，青浦、宝山、南汇、川沙的起义军也在清军和地主武装的进攻下撤离县城，退守上海。从此，开始了上海县城的保卫战。

许乃钊在清军攻占上海附近各县之后，便于10月纠集各路清军及上海附近各县的地主武装进逼上海，北面推进到苏州河，在新闸一带建立北营，南而推进到黄浦江下游的卢家湾、小马桥一带，建立南营，以钳形态势夹击上海城。另有红单船多艘，扼守吴淞口，并在黄浦江游弋。

这时，起义军虽然已由万余人减至数千人（有说三千人），且困守孤城，但上海城高墙厚，并储有一定数量的粮弹，因而士气高昂，决心固守待援（等待太平军的到来），与清军斗争到底。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他们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反复宣传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和铲除贪官污吏的革命主张，拘捕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法分子和混进城内的奸细，以鼓舞和安定士气民心。经济上，宣布豁免地方捐税，动员各铺户照常贸易，并派人秘密从常熟一带购运米粮进城，实行配给制度，保障军需民食。军事上，大力动员群众参加战斗，并设女将军和“孩兵局”；在高大建筑物上开凿枪眼，各要地增设炮台，于城外深挖陷坑，设置铁蒺藜，并控制城东黄浦江及城郊的水陆要道，用土办法自制火药、子弹，并通过购买和动员散勇上缴等办法多方补充枪支弹药。外交上，严正宣告起义军“与太平军已属一体，今日之中华实已与外邦并驾齐驱”，并斥责美国侵略者暗助清军，要求各国恪守中立。

（二）挫败清军的水陆夹击

1853年10月初开始，围城清军连日从陆上水上向上海城内发炮轰击，并不断发起进攻，均被起义军击退。10月中旬，围城的清军增至八千余人，加上乡勇，共约二万人，并调集了水师战船数十艘。

11月9日，吴健彰以战船一队，混在外国军舰中间，发炮轰击东门

外董家渡炮台。起义军不动声色，待敌船驶离外国军舰后，突然发炮还击，击沉清军战船一艘，重创两艘。这时，另一队清军战船开到，集中火力炮击起义军的五艘战船，将其全部击毁。随后，敌战船上的清兵登陆，企图占领东门外的炮台。起义军英勇抵抗，将其击退。

在城东作战的同时，清军约三千人向上海县城的北门发起攻击。起义军沉着应战，待敌人缘梯登城时，突然开火，使清军伤亡惨重。清军攻城失败后，纵火焚烧东门外的民房，并大肆抢劫。一天之内，烧毁房屋不下一千五百余幢，从江边到城墙，人烟稠密的商业区，仅剩下一些破壁颓垣。

此后，清军又不停顿地向县城进攻，并在城北宁波会馆墓地上筑起一座高与城齐的炮台，整天向城内开炮，吴健彰的战船也继续轰击城东起义军的炮台，企图切断城内至江边的通道。由于久攻不下，清军决定改取太平军常用的“穴地攻城法”，在城西秘密地挖了一条通向城脚的地道。1854年2月6日晨，引爆火药，轰塌西面城墙，二千余名清军从缺口冲入。起义军立即点燃火药袋和火罐，并用喷筒喷射火陷，封锁缺口。清军一片混乱，纷纷后退。飞虎将军潘起亮率二百人乘势冲出城外，追杀清军，缴获大炮十二门和许多抬枪，胜利返回城内。清军遭此挫败后，从3月到4月，基本上没有大的进攻行动。起义军则多次主动出击，摧毁清军的营垒、炮台，杀伤不少敌人，迫使其全郎退出南郊，初步改善了防御态势。

5月25日凌晨，清军又将小南门城墙炸开一个缺口，二百名清军尾随几名外国兵冲入城内。起义军奋起反击，毙敌四十人，将敌军逐出城外。配合清军进攻的外国战船，也被起义军击伤一艘，击沉两艘。以后，清军又多次挖地道攻城，均被起义军击退。

（三）抗击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

小刀会起义武装占领上海县城后，标榜“中立”的英、美、法侵略者，想利用这个机会，要挟清政府对它们在上海的侵略特权作出更大的让步，然后帮助清政府镇压起义军，当时的外国租界位于县城以北的洋泾浜地区，英、美、法领事以避免清军和起义军的炮火毁坏租界建筑物为由，曾禁止清军从北面进攻起义军，并对清军采取威胁态度。1854年4月4日，英、美军队以清军侮辱、袭击租界外侨为借口，向驻于泥城浜（今西藏中路）的清军发起进攻，清军不战而退。事件发生后，许乃纠立即派员向英、美领事求和，第二天又派吴健彰出面“陪罪”，作出了“租界不可侵犯”的保证。不久，许乃钊、吴健彰又接受英国领事阿利国的建议，由英、美、法三国领事各指派税务司一人，组成所谓“关税管理委员会”，控制海关。6月29日，与三国领事签订“上海海关征税规则”九条，从而开创了出卖中国海关主权的先例。外国侵略者通过“泥城之战”，在租界地位、海关控制权等问题上获得了满意的结果，随即撕下“中立”的假面具，公开与清军勾结起来，镇压上海的起义军。6月中旬，英、美、法三国领事就达成协议，决定以武力强迫起义军退出上海城，将县城交给清军。

同年7月，清廷以“许乃钊督师上海，日久无功”，将其革职，吴健彰也被拿问，由吉尔杭阿升任江苏巡抚，节制围攻上海县城的清军。清廷令吉尔杭阿立即“督率各路兵勇，迅速筹攻，务将沪城克期收复”。吉尔

杭阿接任后，不断驱使清水挖地道，埋火药，爆炸上海城墙。有的坑道被起义军湘水破坏，有的虽爆炸成功，但始终未能攻入城内。7月24日，清军在城南的一次爆炸中，竟自毙官兵五十名。起义军趁势反击，“孩兵局”的少年战士在战斗中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吉尔杭阿见上海久攻不下，便步许乃钊，吴健彰的后尘，求助于外国侵略者，他通过买办分子杨坊及其亲信吴煦奔走活动，征得外国侵略者的同意，于10月至11月底，筑成一条东起黄浦江边、中经陈家木桥直至洋泾浜北岸护界河的围墙，断绝县城与租界的交通，使起义军无法假道租界得到粮食与军火的供应。

在日益严酷的形势下，起义军中的少数不坚定分于（如李咸池、林阿福等）或者出走，或者降敌。但刘丽川等仍然不畏艰险，率部坚持斗争。12月上旬，起义军连续出击，摧毁了北门外的清军营垒，并于城外构筑炮垒，轰击围墙，以图打破敌人的封锁。

1854年12月6日，法国舰队司令辣厄尔蓄意寻衅，借口起义军的炮火将危及外国人的安全，竟要起义军拆除洋泾浜南岸的炮台。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起义军的严词拒绝。12月9日，法国战舰“高尔拜”号悍然开炮轰击县城和小东门炮台达两小时之久。14日，法国侵略者正式向起义军宣战。1855年1月6日晨，法国侵略军四百人伙同清军一部向上海北门发动进攻。法舰“高尔拜”和“贞德”号以及领事馆附近的大炮同时猛轰，将城墙打开一个缺口。接着，二百五十名法军首先突入城内。英勇顽强的起义军在潘起亮率领下，立即发起反击，使敌人前进受阻。法军慌忙打开北门，数千清军蜂拥而入，同样被起义军击退。有的清军来不及从城门逃走，直接由城墙往下跳，死伤甚众。此次作战，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共毙伤法军数十名、清军二千余名，取得了反击中外反动汲联合进攻的辉煌胜利。从此，法军不敢力攻，惟配合清军加紧围城。

（四）弃城突围与最后失败

起义军英勇奋战，虽然粉碎了敌军多次进攻，但由于长期困守孤城，兵员、弹药的补充越来越感到困难，粮食问题更是难以解决。从1855年初起，城中粮食几尽，军民饥饿而死者与日俱增。2月16日，清军轰塌小南门城墙，冲入城内，法军也发炮助战。起义军忍着饥饿奋勇拚杀，再次迫使清军退出。尽管如此，起义军终因内无粮弹，外无援兵，势难继续坚守，便于2月17日（咸丰五年正月初一日）夜分路突围，约定到镇江与太平军会师。

起义军出城后，有的被清军截杀，有的散入租界。刘丽川率部由城西南冲出后，次日黎明到达上海西郊虹桥附近，与清军遭遇，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只有潘起亮和少数起义军突出重围，到达镇江，参加了太平军（1861年底太平军攻克宁波后，潘起亮以功封“衡天安”任海关主官，后随太平军余部转战赣、闽，1866年在广东牺牲）；另一部分突围后，于1855年冬参加了江西天地会起义军。还有部分起义军散入南翔、浦东农村，在以后太平军进攻上海时，积极配合作战。

第二节 大成国起义战争（1854年6月～1864年5月）

一、广东天地会发动武装起义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内加紧压榨，鱼肉人民，社会危机更趋严重。广东在鸦片战争中首当其冲，受害最深，战后分担的战争赔款又最重，因而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更为残酷。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小商贩、船民、无业游民等加入天地会组织，走上反清斗争的道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尤其是1853年定都金陵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东天地会会众，终于在1854年夏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广东天地会武装起义。

1854年6月10日（一说6月8日），东莞天地会首领何六等率众在东莞县石龙镇起义，17日占领县城，揭开了广东省城附近天地会起义的序幕。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三万余人，拥有船六百余只。7月5日，佛山天地会首领陈开在佛山石湾附近的大雾冈发动起义，随即占领南海县田属佛山镇（今佛山市）。接着，李文茂、甘先，周春等在广州北郊的佛岭市、陈显良等在城东燕塘、林洸隆等在省河（珠江）南岸纷纷聚众起义，关巨和何博奋等也率领珠江船户起而响应，迅速形成了对广州的包围。起义者头裹红巾，或腰缠红带，自称“洪兵”，又称“红兵”。

武装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广东全省，数月之内，攻克了四十余座府、州、县城，并先后形成了几个中心地区。在广州附近地区，除陈开、李文茂等外，还有陈金刚、练四虎、侯陈带、林大年，陈吉、梁楫、刘观秀、陈松年、吕萃晋，冯坤等分别领导了花县、三水、清远、顺德、龙门、新会、鹤山等县的天地会起义。在西部的肇庆地区，陈荣、伍百吉筹率众起义，于8月5日在水勇内应下，一举攻占肇庆府城（今肇庆市）。在北部的韶州地区，首先由英德县的陈义和，乐昌县的葛耀明发动起义，后与其他起义军一起，三次围攻韶州府城（今韶关市）。在东部的潮州、惠州地区，由陈娘康、郑游春、吴忠恕、翟火姑等领导的起义军，积极活动于惠来、潮阳、澄海、普宁、揭阳和归善（今惠阳）、博罗等地。此外，嘉应州、高州、廉州府属各县也都有规模不等的起义。各地的起义军，大股有数万人，小股有数千或数百人，但由于没有统一领导和缺乏作战经验，为时不久，多数被清军和地主豪绅组织的团练各个击败。有的如周春、翟火姑、葛耀明等部分别于1855年和1856年转移至湖南、江西，参加了太平军，成为太平军中的“花旗”。有的如陈金刚部流动于湘、粤、桂边境地区。而陈开、李文茂等领导的起义军，先则围攻广州，后转移至广西，建立起“大成国”政权，在广西天地会起义武装配合下，坚持了较长时间的反清战争，成为当时遍布全国的各族人民起义队伍中一支重要的反清武装力量。

二、围攻广州之战

（一）双方作战部署

1854年7月，陈开、李文茂等率众起义后，立即相互配合，开始了围攻广州的作战。其部署情况是：陈开部以佛山镇为据点，由南向北进攻；李文茂部以佛岭市为主要据点，以萧冈、龙潭观等为辅翼，直逼北门；陈显良部以燕塘为主要据点，以三宝墟为后应，进攻东门，林洸隆部驻省河南岸，牵制清军，关巨、何博奋的水军截击清军内河水师，断绝其水上交通。各路起义军的总兵力号称二三十万，实际约有十余万人，没有统一和正规的编制。部队除装备部分鸟枪，火炮外，大部分为刀矛等冶兵器。

两广总督叶名琛、广东巡抚柏贵等因城内兵力空虚，立即关闭城门，并采取如下应急措施：将派至与湖南，江西、广西交界地区的绿营兵四千余名调回省城，与八旗兵一千三百余名共同防守炮台和水陆要隘，令各地豪绅地主从速组建团练，并以“优给口粮”，“加倍给予工价”等办法从省城，香山、新安、东莞、新会、潮州等地先后雇募乡勇二万七千余名，增添内河战船数百只，选雇水勇、炮勇一万六千余人，配合八旗，绿营作战（同年秋，守城的兵勇、团练增至五万多人）；奏请清政府速从福建、湖南等省调兵来粤会剿；组成以大买办伍崇曜为头子的“筹饷局”，后又无耻地乞求港英当局出兵救援。随着兵力的增加，叶名琛、柏贵与广州将军穆特恩、右翼副都统托恩东额会商，作了具体的防御部署：参将卫佐邦牵所部绿营分驻东路和防守保厘炮台，千总黄大荣、熊应荣率绿营及部分团练驻守小北门外各要隘；游击曾廷相、参将济山率绿营及部分团练驻守城北各要地；游击陈定邦率部分绿营，炮勇分守耆定、拱极、保极等炮台；协领来存、王镇雄及佐领格绷额等率八旗守卫北门外永康炮台；游击陈国辉、水师把总王显等率绿营及团练一部驻守城西的西山寺，泥城等处，协领托云全、太承恩、国荫等率八旗及部分团练分守老城；副将怀塔布率广州协绿营防守新城。叶名琛等每日登越秀山五层楼（镇海楼）亲自指挥。上述部署，以城北为重点，其次为城东和城西，同时加强炮台的守卫。

（二）迫使清军转入防御

7月18日叶名琛等为了先发制人，派出副将崔大同、游击洪大顺率绿营兵三千余人，欲进攻北路起义军的据点江村。李文茂等闻讯，决定依托佛岭市周围的有利地形，伏击敌人。清军进至佛岭市前时，忽遇滂沱大雨，火药、火绳尽被淋湿，只得在山坡扎营。埋伏在周围的起义军突然冲上山坡，与清军娄开白刃格斗，杀死崔大同、洪大顺等。清军大量被歼，余皆溃散。起义军缴获大批军械物资，取得了初战的胜利。

7月20日，起义军分三路进攻广州东、西、北各门，被清军击退。7月26日，叶名琛等派出兵勇约五千人再次对北路起义军的据点牛栏冈发起进攻。李文茂一面组织起义军进行正面阻击，一面派千余人绕至清军背后，袭击敌人。经过激战，起义军再次将清军击退，一直追到离广州城仅十里的三元里，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此后，起义军乘胜转入进攻，兵锋直逼广州城下。叶名琛等不得不采取“以守为战，严密设防”的方针，依托城垣和炮台进行防御作战。

（三）攻城作战一再受挫

从8月初至9月初，北路、东路和西路起义军，连续发起攻城作战

（有时一路单独进攻，有时两路或三路同时进攻），企图先夺占炮台，进而攻入城内。由于清军拚死抵御，起义军进攻一再受挫。例如，8月3日，北路起义军数千人冒着狂风暴雨，从三元里绕至飞鹅岭，进攻永康，耆定炮台。守台清军发炮拦阻起义军的进攻道路，接着，千总熊应荣率部从正面迎战，游击陈国辉、千总黄大荣率部从三元里进行侧击，迫使起义军后撤。8月17日，东路起义军猛扑距东门五里的保厘炮台。清军同样以部分兵力从正面迎战，以部分兵力从“旁径绕出，夺据要隘”，前后夹击，将起义军击退，8月29日，起义军十余万人从东、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亦宋获胜，9月2日，北路起义军又兵分两路出击：一路由三家店至飞鹅岭进攻白云庵，一路向三元里方向进攻。结果，进攻白云庵的起义军遭到两路清军的截击，前进受阻，向三元里方向进攻的起义军进至流化桥时，遭到永康、耆定、保极、拱极和越秀山各炮台清军的炮击，也只好再次后撤。

起义军在连续攻城作战中既不能正确估量主客观条件，又不讲求战术，一味盲目硬攻，忽视侧翼保障，结果，不但没有攻占一座炮台、一个据点，反使自己遭到不小的伤亡，进攻能力日益减弱，给尔后作战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

（四）起义军被各个击破

广州清军虽然击败了起义军的多次进攻，但叶名琛仍感兵力不足，顾此失彼，“攻剿则兵分而见寡，堵守则路歧而难防，策应维艰，战守非易”，决定采取集中兵力“专注一处，先行扫荡”，然后并力进攻他路的作战方针。

清军的第一个进攻目标是东路起义军，其部署如下：参将卫佐邦率所部绿营及部分团练为中路，出东门直攻燕塘；千总马超亮率城东团练乘船至东涌登岸，先占簸箕衬，然后从右侧进攻燕塘，把总黄镛和县丞郑锡琦分率东莞、潮州兵勇从左侧进攻燕塘；外委赖永清率安邑团练为后应。各路清军于9月7日展突然向燕塘发起攻击。起义军仓促应战，力不能支，只好突围外撤。一部分由陈显良率领从瘦狗岭撤至新造，另一部分撤至佛岭市。清军攻占燕塘后，将所有草房百余间全部烧毁，实行残酷的烧杀政策。

东路起义军战败后，李文茂北路起义军失去了左翼屏障，便由进攻转入防御，并采取如下防御措施：加强各据点间的联系，主动配合作战；在主要据点周围挖壕筑垒，配置火炮、抬枪，在山坡、田埂、交通要道插上竹签，撒布蒺藜；在有树林的山坡上暗设火炮，布置伏击阵地。

叶名琛在取得东路作战胜利后，即集中东，北两个方向的部队，进攻北路。鉴于北路起义军数量多，据点密布，他决定采取“先分其势，复截其援”，“逐一剿洗”的方针，即首先围攻靠近省城的几个较小的据点，然后进攻主要据点。9月22日至10月1日，清军先后攻占了棠夏、沙涌、三家店、瑶台等起义军据点。10月11日，清军向义勇祠进攻时，突遭分散在附近各乡的起义军截击，被迫后撤。为此，决定首先分路“清剿”东北、西北各乡小股起义军。至10月21日，十三乡的起义军均被击溃。这时，北路起义军尚有佛岭市、萧冈、龙潭观、牛栏冈等重要据点，彼此呼应，互为犄角。迨至11月3日，上述据点也逐一被清军攻占，起义军

伤亡重大，余部退向石井，石门等处。

清军攻占北路起义军主要据点后，即采取水陆夹击战术，进攻西路起义军。至1855年1月中旬，石井、石门以及附近各乡的起义军均被击败。起义军首领何六、周春、甘先等率部北上，参加围攻韶州的战斗，后又退入湖南；李文茂则率部转移至南海县的九江。

正当清军疯狂进攻北路起义军之际，英国侵略者接受叶名琛的请求，于12月13日公开派道舰队，闯入珠江，充当清军镇压起义军的后援。叶名琛有恃无恐，便立即进攻省河以南的起义军。但由于省河港汊纷歧，东连狮子洋，西连佛山镇，起义军水军出没无常，曾于大黄滘、新造等处大败清军水师，使清军的“堵剿倍形吃紧”。这时，候补道沈棣辉提出了先破佛山的建议，他认为佛山是起义军的重要据点，是辎重和精锐的集结地，佛山一破，其余便可一战而定。叶冬琛接受了这一建议，命沈棣辉统一指挥陆路兵勇近万人，战船百余只、水勇三千人，连同原驻佛山附近的兵勇四千七百余名，向佛山进攻。

当李文茂、陈显良等起义军勇猛攻打省城之际，佛山陈开起义军竟被南海县的大沥、梯云、扶南、太平四堡九十六乡的团练阴止了北进的道路，以致数万起义军偏处佛山，无所作为。沈棣辉在进攻佛山前，察看了各处地形，决定先破与大沥团练对峙的桥头、谢遥村等据点。1854年12月25日至1855年1月14日，清军将佛山外围的据点全部攻占。沈棣辉鉴于佛山道路盘旋，街巷纷歧，事先绘制地图，分发各营，使部队熟悉进攻的街道，明确各自的攻击目标。1月27日，清军分十三路同时进攻佛山镇，起义军首尾不能相顾，纷纷突围。陈开率部向南海县的九江退却，后与李文茂部会攻三水县城不克，遂一齐西进肇庆，与伍百吉部及由广西东下至肇庆的梁培友部会师，进行休整。2月下旬，南路起义军的主要据点也全部失守。至此，长达半年多的围攻广州之战，以起义军失败而告终。

广州解围后，叶名琛下令“凡昔通匪者，吏民格杀勿论”，对广东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全省被害者约在百万以上，仅广州一地就有十万余人惨遭屠杀。英国军舰也参与围捕退到海上的起义军，几乎把所有北里湾和石浦港的起义军船只击沉，并伙同清军成批地捕杀起义军战士。

广州城墙高厚，四周炮台环列，构成坚固的防御体系。刚刚兴超的天地会起义军，虽然人数众多，但组织松散，武器装备差，战斗力不强，而且没有城内居民的响应，在这种情况下，强攻坚城，显然是不明智的。广州城虽然处于起义军四面包围之中，实际上是围而未死。叶名琛等仍能通过水路，在英、美、法殖民主义者的帮助下，将军需民用物资运进城内，支持其持久作战，并最终挫败了起义军的进攻。半年多的围攻广州之战，起义军不仅消耗了很大力量，而且丧失了向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发展革命势力的有利时机。

三、转移广西，开辟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

（一）占领浔州城，建立大成国

陈开、李文茂率部到达肇庆不久，就面临清军从西江上下游夹击的不利形势。1855年4月13口，广西按察使张敬修郎攻占了德庆城。5月

中旬，广东盐运使沈棣辉部攻占了九江、三洲等据点，并于羚羊峡外击败起义军的水军。21日，乘大雾迷漫之际，抢占起义军的羚举峡炮台，战船冲过峡口，直驶肇庆。

面对上述形势，陈开、李文茂等接受对广西情况非常熟悉的梁培友的建议，决定放弃肇庆，向广西转移。在广东各地起义军已遭清军和团练的血腥镇压，武装起义已转入低潮，而广西的天地会起义又仍很活跃的情况下，此种战略性转移自然是正确的。当时，广西比较大股的起义武装，桂西南有以吴凌云为首的起义军，桂东南声以黄鼎凤和范亚音为首的起义军，桂东北有以张高友为首的起义军，永淳（今峦城）、横州（今横县）一带有李文彩为首的起义军，苍梧县有罗华观起义军，湘、桂边有陈永秀、黄金亮起义军。此外，还有活跃在各地的许多小股起义军。至于广西的清军，自太平军兴起并向湘鄂地区转进后，主要用之于对付太平军，留下的部队不多，广西地方当局不得不依靠团练来对付各地起义武装。陈开、李文茂等毅然率领起义军向革命势力比较活跃，反动势力此较薄弱的广西进军，对于保存和发展自己，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1855年5月下旬，陈开、李文茂、梁培友、区润，梁昌等率战船千余艘，溯西江扬帆直上，在德庆冲破张敬修部水师的堵扼，越过封川，进入广西。在进攻梧州不克后，即西走藤县，过平南，进据大黄（湟）江口，于6月5日直薄浔州府城（今桂平），浔州城三面临水，起义军战船分泊南、北两河，发炮轰城，步军则在东，西两门外扎营安炮，从陆路进攻。浔州知府刘体舒督率清军，团练闭门坚守。起义军在展攻不克的情况下，一面派兵控制交通要隘，一面在城外筑墙设垒，阻击清军的援兵，切断城内的粮饷接济，实行长期围困。7月23日和8月28日，起义军两次采用穴地攻城法轰塌南门城墙，但缺口很快被清军封闭，未能突入城内。

广西巡抚劳崇光因无兵可调，贵县勇练的增援亦为起义军所阻，只得把希望寄托在业已进至梧州的张敬修身上。可是，张敬修所部不仅兵力有限，而且士气低落，并需换乘适应浅水作战的战船，筹措欠发的粮饷，因而进展十分迟缓。叶名琛不得不于8月中下旬先后增派参将尹达章率浅水船八十只、兵勇三千名，已革知县谢效庄率团练千余名，加强张敬修部，令其立刻水陆并进，解浔州之围。9月21日，清军战船驶至石咀时，被扼守大黄江口的起义军击败，纷纷逃回梧州。

浔州城内的清军粮尽援绝，士气更加低落，起义军便于9月27日乘机发起总攻，由南城登梯缘墙，一举攻入城内，俘杀了知府刘体舒和桂平知县李庆福等人。

占领浔州城后，陈开等宣布建立“大成国”，改元“洪德”，改浔州城为“秀京”，并蓄发易服，颁发制度，分官设守，开炉铸钱（称“洪德通宝”），开始进行政权建设。为了防御清军进攻，在城外修筑土城二道，在东门外的三角咀修筑炮台，在沿江两岸筑垒设营。

（二）攻占武宣、乎南

浔州城的攻克和大成国的建立，大大鼓舞了广西各地起义军的士气，陈、李起义军开始成为广西各支起义军的中心，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

广西巡抚劳崇光鉴于广西兵单饷竭，只得采取消极防堵的方针，其部署如下：提督惠庆率绿营千人，与右江道黄辅相等所率绿营分驻武宣，蒙墟，防堵起义军北上柳州；新任署浔州知府张鹏万驰赴平南与署知县李载文等招集溃散兵勇、团练，防堵起义军东进；左江镇总兵色克精阿率部驰赴横州，防堵起义军西进。

起义军攻占浔州后，立即发起了攻势作战。10月初，李文茂、梁培友等率军数万，攻占浔州西南的贵县县城，当地起义军首领黄全义、黄鼎凤和活动于横州、永淳一带的李文彩率部参加大成国起义军。不久，李文茂又挥军进攻浔州东北的平南县。由于平南清军防守坚固，以致从1855年10月中旬至翌年2月，久攻不克。清军乘机攻占平南以西的一些沿江据点，并从广东陆续调来援兵，向浔州推进。在此情况下，李、梁等一面以部分兵力在大黄江口一带依托有利地形扼阻广东清军的水陆援兵；一面毅然率部北上，于1856年4月15日夜一举攻陷武宣城，毙浔州协副将福格、守备朱锦兰等多人。起义军袭占武宜，不仅威胁象州、柳州，而且威胁蒙墟清军的安全，打乱了清军进攻浔州的部署。此后，梁培友率水军南返浔州，李文茂率部继续北上，于5月7日攻占象州。李文茂联络荔浦张高友起义军，于7月进攻柳州。劳崇光忙调桂林和浔州附近的清军、团练前往增援。起义军进攻柳州受挫，张高友率部退守象州，李文茂于8月率部返回浔州。

梁培友率水军南下后，准备再攻平南。6月17日至23日，连日大雨，江水猛涨，清军设置于大黄江口下游的拦河铁链被急流冲断，岸边的炮台多被淹没，陆路各营也因洪水阻隔，彼此不能应援。梁培友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6月26日一面派兵围攻清军陆上营垒，一面集中战船数百只，顺流连樯而下，火攻清军水师。清军广东水师的一百余只战船被烧毁殆尽，张敬修、尹达章以及候选知府谢邦瑞、已革肇庆千总柯维和兵勇四百余名被击毙。起义军打了一次漂亮的水上歼灭战。接着，起义军水陆并进，围攻平南，于8月29日攻克县城，击毙和俘虏李载文等多人。在围城期间，起义军水军还在藤县的白沙击毁由广东水师千总苏海率领的战船三十余只，缴获米船百余只，一度进抵梧州城外。起义军攻占武宜，平南后，又于10月初拔除了威胁浔州的清军据点蒙墟，提督惠庆败退石陇。

起义军进入广西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占领了浔州府属的广大地区，初步开辟了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开始在广西立定了脚跟。这些胜利的取得，客观上由于广西清军兵力薄弱，而起义军能得到广西起义武装的积极配合，主观上则由于李、梁等起义军首领能在作战中注意集中兵力，乘敌之隙，出敌不意。起义军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与广西清军和团练的力量对比，仍然处于劣势，根据地还很不巩固。

（三）夺取柳州、梧州、南宁

1856年10月，陈开召开了起义军将领会议，分封诸王：李文茂为平靖王兼陆路总管，梁培友为平东王兼水路总管，区润为平西王，梁昌为定北王。陈开自称镇南王，不久又改称平浔王。此外，还分封了公、侯、元帅等职官。会议还确定：由李文茂率部北攻柳州，梁培友率部向东发展，区润、梁昌率部向西发展，陈开则坐镇浔州。部署既定，各王便分别率部向北、东、西三个方向发起攻城作战，以便进一步扩大以浔

州为中心的根据地。

1.北攻柳州之战

1856年11月，平靖王李文茂率水陆两军由象州北上，再次进攻东、西、南三面临水的柳州城。11月11日，起义军战船直驶城下，步兵则占据了铜鼓、长塘、欧阳等据点。12日，起义军向东门，北门外清军营盘发起进攻，清军不支，退入城内。起义军占据了城外各要隘，完成了对柳州城的包围。

柳州城仅有游击韩凤所部二千余人及右江道孙蒙、参将汤遇珍所率的少数部队固守待援，而这时陈永秀、黄金亮、张高友部起义军，正积极活动于兴安、灵川、永福地区，威胁省城桂林。劳崇光一面调兵防守桂林，一面催令道员张凯嵩由庆远（今宜山）率部驰援柳州。张凯嵩收罗绿营一百五十名和团练三千名，于12月3日进驻与柳州城隔江相望的二都。同月21日，提督惠庆也由石陇率绿营近千人赶到该处。因兵力有限，并受到柳江南岸起义军的牵制，张、惠二郎清军均滞留二都，不敢渡江作战。而起义军的围城作战正日益加紧，曾于1857年1月2日炸塌城墙一段，虽未能突进城内，却给守军以极大震晾。劳崇光催促驻二都的清军迅速渡河增援。1月8日，惠庆率部渡江。他自知难于解围，便约韩凤由城内出击，内外夹攻。但韩凤龟缩城内，拒不出战。起义军一面阻击惠庆援军，一面加紧攻城。这时，城中粮食已尽，兵丁饥饿难忍。3月14日，韩凤率亲兵二百余名企图突围逃跑，刚出城门，就被起义军击散，韩凤仅率少数人逃往桂林。15日，李文茂乘机挥军攻入城内，歼灭了其余守军，击毙孙蒙、汤遇珍等，胜利地攻占了柳州府城。惠庆见柳州已失，慌忙向桂林撤退。

占领柳州盾，起义军乘胜攻占了柳城（今柳城南）、罗城、庆远、融县（今融水），控制了柳州、庆远二府所属各州、县，打开了通向贵州的道路，并与贵州苗民起义军取得了联系。李文茂坐镇柳州（改称龙城府），建立平靖王府，设丞相、都督、将军等职，所占州、县派部将分任知州、知县。在军事上，将起义军编为前，后、左、右、中营，此外尚有御林军，常胜军、长生军、祷天军等番号。在经济上，注意恢复生产，发展商业，并自铸"平靖胜宝"钱币，俨然自成一统。

2.东取梧州之战

平东王梁培友拟首先肃清平南县属的地方团练，保障后方安全，然后东攻梧州。1857年4月3日，梁培友率部从平南县大乌墟出发往攻廖洞村团练，不幸中炮牺牲。起义军失去了一名得力将领。之后，陈开亲自统率梁部继续东进，于5月30日占领藤县后，率战船千艘顾流东下，直抵梧州，在活动于苍梧一带的罗华观起义军配合下，发动了进攻梧州城之战。6月22日，起义军抢占了梧州城外浔江和桂江汇合处的三角咀，居高临下，炮击梧州城。接着，占领了梧州对岸的戎墟镇（今苍梧县），水军战船还控制了广东封川至德庆间的江而，从而封锁了水陆交通，完成了对梧州城的包围。

梧州城内有按察使黄钟音、知府陈瑞芝，副将蒋福长等统带的潮勇、香山勇一千二百余人，加上当地团练，共三千人左右。叶名琛得悉梧州被围后，一面令肇罗道张承修、肇庆知府史朴加强肇庆方向的防御，一面派广东陆路提督昆寿率绿营五千人、水师守备苏海率战船九十

余只，增援梧州。起义军水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一面在梧州城外游弋，发炮环攻，一面积极打援，主动，进攻广东援军。7月28日，起义军水军在广东都城（今郁南县）江面对正在逆水上驶的广东水师发起突然袭击。苏海所率的战船不是被击毁、击沉，就是缴械投降，苏海也当了俘虏。昆寿所率绿营也遭到起义军有力的打击，被迫向肇庆溃退。从此，梧州城内守军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梧州被围日久，城内粮食渐罄。劳崇光先在桂林采办粮食，准备由桂江南运梧州，但因中游的平乐县已被杨西安起义军占领，运输受阻，后又令怀集，贺县团练从陆路开辟粮运通道。叶名琛也令肇庆知府史朴、高要知县黄家仁李兵练千人向梧州运米，但水陆要隘均被起义军控制，以致粒米片薪未能进入城内。至9月中旬，城内粮米颗粒无存，每天饥饿而死者达数百人。陈开得悉这一情况后，命令部队奋勇攻城，于9月27日夜一举攻入北门。在广东镇压起义军颇为卖力的潮勇等这时也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被歼千余人，除陈瑞芝乘乱逃脱外，黄钟音、蒋福长等都当了俘虏。起义军占领梧州后，将该城改名秀江府。

3．南宁不战而得

定北王梁昌、平西王区润、定国公李文彩所部起义军，于1857年2月和4月先后占领了永淳、横州两县，恢复了李文彩起义时的根据地，受到当地壮、汉人民热烈欢迎。5月27日，梁昌、区润、李文彩率部四万余人，战船数百只沿邕江水陆并进，往攻南宁。驻守该城的左江镇总兵色克精阿等慑于起义军的声威，率文武官员事先出城走避，起义军不战而得南宁城。

占领南宁后，梁昌、区润率部西攻百色不克，又折回南宁；李文彩率部东攻灵山，后又折回横州，永淳。在此前后，隆国公黄鼎凤率部攻占了宾州（今宾阳东北），上林等县，活动于容县、岑溪地区的荣国公范亚音率部攻占了北流，进围郁林（今玉林），在南线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自1855年9月占领浔州至1857年9月占领梧州为止，起义军经过两年鏖战，先后攻占府、州、县城数十座，控制了大半个广西，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起义军在这一时期的攻城作战，克服了起义初期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强攻的缺点，在广西清军缺乏机动力量的情况下，改用长期围困的方针，比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反映出作战指挥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四、被迫转入防御，根据地日益缩小

正当起义军不断发展进攻之际，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太平天国经过1856年内讧以后，元气大伤，使清政府得以腾出较多的力量去镇压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湖南巡抚骆秉章应劳崇光的请求，派候选知府蒋益澧率湘军一千六百人，段莹器率祁勇一千人，江忠浚率楚勇千余人，共三千六百余人，在蒋益澄统一指挥下，于1857年6月中旬进入广西，配合广西清军进攻正在威胁桂林的陈永秀、黄金亮起义军，9月占领了全州，兴安、灵川等县，进入桂林城。陈永秀、黄金亮部被迫转移，分别参加了活动于粤、桂边的陈金刚部和柳州

的李文茂部。其次，起义军占领梧州后，广东当局加紧添制和改选战船，抽调部队，雇募壮勇，积极进行收复梧州、浔州的准备。再次，南宁城于1857年10月3日，竟被色克精阿等纠集的数千团练所攻占，梁、区仓促率部东撤，退入灵山（后来梁、区发生内讧，梁昌在合浦被团练所擒，区润被其部下杀害）。由于上述种种不利情况，大成国起义军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逐渐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以致形势急转直下，开始由胜利走向失败。

（一）会攻桂林计划落空

1857年12月，当蒋益澧所率湘军在平乐，贺县一带进攻陈金刚，陈永秀起义军时，陈开、李文茂没有主动支援，而是准备以陈开为东路、李文茂为西路，会攻桂林。

1858年1月，李文茂由柳州率部北上，占领永福。2月，李文茂率万余人进驻桂林西南六十里的苏桥镇，并在此等待沿桂江北上的陈开部的到来。可是，当陈开郎于4月抵达平乐县时，由昆寿指挥的粤军已由肇庆向梧州开进。5月，陈开部遭到已经占领平乐的湘军的攻击，前进受阻。梧州是两广咽喉要地，粤军一旦攻占梧州，西进则可直接威胁浔州，北上则可与湘军夹击正在平乐一带的陈开部主力。陈开在北进受阻、梧州告急的情况下，立即率部南返，保卫梧州。这样，进攻桂林的任务完全落到了李文茂所部身上。

当李文茂屯兵苏桥，威协桂林的时候，蒋益澧所率湘军虽已增至五千余人，但兵力分散，桂林仅有二干余人。为防止李文茂部进攻，蒋采取不时调换部队防地、布设疑兵的办法，迷惑对方。并由右江道张凯嵩纠集团练进攻庆远，牵制李部。李文茂未作周密侦察，不知湘军的虚实，结果万余人长期滞留苏桥，不敢进攻，丧失了打击湘军和地方团练的有利时机。陈开率部南返后，蒋益澧便命令驻平乐的湘军折回桂林，并秘密调动一千五百人绕到苏桥后面，于1858年5月下旬开始对李文茂部实行前后夹击。李文茂不幸负伤，便率部撤出苏桥，后退守柳州。起义军进攻桂林的计划宣告失败。

（二）梧州失守

当李文茂与湘军作战失利，向柳州撤退时，在梧州与粤军作战的起义军也节节败退。

此次进攻梧州的粤军，由广东巡抚江国霖和提督昆寿亲自编组。他们认为，过去几次作战失利，主要是“选勇未精，配船无法”，以及进攻时机选择不当，必待“西水未涨，东风当令之时，水陆并进，步步为营，方能得手”。据此，他们得到署理两广总督柏贵同意后，抽调外海，内河水师，根据战船大小、火炮轻重、行驶快慢，分别编为前、中、后三队。即以能装载四五千斤火炮的红单等大型船六七十只为前队，能装载二三千斤火炮、桨多人众，转棹方便的扒船五十只为中队，能装载一千斤火炮，行驶快速的湖南麻阳舢板船一百只为后队。前队主要发挥火炮射程远的优势，便于先发制人，中队既可掩护前队，又便于进退；后队可以在前队、中队的炮火掩护下，迅速接近对方，实行近战；陆路方面，兵力增至一万余人，一半掩护水师溯江前进，一半专门进攻陆上起义军的据点。此外，还督令沿江各县团练于西江两岸配合作战。部署就绪后，粤军于4月19日趁江水尚未大涨、水流较缓之际，由昆寿统一指

挥，从肇庆西上，往攻梧州。

起义军对粤军的兵力和进攻部署缺乏了解和研究，仍然袭用过去的老办法，在封川江面集中战船二三百只。于4月29日顺流下驶，直冲敌阵。当驶至德庆的春牛坪江面时，预有准备的广东水师前队首先发炮，击沉起义军前队战船数只。起义军水军右营安国公李发、先锋李明中炮牺牲。这时，粤军水师中队扒船向两翼展开，后队麻阳舢板船在炮火掩护下迅速接近起义军战船，枪炮齐放，岸上的兵勇也配合作战。经过激战，起义军不少战船被击沉，击伤，人员伤亡也不断增加。在危急情丑下，起义军自焚战船十余只，利用烟雾掩护，转棹撤回封川江面。起义军在封川添筑炮台，并由梧州增兵四五千人，准备堵击粤军，还联络广宁、怀集等地起义军南下抄袭粤军后路，进行牵制。但水、陆部队不久即被敌击败，广东水师扬帆直驶梧州。5月30日晨，起义军的主要据点戎墟被苍梧、西宁的数千名团练攻占。梧州城守军面临两面受敌的不利形势，遂于30日深夜撤至城外。粤军占领梧州后，便停止了追击。

（三）柳州陷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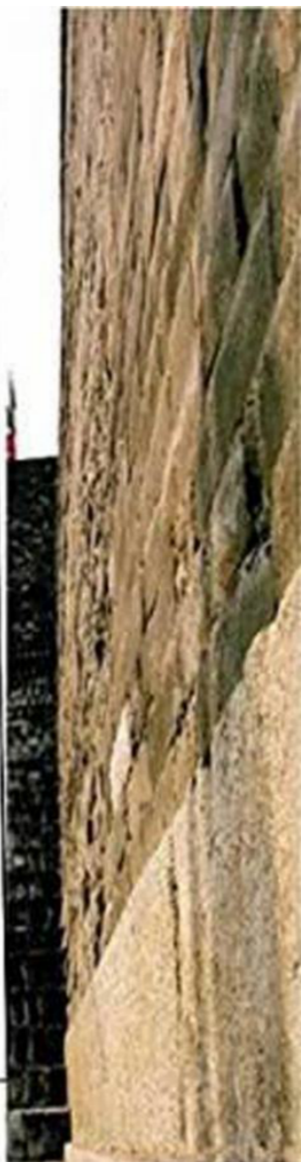
蒋益澧所部湘军在苏桥击败李文茂部后，便乘胜向柳州逼进。李文茂派其弟李文辉率部扼守白沙江口，扎竹为筏，横锁江中。白沙江口是洛清江和柳江的汇合处，李文茂以为守住这一咽喉要地，湘军水师便难于攻取柳州。然而，蒋益澧事先摸清了李文茂的防御部署，湘军由桂林乘坐麻阳船驶抵雒容（今鹿寨西南）后，不再下驶，而是于夜间拖船上岸，由陆路抬运至柳州城附近的洛垢下水，出其不意地直逼柳州。1858年6月24日，李文茂以为白沙江口已经失守，便慌忙从柳州撤退。蒋益澧占领柳州后、立即分兵荫路，一路追击李文茂，一路进攻李文辉。驻守白沙江口的李文辉郎因孤立无援，大部溃散。李文茂部先后在柳城、融县反击湘军失利，便转入贵州东南部，与苗民起义军配合作战。8月，在围攻黎平失败后，旋又折回广西融县一带。11月，李文茂不率病故于怀远（今融安北）山中，余部由陈戊养统领，仍归陈开指挥。

柳州、捂州之所以失守，除了清军兵力增加这一原因外，主要由于起义军由一味进攻而被迫转入防御作战，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李文茂从苏桥撤退后，在兵力上仍占有优势，如果沉着冶静，集中力量对南进之敌进行一二次歼灭战，仍然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陈开韶在梧州方向的作战中，在兵力上也占有相对优势，同样由于事先缺乏防御准备，对粤军的进犯虽然进行了节节抗击，但因仓促应战，以致难于阻止准备比较充分的敌人的进攻。

梧州、柳州等地相继失守以后，大成国起义军受到很大削弱，根据地也缩小了很多，原来的五王只剩下陈开一人，形势已非常不利。但当时大成国尚据有十多个州、县，拥有水陆两军十余万人。此外，还有陈金刚和罗华观等起义军分别活动于贺县和苍梧下郢一带，构成犄角之势。以后，又有石达开部进入广西活动。因此，在兵力对比上，起义军仍占有优势。如果陈开等能够客观地分析形势，采取正确的决策，还是有可能扭转不利局面的。但是，由于主观指导上的原因，这种可能非但未能实现，而且每况愈下，最后终于失败。



近代战争史（下）



目录

第七部分 收复新疆的战争（1876年7月～1878年1月）
第一节 北疆的收复（1876年7月～11月）
第二节 南疆的收复（1877年4月～1878年1月）
第三节 伊犁的索还
第八部分 中法战争（1883年12月～1885年4月）
第一节 山西、北宁之战（1383年12月～1884年3月）
第二节 战争的扩大
第三节 清廷对法宣战及双方战略方针
第四节 东南沿海防御作战（1884年9月～1885年3月）
第五节 北圻陆路反攻作战（1884年10月～1885年4月）
第九部分 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7月～1895年10月）
第一节 战争的爆发和双方战略方针
第二节 平壤之战（1894年9月）
第三节 黄海海战（1894年9月17日）
第四节 辽东半岛之战（1894年10月～11月）
第五节 山东半岛之战（1895年1月～2月）
第六节 辽东清军的溃败（1894年11月～1895年8月）
第十部分 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1900年6月～1901年9月）
第一节 大沽、天津之战（1900年6月～7月）
第二节 北京之战（1900年8月）
第十一部分 抗击沙俄入侵东北的战争（1900年7月～11月）
第一节 沙俄入侵东北的准备及部署
第二节 清朝在东北三省的设防和战备
第三节 战争经过
第十二部分 抗击英军入侵西藏的战争（1903年12月～1904年9月）
第一节 曲眉仙角、古鲁之战（1903年12月～1904年3月）
第二节 江孜之战（1904年4月～7月）
第十三部分 辛亥革命战争（1911年10月~1912年4月）
第一节 武昌首义成功，全国掀起革命高潮（1911年10月~12月）
第二节 汉口、汉阳保卫战（1911年10月~11月）
第三节 苏浙联军攻取南京和成立中央临时政府（1911年11月~1912年4月）
第十四部分 讨袁战争（1913年7月~9月）
第一节 江西讨袁作战（1913年7月~8月）
第二节 江苏讨袁作战（1913年7月~9月）
第十五部分 白朗起义战争（1911年10月~1914年8月）
第一节 起义武装的创立和初期活动
第二节 袭击豫鄂两省敌军，配合“二次革命”战争（1913年5月~11月）
第三节 转战京汉路两侧，打破敌军两次“围剿”（1913年12月~1914年3月）
第四节 西进陕甘，由胜转败（1914年3月~6月）

第五节 回师豫西，最后失败（1914年5月~8月）
第十六部分 护国战争（1915年12月~1916年7月）
第一节 四川战役（1915年12月~1916年3月）
第二节 湘西之战（1916年2月 ~ 4月）
第三节 滇桂边之战（1916年2月~3月）
第十七部分 护法战争（1917年7月~1918年11月）
第一节 北军第一次攻湘之战（1917年9月~1918年1月）
第二节 北军第二次攻湘之战（1918年2月~5月）
第三节 滇黔靖国军攻川之战（1917年7月~1918年3月）
第四节 粤、闽、赣地区的作战（1917年10月~1918年11月）
第十八部分 反对沙俄侵略蒙古的战争（1911年8月~1915年11月）
第一节 沙俄策动外蒙“独立”
第二节 沙俄策动呼伦贝尔
第三节 政府军抗击外蒙叛军向内蒙的进犯（1912年12月~1913年12月）
第十九部分 反对英国分割西藏的战争（1912年3月~1918年10月）
第一节 英国唆使西藏亲英分子发动叛乱
第二节 川滇两省出兵平乱
第三节 川军攻占乡城，稳定川边局势
第四节 英国分割西藏阴谋的破产
附录：大事年表

第七部分 收复新疆的战争（1876年7月～1878年1月）

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斗争的日益加剧，英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角逐激化，对中国西部边境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1865年（清同治四年），中亚浩罕汗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率兵侵入中国新疆，不久自立为“汗”，建立反动政权。1871年，沙俄也出兵占领伊犁地区（今伊宁市一带）。这样，中国的新疆面临着被肢解侵吞的危险。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在陕甘总督左宗棠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抓紧了进军新疆的准备，接着于1876～1878年间进行了收复新疆的战争，粉碎了英俄企图肢解和侵吞新疆的阴谋。

第一节 北疆的收复（1876年7月~11月）

一、作战部署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从兰州移驻肃州，准备发起进攻。当时，清军已出关的兵力有：广东陆路提督张曜的河南嵩武军十四营和总兵桂锡桢的骑兵一营一起，驻哈密；乌鲁木齐都统金顺的马步三十九营（包括归其统辖的景廉旧部马步十九营）和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的骑兵一营一起，驻巴里坤、古城一带。左宗棠命张曜所部固守哈密，防敌由吐鲁番东犯；命金顺部进驻济木萨，监视敌人行动。4月底，总理行营营务、湘军统领刘锦棠率马步二十五营分批入疆，经哈密前往巴里坤。不久，记名提督徐占彪率所部蜀军马步五营也出关继进。至此，先后出关各军总计八十余营。加上原在新疆的伊犁将军荣全所部八营（驻塔尔巴哈台）、哈密办事大臣文麟所部四营（驻哈密）等，总兵力约六七万人。此外，在星星峡以东担任警备的部队尚有二十余营，起着战略预备队的作用。左宗棠率亲兵数营，坐镇肃州指挥，“其前路进止机宜，悉委总统湘军刘锦棠相机酌度”。

清军按照先北后南的既定方针，第一个目标是收复南北疆的交通要冲乌鲁木齐。左宗棠命刘锦棠和金顺两部担负此项任务。

乌鲁木齐位于东西天山接合部的北麓，三面环山，北部及西北部较为开阔，但有古牧地（今米泉）为其外卫，南面有天山作为依托，地形比较险要。由济木萨西行二百四十里是阜康，由阜康又西南行百里是古牧地，古牧地的西南才是乌鲁木齐。因此，左宗棠认为，“官军必先攻古牧地，撤乌垣、红庙（乌鲁木齐汉城，即迪化州城）之藩篱，乃可成捣穴犁巢之举”。

阿古柏得知清军西进的消息后，急忙从阿克苏赶到托克逊，调兵遣将，布置防御：命妥明余党马人得、马明和白彦虎等分守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古牧地等地，企图以天山为依托，以乌鲁木齐为支柱，控制南北疆的交通要冲，阻止清军南下。鉴于达坂城及其东南的狭窄河谷是东西天山的接合部，为乌鲁木齐通往吐鲁番、辟展（今鄯善），托克逊的交通咽喉，派重兵把守；为了防止清军从哈密、巴里坤方向进攻吐鲁番，还派兵一部控制要点胜金台及辟展、七克腾木（今七克台）等地。阿古柏的主力部署在吐鲁番和托克逊：吐鲁番由布素鲁克之侄艾克木汗防守；托克逊由阿古柏之次子海古拉（即哈克库里）防守，阿古柏本人则在托克逊督战。其总兵力约四万人。

二、作战经过

1876年7月，刘锦棠率所部各营到达巴里坤，并进驻古城，侦知马人得踞乌鲁木齐，白彦虎踞红庙子，马明踞古牧地。根据当面敌情，刘锦棠于21日轻骑赴济木萨，与金顺商议进军事宜，并察看地形。28日，

金顺部进驻阜康城，刘锦棠部则于城东的九运街扎营，沿途各要隘均派营守护。此时，马明已被阿古柏逮往南疆（阿古柏和白彦虎怀疑他与清军私通），古牧地由王治、金中万率兵数千驻守。为阻止清军前进，白彦虎等由红庙移据古牧地，阿古柏也派出部分侵略军助守。刘锦棠考虑到当时正收获麦豆，有粮可因，“虽后队尚未到齐，然师期不宜再缓”，毅然决定提前进攻古牧地。

从阜康至古牧地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大道，从阜康县城西行二十里至西树儿头子，有废渠可引县西之水供给饮用，但从此再往西五十里至黑沟驿，除甘泉堡有可供百人一天的饮水外，全是戈壁，供水困难；另一条是途经黄田的小道，水源充足，但敌军已在该处筑卡树栅，严密防守。显然，白彦虎企图引诱清军由大道越过五十里戈壁而来，迫使其处于前阻坚城、人马渴乏的不利境地。

8月8日，刘锦棠率军进至阜康县城西十里处，开沟引水，节节疏通，将水引至西树儿头子，就地筑垒。9日，派出步骑各队故意在甘泉堡掘井挖渠，佯装要从大道进攻。10日夜半，刘锦棠与金顺所部突然从小路偷袭黄田。11日清晨到达后，迅速抢占附近高地。接着，金顺所部从右路进攻，刘锦棠所部从左路进攻。左路又分为两翼：左翼以总兵余虎恩、陶鼎金的骑兵为前锋，总兵谭拔萃、参将董福祥、副将张俊的步兵殿后；右翼以提督黄万鹏的骑兵为前锋，总兵谭上连和提督肖元亨、戴宏胜、谭慎典、汤秀斋的步兵殿后。炮兵及辎重随后跟进。左路左翼的余虎恩和右翼的黄万鹏两支骑兵分驰下山，敌军骑兵也向前迎战。由于清军勇猛冲击，敌骑不支，不得不出动步兵配合作战，妄图阻止清军骑兵的进攻。此时，清军骑兵分张两翼，向敌左右包抄，谭拔萃、谭上连、董福祥等则率步兵投入战斗，由中路攻击敌军。于是敌军阵势大乱，刘锦棠督率步骑各营乘胜追杀至古牧地。与此同时，右路的金顺部也取得了胜利。刘锦棠鉴于古牧地城池坚固，不易很快攻下，便回驻黄田。

8月12日，清军进扎古牧地城东和东北。13日清晨，阿古柏派往北疆的数千骑兵在阿托爱的率领下，从红庙来援。刘锦棠针对敌人已在城东和东北的山地依山筑垒，加强了外围防御，并得到阿古柏派兵增援等情况，决定采取先扫外围，再攻坚城的战法。他当即命余虎恩、黄万鹏率骑兵驰赴山前严阵以待，并派步兵一部为后应；命步兵分两路攻取山垒，分两路夺占南关，命炮兵构筑临时炮台，配合步兵轰击山垒和南关之敌。战斗打响后，清军很快夺占了山垒和南关，守敌退入城中。赶来增援的阿托爱所部骑兵也被清军骑兵击败，向南溃退。

刘锦棠和金顺策马巡视古牧地，知敌军守备甚严，必须强攻，便令各营四面包围敌人：金顺部在城正西、西北、西南三面筑垒，刘锦棠部在城正北，东北、正东、东南、正南筑垒。与此同时，抽派兵勇于南城外昼夜赶修炮台，要求以高过城墙一丈为度，其它各面炮台也都培土铺板，以便安炮。8月15日，炮台竣工，刘锦棠命谭拔萃率千总庄伟等用开花大炮轰塌古牧地东北面城墙，并对准缺口进行了连续轰击。16日，

将开花大炮移至城之正东，轰开另一个缺口，接着用开花小炮及劈山炮继续进行轰击。夜半，刘锦棠传集将领布置攻城任务：命谭拔萃督同提督席大成、副将汤仁和率兵三营由城东北缺口进攻；谭上连督同肖元亨、戴宏胜率兵三营由正东缺口进攻，知府罗长祜督同副将杨金龙及庄伟率亲兵用开花大炮轰击南门，并调标针快响枪、七响洋枪以及劈山炮配置于开花大炮两侧，同时轰击南门；命谭慎典、董福祥等率部潜伏墙壕待机，一旦南门轰开，即行攻入；命知州袁尧龄、提督唐国华等率部列队于城南左右两侧，准备接应，并截击逃敌；命余虎恩、黄万鹏、陶生林等率骑兵一部分布于正南一带山冈，提督张春发，陈广发率步兵两营分布于城西南一带平地，担任警戒和截击逃敌的任务。

8月17日黎明，炮兵轰塌南城，攻城部队冲入缺口，各以火药包投向敌人。后续部队迅速挖土填壕，涌入城中展开巷战。金顺所部亦由东北面并进。敌军大部被杀，少数由缺口逃出者，也被预次的清军歼灭。当时白彦虎未在城中，幸免一死。守城头目王治、金中万及阿古柏的部将多人均被击毙。

这次战斗，歼敌近六千人（其中有阿古柏兵三百五十八人），俘敌二百一十五人，获战马二百余匹以及火药，硝磺数千斤。清军阵亡一百五十八名，伤四百五十人。

攻克古牧地时，清军缴获守城敌军头目王治、金中万向乌鲁木齐求救的信件一封，上有马人得的批复："乌城精社已悉数遣来，现在三城（按：即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及妥明所筑的伪王城）防守乏人，南疆之兵（按：折阿古柏军）不能速至，尔等可守则守，否则退回乌城，并力固守亦可"。刘锦棠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不失时机地乘虚蹈隙，除留两营兵力扼守古牧地外，即率所部于8月18日黎明急速向乌鲁木齐挺进。白彦虎和马人得不料清军来得如此迅速，一闻炮声，即弃城向达坂方向逃跑。清军在乌鲁木齐城北十余里处，即发现敌人有弃城南逃的企图，刘锦棠当即命余虎恩率骑兵三营、谭拔萃率步兵四营由左路追击，命黄万鹏率骑兵一部、谭上连率步兵四营由右路追击，命谭慎典等率步兵三营向乌城疾进。敌人望风溃逃，清军立将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及伪王城收复。阿古柏所遣援军五千骑进至达坂城后，闻败而止。

乌鲁木齐收复后，左宗棠命刘锦棠驻守该城，并继续搜捕山中逃敌，命金顺挥军西进，攻取乌鲁木齐以西各城。盘踞于昌吉、呼图壁与玛纳斯北城之敌如惊弓之鸟，清军尚未到达即弃城逃走。惟玛纳斯南城之敌，凭借城垣坚固，地形开阔，易守难攻，仍并力死守。9月2日起，金顺率部从昌吉进攻玛纳斯南城，久围不克。10月4日，刘锦棠派罗长祜、谭拔萃、董福祥等率部增援。10月13日，伊犁将军荣全也率部前往合攻。直至11月6日，才将玛纳斯南城攻克。至此，天山以北，除伊犁地区外，所有敌占据点全部克复。这时冬季来临，大雪封山，不便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清军利用这一机会，一面继续肃清残敌，一面就地整训部队，并征集粮秣，建立采粮和转运机构，准备明春向南疆进军。

乌鲁木齐的收复，具有重要意义。诚如左宗棠所说："不得乌鲁木齐，无驻军之所，贼如纷窜，无以制之，不仅陕甘之忧，即燕晋内外蒙古，将无息肩之日。若停军巴、古以东瘠区，兵少无以扼奔冲，兵多徒以耗军饷，……断难为持久之计"。由于北疆作战的速战速决，使清军巩固了在新疆的战略地位，不仅解除了敌军窜犯内地的后顾之忧，更为以后进军南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节 南疆的收复（1877年4月～1878年1月）

一、三路并进，打开南疆门户

1876年9月中旬，当围攻玛纳斯南城的战斗尚在进行之际，左宗棠即上奏清廷，提出让金顺所部（当时已增至四十余营）留守北疆各城堡要隘，办理善后事宜，“调张曜，徐占彪会同刘锦棠进规南路，并增派马步各营及枪队炮队赴前敌助剿”。清廷同意左宗棠的建议，并多次催促他“饬令刘锦棠等约定师期，并力进取南路，迅扫逆氛”。

清军在北疆的胜利，使阿古柏的支持者英帝国主义惊惶不安。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一面阻挠英商向清政府贷款，一面代阿古柏进行所谓。请降”，要求清政府准许阿古柏伪政权作为“属国”而继续存在。阿古柏为了配合英国的调处阴谋，命令“各处不要和清军纠杀”，暗中则加紧部署防御。他下令在达坂另筑一新城，控制东西天山的隘口，以其大通哈（即大总管）爱伊德尔胡里防守，并增派骑兵四五千人，使之成为天山北面的防守要点。东面则以重兵防守吐鲁番（驻有骑兵三千五百人、步兵五千人，炮二十门）。该处原有满汉两城，后又筑一坚固高大的伪王府。白彦虎，马人得溃逃南疆后，阿古柏将他们派往吐鲁番，加强该处防御。由海古拉驻守的托克逊有骑兵四千、步兵二千、炮五门，并新筑两城以资防守。阿古柏本人则坐镇喀喇沙尔指挥。这样，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构成鼎足之势，而以托克逊为重点。

左宗棠根据敌人部署，判断阿古柏军“守吐鲁番者拒哈密官军，守达坂者拒乌垣官军，皆所以护托克逊坚巢也”。他针对敌人的企图和设防情况，于11月初提出了一个三路并进的作战方案，即由刘锦棠、张曜、徐占彪各部克复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城，打开南疆门户，然后乘胜西进，收复所有失地。具体部署是：刘锦棠部由乌鲁木齐南下，进攻达坂城，为北路；张曜部由哈密西进，为东路；徐占彪部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为东北路。张、徐两部在盐池取齐，协力攻取七克腾木，辟展和吐鲁番。得手后，立即指向托克逊。届时如达坂未克，即配合刘锦棠部会攻达坂，以收夹击之效。左宗棠预计，“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三处”，“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清军能否攻下达坂，进而克复吐鲁番和托克逊，是关系到战争全局的一次作战。为了慎重起见，左宗棠一再强调：“察酌彼己情形，仍非缓进急战不可。”

按照上述方案，清军用了较长的时间调运粮食，补充兵力，调整部署，巩固后方。当时，刘、张、徐三部共计马步四十余营。左宗棠考虑到，“师行日远，留防之兵日增，进战之兵日减”，“况转战数千里，士卒之伤亡疾病又在所不免，额数有缺，则士气易堕”。因此，由关内加拨副将秦玉盛马队一营加强徐占彪部，加拨副将武朝聘马队一营加强张曜部，并令炮队游击陈文英带开花炮往助；令参将侯名贵所率炮队护开花后膛大炮两门，车架开花后膛小炮四门及后膛七响枪三百杆，赶赴乌鲁木齐，续调肃州镇总兵章洪胜、总兵方友升率所部马队两营及总兵桂锡

桢马队一营，加强刘锦棠部。为了巩固后路，防敌窜扰，左宗棠又奏调驻防包头的记名提督金运昌所部淮军马步十营出关，分屯古城至乌鲁木齐一线要隘，以保护运输线。同时，抽调徐万福等五营从安西进驻巴里坤，替换徐占彪所部蜀军的防务；以新授哈密办事大臣明春所部四营接替张曜所部嵩武军的防务。对于北路新授伊犁将军金顺所部各营，由于只担任防守，由四十余营裁减为步骑二十营，以节军饷。经过调整，既加强了后方的防护，又集中了进攻的兵力。

1877年1月9日，清廷谕令左宗棠："一俟春融冰泮，即著饬令各军鼓勇前进，迅扫逆氛，廓清疆圉。"左宗棠规定：张曜部待金运昌部过巴里坤时开始西进；徐占彪部待金部过古城再进；刘锦棠部则待金运昌抵乌鲁木齐商酌后再行南下。并指出："但能速战，则缓进未尝非策也。"但是，刘锦棠鉴于金运昌部"远道奔驰，未能速赴春融之约，而南路天气炎热甚早，麦秋收割每在春夏之交"，认为"机有可乘，时不可失，多候一日即多耗一日之粮"，决定提前进军，并约张、徐两部于4月中旬开始行动。

1877年4月14日，刘锦棠率主力一万余人及开花炮队由乌鲁木齐南下，16日进至达坂城西北的柴窝铺（今柴窝堡）时，侦知达坂城敌军尚以为清军仍在乌鲁木齐未动，只在城郊预引湖水遮断通道，造成深及马腹的一片泥淖。刘锦棠根据这一情况，立即派余虎恩等率马队九营、谭上连等率步队四营，分别于夜间乘敌不备，将达坂城四面包围。4月17日黎明，达坂守敌发觉被围，慌忙用英制快枪和开花大炮射击清军，自晨至午不绝、清军虽有伤亡，但阵容屹立如故。刘锦棠赶到后，令各营一面防敌突围，一面筑垒挖壕，准备攻城及阻援。18日，清军炮队抵达，立即察看地形，修筑炮台。当天，海古拉派来增援的骑兵五六百人接近达坂，刘锦棠派提督陶生林等率骑兵一部迎击。敌骑被清军左右包抄，大败而逃。继来增援的一千多敌骑也掉头狂奔。维吾尔族人民冒死出城报告清军：城中阿古柏军"盼援不到，官军锁围日逼，群议突围而走"。刘锦棠得此情报，传令各营加倍严防，夜间遍燃火炬，严密监视敌人动向。4月19日，清军炮兵在城东修筑败炮台竣工。当夜，用开花大炮三尊，连续轰击，先后将城中大炮台，月城及城垛炸塌。后又击中敌弹药库，引起强烈爆炸，大风骤起，火势更旺，敌军死伤甚众。守敌企图从东门突围，遭清军截杀未逞。清军乘势喊话，敌军大小头目惧降，遂克达坂城。是役，总计毙敌二千数百人，俘敌一千二百余人（其中有阿古柏的大总管爱伊德尔胡里等安集延人二百一十三名），缴获战马八百余匹，枪炮等一千四百余件，其中有大开花铜炮一门。刘锦棠下令宽待俘虏，并将俘虏中的南疆回民等全部释放，"给以衣粮，纵令各归原部"。

与此同时，由哈密西进的张曜部和出木垒河南下的徐占彪部；在盐池会师后，于4月21日克七克腾木，22日克辟展，25日克胜金台，并向吐鲁番挺进。

刘锦棠所部自4月20日收复达坂之后，于24日夜继续前进，次日上

午抵达白杨河，然后分兵两路；罗长祜、谭拔萃等率步骑六营助攻吐鲁番；刘锦棠自率谭上连、黄万鹏等步骑十四营直捣托克逊。

这时，托克逊的阿古柏侵略军正在四出抢掠，焚烧村堡，准备逃窜。被裹胁的回族士兵，得知清军优待俘虏，盼望清军早日到来。有鉴于此，刘锦棠立即命骑兵先发，步兵随后跟进。在托克逊城外经过激烈战斗，重创敌军。4月26日上午，海古拉等慌忙烧毁存粮和火药，仅率二千余骑仓皇逃往喀喇沙尔。未及逃窜的二万余人，全部投降。是役，毙敌二千余名，清军仅亡三十九名，伤五十三名。

罗长祜分领的湘军进抵吐鲁番后，配合张曜和徐占彪部会攻该城。由于白彦虎早已闻风西逃，把防务交给了马人得，而马人得见大军压境，不敢负隅顽抗，开城乞降。于是，清军顺利地收复了吐鲁番满汉两城。

清军三路并进，不到半个月时间便连下三城，为直捣敌巢、收复南疆八城创造了条件。此时，迭遭阿古柏匪帮暴虐压迫的南疆各族人民纷纷起来反抗，使阿古柏完全陷于绝望境地。这个帝园主义的走狗，由喀喇沙尔退至库尔勒后，见大势已去，遂于5月下旬服毒自杀。海古拉赶往库尔勒，携其父尸西逃，防务交白彦虎负责。海古捡逃至库车时，被其兄伯克胡里所杀。伯克胡里率部退保西四城，在喀什噶尔称王。他企图在沙俄的卵翼下，苟延残喘，进行垂死挣扎。

达坂、吐鲁番、托克逊收复之后，南疆八城门户洞开，清军本拟乘胜“整旆长驱，以符缓进急战之议”。但是，左宗棠考虑到，要进军喀喇沙尔，途中粮食缺乏，必须靠随军携带，而吐鲁番地区存粮甚少，需要从哈密、巴里坤粮局转运屯集，因此，必须等待新秋采运充足之后，才能继续进军。另一方面，在达坂就擒的阿古柏的大总管爱伊德尔胡里等曾表示愿派人劝说阿古柏投诚，左宗棠和清廷对此都一度心存幻想。直至7月下旬，确知阿古柏自杀、余部西逃之后，左宗棠才决定一俟新秋采运充足，立即向西进军。

二、长途追击，收复南疆八城

1877年8月10日，清廷谕令左宗棠：“刻下已届秋令，著即檄饬各军克日进兵，节节扫荡”。当时，白彦虎已由喀喇沙尔退往库尔勒。为了阻止清军前进，他下令决开开都河，造成河水泛滥。开都河自北而东南注入博斯腾湖，洪水期（5～8月）水宽数百米，是一条障碍性河流。白彦虎决河之后，使喀喇沙尔与库尔勒之间一百数十里的地带成为泛区，深者过顶，浅处亦及马背。此时刘锦棠禀报：一俟清军进逼，白彦虎有可能翻山北窜伊犁，玛纳斯一带。左宗棠经过分析，认为敌人屡遭失败，已出现混乱溃敞状态，其残余各部中，以伯克胡里和白彦虎两股为最大。这两股敌军的特点是：伯克胡里长于据守，白彦虎则长于流窜。左宗棠判断白彦虎“悍鸷不足，狡猾有余。现虽偷息开都河西岸，一闻官军进逼，其避兵鼠窜，自在意中”。而其流窜的方向，则有三种可能：一是

西窜库车，阿克苏一带，二是由西转北，绕道伊犁边境回窜昌吉和玛纳斯，三是往东南罗布淖尔（罗布泊）取道吐鲁番边界，东窜敦煌，入青海。在三个方向中，以窜往昌吉、玛纳斯威胁最大，因为这个方向“地势平衍，道路纷歧，难于遮截，非预为择要堵剿不可”。为此，左宗棠一面通知金顺等。远发侦探，加意预防”，一面告知新任署理乌鲁木齐都统英翰饬令金运昌部“加意侦探防剿，毋稍疏忽”。同时，调留防吐鲁番的徐占彪部回扎巴里坤与古城之间，另调记名提督易开俊率马步七营进驻吐鲁番一带。

正当阿古柏反动势力土崩瓦解、行将灭亡的时候，英帝国主义又公然出面干涉。它通过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向清政府提出保存伯克胡里汗位，将喀什噶尔作为中国“保护国”的无理要求。这时，俄土战争（1877～1878年）业已爆发，英国正忙于维护它在土耳其的利益，不可能给阿古柏残余势力以有效的援助。清廷有鉴于此，对英国再次玩弄的“调停”花招不予理睬。左宗棠更是义正词严地驳斥了英国政府的无耻谰言，指出：“安集延非无立足之处，何待英人别为立国”如果英国要越俎代庖，“则割英地与之，……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并尖锐地揭露英国不可告人的阴谋是。侵占中国为蚕食之计”。他决心乘胜追击，彻底消灭阿古柏匪帮残余势力。

（一）收复东四城

1877年9月，清军乘秋高气爽之际，开始了收复南疆八城的作战。刘锦棠率马步三十二营为前锋，张曜率马步十六营为后队，并兼筹粮运和办理善后。刘、张两部总兵力为二万余人。

刘锦棠先派数营由托克逊出发，分两路前往曲惠安营：一路沿苏巴什、桑树园子、库米什、榆树沟、乌什塔拉大道；一路由伊拉湖小道前进。沿途搬运柴草，开浚泉井，按程预备，以待大队继进。9月27日，刘锦棠部大队出发。他命步兵各营走大道，自率骑兵各营走小道，于10月2日同抵曲惠。

这时，侦知敌人已发现清军主力开始行动。刘锦棠乃于10月3日命余虎恩、黄万鹏等率马步十四营取道乌什塔拉，沿博斯腾湖南岸指向库尔勒侧背为奇兵，5日，刘锦棠自率主力沿大路指向开都河为正兵。由于开都河泛滥，刘锦棠部一面搭桥修路，一面堵塞上流。10月7日，刘部抵达喀喇沙尔城，但城空无人．水深数尺，官署民舍，荡然无存。9日，刘锦棠与余虎恩，黄万鹏会合，接着进入库尔勒，同样是一座空城。原来白彦虎劫掠四乡秋粮后，已西逃库车。此时，清军粮食不继，刘锦棠一面传令后路迅速转运接济，一面令军士觅掘窖粮，获数十万斤。

刘锦棠根据敌军西逃库车，立足未稳等情况，决定亲率精兵乘胜追击。于是，从各营中挑选健卒一千五百名和精骑一千名，先行进发，命罗长祜率后队各营及辎重跟进。清军三昼夜疾驰四百余里，于10月15日

追至布古尔（今轮台），击败敌骑千余，毙敌百余名。16日，追四十里，见前方步骑甚众，但用望远镜观察，其中持枪者不过千余人，余皆被裹胁西行的民众。刘锦棠立即传令："执械者诛，余勿问！"顿时号鼓齐鸣，马步并进，敌军败逃。10月18日，清军追至库车城外，发现大量敌军。刘锦棠立即作出三路进攻的部署：命黄万鹏等率骑兵七营从右路进击，谭拔萃等率步兵三营继之；命章洪胜等率骑兵四营由左路进击，张俊等率步兵三营继之；刘锦棠自率骑兵从中路进攻，罗长祜率后队马步跟进。战斗开始后，敌军虽遭重创，仍然顽抗，直至罗长祜所率后队马步各营赶到战场时，敌始大溃。清军乘势收复库车，并追杀数十里，毙敌近千人。白彦虎率余部狂逃，企图继续投靠已在喀什噶尔称王的伯克胡里。

清军此次由库尔勒出发，日夜兼程，六天之内前进八九百里，歼敌虽只千余，但救出难民约十万人。左宗棠随即遣员设置善后抚辑局，办理各地善后事宜。

10月19日，刘锦棠率军继续西进，21日抵拜城，闻白彦虎于20日由此西逃，便决定穷追不舍。22日凌晨，清军将士冒着冰霜，不顾困乏，向西急进。抵达铜厂时，侦知敌军正在渡木杂喇特河（今木扎提河），清军立即扑向敌人，斩杀甚众。敌人顽抗，白彦虎军居左，伯克胡里军居右，列阵于上铜厂，"枪炮环轰，连珠不绝"。清军也张两翼包抄，奋勇冲杀。副将夏辛酉跃马突入敌阵，生擒敌右路指挥官，敌军顿时大溃。清军乘胜追杀，直至察尔齐克台（今拜城西南察尔齐）西三十余里。10月23日，清军师行戈壁，裹粮而前。敌军惊魂未定，只顾狂奔，不复拒战，清军遂于24日克阿克苏城。接着，一面安抚拒绝随敌西逃的群众，一面分兵追击敌人。

据俘虏供称：敌人为了分散清军兵力，自阿克苏以后分兵两路，阿古柏军残部逃往叶尔羌，白彦虎率余部逃往乌什。刘锦棠决定暂舍阿古柏军残部，专追白彦虎。他命黄万鹂，张俊马步两营直捣乌什，调谭慎典，夏辛酉各率骑兵从翼侧绕进。10月26日，在乌什城东击败小股敌人，次日追至乌什西九十里的阿他伯什地方，只见一片戈壁，并无敌军踪迹。原来，白彦虎已从间道逃向喀什噶尔。黄万鹏等回军阿克苏，清军大队也已抵达该处。张曜所部则正由喀喇沙尔向库车前进中。

（二）收复西四城

清军于一个月之内驰驱二千余里，经过两次较大的战斗，收复了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这时，西四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喀什噶尔）的敌人内部已发生重大变化。和阗的叛军头目呢牙斯向清军请降，当闻知清军克库车后，即主动率兵围攻叶尔羌。伯克胡里闻讯，令其头目阿里达什留守喀什噶尔，自率精骑五千，前往增援，击败呢牙斯，占领和阗。当伯克胡里率兵进攻呢牙斯时，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乘机反正，率数百满汉兵民占据喀什噶尔汉城。阿里达什据回城自保，并约白彦虎围攻汉城；伯克胡里也赶忙回救

喀什噶尔。何步云等派人到刘锦棠处乞援。刘锦棠原来计划先取叶尔羌，当得知喀什噶尔何步云反正的消息后，认为速克喀什噶尔是当务之急，于是不待张曜全军到达，便分兵三路前进；一路由余虎恩等率步兵三营，骑兵二营，从阿克苏取道巴尔楚克（今巴楚东）直趋喀什噶尔为正兵；一路由黄万鹏率骑兵六营、张俊率步兵三营，经乌什取道布鲁特边境出喀什噶尔西为奇兵，约定于12月18日两路同抵喀什噶尔，形成包围之势；刘锦棠自率马步各营，经巴尔楚克直捣叶尔羌和英吉沙尔，策应攻取喀什噶尔。12月17日，余虎恩、黄万鹏等部同时到达喀什噶尔，当晚一举收复该城。伯克胡里、白彦虎等在沙俄的庇护下，分别率残部逃入俄境。余虎恩、黄万鹏等分途追击，至边界而止。12月21日，刘锦棠亲自率领的清军收复叶尔羌，然后派总兵董福祥率部指向和阗，自率主力于24日收复英吉沙尔，随即前往喀什噶尔。1878年1月2日（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董福祥部克复和阗。至此，新疆全境除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

在收复南疆西四城的作战中，清军以破竹之势，横扫敌巢，生俘数千人（内有阿古柏子女八人，阿古柏军头目多人、叛军头目余小虎、马元及反动封建主金相印父子等），缴获各冲开花炮百余门、战马万余匹、枪械若干，取得了巨人胜利。

第三节 伊犁的索还

在收复新疆的战争进行过程中，清政府多次同俄国交涉，要求归还伊犁，但沙俄政府制造种种借口，拒不交还。阿古柏侵略势力被消灭以后，清政府乘胜向饿国索还伊犁，并要求引渡白彦虎等。沙俄政府一面答称，如果赔偿饿国占领伊犁之军费，可以交还伊犁，一面唆使白彦虎、伯克胡里残部等多次回窜，骚扰边境，企图借口边境未靖，缓交伊犁。清军粉碎了敌人的骚扰，并从俘虏口供及查获俄国所给的路票，证实这些骚扰均系俄国政府所指使。

俄国政府的阴谋败露，只得答应进行谈判。清廷派吏部侍郎崇厚为钦差全权大臣赴俄交涉。1878年底，崇厚到达俄都圣彼得堡（今苏联列宁格勒）。这时，俄土战争已经结束，狡猾的沙俄政府利用清政府深恐与俄国作战的心理，趁机敲诈。在沙俄的威胁讹诈下，崇厚于1879年10月在黑海岸边的里瓦基亚（靠近雅尔达）与俄方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基亚条约》）。条约规定：俄国归还伊犁东部地区，但由中国赔偿俄国占领费五百万卢布（合银二百八十万两），并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领土，修改《塔城界约》所规定的斋桑湖地区国界，增辟由新疆到西安、汉口、天津的通商路线，在嘉峪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七处增设领事馆。这样，伊犁虽在名义上归还中国，实际上却变成一座三面临敌、险要皆失的孤城。这一讹诈性条约传出后，激起了中国朝野的极大义愤，以致“街淡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左宗棠也表示反对，主张对于解决伊犁问题必须“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而李鸿章则主张履行崇厚所订的卖国条约。清政府慑于朝野舆论，最后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并判崇厚“荒谬误国”之罪，逮捕下狱。1880年2月19日，清政府正式照会沙皇政府：崇厚所议条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窒碍难行”。同时，另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授权谈判改约问题。

俄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恼羞成怒，决定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其驻华使馆代办凯阳德扬言：“俄国并非无力量，至条约准与不准，在俄国总是一样”。与此同时，沙俄在我东北、西北边境调集上万军队进行威胁，甚至出动黑海舰队到中国黄海示威，并增兵伊犁。清廷为了自卫，也在中俄边境和沿海地区采取防御措施，并命左宗棠部署新疆军务，准备用武力收复伊犁。左宗棠拟定了分三路向伊犁进军的计划：东路由金顺率步骑二十五营一万二千余人，扼住晶河一线，严防俄军窜犯；西路由刘锦棠率步骑二十八营一万一千人，取道乌什，从冰岭以西经布鲁特游牧地区直指伊犁，中路由张曜率步骑十九营八千五百人，从阿克苏冰岭之东，沿特克斯河指向伊犁。此外，以六千人分屯阿克苏、哈密为后应，以三千人增强塔尔巴哈台防务。准备参战的部队共约五万余人。5月，左宗棠“亲自舆榇出关，誓与俄人决一死战”。6月，左宗棠进驻哈密，积极部署进军事宜。然而，清廷却在沙俄的压力下“暂免”崇厚死刑，不

久又将左宗棠调回北京。

同年7月底，曾纪泽由伦敦抵达圣彼得堡，与沙俄政府谈判。曾纪泽自称此行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深知任务艰巨。但由于此时俄土战争结束不久，沙俄又忙于镇压中亚地区少数民族的反抗，已经没有多大力量进犯中国，特别是注意到左宗棠等的军事准备，加之对曾纪泽的威胁刁难又未收到预期效果，最后于1881年2月24日与曾纪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以代替崇厚所订的条约。中国虽收回了伊犁地区及特克斯河流域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万九千平方公里土地，但条约规定“赔款”增加到九百万卢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仍被沙俄强行霸占。条约还规定中俄已定的西北边界有“不妥之处”应重新“勘改”，为沙俄下一步继续侵占我国西北领土留下了伏笔。随后，沙俄根据这个条约的原则，于1882年至1884年与清政府签订了《伊犁界约》等五个子约，分段勘定新疆的中俄边界，把七万一千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正式并入了俄国的版图。

第八部分 中法战争（1883年12月～1885年4月）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年，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化的过渡时期。在这期间，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日益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随之而来的是资本输出越来越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殖民地的依赖性更大了。它们一方面力图垄断殖民地原料和市场，一方面为金融资本寻找更多的投资场所。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加强，资水主义各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急剧变化，美、德、日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为了取得与其经济威力相适应的殖民地，不断向占有较多殖民地的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挑战，要求重新分割世界。所以，正是在七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由于法国武装侵略越南和中国而引起的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就是资木主义列强夺取殖民地大高潮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第一节 山西、北宁之战（1383年12月～1884年3月）

一、双方作战方针和部署

在法国侵略者强迫越南封建王朝签订第一次《顺化条约》之后，清政府对法国武装侵略的态度虽已转趋强硬，但统治集团内部在作战方针上存在很大分歧。主战派鉴于黑旗军屡创法军，越南义军也在北圻红河三角洲地区纷纷响应，而法军增援部队又未赶到，极力主张采取攻势。兵部尚书彭玉麟建议由广西、云南“各派骁将，率领精兵数千，督同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疾捣顺化河暨西贡敌营，覆其巢穴”。内阁学士周德润等建议迅速调回在德国定购的两艘新式军舰，会同广东水师，“突入越洋，直泊海防，封住海口”，然后以滇桂之师，由北宁、山西会攻河内。清朝最高统治者排斥了上述主动进攻的主张，决定采取保守求和的方针，即；在越南，“保守北圻，力固滇粤门户”；在中国，扼守沿海各海口与长江沿江一带。总的指导思想是希图“久与相持”，使敌“情见势绌，自愿转圜”。其实质依然是以军事上的防守达到政治上求和的目的。基于上述方针，作了如下部署：

北圻方面——以北宁为重点，山西为犄角，分别命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驰赴前敌，督率各营，严密防守，以固门户。鉴于“保全北圻，总以克复河内为要著”，决定“激励刘永福整顿队伍，联络越南义兵，相机进取，力图恢复”。

沿海方面——鉴于广东当南洋首冲，天津为畿辅重地，确定以天津，广东为重点，在沿海各省海口择要布置，以防法国海军袭扰；同时，命令长江中下游各省察看沿江形势，分布扼守，防敌兵船沿江内犯。

法国用兵北圻，其目的在于变整个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然后以之为基地，进窥中国。在清政府发出法军不得侵及北圻清军驻地的照会之后，以茹费理为首的法国内阁便决计用武力攻取山西、兴化、北宁等地，驱逐黑旗军及中国驻越军队，完全占领北圻。

山西、北宁互为犄角，瞰制河内。清军欲取河内而保北圻，非守此两地不可，法军欲保河内而取北圻，亦非夺此两地不可。因此，山西、北宁实为中法两军必争之地。法军鉴于当时山西主要由黑旗军驻守，若先攻北宁，须渡红河、新河（今急流河），且后路空虚，黑旗军随时有可能从山西直捣河内，届时难以回救，若先取山西，驻守北宁的清军不一定渡河策应。因此，决定采取先攻山西，后取北宁的方针。

1883年10月25日，法国以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在北圻的海陆军队。在待援过程中，法军在河内、海防、海阳、嘉林、丹凤等地不断增筑炮台，加强防御，同时，加宽河内至丹凤的道路，以便向山西

发动进攻。12月初，北圻法军已增至九千余人，大部分集中于河内地区，作战准备基本就绪。

在法军即将大举进攻之际，负责北圻东线防务的广西巡抚徐延旭托病滞留谅山，所部桂军计三十余营，主要集结于北宁及其附近地区，由广西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担任前线指挥。负责西线指挥的岑毓英虽奉命力保山西，但尚未起程；革职留任的云南巡抚唐炯也远在云南边境。驻守山西的部队只有黑旗军三千人，以及12月初才赶到的滇军三个营、桂军两个营，共计五千人左右。

二、山西保卫战

1883年12月11日，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按照其先攻山西、再取北宁的作战方针，率军六千人，分成水陆两队，由河内向山西进发。法军企图先夺取山西城东北的扶沙要塞及城北的堤岸阵地，再从右翼迂回城西，切断山西与兴化的联系，一举攻占山西。其部署是：第一队，以大炮舰三艘、小炮舰十余艘和民船数十只，载兵三千三百余人，溯红河西上；第二队二千六百余人，由陆路进至丹凤后，渡喝江，沿红河南岸向山西推进。陆路随行的还有大量胁从的民夫，以及五百辆弹药车。

山西位于红河南岸，是控制红河中上游的战略要地。城周长约二十里，有砖石内城和土质外城。黑旗军进驻山西后，进一步加强了这里的城防工事，并在红河上设置竹筏阻塞河面，沿河岸修筑炮台，北门至河堤相距五里，筑栅五重。刘永福鉴于山西的存亡关系重大，而协助防守的滇、桂军队为数既少，斗志又不高，因而决心发扬黑旗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依托城垣及外围工事粉碎敌人的进攻，并以确保河堤和城北市区为防御重点。在得知河内法军倾巢出动的情报后，刘永福和唐景崧（清政府派至黑旗军的官吏——吏部主事）立即巡视阵地，激励将士，准备痛击来犯之敌；同时，函请北宁清军会同越南义军乘隙进取河内，或于新河，嘉林方向佯动，牵制敌人。

山西守军五千人的防御部署是：黑旗军六个营加桂军一个营扼守城北河堤，黑旗军五个营扼守城东；黑旗军、桂军各一营扼守城南；滇军三个营扼守城西。此外，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炎等率领的越军约二千人，驻扎于南门外村落中。

12月14日上午9时左右，法军发起攻击，以舰炮和哈齐开斯机枪掩护其步兵展开，并摧毁了扶沙要塞。防守堤岸的黑旗军奋起还击，竭力迟滞敌军的行动。与此同时，刘永福命令东门外的黑旗军五个营利用地形秘密地向敌人侧后机动，以便配合堤岸守军夹击敌人。约中午12时许，迂回敌后的黑旗军突然出现于陆路法军及水路舰队之间，从翼侧攻击向西运动之敌，法舰炮火无法发挥威力。孤拔见情况危急，立即命令法军转入防御，并集中所有炮火还击黑旗军。在敌人密集炮火和机枪的阻击下，黑旗军迂回部队伤亡较大，被迫撤退。下午4时，法军重新发起攻击，城北黑旗军顽强抵抗，战斗非常激烈。当法军迫近城北堤岸

时，黑旗军从工事中一跃而出，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经过一小时激战，法军以死伤士兵二百人，军官二十二人的代价，夺取了河堤阵地。

15日凌晨1时，守军一部乘夜接近河堤，突然发起反击，冀图夺回河堤阵地。由于当晚月明如昼，加上法军拚死抵抗，偷袭未获成功，但毙伤不少敌军，并生俘非洲兵二十名、法海军陆战队兵士五名。刘永福、唐景崧知沿河阵地难保，便将守军撤至外城，分段固守。当日上午，双方调整部署，法军不停地进行炮击。下午，孤拔以主力向西机动，企图夺取扶里炮台，从西门攻入城内。刘永福判明情况后，亲率黑旗军主力增援西门，并加强防御工事。

16日拂晓，法军猛攻北门和扶里炮台。北门守军沉着应战，连续向城下投掷火药包，阻止了敌人的前进。防守扶里炮台的滇军也奋起还击，但终因炮台设施陈旧，被敌突破，撤入外城，以致敌人得以进逼西门城垣。当日上午，法军炮兵配合舰炮以猛烈炮火将西门城楼轰塌，并摧毁全部防御工事。守军伤亡较大。下午，法军由西门突入城内，守军依托市区建筑物顽强阻击，激战至夜。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黑旗军和清军乘夜从南门和东门撤出山西城，经不拔县向兴化集中。城南村落中的越军随即溃散。

侵略军入城之后，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据英国记者披露：法军“把所遇见的男人、女人、小孩——一切生物，全都杀死”。《泰晤士报》记者于次年2月前往山西采访时，目睹那里的炮台及滨河之村落，“悉被法人焚毁”，城北大村“屋宇虽存，惟寂其无人，只觉鸟鸣于屋巅而已”。

山西虽然失陷了，但守军在伤亡逾迁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浴血奋战，毙伤法军近千人，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特别是黑旗军，在刘永福“纵敌入我重地，始能痛歼”的思想指导下，敢于以劣势装备和优势装备的敌人拚杀，顽强抗击。在指挥上，刘永福能根据法军水陆并进的特点，着重加强河堤及城北城东的防御，并善于抓住战机，适时地对突入之敌实施反击。当法军集中注意力攻击城北河堤守军之际，果断地集中所有可能机动的兵力，迅速隐蔽地迂回敌后，插入进攻之敌及法军舰队之间，给敌人以突如其来的打击。对此，法军中的外国随军记者也佩服地说：“他们的迂回动作是聪明地设计出来的：华军就在法军及舰队之间，所以舰队不敢开炮……”这次反击，虽然未能奏效，但刘永福在掌握反击时机、选择反击方向、适时机动兵力等方面，表现出了他的指挥才能。

山西作战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驻守北宁的桂军无所作为。他们临战观望，既不增援山西，又不乘隙向河内方向出击，给敌军以必要的牵制，致使法军得以集中兵力西上，而山西守军则得不到友军支援，陷入孤军作战。同时，由于云南巡抚唐炯消极避战，以致滇军主力推进迟缓。直至战斗前夕，才有少量部队进至山西、兴化，起不到支援山西守军作战的作用。此外，刘永福等在作战指导上也

有不当之处。如面对优势敌人的进攻，未能利用有利地形，伏击、袭击敌人于运动之中。单纯采取固守城池的战法，自难抵挡住拥有强大炮火之敌的强攻。

山西保卫战是清廷被迫应战后的首次作战。首战失利，丢掉了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要地，不但失去了对河内法军的威胁，而且使东西两线的联系增加困难，给尔后的北圻作战造成很不利的影响。

法军占领山西的消息传到巴黎，法国反动当局兴高采烈，得意忘形，大叫什么“色当被山西掩蔽了”，企图以侵占山西掩盖和粉饰其在普法战争中色当大败的羞辱。

三、北宁等地的失陷

山西失守后，清廷命广西巡抚徐延旭严守北宁，令云贵总督岑毓英迅即出关，加强兴化方面的防御，并令两广总督张树声“选派得力将领，统带劲旅，驰赴镇南关（今友谊关），以实后路”。

1884年2月22日，岑毓英进抵兴化前线。这时，黑旗军经过休整补充，编为十二个营，共计四千余人。滇军调至兴化、临洮、端雄、宣光一线的兵力已逐次增至二十余营，约一万人。鉴于东线军情紧急，岑毓英遣唐景崧偕同刘永福率领全部黑旗军赶赴北宁。当时，岑毓英被指定为北圻东西两线军事总指挥，但他以两线阻隔，不便指挥为由，不愿挑此重担，以致东西两线军队始终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负责东线作战指挥的徐延旭，是一个贪生怕死而又体羸多病的投降派。他拥兵五十余营，二万余人，却不亲临前线积极部署作战。他一面向清廷吹嘘“北宁守御，固可无虞”一面借故留在谅山，将前线指挥权仍委诸左右两路统领黄桂兰和赵沃。黄桂兰虽为淮军“宿将”，但有勇无谋；赵沃则文弱书生，不懂军事。二人又彼此不和，对战守之策，并无通盘谋划，只注意沿北宁至河内的大道布阵设防，正面防守，不注意翼侧的掩护。

法军在攻占山西之后，由于伤亡较重，后方又不时受到越南义军的袭扰，无力继续发展进攻，只能固守山西、河内一线，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

1884年2月，由法国陆军部派来的一个步兵旅和两队炮兵、一队工兵到达北圻，使远征军总数达到一万八千余人，炮舰二十余艘。根据法国政府指令，新到的米乐将军于2月12日接替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孤拨重返舰队，指挥海上作战（后被任命为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升为中将）。米乐接任后，将法军分为两个旅，分别由副总司令波里也和尼格里二将军指挥，又以莫列波约统率北圻江防舰队。米乐按照原定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驻守山西，牵制兴化方面的清军，主力集中于河内、海阳两处，以便大举进攻北宁。

北宁西按山西，东临海阳，南拒河内，北蔽谅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驻越清军全力经营的军事重镇。它的得失，对北圻全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1884年3月7日下午，法军开始行动。米乐、波里比率第一旅由河内出发，于当夜渡过红河，扬言由嘉林渡新河沿大道向北宁前进。实际上，米乐决定避开清军设防坚固的正面，从翼侧进攻北宁。

3月8日晨，法军从两个方向同时进军：尼格里率第二旅从海阳出发，乘船沿太平江北上；米乐、波里也则以一部兵力佯攻新河，主力沿新河南岸向东疾进。水陆两路各六千人左右。同日上午，法军第二旅主力在舰炮掩护下，由扶朗两侧登陆，围攻驻守该处的四营清军。当地天主教民也四出响应，为虎作伥。守军凭借炮台工事抵抗，并派人赴北宁乞援。黄桂兰派出的三营清军于半路得悉扶朗已失，折回北宁。扼守扶朗的清军向西退至桂阳时，黑旗军一部赶到，与之并力堵截法军，使其前进受阻。黄桂兰调扼守三江口一带的党敏宣所部八营回防北宁，党敏宣避战自保，拒不执行命令。

3月11日，法军第一旅在北宁东南方向渡过新河，与第二旅会合，准备次日从北、东、南三面会攻北宁。

3月12日，法军第二旅一部在舰炮火力支援下，向桂阳、春水等地进攻，第一旅迅速向西机动，从北宁南面发起攻击；第二旅另一部由水路绕至城北，企图夺占涌球（今答求，北宁东北四公里），切断清军后路。涌球对北宁的防御有重要作用。据当时随军者记述：该处“有河宽十丈，深八尺，轮船可至河边。有土山两座，商民无不宫，敌若据此山，将开花炮近指入城，点滴不差，昼夜不绝，则城断难守”。可是，黄桂兰只派陈朝纲两营守涌球，直至3月11日，才调黑旗军千人加强该处防御，并挖地营（有被覆的野战掩体）十座。但是，第二天早晨黄又突然变计，将黑旗军调离涌球。就在这天下午，法军第二旅轻取涌球，“曳炮阜顶，俯击北宁城。弹三落，城市哗奔，越官张登惶等开城遁”。正在城外督战的黄桂兰、赵沃见情况紧急，竟放弃指挥，分别向谅江、太原方向逃跑，清军顿时全线溃散。黑旗军及少数清军试图抵抗，因大势已去，不得不撤往太原。黑旗军不久又从太原返回兴化。

3月15日起，法军分路追击清军。至19日，谅江、郎甲（今盖夫）、太原相继失守。东线清军被迫退至山区，大部溃散，余部集结于谅山，镇南关一带。

4月初，法军为转移兵力夺取兴化，主动放弃太原，仅以少数兵力在郎甲一带筑垒防守，主力经河内向山西集中。岑毓英闻风丧胆，随即将滇军主力后撤至保胜、河口一带，于是，兴化、临洮、宣光一线不久就被法军占据。至此，法国侵略军达到了占领红河三角洲全部重要城市的战略目的。

北宁作战，是双方在第一阶段中的主力决战。清军东路主力二万余人，全聚于此，为数不为不多，经营防备，不为不久。其所以一触即溃，主要是由于清廷墨守其消极应付的战争指导造成的。山西失陷后，清廷仍只是要求前敌将领“严饬各军，力保完善之地，毋使再行深入”，以致在山西战后至北宁作战前的一个多月时间内，东线清军竟无所作为，坐待法军增兵进攻，各个击破。其次，作为东线指挥官的徐延旭，“平日既无调度之方，临事复无应变之策”，前线指挥一概由彼此不和的黄桂兰，赵沃二人负责，以致北宁失陷前一日，对于前线紧急情形一无所知，失后两日，仍未得信。为此，清廷责备他“于前敌军情，形同聋聩，殊堪痛恨”。以如此昏庸之辈指挥一个方向的作战，要想取得胜利当然是不可能的。此外，桂军临战扩兵，缺乏训练，纪律涣散，也是北宁失守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延旭筹办广西边防以来，广西防军由原来的十余营增至五十余营，但求多而不求精，以致粮饷不敷，兵无斗志，且未经训练，不习火器。尤有甚者，将弁贪污腐化，毫无纪律，“此次法人进攻北宁，不过遥遥相击，并未逼攻城池，该军弁勇有室家者居半，吸食洋烟者居半，闻警先携妇女逃走，致使军械饷银濒以资敌”。

四、《中法简明条约》的签订

山西、北宁之战以后，清廷下令将徐廷旭、唐炯等人革职查办，党敏宣等军前正法，以署湖南巡抚潘鼎新为广西巡抚，以贵州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以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署理广西提督，并命原广西提督冯子材速赴前敌，接替黄桂兰统率关外各营。西太后还乘机把战败的责任推到和她有矛盾的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身上，更换全部军机大臣，命礼亲王世铎管理军机处，并让她的妹夫、光绪帝（载湉，谥德宗）的生父醇亲王“会同商办军机处要政”，又任命贝勒奕劻（后封为庆亲王）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但是，清廷关于中央和前线人事方面的变动，仅仅是为了掩饰败绩，丝毫不意味抗战决心的加强；相反，前线的军事失败，给了主和派以可乘之机，李鸿章等又加紧进行妥协求和活动了。为迎合法国侵略者的意图，李鸿章通过总理衙门，任命淮系的李凤苞接替湘系的曾纪泽（主战派）为驻法公使，以便为和谈铺平道路。法国也希望有一段休整时间，因而趁北圻取胜的有利形势，一面扬言进攻广州，一面加紧向清廷诱和。

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二）中国将驻北圻的军队调回边界，并对越法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条约一概不加过问；（三）法国不索赔款，但商品可从云南、广西输入中国内地；（四）法国答应在与越南订约时，决不出现有损中国体面的字样，（五）三个月后，双方各派全权大臣，照以上各节，制定详细条款。6月6日，法国又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顺化条约》，以确定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中法简明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法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

第二节 战争的扩大

一、法国借故扩大侵略战争

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完全屈从了法国侵略者的讹诈，正因为这样，茹费理致电福禄诺，通过他向李鸿章表示敬意。李鸿章博得了侵略者的喝采，却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连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人指责李鸿章通敌，“致比诸秦桧、贾似道”。在举国舆论的压力下，清廷只得命令驻北圻的军队仍扎原处，不得撤回。

侵略者欲壑难填，清政府的妥协政策，并没有换来它所希望的“和局”。《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的第六天（5月17日），福禄诺就向李鸿章提出：法军将于6月5日进据高平、谅山，7月1日进据保胜。李鸿章不敢答应，福禄诺当即勾销这条无理要求，并画押为据。可是，法国远征军总司令米乐竟令其陆军中校杜森尼率军北上，企图以武力强占谅山。6月22日，法军九百人（一说七百）行抵北黎（观音桥，即今北丽），接近清军阵地。清军前敌将领通知杜森尼说，没有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清暂缓进兵，“并非常合理地请求他通知法国当局转递必要的命令”。23日，杜森尼扬言“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随即指挥法军炮击清军阵地，守军被迫还击，将法军击退。此次战斗，清军伤亡三百人，法军死伤近百人，并丢弃大量军用物资。这就是法国侵略者蓄意挑起的“北黎冲突”，或称“观音桥事变”。接着，法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反诬中国破坏《中法简明条约》，乘机扩大事端。茹费理命令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暂缓讨论《中法简明条约》细节，要求中国立即从北圻澈军，并索取二亿五千万法郎的巨额赔款。

7月9日，茹费理通知中国驻法公使李凤苞：中国政府必须立即满足法国的要求，否则，法国“将有必要直接地获取担保与应得的赔偿”。7月13日，法国海军殖民部长海军中将裴龙电令孤拔遣派所有可调用的船只前往福州和基隆。孤拔随即率领法国远东舰队驶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准备直接进攻中国领土，扩大侵略战争。但由于茹费理考虑到法国占领越南后，“与中国将成为直接邻邦”，彼此造成太深的仇恨，于法国不利，因而法军这时的作战意图，主要在于“踞地为质”，迫使清廷就范。

清政府在敌人的威逼下，一面立即下令撤回北圻清军，一面以新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为全权代表，与法使巴德诺在上海举行谈判，并呼吁美，英等国进行“调解”。与政治上向敌厢服相适应，清廷在军事上并不做认真的准备。虽曾电偷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密饬各军，产阵以待”，但同时又束缚军队手脚，告以“倘有法军前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继续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二、基隆清军反击获胜

法国侵略者一面与清政府举行谈判，一面加紧推行炮舰政策，企图“踞地为质”，索取赔款。孤拔等人狂妄主张派舰队前赴江宁（今江苏南京），福州，或北上直隶湾，袭取旅顺、威海卫，威胁京师。茹费理认为法舰过于北上会引起其它资本主义列强的疑忌和干涉，不得不将法国远东舰队的攻击目标暂定为福州，基隆两处。在侵略者眼中，孤悬海外的台湾是可以轻而易举地侵占的。夺取了台湾，不但“担保政策”得以实现，而且有了新的前进基地，同时认为，一旦占据基隆煤矿，军舰燃料供应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台湾防务，初由兵备道刘璈主持。他将全台四十个营的兵力分驻各地，台南多至三十一营，台北仅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所部三营、总兵曹志忠所部六营。1884年7月16日，奉命督办台湾军务的淮系将领前宜隶提督刘铭传（新授巡抚衔）率亲兵百余人抵达基隆，加紧设防练兵，增筑炮台。当时，法舰一艘已在基隆港附近进行侦察活动。刘铭传根据基隆地形和敌情，重新组织海岸防御：以新从台南调来的总兵章高元部两营兵力扼守八尺门高地和东岸炮台，以曹志忠部六个营的主力扼守田寮港附近高地，一部扼守八斗子附近海岸，由杨洪彪率一个智扼守西岸仙洞山高地。淡水方面，则由孙开华部防守。

8月4日，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海军少将利士比率军舰两艘（“拉加利桑尼亚”号和“鲁汀”号）及法军四百余人闯进基隆港，与原在该处活动的另一法舰（“费勒斯”号）会合。当日，利士比发出“劝降书”，要守军交出基隆地区所有防御工事。守军置之不理，一面加紧备战，一面飞报尚在淡水的刘铭传。

8月5日晨，法舰逼近基隆港东海岸，上午8时开始炮击。守军奋起抵抗，炮弹连续命中敌舰，但由于弹丸威力较小，未能给敌舰以致命打击。炮战约一小时，守军炮台、工事大部被毁，弹药库也中弹起火，被迫后撤。法军陆战队约二百人先后换乘小艇登陆，占领大沙湾附近高地，进行整顿巩固，准备次日继续进攻。

刘铭传赶回基隆后，鉴于法舰火力较强，决定让登陆法军脱离舰炮火力支援后，再行反击。8月6日下午2时，法军一部沿滨海道路向基隆城前进，另一部在大沙湾附近进行掩护。扼守田寮港西侧高地的曹志忠部给前进之敌以迎头痛击，迫使其后撤。曹志忠率二百余人乘势追击。为了围歼敌人，刘铭传立即命令章高元率百余人向敌人左侧反击，并以六十人迂回敌之右侧，形成三面合围之势。法军节节败退，最后在舰炮火力的掩护下，狼狈逃回军舰。利士比无奈，率舰队退走，法军第一次进犯基隆宣告失败。

8月10日，清政府就法国在谈判期间突袭台湾提出强烈抗议，并呼吁各国“秉公评论”。可是，法国驻北京代办谢满禄反而借口“基隆事件”，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继续要求对“北黎事件”进行赔款（此时已由二亿五千万法郎减为八千万法郎），勒索未遂，便于8月21日下旗离京。与此同时，中国驻法公使李凤苞也离开巴黎去柏林，中法外交关系

完全破裂。

三、马江海战

马江又称马尾，位于福州东南，是闽江下游的天然良港。清朝除南北洋海军以外的第三支海军——福建海军和创建近二十年的福建造船厂，均在此港。马江港是一个河港，四周群山环抱，港阔水深，可泊巨舰。从闽江口至马江，距离三十余公里，沿岸形势险峻，炮台林立，仅马江附近就有七座炮台，并有部分克虏伯大炮，防御能力较强。

从1884年7月中旬起，法国军舰就陆续闯入闽江口，进泊马江，伺机挑衅，勒索赔款。当时，负责福建军事指挥的要员有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州将军穆图善等。他们根据清廷“不可衅自我开”的指令，对法舰的侵入非但不敢阻止，反而给孤拔以友好款待，同时，命令各舰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于是，法规在马江者日或四五艘，或五六艘，出入无阻。它们与中国军舰首尾相接，日夜监视港内福建海军，不许其移动，前后为时月余。其间，马江一带人民纷纷要求先发制敌，呈递“万民书”，建议潜水破坏敌舰。他们怒不可遏，坚决表示：“要是官家害怕，不敢抵抗；那抗法的事，我们愿承担下来。”但是，人民请缨杀敌的正义要求，却遭到了张佩纶等人的阻挠，直至尔后局势非常紧张时，部分民众武装才被允许参战。

8月17日，清政府见和谈无望，不得不撤回上海谈判代表，令沿海沿江各省极力筹防，严行戒备。但对马江方面，仅指示“法舰在内者应设法阻其出口，其未进口者不准再入”，并未解除不得主动出击的禁令。

当时，马江一带水陆防军的兵力已有所加强：海军舰只十一般，江防陆军逐次增加到二十余营，还有大量自动参加战备的民众武装。清军的部署是：以十一营兵力扼守马江和船厂一带江岸；十一营长门、琯头等炮台，又以民壮近二千人协守闽安至琯头沿江两岸，十一艘舰只与法舰相持于马江江面，另以旧式战船及渔船各二十余艘分泊于罗星塔两侧。张佩纶、何如璋负责指挥马江一带水陆各军，穆图善驻陡门，何璟、张兆栋驻福州。由于清廷和战不定，前敌将领昏聩无能，水陆各军缺乏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的周密计划，加之装备不良，弹药不足，因此，总的兵力虽然较法方优势，而战斗力却很弱。

8月22日，即法国驻北京代办谢满禄下旗离京的次日，法国政府电令孤拔消灭中国福建海军。孤拔立即进行战斗部署，决定于次日下午趁退潮船身转移方向的时候开战。当时，泊于马江的法国舰队有军舰八艘，共计一万四千五百余吨，另有鱼雷艇两艘，还有两艘军舰在金牌、琯头一带江面，阻止清军塞江封口，保障后路安全。参战法舰共有重炮七十七门，还有不少射速为每分钟六十发的哈齐开斯机关炮，兵员约一千八百人。福建海军的十一艘军舰（其中九艘为木质）共计只有六千五百吨，炮四十五门（大口径炮很少），兵员约一千一百人。从吨位、防

护能力、重炮数量、兵员素质等方面比较，法国舰队显然占有优势。另一方面，孤拔“只在退潮时方攻击”的决定，对法舰非常有利。这是因为，当时用船首系泊，船身随潮水涨落而改变方向（涨潮时，船头指向下游，落潮时船头指向上游），孤拔选择落潮时开战，可使大部分中国军舰位于法舰之前方，从而暴露于敌人主要炮火之下，无法进行有力的回击。

8月23日上午8时，法国驻福州副领事向何璟投递最后通牒，限福建海军于当日下午撤出马尾，否则开战。何如璋得知后，竟然对福建海军将士封锁消息，并企图要求法方把开战日期改在8月24日，遭到拒绝后，才匆忙下令进行临战准备。

当日13时56分，孤拔趁落潮的有利时机，指挥法舰突然发起攻击。福建海军舰只未及起锚，就被敌舰第一排炮弹击沉两艘（“琛航”号和“永保”号），重创多艘。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福建海军下层官兵英勇还击。旗舰“扬武”号（福建海军唯一的一艘轻巡洋舰）用尾炮准确地还击在它下游的法园浸略军旗舰“窝尔达”号，首发命中舰桥，击毙其引水和五名水手，孤拔仅以身免。正在这时，敌46号鱼雷艇向前猛扑，发射鱼雷，击沉了“扬武”号旗舰，但该艇也被清军岸炮击中，锅炉爆炸。“扬武”号沉没时，管带（舰长）兼舰队指挥张成擅离职守，泗水（一说乘小舟）逃跑。炮艇“福星”号离敌舰最近，在开战时就受了重伤，但它立即断锚转向，冲入敌阵，瞄准敌旗舰猛烈射击，连续命中。后遭敌舰三面围攻，火药库中弹爆炸，全艇官兵壮烈牺牲。受伤的“福胜”、“建胜”两炮艇也奋力抵抗，直至沉没。在罗星塔下游，炮艇“振威”号被刚从闽江口外赶来的一艘法国装甲巡洋舰“凯旋”号击穿，首尾均已着火，船身失去控制，随波漂向下游。但艇上官兵仍英勇奋战，直到最后被敌鱼雷击中沉没前的一刹那，还发射了最后一颗炮弹，重伤一敌舰舰长和两名士兵。

江面战斗仅进行了约半小时，福建海军十一艘舰艇全部被法舰击沉，海军将士伤亡七百余人，还损失了数十艘商船。法军仅死伤三十余人，有两艘鱼雷艇受重伤，其余为轻伤。

8月24日上午，法军部分炮艇乘涨潮上驶到福建造船厂附近，用重二十八公斤的榴弹轰击船厂，“对凡力所能及的东西，均予摧毁”。与此同时，法舰继续对马江附近的帆船、舢板进行毁灭性的破坏。

8月25日，法海军陆战队一部在罗星塔登陆，夺去三门克虏伯大炮。此后几天，法舰驶向下游，逐次轰击闽江两岸炮台。由于炮台门对准下游，不能掉转炮口回击从后方攻击的敌舰，因而全部被毁。这样，法舰得以鱼贯而出，退至马祖澳（今定海湾）。

马江战后，清廷撤销了张佩纶、张兆栋、何璟、何如璋等人在福建的任职，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以福州将军穆图善和漕运总督杨昌浚（改任闽浙总督）为帮办大臣，闽中防务逐渐恢复。

马江海战的惨败，固然有舰艇“我小彼大，我脆彼坚”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清廷妥协求和政策造成的。很明显，法国利用谈判麻痹清政府，以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清廷却一味求和，在军事上丧失警惕，致使马江守军仓促应战，措手不及。马尾军港形势险要，闽人张茂才就曾评论说：“天下滨海诸省，独福州海口奇险天生，当事者苟未雨绸缪，虽铁胁亦难飞渡，何至令人直捣而入哉！”清统治者唯恐有碍和谈，竟听任法舰违犯国际惯例，肆意闯入，进出无阻，沿岸炮台形同虚设。这就无异于把主动权拱手让给敌人，自己只有坐待失败的命运了。其次，前敌将领昏聩畏敌，比是招致马江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张佩纶等明知敌人“有密据要害先发制人之意”，却借口“不敢事先张皇”，不做认真的应敌准备，甚至将舰上的炮弹也控制起来。张佩纶与何如璋，都是不懂军事，只知奉承李鸿章的昏庸官僚。8月23日，当战云密布、端倪尽露之际，仍不利用早晨涨潮移转船身的有利时机，先发制敌，而这点正是孤拔所非常恐惧的。侵略者自供：“如果他们（指福建海军）于潮水来时进攻，那地位便完全倒转，提督（指孤拔）所打算可得到好处的所有优势，都将转到他们手中去，反而对我们不利。”战斗开始以后，张佩纶竟吓得神慌意乱，晕倒在地，由随从扶起逃命。那个“只图一己口腹，不顾民生涂炭”的张兆栋，以及由于有点口才而被张佩纶赏识提拔的舰队指挥张成，也都先后逃之夭夭。由这样一群战前调度无方，临阵争相逃命的懦夫庸人指挥福建前线战事，失败是必然的。此外，北洋、南洋海军各分畛域，不予支援，对马江战局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果当时的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能联合起来，发挥近海作战的长处，利用法舰远道而来、补给困难的弱点，并力围攻，完全有取胜的可能。可是，淮系、湘系军阀都把自己掌握的舰队当作巩固个人权势的资本，彼此之间经常倾轧摩擦，势如水火。福建海军受优势敌人直接威胁，一再吁请支援，直隶总督李鸿竞竞以“北洋轮船皆小，本不足敌法之铁舰大兵船”，“若一抽调，旅顺必不能保”等等为由，拒绝派舰前往马江。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荃控制下的南洋海军也拒不支援，造成福建舰队孤军苦战，全军覆没。

马江海战虽然失败了，但是，广大中国军民在这次作战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他们誓死抵抗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和上层统治阶级畏葸投降的可耻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三节 清廷对法宣战及双方战略方针

法国远东舰队偷袭马江，清政府感到有损“天朝”体面和尊严，在主战舆沦的压力下，被迫于8月26日发布宣战诏旨，命令前线海陆各军准备对法作战。鉴于法国侵略者已把战火引向中国本土，清廷认为：“惟当一意备战，应以进兵越南，规复北圻，俾彼族不敢悉众内犯，为制敌要策。”根据“牵敌以战越为上策”这一总的指导思想，在战略上确定了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方针。为此，下令“沿海各口，如有法国兵轮驶入，著即督率防军，合力攻击，毋任蔓延。其陆路各军，有应行进兵之处，亦即迅速前进”。同时，公开表示支持黑旗军首领刘永福，“著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侵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

清廷宣战后，法国为了能够继续利用香港等“中立”口岸作为基地，并取得英、美等国的煤和食品等物资供应，因而没有正式宣战。同时，法国再次从政治上对清政府进行诱降活动，由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为拉线人，大搞幕后外交，以此作为它在军事上暗中积极部署的烟幕。早在马江海战之前，孤拔和巴德诺就极力主张法舰北上袭取旅顺和威海卫，威胁清朝京畿重地。马江偷袭得逞之后，他们认为“虽然中国此次完全失败”，但“福州距离北京太远，不足使帝国朝廷获得教训”，因而“复又坚决主张将战争移至北方”。茹费理政府曾一度赞成孤拔等人的侵略计划，并令其立即在北方各海口行动，但不久又改变了决心。其所以如此，一则担心北上扩大战争，可能招致其它列强的干涉，而当时法国正对由于埃及问题同英国的矛盾尖锐化所造成的欧洲局势颇为不安，一则担心北上与北洋舰队交锋，影响李鸿章的地位，而他正是法国政府“应该尽量宽待”的未来谈判的极好对手。于是，夺取台湾北部，又成了法国侵略军的战略目标。茹费理希图通过“继续执行报复”的军事行动，迫使清政府屈服，允许赔款，或将基隆、淡水两埠口的行政、经营、海关、矿山等权让给他们，以“提供同等价值的赔偿”。北圻方面，法国政府以谅山为中国军队入越的主要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且思雪北黎惨败之耻，因而决计于两季过后占领谅山，并相机进犯广西边境，以配合孤拔舰队的海上进攻。所以，法国当时的战略方针是：东攻台北，西取谅山，踞地为质，勒索赔款。

第四节 东南沿海防御作战（1884年9月～1885年3月）

一、基隆弃守

法舰退出闽江之后，集结于马祖澳休整待援。1884年9月中旬，法军由越南调来三个步兵大队，使海军陆战队增至二千余人，军舰增至二十多艘。根据法国政府的指令，孤拔立即准备进攻台北。他决定自率五舰进攻基隆，占领基隆和煤矿，派利士比率三舰进攻淡水，得手后，两路向台北府发展进攻，进而占据台湾北部。

台湾守将刘铭传判断法军。不得基（隆）煤，万难用兵中国”，决心亲率主力扼守基隆，而以孙开华率部扼守淡水。当地民众也积极参加战备，保卫海防。

9月29日和30日下午，孤拔和利士比分别率领舰队自马祖澳出发。9月30日上午9时，孤拔率领的“胆”号等五艘军舰到达基隆港口海面，连同先期到达的“梭尼”号等三艘军舰，共计八艘。孤拔立即进行侦察，连夜部署，准备次日于港湾西海岸登陆。其登陆部队由海军步兵大队和炮队各三个、宪兵和工兵各一队组成，共约千余人。另有一批来自西贡和海防的民夫。孤拨的企图是：首先从仙洞山脚登陆，并抢占仙洞山顶，以便安设炮位，配合舰炮掩护步兵沿岸边的山脊路线绕袭基隆守军翼侧，控制通往台北府和淡水的大道，夺占狮球岭和基隆城，尔后向台北府前进。

当时，基隆清军共有九个营，以曹志忠部六个营防守港湾东岸，章高元部两个营及陈永隆部一个营防守西岸，以民众武装数百人防守基隆城。

10月1日晨6时，法军一个海军步兵大队在舰炮掩护下，换乘小艇向仙洞山海岸前进。陈永隆、章高元部坚决抵抗。经过四小时战斗，法军夺占仙洞山，炮队在山顶展开，轰击清军阵地。清军坚守二重桥一带，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中午，法军另两个海军步兵大队相继登陆，准备次日继续进攻。

在基隆交战的同时，利士比率领的“拉加利桑尼亚”号等三艘法舰也已到达淡水。刘铭传被淡水前敌营务处李彤思夸大该地敌情所迷惑，强调“沪尾（淡水）为基隆后路，离（台北）府城只三十里，……该口除沉船外，台脆兵少，万不足恃，倘根本一失，则前军不战立溃，必至全局瓦解，不可收拾”，便不听曹志忠等人劝阻，竟然连夜率主力往援淡水，仅留三百人守狮球岭高地。

10月2日，法军轻取基隆和狮球岭，由于兵力不敷分配，未敢进据基隆港东岸煤矿。刘铭传到达台北府后，发现淡水情况并不紧急，即以

章高元部援淡水，曹志忠部仍折回基隆。但由于法军已占据基隆和狮球岭，曹部只得扼守台北府东面的水返脚一带，以防法军南下。在前敌指挥官刘铭传的错误决心下，基隆轻易弃守。清廷认为，“基隆要地，岂容法兵占踞”，命令刘铭传乘法军喘息未定，“联络刘墩，同心协力，合队攻剿；并募彰、嘉劲勇助战，将敌兵悉数驱逐”。同时，命前陕甘总督杨岳斌帮办左宗棠军务，向福建增调援兵，“设计渡台”，增强台北防御力量。

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见法军在台湾进展顺利，便狂妄地声称：“我们有希望很快地把整个台湾北部，不可动摇地置于我们统制之下”耳并再次向茹费理建议，让孤拔舰队北上进攻旅顺等地。巴德诺没有想到，他所得到的下一个消息便是法军在淡水的惨败。

二、淡水获胜

淡永港位于淡水河口，沿河可直达台北府，北岸滨海沙滩便于登陆，是清军仅决于基隆的防守重点。1884年8月下旬以来，淡水守军即以木船满载石块沉塞港口，并敷设电力操纵的水雷，封锁航道；又在北岸构筑两座炮台（法军称之为红炮台，白炮台），封锁港口及海滩。

10月1日，利士比率领“拉加利桑尼亚”号等巡洋舰三艘到达淡水海面，与原在港外活动的一般炮艇会合，决定于次日上午10时开始发起攻击。利士比企图以舰炮火力摧毁岸上炮台和军营，打开港口，保障舰队在淡水河的行动自由，尔后登陆占领淡水街，策应基隆方面法军主力的作战。

当时，淡水守军由于从大陆增援的刘朝祜部两个营的到来而有所加强。章高元部两个营由基隆赶来后，总兵力增至九个营。守将孙开华判断敌军无法突破港口障碍，必然由北岸海滩登陆夺占淡水街。因此，他决心在北岸浅近纵深内利用丛林和高地预伏一部兵力，歼灭登陆之敌。

10月2日晨6时30分左右，守军趁法军逆着阳光不便瞄准之际，先敌发起炮击，打乱了利士比的进攻准备。双方展开激烈炮战。白炮台距敌较近，大部被毁。红炮台尚未完全竣工，只安好了三门一百七十毫米的克虏伯炮；尽管这样，炮战中仍然起了很大作用。法国侵略者自称：红炮台的守军十分勇敢，“不顾在他们周围落下如雨的子弹，不停发炮约一小时”。当夜，利士比派舰侦察港口航道，接着又派炮舰及小艇前往侦察和排除水雷，其中一艇中雷受伤。利士比判明水雷为电发火式，而且点火站在白炮台附近。于是，他决定派陆战队由北岸海滩登陆，避开丛林，经红炮台山坡绕到白炮台东侧，夺取点火站，引爆水雷，以打通港口航道。为完成这一任务，利士比报请孤拔由基隆增派登陆兵力前来淡水。

4日，法军援兵二百余人，军舰三艘，由基隆赶到淡水海面，连同原有兵力，共拼凑了军舰七艘、登陆部队六百余人，准备在大风浪停止

以后立即行动。

10月8日，海面风平浪静。淡水守将见法舰忽然散开，知其意在登陆，便督令各营按预定计划分散荫蔽。上午9时，法舰舰炮以榴弹向北岸海滩及守军营地猛烈轰击，掩护其登陆部队换乘小艇分三路上岸。约一小时后，法军登陆完毕，开始向目的地前进。他们因没有遇到抵抗，便不再绕经红炮台山坡，直向白炮台扑去。孙开华待敌兵逼近丛林，立率两营从正面拦击，并命令埋伏于红炮台山后的章高元部和刘朝祜部从右翼出击，围歼登陆之敌。双方展开激战。中午12时许，孙开华亲率卫队奋勇直前，各路合力齐进，与敌短兵相接，加上爱国艺人张李成率领的民兵从敌人侧后阻截，法军溃败，纷纷向海边逃窜。守军追至海滩，敌兵争渡，溺死者数十人。

此次战斗，法军被歼百余人。侵略者哀叹：“这次的失败，使全舰队的人为之丧气”。孤拔也惊呼：“我们的损失十分严重”。此后，法军除以部分舰只对港口进行监视封锁外，直至战争结束为止，再不敢贸然进犯淡水。

淡水战后，基隆法军向南进犯，清军由水返脚北上阻击，在暖暖附近展开激烈争夺，战事呈胶着状态。后来双方又陆续增加兵力，并相持于暖暖，八堵，七堵地区。

三、镇海退敌

淡水清军获胜，粉碎了法军以钳形攻势一举占领台北的企图。为了孤立台湾守军，法国侵略者于10月23日宣布封锁台湾海峡，由利士比率领一支分舰队沿台湾西海岸海域进行巡逻截击，并以三至六艘军舰在马祖澳附近海域游弋，控制南北海运和截断闽台间联系。为了保卫祖国领土，全国各地掀起了支援台湾的运动。福建前线军民利用夜雾偷渡等办法进行反封锁斗争，有的胜利到达彼岸，将一批批物资和兵员送到台湾，不断加强守军的防御力量。但是，偷渡援台毕竟缓不济急，且损失过重。有鉴于此，新授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人纷纷建议由南、北洋海军各派军舰数艘，组成援台舰队，打破敌军封锁。清政府也以“台湾信息不通，情形万紧”为虑，经过多次催促，最后由南洋派出“开济”、“南琛”、“南瑞”，“驭远”、“澄庆"五舰，交提督衔总兵吴安康统领，执行援台任务。舰队从11月起在上海进行准备，添置炮位，迟至次年1月18日才出发南下。孤拔早已得知这一消息，他决定亲率法舰七艘，拦击中国援台舰队。

1885年2月7日，孤拔率舰队自马祖澳出发，北上搜索中国援台舰只。2月12日，双方舰队于浙江石浦檀头山附近洋面遭遇。吴安康不敢与敌交锋，率舰队逃跑，“驭远”，“澄庆”两舰航速较低，落在后面，被迫驶人石浦港隐蔽。法舰追赶“开济”等三艘巡洋舰未及，便返回封锁石浦港，并于14日夜间用水雷将“澄庆”、“驭远”两舰击沉（一说自沉）。之后，孤拔得知“开济”等三舰躲避在镇海口内，便又率舰队进犯镇海。

镇海位于甬江海口，北岸为沙滩，敌舰不能靠岸，易于防守，南岸港汊较多，便于登陆。法舰侵扰东南沿海以来，浙江提督欧阳利见认识到镇海系“浙东之咽喉，防浙以防镇为急务”，便以南岸为重点，进一步加强镇海的防御。其主要措施是：充实兵力，调整部署，以一千人驻金鸡山，五千人分守南北两岸，另以二千五百人为后应，分扼镇海至宁波沿江各隘，在甬江口钉桩沉船，堵塞航道，在金鸡山险要处修筑暗炮台，安设进口大炮，台上覆土一丈，护以毛竹、草皮，又在高阜显露之处筑假垒十余座，只插旗帜，不设一兵，以迷惑敌人，并在沿岸险要处加修围墙，长堤，挖掘壕沟，密布地雷，障碍物等，从而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此外，在各乡组织民团，盘查奸细，把法国教堂的传教士全部迁至后方，派兵监护，以切断敌之内应，并高价收买外国引水人员，使其不为法军所用。

2月28日夜间，孤拔率法舰四般侵入镇海海面。欧阳利见下令沉船堵口，命各营严阵以待。援台三舰和原在港内的“超武”，“元凯”两舰也都做好战斗准备。

3月1日下午，一般法舰企图进港侦察，被北岸招宝山炮台守军开炮击退。接着，四艘法舰合力来犯，守军岸炮和舰炮一齐轰击，击穿敌先头一舰。法舰不支，施放烟幕逃走。当夜，法军以两小船于乾口门靠岸，企图登陆偷袭，被守军击退。3月2日，受伤法舰驶离镇海，其余三舰仍泊原处。入夜，法以二鱼雷艇进行偷袭，又被守军水陆炮火击退。3日上午，孤拔再次率领舰队进攻；同样遭到守军的猛烈炮击，其中一舰烟筒中炮受损，各舰掉头逃跑。此后，法军又数次利用夜暗进行偷渡和鱼雷攻击，均遭失败。孤拔智穷力竭，不得不干3月7日率队南返。

此次镇海作战，由于守军预有准备，水陆防守严密，伤亡甚少。法军则有两艘巡洋舰负伤，两只舢板沉没，并死伤不少官兵。孤拔本人也中弹受伤，后死在澎湖岛上。

第五节 北圻陆路反攻作战（1884年10月～1885年4月）

一、双方作战方针和部署

清廷于1884年8月26日被迫对法宣战以后，虽然确定了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方针，命岑毓英催促刘永福赶紧督军进取，又令岑敏英、潘鼎新率滇、桂各军速赴北圻战场，尽力反攻。但是，究竟如何反攻，开始并不明确。后来根据前方奏报，才逐渐确定：东线桂军进攻谅江、太原，西线滇军和黑旗军进攻宣光，并推进到白鹤、永祥附近地域；两军在太原、永祥一带会师后，合力进攻北宁、河内。10月初，清廷鉴于基隆失守，更急于攻法之所必救，电令北圻各军力图进取，“直逼西贡等处，庶使分兵西援，台湾乃可稍松”。对此，岑、潘二人一开始就没有信心。潘鼎新当即表示：“台北吃重，此间一军前进，恐不足牵制，法方于河内、北宁增兵迎拒，西贡万难骤达。”岑毓英也强调。西贡系南圻地方，隔顺化及宁平、南定等处，皆有法人坚守，道阻且长，万难进取。”潘鼎新和岑毓英等固然有畏敌怯战的一面，但清廷进军西贡的要求也是当时清军兵力难以胜任的，这反映了清廷战略指导上的无知。

法军方面，因米乐回国养病，由波里也于9月8日接任远东军总司令。当时，北圻法军计有第一、第二两旅及内河舰队等共约一万八千余人，分守陆岸（今陆南），谅江、太原、宣光、馆司等前沿要地，兵力比较分散。波里也根据法国政府东攻台北，西取谅山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北圻采取西守东攻的作战方针，即西线坚守宣光、兴化，东线集中兵力夺取谅山，得手后，再转兵西向。

二、东线桂军反攻失利

东线桂军奉命再度开赴北圻战场后，开始进展顺利，至1884年9月中旬，署理广西提督苏元春率领的桂军主力十三个营（约四千八百人）进抵船头（今陆岸），10月初曾一度攻占陆岸，与此同时，记名提督方友升及总兵周寿昌等所部九个营（约三千二百人）进占郎甲及其以北地区。上述东、西两路桂军“互相犄角，自为战守”。潘鼎新率淮军五营及道员赵济川一营驻谅山，“整理操练，以备两路策应”。此外，副将马盛治所部六个营驻于牧马、新街一带，牵制太原守敌。东线清军兵力共约一万二千人，然而，“营哨各官大半代理，精壮能战者仅十之二三”。

这时，法军已在河内、北宁集结完毕。波里也为了粉碎东线清军的反攻，进而夺取战略要地谅山，以第二旅编成两个纵队，分别进攻郎甲、船头，以第一旅一部兵力配置于谅江附近，准备随时机动。法军主力于10月3日自河内出发。

10月8日，尼格里率领第二旅主力约三千人进攻谅江北面十余里的郎甲。驻守该村的方友升等麻痹大意，没有做好必要的防御准备，对关

系郎甲安危的南堡高地也未予以足够重视。因此，法军轻取南堡高地，随即在此布置炮兵，以密集炮火掩护主力从两侧迅速包围了郎甲村。守军仓促应战，除方友升率领一部撤至郎甲东侧高地外，尚有数百人被围于村中。清军为解救被围部队，两次由侧翼反击敌军炮兵阵地，均未成功。法军乘势抽出部分兵力进攻村北高地周寿昌部。该部兵力数倍于进攻之敌，但稍事抵抗就向观音桥、屯梅方向溃退。法军接着全力进攻郎甲村，守军浴血奋战，与敌人肉搏拚杀，直至全部牺牲。此战，清军伤亡七百余人，法军死伤百余人。尼格里也在这次战斗中受伤，暂时返回河内。波里也兼统第二旅，以一部兵力守郎甲，其余撤至谅江，后又向东增援船头。

进犯船头的法军第二旅一部千余人，由端尼埃上校率领，搭乘炮舰五艘，拖船十余只，于10月2日离北宁，经七庙，沿陆南江（今陆岸河）前进。苏元春率领的东路清军在船头附近筑杍堑壕、堡垒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并在西南二十里的尼村附近配置部分兵力，防止敌军上岸。10月6日上午，法军进至尼付，舰炮齐发，与守军展开激战。清军伤亡较重，但仍竭力抵抗，终于迫使敌人后撤。此后，双方相持于船头以西地区。9日，法军得到增援，10日再次发起进攻。清军总兵陈嘉督军迎战。当法军第一梯队四个连向船头主阵地冲击时，陈嘉以一部兵力依托阵地顽强抵抗，亲率主力向法军右翼猛烈反击，将敌两个连大部歼灭，并击毙其右翼指挥官。残余法军狼狈逃窜。与此同时，法军左翼两个连仍在拚死挣扎，端尼埃也以其所控制的机动兵力在炮兵及舰炮火力支援下疯狂反扑。陈嘉见翼侧受到威胁，主动撤回主阵地。此后，战斗又成对峙状态。

清军在船头重创法军精锐部队，歼敌二百余人，士气为主一振。法国侵略者为船头守军“这样奋不顾身地激烈作战”而惶恐不安。但是，株守谅山的潘鼎新未能及时调部增援。苏元春在获知西路郎甲失守、后援无望的情况下，便于10月11日夜间率部撤回谷松。

郎甲、船头既失，桂军东、西两路的形势为之大变，战局开始陷入被动。清廷力促滇、桂两军联成一气，规复北宁、河内，甚至直捣西贡的战略意图，随之戍了泡影。但是，这时法军对台湾淡水的进攻遭到失败，士气为之沮丧。巴德诺声称：“尼格里将军在郎甲的胜利，在某种范围内，可减轻台湾消息的令人不快印象，但其效能，是否将被北京朝廷敏锐地觉到，尚属疑问。我们东京的远征队，距离中国边境还太远，不能使帝国政府受到严重的警告。”茹费理也认为只有乘胜向广西边境推进，方足以“有力引起帝国政府的忧虑”。然而，波里也在攻占郎甲，船头之后，鉴于援兵未到，加之后方受到越南义军的牵制，无力继续发展进攻，不得不暂取守势，于是将主力撤回北宁、河内，以一部兵力在船头、郎甲一线巡逻警戒。12月以后，法国陆续增兵远东，三分之一赴台，三分之二赴越，并将北圻战场的法军改归陆军部指挥（原由海军部指挥）。在待援期间，波里也积极进行攻取谅山的各种准备，以船头为基地，修筑工事，道路，屯积作战物资。

清军方面，西线滇军和黑旗军已于1884年10月底进抵宣光城下，正在竭力围攻。东线桂军也陆续补充了兵力，调整了部署：以驻谷松的苏元春、陈嘉所部十八营为中路；以驻观音桥的杨玉科、方友升所部九营为西路，以驻车里、那阳一带的王德榜所部湘军十营为东路，另以叶家祥所部淮军五营、董履高所部桂军五营驻谅山为后应。此外，马盛治所部桂军六营仍驻新街一带。以上共有兵力五十余营，约二万人。

为了策应西线的军事行动，打乱北圻法军西守东攻的作战部署，清政府曾命令东线清军乘北圻法军转入防御之机，主动出击，先发制敌。但是，潘鼎新根据李鸿章“切勿攻坚伤精锐”等指示，仅以小规模的出击牵制船头方向的法军，作出一点策应西线作战的姿态。12月16日，中路清军二千人在纸作社（船头东北）伏击法军巡逻部队，毙伤敌军百余人，取得了胜利。年底，东路湘军进至船头东面的丰谷，准备配合中路进攻船头。1885年1月3、4两日，丰谷清军突遭法军四千余人猛烈攻击，“王德榜督军苦战，死伤颇多，因少后门枪，且子药已尽，势难抵御”，被迫丢弃大量物资，撤回车里。潘鼎新恐法军由那阳迂回苏、王两部之后而攻取谅山，急忙从谅山调淮军两营守那阳，并要求清廷迅速增援。

在此以前，两广总督张之洞也认为法军专注谅山，“桂军各道分防，兵力尚薄，必应由东路再增劲兵，以收犄角夹击之效”，于是命冯子材率粤军十营，总兵王孝祺率淮军、粤军共八营，分别由钦州、梧州起程，经由广西赴越。由于谅山吃紧，冯子材以八营由上思州直接入越，协同王德榜部守东路；自率两营赴龙州筹办粮饷军械和招募新兵。王孝祺部中途哗变，溃散近半，至龙州时不及二千人。

1885年1月底，法军第一、第二旅主力七千余人，在船头一带集结完毕，准备转守为攻，向广西边境大举进军。法军扬言分两路前进：一路攻谷松，一路攻车里。实则全军指向谷松，并力进攻中路。

潘鼎新企图阻止法军进攻，命中路清军（包括新配属的董履高部五营）前出到竹山附近高地设防。2月4日，法军集中炮火轰击竹山清军营垒，随即展开猛攻。守军顽强抵御，但因仓卒移防，工事不坚，伤亡甚众，被迫后撤。次日，法军再次发起攻击，守军不支，退守谷松。2月6日，法军在炮火掩护下猛攻谷松，清军被迫撇至谅山南面三十五里处的委坡一带。

中路清军溃败，谅山垂危。“东西两军相去远，闻调赴援，一日之间号令屡改。”潘鼎新时而令王德榜、杨玉科等部回援谅山，时而令其仍扎原处，时而令其夜袭法军后路，最后又令其飞援谅山，但为时已晚，无济于事了。就在2月12日，法军攻占委坡，潘鼎新于当夜逃离谅山入关，苏元春随之率部退入关内。2月13日，法军未经战斗，即占领了战略要地谅山。

至此，法军在东线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波里也随即于2月17日

率领第一旅（约三千人）离开谅山，以便经河内赶赴西线，解救被围千宣光的法军。

谅山弃守后，冯子材毅然以守关自任，亲率一营从龙州赶到镇南关，和王孝棋部一起拦截溃散兵丁，并急调协守东路的冯军八个营回守镇南关。可是，潘鼎新竟“告以守关无须该军，令仍顾东路”。

2月19日，西路杨玉科部自观音桥，屯梅绕道撤至文渊（今同登）。杨玉科以主力防守文渊两侧高地，自率一部驻镇南关。2月23日，尼格里指挥法军第二旅进攻文渊，守军浴血奋战，节节抵抗。杨玉科亲临前线指挥战斗，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但由于清军发射的炮弹多未爆炸，未能予敌以大量杀伤。午后，杨玉科中炮牺牲，守军随即溃散，退入关内。法军乘势侵占镇南关，前锋一度侵入我国境内近十公里的幕府附近。

由于兵力不足，补给困难，加之不时受到当地群众武装的袭扰，法军于2月25日炸毁镇南关城墙及其附近工事，退回文渊、谅山。根据波里也离开谅山前的指令，法军在镇南关废墟上立一木牌，上书“……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但是，当地军民在同一地方写着：“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以此作为对侵略者的回答。

冯子材闻镇南关失守，立即疾驰二百余里，由东路统兵回援；王德榜也率部赶回，驻于镇南关东面三十里的油隘一带。

潘鼎新则畏敌如虎，在文渊战斗之前，即由镇南关继续后逃至幕府。2月23日，正当文渊前线激战之际，他又经凭祥、海村连夜逃到关内一百余里的龙州，由于遭到当地各阶层人民的愤怒斥责，“始乘船由水路返海村，日驻岸，夜驻船”。事后，他竟谎报自己在文渊战斗中“督亲兵助战，枪炮声震山谷，逆党（法军）纷纷倒地”，并诡称由他指挥各军“收复”了镇南关等等，以推卸东线反攻失利的责任。

东线清军反攻失利，主要原因在于前敌指挥潘鼎新消极怯战，畏敌如虎，以致屡误战机。“潘军不是没有战争经验，又用新式枪械，节节败退，完全是接受李鸿章失败主义的影响。”潘鼎新在作战指挥上，明显地犯了消极被动、分兵把口的错误。东线清军顺利进抵船头，郎甲一线以后，正值法军兵力分散，援军未到和越南义军纷起袭扰的有利时机，战场的优势和主动，基本上在清军方面。然而，潘鼎新却滞留谅山，与西线方面互相观望，消极等待，强调“一俟滇军牵制西路，此间有隙可乘”，才能“趁势袭取”，使法军得以从容集结兵力，分别夺取郎甲、船头。清军被迫退守山区，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尔后，清军经过调整补充，实力大为加强；法军则因国内援军未到，宣光被围，处境相当困难，不得不转攻为守，仅以部分兵力守备前沿阵地。这时，清军在全局形势上仍有可能挽回颓势。以越北山区的有利地形，完全可以正面钳制，侧后攻击，粉碎法军的进攻。可是，由于清军在总的战略指导上消极被动，以致在兵力部署上仍将前线数十营部队分散于观音桥、谷松、

车里各点，正面宽广，没有形成重点，加上配置于谅山纵深的兵力又没有适时向前机动，起不到预备队的作用，以致形成前后分兵把口，被动挨打的态势。在作战过程中，潘鼎新决心犹豫，朝令夕改，不能组织第一线各部之间的相互协同，特别是法军专攻中路，苏元春部节节败退之际，没有及时机动翼侧军队加强纵深防御或向敌人侧后出击，使法军得以长驱直入，连续突破中路防御，直逼谅山。此外，清军中派系矛盾的长期存在，也严重影响了各部之间的统一与协同。如王德榜“自负湘中老将，每与督师（潘鼎新）龃龉”，潘鼎新便有意“征调屡更”，使之无所适从，疲于奔命，最后反诬王“催援不至”。丰谷之战，苏元春不及时援救王德榜部，法军攻中路苏元春部时，王也就消极观望，不主动支援，给了法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三、西线滇军东下受阻

在正式对法宣战前后，清廷多次命令西线指挥官岑毓英再度督师出关，与东线桂军合力规复北圻各城。但岑迟至1884年9月28日才命令原留驻于文盘、大滩一带的黑旗军十个营（约三千七百人）、滇军张世荣部五个营（约二千五百人）分道前进：黑旗军黄守忠、吴凤典两部由山路绕赴陆安，出馆司之后；刘永福、张世荣率部沿红河直下，期收夹击之效。岑毓英企图先后夺取馆司、宣光，并以集结于云南边境的滇军主力六千余人沿红河逐次进占夏和、清波以及临洮等地，得手后，再与东线清军会师，并力进攻北宁、河内。

北圻法军为贯彻其西守东攻的作战方针，于10月11日撤走馆司守军，以便缩短防线，固守兴化、端雄、宣光，保证河内以西地区的安全。岑毓英鉴于馆司之敌自动撤离，便将黑旗军及滇军张世荣部集中指向宣光。

宣光城筑有石墙，依山傍水，“向称天险，城内一山耸峙，悬炮可击外军，城外植竹五六重，兵难破入”。10月中旬，清军陆续进抵宣光附近，因法军水陆防守甚严，便在离城十里的琅琯、中门等处扎营。此时，东线桂军已失郎甲、船头，清廷严令滇军速进，以分敌势。岑毓英乃于10月20日由保胜移驻文盘，并调原驻扎于云南边境的记名提督吴永安、邹复胜所部四千人和记名总兵覃修纲所部二千余人进扎馆司、夏和、清波一带，伺机向兴化等地进击，威胁敌军后路；同时，令宣光清军逐步进逼城下，四面围困敌人。

法军为确保宣光，稳定北圻西线防御态势，从11月4日至12日，多次派兵增援，但大都被清军击退。11月12日起，清军于宣光东南十余华里的左育地方清河（今泸江）两岸挖筑地营，并将以前截获的船只装石塞河，以期截断法军水路交通。11月18日，法军端雄、山西地区指挥官多米尼亲率步、炮、工兵千余人，搭乘炮舰五艘、民船十余只，趁连日大雨、清河水涨之机，增援宣光，遭到埋伏于左育清河两岸的清军夹击，不能通过。次日，法军舍舟登岸，分两路进犯左育。清军依托地营毙伤法军百余人，但因工事尚未全部构成，又遭敌人腹背夹击，被迫撤

出阵地。法军立即上船，驶抵宣光，加强了城防力量。岑毓英强调必须先取宣光，滇桂各军联为一气，才能相机进取，因而使黑旗军和大量滇军长期顿兵于坚城之下，不能东进，坐视法军集中兵力专注谅山。

12月，清军围城部队又得到补充。月初，唐景崧在龙州招募的四个营（二千人）经牧马进抵宜光城外（后又扩编为六个营）；月底，记名总兵丁槐所部十三小营（共三千人）出马白关，经河阳（今河江）进至宣光。1885年1月中旬，岑毓英由文盘进扎馆司，随即派兵三千六百人由记名提督何秀林率领前往宣光方向，进一步加强围城兵力。在此期间，宣光清军重新调整了部署：山黑旗军和何秀林部担任阻援，唐景崧、丁槐（兼统张世荣部）两部分驻城北和城南（均离城一公里左右），担任攻城。

1月26日，唐、丁两部合力夺取宣光城南法军据点，法军开东门出援，双方展开激战，彼此伤亡很重。后因何秀林部赶来增援，法军又撤入城内。接着，清军采用“滚草龙”的战法，于31日夺取了南门炮台，并歼敌二百余人。此后，法军被迫龟缩城中，由于水路被黑旗军切断，供应日缺，处境极艰，只好用玻璃瓶、竹筒等封装求援信，投入清河顺流而下，向端雄，河内告急。2月，清军连续攻城，多次挖地道用地雷炸开城墙，从缺口突入城内，但因法军阻击火力较猛，均未成功。

波里也为解宣光之围，亲率由谅山撤回的法军第一旅溯河而上，2月27日于端雄登陆，与不久前派出的先遣部队会合。清军侦知法军大队来援，立即由何秀林部拨一千人前往左育，协助黑旗军阻援。另以覃修纲部二千人出扎临洮府附近，待法军攻左育时，向端雄前进，断敌后路。3月2日，法军分路进攻左育及对岸的同章。左育黑旗军依托地营顽强抗击，并引发地雷，多次打退法军的冲击，毙伤大量敌人。后由于防守同章的黄守忠部黑旗军被敌击溃，法军占据对河高地，安设炮位，向左育黑旗军轮番炮击。刘永福所部黑旗军伤亡近千人，不得不撤出左育阵地。新赶到的何秀林部也不支败退。覃修纲部进至端雄，闻法军已抵宣光，只得仍回临洮、清波。

岑毓英见宣光法军兵力大增，随即命令疲惫不堪的围城部队撤至宣光附近山区休整，唐景崧所部六营则经占化撤往牧马。西线清军围攻宣光的计划半途而废，东下河内的意图随之落空。据岑毓英奏称：此次以近万人攻城，“历三十五、六昼夜，久雨泥滑，死者一千数百余人，伤者二千余人，疲惫不堪，不能不暂为休息。”岑毓英明知“顿兵坚城，徒伤精锐”，唐景崧也“明知攻坚，兵家下策也”，可是又强调“事急不得不攻，且城垂拔亦不肯松劲”。不难看出，此次行动的失利，实属作战指导上的严重错误所致。以滇军当时的兵力，一面围宣光，一面沿河东进，威胁河内，使敌不敢增援宣光，是可能办到的。此着不行，顿兵坚城，反为敌所牵制，置优势兵力于无用，宣光既久攻不下，就应适时把作战重点改为打援，援兵既挫，宣光不难攻下。此着又不用，结果丧失主动，为敌所败。

四、清军陆路大捷

（一）临洮败敌

1885年3月，法军既解宣光之围，即以第一旅留守宣光，其余部队撤回端雄、河内等地。接着，波里也企图向兴化以西红河两岸滇军发动进攻，进一步改善法军在北圻西线的态势，保障主力继续在东线发展进攻。岑毓英获此情报，即令覃修纲部（此时约为四千人）严守夏和、清波、锦溪等红问两岸要点，令云南农民军竹春、陶美等部千余人及越南义军一部，与滇军李应珍部共同防守临洮府以东村落，刘永福则率黑旗军进驻临洮。

3月23日，法军非洲兵千余人及越南教民一批，由兴化渡红河，进攻临洮东南的山围社。在此防守的中越军民联合部队坚守地营，沉着应战。待敌接近时，枪炮齐鸣，并引发地雷，打退了进攻之敌。法军连续几次冲击，守军均依托工事，发挥近战火力，顽强奋战，毙伤不少敌人，守住了阵地。傍晚，正当法军进退维谷之时，与刘永福有联系的越南义军在村落四周遍插黑旗，用中国话齐声喊杀。法军以为突遭黑旗军包围，惊魂落魄，纷纷脱掉军服，乘夜从附近的河沟泗水，偷偷向越池方向逃窜。守军没有发觉，未予追击。

中越军民在临洮附近大败法军，毙伤敌军数百人，缴获法军红白衣裤、军帽等千余件。这是西线战场上取得的一次较大胜利。这次战斗的主要特点，是中越两国军民紧密配合，英勇战斗。另外，守军充分利用地形，构筑了比较适应当时作战情况的野战工事——地营，减煞了敌人的火力优势，弥补了自己火力不强的弱点，也是这次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景崧对滇军构筑地营一事．作了相当详细的记载，这表明滇军在这方面有其独到之处，至少在他看来，如此完善的地营是当时战争中的新鲜事物。

“野战筑城工事具有和军队同样悠久的历史。”“兵力上处于劣势的军队，可借以成功地抵抗优势敌人，因而野战工事能对战局的结果起重大影响。”随着野战炮兵的大量使用和火炮射速与弹丸威力的加大，仅凭地面工事远远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从而迫使人们向地下发展，构筑既能防护自己、又能攻击敌人的地下工事。地营的出现和发展，正是战争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中法战争中，滇军和黑旗军一直重视这一作战手段，“扎营之处，兵卒均荷锄铲刀锯之类，掘地锯木”，修筑基本上相当于今日有被覆的野战掩体的地营，在各次战斗中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镇南关大捷

在潘鼎新不战而逃、东线法军直逼广西国门的情况下，龙州等地商民惊徙，游勇肆掠，难民蔽江而下，广西全省大震，形势十分严重。清廷以广西关外各军迭次失利，于2月17日电令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

务。冯子材虽已年近七旬，但“久任广西提督，三次出关，威惠素著，得桂、越人心”。由于潘鼎新远离前线，前敌将领公推冯为东线总指挥。冯子材决心“保关克谅”，并相机收复北圻各城。他一面调整部署，令部下赶修工事，一面整顿军纪，安定民心，迅速稳定和改善了防御态势。

与此同时，清政府通过总税务司赫德的私人代表金登干在巴黎与法国政府之间的秘密谈判正在加紧进行。由于法军在北圻东线占领谅山之后，接着于3月3日在西线解了宣光之围，法国政府急于趁胜迫和，以缓和国内人民对旷日持久的战争所表现的强烈不满。为了保证它在和议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法国政府要求东线法军继续发展进攻。波里也随即于3月16日电告尼格里：现在正与中国进行谈判，若能对龙州有所动作，派北非骑兵前去，将大有裨益。你看有什么办法，可以使中国人相信我们不久就要向龙州进攻。接着，波里也向谅山方面增派援军。尼格里认为威胁龙州是“玩一种危险的把戏”，但还是积极备战，待命行动。

根据当面敌情和广西中越边境的地形条件，冯子材经过反复勘察，选定关前隘（今隘口南）附近的有利地形构筑防御阵地。关前隘在镇南关内约八华里处，东西两面高山夹峙，中间为宽约二华里的隘口。东面的大青山高八百余米，向南倾斜与小青山相连，再南为马鞍山，一直延伸到镇南关的东面。西面的凤尾山高六百余米，同样向南倾斜，直至龙门关（一东西向峡口，有小路可通扣波），然后经一座大石山延伸到镇南关的西面。关前隘南面的谷地宽二华里多，谷地南端有几座小石山，往南直至镇南关都是起伏不平的山丘，统称横坡岭。冯子材命令部队在关前隘附近筑起一连土石长墙（长三里多，高约七尺，宽约四尺），横跨东西两岭之间，墙外挖掘四尺宽的深堑，以利坚守，并在东西岭上修筑堡垒多座，构成一个较完整的山地防御阵地体系。

在兵力部署上，冯子材亲率所部冯军担任关前隘正面防御，扼守长墙和山险要地；王孝棋部八个营屯于冯军后面半华里处，作为正面防御的第二梯队，王德榜所部湘军十个营屯于油隘，保障入关旁路的安全，并相机袭击敌后，苏元春及陈嘉所部桂军十八营屯于幕府（关前隘之后五华里），作为总预备队，魏纲所部鄂军八个营驻平而关，控制由封（今七溪）至龙州的水道。此外，蒋宗汉部（杨玉科阵亡后，所部由蒋统领）及方友升部共十余营屯于凭祥，潘鼎新率淮军五营屯于海村，以镇后路。加上驻龙州、新街等处部队，东线清军总兵力约达八十余营。

3月9日，尼格里派北非骑兵和越伪军各一部，企图由文渊经扣波进占艽封、牧马，绕出镇南关之北，摆出一副威胁龙州、切断唐景崧部（当时已由宣光撤至占化）和马盛治部（驻新街）归路的架势。冯子材根据越南人民提供的情报，立即派驻龙州的冯军五个营前往扣波，苏元春则率桂军暨魏纲部前往艽封。3月13日，法军进至艽封，见清军已先期到达，便掉头南撤。到达扣波的冯军奋力拦击，法军败回文渊。尔后，苏元春部仍回幕府，魏纲部八营和冯军五营则分别留守艽封、扣波。

3月21日，冯子材为打乱敌人的进攻部署，不顾潘鼎新等人的阻挠，决定先发制敌，毅然率王孝祺部出关夜袭法军前哨据点文渊，一度冲入街心，毙伤不少敌人，并毁炮台两座后主动撤回，取得了较大胜利。由于清军的主动出击，尼格里感到自己已处于被动地位，为争取主动，他不待援军到齐，决定提前发起进攻。

3月23日晨，法军第二旅主力一千余人趁大雾偷偷进入镇南关。上午10时30分，大雾开始消散，法军便分两路进攻：主力沿东岭前进；另一路沿关前隘谷地前进，企图在主力夺取大青山顶峰大堡之后，两路前后夹击，攻占关前隘清军阵地。此外，法军一部近千人配置于镇南关东南高地，作为预备队，并向油隘方向担任警戒。冯子材立即商请驻于幕府的苏元春部前来接应，又通知王德榜部从侧后截击敌人。冯子材自率所部和王孝祺部奋力迎击当面之敌。法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经过几小时的拚死争夺，占领了尚未完工的东岭五座堡垒（分别构筑于小青山五个相连的山峰上）中的三座。冯子材见形势逐渐危急，激昂地高呼：“法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何以生为！”冯、王两部将士在爱国热情激励下，誓与长墙共存亡，个个奋不顾身，英勇抗击，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下午4时许，苏元春、陈嘉等率部自幕府赶来增援。不久，蒋宗汉、方友升部也闻讯赶来。各部奋力抵抗，战斗甚为激烈，彼此势均力敌，死伤相当。当天，王德榜部自油隘出击法军右翼，牵制了敌预备队的机动，并一度切断敌人运送军火，粮食的交通线，有力地配合了东岭的战斗。入夜，清军进一步调整部署，由苏元春部协助冯军守长墙，王孝祺部守西岭，陈嘉部守东岭，蒋宗汉、方友升部扼守大青山顶峰。冯子材还派人持大令飞调驻扣波的五营冯军前来抄袭法军左翼。附近群众连夜挑水送饭，赶运弹药。将士们磨刀擦枪，修补工事，严阵以待。经过一番整顿，前线军民更加同仇敌忾，决心与侵略者血战到底。

3月24日晨，尼格里指挥法军分三路再次发起冲击。在侥幸取胜的心理支配下，尼格里首先派其副手陆军中校爱尔明加率兵一部，利用大雾偷偷向大青山顶前进，企图突然夺取大堡，控制东岭制高点，但由于地形险峻，道路难行，法军偷袭未逞，不得已沿原路退回。上午11时许，尼格里见山顶久无动静，以为偷袭部队已不战而占领了山顶大堡，便命令以猛烈炮火轰击清军正面防御工事，企图掩护沿谷地前进的法军接近长墙，配合东岭法军一举突破关前隘阵地。冯子材立即传令各部统领：“有退者，无论何将遇何军，皆诛之！”并于各路设卡，堵截逃兵。当敌人接近长墙时，冯子材持矛大呼，率领两个儿子跃出长墙，冲入敌阵，展开白刃格斗。全军将士见主帅身先士卒，一齐大开栅门，向敌人冲去。当地人民群众和部分散兵游勇也主动前来助战，“伺便随处狙击”。中午，从扣波赶来增援的五营冯军在游击杨瑞山、都司麦凤标等率领下，由摩沙村（龙门关西口）冲进龙门关，突然出现在法军侧后，给进攻之敌以意想不到的打击。经过一场激烈的殊死战斗，中路法军狼狈退回谷地。在关前隘长墙激战的同时，陈嘉、蒋宗汉相继率部反复争夺被法军占领的东岭三座堡垒。直到傍晚，王德榜部在击溃敌之增援部队及消灭其运输队后，从关外夹击法军右侧后，配合东岭守军夺回了全部敌占堡垒。这时，王孝祺部也已击退沿西岭进攻之敌，并由西岭包抄敌

后。法军三面被围，伤亡甚众，后援不及，弹药将尽，开始全线溃散。于是，尼格里不得不下令撤退，法军丢下数百具尸体，狼狈逃回文渊。

冯子材指挥东线清军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共毙伤敌军精锐近千人，缴获大批枪炮、干粮，大大鼓舞了中越两国军民的斗志，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气焰。这是中法战争中关系全局的一战。它不仅使北圻东线反攻转败为胜，而且使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法人自谓入中国以来，从未受此大创。”3月27日晚，法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立刻在法国统治阶级中引起巨大的震动和恐慌。他们害怕因此而动摇法国在远东初步建立起来的殖民统治，因而群起抨击茹费理的远东政策。法国人民也纷起反对茹费理政府的殖民战争。3月29日，法军在谅山惨败的消息接踵传至巴黎，茹费理内阁随即于3月31日在一片责骂声中垮台了。

东线法军经镇南关惨败之后，人数不满二千，在文渊稍事休整，主力即仓卒撤至谅山，和已经到达那里的援兵会合，总数增加到四千五百人左右。冯子材为了不给溃败之敌以喘息机会，于3月26日亲率所部及王孝棋部出关进攻文渊，并通知王德榜部由小路抄袭敌之右翼。文渊守敌倾巢出战，清军“分路四面环攻，枪炮雨密”。战不多时，守敌头目中弹落马，余众溃逃，清军立将文渊收复。

这时，越南义军已在谅山通往那阳、屯梅等交通线上加紧袭扰，给法军后方以很大威胁。尼格里企图坚守谅山，等待更多援兵到达后再次进犯镇南关，做了如下部署：主力扼守驱驴北面的一个高地，以确保驱驴，屏蔽谅山；一部兵力配置于淇江（今奇穷河）南岸，分守通向谷松、屯梅的交通要道；将老弱残兵编成“城堡班”，驻守谅山城垣碉堡。

冯子材鉴于谅山为越南北部军事要地，“若不急先攻取，实难成破竹之势”。并且认为，法军连战皆败，心胆已寒，“与其明攻多损士卒，不如暗取更易见功”。因此，与苏元春等密商，“以正兵明攻驱驴，出奇兵暗取谅山”。3月27日，冯子材派杨瑞山率所部绕道而进，乘夜渡过淇江，于次日黄昏潜至谅山，散伏城外各处。

3月28日，冯子材、苏元春、王德榜、王孝祺各部次第向前挺进，分三路逼攻驱驴：冯子材、苏元春率主力进攻正面；王孝祺部和冯军一部进攻西面，王德榜部进攻东面。法军依托驱驴北面高地的坚固工事，负隅顽抗，阻止了清军的进攻。尼格里鉴于其左翼和正面阵地工事坚固，而东面地形较难防守，决定由爱尔明加率军一部，向东面的王德榜部发起反击。下午2时许，冯、苏两部趁敌人调动兵力，正面防御力量有所减弱之机，再次发起猛烈攻击。激战中，尼格里胸部中弹重伤，接替指挥的爱尔明加随即下令向淇江南岸撤退。凉山守敌在慌乱中砍断浮桥，致使部分法军在溃逃中落水溺死。之后，法军退入凉山城，并立即部署分两路向南撤退。

3月29日拂晓，清军主力徒涉淇江，向谅山挺进。在此之前，埋伏于城外的杨瑞山部乘法军熟睡之机，突然发起攻击。城中法军仓皇应

战，一片混乱。杨瑞山等“督率各营员弁、勇丁，蚁附而上，劈开城门，兵刃交下”。法军死伤累累，残部向南逃窜。清军追击二十余里，并边进边搜山，从山谷中俘获不少敌人。

清军在克复谅山的过程中，共毙伤法军近千人，并缴获大量军械物资，仅杨瑞山部就夺获大小火炮三十余门。

谅山既克，清军乘胜分东西两路向南追击。3月31日，东路陈嘉部及王德榜部攻克谷松，西路冯军一部克复屯梅，进逼郎甲。法军犹如惊弓之鸟，一口气逃到郎甲、船头一带。

在这大好形势鼓舞下，越南义军的活动更加频繁。北宁总督黄廷经集合各路义民二万余人，“建冯军旗号，自愿挑浆饭，作向导，随军助剿，或分道进攻”。河内、海阳、太原、西贡等地人民也纷纷酝酿起义，盼望清军早日挥戈南下，赶走法国侵略者。冯子材决定于4月中旬亲率东线全军进攻北宁、河内；唐景崧部也准备出牧马，攻太原；广东方面，准备派兵出钦州，沿北圻东海岸进攻广安；会办云南军务鲍超所部三十余营生力军正向龙州前进，随时准备入越，西线滇军也已克复广成等地，正向兴化发展进攻。但就在这时，清廷下达了妥协求和的停战撤兵令，彻底破坏丁前线军民乘胜进军的作战计划。

第九部分 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7月～1895年10月）

十九世纪末年，随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大部分土地都被分割完毕。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一面要求重新分割殖民地，一面与老牌殖民强国一起，竞相向政治、经济、军事都很落后，仅在形式上保持独立的国家加紧渗透和扩张。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的中国，自然更加成了列强激烈争夺的主要对象。在所有企图瓜分或鲸吞中国的列强中，日本是野心最为狂妄、威胁最为严重的一个。发生于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就是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由于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故这次战争通常称为中日甲午战争。

第一节 战争的爆发和双方战略方针

一、战争的导火线

1894年春，朝鲜全罗道爆发农民起义。在东学党的领导下，起义者举起“尽灭权贵”、“逐灭洋倭”的革命旗帜，反对国内封建剥削，反对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6月1日，起义军占领全罗道首府——全州，各地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势力逐渐波及全国，朝鲜封建王朝惊恐万状。

东学党起义后，日木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认为借口侵朝的良机已到，不可失之交臂。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也向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建议：“东学党势甚猖獗，韩兵不能镇压，目下趋势必向清国请求援兵，清国政府必容纳此种请求。我国如欲保护在韩臣民，维持帝国均势，殊有出兵之必要。”

中国方面，李鸿章开始并不主张出兵朝鲜，但当时清朝政府派驻朝鲜的商务大臣袁世凯积极主张派兵“助剿”，并援引日本驻朝使馆译员郑永邦所说“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我政府必无他意”等语，鼓动李鸿章派兵赴朝。这样做正好上了日本侵略者的圈套，因为中国一旦出兵，日本便有了出兵的借口，进而把清朝政府拖入预设的战争陷阱中去。

6月4日，李鸿章接到朝鲜政府关于“酌遣数队，速来代剿”的正式请求，随即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连同已在仁川的“平远”号共计三舰），并命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兵二千余人，由海道赴朝。6月6日，聂士成所率前锋九百人搭乘招商局轮船“图南”号自大沽出发，8日抵牙山口后，换乘驳船，9日于白石浦登陆，进驻牙山。叶志超自率后队一千五百余人，搭乘“海晏”、“海定”号，6月8日自山海关出发，于11日抵达朝鲜，登陆后，与聂部合屯牙山县。在派兵赴朝的同时，按照中日天津条约的规定，由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将出兵情况通知日本外务部，并表明一旦完成镇压东学党起义后，随即班师回国。

在中国派兵赴朝之前，日本内阁会议已于6月2日作出决定，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名义出兵朝鲜，并立即下达秘密动员令。日本侵略者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政策，命正在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返回朝鲜，由海军陆战队四百余人以“护送”公使为名，直入汉城。接着，又悍然派出一个混成旅团（以驻广岛的第五师团第九旅团为基础，计有第十一和第二十一两个步兵联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野战炮兵大队、一个工兵中队，以及辎重队、卫生队和两个野战医院，共八千余人），由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赴朝，占据汉城至仁川一带战略要地。海军则派出“松岛”（常备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的旗舰）、“千代田”，“高雄”、“赤城”、“筑紫”、“大和”、“八重山”和“吉野”等军舰，控制海港釜山和仁川，监视海面，并布设水雷障碍等。

在清军既已前去朝鲜，日军剑拔弩张，战争迫在眉睫之际，李鸿章并未采取紧急措施，做好应战部署，仍然寄希望于“以敌制敌”，徒劳地奔波于俄、英等国驻华公使之间，乞求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出面“调停”，结果四处碰壁。他明知“日兵分驻汉、仁，已占先著”，非但不与抗争，反而于7月初将在朝军舰全部调回。这一行动，在战略上是一大失策。因为放弃仁川，无异于给日军提供了由海道进犯中国的前进基地，并使牙山清军处于孤立无援的严重地位。

日本方面，挑起战争是其既定方针。当清朝政府以“韩乱”已息，要求根据中日天津条约同时撤兵时，日本政府不仅不同意，反而无理提出干涉朝鲜内政的所谓“改革方案”，故意制造纠纷。同时，日本政府又以默许英、俄等国的在华利益为条件，换取了列强在中日两国冲突中采取有利于日本的“中立”立场。7月14日，日本政府见其阴谋外交得逞，而且军事上已占先着，便照会清政府，断然拒绝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兵的建议，反诬中国政府“有意滋事”，声言“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企图把中日开战的责任归咎于清政府。实际上，陆奥宗光早在7月12日即已电告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随后，日本海军主力舰艇于佐世保军港集结，成立联合舰队（由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合编而成，伊东祐亨任司令官），下分本队和第一、第二游击队。7月23日，日军闯入朝鲜王宫，非法囚禁朝鲜国王李熙及闵妃，诱胁大院君李昰应主持国事，并强迫朝鲜宣布废除过去同中国所签订的一切条约。25日，日军在丰岛附近偷袭中国舰船，并进犯牙山清军，正式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

二、战争的序幕

（一）丰岛海战

由于日本侵略者蓄意挑衅，清廷不得不责令李鸿章速筹战备。7月16日，光绪帝又电谕李鸿章“断不可意存畏葸”，并严厉指出：“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李鸿章见乞求列强调停的希望破灭，又受到光绪帝的严厉责问，只得增兵赴朝。他派出四支援军，即：从天津出发的盛军总统总兵卫汝贵率领的盛军六千余人，从旅顺出发的宋庆所部提督马玉昆率领的毅军二千人，从奉天出发的奉天练军统领总兵左宝贵率领的奉军三千五百人，从奉天出发的奉天盛军总统丰升阿率领的吉军，盛军一千五百人。上述各军共约一万三千余人，均取道辽东过鸭绿江进军平壤。由于道路迂远，不能救牙山之急，李鸿章决定从天津一带再抽兵二千余人，由海道前往牙山，认为“合叶原队共五千人，可当一面”。因轮船招商局船只正在运载盛，毅两军赴大东沟（今东沟），只得雇英商“爱仁”，“高升”、“飞鲸”三轮应急。7月21日至23日，“爱仁”载兵一千二百人，“飞鲸”载兵约五百人，“高升”载兵九百五十人，先后由大沽口开出。为保证登陆安全，由副将方伯谦率军舰“济远”、“广乙”、“威远”自威海卫开赴牙山。24日，“济远”等三舰及、“爱仁”、“飞鲸”两轮先后抵牙山内岛，部队登陆。

当时，在天津潜伏多年的日本间谍石川五一等勾结汉奸刘芬，获得了援牙清军的出发日期及航渡运载等情况，密告日军。日军决定在清军增援部队只到达一部分的时候，采取偷袭手段，不宣而战。7月23日上午，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启航，次日到达牙山以南的群山浦。伊东佑亨命第一游击舰队司令坪井航三率军舰。吉野”，“浪速”、“秋津洲”向牙山湾搜索前进，伺机攻击。24日这天，停泊在仁川的英舰透露，日舰将要截击中国舰只。这时，北洋舰队主力远在成海卫，“高升”号和运送饷械的“操江”号则已离开大沽，正在赴牙途中。当日20时和21时15分，“爱仁”、“威远”先后离牙返航、“济远”、“广乙”两舰继续帮助“飞鲸”赶卸兵马。25日晨4时，“飞鲸”驳卸将毕，“济远"、“广乙”两舰离牙，拟于途中告知“高升”，“操江”掉头西归。行抵丰岛西南时，突遭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的袭击，“济远”，“广乙”被迫还击。两舰爱国官兵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沉着应战。“广乙”号是福建船政局白造的排水量仅有一千零三十吨的炮舰，火力不强，开战不久即受重伤，船身倾斜，退出战斗后在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纵火自焚。“济远”号是一艘二千三百吨的德制钢甲巡洋舰，配备有舰炮十八门，并有鱼雷发射管四个。战斗中，船舵被毁，便向西退走。日舰“吉野”尾追不舍。

9时许，正当“济远”向西退走时，“高升”号向东驶农，日舰“浪速”号鸣炮令其停航。在后面不远的“操江”号见状即调头西返。坪井航三命“浪速”号俘虏“高升”，令“秋津洲”追赶“操江”，以自己乘坐的“吉野”号继续追击“济远”。“济远”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躲在舱内铁甲最厚的地方瑟缩不出，并下令悬挂白旗投降（一说诈降）。舰上士兵极为愤怒，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等毅然发尾炮击中“吉野”，使它不敢再追。

“济远”向西退却途中，曾赶上调头西返的“操江”号（因“操江”时速只有八海里），但方伯谦只顾自己逃命，致使“操江”号被日舰“秋津洲”掳去。

“高升”号上清军全体官兵面对日舰“浪速”的威逼，坚贞不屈，宁死不降。13时许，日舰“浪速”号鱼雷、舰炮齐放，“高升”号上的清军官兵以步枪还击。不久，“高升”号沉没，船上清军九百五十人，除二百五十余人后来得救外，其余全部死难。

（二）成欢之战

在日舰进行丰岛偷袭的同时，日大岛旅团长率主力三千余人，携山炮八门以及辎重、电信、野战医院等，自汉城向南开进，企图消灭牙山一带清军，以解除尔后北进时的后顾之忧。而丰岛偷袭，则正是为了阻止清军从海道增援牙山，保证其陆路战斗的首战获胜。

孤守牙山一带的清军（加上由海道新到的援军，共计八营，约四千一百余人）失去了与天津的联系，又鉴于滨海地形开阔，不利防守，因此，由总兵聂士成率军三营，于7月26日移驻牙山东北五十里的成欢驿。聂士成得知日军已进抵距成欢四十里的振威，立即请援于叶志超。

27日，营官江自康，许兆贵率队前往增援。28日晨，叶志超也赶到成欢。聂士成鉴于海道已阻，援军断难飞渡，牙山绝地，不可再守，而公州背山面江，形势险要，建议叶志超马上前去占据。并且说：“幸而胜，公为后援，不胜，犹可绕道出。”这时，日军已进逼素沙场，离成欢仅十里之遥。于是，叶志超率叶玉标一营进据公州，聂士成率六营扼守成欢，另留一营守牙山。

成欢驿东西皆山，北通汉城，南达公州。北面临河，南北两岸皆水网沼泽地。有桥一座名“安城渡”，为南北往来隘道。清军在成欢驿东面山顶筑垒自固，西面山顶则设有炮兵阵地，控制日军必经的驿道。

28日夜，日军自素沙场分两路进犯：一从大道进攻，钳制清军主力；一从东面迂回，进攻清军右侧。当夜，武备学堂学生于光炘等冒雨侦察敌情，发现日军偷袭，立即报告聂士成，并率兵一部预伏安城渡桥侧，控制要点。半夜，日军右路前锋进抵安城渡桥北，于光炳等奋力阻击，杀伤不少日军，使其前锋败退。可是，聂士成未能及时增援，而日军后队又至，于光炘等英勇抵抗，力战牺牲。29日黎明，日军攻占成欢西北面山坡，聂士成率主力抵抗，战斗甚为激烈。正在这时，日军迂回部队突然袭占清军右翼之东北面山坡，并发炮轰击清军东面诸垒。经过激战，清军不支，聂士成率队退往公州。这时，叶志超已放弃公州向北逃跑，于是两部合军北走。

日将大岛原来判断清军必退牙山，因而率队向牙山追击；及抵牙山，不见清军踪影，便留一小队驻防该处，自率大队返回汉城。

叶志超逃跑时，因害怕同日军遭遇，绕道远离汉城的朝鲜东部山区，经清州、忠州、堤川、原州、狼川、金化、平康、伊川、遂安、祥原，渡大同江抵平壤，途中历时近一个月。当时正逢炎夏，“残军饥疫死者相属”，而叶志超竟无耻地向李鸿章谎报战功，诡称“沿途叠败倭兵”。于是清廷“论功行赏”，嘉奖员弁数百人，赏军士银二万两，并提升叶志超为平壤各军的总指挥。

日军丰岛偷袭，并进犯驻朝清军，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但是，李鸿章不但不积极准备抗战，反而认为“高升系怡和商船，租与我用，上挂英旗，日敢无故击沉，英人必不答应”，幻想英国出面干涉。可是，随着后来战事的发展，英国见日方处处居于优势，竟然不顾事实和国际公法，声称7月23日日军侵入朝鲜王宫之时，即中日开战之日，“高升”号系“开战后”驶离大沽口，因此责任不在日方。清政府不敢抗争，最后竟由出面租船的轮船招商局赔偿英商损失。

三、中日宣战和双方战略方针

清政府见日本侵略者已公然揭开战幕，被迫于8月1日对日宣战，日本也于同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早在宣战之前，日本即已成立战时大本营，统一筹划和指挥陆海军

作战事宜，大本营首席长官由参谋本部总长陆军大将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担任（1895年1月炽仁亲王死后，由陆军大将小松宫彰仁亲王代理），由参谋本部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和海军军令部长中牟田仓之助（7月17日，中牟田仓之助免职，海军中将桦山资纪接任）二人共同辅佐。在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首相等的亲自参与下，日本战时大本营在战前已制订好侵略中国的“作战大方针”，即：以主力在山海关附近登陆，于直隶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夺取北京。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导下，日军制定了如下作战计划：首先派陆军第五师团进占朝鲜，钳制和击败在朝清军；海军则以联合舰队击破中国北洋舰队，迅速夺取黄海和渤海制海权。下一步则视海军胜败情况而定：第一，如海军主力决战获胜，则将陆军主力输送至渤海湾（以山海关为主）登陆，实施直隶平原决战，第二，如果海上决战不分胜负，中日双方均不能掌握制海权，就用陆军主力侵占整个朝鲜；第三，如果海上决战失败，清军控制了制海权，本国又受威胁，则尽力援助在朝的陆军，而把陆军主力留守本土，以防清军反攻。日军这一作战计划的核心是，消灭北洋舰队，夺取黄海、渤海的制海权，控制海上运输线，进而与清军进行直隶平原决战。

清军方面，事先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为“后党”和“帝党”两派。光绪帝自1889年“亲政”以来，力图有所作为。他与户部尚书翁同和为首的“帝党”，竭力主战。而实际把持朝政的西太后慈禧与李鸿章为首的“后党”，为了保持实力，竭力主和，积极推行“屈辱求和”，“避战自保”的政策。由于政治腐败和内部纷争，清廷始终不能协调一致地统筹全局，因而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又未制定相应的战略方针，以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开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所谓“调停”。当朝鲜形势极度紧张，全国舆论和清军某些爱国官兵强烈要求清政府积极抗战时，主和派既不敢公开反对，又不愿认真备战。直至战争爆发之后，清王朝为形势所迫，才临渴掘井，在宣战诏书中提出了一个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根据这一方针，决定增调陆军赴朝，先在乎壤集中，然后南下驱逐在朝日军，以海军各舰队分守各自防区内的海口，北洋舰队即集结于黄海北部，扼守渤海海峡，策应在朝清军，并确保京畿门户的安全。

第二节 平壤之战（1894年9月）

一、双方作战方针及部署

日本大本营为迅速获得制海权，于宣战的次日（8月2日）即命令联合舰队搜索并击破中国北洋舰队，以求年内实施其“作战大方针”的重点——直隶平原决战。不久，得知大批清军将于平壤附近集中并相机南下，于是，日军大本营已无暇等待其海战的结果，乃命令第五师团的其余部分立即赴朝。8月14日，日本大本营根据其联合舰队未能与北洋舰队决战，并为检修舰只而移泊朝鲜半岛南端的长直路等情况，确认年内已无法实行直隶平原决战的原定计划，必须等到来年解冻之后再作考虑，于是重新制定冬季作战方针，即：增派第三师团（先编成混成第五旅团）与已在汉城附近集结的第五师团合编为第一军，以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司令官，执行北攻平壤，相机进攻奉天，吸引直隶清军主力出援的任务；同时准备组建第二军，以待机攻占辽东半岛，为将来实施直隶平原决战建立进军基地。

山县有朋到达朝鲜（9月12日于仁川登陆）以前，在朝日军由第五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贯统率。9月2日，野津道贯等议定，以第五师团及第三师团之一部，共约一万五千人，分四路进攻平壤。其部署是：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混成第九旅团（步骑约五千、炮二十门）由汉城出发，沿大道指向平壤东南，从正面进攻，牵制清军。野津道贯自率步兵第二十二联队、十二联队及骑兵、工兵、炮兵各一部（步骑约五千、炮十二门）继后，渡大同江之下游，进攻平壤西南。第十旅团长陆军少将立见尚文率步兵第十二联队之第一大队、第二十一联队之第二大队及骑兵、炮兵各一部（步骑约二千、炮六门），自朔宁经新溪、遂安、祥原、江东，渡大同江进攻平壤东北，称“朔宁支队”。陆军大佐佐藤正率步兵第十八联队及骑兵、炮兵、工兵各一部（步骑约三千，炮十二门）自朝鲜东北部的元山登陆（称“元山支队”），经文川、阳德、成川（今新成川南）、顺安，绕攻平壤北部，截断清军后路。

日军根据这一分进合击的作战计划，预定9月15日包围平壤，发起总攻。

早在8月上旬，清政府派出的四支援军先后抵达平壤。丰升阿、卫汝贵等以兵力不足、后路空虚为由，要求“先定守局，再图进取”。李鸿章也认为。非有劲旅三万人，前后布置周密，难操胜算”，“目前只能坚扎平壤，扼据形胜”。尽管清廷急于要按原定方针向南进军，多次电催李鸿章饬令各军“相机进取”，“直指汉城”，李鸿章总是借故延宕，以致前敌各军既不南下进攻汉城，又不择险据守，互为策应，“而以二十九营万四千余人聚乎壤，置酒高会，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坐待日军来攻。8月下旬，叶志超抵达平壤。这个败军之将被任命为平壤各军总统，“一军皆惊”，进一步破坏了士气。叶志超对于军事更加漫无布置，身为前线统帅，不亲自组织侦察，及时获取准确的情报，

主要依靠天津的电报通报，因而对前线敌人情况很不了解，只知道日军主要从中和大道来攻，而不知其从几个方向同时包围平壤。9月6日，叶志超与诸将议定，以一部兵力监视元山方向之敌，以主力南下迎击自黄州北进之日军。6、7两日，部队已按计划出发。此时，叶志超得到日军一部已抵成川的消息，因顾虑平壤后路发生危险，于是突然改变决心，急忙将部队调回，仓卒作出防御平壤的部署，而此时各路日军已完成了对平壤的合围。

平壤是朝鲜的旧都，山环水抱，形势险要，城墙高约十米，墙基厚约七米，南北绵亘十余里。大同江自城东至西南流过。城有六门：南为朱雀门，西南为静海门，西北为七星门，北为玄武门，东为长庆门，东南为大同门。长庆、大同二门紧靠大同江。玄武门跨牡丹台山修筑。由于牡丹台紧靠城墙，因而成了守卫平壤的命脉所在。

清军依城划分各军防区：城北方面，由左宝贵所部奉军、丰升阿所部盛军及江自康之仁字两营防守；城西方面，由牙山军（即叶志超原来所部）防守；城南方面，由卫汝贵所部盛军及马玉昆所部毅军之一部防守；城东南大同江东岸，由马玉昆所部毅军防守，有浮桥一座沟通两岸联系。叶志超坐镇城内，居中调度。

二、作战经过

9月13日，四路日军均已逼近平壤，其中元支队已进至顺安，切断了清军退往义州的后路。

14日清晨，日军元山、朔宁两支队一齐发起攻击，占领了城北山顶数垒。左宝贵亲自督队争夺，未能取胜，便率部入城，用大炮轰击敌人。日军坚伏不退。当晚，叶志超主张弃城撤退，遭到左宝贵的坚决反对。左宝贵派亲兵监视叶志超，防止其逃跑。

15日拂晓前，日军发起总攻。大同江东岸的日军混成第九旅团分三路进攻平壤城东南。扼守大同江东岸的马玉昆所部毅军奋力抵抗，与敌展开肉搏战，自清晨激战至午后，终于打退了东路日军的进攻。北路战事也十分激烈。日军朔宁、元山两个支队又于当天拂晓发起进攻，左宝贵亲自登玄武门指挥，士兵拚死拒敌。战至上午，日军先后攻破玄武门外的五座堡垒，并向玄武门猛烈突击。左宝贵为了表示与城共存亡的决心，身穿黄马褂，继续指挥。11时，左宝贵中炮阵亡，士气大挫，玄武门遂被日军攻占。叶志超随即悬白旗乞降，并下令撤军。当时，马玉昆部正与东路日军相持于大同江东岸，偷袭平壤西南的日军第五师团主力也被卫汝贵所部击退，伤亡惨重。正当东西两路清军准备乘胜出击的时候，忽闻北路失利，并接到叶志超的撤军命令，马玉昆、卫汝贵只得率部回城。日军准备宿营，未再前进。当晚，叶志超率守军乘夜暗仓皇逃出平壤。日军于城北山隘堵截，清军伤亡二千余人，被俘数百人。途经顺安，又遭日军拦击，死伤枕藉。

16日，叶志超等逃至安州，始与吕本元，聂士成等部会合。安州距平壤九十公里，北倚清川江，南有群山依托，城垣高大，是平壤以北的第一重镇。聂士成建议叶志超凭借安州有利地形，阻敌北犯。叶志超不同意，继续率军向义州狂逃。19日，李鸿章曾电告叶志超驻守义州，不准退往鸭绿江以西。三天以后，李鸿章又认为与其株守义州孤城，不如全线撤回，于是，清军于22～24日放弃了义州等战略要地，退过鸭绿江。

平壤之所以轻易陷落，关键在于前敌总指挥不得其人。叶志超于成欢之战打响时，立即弃军逃奔平壤，惊魂未定，又以谎报战功而被任命为平壤各军总统，由于不孚众望，“各将领均不受节制”。他庸懦怯敌，既不敢驱军南下，也没有保卫平壤的决心，一经接战，再次率先逃跑，致使军心大乱，“凡有大小炮四十尊，快炮并毛瑟枪万数十杆，将弁私财，军士粮饷，军资、器具、公文、密电、尽委之而去”。此外，清军纪律甚差，不能与当地人民呼吸与共，也是平壤失守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来，由于中朝两国同遭日寇侵略，共同的命运把两国军民联系在一起。当清军刚到平壤时，朝鲜人民夹道欢呼，以各种物资慰劳、供给清军；朝鲜官员也盼望清军多打胜仗，“其王京（汉城）自大院君以下，时密输倭人消息于我，日盼我军进趋汉城”。可是，清军入朝后不但无所作为，而且侵害群众利益，致使朝鲜人民大失所望，不再尽力支援，这就大大影响了保卫平壤的作战。

第三节 黄海海战（1894年9月17日）

一、丰岛海战以后双方舰队的行动

丰岛海战以前，日本政府“预料陆战可操胜券，但对海战的胜败如何尚抱疑虑”。日舰丰岛偷袭得逞，使日本海军增强了战胜中国海军的信心，自那以后，联合舰队一直活动于朝鲜海域，一面掩护后续陆军和军械粮秣的海上运输，一面声援在朝日军的陆路作战。8月5日，联合舰队接到日本大本营关于搜索和击破中国舰队的命令，伊东祐亨随即于8月7日率舰队从隔音岛出发，驶往黄海西部海面，甚至闯到威海卫和旅顺军港，进行搜索和挑战。

北洋舰队方面，7月25日的丰岛海战只是稍有损失，对整个舰队的战斗力并无多大影响。战后第二天，李鸿章电令丁汝昌“即带九船开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但同时又说：“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丁汝昌于7月27日率队由威海卫出发，由于受李鸿章“保全坚船”指示的束缚，不敢前往汉江口，仅至大同江口外即返回威海卫基地，以“未遇倭兵商各轮”敷衍了事。中宣战的当天（8月1日），李鸿章又电告丁汝昌：“总署催汝统铁、快各船往仁川附近……相帆截击”。但又继续强调：“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于是，丁汝昌于出发前复电李鸿章，以无侦探快船、又少快炮等为由，言明不能去汉江口，只宜“远巡大同冰洋，遇敌痛剿；近顾北洋门户，往来梭查”。李鸿章当即转告总理衙门，称丁所言“似系老成之见”。8月5日，清廷得知叶志超军已经溃败，预料日军必将北攻平壤，于是令北洋舰队专顾大同江口一带海面的安全，以便由海路增援平壤。8月9日，丁汝昌第三次率队出巡。第二天黎明，日舰二十余艘突然出现于威海卫港外，遭到海岸各炮台的猛烈炮击。当晚，日舰又窜至旅顺口外，与城头山炮台交相炮战。清廷闻知威海、旅顺一带洋面有日舰活动，甚为惊骇，急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速回北洋海面，跟踪击剿”。8月23日，清廷进一步指示：“成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务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此后，北洋舰队再未远巡，不出北洋一步。这样，日本海军便完全控制了朝鲜仁川，大同江口等重要港口，占领了从海路进攻中国的有利前进基地。

由于丁汝昌多次率队出巡无功，受到朝野不少人的攻击。8月26日，光绪帝下令将丁汝昌革职，但仍“戴罪自效”。李鸿章不得不上奏为丁汝昌辩护，同时乘机正式提出“保船制敌”的方针，进一步强调“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建议清廷放弃争夺制海权。他认为，“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因而主张北洋舰队“不必定与拚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从此，北洋舰队更加陷入了消极自保的被动局面。

二、海战经过

9月上旬，清廷鉴于平壤将有大战，拟派兵增援。为了及时到达前方，决定将驻防大连一带的总兵刘盛沐所部铭军八营四千人由海道运至大东沟，然后转由陆路赴朝。这样，海军掩护，责无旁贷。李鸿章乃令丁汝昌率舰队护航。9月15日上午，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主力抵达大连湾。

9月16日2时左右，铭军搭乘招商局“新裕”、“图南”等五艘轮船，在北洋舰队的护卫下，由大连出发，午后抵大东沟。“平远”，“广丙”泊于港口，由“镇南”，“镇中”两炮艇护送进港，“定远”等十舰均泊于港外十二海里之大鹿岛东南。铭军四千人连夜上岸，安全到达目的地。不过，此时平壤已失，铭军无法起到应援的作用。

日本联合舰队早想与北洋舰队决一雌雄，当得知中国海军将护送陆军赴朝的消息后，便于9月14日午后由仁川港出发，15日到达大同江口。因不见有中国舰船，伊东祐亨命部分舰只溯大同江支援第五师团进攻平壤，其余舰只暂泊于小乳纛角的东北。伊东祐亨判断，北洋舰队有可能护送陆军往鸭绿江口一带，于是不待全舰队集中，立率军舰十二艘，于16日下午出发，向黄海北部的海洋岛方向航进，17日晨抵达该岛附近。

“松岛（旗舰）、“严岛”、“桥立”、“扶桑”、“千代田”，“比睿”、“赤城”、“西京丸”为本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为第一游击队。

9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北洋舰队正准备起锚回航旅顺时，发现日本舰队自西南驶来，丁汝昌随即命令舰队起锚迎战。

日本联合舰队吨位总数大，航速快，机动性好，火炮多，攻击力较强；北洋舰队拥有两艘巨型装甲战列舰，重炮多，防护性能较好。

战斗之前，丁汝昌曾规定三条训令：“1.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2.始终以舰首向敌，借保持其位置，而为基本战术；3.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视运动之。”

北洋舰队开始成“并列纵阵”（“定远”、“镇远”两舰居前），以每小时五海里的速度向西南方向航进。各舰爱国官兵，“皆同仇敌忾，凝视敌队，自负决心，勇气百倍”。日舰则以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艘速率最高的巡洋舰为先锋，伊东祐亨自乘旗舰“松岛”，率领本队“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跟进，12时许，又将武装商船“西京丸”及小炮舰“赤城”移至本队的左侧（非战斗一面）。丁汝昌、刘步蟾及总查德国人汉纳根等在“定远”舰前方的飞桥上，见日舰成“单行鱼贯阵”（单纵队）扑来，决定采取以主舰居中的“夹缝雁行阵”（交错配置的双横队）应战。由于阵形尚未完全组成，旗舰即以每小时八海里的速度前进，“济远”、“广甲”、“超勇”、“扬威”等后续舰斜行追赶不及，以致形成半月形而类似“后翼梯阵”（又

叫“燕剪阵”）。因此，日方认为，北洋舰队当时所列队形。似为不规则之单横阵，又似后翼梯阵，而‘定远’、‘镇远’居中……”。

日舰第一游击队开始指向北洋舰队的中央，约距离一万二千米时，稍向左变换航向，然后又按原方向前进，准备首先进攻北洋舰队的右翼。本队也取大致相同的航向继进。

17日12时50分，双方舰队相距约五千七八百米，“定远”首先发主炮攻击，其余各舰亦相继开炮。弹丸落于日舰第一游击队近旁，但均未命中目标。当时正值微弱东风，硝烟弥漫于北洋舰队之前，日舰趁机以每小时十四海里的速度向前急驶。当前出到离北洋舰队右翼约三千米时，日第一游击队四舰陆续以其右舷速射炮猛轰“扬威”，“超勇”。13时5分，彼此仅距一千六百米，日舰以低弹道向“超勇”，“扬威”实施抵近射击，二舰相继起火，退出战斗。日舰“吉野”比中弹起火，但很快被扑灭。约13时30分，“超勇”沉没。这时，“平远”、“广丙”和两艘鱼雷艇已赶到，但因火力均不强，未能改善右翼态势。

当第一游击队绕攻北洋舰队右翼时，本队也与北洋舰队主力交相炮击。北洋舰队虽然阵形已被打乱，但各舰随时变换方向，力求陆岘首对敌，以充分发挥主炮威力。“‘定远，猛发右炮攻倭大队各船，又发左炮攻倭尾队三船”。日舰“比睿”、“赤城”因速度迟缓掉队，正好被北洋舰队所截击。13时10分，“比睿”突然改变航向，向右急转舵，冒死从“定远”，“来远”之间窜逃（距“定远”约一千米，距“来远”约四百米）。“定远”，“来远”以及“经远”等舰乘机予以夹击，重创“比睿”，迫使其向左转舵，逃出包围圈，追赶本队。黄海海战示意图之二“赤城”企图营救“比睿”，受到“来远”等舰的猛烈炮击，其舰长坂元八郎太等多人当场毙命。“西京丸”也受重伤，“舵已轰断，舟中观战之大吏（按：即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几被华军连船擒去”，“后遁至济物浦（仁川），丸中人如已赴法场重邀恩赦者然”。

日舰第一游击队掠过北洋舰队右翼以后，又向左作一百八十度回航，企图利用其速度快，便于机动的优点，配合本队作战。但本队旗舰“松岛”发信号令其归队，便又向左作一百八十度回航。于是，北洋舰队主力舰只对准第一游击队右侧后方，猛烈炮击。14时15分，第一游击队刚刚追上本队最后一舰“扶桑”，又见“西京丸”发出“‘比睿’，‘赤城’危险”的信号，只得再次向左作一百八十度回航。与此同时，本队已绕至北洋舰队的背后，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夹击之势。这样，北洋舰队便陷入了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队形更加混乱。

战斗过程中，丁汝昌身负重伤，仍然坚持在“定远”甲板上鼓励士兵作战。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代替丁汝昌督战，沉着指挥。北洋舰队大部分官兵都能英勇战斗，奋不顾身。“致远”管带邓世昌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致远”舰多处受创，船身倾斜，弹药将尽。邓世昌见日舰“吉野”十分猖狂，毅然下令开足马力，准备用冲角撞击“吉野”，与敌同归于尽。“吉野”慌忙规避，并发射鱼雷。“致远”不幸重伤，锅炉爆

炸。约15时30分，“致远”沉没，邓世昌等二百五十名官兵壮烈牺牲。“经远”也中弹起火，管带林永升浴血抗战，不幸中弹阵亡。

“致远”沉没后，“济远”管带方伯谦和“广甲”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日第一游击队尾追不及，又折回猛攻已受重伤的“经远”。约17时左右，“经远”沉没，全舰二百七十名官兵除十六人获救外，余皆殉难。“广甲”仓皇逃跑时，“避大洋，傍岸行”，以致在大连湾的三山岛外搁浅（23日，遇日舰“秋津洲”，“浪速”巡航，便自行炸沉）。

“靖远”、“来远”因中弹过多，力不能支，退出战斗，避至大鹿岛附近紧急修补损坏的机器。“平远”、“广丙”及“福龙”雷艇也因尾追单烛逃跑的“西京丸”，而为敌第一游击队所断，未及归队。

在“致远”、“经远”等舰同第一游击队激战的同时，“定远”，“镇远”两舰正同联合舰队本队进行着艰苦的鏖战。一小时后，“定远”只有三门炮，“镇远”只有两门炮尚能发射。两舰以寡敌众，始终保持相互依恃的距离。虽中弹甚多，几次起火，全体官兵仍然坚持奋战，一面救火，一面拚死抵抗，并重创敌旗舰“松岛”。日方承认：“（午后）三点三十分，‘镇远’所发的三十公分半巨弹两门，命中了我旗舰‘松岛’下甲板炮台的第四号炮，放在近旁的十二公分炮的装药因此爆发，霹雳一声，船舳倾斜了五度，冒上白烟，四顾黯澹，炮台指挥官海军大尉志摩清直以下，死伤达一百余人，死尸山积，血流满船，而且火灾大作，更加困难。”由于无法继续指挥，伊东祐亨不得不下令各舰自由行动。

不久，“靖远”、“来远”抢修完毕，重新投入战斗。“靖远”帮带大副刘冠雄知“定远”舰号旗桅杆断裂，不能升旗指挥，建议管带叶祖珪代悬信旗集队，指挥各舰绕击日舰，并调出泊于港内的“镇南”，“镇中”等前来助战。于是，“平远”，“广丙”及各鱼雷艇也都折回。这时，日旗舰“松岛”已经瘫痪，“吉野”只剩下一具躯壳，失去战斗力，其余日舰也伤亡惨重，不能再战，又见北洋舰队重新集队，伊东祐亨便于17时40分左右下令各舰向东南方向遁逃。北洋舰队稍事追击，由于时已日暮，加之炮弹告竭，于是收队返回旅顺。

这次海战，历时五个多小时，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近代世界海战史上所罕见。战斗中，日海军“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五舰受重伤，共死伤约六百人。北洋舰队“致远”，“经远”、“扬威”、“超勇”被击沉，“广甲”自毁，“来远”等舰重伤，共伤亡近千人。

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损失虽然大于日方，但亦给日舰以重创，并迫使其率先逃跑。因此，当时中外舆论对于谁是这次海战的胜利者，众说纷纭。从客观效果看，经过黄海海战，日本联合舰队虽未能达成“聚歼”北洋海军的目的，但由于北洋舰队嗣后不敢再战，日军基本上掌握了黄海制海权，为下一步实施花园口（今旅大市庄河西南九十里）登陆进

攻辽东半岛创造了条件，对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鸿章视北洋海军为私人资本，他不愿“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然更不愿意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喋血一战，因而一再强调，“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主张将黄海制海权拱手让日本。这就不难看出，李鸿章提出的“保船制敌”方针，并非着眼于“制敌”，而是在于“保船”，其实质是避战自保。李鸿章先则不准丁汝昌率舰队护航增援牙山之清军，致有丰岛之败、“高升”之沉，助长了日本联合舰队的嚣张气焰；继则多次阻挠北洋舰队出海巡航，使日舰得以在汉江口至旅顺、威海卫之间的广阔洋面自由往来，而无后顾之忧。汉纳根曾指出：当时“已有责北洋海军之不山者，不知此不能为海军咎，且亦不能为丁汝昌咎也，有钳制海军者（如饬令毋得失船之类），丁汝昌不能专主也。”此语颇为切中要害。所以，清政府的腐败怯懦，李鸿章的消极防御与避战自保方针，实为海战失利的根本原因。当然，除了战略指导上的错误以外，还与其它因素特别是作战指挥和战术运用等有关。

丁汝昌以陆将任海军提督，指挥海上作战，自难得心应手。由于缺乏海战经验，因而不善于根据敌我舰船的战术技术特点，采取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的灵活战法。黄海海战开始时，北洋舰队以夹缝雁行阵对付敌人的单纵阵，这种战斗队形诸多不利，如最难维持阵形，不便行动自由，不易发挥全舰队炮火之威力等等，因而颇遭后人责难。当然，黄海海战中丁汝昌等决定采用横阵应战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晨园漫录》指出：由于北洋舰队各舰购置较早，其装备“大抵专注重舰首之重炮，而于两舷侧之速射炮则不甚加意，……其后速射炮日益发达，我各舰仍然依旧，未曾加以改造”，为了充分发挥重炮的优势，“自以布成横阵为最便”。北洋舰队的中坚是“定”、“镇”二舰，各有三十点五厘米口径的主炮四门，它们不是安装在中心线上，而是位于军舰前部的两侧，只有基本上保持舰首对敌，才便于充分发挥其威力。因此，丁汝昌在战前训令巾规定“始终以舰首向敌，借保持其位置，而为基本战术”，在海战报告中，也有“各船均以船头抵御，冀以大炮得力”的说法。北洋舰队战术运用上的错误，主要在于把速度不同的军舰混合编组，并驾齐驱，致使“致”、“靖”、“经”、“来”四舰徒具高速而不能充分发挥其战术性能，丧火了巡洋舰应有的机动攻击作用，而陷于被动。相反，日方正是正确地利用了这一特点，将四艘高速舰单独编为一队，加之采用便于机动的单纵阵，因而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不受本队航速的限制，进行机动突击，而居于主动地位。其次，北洋舰队在编队土置弱舰于两翼，当敌舰迂回包抄其侧翼时，得不到强大炮火的支援。正是由于这一错误，一开始就造成“扬威”、“超勇”两舰中弹起火的恶果。此外，旗舰“定远”在战斗开始后不久就中弹负伤，失去升旗指挥的能力，对于整个舰队的作战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在实力对比方面，北洋舰队是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近代海军，不仅拥有当时世界上有数的大型装甲舰和优良军港，而且将领中不少人是受过西方海军专业训练的留洋学生，士兵大多是选自沿海一带的劳动

者，并聘有外国军官担任炮术，驾驶等各科教习，按西法进行训练，战前还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校阅和演习，但和日本海军相比，总的实力毕竟居于劣势。军舰的速度是关系海战胜负的重要条件。北洋舰队速度最快的“致远”、“靖远”二舰，最高航速为十八节（由于使用日久，实际只有十五六节），最慢的“镇中”、“镇南”二炮舰，只有八节，而日舰最慢的“赤城”是十点二五节，最快的“吉野”达到二十二点五节。在战斗过程中，日舰（特别是第一游击队）正是利用其速度快，便于机动的特点，始终居于“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的有利地位，北洋舰队则处处显得被动，“惟随敌队之运动以为运动”。在当时条件下，舰队的攻击力主要在于火炮。日本联合舰队不仅火炮总数大大超过北洋舰队，而速射炮更是众寡悬殊。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黄海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的火炮发射力超过北洋舰队六倍，以致“日军以共胜利归功于速射炮”。除此以外，北洋舰队虽有巨炮八门，“惟清廷怠忽无状，平时不事补充，战时全舰队中，仅有榴弹数发而已，瞬息之间，榴弹告罄”。尤育甚者，有的炮弹实以泥沙，有的弹丸火药内掺水泥。因此，尽管战斗中命中弹丸不少，却未能击沉一艘日舰。

黄海海战虽然失利了，但在力量对比居于相对劣势和指挥火灵的情况下，北洋舰队大部分官兵仍能奋勇拚杀，开创了海上鏖战五个多小时的纪录，其英烈精神和光辉事迹，是值得称颂的。

第四节 辽东半岛之战（1894年10月～11月）

一、辽东半岛的战略地位

辽东半岛面临黄海，不仅是日军从海上进攻东北的唯一方向，更重要的是它与山东半岛遥望相对，共同封锁着渤海海峡，因而是保卫京津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口，地势险要，又是控制渤海海峡的锁钥。其地东有黄金山，西有老虎尾，互相环抱，雄峙口门。口门内水域宽广，港阔六百余米，水深六米左右，可锚泊舰艇三十余艘。平均气温为摄氏十度左右，严冬不冻。

清王朝鉴于旅顺的战略地位和易守难攻的良好地形，决定在此构筑船坞、炮台、厂房、仓库和电报局等军事设施，作为北洋舰队的基地。自1880年开始修建，1890年基本完工，历时十年之久，费银数千万两。建于东岸的大船坞，是旅顺军港的主体工程之一。李鸿章奏称："北洋创办海军，历年添购铁甲钢快等船，规模略具。从前并无修船巨坞，遇有修理要工，必须驶赴日本、香港各洋厂，诸多不便。自旅顺造办石船坞，各战舰均可就近修理，无须借资外国，缓急可恃，洵为海军根本至计。"

旅顺口炮台林立，至甲午战争时，东西海岸新旧炮台共计十二座，安设各种，海岸炮七十余门，另有依山建筑的陆路炮台十七座，大小火炮近八十门。总兵黄仕林和张光前各统亲庆军四营，分驻于东西海岸炮台。四川提督宋庆统毅军九营一哨，专防旅顺。

与旅顺口互为犄角的大连湾，也建有炮台、仓库、火药库、水师学堂等。甲午战争爆发时，大连计有海岸炮台五座、陆路炮台一座，共有大小火炮近四十门，由提督刘盛休统铭军十二营驻守。

宋庆和刘盛休所部由北洋大臣直辖。为便于节制，在旅顺没有北洋前敌营务处，由道员龚照玙负责。

具有坚固设防的旅顺口，是日军从渤海湾登陆，遂行直隶平原决战方针的严重障碍。

二、双方作战方针及部署

（一）日军方面

黄海海战之后，日军大本营为在来年进行直隶平原决战，决定按照其冬季作战方针，首先实施辽东半岛的登陆战役，夺取旅顺、大连。9月21日起，大本营即着手组建由第一师团、第二师团（预备，后未参战）和第十二混成旅团（第六师团的一半）编成的第二军，以陆军火将

大山岩为司令官。为了荫蔽攻占辽东半岛的企图，大本营命令第一军在鸭绿江东岸义州一带集结，以牵制对岸清军，届时向九连城（今丹东市东北二十五里）发起进攻，掩护第二军的登陆作战。

（二）清军方面

1.清军战略方针的转变

为阻遏日寇向中国水土进攻，李鸿章捉山了“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的方针，同时强调，必须“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堕彼速战求成之诡计。”李鸿章还要求指派大臣专门督办奉天军务。清廷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随即令宋庆帮办北洋军务，由旅顺驰赴九连城一带，督率前敌各军合力严守鸭绿江西岸。不久，又将从平壤溃退过江的叶志超、卫汝贵撤职，所部交由聂士成统带。

清廷采纳李鸿章的上述建议，意味着由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转变为战略防御的方针。按照这一方针，清廷命北洋舰队尽快修复受伤各舰，不时巡弋于大连、旅顺、威海之间，扼守渤海湾门户；为力保沈阳，以东三省军队之大部集结于沈阳、辽阳之间，并增强第一线兵力，为保卫北京，在天津、大沽间，山海关与秦皇岛间，以及通州（今通县）附近，厚集外省兵力。

2.鸭球江沿的防御部署

清军以九连城一带为主防御阵地。九连城南依鸭绿江，东枕叆河。叆河东面的虎山，是屏障九连城的要塞。再东至安平河口，逾安平河而东为苏甸，再东为长甸。九连城以西为安东县（今丹东市），再四为大东沟，更西为大孤山（今孤山）。

在这一沿江地带，清军部署分中、东、西三段：

中段：帮办北洋军务宋庆率亲兵四百人，设司令部于九连城北面的苇子沟，总兵刘盛休率所部铭军专防九连城；总兵聂士成率牙山军驻守栗子园及虎山附近；总兵马玉昆率毅军五营驻守九连城北面的榆树沟附近，总兵宋得胜率毅军四营驻守榆树沟北面的苇子沟一带。

东段：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齐字练军及镇边军共十二营分守安平河口至长甸河口一线。

西段：丰升阿、聂桂林率奉天盛军和原左宝贵所部奉军共十二营分守安东、大东沟，大孤山各城邑。吕本元、孙显寅率原卫汝贵所部盛军十八营驻守沙河镇（安东县）一带。

鸭绿江沿线清军虽有七十余营，两万三千多人，但因是一线设防，兵力分散，纵深内没有强大的预备队实施机动，加之宋庆与依克唐阿互

不统属，因而总体防御能力是脆弱的。

3.旅大地区的防御部署

辽东半岛正面的沿海陆地，西起老铁山，东至鸭绿江口，整个地形前低后高，山地重迭，原是组织抗登陆作战的良好地区。但是，自1888年以来，由于西太后挪用海防经费修建颐和园，以及官吏们中饱私囊，以致除旅顺，大连有坚固设防外，全线并没有完整的防御体系。当日军攻占平壤进逼鸭绿江时，李鸿章等不了解日本大本营的战略意图，错误地判断了日军的主攻方向，加之奉天是清王朝的陪都，以致陆续把长期守备旅顺、大连之兵（宋庆所部毅军和刘盛休所部铭军）调赴鸭绿江前线。为了填防，李鸿章令宋庆所部的分统姜桂题新募桂字四营、提督程允和新募和字三营调赴旅顺，后又令提督卫汝成新募成字六营及所部马队两营，正定镇总兵徐邦道新募拱卫军三营并所部马队两营、炮队一营，由天津调赴旅顺协防，而以铭军分统赵怀业新募怀字六营，代替铭军防守大连湾。日军进攻时，旅大地区清军的部署是：

金州大连地区：副都统连顺率捷胜营步队一营守金州城，以马队二哨驻皮子窝（今皮口）监视附近海岸，总兵徐邦道以拱卫军步队三营守徐家山，以炮队一营驻金州城南，马队二营巡防金州东北一带，总兵赵怀业亲率步队二营守大连湾和尚岛，另以二营守老龙头及黄山，一营守南关岭，一营二哨守苏家屯。连顺受奉天将军裕禄遥制，徐邦道，赵怀业受李鸿章节制，互不相属，而无统一的指挥。

旅顺地区：总兵张光前率亲庆军四营守西炮台，总兵黄仕林率亲庆军四营守东炮台，毅军分统姜桂题新募桂字四营、提督程允和新募和字三营，提督卫汝成新募成字六营，均依陆路炮台分守旅顺后路。凡无炮台处，则配置野战炮，野战炮间的空隙，则配置步兵，依托山地修筑临时工事。

三、作战经过

（一）鸭绿江防线被突破

1894年10月22日，日第一军二万五千人于朝鲜义州一带集结完毕，准备渡江攻取虎山，进而夺占九连城。为了牵制对岸清军，日军采取“近而示之远”的战法，于24日以一部兵力故意在义州作出渡江的姿态，暗地则命第三师团的佐藤大佐（第十八联队长）率领一个支队（步兵二大队，炮兵一小队）于九连城东北的水口镇（在朝鲜境）附近徒涉渡江，向依克唐阿所属副部统倭垣额防区安平河口，鼓楼子一带发起攻击，企图由东而西，绕攻虎山清军，击九连城的侧背。驻守该处的清军一听枪响，即纷纷向宽甸方向逃走。佐藤支队轻取安平河口等处，随即向虎山方向前进。在佐藤支队渡江的当天上午，日军还派遣奥山少佐率领一个支队（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之第三大队）沿鸭绿江而西，屯于安东对岸的麻田浦，以两门野炮轰击安东，牵制该处清军。

义州日军在佐藤支队渡江的当夜，其架桥队利用夜暗在虎山附近江面架设了浮桥（清军竟然没有发觉）。25日凌晨，日军第三师团在炮火掩护下首先渡江，第五师团之第十旅团继进。战斗开始后，宋庆急调苇子沟、栗子园、九连城的清军进行拦击，一度迫使日军不能向纵深发展，后续日军无法通过浮桥。战至上午10时左右，沿岸清军及守备炮台的铭军木支，相继溃逃，只有聂士成部仍坚守虎山阻击日军。由于各路清军溃退，日军（包括由安平河口西进的佐藤支队）得以集中兵力围攻虎山。聂士成部终以寡不敌众，不久亦退往叆河以西。宋庆不敢继续抵抗，于当夜率部退守凤凰城（今凤城）。26日，日军进占九连城，随即分兵一部西占安东，丰升阿，聂桂林率部西奔岫岩。仅三天时间，鸭绿江防线即被日军突破。此后，日军向我东北境内步步进逼。

（二）金州、大连陷落

已集结于朝鲜大同江口渔隐洞锚地待机的日第二军（第二军司令部及第一师团），在第一军发起鸭绿江战斗的同时，即开始实施辽东半岛的登陆作战。10月24日、26日、27日，日军由联合舰队十四艘军舰担任护航，用三十余艘运输船分三批输送第二军第一师团在花园口登陆。登陆后，即布置警戒，建立起登陆场，以掩护混成第十二旅团继续登陆。

徐邦道、赵怀业获悉日军登陆的消息后，以金州、大连兵力薄弱，向旅顺龚照玙请援。龚照玙不明日军是北犯还是南下，因而按兵不动。这时，在皮子窝一带巡防的连顺南部捷胜营马队捕获日本间谍钟崎、山崎二人，获悉日军将攻金州、大连。赵、徐等据以电告李鸿章，希望旅顺分兵北援，并要求速令北洋舰队（已修复的“定”、“镇”等六艘军舰于10月中旬由丁汝昌统率驶回威海）赴援大连。龚照玙也发电向李鸿章请援。李鸿章一面令由营口方面增援旅顺的山西大同军二千人（由总兵程之伟统领）兼程前往金州，一面以责备的口气复电赵、徐等前敌统领：“倭匪尚未过皮子窝而南，汝等只各守营盘，来路多设地雷埋伏，并无守城之责；旅顺兵单，同一吃紧，岂能分拨过湾？可谓糊涂胆小！”金州守军多次催促程之伟玙南下增援，程之伟竟逗留复州（今复县）、熊岳不进。

11月1、2日，进至皮子窝的日军停止前进。徐邦道分析日军之所以不进，可能在皮子窝开辟新的登陆场，掩护后续部队登陆，或是等待粮秣弹药的输送，因而认为机不可失，应主动出击。于是，连顺与徐邦道亲向大连的赵怀业请援，而赵按兵不动，以致丧失了战机。赵怀业部营官周鼎臣等自告奋勇要求赴敌，赵竟说：“我奉中堂（李鸿章）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汝辈欲往鼻〔皮〕子窝拒敌，须请令方可。”最后仅派出步队两哨，不及三百人。

徐邦道主动出击的计划不能实现，便以右翼依托金州城东面的大和尚山，占领该山北麓格条沟之西方高地至破头山一带，左翼则占领通复州的大道十三里台南方高地，紧急修建临时工事。11月3日，日军先头

部队（步兵第十五联队的第一大队，工兵一大队和骑兵一中队）已达亮甲店。同日，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率师团主力由皮子窝出发南下。4日，日军一部切断复州电线。5日，日军先头部队遭到大和尚山徐邦道部炮击，不能前进。师团主力便由石拉子（亮甲店西南）折向金州北面的三十里堡一带，进攻金州守军的左侧背。

11月6日，徐邦道部溃败。接着，日军攻破金州城。连顺早已逃走，其余清军奔向旅顺方向。

7日，日军在联合舰队配合下，分路进攻大连。由于赵怀业已于6日弃大连炮台逃跑，兵勇溃散，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大连，获取了清军遗弃的大小炮一百二十余门和炮弹二百四十六万余发，以及大量的军用物资。当天，发自仁川港的日混成十二旅团亦在花园口登陆完毕，随即向金州方向前进。

（三）旅顺失陷

10月底，当日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并缓慢向前推进之际，丁汝昌曾率北洋舰队由威海卫抵达旅顺，但未敢前往日军登陆之处，进行任何必要的袭扰，11月7日，大连湾失陷，丁汝昌认为旅顺“万难久支”，便借口“旅顺后路警急，各船在口内，水道大隘，不能展动为力，有损无益”，率舰队返回威海。11日，丁汝昌奉命率舰队抵大沽，并前往天津与李鸿章等面商援旅事宜。12日下午，北洋舰队由大沽开赴旅顺，稍事游弋，13日晚即离旅折回威海，此后再未北巡。

本来，日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拟待第二师团到达后再向旅顺进攻，后获悉旅顺清军仅有陆军一万二千人（含金州、大连溃兵），又多系新兵，便决定不待第二师团到达即进攻旅顺。11月17日，日军在大连休整了十天之后，开始向旅顺进攻。大山岩决定，除以步骑二千留守金州，一千留守大连外，将其余部队分为搜索骑兵（骑兵第一大队）、左翼纵队（步兵第十四联队、骑兵一小队、山炮一中队、工兵二中队）、右翼纵队（第一师团和混成第十二旅团之主力），沿旅顺北面大道展开进攻。

当时，负责旅大前线总指挥的龚照玙，在金州失守之后即乘鱼雷艇经烟台逃住天津，其余大小官员也纷纷抢掠财物，准备逃走，以致旅顺军心涣散，人心惶惶。18日，日军控制了旅顺陆路咽喉南关岭，前锋进至土城子。

旅顺危急，诸将互不统属，公推姜桂题担任临时指挥。姜桂题无所作为，坐待敌攻。这时，只有徐邦道率领残军主动迎战。19日，徐部在土城子南面同敌人先头部队遭遇。徐邦道挥军奋击，将敌截为数段，重创日军，一直追击至营城子西南的双台沟。由于日军不断增援，徐邦道兵力薄弱，又没有后援，整整激战了一天，士兵饥饿疲乏，只得退回旅顺。这时，驻防旅顺的八艘鱼雷艇已逃往威海，黄仕林、赵怀业、卫汝

成三个统领也仓皇乘船逃跑。

21日，日军舰队在港外游弋，借以牵制旅顺东西炮台的清军，陆军则集中兵力猛攻可以瞰制各台的椅子山炮台。22日，椅子山炮台为敌攻占，接着，案子山、松树山、二龙山等各炮台相继失陷，守军溃散，旅顺随即陷落。

日军炮击旅顺

就在日军占领旅顺的当天，宋庆所率援军约七千人（含刘盛休所部铭军）进抵金州城北。日军以步骑二千、火炮四门阻击，激战半天之久。宋庆所部清军未能越过金州赴援旅顺，于当晚退至三十里堡，后又向盖平（今盖县）退却。

日寇陷旅顺后，兽性大发，对旅顺人民（二万余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个中国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供认：“把俘虏绑上屠杀，杀害平民，甚至妇女以不例外，这些似乎都是事实”。

在日第二军进攻旅大的同时，业已突破鸭绿江防线的日第一军继续向纵深发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即攻占了辽东半岛的大部要点，达到了为进行直隶平原决战夺取前进基地的战略企图。

对于日军在辽东半岛登陆，清军缺乏抗登陆的应有准备。事前，既未根据地形情况对敌人可能登陆的地点进行认真研究，在威胁最大的地段重点地部署兵力，并加强沿海观察和巡逻，又缺乏必要的机动部队，无法及时组织反击。因此，日军在登陆作战的航渡、换乘、登陆各个阶段，均未受到北洋舰队的任何袭扰。花园口是丰升阿所派盛字营马队的防区，日军在此登陆，该部竟未及时发现和抗击。这一切，表明前敌清军在敌人重兵压境的严重情况下，仍然漫无布置，戒备松弛。李鸿章虽然早在9月29日即曾电告旅大前线各军将领和丁汝昌：“各国探报，均称日派大队分路北犯，尤注意金州各岛左右，欲窜旅后路，毁我船坞，实在意中。各炮台须昼夜分班了望严守，……师船速修，择其可用者，常派出口外，靠山巡查，略张声势。”但是，基于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的错误，在实际部署上却以鸭绿江方向为重点，忽视了旅大方向的守备。当日军已在花园口登陆，并准备进攻金州之际，盛京将军裕禄等仍错误地认为，“倭寇分兵窜扰，明系包抄前敌各军后路。目下九连城既被抢渡，难保不合谋北犯。”并以兵力不足为由，不及时分兵增援旅大。旅大的军事总指挥龚照玙，在敌人已从侧后抄袭而来的情况下，仍不出兵阻击。李鸿章也未采取得力措施。更有甚者，当日军已占金州、正向大连挺进的当天（11月7日），慈禧竟不顾前线军情紧急，仍若无其事地在北京庆祝其六十大寿。清廷和前敌将领如此昏庸，自然不可能对战事实行正确的指导。

11月23日，清廷以辽东半岛溃败责怪李鸿章“调度乖方，救援不力”，下诏“革职留任”，并令其亲赴大沽、北塘等处“周历巡阅，严密布置”，以防日军直逼京畿。与此同时，清廷进一步开展求和活动，准备屈辱投降。

第五节 山东半岛之战（1895年1月～2月）

一、山东半岛的战略地位

山东半岛突出于黄海与渤海之间，北隔渤海海峡与辽东半岛遥遥相望，共扼渤海门户，对于保卫京津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位于山东半岛北岸东部的威海卫，北与辽东半岛的旅顺口相对，西与烟台互为犄角，地当要冲，是控制渤海海峡、保卫京畿门户的锁钥之一。“其海湾形若箕张，两臂斜伸入海，作半环形”。口外刘公岛横置于前，形成东西两条水道，水深十米左右，一般舰船均可通行。刘公岛之西端为黄岛，东南有日岛等分布海中，形成海防的天然屏障。

1887年，清王朝开始在威海建立海军基地，布置防御，作北洋舰队的停泊场。清军在威海的设防，是围绕着南岸、北岸及刘公岛进行的。南岸筑有炮台三座（灶北嘴、鹿角嘴、龙庙嘴），统称南帮炮台；北岸也有炮台三座（北山嘴、黄泥崖、祭祀台），统称北帮炮台；刘公岛有炮台二座（黄岛、东风扫滩）；日岛有炮台一座。另有南帮陆路炮台（所前岭、杨峰岭等）、北帮陆路炮台（合庆滩、老姆顶等）多座。绥巩军统领道员戴宗骞自统绥军四营驻北帮炮台，而以分统总兵刘超佩统巩军四营驻南帮炮台，记名总兵张文宣统北洋护军二营驻守刘公岛。甲午战争爆发前后，威海又陆续增修炮台和添置火炮，迨至日军进攻时，共有各种炮台二十三座，大小火炮一百六十余门。此外，在东西两条水道布有各种水雷：西口七十九个，东口一百六十九个。

旅顺口既失，威海卫便成了北洋海军的唯一基地，战略地位显得更为重要了。当时，停泊在威海军港的北洋舰队舰只有：“定远”、“镇远”、“来远”“靖远”、“济远”、“平远”、“广丙”、“威远”、“康济”、“镇边”、“镇中”、“镇南”、“镇北”、“镇东”、“镇西”等十五艘军舰，此外，尚有水雷艇十二艘，水雷布设船“宝筏”号一艘，附属汽船“飞霆”号一艘。其中“来远”尚在修理，“镇远”触礁负伤（林泰曾即因此事自杀），勉强修补，航速仅达每小时七海里。

黄海海战之后，德国人汉纳根辞去北洋海军总查，不久，李鸿章改请英国人马格禄帮办北洋海军提督。马格禄以前是“金龙”号商船船长，对于海军军事问题一无所知。

二、双方作战方针及部署

（一）日军方面

日军攻占旅大之后，其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和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于12月6日联名向大本营建议：鉴于渤海湾封冻，登陆困难，若欲继续作战，不如出兵山东半岛，海陆夹攻，歼灭北洋海军，以保障从渤海

湾登陆的安全。日本大本营采纳了这一建议，随即任命大山岩为“山东作战军”的司令官。其军队编成为：第二师团（辖步兵第三、第四旅团）及第六师团之第十一旅团，此外，还包括两个骑兵大队、一个野战炮兵联队又一个大队、三个工兵大队以及后方勤务部队等，共计二万五千余人。1895年1月中旬，上述部队自日本广岛航运至大连湾集结，待机进发。与此同时，大本营命令联合舰队负责护送山东作战军的登陆兵团，并与之相配合，攻打威海卫军港，消灭北洋舰队。

联合舰队经过多次侦察，确知北洋舰队仍在威海港内。但威海军港正面设防坚固，不易夺取，因而日军决定把登陆场选择在清军防御薄弱的荣成湾龙睡澳内落凤凤东北的浅滩地段，登陆后再西进，从侧后夺取威海卫。大山岩鉴于从荣成（今旧荣成）至威海的地形复杂，冬季积雪一般深达二尺，车辆难以通行，决定改用人力搬运物资，并计划在二十四小时内将一个师团的兵力登陆完毕。航渡时，联合舰队护送运输船，登陆时则负责海上警戒，并以主力封锁威海港，以防北洋舰队出击。

（二）清军方面

旅大失守之后，清政府判断，日军第一、第二军将并力攻取奉天，以主力打通锦州走廊，进逼山海关，再别遣一部从渤海湾登陆，会攻北京。基于以上判断，“调兵多往顾辽沈”，并以重兵严防山海关至天津一线，关内外总兵力共约十万以上。

由于清朝政府专注京津方向，以致山东防务十分薄弱。整个山东半岛沿海地区的兵力仅四十八营二哨，约一万七千人。主持山东防务的山东巡抚李秉衡，规定在四个方向上防止日军登陆：即宁海（烟台东南）方向，旧馆（今酒馆）方向、威海方向、荣成方向。其中以旧馆为主要防御方向，荣成方向兵力最弱，仅有参将赵得发所部一营，巡检徐抚臣所部一营、副将阎得胜所部二营，共一千四百余人，均受阎得胜节制。

山东半岛的防御重点是威海卫海军基地。1894年11月30日，李鸿章曾指示威海前敌各军：“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且新炮能击四面，敌虽满山谷，断不敢近。多储粮药，多埋地雷，多掘地沟为要。”这是一个消极自保的错误方针。而丁汝昌在执行时更加消极，他连在台炮射击范围内傍岸击敌也没有去做。戴宗骞鉴于“大连湾守兵不并力陆援，旅顺诸军不据南关岭而株守营墙，均以失事”的教训，要求采取“虽布近局，仍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的战守方针。然而，李鸿章还是坚持“仍以扼要埋伏地沟为妥”的错误指导。

12月25日，李鸿章得知荣成湾龙须岛有日舰和小火轮活动，才指示丁汝昌：“应速统现有师船赴龙须岛，成山一带巡探，如日船少，即设法驱逐，否则，听其由后路包抄，则威危而兵船无驻足之地”。但丁汝昌没有执行。1895年1月13日，李鸿章接到光绪帝关于北洋海军应“相机迎

击，以免坐困”的谕旨，又指示丁汝昌等：“查倭如犯威，必以陆队由后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游弋口外牵制我师，彼时兵轮当如何布置迎击，水陆相依，庶无疏失，望与洋弁等悉心妥筹”。李鸿章根据光绪帝指示而作出的这一判断，仍不为丁汝昌所重视，北洋舰队始终蛰居威海港内，不敢与敌争锋。

三、作战经过

（一）荣成湾抗登陆战斗

1895年1月19日，集结于大连湾一带的日本山东作战军在联合舰队二十五艘军舰护航下，开始分批向荣成湾航进。为了迷惑清军，荫蔽自荣成登陆的企图，1月18日和19日，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向登州（今蓬莱）连续轰击。坐镇烟台的山东巡抚李秉衡果被日军的佯动所迷惑，他在19日的奏报中说：“前荣成之成山岛、宁海之金山寨均有倭船窥伺，昨登州又有倭船开炮一时之久。由登州至威海、威海至成山，共五百余里，处处吃紧”。由于他不明敌军将从何处登陆，于是采取应付态度，强调“明知兵分则力单，而地面太长，有不能不分之势”，结果处处兵力薄弱。

1月20日，日军第二师团开始登陆。这时，北洋舰队尚堪一战，本应出击，但丁汝昌“震于倭舰声势，坚匿坐毙”。日军在龙须岛登陆时，驻岛之清军四哨用七五毫米口径火炮轰沉日军舢舨二只。日军受挫后，集中舰炮火力猛轰岸上清军，并仍以小火轮拖带舢舨强行登陆。清军不支，向西败退，日军前锋千余人跟踪迫至荣成。驻守荣成的团练纷纷逃散，城门大开。阎得胜等四营清军多系新兵，又少枪械，因而一触即溃，荣成遂为日军所据。

（二）威海南北两岸炮台的陷落

日军登陆之后，主持山东防务的李秉衡虽知日军约近两万人已从荣成登陆，但仍然错误地认为，日军“又难免不从西面乘隙上岸”，因此，集结在威海、宁海、文登一带的三十五营清军仍然按兵不动，只抽出总兵孙万龄所率嵩武军千余人自旧馆前往增援。山于李秉衡未能集中兵力对从荣成方向登陆之敌进行反击，使日军得以在荣成从容地进行了两天休整。

1月25日，日军分左右（南北）两路西犯威海：左路（南路）为第二师团，自荣成经桥头，温泉汤、虎山，指向威海，负责切断南帮炮台清军退路，右路（北路）为第六师团之第十一旅团，自荣成经三官庙、崮山后，直扑南帮炮台。

孙万龄部于1月22日到达桥头，收集了从荣成败退的阎得胜部。次日，戴宗骞所派知府刘树德率领的两营绥军亦抵桥头一带。在清军东进过程中，沿途人民自动支援，在风雪中帮助拉炮和运送粮草，并协助侦察敌情，修工事，抓特务，给清军官兵以很大鼓舞。26日起，孙、刘两

部清军在桥头附近奋勇阻击南路日军前锋，使敌人接连两天不得西进。但北路日军由于清军阻击不力，较快地进抵鲍家村、崮山后一带，严重威胁着南帮炮台的安全。

28日，李秉衡命孙万龄、戴宗骞夹攻北路日军。但是，戴宗骞违令不至，而阎得胜又不战而退。孙万龄部孤军力战，终因众寡不敌，退回桥头。此时，驻守桥头的刘树德所率绥军竟被戴宗骞调回威海，孙万龄左右无援，亦弃桥头西去。南路日军遂占桥头，并向温泉汤方向逼进。

30日晨，南北两路日军分别进攻凤林集东南高地和威海南岸堡垒群。南帮炮台官兵英勇抵抗，给日寇以大量杀伤，并击毙敌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当日军尚未逼近时，丁汝昌曾建议戴宗骞事急时卸掉南帮炮台的大炮炮门，以免日军利用，轰击港内军舰，但戴宗骞不同意。后来果如丁汝昌所料，日军从南帮炮台发炮轰击港内舰船，使北洋海军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当南帮炮台战斗激烈时，巩军统领刘超佩临阵脱逃，乘小轮渡奔北岸，南岸士兵各自为战。一部分官兵最后在港内军舰火力支援下，由长峰以东沙滩突围，退至成海卫。日舰队一部在南岸激烈陆战时，曾逼近东口，但被日岛清军的猛烈炮火山退。30日下午，南帮炮台全部陷落。

南帮炮台失守后，驻守北岸的绥军见南岸伤亡惨重，便望风溃退，刘树德也仓皇逃命。戴宗骞无奈，移驻祭祀台，从者皆散。2月1日，丁汝昌乘小轮将戴宗骞接往刘公岛（戴至岛即自杀），并炸毁北帮炮台及弹药库，以免资敌。于是，日军不战而占领威海北岸。至此，威海陆上据点尽失，北洋舰队和刘公岛陷入重围。

（三）北洋舰队的覆没

1月30日，一直停泊在荣成湾的日本联合舰队二十一艘军舰（留四艘警戒运输船），在南帮炮台两军激战时，于凌晨2时启航开向威海，7时抵达百尺崖南，先后配合陆军轰击杨峰岭、所前岭炮台。南帮炮台陷落后，北洋舰队因威海港东口暴露在敌军陆路炮火之下，遂移至西口。于是，日鱼雷艇得以破坏东口障碍物，且入港袭击北洋舰只。

在此不利的情况下，北洋舰队本应冲破日军舰队的封锁，出到海上，拚力一战。清廷早在1月23日即曾电谕李秉衡：“现在贼踪逼近南岸，其兵船多只，难保不闯入口内，冀逞水陆夹击之诡谋。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贼归路。”李鸿章于同一天电告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但是，丁汝昌却表示：“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他决定株守港内，既不出战，又不转移。1月30日，李鸿章再次电告丁汝昌、戴宗骞：北洋舰队应冲出威海，“设法保船”。“万一刘（公）岛不保，能挟数舰冲出，或烟台，或吴淞，勿被倭全灭，稍赎重愆。否则，事急时将船凿沉，亦不贻后患。”但是，丁

汝昌仍迟不执行。

2月3日，日舰及占据南帮炮台的日军以大炮水陆合击刘公岛及北洋舰队，双方相持竟日。刘公岛清军伤亡甚众。当夜，日鱼雷艇队闯入东口袭击北洋舰只，“定远”中雷重伤，不久自毁。但日军也有五艘鱼雷艇被击沉。“定远”毁后，丁汝昌移督旗于“镇远”舰。5日，日军又水陆一起发炮轰击，炸毁日岛弹药库及地阱炮。清军发炮还击，击伤日舰两艘。6日凌晨，日鱼雷艇又入东口，袭沉“来远”、“威运”及“宝筏”号。7日，管带王登瀛私率十二艘鱼雷艇从西口逃出，遭日舰追击，全部被俘。此时，刘公岛电讯已中断，形势岌岌可危。在北洋舰队服役的洋员唆使部分民族败类鸣枪过市，公开要求投降，引起刘公岛居民惶惧，军心涣散。9日，“靖远”被敌击沉。当天，刘步蟾自杀。此时，北洋舰队尚有“镇运”、“济远”、“平运”、“广丙”以及“镇中”等大小舰船十艘，但弹药将尽。10日，丁汝昌命令沉船，由子洋员的阻挠，无人执行。

11日，丁汝昌得到烟台密信，知李秉衡已远逃莱州，陆路增援已无希望，便召开会议，研究突围。当即遭到洋员瑞乃尔（德国炮师）、马格禄以及一小撮民族败类营务处道员牛昶炳等的坚决反对，迫使丁汝昌、张文宜等相继自杀。12日晨，一群贪生怕死之徒盗用丁汝昌名义，向日本舰队投降。于是，北洋舰队尚存的“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艇以及刘公岛炮台和军资器械，全被日军所掳。

日军从荣成湾登陆至占领威海卫军港，为时仅三个星期。和辽东半岛之战一样，清军在山东半岛之战中仍然采取消极防御的被动挨打方针，作战指导上产生了一连率的失误。首先，由于对日军攻占旅大之后的战略企图判断错误，在战略防御部署上重奉天而轻山东，山海关内外重兵云集，山东方面则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抽兵（总兵章高元所率嵩武军八营）北援辽东，以致日军由荣成西进时，山东清军无足够数量的预备队可供调遣，不得不从威海附近分兵堵截，造成顾此失彼的被动态势。其次，山东清军在部署上分兵把口，以致处处兵单，尤其是没有汲取日军于花园口登陆从侧后进犯旅大的教训，对敌人从远处登陆进行侧后攻击的可能性缺乏预计；当得知日军已从荣成方向登陆后，又未能及时集中兵力，组织有力的反击，致使登陆之敌得以两路并进，直扑威海。此外，李鸿章死守其保船避战的错误方针，既规定北洋海军“不得出大洋浪战”，又不准陆路各军半渡而击，主观地认为只要。固守大小炮台”，依仗“能击四面”的新式大炮，即可使日军“断不敢近”，这无异于把战场主动权拱手授之于人，而使自己立于未战先败之地，加上丁汝昌最后抱定“惟有船没人尽而已”的愚蠢打算，拒不执行出口决战和突围退却的指示，终于酿成北洋海军坐以待毙，全军覆灭的可悲结局。恩格斯在评论俄土锡诺普海战时指出，土军分舰队的覆灭，是土耳其方面犯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造成的。“考虑到失败绝对不可避免，因此只要风向许可，土耳其分舰队也许最好是起锚并倾全力向俄军攻击。这样做，虽然不可避免地要牺牲几艘舰船，但是至少可以保存部分舰船。”北洋舰队重蹈土耳其分舰队的覆辙，同样是犯了一系列错误的结果。

第六节 辽东清军的溃败（1894年11月～1895年8月）

一、岫岩——赛马集之战

越过鸭绿江之日第一军继1894年10月26日占领九连城、安东之后，接着又于27日占领大东沟，31日占领凤凰城，11月5日占领大孤山。其后，日第二军攻占了金州大连湾，于是，第一军受领的牵制辽东清军、掩护第二军由花园口登陆的任务基本完成，大本营令其在瑷河、大洋河两流域布置冬营，以待来年参加直隶平原决战。为确保冬营安全，日第一军决定以其第三师团之第五旅团长大迫尚敏率一支队（步骑约三千）由大孤山出发，进攻岫岩；以第五师团之第十旅团长立见尚文率一支队（步骑四千）由凤凰城出发，北攻赛马集，并分兵一部（一个大队和少量骑兵）由少佐三原重雄率领西进，协助大迫支队夹攻岫岩。

岫岩西通海城、盖平，北连辽阳，东通凤凰城，南达大孤山，是奉天南部的战略要地。11月14日，日军大迫支队出大孤山，经土城子、老孙家堡、土门子岭，指向岫岩之南，三原重雄所部则出凤凰城，经高家店、黄花甸、黄岭子，指向岫岩之北。丰升阿、聂桂林分兵北扼黄岭子，南控土门子岭和洪家堡，抵御来犯之敌。18日，三原重雄所部猛攻地势险峻的黄岭子山，清军不支，弃险而走，退守兴隆沟。此时，南面守军也为大迫支队所逼，退入岫岩。当晚，丰升阿等见南北两面受敌，率部夜奔海城东南的析木城，岫岩遂为日军所陷。

赛马集东近瑷阳，西接连山关。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所部弃守宽甸之后，即退驻于赛马集一带。日军立见支队由凤凰城向赛马集进军时，分兵一部（步兵一大队、骑兵炮兵各一小队）由少佐今田唯一率领，经雪里站、通远堡、草河口，西犯连山关。当时，连山关、甜水站诸处由吕本元，孙显寅所部盛军驻守，其西面的摩天岭由聂士成等部驻守。由于宋庆奉命率所部毅军并铭军南下救援旅顺，连山关，摩天岭一带防务由聂士成统管。

11月12日，今田唯一所部骑兵抢夺连山关关口，大队继至，遂陷连山关，直趋摩天岭。聂士成部顽强抵抗，“扼隘路，以巨炮当其冲，张旗帜丛林问，鸣鼓角为疑兵，时出截杀，而露宿以守”。日军不得逞，撤回连山关。在西犯摩天岭的同时，日军一小队由瑷阳偷袭赛马集，侦察依克唐阿部虚实，遭到依军痛击，死伤惨重。日军西则阻于摩天岭，东则败于赛马集，不得已于11月24日撤离连山关，集结于草河口一带，阻隔聂、依两军通道。26日，聂、依两军东西夹击，大败草河口日军。29日，立见尚文以大队来援，分犯赛马集和草河口。清军竭力抵抗，战事呈胶着状态。日军前进受阻，又恐凤凰城老巢空虚，后路危险，便于12月6日弃草河口，返回凤凰城。此时，聂、依两军声势相通，拟合力南下，收复凤凰城。依克唐阿并分兵一部绕道瑷阳指向凤凰城侧背。立见

尚文留兵一部守城，自率大队北上迎击自通远堡南下的清军。9日，双方激战于通远堡南面的金家河，彼此伤亡甚众。12日至15日，清军连战皆败，终未能收复凤凰城。这时，日军第三师团已陷海城，辽阳危急。依克唐阿奉命西援辽阳，与宋庆及吉林将军长顺会合，以固沈阳门户。此后，辽阳以东防务主要由聂士成部承担。聂部以摩天岭阵地为中坚，长期与敌相持，日军始终未能越岭西进。

二、海域、盖平等地的陷落

日第二军攻陷旅顺之后，其第一军司令野津道贯即建议大本营准其进军海城，以消除旅大方面日军的后顾之忧。日第一军既不能越摩天岭西犯，改由岫岩经海城而进逼辽阳，断摩天岭清军后路，必要时与第二军会师北上而威胁沈阳，自然有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海域实为中日两军必争之地。

12月上旬，日第三师团于岫岩集结，准备进军海城。当时，由摩天岭奉命回援旅顺的宋庆所部毅军和铭军屯于盖平；由岫岩败退的丰升阿，聂桂林所部十余营驻析木城。12月10日，日军第三师团全队西犯：先以步兵第十八联队长佐藤大佐率兵一部指向盖平，牵制宋庆军，第三师团长桂太郎中将自统师团主力扑向析木城。11日，清军屡战皆败，丰升阿、聂桂林夜奔海城，析木城遂于12日为日军侵占。13日，日军乘势进攻海城。防守该地的清军有奉军等步、骑、炮队十七营，分扼城东的荞麦山及城西的晾甲山以为左右翼，而以养麦山为防御之锁钥，置炮兵于该山南部及山麓，又以部分兵力占领沙河左岸箭楼子附近。日军进攻时，清军稍事抵抗，即退奔辽阳，海城为敌所占。于是，辽阳、盖平、营口（今营口市），牛庄等处告急。清廷更觉奉天省城势危，急令依克唐阿、长顺各率所部西援，以护辽阳，令宋庆率所部自盖平北上，以护营口，牛庄，防敌西窜。

宋庆在盖平闻日军由岫岩长驱北进，已于12月10日亲率毅，铭军等二十余营移驻于大石桥（今营口县），拟救援海城。但12日析木城陷落，13日海城又入敌手，宋庆便改变计划，拟与北面诸军取得联络之后，再共图收复海城，于是将全军二十余营屯于距海城二十里的缸瓦寨，未能趁敌立足未稳之际发起攻击，丧失了战机。12月19日，海城日军大股来袭，宋庆军人败，由缸瓦寨退往营口。田庄台一带。

日军攻占海城后，以孤军（约六千人）入重地，颇觉力单，于是，野津道贯率第一军司令部和军预备队由安东移驻岫岩（1895年1月5日到达），同时，请求第二军分兵一部协攻盖平，以便两军声势相通。1895年1月初，日第一军派遣第一师团之混成第一旅团约八千人由普兰店（今新金）北上。当时，驻盖平之清军只剩下章高元所部山东嵩武军八营、徐邦道所部拱卫军十一营、张光前所部亲庆军五营。1月5日，徐邦道部奉宋庆之命移驻牛庄（以便联络辽阳清军），盖平兵力更单。徐部出发不久，宋庆以日军混成第一旅团逼近盖平，令其回援。6日，徐部返抵蓝旗厂（益平北面二十余里），宋庆又改变命令，令其开赴田庄

台。徐部又回师北上，刚过营口，宋庆仍令其回援盖平，于是又折而南行。这样，徐邦道所部往返奔波于田庄台、营口、盖平之间，四昼夜未得休息。9日夜，徐部前锋进至盖平境时，日军已扑攻盖平。扼守东门外凤凰山的张光前部闻敌即溃，日军一部乘势攻入东门，然后出南门，绕至扼守南门外的章高元部之后。章部不支，刚赶到战场的徐邦道部也因疲惫过度，不堪任战，于是各部齐退营口。10日上午，盖平陷落。从此，日第一、二军声势联络，辽东清军进一步陷入被动。

三、清军反攻海城失败

自平壤之战以后，清廷以淮军不可恃，便起用湘军旧将魏光焘、李光久等，令其募兵北援。1895年1月，光绪帝又召湘军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入京，授为钦差大臣，令湖南巡抚吴大澂、淮军总统宋庆共同帮办刘坤一军务。

1月14日，清廷以日军既据海城，又陷盖平、关外军情更紧，乃令新授钦差大臣刘坤一迅赴山海关驻扎调皮，节制关内外各军。并令自动请缨的吴大澂统率新疆布政使魏光焘所部新湘军、总兵刘树元所率抚标军，吴元恺所率恺字军等，“即日拔队出关，分起进发，会合宋庆等军，相机进剿”，于是，宋庆于田庄台坐待援军。

这时，奉命扼守辽阳的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和吉林将军长顺深感责任重大，一致认为，与其坐待日军来攻，不如乘其占领未固之际，先发制胜，于是商定，以集结于腾鳌堡，鞍山站一带的五十余营约二万人的兵力，“分左右两路，步步前往，相机规海”。1月17日，依、长两军已前进至海城北面，距敌人前沿阵地仅二里许。西路（依军）包抄至二台子，东路（长顺军）包抄至头河堡，东西绵亘近三十里。日军扼守城北欢喜山和双龙山（山上均筑有炮台），并有步、骑、炮兵列阵以待。当清军发起攻击时，日军步骑数千人在炮火掩护下蜂拥齐出。清军大半使用土枪，射程小，射速慢，加之“旗汉兵团心志不齐”，相持不久，西路依军先退，东路长顺军继之，第一次反攻海城遂告失败。

1月22日，依、长两军又分左右两路会攻海城。依军自长虎台向欢喜、双龙二山之间的三里桥突击，为欢喜山日军炮火所阻，又折而北，经沙河沿绕出欢喜山之西，拟攻海城之西北角。长顺军则从头河堡向海城东北的双龙山发动进攻；终因日军炮火猛烈而不得进。下午，日军发起反击，依军大量伤亡，经大富屯向西北方向退走。东路长顺军亦退。第二次反攻海城又归失败。

此后，山东半岛军事形势日趋恶化，清廷主战派为了从辽东战场捞回一点面子，急欲乘日军战略重点南移之机，一举收复海城。2月7日，军机处奉旨电谕长顺和依克唐阿：“此时各军俱到前敌，亟宜克期合剿。著长顺与依克唐阿同心协力，严饬诸将奋勇进战，务期一举攻拔，再向南路与宋庆会合，节节扫荡，军事当大有转机矣。”依、长二将鉴于前两次攻海失败，深感兵力尚单，商请宋庆出兵会攻。2月11日，吴大澂到

达田庄台，其所部除道员李光久军（老湘军五营）已先期出关屯于牛庄外，总兵刘树元所率亲兵六营亦已到达牛庄。又总兵梁永福所率凤字军五营，也于前一日由田庄台开入牛庄。于是，依克唐阿、长顺与宋庆等商定，于2月16日以九十余营三万余人的兵力，再次反攻海城。进攻部署是；依军自北面进攻大教场为中路，长顺军进攻玉皇山为东路，李光久和徐邦道各率所部从柳公屯进攻唐王山为西路。当天，东西二路进逼颇紧。日军先则坚伏不动，继则步、骑、炮兵一齐出击。东路长顺军伤亡甚众，中路依军亦阻于欢喜山炮火，相继败退。西路李、徐两部见势不妙，也纷纷西走。这样，第三次反攻海城又未成功。

2月21日，清军上述各部再次会攻海城失败。在第四次反攻海城的同时，宋庆依约率所部毅军、铭军（统领刘盛休已撤职，改由姜桂题接任）及河南嵩武军（总兵刘世俊统领）等五十余营近二万人进攻盖平北面的太平山日军，一则配合攻海，一则为日后收复盖平作准备。宋庆军一度占领太平山，并与敌相持三日。24日，日军三面来攻，清军大败，退回营口以东地区，防止日军西犯。

清军四次反攻海城，虽不是决定性的战役，但其持续时间之长、动员兵力之多，涉及地区之广、战斗规模之大，在整个中日甲午战争过程中是仅有的。清军总的战略方针是消极防御，然就反攻海域来说，则属于具体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固然是由于海域战略地位重要，它的得失，关系到清廷“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方针能否实现，恨主要还是由于日本侵略者当时的战略重点是海陆进攻山东半岛，全歼北洋海军，而在辽东战场上基本上取守势的缘故。

四、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地的失守

清军第四次反攻海城失败之后，还想进行第五次反攻。当时，“环海城而军者：两将军（依克唐阿、长顺），一巡抚（吴大澂）、一提督（宋庆）、一藩司（魏光焘），共百余营，六万余人（按：宋庆毅军时已增至三十营）”。吴大澂所部湘军分布海城西北，控制通往牛庄的大道，依军分布海城正北，扼牛庄通辽阳的大道，长顺军分布海城东北，扼通向辽阳的大道。

日军方面，为了扭转局面，决定趁冰冻未解之际，由盖平、海城、凤凰城分路进攻，一由盖平北趋营口，一由凤凰城经黄花甸，三家子赴鞍山站）；一出海城北攻依。长两军，经甘泉堡指向鞍山站之南。鞍山站系牛庄至辽阳之孔道。日军欲夺此要隘，示形逼攻辽阳，实将袭取牛庄。因为牛庄一旦有警，海城西面的湘军势将由于退路受到威胁而停止攻海。

2月28日凌晨，未等清军发起第五次反攻，海城日军第三师团便分路出击。激战约三小时，中路依军败退。恰在这时，辽阳南九十里之吉洞峪为出凤凰城的日军第五师团袭占，辽阳大震。辽阳知州徐庆璋请援于依克唐阿，依便托词援辽，率部北走，长顺军也随之而去。日军跟踪

追击，一举夺占鞍山站。不久，第五师团也间道来会。除留兵一部控制鞍山站外，日第三、第五师团合军西指牛庄。

3月2日和4日，魏光焘、李光久先后率部回援牛庄。两部新老湘军共十一营，均困守市内。4日，日军三路围攻牛庄，李光久等弃军而逃。军士们深陷危地，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殊死搏斗，与敌相持竟日，最后伤亡近二千人，被俘六百余人。日军也死伤近四百人，其中有令田唯一等将陆军官十五人。这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唯一的一次大规模专战，参战清军英勇拚杀，表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牺牲精神。

牛庄失守后，吴大澂率部由田庄台退往双台子，宋庆则连夜率全军主力退扎田庄台，只留少数兵力守营口。3月7日，由牛庄出发的日军轻取营口，并与盖乎北上的日军会师。

田庄台四面平坦，加之当时辽河仍然封冻，更是无险可守。3月9日，日军第一、第三、第五师团分路来攻，宋庆军大败，伤亡枕藉。被圈子田庄台内的清军则被日军纵火焚烧，死者二千余人。

田庄台陷落后，宋庆、吴大澂等率残部退往石山站（锦州东）。从此，自田庄台沿辽河而东，自鞍山站而西，皆为日军所占。清廷以淮军既溃于先，湘军复败于后，北洋海军亦已覆没，日军海陆交乘，畿疆危逼，于是束手无策，屈辱求和之心更为迫切。日本方面，则认为“作战的第一期已经结束，因此令‘征清大总督府’进驻战址，即将开始第二期作战”。

第十部分 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1900年6月～1901年9月）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速了争夺中国的步伐，使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危机。清王朝不积极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反而镇压民众的反帝斗争和救亡图存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1900年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并阴谋乘帆瓜分中国，借口清政府“排外”，纷纷调兵前来中国，进而发动了一场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联合侵华的战争。为了保卫家园，中国军民在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中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

第一节 大沽、天津之战（1900年6月~7月）

一、义和团及清军英勇阻击西摩尔侵略军

列强于1900年5月底6月初派兵四百余人进入北京后，6月9日，驻天津各领事又开会决定，再从驻天津租界的三千余官兵中抽调两千余人，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美国海军上校麦克拉率领，分批乘火车进入北京。

6月10日上午9时，西摩尔率第一批八百余人（携带火炮数门）乘火车自天津出发，后续部队拟于三日内分批离津北上。当时，京津铁路有些地段已被义和团拆毁，西摩尔派兵边修边进，次日下午方抵廊坊。当西摩尔督队抢修前方铁路时，附近的义和团员手持大刀、长矛冲上前去，同敌人展开白刃战，迫使侵略军逃向廊坊车站。义和团紧迫不舍，将侵略军围困于廊坊。6月14日晨，侵略军正欲继续北上，义和团三百余人大声疾呼，冲向廊坊车站，毙伤敌兵多人。当日下午，义和团还对留守落垡车站的侵略军进行袭击，西摩尔不得不派兵回救。

鉴于前进无望，西摩尔于6月16日率部撤至杨村。18日14时30分，董福祥部甘军三千余人及义和团二千余人，向尚留于廊坊的侵略军两列火车发起进攻。经过八十多分钟的激烈战斗，毙伤敌五十余人。侵略军撤至杨村车站后，又遭义和团包围袭击，死伤近四十人。

6月19日晚，西摩尔侵略军已处于缺粮少弹，被动挨打的窘境，遂决定抢夺附近民船数艘，运载伤兵、军械，顺北运河撤回天津，部队则沿北运河东岸徒步行军。6月20日，侵略军从杨村撤退。

侵略军在向天津撤退途中，仍不断遭到义和团及清军聂士成部的袭击。6月21日14时半，在北仓、穆庄与聂士成部发生激战。聂士成亲自指挥作战。侵略军受创甚重，白天不敢行军，夜间拚命狂逃，于6月22日2时左右抵近天津西北郊的西沽。该处有清军的武库（军械局），内贮大量枪炮弹药，周围墙垣甚厚，防御条件较好。驻守该库的清军为练军卞长胜、陶良才部。此外，武卫前军左路统领杨慕时部也于6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由保定到达西沽。由于守军疏于防范，杨慕时部又仓卒赴战，武库于22日凌晨被侵略军攻占。西摩尔侵略军得到了粮弹补充，获得了喘息机会，但由于沿途连遭袭击，死伤已近三百人，又抽出数百人抬伤员，能战之兵已不满千，很难通过清军及义和团的驻区进入租界，只得暂驻西沽，并秘密派人前往租界求援。6月26日，侵略军摧毁西沽武库，在千余援军接应下退入天津租界。

这次作战，义和团及清军共击毙侵略军六十二人，击伤二百二十八人，彻底粉碎了西摩尔所率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特别是义和团的勇敢精神，使侵略军大为震惊。战后，西摩尔心有余悸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灭。"6

月20日，侵略军已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如果当时廊坊一带的董福祥部南下紧迫，聂士成部在杨村、北仓一带全力堵截，同义和团数千人协同作战，有可能将敌全部歼灭。但是，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慈禧竟令萤福祥部回京围攻使馆区，从而丧失了南北夹击逃敌的战机。聂士成部在杨村、北仓的阻击战中，大多以村庄为阵地，远离运河河道，遥向敌人开炮。虽然炮声隆隆，但杀伤敌人不多，加之没有切断运河航道，致使侵略军得以乘夜暗窜越北仓，逃至津郊西沽。侵略军夺占了西沽武库后，在津清军未能集中兵力组织围攻。6月23日晨，杨慕时部一度攻入武库，但卞，陶两部竟观望不战，结果杨部因兵力不足，被迫退出。6月26日上午，西摩尔沿铁路撤回租界时，附近清军不积极出击，最后终于丧失了全歼该敌的良机。

二、大沽失守

正当西摩尔侵略军在廊坊受到义和团及清军阻击时，联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侵占了大沽。

大沽是天津的门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该处炮台进行了修复和改建。八国联军进犯前夕，南北两岸共有四座炮台：主炮台在白河口南岸，安设各种火炮五十六门，并有发电所，电信局各一处，探照灯两具，主炮台之南建有一座新炮台，安设各种火炮二十门。白河口北岸建有北炮台，安设各种火炮七十四门，并有电信局一处，北炮台之西北建有西北炮台，安设各种火炮二十门。这些火炮大部是克虏伯、阿姆斯特朗式和国内仿制的产品。

驻守大沽炮台的清军，有天津镇总兵罗荣光部准军六营三千人及一个水雷营。此外，还有叶祖珪所率北洋海军“海容”号巡洋舰一艘和“海龙”号等鱼雷艇四艘，泊于白河口内。

根据以往的不平等条约，列强的舰船可以出入白河口而不受任何阻拦。1900年6月底，大沽守军拟增兵驻守火车站，控制大沽至天津的铁路交通，并在白河口布设水雷，控制外国舰船出入。帝国主义者得此消息后，6月15日在俄国旗舰上开会，研究确定了从水陆两路攻取大沽的作战部署，当即令先已驶入白河的十艘吃水较浅的千吨以下舰艇做好作战准备，并派遣日军三百名（随带火炮两门）于当晚至塘沽登陆。16日，各国海军头目又开会精心策划，并令已在白河内的各舰驶泊各自的作战位置：日舰“爱宕号”，美舰“莫诺卡西”号驶靠塘沽火车站附近的白河左岸边，以便保护车站，英水雷驱逐舰“惠钦古”号、“弗爱摩”号驶靠清军水雷营附近，监视北洋海军的四艘鱼雷艇；法炮舰“利夭”号、德炮舰“伊尔契斯”号驶靠位于塘沽、大沽之间的海关附近，俄炮舰“基里亚克”号、“考里埃芝”号、“保布尔”号驶靠白河右岸东沽附近；英巡洋舰“阿尔舍林”号在俄舰北侧于家堡对岸，以便共同炮击南北炮台。各舰装备有七至二十厘米口径的速射炮，还有不少口径为三十七至四十七毫米的机关炮。当日，又有英、德、俄各军约六百人，由德国海军大校波尔指挥在塘沽分批登陆（连同15日晚登岸的日军，共有九百余人），准

备从侧后进攻大沽炮台。至此，联军的作战部署已基本就绪。

这时，大沽守军也加强了炮台的守备，并于6月16日在白河口布设水雷，封锁航道，阻止敌军舰船出入。联军即以此为借口，由俄国海军副司令海尔布德朗出面，于16日19时半给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胡说清军在白河口布设水雷及加强大沽防御，“于我西人代平匪乱一事，实有不便”，无理限令中国守军于17日凌晨2时交出炮台。驻天津各国领事也将同样内容的通牒递交裕禄。罗荣光严辞拒绝，并立即传令各炮台准备战斗。

6月17日零时50分，距通牒限定的时间还差七十分钟，侵略军便开始进攻大沽炮台。泊于白河的联军舰艇首先发炮轰击南北两岸炮台，守军被迫还击。这时，集结在塘沽的联军分左中右三路直逼西北炮台。在敌军猛烈攻击下，西北炮台于5时左右失守。6时许，联军未遇抵抗便占据了北炮台。之后，左岸陆路联军从北炮台，法、俄各舰从所在位置向南炮台猛烈轰击。同时，俄、德、法军一部，由北炮台附近渡至白河南岸，从侧后抄袭南炮台。南炮台守军腹背受敌，弹药库又中弹起火，伤亡不断增加，被迫撤退。至6时50分，大沽炮台全部失守，清军残部向新城方向退走。此次作战，清军阵亡七八百人，北洋海军“海容”号巡洋舰及四艘鱼雷艇也被联军掳走。联军死五十八人，伤一百九十七人，并有四艘战舰负伤。

联军夺占大沽炮台后，控制了大沽口和火车站，使海上援兵能够顺利地运往天津，给津京，直隶地区军民的防御作战增加了不少困难。

大沽炮台的失守，与清政府在兵力部署上采取重北京而轻津沽的方针有很大关系。6月上旬，各国军舰云集大沽，侵略军大批上岸的时候，清政府仍没有增派军队加强大沽，塘沽、北塘的守御，致使分守大沽炮台、火车站、海关等地的三千清军，在毫无外援和不能互相策应的情况下，被侵略军各个击破。其次，大沽炮台的失守，还与战备不及时有关。守将罗荣光，直至侵略军的十艘舰艇驶入白河作战位置后，才在白河口布设水雷，封锁航道；九百多名敌海军陆战队在塘沽登陆时，也没有及时采取应急措施，致使联军顺利实施水陆夹攻，在六个小时内即夺占了整个炮台。大沽炮台的失守，也反映出炮台构筑的落后，如炮位及军火仓库，都没有采取荫蔽、伪装和加强保护的措施，全部暴露在外，成为敌人轰击的目标。在守备战术上，罗荣光以绝大部分兵力分守几处炮台，台外缺少机动兵力，以致当敌人从侧后抄袭时，不能组织有效的阻击，粉碎敌人的进攻。事实再一次证明，孤立地防守炮台，总是难以守住的。

三、天津之战

6月19日，清廷还不知道大沽炮台已经失守，但已接到6月17日裕禄关于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折，于是一面令裕禄固守大沽炮台，一面照会各国公使，抗议列强的无理行为，并要求各国驻华公使于二十四小时

内从北京撤往天津。鉴于形势严峻，慈禧于6月16日至19日多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当时，光绪帝存有依靠列强恢复自身权力的幻想，因此，以他为首的帝党，对外主和，对内主“剿”。他们认为，“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并提出“乱民当早除，不然，祸不测”。中央和地方的洋务派官僚也主张与帝国主义媾和，全力镇压义和团。以慈禧为首的后党本来也不愿与帝国主义作战，但当时和帝国主义存在一些矛盾。特别是慈禧欲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大阿哥（帝位继承人），逼迫光绪让位，各国公使表示不予承认，这使她对帝国主义列强非常不满。在载漪等顽固派成员的怂恿下，她决定对各国宣战。6月21日以皇帝名义发布了一个宣战诏书，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但是，慈禧的宣战并非出于真意，宣战不到十天，就以军机处名义命令驻外公使向各国解释宣战乃出于“万不得已”的苦衷，表示“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这充分暴露了慈禧等人假宣战、真妥协的嘴脸。

其实，早在清廷发布宣战《上谕》之前，天津的义和团和清军已与紫竹林租界内的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当时，驻守天津城区的清军有；总兵何永盛部练军六营两千五百人，驻守天津城东侧、东机器局，马家口及西沽武库至三岔河口一带；水师营驻三岔河口北岸炮台及金钟河火药库，罗荣光部淮军四营一千七百五十人驻城东及紫竹林租界西侧；武卫前军聂士成部十营约五千人，分别驻守城西南的广仁堂、南门外海光寺、南机器局、紫竹林租界东北侧及老龙头车站北部一带。总兵力约一万人左右。参战的义和团约有二三千人。租界内的联军则不足两千人。

6月15日前后，天津的义和团激于义愤，焚烧了马家口及三岔河口望海楼等地的教堂。联军开枪镇压，义和团奋起还击。17日，当联军再次开枪镇压时，驻防清军也配合义和团进行还击。练军炮击紫竹林租界，水师营炮击老龙头车站，曹福田则率义和团民袭击老龙头车站及租界内联军，揭开了天津军民反侵略战争的序幕。从18日至22日，清军各部及义和团连续围困和炮击租界。意大利军司令官，英国的戒严司令官都受重伤。俄国领事馆、太古洋行、英租界的工部局，戈登堂及德军司令部都遭到炮击。被围联军因兵力单薄，只得实行缓兵之计，“皆高挂白旗，以示不战”。但义和团及清军没有停止攻击，只是由于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仅限于炮击和袭扰而已。

从当时的兵力对比看，天津一带的清军至少比紫竹林租界内的联军多四至五倍，再加上义和团数万人，居于绝对优势。如果清军与义和团密切配合，实行分割包围的战术，有可能将分兵把守紫竹林租界的联军各个歼灭。但由于清军天津地区的最高指挥官裕禄根本没有决心真正同联军作战，以致丧失了有利战机。

至6月22日，双方在天津的兵力都发生了变化。这时，武卫前军杨

慕时部三营一千余人已抵北郊西沽、红桥一带；聂士成已率武卫前军约五营两千余人回师天津，又有从大沽撤至津郊的淮军六营约两千人，其中一部驻租界西马家口附近。义和团主要有：曹福田部在老龙头车站附近，韩以礼部在天津西南郊一带，称为“天下第一团”的张德成部五千人在马家口一带。

联军则于6月21日（一说18日）由俄国军官斯泰赛率领两千八百余人，从大沽乘火车增援天津。这股侵略军行至军粮城车站时，因铁路被毁，改为步行，后在老龙头车站附近遭到义和团曹福田部及部分清军的猛烈阻击，死伤五百余人，第二天才进入车站。6月23日，又开来一部分联军，在租界内联军的接应下，进入租界。至26日，连同从西沽武库撤回的西摩尔军，租界内的联军已增至七千余人。

联军的兵力虽然增加了，但处于义和团和清军的包围之中，缺少食物，房屋毁坏，医院中的伤病员拥挤不堪，处境仍然十分困难。联军各军司令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万不能向北京进发，只得暂在天津，以图自保。若再不能自保，不如退守大沽”。于是决定采取固守措施，由各军分区防守。

紫竹林租界位于天津城东南，东临白河，北面隔河紧靠老龙头火车站。6月23日，联军务司令官会议决定：俄军防守老龙头火车站至租界东面的武备学堂一线，法军防守租界西北部，美军防守租界西南部，日、英、德、意、奥各军分守自租界西南端沿墙子河至梁园门一带。除加强租界区防守外，还分兵控制天津至大沽间的交通线。

6月22日至29日，围攻租界的清军约有一万六千人，义和团三万余人。但是，由于清军缺乏积极进攻精神，只是向租界开炮遥击，故联军损失不大。义和团虽曾多次主动出击，不断给敌人以杀伤，但也没有使联军受到严重打击。又由于清军没有切断天津至大沽间的交通线，致使联军能不断得到兵力和粮弹的补充。27日，联军集中近三千人的兵力，攻占了天津城东面的清军主要军火补给点东机器局。联军夺占该局后，既可免遭该处清军对租界的炮击，又可保证“与大沽通达消息之路”“平安无碍”，改善了防御态势，因而“视为极大之幸事”。

从6月30日开始，围攻天津侵略军的作战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天，裕禄向清廷提出了一个“先将紫竹林洋兵击退，然后会合各营，节节进剿，直抵大沽，……迅将大沽炮台恢复，以固门户”的作战方案。这一方案，是以清政府调赴天津的援军陆续到达为前提的。6月29日，浙江提督马玉昆部十五营六千余人，已由山海关进驻白河河东陈家沟、老龙头火车站附近，6月底7月初，聂士成部除留五营驻守芦台外，共二十五营一万余人陆续齐集天津，分驻于海光寺及盐坨、陈家沟等地；宋庆部十三营正在增援途中。同时，清政府又从天津水会七十二局中招募精壮万余人，成立芦勇、保卫军、安卫军，并将南门外数十个打雁户组成排枪队，驻守南门附近。至此，在津清军已增至两万四五千人，各种民众武装约万人。此外，又有义和团两万余人从青县，静海、沧州、南

庆，庆云等地纷纷来津。曹福田、张德成等趁机整顿队伍，使能参战的义和团增至五万人。

此时，在大沽登陆的联军约有一万四千人（随带火炮八十九门），已抵天津租界者约八千至一万人。

7月5日，裕禄、聂士成、马玉昆等同义和团商议，决定对租界内的联军实施“三面进攻之计”。其部署是：由义和团曹福田部及武卫左军马玉昆部从北向南进攻老龙头火车站，夺回东机器局，控制附近铁路线，切断联军至大沽的交通，并相机从北面进攻租界，驻盐坨的武卫前军前路统带周鼎臣部三营助攻车站及租界。由义和团张德成部及淮军罗荣光部，练军何永盛部，在马家口一带从西面进攻租界。由驻南门外海光寺一带的武卫前军聂士成部，从西南面进攻租界，武卫前军后路统领胡殿甲除派一部助攻东机器局外，率领各营四面游击，进行机动作战。其余练军各营、水师营及盐坨各营仍继续炮击租界。

三面进攻开始后，马玉昆部从北面炮击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周鼎臣部也配合轰击。义和团多次勇猛冲杀。俄军一度被迫退出车站；联军增派日、英、法军前往死守。从7月7日至11日，义和团及清军几乎每天都组织数百人规模的冲锋，战斗相当激烈，仅日军就被打死打伤七十一人。7月5日那天，马玉昆却还与胡殿甲部一起五次猛攻东机器局，虽未夺回该局，但杀伤了不少敌人。

在西面，义和团张德成部及淮军蒋顺发，周行彪部于7月5日晚在靠近租界的马家口同联军激战。张德成事先将义和团群众埋伏起来，然后出其不意地发起围攻，歼敌甚众，并乘胜进抵租界边缘。7月6日，张德成部以火牛数十只为前驱，踩爆联军埋设的地雷，一度冲进租界。租界内的中国居民也利用夜暗打冷枪、烧仓库、施放信号，积极配合清军及义和团打击敌人。

在西南面，聂士成部于7月6日在小西门围墙土台上安置火炮，轰击租界。联军五六百人被迫退至跑马场地道内潜藏，稍后复出，又被清军炮火击散。当晚，聂士成部进驻八里台、跑马场等地，次日又攻至租界南部外侧的小营门一带。

联军为了解除南机器局、跑马场、八里台等处聂士成部炮火的威胁，决定向租界西南发起反击。7月9日凌晨3时，联军步兵一千人、骑兵一百五十人、炮兵两个连（携带火炮九门），以日军五百人为先头部队，出梁园门往南，进攻纪家庄一带的义和团，英、俄、美军则向跑马场、八里台、南机器局发起攻击。法军炮队自租界西南发炮助攻。5时半左右，联军逼攻跑马场，该处清军退往八里台。聂士成闻讯，从小营门率部往援。7时左右，联军夺占跑马场后，即涌向八里台围攻聂士成部。攻占纪家庄的日军也北上协攻。激战多时，聂士成重伤七处，仍挥军奋战，终因伤势过重而阵亡。日军趁势攻占南机器局，因该局离租界太远，不便驻守，遂将其烧毁。午后，联军又撤回租界。聂士成牺牲

后，余部归马玉昆指挥。

义和团及清军实施“三面进攻之计”，取得了一定的战果。经过此次作战，使联军进一步陷入“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疲惫已极”的境地。但是，腐败的清政府不但不激励军民继续奋勇杀敌，扩大战果，反而急于求和。7月8日，清政府任命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未至津前由裕禄署理），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大臣，为求和作准备。害怕财产和商务毁于战争的天津缙绅，趁机奔走相告，一时和议之声传遍前线，加上聂士成部作战失利，大大影响了军民的抗敌意志。武器简陋的义和团，在连日进攻作战中，被清军胁迫“充先锋当前敌”，伤亡也很大。7月10日，宋庆率部到达天津（驻于西门外），13日便借故下令屠杀义和团，“半日间城内外树旗设坛者皆散去”，大大削弱了抗击联军的力量。联军则由于大沽援军不断到达，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7月12日，租界内的联军已增至一万七千余人。侵略者见清军的进攻业已停止，便准备进攻天津城。当日，联军指挥官会议决定分两路攻城，由俄国海军司令阿列克谢也夫任总指挥。其部署是：阿列克谢也夫率俄军两千六百名为前队，德军两个步兵连，法军一个炮兵连为后援，共约三千人，从白河东岸向北进攻三岔河口水师营炮台及天津城东北，切断河东清军及义和团与城内的联系。由英军少将陶白率英军七百，美将白勒率美军六百，日将福岛率日军两千四百，法军大校派拉克率法军八百，共四千五百人，携火炮二十四门，进攻天津城南门。

当时，清军水师营守三岔河口炮台，马玉昆部十五营驻老龙头车站北侧地区，聂士成部二十五营由周鼎臣，胡殿甲等五个统领率领驻广仁堂、海光寺、南机器局一带，罗荣光（7月9日已死）余部驻城东南至租界西侧一带，练军何永盛部、淮军其余各部及水会等民众武装，守南门及分驻南门外各村落，宋庆部驻西门外，义和团则分散于城内外各地。从兵力部署看，清军建制杂乱，没有统一指挥，而且大部驻守城外各地，城内驻军很少，没有坚守防御的准备。

7月12日夜，白河东岸的俄军向北进攻，13日黎明炮击马玉昆等部阵地。13日上午7时左右，法军炮击城东北壕墙外的火药库，引起爆炸。俄军乘机强攻清军各阵地，并向水师营炮台进攻。至13日中午12时，清军被迫撤出各阵地，纷纷向北郊溃退，联军乘胜进抵东北城下。

白河西岸的英、美、日、法军，以法军为右路，日军为中路，美、英军为左路，于13日凌晨出租界南面土墙，经海光寺向天津城南门进逼。英炮兵则在租界南面壕墙上炮击天津城区。南门外清军奋起抵抗，正西门附近的武卫前军炮兵开炮轰击海光寺附近的联军。此前，城门外居民已挖开河堤，使联军被阻于海光寺附近一带。日、英、法军指挥官决定架桥强攻。14日，日军渡过护城河，直抵南门城下，然后派工兵用炸药轰破城门，乘机攻进城内。南门城上原有清军驻守，后“为众绅民禀清撤去”，“众谓城上不用炮击洋人，洋人必不用炮击城内”。因此，南门

内无兵防守，只有部分义和团及民众武装。他们先则在城墙上奋力抵抗，继则同侵略军展开巷战，打死打伤侵略军数百名，但终因经不住侵略军炮火轰击，被迫后撤。

联军从南门入城后，便北上配合城东北的联军夹攻水师营炮台。该处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虽腹背受敌，仍英勇作战，在毙伤敌人二百余名后撤离。当日，联军占领天津，洗劫全城。在城内抗击联军的义和团大部惨遭杀害，退出城外者又遭宋庆军屠杀，伤亡数千人。

在联军攻城时，驻扎城外的宋庆、马玉昆部七十余营两万余人，不但不迎击敌军，反而临阵脱逃。天津前线的最高指挥官裕禄，于城破前即同宋庆所部一起逃往杨村，马玉昆则率部逃往北仓，只有装备简陋的义和团始终英勇顽强地坚持抗战。

这次作战，八国联军死伤九百余人（其中校以上军官二十五名），是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伤亡最多的一次。

天津之所以失陷，主要由于慈禧集团推行以战求和政策和前线指挥官畏敌怯战造成的。天津的义和团及部分清军官兵，在围攻紫竹林租界时，杀敌热情很高，多次给联军以沉重打击。但是，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慈禧等人转战为和的态度日趋明朗。她派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不战而退的宋庆帮办北洋军务，当裕禄的助手。宋庆当即表示：“中东之役，仅与日本开衅，尚不能支，何况今拒八国？”可见慈禧令其前往天津，名为加强防御，实为媚外求和。宋庆心领神会，一到天津便大肆镇压义和团，露骨地破坏天津军民抗战的大好形势。在作战过程中，裕禄、马玉昆等人驱使装备简陋的义和团群众充当先锋，让清军殿后。义和团既遭外国侵略者的轰击，又遭清军的枪杀，伤亡极大。如在7月9日夜进攻租界的一次战斗中，义和团民阵亡二千余人，而清军伤亡甚少。对此，当时就有人披露，“是夕‘团匪’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无疑会使义和团这支真正的反帝爱国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加上裕禄等人害有“恐洋病”，根本没有坚守天津的决心，遭敌进攻便弃阵西撤，以致本可固守的战略要地天津城，两天内即被联军攻占。

联军攻占天津后，使津沽之间连成一片，有了可靠的基地，军械、粮饷得到了补充，摆脱了被动的局面。清军则失去了重要军火供给基地和拱卫北京的主要屏障。事后，清政府给裕禄以“革职留任”、宋庆“交部议处”的处分，令其戴罪“联络各军，并将水会民团重加整顿，克期规复天津”。实际上，裕禄、宋庆等人已畏敌如虎，“坐困偏隅，一筹莫展”，根本没有收复天津的决心。

第二节 北京之战（1900年8月）

一、清军在津京间的防御部署

天津失陷后，清廷一面令从天津撤离的部队在北仓、杨村等地设防，一面调派其它部队增强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防御。其时，马玉昆部十五营、聂士成余部四营、吕本元部五营、何永盛部五营、安卫军二营共约一万五千人退至北仓，宋庆部十三营退至杨村。芦台有武卫前军冯义和部十七营、胡殿甲部五营，北塘守军如前。此外，部分勤王之师也陆续到达：杨柳青有记名总兵蒋尚钧部豫军五营，北京附近有湖北提督张春发部武卫先锋左翼十营，江西按察使陈泽霖部武卫先锋右翼十营，总兵夏辛酉部嵩武军六营，总兵万本华部晋威军四营，陕西布政使升允部陕军八营，甘肃布政使岑春煊部甘军六营，北京城内有驻军六七万人。总计京津间兵力不下十万。此外，还有义和团七万余人，其中北京城内约有五万，另二万余人分散在津京间的交通沿线。

为阻止联军沿北运河北上，退至北仓一带的清军万余人在马玉昆的统率下，于北仓以南横跨运河构筑了两道防御阵地。第一道由刘家摆渡（今刘家码头）、韩家树（今韩家墅）、火药局（今杨家咀附近）、刘家房、唐家湾、穆庄（今天穆村）等据点组成，构筑了火炮阵地，埋设了地雷，由武卫左军、武卫前军及淮军、练军等九千人防守。第二道以北仓南的王庄为中心，构筑向左右各延伸三公里的垒墙，并在各要隘埋设地雷。在北仓东南和西北构筑了火炮阵地，分别配置十门和十四门火炮。北仓东南地势空旷，于马家庄筑坝开沟，引水淹灌。第二道阵地由武卫左军四五千人防守。此外，北仓附近尚有一二千人作为预备队。

宋庆以杨村车站为中心，跨北运河构筑了正面约五公里长的垒墙，由五千人驻守，并沉大船二三十只于运河中，以堵塞水道。

7月18日，清廷派翼长长麟、文瑞分统北京义和团两千余人前往通州及其以南地区，挖壕筑垒，令其“扼要助剿，勿任敌兵北犯”。

二、联军北犯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立即派兵占据各要隘、炮台，修整工事，防御清军及义和团的反攻，并成立“都统衙门”，以维护其侵略秩序。同时，继续调兵遣将，准备进犯北京。

7月底8月初，联军在天津的兵力已增至三万四千人，北上作战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8月8日，侵略军召开指挥官会议，协调了彼此间的意见，拟定了进攻北京的计划，准备集中兵力，攻占北运河两岸各战略要点，最后夺取北京城。

8月4日夜，联军除以部分兵力留守天津、大沽等地外，集中一万八

千余人及八十一门火炮，从天津出发，沿北运河两岸向北仓进犯。运河右岸为日、英、美军，共一万三千二百二十人，携带火炮五十三门；左岸为俄，德、法、意、奥军，共四千八百五十四人，携带火炮二十八门。8月5日2时许，联军接近并进攻清军第一道防御阵地的刘家摆渡、韩家树、火药局等据点。清军稍事还击，即溃敌撤退。5时左右，第一道防御阵地即被敌攻占。之后，日军从西侧，英军从中部，美军为后援，进攻清军的第二道防御阵地。日军由西侧“绕道十余里，出马军后”，马玉昆部“尽失其险”。在联军前后夹击下，清军腹背受敌，且战且退。当清军同联军接战时，附近义和团数千人赶来助战，虽然给联军以不小的打击，但也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当日上午9时，北仓防线及北仓据点全被敌人攻占。北运河左岸的联军因徒涉水淹地，行动迟缓，战斗结束后才赶到北仓。此战，联军共死九十五人，伤五百四十人。

8月6日晨，联军乘胜分路进攻杨村的清军阵地。俄、法军攻清军右翼，美军攻左翼，英军从正面进攻，日军为后应。宋庆军一触即溃，与马玉昆残部一起，向通州方向败退。直隶总督裕禄逃至南蔡村后，自杀而死。8月8日，南蔡村失守。

在清军丢失北仓、杨村前，清政府命李秉衡统率“勤王师”前往河西务御敌。李秉衡曾任山东巡抚，奉命进京前为巡阅长江水师大臣。7月25日陛见慈禧时，他自动请求赴前线杀敌。次日，清政府即任命他为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所有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均归该大臣节制”。8月6日，李秉衡率四军离京，7日抵马头，8日抵河西务。李秉衡令张春发部十营、万本华部四营驻守河西务；陈泽霖部十营驻守河西务西侧，自率夏辛酉部六营驻守河西务西北八里之羊房。9日晨，清军防御阵地尚未构筑完毕，两路联军即已包抄河西务。战斗打响后，张春发部稍战即退南苑，陈泽霖部也大部溃逃。万本华部虽同联军接战多时，但因兵力不足，无法击退联军的进攻。李秉衡督率夏辛酉部迎敌，升允也率马队两旗助战，经激战后均退马头。马玉昆率败退的清军路过河西务，竟遇敌不战，一直溃逃到南苑。该部同宋庆败军一起，沿途焚掠洗劫，人民深受其害。李秉衡目睹数万清军不战而逃，颇为愤慨，但又无法阻止。8月10日，李秉衡由马头退至张家湾，饮日即吞金自杀。联军随即夺占张家湾，并派兵袭击通州。该城守军有险不守，弃城逃京。

8月12日晨，联军不战而据通州，尽获库中军械、粮饷。除留德、法军一部驻守外，联军宜扑北京。

从8月5日至12日八天之内，不足两万人的侵略军竟然连续攻占了数万清军防守的北仓、杨村、河西务、通州等战略要地，直接威胁北京。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清军已被失败情绪所支配，战术上又采取了分兵守点的单纯防御，同时，各要点未构筑起足以阻敌前进的坚固阵地，结果在敌人并力猛攻下全线崩溃。李秉衡虽请缨上阵，无奈军心已散，所统各军又皆临时应命之师，不能同心协力御敌，以致无法挽回败局。

三、北京的陷落

通州失守后，清军七八万人齐集北京：宋庆、马玉昆部万余人驻南苑；董福祥部二十五营驻广渠门、朝阳门、东直门；荣禄部三十营驻西华门、棋盘街；八旗、绿营两万余人驻内城九门、外城七门；虎神营、神机营等三十九营驻守各门城楼；八旗前锋和护军守紫禁城。义和团五万余人分别守卫东西河沿、东西珠市口、菜市口、花儿市等六大区。全部城防由荣禄负责，与徐桐、崇绮、奕劻、载漪等共商重大事宜，实际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

8月13日夜，联军一万五千余人携火炮百余门，分三路冒雨进逼北京：日军七千二百人，携火炮五十四门，从通州出发，经八里桥、定福庄、红庙、关东店，先头部队于14日7时半抵达朝阳门外东岳庙附近，俄军三千四百八十人，携火炮二十二门，沿通惠河北岸经八里庄、八王坟、郎家园，于14日黎明前抵近东便门；英军两千二百五十人，携火炮十三门，沿通惠河南岸经苏家沟、关厢附近，于14日上午11时抵近广渠门；美军一千八百二十人，携火炮六门，随英军后开进；法军四百人，携火炮十八门，循俄军路线开进。另有三千联军从天津出发，以为后援。

俄军先头部队于8月13日午夜到达东便门，因途中未遇任何抵抗，认为可以轻取城门，遂提前攻城；讵料清军和义和团“守护极严，急切未能得手”，只得向日军求援。日军派步兵一个大队前往助攻。日军于14日上午8时在朝阳门、东直门外一千五百米处开炮轰城，遭清军炮火还击。董福祥在得知上述三门受到攻击后，即调广渠门守军往援。上午11时左右，英军抵广渠门，乘虚攻城，14时进入城内。英军得知水门处河道枯涸，便涉淤泥进入内城，15时左右首抵使馆区，并分兵一部占领天坛。美军随英军之后，于17时许进入使馆区。进攻东便门的俄军在部分美军配合下，一部于14日午后从城门洞隙处匍匐而入，一部攀上城墙，打退守军，进入城内。进攻东直门的日军，不断以炮火猛烈轰城（发弹万余发），摧毁城墙上的清军火炮，然后派两个工兵队携带炸药包，于21时许对第一、第二门连续爆破，21时40分占领东直门。接着，日军北占安定门，南攻朝阳门，于22时许破门进入城内。法军也于14日午夜入城。联军入城后，被围近两个月的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之围随之解除。

8月14日，在京城即将被联军攻破时，慈禧欲召集六部九卿议事，但无一人应召，只得同入值大臣载澜商量出走事宜，并令载澜护卫。载澜借口无兵而推辞，并建议张白旗投降。8月15日晨，当联军进攻东华门时，慈禧挟持光绪帝出逃，分别着青衣素服，同载澜，载漪，奕劻、刚毅等王公大臣以及内监李莲英等人，在两千余名八旗兵的护卫下，仓皇出西华门和德胜门，经颐和园、居庸关等处，往太原方向出走。

联军进城后，清军大部溃散，仅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筑起街垒，继续同侵略军战斗。8月15、16日，联军攻占了各城门和紫禁城，17日占领全城。

此役，联军死伤四百五十余人，内有校以上军官二十五人。清军伤亡四千余人，义和团民牺牲甚众。

联军攻陷北京后，纵兵抢劫三日，皇宫、官邸、住宅、商店无一幸免。“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尚留在城内的义和团及不少无辜百姓，惨遭屠杀。侵略者无恶不作，奸淫掳掠之事，不可胜计。

随后，联军成立“北京管理委员会”，将京城划为十一区，分别由各国侵略军占领。同时，联军继续增兵，加强京津间战略要地的守卫，并对北京周围五十公里以内的重要村镇巡回扫荡，沙河、八大寺、玉泉山、芦沟桥、良乡、庞各庄、礼贤镇等地先后被占。为了便于控制，联军在占领区内迅速恢复了铁路交通和通信联络。

9月25日，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到达大沽，10月17日进京，设总司令部于紫禁城的仪銮殿。此时，联军在华兵力已逾十万，驻京部队超过三万人。

防守北京城的清军四倍于敌，但在数日之内，清王朝的统治中心竟落敌手。之所以如此，除了清廷政治腐败，军队士气不振这一根本原因外，从防御部署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没有在联军进攻方向的正面和两侧集结必要兵力，阻击和侧击敌人，而是将七八万兵力密集于城区，使联军得以长驱直进，迅速兵临城下。其次，清军虽然装备了不少近代枪炮，但其守城战术仍然是过去的一套旧法，以八千名士兵分别守卫各城门的城楼和城垛，将近九百门新旧火炮配置于城上，冀以居高临下的炮击，阻止联军的进攻。结果，城上火炮被敌炮击毁，城墙遭敌工兵连续爆破，无险可守。城内各区守军，也因没有在主要通道口构筑巷战工事，以致东三门被联军突破后，全城很快沦陷。此外，北京的失守，还在于缺乏有权威，会指挥的最高统帅，以致各部分区防守，互不统属，互不策应。结果，东城各门被联军分别攻破，其它各门，各区的守军也很快不战而散。

第十一部分 抗击沙俄入侵东北的战争（1900年7月～11月）

1900年夏，派兵参加八国联军侵华和最野蛮地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沙皇俄国，趁清廷京畿危急之际，又单独大量出兵侵入我国东北黑龙江，吉林，盛京（今辽宁）三省，以推行其罪恶的“黄俄罗斯”计划。侵略者铁蹄所至，烧杀掳掠，罪行累累。为了抗击沙俄侵略军的疯狂入侵，东北军民和义和团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

第一节 沙俄入侵东北的准备及部署

东北三省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是我国反抗外敌入侵的战略要地。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扩张由来已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沙俄政府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封建贵族向外扩张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规定沙皇为俄军的最高统帅，陆军大臣负责指挥全军的作战和训练；全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降低士兵服役年龄，扩大新兵来源；改进士兵训练和军官培训制度，提高官兵素质，在全国建立十五个军区，加强平时对军队的训练和战时对军队的指挥；整顿陆军体制，精简非战斗部队，将野战部队和炮兵各增加60%；改进和统一军队的装备，使用射程为两千米的纳甘特步枪和马克沁机枪，统一了野炮、骑炮、野战臼炮的形制，海军舰队也得到了加强。至十九世纪末，沙俄已发展成为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军事封建帝同主义国家。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我国东北地区进一步成为沙俄推行其向远东侵略扩张政策的重要目标，在侵略我国东北地区的步骤上，沙俄当时有两种主张；以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和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为代表的封建军阀、贵族和军事工厂业资本家，主张直接进行军事占领：以财政大臣维特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垄断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则主张以经济掠夺手段实现最终征服。沙皇政府综合两种主张，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侵华政策。

1896年，沙俄以联合德、法干涉日本还辽“有功”，诱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中俄密约》和《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攫取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中国段（中东铁路）的建筑权。这条铁路通过黑龙江、吉林两省，直达海参崴（今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不但便于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经济掠夺，而且便于军事侵略。维特当时就露骨地宣称：有了这条铁路，俄国就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线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并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1898年3月，沙俄又通过《旅大租地条约》，取得了从哈尔滨经宽域子（今长春）、奉天（今沈阳）至旅顺、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筑路权。同年5、6月间，沙俄大批铁路员工进入我东北三省。并从山东、直隶及当地陆用二十多万中国民工，分十九个工区，开始全线修筑铁路。通过筑路，沙俄得以派遣各种人员，搜集东北三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同时，又以“护路”为名，向铁路沿线派遣了六千余名武装“护路队”。此外，还在哈尔摈滨立有二千五百余人驻守的铁路警备司令部。

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沙俄在抢修中东铁路的同时，又采取各种手段，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河航运、公路交通以及外海通路。当时，东北三省的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等主要河流及其支流的航运，几乎均被沙俄所垄断。沙俄“阿穆尔汽船公司”拥有各种运输船三百余艘。其中有专为适合松花江航行而建造的汽船；有由十三艘大型汽船组成的运载量达一万五千余吨的海上运输队。1900年4月，中东铁路千余公里的路基和大部分铺轨工程已经完工，中东铁路支线除中段二百

余公里外，也已竣工。至此，沙俄几乎完全控制了我国东北地区的交通命脉，为战时运送兵员和军需物资创造了条件。

为了实现鲸吞我国东北三省的野心，沙俄还加紧进行大规模入侵的军事准备。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沙俄在我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兵力日益增加，到1900年6月初，统辖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地区的沙俄阿穆尔军管区，已有兵员九万八千余人，马一万五千余匹。除要塞及留守部队外，这些部队大部驻扎干我国东北三省当面的俄国各边境城镇，如海参崴、双城子（今乌苏里斯克），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海兰泡（今布拉戈维中斯克），赤塔等地，直接窥视和威胁清军行动。

与此同时，沙俄还加强了旅顺军港的建设，使其成为具有一定独立作战能力的军事基地。至1900年7月初，沙俄驻旅大兵力达两万三千三百余人，游弋于黄海，渤海的各种钢铁军舰达四十一般，水雷艇三十艘，控制了从黄海经朝鲜海峡及日本海抵海参崴的通路，沟通了南北各据点间的联系。

从1900年6月初开始，沙俄最高当局即密切注视着我国直隶地区义和团运动发展的趋势，寻找进攻我东北三省的时机和借口，同的加紧进行战争准备。6月8日，沙俄政府宣布关东一带进入战争状态，命令军队作好临战准备。6月15日，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命令驻伯力的阿穆尔军事总督格罗杰科夫中将，制订进攻东北义和团及清军的作战计划。6月17日，八国联军侵占大沽，沙皇尼古拉二世便于6月23日宣布，首先在阿穆尔军管区进行战争动员，全区进入战争状态，并立即编组先遣军。接着，在沙俄亚洲部分的西伯利亚、土耳克斯坦军管区以及欧洲部分的某些地区进行战争动员。7月6日，尼古拉二世宣布自任俄军总司令，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任总参谋长。不久，沙俄陆军部下令将原驻阿穆尔地区的西伯利亚军改编为西伯利亚第一军，并将新征调的部队进行统一编组和部署：

西伯利亚第一军：集结于旅大、海参崴。作战部队约三万四千三百余人，计有步兵四个旅（共三十二个营）、骑兵十四个连，工兵一个营又一个连，炮兵两个营又六个连（装备各种火炮九十六门）。

西伯利亚第二军：集结于伯力。作战部队约三万六千二百余人，计有步兵四个旅（共三十二个营）、骑兵一个混成师（共二十七个连），工兵一个营（一说一个营又两个连），炮兵两个营又七个连（装备各种火炮九十门）。

西伯利亚第三军，集结于赤塔，涅尔琴斯克（原尼布楚）等地。作战部队约三万一千三百余人，计有步兵四个旅（共二十八个营）、骑兵一个师（共二十五个连，其中有一个装备六门炮的骑炮连），工兵四分之三个营，炮兵九个连（装备各种火炮七十门）。

登陆军：集结于海参崴，双城子。作战部队约三万三千七百余人，

计有步兵四个旅（共三十二个营）、骑兵十三个连（一说十一个连）、工兵一个营又一个连、炮兵三个营又一个连（装备各种火炮七十八门）。

以上共有作战部队约十三万五千余人，火炮三百二十八门。此外，各要塞和军区尚有留守部队四万余人。

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清廷因京城危急，已无力顾及东北三省的危局。沙俄陆军部抓紧这一时机，分别于7月18日和22日（俄历7月5日和9日）致电在伯力的格罗杰科夫和在旅顺的阿列克谢也夫，指示俄军三路从北部（铁岭以北，含吉林、黑龙江省），一路从南部（盛京省）进攻中国东北地区：北部由西伯利亚第二军，第三军及登陆军一部担任主攻，司令部设于伯力，阿穆尔军事总督格罗杰科夫中将任总指挥；南部由西伯利亚第一军及登陆军一部担任主攻，司令部设于旅顺，关东省（沙俄擅自设立）总督阿列克谢也夫海军中将任总指挥。沙俄陆军部作战指示的要点是，多路出兵，攻取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长春、奉天等重要城市，以实现分进合击，速战速决，迅速夺取东北三省的战略目的。经格罗杰科夫和阿列克谢也夫建议对上述方案作某些调整，沙俄陆军部最后决定按下述五路部署进攻：

西北路：以集结于赤塔，涅尔琴斯克的西伯利亚第三军一部为主力，越过阿巴该图，向东南进攻呼伦贝尔（今海拉尔市）齐齐哈尔，尔后会同北路俄军及东北路俄军一部，向吉林，奉天推进。

北路：以集结于海兰泡的西伯利亚第三军一部为主力，渡过黑龙江，向南进攻瑷珲（今爱辉南），墨尔根（今嫩江）、齐齐哈尔，尔后会同西北路俄军及东北路俄军一部，向伯都讷（今扶余）、长春推进。

东北路：除派兵一部支援海兰泡俄军作战外，以集结于伯力的西伯利亚第二军为主力，沿黑龙江，松花江水路，向西南进攻三姓（今依兰），呼兰、哈尔滨、与“护路队”里应外合攻占哈尔滨后，分兵一部向东进攻宁古塔（今宁安），另一部向西助攻齐齐哈尔，尔后会同西北路和北路俄军，向吉林、奉天推进。

东南路（分两个方向进攻）：一部以集结于双城子、海参崴的西伯利亚第一军及登陆军为主力，向西进攻牡丹江、叶河宁古塔；另一部从克拉斯基诺出发，向西进攻珲春、鄂摩和。尔后合力向吉林、奉天推进。

南路：以集结于旅大的西伯利亚第一军和登陆军一部为主力。一部从水路进攻营口（今营口市），另一部从陆路进攻熊岳，盖平（今盖县）。尔后向辽阳、奉夭推进，并在铁岭同北部战场的四路俄军会合。

在部署上述五路进攻的同时，沙俄政府又向我东北三省铁路沿线增派“护路队”，使其由原来的六千余人增至一万一千人，借以牵制东北三省清军的行动，策应各路俄军的进攻。

第二节 清朝在东北三省的设防和战备

正当沙俄剑拔弩张，准备向我东北地区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之际，关内战事十分吃紧，因此，东北三省只能依靠原有驻军和防御设施，抗击入侵之敌。至1900年6月止，东北三省共有防、练军一百一十七营三哨。其中盛京省五十二个营，吉林省二十九营三哨，黑龙江省三十六个营。按编制计算，总数可达五万八千余人，但实际不足五万人。以后各省又进行扩兵，人数稍有增加。此外，东北地区尚有四万四千余名战斗力很低的八旗兵。这些清军装备的武器，除一部分由国外进口、内地拨给和吉林机器局仿制的毛瑟、曼利夏步枪及克伯、格鲁森火炮外，还有不少抬枪、抬炮及其它旧式火炮。

除清军外，东北三省还有义和团及人民群众协助清军抗敌。但义和团运动的规模不如关内，力量没有关内强，组织更为分散，所以难以承担较大的作战任务。

东北三省的将军及其他军政要员，在如何对待沙俄入侵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严重地影响了战争准备。

黑龙江将军寿山，在沙俄重兵压境，形势危急之际，多次上奏朝廷，历陈沙俄“乘我畿辅危急，日为增兵之谋”的种种事实，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提出了“不得不战”、“不可不战”、“不可失机”等抗战主张。他还分析了抗战的有利形势，认为：甲午战争以后，人们“负痛方深”；义和团的兴起，足见民心对沙俄之忿恨；在军事上，可扼守陆路要地，以静待动，截击深入我境、前后不能相顾的俄军。为了集中力量守卫边防，他建议朝廷“先清内患”，对沙俄“护路队”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盛京副都统、育字军总统晋昌，积极支持寿山的主张。他建议三省联为一气，并力抗战。伯都讷副都统嵩昆，也赞同寿山等人的抗战主张。但是，吉林将军长顺和盛京将军增祺，却极力反对寿山和晋昌等人的正确意见，认为“当此各国合谋，何可再树一敌”，主张对沙俄的进逼实行不抵抗主义。

由于上述分歧，三省无法进行统一部署。主战的黑龙江将军寿山，只能调派木省的力量，加强战略要地的防御。1900年7月8日，沙俄阿穆尔总督格罗杰科夫以“护路”为名，要求将数千俄军经瑷珲，齐齐哈尔运往哈尔滨。寿山严词拒绝了沙俄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并积极进行临战准备。他奏请清廷分别委任瑷珲副都统凤翔、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通肯（今海伦）副部统庆祺为北、西、东三路翼长，分别指挥三路战守；委任安徽候补知县程德全为行营营务处，负责来往联络。此外，还向清廷请求调拨粮饷，商请盛京，吉林两省匀拨枪械弹药等物，准备抗击沙俄的进攻。

畏敌怯战的吉林将军长顺则根本不作临战准备。练军六营约三千人仍然分布在各城镇；新募五营散驻于铁路沿线；主力靖边防军十八营三

哨，分布在三姓、宁古塔、珲春等七个城镇。同时，长顺还在6月底7月初以“奉旨招练”为名，对伊通、宽城子、伯都讷、哈尔滨一带的义和团进行严密控制，并遣散铁路沿线的大量民工。此外，对哈尔滨等地的沙俄“护路队”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任其在哈尔滨至双城子的铁路以及松花江沿线自由往来。

由于晋昌的积极主战及义和团斗争的影响，盛京省作了一定的防御准备：西部由仁字军，奉军共八营两哨驻守锦州、山海关一带，北部由仁字军、奉军共六营驻守开原、铁岭一带：东部有四营清军驻守凤凰岭、岫岩一带；南部由晋昌自率育字军十余营驻守熊岳、海城一带。

第三节 战争经过

1900年7月下半月，俄军作战部署就绪后，即以“护路”和帮助中国政府“平定叛乱”为名，悍然对我国东北三省发动全面进攻。东北三省军民和义和团，为了保家卫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同侵略军展开了顽强的战斗。

一、瑷珲和呼伦贝尔方向的作战及黑龙江省的陷落

瑷珲（今爱辉县爱辉乡），位于黑龙江中游右岸，与它隔江相望的是江东六十四屯，由瑷珲副都统管辖。瑷珲北面的黑河屯（今爱辉县）则同沙俄边城海兰泡隔江相望。小兴安岭自西北向东南长约四百公里，海拔六百至一千米，是黑龙江省北部的天然屏障。瑷珲方向驻有清军步，骑兵十六个营，由瑷珲副都统凤翔指挥，守卫着南至富拉尔基屯，北至五道霍洛卡之间约七十五公里的江岸。守军装备有钢制火炮八门，旧式火炮十六门，水师营有小船十余艘。

毁军在海兰泡集中了步兵三个营又三个连、骑兵七个连、炮兵两个连，加上地方部队及其它武装力量两千余人，共约七千余人，配有二十八门火炮。由格里勃斯基中将指挥。

7月15日，海兰泡俄军企图从黑河屯偷渡过江，被清军击退。16日，俄军大肆搜捕海兰泡中国居民。次日上午，俄军将三千余名中国居民赶至黑龙江边，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俄兵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扮骨”。至21日，五六千中国同胞惨遭杀害，致使“骸骨飘溢，蔽满江岸”。与此同时，俄军马队焚烧江东六十四屯，并将七千多居民驱入江中溺死。列宁曾在《火星报》上发表文章，强烈谴责沙俄侵略者“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时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等野兽般的暴行。

沙俄侵略军的兽行，激起了瑷珲人民和清军官兵的无比义愤。凤翔于7月17日晚派船按运难民，并令千余清军从下游过江，抄袭俄军后路。18日凌晨，渡江清军袭击俄军博尔多屯哨所，同五百名俄军激战四个多小时，毙伤敌人百余名，焚毁弹药库一座。当晚，清军撤回瑷珲。

为了保证黑龙江的航运和加强进攻瑷珲的俄军兵力，格罗杰科夫按照原定方案，于7月下旬从伯力和斯特列津斯克两地，调遣步兵九个营、骑兵三个连、炮兵一个连，携各种火炮四十门，组成两支增援部队，沿黑龙江两岸西进。这支俄军沿途捣毁清军各哨卡，于8月初抵达海兰泡。

8月2日，俄军开始进攻瑷珲。为迷惑清军，俄军一部由瑷珲对岸渡江佯攻，主力则由苏鲍齐奇少将率领，从黑河屯上游偷渡过江。驻守黑河屯一带的三营清军，在统领崇昆山指挥下凭壕坚守，同上岸俄军激战

四小时后，退守瑷珲。俄军一万四千余人，于4日晨越过瑷珲北面的卡伦山，从北、东、南三面进攻瑷珲城。守军三千余人顽强抵御，城内的义和团及居民也奋起参战。俄军以优势炮火猛轰城垣。激战一天后，守军不支，由凤翔率领撤至城西南四十余公里的北二龙和额雨尔（驿站）一带的山口。撤退过程中，有三百余名清军于城郊被俄军包围，最后全部牺牲。8月5日，俄军入城，城内居民同侵略者逐屋争夺，一千五百余人英勇战死。俄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俄军攻占瑷珲后，即调整部署。苏鲍齐奇被晋升为中将，并奉命前往旅顺，负责指挥奉天方向的作战，同时调一部分俄军随同前往，以增加南战场的兵力。其余俄军由伦年卡姆普夫指挥，继续追击清军。8月6日，伦年卡姆普夫率领四个半连骑兵组成的“快速支队”，携火炮两门，直逼额雨尔。其余俄军除守城者外，随后跟进。

退守额雨尔的清军，依山挖壕筑垒，凭险坚守。俄军逼近后，清军突然发炮轰击，毙伤敌四十人，予俄军“快速支队”以迎头痛击。俄军在正面进攻受挫后，便派一个连从右翼迂回至清军侧后。凤翔见两面受敌，又见俄军援兵赶到，乃率部退守北大岭山口（今大青山）。

北大岭山口森林密布，地势险要，是小兴安岭的重要隘口。凤翔率部（八九个营约四千人）退守该地后，又从省城开来两营援军，兵力增至五千人，并有火炮十门。当地鄂伦春族人民，也组织骑队约五百人，自动前来参战。凤翔决定利用有利地形，于山口两侧挖掘战壕，将部队荫蔽于壕内，诱敌深入岭底，然后从两侧发起突然攻击。8月13日（一说8月10日），俄军“快速支队”进入北大岭山口，埋伏在两侧的清军，出敌不意，枪炮齐发，猛击俄军。鄂伦春骑队也勇敢杀敌。俄军遭此伏击，乱作一团，仓皇后撤。凤翔督军趁势追击三十余里，杀敌甚众。正当清军勇猛追敌之际，凤翔不幸堕马牺牲。凤翔自瑷珲交战以来，左腿右臂先后受伤，仍然身先士卒，指挥清军英勇顽强地抗击数倍于己的侵略军，是一位出色的爱国将领。他牺牲后，山镇边新军后路统领恒玉署理北路翼长，率领清军继续构筑工事，扼守北大岭山口。

伦年卡姆普夫在“快速支队”两次受挫后，认为“以现有骑兵部队的兵力不可能在山地作战”。8月15日，其后续部队到达后，便调整部署，改变战术；先以炮兵逼近北大岭山口，用二十余门火炮轰击山口两侧的清军阵地；同时利用山林和夜暗，派出两营步兵迂回至清军侧后，攻击清军的辎重队。清军腹背受敌，被迫于16日撤往墨尔根。此时，该路清军仅剩七百余人，由恒玉率领退守讷谟尔河南岸。8月17日，俄军占领墨尔根后，暂停进攻，等待西北路俄军到达后，再会攻齐齐哈尔。

正当北部清军在瑷珲抗击俄军时，西北部呼伦贝尔一带的清军也展开了抗击俄军的作战。

西北部的清军由呼伦贝尔副都统兼翼长依兴阿指挥，共有步骑兵十个营，装备克虏伯炮四门，小钢炮两门。呼伦贝尔西北有大道直通粗鲁

海图，西面则有正在修建的中东铁路通往阿巴该图方向。

沙俄陆军部原命西北路俄军由粗鲁海图发起进攻。依兴阿发现俄军这一企图后，“以重兵北扼粗鲁海图，……复以偏师驻扎海拉儿〔尔〕河两岸，西扼阿普〔巴〕该图”。俄军发觉清军上述部署后，便改变了进攻路线。7月25日，奥尔罗夫少将率步兵四个营又一个连，骑兵一个团又三个连，骑炮兵一个连，随带六门火炮，改从阿巴该图进犯完工车站。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闻讯后，急派统领全德率步骑五个营驰往完工迎战。该部于7月29日出发，次日同敌军遭遇。俄军以火炮轰击清军，步兵由正面进攻，骑兵冲击清军左翼。清军立足未稳、仓卒按战，伤亡九百余人。呼伦贝尔城一带的守军纪律松弛，且有不少是新募之兵，当得知完工战败的消息后，即“漫散逃走，衙署官兵亦皆因之逃窜一空”。7月31日，依兴阿放弃呼沦贝尔，率部退守雅克岭，“以为省城西路之藩篱”。俄军占领呼沦贝尔后，血腥屠杀居民三千余人。

雅克岭原有义胜军左路五营防守，加上从完工撤退的清军，共约九个营。8月8日，俄军“快速支队”约六七个连追至岭前，见地势险峻，未敢进攻，就地停止待援。8月10日，清军各路统领会商，决定由统领保全率镇边陈军四营，统领吉祥率义胜军二营出岭截击孤军深入的俄军。8月11～13日，出击的清军三战三胜，“踏破俄营九座，压迫二百余里”。14日晨，清军紧迫至呼伦贝尔附近的小桥子，黑山嘴一带。由于同样犯了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的错误，被俄军大队四面包围。清军在突围中死伤甚众，统领保全中弹阵亡，吉祥被迫督队后撤。不久，奥尔罗夫率俄军主力向雅克岭发起攻击，并派先头部队从火燎沟口抄袭清军后路。清军前后遭敌炮击，部队溃败，雅克岭被俄军侵占。

北路小兴安岭的要隘北大岭山口和西北路大兴安岭的重要据点雅克岭阵地的失守，使省城齐齐哈尔失去了两大屏障。俄军遂从北路、西北路长驱直入。8月21日，北路俄军进入博尔多（今讷河），抵达讷漠尔河北岸。在此严重形势下，寿山指令恒玉坚守讷谟尔河南岸，令副都统萨保在省城齐齐哈尔挖壕固守，同时还加紧操练义和团，“恃为长城”。正当寿山准备继续抗战时，忽然接到了清廷于8月7日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向八国联军求和的上谕。鉴于“朝廷业已遣使求和”，东北亦不能例外，寿山遂派程德全赴讷漠尔河北岸俄军军营议和。8月25日，双方议定：俄军不得进入齐齐哈尔城内，只驻于城外。8月28日，俄军抵达城郊时，竟背信弃义地炮击后撤的清军。寿山见大局已不堪收拾，于8月30日自杀身亡。俄军于当天占领齐齐哈尔，清军南撤至伯都讷。西北路俄军在越过大兴安岭后，于8月30日占富拉尔基，9月4日与北路俄军会师于齐齐哈尔。俄军将市内的军械、粮饷，财物抢劫一空。9月6日，伦年卡姆普夫率突击队由齐齐哈尔出发，向伯都讷、长春、吉林方向进犯。

在黑龙江省的抗战中，全省大部分军民表现出了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黑龙江将军寿山，在上受朝廷压制，周围有投降派梗阻的情况下，仍然积极领导黑龙江省清军英勇抗敌。在他的影响下，不少爱国

官兵拚死作战，血染战场。尤其可贵的是，寿山在临死前仍上奏朝廷，建议将来收复黑龙江省之后，实行招民开荒，屯垦戍边，充实边防的政策，使黑龙江成为“内政孔修，外侮足御”的富强之省。象寿山这样积极抗战，至死不忘祖国山河的清军将领，在当时是为数不多的。

黑龙江省如此迅速地失陷，从客观上看，主要由于清军兵械两绌。以三十六个营分守四千多公里的水陆边界和腹地要点，兵力显然不足，且分兵各处，难于互相应援，因而在大小兴安岭主要隘口失守后，清军已无力组织有效的抵抗。从主观上看，与寿山的作战指挥不尽得当也有关系。7月初，寿山虽相对集中兵力，加强了边沿城镇的防御，也有扼守陆路要地和截击深入腹地之敌的考虑，但在实际部署上，却没有真正做到。边沿城镇失守后，部队只得在后撤过程中临时构筑工事，仓卒防御。这种防御，只能阻挡小股俄军于一时，难以抗击共主力部队的进攻。在战斗中，清军只注意正面阻击敌人，忽视了俄军的迂回包抄战术，以致几个重要隘口都是在腹背受敌情况下失守的。此外，寿山最后轻信“协议”，准许俄军进驻齐齐哈尔城外，又不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结果在后撤时遭敌炮击，齐齐哈尔为俄军轻易攻占，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策。

二、拉哈苏苏、双城子、珲春方向的作战及吉林省的陷落

当北路俄军在海兰泡大肆屠杀中国居民时，东北路俄军由萨哈罗夫少将率领步兵四个营，骑兵四个连，炮兵两个连及一个工兵排，一个电信排，一个医疗救护队，随带火炮二十六门，分乘二十二艘江轮和五十六艘拖轮，从伯力出发，沿黑龙江西进，于7月22日到达拉哈苏苏（今同江）。驻守该地的清军稍事抵抗即行撤退。俄军占领松花江口这一要点后，留兵一部驻守，主力随即溯松花江进犯三姓城。三姓位于松花江南岸，西濒牡丹江，东临倭肯河，是吉林北部水陆交通重镇。三姓副都统农英阿率八营清军（有火炮二二十二门）驻守该地，沿江还驻有水师营。7月27日，俄军攻占了城外北面和西面的清军阵地，接着于28日上午9时，水陆两路夹攻三姓城。守军英勇抵抗，激战至下午4时，击沉俄轮一艘，毙伤敌军多人。终因俄军炮火猛烈，其后续部队又相继登岸，清军伤亡严重，被迫撤退。俄军占领三姓，枪杀居民，焚烧房屋，然后登轮向哈尔滨进犯。

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枢纽，原驻有沙俄“护路队”两千余人，因受义和团的攻击，各地“护路队”陆续向哈尔滨集中，此时总数已逾四千人。寿山在部署黑龙江战守时，奏请清廷委任通肯副都统庆祺为东路翼长，率领六营清军，驻扎于松花江口至呼兰沿线各站，防御俄军从东面入侵黑龙江省。鉴于哈尔滨为三省腹心之地，又严重威胁黑龙江省的后路，寿山于7月初曾约请吉林清军会攻哈尔滨，先清除哈尔滨“护路队”，然后专注北方边防。由于吉林将军长顺极力阻挠，此计未能实现。

7月26日，当俄军逼近三姓，形势极为严重时，寿山毅然命令庆祺率清军四营，统领定禄，穆隆阿、公培珍及营官富德等各率所部清军，

进攻哈尔滨沙俄“护路队”司令部。因敌人已有戒备，清军遭到伏击，伤亡三百余人，退守呼兰。8月3日，萨哈罗夫所部俄军进占哈尔滨，同“护路队”会合。

俄军夺占哈尔滨后，迅速沟通了与双城子方向俄军的联系。9月1日，又派遣一个支队乘坐满载粮食弹药的列车，前往齐齐哈尔，以加强该处俄军。9月12日，触军从哈尔滨发兵北攻呼兰，清军弃城退走。俄军在呼兰大肆抢劫勒索，并将清军库藏军火“尽数搬出，或毁或运，或投深井，或掷大河”。

在萨哈罗夫率东北路俄军向哈尔滨方向进犯的同时，集结于双城子、克拉斯基诺的东南路俄军，分别向宁古塔和珲春发起进攻。

7月中旬，奇恰戈夫少将率俄军步兵两个营、炮兵一个连、骑兵两个半连及“护路队”若干人，携火炮六门，从双城子向宁古塔进犯。宁古塔是牡丹江畔的历史名城，吉林东部的重要屏障。该城驻有清军十余营，连同杨玉麟的民团组织镇东军及义和团，共约六七千人，分守叶河炮台，牡丹江渡口和宁古塔城。7月18～19日，俄军进攻叶河及牡丹江渡口，被清军击退。时值雨季，山洪爆发，俄军骑兵行动受阻，加之兵力不足，便于铁路附近“坚筑高垒”，等待援军。

7月27日，艾古斯托夫少将率俄军步兵六个营、炮兵三个连、骑兵两个连、工兵半个连，携带火炮二十门，从克拉斯基诺出发，向珲春进犯。珲春西濒图们江，北倚大盘岭，由清军帮办英联率靖边军六个营驻守，并有刘永和率领的忠义军协助防守。清军重点防守城南九十里的黑顶子和城东南八里、城西南十里的三处炮台。7月30日，俄军首先炮轰黑顶子炮台，接着进攻其余两座炮台。清军及忠义军发炮还击，毙伤俄军二百余人。激战至下午2时，城外炮台相继被毁，同时，城内外国商民趁机纵火作乱，英联被迫率部退至城外。俄军占领珲春后，因进攻宁占塔的兵力不足，艾古斯托夫即率部折往双城子，旋即西向增援宁古塔方向的俄军。

进攻宁古塔的俄军得到增援后，于8月26日夜逼近叶河。次日晨，控制了清军阵地对面的高地，同时，其骑兵直插叶河至宁古塔的大道。叶河守军恐后路被断，便主动退往宁古塔。

当清军和刘永和的忠义军在叶河，宁古塔坚守时，躲在省城吉林的长顺却加紧进行投降活动。8月13日夜，他煽动部分受官府控制较严的义和团民杀害了义和团首领敬际信及四十名团众。8月25日，又令已革记名副都统黑龙江协领达桂前往哈尔滨，向饿方卑屈求和，约定两军相见，以白旗为先，各不开枪，让路而行。随后，又令各路防军“遇俄兵时切勿开枪，免致重开衅端”。消息传至宁古塔，守军即退至鄂摩和。俄军于8月29日进入宁古塔，9月7日又占鄂摩和。9月22日，浓军先头部队进入吉林城。与此同时，伦年卡姆普夫率齐齐哈尔的北路、西北路俄军南下，于9月23日进入吉林城。9月30日，进占宁古塔的东南路俄军大队

也赶至该处。侵略军入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吉林银元厂的白银数十万两被抢劫大半，城内的兵工厂和炸药均被毁坏。厚颜无耻的长顺，却对俄军格外优待，备牛羊以犒俄师，对俄军所索军需差役，全部应承，并令吉林所属各府厅州县，“遇俄兵至，均照和约款接”，充分暴露了卖国贼的可耻嘴脸。

三、海城、辽阳一带的作战及盛京省的陷落

八国联军于7月14日攻占天津后，沙俄陆军部即于7月22日命令驻旅顺的俄军暂停向直隶增兵，迅速前往营口，攻击清军和镇压铁路沿线的义和团，进占辽东半岛。阿列克谢也夫立即集中步兵二十个营、骑兵十六个连、炮兵五个连，分两部向北进攻：一部沿中东路支线北上，一部由水路增援营口、大石桥（今营口）的俄军。尔后进攻海城、辽阳、奉天。

盛京省邻近直隶，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声势甚大，7月初就拆毁了海城至开原的铁路桥房，并经常成群结队，以刀斧、铁棍、火枪同沙俄“护路队”交锋。7月中旬，辽阳、鞍山一带的义和团及清军，将辽阳的“护路队”二百余人围困三昼夜，迫使其向营口逃窜。7月15日，驻大石桥的“护路队”在米辛克上校率领下反扑海城，夺占唐王、亮甲各山，接连向城内开炮，击毁城楼。义和团及清军奋力抵抗，毙伤敌七十余人，并乘势追击，迫使沙俄“护路队”龟缩于大石桥、营口一带，不敢轻易出动。

7月25日（一说27日），沿铁路北进的汲军占领熊岳，8月1日占领盖平。8月4日，沿水路向北进攻的俄军在营口登陆，占领营口道署。驻守营口的清军骑兵三个营又三个哨，稍战即溃，仅义和团三百余人同俄军英勇斗。

主张抗战的盛京副都统晋昌，见形势危急，于8月上旬亲赴海城指挥作战。海城位于中东路支线上，西、北两面为平原，东、南两面为山地。当时驻有育字军、奉字军及县属地方武装四千余人，义和团千余人，共有火炮八门。晋昌抵海城后，决定依托城西南十多里的唐王，亮甲等阵地抗击敌人。8月9日，俄军少将弗列舍尔率步兵两个团又两个连、骑兵四个连、炮兵五个连，从大石桥出发，分三路进攻海城。8月10日，俄军炮击虎獐屯（今虎庄屯），清军退守邓家台，11日又退守唐王、亮甲等山。俄军迫至唐王山，集中炮兵火力轰毁清军各阵地。晋昌率部退守城东北的双山。8月12日，俄军夹攻双山。晋昌恐后路被断，即撤向辽阳，触军乘势占领海城。

正当海城前线激烈战斗之际，增祺伙同盛京户部侍郎清锐，于8月11日竟在奉天杀害了义和团首领刘僖禄，张海及六十余名团众。接着又下令各州县将抗战的义和团众“一律查拿法办，以绝根株”。海城失陷后，增棋急忙派员至营口向俄军乞降，遭敌拒绝。在这种险恶形势下，晋昌多次上奏朝廷，请求“收整队伍”，“广招民团”，同侵略军进行持久

作战，并斥责投降派一遇敌人“均执旗迎降”的丑恶行径。

俄军进占海城前夕，正是八国联军向北京大举进犯之时。沙俄为在关内攫取更大的利益，决定抽调辽东战场的部队，迅速“从营口或经旅顺投向大沽口”。这样，俄军侵占海城后，只得屯兵等待，不敢继续北犯。清军也未乘机反击，与敌处于相持状态。

9月初，沙俄从共欧洲部分抽调来的两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连抵达旅顺。9月21日，苏鲍齐奇中将也奉命到达营口。旅顺毁军遵照沙皇8月6日发出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旅顺俄军的“主要任务将是攻占奉天，并征服盛京全省”的指令，加紧进行北犯的各种准备。

至9月下旬，营口、海城一带的俄军已有步兵十一个营、骑兵四个连、炮兵十个连，随带火炮四十门。侵略军分左、中、右三路向北进犯：弗列舍尔少将率左路进攻牛庄；苏鲍齐奇亲自指挥中、右两路进攻鞍山。

当时，驻守牛庄、鞍山、辽阳一带的清军，除晋昌的育字军外，还有全营翼长寿长率领的奉字军、仁字军等，共约五十余营，加之义和团踊跃参战，兵力尚属可观。但因增祺一再鼓吹停战议和，并多次调兵回保省城和增援北路，因而削弱了辽阳方向的作战兵力。

9月24日，左路俄军攻牛庄，寿长率清军十余营及部分义和闭进行还击。由于俄军以速射炮连续轰击，守军不支，退守大望台，旋又退守刘二堡。俄军子当日占领牛庄后，将数千名中国居民围住，挥舞马刀来回砍杀数小时。这就是沙俄侵略者吹嘘为“赫赫武功”的“牛庄战役”。

9月26日，中、右路俄军在摧毁清军阵地后占领鞍山，接着向辽阳进攻。27日，寿长收集溃军，在沙河南八卦沟一带与俄军“复决死战”。但俄军“炮多力猛”，清军伤亡惨重，不支而散。当时，辽阳一带尚有清军步兵两千人、骑兵六百人、火炮三门。但在增祺的不抵抗命令下，城内遍插白旗。9月28日，俄军穿城而过，越太子河，直逼奉天。

这时，从黑龙江、吉林南下的各路俄军也已逼近开原、铁岭，对奉天形成南北夹攻的态势。奉天军政官员惊慌失措，争相逃命。增棋携带将军印，偕左右逃往新民厅所属的广宁一带。寿长、晋昌则收集溃军退往法库门（今法库）一带。10月1日，俄军不费一枪一弹进占奉天。10月6日，南北各路俄军于铁岭会合。至此，我东北三省各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全被俄军侵占。

在占领奉天前夕，沙俄从旅顺派出两个团又一个连，乘军舰四艘，于10月1日（一说9月30日）在山海关登陆。接着，这支俄军沿铁路北上，于10月4日占领锦州，中旬占领新民厅，控制了直隶通往东北三省的铁路交通，切断了关内外的联系，以便实现其独吞中国东北三省的目的。

11月11日，增祺在沙俄的军事压力下，派代表与沙俄侵略者于旅顺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其中规定：清军一律遣散，交出军火，拆毁炮台、营垒及火药库；俄军驻奉天及盛京各地；奉天设俄国总管，与闻重要公事。《章程》名为俄军向清政府“交地”，实则是在俄军控制下，让盛京各地官僚返回任所，充当傀儡，把盛京省变为沙俄的殖民地。

投降派的不抵抗主义和残酷地镇压义和团，是盛京省失陷的根本原因。此外，清军在作战部署和指挥上也有不当之处。如部署防御时，南部兵力过少，因而俪军从旅顺出兵后，得以乘虚而入，迅速占领熊岳。盖平、营口等重要城市。晋昌亲赴海城指挥作战时，也没有根据敌强己弱的情况，采取机动作战的方针，而是单纯地实行“敌来则打，敌退则守”的阵地防御战，加之缺乏坚固的防御工事和足够的火炮，而且士气低落，结果在俄军优势炮火的轰击下，被迫撤退，造成失败。

第十二部分 抗击英军入侵西藏的战争（1903年12月～1904年9月）

1903年夏，英国趁日、俄两国为宰割我国东北地区而进行激烈争夺之机，以要求“谈判”为借口，派兵侵入我国西藏地区。侵略军大肆烧杀淫掠，激起了西藏爱国军民和广大僧侣的强烈反抗。他们凭险设卡，英勇战斗，到处伏击敌人，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终于粉碎了英帝国主义妄图分割我国西藏地区的图谋。

第一节 曲眉仙角、古鲁之战（1903年12月～1904年3月）

1903年12月11日，麦克唐纳率侵略军一千一百五十名，携火炮四门、马克沁机枪四挺，越过则利拉山口，于13日占领了仁进冈，14日进占通向江孜的重要门户一春丕。由于西藏地方政府对英军入侵方向判断错误，主要兵力在干坝一带设防，以致亚东至帕里一带险要地点无兵把守，敞开了门户。结果，英军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了春丕一带的边寨要地。接着，荣赫鹏率后续部队到达，春丕成丁侵略军的兵营和军事物资贮存地。这时，西藏地方政府急调军队去帕里防守，但为时已晚。12月18日，麦克唐纳率由七百九十五名步骑兵组成的轻装纵队继续北犯，20日抵达帕里，夺取了帕里宗政府储存的火药和武器。由于风雪严冬，道路险狭难行，英军的给养极为困难，“燃料几完全缺乏”，再向前推进已不可能。麦克唐纳只得命令两个连驻扎帕里，自率其余部队返回春丕，筹措给养、燃料。这时，赶到帕里前线的藏军准备组织反击，却被驻藏大臣裕钢下达的“沿途地方文武官，只能理阻，不准与英兵生事”的命令所阻，结果失去一次歼敌的极好机会。

1904年1月4日，麦克唐纳与荣赫鹏又率军从春丕出发，越过帕里，于8日推进到堆拉。荣赫鹏率部分侵略军留在堆拉，与拉萨派来的代表进行“谈判”，麦克唐纳则率部再次返回春丕，进行休整和筹集给养。

西藏地方代表多次要求英国侵略军撤回亚东，均被荣赫鹏拒绝。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从各地征调的军队两千余人，已赶到堆拉以北的曲眉仙角（堆拉北七里）和古鲁（堆拉北二十里）一带，构筑了两道石墙，组织防御。3月初，守军又增至三千余人，共六个代木。其中来自拉萨两个代本，日喀则两个代本，江孜、丁日各一个代本。这些部队属于临时凋集，未经训练。其总指挥降巴丹增，前线指挥莱丁色，副指挥郎色林，都无战争经验，以致在兵力部署，作战指挥等方面都存在许多漏洞。

占领堆拉的英军仪是一支力量不大的先遣队（有步枪四百支、火炮二门、机枪二挺），而且天时地利对其非常不利。侵略军不适应高原缺氧和风雪严寒的气候，很多人患有肺炎，已有十二名死亡，不少人冻伤致残。由于风雪猛烈，前后方联系经常梗断，加之牲畜劳累和染疫而死者十之八九，以致运力剧减，供应十分困难。而西藏守军仍未趁机向英军发起反击，也未切断敌人兵力薄弱的运输线，结果又丧失了一次有利的战机。

3月中旬，英军完成了进攻江孜的准备。3月28日，麦克唐纳率工兵四个连、步兵三个半连及野战救护队。战地工程队等，携炮四门，马克沁机枪若干挺，抵达堆拉。与此同时，荣赫鹏致函新任驻藏大臣有泰（升泰之弟），横蛮地提出要进至江孜“谈判”，并威胁西藏守军不得抵

抗。3月31日，麦克唐纳，荣赫鹏率侵略军一千三百余人，由堆拉出发，分三路向北推进。西藏当局派代表前去劝阻，要求英军撤至亚东谈判，荣赫鹏不予理睬。当英军接近曲眉仙角藏军阵地时，荣赫鹏又耍阴谋诡计，要求双方停火谈判。藏军受骗，未予射击。麦克唐纳却暗中调动兵力，命令第八廓尔喀步兵营从左翼迂回，抢占山头。西藏守军发觉后，竟放弃山上阵地，退至拦阻墙内。随后，英军于山之右侧部署了机枪和炮兵阵地，骑兵在乎地层开，从三面将一千五百余名藏军包围。这时，荣赫鹏原形毕露，限令藏军在十五分钟之内缴械投降。藏军前线指挥莱丁色严词拒绝，麦克唐纳便突然下令开火。藏军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毫不畏惧，用手中的大刀、长矛、铁叉与英军展开白刃格斗，打死打伤英军官兵十五人。后在敌人的交叉火力射击下，莱丁色、郎色林和七百余名藏军相继牺牲，余部辙向古鲁，守卫第二道防线。英军追至古鲁，藏军再次奋起抵抗，终因伤亡过大而后撤。

曲眉仙角和古鲁之战，藏军共伤亡一千四百余人，“但是没有一个向敌人屈膝投降”，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和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英国侵略军的残酷屠杀，更加激起了西藏人民的无比愤怒，进一步点燃了广大西藏人民群众反侵略的熊熊烈火。

第二节 江孜之战（1904年4月~7月）

一、江孜的陷落

1904年4月6日，英军从古鲁出发，向江孜进犯。从古鲁撤退的藏军会同拉萨调来的援军，扼守康玛一带的山谷要地，并组织小分队，沿途袭扰敌军。当地藏民也自动拿起武器，纷纷参加抗英斗争行列。英军进至康玛南五六里的雪那守时，遭到藏军二三百人的顽强抵抗。侵略军用步骑兵从三面包围了该寺。藏军英勇战斗，给敌以沉重打击，自己亦伤亡一百余人，被迫退往藏姆章防守。英军占领康玛后，大肆抢掠。西藏民军翻穿羊皮袄，混在羊群中引诱敌人，一次即杀伤侵略军二三十人，使敌人再不敢贸然出来抢劫。

4月9日，英军从康玛继续北犯，当行至距康玛十五里的山峡时，遭到据守藏姆章两侧高山的藏军阻击。藏军千余人依托山地工事，连续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使英军不能前进。最后，英军集中全部兵力，在炮火的支援下，一部兵力从正面进攻，一部兵力从翼侧迂回，包围了藏军阵地。藏军战士经过英勇抑斗，被迫突围。第二天，英军乘势侵占绍岗，11日进迫江孜。

江孜为宗政府所在地，南邻年楚河，周围是一片平原，其西有一条路直达日喀则，向东越过卡罗拉山（江孜东七十公里）通往拉萨。宗政府设在江孜城区最突出的宗山顶上，是个坚固的堡垒。在宗山的西北，与之相连的一座小山上有全城最大的寺院——白居寺。由于驻守江孜的军队大部分调往南面各隘口防守，交战失利后，又没有及时收拢，因而与英军相比，兵力悬殊。在此情况下，江孜守军主动后撤。4月13日，英军占领江孜。侵略者抢夺了近百吨粮食和数吨火药，并对附近的寺院及村镇大肆烧杀抢掠。

英军占领江孜后，为了减轻运输压力和做好进犯拉萨的准备工作，留下一支拥有五百余支步枪、两挺机枪、两门火炮的部队和三个星期的食品，随同荣赫鹏驻扎于江孜年楚河畔的江洛林卡，其余部队由麦克唐纳率领撤回春丕。

二、卡罗拉战斗

江孜失守后，达赖立即动员各地藏民组织民团武装，向江孜一带集结。5月初，共有近万人到达江孜周围各隘口，其部署是：江孜附近二千五百人，绒谷一千五百人，浪卡子二千五百人，热隆一千人，日喀则一千五百人。此外，还在卡罗拉设卡守卫。卡罗拉前通江孜，后通拉萨，向南可以直插康玛，切断英军的运输线。该处设有一道横跨山谷的五百余米长的拦阻墙，由二千名西藏民军把守。英军于4月28日派骑兵一个连进行侦察，被卡罗拉守军击退。荣赫鹏担心藏军在日喀则、江孜一带募兵，5月2日下令扣留了江孜守备，并决定在藏军尚未完全集中之

前发动进攻。由于驻藏大臣有泰对于西藏军民的抗英斗争非但不予支持，反而横加指责，执行一条“任其战任其败”的可耻方针，助长了敌人的侵略气焰。

5月3日，荣赫鹏派驻守江孜的三分之二兵力，即工兵三个连、步兵一个连及部分骑兵，携带火炮二门、机枪二挺，向卡罗拉进犯。经过三天行军，英军抵达卡罗拉藏军前沿阵地附近。侵略军企图先从两翼迂回，控制拦阻墙后面的制高点，再发起攻击。由于绕路过远，且两翼岩石陡峭，攀登困难，后又放弃了这一计划。5月7日上午10时，英军被迫从正面发起进攻，以一个半连沿河床前进，以一个连向藏军左侧阵地攻击，以半个连向右侧攻击，其余部队随同炮兵行动和守卫营地。西藏民军依托有利地形，顽强抗击，大量杀伤敌人。经四小时激烈战斗，毙敌军官一人、士兵十七人，迫使英军龟缩在山峡中，陷入“绝望之境地”。下午2时，英军再次发起进攻，在优势火力支援下，占领了藏军右翼一段拦阻墙。藏军增援部队五百人立即集结向前机动，准备夺回失去的阵地，但由于英军预备队已从藏军右翼投入了战斗，藏军的机动受阻。藏军为了改变不利态势，在左翼连续组织了三次阵前突击，均因遭敌机枪火力的拦击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此时，从右翼突人之敌占领了藏军侧后高地，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藏军被迫退守浪卡子。

这次战斗，藏军在作战指挥和战术运用上都有了很大进步，改变了单纯防御的战法，注意了组织进攻。但由于装备落后，加之训练差，射击不准，尽管在兵力上占有优势，战士亦不乏勇敢精神，终未能阻止英军的进攻。

在卡罗拉战斗激烈进行之际，英军得知江孜驻地被袭，乃于占领卡罗拉后，急忙撤军回救。

三、江孜反击战

驻江孜英军分兵东犯卡罗拉后，仅剩一百七十名士兵防守，力量非常薄弱。集结在日喀则一带的西藏民军获悉这一情况，乃于5月4日晚出动一千五百人，直插江孜，很快占领了帕拉村、白居寺、曲龙寺和宗政府等要点，控制了整个市区，并包围了荣赫鹏驻地江洛林卡。

5日黎明前，潜伏于英军营地周围的西藏民军趁敌不备，突然发起进攻。他们一边喊杀，一边冲向敌营，抢占围墙枪眼，向敌营房射击。敌人遭此突然袭击，慌乱不堪，有的来不及着装就被消灭了。但由于民军未能及时冲入围墙，近战歼敌，致使英军得到了喘息时间，组织抵抗。一部分英军爬上屋顶，一部分把住了东北营门，拚命向民军射击。民军几次攀越围墙，均遭敌火力杀伤而未成，天明后被迫后撤。由于组织不严密，撤退途中，又有许多战士牺牲。在以后几天的战斗中，西藏民军仅依靠宗政府的堡垒火力进行封锁，而未乘敌孤立无援之机，再次发起进攻，彻底歼灭敌人。英军残部利用时间加固了工事。

5月9日，进犯卡罗拉的侵略军返抵江洛林卡，江孜英军的防御能力得到加强，但仍无法摆脱被围的困境，不得不采取守势，整天“蛰居斗室，不能越雷池一步”。西藏民军逐步缩小包围圈，相继占领了英军驻地周围的几个村庄，并派兵截击敌之通邮小分队，威胁其后方交通安全。英军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决定对附近村庄进行“扫荡”。在民军顽强抗击下，进行“扫荡”的英军虽然取得了一定战果，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当英军发现民军准备袭击其营地时，即匆忙撤回。

5月24日，从春丕山发的英援军先头部队二百余人，携带十磅火炮两门，越过乃尼寺（江孜东南十一公里）的火力封锁，抵达江孜。英军在得到增援以后，为了保证后方运输线的畅通，决定向万尼寺发起进攻。但当英军到达该寺时，西藏民军已转移他处。

当时，对英军安全威胁最大的是驻帕拉村的民军。该村位于英军营地约二公里处，房屋坚固，利于防守，并可直接攻击英军防御工事薄弱的翼侧。5月26日，英军派步兵三个连及部分工兵，携爆破器材从正面强攻，炮兵则迂回占领了一个可以俯瞰帕拉的山脊阵地，支援步兵战斗。但英军几次冲击均被西藏民军击退。由于房屋墙壁高厚，英军的榴霰弹失去作用，遂以工兵进行爆破，企图突破民军的防御。但英军爆破一次，仅能进入一个庭院，无法扩大突破口。西藏民军依托有利地形，与英军逐屋逐院展开争夺，先后毙伤敌官兵二十三人。经过十一小时的艰苦战斗后，民军始被迫后撤，英军随即占领帕拉村。之后，民军致力于加强宗政府堡垒的防御，并不断前出袭扰敌人，使英军不得安宁。英军由于兵力单薄，不敢贸然向宗政府发动进攻，以致仍处于被围状态。6月5日，荣赫鹂率四十名骑兵驰回春丕求援，途经康玛时，受到三百多名藏军的袭击，几乎毙命。

西藏民军在江孜反击作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可惜的是，民军缺乏严密的组织和得力的指挥，因而来能一鼓作气，彻底歼灭敌人。

江孜战局的变化，使英国政府手忙脚乱。英印事务大臣布罗德里克声称：“政府业已决定，不管什么生力军，只要印度政府认为必要，均可调往江孜去。”6月中旬，侵略军的增援部队在春丕集结，计有：四个土著士兵营二千八百人、英皇家步兵连四百人，英山炮连二百五十人，土著山炮连一百人、土著山地步兵连二百人，民夫和运输人员七千六百人和配属的其它小分队，总计在一万一千五百人以上。除来福枪、手枪外，尚携有火炮十二门，机枪数挺。此外，还备有牲畜七千五百头，运输车一千六百五十辆。

6月13日，麦克唐纳和荣赫鹏率援军相继从春丕出发。途经乃尼寺时，遭到八百名西藏民军的顽强阻击，死伤十五人。在江孜英军接应下，才于23日抵达江孜。为了解除西藏民军对江洛林卡及帕拉村的包围，英军首先向江孜外围的民军据点发起攻击，先后占领了江孜北面和西面的十二个村庄。6月28日，英军进攻江孜西北三公里的则城寺（即翟金寺）。一千二百名藏军苦战一天，经激烈白刃格斗，最后辙出战

斗，江孜至日喀则的交通随之断绝。至此，英军从三面包围了江孜宗政府及江孜街的守军，并控制了水源。江孜民军面临一场更加严酷的战斗。

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更大的伤亡，西藏地方玫府再度作出忍让的决定。7月1日，达赖派出的宇妥噶伦、大喇嘛、大仲译及三大寺代表到达江孜，与英军谈判。但是，荣赫鹏无理要求西藏民军于7月6日正午前撤出宗政府，谈判终于破裂。

7月5日下午，英军向宗政府和江孜街发动进攻。进攻江孜街的英军分为左右两翼。守卫江孜街的藏军利用已筑起的围墙和房舍，奋勇还击，毙伤敌官兵多名。直至傍晚，英军方占领了江孜街。在宗政府方向，英军先派出步兵六个连和骑兵一个连，携炮二门，从左翼佯攻炮台之岩石方面，以牵制西藏民军主力，使其误认为是英军的主攻方向。黄昏后，英军撤回，趁夜暗又遣步兵十二个连、骑兵一个连，工兵半个连，携炮十二门，进至宗政府东南的外围阵地。这一带多悬崖绝壁，系民军指挥所所在地，是整个防御的要害。阵地前比较开阔，有民军修筑的多道围墙。但英军认为用火炮可以将其摧毁，故选择这一方向进攻。7月6日，英军在炮火支援下发起攻击，经数小时激战，付出了重大伤亡，始抵达宗政府脚下的边缘阵地。当日下午，英军集中所有炮火向围墙轰击，始炸开一个缺口。这时，一个藏兵装药不慎，引起山上火药库爆炸，加大了墙垣的缺口。英军立即发起冲锋，蜂涌而上。西藏民军虽用火力封锁缺口，但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遂拆下墙上巨石投向缺口，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打死打伤敌人数十名。最后，在敌人优势火力攻击下，西藏民军被迫突围，向拉萨方向撤退，江孜重新沦于敌手。

英勇的西藏爱国军民，在江孜抗击英国侵略军达三个月之久，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十三部分 辛亥革命战争（1911年10月~1912年4月）

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10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和发动了一场以推翻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革命战争。这是一次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推向又一个新高潮，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革命。在这次革命战争过程中，交织着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本章对这方面的内容仅作概要的介绍，而着重叙述武昌起义，汉口、汉阳保卫战，攻取南京城等作战行动，并针对这次起义战争的特点，探讨其在指导方而的得失。

第一节 武昌首义成功，全国掀起革命高潮（1911年10月~12月）

一、清军在武汉的部署和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

清政府鉴于武汉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对该地的设防一向十分重视。189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仿效西法，编练了两镇装备齐全、训练有素的湖北新军。1906年，按全国陆军编制序列，第一镇改称陆军第八镇，张彪任统制，第二镇改称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任统领。两部共有官弁兵夫一万七千二百五十九人（第八镇一万二千零七十一人，第二十一混成协五千一百八十八人）。此外，在武汉及湖北各地还驻有相当数量的巡防营，水师营等旧军。巡防营由张彪兼管，水师营统领为陈得龙，归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管辖。武昌起义前夕，新军在武汉的部署情况是：约有三千人分驻武昌城内，四千人驻武昌城外南湖，塘角等地；约有千余人驻汉口；约有五百余人驻汉阳。另有武装警察二千人和巡防营、督署卫队等旧军，驻武昌城内。当时的湖广总督瑞在武汉驻扎重兵，目的是为了镇压革命。而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新军已被革命党人所控制，瑞等文武大员已经坐在火药桶上而不自知。

为了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湖北各地的反清群众，1911午9月上旬，瑞等奉命将第八镇第三十一标及第三十二标两个营调赴四川（少数人留守武昌），另将第四十一标和第二十九标的几个营、队分别调往宜昌、襄阳、郧阳和湖南岳阳等地。新军的调动，固然分散了一部分革命力量，但也使湖北反动统治的腹心地区兵力空虚，有利于发动起义。同年9月14日，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决定消除门户之见，联合武装反清。两个革命组织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军事方面，由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政治方面，由刘公任总理，设军务、参议、内务、外交，理财等部，负责制造炸弹，起草文告、印信，赶制旗帜、符号等工作。同时，派人往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等来汉主持起义。黄兴得知武汉的有利形势后，便致电在国外的孙中山，介绍了湖北革命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和起义的决心，提出了“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的起义方针，认为如此则“大事不难一举而定”，并要孙中山迅速筹款接济。黄兴对形势的估计，基本上符合客观实际，但他没有及时去武汉领导起义。这时，瑞徵等已闻到起义的风声，开始四处搜捕革命党人，加强了防范。在这紧急情况下，孙武等人便于9月24日召开了六十余人参加的骨干联席会议，讨沦了起义日期和总动员计划，制定了起义方案，会议确定于10月6日（阴历中秋节）举行起义，并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对各标、营的任务确定如下：

（一）混成协辎重，工程两队负责在塘角放火作为发难信号；同时掩护该协炮营进占凤凰山炮台及青山，拦击海军舰船。

（二）第八镇工程第八营负责攻占中和门内楚望台军械库，并占领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入城。

（三）第八镇二十九标二营和三十标一。三营以及测绘学堂学员见到信号后，立即赶往楚望台，协同工程第八营向总督署发起进攻。

（四）第八镇炮兵第八标在三十二标（留守部队）掩护下，从中和门进城，在楚望台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总督署轰击。

（五）第八镇和混成协的骑兵，负责城外警戒和通讯联络。

（六）第八镇三十一标、混成协四十一标（留守部队）负责占领蛇山，掩护炮队占领发射阵地。

（七）混成协四十二标驻汉口的部队占领武胜关，四十二标驻汉阳兵工厂的部队控制兵工厂和占领龟山炮台。

（八）宪兵营起义者，负责侦察官方情报，将军事要点之防备情况随时报告起义总司令部。

此外，派人通知湖南的焦达峰，请他按原定成约，届时起事响应。

会议当天，发生了南湖炮队少数参加革命团体的士兵反抗长官压迫而企图暴动的事件，引起了湖北统治当局的注意。10月3日，湖广总督瑞澂召集首县和管带以上文武官员紧急会议，决定调巡防营、教练队等驻守督署及附近各要道，令张彪，黎元洪督率所部日夜巡城，派舰船游弋江面，对楚望台军械库加派人员监守，收缴士兵子弹，实行械弹分离。革命党人鉴于清军已有戒备，加之湖南策应起义的准备工作尚来就绪，遂决定延期起义，并派人催促随队前往岳阳的蒋翊武速回武汉。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配制炸药时，不慎引起爆炸。孙武受伤被送入医院，其余人员仓促转移。俄国巡捕闻声赶赴现场，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印信等物，并转交总督署。瑞澂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急调巡防营分守各街巷，四出搜捕革命党人。在风云突变之际，适蒋翊武从岳阳赶回武昌起义总机关，当即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研究对策。刘复基认为“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蒋翊武亦认为，“再无别法，只有前干，或可死中求生。”遂决定于当晚12时，以城外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发动起义。蒋翊武根据原定计划，以临时总司令名义下达了起义命令，重新明确了各标营的具体任务。不料就在当天，杨宏胜往工程第八营运送炸药时不幸被捕，起义总机关也突然被军警包围，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蒋翊武乘隙逃脱，离开武汉。武昌戒备森严，城内外交通断绝，起义的命令未能及时送达城外的炮队，城内的部队亦未全部接到命令，结果南湖的炮声未响，各标营均未行动，起义计划遂告流产。

10月10日清晨，瑞澂下令将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杀害，加

强督署的防卫及要道的巡逻，传令各标营停止操课，子弹一律上交，禁止官兵出营。在巡警的搜抄下，又有一些革命机关遭到破坏，三十多名革命党人和不少无辜群众被捕入狱，武昌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二、武昌首义，光复武汉三镇

（一）工程营首先举事，夺占军械库

瑞澂采取严厉镇压措施，武汉革命党领导人有的被捕，有的走避，对武装起义无疑是个沉重打击。瑞洋洋自得地电奏清廷，声称他“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现在武昌汉口地方一律安谧”。愚蠢的瑞澂对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

由于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工作比较深入，组织比较隐蔽，各标营中的革命组织未遭破坏，革命力量未受大的损失。在危急关头，第八镇二十九标、三十标的革命党人蔡济民、吴醒汉与工程第八营的熊秉坤，金兆龙等秘密联络，约定于10月10日晚，以枪声为号，按原计划发难，并立即分头通知各标营。驻城外的混成协辎重队的革命党人也不约而同地进行了举义的部署，与附近的炮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

当晚，工程第八营的革命代表将收集所得的数盒子弹分发各革命党人，打死了反对武装起义的军官，并连放三枪作为起义信号。熊秉坤等急率数十人赶赴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库，该营左队守库的革命党人立即响应，顺利地占领了该库。楚望台军械库为湖北新军的重要军火库，储有从国外购买的双筒毛瑟枪一万余支，单筒枪一万五千支，汉阳造步枪数万丈，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起义军首先占领该库，对武昌起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工程第八营占领楚望台后，陆续集合了二百余人，推举原日知会干事、队官（相当子连长）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吴便整理队伍，作了如下部署：以两个排防守军械库；以两个排袭击军械库东西两测的三十标及宪兵蕾的旗兵，以一个队夺占中和门，迎接炮队入城，派数人向遁湘门、中和门一带侦察敌情，并切断敌人的电话线；派人分头递信，催促各营响应；指挥部设在军械库南端，预备队在军械库北端集绪待命。与工程营起义同时，驻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的革命党人李鹏升，亦举火发出了起义信号。炮兵营与工程队立即响应，并同辎重队一起向武胜门挺进，园城门紧闭，一部绕道至中和门，直趋楚望台。

（二）各标营立即响应，迅速攻占总督署

当工程第八营打响起义的枪声，混成协辎重队点燃革命的火焰后，其它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纷起响应。二十九标的蔡济民、三十标的吴醒汉等分别率领部分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测绘学堂的近百名学兵也迅速向楚望台集中。其它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先后率众起义。清军军官大部逃逸，部分士兵自动走散。这时，武昌城内除防守督署等机关的旧军仍企图顽抗外，已有近三千人参加起义；但大多散处各地，到楚望

台集中的仅约七八百人。吴兆麟与熊秉坤，蔡济民等商议，认为单纯防守楚望台，不迅速进攻，待至天明，清军集兵反扑，处境将很危险，遂决定兵分三路，趁夜向总督署及紧靠督署的第八镇司令部发起进攻。

武昌城东西长约五里，南北长约六里，周长约二十二里。蛇山横亘其中，将城区分隔为山南山北两部分。山南东部为各标营驻地，西部有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山北有藩署（布政使所在地）。当时，守卫督署的部队，计有巡防队三个营、教练队一个营、武装消防队一队、骑兵一队、机关枪一队及部分督署卫队和警察。瑞澂、张彪在得知起义消息后，又急忙将辎重第八营调入城内，总兵力约有三千人。其部署如下：辎重第八营为左路，以长街为主要防线，前沿伸至王府口街、南楼一带，防御由武胜门入城及从阅马场西进之起义军；巡防队、消防队为右路，以保安门正街为主要防线，前沿伸至津水闸一带，防御城内及从南湖入城之起义军，警察则分布在督署以北及长街以东各街巷，前沿达阅马场、紫阳桥一带。

起义军的进攻部署是：第一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二十九标一排及其它零星部队组成，从紫阳桥经王府口街进攻督署后院；第二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组成，从水陆街进攻第八镇司令部及督署翼侧，第三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及二十九标、三十标各一部组成，从津水闸经保安门正街进攻督署前门。同时，令已入城之炮八标迅速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轰击。其余人员编为预备队，在楚望台待命。

晚10点30分，起义军开始进攻。因事先未将敌人的部署侦察清楚，加上兵力有限，南湖炮队尚未完全进入阵地，不能给步兵以有力支援，以致初次进攻受挫。第一路进至紫阳桥附近时，遭敌军猛烈射击，伤亡较大，一部退回楚望台。第三路之一部进至津水闸，遭敌顽抗，前进受阻，另一部虽进抵保安门附近，亦被敌击退。

正当起义军进攻受挫时，又有一部分起义士兵自动前来参战，炮队也已进入蛇山阵地，开始射击，于是士气更加高涨。

晚12时后，起义军发起第二次进攻。第一路向紫阳桥发动猛攻，战斗异常激烈。第三路之一部转至大朝街，对紫阳桥守敌形成翼侧威胁，迫使其向西撤退。起义军乘势追击，一举突破敌人防线，向督署进逼。这时，四十一标一部起义队伍已攻占官钱局和藩署，随即分兵一部南攻督署，第二路及第三路之一部已进至水陆街西口，接近督署，第三路之另一路进至保安门正街恤孤巷时，遭敌伏击，进攻受阻。为了突破敌人防线，第三路起义军组织了四十余人（一说一百人）的敢死队，向前猛冲。其余部队攀登保安门城楼，沿城墙西进，配合敢死队实行上下夹击，迫使保安门正街之敌节节败退。这时，第二路已进至水陆街西口外大街，与第一路会合，南向进攻督署，并联络第三路，在督署和镇司令部后门以及前门钟鼓楼等处放火，使蛇山和中和门的炮队对督署的射击更加准确。三路起义军紧紧包围了督署及镇司令部，在炮兵火力支援下，一举冲入署门，将大堂点燃。企图依托围墙进行顽抗的守军，见大

势已去，一部投降，大部溃散，督署及镇司令部遂被起义军占领。

在起义军快要逼近督署时，瑞澂慌忙率少数卫兵从后墙凿洞，逃"楚豫"号军舰，并在舰上致电湘，豫两省速派巡防营来鄂"会剿"，又电奏清廷，"请派大员，多带劲旅赴鄂剿办"。张彪也率兵一部仓皇逃往汉口刘家庙，黎元洪则躲藏在其僚属家中，布政使连甲逃匿。清军失去指挥，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11日黎明，武昌城内各官署，城门均为起义军所控制；当日上午，一些处于观望状态的清军士兵也陆续向楚望台集中听从革命党人指挥。革命党的十八星旗帜飘扬在黄鹤楼上，宣告了武昌首义的胜利。

（三）夺占汉阳、汉口

10月11日下午，驻汉阳的混成协四十二标一营（左队驻兵工厂，前队驻钢药厂）的革命党人，得知武昌起义获胜的消息后，决定于当晚8时30分举义，并派人与驻汉口居仁门的第二营取得联络。汉阳的起义者未遭任何抵抗，迅速占领了兵工，钢药两厂，并拖炮布防于龟山。起义军随即向从武昌逃来的辎重第八营（宿于大校场）三百余人发起攻击。该部未作抵抗，即向汉口刘家庙方向逃窜。12日清晨，瑞澂派载有步兵的军舰一艘，从刘家庙直驶龟山，企图夺占兵工厂，结果被龟山上的炮兵发炮击中，被迫驶回青山下游。同日上午，驻汉口的第二营中的革命党人，在第一营派人策应下，亦率众起义，并拟夺占刘家庙车站。该营在进军途中，得知清河南援军已抵汉口郊外，因虑寡不敌众，遂退回大智门一带防守。驻汉口的三十标第二营中的旗兵，大部闻风逃匿，其余百余人与二营的起义者一起，分防汉口，维持社会秩序。至此，武汉三镇全部为起义军占领。起义军严守纪律，"无一兵入民家之房，无一人夺民家之食"，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武汉三镇人民也积极支援革命军，军民关系十分融洽。

（四）湖北各地遍燃革命烽火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出后，湖北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举兵响应。10月12日，梁钟汉、王守愚在汉川起事，杀死县令，组织军政分府。15日，刘英在京山永隆河起兵，很快攻克了钟祥、天门、潜江，监利等地，17日，武汉下游重地黄州（今黄冈）宣布独立，所属八县一齐响应。与此同时，驻守河南信阳的四十二标第三营革命党人刘化欧等率领起义士兵，工人、农民，会党千余人进袭武胜关（不久即被清军击退）。19日，唐牺支组织革命军攻克武汉上游重镇宜昌，先后夺取当阳、沙市，荆州等地。28日，施南驻军反正。11月下旬，郧阳、襄阳等地，亦披会党势力与起义的新军所控制。这些起义，巩固和扩大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成果。

三、成立军政府，编组革命军

起义军占领武昌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革命政权，巩固起

义成果，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当时，孙中山远在国外，黄兴、宋教仁等重要领导人又迟迟不来武汉。而组织武昌起义的领导成员，孙武负伤，蒋翊武脱险寓汉，在武汉的革命党人中缺少有威望的人物，加之革命党人对掌握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于10月11日上午成立军政府时，竟将曾亲手杀害过革命党人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抬出来做了都督。其理由是可以利用黎的“威望”以“号召天下”。立宪派的头面人物汤化龙等也乘帆混入了军政府。军政府内部成员复杂，从成立第一天起，革命势力与旧势力之间就存在着激烈的斗争。革命党人为了行使领导权，便由蔡济民等十五人组成谋略处，实际负起领导责任。10月12日，复由革命党人詹大悲等组成汉口军政分府。

军政府成立后，首先进行了如下工作：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民众，废除清帝年号，发布檄文，声讨清廷的残暴统治和卖国罪行，号召各省人民迅速执竿起义，致电黄兴、宋教仁等，促其来鄂，电请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颁布了一些具有进步性的政策。法令，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告以军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权，要求外国政府不得助清“以妨害军政府”，否则就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为了保卫武汉和推进革命，10月14日，军政府决定扩编革命军，在参加起义的三千人基础上，扩编成步兵四个协、骑兵一个标、炮兵二个标、工程和辎重各一个营。自军政府贴出招兵布告后，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和退伍士兵踊跃参军，四五天内即招足了约二万人的新兵，而四乡农民前来报名的仍源源不绝。后来，随着战事的发展，又先后成立步兵四个协，骑兵，炮兵各一个标，工程、辎重各一个营，机关枪一队，以及将校决死团、学生军、宪兵队等。此外，还集中部分老兵组织了四个敢死队，并编组了荆襄、长江水师。总兵力最高额约六万人。

革命军的编制仍仿旧军队，军官的薪饷则不论职位高低，一律月支二十元，班长十二元，士兵十元。这样，士兵的生活有所提高，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也有改善。由于编制扩大，新兵数量骤增，军事干部极感缺乏，大部分老兵被提升为初级指挥官和军士。因战事紧迫，部队训练不多，战斗力受到二定影响。

军政府在扩军的同时，还部署了武汉三镇的防务：吴兆麟的步兵第一协防守汉阳，何锡藩的第二协防守汉口，成炳荣的第三协防守武昌武胜门外两望山至青山一带，张廷辅的第四协防守武昌，熊秉坤的第五协（10月16日成立）为预备队，驻武昌。马、炮各标营分隶各协指挥。

武昌起义后，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人心安定，商店照常营业，武汉三镇呈现出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武昌起义之所以能获得胜利，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自《天津条约》规定汉口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竞相在此兴办企业，开辟航运，倾销洋货，不仅工人受到剥削，而且愈来愈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运输工人陷入破产失业的境地，加上洋务派首领之一的张之

洞，不惜耗费巨额资金，在湖北积极推行“新政”，因而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捐税分外苛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迅猛发展，这就为首义成功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武汉和湖北的革命党人把着眼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在群众中特别是在新军中长期；进行艰苦扎实的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作，积蓄了相当的革命力量，从而为首义成功准备了主观条件。这次起义的军事行动也是很成功的。起义的部队首先抢占制高点和军械库，并由基层单位迅速推举出统一指挥的人员，立即组织部队实行步炮协同，很快攻占敌人的首脑机关，使敌军失去指挥，陷入混乱，从而很快控制了武昌城。

四、各省响应起义，纷纷宣告独立

武昌起义的炮声，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迅速形成了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

首先响应起义的是湖南．10月22日，革命党入焦达峰、陈作新发动新军和会党攻入长沙。巡抚余诚格外逃，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杀。焦达峰、陈作新被举为正副都督，建立了湖南军政府。湖南起义胜利后，军政府下令扩军，并先后派王隆中、甘兴典各率步兵一协赶赴湖北，支援武汉革命军，使首义地区增强了抗清实力，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日，陕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和哥老会发动起义，占领省城西安。曾参加过同盟会的新军管带张凤翙被举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后改称都督）。23日，江西九江新军起义，次日攻占湖口及马当炮台，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30日，南昌新军举义，占领南昌城，建立江西军政府。

接着，山西、云南、贵州，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先后宣布独立。至11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中已有十四个省和上海脱离了清朝的统治。宣布独立的省市主要在华中、华南地区，其中以长江中游的湖南、江西和下游的江苏、安徽对武汉影响较大。北方地区各省，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较为稳固，因而没有出现独立的省区，但当地的同盟会员及与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团体也发动了规模不等的起义和暴动。此外，东北、内蒙、西北的甘肃和新疆、西南的少数民族人民，也先后爆发了反消斗争。这些起义和暴动，对武昌起义起了积极的策应作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高潮。

由于同盟会对迅猛到来的革命形势没有足够的准备，缺乏坚强的领导和通盘的筹划，在各省的实力有大有小（不少省同盟会的实力小于立宪派），对革命的态度也不相同，参加起义队伍的更是鱼龙混杂，这就使各独立省份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有的省在革命派武装夺取政权后，被立宪派，旧官僚采取阴谋手段，窃夺了实权（如湖北，福建）。有的省被立宪派分子采取流血政变的办法篡夺了政权（如湖南、贵州）。有的省在革命洪流冲击下，迫于形势，采取改头换面的手法，仅将旧衙门换上一块新招牌（如江苏、广西）。即使革命党掌权的省份，

也有部分革命党人很快成为争权夺利的政客，或者变成了地方军阀（如安徽、山西）。这些独立的省份，相互之间各有打算，内部局势也不稳定，因此很难做到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尽管如此，各省的独立，毕竟极大地孤立了清政府，壮大了革命声势。还应指出，由于革命党人重视做新军的工作，自武昌新军打响反清第一枪后，不到三个月，在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四个标的新军中，先后反正，解散，溃败的约有七个镇、十个混成协、三个标，大大削弱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力量。所有这些，都为最后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汉口、汉阳保卫战（1911年10月~11月）

一、清军南下攻鄂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极为惶恐，于10月12日确定如下应急措施：将瑞澂革职留任，令其“克期克复省城”命河南巡抚宝棻就近派兵一协，星夜驰援武汉，停止永平（今河北卢龙县）秋操，速调北洋陆军两镇“赴鄂剿办”，由海军提督萨镇冰、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牢两舰队“即日赴援”，任陆军大臣荫昌为钦差大臣，“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

由于当时京汉铁路运输能力有限，加之尚需补充弹药，清廷决定从10月13日起，将所调陆军分批南运，并于河南信阳设总粮台，负责南下部队的后勤补给。北洋军将领多系袁世凯的亲信，清廷恐荫昌指挥不灵，不得不于14日下谕重新起用贬回河南“养病”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同日，清政府决定将北洋六镇和禁卫军编组成三个军，并明确规定了各军的任务：

第一军以荫昌为军统（亦称总统）。由陆军第四镇和第二镇的混成第三协、第六镇的混成第十一协编成。该军第四镇即向孝感附近集中，第三协及第十一协二十二标速趋溵口，掩护大军南下。

第二军以军谘府正使冯国璋为军统。由陆军第五镇、第三镇的混成第五协、第二十镇的混成第三十九协编成。“迅速筹备，听候调遣”。

第三军以贝勒载涛为军统。由禁卫军、陆军第一镇编成。“驻守近畿，专司巡护”。

10月17日，荫昌到达信阳，坐镇指挥。袁世凯一面要挟清廷，一面又对清廷表示忠心，于19日奏陈在冀鲁豫招募一万二千五百人，编成湖北巡防军二十五个营（后更名为武卫右军），参加对起义军的“围剿”。

二、刘家庙争夺战

（一）双方作战企图及兵力部署

汉口保卫战首先是从争夺刘家庙开始的。刘家庙在汉口以北十公里处，濒临长江，周围地势平坦，水网沟渠纵横，部队不便展开。刘家庙车站（即江岸车站）为南下清军必经之路，也是革命军保卫汉口的前哨阵地。

第八镇统制张彪逃到刘家庙以后，湘、豫援军亦先后到达。他得悉清廷派荫昌率军南下后，便决定固守既有阵地，然后配合南下清军向武汉反攻。当时，集结在刘家庙的清军，有辎重第八营及四十二标残部，湖南驻岳州巡防营两个队，河南新军二十九协五十八标两个营及一个巡

防营，另有骑兵数十人，共约二千余人。清军在刘家庙以南构筑工事，沿铁路两侧进行防御，预备队配置在刘家庙东北的丹水池地域。不久，南下清军先头部队进抵刘家庙东北的滠口，萨镇冰所率舰队也大部驶至武汉江面，并派鱼雷艇在江面巡弋，防阻革命军从武昌渡江增援。

湖北军政府得知消军南下消息后，于10月15日召开军事会议，确定趁南下清军尚未全部集中时，先敌发起进攻。其方针是："拟先击攘汉口之敌，逐次向北进攻，以阻止清军南下。"为此，决定向汉口增兵，首先肃清盘踞刘家庙之敌。

当时，驻守汉口的革命军为步兵第二协，下辖步兵第三棕（统带姚金镛），第四标（统带谢元恺），另配属骑兵一营。炮兵一标（欠一营），工程兵一队，敢死队两个大队，共四千余人。其进攻部署是：右翼为第四标，左翼为第三标（欠一营），分别从铁路两侧进攻刘家庙以南之敌；炮兵及工程队配置在洋商跑马场东侧，预备队在第四标之后跟进。此外，以驻武昌的第五协为增援汉口的预备队，令驻汉阳的步兵第一协派一个标移驻汉口，负责接济弹药。由第二协统领何锡藩任前线指挥。

（二）革命军攻占刘家庙

10月18日黎明，革命军在炮兵支援下发起进攻，很快逼近刘家庙车站，与清军展开肉搏战。因后续部队遭敌舰炮火拦击，未能及时投入战斗，以致进攻受挫，部队退回大智门车站附近。

18日上午10时，步兵第一协的一队士兵，突然从右翼发起冲击，其势甚猛，迅速突入清军阵地，守军一部乘火车北撤。该队乘胜追击，进展顺利。但因其余部队未能及时跟进，形成孤军深入，翼侧暴露。北逃之敌忽停车阻击，革命军遭受很大伤亡，不得不再次退回大智门一带，仅留百余人（内有铁路工人致名）隐蔽在铁路两侧，监视清军行动。革命军两次进攻受挫后，重新调整部署，令两个敢死大队分别在第三，第四标之后，督同步队前进。

18日中午12时后，革命军再次发起进攻。由子新兵不善利用地形，伤亡较大，进展迟缓，至午后3时才推进五六百米。这时，敢死队全部投入战斗，炮兵一部向敌右翼猛烈轰击。下午4时，清军急派步兵一标、炮兵一队乘车急赴刘家庙增援。革命军发炮拦击不中。此时，潜伏在铁路两侧的革命军士兵，迅即将十余丈路轨拆毁，使列车脱轨倾覆。革命军乘机发起冲锋，附近的工人、农民亦手拿铁锹、锄头、扁担助战。清军死伤惨重，纷纷后退。为了阻止革命军的进攻，清军立即派兵一部，从姑嫂树迂回革命军侧后。

10月19日晨，革命军约三千人，以骑兵为前锋，在炮兵支援下，从两翼发起进攻，并派兵一部阻击敌之迂回部队。清军依靠舰炮支援，顽强抵抗。激战至中午12时，清舰弹药用尽，驶往下游。革命军乘机加强

两翼攻势。清军窜入棚户，继续顽抗。革命军立即以敢死队组织火攻。时正顺风，顷刻之间烈焰冲天。清军无法立足，丢弃大量辎重，向三道桥退却。革命军占领刘家庙，追至三道桥附近，才停止了进攻。第二协因连战疲惫，遂留一半兵力固守刘家庙阵地，其余人员运送战利品回汉口。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革命军的士气。清军经此挫败后，湖广总督瑞澂一面急电催援，一面借故逃往上海。

（三）革命军转入防御

革命军虽在刘家庙初战获胜，但打的是击溃战。而南下的北洋军正陆续向祁家湾、滠口附近集结。19日夜，军政府调步兵第四协增援汉口，由第五协接替武昌防务。同时，召开军事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在清军尚未全部到达之前，继续发起进攻，首先击退滠口之敌。前线指挥何锡藩，因与少数革命党人意见不合，提出辞职。军政府改任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指挥官。张景良原为八镇步兵第十五协二十九标统带，因策动黎元洪叛变，革命党人曾将其拘留，后被黎元洪保释。山这样一个奸细掌握前线指挥权，给尔后的作战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此时，清军两栋正在滠口集结，并陆续有增援部队到达，海军兵舰五艘在阳逻湾待命。张景良到达刘家庙后，故意拖延时间，不作任何作战部署。20日，军政府派人前往检查，发现部队混乱，毫无进攻准备，遂代张下达任务，令步兵第二协从正面进攻，于21日拂晓前先派兵一部潜入三道桥以北，掩护其余部队从正面进攻滠口之敌，步兵第四协（欠第七标）从滕子冈渡河进攻滠口之敌右翼；炮兵第一标在一道桥附近占领发射阵地，轰击三道桥以北敌军，支援步兵作战，步兵第七标及敢死队为预备队，在造纸厂西南端集结待命。为了配合这次进攻，军政府还令步兵第三协驻青山的炮兵拦击清舰上驶，在第二协主力通过三道桥后，立即派一支小部队渡江，袭扰滠口清军侧后。汉口军政分府在大智门，刘家庙设立粮台，负责接济械弹粮秣。

10月21日拂晓，步兵第二协第四标在谢元恺率领下，潜行至三道桥北端，发起冲锋。清军以机关枪猛烈扫射，封锁三道桥。革命军既不能前进，又无法机动，伤亡惨重，退守二道桥。步兵第四协从滕子冈渡江到达对岸，因地势低洼，泥泞难行，加之清军防守严密，进展困难。在得知正面进攻失利之后，遂自动撤回。当晚，军政府再次召开会议，鉴于进攻受挫，决定暂取守势。部队在三道桥以南占领险要地形，加紧构筑工事，转入防御。

三、保卫汉口之战

（一）双方调整作战部署

清军从刘家庙退至三道桥北后，一面加固阵地，一面将重型火炮和集结于祁家湾一带的第一军主力调往前线，企图先夺占刘家庙，尔后向汉口市区发展。其部署是：左翼为混成第三协，在铁路以东占领阵地，

右翼为第四镇，在铁路以西占领阵地。总兵力约一万五千人。同时，令海军舰艇配合作战。

革命军在三道桥以南转入防御后，其任务区分如下：步兵第二协防守二道桥以东地区，步兵第四协（欠第八标一营）防守二道桥至滕子冈一线，炮兵配置在一道桥附近，并以一部兵力占领戴家山，第八标一个营及敢死队为预备队，配置在造纸厂附近，骑兵在左翼担任警戒。总兵力约一万人。同时，积极筹组步兵第六协，接替武昌坊务，令步兵第五协作好支援汉口作战的准备。

10月22日至25日，双方都在积极进行战前准备，除在二道桥一带有零星接触外，未发生大的战斗。

（二）革命军节节阻击清军

10月26日晨，清军水陆协同，向革命军发动进攻。先由军舰数艘，乘革命军青山炮队疏于戒备之际，驶至谌家矶附近，从翼侧向三道桥以南革命军阵地实施火力急袭。革命军猝不及防，牺牲五百余人。滠口的清军在机枪和管退炮火力掩护下，乘机通过三道桥，沿铁路两侧发动猛攻。革命军依托工事顽强抗击，终因减员过多，被迫后撤。上午10时，刘家庙复为清军占领，革命军退守大智门一带。

正当激战之际，前线指挥张景良竟不知去向。中午12时，第四标统带谢元恺自告奋勇，指挥部队向刘家庙反攻。在距刘家庙五百多米处，战士们上好刺刀，冒着弹雨，齐声喊杀，勇往直前，与敌展开肉搏战。清军不支，纷纷逃窜，刘家庙又被革命军夺回。革命军追至造纸厂附近，遭敌阻击，时已黄昏，遂停止进攻。

26日晚，军政府鉴于汉口的革命军伤亡较大（共计伤亡一千余人），立即从武昌调步兵第五协、敢死队两大队，从汉阳调步兵第一协一部，增援汉口，准备于第二天乘胜进攻，驱逐造纸厂之敌。同时，由新编步兵第六协（统领杨载雄）担任武昌防务。军政府对于临阵脱逃的张景良不作断然处置，仅令炮兵统领姜明经协助指挥。

27日凌晨，清军集中更大兵力，先于革命军发起进攻。其部署是：第四镇从造纸厂正面进攻；混成第三协从戴家山、姑嫂树迂回革命军翼侧。革命军依托阵地，坚决抵抗。而张景良既不亲临前线指挥，又不给部队及时补充弹药，以致战不多久，部队弹药告罄，加之新兵不善于利用地形，部队伤亡过大，不得不从刘家庙逐步后撤，退守大智门一带。清军进至洋商跑马场。

当晚，军政府召集会议，研究配备缺额干部，派炮队二营增援汉口，派工程营帮助驻汉口各部队赶筑和加固工事，并致电湘、赣、陕等省，请速出兵，支援武汉。这时，清廷已召荫昌回京，以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权指挥武汉战事，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并由冯国璋亲往汉口督战。

28日上午，清军继续沿铁路向大智门猛扑，并以进占洋商跑马场之清军，绕道三义桥，迂回革命军翼侧。时张景良又不在战地，部队无人统一指挥。革命军与敌反复争夺，因后援不继，被迫从大智门后撤。据守歆生路的革命军，依托坚固房屋，进行顽强抗击，多次以冲杀肉搏打退清军的进攻。

29日，清军以重炮轰击革命军炮兵阵地。由于革命军的炮兵目标暴露，火炮和人员损失很大。清军在优势炮火支援下，不断向前推进，相继攻占了歆生路口及华商跑马场。革命军分别退守玉带门及歆生路以南街市。此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三）革命军撤离汉口

在激烈的战中，代理第四协统领谢元恺，炮兵统带蔡德、敢死队队长马荣等率先冲锋，先后牺牲，第二协统领何锡藩亦中弹受伤。革命军的领导骨干不断削弱，张景良又藏匿出出，前线指挥乏人，部队士气开始涣散。这时，黄兴与宋教仁等由上海抵达武汉，黄被推举为武汉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到任后，设总司令部于汉口满春茶园，并立即到前线视察部队，激励士气。当时，在汉口的革命军尚有六千余人，经过动员整顿，士气复形高涨。时清军已从大智门至玉带门一线不断向市区发动进攻，情况十分危急。黄兴立即组织部队分路反击，一路曾突破清军歆生路防线，但硚口一路为清军所阻。

10月31日，袁世凯抵信阳接任钦差大臣，令冯国璋调集军队猛攻汉口。汉口的革命军依托歆生路一带的房屋树木，与清军逐屋逐段争夺，使敌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受重大伤亡。清军凭借优势兵力火力，节节向市内进逼。军政府急将驻汉阳步兵第一协大部兵力及武昌辎重第二营调往汉口增援。

11月1日晨6时，清军从王家墩发起攻击，革命军依托堤防顽强抗击，使敌一时无法突破防线。上午10时左右，清军利用歆生路附近房屋作掩护，向革命军右翼逼近，同时用火炮轰击革命军防守的据点。革命军遭受重大损失，逐步后撤。清军为使革命军失去依托，竟不顾居民的生命财产，火烧歆生路一带房屋，烧一段进一段，一直烧到沿江一带。繁华的汉口市区顿时湮没在一片火海之中。这时，驻守汉阳的第一协统领宋锡全擅自率部撤往岳阳（一说奉命撤退）。汉口的正面及左翼亦有少数革命军官兵借故退走。下午，汉口市区逐步为清军占领。黄兴见汉口革命军已被打散，无法挽回败局，遂决定退守汉阳，等待援军，再图恢复。11月2日，汉口失陷。此次争夺汉口之战，双方各死伤二千余人。

四、保卫汉阳之战

革命军和清军在汉口连日苦战，均甚疲劳，双方都需休整，作再战准备。加之“海琛”、“海容”、“海筹”等舰于11月1日宣布起义，驶抵九

江，加入革命军，使清军的渡江作战增加了一定的困难。因此，暂时形成两军对峙的局面。

（一）清军的进攻部署与“和谈”阴谋

清军攻占汉口后，一面巩固阵地，一面调运枪械弹药及渡河器材，并继续车运援军南下。冯国璋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行动。冯以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时力争武昌的战例，说明“昔日之势，重在武昌，武昌以洪山为扼塞，洪山失则武昌不守，顺流以取汉阳、汉口，如破竹耳。今日之战，则重在汉阳，汉阳之大别（龟山）诸山，俯瞰武汉，如釜底一丸，下掷则全城瓦碎，不待攻而自破矣。为今之计，惟有先取汉阳，为攻心之上策”。他决心先取汉阳，再攻武昌。当时清军的配置是；第四镇和混成第三协驻汉口，第五镇驻孝感，混成第十一协从孝感南下新沟，另有清军五千人进驻祁家湾。总兵力约三万人。其进攻部署是：左翼为第四镇，从汉水正面渡江，直接进攻汉阳。右翼为混成第十一协和炮兵十九标一队，分甲乙两支队（各约一标兵力）迂回汉阳翼侧。甲支队从新沟渡汉水，经蔡甸（今汉阳县）向三眼桥进攻，乙支队从舵落口渡汉水，向琴断口进攻。另以第八协步兵一标为预备队，在甲乙两支队后跟进。同时，在汉口歆生路，刘家花园、大智门，招商局、华商跑马场、硚口及沿江一带，设置炮兵阵地，支援渡河部队。又在汉水口附近强索民船，进行佯动，掩护迂回部队渡河。经过十多天的准备，逐步完成了进攻部署。

正当袁世凯、冯国璋部署向汉阳进攻之际，从保定移防石家庄的清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与驻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山西革命党人联络，准备响应武昌起义，回师京城，并在石家庄截留运往武汉的军火一车。袁世凯为了稳住北方，消除北上组阁的威胁，收买凶手于11月7日刺杀了吴禄贞。不久，张绍曾被“开出差缺，解除兵柄”。但此时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省已先后宣布独立，清廷正处在四面楚歌之中。面对全国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和武汉革命党人在军事上的暂时挫折，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唆使下，派亲信于11月10日到武昌进行“和平”试探。因其坚持以君主立宪为停战议和条件，虽为黎元洪所接受，却被革命党人拒绝。袁世凯诱和不成，遂令冯国璋积极准备进攻汉阳。

汉口失陷后，军政府内部对是否防守汉阳，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固守汉阳，并电请起义各省迅速出兵，合攻清军。军政府一面整顿队伍，组建新军（即步兵第七协，统领为邓玉麟，步兵第八协，统领为罗洪升）；一面在汉水沿岸及险要地点加紧构筑工事，部署防御。11月2日，黄兴返武昌后，许多革命同志主张战时总司令应与都督平行，而立宪派和革命党人中的妥协分子，为了保持湖北军政府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坚持总司令要受都督节制，结果后者占了上风，于11月3日效法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演出了一场由黎元洪登坛拜将的“闹剧”。黄兴受命后，即赴汉阳，在昭忠祠组织司令部，在归元寺设立粮台，积极布置守城事宜。当时，退驻汉阳的革命军不足五千人，经过补充，加上

新从武昌调来的步兵第六协，共约万余人。适湖南援军王隆中，甘兴典二步兵协（均不满员）于11月6日，9日先后开抵汉阳，总兵力增至二万余人。汉阳革命军沿汉水，背龟山、黑山、仙女诸山，由东向西，自南岸嘴经琴断口至三眼桥一线，划区设防。11月11日，其部署如下：步兵第四协防守南岸嘴至兵工厂一线，步兵第五协（欠第十标）防守兵工厂与钢药厂，步兵第二协第四标防守钢药厂至黑山巨麓，湖南援军第一协及工程兵一队防守割丝口至琴断口一线，湖南援军第二协及工程兵两个队防守美娘山、三眼桥、扁担山一带，并向蔡甸方向警戒，炮兵在大别山、黑山、仙女山、扁担山占领发射阵地，步兵第六协在七里铺、步兵第十标在归元寺为预备队。由子设防没有重点，因而处处兵力薄弱。

（二）革命军反攻汉口失利

黄兴到达汉阳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以及湖南援军的到来，汉阳防务的逐步就绪，产生了急于收复汉口的思想。对此，军政府内部很多人表示反对，认为目前新兵太多，又缺乏训练，不宜马上反攻。黄兴不采纳这些正确意见，反而轻信他的军事顾问、日本人大元大佐关于汉口清军“不难击灭”的意见，并受王隆中声官如不反攻即率部返湘的要挟，决定反攻汉口，先发制人，以求打乱敌人的进攻计划。其部署是：以湖南援军第一，二协及武汉革命军第五协（欠第十标）为主攻部队，从琴断口渡河，分左，中，右三队占领博学书院一带堤防，然后向玉带门方向前进，攻击清军右翼。步兵第四协，第六协为助攻部队，俟主攻部队渡河并发起攻击后，即由汉阳东北端渡河，在龙王庙登岸，向中国街前进，攻击清军左翼。炮兵第一标（欠一营）渡河后在博学书院西南占领发射阵地，支援步兵作战。步兵第五协第十标和其余部队为预备队，渡河后，在博学书院西端待命。

11月16日下午5时，工程营在琴断口架桥完毕。当晚10时，主攻部队陆续渡河，抵达预定地点，即向玉带门方向攻击前进，很快推进至玉带门附近。后由于清军猛烈射击，部队伤亡较大，遂停止前进。17日晨，革命军再次发起冲击。清军不支，逐步后撤。上午9时许，湖南援军第一、二两协进至居仁门一线，武汉革命军第五协进至王家墩。黄兴即令步兵第四协和第六协奋勇渡河，攻击清军左翼，以收夹击之效。但该两协在渡河时，遭到清军机关枪猛烈扫射，抢渡未成，使主攻部队失去了有力支援。不久，清援军到达，在炮火及机枪火力掩护下，向革命军反击。革命军第二协及第五协在清军压力下，首先退却，牵动全线。黄兴下令停止退却，部队皆不听命，不得不率军返回汉阳。这次作战，革命军伤亡较重，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使士气受到很大的挫伤。

（三）革命军退出汉阳

革命军退回汉阳后，一面从武昌调步兵第七协一个标增援汉阳，一面部分地调整了部署，命第二协第四标专任兵工厂防御，黑山至割丝口一段，令步兵第六协接替。同时，购买麻袋，于各要隘盛土为堡，并在汉江沿岸增架铁丝网、鹿砦，于三眼桥隘道处埋设地雷，以加强防御。

但是，黄兴对清军的进攻部署，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清军主力在汉口龙王庙至玉带门一线，汉阳正面是敌人的主要进攻方向，对于从孝感、新沟南下，迂回侧击汉阳的大批清军，认为是敌人的牵制部队，未予足够重视，仅派少数步、骑兵前往蔡甸设防。这一错误判断，对汉阳的防御作战影响很大。

清军在革命军反攻汉口受挫后，便于11月20日按既定部署向汉阳发起进攻。其右翼甲支队约二千人从新沟渡过汉水，未遭多大抵抗，即将汉阳的门户蔡甸占领，并迅速推进至汉阳以西的三眼桥附近。乙支队电在舵落口架好浮桥，准备渡河。21日，甲支队以骑兵营为先导，向三眼桥发起冲击，遭革命军阻击，不得前进。这时，在汉水正面的清军，先以炮火向据守琴断口、美娘山的革命军阵地猛烈轰击，继以步兵抢渡舵落口，进攻琴断口。经近一小时激战，清军乙支队占领了琴断口。22日，清军甲支队因正面进攻三眼桥失利，于桥南蒋家渡架桥，企图强渡，被驻守汤家山的革命军炮兵击退。乙支队从琴断口向革命军右翼阵地美娘山进攻，亦未得逞。清军在进攻三眼桥接连受挫后，遂集中兵力于琴断口方向，向美娘山发动猛攻，于23日下午1时攻占该山。革命军趁其立足未稳，实施反击，使美娘山失而复得。这时，汉口口一带清军，使用民船十余只强行渡河，企图从正面进攻，结果被革命军炮火击退。为了减轻汉阳的压力，革命军步兵第三协派兵一部，在海军支援下，从武昌青山渡江，占领谌家矶，向刘家庙进攻，袭击清军后方。清军猝不及防，退至二道桥附近。次日，清援军乘车赶到，以机关枪猛烈扫射，革命军遭受重大伤亡，被迫退回青山。

24日，清军陆续增兵于美娘山方向。凌晨，在炮兵支援下，很快攻占了美娘山、仙女山。黄兴鉴于仙女山之敌可以瞰制汉阳，侧击大别山，对汉阳威胁甚大，遂令预备队陆续投入战斗，进行反击。因有的部队不听指挥，以致未能奏效。清军甲支队乘势进攻三眼桥革命军阵地。革命军被迫退守锅底山、扁担山。经反复争夺，终因力量悬殊，锅底山、扁担山及磨子山相继失守。25日，革命军从各部队挑选敢死队百余人，乘夜进行反击，夺回了磨子山。由刘玉堂率领的湖南援军一标，刚抵汉阳，亦立即投入战斗，夺回了扁担山。清军集中炮火向革命军射击，刘玉堂不幸中弹牺牲，部队相继溃散，磨子、扁担两山复被清军夺占。至此，汉阳周围的制高点已大部为清军控制。革命军在争夺上述各山过程中，伤亡较大，已无力进行反攻。26日，革命军在黑山、十里铺一线组织防御。在各路清军进逼下，革命军的防线很快被突破。这时，驻汉口的清军从硚口渡过汉水，侧击黑山。革命军腹背受敌，遂不听黄兴指挥，纷纷撤退。湖南援军第一协退往武昌，第二协从鹦鹉洲返回湖南。黄兴见败局已定，遂下令将兵工厂的武器弹药运往武昌。27日，清军占领大别山，进据汉阳城。

此次战斗，革命军伤亡三千三百余人，清军亦死伤惨重。清军面对长江天险，又无海军支援，同时为了给“和谈”留下余地，没有马上进攻武昌。武汉战场再次呈现隔江对峙的局面。

汉口、汉阳保卫战，革命军在作战指挥上有不少失误，诸如偏重于从正面与兵力火力均占优势的清军争夺阵地和街道，未能充分利用道路纷歧、街道纵横的特点，迂回侧击敌人，让内奸张景良充当前线指挥，并在已经发现其有渎职行为后仍不作断然处置，不顾主客观条件，贸然反攻汉口，将汉阳设防重点放在汉水岸边，未能以更多兵力控制翼侧和制高点，也未掌握足够的预备队，等等。这些，都是导致汉口，汉阳失守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革命军为保卫汉口、汉阳，与敌人进行了四十多天的浴血奋战，充分表现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它打破了清政府妄想以北洋精锐之师，一举将革命起义扼杀在摇篮中的企图。经过革命军的顽强抗击，给维护清王朝的反动支柱——北洋军以重大杀伤，使全国各地革命党人受到巨大鼓舞，为各省组织起义赢得了时间，对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三节 苏浙联军攻取南京和成立中央临时政府（1911年11月~1912年4月）

当汉阳激战之际，苏浙联军正会攻南京。11月初，上海、浙江，江苏先后宣布独立，但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东南重镇南京，尚为清廷所控制，并驻有重兵。这对临近各省是个很人的威胁。革命党人几次策动守军起义均未成功。苏浙沪革命党人为了减轻武汉的压力，发展东南地区的革命力量，决定联合攻取南京。

一、驻宁新军与旧军的斗争

南京城内，原驻有以徐绍桢为统制的新军第九镇步兵第十七协，第十八协三十六标一个营，及炮标，骑标、工程、辎重等营，总人数约七千人。另有江防会办，江南提督张勋统率的江防军二十营，赵会鹏统率的江宁巡防军五营，王有宏统率的新防军（又称缉私队）十营，由未裁绿营及饥民新编成的巡防军十营，江宁将军铁良新练的步兵一标，炮兵一营及督署卫队等，分驻城内外。旧军总兵力约二万人。

著名的革命党人赵声等曾在第九镇进行兵运工作，因而该镇官兵具有一定的民主革命思想。武昌起义后，该镇官兵进一步向革命方面转化。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认为新军不可恃，不予补充弹药，并派江防营进行监视。10月31日，张人骏又命第九镇限期从市内移防至距城六十五里的秣陵关，由江防营及巡防营负责城内守卫，每人补充子弹五百发。第九镇官兵对此愤愤不平，纷纷要求起事，但苦无弹药，不敢轻动。第九镇移驻秣陵关后，张勋等派人监视，观察动静，并企图谋刺徐绍桢。徐绍桢本无意革命，但被张人骏、铁良所逼，且各标营的革命呼声甚高，遂下决心联络革命党人，举行起义。他一面派人去上海领取弹药，一面入城联络巡防军，督署卫队为为应，相约于11月8日以演习为名，同时行动，袭取南京城。不料城内一些同情革命的人自行于7日仓促发动，被张勋调兵镇压，很多革命党人牺牲。清军紧闭城门，严密戒备，并增派步兵三个营、骑兵一个营防守雨花台，在通济门，汉西门增设了山炮和机关枪。

第九镇闻城内起事，遂于11月8日誓师，兵分三路，进攻南京城。其部署是：右路以步兵第三十六标第三营（缺一队）、骑兵第九标第一营（缺一队），经曹家桥向通济门进攻，进城后，占领督署。左路以步兵第三十三标第三营、骑兵第九标第三营，经铁心桥，安德门向汉西门进攻；进城后，消灭清凉山守军，占领饷械局。中路以步兵第三十四标、骑兵第九标第二营，经姑娘桥，花神庙向雨花台进攻，进城后，分军渡江，占领浦口。同时，约镇江步兵第十八协第三十五标进攻朝阳门，进城后，占领将军署。当时，第九镇官兵每人只有子弹三五发，重武器则有炮无弹。上午11时，各路部队在无名纬河南岸高地集结待命，准备夜间行动。中路的骑兵因求战心切，竟不顾统一号令，单独北进，

在逼近雨花台时，遭清军炮击，退至花神庙。这时，步兵三十三、三十四两标，也先后发起进攻，因无统一指挥，形成各自为战。黄昏，中路部队向雨花台发起冲击，遭敌火力压制，伤亡较大。当晚，革命军连续三次冲锋，终因弹药不足，守军工事坚固，未能奏效。待至9日拂晓，革命军弹药用尽，被迫退往镇江。

二、苏浙联军会攻南京

（一）联军总司令部成立和攻城作战部署

新军第九镇进攻南京失败后，徐绍桢赴上海与革命党洽商。北海都督陈其美与江，浙各省起义军将领集会，决定组织苏浙联军，攻取南京，配合武汉革命军的作战，发展东南各省的革命形势。会议推徐绍桢为总司令，设司令部于镇江，设总兵站于上海。11月15日至20日，各处革命军陆续集中于镇江及其西南地区；计有：江苏军步兵四营、炮兵一队、骑兵一队，约三千人，由刘之洁统带，驻句容、丹阳等地，浙江军步兵二标（缺二营）、游击队二营、骑兵一队、炮兵一营（携炮四门），工程辎重各一队，共三千余人，由朱瑞统带，驻高资、淞军步兵六百人，由黎天才统带，驻镇江金山河，沪军步兵一千人，由洪承典统带，驻镇江，镇江军步兵二协，约四五千人，由林述庆、柏文蔚统带，驻高资，下蜀和镇江。此外，还有前来会师的其它零星部队和起义海军舰艇十四艘。总兵力一万四千余人。

在联军开始集结的同时，总司令部召开了两次军事会议，研究确定先驱逐南京城外清军，夺取各要塞炮台，再攻取南京城。具体部署如下：以淞军为右翼，攻取乌龙山及幕府山炮台；浙江军为中路，由麒麟门进占紫金山，向朝阳门，太平门进攻；江苏军为左翼，经淳化镇向雨花台进攻，镇江军为预备队，随同中路前进，进攻天保城，沪军担任警戒，海军配合陆军进攻，掩护、运载陆军登岸，镇江军一部及扬州徐宝山部进攻浦口，断敌退路。

（二）联军三面进攻，夺占城外各要点

南京城垣高厚，北有乌龙、幕府两山，南有雨花台，紫金山天保城扼其中，均筑有坚固工事。城内外炮台环列，易守难攻。清军司令部没在北极阁。紫金山有野炮十七门，雨花台有要塞重炮一门，各城门配有野炮多门，由江防营分别监守。皇城内有旗兵及巡防兵五营，准备三路机动。其余兵力分驻于城内外各炮台及交通要道，每处有一营至数营不等。清军昼夜巡逻，防守严密，但士气低落，有不少官兵同情革命。

11月24日，右路淞军和浙江军一营，乘兵舰直趋乌龙山麓，在守台官兵内应下，很快攻占了乌龙山炮台。25日晨，又将幕府山炮台占领。革命军当即用炮台的大炮向清军北极阁司令部及狮子山炮台轰击。清军慌作一团，水师营参将率战船四十只归顺，下关东西炮台守军亦降。同日，中路浙江军进至马群，清军五个营据守四道防线，进行顽强抵抗。

经数小时激战，浙江军突破敌人防线，毙伤清军甚众。清军统领王有宏亦被击毙。下午2时，又攻占孝陵卫，前出至紫金山一线。26日，清军以三营兵力向幕府山、以五营兵力向孝陵卫实施反击，均被联军击退，缩入城内。此时，左路江苏军已占领上方镇、高桥门，进逼雨花台。

（三）联军攻占南京城

11月27日，联军进行攻城准备。28日，小路浙江军向朝阳门发起攻击，因攻城器械不足，多次掷放炸药轰城不果，并遭天保城清军炮火袭击，伤亡多人。左路江苏军进攻雨花台，亦未奏效。第一次攻城遂告失败。为了迅速攻下南京城，联军总司令部决定集中镇江军，浙军、沪军近万人，合力进攻天保城。另以江苏军一部进攻雨花台，作为牵制。天保城位于紫金山半山腰，地势险要，上筑要塞炮台，有炮十余门、机关枪四挺，由江防兵一营及旗兵四百人防守。11月30日，联军向天保城发起攻击，清军据险顽抗抗。在敌火炮和机关枪扫射下，联军伤亡较大，无法前进。随后，联军组织敢死队，以一队从紫金山正面攻天保城东侧，另一队攻其侧背。第二次攻击发起后，敢死队不怕牺牲，攀岩登壁，勇猛冲锋，各军亦相继跟进。清军不支，遂假示投降。联军受骗，死伤百余人。革命军官兵愤极，冒死前进。经一夜激战，将守敌全部歼灭。联军控制了这一俯瞰全城的制高点后，即于次日凌晨用缴获的大炮向朝阳门、富贵山、太平门等处轰击，连连命中目标。此时，雨花台也被江苏军攻占。由于围绕南京的制高点相继为联军所控制，城内清军顿形动摇。张人骏、铁良等于当天夜间逃遁；张勋率部由汉西门逃出，经浦口逃往徐州，城内残存的清军开城投降。12月2日，联军开进南京城，受到城内居民热烈欢迎。

苏浙联军在兵力数量上不占优势，其所以能取得攻城作战的胜利，主要由于来自不同地区的各支武装能够团结一致，在联军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发扬了不怕牺牲和压倒敌人的精神，在作战指挥上，注意集中兵力各个攻占制高点，迫使清军丧失守城的信心，从而比较顺利地夺取了南京城。苏浙联军攻取东南重镇南京，对袁世凯是个沉重打击，大大减弱了北洋军攻陷汉口，汉阳的意义，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个很大的鼓舞，开始扭转了革命军株守武昌的不利形势。从此，革命党人以南京为基地，形成一个新的革命中心，并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三、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反对袁世凯篡权斗争的失败

武昌起义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但这时，一些革命党人的权势思想，地域观念和宗派情绪有了发展，革命营垒中原有各派系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经过分化、组合，形成了湖北，江浙两大集团。两集团对于临时革命政府的人选和所在地点争论不休，相持不下，以致造成临时政府难产，同时，也丧失了联合起来，共同反击北洋军的有利时机。

袁世凯的北洋军虽然攻占了汉口，汉阳，但已师老兵疲，官兵厌战情绪日益增长。而这时北方和东北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展开，南方独立各省正派出援兵源源向武昌集中。北洋军不仅无力攻占武昌，而且后方不稳，进退两难。在这种局势下，袁世凯便加紧施展诱和伎俩，以达到其扑灭革命和篡夺革命果实的目的。他勾结英国驻中国大使朱尔典，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戈飞出面调停，提出停战议和的建议。当时在国内的革命党某些领导人，不仅看不到有利的革命形势，相反对袁世凯心存畏葸和幻想，加之受到妥协势力的包围，因而表示愿意和谈。12月18日，双方代表在上海开始“南北和谈”。在袁世凯的胁迫和帝国主义的干预下，南方代表表示，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逼清帝退位，就可以将大总统职位让给他。当时，许多革命党人纷纷反对议和，主张组织北伐军，用武力完成南北统一，但他们的正确主张不占主导地位，无法阻止和议的进行。正当南北代表进行和谈之际，革命领袖孙中山于12月25日从海外回到国内。因众望所归，于29日被独立各省代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尽管孙中山对袁世凯有所戒备，但因受到革命政府内部妥协势力的胁迫，和他本人有“但求早固国基”的思想，故在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不得不致电袁世凯，作出了“暂时承乏”，“虚位以待”的承诺。

袁世凯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甚为不满，通电指责南方先组政府，选举总统，违背和谈协约。袁还唆使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余人发出通电，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声言要以“开战”来解决政体问题。在袁世凯的军事讹诈面前，孙中山针锋相对，激励各地军民，积极准备北伐。他指出：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1月11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黄兴为北伐陆军参谋长，并制定了六路北伐计划：“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路前进；宁，皖为第三军，向河南前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之间，淮、扬为第二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济南，秦皇岛合关外之军为第五军，山（晋），陕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第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步目的后，再与第五、六军会合，共扑虏廷”。1月13日，北伐军在津浦铁路上首战告捷，败清军于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不战而下。湖北的革命军则由襄樊东下随、枣，并北出河南唐河、邓县，威胁南阳，洛阳段祺瑞害怕后路被切断，急忙将其大营由孝感撤至信阳。当时，袁世凯所拥有的反革命军队，总数不超过十万，所控制的地区，只有河南，山东、直隶等少数省份。而分别集结在湖北，江苏两省的革命军务约有十万之众，加上其它各独立省的军队，总数不下三四十万人。北方各省的革命党人也在积极活动，准备与北伐军遥相呼应。如果革命军坚持北伐，袁世凯的北洋军有可能被击败，革命形势将起重大变化。但就在这时，帝国主义公开为其新的代理人袁世凯撑腰。它们声称只有由袁世凯统一南北，才肯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并从财政上、军事上、舆论上对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巨大压力。在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旧官僚，则故意制造种种困难，借此胁迫孙中山妥协；革命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在右倾妥协势力包围和影响下，也动摇后退，许多独立省拥兵自重，无意北伐。在内外交迫

下，不但使北伐半途而废，孙中山也“心灰意冷”，再次被迫表示，只要得到清帝退位的确切消息，袁世凯公开宣布赞成共和，他就立即辞职，由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让权的诺言后，又迫使临时政府承认了关于大清皇帝退位后之《优待条例》，便逼迫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在养心殿下诏宣布退位。13日，袁世凯通电南京临时政府，声称“共和为最良国体”，作出了“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的虚假保证，同日，孙中山提出辞职咨文。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随后，又选黎元洪为副总统。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曾想以奠都南京、袁世凯到南京就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条件来约束袁世凯的独裁野心，保证在中国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在袁世凯的欺骗恫吓下，上述目的均未实现。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其他一些同盟会领导人也“相率下野”。在内外反动势力联合进攻下，软弱的资产阶级节节退让，由无数革命志士流血牺牲换来的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仅仅存在三个月，即被扼杀了。政权落到了袁世凯手里，开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第十四部分 讨袁战争（1913年7月~9月）

讨袁战争（也称“二次革命”或“癸丑之设”），是继辛亥革命之后，由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一次革命战争。战争结果，资产阶级革命派遭到失败，北洋军阀势力乘机伸展到南方各省，开始了全国性的封建军阀专制统治。这次战争，遍及南方七八省，本章重点叙述江西和江苏两个主要战场的作战情况。

第一节 江西讨袁作战（1913年7月~8月）

一、双方作战部署

（一）北洋军的部署

早在1913年6月初，袁世凯就命豫南总司令兼北洋第六师师长李纯率该师由信阳向湖北之兴国（今阳新）、蕲春等处移防，王占元之第二师随后跟进。副总统黎元洪指令李纯："贵师将来开至兴国、田家镇一带，选一待机阵地，一旦有事，即相机直捣九江或南昌"。5月中旬，李纯以该师第十一旅旅长马继增率步兵第二十一团附机关枪，骑、炮各一连开赴田家镇，并分兵一部进驻武穴，警戒九江及安徽方向，以第二十二团团长张敬尧率所部及机关枪两连，骑、炮各一连，进驻兴国，监视瑞昌方面之赣军，师部及第十二旅之二十三团、二十四团进驻蕲春、蕲州一带，准备寻机渡江。上述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后，即对江西的地形及赣军分布情况不断进行侦察，并进行渡江作战准备。

7月2日，已被袁世凯收买的九江要塞司令陈廷训密电黎元洪，告知他革命党人准备在九江起事，并要求袁世凯"速派军队及兵轮来浔（九江），以资镇慑"。袁闻报后，即令第六师渡江南进，第二师一部迅速由鄂北南下，与第六师会合（两师共约一万五千人）；另调驻辽阳之第二十师一个旅进关赴鄂，作为进攻江西的二梯队，抽调第二师，第三师各一个团进驻武汉设防，奉军一个旅进驻孝感一带，保护武胜关以南铁路线，另由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飞霆"号等军舰五艘，驶往江西，策应陆路进攻九江。该路军队由黎元洪节制。

7月6日，第六师所属吴鸿昌第二十三团附机关枪一连并电话、卫生各队，先行渡江，开赴江西。10日，该师主力从官牌夹（九江西约四公里）登陆，全部抵达长江南岸。李纯以萧安国第二十四团两个蕾驻九江城西部，与驻城东部的赣军四个营同城相峙，以吴鸿昌第二十三团进驻沙河镇（九江西南十五公里），莲花洞（九江南十二公里）一线，警戒德安方向赣军，以张敬尧率第二十二团第二营一连，第三营及周文炳的第二十一团第一营附机关枪一连，进驻金鸡坡（九江东四公里）、八里坡（九江东南三点五公里）至马宿岭（九江东南七点五公里）一线，警戒姑塘及湖口方向的赣军，以第二十四团一个排进驻洗心桥（九江西二十公里），警戒瑞昌方面赣军，以混成第十一旅旅长马继增率第二十一团第二营，二十四团第二营、炮二十团第二营，机关枪第四连进驻官牌夹，为总预备队。这样，北洋军第六师约七千余人占据了九江外围诸要点，形成了对九江域的包围和耐九江以南赣军的进攻态势。

（二）赣军的部署

战前，赣军共有两个师和一个混成旅，计十个团。江西护军使兼第一师师长欧阳武驻南昌，所部第—旅旅长林虎率第一、二两田驻德安，

瑞昌一线，第二旅旅长余维谦所部第三团两个营驻九江，第四团是新兵，随余驻南昌训练，第二师师长刘世钧驻九江，所部第三旅旅长赵复祥部第五团驻南昌，第六团两个营驻九江，一个营驻德安；第四旅旅长蔡森率部驻赣州，混成旅旅长方声涛事用璧阶第九团，金其昌独立营驻姑塘，所属第十团李明扬部驻湖口。总兵力约二万五千人。赣军主要集中在九江以南和南昌以北地区，在长江沿岸的重镇九江只配置了一个师部和四个营的兵力，湖口只有一个团的兵力，省城南昌的防务也很薄弱。

1913年7月8日，李烈钧从上海回到湖口，立即召开高级官员会议，商量讨袁事宜，12日，得知驻守德安之林虎部已与北洋军接火，遂宣布江西独立。同日，省议会在南昌开会，举李烈钧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欧阳武为江西都督。李烈钧等拟定作战计划如下：将所有在赣北的军队分为左右两军，以林虎为左翼军司令，指挥第一，二团和第六团一个营，进攻沙河至十里铺一线之敌，得手后进取九江，以方声涛为右翼军司令，率所部第九团和独立营从姑塘进攻九江。另以水巡总监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指挥李明扬第十团守卫湖口，李烈钧亲往督战。部署略定，李又委托欧阳武给广东陈炯明和湖南谭延分别写信，要求两省派兵援赣。赣军的战略意图是夺取九江；消灭南犯之敌。

但赣军内部并不巩固。九江要塞司令陈廷训完全投靠了袁世凯；第二师师长刘世钧早与李烈钧不睦，并与黎元洪，袁世凯秘密勾结，表示对李烈钧“阳奉阴违，以作牵制”，准备配合袁军作战，第一师师长欧阳武因受袁世凯拉拢，反袁也不坚决。赣军两师两团中，真正受李烈钧指挥并有点战斗力的，只有林虎从南京带来的步兵第一团（附机关枪两连，炮兵一连）和伍毓瑞的第三团，不足三千人。与北洋军相比，赣军在兵力上处于劣势。

二、九江，湖口之战

袁世凯侦悉李烈钧回到湖口准备发难的消息后，遂指令李纯师的过江部队迅速向南推进。7月10日，吴鸿昌第二十三团越过沙河，不断向赣军开炮挑衅。

7月11日，驻守德安的赣军旅长林虎致电欧阳武，报告北洋军寻衅情况，请求速发援兵。12日拂晓，林虎分兵二路向在当面寻衅的袁军发动进攻：以主力沿铁路向沙河进攻，另派一部出右翼袭击十里铺，策应正面。从此，揭开了武装讨袁的战幕。袁世凯指令李纯对赣军“即按叛兵剿办”。李纯一面令驻沙河之吴鸿昌团阻击赣军，一面命驻十里铺之萧安国团向沙河迂回前进，抄袭赣军后路。萧团于途中与林虎派出的策应部队遭遇，前进受阻。林虎旅装备比较齐全，部队经过一定的训练。其主攻部队经一昼夜战斗，夺占了沙河镇，进据铜鼓岭、骆驼山等处炮台。吴鸿昌团死伤三百余人，向赛湖方向败退。李纯惊慌失措，从官牌夹逃回停泊在长江中的座舰，急电袁世凯“万乞迅派增援，以救危局”。但林虎旅首战告捷后，没有乘胜追击，丧失了歼敌良机。

沙河方面开战后，驻九江城内的赣军第三团团长伍毓瑞，与同驻该城的赣军第二师师长刘世钧和第六团团长李定魁等磋商，计划趁北洋军增援部队尚未到达之际，以赣军第三团之一营与第六团之两营，迅速歼灭北洋军驻九江城西的两个营，以第六团之另一个营为预备队，监视陈廷训的炮台兵，待解决城西两营敌军后，率部沿庐山开赴德安，从翼侧攻击九江以南袁军，配合林虎旅作战。此计如能实现，将陷李纯师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不料李定魁竟于次日违约，按兵未动。伍毓瑞见情况突变，即弃军逃往湖口，所部一个营转移湖口，一个营投附刘世钧。九江城全为北洋军所占。

当北洋军第六师右路在沙河战败，向赛湖以北撤退时，又得悉姑塘方面方声涛之右翼赣军亦准备向九江推进。李纯急忙调整部署：令马继增率预备队在官牌夹构筑防御工事，令驻九江战西的二十四团迅速抽调兵力，协同二十二团之一，二营加强城南十里铺的防御，令二十一团第一营加强城东南之八里坡的防御；令张敬尧率混成二十二团第三营，第二营第六连及机枪、山炮各一连，协同陈廷训部守卫金鸡坡炮台及普应寺一带。这时，北洋军第六师已呈背水之势，官兵慌乱。李纯也自称“力尽智穷”，一日数电袁世凯，“惟乞援军迅到”。

7月15日，黎元洪致电驻孝感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令该师驻鄂各部迅速开赴九江，其任务是：进攻湖口，并配合第六师进攻德安。王占元接电后，即于当日派朱廷灿第七团由汉口开赴九江，16日，又派步兵第四旅旅长鲍贵卿率步兵第五团一、三营（携管退炮八门）及机关枪连开赴九江。第二师其余部队，拟在第二十师和第三师接防后，再向九江集中。同日，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陆军第一军军长兼江西宣抚使，李纯为第一军左司令，王占元为第一军右司令，以统一前线的作战指挥。

林虎旅进占铜鼓岭，骆驼山后，欧阳武又令第二旅旅长余维谦，第三旅旅长赵复祥，率领驻南昌的第四团和第五团开赴德安，计划与林虎旅会合后，以主力从青山（九江西南十二公里），瓜子岭（青山北）向正面进攻，分兵一部从铜鼓岭侧击十里铺之敌，然后一举拿下九江。但赣军动作迟缓。16日，赣军与袁军在赛湖一带作战，虽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但因兵单势孤，未敢追击。17日，北洋军第二师的两批援兵已先后赶到九江，会同第六师马继增旅向赣军反扑。而这时赣军担任前沿警戒的第六团一个营忽然叛变投敌，遂使林虎旅军心浮动，放弃铜鼓岭各炮台，退守蓝桥（九江西南二十公里）。

这时，赣军右翼方声涛旅的攻势也已受挫。按预定计划，赣军左右两翼应于7月12日拂晓同时发起攻击，但方声涛之右翼因临时调集部队，以致行动缓慢，迟至16日晨7时才开始进攻。方声涛将周壁阶之第九团和新从湖口来援的伍毓瑞团（欠第二营）分为左右两路，由姑塘向九江东南之八里坡一线发起攻击，张敬尧一面令守卫八里坡的第二十一团第一营在正面组织防御，一面令驻守十里铺之两个连携机枪、火炮绕击方部左翼，自率该团两个连和二十四团一个连抄袭方部右翼。方部第九团团长周壁阶挥刀跃进，带头冲锋，但因专恃勇猛，不讲战术，致被

敌击中，不幸阵亡，使该部士气受到影响。双方激战至下午1时，左路赣军伤亡惨重，士气动摇，部分士兵北向投敌。这时，北洋军第二师第六团又前来增援。伍毓瑞虽率赣军右路奋力抵御，但在北洋军多路夹击下，也力渐不支，遂撤出战斗，退回姑塘。北洋军进至马宿岭，因地形不熟，未敢继续追击。次日，赣军第九团两个营（千余人）绕道至金鸡坡，向张敬尧部缴械投降，使姑塘赣军兵力锐减。

7月22日，王占元率率第二师主力（欠第八团）抵达九江，增强了进攻力量。23日，抵达九江的第一军军长段芝贵发布作战命令，定于24日进攻湖口。其部署是：由第二师鲍贵卿旅担任主攻任务，于24日夜乘船从官牌夹出发，在助攻部队掩护下，从湖口东岸登陆，尔后进据钟山，夺取湖口东炮台。以左司令李纯为守势地区司令官，自邱（书阁）南（康）大道经十（里铺）莲（花洞）大道，至沙河镇、洗心桥一线，择地构筑防御阵地，掩护北洋军右侧后方安全；第六师旅长马继增率该旅第二十一团由八里坡经马宿岭、狭市向姑塘方面攻击前进，掩护左翼进攻部队，第六师二十二团团长张敬尧率所部由金鸡坡出发，经新港（九江东十一公里）向灰山（湖口西岸）、回峰矶（新港东五公里）进击，相机占领湖口西炮台，封锁鄱阳湖口，协同海军掩护鲍贵卿旅的登陆作战。

7月24日，张敬尧团沿长江南岸向湖口西炮台进攻。该团步炮协同，首先攻占新港。25日，经激战，攻占了三面临水一面依山的灰山、回峰矶赣军据点。接着，又占领了西炮台。24日夜12时，鲍贵卿旅（步兵五营，炮兵二连、机枪兵三连、辎重兵一连、电话和桥梁队各一大排）乘船从官牌夹出发，沿长江东进，偷渡鄱阳湖口，次日凌晨，在汤芗铭所率军舰的掩护下，利用浓雾于湖口以东抢滩登陆，进攻湖口钟山炮台。汤芗铭的助纣为虐和李烈钧的麻痹大意，使湖口的赣军吃亏不小。当江西宣布独立不久，汤即率舰队驶近马当炮台。炮台守兵准备发炮拦击，但李烈钧认为与汤“共事亦颇久，当不致有他故，不欲示以防御”，任其向九江方向驶去。25日拂晓，汤以四艘军舰分成两组，突然轰击湖口东、西两炮台，致使赣军措手不及。不久，钟山炮台部分士兵哗变，更加削弱了湖口的防御力量。午后8时，在北洋军水陆夹击下，湖口终于失陷，李烈钧率余部从水路退守吴城。方声涛所部，在袁军旅长王金镜所率之右翼支队猛攻下，也于26日上午放弃坚守多日的姑塘阵地，退往吴城。

北洋军攻占湖口，姑塘后，段芝贵令第二师旅长鲍贵卿为湖口守备司令，率该旅驻守湖口，第六师旅长马继增以一部驻守姑塘，其主力配置在通南康（今星子）大道上，伺机进攻南康，令第二师第四团由马头镇向瑞昌方向发展，保护九江西侧安全，令王占元为西区留守司令，担任后方警戒兼理后勤事务，令李纯率第六师各团及第二师一部，从沙河、十里铺、马头镇分道出发，进攻扼守蓝桥之赣军。

30日拂晓，北洋军对蓝桥发动进攻。赣军鉴于蓝桥地形开阔，恐遭敌迂回侧击，稍事抵抗，即于当日上午放弃该地，退守黄老门。黄老门

位于蓝桥南十公里处，东、西、南三面环山，北面山口险狭，铁路穿山而过，是个易守难攻之地，林虎旅在此构筑阵地，组织防御。30日夜，北洋军第六师第二十三团和第二师第五团向黄老门轮番进攻。林虎指挥部队扼守南面高地，顽强抗击，使北洋军进攻受阻。李纯连夜调正在官牌夹休整的第二十二团乘火车赴黄老门助战。31日凌晨，北洋军分三路进攻赣军阵地：以第二十三团攻赣军正面，第二十二团攻赣军左翼，第五团攻赣军右翼。林虎旅竭力抵抗，相持约两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弃守黄老门，经德安退往建昌（今永修）。

这时，湖南已经宣布独立。湖南都督府军事厅厅长程潜等人，鉴于赣军孤军作战，节节失利，便一面组织援赣部队，由团长唐蟒率领赴赣，一面敦促谭廷与四川熊克武进行电报联系，约其三路出兵，会攻武汉，以配合赣军作战。该电要求川军趁“北军会攻九江，武昌空虚”之机，与湘军和在湖北沙洋宣告独立的刘铁部联合行动，“乘机直取武汉”，以断绝北洋军南进的通道，威胁攻赣北洋军的侧背，将赣军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但该电被贵州都督唐继尧截获，并于7月31日密告黎元洪，致使三路攻汉的计划成为泡影。唐蟒之攫赣部队也迟迟未至。

赣军得不到邻省的支援，在优势敌人进攻下，节节后退，完全丧失了反攻的能力。

三，南昌外围的作战

北洋军攻占黄老门后，乘胜疾进，不战而得德安，与此同时，还分别占领了南康、瑞昌，巩因了后方的安全。8月7日起，北洋军便以南昌为目标，分路攻击前进。共进攻部署是：第六师第十一旅于日由南康乘船沿水路进攻吴城，陆路则分兵两路进攻建昌，第六师二十二团为右纵队，山拖沟岭（德安南）出发，沿驿南（德安南十三公里）一线开进，第二师第五团为左纵队，由德安沿南浔未竣铁路前进，第六师别十二旅（欠二十四团）为预备队，随后跟进。上述各部完成当前任务后，乘势续进，合击南昌。

此时，林虎旅已丧失斗志，不待敌人接近，即放弃建昌，退守山下渡（今永修县城附近），又被北洋军击败，旋即经奉新退往湖南。8月10日，北洋军未遇抵抗，即进占建昌。

李烈钧由湖口退往吴城后，整顿了撤回的部队，复命方声涛负责吴城防务。8月7日夜，北洋军马继增第十一旅的官兵约七十人，乘坐民船，伪装难民，利用夜雾乘风直驶吴城东岸登陆。吴城赣军仓促抵抗。8日拂晓，马旅援军赶到，赣军不敌，慌乱败退。吴城失守后，李烈钧率余部退往南昌。

留守南昌的江西部督欧阳武闻吴城失守，即于9日弃职潜逃。欧阳武的两营护兵被宪兵司令廖伯琅控制。当李烈钧于11日率部退至南昌城下时，廖伯琅紧闭城门，拒绝李部入城。李烈钧一面打电话斥责廖伯

琅，一面派兵一营攀城而上，打开城门。廖伯琅仓皇逃往赣州（后被李纯捕杀）。李烈钧进城后，命伍毓瑞率领欧阳武留下之两个营和从吴城撤回之两个营在樵舍（南昌东北二十公里）、乐化（南昌北十六公里）一线组织防御，抗击北洋军。

8月16日下午，李纯令马继增第十一旅（欠二十二团）由灌口出发进攻樵舍；张敬尧第二十二团由山下渡乘船，沿赣江进攻南昌；其余部队留守建昌。

此时，张敬尧之前锋部队已抵距南昌六十余里之花岩街，因陆路进展顺利，不愿折回山下渡从水路进军，建议山花岩街经落花街，从陆路进攻南昌。李纯同意了张敬尧的意见。18日上午9时，张敬尧分兵两路夹击落花街。赣军不支，退往高桥（南昌北）。中午，张敬尧以第二营从左侧，第三营从正面，向高桥发起进攻。赣军坚守阵地，竭力抵抗，两小时后，阵地被占，退至赣江以东，企图固守南昌。张敬尧部一面发炮猛轰，压制赣军，一面由第二营征集船只，强渡赣江。下午6时，张部攻入德胜门，向城内纵深发展。伍毓瑞虽率部奋力抵抗，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只得撤离南昌城，掩护李烈钧等人退往湖南。李烈钧、林虎等见败局已定，遂遣散余部，只身潜赴上海，后又亡命海外。

8月18日，李纯部占领南昌。不久，驻赣州的赣军第四旅旅长蔡森率部向李纯投降。至此，首先发难讨袁的江西全省落入了北洋军阀之手。

江西是讨袁战争的重要战场。赣军讨袁作战的迅速失败，对整个讨袁战争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失败的客观原因是兵力对比悬殊。主观方面，一是内部不纯，军心不齐。除陈廷训、刘世钧等暗中与袁世凯勾结外，一些中下级军官也各怀贰心。如战斗刚刚打响，九江城内的第六团团长就按兵不动，不久，该团一个营在沙河前线倒戈，之后，又连续发生成建制的部队投降和溃散现象。这就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动摇了讨袁官兵的士气。二是准备不足，部署不当。李烈钧宣布独立，是在林虎旅与敌接战后仓促决定的，在军事上缺乏应有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如九江、湖口为长江要冲，湖汊纵横，丘陵起伏，利于防守，赣军如能以重兵扼守，将北洋军阻止在长江以北或牵制在九江，湖口地区，虽不能决定最后的胜利，但必能延长战争的时间，有利于其它省份发动讨袁和支援江西。由于李烈钧等虑不及此，致使九江、湖口迅陷北洋军手中，战局急转直下。三是战术呆板，不善于利用江西的山岳丛林和险要山口伏击歼敌，阻止敌人的进攻，致使敌军长驱宜进，迅速占领了江西。此外，江西全省武力的调遣，扩充，人民群众的发动等，均未进行，即仓卒首先发难，这在与敌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是难有取胜把握的。

第二节 江苏讨袁作战（1913年7月~9月）

一、江苏独立经过及作战部署

（一）战前江苏军内部情况

战前，江苏（不含上海）共有军队五个师四个旅，即章梓的第一师，章驾时的第二师，冷遹的第三师，徐宝珍的第四师，陈之骥的第八师，和分别由张振发，赵念伯任旅长的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独立旅，以及清江护军使刘之洁所辖的两个独立旅。第一、第八师驻南京，第二师驻苏州，第三师驻徐州，第四师驻扬州，四个独立旅分驻镇江和清江。

五师四旅中，第四师师长徐宝珍已被袁世凯收买，表面上宣布“以约束军士，保卫地方为主义”，暗中却向袁保证“秣马厉兵，以待调遣”，成为革命军的心腹之患。镇江的两个旅系暂留待裁的部队，军心涣散，不堪倚用。驻清江的两个旅宣称以“以维持地方为宗旨”，实则看风使舵。第一、二，三师系在大裁军时缩编而成的部队，虽然装备较好，兵员充实，但由于1913年3月才组建，且内部派系纷杂，缺乏教育训练，战斗力也不强。第八师系武昌起义后，由分别从桂林、南宁开赴南京的两批北伐军组成，中上级军官多为老同盟会员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训练较好，装备也较齐全。该师原负责警卫南京，后因湖南大搞裁军引起兵变，将该师赵恒惕旅派往湖南进行镇压，事后赵旅即留驻湖南。这样，第八师只剩下陈裕时一个旅，总数不过四千人。1912年底，八师虽又增募新兵，重建了两个旅，但新成分多，缺乏训练，战斗力已大不如前，且师长陈之骥系冯国璋之婿，对于讨袁心怀异志，这就更使该师的战斗力受到影响。

（二）江苏讨袁的发动及作战部署

1913年7月10日左右，黄兴先派赵正平、何成浚等赴南京，约集驻南京的第一，第八两师高级将领，以及徐州的第三师师长冷和前安徽都督柏文蔚，召开军事会议，磋商独立日期，制订军事计划。会上，多数人主张趁进攻南京的北洋军尚未南下时，及早发动。冷提出第三师分散在四乡剿匪，南京一旦宣布独立，山东的北洋军势必首先对该师发动进攻，恐难于在第一线挡住敌人。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并未引起大家的重视。冷只好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决心“苦战徐州”。

7月14日，黄兴由沪抵宁。次日，黄率众将领往见江苏都督程德全，逼其响应讨袁。程德全发出通电，宣告江苏独立，委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为临淮关总司令，并咨委陈其美为驻沪讨袁军总司令。主管沿江各炮台的要塞总司令吴绍璘因反对独立，被士兵枪杀，由洪承点接任。17日，驻镇江的两个独立旅和驻苏州的第二师，也表示响应讨袁。

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后，即着手组织总司令部，委章士钊为秘书长，黄恺元为参谋长，何成浚为副官长，赵正平为兵站总监。他发布了告将士檄文，并作了如下部署：令冷遹率第三师乘驻韩庄（徐州北四十公里）的北洋军第五师一部无备之际，突然向其发起进攻，令第八师骑兵团长刘建藩率该师二十九团附机关枪连及骑、炮、工兵各一个营（编为一混成支队），沿津浦路星夜开赴徐州助战；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戢翼翘率该旅随后跟进，周应时率第一师第二旅开赴临淮关，协助该处的安徽讨袁军进攻倪嗣冲部，派新任一师师长洪承点进驻蚌埠，节制第八师之混成支队和开赴徐州、临淮关一带之第一师部队，组织徐州以南铁路沿线要点防御，第一，第八师其余部队分别沿江构筑防御工事，并扼守狮子山、天保城、富贵山诸炮台，将驻守南京的刘福彪的福字营调赴上海，协助陈其美所部攻夺上海制造局。

当时，江苏的主要领导人中，黄兴本来就不赞成武力讨袁，到南京来只是屈从于孙中山等人的意见，并无象其在讨袁檄文中所说的“不除袁贼，誓不生还”的决心，江苏都督程德全是在黄兴等人的胁迫下宣布独立的，并于16日晚离宁赴沪。17日，程电告北京政府和各省都督，表明江苏宣布独立与他无关。程德全的出走，更助长了陈之骥、朱熙等人的动摇性。此外，黄兴抵宁后，不举孙中山这面鲜明的旗帜，却由省议会联合会推举与袁世凯有矛盾的清末旧官僚岑春煊为“全国讨袁军大元帅”，规定“凡独立省份都督及讨袁军总司令，一律归其节制”，企图利用岑拉拢两广的陆荣廷、龙济光参加讨袁。但岑却不肯就职。这也造成了政治上的被动。

二、徐州之战

南京会议后，冷返回徐州，立即收拢分散的部队，于7月15日晚仓促率部向利国驿（徐州北三十公里）方向运动，并派兵拆毁韩庄以南铁轨数处，占领徐州电报局，断绝南北交通和通信。山东都督周自齐和北洋军第五师师长靳云鹏闻讯后，立即致电袁世凯，建议趁冷师尚未全部集中之际，令张勋所部沿铁路线对冷师发动进攻，第五师待集中后即行跟进。当时，袁世凯对冷遹还抱有幻想，认为“冷遹向顾大局”，“是否叛变，尚无确音”，因而指令第五师“严守准备，未可轻进”。

7月16日晨，冷遁师冒着风雨突然向驻韩庄的北洋第五师方玉普旅发动进攻，拟从韩庄进取兖州，尔后向济南方向发展。方玉普率步兵两个营（携炮六门、机枪两挺）固守阵地，连续击退冷师多次进攻。这时，袁世凯急令在兖州以南铁路沿线待命的张勋军和驻天津的北洋第四师驰援韩庄。17日晨，张勋之义子张文生所率之四营辫子兵及兖州总兵所派之援兵赶到韩庄，与方玉普旅分左右两翼向冷师反攻。冷师不敌，向利国驿、孙庄退却。18日晨，北洋军第五师步兵一营、炮兵一连到达锦庄，用炮火向利国驿猛烈轰击，将车站轰毁，冷师又退守柳泉（徐州北二十公里）。7月19日拂晓，刘建藩所率江苏军第八师混成支队赶到柳泉，从铁路两侧向敌猛攻。北洋军急调五师第二十团前往增援，加强两翼兵力。双方激战竟日，相持不下。20门凌晨，江苏军第一师第一旅

赶到，与冷师、刘支队并力反攻，将敌赶回到利国驿一线。当日，黄兴闻扬州徐宝珍师欲从六合进攻南京，急令刘建藩支队撤离前线，回守六合。刘支队撤走，大大削弱了利国驿前线的兵力。

在此期间，黄兴曾于19日致电张勋，要张“外察大势，内顾宗邦”，“率一旅之众，直捣济南”，配合革命军讨袁。张勋是个极端仇视革命的臭名昭著的保皇派，想让他调转枪口配合革命军作战，无异与虎谋皮。张勋对黄兴的规劝不仅无动于衷，相反，于20日派出骑兵部队，由台儿庄绕攻江苏军侧背，配合利国驿的北洋军（时北洋第四师已派出两个团由杨善德率领增援利国驿）夹击江苏军。这的，被北洋参谋部收买的当地大土匪李扒子部（李扒子已被冷打死），也抄袭江苏军后路。江：苏军腹背受敌，力不能支，遂拆毁铁路、桥梁，退守徐州，拟凭借防御工事进行固守，待机退敌。北洋政府鉴于徐州系苏北军事要地，若讨袁军“择险固守，万众一心”，则其军事强攻必遭顿挫，遂采取“攻间并用，奇正兼施”的方针，派人策动冷师骑兵团团长张宗昌倒戈，从内部瓦解讨袁军。当前线讨袁军退入徐州时，突遭张宗昌团袭击，以致军心大乱。22日夜，江苏军被迫放弃徐州，退往蚌埠。不久，第一师第一旅撤回南京，第三师因师长冷离队，由旅长伍崇仁率领移驻凤阳。23日，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统一指挥江苏方向的作战。25日，冯国璋将北洋军主力集中于徐州一带，整修铁路，调集弹饷，进行向南推进的准备。

三、南京保卫战

（一）北洋军分路夹击南京

徐州之战后，先后调往江苏的北洋军计有：第四师第八旅，第五师第十旅，第二十师步兵第七十九团，直隶第一混成旅，张勋的武卫军以及王廷祯的禁卫军、雷震春的备补营各一部，总兵力约二万五千人。7月27日，袁世凯致电冯国璋、张勋，分析了徐州之战后的江苏形势，认为讨袁军在徐州新败，镇江空虚，南京混乱，并据此作出了分兵两路夹击南京的部署：令张勋率部由运河水路南下扬州，会合徐宝珍第四师进攻镇江；冯国璋率四、五两师由津浦路南下，速取临淮关，再趋浦口，与张勋部取得联络，会攻南京。

这时，江苏讨袁领导机构进一步分化。7月25日，程德全在上海再次发表通电，要求江苏各师取消独立；26日，又致电黄兴，要求“取消讨袁名义，投戈释甲，痛自引咎，以谢天下”。黄兴则因徐州战事失利，又遇军队不服从调动和饷弹难筹等困难，遂失去信心，于28日晚弃职跑回上海。代理都督章梓、第一师师长洪承点等也随即离宁。黄兴等走后，代理江苏民政长蔡寅、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和代理第一师师长周应时，立即宣布取消独立，并电催程德全回宁。程德全急派杜淮川前往南京接任第一师师长。7月30日，撤退至凤阳的第三师也宣布取消独立，投靠北洋军。数日后，张宗昌发表通电，声称由他暂领第三师师长职务，加入北洋军序列，充当进攻南京的先锋队。接着，驻苏州的第二师

和驻镇江的两独立旅也宣布取消独立。至此，江苏的讨袁武装已失过半，讨袁作战险象频呈。

属于地方实力派的杜淮川见江苏军大多已取消独立，恐北洋军乘虚而入，将江苏这块肥肉夺走，遂于8月2日致电袁世凯，恳请冯国璋部暂缓前进。袁不肯中途辍兵，于5日电令冯国璋、张勋“仍饬各军迅速前进，克日到宁，以免旷日持久，别生波折”。于是，冯、张率军继续南进。7日，张勋的前卫部队抵达扬州，与徐宝珍的第四师会合。西线冯军，一则由于军队庞杂，指挥混乱，大量兵车拥积徐州，调度不灵，二则江苏军从徐州南撤时，拆毁铁轨多处，固镇铁桥也被炸毁，因而无法前进。袁世凯因多处分兵，后方空虚，战局持久对其不利，遂于6日电令冯军离开铁路线，由蚌埠经和州（今和县）、芜湖、太平（今当涂）一带绕进；或分兵入淮河一带，会同倪嗣冲军进攻寿县正阳关和安庆，再由长江顺流而下。但冯国璋不愿受远程跋涉之苦，也不肯配合倪军作战，仍沿津浦路缓慢地前进。

（二）保卫南京之战

黄兴等出走，北洋军又已逼近，南京城内动荡不安。时在镇江运动讨袁的国民党激进分子海鸣，韩恢以及戴天仇（即戴季陶）、詹大悲等人，闻苏北讨袁作战失败，黄兴出走，遂相继赶赴南京领导讨袁作战，8月8日，何海鸣率第一师百余人，占据江苏都督府，再次宣布独立，举陈之骥为江苏都督，何自任江苏讨袁军临时总司令。陈之骥子黄兴离宁后即投靠袁世凯，曾于8月3日致电袁，请他电饬程德全赴宁，“速筹善后”。此次趁受职之机，陈派1该师第三十团包围都督府，拘捕何海鸣；10日又到江北，拟与冯国璋商洽献城之策。陈之骥刚离城，从六合退守南京的该师二十九团官兵，击散拥陈的第三十团，放出何海鸣，仍举为讨袁军总司令。11日，第三次宣布独立。戴天仇见何海鸣仍为总司令，竟负气出走。南京第三次独立后，何海鸣等推举前江苏都督府顾问张尧卿为江苏都督，并下令驱逐杜淮川，命原第十团团长徐涛为第一师师长，原第二十六团团长吴浩为卫戌司令，何自兼第八师师长。同时，招募城内及城郊各县的退伍官兵，组成第三军，下辖第五、第六两师，以韩恢为讨袁军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何命第一师驻守富贵山、雨花台等高地，第八师驻守狮子山，天保城诸炮台，其它部队驻防于各城门，决心固守南京。

南京保卫战，在整个讨袁战争中是打得最激烈的。

北洋军东线的张勋部与徐宝珍师在扬州会合后，其先头部队于8月8日渡江进攻镇江。驻守镇江的第三十一旅旅长张振发和第三十二旅代旅长卢祥麟弃军脱逃，部队无人指挥，驻守焦山、象山的官兵稍加抵抗，也慌乱逃散。张勋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镇江。13日，张徐军进抵高资，龙潭。次日分兵向明孝陵、紫金山和太平门进攻。

14日拂晓，张勋派敢死队十余人，首先将军旗插上紫金山顶，继命

旅长方更生，团长赵振东等督大队步兵抢攻紫金山。天保城守军当即以大炮猛轰敌人，炸死赵振东，炸伤方更生及两个管带。张勋不顾伤亡，催令步兵蜂拥而上，终子攻占紫金山主峰，随后，又派兵进攻天保城。

天保城位子紫金山西侧，筑有坚固的炮台工事，是屏蔽南京的重要支撑点。守卫天保城炮台的系第八师工程营。8月17日，张军突袭天保城，工程营不支而退，天保城落入敌手。19日，江苏军八师二十九团向天保城反攻，将该阵地夺回。张勋悬重赏，驱使部队续攻天保城，并分兵一部向雨花台进攻，以分散守军兵力。南、北两军反复争战，天保城三失三得，至21日午后，终被北军夺占。

与此同时，张勋率主力于19日上午猛攻太平门。该门守军悬旗诱降。张勋受骗，挥兵拥入太平门。霎时，城门外地雷轰响，张军前队死伤过半，急欲退出，又被埋伏在城外的守军勇猛袭杀。张军死伤惨重，慌忙后撤。接着，张、徐两军又转向尧化门，组织部队反复攻城，均被守军击退。张勋复命部队用云梯、绳索冒着弹雨攀登城垣，结果梯折索断，士兵非伤即死。目睹者讥讽说：张勋军作战“直进直退，以生命为比试之具”，其战法实在“呆笨无比”。

当东线的张、徐军向南京进攻时，西线的冯国璋部已修复，了铁路，向南京逼近。8月12日，其先头部队抵达浦口。14日，张宗昌师的两个营从浦口偷渡长江，在下关登陆后，攻占了幕府山。但渡口遭到狮子山守军的炮火猛烈轰击，后续部队无法渡江。冯国璋见从浦口渡江受阻，决定组织部队从下游渡江。16日，冯国璋在滁县发布渡江攻城命令：以张宗昌第三师所余部队（欠第十团）和第五师为主攻部队，于16日晚相继从卸甲甸（老虎山对岸）渡江，上岸后分别向神策门（令中央门）、钟阜门（今无此门）和太平门一带攻击前进，并分兵一部援助张勋部夺取天保城炮台，以何丰林率第四师第十六团和原江苏军第三师第十团赴老西江口，掩护右翼部队的安全，并佯示渡江，牵制江苏军，以第四师其余部队固守浦口至枚管营一线，以炮火轰击南京城，支援由卸甲甸渡江的部队。冯部按预定计划渡江后，即派施从滨为南岸部队总司令官，李奎元为、第三师代旅长（张宗昌尚留江北），率部连夺北固山、黄家卫、上元门诸要点。23日，冯军第十九团进逼南京城下，进攻太平门。守军据城抗击。冯军进攻受阻，遂退驻炮火射程以外。

江苏军在保卫南京的作战中，第八师官兵十分英勇顽强，特别是该师第二十九团，始终坚守在最关键的部位，屡次打退敌军的进攻。张勋军畏之如虎，“每见黄帽檐之兵至，立即退却”。当时在南京的一个美国医士说：第二十九团“足以当英雄之名而无愧”。

北洋军兵临城下，南京城内守军将领再次发生了内哄。第一师师长徐涛和卫戍司令吴浩暗中与敌军勾结，企图叛变献城。18日，吴浩以武力威胁何海鸣离开南京。何被迫躲入金陵医院。当夜，第二十九团一个营围攻一师司令部，捕杀徐涛；次日，又协同第一师士兵击散卫戍团，吴浩潜逃。讨袁将士再一次粉碎了取消独立的阴谋。

这时，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因领导安徽讨袁作战失利，于8月19日率卫队营并携部分粮饷到达南京。何海鸣因与都督张尧卿有矛盾，逼张将都督一职让与柏文蔚，并委柏兼第八师师长。柏接任后，于21日率部向天保城发动进攻，企图夺回已失阵地，后因众寡不敌，未获成功。

袁世凯鉴于南京城久攻不下，乃于8月24日急电海军总长刘冠雄，令其派军舰迅速载运浦镇和老西江口的部队过江，以便全力攻城。25日，刘冠雄派“海琛”号等舰驶往浦口江面，掩护滞留江北的冯国璋部渡江。

8月27日夜，北洋军会攻南京。张勋部和冯国璋部第五师从东面攻太平门和朝阳门（今中山门），施从滨、李奎元率第三师两个团从北面攻神策门，雷震春部从南面攻雨花台，刘冠雄以舰炮配合冯国璋部攻城西北的狮子山炮台。守军固守城垣和诸要点，大量杀伤敌人。张勋见强攻失利，遂在富贵山南侧偏僻处挖掘地道，拟用炸药破城。

值此城防吃紧之际，新任都督柏文蔚深感守城无望，遂带侍从官兵由汉西门退出南京。柏走后，何海鸣任王宪章为第一师师长，自任江苏都督兼第八师师长。但何“不懂军事”，“经济全不公开”，不为某些将领所信服。30日晨，何海鸣召集将领会议，决定子次日晚9时分四路反攻盘踞紫金山、幕府山及朝阳门外之北洋军，夺回制高点，扭转被动局面。其部署是：由第一师派出一个支队由雨花台出击紫金山之敌；第五师派出一个支队至朝阳门，待第一师与敌接战时，出城合击敌人，第八师派出一个支队至太平门，待第五师出发后，猛攻天保城，第六师派出一个支队出仪凤门（今挹江门），袭夺幕府山。翌日，总司令部下令将守城之有关部队集中编组各突击支队，准备出发。但第一师违令不动，第五师进至朝阳门时，因敌人炮火猛烈，不能出城，第八师也就无法进攻天保城。江苏军的四路反攻计划遂告流产。

9月1日上午9时，张勋部用炸药炸开富贵山南侧城墙两丈余，部队蜂拥而入，并分兵三路：一路抢占富贵山，并轰开太平门内守军设置的沙袋，开门接应城外部队，一路向南，将朝阳门，洪武门（今光华门）夹城轰开，迎接城外部队入城，一路向西，抢占北极阁，骆驼山，神策门，西华门堵要点。城内的江苏军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在张勋部的接应下，冯国璋之第三，第五师分别由神策门，洪武门，太平门攻入城内，并在舰炮掩护下夺占了狮子山炮台。下午，江苏军原朝阳门守城司令胡炳炎和护卫团团长李维作等相继叛变，引敌进占都督府。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何海鸣率部出聚宝门，退向雨花台。

雨花台原由第一师第三团防守，后又增派第八师第二十九团赴援。该两团为江苏军的精锐部队，自9月1日至2日，官兵们忍饥挨饿，日夜苦战，击退雷震春部及冯军第四师多次进攻，毙敌千余人。何海鸣到达后，立即与韩恢等人率二十九团向敌反突击。无奈，该团官兵已精疲力尽，战斗力明显下降，在敌军的密集炮火下，死伤过半。何海鸣只好放

弃雨花台，率余部退回城内。旋遭张勋与雷震春部前后夹击，部队溃散，何仅率少敦士兵从水西门出走。坚守了二十余日的南京城终于落入敌手。

北洋军入缄后，张勋纵兵烧杀淫掠，冯国璋部放火焚烧下关。南京居民继1864年受刽子手曾国荃的湘军血洗之后，又一次遭到惨重蹂躏。

江苏讨袁作战之所以失败，原因很多。主要由于；一是缺乏坚强的领导。除程德全从中破坏外，身为讨袁军总司令的黄兴，竟在危难时刻离职出走，对于战争全局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何海鸣虽意志坚决，但因不谙军事，不孚众望，又得不到国民党要人的支持，难于统率全军和指挥全局。二是各部队主要负责人大都为动摇分子，战前却未进行任何调整和防范，以致当敌军压境时，不是弃职潜逃，就是率部投敌。幸有一些坚定勇敢的中下级军官，率部与敌拚杀，否则，南京城早已陷于北洋军手中。三是指挥不力。南京宣布独立后，讨袁军的作战企图是先攻徐州方向之敌，“大举北伐”，但在冷师尚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发起进攻，实属轻率之举。徐州前线作战失利后，何海鸣等虽决心固守南京城，但因内部矛盾重重，且又兵力不足，虽经苦战，终难抵御优势之敌的进攻。

第十五部分 白朗起义战争（1911年10月~1914年8月）

1911年秋，正当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之际，河南发生了由白朗领导的宝丰、鲁山等地贫苦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武装起义。在清王朝被推翻，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后，这支起义武装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坚持进行反袁和反帝斗争，使起义成为一次带有较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的农民起义战争。这次起义战争扩及豫、鄂、皖、陕、甘五省广大地区，历时三年之久。最后虽遭北洋军镇压而失败，但它在配合和支援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战争，沉重打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节 起义武装的创立和初期活动

河南宝丰、鲁山一带，是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发源地。这一地区的农民，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十分严重。清末民初，约有70～80%的土地被地主所霸占，地租高达收获量的60%以上。农民除受地租剥削外，还受高利贷的盘剥，比较普遍的是借银一月，索利三分，借粮一季，交息五成。反动政府征收田赋本较苛重，承包人又从中侵吞，中饱私囊，外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为地主、官府服各种无偿劳役，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1911年，宝丰，鲁山地区遭大冰雹袭击，农业歉牧，但封建剥削却有增无减，致使广大农民无法生活下去，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出现了“千百成群，揭竿起事”的革命形势。由贫苦农民，采煤工人、“匠”和部分被裁士兵组成的许多小股农民武装，纷纷开展反抗地主豪绅的斗争。

在封建统治阶级巧取豪夺，土豪劣绅横行乡里，不少中小地主遭到破产的情况下，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白朗也被迫走上了起义的道路。

白朗字明心，1873年生于河南省宝丰县大刘村，家有土地二百亩。1908年被人诬告入狱，经变卖土地营救，才被释放。之后，经历了当兵、贩盐、炼铁等活动，比较广泛地接触了贫苦群众。1911年10月，白朗公开扯起义旗，组织了一支起义武装。最初只有二三十人，多为衣衫破烂的贫苦农民。所用武器除一支快枪外，其余尽是“笨炮”（即土铳一类武器）和大刀，因此有人称他们为“笨炮队”或“袄片队”。

白朗起义武装成立后，即于11月联合以张群为首的义军共约一百人，进攻靠近叶县的鲁山张官营地主武装。因遭叶县军队和地主武装夹击，损失八十余人。张群阵亡，白朗负伤。虽然初战受挫，但白朗并不灰心，继续坚持斗争。1912年4月，白朗率起义军二三十人，在宝丰东北交马岭设伏，袭击宝丰卸任知事张礼堂的保镖，缴获快枪十余支。不久，又和郜永成（又名秦椒红）的起义军联合作战，多次击败叶县知事温少良率领的反动武装，使其龟缩城内，不敢出战。

这时，宝、鲁一带各股起义武装活动频繁，声势日益壮大。

当地反动政府无力镇压，便使出了招抚伎俩。一些起义军首领中计受骗，惨遭杀害。白朗识破了反动派的欺骗勾当，拒绝“受抚”。他率部北上禹州（今禹县），一举攻克神垢镇。后又南下舞阳县，以母猪峡为基地，往来游击，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封鄂豫边境。起义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每到一地，将地主富商的粮食，银钱，衣物，首饰分给穷人，加之起义军的纪律也比较严明，因而深受群众的拥护。当时流传着不少赞扬白朗及起义军的民谣。由于白朗的威望日高，许多小股起义武装纷纷投奔。特别是袁世凯篡权后，变本加厉盘剥民众，使民生更加凋敝，河南人民“十（之）八九不能自活”。于是，参加起义的群众日益增加，一年之内，部队迅速发展到二三千人。

白朗起义军经过初期战斗活动，建立了一支比较能打游击战的武装，并有一小块游击基地，给了地主豪绅、反动地方官吏以应有的打击。但是，军队的组织形式比较原始，没有正规的编制和番号，只有人数不等的“杆”（分马队和步队），由，各杆头统率，以杆头的姓名为旗号，无统一的职称。

第二节 袭击豫鄂两省敌军，配合“二次革命”战争（1913年5月~11月）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发动“二次革命”前，已与白朗取得了联系，并派人在白朗的部队中工作。正当袁世凯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南方的革命军之际，河南省国民党干事阎子固曾动员白朗“在淮上起事接应”圆。白朗也曾派人到武汉，与革命党人接洽。“二次革命”战争爆发后，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又于7月20日写信给白朗，向他提出了“乘虚直捣”豫鄂，配合讨袁作战的建议。虽然信使在开封被反动军警逮捕杀害，白朗并不知道黄兴的具体意见，但这一时期，白朗起义军转战于已被北洋政府所控制的豫鄂两省，积极打击反动地方武装，牵制了北洋军的部分兵力，威胁着被袁世凯视为生命线的京汉铁路，客观上配合了革命党人发动的讨袁战争。

一、克唐县，占禹州

正当北洋军沿京汉路南调，准备向南方革命军发动进攻之际，白朗于1913年5月底6月初分兵两路，积极展开活动。一路由高鑫，宋一眼率数百人，在许昌、襄城、叶县一带袭扰敌人；另一路由白朗亲率二千余人，南下唐县（今唐河）、泌阳一带，声言攻占唐，泌等处后，即“与高鑫、宋一眼合股通南方，以图大举”。河南都督张镇芳急忙商请河南护军使雷震春，派团长任昶武、南阳镇守使田作霖率部“追剿”高、宋起义军；派河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旅长王毓秀率一个团“兜剿”白朗所率的起义军。白朗利用唐、泌守军的离心倾向，事先与唐县守军取得联系，于5月31日夜一举攻克该县，缴获大炮六门，机枪两挺和许多枪械子弹，并争取豫军一个营起义。白朗破唐县后，立即率部北上，连克源潭、饶良、麦北，下洼，金汤寨，直逼裕州（今方城）。雷震春慌忙命右翼帮统王茂元率两个营星夜赶赴裕州堵截，由驻马店下车的王毓秀部亦由泌阳、唐县分路追击。白朗闻讯后，便率部西入檀山，复经南召直趋鲁山。雷震春急令王茂元部由襄城兼程西进，改援鲁山。起义军改变攻鲁计划，转移至鲁山西北的深山密林处，甩掉尾追之敌，然后穿山越岭，采取奇袭战术，直趋禹州。

禹州位于襄城以北。6月14日，该县城内正为不久前被起义军击毙的团勇开追悼会。白朗军混在群众中，趁机入城，攻取南门大街，并向凭借西街寨门顽抗的民团勇猛进攻。城内守军约三百人，惊慌失措，弃械而逃。起义军缴获颇多。15日晚，起义军主动撤离禹州城，直趋郏县、宝丰。在郏县以北八里之白庙寺，击退了雷震春所部三个营的堵截，转入鲁山西北山区。这时，起义军声威大振，“一时望风而归者，不数日间达一千五百人。所得军器，亦极精锐”。队伍发展至五六千人。

二、西破淅川，南据枣阳

起义军转回鲁山地区后，雷震春率左翼统领申保亨，于6月21日由许昌进驻宝丰，调集部队，布置对起义军的围攻。其部署是：旅长王毓秀所部开赴鲁山，由东南向西北“搜剿”，左三营管带金聚率部开赴半扎（临汝南三十二里），由北向南“搜剿”，右三营管带雷存修率部开赴大营，由东向西“搜剿”，西大社社董督率社勇堵截山口，防止起义军西走，管带鞠得胜率马队在襄城，叶县、舞阳、裕州、南召、鲁山等处巡逻。此外，还收买和派遣间谍、坐探，进行侦察破坏活动。雷震春把这一部署吹嘘为“四面围剿之法，为一鼓荡平之计”。并向陆军部夸口说：一定要“严缉首要，以期拔本塞源，永绝后患。”正当雷震春调动部队部署围攻之际，起义军悄悄离开山区西行，于6月底奔袭数百里外的卢氏城。7月1日，攻占淅川县的西坪。2日，攻占豫、鄂，陕交界的重镇荆紫关。驻守荆紫关的王天佑率残部向浙川逃跑，起义军乘胜追击，一举攻克浙川城。至此，雷震春的“四面围剿”计划完全落空，而邓州（今邓县）、内乡、镇平等县频频告急，纷纷请派援兵。镇守南阳的周符麟，急不可待地连电袁世凯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声称如不及时增援，不但邓州、内乡等县难保，即南阳亦岌岌可危，进而提出给他“另委一相当之事”，准备临阵脱逃。

起义军攻占淅川后，又挥师南下，进至鄂北的郧县境内。此时已投靠袁世凯的副总统黎元洪立饬鄂、豫、陕三省军队，不分省界，联合“会剿”。7月14日，起义军与三省联军激战于均县贾家寨以东，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弹药消耗甚多，故未紧追败敌。随后，起义军乘船渡丹江东进，消灭了阻拦的敌军，复北入豫境。17日进围镇平县，威逼南阳。张镇芳急电奉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吴庆桐，请他派兵一团救援。8月，起义军又击败周符麟部于百泉山，获大炮数门，枪械甚多。随后，再次进入河南唐县、泌阳，桐柏和鄂北天河口等地，并在桐柏县建立第二个游击基地。

9月下旬，白朗又率部南进至鄂北随（县）、枣（阳）地区。25日夜，在枣阳守军两个连内应下，攻占县城。起义军逮捕了横行霸道、荼毒居民的外国传教士数名。枣阳被占后，吴庆桐电令驻樊城之第五团派步兵一营、驻钟祥之第五团第一营派步兵三连，由西、南两个方向进攻枣阳；令驻随县之第四团分扎边界防堵，由帮统李治云和团长赵福汇所率之部队也分别进至枣阳城下，形成四面包围。起义军据城固守，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毙敌团长、副官各一名。黎元洪下令调拨重炮两门，加紧轰城。起义军为保存实力，于10月6日晚从北门突围西行。虽敌军“四面云集”，结果依然“莫之阻也”。大量敌人被起义军牵着鼻子团团乱转。

三，袭鲁山，占宝丰

起义军从枣阳突围后，旋即转移至唐县，泌阳，裕州，舞阳一带，于1913年10月中旬，进入鲁（山）、宝（丰）地区。10月19日晨，进攻鲁山城，因守军有备，攻城不克，遂退至鲁山西北山区。张镇芳急令河南第一师师长张锡元和旅长王毓秀分别率部“进剿”。起义军依托高山密林，与优势敌人周旋。22日，在娘娘山，青条岭、椅子田一带与“进

剿”军激战。23日，又在锯齿岭阻击敌人。“进剿”军既怕起义军夜袭，又怕起义军乘虚攻取鲁山城，所以只能朝发夕归，不敢在山地驻扎。起义军稍事休整后，即准备进攻宝丰城。首先派人潜入城内，主力于11月11日从百余里外向宝丰疾驰，次日凌晨，趁守城民团困倦之际，城内的起义军纵火扰敌，城外的起义军立即架梯登城，一举攻占宝丰。这时，新任河南护军使赵倜正率马步四营前往鲁山途中，忽闻宝丰被占，“即派马飞调赴鲁山之队回剿”。起义军稍事抵抗，即撤出县城，回到鲁山西北山区。随后，又挥师南下，转至南阳地区。不少反袁的进步青年以及基层的革命党人投奔起义军，原季雨霖第八师的士兵也纷纷携械投奔。

自1913年5月至11月，半年之内，白朗起义军转战豫，鄂两省，共牵制了北洋军及地方部队约五个团和十四、五个营的兵力，相继攻破十多个城镇，歼灭了敌人部分有生力量，不仅使鄂豫两省的军政头目惶恐不安，而且惊动了袁世凯和北洋政府。

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近万人，并打起了“中华民国抚（扶）汉讨袁军”的旗号。随着快枪、火炮等新式武器日益增多，部队的编制也有了变化。起义军已分为步、马、炮、工、辎，“扎立营寨，放哨巡逻，悉如军队”。这些重要变化，标志着这支起义武装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节 转战京汉路两侧，打破敌军两次“围剿”（1913年12月~1914年3月）

一、打破第一次“围剿”

讨袁战争失败后，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并积极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但是，声势越来越大的白朗起义武装，对于北洋政府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心腹之患。陆军总长段祺瑞就透露了这种心情，他认为起义军“地处腹心，若不认真痛剿，终无了局”。不仅如此，还由于起义军的活动，“大碍西人商务及传教事宜”，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的重视。1913年11月，驻汉口的各国领事，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建议北洋政府使用飞机，“将白朗军队全行炸尽”。各国驻京公使也“迭经函致政府，要求迅速扑灭”这支起义武装，依靠帝国主义支撑的；比洋政府，在“外人注目”的情况下，决定对白朗起义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

1913年11月下旬，北洋政府增兵河南，电饬豫督张镇芳对起义军进行“围剿”。其具体部署：毅军统领宝德全率部驻郏县、宝丰、汝州（今临汝）三县，师长张锡元率部驻舞阳、泌阳一线，王毓秀旅驻裕州，南召、鲁山，伊川一线，成慎团驻襄城、叶县；南阳镇守使田作霖部分驻镇平，内乡、浙川和南阳、邓县、新野六县，南下的奉军驻唐县、桐柏两县；镇嵩军统领刘镇华部驻嵩县，宜阳、永宁（今洛宁）、卢氏县，北洋陆军第二师的混成营驻确山，遂平一线；统领徐占凤，高文贵所部担任京汉路警戒；河南护军使赵倜率马队巡察各处，督饬诸军。上述总兵力约三万余人，妄图将白朗起义军围歼于豫西南地区。原计划12月1日开始“围剿”，于一个月内将起义军“一律肃清”。并要各县知事“赶办清乡，以绝后患”。实际上，“围剿”行动于1913年末才开始。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起义军作了相应的部署：由白瞎子等率部分兵力留在豫西南地区活动，牵制“围剿”军；白朗则亲率起义军主力跳出包围圈，到京汉路以东，打击守备薄弱的敌人。

1913年底，白朗率部向京汉路秘密移动，于1914年1月8日到达京汉路东的新安店。9日上午，在新安店北十里的小为庄，与石振声补充旅之胡永奎团遭遇，激战三时许，歼敌一部。后进至新安店东北的蔡庄，兵分三路南下。先攻罗山未克，遂转攻光山。1月11日，在当地小刀会众暗助下，一举攻破光山城。15日，又攻占光州（今潢川）城，缴获枪械四五百支。起义军破光、潢后，即扬言将北上项城，抄袁世凯和张镇芳的老家。袁大惊，立即调兵“护陵”。其实，起义军并未北上，而是继续东进，于16日陷商城，歼团勇三百余人，缴获枪械子弹甚多。旬日之间，起义军连陷豫东南三城，使袁世凯人为震惊。他急令其亲信、新任湖北都督段芝贵先到信阳“统筹全局”。不久又将其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革职，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驰赴信阳“督剿”。段芝贵到信阳后立即调动部队，作出了“相机痛剿”起义军于光（山）、固

（始）的部署。但是，行踪飘忽、惯于避实捣虚的起义军，早已摆脱迫堵的敌军，转至皖西，威逼六安、霍山。

六安是皖西的水陆交通枢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当时，皖军主力正在该省东北部镇压起义农民，皖西地区兵力比较薄弱。起义军进入皖西后，皖督倪嗣冲慌忙下令；芜湖镇守使鲍贵卿率部由芜湖至庐州（今合肥），安徽第一师师长马联甲率部由省城安庆至舒城，安武军中路统领邱昌锦率部由寿州（今寿县）赴六安，准备"会合兜剿"。正当倪嗣冲忙于调集军队之际，起义军打响了进攻六安的战斗。当时，六安城内仅有巡缉营营长王传禄所部约五百人。起义军东进时，王传禄率部在叶家集、金家寨、流波磕一线进行防御，仅留数十人守城。1月20日，王传禄部在流波陂起义军击溃，经苏家埠逃进城内。比前，该县知事段保森见六安城危在旦夕，携款潜逃。段的卫队中有的与起义军有联系，乘机打开监狱，将犯人全部释放，并将"县署公款什物掳掠一空"，城内秩序大乱。这时，皖北镇守使倪毓飞令统领境邱昌锦率二营、帮统马联率一营由寿州驰援，1月24日晚，马联营进驻六安。但起义军一部早已潜入城内，与守军展开巷战，并四处放火，秘开城门，城外大队也适时赶到，乘机入城。守军不支，弃城逃跑。起义军骑兵三百余人乘胜追击，毙伤敌军颇多。六安城当即彼起义军占领。邱昌锦行至六安北五十里之马头集时，闻马联棻部在六安被围，立即兼程往救，以管带陈怀忠为左翼，自率管带李长胜为右翼，从东、北两面进攻六安城。起义军利用城东有利地形，事先设下埋伏，陈怀忠营陷入重围，李长胜营也遭到有力的反击。自下午1时战至7时，邱部"饥疲交加"，"伤亡枕藉，狼狈溃退。在起义军进围六安时，驻舒城的骑兵团团长路靖坤也奉命率一个营驰援。24日晚，该营行抵六安城东：二十里铺时，路靖坤不明情况，先带三十余人入城，准洽与马联棻接洽守城事宜，结果自投罗网，被起义军俘获处死。路营也披击溃。六安之战，起义军给皖军三个多营以歼灭忏的打击，是起义军在外线作战中取得重大胜利的一次战斗，这次战斗的胜利，使士气民心大为振奋。

在起义军主力转至外线，驰骋于豫东，皖西之际，坚持在内线作战的起义军，在内乡，赊旗镇（今社旗县），南阳等地积极活动，牵制和打击"围剿"军。当时，荆紫关巡防队也加入起义军，被裁汰的坟府军士兵及各地小股义军，纷纷"闻风归附或遥为附和"，因而起义军的实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有所发展。

由于起义军采取了比较正确的作战方针，北洋政府策划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

二、打破第二次"围剿"

在袁世凯对起义军进行"围剿"时，英国驻华武官罗伯逊、俄国驻华武官佛多楼夫，先后赴信阳"观战"。罗伯逊提出了以轻便马队跟踪追击，配以步兵围堵和"遍立堡垒"的"剿匪节略"，为北洋军出谋划策。袁世凯还接受各国驻汉领事的建议，不惜以重金购买飞机数架和聘请俄国

飞行员来华，并派卫队护送飞机与飞行员到信阳机场，用新式武器镇压起义军。

起义军进据皖西地区后，皖督倪嗣冲一面从安庆、芜湖、寿州调动约十个营的部队，向六安、霍山方向围堵，一面电请段祺瑞增兵英山，霍山、罗田、蕲春，阻塞起义军南下道路。与此同时，河南护军使赵倜率统领高文贵等部到达固始，并令拱卫军、北洋陆军第二师第六团向商城、固始方向集结，与皖军声势联络，“稳慎前进”。这就再次形成了对起义军的“围剿”。白朗等为了摆脱被动不利态势，决定率部突围，向铁路以西转移。

1914年1月27日黎明，起义军从容撤出六安，并再次声东击西，迷惑敌人。军队出城后，先向东行进，声称将进攻庐州，尔后转旗西走，进据豫皖边的金家寨，准备伺机突破敌军防线。此时，赵倜正待拱卫军和二师六团集中后向麻布街（商城东一百八十里）一带进发。但统领高文贵未执行赵倜的命令，于1月28日令拱卫军团长熊文朗率两营单独由固始开往麻布街。熊团于29日出发，在叶家集宿营。起义军侦悉该团孤军冒进，便迅速奔袭叶家集。熊文朗因叶家集无寨垣可守，即在该集东八里的石碑楼布置防御，由管带李凤举指挥左翼，帮带王翰文指挥右翼，熊自带山炮两门居中指挥。熊还派人飞报驻武庙集（叶家集西四十里）的高文贵，请速派兵增援。1月30日上午，起义军集中兵力向熊团发起进攻。激战至下午2时，先将其左翼击溃，再转攻其右翼，将帮带王翰文击毙。该部见主官毙命，纷纷溃退。起义军立即包围中路，熊文朗不敢抵抗，率部突围，退回固始。这次战斗，起义军共击毙敌军帮带、副官、哨官、哨长七人，击伤哨长、哨官二人，歼敌百余人，缴获步枪一百二十四支、手抢六支、望远镜两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

熊团溃败后，商、固一线的豫、鄂联军便加紧防堵。起义军又于2月6日攻占霍山，继又南下至英山。皖军马联甲师“跟踪数日，竟未追及”。段祺瑞鉴于“北部兵力已经厚集”，电令马联甲师迅速南下，堵击起义军，令英山、罗田守军严防要隘，令鲍贵卿率部往舒城堵击，令北洋陆军第二师师长兼鄂皖“剿匪”总司令王占元增兵鄂皖边界的松子关一线，以便“约期会合，严行痛剿”，妄图将起义军围歼于霍丘、霍山、叶家集之间。这时，起义军已转移至双河店（金家寨西南四十里）、皂靴河（商城东南四十里）一带活动。驻光州的王占元急令所部第九团进驻瓦庙集（固始西南四十五里），骑兵第一旅赶赴叶家集，与皖军联络，石振声旅混成第五团待机于商城附近，混成第六团从固始南下。为防止南方的革命党人接济起义军，段祺瑞还请袁世凯派军舰数艘，在长江梭巡。

由于鄂、豫、皖三省的“围剿”军愈集愈多，起义军在内线的回旋余地愈来愈小，白朗等决定率部迅速突出包围圈。先准备从商、固之间的瓦庙集突围，因遭敌第九团堵截，遂进攻段家集、方家集，又遭敌混成第六团阻击，于是集众向鄷家集（商城东北二十里）进攻。2月21日，起义军首领之一李鸿宾率步兵四五千人、马队三四百人，携火炮两门，

从皂靴河经苏仙石向西北挺进，白朗率大队跟进。王占元命驻段家集的混成第六团和商城的混成第五团立即出动，对起义军实行夹击。21日上午，混成第五团与起义军前锋相遇，李鸿宾率起义军占领酆家集南面一带高地，与该团展开激战，至下午5时，起义军被迫后撤。王占元即令第九团扼守商城以南至松子关一线各要隘，阻止起义军南下，令石振声督率五、六两团从苏仙石西，北分进合击。他得意洋洋地向段祺瑞报告："迄今合围之势已成，进攻之机已熟"。

2月23日，白朗所率之万余人在酆家集南又遭混成第五、第六两团夹击，被迫东撤。起义军集合大队突围，多次受阻，北洋军又步步紧逼，处境十分不利。白朗等决定以部分兵力在当地起义武装配合下，潜行至光州附近，出敌不意地袭击王占元的指挥部，借以调动敌人，其余部队分成几路，乘机冲出包围圈。这一部署果然奏效。当起义军的枪声在光州城外突然打响时，王占元惊慌失措，急令一个营守城，两个营出城迎战，同时命令附近驻军星夜驰援。袭击光州的起义军奋不顾身，与优势敌人激战两日，终于胜利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分路突围的任务。

各路起义军于2月26日、27日跳出包围圈后，日行百余里，兼程西进。其中一路发现有飞机在空中盘旋，部队立即疏散隐蔽，组织对空射击，击伤敌机一架，开创了中国近代战争史上用轻武器打飞机的先例。

起义军跳出包围圈，至京汉路侧集中后，在武胜关一带破坏铁路，一度造成车运中断，使"中外居民异常恐惧"。随后，起义军从信阳南东双河分兵两路，一由柳林南下，威胁武汉，主力经随、枣西进，直趋老河口。

老河口位于汉水东岸，是汉水中上游的货物集散地。当时，由黎天才第一师赵荣华团的一个营驻守该镇。赵平日肆意鞭打市民，勒索商户，并经常沉溺在戏院中，不理军务，军队纪律废弛。当起义军越过随县、枣阳，向老河口方向前进时，赵荣华仍不介意。少数起义军便混在一戏班里，潜入镇内。

3月7日，起义军三千余人攻占老河口东南的黑龙集，驻守该集的第二混成旅第五团第三连向老河口溃退。此时，赵荣华才匆忙下令戒严，派部队防守城关。当晚10时许，起义军猛攻大东门，事先进城的起义军立即响应，火光烛天，枪声大作。战至8日凌晨，镇内守军及商团大部被歼。赵荣华仅率马队数十人逃往樊城。起义军共缴获火炮两门、炮弹九十余发、枪弹二十余万发，取得了外线作战的又一次较大胜利。

西进的起义军进展顺利，南下的起义军也接连获胜。当起义军还在路东的鄂豫边活动时，鄂督段芝贵为了防止起义军南下长江与革命党联络，将主要兵力集中在罗田、麻城、黄安一线，因而路西的兵力比较薄弱。广水虽有驻军，但责在保护铁路，不敢轻动。所以，该路起义军出武胜关后，未经大的战斗，就连破应山县的麻烟市、霍家集，直趋安陆，待到鄂军赶来时，部队即转旗北上，与由老河口转移的起义军主力

会师。8月14日，起义军再次攻克鄂、豫、陕三省边境要隘荆紫关。守关的巡防营一个营狼狈北逃，退守西坪。

袁世凯先后派出亲信段祺瑞、段芝贵和赵倜，王占元等将领亲临前线指挥，相继调动两万余部队迫围堵击，历时两月，妄图将白朗起义军消灭于鄂豫皖边地区，结果再次以失败告终。起义军在反“围剿”斗争中，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部队扩大至二万余人。这是起义军最兴盛的时期。

第四节 西进陕甘，由胜转败（1914年3月~6月）

一、北洋军的八路“兜剿”计划和起义军的西征决策

白朗起义军连战获胜，袁世凯十分惊慌，连电段祺瑞和段芝贵，命令他们加派部队，“酌配利器”，再次组织更大规模的“围剿”，务求“早日荡平”。

1914年3月15日，段祺瑞根据袁世凯的指令，与段芝贵等分析了前段作战情况，认为起义军惯于避实击虚，合围、追击均难于奏效，但也别无良策，只得仍然采取老一套的办法，实行所谓分进合击，八路“兜剿”。其具体部署是：豫皖“剿匪”副司令王汝贤率所部一旅及归其节制的何共慎旅驻裕州，另以一团驻许昌；骑兵第一旅旅长陈文运率所部驻襄城、叶县；河南陆军第一师师长张锡元率部驻舞阳、泌阳；河南护军使越倜驻洛阳，所部毅军分扎汝州、宝丰一线；镇嵩军统领刘镇华率所部驻卢氏，另以镇嵩军或毅军两营驻于熊耳山，杏花山之间，切断起义军回基地之路，奉军吴庆桐旅驻南阳、唐县，北洋陆军第九师十八旅旅长张联升率所部驻淅川附近，兼防郧县，湖北陆军第三旅旅长卢金山所部之一营并入北洋陆军第二师，以第二师一个团驻新甸铺（新野南三十里），相机前进，另一个团为游击之师，四面策应。

此外，为了保障后方运输，令北洋陆军第八混成旅旅长徐占凤等率部加强铁路沿线防守。

在北洋军刚刚部署八路“兜剿”之际，白朗等起义军首领作出了西征陕甘，伺机入川的决策，并利用很短时间作了如下准备：

（一）起义军改称“公民讨贼军”，白朗任总司令，李鸿宾为参谋长，建立了统率机关。

（二）区分前、中、后三军，以王生歧为前军总司令，韩世昌为中军总司令，白瞎子为后军总司令。

（三）将分散活动的部队调回，分别集结于豫、陕交界的荆紫关、卢氏一带，作好人陕的准备。

二、攻破商县，威逼西安

起义军在荆紫关停留三日，于3月17日分路西进，连克西坪、富水关、商南、武关。20日，先占龙驹寨（今丹凤），继克商县，歼敌百余人。起义军顺利进入陕西，使段祺瑞的八路“兜剿”计划完全落空。3月下旬被召回京。

陕督张凤翙见起义军来势凶猛，省城西安受到严重威胁，仓皇率军至黑龙口，蓝田进行防御，以民政长宋联奎会办军务，专守省城。3月

25日，宋联奎急电段祺瑞、段芝贵，要求豫、鄂两省速派北洋陆军第二师由荆紫关、毅军由潼关、镇嵩军由卢氏，张联升旅由郧西分路进击。

北洋政府为确保西北重镇西安，除令王汝贤第八师和赵倜毅军分左右两路急赴荆紫关，潼关追堵外，又令北京南苑航空学校将法式双翼飞机四架运抵潼关助战，命京畿军事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率拱卫军十二营及雷震春部八个营共约万人，沿京汉转陇海铁路入陕；命川军加强汉中方向防御，命山西都督阎锡山扼守晋南要隘，并增兵潼关，配合陕军作战，命甘肃驻重兵于乾县，凤翔以西，防堵起义军西进。为了统一指挥，以后又命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赵倜为“会办”。袁世凯调集号称二十万大军（实际十余万人），企图消灭起义军于陕西境内。

白朗在攻克商县后，以一部兵力进攻蓝桥（蓝田东南二十五里）、孝义（今柞水），自率主力指向汉中，准备伺机入川。进攻蓝桥的起义军为陕军所阻，遂西趋引驾回，于3月30日克孝义。进军汉中的起义军，于24日占山阳，29日占镇安。31日，张凤翙返回省城，与宋联奎共商围攻起义军的部署：令张建有团改骑为步，从大峪口（蓝田西南五十里）入秦岭迎头堵击，陈树藩第四旅由商县西杨家斜南下尾追，飞调驻防汉中的两个营驰赴兴安（今安康），催令汉中镇守使张钫率部进至紫阳、洵阳（今旬阳），扼守汉水要口，防止起义军南下入川，催促豫、鄂各军迅速西进，实行四面围攻。

起义军主力进至镇安，凤凰咀地区后，得悉南下入川的道路已被阻塞，遂与攻占孝义的部队会合，决定出秦岭北上。先在孝义以北的营盘岭将张建有团击溃，毙伤敌营长以下官兵一百二十余人。随后，于4月初分别由库峪，大峪口出秦岭入关中。4月6日克盩屋（今周至），8日渡渭水，经武功直趋醴泉（今礼泉），闻陈树藩旅已进驻醴泉，遂改攻乾州（今乾县）。9日黎明，起义军炮轰县城，乘敌慌乱之际，大队攻进城内。13日、14日又先后攻占永寿，邠州（今彬县）。此时，陈树藩已率部至永寿，他命第七团团长率第三营向邪州进攻，亲率第八团二、三两营及军士队二百余人进攻邠州西南之大峪镇（今太峪）。起义军与陈部激战两昼夜，三战皆败，遂撤离邠州城，进入该县所属之西南山中。之后，又乘陕军不备，于18日、19日先后攻破麟游，岐山。驻凤翔的甘军见起义军来势凶猛，相率退避至陇州（今陇县）一带。此时，赵倜所率之毅军已尾随而至，于4月21日抵凤翔。起义军绕过凤翔，于21日、22日先后破汧阳（今千阳）、陇州。毅军紧追不舍，起义军转入固关山中，据险抵抗。毅军越山绕路，四面包抄。起义军拒敌失利，阵亡一千五百余人，丢失枪支，骡马甚多。在此不利情况下，白朗便率部继续西进，入甘肃境内。

三、入川计划受挫，在甘处境艰危

起义军首先在陕甘边的固关镇与甘肃骁勇军统领崔正午所部近千人接战，一举将崔部击溃，于4月底由张家川进入甘肃境内。甘肃都督张广建急忙在兰州东南地区组织防御，其方针是“一以遏其奔窜，一以跟踪

游击”。并作了如下部署，循化、夏河，狄道（今临洮），洮州（今临潭东），岷县，由提督马安良所部及原驻循化，夏河等处各营分段扼守堵截；安定（今定西）、通渭、陇西、狄道四县，由镇守使张定邦所率五营分段驻扎，严守省垣门户，并以余力兼顾会宁一带，宁远（今武山）东南各县，由镇守使马国仁及分统马国礼所率各营分守要隘，并抽调一支部队机动驰击，静宁以东各县，由平凉护军使张行志所部各营分别防堵，并抽调“劲旅”机动作战，由统领吴炳鑫率所部在静宁、通渭、安定、狄道、会宁、陇西、渭源等处游动作战，并与统领张定邦及宁远军联络，以壮声势，甘州提督焦大聚为行营总司令，率所部三营以及分统马永祥三营、统领崔正午所余各队、统领陈正魁三营、帮统马忠孝四营，在营务处金承荫辅助下，即时开赴前线“跟踪痛剿”。

起义军在击溃崔正午部后，即翻越高塬深涧，迤逦西行，抵达通渭、马营一带。为了阻止尾追的毅军，所过之处，在井内塞以死尸秽物，实行坚壁清野。赵倜部有的终日不得一饮，有的两天仅食一餐，骡马因饥渴而死者日有十余头，行军宿营造成极大困难。当赵倜部追至马营南山时，起义军于各要隘设卡据守。赵部分左右两队猛攻，夺取了一些要隘。起义军乘赵部用饭之际，突然从四面围攻，激战两小时后，向宁远方向转移。这次战斗，使赵部遭到相当大的损失，起义军也阵亡二百余人，丢失快杂枪百余支。

5月初，起义军兵锋指向宁远以东的洛门镇。当地驻军马国礼、陈正魁部得悉起义军来攻，“马则逗遛不前”，“陈则卤莽前进，……仓皇迎战”。移时，起义军将陈部三面包围，猛烈攻击，杀伤甚众。陈正魁率残部退守洛门镇，起义军加紧围攻，“逼令缴出快枪四百余杆、子弹约四五万粒，始将该队放走”，洛门镇遂被起义军占领。这时，尾追的毅军因“数十日奔逐，伤病疲劳，为数甚多，随队急迫，必多牵累”，乃派三个统领率八个营轻装向陇西“追剿”，赵倜则“带伤病各兵及辎重暂赴安定休息调养”。这支追赶起义军最卖力的部队，已被拖得疲于奔命，狼狈不堪。

洛门镇战后，适值天雨，赵倜的“追剿”部队被暴涨的河水所阻。起义军乘机于5月3日攻破伏羌（今甘谷），然后直趋陇南重镇秦州（今天水）。秦州守军有总兵马国仁所部五营。马将部队布置在城西之北山、三十里店一带进行防御。4日，起义军先以少数部队进袭，随即且战且退，诱敌脱离既设阵地。马国仁未探明情况，亲自率队追击，结果遭到伏击，被起义军击毙。马部见主将毙命，顿形溃乱。起义军乘势猛追，直逼城下。城内官吏开城投降，秦州遂被起义军占领。

起义军在洛门镇，秦州两战获胜后，士气复振。5月7日取道徽县南下，意欲由此入川。因有川军步兵第十、第十二闭、炮兵第三团在略阳一线堵截，随即经成县转趋阶州（今武都）、文县，拟由碧口入川。5月14日，起义军攻占阶州，川军闻警，即由碧口星夜赶至阶州方向防堵。起义军入川的道路又被堵塞，士气受到一定影响。这时，跟踪追击的毅军，甘军又相继赶到。起义军遂北上宕昌，经哈达铺（宕昌西北六

十里）、荔川（今理川），于21日破岷州（今岷县），25日破洮州，威胁兰州。

岷州系藏民聚居区，洮州系回民聚居区。藏、回等族人民既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歧视和压迫，又受本民族上层分子的欺骗蒙蔽，与汉族人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和矛盾。起义军进入上述地区后，由于不能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因而引起藏、回入民的不满和反抗。如在攻取洮州城时，回族民众和甘军一起据险反击，起义军进城四天，战斗仍未停息。这样，起义军成了与当地人民对立的孤军，人员、械弹无法补充，给养的筹集十分困难，只得杀马充饥。由于提督马安良等所率追兵和地方反动武装已节节进逼，赵倜又率军至狄道堵截，形成首尾夹击之势，起义军陷入十分被动和危险的境地。

这时，起义军领导集团内部在入川还是返豫问题上的矛盾明显地暴露了出来。白朗等主张继续南下入川；李鸿宾、宋老年等主张重返河南。乡土观念浓厚的起义军战士，经过长期艰苦转战，思乡心切，也不愿入川。在众意难违的情况下，白朗不得不同意回师返豫。

第五节 回师豫西，最后失败（1914年5月~8月）

起义军进占岷州，洮州以后，张广建和赵倜拟定了“洮岷圈制”计划，布兵于河州（今临夏东）、狄道、渭源、巩昌（今陇西）、漳县、伏羌、安定等处，“意在以有定制无定，以围兵作剿兵”，“并严饬各将领据险扼堵”，一遇起义军便立即进攻。根据这一计划，赵倜所率之八营毅军及忠毅军统领马忠孝所率之五营马队，于5月27日进驻巩昌一带，与建成军统领吴炳鑫所部二千人会合，陶云鹤所率之北洋陆军第十五旅和另一个团，于6月1日分别进抵狄道、安定；焦大聚、金承荫所部由礼县经岷州西进，与提督马安良所部扼守河州东境及南境，防止起义军西趋青海，另调秦州之张联升旅扼守西津。防止起义军回走阶州。张广建准备亲赴狄遭指挥。5月底6月初，“西路剿匪督办”陆建章所率之北洋军第十一，十三，十四等旅，先后抵达陕，甘边境驻防，陆建章坐镇西安指挥。

起义军自作出回豫决策后，即于5月末从洮州出发，经漳县，宁远趋秦州。前队由白朗率领，后队由李鸿宾、孙玉璋、尹老婆等率领。6月1日，后队进至漳县时，焦大聚，张联升，吴炳鑫所部分右、中、左三路前来阻截。左路吴炳鑫部先与起义军接战，焦大聚等部也相继赶到，实行夹击。起义军英勇抵抗，但因弹药不继，伤亡约二千人，马匹枪支丢失甚多，随即渡渭河东走。2日晨，又在宁远西北三十里之鸳鸯咀遭张联升部截击，部队分成两路，一路强行突破张部封锁与先过宁远之前队会合，东走伏羌，一路从小道越过宁远南之摊歌镇迂回东进，奔向秦州方向。两路会合后，再克秦州，并北渡渭河，于6月4日攻占秦安。起义军经过英勇作战，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洮岷圈制”计划，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

此时，陆建章已经以宝鸡为中心，将十一、十三、十四旅和石振声旅部署在北至长武，南至凤县一线，在陕甘地方武装配合下，作好了堵击起义军的准备。陆建章还下令川军司令彭光烈，二十五团团长王茂元加强阶州方向的防御，防止起义军南下入川；同时派时三旅二十六团步兵一营，骑兵一连，轻装兼程，由武功向麟游、灵台、崇信，华亭之小道间活动，随时准备追击起义军小股突围部队。当得悉起义军于6月7日进占秦安以东之清水县后，陆又令二十六团由崇信改道速赴宝鸡东河，令平凉护军使张行志加派步队一营驻守华亭，增派马队扼守张京川两侧；令凤县之二十五团严密扼守凤县至宝鸡一段隘门，从南北两翼加强宝鸡正面防御。

起义军攻破清水后，每昼夜急行军一百七十余里，直趋陕西宝鸡。而赵倜之尾追部队每昼夜行军一百四十余里，“已劳顿不堪任战”。这就便于起义军集中全力对付正面堵截之敌。6月9日，起义军在宝鸡以北五六里处，与张敬尧十一旅所属之夏文荣二十三团展开激战，突破该团防御阵地，越过宝鸡防线。起义军随即南渡渭河，进至郡县（今眉县）东

南之青花镇附近。继又日行百余里，乘势东进，10日克盩厔13日逼近西安，后又南下进入子午镇一带山地。十四旅之何乃中团急赴该地堵截。起义军向该团发起猛攻，终于突破险关，转向孝义，镇安方向。6月14日，陆建章派出两路追击队伍：西路步从两营，马队一连，由子午谷跟踪追向镇安；东路步队两营、马队四百人，由大峪口绕赴商县。起义军继续兼程前进，于17日攻克镇安。至此，又突破了敌人重兵设防的第二道防线。

当起义军突破宝鸡防线后，陆建章急命几个主力旅转头东追，并要赵倜等速到西安商谈“追剿”计划，同时，致电袁世凯，请求增调部队，结果受到袁严厉斥责。袁还令共将未能堵住起义军的二十三团团长夏文荣等“从严参办”，以“振刷士气”。

起义军攻占镇安后，陆急忙向袁报告：东路已增派毅军三营，西路增派个十一旅步队五营，分别由赵佣、张敬尧率领，干6月19日出发追击，张联升所部三营于21日由子午谷、孝义、蓝田之间的小道前进。起义军于21日进占山阳，直趋荆紫关后，陆又向袁报赵倜的追军已于24日抵龙驹寨。当时，南阳镇守使吴庆桐见起义军日益接近豫省边境，也向袁世凯报告：在荆紫关只有田作霖的巡防队四营，最多只能另调两营加强该方向的防御。上述情况表明，当时尾迫之敌，距起义军少则有一至两天，多则有三至四天的路程，正面堵截的兵力又相当薄弱，这就为起义军突破荆紫关防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尽管袁世凯下令‘万勿使匪逼近荆关”，而起义军终于在6月下旬先后越过荆紫关防线，进至豫西地区。6月26日，宋老年等率起义军一部在陕豫边之富水关与刘镇华的镇嵩军恶战一昼夜后，从西坡一带各山口进入河南，30日返抵内乡县境，继又进入鲁山县的娘娘山。白朗则率主力数千人沿丹江东进，于29日越过荆紫关以北数十里之西坪，径赴鲁山山区。

起义军经连续苦战，先后突破岷洮、宝鸡、荆紫关三道防线，返回豫西地区，应该说是又一次重大的胜利。但在此时，起义军内部由农民的狭隘性而产生的宗派和乡土观念，迅速地泛滥起来，竟出现了不可克服的离心倾向。起义军一回河南，便分别由大小杆头带着，多则上千人、数百人，少则数十人，漫无目的地各自返乡。另有不少战士请假探家，结果多数去而不返。

起义军的离散，给反动武装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袁世凯为了镇压分散的起义武装，不仅集中了河南赵倜的毅军，刘镇华的镇嵩军，张锡元师和成慎旅、田作霖的巡防营以及豫西的地主武装，还指令张敬尧旅和驻湖北的刘佐龙旅，总兵力二万余人，全力以赴，进行“搜剿”。他令各部“分派队伍扼守各处要口，另抽拨精锐支队，多购眼线侦探，随处分投搜捕”，“遇匪巢穴，酌量焚毁”，对于“视匪如家人，视兵如仇仇”的地区，则“分驻重兵，清乡严洗”，实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政策，迫使起义军“无巢可回，无地可居”。北洋军与河南地方武装先在邓州、叶县、鲁山、宝丰、汝州等地进行围山“搜剿”，后又集中兵力“搜剿”分散活动在鲁、宝、郏、汝山区和裕、舞、泌山区的起义军。当地的地主武装，强

迫群众摊款出丁，实行联防，进行“清乡”。过去起义军经常活动的娘娘山、檀木沟，老母庵、母猪峡等山区，虽然地势险峻，但回旅余地很小。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分散活动于上述山区的小股起义武装，由于各自为战，互不协同配合，伤亡不断增加，粮弹日益减少，终于有的被击溃，有的“弃械藏匿，改装潜逃”自行溃散了。

白朗返豫后，先率数百人于7月初在叶县西北的平顶山一带活动，7月8日，在鹅庄、新店遭敌截击，部队损失较大。继在鲁，宝，郏、叶诸县山区流动游击，后又率五六十人转移至宝丰，汝州两县交界的虎狼爬岭。8月3日，反动武装将该山层层包围，白朗率余部在山北三里寨凭险抵抗。“围剿”军进攻两昼夜，来能破寨，便集中炮火轰击。不少起义军战士负伤牺牲，鲜血染红了三里寨。在粮断水尽，子弹所剩无几的情况下，白朗决定率幸存的二三十人于黑夜突围。当行至南山坡时，与汝州民团百余人遭遇，白朗不幸中弹牺牲，余部各自星散。至此，这支曾使反动派惶恐不安的农民起义武装完全失败了。

第十六部分 护国战争（1915年12月~1916年7月）

继“二次革命”（讨袁战争）之后，中国资产阶级又发动和领导了旨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护国运动。护国战争，主要是指作为护国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滇、黔、湘，桂等省尤其是滇省进行武装讨袁的军事行动。本章以滇省护国军的军事活动为重点，着重叙述四川、湘西、滇桂边等地的作战经过及其经验教训。

第一节 四川战役（1915年12月~1916年3月）

一、护国军第一军的作战企图和部署

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此次又是护国战争的主要战场。

1915年2月，袁世凯为控制四川，派其亲信、陆军参谋次长陈宧督理四川军务。陈宧以四川兵少难以镇慑为由，将中央直属第四、十三、十六混成旅带进四川。战前，连同川军两个帅两个混成旅及各地警卫郎畝，在川军队总数已达四万人。其驻防地点如下：川军周骏第一师驻重庆、泸州，刘存厚第二师驻永宁（今叙永）、成都，黄鹄举第一混成旅（后并入周骏师）驻江津，钟休道第二混成旅驻顺庆（令南充），北洋军伍祥祯第四混成旅驻叙州，李炳之第十三混成旅驻綦江，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驻内江。

蔡锷分析了袁军的情况后认为：守叙州的旅长伍祥祯是云南人，不会与护国军死战，守永宁的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已与护国军暗中联络，拟伺机响；可能与护国军一战的仅有周骏第一师和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而冯玉祥并非真心拥袁，周骏则不服从陈宧的调动。在这种形势下，只要护国军“趁北方援军未抵川黔以前，速与作战，一举破之”，夺占川边几个战略要地，进而控制四川，是完全有可能的。于是，蔡锷决定分兵二路进攻四川，把攻击重点放在泸州。具体部署是，以第一梯团长刘云峰指挥的邓泰中，杨蓁两支队为第—军左翼，出昭通，取叙州，伺机进迫成都，蔡钙亲率赵又新、顾品珍之第二、第三梯团为中路，出叙永，取泸州，得手后颇江而下，进攻重庆。

第一军右翼为黔、滇军。1916年1月初，戴戡率滇军徐进先遣纵队东趋贵州，敦促贵州护军使刘显世起义讨袁。1月27日贵州独立后，即委戴戡为第一军右翼军总司令，令率滇军一个支队、黔军两团，出松坎，攻綦江，威胁重庆。

蔡锷原想集中第一军主力，潜动秘行，以突然动作一举突破泸州或叙州，然后乘势东取重庆，“与北洋军周旋于巫峡门以外”。但由于各种原因，第一军形成三路出击，分散了力量，又由于云南兵马未动就公开宣战，因而破坏了秘密接敌，突然袭击的作战企图。加之各梯团向战区运动速度太慢，致使护国军主力尚未赶到泸州，袁世凯派往四川的北洋军已先期到达，战场形势发生了不利于护国军的变化。

二、叙州之战

护国军第一军左翼第一梯团两支队出发最早。邓泰中第一团于1915年12月16日出开昆明向叙州进发。五天以后，杨蓁率第七团也离开昆明前往川边。该两团在行军途中，才接到改为护国军第一梯团第一、二支

队的电报。1916年1月16日，两部顺利通过盐津县，抵达滇川接壤之新场。

驻守叙州的袁军第四混成旅旅长伍祥祯，早已派出军队在新场及纵深设防，但未注意重点控制险关要隘。1月17日，护国军在新场与敌接战，袁军一触即溃。护国军连占燕子坡、黄坡耳，捧印村等要点。18日晨又占领横江城。当天，护国军分兵两路，向安边镇推进，次日中午发动进攻。第一支队沿横江从正面进攻，第二支队东渡横江，又北渡金沙江攻敌侧背。敌不支，弃安边向柏溪镇和叙州逃窜。护国军乘胜追击，攻克柏溪镇，直逼叙州。21日，伍祥祯放弃叙州，向自流井（今自贡市）方向退却，叙州遂为护国军占领。

叙州是云南入川的重要通道，沿途山势险峻，河流湍急，若伍祥祯部凭险固守，将给护国军造成极大困难。左翼护国军如此顺利地占领叙州，颇出意料。

叙州失守，使袁世凯大为震怒。他下令褫夺伍祥祯川南镇守使职务，责令戴罪立功。四川将军陈宧也悬赏五十万元，下令各部分四路向叙州反攻：伍祥祯率残部由自流井回攻叙州北，朱登五率巡防军十二个营由犍为进攻叙州西；冯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由江安、南溪进攻叙州东，并分兵一部绕高县进扰叙州南；另派亲军团长倪文翰率兵一团另二营，由成都乘船，顺岷江而下，参加反攻叙州作战。以上各路总兵力达万余人。

1916年1月29日，伍祥祯部首先由北面迫近叙州。护国军梯团长刘云峰令第一支队前出至宗场（距叙二十余公里）进行阻击，继又令杨蓁率第二支队前往助战。双方激战两日，相持不下。旋侦知东路冯玉祥旅已进抵南溪，有从翼测进取叙州之势，刘云峰急调第二支队预备队田钟谷营，由宗场赶赴叙东之白沙场组织防御，同时令宗场部队必须在31日下午3时前击退伍旅。宗场之部队拚死作战，至深夜始将敌击退。刘云峰立即调动部队，增援白沙场。

白沙场为叙东交通孔道，地势险要。冯玉祥率两混成营由泸州日夜兼程，于31日晨抵达白沙场，旋即遭到护国军田钟谷营的阻击。冯部占据白沙场当面之龙头山，集中火炮、机枪火力猛烈轰击田营阵地。田营虽伤亡巨大，但仍坚持战斗。下午，杨蓁率援军赶到白沙场，立即从正面和左翼反击，始转危为安。半夜，第一支队李文汉营也赶来助战。2月1日，护国军从左、右两翼进攻敌龙头山阵地，同时以一炮兵排迂回至敌侧后高地轰击敌人。战至2日下午，冯旅伤亡颇重，力渐不支，遂撤往泸州。行至江安，遭到已宣布讨袁的川军刘存厚部的截击，死伤惨重。

护国军击败冯旅不久，由成都顺江而下的陈宧亲军倪文翰部，又在犍为以南登陆，进窥叙州，其前锋子2月6日抵叙州近郊翠屏山。刘云峰一面令城内守军抗击敌人，一面急调叙东部队沿江西进，从吊黄楼渡到

岷江南岸，抄袭敌军后路。敌猝不及防，纷纷溃退。护国军追击数十里，缴获辎重五十余船。2月7日，第二支队长杨蓁带兵三营连续作战，又击败了由屏山方向犯叙的川军朱登五部。至此，护国军第一梯团利用袁军缺乏统一指挥和协同动作的弱点，激战七八昼夜；终将四路敌人各个击破，挫败了陈宧反攻叙州的计划。

二月中旬，纳溪战场吃紧，蔡锷电令第一梯团增援。刘云峰先后派李文汉、金汉鼎等三营往援，叙州仅留田钟谷营和数营新兵据守。2月29日，冯玉祥旅乘隙由自流井进攻叙州。刘云峰率部凭险抗击，终因兵单不敌，于3月3日放弃叙州，退守横江。因冯玉祥也有反对袁世凯称帝，响应云南讨袁之意，故在进占叙州后，即顿兵不前，叙州方面的战局遂成相持状态。

叙州之战，护国军第一梯团的官兵先以勇猛突然的动作，快速挺进，轻取叙州，接着又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各个击败围攻叙州之敌；最后在大部兵力调往纳溪，叙州仅余三四百人的情况下，仍然奋力作战，牵制了十倍于己之敌，表现了起义军队的勇敢善战。

三、泸、纳之战

（一）川军第二师响应起义

护国军第一军中路各部队，原分驻滇省各地，确定作战编成后，才分别从驻地向泸州开进，时间参差不齐。蔡锷不待后方准备完毕，即于1916年1月16日率第一军总司令部离开昆明，向泸州进发（其时左翼刘云峰梯团已与袁军接战）。第二梯团第三支队（支队长董鸿勋）作为中路先遣队提前六天山发。

当时，气候多变，雨雪霏霏，护国军“踏雪救国”，穿山越岭，兼程前进。1月26日，董支队抵达毕节。驻扎永宁的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即派代表前往董处，密商酉2合作战的办法。双方议定，董支队先与刘师接战，刘师佯败，董支队尾追，进抵泸州，两军合兵一处，袭取该城。

于是，按商定办法，刘存厚师从赤水河（川黔交界处）节节退守，董支队紧紧跟进。时值袁军四路攻叙，蔡锷因第一梯团孤军无援，深为焦虑，急令董支队“兼程进发，袭取永宁，即阳攻泸城以牵贼势”；“并催促黔军速攻綦江，一面迫刘积之从速发动，以解叙危”。董鸿勋接电后，率部疾速前进，有时日行军达一百一十里，于1月31日进抵永宁，2月4日抵纳溪。这时，刘存厚已于纳溪提前宣布独立。

原来，董支队抵毕节前，刘存厚曾发出请云南护国军速行入蜀之电，不料该电被毕节知事截获，并向陈宧告密，故当刘师回军纳溪时，陈宧已命驻泸州的川军第一师熊祥生旅严加戒备。刘存厚见袭取泸州无望，遂于2月2日在纳溪宣布独立，自称护国军四川总司令。董、刘两部会师后，决定并力强攻泸州。

（二）护国军会攻泸州

泸州位于长江和沱江的汇合处，东南临长江，北倚沱江，西有龙头关作屏障，南与蓝田坝隔长江相望，地势险要，素有“铁打泸州”之称。

陈宧得知刘存厚附义，泸州危急，急调已经抵谕的北洋军第三师第六旅和驻綦江的北洋军第十三混成旅兼程赴援。

2月5日，董鸿勋、刘存厚二部会攻蓝田坝。刘师团长陈礼门率所部沿大道进攻蓝田坝的正面，董支队绕道双河场、牛背石、南寿山，攻击蓝田坝翼侧。敌在蓝田坝守兵仅一营，稍事抵抗即放弃阵地渡江逃命。2月6日晨，董、刘部占领蓝田坝，进据月亮岩。扫清南岸之敌后，董鸿勋决定立即进攻泸州。鉴于蓝田坝渡口被对岸高地之敌炮火封锁，无法由正面渡江，遂决定陈礼门混成团驻守蓝田坝、月亮岩一带，防敌渡江，董带本支队并刘师两营从下游渡江，向泸州侧背进攻。

2月6日上午，袁军第三师王承斌团和李炳之第十三混成旅两营相继赶到泸州，不久，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吴佩孚率张福来团继至，驻守小市，使泸州防御力量显著增强。

2月8日拂晓，董鸿勋率部由泰安场渡过长江，前进二里许，即与两连敌兵遭遇。董部猛冲猛打，击溃阻击之敌，占领了临江制高点大龙山。9日，董部继续向罗汉场推进。敌以团长王承斌带兵一营往罗汉场阻击。董部背水作战，英勇冲击于9日下午击退敌军，占领罗汉场。

新任防泸司令熊祥生见泸州侧背形势危急，决定从正面袭击蓝田坝，以调动董鸿勋支队。2月9日下午，熊祥生挑选精锐步兵两连，由沙湾秘密渡江（后又派两连续进），袭击月亮岩，同时命五峰顶之炮兵猛烈轰击月亮岩，掩护偷渡部队。防守月亮岩的陈礼门部猝不及防，慌乱溃逃。陈礼门愧愤自戕。次日拂晓，袁军李炳之旅一个营全部过江，会合已抵南岸的熊旅四个连攻占了蓝田坝。

时护国军第二梯团长赵又新已率部分部队抵达纳溪，闻蓝田坝失守，立即率所部警卫连往援。10日，会合刘师工兵营反攻月亮岩，一度将敌军逼退至江边，熊祥生见状，亲室龙头关高地，指挥炮兵轰击蓝田坝，月亮岩护国军阵地，刘师工兵营遭到炮击，四散奔逃，赵又新部势孤力弱，遂放弃蓝田坝，月亮岩，退守纳溪。

正在泸州测后作战的董鸿勋支队，闻蓝田坝失守，急忙收缩兵力，于11日夜经泰安场撤回江南。次日晨，董又率部反攻蓝田坝，企图恢复原阵地。激战一日，未能奏效，恐敌迂回纳溪，切断退路，即于是日晚撤出战斗，退往纳溪。护国军出敌不意攻取泸州的计划未能实现。

（三）纳溪保卫战

在蓝田坝争夺战前后，泸州的袁军不断增加。至2月中旬，计有北

洋军第十三混成旅一部，第三师第六旅、第七师全部先后抵泸，加上防守泸州的熊祥生旅，总兵力达二万余人。袁军攻占蓝田坝后，立即分兵两路向纳溪攻进。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吴佩孚指挥右翼部队，由蓝田坝经石保沟取道棉花坡，进攻纳溪正面，第七师师长兼第二路军司令张敬尧指挥左翼部队，由南寿山、牛背石向双河场绕进，企图越过永宁河进攻纳溪侧背。

护国军梯团长赵又新仓促组织部队转入防御，以刘存厚师之工兵营防守棉花坡，阻击正面敌人，董鸿勋支队防守高屋基一线，阻击由翼侧进攻之敌。

2月13日晚，护国军第二梯团之何海清支队抵达纳溪，14日奉赵又新之命，会合董鸿勋支队第二营，反击逼近双河场之敌，将敌军击退至高泉场。是日上午，袁军团树勋旅赶到高泉场，占领两侧高地，以猛烈炮火压制护国军。何、董支队反击受阻，遂撤出战斗，退至永宁河以西，于沿岸组织防御。

在纳溪保卫战中，棉花坡战斗最为激烈。棉花坡系纳溪镇东面一高地，周围丘陵起伏，竹木丛杂，水田环绕，中有石板小路与蓝田坝相通，是纳溪与蓝田坝之间的重要据点。护国军能否控制棉花坡，是保卫纳溪的关键。进攻棉花坡之敌为袁军吴佩孚旅和熊祥生旅各一部。吴旅为袁军精锐，战斗力较强，攻势凶猛。防守棉花坡之刘师工兵营依托壕垒抗敌，渐有不支之势。2月14日，第三梯团之禄国藩支队和从左翼第一梯团调来的李文汉营，相继赶到纳溪，随即增援棉花坡阵地，稳定了防御。2月16日，赵又新又将在右翼作战的董鸿勋支队一部调赴棉花坡，接替刘师工兵营，增强该方向防御力量。这时，正在开进途中的蔡锷，接到纳溪战斗激烈的报告，立即催令已抵永宁的第三梯团之朱德支队，火速前进，增援纳溪。朱支队冒着雨雪，于17日上午抵达纳溪。由于情况紧急，部队枵腹调上棉花坡阵地。其第二营士气高涨，刚抵战地，即从正面反击敌人，迫敌放弃前沿阵地，后退数里。旋因两翼友军未能配合进攻，朱德支队不便孤军深入，又退回原阵地。

2月18日上午，袁军再次发动进攻。第七师进攻双河场，吴佩孚旅进攻棉花坡。护国军第一军参谋长罗佩金于是日抵达纳溪，即亲赴战地指挥抗敌。各部官兵扼守险要，顽强作战。朱德支队之曹之骅营长阵亡，董支队之董鸿铨副营长负伤，各部士兵也伤亡严重，棉花坡阵地险象频生。幸连日大雨，山路泥泞，给不习惯山地作战的袁军造成意外困难。激战竟日，袁军撤兵回守，护国军阵地始得以稳固。

为了打退袁军的进攻，2月19日拂晓，罗佩金和第二梯团长赵又新指挥部队分四路对敌实施反击；禄国藩率一个营附山炮一门，机枪一排，由黄土坡向蓝田坝进攻；何海清率两个营附炮二门，机枪一连，沿永宁河向双河场进攻；朱德率两个营附炮兵一连、机枪一排，由棉花坡向菱角塘进攻；刘存厚师之一部迂回渡江，佯攻泸西龙头关，掩护主力反击作战。进攻开始后，各路部队猛冲猛打，连续作战。右翼何海清支

队进展顺利，第一天即收复双河场，迫敌后退十余里。2月20日，罗佩金鉴于朱德支队反击受挫，便令何海清支队改变进攻路线，由双河场向菱角菱侧后攻击前进，与朱支队夹击菱角塘之敌。反击作战一直持续到22日下午，菱角塘之敌虽被何海清支队击退，但由于袁军援兵源源开到，护国军弹药不济，被迫于23日转人防御。这次反击作战，袁军死伤千余人，护国军也伤亡营长以下官兵二三百人。

2月23日，蔡锷赶到纳溪前线，研究了前线形势，决定从25日晨起，再次发动攻势。其部署是：以右翼何海清支队为主攻部队，向朝阳观方向实施突击，其它各支队均依托现阵地牵制当面敌人，同时集中炮火压制朝阳观之敌，支援何海清支队作战。护国军企图以集中火力的方式，首先突破袁军左翼阵地，为全面反击打开缺口。与护国军上述反击行动几乎同时，袁军为打破战场僵局，命川军团长刘湘率所部于25日拂晓从长江北岸的石棚向纳溪对面运动，企图抄袭纳溪护国军的侧后。蔡锷闻讯后，立即令何海清所部拨出一营，于了当夜秘密渡江，协同已在江北的刘存厚师一个营，驱逐江左之敌。护国军迅速击退了刘湘团，占领了石棚附近之方山，以保障护国军翼侧的安全。由于刘湘团的袭扰，蔡锷企图首先突破袁军左翼阵地的作战计划未能实现。

纳溪战线稍趋稳定后，蔡锷对指挥人员作了必要的调整。鉴于董鸿勋初战失利，撤销其第三支队支队长职务，改由第六支队长朱德接任，第六支队长则由第三梯团参谋长王秉钧补任。27日下午，从叙州第一梯团抽调之金汉鼎，马鑫培两营援兵赶到，蔡任命金汉鼎为第一支队长。时熊克武正率四川护国讨袁军取道泸北，向泸州方向前进。纳溪护国军的兵力得到一定的加强，蔡锷遂决定于28日组织一次总攻，以改变僵持局面。其作战部署是：何海清支队携炮二门，机关枪二挺，为主攻部队，从棉花坡翼侧攻击袁军防御阵地石保沟；朱德、王秉钧支队配合主攻部队行动，从所在阵地攻击前进，何支队发起攻击后，其它支队的炮火即向石保沟集中射击。另第二梯团长赵又新指挥防守双河场之部队（共约三个连），实施阵前反击，策应正面行动，金汉鼎支队为总预备队，在双河场附近待命。为确保反击作战顺利进行，蔡锷与刘存厚亲自带领督战队，在进攻部队后面督战，明令“凡无命令后退者，立即当地枪毙”。

2月28日上午开始，护国军在左起长江边右至双河场绵亘十余里的战线上，冒着绵绵细雨；不顾料峭春寒，夜以继日地奋力猛攻，多次与敌短兵相接，白刃格斗，经数日激战，护国军虽在左右两翼取得一些进展，但由于袁军兵力较厚，注意纵深设防，并占据石保沟、朝阳观等险要据点，以致始终未能攻破敌之正面阵地。这次作战，护国军虽予敌以重大杀伤，但本身也伤亡和失踪不下千人，兵力大为减弱。蔡锷感慨地说：“此三星期之剧战，实吾国有枪炮后之第一战也”。

（四）护国军退守大洲驿一带

2月下旬，护国军几次反攻均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且因连日激战，

官兵伤亡颇重，弹药消耗殆尽，又得不到后方接济，形势极为严重。此时，罗佩金、刘存厚等人“深以子弹不给，士气不扬，疲劳太甚为虑”，建议暂时退却，“俟子弹续到，元气稍固，再行进取”。蔡锷起初不以为然，认为退却对战争全局影响甚大，恐一退而不可收拾。后由于部下多方促迫，遂于3月6日下令后撤。除第三梯团留少数部队担任阻击任务外，各部队分路撤至叙蓬溪（今护国镇），白节滩、大洲驿一带。蔡锷等积极整顿队伍，构筑防御工事，并电催唐继尧迅速接济弹药，以便伺机转入反攻。

袁军在第一阶段作战中，虽然依仗兵力优势，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袁军遇到的主要困难，除士气低落外，就是对战场条件不适应。川南地区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且时值气候多变，雨雪连绵。在北方平原地区训练出来的北洋军，来到崎岖泥泞的山地作战，经常打滑跌跤，行动非常困难。据称，袁军进入川南以后，由于山路险窄，所有枪炮弹药和急需物品均雇民夫抬运，陆炮每尊需民夫，七十人，山炮每尊需三四十人，一个混成团需民夫一千一百余人，以致一个营开进，行军长径十余里。由于地形不熟，机动困难，所以护国军退却时，袁军只占领了纳溪等地，未敢继续追击。

护国军退至大洲驿一线后，蔡锷总结了纳溪作战的经验教训，决定将下一步的作战方针改为“扼守要点，集结主力，多张疑兵，以分敌势，俟有隙可乘，分头击破之”。据此，护国军设总司令部于大洲驿，并调整了兵力部署：以朱德等三个支队守卫永（宁），泸（州）大道，为中路，以何海清支队和刘存厚部为左翼，沿江安西进，准备增援叙州作战，罗佩金指挥金汉鼎支队和川军张煦支队并加强一个营，防守右翼，在白节滩构筑阵地，警戒牛背石方向之敌，“守则固我右侧，出则冲彼侧背”。

护国军在大洲驿一带经过休整，兵力和弹药得到补充，士气有所恢复。而袁军方面，由于护国军右翼戴戡所部进攻綦江，急调李炳之旅前往增援，纳溪的兵力有所减弱。其部署在第一线的部队不过二三千人，分别防守鹞子岩，牛背石、双河场、棉花坡，纳溪各要点，兵力分散，士气低落。其次，袁军后勤保障也遇到了极大困难。北洋军远离北方到西南作战，部队的弹药、物资、粮秣供给和技术保障等问题接踵而来。至3月初，袁军枪械损坏甚多，“缺乏机关枪子弹及山炮、子母、开花各弹甚队”，张敏尧等向袁世凯迭电告急，请求按济。然而“川江道路遥远，输运倍极困难”，一些作战物资，从北京运到武汉，再由武汉逆江而上运到四川，需六十余日。沿途激流险滩，又遭民军袭击，所运辎重往往损失过半，能补充到作战部队的所剩无多。即使毫无损失地前送至部队，当时一次补给量也只能维持一个师激战十天之用。3月中旬，前线袁军再次面临弹尽粮竭的困境。蔡锷决定趁此时机，对敌展开全线反击。3月15日，蔡于大洲驿发布作战训令，以右翼之朱德、金汉鼎，张煦、廖廷桂四个支队为主攻部队，由第二梯团长赵又新为前敌指挥，从白节滩进攻牛背石，进而向纳溪，蓝田坝侧击，以中路顾品珍梯团由本道“阳攻”，占领茶塘子一带高地，相帆进攻鹞子岩之敌，以牵制当面敌

人，掩护护国军右翼行动，刘存厚部进驻牛滚场，威胁江安方向之敌，并掩护中路顾梯团的进攻，以何海清支队为左翼，进驻合面铺、中兴场，警戒叙州，江安之敌；另以屯扎赤水的黔军杨汝盛营，相机规取合江，得手后进袭江津，切断綦江之敌的后路。蔡在训令中强调指出，此次攻击，“我军对共正面只宜配布少数之兵，而以主力冲其侧背，彼自溃走。宜切谕诸将领，务多留预备队在指挥官之掌握，俾便运用。

3月17日，各路部队同时发起进攻。右翼赵又新所部四个支队，由于步队之间以及步队与炮队之间协同配合较好，先后攻占了沙山、大小山坪和牛背石，并于19日下午进占高洞场。袁军一部退往蓝田坝，主力退守双河场，依托阵地进行抗击，并出动飞机进行侦察轰炸。赵又新命金汉鼎支队猛攻双河场之敌，朱德、张煦支队进攻朝阳观之敌，廖廷桂支队向分水岭、先市方面进攻。战至22日，右路朱、张支队已推进至距蓝田坝仅四公里的南寿山，金汉鼎支队也攻占双河场，与敌隔永宁河对峙，廖廷桂支队进据分水岭。此时，赵梯团因“弹药已损耗十之八九”，遂停止进攻。担任正面攻击任务的顾品珍梯团，于发起进攻后，迅速冲入敌阵，与敌白刃格斗，占领了茶塘子，鹞子岩，迫敌退守纳溪镇后面之光山（今观山）。在左翼担任掩护任务的何海清支队，乘机攻占了江安城。

3月23日，蔡锷发现袁军新援之第八师一个旅已至合江，有沿赤水河抄袭护国军侧后之势，乃下令全线停止进攻，“暂取攻势防御”。护国军遂退守茶塘子至红花地一线，整顿部队，休养兵力。袁军在占领双河场至纳溪城东一线阵地后，亦改取守势。

在这次作战中，护国军共毙伤敌九百余人，缴获大炮七门，机枪九挺，步枪九百余支、炮弹二百余发及子弹无数。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争夺，袁军死伤惨重，其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之能力”。正在这时，袁世凯迫于国内外形势，子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在四川方面，陈宧也派人到大洲驿护国军第一军司令部，要求停战议和。蔡锷鉴于护国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兵员军需均待补充，遂同意停战。先议定从3月31日至4月6日停战一周，以后又派刘云峰与张敬尧谈判，双方继续休战。

泸纳之战是护国战争中最为激烈的一战。在整个作战过程小，护国军以劣势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间断的情况下，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连续奋战，勇猛打击北洋军的精锐之师，虽未能按预定计划夺占泸州，却顶住了袁军的攻势，牵制了袁军的主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的作战。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抱病亲临前线，废寝忘食，运筹决策，其舍身精神，大大鼓舞了全军将士的战斗热情。

四、綦江之战

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在黔军团长王文华等促逼下，赞成讨袁，因黔省

兵力薄弱，又毗连湖南，恐袁军由湘入黔，难以抵御，故暂时隐忍不发。自戴戡率滇军徐进先遣纵队于1916年1月24日到达贵阳后，刘即亮出讨袁旗帜，于27日宣布独立。众推刘为都督。当时，贵州省仅有步兵六个团、炮兵一个营及巡防军数营，共约六千余人。贵州宣布独立后，刘显世等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订黔军出师计划，决定编滇军炮队、机枪队及黔军第五、第六两团为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以戴戡为总司令，率部攻打四川綦江，威胁重庆。另升任黔军第一团团长王文华为贵州护国军右翼东路司令，率黔军三个团和滇军徐进先遣纵队之步兵及部分湘军，进攻湘西。

（一）黔军进攻綦江

黔军进攻綦江，是为了由此突破，进取川省门户重庆。袁军以重庆为前进基地，对叙、泸方向采取攻势，对綦江方向采取守势。扼守綦江，主要为了防御从贵州攻川之黔军，保障重庆的翼侧安全。为此，袁军以綦江为重心，右至江津、荣昌，左至南川、涪州（今涪陵），组成一道弧形防线，配置重兵防守。其兵力部署是：川军周骏师之第五十九团（团长伍德明），以一营驻荣昌，两营驻江津，第六十团（团长张鹏舞）一部驻南川，一部驻涪州，北洋军第十三混成旅之第三团（团长刘虎臣）驻綦江。贵州独立后，袁军又以北洋第三师之阎相文团增援綦江，以北洋第六师之齐夑元旅由湘西增援南川。这样，袁军在川黔交界地区的兵力达五六个团。黔省护国军仅以两团多的兵力，企图实现由綦江进攻重庆的计划，显然是很田难的。

1916年9月2日，戴戡率队由贵阳出发，13日抵松坎。他将黔军第五、六两团编成三个支队：熊其勋之第五团为左支队，进攻敌九盘子阵地，得手后向东溪，綦江方向发展，胡忠相指挥第六团一、二营为右支队，进攻青羊寺（今青羊市），尔后向南川发展，另以第六团第三营为一个支队，取道新洲袭击南川，策应主力行动。各支队同时于14日发起进攻。

熊共勋率左支队于2月14日拂晓前秘密接敌，6时对九盘子之敌发起进攻。九盘子为川南天险，两山壁立，仅通一线小路。黔军攀藤附葛，缘崖而上，节节仰攻，至午后2时占领九盘子。黔军乘胜推进，三路皆捷，连克青羊寺、赶水、东溪等要地，并冲过分水岭，柑子椏等险隘，于15日午前攻占马门垭，前锋进逼桥坝河（今桥河镇），既綦江仅十余里里。袁军在桥坝河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以重兵伏壕据守，封锁河谷子地。黔军左支队进攻受阻，退守两路口。

（二）龙台寺攻守战

袁军见黔军以主力进攻綦江，急欲改变不利态势，遂遣驻江津之伍德明团第一、二营，于2月24日由江津向綦江西南之龙台寺、高庙一带进攻，拟从翼侧抄袭攻綦黔军之后路。时防守龙台寺的黔军仅一个连，以寡敌众，使两路口之黔军主力面临腹背受敌的威胁。戴戡急命驻青羊

寺之胡忠相支队西进，在龙台寺东北之分水岭一带组织防御，以保障攻綦部队的侧后安全，另调已于23日抵达东溪的滇军华封歌支队之部分兵力前出至高庙，增援龙台寺作战，以主力增援正面之熊其勋支队，拟合力攻下綦江，使袭击龙台寺之敌“不攻自退”。

无奈，战况并未如戴戡所预想的那样顺利。龙台寺方面的护国军，由于袁军攻势猛烈，无法守住阵地，被迫于2月24日晚退守东溪。在此情况下，护国军不得不放弃攻綦计划，而以主力于25日晨反击进据龙台寺、高庙之敌。经一日激战，终于夺回龙台寺，解除了侧后威胁。

2月27日，綦江袁军反攻马口垭，华封歌支队奋勇迎战，将敌占退。时已抵南川的北洋第六师齐燮元旅出南川，拟经油萝坪、青羊寺向扩，国军右翼进攻，企图夺回赶水、东溪。护国军再次面临两面受敌的威胁。董鸿勋、华封歌等召开前敌会议，一致认为：护国军出战以来，连战皆捷，勇敢精神诚属可嘉，“惜乎地方太宽，兵力单薄，防守不足，若一味进攻，綦江固不难取，而敌人左右转袭，我军即将受困”，且“黔军已无后继”，于是决定“暂退东溪，缩小范围，聚集力量”，以便“防守出击，较有把握”。当夜，各支队悄悄撤出阵地，于28日退驻东溪一带。

（三）护国军退守松坎

护国军撤至东溪后，重新调整部署，以熊其勋第五团防守右路，阻击由南川进犯之敌；华封歌团防守中路，警戒綦江方向之敌，胡忠相第六团防守左路，防御由江津来犯之敌。

袁军于护国军撤退后，进占龙台寺和分水岭。旋在右路和中路暂取守势，集中兵力进攻护国军右翼。3月1日，齐燮元旅进袭油萝坪，威胁青羊寺。熊其勋率部前出至玉皇观抵御敌人。此后，双方在油萝坪至青羊寺一线展开拉锯战，互有进退。9日，袁军李炳之旅一个团从泸州来援，与齐燮元旅改从中路进攻，占领扶欢场。护国军连日激战，伤亡严重，且因战线过长，兵力过单，渐呈不支之势。

3月中旬，北洋第八师等部队又进抵川境，增强了前线兵力。蔡锷判断敌可能在泸州方向取守势，綦江方向取攻势，遂于16日电示戴戡，指出：“近日敌军纷纷向重庆进发，恐泸州取守势，綦江取攻势，我军既是单弱，尽可竭力将范围缩小，以免将来腹背受敌”。护国军本已是强弩之末，接蔡锷电后，立即从东溪退守松坎一线。袁军进占东溪、九盘子等要点后，未再追进。护国军的攻取綦江、进规重庆的作战计划，终因兵微力弱和未能集中兵力歼敌有生力量而无法实现。

在此之前，已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刘伯承与王伯常等人在涪州一带起义，建立川东护国军。他们攻长寿，打丰都，袭击袁军运输线，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川东袁军，对在川南正面战场作战的滇、黔护国军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四川战役历时两个多月，护国军第一军虽然不畏强敌，打得非常勇猛顽强，但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战果，达到预期的目的。其主要原因在于过早地对袁宣战，未能实现秘密接敌、先发制人的作战计划。其次是多路出击，分散了兵力。攻川之滇，黔、川护国军，总数不足万人，却分兵三路，各自为战，致使各个突击方向上的部队皆无法完成预定的作战任务。后来，尽管蔡锷认识到这一失误，提出了“以重兵趋綦渝”的主张，但因各路护国军都已遭到重大消耗，并被袁军牢牢拖住，已难于集中兵力于綦渝方向。再次，护国军主要着眼于攻夺城市，并未立足于运用灵活的战法调动敌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蔡锷等为了攻占叙州、泸州，不惜以有限兵力在正面与敌反复争夺，死打硬拚，而不注意发挥滇，川、黔军队善于在山岳丛林地带运动作战的特点，采取乘隙捣虚、迂回包抄等多种战法打击敌人，致使护国军付出很大代价而战果甚微。

第二节 湘西之战（1916年2月～4月）

一、双方作战部署

护国军湘西一路的作战任务，按原定计划，系由贵州入湘，直抵沅州（今芷江）、辰州（今沅陵）地区，然后以一部兵力经新化取长沙，迫武汉，另一部取常德，规荆州以指襄阳。云南护国军初定的湘西作战预案，是以第三军参谋长韩凤搂率赵钟奇的第一梯团两个支队入黔，与黔军会师后攻取全湘，黄毓成率领挺进军由黔省出湘西，直捣武汉。后由于四川、广西的战局发生变化，临时改变部署，湘西方面的作战，主要由护国军右翼军东路司令王文华所率的黔军第一，二、三团进行。

辛亥革命以后，湖南军队几经更迭，混乱复杂。1913年底汤芗铭督湘后，又对湘军裁减整编，解散原有陆军，按行政区划成立六个守备区。每守备区保留陆军若干营，设司令一人统率，负责该区防务，另成立一模范营于省城。1915年夏，又组建一暂编陆军混成旅（旅长胡叔麒），驻长沙。云南起义后，汤芗铭根据袁世凯的命令，将暂编混成旅调往湘西，准备与护国军作战。

袁世凯原打算调集重兵，经湘西取道贵州，作为进攻云南的主要方向。后改变主攻湘西的计划，仅命部分“征滇”部队向湘西运动。因湘西山高林密，瘴气袭人，陆路崎岖难行，水路船少水枯，袁军开进速度异常迟缓。至1916年2月上旬，抵达沅辰地区的部队，仅有北洋第三师第五混成旅一部（原驻湘南）和第六师先遣队四个营，兵力比较薄弱。

二、护国军进军湘西

护闰军东路司令王文华接受进攻湘西的任务后，早在贵州宣布独立之前，即率所部秘密离开贵阳，掩旗疾进。第一团经镇远、玉屏秘密进抵湖南昆州（今新晃）城外，第二，三两团也分别向湘边集结。护国军拟分三路，从晃州、漠滨，铜仁三处突破，进攻湘西。

1916年2月2日（农历除夕）夜，王文华所率之中路部队乘晃州守敌（仅湘军一连）不备，突然发起进攻。湘军惊慌失措，稍事抵抗，便退守蜈蚣关，护国军顺利攻占县城。次日拂晓，护国军继续推进，猛攻蜈蚣关。前湘省镇远道尹林炳华，率湘军一部和北洋军第五混成旅两营在蚁蚣关恃险顽抗。护国军昼夜强攻，于4日下午克蜈蚣关，毙敌八十余人。护国军初战获胜，军心振奋，王文华乘胜挥兵继进，直逼沅州，同时令右路吴传声第三团由黎平、天柱攻下洪江后，立即向中路靠拢，与第一团钳击沅州。

吴传声团于2月3日发动进攻，顺利攻下湘黔边境据点漠滨、托口，并于5日攻克黔阳（今黔城镇），6日夺占洪江镇后，即折赴沅州。

沅州守敌为汪学谦第五混成旅。晃州、黔阳失守，沅州首当其冲。汪学谦迭电湘西镇守使田应诏由麻阳（今锦和）派兵救援，并哀告湘督汤芗铭说："职旅兵单分驻，较远炮兵，察看近日情形，竟有不幸料中之势。各处函电纷纷告急，实难措置"。汤芗铭手中无兵，只能以"希力持镇定，相机因应"等空话敷衍了事。

2月13日，护国军第一、三团分左右两路会攻沅州。战斗十分激烈，经夜不息，汪学谦部弃城而逃。14日午前，黔军占领沅州。在此次作战中，团长吴传声不幸阵亡。

占领沅州后，王文华令第一团二营营长胡瑛率部由沅州北进，配合铜仁方向之第二团进攻麻阳。

护国军第二团原任团长彭文治反对起义讨袁，于战前弃职潜逃，由卢焘接任团长职务。护国军开始进攻后，卢团由铜仁出发，连克米沙、小坡等边界据点，逼进麻阳。时麻阳守敌仅有一营。该营以一连守城，两连前出至距城七里的童湘溪，据险顽抗。护国军连攻数日不下。2月8日后，袁军第三师之第五团和第六师一个营，分别从沅州东和辰溪增援麻阳。护国军寡不敌众，于9日下午6时撤出战斗。第一次进攻麻阳失败。16日晨，在第一团援兵的配合下，卢团对麻阳组织第二次进攻。这时，麻阳守敌因前分兵一部救援沅州，兵力减弱，经不住黔军的猛攻，遂放弃麻阳，退守高村（今麻阳）。黔军随即进占麻阳。

这时，护国军游击队司令王华裔联络原湘西守备司令周则范起义讨袁，乘正面战场胜利之机，连克靖县，通道、绥宁等城，敌军退守武冈。

这一阶段作战，护国军以敏捷的动作，连续发动进攻，所向披靡，击溃敌人约三个混成团，攻占湘西八座县城。护国军攻下麻阳后，便进行补充休整。王文华将所部扩编为四个团，分驻所占各县。

三、英勇抗击袁军反攻

湘西连失数县，袁世凯大为惊恐，迭电催促第一路军司令马继增督率各部兼程赴援。袁军进入湘西，沿途烧杀抢掠，民怨沸腾。2月29日，马继增在途中暴卒，袁世凯命第六师第十一旅旅长周文炳代理师长和第一路军司令，继续向湘西进发。

8月中旬，袁军第一路军各部陆续抵达湘西，遂分四路向黔军反攻：卢金山第三混成旅和奉天骑兵一部由辰溪向沅州进攻；汪学谦第五混成旅和湘军第二团由中火铺、江口向怀化、沅州进攻，周文炳第六师由高村向麻阳进攻，刘跃龙第二混成旅和湘军第一团由武冈向绥宁方向进攻。

3月31日，卢金山旅首先对沅州发起攻击，继而奉军参战。护国军在沅州与敌苦战，终因兵力单薄、子弹缺乏而被敌破城。与此同时，周

文炳部已逼近高村，准备攻击麻阳。

4月2日，王文华令第三团及第一团第二营、第二团第二营由麻阳前出，在高村一线阻击周文炳部，令第四团、第二团第一营及敢死队数百名反攻沅州。由于袁军重兵云集，来势凶猛，护国军兵力分散，弹药不继，各路作战均不顺利。反攻沅州的护国军，与敌激战四昼夜，多次展开白刃搏斗，歼敌四百余人，但自己也遭巨大损失，不得不于6日退守斐家店一带。麻阳方向，袁军约三个混成团，于8日上午8时进攻高村护国军阵地。护国军顽强抗击，至下午3时，战力不支，遂撤离高村，退守岩门。袁军乘势反扑，攻破岩门，于7日陷麻阳。黔阳方向，护国军独立营也退守瓮洞一带。

4月7日夜，贵州护国军奉蔡锷电令，与当面之敌停火休战，双方遂成对峙状态。

这时，湘西一带，在护国军湘西招抚使程潜，陈强等人发动和领导下，讨袁烈火方兴未艾，湘西二十余县部已宣布独立，加入护国讨袁行列。此外，已于3月中旬宣布护国讨袁的桂军，其攻湘部队二十余营已抵达湘南之龙虎关、黄沙河一带，有攻取零陵，沿湘江直捣衡阳、长沙之势。这样，湘西袁军已呈孤立突出之势，其后路及两翼受到桂军及湘省地方讨袁武装的严重威胁，故在攻克湘西数县后，开始收缩兵力，未敢深入黔境。

湘西之战初期，贵州护国军以勇猛的战斗精神，采取突然袭击、迂回包抄，短兵相接等作战方法，连克湘西数县，一度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旋因护国军兵力单薄，弹药不继，且又分散兵力，与优势之敌进行阵地战，以致虽初战获胜而不能持久，终于在敌人重兵反攻下节节败退。尽管如此，贵州护国军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牵制了约两个师四个混成旅的敌军，有力地配合了四川、广西方向的作战，其战绩是显著的。

第三节 滇桂边之战（1916年2月~3月）

1916年2月21日，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率所部方声涛梯团千余人，由昆明出滇南，趋广西，东征粤浙。唐继尧将准备开往湘西的第三军一部也调往桂粤方向，以增加第二军兵力，保证攻粤计划的完成。

袁世凯之由海路运兵南下，取道越南进攻云南护国军后路的计划受阻后，即任广东第一师师长龙覲光（广东将军龙济光之兄）为云南查办使，令其率军经广西进攻云南。1916年1月中旬，龙覲光以广东陆军第二旅第三团团长李文富为先锋，以虎门要塞司令黄恩锡为前敌司令，率粤军四千人（沿途又招募四千，约计八千）经梧州到达南宁。龙覲光与广西将军陆荣廷系儿女姻亲，他劝陆效忠袁世凯，率兵攻打云南。陆佯为应允，并派其子陆裕光带领桂军五个营协助龙军。龙覲光喜出望外，遂令李文富为第一路司令，率一千五百人由百色进攻云南剥隘，以黄思锡为第二路司令，率一千五百人经西林（今定安）绕攻云南广南，张耀山、吕春绾各率二个人（编成第三、第四队），为主攻部队之后援，以来朝瑛率兵千人，北趋西隆（今隆林），阻断黔省援兵进路。龙济光则派其子龙体乾潜回云南蒙自老家，组织武装暴乱，以策应龙军的正面进攻。

正在开进途中的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闯报，即命张开儒、方声涛两梯团迅速在云南之富州（今富宁）、广南一线展开，准备阻击来犯之敌。另请待出湘西的黄毓成挺进军（一个梯团）和准备增援贵州并已进至沾益的赵钟奇梯团（欠一支队），经贵州兴义折向广西西隆，从翼侧进攻龙军。

1916年2月底，龙军分兵两路进窥云南。黄恩锡率四个营为右翼，由西林经龙潭乡向广南县城潜进，李文富率该团主力为左翼，进攻剥隘、皈朝。

剥隘地形险要，为滇桂边界较繁盛的商埠。驻守该处的滇军张开儒梯团两个连于3月2日遭到李文富部突然攻击，势孤力单，于下午3时撤离，退守皈朝。不日，张开儒亲率梯团主力（步兵三营、炮兵一连）驰赴皈朝，构筑阵地，据险扼守。11日，李文富部猛攻皈朝，护国军坚守虹山阵地，英勇抗敌，鏖战七昼夜，彼此呈僵持状态。

与此同时，护国军方声涛第二梯团也与敌在龙潭激战。龙潭是由西林进攻广南的咽喉要地，先被龙军第二路司令黄思锡派兵控制，其主力则由龙潭继续向广南攻击前进。李烈钧命方声涛梯团迅速由广南前出，迎击该敌。该部在龙潭以南之石涧与敌遭遇，激战数日，始将敌击退。

广西将军陆荣廷，政治上倾向进步党，与袁世凯素有矛盾。当袁进行复辟帝制活动时，陆表面上敷衍应付，暗中则与反袁势力互通声息。云南独立后，他在其老上司岑春煊和梁启超等人的鼓励下，于3月15日

宣布广西独立。广西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护国军第二军的士气大振。3月16日，方声涛部举行反攻，收复龙潭。时赵钟奇部也由贵州兴义进入广西西隆，进而抄袭黄恩锡部后路。黄部腹背受敌，失败而逃。

与此同时，黄毓成之挺进军也出兴义，经潞城向百色挺进，于黄南田一带与袭扰黔边的龙军朱朝瑛部遭遇。经一夜激战，击溃朱部，遂直趋百色，与桂军会师。时坐镇百色的龙觐光及其所率部队，已被马济、陆裕光等率领的桂军包围，缴械投降，接受改编。

在皈朝与滇军作战的龙军第一路司令李文富，战败退至者桑，旋见右路兵败，后路遭袭，龙觐光被擒，感到大势已去，遂率所部投降。

3月上旬窜扰云南蒙自、个旧、临安（今建水）一带的龙体乾叛乱武装，也遭到滇军刘祖武梯团和唐继尧组织的援军迎头痛击，迅速土崩瓦解，逃离滇境。至此，袁世凯的进攻云南护国军后路之计划完全破产。

滇桂边作战结束后，李烈钧遂督师东进广东，黄毓成、赵钟奇部则奉命援川。

滇桂边之战，虽然规模较小，持续时间不长，但由于李烈钧部及时赶到富州、广南一线，阻止了龙军的入侵，从而打破了袁世凯迂回袭滇的计划，保障了护国军大后方的安全，同时，对陆荣廷之宣布独立，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十七部分 护法战争（1917年7月~1918年11月）

护法战争，是继护国战争之后，由孙中山发动的旨在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反对北洋军阀独裁专制统治的革命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桂、滇、粤、湘、鄂、川等省的军阀，打着护法的旗帜，在湘、川、鄂、粤、闽等省与北洋军阀集团的军队及依附于该集团的地方势力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军事角逐。本章着重叙述双方在主要战场湖南的作战经过，并简要叙述川，粤、鄂、闽战场的作战情况。

第一节 北军第一次攻湘之战（1917年9月~1918年1月）

一、湘南宣告自主

谭延督湘时，湖南共有军队六万余人。其中归督军直辖的有第一、第二两个师及六个区的守备队（每区的守备队三至十余营不等），加上各道尹，总兵所辖的守备部队共四万余人，另有全省警备队二万余人。两个正规师中，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下辖第一、第二旅。第一旅旅长李佑文，所属第一团驻湘阴，平江，第二团驻长沙；第二旅旅长林修梅，所属第三团驻宝庆（今邵阳市），第四团驻衡阳。第二师师长陈复初，下辖第三、第四旅。第三旅旅长陈嘉佑，所部驻常德，第四旅旅长朱泽黄，所部分驻长沙，湘潭。

潭延离职前，任命刘建藩代理零陵镇守使，并调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由衡阳移驻衡山，以便随时配合桂军作战。刘建藩和林修梅都是革命党人，先后参加过辛女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在湘军中威望较高。傅良佐手1917年9月9日到任后，知道刘建藩、林修梅是谭延安排的两个心腹，将威胁其在湘南的统治，于是下令免掉了他们的职务。在此情况下，刘建藩，林修梅被迫于9月18日联衔宣布湘南自主，通电揭露殴祺瑞“违法横行，破坏国纪。……易湘督以为武力征服之图”；声明“特率湘南军民子弟，宣告自主，与段政府脱离关系，一切军民政务，均与海军、两广、云南各省一致进行”。接着，湖南第一区守备司令吴剑学、第二区守备司令周伟和铁道守备司令李仲麟，相继宣告自主。孙中山致电刘、林等人表示祝贺，并派革命党人林祖涵（即林伯渠，林修梅之弟）为湖南劳军使，前往湘南慰劳举义部队。

湘南宣告自主，傅良佐异常惶恐。此时北洋军仅有第八师先头部队两个营抵达湘阴，傅只得先令湘军第一师代师长李佑文，率该师第一旅开赴衡山“相机剿办”。

9月20日，李佑文率第一旅离长沙南下，命第一团团长梅倬敏率部从株洲沿湘江东岸开进，李随彭树煌之第二团由湘潭沿湘江西岸南进。22日，第一团在衡山县七里滩与林修梅部接战。该团第三营不愿“以湘人攻湘人”，于28日在衡山石湾起义，加入护法军。第一，二团大部官兵立即响应，少数携枪逃散，李佑文仅带十余人逃回长沙。傅良佐欲迅速扑灭湘南护法军的企图就此落空。

二、衡山、宝庆之战

（一）双方作战部署

由于湘军第一师第一旅官兵参加护法，使湘南护法军声势大振。1917年9月27日，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从家乡赶赴衡阳，投身护法；

28日，刘建藩率所部十营开抵衡阳，29日，程潜由广州抵达衡阳。10月6日，湘省护法军各路将领齐集衡阳，决定组织“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公推程潜为总司令。

傅良佐之进攻湖南护法军，表明南北军队在湘决战已势不可免。桂系军阀决定组织军队援湘，以武力“驱逐傅良佐，收复湖南，以固两广门户”。9月底。桂军陆裕光师先头部队进抵衡阳。10月2日，陆荣廷在广西南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援湘问题，广东督军陈炳，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议定了援湘军事计划：由两广出兵八十营（其中广东三十五营，广西四十五营），分编成五个军（由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分任军长），由广西督军谭浩明任两广护国联军总司令”。进军路线是：马济率粤军出韶关入湘，经攸县、醴陵取长沙，桂军分成两路：韦荣昌军由三江人湘，经新宁逼宝庆，陆裕光、林俊廷二军则出全州入湘，经永州（今零陵），祁阳增援衡阳。两广军总的目标是会攻长沙。

正当两广护国军准备援湘之际，傅良佐也在积极备战。9月28日，傅以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各军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负责组织指挥湘南作战；以第八师十五旅（旅长王汝勤）和第二十师三十九旅（旅长张纪）从正面进攻衡山，以湘军第二师朱泽黄旅和即将抵湘的二十师之第四十旅（旅长张建功）进驻永丰（今双峰）。10月初，北军第八师之第十五旅和第二十师之第三十九旅相继开抵长沙。嗣后到达的还有倪嗣冲之安武军二十营、晋军商震混成旅以及北洋第三师阎相文旅。

10月上旬，南北两军之间的交战，在朱亭，衡山至永丰一线全面展开。

（二）衡山战斗

湘潭是北军进攻衡山的前进基地，有三条道路可通衡山：一由湘潭经株洲，沿三门、淦田、朱亭一线，一由湘潭经茶园铺，沿熊家桥、护湘关一线，此为陆路大道，一由湘潭沿涓水至福田铺一线。为了抗击北军进犯，护法军的布防如下：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指挥该师之第一、二两团（欠一营），在衡山、护湘关至茶园铺沿线设防，另将一个营配置于福田铺担任翼侧警戒，刘建藩所部数营防守淦田、朱亭，林修梅率该旅之第四团驻守岳后，防敌由永丰方向窜犯。

10月6日晨，南北两军开始在湘潭县属之西倪铺接战。护法军在衡山以北只有不足两个团的兵力，却要防守从福田铺至湘江边宽约十五公里的正面，力量分散；加上装备较差（除步枪外，仅有二门炮、二挺机枪），难于阻止敌人的进攻。北军王汝勤所部由中路进攻，集中兵力，重点突破，连占茶园铺、中路铺和白石铺等要点，逼近护湘关。护湘关位于衡山北十二公里处，两隩山势险峻，湘（潭），衡（山）大路从山间穿过，是易守难攻之地。护法军在护湘关两侧高地构筑工事，重点设

防。8日晨6时，北军分三路攻打护湘关。护法军凭险抗击，“顽强异常”，“抵死不退”。战至次日凌晨，北军从侧翼突击，仰攻肉搏，护法军力不能支，遂弃关撤退。护湘关落人敌手。

10月10日晨，北军进攻护法军在衡山北面的最后一个要点石桥铺。护法军控制附近高地，顽强抵抗。临近中午，刘建藩派数营援兵赶到战地，让正在奋战的第一师士兵撤下吃饭。但这些援兵多数是新兵，未经严格训练，缺乏作战经验，以致一有伤员，就惊慌后退。北军乘势冲击，护法军大败。

10月11日上午7时，北军向衡山外围发起攻击。王汝勤亲率该旅第二十九团及工兵营、炮队由正面实施突击，以第三十团由翼侧抄袭。护法军据守城外据点的部队经不住敌军的猛攻，纷纷逃进城内，并牵动了守城部队，护法军只得放弃衡山，分向湘江以东和衡阳退却。王汝勤旅遂轻取衡山。

北军张纪旅行动迟缓，10月11日由湘潭进抵株洲，翌日沿湘江东岸向南攻进。13日在淦田乌鸦山与刘建藩之警戒部队遭遇。双方激战两小时，刘部不支后退。张旅乘势追击，于下午7时攻占朱亭。14日，张旅向衡山靠拢，拟配合王汝勤旅向衡山以南进击。但王汝勤由于作战顺利，便不等张旅跟进，即率所部向贺家山进攻。

贺家山位于衡山与衡阳之间，左接巍巍衡山，右倚滚滚湘江，北面是宽约数里的开阔地，山势虽不高峻，但北陡南缓，易守难攻，是防卫衡阳的天然屏障。护法军控扼贺家山，封锁山下开阔地，进行顽强阻击，遏止了王旅的推进。10月15日，北军张纪旅也投入战斗。在此前后，桂军第三军副司令贲克昭率领的先锋团和粤军第一军副司令邱渭南率领的三个营，也先后赶到贺家山一带，增援湘军。

从10月15日起，南北两军各投入兵力万余人，在贺家山一带连日激战。北军旅长王汝勤和张纪组织部队对贸家山轮番进攻，但由于不讲战术，士兵盲目射击，徒耗枪弹、炮弹，因此虽付出很大代价，但战果不隆。团长傅良藻（傅良佐之弟）战殁，部队死伤过半。加之秋雨连绵，山地泥泞，给不习惯江南气候的北军造成意外的困难。北军连日强攻，毫无进展，只好转攻为守。湘南护法军在桂、粤军支援下，经数日激战，挫败了北军的进攻，但苦干弹药不继，也未发起新的攻势。

10月21日，程潜与陆裕光、贲克昭、邱渭南等桂、粤军将领在衡阳举行会议，商定下一步作战计划。鉴于贺家山至衡山方向北军云集，护法军反击困难，而宝庆已为北军攻占，遂决定由赵恒惕指挥两团湘军并桂军贲克昭部，在原地实行坚守防御，刘建藩部出守大浦，警戒江右，而将主力向宝庆方向转移，拟出敌不意，收复宝庆，再图长沙。计划甫定，即由林修梅率所部湘军与桂军一部直趋宝庆，邱渭南之粤军三营右出攸县、新市，趋醴陵，威胁敌之后路。

（三）宝庆战斗

傅良佐派兵进攻衡山时，对宝庆方向暂取守势，仅派湘军第二师之朱泽黄旅进驻永丰，并控扼永丰与宝庆间的险要山地界岭（永丰西南三十公里），拟待援军赶到后，再行进攻。湖南第二区守备司令周伟、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宋鹤庚于10月2日在宝庆宣告自主后，为了先发制人，立即率部东进，袭占界岭（时朱旅派一营防守），前锋逼近界岭东面的青树坪，另以原永州守备司令谢国光率兵三营，经洪罗庙进逼马屋岭，袭击永丰之敌翼侧。

朱泽黄见要地界岭失守，关系重大，立即转守为攻。10月6日，朱旅倾巢出动，反攻青树坪。战至次日上午，护法军不支，退守界岭。朱旅乘胜追击，猛攻界岭。护法军立足未稳，弃守而退，界岭复陷敌手。

朱泽黄夺回界岭后，以主力驻守该地，另以参谋长周诗率兵二营迎击进逼永丰翼侧之护法军。10月10日，周诗部于马屋岭击败谢国光之护法军，进据洪罗庙。朱泽黄见翼侧威胁已经解除，遂于18日组织部队由界岭向宝庆进攻。朱将所部分为两路，以第七团团长毛树峻为左翼指挥官，第八团团长周崇岳为右翼指挥官，两路相互策应，齐头并进。19日，朱旅攻占黑田铺（宝庆东三十公里），继陷洪桥（宝庆东十八公里），直薄宝庆城下。护法军据城抵抗一夜，于20日撤离宝庆，退往杜家坪。朱泽黄进占宝庆后，接到傅良佐令其速率主力增援贺家山北军的电报，遂留两个营守宝庆，亲率四个营于10月25日出两市塘（今邵东），拟经洪罗庙趋援贺家山。

这时，贺家山战场已呈胶着状态。10月21日，桂军韦荣昌郎抵达衡阳。程潜为打破战场僵局，商请韦荣昌派出所部一个团，会同湘军李仲麟、谢国光部（共六营），由衡阳左趋渣江，拟经洪罗庙攻取永丰。31日，韦、李、谢所部湘桂军于洪罗庙与朱泽黄旅相遇。双方激战竟日，朱旅不支，退守界岭，旋又退至永丰。数日后，林修梅也指挥所部湘军，在桂军陆裕光部配合下，向宝庆发动反攻，于11月4日下午克复宝庆。尔后，林修梅派宋鹤庚团东进，拟配合在洪罗庙地域待机的韦、李、谢军进攻永丰。

永丰守敌除朱泽黄所部一个旅（欠二营）外，还有新从长沙赶到的晋军商震旅和北洋第八师第三十二团。上述守城兵力虽约一师之众，但由于朱旅已成惊弓之鸟，不堪再战，商旅新到，立足未稳，加上相互之间互不统属，所以防御能力并不很强。11月8日，湘桂护法军攻克界岭，继下青树坪。11日，护法军分四路进攻永丰：李仲麟部由青树坪攻敌正面，桂军一部由石头山经下五里牌攻敌左翼，谢国光部由上五里牌攻敌右翼，另以桂军一部出三甲塘抄敌后路。护法军四面围攻，勇猛作战，北军渐呈不支之势。下午又有由宝庆开来的湘军宋鹤庚团和桂军二营投入战斗，护法军攻势更猛。永丰守敌见后援不继，孤城难守，遂于傍晚弃城而逃：朱泽黄旅逃向湘西，商震旅和第八师之三十二团逃往湘乡。

与此同时，南，北两军在湘东醴陵、攸县方向也展开了激烈战斗。安徽援湘司令李传业率安武军十营于10月底抵长沙，傅良佐令其由醴陵进攻攸县，得手后“由攸县进攻衡州之背”，策应贺家山正面战场。李传业以帮统高世续率兵五营自醴陵出发，帮统马联甲率兵三营由朱营出发，对攸县分进合击。11月7日，高世续所部首先进抵距攸县二十公里之新市。这时，广东护国军第一军副司令邱渭南部已进驻攸县，在攸县至新市地域内派兵设防，严阵以待。8日拂晓，双方在新市西侧山地展开激战。战至10日，邱部因兵少不支，遂放弃新市、攸县，退守耒阳。安武军于10日上午占领攸县。

（四）北军停战主和

正当南北两军在湘南鏖战之际，陆荣廷于11月10日在悟州召开有桂军，驻粤滇军、海军和军政府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鉴于北军源源入湘，湘南战事吃紧，决定由李烈钧率领驻粤滇军、海军和陈炯明之粤军，联合进攻闽浙，以分散北军兵力，减轻湘南护法军的压力。但梧州会议刚结束，忽然传来攻湘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宣布停战议和的消息。原来，王汝贤，范国璋都是接近直系的将领，对段祺瑞的武力政策持有异议，对傅良佐督湘深表不满，在“兵疲力早”、损兵折将的情况下，不愿意再譬段、傅火中取栗，乃于11月14日发出通电，主张南北军立即停战议和。通电发出后，王、范二部自行停战，并从衡山撤退。

王，范突然主和，使湖南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傅良佐因对王、范的主和行动“既非空言所能挽回，又无实力以资镇压”，于14日夜与代理省长周肇祥乘军舰匆匆逃离长沙。段祺瑞对王、范之擅自停战求和更是大为恼怒，但为了不使湖南轻易落入护法军之手，便采取笼络王，范的办法。他一面将博良佐、周肇祥免职查办，一面加委王妆贤以总司令代行督军职务，“所有长沙地方治安，均由王汝贤督同范国璋完全负责”。这一任命颇合王，范心意。他们宣布停战，本意就想逼走傅良佐，取代督军和省长的地位，于是，一面在湘潭、株洲一带集结兵力，一面向南军提出按现有界线先行停战，一切问题留待和平解决。

湘粤桂联军识破王，范的缓兵之计，继续向湘潭，株洲进攻。此时，北军斗志已丧，望风披靡，纷纷北逃。当王汝勤的兵车驶过一铁路桥时，“正值徒步溃兵拥塞桥上，王命火车直冲过去，当即轧死轧伤官兵七、八百人，血流数日，惨不忍睹”。11月17日，联军攻克湘潭，株洲。这时，从湘乡败退的商震混成旅，不知湘潭已被护法军攻占，全旅蜂拥入城，遭到护法军伏击。商旅几乎全军覆没，仅二百余人逃往长沙。20日，赵恒惕、程潜、刘建藩等部进占长沙。王汝贤、范国璋率残部逃往岳阳。

程潜进入长沙后，马上召集湖南各界代表会议，推举陆荧廷为湘粤桂巡阅使，谭浩明为湖南督军，程潜为省长兼军务会办。军事方面，除留少数部队镇守长沙外，立即令刘建藩、贲克昭等部分别向湘阴，平江

方面开进，准备乘北军溃败的有利时机，收复岳阳。同时迭电进驻衡阳的联军总司令谭浩明“火速来省，指示方略”。但谭浩明一则对程潜任省长不满，二则刚收到直、鄂、苏、赣四督军呼吁停战议和的电报，便以“尚未准备停妥，未便操之过蹙”为借口，故意在衡阳迁延不进。桂军按兵不动，湘军也未敢单独深入，致使北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得以在岳阳完成了防御部署。12月8日，程潜自动解除省长兼职，谭浩明才于17日到长沙。谭抵长沙后，应各方要求，将粤桂护国军改称为护法军。18日，谭宣布他本人以湘粤桂护法军总司令名义兼管湖南军政事宜。这个目不识丁的“草莽英雄”，依仗桂军势众，攫取了湖南的军政大权。

衡宝之战是护法战争中南北军队的第一次交战。作战伊始，湘南护法军就表现出了积极顽强的战斗精神。在初战失利、衡山失守的情况下，湘南护法军利用贺家山有利地形，扼险阻敌，为扭转战局创造了条件。当战斗进入相持阶段后，护法军领导人鉴于正面反击难于取胜，遂及时调整部署，在坚守贺家山的同时，抽调相当兵力转攻守备薄弱的宝庆，连克宝庆、永丰，逼使北军前线将领停战求和。接着，又乘势反击，连克衡山、湘潭、株洲等地，并在中途伏击溃敌，取得了全歼晋军一混成旅的辉煌战绩。这说明程潜等护法掌领导人具有一定的组织指挥能力，其战术运用是成功的。此外，桂、粤两省及时出兵支援，与湘南护法军并肩作战，勇敢杀敌，对夺取衡宝之战的胜利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岳阳之战

（一）南军顿兵待和，北军积极备战

王汝贤、范国璋通电主和，以及衡、宝作战失利，打乱了段祺瑞的“武力统一”计划，使其陷入尴尬的境地。在王、范通电主和的次日，段即向大总统冯国璋请求辞去国务总理职。11月18日，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苏督李纯（时称“长江三督”），秉承冯国璋的旨意联衔通电，主张北京政府与西南各省撤兵停战，并表示愿负调停之责。22日，冯国璋批准段祺瑞辞职，并装出准备同西南当局议和的姿态。

北洋政府停战议和的表示，在护法军政府和西南军阀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孙中山于11月18日发表时局通电，明确表示“此次西南举义，既由蹂躏约法，解散国会，则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之余地”。非常国会也致电程潜，揭露北洋政府“阳托调和，阴则厚增援兵”，要程潜等迅速进攻岳阳。联军占领长沙后，孙中山又动员驻扎湖北的北洋陆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和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响应护法，与长沙联军向岳阳、武昌对进，“以成腹背夹攻之势”，争取出现“控扼武汉重镇，湘鄂连为一体”的形势。黎天才等接电后，立即部署起义，准备与护法联军协同动作。然而，桂军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针。11月28日，在陆荣廷授意下，谭浩明擅自发出了停战议和的通电，声称“段祺瑞奉令免职，根本已得解决，自应照约法停战”。孙中山对此十分愤慨，一针见血地指出：“陆此次出兵，本在攫取湘权，长沙既得，其欲已偿，故一再电冯停

战，而未及旧国会之应恢复，对于岳州北军，亦无驱逐之意，于军府始终无诚意之表示，致冯意益肆，局势如此，危险实甚”。程潜等湘军将领虽对议和持有异议，但因湘军兵力不足，且恐进一步搞僵与桂系的关系，故亦未及时发兵进攻岳阳。于是，孙中山又把希望寄托在滇系军阀身上。12月10日，他致电滇督唐继尧，促其疾速率领滇军沿长江东下，与黎天才、石星川之鄂军会攻武汉，指出：“陆主停战议和，全出于自便私图”，“望帅迅出宜昌东下，进击武汉，则长江以北将来属军府范围，届时陆虽单独议和，亦无能为也”。唐继尧却回电声称：“川中逆军尚未悉数荡平，猝难东下”。这样，孙中山的计划便无法实现，并使湖北黎、石起义军因孤立无援而处境日益危险。

段祺瑞下野后，不甘心于对西南用兵的失败。他策动各省皖系军阀，并拉拢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实力派曹锟，子12月2日在天津召开会议，一致主战，要求冯国璋明令讨伐湘粤。会议初步制订了两路进兵湖南的计划：第一路推曹锟为主帅，率所部由京汉路南下，经湖北进攻湖南，第二路推张怀芝为主帅，率军由津浦路南下，经江西进攻湘东。会议还确定了各省出兵的数目：直隶（今河北），山东、安徽各出一万，奉天（今辽宁）出二万，山西、陕西各出五千。军费由各省自行负担。

冯国璋等人唱着“议和”，“停战”的高调，不过为了敷衍南方，在死守岳阳，维护北洋军阀根本利益问题上；与主战派并无分歧。在天津会议的胁迫下，冯国璋赶紧声明：“本大总统对于湘事决不能尾怜求和”。12月15日，冯正式任命曹锟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张怀芝为第二路军总司令，令各率本路军队南下攻湘。18日，冯又委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并规定关于参战事务均交参战督办处理，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送还段祺瑞。

这时，日本政府也表示全力支持段祺瑞和北洋主战派。12月30日，与北洋陆军部签订了一千八百余万日元的军械借款合同。日本帝国主义出面撑腰，大大助长了北洋军阀的内战气焰。1918年1月8日，玛国璋通电北洋各督，同意继续对护法军作战。喧嚣一时的南北停战议和活动，为北洋政府赢得了调兵遣将的时间，却使南方军政府内部扩大了矛盾，并丧失了会攻武汉的有利时机。

（二）南北双方在岳阳地区的兵力部署1918年1月，陆荣廷和护法联军将领见冯国璋附和主战派，且有“先挫西南声威，然后言和”的企图，感到求和无望，遂决定在北军主力抵湘之前，先发制人，收复岳阳。

岳阳为湘鄂交界的军事要地。当湘南战事吃紧之际，段祺瑞就已调派北洋第二师师长王金镜为岳防总司令，指挥该师之第三旅（旅长孙传芳）、第七师之第十四旅（旅长吴新田），第十一师之第二十二旅（旅长萧安国）和直隶之第二混成旅（旅长阎相文）、第三混成旅（旅长萧耀南）防守岳阳。王汝贤，范国璋两师在衡山、宝庆作战失利后，其余部亦退往岳阳。这样，据守岳阳之北军已达六七旅之众。

王金镜将主要兵力配置在新墙河至油河诸要点，利用有利地形，构筑防御阵地。其具体部署如下，北洋第二师之混成第六团防守坡塘（今破垄口），第五团担任南津港至坡塘沿湖警戒，吴新田旅防守山桥岭，阎相文旅防守枫树桥，萧耀南旅防守乌江桥；第十一师之四十四团为左翼总预备队，暂驻岳阳城内。范国璋师之三十九旅防守岳阳至蒲圻铁路沿线，四十旅守板桥至托坝（今长塘）一线；王汝贤第八师余部移驻江北监利一带，为总预备队。王金镜的第一线兵力共约一万三千人，基本上沿新墙河一线配置，且左翼比较薄弱，这就给联军的进攻留下了可乘之隙。

湘粤桂联军进占长沙后，其总兵力约有四万余人。随着和谈逐渐无望，联军除以湘、桂、粤军各一部留防长沙，粤军济桥、冷水铺的部队调回岳城防守。1月25日下午3时，萧耀南电称乌江桥被湘军三面包围，急乞援兵王金镜又将新抵岳阳的北洋第十一师二十一旅之两营派赴乌江桥，并派出飞机两架助战，但刚飞临战区上空，即被湘军枪弹击伤，被迫返航。

1月26日拂晓，湘军以一团跃过白湖瑕迂回至岛江桥背后，另两团在乌江桥右侧和正面，同时发起猛攻，与敌短兵相接，白刃搏斗。激战竟日，毙俘敌数百人，湘军也伤亡官兵五百余人。当日下午，北军萧旅因伤亡惨重，疲惫难支，不得不放弃阵地，退往三眼桥。其左翼守桃林之二十师一部和右翼守南木冲之阎相文旅，见中路乌江桥失守，也无心再战，纷纷弃阵后退。三眼桥是通向岳阳城的最后一个要点，王金镜命萧旅死守，“作背城一战，以挽回危局”。然而，萧旅残部已无力再战，于午夜弃守逃命。此时，守坡塘、新墙一线的吴新田、孙传芳两旅，见乌江桥失守，恐后路被南军切断，也争相撤退。湘桂军长驱而进，直抵岳阳城下。王金镜见岳阳已经难保，遂指令吴、阎、萧旅沿铁路退往湖北蒲圻，孙传芳旅退往嘉鱼。王本人逃往武昌。

1月27日上午，湘桂粤联军占领岳阳，俘敌一千三百余人，缴获飞机两架、火炮四十余门，以及大批枪枝弹药。战后，程潜赋诗志庆：“严冬十二月，晨起临前营，诸将环我立，受命各成行。指途向岳阳，攻其所必争。先趋白湖荡，猛力洞厥膺。鏖战五日夜，我锋不可撄。伏尸遍原野，直抵巴陵城。壮哉甲胄士，誓死秉吾城”。反映了南军的勇猛和战斗激烈的情景。

护法联军之所以能攻克北军重兵防守的岳阳，除了联军在兵力上居于优势和有较高的士气外，在指挥上亦有其可取之处。首先，掌握了敌人的防御部署，将主攻方向选在敌之防御薄弱处乌江桥，使敌军频繁调动，打乱其整个防御部署，其次，将主攻任务交给士气较高的湘军主力执行，在部队的使用上也是得当的，再次，除正面进攻外，还组织小股武装深入敌后活动，对于配合正面作战，打乱敌人的兵力部署，也起了一定作用。

护法联军攻下岳阳，独立各省人心振奋，希望护法军长驱直下攻取

武汉。而此时鄂省北军主力正集中力量“围剿”荆、襄靖国军，武汉空虚，如果联军乘虚径取武汉，与湖北靖国军协同作战，将使湖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无奈桂系军阀仅以夺取湖南为满足，不想进攻直系督军王占元的地盘。在联军占领岳阳的当天，谭浩明又擅自下令严禁前线各军跨入鄂省一步。他在致苏督李纯的电报中声明，“已饬前方停止进攻，不入鄂境”，并称如“北不攻岳”，则“南不攻鄂”。这样，联军就丧失了乘胜北进的大好时机。

四、荆襄之战

（一）湖北组成“靖国军”参加护法

1917年12月，正当南北酝酿议和之际，湖北境内的部分军队宣告自主护法，牵制了北军驻鄂部队，对湘桂粤联军进攻岳阳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护法战争前，湖北共有军队三个师、四个旅和两个独立团。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和襄郧镇守使兼第九师师长黎天才，早年参加同盟会，后又参加辛亥革命，与革命党有较深的关系。在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人的激励下，石星川和黎天才分别于12月1日和16日宣布自主。同时，原湖北第三师师长王安澜也潜回枣阳，召集旧部举义护法，共同成立“湖北靖国联军”。公推黎天才为联军总司令兼第一军总司令，石星川为第二军总司令，王安澜为第三军总司令。这种革命形势的出现，使孙中山极为振奋。12月26日，他致电黎天才，提出湘、鄂、川护法军队夹击武汉的作战方略，指出：“执事据荆襄重地，地扼江汉之形胜，南与滇黔川湘桂军互为声援，合力并进，以成腹背夹攻之势，则必胜之算操自我手。”

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和当时战场的客观形势，湖北靖国军拟定了基本作战计划；由第二军分兵出荆州，攻宜昌，以打通长江上游航路，接应滇黔靖国军出川，进逼武汉；第一军一部会同第三军合攻武汉，黎天才率第一军另一部北规信阳，控扼武胜关，切断京汉铁路，阻止北军南援。但是，湖北靖国军虽号称三军，实际参加护法者不过万人左右。以此有限兵力，企图分兵作战，实现上述作战计划，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更为困难的是，此时湘桂粤联军正屯兵长沙，等待议和，无意援鄂，滇黔靖国军正全力争夺四川，无暇东下，黎天才等只好率靖国军独立作战。

湖北之襄阳、荆州和武汉素称“一鼎三足”。荆、襄宣布独立，武汉便陷于孤立。湖北督军王占元一面致电北洋政府乞援，一面组织鄂省部队防堵靖国军。1918年1月10日，北洋政府正式下达“武力戡定荆襄令”，命“第一路总司令曹锟、湖北督军王占元各派得力队伍，克日分路会剿”，“河南督军赵倜派兵相机协剿”。在王占元主持下，北军拟定了基本作战计划，将襄阳、荆州地区划分为第一、第二“清匪”区。北洋第三师代师长吴佩孚为第一区司令，指挥该师两个旅和驻南阳之豫南总司令吴庆桐混成旅，“围剿”黎天才部。北洋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为第二区司

令，指挥北洋第二师之第四旅、吴光新所部两个旅和第十八师一部，“围剿”石星川部。总兵力约二万七千人。

（二）靖国军荆、襄作战相继失利

黎天才宣布自主后，未能按既定计划出兵河南信阳，控扼武胜关，而于1917年12月20日率兵一部进攻南阳。在南阳外围遭到豫军阻击，遂退据新野，数日后又撤回襄阳。

1918年1月初，北军开始对襄阳发起总攻，第三师第六旅由倌阳西进，吴庆桐旅由新野南进，另以反对独立的原第九师第十八旅（旅长张联升）由老河口（今光化）东进，第三师第五旅由孝感经钟祥北进，对襄阳实行向心攻击。

这时，黎天才所部靖国军不足一旅，鉴于敌军四面围攻，难以抵御，便于1月20日主动放弃襄阳，经南漳南进。驻守枣阳、随县之王安澜军也向南转移，以图与驻守荆门的第二军靠拢。

石星川宣布独立时，该师驻守荆州，沙市的兵力只有一个师部和第一旅第一团，共有步兵三营，机关枪两连。不久，驻仙桃镇第一旅第二团响应独立，总兵力也不过六七营。鉴于兵少力单，石星川一面匆匆招募新兵，扩充力量，一面迭电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学济，请派军队出石首、公安，策应荆沙靖国军行动。张学济接电后，立即率所部二十营出桃源，趋澧县，增援荆州靖国军。1917年12月30日，其前卫司令胡瑛所部进抵湖北公安，遭到北洋第十八师阻击，无法接近荆州。

当时，驻鄂省之北军主力集中于武汉和岳阳，武汉以西仅有第十八师之一个旅（驻监利，公安）、第二师之第四旅（驻宜昌西北），和刚从重庆遇到宜昌的吴光新所部之李炳之、刘跃龙两个旅。为了围攻荆，沙靖国军，王占元令朱廷灿第四旅从当阳沿漳水南下，李炳之第十三旅沿长江东进，刘跃龙第二旅之一个团助攻宜都，松滋，第十八师负责拦击湘西护法军，并袭击荆沙靖国军后路。

北军兵力虽居优势，但系统杂乱，互不统属，多路进攻，缺少协同。荆沙靖国军如能利用这些弱点，集中兵力，机动作战，有可能将敌各个击破。但石星川面对强敌进攻，却派出一团兵力到荆州以西，沿长江北岸分散设防，形成了分兵防堵，被动挨打的架势。

1918年1月14、15两日，北军朱廷灿，李炳之旅开始向荆、沙进攻。靖国军节节后退，朱廷灿部连夺当阳，河溶、清溪河等要点。李炳之旅未遇任何抵抗，直薄荆州城下。

石星川见北军兵临城下，而张学济率领的湘西护法军在公安遭到北军阻击，远安的王安澜军也迟迟不能向荆，沙靠拢，遂丧失信心，于1月22日自行解职而去。石星川出走后，其部下大多逃散，余部在副司令唐克明带领下退出荆州，会合湘西护法军后撤往宜都。22日夜，荆州城

被李炳之旅占领。

湖北黎、石等部举义，正值湘桂粤护法联军攻克长沙之后，如当时湘省护法联军迅速攻取岳阳，进规湖北，则可以得到湖北靖国军的有力配合，护法战争的局面将会有很大改观。无奈护法联军在克复长沙后，即顿兵不前，致使北洋政府得以调集部队“围剿”荆、襄靖国军。湖北靖国军之所以遭到重大损失，本身兵力薄弱和指挥不当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湘省护法联军既不配合作战，又不及时救援，也难辞其咎。邵元冲断言，襄、荆失败是“湘中桂军按兵不救之罪也”，此话不无道理。

第二节 北军第二次攻湘之战（1918年2月~5月）

一、护法军内部矛盾日趋激化

经过半年的奋战，到1918年2月，各路护法（靖国）军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湖南战场上，护法军占领了长沙，攻克了岳阳，在四川战场上，靖国军占领了重庆和成都。与此同时，其它各省的护法势力也有很大发展，“独立”，“自主”的通电接连不断。在湖北，石星川，黎天才的靖国军虽遭挫损，但尚有革命党人蔡济民率领的民军在广济等地活动，在陕西，陕军团长郭坚在凤翔宣告自主，革命党人于右任，胡景翼在三原宣布独立；陕西靖国军一度攻占了西安；在浙江，驻宁波的旅长叶焕华宣告独立，温州、处州（今丽水）、绍兴等地的军队一度响应，在河南，原京津总稽查长王天纵在临汝宣告独立，在山东，部分陆军起义，一度攻占了东平，在福建，安徽，也出现“靖国军”、“讨倪军”，响应护法。短短几个月内，护法烽火遍及十几个省，形势十分有利。这时，如果参加护法的各种势力能够团结一致，在护法军政府统一领导下，协同作战，共同对敌，未尝不能发展大好形势，取得战争的主动权。但是，广东军政府的政治基础十分脆弱。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缺乏经济和军事实力，没有力量组织和领导全国的护法武装。而具有较大实力的两广军阀和云贵军阀，各自怀有自私的动机，不愿把自己的军队置于军政府领导之下。因此，护法战争名义上虽由军政府领导，实际上各省护法势力各自为战，始终未能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

不仅如此，随着护法战争的节节胜利，以陆荣廷、唐继尧为首的两大军阀势力与军政府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和表面化。尤其是桂系军阀，竟对军政府的活动进行百般限制与刁难。1917年8月，广东督军陈炳焜逼走倾向军政府的省长朱庆澜，并极力拉拢广东地方派军人，对军政府搞“釜底抽薪”，9月，又以提供军饷和煤炭为诱饵，拉拢军政府海军总长程壁光，从组织上分裂军政府。11月，桂军统领沈鸿英借故杀害军政府任命的潮梅军第一支队司令金国治。11月21日，原广惠镇守使莫荣新继陈炳代理广东督军后，变本加厉地破坏护法军政府。莫先以不准私自招募民军为由，驱逐逮捕军政府派往各地的募兵委员，继又诬指大元帅府卫队连的排长多人为“匪”，擅自逮捕枪杀，借以恫吓孙中山。孙中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8日晚率少数卫士登上军舰，指挥舰炮轰击观音山督军署，迫使莫荣新于次日亲至大元帅府“谢罪”。但是，桂系军阀对军政府的破坏活动并未因此而收敛。面对异常险恶的环境，孙中山愤激万分，但为了护法大业，仍忍辱负重，勉强支撑着岌岌可危的军政府。

桂系军阀与护法军政府的矛盾，直接反映到护法战争的湖南战场。自联军占领长沙后，其内部矛盾便开始尖锐起来，主要是湘军与桂军的矛盾，也有湘军内部的矛盾，严重影响着护法联军的协调统一，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更为严重的是，联军自占领岳阳后，“军纪之紊乱达于极

点”。尤其是桂军，以功臣自居，纪律涣散，横行无忌，“掠夺杀伤之事件屡有所闻”。该军第一军总司令韦荣昌一进岳阳，即嫖妓酗酒，大施淫威，其所属官兵也群起效尤，无所不为。对此，不仅湖南人民侧目而视，而且湘军官兵也极为反感，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

二、北军第二次攻湘前双方的作战部署

（一）北军的作战方针及部署

北军在岳阳遭到惨败后，皖系军阀和主战派纷纷责骂李纯等主和督军“损失国家资格，玷污军人名誉”，积极策划罢免王（士珍）、李（纯），推倒“大树”（冯国璋）。冯国璋和“长江三督”在主战军阀的围攻下，处境十分困难，又鉴于岳阳失守，湖北危急，直系的地盘也受到威胁，于是纷纷“引咎自责，倒向主战派。

1918年1月27日，冯国璋离京“出巡”济南、徐州、蚌埠等地，与皖系督军张怀芝，倪嗣冲等人会商时局，于29日返抵北京。31日，冯国璋下达对南军“局部讨伐令”，特命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著总司令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即行统率所部，分路进兵，痛予惩力，”。2月2日，北京政府下令对湘桂粤联军进行作战，宜称“非将长沙完全克复，不能议和。”北军第二次攻湘的作战企图，是攻下岳阳、长沙，进而占领全湘。

2月中旬，各路北军分别向湘鄂，湘赣边界开进。

曹锟之第一路军分为两队：吴佩孚率第三师及三个混成旅，由襄阳乘船沿汉水南下，经武汉进至鄂南蒲圻待机，准备进攻岳阳，张敬尧率第七师另两个补充旅和安武军一部进至鄂南通城，准备进攻平江。此路兵力共约五万人左右。

张怀芝之第二路军分为左右两翼：施从滨率山东暂编统一师（欠第一旅）及张宗昌之江苏第六混成旅，出江西铜鼓进攻湖南浏阳，江西第十二师之张之杰第二十三旅和由攸县退过萍乡的李传业所属安武军二十营，经江西萍乡进攻湖南醴陵。此路兵力共约二万人。

冯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约六千人，从浦口溯江而上，拟经常德进攻湘西。

此外，又令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率五艘军舰由水路开进，策应陆路进攻。加上随后入湘的奉军五个混成旅和李奎元之十一师，北军攻湘兵力共约十万人。

北军源源南下，气势逼人。护法联军见和谈无望，只好仓促分兵御敌。

（二）护法联军的兵力及防御部署

护法联军占领岳阳后，各路军队进行了扩编，截止北军攻岳前，在长沙以北屯集的联军总数达二百五十余营，约合十个师八万余人。其中，粤桂军队除原有韦荣昌，林俊廷、陆裕光三个军和马济之粤军十八个营外，又新组建两师一旅，比刚入湘时增加六十余营，湘军也大力扩充，总数达一百五十余营（其中湘西军队六十营）。联军在数量上虽与北军相差无几，但武器装备不如北军，加之部队新成分大量增加，缺乏训练，纪律松弛，战斗力已大不如前。

护法联军在北军可能进攻的方向进行防御部署：平江、通城方向之防御由湘军刘建藩、李仲麟所部担任，浏阳至醴陵方向之防御由粤军马济部担任，常德至益阳方向之防御由桂军林俊廷部担任，岳阳至羊楼洞方向之防御由湘桂军主力部队担任。联军在岳阳至羊楼洞约五十公里的防区内，布设多道防御地带。第一防御地带从新店、滩头至赵李桥、羊楼洞以南，长约二十公里，由湘军第一师（欠第一团）和独立第三旅第五团防守，第二防御地带设在羊楼司（又称羊楼市，今羊楼司公社东），廖平铺铁路两侧，由独立第三旅之第六团和桂军韦荣昌所部之一旅防守，第三防御地带设在临湘（今陆城）至桃林一线，由桂军贲克昭旅和湘军第一师之第一团防守，陆裕光所部一混成旅和程潜所部五营驻守岳阳。联军的防御配系，基本是以岳阳为中心，以武（昌）岳（阳）铁路为轴线，实施重点设防，以对付嘉鱼、蒲圻方向之敌的进攻；平江、醴陵方向的防御兵力则比较薄弱。

三、岳阳攻防战

1918年2月5日，冯国璋任命吴佩孚署理陆军第三师师长，令其率所部向蒲圻、嘉鱼一带开进。2月23日，吴佩孚率先头部队抵达蒲圻。在此之前，张敬尧率第七师等部已进抵通城。第二路张怀芝部因被在武穴顿兵主和的冯玉祥旅所牵制，滞留九江，未能按期进入湘东待机地域。

吴佩孚对这次攻湘作战最为卖力。他刚任师长，踌躇满志，急于想利用这次作战树立声威，发展个人权势。因此，他不待所部全部进入待机地域（第二、第三混成旅还在开进途中），便迫不及待地于2月28日发动了进攻。

吴佩孚将进攻部队分为三路；以王承斌之第一混成旅出嘉鱼，经太平口，鼓花洲（今谷花洲）沿江岸进攻联军翼侧；以第三师第六旅（欠步兵第十一团两个连）和曹瑛之第四混成旅进占羊楼洞，牵制羊楼司方面之联军，吴佩孚亲自指挥暂编第五混成旅（由第三师第五旅及炮团、工兵营等组成）、骑兵第三团（易骑为步）和第十一团两个混成连，组成突击部队，向联军防守薄弱的新店镇、滩头（今坦渡）方向进攻，拟从中路突破联军防线，尔后与左路部队钳击羊楼司之联军。2月28日晨，北军发起进攻，于当日击败了守卫新店、滩头的湘军第一师之第二旅，向纵深推进。联军急以湘军第一师之第二团和独立第三旅之第五团，进入滩头以西之万峰山阵地阻击敌人。3月2日，北军再次突破湘军阵地，攻占万峰山。至此，联军的第一防御地带被敌攻破，羊楼司暴露

在敌人面前。这时，岳阳地区雨雪交加，山险路滑，给北军的进攻造成了困难。吴佩孚决定息战数日，等待天气好转，同时电令后续部队赶紧向战地集中。

羊楼司位于万峰山与大药姑山之间，周围山势陡峭，铁路横穿狭谷，是由武昌入岳阳的咽喉要道。联军原将湘军第三旅之第六团、桂军韦荣昌所部一旅，部署于羊楼司至廖平铺铁路两侧的高岭上，控扼险要，林修梅、韦荣昌亲至羊楼司指挥。新店、滩头失守后，赵恒惕部也退守羊楼司。联军以羊楼司为中心，在南起港口，北至黄盖湖一线，构筑了由堑壕、石垒和铁丝网组成的四道防御阵地，准备坚守；同时，派出敢死队，深入太平口、新店一带，袭敌后路。

3月5日左右；吴佩孚所部后续部队相继抵达战地。吴便令曹瑛之第四混成旅由太平口沿江西进，增援第一混成旅。3月10日，吴亲率第二、三、五混成旅和湖北第三混成旅，左起朱楼坡（羊楼洞南）右至黄盖湖，对联军第二防御地带发动进攻。吴部沿山梁推进，攻势猛烈。联军虽依托阵地顽强抗击，仍抵挡不住北军的冲击，当天即有三道阵地被敌突破。11日上午9时，最后一道阵地也落入敌手，联军只得放弃羊楼司，向岳阳方向后撤。这次战斗，北军死伤三百余人，南军伤亡更为惨重。

北军攻占羊楼司后，便于3月11日上午以第三混成旅为第一追击队，经长安驿（今临湘）向新墙方向追击，抄袭联军后路，以第二混成旅为第二追击队，由平水铺经长安驿、路口铺向云溪推进，尔后窥取岳阳；吴佩孚亲率第三师第六旅，于12日向新墙方向续进，企图切断联军退路。

云溪是通往岳阳的最后一个要地，由桂军陆裕光部一混成旅和湘军第一师第一团防守。3月13日，北军阎相文之第二混成旅开始沿铁路向云溪进攻。云溪守军竭力抵抗，阎旅进攻受阻。这时，从北面的临湘（今陆城）和东面的通城方向向云溪撤退的联军，乘机从侧后袭击阎旅，毙伤其官兵四百余名。吴佩孚急令第五混成旅和张敬尧师之补充旅驰援阎旅。北军四个旅并力合击，终于在15日下午攻占云溪。

北军攻占云溪后，立即对岳阳城发起总攻。其进攻部署是：以第一混成旅之第一团为右纵队，沿江岸进击；该旅之第二团和第四旅之第八团（欠第二营）为左纵队，从云溪向岳阳正面进攻，湖北第三混成旅之第五团进驻对岸之白螺，防联军退往江北，海军第二舰队派“楚观”号等四舰沿江梭巡，配合陆军进攻。3月16日上午总攻开始。右路第一混成旅第一团在舰炮配合下，一举攻占要隘城陵矶，其少数先头部队乘胜突入岳阳城内。后见联军溃兵纷纷退入城内，恐被城外北军误攻，又退至城外。17日，各路北军会攻岳阳。这时，联军前线总司令程潜分析战场形势后认为：“一、二两路的敌军兵力皆比我雄厚，……如果我军与曹张部队在羊楼司和平江作胶着战，不能迅速解决，让张怀芝率部长驱进入湘东，我军势必腹背受敌，全军成俘”。据此，他电令前线部队：“如不

能进取，可退后暂将岳阳让出，再行相机进击”。于是，守城联军于17日夜弃城退守新墙。18日上午，北军进占岳阳。

3月21日，联军在新墙遭到北军第二、第三混成旅的夹击，稍事抵抗即向长沙败退。

在守卫岳阳的战斗中，联军防御部队约有三师之众，又有便于防守的地形和事先构筑的工事，本可以打个漂亮的防御战，但结果却完全相反。联军作战之所以失利，主要由于湘桂军将领间矛盾重重，相互掣肘，其次是兵力分散，消极防堵，第三是装备落后，士气不振，骤遇北军新锐，便难于招架。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的“后起之秀”，在这次作战中，他指挥部队对联军的阵地实行猛打猛冲，对联军的据点实行分路夹击，战术运用比较得当，致使联军陷于被动，连连败退。联军在岳阳的失败，使湘省护法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也给直系军阀吴佩孚提供了扬名的机会。

四、平江阻击战

平江是北军攻湘作战的辅助方向。在吴佩孚部向羊楼司发动进攻的同时，由张敬尧指挥的北军约二万人也开始向平江发起进攻。

平江地处幕阜山脉南麓，山峦起伏，地势复杂，北与湖北通城相通，是长沙东北方的重要屏障。护法联军在平江方向担任防御的部队，有湘军刘建藩部十八个营、谢国光部六个营、罗列开部八个营，李仲麟部五个营，共计四十余营约一万五千人。护法军在通城至平江之间设置三道防线：由詹家桥、梧桐山经九岭至白米山为第一道，由大洲。倒流滩经张元岭、梅仙市到桃花洞为第二道，由新市经平江至浏阳为第三道。部队以营为单位分散配置，因险设防。

3月上旬，张敬尧所部第七师和李奎元之第十一师，陈德修之安武军各一部，在通城一带集结完毕。11日，北军分兵多路向平江进犯，以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田树勋为中央纵队司令，率四个团由三埠桥经上塔寺、五里牌、梧桐山、梅仙市向平江进攻；以第十三旅旅长吴新田为右纵队司令，率两个团由詹家桥经长乐街向平江进攻，以第四十二混成旅旅长张敬汤为左纵队司令，率三个团经天岳关，虹桥市向平江进攻，以安武军陈德修所部五营为预备队。

北军发起进攻后，两翼进展较为顺利。3月11日，右纵队击退了防守花凉亭的两营湘军，推进到古米山，金家坳一线。中央纵队进占阿婆岭、梧桐山；其第一团进至潭下时，遭到联军英勇阻击，14日拂晓，在一营安武军支援下，始将当面联军击退。左纵队于11日进占麦市，次日攻占盘石铺，直插天岳关。至此，湘军第一道防线全被突破。

天岳关是平江北面的重要屏障，“悬崖绝壁，高耸群山，鸟道羊肠，艰危万状”。护法军占据山顶，严密防守。3月14日拂晓，张敬汤部在炮兵掩护下，分两路强攻天岳关。护法军居高临下，猛烈射击，连续粉碎

敌人三次进攻，毙伤敌营长以下官兵五百余名。16日，北军派第十一师之四十四团由杨芳林市进攻龙门关，得手后抄袭天岳关之侧后，同时派预备队一营由绝壁攀藤附葛而上，与守军展开白刃格斗。护法军两而受敌，遂放弃天岳关退守梅仙市。

3月18日，北军继续进攻，相继占领了大洲、倒流滩，张元岭、桃花洞等要地。21日，田树勋之中央纵队进逼平江以北十六公里之梅仙市。该处奇峰突起，形势险要，护法军有六千余人扼险据守。北军连续发动进攻，激战两日，仍无进展。张敬尧急令陈德修率安武军由月田赴援，田树勋亦令所部第二十七团迂回至梅仙市西南，袭击护法军侧背，正而部队趁机猛烈进攻。护法军腹背受敌，向平江撤退。

张敬尧不让护法军有喘息机会，除令正面主力部队冒雨追击外，又令左纵队司令张敬汤率一个团连夜向平江侧后穿插，抄袭护法军后路。3月22日拂晓，穿插部队进抵三阳市，抢占附近高地，猛烈袭击护法军侧背。护法军后防空虚，又见岳阳已经失守，遂无心再战，放弃平江南撤。22日上午，平江为北军占领。

在北军疯狂向岳阳和平江进攻时，驻长沙的湘桂粤军“联帅”谭浩明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在岳阳被占之日，谭曾发布安民告示，声称“岳阳小挫，兵事之常，本帅坐镇，自有主张，……”。但到了25日，这位“自有主张”的三省“联帅”竟惊慌失措，率所属桂军慌乱地撤离长沙。

桂军撤走后，长沙成为不设防的城市。3月26日晚，吴佩孚第三师不费一枪一弹开进长沙，张敬尧部也随后赶到。这时，冯国璋已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于3月27日任命皖系军阀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同时电令吴佩孚立即率部。向湘南进军。

护法联军平江之败，除兵力对比居于劣势外，同样由于分散设防，单纯防御的结果。加上所守据点又忽视保障侧后的安全，以致险要之地屡遭北军迂回夹击而被迫撤守。

五、湘东反击战

1918年4月初，段祺瑞政府见湖南战事发展顺利，而琼州的龙济光和福建的李厚基都已出兵攻粤，在此形势下，确定了北军下一步总的作战方针：“定湘、援龙同时并举”，“虚攻衡宝，以掣敌势。一面阳出郴州援粤，阴由闽急攻潮惠，奇兵制胜”。根据以上方针，除令浙江派一师赴闽，江西编一混成旅趋大瘐岭，以牵制粤军，“遥增龙军之气”外，令在湘的北军分三路向南推进。以吴佩孚之第三师及一、二，三、四、五混成旅为中路，出长沙经湘潭向衡山，衡阳进攻，以张敬尧之第七师及补充旅、混成旅为右路，由长沙经湘乡，永丰攻宝庆；原第二路军之施从滨第一师、张宗昌第六混成旅、张之杰第二十三旅及李传业安武军十五营为左路，经醴陵南下，攻攸县、茶陵；另调奉军两旅驻守长沙。北军企图于旬日之内占领全湘，然后直趋粤省。

联军自弃守岳阳、长沙后，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决定：湘桂粤联军全部退驻衡山，永州一线，“暂取守势”，商请川、滇，黔靖国军立即出川东下，进取鄂西，以分敌势，桂粤两省集中全力进行讨龙作战，以肃清后方隐患。这时，潭浩明已率桂军退到祁阳，宝庆地区，把湘军甩在湘潭，衡山一带。

湘军退守衡山等地后，程潜、赵恒惕、刘建藩、林修梅、林祖涵等举行紧急会议，决定依靠湘军自己的力量，对敌组织顽强抵抗，确保湘南。他们分析认为，在南犯的三路北军中，中、右两路是主力，唯左路张怀芝所部系由四省军队凑合而成，指挥关系紊乱，战斗力较弱，如将该路敌军击破，则其余两路必不敢轻进。于是决定以赵恒惕为湘东前线总指挥，刘建藩为总参谋，集中退到衡山一带的湘军一万一千余人，并联络退守安仁的马济所属粤军和李书城之援鄂军，共约二万人，对北军左路军实施反击。程潜、林修梅、吴剑学等率四千人扼守衡阳，阻击从正面进攻之敌。

北军左路军进展迟缓，在吴佩孚，张敬尧部进占长沙后，才由赣西进入湘东。该军企图由醴陵南下，沿湘东大道进取攸县，然后直薄粤省。4月15日，其先头部队施从滨师占攸县，不久，李传业之安武军和张之杰的赣军一旅也进抵攸县，分别驻于攸县城外之马鞍山、桑田、小集、朱亭等地。20日，施从滨师第一、第二旅由攸县分别经马子坡、桑田继续南进，企图进据安仁，进而攻取永兴、郴县，尽快实现直指广东的作战计划。

根据敌军上述行动，赵恒惕等率部于4月20日由萱洲渡湘江，秘密进入霞流市、吴集和青山冲地域，待机歼敌。湘军拟由五个方向对正在行进中之施从滨师发起突然攻击：驻安仁之马济率粤军自渌田经桑田出和尚坳、五里牌，攻攸县之南，刘建藩所部由草市、杨林出马鞍山，经马子坡、皂角市攻攸县之西，赵恒惕所部分成两路，一路出黄泥塘以配合刘建藩部出击，一路由毛陈桥攻敌之侧背，李仲麟郎攻小集，李书城部为总预备队。

4月21日，刘建藩率邮首先深入到攸县与桑田之间的皂角市，与粤军一道，完成对施从滨师部队的合围。双方激战两昼夜，施师损失大半，余部向茶陵逃窜。

4月23日，驻攸县之北军一部，向刘建藩部侧后迂回，适与赵恒惕师出毛陈桥之部相遇，遭到迎头痛击，缩回攸县。下午，湘军合力向攸县城发起总攻，守敌不支，分向醴陵、茶陵方向逃窜，湘军一举攻克攸县。这一仗，共毙敌千余名，俘敌数百名，夺获飞机两架。湘军也伤亡数百人。

4月24日，湘粤军分数路追击敌人。刘建藩和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沿新市，黄土岭（今皇图岭）大道向醴陵攻进；第一师第一旅由新市出贺家桥，作为策应；马济粤军一部守攸县，一部进击茶陵，李仲麟部攻克

小集后，即会合李书城郎反击朱亭之敌，尔后向渌口推进。

北军为掩护部队后撤，以一部兵力扼守要地黄土岭。4月25日，湘粤军与扼守黄土岭之敌展开激战。赵恒惕命刘建藩部攻敌左翼，湘军第一师第二旅和马济粤军一部攻敌右翼。同时，逼近醴陵的第一师第一旅也举旗南下，回击黄土岭。27日，湘粤军发起总攻，据守黄土岭之张宗昌第六旅及李传业安武军拚死抵抗。赵恒惕亲临督战，指挥湘军从正面连续突击。北军终于不支，遂放弃黄土岭，分别逃向萍乡、浏阳和株洲。湘军乘势猛追，连克醴陵，株洲，前锋距长沙省城仅数十里。经此一战，北军左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施从滨师仅剩七百余人，张宗昌混成旅仅剩两营，李传业安武军也死伤过半，损失枪炮子弹不计其数。张怀芝只身逃回汉口，向攻湘军总司令曹锟诉说因张敬尧不出兵救援，致遭失败，为自己开脱。

湘军反击获胜后，准备从株洲渡河抢攻白石港。刘建藩在渡河时不慎落水身亡。张敬尧闻左翼兵败，一面急调进攻宝庆之田树勋旅退保长沙，一面令正在宁乡“清乡”的李奎元第十一师和奉军一部前往株洲阻击湘军。同时，令已于4月21日攻占衡阳的吴佩孚部向江东卷击，威胁湘东护法军之后路。这时，湘军因遽失勇将，又有腹背受敌之虞，赵恒惕遂下令放弃株洲，醴陵，留李仲麟部在茶陵担任警戒，主力撤往酃县和永兴。北军乘势逼进，田树勋旅再次攻陷宝庆，吴佩孚部连陷安仁、攸县及耒阳。至此，湖南大部又为北军所占。护法联军全部退守湘桂边界地区。

湘东反击战是护法战争中一次最出色的作战。湘军将领在岳阳失守，桂军南撤，北军气势逼人的情况下，不畏强敌，决心联合粤军，坚持实行反击作战，并能冷静地分析敌情，决定集中兵力，打敌比较薄弱之一路，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此外，在战法上，汲取了前次作战失利的教训，由单纯防御改为主动进攻，在统一指挥下，对正在运动之敌实施多路突击，攻其不备，出奇制胜。首战获捷后，又乘胜追击，不给敌人以喘息时机，从而取得了歼敌万人的重大胜利，其战斗精神和指挥艺术都是值得肯定的。

六、湘西争夺战

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后，湘西辰沅道尹张学济派人赴广州谒见孙中山，表示愿意响应护法。孙中山遂任命张为湘西护法军总司令。1917年10月下旬，张学济和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镇守副使兼第五守备区司令周则范、第二师第三旅旅长陈嘉佑，在沅陵，洪江，常德等地相继宣布独立。张学济推旧友胡瑛为护法军湘西招抚使，永绥镇总兵谢重光为护法军副总司令。湘西护法军共有一万一千余人。

张学济响应护法后，率本部东进桃源。不久，应湖北石星川吁请，率部援鄂，旋随荆沙靖国军退往鄂西。

1918年3月，护法联军在岳阳战败，大军南撤，湘西护法军便受到严重威胁。这时，据守常德一线的湘西护法军有田应诏，胡瑛所部共六千余人，周则范部约三千余人。北洋政府令原第十七师师长陈复初，在湖北长阳招抚旧部，恢复该师建制，然后会合原湖南第四守备区司令王正雅所部，进攻湘西。4月2日，陈复初率十三个营约六千余人由沙市出发，经渔洋关进窥湘西。

湘西护法军急电唐继尧，刘显世，请求滇、黔军赴湘救援。唐、刘以湘西系滇、黔门户，不能见危不救，遂派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卢焘和游击司令王华裔分别率部开赴辰州（今沅陵），洪江，支援湘西护法军。

4月23日，北军陈复初与王正雅率部从临澧出发，经朱日桥进攻常德，并电请张敬尧令李奎元第十一师分由益阳、宁乡进逼汉寿，“俾壮声援”，请吴光新旅一部进驻公安及津市，澧县一带，相机策应。

4月25日晨，北军陈、王部在八里铺与湘西护法军接战，田应沼，周则范牢部且战且退，扼守鳌山。下午3时，北军夹击鳌山，护法军不支，弃鳌山后撤。

田、周两军在鳌山失利后，拟与北军妥协，电邀张敬尧派人到常德谈判，表示护法军移驻桃源，将常德让给北军。这时，已进至麻阳，辰州一带的援湘黔军闻田、固有妥协撤退之意，急在辰龙关至兴隆街一线展开，准备防堵，并警告田、周，如“遇有后撤者，必将迎头痛击”。田、周只好继续对北军作战。

5月4日，田，周派人持函赴陈师司令部，诡称护法军将按前约移驻桃源，欢迎陈复初军人驻常德。陈见函不疑，率军入常德城。及至城内，突然伏兵四起，田、周则率部从外面包围该城，实行内外夹攻。北军突遭攻击，军心大乱。陈复初率部左冲右杀，夺路而逃，后只身逃往长沙。陈部朱泽黄旅退保津市。田、周联合林德轩，胡瑛等部，乘胜追击，于6日克复临澧，5月15日，田，周致电冯国璋，要求“休兵息战”，划地自守。此时，抵达津市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也致函田、周，希望湘西各军停止进攻，让出常德、桃源，作为南北两军缓冲之地。湘西军队已无心再战，同童与冯妥协。5月下旬，田，周率部撤出临澧、常德。冯玉祥旅进入常、澧后，也不再向南进攻。李奎元十一师则于6月中旬乘机占领了益阳、汉寿。

北军在第二次攻湘作战中，共投入兵力约十万人，并起用吴佩孚为主战场指挥，取得了明显战果。尽管北军付出了巨人的代价，但终于占领了湘省大部地区，基本上实现了预定计划。

护法联军之所以遭到失败，一是由于战前顿兵乞和，内部矛盾加剧，部队士气下降，二是缺乏战略协同，先是不与湖北靖国军配合作战，后又不与湘西护法军密切协同，三是在岳阳、平江防御战中，实行

单纯防御。后来虽然取得了湘东反击战和湘西伏击战的局部胜利，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颓势，不得不退守湘桂边界地区。幸好北军主将吴佩孚在攻占衡阳后，以部队久战力疲为借口，顿兵不前，并于5月25日起在耒阳与湘军师长赵恒惕秘密谈判，约定从6月15日起，双方于宝庆至茶陵一线停止交火，才使护法联军有了喘息的机会。

吴佩孚的自动停战，虽然打乱了段祺瑞的进攻部署，加剧了直皖军阀间的矛盾，但同时也加速了桂系军阀与北洋直系军阀的勾结，因而不仅没有给孙中山的护法事业造成有利条件，反而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三节 滇黔靖国军攻川之战（1917年7月~1918年3月）

一、战前滇、黔军与川军的矛盾

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8月，蔡离川去日本治病，由罗佩金代理督军，戴戡代理省长。当时，驻川军队共约八个师，其中川军五个师，滇军两个师，黔军一个旅。罗佩金利用北京政府下令裁军的机会，将滇，黔军改编为“国军”，川军则仍为地方军，并缩编为三师一旅，废除特种兵。此举引起了四川军政各界的严重不满，滇川矛盾随之迅速激化。

1917年4月，罗佩金将川军第四师遣散，令第五师缩编为旅，第一，第二师裁减兵额，并拟以滇军将领刘云峰接替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刘存厚参加过护国战争，在川军中有一定影响。他对罗佩金缩编川军，排除异己，心怀不满，于4月17日秘密召集所部军官会议，决定联络川军第一，三、五师，实行武力驱罗。

4月18日，刘存厚部突然袭击押运第四师枪械回成都的滇军。双方在成都城内持续战斗了七八天，最后达成妥协，确定JII、滇军均撤出成都，刘存厚免职，罗佩金辞职，由戴戡暂兼四川督军。成都由黔军填防。

双方撤兵后，刘存厚仍留一部兵力驻守成都西、北两门。戴戡到成都后，多次催促川军留城部队撤走，刘存厚执意不从。戴与罗佩金密谋以武力驱逐成都川军，进而解决刘师全部。7月1日，张勋在京复辟，授刘存厚以“四川巡抚”伪职。戴戡认为时机已到，便于7月5日以“讨逆”为名，命城内黔军攻击西、北两门的刘军。刘军里应外合，夹击城内黔军。黔军战败，弃城退走，行至仁寿县时，又遭川军截击，戴戡被击毙（一说自杀），黔军余部溃散。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川军与滇黔军之间的矛盾。

二、云南靖国军的兴起

当刘、罗、戴军阀在四川混战之际，全国各派政治力量正围绕着要否坚持《临时约法》问题展开新的尖锐斗争。此时的云南督军唐继尧，由于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历史关系，还多少保留一些维护约法、拥护共和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反对北洋军阀破坏约法，解散国会，指斥北洋军阀“以宪法不良为借口，以暴民专制为号召，实则不慊于民党，不甘于共和，时思破坏，以复其北派把持顽固之旧，民国之危，有如累卵”。唐继尧决定联合滇黔川军，对段祺瑞组织的督军团实行武力“干涉”。为了全力对付北洋军阀，唐继尧对于川省混战，最初采取调解态度，多次致电刘、罗、戴等人，要求他们“尽释前嫌，共同携手，以维大局”。

1917年6月上旬，唐继尧积极进行“北伐”准备，对滇军实行战时扩编。旬日之间，即将驻滇的三个师、一个警卫军扩充为五个梯团（每梯团相当于一个混成旅），共约二万余人。6月12日，唐继尧致电孙洪伊（后任护法军政府内务部长），告其滇省“已下动员令，克日开拔”。同时，致电叙州（今宜宾市）罗佩金，要求驻川将领“严守纪律”，注意“联络川滇感情，共维大计”。

当张勋复辟的消息传到云南，并闻刘存厚“甘受伪职，叛攻成都”，唐继尧感到“义愤填腐，匡扶有责”，立即打起“讨伐复辟叛逆”的旗号，声明将滇军改称为靖国军，准备“躬率三军”，借道川境，讨伐张勋。其实，讨伐张勋是假，借机入川是真。这从唐继尧对李曰垓一封电报的批复中可以得到印证。7月3日，原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李日填，从广东致电唐继尧，指出：北方政局混乱，派系纷歧，陆荣廷正在“巩固两粤”，“先谋自固”，全国“已渐呈割据之势”，因此，滇军应先发制人，进占四川。李还提出“由镕（罗佩金）与川军开衅，即借口进兵，占领成都”，这是取川的“第一策”。唐继尧批复道，“刘已叛，当然取第一策”。表明了以“讨逆”为名攻占四川的用心。7月16日，唐继尧以护法讨逆的名义通电讨伐刘存厚，川滇之战全面爆发。

由于唐继尧响应护法是为了借机扩张地盘，发展个人势力，因而在以后的战争中，实际上既不奉行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也不服从军政府的统一领导和照顾护法战争的全局利益，却与桂系军阀沆瀣一气，阻碍护法战争的顺利发展。

三、双方的兵力编成及部署

作战动员令下达后，唐继尧即将滇省的五个梯团改编为六个混成旅，两旅为一军，并令顾品珍，赵又新立即在川省招兵买马，将所部两师扩编为两军。其编制序列如下：顾品珍为靖国军第一军军长，赵又新为第二军军长，罗佩金为总司令；庾恩畅为第三军军长，黄毓成为第四军军长（以上两军山唐继尧直接指挥），驻粤两师扩编为第五、第六两军，张开儒，方声涛为军长，拟以叶荃为总司令。与此同时，黔督刘显世也令师长王文华率黔军两个旅入川协同作战，并推唐继尧为滇黔联军总司令。滇黔军入川兵力约五万人。唐继尧的对川作战计划是：顾、赵两军扼守川南资中，内江和叙州，泸州诸要点，牵制当面川军，由滇入川之第三、四军和黔军伺机夺取重庆，然后进攻成都，或分兵东下，攻取武汉。

“刘罗、刘戴之战”后，川军分为三股势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明守中立，实助刘存厚，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亦称中立，但倾向滇黔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和许多绿林武装，公开站在刘存厚一方。刘存厚在原第二师两个步兵旅和骑兵，炮兵团基础上，招收了被遣散的原第四师士兵，新组建三个混成旅和一个独立旅，总兵力约二万人，加上钟体道之第三师，共约三万余人。在“刘戴之战”后，第二师沿岷江向南推进，占领岷江下游各要点，其前锋距叙州仅三十华里，第三师进据金堂，乐至、洫

南，遂宁各要地，控制沱江至涪江之间广大地域，其前锋与防守资中之滇军对峙。

四、川南争夺战

（一）战前态势及双方作战企图

戴戡死后，冯国璋特任四川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暂代督军。这时，北洋政府表面上要周道刚调解滇、黔、川军间的冲突，实际上企图利用四川的混乱局面，扩充亲北洋的势力，把滇黔势力排挤出川。1917年8月6日，北洋政府任命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带领两个旅入川“查办”滇黔川军冲突。不久，又命陕南镇守使管金聚率一混成旅入川，支援川军作战。

在北洋政府的怂恿下，刘存厚等有恃无恐，决心继续对滇军作战，达到将滇黔军赶出川省的目的。其作战方针是，先打滇军，后攻黔军，三路出兵，分进合击。具体计划是：第一师由东向西、第三师由北向南，夹击据守资中、内江一带之滇军，尔后第二师攻叙州，第三师攻富顺，第一师攻合江，得手后三路对进，会攻泸州。

8月下旬，第三师之张鹏舞、李挽澜两旅，由安岳向资中推进，第一师刘湘旅进占隆昌。代督军周道刚乘机劝说滇军顾品珍部让出资中，退往叙州以南。顾因所部防区孤立突出，如。固守资中，有被川军包围吃掉的危险，遂答应周的要求，于9月6日撤离资中、内江，退守自流井（今自贡市）。第三师乘机进据资中、内江。

在此前后，云南靖国军五个混成旅，分别抵达叙州和泸州。9月22日，第四军军长黄毓成也进抵泸州。此外，黔军师长王文华也率所部进抵綦江，准备配合滇军作战。10月4日，唐继尧由昆明启程赴贵州毕节，亲自指挥对川作战。

但是，这时四川战场的形势对滇军十分不利。其一，川民视滇军为侵略军，实行坚壁清野，骚扰袭击，配合川军打击滇军，使滇军四面受敌，其二，滇军曝师他省，军心不齐，官兵思归，斗志衰退，其三，滇省连年用兵，弹药匮乏，粮饷不济。面对这种情况，滇军将领中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滇军应“克日进取，速攻渝城（重庆）”，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暂谋收束，审机观变”。唐继尧坚决反对收束，他认为：“（1）我军若不进取，则北军集中重庆后，联合川军协以谋我，使我措手不及，进退均极困难……；（2）我军内容不整，若不冒险进取，愈缓愈馁，必至不战而溃……；（3）两广正在进行，陆（荣廷）且极力援湘，龙（济光）亦积极筹备，我军若不进取，他方进行，必受影响”。因而坚决主张滇军“冒险进取”，“速取渝城”，以先声夺人，争取主动，改变滇军的不利态势。据此，命黄毓成军之李友勋旅和顾品珍军之何海清旅，分出合江、永川，向江津潜进，配合黔军王文华师会攻重庆。

刘存厚尽管已经识破滇，黔军的战略意图，但认为江津、永川有周道刚之第一师，重庆有熊克武之第五师驻守，而且北洋军吴光新部已经入川，重庆必无大虑，决定乘虚进攻叙、泸，先收复川南要地，尔后再回攻窥渝之滇军。

从双方作战方针看，川军重前轻后，潜伏着危机，只有在既能攻取叙泸，又能迅速抽兵回顾重庆的情况下，才能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滇军分兵作战，要想争取主动，固然叙泸之战关系甚大，但攻渝之战关系更大。如能攻克渝城，既可切断北军援川之主要通道，又可置川军于腹背受敌之困境，出现全盘皆活的有利态势。而滇黔军能否顺利克渝的关键，在于守渝之川军第五师的态度。于是，唐继尧加紧联络熊克武，促其响应护法，配合滇黔军作战。

（二）内江、荣县之战

10月10日，滇军缴获川军10月9日的一份作战命令，得悉川军将于一周内实施攻取荣县。自流井，威远，并相机进攻綦江的作战。为了先发制人，滇军决定提前发动进攻。10月12日，颇品珍令金汉鼎宰三个团夺回内江。金旅于当晚出发，隐蔽开进．13日与川军在白马庙接战。次日攻克白马庙，直趋内江城。激战两日，激城的川军张鹏舞旅弃城逃走。滇军于15日占领内江。当晚，川军第三师李挽澜旅偷渡沱江，占领内江城郊白塔寺高地，向城内发炮轰击，掩护步兵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滇军损失较大。后金汉鼎组织敢死队攻下了白搭寺，李旅被迫退走，内江防御始趋稳固。

由于滇军进攻内江，四川代理督军周道刚公开放弃“中立”立场，通电声讨滇军。10月22日，川军第一、二、三师约四万余人，对滇军发动全面进攻。其部署是，第一师之第一旅（加强第二旅一个团）由永川直攻泸州，第二师与陈洪范、刘成勋两混成旅及赖心辉等四个支队进攻荣县，汪可权，舒荣衍两派进攻威远，尔后向叙州发展，第三师反攻内江，另以龙光独立旅进攻自流判，得手后与一师夹击泸州。23日，第三师顺利攻下内江，滇军金汉鼎旅分路撤往自流扑和泸州。10月26日，川军第一师经永川攻占北雅镇，尔后进逼员泸州。中路第二师之第三旅子25日攻占威远后，以主力配合第三师进攻自流井，以一部兜击荣县。防守荣县的滇军第一军田钟谷旅奋力抗击，毙伤川军千余名。后冈川军抄袭后路，遂于31日放弃荣县，退往叙州。川军第二师各旅乘势追击，兵临叙州。

（三）泸州、叙州之战

泸州驻有滇军赵又新，黄毓戌两个军部及所属两个旅。但是，赵、黄两军不相统属，各自为战，其中一个旅又多新兵，无作战经验。因此，滇军在泸州的防御薄弱，除防守城区外，城郊各要点未置一兵。11月10日，周道刚委徐孝刚为川军第一师总指挥官，指挥该师从泰安场进攻泸州，另有第三师分别由富顺，荣昌向泸州进攻。16日，川军第一，

三师对泸州发动总攻，迅速控制了五峰顶、小市诸要点。在川军攻势面前，滇军各级官长“各为顾贷财、保妻子之计，不知勇猛督率所部，生死与争”，以致素称“铁打泸州”的坚城，子21日轻易失守。滇军经临田坝，纳溪向南溃退，拥挤践踏，互不相顾，沿途又遭棒匪袭击，“死伤相继，尸血载道”，部队损失过半。川军渡江追击，于11月23日攻占纳溪。

在川军第一、三师攻占泸州两日后，第二师也对叙州发动了总攻。滇军守叙总司令为赵钟奇，下辖马、赵式铭两旅，分别防守宗场、炊锅山、白沙场、真武山、翠屏山等高地。11月23日上午，川军第二师以三旅之众，并联络棒匪数千，分别从白沙场、宗场两个方向对叙州发动进攻。防守宗场之滇军一个团初抵战地，不熟地形，在敌两路夹击下放弃阵地，撤往吊黄楼。防守白沙场，象鼻场之滇军闻宗场失守，因翼侧暴露，亦弃守后退。吊黄楼系叙州北面之咽喉要地，滇军竭力据守。川军见吊黄楼难于攻取，遂一面在此佯攻，牵制滇军，一面派兵由上游渡过岷江，从翼侧攻击翠屏山，同时派遣便衣队潜入城内，袭击滇军司令部。防守吊黄楼之滇军见敌人兜击侧后，军心摇动，纷纷放弃阵地，向叙城撤退。赵钟奇等将领下令紧闭城门，不知所措。28日，滇军放弃叙州城，“分头乱窜，有由柏树溪退者；有向筠连退者，有经牛街镇雄方向退者，沿途均被团防，棒匪堵击，枪支大半散失”。此战，滇军伤亡二千余人，弹药辎重损失殆尽。11月29日，赵钟奇率残部退至安边，旋又退守横江。川军占领叙州后，乘势南进，连陷高县，庆符、珙县，筠连，兴文等县，大有进窥云南之势。

滇军在泸州，叙州之战中所以遭到惨败，主要由于防守泸、叙的兵力弱于川军；其次是唐继尧远驻毕节，却直接指挥各旅作战，以致前线各部队之间互不协同，举措紊乱，此外，士兵普遍存在厌战惧战情绪，以致稍战即溃。泸、叙失守后，唐继尧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攻渝作战上，他一面下令攻瀜部队加紧作战，提出“我军可胜不可败”，一面令新组建的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火速入川，牵制川军，准备一旦重庆得手，立即反攻叙、泸。

五、重庆之战

川军攻占泸州、叙州后，未能按预定计划牵制住攻渝之滇军，反使自己被牵制在叙、泸等地，进退两难。同时，川军的后方也动荡不安。1917年11月土日，川边屯殖使张煦在西昌宣布独立。唐继尧委张为靖国军第七军军长，令其率所部三十营进攻汉源，威胁成都。不久，由孙中山派遣入川的中华革命党人黄复生、石青阳和前川军将领卢师谛、颜德基等人，招集旧部，散兵游勇和绿林武装，组成四川靖国国民北伐军，在永宁、合江和綦江一带活动，配合滇黔军进攻重庆。于是，四川的军事形势发生了不利于川军的变化。

滇黔军攻渝之战早于1917年11月初即已开始。滇军何海清，李友勋两旅乘川军第一师西进攻泸之际，迅速由两翼袭取永川和合江，切断了

攻泸川军与江津，重庆守军的联系。与此同时，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指挥该师和石青阳之四川靖国军一部，由綦江分兵两路向重庆推进：一路经广兴场、夹滩场进迫江津；一路出龙岗经界石进攻三百梯，拟从正面进攻重庆。该路部队约两个团，秘密开进，隐蔽接敌，顺利通过龙岗、界石，突然于11月12日晨将防守三百梯的北军吴光新部一个营团团包围，并发起猛烈进攻。北军旅长李炳之亲率一团驰援，凭险顽抗。黔军见正面进攻受阻，便分兵一部，企图从侧翼经鹿角场、黄角椏袭击重庆，结果遭到北军李旅另一个团的节节抗击，进展缓慢，其后路又受到自土桥方向迂回而来的一营北军的威胁，被迫于14日退守鹿角场。

此时，另一部黔军向江津发动了进攻。江津位于长江南岸，距重庆数十公里，是由长江北岸进攻重庆的重要通道。黔军以四个营的兵力，于11月11日秘密进抵江津外围，并控制了龙门滩、夹滩场等要地。12日晨，向江津城发起进攻，顺利攻占了城南高地。这时，防守江津之川军仅第一师一个营，周道刚急令刚抵重庆的管金聚之陕军第二梯团（步兵两营，骑、炮各一连）增援江津。陕军赶到江津后，以一营扼守沿江要隘，另一营配合川军仰攻城南高地，经两昼夜战斗，终将黔军击退。20日，滇军李友勋旅赶到，配合黔军一举攻克江津。

11月26日，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抵达江津，与黔军师长王文华商定协同攻渝作战计划。其要点是，滇军负责阻截可能由泸州援渝之敌，并以主力从江北分由走马岗和江津指向重庆，为助攻，黔军以一部固守江津，白沙，其主力沿长江南岸进攻黄角椏、连山一带，为主攻，电请唐继尧转饬赵又新、黄毓成所部反攻泸州，以牵制叙，泸之敌，掩护攻渝部队之侧后安全。唐批复：“叙泸方面，正力图恢复。重庆须早日攻下，方有办法。计划既商定，此间不为遥制”。由此观之，唐继尧似乎汲取了叙泸之战的教训，改变了对前线部队统制过死的做法。

11月30日，滇黔川靖国联军按计划分路向重庆发动了进攻。江北滇军分为两路：右路李友勋旅由江津向白市驿方向推进。当日克铜罐驿，12月1日进占陶家场，福寿场，次日克白市驿。左路何海清旅由永川进击，于12月2日克走马岗、老关口，3日进迫浮图关。与此同时，长江南岸之黔，川军也对铜元局、黄角椏之敌发动了进攻。该方向有北军吴光新所部之李炳之旅和川军第一师之两营特种兵，共约千余人。黔军投入作战的部队共九营，加上石青阳所部四川靖国军，共约二千人，12月1日，黔川军分左右两路奋勇进击，王文华“严令前敌各军，虽伤亡至五六营以上，不准稍退一步”。血战数日，黔军共伤亡营长以下官兵约千人，终于在12月4日上午进据真武山和黄角椏，与重庆仅一江之隔。

周道刚、吴光新见滇黔川联军兵临城下，感到重庆难保，遂弃城而走。吴光新部于12月3日夜乘船退往宜昌，周道刚率所部于11月4日晨退往合川。4日下午，滇黔川联军进占重庆，请熊克武出面维持秩序。13日，熊克武致电孙中山、陆荣廷、唐继尧等，宣布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

六、成都之战

滇黔川联军攻占重庆后，即确定了以占领成都为主要目标的全线进攻作战计划。进占重庆的部队分兵三路向成都进发；四川靖国军为右路，由重庆出璧山，经青木关、合川西攻成都；贵州靖国军为中路，由重庆出璧山，大足，经安岳、乐至进逼成都，滇军顾品珍部为左路，由重庆西攻永川、荣昌，进取内江，资中，尔后北攻成都。与此同时，退驻川南的滇军赵又新，黄敏成等部由永宁北攻纳溪、泸州，然后一路循长江反攻叙州，一路经富颇进攻自流井，得手后，再进取威远、荣县，经仁寿进逼成都。

联军发起进攻后，进展颇为顺利。12月15日午前，滇军赵又新部攻占纳溪，继向泸州进逼。18日，川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王缶合川发出通电，宣布护法，驻守泸州之刘湘第一旅随之动摇。19日，滇军一举攻占泸州，刘湘旅退往永川。22日，顾品珍部攻占永川，川军第一师代师长徐孝刚暨刘湘旅退往隆昌。

12月18日，冯国璋特任刘存厚为四川督军。1918年1月1

日，甘心附逆的刘存厚在成都正式就职，并电饬徐孝刚固守隆昌，阻止滇军前进，准备调集兵力，调整部署，进行反击，夺回泸州、重庆。然而，未等川军反攻，滇黔川联军先敌发动了更为强大的攻势。其部署是：滇军顾品珍部由永川沿大路攻取隆昌、内江、赵又新部一由泸州攻富顺，一向叙州进攻，以为牵制，黔军王文华师之一部出大足，经吴家铺助攻隆昌、内江，川军石青阳部进攻安岳，乐至，熊克武部一由安岳取遂宁，一攻顺庆，叙南赵钟奇部牵制盘踞叙州之川军，策应主要战场行动。据此部署，顾品珍所部于1月2日占荣昌，8日下隆昌，15日占内江，熊克武指挥之川省靖国军于1日克渠县，3日克遂宁，9日克顺庆（今南充）、保宁（今阆中），黔军王文华师占领了大足等地。此后，赵又新所部于“日占富顺，叙南赵钟奇进占屏山，筠连。靖国联军的强大攻势，不仅打破了刘存厚反攻泸州，重庆的计划，而且进一步削弱了他的实力。刘、钟、周各部被压缩在叙州、自流井、简阳至成都的狭长地域内。

刘存厚面对险恶形势，一面迭电北京政府，请速接济枪支弹药，并请转令陕、甘、鄂三省督军迅速抽调劲旅增援，同时再次调整兵力，准备对联军实行局部反攻，企图夺回部分失地，稳住阵脚，坚守待援。1月16日，刘存厚军北路司令杨肇锡反攻遂宁获得成功。20日，南线之舒荣衢旅打退赵又新部的进攻，夺回富顺，中路钟体道师也击败进攻安岳之黔军，推进到永清场。刘存厚军反击作战，给滇军造成较大损失，但其所属部队亦因数月激战，已成强弩之末，局部反攻虽获小胜，终因兵力不敷，无法摆脱被动态势。

1月23日，冯国璋任命刘存厚兼北洋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舒荣衢师第四十一旅旅长，陈洪范为第四十二旅旅长，刘成勋为陆军第二十二

混成旅旅长，汪可权为第二十三混成旅旅长，企图用将刘存厚所统之川军纳入北洋军序列的办法，继续把刘牢牢地拴在“武力统一”的战车上。北洋政府这一招果然见效，刘存厚在接到命令的当天，即致电北洋政府，声称要作战到底，“决不与滇黔议和”。然而，这种顽固态度，并未给川军带来任何希望。

1月25日起，川南滇军分兵四路向叙州、富顺、内江和资中等地发起猛烈进攻。刘军因伤亡惨重，弹药匮乏，后援不继，战力锐减，整个防线呈瓦解之势。30日，刘存厚急电段祺瑞，谓“饷械全罄，各军退却，叙州，遂宁相继失陷，维持力竭，乞速援救”。但此时北军在湖南新败，岳阳失守，北洋政府本其必先争湘图粤的既定方针，正急于改变湖南战场的被动态势，无力顾及四川方向，因此，对刘存厚的告急电，未予回音。

1月31日，滇军攻占叙州，2月2日攻占内江，富顺，6日攻占自流井。刘军一、二、三师龟缩于乐山，简阳至成都：间狭小的地域内。

为了保存实力，应付危局，刘存厚于1月31日通电宣称，将四川督军一职让给熊克武，“自己解甲归田，以明索志”，要求与联军停战议和。这一缓兵之计当即被联军识破，认为“所云停战，实系缓兵”。唐继尧、熊克武要求刘克日率部撤出四川，退往陕西。刘存厚默而不答。于是，各路靖国军继续挥兵前进。

缓兵之计落空后，刘存厚决心以所余兵力固守成都外围外要点，等待北洋政府救援。他分析战场形势，认为滇军在南路，黔军及熊克武所部在北路，“两相比较，实南强而北弱”，因而决心对南路之滇军取守势，对北路之黔军取攻势。为此，决定抽调防守资小的部分兵力至简阳方向，准备伺机反击。

2月上旬，防守简阳的川军第三师未等资阳之援兵赶到，就仓促协同第二师之第三混成旅，对乐至之黔军发动进攻，攻古该镇后，又继续进攻安岳。中途遭到黔川联军迎头痛击，旋即放弃乐至，回守简阳。联军乘势追击，在乐至以西之施家坝遭到由资中和乐山赴援之刘存厚军猛烈阻击。

正当简阳刘军顽抗联军进攻之际，第二师所属之刘成勋、陈洪范两旅于2月16日在乐山宣布参加护法。18日，第一、三两师全体军官和第二师之汪可权；舒荣衢旅，也宣布与西南靖国军一致行动，并推熊克武主持四川军政事务。

刘军纷纷参加护法，滇黔军得以长驱直人，于2月18日占领简阳，进逼成都。熊克武所部也乘势攻占淮镇，向成都挺进。

刘存厚见所属部队分崩离析，无法再战，遂干2月19日伙同城防司令田颂尧等撤离成都，退往川北。3月8日，孙中山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历时八个月的四川护法战争，至此告一段落。

滇黔川联军攻占成都后，唐继尧于3月下旬开始组织部队援鄂援陕。但这时湖北靖国军已败退鄂西，滇黔援鄂军遂与北军相持于宜昌、夔州间，不再前进。

滇黔军所以取得攻川之战的胜利，主要由于其作战指导比较正确。滇黔军入川伊始，针对刘军主力集中于川南的情况，把注意力放在防守薄弱的重庆方面，兜击刘军的后方。这一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以后虽出现了叙州，泸州相继失守的危局，进攻重庆的初旨仍不动摇，结果重庆一经攻占，战场形势马上发生变化。在攻占重庆后，联军以一部兵力牵制叙州刘军，集中主力分由重庆，泸州迅速攻取成都，使刘军陷入困境，从而完全夺取了战场主动权。此外，中华革命党人在四川组织反刘武装和联军注意开展分化川军的工作，也为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刘存厚军的失败，主要在于政治上逆历史潮流，而动，军事上急功近利，缺乏全局部署。他只顾争夺叙、泸，而忽视对后方要地的防守，结果虽得叙、泸，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既不能向纵深发展，又不能回兵救渝，陷入进退维谷之境地，终于招致最后失败。

滇黔军进攻对抗护法运动的刘存厚所属川军，固然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以护法为名，行吞并四川之实，这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四川人民的反对，因而其胜利也是暂时的。滇军进占四川后，耀武扬威，专横跋扈，与黔、川靖国军的矛盾逐渐加深，开始酝酿一场新的军阀混战。

第四节 粤、闽、赣地区的作战（1917年10月~1918年11月）

一、作战双方的企图及部署

夺取广东，是段祺瑞“武力统一”战略中最根本的任务。段政府认为：“欲谋统一，必先收粤，粤不下，湘不安，战局不了，国是不定”。因此，在1917年9月傅良佐带北军入湘时，北洋政府就同时指令闽，赣、浙省军队和琼州龙济光部，对粤省“同时并举，协力进攻”，以策应湘省作战。其攻粤部署是：龙军直取钦（州）、廉（州），高（州），雷（州）地区，东图广州，并切断粤桂通路，福建派两混成旅沿汀江入粤，进占嘉应州（治今梅州市）、意州（治今惠州市）地区，西攻广州，江西派一混成旅逾大庚岭，入韶州（治今韶关市）地区，南攻广州，形成三面夹击之势。10月23日，北洋政府收买广东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宣告“对省独立”，与广东省政府脱离关系，直接听命于北京政府，并立即派兵攻打惠州。

莫擎宇发难兴兵，为北洋政府大举图粤制造了契机。10月24日，闽督李厚基在段政府授意下通电支持莫擎宇，并令汀漳镇守使兼北洋第十四混成旅旅长减致平率兵十营进援。此后不久，龙济光也由琼州出兵，抄袭粤省侧背。于是，段系军队攻粤之战全面展开。

1917年11月10日，陆荣廷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讨沦粤省攻防作战计划。参加会议的除桂系要员外，还有孙中山的代表胡汉民、海军总司令程璧光、广东省长李耀汉等。会上，军政府代表提出应将屡与军政府为敌的广东督军陈炳调离，并要求将已编为警卫军的原省长朱庆澜的二十营军队，重归陈炯明统带。陆荣廷表示”让步”，建议调陈炳为讨龙军总司令（后改为李烈钧），但同时要求陈炯明率所部二十营协助攻闽，借以削弱军政府的势力。会议推举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兼广东督军，陆自称“年老多病”，派其亲信、原广惠镇守使莫荣新代理广东督军。

莫荣新上任后，鉴于莫擎宇盘踞潮汕，李厚基出兵援潮，在陆荣廷的授意下，决定在进剿莫擎宇部之同时，实施大规模攻闽作战，以策应湘省军事。11月27日，由程壁光出面，召集滇军总司令李烈钧、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督军署参谋长郭椿森以及胡汉民、汪精卫等，在广州海珠开军事会议，商订攻闽方略。决定成立“征闽海陆联合军”，以程璧光为总司令，指挥海军、滇军，粤军三支部队，分五路攻闽。兵力包括驻粤海军全部，陈炯明之粤军二十营，驻粤滇军全部，和粤省地方军八营，桂军一支队。具体部署是：以陈炯明部二十营进攻漳州，为第一路，李烈钧统率滇军两个师进攻汀州（令长汀），为第二路，沈鸿英率“平潮军”十二营进攻上杭，为第三路；刘志陆率“平潮军”十五营进攻诏安，为第四路，程璧光率海军舰队袭击福州，为第五路。计划确定不久，得悉龙济光子12月11日由琼州出兵攻粤，遂重新调整部署，由攻闽粤军总司

令陈炯明继续率所部进攻闽省，以驻粤滇军第六军军长方声涛为征闽靖国军总指挥，率所部第八旅（旅长伍毓瑞），第九旅（旅长夏述唐）进驻潮、汕、策应陈炯明部作战，以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率沈鸿英，林虎两支部队赴粤东南抵御龙济光部；海军则全部参加讨龙作战。

二、攻闽之战

（一）双方兵力及作战部署

陈炯明于1917年12月3日就任攻闽粤军总司令职后，便着手进行作战准备。由于原二十营粤军装备低劣，每营仅有枪二三百支，莫荣新又从中掣肘，除拨少量开拔费外，饷弹方面概不负责。陈炯明等深感实力单薄，出兵困难，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施行一项扩充实力的方案；一面向地方士绅借枪，一面向海外革命人士募捐饷款。其中规定，能募到人枪二百者为营长，人枪六十者为连长，人枪二十者为排长，不愿担任军职的按枪付钱。经过一番努力，共筹集到各种枪二千余支，子弹数万发。这样，加上滇军方声涛部，攻闽军总数达二万人左右。陈炯明将攻闽军编为若干个支队，每支队辖二至四个营不等，任邓铿为参谋长。

1918年1月25日，陈炯明在广州誓师攻闽。27日，率主力部队离开广州，开赴汕头。

这时，闽省全部军队约有三个师的兵力，其中有福建第一旅（旅长姚建屏）驻福州，北洋第十混成旅（旅长唐国谟）驻厦门，北洋第十四混成旅（旅长臧致平）驻诏安，闽省清乡队（总司令张清汝）驻延平（今南平市）。另有巡防队约四个团分驻各地。总计二万二千余人。闽督李厚基得到粤军将要攻闽的情报后，一面调唐国谟等部开赴永定、上杭一带赶筑工事，准备抗击粤军，一面迭电北洋政府派兵援闽。

早在1917年11月底，北洋政府看到潮梅的莫擎宇部将被粤军剿灭，闽省兵力单薄，岌岌可危，感到“闽或有失，浙必动摇，粤、闽、湘、桂联成一片，大局益不易收拾，斯时政府处置愈难”，于是急派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由直隶廊坊南下援闽（冯旅到江苏浦口后又改援湘西），继而又令浙江童葆暄师赴闽助战。

（二）粤军三路攻闽

1918年2月中旬，攻闽粤军进抵潮州（今潮安）、汕头一带。但是，陈炯明对攻闽作战并不热心，部队进抵潮汕地区后，忙于招兵索饷，培植个人势力，迟迟不向闽省发动进攻，致使北军得以从容调遣兵力，扩充力量，加强并完善了在闽西南的防御部署。3月22日，孙中山致电陈炯明，指出：“若乘敌军初到，地形未谙，利用内应，犹可先发制人”，宜“速下攻击命令”。但陈炯明以“布置未周”为借口，对孙中山之电令置若罔闻。4月5日，孙中山再次致电陈炯明，严厉指出，“援闽之举，准备已久”，“惟攻击之令，至今寂然无闻，敌备日增，且狃于岳长之役，虏气益骄，我军顿兵不进，足以示弱”，“况段贼复出，积极图

南，我军从事准备，增力几何？而彼则恃有外援，愈久则力愈充，及今图之，惟在速战”。孙中山着眼全局，晓以利害，催陈速战，是很有道理的。

陈炯明部在粤闽边境滞留三个月，确已错过了大好战机。在此期间，其它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湘省，北军陷岳阳，占长沙，正向湘南推进；在江西，陈光远已调遣兵力，袭占广东南雄，在闽省，不仅防御准备日臻完善，而且浙江援军已经入闽，军事力量已得到较大加强。总之，整个形势对攻闽粤军越来越不利。

到5月初，攻闽粤军已扩充至三十营，约一万二千人。在孙中山和粤军将领的逼促下，陈炯明才下达进攻命令。其第一阶段作战计划是：许崇智第二支队四个营为左路，从蕉岭向武平，上杭进攻，得手后，进规长汀，连城，陈炯明亲自指挥第一、三、四支队和预备队为中路，分两路进攻，以第一支队和预备队共五营，从大埔进攻永定，得手后，进规龙岩，第三、四两个支队共六营，从饶平（今三饶）进攻柏嵩关以规平和，右路则由参谋长邓铿指挥，包括第五支队三营和游击二营，集中于澄海、黄冈（今饶平）以监视诏安、云霄之敌。粤军指挥部设在三河坝。

5月10日，粤军发动全面进攻。由于许崇智在民国元年曾任闽军师长，较有声望，战前已运动驻武平的一个营和驻上杭的一个大队倒戈附粤，故该路进展顺利，当日即占领武平，三日后占领上杭。因中路李炳荣第一支队进攻永定受阻，许崇智当即派出二营增援，始克永定。中路第三、四支队也顺利攻占柏嵩关。这样，闽军第一道防线完全被突破，粤军向闽省推进达五十公里，基本完成了第一阶段作战任务。

粤军稍事休整后，即准备实行第二阶段作战计划。左路许崇智部分为二支，一从上杭进攻连城、永安，规取沙县；一取长汀、清流、归化（今明溪），将乐，顺昌，然后进占延平，中路李炳荣第一支队和熊略预备队分别进攻龙岩，南靖，罗绍雄、邓本殷第三、四支队进攻平和，攻取漳州，右路洪兆麟第五支队进攻云霄，漳浦。各路若进展顺利，则继续向纵深发展，夹击福州。不抖部队尚未行动，从浙江援闽的童葆暄第一师已抵前线，闽、浙军队联合发起反攻，战局急剧逆转。

（三）闽浙联军大举反攻

1918年5月20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吴佩孚为援粤副司令，调集北方各省军队组成援粤军，拟分三路攻粤。段祺瑞野心勃勃，企图一口吞并粤省。但是，吴佩孚对任共为援粤副司令一事不予理睬，张怀芝则在湘东作战时吓破了胆，已无攻粤的勇气，各省“援粤”军也相互观望，迟迟不动，只有东线李厚基，处在粤军进攻正面，为保住地盘，不得不拚力作战。

5月底，童葆暄率浙军第一师赶到前线后，北洋政府任命李厚基为

闽浙援粤军总司令，童葆暄为副司令。6月4日，闽浙联军分兵三路，向粤军发动全线反攻：以臧致平旅为左路，拟突破诏安、黄冈粤军阵地，进窥潮汕，童葆暄师为中路，从平和进攻柏嵩关，然后进取高陵，控扼韩江，威胁粤军总指挥部所在地三河坝，唐国谟旅为右路，收拢被许崇智部击散之溃兵，拟先取龙岩、上抗，永定，然后改取守势，牵制粤军左翼兵力。闽浙联军投入反攻之总兵力约一万五千人，基本企图是左攻右守，首先进占潮汕，同时袭取大埔、三河坝，将粤军南北割裂，进而各个击破。

此时，陈炯明与方声涛之间已出现隔阂，滇军隔岸观火，消极怠战。粤军右路兵少力弱，饷弹不继，在闽军减致平旅的反击下，放弃黄冈，退守汕头。陈炯明急调许崇智之左路军一部增援，企图趁臧旅立足未稳之际，收复黄冈。不料闽军右路又乘虚而人，攻占永定，许崇智部退守岩前；粤军中路防线也被浙军突破。激战日余，粤军在初期攻取的闽西南要地又全部丧失。接着，闽军左翼前锋深入到汕头一带，其中路已突破峰市，进逼大埔。粤军被动挨打，形势岌岌可危。

这时，已经离开广东护法军政府的孙中山，鉴于闽粤战场形势恶化，极为焦虑，于6月27日致电陈炯明，指出：粤省北面，张怀芝已组织军队屯集赣南，南面，北军已由海路运兵二千至汕头，东面，李厚基、童葆暄大兵压境。攻闽粤军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此时敢冒险进攻则生，不冒险则必致坐困。以攻为守，则士气壮，响应多，敌胆寒，一进必收奇效。否则士气日丧，响应日微，敌胆日壮，而我以可胜不可败之兵，据能战而不能退之地，必无幸免也”。然而，陈炯明此时对北洋政府已有“内附之意”，因此，一面消极防御，节节退守，一面暗向北军传递函电，以示妥协。

但是，这时北军在军事上迭获胜利，气焰正盛，对陈炯明“内附”之表示置之不理，拟乘共斗志动摇之机，“一击破之”。于是闽浙军队继续穷追猛打，并以主力从左翼楔人粤境，于7月18日攻占大埔，威胁粤军总指挥部驻地三河坝。

在此危急时刻，孙中山再次写信给陈炯时，向共分析敌我形势后指出：“兄身当敌冲，后援难恃，强敌在前，所部又饷械俱乏，处此局势，万难操全胜之算，若审慎求全，则我之兵力有限，敌之增援无穷。为兄今日计，惟有奋力前进，冒险求胜，规取闽中”。孙中山一面反复劝导陈炯明，面派广东军政府参谋部长吕公望（原浙江督军）往前线策动浙军倒戈起义，分化瓦解北军。

（四）粤军转败为胜

陈炯明见“内附”之意不被北军理睬，当面敌军又步步进逼，因而不得不听从孙中山的劝导，重新组织兵力，从军事上寻找出路。7月23日，他将右路之洪兆麟支队调至中路，增强三河坝一线防御力量。8月初，陈炯明集中中路粤军反攻大埔，以一部兵力从正面仰攻，分兵一部

由漳溪下游攻敌侧背。经两昼夜激战，闽军不支，弃城溃逃。这时，驻守饶平的浙军第一团团长陈肇英，在吕公望等人的策动下率部起义，成立“援闽浙军”总司令部。浙军师长童葆暄仓皇率部撤离前线，退往厦门。粤军乘势全线反攻，右翼邓铿部连克诏安、云霄、漳浦等城，直逼漳州。左翼许崇智部乘势向闽西进攻，连占武平、上杭、龙岩等地，与主力部队会攻漳州。8月31日，粤军攻克漳州，继而向厦门推进。李厚基惊慌失措，逃回福州。9月12日，李致电段政府，报告闽军处境危急，请辞闽浙援粤军总司令职。段政府一面电令李厚基坚守待援，一面急调北军从三路援闽：赣省抽调军队开赴上杭，浙省增派军队驰往厦门，海军，派舰队进入厦门海面。

10月3日，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福建省宜抚使兼攻闽军总司令。11月，粤军与闽浙联军在福建前线划界停战。

三、讨龙之战

龙济光同张勋一样，是反动愚顽的“怪物”之一。在护国战争后期，面对滇桂军的强大军事压力，龙济光走投无路，后由黎元洪出面调解，才得以两广矿务督办名义率残部移驻琼州。龙在琼州招兵买马企图卷土重来，重作广东的土皇帝。

护法战争爆发后，段祺瑞调动北军进攻湖南，龙济光认为时机已到，迭函冯国璋，表示愿充攻粤前驱。他声称，“惟冀钧座排除群论，速定方针，……济光秣马厉兵，敢惮征缮。各将领枕甲请缨，勿灰其气，望钧座有以策厉之。”北洋政府也很赏识龙济光这只鹰犬，于1917年11月8日任命龙为两广巡阅使，令其出兵攻粤。

龙济光受命后，立即以所部二万余人分三路进攻：任李嘉品为第一路司令，拟从阳江登陆，经合山、恩平进图广州，并控扼西江中段，断绝桂粤联系，任段尔源为第二路司令，马存发为第三路司令，拟从海安登陆，先占雷州半岛，尔后向桂粤．边界发展，伺机攻取南宁。

1917年12月14日，李嘉品率部在阳江秘密登陆成功，即以一部兵力驻守阳江，主力向思平和阳春推进。龙济光则亲率第二、三路军从海安登陆，向石城（今廉江）、化州方向发展。

广东督军莫荣新得知龙军大举进犯，急令沿海粤军抗击登陆之敌，以待后援；继令驻粤海军分别开赴闸坡、崖门等地，堵截龙军后继船队。旋于12月16日召开军事会议，商订讨龙作战计划。12月30日，莫荣新任命钦廉镇守使沈鸿英为讨龙军第一军司令，令其率所属十二营在石城至化州一线阻击龙军，以原高雷镇守使林虎为讨龙军第二军司令，令其率警卫军十二营开往恩平方向迎敌。以上两支军队兼程开赴前线，在预定地点展开并完成防御部署，阻止和迟滞向前疾进的龙军。嗣后，莫荣新又分任督军署参谋长刘志陆和粤省警务处长魏邦平为讨龙军第三、四军司令，李根源为讨龙靖国军（由滇军三个团组成）司令。以上

讨龙军总数共五十营约二万余人。

东路阳江方向作战非常激烈。林虎所部讨龙军开赴前线后，猛冲猛打，曾一度收复阳江，迫敌前锋退守织。1918年2月初，李嘉晶之后续部队驰赴织，会合退守该地之先头部队并力反扑，于25日复占阳江，东路战局再度恶化。3月7日，粤督莫荣新任命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统一指挥阳江方向之作战。

3月11日，李烈钧拟定了全线反攻作战的计划，基本企图是；集中主力部队于开平至阳春一线，分兵四路围歼李嘉品所部龙军，收复阳江，再进击石城、化州之敌。具体作战部署是，第四军由那扶进逼阳江东部，负责牵制敌人；第三军由恩平、那龙出合山，进逼阳江东北部；第二军于思平与阳春之间前进，攻击阳江西北部，李根源靖国军由黄泥湾至阳春大道前出，配合第二军进击阳江西北部，并负责警戒高州、雷州方向之敌，沈鸿英之第一军进抵石城一带，袭击龙军之二、三路，阻敌增援阳江。

3月16日，刘志陆指挥第三军克复恩平，为其它各路军眼进展开扫除了障碍。李烈钧当即决定第三军从正面牵制敌人，而以李根源之靖国军作为主攻部队，于24日前插到阳江北部，从翼侧攻击敌人。同时令第二、三、四军均按原计划分别于23日前向阳江推进，掩护李根源部之进攻行动。

讨龙军四路进攻，海军舰队也协力堵剿。李嘉品见难于抵抗，遂于3月25日放弃阳江，逃向电白（今电白东）。讨龙军乘胜追击，于4月12日占领电白。

这时，龙济光主力麇集在高州、化州、石城一带，准备顽抗。讨龙军攻克电白后，立即分兵两路，以左翼部队配合沈鸿英部扼制化州东北部，并向化州、石埔之正面攻击，以步兵一营、工兵一连组成别动支队，在海军掩护下，在雷州半岛南部登陆，攻击龙军侧背，另以军舰载步兵一部，在琼州登陆，袭击龙军老巢。

龙济光部四面被围，已无斗志。讨龙军步步推进，势如破竹，于4月25日收复化州，27日攻克石城，28日下遂溪。与此同时，琼东县（今琼海东北）警卫营长杨锦龙，联络本部及当地黎族人民宣布独立，反对龙济光在琼州的统治。龙济光见所部弹心粮绝，进退失据，只好弃军逃走，赴北京投靠段祺瑞，其部下多缴械投降。

四、南雄之战

1918年4月，江西督军陈光远遵照段祺瑞三路攻粤的命令，派兵攻入东南雄。南雄位于大庾岭南麓，是江西进入广东的通道之一。4月18日，陈光远派赣南镇守使吴鸿昌为攻粤总司令，混成旅长丁效兰为副司令，率兵两旅向南雄进攻。广州护法军政府陆军总长、靖国军第五军军长张开儒，鉴于南雄只有守兵四营，难于抵敌，急调驻韶关，仁化等地

的第五旅、第六旅及炮兵一团，向南雄增援。但援军立足未稳，即被赣军击溃，南雄陷落。莫荣新得报，急任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军务督办，令率所部滇军由讨龙战场疾速北上。

李根源率靖国军赶到韶关，将所部布置在韶关以北，接替第五军防务。5月初，李烈钧又奉命率讨龙部队增援北线。由于张开儒南雄之败，莫荣新乘机排除异己，撤掉了张的军长职务，将第五军交给李根源统率。李烈钧、李根源整顿部队后，决定分兵三路反攻赣军。命滇军朱培德旅出仁化、扶溪，杨益谦旅出都坑、罗坝，威胁赣军两翼，第五军为中路，从正面进攻南雄。为加强攻击能力，李烈钧从广州调运数门重炮配属部队。

6月3日，靖国军发动全面反攻。激战四昼夜，赣军向赣境败退，靖国军克复南雄。

靖国军反攻获胜后，李烈钧联络在衡、宝以南屯集的湘、桂军，拟相互策应，大举北进：由湘桂军负责攻取衡、宝，滇军负责攻取赣州；另调驻守潮梅的方声涛部由梅县出武夷山，直捣宁都。但此时粤、桂军意见纷歧，俱无战意；陆荣廷则主张“湘边现状，宜取守势，虽有生力军到，亦不必汲汲进攻，但以保守桂边，静待为上”。不久，李烈钧奉调为广州军政府参谋长，其三路反攻计划遂成泡影。此后，滇、赣军相持于大庾岭及信丰，崇义之间，再无大的战事。

第十八部分 反对沙俄侵略蒙古的战争（1911年8月~1915年11月）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正当中国人民为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而斗争之际，沙俄帝国主义乘机策动被它收买的外蒙古某些反动王公和活佛搞外蒙“独立”，煽动内蒙古和黑龙江某些蒙古族反动王公叛国投俄，进而唆使和支持外蒙叛军进犯内蒙，妄图侵占我国整个蒙古地区。在我国人民包括蒙古族人民的激烈反对和强大舆论压力下，当时的中国政府调集军队，进行了反击侵略和平息叛乱的战争。经过爱国军民的英勇奋战，终于击退了进犯内蒙的俄军与叛军，镇压了叛乱武装，收复了内蒙全境。迨至级国十月革命爆发，沙皇政府垮台，外蒙傀儡政权失去了靠山，中国才恢复了对外蒙的主权。本章着重叙述沙俄策动外蒙“独立”，煽动内蒙某些反动王公叛乱，以及中国政府军反击入侵内蒙的俄军和外蒙叛军，粉碎内蒙和黑龙江蒙古族贵族叛乱势力的作战经过。

第一节 沙俄策动外蒙“独立”

一、炮制外蒙傀儡政府，攫取种种特权

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沙皇政府即制汀了吞并满蒙的汁划，并不断派人与一些蒙古王公接触，灌输亲俄思想；同时，向蒙古地区进行经济渗透。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以“调停”为名，用卑那手段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取得了在蒙古通邮、通商，在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设立领事等特权。1862年，沙俄又通过《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进一步取得了俄商在蒙古全境免税贸易的特权。与此同时，沙俄不断向蒙古地区派出“探险队”、“考察队”、“旅行团”，进行间谍活动，收买蒙古活佛及上层喇嘛、王公，培植亲俄势力。十九世纪末，沙俄公开叫嚣要进一步改变中俄边界，妄图直接占领一直到长城脚下的我国大片领土。1900年7月，沙皇政府在派遣浸略军大举入侵我国东北地区的同时，派哥萨克骑兵一大队（约五百人）强行进驻库伦。其后，由于沙俄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它在我国东北的扩张受到挫折，便集中力量转向蒙古地区。1907年，沙俄同日本签订了以沙俄侵占我国外蒙、日本吞并朝鲜为内容的密约。1910年，日俄双方又订立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第二次密约。同年8月，日本吞并了朝鲜，沙俄则进一步向外蒙扩张。

1910年，清政府在外蒙古实行“新政”，沙俄乘机煽动一部分王公和活佛，进行分裂蒙古的罪恶活动。1911年7月，沙俄驻库伦领事操纵哲布尊丹巴活佛和亲俄分子杭达多尔济亲王等人，利用喀尔喀各盟王公、喇嘛会盟大典之机，密议外蒙“独立”，脱离中国，投靠沙俄，并组成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代表团”，冒充代表外蒙全体王公的公意前往彼得堡（今苏联列宁格勒），以“承认俄国保护”和给俄国种种特权为代价，换取沙俄以武力支持外蒙“独立”。沙俄政府为了支援外蒙“独立”，令伊尔库茨克军区将步枪一万五千支，骑兵军刀一万五千把，枪弹七百五十万发，交给外蒙叛国集团。10月初，沙俄借口保护领事馆，又派步骑兵八百余人侵入库伦，使其在库伦的驻军增至一千三百余人。另外，还有由沙俄武装的外蒙军四千余人。接着，沙俄又要求清政府承认外蒙“独立”，不在外蒙驻军和建立行政机构，不得俄国同意不准在外蒙进行任何改革。这种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

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政府便利用中国政权交替，政局混乱之机，加紧炮制外蒙傀儡政权。同年12月1日，沙俄侵略军带领外蒙军队闯入办事大臣署，对办事大臣三多进行威胁利诱。3日，散发所谓“独立宣言”。4日，将三多等驱逐出境，并收缴了驻库伦防营（有步骑兵二百五十人）的抢械。28日，在沙俄一手操纵下，哲布尊丹巴“行登极礼”，自称“大蒙古国皇帝”，以“共戴”为年号，成立傀儡政府。

外蒙的“独立”，立即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多次电告外蒙的王公，活佛，要求他们立即取消“独立”，

勿被沙俄利用。

沙俄策动外蒙“独立”后，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于1912年11月3日，与外蒙傀儡政府非法签订了《俄蒙协约》和《商务章程》，宣称“蒙古对中国的过去关系已经终止”，规定俄国政府“扶助蒙古的自治”，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境，不准汉人移居辈地。通过不平等条约，沙俄在外蒙古取得了广泛的特权。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对俄蒙所订“条约”概不承认，并抗议沙俄侵犯中国主权。中国各族人民强烈反对《俄蒙协约》，蒙古爱国王公亦宣布“现在共和成立，正宜联合为一大国，蒙古断无独立之理”，强烈要求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

二、支持叛军侵占外蒙要地

外蒙傀儡政府成立后，沙俄为了进一步控制外蒙，一面非法向外蒙增兵，一面援助外蒙傀儡政府，武装外蒙叛军，企图阻止中国政府军向外蒙进军。当时，沙俄在外蒙库伦驻有步，骑、炮兵十个大队，恰克图驻有步兵两个大队，乌里雅苏台（今蒙古扎布哈朗特）驻有步兵两个大队，科布多（今蒙古吉尔格朗图）驻有步兵一个大队，炮兵一个中队。

库伦傀儡集团在沙俄的援助下，也大力扩充军队。外蒙的土谢图汗部、三音诺颜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等地，原有蒙军九千七百余人。宣布“独立”以后，哲布尊丹巴向四汗部各抽调一千人，另招募土匪二千人，以后又下令四汗部各征兵一万人，共五万余人。其中多系未经训练的贫苦牧民，且散处各地，较有战斗力的不过数千人。其统兵官为土匪首领白差尔、乞卡尔、陶什陶胡等。所有叛军均受沙俄军官指挥。

库伦傀儡政府的成立，不仅激起了外蒙古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和反抗，也引起许多上层爱国王公、喇嘛的不满和抵制。当时，外蒙的某些要地仍驻有政府军队。外蒙傀儡政府依恃沙俄的支持，决心进行武力进攻，并煽动叛乱，迫使政府军和各地王公屈服，进而控制整个外蒙。

（一）科布多之战

1912年1月，沙俄驻乌里雅苏台领事策动该地反动王公叛乱，并派兵将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驱逐出境，占领了外蒙西北重镇。

同年春，在科布多附近杜尔伯特各旗活动的沙俄特务丹必占灿，勾结杜尔伯特反动王公发动了暴乱。当时，科布多驻军不足三百人。面对外蒙叛军的威胁，科布多参赞大臣溥在附近各旗爱国蒙民的援助下，迅速征集了蒙族士兵一千人，加强科布多城的防御，同时，急电北京政府派兵前往，并派人到新疆求援。北京政府令新疆都督杨增新、阿尔泰办事长官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伊犁镇守使广福派兵驰援，帕勒塔先派连长吴得山率三十余人赴科布多侦察军情，继派骑兵营长广肇率兵一营兼程向科布多进发。杨增新不顾沙俄驻新疆领事的干涉，先派马步各一营由古城（今新疆奇台）出发，继令后续部队三营陆续向科布多开进（为了在沙漠戈壁地区行军不致缺粮，步兵每人配一驼，骑兵每人配三驼，

驮运三个月料粮）。广福也派兵从伊犁（今新疆伊宁市西惠远）赴援。

沙俄侵略者和库伦傀儡集团先派“使者”到科布多劝降，结果被当地爱国蒙民将其绑送官署，斩首示众。由于劝降失败，库伦当局决计出兵向科布多发动进攻。6月21日，由库伦派出“俄官教练之精兵二百，杂以俄兵二十名，佐以大炮两尊，子弹十余驼”，向科布多进发。抵达后，因见守军防御严密，未敢进攻，立即派人回库伦请求增援。傀儡集团又加派“精兵”三百名，并令其“沿途多方征调，足成四千之数”。7月底，俄军和外蒙叛军开始进攻科布多城。溥率军坚决抵抗，并乘隙发起反击，给敌以重大杀伤，将其击退。8月2日，阿尔泰援军广肇骑兵营进至距科布多十会里之黑山头，与叛军三千余人遭遇，卒以“寡不敌众，全军覆没”。8月中旬，敌又从库伦增兵三千人，继续围攻科布多，终未得逞。沙俄领事库斯敏斯齐鉴于城坚难下，遂致函，要求出面“调停”，溥计。8月20日，库斯敏斯齐带领俄兵三十人、外蒙叛军二百人，骗开城门，进入科布多。俄、蒙兵进城后，大肆抢掠，城内居民被杀过半。9月中旬，溥和所部官兵及内地商民约七百人，被沙俄领事派兵“护送”出境。

（二）察罕通古之战

科布多失陷时，新疆援军步骑两营在管带严保清、有世率领下，已进至距科布多五站路之大营盘，因闻科城已失，大营盘又无险可守，遂于8月30日退守阿尔泰区之要冲察罕通古（科布多南二百五十公里），以待援兵。杨增新电令后续部队由古牧地（今新疆米泉）取道绥来（今新疆玛纳斯），改援阿尔泰，并要求各部一到驻地，即仿照湘军办法，挖壕修垒，以备不虞。

俄军和外蒙叛军侵占科布多后，便调整部署，准备向阿尔泰进犯。当时，阿尔泰驻军不满千人，帕勒塔亲王惶恐动摇，企图后撤。北京政府一面电令帕勒塔“静守待援，力保疆土”，一面急电新疆的杨增新和广福迅速派兵援阿。10月中旬，新疆援军十个营（二千余人）先后到达阿尔泰。杨增新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即进攻科布多城，牵制外蒙叛军，使其不敢直趋阿尔泰。为此，除令严保清、有世两营驻守察罕通古外，又急电步队杜发同和李华桢两营、巡防马队李策胜一营、古城旗兵步队全象一营，迅速进扎锡伯图（察罕通古西南五十公里），察罕通古一带，“相机进取”；并令哈密之马队一营、炮兵一队，立即起程，令库车等地添募马步数营，均作为收复科布多城之预备队。同时，在哈密、巴里坤、古城、元湖（古城东北一百二十五公里），绥来等地增设了马步炮队，并改善了台站、电讯及后方补给工作。

10月下旬，严保清，李华桢率步队两营向科布多开进。当时，北京政府正准备与沙俄谈判，因而下令“切勿轻率进兵，致碍大局”，严、李两营被迫于11月24日退回察罕通古。于是，收复科布多的计划遂被搁置。

1912年12月10日，丹必占灿率叛军数千人在科布多城附近大肆抢

掠，并声言不日进攻阿尔泰。杨增新增派步马队各两营，进驻元湖、察罕通古叶带，并令严保清营开往布尔根河，与帕勒塔拨出的一营共同守卫该处，派团长张键到察罕通古统一指挥该地驻军。杨增新根据袁世凯的旨意，下达了“敌来则痛击，敌去则严备”的“正当防御”方针，一再告诫部队不要向科布多进军。

1913年1月末，丹必占灿率千余人侵入阿尔泰区境内，驻扎于距布尔根河两站的乌梁海大庙，同时，由沙俄领事出面，阻止政府军进驻乌梁海的萨克赛河一带（今蒙古乌列盖西南一带），并派俄军官兵九人“假道”政府军驻地赴科布多，借以侦察军情。

4、5两月，叛军趁天暖雪消，积极整修道路，前送武器弹药，筹备给养，作进攻作战的准备。

6月17日，叛军近万人由蒿不都喀勘五苏山分三路窜犯：一路由乌梁海大道进攻布尔根河，一路由包墩庆（察罕通古北约三站地），一路由五云集（察罕通古东约一站地）夹攻察罕通古。当时河水暴涨，叛军先头部队被阻子包墩庆。杨增新立即调元湖炮队赶赴察罕通古支援。7月4日夜，叛军四五千人在俄军协助下，向察罕通古发起进攻，张键率部依托工事抵抗，5日拂晓发起反击，毙敌二百余人，将敌击退。这时，丹必占灿正率叛军三千人由乌梁海向布尔根河开进，并拟分兵绕道切断，杨军后路。杨增新为了缩短战线，决定将驻布尔根河之马步两营，撤至察罕通古，使该处兵力增至马步七营，炮队一连，同时，调马步七营分驻元湖，乌什克等处，加强察罕通古后方之防御。

7月11日晨，叛军马队三千余人再次从察罕通古正面发起进攻。张键率部反击，敌败窜山中。另路叛军七八百人，绕至察罕通古南面山中，向守军第四营发炮轰击。张健急派备补营长马得贵、团副杨庆明率队前往支援。经四小时激战，将敌击退，营长马得贵不幸阵亡。是役，先后击毙叛军三百余名，战马五百余匹。

外蒙叛军连遗失败，锐气大挫。不久，其统兵官“照会”政府军，提出两军“各辑地界”，并约“趁机退兵”。杨增新亦列举不利于继续作战的各种“理由”，密陈北京政府，主张妥协停战。因此，丧失了乘胜反击的时机。

9月间，沙俄侵略者乘伊犁援军回防之机，以中国士兵刺伤俄领事为借口，出动俄军一混成旅（约千余人），侵入阿尔泰首府承化寺（今新疆阿勒泰）一带，又派俄兵数百人，侵占了布尔根河。同时，威胁利诱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背叛祖国，宣布“独立”。10月初，帕勒塔盗用“阿尔泰办事长官”的名义，与沙俄驻阿尔泰领事签订了所谓《临时条约》，12月，又签订了《中俄军队停战条约》，允许俄军和外蒙叛军驻扎阿尔泰区东部，规定新疆援军撤出察罕通古。消息传开，全国舆论哗然，纷纷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北京政府不得不下令将叛国分子帕勒塔撤职，并宣布由帕勒塔与沙俄非法签订的“条约”一概无效。经多次交

涉，直至1915年3月，才确定外蒙叛军退出阿尔泰地区，新疆援兵从察罕通古退驻元湖，沙俄撤走部分侵略军，但仍有两连骑兵留驻该地。

第二节 沙俄策动呼伦贝尔

“独立”和乌泰叛乱（1912年1月～11月）

一、呼伦贝尔“独立”与胪滨之战

沙俄一手导演外蒙“独立”之后，即唆使哲布尊丹巴以“蒙古君主”的名义打电报和写信给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的王公，煽动他们率众叛乱，脱离中国。1912年初，沙俄驻呼伦贝尔领事乌萨蒂操纵和指使额鲁特旗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旗总管车和扎、索伦旗总管成德等人，调集附近各旗蒙兵一千人，以“大清帝国义军”的名义发动叛乱。1月15日，叛乱武装在俄军暗助下，进入呼伦（今内蒙海拉尔市）城内，占领官署，逼迫政府官员交出行政权和撤出当地驻军。当时，呼伦道台准备率兵反击，沙俄领事公然威胁说：“双方交战，炮弹若落入站界，即行调兵干涉”。道台害怕引起中俄争端，被迫退出衙署，并电告黑龙江巡抚“速派兵剿办”。胜福等占领呼伦后，立即宣告“独立”，并成立了伪“自治政府”。哲布尊丹巴授胜福以“参赞大臣”头衔，作为伪“大蒙古国"驻呼伦的“总督”。

北京政府得知上述情况后，立即派人劝说胜福取消“独立”，同时电令黑龙江巡抚“派兵弹压”。沙俄驻齐齐哈尔领事照会黑龙江巡抚，声称：对于呼伦贝尔事件，依照俄国政府的训令，如果中国政府与蒙古兵开战，俄国将守中立，但不许在东清铁路开战，不许用火车运送中国军队。显然，沙俄竭力阻挠政府军的行动。

1月下旬，黑龙江巡抚多次派人劝说胜福取消“独立”。因沙俄从中阻挠，胜福不但不听劝说，反而继续发动武装进攻。2月2日晨，叛军四百人和化装成叛军的沙俄浸略军约一个营向胪滨城（今内蒙满洲里）发动进攻。守卫胪滨城的巡防兵一个营立即还击，毙沙俄西伯利亚第十五号联队军官劳喀普林斯基及俄兵四名、叛军二十名，伤敌多名，缴获沙俄军用地图十幅。

2月4日黎明，沙俄“马步兵二千余名，大炮六尊，并残败蒙兵二百余名”，将胪滨府衙包围。上午11时，沙俄官员进入府衙进行威胁，“限12点钟交枪马，否则开炮轰击”。北京政府害怕中俄冲突进一步扩大，遂命胪滨等地的驻军撤走。沙俄的侵略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

1915年11月6日、在沙俄的胁迫下，北京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关于呼伦贝尔之协定》。该《协定》虽然承认呼伦贝尔为直属中央政府的“特别区域”，但仍由沙俄扶植的胜福叛国集团的武装所控制，政府军队非经俄国准许，不得进入该地区。《协定》还规定除关税和盐税归中央政府征收外，其它一切税收和各业收入，均作为地方经费，北京政府承认沙俄与脸福集团订立的各种“合同”。这样，实际上使沙俄对呼伦贝

尔地区的控制合法化。

二、乌泰叛乱与洮南、镇东之战

沙俄和外蒙叛国集团侵占了呼伦贝尔地区后，又指使早被它收买的内蒙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即札萨克图旗治，今内蒙乌兰浩特东南）郡王乌泰发动叛乱。

1912年4月，乌泰拟联合哲盟十旗发动叛乱，因缺乏武器，遂派协理台吉诺庆额（即色楞旺保）和葛根庙的锡勒图喇嘛等为“特使”，赴库伦求援。哲布尊丹巴答应“兵力武器，尽力援助”，并任命乌泰为“进攻中华民国的第一路总司令”。乌泰与外蒙傀儡集团私通的情况，被洮南（今吉林洮安）知府孙葆瑨侦知，报告了奉天都督赵尔巽。赵令孙严加查防。孙葆瑨要私赴库伦的“特使”到府谈话。乌泰认为“事已泄露，无法掩盖”，“与其受制于人，莫如先发制人”，遂与科尔沁右翼后旗镇国公拉喜敏珠尔约定，由两旗首先发动叛乱。8月上旬，乌泰发布了征兵及编组叛乱武装的布告，令所有军队在洮儿河东岸集结待命，并发布了所谓“东蒙古独立宣言”。乌泰认为洮南，镇东（今吉林镇赉）位居要冲，夺占两地后，其它各县即可唾手而得。

乌泰计划分三路进兵：以锡勒图喇嘛为元帅，那孙德格吉勒胡为副元帅，硕代喇嘛图布新阿木尔为参谋，率四百人为中路，由乌泰王府出发，直取洮南，命葛根喇嘛为统领，协理巴图吉尔嘎拉为副统领，乌勒木吉为参谋，率五百人为左路，由葛根庙出发，进攻白城子；命嘎钦喇嘛为统领，孟和朝克图为副统领，布呼吉尔嘎朗为参谋，率三百人为右路，由嘎钦庙出发，进攻突泉，并夹攻洗南，命周福堂、陈辅廷为统领，招集民兵为预备队，并负责后勤补给。同时，催促其它各旗出兵接应。但各旗均抱观望态度，未敢马上附从。

3月中旬，乌泰叛军迅速逼近洮南。知府孙葆急电赵尔巽告急求援。赵尔巽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奉天（今辽宁沈阳市）成立军政筹备处，在昌图设立兵站部；命驻郑家屯（今内蒙双辽）巡防队后路统领第二骑兵旅旅长吴俊升为先锋，率八个营驰援洮南，都统金寿山部为后续部队，电请黑龙江都督宋小濂派兵在嫩江西岸警戒，并进攻镇国公府，电请吉林都督陈昭常派兵进至伯都讷方向，监视沙俄的动向，并经安广夹攻札萨克图旗（乌泰王府），命新民屯（今辽宁新民）的第二十师抽调步，骑、炮，工兵共二千人（携大炮九门），第二十四师调骑兵二个旅及右路巡防队四营，溯辽河北上，至郑家屯集结待命。

在各路援军尚未到达前，孙葆鉴于形势紧张，兵力单薄，决定采取缓兵之计，先派人与叛军谈判议和。结果，被叛军拒绝。孙又用疑兵计，将仅有的二百名城防队扮作援军，夜出昼。乌泰受骗，迟迟未敢进攻。但孙葆恐日久被敌识破，遂率队弃城而走。

在乌泰部署向洮南进攻的同时，科尔沁右翼后旗镇国公拉喜敏珠尔

纠集本旗五百余人，集结于镇东城东二十余里之包特，敖瑞付，以商谈民族纠纷为名，邀请城防队军官李把总赴宴劝降。李不允，被扣留。8月20日，拉喜敏珠尔率叛军攻城。该县知事命哨官李家成率军警二百余人竭力抵抗。已通敌的蒙古族士兵乘机在城内放火策应，城防队不明真象，纷纷溃散，县知事及李家成遂率余部撤往白城子。镇东城被叛军攻陷。8月22日，李家成部乘夜发起反攻。叛军疏于戒备，慌忙弃城东窜，于是镇东失而复得。

8月28日，由带队官王伯龙率领的黑龙江省援军三百余人向镇国公府发起进攻。经一日激战，占领了镇国公府。叛军向西北方向溃退。拉喜敏珠尔非常沮丧，携家眷逃往札萨克图旗的葛根庙。

8月底，吴俊升部到达洮南，立即向乌泰叛军发起进攻。中路叛军节节败退，左右两路也闻风溃逃。最后，叛军大部撤至归流河北岸设防。此时，归流河北岸有乌泰叛军约五千人，南岸有吴俊升等所率之巡防队约七千人，双方形成对峙。9月12日，吴俊升决定在吉林，黑龙江两省军队协同下，向乌泰叛军发起进攻。在炮兵掩护下，吴部步骑兵强渡归婉河，直下王爷庙（札萨克图旗西北十五公里）。乌泰见库伦援军不到，败局已定，遂率残部数十骑，携带家属仓皇外逃，经索伦山（今内蒙索伦）入呼伦贝尔境，后乘车经饿境到达库伦。拉喜敏珠尔也率家属及少数残兵外逃。

乌泰等北逃后，札鲁特左旗的协理台吉官布札普和郭尔罗斯左旗的台吉多尔济公，纠集乌泰余党和部分土匪共千余人发动叛乱，于11月10日攻陷开鲁。这些叛乱武装很快被政府军镇压。至此，乌泰残部全被肃清，沙俄和库伦叛国集团苦心策划的这次暴乱彻底失败。

第三节 政府军抗击外蒙叛军向内蒙的进犯（1912年12月~1913年12月）

一、双方作战部署

沙俄煽动哲里木盟某些反动王公响应库伦“独立”的阴谋失败后，即唆使哲布尊丹巴集团出兵进攻内蒙古。外蒙叛军在向内蒙进攻之前，沙俄前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伊尔库茨克军区哥萨克骑兵队长葛布利克大尉等，亲自参加了库伦王公大臣会议，出谋划策。会议确定分兵三路向内蒙进攻：一路由反动王公松木彦、内蒙叛匪头子巴布扎布、渠魁苏带领叛军和土匪七八千人，沿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昭乌达盟的林西一线向内蒙东南及东北部进犯，一路由原内蒙科尔沁左翼后旗叛国王公那逊阿尔毕吉呼、原呼伦贝尔叛国分子达水下苏伦带领叛军四千余人，沿库张公路向内蒙中部进犯，另一路由土谢图汗部盟长察克都尔札布和内蒙叛国分子海山，锡勒图喇嘛、陶什陶胡、东西盟统帅班的达（即王德呢吗）等率领叛军数千人，进犯内蒙西部的中公旗（今内蒙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武川、四子王旗、陶林（今内蒙察哈尔右翼中旗）等地。各路叛军中均有沙俄军官充当军事顾问，进行指挥。

1912年底，叛军窜人内蒙，气焰极为嚣张，在很短时间内，先后侵占了昭乌达盟北部和多伦，张家口以北及阴山北麓广大地区叛军所到之处，焚毁村落，抢掠寺庙集镇，残杀居民，农牧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内蒙各族人民不堪叛军的蹂躏，纷纷逃亡。内蒙驻军也频频告急。而当时的北京政府却认为“库兵虽有南犯之耗”，但“为数无多，防剿尚易”，只需“扼要防堵，以杜窜扰，毋庸派兵会剿”。并把希望寄托在小俄谈判上。

沙俄指使叛军入侵和大肆骚扰内蒙的严重罪行，激起了我国各族人民的义愤。北京政府在国内舆论的谴责下，才命参谋部、陆军部统一指挥热河。察哈尔、山西、绥远等地的驻军进行反击。当时的兵力分布如下：

开鲁、赤峰、朝阳、承德、古北口至丰宁一带，驻有热河新军、毅军、第四师和第二十八师各一部，以及直隶、奉天、热河、古北口巡防队等，共二万一千四百人，乌珠穆沁，多伦、打马诺尔（今河北张北东三十五公里）一带，驻有第一师、第四师各一部以及淮军、毅军，察哈尔马队、蔡卫军、宣化邂防队等共四千人；张家口、宜化、丰镇、阳高一带，驻有第一师一部、淮军、保卫军以及山西、宜化巡防队和巡警、绿营等，共九千一百人；陶林、归化（今内蒙呼和浩特市）、包头一带驻有第一师一部、山西巡防队，绥远陆军、禁卫军、绿营兵等，共五千四百余人。总计共有官兵三万九千九百余人，大炮五十四门，机关枪四十八挺。以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又陆续增调大批援军。

二、内蒙中、西部的作战

1913年3月，王德呢吗等率叛军数千人进犯内蒙中，西部地区，滂江（今内蒙苏尼特右旗东二十五公里）、拜申图（今内蒙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东北三十公里），大余太诸要隘相继失陷，匪氛颇为猖獗。王德呢吗还遣军一部窜犯后套地区，胁迫各盟旗出兵，绕道围攻包头，于是“晋甘边境，骚然不靖”。

绥远将军张绍曾任命驻大同、包头一线之晋军第一师旅长刘廷森为西路司令，旅长陈希义为东路司令（以上两路仍归该师师长孔庚指挥），驻归化之朱泮藻为中路司令，各率所部协同防御，相机进剿。以上总兵力约四千余人。

（一）粉碎叛军对后套的进攻

1913年5月下旬，内蒙西部地区的形势日益紧张。西路军已退到鄂尔多斯旗（今内蒙包头西南一带地区），包头等地相继告危。张绍曾立即派兵增援。

6月初，得到增援的西路军与叛军进行多次战斗，均获胜利，遂采取分进合击之策：赵守钰团从中路、谭涌发团从北面、宁双安团从南面，向大余太等地发起进攻。6月9日，刘廷森所率之赵守钰、宁双安两团，与叛军千余人于老爷庙遭遇，将该敌击退。次晨，叛军分三路来犯，刘廷森率部迎击，再败叛军，收复台梁（大余太东南二十三公里）。此时，谭涌发部由北路袭占了二分子（今内蒙固阳西北三十公里），威胁叛军后路。13日，刘廷森令各团继续发动猛攻。叛军不支，纷纷逃窜。刘廷森率部乘胜收复大余太和台梁南面的乌拉山。此时，宁夏镇守使马福祥率百人路过河套赴京，与王德呢吗叛军遭遇。马福祥所带兵力虽少，但能随机应变，以接洽“助战”为名，于7月2日智擒了匪首王德呢吗及其参谋官彭索胡鄂木加和统领韩福海等十人。该股叛军因无人统率，遂全部溃散。

（二）黑沙土庙，百灵庙之战

在西路军肃清窜犯后套叛军的同时，中路军亦开始反击。5月下旬，叛军二千余人盘踞百灵庙东南之黑沙土庙（今内蒙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东南三十五公里）一带，另有千余人据守百灵庙，并由库伦派后续部队继续南来，准备进攻归化，朱泮藻决定由新到援军第八十混成团团长徐廷荣率所部为右支队；二团团副堵雪笠率该团为左支队，另将所有马队编为一团，由团长特克慎指挥，为预备队。计划“先将黑沙土庙之匪歼灭，再进攻百灵庙”之敌。

1913年7月7日，徐廷荣率右支队进攻黑沙土庙。叛军依托工事负隅顽抗。徐廷荣部先以大炮轰击，继由营长王庆麟率部猛冲。自下午2时一直战至5时半，叛军不支，向西北方向退却。8日晨，左右两支队分头向后厂汗（黑沙土庙南三十八公里）前进。上午11时，与叛军一千二百

余人接战，两个支队和骑兵团互相协同，奋勇冲击。直至下午3时，叛军仍拚命顽抗，不稍退缩。朱泮藻令炮兵与机枪连变换阵地，以火力侧击敌人两翼，敌始披靡，向百灵庙逃窜。朱部随即进驻后厂汗。

黑沙土庙之战获胜后，朱泮藻部用一天时间进行了进攻百灵庙的战前准备。7月10日晨，各部由后厂汗轻装出发，10时抵达百灵庙南面一带高地，并立即发起攻击。此时，百灵庙已集聚叛军五千余人，并筑有防御工事。战至下午1时，朱部攻击未能奏效，而部队已甚疲劳，又值天雨，无法露宿。朱泮藻电请暂返后厂汗，“候令行止”。张绍曾接电后，除令朱泮藻部继续进攻外，又令乌兰花（今内蒙四子王旗）一带部队向西北相机剿堵。朱泮藻接电，立即率队冒敌猛烈炮火奋勇直前，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阵地。下午4时许，叛军从百灵庙溃走。此次战斗，共毙敌四百余名，缴获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给叛军以沉重打击。

（三）西苏尼特和滂江争夺战

1913年5月间，察哈尔军队在滂江，西苏尼特（今内蒙温都尔庙）作战失利。察哈尔都统，陆军第一师师长何宗莲派支队司令李奎元率步骑兵各两营，炮兵，机关枪兵各一连，开赴前线，加强防御。李奎元探知西苏尼特王府有叛军数百名，于5月16日下午率军往剿。17日，进至西苏尼特王府以南，与叛军遭遇，毙敌数十人。李奎元又派骑兵从侧翼抄袭叛军后路，自带各营连从正面进攻。当进至距敌三百米处，忽然狂风大作，尘沙迷目，进攻受挫。李奎元和骑兵团一营营长均受重伤，军心因之动摇，“全军哗溃”。战后，何宗莲命什巴台（今河北张北东十公里）独立骑兵团曹团长暂代支队司令，率步兵三营，骑兵一营又四个连，于镶黄旗、大马群山（今河北张家口东北），马王庙（今内蒙化德西南二十公里）、太仆寺、察罕霍罗（今内蒙化德东南三十五公里）一线进行防御。5月22日，驻守陶林以北的绥远东路司令陈希义派刘虎臣团往攻西苏尼特，中途与敌遭遇，因弹粮不济，又退回四道沟（今内蒙四子王旗东七十五公里）防御。张绍曾为了防上该敌与西路叛军会合，便调中路之孟效曾旅进攻西苏尼特、滂江等地。参谋部、陆军部增调二十师混成团赶赴阳高，加强后方防御；6月间，又任命卢永祥为察防前敌总司令，率混成第五旅出张家口，负责剿办事宜。此时，东、西苏尼特王公均已降附库伦叛国集团，盘踞在西苏尼特王府一带的库伦叛军已增至二千众人，另在蚀黄旗驻有叛军千余人，彼此互相策应，气焰甚为嚣张。随后，正白旗、镶白旗王公亦相继降附，形势十分严重。6月17日，孟效曾率部由陶林出发，进攻西苏尼特王府，同时要求驻马王庙之卢永祥部进攻孤山庙之敌，以为声援。6月23日，孟效曾旅攻克西苏尼特王府，继克滂江。但由于卢永祥部配合不力，致使孟旅孤军深入，陷于困境。

滂江，西苏尼特王府距陶林兵站四五百里，驻孤山之敌多次截击孟旅之运输车队，使该旅的供应异常困难。7月初，陶林兵站再次向孟军运送粮弹，中途又遭叛军截击，被迫退回陶林。孟旅因后路断绝，“马匹已倒毙三分之一，人多病，粮已告罄，子弹因连次受敌夜袭，所余无

几”。张绍曾一面令东路派兵护送粮弹，一面令孟旅打通粮道。陆军部也急电卢永祥迅速派兵赴援，并令孟效曾“相机进止，如不能久待，即移扎就粮，免生溃变”。卢部为敌所阻，一时不能往援，孟旅被迫于7月中旬撤至乌兰花北面的四子王府一带。于是，滂江、西苏尼特王府得而复失。

9月间，卢永祥部在古鲁巴诺尔（镶黄旗东北三十二公里）与叛军交战，又遭失败，官兵伤亡较多，遂由马王庙退守托罗盖（今河北公会）。镶黄旗、马王庙，大马群均为叛军占领。袁世凯将卢永祥“褫去中将（衔），责令戴罪立功”。时奎苏（今多伦西北约六十公里）方向之叛军鉴于多伦守军兵力较强，便往西南方向窜犯。张家口“附近要塞，已无得力兵队防守，危险情形日甚一日”。直至10月间，高在田骑兵团冒雪力战，将新苏木庙（今多伦西北约三十公里）之敌剿平后，才制止了叛军的进攻，使内蒙中部的形势稍有好转。

三、内蒙东南部的作战

内蒙东南部之林西、经棚（今内蒙克什克腾旗）、多伦一线，是库伦叛军进攻的重点。1913年4、5月间，在游格吉庙（今蒙古额尔德尼察干附近）、达里岗屋（今蒙古达里甘嘎地区）之叛军数千人，经贝子庙（今内蒙阿巴哈纳尔旗）等处南下，窜至大王庙（今内蒙克什克腾旗西六十公里）、什巴尔台、米思庙（两地在内蒙林西北约五六十公里）、浩勒图庙（今内蒙西乌珠穆沁旗南三十公里），黄瓜梁（今内蒙克什克腾旗北三十公里）等地。政府军迎战连连失利，林西、经棚、多伦前线形势紧张。为了制止叛军的进攻，北京政府先后从各地调集大批援军。5月上旬，于有富混成旅、陈文运骑兵旅从张家口赴援多伦。察哈尔副都统兼多伦镇守使傅良佐令陈旅骑二团留守多伦，骑一团赴援经棚，于有富旅驻守大王庙。此时，热河剿匪总司令、毅军统领米振标率所部一千四百余人及热河北路巡防马队两营，步兵一团，亦已进抵林西附近之刘家营子及什巴尔台一带。双方随即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一）收复他他庙，浩勒图庙

1913年6月初，米振标、傅良佐商定了反击作战的计划：米振标从什巴尔台向他他庙，乌泊罗河（两地均在什巴尔台西）进攻，为了防敌南窜，令淮军统领乔建才率骑兵五百人从经棚向北堵截，傅良佐率部专攻黄瓜梁之敌。

6月14日，傅良佐率骑兵一团攻占黄瓜梁，不久又退防经棚。与此同时，米振标与热河北路巡防队统领张玉春、第一团团长奎文率马步炮兵三千余人，于6月26日攻占他他庙后，继续向喇嘛罕庙、浩勒图庙一带进剿。喇嘛罕庙有叛军一千五百人防守，共分三股：一股在山前正面，一股占据右翼山顶，一股在左翼。6月27日，米振标留步兵一营保护辎重，亲率步马炮兵猛攻正面之敌，迅速攻占了山头，遂用炮火轰击敌之左翼，同时派骑兵一队从右翼迂回敌后。经九小时激战，连占山头

十余处，毙俘敌四十余人。叛军退向王子庙。28日，米部再克王子庙，击溃叛军二千余人。因该庙无险可守，于30日撤回米思庙。7月2日拂晓，叛军四千余人突至，分三路向米部进攻，所有险要之处均被占领。米振标立即指挥部队反击。叛军依山据险，拚死抵抗。下午1时，米部步队与叛军展开白刃格斗，骑兵从旁包抄，间用火炮轰击，连夺山险十余处，击毙叛军头目四名、士兵二百余名。叛军不支，向东北浩勒图庙败退。米部以炮火实施火力追击，又毙敌数十人。之后，米振标鉴于敌众已寡，决定回防什巴尔台。乔建才亦率部返回经棚。

（二）克里更、大王庙失守，多伦告急

7月10日，叛军进至大王庙外围据点克里更。该地驻有于有富混成旅沈广聚团所属三百一十余人。11日晨，叛军二千人发起猛攻。经一日激战，未分胜负。次日，沈广聚率骑兵两连，步兵一营增援，抵达克里更后，立即抢占山头，与敌展开激战，将敌击退。沈乘胜率部追击，结果误入敌围，伤亡甚众。后被迫突围，退守大王庙，叛军乘势侵占克里更。

7月13日上午，匪首苏木亚公爷等率叛军进攻大王庙，守军于有富混成旅张凤鸣团步队怯战，一触即溃，牵动全军，大王庙遂即失守。于旅伤亡四百余人，损失步枪四百余支、火炮一门，机关枪二挺、子弹十余万发，余部退到经棚休整。

8月2日，盘踞于大王庙之叛军三四千人，分窜五花城，罗陀庙，蓝旗（今内蒙那日图）等地，准备向多伦进攻。

大王庙失守不久，王怀庆接替傅良佐为多伦镇守使。8月25日，王怀庆侦知叛军千余人在蓝旗等处集结，遂以淮军和练军步骑炮各队千余人编为混成支队，由淮军纵队司令李际春指挥，陈文运骑兵第一旅一团（携机关枪四挺）为另一支队，由陈文运指挥，于27日出发，分路进攻蓝旗。

8月底9月初，李、陈两支队先后在力不胡图格，哈噶蹋拉、奎苏等地与叛军激战，共毙伤敌千余人，马百余匹。叛军虽然受到重创，但仍愈聚愈多。此时，多伦城防空虚，恐为敌所乘，李际春、陈文运遂率部返回多伦。为了加强多伦的防御，陈文运、李际春等要求将驻防经棚的淮军撤回多伦，经栩则由毅军接防，并请卢永祥、米振标派部队向蓝旗、白旗、大王庙、克里更进攻，使敌首尾不能相颐，以减轻叛军对多伦的压力。9月12日开始，叛军分四路昼夜不停地向多伦进攻。王怀庆等率部固守，以待援兵。

（三）林西被围，经棚失陷

在多伦前线激战的同时，林西方面的战斗也日趋紧张。

9月初，叛军千余人在巴林王府一带集结，企图进袭大扳（今内蒙

巴林右旗）。土城子（林西南六十公里）一带亦时有叛军出没。热河会办陈光远令文管带率所部前往迎击大板之敌，并命驻乌丹城（今内蒙翁牛特旗）之骑兵营李管带所部及步队一营分扎巴林桥、土城子等处，以为前方之援应。当时，奎文团步马炮一千五百余人防守五十家子（今内蒙新林镇东北二十五公里），白塔子（今内蒙新林镇东北四十五公里）等处。9月10日晨，热河剿匪司令米振标又派毅军统领常德盛等率骑兵两营、李管带率步兵一营（携炮两门），从什巴尔台驰援五十家子等地，并将调往经棚之骑兵部队调同，作为预备队。是日，常德盛率领骑兵占领了乌泥江左岭，步兵营占领了珠尔沁庙，叛军退向五十家子。11日，常德盛率队攻占了五十家子东十里之太白庙后，乘胜追击，在石门沟（距太白庙十余里）突遭叛军两千人同攻，部队遭到很大伤亡。常指挥骑兵奋力冲杀，始将敌击退。随后，退守珠力尔沁庙。

9月14日上午9时，坝后叛军分四路进窥林西。另一支叛军由巴林桥南渡舍力摩河（即西拉木伦河），窜入乌丹附近，劫夺军需，骚扰后路。接着，什巴尔台、汤上（今内蒙热水汤），刘家营子、大桥上、珠尔沁庙的守军均遭到叛军的围攻。当时，“多伦吃紧，经棚空防，林西方向岌岌可危”，乌丹、赤峰，围场皆受威胁。护理热河都统舒和均急派参谋兼第二团团长杨裕三率所部三连（携机枪二挺），于9月16日开赴赤峰、围场，以加强后路之防守；并要求北京政府速派重兵援剿，并催促新任热河都统，毅军军统姜桂题迅速到任，“专固热河，徐图援多”。

9月17日，米振标部将围攻林西之叛军击退。18日拂晓，叛军又分十余股向林西猛扑。米振标令部队抢占山险，分头抵抗，经两昼夜激战，给敌以重大杀伤，再次将敌击退。米振标恐叛军绝其坝外守军退路，遂将坝外部队撤回林西。

在叛军围攻林西的同时，另股叛军趁经棚驻军回防多伦、米部尚未接防之隙，侵占了经棚，并攻占了五十家子等地。于是，林西形势更加危急。

四、击退窜犯内蒙的叛军

自1913年9月以来，叛军集中主力，围困林西，猛攻多伦。北京政府也不断增调援军，力图摆脱被动局面。当时，在多伦方向，先后集中有淮军和于有富混成旅、陈文运骑兵第一旅和练军等部队共约七八千人；在林西方向，计有毅军步队九大营，骑兵和炮队各一营，新收土匪马队四大营，另有热河混成旅奎文团等，共约万余人，分别驻于什巴尔台、刘家营子、林西、汤上等地。为了粉碎叛军对多伦、林西的重点进攻，北京政府参谋部、陆军部于9月底10月初又令河南第八师师长王汝贤率第十六混成旅及归其节制的七十九混成团，经张家口赴援多伦；奉军骑兵第二旅旅长兼洮辽镇守使吴俊升率所部及逃防队步马六营径赴林西。为了保障翼侧的安全，参陆两部还电吉林护军使孟恩远从吉林抽调三千人，协同吴俊升留下的巡防队马步九营，加强洮辽方向的防御，并令归绥方向之驻军积极配合作战。

（一）林西解围和收复经棚、大王庙

1913年10月初，叛军围攻林西日急。10月1日，常德盛所部在北大营子（今内蒙林西东北十公里）与叛军激战竟日。2日，叛军千余人三面围攻刘家营子，毅军以步骑炮五六营之众全力抵抗，将敌击退。林西三面被围，毅军坚守孤城，“兵力已疲，子弹将尽，危险万状”。

10月12日，吴俊升旅团长石得山率骑兵第四团由辽源经开鲁、乌丹驰援林西。姜桂题亦督师出关，于17日抵朝阳。姜以巡防队五个营留驻朝阳，亲率五个营赴赤峰，另以五个营驰援林西。10月21日，驻守刘家营子的毅军向叛军反击获胜。22日，米振标令毅军步队和石得山骑兵团进攻珠尔沁庙，中途与敌军接仗，连战皆捷。叛军焚巴林王府西遁，林西之围遂解。姜桂题令米振标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先迅速肃清林西周围百余里内之残敌，解除后顾之忧，再规复经棚。

10月29日凌晨4时，石得山团与毅军会攻经棚。经棚驻有叛军三千余人，环城修筑了围墙、堡垒，工事比较坚固。石团从左翼进攻，连夺外围哨卡十四处，并于经棚后山击毙叛军统领三吉迷吐、五喇嘛等大量官兵，攻入经棚街东关帝庙。上午11时，毅军从中路攻入，两军联合奋战，于下午5时收复经棚。叛军向西逃窜。

吴俊升与帮统陈锡武，骑兵三团团长诺门巴图率队经黄花庙（今内蒙巴林右旗东五十公里）、大板等地，粉碎了叛军的阻击，于11月9日驰抵林西。11日，吴俊升率军赴经棚，与米振标研究具体作战计划，决定分三路实施进攻：左路以诺门巴图、石得山率骑兵三，四两团，经毛盖他拉、白土井子向大王庙进攻，右路以奉军巡防队帮统陈锡武、毅军营务处张殿如各水所部，经太子府等处向大王庙进攻，中路由吴俊升、米振标统率，取道水头前进。

11月18日，吴俊升，米振标率奉，毅两军进抵水头，侦知叛军二千余人在驼罗庙，沙坑一带据险设卡，准备顽抗。吴俊升、米振标当即令诺门巴图，石得山率骑兵三，四两团由左路迂回沙坑东、南两面，陈锡武，张殿如等各率所部由右路驰赴驼罗庙北面，切断叛军后路，吴俊升，米振标率本部从正面进攻。当中路行至沙坑附近时，忽然尘沙四起，蔽不见人，叛军又突然以密集火力射击。吴、米指挥部队发起猛攻，叛军后退。中路军乘胜前进，接近沙坑时，叛军援军亦已赶到。这时，诺门巴图、石得山所部已迂回到沙坑西面，占领了南山阵地。但叛军仍拚死顽抗。吴，米激励士兵，指挥步骑炮各营密切协同，分割包围叛军，迫使其退守后山。下午5时左右，陈锡武、张殿如所部从北面迂回袭击叛军后路。在左中右三路奋力夹击下，叛军由沙坑，驼罗庙退向大王庙。

攻克沙坑、驼罗庙后，吴俊升和米振标率部于当晚12时分三路向大王庙进攻。大王庙“前临鱼泽，后枕崇山，附近百余里中，沙深没膝，随高下俱成坑堑”，先有大股叛军盘踞，又有驼罗庙等处残军麇集，共约三

千人。叛军在南面沙堤中层层设卡，东据莽牛泡子沿岸高山，扼险防守。吴俊升和米振标将中路步炮各队分成两路，攻击敌东、西两侧，另以一部兵力居中直进，连破敌卡六处，复仰攻山上之敌，诺门巴图、石得山率左路部队从左翼猛攻西南沙梁一带之敌。叛军乘西北风正猛，纵火烧草，企图阻止中路军的进攻。吴俊升和米振标亲率部队冒火冲锋。叛军退守庙前断墙破堡，继续顽抗。中路军集中炮火连续轰击，庙宇中弹起火。叛军无法存身，败退后山。与此同时，南北两股叛军亦被左右两路军击退。奉、毅两军乘势分三路追击，毙敌五六百名，俘敌三十余名，夺获大批军用物资。至下午4时，攻克大王庙。

战后，米振标率部回防林西，吴俊升率部返回经棚。盘踞黄瓜梁之叛军得知大王庙失守，遂“闻风远”。不久，政府军将巴林王府，什巴尔台、五十家子、经棚、驼罗庙，大王庙等处的残余叛军先后剿平。

（二）昭苏乃木城和奎苏之战

在奉、毅两军反攻经棚、大王庙时，多伦方向的政府军亦展开了反攻作战。

第八师师长王汝贤所率之第十六混成旅及二十师第七十九混成团，自10月初受命北上后，因赶制皮袄皮裤，迟至30日才全部到达多伦。王汝贤与多伦镇守使王怀庆等研究了对昭苏乃木城（多伦西北三十公里），奎苏、黑风庙（多伦北三十公里）之敌的进攻方略。其部署是：以淮军步马炮各营二千七百余人为一纵队，由李际春指挥，以第八师步兵四营和山炮、陆炮、机关枪各一连共二千五百余人为一纵队，由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何锋钰指挥，以陈文运骑兵第一旅八百余人为总预备队；为了保障多伦；之安全和后方粮道之畅通，以第八师步兵三营、炮兵两连、机关枪一连、马队两连及淮军新兵五百名、骑兵二百名防守多伦，另以第八师步兵两营，分驻后方要道闪电河（今河北沽源东北十公里）与大梁底（多伦西南六十公里），淮军马队三营往来巡逻，负责联络。李，何两纵队及陈旅于11月2日同时出发，依次向昭苏乃木城、奎苏、黑风庙发起进攻。

11月3日，何锋钰、李际春两纵队自带柴水，履冰踏雪，合力进攻昭苏乃木城，击毙叛军指挥官那木斯赖巴图鲁及其所率官兵数百名。叛军二千余人退守奎苏。11月6日晨，何锋钰纵队由乌苏台沟（多伦西北四十公里）出发，向奎苏及札克苏台（多伦西北五十公里）方向进攻。11时，在奎苏南端与敌接触。叛军集中札克苏台，黑风庙的驻军以及从经棚、昭苏乃木城撤退的部队共七千余人，防守奎苏。奎苏三面环山，地势十分险要。何锋钰率步兵三十二团附陆炮、山炮各一连为主攻部队，以步兵两营、机关枪一连为预备队，进攻中央山顶阵地，李际春率淮军步兵支队附山炮队进攻右翼山顶，团长张建功率第七十九团附山炮队进攻左翼山顶，陈文运率骑兵旅负责后方掩护，防敌迂回，高青云率骑兵百余人，迂回叛军之右翼。进攻开始后，叛军以猛烈火力进行拦阻。政府军以炮火进行压制，掩护各营团进攻。至下午5时，叛军不

支，纷纷向西北方向逃窜。此次战斗，共毙伤叛军官兵二千余名，俘虏百余名，毙敌马六七百匹，夺获敌马九十余匹、牛车二百余辆。

正当奎苏前线激战之际，叛军二千余人突然袭击政府军的后方。骑兵第一旅苑尚品、郑后彦两团协同何锋钰所派预备队步兵一营，奋勇迎战，将敌击溃。

奎苏之战后，叛军大将军忙乃巴图率残部向蓝旗一带窜逸，乌拉玛等率残部退回黑风庙。11月15日，王汝贤，王怀庆命第八师步兵团长朱文藻率步兵两营、炮兵和机关枪各一连，推军骑兵统带甄文龄率骑兵六百名、山炮一队，于21日出发，进攻黑风庙。届时，黑风庙叛军闻风向西北逃窜。王汝贤立即将步炮改作后梯队，交朱文藻带领，将多伦所有骑兵统一编为前梯队，由甄文龄率领，星夜追击，截住敌辎重队，夺获牛马羊三百余头、枪支弹药一部。至此，昭苏乃木、奎苏之战遂告结束，多伦附近的叛军全部被肃清。

叛军为了策应经棚、多伦方向的作战，曾向内蒙中、西部的托罗盖、石拉干（大余太北十五公里）、大佘太等地发起进攻，在百灵庙一带再次发生了激战。结果，均被当地守军击退。从此，内蒙各地的政府军改变了被动不利的态势，由防御转入了进攻。1913年底，外蒙叛军陆续向库伦败退，沙俄妄图控制整个蒙古地区的图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第十九部分 反对英国分割西藏的战争（1912年3月~1918年10月）

在沙俄侵略我国蒙古的同时，英国加紧了对我国西藏的侵略。它唆使西藏亲英分子制造叛乱，驱逐驻藏川军，并支持由亲英分子所控制的藏军向川边地区进犯，妄图制造西藏“独立”，分割西藏地区。当时的中国政府（以下称北京政府）在西藏爱国僧侣和民众的要求以及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令川、滇两省出兵反击，打退了藏军对川边地区的进犯。最后，终于粉碎了英国妄图分割我国西藏的图谋。本章着重叙述川军在西藏和川、滇军在川边地区与藏军作战的经过。

第一节 英国唆使西藏亲英分子发动叛乱

1903年，英国派兵入侵西藏，遭到当地爱国军民的无情打击。以后，英国便加紧采取在西藏统治集团内部寻找代理人的政策。1905年，英国以所谓会见英国皇太子的名义，用武力劫持班禅九世去印度，优礼款待，百般笼络，企图以班禅取代达赖，充当英国傀儡，结果遭到班禅的拒绝。此后，英国把注意力转向拉拢拉萨地方当局。以大贵族夏扎边觉多吉为首的一部分封建领主，由于在对英贸易中获得了许多好处，便越来越倾向英国侵略者，并影响丁徘徊子内地的达赖十三世的政治态度。

英军于1903年发动侵藏战争后，主张抗英的达赖于1904年英军侵占拉萨前，在沙俄间谍德尔智的怂恿下离开西藏，准备前往俄国，后在外蒙库伦被清政府阻留。1908年10月，达赖辗转到达北京。由于他在抗英斗争中来能得到驻藏大臣的帮助以及其它原因，对清政府怀有某些不满情绪。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乘机进行拉拢，大肆挑拨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使达赖的对英态度有所转变。1909年12月21日，达赖返回拉萨，后在西藏亲英分子的影响下，逐渐倾向英帝国主义，疏远中央政府。

清政府鉴于英军多次入侵西藏，逐渐意识到加强西藏的治理和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紧迫性，于1906年4月命张荫棠领副都统衔，以驻藏帮办大臣的身分入藏，“查办藏事”。张抵拉萨后，参革了在抗英战争中严重失职的驻藏大臣有泰等十余名官员，获得西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随后即着手整顿西藏内政，推行“新政”。1909年（宣统元年）夏，清政府接受驻藏大臣联豫的建议，派川军二千人，编为三营，由知府钟颖统率，从成都出发，取道昌都开赴拉萨。同时，命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进驻昌都，屯兵据守，以便策应入藏之川军。这些，本为中国内政，英国却公然表示反对，并乘机煽动西藏上层中的亲英分子发动叛乱。达赖回藏后，亦下令藏军阻击入藏之川军。

1910年2月初，钟颖率领川军在西藏江达（今太昭）击败了藏军的阻拦，于2月12日进驻拉萨。达赖于当夜与少数亲英分子离开拉萨，逃往印度。清政府革去达赖的名号，下令通缉随同叛逃的几个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官员。达赖逃印后，英帝国主义以帮助西藏‘独立”为诱饵，百般拉拢。3月5日，英国政府竟然为川军入藏和达赖被革一事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6月，英国又派步兵两个纵队及工兵一部（携炮四门），进驻印藏边境，并叫嚷“倘若达赖回藏，藏境发生变化”，英军“则须入藏以当保护之任”，公开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拉萨后，驻藏官员和川军内部分成维护帝制与赞成共和两派，内讧不已，并危及藏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英帝国主义决定利用这种局势，实现共分裂西藏之阴谋。英印总督与达赖密谈后，随即派遣亲英分子达桑占东（又名擦绒）潜回西藏，策划武装叛

乱。与此同时，英国还在西藏边境一带集结军队，以为声援。西藏部分人农奴主乘机以达赖名义发布了实际上是脱离祖国的“驱汉”命令，大肆驱杀汉人，并组织以达桑占东为总司令的“民军”（即藏军）万余人，围攻拉萨，日喀别、江孜的川军，且进扰川边地区。在亲英分子的操纵和毒害下，具有反帝爱国传统的藏军，竟成了破坏祖国统一的工具。

1912年春，达桑占东调集五千藏军向江孜进攻。驻守江孜的川军百余人，固守依山的造纸厂，并向拉萨求援。由于粮食不济，援兵不至，该部川军在英商务专员及尼泊尔驻藏代表的“调停”下，被迫以枪支弹药换取路费，离开江孜，经印度返回内地。不久，日喀则守军也被迫放下武器。同年4月，达桑占东又调集大批藏军围攻驻拉萨的川军。钟颖率千余人据险防御，等待援军。经数月苦战，伤亡不断增加，粮食亦将告罄，处境异常危险。藏军虽人数众多，但战斗力不强，一时也难于攻破川军防线。后经尼泊尔驻藏官员“调停”，双方达成协议：川军交出武器，由汉、藏，尼三方共同封存，不得擅取；川军全部退伍，经印度回国，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员照旧驻藏，并保留一定数量的卫队。8月中旬，川军交出毛瑟枪一千五百支、开花炮三门、机枪一挺、子弹八十箱。此时，钟颖已被北京政府任命为驻藏办事长官，但西藏亲英分子拒不承认，屡次促其起程。钟颖因未得中央同意，执意不走。双方遂复开战。此时，钟颖所部仅约二百人，粮弹俱缺，处境更加困难。后经尼汕尔驻藏官员再次“调停”，钟颖及其所部终于被迫离开西藏。

驻守江孜的川军被迫撤离，经印度返回内地驻拉萨川军被缴械撤离后，英帝国主义于1912年底武装护送达赖回到拉萨。达赖周围的一小撮亲英卖国分子，公开策划西藏“独立”，并以极其野蛮的手段镇压坚持反帝爱国的僧俗人士。英军亦以“护商”为名，由江孜侵入拉萨。西藏人民和一些爱国上层人士，坚决反对亲英分子分裂祖国的罪行，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独立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表现出热爱祖国的坚定决心。

第二节 川滇两省出兵平乱

一、北京政府的平乱决策及川滇两军的作战部署

正当西藏亲英分子驱赶驻藏川军之际，川边地区的藏族上层分子，由于赵尔丰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危及他们的统治，加之受西藏亲英分子的指使，于1912年5月也发动了叛乱，并得到西藏叛乱武装的直接支持。两月之内，川边地区的不少州县先后落入当地和西藏的叛乱武装之手。巴塘、昌都被围，乍丫（今西藏察雅东）、江卡（今西藏芒康东），乡城、稻城、理塘相继失陷，河口（今四川雅江）岌岌可危，川藏交通因之断绝。滇、川两督屡请北京政府出兵西征。全国各族人民一致谴责英国勾结西藏亲英分子分裂中国的罪行，猛烈抨击北京政府的对外妥协政策。在舆论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于1912年6月14日正式电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川军入藏平乱，令云南都督蔡锷派滇军入藏增援，同时，通告英国驻华公使，声明“此次川军入藏全为平乱，至希英国严守局外中立”。

尹昌衡接电后，迅速作了西征的准备。其作战计划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取南北两路“首尾夹攻”的方针，首先控制川边重镇理塘和进藏咽喉要地昌都，而后分别南下，夺取稻城、乡城、乍丫、江卡等地，以巩固川边地区。第二阶段：从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以西的十余营边军中，选拔“有志之精兵”数百名为前锋，其余各军继后，乘胜直拉萨。同时派得力喇嘛前往拉萨劝说达赖脱离英国的羁绊，维护祖国的统一。

蔡锷接令后，命滇军参谋厅总长殷承为西征军司令，率队进发。蔡锷考虑到川滇两军如先会师巴塘，再行进藏，不仅粮秣难继，而且可能扩大由辛女革命以来所引起的川滇两军之间的矛盾，因此主张滇军经维西及西藏东南地区直趋拉藏。这样，既可缩短路程，又可形成军事上的有利态势，使“滇犄其南，川捣其东，首尾策应，形势都归掌握”。北京政府不同意蔡锷的主张，而令滇军取道中旬北上，先支援巴塘，以固滇边门户。

二、击退藏军向川边的首次进攻

1912年初秋，川滇两军按既定计划分路开进。

7月上旬，尹昌衡率川军从成都出发。原计划出兵八个团，因“器械不备，师皆未练，饷亦无储”，遂先以朱森林团为先锋，尹自率三个营为本队，总兵力约三千人（一说五千人），兼程西进。其部署是：朱森林率所部两个营及先遣队陈步三一个营为南路，由打箭炉直趋理塘，副官刘瑞麟率蒯书礼营为北路，经甘孜进援昌都，本队三个营驻雅安，相机应援。朱森林以南路藏军势大，设防坚固，力请集中兵力于南路，尹昌衡未允。朱部至打箭炉后，以军孤势单，迟疑不敢前进。尹昌衡遂亲赴

打箭炉进行动员，指出：今川边部队尽被围困，损失甚重，急需支援，只要川军进展神速，出藏军之不意，兵力虽少，必能起到救援作用。经过动员后，川军遂分两路并进。

8月，被尹昌衡破格提升为北路督队官的刘瑞麟，率蒯书礼营由打箭炉出发，日行百余里，往攻道坞（今四川道孚）。沿途扬言尹都督率师十万亲征，即将到达。藏军闻讯，不战而溃，道坞、瞻对（今四川新龙）之围遂解。刘瑞麟便令边军牛运隆部守道坞，刘筱廷部守瞻对，令杜培基、刘赞廷率部从间道驰援巴塘；自率所部及顾复庆，时传文、朱宪文等营往援昌都。当时，驻守巴塘的顾占文部四五百人，已被围三月有余，粮弹将尽，水源断绝，处境十分危急。援军到后，内外夹击，迅速解围。刘瑞麟率部突然逼近昌都时，藏军不战而逃，防守昌都的彭日升立即率全部三百人出城追击，缴获辎重无算，并俘藏军首领呼图克图。

与此同时，朱森林率南路各营亦顺利完成了既定任务。其先锋部队两个营，先在河口击败藏军，又于8月12、14两日收复了麻盖宗、剪子湾、西俄洛三要隘，继而向理塘进逼。围攻理塘之藏军闻风溃逃。至是，川军西进未及三月，即以破竹之势收复了理塘、巴塘、昌都诸要地。于是，尹昌衡令顾占文部守巴塘，刘瑞麟郎守昌都，分援乍丫、江卡、盐井等地；令营长邹衍贵肃清河口一带残存藏军。

在川军进军川边之际，滇省西征军司令殷承率新军一混成协、防军十九营，从滇西北取道盐井支援巴塘。8月15日，前卫司令李学诗率部进至溜筒江附近。该地藏军依险据守。经李部奋力攻击，藏军退守隔江之墨里村，并斫断江上溜索，以阻滇军前进。李学诗派人另架溜索，命防军，土军各四个排溜渡过江，迂回墨里村。藏军又将村外木桥砍断，据险死守。16日，滇军发起猛攻，于下午3时将该村攻占。

8月19日，殷承率事部抵丽江，随即作了如下部署：以郑开文为左纵队长，率步兵四大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枪兵各一小队及李学诗的西防国民军，取维西大道直趋盐井，以姜梅龄为右纵队长，率步兵三中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枪兵各一小队及杨汝盛的西防国民军，取中甸大道直趋乡城，司令部及其余各队暂驻丽江，相机进止。

滇军经充分准备后，于8月26日夜突袭侵占盐井之藏军。经激烈战斗，将藏军击溃，并俘其指挥官鲁宗甲约，遂克盐井。

当滇军向川边进军时，怀有军阀割据思想的尹昌衡竟发电阻止，声称“川军围攻理塘，不日可下，滇军无须由维（西）援巴（塘），请由原议，直抵拉萨”。滇军收复盐井后，尹再次电阻，并令顾占文部向盐井一带开进。蔡锷则连电北京政府，以速克巴塘、理塘，“早日规复西藏”为由，要求继续向川边进军。川、滇两军互相攻讦：矛盾加深。后尹昌衡以“若滇军兼进，酿成（英国）交涉，则咎不在川”为辞，要挟中央。北京政府恐“两军逼处，别生枝节”，遂于9月致电蔡锷，令滇军酌留陆军

一大队及防军一、二营，专顾滇省门户，余悉撤回。滇军的平乱作战至此遂告结束。

当川军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基本完成后，尹昌衡认为，“控边制藏，非同时并举，无以全领土、维国权”。根据这一方针，他对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作了如下部署：命邹衍贵营驻打箭炉，河口，保护川军的后方供应线，命朱森林团为南路，驻巴塘，理塘，相机进攻稻城、乡城，命团长向树荣率所部两个营及陈步三营为北路，进攻甘孜，登科（今四川邓柯），从朱，向两团中各抽一营驻昌都，作为机动部队，以打箭炉为大本营，随时策应南北两路。不久，南北两路部队连战皆捷，惟乡城久攻不下。之后，尹昌衡任命黄煦昌为司令，由他指挥集小于昌都一带的川边部队，命张茂林为前锋，率部进据江达，待命入藏。

三、英国胁迫北京政府停止向西藏进军

西征军在川边作战中取得重大胜利，引起了英帝国主义和西藏亲英分子的极度恐慌。为了制止川军入藏平乱，英国于1912年8月17日令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干涉，以“不承认中华民国，并以实力助藏‘独立’”相威胁。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正急欲获得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遂屈从于英国的威胁，于9月下旬一再电令川军停止入藏，以江达为界，“先行肃清川边，万勿越境深入，致启外衅”，从而丧失了进军西藏的良机。

四、击退藏军向川边的第二次进攻

1912年底至1913年初，藏军经波密窜至川边，再次向川军发动进攻。乍丫、江卡、盐井等地首当其冲。川军陈桂亭营败退巴塘，舒云山营被围于南墩（盐井东北约四十公里）。巴塘守军粮食已绝，正欲撤退。尹昌衡急令嵇廉率部驰援，才守住巴塘。不久，黄煦昌率部至乍丫，与顾占文部夹击东犯之藏军。激战十余次，将其击退，乍丫、江卡，南墩之围遂解。藏军战败后，在嘉裕桥（今西藏洛隆东北之嘉玉桥）以西密布碉卡，驻扎重兵，进行防御，并派人四出煽动藏民，准备伺机再行进攻。尹昌衡根据北京政府提出的“步步稳进，以期慎固封域”的方针：令刘瑞麟部守昌都，西遏藏军，南控江卡；顾占文部守巴塘，南防盐井，东控乡城、稻城；朱森林部守理塘，西援顾军，南防稻坝；刘筱廷部驻甘孜，镇守北路。以上各部，有事互相救援，无事坚守不动。另由嵇廉率兵六百于乡城一带游动，以牵制该地藏军。

1913年初春，藏军连续向嘉裕桥，江卡发动进攻，均被川军击败，遂退守烟袋塘（乍丫西），并继续增兵。刘瑞麟见藏军势众，遂调昌都彭日升，时传文两营由西北方向，傅青云、牛运隆两营由乍丫方向，对烟袋塘藏军实行夹攻。2月28日，傅、牛两营首先发动进攻，将凭借碉房、哨卡顽抗的藏军击退。3月3日，彭、时两营进至距烟袋塘十余里处，发现藏军据守山顶，碉卡密布，难以从正面进攻，遂派数十人绕至山后，实行偷袭。藏军猝不及防，惊惶逃窜。彭、时率部追击，与傅、牛两营会师，将烟袋塘之藏军击溃。上万藏军纷纷西撤。至此，藏军的

第二次进攻又被粉碎。

第三节 川军攻占乡城，稳定川边局势

川军虽然击退了藏军对川边的第二次进攻，但乡城一带仍为藏军所控制。尹昌衡决定继续从省城抽调部队，厚集兵力，乘胜向乡城发动进攻。这是一次历时较长，并对稳定川边局势具有重要意义的作战。

一、川军的作战部署

乡城地处巴塘、理塘之南，靠近云南边境，周围皆山，城西有桑披岭为天然屏障，城东的无即河水流湍急，不便舟楫航行。此外，马鞍山、冷龙湾、阿都、下洼、门坎山、八格等处，均为险要之地，亦为进攻乡城必由之路，虽山道崎岖，但能通行驮马。乡城驻有藏军三四千人，主要是步骑兵，还有少量炮兵。武器有日式速射山炮、德式管退炮各一门，另有五子、九子、十二子等杂式快枪（平均二三人有一支），其余均为土枪、土炮和刀矛。

1913年4月2日，孙绍骞在理塘接替嵇廉为攻乡总指挥。4日，由省城派出的第四师参谋长刘成勋率混成支队到达理塘。于是，确定了进攻乡城的部署：刘成勋率混成支队步兵三个营、炮兵二个连、机关枪一个排为左路，由理塘经稻城向乡城进攻，孙绍骞率步兵一营和朱森林，周尚赤的两个步兵营及炮队、卫生队等为右路，由喇嘛桠（丫）经火珠乡向乡城进攻。

二、右路军攻占冷龙湾

在右路军发起进攻之前，盘踞乡城的藏军一部突然围攻靠近喇嘛桠的东龚。川军支队长周尚赤率部反击，将藏军击退，并夺获日式速射炮一门，其它军械数十件。右路军首战告捷，士气高涨。孙绍骞决定每兵暂发糌粑两碗，于5月15日分三路发起进攻。16日，一举攻克下洼、阿都，17日又克火珠乡的山根子。因部队缺粮，遂暂驻火珠乡。该处喇嘛寺之堪布罗松成献出杂粮千包，以济军食，于是士气复振。5月23日，朱森林率队由山根子向马鞍山进攻。马鞍山路隘林密，藏军凭险坚守。朱部与之激战一日，未能攻克。孙绍骞令周尚赤等率部往援，合力进攻，始将马鞍山占领。藏军退守冷龙湾的碉房、坚卡，进行防御。川军进攻数日，终不能克。当时部队缺粮缺水，士气颇受影响。6月3日，孙绍骞亲自到达前线，安定军心。6月25日，川军再次发起进攻，将藏军击退，先后攻占了冷龙湾和门坎山。

三、左路军进占稻城

4月25日，左路军进至拉波，侦知藏军在夕波筑有坚卡十余处、碉房数十座，外有散兵壕和深沟。27日夜，刘成勋密令三营营长张建勋率所部及炮兵第二连，参谋赖心辉率预备营一、四连和机枪排，分道潜占各要隘。28日上午8时发起进攻，先用炮火猛烈轰击，继以步兵第九连

由界牌山腰向夕波正面，第一，十一连从左右两翼同时进攻。战至下午4时，川军连克十余座碉房，迫使藏军向稻城方向退走。夕波告捷后，附近的藏军相继投诚。5月3日，攻乡左路川军收复大桥，8日进占色母，逼近稻城。

稻城附近群山环绕，中为平坦坝地，筑有碉房数十座，坚卡十余处。藏军分占东西两侧高山及坝内碉房。刘成勋命预备营营长张英率步兵一个营、炮兵一个连为第一队，进攻右侧高山，命三营营长张建勋率步兵一个营、炮兵一个连为第二队，进攻左侧高山，命参谋赖心辉率步兵一个营，机枪兵一个排为第三队，防守各隘口，相机应援。

5月10日晨6时，川军开始进攻。由于第一队需通过开阔的低洼地，张英派出敢死队冒敌炮火匍匐前进，接近山边，经四小时激战，夺取山顶坚卡四座，进至距藏军主阵地五六百米处。张英一面命炮兵向藏军主阵地射击，一面要求第三队派出机枪一挺抄袭藏军退路。炮兵连续发射炮弹四十余发，击毁碉房十余座，尔后转移火力向稻城城内集中射击。与此同时，张违勋所率之第二队与藏军步骑兵千余人接战，至上午10时，夺得坚卡六七座，并以一个连迂回藏军右翼，粉碎了藏军从左翼抄袭的企图。下午3时，一，二队分别向当面之藏军发起总攻。稻城及坝内之藏军动摇，纷纷逃窜。川军攻占稻城后，立即乘胜追击，于16日克桑堆。藏军向乡城退却。

四、会攻乡城

稻城战后，刘成勋于5月27日率部队主力绕道进攻中乡城，在簇东高地击退藏军的拦阻，进入八格村南的狭谷，遭到谷底和山顶藏军三千人的袭击。张建勋督率前卫营各队迅速夺占了谷底的一座坚卡作掩护。刘成勋见前卫营受阻，立即命赖心辉率兵向左面山顶迂回，连长李邦君、萧子英率兵向右面山顶攻击，张英督队策应。入夜，藏军败退。刘成勋乘机率队追击二十余里，始出谷口，并乘势攻取了八格村及上乡城各要隘。藏军焚毁桥梁，退守对河贡撒、俄杂及业洼等地，凭险顽抗。5月29日，刘成勋部因无造筏架桥器材，遂挑选士兵数百人，从上下游泅渡，分左右两翼实施强攻，并在对岸用火炮、机枪火力予以支援。部队渡江后，攻占贡撒、俄杂，河左部队则直逼业洼。业洼距定乡城二十余里，丛林茂密，坚卡重重。6月3日，刘成勋令张英趁夜暗浓雾，率队进抵业洼左侧高山及右侧河岸一带，占领了进攻出发阵地，于拂晓发起进攻。藏军依托碉房、坚卡顽强抵抗。张英见正面攻击无效，便命步兵两个连从左侧高山密林中抄袭藏军后路，炮队从正面猛击碉房。藏军不支，退向桑披岭。

左路军经过连续作战，前方兵力已不足两营。刘成勋遂致电尹昌衡，请求派兵一营，接替后方防务。6月19日起，刘成勋集中所部兵力，经三昼夜激战，攻克藏军屯粮要地罗拉寺。23日，又攻占雨洼。藏军退至定乡城外之最后一道防线泥四顶。至此，川军左右两路军从冷龙湾、雨洼对乡城形成了钳形攻势。泥四顶两侧高山耸立，森林茂密。藏

军以少数兵力配置于正面，主力隐蔽集结于左山，企图喇击从正面进攻之川军。张建勋侦知藏军部署后，命一部兵力从正面佯攻，主力从左侧迂回进攻。经一日激战，连夺坚卡十余座，迫使藏军退向定乡。川军紧追不舍，抢占通往定乡的大桥，为攻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6月25日黎明，孙绍骞所率之右路军在攻占冷龙湾，门坎山之后，即从右翼向定乡进攻，刘成勋所率之左路军从泥四顶协同进攻。经五小时激战，藏军动摇，向下乡城方向撤退。下午3时，孙、刘两路军攻占定乡。

不久，江西、江苏等省爆发了由孙中山等领导的讨袁战争，四川的熊克武亦举兵响应，刘成勋支队奉调返回成都。西藏少数亲英分子又乘机唆使和支持各地暴乱，川边形势再度吃紧。孙绍骞为了应付危局，一面令各营分扎各要地，以保粮道，一面对下乡城一带的藏军进行招抚。由于亲英分子的阻挠和破坏，招抚工作未见成效。10月31日，藏军数千人分三股围攻定乡。孙绍骞率部坚守二十余日，在得到运粮队的增援后，实施反击，才得以解围。

1914年初，川军先后收复了下乡城、丹巴及三十九族地区，从而稳定了川边局势。

第四节 英国分割西藏阴谋的破产

一、英国策划的“西姆拉会议”

英帝国主义为了分割我国的西藏，除派遣军队公开入侵西藏和指使西藏亲英分子发动暴乱外，还极力阻挠中国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发生联系。如1912年10月28日，北京政府明令恢复了达赖的封号，并邀达赖赴京会谈，1913年4月，北京政府又任命了新的驻藏办事长官。英国不仅阻止西藏地方当局与北京政府直接谈判，还不许驻藏办事长官假道印度入藏，同时，提出举行中英藏会议，并以北京政府如不派代表与会，英国将与西藏当局直接缔约相威胁。袁世凯在西征军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下，不顾全国各族人民的反对，竟接受了英国的无理要求，于1913年10月派代表参加了在印度西姆拉召开的会议。

“西姆拉会议”，是英国勾结西藏少数亲英分子企图分割中国西藏的一个大阴谋。会议期间，英国代表麦克马洪抛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西姆拉条约》草案和“西藏地图”，公然把西藏、西康、青海全部地区和云南，四川，甘肃的藏族地区，统称为“西藏”，并将金沙江以西地区称为“外藏”，以东地区称为“内藏”，“外藏”完全“独立”，“内藏”则‘中藏共管”。草案还规定：“西藏中央政府在‘内藏’仍保留共已有之权”，中国不得驻兵藏境，中国政府与西藏有争议时，由英印政府裁决，英人可以在西藏自由经商，中国不得加以限制，西藏内政暂由英印政府监督等等。充分暴露了英国妄想侵吞西藏的狂妄野心。这个条约草案一出笼，立即遭到中国人民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爱国人士的坚决反对，中国代表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北京政府也断然加以拒绝，立即召回代表。于是，英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外交手腕分裂西藏的阴谋遭到了破产。会议并未讨论中印边界问题，英国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代表夏扎边觉多古在全外秘密换文小提到的所谓划定中印东段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把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则是完全非法的，当时以及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夏扎边觉多吉回藏后，亦被达赖削职。

二、英国加紧武装藏军，再次挑起川边冲突

“西姆拉会议”破裂后，英国遂大力帮助西藏地方政府扩建新式藏军，企图继续以武力制造西藏“独立”。1914乍以后，英国协助西藏地方政府成立藏军总司令部，以亲英分子达桑占东为总司令，台吉车门巴为副司令，计划将原有三千人的常备军扩充到万人以上。英国还在江孜开办了一所军官学校，为藏军训练军事指挥人才，并选派一批西藏贵族子弟去英国、印度学习军事，又在札什城设立了一所机器厂，由印度技师帮助制造枪械弹药。

藏军经过扩充和训练，实力有所增强。于是，英国又唆使西藏亲英分子再次驱使藏军进犯川边地区。1914年9月间，西藏地方政府派噶伦喇嘛为西康总管，会同错郭娃代本率兵前往江达。10月，又派穹然木代

本带领藏军三百人前往三十九族地区，准备再次挑起战端。由于当时的边军统领彭日升拥有装备比较精良的三个营，分别驻防昌都、类乌齐和三十九族地区，因而藏军未敢贸然进攻。1917年春，四川爆发了川、滇军阀之间的战争，战火波及川边。7月，边军统领彭日升派兵两营进攻打箭炉，被滇军华封歌团击败。不久，川边镇守使殷承被迫离开打箭炉回滇，由陈遐龄接任。英国见有机可乘，立即接济藏军“五子枪五千支，子弹五百万（发）”，唆使藏军向川边发动进攻。边军一败涂地。

1918年1月，类乌齐被裁军攻陷，边军一营营长田文清败逃昌都。1月22日，彭日升令第三营营长张开胜，第十营营长曹树范分道夹攻驻欧月（昌都南八十里）之藏军，结果为藏军击败，分别退守昌都、乍丫。彭日升急忙向陈遐龄求援。时陈正参与川省军阀混战，且虑彭之势力扩展对其不利，以致见危不救。2月下旬，藏军进攻昌都，首先占据昌都后山。3月3日，彭日升派队分道进攻后山，又被藏军击败。4月3日，藏军攻陷鸡心山，15日又陷四川桥。彭日升等因昌都已无险可守，遂缴械投降。藏军攻占昌都后，分南北两路进攻。边军纷纷溃降，以致“德格、邓柯、石渠、白玉、贡县、武城、宁静七县相继俱陷”，整个川边为之震动。

是时，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先后派人递信给达赖，劝其休兵息战。由于西藏少数亲英分子的阻挠，陈的停战提议未获结果。藏军在攻占德格后，又直逼甘孜、瞻对。陈遐龄于7月令团长朱宪文率部抵御。川军与藏军在甘孜西南之绒坝岔激战二十余日，始进至雅砻江东岸，阻止了藏军的进攻。

三、川藏两军停战议和

川藏两军在甘孜前线形成对峙局面后，陈遐龄于1918年8月再次派人赴拉萨交涉。英国鉴于藏军进攻受阻，加上兵力不足，如川军增调主力反攻，已占地区仍有丧失的危险，遂令驻川边副领事台克满出面“调解”，由英川藏三方代表谈判议和。谈判虽未达成协议，但同意从1918年10月17日至31日，川军退守甘孜，藏军退守德格，停战一年。

随着我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藏族地区的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西藏爱国人士增强了反帝信心，纷纷要求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取得直接联系。1919年10月，北京政府派出的代表团抵达拉萨，受到西藏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达赖亦向代表表示：“亲英非出本心”，“余誓倾心内向”。班禅九世也派人向中央代表表达了拥护中央的心愿。

此后，达赖逐渐摆脱了亲英分子的羁绊，不断加强了与中央的联系，使英国妄图分割西藏的图谋终于彻底破产。

附录：大事年表

1838年（道光十八年戊戌）

6日2日（闰四月初十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以死刑禁食鸦片。

7月28日（六月初八日）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率军舰三艘闯入虎门，被广东水师驱逐出口。

9月20日（八月初二日）湖广总督林则徐奏陈严禁吸食鸦片，以杜弊源，支持严禁主张。

12月31日（十一月十五日）道光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并节制广东水师。

1839年（道光十九年己亥）

3月10日（正月二十五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广州。（18日晓谕外商，限期交出鸦片，并出具“永不夹带鸦片”保证书。）

4月3日（二月二十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上书英政府，建议保护英国鸦片走私贸易，发动侵华战争。

6月3日（四月二十二日）林则徐与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于虎门开始当众销烟。（至25日，共销毁收缴之鸦片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

9月4日（七月二十七日）英舰于九龙附近炮击广东水师巡船，被击退。

10月1日（八月二十四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舰队来华，发动侵略战争。

11月3日（九月二十八日）英舰炮击穿鼻洋广东水师巡船，被水师提督关天培督兵击退。（至13日，英舰在官涌一带连续六次挑衅，均被击退。）

1840年（道光二十年庚子）

2月20日（正日十八日）英政府任命驻好望角舰队司令乔治懿律为对华交涉全权代表，义律副之。

4月7日（三日初六日）英国议会下院正式通过政府的对华战争政策。

6月28日（五月二十九日）英舰封锁珠江口。

6月30日（六月初二日）懿律、义律等率舰队北犯。

7月3日（六月初五日）英舰炮击厦门。

7月6日（六月初八日）英军攻陷定海。（28日，英舰队自定海继续北犯。）

8月9日（七月十二日）英军舰队驶抵白河口外，（15日递交巴麦尊照会。）

8月30日（八月初四日）直隶总督琦善与义律举行大沽谈判。

9月15日（八月二十日）英军舰队自白河口南驶。

9月17日（八月二十二日）道光帝命琦善为钦楚大臣赴广东办理中英交涉。（28日又令其兼署两广总督。）

10月38日（九月初八日）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

11月14日（十月二十一日）懿律、义律等以一部兵力驻守定海，率其余舰只南驶。（20日抵澳门。）

11月29日（十一月初六日）钦差大臣，署两广总督琦善抵广州。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辛丑）

1月7日（十二月十五日）英军攻陷虎门外沙角，大角炮台，清军副将陈连升父子英勇牺牲。

1月26日（正月初四日）英军霸占香港。

1月27日（正月初五日）道光帝通谕中外，决定对英宣战。（30日命御前领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率军赴粤，主持广东军务。）

2月10日（正月十九日）道光帝命江苏巡抚裕谦接替伊里布为钦差大臣，督办浙江军务。

2月26日（二月初六日）英军陷虎门横档地区六座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战力战牺牲。同日，道光下令锁拿琦善。（命祁接任两广总督。）

2月27日（二月初七日）英军陷乌涌炮台。（3月2日又陷猎德炮台，逼近广州。）

3月20日（二月二十八日）杨芳与义律达成临时停战和广东恢复对外贸易的协改。

4月14日（三月二十三日）奕山、隆文、祁抵广州。

4月30日（闰三月初十日）英政府否认所谓的《穿鼻草约》，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准备扩大侵华战争。

5月21日（四月初一日）奕山等令清军夜袭英舰失败，英军决定乘势进攻广州城。

5月26日（四月初八日）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日次，余保纯与义律签订停战协定——《广州和约》。）

5月30日（四月初十日）三元里附近一百零三乡的群众数万人，严惩处军于牛栏冈。（31日又包围四方炮台。）

6月1日（四月十二日）英军开始撤离广州。（7日全部撤至珠江口外。）

7月28日（六月十一日）清廷谕沿海各省酌撤调防官兵。

8月10日（六月二十四日）璞鼎查抵澳门。

8月21日（七月初五日）璞鼎查等率舰队北犯。（26日陷鼓浪屿和厦门。）

9月5日（七月二十日）英军舰队自厦门北犯。（23日抵舟山海面。）

9月30日（八日十六日）英舰一艘炮轰台湾基隆，被守军击退。

10月1日（八月十七日）英军再陷定海，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三总兵英勇牺牲。

10月10日（八月二十六日）英军攻陷镇海，钦差大臣裕谦投水自尽。（13日英军进陷宁波。）

10月18日（九月初四日）清廷命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率军赴浙，主持军务。（不久又命户部左侍郎文蔚、蒙古副都统特依颇为参赞大臣，驰赴浙东。）

10月19日（九月初五日）英舰一艘再犯基隆，后在三沙湾登陆，被击退。

11月14日（九月二十一日）英新任外交大臣阿伯丁致函璞鼎查，令其继续扩大侵华战争。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壬寅）

3月10日（正月二十九日）奕经等令浙东清军分三路反攻宁波、镇海、定海，均遭失败。（15日英军陷慈谿。）

5月18日（四月初九日）英军陷乍浦。

6月16日（五月初八日）英军攻陷吴淞，江南提督陈化成英勇牺牲。（19日英军进占上海。）

7月6日（五月二十八日）英军舰队自吴泄口溯长江西犯。

7月21日（六月十四日）英军攻陷镇江，守城清军大部英勇牺牲，副都统海龄举家自尽。

8月9日（七月初四日）英军舰队驶抵江宁江面。

8月29日（七月二十四日）中英签订《江宁条约》（《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10月8日（八月十五日）中英签订《虎门条约》。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7月3日（五月十八日）中美签订《望厦条约》。

10月24日（九月十三日）中法签订《黄埔条约》。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10月18日（九月初时日）湖南新宁雷再浩等率众起义。（12月失败。）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11月27日（十月十三日）湖南新宁李沅发率众起义，攻占县城。（次年6月失败。）

1850年（道光三十年庚戌）

7月洪秀全下令“团营”，动员拜上帝会会众齐集广西桂平金田村，准备发动起义。

1851年（咸丰元年辛亥）

1月11日（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拜上帝会众于广西桂平金田村举行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2月18日（正月十八日）太平军败广西提督向荣等部清军于大湟江口。

3月23日（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于武宣东乡称天王，分封五军主将。

9月15日（八月二十日）太平军大败向荣部清军子宫村。

9月25日（闰八月初一日）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城。

12月17日（十月二十五日）洪秀全于永安封王建制，以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

1852年（咸丰二年壬子）

4月5日（二月十六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进军桂林。

（18日围攻桂林，因久攻不克，于5月19日撤围北上。）

6月3日（四月十六日）太平军攻占全州。（6月6日撤走。）

6月10日（四月二十三日）南王冯云山因伤重牺牲。

6月12日（四月二十五日）太平军攻占湖南道州。

8月10日（六月二十五日）太平军自道州撤军北进。（17日攻占郴州。）

9月11日（七月二十八日）萧朝贵率太平军强攻长沙。（12日萧朝贵中炮牺牲。26日，洪秀全、杨秀清率太平军主力撤离郴州，向长沙进军。）

10月13日（九月初一日）洪秀全，杨秀清率太平军开始围攻长沙。（11月30日撤围北上。）

12月3日（十月二个二日）太平军克益阳，获船数千只。

12月13日（十一月初三日）太平军克岳州，获船五千余只，成立“水营”。

12月23日（十一月十三日）太平军克湖北汉阳，包围武昌。（29日攻占汉口。）

1853年（咸丰三年癸丑）

1月12日（十二月初四日）太平军攻克湖北省城武昌。

2月9日（正月初二日）太平军自武昌顺流东下。（18日克江西九江。24日克安徽省城安庆。3月4日克芜湖。3月8日兵临金陵城下。）

3月19日（二月初十日）太平军攻破金陵外城，毙两江总督陆建瀛。（20日攻破满城，斩江宁将军祥厚等。）

3月29日（二月二十日）洪秀全等入金陵，正式建都，改金陵为天京。（31日罗大纲率太平军一部攻占镇江。）

4月1日（二月二十三日）李开芳、林凤祥等率太平军一部攻占扬州。（7日，钦差大臣向荣部清军抵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16日，钦差大臣琦善部清军抵扬州，建立“江北大营”。）

5月13日（四月初六日）林凤祥，李开芳等率太平军一部自浦口开始北伐。

5月19日（四月十二日）胡以晃、赖汉英等率太平军一部溯江西征。

6月10日（五月初四日）太平军北伐军攻占安徽亳州，西征军再克安庆。

6月13日（五月初七日）北伐军克归德府城。

6月24日（五月十八日）西征军开始围攻南昌。（9月24日撤围北进。）

7月7日（六月初二日）北伐军开始围攻河南怀庆府。（9月1日撤围西进。）

9月5日（八月初三日）江苏青浦小刀会周立春等起义，攻占嘉定。

9月7日（八月初五日）上海小刀会刘丽川等起义，占领上海县城。（9日占宝山，10日占南汇，13日占川沙，17日占青浦。）

9月25日（八月二十三日）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率所船抵安庆，主持西征事宜。（29日，西征军攻占九江。）

10月9日（九月初七日）太平军北伐军攻占直隶深州。（25日占献县，27日占沧州，29日占静海、独流、杨柳青，逼近天津。）

10月15日（九月十三日）太平军西征军石祥祯部大败清军于湖北田家镇。

10月20日（九月十八日）西征军再占汉口、汉阳。（11月6日撤离东走。）

11月14日（十月十四日）太平军西征军胡以晃部攻占安徽桐城。（29日占舒城。）

12月26日（十一月二十六日）曾立昌部太平军撤出扬州，准备北援。

1854年（咸丰四年甲寅）

1月15日（十二月十七日）太平军西征军胡以晃部攻占庐州，安徽巡抚江忠源投水死。

2月4日（正月初七日）曾立昌等率北伐援军自安庆出发，增援北伐军。

2月5日（正月初八日）太平军北伐军自静海、独流突围南走。（9日，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及胜保部清军包围北伐军于河间府束城镇一带。）

2月12日（正月十五日）太平军西征军大败清军于黄州，毙湖广总督吴文镕。

2月16日（正月十九日）西征军三占汉阳、汉口，围攻武昌。

2月27日（二月初一日）西征军石祥祯等部再占湖南岳州。

（3月4日占湘阴，7日占靖港，11日占宁乡。3月21日撤出岳州。）

3月9日（二月十一日）太平军北伐军退守直隶阜城，旋遭清军围困。

3月杨元保领导布依族农民于贵州独山丰宁上司起义。（5月失败，杨元保被俘遇害。）

4月7日（三月初十日）西征军石祥祯部再占岳州，曾天养部攻占湖北德安府。

4月12日（三月十五日）太平军北伐援军攻占山东临清。

（23日自临清南撤。27日于冠县军溃。

4月24日（三月二十七日）西征军林绍璋部攻占湖南湘潭。

4月28日（四月初二日）西征军大败湘军水师于湖南靖港。

5月1日（四月初五日）西征军林绍璋部干湘潭为湘军所败，北返靖港。

5月2日（四月初六日）西征军曾天养部克湖北荆门。（18日克宜昌，27日放弃。）

5月4日（四月初八日）西征军石祥祯部退守岳州。

5月5日（四月初九日）北伐军自阜城突围，退据东光连镇。（28日，李开芳率一部自连镇突围南撤，进入山东境，于29日袭占高唐。）

6月10日（五月十五日）广东东莞天地会首领何六率众于石龙镇起义。（17日攻占东莞县城。）

6月26日（六月初二日）太平军西征军再克武昌。

7月5日（六月十一日）广东佛山天地会首领陈开率众起义，旋即攻占佛山镇，李文茂等率众响应。

7月20日（六月二十六日）广东天地会起义军围攻广州。

7月25日（七月初一日）湘军攻陷岳州。（30日，太平军西征军韦志俊、曾天养、林绍璋部反攻岳州失利。）

8月9日（七月十六日）西征军曾天养等部大败湘军水师于城陵矶。

8月11日（七月十八日）西征军曾天养等部与湘军激战于城陵矶失利，曾天养牺牲。

8月25日（闰七月初二日）湘军攻陷城陵矶，太平军韦志俊等部撤往武汉。

9月斋教领袖畅凤及舒裁缝等于贵州桐梓九坝起义，攻占桐梓县城，建立“江汉”政权。

10月14日（八月二十三日）曾国藩督湘军攻陷武昌，汉阳，太平军西征军东撤。

11月24日（十月初五日）湘军罗泽南部败燕王秦日纲等部太平军于半壁山。（太平军石镇仑、韦以德等阵亡。）

12月3日（十月十四日）湘军攻陷田家镇，秦日纲等率太平军东退黄梅。（后又为湘军所败，退入安徽境内。）

12月9日（十月二十日）驻上海法军炮击上海小刀会起义军。（14日正式向起义军宣战。）

1855年（咸丰五年，乙卯）

1月6日（十一月十八日）法军会同清军大举进攻上海县城，为小刀

会起义军所败。

1月18日（十二月初一日）湘军分路攻九江，为太平军所败。（23日，湘军攻湖口梅家洲，被太平军击退。）

1月27日（十二月初十日）广东清军攻陷佛山镇，陈开率起义军撤出。

1月29日（十二月十二日）太平军在石达开等指挥下，取得湖口大捷，大败湘军水师。

2月11日（十二月二十五日）石达开等部太平军再败湘军水师，曾国藩逃遁。

2月16日（十二月三十日）太平军秦日纲，陈玉成等部败清军于广济。

2月17日（正月初一日）清军在法军的配合下攻陷上海县城，小刀会起义军失败，刘丽川等牺牲。

2月23日（正月初七日）太平军第四次克汉阳。

3月7日（正月个九日）僧格林沁督清军攻陷东连镇，林凤祥被俘（后于北京慷慨就义）。

3月17日（正月二十九日）清军逼攻高唐，李开芳率北伐军余部突围，撤至茌平冯官屯。

4月3日（二月十七日）秦日纲、韦志俊、陈玉成等部太平军第三次攻克武昌。

4月22日（三月初七日）杨凤所部贵州斋教起义军于石阡葛彰司为清军、团练所败，杨凤负重伤自刎死，舒裁缝率余部撤往铜仁府，遵义府。（6月2日，舒裁缝被俘遇害，起义失败。）

4月30日（三月十五日）张秀眉、包大度、李鸿基等发动贵州台拱厅苗民起义。

5月下旬陈开、李文茂等率天地会起义军撤离广东肇庆，向广西进军。

5月31日（四月十六日）僧格林沁部清军攻陷冯官屯，太平军北伐失败。李开芳被俘（6月11日于北京遇害）。

7月16日（六月初三日）张秀眉等率苗民起义军攻占贵州岩门司。

8月皖豫各路捻军首领会盟于安徽雉河集，举张乐行为盟主，并决

定建立黄、白、红、黑、蓝五旗军制。

9月12日（八月初二日）韦志俊等部太平军攻占金口。（18日，太平军大败署湖北巡抚胡林翼等部清军于汉阳西南之山。）

9月27日（八月十七日）陈开、李文茂率天地会起义军攻占广西浔州府，建立“大成国”，改浔州府城为秀京。

10月23日（九月十三日）张秀眉等率苗民起义军攻克贵州丹江厅城。

11月5日（九月二十六日）石达开等率太平军攻占湖北崇阳。（14日占通城，24日进军江西。）

11月7日（九月二十八日）张乐行等率捻军攻占安徽蒙城。

11月11日（十月初二日）徐廷杰等领导贵州铜仁府红号军起义，攻占铜仁府城。

12月6日（十月二十七日）张秀眉率苗民起义军攻占贵州黎平府下江厅城。

1856年（咸丰六年丙辰）

2月1日（十二月二十五日）燕王秦日纲、冬官正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率太平军自天京出发，东援镇江。

3月24口（二月十八日）石达开等率太平军四路围攻江西樟树镇，湘军溃逃南昌。

4月2日（二月二十七日）秦日纲等部太平军会合镇江守军吴如孝部击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等部清军。

4月5日（三月初一日）秦日纲等部太平军再克扬州，摧毁清军江北大营。（16日攻占浦口。）

4月15日（三月十一日）张乐行、任乾、夏白等部捻军围攻安徽怀远城；李文茂、梁培友等率天地会起义军袭占广西武宣城。

5月2日（三月二十八日）太平军石达开部攻克安徽宁国府。（11日攻克芜湖。）

5用7日（四月初四日）李文茂等率天地会起义军攻占广西象州。

6月1日（四月二十九日）秦日纲等部太平军于高资大败清军，毙吉尔杭阿。

6月20日（五月十八日）太平军第一次击破江南大营。（向荣逃往丹阳，8月9日自杀而死。）

7月16日（六月十五日）张乐行等率捻军攻占皖北三河尖。

8月29日（七月二十九日）梁培友等率天地会起义军攻占广西平南。

8月杜文秀发动云南蒙化厅回民起义。

9月2日（八月初四日）天京内讧，北王韦昌辉杀死东王杨秀清。

9月16日（八月十八日）杜文秀等率回民起义军攻占大理府城。

10月8日（九月初十日）英国侵略者挑起“亚罗船事件”。

10月23日（九月二十五日）英军舰队闯入珠江，攻占猎德炮台，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杜文秀为首的滇西回民起义军建立大理革命政权。

10月29日（十月初一日）英军攻入广州城，旋即退出。

11月12日（十月十五日）英军攻占虎门横档炮台。（次日又陷威远、靖远和镇远炮台。）

11月洪秀全下令处死韦昌辉。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辅政。

2月15日（十一月十八日）广州群众怒烧十三洋行。

12月19日（十一月二十二日）清军攻陷武昌，汉阳。

1857年（咸丰七年丁巳）

3月15日（二月二十日）李文茂等北天地会起义军攻占广西柳州。

5月27日（五月初五日）梁昌、区润、李文彩等率天地会起义军占领广西南宁城。

5月底石达开率数万太平军自天京出走。（6月中旬抵安庆。）

6月16日（五月二十五日）清军牲保部攻陷三河尖。

9月27日（八月初十日）陈开部地会起义军攻占广西梧州。

10月26日（九月初九日）湘军攻陷湖口及梅家洲。

12月15日（十月三十日）英法联军侵占广州河南地方。

12月27日（十一月十二日）清军攻陷镇江、瓜洲，吴如孝撤军天京。

12月28日（十一月十三日）英法联军炮轰广州，次日广州沦陷。

1858年（咸丰八年戊午）

1月5日（十一月二十一日）两广总督叶名琛为英法联军所俘。

1月8日（十一月二十四日）张国梁等率清军进逼天京，再建江南大营。

1月贵州白莲教教主刘义顺领导白号军于思南起义。

3月7日（正月二十二日）金干干、柳天成等率黔西南苗民起义军攻占麻哈州。（14日占都匀府）

3月杨和风等在贵州安化、婺川一带领导黄号军起义。

4月15日（三月初二日）太平军石达开部撤江西广丰围，经玉山入浙，占江山。

4月20日（三月初七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于白河口外会齐。（24日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在北京或天津举行谈判。）

5月19日（四月初七日）湘军攻陷九江，太平军守将林启容等万余人牺牲。

5月20日（四月初八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26日，联军舰艇驶抵天津城外。）

6月2日（四月二十一日）张乐行、龚得树等部捻军攻占怀远城。（14日占临准关，15日占凤阳府县两城。）

6月13日（五月初三日）中馈签订《天津条约》十二款。

6月18日（五月初八日）中美签订《天津条约》三十款。

6月26日（五月十六日）中英签订《天津条约》五十六款，附件一款。

6月27日（五月十七日）中法签订《天津条约》四十二款、附件六款。

7月14日（六月初四日）太平军石达开部撤浙江衢州围，进军福建。

7月21日（六月十一日）广东团练壮勇围攻广州，英法侵略军龟缩城内。

8月上旬李秀成、陈玉成等于安徽枞阳会各路将领，商讨军事，谋解天京之围。

8月23日（七月十五日）太平军陈玉成，李世贤、吴如孝部再克庐州。

9月26日（八月二十日）陈玉成，李秀成等部太平军大败钦差大臣德兴阿部清军于乌衣。（27日又击败清军总兵冯子材部。）

9月29日（八月二十三日）陈玉成等部太平军占领江浦。至此，清军江北大营再次被摧毁。

10月5日（八月二十九日）贵州苗民起义军攻占镇远城。

10月9日（九月初三日）太平军李秀成部攻占扬州。（21日弃城撤走。）

10月13日（九月初七日）湘军李续宾部攻陷桐城。（24日陷舒城，进逼三河镇。）

10月18日（九用十二日）太平军石达开部攻占江西瑞金。

10月24日（九月十八日）太平军陈玉成部攻占江苏六合，李世贤部攻占溧水，进攻秣陵关。

11月16日（十月十一日）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等部全歼湘军李续宾部，取得三河镇大捷。（27日，安庆之围不战而解。）

11月24日（十月十九日）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攻占桐城。（27日克潜山、太湖。）

11月英政府任命普鲁斯为驻华特命全权公使（接替包令职务）。

1859年（咸丰九年己未）

1月3日（十一月三十日）太平军石达开部攻占江西南安府。（11日克崇义。）

2月26日（正月二十四日）石达开部弃南安、崇义，进军湖南。

3月20日（二月十六日）太平军陈玉成部联合捻军在庐州以西击溃前署安徽巡抚李孟群部清军，毙李孟群。

3月21日（二月十七日）捻军孙葵心、刘添福部攻占河南睢州。

（23日退走。）

6月25日（五月二十五日）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大沽炮台，为清军所败。

8月14日（七月十六日）太平军石达开部因长期围攻湖南宝庆不下，撤围南走。（22日进入广西。）

10月3日（九月初八日）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军攻占四川筠连。（6日占高县，8日占庆符。）

10月15日（九月二十日）石达开部太平军攻占广西庆远府城。

11月17日（十月二十三日）贵州白号起义军攻占湄潭县城。

11月21日（十月二十七日）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大败清军于江浦，攻克浦口，毙署湖北提督周天培。

11月28日（十一月初五日）贵州张凌翔等率回民起义军攻占新城，建立政权。

12月8日（十一月月十五日）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军撤叙州围，分别向宜宾青山地区和犍乐盐场进军。

1860年（咸丰十年庚申）

1月26日（正月初四日）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军攻占自流井、贡井。

1月底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出天京，于芜湖召集各路将领会汉，宣布攻杭救京计划。

2月24日（二月初三日）太平军李秀成部攻克皖南广德府，向浙江进军。

3月6日（二月十四日）太平军陈玉成部攻占滁州。（14日占全椒，谋解天京围。）

3月19日（二月二十七日）太平军李秀成部攻占杭州。（24日撤出，回援天京。）

3月28日（三月初七日）蓝朝鼎率起义军攻占四川青神县城。

4月8日（三月十八日）李秀成与杨辅清、李世贤以及刘官芳、黄文金、吴定彩，陈坤书等会于安徽建平，决定分路进援天京。

4月21日（闰三月初一日）英法联军占领舟山。

5月3日（闰三月十三日）马如龙、李芳园率云南回民起义军攻占广通。（21日围攻楚雄府城。）

5月6日（闰三月十六日）陈玉成、李秀成等部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清军溃败，天京围解。

5月19日（闰三月二十九日）太平军李秀成等部攻占丹阳，张国梁落水死。

5月26日（四月初六日）太平军李秀成等部攻克常州，和春自杀。同日，陈玉成部围攻扬州（31日撤围）。

5月27日（四月初七日）英军占领大连湾。

5月陶新春于韭菜坪领导黔西北苗，彝，布依等族农民起义，旋即攻占黔西北要隘七星关。

6月2日（四月十三日）太平军李秀成部占领苏州。

6月8日（四月十九日）法军占领烟台。

6月11日（四月二十二日）马如龙等率云南回民起义军攻占楚雄府

城。

6月15日（四月二十六日）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占浙江嘉兴府城。

7月1日（五月十三日）太平军陆顺德部攻克江苏松江府城。（16日为华尔洋枪队夺占。）

8月1日（六月十五日）英法联军于北塘口登陆，占领北塘镇。

8月2日（六月十六日）太平军李秀成部大破洋枪队，解青浦围。（9日再次击溃洋枪队的进犯。）

8月12日（六月二十六日）太平军李秀成部夺回松江。同日，英法联军陷新河。（14日占塘沽。）

8月16日（六月三十日）太平军李秀成部分两路进军上海。

（18日起围攻上海，遭英法侵略军阻击，乃于24日撤上海围，改援嘉兴。）

8月21日（七月初五日）英法联军陷大沽口北岸炮台。

8月24日（七月初八日）英法联军占领天津。

9月18日（八月初四日）英法联军攻陷张家湾清军阵地，并占通州。

9月20日（八月初六日）捻军刘玉渊等部大败清军总兵承惠部于河南汝阳野猪冈。

9月21日（八月初七日）英法联军进攻八里桥，经激战，清军败退。

9月22日（八月初八日）咸丰帝逃奔热河。

10日6日（八月二十一日）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安定门、德胜门。（6日攻人圆明园，大肆劫掠，旋又纵火焚园。）

10月13日（八月二十九日）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外城。

10月24日（九月个一日）中英签订《北京条约》，并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

10月25日（九月十二日）中法签订《北京条约》，并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11月10日（九月二十八日）蔡德春、李芳园等率滇西回民起义军攻

占禄丰。（18日占安宁州。）

11月14日（十月初二日）中俄签订《北京条约》。

12月27日（十一月十六日）捻军张敏行、姜台凌等部大败僧格林沁等部清军于山东巨野东南之羊山集一带。

12月28日（十一月十七日）太平军李世贤、刘官芳等部分路进逼安徽祁门曾国藩大营。（31日，刘官芳部为湘军鲍超部所败，撤退羊栈岭外。）

1861年（咸丰十一年辛酉）

1月4日（十一月二十四日）逼攻祁门的太平军李世贤部为湘军张运兰部所败，退守黟县东面的兰田。

2月17日（正月初八日）太平军刘官芳部逼近祁门湘军大营，遭湘军唐义训部伏击，退至大赤岭外。

2月20日（正月十一日）捻军赵浩然、张敏行、李成等部击败僧格林沁部清军于山东菏泽东北之李家庄。

3月8日（正月二十七日）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占安徽婺源。22日子甲路击败湘军王开琳部。）

3月10日（正月二十九日）太平军陈玉成部攻占安徽霍山。

（14日占英山，18日占湖北黄州府。）

3月17日（二月初七日）捻军赵浩然等部于山东汶上杨柳集大败僧格林沁军。

4月4日（二月二十五日）太平军李秀成部攻占江西新淦。（20日占吉安府，22日弃城北进。）

4月9日（二月三十日）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占江西景德镇。（23日于乐平为湘军左宗棠部所败，旋即东返浙江）。

4月27日（三月十八日）太平军陈玉成部由湖北返抵安徽安庆集贤关，逼近围城湘军曾国荃部。

5月6日（三月二十七日）太平军黄文金会合洪仁玕，林绍璋等部增援安庆，于新安渡，挂车河为清军多隆阿部所败。

5月15日（四月初六日）太平军李秀成部攻占江西瑞州府。（23日占武宁，30日占义宁。）

5月24日（四月十五日）太平军陈玉成部会合洪仁、林绍璋、黄文金及捻军一部再援安庆，遭多隆阿部清军五路迎击，败回桐城。

6月9日（五月初二日）湘军鲍超部攻破集贤关外四垒，太平军陈玉成部将领刘琳等牺牲。

7月1日（五月二十四日）张凌翔率黔西南回民军攻占普安县城。（因城中无粮，不久即退出。）

7月8日（六月初一日）湘军曾国荃部攻破菱湖南北两岸的十八垒，太平军吴定彩率余部撤入安庆城内。

7月26日（六月十九日）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占浙江严州府。

7月29日（六月二十二日）蔡发春、陈义等率滇西回民军攻占云南永昌府城。

8日7日（七月初二日）太平军陈玉成、杨辅清、林绍璋、黄文金、吴如孝等部又援安庆，于挂车河一带复为清军多隆阿等部所败，退入桐城。

8月21日（七月十六日）清军攻陷浔州府，陈开率天地会起义军撤出。（不久，陈开被俘遇害，大成国起义失败。）

8月25日（七月二十日）太平军陈玉成、杨辅清、林绍璋、黄文金等部自集贤关进攻安庆外围湘军，为曾国荃部所阻。（以后又数次进攻，均未得手。）

9月5日（八月初一日）湘军曾国荃部攻陷安庆，太平军吴定彩、叶芸莱等殉难。陈玉成等部援军退集贤关外。

10月20日（九月十七日）太平军李秀成部攻占浙江余杭，进逼杭州。

10月22日（九月十九日）蔡发春，马国玺等率滇西回民军攻占腾越厅城。

12日9日（十一月初八日）太平军黄呈忠、范汝增部攻占浙江宁波。

12月13日（十一月十二日）清军围攻四川丹稜插旗山，蓝朝鼎率起义军突围，壮烈牺牲。

12月29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平军李秀成部攻占杭州。

（31日破杭州满城，杭州将军瑞昌、副都统杰纯等自杀。）（1862年（同治元年壬戌）

1月7日（十二月初八日）太平军谭绍光、郜永宽等部自杭州向上海进攻。（20日基本上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

2月8日（正月初十日）蓝朝柱，张第才、郭富贵等率滇川农民军攻占西川新宁。（3月5日放弃。）

2月20日（正月二十二日）石达开军攻占四川石厅。

4月4日（三月初六日）太平军谭绍光等部于王家寺等地与英、法军及华尔“常胜军”激战，击伤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

4月21日（三月二十三日）张凌翔率黔西南回民军攻占兴义府城。

5月1日（四月初三日）英、法军及“常胜军”等攻陷嘉定。（12日陷青浦，17日陷南桥，20日陷柘林。）

5月10日（四月十二日）英、法军配合清军攻陷宁波。

5月13日（四月十五日）清军多隆阿部陷庐州，陈玉成率军北走寿州。

5月15日（四月十七日）陈玉成子寿州为苗沛霖所诱擒。

（6月4日于河南延津遇害）

6月18日（四月二十日）湘军曾国荃等部攻陷当涂。（20日占芜湖。）

5月26日（四月二十八日）太平军李秀成部再占嘉定。（29日进围松江。）

5月30日（五月初三日）湘军曾国荃部进逼雨花台。

6月3日（五月初七日）蓝朝柱等率滇川农民军进入陕西境，攻占定远厅城。（18日占西乡城。）

6月9日（五月十三日）李秀成部太平军再占青浦。（17日撤松江围，直逼上海，18日为淮军李鸿章部击败，退回泗泾。）

7月5日（六月初九日）蓝朝柱等率滇川农民军攻占陕西洋县，建立农民政权。

7月11日（六月十五日）湘军鲍超部攻陷安徽宁国府。

8月25日（八月初一日）陕西回民起义军子洛水南岸击败直隶提督成明部清军。

9月8日（八月十五日）陕西回民起义军击败胜保部清军于临潼。

9日18日（八月二十五日）太平军黄呈忠，范汝增部再占浙江慈谿。

9月21日（八月二十八日）“常胜军”攻占慈谿。（“常胜军”统领华尔，受伤，次日死。）

10月1日（闰八月初八日）黔西南回民起义军攻占贵州普安厅城。

10月13日（闰八月二十日）李秀成率十三王等部太平军与围困天京的湘军曾国荃部开始激战。

10月18日（闰八月二十五日）李永和、卯得兴等李蓝起义军首领为清军所擒，后于成都遇害。

10月24日（九月初二日）英法军、“常胜军”及李鸿章所部淮军攻陷嘉定。

11月3日（九月十二日）太平军谭绍光部与淮军、“常胜军”于嘉定黄渡，四江口一带大战失利，退守昆山。

11月15日（九月二十四日）黔西南回民起义军攻占安南。（20日攻占兴义县城。）

11月26日（十月初五日）李秀成、李世贤等部太平军与天京外围湘军曾国荃部激战四十余日不胜，乃撤围，十三王援救天京的作战完全失败。

12月18日（十月二十七日）太平军林绍璋，洪春元等部攻占安徽含山。（19日占巢县，21日占和州。）

1863年（同治二年癸亥）

1月2日（十一月十三日）湘军左宗棠部攻陷浙江严州。（2月28日陷汤溪。）

1月3日（十一月十四日）郭富贵率滇川农民军一部在四川巴州遭清军袭击，全军覆没，郭富贵于巴州鼎山铺被俘。

3月1日（正月十二日）湘军左宗棠部攻占浙江龙游，兰溪。（2日占金华，18日占桐庐。）

3月15日（正月二十六日）“常捷军”、“常胜军”及清军攻陷浙江绍兴。（20日占萧山。）

3月19日（二月初一日）僧格林沁部清军陷雉河集，尹家沟，张乐

行等率捻军南走。

3月23日（二月初五日）捻军首领张乐行于西洋集被俘，后遇害。

5月2日（三月十五日）淮军和“常胜军”攻陷太仓。

5月19日（四月初二日）清军多隆阿部攻陷陕西回民起义军重要据点仓头镇。

5月21日（四月初四日）石达开部太平军于四川紫打地抢渡大渡河遭清军阻击，陷入绝境。

6月3日（四月十七日）石达开部于紫打地再次突围未成。

6月13日（四月二十七日）石达开部于紫打地全军覆灭。石达开自投清营（8月6日就义于成都）。

6月13日（四月二十七日）湘军曾国荃部攻陷天京雨花台及聚宝门外各石垒。

6月25日（五月初十日）湘军曾国荃部陷浦口。（30日陷九洲。）

10月上旬太平军陈得才、赖文光部与蓝朝柱所率起义军攻占陕西汉中府和城固县城。

11月湘军曾国荃部攻陷天京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淳化、湖熟、三岔镇等地，并于25日进扎孝陵卫。

12月4日（十月二十四日）太平军纳王部永宽、康王洪安钧等杀慕王谭绍光，献城降清，苏州失陷。

12月12日（十一月初二日）淮军李鹤章、刘铭传等部攻陷无锡。

1864年（同治三年甲子）

2月28日（正月二十一日）湘军攻占紫金山巅之天保城。

3月2日（正月二十四日）曾国荃部湘军进逼天京太平门、神策门外，对天京形成合围。

3月30日（二月二十三日）蓝朝柱率起义军撤出陕西盩。

（4月11日，蓝朝柱于陕西安康紫溪河遇伏身亡。）

3月31日（二月二十四日）湘军左宗棠部攻陷杭州。同日，太平军汪海洋部弃守余杭。

5月11日（四月初六日）淮军李鸿章部及“常胜军”攻陷常州。

5月22日（四月十七日）曹灿章（滇川农民起义军首领之一）于陕西鄠县玉皇庙被俘牺牲。

6月1日（四月二十七日）天王洪秀全去世。

6月6日（五月初三日）幼天王洪天贵福即位，一切军政事务由忠王李秀成执掌。

7月19日（六月十六日）曾国荃部湘军攻陷天京。李秀成护洪天贵福突围出京后彼此失散。

7月22日（六月十九日）李秀成于方山附近被俘。

8月7日（七月初六日）李秀成在金陵被曾国藩杀害。（曾国藩于7月28日自安庆抵金陵。）

9月18日（八月十八日）太平军梁成富部与滇川农民军蔡昌龄部联合攻占甘肃阶州城。

10月9日（九月初九日）太平军幼天王洪天贵福和干王洪仁玕部于江西石城杨家牌军溃。洪仁玕北走广昌，于白水镇被俘。（25日，洪天贵福于石城被俘。）

10月14日（九月十四日）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占福建漳州。（15日，陆顺德部攻占龙岩。）

11月5日（十月初七日）太平军扶王陈得才等部及捻军张宗禹、任化邦等部于安徽霍山黑石渡为僧格林沁军所败。（后陈得才服毒自杀，邱远才、赖文光及张宗禹、任化邦率部转战河南。）

11月13日（十月十五日）黔北号军攻占贵州黔西州城。

11月18日（十月二十日）幼天王子南昌遇害。（23日，洪仁玕在南昌就义。）

12月12日（十一月十四日）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率捻军于河南邓州唐坡大败僧格林沁军。

12月14日（十一月十六日）黔北号军及岩大五领导的苗、彝联军攻占贵州大定府城。

1865年（同治四年乙丑）

1月28日（正月初二日）赖文光、张宗禹等率捻军子河南鲁山城郊大败僧格林沁军。

1月中亚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侵入新疆。

4月11日（三月十六日）阿古柏入侵军攻占新疆英吉沙尔城。

5月15日（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提督郭松林，高连升等都攻陷漳州，李世贤率部突围。（26日，李世贤部复为清军所败，李世贤只身逃走。）

5月18日（四月二十四日）赖文光、张宗禹等部捻军歼灭僧格林沁军于山东曹州高楼寨，毙僧格林沁。

6月6日（五月十三日）清军四川提督胡中和等部攻陷阶州，梁成富被俘，蔡昌龄被害，守城太平军及滇川农民军大部牺牲，李蓝起义最后失败。

7月29日（六月初七日）马化龙率陕甘回民起义军大败清军提督雷正绾，曹克忠等部于甘肃宁夏府金积堡。

8月23日（七月初三日）侍王李世贤于广东镇平被康王汪海洋杀害。

8月29日（七月初九日）来王陆顺德部攻占广东长乐。

9月7日（七月十八日）阿古柏军陷新疆喀什噶尔汉城，参赞大臣奎英举家自尽。

9月20日（八月初一日）清军陷长乐，陆顺德被俘。

12月8日（十月二十一日）太平军汪海洋部攻占广东嘉应州。

1866年（同治五年丙寅）

1月23日（十二月初七日）赖文光、任化邦率捻军攻占湖北黄陂，进逼汉口。

1月28日（十二月十二日）汪海洋所统太平军余部溃于广东嘉应州。（汪海洋因伤重于2月1日牺牲。）

4月11日（二月二十六日）捻军张宗禹部于山东菏泽安兴寨击败清军总兵杨飞熊部。（13日于巨野龙堌集击败清军总兵王心安部。20日又败淮军潘鼎新部于郓城柳条圈。）

9月24日（八月十六日）赖文光、张宗禹等率捻军于河南开封南之芦花冈击溃河南清军，疾趋山东。

10月下旬捻军在河南中牟分兵为东西两支。赖文光、任化邦率部进军山东，称东捻军，张宗禹、邱远才等率部进军陕甘，称西捻军。

11月14日（十月初八日）张宗禹等率西捻军于陕西渭南赤水镇击败清军提督刘厚基部。

11月25日（十月十九日）西捻军于陕西华州水火败湘军唐炯部。

12月22日（十一月十六日）赖文光等率东捻军山河南入湖北，攻占麻城。

1867年（同治六年丁卯）

1月11日（个二月初六日）东捻军于湖北钟祥罗家集大败清军提督郭松林部。（26日于德安府杨家河东岸又败淮军张树珊部。）

1月23日（十二月十八日）西捻军大败湘军于西安灞桥，进围省城。

2月19日（正月十五日）东捻军于湖北安陆尹河大败淮军刘铭传部。（后被湘军鲍超部击败。）

3月23日（二月十八日）东捻军击败湘军彭毓橘等部于蕲水。

5月4日（四月初一日）东捻军于河南信阳潭家河击败淮军用盛波部。（14日，再败淮军杨鼎勋部于湖北黄安王家冈。）

5月27日（四月二十四日）西捻军与陕西回民军逼攻西安失利，东下蓝田。

6月13日（五月十二日）东捻军自山东郓城突破运河长墙，进至运河东岸。（下旬进入胶东半岛，后于烟台被英法侵略军击退。）

6月中旬左宗棠军由湖北樊城分三路入陕。

7月20日（六月十九日）云南清军岑毓英部攻陷贵州猪拱箐，苗民起义军大部牺牲，陶新春等被俘。

8月19日（七月二十日）东捻军突破清军胶莱河防线，西走潍县。（28日由日照入江苏。）

11月19日（十月二十四日）东捻军于江苏赣榆为淮军刘铭传部所败，任化邦为叛将潘贵升杀害，后赖文光率余部折回山东。

12月17日（十一月二十二日）西捻军由陕西东渡黄河，攻占山西吉州，围攻稷山县城。（24日撤稷山围北进。）

12月18日（十一月二十三日）杜文秀率云南回民起义军攻占楚雄府城。

12月24日（十一月二十九日）东捻军于山东寿光滨海地区为淮军刘铭传等部所败，首王范汝增壮烈牺牲。（31日抢渡运河失败，转兵东向。）

1868年（同治七年戊辰）

1月5日（十二月十一日）东捻军于扬州瓦窑铺与淮军吴毓兰部激战，全军覆没，赖文光被俘（10日殉难于扬州）。

1月28日（正月初四日）湘军席宝田、李元席部攻陷贵州思南府黄号军根据地荆竹园。

2月19日（正月二十六日）云南回民起义军攻占富民、安宁。（20日进至省城昆明城郊。）

3月9日（二月十六日）云南回民起义军攻占晋宁。（10日占呈贡，进围省城。）

3月16日（二月二十四日）西捻军于直隶饶阳元城为清军郭松林，刘松山等部所败，邱远才、张禹爵等人牺牲。

4月1日（三月初九日）西捻军大败刘松山、郭宝昌等部清军于河南封丘。

4月12日（三月二个日）西捻军击败潘鼎新、郭松林等部清军于河南滑县。（后突围抵山东东昌府，再渡运河东进，逼天津。）

5日26日（闰四月初五日）湘军席宝田，川军唐炯等部攻陷贵州思南府白号军根据地偏刀水。

8日16日（六月二十八日）西捻军于山东茌平西南广平镇被清军围歼，张宗禹突围后不知所终，捻军起义战争至此最后失败。同日，川军唐炯部陷贵州尚大平，号军战败，教首刘义顺被俘后遇害，贵州号军起义最后失败。

9日29日（八月十四日）云南清军岑毓英部攻陷呈贡，滇西回民起义军将士三千余人英勇牺牲。

11月1日（九月十七日）滇西回民起义军击败清军杨玉科部，攻占武定州城。

11月3日（九月十九日）川军唐炯部、黔军唐天佑部击败贵州苗民军，攻陷麻哈州。（28日陷黄平旧州城。）

11月4日（九月二十日）清军岑毓英等部败滇两回民军，陷晋宁。（27日陷澂江。）

1869年（同治八年己巳）

3月10日（正月二十八日）湘军席宝田部击败贵州苗民军，陷镇远

府卫二城。

4月3日（二月二十二日）清军击败陕西回民起义军，占据甘肃董志原一带。

4月9日（二月二十八日）湘军席宝田等部败黔东南苗民军，攻陷贵州清江厅城。（30日陷施秉县城。）

5月3日（三月二十二日）包大度等率贵州苗民军败湘军席宝田部，大捷于黄飘。

7月14日（六月初六日）柳天成等率贵州苗民军大败黔军提督张文德部于楼山口。（19日收复都匀府城。）

12月11日（十一月初九日）马化龙率甘肃回民起义军大败清军总兵简敬临部于金积堡，毙简敬临。

1870年（同治九年庚午）

2月14日（正月十五日）清军刘松山部进攻金积堡，回民军英勇抗击，毙刘松山。

4月15日（三月十五日）湘军席宝田等部败张秀眉部贵州苗民军，陷施洞口。

5月1日（四月初一日）云南靖军杨玉科部击败回民军，攻陷姚州城。

6月8日（五月初十日）湘军席宝田部击败贵州苗民军，攻陷施秉岩门司等地。

11月17日（十月二十五日）湘军席宝田等部击败贵州苗民军，攻陷台拱厅城。

1871年（同治十年辛未）

1月6日（十一月十六日）清军刘锦棠等部陷甘肃金积堡，回民军首领马化龙投降（3月初被刘锦棠杀害）。

5月21日（四月初三日）湘军席宝田等部击败张秀眉部苗民军，攻陷贵州凯里城。

7月4日（五月十七日）俄军占据中国新疆伊犁。

9月7日（七月二十三日）清军蒋宗汉、李凤祥等部败滇西回民起义军，攻陷云南永昌府城。

12月19日（十一月初八日）清军何世华部击败贵州回民军及苗民军，攻陷贞丰州城。

1972年（同治十一年壬申）

2月14日（正月初六日）甘肃河州回民军于太子寺南新路坡大败清军，毙提督傅先宗、徐文秀等。

4月30日（三月二十三日）湘军和黔军联合攻陷贵州凯里乌鸦坡苗寨，张秀眉等率苗民军余部突围。（后张秀眉、杨大六于雷公山被俘，在湖南长沙就义。）

5月31日（四月二十五日）滇、黔清军击败张福禄、张福荫部贵州回民军，攻陷兴义府。

6月8日（五月初三日）清军杨玉科部击败杜文秀所率滇西回民起义军，攻陷赵州。（12日陷大理上、下关。）

6月22日（五月十七日）清军杨玉科等部陷云南蒙化厅城。

11月5日（十月初五日）滇军、黔军攻陷贵州新城，黔西南回民起义最后失败。

11月19日（十月十九日）清军刘锦棠等部陷甘肃西宁。

12月27日（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军杨玉科等部围攻大理府城甚急，杜文秀服毒后前往杨玉科大营，被杀。

1873年（同治十二年癸酉）

2月1日（正月初四日）清军刘锦棠等部击败陕甘回民军，攻陷甘肃大通向阳堡。（5日陷大通，白彦虎率部向肃州撤退。）

3月2日（二月初四日）清军陈湜等部击败甘肃回民军，攻陷甘肃巴燕戎格厅城，马桂源，马本源被俘，后被杀害。

3月23日（二月二十五日）清军杨玉科等部陷云南顺宁府城。

4月28日（四月初二日）清军杨玉科等部陷云南云州城。

5月29日（五月初四日）清军李维述、徐联魁部陷云南腾越厅城，云南回民起义最后失败。

10月6日（八月十五日）左宗棠督甘肃诸路清军向肃州城发起总攻，马文禄率回民军英勇抗击。

11日4日（九月十五日）肃州回民军首领马文禄开城投降，清军陷

肃州，陕甘回民起义最后失败。

11月20日～（十月初一日）法将安邺率军侵占越南河内。

12月21日（十一月初二日）刘永福率黑旗军击败法军于河内城外、毙安邺。

1874年（同治十三年甲戌）

2月2日（十二月十六日）英国背着中国政府与阿古柏签订“通商条约”十二条，阴谋分裂中国新疆。

3月15日（正月二十七日）越南阮氏王朝与法国侵略者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使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6月2日（四月十八日）日军三路进攻台湾，焚烧牡丹社等处。

10月31日（九月二十二日）中日签订《台事专条》。

是年前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北洋水师章程》六条，建议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清廷议定先建北洋水师。

1875年（光绪元年乙亥）

1月12日（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载淳病死。（不久，光绪帝载即位，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

2月21日（正月十六日）非法进入云南的英使馆翻译马嘉理在永昌地方行凶被打死。史称“马嘉理事件”。

5月3日（三月二十八日）清廷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

5月30日（四月二个六日）清廷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命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

9月20日（八月二十一日）日舰“云扬”号侵犯朝鲜江华岛，制造“江华岛事件”。

是年左宗棠为收复新疆，提出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

1876年（光绪二年丙子）

4月7日（三月十三日）左宗棠从兰州移驻肃州。

4月26日（四月初三日）湘军统领刘锦棠部开始分批入疆，经哈密

前往巴里坤。

8月17日（六月二十八日）清军刘锦棠、金顺部收复新疆古牧地。（次日克乌鲁木齐。）

9月13日（七月二十六日）李鸿章与英使威妥玛订立《烟台条约》和英人入藏“探路”专条。

11月6日（九月二十一日）清军攻克新疆玛纳斯全城。

1877年（光绪三年丁丑）

4月20日（三月初七日）向南疆进军的清军刘锦棠部攻克达坂城。

4月26日（三月十三日）清军刘锦棠部克复托克逊，张曜、徐占彪部克复吐鲁番。

5月22日（四月初十日）间古柏在库尔勒服毒自杀。

10月7日（九月初一日）清军刘锦棠部收复喀喇沙尔。（9日克库尔勒，18日克库轧24日克阿克苏。）

12月1了日（时一月十三日）清军收复喀什噶尔。（21日克叶尔羌，24日克英吉沙尔。）

1878年（光绪四年戊寅）

1月2日（十一月二十九日）清军克和阗。除伊犁地区外，新疆全境收复。

6月22日（五月二十二日）清廷以吏部左侍郎崇厚为钦差大臣，莳往俄国谈判索还伊犁问题。（年底，崇厚到达俄都圣彼得堡。）

1879年（光绪五年己卯）

3月30日（三月初八日）日本侵占琉球，改为冲绳县。

10月2日（八月十七日）崇厚擅自与俄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基亚条约》。

是年李鸿章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到天津的电报，是为中国最早创办的电报。

1880年（光绪六年庚履）

2月12日（正月初三日）清廷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出使俄国，改订《交收伊犁条约》。（7月底，曾纪泽由英国伦敦抵达

俄都圣彼得堡。）

2月19日（正月初十日）清政府致函俄国，声明崇厚所议条约，违训越权，窒碍难行，不承认《交收伊犁条约》。

6月15日（五月初八日）左宗棠进驻哈密，进一步部署进军伊犁事宜。

8月11日（七月初六日）清廷调左宗棠人京，对俄妥协。

9月8日（八月十四日）清政府同意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架设天津上海间电报。（次年底开通。）

是年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北洋向德国订购“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和“济远”巡洋舰。

1881年（光绪七年辛巳）

2月24日（正月二十六日）曾纪泽与沙俄代表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

6月9日（五月十三日）唐山胥各庄铁路完工，是为中国自办最早的铁路。

6月26日（六月初一日）吴大澂奏请设立吉林机器局，制造新式枪械子弹，获准。

1882年（光绪八年壬午）

4月25日（三月初八日）法国侵略军占领越南河内。

7月23日（六月初九日）朝鲜汉城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胁迫朝鲜与之签订《仁川条约》，取得了在汉城驻军的特权。）

10月29日（九月十八日）中俄签订《伊犁界约》。

12月9日（十月二十九日）中俄签订《喀什噶尔界约》。

1883年（光绪九年癸来）

3月27日（二月十九日）法军占领越南南定。

5月19日（四月十三日）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大败法军于越南河内城西之纸桥，毙法将李威利等。

8月25日（七月二十三日）法军攻入越南首都顺化，强迫越南政府与之签订第一次《顺化条约》。

9月1日（八月初一日）黑旗军会同越军黄佐炎部与法军激战于丹凤。

9月22日（八月二十二日）清廷谕兵部尚书彭玉麟前往广东，会同两广总督张树声办理海防。

12月14日（十一月十五日）孤拔率法军六千人进攻由黑旗军和清军共同驻守的越南山西，中法战争爆发。

12月16日（十一月十七日）法军攻陷越南山西，清军与黑旗军退守兴化。

1884年（光绪十年甲申）

2月12日（正月十六日）米乐接替孤拔为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重返舰队，后被任命为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升中将。）

2月22日（正月二十六日）云贵总督岑镜英丰滇军进抵越南兴化前线。

3月12日（二月十五日）法军攻陷越南北宁，桂军黄桂兰等部溃败。（16日，法军又占郎甲，20日占太原。）

4月8日（三月十二日）慈禧太后黜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及全部军机大臣，以礼亲王世铎管理军机处。（12日，命奕劻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4月16日（三月二十日）越南兴化失守，法军占领了红河三角洲。

5月11日（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

6月6日（五月十三日）法国强迫越南与之签订第二次《顺化条约》。

6月23日（闰五月初一日）杜森尼率领的法军侵犯北黎清军阵地，被清军击退。史称“北黎冲突”，或“观音桥事变”。

7月15日（闰五月二十三日）孤拔率远东舰队以“游历”为名，强行驶入福建海军驻地马江港。

8月5日（六月十五日）法舰炮击基隆港，陆战队攻占大沙湾附近高地。（6日，法军陆战队遭清军围攻，逃回军舰败走。）

8月23日（七月初三日）孤拔舰队攻击马江福建海军舰船，挑起马江海战。（次日，法舰击毁福州造船厂。）

8月26日（七月初六日）清廷被迫对法宣战。

9月8日（七月十九日）波里也接替米乐为法远东军总司令。

10月1日（八月十三日）孤拔率法舰再次进攻基隆。（次日占领基隆及狮球岭。）

10月8日（八月二十日）法军陆战队于淡水登陆，被清军击溃。同日，尼格里率法军攻占越南郎甲。

10月11日（八月二十三日）端尼埃率法军攻占越南船头。

10月23日（九月初五日）法国侵略者宣布封锁台湾海峡。

11月17日（九月三十日）清政府于新疆建立行省。（次日，命刘锦棠为甘肃新疆巡抚。）

11月18日（十月初一日）多米尼率法军乘炮艇、民船增援被清军包围的越南宣光，遭左育清河两岸清军夹击。（19日，法军攻陷左育，旋上船前往宜光。）

12月4日（十月十七日）朝鲜发生“甲申政变”。（1885年1月9日，日本胁迫朝鲜签订《汉城条约》。）

1885年（光绪十一年乙酉）

2日13日（十二月二十九日）法军占领越南谅山。

2月23日（正月初九日）法军占领镇南关。

2月27日（正月十三日）波里也率法军于端雄登岸，前往增援宣光。

3月1日（正月十五日）孤拔率舰队进攻镇海，被清军击退。3日，法舰再攻，又被击退，7日，法舰南返。）

3月13日（正月二十七日）冯子材派军拦击法军于越南扣波，法军败回文渊。（21日，冯子材等率军夜袭文渊，大败法军。）

3月23日（二月初七日）法军进攻越南临洗山围社，被中越军民击溃。

3月24日（二月初八日）冯子材等率领清军大败法军于关前隘，取得镇南关大捷。

3月29日（二月十三日）冯子材等率军攻克谅山。（31日，清军分别攻克谷松、屯梅，进逼郎甲。）

4月1日（二月十六日）法军攻陷澎湖。

4月4日（二月十九日）中法签订停战协定。

4月7日（二月二十二日）清廷谕越南前线清军定期停战撤兵。

4月18日（三月初四日）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

6月9日（四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与法使巴德诺于天津签订《中法天津条约》，中法战争结束。

10月12日（九月初五日）台湾建行省，以刘铭传为巡抚。

10月13日（九月初六日）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

11月从德国购买的“定远”、“镇远”、“济远”三舰到达北洋。

1888年（光绪十二年丙戌）

7月4日（六月初三日）吴大澂与沙俄代表订立《珲春界约》。

7月24日（六月二十三日）中英签订《缅甸条约》，清政府被迫承认英国占领缅甸。

是年李鸿章于天津筹建武备学堂。

1887年（光绪十三年丁亥）

3月29日（三月初四日）中法签订《中越交界界约》。

10月9日（八月二十三日）福建台湾间水底电线建成。

12月1日（十月十七日）中葡签订《北京条约》。

是年张之洞在广东设水师学堂，建广州枪弹厂。

1888年（光绪十四年戊子）

8月20日（二月初八日）英军进攻西藏隆吐山，开始了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之战。

7月张之洞在广州筹建枪炮厂。天津至唐山铁路建成。

9月24日（八月十九日）英军进攻西藏捻纳。（接着，英军占领了则利拉、亚东等地。）

12月17日（十一月十五日）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以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

1889年（光绪十五年己丑）

3月4日（二日初三日）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亲政”。

4月2日（三月初三日）张之洞奏请建造芦（沟桥）汉（口）铁路。（同年8月开工。）

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

8月17日（二月二十七日）中英签订《藏印条约》。

2月23日（正月初九日）法军占领镇南关。

2月27日（正月十三日）波里也率法军子端雄登岸，前往增援宣光。

3月1日（正月十五日）孤拔率舰队进攻镇海，被清军击退。（3日，法舰再攻，又被击退。7日，法舰南返。）

8月13日（正月二十七日）冯子材派军拦击法军于越南扣波，法军败回文渊。（21日，冯子材等率军夜袭文渊，大败法军。）

3月23日（二月初七日）法军进攻越南临洮山围社，被中越军民击溃。

3月24日（二月初八日）冯子材等率领清军大败法军于关前隘，取得镇南关大捷。

3月29日（二月十三日）冯子材等率军攻克谅山。（31日，清军分别攻克谷松、屯梅，进逼郎甲。）

4月1日（二月十六日）法军攻陷澎湖。

4月4日（二月十九日）中法签订停战协定。

4月7日（二月二十二日）清廷谕越南前线清军定期停战撤兵。

4，q18u（三月初四日）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

6月9日（四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与法使巴德诺子天津签订《中法天津条约》，中法战争结束。

10月12日（九月初五日）台湾建行省，以刘铭传为巡抚。

10月12日（九月初六日）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

11月从德国购买的“定远”、“镇远”、“济远”三舰到达北洋。

1886年（光绪十二年丙戌）

7月4日（六月初三日）吴大澂与沙俄代表订立《珲春界约》。

7月24日（六月二十三日）中英签订《缅甸条约》，消政府被迫承认英国占领缅甸。

是年李鸿章于天津筹建武备学堂。

1887年（光绪十三年丁亥）

8月29日（三月初四日）中法签订《中越交界界约》。

10月9日（八月二十三日）福建台湾间水底电线建成。

12月1日（十月十七日）中葡签订《北京条约》。

是年张之洞在广东设水师学堂，建广州枪弹厂。

1888年（光绪十四年戊子）

8月20日（二乃初八日）英军进攻西藏隆吐山，开始了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之战。

7月张之洞在广州筹建枪炮厂。天津至唐山铁路建成。

9月24日（八月十九日）英军进攻西藏捻纳。（接着，英军占领了则利拉、亚东等地。）

12月17日（十一月十五日）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以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

1889年（光绪十五年己丑）

3月4日（二月初三日）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亲政”。

4月2日（三日初三日）张之洞奏请建造芦（沟桥）汉（口）铁路。（同年8月开工。）

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

8月17日（二月二十七日）中英签订《藏印条约》。

8月8日（六月二十三日）四川大尼县余栋臣反洋教斗争爆发。

11月9日（九月二十七日）旅顺船坞竣工。

是年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炼铁厂和枪炮厂。北洋海军于威海刘公岛设

水师学堂。南洋大臣于南京设水师学堂。

1892年（光绪十八年壬辰）

6月27日（六月初四日）中英议定《藏印通商事宜章程》。

8月沙俄强占中国萨雷阔勒岭以西二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1893年（光绪十九年癸巳）

12月5日（十月二十八日）中英签订《藏印续约》。

是年台北至新竹的铁路建成。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

2月8日（正月初三日）朝鲜全罗道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

5月7日（四月初三日）北洋大臣李鸿章等自天津启程开始校阅北洋海军。（至27日结束。）

6月11日（四月二十八日）朝鲜东学党农民起义军攻占全罗道首府全州。

6月2日（四月二个九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出兵朝鲜。（9日，日军先遣队于仁川登陆。15日起，日军陆续从仁川登陆，直犯汉城。）

6月14日（五月初一日）李鸿章派“济远”等舰赴朝鲜仁川护商。

6月5日（五月初二日）清政府应朝鲜政府要求，派叶志超、聂士成率军援朝。（9日，聂士成部于牙山登陆。11日，叶志超部抵牙山。）

6月22日（五月十九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复照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拒绝清政府关于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兵的建议。（次日，日本枢密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中国发动战争。）

7月23日（六月二十一日）日军闯入朝鲜王宫，非法囚禁国王，组织傀儡政府。

7月25日（六月二十三日）日舰于丰岛附近偷袭中国舰船，其陆军旋即进犯牙山清军，正式挑起侵华战争。

7月26日（六月二十四日）清廷令刘永福率兵前往台湾，协同台湾巡抚邵友濂办理台湾防务。

7月28日（六月二个六日）日军进犯朝鲜成欢驿，清军聂士成部抗击。（29日，日军攻陷成欢、牙山，清军撤往平壤。）

8月11日（七月初一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

8月10日（七月初十日）日本联合舰队闯至威海、旅顺挑衅。

9月15日（八月十六日）日军进攻平壤，清军战败，左宝贵阵亡，叶志超率军撤出乎壤。

9月17日（八月十八日）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激战于黄海，邓世昌等阵亡。史称黄海海战。

9月29日（九月初一日）慈禧太后起用恭亲王奕沂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0月初，奕沂亲自出面请求英国联合美国和沙俄共同调停中日战争。）

10月20日（九月二十二日）日军侵占朝鲜义州。

10月24日（九月二十六日）日第一军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东北，占领安平河口等处。同日，日第二军开始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

10月26日（九月二十八日）日军侵占九连城、安东。（27日占大东沟，31日占凤凰城，11月5日占大孤山。）

11月7日（十月初十日）日军侵占大连。

11月22日（十月二十五日）日军侵占旅顺。

11月24日（十月二十七日）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

11月26日（十月二十九日）聂土成等部清军大败草河口日军。

12月12日（十一月十六日）日军攻陷析木城。（13日又陷海城。）

是年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受命编练新军（定武军），屯天津马厂。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1月5日（十二月初十日）清政府被迫派总理大臣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

1月10日（十二月十五日）日军攻陷盖平。

1月16日（十二月二十一日）清廷命四川提督宋庆，湖南巡抚吴大澂帮办东征军务。（此前，已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

1月17日（十二月二十二日）清军依克唐阿，长顺部反攻海城失利。（22日再次反攻，又失利。）

1月20日（十二月二十五日）进攻山东半岛的第一批日军在荣戌湾登陆，占领荣成。

1月20日（正月初五日）日军陷威海南帮炮台。（2月1日又陷北帮炮台。）

2月11日（正月十七日）丁汝昌服毒自杀。（次日，威海卫失守，北洋海军覆没。）

2月13日（正月十九日）清廷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2月1日，张荫桓、邵友濂与口力代表会于广岛，被拒。）

3月16日（正月二时二日）清军第三次反攻海城失利。（21日，第四次反攻海城又失利。）

3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

2月25日（二月初一日）辽东民众武装配合清军收复宽甸。

（8月1日收复长甸。）

8月4日（二月初八日）日军攻陷牛庄。（7日又占营口，9日又陷田庄台。）

8月25日（二月二十九日）日军侵占澎湖列岛。

4用17日（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与日本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4月23日（三月二十九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其放弃领有中国辽东半岛。（5月4日，日本政府声明愿放弃辽东半岛。）

6月29日（五月初六日）日军在台湾三貂湾登陆。

6月2日（五月初时日）日军进占台湾瑞芳。（3日陷基隆，7日侵占台北，9日又占淡水。）

6月13日（五月二十一日）日军进犯台湾大湖口，被吴汤兴、姜绍祖等部义军击退。

6月23日（闰五月初一日）日军攻占台湾新竹。

7月9日（闰五月十七日）徐骧、吴汤兴等率义军民团反攻新竹失利。

8月15日（六月二个五日）日军攻占台湾苗栗，徐骧等部义军英勇

抗击，退守大甲溪。（23日，日军攻破大甲溪义军防线。28日，日军陷彰化、鹿港，29日又相继占云林、斗南，大莆林，直逼嘉义。）

8月30日（七月十一日）杨泗洪、简精华等率义军反攻大莆林，大败日军。（31日收复大莆林。）

9月1日（七月十三日）王德标、简精华等率义军克复云林，日军溃逃。（4日，围攻彰化，未能得手。23日起，诸路义军民团总攻彰化，数日不克。）

10月8日（八月二十日）日军陷台湾嘉义。

10月10日（八月二月二日）日军一部于台湾布袋嘴开始登陆。（11日，另一部在枋寮开始登陆。）

10月21日（九月初四日）日军陷台湾台南。

10月26日（九月初九日）孙中山领导广州起义失败。

11月25日（十月初九日）日军退出岫岩、凤凰城。（28日退出海城，30日退出牛庄、营口。）

12月8日（十月二十二日）清廷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就胡燏蔡定武军扩练新建陆军。

12月21日（十一月初六日）日军退出金州，旅顺。（25日退出大连湾。）

2月27日（十一月十二日）张之涧奏请编练自强军。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6月3日（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与沙俄代表签订《中俄密约》（即《御敌互相援助条约》）。

9月8日（八月初二日）中俄签订《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3月1日（正月二十八日）张之洞奏请兴办湖北武备学堂。

11月14日（十月二十日）德国借口山东巨野教案，派军舰侵占胶州湾。

17月15日（十一月二十二日）沙俄派军舰强占旅顺、大连。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3月6日（二月十四日）德国胁迫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

3月27日（三月初六日）沙俄诱迫清政府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

4月11日（三月二十一日）法国强租广州湾。

5日了日（闰三月十七日）沙俄又迫清政府签订租借旅大《续约》。

6月9日（四月二十一日）英国胁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九龙半岛及香港附近岛屿。

6月11日（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宣布变法维新。

7月1日（五月十三日）英国强租威海卫为军港。

8月5日（六月时八日）湖南兴办枪炮厂。

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光绪帝，维新变法失败。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3月朱红灯率义和团于山东平原一带起义。

9月6日（八月初二日）美国提出各国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

10月9日（九月初五日）朱红灯率义和团大败清军于山东平原县。

12月6日（十一月初四日）清廷谕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统兵前往镇压义和团。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4月6日（三月初七日）英、美、法、德四国公使照会清政府，限其于两月内‘剿灭”义和团。

6月22日（四月二十四日）宜隶义和团于涞水大败清军杨福同部。

6月27日（四月二十九日）直隶义和团攻占涿州城。（28日袭击长辛店、芦沟桥车站，29日烧毁丰台车站。）

5月31日（五月初四日）英、美、法、日、意、俄等国开始派兵强行进入北京。

6月10日（五月十四日）西摩尔等率八国联军一部离开天津，向北京进犯。（次日，被义和团包围于廊坊车站。14—18日，义和团在廊坊、落垡、杨村等处痛击西摩尔联军。）

6月15日（五月十九日）北京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

（20日，义和团及清军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

6月17日（五月二十一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

6月18日（五月二十二日）义和团及清军开始围困和炮击天津租界内的八国联军。

6月21日（五月二十五日）清廷对外国侵略者宣战。

6月22日（五月二十六日）西摩尔所率联军退至天津西沽，攻占清军武库。（26日摧毁西沽武库，退回天津租界。）

6月26日（五月三十日）刘坤一，张之洞等派上海道余联沅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订立所谓《中外互保章程》。

7月6日（六月初十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自任总司令，下达动员令，准备大举侵华。

7月8日（六月十二日）清廷命两广总督李鸿章为宜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促其来京，准备向联军乞和。

7月9日（六月十三日）聂士成率部在天津南门外八里台抗击八国联军，负伤阵亡。

7月14日（六月十八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城。

7月16日（六月二十日）俄军大肆捕杀海兰泡中国居民，制造“海兰泡惨案”。（次日，又血洗中国“江东六十四屯”，制造“江东六十四屯血案”。）

7月22日（六月二十六日）俄军攻占拉哈苏苏。

7月30日（七月初五日）俄军陷珲春、三姓。（次日，陷呼伦贝尔。）

8月3日（七月初九日）俄军攻占哈尔滨，同“护路队”会合。

8月5日（七月十一日）八国联军陷北仓。同日，俄军攻占瑷珲。

8月12日（七月个八日）八国联军占领通州。同日，俄军占领海城。

8月14日（七月二个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次日晨，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走。17日，联军占领北京全城。）

8月27日（八月初三日）清廷谕李鸿章赴京，会同奕劻与八国联军议和。

8月29日（八月初五日）俄军攻占宁古塔。（30日，占齐齐哈尔，清军退守伯都讷。）

9月21日（八月二十八日）德、俄军攻陷北塘炮台。

9月22日（八月二十九日）俄军陷吉林城。

9月24日（闰八月初一日）俄军陷牛庄，（26日陷鞍山，28日陷辽阳。）

9月30日（闰八月初七日）英军占领山海关炮台、车站。

10月1日（闰八月初八日）俄军进占奉天。（4日占锦州。）

10月12日（闰八月十九日）八国联军自北京、天津分两路犯保定。（13日占领保定。）

10月17日（闰八月二十四日）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抵京，设总司令部于紫禁城。同日，奕劻、李鸿章照会各国使臣开始议和。

10月26日（九月初四日）慈禧太后逃至西安。

11月11日（九月二十日）增祺派员与俄军代表于旅顺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

11月12日（九月二十一日）德、意军攻占南口、居庸关。

（24日占宣化，27日占张家口。）

12月24日（十一月初三日）八国联军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

12月刘永和率东北忠义军克复通化县城。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1月29日（十二月初十日）慈禧太后在西安颁发“变法”上谕。

2月14日（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发出“自责”上谕，声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4月19日（三月初一日）刘永和率东北忠义军与俄军，清军激战于兴京附近。

4月22日（三月初四日）八国联军攻陷娘子关，固关。

9月7日（七月二十五日）奕劻、李鸿章与英、美、法、德、日、俄、意、奥及荷、比、西等十一国全权代表于北京签订《辛丑和约》。

9月17日（八月初五日）八国联军撤出北京。（22日开始撤离直隶。）

10月6日（八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等自西安启程返回北京。

11月7日（九月二十七日）李鸿章死，由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1月7日（十一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等回到北京。

4月8日（三月初一日）清政府同沙俄政府签订《中俄收交东三省条约》。

6月26日（五月二十一日）驻哲孟雄英军挑起边界冲突，侵入西藏甲岗和思补布纳一带。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6月驻哲孟雄英军再次进犯西藏，由甲岗直趋干坝。

12月13日（十月二十五日）英军攻占西藏仁进冈。（14日攻占春丕，20日进占帕里。）

1904年（光绪三十年甲辰）

1月8日（十一月二十一日）英军推进至西藏堆拉。

2月6日（十二月二十一日）日俄战争爆发。（12日，清政府宣布严守“局外中立”。）

4月13日（二月二十八日）英军占领西藏江孜。

5月4日（三月十九日）西藏军民收复江孜。

7月6日（五月二十三日）英军再次侵占江孜。

8月3日（六月二十二日）英军侵占西藏拉萨。

9月6日（七月二十七日）英军强迫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订《拉萨条约》。

9月23日（八月十四日）英军自拉萨撤退。

10月1日（八月二十二日）英军退出西藏。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8月20日（七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于日本东京成立，举孙中山为总理。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4月27日（四月初四日）中英签订《藏印续约》。

4月29日（四月初六日）清政府命张荫棠以驻藏帮办大臣身分入藏“查办藏事”。

12月4日（十月十九日）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发动湘赣边界

萍浏醴起义。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1月18日（十二月初五日）清政府于保定设立武备学堂。

5月22日（四月十一日）广东潮州革命党人陈涌波，余既成等发动黄冈起义。

6月2日（四月二十二日）同盟会员邓子瑜领导会党二百多人于广东惠州七女湖举行起义。

7月6日（五月二十六日）光复会员徐锡麟率安庆巡警学堂学生举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占领军械局。

7月30日（六月二十一日）日俄签订《日饿密约》和《日俄协定》。

8月“共进会”于日本东京成立，推张百祥为会长。

9月1日（七月二十四日）同盟会发动钕廉防城起义。

12月2日（十月二十七日）同盟会发动镇南关起义。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3月27日（二月二十五日）同盟会发动钦州上思起义。

4月30日（四月初一日）同盟会发动云南河口起义。

7月26日（六月二十八日）原“日知会”会员任重远等组织“湖北军从同盟会”。

11月19日（十月二十六日）光复会会员、新军队官熊成基等发动安庆马炮营起义。

12月2日（十二月初九日）溥仪即帝位，改元宣统，由共父载沣摄政。

1909年（宣统元年己酉）

2月19日（正月二十九日）清廷为重整海军，派肃亲王耆善等人筹划，庆亲王奕劻总核确查。

3月1日（二月初十日）同盟会员余竟成、熊克武、秦炳利等于四川发动广安起义。

1910年（宣统二年庚戌）

2月12日（正月初三日）同盟会员倪映典率广州新军起义。同日，四川知府钟颖率川军进驻拉萨。

2月16日（正月初七日）孙中山于旧金山设立同盟会分会。

2月光复会于日本东京成立总会，推章炳麟、陶成成章为正副会长。

6月英国派兵进驻藏印边境的郎塘，公开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

7月4日（五月二十八日）日俄签订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第二次《密约》及第二次《协定》。

11月13日（十月十二日）孙中山、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于槟榔屿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于广州再次发动起义。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

1月30日（正月初一日）“文学社”于武昌成立，举蒋翊武为社长。

4月27日（三月二个九日）黄兴等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

5月8日（四月初个日）清政府颁布新订内阁官制，成立“皇族内阁”，以奕劻为总理大臣。

6月17日（五月二十一日）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蒲殿俊、罗伦主持会事。

7月31日（闰六月初六日）同盟会中部总会于上海成立，推宋教仁、谭人凤等为总务干事。

7月沙俄驻库伦领事操纵活佛哲布尊丹巴和亲俄分子杭达多尔济等人，密谋外蒙“独立”。

8月24日（七月初一日）成都召开保路大会，倡仪全省罢市、罢课、停纳捐税。

9月8日（七月十六日）四川保路同志军在各州县相继起义。（9日，清廷命湖广总督瑞徵速派兵队入川。

9月14日（七月二十二日）湖北“文学社”、“共进会”成立统一起义机构，决定联合反清。举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

10月3日（八月十二日）湖广总督瑞徵召集紧急会议，决定武汉戒严。

10月9日（八月十八日）孙武于汉口俄租界配制炸药引起焊炸，起义领导机关遭敌破坏。

10月10日（八月十九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工程每时八营夺占军械库，旋与各路义军攻占湖广总督衙门。（11日，武昌光复，湖北军政府成立，推黎元洪为都督，废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同日，革命军攻占汉阳，12日，革命军占领汉口，武汉三镇光复。）

10月12日（八月二十一日）清廷令陆军大臣荫昌督率陆军两镇赴湖北镇压民军，并授权节制所有援鄂清军。另饬海军提督萨镇冰率舰会同长江水师配合作战。

10月114日（八日二十三日）湖北军政府决定扩编革命军，出示招募新兵。清廷重新起用罢黜回籍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

10月15日（八月二十四日）刘英等于湖北京山举事，旋克钟祥。天门、潜江、监利等县。湖北军政府召开军事会议，议定趁清军未全部集中时先发制人，向北进攻。

10月16日（八月二十五日）革命党人刘化欧率革命军进攻武胜关，后被清军镇压。（17日，李长庚等策动兵变，黄州宣告独立，所属八县响应。19日，唐牺支率革命军攻克宜昌，旋东攻当阳，沙市，荆州等地。）

10月18日（八月二十七日）革命军与清军激战于汉口刘家庙，（19日，革命军攻占刘家庙。）

10月21日（八月三十日）革命军进攻滠口，清军受挫，转入防御。军政府召开会议，决定暂取守势。

10月22日（九月初一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发动会党和新军起义，攻占长沙，宣告独立。同日，西安新军起义，宣布陕西独立。

10月23日（九月初二日）江西九江新军起义，次日攻占湖口及马当炮台。

10月27日（九月初六日）清军陷刘家庙、洋商跑马场，革命军退守汉口大智门一带。

10月28日（九月初七日）清军攻陷大智门，革命军退守汉口市区。同日，黄兴自上海抵武昌，被举为总司令。（29日，黄兴至汉口督师作战。）

10月29日（九月初八日）太琢新军起义，成为山西军政府，举标统阎锡山为都督。

10月30日（九月初九日）昆明新军起义，旋攻占全城，成立军政府，举协统蔡锷为都督。

10月31日（九月初十日）南昌新军起义，旋成立军政府。同日，钦差大臣袁世凯抵信阳，督令冯国璋猛攻汉口。

10月沙俄派步骑兵侵入库伦。当月，河南宝丰白朗起义，活动于鲁山一带。

11月1日（九月十一日）清军进攻汉口市区，革命军退守汉阳。同日，广东革命党人陈炯明等于淡水起义，旋光复惠州。清海军“海琛”，“海容”，“海筹”等舰宣布起义，驶抵九江加入革命军。

11月2日（九月十二日）清军攻陷汉口。

11月3日（九月十三日）黄兴于武昌任战时总司令，设司令部于汉阳，积极备战，布防。是日，上海同盟会、光复会及商团、部分军敬举事，旋光复上海，成立沪军都督府，举陈共美为都督。（4日，贵阳新军起义，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举杨荩诚为都督。同日，驻上海清海军“南琛”等舰起义，驶抵九江。）

11月5日（九月十五日）苏州宣布独立，成立江苏军政府。

是日，杭州新军起义，成立浙江军政府，四川成都新军起义，东趋重庆。

11月7日（九月十七日）驻镇江新军第九镇步兵十八协起义，成立军政府。是日，广西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以原巡抚沈秉堃为都督。

11月8日（九月十八日）江苏新军第九镇誓师起义；兵分三路自抹陵关进攻南京，因弹药不济失利，退至镇江。同日，福州新军起义，成立军政府，举孙道仁为都督；安徽宣布独立，举原巡抚朱家宝为都督。

11月9日（九月十九日）广东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举胡汉民为都督。（13日，山东宣布独立。19日，宁夏银川会党举事，成立军政府。）

11月16日（九月二个六日）革命军自汉阳渡河反攻汉口，推进到玉带门一线。（17日，清军反扑，革命军退守汉阳。）

11月20日（九月三十日）清军对汉阳革命军发起进攻。（27日，清军陷汉阳，革命军退守武昌。）

11月24日（十月初四日）江浙起义联军进攻南京，攻占乌龙山炮

台。（25日，攻占幕府山炮台和孝陵卫。26日，消军反扑，被联军击退，联军占上方镇、高桥门，进逼雨花台。）

11月28日（十月初八日）江浙联军对南京发起总攻，未克。（31日，联军进攻天宝城、雨花台，占领城周围制高点。）

11月白朗起义军联合张群起义军，进攻河南叶县鲁山张官营地主武装失利，白朗负伤，张群阵亡。

12月1日（十月十一日）江浙联军攻占天保城。（次日攻克南京。）

12月4日（十月个四日）沙俄侵略军与外蒙军将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驱逐出境，并强行收缴驻库伦防营枪械。

12月25日（十一月初六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国抵上海。（29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2月28日（十一月初九日）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布库伦“独立”，建立“大蒙古国”

1912年（民国元年壬子）

1月1日（十一月十三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自上海抵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3日，选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是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1月11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总指挥，令黄兴为北伐陆军参谋长，并制定六路北伐计划。

1月13日（十一月二十五日）北伐军击败清军于宿州等地，攻占徐州。

1月15日（十一月二十七日）沙俄驻呼伦贝尔领事乌萨蒂操纵和指使额鲁特旗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旗总管车和扎、索伦旗总管成德等人叛乱，进入呼伦城，宣布“独立”，成立伪“自治政府”。

1月沙俄驻乌里雅苏台领事策动反动王公叛乱，并派兵驱逐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

2月2日（十二月十五日）沙俄侵略军及呼伦贝尔叛军进攻胪滨城，巡防兵英勇还击。（4日，沙俄骑兵包围胪滨府衙，北京政府命胪滨等地驻军撤出呼伦贝尔地区。）

2月12日（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宣布清帝退位。（13日，袁世凯电南京临时政府，表示赞成“共和”。同日，孙：和山提出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旋又选黎元洪为临时副总

统。）

3日3日（正月十五日）中国同盟会于南京召开本部全体大会，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

3月10日（正月二十二日）袁世凯于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1日，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3日，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

4日1日（二月十四日）孙中山正式宣告辞去临时大总统职。

4月西藏亲英分子达桑占东指挥藏军围攻驻拉萨川军，知府钟颖率千余人据险苦战，等待援军。

5月9日（三月二十三日）袁世凯任命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

6月11日（四月二十六日）袁世凯电令蔡锷率滇军入藏增援。（14日，又电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川军入藏。）

6月15日（五月初一日）由于袁世凯独断专行，破坏《临时约法》，内阁总理唐绍仪辞职。（17日，袁世觊命陆征祥暂代国务总理。）

7月8日（五月二十四日）日俄签订第三次《密约》，再次划分两国在内蒙的势力范围。

7月10日（五月二十六日）尹昌衡率川军离成都向西藏进发。

7月25日（六月十二日）俄军及外蒙叛军进攻科布多，参赞大臣溥率军抵抗，击退敌军。

8月12日（六月三十日）川省西征军南路先头部队于河口击败藏军，旋收复麻盖宗，剪子湾，西俄洛等要隘。

8月19日（七月初七日）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郡王乌泰叛乱，发布“东蒙古独立宣言”，翌日遣叛军分路进攻洮南、白城子、突泉。

6月20日（七月初八日）科尔沁右翼后旗镇国公拉喜敏珠尔率本旗叛军攻占镇东县城。同日，沙俄领事库斯敏斯齐率俄军及外蒙叛军进占科布多城。

8月22日（七月初十日）镇东县哨官李家成率部反击拉喜敏珠尔叛军，克复镇东县城。

8月25日（七月十三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于北京召开，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

8月26日（七月十四日）滇省西征军击败藏军，克复盐井。

9月12日（八月初二日）吴俊升等率骑兵进攻乌泰叛军，克王爷庙，乌泰等率残部逃往库伦。

10月27日（九月十八日）沙饿指使外蒙叛军分路进犯内蒙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及苏尼特旗等地。

11月3日（九月二十五日）沙俄密使廓索维慈于库伦与哲布尊丹巴等擅订《俄蒙协约》。（7日，北京政府声明，不承认《俄蒙协约》。）

11月10日（十月初二日）内蒙昭乌达盟郭尔罗斯左旗台古多尔济公，扎鲁特左旗协理台吉布札普等率叛众攻陷开鲁。

（旋被政府军平定。）

12月16日（十一月初八日）达赖喇嘛返抵拉萨。

12月外蒙叛军先后侵占内蒙昭乌达盟北部和多伦，张家口以北及阴山北麓广大地区。

1913年（民国二年癸丑）

1月10日（十二月初四日）俄籍蒙古人佐治野夫代表达赖喇嘛与库伦当局私订《蒙藏条约》。

1月27日（十二月二十一日）丹必占灿率外蒙叛军千余人窜人阿尔泰境。

3月3日（正月二十六日）川军克复烟袋塘，藏军溃败。

3月20日（二月十三日）袁世凯派人于上海车站暗杀宋教仁。

3月26日（二月十九日）孙中山从日本返抵上海，主张发动“二次革命”，兴师讨袁。

3月外蒙叛军连陷内蒙滂江，拜申图、大余太诸要隘；一部叛军窜犯后套地区，企图绕道围攻包头。

4月26日（三月二十日）袁世凯同俄、英、法、德、日组织的“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借款二千五百万英镑。

4月29日（三月二十三日）袁世凯派员赴天津向德国定购大宗军火。

4月30日（三月二十四日）是日起，袁世凯连续召集亲信将领开

会，策划武力对付革命党人办法。

5月1日（三月二十五日）袁世凯任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内阁总理，组成“战时内阁。”

5日6日（四月初一日）袁世凯再次召开秘密会议，制定了对南方作战的军事计划。

5月29日（四月二十四日）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组成进步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等为理事。

5月31日（四月二十六日）白朗起义军攻克河南唐县。（旋北上，连克源潭、饶良、麦北、金汤寨，直逼裕州。）

5月海军部决定分中国沿海为三大军区：自鸭绿江至烟台为北区，设司令部于秦皇岛，自烟台至三都澳为中区，设司令部于崇明岛；自三都澳至澳门为南区，设司令部于琼州岛。

6月9日（五月初五日）晋军第一师旅长刘廷森率部于老爷庙击退外蒙叛军。（10日，再败叛军，收复台梁。13日，收复大余太和乌拉山一带。）

6月14日（五月初十日）白朗起义军攻克禹州。（旋于15日撤离，转移至鲁山西北山区。）同日，察哈尔副邢统兼多伦镇守使傅良佐率骑兵一团，击败外蒙叛军，攻占黄瓜梁。（旋退防经棚。）

6月17日（五月十三日）绥远将军张绍曾命旅长孟效曾率部进攻西苏尼特王府。（23日，击败外蒙叛军，克西苏尼特王府，继克滂江。）

6月25日（五月二十一日）川军击败藏军，攻克川边乡城。

6月26日（五月二十二日）统领米振标、团长奎文等率兵三千余人，击败外蒙叛军，攻占他他庙。

6月白朗起义军奔袭卢氏城。同月，袁世凯借口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不服从中央，先后下令将三人褫职。

7月1日（五月二十七日）白朗起义军攻占河南浙川西坪。（2日，攻占荆紫关，乘胜克渐川县城。）

7月2日（五月二十八日）宁夏镇守使马福祥等智擒外蒙叛军统帅王德呢吗及其参谋官彭索胡鄂木加等，该股叛军溃散。

7月8日（六月初五日）李烈钧自上海返抵湖口，召集军官会议，商量讨袁事宜。

7月12日（六月初九日）赣军攻占江西沙河镇。同日，李烈钧等宣

布江西独立。（次日，李烈钧被举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举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

7月13日（六月初十日）外蒙叛军攻占大王庙。

7月14日（六月十一日）黄兴自上海抵南京。同日，白朗起义军与鄂、豫、陕三省军队激战于湖北均县贾家寨以东地区，大败敌军。

7月15日（六月十二日）黄兴入南京，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响应讨袁。程发出通电，宣布江苏独立，委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为临淮关总司令，并咨委陈其美为驻沪讨袁军总司令。

7月16日（六月十三日）江苏讨袁军第三师进攻韩庄。（17日遭袁军反击，退守利国驿，18日又退柳泉。）同日，方声涛率江西讨袁军右翼由姑塘进攻九江，遭袁军张敬尧团多路夹击，退回姑塘。

7月17日（六月十四日）驻九江袁军向江西讨袁军林虎旅反攻，林旅败退蓝桥。同日，安徽宣布独立，众推柏文蔚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28日，柏文蔚返安庆组织讨袁作战。）

7月18日（六月十五日）上海宣布独立，陈其美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是日，广东宣布独立，广东都督陈炯明兼任广东讨袁军总司令。

7月20日（六月个七日）福建宣布独立，许崇智任闽省讨袁军总司令。

7月22日（六月十九日）袁世凯发布“讨伐令”。

7月23日（六月二十日）上海讨袁军向上海制造局发动进攻。是日，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统一指挥江苏方向作战。

7月25日（六月二十二日）袁军攻陷湖口，李烈钧率余部退守吴城。（26日，方声涛部也放弃姑塘阵地，退往吴城。）是日，程德全在上海发表通电，要求江苏各师取消独立。同日，湖南都督谭延闽宣布独立，响应讨袁。

7月28日（六月二十五日）黄兴对讨袁失去信心，是夜由南京潜赴上海。

7月30日（六月二十七日）退至凤阳的江苏讨袁军第三师宣布取消独立。

8月1日（六月二十九日）广东讨袁军分三个支队出师北伐。（4日，部分讨袁军倒戈拥袁，炮轰都督府，陈炯明逃往香港。）

8月2日（七月初一日）袁军舰队轰击吴淞炮台。（13日，钮永建、

居正率讨袁军退往嘉定。旋解散军队，分赴海外。）

8月4日（七月初三日）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于重庆宣布独立。

8月7日（七月初六日）安徽第一师师长胡万泰宣布取消独立，率部围攻都督府，柏文蔚不敌，撤至芜湖。

8月8日（七月初七日）何海鸣等率江苏军第一师百余人，占据江苏都督府，再次宣布独立。何自任江苏讨袁军临时总司令。（旋被第八师师长陈之骥拘捕扣留。）

8月9日（七月初八日）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取消独立。

8月10日（七月初九日）南京第八师师长陈之骥潜赴江北，与冯国璋商洽献城之策。该师第二十九团官兵趁机放出何海鸣，仍举为讨袁军总司令。（次日，何海鸣宣布南京第三次独立。）

8月14日（七月十三日）张勋军攻占南京紫金山。

8月17日（七月十六日）张勋军攻陷天保城。

8月18日（七月十七日）北洋第六师占领南昌。袁世凯任李纯为江西护军使。

8月19日（七月十八日）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率卫队营抵南京，被举为江苏都督兼第八师师长。

8月21日（七月二十日）柏文蔚率部向天保城反攻，未获成功。

9月1日（八月初一日）张勋军突入南京城内，并接应冯国璋部入城。讨袁军出聚宝门退向雨花台。

9月2日（八月初二日）何海鸣率少数士兵从南京出走，潜赴上海。南京城陷入敌手，“二次革命”失败。

9月11日（八月十一日）四川讨袁军失败。熊克武潜离重庆，逃亡日本。

9月12日（八月十二日）外蒙叛军分四路进攻多伦。

9月14日（八月十四日）外蒙叛军分四路进攻林西。（17日，米振标部击退围攻林西的叛军。）

9月25日（八月二十五日）白朗起义军攻占湖北枣阳县城。

9月俄军侵入间尔泰首府承化寺一带，并侵占布尔根河。同时，胁迫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勘塔叛国“独立”。当月，察防前敌总司令卢永祥率

部于古鲁巴诺尔与外蒙叛军激战，为叛军所败，由马王庙退守托罗盖。

10月4日（九月初五日）袁世凯的御用班子宪法会议通过并公布《大总统选举法》。（6日，袁世凯胁迫议员选举其为正式大总统。7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10月6日（九月初七日）袁军围攻枣阳城，白朗起义军从北门突围，向河南转移。

10月19日（九月二十日）白朗起义军进攻鲁山县城未克，退至鲁山西北山区。（22日，与袁军激战子鲁山西北娘娘山。青条岭，椅子圈一带。23日，阻击袁军于锯齿岭。）

10月29日（十月初一日）米振标、石得山等部攻克经棚，外蒙叛军向西逃窜。

11月4日（十月初七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员在因会中的议员资格。

11月5日（十月初八日）袁世凯政府与沙俄签订关于蒙古问题的《中俄声明文件》，承认外蒙古“自治”。

11月12日（十月个五日）白朗起义军攻占宝丰县城。（旋又撤往鲁山西北山区。）

11月19日（十月二十二日）吴俊升、米振标率部与外蒙叛军激战，攻克大王庙。

12月帕勒塔盗用阿尔泰办事长官名义，与沙俄领事私订《中饿军队停战条约》，允许俄军和外蒙叛军驻扎阿尔泰东部，规定新疆援军撤出察罕通古。月底，外蒙叛军全部撤回库伦。

1914年（民国三年甲寅）

1月10日（十二月十五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

1月11日（十二月十六日）白朗起义军破光山。（15日克光州，16日破商城。）

1月24日（十二月二十九日）白朗起义军攻破安徽六安。（27日撤离。）

2月6日（正月十二日）白朗起义军攻破安徽霍山。（旋又南下英山。）

3月7日（二月十一日）白朗起义军攻占湖北老河口黑龙集。（8日，攻占老河口，旋转移入豫。）

3月14日（二月十八日）白朗起义军再次攻克鄂、豫、陕边界要隘荆紫关。

3月15日（二月十九日）段祺瑞等拟定分进合击、八路“兜剿”白朗起义军的计划。

3月17日（二月二十一日）白朗起义军再荆紫关分路西进，连克西坪，富水关、商南、武关。（20日，进占龙驹寨，继克商县。）

3月24日（二月二十八日）英国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于印度德里以秘密换文方式，擅自划定中印边界线，即所谓“麦克马洪线”。把中印东段边境地区历来属于中国领土、面积约九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地区划入英印版图。是日，白朗起义军占山阳。

4月6日（三月十一日）白朗起义军破陕西盩。（8日渡渭水，9日破乾县，13日破永寿，14日破邠州，18日破麟游，19日破岐山，21日破阳，22日破陇州，旋入关固山中，后又转入甘肃境内。）

5月1日（四月初七日）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

5月3日（四月初九日）白朗起义军攻破甘肃伏羌。（次日破秦州。）

5月14日（四月二十日）白朗起义军攻占甘肃阶州。（21日破岷州，25日破洮州，威胁兰州。）

5月底白朗起义军决定由甘肃回师返豫，随即从洮州出发，经漳县、宁远趋秦州。

6月4日（五月十一日）白朗起义军破甘肃秦安。（7日破清水，直趋陕西宝鸡，10日再破盩，13日逼近西安，17日破镇安，21日破山阳，直趋荆紫关。）

6月26日（闰五月初四日）白朗起义军宋老年部于陕豫边之富水关与刘镇华部镇嵩军激战，突入河南。（29日，白朗率主力由荆紫关北之西坪返豫，径赴鲁山山区。）

7日3日（闰五月十一日）英国代表与西藏地方代表于印度西姆拉擅签《西姆拉条约》，中国政府代表拒绝签字。

7月8日（闰五月十六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准备继续讨袁。

8月3日（六月十二日）白朗等起义军将士数十人于宝丰、汝州交界之虎狼爬岭遭袁军多路围攻。白朗在率部突围时中弹牺牲，起义军彻底失败。

8月6日（六月十五日）袁世凯政府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发表中立宣言。

8月23日（七月初三日）日本对德宣战。（27日，日本舰队封锁山东胶州湾。31日，日军相继占领胶州湾附近各岛屿。后又侵占青岛和放济铁路沿线，夺占了德国在山东的全部侵略利益。）

8月李根源，程潜、章士钊等于日本东京组织欧事研究会。

9月1日（七月十二日）孙中山于日本发表宣言，宣布中华革命党成立。

1915年（民国四年乙卯）

1月18日（十二月初四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条”。

5月9日（三月二十六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中除第五部分内容以外的全部要求。

5月31日（四月十八日）陆军总长段祺瑞称病呈清开缺，退居北京西山。袁世凯任王士珍署陆军总长。

6月7日（四月二十五日）中、蒙、俄三方于恰克图签订《中俄蒙协约》。《协约》规规定了中国对外蒙古继续行使宗主权。（9日，活佛哲布尊丹巴于库伦宣告取消外蒙独立。）

8月14日（七月初四日）杨度等六人于北京发起成立“筹安会”，鼓吹恢复帝制。

9月1日（七月二十二日）中华革命竞子日本东京集会，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9月云南团以上军官秘密会设，议决反对帝制。

10月27日（九月十九日）国务卿徐世昌称病请假离京，袁世凯任陆征祥暂兼代理国务卿。

10月8日（九月二十日）全国务省区所谓“国民代表”开始进行“国体投票”。（至11月20日全部结束，“一致赞成”改民主共和为君主立宪。）

11月6日（九月二十九日）北京政府在沙俄胁迫下，与之签订《中俄关于呼伦贝尔之协定》，承认沙俄在该地区的特殊利益和该地区的“特别”地位。

11月10日（十月初四日）上海中华革命党人刺死袁世凯的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

12月5日（十月二十九日）中华革命党人于上海发动“肇和”号军舰起义，炮轰上海制造局，旋即失败。

12月11日（十一月初五日）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向袁世凯上“推戴书”。（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13日。接受百官朝贺，大加封赏。31日，宣布自明年元旦起改民国五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

12月17日（十一月十一日）李烈钧偕煎克武，龚振鹏秘密抵达昆明。（19日，蔡锷抵昆明。）

12月25日（十一月十九日）唐缮尧，蔡锷等联名通电全国各省，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护国运动开始。

1916年（民曰五年·丙辰）

1月1日（11月26日）云南都督府正式成立，唐继尧任都督。

1月6日（十二月初一日）袁世凯令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对云南护国军“严筹防剿”，并派虎威将军曹锟督师，令其分两路经川湘进攻云南。（旋又设“征滇临时军务处”，自主征滇军务。）

1月21日（十二月十七日）云南护国军占领四川叙州。

1月27日（十二月二十三日）贵州宣布独立，推刘显世为都督。

1月29日（十二月二十五日）袁军分四路反攻叙州，第四混成旅于是日首先进迫叙北宗场。（31日，被护国军第一梯团击退。是日，袁军

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半两营抵达叙东白沙场。）

2月1日（十二月二十八日）护国军第一梯团分两路反击冯玉祥旅。（2日，冯旅山白沙场败退江安。）

2月2日（十二月二十九日）护国军第一军右翼军总司令戴戡率军离贵阳向四川綦江进发，右翼军东路（黔军）司令王文华率部突袭湘西晃州，占领该城。是日，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率部于纳溪宣布起义。

2月5日（正月初三日）护国军黔军第三团攻克湖南黔阳。（6日夺占洪江镇，即折赴沅州。）

2月14日（正月十二日）戴戡指挥第一军右翼军，分两路进攻綦江方向之敌，是日攻占九盘子。（后乘胜推进，连克青羊寺、赶水、东溪等要地。）同日，护国军黔军第一、三团攻克湖南沅州，第三团团长吴传声阵亡。

2月16日（正月十四日）护国军黔军第二团进占湖南麻阳。

2月19日（正月十七日）护国军第一军参谋长罗佩金、第二梯团长赵又新，指挥部队分四路反击进攻纳溪之袁军。（因弹药不济，23日被迫转入防御。）

2月23日（正月二十一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纳溪抵。

2月28日（正月二十六日）蔡锷于纳溪组织护国军对当面之袁军发起总攻。（激战数日，未能奏效。）

2月29日（正月二十七日）袁军冯玉祥旅由自流井进攻叙州。（3月3日，护国军退守横江。）

2日下旬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率部离昆明，趋广西，东征粤、浙。广东第一师师长龙觐光奉袁世凯命令，率部经广西往攻云南。

3月6日（二月初三日）蔡锷率纳溪护国军撤至叙蓬溪、大洲驿一带，组织防御。

3月15日（二月十二日）广西将军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旋派兵进攻龙觐光军。（护国军第二军乘机反击，迫使龙觐光部投降。）

3月16日（二月十三日）蔡锷电示綦江护国军缩小战线。戴戡旋即率部退守松坎。

3月17日（二月十四日）是日起，大洲驿护国军对袁军发动总攻，连克茶塘子、双河场、南寿山，江安等地。

3月22日（二月十九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23

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电蔡锷等请求停战，商议善后。）

3月23日（二月二十日）蔡锷令所部护国军停止进攻，“暂取攻势防御”。

3月31日（二月二十八日）蔡锷与袁军第二路军司令张敬尧议和停战，是日起停战一周。同日，沅州护国军（黔军）遭敌攻击，不久城破。

4月2日（二月三十日）是日起，护国军黔军反攻沅州。（经四昼夜激战，终未奏效。）

4月6日（三月初四日）广东将军龙济光宣布独立，改称都督。同日，进军湘西的护国军黔军奉蔡锷令，与当面之敌停火休战。

4月12日（三月初十日）浙江宣布独立，举吕公望为都督。

4月18日（三月十六日）滇、黔、桂，粤四省都督联名发表宣言，坚持取消袁世凯大总统资格，由副总统黎元洪接任，并领海陆军大元帅职。

5月8日（四月初七日）南方独立各省宣布于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遥戴黎元洪为总统，举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蔡锷、李烈钧，陆荣廷，龙济光等为抚军，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

5月9日（四月初八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同日，陕西宣布独立。

5日22日（四月二十一日）四川宣布独立。

5日29日（四月二十八日）湖南宣布独立。

6月6日（五月初六日）袁世凯死。（次日，黎元洪代理大总统。）

6月29日（五月二十九日）黎元洪宣布遵行《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裁撤参政院，由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

7月6日（六月初七日）北京政府改各省军务长官为督军，民政长官为省长。

7月14日（六月十五日）南方军务院撤销，护国战争结束。（25日，中华革命党发出通告，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10月30日（十月初四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

10月31日（十月初五日）黄兴于上海病逝。

11月8日（十月十三日）蔡锷于日本东京病逝。

1917年（民国六年丁巳）

1月9日（十二月十六日）安徽督军张勋等及各省督军代表在徐州会议，提出修改约法，解散国会，改组内阁等主张，打击黎元洪，支持段祺瑞。

3月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围绕对德宣战问题，展开“府院之争”。（14日，北京政府宣布与德国绝交。）

4月25日（三月初五日）段祺瑞纠集“督军团”于北京开会，拟定了对德“宣战案”。（旋胁迫总统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参战。）

5月23日（四月初三日）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

5月底安徽、浙江、黑龙江等省纷纷宣布独立。

6月1日（四月十二日）福建宣布独立。同日，黎元洪召张勋来京共商国事。

6月2日（四月十三日）段祺瑞唆使八省督军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处，以武力威胁总统。

6月12日（四月二十三日）黎元洪被迫下令解散国会。

6月14日（四月二十五日）张勋率军抵京，阴谋复辟帝制。

6月19日（五月初一日）各省陆续通电取消脱离中央宣言。

7月1日（五月十三日）张勋在京拥溥仪复辟。（2日，黎元洪避入日本公使馆，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7门3日（五月十五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宣布出师讨逆。

7月5日（五月十七日）段祺瑞通电宣布就任国务总理，在天津设立办事处。

7月6日（五月十八日）孙中山偕廖仲恺，章太炎，朱执信等人乘舰由沪启程赴粤，拟以广东为基地，组织护法讨逆。

7月12日（五月二十四日）段祺瑞指挥“讨逆军”攻进北京，张勋复辟破灭。

7月16日（五月二十八日）唐继尧通电讨伐刘存厚，川、滇之战全面爆发。

7月17日（五月二十九日）孙小山一行抵达广州，当晚发表演说，阐述护法宗旨。（19日，孙电邀国会议员赴粤，组织护法政府。）

7月22日（六月初四日）海军总司令程壁光率海军第一舰队由上海驶赴广州，参加护法。

8月1日（六月十四日）冯国璋由宁抵京。（6日，通电宣布就任代理总统。）

8月6日（六月十九日）冯国璋特任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同日，下令免去湖南省长兼署督军谭延的督军职务。

8月14日（六月二十七日）段祺瑞政府通告对德、奥宣战。

8月18日（七月初一日）孙中山在广州宴请南下议员，议定召集“非常因会”，组织护法政府。

8月25日（七月初八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

8月下旬川军第一、二、三师分二路出兵，进攻资中、内江一带之滇军。

9月2日（七月十六日）陆荣廷致电孙中山，拒受元帅职。（8日，唐继尧也通电不受元帅职。）

9月9日（七月二十三日）博良佐抵长沙。谭延向傅移交督军印，尔后潜赴上海。

9月10日（七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任护法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宣告军政府成立。

9月18日（八月初三日）代理零陵镇守使刘建藩、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联衔通电宣告湘南自主。

9月20日（八月初五日）傅良佐派湘军第一师代师长李佑文，率该师第一旅出长沙进攻湘南护法军。（28日，该师第一团第三营在衡山石湾起义护法，第一、二团大部官兵响应，李佑文率十余人逃回长沙。）

9月22日（八月初七日）滇军第四军军长黄毓成率部抵泸州。

9月27日（八月十二日）原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从衡山赶赴衡阳，投身护法。（28日，刘建藩率兵十营由零陵抵衡阳。）

9月29日（八月十四日）程潜由广州抵衡阳参加护法。同日，冯国璋下令缉拿军政府成员。

10月1日（八月十六日）段祺瑞宣布“出师剿灭”南方军队。

10月2日（八月十七日）陆荣廷在南宁召开军事会议，议定组织“两广护国联军”援湘，以谭浩明为总司令。同日，湖南宝庆守备第二区司令周伟，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宋鹤庚，联衔通电宣告自主，旋率部东进，袭占界岭，进迫青树坪。

10月4日（八月十九日）唐继尧由昆明启程赴贵州毕节，亲自指挥对川作战。

10月6日（八月二十一日）湘省护法军将领在衡阳组织“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推程潜为总司令。同日，北军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王汝勤，率部与湘军赵恒惕师在湘潭县属西倪铺接战，连占茶园铺、中路铺和白石铺等要点。

10月7日（八月二十二日）孙中山通电否认冯国璋、段祺瑞政府，下令出师北伐，讨逆护法。

10月9日（八月二十四日）护法军政府提出多路出兵，会师武汉的战略设想。同日，北军王汝勤旅占领护湘关。（10日进占石桥铺，11日陷衡山，护法军退守贺家山。）

10月13日（八月二十八日）攻湘北军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旅长张纪，率部击退防守淦田乌鸦山之刘建藩军，进占朱亭。同日，云南靖国军顾品珍师反攻内江，在白马庙与川军激战。（14日攻克白马庙，15日克复内江。）

10月15日（八月三十日）湘粤桂护法军与北军在衡山县贺家山一线激战。（21日，湘南护法军将领在衡阳举行会议，拟定中路坚守，左路反攻的作战计划。）

10月18日（九月初三日）湘军第二师之朱泽黄旅分两路由界岭向宝庆进攻。（19日占黑田铺，洪桥，20日进占宝庆。）

10月20日（九月初五日）谭浩明通电就任“两广护国联军总司令”，誓师援湘。

10月22日（九月初七日）川军第一、二、三师分三路对川南滇军发动进攻。（23日，第三师占内江；25日，第二师占威远，26日，第一师占北雅镇。月底，川军分别逼近泸州、叙州。）

10月23日（九月初八日）广东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宣告“对省独立”，旋派兵攻打惠州。（24日，闽督李厚基通电支持莫擎宇，并派兵攻粤援莫。）

11月3日（九月十九日）广东督军派钦廉镇守使沈鸿英、惠州督办

刘志陆，各率所部进剿莫擎宇。

11月4日（九月二十日）湘、桂护法军克复宝庆。

11月8日（九月二十四日）冯国璋任陆荣廷为宁威上将军，着即赴京任职，另任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同日，湘、挂护法军攻克界岭，继下青树坪。（11日，护法军进攻永丰，傍晚克之。）

11月12日（九月二十八日）滇、黔靖国军合攻重庆。

11月14日（九月三十日）攻湘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自长沙通电，主张南，北军停战议和。是夜，湘督傅良佐和代理省长周肇祥逃离长沙。

11月15日（十月初一日）段祺瑞向冯国璋请辞国务总理职。同日，湘、桂、粤联军克复衡山。

11月16日（十月初二日）川军第一、三师对泸州发动总攻。（21日攻占泸州，23日陷纳溪，滇军败退永宁。）

11月17日（十月初三日）湘、桂、粤联军攻克湘潭、株洲。（20日，赵恒惕、程潜、刘建藩等部进占长沙。）

11月18日（十月初四日）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苏督李纯、直督曹锟联衔通电，主张北京政府与西南各省撤兵停战。同日，孙中山发表时局通电，指出：“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之余地”。

11月22日（十月初八日）冯国璋批准段祺瑞辞职，以汪大燮暂地兼代总理。同日，湖南各界代表会议举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谭浩明为湖南督军，程潜为省长兼军务会办。

11月28日（十月十四日）陆荣廷授意谭浩明发表停战通电。同日，川军第二师占叙州。

11月30日（十月十六日）冯国璋特命王士珍署理国务总理。（12月日，正式任王为国务总理。）

12月1日（十月十七日）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在荆州宣告自主。同日，原湖北第三师师长王安澜率旧部于鄂，豫边宣告独立，旋进驻随县，枣阳一带。

12月2日（十月十八日）段祺瑞在天津召开督军团会议，一致主战，并拟定了大举进攻湖南的计划。

12月3日（十月十九日）陈炯明就任“攻闽粤军总司令”。

12月4日（十月二十日）滇、黔、川靖国联军攻占重庆，请熊克武

出面维持秩序。（13日，熊克武通电宣布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

12月7日（十月二十三日）驻粤滇军第四师第八混成旅在广州誓师攻闽。

12月10日（十月二十六日）孙中山电请唐继尧速率滇军东下，与石星川部等起义鄂军会攻武汉。

12月14日（十一月初一日）龙济光自琼州出兵攻闽。

12月15日（十一月初二日）冯国璋任命直督曹锟为攻湘“第一路军总司令”，鲁督张怀芝为“第二路军总司令”，令各率本路军队南下攻湘。同日，滇、黔、川靖国军分三路反攻川军，进趋成都。是日，滇军赵又新部攻占纳溪，进逼泸州。（19日，克复泸州；22日，顾品珍部攻占永川。）

12月16日（十一月初三日）湖北襄郧镇守使黎天才通电宣告自主，旋就任“湖北靖国联军总司令”。

12月18日（十一日初五日）冯国璋委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特任刘存厚为四川督军。

12月26日（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致电黎天才，指示湘、鄂、川护法军队“合力并进”，夹击武汉。

12月30日（十一月十七日）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学济率军援鄂。其前卫司令胡瑛所部于是日进抵湖北公安。同日，莫荣新任命沈鸿英为讨龙第一军司令，林虎为讨龙第二军司令。

1918年（民国七年戊午）

1月1日（十一月十九日）刘存厚于成都就任四川督军。同日，熊克武指挥之四川靖网军克渠县。（3日克遂宁，9日克顾庆、保宁。）

1月2日（十一月二十日）滇军顾品珍部攻占四川荣昌。（8日下隆昌，15日占内江。）同日，粤督莫荣新枪杀孙中山卫队官兵多人。

1月3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孙中山指挥军舰炮轰广东督军署。

1月4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原京津总稽查长王天纵在河南临汝宣告独立。

1月9日（十一日二十七日）熊克武在重庆就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

1月10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北洋政府下达“武力勘定荆襄令”，命曹锟、王占元派兵“分路会巢”，湖北靖国军。

1月14日（十二片初二日）湖北陆军第四旅旅长朱廷灿，北洋第十三混成旅旅长李炳之，各率所部进攻荆沙靖国军。同日，滇军赵又新部攻占四川富顺。（1月20日，川军复占富顺。）

1月16日（十二月初四日）刘存厚军北路司令杨肇锡反攻遂宁得手。

1月18日（十二月初六日）湘军总司令程潜下达进攻岳阳令。同日，龙济光部攻占广东化州。

1月20日（十二月初八日）黎天才所部靖国军放弃襄阳，向南转移。

1月22日（十二月初十日）湖北靖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石星川解职出走。是夜，荆州被北军攻占。

1月23日（十二月十一日）湖南护法联军进攻岳阳战斗全面打响。是日，湘军攻克托坝，逼近乌江桥。（26日克之。）

1月25日（十二月十三日）滇军分四路向四川叙州、富顺、内江、资中等地发起猛攻。

1月27日（十二月十五日）湘省护法联军攻克岳阳。

1月31日（十二月十九日）冯国璋下达对南军“局部讨伐令”，命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即行统率所部分路进兵”，特任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同日，滇军攻占叙州。（2月2日进占内江，富顺，6日克自流井。）是日，刘存厚通电宣称，愿将四川督军一职让与熊克武，要求与靖国军“停战议和”。

2月2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北京政府下令对湘粤桂联军作战。

2月5日（十二月二个四日）冯国璋任命吴佩孚署理陆军第三师师长，令率所部向蒲圻、嘉鱼一带开进。

2月14日（正月初四日）北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于湖北武穴通电主和，要求南北罢兵休战。

2月16日（正月初六日）川军第二师旅长刘成勋、陈洪范在乐山通电护法。（18日，第二师汪可权、舒荣衢两旅长和第一、三两师全体军官，也宣布与滇，黔靖国军一致行动。）

2月18日（正月初八日）滇、黔靖国军攻占简阳，进逼成都。

2月20日（正月初十日）四川靖国军熊克武部进占成都。

2月26日（正月十六日）广东军政府海军总长程壁光被刺身死。

2月28日（正月时八日）吴佩孚率部向岳阳外围护法联军发动进攻，是日攻占新店，滩头。

3月7日（正月二十五日）粤督莫荣新任命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统一指挥阳江方向作战。

3月8日（正月二十六日）孙中山特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四川省省长。（27日，熊克武电请孙中山收回成命）是日，陕西靖国军举唐继尧为川、滇、黔。陕四省靖国联军总司令。

3月11日（正月二个九日）张敬尧指挥所部第七师和李奎元第十一师分三路由通城向平江方向发起进攻。（22日占领平江）。

3月16日（二月初四日）刘志陆率讨龙第三军克复恩平。

3月18日（二月初六日）北军吴佩孚师占领岳阳。

3月23日（二月十一日）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力主“武力统一”

3月25日（二月十三日）谭浩明率所郎桂军逃寓长沙。（26日，北军吴佩孚师进占长沙。）

3月27日（二月十五日）冯国璋特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同时电令吴佩孚部立即向湘南进军。

4月12日（三月初二日）广东讨龙军占领电白。（25日克化州，27日克石城，28日下遂溪，龙济光逃往北京。）

4月15日（三月初五日）北军张怀芝部之施从滨师进占湘东攸县。

4月18日（三月初八日）赣督陈光远派赣南镇守使吴鸿昌为攻粤总司令，率兵两旅进攻南雄。

4月21日（三月十一日）北军吴佩孚部攻占衡阳。（不久渡江东向，威胁湘东护法军后路。）

4月23日（三月十三日）湘军克复攸县。

5月日（三月二十四日）广东非常国会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孙中山在西南各省军阀排挤下，于是日通电辞大元帅职。

5月0日（四月初一日）攻闽粤军发动全面进攻。许崇智支队占武平。（三日后占上杭。）

5月5日（四月初六日）湘西护法军致电冯国璋，要求“休兵息战。（下旬，湘西护法军撤兵，北军冯玉祥旅进占常德，临澧。）

5月20日（四月十一日）广东非常国会废除军政府元帅制，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和岑春煊七人为军政府总裁。（21日，推举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同日，北京政府任命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吴佩孚为援粤副司令，令率北军分三路攻粤。

5月月21日（四月十二日）孙中山离广州赴汕头。（6月6日离汕头，转道日本返上海。）

5月25日（四月十六日）吴佩孚与湘军师长赵恒惕在来阳开始秘密谈判，约定从6月15日起，双方于宝庆至茶陵一线停战。

5月浙军第一师师长童葆暄率部援闽。北洋政府任命闽督李厚基为闽浙援粤军总司令，童葆暄为副司令。

6月4日（四月二十六日）闽浙联军分三路反攻粤军。

6月27日（五月十九日）孙中山致电陈炯明，示其“冒险进攻”，“以攻为守”。

7月18日（六月十二日）闽浙军攻占大埔，威胁粤军总部驻地三河坝。

8月4日（六月二十八日）陈炯明指挥粤军克复大埔。

8月21日（七月十五日）吴佩孚等通电反对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

8月31日（七月二十五日）粤军攻克漳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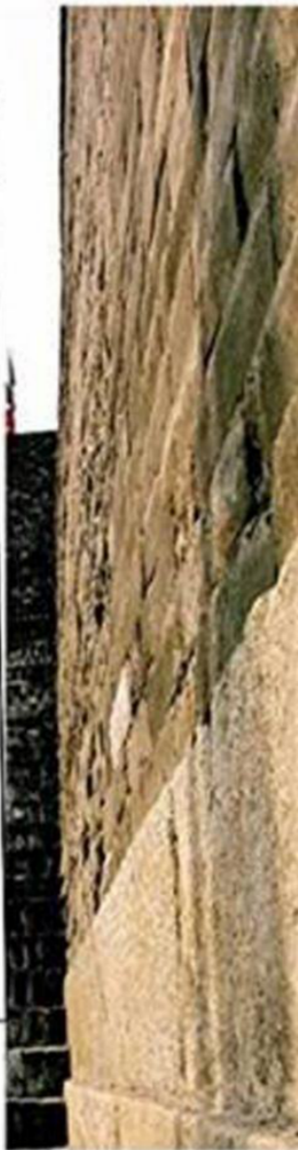
9月4日（七月二十九日）冯国璋总统任期届满，是日北京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10月10日上任。）

10月3日（八月二十九日）广东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福建省宜抚使兼攻闽军总司令。（11月，粤军与闽浙联军在福建前线划界停战。）

11月16日（十月十三日）徐世昌对北军前线部队发布停战令，倡议召开南北和平会议。（22日，广州军政府通令休战。）



秦汉战争史（上）



目录

第一部分 秦代时期总论
第一节 秦王朝的建立
第二节 秦进一步统一北方和南方的战争
第三节 秦末农民起义
第四节 秦朝的灭亡
第二部分 秦统一六国的战争
第一节 秦统一六国前各国之形势
第二节 秦灭六国的基本战略与策略
第三节 并韩灭赵战争
第四节 灭魏战争
第五节 灭楚之战
第六节 灭燕战争
第七节 灭齐战争
第八节 秦灭六国后的军政建设
第三部分 秦统一后的对外战争
第一节 驱逐匈奴战役
第二节 征南越战役
第四部分 秦末农民起义战争
第一节 秦代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
第二节 大泽乡农民起义
第三节 陈胜吴广起义军的胜利进军
第四节 项梁项羽刘邦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第五节 各路反秦军与秦军作战经过
第五部分 秦代灭亡之战争
第一节 钜鹿战役
第二节 刘邦项羽西进秦都之战
第三节 项羽刘邦灭秦后的相互斗争
第六部分 楚汉战争时期总论
第一节 楚汉两大集团的形成
第二节 楚汉战争的梗概
第三节 楚汉战争双方成败的基本原因
第四节 楚汉战争时期的战争特点
第七部分 楚汉战争支战场作战
第一节 三秦战役
第二节 安邑战役
第三节 潍上战役
第八部分 楚汉战争主战场作战
第一节 彭城战役
第二节 成皋战役
第三节 垓下战役
第九部分 西汉时期总论

第一节 西汉王朝的始末
第二节 西汉王朝的政治军事建设
第三节 西汉王朝的经济与战争实力
第四节 西汉时期的重要战争梗概
第五节 西汉时期的战争特点和杰出将领
第十部分 刘邦巩固初建统一政权的战争
第一节 西汉政权建立初期的形势
第二节 平定韩王信之晋阳战役
第三节 平定陈的东垣战役
第四节 平定英布之蕲西战役
第五节 平定卢绾之战
第十一部分 西汉初期平定同姓王叛乱的战争
第一节 汉初平定异姓诸王后的政治形势
第二节 平定七王之乱的昌邑战役
第十二部分 西汉末期的社会状况和农民起义战争的爆发
第一节 农民与统治阶级的尖锐矛盾
第二节 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
第十三部分 绿林起义军的战争
第一节 起义战争初期的作战
第二节 昆阳战役
第十四部分 赤眉起义军的战争
第一节 赤眉起义军的初期作战
第二节 成昌战役
第三节 赤眉对更始的长安战役
第四节 崤底战役

第一部分 秦代时期总论

秦国自秦孝公变法图强至秦始皇时期，共经六世，一百一十多年。秦始皇继前六世秦王的开拓精神，更加励精图治，开始了并灭六国的统一战争，终于最后灭亡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

第一节 秦王朝的建立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灭亡了齐国之后，终于完成了白商周以来最大的统一大业。秦的建立，使中国北起原燕、赵长城内外，中原的黄河流域的中下游，长江流域的中下游以至珠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第一次置于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秦朝的建立，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既是秦国强于赵、魏、韩、齐、楚、燕诸国，进行统一战争的结果，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社会经过春秋时期、战国时期的几百年战乱割据，早已不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整个社会进步的需要，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因此，时代要求要有一个统一的、安定的社会制度，秦王朝正是适应这一时代的要求，依靠自己强盛的国力和政治军事上的凝聚力，通过统一战争，取得了一统天下的政权。

秦朝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适合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体制。朝廷之内设三公、九卿，协助皇帝掌管全国的军政大事。在地方则设立郡县制，一郡之内管辖若干县，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足万户的县设县长。一县之内设若干乡。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大大有利于秦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秦统一六国后，进一步承认了土地私有制度，并用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这在当时的社会里无疑对繁荣农业经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当然，这种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的合法化，也使农民永远成为地主阶级剥削压榨的对象。

秦王朝无论在统一战争时期还是在统一政权建立后，仍然在不断完善这些政治和经济制度。

秦王朝在统一战争期间和在统一政权建立之后，均拥有一支数量众多的军队，总数常在一百万以上。它由常备军和地方军两部分组成。常备军由朝廷指派大将统率，或执行机动作战任务，或驻守边疆。地方军则由郡尉统率，执行地区性的作战任务或临时编入中央军序列，执行统一的作战任务。

秦朝为了保障自己对内对外有效地实行统治，制定了一套严苛的法典《秦律》。《秦律》最初是由商鞅参照李悝的《法经》修改补充而制定的。《秦律》虽已失传，但从一些出土文物中，特别是一九七五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代竹简中可以看出《秦律》的部分内容，它对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对兵役徭役的征调，对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都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凡是违背律条的都要按规定治罪。

秦王朝的建立，结束了战国诸侯割据称雄的战乱局面，是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但秦朝的苛政和对人民的严酷统治与镇压，却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无法忍受的灾难。

第二节 秦进一步统一北方和南方的战争

秦在统一六国之后，继续推行统一北方和南方的战争。

我国北方的兄弟民族之一的匈奴族，他们世代生活于蒙古高原以至贝加尔湖之间的广大地区。到战国中后期，匈奴部族也已进入奴隶社会，他们过着游牧生活，人人善于骑射，勇猛强悍。匈奴奴隶主贵族依仗其骑兵机动性强、突击力猛的特长，从战国以来就不断进袭中原，严重威胁中原地区的安全。秦统一六国后，为彻底击败匈奴，于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命大将蒙恬率领大军北征匈奴，取得全胜，收复了被匈奴占领的河套南北的广大地区。随后即大规模向这一地区移民，以巩固边疆。繁荣边疆的经济，这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国南方和东南方，大约相当于现今的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西等地区，居住着一些蛮夷部族，称为“百越”。秦始皇为进一步开拓南部中国的疆域，先后派出五十多万大军由尉屠睢率领南征越人。经过多年的征战，秦军最终战胜了越人，并设置了闽中南海、桂林，和象郡，并带领内地五十多万人去越人地区定居，以与越人共同开发南中国的经济。

秦王朝由于战胜了匈奴和越人，大大增强了秦王朝的统治，促进了南方和北方与中原地区各族人民之间的融合，对中国的统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使秦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最大的多民族封建国家。

第三节 秦末农民起义

秦王朝的建立，并没有彻底消灭奴隶制度的残余。因而秦代社会，除了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一对主要的矛盾之外，还有大量奴隶与各种形式的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同时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和下层的小商业者，也与统治阶级有着深刻的矛盾。这些处于被统治被压榨的阶级，无法忍受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和剥削。当时，大批劳力被强迫长年从事役力，修建豪华的宫殿和陵墓，无休止地消耗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人民苦不堪言，农民大量破产，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秦王朝这种残酷的统治，更加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激烈反抗。

秦始皇即位之初，自认为自己的王位可以传至百世，因此，自己称始皇帝。但秦始皇病死后，宦官赵高伙同丞相李斯，假造秦始皇诏书，除掉公子扶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胡亥是个更加残暴和昏庸无度之君，他把宫内大批宫女殉葬秦始皇，把修骊山陵墓的全部劳工活埋。他不但继续推行苛政酷刑，一人犯法，三族均治罪，一家犯法，则连及邻里，还以“杀人众者为忠臣”，“税民深者为明吏”。造成“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积於市”的悲惨情景（《史纪》卷八十七，第2557页）。秦二世不仅惨害百姓，还杀死他的兄弟姐妹二十多人，一些重要大臣也相继誅杀。因此，在秦二世统治下，从朝廷内部到整个社会，阶级压迫和矛盾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农民群众的揭竿起义就是必然的趋势了。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爆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领的大泽乡农民起义，他们攻城略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他们打着“伐无道、诛暴秦”的革命旗号，动员和鼓舞全国各地的农民举行起义。一时之间，秦嘉、朱鸡石、项梁，项羽、刘邦、武臣、周文等等也都在各地取得起义的重大胜利，全国的反秦声势，呈现一呼百应的局面。据《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记述：“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各地的起义大军风起云涌，兵锋所至，势如破竹。周文率领的起义大军很快逼近秦都咸阳。但由于秦军的反扑，周文军被其击败，陈胜、吴广大军也相继失利。

第四节 秦朝的灭亡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失败后，项梁、项羽、刘邦领导的起义军继续与秦军作战，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春，项梁等率军北上，陈婴、英布、蒲将军等领导的起义军先后与项梁、项羽军合兵继续北进，此后刘邦、吕臣等领导的起义军也来相会，兵力很快扩展到六七万人。

在陈胜军失败陈胜被害后，项梁、项羽等采纳谋士范增的建议，立楚怀王之孙（名心）为新的楚怀王、建都于盱眙（今江苏省盱眙县）。项梁、项羽、刘邦军多次与秦军交战，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后来项梁由于骄傲轻敌而战败，项梁战死于定陶战役。在决定秦楚双方胜败的关键性战役——钜鹿会战中，楚军战胜了秦军。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七月，秦军终于被楚军彻底战败，并向楚军投降。至此，秦朝丧失了唯一能够机动作战的重兵集团章邯军，秦王朝的灭亡已指日可待。

刘邦所率领的起义军，从秦二世三年二月开始了西进秦都之战。一路之上进展顺利，先后攻克了陈留，白马（今河南省滑县境）。曲迂（今河南省中牟县境），宛城（今河南省南阳），进入武关，直趋秦都。

这时，秦统治集团内部更加混乱不堪，对起义军的胜利惊恐万状，预感到秦朝的末日即将来临。赵高为防止秦二世追查他的责任，竟派亲信杀了秦二世，立秦二世之侄子婴为秦王。子婴随即诛杀了赵高，并派兵至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等地加强守备，以阻止刘邦军的西进，又被刘邦军战败。刘邦军于秦王子婴即王位一个半月后（公元前207年十月），进至灞上。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遂率朝臣向刘邦军投降。至此，秦王朝结束了自己延续十五年统治的历史。

第二部分 秦统一六国的战争

秦统一六国的战争，基本战略是以强大的政治外交攻势拆敌六国的“合纵”联盟，接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主要的战争有：

并韩灭赵战争：灭赵之战始于秦始皇十一年（公元前236年），赵悼襄王九年。大战三次，共历九年。至秦始皇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赵代王嘉六年，秦灭亡赵，灭韩战争发生于秦始皇十七年（公元前230年），韩王安九年。

并魏战争：发生于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先前225年），魏王假三年，魏被秦并灭。

灭楚战争：始于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楚王负刍三年，经过两次大战，历时近三年，秦先败后胜，于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楚王负刍五年，楚被秦灭亡。

灭燕战争：发生于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燕王喜二十八年。秦军一举攻占燕都蓟，燕王喜弃都逃至辽东。至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燕王喜三十三年，燕才最后为秦灭亡。

灭齐战争：发生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在秦灭燕后，王贲率军南下。以突然袭击的行动，直趋临淄，将齐一举灭亡。

第一节 秦统一六国前各国之形势

经过春秋和战国长期的兼并和战乱，中国社会逐渐向全国统一的趋势发展。到了公元前246年，也即秦始皇即位的初年，随着秦灭六国统一战争的开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大帝国——泰国即将在刀光剑影中诞生。六国日渐没落、秦国蒸蒸向上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齐国，向为东方之强国，但到秦始皇初年，齐政权传至齐王建时，齐威王时期建立起来的霸业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齐国实已徒具东方强国的虚名。它政治落后，经济发展缓慢，多年来处于鼓乐升平，独力自保的境地。国无贤臣良将，军无奋进战斗之志，面对强秦即将发动的并灭六国的战争，竟毫无准备，坐以待毙。

韩，本来就是三晋之中最弱的一方，因为它与秦接壤，秦每次出兵，韩几乎都要受害，到韩桓惠王时，韩就已臣服于秦国。秦始皇初年，韩国的疆域更加缩小，只剩下都城阳翟（今河南省禹县）与其周围十多个中小城邑，基本上已是名存实亡之国了。

魏，虽然也曾经历过战国初期最强盛的时期，它据有河东、河西、河内、河外的广大地区，疆域之内山河纵横，形势险要，但由于它阻扼秦东出函谷之咽喉，多年均为秦之首要对手，特别是自魏惠王以来，不断被秦战败，疆域日渐缩小。秦始皇初年，正当魏安釐王晚期，国势更加衰弱。但信陵君窃符救赵，尤其是联合各诸侯国合纵抗秦，取得河外大捷，大大提高了魏的威望，本应乘胜恢复魏之强域，但安釐王昏聩无能，不但不借机复国，反而听信秦国之闲言挑拨，罢黜信陵君，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可贵机。

赵，地处中原之北方，方圆二千里，也是北方之强国。在赵武灵王时，倡导胡服骑射，革新政治，富国强兵，国势为之一。赵国北拒匈奴，南抗强秦，成为唯一可以与秦相抗衡之国。赵武灵王死后，赵屡被秦兵攻伐，对本国良将廉颇，李牧等不任用，竟听信谗言妄加诛黜，赵王的这种昏庸举动，使赵终于为秦所破。

燕，在春秋初期尚属极弱小之国，到燕昭王时，励精图治，疆域扩大，国力日强，曾北至辽东，西至上谷，南与齐、赵接壤。到燕王喜当政时期，非但不与近邻赵，齐修好，且常常发动混战，劳民伤财，国力损耗巨大，成为六国之中略胜于韩的弱小之国。

楚，自春秋至战国始终未失其南方大国之地位，领有疆域五千里，带甲百万，地大物博，粟支十年，为诸侯国中具有相当实力的大国，但自秦将白起攻陷楚都后，楚国势力大大减弱，国都被迫迁于陈地，以后又再迁于巨阳与寿春。都城多次被迫迁移，大大挫伤了楚图的民心士气。楚考烈王当政的前后，楚国实际上已徒具强楚之名，远远无法与秦相匹敌。

北方之各兄弟民族，主要包括匈奴、东胡、月氏。这些民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落后于中原地区，他们的国力和部落的文明进步发展速度也各不相同，常与中原诸侯国接触的则实力较大，发展较快。

但总的来说。它们趋向统一的进程大体与中原各民族相一致。到战国末期，北方各族以匈奴最为强大，常以数万、十数万骑兵与燕、赵等国作战。他们在作战中依靠骑射本领和强悍勇猛的作风，往往给对手以突然打击，使对手防不胜防。但赵国自李牧担任代北守将以后，匈奴屡被击败，被迫远走大汉以北。

南方和西南方各民族，包括巴、扬粤、百濮与群蛮。这些兄弟民族的发展也比较缓慢，部族力量远较中原与北方各民族弱小，他们往往被楚国所征伐。

秦，地处西陲，原为关中地区的一个戎狄小国，春秋时期较中原地区各诸侯国落后，春秋各国称霸中原盟会争雄时，秦被摈斥于外。但自秦孝公起励精图治，任用商鞅变法革新，废旧奴隶主贵族特权和世卿世禄制度，逐渐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政权。对内实行“奖军功，教耕战”，对外则连横而战诸侯马错又南并汉中，巴蜀，北灭义渠、陇西，巴蜀广大地区先后秦所有。后白起率军攻拔楚都郢，逼楚东迁于陈，又击溃赵魏军于华阳，歼灭赵军于长平，中原地区的大片河山几乎都在秦的控制之下。

秦自孝公至秦始皇即位起，共历时一百一十五年（公元361年至前246年），经历了六代君王。代代都是奋发有为之人，特别是秦始皇更是一位雄才大略之君。他重用客卿李斯。李斯根据六国日渐没落的形势，及时向秦始皇提出了并灭六国的建议“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足以灭诸而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以坚强无比的决心，开始了并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宏伟大业。

第二节 秦灭六国的基本战略与策略

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经过了详细策划，根据六国当时强弱态势和山川地理形势，决定先由北路对赵进攻。

赵国被攻灭后，再转向灭燕，继而攻灭韩、魏，最后再进攻齐、楚两国。秦国向六团进攻，占有很重要的地理优势，几条战略通道均在秦国的控制之下，这些重要的战略通道为：

成皋道路。这条通道由成皋到函谷关，中原各国每次合纵攻秦，战秦东出中原均多经由此线进军。秦灭六国的战争，首先控制了这条通道。

夏路要道。这条通道经伏牛山脉，南阳盆地隘口，向东南可达下蔡、居巢，楚都由陈迁往寿春后，这条重要通道即为秦军控制。

井陉、孟门通道。这条通道为通燕、赵、齐之要道，也渐为秦所据有。

秦占有了天时、地利、人和这诸多方面的优势地位之后，即开始了消灭六国的战争。

第三节 并韩灭赵战争

第一，借挑起燕赵战争之机第一次攻赵

秦灭赵战争起于秦始皇十一年（公元前236年），赵悼襄王九年，燕王喜十九年，迄于秦始皇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在发动攻赵之前，即依李斯、尉缭之谋，以间谍挑拨活动，挑起燕赵两国之间的战争，待燕赵战起，秦国即借口援燕抗赵，开始对赵进攻。秦军从西面、西北面，南面三路攻赵，但把进攻的重点指向赵国南部，以陷赵军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困境。

秦始皇十一年冬，燕赵两国正在酣战之际，秦派王翦率军进攻太行山之战略要地阏与，使这个早为秦国垂涎的战略要地一举被秦拔除，从而打开了从西面进攻邯郸的通道。

秦杨瑞和军进攻韩阳（阏与之北），也颗利攻克，这样邯郸的西北方向即失去了屏障。

秦桓龁军从南阳出发，攻占邺邑所属之安阳。至此，秦军已推进到邯郸之南，仅与赵都邯郸相隔一条漳水和少数城邑。各路秦军虽有三十万之众，但由于受到赵二十万大军的顽强抗击，在攻占了上述地区后，即被阻于现地，无法前进，秦国只得罢兵休战。

第二，襄军第二次对赵进攻

平阳之战。经过连续战争，秦始皇将原来由南北三支攻赵部队，编为一个独立作战单位。由桓龁统率之，始皇帝十三年（公元前234年）这个新编部队，再度向赵南部进攻。桓龁避开正面渡河，改由漳河下游渡河迂回赵扈辄军的侧背，攻击邯郸东南的平阳。两军于平阳发生战斗，赵军被击破，被斩首十万人，赵将扈辄阵亡。

宜安之战。赵军平阳挫折，赵王啟用北部边疆名将李牧为统帅。赵国北部驻扎的李牧边防军，曾歼灭匈奴入侵军十万之众，威震边疆，战斗力最强。李牧率军回赵，立即同秦桓龁军交战于宜安肥下地区，给秦军几乎一个全军覆灭的沉重打击（详情见第一册第六章宣安战役），只有统帅桓龁带领少数护卫突围逃走。赵国首都出现的危险状况，由于宜安大捷又趋稳定，这样赵国可以依然与秦继续作战。

第三，韩国先被秦灭亡

韩国领土属地在七国中为最小，而所处地位却最重要。它扼制秦由函谷关东进之道路，秦要并灭六国，必须首先灭韩，因而形成了秦韩两国间的连续战争，经过秦国的多次打击，韩的土地日渐缩小。韩统治阶级，感到独立支撑的局面难以继续维持，于是向秦表示愿为藩属，“纳地效玺”，并派韩非为代表，前往秦作屈服性朝聘。韩非到秦，使命完成后，遭到李斯的排斥被逮捕逼死，两年后秦又逼迫韩割出残存的南阳，秦即派内使腾为南阳假守。秦始皇十七年（公元前230年），韩王安九年，秦为彻底灭韩，派内史腾率兵再度对韩进攻，韩无力抵抗，内史腾指挥秦军攻克韩都，俘虏韩王安，把所得韩地改建为颍川郡。韩自和赵魏消灭智伯、三家分晋，建立韩国开始称侯，经过一百九十四年，到韩王安九年，国亡于秦，为当时六国最先被灭亡之国。

第四，秦对越第三次进攻

宜安战后的第二年，即秦始皇十五年（公元前232年），赵王迁四年，秦军又大举对赵进攻，进攻兵力的部署为：

南路军推进邺邑平阳，从南面威胁赵首都邯郸。

北路军推进太原，经太行山进攻番吾战略要地。

赵军统帅李枚面对南北两路秦军，决定先集中兵力，打击北面来犯的秦军，取胜后，再攻击南面的秦军。李枚指挥的赵军机动灵活，风驰电掣，先给进攻番吾秦军以沉重打击，跟踪追击，驱逐秦军退出赵境，立即回师南进，声势所及，锐不可当，漳河沿岸秦军闻讯，不战而走，上党等地秦军也纷纷撤退，不敢应战，秦军第三次大举进攻失败。赵军虽然在李牧统率指挥下，一再战胜，可是兵力损失后难以补充，单凭现有兵力无法对秦持久作战，必须立即寻求外援。而这时楚，魏业已削弱，燕、赵关系欠佳，只有联齐，争取齐国人力物力的支持，才能与秦相抗衡。秦也察觉赵的这种企图，立即派遣一批策士到齐进行游说活动，极力破坏了齐、赵的联合；孤立了赵。秦则不失良机，接着发动又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第五，秦第四次大举进攻赵国

秦始皇十七年（公元前230年），赵王迁六年，赵发生特大旱灾，秦就于次年（公元前229年）再度发动对赵大举进攻，进攻部署和路线为：

北地驻军由大将王翦指挥通过井陉进攻赵都北部。

河内驻军由大将杨端和指挥推进邺邑，向赵首都邯郸以南进攻。

秦军派出南北两路大军并抽调一些少数部族兵参加作战，赵军则在大将军李牧、副将司马尚指挥下，继续对秦军作战。秦军虽经苦战，但胜负未分，充分显示了赵军战斗力的顽强程度。秦王和他的谋臣认为秦两次伐赵均被李牧所阻，都深感在军事上无法取胜，遂改用反间计，不惜重金收买赵国内奸赵王宠臣郭开在赵王面前造谣，诬蔑李牧、司马尚企图谋反。赵王竟不加分析即轻率罢免了李牧、司马尚，改任赵葱、颜聚为赵军统帅将领，并错误地将名将李牧杀害。这种昏庸颠倒的措施，恰恰符合泰国的需要，赵王迁自毁赵军战斗力的行为，加快了赵国覆灭的步伐。

第六，秦终于灭亡赵国

赵王迁由于中了秦之反间计，罢去并杀害李牧，自毁了秦军的强劲对手，为秦灭赵铺平了道路。赵葱不是王翦的对手，很快被秦军击败，赵葱被杀，颜聚收拾残兵退回邯郸勒兵固守。内奸郭开被秦收买，甘心为秦效劳，多方劝赵王投降。赵公子嘉则坚决反对，主张战斗到底，率领宗族，宾客参加了首都邯郸的保卫战。但赵王丧失斗志，任由内奸郭开摆布，竟下令开城向秦军投降。公子嘉拒绝投降，于邯郸失守时带着亲友，亲兵奔往代郡，重建政权，继续战斗，秦军占领邯郸后，将赵王迁作为俘虏，安置于房陵。这位亡国之君，到达房陵，方感国破家亡之痛苦。虽常做诗唉叹，但已为时过晚了。

赵自赵无与韩魏消灭智伯、三家分晋，到赵籍称侯，六传至武灵王，再四传至赵迁被秦所灭。秦占赵地后，将赵地改建为邯郸、钜鹿两郡。赵嘉于代地自立政权虽又延续六年，终于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

前222年），代王嘉六年，被秦灭亡，共延续二百五十多年。

第四节 灭魏战争

赵被秦灭亡后，秦即想南下灭楚，但中间尚相隔一个魏国，魏此时虽然已只剩下国都大梁（开封）附近的一些城邑，但终属秦进军楚地之障碍，于是决定先灭魏，再伐楚。本来魏处于“天下之枢”，具有优越的战略形势，但由于战争频繁，大量削弱了魏的实力。多年来，在强秦的进攻下，节节败退，不断割地求和，秦始皇五年（公元前242年），酸枣、山阳等十个城邑被秦占领，次年秦又进占朝歌和魏属濮阳，再进占汲、垣、蒲、衍氏等地，魏国大河以北领土被吞食殆尽，当秦、赵战事紧张之际，魏已无力支援赵军作战。待秦军胜利结束秦赵战争，自然要把进攻矛头指向魏国。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魏王假三年，秦派兵进攻魏国首都大梁。秦战地统帅王贲认为大梁城垣坚固，很难在短期内攻拔，于是引大沟之水冲灌大梁城，经过三个月战争。城垣崩塌，秦军进城，魏王假出降，被王贲所杀。魏国灭亡，秦以其地建为东郡。

魏自魏斯与韩、赵三家分晋，进入战国七雄之列，共计立国二百二十年，七传至魏假，继赵、韩之后为秦所灭。

第五节 灭楚之战

第一，秦第一次攻楚

秦军灭赵国、破燕并魏后，紧接着大举进攻楚国，当时楚国仍为中国南方大国，拥有现今河南省西部及东南部，山东省南部，湖北湖南两省，襄河及洞庭湖以东和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全部。楚国此时尚有对秦作战所需要的实力。秦始皇认为年少壮勇的将军李信，曾以兵数千急追燕太子丹于衍水，并获得了胜利，是率兵攻楚的理想将领。于是便委以重任，并问李信说，如果派兵攻楚，需要多少兵马？李信答复说；“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又问王翦，王翦则说“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不同意王翦的意见，而同意李信的说法，当即说：“王老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王翦以言不见用，谢病告老，归还频阳。李信则受命为秦军统帅，与蒙恬率兵二十万对楚进攻。李信把兵力集中于颍川郡（现今许昌、襄城、舞阳、郾城地区），鉴于秦楚接界（河南省东南，安徽省东北部）广阔平原，无险可扼，认为这次作战的目的在于歼灭楚之野战部队。李信判断，当秦军向楚进攻时，楚军为抗御秦军之进攻，必将集中兵力于汝水两岸，即淮阳、商水、上蔡边界地区。进而决定采取两翼钳形攻势战略，包围歼灭楚军，于是决定了进攻的兵力部署：以部分军队由蒙恬指挥，沿汝河两旁前进，从正面进攻楚军。主力军由李信亲自指挥，从汝水以南，经过舞阳、平舆、新蔡、颍邑（安徽省颍上县）迂回楚军左侧翼，与蒙恬军会师，包围楚军，聚而歼之。

楚军统帅项燕，惯于在广阔平原作战，看出秦军的攻势动向，为着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机动打击敌人起见，采取如下兵力部署：

以少数部队，置于边界要点，监视敌人。

寝、平舆两地守军机动应战。

屈定指挥强有力之军集中于寿春和淮北地区，机动使用。

秦军排除楚国边境监视部队的抵抗，于汝河南北分向寝、平舆展开攻击，击破楚军，李信军占领了平舆，蒙恬军占领寝城。秦军未遇楚军重大抵抗，进占两城后，渡过洪河东进。

楚军统帅项燕以秦军转变进军方向，孤军深入，立即率楚军主力，兼程急进，追击秦军于棠溪，给秦军以沉重打击。李信战败，率军往城父方面撤退。楚军乘胜猛追，三昼夜战斗不息。秦军连日所筑营垒，都被楚军攻破，都尉一级将领七人阵亡，李信军损失惨重，多亏城父蒙恬军的掩护，李信得以突围逃回秦境，才免被俘。这是秦统一战争中宜安战后，又一次重大的挫折。

第二，秦军第二次攻楚

秦军第一次对楚进攻，遭受重大挫折。秦始皇虽然感到自己当初对统帅人选有误，但并未动摇灭楚之决心，仍然继续进行灭楚战争。李信失败后，秦军统帅一职只有重行起用王翦。而这位老将军原来因为对楚作战在使用兵力的多少问题上，被秦始皇斥为“老矣”、“何怯也”，而告老还乡。在这紧急时期，秦军不能没有卓越的统帅，秦始皇也只有移樽

就教，亲往王翦家乡频阳邀请王翦出任秦军统帅，秦始皇到频阳见了王翦说：

“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战败耻辱）。今闻荆兵（楚军）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心）弃寡人乎？”王翦谢说身体不好，难以从命。秦始皇则坚持请他出征，并问他有什么要求。

王翦进而说：“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应允。王翦于是接替李信，担任秦军统帅，率领六十万人对楚作战。秦始皇亲送王翦至京郊灞水之滨。王翦请求秦王多赐给他一些田宅。秦王答应了他的要求，王翦遂带兵东去。

王翦根据已往长期作战经验，知道楚军和赵军都具有坚强的战斗意志，是能战能守的军队。楚军新近击破李信指挥的秦军，锐气旺盛，斗志昂扬，对付这样的敌人，不仅没有胜利的把握，一旦行动不慎，还会影响整个战争前途。所以王翦军进入楚国之后，即令部队在商水、上蔡、平舆一带地区构筑坚垒，进行固守，并令部队不许出战，休整待命，相持数月没有大的交战。

楚军对秦军大举东进，也动员集中全部兵力应战。当时秦已灭三晋，无后顾之忧，有物力的大量支援，能够打持久战。楚则无论军事、政治都远为落后。统帅项燕没有看出秦军改变了战略，仍然集中楚军主力子寿春北之淮河北岸地区，等待秦军的进攻。楚王责怪项燕怯战，派人数度催他主动进攻秦军。项燕军只得向秦军进攻，但既攻不破秦军的营垒，秦军又拒不出战，项燕无奈，引军东去。王翦立即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命令全军追击楚军，楚军为涡河所阻，双方发生战斗，楚军被击破东逃。秦军追至蕲南，斩杀将领项燕，王翦率兵直取楚都寿春，楚国首都被秦军攻陷，楚王熊负刍被俘。

秦军进军蕲南，未遇重大战斗，平定楚属各地。王翦军略定江南楚地，也比较顺利，只经一年多的作战，号称南方赫赫之强国的楚，便冰消瓦解。秦军进占寿春后，把楚国改为楚郡，平定江南百越后，增建会稽郡。楚自周代建国以来，历经八百年，由春秋至战国均为我国南方之最大国。但从吴起变法失败起，政治经济的发展便落于强秦之后，至怀王熊槐被秦诱执，国势便更加一厥不振，又五传至熊负刍被秦所虏，时至秦始皇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楚王负刍五年，楚这个春秋以来的最大国，就被秦所灭。

第六节 灭燕战争

燕王太子丹曾为质于赵，与秦始皇幼年时，有友好交往。及秦始皇返秦就位主政，太子丹又为质于秦，始皇对之冷落，没有给予礼遇，丹愤恨之余，奔回燕国。太子丹在秦期间，看到秦对东方各国的进攻，三晋中只有赵国还有应战的力量，赵如果抵抗不住，秦军兵锋就会直指燕国，燕国则立即面临灭亡的危险。太子丹回到燕后，积极展开反秦保燕活动。其傅鞠武建议西约三晋，南联齐楚，北媾匈奴，以图秦的策略。被太子视为是缓不济急的迂阔之论。太子丹认为时间紧迫，不容拖延，要派遣刺客除掉秦始皇，否则就不能扭转整个局势。这种天真设想不只无济于事，而且导致秦军的加速进攻。

卫人荆轲好读书击剑，属于游侠刺客类人物。太子丹逻至为上宾，给以厚遇，并把燕国的生存命运，寄托于这位刺客身上，希望他能效法古时曹沫于盟会中劫持齐桓公的英雄行为，也劫持秦王，令他退还六国土地，罢兵回秦。于是就在秦军灭赵形势紧急之时，太子丹派荆轲往秦执行暗杀任务。荆轲则提出接近秦王的办法需要“督亢地图”和“樊于期头颅”。太子丹同意它的要求，逼樊自杀，由勇士秦舞扬陪同前往。

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荆轲到咸阳，向秦始皇亲信大臣蒙嘉说明来意。蒙嘉通报后，始皇大喜，举行盛大接见仪式。荆轲呈献地图，图献完毕即借机行刺，但秦始皇惊走，演出了“荆轲刺秦王”这幕武剧。荆轲赴秦时歌唱的“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诗句，表达了荆轲必死的决心。

当初秦军进占赵国，分别推进到燕赵接界，约在易水以南（现今河北省清苑县至任丘县之线），摆好进攻态势。这次燕国派遣荆轲往秦行刺，荆轲失败被杀，秦始皇在激怒之下对燕增兵，加速进攻。

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秦派将军王翦、辛胜率强有力部队对燕作战。统帅王翦以直接攻略燕国首都蓟城为作战目标。同时判断燕军必然依托燕赵大道经过的各河川作抵抗，尤其燕赵界上较大河流易水定有重兵守备，不宜将主力投入正面进攻。易水下游，河流深广，渡河不易，由易水上游山地迂回包围易水正面燕军，可出敌意外，容易成功。于是，王翦决定以部分兵力由中山（河北省定县）北进攻燕。燕军与代郡赵嘉部赵军，已组织了联合部队于易水北岸抗击秦军。燕军作战准备不充分，代郡新建赵军属于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王翦以秦军主力，迂回易水上游，包围易水燕代军右翼，双方在易水以西发生战斗，秦军击破燕军，赵军撤回代郡，燕军残部向蓟城退却。秦继续对燕进攻，击破燕军抵抗，进围燕都。燕统治阶级无固守首都决心，率部分精锐向辽东撤退，使秦军未经重大战斗，进占蓟城。王翦攻燕国首都后，立即派将军李信率军急追东退的燕军，追击到衍水击破燕太子丹率领的残部。此时逃到辽河流域的燕统治阶级，认为秦军攻燕，是完全由太子丹的谋刺阴谋引起，祸起于太子。赵嘉亦劝燕王杀太子丹，献首于秦以求和。于是燕王杀了太子丹，献首求和，但秦军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其军事进攻。

秦军追击燕残部到辽东，由于地方偏远，对全局关系不大，即把兵力转用于对楚作战。经过三年左右时间，秦对楚战争胜利结束，又转用兵力，由将军王贲指挥，进攻辽东。燕军无力应战，燕王喜被秦军俘虏。秦又立即转移兵力，攻击代郡，赵嘉率部虽力战，终于不免失败，悲愤自杀。

燕自召公就封，八传至庄公，受山戎侵掠，经齐桓公支援，击败戎狄，扩地五百里，开始强大。至战国时代，竟能列入“战国七雄”之林，共传四十三代，经过六七百年，到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燕王喜三十三年，被秦所灭。

第七节 灭齐战争

齐经过燕军进占，元气大为损耗，以至没有力量参与东方各国与秦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在秦军并灭赵、韩、燕、魏、楚战争时期之内，齐国一直置身度外，坐视各国灭亡。过去当秦赵长平之战的关键时刻，赵向齐请求援助军粮，有政治远见的周子曾向齐王说："且赵之与齐楚，捍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力主积极援赵。齐王竟没有接受这个有识高见，支援赵国。尔后各诸使国虽几度联合对秦作战，齐都避免参加，或者参战不力，企图讨好于秦。

齐王建继位四十余年，三晋、楚、燕与秦战争连绵不断，齐由于与秦没有共同边境线，未被攻击，上下宴然，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不备兵革，不修战备，政治上已达惊人的麻木程度。齐王建本人昏庸无能，齐相国后胜又是一个贪财无厌之徒，秦多年来用重金贿赂后胜，后胜就为秦远交近攻的策略效劳，终日规劝齐王建臣服于秦，朝野上下已无丝毫斗志。所以尽管秦灭六国时，齐还拥有七十余座城邑，但仍不堪一击。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王贲统帅的军队，由燕南部对齐北境突然进攻，直趋齐都临淄，齐则毫无作战准备，仓猝之间竟无应战之兵。齐相后胜，力劝齐王投降，齐王建也就不战而降，秦军则分兵进占齐属各郡邑。齐王建被送于共这个地方，饿死于松柏之间。这个贪图享受、丧失国家的亡国之君，得到应有的下场。

齐由共和元年齐武公起至齐王建，共延续六百多年，为六国最后被灭之国家。

第八节 秦灭六国后的军政建设

第一，政治建设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灭亡六国后，在中国历史上开创性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全国统一政权，自此把我国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黄河中下游、长江下游和珠江流域全部置于秦王朝的统辖之下，这种一统天下局面的出现，表面上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实质上则是反映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而导致的必然趋势。

秦王朝在政治建设上，除了按照丞相李斯等人的建议进一步完善各种法制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郡县制，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一整套专制的政治体制。朝廷设丞相，为负责全国行政的最高官职；设置太尉为全国最高的军事宫职，统管全国的军务；设御史大夫为监察方面的最高官职；设廷尉负责全国司法方面的工作；设太仆，管理宫廷车马方面的事务；设郎中令掌管宫廷警卫；设卫尉掌管皇宫保卫事宜。它最初将全国设立为三十六个郡，以后增加为四十多个郡。郡设有郡守、郡尉、监御史等等与中央相对应的官职。县则设置县令、县尉、县丞等官职。县以下设乡，乡设三老、啬夫、游徼，掌管教化、行政治安。乡以下有亭里与什、伍组织，是征粮征兵的基层单位。秦王朝实行郡县制最大的功劳是打破了自商、周以来的诸侯封国和贵族世袭制，使郡县直接受朝廷的管辖，这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对加强中央集权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秦始皇对反对郡县制坚持分裂割据的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那些“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以《诗》、《书》、百家语诋毁当前朝政，引古非今的儒生给予严厉镇压。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凡不属于秦国所记的史书及《诗》，《书》诸子书籍统统烧掉；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杀全族；焚书令下三十日不烧者，判处徒刑。焚书令的第二年，秦始皇发现有一部分方士和儒生诽谤他，乃下令追查，共逮捕了四百六十人，将他们全部坑杀于咸阳。这就是举世震惊的“焚书坑儒”事件，这一事件实质上反映了当时维护统一还是反对统一尖锐激烈的斗争。这种严酷的打击手段虽然难以彻底压制人们对朝政的议论，但对维护秦王朝当时的统一却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然，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也开创了我国古代社会文化专制主义的恶劣先例，它对我国古代文化知识的保存和传播起了极大的摧残作用。

第二，军事建设

秦王朝在统一六国后，仍把开拓疆域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势力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秦始皇为了巩固北部边疆，加强北方的防务，修筑了由咸阳直通九原的一千八百多里的大道，为大规模向北调兵作战提供了重要保障。秦为防备匈奴的入侵，将原来秦、赵，燕等国修筑的长城加以连接，成为西起临洮、东止辽东绵亘不断的长城。这条长城从古代战争的观点来看，起着一定的防护作用。

秦始皇为了宣扬他的武功借以镇服原六国的臣民，曾多次出巡，这也有助于加强秦王朝的威望。秦为了不使一些旧势力利用各地的险要地

势拥兵自重，割据反秦，专门破坏了这些险要之地，甚至把一些坚固的城廓也拆除了，修通了由都城咸阳至全国各地的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秦始皇强行把各地区的富豪十二万户迁往咸阳，部分迁往巴蜀，南阳等地，这就便原六国的豪强失去了反秦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大大减少了发生封建割据战争的军事政治因素，有利于强化秦王朝的统治，对维护整个社会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

统一六国战争评述

春秋战国之末，秦始皇以气吞山河之志，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并灭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五百五十多年的战乱局面，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这个大帝国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使中国古代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历史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偶然寓于必然之中。自古以来，史学界对于秦兼并六国，远非众口皆碑。赞誉之词有之；痛惜六国之亡也有之。秦之统一六国决不是天赐，六国的逐一灭亡也决非偶然。

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最初虽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但最后终于赢得了全国的支持。人心的向背决定着天下的兴亡，这是自古以来的真理。尽管孝公死后，商鞅即被旧奴隶主贵族处死。然而由于商鞅变法彻底，新法已深入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代表社会进步力量主流的新兴地主阶级衷心拥护变法图强，野蛮的旧奴隶主制渐被废除，奴隶越来越多地被解除身上的桎梏，平民可以论功行赏，可以自由开垦土地，民富国强冠于六国之首，因而，秦民愿为秦国效忠作战。

秦自孝公之后，连续六世不断开拓，秦已经占有地利的战略优势。秦由一个西戎小国开拓为一个头等强国，实非一日之功，经过六世王朝的奋战才登上了七雄之首的宝座。秦孝公时，命商鞅伐魏，夺取了魏河西地区，随后再夺占楚国之武关，将整个关中之地据为秦有，秦惠文王时，以张仪为相，不动刀兵，游说诸侯割地事秦，同时命司马错北灭义渠，南夺汉中巴蜀，使秦国的疆域大增。昭王时期，白起统兵先后破诸国联军于伊阙、华阳，攻占楚首都郢。长平大战前后，又占领魏、赵大片领土。至秦始皇即位之初，秦的疆域东达三川郡，（今河南莱阳、登封、密县），南至黔中郡（今湖南西部），北至上郡（今陕西榆林），中原地区之大部和南中国的西、中部地区已完全为秦所有。这时各诸侯国与秦相比已显得十分弱小，有的尚不及秦国的一郡之地。秦占有的这种地理上优越的战略形势，成为其并灭六国最雄厚的物质基础。

秦谋臣良将林立，运筹帷幄和统兵征战以及战略策略协调运用均珠联璧合，占尽了主观指导上的优势。秦几世以来都汇集了大批将相英才，这些人物多是客卿于秦，然而却忠心事秦，对秦统一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商鞅变法为秦的强盛打下基础，张仪范雎的“连横事秦”，范雎的“远交近攻”战略和策略，成了秦并灭六国的基本国策。司马错、魏冉、白起等的将相才能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运用。到秦始皇时期，周围更是人才济济。相国吕不韦在秦始皇幼年即位时，就辅佐秦始皇当政，军事政治决策皆出于吕不韦。相国李斯既长于以法治国，也长于谋划战争。战将王翦在秦统一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在秦军被楚军打败的危急时刻，一举战胜楚将项燕，攻克楚都，将楚灭亡。秦朝这

些精英将才对秦统一战争的胜利所做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任何战争的胜利，都离不开统帅对战争的正确决策和对战争全局高瞻远瞩的筹划，秦始皇正是在这些方面具备了远见卓识的决断能力，这也是秦能并灭六国的重要因素，秦始皇既是我国古代罕见的一世雄主，也是当时其它六国国君望尘莫及的明君。当相国李斯根据当时总的形势，向秦始皇提出并灭六国的建议时，秦始皇即当机立断加以采纳，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展开灭亡六国的战争。当战争进行到关键性的时刻，秦始皇亲临前线视察，督导战争的进展。秦始皇吸取前人分封王侯的教训，每攻占一个诸侯国的地区，就改立为郡；秦军灭楚把楚地改为楚郡和会稽郡；夺占魏一些地区后，改立为东郡等等，这对巩固秦统一战争成果起了重要作用。总之，秦之取得并灭六国战争的胜利有着秦始皇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

说到底，任何战争的胜利起主导作用的自然是人民群众，秦之统一六国作战的胜利当然也是如此。假如没有人民群众自觉地为统一大业而奋战，秦始皇是根本无法完成统一华夏的历史使命的。可惜当时的秦始皇受历史的局限看不到这一点，他对人民的暴虐和杀戮，使秦在胜利的土壤之中埋下了迅速覆亡的种子。

第三部分 秦统一后的对外战争

秦统一后的对外战争主要为：

驱逐匈奴战役：发生于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王朝获得了战争的胜利，北逐匈奴七百里。

征南越战役：发生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战争结果，秦军统一了中国东南和西南地区。

第一节 驱逐匈奴战役

第一，秦北部边疆与匈奴之形势

秦统一六国，据有了燕、赵北部地区的全部疆域，这样秦、燕、赵北部就连为一体并与东胡和匈奴接壤。在秦统一六国作战时，无力北顾，燕、赵两国也倾全力与秦交战，对北方的防御力量大为减弱，匈奴此时即乘虚南下，其兵锋已达阴山、九原、云中。秦之上郡、陇西等地边境也常遭匈奴袭掠，严重威胁关中和都城咸阳的安全。秦既已灭亡六国，对北部边疆的安全自然引起了充分的重视。

生活于中国北方与秦王朝接壤的少数民族，至秦统一六国前后，已逐渐融合为东胡、匈奴。月氏三大民族，并以匈奴最为强大。匈奴部族主要居住于蒙古高原地区。匈奴单于头曼为一世之雄主，他雄心勃勃，常以武力征服周围弱小部族，多年来，与赵、燕、秦交兵于三国北部长城内外，成为三国之大患。它已占有了现今之辽宁西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宁夏等一带地区。匈奴已将东胡部族全部逐赶于燕山以东，将月氏部族逐赶至祁连山以西地区，并进占河套水草丰茂地区，人强马壮，经济繁荣，且男女老少长于乘骑，勇猛凶悍，具有相当强的野战机动作战能力，成为北方各国最难对付的敌手。

第二，秦对匈奴作战之策划

秦在统一六国之前，秦，赵，燕三国北部地区长期受到匈奴等部族的袭掠，边境地区烽火连绵不断，人民生命财产经常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之中。当时除原赵将李牧防守代郡期间堪与匹敌之外，各国既无征战匈奴的精兵勇将，也无对匈奴作战的长期有效的战略，多以筑长城单纯防御为主，战略上始终处于消极被动的局面。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为消除来自匈奴的侵袭，寻求对匈奴作战的策略，于公元前二一五年就亲自沿边境地带巡视，对秦皇岛、右北平郡（今河北省东北部），渔阳郡（今河北省北部地区）。上谷郡（今河北省西北部）、代郡（今山西省东部）、雁门郡（今山西省西北部）、上郡（今陕西省北部）等等地区的情况做了实地察看，进而确定了对匈奴作战的战略：（一）从内地移民充实边境地区，开发边境地区的经济，以增加战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二）修筑从内地通往边境的道路，为调兵运粮提供可靠的保障；（三）连接秦、赵、燕之长城，使之成为绵亘不断的防护屏障；（四）加紧战争准备，收复失地，彻底战胜匈奴，永保边疆巩固。

秦军按以上战争策划，在完成战争准备的基础上，确定了以下具体作战计划：先将侵占陇西河套之匈奴赶到贺兰山脉与狼山山脉以西，将侵占赵边境地区之匈奴驱赶至赵筑长城以北，秦以大部兵力进击河套北部，以一部兵力由北地郡（今甘肃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相连地区），进击河套南部，收复河套地区后，主力由河套北部地区渡过黄河，向高阙（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北）、狼山山脉进军，一部兵力由河套西南地区渡河，向贺兰山方向进军。

第三，北征匈奴的作战经过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命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

大军开始了对匈奴的作战。蒙恬自率主力，经过现在的陕西榆林向河套北部地区进发，一部兵力出萧蒹关直趋河套南部地区，秦军由于进攻突然，来势迅猛，加之匈奴在河套地区兵力有限，匈奴难以形成有组织的抵抗，秦军遂将河套地区的匈奴部落扫除，顺利进占河套地区，黄河南岸尽为秦收复，泰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春，秦军主力由五原渡过黄河后，迅速进至狼山山脉。一部兵力渡河后攻占贺兰山地区。秦军兵威势猛，匈奴在秦军的打击下，深为恐惧，向北方逃走。至此，秦、赵原边境地区全部被秦收复。秦驱逐匈奴之战胜利结束。

第四，驱逐匈奴的战后措施

蒙恬收复原被匈奴所占地区后，设立九原郡，郡治在今内蒙古之五原县。该郡共辖四十四个县。为巩固盾方领土，秦始皇命蒙恬率军加修由高阙沿阴山山脉至云中原赵国之长城，并新修由高阙沿狼山至榆中之长城，同时责令云中、代、上谷、渔阳、右北平等郡组织人力加修与连接燕赵原长城，经过多年修筑，长城逐渐连接成秦北方一道绵延巍峨的防御屏障。

秦始皇为镇服匈奴，命蒙恬军长期驻守于塞外，并命自己的长子扶苏做蒙恬的监军。匈奴由于惧怕蒙恬军，自此战之后，一直不敢侵犯秦之边境，但蒙恬死后，匈奴又卷土重来。

第二节 征南越战役

第一，南越地区的形势

在秦统一六国之后，中国的西南部、东、南部广大地区还没有统一起来。秦代所指的南越地区即今福建，浙江东南部，广东和广西的一部分地区。这个地区气侯温和，雨水充沛，森林茂密，十分富饶，但为山川所阻隔，南越与群蛮部族仍过着相当原始的生活，社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

居于中国境内的越人主要分布于华南和华东的广大地区，具体分为西瓯、东瓯、南越、闽越等几个部分。西瓯约在今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南越遍布于今广东南部、北部与西部地区；东瓯、闽越散居于今浙江、福建一带。西瓯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南越和闽越主要从事渔猎和农业。越人“断发文身”，文化知识落后，各部互不统属，甚至经常自相残杀，作战虽勇敢，但缺乏大部队的整体协同观念，更没有相应的战略头脑，无论政治、军事、经济等等方面均明显地劣于秦军。

南越居住的地区，高山大川纵横交织，沼泽密布，陆路交通极为不便，一些城邑之间虽有山路相通，但也多蜿蜒于丛山峻岭之间，对大部队的进军造成极为不利的障碍。相比之下，水路交通尚比较便利。东面有鄱阳湖五水（现赣江、修木、抚河、信江、鄱江），西面有洞庭湖四水（现湘江，资江、沅江、澧水），有的可以通达南越、闽越、西瓯部族居住的一些地区，为水路进军的重要通道。

秦国此时正值并灭六国之后，国富兵强，军威鼎盛，秦始皇想乘胜南征，统一中国东南与西南的广大地区，以完成全国统一大业。

第二，征南越战役作战策划

秦军统一南越之战，系在广大地域对付分散之众多部族作战，无法集中力量于一地作战略决战，因而采取多路分兵进击的作战行动，如遇重大抵抗再合兵共击。

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述，秦军征南越计划分五路大军作战：一军塞坛城（今湖南靖县西南）之岭，一军守九嶷（今湖南江华）之塞，一军处番禺（今广州）之都，一军守南野（今江西南康县南）之界，一军驻余干（今江西余干）之水。这样各路大军即可适时向前推进，分别进入闽地、粤地、广州、桂林等地。既分路行动，也相约合击，确保作战胜利。

第三，征南越作战经过

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起，秦始垦派尉屠睢率五十万大军按照以上的作战策划，进入与南越、闽越等接界之地区，“三年不解甲弛弩”。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五路大军开始按预定计划行动。

秦军统帅尉屠睢亲自率领第三路军，从长沙宜章南下，发展顺利，击溃越族许多部落，西瓯君吁宋战死，但越人仍顽强抗御秦军，并利用丛山密林与秦军周旋。当尉屠睢军进至乐昌曲江地区时，遭到越族军夜间偷袭，屠睢战死。幸尉任嚣所率之第二军由南岭出至越族军背后，把

越军击溃，将两路兵合在一起，乘胜前进，占领番禺一带地区，直达南海之滨，征服了西瓯，秦遂将所占西瓯及其周围地区建立为南海郡。

秦之另一路军于出兵当年顺利送至闽中地区，击破了闽越人的抵抗，将所占地区建立为闽中郡。

秦第五路与第四路军，分别由坛城、零陵分进台击，占领了桂林用围广大地区，进而占据了红河流域地区，建立了桂林郡和象郡。

秦王朝为了支持对南越西瓯的战争，还组织人力开凿灵渠，以沟通湘江与桂江支流漓江，这对支援当时的战争和南方以后的开发事业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第四，征南越的战后措施

秦统一中国东南、西南广大地区后，除了设置闽中郡（郡治在今福州市）、南海郡（郡治在今广州市）、桂林郡（郡治在今桂林市）和象郡（郡治在今同正县）外，还安置了从内地迁移的几十万谪民、贾人、赘婿等，以开发这些地区的经济，繁衍生息，增殖人口，这对四郡地区的发展进步起了重要的作用。

尉任嚣经略南海地区后，南海地区的经济逐渐发展，至陈胜吴广起义后，即减少了与秦往来，固境自保，拥兵自重。任嚣死后，其部下赵佗继任经略南海，秦亡后赵佗并灭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秦对外战争评述

秦始皇乘并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兵威，北除匈奴，南并南越，实为具有宏大战略眼光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奠定我国古代疆域的里程碑之战。秦始皇这一伟大历史功勋将永垂中华民族之发展史册。

秦始皇南征南越之战，出动五十万大军一举奏效，没有为中华民族求统一、求发展的坚定信念和雄才大略，实难下此决心。显然，五十万北方士卒农民进入南方，气候的不适，疾病的流行，难免造成一定数量的伤残死亡。但这与秦始皇在此战略行动中为中国统一的丰功伟绩相比，实在不能相提并论。后世一些历史资料中，就此次战争加于秦始皇的指责与怨恨之词，只能是本末颠倒的历史偏见。

秦始皇北修长城，也成为历代一些持管窥之见者唾骂的事件。秦始皇将秦、赵、燕三国原长城联为一体，同样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中国中原地区自古就受到来自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袭扰，有了万里长城的阻隔，千百年来，使长城内外各兄弟民族之间少动了许多干戈，因而有效地保障了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与修筑长城所耗费的人力物力相比，自然后者也是微不足道的。至于对秦代苛政的愤恨，而迁怒于修筑长城之事，就更加偏离公正的历史结论了。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无论是秦代的对外战争，还是修筑万里长城的壮举，都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秦王朝只是这种力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凝聚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万里长城已经流芳百代，驰名世界，同样，对秦代统一我国万里南疆的伟大业绩，也应当给予不亚于万里长城的历史评价，永垂史册。

第四部分 秦末农民起义战争

第一节 秦代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

秦在统一六国的进程中以及建立统一政权后，均进行了大规模的长期战争，同时还展开了宏大的土木建设，这些都耗费了社会的大量财富。秦为了调动人力物力进行战争和建设，对人民横征暴佥欠，并强迫从役。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秦征发“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秦始皇为自己修建多处宫殿，仅阿房宫和骊山自己的陵墓就动用一百四十万劳力，这在当时总共不足二千万人口的社会里，可想而知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大批劳动力被征发，使土地无人耕种，整个社会的财富供养不了兵役劳役大军和庞大的官僚阶层，这就造成了“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极端危机局面。加之，秦始皇又用法律形式保障新兴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合法”地剥夺农民的土地财富，农民在地主的盘剥与暴吏的酷刑双重压迫下，过着“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的悲惨生活，纷纷破产，以至沦为无地游民，弃乡外逃，“聚众为盗”，整个社会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

秦代末期不但社会经济岌岌可危，政治也孕育着难以避免的动乱。秦统一六国后，并没有将六国的反动贵族残余势力全部清除，虽然将原六国贵族富家十二万人强迁至咸阳地区，但并未从政治思想上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他们对新生政权的敌对情绪。在这些人中存在着相当强大的潜在的反秦势力，他们有的结成死党，狼狈为奸，“欲复其宗”。楚怀王孙熊心逃匿民间，为人牧羊，楚将项燕之子项梁带着侄儿项籍逃匿于吴郡；魏公子魏咎和陈名士张耳、陈余都隐于民间；齐旧王族田假、田儋、田荣等潜伏于齐地，进行反秦活动；五世为韩相的张开地、张平后裔张良也是反秦的活举人物，曾派力士于博浪沙伏击秦始皇；赵国贵族阴谋分子赵高则骗取信任，混入秦宫廷，当上秦太子胡亥之师，成为埋于秦廷的定时炸弹。这些都对秦政权构成相当的危害。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嬴政最后一次出巡时，经武关、云梦、上会稽山、沿海北上，行至沙丘（今河北省平乡县）病死。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合谋，假造诏书，赐秦始皇聪明英武的长子扶苏和将军蒙恬自杀，立秦始皇少子胡亥为帝，赵高举纵胡亥，把不合自己心意的许多大臣、宗室、以及秦始皇的其它子女统统处死，被杀害的无辜人民则更无法统计。赵高揽权于一身，阶级矛盾和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激烈。

公元前二一○年，二世皇帝胡亥即位，这个昏庸无道只知压迫人民的暴君，完全听命于赵高。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史记•李斯列传》）。他继秦始皇之后，继续加紧修建阿房宫，无止境地强征劳役，百姓已穷困到无法生活的吔步，官逼民反，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巳成揭竿而起之势。

第二节 大泽乡农民起义

秦二世胡亥元年（公元前209年），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人陈胜，字涉。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吴广，字叔。奉命与戍卒九百人发往渔阳（今北京密云）、因大雨延误了到达的限期，按照秦朝的法律，误期将被处死。陈胜、吴广秘密商议，误期、逃跑都要被斩，不如起来公开反秦干它一番。他们认为考百姓对秦政权早已恨透了，只要有人带头反秦，百姓一定会跟着起来干。于是，就于大泽乡发动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陈胜、吴广是管辖五人的戍卒屯长（《商君书•境内篇》）。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便于动员大家起义，在起义之前他们详细商定了借助传奇迷信，采用“鱼帛丹书”、“篝火狐鸣”、的方法，使众人敬服他们的决定。戍卒买鱼，在鱼腹中发现一块陈胜等人串先塞进去的写有“陈胜王”的帛，使大家为之惊异。晚间，戍卒们又听到从驻地旁树林神祠中狐狸拟人的鸣叫声：“大楚兴、陈胜王”，大家更为惊奇。这样，陈胜就成了众人敬畏的人物。于是，他们亲自杀掉了带队的军官，立即号召大家起义。陈胜、吴广对大家说，你们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即令不斩，十之六七也要死的。“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家表示敬服。陈胜、吴广遂借用已死之奈公子扶苏和楚名将项燕的名义，竖起了起义大旗。附近的百姓纷纷响应，斩木揭竿而起。众人拥立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开始了起义战争。

第三节 陈胜吴广起义军的胜利进军

陈胜、吴广所率之起义军，由于沿途得到众多百姓的响应，力量越来越大，进展十分顺利。

攻占陈邑。起义军首先占领了大泽乡，继而攻占了蕲（今安徽省宿州南）。接着起义军一部向东发展，陈胜、吴广率主力则向西推进，连克今河南东部。安徽北部之铚、酂、苦、柘，谯各县。这时已是拥有战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步卒数万人的起义大军了。陈邑即春秋时代之陈国，后为楚所灭，战国时期为楚国都城，人口众多，城池坚固，但却远不是起义军的对手。陈胜军顺利攻占陈邑城，杀死守丞，并在此地建立政权，名号“张楚”。

陈胜既建国，欲自立称王，原魏国县令张耳与陈余劝说陈胜立六国之后为王。陈胜不听，遂自立为陈王。起义军建国，更增大了号召力，许多县邑的百姓纷纷起义，杀死官吏，加入陈胜起义军的行列。据《史记•陈涉世家》记载：“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陈胜、吴广见自己力量日渐强大，遂决定分路向西攻秦。

进攻荥阳。农民起义军的西征大军由假王吴广为统帅，指挥田臧、李归等部执行此项战略重任。荥阳巩县一带为中原地区的战略要地，是向西进攻秦腹地必经的重要城邑。它周围被高山沟谷环绕，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吴广率领大军攻取荥阳，该地为当时三川郡郡治所在地，且有郡守李由（李斯之子）率重兵防守，数度强攻，未能得手，吴广顿兵坚城。当时，邓说军进占了郏县。伍徐军进占了许昌。

进攻函谷关。函谷关为西向攻秦的关隘，形势极为险要。陈胜任命陈之贤士周文为将军，率兵攻函谷关，以便由此向秦之腹地和秦之后方实行战略奇袭。周文过去曾在春申君和项燕军内为官，懂得一些军事知识。周文经过荥阳，不在荥阳参加围攻作战，而径直率军西进，进展顺利，沿途吸收许多起义队伍，发展到车乘千余，卒数十万人，攻入函谷（河南灵宝西南），进至关中戏地（今陕西临潼），兵锋直逼咸阳，震撼了秦朝上下。

徇略旧赵地。陈胜命陈人武臣为将军，以张耳、陈余为校尉，率军于白马津（现河南省滑县）北渡黄河，徇略赵地。武臣军进入赵地后，发展也比较顺利，许多县邑起义响应，兵力很快扩展到数万人。尔后接受范阳人蒯彻的建议，施展招降策略，得城邑更多。武臣占领了原赵都城邯郸后，受张耳、陈余的挑唆和鼓动，自立为赵王，张耳，陈余也分别当了右丞相和大将军。陈胜无奈，只好承认，但却立即命武臣急速西进攻秦，援助周文之军。此时张耳，陈余又挑动武臣不要攻秦，应自行开辟地盘，扩大势力，以备将来与张楚和秦朝抗衡，武臣遂派李良率兵攻占恒山之地（今河北省西部地区），张魇攻取上党地区（今山西长治一带地区），韩广进略旧燕地。韩广在燕地得手后，遂自立为燕王。

徇略旧魏、齐地区。陈胜命周市为将军，率军攻取旧魏国、齐国地区。周市攻占魏一些地区后，即立魏旧贵族魏咎为魏王，白为丞相。周市军在齐地遭遇齐旧贵族田儋的抵抗，进展不大。

第四节 项梁项羽刘邦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胜利，很快震动了全国，一时之间各地的反秦力量纷起，旧六国贵族的后裔、秦朝的下级官吏也借机起义，收编农民起义军，投向陈胜、吴广反秦起义的洪流。

项羽领导的农民军。项羽，名籍，是原楚将项燕之孙。楚被秦灭亡之后，随其叔父项梁逃到吴中（今江苏省吴县），从小身高力大，豪气横溢，勇力超群，曾跟项梁学习兵法。在秦始皇东游时，项羽观看秦始皇出巡的威严盛大场面时说："彼可取而代之！"各地反秦起义爆发后，会稽郡（今江苏吴县为郡治所）守殷通欲响应陈胜、吴广起兵反秦，项梁与项羽想自己起兵，于是密谋斩杀殷通。项羽先斩杀殷通，接着又击杀殷通手下数十人，众人皆知畏服。项梁等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月，在吴中宣告起义反秦。项梁自为会稽郡守，项羽为裨将，收编吴中兵卒八千人，他们联合附近的起义军，势力很快壮大起来。

刘邦领导的农民军。刘邦，字季。江苏沛县人。贪酒色，好交友。初为秦泗上亭长。刘邦曾到秦京都咸阳看到秦始皇出宫时的盛大仪仗场面，无限感叹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也！"这表露了刘邦心怀大志的气质。一次刘邦在押送劳役途中，因酒醉而致多人逃跑，自知必获死罪，于是把全部劳役放掉。其中有十几个人不愿逃走，便跟随刘邦逃入山野，慢慢聚集了一百多人。秦二世元年，沛县令欲起兵反秦，想召刘邦入沛。后见刘邦人多势众，又有些惧怕，拒绝刘邦入城。刘邦在县吏萧何、曹参的帮助下，杀了沛县令，接着收编沛子弟三千人，很快向周围扩展，力量日益壮大。

第五节 各路反秦军与秦军作战经过

第一，陈胜吴广起义军被秦军击破

陈胜、吴广起义军之周文军攻克函谷，进展顺利，及至逼近咸阳，秦二世闻奏大惊。秦少府章邯自请骊山之役夫编成军队与在首都的现有秦军合在一起，紧急迎击周文军。这些役夫刑徒对秦抱有幻想，参加秦军东征，作战胜利，就有免除刑役，回归故里的希望，因而有一定的作战积极性。双方交战于临潼附近，周文军虽经过一段时期的作战，但终究未经正规训练和大战的锻炼，经不起章邯军之攻击，被秦军击败，退出函谷关，再退至曹阳（今河南灵宝县）。章邯军再追，周文军又退至渑池，经决战，终至失败，周文自刎，起义军溃散。

吴广所率之军，围攻荥阳，经过几个月战斗没有攻下。秦军于渑池击溃周文之军后，已距荥阳不远，形势日渐危急。吴广部将田臧等合谋杀害了吴广，并向陈王报告。田臧被赐为楚令尹上将军，统领荥阳之兵，立即决定留部分兵力由李归等指挥继续围攻荥阳，亲自率领主力西进迎击章邯军，双方战于敖仓（今河南省荥阳县汜水镇），田军战败兵溃，田臧战死。

章邯军乘胜东进，于荥阳城郊击败李归军，李归等将领战死，章邯夺取荥阳附近地区后，即派军进攻郏邑（今河南省郏县），顺利攻克该地。章邯派出的另一支部队，直攻许邑（今河南许昌），陈胜部将邓说，伍徐战败，退走陈邑。陈胜责令斩杀了邓说。

秦军章邯歼灭了周文军、田臧军，又战胜了荥阳外围之吴广军余部，遂挥师向张楚都城陈邑进击。途中张楚上柱国蔡赐率军截击秦军，被秦军击败，蔡赐牺牲。当秦军逼近陈邑，陈胜亲自与将军张贺于城西迎战秦军，又为秦军击败，张贺战死。陈胜率少数人退走，当辗转到下城父（今安徽亳县）时，陈胜被御者庄贾所杀。陈胜部将吕臣，听说陈胜被杀，率领苍头军由新阳（今河南汝阳县），回救陈邑，一举收复陈邑，杀了庄贾。陈胜、吴广领导的在其它地区的起义军不是战败，就是降秦。至此，历经半年多声势浩大的陈胜、吴广起义，终于被秦军残酷地镇压下去。

第二，项梁项羽军和刘邦军之作战

项梁项羽军。陈胜部将召平奉命攻打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得知陈胜兵败，形势危急，渡江见项梁，假借陈胜王命令任项梁为楚图上柱国，并令项梁军渡江向西抗击秦军。秦二世二年三月，项梁项羽带领八千江东子弟兵渡江西进。

途中遇到陈婴率军两万，吕臣、英布、蒲将军等部率兵数万前来相会，这时各路起义军合在一起，共约七万之众。项梁项羽军到达薛邑后，听到陈胜牺牲的消息，即与众将商议对策。范增建议应立原楚国之后为王，以便更有号召力。项梁、项羽等同意，于是立楚怀王之孙心为新的楚怀王。定都于盱眙（今江苏盱眙县），项梁称为武信君，掌握军政人权，陈婴为上柱国。

陈人泰嘉，在陈胜起义初期，曾率朱鸡石、郑布、丁疾等起义响

应。陈胜为王后，曾使武平君畔监秦嘉军，秦嘉不但不接受，反而将武平君杀害，并自立为大司马。当秦嘉得知陈王失败的消息后，即立楚旧贵族景驹为王。项梁项羽率军渡江西进，秦嘉深怕项梁打击他的势力，而把自己的军队移到彭城以东，以对付项梁军。项梁认为如不击破秦嘉军，将无法对秦军作战。于是，派军向嘉军进击，秦嘉军战败，退走胡陵（今江苏沛县北五十里），项梁挥军追及，将秦嘉处死，景驹在逃往魏地途中也被项梁军所杀。项梁灭了秦嘉军，势力更加强大。经这次战斗后，成了各路起义军的统帅。

刘邦军。秦二世二年十月，也即二世二年初，秦军泗水郡监平率兵围攻刘邦据守的丰邑（今江苏丰县），被刘邦击败，退去薛地（今山东滕县）。刘邦以雍齿守卫丰邑，自率兵直攻薛地，泗水郡守又战败，被刘邦军追及杀死。不久，魏相周市率兵进到丰邑，劝降雍齿，雍齿遂背叛刘邦，投降周市。刘邦得悉后，即率兵进攻丰邑，没有奏效，刘邦只得退回沛地。二世二年三月，项梁项羽兵至薛地时，刘邦率兵投奔项梁，项梁调给刘邦五千人，刘邦率领人马再次进攻丰邑，顺利攻克。

第三，临济之战周市军的战败

周市本为陈胜、吴广部将，被派往原魏、齐等地扩展起义军的势力。周市想自立一块地盘，拥兵自重，就立魏公子咎为魏王，自为丞相。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六月，秦将章邯率兵进攻魏地，双方交战于临济，魏军支持不住，魏军退守临济城。魏王咎命周市向楚齐军求救，楚项佗及齐王田儋率楚、齐兵救魏。章邯军乘楚齐军远道而来疲劳之际，利用黑夜奇袭两军，两军大败。周市被俘，齐王田儋被杀死。魏军投降秦军，魏王咎自焚。

田儋弟田荣收拾残余部队向东阿（现今山东省境内）败退，秦军追至东阿，将田荣军包围。齐国内部，因田儋战死，共立前齐王建之弟田假为王，田角为相，田间为将。但田假并不支援田荣，而是拥兵自保，秦军加紧围攻东阿，田荣军危急。项梁军闻讯，立即率兵前去救援，击败章邯军，秦军向西退走。田荣即率兵返齐，以驱除田假。

第四，雍邱之战

项梁击破秦军于东阿后，即率兵转攻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虽经战斗，但未攻克。章邯军此时则在濮阳（今河南濮阳市）补充休整，实力已得到恢复，项梁数度派人联络齐赵两国出兵，联合对秦。这时田光已在齐赶走了田假，立田儋之子田市为王，自立为国相，拒绝出兵。项梁无奈，只得先派出项羽、刘邦向西南攻取魏属战略要地雍邱（今河南省杞县），一举攻克，斩杀了秦三川郡守李由。雍邱之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起义军的斗志。

第五，襄楚定陶之战

项梁军经东阿、雍邱战后，项梁即命项羽刘邦追击章邯军。先战于城阳（今河南范县境），秦军继续败退，再与秦军战于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市境），章邯军固守该城，因未攻下，便向西攻击其余秦军占领的地区。

项梁见项羽刘邦军节节胜利，遂自东阿率兵直趋定陶，准备攻打该城。此时，项梁滋长了骄傲情绪，认为秦军没有战斗力。不是他的敌手。将军宋义建议项梁，要防止因连续胜利而骄傲，秦军还强，必须慎

重对待。但项梁不听，军心斗志开始松懈，大军散驻于定陶城外。富有作战经验的章邯集中了自己的主力，并经过整顿补充，战斗力又重新得到加强。当章邯摸清了项梁军心懈怠、疏于戒备的情况后，经过周密策划，利用夜暗突袭项梁军，项梁军大败，项梁战死。这使唯一没有失败的最后一支力量最强的反秦起义军，几乎毁于定陶一役。

项羽刘邦得知项梁兵败战死后，心中惊恐，从陈留地区撤兵，向东退去。楚怀王居于彭城，项羽军驻彭城之西，吕臣军驻于彭城之东，刘邦军驻于砀，楚军暂取守势，整顿军队，待机而动。

秦末农民起义战争评述

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战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这次起义战争，公开提出“伐无道，诛暴秦”的政治号召，对彻底推翻秦王朝起了巨大的动员作用。

秦代末年，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已使社会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均达到无以复加的尖锐程度。陈胜、吴广代表着被残酷压迫的农民群众，揭竿而起。他们在起义中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思想，是对自古以来唯心主义天命观的大胆的否定与批判，这对后世历代农民起义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失败，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时代的必然。

所谓时代的悲剧，就是戍卒出身的贫苦农民陈胜、吴广代表着广大农民百姓反抗秦朝残酷压迫的基本愿望，反映着当时社会的发展灭除暴秦统治的时代需要。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使这次农民起义的正义战争，却以失败的结局而告终，这不能不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所谓也是时代的必然，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小生产者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注定这样性质的革命必然失败，同时陈胜、吴广还有许多主观和客观上的致命因素也注定着起义必然定向失败。而主观与客观相较，陈胜。吴广主观上的原因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陈胜、吴广的失败，主观上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尽管历代史学者也仿过一些分析，但似乎尚未见到十分精辟的见解，用社会科学的观点来看，陈胜、吴广失败的主观因素最要害的问题，当是这个起义领导集团、特别是做为核心决策人物的陈胜、吴广的政治素质问题。他们本身都属于贫苦农民，既没有一般的阶级斗争、政权建设、招募人才的知识，更缺乏统帅军队、运筹帷幄、领兵打仗的基本战略和策略头脑，只靠一呼而起，顺其自然，这样，无论如何是难以逃脱失败命运。

至于军事上失败的直接原因则更是显而易见的，其一，陈胜、吴广起义军没有具体的战略计划。这就使起义军失去了明确的战略目标而奋斗。其二，力量分散，四面出击。这是陈胜、吴广在力量使用上最大的失策。假如当时他们能够将吴广、田臧、李归、邓说、伍徐、蔡赐等诸军合兵一处，或者兵分两路协同攻击，则定会大大增强起义军的实力和声威，如果陈胜、吴广亲率全部谋臣。战将和数十万大军兵临咸阳城下，秦廷决难很快反击成功。其三，起义军队伍里混进了过多的旧六国的贵族后裔。这些人起兵反秦并非在于彻底击败秦朝，而是想恢复旧六国的势力，重新割据称雄。陈胜、吴广对他们缺乏应有的警惕，这样，

大量的农民起义力量被他们拉走，有的甚至还成了农民起义军的对立面。其四，遇到了章邯这样一个强劲的对手。章邯收编骊山刑徒役夫，后来又得到防御匈奴边境部队的加强，实力相当雄厚。加之章邯本人勇略兼备，富于作战经验，是一个凶悍无比的敌手。他采用个个击破、连续作战的手段，逐次消灭各地的起义力量，最后将陈胜的主力军一举击溃，消灭了张楚政权。

第五部分 秦代灭亡之战争

秦代送入它的最后一年，也即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有两次带战略决战性的战役：

秦楚钜鹿战役：发生于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了年）十二月，项羽统率楚军与章邯统率之秦军主力决战于钜鹿地区，交战结果，楚军取得了对秦作战的决定性胜利，秦军主力丧失殆尽。

刘邦项羽西进秦都之战：开始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经过十四个月作战，刘邦军进至咸阳，秦王子婴投降于刘邦，秦朝灭亡。

第一节 钜鹿战役

第一，钜鹿战前的秦楚形势

秦朝自秦二世当政、赵高独揽军政大权之后，朝政更加黑暗混乱。赵高的专横残暴已使人人自危，满朝文武无人敢向二世皇帝报告秦朝所面临的政治、军事、经济极端严重的局面，尤其不敢提及各地起义军、反秦军战胜秦军的情况。

秦章邯军经过定陶战役，战胜了项梁军，虽暂时取得一些胜利，但并非消灭了楚军主力，秦朝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赵高对整个形势是清楚的，尤其在章邯屡败之后，赵高更感局势的危急，难以向秦二世交待，于是赵高就开始谋划刺杀秦二世。当赵高谋杀秦二世得手后，秦朝朝政就陷入更加混乱之中。

楚军在项梁失败之后，受到不小的震动，楚军东撤，退保彭城，休整军队，以备再战。

第二，钜鹿战役的导因

秦章邯军于定陶地区击败项梁军后，乘赵将李良与赵陈余混战期间，引兵渡河，开始平定赵地的反秦势力。赵军虽有数万之众，但经不起章邯军的进击，被章邯军一举击破，赵之都城被秦军占领。赵王歇北逃，入钜鹿城（今河北省平乡县），章邯军追到钜鹿，以一部兵力围城，主力驻于钜鹿南郊，准备对钜鹿进攻。

赵将陈余集结了数万兵力，驻于钜鹿之北。赵军顾虑自己兵力单薄，无法与秦军相匹敌，遂派人请求楚、燕、齐各国出兵相助。

楚怀王接到赵国求援的请求后，即决定派兵往救钜鹿，但在以谁为楚军统帅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楚怀王左右的一批旧楚国之官僚贵族，以项羽军作战纪律差，杀戮过多为由，建议怀王不要任用项羽为帅。楚怀王也考虑到项羽做统帅不太合适，而选用将军宋义为上将军，并尊为卿子冠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

宋义在定陶战役前，曾批评项梁军因胜利而骄傲，预言过骄兵要失败。因而，在这次楚怀王选将时，得到怀王的赏识，选为上将军，但看来这似乎只是表面上的原因，实际上则很可能是出于对项氏集团声威的惧怕。因为项梁在世时，权倾当时，主宰军政大权，调动楚国一切。且楚怀王又是项梁主持立为楚君的，这使楚国君臣看到，楚主的废立都取决于项氏集团的意志，大臣的存亡自然不在话下，因而，楚国统治阶层对项氏集团的惧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这样看来不用项羽为帅，而用宋义，似早已在意料之中。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十月，宋义率领救赵大军进到安阳（今山东省曹县）地区，即下令停止前进，驻军达四十五。六天之久，仍不做继续前进救赵的准备，项羽等人十分着急。此时秦军正在加紧对钜鹿的进攻，赵国形势更加危急。项羽鉴于这种情况，即向宋义建议说：“秦围赵急，宜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

宋义出于惧怕秦军的强大，不敢前去救赵，但又不敢明说不去救赵。于是宋义对项羽说，现在秦攻赵，秦若打胜了，它也兵疲力竭了，

我就可以利用这种有利时机进攻秦军；如果秦军败了，我就可以直接攻击秦军，必然获得胜利。因而不如先让秦赵相争。宋义还以教训项羽的口吻自夸地说：“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运筹策，公不如义。”宋义遂拒绝了项羽的建议，宋义这种消极避战，以拖延的手段违背救赵国的战略任务，更加引起楚军将领的不满。

宋义拒绝了项羽立即进兵的建议，自觉难以制服项羽，说服军心，有些后怕。但为约束项羽，打击他的锋芒，竟然又下了一道军令：“有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汉书》卷三十一，第1802页）。宋义身为楚军最高统帅，不思如何尽快出兵救赵破秦，而千方百计算计制服和排斥项羽，这不能不更加引起项羽的愤怒。宋义怕项羽将来对自己采取意外行动，乃派其子宋襄到齐国做联络工作，以免将来遭到不测。为此，宋义除置酒高会外，还亲自远送至齐地无盐（今山东省东平县）。

项羽见宋义继续按兵不动，且不管士卒冻饿死活，只顾自己享乐，决心趁宋义离开军中之机，制造诛杀宋义、夺取统帅地位的舆论。项羽向军中宣称，我们奉命奋力攻秦，现在全军久久停止不前，这里百姓贫困，士卒饥饿，军粮眼看就要中断，而宋义还饮酒高会，不去救赵，拖延时间。秦军占据优势地位，必然击败赵国，击破赵国后，秦军将更强。宋义不顾这种危急形势，“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资治通鉴》卷八）。众将校皆以为项羽言之有理，同时大家也早对宋义的行为不满，这就为项羽除掉宋义制造了必要的舆论。因此当宋义返回军中的第二天早晨，项羽即顺利进入宋义帐中斩了宋义。

项羽杀了宋义后，立即对全军将士宣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籍诛之。”（《资治通鉴》卷八）大家一致认为：“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为国家诛杀宋义是应该的。遂共同推举项羽为假上将军。项羽杀了宋义后，即派桓楚向楚怀王报告，怀王无奈，只得正式任命项羽为上将军，担任楚军统帅。经过这场斗争，农民起义军的统帅权，才由旧贵族官僚之手，转到农民起义军将领之手。这对进一步展开对秦作战，彻底打垮秦政权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第三，秦军与各路反秦军的态势和作战序列

秦军在夺占邯郸后，章邯即以王离、涉间两军围攻钜鹿城，章邯则自率主力驻于钜鹿之南，并修筑甬道，秦军此时的战斗序列如下：

统帅：少府章邯

副统帅：裨将王离

将领：长史司马欣

都尉董翳苏角涉间

总兵力：二十五万至三十万人。

楚军由项羽统帅全军之后，立即整顿部队，抚慰士卒，士气大振，积极准备渡河与秦军决战。楚军的战斗序列如下：

统帅：上将军项羽

将领：范增、司马桓楚、当阳君英布、蒲将军、项庄、季布

总兵力：约十万人。

赵军张耳率部分兵力在钜鹿城内驻守，陈余收恒山附近地区之军数万人驻于钜鹿北郊，与楚军遥遥相对，但始终不敢出战。赵军的战斗序

列如下：

统帅：赵王赵歇

将领：丞相张耳、大将军陈余、成都君张敖、张黡、陈泽、司马卬

赵军总兵力：数万人。

齐军由田都率领，脱离田荣的约束，到钜鹿参加楚军对秦作战。齐王建之孙田安也率军跟随楚军对秦作战。

燕军由臧荼指挥也进至钜鹿地区，支援赵军作战。

第四，秦军对楚军联合军作战策划

秦军只以王离、涉间军围攻钜鹿，而以章邯亲率主力部队于钜鹿城外应付不测，同时也可防止顿兵坚城，消耗和疲劳自己的主要力量。

楚军联合军则以楚军为中坚力量。各路反秦军均于钜鹿城外筑垒，以待楚军到达，共同出兵作战。

楚军计划先派遣部分先遣部队渡河，切断秦军的通道，断绝秦军的后勤补给，置秦于粮草困乏的境地，再展开与秦决战。

第五，钜鹿附近作战经过

秦军经过邯郸、直趋钜鹿，张耳率军和赵王歇据城守备。陈余则在城北策应战斗。王离指挥秦军精锐部队，击破赵军抵抗，展开对钜鹿围攻，城坚难克。章邯的主力军控制棘原（今河北省平乡县南）等地。为着防备敌人袭击军粮运输，筑起夹寨围墙，因而，王离军补给来源充足，加紧攻城战斗。陈余虽有兵数万人，只能与城内守兵，遥相呼应，不敢对秦军进攻。当时，被称为河北军的这支军队竟不起任何作用。城内兵少粮缺，濒于危境，张耳数度派人催促陈余进军，都被陈余搪塞过去，张耳迫不得已乃派遣地位较高的张魇、陈泽前去申斥陈余说，你拥兵数万，不该见死不救。而陈余则认为自己力量单薄，难以战胜秦军，如若勉强出战，则形如“以肉委饿虎”。但张黡、陈泽坚持要带兵出击。陈余无奈，最后派出五千人，由张黡、陈泽率领，对秦攻击，战斗结果，全部被歼，张黡、陈泽战死。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十一月，项羽指挥全军，北渡黄河前往救赵。秦军乃屡战屡胜之劲敌，项羽军为慎重起见，当推进到大河岸，先派出英布，蒲将军指挥两万兵力，渡河作试探性攻击，英布、蒲将军率军渡河后，立即与秦军发生战斗，英布等将领奋勇进攻，击破秦军阻击部队，进而机动灵活连续攻击秦军运输军粮甬道。甬道被切断，开始威胁秦军的攻城部队，楚军初战的胜利给各路反秦军以很大鼓舞，陈余趁此机会，派人请求项羽增派兵力北进，项羽于是决定渡黄河，涉漳水，并命令全军在渡过漳河之后，把船只凿沉，釜甑打破，营舍烧毁，携带三日食粮，表示出只前进不后退、誓与秦军决一死战，不再生还的战斗意志。

秦军统帅章邯察觉到重大作战行动即将展开，立饬全军，作应战准备，楚军全部渡河后，项羽与英布、蒲将军会师，随即把围攻钜鹿的王离军包围。章邯则指挥秦军主力，向楚军侧面进攻，项羽也用楚军主力，对秦军作战。两军于钜鹿城下展开大规模交战，项羽等重要将领都亲持刀戟参加作战，楚军士卒深受鼓舞，无不以一当十，奋勇杀敌，四处杀声惊天动地。齐燕等救援钜鹿的诸侯军，在钜鹿城下有十余壁垒军队，看到楚军士卒英勇冲杀的壮烈场面，惊恐得莫敢纵兵参战，只好从

壁上观战。秦楚两军经过九次激战，不可一世的秦军，终于被项羽的楚军所击破。秦将苏角被杀，统帅章邯不得不向钜鹿以南撤退，战争胜负已定，观战的诸侯军才敢于出垒协同楚军向秦军攻击。经过激烈战斗，王离、涉间军被诸侯军包围歼灭。涉间拒绝降楚，自行烧死，王离成了项羽的俘虏，楚军则获得战略决战的初步胜利。

楚军击破秦军主力，项羽于营内召见诸侯各军将领，由于战胜的威望，各将领进入辕门无不膝行（跪着走），莫敢仰视。项羽原来仅为楚军的将军，此时已成为诸侯各军的上将军。

第六，漳南地区的作战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十二月，钜鹿战后，秦章邯军驻于棘原，楚项羽军驻于漳南（今河北平乡县南）。秦楚两军相持，未曾发生重大作战行动。秦二世以章邯战败于钜鹿，致王离统率的秦军精锐，全部损失于战场，又连续挫折，派人申斥章邯作战不力。章邯惶恐，派长史司马欣返回咸阳，报告前方军事形势。司马欣到了咸阳，私下听说丞相赵高对章邯等将领抱有怀疑之心，停留司马门三日，不得会见，司马欣更加害怕，不敢在京师久留，急速由另一条路线潜回军中，赵高果然派兵沿司马欣来的路线进行追捕，没有赶上。司马欣回到军内。即向章邯报告了去京都遇到的情况，并对章邯说：“事亡可为者。相国赵高专国主断。今战而胜，高嫉吾功；不胜，不免于死。愿将军熟计之”（《汉书》卷三十一）。

秦军定陶战前，秦政权内部发生了赵高陷害李斯夺取丞相大权的斗争，朝政更加混乱不堪，人人身危，赵高对秦在前线领兵作战将领的猜疑，引起军心动摇。楚军和联合军方面乘机展开政治攻势，陈余给章邯写了一封劝降书，书中说：“白起为秦将，南并鄢郢，北阬马服，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尽封，因以法诛之。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隙。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常存，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此孰与身伏铁铁质，妻子为戮乎？”（《史记•项羽本纪》）。

陈余的书信，打中了章邯内心的痛处。使章邯在战无胜利的希望，且不受朝廷信任的困境之下，不得不为自己的生死存亡担心，从而为章邯在漳南战后谈判降楚、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章邯看到自己的危险和困难处境，动摇了继续作战的决心，想向项羽求和，便密派“军侯”始成暗地到楚军与项羽接谈降约。但项羽认为钜鹿之战虽然歼灭了王离攻城部队，而秦军主力损失不大。还需要给以沉重打击，才能压迫章邯降服。于是采取战略上的主动进攻行动，项羽命令蒲将军指挥的军队，不分昼夜由三户津（今河北省临漳县境）渡河前进，自率主力军向漳水以南前进。

楚军移于漳南，立即与秦军发生战斗，击破一部秦军的抵抗。项羽认为决战时机已到，遂把主力全部展开，攻击秦军于汙水上，给以歼灭性的沉重打击，从而使秦军将士更加失去继续战斗的信心。

秦军遭到惨重损失后，章邯再次派人向项羽表示愿意降伏。项羽乃召集军吏商讨，并说明军内军粮不足，预备接受秦军提出降约的建议将佐一致赞成，项羽乃与章邯相会于洹水以南之殷墟，章邯向项羽作了投降式的盟约。至此，曾经鲸吞关东，统一六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秦军，成了败军残伍，降伏于以农民起义力量为中坚的楚军，使秦帝国遭受了自建立以来最严重的失败。章邯见到项羽后，泣诉自己受赵高压迫排斥的痛苦心情，项羽于是封章邯为雍王，留于项羽军中。项羽并采取了一些控制秦军的措施，更动了它的统帅和重要将领，以司马欣为上将军，统帅秦军，充当西向入秦的先锋。

钜鹿之战评述

钜鹿之战是秦楚双方带有战略决战性的重大战役。此次战役中秦军的失败，使其失去了战略上最强有力的机动兵力。至此，秦朝再无可用之兵，已处于坐以待毙的绝境。

章邯军的失败和项羽军的胜利，历来被某些史学家完全看成是项羽“破釜沉舟”的战绩，其实远非如此。如果全面地加以分析，秦军的失败决定的因素应是秦朝政治上的腐败没落，丧尽天下人心的必然结果。“天下苦秦久矣”，“伐无道，诛暴秦”已经成为动员天下人丁起而诛灭秦朝最有力的口号，秦军在战场上直接作战的失利，则是第二位的因素。

秦代末年赵高专权，为非作歹，二世皇帝胡亥昏庸无道，任凭赵高残害朝臣，满朝上下人人朝不保夕。章邯统兵征战在外，连战连捷，迅速歼灭农民起义军的核心力量陈胜吴广主力，再败项梁之军，转瞬之间，河内外广大地区的起义力量，皆被章邯扫平，秦朝大有为之一振的趋势。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死心塌地为秦朝卖命，东征西战，解咸阳之急，救秦廷于危难之中的秦军统帅，竟无端受到赵高的猜疑，那里还会有什么作战的积极性。

项羽“破釜沉舟”固然表现了楚军决一死战的坚强意志，但双方毕竟实力悬殊。章邯拥有近三十万大军，而项羽只有不足十万之众。况且章邯能征惯战，经受了多次实战的锻炼，章邯本人又是智勇兼备之将，面对项羽以农民起义军为主体的军队，如果不是秦军将士对秦朝黑暗政治的厌恶，项羽的楚军，无论如何也是难以轻易取胜的。退一步说，就是章邯钜鹿战败，尚有二十多万大军，总结教训，再次交战，并非注定就处于战败之地。而陈余一封劝降书就起了那么大的瓦解章邯的作用，不是政治上的因素起了决定作用，无论如何是解释不通的。

当然，项羽是当时勇武无双的战将，他用破釜沉舟的手段，激励士卒拼死一战，也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节 刘邦项羽西进秦都之战

第一，刘邦西进秦都之战

楚怀王与起兵各将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时秦军兵力强大，经常击破起义部队。各部都害怕秦军，无人敢向关中推进。项羽曾与刘邦转战定陶、陈留等地，深恨秦军击杀项梁，愿同刘邦西进入关。怀王左右资深宿将都以项羽为人栗悍猾贼，不如派遣有长者风度的刘邦西进关中。怀王同意，于是派刘邦西进。

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九月，刘邦率领砀郡兵，并收容陈胜、项梁部份散兵以曹参为前锋，进攻东郡尉军于成武以南，取得胜利。十二月，刘邦军到栗（今河南省夏邑县），遇刚武侯巧妙夺取其所率的四千余人，予以合并。同时与魏军将领皇欣，武满等部联合攻击秦军，击破秦军的抵抗。

次年（公元前207年）二月，刘邦又由砀北攻昌邑（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遇彭越率千余人来会合。昌邑未攻下，为避免攻坚，向西前进，经过高阳（今菏南省杞县西），监门郦食其，劝说沛公袭占陈留（今河南雀开封市东南）。刘邦采纳了郦食其的建议，打下了陈留，获得了一批财物、粮食，充实军用。郦食其并引介其弟郦商所集聚的四午余人参加刘邦的军队，陈留郡兵也就配属于郦商。刘邦遂以郦食其为广野君，以郦商为将军。刘邦由砀郡到陈留，以数千郡兵，扩大到两万以上的军队；并占领"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战略要地陈留，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刘邦率部进占陈留这个战略要地后，得知河北方面楚军已解矩鹿之围，项羽名声威震天下。刘邦不敢停顿，继续向西机动，以争取先进关中，紧接着与秦军一些郡县驻军，发生了一系列战斗。

一、白马曲遇之战

三月，沛公刘邦率军，由陈留向北进攻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南五十里），秦将率兵守坡，城坚难下，转向西进，与秦将杨熊军会战于白马（今河南滑县），又战斗于曲遇（今河南省中牟县境），俘虏秦司马及御史各一人。杨熊战败退回三川郡首邑。二世皇帝遣使将杨熊斩杀。刘邦没有直接进攻荥阳，而改向颖川郡推进。

二、颖川乎险之战

四月，刘邦率军攻克颖川郡，由张良主持郡内军政，略定前韩国属地，此时赵军别将司马卬，于河内方面企图渡河抢先入函谷关。刘邦为着制止赵军这一行动，乃北攻平阴（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断绝赵军渡河通路，阻止其向河南进展。

三、洛东犨东之战

刘邦阻止赵军南进，转往洛阳，在洛东与秦军发生战斗，遭受损失，不得已经过辕，退到阳城（今河南省方城），转向南阳郡推进。刘邦部队南移，韩王成留守阳翟，张良则率部份兵力随刘邦行动。六月，与南阳郡守军战于犨东（今河南省鲁山县东），击破其抵抗，进略南阳郡。

四、胡阳析郦之战

南阳郡守退走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据城固守。沛公攻宛城不克，引兵西进，张良建议说，公虽急于入关，秦兵尚众，据险自守。“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史记•高祖本纪》）。于是刘邦乘夜走另一条路线返回，偃旗息鼓，拂晓前直趋城下。围宛城三匝，郡守想自刎。其舍人陈恢劝其出城投降。接受劝告，向刘邦提出：“约降封守，刘邦应允。当即以南阳郡守为殷侯，封陈恢为千户。南阳郡既降，郡西各城都不战而下。到达丹水（今河南省浙川县东南）高武侯鳃、襄侯王陵来归，还攻胡阳（今河南省唐河县南八十里）遇番君吴芮别将梅铝率部参加刘邦军，合兵进攻析，郦（今河南省浙川、内乡县境），未经重大战斗，都告降服。刘邦军进军期间禁止掳掠，纪律严整，大受秦人的欢迎。此时章邯秦军已向项羽投降。瑕丘申阳则率部进占河南郡，也引兵归附于项羽的楚军。

五、峣关蓝田之战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八月，刘邦军攻克武关（今陕西省商南县东南），进入秦境。秦朝廷内政变，丞相赵高杀了秦二世，并派出代表到刘邦军内与刘邦商议分王关中之事，尚未商议妥当，秦内部又发生变化，赵高立子婴为秦王，取消了秦皇帝称号，子婴与其二子密议后，诛杀了赵高，灭了赵高的三族，立即调兵遣将，加强峣关（在今陕西蓝田县东南）守备，以阻止刘邦军进关。

刘邦率兵进至峣关，想立即攻关。但张良却建议要智取，不要强攻。张良说：“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啗秦将。（《史记》卷五十五）。刘邦采纳了张良的建议，秦将果然答应投奔刘邦，并愿与刘邦合兵共袭咸阳。这时，张良又建议说，秦将虽然同意投奔我们，恐怕他的士卒不一定愿意，如果不愿意，那我们是很危险的，不如乘其不加戒备的时机歼灭他。刘邦认为张良的看法有理。于是率兵绕过蛲关，越蒉山（今蓝田县东南三十里），从背后袭击秦军，大败秦军于蓝田以南地区，进至蓝田后，又与秦军在蓝田以北发生战斗，再次将秦军击败。至此，咸阳以东，秦军再无应战之兵，刘邦率十万大军得以顺利进至霸上（今西安市东之灞桥）。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率朝中官吏出降于刘邦，秦朝遂宣告灭亡。

第二，项羽之西进秦都

章邯秦军向项羽投降后，项羽认为河北大局已定，下一步最重要的大事是进军关中，与刘邦争夺“关中王”，以便掌握全国的政权。此时赵将司马卬已将河内之郡县全部占领，河南地区由申阳率兵进占了洛阳。司马卬与申阳都与项羽站在一边，因而项羽所率大军得以顺利经过两河地区，向关中进发。

但是当项羽进至新安地区（今河南省新安县西），由于楚军将士对秦之降兵随意欺凌，引起秦兵的不满和怨恨。项羽得知这些情况后，不是研究如何正确对待投降秦军的政策，而是做出了除章邯、司马欣、董翳之外，将二十万秦军全部坑杀的残暴决定。这是继春秋战国期间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降卒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坑杀降卒的事件。项羽坑杀降卒的暴行，立刻引起秦人“痛入骨髓”的愤恨。从此，“天下多怨，百姓不

附”，项羽已将天下民心失尽。

刘邦受降秦王后，采纳了占据关中以称王的建议，紧急派兵防守函谷关，以阻止项羽大军进关。当项羽军至函谷关前，得知刘邦已派兵闭关据守，盛怒之下，命英布等攻进关内，大军迅速推进到鸿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十里）。

刘邦西进秦都之战评述

刘邦向秦都咸阳的进军，历经十四个月，初期虽屡遭挫折，但随着力量的增强，在攻克武关之后，进展顺利，迅速逼近咸阳，刘邦军的胜利，不仅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更重要的是为他尔后战胜项羽、建立西汉王朝奠定了基础。

刘邦军取胜最关键的因素是取决于项羽对秦章邯军作战的胜利。秦王朝为了对付项梁，项羽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除了将骊山役夫编成军队之外，还将防御匈奴的主力部队和全国可以机动作战的兵力，统统置于章邯的统率之下，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一举将起义军彻底消灭，结果都被项羽军击破。这就使秦王朝再无力组织起抗御刘邦军的基本力量，等于为刘邦军铺平了西进的道路，秦军只能依靠一些孤立的城邑固守，各自为战。因而，刘邦军欲攻城则攻城，想前进则前进，机动自如。

刘邦军西进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秦王朝统一全国时间太短，远没有形成自己深厚的统治基础。更加之朝纲混乱，坏人专权，推倒秦朝的统治，已属民心所向。特别是经过陈胜、吴广起义军的打击之后，秦朝的统治已成土崩瓦解之势。因而，刘邦军所到之地，顽抗者鲜，迎降者众，经常是兵不血刃，连连克城破关。

刘邦善于网罗人才，采纳谏议，宜进则进，宜避则避，不顿兵坚城，武攻与招降交替运用，表现了战略与策略上的灵活性，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各方面的优越条件，对他西攻秦都的胜利，造成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局面。

第三节 项羽刘邦灭秦后的相互斗争

项羽、刘邦各率军进抵秦都咸阳附近地区后，秦王子婴出降，便宣告了秦代历史的结束。刘邦、项羽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由此揭开了序幕。

第一，杀气腾腾的鸿门宴

项羽四十万大军，一路进展顺利，进至于戏地区驻止。刘邦左司马曹无伤见项羽实力雄厚，威镇各诸侯之军，为了个人博取项羽的好感，派人向项羽报告说：刘邦想当关中王，并令秦王子婴为相，将珍宝玉器尽行掠走，项羽得知这个消息，十分震怒，想第二天即出击刘邦军。范增也向项羽建议说："沛公居山东时，贪财好色，今闻其入关，珍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小。急击之，勿失！"（《汉书•高帝纪》）。项羽同意范增的建议，命令部队预定第二天展开对刘邦军的进攻。

项羽欲进攻刘邦军的决定，被项羽季父左尹项伯密告刘邦的重要谋士张良。张良即向刘邦引见项伯。刘邦则乘机向项伯表白自己如何尊敬和忠于项羽，说自己进关以来不敢私取任何财物，并且封了秦朝的府库，遣将守关，以防他人抢盗，一切都恭侯项王来发落。项伯返回楚营之后，极力向项羽陈述刘邦对项羽的忠心，为刘邦说了许多好话，项羽为之所动，遂决定暂不进攻刘邦军。但却与范增拟定在鸿门摆宴，借招待刘邦之机，杀死刘邦。

刘邦率张良、樊哙、纪成、夏侯婴等赴会。见了项羽竭诚拜谢，又说了一些恭维项羽的话，表示非常谦恭忠诚。刘邦并假心假意地说；"臣与将军戮力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先入关，能破秦，与将军复相见。今者有小人言，令将军与臣有隙。"项羽竟被刘邦的巧言所欺骗，随即告知刘邦："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这时项羽已把刺杀刘邦的念头置诸脑后。宴席间范增虽数次出示约定的暗号，但项羽佯装不知。范增不得已令项羽从弟项庄进入会场，以舞剑为名，借机刺杀刘邦。但项伯也随即拔剑而起，名为与项庄对舞，实际则以身掩护刘邦，使项庄始终无隙可乘。张良在这紧急时刻暗中告诉樊哙入内保护刘邦，刘邦机智脱身，逃回军中，立即杀了曹无伤，并做了应付项羽进攻的准备。张良约摸刘邦已安全返回霸上，一面替刘邦辞谢项羽；一面赠送白璧、玉斗给项羽和范增。巧妙地解救了刘邦。

第二项，羽刘邦分封关中王的斗争

鸿门宴后，项刘关系稍稍和解，项羽凭着盛大的军威，西进咸阳。进至咸阳后，项羽军竟屠咸阳城，杀降王子婴，烧毁阿房宫，将库存珍宝、物资、宫中妇女悉数掠走，这就大失秦民所望，百姓惧怕项羽成为关中王。

刘邦当初西进关中时，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所到之地，秋毫无犯。进入咸阳后封府库，对秦王及秦朝降官的政策都比较宽厚。这样，刘邦深得关中的民心，秦人有所谓"唯恐沛公不为秦主"的殷切愿望。

关中地区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土地肥沃，农业经济发达。谁占有关中，谁就可以成就霸业。因为楚怀王有约在先，先入咸阳者为关中王，都不愿意背负约之名。刘邦想做关中王，但考虑自己实力大大弱于项羽，不敢伸手；项羽也不甘心把这块宝地让刘邦占有。于是，谁为“关中王”就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项羽的谋士，劝项羽自为关中王，项羽不听。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即把关中分为三个地区，并分别封三个王占有；同时为了安抚刘邦，硬把巴蜀也说成是关中属地。因而，就名正言顺地把刘邦贬至巴蜀为汉王。项羽自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管辖原楚梁九郡，将楚怀王贬为义帝，迁于郴地（今湖南省郴州）。

除了项羽和怀王的封地之外，在项羽主持下，将原秦国和六国疆域分封为十八个王国。

一、秦国分封为四个王

汉王刘邦。定都陕西南郑；

雍王章邯。定都废丘（今陕西省兴平县）；

翟王董翳。定都高奴（今陕西省延安市）；

塞王司马欣。定都栎阳（今陕西省临潼东北）。

二、楚分封为三个王

九江王英布。定都六（今安徽省六安市）；

衡山王吴芮。定都邾（今湖北省黄冈县）；

临江王共敖。定都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

三、齐国分封为三个王

齐王田都。定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

济北王田安。定都博阳（今山东省聊城地区博平）；

胶东王田市。定都即墨（今山东省平度县境）。

四、赵分封为二个王

代王赵歇。定都代（今河北省蔚县境）；

常山王张耳。定都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地区）。

五、韩分封为二个王

韩王韩成。定都阳翟（今河南省禹县境）；

河南王申阳。定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境）。

六、魏分封为二个王

西魏王魏豹。定都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地区）；

殷王司马卬。定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境）。

七、燕分封为二个王

燕王臧荼。定都蓟（今北京市）；

辽东王韩广。定郝无终（今河北省玉田县境）。

项羽除分封的十八个王国外，番君将领梅战功最多，被封为十万户侯。陈余虽然末同丈军进关灭秦，也不得不封给他三个县，加以慰抚。对齐国之田荣，因其数度反对项梁，又不派兵击秦，则不如封赏，这为另一次战争埋下了导火线。

第六部分 楚汉战争时期总论

第一节 楚汉两大集团的形成

秦末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胜利地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中国社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短暂的战争时期，即楚汉战争时期。农民起义军领导者项羽、刘邦为了争夺封建统治的最高权力，建立自己的封建王朝，楚汉双方展开了历时四年多的激烈战争。

刘邦率军进入秦都咸阳，收降秦王子婴之后，为了笼络民心，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采纳张良、樊哙等人的建议，封存秦朝的府库珍宝，废除秦朝的苛政，约法三章，稳定社会生活秩序，因而，深得民心。按照怀王之约，本应为王关中，但项羽却将刘邦封为汉中王。

项羽在钜鹿之战消灭了秦军的主力集团后，旋即挥戈西进，进入函谷关，驻军于鸿门（今陕西临潼县境），欲与刘邦军决战，以争夺天下的霸主。但刘邦当时仅有十万军队，而项羽却拥兵四十万之众，刘邦集团深知难以与项羽争雄，遂接受了项羽的封号，忍气吞声赴巴蜀就任了汉王位。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二月，项羽凭借着自己强大的实力，自立为西楚霸王，占据梁，楚九郡，建都于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为限制刘邦再入关中，将关中地区分封了三个王。项羽为了统治天下，将楚怀王尊为义帝，迁都于郴（今湖南省郴州）。

刘邦和一些未得到分封的领兵将领对项羽的封王十分不满，于逐渐形成了刘邦、项羽两大集团，开始了楚汉战争时期。

第二节 楚汉战争的梗概

楚汉战争自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起，至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止，在近四年半的时期内，楚汉双方大致在两个战场作战：支战场的作战，主要经历了三秦战役、安邑战役、井陉战役、潍上战役；主战场的作战则主要为彭城战役、成皋战役，垓下战役。

汉高祖元年五月，田荣赶走项羽所封的齐王田都；杀掉胶东王田市，自立为齐王。七月，联合梁地（今河南省东部）的彭越，杀死济北王田安，占领了三齐地区，同时指使彭越进攻梁地。田荣与陈余一起进攻常山王张耳，张耳战败逃走，田荣、陈余以原赵王歇为赵王，赵王则立陈余为代王。为此，项羽决定采取先击破齐军，解除后顾之忧，再对付刘邦的战略，因而发兵进攻田荣。

刘邦乘项羽兵陷三齐，无力西顾的机会，积极准备东进，他根据韩信的建议，由萧何留守巴蜀，收取税赋，负责东进部队的补给。八月，汉军即由刘邦亲自统率潜出故道，与三秦王（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激战于关中地区。在取得关中作战决定性的胜利后，又立即派兵出武关，挥师向楚都彭城方向进军。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项羽大军打败田荣，田荣被百姓杀死，但田荣弟田横继续率领残余力量与项羽军交战。刘邦再次趁项羽军深陷齐地之机，率军攻占了项羽都城彭城。项羽随即返兵奔袭刘邦军，将刘邦军几乎歼灭殆尽。

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项羽率军西进，攻占荥阳、成皋地区，刘邦军节节败退，形势对汉军十分不利，一些原附于刘邦的势力，则纷纷倒向项羽。此时，幸亏韩信军在支战场的作战连连获胜，逐渐给项羽军的侧背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同时萧何又源源不断地从关中调发新的兵员补充刘邦军，刘邦在主战场的作战才得以稳定了自己的态势。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以后，楚汉双方在成皋附近地区形成相持状态，战争互有胜负。在这个期间，以成皋为中心双方反复争夺这一战略地带。刘邦军在争夺战中，逐渐转化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加上支战场的有力配合，使刘邦由战略上的劣势，转变成战略上的优势，项羽则由战略上的优势，转变成战略上的劣势地位，项羽被迫与刘邦鸿沟议和。刘邦则趁项羽撤军而未加戒备，撕毁协议，突然向项羽军进行追击，最终将项羽包围于垓下（今安徽省灵璧县境）地区，全歼了楚军，刘邦军取得楚汉战争的彻底胜利，从而结束了楚汉时期的战争史。

第三节 楚汉战争双方成败的基本原因

刘邦以弱小的实力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项羽则以绝对的优势招致了最后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政治上的原因，这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刘邦顺应社会历史潮流的发展，力图巩固和发展秦朝的郡县制度，汉军每到一地，都注意体察民情，严整军纪，笼络人心，废除秦代的严苛法纪，并注意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发展社会生产，养民生息。因而，得到了民众的真心维护。百姓“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史记•汉高祖本纪》），所以刘邦军便由弱变强，节节胜利。而项羽军在夺得了反秦战争的胜利后，却大封诸侯，将秦王朝的疆域分封给十八个王，又重新使社会倒退到封王割据的春秋战国时代，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无法获得百姓的支持。加之项羽不但不注意争取民心的工作，反而在攻取一地之后，常常用残酷的手段镇压反抗者，尤其是大规模坑杀降卒，更加激起了秦人、齐人的强烈仇恨，民怨沸腾，人心丧尽，这就注定了项羽军必然走向彻底失败的道路。

战略策略的原因。刘邦军对整个战争的战略指导预先就有通盘的计划，刘邦从入巴蜀，烧栈道，夺占三秦，兵出函谷，武关，攻取楚彭城，退保成皋一线，都有着较为成熟的战略策划，到彭城惨败后，刘邦军虽处在于相当被动的劣势地位，但却定下了主战场正面坚持，交战场南北配合的战略决策。在正面的主战场江军扼守成皋要地，占据敖仓之寨，兵出武关，在宛（在河南省南阳地区）、叶（今河南省叶县地区）一带机动作战，成功地调动和疲惫了楚军，以战略上的持久战积蓄力量，转换优劣态势。为配合主战场作战，，刘邦在北方以韩信破魏之后，命其领兵向北攻取燕赵，向东进击三齐，再插进楚军的侧背，断绝楚军的供应渠道；在南方以随何游说九江王英布叛楚归汉，使项羽军的大后方失去依托，且牵制了项羽的大量兵力；与此同时以彭越之军数度偷袭楚军腹心地区，迫使项羽不得不两度，回军解救后方之危机。刘邦军在整个楚汉战争期间，还十分讲究斗争策略，善于用间，以挑拨离间、分化瓦解、威胁利诱等等手段，有效地削弱了楚军的力量，范增的出走，项伯的暗中效力刘邦，周殷的叛变，英布的附汉都给楚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相比之下，项羽则在整个楚汉战争期间缺乏长远的、通盘的战略策划，许多重大作战行动都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尽管战役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诸如战败田荣、收复彭城，打败英布，驱赶刘邦杰出的统帅才能。但在战略全局的指导上却一再失策，说明项羽军缺乏应有的战略头脑。田荣反楚，占领三齐，虽然楚军应反击田荣，但在刘邦已乘机夺占关中，直逼彭城的紧急关头，项羽军仍未看到主要的威胁为西方的刘邦主力军，继续陷在齐地作战。彭城反击胜利，攻占荥阳，直逼成皋本来已占有非常有利的态势，但项羽不知集中力量突破成皋后，再入函谷关，夺回三秦，彻底摧毁刘邦的基地，而是徘徊于成皋、荥阳地区，且受刘邦战略意图的调动，忽而南下，忽而东返，丧失了时间丢掉了主动

权。使部队疲劳不堪，将自己的优势地位拱手让予了刘邦军。至于用间和谋略欺诈等手段的运用，与刘邦相较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这充分暴露了项羽军勇有余而谋不足的严重缺陷，显然这样的军队要和足智多谋的刘邦军相较，自然难以取胜。

招贤纳士运用人才方面的原因。刘邦既善于联合一切反对项羽的力量，组成自己的同盟军，又十分注意招贤纳士，任用人才。所以在刘邦周围聚集了一批贤臣良将，诸如萧何、张良、韩信、樊哙、灌婴、陈平、彭越、郦食其、王陵等人，可谓谋臣勇将云集。这些谋臣勇将成了刘邦进行决策和作战指挥的智囊与核心力量，对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所以刘邦在登上帝王的宝座之后让群臣述说自己战胜项羽的原因时，高起、王陵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而项羽则不注意网罗和使用人才，甚至妒贤嫉能，刚愎自用，听不进有益的建议，不少精干之才都纷纷背离项羽，投向刘邦，韩信、陈平、英布都是这种情况。亚父范增对项羽赤胆忠心，最后也被项羽逼迫而走。项羽只相信自己的勇力。因而在整个战争中，没有一员得力战将，更没有代替他独挡一面的栋梁之才，只能靠自己左冲右突，这一方面实在比刘邦差之千里。

建立后方巩固基地的原因。刘邦在整个战争中，十分注意建立巩固的后方供应基地，专留萧何经营巴蜀和关中地区，既无后顾之忧，又保证了对前方源源不断的兵员和物资供给。而项羽的后方既有封王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战乱，又有彭越、英布等人的袭扰和作乱，经常处于供应紧张的困境，严重地影响了军心士气和作战行动。

第四节 楚汉战争时期的战争特点

这个时期的战争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相比，无论就战争的规模、战略战术的运用、战场的空间等等方面都有许多显著的特点。

（一）战争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楚汉战争无论刘邦军还是项羽军都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刘邦军自彭城战败后，即转入了战略退却和战略防御阶段。在此阶段中，刘邦军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只能退守成皋、荥阳，深沟高垒，持久防御，以争取力量对比的转换。大约自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起，刘邦军逐步转入了与项羽军的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刘邦军通过补充兵员和作战物资，稳定了部队的情绪，特别是通过数次调动项羽之军，使项羽军疲惫不堪，无力继续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双方形成了长期相持状态。自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刘邦军逐渐占据了优势，楚军几次受刘邦、彭越、韩信军的调动，东奔西救，特别是分兵二十万救齐，曹咎的二十万大军又遭到失败，更进一步削弱了项羽的军力，项羽军终于兵疲粮尽，被迫与刘邦订立鸿沟之盟，全军东撤，实际上此时项羽军是在劣势情况下由战略相持转为战略退却。刘邦这时则抓住战机，适时转入战略进攻和追击阶段，最后将项羽军全军歼灭。

（二）多战场多方向的协调作战。楚汉双方交战，主战场和支战场的配合协调十分紧密，而且中央战场、北部战场、敌后战场、南方战场都为同一个战略目的服务，这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争中是很少见的。当刘邦所率主力被歼于彭城地区，逃回荥阳、成皋后，除了组织力量，坚守中央战场外，由韩信率军在北部战场扫平北方亲项羽的势力，从北面向项羽侧背进攻，以减轻中央战场的压力；命令彭越率军开辟敌后战场，袭扰项羽军的后方，切断项羽军的粮食供应道路，威胁项羽军腹心地区的安全；在南面则争取九江王英布背楚附汉，以便从南面牵制项羽的军力。项羽军回兵出击彭越军时，刘邦在主战场即抓住战机歼灭了曹咎的大军。在鸿沟议和后，刘邦率军追击项羽军时，刘邦又及时命令北方的韩信、彭越两军急速南下，同时命令英布在南方即刻北上，从而对项羽军形成三路齐攻的有利态势。由于刘邦军在各个战场，各个方向上的协调作战，逐渐转变了自己的不利态势，由被动和劣势地位转向主动而优势的地位。

（三）战争空间的空前扩展。楚汉战争交战的战场十分广阔，东自东海之滨，西至关中地区，南至江淮九江一带，北达于燕山脚下。在这广阔的战场范围内，楚汉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既有长距离的战略进攻，又有远程的奔袭迂回，还有长时期的攻防拉锯，不管那种形式的作战，都能在统一的战略意图下行动，这说明当时双方在战争的组织指挥、军队的素质等等方面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军队的供应保障方面更显示了比战国时期规模大，组织复杂的特点。刘邦率领几十万大军由汉中出发，夺占三秦，东出函谷、武关，且战且进，直抵彭城，历时八九个月，跋涉三四千里，军队数量如此之大，作战行程如此之远，假如不是周密及时的供应保障是无法进行作战行动的。同样，项羽之军出

战三齐，再急驰彭城，接着兵至荥阳，成皋，也是千军万马长途奔驰，而军队的供应也基本上保障了作战的需要，只是在遇到彭越军的袭击后，才出现供应紧张的情况，这在运输工具和交通道路极不发达的古代应当说是相当出色的。

（四）重视制定完备的军事战略思想。楚汉双方在整个的战争进程中，既是军事实力的较量，也是军事战略思想的竞赛。刘邦军在这场战争中，能够由劣势转为优势，在很大程度上靠着制定了正确的军事战略思想。在项羽将刘邦排挤出关中地区时，刘邦阵营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刘邦主张当即与项羽决一雌雄，张良等则认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以十万之军决难战胜项羽的四十多万大军，于是确定了经营巴蜀，积蓄力量，再行决战的战略决策。在田荥、田横等反叛楚军，吸住了项羽集团的主要兵力时，刘邦军则制定了还定三秦，乘机东进的战略决策。当刘邦军彭城战败，主力被歼，被迫西撤时，又制定了不与项羽决战，进行持久防御的战略决策。在刘邦已转化为优势地位，项羽被迫鸿沟议和，向西撤退之时，刘邦军又立即实行战略追击的决策。这种随着战争的不同进程，适时提出不同的军事战略，显示了楚汉战争中在主观指导的很大进步。

第七部分 楚汉战争支战场作战

楚汉战争支战场的作战，经过的重要战役有四次：

三豪战役：发生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刘邦率军进袭中原，击破雍王章邯军的抵抗；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未经重大战斗，即告降服。刘邦胜利平定三秦，顺利达成其称王关中的战略目的。

安邑战役：发生于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八月。韩信率领汉军，渡河奇袭安邑，占领魏全境，俘获魏王豹，解除了汉军侧背的威胁，对汉从战略上包围楚国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战略态势。

井陉战役：发生于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十月，韩信率军背水诱敌，奇兵迂回，全歼赵军，对刘邦军的发展壮大起了重大作用。

潍上战役：发生于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韩信率军与楚军龙且部激战于潍水两岸，汉军将龙且二十万大军歼灭。

第一节 三秦战役

第一，刘邦入汉与整军备战

项羽与刘邦鸿门相会后，分封诸侯，立刘邦为汉王，建都于南郑。刘邦没有当上关中王，十分恼怒，欲与项羽一决胜负。周勃、灌婴、樊哙等将领极力赞成刘邦起兵与项羽决战。具有政治远见和战略眼光的政治家萧何，清楚地了解楚汉力量相差甚为悬殊，项羽正处于兵锋鼎盛之时，若贸然与项羽决战，必然百战百败，自取灭亡。所以他极力反对立即决战，主张刘邦先就汉王位，经营巴蜀，整军备战，待力量强大之后，再夺回关中，进而与项羽争夺天下。萧何对刘邦说：“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书》卷三十九）。

萧何这种战略上暂时退让，以避楚军锋芒的建议，终于被刘邦接受。于是刘邦忍气吞声入汉中地区就汉王位。项羽为削弱刘邦实力，尽量减少刘邦军的数量，后经张良重赂项伯，并由项伯从中斡旋，项羽才勉强允许刘邦率兵三万去巴蜀。于是刘邦便于汉元年四月前往汉中，萧何、张良等一起随行，不久，刘邦即送张良返回韩国，当刘邦与张良在褒中分别时，张良劝说汉王刘邦烧毁栈道，以向项羽表示永远不再东向的意图，达到麻痹项羽和关中诸王的目的。

刘邦一入汉中，即抓紧时机整军备战，积极扩充实力，储备作战物资，为东进关中准备各方面的条件，其中很重要的是物色了像韩信这样的优秀军事统帅。

韩信系淮阴人，深知兵法之道，家中贫穷，不能为官，也不会经商，常常寄人篱下，难得温饱，曾受人胯下之辱，在项梁率兵渡淮时，即跟随项梁军西进。项梁军失败后，他又转属项羽部下，任郎中一类的小官。韩信在项羽军中也曾向项羽多次提出过作战建议，但官微言轻，不受项羽重视。韩信非常失望，感到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认为继续在项羽统辖下肯定没有出路和前途。于是趁刘邦军往汉中时，逃离楚营，归附刘邦。韩信归汉初期也未被重用，只担任连敖之类的小官，在跟随刘邦军前进的途中，又犯了应当斩首的法律，被依法押去行刑处决。同犯已斩十三人，依次序轮到韩信，韩信仰视，巧见滕公夏侯婴，乃说：“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夏侯婴惊异韩信说的话，同时看到信的容貌外表不凡，于是释而不斩，与信交淡，心中十分欣喜，乃向汉王保荐。刘邦当时没有重视这件事，就派他任治粟都尉。韩信当上汉军治粟都尉，有机会得与丞相萧何接近，他不平凡的政治和军事见解，受到萧何的特别重视和钦佩，数次向刘邦建议应重用韩信，但未引起汉王足够的重视。

汉军将士翻山越岭向汉中进发，大都讴歌渴望东归。有将佐十余人未到郑就往东逃走。韩信此时也感到萧何已经向汉王提议多次，判断汉王不会重用他，也就同时逃走。韩信出走后，萧何闻讯，不分昼夜急忙追赶。萧何赶上韩信，做了很多说服工作，扭转了韩信的想法，同回南郑。萧何向汉王报告追回韩信的经过，遭到汉王指责。萧何追韩信之

事，《史记》中有一段十分生动的记述：

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日；"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史记》卷九十二、第2610至2611页）。

汉王即拜韩信为大将军，征询这位新任大将军关于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对策。韩信正确分析了项羽和刘邦各自的优劣形势，着重指出了项羽的不能任用贤人，性情残暴，不得民心，尤其为关中地区人民所痛恨的致命弱点。从而建议刘邦要做到三条：一是善于任用天下之武勇；二是以天下城邑封有功之臣；三是利用部队思乡东归的情绪，向东进攻，定会激励大家奋勇作战的意志。

韩信认为刘邦东进首先要还定三秦。韩信指出：三秦王章邯、董翳、司马欣率几十万秦子弟兵降楚，大部被杀亡，尤其在新安被项羽坑杀二十万，唯独章邯、董翳、司马欣三人不但未被杀，反而封王关中，关中百姓对此三人早已恨之入骨，秦人不会再拥护他们。而汉王入武关，进关中，秋毫无犯，约法三章，深得百姓敬仰。关中父老无不以刘邦未封关中王而义愤，早已翘首而望汉军再回关中。因此，只要汉军举兵东进，三秦可"传檄而定"。

刘邦听完韩信的分析，颇觉入情入理，完全接纳了韩信的建议，并深恨与韩信相见过晚。

第二，项王统治权力的崩溃

项羽凭着战胜秦军声威，以为天下已定，口号为西楚霸王，以彭城为首都，属地九郡，把其余各地分封十八个王，使秦灭六国统一全中国的局面遭到破坏，倒退到战国时代。一些得封和不得封的旧贵族和地主阶级人士，认为项王分封不公平，虽勉强到封地就国，但仅只一个多月，山东各国就纷纷出现动乱局面。

随着项羽进关的田都、田安都被封王，田都为齐王，徙旧齐王田市于胶东，立即引起掌握实权的国相田荣的反对，于五月发兵迎击前来为齐王的田都。田都兵力有限，失败后只得逃往楚国。齐王田市怕项王军威，不得不遵项王吩咐，往胶东就封，田荣则追杀之于即墨，索性自立为齐王。此时钜野地区的彭越已拥有数万人而未被封王，无所归宿。田荣抓住机会，拉拢利用彭越，送给他将军印信，饬令其进攻济北国。彭越率兵进攻济北国，击杀济北王田安。由荣于是并有三齐之地，与楚对立，使彭越攻楚，击破项王派出的萧公角等部，极大地破坏了项羽当时

的威信。

陈余以钜鹿之战与张耳关系破裂，以致没有随军进关。项羽封张耳为王，陈余未被封王，只封给其所在的南皮周围的三个县，引起陈余对项羽的溃恨。因此，当田荣树起反项旗帜后，陈余即派亲信夏说向田荣致意，请兵支援进攻常山，恢复赵国，赵可以作为齐的屏蔽之邦。田荣也乐于树党于赵，共同对楚，于是派兵支援陈余。陈余乃征集所属三县兵，会合齐军袭击常山，陈余发动的突然袭击，出乎张耳的意外，作战失败，耳以与楚王有旧交，又为项羽封立为王，欲奔往楚。亲信甘公经过分析大局形势后，认为楚虽强大，但终于要被汉所并，建议张耳投奔汉王为好，张耳于是走往汉。陈余战胜张耳，迎赵歇于代，复为赵王。赵歇则立陈余为代王，仍兼赵相。原来燕王韩广不愿逃往辽东，新任燕王臧荼则击杀之，而并其属地。

项羽分封十八王，把统一的中国倒退到割据分裂的战国时代，导致了分封诸王的纷争，为刘邦乘机东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战机。

第三，进攻三秦的战略

秦岭山脉雄踞于渭水以南，汉水以北的整个地区，高度由西向东逐渐降低。西部高度大约在三千公尺左右，成为高原状；东部高度逐渐降至一千公尺左右。秦岭和巴山间有汉中平原。这个平原从勉县到洋县，东西长约八十公里，南北宽约十数公里，汉水流经其间。由汉中进入关中主要的进军路线有三条：

褒斜道：历来称之为北栈道，为秦惠文王派兵取蜀之道。南口称“褒”，在汉中褒城北十里，北口称“斜”，在眉县西南三十里。

傥骆道：其中有大的弯曲道路四十公里，凡九十四盘。南口称“傥”，在洋县北三十里。北口称“骆”，在周至县西南一百二十里。

子午道：谷长三百三十公里，即古之蚀中。汉王往南郑，从杜南入蚀中即经过此道，通过后，放火烧毁之栈道即指此路。

历代南北征战大都以褒斜为主要路线。傥骆和子午两道为次要通路。

项羽分封章邯为雍王，目的就是堵塞汉军北进的道路，塞王、翟王只不过起到支援雍王的作用。

雍王章邯将自己军队的主力集结首邑废丘，在宝鸡、咸阳等地各配备强有力部队，担任对汉军北行堵击的重要任务。

汉王这次进军如仍走进入汉中时的老路，那么，首先遇到的严重问题，就是要与章邯主力军战斗。是否能够一举歼灭章邯的雍军，没有绝对把握。如果塞、翟援军到达，就会更加陷于被动不利的局面。新任汉军统帅的韩信，对此已做了深思熟虑的思考，因而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战略，进而决定：

（一）派出部分兵力，督率民工明修烧毁的栈道。

（二）主力经褒斜以西故道，袭击陈仓（今陕西省宝鸡东北）再由陈仓向东进攻。

韩信预定的出乎章邯意外的袭击作战，逼使章邯被动转移兵力应战，获得了战略上声东击西的成功，不仅在当时作战中起了重大作用，还成为后人效法的军事指挥艺术。

第四，与三秦军作战序列

汉军

统帅：大将韩信

将领：将军曹参、将军周勃、陇西都尉郦商、郎中樊哙、中谒者灌婴、骑都尉靳歙、右骑将傅宽

兵力：五万人左右。

三秦军

雍军：雍王章邯

将军章平、赵贲

兵力：约两万至人三万。

塞军：塞王司马欣

兵力：约一至两万人。

翟军：翟王董翳

兵力：约一至两万。

第五，汉与三秦军作战策划

一、汉军

汉军由南郑向关中进军的战略，为明修栈道迂回故道，暗渡陈仓，奇袭关中。曹参、樊哙为先锋，韩信与刘邦率领周勃、灌婴等为本队。为保障长期作战的胜利，刘邦让丞相萧何留守巴蜀，筹集军粮器械，保障前方的供给。

刘邦为了掩护自己东进关中的作战意图，在送别张良时，即赋予张良麻痹项羽的任务。张良见了项羽即对项羽说，汉王烧了栈道，决无东返之心。待韩信攻取三秦后，张良又致书项羽说："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汉书•张良传》）。这种周密的东进作战策划，使刘邦军占据了明显的战略优势。

二、三秦军

三秦军没有统一的作战统帅部，雍军在统帅章邯统率下，担任抗击刘邦军的主要作战任务。塞、翟两军担负支援任务。

第六，进攻三秦作战经过

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汉军由南郑出发，统帅韩信改变通过"褒斜道"进军路线，转向故道，迂回雍军侧后。曹参指挥前锋部队排除雍军抵抗，攻克故道城。汉军通过故道要隘，势如破竹，迅速推进到陈仓附近，陈仓遭到汉军的突然袭击，雍王章邯才感到形势严重，准备立即出战。塞、翟两王也作出支援雍军的相应准备。

雍王章邯率军驰援陈仓，汉雍两军于陈仓附近展开战斗，章邯军以轻车骑列陈，汉军樊哙率部猛冲，一举攻破章邯军。雍王军首战失利，分向废丘（今陕西省兴平县南）和好畤（今陕西省乾县东南四十里）两方面撤退。韩信判明，往废丘撤退的为雍王章邯所率的雍军主力，退往好畤的为雍将章平指挥的一部。废丘为雍国首都，章邯久历征战，废丘城不容易迅速攻拔。若时日持久对军心士气都有影响，好畤为废丘战略侧翼，互为犄角可呼应支援，同时也可等待塞王、翟王的援军到达。章平虽然也是能征惯战之将，但兵力不大，如能攻克好畤，废丘就更加孤立。于是汉军当即决定缓攻废丘，把进攻重点指向好畤。对三秦可能到来的援军只派出一部警戒兵力。

汉军分道前进，曹参军追击章平军，于好畤城南发生战斗，章平战

败，退守好畤城待援，汉军随即围攻好畤城。当汉军正围攻好畤之时，司马欣派其将军赵贲率军驰援废丘，董翳军也向泾水地区急驰。章邯得到援军后，沿渭水西进，与汉军战于壤乡（今陕西武功东南）附近地区，两军经过激战，三秦军大败，章邯只得率败军再度退守废丘，当汉军与三秦军大战时，曹参留周勃军担任对好畤围攻。立即率所部前往迎击塞、翟军，击破三秦军后，复又转向好畤。此际樊哙军也转进到好畤与曹参等部会师。韩信赶到后，统一指挥对好畤的围攻战。樊哙率部奋勇先蹬，汉军其他各部，蜂拥登城。章平难以力战，被迫撤出好畤，向北地方面撤退，汉军则进占了好畤城。

汉军在围攻好畤时，韩信为着迅速平定秦地，当即把军队区分为攻城和略地两军，分路行动。

（一）废丘围攻军

曹参、樊哙两军担任之。

（二）三秦略地军

周勃军向汧、陇方面略地；靳歙军向陇西进攻；郦商军向北地方面略地；灌婴军相机向栎阳进攻。

曹参以樊哙率部担任围攻废丘，抽出所属部队进攻咸阳。雍军驻咸阳的赵贲和内史保等部起而应战，曹参击破其抵抗攻占咸阳，将咸阳更名为新城，后进驻景陵。支援被围废丘的塞王司马欣派主力军反攻景陵，经过激战，被汉军击破。章平等率军向漆（今陕西彬县西）败退，曹参挥军追击。此时章平军得到章邯及翟王所派援兵的加强，于漆地反击曹参军，曹参军几乎出现力不能支的局面，正在危急之时，周勃率援军赶到。

周勃军北攻漆，击破章平、姚卬部，西定汧陇（今陕西省陇县以东一带地区），还军攻克郿（今陕西眉县东北）和频阳（今陕西省富平县东北）后，即率军参加对废丘城的围攻战。

灌婴军对塞国首都栎阳进攻。塞王司马欣以主力援雍失败，同时，也由于缺乏备战措施，无力应战，只得向汉军投降。

靳歙军击破陇西方面雍军，平定陇西所属各县。

郦商军击破雍军别将周类据守的乌氏（今甘肃省平凉市境）、栒邑（今陕西省旬邑县）、泥阳（今甘肃宁县境），进而平定北地郡所属各县，在攻克北地时，俘获了雍军大将章平。

汉军分道进展，兵至上郡，翟王董翳无力对抗，向汉军投降。三秦属地基本平定，汉军转移于对废丘的围攻战。

第七，雍国首邑的最后攻克

雍王章邯退守废丘，奋力作战，汉军久攻不下，顿兵坚城。此时汉军在关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形势的发展使汉王刘邦感到必须迅速向东急进，以夺取更大的胜利。但雍国首都又不能不留强大军队继续围攻，以免发生意外，于是，刘邦迅速调整了军队部署。

韩信统率强有力军队继续担任对废丘的围攻，刘邦统率部分兵力出关扩展胜利。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六月，废丘城攻守战已经历时十个多月，章邯雍军相当顽强，不采取特殊措施。难以攻克，这时关东汉军东进又出现重大挫折，几乎全军覆没。汉王刘邦回到新占领的塞国首都栎

阳，废丘城仍然在章邯军手中。刘邦与韩信为着巩固关中军政根据地，急于迅速结束废丘城的战事。因此，决定采用引渭水灌城，乘水攻城的战术。樊哙掘开渭水河堤，引水冲击城垣，城墙崩溃，汉军乘势攻进城内。章邯见汉兵进城势不可挡，乃自杀。废丘攻克，雍国属地全部平定。至此，进攻三秦之战全部胜利结束，汉政权把雍地改建为中地、北地、陇西三个郡。

三秦战役评述

刘邦还定三秦之战，对刘邦争夺天下，战胜项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刘邦占据了三秦，拥有“形胜甲于天下”的关中地区，大大地加强了他的实力和声威，为其进兵中原，举行了奠基礼。

刘邦以不足十万之军，彻底击败三秦王之全部兵力，有着许多值得吸取的经验。

正确的决策离不开正确的慎时度势，这是刘邦军取胜的第一条经验。刘邦军在决定是否东进还定三秦这个最关键性的战略行动前，主要是对三方面的因素做了正确的分析：其一是山东子弟兵的士气可用。刘邦、韩信看到自己所率之军都是山东地区的子弟，他们“日夜企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显然，利用山东子弟这种急欲回归故里的情绪，进占关东，再东进彭城，以与项羽决战，肯定会激发起部队作战的高度积极性和自觉性；其二是关中地区民心可用。三秦王当初率几十万关中子弟东征，亡者不计其数，特别是项羽坑杀二十余万秦军的暴行和掠咸阳财宝与宫廷妇女等等做法，早已引起秦人的仇恨，及至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被封为王，更为秦人所深恶。尽管这些人都是久经沙场、能征惯战的悍将，但韩信、刘邦洞察了关中的民心，认为一纸檄文即可降服关中，还定三秦。其三是诸侯对分封不平的怨恨情绪与离心倾向可用。项羽分封不公，诸侯王之间从一就国就刀兵相见，互相吞并。刘邦、韩信等看到，乘项羽江山未稳，诸王混战之机起兵，最易取胜。假如延误时机，各方稳定下来，再行东征，就很难达成预期的战略目的。

深谋远虑，成功地隐蔽了战略企图是刘邦军取胜的第二条经验。刘邦在项羽违背怀王之约，被屈封巴蜀时，就想立即与项羽决一胜负，但为谋士所劝阻。刘邦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忍气吞声赴汉中就任汉王位。行军途中，又听从张良的谏议烧毁栈道，以向项羽宣示永不进兵关中的诚意。后来刘邦在送别张良时，又赋予张良麻痹项羽的使命。这样，刘邦从备战整军直到进军关中，都未引起项羽的疑虑，这种战略上的深谋远虑、周密隐蔽自己的作战企图的种种措施，对刘邦军的胜利无疑起了重大作用。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给三秦军以突然打击，使秦军猝不及防是刘邦军取胜的第三条经验。“谋贵用疑”，是一切智谋之将的惯用手法。他们布设疑兵，声东击西，常常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韩信以一部兵力明修栈道，实则沿汉水西上，出大散关，再渡渭水而兵临陈仓，打了章邯军一个措手不及，将其推入被动应付的境地。

这次战役秦军虽然失败了，但却证明秦军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战斗力。章平、章邯虽数战皆败，但漆地的反击、废丘的守卫战都给刘邦军造成了不小的威胁，这恐怕也出乎汉军意料之外。如果汉军不是慎重临之，战争肯定还会延续更长的时间。

第二节 安邑战役

第一，西魏的附汉和反汉

秦统一六国前，魏公子魏咎曾封为宁陵君，秦灭魏国后降为庶人。陈胜起义建张楚政权于陈，魏咎前往依附，无所建树。陈王派魏人周市北略魏地，周市略定魏地，进展到齐境内的狄地（今山东省境内）。张楚欲立周市为魏王，周市辞而不受，遣人迎魏咎于陈，五度往返，陈王才同意立魏咎为魏王，周市则为国相。

魏国重建，为时不久陈胜即告失败。秦军节节进攻，击破农民起义各部队，进兵攻击魏王于临济。魏王咎派周市分至齐、楚求援。齐王儋亲率兵救魏，楚亦派将军项它指挥楚军前来支援。魏、齐、楚三国联合军遭到秦军突然攻击，齐王田儋、魏相周市阵亡。章邯率军进围临济，魏王咎以战斗损失严重，为着城内人民不受更大的牺牲，与秦军协议投降，约定后自杀。魏王咎之弟魏豹溃围而出，逃往楚国。楚怀王拨给数千人，由魏豹率领重行徇略魏地。魏豹收复魏属二十余城，楚就立魏豹继任为魏王，管理收复的城邑，灭亡的魏国，得以重新再建。

魏豹略地恢复魏国政权，秦楚钜鹿之战，章邯降楚，项羽统率大军进关，魏王豹见大势所趋，也抽调精锐，编成新军，亲自统率，随项羽入关。分封十八王国时，由于项羽自为西楚霸王，需要魏的宋梁等地。魏国属地就划进西楚的疆域，于是把魏国移封河东，都于平阳（今山西临汾）。大约管辖三家分晋初期时的韩魏两国属地，魏国就从此称为西魏。

三秦战争，汉军在取得决定性胜后，汉王为着积极向东方发展，除留置一部兵力围攻废丘外，主力军由临晋（今陕西省六荔县朝邑镇）渡河东进，攻入魏国境内。这时西魏建立只有十个多月，魏豹没有积极作相应的战争准备，三秦战争发生，认为与己无关。置身事外，及汉军平定了三秦，大军压向魏境，魏无力应战，表示降服，并率领西魏军为汉方附庸，追随汉军向东推进。

魏王豹虽率军随汉军东进，但并未受到汉王的重视，魏豹心中不悦。同时汉王刘邦又任命彭越为魏相国，继续任其自由出兵略地，这就引起魏豹对彭越进而对汉王的不满。加之因彭城附近作战，西魏军无所建树，魏豹又受到汉王的指责和申斥，就更加深了魏豹对汉王的不满。刘邦彭城作战失败，楚骑兵乘胜追歼刘邦军及其附庸部队，魏豹被项羽楚军声势所吓倒，于是借机返回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到达国都后立即断绝河津，叛汉附楚。魏豹反汉附楚，不仅使汉军占据的荥阳。洛阳侧背受到威胁，连最近平定的三秦关中基地也受到严重的战略压力。

第二，对魏作战的起因

魏王豹反汉引起大局形势的突变。汉军彭城败后，重新编组军队与楚对峙，荥阳以东形势很不稳定，汉暂时无法抽调兵力对魏进攻。但为解除魏对汉侧背威胁，保障运输路线和关中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乃遣谋士郦食其往魏，对魏豹做争取说服工作。刘邦并许诺郦食其，如果他能说服魏豹附汉，刘邦就以魏地之万户封给郦食其。

魏豹因早已对汉王不满，同时慑于楚之强大，遂谢绝郦食其说："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耳。今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吾不忍复见也。"（《史记》卷九十，第2590页）。郦食其游说失败，回报刘邦，于是，刘邦决定派遣韩信率军准备进攻魏国。

郦食其平阳之行，虽然没有取得预期成果，但却对西魏军事重要将领有了具体的了解，为汉军攻魏提供了难得的情报材料。

汉王首先问"魏军大将是谁"？郦答："柏直"。汉王轻蔑的说："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

汉王又问："骑兵将领是谁"？郦答："冯敬"。汉王比较慎重的说："（冯敬）是秦将冯无择之子，虽贤，不能当灌婴。"

汉王再问："步兵将领是谁"？，郦答："项它"，汉王说："项它楚将，不能当曹参。"刘邦和韩信对敌我双方的将领进行分析后认为，进攻西魏确有致胜的把握。

第三，汉魏两军作战序列

汉军

统帅：左丞相韩信

步兵将领：中尉曹参、骑兵将领：中大夫灌婴

兵力：约三万至五万人。

魏军

统帅：西魏王魏豹

将领：大将柏直、步兵大将项它、骑兵将领冯敬

兵力：约三万至五万人。

第四，汉魏两军作战策划

韩信军认为，魏军为防范汉军的进攻，必然采取扼守各渡河要津，阻止汉军渡河，同时有可能向赵代等王请求支援共同抗御汉军之进攻。因而韩信决定采取速战速决战略，以奇兵突然袭取魏军之指挥中枢安邑。为欺骗敌人，达到战略奇袭的目的，决定派一部于临晋征集船只，摆出大军渡河姿态进行佯动。主力隐蔽集结于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南22里）附近，准备渡河，迂回袭击安邑。

魏国北与赵代两国相接，西有黄河天险以为屏障，安邑为河东之重要战略要地。这样魏抵御汉军的进攻，北有赵代为后盾，西据黄河沿岸的重要渡口并以安邑为指挥中枢，牢牢扼守黄河沿岸，阻止汉军渡河。魏豹、柏直以汉军原来曾由临晋渡河至河东，现发现汉军征集舟船，以为汉军又会再次由此渡河，为着迎击汉军，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增调军队，加强临晋的防御。

第五，安邑战役的经过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八月，推进于临晋河岸的一部汉军，征集船只，大张旗鼓准备渡河。魏王豹被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而主观地改变军队部署，集中力量，推进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县西南的蒲州城），企图堵塞汉军东渡黄河。因而对战略要地安邑和首邑平阳都没有留置强有力守备兵力。

韩信声东击西于临晋虚张声势，摆出大军渡河姿态，把主力隐蔽集结于夏阳附近，分乘木罂横渡黄河。渡河后，即以迅猛的行动进攻临晋

魏军之侧后，在东张地区击破魏军，旋即攻击战略要地安邑。汉军对魏战略要地的奇袭，给魏王豹以十分沉重的打击，以致仓猝间被迫转移蒲坂附近兵力以救安邑的危急。这样魏集结于蒲坂之大军，先是被置于无用武之地，后又被动回军，往返奔驰，疲于奔命。

汉军袭占安邑，立即转向从蒲坂北进魏军进攻，两军在安邑西南地区发生战斗。汉军曹参部从正面进攻，灌婴骑兵包围侧击。魏军将领项它挡不住曹参的攻击，冯敬的骑兵则被灌婴击散，魏军逐渐陷入包围。而临晋渡河经蒲坂前进的汉军又及时赶到参加战斗。魏将王襄被韩信军俘获，魏王豹率败军东走曲阳（今山西垣曲地区）再度被汉军击破，魏豹逃至东垣（今山西垣曲县）被汉军所擒，魏军全部被汉军歼灭于战场。这是汉军彭城失利后，获得的振奋军心士气的战略战役上的胜利。

第三节 潍上战役

第一，战前的基本形势

汉军在韩信统率之下，自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九月至汉高祖三年十月的两个多月时间之内，先后击败魏王豹，略定代地，夺占赵国，不战而迫降燕王臧荼，使汉军从北和西北两个方面构成了对楚的战略包围，支战场北方的作战形势对汉军极为有利。

但是，在此期间，于主战场作战之刘邦军却屡遭惨败，刘邦军几度被项羽军追歼驱赶，形势十分危急。汉高祖三年六月，楚攻拔荥阳，进围成皋，刘邦眼看即被项羽擒获，最后将军纪信假扮刘邦诈降项羽，项羽军中计，刘邦才得以逃脱，刘邦率少数从骑奔往韩信，张耳小修武（今河南省修武县东四里）营中。

在韩信破魏、代、赵燕期间，项羽军在主战场作战中南冲北突，节节胜利，打得刘邦军已近乎无还手之力，特别是以楼烦为主力的项羽骑兵部队更是所向披靡，锐不可挡。但是，韩信在北方的胜利，却使项羽十分忧虑，因而，在韩信破赵以后，项羽虽曾几次派兵北渡黄河袭击韩信军，以便稳住西北地区，牵制韩信的兵力，但因为时已晚，失掉战机，未起重大作用，致使西北地区战场形势江河日下，终于使代、赵、燕地完全落入汉军之手。

第二，潍上战役的起因

刘邦、项羽在主战场争夺成皋，荥阳半年多的作战中，荥阳成皋数次告急，韩信未采取更加积极的作战行动，直接策应主战场之作战，刘邦对此已表示不满，及至韩信军推进到修武，仍按兵不动，刘邦又在荥阳、成皋连续败退，就更殷切盼望韩信率军解救燃眉之急，因而，刘邦逃至修武之后，即急驰韩信、张耳军营，夺韩信印信兵符，欲亲调韩信，张耳之军征伐项羽，同时申斥了韩信、张耳。这无疑在刘邦，韩信之间的关系上埋下了阴影。

刘邦为更好地全面照应主战场和支战场的作战，拜韩信为相国，以统率赵军进攻齐地。以张耳为赵王守备赵地，为主战场作战征发士卒粮草，源源支援主战场的作战。

齐王田广在楚汉两强相争之中，于彭城大战前依附于刘邦，彭城之战刘邦战败后，即又与项羽媾和，依附于楚。刘邦为了彻底征服齐地，从北和东北方向对项羽构成战略包围，故决定对齐出兵作战。

第三，潍上战役的序幕韩信破齐

汉与齐楚之间在未发生潍上决战之前，曾首先发生了韩信破齐之战。韩信破齐之战的战场在今济南市、历城县一带地区。这一地区位于泰山山脉与济水相隔的狭长地带，山水相依，地形复杂，自古以来即为齐国的战略要地。

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六月，刘邦夺取韩信、张耳兵符印信后，即命韩信东向破齐。齐王田广得悉汉军进攻的消息，即调集全国的兵力，号称二十万大军驻于历城、济南一带地区，积极备战，准备与韩信军决战。

刘邦谋士郦食其对汉军攻齐提出了不同建议，郦食其认为北方燕赵已经完全平定，唯有齐国未下，不必强攻，应通过游说，迫使齐国屈服。他建议刘邦说：“齐王田广占有千里之广大土地，齐相国田横调集二十万大军于历城，田氏宗族统治的地区背靠东海，前有河济阻隔，南近楚地，且齐人诡诈多端，虽发数十万大军，未必能在年内将其攻破。不如下书诏降齐王。”刘邦同意郦食其建议，遂派他出使齐国，诏降齐王。

郦食其至齐见到齐王后，首先就楚汉双方的优劣形势对比，说明汉强楚弱，楚必为汉败的道理。郦食其指出：汉占据敖仓之粟，据有成皋之险，守白马津，且有太行山之屏藩。楚军已不能西进。燕赵之地已尽为汉有，齐楚则无法与汉优越的形势相比。郦食其进而威胁齐王说：“后服者先亡”。如果齐国能够早些向汉王降服，则齐国定能保全，如若不然，齐国的危亡就在眼前了。齐王田广认为郦食其的分析颇有道理，立即答应叛楚附汉，并命令撤除历城附近的戒备。

韩信正率兵向东进发，大军尚未渡过平原津（今山东省德州市南），忽然得知刘邦已派郦食其说降了齐国，韩信想停止前进。但谋士蒯通却建议韩信不要停止进军。他对韩信说：“将军奉命进攻齐国，而刘邦自己又派谋士去说服齐国，难道他又有命令要你停止前进吗，既然没有，就应该前进。况且郦食其这个人，凭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一下降服齐国七十余座城邑，将军率领数万部队，血战一年多才攻下赵国五十多座城邑，身为将军多年，反而不如一个见识浅陋的人功劳大吗？”韩信觉得蒯通言之有理，于是接受了他的建议，渡过黄河继续东进（原文见《史记》卷九十二、第2620页）。

齐国因已与郦食其商定归附汉王，就解除了对汉军的戒备。这时韩信大军已迫进历城，以突然袭击的行动，歼灭了齐国历下（即历城县）的部队，并乘胜攻克齐国都临淄。齐王田广以为郦食其出卖了自己，于是将郦食其煮死。田广遂败退高密（今山东省高密县东南），派人请求楚王援救。韩信攻占临淄后。向东追击田广，到达高密以西地区，楚王派出其大将龙且，率领二十万人马，前来援救齐国。

龙且是一位不久前击破九江王英布、进古寿春等地的颇负盛名的楚军将领，他统率大军援齐，动作迅速，很快进入战区，并与齐王田广等军在高密会师，楚汉两军的潍上决战即将展开。

第四汉和楚齐军的作战序列

汉军

统帅：相国大将军韩信

幕僚：辩士蒯通

将领：左丞相曹参、御史大夫灌婴、右骑将傅宽

兵力：五万至十万人。

楚齐联合军

（一）楚军

统帅：大将龙且

亚将周蓝、末将项冠

兵力：约二十万。

（二）齐军

将军：田既

华无伤

兵力：约五万人。

第五，汉楚齐军的作战策划

汉军由韩信统率，本欲在济南历城一带与齐军大战，但由于郦食其说降了齐王田广归附汉王，齐王田广放弃了对汉军的戒备，韩信即利用此一良机，以对齐军实行突然奇袭取得了初战的胜利。但由临淄推进到潍水以西地区时，即得知了楚大将龙且二十万大军已与齐军会师，兵力大大优于汉军，两军隔潍水对峙，韩信军对潍上决战做了如下策划：

（一）派兵于潍水上游，沉放大量沙袋，以堵塞潍水。到一定时间掘开沙袋放水，以水阻隔和淹没楚齐联军；

（二）以主力军于潍水西岸待机，随时准备进击被阻于西岸之敌军；

（三）由韩信亲率主力军，乘潍水水浅之时渡河攻击楚军，引诱楚齐军出击，追击汉军至西岸。

齐军在经过韩信军突然袭击后，二十万人军已七零八落。齐王田广败退高密，相国田横败走傅阳（年山东省泰安市境），将军田既退守胶东（今山东平度县境），守相田光败走城阳（今山东即墨县境）。面对齐军的这种形势，齐王广只能调集附近军队，等待已散败的军队重新集结于高密，以便与楚军协同作战。

楚军有素养的将领向龙且建议说："汉军远征，其锋锐很难抵挡。齐、楚联军在家乡附近作战，士兵会很容易逃亡。不如坚壁待机，让齐王派人去告知所有被汉军占领的城市，这些城市得知齐王还安在，并且楚军也来救援，必然群起而反抗汉军。这样，汉军深入两千多里作战，齐国城邑都起来反抗，汉军就根本无法获得粮食柴草，那就可以不战而迫降汉军了。"（原文见《史记》卷九十二、第2620页）。

但是，龙且听不进这些正确的作战主张，自认为韩信不过是一个平庸之徒，很好对付，并且好大喜功地说："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史记》卷九十二），遂坚持与韩信军决战。

第六潍上战役作战经过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十一月，韩信为了利用潍水阻隔与分割楚齐军，按照预定的作战策划，利用夜暗，派兵携带大量沙袋，于潍水上游堵塞水流。命令部分汉军乘水位降低之机，涉过潍水，向楚齐军进攻。龙且见汉军来攻，立即挥军迎击，经过交战，汉军佯装战败，退回潍水之上。龙且见状喜形于色地对众将说："固知信怯也"（《史记》卷九十二），遂命令部队渡水追击汉军。

韩信见龙且指挥楚军涉渡潍水，于是命令按计划掘开上游之沙坝，河水急流而下，龙且军被河水分割为东西两个部分。主力军全被阻于东岸，无法继续渡河。此时汉军机动部队乘机出击，反击楚军。龙且被曹参军斩于阵前，楚亚将周蓝被灌婴俘获，汉军将潍水西岸的楚军全部歼灭。

停留于潍水东岸的楚军见西岸楚军惨败，遂立刻溃散，韩信军乘胜急渡潍水，追杀楚齐败军。

韩信亲率大军追败军至城阳（今山东省即墨县），俘获齐王田广；

灌婴率骑兵追击并俘获了齐守相田光；曹参率军向胶东进攻，击破齐军。斩杀了齐将田既。

齐相国田横得知齐王田广被汉军擒杀的消息，即自立为齐王，与前来进攻的灌婴军战于嬴下（今山东省泰安市境），田横军战败。率败军奔往梁地，投靠彭越。至此，齐地已全部为韩信军平定。

第七潍上战役后双方的动态

韩信平定齐地后，便派人向刘邦请求封自己为齐之假王。这时，正值项羽军围困刘邦于荥阳之际，刘邦听完韩信来使的请求后，立即大骂道："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史记》卷九十二）谋士张良、陈平见刘邦怒，急忙踩了一下刘邦之足，并悄声对刘邦说："现在形势对汉军十分不利，阻止韩信当王恐发生变故，不如将计就计，就立韩信为齐王，以便使他安心防守齐地。"刘邦领会了张良、陈平的意思，随即又改口骂道："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就应当成为真王，何必要做假王。"（原文见《史记》卷九十二）。于是即派张良去齐立韩信为齐王，并征发韩信之军进攻楚。

韩信率劣势之军，继平定代、赵、燕地之后，又在短短数月之内平定齐地，特别是潍上战役，一战而歼灭项羽二十万之众，并斩杀了项羽大将龙且。韩信之名已威震天下，韩信的势力，在刘邦、项羽之间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此，项羽急派盱眙人武涉去韩信处游说，劝韩信背汉并与楚合作。武涉见了韩信后说："秦朝被击破后，按照功劳大小，割地封王，安定天下，休养生息。现在汉王突然又发兵向东方进攻，侵掠别人的封地，已经灭亡了三秦，又引兵出函谷关，征服诸侯并强编诸侯之兵再东向进攻楚地，看来汉王的意图是非全部吞并天下不可，他贪得无厌已达到极点"。武涉接着进一步指出，刘邦决不会放过比他强的人，定会将他们一个一个消灭掉。武涉说："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擒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於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史记》卷九十二、第2622页）。韩信想到过去自己曾在项王手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的往事，谢绝了武涉的劝告，并请武涉代谢项王的好意。

谋士蒯通也深知当今天下大局之关键在于韩信，因而苦苦相劝韩信不要依靠和相信刘邦，要自立为王，三分天下，才是万全之策。蒯通以相人之说劝告韩信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韩信问其中之意，蒯通继续说："楚人起彭城，转斗逐北，至於荥阳，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於此矣。汉王将数十万之众，距巩、雒、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夫锐气挫於险塞，而粮食竭於内府，百姓罢极怨望，容容无所倚。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两主之命县於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

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疆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疆，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於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熟虑之。”（《史记》卷九十二）。

蒯通为了彻底说服韩信，还引述张耳与陈余，范蠡、文种与越王勾践等人的经历和遭遇告诫他再思再想。蒯通说：自古以来“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蒯通说：“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史记》卷九十二）

几天以后，蒯通又复劝韩信当机立断，脱离汉王，否则将失掉天赐之良机，悔之晚矣。蒯通引用古人之话说：“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局躅，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聋之指麾也。”蒯通最后说：“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史记》卷九十二、第2625页）

韩信始终认为汉王对他甚厚，不忍心背离刘邦。同时自信为汉王立了许多战功，刘邦不会忘恩负义而剥夺他的王位。遂谢绝了蒯通的劝告。蒯通见劝说韩信无效，假装疯癫而去。

楚军战败后，逃散于山东南部一带，后又重新集结起来。韩信既已决定继续辅佐刘邦与楚军作战，于是指挥军队南进。灌婴的骑兵击败楚将公杲，直达薛郡（今山东省滕县南），再胜楚军，继之推进至淮水南北地区，攻占项羽家乡下相（今江苏省宿迁县西），连克附近各县邑，又渡过潍水进至广陵（今江苏省江都县境）。面对韩信军的袭击，项羽命项声、薛公等至淮北，灌婴之骑兵遂也渡淮北进，击败项声所部，后再与楚军战于平阳（今山东省邹县），并一度进袭彭城等地，对项羽的后方地带造成了重大威胁。

潍上战役评述

楚汉之间的潍上战役，虽然不是主战场的正面作战，但对双方的战略全局却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汉军由于潍上战役的胜利，进一步从北面与东北面对项羽形成了战略包围，这一包围态势置项羽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使西楚失去了北方的屏障，直接威胁着项羽大本营彭城的侧背安全，使项羽如芒刺在背。

潍上一战，汉军歼灭了项羽二十万大军，而且斩杀了楚军名将龙且，这对项羽军的军心斗志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打击。项羽也由于龙且的被杀十分惊恐，已经感到依靠自身的力量将难以战胜刘邦和韩信两大集团，于是想通过外交游说拆散刘邦韩信的联合。一贯极端自负、刚毅不屈、坚信以武力征服一切的项羽，这时竟然想通过外交游说获取战场上难以得到的东西，可见他当时的处境已经到了何等岌岌可危的程度，这无疑反映着项羽心理上的重要变态，楚汉战争的结局由此已经有端倪可察了。

潍上战役韩信军的胜利，还严重地破坏和威胁着项羽军的后方供应。鲁南和淮河南北地区一向为项羽军的粮食供应基地，但三齐为韩信

所占，淮河南北也朝不保夕，使项羽大军的粮草供应已大有枯竭之感，这就不能不给予楚汉战争的发展以决定性的影响。

骄兵必败已是战争的基本规律。楚将龙且由于多次作战的胜利，尤其是新近又战胜九江王英布，更加轻视韩信，不对汉军和韩信做基本的分析研究，也不侦察了解敌人的作战意图，便轻率出战，导致二十万优势大军的兵力，毁于潍水一战的可悲下场，这其中的教训实在值得人们深思。

第八部分 楚汉战争主战场作战

楚汉战争的主战场，汉方由刘邦统一指挥；楚军由西楚霸王项羽统率。双方经过的重大战役有三次：

彭城战役：发生于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四月。刘邦以五十多万大军，进占楚首邑彭城，楚军以三万神骑迂回彭城，一举歼灭诸侯军二十万，刘邦军几乎被全部歼灭。

成皋战役：发生于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四月。双方以争夺战略主动权为目的，对荥阳、成皋展开反复争夺。至楚汉四年双方形成对峙。

垓下战役：发生子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一月。这是楚汉双方最后一次战略决战，韩信以三十万大军战胜项羽九万之众，项羽军被彻底歼灭，项羽自刭乌江，刘邦取得了楚汉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一节 彭城战役

第一，彭城战前之形势

项羽分封诸侯时，将各地划分为三齐，即齐、胶东、济北三国，并以田都、田安、田市分别为齐、济北和胶东三国之王，但是，对于齐国之实权人物田荣和田横则未能封王，于是引起了三齐内乱。经过互相攻杀，田都逃往楚国避难，田安被田荣策动彭越而攻杀，田荣又亲自将田市斩杀于胶东国首邑即墨，田荣终于自立为齐王。三齐政治上的动乱，激起由于分封不公的一些诸侯反项羽的情绪，使项羽分封诸王侯时的极盛局面遭到破坏。田荣称王后，即派出兵马支援陈余，驱除了常山王张耳，恢复了赵国，齐赵两国遂形成了联盟。

在此时期之内，汉王刘邦进军关中，袭取了三秦，项羽知悉关中的情况后，十分焦急。是北攻三齐，还是西进关中，逼迫项羽必须立即做出战略决择。正在项羽举棋不定之时，张良按照与刘邦的预谋，对项羽说："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同时以齐王田荣反对楚国之言行也告知项羽。项羽遂解除了怕刘邦继续东进的疑虑，而决定发兵北攻齐地。

项羽的决定，实际上既是上了刘邦张良的谋略圈套，也是失于对张良情况的深入了解。张良家族五世相韩，楚灭亡了韩国，而张良辅佐的韩王成，又被楚所杀，这些情况，都是促成张良憎恨楚王的深刻的思想渊源。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一月，楚军攻入齐境，推进到城阳（今山东省即墨县），齐王田荣率军迎击楚军，两军立即在城阳附近展开战斗，田荣的齐军未经过重大战争的考验，自然无法与项羽亲自指挥的大军相匹敌，因而，齐军迅速溃败，田荣撤退到今山东平原县境时，被平原人打死。齐王既死，项羽复立在楚避难的田假为齐王，楚军乘胜攻略齐地。

楚军由于军纪不严，所经过之地区，烧杀抢掠，击杀降将降卒，从而引起齐人的愤慨，纷纷起而反抗楚军。齐王田荣之弟田横收编数万败兵，乘楚军向北海地区推进期间，以城阳为基地，展开敌后反击作战，并取得一定战绩。四月，田横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重建齐政权，在更大范围内对抗楚军。齐军由于得到齐国广大百姓群众的支持，使项羽军深陷齐境，难以很快取胜。这时项羽又得悉刘邦已率军东进，发展神速，对楚已构成重大威胁，但是项羽此时并未正视大局的变化，从而采取重大决策，结束对齐战争。

第二，彭城战役的起因

刘邦夺取了三秦的绝大部分地区后，鉴于项羽率军深陷齐境，齐赵两国也出现联合对楚的局面，认为进军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必须抓住战机立即行动。于是刘邦决心加快平定三秦尚未夺占之地区，一方面减轻百姓租税负担，安抚关中父老，巩固关中的地盘；一方面则陆续派兵出关东进。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十月，刘邦率汉军进至函谷关一带地区，以兵威迫降河南王申阳，将申阳辖地设置为河南郡。接着刘

邦命令韩太尉韩信攻伐被项羽封为韩王的前吴郡令郑昌，郑昌无力抵抗，也降归汉王，刘邦遂立韩信为韩王。

当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三月，三秦战争已只剩废丘的围攻战时，刘邦就将关中的战争全部交由韩信指挥。自己率领灌婴、曹参等部将由临晋渡黄河，西攻魏王豹。魏豹未作抵抗，即归附刘邦，随即协同刘邦军一起向殷王司马卬进攻。汉军的神速进军，完全出乎司马卬意外，加之殷国事先又疏于战备，临时仓猝应战，一经交手也告失败，司马卬遂归降刘邦，汉军以破竹之势，胜利地进占河内广大地区。

殷国被刘邦占领后，形势本已十分严重，但项羽仍陷于齐地之战争中，汉王抓住时机，又由平阴津（今河南省孟津东）南渡黄河，进到洛阳东七十多里之新城地区。然后即向彭城推进。项羽在得知刘邦进袭彭城后，随即率兵迎击，于是展开了彭城会战。

第三，楚汉两军的作战序列

楚军

统帅：西楚霸王项羽

将领：范增、季布、钟离昧、项声、龙且、周蓝

兵力：三万余人。

汉军

统帅：汉王刘邦

将领：张良、灌婴、周勃、樊哙、曹参、夏侯婴、靳歙、陈平、郦商

诸侯军

塞王：司马欣

翟王：董翳

魏王：魏豹

殷王：司马卬

河南王：申阳

兵力：共五十六万人。

第四，楚汉双方作战策划

彭城即徐州，城邑四周虽被大小不等的丘陵。高地所环绕，但交通却十分发达，又有泗水、睢水流经县境，是东西南北交通之要冲，自古以来即为东方之重要战略城邑，彭城周围地区是大兵团交战的理想战场。

项羽得知刘邦进占彭城的消息后，立即选拔精锐骑兵三万多人，以突然迅猛的远程奔袭，迂回彭城以西，切断汉军西退之路，将汉军包围歼灭于彭城地区。

刘邦乘项羽率军攻齐；彭城空虚之机，率各路诸侯，以绝对优势之兵力进占彭城，捣毁项羽的根据地，进而歼灭项羽之军。

刘邦为使自己师出有名，在进到洛阳新城时，接受了董公“顾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力贼，敌乃可服”的建议，以讨伐项羽杀害义帝为名，进行了周密策划。刘邦亲自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哀临三日”，装出悲痛欲绝的样子，制造舆沦，收买人心。刘邦为争取各诸侯，还派出使者通告各诸侯说：天下都共同拥戴义帝，尊敬朝廷，但项羽却违背民心，放逐义帝并将义帝杀害于江南，大

逆不道。汉王刘邦亲自为义帝发丧，全军白衣素装，带关中全部兵马，率三河之士（河东、河内、河南），愿意同各诸侯王一起，共同起兵讨伐杀害义帝之人。刘邦仿了这样的策划之后，才开始发兵东进。

第五，楚汉双方的作战部署

刘邦军按照预定的作战策划，决定了以下的主要部署：

（一）刘邦军，分三路大军向彭城进发：刘邦率张良、陈平、夏侯婴、靳歙、卢绾和河南王申阳、韩王信，司马欣、董翳、设王卬等诸侯军为中路。常山王张耳，魏王豹等也随同刘邦军行动。将军薛欧、王陵、王吸为向彭城进攻之南路军。曹参、灌婴、周勃、樊哙等率领北路军。

（二）韩信继续率军围攻废丘之章邯军。

（三）萧何镇守栎阳，仍负责前线部队之人力，物力的补给。

项羽军为防备汉军之东进，在进入齐境作战前后即做了一些战略上的部署，对黄河沿岸，定陶、中牟、太康、淮阳等地均布设兵力重点防守，彭城也留有一定兵力守备。

在刘邦军进占彭城等地后，项羽军又根据刘邦军进驻彭城附近地区的情况，决定以主力迂回彭城以西，截断汉军西撤的道路，一举将刘邦军歼灭于彭城以南地区。

第六，彭城战役的作战经过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四月，刘邦率领大军，分南北中三路开始向彭城及其周围地区推进。南路军进占今河南太康地区后，继续向苏北方向进击。北路军自围津（今山东省东明县境）渡过黄河，一部进到煮枣（今山东省菏泽地区），曹参则率领另一部大军击效楚将龙且、项它，占领定陶，再继续前进，攻占了胡陵（江苏省沛县北五十里有胡陵城）。刘邦所率之中路军，先攻下曲遇（今河南省中牟县境），进至外黄（今河南省杞县境）。此时彭越率领三万人马与刘邦相会。进而又向砀萧地区进军，顺利攻克该地，随即进驻彭城。

刘邦占领彭城，以为项羽老巢已被拔除，对项羽迅速回击的可能性估计不足，疏于戒备，整日在项羽宫内与美女大臣饮酒作乐，欢庆胜利。这时刘邦将五十余万大军布防于今山东之枣庄、曲阜、邹县，江苏省之沛县，安徽省砀山等地区。既无迎击项羽军可能回击彭城的战略计划，也未做相应的作战部署。

项羽得知刘邦军进占彭城消息后，十分焦急，决计将齐国战争的指挥权移交给部下，迅速回击彭城的刘邦军。项羽亲自挑选精锐骑兵三万余人，由鲁南向彭城方向急进；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四月，项羽率军经鲁地将樊哙军击败于瑕丘，即急驰胡陵，乘夜暗再围萧邑，拂晓时突然发起攻击，汉军遭到意外的突击，仓惶向彭城方向逃走。项羽挥军追至彭城，与汉军展开大战，汉军对项羽军的突然袭击，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自相残踏，乱作一团，被项羽军于彭城近郊斩杀十余万人。汉军纷纷向南溃逃，刘邦企图在吕梁山地区利用有利地势组织抵抗，但项羽军猛烈追杀，锐不可挡，刘邦只得继续败退。项羽军将汉军追到今安徽宿县灵璧城东睢水上，再斩杀汉军十余万，刘邦军跳入睢水溺亡者不计其数，睢水竟被阻塞断流。项羽军将刘邦及其残部包围了三层，正在聚歼之际，忽然西北大风猛袭而来，飞沙走石，树木被拔起，

房屋被掀翻，一时之间天昏地暗，吹打得项羽军阵营混乱，刘邦趁此机会，仅带十余骑兵突围而逃，彭城一战，使刘邦遭到起兵以来最大的惨败。

刘邦在突围之后，先至沛县以图安抚家室再行西逃，但因家属已先逃，未得相见。在西逃中，遇见其子孝惠，其女鲁元，刘邦即将子女载上车同逃，但楚军紧紧追来，刘邦伯被楚军追及，三次把子女推下车去，但三次都被夏侯婴救起。刘邦的岳父及妻子吕后被楚军俘获，刘邦被楚将丁公追及，向丁公求饶后，丁公将刘邦放走。由此可见，刘邦彭城失败之狼狈状况。

第七，双方战后的动态

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五月，刘邦率领残兵败将退至荥阳。此时，各诸侯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殷王司马卬混乱中挤压而死，河南王申阳下落不明，魏王豹见汉军大势已去，借探视亲人之病返国，断绝河津，反汉附楚，翟王司马欣和塞王董翳也叛汉降楚，陈余发现张耳并未被杀，知道刘邦骗了自己，也借此反汉，与楚媾相。

萧河得知刘邦军败，即刻动员征发关中老弱和少年参军，以韩信统兵急驰荥阳救援刘邦。周勃，灌婴等人也率残兵陆续返回荥阳，汉军又得到恢复，才将大局形势稳定下来。

项羽军乘胜追至荥阳地区后，本可一举歼灭刘邦军，但由于韩信援军赶到，反击楚军取胜，遂阻止了楚军的推进，保住了战略重镇荥阳。

彭城战役评述

楚汉两军之间的彭城大战，是楚汉战争主战场项羽、刘邦亲自统率军队的第一次较量。这次战争，项羽以三万精兵大败刘邦五十六万军队，主帅刘邦几乎被项羽生擒，这构成了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绝对劣势之军战胜强大之军的奇迹。

项羽军在彭城之战的胜利，对改变楚汉两军的战略态势都至关重要。汉军攻占彭城后，已处于极为有利的战略地位，只要再接再厉，以高度的戒备状态，积极寻求与项羽军决战，是有可能夺取更大胜利的。但却疏于戒备，导致惨败。而楚军则因此军威大振，将汉军赶至荥阳以西地区，夺得了主战场作战相当大的主动权，楚军的胜利最重要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战略指导上的雄才大略，英勇果敢是项羽军取胜的第一个因素。当刘邦以五十六万大军进占彭城之时，也正是项羽深陷齐境战争，进退维谷之际。项羽明知自己两面作战，且都城已被刘邦重兵占领，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但他毅然决定将齐境作战交由部将指挥，自己仅率三万骑兵突袭五十多万汉军。这又一次证明项羽既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勇士，更是雄才大略、坚毅果敢、英勇无比的优秀统帅。刘邦长时期谋划的东进之战，在项羽一击之下，即冰消云散的事实，更突出了项羽的这种统帅才能和可贵的气质。

奇兵突袭，出敌意外是项羽军取胜的第二个因素。项羽率三万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迂回彭城，打了刘邦军一个措手不及，使刘邦军来不及组织抵抗，即告溃败。项羽军乘胜追杀千里之遥，刘邦二败再败，几乎全军覆没。这再次说明善出奇兵，骤然临之，常可以获取巨大的成果。可以设想，假如不是韩信率兵及时赶至荥阳地区，阻止了项羽

军的追杀；如果项羽军部将丁公不放走刘邦，那么楚汉战争以后的发展和结局，则很可能又当别论了。

以精锐骑兵为主体，充分发挥骑兵快速突击的特长是项羽军致胜的第三个因素。项羽所率之骑兵系以楼烦骑兵为主体，马匹精良，久经沙场，勇猛异常。这些骑兵过去在蒙恬统率下对匈奴作战，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作战经验，以这样凶猛强悍的骑兵对付刘邦的步兵车骑，虽居于数量上的绝对劣势，但在每一个局部作战地区，则很可能形成相对的优势，因而项羽军能够千里冲杀，所向披靡。

楚国实力雄厚，且在楚国本土作战，人和、地利的优势是项羽军取胜的第四个因素，项羽虽率领大军在齐国作战，彭城被刘邦占领，但楚国地域宽广，楚之民心无疑仍倾向项羽。因而，项羽大军兵锋所至，刘邦军自然也就无可靠之依托，军资供应也难免不发生危机，势必影响刘邦军之军心斗志。

第二节 成皋战役

第一，成皋战前楚汉双方之形势

楚军在项羽统率下，连续追杀汉军至荥阳地区，项羽的大军，逐渐向荥阳地区集中。虽然被韩信之援军阻止，难以越过荥阳继续西进，但却控制着战场的主动权，总的形势对楚军有利。

刘邦自彭城惨败之后，各地诸侯又附楚叛汉，形势大有急转直下的趋势。刘邦到达下邑，即向他的臣下问道："我愿意划出函谷关以东的土地，封赐给能帮我打败楚国的人，谁可以与我共同完成这一事业？"张良回答说："九江王英布，是楚国最勇健的将领，他现在又与项羽有隔阂。彭越在齐国的帮助下，又返回梁地活动，可急速派人去联络这两个人。汉王的将领，只有韩信可以担任独当一面的重要任务。如果要让出关东的话，让给这三个人，就可以攻破楚国。"刘邦又问："谁能为我充当去九江的使臣，说服英布发兵背楚？"谋士随何说："请派我去九江。"刘邦立即应允，并派二十余人，随同随何前往九江，随何临行前刘邦对他说："你能说服九江王英布，让他发兵向楚军进攻，项羽的军队必然要与英布作战，这样能牵制项羽军数月，我必定可以夺取天下了。"刘邦在派人去说降英布的同时，也派人去联络彭越。刘邦做了这样的部署，就使项羽的腹心地区出现了难以预测的危机，使形势朝着有利于己的方向转化。

刘邦败退荥阳，正在危急之时，韩信的援军到达，于荥阳东南京，索地区，指挥中大夫灌婴和原秦军骑兵将领李必，骆甲率须的步骑兵联合部队，击破了楚军的追击部队。汉军在阻止了楚军的追击部队后，邵绍织力量构筑甬道，北连黄河，搬运敖仓粮食，以供军队作战的需要，刘邦对后勤供应方面的部署，看来也对扭转大局形势提供了重要的物资条件。

第二，楚汉双方的作战序列

楚军

统帅：西楚霸王项羽

谋士：历阳侯范增、武涉

将领：大司马曹咎、长史（前塞王）司马欣、将军季布、将军钟离昧、将军龙且、将军项声、将军终公

总兵力：十五万至二十万人。

汉军

统帅：汉王刘邦

成信侯张良、护军中尉陈平、广野君郦食其、谒者随河

将领：将军夏侯婴、将军周勃、将军樊哙、中大夫灌婴、淮南王英布、御史大夫周苛、都尉郦商、将军刘贾、楼烦

总兵力：八万至十万人。

第三，楚汉两军作战策划

楚军西进行动被阻止于荥阳地区后，项羽仍积极策划西进之策，除大力巩固自己的后方外，着力争取一切力量。突破汉军荥阳成皋防线，

杀进关中，彻库消灭刘邦势力。为此，楚军采取以下几项策：

（一）拒绝汉方提出的割荥阳以西归楚的求和建议，从各方面加紧西进的准备。

（二）派遣使臣去说服九江王英布，出兵武关西击关中。

（三）与赵齐订立和约，稳定楚北、东北和西北方向的局势，进而争取联合对汉。当项羽率军撤出齐境，南下彭城迎击刘邦军时，虽然项羽曾将与齐国战争的指挥权交由部将指挥，但楚军支持的田假军被田横击败，田假逃至楚军营中，项羽为与齐约和，按照田横的要求，斩杀了田假，这样齐赵两国遂与楚又联合起来以对付刘邦。

（四）由项羽亲率大军进攻荥阳，切断刘邦运粮甬道，造成汉军的供应困难，再进而夺取成皋，西出函谷关，与从武关进入关中的英布军会合。

汉军放退荥阳后，刘邦决意以张良等人的建议为基本作战设想，将荥阳、成皋做为最终的退却线，全力巩固此一重要战略地区，掩护关中根据地，以便得到兵员和粮食的可靠供应，为此，刘邦军也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以主力军在正面牵制楚军，坚决阻止楚军继续西进。

（二）派遣使者立即去联络彭越，让彭越率兵袭击楚国后方，破坏楚军的供应线，置项羽军腹背受敌的困境。

（三）派人争取九江王英布背楚降汉，使项羽军更加孤立。

（四）加强关中的守备，为防止项羽攻占荥阳、成皋后直趋关中，刘邦亲回关中部署防卫力量。对一些重要关口和通道派兵固守，诸如武关、峣关、函谷关、临晋关等等。

（五）为从北方对楚构成战略包围，牵制项羽的兵力，派遣郦食其游说魏王豹背楚附汉，进而再争取齐赵共同对楚作战。

第四，成皋战役的作战经过

成皋之战，开始于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四月末，持续到汉高祖四年十月，双方在此时期之内，进行了许多次大小规模不等的交战，除各自力求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之外，对策略和谋略的运用也相当出色。这次战争，概括起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楚之战略进攻，汉之战略防御

楚军追杀汉军至荥阳地区后，本想乘胜继续西进，但却被韩信援军阻止，楚军为组织西进关中的力量，一方面稳定了楚之后方，一方面派使臣去九江联络九江王英布。先前在项羽率兵击齐时，曾命九江王英布发兵同往，但英布假称身体有病，拒绝征齐，仅调给项羽四千人。后来刘邦攻占彭城，英布又按兵不救，坐视彭城失守，项羽虽因此对英布有所怨恨，但认为英布向为楚之名将，骁勇善战，项羽所封诸王，只有英布未曾叛楚。这次要继续对刘邦军进攻，打进武关，不可没有英布的力量参加，因而，楚之使者一到九江，即对英布进行说服工作。

刘邦退至荥阳后，即按照预定的战略企图，力图分裂项羽的力量，破坏项羽后方的安定，一方面派出人员去联络彭越，一方面派随何出使九江，说服英布背楚附汉。随何正好与楚使同时到达九江。随何欲见英布，英布开始只派大臣出面，后经随何再三请求，英布才接见了他，随何见到英布后，极力向英布陈述汉强楚弱，汉必夺取天下的道理，同时

挑拨项羽与英布之间的关系，说英布不救彭城，早已经引起项羽的愤恨，项羽不会宽容这种行为。同时随何还以汉王取得天下之后，必定以更大的封地给予英布为诱饵，说服英布立即归汉。英布虽然觉得随何之言，甚有道理，但由于楚使也正在做他的说服工作，一时之间难以决断。后来，随何乘英布接见楚使者的机会，强行晋见英布，并当着楚使之面宣称：“九江王已归汉”，不会再发兵击汉。随何并对英布说：事情已定，应杀掉楚之使者，立即率兵附汉。英布遂按照随何的建议，杀了楚使者，而举兵叛楚。项羽得知英布背楚附汉的消息后，即派大将龙且、项声进击英布，经七个多月的作战，英布战败，逃走归汉。

英布这股重要力量，由于刘邦军施展谋略的结果，不但从项羽营垒中分裂出来，还拖住了项羽相当一部分兵力长达七个多月之久。这对项羽战略进攻的力量，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削弱。而对刘邦稳定战略防御态势，减轻主战场的压力，争取成皋之战的胜利，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刘邦军自彭城撤退荥阳途中，原已占据的地区，又纷纷背汉归楚，对刘邦稳定防御态势也甚为不利，于是刘邦先后命曹参率领樊哙、灌婴等部平定了燕（今河南省汲县境）、外黄（今河南省杞县境）、雍丘（今河南雀杞县境），昆阳（今河南省叶县）、衍氏（今河南省新郑）等地。这些地区的平定，对刘邦防守荥阳、成皋地区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十二月，项羽军进攻荥阳，数度攻破汉军运粮甬道，汉军的粮食供应受到很大威胁，军心有些恐慌，汉王刘邦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力量，目前尚难以与楚军决战，稳定现有防御态势也很吃力，如果项羽军再继续猛攻下去，汉军将难以守住荥阳、成皋。刘邦这时与部将商议对策，如何稳住战略防御形势。

郦食其建议为了孤立项羽，壮大汉之势力，应采取分封原六国之后的措施。郦食其认为秦灭亡六国之后，使各国无立锥之地，汉王如能复立六国之后代，赐予印信，原六国的君臣百姓必定深深感激汉王之恩德。愿归附汉王而称臣。汉为德义之主，必能称霸于天下。这样，由于大势所趋，楚也只得称臣来朝。刘邦采纳了郦食其的建议，遂令人立即刻制印件，并拟派郦食其为使者代表刘邦去分封六国之后。张良晋见刘邦时，听说此事后，极力反对，认为如若按郦食其的意见去办，争夺帝业必然难以成功。为此，张良详细陈述了不能复立六国之后的道理，认为有八条理由不允许封立六国之后，《史记》卷五十五对此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张良：“昔者汤伐桀面封其后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

刘邦：“未能也。”

张良：“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纣封其后於宋者，度能得纣之头也。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

刘邦：“未能也。”

张良：“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者之闾，式智者之门子？”

刘邦：“未能也。”

张良："其不可三也。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穷。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

刘邦："未能也。"

张良："其不可四矣。殷事已毕，偃革为轩，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复用兵乎？"

刘邦："未能也。"

张良："其不可五矣。休马华山之阳，示以无所为。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乎？"

刘邦："未能也。"

张良："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输积。今陛下能放牛不复输积乎？"

刘邦："未能也。"

张良："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忠、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无疆，六国立者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

刘邦听完张良的陈述之后，恍然大悟，责骂郦食其几乎坏了他的大事，立即取消所制之印，彻底打消了分封六国之后的念头。这不仅稳定了当时的局势。且对而后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刘邦抵抗项羽军的正面进攻已日感吃力，为了寻求对付楚军的办法，陈平向刘邦提出了离间项羽君臣的建议。陈平认为可以通过谋略使项王、亚父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等人之间互相猜疑。如果能用数万斤金，施行反间计，离间项羽君臣，项羽疑心很重，必然引起内部相诛，这时汉军再向楚军进攻，则一定可以击败楚军。刘邦认为陈平的建议可行，于是，拿出四万斤黄金，由陈平任意支出，不加过问他的用途。

陈平以黄金收买了一些人，专门在楚军内进行间谍活动，散布谣言说，钟离昧等将领，为项王立了很大的战功，但项王却不能分封他们为王，他们决心与汉王一起，以消灭项氏，分占楚国土地。项羽听到这些谣传后，顿起怀疑之心，派使者至汉。汉军开始隆重接待楚之来使。刘邦会见楚使后，即假装吃惊地说：我以为是亚父派来的使者，原来是项王的使者。于是撤去对使者的高级招待。楚使返回后，向项羽报告了以上情况，项羽果然对亚父范增大加怀疑。范增想急急攻下荥阳，项羽不听范增的建议。后来范增知道了项羽对他的怀疑，十分气愤地说："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史记》卷五十六、第2056页）。范增怒辞项羽而归，还没有走至彭城，背发疽症而死。范增的离去，使项羽受到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楚军从五月起，加紧围攻荥阳，汉军由于甬道已被楚军切断，粮食断绝，形势日益危急。将军纪信向刘邦建议说："形势已十分危急，请让我装扮成陛下，去欺诈项羽，我佯装向他们投降，陛下可以乘机从小路逃走。"刘邦采纳了纪信的建议，派出很多妇女和两千多士兵，冲出东门，楚兵立即从四面把他们包围起来。这时，化装成刘邦的纪信，坐着刘邦乘坐的黄盖车，带着刘邦的全副仪仗，出来说："城中粮食完了，因

此我来投降。”楚军信以为真，欢呼万岁，都拥到城东来观看。城外楚军的戒备松懈了，刘邦留下御史大夫周苛，魏王豹、枞公等防守荥阳，自己仅带数十骑从西门逃走，项羽发现来降者不是刘邦，而是纪信，即追问纪信刘邦在那里，纪信说汉王已经出走。项羽知道自己受骗，恼恨至极，遂下令将纪信烧死，随即挥军追至成皋。荥阳守将周苛、枞公等认为魏豹不太可靠，因而杀了魏豹，继续坚守荥阳城。

（二）汉在战略防御中，变被动挨打为主动

调动和疲惫楚军，确保成皋，荥阳地区防御的稳定性。

刘邦由荥阳逃到成皋，项羽追兵即至，因而，未敢停留，即急入函谷关，退回关中长安，征集部队，企图再次东出函谷关，与项羽争夺荥阳地区。这时，关中有位袁生向刘邦建议说：“汉与楚在荥阳相持已几年了，但汉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困境，建议陛下可率领军队南出武关，项羽得知必定会南来武关寻求决战，陛下深沟高垒，不与项羽作战。这样就将项羽的兵力调到了武关，使荥阳，成皋之间的汉军获得休整的机会。陛下另派韩信等出兵黄河以北，招降赵国，联合燕国和齐国，从侧后攻击楚国，到那时陛下再引兵出荥阳，也不算晚。这样，楚国要防备的地方多，力量就分散了，而我们却可以得到休整，等再与楚军交战时，就必定可以破楚了。”（原文见《汉书•高帝纪》）。刘邦很赞赏袁生的建议，立即改变了再率兵至荥阳作战的主张，而亲自率兵出武关，进至今河南南阳、叶县一带机动作战，同时；命令英布收集九江兵员，也来此地区活动，以吸引项羽的兵力，减轻荥阳正面战场的压力。

项羽听说刘邦在南阳、叶县一带，命其将领终公守成皋，亲自率兵南下，与刘邦军在南阳、叶县地区交战。刘邦见项羽军到，主力不与楚军交战，坚守营垒。此时，北方的彭越，又乘机东渡睢水，进入楚之后方游动作战，项羽派出将军项声、薛公与彭越战于下邳地区，楚军大败，薛公也战死，楚后方形势日加危急。项羽鉴于这种情况，停止在南阳、叶县一带地区的作战行动，仍以将军终公担任荥阳、成皋方向作战任务，自率主力回兵进击彭越。刘邦此时遂率大军北上，击败终公，收复成皋。

项羽率军击败彭越后，得知刘邦率兵攻占了成皋，于是，急引兵返回荥阳，一举攻克该城，杀了守将周苛、枞公，俘获了韩王信，再乘胜攻克了成皋。

项羽军在这个阶段作战中，虽然多次战胜汉军，无人能与之匹敌，却由于受刘邦军之调动，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军队往返跋涉，不但未取得理想的战果，而且还使军队处于疲惫不堪的状态。战略上已日益显出被动应付的局面。

（三）汉军的再次战略退却和在荥阳地区的反攻作战

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六月，项羽攻克荥阳，进围成皋，形势又趋危急，刘邦又难以抵挡项羽军的猛烈进攻，决定再做战略退却。于是刘邦与夏侯婴共乘一车由成皋之玉门（北门）慌忙出逃，北渡黄河，至小修武（今河南省修武县东）。项羽军乘机进占成皋，准备继续西进，但被巩地（今河南省巩县境）汉军所阻，未能突破巩洛一线，只得停止西进。项羽由于不听亚父范增急攻荥阳、成皋的建议，使自己在战略上失去了两三个月的宝贵时间，给了刘邦军以喘息休整的机会，是

战略上的最大失策。

刘邦到达小修武的第二天清晨，即闯进了韩信、张耳军营，乘他们未睡醒之前，即夺取了他们的兵符印信，把留守在修武的汉军部队收归自己指挥，命令张耳在北面守备赵地，派韩信率兵去东方攻打齐国。刘邦这对的战略企图主要是想从北、西北两个方面对楚国形成战略包围，进而威胁楚军的侧背，逼迫项羽分散兵力以对付各个方向的汉军。

刘邦得到韩信的军队后，军力又开始恢复，欲将军队调至黄河南岸，再与项羽军决战。郎中郑忠劝止了刘邦，建议刘邦深沟高垒，坚守阵地以待战机，不要与楚决战。刘邦接受了邓忠的建议。因此，刘邦决计坚守阵地，同时派出卢绾，刘贾率领步兵两万，骑兵数百人，由白马津渡过黄河，深入楚国腹地，与彭越一起行动，拢乱楚围的后方，破坏楚国的粮食储备基地。彭越率兵于八月首先攻下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外黄（今河南省杞县东北六十里），连下梁地十几座城邑，对楚之后方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使项羽十分忧虑。

这时，韩信已率兵东进，袭破了齐国。项羽得知韩信连败赵、齐两国，并准备从侧后攻击楚腹心之地，便派大将龙且、周蓝分兵往击韩信（详情已见前章）。在此期间，彭越又将军队屯于梁地，往来游动作战，破坏了楚军的粮食供应。项羽面对这种腹背临敌的情况，决心再引兵回击彭越，把成皋前线的守备作战任务交由海春侯大司马曹咎和塞王欣指挥。项羽在离前线时，叮咛曹咎等说："你要谨慎坚守成皋。假如汉军来挑战，千万不要应战，只要不让汉军东进就行了。我十五天之内一定平定梁地，那时候再来和你们会师。"（原文见《汉书•高帝纪》）。项羽引兵东进，攻击陈留（今河南省陈留镇）。外黄。外黄攻击数日才得手，项羽对外黄人的顽抗十分恼怒，下令将十五岁以上的男子统统杀死。这时有个十三岁的儿童，进入楚营进见项羽说：彭越的军队抢占外黄，外黄被迫降敌，以待大王，现在大王来了，又要将这么多人全部坑杀，这样，百姓谁还愿意归须大王呢。如若梁地十多座城邑都恐惧大王，那么就更不肯降服于大王了。项王觉得儿童言之有理。于是赦免了外黄人，这件事影响很大，很快传遍了梁地，于是梁地其余城邑皆归服了项羽军。

刘邦鉴于荥阳、成皋有楚重兵防守，想放弃成皋以东地区，坚守巩、洛一带，以与楚军对持。这时，郦食其向刘邦进言说：楚汉相争的战略焦点，应为敖仓之粟，谁据有敖仓就可以长期支持战争。楚军不占敖仓，这是天踢汉军的巨大财富，汉军不应撤退，而应进占敖仓。刘邦采纳了郦食其的建议，决心占据敖仓，争夺荥阳、成皋这一战略要地。

楚大司马曹咎和塞王欣率兵于成皋驻守，避将钟离昧军集结于荥阳地区，刘邦乘项羽尚未回兵之际，首先选定进攻成皋之曹咎军。汉军再三向楚军挑战，楚军一直拒不出战。刘：邦无计可施，转而采取诱敌出战。于是派人天天去阵前辱骂楚军，骂了五六天，大司马曹咎被激怒了，竟决定渡汜水与汉军决战。楚军刚刚渡过一半，汉军则乘势攻击，大破楚军，缴获了楚军的全部金玉财宝和军需物资。大司马曹咎和原塞王长史司马欣见败局已定，自感无面目再见项羽而自刎死。刘邦遂引兵渡过黄河，夺回成皋，屯军于广武山西城，尽占有敖仓屯积的全部粮食，接着又以重兵包围钟离昧军。

项羽军进至睢阳（今河南商丘），得知曹咎司马欣被汉军击破的消息，不得不引兵急回成皋。这时，正在荥阳围攻钟离眛军的汉军，听到项羽回兵成皋的消息，便撤军进入险要地方，凭险据守，以待项羽军。项羽军至荥阳，也就暂屯军于广武东城，与汉军对峙。

汉军在这第三阶段的作战中，形势已经大大改观，此时，项羽大将龙且所率二十万大军已被韩信歼灭，刘邦已完成了从西北和北方对项羽侧背的战略包围。项羽主力也被刘邦、彭越军来回调动，战略上已处于疲于奔命的被动处境。

（四）楚汉战略相持和楚之战略退却

汉军退守广武西城，项羽率兵进至广武东城，两军之间相隔一深涧，约两百余步相对峙。从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十月形成这种对峙局面以来，一连数月，汉军固守营垒，拒不出战。楚军后方由于受到彭越的继续袭击，粮食供应发生困难，即将出现兵疲食绝的困难局面。项羽为急于与汉军决战，便想利用刘邦父亲、妻子在自己手中为人质的条件，约刘邦直接对话。

项羽把刘邦的父亲带至阵前，项刘二人隔涧对话，项羽对刘邦说：你若不赶快降我，我今天就立即把你的父亲烹死。刘邦回答项羽说：过去我们共同受命于怀王，曾盟为兄弟，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如果你一定把他烹了，请你分给我一杯羹吃。项羽听到刘邦这样说，更加愤怒，想立即烹死刘邦父亲，经项伯力劝，才没有动手。

刘项两人继续对话，项羽对刘邦说：天下相争已数年了，只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缘故，我愿与你决一胜负，以免再使天下百姓遭受痛苦。刘邦讽刺地笑着谢绝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史记》卷七）

楚汉两军相持，长久难以决定胜负，百姓都苦于当兵作战，一些老弱之人也不堪运送军饷物资的劳苦，项羽急于结束战争，便想与刘邦单独决战。

项羽知刘邦不与之决战，便派出人员向汉军挑战，一连三次挑战，均被楼烦将射杀。项羽震怒，亲自出阵挑战，刘邦也相对而出，双方再次对话。刘邦在对话中历数项羽十大罪状：违背怀王之约，不尊君命，剥夺我关中王的位置；假造圣旨，妄杀卿子冠军而自称：奉命救赵之后，不回报怀王，而擅自率领诸侯之军西入函谷关；烧秦始皇宫室，掘秦始皇陵墓，私自掠取秦宫财物，杀死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在新安坑杀秦军二十万，反而将其将（指章邯等）封王；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畔；将义帝赶出彭城，做为自己的都城，夺了韩王的封地，并王梁楚，多自予；派人暗杀义帝于江南；身为臣下而杀君王，杀害降者，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刘邦数说完项羽罪状后，又说道：我与各诸侯来诛灭你这个贱贼，没有必要亲身与你挑战。项羽听罢大怒，令事先埋伏之弩手发射暗箭，射中了刘邦胸部。刘邦胸部受伤，立即伏身摸着自己的脚说：恶奴伤了我的脚趾！

刘邦因为箭伤很重，卧病不起。张良劝他勉强起来巡视慰劳部队，以安定士兵情绪，不致使楚军乘机攻击。刘邦只得咬紧牙关来巡视军队，结果伤势加重，支持不住，便驱车进入成皋城养病。

刘邦病愈之后，便西入函谷关，到栎阳，慰问当地父老，摆酒招待他们，又砍下已死的塞王司马欣之头，挂在栎阳的闹市街上，以消除百

姓的怨恨，刘邦在栎阳停留了四天，又回到广武军中。关中由于刘邦的慰问，新征集的士兵源源不断地出关补充刘邦的军队。

这时，汉军兵多粮足，楚军兵疲粮绝，项羽几次回军击彭越军都没有取得预期战果，加之，韩信的军队又从后方进击楚军，项羽非常恐慌和忧虑。于是，决定与刘邦谈判，双方约定平分天下，楚愿割鸿沟（今河南省中牟县之贾鲁河）以西地区为汉所有，鸿沟以东地区为楚所有。项羽遂将留在军中为人质的刘邦父母，妻子送还给刘邦，楚军撤去成皋之围，回师东去。

至此，楚汉双方对峙十一个月后，也就是从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十月，到汉高祖四年八月，以著名的楚汉鸿沟媾和为终结，结束了楚汉成皋之战。

成皋战役评述

楚汉成皋之战，是楚汉双方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战役。楚汉双方经过三年多的较量，至成皋战役结束，双方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楚军由战略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劣势，逐渐失去了战略上的主动权。汉军则由战略的劣势，转化为战略优势，逐渐掌握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战争经验一再证明，主动和优势的丧失，必然导致最后的失败。成皋之战，楚汉双方的成功与失败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总结的教训。

汉军的胜利，再次说明主观指导的正确，对获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刘邦在成皋之战中既注意在政治上争取人心和团结内部，也注意从战略全局的形势出发处理奸最关键的问题。汉军自彭城惨败后，刘邦鉴于汉弱楚强的劣势地位，适时改换战略指导，转攻为守，退保成皋这一咽喉地带，有效地保卫了关中和巴蜀，使汉军始终保有巩固的战略后方基地，从而在人力物力上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保障了进行长期战争的需要。

汉军的胜利，告诉人们，在每一步作战行动中，都应有完善的具体作战方针。刘邦在指导主战场和支战场的作战中，能够及时采纳张良，韩信、陈平、袁生、邓忠、郦食其等人的正确建议，坚持实行正面坚守、南北两翼牵制、敌后骚扰的方针，这就使强大的楚军陷于多面作战、到处分兵的不利境地。而汉军的实力则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得到发展，由劣势转化为优势，终于逼迫项羽鸿沟媾和，撤兵息战。

汉军的胜利，还说明劣势之军必须通过争夺战场的主动权，才能转换自己的劣势地位。主动权也就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而行动的自由则是军队的命脉。刘邦在荥阳、成皋正面难以坚持时，先是出兵武关，活动于南阳、叶县一带，首次调动了项羽军被动南下，使刘邦军在劣势危急之中，第一次争得了主动权：彭越侵占睢水下邳，袭扰项羽后方时，项羽又被动地被迫回军，刘邦又争得了一次主动权；刘邦再次北击成皋时，项羽又再次被牵因成皋，刘邦又获得了主动权；最后当彭越再次袭扰楚军后方对，项羽又奔回后方，刘邦又机动自如地歼灭楚大司马曹咎军于汜水之上。这样多次往复，刘邦军都处于机动自如的地位，而项羽则被刘邦牵着鼻子，穷于应付，疲于奔命，丝毫没有主动权，这就难免导致失败的命运。

雄冠诸军，叱咤风云，拥有很大优势的项羽，以彭城会战大败刘邦的军威，当可破荥阳、下巩洛、直入函谷关，但却未能如愿以偿，只落

得一个鸿沟媾和，战略撤退的结局。这其中除了政治上的不得人心之外，在战略指导上缺乏深谋远虑，以一时之勇代替必要的作战策划，不对全局做正确的分析，不倾全力坚定不移地为实现主要战略目的服务，而轻率地率领主力东奔西突，一步失策，步步被动。项羽冒冒失失地南下武关，数度回兵反击彭越，不去占领和破坏敖仓，龙且的二十万大军的败灭，将战略全局的指挥重任交给无能之辈曹咎等等，这一系列的失策，都在全局上给楚军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最后，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把优势和主动的地位，拱手让予了刘邦，从而，失去了争夺天下的基本条件。

第三节 垓下战役

第一，垓下战前楚汉双方的基本形势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十月，项羽击败彭越后，听到刘邦军已于成皋将大司马曹咎军击破，急忙回军成皋前线，稳住自己的形势，大军推进至广武。

刘邦军歼灭曹咎军后，乘势进占成皋，待项羽军到后，即于广武西山，与楚军对峙。

此时，韩信军南下，子十一月在潍水上击败楚大将龙且所率之二十万大军，从北方和东北方向对楚之侧背构成了战略包围，直接威胁楚国腹心地区的安全。彭越军为汉军防守魏地，不时出击楚之运粮要道，项羽军腹背受敌，军队补给十分困难，陷于更加被动的处境，整个形势对楚军极其不利。

相比之下，刘邦军已日渐占有明显的战略优势。汉军已拥有赵、魏、齐地，九江王英布也早已降汉叛楚，且刘邦稳定了关中形势，不断得到新的兵员和军需物资，因而，汉军士气大振，在主战场的正面战场上，楚军的局部优势已不复存在，整个形势，都预示着汉胜楚败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第二，垓下战役的起因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楚汉双方达成了鸿沟议和，中分天下，双方罢兵。项羽按照和约的规定，释放了刘邦的父亲和刘邦的妻子吕雉，并撤军东走。

楚军撤走后，刘邦也准备下令撤军西退。这时张良、陈平向刘邦建议说："观在汉已占领了天下的大半、诸侯皆归附。楚军已疲惫不堪，粮食断绝，这正是天亡楚军之机，不抓紧机会而消灭楚军，就是养虎遗患。"（原文见《史记•项羽本纪》）。

刘邦采纳了张良，陈平的建议，停止撤军西退，而乘项羽退军东走的机会，撕毁双方共同商定的约言，转而率军紧紧追击项羽军，遂爆发了垓下战役。

第三，垓下战役楚汉双方的作战策划

刘邦撕毁鸿沟议和协议，决心与项羽军作最后的战略决战，欲乘楚军撤军途中麻痹松懈和补给奇缺的机会，调集优势的兵力一举歼灭项羽军，建立自己的封建统一政权。于是，决定以樊哙向胡陵（今山东省鱼台县境）进击，命英布率军立即攻击寿春，刘邦亲率主力追击楚军，并以韩信的齐军、彭越的梁军急速与汉军主力会合。造成一个南北共进，三路齐攻的强大态势。

项羽由于对鸿沟议和深信不疑，又是在撤军开进途中，没有防止刘邦军突然背约进攻的准备，故在固陵之战前，没有做应付突然多变的作战策划。

其实刘邦军背约而进攻对方的策略已多次运用，以前在他西进秦都之武关作战中，也是订了和约，招降秦军守将，过了险要关隘之后，再回兵击灭对方。而楚军对此缺乏起码的估计和戒备，也足以说明了其战

略策略和指挥谋略的运用均不是刘邦军的敌手。

第四，垓下战役的前哨战——固陵之战

九月，汉军追击楚军至阳夏以南（今河南太康县境），即停止前进，以待前来会合的韩信之齐军与彭越军，但两军未到来。当汉军于十月再进至固陵（今河南省淮阳县境）时，韩、梁两军还未赶到，因而，刘邦军始终不敢与项羽军接战。

项羽军对刘邦背信弃义，毁约追击而来，十分气愤，决定乘齐、梁两军未到之机，项羽亲自指挥季布，钟离昧等将领，突然向汉军猛攻。汉军由于突然遭到楚军反击，完全出于意外，被打得溃不成军，慌忙退入壁垒，挖掘深堑，固守待援。

项羽军初战取胜后，没有乘胜扩大战果，进而围歼固陵之汉军。这样，就给了刘邦军以喘息待援之机。刘邦军则乘此，一方面巩固自己的防线，一方面想急催韩信、彭越军前来会战。

刘邦对张良等说：我们困兵于此，韩信彭越之援军又迟迟不来，该怎么办？张良认为：现在楚军即将被击破，韩信、彭越却没有得到封地，所以他们按兵不动，如果君王能与他们共有天下，分地封王，他们定会立即出兵，当初封韩信为齐王，并非君王本意。彭越在夺取梁地之后，由于魏王豹尚在，只让彭越当了魏相国，现魏王豹已死，彭越自然也非常希望封王，现在只有以睢阳（今河南省商丘）至谷城（今山东省东阿）之地封彭越为梁王，以陈（今河南省淮阳）以至东海之地封给韩信。同时，韩信祖居楚地，他很想得到故地，如果能够这样做，他们两人肯定能积极与楚作战，那时破楚就易如反掌了（见《史记•项羽本纪》）。刘邦认为张良的见解很有道理，于是派人去告之韩信、彭越二人，请他们出兵。韩信、彭越得知刘邦将封赏他们的情况后，答应立即率兵前往进击楚军。

刘邦为了争取南方的势力，已封英布为淮南王。英布曾派人进入九江地区，攻占了几个县邑，诱降了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守将楚大司马周殷，周殷遂率九江兵叛楚归汉。至此，汉军南、北、中三路大军对楚军最后的战略决战即将开始。

第五，楚汉两军作战序列

一、楚军

统帅：西楚霸王项羽

幕僚：左尹项伯

将领：将军季布、钟离昧、项声、项冠、项悍

总兵力：约十万人。

二、汉军：刘邦在各路大军会合后，仍以韩信为最高统帅，负责全战场的指挥，总兵力约五十万人。

（一）刘邦统率之汉军：

将军周勃、樊哙、王陵、骑都尉郦商、骑都尉靳歙、御史大夫灌婴

兵力：约十万人。

（二）齐军：

齐王韩信、将军李左车、孔熙、陈贺

兵力：三十万人。

（三）梁军：

梁王彭越、大夫栾布
兵力：约五万人。
（四）九江军：
淮南王英布、将军刘贾、前楚大司马周殷
兵力：五万人左右。
第六，垓下战役的作战经过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十月下旬，固陵之战后，楚汉双方仍对峙于淮阳地区。此时，韩信军已率军南下，韩信以一部兵力引诱楚军出击，双方战于九里山一带。西楚军陷于韩信军伏击中。韩信军之灌婴骑兵部队乘机向彭城进攻，一举将彭城击破，楚柱国项它被汉军俘获。汉军接着向萧（安徽省萧县），谯（今安徽亳县）、苦（今河南省鹿邑）等地进攻，一一攻克了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东部等广大地区，兵锋直趋项羽军之侧背。
项羽军兵败，再失彭城，苏北、皖北、豫东等广大地区又被汉军占领之后，已无法稳住局势，只得携带大量军政官员，贵重物资，向东南方向撤退。此时，项羽军已更加陷入危机之中。
十一月，项羽率领近十万军队向垓下地区败走，到达垓下地区后，项羽与大将季布、钟离昧等都认为垓下地区地形险要，可以防守，于是决定构筑营垒，进行防御，以便整顿部队，恢复军力，准备与汉军在垓下地区决战。此时，项羽军的大致态势是：季布军在垓下以西、以南地区；钟离昧在垓下以东以北地区；项羽自率主力于垓下周围地区。
韩信军取得九里山大捷、进占彭城后，得知项羽率军向彭城东南方向撤走，于是挥军继续向东南方追击项羽军。这时，楚之大司马周殷叛变楚王后，率兵进占了楚之六地（今安徽六安县），接着统率九江兵与将军刘贾向北攻占城父。至此，汉军、齐军、九江军及彭越的梁军等四路大军会师于垓下，构成了对项羽军的包围态势。当时汉军及各诸侯军的关系位置大致为：齐王韩信统率的齐军驻于垓下东北地区；九江王英布指挥的九江兵驻于垓下的西南地区；梁王彭越指挥的梁军驻于垓下的北部地区。
汉方各路大军在完成对项羽军的直接包围后，便加紧准备与项羽军的最后决战，以求彻底歼灭项羽军。韩信为向垓下进攻，做了如下部署：以将军孔熙军为左路，费将军陈贺居右路，韩信自率主力在中路主攻。汉军在韩信统率之下，分路向垓下之楚军进攻，楚军在项羽率领下，奋勇力战，多次击退汉军的进攻，但由于项羽兵力已经有限，无力出击汉军，更难以迫使汉军撤退，终于在汉军多面夹攻之下，退入营垒坚守。韩信军遂以各路大军，把项羽军重重包围。双方虽经不断作战，但汉军尚难以彻底打败楚军，为尽快将楚军打败，张良建议刘邦采取以瓦解楚军斗志为主的“攻心战”，以楚方归顺人员和汉军中善唱歌者，每夜皆唱楚词、楚歌。
项羽兵困垓下，兵少食乏，处境更加险恶。前线坚守营垒的部队，每日黄昏战斗停顿时，就听到四周唱出的楚歌声，士卒听到这种楚国乡土歌声，看到自己目前的处境，极大地影响了战斗意志。早已被汉军收买的项王叔父项伯，力劝项羽夜间巡视军营，以便让项羽也听到四周的楚歌声，瓦解项军的斗志。果然，项羽听到这些歌声后，十分吃惊，他

说："难道汉军已经把楚国的地方都拿下来了吗？为何他们中间会有这么多的楚人呢？"项羽面对这种局面甚为忧虑，半夜里在营帐中饮酒解愁。

项羽有一位妃子，名叫虞姬，很受宠爱，时常跟随在项王身边。项羽也有一匹青白色的好马，名叫骓，是他最得力的战马。项羽边饮酒边悲凉地歌唱道："力大能够拔山啊，气壮盖过了全世。不料时势不利啊，连乌骓马也不济！乌骓马不济了啊，那可叫我怎么办？虞姬啊，虞姬！我怎么能对得起你！"（原文见《史记•项羽本纪》。项羽接连唱了几遍，虞姬也应和着一同唱，根据《史记正义》引《楚汉春秋》记载，虞姬当时也唱道："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唱罢，即自刎而死。项羽的泪水一行行地涌流，左右的人也都泪流不止，以至互相不能抬头相看，气氛甚为悲壮。

虞姬已死，项羽悲痛地上马出营，率领部下八百精锐骑兵乘夜突围而去。次日天明，汉军才得知项羽已经突围，韩信急令灌婴率领五千骑兵追击。由于项羽突围之先头骑兵急驰而行，后续骑兵未能全部跟上，待项羽渡过淮水之后，仅跟上来百余骑士，项羽行至阴陵（今安徽省定远县西北），迷失了方向，便向一个老农夫问路，老农夫欺骗项羽部队说，向左走。项羽于是向左急奔。但走不多远，即陷入了大泽之中，行进艰难，很快被灌婴骑兵追上。项羽又引兵向东突进，至东城（今定远县东南五十里）地区后，仅剩下二十八名骑士，而汉军追兵竟有数千骑。项羽此时自料不能逃脱，便对跟随他的骑士说，"我从起兵到观在已经八年，亲身经历过七十多次战斗，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从未打过败仗，因此，做了天下的霸王。不料今天倒被围困在这里，这是天要亡我，并不是我在战争中的错误啊。"（原文见《史记•项部本纪》）。项羽接着又强调：今天要决一死战，必须做到三战三胜：溃围（击溃敌人，突出重围）。斩将（杀敌将领）、刈旗（砍倒敌人的旗帜）。

项羽说毕，将自己的二十八名骑兵分做四队，对着四个方向，汉军骑兵虽然包围了数层，但项羽毫无惧色。项羽说："吾为公取彼一将"。于是他命令骑兵坚决向敌冲杀，到达山下后，在山东分三处集合。项羽吩咐完毕后，即呼喊冲杀而下，将汉军打得人仰马翻，四处溃散，并斩杀汉军骑将一人。项羽军到达山东三处集合后，汉军再分兵三队将项羽军团团围住，项羽率兵又驰逐冲杀，斩杀汉将一人，杀死汉军百余人。项羽将自己的兵马又集中起来，结果发现自己仅亡两骑。项羽对众人说："各位看我打得如何？"众骑兵说："诚如大王所说的一样。"项羽得胜，乘汉军混乱之际，冲出一条血路，向南疾走，准备渡过长江。项羽到达乌江。乌江亭长撑船靠岸，等待项王上船。亭长对项王说："江东地方虽然不大，但方圆也有千里，有民众数十万，足够建立霸业，请大王急速渡江。这一带只有我有船，汉军到后将无船渡江。"（原文见炙史记•项羽本纪》）。

项羽笑着对乌江亭长说："上天要灭亡我，我不能渡江了。当初我带领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西征，现在没有一人生还，纵然是江东父兄谅解我，继续拥立我为王，我有什么面目见这些父老？即令是他们不谴责我，我也羞愧难容。我知道你是忠良之人，我骑的这匹马只有五岁，所向无敌，一日可以行千里，我不忍心杀之，观在赠送给你。"（原文见《史记•项羽本纪》）。项羽把自己的乌骓马送给乌江亭长后，命令所有

骑士均下马步行，以短兵器与汉军追到的骑兵搏斗。项羽一人即杀死汉军将士数百人，自己受伤十多处。

项羽在冲杀间回头看见汉军骑司马吕马童；便指着吕马童高芦说：“你岂不是我的老部下吗！”吕马童看见项王后，即指给汉将王翳说：“此项王也”。项羽对王翳说：“我知道汉军要出千金得我的头，还要封万户侯，为了使你得到功赏，请把我的头拿去吧。”项羽说罢，即自刎而死。王翳割取了项王之头，汉军其余将领争割项羽尸体，以便回军请功。

第七，垓下战役后的动态

垓下会战为楚汉双方的最后战略决战，在此次决战中，汉军共斩杀楚军近十万人，使项羽大军全军覆没。至此，西楚政权即宣告灭亡。但项羽原封地之鲁人，仍在抵抗刘邦军的进攻，后来也被刘邦击灭。

刘邦在消灭项羽之后，即急忙驰入韩信军营，夺了韩信的兵权，并将韩信由齐王改为楚王，封其统辖淮北地区，建都于下邳（今江苏省邳县，故城在邳县东）。封彭越为梁王，建都定陶。将衡山王吴芮改为长沙王，定都临湘（今湖南省长沙）。

刘邦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二○一年）二月称帝，最初定都于洛阳，三个月之后，迁都长安。

垓下战役评述

历时四年半的楚汉战争，迄于刘邦夺占三秦之战，至垓下一战才告结束。刘邦与项羽之间争夺封建领导权的战争，终于以刘邦彻底胜利和项羽军的覆灭而载入战争史册。

垓下大战，是刘邦、项羽间的最后战略决战，项羽军在垓下作战中之所以迅速被刘邦军歼灭，除开政治上的原因之外，在战场交战的直接原因是战略指导上的低能。

战略撤退中疏于戒备。项羽与刘邦达成了鸿沟议和后，没有在战略全局上正确地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此时的楚军虽然不是败将求和，但战略上已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一纸空文能对刘邦起多大约束作用，楚军毫无考虑，只是遵约东撤，给了刘邦乘胜追击的难得的战机。劣势之军后撤，本已造成军心士气的严重影响，加之再有重兵集团的追击，更会在心理上加重失败的恐惧。因而，从根本上说，项羽军虽有十多万兵力，但实际已处于军无斗志的失败情绪之中。可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固陵之战缺乏战略远见。项羽军在固陵地区回兵反击刘邦主力，一举取胜，在战略上出现了挽回颓势的一线转机。而此时韩信、彭越之军还远在北方，项羽如果重振士气，以战胜之余威，咬紧牙关，全力攻歼刘邦军，设若刘邦军被一举歼灭，无疑会对楚军起巨大的鼓舞作用。这样是否还有彭越、韩信南下之举，则恐怕又当别论了。可惜，项羽缺乏这种战略远见，反击胜利，即行止戈，给了刘邦固守待援的天赐良机。

垓下突围造成战略上的不击自溃。项羽军虽被困垓下，受韩信几十万大军的包围，但汉军如单凭力战，欲将项羽军很快歼灭，也并非易事。但项羽军却中了张良等的“四面楚歌”之计，不是组织全军有组织地突围撤退，而是项羽自率八百骑兵突围，这实际上就是弃军而逃。一个战略统帅，在全军处于被包围的困难境地时，只顾自己突围而走，这支

军队自然是不击而溃了。这使叱咤风云、英名盖世的项羽，落了一个很不光彩的名声，虽然有自刎乌江的悲壮场面，也暗然失色了。

退守垓下，不返江东，是战略上最后的失策。项羽从固陵后撤，再加上彭城南撤之军，绝不止十万之众，尚有相当可观的实力。项羽未能早日定下南渡江东的决心，以现有兵力，加上江东的人力物力，并有长江天险的阻隔，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也并非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然而，项羽军却是退一步，看一步，没有长远的战略策划，以至处处被动，全军覆没。

第九部分 西汉时期总论

第一节 西汉王朝的始末

刘邦取得楚汉战争的彻底胜利后，即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92年）二月即了皇帝位，做了西汉王朝的开国之君。同年五月迁都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地主阶级封建统一政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社会由楚汉相争的五年战乱时期，跨进了相对稳定发展的历史新纪元。

西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它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经济，开拓我国疆域，增进我国各族的团结，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封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开始于秦代，那么短短的秦代统治只能是一个尝试，而长达二百多年的西汉王朝，才是使这种政权形式日趋完善、不断巩固发展的第一个朝代。

西汉王朝从汉高祖刘邦元年（公元前206年）起，传至西汉的末代皇帝孺子婴三年（公元8年）止，共历二百一十四年。在这二百年中，更替帝王十三人。汉高祖刘邦在位十二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95年），汉惠帝刘盈在位七年（公元前194年至公元前188年），刘邦之后吕雉执政七年（公元前187年至公元前180年），汉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57年），汉景帝刘启在位十六年（公元前156年至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三年（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汉昭帝刘弗陵在位十三年（公元前86年至公元前74年），汉宣帝刘询在位二十五年（公元前73年至公元前49年），汉元帝刘奭在位十五年（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33年），次成帝刘骜在位二十六年（公元前32至公元前7年），汉哀帝刘欣在位六年（公元前6年至公元前1年），以后即为汉平帝、孺子婴时期。整个西汉时期除了对外战争之外，内乱有时也非常激烈，稳定中孕着者许多动乱的因素，西汉的统治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阶段。

第一，西汉政权的巩固阶段

中国社会自灭秦战争至楚汉相争，已经过多年的大规模的战乱，这两次大的连绵不断的战争，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人民由于遭受战争的杀戮和掠夺，苦不堪言，纷纷背井离乡、逃往山林僻野避难，人口锐减，田园大量荒芜，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凋敝凄凉的景象。西汉王朝的统治者面对这种严重的局面，深深感到要想巩固自己已取得的政权，必须稳定社会生活秩序，安抚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增加社会财富，缓和社会的各种予盾，汉朝廷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迁都长安。齐人娄敬向刘邦建议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之地，一旦发生突然情况，秦地兵员充足，且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天府立地。建都长安即使山东离乱，秦之故地，也可以保全。刘邦犹豫不

决，再问计于张良，张良同意娄敬的意见。张良认为洛阳地区狭小，各种条件都不适宜做为都城，他说洛阳“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右崤函、右陇属、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史记•留侯世家》）汉高祖刘邦同意刘敬、张良的见解，遂于五月迁都于长安。迁都长安的措施意义重大，对于巩固西汉政权，统治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招抚流亡的人口。将多年战争期间流散逃亡于山野之间的没有户籍的人口，统归故籍，恢复他们的爵位和田宅，使他们重新获得爵位和土地，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生活秩序。同时，汉王朝还下令释放奴婢，凡因饥饿而卖身为奴婢者，一律解除卖约，免为庶人。

（三）精简兵员，充实农业生产力量。将相当数量的军队官兵复员，视其军功大小和爵位的高低，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复员官兵和原故诸侯子弟凡留在关中地区者，免除十二年的赋役：回原籍者免除六年的赋役，这样，就使一大批人转为农业生产力量或拥有众多土地的地主，对于发展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赐予军吏卒爵位，从政治上、经济上安抚军队。凡带罪从军者（谪卒），一律赦免其罪；军吏卒爵位在大夫以下和未赐爵位者，一律赐爵为大夫；凡爵位在大夫以上者，一律加爵一等。

（五）制定汉朝的新法律。西汉王朝为稳定社会秩序，由萧何在《秦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汉律》。《汉律》较《秦律》多了三章，即《兴律》、《户律》、《厩律》，称为《九章律》。这些措施的实施，对巩固汉初的政权、恢复和促进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生活秩序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在这个阶段中，由于发生了汉高祖刘邦铲除异姓诸王和吕氏集团的作乱，汉政权内部也充满了重重的政治危机。

第二，文景之治的盛世阶段

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41年为汉文帝至汉景帝在位时期。在此时期之内，西汉政权进一步巩固，社会生活秩序也更加好转。文、景两代实行以农业为根本，坚持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财富开始丰富起来，百姓安居乐业的愿望，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减少农民的负担，文景时期始终注重“与民休息”、“约法省禁”的政策。“令田半税”、“除田租税”、开放山泽禁苑予民耕种等措施和法令的实施，对缓和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与经济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文景时期在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同时，还从各方面削弱分封诸王的势力，强化中央集权。积极增强北部边防，并对匈奴继续推行妥协的和亲政策，以减少战争的消耗，充实国家的府库储备。

第三，汉武帝与昭宣中兴阶段

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占据了西汉王朝四分之一的统治时间。这个时期，武帝除继续前朝的政策，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外，主要是内部民

族战争，北对匈奴，南对西南地区诸夷族和南越，经四十多年的作战，虽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但对国力的消耗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至汉昭帝时，为恢复多年战争的创伤，才暂息干戈，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积累财力，从而使西汉的实力又得到一定的增强。汉宣帝即位后，再次征讨匈奴，基本上歼灭了匈奴的主要力量。

昭帝和宣帝时期，汉王朝鉴于武帝后期国力枯竭，民穷财尽，众怨沸腾，农民暴动此起彼伏的危机景况，重新强调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多次下令减免租税，救济灾民，不断减轻农民的负担。这种以农民为本的政策很快收到了效果，农业生产稳步上升，府库盈满，财力充实。在政治上修明吏治，革除弊政。褒奖贤官，对于政绩优良的官吏给予升赏，出现了“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的政治局面（见《汉书》卷八十九）。为了改变汉武帝末年法重如山、人人自危的局面，汉宣帝当政后，即废除了武帝时期许多严刑酷法。这些措施，都获得了百姓的拥护。因之，逐渐使府库殷实，民富康乐，形成了西汉时期的所谓“昭宣中兴”。

第四，西汉的衰落阶段

西汉政权自汉元帝起已日趋没落，汉元帝迷恋于狩猎取乐，宫廷、贵族奢侈无度，宣昭时期积累的社会财富被一洗而空。汉成帝更是荒淫昏庸，沉迷于酒色，为大兴游宫和陵寝，不惜重征赋税，任意征发徭役，耗尽天下之财。整个统治阶级的公卿、列侯、皇亲国戚仗势搜括民财，建造府宅，欺压百姓。哀帝即位。更甚于成帝，是西汉最昏庸的君王。他甚至不问朝政，欲将帝位让予他的宠臣董贤，统治集团已腐败透顶。广大百姓在这种黑暗政治的残酷压榨与剥削奴役之下，过着流离失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百姓已处于“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的境地，西汉王朝终于临近了它的末日。

第二节 西汉王朝的政治军事建设

西汉王朝在政治军事建设方面，总的来说是全面承袭了秦代的一套制度，并将这套制度不断修改充实，使其更好地为自己的政权巩固、开拓边疆和延续统治权力服务。

第一，政治建设

西汉时期中国的疆域进一步统一，居于我国北方的匈奴各部族更加向北迁移。汉王朝为了统治已占领的地区，采取封国和设郡县相结合的措施，据《史记》记载：西汉将全国划分为八、九十个郡，诸如五原、朔方、云中、代郡、上谷，雁门、定襄，右北平、渔阳、辽东，玄菟、辽西，太原、上党、河南、河内、河东、钜鹿、东郡、颍川、陈留、弘农、涿郡、常山、清河、济南、平原、千乘、渤海、济阴、北海、东莱、齐郡、泰山、沛郡、魏郡、东海、临淮、琅琊、陇西、巴郡、张掖、酒泉、天水、蜀郡、武威、敦煌、金城、安定，上郡、北地、西河，汉中，广汉、益州、武郡、群柯、南阳、汝南、南郡、九江、庐江，江夏、会稽、武陵、丹阳、零陵、豫章。犍为、苍海、乐浪、越嶲、苍梧、南海、交趾、日南、合浦、九真以及左冯翊、右扶风、京兆等郡。这些郡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相互约制（见《史记》卷十五）。

西汉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与秦朝相同，即所谓“汉承秦制”。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为“三公”，在“三公”之下，设有“九卿”。汉高祖皇后吕雉当政时，还设有太传，地位高于“三公”，这些官职的大致职责如下：

“三公”

（1）丞相，也称相国，哀帝时改称大司徒，主要是辅佐皇帝，这是封建官僚中的最高官职，综理全国政务，为百官之长。

（2）太尉，为全国军事的最高官职。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

（3）御史大夫，这是从秦代开始就仅次于丞相的最高长官，主要负责监察、司法，兼负管理重要文书资料等。西汉时丞相一旦缺位，常以御史大夫升丞相。汉成帝时改称为大司空，后来一度又改过来，哀帝时再改称大司空。

“九卿”

（1）奉常，汉景帝时曾改称为太常，主军职责为掌管宗庙礼仪，并兼管选试博士。

（2）郎中令，汉武帝时改称为光禄勋。为皇帝左右亲近的高级官员。郎中令下属的官员种类繁多，它包括：大夫，有大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之别，主要职责是谏议政务；郎，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主要职责为掌管宫廷门户，充任皇帝的侍卫等等；谒者，为皇帝受理传达禀报之事。

（3）卫尉，负责宫门警卫，传呈四方的贡献仪物，征召等等；并主领南军。汉景帝时曾改称中大夫令，属官有公车司马和令丞。

（4）太仆，负责管理皇帝的舆马和马政事务。

（5）廷尉，汉景帝时曾一度更名为大理，汉武帝时复称廷尉。属官有正、监、平等，都是司法官员，主要职责为负责刑狱等事务。

（6）典客，汉景帝时改称为大行令，武帝以后又改称大鸿胪。其属官有行人、译官等等。主要职责为接待各少数民族官员、处理民族事务等。

（7）宗正，汉平帝时曾改称为宗伯。这个宫职多由皇帝的亲族担任，为掌管皇帝家族事务的长官，皇族犯法时，先报知宗正，由宗正上报处理。

（8）治粟内史，汉景帝时改称为大衣令，武帝时期又改称为大司农。主要职责为掌握全国的税租钱谷盐铁和国家的财政收支等事务。

（9）少府，主管全国的山海池泽的税收，皇帝之手工业制造事务等。

汉初分封的诸侯王既有异姓王，也有同姓王，郡国交错。各分封国的官职大致与中央政权的官职相同，郡县的官制与秦代郡县也略相同，县以下也是乡、里、亭等组织。

西汉由于在政治上采取了郡国制的政治制度，给中央集权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因此，从刘邦起就一直十分重视削弱和打击分封势力，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各代均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到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打击削弱地方的分封割据势力，根据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下达了“推恩令”。严格规定诸侯王所生嫡庶子都可继承王位，其余的儿子均应在王国区域内分封为侯国。这样就使大王国不得不分为许多小侯国，西汉一代王子侯共有四百多人，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载，此时“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这样各封国越分越小，势力日渐削弱，失去了拥兵自重，与中央分庭抗礼的政治和物质基础。汉武帝为了提高皇帝的权力，削弱丞相等官吏的权力，还规定“九卿”可以不通过丞相直接向他报告工作。并任用一批中层官吏，诸如尚书、侍中等等组成“中朝官”，成为皇帝的决策班子，使中央的统治权力更加集中于帝王之手。

到了昭宣时期，更加重视官吏的选拔，凡担任相当一级官吏者，皆经重要大臣荐举，有时皇帝还亲自召见，考察他的实际才能，听取其从政的建议。但自此以后，特别是西汉末年，由于帝王的昏庸无道，官场黑暗无比，公卿，列侯，亲属、宠臣结党营私，贪官污吏比比皆是，整个政治制度已达腐朽透顶的地步。

第二，军事建设

西汉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建立了一支更加完备和严密的军事组织和武装力量。在京师置南军和北军，作为保卫京师与皇室的精锐常备军，并分别由卫尉和中尉统率。在各地区有数量相当可观的地方军和预备军，这些军队一般由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组成，一些水网地区还有楼船军，并由郡守和郡尉统率。

（一）西汉时代的主要军职官员。

（1）太尉，见本章第一节之论述。

（2）大将军，为将军的最高称号，或由战功卓著的将军充任，或由贵戚皇亲担任，主要职责为统兵征战。

（3）将军，多为统兵征战的军职称号。汉代皇帝左右的大臣有时

也称大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等。率兵出征时，还往往以地名或兵种的不同而称号，如匈河将军。祁连将军、牙虎将军、强弩将军、材官将军、楼船将军等。将军的最高等级为大将军，依次为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等。

（4）校尉，仅次于将军的武职。校尉的区分种类不少，比如掌管北军的军垒校尉，负责京师城门屯兵的称城门校尉，在西域屯兵的队有戊、己校尉。汉代主要的有八校尉：虎贲、步兵、越骑、射声、胡骑、屯骑、长水、中垒等等。

（5）中郎将，西汉时期曾设置五官、左、右三署，每暑由一中郎统率皇帝的侍卫军。

（6）郡尉，秦朝设置此武职，本为一郡之军事首脑，到汉景帝时政称为都尉。

（7）都尉，在战国时代这是略低于将军的武官司，管理一郡的军事，汉代仍设置此官。

（8）关都尉，汉武帝时设置，负责守卫和防护重要的关隘。

（二）西汉的京师常备军。西汉时期的京师常备军是全国最精锐的部队，人员武器装备都经过慎重挑选，汉武帝时期据推算曾达六万多人，并分为南、北两军。

南军。统兵将领为卫尉，部分军队由光禄勋统领。卫尉属下的官职主要为司马都侯等等，如公车司马，南宫南屯司马，武司马，北屯司马，东明司马和左右都侯等等。光禄勋所属的官员主要有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郎、羽林左、右监等等。南军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京师和皇宫的安全保卫，因为未央宫在就师长安城的南部，因而称之为南军。除未央宫南军也负责守卫长乐宫、建章宫、甘泉宫等。南军的兵员来源都是由郡国兵之正卒担任，一年轮换一次。光禄勋所统率的羽林左、右骑多选自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郡县之所谓“良家子弟”，左右两骑兵共兵力约达两千人。

北军。因北军驻于长安墟的北部。故名。统兵将领为中卫、其所属官员为步兵，胡骑、屯骑、越骑、射声、长水、虎贾和中垒授尉。北军的主要任务也是负责守卫京师的安全。北军的主要来源为三辅地区的正卒组成，一年更换一次。汉武帝时由于扩大了北军的数量，北军从此除一部分仍驻于长安城北部外，一部分已屯驻于京城附近地区，并有随军出征的任务。

（三）西汉的地方军。西汉的地方军基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郡与封国兵。各郡和各封国均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各郡、国由于大小和人口的多少不同，因而，武装力量的数量也不尽相同，天子可以征调地方军参战；一类是边防军，也称为戍军。边防军由屯田军和边境郡县兵组成。边防军的统帅通常由边境郡的太守充任，汉代对匈作战常常由太守统率本郡兵马参加各路大军征战。此外，汉代还有少量的属国兵，也参加对少数民族的征战活动。

第三节 西汉王朝的经济与战争实力

西汉王朝的版土进一步扩大，人口也逐渐增加，经过文景之治，社会安定，国富兵强，既有进行战争相当充足的兵源人力，又有较为丰富的财力，战争实力空前雄厚。

经济是赖以进行战争的基础，西汉初期，由于大规模战争业已结束，百姓陆续返回家园，社会经济得到很快恢复和发展，文景之治时天下已是相当富足。据《史记》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数）。太仓之粟陈豨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这其中虽然难免有夸张文景之治使天下盈富之意，但与汉初连重要大臣也只能坐牛车之情景相比，实是起了巨大的变化。

西汉发展经济最重要的政策是以农为本。西汉王朝为了增加农田收入，曾下令禁止宰杀耕牛，违者处以重刑，耕牛逐渐繁衍，提高了劳动效率。到汉武帝时期，冶铁工业由国家控制，各种铁制农具已相当普遍，这对改进耕作技术，提高作物产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为了提高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汉王朝还大规模治理黄河和兴修水利。有的渠道长达一百一十多公里，有的渠道穿山引水，工程相当宏伟。

自西汉政权建立以来，汉代的手工业发展也很迅速，当时已经有了设备齐全，规模较大的冶铁作坊。冶铁技术的发展，对农业工具的改进和制造锋利的兵器都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这时铁制的大刀。长矛、长剑、佩剑等等，已广泛使用于战场。

伴随着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发展，西汉的商业也日趋繁荣，当时的巨商大贾，富过王侯。

商业的繁荣，带来了城市的发展。京城长安城周围长二万二千六百多米，街道宽广，宫殿雄伟，店铺林立，建筑整齐，人口最多曾达二十四万，除长安之外，当时的洛阳、邯郸、广州、长沙、南阳、临淄等都是著名的繁华都市。

第四节 西汉时期的重要战争梗概

西汉时期的战争大致分为四大类：一是汉初的铲除异姓王和同姓王的战争；二是对边疆兄弟民族之间的战争；三是对外部的战争；四是汉末农民反对新莽政权的起义战争。

第一，汉铲除异姓王和同姓王之间的战争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亲自率军平定了燕王臧荼的叛变。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三十万大军征讨韩王信，与韩王信军展开大战，刘邦军将韩王信军击破，匈奴旋即派军援助韩王信，将刘邦围困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地区）。

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代相陈联合韩王信及燕王卢绾，以赵代联军反汉，刘邦以两路大军进击赵代联军，经过多次大战，击败了赵代联军，斩了韩王信。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叛乱，英布首先击败荆王刘贾，再败楚王刘交，刘邦率军与英布于蕲西地区（今安徽省宿县境）交战，英布军终因劣不胜优，而被刘邦击败。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燕王卢绾起兵反汉，当时刘邦因病，无法率兵亲征，而以大将周勃率大军征讨，将卢绾战败，卢绾逃往匈奴。

至此，汉高祖刘邦铲除异姓诸王的战争已全部结束。

刘邦铲除异姓王的同时，便大封刘邦子弟为新的王侯。这些同姓王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便发生了七王之乱，于是汉王朝遂进行了平定七王之乱的战争。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与楚王、赵王联盟，商定共同起兵反汉，吴军开始进展顺利，声势越来越大。景帝令大将周亚夫率军迎击，终将吴军击破。

汉景帝三年，在吴王刘濞进军的同时，胶东王、胶西王、济南王、川王、赵王等也出兵反汉。经过作战，五王之兵皆败。

七王之乱平定后，西汉统治集团内部的战争即告结束。

第二，对边疆兄弟民族之间的战争

自秦代以来，中国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西汉王朝建立后，我国境内北方的匈奴族、西域的各民族（包括天山南北诸国），东北地区的各族，西南、东南地区各族，虽然与汉族进一步得到融合，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和交流有了新的发展，但是，由于各民族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也发生了一些大小规模不等的战争，这些战争既给当时社会造成了一定的灾难，也推动了中国各民族的进一步统一和发展。西汉与各兄弟民族之间进行的战争以及西汉的对外战争，将在本书第三册中专门论述。

第三，西汉对外部的战争

西汉时期对外部的战争，主要是对朝鲜和越南的战争。这些战争将在本书第三册中论述。

第四，汉末农民反对新莽政权的起义战争

西汉末年政治腐败至极，经济陷于崩溃，人民已经到了无以求生的地步。王莽篡位后改制的失败，更加剧了社会危机，终于爆发了绿林、赤眉的大规模起义，起义军经过艰苦战斗，胜利地推翻了王莽政权，结束了西汉王朝和新莽的统治。

第五节 西汉时期的战争特点和杰出将领

（一）西汉时期的战争特点

西汉时期的战争，最大量的是与匈奴作战，前后历经一百多年。其次才是汉初的平定七王之乱的战争，因而，西汉时期战争的特点，基本上是指与匈奴作战而言。

一、交替运用战争与和亲妥协的两手策略，汉王朝取得政权之初，由于经济尚未恢复，国穷财尽，无力对匈奴作战，便采取了“和亲”妥协政策。即把汉王室的公主嫁予匈奴单于，同时每年还送给匈奴王室大量丝绸，粮食等物资，以兄弟之邦相称，借以换取时间，积蓄力量。在这期间，即使匈奴仍不断入侵汉王朝的北部边境，但汉王朝只做小规模的暂时抵抗，力避与匈奴大规模作战。汉武帝当政后，西汉政权早已稳定，经济实力急剧增长，力量已相当强大，即开始了对匈奴的大规模作战。

二、战略上最大限度地孤立匈奴，周密策划、由近至远、逐次击破故人。汉王朝为了孤立匈奴，曾派霍去病攻取河西四郡，以切断匈奴与西域的联系以张骞通西域，与乌孙结盟，也在于此目的。这样就为汉王朝集中力量对付匈奴，避免两面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战略态势。汉王朝为了获得每次战役的胜利，每次作战前都进行了充分谁备，详细策划，先将对自己威胁最大的近处之敌歼灭，再逐次转向歼灭远方之敌。对占领的一些地区，或立为属国，或即改为郡县，以屯田之军戍守，一步一步地缩小匈奴的势力范围，延伸自己的作战基地，这样逼迫匈奴步步后退，越来越处于不利的态势之中。

三、以骑兵为主体，配合以车战、步兵，实行大规模，长距离的机动作战。楚汉战争时期，项羽的骑兵曾发挥了巨大的威力，逼迫刘邦军也不得不发展骑兵，配合步车兵作战。但那时骑兵必竟还只是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到了西汉与匈奴战争时，由于匈奴军队几乎全为骑兵，奔驰原野，机动自如；飘忽不定，占有很大的优势，西汉时期为了与匈奴相抗衡，也就大规模发展骑兵，在北部和西北部边疆设立了三十个牧马所，三万人专门牧养马匹，训练的马匹大量装备骑兵，提高了西汉军队的机动力和突击力。因而，汉军每次与匈奴作战，只要是攻势行动，往往都是进行数百、近千公里左右的长距离机动作战。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军调集十万名骑兵大军，奔袭一千多公里，大获全胜。

四、战略战役上广泛采取迂回，包围、奔袭等作战手段。西汉的作战，在战略战役的指导和指挥艺术方面、已较战国和楚汉相争时期前进了一大步，每次作战都能因敌、因时采取灵活的作战手段和方式。因而，常能收到预定的作战效果。周亚夫于汉景帝三年率兵平定七王之乱时，本欲出函谷、直趋洛阳，但为了避开吴王刘濞的耳目和吴王可能在函谷洛阳间设置伏兵，而绕道武关，迂回洛阳，结果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进入了洛阳，为以后的作战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汉高祖刘邦在消灭英布军时，惧于英布军威严整、布阵严密，便不从正面进攻，而以灌

婴、曹参各军军从侧后配合正面的部队协同进攻，一举将英布军击败。汉军对匈奴军的几次大规模作战，也几乎都采取深远的迂回、奔袭的战术手段。霍去病第二次率军攻击浑邪王的作战，长途奔袭绕至浑邪王的背后，打了浑邪王一个措手不及，浑邪王兵败逃走。

（二）西汉时期杰出将领的作战指导思想

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所以能够以劣势的地位战胜了强大无比的项羽，获取了楚汉战争的彻底胜利。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谋臣战将。这些杰出人物有的对西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有的在对匈奴的作战中成为威震敌胆的常胜将军。

张良：这位韩国贵族出身的著名的军事谋略家，曾是刘邦夺取楚汉战争的胜利，建立西汉政权这一重要历史阶段中最受刘邦宠信的智囊人物之一。在许多重要的战略关头，都是他以远见卓识的谋略帮助刘邦获取了胜利，他最重要的作战谋略思想是：

（1）重视长期战略的策划。张良的作战谋略思想不是从一时一地着眼，而是多从长远的战略需要出发。当刘邦率军进占秦都咸阳后，张良立即建议刘邦吸取秦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不要贪图秦朝王宫的享乐，要尽量争取百姓的支持，巩固取得的胜利：当刘邦入巴蜀就任汉王位时，张良建议烧毁栈道，以显示永无返回关中之意，欺骗天下耳目，麻痹了项羽；当刘邦已经占据三秦，即将东进时，张良还致书项羽诡称刘邦没有东进的打算，使项羽专心对齐。这些长远的战略谋略，都对刘邦的取胜，起了重要作用。

（2）着眼战略全局。张良对战争的策划善于从战略全局出发，以局部利益服从战略全局的需要。刘邦彭城战败，形势对刘邦极其不利，张良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扭转战争全局的正确战略。张良认为战胜项羽必须充分利用韩信，彭越、英布三股力量，以韩信的力量开辟北部战场，威胁项羽的侧背，牵制项羽的兵力；以彭越袭扰项羽的后方，断绝项羽的军粮供应；破坏项羽腹心地区的安定；争取英布背楚向汉，分裂和瓦解项羽集团，从南面构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在韩信占据三齐向刘邦要求封为齐王时，刘邦怒斥韩信来使，欲断然拒绝，张良立即向刘邦建议应当答应封韩信为齐王。张良认为，齐地方圆两千里，城邑七十余座，兵民逾百万，南有泰山之固，西为黄河天险，东负大海，是割据称王的天府之地，如果韩信的封王要求得不到满足，自立为齐王，脱离刘邦阵营，刘邦就无法取得天下。这些事关战略全局的重要决策，都被刘邦一一采纳。

（3）善于审时度势。张良能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形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当刘邦与项羽订立了鸿沟议和之盟后，项羽率军东撤，刘邦也欲退兵西走，在这个重要的关头，张良审时度势，认真分析了楚汉双方的形势，认为汉军已夺占了天下大部分地区。且已由战略上的劣势转化为优势，项羽军兵疲食尽，已无法与汉军相匹敌，因此，汉军应当趁此良机，追击楚军，夺取战争的彻底胜利。刘邦于是率军东进，追歼项羽之军。当刘邦在固陵地区遭项羽军反击。无力推进时，张良经过分析形势，认为没有韩信、彭越两军的南下，难以歼灭项羽军，因而又建议以分封给韩信、彭越土地为条件，促使其出兵南下，从而迅速围歼了项羽军。

韩信：他作为刘邦手下战功卓著，首屈一指的大将，对于战胜项羽、辅佐刘邦建立西汉政权起了无与伦比的重大作用。韩信从刘邦登台拜将，到楚汉战争结束，历时五年，指挥重大战役八次，均获全胜。他的作战指导思想和指挥艺术，成为我国后世兵家学习效法的楷模。

（1）洞观敌我形势，先计而后战。韩信为刘邦策划兵出巴蜀，还定三秦的决策，集中地体现了他指导战争洞观形势，计而后战的杰出思想。

当时韩信经过对楚汉双方的全面分析，认为项羽虽占据军事上的全面优势，但终将难以成就大业，主要是因为项羽有许多战略上的致命失误：项羽只相信个人之勇，不知任用贤才；舍弃关中四塞之地、天府之国，定都彭城，偏居一隅，无法控制天下；背离怀王之约，不论功行赏，引起众诸侯不满；抛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放逐义帝，失去了道义上的优势；楚军坑降卒，抢掠烧杀，失去民心。因而韩信向刘邦献策说："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韩信对楚汉形势洞若观火、鞭辟入里的分析，使刘邦预见了未来的胜利，鼓起了进军三秦的信心。

（2）不拘泥于常规，出奇制胜。韩信深明"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道理。作战中常常根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战场条件，从敌人意想不到之处，选定进击路线，出敌意外地进行攻击。韩信在进古三秦的作战中是这方面最典型的战例。他为了避开关中三王设置的重要关隘，"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命樊哙、周勃率领一万余人修筑原已烧毁的栈道，明里摆出一付经由栈道、攻夺关隘、兵入三秦的架式，更加吸引了章邯等军的住意，增派大军守备。暗中却自率全部兵力潜出故道（今甘肃省两当县境）、翻越秦岭，直达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县境）。当章邯发觉上当，已经为时过晚，再仓猝调军回击，结果被韩信军打得大败，韩信率军旋即实现了。还定三秦的战略目标。韩信这一奇兵制胜之举，使刘邦等人深知其用兵的非凡才能。

（3）擅长于布设疑兵示形，调动敌人。韩信在战争中，非常重视似疑兵示形，调动敌人就范。如前所述，他在击破魏王豹时，鉴于魏豹沿河列阵守备，且判断他将在黄河东岸之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县西蒲州镇）渡河，因而魏豹便调集重兵在河对岸的临晋防守，以阻止韩信大军渡河。于是韩信将计就计，调集了大量船只于临晋渡口，让部分部队虚张声势，摆出由此处渡河的态势，这样，就使韩信率领部队在魏军不加戒备的上游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南）偷渡成功，直插魏后方重镇安邑（今山西夏县境），切断了魏都平阳（今山西省临汾）与前方的联系，前出到魏军主力的背后，一举将魏军击溃。韩信在潍上战役中歼灭项羽名将龙且的作战，也是巧妙地示形，调动敌人的范例。韩信与龙且军夹潍水对峙，龙且拥有二十万大军，而且是以逸待劳，如果龙且军深沟高

垒，坚壁不战，同时号召齐地人民起来反对汉军，那么龙且军就会占尽军事上、政治上、经济物质上和地理条件上的优势。这样，韩信只有几万名军队，千里远征，兵疲食乏，是无法战胜龙且军的。但韩信却千方百计地想利用潍水“半渡而击”，歼灭龙且军，龙且军如不主动渡河，韩信军便没有这种机会。于是韩信先让人于上游截断潍水，自己于下游率军先行涉水渡河，渡到一半时，再佯装怯阵，退回己岸，这样龙且军果然上当，而率兵涉水追击韩信军。正过河期间，上游突然放水将龙且军截为两段，韩信则轻而易举地将龙且军歼灭，韩信的示形诱敌，制造假象，给以不意的攻击，迫使敌人就歼，恰如孙子兵法中指出的那样：“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4）巧用兵法原则，出神入化。韩信对兵法原则的运用，从不死搬硬套，主张依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韩信在灭亡赵国的作战中，对兵法中。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的原则的运用，就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韩信所以违背兵家历来反对的背水列阵，摆出了“背水阵”的阵势与赵军决战，其基本的考虑是：赵军拥有精兵二十万，且占据并陉口的险要地势，以重兵把守，赵军人情熟、地理熟，补给方便，占据明显的优势；韩信军在击破代国之后，刘邦便把韩信的精锐部队调至荥阳地区，抗击项羽军的攻势，因而，韩信攻赵所率部队不但数量少，而且又多是新召募而来；韩信军千里进军，粮草供应艰难，部队疲惫不堪；并陉口窄狭难行，大部队无法展开，易守难攻。显然，韩信以这样的部队，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作战，若用常规的作战手段无疑是难以取胜的。韩信认为，他此时如同赶着集市上的人群去打仗，不把他们置于毫无退路的死地，他们是不会拼力死战的。结果，韩信军奇迹般地全歼了赵军。垓下战役，韩信军以优势兵力与项羽军对阵，本可以一鼓作气，与项羽军决一死战，但他却根据兵法“十则围之”的原则，布设“十面埋伏”，将项羽军层层包围，接着用四面楚歌，瓦解了项羽的十万大军。试想如果韩信靠着硬拼作战，当然也可以歼灭项羽部队，但若项羽军作困兽犹斗，则韩军的损失肯定会是相当惨重的。

总之，韩信的作战思想和指挥艺术，既继承了古代兵法的杰出的作战思想，又进一步发展和创造了许多出奇致胜的战法，在我国战争史上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据史书记载，韩信还著有兵法三卷，但可惜未流传于世，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曾命他和张良将先秦一百八十二家兵书，删繁摘要，去粗取精，编纂整理成三十五家兵书，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传播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汉武帝刘彻：汉武帝是西汉王朝时期亲自统率军队指挥作战时间最长、经历的战争最多的帝王，他在位的五十余年中，就有近四十年内发生了大小规模不等的战争。他对每次南征北战的主要作战活动，都是亲自决策和部署，因而他既是西汉时期一代宏图大略勇于开拓进取的君王，又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军事统帅。他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尤其是大规模骑兵机动作战的经验，创建了颇有价值的治军和作战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重视对战争全局的谋划。汉武帝时期几次对匈奴作战都是汉武帝亲自策划的，在作战之前，即对每次作战的目的、战略策略的运用，战争全局上的配合等等方面都有较为详尽的计划，因而军队在作战

中常常能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灵活性，形成有机配合的整体，收到预期的作战效果。汉武帝为了开发和巩固西域地区，彻底根除匈奴在这一带的势力，在全局上采取了斩断匈奴右臂，切断匈奴与月氏、西羌等国联系的战略和策略，战略与策略紧密配合，终于使匈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很快被汉军击败，远逃漠北。汉武帝在具体的作战指导上也是紧紧围绕全局上的需要，慎重地策划每次重要战役，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他为了歼灭盘据河套地区的匈奴部落，解除多年来威胁京师长安的心腹之患，接受前人对匈奴作战一线平推，赶跑后又卷土重来的教训，着眼战争全局，采取了彻底围歼的战略。以卫青率军西出高阙（今内蒙古自治区狼山西北地区），再折而南下贺兰山（今宁夏贺兰山至黄河西岸地区）、直插陇西（今甘肃省临洮附近地区），一举将河套地区的匈奴势力几乎全部歼灭，残敌远遁。汉武帝在这个地区设立了五原郡（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西北），朔方郡（今内蒙伊盟西北地区），从而比较长期地占领和巩固了这一带辽阔的地区。

（2）强调备而后战。充分做好战争准备，备而后战是汉武帝对战争指导的重要思想。我国匈奴部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掠已始于秦代之前，西汉政权建立后，之所以采取“和亲”政策，对匈奴长期妥协退让，其基本原因是国力不足，难以与匈奴对抗。因此，汉武帝即位之初，除了一方面继续消极防御匈奴入侵外，一方面则积极富国强兵，做好向匈奴进击的一切战争准备。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七年，即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又来和亲，汉武帝本想不予应允，但战争尚未准备成熟，只好答应。又过了两三年，汉武帝完成了战争准备，便开始了大举对匈奴用兵。他不但在战争的全局上如此，而且在他一生与匈奴的十五次大战中，每战都是如此。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的马邑诱击战第一次对匈奴作战起，汉武帝就按照他备而后战的思想，他的五路大军，共三十万之众，在一切部署准备就绪之后，才开始行动，只是由于汉军被俘人员的泄密才没有成功。

（3）实行积极的进攻战略，自汉武帝以前的各代王朝对匈奴作战，基本上都是以消极防御为主，或实行消极避战，或以长城，关山阻挡匈奴的入侵，或对匈奴的入侵做有限的反击。汉武帝即位后，便深感这不是消除匈奴入侵的根本之策，必须积极进攻，主动寻歼匈奴的主力，彻底征服匈奴，以求一劳永逸地消除匈奴之患。因而，他在大大地增强了战争的实力之后，便一反消极防御为积极的进攻战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连续不断地发动对匈奴的进击。开始对匈奴作战的第一仗的马邑诱击战，即以歼灭匈奴主力为目的，其后的辽西。雁门、渔阳地区的作战，上谷地区的作战，袭击匈奴右贤王的作战，河西地区歼灭匈奴势力的作战，元狩四年的对匈奴漠北地区总部的进袭作战，进而到后期的三次战略进攻的大决战等等，都是汉武帝竭尽全力贯彻积极的进攻战略的体现，汉武帝推行进攻战略的结果，使他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机动有序，进退自如，彻底扭转了以前对匈奴作战的被动挨打局面。虽然汉武帝在位期间，仍没有完全制服匈奴，但却极大地消耗了匈奴的有生力量，使其不断南侵袭占中原的企图归于破灭，为武帝之后的宣帝和元帝时期彻底制服匈奴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4）行兵布阵皆以骑兵为主体，多路配合协调作战。汉武帝作

战，尤其是与匈奴军队作战时都是以骑兵为主体，数路大军协调出击，多者五路，少者三路、二路。他的马邑首次诱击战出五路大军：御史大夫韩安国一路，卫尉李广一路，太仆公孙贺一路，大中大夫李息一路，大行王恢一路。第二次作战之关市诱击战出四路大军：车骑将军卫青为一路，袭击上谷，轻车将军公孙敖为一路，出击云中，骁骑将军李广率一路军进袭雁门，骑将军公孙贺进攻代郡。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正月，对匈奴的大决战，仍以四路大军进击，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平定南越之战也以四路大军南进。汉武帝作战无论兵分几路，都围绕同一作战目标，主次分明，互相协调，往往造成数路大军夹击对方之势，在战略的主观指导上占据很大的优势，胜敌一筹。

（5）赏罚严明的治军观念。汉武帝刘彻非常重视对作战中有功和失职人员的奖励与惩戒，赏罚必信，这几乎是他终生治军和统率军队作战的最鲜明的原则，汉武帝为了奖赏军功，鼓励部队英勇作战的精神，制定了十一级武功爵，只要是作战中的有功之士，他都能够论功行赏，豁然大度，从不吝啬，也从不失信。对上至大将军，下至普通士卒，甚至于对参军的罪犯，都是如此。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卫青击败匈奴右贤王大获全胜，即拜卫青为大将军，封八千多户，三个儿子均被封为侯。随军出征的轻车将军李蔡、都尉韩说、护军都尉公孙敖、校尉李朔、公孙戎奴、赵不虞等也都封侯，将军李息、李沮、中郎将绾等皆封爵关内侯。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在卫青，霍去病再次击破匈奴后，二人同时晋封为大司马，他们手下的将领、士卒也一一得到赐爵和食邑及黄金的赏赐。

汉武帝对作战中的畏缩失职行为诸如："畏懦后期"、"弃军逃亡"、"失亡过多"、"乏军兴"等等严重过失都会给以严厉的军法治裁，不讲情面，不循私情。在马邑诱击战中，身为将屯将军的大行王恢，本来是马邑诱击战的倡议者，后来匈奴从俘供中得知汉军设伏；而引兵急退时喜，他怯战怕死，不敢追歼逃敌，放走了敌人。汉武帝因此而下令斩杀王恢，皇太后和丞相等大臣为王恢说情，但汉武帝认为不杀王恢"无以谢天下"，坚持杀了王恢。

总之，汉武帝由于亲自决策和指挥战争达四十多年，开辟了我国战争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即骑战时代，他积累了许多属于统帅地位的特殊的作战指导思想。这些，对后世均有重要的影响。

卫青：为汉武帝的青年将领，他多次率兵与我国北方的匈奴部族作战，戎马征战终生，折服纵横无敌的匈奴，连战连捷战功卓著。卫青的作战思想和指挥艺术，对我国古代战略战术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尤其是对骑兵重兵集团的战术运用，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基本的作战观点有以下几点。

（1）依靠骑兵重兵集团致胜。我国骑兵作战发展的历史，虽由来已久，但在秦代以前的战争中，却一直处于辅助地位。春秋时期以前，车战主宰战场，是典型的"车战时代"。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骑兵虽然有一定的发展，战争进入了车兵、步兵、骑兵联合作战的时期，但骑兵仍处于从属地位。尽管战国时期的赵国李牧。秦将白起，楚汉战争中的项羽。韩信，韩信等人都曾统率过骑兵作战，但骑兵也不是军中的主要兵种，战争中还是依靠步兵、车兵致胜。在汉武帝大量发展骑兵之后；

卫青却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指挥和依靠骑兵重兵集团致胜的将领。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29年）秋，汉武帝派四路大军于关市地区进击匈奴之战中，青年将领卫青首次出战，即统率骑兵一万余人击破匈奴军一部，将匈奴军从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直追到龙城（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硕柴达木湖附近地区），斩杀匈奴将士七百余人，胜利而还。第二年的秋天，卫青再率骑兵三万，与匈奴入侵辽西（郡治在今辽宁省义县境）。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地区）、雁门等地之两万匈奴骑兵作战，卫青铁骑所到，旗开得胜，斩杀匈奴军数千人，匈奴残军逃走。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97年）春，卫青又统率骑兵四万人左右，再出云中（今内蒙托克托县地区）。将匈奴右部楼烦白羊王军包围于今内蒙伊克昭盟地区，大破匈奴军，斩匈奴将士五千而归。这些战绩，说明卫青成为我国战争史上以骑兵为主作战时代的先驱。

（2）善于以骑兵集团长距离奔袭和在复杂地形上作战。卫青使用骑兵集团作战，每次几乎都是奔袭几百里，有时近两千多里。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与霍去病共统率十万骑兵，远出大汉以北，与匈奴单于决战，一举消灭了匈奴单于亲自统率的主力军。卫青这种远程奔袭，常常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也开历史上骑兵作战的先例。因为汉代以前骑兵的作战多是执行一些近距离的侧击。突袭等有限目的的作战任务，而且都遵照孙膑等一些兵家提出的“骑战十利”和骑战“十胜九败”的原则行动，不渡荒原，不入高山峡谷，避开丛林水网地带等等不利地势。但卫青却既是长距离的奔袭，又每每越高山、穿峡谷、入丛林、涉沙漠，甚至在水网等所谓兵家大忌陷骑兵于死地的地形上作战，这不仅使人们看到了骑兵在当时作战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又把骑兵战术的运用推向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新阶段。

（3）攻其不备，秘密突袭。卫青与敌人作战，很注意隐蔽自己的行动，对敌人进行秘密突袭，以收攻其不备的效果。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率军攻击匈奴楼烦王，白羊王军，以夺回河南（今河套和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地区），卫青率领大军，沿黄河秘密进发，以神速的行动，隐蔽接近了楼烦王和白羊王的营地，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打了楼烦王和白羊王一个措手不及，匈奴军惨败，楼烦王和白羊王仅率少数侍卫骑兵仓惶而逃。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卫青率领大军进袭匈奴单于手下最强大的部落右贤王军，当时右贤王的王府远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南部，右贤王认为自己的总部远离高阙（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黄河北岸地区）又设在自己的大后方，卫青军不会冒险进攻到这里，遂疏于戒备，但卫青军却出乎匈奴军的意外，大军急进七百里，击破了匈奴军，并巧妙地逼近了右贤王府，趁夜暗包围了右贤王的营垒，突然发起攻击，右贤王惊慌失措，率少数骑兵突围而逃，卫青军追杀数百里，俘获匈奴裨王十余人，将士一万五千多人，取得了巨大胜利。

卫青为了使自己获得突然袭击的成功，他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诸如以敌人的降将降兵做向导，采取各种手段获取敌方的情报，在无法探明敌人虚实动向的情况下，先派出小股骑兵分队实行远距离侦察，或以小部队做试探性进攻，待发现敌之弱点，再从敌人意想不到的时机，以强有力的部队给以迅猛的攻击，从而，常常能够保障作战的胜利。

霍去病：这个稍晚于卫青并在卫青带领之下而起的青年将领，是与卫青齐名的抗击匈奴的大将军，他的一生尽管只有二十四岁，戎马生涯也仅仅短短的六年，但他却是西汉时期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他与卫青在汉武帝的统率下，共同成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上骑战时代的开拓者，他指挥骑兵作战的观点和指挥艺术，可谓有与卫青异曲同工之妙，并大有青出于兰而胜于兰之处。

霍去病最善于以骑兵重兵集团进行深远距离的迂回作战。他首次跟随卫青作战；不满二十岁的霍去病自率八百骑兵，远离主力数百里，进击匈奴大部队，大获全胜，杀死和活捉匈奴单于的叔父、叔祖父、相国等匈奴大臣，斩杀敌人两千余名，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季，二十岁的霍去病第二次出兵，即以骠骑将军职统率一万骑兵，独立执行进击河西一带地区的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的任务。浑邪王和休屠王拥有十多万强大的骑兵，且依靠重重高山，纵横的河川和深涧密林为屏障，战略形势十分优越，但霍去病军却一鼓作气奔袭一千多里，跨越峰峦叠障的乌鞘岭，再越焉支山（今甘肃省山丹大黄山），与浑邪王和休屠王之匈奴军交锋，俘获浑邪王之子。相国及都尉等大臣，消灭敌军近九千人，浑邪王和休屠王率残部逃走。

霍去病在作战中具有更坚定的决心和为达成作战目的而坚韧不拔的精神。霍去病在第一次击破浑邪王和休屠王之后，为了彻底歼灭这两股匈奴势力，又于当年的夏季，再次向河西进军。他接受了前次使浑邪王和休屠王沿河西走廊向北逃窜的教训，决心实行大迂回，绕至他们的侧后，切断他们向西北逃跑的退路，实行突然袭击。霍去病率军由灵武（今宁夏自治区灵武县境）渡黄河、翻越贺兰山北上，穿过巴丹吉林沙漠，绕至居延海地区，再逆弱水南下，历尽艰辛，行程两千多里，终于出现在浑邪王和休屠王侧后，一战之下，大获全胜，俘敌相国、将军、都尉、单于王子等多人，歼灭匈奴军三万余，并逼降匈奴单桓王、酋涂王两部落。霍去病这种孤军深入，大胆进击的成功，完全靠了他的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充分体现了他卓越的作战思想和指挥艺术。

霍去病更勇于以骑兵集团在复杂困难的地形条件下作战。如前所述，霍去病第一次迂回进军河西和第二次进军河西浑邪王和休屠王之战时，整个河西走廊都是深谷大河，高山密林，蜿蜒于居延海和张掖之间的弱水与黑河两岸，更是山回路转，沟谷交错，林木丛生，而干旱的巴丹吉林大沙漠，更给骑兵行动尤其是运送作战物资造成许多困难。然而霍去病却从不把这些前人兵法中的所谓骑兵作战的“竭地”、“陷地”，“死地”放在眼里，反而常常突破这些禁区，勇于利用这些地势，麻痹敌人，隐蔽自己的企图，实行深远距离的迂回，奔袭，出敌不意地攻击敌人，从而创造了一套骑兵集团的各种复杂地势条件下行军、作战、补给的行动原则，这对骑兵战术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第十部分 刘邦巩固初建统一政权的战争

西汉自刘邦建国的初年，也即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七月，就开始了巩固初建政权的战争，这些战争即为消灭异姓诸王之作战。

平定韩王信的晋阳战役：发生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十月，至汉高祖七年十二月。刘邦统率三十二万大军亲征，以刘邦被围困于平城而告结束。

平定陈豨的东垣战役：发生于汉高祖刘邦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冬。刘邦亲率近三十万大军至邯郸地区，经过两三个月的作战，全歼了陈豨和韩王信军。

平定英布的蕲西战役：发生于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七月，至汉高祖十二年冬。刘邦率二十万左右的大军东征，终于歼灭了淮南王英布的叛军。

平定卢绾之战：发生于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6年）十二月。汉军出动十万部队北征，一举平定了燕王卢绾的叛乱。

第一节 西汉政权建立初期的形势

楚汉战争的结束，刘邦消灭了与他争夺帝位的西楚霸王项羽，扫清了他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的障碍，随即于消灭项羽后的两个月，也即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登上了西汉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的宝座。至此，秦末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成果，又经过楚汉相争的战乱，终于换来了西汉王朝大统一的局面。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增强与项羽争雄的实力地位，从策略和战略的根本利益出发，曾先后封韩信、英布、彭越、臧荼、吴芮等为王侯，这对刘邦战胜项羽，夺取楚汉战争的胜利确实起了无可估量的重大作用，正像当时纵横家蒯彻和盱眙人武涉说的那样；韩信如能自立为王，必三分天下；韩信的力量若投向项羽，则项羽胜，刘邦败；若韩信的力量投向刘邦，则刘邦胜，项羽败。因而，当时的封王确实是大势所趋，是争夺统一战争胜利的重要决策。

刘邦从楚汉战争至即皇帝位前后，已被封王的有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赵王张耳，韩王言、燕王臧荼。与此同时，刘邦还分封了一大批功臣，如张良、萧何等一百四十余人为列侯。汉初刘邦所分封的七个王，包括后来被封为燕王的卢绾，绝大部分王侯都不是贵族，七个封王中一个同姓王也没有，都是异姓王。这些被封的王国，自己拥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有与朝廷相仿完整的政权组织形式，各王国的官吏，除了丞相等由皇帝任命外，其余都由封王自行任命，这些王国势力相当强大，封地多者达一百多个城邑，少者也有三四十个城邑，几乎形成独立于中央的国中之国。

其实刘邦在封王之初，就对所封诸王存有极大的顾虑，怕尾大不掉，后患无穷，而这些封王，又多是与刘邦共同起兵的功臣战将，特别是韩信、英布、彭越等人，他们善于用兵，功高盖天，早已被刘邦看做是自己帝位的最大威胁，因而，刘邦为了巩固汉家帝业，便开始了擒杀异姓王和平定异姓王反叛的战争。

第二节 平定韩王信之晋阳战役

第一，平定韩王信作战前诸异姓王之动向

刘邦当初既然是迫于形势的需要，勉强分封了一些异姓王，那么随着楚汉战争胜利形势的发展，也就逐步展开了削弱异姓王势力的斗争。

齐王韩信势力最为强大，功高望重，成为刘邦首先剪除的目标，当垓下战役刚一结束，天下大局已定，刘邦返回定陶，即急到韩信军营，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夺回了韩信的军权。随后即将韩信改封为楚王，命其建都于下邳，管辖淮北一带地区。这样，就将韩信的封地，由原来的白陈（今河南淮阳）和开封以东以至东海之滨的广大地区，包括三齐地区的七十余城，缩小到淮北一带地区，而把齐地的七十余城、地方二千里的地区，改封给了自己的儿子齐王刘肥。

韩信被改封楚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汉高祖刘邦就以有人告发韩信“谋反”为口实，于汉高祖五年十二月，采纳陈平主谋，设下了“南游云梦”的圈套，逮捕了韩信。在此之前，项羽的大将钟离昧在垓下战败后，即逃归楚地，因钟离昧与韩信素有交往，所以便寄居在楚王韩信家。刘邦知道这个情况后，十分不安，曾下诏命令韩信捕杀钟离昧，韩信一直未肯执行。这也引起刘邦的怨恨，一旦两员战将合兵一起，将来真的谋反，对刘邦的政权将是致命的威胁。因而，刘邦捕捉韩信将收到一石双鸟之效。《史记•陈丞相世家》对此有颇为详细的记载。当刘邦得知有人告发韩信欲谋反时，刘邦即问计于群臣，有人主张应急速发兵征讨，刘邦转问陈平，并把主张征讨的意见，告诉了陈平。陈平反问刘邦说：“朝中的各路大军，谁能胜过楚军？”刘邦说：“都不能与楚军匹敌”。陈平又问：“各位将军统兵作战，谁能高于韩信？”刘邦说：“都不如韩信。”陈平因而说：“既然我们兵不如楚军强，将比韩信弱，在这种情况下举兵向韩信军进攻，是趣之战也，必然处于被击败的危险境地。”刘邦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陈平于是向刘邦建议：陛下不如以伪称率领诸侯游南方的云梦，到时候韩信来见天子，只须两个勇猛之士即可擒获韩信。刘邦欣然应允，立即派出人员告诉各诸侯相会于陈，名为巡狩游历云梦，实际上要准备袭击韩信，但对韩信不许走漏消息。

韩信得知刘邦带着将军樊哙、夏侯婴、灌婴、郦商等大队兵马到楚之陈地的消息，本想发兵抗击刘邦军队的突然进兵，但想到自己并无任何罪过，但刘邦来者不善，如果独自前去谒见，难免被刘邦军抓获。这时候手下有人向韩信建议，陛下可能是怨恨钟离昧，如果杀了钟离昧，再去谒见皇上，必会取得皇上的欢心，灾难定可解除。韩信于是把这个意思告知了钟离昧。钟离昧说：“刘邦所以不敢贸然进攻楚地，是因为我在你这里。如果你杀了我去向刘邦献媚，那么我今天死，你也会很快被刘邦杀害。”钟离昧说完，即自刎而死。于是韩信只好提着钟离昧的首级去见刘邦。韩信一到，刘邦即命武士捉住韩信，绑在囚车之内。韩信这时才恍然大悟，自叹真如过去人家说的那样：“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史记•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刘邦不容分说，将韩信押解至京师洛阳。但回到

京师后，并未杀死他，而是将他贬封为淮阴侯，将其留在京师，以便监视控制他的行动，刘邦为什么当时不杀死韩信，史书未记载其中的原因。这可能是因为找不到韩信谋反的证据，也可能是怕妄杀韩信，既难以向天下人士交待，又会引起诸位开国功臣的愤恨。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十月，燕王臧荼，起兵反对刘邦，攻取了代地。刘邦亲自率周勃、灌婴、樊哙、夏侯婴等前去征伐。将军郦商率部先与臧荼军战，汉军于易水击破臧荼军，臧荼被樊哙部擒获。刘邦平定了燕地，任命其幼年即是亲密朋友、又共同起兵的太尉卢绾为燕王。

第二，韩王信背叛汉朝之原因

韩国旧地，在项羽封王时，曾封韩王信成为韩王。后来，刘邦进兵中原，以张良等恢复韩地，韩地归属刘邦。张良在韩地时与韩王信相遇，以韩王信为将军，继之，韩王信率兵跟随刘邦入武关，再入巴蜀，曾建议刘邦出巴蜀，与项羽争夺天下。在汉王刘邦还定三秦时，即答应将来攻下韩地，以信为韩王。开始先拜信为韩太尉，命其率兵攻略韩国之旧地，后来刘邦常常率领韩王信的部队与项羽作战，刘邦消灭项羽后，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春，才又正式封信为韩王，定都颍川（今河南省禹县境）。

后来，刘邦感到，韩王信英勇善战，他现在的封地，向北可以进逼战略要地巩洛地区，向南面则能直取宛（今河南省南阳地区）叶，向东又可以通达重镇淮阳，是天下劲兵之处。同时，韩王信是战国时期韩襄王之孙，世代以韩地为王，在韩地具有相当的统治基础，如以后有变，将造成严重的恶果。因而，刘邦于称帝后的第二年，即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春（史记为五年二月），遂将韩王信的封地改封在太原以北地区，建都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以抗击日益向南侵掠的匈奴部族。

这样刘邦即削弱了韩王信的势力，剥夺了以后其割据称雄的基地，又可以用其与匈奴作战，进一步消耗韩王信的实力。韩王信建都于晋阳后，匈奴数度入侵边境，晋阳距边塞太远，难以及时率兵救援。韩王信鉴于这种情况，上书刘邦，请求将国都迁移至马邑（今山西省朔县境）。经刘邦批准后，韩王信即迁往该地。

韩王信迁都马邑当年的秋天，匈奴又侵入边塞，包围了韩王信的都城马邑。韩王信兵少，数次派人向匈奴军求和。刘邦得知匈奴围攻马邑，便派出援兵往救，当刘邦了解到韩王信派人向匈奴求和的情况，便怀疑韩王信心存二心，而使人责备韩王信。韩王信受到刘邦的责斥，十分恐惧，怕被诛灭，于是不久他在马邑投降匈奴。

第三，韩王信与匈奴之联军

韩王信既已投降于匈奴，便得到匈奴冒顿单于的支持，韩王信自恃有强大的匈奴军为后盾，便放开胆量与汉作战。韩王信与匈奴达成了共同向汉朝进攻的盟约后，他即准备率军进击太原一带地区。

匈奴此时正值冒顿单于当政，冒顿为匈奴一代英武善战之君。当初冒顿为太子时，其父头曼单于想把冒顿废去太子，而另立其宠爱的阏氏（即匈奴皇后）所生之少子为太子，于是便派冒顿去月氏做人质。头曼单于随即派兵进击月氏。月氏恼怒匈奴，准备杀掉冒顿，冒顿得知消

息，盗了一良马，逃回匈奴，被其父任命为骑兵将领。冒顿通过严格的训练和对不听从他命令的士卒立即斩首的办法，使他的骑兵谁也不敢违抗他的命令。他制造了一种带响的箭，“矢镝飞则鸣”，号称“鸣镝”。当他带头射出这种箭时，所有将士必须跟着鸣镝射向同一个目标，不管什么目标，有胆怯不射者，立即斩首。开始，他以鸣镝射自己的宝马，有的不敢跟着他射，他便把这些人杀了。后来，他以鸣镐射自己的爱妾，又有人不敢射，他又把这些人杀了。不久，他出去射猎，以鸣镝射其父的宝马，众人皆随其射之，冒顿深知他左右的骑士已训练成熟，终于他利用这种手段，借跟随其父头曼单于出外打猎的机会，首先向头曼发射鸣镝，接着他的将士便一齐向头曼发箭，将头曼射死，后尽诛其后母、兄弟与不服从他命令的大臣，冒顿遂自立为单于。

冒顿当政后，即发奋图强，想战胜其近邻强大的东胡（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河北省北部和辽宁一带）部落。这时东胡知道冒顿当了单于，便派人去匈奴向冒顿说，东胡王很想得到头曼单于的千里马。冒顿便与群臣商议，群臣一致说：“千里马是国宝，不能送给他们”。冒顿说，“为睦邻和好，怎能舍不得一匹马呢？”遂将千里马送给了东胡人。不久，东胡王以为冒顿不敢惹他，又派人向冒顿说，我想得到单于的一个美女，冒顿又征求群臣的意见，大家非常愤怒地说：“东胡仗势欺人太甚，又来强求美女，应以武力去进击他”。冒顿则劝大家说，不应该舍不得给东胡一个美女，于是便忍痛把一个最心爱的美女送给了东胡王。东胡王鉴于两次欺侮挑动冒顿，冒顿都不敢违抗他的旨意，便益发骄横，进而想向西扩张自己的势力和领土。正好东胡与匈奴接壤的地方，有一片荒芜的土地，一直没有人居住，面积约近千里，双方仅在控制边界上有哨所，东胡王想将这片地区占领，于是又派人向冒顿说：“你们警戒以外的那片土地，不是你们的，我们要占领它。”冒顿再次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有的说这是我们丢弃的荒芜人烟的地区，给他们也可以，不让他们占领也可以。冒顿听后大怒道：“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史记•匈奴列传》）。说罢，冒顿将建议割给土地的人全部斩了。冒顿立即召集部队，进击东胡。冒顿出征前对大家说，再有建议割让领土和畏惧东胡的人，也一律斩首。随后率领部队向东胡进攻。东胡由于一贯轻视冒顿，未对匈奴可能的袭击采取任何戒备措施。及冒顿率领匈奴大军突然来攻，一击之下，即将东胡灭亡，虏获了东胡的全部百姓和财产。而后又向西进攻月氏，将月氏逼走。再向南扩张，兼并了楼烦（今山西省东北部地区）和白羊河南王辖地（约今河套至内蒙伊克昭盟地区），夺回了秦朝蒙恬所占领的匈奴的大片地区，匈奴势力迅速增强，成为我国北方最强大的部族，拥有三十万精骑，大军直逼汉王朝燕、代边境。

冒顿单于与韩王信相约之后，即调动大军，以做韩信的援兵，故导致了韩王信与匈奴联军共同对汉王朝进击的局面。

第四，韩王信匈奴联军与汉军的作战序列

一、韩王信军

统帅：韩王信

将领：王喜、曼丘臣、王黄

总兵力：估计可能为数万人。

二、匈奴军

统帅：冒顿单于
将领：左贤王、右贤王
总兵力：三十万人。
三、汉军
统帅：汉高祖刘邦
将领：灌婴、靳歙、樊哙、夏侯婴、周勃
总兵力：三十二万人。
韩王信与匈奴联军的兵力略多于汉军，且匈奴军几乎全为精锐骑兵，汉军则以车步兵为主，战略形势对汉军并非有利。
第五，双方作战策划
韩王信投降匈奴后，想借匈奴之强大兵力，首先占据太原以北地区。然后再继续南进，进占晋阳，继而向整个河东地区推进。
汉高祖刘邦以樊哙、夏侯婴、周勃等将领率领骑兵部队，自代郡向西北方向迂回匈奴后继之部队，取胜后，再南下与刘邦会师晋阳。刘邦则自率主力大军向北迎击韩王信军。史书对刘邦亲征韩王信的最终作战目的虽无详尽记载，但从刘邦亲率三十多万大军，满朝大将全部出动的气势来看，绝不仅在于消灭一个并无多大实力的韩王信，似有一举彻底击败匈奴，以解除北部边境之患的企图。
第六，晋阳战役作战经过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秋，韩王信投降匈奴后，不久即率领大军由马邑等地出发，向太原进击，攻占太原后，再进占晋阳，接着攻取了铜鞮（今山西省沁县一带地区），逐渐向西南方向发展。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十月，刘邦率领大军直趋晋阳，当进至铜鞮地区时，韩王信军正向铜鞮西南地区侵掠，即与韩王信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韩王信军力单薄，迅即被刘邦军击败，将军王喜被汉军斩杀。韩王信急忙向晋阳地区败退，刘邦挥军追击，追至晋阳，再与韩王信军和部分匈奴军继续交战。
刘邦派出的樊哙、夏侯婴、周勃所率的向西北迂回进击的骑兵部队，一路进展顺利，首战夺下霍人（今山西省繁峙县地区），向西北攻取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境），进至武泉（今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地区）北部地区，击破匈奴骑兵一部，旋即回军南返。樊哙军回军马邑（今山西省朔县），继续南下。周勃转攻韩王信军于铜鞮，与刘邦主力共同击破韩王信军，周勃军接着北进，夺取太原六城，再与韩王信军和匈奴骑兵战于晋阳。
这时刘邦的各路大军，齐集晋阳地区，与韩王信军和匈奴骑兵展开决战，汉军大胜，遂乘战胜之兵威，继续向北追歼韩王信军和匈奴骑兵，向马邑、广武（今山西省代县北）地区进击。
韩王信战败，逃入匈奴。其将军曼丘臣、王黄等为增加反攻刘邦的力量和声势，立赵利为赵王，同时收编败兵，重整军队，准备再战，韩王信与冒顿经过商议，确定了进一步向汉军反攻的措施。冒顿命其左右贤王各率万余名骑兵，与韩王信部将王黄军，占据广武以南及晋阳之间的有利地势，以阻止汉军的向北推进。汉军再次向韩王信匈奴联军进攻，匈奴军和王黄军大败，汉军又追击至离石（今山西省离石县地区），再度将匈奴军击败。匈奴与韩王信联军又退据楼烦地区，汉军又

追至，又将匈奴军击破。这时正值北方的严冬，“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坠指者十二三”，冻坏这么多人，可见当时对刘邦军十分不利。这时匈奴军伪装败走，以引诱汉军再向北进。

汉高祖刘邦军由于一胜再胜，当他得知冒顿单于在代谷（今河北省怀来地区）时，即想与冒顿军决战，汉兵追击匈奴军，匈奴军便将精兵撤走，以老弱残兵继续引诱汉军。为了摸清匈奴军的虚实，刘邦多次派出间谍去匈奴境内刺探情况，都回报刘邦说匈奴只剩老弱之兵，完全可以进攻。刘邦为确有把握起见，再派建信侯刘敬前往匈奴，详细观察动向。

刘邦由于满足于前一段作战的胜利，同时也出于轻信了侦察人员的报告，便亲率其全部大军向北进发，当越过句注山后，适逢刘敬返回。刘敬确实在匈奴看到的都是些老弱残兵和瘦弱不堪的牲畜，但是他想两国交兵，虚实难测，有可能隐真示假，因而，他向刘邦报告说：“两国相击，此宜夸衿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但这时，刘邦已听不进刘敬的意见，痛骂了刘敬一顿，责怪刘敬胆敢阻止他征伐匈奴，然后命人将刘敬捆起来载至广武。

当刘邦率领骑兵先进至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地区），其步兵尚未全部到达之际，冒顿单于即突然以其四十万骑兵，将刘邦等包围于平城东北之白登山白登台。匈奴兵摆出了极其威严的阵势：西面全部是白马，东面全为青之马，北方全为青一色的乌骊马，南方则尽为骍马。刘邦等被包围七天七夜，兵疲食尽，不得突围。刘邦无奈，只得派人携带重礼去求见阏氏，请阏氏劝说单于解除平城之围，双方议和。冒顿一方面听从了阏氏的劝告，一方面因为原先已与王黄、赵利相约，合兵共同攻击汉军，但他们却迟迟不来，疑心他们与汉军另有谋划，害怕自己中计，于是，答应了刘邦的请和。自此以后，汉朝以公主嫁与单于为妻，每年供奉匈奴锦帛等财物。这样，冒顿遂命令自己的部队解除包围圈的一角。刘邦才从重围中撤出，此时西汉大军也已到达，与刘邦军相会，随后引兵退走。

第七，北方战后的动态

汉高祖刘邦七年（公元前200年）十二月，汉军从平城撤军回归。刘邦遭到平城之困，十分恼怒，把向他报告可以向匈奴进攻的将士一律杀掉。到了广武，立即释放了刘敬，心情非常悔恨，对刘敬说：“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刘敬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刘邦为了防御匈奴和韩王信军的再度侵掠，命周勃、樊哙率兵二十万驻守于代地。

韩王信、将军王黄和其所立之赵王赵利和匈奴军，在刘邦军刚刚撤走后，又引兵进犯代地、云中等郡，进逼东垣（今河北省正定县一带地区），刘邦又于汉高祖八年，率人去东垣指挥与韩王信和匈奴军作战，但仍未消除韩王信、赵王利和匈奴之患，刘邦面对匈奴等入侵的局势，无计可施，遂与刘敬商议对策。

刘敬向刘邦献策说，如果陛下真的能将长公主送给单于为妻，同时多多奉献财物，单于必然以长公主为阏氏，那么阏氏所生之子，也就是匈奴国的太子，将来就会继承单于之位。这样，冒顿活着，他是陛下的女婿，冒顿死后，其子即位，则是陛下的外孙，天下那有外孙攻打外祖

父之礼，这样，北边之患自然可以解除。假如，陛下舍不得长公主，用别人冒充长公主，匈奴也会知道，那将没有什么作用，刘邦同意刘敬的建议。但吕后日夜哭诉说；“妾只生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为什么要把她逼到匈奴去！”（原文见《史记》卷九十九）。刘邦无奈，只好以后宫女子为长公主，并派刘敬前去匈奴和亲。

刘敬从匈奴回到京师，又向刘邦建议说，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所部，距离长安只有七百里路程，轻骑一天一夜即可到达，对京师威胁很大。关中地区又是新近平定，土地肥沃，百姓稀少，应该充实人口，经营好关中。刘敬又引述战国时期七雄发展壮大的情况说，各诸侯国都是靠着一两个强大的宗族才兴盛起来，现在陛下定都关中，人这么少，北边有匈奴的威胁，关东有旧六国的强宗大族，一旦情况突变，局面将很难控制，陛下可以将原六国的这些强宗大族统统迁入关中，无事，可以增强防御匈奴的力量，如果诸侯王有叛变者，也可以率领这些大族东征，这是“强本弱末之术也。”刘邦遂采纳刘敬之策，并命刘敬负责迁移关东大族强宗十万多口入关中定居。这对巩固西汉的政权，确实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晋阳战役评述

刘邦平定韩王信的晋阳战役，是西汉王朝建立之后，为巩固新生的政权而进行的一次规模巨大的战役，对于维护封建统一大局，反对分裂割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刘邦在取得全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西汉统一政权后不久，即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和他手下几乎全部重要将领，征伐韩王信的叛乱。这表明了刘邦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强决心，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不把韩王信的叛乱镇压下去，社会就会重新陷入战乱不止的年代。尽管由于匈奴军队的介入，刘邦非但没有消灭了韩王信，反而遭受了平城之困，但这丝毫也不能减低这次战争的重要作用，它打击和削弱了韩王信的分裂势力，夺回了北部边疆的部分失地；对匈奴势力的南侵气焰有一定程度的打击；在战争的失利中找到了向匈奴暂时妥协的和亲政策。虽然这对赫赫的西汉大国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屈辱，但在当时无力对付匈奴的具体条件下，也不失为可取之道，此后，随着和亲政策的延续，既为西汉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更主要的是为以后西汉政权长时间准备击败匈奴的最后决战，争取了战略上难得的宝贵时间。

刘邦军这次战役的失利，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概括起来，主要的有如下几点：

（一）战略上轻敌。晋阳战役开始，刘邦以三十多万大军，大将樊哙、周勃、灌婴、夏侯婴等随同征战，应当说对韩王信和匈奴联军相当重视，但随着刘邦占铜鞮、下晋阳、克马邑等初作战的胜利，便在战略上犯了轻视敌人，急躁冒进的错误。刘邦军在进占平城之前，尽管多次派人去匈奴一方侦察，然而由于胜利后的轻敌情绪，对侦察所得的虚假情况便再无心进行认真的思索和分析，因而，未等其重要谋士刘敬返回，即率轻兵疾进，途中对刘敬的劝阻，自然火冒三丈，终于中了匈奴的诱兵之计，导致了被困平城，向匈奴屈辱求和的结局。

（二）缺乏对匈奴作战的基本经验。按理说，刘邦和他所率领的这

批重要战将，从反秦起义到楚汉战争，都是久经沙场、身经百战之士，自然不缺基本的作战经验，但是与匈奴大规摸的骑兵作战却是首次。因而，对于敌人的作战思想，行兵布阵均缺乏基本的了解，尤其是遇上了冒顿单于这样一个英烈雄主，再加之有韩王信与其共同的谋划，匈奴就成了刘邦军难以对付的劲敌。

（三）失掉了杰出谋臣和猛将的辅佐，樊哙、周勃、灌婴、夏侯婴等人，虽也是刘邦的重要战将，刘敬也算做善长筹划之士，但这些人与“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和英勇善战的名将英布相比。相差甚远。张良因病不能出征，韩信被“软禁”于京师，英布也被远封于淮南，这不能不是刘邦军失利的重大因素。

第三节 平定陈的东垣战役

第一，东垣战役前的形势

刘邦于平城地区返回京师后，再征韩王信军于东垣，又未彻底消灭韩王信和赵王赵利，这些分裂势力背靠匈奴，仍在北方的广大地区攻城略地，西汉王朝的北部边境的形势，一直引起汉王朝的忧虑。

刘邦为了向匈奴妥协，派刘敬送“长公主”去匈奴进行和亲之后，匈奴单于冒顿虽未大规模派兵侵掠西汉北方地区，但明里暗里仍在支持韩王信等军的叛汉战争。

汉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西汉按照刘敬的建议，开始大规模迁移旧六国的贵族大宗入居关中地区，使关中地区的人口开始增加。同年，赵相国贯高等欲谋杀刘邦之事，已经查明，刘邦将贯高处死，并夷灭贯高的全族，废掉了赵王敖，便以刘邦戚夫人所生之子如意为赵王，并以陈豨为钜鹿守、赵相国，后又被派往代地驻守。

至此，刘邦所封之异姓诸王，还剩下了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长沙王吴芮。而刘邦的兄弟子侄这时已先后被封为王的有：刘交为楚王，刘喜为代王，刘肥为齐王，刘如意为赵王等等。

第二，陈豨叛汉的起因

陈豨本为刘邦宠信之臣，当初被派往担任钜鹿守并先后以赵相国和代相国的身分，统率大军守卫赵代等地，按理说官高任重。不应反叛刘邦，但史书对陈豨的反叛原因未加更多说明，较为集中的可以看到两处。一处是在陈豨被任命为钜鹿守，上任之前，向韩信辞别时，《史记》做了如下的记载：韩信令左右人等回避，然后对陈说：“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这意思是说，你现在去的地方，是出精兵战将之处，你虽是陛下很信任的重臣，但如果将来有人在陛下那里说你三次欲谋反的坏话，刘邦必然亲自领兵去征讨你。那个时候你起兵，我配合你，定可以夺取天下。对这段陈豨反叛原因的记述，不敢妄评，因为这毕竟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东西，但是也很难使人轻信。因为若韩信真有谋反的意图，按人们的正常理智去判断，决不会轻易对一个正在受到刘邦信任重用之臣去说；而一个正在政治上飞黄腾达之士，也决不会受一个政治上已经失势之人的鼓动，而甘愿背上反叛朝廷，祸灭三族之罪。

在陈豨到任之后，《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还有一处大意如下的记述：陈豨常常经过赵地，赵相周昌看到陈豨有随行的宾客千余乘，陈豨对待这些宾客礼贤下士。赵相周昌遂将这种情况上告刘邦。并说：“擅兵于外数岁，恐有变。”刘邦于是派人调查陈豨所养宾客的情况，发现一些事情多牵连到陈豨。这时陈豨惊恐，便暗中派人至韩王信部将王黄，曼丘臣处，联络反叛之事。汉高祖十年七月，刘邦父亲死，刘邦派人召陈豨回朝，陈豨称病重，未归，九月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

这样看来，上述一段记述则是陈豨起兵反叛的真实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对刘邦不断削弱和排挤异姓诸王侯，并以刘氏

诸王取而代之的做法不满，也深怕自己难逃他们的复辙。因而，陈豨的反叛，不能不说是刘邦排除异姓诸王的必然结果。

陈豨既已决定叛离西汉，于是便与韩王信军结成联军，率领代赵等地之军，共同起兵。

第三，汉军与陈豨军的作战序列

一、陈豨军

统帅：赵相陈豨

将军侯敞、宋最、陈武

将领：韩王信、曼丘臣、王黄、赵王利

二、汉军

统帅：汉高祖刘邦

将领：谋臣张良

将军樊哙、周勃、灌婴、夏侯婴、郦商、斩歙、柴武

双方的总兵力，虽无史料可考，但根据推断，陈豨既统代、赵两地之兵，此两地又是防备匈奴的前线地区，故有可能在十万左右，或多于十万，如果再加上韩王信，赵王利之军，有可能接近十五万至二十万人。

刘邦由于有上次平定韩王信之战中三十二万大军被匈奴围困的教训，估计总兵力也不会少于二三十万人。

第四，陈豨军汉军双方作战策划

陈豨军与韩王军预计兵分两路南攻。陈豨率领一部兵力自东垣南进；韩王信之曼丘臣等军攻取马邑，然后也继续向南推进。

汉军根据陈豨、韩王信军的叛变情况，也兵分两路迎击叛乱军，刘邦亲率樊哙、灌婴、夏侯婴、郦商、靳歙等将领首先进占邯郸，再北上进击东垣；张良虽在病中，也亲与太尉周勃等将领，为另一路大军，先进至晋阳，再向北进击。

刘邦在发兵之前，也令淮阴侯韩信一同前往，但韩信称病，未与刘邦向去东垣。刘邦也同时派人命令梁王彭越率兵前往东垣，参加对陈豨作战，彭越也称有病，而命部下将领代他率兵前去。

第五，东垣战役的作战经过

汉高祖于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冬，刘邦率领的一路军向邯郸地区进发，刘邦率轻骑先进入邯郸。他对陈豨未曾派兵占领邯郸城非常高兴，因而，对部下说：“豨不南据漳水，北守邯郸，知其无能为也。”赵相国周昌上奏刘邦，要将常山守、尉统统斩首。刘邦认为不可，常山郡之二十五城，虽然已丢失二十个城邑，但不是他们的过错，是兵力不足。现大军尚未到达，全靠他们带领邯郸这一带的士卒作战。因此，刘邦不但未杀他们，反而各封千户，并任为将军。同时刘邦还了解到，陈豨手下的将领多为商人出身，酷爱财物，便确定要以财物收买陈豨的将领。

这时，陈豨军的先头部队将军侯敞部正率领一万多军队进攻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地区），樊哙等率军赶到，与候敞军大战，将侯敞军击破，灌婴部将斩杀侯敞及特将五人，灌婴部遂再攻王黄守卫之曲逆（今河北省定县东南地区），也将王黄军击败。陈豨派往攻击聊城的将军张春部，被刘邦之将军郭蒙等击退。

赵利军防守东垣，刘邦挥军进攻，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未能攻下。守卒辱骂刘邦。后刘邦急攻，东垣城破而降，刘邦将东垣守军骂他的人全部屠杀。刘邦军遂将卢奴（今河北省正定县境）、上曲阳（今河北省曲阳县西）、安国（今河北省安国县境）、安平（今河北省安平县境）等占领。至此，常山、清河两郡全为刘邦军收复。

张良、周勃所率之军，先入晋阳，再攻代地，围攻马邑，因攻之不克，而屠马邑，韩王信军大败。陈豨、赵利、韩王信军皆败走楼烦。

汉军两路兵马会师后，继续追击陈豨等军，双方再战于参合（今山西省阳高县境）。汉军将军柴武先至参合围攻韩王信军，并命人下书劝降韩王信。韩王信认为自己既为项羽效过力，又以马邑投降匈奴，现在又率胡骑与汉军作战，身负三大罪状，投降只有被处死。因而，拒绝投降，继续作战。柴武部屠三合，韩王信军再败，汉军斩了韩王信，捉住代相冯梁，胡将王黄等将军、守备孙十余人。周勃军在擒陈豨之将军宋最，雁门守园后，转攻雁门、云中各城邑，俘获云中守邀。丞相箕肆等。再与陈豨战于灵丘（今山西灵丘），大败陈豨军，斩杀了陈豨、俘获稀丞相程纵，将军陈武，都尉高肆等。

至此，陈豨、韩王信军已全部被歼，代地的所有城邑，雁门十七县，云中十二县已全被汉军收复。

第六，东垣战后汉军的动态

刘邦此次在消灭陈豨、韩王信军的作战中，匈奴虽然碍于和亲的关系，未出动大军援助陈豨、韩王信军，但这次叛乱，实际都以匈奴为后盾。因而，汉王朝为避免再与匈奴军的直接冲突，遂将恒山以北原代郡各地区主动放弃，将代国移于恒山以南，以刘邦子恒为代王，定都晋阳。

在刘邦率兵征讨陈豨时，淮阴侯韩信一个家人因犯罪，被韩信囚于家中，准备杀死，家人之弟逃跑上告吕后说，韩信欲谋反，假传圣旨，放出诸官徒奴，组成军队，以袭吕后，太子。吕后据此便想召韩信入宫杀害，怕韩信不来，而与相国萧何商议，定下了诱骗韩信入宫加以杀害的计谋。遂由萧何出面去见韩信，萧何见了韩信说，皇上已经回京，陈豨之乱已平定，京师群臣皆上朝庆贺，你虽然有病，望也能入朝庆贺。韩信遂信以为真，随萧何入宫。韩信刚一入宫，便被预先埋伏之武士捕获，斩于长乐宫钟室。韩信被斩之前悔恨地说：“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当初萧何追韩信，并力保韩信，被刘邦拜为大将，后来又是萧何与吕后密谋杀害韩信。后世对此颇有感慨地说：“成亦萧何，败亦萧何”。

刘邦征陈豨回来，知韩信已除，高兴地问吕后，韩信死时说了些什么？吕后说：“信言恨不用蒯通计。”刘邦于是下令捕捉蒯通进京。刘邦见了蒯通便斥责他说：“是你当初建议韩信三分天下吗？”蒯通答道：“是的，可惜韩信不用臣之策，故今天招此杀身之祸。如果韩信能用臣之策，陛下安能将韩信斩于这里吗！”刘邦听后大怒说：“烹之”。蒯通大喊冤枉。刘邦问蒯通为何冤枉，蒯通说：“在秦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候，都想争夺天下，我是韩信的部下，只知效忠韩信，而不知有陛下。天下欲与陛下为敌，以争雌雄者大有人在，只是力量不足而已，难道你能把他们都烹之吗？”刘邦无言以对，只好放了蒯通。

刘邦因调彭越征陈豨，彭越称病不去，刘邦怒，派人责备彭越，彭越惊恐，打算亲自去见刘邦谢罪。其将领扈辄对彭越说：“开始你不去，陛下责备你后，你才去，去了必定被擒，不如发兵反。”（原文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彭越不听，想斩其太仆，太仆逃奔汉，上告刘邦，说彭越与扈辄想谋反。于是刘邦便派人捕捉了彭越。司法机关以彭越知道扈辄要谋反，而不治扈辄之罪，犯了“反形已具”之罪；要依法惩治彭越。刘邦没有同意，贬彭越为庶人，发配蜀地青衣县。在彭越被押解去长安，途中正遇见吕后往洛阳去，彭越向吕后哭诉自己的冤屈，愿意回昌邑，吕后答应到了洛阳当面向刘邦奏告，于是便带彭越一起回到洛阳。吕后见了刘邦说：“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于是，吕后乃令彭越舍人再告彭越谋反。廷尉遂奏请刘邦，杀了彭越宗族。

东垣战役评述

刘邦平定陈豨反叛的东垣战役，是西汉初年又一次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战争，同时也是剪除异姓诸王侯的又一关键战役。这次作战中，刘邦亲率大军，一举歼灭了陈豨和韩王信军，彻底消除了北部边强地区的分裂势力，和晋阳战役一样，对巩固西汉初期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

刘邦和吕后在这次战役后，利用阴谋手段，诛杀功臣战将韩信和彭越，引起了世人的惊恐，特别是一些战功卓著的将领，更是有朝不保夕之感，这对西汉政权的威望，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损伤。刘邦对于公开起兵反叛的将领，以重兵剿灭；对于一些并未起兵反叛的将领，则以“谋反”罪剪除，虽两手交替运用，但目的却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消灭异姓诸王侯。

韩信、彭越都是以其部下上告其“谋反”的罪名而诛杀的。彭越不是谋反，已见诸文字记述，无需争论，实属欲加之罪。

那么韩信“谋反”是否也是欲加之罪呢，虽然这是一个历史遗留之谜，但从一些零碎的史料记述中，也可以看出欲加之罪的蛛丝马迹，有的甚至已是跃然纸上，诸如：

（一）两次“谋反”都是家人上告。第一次上告，韩信即被捕获；第二次上告，韩信遂被夷灭宗族。打下汉代半壁多河山的一员赫赫战将，竟然因一个家人上告，即被定了十恶不赦之罪，这种情况即令是在那样的时代，如若不是出于既定的目的而有意陷害，是不会如此草菅人命的。

（二）第二次上告韩信谋反时，陈豨早已起兵反叛，刘邦并已亲率大军前去征讨，还说韩信派人到陈豨住所，告诉陈豨“弟举兵，吾从此助公”。说韩信“部署已定，待豨报。”陈豨远在代地，且正与刘邦激战，韩信还要等待家人从陈豨处回来报告情况后再定。这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从长安到东北边疆的代地，往返一次，该是多么的困难之事！而且还要在战乱中去寻找陈豨，不要说像韩信这样足智多谋的统帅不会如此愚笨，一般人也很难做这样的处理。

（三）刘邦两次剥夺韩信的兵权，早已是韩信危亡的信号。而且第二次剥夺韩信兵权时，则是垓下大战刚刚结束，刘邦即急驰入韩信营，这说明刘邦始终都把韩信看做对他刘氏江山的最可怕的威胁。

（四）当东垣战役中，将军柴武包围参合，劝韩王信投降定会得到刘邦谅解，重新恢复他的韩王称号时，韩王信以历史上越王勾践的重臣文种，范蠡的下场，相比喻说：“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这说明；韩王信早已从他自己被迁于太原、齐王韩信被迁于楚地、英布被封于淮南等等事件中，看出刘邦坐上帝王宝座之后，必定要残害功臣的本质。

（五）吕后在诛杀彭越时，所说的：“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就将刘邦，吕后彻底剪除功臣的阴谋，已自我表露无遗。韩信、彭越虽然都是战将，但彭越与韩信相比，则韩信自然是木秀于林，在刘邦和吕后的眼中，留下彭越已是后患无穷。那么留下韩信，则可想而知对他们心理上的严重威胁了，由此看来，韩信必死已是无疑。

第四节 平定英布之蕲西战役

第一，淮南王英布叛汉之起因

淮南王英布，为安徽六安人。秦朝时期为平民，因犯罪而受黥刑，故也称黥布。后来被秦始皇征发赴骊山，与其他罪犯一起充当修建秦始皇陵墓的苦工。英布在做劳工期间，便善于与众人交往，后来便率领其他人，在江中为盗。陈胜、吴广起义后，英布与番君商议，聚众数千人响应起义军，番君并以女儿嫁给英布为妻。

英布所率之起义军，由于作战勇敢，常常以少胜多，成为勇冠诸军的精兵。英布在作战中多次充当项羽的先锋，在项羽的指挥下屡破章邯军，曾主持击杀并坑埋秦军二十万于新安，率军首先入关，进到咸阳，因而被项羽封为九江王。后来，在楚汉战争中刘邦派谒者随何劝说英布叛楚投汉后，曾为刘邦击败项羽立下了很大的战功，刘邦建立汉政权后，蒋英布改封于淮南，称淮南王。

英布由于作战英勇，善于用兵，诸军都惧怕英布的军队，因而英布遂成了刘邦最畏惧的三人（韩信、彭越）之一。

英布得知吕后诛灭韩信全族，感到甚为惊恐。不久，吕后又诛灭彭越，将其肉做成肉酱，让各诸侯王遍尝彭越肉酱。当彭越肉酱传至淮南时，英布刚出外打猎而归，见彭越肉酱后，大惊，已预感到同样的命运即将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于是，便秘密调集本国兵马，准备应付突然情况的到来。

第二，刘邦诛灭英布的借口

英布有一个非常宠爱的美妾，因为患病，需要就医，正巧英布的中大夫贲赫对门有一名医，贲赫自以为是英布的侍中，便常常陪同英布美妾至医家治病，英布妾因之便在英布面前多次夸奖贲赫，英布便怀疑她与贲赫私通，赫知道后，十分害怕，便称病而不去见英布。这样，英布愈加愤怒，准备逮捕贲赫。贲赫知道这一消息后，便急忙逃奔长安，上告英布即将谋反，建议刘邦急速派兵诛灭英布。

刘邦得知报告后，即与相国萧何商议，萧何认为，英布不一定会叛乱，可能是上告人因为私仇而妄加之罪，可以先将上告人抓起来，再派人去考察一下，如果当真，再行发兵。

这时英布发现贲赫已逃去京师，预料他很可能会告发其调集部队之事。不久，朝廷的专使又到淮南来视察，英布知道事已败露，便诛杀了贲赫全家，并决意发兵反汉，英布认为，刘邦已经年迈，不可能再率兵亲征，必然让别的将领率军前来，但大将韩信、彭越已死，别的将领不足为惧，于是便积极准备进兵，这是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七月的事。

刘邦得知英布已起兵的消息，便释放了贲赫，并以贲赫为将军。刘邦深知英布是很难对付的劲敌，如何征讨心中无数，便召集群臣计议，谁也说不出英布叛变的道理和对付他的办法。汝阴侯夏侯婴门下有一客人薛公，原来曾是楚国之令尹。夏侯婴便问他英布起兵反叛的原因，夏侯婴对薛公说：陛下分给彭越大量的土地，封其为王，他为何还反叛？

薛公说，陛下连杀韩信、彭越，这两个人都是建立过大功，属同一类型的人，杀了他们，英布自然疑虑自己也将被杀，所以起兵反叛。夏侯婴认为，薛公分析有理，便遵照刘邦的旨意，带他去当面向刘邦陈述他的看法。

薛公见了刘邦，对刘邦说："英布反不足为怪，假如英布出于上计，崤山以东就将会全部为英布占领；假如英布用中计，英布和汉谁胜谁败还说不一定；假如英布用下计，陛下可安枕无忧也。"（原文见《史记•黥布列传》）。

刘邦问薛公何为上计，薛公答道："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其所守，山东非汉之有也。"

刘邦问薛公何为中计，薛公答说："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

刘邦再问薛公何为下计，薛公答说："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

刘邦接着问薛公对英布将出上中下那一计，薛公答说："英布将出下计"。刘邦又问是什么道理。薛公最后对刘邦说，他认为英布是骊山的一个刑徒，现在当了万乘之主，已经很满足了，他没有更大的宏图远虑，所以，他必定选择下计。刘邦听后很满意，封薛公为千户，遂立自己的儿子长为淮南王，决定亲自率兵前去征讨英布。

第三，汉军英布军双方作战序列

一、汉军

统帅：汉高祖刘邦

将领：车骑将军灌婴、右丞相郦商、太仆夏侯婴、车骑将军靳歙、将军贲赫、齐王刘肥、齐相国曹参

总兵力：约二十万人左右。

二、英布军

统帅：淮南王英布

大司马（失考）、上柱国（失考）、别将肥诛

总兵力：估计为十万人。

第四汉军英布军双方作战策划

一、汉军

汉军在确定统帅的人选时，经过了一番周折之后，才由刘邦录目出征。

本来，刘邦年已迈，且身患疾病，打算让太子率军前往。但吕后等根据张良的建议，请来四位隐居的贤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等，先准备请他们游说刘邦，打消废易太子的计划，适逢出兵征讨英布，四人便遵照吕后和吕后兄吕泽的意图，研究商讨迫使刘邦改变让孝惠出征决定的理由和对策。四人认为：太子领兵出征，有功则位不益太子；假如无功而还，那么太子必然被斥为无能之辈，定难保太子地位。而且太子所率领的诸将，都是与陛下夺取天下的雄将，太子率领他们出征，犹如羊驱赶狼一样，肯定没有人为太子尽力，定然不会取得作战的胜利。再加上戚夫人受刘邦的宠爱，其子如意常在刘邦身旁，又深受刘邦喜爱。太子出征，其太子地位肯定就要丢掉。因此，四人建议由吕后向皇帝哭诉这样的理由："英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

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吕后接着哭诉请求说，陛下虽然有病，陛下只要打起精神，坐在辎车之中，诸位将领就不敢不尽力作战，这样，陛下虽然要吃一些苦，但为了我们母子，请你一定亲自出征，刘邦见此情景，只好勉强改变主意，自己带病出征。

刘邦根据英布军的动向，遂于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七月，确定自率巴蜀、北地、上郡等地区的车骑步卒，并调集各诸侯兵直趋蕲西（今安徽省宿县）；同时命令齐王刘肥和齐相国曹参率齐军十二万车骑，直下蕲西与刘邦大军形成夹攻之势，在蕲西地区歼灭英布军。

二、英布军

英布军的作战策划，正如薛公分析的那样，先夺占荆地，再攻取楚地，不取齐鲁燕赵韩诸地，转而向西发展。

第五，蕲西战役作战经过

英布率淮南军起兵后，首先向东进攻，夺占荆王刘贾的都城临淮（安徽省泗县东南），刘贾军被英布军歼灭，荆王刘贾败走富陵（今安徽泗县境），被英布军追及斩杀。英布收编刘贾军后，渡过淮河，进攻楚地。楚王刘交率军迎击英布军。刘交将全军分为三军，布设于徐、僮间地区（今安徽省泗县、宿县一带），以便互为犄角，进而相互救援。有人看到楚王刘交这样的部署兵力，便对刘交和楚将说：“英布善于用兵，各地的军民都很怕他；而且兵法上讲，诸侯在自己地区内作战为散地，军队很容易散掉，现在将全军分为三处，英布如果战胜我们任何一处军队，其它两处都将会散走，哪还能相互救应呢？”刘交等不听，仍坚持按原部署进行迎击英布军。英布率军果然首先攻击刘交军的一路，迅速将其一路军击破，其余两军闻讯而散逃，楚王刘交遂归于失败。

英布战胜刘交后，继续率军折向西进，正好与刘邦所率大军相遇于蕲西。两军会于甀（估计也在今安徽宿县地区），双方摆开阵势，准备交战。

刘邦望见英布军异常精锐，不敢贸然向英布军进攻，遂占据庸城固垒而守，刘邦又观察到英布军的阵势，犹如项羽的行兵布阵，严密威武，甚为忌恨。

这时，齐相国曹参与齐悼惠王刘肥所率之十二万大军，也进到蕲北地区布阵，准备进攻。刘邦旋即派出车骑将军灌婴，进攻英布别将于相地（今宿县西北地区），将英布之别将军击破，斩亚将和楼烦将三人。曹参军和灌婴军再向英布北翼继续进击，又击败英布上柱国军和大司马所率之军，进而再击败英布别将肥诛。俘左司马一人，斩小将十人。同时从正面向英布军进攻之郦商军，也击破英布军，英布全军遂溃败，向淮河岸边撤退。汉军挥军急追，一直追至淮河岸边，英布率残余部队渡淮河南走，汉军也随之渡河，紧迫不放。英布军又与汉军数次交战，又失利，最后仅剩百余人逃到江南。长沙成王臣使人诱骗英布，伪称与英布共同逃亡，英布不知是计，随同他们一同到达番阳，番阳人将英布杀于兹乡（今江西省鄱阳地区），于是，英布的反叛被彻底平定。这时已是汉高祖十二年十月。

蕲西战役评述

刘邦率军平定淮南王英布之战，前后历经三个多月，蕲西决战，一

举歼灭了英布军，消灭了最难对付的异姓王之一。

蕲西决战，刘邦采纳了张良的“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的建议，虽然以优势兵力临敌，但面对雄将英布，却首先采取了坚壁固守的战略，待各路大军齐集之后，多面进攻，协同作战，终于战胜了劲敌英布军。

英布的反叛，虽然是不得人心的破坏统一，制造分裂的行动，然而却使人觉得英布的反叛，实乃刘邦，吕后所逼，是他们诛杀功臣阴谋的必然结果。吕后诛杀彭越之后，送彭越的肉给英布品尝，就是诛杀英布的信号，这使英布深深感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兵反叛，除此之外，别无求生之路可走。因此，一些历代史学家对刘邦蕲西战役的胜利，既无多少称誉之词；对英布的叛乱，也无多少贬抑之句。

第五节 平定卢绾之战

第一，卢绾反汉的起因

燕王卢绾，汉时丰邑人，与刘邦是同乡，卢绾之父和刘邦之父相交甚厚。二人各同时生卢绾与刘邦。卢绾刘邦又同时入学，友爱相处。刘邦以后犯罪逃跑，卢绾常常跟随左右。后来刘邦起兵于沛地，卢绾也随同刘邦作战。刘邦入巴蜀就汉王位时，卢绾为将军，后迁升为太尉常从，任意出入刘邦营帐、卧室。刘邦对卢绾的赐赏尤为优厚，群臣无人敢比，就是萧何曹参也不如他更受到刘邦的宠信，后来刘邦封卢绾为长安侯。

汉高祖五年冬，卢绾与刘贾同击临江王共尉，后又跟随刘邦歼灭燕王臧荼军，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八月，遂被刘邦封为燕王。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秋，当陈豨起兵反汉时，卢绾发兵进击陈豨的东北地区，后来，陈豨命将军王黄求救于匈奴军。卢绾也同时派他的使臣张胜出使匈奴，准备向匈奴陈述陈豨军已被击败，不要派兵支援陈豨军，张胜到达匈奴后，燕王臧荼之子衍也逃亡在匈奴；衍见了张胜，便对张胜说了一些不能帮助刘邦灭亡燕王陈豨的道理，劝告张胜回去说服燕王卢绾，共同反抗汉军。臧衍说："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臧衍继续说："假如现在燕急于灭亡陈豨军，等到稀军已灭，刘邦接着就要灭亡燕王卢绾，你们都要成为汉军的俘虏，你为什么不说服燕王卢绾不要与陈豨对抗，并与匈奴联合起来？这样，我们都会保证平安无事，卢绾也可以长久地占据燕地称王，即使汉军来攻，也能够保障燕国的安全。"张胜听了臧衍陈述后，觉得很有道理、遂放弃了原来的打算，背着卢绾向匈奴请求出兵援助陈豨，进击燕军。燕王卢绾怀疑张胜可能勾结匈奴谋反，于是，便向刘邦上书，说张胜已反，请求灭张胜族。等到张胜返回燕地，向卢绾说明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道理，卢绾才恍然省悟，也已预感到陈豨一旦被刘邦消灭后，自己必将随之会被消灭。于是，卢绾立即再向上报告，改称不是张胜而是别人谋反，解脱了张胜的谋反罪，并暗中派范齐与陈豨联系，告诉陈豨要坚持长期与汉军作战。

第二，卢绾的反叛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十二月，汉大军征讨陈豨叛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陈豨被汉军斩杀，陈豨军也几近全部就歼。陈豨部下有一名裨将投降了汉军，他知道燕王卢绾派出范齐与陈豨密谋共同对付汉军的问题，于是便向汉军报告了这件事情。刘邦听后，便立即派出使者召卢绾入朝，卢绾害怕，称说有病，不敢奉召入朝。刘邦又派辟阳候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等去燕国，再召燕王卢绾入朝，同时查问了卢绾左右的人，卢绾更加恐慌，躲藏起来。卢绾暗中对他的幸臣说："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于是，卢绾乃称病，不奉召入朝，卢绾的左右大臣也都躲起来，辟阳戾审食其听说了卢绾上述的议论，回到京师，即向刘邦做了报告。刘邦听了更加愤

怒，正巧此时又有匈奴投降汉之人员讲，张胜现住在匈奴，是燕王卢绾派驻的使者，于是，刘邦决定派兵前去征讨卢绾。

第三，汉王朝的调兵遣将

刘邦决定出兵征讨燕王卢绾，但因自己曾在平定英布的叛乱中，身中流矢，无法继续率军出战，故开始准备以将军樊哙为相国带兵前往燕地。但这时有人将樊哙与吕后结党，欲等待将来刘邦病故后，以兵尽诛刘邦宠姬戚夫人一家、赵王如意等告知刘邦。刘邦听到这一消息后，大怒，便免除樊哙征燕的任务，并命令周勃为帅，同时下召陈平将樊哙斩于军中，樊哙之妻吕须系吕后胞妹，陈平畏惧吕后报复，不敢按刘邦的命令斩杀樊哙，遂将樊哙带回长安。等到刘邦病故，吕后便放出了樊哙，恢复了他的爵位。

刘邦于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十二月，派周勃以相国职代替樊哙为帅，率领十万大军前去平定卢绾。

第四，平定卢绾的作战经过

周勃率兵攻燕，采取军事进攻和招降并用的策略，对燕六百石以上的官吏，凡不跟随卢绾反者，均爵加一级，其余人等凡脱离卢绾者也一律免罪。

周勃军首先攻下蓟（今北京市东南），俘获燕大将抵、丞相偃、蓟守陉、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大破绾军，绾军败退，汉军追击，再击败绾军于沮阳（今河北省怀来县境）。绾军溃败，周勃挥军直追到长城脚下，遂夺占了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西、辽东二十九县，渔阳二十二县，将卢绾叛乱彻底平定，刘邦以其子建为燕王。

卢绾军战败后，遂将其宫人和残余部队数千人驻于长城下。后来，卢绾得知刘邦于十二年四月病死，遂将其所部投降匈奴，匈奴封其为东胡卢王。

至此，除一个势力最小的长沙王吴芮的封国之外，所有异姓王已全部剪除。

第十一部分 西汉初期平定同姓王叛乱的战争

平定同姓王的战争，是继西汉初年为巩固西汉政权平定异姓诸王之后，而进行的重要战争。

这次战争主要是发生于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止于同年三月的昌邑战役。汉景帝以周亚夫为帅，进行了昌邑战役的全面准备工作，一举平定了七国之乱。

第一节 汉初平定异姓诸王后的政治形势

第一，刘邦病故前后的政治动向

汉高祖刘邦，通过种种谋略策划，逐一消灭和诛杀了曾建立过大功的异姓诸王，刘邦的主导思想，就是认为只要有异姓封王存在，西汉的江山就不会稳固，时刻有易于他人之手的危险。因而，他不惜编造口实，罗织罪名，冒天下之大不韪，将西汉开国之有影响的几个异姓王韩信、彭越、英布等等诛灭，成为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妄杀大批功臣的帝王。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刘邦诛杀功臣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他一方面以诛灭诸异姓王作为他巩固刘氏政权的根本措施；一方面又深感失去具有统帅才能的一些战将后，无人替他征战四方的苦恼。刘邦在征讨陈豨回京后，得知韩信已被诛灭，当时即表现出“且喜且怜之”的复杂心情，故刘邦在平定英布回京途中，路过他的家乡沛地，在与家乡父老饮宴中，更流露了他的这种心情。《史记•高帝本纪》记载，当时刘邦在酒酣之际，自己击筑，边击边唱道：“大风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刘邦诛灭功臣的结果，一方面使西汉失去了忠勇猛将；一方面也导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恐慌与分裂，丧失了一些人心。

在刘邦即将死去时，吕后问刘邦对后事如何安排。刘邦说，在相国萧何死后，曹参可以代替萧何为相，其次可以为相者是王陵，但要有陈平相助。刘邦又说：“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孝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萧何死后，曹参继萧何为相国。

第二，一场大规模战乱的夭折

刘邦于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四月，病故于京师长乐宫，由太子孝惠帝继位。在刘邦刚病故时，吕后深恐未被诛灭的一些开国功臣借机叛乱，夺取帝位。于是便与亲信大臣审食其密谋，要对刘邦死去的消息严密封锁，并借刘邦的诏令，把诸功臣斩尽杀绝，因而，秘不发丧。吕后对审食其说：“诸位将领原都是与高帝一起，从平民起兵，而他们却不能当帝王，只能称臣，心中自然不满，现在陛下病亡，仍让他们侍奉幼主，更是危险，不将他们全部杀掉，天下不安。”（原文见《史记》卷八）曲周侯郦商听到这一情况后，便去会见审食其，郦商对审食其说：“吾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审食斯听完郦商的话，很紧张，便立即入宫去向吕后传话。吕后惊恐，遂不得不发丧，并尊刘邦为高帝，由刘邦子孝惠继承了帝位。由于吕后诛杀全部功臣的阴谋败露，遂避免了汉初一场更多大的混战局面的发生，使西汉政权得以巩固地向前发展。由此看来，诸异姓王的叛乱，实际上皆由刘邦、吕后诛杀功臣的阴谋而被逼起兵。诛杀功臣，非但不是巩固西汉政权的措施，而是导致分裂混乱的最基本的原因。

第三，吕后专权与其党羽的作乱

公元前195年，太子刘盈，即汉孝惠帝，继位时年十七岁。孝惠系刘邦的第二子，但为吕后所生，故能继承帝位。孝惠由于年少，因而，在其当政后，吕后实际上操纵了执政，但是由于惧怕众诸侯反对，有些事情，也不敢过于露骨。孝惠帝在位期间经历了七年的时间，于孝惠七年（公元前188年）八月崩。

刘盈死后，发丧时，吕后干哭不落眼泪，群臣皆不解其意。这时张良之子十五岁的侍中张辟疆便对丞相说：“太后只有孝惠一个儿子，陛下崩，太后只哭不悲，丞相知道其中的道理吗？。丞相说：“不知道。”辟疆说：“陛下没有留下大太子，太后畏惧各位老臣，现在只有请丞相等拜吕后兄侄吕台、吕产、吕禄为将，统率南军和北军。诸吕皆入宫中，主持宫中和军政事务，这样，太后就会放心了，丞相也就会平安无事，摆脱即将降临的灾祸。”（原文见《史记》卷九）丞相立即采纳了张辟疆的建议。于是，吕后大喜，遂痛哭其子病亡。吕氏党羽从此而日渐权倾当朝。

惠帝的皇后，为吕后女鲁元公主的女儿张氏，因张皇后没有生育，所以将后宫美人所生之子为太子，而将太子的生母杀害。惠帝死后，即由这位少儿太子即位，吕后便自己亲临朝政，主宰一切。

吕后为了巩固吕家天下，以与诸旧大臣相抗衡，欲大封诸吕为王侯，但仍畏惧诸大臣的反对。于是，便问右丞相王陵的意见，王陵说：“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吕后很不满意，接着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的意见。陈平、周勃等回答说：“高帝时夺取了天下，封其子弟为王，现在太后称制临朝，以太后家吕氏子弟为王，当然也可以。”正直的王陵不知周勃、陈平的用意，下朝后责备了陈平、周勃一番，经二人解释后方罢。不久吕后便解除了王陵的丞相职务。以陈平为右丞相，以审食其为左丞相，负责宫中事务，深得吕后宠信。

吕后扫除了吕氏子弟封王的障碍后，便先后封其兄周吕侯主子吕台为吕王，以吕产为梁王，吕泽子吕禄为赵王，吕台子吕通为燕王，吕氏其他子弟多人被封为列侯，吕后的势力急剧增强。

吕后所立的少儿皇帝在稍懂事时，知道了自己生母被吕后杀死，而说了几句将来要报仇的话，被吕后得知后，便借此废除了少帝，将其杀死。另立惠帝后宫所生之常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这时已是吕后执政的第四年（公元前184年）夏。

吕后七年正月，吕后听信诬告赵王友想在吕后死后，击杀诸吕的谣言，遂将赵王友幽死。并进一步加重诸吕的权势，以吕产为相国，领南军；吕禄为上将军，领北军。吕后八年七月，自觉病重难以医治，便告诫吕产、吕禄说：“高帝夺取天下之后，曾对大臣盟约，非刘氏为王者，天下共击之。现在我们吕氏家人封王，大臣们都不满意，我快不行了，皇帝又年少，大臣们有可能作乱，你们必须率兵紧紧守卫住皇宫，不要远出送丧，以免出现不测事件。”（原文见《史记•吕太后本纪》）不久，吕后即病死。

吕太后死，吕产、吕禄更加专权，欲为乱。但害怕被高帝诸旧大臣诛杀。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兴居都是齐哀王襄之弟，居于长安，朱虚侯的妻子系吕禄之女，知道诸吕欲作乱的阴谋，怕将来被大臣诛杀，遂告

知了刘章，刘章便将此事又告知了齐王。让齐王发兵西征，诛杀诸吕后，自立为帝，朱虚侯准备与大臣们为内应，齐王于是决定发兵，但齐相从中阻止。齐王杀死齐相，并夺取了琅琊兵，向西进发。齐王襄在告诸侯王书中，列举了诸吕的罪过，并说：“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相国吕产得悉齐王率兵西进，便派颍阴侯灌婴统兵前往迎击。

灌婴率兵到荥阳，便驻军于该地，不再前进。灌婴认为，诸吕拥兵关中，想篡夺刘氏江山，我假如击败齐兵，只能对诸吕有利，故不能去迎击齐军。于是，他便派人去联络齐王与诸侯，以待吕氏作乱时，联合起来，同将诸吕消灭。齐王接受了灌婴的建议，遂将大军屯于齐国的西部边境，以待情况的变化。

吕产、吕禄控制了京师的兵权，欲作乱关中，但内怕周勃、朱虚侯等抵抗，外怕齐、楚兵西进关中，同时还怕灌婴反戈而击，故一直未敢动手。

周勃此时虽然身为太尉，但没有一点军权，无法对付诸吕。曲周侯郦商之子郦寄，与吕禄交谊甚厚，周勃遂与丞相陈平商定，让郦商派其子去欺骗吕禄，企图让吕禄交出兵权，去赵国就赵王位。郦寄见了吕禄对他说：“高帝所立的九个刘氏王，吕氏所立三个王，都是经过大臣商议而定，而且天下诸侯都很同意。现在太后崩，陛下年少，你身为赵王，又是上将军，将兵留在京师，已引起众大臣的疑虑，你不如把将印归还太尉，并请梁王将相国印也交出来，与大臣相盟，然后归国。这样，齐兵必罢，大臣们也就放心了，你也可以高枕王位，这是万世这利。”吕禄去与吕产和吕禄姑母吕须商议如何办。樊哙妻子吕须勃然大怒，斥责了吕禄。吕须说，她坚决反对交出兵权。此时正值郎中令贾寿从齐出使回来，使将齐王如何与灌婴达成协议，准备诛灭诸吕之事，详细告知了吕产。平阳侯得知此事后，便急报告了丞相陈平、太尉周勃。

周勃知道情况紧急，想直接去统率北军，但不得入，诸吕控制很严。于是周励便通过尚在北军任职的襄平侯纪通，召集北军一些将领，伪称上面有令，让太尉周勃统领北军。与此同时，周勃命郦寄与典客刘揭去通知吕禄说：“陛下已命太尉统率北军，让你急速回赵国，迅速把将印交出，不然，你要大祸临头。”吕禄见郦寄这样说，便信以为真，遂把将印交给典客，而将兵权授给太尉。

太尉夺了北军军权之后，驰入北军，召集北军将士，下达训令说：“拥护吕氏的人袒露右臂，拥护刘氏者袒露左臂。”于是军中袒露左臂。北军遂在周勃的完全控制之下。此时南军尚在吕产的掌握之中，平阳侯将吕产已知道诸大臣欲诛诸吕之事，先告知了丞相陈平。陈平立即派朱虚侯刘章前去协助周勃夺取南军。吕产由于尚不知道吕禄这时已将兵权交出，正入未央宫准备作乱。宋虚侯刘章率领一千余士卒赶到未央宫，将吕产击杀。

吕产、吕禄既除，太尉周勃遂分别派人去逮捕吕氏家族的大小人，一一斩首。抓住吕须后，以鞭她抽杀而死。诸吕之乱平定以后，周勃等派使通知齐王和灌婴；齐王遂罢兵，灌婴也率兵回归荥阳。诸吕作乱阴谋的夭折，避免了西汉初期一场巨大的战乱。

第二节 平定七王之乱的昌邑战役

第一，西汉初年刘氏诸王的变迁

汉高祖刘邦，当初为了战胜楚霸王项羽，夺取天下政权，在楚汉战争以及建国之始，出于战略策略上需要，逼于形势，不得不封了一些异姓王，但这些异姓王，早已被刘邦看成是心腹大患，因而便千方百计加以剪除。而在剪除异姓王之后，便先后大封自己的子弟为王，以为这样，才能确保刘氏江山的延续巩固和发展。

从刘邦当政开始，被封为王者共有刘氏子弟九人。刘邦有八个儿子，除吕后所生孝惠帝外，其余七子皆封为王。曹夫人所生之子刘肥最大，封为齐悼惠王，戚夫人所生刘如意为赵王，薄夫人所生之子刘恒为代王，后宫诸姬所生之子刘恢为梁王，刘友为淮阳王，刘长为淮南王，刘建为燕王。刘邦之弟刘交为楚王，刘邦侄子刘濞为吴王。荆王刘贾，虽也是刘姓王，但据《汉书》记载，他系刘邦从父兄之子，不是刘邦的亲子弟。

刘邦所封刘氏诸王，并未按照刘邦的愿望发展，互相之间争夺帝位的斗争也很激烈，所以西汉从封同姓王的开始，便孕育着起兵叛乱的因素。

刘邦原立吕后所生的孝惠为太子。后来，刘邦觉得孝惠生性仁弱，远不象刘邦，便想废去刘盈的太子地位，而另立刘邦宠爱的戚姬所生的赵王如意为太子。经过长期的激烈斗争，吕后取得了胜利，保住了刘盈的太子地位。

汉高祖刘邦死后，为人刚毅、阴险狠毒之吕后，便展开了消除她认为可能成为孝惠帝政敌的一系列斗争。吕后最恨戚姬及其所生之子赵王如意。她首先将戚姬囚禁起来，接着便从赵地将赵王如意调回京师，欲加杀害。但孝惠帝已知其母吕后要杀赵王的阴谋，遂将赵王放在自己宫内，与自己同吃同住。但一天孝惠早赶出走打猎，赵王如意年幼起床晚，便被吕后派人偷偷刺杀。接着吕后便命令砍断戚姬手足，挖去双眼，囚于厕室，称做“人彘”，并让孝惠帝前去观看“人彘”。当孝惠知道这是其母所为时，痛苦万分，对太后说：“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自此，便不再听政。

齐悼惠王刘肥，是孝惠的异母兄，他勇猛过人，且据有齐地七十余城。吕后深感他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便想借其来朝之机将他害死。在宴席向，吕后命人给齐王送来两杯鸩酒，孝惠不知是鸩酒，也同时与齐王举起鸩酒欲饮，被吕后打掉。齐王刘肥警觉，未敢饮酒，装醉退席，幸免于死。后来以齐地一个郡送给吕后女鲁元公主做汤沐邑，才得以逃离长安，返回齐国。

赵王如意被吕后杀死后，吕后随即以刘友为赵王。吕后为了控制刘友，便以诸吕女为友之王后，赵王友不喜欢她，便又被吕后幽杀而死。吕后再命梁王恢为赵王，并又以吕产女为赵的王后，赵王恢同样被吕王后压抑，悲愤而自杀身死。

总之，刘邦自汉初所封刘氏子弟诸王，没有间断过明争暗斗，统治

集团内部的残杀争斗，交织着诸吕作乱，愈演愈烈。

第二，汉文帝的即位和进一步削弱刘氏诸王势力的斗争

吕后死，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共谋，废除了少帝，准备迎立代王刘恒为帝。当陈平、周勃派出的使臣去迎接代王时，刘恒遂召集众臣商议，许多人都认为有可能是大臣变乱的诈谋，不可轻信，最好称病不去长安。唯独中尉宋昌认为，诸大臣迎立代王为天子，是真心实意，并非诈谋。他分析说，诸大臣之所以衷心迎立代王为天子，理由有如下几点：一是诛灭暴秦、统一天下者，为刘氏也；二是汉王侯封地，犬牙交错，互相节制，可谓盘石之宗，天下皆服其强；三是汉除秦苛政，施德惠于百姓，人人自安，百姓向汉之心，难以动摇；四是诸吕封王，官高权重，且有吕太后的威严，但是太尉一呼，众人便叛离诸吕，拥立刘氏，说明刘氏政权深得人心。今后大臣假若要叛乱，百姓也决不会听从他们的命令。而且京师内有朱虚侯等内亲，外有吴、楚、淮南、琅琊、齐、代之强，他们也不敢轻易为乱。同时代王贤圣仁孝，天下皆知，所以大臣是诚心诚意拥立代王为帝，不必怀疑。代王刘恒遂逐渐打消了顾虑，去长安就帝位。由代王被大臣迎立就帝位的过程，可以看出西汉初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起兵战乱的严重情况，已经给人们造成了心理上的人人自危的状态。

刘氏诸王，随着其国内局势的稳定，社会生产和经济实力的发展，各自的势力都日益强盛，他们皆都设置了“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虽然诸国之太傅、相、内史、中尉还是由汉朝廷统一任免，并仍由相掌握兵权，但诸王的权力却越来越大，他们任免官吏，铸造钱币，殷实富强，一切礼仪形同天子，甚至不听皇帝的诏命，日渐形成“尾大不掉”的状态，举兵谋乱已成箭在弦上之势。汉文帝刘恒即位的第三年（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乘汉文帝征讨匈奴之机，打着立其兄齐王襄称帝的旗号，起兵叛乱。汉文帝以大将军柴武，率十万大军前去征讨，济北军被击破。这是继齐王襄举兵征讨吕氏之乱以后，首次同姓王欲夺取帝位的武装战乱。汉文帝六年（公元前l74年），淮南王刘长，废除了汉朝廷法令，不听天子诏令，自己任命相、内史、中尉等二千石之官吏，明目张胆地与汉朝廷分庭抗礼。他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派使者去闽越、匈奴，欲请其发兵攻汉，后来幸被朝廷发现其叛乱阴谋，拘捕后，废迁途中而死。中央政权与王国势力之间的矛盾，已日益尖锐激烈。汉中央王朝的统治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诸王国已成为汉王朝的巨大威胁。对此，许多大臣都深感局势危急，必须迅速加以解决，否则汉室将陷入战乱危亡之中。

汉文帝之子梁王刘揖的太博政治家贾谊，为此先后两次上书汉文帝，他在著名的《治安策》中，痛心疾首，认为诸王国的欲谋独立咄咄逼人的态势，“可为痛哭者一”。他建议文帝“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贾谊认为，国强者必先反叛，若把诸侯王国划小，国小力弱，则很难起叛乱之心。因而要将全国治理成好象身体之使臂，臂之使指，挥动自如，诸王侯谁也不敢有异心，诚心诚意归命于天子。汉文帝根据贾谊的建议，开始把一些王国划小，并将自己的儿子淮阳王刘武，封在梁地，以做为自己的屏障，将齐王刘肥之孙城阳王喜，迁为淮阳王。

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文帝太子家令晁错上书文帝，建

议削弱诸侯王国势力。以后文帝便进一步削弱王国，首先从淮南王和齐王两个封国开始，将淮南王喜，迁为城阳王，将淮南地区由淮南王刘喜的三个儿子划地分治：以刘安为淮阳王，建都寿春；以刘勃为衡山王，建都于六；以刘赐为卢江王。将齐国封地，分给刘肥的六个儿子：刘将闾为齐王，建都于临淄；刘志为济北王，建都于博阳（今山东泰安附近）；刘贤为川王，建都于剧；刘辟光为济南王，建都于东平；刘印为胶西王，建都于高苑；刘兴渠为胶东王，建都于即墨。淮南和齐地的被分封削弱，对王国割据势力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第三，昌邑战役前七王的联合

汉文帝于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病故，由太子刘启继承帝位，称汉景帝。

景帝即位后，任用其“智囊”晁错为御史大夫。晁错由于才华出众，识广见博，忠于汉景帝，遂深得景帝宠信，言听而计从，是景帝首屈一指的决策人物。晁错力促景帝继续削弱王国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当时有人发现吴王刘濞谋反准备已久，晁错便向景帝建议说，吴王以前就想谋反，依照古来的法律，就当斩首，当时文帝仁慈，只让打了他几杖，但他现在仍不思改过自新。他“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入，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弱王国的建议，开始剥夺他们的一些封地。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决定削去吴之豫章郡，会稽郡。楚王来朝，以其以往犯罪，削去其东海郡，在此之前，已削去赵王的河间郡，胶西王刘印被削去六个县。

吴王刘濞听说要削去吴国两郡的消息，十分气愤，因之想立即起兵，他听说胶西王勇猛、好斗，便派使者中大夫应高前去约胶西王起兵击汉。应高对胶西王许愿说，将来夺取天下之后，“两主分割”。胶西王答应后，吴王刘濞尚不太放心，又亲去胶西，当面与之结盟。随后吴王又派使者联络胶东、菑川、济南、济北、楚、赵等国，各国均答应共同起兵反汉。

晁错削弱诸侯王国的主张，引起了众多割据势力的怨恨，晁错父亲闻知此事，便当面责备晁错不该建议削弱诸侯势力，并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晁错对他父亲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吾不忍见祸及吾身。”遂饮毒药而死。

第四，汉军吴楚联军作战序列

一、汉军

统帅：太尉周亚夫

将领：大将军窦婴、护军赵涉、将军栾布、曲周侯郦寄、弓高侯韩当、将军韩安国、张羽

总兵力：三十多万人。

二、吴楚联军

统帅：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胶西王刘印、菑川王刘章、济南王刘辟光、胶东王刘雄渠、赵王刘遂

大将军田禄伯、将军周丘

总兵力：吴军二十余万，楚、赵等六国之军至少也有十五万以上。

第五，汉军吴楚联军双方作战策划

一、吴楚联军

吴王为了夺取攻汉的胜利，动员了自己国内从十四岁至六十二岁的人统统入伍参战。吴王下令全国说：“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除国内出动二十万大军外，并使闽越、东越也发兵相助。

吴王召集诸将领商讨进兵计划，大将军田禄伯建议说：“兵屯聚而西，无它奇道，难以就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但吴王太子却不同意田禄伯单独行动，怕另有变故，因而便对吴王说：“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别，多它利害，未知可也，徒自损耳。”吴王遂不用其计。

吴另一少年桓将军也建议说：“吴军多步兵，步兵利于在险要的地势条件下作战，汉军多车骑，车骑利于在平坦的地形下行动，吴军不应在所过城邑停留，急速占据洛阳的武库和敖仓之粟，夺占山河险要关隘以令诸侯，即使不入函谷关，天下也会基本稳固。如果行动迟缓，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地，我们就会失败。”（原文见《史记》卷一○六）但吴王等又以他年少无知，而拒绝他的建议。遂决定以一路大军向西北先攻梁地，然后再节节向前发展。

二、汉军

周亚夫奉命率三十万大军东征，深知楚军历来剽悍骄捷，战斗力强，很难轻易将其打败。因而向汉景帝建议说：楚国之兵剽悍勇捷，难以很快战胜它，我们应该舍弃梁国，尽量以梁地拖住敌人，并切断敌人运送粮草的道路。这样就可以使敌兵疲粮尽，战而胜之。汉景帝同意周亚夫的策划。汉军以大将军窦婴驻军于荥阳，控制荥阳一带战略要地，阻止吴楚联军西进。周亚夫自率主力向吴楚联军进击，并以另一部兵力向齐，赵等地进攻。

第六，昌邑战役的作战经过

一、以杀晁错为借口起兵

吴王刘濞在作战准备完毕后，即于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打着“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叛乱。先将汉朝所任命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吏统统杀掉，然后他即亲率大军从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地区）北上，西渡淮水，与楚军合兵，继续前进。

吴王刘濞为壮大其起兵的声势，制造叛乱的舆论根据，在起兵后即派遣使者，致书胶西王、胶东王、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故长沙王子，历数汉朝廷任用“奸臣”，削夺诸王侯封地，危及汉宗室安全的“罪状”，然后宣称：“吴国虽然地方不大，但地方三千里；人虽然不算多，但可出精兵五十万。而且我一向与南越友好相处三十多年，越君王愿意出兵以帮助吴国，又可得精兵三十万。吴国虽然不富，但节衣缩食，积金钱，备兵革，屯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原文见《史记》一○六卷）

刘濞为了鼓舞将士的作战积极性，还宣布：凡抓住汉军大将者，赐赏金五千斤，封万户；抓住列将者，赐金三千斤，封五千户；抓住裨将

者，赐金二千斤，封二千户。以下也皆有赏赐。对降城略地者，也给予重赏。

汉景帝听说吴王刘濞等已起兵叛乱，想派人劝说吴王罢兵。这时原吴相袁盎，曾因晁错欲治他的贪污受贿罪，对晁错恨之入骨，即向景帝建议说，诸王起兵，完全是因为晁错，只要杀了晁错，吴楚即可退兵。汉景帝遂杀了晁错，并立即以袁盎为太常，派往吴国，向吴王说明，晁错已斩，请吴王退兵。吴王回答说，他已称东帝，拒绝退兵。这时正好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曾随军征讨吴楚军，返回京师，谒见景帝，景帝问他说：“晁错已死，吴楚能不能退兵？”邓公回答说：“吴王准备叛乱已经数十年了，他是发怒于削地，以让朝廷诛杀晁错为台，其用意远不是杀晁错而已。”邓公接着说：“晁错深伯诸侯强大难制，所以建议削地，以加强朝廷的力量，这本来是有利于万世江山的良策，但刚刚实行，晁错便被诛杀，这样，忠臣就无人敢再说话了。”景帝这时才省悟（原文见《史记》卷一○一）。

二、昌邑下邑地区的作战

吴楚联军首先向西北进攻梁地，攻破梁之棘壁（今河南省宁陵地区），斩杀梁军数万人，乘胜继续向梁地推进。梁孝王十分惊恐，派遣六位将军率军再与吴军战，梁军溃败。梁孝王数次派人去向周亚夫求救，周亚夫均不救援。吴楚联军又进而包围梁都城，由于梁都坚固，无法攻下梁都。吴楚联军被阻。这时，吴将周丘通过威胁诈谋，劝降下邳，一夜之间得三万兵马，遂向北继续略地，到了城阳，已拥有近十万之众。

太尉周亚夫率军东走，当进至霸上（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对，赵涉对周亚夫说：“吴王刘濞一向豪富，长期以来搜罗亡命之徒。现在他知道将军即将东出函谷关的动向，必定会在崤山、渑池之间的险要处设置间谍伏兵。用兵贵在神速秘密，将军何不从这里向右进军，经蓝田、出武关，迂回而至洛阳，这样只不过多用一两天的时间，便可直入洛阳的武库，到后敲击战鼓，诸侯发现汉军到达，一定会以为将军是从天而降。”（原方见《资治通鉴》卷十六）周亚夫遂按照赵涉的建议，率领部将安全到达了洛阳。周亚夫这是高兴地说：“七国叛乱战起，我坐驿车到达这里，没想到会这样安全。现在我控制了荥阳，荥阳以东就没有什么危险了。”（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十六）周亚夫进至洛阳后便立即派兵搜索崤山、渑池之间地区，果然抓到了吴王派出的伏兵。于是，便请赵涉当护军。

周亚夫军至淮阳，周亚夫的父亲周勃的故客邓都尉便向周亚夫建议说：“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罢极，破吴必矣。”周亚夫很高兴地采纳了邓都尉的建议。周亚夫遂率主力军向东北进军，进占了昌邑（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并在昌邑筑垒坚守。这时吴楚军加紧围攻梁国，由于周亚夫拒绝派兵支援梁王，梁王便派人上诉于汉景帝。汉景帝诏命周亚夫救援梁王，亚夫仍坚壁不出，只派弓高侯韩当等率轻装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出淮泗口（今江苏省淮阴县西，又名清口），切断吴楚联军的后路，绝其粮道。梁王命中大夫韩安国和张羽为将军，以韩安

国坚守城池，张羽出战，使吴军受到一些挫折和损失，吴军俗向西进军，但无法突破梁军的防守，吴楚联军胶看于坚城立下，往日的锐气大失，为求速战速决，便转而进攻周亚夫军，两军相遇于下邑（今安徽省砀山东），吴楚联军企图寻找汉军主力决战，但是周亚夫仍坚持坚壁不战。吴楚联军由于挑战，周亚夫军拒不应战，吴楚军采取佯攻汉军阵地东南角，实际主攻西北角的战术。周亚夫识破了吴楚军的企图，便加强了西北角的防御，当吴军猛攻西北角时，周亚夫军已严阵以待，吴楚军最后的攻击失败，加上士卒疲劳饥饿，于是开始溃乱，吴王刘濞决定率部队撤走。二日，周亚夫率军追击，大破吴楚联军。吴王刘濞丢弃部队，仅率数千人乘夜逃窜。楚王刘戊见大势已去，被迫自杀。周丘自感吴楚联军无力向西北发展攻势，遂退往下邳，途中病死。吴王率军渡江，退守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地区），再退走东越，以东越兵万余人，并收聚其残兵，企图重振军威。汉军派人买通了东越，使东越以劳军的名义诱骗吴王刘濞出营，将吴王斩杀。至此，声势洁大的七王之乱的主力军吴楚联军，即告全部失败。

三、汉军与诸齐王和赵王军的作战

济南、胶东、肢西、菑川等诸王和赵王；按照与吴王刘濞的协议，也同时起兵于齐地和赵地。

济南、胶东、胶西、菑川等四王起兵后，首先进攻齐王刘将闾军于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东）。齐王本来也预定要参加七王之乱，可能后来觉得事情不妙，退出七王反叛的行列，畏罪而自杀。临淄被围困三个月未被攻破。这时进击齐地的汉军在将军栾布的统率下，与弓高侯韩当的援军合兵一处，向围攻临淄四国之军进攻，将四国之军击破，各败退回本国。

在胶西王阴谋叛乱之前，诸大臣即劝阻胶西王不要起兵叛乱，他们认为在胶西为王已经很不错了，吴王虽然与胶西约定，事成之后，平分天下，但那也是后患无穷。胶西王不听。待兵败退回胶西后，始知后悔已晚。胶西王太子刘德还想再战，打算战败之后，逃入东海。但胶西王刘卬觉得已无任何取胜的希望，遂自请向汉军韩当军投降，韩当向刘卬展示景帝的诏书：“王其自图。”刘卬看后，自叹说：“如卬等死有余罪。”即自杀身死，太后、太子也皆死。胶东王渠、济南等王兵败后也自杀，诸齐王之叛乱，遂被平定。

郦寄率军进攻赵地，进展也比较顺利，赵王之军节节败退，最后退守都城邯郸，郦寄军包围邯郸城近十个月，后城破兵败，赵王刘遂自杀。这样，七王之乱遂全部被平定，汉军胜利地结束了昌邑战役。

昌邑战役评述

汉景帝时期发生的七王之乱，是自刘邦以来分封同姓王的必然结果。这些同姓诸王依仗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反叛西汉王朝，制造分裂和战乱，违背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破坏了当时“文景之治”的安定繁荣的大好局势，很不得人心。

周亚夫在昌邑之战中，仅仅经过三个月的作战，即将七王之乱的叛军主力吴楚联军，一举击败，其中有着十分可贵的经验。

从战略全局出发，确定恰当的作战方针，是这次战役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周亚夫军，在进军之前，即对七王叛乱的形势，做了全面的估

计，针对叛乱的主力吴楚联军剽轻难敌的特点，确定了以梁地拖住敌人，坚壁不战，断敌粮道，待敌疲惫之后，再行进攻的作战方针。显然这一方针对战胜敌人起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周亚夫正是依据这一方针，在作战之初，避开敌军的锋芒，避免了初战失利的危险；在吴军兵锋正盛，之时，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宁肯牺牲梁地，拖住敌人，挫败敌之锐气，抓住适当战机，再行攻击，力求一战而胜；派轻兵断敌粮道，沮丧敌军，给敌人造成心理上的严重威胁。这一整套作战策划，确实击中了敌人的要害。

正确的战略方针确定之后，还需要战略指导者具有为达成作战目的，思想上高度的指向性和集中性。汉军统帅周亚夫为贯彻预定的作战方针，梁王数次紧急求救，周亚夫按兵不动；汉景帝诏命周亚夫往救梁王，周亚夫甘冒抗拒君命之罪，仍然按兵不动；吴楚联军多次挑战，欲图激怒周亚夫出兵决战，周亚夫还是按兵不动。为此，周亚夫营内曾于夜间引起惊乱而互相攻击，周亚夫竟静卧床上，不动声色，部队自然平静下来。最后终于等到了吴楚联军自行撤退的宝贵战机，周亚夫当即挥军猛击，一战而胜吴楚三十万大军。周亚夫这种战略指导思想上可贵的指向性和高度的集中性，很能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兵贵神速，出敌意料是周亚夫军致胜的另一重要因素。周亚夫本来想出函谷关，直趋洛阳荥阳地区，但他接受了赵涉的建议，以神速的行动，秘密绕道武关，避开了吴王的间谍伏兵，顺利到达荥阳。这样，便使周亚夫军占据了中原战略要地荥阳，夺取了进攻吴楚联军的前方战略基地，形成了遥制齐赵，屏护关中的有利战略态势，使汉军处于十分有利的主动地位。

各个击破、逐次歼敌是周亚夫军取胜的又一重要因素。在战略全局上处于劣势的周亚夫军，为了稳操胜券，采取了以主力对付吴楚联军，以少量兵力牵制齐赵等军的作战部署，这样，就争取了在作战局部地区内的一定优势，从而保证了逐次歼灭敌人。

当然七王之乱，吴楚军的惨败从根本上说，还是吴楚等国制造分裂，把人民推向割据战乱的痛苦深渊，必然遭到人民反对的结果，兵无斗志，自然连战连败。

七王之乱，使汉王朝接受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汉景帝在错杀贤臣晁错，痛恨之余，才进一步认识到推行削弱诸侯势力的政策是何等的重要。汉景帝于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将各王国的丞相改为相，废除御史大夫、廷尉、宗正、博士等官吏，将王国官吏的任免权和行政诸权，统由朝廷收回，不让各王国拥有军队，同时严令规定，“不得复治国”，逐渐把王国的势力削弱到同郡一样，这就从组织上保证西汉政权的长期统一和巩固发展。

第十二部分 西汉末期的社会状况和农民起义战争的爆发

第一节 农民与统治阶级的尖锐矛盾

第一，西汉末期社会濒临崩溃

西汉末期，汉王朝的统治已腐朽不堪，农民百姓与统治阶级间的矛盾已到相当尖锐的程度。官僚、皇亲和豪强地主对农民百姓横征暴敛、残酷无比。广大劳苦农民身受苛捐重税、乡典私求和高利贷的多重盘剥，已处于“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的痛苦深渊。遇到灾害，情景更为悲惨，嫁妻卖子、或自卖为奴者比比皆是。

统治阶级和大小官吏除了剥削压榨农民百姓之外，还任意夺占农民的土地，使大批破产农民成了他们的佃户。汉成帝的丞相安昌侯张禹在渭河、泾水流域掠夺了农民四百余顷肥沃良田，丞相高陵侯翟方进，由于强占农民田地的阴谋没有得逞，竟擅自使用朝廷中枢之令，借故废除当时著名的重要水利工程鸿隙陂，使大片农田失去水源灌溉，禾苗枯死，农民无以为生，纷纷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吏书对西汉自元帝以后之社会穷困的情况有颇多记载。汉元帝初年。天下大水，关东十一郡尤甚。二年，齐地乱，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汉成帝永始二年“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灾，人相食”。百姓财尽力竭，“死于道，以百万数”，使西汉社会更加陷入严重的危机。成帝除大兴土木，挥霍无度之外，根本不问朝政，任凭皇亲国舅为所欲为，有的妻妾数十，家奴千百，汉哀帝的幸臣董贤的家产竟达四十三万万之巨，而广大劳苦百姓则生与牛马同栏，死被猪狗所食，处境悲惨至极，不得不纷纷起而反抗西汉的黑暗统治。

汉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颍川（今河南省禹县）铁官徒申屠圣等百八十人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

汉成帝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广汉（今四川省梓潼）郑躬等六十多人起义，他们攻官寺，篡囚徒，盗库兵，“自称山君”。势力很快扩展到四个县，至汉成帝鸿嘉四年已拥有近万人，汉王朝派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发广汉郡和蜀郡兵三万余人进行围剿，才全部将起义军镇压下去。

汉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尉氏人（今河南省尉氏县）樊并等起义，“杀陈留太守严普”，出囚徒，取库兵，“劫略令丞，自称将军。”后来才被汉王朝镇压下去。山阳（今山东省金乡县）铁官徒苏令等二百多人起义，攻杀了长吏，砸开兵器库，起义声势很大，波及“郡国四十（《汉书》卷十说为十九郡国）”，东郡太守、汝南都尉均被起义军诛杀。

从《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二十二页、二十三页、一百七十页等页中，均可见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的记述。如某地严就的起义，官府难以镇压，竟出高价悬赏捉拿起义领袖，捉住严就、君兰等渠帅一人，赏钱十

万，党与五万。南阳人杜光的起义声势也很大，起义之初即拥有田客一百二十三户，汉简中朝廷下的捕劓诏书中，对起义领袖杜光的皮肤颜色、年令、乘坐的车马颜色等等都做了详细记载。虽然以上农民起义均不见于《汉书》的记载，但从朝廷的重视、悬赏之重，也必定为当时威胁汉王朝统治的心腹之患。

面对农民百姓不断的起义反抗，引起了统治集团的恐惧，到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西汉政权的统治摇摇欲坠，当时大司马师丹、孔光、何武等提出了“限田”、“限奴婢”的主张，企图以此缓和社会的阶级矛盾，但由于一些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未能实现，这就更加剧了西汉王朝的危机。

第二，王莽的当权和改制的失败

（一）王莽的当权

外戚当政，是汉王朝统治后期的一大流弊。刘邦死后，为吕氏家族当政，汉元帝以后的各代君王多因年幼或昏庸无能，外戚专权的情况更为严重。汉元帝时期，外戚史、徐两家与宦官相勾结，控制了朝政。王莽是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皇后王攻君的兄弟王凤、王商、王音、王根都做过大司马大将军，王氏门庭前后有九人封侯，从中央到地方许多达官要吏都是王氏家族之人。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8年），王莽继王根之后任大司马大将军，掌握了全国军、政全权。哀帝即位后，王莽失去了权力。汉哀帝死后，只有九岁的汉平帝即位，王莽又出任大司马，并录尚书事，重新操纵了汉大权。

王莽当政后，采取了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措施。他下令加封汉宗室与重要功臣的后代，对于年老退休的官吏给予优厚的待遇，大规模扩建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将熟知古书、经学、兵法、历算、医药、天文、地理等等方面向的人才召至京师，加以利用，因而取得了相当一部分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支持。王莽为了进一步制造他自己贤臣良君的形象，他献私田三十顷、钱百万分给受灾地区的人民，在京师长安城内修建大批供贫民居住的房屋。据史书记载，上书称颂王莽者达四十八万多人，朝野上下充斥着为王莽歌功颂德的气氛，这在当时几乎所有达官贵族都荒淫无度，醉生梦死，贪官污吏遍地皆是的黑暗政治统治中，自然给人们一种“木秀于林”的假象。当王莽觉得时机成熟之后，便于汉平帝五年（公元6年），将当了五年傀儡皇帝的平帝毒死，另立孺子婴为帝，从这年起他以“居摄”的形式，称“假皇帝”。过了两年多，他便索性废除孺子婴，夺取了刘氏政权，自立为皇帝，更改国号为“新”，这是公元八年的事。

其实，在王莽“居摄”期间，许多人已渐渐感到王莽有篡夺西汉王朝的野心。孺子婴元年（公元6年），汉宗室安众侯刘崇率兵反对王莽，被王莽镇压；第二年东郡太守翟义拥立严乡侯刘信为皇帝，率兵讨伐王莽毒死平帝，欲夺汉室的罪行，兵至十万多人，王莽发长安兵前去征讨，才在考城地区战胜刘信军，并于固始斩杀了翟义。

（二）王莽的改制和失败

王莽当了新朝的帝王之后，为了缓和当时社会的危机，即宣布对土地、商业、币制、官制等等制度进行改制。这些改革多系托古而来，严重脱离当时危机四起的社会实际，其主要的内容为：

一、农田改为王田。根据《周礼》的并田制度，规定土地属于朝廷，私人不得买卖。一家不够八个男子，而占田超过一井的，把多余的田分给本族人，或邻居无田的人。

二、奴婢改为私属。每一奴婢，在奴婢所有主家中，有占着一个成员的地位。奴婢和土地一样不得买卖。违犯重者则处死，轻则放逐到边远地区。王莽的实行王田，把奴隶社会的土地制度“井田制”搬到封建社会，完全是复古倒退，违反社会发展规律。要多田人分余田给贫民，是十足的空想。到建国四年，王莽只得取消这一“改革”，准许买卖王田，不算犯罪，买卖奴婢暂不治罪。改革制度的主要内容至此完全失败。

三、改官制和郡制，王莽按照周朝的官制，改变汉朝的官职制度，设四辅位上公：王舜为太师安新公，平晏为太傅就新公，哀章为国将美新公，刘歆为国师嘉新公；将汉以来的诸侯王称号改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汉周边的属国凡称王者，也一律改称为侯；重新改划郡县。并规定在改制过程中，大小官吏均自筹俸禄。这就造成大小官吏公开的横征暴敛，不择手段地搜括民财以自肥。

四、垄断工商的五均六管。王莽为着限制，管制工商业，平均物价，于建国二年（公元10年）实行“五均六管”制度：

五均：在首都长安及全国另外五大都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司市官，以每季中月，评定出物价上中下三等标准价格，并严禁屯积居奇。

六管：政府管理卖酒，卖盐，铁器（农具），铸钱，山泽生产税和五均、赊贷、总称为六管。

六管中人民受害最大的是铸钱，币制时常改变，每几年改革一次，就铸造多种新钱币，以小换大，套取民财，工商业和农民就大量破产一次。王莽统治十余年间，币制改革三次，可想农民所受灾祸的沉重。掌管五均六管的高级官吏，为“五均司市师”。它任命大商贾出身的人做官，去督察“五均六管”的执行。官吏和商人互相勾结，剥削人民，贪污舞弊。地方宫把贪污所得，分送中央官吏，得到保护，更是无恶不作，商贩、城市贫民和农民大受其害。五均六管变成害民的政策。结果“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加上赋敛苛暴，徭役繁多，形成“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改革和法令变动的频繁杂乱，既加剧了社会的动乱的因素，又给贪宫污吏造成了欺压和勒索人民的机会，百姓时时面临刑罚与丧命的危险。因而，人民被迫纷纷起义。当时农民出门生产，所得不够纳税；关门守家，横祸也会飞来。的确到了除起义外，别无其他出路的境地。

王莽改制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各地因饥饿和残暴刑罚迫使农民即将掀起大规模起义的风暴。这时王莽一方面为着显示自己当朝的威德，一方面为着转移百姓的视线，便向四周各族发动了战争。

对匈奴的战争：自汉宣帝以来，西汉与匈奴关系良好，匈奴对汉保持朝贡国的关系，边境安定，汉匈人民和睦相处。在王莽称帝后，于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重新颁发“新匈奴单于章”，王莽命令将匈奴全国改分为十五单于，并将匈奴单于改称为“降奴服于”。同时发北方各郡、鲜卑与乌桓等三十万大军，以立国将军孙建为统帅，分路向匈奴进攻，各路军队的统兵将领如下：

将军苗䜣、王况出五原；
将军陈钦、王巡出云中；
将军王嘉、王萌出代郡；
将军李棽、李翁出西河；
将军阳俊、严尤出渔阳；
将军王骏、王晏出张掖。

但各路大军由于长时间调集不齐，且后方的粮草供应又接济不上，只好在边境地区以军屯田，解决军队的吃用问题。这样，并未与匈奴进行大规模交兵，大军在边境停留七年，耗尽了边境地区的财富，大大削弱了汉北部边境的实力，使北部边疆空虚，“野有暴骨矣。”后来，王莽不得不召回北征的将领。

天凤五年（公元18年），王莽又发动了再次入侵匈奴的战争，王莽政权召募天下的丁男、罪徒、奴隶，并诏令举国臣民捐出财产的三十分之一，支持军队作战，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对西域的战争：自汉武帝派人通西域以来，当时我国西域各部族共建立了三十六国，多年都与汉基本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西汉王朝曾相继设置过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以统辖西域各国。但王莽称帝后，贬西域各国诸王为侯，侮慢各国。天凤三年（公元16年），新莽王朝命五威将军王骏，西域都护李崇、戊己校尉郭钦率兵进击西域各国，王骏战死西域，未取得预期战果。破坏了汉与西域的关系，使西域各国纷纷背离汉朝。

对西南地区的战争：王莽改西南地区的句町王为侯，又诱杀句町王，引起句町的反抗。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派出将军冯茂等率兵前去镇压，“士卒疾疫，死者十六七”，耗尽了益州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也未将句町征服。其后再派将军廉丹率天水之陇西，广汉巴蜀等地步骑兵十万，再次对句町进攻，又未将其征服，从而进一步引起西南地区各民族的起兵反抗。

对高句丽的战争：建国四年（公元3年），王莽派将军严尤征服了高句丽，击杀了高句丽侯，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引起高句丽人民的强烈不满，一直多年没有停止与汉朝的作战。

王莽夺权后的统治，内部危机四起，新莽王朝本已危在旦夕，加之王莽又连年发动战争，农民百姓已到无以为生的地步，于是，以推翻王莽政权为目的的全国性农民大规模起义，就揭竿而起了。

第二节 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

第一，边疆和边远地区人民的起义

王莽调往北部边境与匈奴作战的各路大军，由于兵力长时间调集不齐，故一直由边境地区郡县供养，对边境地区的农民百姓造成了无法忍受的沉重负担，这些部队由于缺衣少食，基本生活无法维持，因而许多士卒与当地人民被迫起义，其中以并州地区的军民最先发起反抗王莽政权的起义。这些起义的士卒和农民有的几百人，大者数千人为一股，攻打郡县城邑，莽军经过一年的剿灭，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天凤四年（公元17年），临淮人瓜田仪等起兵于会稽郡治所长州地区（约在今江苏吴县一带地区），活动于江河湖网地区。琅邪妇女吕母也率人起义。当初吕母之子吕育为县吏，被县宰判刑冤杀，吕母散家财，招募穷苦百姓，开始只有几百人，攻拔海曲县城；（今山东省日照县境），斩杀协造冤狱的县宰，声势越来超大，响应起义的人越来越多，发展到万余人；成为一支重要的反对新莽政权的力量。后世对吕母集合队伍起义的地方称名为“吕母岗”，以纪念历史上第一个统率千军万马反封建斗争的女英雄。

第二，内地人民的起义

王莽当政以来，内地人民的起义就此起彼伏。在王莽“居摄”前后，有的起义就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居摄二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反莽时，长安地区的赵明、霍鸿就率领农民起义，与翟义遥相呼应，起义军得到茂陵（今陕西兴平县境）以西十多个县农民百姓的响应，起义力量发展迅速，很快达到十余万人，起义军一度攻打长安，王莽政权紧急调遣大军剿灭。

天凤四年（公元17年），荆州一带地区发生严重饥荒灾害，人民纷纷到野泽掘食野植物，灾民聚集，常起纠纷，其中新市（现湖北省京山县东北的南新市城）人王匡、王凤以善于评理公道、对人和气，受到饥民的爱戴，被推举为渠帅，开始只拥有起义灾民几百人。南阳、颍川人马武，王常、成丹等也率领一些起义农民前来参加。他们首先进攻离乡聚（现湖北省当阳县境），起义军劫富济贫，附近群众纷纷响应，很快便发展到七八千人，随即转入绿林山，依托山区打击王莽政权的反动力量。同时，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地区）的张霸、江夏的羊牧也各自汇合万余人举行起义。

地皇二年（公元21年），南郡人秦丰率领万人起义。

扬州地区的广大劳苦人民和荆州地区由于灾情严重，饥民遍地，一些零星的灾民起义，到处可见。

第三，地主武装的起义和加入农民军

农民起义势力的壮大和发展，使一些痛恨王莽篡权的豪强地主也趁机纠合自己的宗族、食客组成武装，加入农民起义军。

西汉王朝的宗室刘玄就趁机参加了平林兵。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南阳郡舂陵乡（今湖北省枣阳县南三十里之舂陵城）刘、刘秀兄弟既是汉朝宗室，又兼豪强地主。王莽称帝，撤销汉宗室封爵，禁止姓

刘的做官。刘非常愤慨，“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成为南阳豪强集团的首领人物。绿林起义军进入南阳地区，刘、刘秀发动宗族和宾客七八千人，起义兵于舂陵乡。刘起兵时，当即宣布他的宗旨：“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南阳豪强李轶，邓晨也带着宾客前来会合，势力逐渐壮大。刘率领这部贵族、地主豪强为核心的力量，与以绿林起义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力量后来进行了联合，但由于阶级的根本利益不同，最终仍难于避免分裂。

第四，各路起义势力的会师

农民起义军以绿林山为根据地，与王莽反动部队经过多次战争，势力扩大到五万多人到地皇三年（公元22年），绿林山区发生时疫，病死者近半数，于是采取撤离山区，分兵进行活动的策略。

新市兵：向南阳地区活动，由新市人王匡、王风和马武及朱鲔等率领，此为起义军的主力部队。

下江兵：西进南郡地区活动，由成丹、王常、张卬等率领，此为部分起义部队。

平林兵：王匡军进攻随县，平林（今湖北省随州地区之平林城）人陈牧，廖湛率众千余人起义响应，称为“平林兵”。这时刘玄乘机投入平林起义军。

绿林军分兵西进的下江兵转战到上唐（今湖北枣阳东北），击破王莽荆州牧部队，随即进兵到宜秋（河南省桐柏县境），企图与新市、平林等部会师。刘、刘秀以前曾招诱新市平林与他合作，这时亲到宜秋劝说下江兵首领王常，力陈复兴汉室共同富贵的道理，王常当即表示。“诚思出身为用，辅成大功”。王常回营，他把与刘协议的经过告知其他起义将领，即遭到成丹，张卬等的反对。他们认为，大丈夫既然起兵，就不要受这些帝王宗室的制约。但王常以自己在起义军中的威望，极力陈述合并的好处，并说：“来议事者，皆有深计大虑，王公之才，与之并合，必成大功。”最后才勉强地说服了这些将领，而实现了汉军、新市、平林会师。刘以汉军为主，结合绿林起义军、新市，平林和下江兵的情况，将全军区分六部，统兵将领皆称将军，攻城略地，散发檄文，宣布王莽罪状。王莽原来认为东方各地起义军，人数虽多至数十万，但并无队伍、旗帜、号令，多属于“饥寒群盗”，不会起大的作用。而刘统率的这部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使王莽开始感到恐惧。

随着荆扬两州农民起义战争的发展，天凤五年（公元18年），徐州的琅邪人樊崇起兵于莒（今山东省莒县），初期只有百余人转进泰山，自称“三老”，此时青、徐等州发生严重灾荒，各地均有小股农民起义部队，以樊崇勇猛善战，前往依附的农民起义部队主要有：

逄安部：琅邪郡人（樊崇的同乡）。

徐宣部：东海郡人。

谢禄部：东海郡人。

杨音部：东海郡人。

逄安等部参加樊崇农民起义军后，使樊崇军很快地发展到十万人左右，并进攻莒城，城坚难下，乃向北转进，击破王莽探汤侯田况于姑幕（今山东省诸城县境），北进青州，沿途收容青壮，回到泰山，留兵驻守南城（今山东黄县）。樊崇领导的这部起义军，发展成为农民大起义

的主力军之一——赤眉起义军。

城头子路军：东平人爰曾（字子路）和肥城人刘诩，率领农民在卢县（今山东省长清县境）城头起义，称为“城头子路”起义军。这部起义军活动于现今山东北部，河北东南部地区，发展到二十多万人。

东海力子都军：东海人力子都（也称刁子都）率众起义，一年之内发展到六七万人，机动活跃于徐、兖两州间广大地区。新莽政权派遣郡国兵前往攻击，反被力子都部所击破。

平原女子军：地皇二年（公元21年），平原女子迟昭平也率领数千人起义，活动于河阻之间，这是继吕母起义反抗新莽暴政后，又一支以女子为首领的起义军。

与全国其他地区的起义先后爆发的北方冀、幽等州的农民起义军，也在各地制造了很好的起义形势，声势很大，发展很快，主要的力量有：

（一）铜马起义军：起义军首领为东山荒秃、上淮况等，活动于冀青等州间，即现在河北山东边界，拥众数十万，为河北地区最强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

（二）青犊起义军：于新莽末期在河北方面活动时间较长，力量较强大的部队。

（三）其他起义军

大彤部：渠帅樊重

尤来部，渠帅樊崇（与琅邪樊崇同名）

五校部：渠帅高扈

五楼部：渠帅张文

檀乡部：渠帅董次仲（力子都死后，由董为首领）

富平部：渠帅徐少

获索部：渠帅古师郎

除以上各部外，尚有高湖、重连，铁胫，大枪、上江、五幡等大小几十支起义军。大的有十万人以上，小的也有几万人，据史书记述“众合数百万人”，有时虽然也联合作战，但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强大力量。

第十三部分 绿林起义军的战争

西汉末年，声势浩大的绿林农民起义战争，经过三次主要作战，全部歼灭了新莽王朝的军队，夺取了起义战争的胜利。

起义战争初期的作战：绿林起义军初期的作战主要包括分兵向各地发展和消灭甄阜，梁丘赐军的战争，起于新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四月，止于同年十二月。起义军一举歼灭了甄阜、梁丘赐的十万大军。

昆阳战役：发生于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更始元年三月，至同年六月初。起义军以绝对劣势之军，全部歼灭了王莽四十万大军。

进占长安之作战：发生于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更始元年八月，至同年九月上旬。起义军两路进兵长安，迅即推翻了新莽王朝。

第一节 起义战争初期的作战

第一，南阳郡内发生的战争

一、进入南阳郡的声势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四月，荆州地区农民起义军，由于根据地绿林山发生时疫，病死者甚多，无法在山中的根据地久留。于是便分道向南阳，南郡机动，北进南阳郡的起义军由王匡，王凤率领，号称“新市兵”，南进南郡的起义军由成丹，王常率领，号称“下江兵”。新市兵，下江兵构成绿林起义军的主要基础。北进起义军进攻随县，随县东北平林人陈牧，廖湛聚众响应，参加了绿林军的起义行列，这部队伍就号称“平林兵”。汉朝破落贵族刘玄参加平林兵后，担任安集掾的低级官吏。刘玄族弟刘、刘秀已与绿林起义军联合，刘由自封的“柱天都部”，摇身一变也成为起义军的首领。进而整顿合编部队，起义军从此以正规而严整的军容，更大的声势向南阳进发，从而震惊了新莽王朝。

此时，南阳郡的前队大夫为甄阜，郡属正为梁丘赐。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当新市平林兵北进威胁南阳时，王莽即急忙部署豫州和荆州剿灭起义军的力量，命司命大将军孔仁进驻豫州，甄阜、梁丘赐即在此时被派守南阳。王莽同时还以纳言将军严尤和秩宗将军陈茂去江陵募兵，以便对付绿林起义军南下的“下江兵”。因为此时王莽政权军事力量分布在全国各地，重点则为对付东方赤眉起义军，没有更多力量使用于荆州和南阳。于是采取命将领自行招兵威军的办法，以应急需。

二、起义军初期的战斗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十月，刘与新市平林兵，西击长聚，进屠唐子乡（今河南省唐河县湖阳镇），斩了湖甲尉，进而攻占了枣阳（今河南省新野县境）。严尤、陈茂在荆州招募将士而编成军队，进攻向荆州南郡活动的绿林起义军。“下江兵”起义军英勇应战，但不幸被莽军击破。王常、成丹收容散兵，转移蒌谷（今湖北省随州北）进驻钟龙险要地带。严尤等部莽军未再进攻，起义军利用山险休养整顿，战斗力很快恢复并及时向西机动。与荆州牧统率的军队交战于上唐，打了一个胜仗，扭转了初战失利的形势。

下江兵于随枣战斗期间，春陵兵和新市平林兵在联合攻击长聚，进屠唐子乡后，一度发生矛盾，经平息后进占枣阳（今河南省新野县境）。刘此际企图攻占全国重要城市之一——“宛”，作为重建汉朝政权的基地。进军到小长安聚（今河南省南阳县南），与南阳郡军政首领甄阜、梁丘赐指挥的强有力部队发生遭遇战，加土雾重，不辨方向，起义军竟打了个败仗。刘秀单骑逃走，刘收兵退守枣阳。

歼灭甄阜、梁丘赐军。莽军由于在小长安聚的胜利，甄卓、梁丘赐竞过低估计起义军力量，过高估计自己力量，以为能够一举歼灭进入南阳郡的绿林起义军，轻率地把辎重物品全部留于蓝乡（今河南省新野县境）后方基地。十万大军主力渡过潢淳水，前临沘水，依两水立营，毁掉兵营房舍，砸毁釜甑等用具，拆毁后方桥梁，表示义无反顾、破釜沉舟、决战到底。事实上莽军内部矛盾重重，表面强大，内部异常空虚。

而起义军由于新市、平林兵、春陵军、下江兵等各路军队合为一体，实力大大增强，又经短暂的养精蓄锐，军心大振，准备继续作战。地皇三年十二月，起义军编为六部，利用夜暗偷袭蓝乡，大获全胜，夺取了莽军的全部军需物资，起义军受到巨大鼓舞。

地皇四年（公元23年）正月甲子朔，起义军分左右两路。展开对沘潢两水间的莽军进攻。

左翼军：以春陵和新市、平林兵编成；

右翼军：下江兵独立担负。

右翼下江兵奋勇当先，首先自东南方向击破梁丘赐之军的抵抗。春陵、新市、平林也不甘落后，紧接着击破甄阜军，莽军全部崩溃。甄阜、梁丘赐于混战中被起义军所斩杀，莽军失去将帅指挥，自行溃败，十万大军被斩杀和争渡潢淳水淹亡达两万人。这是起义军进入南阳地区作战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四、夺取宛城的胜利

王莽先前派出的进攻荆州起义军的严尤、陈茂军，闻悉甄阜、梁丘赐军被起义军歼灭的消息，十分惊慌，急忙率领本部兵马向北急驰，企图占据南阳首邑宛城（现河南省南阳），挽回甄阜、梁丘赐军失败后的不利局势。

宛城既是南阳地区重要的战略城邑，又是自秦以来有名的繁荣都会，北可以通达伊洛，南可以控制荆襄，西可以出武关入于关中，因而，自古以来宛城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新莽政权靠控制宛城稳定荆州、豫州之形势，屏障其武关、长安之安全。起义军争得此地，既可以西出武关、进入关中，直趋长安，又可以北进洛阳，折而向西，与赤眉军合兵进击长安。

起义军得知严尤、陈茂军北上宛城地区的消息后，也挥军急进，双方在淯阳地区（今河南南阳县东）不期遭遇，起义军对莽军立即展开猛攻，将严尤、陈茂军击杀三千多人，严陈两军遭此突然打击，被称为莽军名将的严尤，也不得不和陈茂于战败中慌忙北撤，放弃进入宛城的计划，退守颖川（今河南省禹县境）。起义军战胜严尤、陈茂军后，兵力进一步增强，已达十多万人，遂乘战胜之军威，包围了宛城。

在起义军围攻宛城之前，起义军已拥立刘玄为皇帝，建立了更始政权。刘玄称帝后，起义军除以主力进行围攻宛城外，另以一部兵力攻取新野，同时派出由王凤率领的廷尉大将军王常、五威将军李轶，太常偏将军刘秀等两万多人进取颍川等地。

宛城被起义军长期围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以致再无力坚持抵抗，于是在守将岑彭的带领下，举城向起义军投降。至此，起义军胜利占领了重要战略要地宛城。该地的占领，对起义军而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起义军更始政权的建立

起义军经过前一段时期的作战，节节胜利，感到没有统一的政权，难以有更大的号召力。于是，在取得前段作战的胜利声中，便想推举一人做皇帝，建立起义政权。由于起义军受复兴汉室正统观念的影响，同时也由于一些地主豪强分子的宣传，因而便决定从刘姓将领中推举皇帝，但是各派起义力量对具体人选却存在着比较尖锐的分歧：

以王匡为首的新市，平林兵，极力主张立刘玄为帝。客观上刘玄势力很弱，显得比较谨慎，他利用起义军中许多人对刘的不满情绪，争取了不少起义将领的信任，起义军主观上也觉得刘玄怯懦，立刘玄为帝，他不至于违背起义军将领的意志，比较易于控制。因而除了新市。平林兵的将领外，下江兵中的一些将领如张卬、成丹等也都坚持拥立刘玄为皇帝。

春陵军、下江兵中的一部分将领如王常等则推举刘为帝。但王常等的意见占极少数，迫于形势的压力，最后也只好同意刘玄为帝，这样起义军将领于是背着刘、刘秀和春陵军的其他将领，便决定立刘玄为皇帝。

当将立刘玄为皇帝的决定告知刘时，刘虽然十分不满，感到大势已去，但因不便公然反对，而委婉地提出暂不拥立皇帝的主张。他认为：起兵于青，徐等地的赤眉军，已有数十万之众的兵力，如果他们知道了南阳这里立了皇帝，赤眉军也立一个皇帝，就会出现王莽未除，汉宗室相争的局面，使天下无所适从。因而刘主张："先打破王莽，招降赤眉，再立皇帝"（详见《后汉书•齐武王刘传》卷四十四）。这一主张的实质，在于拖延时间，为刘称帝创造条件。这一主张虽蒙蔽了一些人，但为下江兵将领张卬等所识破，他坚决主张立即立刘玄为帝。因再无人反对这个意见，遂一致同意了以刘玄为皇帝，这样皇帝虽然被勉强拥立起来，但起义军中春陵贵族势力与绿林起义力量之间的矛盾却日益加深了。

地皇四年（公元23年）辛已朔（二月初一），起义军于淯水（即白河）沙滩上设立坛场，刘玄举行登上皇帝位的仪式。刘玄称帝后，首先办了两件大事：

（一）确定以建元为更始元年，取消王莽地皇四年的年号，用更始做为自己的年号。

（二）封赏官吏。刘玄起义将领的封赏，多偏重于拥戴自己为帝的新市、平林两派的将领，将下江兵中的将领排斥于三公之外。

（1）新市兵将领：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

（2）平林兵将领：陈牧为大司空；

（3）春陵兵将领：刘为大司徒：刘秀为太常偏将军。

（4）下江兵将领：王常、张卬只列入九卿之内，王常为廷尉大将军。

更始政权的建立，尽管选择了汉宗室刘玄为皇帝，但毕竟仍算是起义军胜利的标志。但是对下江兵将领的封赏的不公，促成了而后下江兵将领倒向刘、刘秀一边的局面，为起义军的最终分裂埋下了重要根源。

绿林起义军初期作战评述

西汉末年，绿林起义军是各路起义军中发展最快、力量最大的一支。这支起义军开始由受灾的饥民组成，经过战争实践的锻炼，逐渐成长为一支组织严密、军威雄壮、所向无敌的大军。绿林起义军这一发展壮大的过程有着当时社会政治的、军事的各方面的因素。

西汉末年政治上已到腐败透顶的地步，王莽篡夺西汉政权后，改制复古，严重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实际。更加引起了社会的大动乱，给人民带来更深的灾难，人民除了起义推翻这种反动统治之外，别无他途可

走。因而，起义军顺应历史的发展和民心，揭竿而起，一呼百应，星星之火，迅即变成燎原之势。但是统治集团看不到这一历史的必然趋势，他们认为起义人民只不过是“饥寒群盗，犬羊相聚”而已，更想不到起义群众就是他们的掘墓人。

赵义军执行了正确的军事战略，是他起义初期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当他们的根据地发生严重疫情、疾病流行、人员伤亡过大时，他们当机立断，毅然舍弃了根据地，全军部队分路出击。这样一方面使自己摆脱了根据地内的因难处境，使起义军民得到起码的主活保障：一方面起了扩大起义的影响，汇集各地起义力量的作用。无疑，这一勇敢的战略决策对起义军的生存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而王莽军对绿林起义军，既没有正确的估价，又没有长期的作战策划，应会被动，战略上轻敌，给了起义军发展壮大的自由权。

起义军打破了王莽军的围剿，取得初期作战的胜利，还靠了战场上直接的正确的作战指导，他们在小长安聚遭受严重失败之后，不气馁、不溃散，而是立即采取措施，积蓄力量，重振军威接着乘夜偷袭甄阜、梁丘赐军的后方，全部俘获敌人的军事物资。旋即乘胜两面夹击甄、梁二军。一举将其十万精兵击破，极大地震撼了莽军，鼓舞了自己。在取得这些胜利后，迅即决策挥兵急夺战略重地宛城，且在遭遇中打败莽军名将严尤。这一系列正确而果断的作战指导，成起义军以劣势地位战胜优势之敌的直接因素。

第二节 昆阳战役

第一，昆阳战前新汉两军的态势

昆阳（今河南省叶县）位于战略重镇宛城（今河南省南阳）的东北，它北可以通达颍川（今河南省禹县），西北则直达洛阳，是由颍川、洛阳进入宛城的重要通道。因而，在宛城被汉军重兵围困时，王莽军为解救宛城之围，途径昆阳，遂与汉军于昆阳地区发生了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

一、新莽军

王莽面临北方赤眉、南方绿林两大起义集团的进攻，日渐焦虑不安，北方的赤眉与南方的绿林一样，同为当时起义力量最强大的两支军队。当初王莽认为赤眉军声势更大，起义军几乎遍布北方各州郡，觉得形势更为严重，于是新莽王朝便把进攻的重点放在围剿北方的赤眉军，派出由太师王匡、国将哀章统率的精兵十余万用于对赤眉军作战。而以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陈茂仓猝拼凑的郡县军和临时招募的部队对付南方的绿林起义军。严尤和陈茂统率这些军队作战，王莽还不轻易授给他们兵符，每次行军作战必须先行上报，否则就会判以“弄兵”之罪。

在北方的赤眉起义军于成昌大捷，兵到豫州，活动于濮阳、陈留一带地区时，王莽仍然把作战的重心放在北方，还未对绿林起义军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当绿林军歼灭了甄阜、梁丘赐军，击败严尤、陈茂于南阳城下，接着刘玄称帝，公开提出恢复汉朝，自从更始政权之后，王莽才意识到南方的绿林起义军对新莽政权攻击力更大，因而决定转移战略重心，一方面将进攻赤眉的主力军调到南方作战；一方面紧急调集各郡兵力，准备彻底消灭绿林汉军。

王莽为了编成对汉军作战的强大部队，特任命大司空王邑和司徒王寻为统帅，征调当时所谓精通六十三家兵法的人，充当军中的类似参谋的官吏，并任用长人巨毋霸为垒尉，专门负责构筑营垒，将虎、豹、犀牛、象等凶猛野兽至军内饲养，以便在作战时放出来，震撼敌人。

各州郡均自选精兵，由郡和牧守亲自率领，限期到洛阳附近集中，各地到洛阳的兵力达四十二万多人，号称百万大军。这些军队集中后，即开始向东南方向的颍川开进。在颍川又会合了严尤、陈茂的部队，随即向昆阳方面进击。大军逶迤千里，粮草辎重络绎不绝。

二、汉军（起义军）

地皇三年（公元22年）一月，绿林起义军歼灭甄阜、梁丘赐军后，接着在南阳城下又打败了莽军名将严尤、陈茂。严尤、陈茂即率军退往颍川。同年三月，汉将王凤与太常偏将军刘秀等进击昆阳、定陵、郾城等地，进展顺利。王常指挥的部队在汝南等地区的活动也节节胜利。汉军见莽军大队人马向昆阳地区开来，于是王凤与王常率领近万人的部队占据了昆阳城。

这时刘指挥的大军正在宛城围攻守城之新莽军队，胜负未见分晓，但宛城已是兵少食尽，内无斗志，外无救兵，形势对新莽军极为不利。

第二，新汉两军作战序列

一、新军
统帅：大司空王邑
将领：大司徒王寻
纳言将军严尤
秩宗将军陈茂
垒尉巨毋霸
总兵力：四十二万人。
二、汉军
统帅：成国公王凤
廷尉大将军：王常
太常偏将军：刘秀
骠骑大将军：宗佻
五威将军：李轶
总兵力：约一万三千多人（不含李轶所率定陵、郾城援兵的主力部队）

汉军的统帅虽然为王凤，但以后在昆阳之战中，由于王风等人面对绝对优势的新莽大军，一度缺乏作战的坚定性，刘秀成了昆阳战役的重要决策人物。

第三，新汉两军的作战策划

一、新军

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刘玄更始元年五月，王邑、王寻统帅的大军与严尤、陈茂会合后，即由颍川向昆阳前进，两三天即到达昆阳十余万军队。统帅王邑立即下令围攻昆阳。纳言将军严尤根据以往作战的失利教训，认为不可把兵力用于昆阳这个既坚固又无碍大局的小城，大军应当直趋宛城，击破围攻宛城的汉军，则昆阳将不攻自破。于是他向统帅王邑建议说：“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王邑听不进严尤的建议。他既无战略眼光，又不深思熟虑，而傲气十足地说：“我以前围攻翟义时，就因为没有能生俘他而受过指责，现在统帅百万大军，碰到敌人城池，竟绕道而过，不能攻下，这怎么能显示我们的威风！应当先杀尽这个城中的军民，全军踏着他们的鲜血，前歌后舞而进，岂不是更痛快吗！”（原文见《资治通鉴》卷三十九）于是王邑仍然决定立即以十万大军围攻昆阳。

二、汉军（起义军）

王凤、王常等见新莽大军逐渐云集昆阳，形势十分严重，刘秀所率之三千骑兵在颍川西北：遇见新莽军后，也引兵退回昆阳，加上汉军其他退入昆阳的一些零星部队，昆阳守军共约一万人。王凤等鉴于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对坚守昆阳信心不足，一些退入昆阳城中的官兵也惊惶失措，担心妻子儿女，想分散回去，各保存自己的地区。刘秀看到这种情祝便对大家说。“目前我军兵卒和粮食都少，而城外又有强大之敌，如能集中力量抗击敌人，还有取胜的可能；如果分散各自回去，势必都不能保全。况且刘等攻打宛城，尚未得手，也无力挽救我们。昆阳一旦失守，不出一天，各部也必将被敌各个击破歼灭，现在如果我们不同心协力，存亡与共，同立功业，反而贪生怕死，能只顾各守自己的妻子财物吗？”诸将领等听到刘秀这些话，大怒说：“你怎敢教训起我们来！”刘秀

听了便笑着站起来，恰在这时侦察员回来，报告说：“王寻大军即将到达城北，军队连绵百里，还看不见后卫。”王凤等向来轻视刘秀，见当前情况急迫，才互相商量决定，请刘秀计划破敌之策。这时刘秀经过分析情况，便做了决策，以王凤和廷尉大将军王常率人坚守昆阳城，自己当夜和宗佻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骑，出昆阳城南门到外面去调集部队，准备对新莽军内外加攻，一举破敌。

第四，新汉双方昆阳城的攻守作战

一、新莽军的围攻

新莽大军进到昆阳，即按照统帅王邑。王寻的命令，开始围攻昆阳城。莽军为了显示其作战威力，把昆阳包围十层以上，设置了一百多座军营，军旗遍野，锣鼓之声于数十里之外都可以听到，莽军挖地道，使用冲车和棚车攻城，集中了所有的机弩向坡内狂射，箭矢像雨水倾泱。城中的军民不能外出行动，连出门打水也要头顶门板，以防中箭，战斗最艰苦时，王凤等人又动摇了，想向莽军投降。但王邑、王寻认为昆阳小城已指日可下，不许他们投降，否则，便不算建功立业，因而，决心非要踏平昆阳不可。这时严尤看到昆阳难以在短期内攻下，便又建议王邑说：“兵法讲围城要留一面，我们应当让昆阳之敌逃跑一些，使他们传播失败的消息，以震撼宛城之敌。”

但王邑等依仗自己兵多粮足，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又一次拒绝了严尤的建议，继续加紧硬攻昆阳，使自己几十万大军，顿兵坚城之下。

二、汉军

起义军坚守昆阳的部队不足万人，在绝对优势之敌的猛烈攻击下，王凤等人又发生动摇，认为昆阳难以守住，而向莽军表示降服。但由于遭到莽军的拒绝，这就从反面教育了起义军将士，使他们看到，敌人的真正目的是在于消灭他们，投降是没有出路的，昆阳之战乃是生死存亡之役，只有团结一致，坚决与敌人决一死战，才能有希望获取胜利，求得生存。于是，城内的汉军军民并肩战斗，一次一次地打退新莽军队的强攻，占绝对优势的新莽军也无可奈何，虽经反复攻城，昆阳城仍屹立不动。王邑的“屠此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的设想，一时尚难以实现。

昆阳被围前，乘机出城调集兵将的李轶、刘秀等十三人，到达定陵（今河南省舞阳地区）、郾城（今河南省郾城县）等地调集各地兵马时，一些将领贪惜自己的财物，想就地分兵留守，不原赴昆阳增援。刘秀对他们说：“今天如果能破敌，珍宝财物要比现在多万倍，我们的大事也可成功；如果我们为敌人所败，脑袋都保不住，还谈什么金银财物呢？”于是各营将士遂跟着刘秀、李轶等一齐向昆阳地区开进。

第五，决定新汉命运的战略大决战

新汉两军昆阳攻守战正在胶着状态。五月底，宛城莽军已投降汉军。六月初二，李轶、刘秀所率之定陵、郾城一带的汉军到达昆阳地区。刘秀为着鼓舞大家的斗志，自己率领步骑兵一千多人为前锋，李轶率主力在后跟进，刘秀军在逼近莽军四五里地时，即摆开阵势，准备出击。王邑、王寻也派兵数千人前来迎战。刘秀亲自率领人马冲杀，斩莽军几十个人，跟随的将领都高兴地说：“刘将军平时看到小股敌，都十分害怕，今天见了大敌，却很勇猛，真是了不起。以后请你总在前面率领

我们作战，我们共同协力破敌！”刘秀接着又率领将士再行向莽军攻击，莽军被打得大败，刘秀军斩杀莽军近千人。刘秀率兵连着打了几次胜仗。这就大大地鼓舞了汉军的斗志，杀减了王邑、三寻军的锐气。

刘秀等在昆阳外围与莽军作战，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为着进一步瓦解莽军的战斗士气，鼓舞昂阳城内汉军军民的斗志，故意渲染宛城汉军的胜利，他把写有宛城汉军陈胜，“宛下兵到”的密信，射进昆阳城内，同时也转落到莽军手中，引起莽军统帅王邑、王寻的恐慌。莽军将士看到，一个小小昆阳，大兵压境，苦战一个多月，都没能攻破，如若再加上宛城的十万汉军，则更无法对付。因而，宛城莽军失败的消息，大大地影响了莽军的战斗意志。接着刘秀自率三千人的敢死队，自城西水道去冲击敌人的中坚。

王邑、王寻轻视刘秀，自以为可以很容易打败刘秀。因而，他们只率领万余人巡视阵地。命令各营严格管束自己的部队，没有命令，不准擅自出兵，王邑、王寻亲自率领万余人的部队迎战刘秀，但他们不是刘秀敢死队的对手，莽军的阵势很快即被刘秀军击破，士卒混乱溃逃。这时莽军其余的部队，因不敢轻举妄动，故无人主动支援王邑、王寻军作战。刘秀率领汉军，奋勇冲击，并一鼓作气打垮了王邑、王寻的部队，斩杀了王寻。

王邑的中坚被冲垮，王寻被斩杀后，莽军各部队失去了指挥中枢，立即引起一片混乱。这时昆阳城内的汉军看到刘秀等人所率的敢死队取得胜利，也大喊着冲杀之声，冲出城门，内外夹攻莽军，杀声震天动地，王邑的四十二万大军迅速土崩瓦解。

王莽军本来都是强迫征来的贫苦百姓，早已对王莽政权痛恨之极，经起义军内外夹攻，自然弃阵而逃。溃逃的莽兵相互推挤，“走者相腾践，伏尸百余里。”碰巧又遇上大风和大雷雨天气，屋瓦被大风刮走，大雨倾盆而下，滍川之水暴涨，王邑军随队的虎豹都吓得发抖，莽军士卒掉入水中淹死的有万余人，滍川被尸体堵塞得几乎断流，王邑、严尤、陈茂等人仅带少数长安精骑，踏着死尸渡河才得逃脱。

汉军缴获了莽军的全部军用物资，各种东西堆积如山，一连搬了一个多月还没有搬完。王邑率领千余残兵一气奔逃到洛阳。当王莽得知昆阳惨败的消息后，异常震惊，整个朝廷上下也为之惊恐。

第六，昆阳战后双方的动态

王莽的大军在昆阳的惨败，既进一步鼓舞了全国各地起义军的斗志，也使王莽统治集团临于土崩瓦解之势，全国的形势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对新莽统治政权的浪潮席卷全国。据《后汉书•刘玄传》记载：“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当时各个地区的官吏，纷纷树起反对王莽的旗号：陇西（今甘肃省东部）的隗嚣，巴蜀的公孙述，睢阳（今河南商丘）的刘永，河西（今甘肃省西部的窦融，汉中的延岑，庐江（今安徽省庐江地区）的李宪，东海（今山东省郯城西南地区）的董宪，琅邪的张步等都先后起兵反莽，或自立旗号为王，借机扩充势力。至此，王莽政权尚能控制的地区仅为关中和洛阳一带地方。新莽王朝为了苟延残喘，虽不断变换其骗人的统治手法，但也无济于事。为了应付急需，将败将王邑调回长安，将太师王匡、国将哀章急调洛阳，进行守备。

汉军自昆阳大捷后，立即清理内部，刘玄欲杀掉政敌刘。于是先将刘的得力战将刘稷除掉，以报刘稷过去曾拒绝刘玄封他为抗威将军称号之怨。但是刘却极力反对杀刘稷。因而，起义军将领李轶、朱鲔建议将刘、刘稷一同剪除。刘玄当即下令将二刘处死。刘秀得知处死二刘的消息，心中虽十分恼怒，但强忍怒火，这给起义军内部与豪强地主势力之间埋下了更深的矛盾。

汉军在清理内部的同时，命全体将士休整近三个多月，积极准备向洛阳、长安进击。

昆阳战役评述

决定新莽政权和汉命运的昆阳战略大决战，以汉军的大获全胜，新莽军队的惨败而告终。至此，新莽王朝赖以抗御农民起义军苟延其反动统治的基本武装力量即冰消瓦解。万民痛恨入骨的王莽政权的彻底灭亡，已是指日可待了。新莽军队以四十三万之众，何以败在汉军一万多人的手下，而且莽军又几乎全军覆没，这其中的教训是很发人深省的。

其一、莽军决战战场的选择失当。战略决战的双方往往都是倾其全力以赴，即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因而通常是在关键的时刻、关键的地区进行较量。但是，这次决战却选在了昆阳这个不大的小城，尽管它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但就战略全局来看，既非瞰制一方的重要中心城市，也非屏障京师的险关要隘，而仅仅是处于京师长安、战略重镇洛阳、宛城这个三角轴心边沿的一个不大的城邑。占据了昆阳，一不会对京师形成威胁，二难以抵抗洛阳、宛城的南北夹击，莽军如果保住宛城，则汉军即使占领了昆阳，也很难长久保持。因而，在这样一个没有重要意义的边区，面对不足万人的对手，投入四十三万大军进行决战，不能不认为是毫无意义的盲目行动。

其二、莽军错用骄狂无能的统帅。战略决战维系国家之命运，统治之存亡，战场统帅对决战的结局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新莽王朝选定统率四十三万大军的核心将领不是选贤任能，而是择官高而定，以唯亲是用。莽军统帅王邑、王寻可谓自西汉以来战争史上少见的庸碌骄狂之徒。昆阳战前，纳言将军严尤建议他不攻昆阳，直下宛城，一旦解围，昆阳则会不攻自下。这本是对莽军战略全局极为有利的良策，但却被王邑一口回绝，当昆阳小城久攻不下，又拒绝了严尤“围师必阙”的重要建议。结果四十多万大军顿兵坚城之下，坐视宛城失守，战略上丧失了可贵的时机，使本来主动进击的绝对优势之军，完全化为无用之物。假如王邑能采纳严尤提出的各项建议中的任何一项建议，或置昆阳城于不顾，或围三缺一，或接受昆阳汉军的投降，那么昆阳、宛城之战的结局则可能会是另一种局面。当然，这不是说已濒临末日的新莽政权会因此而起死回生，但是汉军若不是如此迅速地全歼莽军主力，无疑将会延长消灭王莽政权的时间。

其三、莽军在战略战役上吃了轻敌的大亏。莽军统帅王邑依仗自己四十多万大军的强大优势，根本不把汉军放在眼里。当他指挥大军到达昆阳城下时，不做任何具体的作战部署，即下令攻城，并且盲目狂妄地说。屠昆阳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以显示自己的威风。在刘秀、李轶等调来援军时，本来充其量不过几千人，这正是莽军利用自己的优势消灭敌人的良机，但王邑等却出于素来轻视刘秀的傲慢轻敌情绪，只出

动万人迎战刘秀的三千敢死队，而置自己的千军万马于无用武之地。结果被刘秀军一举冲垮了莽军的指挥中枢，招至全军溃败。其实，莽军统帅王邑只要稍有战略头脑，正视当面的敌人，尤其是得知宛城已被汉军占领的消息后，能够立即指挥全军以击刘秀，争取速战速决，王邑的四十三万大军不致立即遭到全军覆没的下场。

最后，莽军的失败，还在于其对这样事关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行动，既无战略全局的作战设想，又无具体的作战策划，任战争情况的自然发展，凭人多势众，把想当然的马到功成的主观愿望当成胜利的事实。因而王邑大军完全按照汉军的意志被动盲目地行动，这就使全军将士难以明了为何而来，为达到何种目的而战，当然也就无从发挥积积主动的作战精神。这与汉军明确的战略目的和周密的作战策划，以及为达到目的主动顽强的战斗精神相比，实有天壤之别。昆阳决战生动地证明，只有优势之军，而无具体的作战策划，单靠盲目行动，兵力再多也不过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没有不被击败之理。

第三节汉军进占长安之战

第一，新莽政权的总危机

昆阳决战，新莽主朝的重兵集团被彻底歼灭后，已再无继续与更始军和全国各地的起义军以及反莽军作战的力量。起于北方各州郡的赤眉起义军已在现今的河北、山东、山西等广大地区与莽军的残余势力作战，未被起义军占领的地区许多城邑则认清王莽的末日已经来临，纷纷割据自立。在南方由于绿林军起义的巨大影响，更是起义烽火遍布大江南北，反莽者割据称雄日益增多。因而，新莽王朝的统治区域，实际上只剩下洛阳和长安之间的狭窄地带，王莽政权的总崩溃已在旦夕之间。

新莽政权在内外交困之中，又发生了王莽的心腹将领卫将军王涉，联合大臣董忠等密谋以兵“劫莽降汉”的事件，但事机败露，被镇压了下去。

王莽军在各地战败溃散和反莽势力纷起的情况，不断传于宫中，王莽此时深知定将难逃失败的命运，已处于一筹莫展，惶惶不可终日之中。无奈根据大司空崔友引述《周礼》和《春秋左氏》关于：“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的记载，建议王莽“先号咷而大哭”，祈告上天以求救。于是王莽率领众臣到长安南郊祭天，妄图以“真命天子”的招牌，继续欺骗百姓，以维护他的反动统治。王莽对天哭诉道：“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王莽捶胸大哭，叩头不已，接着又把功劳对天陈述了一番，这场哭天闹剧，才告收场，但这丝毫也不能挽救新莽王朝的陷落。

第二，保卫京师长安和洛阳的紧急部署

自昆阳战败后，新莽王朝即着手采取保住京师长安的措施。

长安至西汉末年，已经历了秦汉连续两代做为都城的长期经营建设，不仅是关中也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的东面东南有崤函与武关之险要关隘的阻隔，西和西南有雍歧，秦苓的屏蔽，具有易守难攻的天然优越的军事地理条件。但是，由于新莽王朝昆阳战役王邑的重兵集团覆没的如此掺痛和突然，使王莽已无重兵防守关中和长安地区，新王莽王朝为了做最后的挣扎，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一）将王邑从洛阳调回长安，任命为大司马，张邯为大司徒，苗

为国师，以加强守卫长安的作战。

（二）将围剿赤眉起义军的太师王匡、国将哀章调往洛阳地区，以守住洛阳，屏蔽函谷关，阻止汉军进入关中。

（三）命都尉朱萌、右队大夫宋纲加强武关的守备。

（四）王莽拜将军九人，都以虎为号，称为“九虎将军，率领北军精兵数万人往东，以增强华阴回溪等地的防卫。王莽为了驱使这九虎将为其卖命，不至背叛，竞将他们的妻子留于宫中做为人质。当时朝中尚有六十多万斤黄金，但王莽只给每个将领四千钱，这些都引起了九虎将的极大不满，根本无心为王莽政权作战。

第三，汉军分路进攻洛阳长安的部署

汉军于昆阳大捷之后，一方面休整部队，一方面部署进兵洛阳和京师长安。

（一）昆阳大战的实际统帅刘秀，在决战胜利后，即率兵北上攻取颍川郡的父城（今河南省陕县西南之父城），招降了附近五个县，遂被拜为破虏大将军，封为武信侯，并以其执行大司马职权，持节率兵北渡黄河，负责招抚河北广大地区的州郡县邑。

（二）命定国上公王匡率军攻取洛阳。

（三）派西屏大将军申居建，丞相司直李松等指挥大军进攻武关，以取关中长安。

第四，汉军向洛阳长安的进军

王匡所率之军，北攻洛阳，一路进展顺利，于地皇四年（公元23年），更始元年九月，顺利攻克战略重镇洛阳，并擒杀了太师王匡和国将哀章。更始政权遂自宛城迁都洛阳。

地皇四年八月，汉大军向关中长安进军，震动了整个三辅地区。汉军正向武关进发中，南阳析地人（今河南省西峡县）邓晔、于匡于南乡率百余人起兵响应，归附汉军。当时析宰领兵数千，守备武关，邓晔、于匡对析宰说：“刘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于是，析宰归降起义军。邓晔、于匡力量遂强大起来，邓晔自称辅汉左将军，于匡为右将军。汉军攻拨了析城、丹水，再攻武关，都尉朱萌投降，汉军接着进攻右队大夫宋纲，斩杀了宋纲，武关遂为汉军占领。关中东南方向的战略要隘武关被汉军占领，使汉军能长驱直进长安。汉军于是兵分两路向长安进发，李松统率的一路北上袭驷函谷关，进占了湖城（今陕西省灵宝县西北）。以前王莽派出率领北军加强洛阳华阴回溪的九虎将军各部，被汉军击败大部，其余各部以前后受敌为口实，有的固守要地待援，不敢与汉军接战，有的则收容残兵，退守渭口京师仓。李松、邓晔等率兵直攻京师仓，未曾攻下。随即绕过渭口仓西进，由于未攻下渭口仓，李松、邓晔觉得一个京师附近小小的仓库所在地都这样难攻，坚固的长安城恐怕更难攻下，于是他们决定率军驻于华阴，赶制攻城器械，于此等待更始大军到达。同时派出弘农椽王宪为校尉，率兵数百人，北渡渭水，进入左冯翊地区，进占频阳（今陕西省富平县境），以进击长安的侧背，王宪之军进展顺利，沿途城邑均归降汉军，李松另派出偏将军韩臣等向西直取新丰（今陕西省临潼境），与莽军波水将军交手，莽军败退，韩臣挥军直追到京师长门宫（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北）。至此，汉军已兵临长安城下。

第五，攻克长安作战的经过

汉军兵临长安城下的消息和传说天水隗嚣军也将到长安，因而，长安附近临时起兵反莽的部队也都云集长安城下，想争先攻进长安城，以便进行掠夺和立功行赏。

王莽此时已无力组织军队守卫长安城，于是下令释放狱中的囚徒，编组成新的军队，并强迫这批军队宣誓效忠王室："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命令将军史谌指挥这支军队，向汉军进攻。这部囚徒组成的新军，早已痛恨王莽至极，谁也不愿为王莽送死，因而刚过渭桥，便一哄而散。众囚徒兵挖开王莽妻子父母的坟墓，焚烧其棺木、九庙、明堂等，以解心头之恨。

地皇四年（公元23年）更始元年九月一日，起义军由宣平门（即东城门）攻入长安城内。昆阳决战的败将王邑、王巡等指挥残部抗御起义军于北门前，接近日暮，大批官吏已逃走。

九月二日，长安城内少壮朱弟、张鱼也加入起义军的作战行列，放火烧未央宫作室门（工徒出入的便门），劈开一些宫室的门，高呼"反虏王莽，何不出降！"火势越烧越猛，一些宫殿也燃起大火，更加引起王莽和左右臣僚们的惊恐混乱。王莽避火于宣室前殿，王莽此时尚自我镇定地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长安城内战斗的第三天早晨，王莽率官吏千余人由前殿到渐台（在未央宫沧池中），想依沧池阻挡汉军。大司徒王邑指挥的士卒，经彻夜激战，伤亡将尽，返回渐台，保护王莽，起义军民把渐台包围数层，起义军冲上渐台，首先杀死了王邑父子、三巡等人。接着又把王揖、赵博、国师苗，唐尊等杀死。王莽躲入室内，长安商人杜吴冲进内室，一刀砍死王莽，起义军校尉公宾就，赶上去割下王莽首级，士卒纷纷争割王莽尸身。李松、邓晔统率的汉军遂全部占领了长安城，随后将军申屠建、赵萌也相继到达长安，准备迎接更始来临。

第六，汉军攻占洛阳长安后的措施

更始帝刘玄在汉军攻占了洛阳，长安等地之后，为了尽快消灭掉王莽各地的残存势力，统一天下，恢复汉业，先后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一）派遣使者说降赤眉起义军归汉。赤眉领袖樊崇等人接受说降，亲率渠帅二十多人至洛阳会见刘玄。刘玄只在口头上封他们为列侯，但不给予封地，樊崇发觉上当，因而逃回山东。

（二）攻克长安后，刘玄即命丞相刘赐，先行入京，修葺宫室、宗庙，做好迎接刘玄进入长安的准备工作，更始二年（公元24年）二月，刘玄到达长安。

（三）地皇三年（公元22年），更始元年十月，刘玄命令奋威大将军刘信征讨刘望，将刘望以及刘望的大司马严尤和其丞相陈茂等击杀，遂全部占有了河南郡。

起义军进占长安之战评述

新莽政权，从公元6年王莽居摄起，至公元23年新莽地皇四年止，共历时十八年，终于被绿林起义军攻占了新莽王朝的京师长安，从而结束了新莽政权黑暗统治的罪恶历史。

严格说来，绿林起义军进占长安之战，并不构成什么重大的战役行动，也没有什么高明的战略战役指挥艺术，为什么占尽关中四塞之地，

天府之国的优越地利条件，且又是经营多年盘根错节的王莽统治政权，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被起义军民一扫而光，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治上的因素。

王莽已被历朝历代看做十恶不赦之徒，这早成历史的铁案。凭公而沦，中国历史自有帝王以来，并非没有比王莽更昏庸无道之君，也非无比王莽更骄奢淫逸凶狠残暴之主，但为什么人们对王莽为此痛恨，以至王莽被杀之后，因争抢割食王莽尸肉，几十人死于非命，王莽之头悬挂于宛市街头，人们还争相“切食其舌”。这除了王莽统治时期给社会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之外，还在于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正统观念的影响。篡位本身就历来被视为阴谋狡诈的欺天之罪，再加上王莽篡位使用了许多掩人耳目的虚伪手法，如什么“安汉公”，“假皇帝”等等，这就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憎恶。因此，尽管王莽政权有雄兵百万，战将千员，但同心之士却寥若晨星，自然形同虚设。在起义军一击之下，迅即覆亡。

起义军在取得胜利之后，立刘玄为帝，看来是地主阶级篡夺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但这是当时的历史局限，很难苛求古人超出这个历史的复辙。应当看到，绿林起义军自从吸收了刘、刘秀这些具有一定的将师才能的地主豪强分子之后，起义军的作战威力和整个军队的建设确实起了巨大的变化，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他们的加入，恐怕绿林军也难以迅速取得扣此辉煌的胜利。

第十四部分 赤眉起义军的战争

西汉末年的赤眉农民起义军，与绿林农民起义军先后起义，共同对新莽王朝作战，赤眉起义军前期的主要作战活动在北方各地，中期以后才向关中发展，它于进占长安后，消灭了更始政权，以后退出长安，被刘秀军战败而投降了刘秀政权。赤眉起义军的主要作战活动如下：

赤眉军的初期作战：始于起义之初，新莽天凤六年（公元19年），止于新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赤眉起义军由小到大，连战连胜。

成昌战役：发生于新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冬。新莽的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所率之十万大军与赤眉军交战于成昌地区，赤眉军一举将王匡廉丹军歼灭，斩杀了更始将军廉丹。

长安战役：发生于更始三年（公元25年）二月。向西进军的赤眉起义军，在弘农地区击败了更始政权讨难将军苏茂军，随即向京师长安进军，于同年九月攻克了京师长安，灭亡了更始刘玄政权。

崤底战役：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二年（公元26年），赤眉建世政权二年十二月，赤眉军离开长安东归，建武三年正月刘秀与赤眉军交战于崤山地区，赤眉军被刘秀军击败：全军投降于刘秀军。

第一节 赤眉起义军的初期作战

第一，莒县农民起义及其发展

新莽王朝的反动统治，已将广大贫苦百姓逼上绝路，由于对匈奴乌桓用兵，到处搜括兵粮，民穷财竭，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因而北方的青、并、兖、徐等州地区的百姓受害更为严重，哀鸿遍野，路人相食，惨不忍睹。新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琅邪（今山东省诸城县）人樊崇率领一百多人，在莒县（今山东省莒县）起义，树起反对新莽政权的大旗，樊崇起义后，转进至泰山地区，以泰山为根据地，杀县吏，劫官府，打击新莽王朝的统治势力。王莽遣郡国之兵围剿，皆被樊崇军打败。樊崇起义军的声势越来越大，许多小股起义灾民和各郡县的一些下层小官吏也纷纷投奔樊崇起义军，因而樊崇军起义不久，即拥军数万人。起义的第二年，樊崇的同乡逄安和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等也聚集了数万起义群众，前来与樊崇军会合。琅邪女子吕母起义之后，势力也发展很快，不久即达近万人。后来吕母死去，吕母起义军也归入樊崇起义军，因而，樊崇军更加壮大。

第二，青州兖州等地的农民起义

樊崇起义军的迅速发展壮大，对于北方一些州郡的灾民群众起了巨大动员和鼓舞作用。东海郡（今山东省郯城西南）农民在力子都领导下的起义，发展得也相当迅猛，他们在徐州、兖州交界一带活动，很快即拥有六，七万人。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天凤六年，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

东平人爰曾，字子路和肥城人刘诩率领的城头子路起义军，也是十分活跃的起义军，他们在现今山东北部、河北东南部地区，打击王莽政权的地方围剿军，逐渐发展成二十万人以上的大军。

在今河北、山东、河南交界地带以及河北省北部一带地区爆发的农民起义军也多达几十支，其中势力最大者为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等，这些起义军总共有数百万人。他们也是起义之后发展顺利，新莽王朝和尔后的更始刘秀军，都难以剿灭这些起义力量。

赤眉、铜马等众多的农民起义军，完全保持着穷苦农民的本色，他们作风艰苦纯朴，官兵无明显差别，没有什么旗帜、文书，只有一些口头简单的约规，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为了便于指挥军队的作战和管理，起义首领只采用地方低级官吏的称号。高级首领称“三老”；中级首领称“从事”；下级首领称“卒吏”。起义军士卒互相之间皆称为“巨人”，表示都是英雄豪杰之意。

赤眉、铜马等起义农民，起义之初由于都是灾民群众，只是相聚攻取府库和富豪的粮食，以求温饱。但是随着起义战争的进程，随着新莽王朝残酷镇压的反面教育，才认识到必须推倒反动透顶的新莽王朝，方能彻底改变自己的绝望处境。

新莽王朝对起义军的镇压，在起义刚起时，并未引起重视，一些地方官吏只是作为一般的盗贼对待，由于起义来势迅猛，当地方无力镇压

时，一方面慑于起义军的威力；一方面伯朝廷降罪，又不敢向朝廷报告。形成“县欺其郡、郡欺朝廷，实百言十，实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辄督责，遂至延曼连州”，这就为起义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当青、徐等地起义群众发展到数十万人时，消息传到京师长安，王莽统治集团，也都对起义军十分轻蔑，认为起义军“讫无文号旌旗表识，咸怪异之。”王莽因而问群臣缘由，纳言将军严尤回答说：“此不足怪也。自黄帝、汤、武行师，必待部曲旌旗号令，今此无有者，直饥寒群盗，犬羊相聚，不知为之耳。”王莽和众大臣听后，十分赞同严尤的看法。直到后来绿林起义军委任官吏，皆称将军，攻城略地，击杀甄阜、梁丘赐，王莽才深感惊恐。因此，当新莽王朝认识到起义军已对其统治构成严重威胁时，南方和北方的绿林、赤眉起义军已进至战争的中期发展阶段了。

第二节 成昌战役

第一，成昌战前赤眉起义军连战连捷

赤眉起义军继起义初期的作战胜利，并以泰山为根据地，由不断击败新莽地方州郡部队，到直接与王莽的中央主力部队作战，几乎每战皆胜，声势越来越大。

一、姑幕之战

樊崇起义军以泰山为根据地，向周边发展起义势力，并向莒城（今山东莒县境）进击，然后转向姑幕城（今山东省诸城西四十里），与新莽翼平连率探场侯田况军，发生战斗，双方互有胜负。王莽令田况为青、徐州州牧，想以田况军充当镇压樊崇起义军的主力。田况确实为起义军的一个凶恶的敌人。他从对起义军作战中深深感到起义军的勇猛难敌，上书建议采取坚壁清野，孤立起义军的战略。田况认为："小国无城郭者，徒其者弱置丈城中，积藏谷食，并力固守。贼来城拔，则不能下，所过无食，势不得群众。如此，招之必降，击之则灭。"田况所率的四万大军，也都是穷苦百姓组成，无心与起义军作战，终于在作战中为起义军击破，被击杀近万人。这是樊崇起义军第一次歼敌最多的作战。起义军于姑幕战胜田况军后，战斗意志更加高昂，立即率兵北进，青州所属郡县，由于受王莽统治残害最深，广大农民百姓群众纷纷起义响应樊崇军，沉重地打击新莽王朝在这些地区的反动统治。起义军在节节胜利后，以部分兵力驻守南城（今山东省黄县境）这个战略城邑，主力则胜利返回泰山，继续向西南方向发展起义势力。

二、歼灭景尚王党军

王莽对樊崇起义军的壮大发展，渐感忧虑不安，看到地方军连战连败，已经不可能剿灭起义军，于是便决定派出中央的一部精兵，由太师羲仲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统率，并于新莽二年（公元21年）前去镇压青、徐州等地的樊崇等的起义军。

景尚为太师的重要属官，地位很高，当他统率的大军进入青州、兖州一些地区后，由于军队纪律很坏，任意抢杀掠夺，无所不为，深为当地人民所憎恶。起义军开始避开他们的锋芒，以观察他们的行动，当他们转战各地，疲惫懈怠之时，樊崇起义军才于新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二月，集中兵力给景尚、王党军以歼灭性回击。太师羲仲景尚被击杀，护军王党则下落不明，其所率之部队全部被歼灭于战场。这是樊崇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击败新莽王朝直接派出的中央精兵的第一次胜利，也是起义军对新莽作战取得的第二次重大胜利。

第二，新莽王朝成量战前的调兵遣将

樊崇起义军消灭了景尚、王党统率的新莽军队后，使王莽更加焦虑不安，深感东方青、兖、徐等州的起义军对其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必须派出更强大的部队迅速加以剿灭。于是，王莽于新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四月，便派他的心腹重臣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统率精兵十万余人，向东方进击，企图一举消灭樊崇起义军。

王匡、廉丹统率的十万大军，声势很大，汹涌地向东平一带直扑而

来，樊崇起义军积极备战，准备迎击王匡军。樊崇起义军为了在作战中区别敌我，免与王莽军混杂，便让自己的部队统统把眉毛染成红色，于是樊崇起义军从此便以赤眉军相称。王匡、廉丹军纪极其败坏，与景尚、王党军一样，到处恣意掠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激起广大人民的更大愤怒。当时流传的民谣说："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这充分地表达了农民百姓对新莽军队的痛恨心情。

新莽军统帅王匡，因系王莽的侄子，仅二十四五岁即为当朝太师，官高权重，但没有任何作战和带兵经验，而却受到王莽宠信。更始将军廉丹，本来也是王莽的心腹将领，新莽天凤二年（公元16年），他以宁始将军职，统率陇西、广汉、巴蜀等地十万大军，进攻益州西南各少数民族小国，立下了战功，被王莽升为更始将军。但他们二人凡与起义军战，却连吃败仗，引起王莽大怒，但他不责怪王匡，而特下诏严厉斥责廉丹说："仓禀尽矣，府库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战矣。将军受国重任，不捐身于中野，无不报恩塞责。"廉丹接到王莽的斥责诏书后，心中十分惶恐，连夜与其幕僚冯衍商议对策，冯衍因之向廉丹提出建议说："将军的先人，为汉室之亲信大臣，现在天下乱起，人人都思念汉朝的功德。你不如以众兵屯据大郡，镇抚吏士，招贤纳良，研讨复兴社稷之策，以除万人之害，功烈将永世不灭。否则，你的大军势必覆没于此，葬身于荒郊野外，功败名丧，辱没你的祖先"。

但死心塌地效忠王莽、而与起义军为敌的廉丹，没有接受冯衍的建议，继续与起义军作战。

第三，新莽赤眉两军的作战序列

一、新莽军

统帅：太师王匡

副统帅：更始将军廉丹

幕僚：掾吏冯衍

校尉汝云

王隆

总兵力：十万人以上。

二、赤眉起义军

统帅：三老樊崇

将领：从事逢安徐宣谢禄

总兵力：三万人左右。

第四，新莽赤眉两军的作战策划

一、新莽军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冬，在成昌战役即将发生之前，新莽军深入兖州境内，无盐（今山东省东平县境）索卢恢等起兵，迅速攻占了无盐城。王匡、廉丹迅即向无盐反攻，索卢恢率领起义士卒奋勇力战，终因众寡悬殊，泰山的赤眉军又来不及援救而被王莽军攻破，王匡、廉丹杀死起义军民一万多人。王匡此时则想乘胜立即向梁都（今河南省商丘地区）的赤眉别校董宪部进击。但更始将军廉丹认为，部队新近攻城拔地，转战未停，士卒十分疲劳，应做及时休整补充，然后再向董宪部进击。但廉丹的意见被王匡拒绝，于是当即决定：立即乘无盐战胜的军威，向梁都进军，消灭梁都的赤眉军后，再回兵攻击泰山赤眉老巢，以

求彻底剿灭赤眉军。

二、赤眉军

赤眉起义军在梁郡地区活动的有数万人，主力则正集中于泰山地区。无盐索卢恢战败，被王匡军惨杀万余人的暴行，激起了起义军的极大愤慨，决心消灭这股新莽军，因而决定：趁新莽军南移的途中，选择有利地区和时机予以歼灭。

第五，咸置战役作战经过

王匡否定廉丹的正确建议后，不经廉丹同意，竟率军而走，廉丹无奈，也只好勉强随行。王匡由于无盐的胜利，趾高气扬，不把起义军放在眼里，大摇大摆地向梁郡进兵。

樊崇统率的赤眉起义军，侦察了解到王匡军的动向后，随即指挥部队迅速向成昌（今山东省东平县境）急进，很快到达成昌聚（今山东省东平县西）以南地区，埋伏于有利地势之内，以等待时机，歼灭敌人。

不久，王匡、廉丹军行至成昌聚附近，起义大军立即发起攻击，双方展开激烈的冲杀，开始时双方互有损失，但起义军勇猛异常，越战越勇，王匡军逐渐支持不住，被起义军斩杀惨重，溃不成军。王匡看到自己兵败，怕被起义军斩杀，遂丢弃残兵败将，放弃战场指挥，狼狈突围而逃。这时廉丹仍拼死抵抗起义军，但看到战况越来越恶化，即将全军覆没，于是他命部下将自己的印信符节转交王匡，并气愤地对部下说："小儿（指王匡）可走，吾不可！"直到战至最后，被起义军砍杀。这时在另一处被起义军围战的莽军校尉汝云、王隆等得知廉丹战死的消息，也象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说："廉公已死，吾谁为生？"也一直与起义军顽抗到底，一一被赤眉军斩杀。至此，王匡、廉丹所率之十万大军，被赤眉军一举全部歼灭于成昌地区。

起义军歼灭成昌聚地区之敌后，随即乘胜追击残敌，一直追至无盐城，又将留驻于无盐城的莽军万余人全部歼灭。成昌战役，成为赤眉起义军第三次对王莽重兵集团的作战的胜利。

第六，成昌战役后新莽赤眉双方的动态

赤眉起义军于成昌大捷后，随即转移兵力，还攻莒城，因莒城是樊崇起义的地方，而未曾攻打即行撤军，转而攻击东海，与新莽沂平大尹交战后，胜利进入楚（今江苏徐州一带地区）、沛郡（今安徽灵璧一带）、汝南（郡治在今河南平舆）、颍川（郡治在今河南省禹县境）等地作战，纵横驰骋于现今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省连界的地方，势力发展很快，达到数十万大军之众，与南方的绿林起义军南北配合，遥相呼应。

王莽得知更始将军被起义军打死，十万大军悉数被歼，倍感形势危急，采取了以下紧急措施：

一、派遣国将哀章协助太师王匡率领司命孔仁、兖州牧寿良、卒正王闳、扬州牧李圣，调集各州郡兵三十万人马，进行围剿赤眉军。

二、以重兵进驻当时的重要粮仓"敖仓"，防止赤眉军劝这个要害目标的进攻。

三、新莽王朝为缓和人民的敌对情绪，不得已而宣布废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管之禁，把一些不合理的诏令收回，停止执行。

四、调集人马加强洛阳地区的守卫，借以阻止赤眉起义军向西发

展，屏障关中的安全。

新莽王朝这些措施，已经无法挽救即将灭亡的命运，南方的绿林起义军和北方的赤眉起义军的最后胜利，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

成昌战役评述

起义于我国北方的赤眉军和南方的绿林军，同为汉末两支力量最为强大的农民起义武装，这两大起义军南北配合，同时对新莽王朝作战，置新莽王朝于两面作战，穷于应付的被动地位。

成昌战役中，赤眉军以三万之军，全歼了莽军十万之众，取得了赤眉军中期作战的巨大胜利，这一胜利与绿林军的昆阳战役相比，虽略有逊色，但却立即又吸引了新莽王朝三十万大军前去堵截赤眉军的向西发展，这既使赤眉军威名远扬，又使新莽王朝不得不将主力对付赤眉军，从而大大减轻了绿林军的压力，加快了推翻王莽反动统治政权的步伐，因而，成昌大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完全起自于灾民的赤眉起义军，在成昌战役中，不激怒于无盐城万余起义军的被屠杀，不硬去攻打十万大军驻守的坚城，而是通过侦察掌握了敌人的确切动向，在有利的地区设置伏兵，等待战机，一举将优势之敌击破，再进而回击无盐守敌，终于全歼了王匡、廉丹的十万大军，表现了这支农民起义军很高的作战指挥才能。

赤眉起义军从起义之初，到成昌大捷，一连三次与王莽正规大军作战：第一次击破了田况的四万大军；第二次歼灭了太师羲仲景尚、更始将军护军王党的精兵；第三次又于成昌歼灭太师，更始将军的十万之众，而且将新莽王朝威名赫赫的更始将军廉丹斩杀。这些连战连捷的作战行动，都是以少胜多，以劣胜优的典型战例。这支农民起义军所以能接连取得这一系列的重大胜利，除了说明起义群众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顽强战斗意志之外，还生动地证明了赤眉军以樊崇为首的领导集团，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指挥艺术，因而，尽管是“目不识丁”的穷苦农民，也可以成长为叱咤风云的战将和统帅。

第三节 赤眉对更始的长安战役

第一更始政权的迁都和绿林军的蜕变

在赤眉起义军正与新莽王朝的反动军队作战之际，绿林起义军已立刘玄为帝，并已改称汉军。因而，绿林军这支原农民起义军，由于渗入了过多的旧贵族和地主豪强分子，在进入长安以后，便逐渐蜕变为维护新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

更始元年（公元23年）九月，汉军胜利地结束了进军洛阳和长安的作战。十月更始刘玄自宛城迁都于洛阳，更始二年（公元24年）二月，更始王朝再迁都于长安。至此，更始王朝替代了新莽政权，成为西汉末年统治全国的新的中央王朝。更始建都长安后，立即封赏王侯和功臣。

同姓的被封王有：

刘祉定陶王刘庆燕王

刘歙元氏王刘嘉汉中王

刘赐宛王刘信汝阴王

地主豪强与其他人士被封王有：

李轶舞阴王李通西平王

朱鲔胶东王胡殷随王

农民起义将领被封王有：

王匡比阳王王凤宜城王

王常邓王申屠建平氏王

张卬淮阳王廖湛穰王

陈牧阴平王成丹襄邑王

宗佻颍阴王

农民起义军将领虽然有九人被封为王，但更始政权的实权却几乎全部操于贵族豪强之手。如李松为丞相，刘赐为前大司马，朱鲔为左大司马，赵萌为右大司马，李松与赵萌“共秉内任”，二人包揽了朝中大权。李轶、朱鲔驻守洛阳，王匡、张卬驻守三辅地区，李通、王常驻防于荆州。

没落贵族刘玄怀着称帝的野心，加入农民起义军当上皇帝，便整天沉迷于酒色，特别是进入长安之后，就不问朝政。大臣有事向他启奏，他有时竟醉得难以支撑：“时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内与语”。朝中的大权已完全旁落赵萌之手，赵萌则凭着特殊的身分和地位，手操生杀大权，作威作福，欺压群臣和百姓，谁若稍有反抗，便遭到杀身之祸。军师将军李淑上书劝谏，即被囚禁。这种情况，引起了朝野内外怨声四起，一些起义军将领和正直之士，已感到更始政权完全背离了起义军的意愿，孕育着极大的危机，“关中离心，四方怨叛。诸将出征，各自专置牧守，州郡交错，不知所从。”地主豪强集团和地方封建势力，纷纷割据独立，绿林起义军经过艰苦奋战取得的初步统一局面，很快遭到破坏，有的拥兵聚重，自封将军，有的称王称帝。其中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有：

新莽政权的卢江连率李宪，据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称为淮南王，

五年后又自称天子，当上皇帝。
邯郸卜者王郎冒充汉成帝的从子刘子舆，在邯郸称帝，占据了今河北省南部地区。
贵族刘永，初被更始刘玄封为梁王。定都睢阳，乘机扩充势力，侵占了济阴、山阳、沛、楚、淮阳，汝南等二十多个城邑，后来也自称为帝。
清水长公孙述，割据巴蜀地区，建武元年称帝。
贵族刘杨，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地区）拥兵割据。
贵族刘茂在京（今河南省荥阳县境），密（今河南省密县境）聚众起兵。
田戎在夷陵地区称雄。
延岑在汉中地区拥兵自重。
秦丰在黎丘地区称王。
隗嚣自长安逃回天水后，即割据今甘肃西南部地区，自称西州上将军。
此外，还有董宪、李宪、张步等。而占据一些孤城、小邑自立为将军者，更是遍地皆是，更始政权实际上已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
第二，赤眉起义军向西发展和更始政权的对策
当更始定都洛阳之际，即策划对付赤眉的策略，遂决定招抚赤眉。赤眉军领袖樊崇得知绿林起义军立刘玄为帝，便亲率渠帅二十余人欣然去洛阳投奔绿林军，但刘玄集团丝毫没有诚意，只给他们封了一些空头列侯称号，不给封地，不提安置数十万赤眉军的办法，樊崇看出刘玄集团的不良居心，于是率领大家逃出洛阳，回到濮阳一带赤眉军总部，决定继续与王莽反动政权的势力作战。
更始二年（公元24年）二月，更始政权迁入长安后，赤眉军遂乘更始统治重心西移的机会，立即向西发展，大军进入颍川郡。但由于赤眉起义军都是北方人，又经长期征战，部队十分疲劳，士卒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思乡厌战情绪，“日夜愁泣，思欲东归”。樊崇、徐宣等将领分析了下一步向东、还是向西发展的问题，他们觉得根据目前部队的情绪，如果向东发展，有可能出观使部队自行散掉的危险，于是决定向西继续进军，攻取长安，摧毁更始王朝。
这时赤眉军已发展到数十万之众，为便于军队的行动、作战补给，决定将全军分为两大部分，分路向关中地区进发：
一路由樊崇、逢安统率，经过武关向长安进军；
一路由徐宣、谢禄、杨音统率，经陆浑关袭占函谷关，向长安进击。
更始王朝对赤眉军向西方的发展，开始引起重视，但对赤眉军的具体行动方案，并不清楚，于是决定采取以下对策：
以定国公王匡、水衡将军成丹统率一部军队进驻河东一带，以防备赤眉军和刘秀之邓禹从函谷关以北地区进袭长安；
以讨难将军苏茂指挥一部兵力进驻弘农地区，以阻赤眉军经函谷关西进。
从更始政权对兵力的使用来看，它过分重视河东，而忽略了弘农地区，赤眉大军恰恰都在弘农地区行动，因而，更始王朝开始即处于十分

不利的地位。

第三，长安战役前更始政权被刘秀势力进一步削弱

当更始政权迁都洛阳，刘玄即派刘秀率军渡过黄河北进，以徇略河北地区之州郡，当时朱鲔曾劝告刘玄，不要派刘秀前往，以免他得势之后，背叛更始政权。但刘玄认为，刘秀为人恭顺，虽杀了其兄刘，刘秀毫不记仇，遂决意派刘秀进略河北地区。

刘秀到达河北地区后，以军事进攻和招降安抚等手段，使许多地区都迅速变成了他的势力范围。

在刘秀初入河北之时，邓禹、耿即向刘秀建议，认清天下形势，扩大自己的势力，以争雄天下，邓禹劝刘秀说："现在山东一带地区还没有平定，赤眉青犊军势力很大，更始刘玄是个庸禄之才，他手下的将领也都是些无能之辈，只知为了争夺财物，互相攻杀，以求自己享乐。历代之明君夺取天下，不外两个条件，即天时和人事。从天时方面来看，更始虽然已经称帝，但四方叛乱日渐兴起；从人事方面看，帝王大业，不是庸碌之才所能胜任的，当前分崩离析的形势已很明显，不管为这个政权建立多么巨大的功劳，也不会成就什么事业。你的盛德大功，已为天下所敬服，军政齐备，赏罚明信。当今最好的决策是不如广招英才，取悦民心，恢复汉高祖之帝业，救万民之命，以你的雄才大略，肯定能够顺利地夺取天下。"（原文见《后汉书》卷十六）刘秀对邓禹这一策定天下的卓识远见，深表赞许，因而，刘秀从进略河北之初，即抱定了成就帝王之业的雄心。

所以，刘秀进略河北地区，既把忠于王莽的各残余势力和赤眉、铜马、青犊等各地农民起义军作为敌人，也把更始政权的势力作为敌人。他先扫平王莽政权的势力，再剿灭农民起义军，最后又一一铲除更始政权的官吏。他首先攻占河北地区的重要战略都城邯郸，消灭了割据称帝的王郎，接着便向铜马等农民起义军进攻。他羽毛越来越丰满，同更始政权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加尖锐化、表面化。更始二年（公元24年）五月，当刘秀与更始尚书令谢躬所率之军攻克邯郸，除掉王郎之后，更始刘玄对刘秀势力的急骤膨胀，已深感不安，如果刘秀势力照此继续发展下去，河北地区可能出现尾大不掉之势。于是刘玄采取了紧急措施：（一）升任刘秀为萧王，解除军权，命刘秀带领他手下的将领归还京师长安。（二）撤消刘秀的坚决支持者幽州枚、上谷太守耿况和渔阳太守彭宠的职务。（三）任命韦顺为上谷太守，苗曾为幽州牧，蔡充为渔阳太守，谢躬率军驻屯邯郸。

刘秀对刘玄调他回归长安的意图十分清楚，他这时已感到更始要剥夺他的兵权，因而，刘秀本意不想被调回长安。刘秀的一些将领也劝刘秀不要奉召，耿又向刘秀进言说："你的功名已昭著天下，以正义之师征讨叛逆，很快可以成就大业，当今的天下，你一定要做君王，决不能叫别人占有。"（原文见《后汉书》卷十九）这些进言正合刘秀之意，因而，刘秀以河北未定为口实，拒绝返回长安，并决心立即清除更始在河北的势力，消灭铜马等农民起义军，首先变河北地区为他的一统天下。

刘秀平定河北的邯郸地区后，接着进行了四方面的主要作战行动。（一）夺取更始在幽州地区的地盘。刘秀以急需调兵平定各地的农民起义军为由，下令调集幽州十郡兵马，刘玄的新任幽州牧苗曾接到命令

后，暗中命各郡不得派兵。刘秀立即派吴汉到无终趁苗曾迎接他的时候，击杀了苗曾，夺取了苗曾的兵权。又派耿到上谷，杀了韦顾、蔡充，终于占领了整个幽州地区。接着由将军吴汉等统率幽州的突骑参加了围剿农民起义军的作战。（二）镇压铜马农民起义军。铜马农民起义军占据了今河北省束鹿县以南、平乡县以东、清河县以西以及附近的广大地区，已拥有数十万大军，力量十分强大。刘秀军居于劣势，不敢与起义军正面交锋，遂采取了坚守要点，派兵切断起义军的粮道，使铜马起义军供应断绝。铜马军被困于上述地区达数月之久，兵疲食尽，而撤走。刘秀则趁此机会，纵兵追击铜马军，追到馆陶（今河北省馆陶县境），将铜马军击败，后高湖重连等地起义军驰援铜马军，铜马军威复振，再与刘秀军战于今河北大名等地区，最后又被刘秀军击败。刘秀战胜铜马起义军后，将起义军收编为自己的作战部队，刘秀军因此而势力大增，拥兵数十万之众。（三）镇压青犊、尤来等农民起义军。刘秀在击降铜马等起义军后，即转而组织镇压青犊、尤来、上江、大彤、五幡、铁胫等起义军，这些起义军当时势力也很强大，拥众十余万人，主要活动于今河北省南部的边界与河南省北部地区以及太行山东南的一些地区。刘秀经过苦战，将青犊等军击败，青犊军沿太行山北走，刘秀率军一面追击，一面扫除更始政权在各地的势力。至更始三年（公元25年）正月，刘秀军又与青犊等起义军先后交战于河北省的西部元氏、满城等地区，青犊等军复被刘秀军击败。但当刘秀追至今河北徐水地区时，起义军经过周密组织，巧妙地反击，一举将刘秀军击破，起义军猛烈追杀刘秀军，斩杀数千人。刘秀弃军仓惶落荒而逃，刘秀逃匿数日后，才逃至范阳（今北京市大兴县），收集部队，休息整顿后，再次与青犊军交战于安次（今河北廊坊市境），接着又在渔阳（今北京密云），潞东（今北京通县境）、平谷（今北京通县境）等地，将青犊尤来等起义军主力全部击败。至此，刘秀军的势力更加强大。（四）消灭更始尚书令谢躬的部队。刘秀在未向青犊尤来起义军进攻之前，即与谢躬的部队同驻于邯郸地区，早想趁机剪除谢躬军，但他在夺取幽州之前，因为惧怕谢躬军强大，不敢下手，一贯采用与谢躬假装亲近的手法，迷惑麻痹谢躬，当刘秀策划密谋妥当之后，即以约谢躬军共同进攻青犊尤来等起义军之名，将谢躬大军调出邯郸驻地。当谢躬亲率大军进击青犊起义军取胜返回时，刘秀早已派吴汉，岑彭袭占了谢躬的大本营，在城内设置了伏兵，封锁了消息，待谢躬入城，即将谢捕捉斩首。

刘秀在完成了镇压铜马军，夺取幽州地区，消灭了更始谢躬部，围歼了青犊等农民起义军后，河北地区遂全部为刘秀统一，刘秀乃于更始三年（公元25年）正式称帝于鄗邑（今河北省柏乡县境），国号仍为汉，年号建武元年。

更始王朝失去了河北广大地区后，河东（今山西省的东南地区）地区遂暴露于刘秀的兵锋威慑之下，而东面赤眉军又在向关中长安步步逼近，不得不分军而防守赤眉和刘秀集团两个方面的进攻，力量更加削弱。

第四，赤眉军和刘秀集团双方的派兵西进

一、赤眉军绕过洛阳直趋函谷关

当更始政权由洛阳迁都长安后，更始王朝为防守战略重镇洛阳，派

胶东王左司马朱鲔、舞阴王中郎将李轶与河南太守武勃率三十万大军驻守洛阳及其附近地区，赤眉起义军向关中进军时，巧妙地避开了更始的重兵集团。不经由洛阳、灵宝间的直通大道进兵，而是绕道陆浑关，这就置更始政权的三十万大军无用武之地。赤眉军在向弘农进军中，初遇更始抗威将军刘均军，刘均被赤眉军击败，退向黄河以北，与王匡合兵。

二、刘秀派兵向西进军

赤眉起义军的每一步行动，都引起刘秀的密切注意，刘秀判断赤眉军有能力攻克关中，进占长安，但刘秀自己的力量还难以单独打垮更始政权。因而他既继续对更始王朝作战，也预先派出兵力向西进军，以伺机进击关中抢占长安，刘秀为此目的，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派邓禹率军西进。当刘秀获悉赤眉军西进关中的行动时，立即派他的重要将领邓禹率领精兵两万余人西进，以便首先夺取河东之重镇安邑地区。而后继续突进关中，伺机攻占长安。邓禹军以韩歆为军师，以李文、李春、冯、樊崇等为将军，先夺占了箕关（今河南省济源县境），接着包围了安邑，安邑城池坚固，邓禹军围攻数月，未能攻克该城，更始派大将樊参率兵数万前往救援，被邓禹军击败。王匡、成丹等也率军十万前来迎击邓禹，一举将邓禹击败。邓禹撤军休整，准备再战。两天后，王匡等复引军再攻邓禹军，待王匡军进至邓禹军营下，邓禹军突然杀出，打了王匡军一个措手不及，王匡军大败，王匡成丹等弃军逃回长安。邓禹军擒杀了更始河东太守杨宝、中郎将弭强和赤眉军手下的败将刘均。邓禹以李文为河东太守，至此，河东地区已尽为刘秀所有，邓禹之军已渐成西渡河水之势。

（二）经营河内地区。刘秀为了打下与赤眉争夺天下的基础，在其夺占河内地区（今河南省安阳以南至黄河之间地区）后，即以“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的寇恂为河内太守，刘秀认为河内；“北有太行之险，南据河津之要”，险要富实，可以与汉高祖刘邦经营关中的重要性相比。于是刘秀向寇恂交待说：“过去高祖留萧何镇守关中，我现在让你经营河内，你要负责筹措军粮，练训士卒，提高戒备，千万不要让更始军北渡黄河。”刘秀同时又以将军冯异为孟津将军，统率魏郡和河内的兵马驻防于孟津，与更始洛阳守将朱鲔、李轶部隔河对峙。

第五，赤眉军攻克弘农的胜利会师

更始三年（公元25年）二月，赤眉军徐宣、谢禄、杨音部进至今河南灵宝县境，与更始弘农太守讨难将军苏茂军交战，苏茂军被赤眉军击败。徐宣部遂继续西进，终于与樊崇、逄安所率之军胜利会师于弘农。更始王朝得知赤眉大军西进函谷关的消息，十分惊慌，立即派遣丞相李松率大军前往堵截，同时命令洛阳的朱鲔率军，尾追赤眉军，以与李松军前后夹击赤眉军。结果，李松军被赤眉军打败，赤眉军斩杀李松三万多人，李松弃军而逃。朱鲔军未起任何作用。

樊崇等起义军领袖，鉴于赤眉军的势力越来越壮大发展，再靠原始的形式指挥这样庞大的军队已很困难，而且对所攻占的地区也不便管理，于是决定采取两个重要战略措施：

（一）整编军队。将全军整编为三十个营，每营军队一万人，设三老、从事各一人，负责全营的作战指挥和部队的管理。这样缩小指挥单

位的结果，使全军的指挥调动具有了相当的灵活性，对提高作战能力作用很大。

（二）建立政权。樊崇等认为，为了更好地对付更始王朝和日益扩张的刘秀集团，有必要建立政权，并拥立一刘氏之人为皇帝，以便借此号令天下。于是，在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当起义军推进到郑地（今陕西华阴县北郑城），便立十五岁牧童刘盆子为皇帝，定年号为“建世”也称为“汉”。

赤眉军政权内的大臣都由郡众推举产生，徐宣略通《易经》，任过县监狱的小官吏，便被推举为丞相，樊崇英勇善战，为众人所尊重，由于不知书数，不会写划，被推举为御史大夫。逄安、谢禄为左右司马，杨音以下为列卿将军。

赤眉起义军所建立的汉政权，由于未吸收多少豪强地主之势力，整个领导权完全操于赤眉起义军将领樊崇等人之手，因而，这个政权内部没有两个阶级的尖锐对立。

第六，赤眉军攻占长安战役的经过

一、更始王朝面临两面作战的困境

赤眉于郑地建立“建世”政权后，继续向西进击，顺利进抵华阴地区。这时刘秀大将邓禹军也率军自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县境）渡河，进占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地区），推进渭水，从北面逼近长安。更始王朝面对来自东面和北面的两方面大军的压力。十分惊慌。原绿林起义军将领张卬等人与众臣商议说：“赤眉进至郑、华阴间，一朝一夕就可以到达长安，我们现在只有长安一座孤城了，很快就要被攻破灭亡，不如命令部队将长安中的财富收集起来，大家一齐东归南阳，再集中宛王等所属的部队，重新起来战斗。”（原文见《后汉书•刘玄传》）平氏王申屠建、穰王廖湛等都表示赞同，遂一同向更始刘玄上谏，但刘玄听后大怒，众人便不敢再说了。待赤眉立刘盆子为帝后。刘玄才觉得形势紧张，于是采取了以下两项作战决策：

（一）命令王匡、陈牧、成丹、赵萌等率军，进驻新丰（今陕西省临潼东北）地区。以图扼守新丰通往长安的重要交通干道。李松率军进驻于（今陕西省临潼西北）。

（二）命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率领十万军队，与左冯翊兵众进至衙（今陕西省白水县东北），以抗拒邓禹之兵。

二、更始王朝内部的溃乱

随着赤眉大军的日渐逼近，更始政权内部也日益乱作一团，将领和士卒都无心为更始王朝作战，更始王朝本来就存在的地主豪强与绿林农民起义军将领之间的矛盾，便趋于白热化，更始王朝的统治集团已成不攻自破的状态。

张卬等因前次谏议东归南阳，遭到刘玄严词拒绝，现在赤眉步步进逼，形势更加危急，如不采取断然措施，恐怕只能坐以待亡。因而又与申屠建、廖湛：胡殷。隗嚣等商议，在立秋那一天，乘更始帝刘玄举行祭祀打猎仪式的机会，以武力劫持刘玄转移南阳。然而，计划泄露，侍中刘能卿得知此事，奏告刘玄。立秋那天，刘玄伪称有病不外出，下诏让张卬，申屠建等入宫，预备将他们一齐捉捕杀尽。张卬、廖湛、胡殷发觉情况有变化，冲出王官而走，申屠建被当场杀死，隗嚣事先就怀疑

事机已露，托病未曾入宫。刘玄派邓晔率人围攻隗嚣，隗嚣趁突围混乱之机，逃回天水，收集归部，自称西州将军，割据天水一带地区称雄。

张卬、廖湛、胡殷出宫后，立即率兵进攻王宫，更始刘玄大败而走，率领百余护卫人员，逃至新丰赵萌营中。更始到赵营后，对绿林起义军将领更加怀恨，无端怀疑王匡、陈牧、成丹与张卬是同谋，故密谋将他们一齐杀害，因而，召他们晋见。陈牧、成丹先到，皆被刘玄斩杀。王匡得知消息，立即率兵逃向长安，而与张卬等合兵共守长安。这时完全站在更始刘玄一边的丞相李松与赵萌等在更始刘玄指挥下，放弃对当面敌人赤眉军和邓禹部的防卫，回军向长安进攻，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战败了王匡与张卬、廖湛、胡殷等部，刘玄重新入居长信宫。

此时赤眉军已顺利进抵高陵（今陕西省高陵县境），相距长安只有八十里地。

三、更始王朝的最后覆没

王匡、张卬等战败，即率领部队前往高陵，向赤眉起义军投降。双方联兵后，共同会攻长安东都门（即宣平门了，为贵族居住区）。李松率军迎击赤眉，王匡军，战败被俘。城门校尉李汎为李松之弟，赤眉军遂派人劝说李汎投降：“开城门，活汝兄”。李汎为换取其兄生命的安全，开门迎接赤眉军入城。这样，赤眉军于更始三年（公元25年）九月，兵不血刃，胜利进入长安城。

刘玄得知赤眉军入城，仓惶中单骑逃出长安城。右辅都尉严本，恐怕更始走失，自己被赤眉军诛杀，于是名为护送更始，实则将更始控制于自己营内。更始政权的高级官吏将相大臣除个别将领格斗战死外，其余全部向赤眉起义军投降。十月，赤眉军发布通告宣称：“圣公降者，封长沙王。过二十日，勿受。”更始刘玄派遣其侍中刘恭（刘盆子之兄）向赤眉请求投降，赤眉军命将军谢禄受降，将自己的天子玉玺交给刘盆子。至此，刘玄的更始王朝经过两年另十个月（公元23年至公元25年）的时间，而宣告灭亡。

赤眉军长安战役评述

赤眉起义军在夺取成昌战役胜利的基础上，挥师南下，再折而西向，进军关中，一举夺占了更始王朝的京师长安，从而灭亡了建立两年另十个月的更始王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我国自秦和西汉以来，曾不断发生过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战争，但是完全依靠农民自己的领导力量夺取起义的胜利，摧毁封建王朝的统治，应当首推赤眉起义军。这支军队在当时地主豪强纷纷兵，到处是自称将军割据称雄的乱世，能够始终保持自己起义领导集团的纯洁性，不能不是农民起义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这说明了以樊崇、逄安、徐宣、谢禄、杨音等起义军领袖所具有的坚定而鲜明的阶级意识和超常的组织领导能力，说明了他们在农民起义军中具有的崇高领袖威望。

长安战役所以能够顺利取胜，最基本的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是赤眉农民起义军的英勇善战。他们自起义以来，东征西战。驰骋万里，从东海之滨转战至长安城下，几乎海战必胜，所向无敌；其二是正确的作战指导。他们先是乘更始王朝从洛阳西迁长安之机，迅速挥军南下，向西进至颍川郡。接着绕过更始重兵驻守的战略要地洛阳，迂回防守薄弱的弘农，顺利进至由函谷关，突入了进入关中的东大门。进而，以更始

丞相李松为人质，劝降李松弟李汎，不动刀兵而进入池深城坚的长安城；其三是更始政权的腐败变质，在赤眉军的军威威逼之下，赤眉大军未到，更始王朝已是惊弓之鸟，加剧内部分裂，互相攻杀，无法组织起强有力的对赤眉军作战的力量。虽然这只是客观上的原因，但是，却为赤眉军胜利进军，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第四节 峭底战役

第一赤眉军进占长安后的形势

赤眉起义军取得了长安战役的胜利，赤眉军建立的建世政权迁都长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近乎危机四伏。

一、关东地区的割据势力

在赤眉起义军进占长安和摧毁更始王朝的前后，刘秀集团已全部占领了河北地区和河内、河东、河西地区，刘秀集团的势力大增。刘秀由于出身豪强地主，加之招降了各地的地主割据武装，既有率兵作战的经验，又有拢络人心，建设政权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因而，他每占领一个地区，便委任官吏，整顿社会秩序，严加统治管理，很快便变成他的可靠的势力范围。所以刘秀集团势力的发展，对赤眉军建立的建世政权日益构成潜在的巨大威胁。

除了刘秀集团之外，各地区仍有拥兵割据、分裂自立、称王称帝的大小不等的割据势力，这些割据势力，有的是新莽时期的残余，有的是更始政权的封王属地。赤眉军虽然进占了长安，早已建立了建世政权，但都没有触动他们，因而，他们也对赤眉军政权起着不小的危害作用。其中主要的割据势力有如下地区：

贵族刘茂自称厌新将军，继续聚众于京（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南）、密（今河南省密县东南）地区，他攻克颍水、进占汝南，力量日渐扩大，拥兵十万之众。

更始政权所封的宛王刘赐。南阳太守王常，在其就任王位之后，只知道保境安民，赤眉军无力征讨他们，成为更始政权的残余势力。

贵族刘永，更始时期即以睢阳为基地，极力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攻占附近地区二十八座城邑，原先被更始刘玄封为梁王，更始王朝被赤眉军灭亡后，便自行称帝。

新莽旧官吏李宪，割据店江郡地区，自称淮南王，更始政权覆灭后，李宪即自立为帝。

南郡人秦丰，占据宜城等十一县，以黎丘（今湖北省宜城县）为基地，自称楚黎王。

张步占据齐地，被刘永封为齐王。

董宪原为赤眉起义军的一部分，刘永称帝后，也被刘永封为海西王。

田戎在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境）起兵之后，势力也逐渐扩大，自号大将军、周成王。

二、长安地区地主豪强势力阴谋再起

赤眉起义军接受更始刘玄投降后，实践自己的诺言，封更始刘玄为“长沙王”，对刘玄供应俸禄，以礼相待，仍准其留住长安，并由侍中刘恭和赤眉军将领谢禄保卫刘玄的安全。

但是赤眉军政权把刘玄留住长安，确是政略和策略上的一大失策。因为更始政权从建立起就代表着地主豪强的阶级利益，更始王朝在统治关中地区时，对关中地主阶级的利益丝毫未加触动。以后刘玄又杀害了

绿林起义军将领申屠建，成丹等人，进而又与王匡、张卬等农民起义将领混战，因而，关中的地主豪强势力早把刘玄当成为自己利益的总代表。据《后汉书•刘玄传》记载称，当更始灭亡时，世人“皆怜更始”。这些人在关中和长安地区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对赤眉政权的势力，他们藏起粮食，屯积物资，妄图在粮食和经济上扼杀新生的农民起义政权。同上书记载，他们还阴谋劫走刘玄，重立刘玄为帝，号召天下。“今诸营长多欲篡圣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灭之道也。”原农民起义军将领张卬发现这种阴谋活动后，即与护卫刘玄的将领谢禄商议，乘谢禄与刘玄共同放马于郊外的机会，派兵将刘玄勒死，从而粉碎了关中地主豪强企图政变的阴谋。

三、更始王朝关中地区部队伺机反扑

赤眉军进占长安后，没有乘胜扫平关中地区刘玄的各残余部队，因而，使更始王朝驻于关中的一些部队，仍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实力，他们见赤眉军力量强大，势力不可挡，便采取了率兵远避赤眉兵锋的策略，将军苏茂、延岑就是其中的重要力量。这为赤眉军以后的行动，埋下了巨大的后患。

原先与张卬，申屠建、胡殷等密谋劫持更始刘玄失败后逃回天水的隗嚣，也趁混乱之机，扩充兵力，积蓄力量，占据陇右一带地区，积极备战，准备抗击赤眉军的征讨。

四、刘秀集团邓禹对关中和长安的威胁

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八月，当赤眉军进至高陵地区时，刘秀集团的将军邓禹，也击败更始军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的十万大军，邓禹军力量迅速壮大，各地的豪强地主武装和割据势力，纷纷迎降邓禹，邓禹军竟号称百万之众。赤眉军的进占高陵，引起邓禹部将的忌恨，鼓动邓禹与赤眉军决战，以便战败赤眉，争先攻占长安。但是邓禹认为赤眉军十分强大，难以击败，拒绝了众将的意见。十月，赤眉攻占长安，邓禹遂率军向北进军，以便攻克上郡、北地、安定等郡，企图利用那里的条件休整部队，伺机而动。邓禹当时对诸将说：“我们现在虽然部队众多，但能够打大仗的很少。既没有充足的给养，也没有足够的作战物资。赤眉军攻占长安，财富很充实，锐气正盛，难以战胜它。但他们犹如盗贼群居，没有什么长久之计，财物粮食虽然充足，但杂乱无章，难以做到长期坚守，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地广人稀，粮食牲畜又很丰富，我们在这些地区，休整部队，寻找战机，再与赤眉交战，一定可以打败它。”（原文见《后汉书•邓禹传》）邓禹这支驻于北地三郡的大军，对长安北面构成了严重威胁，是虎视赤眉政权的一支劲敌。

赤眉进占长安后，面临以上的错综复杂的局势，对于政权的稳固、进一步发展起义战争的胜利成果，都是致命的制约因素。

第二，赤眉军的被迫西进和重返长安

一、赤眉西进前的整军

赤眉起义军的将领系农民出身，既保持有其艰苦朴实的优良作风的一面，也难免有一些散慢习气，不习惯于封建官场中的繁琐的礼仪，因而在一次宴乐会上，出现了互相争斗的事件，引起刘盆子的恐惧。在此之前，刘盆子之兄刘恭，因充当过更始刘玄侍中，所以对刘玄一直念念不忘，思想上早已与赤眉军政权格格不入，但愿赤眉军早日失败，所以

这次事件一发生，刘恭便趁机教唆其弟刘盆子早些让出皇帝位，以免遭受祸害，因而宴乐会上的争斗，正好成为刘盆子指责赤眉起义军军纪废弛的借口，说四方“莫不怨恨，不复信向。”并请求以他的死，来平息天下的怨恨，说罢大哭。樊崇等数百人立即向刘盆子奏请原谅自己治军不严的过错：“臣无状，负陛下。请自今以后，不敢复放纵，”经过这次事件，各营将帅均闭营整顿军队纪律，严格管教部队，赤眉军面貌焕然一新，三辅翕然，百姓争还长安，市内又繁荣起来。

但是京兆、冯翊、扶风三辅地区的地主豪强势力，并不因为赤眉军军纪的加强而丝毫放松他们对赤眉政权的破坏和扼杀的活动，而是继续掀起反对赤眉政权的暗流。他们拼命地控制三辅地区的粮食，制造民间的慌恐情绪，使京师一带出现严重的粮荒，长安城内粮食供应几乎完全断绝。起义军由于没有采取得力措施，镇压地主豪强势力，最后在“城中粮尽”的情况下，只得被迫撤出长安，向安定（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区）、北地（今甘肃省环县地区）一带地区转移。

二、赤眉军西进的悲壮历程

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二年（公元26年），赤眉刘盆子建世二年正月，赤眉起义军纵火灰烧宫室后，引兵离开京师长安，向西进军，赤眉军在长安南郊祭告天地之后，循南山（指沿终南山）前进，这时赤眉“车甲兵马最为猛盛，号称百万。”赤眉军建世皇帝刘盆子乘王车，驾三马，从骑数百，浩浩荡荡向西进发，所过城邑地区，均望风而降。但原更始政权的将军严春，率兵占据郡县（今陕西省眉县境），抗拒赤眉军西进，赤眉军一举将严春军击破，斩杀了严春，迅即挥军北上，进占了安定、北地两郡地区。

赤眉建世二年（公元26年）九月，赤眉军向陇上一带移动，遭到隗嚣部将杨广的阻击，遂转向乌氏（今甘肃省泾川县东），泾阳（今甘肃省平凉地区）发展。又被杨追击，受到一定损失。再折向南进番须（今陕西省陇县西北）。但在这一带活动期间，天气突变，适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赤眉军无奈，只得停止西进，折返长安。

赤眉军的西进北上地广人稀的安定，北地一带地区，在当时的条件下，肯定困难众多，且战且走，长途跋涉，士卒多冻饿而死。对这一过程，虽无详细史料记载，但就现有的史书记载的简略过程来看，这是一次徒劳无功的悲壮的进军。

第三，赤眉军回军长安的胜利作战

一、赤眉与邓禹军争夺长安

当赤眉西进，离开长安后，长安城已成无重兵驻守的状态，这时刘秀集团的邓禹军乘机由上郡等地南下，轻而易举地占据了长安。当邓禹军未进占长安之前，刘秀即命令邓禹要伺机进占长安，镇慰西京，维系百姓之心。但邓禹自觉力量远非赤眉军的对手，故一直迟迟不敢向长安进犯，仍在上郡一带地区征集兵马，屯聚粮草，等待时机。但这时，邓禹军内却发生了机弩将军冯愔争权，击杀车骑将军宗歆的事件，接着冯又进击邓禹军，然后率部众向天水方向逃走。这个事件虽经平息，但对邓禹军的军心士气却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也是邓禹在赤眉军雄据于长安之时，不敢进犯长安的原因之一。

但当赤眉大军一从长安撤出西走，邓禹进占长安的计划，才得以实

现。邓禹军进占长安后，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失策行为，他不在政治上改进治理长安的措施，没有在军事上加强保卫长安的部署，没有注意对长安及其附近地区更始政权旧部招抚收容，壮大自己的实力，而是忙于晋谒汉高祖刘邦的神庙，收汉代十一帝神庙，派兵送往洛阳，巡行陵园等封建礼仪琐事。从而，使他失去了巩固长安的可贵时机，客观上为赤眉大军重返长安，减少了阻力。

当邓禹得知赤眉军东返的消息后，邓禹即派兵前去迎击，企图阻止赤眉军重返长安，赤眉军于郁夷（今陕西省陇县境）击败了邓禹军，邓禹慌忙退出长安，入据云阳（今陕西省三原县境）。赤眉军遂又胜利地进占长安。

二、赤眉军与延岑和邓禹的再次争夺长安

据《后汉书》卷十一、《资治通鉴》卷四十记载：当赤眉军西进、邓禹进占长安后，更始二年起兵于汉中的延岑割据势力，这时也乘长安空虚之机，企图率兵进占长安，经过散关，进驻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郊）。

赤眉军御史大夫樊崇得知延岑重兵屯于杜陵，便命令将军逄安宁兵十万，前去征讨杜陵的延岑。

这时位于云阳的邓禹，获悉赤眉精兵十万又离开长安外出作战，城中只剩老弱残兵，便再次引兵攻入长安城，与赤眉军夜战于城内的槀街。这时赤眉军的后卫部队，将军谢禄所率之大军到达，将邓禹军击败，邓禹遂再次退出长安，至此，刘秀集团的赫赫大将邓禹，与赤眉军两次作战，两次失败，确实不是赤眉起义军的对手，只好退走高陵地区（今陕西省高陵县境）。

延岑本来曾与更始政权的将军柱功侯李宝多次敌对作战，这次于杜陵地区，由于双方共同以赤眉为敌，遂联合抗击逄安军。延岑、李宝军也远远不是赤眉军的对手，虽然他们孤注一掷。决心与赤眉决一死战。但一击之下，便被赤眉战败，延岑战败后，逃出战场，李宝被迫向起义军投降。逄安等人，接受了李宝的投降，以诚相待，但李宝的投降却是一种欺骗。

李宝以假投降骗过起义军的耳目后，即暗中派人与延岑密密商定，只要延岑继续率军前来攻打逄安军，他就在起义军内部里应外合，李宝鼓励延岑说，“子努力还战，吾当于内反之，表里合势，可大破也。”

延岑收集残兵败将，经过整顿，赤眉营中有李宝为内应，镇定了下来，重新向逄安军挑战，逄安等将领以为延岑乃前日败将之军，定不堪一击，故都争欲立功，全部出营与延岑对阵。逄安等与延岑战罢返回营地时，李宝早已将赤眉军的全部旗帜换了下来，而插上了自己的旗帜，赤眉军经过一天的战斗；已经十分疲乏，忽然看到自己营内全部换成了敌人的旗帜，上下都深感震惊，部队立即混乱惊走，这时延岑乘势猛攻而来，起义军更加混乱。“自投川谷，死者十余万”，逄安只率数千将士，脱险返回长安，十多万精兵经此一战，几近被全部歼灭。

第四，赤眉军撤离长安东归与刘秀的对策

赤眉军由今甘肃、宁夏等地返回长安，势力已较前大减，及至杜陵一战，十万精兵被歼，又极大地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这时三辅地区又遇上大饥荒。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

郭皆空，白骨蔽野”。各地的豪强地主，聚众以为营垒，坚壁清野，以断绝长安的粮食供应，来困扰赤眉军。赤眉军无计可施，只得第二次被迫做出撤离长安的决定，东归关东地区。于是，赤眉军于建武二年（公元26年），汉光武帝刘秀二年十二月，共二十多万大军离开京师，向东进发。

刘秀集团在平定河北地区和河东、河西。河内等地区的同时，对赤眉军的发展和动向就极为重视，把自己的战略重点转移向赤眉起义军，时时注意寻找战机，消灭这支唯一可以与刘秀争夺天下的武装力量。

刘秀当初派邓禹执行进兵关中，伺机夺取长安的战略行动，由于邓禹军与赤眉军两次作战，两次大败，而没有实现。同时邓禹军对关中遍布各地的大小割据势力，也未能平定，以致造成了“战数不利，归附者日益离散”的不利局面。故刘秀不得不于建武二年（公元26年）十一月召回邓禹，以将军冯异代替邓禹执行抢占关中，消灭赤眉的任务。刘秀对冯异进占关中对抗赤眉军的基本策略和战略作了详细交待。刘秀告诉冯异说：“三辅地区，遭受了王莽更始之乱，又受到赤眉延岑战乱的祸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均遭到严重的损失，无人给他们以任何保障，现在派你去征讨各种叛逆势力，对归附降顺者，把首领集中到长安去，对于他们的部众士卒，则遣送回故乡，从事农业生产，并且要毁掉现有营垒，以免他们又聚众割据。”同时还告诉冯异，征伐各种势力，不在于略地屠城，主要在于平定他们的势力，妥善地安托他们。刘秀判明了赤眉军东归的情况后，为更顺利地镇压赤眉军，即对邓禹说：不要与穷寇争锋拼命，赤眉已日渐处于绝境，他们没有粮食，肯定要向东方来，我以饱待饥，以逸待劳，很容易消灭他们，你千万不要轻率与其交战。刘秀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赤眉军，在其进占洛阳后，针对赤眉军东进，采取了以下部署：

（一）破奸将军侯进率军进驻新安地区；

（二）建威将军耿弇率军进驻宜阳地区；

（三）大司马吴汉统率的大军集结于洛阳附近地区。

这样，刘秀集团对赤眉军的东归，便形成了一个南北待击，中间控制强大的机动兵团的极为有利的战略态势。

第五，赤眉刘秀两军作战序列

一、赤眉军

统帅：御史大夫樊崇

幕僚：式侯刘恭

丞相徐宣

左大司马逢安

右大司马谢禄

大司农杨音

卫尉诸葛坎

总兵力：二十四万人左右。

赤眉军的兵力，在第一次撤离长安西进时，还号称百万之师，在西北阳城番须因天降大雪，冻死一些士卒，沿途又散失一些人马，绿林军将领廖湛又带走十八万兵马进军汉中，加之杜陵之战被延岑歼灭十万之众，所以赤眉军兵力锐减至约二十四、五万人。

二、刘秀军
统帅：汉光武帝刘秀
西路军：征西大将军冯异
大司徒邓禹
车骑将军邓弘
兵力：约七万人左右。
南路军：建威大将军耿
破奸将军侯进
洛阳地区机动军：大司马大将军吴汉
建义大将军朱佑
骠骑大将军杜茂
廷尉岑彭
执金吾左将军：贾复
扬化将军：坚镡
偏将军：王霸
骑都尉：刘隆
骑都尉：马武
骑都尉：阴识
兵力：二十余万人。
刘秀军总兵力：约二十六万至三十余万人。

刘秀集团参加崤底战役的总兵力，无确切根据可查。但依据其各部分的实力推算，大致可以得出上述概略数字，邓禹所部，初入关中为两万人，后来虽有较大发展，但几次战败，损失了一些部队，渡过黄河后大概最多也只能拥有三五万人；冯异指挥的魏郡、河内、河南等郡兵马，估计也在四万人左右。东路军及其洛阳地区的机动力量，大致约在二十五万左右。

第六，赤眉刘秀两军作战策划

一、赤眉军

赤眉军建世政权二年（公元25年），汉光武帝刘秀二年九月，赤眉大军返回长安后，形势日趋恶化，南有延岑的重兵，北有刘秀集团的邓禹之军，陇上又有隗嚣的军队，加上三辅地区地主豪强势力的捣乱破坏，屯积粮食，坚壁清野，因而，当即做出了东归的决策。赤眉起义军的御史大夫樊崇，丞相徐宣等认为，刘秀集团正忙于建都洛阳，派兵向周围扩张势力，在中原地区脚跟尚未站稳，所以，赤眉回军关东，遇到的敌对力量很可能不会太大。故作出了以下东归作战策划。

（一）放弃攻击渭北的邓禹军；
（二）不再攻击延岑的部队；
（三）准备打击冯异的西路军；
（四）出函谷关后，仍按入关的路线东进，然后往东南方向发展。

二、刘秀军

刘秀集团根据赤眉军原先的入关进军路线分析，认为赤眉东归也有可能仍经过颍洛之间，于是预先在洛阳、宜阳、新安等地布设了重兵，准备在颍洛地区将赤眉军这股威胁刘秀称帝的最强劲的敌人彻底歼灭，刘秀集团的作战策划如下：

（一）如果赤眉军走西路，即经过灵宝、新安、洛阳之线，则宜阳的建威大将军耿率军驰往新安，与新安驻防军破奸将军侯进部共同攻击赤眉军。

（二）如果赤眉军走南路，即经过弘农郡，走宜阳，则侯进率新安驻军驰往宜阳，与宜阳的耿军共同击灭赤眉军。

（三）位于洛阳的重兵集团由吴汉，朱佑、杜茂、贾复、坚镡、王霸等统率的六军和由骑都尉刘隆、马武、阴识等率领的边境突骑部队，准备向两个方向机动支援。

第七，华阴湖城附近的作战

汉光武帝二年（公元26年），赤眉建世政权二年十二月，赤眉大军离开长安，沿华县、华阴之大道向函谷关进军。

此时刘秀集团的冯异所率之军，也正沿西路向函谷关且战且进，冯异军沿途招降的割据势力有：

割据称雄于渑池地区的霍邬等军；

割据称雄于陕城附近地区的王长等部；

割据于湖城附近地区的惠等部；

割据于华阴附近地区的阳沈等部。

这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由于与刘秀集团阶级利益的一致性，所以冯异军兵锋所至，都纷纷归降，使得冯异军进展顺利，通行无阻地越过了关中门户函谷关，进抵华阴地区。

赤眉军樊崇等接到冯异率汉军到达华阴地区的消息，即派出兵力，进击冯异军，两军交战于华阴附近地区，双方作战达数十次。相持六十多天，互有胜负。这时赤眉军内部发生了刘始等人带领五千多起义军士卒投降冯异军的事件，对赤眉军士气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赤眉军仍在积极准备与冯异军作战。

邓禹奉刘秀之令，被征调东归的过程中，曾数次率领疲惫饥饿之士卒与赤眉交战，均遭失利，于是率领他的车骑将军邓弘等领兵由黄河以北的芮城，渡过黄河，到达黄河南岸的湖城，企图占据崤函地区的有利地势，再与赤眉军较量。邓禹军渡过黄河后正巧与冯异自华阴东撤的部队相遇，而合兵一处。邓禹于是约请冯异共同进击赤眉军。但冯异根据自己与赤眉交战多天的体会，深感赤眉军尚十分强大，还不到决战的时机。因而对邓禹等说：“我与赤眉军交战数十日，虽然俘获了他们一些勇敢善战的将士，但其实力仍然很强大，暂时只能够用恩信诱骗他们，如马上去攻打他们，则很难取胜。现在汉帝已命令各路大军于渑池（今河南省渑池新安一带）挡住了赤眉军由西路东归的去路，命令我率军西进攻击他们，这种两面夹击的战略，必定可以一举击破赤眉军，这是万无一失的决策！”邓禹、邓弘不听冯异的劝阻。邓禹决计向赤眉进攻，命令邓弘军首先向赤眉军进攻。

赤眉起义军御史大夫樊崇、丞相徐宣等人都清楚地知道邓禹军兵疲粮尽、战斗力不高的具体情况，因而在得知邓禹又将率军来攻的消息时，便将一些运粮大车都装上泥土，泥土上面覆盖一层豆类食物，预备引诱敌人抢粮，再乘他们抢粮混乱之机，一举消灭他们。赤眉军布置妥当，便与邓弘军交战，赤眉军与邓弘军激战到午后，伪装战败，向后撤退，丢弃大量运粮车辆，邓弘部卒饥饿难忍，争先恐后地抢运粮车上的

豆子，阵势大乱。赤眉军这时立即返回，进击邓弘军，将邓弘部队打得溃不成军。

冯异、邓禹见邓弘军惨败，冯邓两人即率领兵马前往援救邓弘，与赤眉军交战后，曾一度击退赤眉军，冯异以士卒从早晨战至午后，都很疲乏饥饿。建议邓禹收兵，暂行休整后再与敌人交战。但邓禹却错误地认为，眼看就要战胜赤眉军，断然拒绝冯异的意见，继续向赤眉军进击，结果赤眉军重振军威，大败邓禹冯异军，斩杀邓禹军三千多人，全军崩溃，四散逃命。邓禹只带了二十个骑兵逃回宜阳，冯异丢弃乘马，爬到一个荒山坡上，仅带着几个士卒，逃回营内，收其残兵败将，进行坚壁自守，赤眉起义军取得了华阴和湖城附近作战的第一次胜利。

第八，崤底战役的作战经过

一、崤底战前双方的作战准备

冯异逃回营内之后，虽然遭到惨重失败，但却没有丧失战斗意志，决心重整旗鼓，以与赤眉军再战，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收容邓禹和自己溃散的将士，将他们统统编入自己的部队，加以整顿，很快组成了新的战斗序列。（二）加修营垒，拒绝敌人的挑战，坚壁自守。（三）招降附近营堡之内的割据势力，收编地方武装，补充和扩大部队。冯异经过采取这些措施之后，部队不但恢复了元气，补充上了损失的兵员，而且还扩大了部队的数量，实力有了很大的增强，为崤底战役打下了极为有利的基础。

赤眉起义军于湖城作战胜利后，没有注意招降和收编冯异、邓禹的部队，给了敌人重新收拢集结的机会，同时也没有注意休整自己的部队，备足下次作战的粮食。作战六十多天后，拉着饥饿疲惫的队伍，急急向东方开进，只想早日返回东方，忽略了对前方可能出现的敌人数量及自己的战略策略的研究。这就使赤眉起义军，在缺乏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仓卒进入了预想不到的崤底交战。

二、赤眉军崤底的战败

汉光武建武三年（公元27年），赤眉军刘盆子建世三年闰正月，冯异已完成崤底战役的一切准备工作，他命令一部分部队穿上赤眉军的服装，预先埋伏于有利地势之下，然后派出部队去如期向赤眉军挑战。赤眉军樊崇等于拂晓派出一万余精兵，首先与冯异的先头部队交战，双方展开激烈战斗。冯异军伪装成渐渐抵挡不住赤眉军的攻势，这时冯异却只派出很少量的部队前来支援，造成了赤眉军误认为冯异兵少势弱的错觉，于是，起义军即出动主力部队，全力向冯异军猛攻。

冯异军见赤眉军主力投入作战，也随即将自己的主力展开，迎击赤眉大军。双方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伤亡，战斗持续到午后，赤眉军的攻势逐渐出现减弱的趋势，冯异看到时机成熟，遂命令埋伏附近的部队出击。这些伏兵由于穿着与赤眉军相同的服装，而且又来势汹涌，使赤眉军分不清敌我，阵势立即大乱，纷纷向崤底撤退。冯异随即挥军向崤底进击，逐渐压缩包围圈，将赤眉军男女八万余人于崤底击破俘获，这是赤眉军自杜陵战役以后，第二次最大的失利，遂使崤底战役成为赤眉军彻底失败的前奏。赤眉起义军遭此严重失败后，还剩下十余万兵力，在樊崇等统率下，急忙向东南方疾走。

三、赤眉军的彻底失败

汉光武帝刘秀得知冯异大败赤眉军后，十分欣喜，对冯异大加赞赏，并立即调动重兵堵截围歼赤眉军的剩余部队。当刘秀得知赤眉军向东南疾走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之韩城）的情况后，立即亲率汉军主力大军，也向宜阳疾进，刘秀到达宜阳后，确定了以下的作战部署：

（一）前军：由大司马吴汉统率，全部为刘秀集团的精锐之师。

（二）左军：这是刘秀集团的骁骑部队，由骑都尉刘隆、马武、阴识统率指挥。

（三）右军：由大将军朱佑，扬化将军坚镡，偏将军王霸等统率。

（四）中军：这是由刘秀直接控制的机动部队，包括建威大将军耿、骠骑大将军杜茂、执金吾左将军贾复等部。

刘秀集团将兵力部署妥当之后，即严阵以待，等侯赤眉军的到达。

赤眉起义军在崤底失败后，正向宜阳疾走，突然在前进的路上与刘秀的大军相遇，这时粮尽力竭的起义军，自感没有可能突破刘秀以重兵布成的阵势，如勉强进行战斗，肯定会遭到无谓的伤亡，于是决定向刘秀投降，遂出现了赤眉农民起义军战争史上最令人悲痛的一页。

当时樊崇等派出式侯刘恭为代表，前去刘秀营内谈判投降事宜，《后汉书•刘盆子传》对赤眉军屈辱投降和刘秀以封建统治者镇压农民起义胜利后的傲慢态度，均有较详细的记载。

刘恭见了刘秀说："刘盆子带领百万之众向陛下投降，陛下如何对待他们？"刘秀回答说："可以免除他们的死罪"。于是樊崇与刘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多大臣将军便开始投降，将汉代的传国玺绶、更始的七尺宝剑等交给了刘秀。赤眉军交出了自己的兵甲，堆积起来与雄巍的熊耳山一样高。

第二天，刘秀大军在洛水边上列阵，让刘盆子君臣观看，以向他们示威，刘秀对刘盆子等说："自知当死不了？"接着又以挑战的傲慢态度对樊崇说："你不觉得投降后悔吧？我现在可以让你重新把你的队伍集合起来，咱们正式做一次较量，以便决一胜负，我决不强迫你投降。"樊崇没有答话，但丞相徐宣却奴颜媚骨地说："今日得降，犹去虎口归慈母，诚欢诚喜，无所恨也。"

至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夏，刘秀以樊崇。逢安继续谋反罪，将他们杀害。

崤底战役评述

起兵于王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的赤眉起义军，至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三年（公元27年），经过近十年的英勇奋战，靠农民起义军及其领袖自己的力量，打败了腐败透顶的新莽王朝的反动军队，摧毁了更始刘玄政权，建立了农民起义军为主体的汉政权，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但由于地主豪强势力的反抗，刘秀集团的残酷镇压，于崤底一役，终于最后失败。

崤底战役所以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渲染，冯异也因此而被封为名将，倒不是因为冯异在这次战役中，有什么惊人的指挥艺术，而实质在于借此向所有反抗封建王朝的人们宣告，反抗者必然遭到覆灭的下场。

崤底战役的失败，战场上直接的原因是赤眉起义军上了冯异的诱兵之计，继之又没有侦察清楚刘秀集团布设重兵的动向，导致了一步被动，步步被动，失去了在当时可能取胜的基本条件。

以崤底战役为终结的赤眉的失败，在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上留下了令人心的悲壮的一页。但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在那个时代纯粹的农民起义既获得彻底胜利，又能长期巩固下去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何况赤眉军在夺取政权的前前后后又发生了一系列致命的失误，这就更难避免失败的命运。

赤眉起义军夺取了长安，摧毁了更始王朝，应该说是取得了起义战争的彻底胜利。但这个胜利，却由于它的失误转瞬即逝。

其一、赤眉军占领长安之后，既没有彻底肃清长安城内的反对势力，也没有平定关中地区的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这就使新建立的建世政权，始终处于敌对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名为取了天下，实际上则形成了只有长安孤城一座的孤立局面。关中尚且如此，全国各地的反对势力就更加强大了。

其二、赤眉军没有更高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他们对于先占哪里，后占哪里，对待哪一类敌人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胜敌人之后，又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等等，均没有全局在胸的筹划。而这些问题，对取得任何一次战争的胜利都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在战前慎重决定，在战争中坚持贯彻实行，否则，就会使自己的行动陷入盲目之中，即使取得战争的胜利，也难免带有很大的偶然因素。

其三、赤眉军两次放弃长安的西进和东进，是极其严重的政略和战略错误。赤眉军第一次占领长安，已经摧毁了更始政权，尽管当时的局面相当困难，但总的来讲全局的形势对赤眉政权极为有利，只要能够想方设法，采取得力措施，有可能暂时站稳脚跟，巩固下来。但他们却贸然出走，进入贫穷严寒的甘肃高原，当在甘肃吃尽了饥寒疲惫之苦重回长安之后，又不思在长安长住久安之策，再次放弃长安东归。这除了更加助长了敌人疯狂地反对和扼杀这个政权的气焰之外，也自然会给农民百姓造成极为不良的心理上的影响，无法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一个合法的、稳固政权的基本形象。这样的政权不管打着什么旗号，也难以获取支持自己生存需要的基本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其四、赤眉军只管作战，不搞政权建设，形成无休止的流动状态，他们没有政权建设观念，攻占一地，大军一走，就放弃一地，既使流血牺牲的胜利战果，一次一次地付诸东流，又使自己没有可靠的后方，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几乎无异于典型的流寇主义者。这与刘秀集团首先占领河北，再扩及河内，河东、河南，并且把河北做为刘邦时期对待关中的地位一样地苦心经营，赖以做夺取天下之本，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以上种种因素说明，赤眉军最后终于失败，当属于历史的必然，难以依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秦汉战争史（下）



目录

第一章 西汉对兄弟民族和对外战争总论
第一节 西汉时期各兄弟民族的发展
一、匈奴与北方各族
二、西域各族
三、东南和西南各族
第二节 西汉时期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第三节 各兄弟民族部族国家的军政建设
一、匈奴族
二、东北各族
三、东南和西南各族
四、西域地区各族
第四节 西汉对兄弟民族和对外战争特点
一、渡海与陆路两军协同作战
二、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交互为用
三、联合诸国力量，重点打击匈奴势力
第二章 西汉前期对兄弟民族的战争
第一节 汉匈河南战役
一、汉高祖至汉文帝初年汉匈战和形势的发展
二、河南战役前汉匈的政治形势
三、匈汉双方作战序列
四、河南战役作战经过
五、河南战役后双方的动态
第二节 汉匈平凉战役
一、平凉战役前汉匈形势
二、汉匈两军的作战序列
三、汉匈两军作战策划
四、平凉战役的作战经过
第三节 汉匈云中战役
一、云中战役前汉匈关系的演变
二、汉匈两军作战序列
三、汉匈两军作战策划
四、云中战役的作战经过
五、云中战役后汉匈双方的动向
第三章 西汉中期对兄弟民族的战争
第一节 汉对匈奴马邑伏击战役
一、汉武帝当政初期汉匈双方的战略形势
二、马邑伏击战役的起因
三、汉匈两军作战序列
四、汉匈两军作战策划
五、马邑伏击战役经过
六、马邑战后汉匈双方的动态

第二节 汉对匈奴关市诱敌奇袭战役
一、马邑伏击战役后的汉匈关系
二、汉匈双方作战序列
三、关市战役作战策划和战役经过
四、汉匈双方关市战后的动态
第三节 汉匈雁门战役
一、雁门战役前汉匈双方的战略形势和战略转变
二、雁门战役前汉匈渔阳之战
三、汉匈双方雁门战役作战序列
四、汉匈雁门战役作战经过
第四节 汉匈西河朔方战役
一、西河朔方战役前汉匈双方的基本形势
二、西河朔方地区的战略地位
三、汉匈双方作战序列
四、汉匈双方作战策划
五、西河朔方战役作战经过
六、西河朔方战役后汉匈双方的动态
第五节 西汉奇袭匈奴右贤王庭之作战
一、汉匈双方的基本形势
二、汉匈双方作战序列
三、汉匈两军作战策划
四、汉军奇袭右贤王庭作战经过
五、汉匈双方战后的动态
第六节 汉匈漠南会战
一、漠南会战的起因
二、汉匈双方的作战序列
三、汉匈两军作战策划
四、漠南会战的作战经过
五、汉匈双方漠南会战后的动态
第七节 汉匈河西战役
一、汉匈河西战役前双方的基本战略形势
二、河西战役的起因
三、汉匈两军河西战役作战序列
四、汉匈双方作战策划
五、汉匈河西战役第一次作战经过
六、汉匈河西战役第二次作战
七、汉匈双方战后的动态
第八节 汉匈漠北战役
一、漠北战役前汉匈双方的基本战略形势
二、漠北战役的起因
三、汉匈两军漠北战役作战序列
四、汉匈双方作战策划
五、汉匈漠北战役作战经过
六、汉匈双方漠北战役后的动态

第九节 汉匈浚稽山之战
一、汉匈漠北战役后双方战和形势的发展
二、汉匈浚稽山之战的起因
三、汉匈浚稽山之战作战经过
第十节 汉匈天山战役
一、天山战役前汉匈双方的基本形势
二、天山战役的起因
三、汉匈两军天山战役作战序列
四、汉匈双方作战策划
五、汉匈天山战役作战经过
六、天山战役后汉匈双方动态
第十一节 汉匈余吾水南战役
一、汉匈余吾水南战役的起因
二、汉匈两军作战序列和作战策划
三、汉匈余吾水南战役作战经过
第十二节 汉匈速邪乌燕然山战役
一、汉匈双方的基本形势
二、汉匈速邪乌燕然山战役的起因
三、汉匈两军作战序列
四、汉匈两军作战策划
五、汉匈速邪乌燕然山战役作战经过
六、汉匈双方燕然山之战后的动态
第十三节 西汉中期
一、西汉时期西域的概况
二、西汉中期通使西域的斗争
三、汉攻鄯善（楼兰）、姑师（车师）之战
四、西汉进击大宛国之战
五、汉匈争夺乌孙的斗争
六、汉征车师之战
第十四节 西汉中期统一中国南方地区之作战
一、中国南方地区之概况
二、统一闽越地区之作战经过
三、统一南越地区之作战
四、汉统一西南地区之作战
第四章 西汉后期对兄弟民族的战争
第一节 西汉后期的社会状况
第二节 汉袭击匈奴战略纵深的大决战
三、汉军作战序列
四、汉袭击匈奴战略纵深之战作战策划
五、汉袭击匈奴战略纵深作战经过
六、汉匈双方战后的措施
第三节 汉平定羌族部落叛乱的作战
一、诸羌部落势力的发展
二、羌族反动首领的勾结

三、诸羌叛乱的起因
四、汉王朝的调兵遣将
五、汉平定羌族叛乱的作战经过
六、平定羌人叛乱后汉王朝和诸羌的动向
第四节 汉匈郅支战役
一、汉匈双方基本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
二、郅支战役前匈奴的彻底分裂
三、汉匈郅支战役前匈奴五个单于的火并
四、汉匈郅支战役的远因和近因
五、汉匈两军郅支战役作战序列
六、汉匈两军作战策划
七、汉匈郅支战役作战经过
八、郅支战役后汉匈双方的动态
第五节 汉征乌桓之作战
一、汉征乌桓的起因
二、汉征乌桓的经过
第六节 汉使乌孙臣服的斗争
第七节 汉征龟兹之战
一、汉征龟兹的起因
二、汉征龟兹的作战经过
第八节 汉征车师、焉耆之作战
一、汉第一次征车师之战
二、汉第二次征车师之战
三、汉征焉耆之战
第五章 西汉时期的对外战争
第一节 西汉对朝鲜之战
一、朝鲜与西汉王朝的关系
二、汉对朝鲜之战的起因
三、西汉朝鲜两军作战序列
四、西汉朝鲜两军作战策划
五、汉军进攻朝鲜王险城的作战经过
六、汉征朝鲜之战后的措施
第二节 西汉威逼越南臣服的斗争
第三节 西汉通西域罽宾之斗争
第六章 东汉时期总论
第一节 西汉的灭亡和东汉王朝的建立
第二节 东汉王朝的始末
一、东汉王朝前期的兴盛阶段
二、东汉王朝中后期的衰败阶段
三、东汉王朝末年的战乱阶段
第三节 东汉王朝的政权、经济、军事建设及其对战争潜力的影响
二、经济建设
三、军事建设
四、对战争潜力的影响

第四节 东汉时期的重要战争梗概
一、东汉王朝的统一战争
二、东汉时期对兄弟民族和对外战争
三、东汉末期的农民起义战争
第五节 东汉时期的战争特点和杰出将帅
一、东汉时期的战争特点
二、东汉时期的杰出将帅
第七章 东汉建立初期统一东方地区的战争
第一节 东汉政权建立前后的战略形势
一、刘秀集团的急剧发展
二、更始主朝的危难处境
三、赤眉军的向西进军
第二节 刘秀更始洛阳战役
一、洛阳战役前刘秀更始两军的态势
二、刘秀更始两军的作战序列
三、刘秀更始双方作战策划
四、刘秀更始洛阳战役的作战经过
五、洛阳战役后刘秀集团的动向
第三节 刘秀平定刘永之睢阳战役
一、睢阳战役前刘秀，刘永双方的基本形势
二、刘秀，刘永两军作战序列
三、睢阳战役作战经过
第四节 刘秀平定董宪之昌虑战役
一、董宪割据势力的兴起
二、刘秀平定董宪之昌虑战役作战经过
第五节 刘秀平定张步之临淄战役
一、张步割据势力的形成
二、临淄战役前刘秀军的动向
三、刘秀张步军双方作战序列
四、刘秀张步军双方作战策划
五、刘秀张步军临淄战役作战经过
第八章 东汉建立初期统一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战争
第一节 刘秀击灭彭宠之战
一、彭宠割据势力的形成
二、彭宠割据后东北地区的战略形势
三、刘秀击灭彭宠之战的作战经过
第二节 刘秀平定隗嚣之陇坻战役
一、隗嚣割据势力的壮大
二、隗嚣与刘秀之间明争暗斗关系的演变
三、刘秀隗嚣陇坻战役双方作战序列
四、刘秀隗嚣两军作战策划
五、陇坻战役的作战经过
第三节 刘秀平定隗嚣之略阳战役
一、略阳战役前刘秀隗嚣双方的战略形势

二、略阳战役前刘秀隗嚣两军的较量
三、刘秀隗嚣两军的作战序列
四、刘秀隗嚣两军作战策划
五、刘秀隗嚣略阳战役作战经过
六、刘秀隗嚣双方战后的动态
第四节 刘秀平定隗嚣之落门战役
一、落门战役前刘秀隗嚣双方的战略态势
二、刘秀军的调兵遣将
三、刘秀隗嚣落门战役双方作战序列
四、刘秀隗嚣落门战役作战经过
五、刘秀隗嚣双方落门战役后的形势
第五节 刘秀平定卢芳之作战
一、卢芳割据势力的兴起
二、刘秀平定卢劳的作战经过
第九章 东汉建立初期统一南方和西南地区的战争
第一节 汉军平定董邓奉之战
一、董邓奉之叛汉
二、刘秀的调兵遣将
三、汉平定董邓奉的作战经过
第二节 汉军平定延岑秦丰之战
一、延岑秦丰割据势力的崛起
二、平定延岑秦丰的作战经过
三、汉军平定延岑秦丰后的动向
第三节 汉军平定李宪之战
第四节 汉军平定公孙述之夷陵战役
一、公孙述割据势力的形成
二、汉军公孙述军夷陵战役前双方的战略形势
三、汉蜀两军作战序列
四、汉蜀双方作战策划
五、汉蜀夷陵战役的作战经过
六、夷陵战役后汉蜀双方的动向
第五节 汉军平定公孙述之成都会战
一、成都会战前汉蜀双方的基本战略态势
二、汉蜀双方成都会战作战序列
三、汉蜀两军作战策划
四、汉蜀成都会战的作战经过
五、汉军成都会战后的措施
第十章 东汉时期对兄弟民族战争总论
第一节 东汉时期各兄弟民族的发展概况
一、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诸兄弟民族
二、中国南方和西南方地区的诸兄弟民族
三、中国西域地区的兄弟民族
四、中国青藏高原地区的诸羌族
第二节 东汉与兄弟民族战争梗概

一、东汉征西羌诸部族的战争
二、东汉征南蛮和西南夷的战争
三、东汉征匈奴的战争
四、东汉统一西域地区之作战
五、东汉征乌桓鲜卑高句丽之作战
第十一章 东汉征羌人诸部族的作战
第一节 东汉马援军平定先零羌叛乱之战
一、河西羌人叛乱前后的陇西形势
二、先零羌叛乱的再起
三、东汉军平定先零羌叛乱的经过
四、平定武都参狼羌的叛乱
第二节 东汉军连续平定诸羌反汉之作战
一、诸羌不断反汉的基本概况
二、平定参狼羌之战
三、窦固平定烧当羌军之战
四、平定勒姐、吾良、封养诸羌反汉之战
五、平定迷吾羌军之战
六、邓训军进击迷唐羌军之战
七、东汉军再击迷唐之战
八、周鲔率军击降迷唐羌军之战
第三节 东汉军镇压羌族人民的第一次起义之战
一、羌族人民第一次起义的爆发
二、东汉军镇压羌族第一次起义作战连遭挫败
三、虞诩示弱诱歼起义羌军
四、羌族人民的第一次起义的最后失败
五、东汉镇压羌族人民第一次起义后的动向
第四节 东汉军镇压羌族人民的第二次起义之战
二、羌族人民第二次起义的爆发
三、东汉王朝的调兵遣将
四、东汉军镇压羌族起义军的作战经过
第五节 东汉军镇压羌族人民的第三次起义之战
二、东汉军镇压三次羌族起义军作战经过
三、汉王朝镇压羌族人民起义后的动向
第十二章 东汉征南蛮和西南夷的战争
第一节 东汉平定交趾“二征”叛乱之战
一、平定交趾叛乱前汉王朝在南方和西南方的战略形势
二、交趾地区“二征”叛乱的兴起
三、东汉军的作战序列和作战策划
四、平定交趾叛乱的作战经过
五、平定交趾叛乱后的措施
第二节 东汉军平定五陵蛮反汉之战
一、五陵蛮的反汉
二、东汉的再次调兵遣将
三、汉军的作战序列与作战策划

四、围剿武陵蛮的作战经过
五、围剿五溪蛮战后汉军的动向
第三节 东汉军连续镇压南蛮诸部族的反汉之战
一、南蛮诸部族的反汉起因
二、东汉镇压武陵地区诸蛮夷反汉之战经过
第四节 东汉军断续镇压日南等蛮夷反汉之战
一、镇压日南、象林蛮夷
二、镇压长沙、零陵蛮
三、镇压交趾、合浦蛮
第五节 东汉军断续平定南郡巴郡诸蛮夷之战
一、平定南郡蛮
二、镇压板楯蛮夷部族的起义
第六节 东汉军断续平定和镇压西南夷反汉之战
一、平定益州郡诸蛮夷反汉的经过
二、镇压哀牢夷反汉的经过
三、镇压邛都夷反汉的经过
四、平定永昌益州蜀郡诸夷反汉的经过
五、镇压都夷反汉的经过
第十三章 东汉征匈奴的战争
第一节 东汉征北匈奴的第一次战役
一、东汉征北匈奴第一决战役前的汉匈基本形势
二、南匈奴单于的崛起和附汉
三、东汉征北匈奴第一决战役前北匈奴的节节进逼
四、东汉北匈奴两军作战序列
五、汉北匈奴双方作战策划
六、东汉征北匈奴第一次战役作战经过
第二节 东汉征北匈奴的第二次战役
一、东汉第二次征北匈奴战役前汉匈战和形势的变化
二、北匈奴的逐渐衰落
三、东汉征北匈奴第二决战役的起因
四、东汉兴兵前的争议和决策
五、东汉北匈奴两军作战序列
六、东汉匈奴双方作战策划
七、东汉征北匈奴第二次战役作战经过
八、汉匈双方战后的动态
第三节 东汉征南匈奴叛军的满夷谷战役
一、南匈奴内部的分裂
二、满夷谷战役的起因
三、东汉匈奴两军作战序列
四、东汉匈奴满夷谷战役作战经过
第四节 东汉征南匈奴单于檀虎泽之战
一、南单于檀叛汉前匈奴的基本形势
二、南单于的反叛
三、东汉南匈奴两军作战序列

四、东汉征南匈奴虎泽之战的经过
五、汉南匈奴虎泽战争后的动向
第五节 东汉征南匈奴叛军的马邑战役
一、马邑战役前汉北方和南匈奴的基本战略形势
二、南匈奴左部军的叛汉
三、汉匈两军作战序列
四、东汉征南匈奴马邑战役经过
第十四章 东汉统一西域地区之作战
第一节 西域诸图的变迁和东汉统一西域的战略与政略
一、西域诸国的变迁
二、东汉统一西域的战略和政略
第二节 东汉班超威服鄯善
一、班超出使西域前汉匈争夺西域的形势
二、班超威服鄯善的经过
第三节 东汉班超智降于阗王
第四节 东汉班超袭击疏勒之战
一、疏勒的战略地位
二、降服疏勒的经过
三、疏勒态度的变化
第五节 东汉联兵平定莎车龟兹之战
一、平定莎车、龟兹之战前的西域形势
二、东汉平定莎车龟兹的经过
第六节 东汉平定月氏焉耆之战
第七节 东汉安帝及其以后时期再定西域之作战
二、东汉王朝对再次统一西域决策的辩论
三、东汉王朝再次统一西域作战经过
第十五章 东汉征乌桓鲜卑高句丽的战争
第一节 东汉征乌桓之作战
一、乌桓部族的掘起
二、东汉第一次征讨乌桓
三、东汉第二次征讨乌桓
四、东汉第三次征讨乌桓
五、东汉第四次征讨乌桓
六、东汉第五次征讨乌桓
七、东汉第六次征讨乌桓
第二节 东汉征鲜卑之作战
一、鲜卑部族的崛起
二、东汉第一次征辽东鲜卑之战
三、东汉第二次征鲜卑之战
四、东汉第三次征鲜卑之战
五、东汉第四次征鲜卑之战
第三节 东汉征高句丽之作战
一、高句丽的叛汉
二、汉光武帝时与高句丽之战

三、东汉和帝、安帝时期征高句丽
第十六章 东汉末期的社会状况和农民起义
第一节 东汉末期统治阶级的进一步腐朽没落
二、东汉中后期人民群众的连续起义斗争
第二节 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的爆发
一、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兴起
二、黄巾起义军的形成
第十七章 黄巾起义军的战争
第一节 颍川黄巾军与东汉围剿军的作战
一、颍川黄巾军起义后的作战形势
二、东汉王朝的对策
三、黄巾汉军双方作战序列
四、颍川黄巾军与汉军作战经过
第二节 冀州黄巾军与东汉围剿军的作战
一、颍川黄巾军失败后的形势
二、黄巾军汉军双方作战序列
三、冀州黄巾军与东汉围剿军作战经过
第三节 南阳黄巾军与东汉围剿军的作战
一、南阳黄巾军的发展
二、黄巾军东汉双方作战序列
三、南阳黄巾军与东汉军作战经过
第十八章 黑山白波黄巾军起义战争
第一节 黑山白波黄巾军的起义
一、黑山军的起义
二、白波等黄巾军的起义
第二节 黑山黄巾军与东汉围剿军的东光之战
一、公孙瓒阻止青徐黄巾军与黑山军的会合
二、曹操于簇阳和东武阳镇压黑山军的作战经过
第三节 黑山黄巾军与东汉围剿军寿张、鹿肠山之战
一、曹操于寿张地区镇压黄巾军的作战经过
二、袁绍于鹿肠山镇压黄巾军的作战经过
第四节 黑山军的最后失败之战
一、张燕军与公孙瓒的联合
二、黑山军的战败
第五节 五斗米道起义军抗击曹操围剿军之战
一、五斗米道张鲁的起义
二、鲁曹操两军作战序列
三、曹军围攻张鲁军的作战经过

第一章 西汉对兄弟民族和对外战争总论

第一节 西汉时期各兄弟民族的发展

一、匈奴与北方各族

（一）匈奴族居住于我国北方的匈奴部族，相传为夏后氏之苗裔，逐渐繁衍发展起来，始称荤粥，周朝时称硷狁，秦代才称匈奴。中国自秦代形成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之后，匈奴族与汉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和交流进一步加强。西汉王朝建立后，匈奴族与汉族人民得到进一步统一与融合。匈奴部族社会的各方面也和汉族一样，不断向前发展。但匈奴各氏族部落之间经济文化的发展很不平衡，有的部落早已开始使用铁器，在一些匈奴墓葬中，发掘出了当时的铁兵器和铁工具，而有的弱小部落仍很落后，匈奴贵族奴隶主死后，普遍还盛行活人殉葬制度。《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说："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当匈奴奴隶主贵族政权传至头曼单于时，匈奴被秦蒙恬军击败而北迁。头曼单于之子冒顿单于当政后，养精蓄锐，建立和训练了一支强大而威严的骑兵部队，开始向周围扩张势力。它乘秦末战乱、楚汉相争之机，突然向强大的东胡进攻，一击之下，即将东胡彻底灭亡，占领了东胡的全部土地；向西进攻月氏国（游牧于今敦煌、祁连山地区），将月氏部族逼走，向南扩张，兼并了楼烦（今山西东北部地区）和白羊河南王辖地（约今河套和内蒙伊克昭盟地区），威逼西汉王朝边境；向北进攻丁零、鬲昆等部族（约今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成为我国北方最强大的部族，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匈奴有相应的国家机构和下属的各级组织。据《史记·匈奴传》记载，匈奴在单于之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称贤为"屠耆"，又以左为尊，所以常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即左贤王）。其左右骨都侯为异姓大臣，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大当户、骨都侯都是大贵族、大首领，凡二十四长，大者统率军队万余骑，小者数千骑。单于的氏族挛疑氏、呼衍氏、须卜氏等，是匈奴部族中最有势力和显贵的氏族。匈奴贵族为了更有效的统治全国各部族，将其疆域划分为中左右三个部分：单于直接统治中央部分；左屠耆王统治东部地区，右屠耆王统治西部地区。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统治的地区为最大国，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也各设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官员。

匈奴自其祖先淳维至冒顿单于已历经1000多年。冒顿单于经历了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吕后、汉文帝四人当政时期。在汉文帝继位二年后（约公元前174年），冒顿单于死去，其子老上单于继立。汉文帝后元四年（公元前160年），老上单于死，老上子军臣单于继立。军臣单于约在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死去，继之由军臣弟左谷蠡王伊犀斜继立单于。伊犀斜在位十三年后，即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

114年）死去，由其子乌维为单于。匈奴在冒顿单于至乌维单于初立的八十多年间，大部分时间接受了西汉的“和亲”政策，特别是在汉武帝即位的前八年，匈奴对西汉除有时进行一些有限目的的边境袭掠之外，汉匈双方基本上无大的作战行动。汉武帝即位八年以后，汉朝才开始了大规模反击匈奴的作战。

乌维单于在位十年，于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死去，由其子詹师庐继立，由于年幼，称儿单于。儿单于在位三年死，再由其叔父句黎湖单于即位，一年后也死去，其后依次传到且凝侯单于、狐鹿姑单于。这些单于在位期间，均是汉武帝刘彻当政之时，汉匈双方多次大战，匈奴屡遭惨败，元气大伤，远遁大漠以北，无力南侵，西汉王朝也因连年用兵财力耗尽。

汉武帝以后，匈奴又经历了壶衍单于十七年的统治、虚闾权渠单于九年的统治、握衍朐单于三年的统治。后来匈奴内部发生了五个单于（呼韩邪、屠耆、呼揭、车黎、乌维）争夺统治权的战乱，进而形成呼韩邪、郅支两个单于南北分治的局面。到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被北匈奴郅支单于击败后，归降西汉，并在西汉王朝的支援下，战胜了郅支单于，郅支单于被迫西迁，后被西域都护甘延寿所击杀。呼韩邪单于终于统一了全匈奴。这个时期西汉王朝则经历了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的统治。在此时期内，匈奴与西汉王朝之间虽然仍发生过大小规模不等的战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的次数已成递减的趋势。

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以宫女王嫱（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被呼韩邪单于立为宁胡阏氏。自此，匈汉之间近五十多年偃旗息戈，“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匈汉人民之间的交往与融合又有了更加密切的发展。

（二）东北各族

在秦代以前，我国东北地区就居住着众多的兄弟民族，这些民族与中原地区的汉族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到了西汉时期，这种联系得到了新的发展，其中主要的民族为：

鲜卑族，原是东胡的一个部落，东胡在被匈奴冒顿单于灭亡后，逃入鲜卑山区，后来便称为鲜卑族。百姓以畜牧为生，人人善于骑射，性格勇猛强悍。

乌桓，也是东胡的一个部族，冒顿战败东胡后，它便逃入乌丸山，因而得名为乌桓。乌桓人与鲜卑人的风情基本相同，骁勇善战。汉武帝时，乌桓人为摆脱匈奴贵族的压榨，派使向汉朝请求归附，遂迁至当时的辽东、渔阳、右北平、上谷等郡地区。

高句丽，在秦代以前称为“高夷”，居住于今鸭绿江东西地区。汉武帝时期建高句丽县，属玄菟郡，高句丽人以农业为主。至汉元帝建昭二

年（公元前37年），始由朱蒙建立高句丽国。高句丽人本来与汉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但西汉末王莽改制时，高句丽人因反对王莽，王莽派将军严尤征服了高句丽。

夫余，也称扶余、凫臾。西汉时称其所建立的政权为夫余。夫余族居住于今松花江中游，以今吉林农安为中心，南达今辽宁南部，北至黑龙江，以农业为生，出产马、貂、赤玉。它的部落首领称为“马加”、“牛加”等等。西汉时期，夫余人学会了以木棚为城，建立了军队，有严格的法律，规定“杀人者死，没其家人为奴隶”。西汉王朝将夫余划属玄菟郡。

此外还有挹娄、息慎、沃祖等等民族。总的来说，东北地区的各族，与汉族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很少有战争的记载。

二、西域各族

西域就狭义的范围而言，系指今甘肃玉门以西，葱岭也即今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西部诸山脉以东地区。广义上所谓的西域则包括了葱岭以西，亚洲的西部地区。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在汉代以前，分为三十六国，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家多在匈奴以西，乌孙之南，也即玉门以西、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区。这三十六国大的部族国家有国家机构、军队、法律、各级官吏，人口达到几十万；小的也都有部落首领，人口只有几百人。匈奴冒顿单于征服西域后，西域地区诸国便成了匈奴的势力范围，匈奴设立了僮仆都尉，统治西域各族。汉武帝当政后，为了消除匈奴势力利用西域地区，从西面向汉朝侵掠的威胁，便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以便与西汉共同夹击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但大月氏已定居于今阿姆河地区，不想与匈奴为敌。到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再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到达了乌孙，并派其随员访问了位于中亚的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一带）、大厦（今阿富汗）、康居（锡尔河下游一带地区）、大月氏（今阿富汗、苏联阿姆河中游地区）等部族国家。张骞的两次出使，打开了汉族与西域各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对西域地区的进步与发展，起了里程碑式的作用。同时也使西域地区的畜牧、瓜果种植等农牧技术传入了汉族地区。

三、东南和西南各族

秦朝时期，秦始皇曾派大军统一了东南地区，设置了郡县。据《史记·西南夷传》记载：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均为越王勾践之后，秦并天下，设置闽中郡，废除了他们的王号。秦末农民大起义时，无渚和摇率领越人归附番阳令吴芮，参加了诸侯的灭秦战争。楚汉战争中无诸和摇又率领部族归附刘邦。刘邦建国后，西汉王朝先后封无诸为闽越王，建都于东冶（今福建福州），封摇为东海王，建都于东瓯（今浙江温州）。闽越和瓯部族的人民自此起与汉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更加密切。

居于我国南方的南越地区的一些部族，在秦始皇派出的南海尉任嚣死后，即由龙川令赵佗为南海尉。秦灭以后，赵佗即击降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西汉王朝建立后，于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命陆贾出使南越，以赵佗为南越王。吕后当政时，由于“禁南越关市铁器”，激怒了赵佗，他以为是长沙王欲击灭南越而向吕后进言的结果，赵佗逐渐断绝了与汉王朝的关系，自称南越武帝。继而发兵攻击长沙王的边境城邑，并以兵威和财物贿赂闽越、西瓯骆等周边部族，将其并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国土面积东西达万余里，俨然与西汉王朝并立。汉文帝即位后，知道赵佗系赵地真定（今河北正定地区）人，于是派人修整赵佗祖先的坟墓，并予以看守，按岁奉祀，同时封赵佗族弟为官。汉文帝做了这些工作之后，又派陆贾出使南越劝告赵佗免去帝号，赵佗很受感动，于是自废武帝称号，并愿永做汉朝的藩臣。

自秦代以前，我国的西南地区，即现在的云、贵、川等地，就居住着众多的兄弟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后来被统称为“西南夷”。据《史记·西南夷传》记载：在今贵州地区有数十个部族，其中以在遵义和桐梓地区的夜郎为最大国，在今云南东部地区也有数十个部族，其中以昆明一带地区的滇为最大，在今四川凉山一带地区以邛都最大。此外还有徙、冉、都、巂、昆明、白马等部落。这些少数民族和部落不管建立和尚未建立国家，都和其附近地区的汉族人民有着各方面的联系与交流。秦始皇统一西南地区后，建立郡县，更进一步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西汉王朝建立后，特别是汉武帝当政以来，夜郎国等诸部落划为汉属犍为郡，后又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就更加密切了汉族与西南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西汉时期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与中亚、西亚各国的关系汉武帝时期，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和他的随员，除了到达今苏联西南部一些地区和阿富汗之外，还到达了安息（今伊朗），条支（今叙利亚）。西汉王朝和这些国家始终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史书极少见发生战争的记载。

朝鲜早在春秋战国以前，中国与朝鲜便有了友好来往的历史。从战国时期以来，燕、齐等地的人，曾经不断地向朝鲜半岛迁移。据《史记》、《汉书》记载，西汉王朝建立后，燕王卢绾叛汉逃亡匈奴，燕人卫满也率领千余人，东渡水（清川江），逃往朝鲜，后来便被立为朝鲜王，建都于王险城（今朝鲜平壤）。汉惠帝和吕后当政时期，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以“保塞外蛮夷，毋使盗边”。这时，卫满乘势以兵威和财物利诱，降服了其周边一些小城邑，真番、临屯等皆归服于朝鲜，朝鲜领土已扩展至数千里。汉武帝时，西汉王朝曾派兵征伐朝鲜。

越南中国与越南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可追溯到战国以前。秦代以前，越南北部即已建立瓯骆国。秦统一我国南部南越等地时，曾经进攻瓯骆国，后来，赵佗称王时，曾并灭瓯骆国，在现今越南的南北地区建立了一些郡县统治机构。

第三节 各兄弟民族部族国家的军政建设

西汉时期，各兄弟民族有的已经进入奴隶社会，有的尚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发展较快的部族已经建立了国家机构，而一些发展缓慢的部族，尤其是一些弱小部族，有的只有一两个首领，统率整个部落的一切行动。

各兄弟民族部族国家的军政建设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成正比，越是经济发达、文化进步的部族，其政权组织和军事建设越加完备，特别是比较大的部族国家，其军事建设，尤其军队的数量已达到相当可观的规模。

一、匈奴族

如前所述，匈奴的逐渐强大，尤其是它与周边国家连年不断的战争，不但使它具有了比较完善的国家统治机器，而且还设置了层次分明的各级官吏和统兵将校，其单于之下的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通常都是统管一个地区和部落的最高军事与行政长官，平时负责管理自己的地区和部落，战时即为领兵作战的统帅。匈奴自左右贤王至左右当户，大者拥有军队万余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匈奴全国兵力曾达40万精骑，是一支强悍难敌的雄兵。

二、东北各族

我国东北地区的鲜卑族、乌桓、高句丽、夫余等部族，由于较其他许多小部族先进，因而，进入西汉时期之前，即有了国家和军队的基本组织形式。特别是乌桓和鲜卑因系东胡部族的分支，由于东胡长期与匈奴作战，已经有了类似匈奴的较完善的政权组织与相当数量的军队，这些军队也是以骑兵为主体，英勇善战，具有一定的战斗力。

三、东南和西南各族

我国东南与西南地区各族部落如夜郎、滇、邛都、冉、徙、都等，有的也有了政权组织和军队，但这些军队多很弱小。

四、西域地区各族

我国西域地区诸国和西域其它国家，至西汉时期其政权与军事建设也逐步发展。

羌国有450户，1750人，胜兵500人。所用兵器有弓、矛、服刀、剑、甲等等。它西与且末相接，西北可至鄯善。

鄯善国本名楼兰，人口1.4万多，拥兵2912人。它设有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译长等官职。鄯善地处汉通西域之要道，是汉与匈奴争夺的重要地区。

且末国有230户，人口1600，胜兵320人，设有辅国侯、左右将、译长等官职。它北接尉犁、南至小宛、西通精绝。

小宛国有150户，人口1050人，胜兵200人，设辅国侯、左右都尉各一人，它与羌接。

精绝国有480户，人口3360，胜兵500人，设置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等官吏。它南可至戎卢国，西通弥国。

戎卢国有240户，人口1600多，它东与小宛、南与羌、西与渠勒相邻。

弥国有3340户，人口2.4万，胜兵3540人，这是西域较大之国。设有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译长等官吏，它南与渠勒、东北与龟兹、西北与姑墨相接。

渠勒国有310户，人口2170，胜兵300人，它东与戎卢、西与婼羌、北与弥相接。

于阗国有3300户，1.93万人，胜兵2400人，是西域天山以南之较大国。设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君、东西城长、译长等官吏。它南与羌为界，北接姑墨、西通皮山。

皮山国有500户，3500人，胜兵500人。设左右将、左右都尉、骑君、译长等官吏。

乌国有490户，2733人，胜兵740人。它北与子合、蒲犁为界、西与难兜相接。

西夜国有350户，4000人，胜兵1000人，东与皮山、西南与乌桓、北与莎车、西与蒲犁为界。

蒲犁国有650户，5000人，胜兵2000人，设侯、都尉等官吏，它东至莎车、北至疏勒、南与西夜、子合相接。

依耐国有125户，670人，胜兵350人。它北至疏勒650里，南与子合相接。

无雷国有1000户，7000人，胜兵3000人。它南与乌、北与捐毒、西与大月氏相接界。

捐毒国有380户，1100人，胜兵500人，它西北至大宛1030里，北与乌孙接界，西上葱岭则为休循国。

莎车国有2339户，16373人，胜兵3049人，设有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君、设西夜君、都尉、译长等官吏。它西至疏勒560里，西南至蒲犁740里。

疏勒国有1510户，人口18647人，胜兵2000人。设疏勒侯、击胡侯、辅国侯、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君、左右译长等官吏。疏勒国系一重要国家，为向西去大月氏、大宛、康居的必经之地。

尉头国有300户，2300人，胜兵800，设左右都尉、左右骑君等官吏，它南面与疏勒相接，西行1300里可达捐毒。

乌孙国乌孙为我国西域地区的大国，有12万户，人口达到63万，胜兵18.88万人。它设有相、大禄、左右大将、侯、大将、都尉、太监、大吏、舍中、骑君等官吏。乌孙原在祁连山、敦煌间，汉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前后，向西迁移至今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建都于赤谷城。

姑墨国有3500户，2.45万人，胜兵4500人。设姑墨侯、辅国侯、都尉、左右将、左右骑君、译长等官吏。它北与乌孙接，东可以通达龟兹。

温宿国有2200户，8400人，胜兵1500人。设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译长等官吏，西可达尉头国，东可通达姑墨，北至乌孙。

龟兹国有6970户，81317人，胜兵21076人。设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等官吏。另设东西南北部千长各2人，却胡君3人，译长4人。龟兹为南疆地区的大国之一，它南与精绝、东与且末、西南与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相接。

乌垒国110户，1200人，胜兵300人。设城都尉、译长各1人，与乌垒都护府同冶。

渠犁国设城都尉1人，有130户，1480人，胜兵150人。它东北与尉犁、东南与且末、南与精绝相接。

尉犁国有1200户，9600人，胜兵2000人。设击胡侯、击胡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击胡君、译长等官吏。它南面与部善、且末相接。

危须国有700户，4900人，胜兵2000人。设击胡侯、击胡都君、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击胡君、译长等官吏。它西至焉耆100里。

焉耆国为南疆地区较大之国。有4000户，3.21万人，胜兵6000人。

设击胡侯、却胡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左右君、击车师君、归义车师君、击胡都尉、击胡君、译长等官吏。它南至尉犁100里，北与乌孙接界。

乌贪訾离国有41户，221人，胜兵50人。设辅国侯、左右都尉。它东与单桓、南与且弥、西与乌孙接界。

卑陆国有227户，1387人。设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译长等官吏。

卑陆后国有462户，1137人，胜兵350人。设辅国侯、都尉、译长、将等官吏。东与郁立师、北与匈奴、西与劫国、南与车师相接。

郁立师国有190户，1445人，胜兵331人。设辅国侯、左右都尉、译长，它西与卑陆、北与匈奴相接。

单桓国有27户，194人，胜兵45人。设辅国侯、将、左右都尉、译长。

蒲类国有325户，2032人，胜兵799人。设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等官吏。

蒲类后国有100户，1070人，胜兵334人。设辅国侯、将、左右都尉、译长。

西且弥国有332户，1926人，胜兵738人。设西且弥侯、左右将、左右骑君等官吏。

东且弥国有191户，1948人，胜兵572人。设东且弥侯、左右都尉。

劫国有99户，500人，胜兵150人。设辅国侯、都尉、译长。

狐胡国有55户，254人，胜兵45人。设辅国侯，左右都尉。

山国有450户，5000人，胜兵1000人。设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译长等官吏。西至尉犁240里，西北至焉耆160里，西至危须260里，东南与鄯善、且末接。

车师前国有700户，6050人，胜兵1865人。设辅国侯、安国侯、左右将、都尉、归汉都尉、车师君、通善君、乡善君、译长等官吏。

车师后国有595户，4774人，胜兵1890人。设击胡侯、左右将、左右都尉、道民君、译长等官吏。

挑槐国离长安11080里，有700户，5000人，胜兵千人。

休循国有358户，1030人，胜兵480人。它在葱岭以西，离京都长安1.2万多里。

乌戈山离国不属西域都护管辖。离长安1.22万里，大约在今克什米尔以西地区，人口众多，是西域之大国。

安息国不属都护管辖，离长安1.6万里，为今伊朗。汉武帝时曾遣使至安息，安息王命将军率2万骑兵迎汉使于安息国东部边境，其后，安息王又派使者随汉使至西汉参观。

大月氏国不属西域都护管辖，有10万户，40万人，胜兵10万人。它离长安1.06万多里，在今阿姆河中游，大部地区在阿富汗境内。大月氏人本来居住于我国敦煌、祁连山之间的地区，过着随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由于遭到匈奴冒顿单于、老上单于的攻击，被迫西迁。汉文帝初年，月氏的大部分人从敦煌、祁连山之间西迁至塞种地区（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及沿该河流域以西地区）。汉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前后，遭到乌孙攻击，又向西迁移至大夏（今阿姆河上游）。约在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张骞通使西域时，曾到达大月氏。国内分为五个部分，分由五个侯统辖，即休密翎侯、双廉翎侯、贵霜翎侯、肝顿翎侯、高附翎侯。

康居国不属都护，离长安1.23万里，有12万户，60万人，胜兵12万人，设五小王分治。康居国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也即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地区，它东界乌孙、西接奄蔡、南邻大月氏。东南与大宛相接，与西汉王朝有一定的通使往来关系。汉宣帝时期，匈奴五个单于争立，汉拥立呼韩邪单于，引起郅支单于怨恨，杀了汉使者，逃至康居。后来，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兵去康居，将郅支单于诛灭。

大宛国离长安1.2万多里，有6万户，30万人，胜兵6万人。设副王、辅国王各一人。它在今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自张骞通西域后，与汉往来密切。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大宛降汉。

罽宾国不属都护，离长安1.22万里，为今克什米尔地区。它人口众多，是西域地区的大国。

难兜国属于励宾，有5000户，3.1万人，胜兵8000人。它南与羌、北与休循、西与大月氏相接。

第四节 西汉对兄弟民族和对外战争特点

西汉时期对兄弟民族的战争，主要是对我国北方匈奴部族的战争，对外战争则主要为对朝鲜、越南的战争。这些战争所表现的特点，除在本战争史第二册第五卷第一章《西汉时期总论》中已叙述的之外，还有以下几点：

一、渡海与陆路两军协同作战

在西汉以前的战争史上，虽然偶尔有过小规模的海上机动，比如吴越战争中越军统帅范蠡，就曾率军经由海路北上，但史料记载简略，无从考证其兵力和规模。西汉时期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秋，武帝征伐朝鲜即派出海陆两军协同作战，开创我国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的先例。当时一路大军由左将军荀彘统率，经辽东渡过鸭绿江和清川江直抵王险城；一路大军5万人由楼船将军杨仆统率，从今山东半岛之烟台附近海域起渡，于今朝鲜之西海岸登陆，海陆两军约期会攻王险城。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航海技术还处于原始状态，造船技术也很不发达的历史条件下，西汉王朝却以5万大军出渤海、跨黄海，这在船舰的制造、水军的训练、航行中的后方补给和通信联络等方面，古人该是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不要说在那样古老的时代，即使在现代条件下，以原始的木船组织5万军队的渡海登陆作战，也不能不算惊天动地之举，足以令人瞠目结舌。

二、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交互为用

西汉中期以前的对兄弟民族的战争，特别是对匈奴部族的战争，基本上都是重兵集团的进攻作战，很少利用其内部的矛盾分化瓦解，以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到了西汉后期却有了明显的变化，无论对匈奴、诸羌，还是西域和对西南夷等部族的作战，都很注意把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有机地结合起来，化干戈为玉帛。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死后，由于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争权，遂导致匈奴统治集团的分裂，逐渐形成为五个单于争立，后来分裂为南北匈奴。西汉王朝则抓住这种有利时机，全力扶植南匈奴之呼韩邪单于，除了给予其大量的食物和各种物资之外，还破例恢复了自汉武帝以来即中断了的“和亲”政策，将后宫良家女子王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为阏氏，使呼韩邪单于诚心向汉，南匈奴遂统一于西汉王朝的版图之内。汉王朝便集中打击郅支单于的势力，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军远程奔袭，一举将其消灭于郅支城。

西汉后期平定西羌诸部落的叛乱也是运用政治瓦解和军事进击相结合的典范。当时诸羌部落并非全部愿意反叛，主要是受先零羌中最反动势力的裹胁。后将军赵充国奉命率领大军西征，他坚持以攻心为主，孤立先零部落，多方争取、等胁从部落的方针，结果、等部落，纷纷脱离

先零部落的控制，投向赵充国。然后，这些部落的首领自动联合起来，斩杀了先零部落的反动头人，使汉朝以最小的代价，平定了延续数年的羌族叛乱。

三、联合诸国力量，重点打击匈奴势力

匈奴奴隶主统治集团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一贯把西域地区诸国作为它的附庸，特别是车师、鄯善等国更是任其驱使，成为匈奴右部的重要力量。汉王朝为砍断匈奴右臂，便派出使者张骞远出西域，联络素与匈奴有仇的大月氏国，以图与之联兵，前后夹击匈奴。虽然由于大月氏国内情况的变化，没有实现汉武帝的战略企图，但是，却使大月氏、康居、大宛等国与汉朝通好，没有成为匈奴的附庸势力。

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秋，汉王朝应乌孙国之请，为了彻底消灭匈奴奴隶主贵族政权，曾派出五路大军，共16万骑兵深入匈奴战略后方的深远纵深，寻求与匈奴主力军决战。乌孙发全国精锐骑兵的一半5万余人，协同汉军作战。匈奴军见汉军和乌孙军大兵压境，遂向其大后方逃走。这次汉军和乌孙的联合进击，尽管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却开创了一次汉王朝与其他国家大规模联合作战的记录。

第二章 西汉前期对兄弟民族的战争

西汉前期对兄弟民族的战争，主要是指对我国北方匈奴部族的战争。这些战争从汉高祖刘邦七年（公元前200年）起，至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西汉政权在此阶段内，皆为防御战略，经过的主要战役为：

汉匈河南战役发生于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率领大军进袭西汉河南地区，威胁长安，汉以丞相灌婴率领8.5万骑兵迎击匈奴军，匈奴军被击退。

汉匈平凉战役发生于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匈奴老上单于亲率14万骑兵，进袭平凉以北地区，汉文帝部署了近30万大军进行防守，匈奴军经一个多月的袭扰，撤军而去。

汉匈云中战役发生于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军臣单于以6万骑兵进袭云中，上郡地区，汉文帝以周亚夫等军，于长安西北地区进行守备，匈奴军进袭后，自行撤回。

第一节 汉匈河南战役

一、汉高祖至汉文帝初年汉匈战和形势的发展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刘邦自率32万大军，在代地平定韩王信的叛乱，击破了韩王信与匈奴联军后，遂乘胜北进。当刘邦率部分兵马进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地区）后，被匈奴40万骑兵重重围困，七天七夜不能突围，兵疲食尽，危在旦夕。后经重赂单于阏氏，遂与单于订立了和约，单于才撤出围兵的一角，放刘邦军撤走。汉自此以后，常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单于为阏氏，并奉送匈奴大批织锦礼物，以求匈奴保持汉匈之间的和睦关系。本书第二册第四卷对此已有详细论述。

汉惠帝即位三年后，又欲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匈奴冒顿单于。匈奴在冒顿的统治下，早已十分强大。它向东征服了强盛的东胡，尽掠其民众畜产；向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全部夺占了秦代蒙恬所占领的匈奴地区，加之又围困汉高祖于平城，所以，更不把汉惠帝、吕后放在眼里，除了不断袭扰汉边境地带外，并派遣使者致书吕后，书中说：“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愤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看了匈奴的来书大怒，立即召集丞相陈平及樊哙、季布等商议，想杀掉匈奴使者，并发大军征讨匈奴。樊哙说：“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吕后问季布的意见，季布说：“樊哙说这种话，应当斩首！以前陈稀反叛于代地，汉兵32万，樊哙为上将军，当时匈奴围困高帝于平城，樊哙都不能解围。现天下对于平城围困之苦，尚记忆犹新，而樊哙却又要动摇天下，妄言以10万之众横行匈奴，这是欺世之谈。”季布接着劝说吕后道：“匈奴喜怒无常，听到它的好言好语不足为喜，而听到它的恶言恶语也不必为其激怒。”吕后遂放弃了出兵的念头，并给单于写了一封自谦退让的回书，书中说：“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坠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汗。弊邑无罪，宜在见赦。”同时还送给匈奴单于御车、好马。冒顿看了吕后的书信，才稍有收敛，遂同意与汉“和亲”。

但“和亲”和岁奉匈奴大量丝绸、粮食、宝马、美酒等政策，并未完全满足匈奴贵族的掠夺胃口，他们在从汉高祖、惠帝、吕后至汉文帝初期的20多年期间里，虽然没有发动更大规模的南下战争，然而却不时出动一些部队袭扰西汉王朝燕、赵、代等地区边境城邑。吕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六月，匈奴派兵进攻狄道阿阳（今甘肃临洮、天水之间地区）。吕后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再次出兵狄道，掠走2000余人。当时，由于汉宗室诸王争立，吕氏诸王欲谋篡权作乱，再加之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南越武帝，发兵进攻长沙地区，西汉王朝面临内外交困的处境，无力反击匈奴的进逼，只好听任匈奴的袭扰。

二、河南战役前汉匈的政治形势

西汉王朝在惠帝当政7年病故后，由刘邦的皇后吕雉执政了8年，吕后于八年（公元前180年）秋七月，病死于未央宫。吕后既死，诸吕王侯将相，自知非刘氏而王违背了高祖的盟约，深深惧怕为众大臣所诛，因而凭借手中的军政大权和其统率的南北两军欲谋作乱。但事机败露，被众大臣先行诛灭，随即迎立代王刘恒为汉文帝。

汉文帝即位后，即宋昌为卫将军，统率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负责宫廷的警卫事务，并一一封赏诛灭诸吕有功之臣。汉文帝于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三月，立前赵幽王子刘遂为赵王，立刘遂弟刘辟疆为河南王，刘章为城阳王，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刘揖为梁王。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冬十二月，任命太尉颍阴侯灌婴为丞相。西月，淮南王刘长杀死吕后重用宠信的辟阳侯审食其。至此，汉文帝已基本上完成了对内政的整顿治理。但其对内政的整顿不只是分封诸王及赏封功臣，还发布了一系列稳定统治秩序的诏令及发展经济的措施，初步强化了自己的统治。

匈奴冒顿单于于秦末时，射杀其父头曼单于后，自立为单于，冒顿单于由于英勇刚烈，很快战胜了强大的东胡和月氏，向北征服了浑窳、屈射、丁零、隔昆、新等五个小国，从而赢得了匈奴统治阶层的拥护和敬服。冒顿单于以30多万大军围困了兵威正盛的刘邦军后，声威更加强大，周边国家乃至强大的西汉王朝，均不敢与其正面交锋，使匈奴部族国家一时达到鼎盛时期。因而，冒顿单于的统治从秦末一直延续到汉文帝初期。

三、匈汉双方作战序列

汉军

统帅丞相灌婴

总兵力骑兵8万人

匈奴军

统帅右贤王

总兵力估计右贤王亲率大军出征，不会少于5万人

四、河南战役作战经过

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背弃“和亲”之约，派其右贤王率领大军南下，进占了西汉的河南地区（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进而进袭上郡（今陕西绥德地区），抢掠财物，杀戳吏民，大有威胁长安之势。

汉文帝即位后，仍奉行“和亲”政策，在得知匈奴入袭河南、上郡

后，决心调动大军，迎击匈奴军。汉文帝在调兵迎击匈奴右贤王军时，下诏说："汉与匈奴订立和约为兄弟之邦，双方互不侵犯边境，所以汉每岁奉给匈奴丰厚的礼物。现在右贤王率领其部落人马南进，侵占了河南地区，并进一步进入塞地，捕杀吏卒，占据上郡，驱赶那里的百姓，夺占他们的家园，匈奴傲慢无礼，背弃和约。故决定发边吏车骑8万诣高奴（上郡的一个县，约今延安地区），命令丞相灌婴为统帅，前往迎击右贤王。"灌婴按照汉文帝的诏书前往高奴，发边境8万骑兵迎击匈奴军。汉军为了保卫长安的安全，又以中尉材官属卫将军。率军驻防于长安附近。

匈奴右贤王军见汉大军前来，即向北退走，渡过黄河北去。汉文帝遂自甘泉亲往高奴，再转去太原，巡视边境地区，召见故旧功臣，论功赏赐。这时，正逢济北王谋反，文帝即归还长安，命令灌婴罢兵休战。至此，汉文帝首次进行的抗御匈奴的河南战役，宣告结束。

五、河南战役后双方的动态

如上所述，当汉文帝亲至代地，欲率兵抗击匈奴军时，济北王刘兴居即乘机反叛，准备率兵袭取荥阳。待匈奴右贤王军北撤后，汉文帝即下令丞相灌婴罢兵回返。并以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率领四将军，以10万之众前往征讨。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八月，汉军将济北王击破，俘获了济北王刘兴居，刘兴居自杀身死，文帝赦免了与刘兴居一起的反叛者。文帝初期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局面，随之缓解。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冬，屡建战功的丞相灌婴病故。

汉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冒顿单于派兵征服了月氏和西域26国以后，乘战胜之兵威，致书西汉，书中充满了傲慢威胁之词，书中说："前些时候皇帝曾提到和亲之事，我也同意建立合欢之好，但汉边境官吏派兵侵侮右贤王，右贤王没有向我报告，就按照部下的建议，与汉军吏卒相抗衡，以致破坏了汉、匈之约，背离了兄弟之情。以后，我便责令右贤王率兵向西方去进攻月氏。匈奴的吏卒英勇善战，马匹强壮，夷灭了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及其附近的26国也皆为我匈奴大军所占领。这些拥有强大骑兵部队的众多国家，皆归附我匈奴，北方地区全部为我所有。现在我愿意休兵养马，除前事，恢复故约，皇帝假如不愿意让我匈奴大军入塞，那就要告诉你的臣民远离边塞。"汉文帝接到匈奴蔑视和恫吓西汉的来书，立即召集群臣，商议是出兵进击匈奴还是继续"和亲"退让，大臣们一致认为，匈奴新近击灭月氏，兵威正盛，不可击，以"和亲"为上策，汉文帝采纳了大臣们的建议。

第二节 汉匈平凉战役

一、平凉战役前汉匈形势

西汉自汉匈河南战役后，深感匈奴为患的严重性，但由于匈奴力量的强大，西汉自身力量的不足，所以，在一面继续推行“和亲”忍让政策的同时，另一面注意稳定国内的政治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力图富国强兵，并大力加强边境防御力量的建设。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匈奴派兵袭狄道，文帝太子家令晁错数次上书，对加强边境建设和抗击匈奴的战略措施，提出了全面的建议。这些建议，成为西汉文帝时期富国强兵抗击匈奴的重要决策，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强调发展社会经济，充实边疆地区的财富晁错力主轻税敛、广蓄积、薄贷息，充实府库仓廪，从多方面积累国家的财富。要以农业为本，更多地开垦土地山泽、兴修水利，使地尽其力，民尽其劳。对边境地区的百姓要积累起够五年吃的粮食，再向郡县交纳粮租，郡县只要够一年以上的支出，可免收农民税租。这样民心稳定，民愈勤，则愈富。

二、根据匈奴来去无定的特点，迁移内地百姓，充实边境地区晁错认为，匈奴以游牧为生，时至时去，他们游猎于塞下，见我兵少，则乘机进袭，我如不发兵救援，边民则会绝望，而产生降敌之心，若发兵救援，兵少难以御敌，发重兵则需要相当长的调集时间，大军一至，匈奴又会逸去。大军常驻边境，耗费巨大，只好撤兵，如此往复，国家负担不了。为此，晁错建议要大量迁徙内地居民前往边境地区安居。为使居民愿意并安心在边境定居，应给予一定的优惠，给他们建家室、置器物，赡养老弱，医治疾病，使人人乐居边境，不思故乡，这样则可以免除边防屯戍之事。晁错还亲自相劝亲朋好友前往边境。

三、改革边塞吏卒轮换制度晁错认为，守边吏卒，从全国各地征募而来，一年就要更换一次，不但耗费征集费用，而且时间太短，士卒不熟悉匈奴军队的情况，很不利于作战。因此，不如选择一些百姓，迁往边境，国家分给他们家室田地，为他们修筑高城深堑。要害的地区，重要的通道，要建立起不少于千家万户的城邑，一遇战争，塞下之民，城邑相救，父子相保，自可抵御匈奴的进袭。

四、从论证汉匈两国军队的长短中，提出了以夷攻夷的战略晁错认为，匈奴的地形、军队的技能均与汉不同。穿山涉涧，且驰且射，汉之马匹与射术不如匈奴；风雨袭扰、饥渴疲劳，汉之士卒也不如匈奴，这是匈奴的长处。如若平原作战，轻车突骑，匈奴定被冲乱；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匈奴之弓难以与汉匹敌；坚甲利刃，长短兵器相杂，游弩机动，什伍俱前，匈奴兵无法抵挡；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匈奴的革甲不能抗御；离马下地格斗，汉军戟剑相接，去就相薄，匈奴也必战败。如若汉军以胡人编成军队，用坚甲弩衣强弓利矢和边郡的良马武装他们，

令得力将领加以统率，遇匈奴顽抗，以胡骑冲杀，平坦地区，则以车骑材官出战，两军相辅相成，各用他们的长处，定会制服匈奴。

五、建议精选良将晁错根据兵法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兵的道理，认为必须要慎重选择安边境立功名的良将。

六、建议严守用兵之道，认真训练士卒晁错认为：用兵之道要一得地形，二是卒能服习，三是器用利。步兵、车骑、弓弩、戟、矛、剑等，要各得其宜，否则十不能当一；士卒不选练、不习服、不严格遵照将令行动，百不能当十；士卒不能熟练地使用武器和武器不坚利，似如空手；甲不坚密，如同袒露身躯，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全族同，此是将不知兵之祸，五不当一。

汉文帝对晁错这些建议的实行，使西汉国力日渐强盛，增强了与匈奴交战的实力。

匈奴冒顿单于于汉文帝六年死去，由冒顿之子稽粥单于即位为新单于，号称老上单于。在老上单于新立不久，汉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并派使者燕人中行说送公主前往匈奴“和亲”。中行说不愿出使匈奴，汉耕廷强行命其前去，中行说到达匈奴后，即投降了匈奴。中行说投降匈奴后，为匈奴进袭西汉出谋划策，挑动匈汉关系，鼓动匈奴进兵，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

当初，匈奴统治阶层都很喜爱汉的丝绸食物等。中行说则教唆匈奴统治者说：“全匈奴的人口不及汉的一个郡多，然匈奴所以强大，主要是有自己的衣食，无需仰仗于汉。现在单于喜爱汉朝的物质，汉朝不过拿出一点点东西，则匈奴就会失去斗志，尽归于汉。同时，穿上汉朝的丝绸衣物，在草原丛林中穿行，很快就会撕裂，远远不如匈奴皮衣坚固耐穿。汉朝送来的食物也应该不要，它也不如匈奴的酪味美。”

汉使至匈奴送书，如若以一尺一寸大，中行说则教单于必长一尺二寸，连印封都要超过汉的印封。中行说并告诉单于回信要签署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汉使每至匈奴，中行说往往当众训斥汉使，并警告汉使，从今以后所送丝绸、食物必须尽善尽美，否则待到秋季，匈奴就要出动劲骑，踏平汉的稼穑。匈奴在中行说的教唆之下，常伺机南犯。

二、汉匈两军的作战序列

汉军

中尉周舍

郎中令张武

兵力车千乘，骑兵10万

上郡将军卢卿

北地将军魏遬

陇西将军周灶

兵力每郡万人左右

机动迎击部队

大将军张相如

前将军董赤

将军栾布

兵力史无记载，估计骑兵10万左右

匈奴军

统帅老上稽粥单于

将领估计右贤王以下诸将皆出动

兵力骑兵14万人

三、汉匈两军作战策划

汉军得知匈奴军进袭，突骑直下，威胁京师长安。因而，为确保京师的安全，以重兵守住长安附近地区，并相应加强北方的防卫力量，并以较为强大的机动部队，迎击匈奴。汉军的企图，仍以赶走匈奴为其基本作战目的。

匈奴军由老上稽粥单于亲自统率，出动14万大军，意在进袭北方边境各郡，似有全面破坏汉王朝加强边防地区建设的企图，没有攻取长安的计划。

四、平凉战役的作战经过

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匈奴单于亲率14万大军，渡过河水南进，攻入北地郡，进占了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杀北地郡都尉孙印（北地郡治在今甘肃庆阳西北的马岭），掠获当地百姓人畜众多。匈奴兵乘胜向东疾进，进占了彭阳（今甘肃镇原东）。与此同时，匈奴派兵奇袭回中宫（今固原），匈奴的骑兵侦察人员进入了雍地（今陕西风翔地区）和甘泉（今陕西淳化

境）。匈奴军的进袭，造成了从北面和西面直逼长安的危急局面。

匈奴军步步进逼的形势，震撼了西汉王朝，汉文帝紧急部署兵力以抗击匈奴军的进攻。

为确保京师长安的安全，以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兵10万，驻兵于长安近郊，以阻上匈奴进攻长安。

为增强上郡、北地、陇西等郡的防御力量，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遬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命他们各统率上述诸郡兵马抗御匈奴军。

老上单于带领大军在塞内所占地区内掠夺一个多月，见汉军已至，便撤军出塞。汉大军将匈奴逐出塞外，再未前进，即撤回军队。至此，汉匈之间的平凉战役即告结束，这是汉文帝即位以来，第二次抗御匈奴军南侵的作战。

第三节 汉匈云中战役

一、云中战役前汉匈关系的演变

汉匈平凉战役后，匈奴老上单于更加骄横，几乎年年都派兵入袭汉边境地区，杀掠人民畜产甚多，其中受害最大的是云中、辽东、代郡等地，每郡被杀和掠走均达万余人。西汉王朝深感不安，不得不又遣使致书匈奴。

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在致匈奴求和书中除了重申汉匈应和好相处，保证边境地区人民生活安全以外，特别指出要捐弃前怨，修百世之好。书中说："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朕与单于皆捐往细故，俱蹈大道，坠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元元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来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释逃虏民，单于无言章尼等。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无食言。单于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后，汉过不先，单于其察之。"

老上单于同意汉文帝来书"和亲"的建议，并复信给汉文帝。汉文帝接到单于回书后，即下诏说，匈奴已决定与汉"和亲"，匈奴勿入塞，汉无出塞，有违犯命令者杀之。

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老上稽粥单于病故，由其子军臣单于即位。军臣单于继立后，汉文帝继续与匈奴执行"和亲"之约。燕人中行说，此时仍旧侍奉单于。军臣单于即按中行说的建议与汉绝"和亲"之约，开始了新的南进战争。

二、汉匈两军作战序列

汉军

车骑将军令免

将军苏意

将军张武

将军周亚夫

将军刘礼

将军徐厉

兵力无确切数字可考，估计总兵力10万

人左右

匈奴军

匈奴军将领失考

兵力6万骑兵

三、汉匈两军作战策划

汉文帝得知匈奴军入袭云中、上郡的情况后，因无力歼灭匈奴军，仍以层层阻其深入为作战目的，并防止匈奴军攻入长安，据此而部署了汉军的兵力。

匈奴军此次只出动6万骑兵，远较上次平凉战役兵力为小，其主要作战企图，似仍为破坏云中、上郡的边境建设，进行有限目的的袭扰。

四、云中战役的作战经过

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冬，匈奴军共以6万骑兵，兵分两路，每路3万人，进袭云中郡（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托克托一带地区）和上郡地区。匈奴骑兵进入代地句注边境，杀掠吏卒人民众多，边境告急的烽火一直通达甘泉、长安，西汉王朝紧急调集兵力，组织力量，迎击匈奴，保卫边塞和长安地区。

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驰往飞狐（今河北涞源北）；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率军进至代地防守句注（今山西代县以西和以北地区）；以将军张武率军加强北地郡的防御力量，防止匈奴军由西北方向长安地区的进袭；以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率军驻守于细柳（今陕西西安西北）；宗正刘礼为将军，率军驻守于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率军驻守于棘门。

汉军经过几个月的兵力调动，行军机动，始到达边境地区，匈奴军见汉援兵到达，随即撤走。云中战役，匈奴双方未做大的较量，即告结束。

五、云中战役后汉匈双方的动向

汉军见匈奴军撤走，也罢兵。汉文帝于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夏，在其执政23年后病故。汉文帝死后，由其太子汉景帝刘启即位。赵王刘遂乘文帝死景帝新立之机，秘密派遣使者至匈奴，商定在吴楚七国起兵之时，与匈奴合兵共同进攻汉朝。后来，汉军粉碎了赵王的叛乱，匈奴兵才未大举入塞。

景帝当政，由于实力的不足，仍继续执行前代的“和亲”政策。景帝

前元二年、三年连续两次派使至匈奴“和亲”。至前元五年（公元前152年）夏，又遣公主嫁与匈奴单于，成为汉代以真公主嫁与匈奴的先例。景帝当政期间，由于发生了七王的叛乱，所以，更注意治理国内的问题，对匈奴更加亲善，以积蓄力量，充实国防，待将来再与匈奴作战。

因此，匈奴于景帝在位时期，一直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南侵。只有一些中小规模的边境袭扰。据《汉书》记载，匈奴军于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春二月，入袭燕地。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六月，匈奴为劫掠和破坏西汉边境马苑，进袭雁门（今山西右玉），武泉（今内蒙古武川）、上郡等地区，吏卒战死者达2000人。汉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春，匈奴再次派兵进袭雁门，太守冯敬战死，汉王朝急调车骑材官前往增援，遂渐渐将长城以内统治区的力量增强起来。汉景帝于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春，在其当政16年病故。至此，西汉前期抗御匈奴进袭的作战，至汉景帝末年，已告结束。

曾经在细柳屯兵防备匈奴，又在平定七王之乱中立下卓著功勋的名将周亚夫，由于被人挑唆，在当了汉景帝数年的丞相之后，竟被汉景帝革职，不久，便被人以购买给皇帝做棺材的木材之诬告而下狱，廷尉给周亚夫加上了“谋反”的罪名。周亚夫争辩说：“我家所买的是准备给我做棺材的木料，并非谋反”。狱吏则说：“你纵然不在人间反，你去阴间也要谋反。”。周亚夫悲愤至极，绝食“呕血而死”。文帝、景帝以来唯一的一位名将，就这样含冤而终。

西汉前期抗御匈奴作战评述

西汉前期抗御匈奴的战争，始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止于汉景帝末（公元前141年）。在这60年的时间里，居住于我国北方的匈奴部族，经过了由冒顿单于当政的最强大的时期。冒顿单于英勇善战，匈奴军骠悍勇敢，依靠其骑兵优越的突击力和机动力，每每向西汉王朝的北方诸郡进袭，几度都曾威胁汉王朝京师长安的安全，使汉王朝完全处于被动防御之势。

汉王朝在此时期之内，采取被动防御的战略，并非怯懦畏敌，而是主客观诸多方面的条件限制了它采取积极的进攻战略。

西汉忙于巩固自己的统一政权，无暇它顾刘邦自建立西汉政权起，就以其主要精力忙于两件大事：一是消灭异姓诸王，剪除他自认为的心腹大患，二是大封刘氏子弟为王，以使他的江山传之于万世。

刘邦死后，代之而起的汉惠帝，匆匆而过。政权落于吕后之手后，以吕后为首的诸吕，整日机关算尽，多方蓄谋篡权作乱。汉文帝、景帝时期，先后发生了诛灭诸吕的斗争，济北王刘兴居叛变，淮南王刘长的谋反，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等事件。这些接连不断的有关西汉政权生死存亡的权力之争，不能不成为西汉统治集团日思夜虑的头等大事，自然没有精力研究其它的战争问题。

缺乏战争必需的经济实力经济是支持战争的物质基础。中国的社会经济在秦代末年已遭到极大的破坏，西汉王朝在取得统一政权之前，又经历了四年半的楚汉战争，更使社会生产受到严重摧残，人民极度贫困，整个社会人口锐减。西汉王朝建立后，既没有进行大规模战争的经济实力，也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刘邦的将相大臣出门只能坐牛车，汉文帝严格规定他的皇后、嫔妃衣不许曳地，帷帐不许刺绣，他的陵墓一律使用瓦器，不得动用金银铜锡作饰物。宫中要修一个露台，约需中等农民十家一年的收入，汉文帝就坚决不让修建。这些都说明西汉前期经济上的艰难程度。因而，西汉王朝在它的前期阶段，不得不力求避免一切战争的发生，恢复生产，厉行节约，充实社会的财富。为达此目的，西汉王朝从汉高祖刘邦起，一直到汉景帝都对匈奴忍辱退让，以“和亲”岁奉匈奴重礼的政策，求得一个安全的环境，甚至对南越的赵佗自立为南越武帝进兵长沙的叛逆行径，也能容忍宽待。

没有进行战略进攻的可用之兵在楚汉战争中，汉军兵力虽曾达到50万至60万的规模，但当时多以车兵和步兵为主，而与匈奴作战，由于匈奴军队全为骑兵，作战地区也多为宽广的草原，浩瀚的沙漠，对汉军来说实在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大转变。这样就使汉军的车骑和步兵远远适应不了与骑兵对阵的作战方式。匈奴骑兵忽来忽往，飘逸不定，穿山越涧十分机动，三天的行程，足够汉军跋涉及月。而且对付这样的骑兵，除了有相当的骑兵之外，还要有一整套的以骑兵对骑兵、或以车兵、步兵对付骑兵的战略战术。但这些都非一朝一日之功，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建设。这就迫使西汉王朝只能在漫长的战略防御时期中，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否则，势将难以适应这种巨大的战略转变。

缺乏能征惯战的将帅之才刘邦在楚汉战争期间，谋臣战将云集，可谓人才济济，文韬武略，皆高出项羽集团一筹。因而，能够从小到大，摆脱劣势，战胜了强大的对手项羽。但刘邦取得胜利后，连续诛杀功臣，勇略智谋之士已认清刘邦、吕后等人妒贤忌能的本质，赤心为西汉效忠之人，已心灰意冷。韩信的诛灭，彭越被杀，萧何的下狱，汉景帝时期政治家晁错的被害，将军周亚夫的含冤而死，无疑都给当时将相大臣以心理上的巨大威胁和打击。因而，在西汉前期这60多年中，除了刘邦时期几位老将之外，再没有出现过象样的将帅人物。即是有千军万马，而没有统帅之才，要想获得战争胜利，也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第三章 西汉中期对兄弟民族的战争

西汉中期对兄弟民族的战争，仍然是以对我国北方的匈奴部族战争为主，其次为对西南和西域地区的战争。这个时期的战争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起，至汉武帝末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止。西汉王朝在此阶段内，一反过去战略防御的被动地位，而变为积极的战略进攻，经过的主要战役如下：

汉对匈奴马邑伏击战役发生于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夏，汉军以30万车骑步兵在马邑地区设伏，消息泄露，匈奴军惊走。

汉对匈奴关市诱敌奇袭战役发生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秋。汉军以4万多骑兵诱击匈奴军，结果汉军失利。

汉匈雁门战役发生于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匈奴以两万骑兵进袭汉辽西和渔阳等郡，汉军以车骑将军卫青率领近5万人迎击匈奴军，汉军获胜，匈奴军败走。

汉匈西河朔方战役发生于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军入袭上谷、渔阳地区，汉军以车骑将军卫青率军5万，对匈奴白羊、楼烦王部进行深远距离的包围迂回，大获全胜，匈奴白羊、楼烦王仅率少数骑兵远逃。

西汉奇袭匈奴右贤王庭之作战发生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前元124年）春。汉以车骑将军卫青为统帅，共10余万骑兵，分为东西两路大军，同时突袭匈奴右贤王和左贤王部。卫青率军急驰600里，于夜间秘密包围了右贤王庭，几乎全歼右贤王军，右贤王仅率护卫精骑逃走。

汉匈漠南会战发生于汉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大将军卫青统率六将军，共10余万骑兵，两次北出定襄，与匈奴7万多骑兵激战，汉军崭杀匈奴军1.9万多人，取得了胜利。

汉匈河西战役共分两次作战。第一次作战发生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三月，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1万多精骑，迂回奔袭1000多里，歼灭匈奴军8900多人。第二次作战发生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夏，汉军以数万骑兵分两个方向作战，主要方向由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骑兵数万人，远距离迂回河西地区，绕至浑邪王和休屠王的背后，一举全歼匈奴军3万多人，获得了巨大胜利。次要方向的博望侯张骞所率领的1.5万骑兵，也取得了一定胜利。

汉匈漠北战役发生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汉军调集骑兵10余万、步兵数十万、预备马匹14万，分编卫青、霍去病两大骑兵集团，各率骑兵5万，两路大军都越过了大沙漠，行进2000多里，与匈奴单于和左贤王军展开激战，歼灭与俘获匈奴军8万多人，汉军获得

了战略决战的巨大胜利。经过此次大战，匈奴军元气大伤，匈奴部族远走漠北，漠南已无匈奴王庭。

汉匈浚稽山之战发生于汉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汉王朝派浚稽将军赵破奴统率2万骑兵，至浚稽山地区接应匈奴左大都尉投降，不料被匈奴单于发觉，匈奴以8万骑兵将汉军全部歼灭。

汉匈天山战役发生于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3万骑兵，在进击匈奴右贤王军取胜后胜利回师时，突然遭遇单于主力军的袭击包围，李广利军损失过半。骑都尉李陵所率5000步骑兵也被匈奴重兵包围，全军溃散，李陵投降了匈奴军。

汉匈余吾水南战役发生于汉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春。汉军出动骑兵7万，步兵14万，以贰师将军李广利军为主力，兵分四路向匈奴进击，匈奴军以10万骑兵迎击汉军于余吾水南岸地区，双方激战十余日，不分胜负，各自撤军。

汉匈速邪乌燕然山战役发生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三月。汉军出动14万大军，分三路向匈奴进袭，欲寻匈奴主力决战。贰师将军李广利统率的7万大军与狐鹿姑单于军激战后，汉军全军覆灭，李广利投降了匈奴，成为汉武帝与匈奴交战以来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西汉中期与匈奴争夺西域地区之作战汉为了统一西域地区，先后发动了进攻鄯善、车师、大宛之战，进行了争夺乌孙的斗争。汉王朝在这些战争中均取得了胜利。

西汉中期统一中国南方地区之作战汉在统一中国北方的同时，也穿插进行了统一中国南方的战争，先后发动了对闽越、南越和西南地区之作战，汉军取得了各次作战的胜利。

第一节 汉对匈奴马邑伏击战役

一、汉武帝当政初期汉匈双方的战略形势

西汉政权的前期阶段，由于经历了秦末战乱、楚汉战争、平定异姓王和同姓诸王的叛乱，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使西汉王朝忙于巩固统一政权，恢复经济生产，无力进行对兄弟民族的战争，尤其对我国北方的匈奴部族，只能采取“和亲”岁奉礼物暂时的忍让政策。这一政策从汉高祖刘邦起，一直延续到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初年。

汉武帝刘彻，幼年勤奋好学，博才多能，具有积极进取的豪爽性格。他16岁即皇帝位后，立即广召贤良忠正之士，多方征询治国安邦之道。《汉书·武帝记》称汉武帝“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以展其宏图大略之志。汉武帝即位后，由于，其前两代君王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生产恢复很快，人口增加，社会财富逐渐丰富，经济卖力日益强大，特别是在边境地区驯养了30万匹战马，极大地增强了西汉的战争潜力，为汉武帝大规模向匈奴用兵准备了雄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反击匈奴贵族掠夺战争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汉武帝遂改变西汉前期阶段消极退让的防御战略，而开始了他长达40多年的战略反攻和进攻作战。

匈奴军臣单于继老上单于当政以后，匈奴的国力进一步加强，疆土更加扩展：当时的呼揭（今新疆北部、苏联斋桑泊、蒙古西部一些地区）、坚昆（今苏联叶尼塞河和鄂毕河流域上游地区），已全为匈奴占有，大宛（苏联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上游）、康居（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地区）也已屈服于匈奴。匈奴在新疆的焉耆、危须、尉犁等地，设僮仆都尉以统治西域诸国。今内蒙古、甘肃、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区的西北和北部，东北的西部也是匈奴部族游牧生活的地区。匈奴的国力正处于极盛时期，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骑兵，有进行战争充足的物资财富，成为西汉王朝最难对付的敌手。

二、马邑伏击战役的起因

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的前6年，仍然继续执行前几代的“和亲”政策，边境没有大的冲突。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军臣单于派使到汉，请求“和亲”。汉武帝召集大臣计议对匈奴是“和亲”还是出兵进击。大行燕人王恢，因多年在边境地区任职，对匈奴的情况比较了解，便说：“汉与匈奴和亲，过不了几年，匈奴即背弃和约向汉进袭，故不应退让，而应出兵进击。”大司农韩安国分析了汉匈双方的具体情况后认为，汉出兵千里而进击匈奴，人困马乏，弊端很多。“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诸大臣大多同意韩安国的意见，于是，汉武帝同意了韩安国的建议，遂与匈奴“和亲”。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县）豪绅聂翁壹，建议王恢上奏汉武帝，乘匈奴新近与汉“和亲”，边境和平亲善，可以利诱击匈奴。汉武帝再次征询大臣们的意见，王恢仍力主进击。但韩安国还是认为现在与匈奴这样的对手作战，对汉不利。我长驱深入，匈奴军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我很难制胜敌人。王恢则坚持主张应与匈奴交战。王恢认为，只要以汉这样强大国力的百分之一而击匈奴，就足可取胜，况且我们是诱敌前来，伏兵突袭，定可成功。汉武帝原本有进击匈奴之意，听了王恢的谏议，便决定出兵诱击匈奴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汉代有名的“马邑之谋”。

三、汉匈两军作战序列

汉军

御史大夫护军将军韩安国

卫尉骁骑将军李广

太仆轻车将军公孙贺

大行将屯将军王恢

太中大夫材官将军李息

总兵力车骑步兵共30万人

匈奴军

统帅军臣单于

总兵力骑兵10余万人

四、汉匈两军作战策划

汉军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统帅，并以骁骑将军李广、轻车将军公孙贺、将屯将军王恢、材官将军李息各率一路大军埋伏于马邑附近之山谷中，待匈奴被诱前来，即行围歼。王恢、李息、李广等部，从代地出击匈奴辎重。汉军谋划，先由聂翁壹逃至匈奴为间，以利诱惑匈奴出兵，为汉军创造歼敌条件。

匈奴军只图趋利，未做应付突然事变准备。

五、马邑伏击战役经过

汉军按预定策划，在马邑周围地区占领有利地势之后，便派聂翁壹前往匈奴。聂翁壹见了匈奴单于之后，对单于说：“吾能斩马邑令丞吏，

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听后，信以为真，答应了聂翁壹。聂翁壹回到马邑后，汉军斩杀了一个死囚犯人，将其人头悬挂于城楼之上，诈称为马邑令丞吏之头，故意让匈奴使者观看，匈奴使者急回报单于说：“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单于闻报，亲率10万骑兵南进，入武州塞（今山西左云县境）。

汉军为使匈奴深信不疑，故意让马邑民众将牛马羊散放于野外。匈奴大军行至距马邑百余里时，即开始掠夺，只见牲畜遍野，而不见有人放牧，军臣单于心中顿起疑团，遂攻取附近的烽火台，俘获武州尉史。尉史怕被匈奴杀死，便招出汉兵设重兵埋伏于马邑的情况，单于听后惊恐，急忙率兵退出塞外。军臣单于退出塞后感慨地说：“吾得尉史，乃天意也。”

汉军见匈奴兵退，急迫至塞。但匈奴军远去，已追赶不上，于是罢兵。这时大行王恢所率的3万多兵马，得悉匈奴兵未与汉军战，即退走。他本应截击匈奴军的辎重，但怕自己碰上匈奴的精锐骑兵，而按兵不动，不敢出击，最后也撤兵而归，汉军以30万大军首次伏击匈奴的战役，以徒劳无功而作罢。

六、马邑战后汉匈双方的动态

汉军以30万大军徒劳无功而结束马邑伏击战役，全军军心皆不悦。汉武帝对于王恢法战怕死十分恼怒，诏令下狱斩首。王恢以千金买通丞相田。田不敢直接向汉武帝为王恢求情，而禀告了太后。太后便将丞相的意思告诉了汉武帝，也求武帝赦了王恢。汉武帝便对太后说：“王恢建议在马邑诱击匈奴大军，我才调动天下30万大军，按王恢的主张办。然而单于察觉率兵撤走，王恢所部应按原计划，截击匈奴军的辎重，一定可以取得相当可观的战果，这样也可以鼓舞将士的斗志。假如不斩杀王恢，无以谢天下。”王恢得知汉武帝不赦免他的消息，即自杀身死。

匈奴军自马邑战后，即不断袭扰汉边境地区，给边境地区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危害。

马邑伏击战役评述

汉武帝于其即位后的8年，也即24岁之时，首次反击匈奴军的作战，使出动30万大军，这一方面反映了血气方刚的汉武帝欲图一举消灭匈奴军雄心勃勃的战略宏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汉武帝对自己对手的强悍骁勇、多谋善断还缺乏基本的了解。事实上，匈奴自冒顿单于、老上稽粥单于、至军臣单于，都是代代英烈之主，他们东征西讨，身经百战，汉武帝依靠一个小小的浅显谋略，就想将匈奴军队一鼓聚歼，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是自然界屡见不鲜的现象。两军交锋，秋毫之末的疏漏，都能危及全局的胜利。一个普通尉史的变节，竟招致

了30万大军空奔劳师一场，这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它生动地告诉人们，一切重大的战略行动，只能限制在最高领导层内掌握，否则便无机密可保。同时它也提示人们，将帅必须有在情况突变时的应急方案，以便适应变化多端的战场形势。

马邑伏击战役，既是汉王朝战略反击的开始，也是西汉王朝进一步统一我国北方地区的重大战略行动，汉武帝为统一我国北方地区进行的对匈奴贵族的作战，无疑是推动我国社会前进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这次战争中，御史大夫韩安国的避战主张并非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正确见解，大行王恢力主消灭匈奴贵族的建议，则是不自觉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要求统一的内在发展规律。

第二节 汉对匈奴关市诱敌奇袭战役

一、马邑伏击战役后的汉匈关系

汉对匈奴的马邑伏击战役，因一小尉史的泄密，而没有取得任何战果。自此，汉匈关系日趋恶化，匈奴军队常常袭掠边境各州郡。汉王朝也在继续寻找进兵匈奴的机会。尽管关系紧张，但双方边境城邑的互通贸易仍然投有中断。匈奴部族的吏民对西汉的丝绸织绵、美酒食物等等物质尤其喜爱。当时的主要关市为上谷、代郡、雁门、云中等城邑，西汉王朝遂想利用各关市通商的机会，引诱匈奴军前来，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消灭匈奴军。

二、汉匈双方作战序列

汉军

车骑将军卫青

骑将军公孙敖

轻车将军公孙贺

骁骑将军李广

总兵力骑兵4万人

匈奴军

匈奴军无资料可考

三、关市战役作战策划和战役经过

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军队进掠上谷地区，杀掠吏民。汉军经过策划，决定由四位将军各率骑兵1万，奇袭云中、雁门、代郡、上谷等关市之匈奴军。

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今河北怀来），并乘胜追击，击破匈奴之龙城，斩杀敌人700而还。

骑将军公孙敖出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被匈奴军击败，士卒被歼灭7000人。

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今山西右玉县南），李广军因大大劣势于匈奴军，被匈奴军击败，几乎陷于全军被歼的境地。匈奴军深知李广英武善战，骁勇异常，一向是匈奴军的强劲对手，便想活捉李广，于是下令

凡捉住李广者给予重赏。李广因负伤被俘，匈奴军以两匹马用绳子连接成一个绳网睡床，让李广卧于床上。李广伪装成伤重垂死的样子，麻痹了匈奴军，走了一段路程之后，李广乘看守人不备，将身旁一个骑着良马的匈奴士兵猛推下马，夺了他的弓箭，飞身上马，加鞭向南急驰，飞奔途中遇见了自己溃散的部队，匈奴军几百骑兵追至，李广以准确有力的利箭射杀了一些匈奴兵，匈奴兵才未敢穷追到底。李广等人终于脱险而归。

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未取得任何战果而收兵。

这样，汉军策划的关市诱敌奇袭作战，终于以一路小胜、一路无功和两路大败而结束。

四、汉匈双方关市战后的动态

汉武帝在关市作战中所派遣的四位将领，李广、公孙敖、公孙贺都曾多次与匈奴作战，尤其是李广，颇有威镇匈奴的雄风。只有卫青是第一次率大军出征。因此，汉武帝对关市诱敌奇袭作战的失利很不满意，除了赐给卫青以关内侯的爵位外，下诏申斥了李广和公孙敖，将他们二人下廷尉治罪。但对于跟随他们打了败仗的吏卒则不予追究。

匈奴在关市作战后，更加不断地向汉边境地区进攻，杀掠无度，汉匈边境局势日益紧张，由此，我国北方地区正酝酿着新的大战。

第三节 汉匈雁门战役

一、雁门战役前汉匈双方的战略形势和战略转变

汉匈继关市之战后，双方都在积极准备应付新的交战。汉王朝似已从近距离的边境作战中认识到，要想制服匈奴，进一步统一北方，消除北方的战乱，必须寻歼匈奴军的主力。因而，汉王朝除在一些次要地区重点防守之外，逐渐将其骑兵部队集中进行远程的进攻作战，汉王朝这种战略思想的转变，有其相当成熟的客观基础：一方面是西汉社会生产的稳步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另一方面是自文景以来边境建设的方针政策逐渐取得显著成果，使边境地区日益巩固繁荣；同时，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西汉政权到汉武帝刘彻当政时，已无内部的权力争斗。内部的这种安定局面的出现，就为汉武帝全力进行统一战争，创造了极为有力的条件。

匈奴对于西汉边境地区建设的发展与守备力量的增强，也深为不安。匈奴为保障其阴山山脉及其以北地区的安全，不断对阴山当面上谷、渔阳、代郡、雁门等地袭扰掠夺。

二、雁门战役前汉匈渔阳之战

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冬，匈奴以数千骑兵袭扰汉边境，尤其以对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的袭掠更为严重，汉王朝急令将军韩安国屯兵渔阳，以防备匈奴的再次袭掠。

三、汉匈双方雁门战役作战序列

汉军

统帅车骑将军卫青

将领将军李息

材官将军韩安国

兵力3万至5万人

匈奴军

将领无资料可考

兵力2万余骑兵

四、汉匈雁门战役作战经过

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匈奴以2万骑兵进袭汉东北边境之辽西地区和渔阳郡，匈奴军杀辽西太守，劫走2000多人。

这时将军韩安国奉命屯兵渔阳。匈奴军大败渔阳太守军1000余人，接着将韩安国包围，后幸亏燕地的救兵赶到，围攻韩安国的一路匈奴军撤军而去。匈奴军接着攻入雁门郡，杀掠千余人。

于是，汉武帝命将军卫青统率3万骑兵出雁门，李息率领部队（人数失考，估计为1万至2万人——著者）出代郡。卫青经过与匈奴军的交战，斩获匈奴军数千人，匈奴军败走，卫青率军胜利而归。

第四节 汉匈西河朔方战役

一、西河朔方战役前汉匈双方的基本形势

汉匈自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的雁门战役后，双方都在策划新的作战行动，我国北方地区正孕育着新的大规模的战争。

西汉在雁门战役中，卫青军斩获敌数千人，这是汉武帝与匈奴军作战以来，取得的首次较大的胜利，也是青年将军卫青率兵出征的第二次胜利。这一胜利，有利于稳定西汉王朝在北部边境的态势，增强了西汉王朝进一步向匈奴主动进击的战略决心。同时，对汉王朝的军心士气也有一定的鼓舞作用。从此，卫青便以汉武帝时期抗匈主将的显赫地位，担负起汉军作战统帅的重任。

雁门战役后，匈奴的中部及左部在西起雁门、代郡，东至上谷，渔阳的漫长汉边境地带上，不断寻找薄弱地区进行袭扰。

二、西河朔方地区的战略地位

西河郡的一部和朔方郡一带，亦即河南地区，为今宁夏河套和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它北靠阴山山脉，南距西汉京都长安400多公里，约相当于骑兵快速机动两昼夜的行程。它的东面是云中，定襄郡，西北和西面为今狼山、贺兰山山脉，水草丰盛，沃野千里，是匈奴右部河南、白羊王所部的重要游牧生活地区之一。秦朝名将蒙恬在击败匈奴后，曾在这个地区设立城塞，匈奴虽日夜想夺回此地，但由于惧怕蒙恬的军威，一度不得不远避。到秦朝末年和楚汉战争期间，匈奴乘中原战起，又重新占领了河南地区。从西汉政权建立以来，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初期，匈奴均牢牢地占领着该地。

当西汉决定建都之际，娄敬、张良均力主刘邦建都于长安。当然，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长安地处关中平原，为“四塞之地”，但距匈奴占领的河南地区太近，不能不是一大缺陷，每次匈奴由此袭边，都给长安造成重大威胁。因而，扫除河南地区的匈奴势力，已成西汉王朝的首要战略任务，否则，京师长安便永无宁静之日。

三、汉匈双方作战序列

汉军

统帅卫青

将军李息

兵力约5万人左右

匈奴军

将领白羊王

楼烦王

兵力估计河南地区兵力较少，渔阳地区在5万人左右（具体数字失考）

四、汉匈双方作战策划

汉军汉军的作战在两个方向进行：一个方向为东北边境的渔阳、右北平郡，汉军以少数兵力采取守势行动。这个地区距西汉京师长安遥远，胜利和失败对西汉王朝的安危并无直接关系，另二个方向为西河、朔方地区，这个方向因为长期以来对汉京师威胁很大，因而，集中骑兵部队，乘匈奴在东北边境作战之机，进行突然进袭，一举扫除河南地区的边患。

匈奴匈奴军在西河，朔方战役前，似乎并未发现汉军的企图，因而，其作战的重点，仍然放在西汉的东北边境地区，以自己的左部兵力，于西汉防御兵力薄弱的地带行动，以便达到有限的作战目的。

五、西河朔方战役作战经过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春，匈奴左贤王军大举入袭上谷（今河北怀来地区），渔阳（今北京密云境）两郡，杀掠人畜甚众。

在此之前，将军韩安国曾屯兵渔阳。韩安国在和匈奴作战中，从抓获的俘虏口中得知，匈奴军已远去。因而，韩安国在上书武帝时，请求撤去屯兵。但是，刚刚罢军一个多月，匈奴大军即至。当时，韩安国只有700余人，安国率军出战匈奴，终因兵力弱小，被匈奴击败，安国军退入城内坚守。匈奴军虏掠千余人及大量畜产而去。汉武帝很气愤，派使臣责备了韩安国一番。

汉武帝见匈奴军在东北的上谷、渔阳等地区进掠，于是，抓住战机，立即命将军卫青和李息率领部队西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地区），沿黄河北岸西进，避实击虚，对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匈奴军进行深远距离的包围迂回。大军迅速进至高阙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茎河西北岸地区），随即沿着黄河西岸，转而南进。卫青、李息军对楼烦、白羊王占领的河南地区的匈奴势力包围袭击以后，斩杀和捕获匈奴军5500多人，牛羊百万余只，全部收复了河南地区。白羊王、楼烦王仅率少数卫骑逃走，卫青大获全胜，率军从陇右地区胜利回师。

六、西河朔方战役后汉匈双方的动态

西汉对西河朔方战役的胜利，十分欣喜。汉武帝对卫青在此次战役中的卓越战功，大加封赏，“益封青三千户”，并封卫青为长平侯。跟随卫青出征的校尉苏建以一千一百户，封为平青侯，张次公为岸头侯。

汉武帝为表彰卫青的功绩，宣扬此次战役的胜利，以鼓舞全国抗御匈奴的斗志，特将这次战役的重大战果，下诏向天下宣告。

西汉王朝为了巩固河南地区，汉武帝采纳大臣主父郾的建议，在河南地区设置了朔方郡（今内蒙古乌拉特旗地区），五原郡（今内蒙古包头西北），由苏建负责修建了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对秦代所筑的长城也进行了加修，并移民10万人，居住于河南地区。

守备渔阳地区的韩安国，由于在渔阳作战中的失利，在受到汉武帝的责备之后，即被派往右北平郡守备，这就更加远离了京师。韩安国由御史大夫奉行丞相职务的显赫地位，被贬斥渔阳右北平，心中积愤，终于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中，呕血而死，使西汉王朝丧失了一位忠勇正直，足智多谋的贤良之才。

匈奴在失去河南地区后，更加与西汉为敌，汉王朝虽然将上谷郡靠近匈奴的斗辟县造阳地区划给匈奴，丝毫也没有缓和汉王朝和匈奴统治者的矛盾。

西河朔方战役评述

汉匈之间的西河朔方战役，是汉武帝驱逐匈奴奴隶主的重大战役，也是西汉王朝统一我国西北地区迈出的重要一步。此次战役，汉匈双方虽然出动的兵力不算很多，但其意义却十分重大。

加速了我国西北地区的统一此次作战的河南地区，在秦代以前，便居住着我国一些兄弟民族部落。秦始皇统一战国诸国后，虽曾派大将蒙恬统一了河南地区，但为时不久，蒙恬被赵高、秦二世假冒秦始皇诏令陷害，匈奴奴隶主贵族，又卷土重来，使河南地区又从统一政权中分裂出去。西河朔方战役的胜利，使这个重要地区一举置于西汉王朝统一政权的治理之下。

解除了匈奴贵族从西北方向对京都长安的威胁长安地处秦川800里的中心，且本为“四塞之地”，攻可进，退可守，是西汉王朝理想的京都。但由于河南地区被匈奴贵族统治，做为京都屏障的上郡，北地等郡地区，常被占据河南的匈奴骑兵突袭，西汉王朝几度紧急调兵遣将，保卫长安的安全，劳师动众，既耗费国家大量资财，又严重影响人心的安定。此次战役之后，西汉王朝把自己的疆界恢复到黄河西北岸，使长安距西北部边境的距离增大至800多公里，从而解除了长安长期面临的战争威胁，大大有利于京都的繁荣和发展，加强了西汉对全国的统治。

建立了向匈奴进一步出击的战略基地汉王朝由于收复了河南地区，设立了朔方、五原等郡，且有黄河天险的阻隔，就使这一片广大的地区

成了尔后向匈奴深远纵深进行战略进攻的可靠基地。汉王朝依托这个基地，取得了许多战略上的利益，因而西河朔方战役，实际上成为西汉王朝向匈奴贵族发动一系列战略进攻的奠基之战。

第五节 西汉奇袭匈奴右贤王庭之作战

一、汉匈双方的基本形势

汉匈西河朔方战役后，汉王朝力图巩固河南地区，建立各级行政机构，加紧向这个地区移民，以争取尽快把该地区建设成屏障长安、反击匈奴的战略基地。

匈奴军臣单于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冬死去。匈奴单于位，本应由军臣单于的太子继立，但是军臣单于之弟伊稚斜却发兵攻破太子于单，自立为单于。于单兵败后投向汉朝，汉武帝封他为涉安侯，于单数月后即死去。

匈奴贵族对失去河南地区十分恼怒，在东起代郡、西至朔方郡的漫长边境地带，以更加频繁的进袭行动，杀掠汉边境郡县的吏民。伊稚斜单于当政后，即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夏，派数万骑兵进袭代郡，大败代郡守军，斩杀了代郡太守恭友，掠略千余人而去。秋天，匈奴又派兵进袭雁门，杀掠千余人。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伊稚斜单于以9万余名骑兵，分三路又攻入代郡、定襄（今蒙古和林格尔东北）、上郡（今陕西榆林南）等地，杀掠数千人。

匈奴右贤王对失去河南地区，更是怨恨之极，数次进袭河南边境地区，进入朔方郡，“杀略吏民甚众”。

匈奴军队对上述各郡县的进袭，使西汉整个边境地区受到严重破坏，所以，汉王朝决定调集兵力，进行反击。

二、汉匈双方作战序列

汉军

统帅车骑将军卫青

将领游击将军苏建

强弩将军李沮

骑将军公孙贺

轻车将军李蔡

将军李息

将军张次公

总兵力骑兵10余万人

匈奴

左贤王

右贤王

兵力无准确资料可考，估计不少于8万人

三、汉匈两军作战策划

汉军汉王朝为了巩固新近统一的河南地区，确保朔方、五原等郡县的安全，决定集中10万大军，以消灭匈奴右贤王部为主，同时以一部兵力进击左贤王部。为顺利达成作战目的，汉军分为东西两个方面作战：西部方向，也即主要方向，由车骑将军卫青直接指挥3万骑兵，出高阙，并指挥游击将军苏建，强弩将军李沮、骑将军公孙贺、轻车将军李蔡率数万人，兵出朔方，基本作战设想是消灭匈奴右贤王部，东部方向为次要方向，由大行李息、将军张次公率数万骑出右北平进击左贤王部，以牵制左贤王兵力，为主要方向创造歼敌的条件。

匈奴右贤王部为单于统率下的实力最强大的部分。它虽然刚刚遭受了丢失河南地区的失败，在河南地区的有生力量已被卫青军基本歼灭，但仍有相当强大的兵力。右贤王军由于对汉军力量估计不足，未做详细战争谋划，导致了再次作战的失利。

四、汉军奇袭右贤王庭作战经过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卫青受领出击任务后，即统率大军由朔方等地渡过黄河，利用夜暗秘密穿越高阙要塞，直扑右贤王部。右贤王自恃自己的王庭（约在今蒙古南部）距汉边境遥远的大漠地区，汉兵很难到达，因而未做防备汉军进袭的准备，仍然饮酒作乐，酒醉后卧于帐中。卫青率领大军急驰600多里，于夜间以秘密突行然的动包围了右贤王。当右贤王惊醒时，才发觉汉兵骤至，自己的部队已全部被汉军击溃，惊恐异常，仅带其爱妾一人和护卫精骑数百人仓惶突围北逃。

卫青得知右贤王突围北逃后，即命轻骑校尉郭成等，率部追击数百里，右贤王已远去，未被汉军捕获。

卫青军在此次奇袭战役中，大获全胜，汉军俘获右贤王部禅王10余人，右贤王部众1.5万余人，牲畜数10万头。卫青大军携带战利品凯旋而归。

大行李息、将军张次公统率的东路军也取得了胜利。

五、汉匈双方战后的动态

汉武帝得知卫青率军大胜匈奴军的消息，非常高兴，决定封卫青为大将军，并立即派遣使者持大将军印，前往迎接卫青军。卫青率军至塞下时，与汉武帝的使者相遇，使者手捧大将军印玺，在卫青的营帐中代汉武帝卫青为大将军，诸将领皆以所部兵将统属大将军卫青。

汉武帝为了嘉奖卫青等将领的功劳，又赐卫青食邑八千七百户，卫青的三个尚是婴儿的儿子也皆加封为侯，封卫青子伉为宜春侯、青子不疑为明安侯、青子登为发干侯。卫青受到重赏，心中不安，向汉武帝谢恩，并请武帝免封他的三个儿子，卫青说："臣幸得待罪行间，赖陛下神灵，军大捷，皆诸校尉力战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上幸列地封为三侯，非臣待罪行间所以劝士力战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武帝不从。

汉武帝对诸将领一一封赏：公孙敖封为合骑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韩说封为龙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轻车将军李蔡封为乐安侯，食邑一千六百户；校尉李朔封为涉轵侯，食邑一千三百户；校尉公孙戎奴封为从平侯，食邑一千三百户；将军李息、李沮、校尉豆如意，赐爵关内侯。

汉奇袭匈奴右贤王庭之战评述

汉奇袭右贤王庭之战，是汉武帝推行进攻战略以来，第二次取得辉煌胜利的重大战役。大将军卫青以10万铁骑突袭匈奴右贤王庭，几乎使右贤王全军覆没，这既显示了汉王朝多年来苦心建设骑兵部队的巨大成就，也标志着西汉军队对骑兵集团战术的运用，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它在战术思想上集中地反映了三条值得重视的经验。

1.骑兵重兵集团远距离奔袭可以获得巨大的战果

卫青统率的西路大军，至少也有七八万骑兵部队，这支大兵团，奔袭600多里，一举将右贤王部击灭，充分证明这种远距离的神速奔袭，具有雷霆万钧之力，使对方猝不及防。

2.利用夜暗秘密行动，是达到突然袭击最好的手段之一

卫青军秘密渡河、夜间隐蔽通过高阙要塞，接着又利用夜暗突袭右贤王庭，几乎全部消灭和击溃了右贤王的军队，七八万大军在敌境纵深作战，竟奇迹般地瞒过了匈奴的耳目，这实是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

3.战略上两个方面配合出战，有主有次，集中兵力

保障主要方向作战，就能分散和调动敌人的力量，达到围歼主要作战目标的目的汉军这次奇袭右贤王庭的作战所以能顺利自如地歼灭敌人，一方面在于卫青行动的神速，使匈奴单于来不及增援；另一方面也要归功于东路军进击左贤王部的行动，使匈奴军两个方向同时受敌，不

敢轻易地将其机动兵力投入任何一个方向，这不能不归功于战略上巧妙的配合。

第六节 汉匈漠南会战

一、漠南会战的起因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将军卫青以10万铁骑奇袭匈奴右贤王庭后，使右贤王几近全军覆没，对匈奴的打击十分惨重。匈奴伊稚斜单于对右贤王的失败，极不甘心，便于元朔五年秋，派出1万多名骑兵进袭代郡，杀害汉朝都尉朱英等官吏，掠走吏民1000多人。

西汉王朝对匈奴的再次进袭也很愤怒，决心集中兵力，寻歼匈奴单于主力，以求根除匈奴之患。于是，导致了汉匈的漠南大会战。

二、汉匈双方的作战序列

汉军

统帅大将军卫青

将领中将军公孙敖

左将军公孙贺

前将军赵信

右将军苏建

后将军李广

强弩将军李沮

总兵力骑兵10余万人

匈奴军

统帅伊稚斜单于

左贤王

匈奴相国

总兵力无资料可考，估计不下于7万人（匈奴单于本部兵力当不会少于4万人，左贤王的支援部队也应在3万人左右）

三、汉匈两军作战策划

西汉王朝对这次漠南会战，十分重视，从其军队编组的中、左、右、前、后诸军的序列来看，是汉武帝与匈奴作战以来，最为严密的一次。汉王朝在基本战胜和消灭了匈奴右贤王的绝大部分有生力量以后，即将其战略进攻的重点，转向了匈奴单于本部和匈奴左部军，决心深入大漠，与匈奴单于决战。因而汉武帝以屡战屡胜的大将军卫青为统帅，以多次与匈奴征战的一批将校为将军，并置渔阳、上谷、代郡等地于不顾，全力转向匈奴单于本部，这体现了汉武帝欲尽快剪除匈奴贵族的战略决心。

匈奴贵族自右贤王部惨败后，除了加紧对边境一些郡县袭扰外，似无更重大深远的作战谋划。但从漠南会战的情况来看，匈奴对西汉王朝可能向其本部和左部进袭，似有一定的防卫准备。

四、漠南会战的作战经过

汉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大将军卫青统率六将军共10余万骑兵，北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东北），向匈奴进击。汉军刚由定襄出塞不久，便遭到单于军的抵抗，汉军经过作战，斩杀匈奴军数千人，胜利而归。卫青回军后，命全军在定襄、云中、雁门诸郡休整，以利再战。

卫青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后，又于当年四月，第二次率10余万大军出定襄，北进数百里，寻找单于军决战。在与匈奴军接战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拼杀，互有伤亡，但汉军已斩杀匈奴军万余人。当汉军正与匈奴单于军激战之时，匈奴后继的主力军和左贤王的援军又增援而来。这时右将军苏建军和前将军赵信军，为抵挡匈奴前来的后继主力军，合兵一处，与匈奴军激战。双方拼杀一天多，苏建赵信的3000人马大部伤亡。此时前将军赵信见匈奴军势众，发生动摇，再加上他原本就是匈奴人，遂率其余800骑兵，投降匈奴。苏建单骑逃脱，回到大将军本部。

当匈奴单于兵败逃走时，18岁的骠姚校尉霍去病率领800骑兵孤军进行数百里深远距离的追击，斩杀匈奴军2028人，并斩杀了匈奴相国、当户、单于大行父籍若侯产，活捉单于叔罗姑比等。

至此，大将军卫青两次率领六将军共10多万大军与匈奴军本部和左贤王主力军的漠南会战，便告结束。汉军虽然损失了前军和右军，但共斩杀匈奴军1.97余人，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右将军苏建逃回大将军本部后，卫青问其属下该给苏建定什么罪，议郎周霸建议说："大将军自出兵以来，还没有斩过裨将。今苏建弃军而逃，应当立即斩首，以表明大将军的威严。"军正闳、长史安则说："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尽，不敢有二心，自归。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

卫青听完众人的意见，对周霸的建议，不以为然。卫青对众将

说："陛下以肺腑之心待我，从来不顾虑在军中没有威信，霸劝我以斩苏建来树立我的权威，这不符合我的意图，应送陛下裁处。即令我有权力斩杀部下将领，也不能自作主张。如若象我这样深受陛下宠信之臣，尚不敢擅自斩杀将士于境外，而将罪犯送交天子，这可以使我们大家懂得，为臣子不能专权的道理。"众将领非常钦佩卫青的为人。于是卫青回军后，命人将苏建送归朝庭处理。汉武帝得知了情况，赦免了苏建，贬为庶人。

五、汉匈双方漠南会战后的动态

大将军卫青率领大军胜利回师后，汉武帝以这次军功不多，未再益封卫青，但却赏卫青千金。

张骞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征，由于其在匈奴地区生活多年，熟知水草的分布规律，为汉军的宿营驻地提供了可靠的情况，加之他以前的功劳，汉武帝封其为博望候。

汉武帝对霍去病随卫青出征所建立的功勋十分欢喜，封他为冠军候，食邑一千六百户。上谷太守赦贤四次跟随大将军出战，捕斩敌人2000余人，封为众利候，食邑一千一百户。

汉王朝为了奖励军功，还制定了武功爵凡十一级。

汉匈漠南会战评述

西汉以10多万大军对匈奴单于本部和左贤王部军队的作战，是西汉中期以来汉匈双方最为激烈的一次大会战。这次会战，以汉胜和匈奴的失败而告终。

历代史学界对这两次的漠南会战，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甚至连汉武帝本人也认为这两次作战军功不多，不予统帅卫青以益封。因而，正确评价这两次作战，在西汉中期的战争史上给以应有的地位，是十分必要的。

历来的史学家只承认汉武帝时期最重要的战役有三次：一次是元朔二年（公之前127年）的西河朔方战役，一次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的两次西征战役，一次是元特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汉匈漠北大决战。诚然，这三次大战役确实是十分重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两次漠南会战的重大意义。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变过程，这个过程又都有一个变化的"临界点"，当事物达到量变与质变的"临界点"时，那么这个事物就开始质变了。战争问题更是如此。两次漠南会战，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争得了汉匈力量对比趋于平衡的临界点的到来。匈奴自两次漠南会战后，实力大大地减弱，已基本上失去了继续向西汉王朝频频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力量，这应当看做是西汉王朝战略全局上的伟大胜利。

行动的自由是军队的命脉，而军队的自由权又是握有主动权的最重要的标志。两次漠南会战，卫青以10多万大军，说进则进，说撤则撤，机动自如。汉军穷追单于本部军，斩杀1.9万余敌人后，安然回师，说明通过这两次对匈奴军的打击，战争的主动权已基本易手于西汉王朝，这是汉匈双方战略上强弱易位的重大变化，它已明显地预示着匈奴必败、西汉必胜的战争结局必然到来。汉武帝以斩杀掠获得多少来衡量军功的大小，这无疑是受习惯思维方式的影响。他没有看到，自漠南会战后，汉北部边境已是临近基本稳定的前夜了。没有漠南会战对匈奴的沉重打击，这种局面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如此迅速出现的。

第七节 汉匈河西战役

一、汉匈河西战役前双方的基本战略形势

河西地区，自古以来即被称为“河西走廊”。这个地区系指今黄河以西的祁连山（今甘肃张掖西南，亦称南山、雪山）和合黎山（今张掖以北）之间的敦煌、酒泉、高台、张掖、山丹、永昌、武威等东南西北走向的一个狭长地带。它斜卧于两山之间，形成一条天然的巨大走廊，是中原地区通往西域诸国的咽喉要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西汉王朝要想完成统一我国西北地区的大业，必须占有这个关键性的地区。

河西地区，原来居住着大月氏部族，自从匈奴冒顿单于等驱除月氏，逼其西迁后，便被匈奴占领。匈奴单于把武威及其周围地区封给休屠王，将酒泉及其周围地区封给浑邪王。匈奴据此，西可控制西域诸国，南可与羌族结成对抗汉王朝的联盟，对西汉西部地区构成严重威胁。因而，能否控制河西走廊已成为匈奴强弱胜败的重大关键。

汉匈西河朔方战役和漠南会战之后，汉王朝给了匈奴右贤王和单于本部以沉重打击，匈奴单于的主力已日感在漠南立足的严重危险，遂将主力远撤。这样，在大漠以南的广大地区内仅剩下左贤王和河西地带内的休屠王、浑邪王所统率的军队，汉王朝战略进攻的重点，势必择其一而攻之。

二、河西战役的起因

匈奴右部占据着河西地区，背靠西域诸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经常进袭西汉西部边境地区，对汉京师长安构成严重威胁。汉武帝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起，即想使西域诸国脱离匈奴贵族的统治，统一西域诸国，当时派了汉中人张骞出使西域，但被匈奴抓获，西汉统一西北的战略宏图，由于河西走廊的阻隔始终难以实现。如果西汉王朝夺回河西走廊，既能解除匈奴从西方对汉王朝的威胁，又可斩断匈奴与羌族部落的联盟，大大削弱匈奴的势力范围，斩断匈奴的右臂，极有利于西汉统一西域地区。

汉王朝基于以上的战略意图，决定发起河西战役。

三、汉匈两军河西战役作战序列

汉军

统帅骠骑将军霍去病

兵力骑兵1万多人

匈奴军

休屠王

浑邪王

折兰王

卢胡王

总兵力匈奴休屠王、浑邪王共拥有10万骑兵，估计此次参战的兵力只有部分骑兵，具体数字失考

四、汉匈双方作战策划

西汉王朝认为，虽然由匈奴本部和左贤王部经常派出大军进袭右北平、上谷、代郡、雁门等地，这些地区遭受战争的灾难最深，本应首先对付匈奴本部和左部。但是，从战略全局上衡量，西部地区的匈奴右部对汉腹心地区威胁最大，而兵力反比匈奴本部与左贤王为弱，因而决定以骑兵部队先向河西地区进攻，并沿河西走廊节节向西北方向推进，争取一举消灭河西地区的匈奴势力，砍断匈奴的右臂。

匈奴在漠南会战失利后，为报复汉王朝进击其左部和本部的行动，仍然依仗其左部和其本部的力量，继续向西汉王朝东北边境进袭，但进袭的次数已明显减少。而对西汉王朝可能向其右部进击的行动，没有具体的作战谋划和调兵遣将的准备。这就为西汉向河西地区的进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五、汉匈河西战役第一次作战经过

汉武帝元特二年（公元前121年）三月，汉武帝命令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1万多名劲骑，开始向河西地区进击。霍去病军从陇西出塞（今甘肃临洮地区），迅速进至金城（今甘肃兰州地区）、令居（今甘肃永登西），跨越乌鞘岭，一路转战6天，扫除了匈奴五个部落王国。接着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之大黄山，亦称燕支山）疾进1000多里，与匈奴军拼杀格斗，斩杀了匈奴折兰王、卢胡王，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俘获浑邪王之子以及休屠王和邪浑王的相国、都尉等，歼灭了匈奴军8900多人。匈奴休屠王和浑邪王率残部逃走，霍去病军进至敦煌地区完成了斩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任务后，胜利回师。

霍去病军回师后，汉武帝对这位20岁的青年将领，首次独立出征建立的功勋十分赞赏，汉武帝下诏表彰霍去病的战功，诏书说：“骠骑将军率戎士乌，讨，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慑者弗取，冀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

二千户。”

六、汉匈河西战役第二次作战

霍去病率军进行的河西战役第一次作战，虽然深入匈奴境内近2000里，大军贯穿整个河西走廊，但由于只有平推，没有聚歼，使休屠王和浑邪王逃之夭夭。汉武帝为了彻底歼灭河西地区匈奴军，又于当年夏天，命霍去病第二次率军进军河西地区。

一、汉匈两军的作战序列

汉军（河西方向）

统帅骠骑将军霍去病

将领合骑侯公孙敖

司马赵破奴

校尉句王高不识

校尉仆多

兵力数万骑兵（估计在四万人左右）

汉军（右北平方向）

博望候张骞

郎中令李广

兵力15万骑兵

匈奴军（右部）

休屠王

浑邪王

单桓王

酋涂王

遬濮王

稽沮王

呼于屠王

兵力骑兵7万多

匈奴军（左部）

左贤王

兵力数万人

二、汉匈双方作战策划

汉武帝为了聚歼匈奴右部在河西地区的兵力，策定由两个方向出击。主要方向由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率数万骑兵进袭河西地区，兵分两路将匈奴包围歼灭于祁连山地区；次要方向以博望候张骞、郎中令李广出右北平，进击左贤王部，以牵制匈奴单于的左部兵力，避免其向河西方向增援。

匈奴左贤王部在汉军出右北平北进时，也派出数万骑兵南下，进击代郡、雁门，似有分散汉军兵力，使其不敢放手全力攻击河西右部的企图。

三、汉匈两军的较量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夏，汉军按预定作战策划开始行动，分两个方向同时出击。

主要方向：骠骑将军霍去病和合骑侯公孙敢各自率领兵马由北地（郡治在甘肃环县东南地区）和陇西（今甘肃临洮县南）出塞。公孙敖部由于迷失了方向，未能按预定的策划和霍去病会师，因而霍去病军只能弧军奋战。他率领部队由今宁夏的灵武渡过黄河北进，翻越贺兰山，涉过浩瀚的巴丹吉林大沙漠，进至居延海地区。转而由北向南，沿弱水而进，经过小月氏（今甘肃酒泉一带），再折而转向东南进击，进至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弱水上游一带地区，突然出现在浑邪王和休屠王军队的背后。经过激战，霍去病军共俘获匈奴手下相国、将军、当户、都尉63人。匈奴之单桓王、酋涂王、稽沮王、呼于屠王、单于阏氏、王子59人也被擒获，斩杀遫濮王，迫降敌2500人，斩首3.02万级，取得了巨大胜利，而霍去病军队仅伤亡十分之三。

主要方向上作战的顺利发展，完全切断了匈奴军北退的通路。匈奴军北退一般沿三条路线：一条是越过今腾格里沙漠沿黄河北上；一条是过焉支山，沿石羊河北去；一条是沿弱水，走居延海北归。汉军两次河西作战的胜利，就将匈奴北撤的路线堵死，使河西地区的匈奴军，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次要方向：博望侯张骞和郎中令李广，率1万多骑兵出右北平。李广所率4000多骑兵为先头部队，先出塞北进数百里，与左贤王数万骑兵部队相遇，两军激战两天两夜，李广军斩杀敌人超过4000多，自己伤亡

过半。但张骞所率之军，到达战场过晚，当张骞军到后，匈奴军见汉军援兵赶到而撤走。

匈奴单于在左，右两个方向与汉军激战的同时，也出兵数万骑，进袭代郡、雁门等地，杀掠边民后撤去。

七、汉匈双方战后的动态

汉军由于河西战役的胜利，汉武帝对霍去病军大加封赏，除了下诏表彰霍去病的功勋之外，益封霍去病五千户。司马赵破奴由于斩了匈奴濮王，俘稽沮王和俘获大量敌人，而封从骠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校尉句王高不识，由于俘呼于休屠王王子以下大量敌人，被封为宜冠侯，食邑一千一百户。校尉仆多有功，封为辉渠侯。

合骑侯公孙敖由于作战中延误了会师时间，理应斩首，汉武帝将其贬为庶人。博望侯张骞也由于延误了会师时机，受到同样的处理。

霍去病两次河西作战，为西汉王朝建立了巨大功劳，受到汉武帝的高度赞扬，这位青年将领的威望与日俱增，也使匈奴军闻之丧胆，成为与大将军卫青齐名的对匈奴作战的主将。

匈奴伊稚斜单于，对其右部的数次失败，损兵折将，非常气愤，责怪浑邪王、休屠王作战不利，准备治浑邪王以死罪。浑邪王得知后，十分恐惧，便与休屠王商议共谋投降汉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浑邪王和休屠王派出使者，前往汉王朝边境防守将军李息营内，商谈投降事宜。李息将情况向汉武帝做了报告，汉武帝怕匈奴浑邪王，休屠王以诈降而进袭边境，于是决定命霍去病率领部队前去受降。

浑邪王和休屠王尽管两次战败，但仍然拥有数万军队，且受降地点远在匈奴境内，很有可能出现预料不到的突然变化。因而汉军虽然名为前去受降，但必须象对待作战任务一样，时刻准备与敌人面对面地搏斗。所以，汉武帝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威镇敌胆的霍去病。

当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尚未到达河西时，休屠王改变了态度，拒绝降汉，浑邪王一怒之下斩杀了休屠王，收编了他的军队。霍去病军队渡过黄河，以威严的编队前进，浑邪王的4万多部众望见汉军严整的队伍，有的紧张，有的部将企图逃跑。霍去病见此情景，当即率领部分将校精骑，驰入浑邪王阵内，与浑邪王相见，同时命令汉军将正在逃跑的8000匈奴兵斩杀掉，迫使浑邪王的部队稳定下来，随即让浑邪王率少数人先去长安见汉武帝。然后霍去病率领匈奴的3万多人马，号称10万人渡过黄河，向长安进发。

浑邪王即将到达京师时，汉武帝派出2万车骑前往迎接。在霍去病所率匈奴降军到达长安后，汉武帝又大摆筵席，招待匈奴军的将士，并以数十巨万赏赐给众人，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裨王呼毒尼为下摩

侯，鹰庇为渠侯，禽黎为河綦侯，大当户铜离为常乐侯。

霍去病率军胜利接受浑邪王投降的成功，是汉武帝时期继两次河西作战后的又一巨大胜利。汉武帝为了表彰霍去病的这一丰功伟绩，又下诏盛赞霍去病说："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犇，率以军粮接食，并将控弦万有余人，诛，获首虏八千余级，降异国之王三十二人，战士不离伤，十万之众咸怀集服，仍与之劳，爰及河塞，庶几无患，幸既永绥矣。以千七百户益封骠骑将军。"霍去病河西走廊两次作战的胜利，继之又成功地接受了浑邪王的投降，成为汉武帝时期最年青有为的赫赫战将，"日以亲贵，比大将军"。

汉匈河西战役评述

西汉王朝与匈奴右部进行的河西战役，是汉武帝时期最重大的三次战役之一。这次战役对汉匈双方都产生了无法逆转的巨大影响，匈奴势力自此日益削弱；汉统一我国北方、西方和西北方的步伐越来越不可阻挡。因而，西汉王朝两次河西作战和匈奴浑邪王的兵败降汉，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河西战役的胜利，使汉完全占据了河西走廊，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这对西汉王朝进而统一我国西域地区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堪称奠基礼之战。同时，由于河西走廊大门的洞开，也为西汉王朝与大宛、康居、安息、大月氏等地区发展经济文化交流等友好关系，开辟了可靠的通道，使中华民族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远远流布于现在的中东、欧洲、西亚各地。

河西战役的胜利，打击了匈奴对西域诸国的统治，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战略联系。从此，匈奴再难以依靠西域地区诸国和羌族诸部落的人力物力资源从西方发动对汉的进袭，西汉西部边境地区，也由此获得了相对安定发展的有利条件，并形成了从西面屏护京师长安的安全地带，这一地带向西延长了两三千里之遥。

河西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铲除了匈奴在祁连山一带地区繁衍生息的重要基地。从而，也就拔除了匈奴在西部地区的统治根基。匈奴右部在我国西部地区本来有两处重要的生息繁衍基地：一处为河南地区，一处为祁连山地区。这两处基地的丧失，结束了匈奴贵族在西部地区统治的历史，对匈奴贵族奴隶主政权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匈奴奴隶主哀叹："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自此以后，"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

河西战役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只就纯军事上的原因来看，首先是汉武帝作战决策的正确。第二是霍去病坚毅果敢、勇略非凡的统帅才能。在第二次出征河西时，由于公孙敖没能如期到达战场，他当时面临两种抉择：要么罢兵而归；要么全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完成进军河西歼灭敌人的重任。他虽然知道浑邪王和休屠王仍然拥有超过自己

的优势兵力，但却毅然北进，突破骑兵作战的禁区，涉沙漠、穿深谷、越高山、跋涉千里，出奇制胜。即便霍去病奉命前去受降时，也是在面临十分凶险局面的情况下，勇敢地闯入浑邪王营内，斩杀匈奴军8000人，力挽狂澜，使浑邪王部就服。因而，河西战役和战后的受降，如若离开霍去病这位英勇无双的统帅，也许难以获得如此巨大的胜利。

第八节 汉匈漠北战役

一、漠北战役前汉匈双方的基本战略形势

西汉王朝在河西战役和接受了浑邪王所部的投降后，将他们分别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今陕西榆林地区）、朔方、云中等五郡，定居在黄河以南故塞外一带地区，称为“五属国”。这次战役和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以后，汉逐渐在河西地区设置了武威（今甘肃民勤地区）、张掖（今甘肃张掖以北）、酒泉（今甘肃酒泉）、敦煌（今甘肃敦煌西）四郡，历史上称为“河西四郡”。这样，长期被匈奴做为从西方进袭中原战争策源地的河西地区，便逐渐变成了稳定发展的农业生产地区。后来西汉王朝又迁徙关东贫民72万多人，定居于陇西、西河、上郡、北地等地区。这些措施无疑对巩固河西、河南地带，发展当地社会生产，具有长远的重大战略意义。

汉王朝由于夺得了河西地区，基本扫除了西部匈奴势力，遂将陇西、北地、上郡三郡戎卒减少一半。

匈奴奴隶主统治集团对其右部的惨败已无可奈何，对日益面临汉王朝更大打击的局面也一筹莫展。这时，以前在汉匈漠南战役中投降匈奴的翕侯赵信，已娶单于姐姐为妻，深受单于器重，被匈奴当成仅次于单于的显赫人物，他向单于建议说，我大军退居大漠以北，以引诱汉军来攻，待汉军疲备不堪之时，再行攻击，必然置汉军于死地。于是，匈奴伊稚斜单于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心用诱兵之计，围歼汉军。

二、漠北战役的起因

匈奴伊稚斜单于对右部的被歼甚为恼怒，于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秋，以两路大军，每路各数万骑，进袭右北平和定襄郡，杀掠汉吏民1000余人而去。

汉朝消灭了匈奴的右部势力之后，解除了来自西方的威胁，但东北方的匈奴左贤王和匈奴单于本部尚拥有相当的实力，仍然是威胁汉北部边境的安全和妨碍西汉王朝统一我国北方地区的强大势力。

西汉王朝为了推进我国北方地区的统一，彻底消灭匈奴贵族奴隶主政权，在经过了近两年的发展经济、改革税收、积累财富，秣马厉兵的认真准备之后，决心向匈奴单于本部和左贤王的势力发动进攻。

三、汉匈两军漠北战役作战序列

汉军（卫青军）

统帅大将军卫青

将领前将军李广

左将军公孙贺

右将军赵食其

后将军曹襄

西河太守常惠

云中太守遂成

兵力5万骑兵

汉军（霍去病军）

统帅骠骑将军霍去病

将领从骠侯赵破奴

昌武侯安稽

右北平太守路博德

北地都尉邢山

归义侯复陆支

归义侯伊即

校尉李敢

校尉徐白为

兵力骑兵5万人

匈奴军

匈奴单于伊稚斜

左贤王

左大将双

比车耆王

屯头王

韩王

兵力估计骑兵不少于10万人

四、汉匈双方作战策划

汉武帝为确保出击漠北作战的胜利，调集了10万多骑兵，分为卫青、霍去病两大骑兵集团，并以大量步兵和14万匹马做为运送粮食、衣物、军械的运输大军。汉武帝让卫青和霍去病各领5万人马，携带物资，分路进兵，并给卫青配备了久经沙场的老将李广、公孙贺和赵食其、曹襄等人为裨将，虽未给霍去病配备裨将，但霍去病的骑兵都是经过挑选的锐骑，战斗力很强。因此，汉武帝准备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霍去病军。原计划让霍去病兵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地区），专力攻击单于主力；以卫青军出代郡（今河北蔚县境）。以后从俘虏口供中得知单于主力在东部，又立即改由霍去病军出代郡，卫青军出定襄。

汉武帝认为，匈奴伊稚斜单于听信赵信的建议，断定汉军绝不敢进入大沙漠的判断，正好造成匈奴心理上的麻痹大意，恰是汉军深入漠北，进行出其不意而攻击的天赐良机，于是决计深入大漠以北作战。

匈奴将自己的主力军，按照赵信的谋划，撤至大漠以北地区，决心利用汉军长途跋涉、疲备不堪之时，予汉军以歼灭性打击。匈奴军自恃有大漠之天然险阻，汉军绝难渡漠北进，即令是进入漠北，也已是疲劳之师，定能被一举击灭。因而，对漠北决战，未做更充分的策划和准备。

五、汉匈漠北战役作战经过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受命后，即率军出征北进。

此时，匈奴单于主力军已退至漠北，并将其军需辎重转移至更远的后方。

卫青出塞后，即得知匈奴主力确实在自己的前方。因此，他便命令前军李广部与右将军赵食其部合兵一处，从东路前出，掩护自己的翼侧，攻击单于军的左侧背，卫青自率主力向单于进击。

大将军卫青所率之军向北前进了1000多里，渡过了浩瀚的大沙漠，突然发现单于主力军正严阵而待，于是卫青当即命令部队用武刚车“自环为营”，以防匈奴突然袭击，布阵完后，即派出5000名骑兵向匈奴军进行试探性进攻。匈奴单于也派出万余名骑兵迎战汉军。两军激战至日没，卫青抓住时机，派出主力部队从左右两翼迂回包围匈奴军。伊稚斜单于见自己的部队被汉军包围，而且汉军人数众多，兵强马壮，继续作战对自己十分不利，惧怕兵败被杀，便乘风沙弥漫和黄昏之际，率领数

百名壮骑突出汉军的包围，向西北方向逃遁。伊稚斜单于逃走，汉军开始并未发觉，两军一直激战至深夜，双方死伤都很惨重。后来汉军一左校从抓获的俘虏口中得知，单于已于黄昏前逃走，于是卫青急令轻骑追击单于，自己也立即率主力随后追赶。一直追到天亮，驰行200多里，也未发现单于的去向。这时，匈奴兵已溃散，被汉军斩杀1万多人，卫青率军追至颜山（今蒙古纳柱特山）赵信城，缴获了匈奴屯集的粮食等军用物资，补充了自己的军队，停留了一天，放火烧毁了剩余军资和赵信城，胜利回师。

从东路出击的郎中令李广和赵食其军，由于迷失了方向，未能如期到达漠北，待卫青率军回师行至漠南时，才与李广军相遇。卫青本想委婉其词，假称命李广殿后，在漠南等侯卫青主力军，谅解这位老将军，派使臣回报朝廷。为此，先让其长史查问李广等军失期到达的原因。李广因想自己与匈奴征战一生，今天失败，岂非天意，遂对其部下说：“我从成年时候起便与匈奴作战，共经大小70余仗，这次有幸跟随大将军出征，而大将军临时把我改为独立行动，迂回匈奴侧背，行进中我迷失了方向，延误了会师期限，不是天意吗？我今年已60多岁了，自不能受刀笔小吏的责难”。李广说罢，即自刎而死。《史记·李将军烈传》对李广自刎后士卒的悲痛情景有一段生动的记述：“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形象地描述了人们对这位抗匈战将的深切怀念之情。

骠骑将军霍去病军，为更有效地与匈奴作战，便挑选从骠侯赵破奴、昌武侯安稽、北地都尉邢山、校尉李敢等充任裨将，并以原匈奴降将归义侯复陆支和伊即轩等人为向导，随军负责宿营保障、寻找水源、草场等。

霍去病将部队编组完毕，便率军出代郡，向北进击，越过荒芜人烟的大沙漠，长驱直进2000多里，与匈奴左贤王部遭遇。霍去病军对左贤王军发动猛烈突袭，左贤王军大败。左贤王率领他的亲信将领弃军而逃，霍去病挥军紧紧追赶，追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斩比车耆，俘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3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俘虏和斩杀匈奴吏卒70443人，几乎全歼了匈奴左贤王的军队。

霍去病在歼灭了左贤王的部队后，为了纪念这次重要战役的胜利，在狼居胥山上修建了一个纪念台，同时又在姑衍山（今蒙古乌兰巴托市东郊）下，修了一个祭天台场，让士卒举起火炬，祭告天地，慰籍壮烈牺牲的英灵，将士们庆祝胜利的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霍去病军满载胜利的荣誉，凯旋而归。至此，惊天动地的汉匈漠北战役，遂告结束。

六、汉匈双方漠北战役后的动态

匈奴伊稚斜单于突出汉军包围后，率领数百护卫骑兵狼狈逃走，匈

奴贵族统治集团十多天找不到单于的下落，这时匈奴右谷蠡王自立为单于。不久，伊稚斜单于才与其溃散的军队会合，右谷蠡王不得不取消自立的单于称号。

汉武帝对漠北战役的胜利异常满意。为了表彰卫青和霍去病的赫赫战功，西汉王朝设置了大司马的官职，卫青与霍去病同时被授为大司马，其地位仅次子丞相，成为全国统率武装力量的最高官职。汉武帝对霍去病的功绩尤其赞赏，除了规定霍去病的品秩与卫青相等外，又下诏历数霍去病的功劳说："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腐，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济弓闾，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接着列举了霍去病军缴获消灭敌人的数字后，增封其食邑五千八百户，封右北平太守路博德为符离侯，食邑一千六百户。北地都尉邢山封为义阳侯，食邑一千二百户。复陆支封为壮侯，食邑一千三百户。封伊即为众利侯，食邑一千八百户。其他将校均论功加赏。

汉武帝还为霍去病修造了一栋府宅、当汉武帝叫霍去病去看修的好不好时，霍去病对武帝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这使汉武帝更深感霍去病是一位忠勇清廉的优秀将帅。不幸的是，这位仅仅度过了24个春秋的青年将领，竟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九月，也即漠北大战后的3年，过早地病逝。对霍去病之死，吏民皆悲痛不已，汉武帝特为他举行了极其庄严的葬礼，以属国之军穿戴黑衣铁甲，列队送葬，送葬队伍从长安一直排列到今陕西兴平县的茂陵墓地，长达100多里。在威严肃穆的气氛中安葬了这位叱咤风云的战将。"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墓"的巨大墓碑，现今仍然矗立于茂陵的基地上。

大将军卫青由于没能全歼单于之军，汉武帝未加益封。

汉匈漠北战役评述

西汉与匈奴的漠北战役，是汉武帝向匈奴战略进攻的顶点，也是匈奴伊稚斜单于与西汉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略大决战。

这次战役，西汉以10万精骑，大量步兵、车兵、14万匹从马，远渡大漠，深入匈奴境内2000多里。伊稚斜单于也以其本部和左贤王所部的全部兵力与汉军一决雌雄。结果，匈奴和左贤王军所剩不过十分之一二，西汉获得了决战的胜利。匈奴势力远遁漠北，自此，"漠南无王庭"。

西汉漠北决战的胜利，制止了匈奴奴隶主对汉边境的残暴掠夺，加速了我国北部地区的进一步统一和开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西汉能够取得决战的巨大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基本的有以下几点：

1.汉对匈奴的战争属于统一之战

汉武帝时期，我国社会早已进入封建社会，而匈奴处于奴隶制社会时期。匈奴奴隶主对西汉边郡的长期进袭掠夺，严重破坏了中国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给吏民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匈奴贵族的统治已成为阻碍我国北部地区统一的巨大障碍，它逆历史潮流而动，不得民心，必然走向失败。

2.汉武帝雄图大略的决心和战略决策的正确

汉武帝在河西战役胜利后，抓住匈奴右部被歼，实力大减，汉军兵威正盛的有利时机；同时巧妙地利用了匈奴队为汉军不能深入漠北的错误心理，迅速组织东西两路大军，并动用了数十万骑兵、步兵和车兵，突然北进，大出匈奴所料，一举获得了作战的胜利。因而，漠北决战，既是汉武帝战略决策的胜利，也是其雄图大略、积极进取精神的胜利。

3.卫青和霍去病这两位杰出的军事统帅坚毅的作战决心和成功的战役指挥

卫青统率的西路军发现单于在自己当面的情况后，立即自率主力疾进，命老将李广、赵食其从侧翼迂回，当伊稚斜单于偷偷突围之后，卫青又率军猛追。从伊稚斜单于弃军而逃，十数日不敢回归的情况来看，匈奴军损失之惨重，是可想而知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由东路出塞之后，长驱直进2000多里，丢弃辎重，轻兵急驰，抓住左贤王部穷追猛杀，一直将其8万多军队歼灭掉十分之八九，追至狼居胥山才胜利而归。卫青和霍去病这种坚毅而正确的作战决心和指挥，无疑是此次战役制胜的重要因素。战后汉武帝以卫青未能全歼单于军而不予益封，未免失之偏颇。而一些史学家认为霍去病取得的几次对匈奴作战胜利是天赐良机，更是与科学的历史观格格不入。从冒顿单于起到伊稚斜几代单于，都是雄武英烈之君，匈奴的实力也处于鼎盛时期，历朝历代都没有人彻底击败过他们，但却被卫青、霍去病打得一败涂地，这决非天赐良机。卫青和霍去病之所以与匈奴军屡战屡胜，最主要的是靠他们在战争的实践中积累了经验，锻炼了自己，提高了指挥才能。尤其是他们创造性地解决了骑兵大兵团在沙漠荒原地带作战的一系列战术、指挥、补给等前人不曾或不敢涉足的问题，再加上他们本身具有可贵的将帅气质，就自然使他们成为纵横战场的智勇之将。

4.但也并非不是决定性的原因，是汉军英勇善战，吃苦耐劳的战斗精神

深入大漠以北作战，对汉军来说，确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甲难。所谓大漠和漠北，即指蒙古高原宽广的荒漠地带，沙海千里，水草奇缺，飞鸟难至，人烟断绝，就是匈奴的军队也视入漠为畏途。汉军如若没有英勇善战、忍饥耐渴，视死如归的坚韧意志，是绝难取胜的。

第九节 汉匈浚稽山之战

一、汉匈漠北战役后双方战和形势的发展

惊心动魄的汉匈漠北战役，汉王朝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汉军也伤亡数万人，死伤马10多万匹，暂时难以再向匈奴进行大举进袭。汉王朝为巩固新近统一的漠南广大地区，修筑了光禄（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令居（今甘肃民勤）三城，并以近6万吏卒进驻，与关中移民共同开发这一带地区。

漠北战役中，由于匈奴在漠南的势力被基本扫除，单于和左贤王均率自己的部落残余远走大漠以北地区，已无力夺回漠南，更难大规模进袭汉边境郡县。在这种情况下，汉匈双方遂形成了一个不算短时间的休战期。在此期间，除了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军主动出兵一次，匈奴数次派少量游击骑兵袭扰河西通向西域的要道之外，这种休战状态约有16年，一直延续到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漠北战役后，匈奴迫于形势的需要，伊稚斜单于为休养生息、恢复战争创伤，以利再战，遂采纳赵信之谋，派遣使者向汉请求“和亲”修好。汉武帝征询众臣的意见，丞相长史任敞建议说：“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为外臣，朝请于边”。于是，汉武帝派任敞回访匈奴，要匈奴向汉称臣。伊稚斜单于知道是任敞所献建议，大怒，将任敞扣留在匈奴，汉匈双方先后相互扣留的使者大体相当。据此，西汉王朝深知匈奴远未放弃与汉为敌的企图。

汉武帝为了准备再次与匈奴作战，继续大修马政。在漠北战役损失十多万马匹后，于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就下诏“平牝马匹二十万”，鼓励百姓竞相养马。元鼎四年、五年又下令规定，百姓可以养边境官府的母马，3年之后，还给政府1匹小马，三百石以上的官吏，按官职大小交给政府一定数量的母马。这样，很快便使政府拥有的马匹增多，源源补充军队的需要。

西汉王朝在与匈奴休战期间，双方都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病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匈奴伊稚斜单于死去，由其太子乌维单于即位。汉武帝采纳张骞通西域的建议，与西域36国通使，并派兵南伐两越。这时汉王朝的实力已经恢复，汉武帝遂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派将军李息平定西羌后，又以故太仆公孙贺率1.5万骑兵、从骠侯赵破奴率1万多骑兵，寻求匈奴军作战。公孙贺军出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北进2000余里，进至浮苴井地区（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赵破奴军由令居（今甘肃民勤）出塞，北进数千里，至匈奴河一带，均未见匈奴军的踪影。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十月，汉武帝率18万大军亲至朔方，以巡视边境为名，实为向匈奴武装示威。武帝派出使者郭古告知乌维单于说：“南越王的人头已悬挂于汉京城的北门之下。你单于今天若敢于与汉交战，那么汉天子已经率大军进抵边境；如果你不敢交战，立即降服称

臣于汉。”乌维单于听罢，大怒，立即斩了接待郭吉的大臣，将郭吉扣留在匈奴。但是，匈奴此时也很惧怕汉王朝的兵威，只好派出使者好言求婚。汉允许“和亲”，并再派杨信出使匈奴，杨信见了乌维单于说：“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单于一听说汉要其以太子为和亲的交换条件，便没有答应。

杨信归来，汉又派王乌出使匈奴。单于欺骗王乌说，我想入汉面见天子，结为兄弟之好。王乌即归，报告了汉武帝。汉王朝听说乌维单于亲自来汉，便专为其修建了官邸。但乌维单于并未至汉，而派一大臣来汉，这个大臣后因病死于长安。汉王朝派路充国至匈奴送丧，匈奴以为汉有意杀害了他的使臣，便扣留了路充国。匈奴数度派少量游骑，袭击汉边境。汉以郭昌为拔胡将军和浞野侯赵破奴率军驻屯于朔方以东，防备匈奴骑兵的袭扰。路充国被扣留3年后，才被放回。

二、汉匈浚稽山之战的起因

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乌维单于在当政10年后死去，由其子乌师卢立为单于，因为年少，称为儿单于。匈奴贵族集团见单于年幼，国力日衰，遂将其国更往西北迁，左贤王所部迁至云中以北，右贤王所部迁至酒泉、敦煌以北。

汉武帝想乘儿单于新立，匈奴国力渐弱、内部不和之机，对匈奴进行分化瓦解，便派出两批使者，一批吊单于，一批吊右贤王。但使者至匈奴后，皆被单于拘留。这时匈奴境内天降大雨雪，牲畜多冻饿而死，儿单于又残暴，引起匈奴国内吏民的严重不安。匈奴左大都尉想杀掉儿单于，便派人告知汉王朝说：“我欲杀单于降汉，汉远，即兵来迎我，我即发。”汉王朝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命因杆将军公孙敖修建受降城（约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境），准备接受左大都尉率部来降，遂导致了浚稽山之战的发生。

三、汉匈浚稽山之战作战经过

汉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汉武帝觉得受降城距离匈奴太远，想在浚稽山（今蒙古境内之阿尔泰山以北）地区去迎接左大都尉，于是便派赵破奴为浚稽将军，统率骑兵2万多人出朔方西北2000多里，进至浚稽山地区，与匈奴左大都尉约定，杀死儿单于后，率部在浚稽山相会。但事机泄露，被单于发觉，单于捕杀了左大都尉，同时命令左贤王率兵袭击赵破奴军。赵破奴军受到攻击，知道事情败露，遂率部回撤，途中斩杀左贤王兵数千人。行至拒受降城400里处时，突然被儿单于所率的8万骑兵追至包围，两军展开激战，战至夜间，赵破奴出营寻找水源，不幸被匈奴的侦察人员捕获。匈奴军乘捕捉了汉军统帅的时机，急攻汉军，汉军遂全军覆灭。儿单于乘胜派出部分骑兵奇袭受降城，未攻克而撤回，汉匈浚稽山之战也告结束。这是汉匈之间休战16年后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作战。

第十节 汉匈天山战役

一、天山战役前汉匈双方的基本形势

汉匈自浚稽山之战以后，形势又日渐趋于紧张，虽然在浚稽山之战中，匈奴取得了歼灭汉军2万余人的胜利，但这并不标志着汉王朝势力的衰落。这次纯属偶然因素的作战行动，是由于一些意外事件而失败，西汉王朝消灭匈奴、统一我国北方和大西北的决心并未因此而有丝毫动摇，为达此目的，许多措施仍在抓紧施行中。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王朝命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修筑城列亭障，以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率兵驻守，命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今内蒙古居延海附近地区）上。

匈奴儿单于立3年而死，由于其子年幼，匈奴贵族集团立其叔父乌维单于之弟句黎湖为单于。句黎湖单于即位后，即派兵进袭定襄，云中，杀掠数千人，杀死汉两千石官吏数人，并破坏光禄勋徐自为所筑之城列亭障。匈奴同时命右贤王入袭酒泉、张掖，掠数千人，意在破坏汉之屯戍政策。汉派任文率军救援，击退匈奴右贤王军，收复被占之地区。

太初三年冬，汉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征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上游一带地区）后，胜利回师，匈奴想乘李广利军回师的机会，截击李广利军，因见李军兵威势壮，未敢动手。匈奴句黎湖欲攻取受降城，尚未进兵，即病死，由其弟左大都尉且侯即单于位。

二、天山战役的起因

西汉王朝由于击败大宛，斩大宛国王而归，威震诸国和西域地区，西域诸国纷纷脱离匈奴，而臣服于汉。汉的势力大大增强，匈奴势力进一步削弱。这时汉武帝想趁势再进击匈奴，便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下诏说：“高皇帝（指刘邦）曾受匈奴平城围困之耻，高皇后（指吕后）受到匈奴书信的侮辱，过去齐襄公曾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从而明确宣布了与匈奴决战到底的决心。

匈奴且侯单于，见汉朝气势正盛，惧怕遭到汉之进攻，便对其臣下说：“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并将过去所扣留之汉使者不愿意投降的人统统归还于汉，路充国等此时即被放回，浞野侯赵破奴一年后也逃回。汉王朝为匈奴的卑词和友好表示所感动，遂派苏武、张胜、常惠为正副使者前往匈奴，以重礼厚币赠单于。他们到了匈奴后，副使张胜因秘密与汉投降匈奴者策划劫持单于阏氏归汉，不料事机败露，三人皆被匈奴扣留。且侯单于自此以后，日加骄狂，不时流露出与汉相抗衡的情绪。因而，汉武帝决计向匈奴发动进击。

三、汉匈两军天山战役作战序列

汉军

贰师将军李广利

因杆将军公孙敖

强弩都尉路博德

骑都尉李陵

假司马赵充国

兵力骑兵5万至6万人

匈奴军

且侯单于

右贤王

兵力估计骑兵5万人以上

四、汉匈双方作战策划

汉军为消灭匈奴右贤王的势力，保障其至西域通道的安全，进一步切断匈奴与西域一些国家的联系，以主要兵力进攻居于酒泉、敦煌以北地区的右贤王军，同时再以部分兵力出西河和居延以北，深入匈奴境内，寻歼匈奴军。为此，汉军决定：向天山方向进击，以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3万骑兵出酒泉，骑都尉李陵率步骑兵5000人，为李广利将军的辎重护卫军。

以因杆将军公孙敖率一部骑兵出西河，向涿涂山（亦称涿邪山）进击，与强弩都尉路博德所率之骑兵部队会师于此。

匈奴且侯单于本部的兵力远在今阿尔泰山以北地区，匈奴为竭力保住其右部的势力范围，常以游击骑兵活动于汉匈酒泉、敦煌边境一带地区，并伺机以机动骑兵支援其右部的作战。

五、汉匈天山战役作战经过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广利所率的3万骑兵部队沿天山北路进击匈奴，顺利击破右贤王军，斩杀匈奴军万余人，胜利回师途中，进至今新疆伊吾地区时，突然遭到单于主力军的包围袭击。李广利军势弧力单，苦战数日，粮食已尽，死伤十分之六七，仍不得解围。李广利遂

命令假司马赵充国率精勇骑兵数百人在前面突围，李广利率主力随后跟进，经过拼力冲杀，才得以突围。赵充国负伤20余处，李广利军仅剩1万多人而归。

因杅将军公孙敖所率之军于西河郡出塞后，一直进至涿涂山地区，未遇匈奴军的抵抗，转而回师。强弩都尉路博德出塞后，也顺利进至涿涂山地区，与公孙敖军会合后，同样未经战斗而归。

李陵所率之5000步骑军，由于李陵不甘于做辎重护军，主动向汉武帝请求先出兵北进的要求，李陵决心以少胜众，以5000步兵和少量骑兵直捣单于庭。于是，武帝命李陵九月率兵出居延。李陵军北进1000多里，至今阿尔泰山以北（今蒙古巴彦洪戈尔地区图音河下游一带），与单于本部军8万多骑兵遭遇，双方展开激烈战斗。由于李陵曾对其所率部队进行了艰苦的射术训练，加之部队多为荆楚之勇武侠士，因而作战非常英勇，匈奴军将李陵部队包围于谷地之中，李陵以大车为营，以弓箭猛射匈奴军，匈奴兵应声而倒，李陵军与匈奴兵大战数个回合，前后共射杀、斩杀匈奴兵1万多人，匈奴兵对李陵军的英勇拼杀和射术的准确，非常惧怕。因而，也不敢死追硬打。李陵率军且战且走，后从李陵军被俘人员中得知，李陵军弧军无援，才将李陵军团团包围于大山之中，李陵军粮食和弓矢已尽，最后只得让全军散走，李陵遂投降匈奴。

六、天山战役后汉匈双方动态

汉武帝对汉军的战败很气愤。但对赵充国率敢死之士奋勇突围，却大加赞赏。武帝特于战后召见赵充国，亲自查看他的伤势，晋升赵充国为中郎，迁为车骑将军长史。

汉武帝就李陵投降匈奴一事问群臣的意见，大家都认为应当判李陵之罪。汉武帝又问太史令司马迁，司马迁则认为：李陵有国士之风，他以不足5000人马，与敌数万人而战，矢尽粮绝，杀敌过万，古代名将也难与其相比，不应判罪。汉武帝听罢司马迁的话，非常气愤，立即给司马迁定了宫刑之罪。我国历史上这位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就是在身受宫刑之后，完成了他永世不朽的伟大历史巨著《史记》的。

汉匈天山战役评述

汉匈天山之战是一个规模不大的战役，汉军以5万多兵马三路出击，遭遇匈奴主力，损失兵力2万多人，为汉武帝与匈奴作战以来第一次惨重的失败。汉军的失败看似偶然，实则有其必然的因素。

西汉王朝自漠南战役、漠北决战取胜后，曾处于它的武功鼎盛之时，但国力已耗损殆尽。此后，虽然与匈奴经过十六七年的休战状态，汉之国力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汉武帝又发动了对其他方向的一些战争，显然，并未达到汉武帝当政前期的强盛局面。因而，汉王朝发动天山之战，实际已处于兵不精，粮不足的状态。更可怜的是李陵率5000步

兵，仅能拨给其极少数马匹，已到了捉襟见肘的程度，这和匈奴强悍的优势骑兵集团相比，取胜的希望自然十分渺茫。

战略上轻敌，是这次战役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几路大军弧军而进，尤其是李陵军仅率步卒5000，深入匈奴单于本部地区，这样，一遇匈奴主力集团，难免不被个个击破。

李陵兵败降敌，历来是一些史学家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其实，两国交兵战败投敌，这本是无需辩驳的错误。即令是在古代的封建社会里，也是定斩不赦之罪。司马迁为李陵辩解的那些理由，引起汉武帝的震怒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但汉武帝因此而对司马迁降下宫刑之罪，实乃迁怒于人，未免失之过严，这是引起后世对司马迁深表不平的根本原因。

第十一节 汉匈余吾水南战役

一、汉匈余吾水南战役的起因

汉武帝对天山战役的失利，损失2万多兵力甚为不满，深虑彻底消灭匈奴的战略宏图久久未曾实现，到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已是汉武帝即位的第43个年头，因而，武帝决心将军队休整后，再次寻求匈奴主力决战，于是调集四路大军，准备向匈奴单于本部进击。

二、汉匈两军作战序列和作战策划

汉军

贰师将军李广利

强弩都尉路博德

游击将军韩说

因杅将军公孙敖

兵力骑兵7万、步兵14万

匈奴军

匈奴且侯单于

匈奴左贤王

兵力骑兵10万人

汉军出动21万大军，调集了全国可能出动的骑兵部队，从出动兵力的规模来看，似为几路大军会攻涿涂（邪）山地区的匈奴单于本部军。

匈奴单于得知汉大军进袭的消息后，便决定将其辎重、物资、家畜和家属等，全部转移至余吾水以北地区（今蒙古鄂尔浑河以北），且侯单于自率骑兵10万人，于余吾水南岸列阵待击，以与汉军决战。

三、汉匈余吾水南战役作战经过

汉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春，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骑兵6万、步兵7万人，由朔方郡出塞北进；以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兵1万多人，由居延北进，与贰师将军李广利军会合；以游击将军韩说率领步兵3万人，从五原出兵前进，以因杅将军公孙敖率领骑兵1万多人、步兵3万人，从雁门出塞，向匈奴境内进发。各路大军以贰师将军李广利军为

主力，进至匈奴境内后，得知匈奴单于军在余吾水南地区，便挥军前进。

匈奴且侯单于以10万大军在余吾水以南列阵，见汉军到来，即指挥兵马迎战，双方连续战斗十多天，不分胜负，贰师将军李广利不得不率军回归。

游击将军韩说所率之3万步兵，进至匈奴境内后，未遇敌人的抵抗，没有任何战果，也收兵回境。

因杆将军公孙敖所率之1万骑兵和3万步兵，与匈奴左贤王军接战后，失利，引兵而归。

第十二节 汉匈速邪乌燕然山战役

一、汉匈双方的基本形势

汉军在余吾水南战役后，由于汉武帝多年来对兄弟民族的战争，国力日益下降，社会生产力已明显减退，经济上已难以再支持大规模的战争消耗。因而，汉在余吾水南战役结束后，再没有对匈奴发动进击，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汉之国力经过7年的短暂休养生息，稍有增强。

匈奴且侯单于，在余吾水南战役后一年，即汉武帝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死去。且侯有两个儿子，长子狐鹿姑任左贤王，次子任左大将。且侯死时，遗诏立左贤王为单于。但匈奴贵族集团却认为立左大将为单于较为合适，于是改立左大将。后来左大将坚持让位给左贤王，这样狐鹿姑才即了单于位。狐鹿姑单于即位，决心与汉继续作战，而且取得了很大胜利。

二、汉匈速邪乌燕然山战役的起因

匈奴狐鹿姑单于，当政6年多以后，也即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单于派兵进袭上谷、五原杀掠吏民。不久再次陆续进袭五原、酒泉，杀了两郡的都尉，气焰嚣张，咄咄逼人。

西汉王朝连遭匈奴进攻，边境地区受害很深，汉武帝遂决心调兵遣将与匈奴作战，欲将单于主力歼灭。

三、汉匈两军作战序列

汉军

贰师将军李广利

御史大夫商丘成

重合侯莽通

兵力14万人（其中骑兵为7万至8万人）

匈奴军

狐鹿姑单于

左贤王

卫律（匈奴之贵臣）

左大将

右大都尉

李陵

左呼知王

右呼知王

大将偃渠

兵力骑兵不少于10万人

四、汉匈两军作战策划

汉军此次战役的作战目的，虽无确切史料可考，但从汉军的几路大军编成来看，仍然是以寻求匈奴主力决战为目的。为此，汉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7万人（估计其中骑兵至少3万至4万人），从五原出发北进；御史大夫商丘成率兵3万（估计为骑兵、步兵混合编成），从西河出发；重合侯莽通统率4万骑兵，由酒泉地区向北进击。各路大军仍以李广利军为主力，莽通与商丘成军似为李广利军左右两翼的保障和迂回部队。

匈奴狐鹿姑单于听到汉军三路大军北进，仍然采用以往的作战策略，将其物资、辎重、家属老弱人等，迁往赵信城以北之郅居水北岸（今蒙古色楞格河）。匈奴左贤王也将其所部迁往余吾水（今蒙古土拉河）以北600至700百里，居于兜衔山一带地区。狐鹿姑单于亲自统帅精兵布阵于姑且水（今蒙古图音河）以西，等待汉军的到达，并乘汉军疲劳之际而攻之。

五、汉匈速邪乌燕然山战役作战经过

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三月初，汉各路大军开始出征。

御史大夫商丘成率军出塞后，向西北方向进发，寻求与匈奴军作战，但未发现敌军，引军而还。这时匈奴派大将和降将李陵率3万骑追汉军，追至浚稽山地区，双方交战9天，汉军英勇奋战，陷阵破敌，杀伤匈奴军甚众。战至蒲奴水（今蒙古翕金河），匈奴军更加支持不住，便率军退走。

重合侯莽通率4万多骑兵，出酒泉1000多里，大军进至天山以北地区，攻击匈奴右部，匈奴命大将偃渠与左右呼知王率2万骑兵准备向汉军突击，见汉军兵威势众，未敢行动，率军而还，重合侯一无所得。此时，汉武帝怕车师兵截击重合侯莽通军，便派陵侯成娩率领楼兰（今新疆鄯善东）、尉犁（今新疆尉犁）、危须（今新疆焉耆东北）等六国之

兵，向车师面国进击，保障莽通军翼侧的安全，结果将车师包围击破，尽俘车师王及其吏民而归。

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7万大军出五原后，即向西北方向进军，匈奴命右大都尉与卫律率5000骑兵于夫羊句山峡阻击汉军。李广利则命属国将领率2000骑兵与其交战，匈奴兵败而逃，死伤数万人，汉军挥军追击，追至范夫人城（今蒙古南戈壁省达兰札达加德西），匈奴军皆逃匿，不敢抗拒汉军的进击。

这时，李广利妻子在长安因被控告有罪而遭监禁。李广利听此消息，甚为忧虑，想进一步北进，寻找匈奴主力作战，以求建立功勋而赎罪，于是挥军至郅居水（今蒙古色楞格河）流域一带地区。由于匈奴后方已远避郅居水以北，故李广利军未遇敌人的抵抗，李广利遂遣其护军率领2万骑兵渡过郅居水北进。这时匈奴左贤王、左大将统率2万骑兵迎击护军军，汉军与左贤王大战一天，斩杀了左大将。匈奴军死伤惨重。

李广利军长史与决眭都尉辉渠侯知道了李广利妻子被捕和李广利的心情，便商议说：“将军怀异心，欲危众求功，恐必败”。于是想把李广利抓起来。李广利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斩了长史，从郅居水回军至速邪乌燕然山。匈奴了解到汉军在郅居水北岸经过与左贤王军激战，又转移至燕然山，汉军必定疲惫不堪，遂率军急速由姑且水西岸地区北返，两军相遇于燕然山地区。匈奴军以5万骑兵猛袭汉军，经激烈交战，双方都有很大伤亡。狐鹿姑单于怕李广利军退走，于是，便利用夜间，在李广利军的前方挖掘了一道数尺深的壕沟，然后集中兵力从汉军的背后猛冲汉军阵，李广利军被冲乱溃败，李广利遂投降了匈奴，全军覆没。

历经两个月的汉匈速邪乌燕然山战役，是汉武帝在位期间，与匈奴的最后一次大战，以汉军的失败而告终。

六、汉匈双方燕然山之战后的动态

汉武帝对燕然山战役的失败异常难过，痛心地说：“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连年的战争消耗，已使国力枯竭，民怨纷起，加之其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太子被冤杀等，于是便于征和四年下了一道罪已诏，诏书中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为此，汉武帝再不派兵出征，并专门召集二千石以上的官吏，研究养马和巩固边防的政策等重大问题，还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其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富民强兵的意图。

匈奴对贰师将军李广利的投降十分欣喜，素知李广利是汉之大将，即以狐鹿姑单于女儿嫁与李广利为妻，不久，李广利便被匈奴杀死，这个降奴的生命便到此结束。

燕然山战役的胜利，使匈奴骄横之气顿起，匈奴狐鹿姑单于派遣使者至汉下书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

自烦。今欲与汉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汉对匈奴这一傲慢态度和要求，断然拒绝。

汉匈燕然山战役评述

汉匈燕然山战役，是汉武帝当政期间，与匈奴的最后一次大战。汉以14万大军，败在匈奴手下，主力集团李广利军10万之众，全军覆灭，成为武帝对匈奴用兵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

燕然山之战的失败，与天山战役失败的原因几乎完全一致，形同天山战役失败教训的重现。它既标志着西汉国力的连续衰退和战争实力的下降；也又一次显示了西汉末期战略指挥上的失当，14万大军分路出击，未做周密的协调，力量分散，终于被匈奴击败。

这次战役实际上李广利是全军最高统帅，做为独当一面的战场最高决策者的指挥水平，将直接决定着战场上的胜败结局。从天山战役到燕然山战役，都充分证明了贰师将军李广利战役指挥上的低能。而这样一个缺乏统帅才能之辈，却每次都充当了对匈奴作战的主帅，这说明了汉武帝在失去了霍去病、卫青之后已无可用的征战之将，将才之匮乏，已到了捉襟见肘的程度。

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有感于汉武帝后期对匈奴作战的失利时写道：“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司马迁的连连叹惜，确实击中了汉武帝后期缺乏贤相良将的要害。

当然，燕然山战役的失利，并不标志着西汉王朝对匈奴战争的全面失败，更不说明在战略全局上西汉已处于劣势地位，相反，西汉王朝对匈奴战争终究是要取得胜利的。因为这是一场统一中国的进步战争，它顺应着历史发展的潮流，激励着吏民对匈奴作战的积极奋进英勇献身的精神，这是西汉对匈奴战争制胜最根本的因素。汉武帝在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的诏书中说：“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这场统一中国北方地区的神圣战争，尽管消耗了西汉王朝巨大的人力、物力，加之燕然山战役李广利军的全军覆没，汉武帝受到强大的舆论压力，使西汉王朝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对匈奴的进击，并非统一战争的夭折。

第十三节 西汉中期

与匈奴争夺西域地区之作战汉武帝时期，为斩断匈奴的右臂，统一我国的西域地区，与匈奴奴隶主集团支持的分裂势力作了长期斗争，为此，也于西域地区进行了一些大小规模不等的战争。

一、西汉时期西域的概况

西域地区诸国的情况，本书在第一章中已做了梗概的叙述。西域的三十六国，后又分为五十多国，大小不一，国力强弱相差悬殊，其中大国拥有人口几十万人，兵甲达数万。小的只有几百人，拥兵也只有百人左右。这些国家的大致分布：在今准噶尔盆地，阿尔泰山至天山以北地区的有乌孙、东西且弥、单桓、蒲类、卑陆、乌贪訾离、车师后国、车师后城长国、蒲类后国等国家，在天山以南至昆仑山以北，塔里木盆地周边的有疏勒、焉誉、龟兹、捐毒、姑墨、温宿、尉犁、乌垒、渠犁、山国、危须、车师、莎车、尉头、且末、小宛、鄯善、羌、精绝、蒲犁、依耐、皮山、乌、无雷、于阗、弥、渠勒、戎卢等国家。

从玉门关至西域，有两条主要通道：一条经过鄯善（楼兰），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地区，称为南道，沿南道过了葱岭，可达中亚地区的大月氏、安息等国；一条经过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向西到疏勒，叫做北道，沿北道越葱岭，可至大宛、康居、奄蔡等国。因而西域地区的国家，又以南道和北道而分为南道诸国和北道诸国。北道诸国分布于今塔里木河以北地区，其中较大的国家为焉耆（今新疆焉耆地区）、龟兹（今新疆库车地区）、车师（今新疆吐鲁番一带）等；南道诸国分布于今昆仑山以北和塔里木盆地南沿之间，其中较大的国家有楼兰（今新疆罗布泊以西地区）、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莎车（今新疆莎车地区）、无雷（大部在今克什米尔地区）。

西域诸国的军队，几乎全部是骑兵，长于骑射，勇猛善战。匈奴在冒顿单于当政时期，也就是公元前二世纪初，冒顿派兵征服了西域诸国。匈奴为长期霸占和统治西域地区，于北道的焉誉、危须、尉犁地区，设立了僮仆都尉，逼迫西域诸国交纳赋税，供养军队，使西域诸国成为其向西汉王朝进攻的战略基地，这无疑对西汉王朝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二、西汉中期通使西域的斗争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从匈奴人中获悉，于今甘肃敦煌、祁连山地区生活的大月氏部族，在遭到匈奴进攻后，被迫背井离乡向西方迁移。但月氏人时刻欲向匈奴进击，以夺回他们的家园，然而由于力量不足，一直未敢行动。汉为消灭匈奴势力，斩断匈奴右臂，汉武帝便派了张骞出使西域，前往大月氏国，以便与大月氏结成联盟，前

后夹击匈奴在河西一带的右部部落。张骞受命出使后，不幸在途中被匈奴抓获，被匈奴扣押了十多年。后来，张骞利用机会逃脱，越过了葱岭，先后到达了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上游一带地区）、康居（今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地区），最后终于到了大月氏（今阿姆河中游，主要地区在阿富汗境内）。这里本是大夏国的故地，大月氏当初迁移至此地时，即定居于大夏国。这时大月氏王已为匈奴所杀，由大月氏王夫人当政，生活安定，百姓富裕，因而，无心再东返与匈奴作战。张骞只得返回，途中又被匈奴抓获，一年之后才逃回长安。这样，汉武帝第一次通使西域，欲联合西域的力量向匈奴进攻的战略企图便未能实现。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匈漠北战役后，匈奴单于虽然率部向漠北远去，但却仍能依靠西域诸国的力量，阻止西汉王朝统一中国西方、北方和西北方。这时张骞向汉武帝建议再次出使西域，联络乌孙国，以击败匈奴右部势力。

乌孙本来与大月氏同在敦煌、祁连山一带地区居住，汉文帝时期，大月氏被匈奴击败后，第一次西迁时，即迁居于塞地（今伊克塞湖至新疆伊宁、温泉、精河一带地区），塞王所部被迫南迁。后来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再西迁至大夏（今阿富汗）地区，乌孙便定居于塞地，乌孙此时已有12万户，63万多人，过着随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因而，张骞向汉武帝建议说："乌孙很思念故地，又非常喜爱汉财物，如若这个时候我们派人携带重礼，前往联络乌孙，让他们迁回东方定居，并以汉公主嫁给乌孙昆莫，结为兄弟之邦，则昆莫必定听从汉朝的指挥，这样就可以真正斩断匈奴右臂"。汉武帝同意了张骞的建议，张骞为中郎将，率领300人，牛羊数万，金币丝绸巨万，前往西域。

张骞到达西域进至乌孙，不巧乌孙内乱，不想东迁，联络乌孙东迁的目的遂未达到。但张骞借出使乌孙的时机，派出他的副使，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促进了汉王朝与这些国家的联系，从此，天山南北便成为汉通往西域的重要通道。

三、汉攻鄯善（楼兰）、姑师（车师）之战

姑师（即车师）位于今准噶尔盆地的东边缘。今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的准噶尔盆地，是一个水草丰茂的游牧地区，从东方进入盆地的通道，由车师控制着。郑善国，原名楼兰，国都在泥城，离阳关1600里，全国有14100多人，胜兵2900多人。由于楼兰、姑师等国处于汉通大宛等国之要道上，汉使者经常过楼兰、姑师等国，引起这些国家的厌烦，楼兰便出兵攻劫了汉使者王恢等，并多次充当匈奴人的耳目，给匈奴军提供袭击汉军的情报。汉使者因而向汉武帝进言说，楼兰兵弱易击，于是汉武帝命从骠侯赵破奴率领属国兵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因数次为楼兰所苦，汉武帝便命王恢为赵破奴军的副将。王恢率轻骑700，先攻入楼兰国泥城，接着赵破奴军击破姑师。汉武帝遂封赵破奴为浞野侯，王恢为浩侯。汉随即修建亭障至玉门关，自此，楼兰臣服于汉。

匈奴得知楼兰臣服于汉的消息后，非常气愤，也发兵击楼兰。楼兰王无奈，只好让一个儿子去匈奴为质，一个儿子入汉朝为质。后来，当贰师将军李广利进击大宛回军时，匈奴欲截击李广利军，见李广利兵威正盛而作罢，但却派人命楼兰王将汉军后卫部队截住。当时汉军正任文率军屯卫玉门关，专门负责保障李广利军后卫的安全，任文从抓获的匈奴俘虏中得知了楼兰王受领匈奴截击李广利军后卫的任务，便上报了汉武帝，武帝因而命任文回师时顺路捕获楼兰王。楼兰王向汉诉苦说："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入居汉地。"汉王朝体谅小国的处境，放回了楼兰王。

汉武帝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楼兰王死去，因在汉为人质的楼兰王之子犯法，受宫刑，而不能返国就王位，楼兰改他人为王，不久又死去。匈奴得知消息，便抢先把楼兰王派入匈奴为质的儿子送回楼兰，继承了王位。自此，楼兰便倒向了匈奴，并数度劫杀汉朝的使者。

四、西汉进击大宛国之战

大宛国有30万人，胜兵6万，它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相接。大宛拥有别邑70余城，出产善（良）马，相传这些马皆为汗血马。

最初汉派使者携带千金及财物，以换取大宛的善马。宛王觉得汉距大宛很远，不可能发兵攻打大宛，不但不给善马，还以汉使者侮辱宛王，而杀了汉使。于是汉武帝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6000骑兵及郡国数万人，前往大宛以兵威取良马。李广利军路过沿途一些小国时，各国皆闭城坚守，不供应汉军饮食。于是，贰师军只好过一城打一城，凡打下城邑者，均可获得食物，有的城坚兵众，攻击数日不下，只得引军而走。李广利军至郁成城，只剩几千人，士卒饥饿疲惫，攻不下该城，伤亡惨重。李广利与左右商议说，一个小小的郁成城都攻克不了，何况大宛的王都，恐怕更难攻打了，不如引军回国。这样，李广利遂率军而归。李广利军来去共经两年之久，士卒仅剩了十分之一二。李广利到达敦煌后，派使者向汉武帝请示说："去大宛太远，沿途食物奇缺，士兵们不怕作战，最怕挨饿。而且我人马太少，请暂且罢兵，待调拨大军以后，再去攻打大宛。"汉武帝听后大怒，派使者急至玉门关，下诏说："军有敢入，斩之。"李广利惊恐，只好屯兵敦煌。

汉王朝认为，汉既出兵攻大宛小国，尚不能下，那么西域诸国就会更加轻视汉了，这样，大宛就绝对不会给我善马。因而，必须再次伐宛。

于是，汉武帝决定：赦免一些囚徒从军、发恶少年及郡骑兵共6万人。

此外，加上大量自愿随军去大宛的人，共计约10万之众，驱赶牛10万头、马3万匹，浩浩荡荡出敦煌向西进发。

贰师将军李广利所率之军，兵威势众，沿途所过之小国，莫不开城相迎，供给汉军食用。行至轮台（今新疆轮台），轮台守军闭门不出，李广利命令部队攻轮台城，数日攻克，尽屠全城。自此再往西行，无人敢于抗拒，顺利进至大宛国。汉军先头部队3万人进入大宛境后，大宛军迎击汉军，被李广利军击败，宛军退保宛城。随之，李广利欲进击郁成城。但由于上次在郁成城作战的失利，深知郁成城城坚难攻，这次假如再行攻打该城，难免又遭顿挫，一旦贻误战机，大宛国又会施展阴谋诡计，陷汉军于不利的境地。于是，李广利军决定舍弃郁成城而不顾，大军直发宛都贵山城（约在今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纳曼干附近地区）。

李广利军进抵贵山城后，因见当地水源奇缺，遂截断贵山城之水源，以大军将贵山城团团包围，攻城40多天未克。这时，大宛贵人见汉军军威正盛，攻城益猛，怕城破被杀，便互相密议说："汉所以派大军攻宛，完全是宛王毋寡惹的祸，他拒绝给汉善马，杀掠汉使者。我们只要杀掉宛王，给汉善马，汉军就会解围。如果汉军仍不解围，我们再决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也未为晚。"宛贵人都赞同这个意见，于是杀掉宛王。

这时，贵山城的外城已被汉军攻破，汉军正拥入攻内城。宛贵人将军煎靡被汉军捕获，然后又放其归城。煎靡入城后和贵人们商议说，汉军所以攻宛，目的在于擒杀宛王毋寡。现在，我们将毋寡人头送至汉营，并与汉贰师将军讲明："如果汉军停止攻城，我尽出善马，任汉军挑选，并供给汉军食用。假如汉军不答应，我尽杀善马，而且康居国的救兵即将到来，那个时候，宛军在内，康居之军在外，内外夹攻汉军，汉军必定灭亡，请汉军决定去从。"

这时，康居的侦察人员看到汉军强盛，不敢向汉军进击。但宛京城中有汉人会打井，且城内食物充足。为此，李广利与部下将领商议说，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攻杀宛王，现宛已交出宛王之头，如果我们不答应他们解围的要求，他们就会继续坚守，当我们兵疲粮尽之时，康居军就会前来救宛，我们必被敌人攻破。于是，众将皆同意贰师将军的主张，遂停止攻宛。

大宛见汉军解围，即赶出善马，任汉军挑选，并供给汉军大量军食物资。汉军立过去与汉亲善的宛贵人昧蔡为宛王，然后回师东归。

当初，在李广利率10万大军向西进发时，考虑到人数众多，沿途小国难以全部负担汉军的食用，便分数路前进。校尉王申生，故鸿胪壶充国等率千余人至郁成，该城守军拒绝供给汉军食物。这时，申生军已离大军200里，郁成守军侦知汉军兵少势孤，乘天刚拂晓，以3000兵马突袭王申生军，申生军全军覆灭，只剩数人逃至贰师将军营内。李广利遂命搜粟都尉上官桀率兵攻郁成，郁成被上官桀军攻破。郁成王逃往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知道汉军已攻破大宛国，遂主动献出郁成王，上官桀命4骑士将其押往贰师将军本部，上骑士赵弟拔剑击斩了郁成王。

汉武帝对伐大宛的胜利，十分欣慰，虽然汉军由于一些将领侵暴士

卒，使汉军遭到很大损失，但汉武帝不追究贰师之罪，反而下诏嘉奖伐宛之师。封李广利为海西侯、食邑八千户，封斩杀郁成王的赵弟为新侯，军正赵始成战功最多，封光禄大夫。上官桀率军追郁成王至康居，为少府，李哆献计献策有功，为上党太守，全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余人，千石以下千余人。

五、汉匈争夺乌孙的斗争

当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到达乌孙后，见了乌孙昆莫，说明了来意。乌孙一方面由于自己内部有些动乱，国家一分为三；一方面由于其距汉遥远，不知汉朝之大小，加之它距匈奴又近，臣服匈奴已多年，其大臣皆不欲东迁。于是便奉送一些马匹，遣人陪张骞返国。使者返回向昆莫报告了汉之地广人多，繁荣强盛之情况后，乌孙才日益重视与汉朝的往来。

匈奴得知乌孙与汉通好，大怒，想发兵进击乌孙。乌孙怕遭匈奴攻击，于是又遣使向汉献马，并请求以汉公主为妻，汉武帝答应，随即于元封年间，遣江都王建之女细君为公主，嫁乌孙。乌孙昆莫立为右夫人，匈奴也嫁其女给昆莫为左夫人，乌孙国遂摇摆于汉匈两大国之间。

六、汉征车师之战

车师国分为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城长国。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以匈奴降将介和王为开陵侯，率领楼兰国兵击车师，匈奴以右贤王将数万骑前往救援，汉军不利，遂引军归。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命重合侯莽通率4万骑兵击匈奴，路经车师北，汉武帝又遣使率楼兰、尉犁、危须等6国兵进击车师，6国兵包围车师，车师王降服，车师国臣服于汉。

西汉中期与匈奴争夺西域地区作战评述

汉武帝时期与匈奴争夺西域地区之作战，既是斩断匈奴右臂，彻底孤立匈奴的战争，也是汉武帝统一中国西北地区战略宏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匈奴为了保住自己在西域地区的势力，千方百计地阻止汉王朝通西域的行动。但汉武帝以其深远的战略眼光和求中国统一的宏图大略，在与匈奴作战的同时，不断向西域地区通使、进击，堪称名垂千秋的重大历史功绩。

汉武帝对西域地区的基本战略与策略思想，是重点打击顽固势力，争取中间力量，恩威并加，交替运用。车师、楼兰等国与匈奴勾结最紧，汉武帝便屡次派兵征伐。大月氏、乌孙等国受匈奴的影响不大，便两次派张骞出使，游说诸国与汉通好，以断绝与匈奴的联系，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派兵攻伐大宛。这一战略和策略思想，无疑，是当时最恰当的政策。这使西汉王朝扬威西域远近诸国，为后世西域地区最终统一于中国中央政权之下，做了开创性的贡献。

张骞通西域不但具有重要军事战略意义，而且更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自从开通西域与汉王朝交流的途径之后，汉族人民的先进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先进技术与生产经验，源源不断地传入西域及其以西的广大地区，同时西域地区的人民也把当地的文化、经济与生产技术的成果，传入中原地区。由于这样不断地交流，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中原和西域地区的经济发展。张骞以他个人坚毅果敢、忠贞不渝的品德，两次完成了出使西域的使命，赢得了后世的敬仰。

第十四节 西汉中期统一中国南方地区之作战

一、中国南方地区之概况

秦始皇并灭六国之后，虽然也派出大军向中国之南方、东南、西南地区进军，统一了一些地区，并建立了相应的政权机构，但很不稳固。秦末和楚汉相争时期，有些地区即叛离了中央，南中国的东南和西南地区，先后出现了几个越族部族割据政权。其中有南越（今广东、广西等地区）、闽越（今福建地区）、东瓯（今浙江地区）。刘邦建立西汉政权之初，由于忙于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和恢复战争的创伤，无力南下，只好对这些地区的部族政权采取妥协政策，“剖符通使”。

今中国的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地区，当时有许多少数民族，被统称为“西南夷”。这些都族到了西汉中期，发展仍很不平衡，有的进入了阶级社会，有的还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时期。其中绝大多数部族，严格地说，并未形成真正的国家。它们的情况，本书在第一章中已作了概述，其大致分布是，在今贵州省之遵义、桐梓一带地区为夜郎国；在今云南昆明一带地区为滇国；云南大理一带有昆明部落，在今四川西昌附近地区为邛都，西昌以西地区有巂；四川汉源一带地区属都，四川汶川、茂汶县一带为冉，四川天全一带地区为徙部落；在今甘肃成县一带为白马部落，这些都是居于以上地区较大的国家和部落。除此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小部族和小部落、散居于上述地区。

二、统一闽越地区之作战经过

秦始皇统一岭南地区后，设置了郡县。秦末农民起义战争中，闽越首领无诸率军与东瓯首领摇率领的东瓯部族均参加了反秦战争。楚汉战争期间，他们又投向刘邦，战胜了项羽。因而，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封无诸为闽越王，定都于东冶（今福建福州地区）；封摇为东海王，定都于东瓯（今浙江温州地区）。

汉景帝时期，东瓯追随吴国，参与了七王之乱。吴越联军战败，吴王刘濞逃匿于东瓯，被东瓯诱杀于丹徒。刘濞之子驹逃至闽越，游说闽越出兵进攻东瓯，以报其杀父之仇。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秋七月，闽越出兵包围了东瓯，东瓯紧急向西汉求救。汉武帝问太尉田的意见，田说：“越人相攻击，固其常，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庄助坚决反对田的意见，认为小国危急而不救，“又何以子万国乎。”汉武帝同意庄助的主张，遂遣中大夫庄助持节发会稽兵，由海上往救，进击闽越。庄助持节至会稽后，会稽太守等以庄助未带兵符为由，想拒绝发兵。庄助立即将会稽一司马斩首，并重申了汉武帝的旨意，会稽太守才同意发兵。闽越王闻汉兵来攻，未等汉军到达，即撤兵而归，汉军也随之罢兵。后来，东瓯向汉朝廷请求将其吏民迁居于长江、淮河之间地区，这样，东瓯便从此安定下来。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秋，八月，闽越王郢发兵进攻南越，南越向西汉王朝告急，汉武帝遂命大行王恢、大农令韩安国率军出会稽，前往救援。闽越王郢率兵抗拒汉军，闽越王弟余善与其相宗族商议认为：汉军强大，兵多将广，这次前来，我们不能抗击，即是我们侥幸取胜，汉大军会源源而来，一定能灭亡我们，不如杀了郢，回报朝廷，朝廷必然罢兵，可以保证国家不致灭亡。众人一致赞同，于是，斩杀了闽越王郢，将郢之首级交大行王恢，大行驰报汉武帝，武帝诏命王恢等撤军。汉武帝封原闽越王无诸之孙丑为越繇王，后又封余善为东越王。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丞相吕嘉起兵叛汉，余善暗中勾结吕嘉，并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公开叛乱，自立为武帝，遂即以驺力为吞汉将军，进袭白沙、武林、梅岭等地，杀汉三校尉，一时间气焰十分嚣张。汉军大司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屯兵不进，不敢进击余善军。于是，汉武帝遣横海将军韩说率军出豫章，从海上出兵进袭；以楼船将军杨仆率军出武林，中尉王温舒率军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汉军攻入东越，余善使徇北将军守武林，击败楼船将军数校尉，杀长史。楼船军士卒钱圹终古斩杀了徇北将军。

故越衍侯吴阳原居住在汉，余善叛乱后，汉命其返东越，劝说余善，余善不听。横海将军率军至东越时，吴阳也率领其邑700人向余善军进攻。越繇王居股等，起而杀了余善，余善的叛乱遂被平定。

汉武帝为表彰平定余善有功将士，封居股为东成侯，食邑万户；封吴阳为卯石侯；封横海将军韩说为按道侯，其余有功将校皆得到封赏。

三、统一南越地区之作战

一、南越地区之变迁

原秦代南海郡尉赵佗，乘秦朝灭亡和楚汉战争之机，割据南海、桂林、象郡自称南越武王，统辖今广东、广西及现越南之北部地区，纵横数千里。汉高祖刘邦当政期间，曾安抚统一了这一地区。吕后当政时期，赵佗又自立为南越武帝，这是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的事。

汉文帝即位后，为招抚赵佗，做了许多工作，派人修茸赵佗老家真定的祖坟，并以专人看守，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然后，即遣曾在汉高祖刘邦时期出使南越的陆贾为太中大夫，前往南越劝说赵佗放弃帝号，臣服于汉。赵佗遂放弃了帝位，改称南越王。

赵佗于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死去，其孙赵胡为南越王。当闽越王郢率兵进袭南越时，赵胡即上书汉武帝说：“两越皆为藩臣，不应当举兵互相攻击，现闽越兴兵向臣进攻，我不敢擅自兴兵回击，等候天子的诏命。”汉武帝兴兵平定了闽越王郢后，便派严助去南越

告知赵胡，赵胡表示万分感激，遂以太子婴齐入汉为质。赵胡并想亲自去京师朝见汉武帝。后来，由于南越诸大臣都反对赵胡亲自去汉，怕有去无还，因此，赵胡称病未去汉。赵胡死后，汉让太子婴齐即回归南越，继承了南越王位。婴齐即位后，即上书汉武帝，请求立樛氏女为后，以樛氏所生之子兴为太子。婴齐死后，太子兴便即了南越王位。

二、统一南越的策略

氏在未嫁婴齐为妻前，常与霸陵安国人少季通奸。汉武帝便想利用少季与氏之关系，派少季前往南越，劝说王太后和子兴继续臣服于汉，并以卫尉路博德率兵屯于桂阳，以助少季入越之威。

少季到达南越后，经数次劝说，南越王子兴及王太后均同意内附于汉，商议已定，即上书汉武帝，南越愿意内附，三岁一朝贡。汉武帝当即应允，赐丞相吕嘉相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其余官吏由南越王自行任免。南越王子兴、王太后命令为其准备入朝京师的行装。

南越相吕嘉，曾为南越三世王之丞相，其宗族势力极为强大，70多人为重要官吏，儿女也多与王室有姻亲关系，越人多亲信和依附于吕嘉，威望在越王子兴之上。当子兴同意内附汉朝，向汉武帝上书时，吕嘉数次劝说子兴不要内附，子兴不听。这样，吕嘉遂起叛心，数度称病不会见汉朝使者。越王子兴和王太后怕吕嘉发动叛乱，想借汉使者的权威，诱杀吕嘉。于是，设宴请汉使者、吕嘉、众大臣赴宴。宴席间，太后首先发难，责问吕嘉，借以激怒使者说：“南越内属，国之利也，而相君若不便者，何也？”吕嘉赴宴之前，已命其弟率兵守候于王宫之外。这时，吕嘉见形势不妙，遂即离席而去，汉使者未敢发令诛杀吕嘉。王太后怒，欲下令徒杀吕嘉，越王手兴劝止了太后，吕嘉终于脱身回府，遂决计与大臣阴谋作乱叛汉。但吕嘉知道南越王子兴不愿意杀他，等待几个月迟迟没有起兵。王太后想独自杀吕嘉，吕嘉防范甚严，没有机会，故双方形成僵局。

汉武帝得知这种僵持局面后，考虑到南越王、王太后势力微弱，使者又怯懦无能，但毕竟王和王太后已同意附汉，只有一个吕嘉为乱，用不着兴师动众前去征讨。便欲派庄参率领2000人马出使南越，用意欲在于为王和王太后助威，并借以威吓吕嘉。但庄参却回奏武帝说：“以好往，数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无足以为也。”汉武帝见庄参托词不去，而罢参。故济北相壮士韩千秋挺身而出，激昂慷慨地说：“以区区之越，又有王、太后应，独相吕嘉为害，愿得勇士二百人，必斩嘉以报。”于是，汉武帝遂命韩千秋与王太后弟乐率2000人前去南越。

三、统一南越的前哨战

韩千秋和乐率兵进入越境后，吕嘉即开始起兵反叛，公开发布声讨南越王太后的檄文，随即与其弟率兵攻杀了南越王子兴和王太后以及汉使者，立婴齐越族妻子所生之子赵建德为新南越王。

韩千秋等率军攻破南越数小邑，吕嘉即命沿途供给汉军食物，放其南下。韩千秋军直奔番禺（今广东广州）而来，待韩千秋等行至距番禺40里时，吕嘉军突然包围了韩千秋军，并将韩千秋军歼灭。

汉武帝得知韩千秋等被吕嘉杀害后，遂下诏说：“韩千秋虽无成功，亦军锋之冠。”遂封韩千秋子延年为成安侯。因乐之姐为王太后，极力主张内附于汉，封乐之子广德为龙亢侯。汉武帝于是决心“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汉武帝统一南越之战，即将展开。

四、汉军统一南越地区作战序列

统帅伏波将军路博德

楼船将军杨仆

归义越侯二人（均为南越降将）

驰义侯遗（为越降将）

总兵力10万人

五、汉军南越双方作战策划

汉军向南越进军时，正是汉武帝对匈奴作战节节胜利，并想进一步威逼匈奴降伏之时。此时，汉武帝统一中国北方地区的战略宏图正在顺利实现之中。因而，汉对南越的作战，也充分显示了汉武帝欲一举统一南越地区的坚强决心，故以四路大军会攻南越。

以卫尉路博德率主力，兵出桂阳（今广东连县地区），下汇水；

以主爵都尉杨仆兵出豫章（今江西南昌地区），下横浦；越归义侯率军出塞陵（今湖南零陵），同时下漓水，兵至苍梧（今广西梧州）；

命驰义侯遗以巴蜀罪人为军，并发夜郎兵，沿柯江进发，与路博德军会师番禺。

这样，汉军就由东北、北面、西北三个方向，利用今湘江、赣江、漓水、西江等水道向番禺进击，造成了强大的多路攻势。

南越相吕嘉得知汉军进袭的消息，以为汉军会以陆路进入越境，故只对今湖南、广西、江西与广东交界的一些山岭关隘加强了防守兵力，欲阻止汉军由陆路的进袭。

六、汉统一南越地区的作战经过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汉王朝下令各路大军开始出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楼船将军杨仆所率之军，首先攻克

了寻狭（今广东韶关曲江至番禺以北地区），楼船将军所率之数万人，齐集番禺之北，等待伏波将军路博德的到达。

路博德军一部由罪人编成，而且路途遥远，其先头只有1000多人与楼船将军杨仆军会师，两军会师后，随即向番禺攻击前进，迅速进至番禺城下。

此时，南越王赵建德和丞相吕嘉见汉军势众，无力阻挡，便退据城内，闭城坚守。楼船将军杨仆所率之军，从东南面包围了番禺，伏波将军路博德军也陆续到达，从西北面包围了番禺城，准备对番禺发动攻击。黄昏之后，杨仆军首先击败越守军，纵火烧城。路博德军在围攻番禺的同时，即派人招降吕嘉军。越军素闻伏波将军路博德的成名，黄昏之时，又不知路博德军多少，更不敢顽抗，纷纷投降汉军，天尚未明，城中的越军皆向汉军降服。吕嘉与赵建德等知道不是汉军的对手，趁夜暗率数百人乘船逃入海中。

路博德经询问南越贵人，得知了吕嘉等人的下落，立即派人追捕，南越校尉司马苏弘，引汉军抓获南越王赵建德，南越之郎官引汉军抓获了吕嘉。

苍梧王赵光与吕嘉关系很好，吕嘉反叛时，苍梧王也是依靠的力量之一。当苍梧王等得知汉军向越进军的消息后，即自行归降汉朝。与此同时，揭阳令史定、桂林监居翁等也归降于汉。居翁并派使者转告瓯骆（今越南北部地区）降汉，瓯骆遂也内属。

至此，汉统一南越地区的作战，遂宣告结束。

七、汉统一南越后的措施

苍梧王赵光因主动降汉，被封为随桃侯；揭阳令史定被封为安道侯，桂林监居翁被封为湘城侯，楼船将军杨仆封将果侯。

汉王朝为彻底根除南越地区重新出现割据局面的基础，将南越地区划分为九个郡，分设郡守加以治理，这九个郡是：

南海郡（郡治在番禺，今广东大部分地区）；郁林郡（郡治在布山，今广西桂平西）；合浦郡（郡治在合浦，今广西合浦境）；珠崖郡（郡治在都，今海南琼山东南）；苍梧郡（郡治在广信，今广西梧州）；儋耳郡（郡治在今海南儋县境）；交趾郡（郡治在今越南河内西）；九真郡（郡治在今越南清化附近）；日南郡（郡治在越南广治北）。

四、汉统一西南地区之作战

西南地区，历来居住的众多少数民族被称为西南夷，其散居的地区主要为今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及南部，云南、贵州一带。据《史记·西南

夷列传》记载，战国时期，楚国将军庄率军沿沅水向西略地，庄长途跋涉经夜郎至滇池，庄发现滇池附近土地平坦、肥沃，遂征服了当地的土著氏族，欲派人归报楚王。但不巧正值秦军向黔中地区进军，归路被秦军截断，庄便带领全军留居于滇地，做了滇国之王。

西汉王朝建立后，巴蜀一带地区的商人与西南地区的商人互相通商换物，西南地区出产的马、牦牛等，常常运至巴蜀，巴蜀的铁制器具和其他商品也不断输入西南地区。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大行王恢率军进击东越时，番阳令唐蒙因告知南越汉军进击东越的消息时，发现了南越地区有蜀地出产的枸酱，进而探明从巴蜀经西南夷地区可以到达南越。因之，他后来向武帝提出了发夜郎兵，沿柯江迂回南越的建议。汉武帝采纳了唐蒙的建议，命唐蒙为中郎将，率领千余人，并以1万多人驾辎重车辆，满载食物礼品，从巴蜀关进至夜郎。唐蒙见了夜郎侯多同，赐以厚礼，告之汉王朝的强大富饶，夜郎侯及其周围小国遂臣服于汉。不久，汉在巴蜀以南设立了犍为郡（今四川宜宾西南），随即发巴蜀士卒修筑自棘道通向柯江的山路。后来，武帝再派司马相如深入至邛、、冉咙一些部族居住区，在那里设置了10余个县，任命一都尉镇抚。后因进入这些地区的道路不通，一些夷族部落数度反叛，汉派兵征伐，士卒病死者众多。汉武帝为集中兵力对付匈奴，遂不再出兵西南夷。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发夜郎兵，配合伏波将军路博德军会攻南越时，且兰（今贵州贵阳附近）君怕国内兵被汉征调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于是，汉军便以中郎将郭昌、卫广率击南越之军八校尉进击且兰，斩杀且兰吏民数万人，平定了南夷，将该地区设为柯郡（郡治在今贵州黄平附近）。汉军在平定且兰后，随即转兵进攻邛、等部族，斩杀了邛君、侯。夜郎侯、冉皆惊恐，夜郎侯遂入朝称臣，被封为夜郎王。这样汉王朝便以邛都为越嶲郡（郡治在今四川雅安南），冉为汶山郡（郡治在今四川茂汶北），白马为武都郡（郡治在今甘肃成县境）。

汉灭上述诸夷后，汉武帝随即命王然于出使滇国，命滇王臣服于汉。滇王与其东北之劳深、靡莫均为同姓之国，因而，联合起来拒绝降汉。劳深、靡莫还数次侵犯汉使者和吏卒，气焰很盛。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发巴蜀兵首先击灭了劳深、靡莫两国，接着兵临滇都，滇王才举国臣服，被封为滇王，汉遂将滇地改为益州郡（郡治在今云南晋宁）。

至此，整个西南夷地区遂告统一，实现了汉武帝统一西南地区的战略意图。

西汉中期统一中国南方地区作战评述

中国南方广大地区，包括东南、南越、西南夷所散居的今云、贵、川、甘南一带，虽然远在战国时期和秦代，有些已被中央政权所统一，

但这种统一远远没有巩固，处于若即若离、时附时叛的状态，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使众多的少数兄弟民族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狭小天地。

汉武帝以他坚毅果敢的战略决心和统一中国的雄才大略，终于使南中国的广大地区归于一统，为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进一步的形成与发展，立下了不朽的伟大历史功勋。

汉武帝统一西南夷和北征匈奴统一中国北方，以及进兵西域的一连串作战行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汉武帝因此而成为我国历史上倍受后人尊敬的英武刚毅、奋进不息的一代雄君。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如果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是摧枯拉朽、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动力；那么，对封建社会时期帝王将相领导的国家统一战争，也应理所当然的看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可是后世一些史学家，特别是一些文人墨客，却若明若暗地指责汉武帝“穷兵赎武”。显然，这对汉武帝推行的统一战争，远非是公正的结论。任何一位具有战略头脑的人都清楚，进行规模如此巨大的统一战争，不付出相当高昂的社会代价，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应当说，中国秋海棠叶形的领土疆域的线条，是在汉武帝时期才勾划出了相当一部分轮廓。看到这个最根本之点，不能不使人们对汉武帝这位伟大历史人物，油然而生敬意。

第四章 西汉后期对兄弟民族的战争

西汉后期对兄弟民族的战争，可上推至昭帝，下延至西汉末年，主要仍为对匈奴部族之作战，其次则为对西域和西南夷地区的战争。这些战争是西汉王朝统一中国的继续，西汉在这些战争中皆采取战略进攻的方针，积极主动，连战连胜。其经历的主要战役如下：

汉袭击匈奴战略纵深的大决战此战役发生于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正月至四月，历时3个月。匈奴正值壶衍单于当政时期，汉以骑兵16万，联合乌孙5万骑兵，向匈奴纵深进击，未遇匈奴主力，汉军无功而归，乌孙斩获匈奴军3.9万多人。

汉平定羌族部落叛乱的作战发生在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四月。汉军统帅赵充国，在统率大军与先零羌等反动首领发动的叛乱作战中，通过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胜利地平定了诸羌的叛乱。

匈汉郅支战役发生于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冬。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统率4万骑兵，分南北两路向郅支单于盘踞的郅支城进攻，一举将北匈奴郅支单于部消灭。

汉征乌桓之作战汉以度辽将军范明友，率军2万，欲进击匈奴军。但匈奴军先已逃走，范明友便转兵进击乌桓，将乌桓军击破。

汉征龟兹之战发生于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夏，汉长罗侯常惠，调集西域诸国之军5万人，进攻龟兹，龟兹王惧，亲见常惠谢罪臣服，常惠遂罢兵。

汉征车师、焉耆之作战发生于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和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夏。汉征车师先后经两次作战，使车师臣服，但后来又为匈奴所占。新莽天凤二年至三年（公元15至16年），派五威将军王骏，率军攻焉耆，汉军被焉耆军歼灭。

第一节 西汉后期的社会状况

一、兴盛殷富的昭宣中兴

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执政的晚年，由于战争巨大的长期消耗和大规模的“大事兴作”、巡游天下，致使府库空虚，民穷财尽，阶级矛盾加剧，农民暴动时有发生。加之一些意外事件的出现，诸如“巫蛊之祸”中太子含冤而死，对匈奴战争的连续失利，贰师将军李广利的投敌叛汉等，使汉武帝认识到全国面临的严重政治局势，因而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也即汉武帝逝世的前两年下达的《罪已诏》中，特别强调了严禁苛暴、恢复农业生产、减轻百姓赋役，表达了他力图使国富民强的殷切期望。汉武帝于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逝世。逝世前两天，他立皇子弗陵为皇太子，随后又任命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汉武帝死后，汉昭帝即位时年仅8岁，一切朝政皆由霍光辅佐。车骑将军金日殚、左将军上官桀为副，协助霍光秉政。霍光推行的政策是武帝晚年政策的继续，重视农业生产，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这一基本国策，贯彻于昭、宣两代皇帝的始终。

昭帝和宣帝时期，推行立本于农，“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长期坚持，不断完善，因而使西汉的经济日渐得到复苏，多年的战争创伤也得到恢复，西汉的经济实力和战争潜力有了进一步增强。

昭帝和宣帝对吏治也很重视。霍光辅佐期间和昭帝、宣帝当政后，特别重视选贤任能，改革弊政。对一些重要官吏的任命，多由大臣推荐，皇帝亲自面试。对于从政清廉，政绩卓著之官吏，皆予以奖赏和升迁。如太守黄霸和朱邑均因贤良清正被升为御史大夫和大司农，因而使昭、宣两世出现了“汉世良吏”，“于是为兴，称中兴焉”的政治局面。

二、汉元帝以后的衰败

西汉王朝自昭、宣时期结束以后，便江河日下，从元帝、成帝、以至汉哀帝、平帝、新莽篡位，一代更比一代荒淫昏庸，挥霍无度。百姓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之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一遇灾荒，争相卖儿卖女，路人相食，惨不忍睹，西汉王朝早已失去了进行大规模长期战争起码的经济实力。

幸好，最强大的匈奴部族的奴隶主集团，已在汉宣帝时期被基本征服，无力大规模进袭汉边疆地区。同时在此时期之内，各兄弟民族的统治集团，也都忙于内部的争权夺利之中，因之，也无力与汉中央政权相抗衡。所以，汉王朝尽管临近它的末日，仍能保持其疆域的完整。

三、西汉后期匈奴部族的状况

汉武帝末年，匈奴与汉军作战，虽取得了很大胜利，特别是贰师将

军李广利全军覆没，对狐鹿姑单于为首的匈奴奴隶主贵族集团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但是，在此之前，匈奴的基本势力已遭到汉武帝的严重打击，特别是被汉武帝穷追猛袭数十年，穷困疲惫之极，元气丧失殆尽，匈奴部族的衰落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狐鹿姑单于在汉武帝病逝后2年，也即汉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又想与汉和亲，但不久即病死。先前狐鹿姑单于有异母弟为左大都尉，贤明英武，深得百姓拥护，狐鹿姑单于阏氏见单于病重，恐怕单于死后，不立其子为单于，而立左大都尉，阏氏便暗中派人刺杀了左大都尉。因而，在狐鹿姑单于将死亡时，深知其子年幼，难以治国，左大都尉又已死去，便遗诏立其弟右谷蠡王为单于。

但是狐鹿姑死去，卫律等与颛渠阏氏合谋，不宣布单于死去的消息，假冒单于的诏命，改立颛渠阏氏之子左谷蠡王为单于，称为壶衍单于。

暗杀左大都尉，改立单于的一系列事件，引起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壶衍单于即位后，便放风于汉使者，单于有与汉和亲之意。但由于多年的与汉战争，不便直接提出这个要求。左贤王、右谷蠡王以自己没有即单于位，对单于十分怨恨，便想率其部落归降于汉。但怕实现不了，反遭单于诛灭，欲胁迫卢屠王与其先西降乌孙，借助乌孙的力量，以攻击匈奴。卢屠王向单于告发了左贤王和右谷蠡王，单于派人责问他们二人，右谷蠡王不服。于是，左贤王和右谷蠡王，再不去龙城与单于相会。

由于壶衍单于年少初立，母亲颛渠阏氏作风不正，国内人心离异，经常担心汉军的突然袭击。这时，卫律便又向单于献策说：“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匈奴单于为了向汉表示和解之意，便主动送还原扣留的汉朝使节苏武、马宏等，但始终未正面向汉提出和亲之事，怕遭汉朝拒绝。

第二节 汉袭击匈奴战略纵深的大决战

一、汉昭帝即位以来汉匈双方战和形势的发展

汉昭帝即位后的前五年，即从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至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期间，汉匈双方基本上没有发生战争。这是由于西汉要休养生息，恢复汉之国力；而匈奴也已疲惫不堪，且内部不和，无力发动战争所致。到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秋，匈奴开始派兵进袭汉边境，匈奴骑兵进攻代郡，擒杀了代郡都尉。

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匈奴单于命其左部和右部出动2万骑兵，分四路进攻汉边境，汉军将匈奴兵击败，乘胜追击，斩杀匈奴9000人，俘虏匈奴瓯脱王，汉军无伤亡。匈奴单于知道其瓯脱王被俘，怕瓯脱王降汉后，带领汉军前来袭击，便率其部落向北之匈奴大后方迁移，不再向南方逐水草游牧；派遣几千骑兵屯于受降城，以防备汉军突击匈奴之后方，在余吾水上架设桥梁，以便匈奴吏民随时可以利用该桥，向其深远后方逃逸。

匈奴壶衍单于由于数次兵败，特别是上述2万兵马惨败后，国力越来越贫困，便又想与汉“和亲”，但又怕汉不答应。单于弟左谷蠡王更是“和亲”的积极支持者，因而，他便时常命其左右大臣，向汉使臣暗示，单于欲与汉“和亲”的意向，同时对汉使者表示出更加亲善的态度。汉朝廷也知道匈奴想要“和亲”的意图，但却避而不谈“和亲”之事。

左谷蠡王死后，壶衍单于派犁王至汉边境一带，侦察汉边境的虚实情况，犁王回报单于说，酒泉、张掖一带汉军防守力量薄弱，可以出兵做试探性进攻，如果取胜，则可以收复匈河西失地。但匈奴这一计划，已先为汉从匈奴降者中得知，汉昭帝遂下诏令边境地区严加戒备。不久，匈奴单于使命右贤王、犁王率4000骑兵，分三路入侵张掖地区日勒、屋兰、番和等地。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即发兵迎击，大败匈奴军，匈奴军大部被歼，只有数百人逃脱，属国千长义渠王部下射杀了犁王。汉昭帝为此次作战的胜利，封义渠王为犁王，赐黄金、马匹，封属国都尉郭忠为成安侯。从此以后，匈奴军再不敢入袭张掖。

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又派骑兵3千多人进袭五原，杀掠吏民数千人，然后又以数万骑兵至汉边境“打猎”，想乘汉不备袭掠汉边境。但由于汉军戒备森严，未能如愿。

二、汉袭匈奴战略纵深之战的起因

匈奴于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以数万人于汉边境“打猎”，伺机袭汉，未曾得手，便转而以2万骑兵侵袭乌桓。汉以度辽将军范明友，率2万骑兵截击匈奴军，匈奴军惧怕而撤兵。

从此以后，匈奴便不敢直接出兵与汉军作战，欲先击灭乌桓。但在出兵乌桓之前，却先派出使者至乌孙，要乌孙昆莫（即乌孙国王）将其夫人汉公主转给匈奴单于为妻。乌孙不接受匈奴这一侮辱挑衅行为，匈奴便以此为由，发兵向乌孙进击，夺取了乌孙车延、恶师等地。公主上书汉昭帝，请求汉发兵协助乌孙击退匈奴。昭帝与公卿大臣商议援救乌孙之事，尚未决断，昭帝即于元凤六年（公元前74年）逝去。汉昭帝病逝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以受汉武帝遗诏辅佐的重臣地位，决定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刘贺只在位27天，便因放纵无度被废。接着以汉武帝曾孙病已即位，即汉宣帝。

汉宣帝刘询即位后，乌孙昆弥再次上书，请求汉救援说："乌孙连续不断地遭受匈奴侵掠，乌孙愿意以全国半数精兵5万人，全力进攻匈奴，敬请汉天子出兵，以救乌孙公主！"于是，汉宣帝遂决定出兵救乌孙，击灭匈奴。

三、汉军作战序列

御史大夫祁连将军田广明

度辽将军范明友

前将军韩增

后将军赵充国

云中太守虎牙将军田顺

校尉常惠

乌孙昆弥

乌孙翕候

总兵力21万（内含乌孙兵5万人）

四、汉袭击匈奴战略纵深之战作战策划

汉宣帝决定出兵援救乌孙，但不直接出兵乌孙国，而是向匈奴战略纵深进击，似有于匈奴战略纵深寻歼单于主力之企图。为此，汉宣帝于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秋，选关东精锐骑士，各郡国吏三百石善长骑射之士皆从军。汉宣帝为一举奏效，遂命五将军率16万骑兵，会同乌孙王之5万骑兵，向匈奴进袭。

以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统率4万骑兵，出西河，向匈奴进击；以度辽将军范明友率领3万骑兵，出张掖，向匈奴进击；以前将军韩增率3万骑兵，从云中出发，北进匈奴；以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

军，率3万骑兵从酒泉出发，北进；以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率3万骑兵出五原，向匈奴进击。同时，以校尉常惠出使乌孙，与乌孙昆弥统率乌孙5万骑兵，从西方向匈奴进攻。

以上6路大军，皆以深入匈奴2000里地区为作战目标，分进合击，歼灭匈奴单于军。汉军这一强大的攻势，似决心毕其功于一役，与匈奴军进行战略决战。

五、汉袭击匈奴战略纵深作战经过

汉宣帝调兵遣将完毕，即于第二年，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正月，命各路大军，向匈奴纵深地区进发。

度辽将军范明友率军自张掖北进，深入匈奴境内1200多里，至蒲离候水一带地区（似在稽浚山地区），斩获敌700人，俘获马牛羊1万多匹，未发现匈奴主力，引兵而归。

前将军韩增率军由云中出塞，北进1200多里，至乌员（可能为漠南一带）、候山，俘虏斩首100余人，获马牛羊2000余，也未遇见匈奴主力，率军而归。

蒲类将军赵充国率军由酒泉出塞1800多里，本来预定与乌孙军合击匈奴于蒲类泽（今新疆巴里坤附近）。但由于乌孙军进展顺利，先期到达，汉军未能与其会师，西至候山，斩获单于使者蒲阴王以下300多人，获马牛羊7000余，得知匈奴军已远逃，便引军回归。

祁连将军田广明由西河郡出塞1600里，至鸡秩山地区（具体地名失考），斩俘19人，获牛马羊百余只。途中正遇汉使者冉弘等回归，告诉他鸡秩山西有匈奴军队，可前去剿灭。祁连将军田广明当即告戒冉弘等，不要对任何人讲这个情况，便欲下令回师。御史属公孙益寿向田广明建议，不可这样做，应当向匈奴进击。祁连将军不听，遂率军返回。

虎牙将军云中太守田顺率3万多骑兵出五原后，前进800里，至丹余吾水上（具体地名失考），便停止前进，领兵而回，诈称其斩俘1900余，获马牛羊7万余。

至此，汉军五路大军均未进至预定歼敌地区，便相继而罢兵。校尉常惠与乌孙昆弥所率之乌孙军，突袭了匈奴右谷蠡王庭，俘获单于父行及公主、名王、犁纡都尉、千长、将以下3.9万人，获马牛羊等70余万。

汉历时三个月的向匈奴战略纵深的决战，便告结束。

六、汉匈双方战后的措施

汉宣帝对祁连将军田广明畏敌怯战，虎牙将军田顺兵不至期，且假

报战果十分气愤，皆下狱治罪，二人畏罪自杀；对蒲类将军赵充国、度辽将军范明友，赦免其不到预定地区即回军之罪；封校尉常惠为长罗侯。

匈奴吏民经此次作战，虽然在战场上的直接损失不是很大，但是其向大后方逃走的途中，人员死伤和损失马牛羊都不可胜数。匈奴自此日渐衰落。

匈奴对乌孙十分愤恨，壶衍单于在当年冬，亲自率领1万多骑兵侵袭乌孙，劫掠了乌孙大批老、弱人等，率军即将回归。适逢天降特大雨雪，一天即达一丈多深，匈奴军和牲畜冻死者十之八九。于是丁零、乌桓、乌孙三国乘匈奴衰弱之际，从北、东、西三面进击匈奴，三国之军共斩杀匈奴军数万人，掠马数万匹，牛羊更多，加上天寒地冻，民众死者达十分之三，畜产死亡过半，国力更加衰败。自此，匈奴一些属国便告瓦解，汉军也乘此机会，出3000骑兵，进击匈奴，匈奴不敢回击汉军，此时，匈奴愈加想与汉“和亲”。

汉袭匈奴战略纵深之战评述

汉宣帝袭击匈奴战略纵深之战，出动骑兵16万，加上西域乌孙之5万骑兵共21万精骑，是西汉与匈奴作战以来，出动骑兵的最高纪录。这充分显示了汉宣帝欲与匈奴决战，并想一举歼灭匈奴军的战略宏图。同时，也说明西汉自昭宣中兴以来，确实出现了经济繁荣、国力殷富、兵强马壮的盛世局面。

汉宣帝虽然是一代英明之主，但在这最大的一次对匈奴用兵中，却表明了他缺乏汉武帝的统帅才能，因而，导致了汉五路大军劳师空耗而归。汉王朝在这次作战中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首先五路大军没有具体的作战目标，只是笼统地规定前出2000里。计划不明，无疑是统帅之过，这说明汉军缺乏应有的运筹帷幄的决策能力。

五路大军没有战略上的协调配合，这就必然是一盘散沙，各自行动。这样，虽然其势汹汹，但难以形成对敌人的致命打击，自然不会获得理想的战果。

没有战场上的统帅，也是未能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汉宣帝这次调遣的五路大军，除祁连将军田广明为4万之众外，其余各军皆为3万人，各路大军不但兵力相当，且互不统属。在这样规模巨大的战略决战中，没有主次，没有战场的最高统帅，任凭各军自行行动，无论如何也难以达成预定的作战目的。

第三节 汉平定羌族部落叛乱的作战

一、诸羌部落势力的发展

居住在我国今甘肃西南部、青海及其西南广大地区的羌族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兄弟民族之一。西汉王朝建立后，居住在这些地区的诸羌族部落，尚处于奴隶社会时期，他们经常与匈奴结成联盟，配合匈奴向西汉西部地区进袭。

远在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匈奴与河湟一带羌族中势力最大的先零羌和封羌、牢姐等羌族部落结成联盟，合兵10余万，向令居、安故等地进击。当时匈奴也在北方向五原地区发兵进袭，造成两面夹击汉朝之势。汉武帝遂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派将军李息和郎中令徐自为统率10万大军，打败了羌军，并乘胜扫荡湟水上游一带地区，先零羌等部落迁移至今青海湖地区。汉将这一带分设了临羌（今青海西宁以西地区）、破羌（今青海乐都东部地区）两县。

汉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前后，河湟地区的诸羌部落又想重新夺回故地，他们再次与匈奴合谋，约定占据河西地区。当时汉宣帝派义渠安国（已降汉的羌人）出使诸羌，先零羌的首领向义渠安国提出，希望汉准其北渡湟水“逐民所不田处畜牧”的要求。义渠安国不辨真伪，便答应向汉廷请示。先零羌不等朝廷答复，便以已向汉使节讲过为借口，渡过湟水至北岸。这样，先零羌等部落的势力又有了新的恢复，郡县已难以对其制约。

二、羌族反动首领的勾结

汉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4年），先零羌召集今甘肃、青海等地区的羌部落首领200多人“解仇交质盟诅”。这样，众多的羌族部落便以先零羌为主体，消除了以往的隔阂，重新结成了联盟。联合起来的羌族部落，声势很大，消息传至京师，震动了朝野上下。

汉宣帝为寻求对付羌人联盟的对策，遂急召后将军赵充国问计。赵充国说，过去羌人所以容易制服，是因为他们内部部落众多，互不统一，且经常互相攻杀。以前西羌反叛，亦是先解仇合约，然后才发动叛乱。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羌人的叛乱，汉用了五六年的时间，才平定了下去。赵充国认为，当前羌人联合的征候很危险，估计他们也可能又与匈奴通使联盟。果然，一个多月之后，羌侯狼何便派出使者向匈奴借兵，准备袭占鄯善和敦煌，以切断汉通西域之道路。赵充国判断，到了秋天马匹肥壮之时，羌人的叛乱必然出现。

三、诸羌叛乱的起因

汉王朝为了及时掌握诸羌的动向，防患于未然，便又派出义渠安国出使堵羌。安国到达西羌之后，首先召集先零部落的30多个重要首领，“以尤桀黠，皆斩之”。安国就这样将他认为其中顽固不化的首领，统统杀掉，接着又杀死了先零部落1000多人。于是，引起了诸羌部落的惊恐，使原来已降服汉朝的西羌部落，也纷纷脱离汉朝。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归义羌侯杨玉等，这时便带领自己的部落反叛，他攻降一些小的部落，进袭汉的边塞，攻城邑，杀长吏。义渠安国以骑都尉率领3000兵马，准备迎击羌叛军，军至浩（今青海乐都），被羌军击败，伤亡惨重，安国率军退至令居。

四、汉王朝的调兵遣将

羌族部落叛乱的声势越来越大，汉宣帝派御史大夫丙吉征求诸将领的意见，问谁出征羌族合适，赵充国说：“亡于老臣者矣”。年逾70岁的赵充国，舍我其谁的毛遂自荐，感动了汉宣帝。汉宣帝随即又让丙吉去问他需要多少兵马才能平定这次叛乱。赵充国没有直接回答，他说：“领兵作战，不能不看战场的实际情况盲目估计，需要待他亲去金城前线，摸清了战地情况，才能提出用兵和战胜敌人的良策”。汉宣帝同意了赵充国的意见，遂命令他立即出征。

五、汉平定羌族叛乱的作战经过

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四月，赵充国率军西进，不久来到金城（今甘肃兰州地区）。大军即将渡河，赵充国为防止敌人“半渡而击”，便采取夜间梯次渡河的办法，命三校尉率部衔枚先渡。渡过河去的部队，立即构筑营垒坚守，先头部队在河对岸站稳脚跟后，大部队遂依次渡河完毕。

羌军见汉军渡河部队扎营防守，便派出一些游骑小队前来袭扰挑战。赵充国知道自己的部队经过长途跋涉，已很疲惫，而羌军以逸待劳，加上敌人的骁勇善战，如果遇小股之敌挑战，即挥师迎击，势必更加疲劳部队，且容易上敌人诱兵之计。因而他严令部队，“小利不足贪”，一律禁止出击。

汉军为慎重临敌起见，偷偷派出侦察骑兵，侦察了下一步必经之地的险要隘地四望，结果没有发现羌军的守备兵力，于是赵充国大喜，乘暗偷偷通过这段险要隘路。到了落都（今青海乐都）后，赵充国召集众将校说：“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四望中，兵岂得入哉！”汉军行至西部都尉府（在乐都西）后，设营坚守，每日休养士卒，对于羌军的挑战，仍采取不予理会的态度。

汉军以赵充国之子右曹中郎将赵印率期门、羽林狐儿、胡、越骑兵押送军需辎重。羌人得知汉军后方的运输路线后，便派兵袭击汉军粮道。汉宣帝遂诏命八校尉，骁骑都尉，金城太守率军联合搜捕剿灭袭击汉粮道的羌军。

汉军根据羌人叛乱的具体情况，采取打击最顽固的势力，争取被胁迫屈从部落的方针，恩威并施，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当诸羌未叛乱时，、两部落的一个首领靡当儿，派其弟雕库向都尉报告过先零部落欲反叛的情况，都尉不敢相信，便将雕库留于军内当人质，过了几天，先零果然反叛了，而且其中有不少、部落的人。这样，都尉便更不放雕库了。赵充国到后，即放雕库回部落去，让他向各部落的头人讲明，汉军的政策是：“大兵只诛斩叛乱的首领分子，希望各首领不要与首恶分子站在一起，以免自取灭亡。天子让告诫各部落，反叛者如能悔悟，捕杀顽固叛乱分子，即可免罪。斩杀一个叛乱的大头目，赐钱40万，中头目15万，小头目2万，斩成年男人3000，斩女子及老人赐千钱。并且把捕获的叛乱分子的妻子、财物统统归他。”赵充国力图以兵威招降、等胁从叛乱的部落，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分子后，再行歼灭。

汉宣帝对羌族的叛乱，却想速战速决，大有灭此朝食之势。因而，便从多方调集重兵。一时之间，将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的材官（步兵部队），金城、陇西、天水、安定、上郡等地的骑兵，原已归顺的羌骑，武威、张掖、酒泉太守统辖的部队，以至将宿卫京师的八校尉之军，并将京畿三郡的罪犯，也统统征调至平羌前线，共计6万大军，逼临羌人叛乱地区。

汉军调集前线后，仍未向羌人大举进攻。赵充国原先的战略策划是等到瓦解了、部落，先零势孤力疲之际，也就是待到秋冬季节再对先零顽敌进击。但是，酒泉太守辛武贤此时却上书汉宣帝说，现在重兵齐集湟中地区，北方诸郡力量单薄，如果汉军久拖于此，一方面匈奴乘机向北方进攻，不好对付；另一方面秋冬之后，天寒地冻，内地的士卒适应不了西北的严寒气候，再加上给养的消耗，汉军肯定要遭受很大的困难和损失，不如现在立即进攻。辛武贤并进而建议说，以在武威、张掖、酒泉等地的1万多骑兵，带足30日的食物军资，七月上旬即出兵进击、羌军。

汉宣帝将辛武贤的建议转去赵充国军中“令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议”。赵充国及长史董迎年等，皆认为辛武贤的立即出兵，进击、的建议，不利于对羌军的作战。赵充国仍坚持原先的作战设想。但辛武贤的建议，却正适合汉宣帝速战速决的意图，也博得朝中大臣的支持。于是汉宣帝便任命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并致书赵充国责备他到秋冬以后再进袭羌人的计划，是“不念中国之费，欲以岁数而胜微，将军谁不乐此者！”并命令赵充国率军立即向先零羌人进击。同时命破羌将军辛武贤率6100人，敦煌太守率兵2000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率、月氏兵4000人，带30日给养，于七月二十二日进击羌部落。汉宣帝还严厉地下诏赵充国说：“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

赵充国接到汉宣帝的命令，仍未立即执行宣帝的命令。他“以为将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国家”为理由，再次上书谢罪，同时进一步阐述了汉羌双方的力量对比后指出：汉军并不占很大优势，再以跋涉千里去

进攻量数众多，以逸待劳之敌，恐难以取胜。而且只有先进攻先零，打垮最顽固的敌人，、等部也就不战而降了。如果那时他们仍不降服，明年正月以后，再进攻、羌军，那么也不费多大力气就可取胜。

汉宣帝接到赵充国的上书后，深感赵充国言之有理，遂撤回了进攻、羌军的诏命，由赵充国自行决定其进兵计划。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赵充国突然进兵至先零羌军营地。先零羌军由于长时间屯驻，经多次挑战，汉军均不予理睬，遂军心涣散，斗志懈怠。见汉军突至，惊惶失措，丢弃辎重，争相逃命，在争渡湟水时，淹亡数百人。赵充国令汉军缓慢追击，左右将校建议赵充国应急迫歼敌。赵充国则说：“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于是，全军仍缓慢追击。

大军进至部落地区，汉军全军无抢掠烧杀行为，骑兵自行割草给食，这样进一步感化了羌部落，羌人发现汉军果然不攻打羌人，其酋长靡忘便立即派人向赵充国军请降，清求允许他们返回故地。赵充国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转达了天子不征伐、等羌人的旨意。羌人更大受感动，诸羌联盟迅速瓦解。

稍后，羌人先后投降者已达1万多人，汉宣帝决心乘势发动攻击，于是命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中郎将赵等，各率大军，三路出击，向羌军发动进攻。这时羌军已疲备不堪，汉军兵势正盛，汉军兵锋所至，叛军即被击破。强弩将军许延寿降敌4000人，破羌将军辛武贤斩杀2000人，中郎将赵斩首并获降者2000人，另有5000羌军投向赵充国军。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五月，赵充国在基本平定了羌族的叛乱之后，便上书汉宣帝说，羌人叛军有5万人，现已被斩首7600级，降者3.12万人，在河湟水中淹亡和饿死者5000至6000人，现残余叛军不过4000人。因而，请求回军。汉宣帝同意了赵充国的请求，赵充国遂振旅而还。

六、平定羌人叛乱后汉王朝和诸羌的动向

赵充国胜利回师，满朝文武大臣在京师城外迎接，赵充国好友浩星赐对赵充国说：“大家认为击破羌军，多为强弩和破羌等将军出击的结果，斩首获降，所以取胜。但是有识之士却认为，在他们出击之前，羌人叛军已势穷力竭，不用出兵，敌人也必会降服。望将军见了陛下，多归功于两位将军的出兵进击，不是你所采取的分化瓦解的策略政策的结果。这样，就可以保你既受到陛下的赏赐，又平安无事了”。但是，赵充国谢绝了好友浩星赐的劝告，认为应当向天子如实禀报汉军取胜的原因。赵充国说：“吾年老矣，爵位已极，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哉！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老臣不以余命壹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谁当复言之者？”于是，赵充国便以袒荡的胸怀和无限的忠心，向汉宣帝讲明了自己的看法，既使汉宣帝明白了汉军取胜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羌人战略策略的正确；又教育了后人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叛乱应慎重出兵

杀伐的道理。

当年秋天，果然如赵充国一贯判断的那样，若零、离留、且种、儿库等羌人首领，共同斩杀了先零部落的叛乱头子犹非、杨玉，联合羌人首领弟泽、相雕、良儿、靡忘等，率领先零部落的顽固叛乱残余的4000多人，向汉王朝投降。汉宣帝遂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离留、且种二人为侯，儿库为君，阳雕为言兵侯，良儿为君，靡忘为献牛君，并置金城属国，以管辖羌人。

汉平定羌人叛乱作战评述

我国西部地区的羌族部落奴隶主，曾长期与匈奴部族贵族奴隶主相互勾结，不断侵袭汉西部边境地区，阻碍了西部地区与中原汉族地区经济、文化、生产技术的交流，使这些地区发展缓慢，远远落后于中原。

由于有匈奴的支持，羌族顽固首领的叛乱声势巨大，一时之间对汉西部地区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汉王朝以70余岁的老将赵充国统率大军征伐，采取分化瓦解、孤立顽敌，恩威并加的策略，耐心等待羌人部落的进步力量自行剪除顽固酋长，终于顺利平定了羌人之乱。这一战争的胜利，使汉族与羌族人民之间，加强了多方面的交流和融合，加快了羌族地区的发展步伐。后来湟水流域成为“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富饶兴旺的农牧区。

将军赵充国在平定羌人之乱中，表现的令人钦佩的胆识和深远的谋略思想，很值得人们借鉴与效法。

用兵持重，先计而后战当赵允国毛遂自荐平定羌人叛乱，汉宣帝问他需要多少兵力时，他不以多年战将而矜持，却以非常谦逊慎重的态度回答说：“百闻不如一见，兵难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赵充国率军渡河时的策略和部署，也表现了惊人的持重。羌军本无用兵的基本作战知识，但赵充国在亲身通过了险要地段四望后，才对部将说出“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的结论。这些都说明了一个老诚宿将的可贵作风。赵充国从开始进兵，便制定了分化瓦解羌人的谋略思想，正切中了羌人部落之间结怨深、互相难以统属的致命要害。由于他始终坚持这一策略思想，因而，事态的发展完全按照预想的结果顺利实现。

以战略利益为重，犯颜直谏汉宣帝对羌人的作战意图一直是力求速战速决，而且决心先打击先零裹胁的部落，特别是酒泉太守辛武贤上书汉宣帝，提出速战速决先打、等胁从部落的建议后，更符合了汉宣帝的想法。因而，汉宣帝两次下诏赵充国要按辛武贤的建议办。但赵充国却数次上书陈述自己的意见，反对速战速决和先打、等被胁从的部落。赵充国之子赵见父亲数次违背皇帝的旨意，非常惊恐，专门派出使者劝说赵充国道：“诚令兵出，破军杀将以倾国家，将军守之可也。即利与病，又何足争？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但他仍置之不顾。这种“亡所顾念、独思惟兵利害”而据理直

谏、殚精竭智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他之所以如此，盖来源于其亲身处于战场的第一线，对于羌人叛乱的真实情况，以及羌人诸部落的心理状态均了若指掌。因而，在其对西汉王朝赤胆忠心的驱使之下，便不顾一切地抗争于朝廷，犯颜于帝王，把他忠勇智谋之将，诤诤铁骨的高贵品质表露无遗。

力拒众议，坚持“以全胜取”的思想赵充国在平定羌人之乱中，始终主张以攻心为主，采取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策略，最大限度地孤立顽敌，招降被胁迫的部落。他的这一主张，在朝廷内部，开始只有十分之一二的人赞成，但随着他据理抗争，慢慢的达到十分之八九的人都支持他。赵充国所以坚持这一主张，这是他几十年沉浮宦海，涉足军事、政治、经济等重要官职，开阔了视野，胸有战略全局，且面对羌人部落这一特定的作战对象所得出的最恰当的作战方略。这说明赵充国在他的晚年，早已不是一介纠纠武夫，而是一个军政兼备、深谋远虑的战略家了。

第四节 汉匈郅支战役

一、汉匈双方基本战略形势的发展变化

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匈奴壶衍单于当政17年后死去。其弟左贤王虚闾权渠单于，即废黜前单于所宠爱的颛渠阏氏，引起颛渠阏氏父左大且渠怨恨，加剧了内部的离心倾向。此时，匈奴已无力大举侵犯汉边境。于是汉撤出屯于塞外一些城邑地区的重兵，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虚闾权渠单于听到汉从一些城邑撤出重兵的消息，非常高兴，便召集贵人商议与汉“和亲”之事。左大且渠想破坏单于的计划，便向单于建议说，以前汉派使者来，大军随其后至，我们也效法汉的办法，先派使者入汉，大军随后，相机袭汉。于是左大且渠便请求与呼卢訾王各率万余骑兵，至汉边境打猎，借机逃入汉境，向汉投降。并向汉报告说，匈奴欲侵袭汉边境。于是，汉宣帝便下诏发边郡骑兵，屯于要塞地区，并命大将军军监治众等4人，率领骑兵5000，分三路出塞数百里，各捕获俘虏十人而归。匈奴先降汉三骑，又被抓去近百人，便不敢进袭汉边境，引兵而去。这一年又逢匈奴饥荒，人民畜产死亡十之六七，实力进一步衰落，一些部落纷纷脱离匈奴的统治。当年秋季，匈奴所降服的西部落，自君长以下数千人，驱赶其全部畜产，脱离匈奴南走，被匈奴瓯脱王所部截杀甚众，西遂南降西汉。

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西域城郭诸国，联合起来向匈奴进击，夺取了匈奴在西域的属国车师国，俘获车师王及车师民众而去。单于又任命车师王昆弟兜莫为新车师王，率车师其余民众东迁，不敢居于旧地，汉则乘势派遣屯田军，分车师地屯垦居住。后来，匈奴怨恨西域诸城国侵夺车师，遣左、右大将，各率万余骑兵进驻于右部地区，准备侵袭乌孙、西域诸国。此后，匈奴遣左右奥各率6000骑兵，与左大将再击汉屯田车师之吏民，未曾攻下车师城。两年以后，虚闾权渠单于，又亲率10万骑兵，到汉边境一带“打猎”，伺机入袭。由于匈奴降汉者的报告，汉宣帝于是派后将军赵充国率4万骑兵屯于边境九郡，防备匈奴军之进袭。不久，单于病重，率军回归。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在位9年后死去，原被虚闾权渠单于废黜的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合谋，将右贤王屠耆堂立为握衍朐单于。

握衍朐单于即位后，匈奴统治阶层内部更加分崩离析。握衍朐单于尽杀虚闾权渠单于所用之贵人刑未央等，而专信任都隆奇，将虚闻权渠单于的子弟近亲也一律免职，虚闾权渠单于之子稽侯未能继承单于位，也对握衍朐单于十分怀恨，遂逃亡于其岳父乌禅幕处。日逐王先贤掸素与握衍朐单于有深怨，在握朐单于即位后，日逐王即率其所部数万骑归汉，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汉书·匈奴传》记载说：匈奴西域“僮仆都

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都护府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至此，西汉王朝有了治理西域的最高长官。在其下还设有副校尉、丞一人，司马、侯等官职。汉开始对全西域地区诸国册封国王、征调赋税、行使主权，西汉的疆土达到今巴尔喀什湖以西地区。

二、郅支战役前匈奴的彻底分裂

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归降汉朝后，握衍朐单于便立其兄薄胥堂为日逐王。不久，单于又将先贤掸两个兄弟杀死。当时，稽候孺的岳父乌禅幕，曾劝阻握衍朐单于，单于不听，更加引起乌禅幕的不满。

匈奴左薁鞬王死后，单于以自己的小儿子为薁鞬王，引起薁鞬贵人的愤怒，共同谋立薁鞬王之子为薁鞬王，并将其部落东迁，欲脱离单于的统辖。单于怒，派右丞相率万余骑兵前去截击，右丞相军伤亡数千人，被薁鞬王将击破。

握衍朐单于的太子左贤王，多次向单于诬陷左地贵人，又引起左地贵人们的怨恨。因而，当乌桓击左地姑夕王，姑夕王兵败怕被单于斩杀时，便与乌禅幕与左地贵人相谋，拥立稽侯为呼韩邪单于。这样，强大的匈奴左部势力，便脱离了握衍朐单于。

呼韩邪单于既立，便想击灭握衍朐单于，于是发左地骑兵约5万人，向西进击，进至姑且水北侧地区。握衍朐单于败走，无奈只好派人向其弟右贤王求救，右贤王历数他杀害昆弟及众贵人的罪行，严词拒绝派兵营救，握衍朐单于走头无路，遂于汉宣帝神爵四年，只当政了三年便自杀身亡。

呼韩邪单于当政后，欲令人杀右贤王，都隆奇便与右贤王合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居于右地。不久，即发兵数万，攻击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兵败，退出单于庭，屠耆单于进占单于庭。至此，匈奴已是两个单于并立。

汉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秋，居于西方的呼揭王与唯犁当户密谋，向屠耆单于诬陷右贤王想自立为乌藉单于，屠耆单于遂抄斩了右贤王父子。后发现了呼揭王的诬陷，呼揭王恐惧，遂叛离屠耆单于，自立为呼揭单于。这样，匈奴又出现了第三个单于争立的局面。

右薁鞬王原被屠耆单于任命为乌藉都尉，率兵2万，屯于东方，以防备呼韩邪单于的进攻。听到呼揭王自立为呼揭单于的消息后，遂也自立为车犁单于。于是，匈奴出现了第四个单于。

随后乌藉都尉也自立为乌籍单于。至此，匈奴遂彻底分裂为五个单于互相争立的局面，匈奴贵族集团的火并，便越演越烈了。

三、汉匈郅支战役前匈奴五个单于的火并

匈奴分裂为五个单于争立的局面后，互相都在厉兵秣马，以决雌雄，争夺单于位。

屠耆单于这时仍占据着单于庭，居于政治上的主导地位。首先，他亲自率领重兵，向东进攻车犁单于，同时命都隆奇率兵进袭乌藉单于，乌藉和车犁单于先后战败，率领本部落向西北方向退走，随即与呼揭单于合兵。乌藉，呼揭单于同时取消单于称号，全力辅佐车犁单于，车犁单于遂拥兵4万骑。屠耆单于闻知呼揭、乌藉、车犁三单于合兵的消息后，为了彻底消灭车犁等三单于的势力，想再次率兵向车犁单于进攻。但为防止呼韩邪单于的突然袭击，便命左大将和左大都尉，率领4万骑兵分屯于东方。屠者单于布署完东方的防御力量之后，遂自率4万骑兵向西进击，车犁单于等被击败，再向西北迁移。

其后，各单于在互相拼杀中，屠耆单于兵败自杀。呼韩邪单于兄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最后这两个单于经过厮杀，呼韩邪单于也战败，郅支单于遂进入单于庭，成为统治匈奴的主要力量。

四、汉匈郅支战役的远因和近因

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被其兄郅支单于击败后，便与群臣商议对策，左伊秩訾王力主匈奴归降于汉，认为：“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后来，呼韩邪单于遂率其部落向南迁移，靠近汉边境，并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汉朝为将，形成南匈奴。郅支单于得知呼韩邪单于降汉，也遣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汉朝。郅支单于占据单于庭以北地区，遂称为北匈奴。

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呼韩邪单于亲自入汉，朝见汉宣帝，宣帝以高于诸王侯的礼节，迎送呼韩邪单于。其后，郅支单于也派使者入汉朝奉献。汉也重重赏赐来使。

汉宣帝甘露四年（公元前50年），郅支单于怕被呼韩邪单于攻击，便想向西攻占右地，他率兵首先攻杀了自立的伊立日单于，并其军5万多人，郅支的势力稍有加强，便留居于右地。他听说汉对呼韩邪单于非常支持，自感难以统治全匈奴，遂更向西迁至乌孙之地区，想与乌孙结为联盟，便派使者去见乌孙小昆弥乌就屠。小昆弥知道汉支持呼韩邪，郅支不能与呼韩邪对抗，才率兵逃入右地，遂杀了郅支的使者，以8000骑兵与郅支战，被郅支击败。郅支遂乘势北击乌揭（今新疆阿尔泰至苏联斋桑泊一带地区），乌揭国归降；向西攻破坚昆（约今苏联叶尼塞河上游至卡通河之间地区）；向北击降丁零国。郅支并三国之兵力，自居昆坚国，势力有很大增强，数次派兵击乌孙，乌孙常常战败。郅支单于势力的发展，对汉西域地区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这便埋下了汉击灭郅支单于的远因。

汉宣帝于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病逝。由太子刘爽即位，称为汉元帝。这时，郅支单于怨恨汉亲近呼韩邪单于，同时以为距汉遥远，便将汉派遣护送郅支质子的使者谷吉杀害。郅支杀害汉使者心中恐惧，又见呼韩邪单于日渐强盛，因而，害怕汉与呼韩邪单于共同击灭他，便想向更远的地区迁移。这时，正值康居数次为乌孙所击败，于是，欲借助匈奴的力量对付乌孙，康居使者至昆坚邀请郅支率其部落去康居，郅支欣然应允，遂率部落西迁。然而天气严寒，郅支的人马多数在中途冻饿而死，到达康居后只剩下3000多人。康居王以女儿嫁给单于为妻，单于也以女儿嫁给康居王为妻，郅支与康居国的关系日益亲密，康居开始借助郅支的力量向乌孙进攻。郅支统率康居和匈奴军，多次侵袭乌孙，乌孙均被郅支击败。

郅支单于随着自己势力的增强，已在康居东南部地区站稳脚跟，便向四周国家侵袭，并强迫西域地区一些国家向其纳贡，因而引起西域诸国的强烈怨恨。

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副校尉陈汤，与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商议说：“现在郅支单于威名远杨，侵乌孙、大宛，经常为康居出谋划策，欲降服此两国，如果它占领了乌孙、大宛两国，那么它向北可以攻取伊列，向西可以夺取安息，向南可以驱赶月氏、山离乌戈，不出数年之间，西域诸国必全为其占领。再加上郅支单于本人悍勇无敌，好征战，常取胜，这样下去，必为西域的大患。郅支所部虽然距离我们很遥远，却没有坚固城池和强弓弩矢，如果我们发屯田士卒加上乌孙的部队，直至郅支城下，它逃跑没有去处，守城则会很快被我击破，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

陈汤的意见，深为甘延寿所赞许。但甘延寿觉得，要兴兵征讨郅支，应奏请汉元帝。但陈汤认为：“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他坚持不要请示报告，抓住战机，迅速行动。甘延寿当时病重，只好由陈汤决断。于是，陈汤决计出兵，汉匈郅支战役遂拉开战幕。

五、汉匈两军郅支战役作战序列

汉军

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

西域都护副校尉陈汤

车师戊已校尉

乌孙军将校若干人

兵力骑兵4万人

匈奴军

郅支单于

郅支单于诸贵人

康居副王抱阗

总兵力郅支单于与康居援军共计约2万人

六、汉匈两军作战策划

汉军计划兵出两路，每路由三校尉统兵编成。一路走西域南道，即沿莎车，过葱岭，经大宛向郅支城进发；一路走西域北道，入赤谷城，过乌孙，涉康居，至阗池西。两路并进，会师郅支城，夹攻郅支匈奴军，争取一举歼灭敌人。

郅支单于听到汉军进攻的消息，随即一方面部署守卫郅支城的兵力，一方面准备迎击汉军于城外。

七、汉匈郅支战役作战经过

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陈汤定下出击郅支单于的决心后，便“矫制”朝中命令，调遣西域城郭诸国的军队和车师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共4万人，编组军队准备出击。甘延寿不得不勉强听从陈汤的安排，遂增设扬威、白虎、合骑三校尉，一共六校尉之军。陈汤、甘延寿各率三校尉，兵分两路开始进军。同时陈汤、甘延寿派使上书，向汉元帝劾奏自己“矫制”的罪过。

两路大军按预定策划，从南北两路向西进发。当汉军进至赤谷城以东地区时，正值康居副王抱阗率数千骑兵杀掠乌孙昆弥部众1000多人，掠夺畜产甚多。抱阗得知汉军已过乌孙的消息，便从后面追赶汉军，当追上汉军的辎重车辆，便开始掳掠。陈汤得知，即命部队回击，杀康居副王部460多人，俘获康居副王贵人伊奴毒。康居军败逃，陈汤将康居掠略乌孙的吏民交还给大昆弥。

汉军进入康居国境后，严令部队不得掠略，并以怨恨匈奴的康居贵人作向导，旋即顺利进至郅支城30里之地区扎营。

郅支单于见汉军到来，便派人责问汉军来意。陈汤等假称为迎接单于及夫人入朝见汉天子。郅支单于知道汉军即将向其进击，本欲率众逃走，后来他怀疑康居已为汉之内应，乌孙诸国也发兵相助，没有可逃之处。因而，郅支出城后，又退入城内，告诉其大臣说：“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单于遂布署兵力坚守郅支城。当汉军进至距郅支城3里远地区时，即设营布阵，望见郅支城上旌旗招展，数百人披甲守卫；100多骑兵在城下往来驰骋；100多步兵夹门布成鱼鳞阵，以向汉军示威。单于随即派出百余骑兵冲向汉军阵地挑战。汉军在营内即手拉弓弩

准备射击匈奴军，匈奴军恐，引兵退回。陈汤、甘延寿随即挥军至郅支城下，并将郅支城团团包围。汉军用弓弩射杀守城军，并以火烧郅支所筑之木城。

这时，郅支单于自己也披甲登城，并命令其数十个阏氏夫人登城射击汉军。汉军攻城越来越猛，郅支单于被汉军射成重伤，转入单于宫室，汉军烧毁外层之木城后，即攻入内城之土城，争相杀入单于宫室。郅支单于伤重死去，军侯假丞杜勋斩下郅支首级，汉军斩杀阏氏、太子、名王以下1500多人，生俘140多人，其余1000多人皆向汉军投降。

至此，汉匈郅支战役遂告结束，汉军胜利回师，并遣送回所发西域十五国之军。

八、郅支战役后汉匈双方的动态

陈汤、甘延寿“矫制”发兵，消灭为患汉西域地区之统一的悍敌郅支单于后，引起了中书令石显、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的极度不满。汉元帝欲封赏陈汤、甘延寿之功，石显、匡衡等极力谏阻，认为天子免其死罪，已够宽宏大量，如再加封赏，必定开创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他们奏告天子说：“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侥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渐不可开。”

故宗正刘向上书汉元帝说，郅支单于囚杀汉使者数以百计，严重损坏了汉朝的威望，满朝文武都对他愤恨之极，陛下念念不忘诛灭郅支，今“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槛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藩，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焉”。刘向并以古人的功业与陈汤、延寿相比，举常惠因随乌孙出击，郑吉因迎降日逐王均受封为侯，何况陈汤、甘延寿这么大的功劳，更应封赏。至于他们二人先出兵后上奏的错误，应以“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的态度对待。匡衡、石显又辩解说，陈汤、甘延寿所杀之单于，并非真单于，应将陈汤、甘延寿治罪。汉元帝最后终于采纳了刘向等人的意见，封甘延寿为义成侯，赐陈汤爵关内侯，各食邑三百户，甘延寿为长水校尉，陈汤为射声校尉。

汉元帝死后，汉成帝即位，丞相匡衡又上书汉成帝，批准惩治陈汤。太中大夫谷永，上书为陈汤申辩，说汤“斩郅支之首，报十年之逋诛，雪边吏之宿耻，威震百蛮，武畅西海，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夫犬马有劳于人，尚加帷盖之报，况国之功臣者哉！”汉成帝无奈，只好放出陈汤，但却剥夺了他的爵位。

汉匈郅支战役评述

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统率西域诸国之军，以神速勇敢的长途进军，两路大军分进合击，将势力强大的郅支单于所部，全歼于郅支城，郅支战役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消灭郅支，汉匈百年大战至此结束。西汉王朝自汉高祖刘邦起，历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元帝等八世君王，与匈奴斗争和作战达170年之久。在这漫长的斗争和作战中，尽管西汉王朝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特别是汉武帝穷追匈奴至漠北，封狼居胥山，大伤了匈奴元气，但始终未将匈奴征服。而郅支一战，全歼郅支单于所部，呼韩邪单于当即稽首来朝，愿守北藩，累世称臣。从此，汉北部边境偃旗息鼓，不闻刀兵之声，汉匈两族人民进入了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历史时期。

消灭了郅支，西域脱离匈奴，汉完成了统一中国西域的历史使命。西域地区诸国，长期做为匈奴右部力量，成为匈奴进攻汉西部地区的战略基地。尽管汉多次出使西域，对西域诸国恩威并加，但却仍不断为匈奴所镇服。郅支单于自迁移至康居之后，康居、丁令、昆坚、乌孙等国渐渐落于匈奴的势力范围。如果郅支势力再进一步发展，西域会有更多国家又复置于其控制之下，将会给汉王朝造成无穷的后患。

消灭了郅支单于，导致了呼韩邪单于的诚心臣服，遂基本完成了汉武帝统一中国北方的战略宏图。郅支战役的胜利，使西汉的北部疆土已北达今贝加尔湖，西至今巴尔喀什湖，东临大海之滨。这种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不断地促进着各兄弟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各民族之间的日渐融合，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因而，陈汤、甘延寿发起的歼灭郅支之战，实为中国战争史上的伟大历史事件，谱写了名垂青史的光辉一页。

“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这些古人之训，含有发人深思的哲理，不失为至理名言。身为百官之首的丞相匡衡，抓住陈汤“矫制”之过不放，连向两代君王参奏陈汤，这种惨害忠勇之将的恶劣行为，无疑将永远成为后世的反面教材，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第五节 汉征乌桓之作战

一、汉征乌桓的起因

西汉时期乌桓有时臣服于匈奴，有时臣服于汉。汉初，乌桓曾臣服于匈奴，每岁都给匈奴供献马牛羊等物，过时不献，匈奴便派兵掠略乌桓人的妻子。汉武帝时期，霍去病彻底击败匈奴后，乌桓人惧于汉朝的兵威，遂请求内附，并将其部落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等郡之塞外。西汉王朝设立了乌桓校尉，专门管辖乌桓地区。

但随着乌桓力量的增强，乌桓也开始袭扰汉东北边塞，有时也和匈奴发生一些小的冲突。

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派3000多骑兵袭击五原，掳杀数千人。后来又派出数万骑兵靠近汉边塞地区“打猎”，准备伺机大举攻汉。但由于汉边境防范甚严，匈奴军无法下手。汉军从匈奴降者的口中得知，乌桓人挖了匈奴单于的祖坟，匈奴单于震怒，便派出2万骑兵进攻乌桓。

这时大将军霍光，想乘匈奴与乌桓作战的机会，也出兵进击匈奴军，于是便询问护军都尉赵充国的意见。赵充国认为：“乌桓人常袭扰我边塞，现在匈奴军进攻它，对汉人有好处。同时匈奴也在时刻寻找机会，进袭我之边境，当前北部边境还比较安宁。匈奴乌桓互相攻击这不是坏事，而我们发兵进攻匈奴，激怒匈奴出兵进攻我们，实在不是上策。”

霍光听了赵充国的意见，不以为然，便又去问中郎将范明友的意见，范明友认为应当乘机进击匈奴。于是，汉王朝决定派兵向匈奴进击。

二、汉征乌桓的经过

大将军霍光同意范明友的见解，便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于是，范明友为度辽将军，统率2万多骑兵出辽东，向匈奴军进攻。

匈奴军得知汉军来攻的消息，不敢与汉军交战，便引军退去。

在出兵之初，大将军霍光告诫范明友说：“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范明友由于大将军有言在先，因此，当他率军出塞未遇到匈奴军，便想乘乌桓刚刚遭受匈奴军进击，士气低落沮丧之时，向乌桓进攻。

度辽将军范明友决心已定，便率军转向乌桓进击，一举将乌桓击破，斩杀乌桓军6000余人，并斩杀了乌桓三个王的首级，率军而归。汉

宣帝因此而封范明友为平陵侯。

汉王朝征乌桓，尽管取得了胜利，但在战略上并非有利之举，这不但引起匈奴的不满，更招至乌桓的深深怨恨。

第六节 汉使乌孙臣服的斗争

乌孙在汉宣帝时，曾与汉使常惠率兵5万，乌汉军合兵20万进击匈奴战略纵深之战后，乌孙昆弥于汉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年），请常惠上书，请求汉批准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后来，乌孙贵人共谋，又改立岑陬子泥靡代为昆弥，号称狂王。

狂王又以解忧公主为妻，狂王暴恶凶狠，大臣多不拥护他，公主解忧也与狂王不和。当时，汉王朝派使者卫司马魏和意、副侯任昌送乌孙侍子归乌孙。解忧公主遂向汉使诉说了狂王残暴，深为乌孙人所痛恨，并向汉使建议诛杀狂王，共同商定在酒席宴前以勇士击杀之。

待设宴那天，汉使者魏和意、任昌、公主、狂王均在座，勇士看准机会，拔剑向狂王砍去。但不幸，剑砍偏了，狂王负伤，上马而逃。

狂王之子细沈瘦率兵将魏和意、任昌、解忧公主等围困于赤谷城，围攻数月，而未攻克。西域都护郑吉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刻率领西域诸国之军，前去赤谷城解围。细沈瘦见汉大军至，遂解围而走。汉为缓和与乌孙的关系，特派中郎将张遵携带医药前去医治狂王之伤，并将魏和意、任昌用槛车囚去长安斩首。

乌孙肥王翁归靡的匈奴妻子所生的儿子乌就屠，在狂王惊走时，带领人马逃居北山中，他以母家匈奴将派兵袭击乌孙恫吓众人，众人皆归降他。于是，他便乘势袭杀了狂王，自立为昆弥。这样，乌孙又将落入匈奴的势力范围。

汉王朝对乌孙局势的变化十分关切。因为此时汉与匈奴的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乌孙一旦落入匈奴之手，西城诸国便有重新被匈奴夺占的可能。所以，汉王朝急派破羌将军辛武贤，率1.5万兵马至敦煌地区，紧急调集粮食，开通运粮道路，以便进兵击灭乌就屠军。

这时，乌孙右大将妻子冯夫人，奉西域都护郑吉的派遣，去说服乌就屠投降汉朝。冯夫人见了乌就屠，说明了汉大军即将进发，一旦汉军到来，你必定灭亡，不如降服于汉朝。乌就屠听后非常惊恐，表示愿意降服。汉宣帝为此特召见冯夫人，问明乌就屠降服的经过后，立即派遣渴者竺次、期门甘延寿送还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至乌孙后，立解忧公主之子元贵靡为大昆弥，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予汉王朝的印绶。乌孙既已降服，汉遂召回破羌将军辛武贤之军。

后来，元贵靡死，子星靡代大昆弥，星靡死后，子雌栗靡代。小昆靡乌就屠死后，子拊离代立，拊离死后，汉又立其子安日为小昆弥。雌栗靡为大昆弥时，乌孙安定强盛，小昆弥末振将惧怕为大昆弥吞并，便派人诈降并刺杀了大昆弥雌栗靡。汉此时又准备发兵征讨小昆弥，后来未能出兵。以后，末振将弟卑爰率其部落8万多人依附于康居，想借康

居之兵，兼并两昆弥。大小昆弥皆惊恐，双双都投向西域都护府。

至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大昆弥伊靡和匈奴单于皆入朝于汉。后来卑爰依势侵袭两昆弥，都护孙建率兵进袭卑爰军，将其杀死。

第七节 汉征龟兹之战

一、汉征龟兹的起因

龟兹，为西域地区之大国，又名鸠兹、屈茨、归兹、屈支、丘兹等（在今新疆库车一带）。龟兹有8万多人口，胜兵21079人。

当初，在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进攻大宛时，回军途中路过弥国，弥太子赖丹，正入侍龟兹为质，李广利便责备龟兹说，诸国皆臣属于汉朝，龟兹为什么还敢接受弥太子为人质？随即将赖丹带至京师长安。汉昭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任命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屯田轮台。

龟兹得知赖丹为校尉将军屯田轮台的消息后，贵人姑翼对龟兹王说，赖丹原来已臣绥我国，现在佩带汉朝的印绥来此，逼近我国屯田，以后必然会侵犯我们。龟兹王遂袭杀了赖丹。杀死赖丹后，龟兹知道负罪于汉，便上书汉朝谢罪，汉当时未发兵征龟兹。

二、汉征龟兹的作战经过

汉宣帝时，遣长罗侯常惠出使乌孙，会同乌孙昆弥率领5万骑兵与汉进袭匈奴战略纵深后，长罗侯从乌孙返回汉京师途中，路过龟兹，于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夏，便调集西域诸国之军5万多人，进击龟兹，以清算电兹袭杀汉赖丹校尉将军之罪。龟兹王惊恐，见了常惠谢罪说，赖丹不是我在位时杀的，而是先王在位时误听了贵人姑翼的建议所为，并立即将姑翼交给常惠，常惠旋即将姑翼斩首，汉军遂罢兵。后来，龟兹王绛宾，取乌孙昆弥妻解忧公主女为妻，夫妻二人同入汉朝奉侍，自此以后，龟兹便诚心臣服于汉朝。

第八节 汉征车师、焉耆之作战

一、汉第一次征车师之战

车师国（在今新疆奇台、鄯善一带）共分为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城长国。其中以车师前国为最大，有6000多人口，车师后国次之，有4000多人口，车师后城长国有900多人，而车师都尉国只有300多人，四国共有胜兵4000多人。

汉昭帝时，车师复为匈奴所夺占，匈奴派4000骑兵屯田车师诸国。汉宣帝即位后，派五将军和乌孙军进袭匈奴战略纵深时，匈奴屯田车师之军逃走，车师便又臣属于汉。由此匈奴震怒，召车师太子军宿入匈奴为质，军宿拒绝去匈奴，逃奔其外祖父焉耆王处。车师王便改立乌贵为太子，后来乌贵当了车师王，遂与匈奴结姻，经常勾结匈奴截击汉派往乌孙的使者。由于车师扼控汉通西域地区的重要通道，因而引起汉王朝的严重不安。

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汉派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免刑罪人编成屯田军，发往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附近地区）屯田、积谷，准备向车师国进击。当年秋收季节，汉军粮食已经备足，郑吉和司马熹遂发西域诸国1万多兵马，并率屯田士卒1500多人，向车师进击，一举攻占车师前国都城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因车师王当时在交河城北面城中，故未将车师王擒获。后来，汉军粮食已尽，无法继续作战，只好暂时收兵，回归渠犁屯田。待秋收全部结束后，郑吉、司马熹再次发兵进击车师王居住的石城。车师王得知汉军进攻的消息后，即逃往匈奴求救，匈奴此时由于力量不足，未敢出兵解救车师。车师王乌贵只得返回车师，遂与贵人苏犹商议，欲投降汉朝，但怕汉不相信他们的诚意，于是，苏犹建议乌贵进攻匈奴边境之小属国小蒲类。车师在击破小蒲类后，便向郑吉军投降。

二、汉第二次征车师之战

匈奴得知车师降汉，遂发兵进攻车师。郑吉和司马熹率军迎击匈奴军，匈奴军见汉兵至，便引军归去。郑吉等除留20余人在车师外，也率军回归渠犁。车师王因害怕匈奴兵再来进犯，兵败被杀，便率轻骑投奔乌孙，郑吉遂将车师王妻子迎接至渠犁。后来，郑吉又奉召把车师王妻子送至长安，汉宣帝对其赏赐极厚，每当接见属国使节时，常常将车师王妻子排在显赫的地位，因而使其深受感动。

郑吉为巩固车师地区，便派300吏卒至车师屯田。匈奴来投降的吏民向汉军报告说，匈奴贵人都认为：“车师土地肥美，靠近匈奴，如被汉占领，屯田积谷，力量强大之后，必将侵袭别国，匈奴不可不争夺过来。”不久，匈奴果然派骑兵进攻汉屯田车师之吏卒，郑吉便与校尉司马

熹，率领屯田渠犁之1500人前去救援车师屯田士卒。匈奴骑兵越来越多，汉军兵少，难以抵挡，于是退保车师城中。匈奴军逼至车师城下，向郑吉威吓说："单于必争此地，不可田也。"围攻车师城数日后，撤军而去。自此以后，匈奴便不断派数千骑兵进袭车师。郑吉鉴于车师距渠犁遥远，势孤力单，便上书汉宣帝说："车师距渠犁1000多里，道路为大山河川所阻，且车师又紧靠匈奴，一旦被匈奴围攻，在渠犁的汉军很难相救，愿益田卒。"但经过大臣们商议后决定，可暂时撤回车师屯田士卒。为此，派长罗侯常惠率张掖、酒泉两郡的骑兵，攻袭车师以北地区，进行武装示威，吓退匈奴骑兵，以保证车师屯田士卒的撤离。结果，汉骑兵进至车师以北地区时，匈奴立即撤军而归，于是，郑吉等率屯田士卒撤离车师城，回归渠犁。汉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以后，汉设戊己校尉屯田车师故地。

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前后，车师后王姑句投降了匈奴。车师后王须置离即位后，又被西域都护但钦斩杀，须置离兄狐兰支遂率车师后王国2000多人投降匈奴。王莽篡位，歧视匈奴单于，引起匈奴怨恨。匈奴遂与狐兰支一起共同出兵，进击车师诸国，杀车师后城长，刺伤都护司马，气焰十分嚣张，西域局势动荡，战火又起。

三、汉征焉耆之战

王莽以欺诈手段，拒绝了匈奴乌单于的"和亲"请求后，匈奴大举进袭汉北部边境，西域地区此时也进一步瓦解。焉耆国靠近匈奴，于是，便首先叛离汉朝，杀死西域都护，王莽无力发兵征伐。

天凤中年（公元15年至16年），王莽派五威将军王骏、西域都护李崇率戊己校尉去西域，诸国都由国君大臣相迎，并供给大军食用焉耆这时也假装投降，暗中调集兵力，准备袭杀汉军。王骏等率莎车、龟兹军7000多人，分数路进入焉耆，焉耆联合姑墨、尉犁、危须诸国之军，龚击王骏马，王骏马被焉耆兵歼灭。戊己校尉郭钦因另为一路，进入焉耆后，焉耆兵尚未回归，郭钦遂乘焉耆国空虚之际，击杀其老弱后，率兵回归。都护李崇收集残余士卒，退保龟兹，西域又呈混乱局面。

第五章 西汉时期的对外战争

西汉时期的对外战争，主要是对朝鲜之作战，其次为威逼越南臣服和通西域之厨宾的斗争。

西汉对朝鲜之战发生于汉武帝元割二年（公元前109年），汉以约10万兵力，前后历经一年多的时间，战胜了朝鲜王右渠。

第一节 西汉对朝鲜之战

一、朝鲜与西汉王朝的关系

朝鲜自建国以来，即与汉有着友好相处的亲密关系。西汉初，燕王卢绾叛乱后，燕人卫满率领1000多人，渡过坝水（今清川江），逃入朝鲜。后来便被立为朝鲜王，建都于王险城（今平壤市），其所率人马便成了他统治朝鲜北部的骨干力量。当时朝鲜北部人民多为游牧生活，朝鲜南部的广大地区则以农耕为主。

在汉惠帝、吕后当政时，辽东太守“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朝鲜从这时起，兼并了周围一些小国如真番、临屯等，卫满所统治地区方圆达千里。以后朝鲜与汉朝的来往更加密切，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及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也更加加强。

二、汉对朝鲜之战的起因

卫满为朝鲜王后，传至下两代，即卫满之孙右渠时，汉武帝对右渠“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同时真番等一些小国欲上书面见大子，又受到右渠的阻拦等情况，甚为不满。便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派使者涉何去朝鲜责备右渠，并召右渠入见臣服，右渠拒绝奉诏。在涉何离开王险城返汉时，右渠派遣其裨王长，送至今清川江边。涉何命部下刺杀了裨王长，提其首级回报汉武帝，向武帝报告说，他杀了朝鲜将而归。武帝已经知道了涉何杀朝鲜裨王长的实际情况，虽心中不快，但却没有责备涉何。随即派涉何为辽东东部部尉，右渠王怨恨涉何斩杀其裨王，待涉何至辽东就任后，即发兵进袭辽东东部都尉所，斩杀了涉何。汉武帝因此怒而发兵，向朝鲜进攻，遂导致了汉对朝鲜之战的发生。

三、西汉朝鲜两军作战序列

汉军

楼船将军杨仆

左将军荀彘

济南太守公孙遂

总兵力估汁不少于10万人

朝鲜军

朝鲜王右渠

朝鲜相路人、韩陶、参

将军王峡

大臣成已

朝鲜右渠王之子长降

朝鲜相路人之子最

总兵力无资料可考

四、西汉朝鲜两军作战策划

西汉为向朝鲜进攻，召募天下罪人从军。鉴于朝鲜三面临海，一面为陆地的地理条件，遂决定水陆两军并进，以夹击王险城。

以楼船将军杨仆统率楼船军5万多人，从齐地渡海东征。

以左将军荀彘率军出辽东，跨水，向王险城进击。荀彘所率之军，正史无确切数字可考，估计不会少于楼船将军杨仆的水军。这样，汉军以水路陆路两路大军，10万之众，南北对进，夹击王险城，形成了十分有利的战略部署。

朝鲜军为抗击汉军的进袭，似以防守水为主，以便利用水为天险，阻止汉军的进军。

五、汉军进攻朝鲜王险城的作战经过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秋，汉军按照预定的作战策划开始进军。

楼船将军杨仆率领5万水军，由今山东半岛之烟台一带地区乘船起渡，向朝鲜西海岸进发。楼船将军杨仆登陆后，不等全军到齐，即先率7000多士兵向王险城进攻。这时，朝鲜王右渠已率重兵防守王险城，双方交锋后，右渠探知楼船军兵微势弱，便主动出击楼船军。杨仆军寡不敌众，被朝鲜军击败，士卒散走。杨仆仅带少数人逃避于山中10多天，后来才逐渐将其故败的士卒收集起来，杨仆暂停攻城行动。

左将军荀彘率军由辽东进发，卒正多首先率辽东兵与朝鲜军战，被朝鲜军击败，汉军散走，卒正多退回营内，被左将军以失军罪斩首。左将军荀彘率军，向狈水西岸之朝鲜军突击，也未能击破朝鲜军的阵势。这样，汉军水陆两军的首战皆失利。

汉武帝见两将所率之军虽首次作战失利，但汉大军兵威势众，对朝鲜仍是巨大的压力，便派卫山出使朝鲜，劝告右渠臣服。右渠见了武帝

派来的使者，便向使者顿首谢罪说：“愿降，恐两将诈杀臣，今见信节，请服降。”右渠既已愿意臣服，便派他的太子跟随卫山人京师，面谢天子，并献马5000匹和大量军粮物资，以1万多军队护送，刚刚要渡狈水，使臣卫山及左将军荀彘心生疑虑，怕事情有变，便对太子说；既已降服，不必再以这样多士卒相送。朝鲜太子也怀疑汉使臣卫山和左将军，去掉他的士卒，可能诈杀他，便向使臣告别，未渡水，而回归。卫山回报天子，汉武帝以卫山未完成使命而将其斩首。

不久，左将军又率军向朝鲜进攻，击败损水沿岸的守军，长驱直进至王险城下。左将军包围了王险城的西北面，楼船将军率兵包围了王险城的南面。右渠坚守城池，两将军之兵围攻数月，未能攻破王险城，双方形成僵持状态。

汉军近10万大军，久攻不下王险城，并非士卒不勇，将帅不精。而是两军之间存有一定矛盾，不同心协力作战所致。左将军荀彘深得汉武帝的宠信，他统率的燕代士卒，能征惯战，虽先头首战失利，但随后就击败了朝鲜军，直抵王险城下。但却轻视楼船之军，不把它看做是攻城的重要力量，不积极主动地与之协同作战。而楼船将军杨仆的军队，在渡海之中肯定就已有部分减员，再之首战又遭惨败，军心士气受到严重损伤，将领也有些怯战。因此，虽然包围了王险城，但并不求歼灭右渠军，只想与右渠约和。这样楼船军消极攻城，左将军之军则极力攻城，两军无法相互配合作战。

朝鲜王右渠看到两军截然不同的态度，便决计以离间的手段，拖延时间，疲惫汉军。右渠派大臣私下与楼船将军杨仆谈判，假称朝鲜欲投降楼船将军，多次遣使往来，议而不决，故意拖延。左将军在此期间，每每想与楼船将军约定协力攻击王险城，杨仆因一心想约降右渠，不与左将军相约。左将军无奈，也派人劝告右渠降服，遭到右渠拒绝，给左将军造成一种右渠只与杨仆亲善的假象。因而，荀彘认为，楼船将军杨仆先有失军之罪，今又暗中与朝鲜私下往来甚密，而又不见右渠投降，恐怕杨仆已起反叛之心，也便不敢再积极进攻。

汉武帝得知两将的这种状态，前次派出卫山劝降也告失败，便命济南太守公孙遂，前往两将军处，协调两军的行动，以图扭转这种被动局面。

公孙遂进至左将军荀彘处，左将军便对公孙遂说，朝鲜早该攻下来了，所以没有攻下的原因、全在楼船将军杨仆。于是，他便把楼船将军的表现，和他个人的想法也告诉了公孙遂，并且说；“如果采取果断措施，恐怕要面临严重局面。楼船将军如若反叛，与朝鲜军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我们，我军就必定被敌歼灭。”公孙遂听了荀彘的话，完全赞同左将军的意见，立即持节召楼船将军杨仆至左将军营内议事。杨仆一到左将军营内，公孙遂便立即命令左将军的部下捕捉了杨仆，将杨仆军并入左将军序列。统由左将军指挥攻城。济南太守公孙遂将其去朝鲜处理两军的情况向武帝报告后，汉武帝大怒，命令诛杀了公孙遂。

左将军自从并两军之后，即加紧攻城，王险城内吏民惊恐。这时，朝鲜相路入、韩陶、相参、将军王峡互相商议说，当初我们想投降楼船，现在楼船将军已被捕获，左将军统率汉军，攻城越来越猛，我们难以抵挡，右渠王又不肯投降，咱们不如降汉。于是他们便一起向汉军投诚。但路人在途中死去，韩陶、王峡皆逃入汉营中。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夏，相参派人刺杀了朝鲜王右渠，来向汉军投降。这时，右渠之力臣成己反对降汉，又率领吏民坚守城池，继续抵抗汉军。左将军遂命右渠之子长降、路人之子最，号召城中吏民杀死成己，成己被杀后，王险城便举城降服汉军。

六、汉征朝鲜之战后的措施

西汉攻占朝鲜后，将所占朝鲜北部地区划为乐浪郡（郡治在今平壤）；将朝鲜西北部划入玄菟郡。此外，还设立了临屯和真番郡。

汉武帝封参为清侯，封韩陶为荻苴侯，将军王映为平州侯，右渠王子长降为几侯，路人之子最为温阳侯。

左将军荀彘“坐争功相嫉，乖计，弃市。”楼船将军杨仆，不待全军到齐，也不等左将军，先率少数人攻王险城战败，士卒亡失多，理当斩首，贬为庶人。

汉征朝鲜虽取得了胜利，但使臣卫山、济南太守公孙遂、左将军荀彘先后被诛，楼船将军杨仆也被贬为庶人，折将亡兵，损失惨重。

第二节 西汉威逼越南臣服的斗争

远在战国之末，现在的越南北方已建立了瓯骆国。

秦代以后，真定入（河北正定）赵佗称雄南越地区时，曾灭亡了瓯骆国，瓯骆国成了南越王赵佗的一部分属地。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汉王朝派军统一南越地区时，当南越被汉军击破，南越王赵建德和丞相吕嘉被抓获后，桂林临居翁，揭阳令史定等也归降于汉。居翁归降后，便派使者至瓯骆，转告瓯骆应该降汉。瓯骆看到强大的南越已被汉军击灭，深知汉兵成势众，所向披靡，瓯骆小国，更无力抵抗，于是，遂也臣服于汉。

第三节 西汉通西域罽宾之斗争

罽宾国（今克什米尔地区）是西域西部之大国。当匈奴击破火月氏，大月氏最初迁至塞地，塞王被逼南迁至罽宾。因而，自疏勒以西休循、捐毒，厨宾等地均有塞种部落。

汉武帝通罽宾之后，与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通使往来。但后来，厨宾王乌头劳以汉距罽宾遥远，汉兵难以征服，便与汉疏远，并数度劫杀汉使者。乌头劳死后，由其子继立，派遣使者向汉朝奉献。汉朝命关都尉文忠送使者归，厨宾王又想劫杀文忠。文忠发觉了厨宾王的阴谋，便与容屈子阴末赴共谋，攻厨宾，斩杀了罽宾王，汉立阴末赴为厨宾王，授予印绶。

汉元帝时，军侯赵德出使励宾，与阴末赴发生矛盾，阴末赴将赵德抓捕下狱，杀死汉副使以下70多人。后来，阴末赴遣使者上书汉元帝谢罪。

汉成帝时，厨宾复派使者奉献谢罪，汉成帝也欲派使者相送。大臣杜钦向大将军王凤建议说："以前汉立阴末赴为厨宾王，后来他终于叛汉，杀汉使者。他们所以知恩不报，杀使者而不怕被诛灭，主要是觉得汉离其遥远，大军难以到达。因此，当他有求于你，便卑词厚利；不需要你的时候，则胡作非为。这样的国家终究难以使其臣服。万里迢迢派遣使者相送，劳民伤财，不如不派。"王凤接受了杜钦的建议，只让使者送至皮山而还。此后，与罽宾之关系逐渐冷落。

西汉对兄弟民族和对外战争的

简要结论西汉王朝既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武功赫赫、战绩辉煌、扬威耀武于世界最强大的割建帝国之一。

西汉王朝在其240多年的统治时期之内，对内对外战争的最大功绩是在秦王朝统一中国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了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巩固发展。这一伟大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刻于中华民族的史册之上。

西汉王朝的对内对外战争之所以不断取得胜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西汉对兄弟民族的战争是统一中国的进步战争，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而，不管遇到怎样的挫折和困难，最终仍然获得了胜利。西汉这一统一战争的胜利，使中国西汉时期的疆域东起东海，西至巴尔喀什湖北岸，南达南海海域，北至贝加尔湖，西南达诸羌居住地区。在这样辽阔的国土之内，各民族得到进一步融合，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

生产技术的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的繁荣、进步和发展。

西汉时期，民富国强，兵精粮足，具有深厚的战争潜力，为支持长期战争，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人力、物力的可靠保障。汉王朝初期经过刘邦、惠帝、吕后至“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国力已极为富强。到汉武帝初期，汉王朝已是：“民则人给家足，都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森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至汉宣帝时，刘向称之为，“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况过于太宗（汉文帝）之时”。尽管西汉王朝最大量的作战活动在汉武帝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力也随之受到相当严重的损耗，但总的来说，西汉王朝的大部分统治时期，也就是除了汉末的衰败时期以外，均为殷实富裕之邦。所以，汉武帝连续用兵40多年而不竭。昭宣时期，骑兵的最大出动量一次为16万骑，也并未显出马匹的奇缺。这些，均由于有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

国防建设的加强和屯垦戍边、大修马政等方针政策的执行，使西汉王朝有了一支以骑兵为骨干的强大武装力量。西汉最主要的作战对象为匈奴，而匈奴军队则全部为骑兵部队，他们依靠强悍的铁骑，在我国北部，西北部的戈壁荒原上，驰突冲杀，确实给汉军造成相当的威胁。汉王朝为了适应对匈奴作战的需要，从兵员的招募，士卒的编练，军队的屯驻，马匹的驯养，将帅的选拔，军粮的筹集、运输和补给等等方面，都以建设强大的骑兵部队为着眼点。这样，使汉王朝在很短的时期之内，便由以步兵、车兵作战为主的传统作战方式，转变为以骑兵为主体的作战。这一重大的战略转变，给西汉王朝带来了深远的战略利益，使其在政治上放弃了受尽屈辱“和亲”奉献的妥协政策，军事战略上诀别了消极防御的被动地位，而以积极进攻的战略方针取而代之。这样，西汉王朝便在战争中，化被动为主动，争得了军队行动的自由权，使自已牢固地立于不败之地，终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各兄弟民族落后的社会制度，使生产发展缓慢，远远赶不上西汉王朝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使汉王朝拥有这方面的巨大优势。在古代冷兵器时代，武器差别虽然在战争中不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是战争制胜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汉军在郅支战役中，郅支单于就是面部被汉军利箭射中而死。西汉时期，汉族地区已进入封建社会多年，由于金属冶炼技术和武器生产技术的发展，使西汉军队装备的强弓劲弩、刀、矛、戈、剑，矢、箭以及各种防护器械、攻城设备等，均处于遥远领先的地位。而当时各兄弟民族，绝大部分部落，包括匈奴部族在内，还处于奴隶社会时期，他们使用的多为落后的兵器，自然无法与汉军匹敌，这也是成为汉军取胜的重要原因。

西汉王朝在对兄弟民族的作战中，还依靠了几代雄才大略的明君贤主，和胆略超人的一批将帅的正确决策，这就使西汉王朝占据了主观指导上的优势。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大将军卫青、霍去病，霍光，赵充国等，尤其是汉武帝刘彻，经他策划和指挥的对匈奴的战争，是西汉时期最关键、最重要的作

战活动。强大的匈奴部族连续遭到汉武帝十几次大战的痛击之后，国力已经耗尽，横戈铁马、驰骋原野的气势，也被汉军扫除干净，匈奴的彻底衰败指日可待，终于在西汉的后期，彻底臣服于西汉王朝。

第六章 东汉时期总论

第一节 西汉的灭亡和东汉王朝的建立

西汉政权传至它的末代君王后，被王莽篡夺了政权。王莽政权由公元9年延续至公元23年，被绿林起义军推翻，刘玄当了两年皇帝，旋即被赤眉起义军消灭。

西汉宗室春陵节侯的后代，豪强地主刘秀和其兄刘缩等人，代表豪强地主的势力，加入绿林农民起义军后，便千方百计地企图实现恢复汉代刘氏江山的设想，后来刘缩在争夺帝位中被杀。刘秀在刘被杀后，不露一丝一毫的声色，极力克制自己的愤怒情绪，表面上仍积极为更始政权效力，暗中仍在继续扩充以他为代表的地主豪强在起义军中的势力。

更始元年（公元23年）十月，更始政权在洛阳战役后，即派刘秀持节，行使大司马的职权，去河北地区，招抚黄河以北诸郡县的农民起义军和一些地方势力。刘秀一到河北，便极力寻求地主豪强势力的支持，得到渔阳（今北京密云）太守彭宠、信都（今河北冀县）太守任光、上谷（今河北怀来）太守耿况等人的支持和受到邓禹、耿弁、吴汉等人的辅佐，首先消灭了割据邯郸称帝的王郎，接着便在继续网罗地主豪强势力的同时，一方面消灭了更始政权在河北的势力；另一方面镇压了河北地区的农民起义武装力量。他以军事围剿，分化瓦解、招降利诱等手段，逐个消灭和收降了铜马、青犊、五幡、尤来、大枪，高湖、重连等农民起义军，迅速扩充了自己的势力，拥兵几十万人。

当更始政权的刘玄，发觉刘秀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时，十分焦虑，后悔不听众人的劝告而错派刘秀去河北地区经略。因而，刘玄政权便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以封刘秀为王作诱饵，急调刘秀回京师就任王位。但刘秀此时不但已在河北地区站稳脚跟，而且羽毛已经丰满，遂决意拒绝奉召回京，准备自立称帝。他以地主阶级争夺封建统治政权敏锐的政治眼光，一面命战将邓禹率兵西进，伺机进入关中，夺取京师长安，一面布置重兵虎视关东战略重镇洛阳，以便在适当时机向更始政权在河南地区的势力开刀。刘秀在完成了这些重大部署之后，便于公元25年6月，在地（今河北柏乡）自立为帝，当年建号为建武元年。

刘秀称帝之后，便在三条战线上，推进他的统一战争：一条战线是继续消灭农民起义队伍，一条战线是对刘玄政权作战，一条战线是消灭各地区的割据势力。作战的重点集中在以下三个地区；

一、个是河北地区。刘秀把这个地区看做是自己最巩固的根据地，他命战将谋臣吴汉，要把河北地区经营得像楚汉战争中汉高祖经营关中一样，成为支持统一战争的战略基地。刘秀以其很大一部分武装力量，留在河北地区继续剿灭檀乡、富平、获索、五校等农民起义军，以求将

河北的局势彻底稳定下来。

二、个地区是关中、洛阳一带。刘秀深知关中和洛阳地区乃是他争夺帝位的决战战场，所以他派出邓禹军进入关中，伺机进攻长安。失利后，便又及时派将军冯异，率军前去接替邓禹。刘秀对关中地区的战略，始终是采取“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方针。他虽然派出一定的兵力，但又深知这些兵力远远不是更始和赤眉起义军的对手，因而，只命他们伺机而动，待赤眉与更始绿林起义军火并，两败俱伤之时，再出兵进击。

三、个战场是荆州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在这些地区，主要是扫除更始政权的残余和一些割据势力。

当樊崇等人领导的赤眉起义军消灭了更始政权，回师东归，行至宜阳附近地区时，刘秀布设重兵，最后消灭了这支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大军。至此，刘秀争夺帝位，攻取天下，统一全国的宿愿才基本上变成了胜利的现实。

刘秀彻底镇压了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队伍之后，定都于洛阳，与此同时，开始了逐步消灭散布于各地的割据势力的战争。这些割据势力比较大的有在梁地称帝的刘永，在齐地称王的张步，在今江苏北部，山东省南部地区的董宪，在渔阳的彭宠，在南郡（湖北江陵一带）的秦丰，在庐江（今安徽巢湖一带）的李宪，在五原一带称帝的卢芳，在河西地区的窦融，在天水的隗嚣和在巴蜀称帝的公孙述等。刘秀又经过10多年的作战，将他们一一平定。至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刘秀终于统一了全国。

第二节 东汉王朝的始末

刘秀自统一中国后，即大力整顿全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生产，恢复战乱创伤，巩固东汉政权。东汉从公元25年刘秀自立为帝起，至公元220年汉献帝刘协末年止，共统治了195年，经历了12个君王。

东汉王朝的统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前期的兴盛阶段，中后期的衰败阶段，东汉末年的战乱阶段。

一、东汉王朝前期的兴盛阶段

此阶段经历了三代君王。汉光武帝刘秀自公元25年至公元57年，在位33年，汉明帝刘庄自公元57年春即位，至公元子5年，在位18年，汉章帝刘自公元75年秋即位，至公元88年，在位13年。

东汉王朝在这三代君王当政期间，尤其是史称“光武中兴”的刘秀时期，国内政局稳定，生产迅速发展，国家殷实富强，人民基本上安居乐业。这三代期间力图恢复西汉的鼎盛局面，除了致力于稳定政权，发展经济之外，还不断推进统一战争，武功显赫，曾向北征破匈奴，向西平定西域，大致恢复了西汉时期的疆域。

二、东汉王朝中后期的衰败阶段

东汉王朝在公元88年汉和帝即位之后不久，便开始出现了衰败的趋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八个君王，这八代君王多为少年或婴儿皇帝。

汉和帝刘肇自公元88年春即位，至公元105年，即位时仅10岁，在位17年，汉殇帝刘隆1岁即位，在位仅1年，即死去；汉安帝刘祜，自公元106年即位，至公元125年，即位时年13岁，在位19年；汉顺帝刘保，即位时12岁，自公元125年至公元144年，在位19年；汉冲帝刘炳，即位时2岁，在位1年；汉质帝刘缵8岁即位，在位1年也死去；汉桓帝刘志15岁即位，自公元146年至公元167年，在位21年；汉灵帝刘宏即位时12岁，自公元167年至公元188年，在位22年；汉灵帝死后，又立了1个少帝刘辩，不到〗年，便被废除。

东汉政权在中、后期阶段，由于都是婴儿和幼年、少年皇帝，因而，每代君王即位，皆由太后执政。而太后们要决定军国大事，又没有相应的知识和才能，于是便只能依靠其父兄和宦官。这样太后执政，实际上也便和幼年皇帝一起，成了外戚与宦官的傀儡，政权遂落入了外戚和宦官之手。有时，由于宦官与外戚分配权力的不等，于是不断出现宦官与外戚的权力之争。汉和帝10岁即位，窦太后临朝称制。窦氏一门高官显贵，横行朝野。当汉和帝日渐长大，知道了自己的生母为窦太后所害，便和宦官郑众等，诛灭了窦氏家族，这时宦官势力崛起。汉和帝死后，邓太后为了亲身执政，先废去了和帝的长子，立百日婴儿为殇帝。

殇帝死后，她又立13岁的安帝，而依靠宦官和外戚掌权。汉安帝死后，阎太后称制，又依靠其兄阎显等掌握大权，不久，宦官孙程等，剪除了阎氏家族势力。汉顺帝即位后，外戚梁商、梁翼权倾当朝。顺帝死后，梁太后称制，梁氏门庭已达权力的顶峰，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毒死年幼的汉质帝，害死太尉李固，不择手段地搜括民财，凶狠残暴至极。当汉桓帝依靠宦官的势力诛灭他们之后，没收的梁氏家产，竟价值东汉王朝半年多的租税收入。汉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太后之父大将军窦武与大臣共谋诛灭宦官党羽，结果反被宦官诛灭。

在外戚宦官争权残杀下，东汉王朝面临一次次政治危机，社会濒临崩溃的历史关头。东汉王朝内一部分有识之士，如太尉杨震，大臣李固、李云、杜乔、李膺以及北海相杜密，河东太守刘祐，太尉杨秉，司空周景，侍御史张纲等，都起而反对宦官外戚专权乱政。后来出现了所谓“党锢之祸”，大批有识之士惨遭陷害，东汉王朝的统治已腐朽不堪，它的覆没已指日可待。

三、东汉王朝末年的战乱阶段

东汉王朝，实际上至汉少帝时，已经到了它的末日。但并州牧董卓带兵进入京师洛阳后，便立即废除了刚刚即位的少帝刘辩，而立了傀儡皇帝汉献帝刘协。刘协自公元189年至公元220年，当了31年军阀手中的玩偶，这时的东汉王朝早已是名存实亡了。

东汉王朝传至汉桓帝和灵帝时，已经腐朽透顶。桓帝、灵帝时的后官彩女竟多达数千人。桓帝开始便公开以钱买官，到灵帝时，更将各级官吏的卖价公诸于世。二千石的官吏卖2000万钱，四百石的官职卖钱400万，既收现款，也可以赊欠，等到任之后再加偿还。这样，官吏的贪婪搜括，加之水旱蝗等灾害连年不断，农民纷纷破产，背井离乡，到处逃荒。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豫州的大饥荒，人口饿死近半，甚至有整户全部饿死者。汉灵帝时，“河内（今河南武陟一带）人妇食夫，河南（今洛阳一带）人夫食妇”人民已无生存的余地，只好起而反抗。各地的起义农民前仆后继地与反动黑暗的东汉王朝作斗争，至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声势浩大的全国黄巾大起义终于爆发了。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进而导致了军阀混战，至此，东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了。

第三节 东汉王朝的政权、经济、军事建设及其对战争潜力的影响

一、政权建设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许多政治措施，仍大致与西汉相同。但刘秀对西汉王朝外戚篡权、王国割据的历史教训，却十分重视，他极力强化中央集权制，集一切大权于皇帝一身。

东汉王朝的统治集团的核心大臣，大都是南阳、颍川、河北等地的豪强地主。刘秀既依靠这些豪强地主在各地的势力，形成了自己统治的阶级基础，又依靠其中的优秀人物，参与核心决策集团。

东汉建立后，仍在朝廷内设置“三公”，“九卿”。“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太尉掌管全国的军事，司徒掌管全国的民政，司空负责掌管的事务与西汉略同，“九卿”也与西汉相同，但九卿却分别隶属于“三公”圆。

东汉在建立的过程中，跟随刘秀南征北战的有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三百六十五”功臣。刘秀为了防止这些功臣战将居功自恃，拥兵作乱，一方面给他们以丰厚的奖赏，另一方面却又严格限制他们的实权。包括他的功勋战将邓禹，他的妹夫大司空李通等人在内，都深知刘秀这种心理状态。因而，他们尽管身居高位，却尽量少管朝政，多让刘秀自己决策。

东汉王朝建立后，刘秀为了削弱和限制三公的权力，大大扩大了尚书台的权力。为此，他扩大尚书台的组织，将其职权和决策的范围，提高到几乎无所不包的地位，一切政务方面的重大决策，几乎不再经由三公，直接由尚书台向皇帝禀奏。尚书台内设尚书令1人，尚书仆射1人、尚书6人。自此，尚书台便成为皇帝直接掌握的最高政权机构。

东汉王朝为了更有效的对全国实行统治，继承汉武帝的做法，仍将全国划分为13个刺史部，这些刺史部统辖着全国105个郡和相当郡级的国。

司隶校尉部管辖的地区东起今河南的开封（不含）以西。南至今陕西的商南，北达今山西的永和、汾西，西至今陕西的陇县。它包括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弘农郡、河内郡、河东郡、河南尹等7个郡。司隶校尉部的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地区）。

豫州刺史部管辖的地区东起今安徽的五河，南到今河南的息县、潢川，北至今河南的商丘地区，和今山东的泗水地区，西达今河南的宝丰，临汝。它包括颍川、陈国、梁国、鱼国、沛国和汝南郡等6个郡国。州治在谯县（今安徽的亳州市）。

兖州刺史部管辖的地区东起今山东的蒙阴，南达今山东的单县以南，北至今山东的聊城，西到今河南开封地区。它包括东郡、济北国、泰山郡、东平国、陈留郡、济阴郡，山阳郡、任城国等8个郡国。州治在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后来迁至濮阳，鄄城等地。

青州刺史部管辖的地区东起今山东的成山角，南达山东的诸城，北至山东的阳信，西到山东的德州地区。它包括平原郡、乐安国，济南国、齐国、北海国、东莱郡等6个郡国。州治在临（今山东淄博地区）。

徐州刺史部管辖的地区东起今黄海之滨，北起今山东诸城以南，南达今江苏的扬州地区，西至江苏的徐州地区。它包括琅邪国、东海郡、彭城国、下邳国、广陵郡等5个郡国。州治在郯（今山东郯城）。

冀州刺史部管辖的地区东起今渤海湾，西至今山西的阳泉，北起今河北的雄县，南达今河南滑县地区。它包括中山国、河间国、渤海郡、常山国、巨鹿郡、安平国、清河国、赵国、魏郡等10个郡国，州治在高邑（今河北高邑），后移至邺城（今河北临漳）。

荆州刺史部管辖的地区东起今湖北的蕲春，西至今湖北的恩施。北起今河南的鲁山、叶县和今陕西的山阳，南达广西的桂林和广东的韶关地区。它包括南阳郡，南郡、江夏、武陵，长沙、零陵、桂阳等7个郡。州治先在汉寿（今湖南常德），后来移至襄阳（今湖北襄樊地区）。

扬州刺史部管辖的地区东起东海之滨，西至今湖北罗田和江西的萍乡地区，北起今安徽的蚌埠和江苏的镇江地区，南达今福建的漳州、厦门和江西的定南，它包括九江、丹阳、吴郡、卢江、豫章、会稽等6个郡。州治在历阳（今安徽和县地区），后来迁移至曲阿＜今江苏丹阳）。

益州刺史部管辖地区东起今湖北的保康和广西的天峨、南丹，西至今四川成都地区和今缅甸北部迈立开江流域以西地区，北起今陕西南部地区.南达今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南端之勐腊。它包括广汉属国、汉中、蜀，广汉、巴、蜀郡属国、犍为、越、犍为属国，柯、永昌、益州等12个郡国。州治在雒县（剖四川广汉境），后来迁移至成都。

凉州刺史部管辖的地区东起今甘肃的庆阳地区和陕西的略阳，西至今甘肃的敦煌地区，北起居延海以北，南达甘肃省的甘南、武都地区。它包括居延属国、张掖属国、敦煌郡、酒泉郡、张掖郡、武成郡、北地郡、安定郡、金城邢、汉阳郡、陇西郡、武都郡等12个郡国。州治在陇州（今甘肃省张家川）。

并州刺史部管辖的地区东起今山西的大同地区和阳泉（不含）以西，西至今内蒙古的磴口和今陕西的靖边，北起今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南达今山西晋城和今陕西的延安地区。它包括朔方郡、五原郡，云中

郡，雁门郡、西河郡、定襄郡、上郡、太原郡、上党郡等9个郡。州治在晋阳（今山西太原）。

幽州刺史部管辖的地区东起今朝鲜半岛的东海岸，西至今山西省的阳高地区，北起今辽宁的铁岭、沈阳地区和河北的承德地区，南达今天津和河北保定地区。它包括代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邪、辽东属国、工东郡、玄菟郡、乐浪郡等9个郡国。州治在蓟县（今北京市）。

交州刺史部管辖的地区东起南海之滨，西至今云南河口，北起都柳江和今广西桂林以南地区。南达今越南之岘港湾。它包括郁林郡、苍梧郡、南海郡、交趾郡，合浦郡、九真郡、日南郡等7个郡。州治在广信（今广西梧州），后来迁移至番禺（今广州市）。

此外还有西域都护府、护匈奴中郎将部、护羌校尉部和护乌桓校尉部，管理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事务。

各州均设立刺史一人，统管各州军政大权。司隶校尉部不设刺史，而设司隶校尉。汉灵帝初改刺史为州牧，各郡设太守，总理全郡的军政大事。各王国的政务则由中央任命的傅总管，侯国的政务由侯国的相管理。这样便使王侯的封国，实际上也是中央王朝统管，避免王侯割据局面的出现。

二、经济建设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一面进行统一战争，一面则大力恢复社会秩序，发展农业生产，繁荣社会经济。为此，东汉王朝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剔除王莽时的严刑苛法，轻法缓刑，以安定人心，调动人们进行生产的积极性。

（二）释放奴隶，安辑流民，增加社会生产劳动力。西汉末期大量破产农民沦为官私奴隶，造成田园荒芜，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因而东汉王朝在建立之初，便六次下诏解放奴隶，三次诏令严禁虐杀奴隶。尽管这些诏令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和整个东汉时期对解放奴隶和阻止农民重新沦为奴隶起了相当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的阶级矛盾，增加了社会生产劳动力，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东汉前期，豪强地主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西汉末，官僚、地主兼并土地和残酷盘剥农民的结果，使大批农民丧失了土地，成为流民。大量流民的出现严重地威胁着东汉王朝统治的安定，社会动乱的因素急剧增加。为消除这种状况，东汉王朝自建立之初，便不断采取多种措施，诸如“赐爵予民”，凡愿意安家定居的流民均赐爵一级。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刘秀下诏“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假民公田”，即将国家占有土地园林租借给农民耕种，农民向国家缴纳相当数量租税。这个办法

也对安置流民起了重要作用。

（三）精兵简政，减少国家的开支和民众的负担。刘秀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六月下诏，合并一些郡县，裁减官吏，“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建武七年（公元31年），又裁去郡国都尉，废止地方都试，撤销内地地方武装，遣返务农，这对减轻人民负担，充实农业生产劳动力也起了一定作用。

（四）屯垦戍边。由于屯垦的顺利进行，一方面减轻了人民对战争的负担，一方面也减少了为军队运输作战物资所占用的大量劳动力。

三、军事建设

西汉时期对军事建设，特别是对武装力量的建设，一贯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随着统一战争的完成，开始逐步削减武装力量，降低军事建设的势头，因而，整个东汉时期的国防力量，呈逐渐衰减之势。所以如此，大致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战争胜利了，无须保留众多的常备军，其二是避免郡国势力拥兵自重，割据作乱，其三是东汉人口锐减，兵马过多，将占用社会大量劳动力，妨碍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据史料记载，西汉平帝时，全国人口接近6000万，至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减至2100万，减少近三分之二。

东汉的军制，部分地摈弃了西汉时期中央军与地方军相结合的制度，保留一定数量的中央军，裁减郡国兵与部分边防常备军。

东汉王朝建立后，仍设宿卫京师之南军和；比军，兵力最高达4万人。南军负责警卫皇宫的安全，北军负责整个京城的守卫任务。

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东汉取消了边境各郡国之都尉，将都尉的兵权统归于太守，废除了都试法。建武，匕年战去全国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军假吏。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再撤消各边郡地区的亭侯吏卒。

汉灵帝时期，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于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增设了西园八校尉之军：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后来即升为元帅，都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东汉为防备匐奴和对西域用兵的需要，在金城（今甘肃兰州）和伊吾卢地区设立了屯田军。

四、对战争潜力的影响

纵观东汉王朝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的情况，实属平平。除汉光武刘秀当朝的时期之外，再没有出现过西汉时文景之治，武帝的鼎盛和昭宣中兴那样的强盛局面。因而，使东汉时代的战争潜力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国家的实力在汉和帝以后，即渐呈衰减的趋势。

这种衰减所导致的恶果，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地暴露出来。本来，自刘秀统一了全国之后，由于生产的发展，实力的增强，曾使四夷各部族逐渐内附。西域的车师、鄯善等16国率先臣服，鲜卑、乌桓等，也来入朝，南匈奴自动归降。但在刘秀逝世之后，随着东汉王朝实力的逐渐衰减，匈奴又不断进袭边塞，羌族部落也屡次进兵三辅地区，鲜卑则从北面而入。

东汉王朝为应付这种四周火起的战乱局面，不得不临时设置一些屯兵机构。如汉明帝时设置了度辽营军，汉和帝时设置了象林营军，汉安帝时设置了长安，雍和渔阳营军。汉顺帝以后，为了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力量，又在全国一些地区设立了数百个屯兵坞。这种新建的屯兵机构，只能临时招募一些人从军，没有严格的选练，军队素质低下，战斗力自然十分脆弱。

第四节 东汉时期的重要战争梗概

东汉时期的战争大致分为三大类：一是东汉王朝的统一战争：二是对兄弟民族和对外战争；三是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战争。

东汉由镇压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而建国，又在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中走向衰亡。因而，东汉时期的战争，多为镇压农民起义后的统一战争，战争活动的中心地区为中原地带。

一、东汉王朝的统一战争

一、东汉建立初期统一东方地区的战争刘秀于更始三年（公元25年）称帝之后，接着立即开始了统一中国东部地区的战争，这些战争起于更始三年，止于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汉光武帝刘秀为统一中国东部地区，先后进行了洛阳战役、平定刘永之睢阳战役、平定董宪之昌虑战役、平定张步之临淄战役。东汉军通过连续作战，交替运用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的两手策略，一一战胜了对手，统一了中国的东方地区。

二、东汉建立初期统一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战争这些战争起于建武二年（公元26年），止于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汉光武帝刘秀，在统一东部地区的战争进程中，开始了统一北方和西北地区的作战，其进行的主要作战活动有：击灭彭宠之战，平定割据陇坻一带地区的隗嚣之三次战役，平定卢芳之战，刘秀军顺利消灭隗嚣，对其统一西北地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是保障其进军西南的关键战略步骤。

三、东汉建立初期统一南方和西南地区的战争这些战争起于建武二年，止于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刘秀在统一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的战争中，先后进行了平定董诉邓奉之战，平定延岑秦丰之战，平定李宪之战，平定公孙述的夷陵战役和成都会战。东汉军在成都会战中，刘秀以大将吴汉等为统帅，以近20万大军会攻成都，将公孙述彻底击灭，重新统一了中国的西南地区。

二、东汉时期对兄弟民族和对外战争

东汉政权建立不久，便开始了对兄弟民族和对外战争。这些战争起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一直延续到东汉的后期。主要的作战活动包括：东汉征西羌诸部族的战争，征南蛮和西南夷的战争，征匈奴的战争，统一西域地区的战争，征乌桓、鲜卑、高句丽的战争等（详见第八卷）。

三、东汉末期的农民起义战争

东汉王朝末期，政治更加黑暗腐朽，贪官污吏横行天下，社会经济崩溃，人民无以为生，从而，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这些起义战争，从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农民起义军以摧枯拉朽的伟力，将东汉王朝推向了彻底覆没的深渊。在此期间主要的作战活动如下：

一、黄巾起义军与东汉围剿军的作战以农民起义军领袖张角兄弟领导的黄巾军起义后，主要势力集中于颍川、冀州、南阳等地区。东汉王朝为歼灭这三个地区的黄巾军，于中平元年四月，调集其精兵悍将皇甫嵩、朱、曹操等军，一一将起义军击破。

二、黑山白波黄巾军与东汉围剿军的作战当张角兄弟领导的黄巾军被东汉王朝镇压之后，黑山、白波等黄巾军相继而起。从东汉王朝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起，至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与东汉王朝进行了反复较量，但终因寡不敌众，先后被公孙瓒、曹操、袁绍等割据势力击败和收编。后来，曹操又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将张鲁领导的五斗米道起义军击败。

第五节 东汉时期的战争特点和杰出将帅

一、东汉时期的战争特点

东汉时期的战争，无论在战争规模、战略策略的运用，作战形式与样式等方面，均逊色于西汉时期。因而，在作战思想、指导艺术、治军观念等问题上，也无明显特色，仅粗略概述如下：

一、战略上的稳扎稳打各个击破东汉开国之君汉光武帝刘秀，在取得初建政权的胜利之后，除了与势力仍相当强大的更始政权作战外，还面对一些割据势力。这些割据势力，均有相当的实力，控制着大小不等的州郡面积，成为阻碍刘秀统一全国的障碍。其中主要的有割据睢阳一带的刘永；割据昌虑一带地区的董宪；割据临淄一带地区的张步；割据东北部地区的彭宠，割据西北地区的隗嚣、卢芳；割据河西走廊一带的窦融，割据南方地区的董诉，秦丰以及割据蜀地的公孙述等。

刘秀对如此众多的敌人，不是四面出击，而是首先消灭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更始政权，争取在中原腹地站稳脚跟，然后根据自己实力的发展，再逐次消灭其余割据势力。刘秀在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称帝于河北部城之后，根据当时的战略形势，首先将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占据洛阳，长安的更始政权，至十月初击降了洛阳更始军。接着于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向称帝于睢阳地区的刘永进击，至建武五年（公元29年）春，歼灭了刘永集团后，兵锋旋即转向了昌虑地区的董宪。待董宪行将覆没之际，又以建威大将军耿算率军平定了张步。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亲至长安，调集精兵勇将，向盘据西北势力最大的隗嚣集团进攻。经近4年的苦战，终于歼灭了隗嚣集团；最后，才将锋芒指向了称帝于巴蜀地区的公孙述。东汉王朝在这些重大战略行动中，策划周密，稳扎稳打，歼灭一个，再及其余。表现了相当高超的各个击破的战略思想，使其从容不迫地达成既定的战略企图。

二、政略、战略、策略思想紧密配合东汉王朝在其开国和统一战争中，常常根据时间、地点、作战对象以及双方形势的变化，交替运用政治攻心、分化瓦解、军事打击，招降利诱等等手法制服敌人。刘秀集团在消灭河北地区各种敌对势力时，由于正确区分了利用谁、争取谁、打击谁，使其战略策略思想的运用颇为得心应手。因此，尽管其刚入河北地区时兵微将寡，势孤力单，但很快便扭转了局势，一一制服了对手。

铜马起义军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农民起义军，是刘秀在河北地区的劲敌。刘秀坚持以军事围剿和政治利诱相结合的手段，制服了这支军队，顷刻之间成为数十万大军的赫赫统帅，获得了“铜马帝”的称号。

东汉在夺取更始王朝京都洛阳的决战中，面对更始30万大军驻守于城坚池深的洛阳城，深知以武力硬攻难以奏效。于是，先对更始两员主将施展离间之计，借刀杀人，除去了李轶，诱降了朱鲔，轻取洛阳，为

刘秀集团全部进占中原腹地，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盘据西北地区的隗嚣，占有山川地势之险，兵精粮足，文臣勇将济济一堂，且南连巴蜀，背依今青海地区的诸羌部落，成为东汉统一西北和巴蜀的最大障碍。东汉为征服这一强大对手，除了调集精兵勇将10多万大军外，也采取了分化瓦解、政治诱降等手段。东汉王朝在进军之前，首先收买了隗嚣的大将马援，并通过马援劝降隗嚣及其他将领。同时，又派人诱降了隗嚣侧背的另一割据势力窦融，最大限度地孤立了隗嚣的顽固势力后，才发动攻击，经过多次交锋，终于歼灭了隗嚣集团，为进军巴蜀扫平了道路。

三、重视战略基地的作用东汉王朝的起家之地，是当时的河北地区。这一地区包括今黄河以北的河南、河北、山西等省的部分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虎踞黄河之滨，距京都洛阳仅一河之隔，退可以险拒守，进可直捣洛阳，长安两京。东汉王朝看到这一地区对其争夺天下的重大战略意义，因而，特别重视这一地区的经营，以使其成为巩固的战略基地。

刘秀为经略河北，以其得力将领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并嘱托他说：“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指刘邦）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接着又以大将冯异为孟津：降军，屯兵于孟津渡口，以阻止更始军渡河北上，刘秀正是由于巩固了河北这一重要的战略基地，使其兵精粮足，进退自如，很快兵临洛阳，进占长安，进而成为争雄天下的霸主。

四、多种战术手段并用，指挥艺术有了一定的提高东汉时期的战争，继承和发扬了历代战争中所使用的许多作战手段，不少将领在战争中表现了一定的指挥才能，诸如集中兵力，后发制人，远程奔袭，声东击西，瞒大过海，欺诈伪装以致暗杀敌军将领等等，均运用得相当巧妙。

东汉王朝在更始二年（公元24年），镇压铜马农民起义军时，分析了铜马军的具体情况，任凭其反复挑战，采取坚壁不战，断绝铜马军粮食补给的对策。三旬过后，铜马义军兵疲食尽，求战不得，只得撤走。汉军此时乘势追击，大败铜马军。建武四年（公元28年），东汉进击董宪军时，也是距敌百里之外，扎营驻守，不与敌军交战，只派兵监视董宪军的动向，待董宪军粮尽退走之机，立即挥军追歼，一举将董宪军击破于昌虑。人将耿宾击破张步、来歙进击隗嚣均相当成功地采取了这一战法。

一些奇袭成功的战例相当出色。建武八年（公元32年），东汉军在进攻隗嚣的重要战略城邑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北陇城镇）时，汉将来歙熟知隗嚣军的虚实，乘隗嚣军疏于戒备之时，率精兵2000，迂回山中，伐木开路。出敌意料，一举攻占略阳，隗嚣闻讯，大惊道：“何其神

也”！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东汉军南下进攻巴蜀地区的公孙述时的几次迂回奇袭也相当成功。当时，汉军统帅岑彭以部分兵力牵制公孙述军的主力，自率主力沿嘉陵江而下，复又折回江州，使敌人产生汉军撤退的假象。然后再暗中沿长江而上，突然进击防守于黄石的公孙述部将侯丹军，一举将侯丹击败。旋即日夜兼程，长途急进，直取武阳（今四川彭山东），出敌不意地迂回至蜀军主力背后，即将逼近成都。公孙述大惊失色，以手杖连连击地惊呼“是何神也！”东汉永平十六年（公元了3年），班超等率三十六吏士出使西域，在与匈奴武装使团争夺鄯善时，利用夜间纵火，突袭匈奴军，一举威服鄯善，也是这方面的杰出战例。

军事间谍和诈谋手段的运用，也有许多生动的例证。建武三年（公元27年），汉将岑彭率军南征秦丰时，被秦丰大将蔡宏阻于邓地（今湖北襄樊西北）数月之久。为击败秦丰，岑彭故意于夜间下令紧急备战，向全体士卒和被俘的秦丰士卒宣告：明天一早即急袭西方的山都（今襄樊市区），并命人放松对俘虏的看管。一些俘虏连夜逃回向秦丰报告后，秦丰信以为真，急忙率部西调，准备迎击岑彭军。但岑彭却暗中率军东进，直捣秦丰的老巢。秦丰大惊，再回军东向，已为时过晚，终于被岑彭大败。在东汉军平定公孙述的作战中，公孙军连遭失败。公孙述为扭转颓势，先于北线战场，派刺客刺杀了汉军大将来歙，后来，当岑彭军逼近成都，公孙述于即将覆亡之时，又派刺客将岑彭暗杀。这两起暗杀对方统帅成功的事件，在古代战争史上颇属鲜见。

二、东汉时期的杰出将帅

刘秀：字东叔，东汉时期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刘秀自西汉末年起兵，加入绿林起义军后，即开始了长期的军事战争生涯。刘秀靠镇压和吞并农民起义军起家，而后，又在扫平割据势力中，成为东汉军队的最高统帅，他做为东汉时期战争舞台上的决策人物，既为中国的统一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又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军和作战经验。

关照战略全局的长远发展，周密地策划和推进每一个阶段的战争活动应当说，刘秀在起兵之初，并非就具备了长远的战略眼光，而是在战争实践中，增长了他这种统帅的必备才能。昆阳之战，莽军号称百万大军包围昆阳小城时，众人皆为当时的危急局面所吓倒。只有刘秀正确地估计了战略全局的形势，毅然率领10多个人冲出包围，调来援兵，一战而获得了带战略决战性的胜利，初步显露了他敢于和善于从战略全局上决策问题的才华。当刘秀以大司马的身分前往河北地区扩大更始政权势力的时候，这种驾驭战略全局的能力便更加显露出来。他在河北地区初步打开局面后，就处处注意为自己称帝，实现恢复汉家帝业的宏图做出了长远的战略安排。他在河北地区把三方面的势力，均敝为自己的敌人，即农民起义军，王莽政权的势力，更始政权的人马。利用谁，打击谁、先消灭谁、再消灭谁、最后消灭谁，都是全局在胸。当河北地区大局即将确定之时，他的目光早已转向了长安和洛阳的更始大军；在更始

与赤眉军火并之时，他又做出了下一步彻底消灭赤眉军的作战谋划；在他向东扫除割据势力时，即想法排除西方可能出现的威胁；当他进攻隗嚣统治的陇地时，又预见下一步攻取蜀地的作战困难。他得陇望蜀，一步一个脚印，周密部署，环环相扣，始终把握着战略全局的发展情势，胜券稳操于手。

政略、战略、策略紧密结合，相辅相成，交替运用经略河北之初，是刘秀最困难的阶段。他虽，然由手昆阳大战，威名远扬，但他初入河北，势孤力单，既无雄兵，又无战将，他就依靠政治攻势，笼络吏民，收买人心，建立自己的权威。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记载，刘秀持节到河北后，巡视郡县，考察官吏，“辄见两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史”，“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宫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很快便获得了舆论的支持。当刘秀集团有人考虑用决开河水冲淹赤眉起义军时，尽管刘梦寐以求要消灭这支力量强大的农民武装，但他却从收买人心出发，认为决堤放水过于残暴，拒绝了这一建议。当刘秀初步拥有了4000多人的武装时，他便首先击灭了最顽固的敌人。在他的武装力量连战皆捷，势力大大膨胀之后，便立即联合各郡的兵力，以军事围剿和政治利诱相结合的手段，收编了这支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他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几十万军队的统帅，获得了“铜马帝”的称号。

刘秀夺争洛阳，深知面对更始政权朱鲔、李轶等30万防守大军的严重局面，若以武力硬攻，结局如何很难预料。为此，他又是首先施展政治攻势，以冯异劝说李轶投降。当李轶决定投降刘秀后，刘秀又施展离间之计，将李轶投降的消息透露给朱鲔，结果借朱鲔之手，杀掉了李轶。接着又派人说降了朱鲔。就这样城坚池深、30万重兵防守的重镇洛阳，便被刘秀垂手而得。刘秀在宜阳地区最后消灭赤眉军的重兵集团和其统帅部时，他将六路大军部署完毕，当赤眉军精疲力竭，走进他重兵布置的包围圈时，刘秀并不急于出兵进击，而又是通过政治攻势，逼迫赤眉军自动放下武器，降服于他。在刘秀以后进行的消灭陇西割据势力隗嚣时，再一次将招降利诱与军事进攻结合起来，均收到事半功倍的奇效。

战略指导刚毅稳健，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刘秀在他十七八年指导战争的实践中，充分表观出一个优秀统帅应当具有的刚毅稳健的可贵气质，从不鲁莽造次，海战力求制胜敌人。因而，常常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牢牢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刘秀先命邓禹争夺关巾与赤眉军交战时，严令他不要与亦眉军硬拼，赤眉军缺乏军粮，军粮一断，必然东归，要以饱待饥，以逸待劳，才能消灭它。邓禹违背了刘秀的作战方针，结果吃了败仗。刘秀立即决定撤换邓禹，而以将军冯异代替邓禹。刘秀在命冯异出征时，明确告诫他一定要“以饱待饥，以逸待劳”，决不可轻敌冒进。冯异坚决贯彻了刘秀的指导方针。结果崤底一战，大胜赤眉军。刘秀在镇压铜马起义军时，根据铜马军粮食补给的情况，决定采取先派兵断绝铜马军的粮道，待铜马军兵疲粮尽退走之时，再行击灭它的作战方针。于是他“坚营自守”，铜马反复挑战，刘秀均按兵不动。一

个月后，铜马军果然粮尽，起兵退走。刘秀此时，则抓住战机，挥部追山，大胜铜马军。刘秀在消灭割据势力董宪时，也是在争得了确有制胜把握时，才向敌人发起攻击，一战而胜。当时，刘秀已确知董宪军粮食不足，难以持久，粮断之时，必然撤走。于是，刘秀率军深沟高垒，拒不出战，耐心地等待战机。为时不久，董宪军阴因军粮断绝率军而走，这时刘秀立即指挥大军将董宪军团团包围，一举击破了敌人。刘秀在派吴汉率军进攻蜀地时，特别告坼吴汉，成都有10万众兵，决不可能轻敌，你应该坚守广部，待公孙述派军来征，假始敌人仍不敢来攻，你再率军转移至距离敌人较近的地区，仍设营坚守，一定要等敌人向你进攻，精疲力尽时，你再出击，便可稳操胜劵了。吴汉开始没有按照刘秀的指导思想去办，硬攻成都坚城，吃了败仗。后来，改按刘秀的指示回师都坚守，引诱敌人前来进攻，最后，吴汉军终于一举攻克了公孙述的京城成都。

治军宽严适度，重赏轻罚，善于笼络军心刘秀治军有其严格的一面，也，有其宽容大度的另一面。他对于军队的纪律十分重视，凡是放纵军队抢掠的将领，刘秀均给以严厉的批评。侍御史杜诗，发现将军肖广纵容士卒在洛阳城内任意掠略。杜诗多次劝告肖广，肖广不听，杜诗未经向刘秀报告，即斩了肖广。刘秀对杜诗不但不怪罪，反而大加封赏，赐给杜诗以“戟”，授予他惩治不法将吏特殊权力。吴汉攻占成都后，纵兵烧掠公孙述的宫室。刘秀对吴汉严加训斥。刘秀这样做尽管引起一些贪婪之士的不满，但颇得正直将领和社会民心之赞扬。

刘秀对待犯有过失的将吏，只要不是屡犯不改，他都是坚持施之以教诲。刘秀在大司马吴汉率九将军镇压了檀乡农民军对功臣封赏时，还念念不忘地教育大家注意严格约束自己，刘秀说：“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义。惟诸将业远功大，诚欲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水，战战栗栗，日慎一日”。

刘秀重赏轻罚的最大特点是赏赐时决不吝惜官禄钱财。博士丁恭见刘秀赏赐过重，有的一次封食邑四个县，便建议刘秀说，自古帝王封侯不过百里，太大了，不利于强干弱枝，现在封列侯四个县，不合古之法制。刘秀则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赏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坚持重赏列侯之功。

刘秀重贤、爱才，对于确有真才实学之士，每加重用，并给予他们施展才能的充分余地，因此有力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当然，这种余地也是有限度的，以不危害他的统治为前提。

总之，刘秀无论率军作战，平时的治军选将，都大有儒将之风。他长于“运筹帷幄”，一切决策都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不失为古代封建帝王和著名军事统帅中军政兼备，智慧豁达，刚毅稳健之姣姣者。

冯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人。冯异是刘秀手下的重要战将，他谦逊持重，从不居功骄傲，为刘秀和东汉王朝的建立屡建战功。范晔在其史

著《后汉书》中旨出："中兴将帅立功名者众矣，唯岑彭，冯异建方面之号"。可见冯异具有较为杰出的将帅之才。

长于韬略，不战而屈人之兵刘秀刚至河北地区不久，由于刘缩被杀，虽然非常悲痛，然而却深藏于心中。冯异此时，即查觉了刘秀的心情，婉言相劝刘秀解除痛苦，并乘势劝刘秀要胸怀天下，以图大业。冯异对刘秀说："天下的百姓都对王莽政权深恶痛绝，多年以来即盼望汉室复兴。现在更始王朝腐败无能，它的将吏士卒所到之处，抢掠残暴，大失民心，天下百姓无所依靠，今将军受命，专至河北，以德政仁惠招降郡县，这是天赐之良机。昔日古人经历了殷纣王夏桀之残暴统治，才深知汤武之功的伟大。所以百姓在苦难之后，最渴望仁义之君的德政。现在必须抓紧时机，派出人员，巡视各个郡县，整顿吏治，体察民情，广泛传布你的恩惠仁慈，以争取民心"。刘秀立即采纳了冯异的建议，便和诸将领立即奔赴各地巡察，这为刘秀以后全部占有河北地区起了重要的作用。当刘秀基本略定河北地区后，即派冯异率军准备攻取洛阳。这时，洛阳正由更始王朝的舞阳侯李轶、廪丘王田立、大司马朱鲔、白虎公陈侨所统率的30万大军驻守。冯异兵少势弱，面对强敌，便以政治攻势离间洛阳守军，他暗中致书李轶说："愚闻明镜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项伯畔楚而归汉，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彼皆畏天知命，靓存亡之符，见废兴之事，故能成功于一时，垂业于万世也"。接着又分析了一番更始王朝和李轶的处境，劝李轶弃暗投明。李轶深深为冯异的劝降所打动。遂决计降服于刘秀。自此之后，李轶便再不与冯异对垒，因而冯异之军顺利攻占了天井关，拔上党两城，又攻克了成皋以东13个县，逼降更始军10余万众。接着又大败将军武勃，斩杀更始军5000余人。李轶此时，均按兵不救。后来，又将李轶欲投降刘秀的书信，使人透露给朱鲔，朱鲔大怒，遂派人刺杀了李轶。这样，洛阳30万大军，实际上皆败在冯异的离间谋略之下。

善于独立决策，刚柔兼备冯异由于常常率军独立执行一些重大的战略任务，因而很善于根据总的战略企图制定出克敌制胜的正确决策，而在贯彻这些决策中，既刚毅果敢，又持重耐心，不怕困难与挫折。冯异在与赤眉军作战中，由于邓禹极力相请，他与邓禹率军吃了败仗，仅率数人逃回营内。他不气馁，不沮丧，立即收集散卒，整顿部队，先以少部兵力与赤眉军纠缠，待赤眉军兵疲之时，他立即以事先埋伏之身穿赤眉军服装的部队，四面包围了赤眉起义军，结果于崤底将赤眉军击败，逼降赤眉军8万余人。赤眉军经此一败，元气大伤，遂在宜阳地区无心再战，被刘秀迫降。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派大将耿弇等，率军进攻隗嚣盘据的陇地，初战失利后，形势于汉军十分不利，大有乘势占领拘邑，危及关中之势。刘秀于是急派冯异率军进占邑，以杜绝隗嚣军东进的路线。冯异军尚未至邑，隗嚣果然便派遣将军王元，行巡等率军出陇地，行巡之军直扑枸邑而来。这时，冯异手下的部将都劝冯异说，敌军气势正盛，且由于新近获胜，兵锋难敌，不如就地止军，以便根据情况，再研究进兵枸邑的对策。但冯异坚定地认为，如若我军不进占枸邑，一旦敌军得手，三辅地区和京师长安将受到严重威胁，于战略全局十分不利。因而我必须急趋枸邑，然后据城坚守，以逸待劳，伺机破

敌。冯异遂暗中率军潜入邑，然后紧闭城门，偃旗息鼓，以待行巡军。行巡军不知邑已被冯异占领，急奔栒邑，由于未加戒备，冯异挥军出其不意地对行巡军突击。行巡军惊慌失措，大败而逃，冯异军追击数十里。于是，北地一带的隗嚣诸豪长均背叛隗嚣而降汉。建武九年（公元33年），刘秀任命冯异为征虏将军，与公孙述的赵匡军对阵，坚持对抗一年多，终于将赵匡斩杀。随后，诸将共同进攻隗嚣之子隗纯统率的大军于冀地（今甘肃甘谷以东），久攻不下，众将都主张暂时退兵休战，冯异则坚持不动。并且在每次出战中，他都率军为诸军的前锋。冯异就是这样在战役指挥上，坚毅持重而屡建奇功。

治军威严而谦逊，深得吏卒敬服据《后汉书》，冯岑贾列传记载："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沦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及破邯郸，乃更部分诸将，各有配隶。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光武以此多之"。刘秀在争夺关中地区时，先派邓禹出征。邓禹由于数度败在赤眉起义军的手下，未能完成任务户便改派冯异率军接替邓禹。刘秀在赋予冯异任务时说："你进军关中，千万不要攻略屠城，关键是在招抚安集。其余的将军不是不能打仗，最大的弱点就是喜欢纵兵抢掠，将军有统御吏卒的非凡才能，想你一定会严格军队纪律，不要给关中郡县带来兵祸之苦"。冯异果然不负刘秀的期望，所到之地，布德招降，深得当地吏民的拥护。弘农地区自称将军的10多个割据势力，均率众敬服于冯异。冯异进入关中后，很快便用兵威和德政扫平和降服了关中地区的群雄势力，威行关中。由于冯异长期镇守关中地区，因而，他在关中威信很高，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这些，都说明了冯异治军从政，都非常善于统御众人之心的卓越才干。

岑彭字君然，南阳枣阳人。岑彭在王莽时期，曾任新莽王朝的枣阳县代理县长，拚死与绿林起义军作对，屡次被起义军打败，在起义军攻打宛城（今河南南阳）时，岑彭顽抗到城中粮尽，人相杀吃的情况下，才投降了绿林军。此后，即跟随刘秀行动。由于他忠心耿耿，具有将帅之才，成为刘秀"云台二十八将"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足智多谋，善于以谋略调动敌人岑彭被刘秀任命为征南大将军，岑彭在连战皆捷后，于建武三年（公元27年），与据守于邓地（今湖北襄樊北）的割据势力秦丰大战。岑彭向其进攻数月，未能奏效。刘秀心中焦急，责令岑彭必须急速攻下邓地，消灭秦丰。情况紧急，岑彭来不及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于是定下了释放俘虏，让其自动传递假情报的办法，麻痹敌人，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再行突击。岑彭为实现他的作战谋划，故意在晚上通报部队，紧急做好出击的准备，使人人皆知第二天黎明即重点攻击山都（今襄樊以西），同时，故意放松对秦丰战俘的看押，战俘便乘机逃跑，向秦丰报告了岑彭的作战计划。秦丰闻知，立即决定全军向西，进击岑彭军。岑彭侦知秦丰已经上当，突然改变原定进击方向，率军偷渡沔水，进至阿头山（今襄樊以南），猛攻秦丰部将张扬军。张扬毫无戒备，被打得大败。岑彭乘胜率军沿山谷间伐木开路，直插秦丰老巢黎丘（今湖北宜城北），一举击破黎丘留守的秦丰军。秦

丰此时正在向西进击的途中，听说黎丘被袭，急忙率军回救。岑彭袭占黎丘后，预料秦丰必然回兵，便在东山设营，准备迎击秦丰军。果然，秦丰与其大将蔡宏，乘夜急攻东山岑彭军，岑彭军因预先已有充分准备，遂将秦丰的主力大军一战歼灭，斩杀大将蔡宏。

作战整体观念强，部署周密，用兵机动灵活通盘关照全局情况，进行周密的兵力部署是岑彭用兵的另一突出特点。因而，他与冯异一样，经常是独挡一面的最高军事统帅。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岑彭为进攻巴蜀的公孙述，早就制造了战船，训练水军，企图水陆并进，置公孙述于顾此失彼的境地。但大将吴汉却不同意岑彭的意见，主张舍弃水军，只用陆战。岑彭上书刘秀，刘秀深深赞同岑彭的建议，遂任命岑彭为南线作战的统帅，节制职位高于他的吴汉所部。当时公孙述以重兵防守今三峡，并在江中架起了浮桥，同时将圆木插入江中做为障碍，以图阻止岑彭的水军前进。岑彭详细布置了兵力，挥师乘风而上，直冲浮桥，进至桥边，岑彭军以火攻烧毁了浮桥和江中的圆木障碍，蜀将被斩，程汛被生俘，田戎率残兵退保江州（今四川重庆），岑彭军顺利进至江关（今四川奉节）。岑彭接着又兵分水陆两军，自率主力，神速迂回至公孙述的腹心；之地成都地区。正当公孙述即将全面瓦解之时，岑彭被公孙述派人暗刺身死，但公孙述很快便被刘秀军消灭。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一带）人。其祖先为战国时期赵国名将马服君赵奢。马援原为王莽政权的新成大尹，后被隗嚣请出，拜为绥德将军，最后才投奔刘秀。马援由于足智多谋和骁勇善战，深得刘秀的器重，他以戎马倥偬的一生，给后世树立了一个长于筹策，忠勇正直赫赫战将的形象。

长于筹策马援善于观察和分析战略大局形势，并据此提出恰当的作战策划，刘秀采纳马援的建议，常常导致作战的胜利。在汉军平定陇右割据势力隗嚣的作战中，马援建议以政治诱降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战胜隗嚣。马援仅率5000人马，往来于隗嚣一些将领中间做分化瓦解的工作，使一些将领从隗嚣集团中分离出来。汉军一路攻占了略阳（今甘肃清水北），刘秀自率主力向添（今陕西彬县）地进发，进至该地后，本欲继续前进。但大道已被隗嚣砍倒的树木所堵塞，诸将都建议刘秀暂时退兵缓进。刘秀进退维谷，于是再召马援问计。马援连夜赶至刘秀行营，刘秀立刻向马援述说了诸将的意见。马援分析了隗嚣的情况后说：“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兵进有必破之状”。随即又以米堆出汉隗两军所处的山川地理形势，进一步指出诸军往来进退的必经道路，“分析曲折，昭然可晓”。刘秀听后惊喜异常地说：“虏在吾目中矣！”黎明，刘秀即率军按昨夜的策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进至第一城（今宁夏固原）。隗嚣军遂被击溃，为刘秀平定隗嚣立了大功。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马援“闲于进对，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辅长者，下至闾里少年，皆可观听。自皇太子、诸王侍闻者，莫不属耳忘倦。又善兵策，帝（指光武）常言‘伏波（马援后被封为伏波将军——著者）论兵，与我意合’，每有所谋，未尝不用”由此可见，马援长于运筹帷幄的才华。

准确料敌马援在作战中，很善于掌握和准确地判断敌人的行动，因而，常常使他有效地采取制服敌人的主动措施。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由于一些羌族部落常常袭击金城（今甘肃兰州）以西的城邑，刘秀派马成率军前往屯驻征剿。但朝廷众大臣皆主张放弃金城破羌（今青海乐都老鸦城附近）以西地区。马援则认为，放弃金城以西地区，更会助长渚羌西犯，不如加固那里的城防，开发经济，吸引诸羌，诸羌定会不战自降。刘秀个分相信马援的判断和估计，即按马援的建议，命武威太守梁统将居于武威的金城人遣返金城郡各邑，修缮城脚，开垦水田，发展农牧业，不久郡中便呈现一片安居乐业，富裕丰盛的景象。随之，又派羌族一个首领杨封去塞外游说宣传，结果堵羌皆来和亲，武都地区的氐人，也部纷纷背离公孙述，投向马援，刘秀遂罢马成军。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马援奉命南征时，一举将五溪蛮夷击破，余部皆败散在山林中。当初马援等率军出征前，曾准确地预料，五溪蛮如果战败必将退逃壶头山，如若出现这种情况，马援将取捷路截住敌人的退路，不让敌人退至山高林密的壶头山中。结果恰如马援预料的一样，五溪蛮果然逐渐向壶头山撤退，马援便下令走捷径截击。但大将耿弁之弟中郎将耿舒却极力反对。他上书耿、刘秀，说捷径艰难危险，不如迂回数百里走平坦大道。等刘秀批准仍按马援的计划行事时，战机已经错过数月之久，致使马援令人痛惜地病故于壶头山的洞穴中。

镇定自若马援率兵征战，不管情况如何复杂，他均表现出镇定自若、泰然处之、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武都地区的参狼羌联合塞外诸羌部落，共拥众数十万户进袭边塞地区，杀长吏，掠略吏民，气势很盛。马援只率4000兵马前去征讨。至氐道县，羌军屯集山上，占据有利地势，马援兵居劣势。马援想，只要占据水草地区，羌军将不战自败。于是，他便从容地率军占据了低洼水草地区，不与羌军硬拼，结果羌军由于粮食水草断绝，数十万户羌众不得不退出塞外，另有1万多人投降马援，陇右地区的羌人叛乱遂不战自平。一次马援正与宾客饮宴，由于民间仇杀相斗，百姓惊慌，纷纷逃入城内。狄道（今甘肃兰州郊区）长急忙向马援报告说，羌人又发动叛乱了，请速关闭城门，发兵往击。马援听后哈哈大笑地说，羌虏决不敢再来犯我，遂命狄道长放心地回归其署衙。事后查明，果然，不是羌人叛乱。

马革裹尸的忠勇精神传之万世马援虽屡立战功，东征西杀，马不停蹄，十分辛劳。但他从不贪恋舒适安逸的生活，总觉得自己为国家贡献的太少。他在年青时经营农牧业，便将所得全部分给大家。他为官之后，每次均将得到的赏赐分给部下的吏卒，因而，深得众人拥戴。建武二十年秋（公元44年），他征南越交趾地区后胜利回师，众朝臣都向他道贺，他的挚友孟冀也向他说了些恭维话。马援便责备他说，别人恭维我，我不见怪，你不应当这样，当初伏波将军路博德也出征南越，立了那么大的功勋，才封赏数百户，而我并没多少功劳，却封赏甚厚，总感到十分不安。当匈奴来犯时，他激愤地说：“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马援的豪言壮语，掷地有声，过了一个多月，他便请求率军出征。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刘秀派武威将军刘尚征讨五溪蛮

夷的作乱，刘尚全军被歼，马援此时已62岁高龄，他见国家危难，又立即请求率兵前往。本来，刘秀见他年迈，不允许他去，他却披挂上马，威风凛凛地表演给刘秀看他的行令指挥。刘秀深受感动，遂批准了他率大军前往。不料，这位为国家民族的统一大业奋战不息的杰出将领，却由于小人的破1坏，病逝疆场。他的“马革裹尸”的忠烈精神，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英烈楷模。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地区）人。他投笔从戎，献身统一西域的事业30年，为我国西域地区重新统一于中国多民族酌大家庭之内，做出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贡献，奇迹般地完成经略西域50余国的艰苦使命，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实属一场旷，日持久军事和外交斗争相间的特殊战争。因而，他也在这场特殊的战争中，给后世留下了独特的作战指导思想和用兵艺术。

坚持奉行“以夷制夷”的战略西域地区距中原关山远隔，加之地域广大，气候恶劣，显然靠中原地区出兵出粮完成统一大业，实非力所能及。于是班超上书汉明帝称：“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班超这一以当地的人力物力资源，并且依靠当地要求统一的进步力量，进行统一战争的战略方针，是当时唯一正确的方针。班超在西域，从斩杀匈奴派往鄯善的使者，威服鄯善起，至他下书辞归止的30年的时间里，主要征战活动10余次，东汉王朝前后只派出过不足2000人，但仍然取得统一西域的彻底胜利，基本是仰仗了班超战略方针的正确。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等1万人攻姑墨石城；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班超调集于阗等国2.5万多兵马进击莎车；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班超又调集附近诸国的兵力，迎击月氏7万大军的进攻，永元六年（公元94年）班超调发龟兹、鄯善等8国之军7万多人进击焉耆、尉黎、危须三国等大规模的作战活动，均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谋略策略的运用得心应手西域地区50多个国家，政情复杂，民俗各异，又时时面临匈奴势力的挑战，而班超身边只有36吏士，不靠正确的谋略策略，实属寸步难行。班超正是靠了他精于韬略的才华，常常绝路逢生，化险为夷，夺取了胜利。诸如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班超以巧妙的谋略擒杀了疏勒王儿题，在此之前班超以诱杀于阗巫者的果敢行动，镇服了于阗王广德，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班超设计于宴席之间擒杀疏勒王忠，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班超在攻打莎车国的作战中，面对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制造假情报，故意放纵俘虏逃跑传报消息的谋略，使支援莎车的龟兹、温宿等国的5万大军，被诱分军，从而被班超率军各个击破，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班超面对月氏7万大军来攻的严重局势，在部将一片慌恐之中，他预设伏兵，斩杀了月氏派往龟兹求粮的使者，从而吓退了月氏的7万大军；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班超又-以兵威、谋略，擒杀了焉耆王广和尉犁王汛等人，顺利平定了焉耆、尉犁、危须三国。凡此等等，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班超高超的谋略策略思想。

勇识超人，善于出奇制胜班超之所以能以36吏士，纵横西域，除了其他方面的有利因素之外，他本身所具有的英勇无畏胆识过人的气质几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常常使他演出一幕幕出奇制胜的活剧。班超刚刚出使西域，便遇到鄯善国王欲投靠匈奴来使的危急场面。他正确分析了形势，当机立断，突然袭杀了匈奴全部使者，逼降了鄯善王，挽狂澜于既倒。这次事件，使班超成了后世有口皆碑的传奇人物。

班超以41岁的中年出使西域，奋战30年而不息，甘愿在“胡天八月即飞雪”的西域地区苦斗，驾驭着变化莫测的政治和战争的风云，还靠了他忠诚为国家民族统一事业的献身精神。汉章帝即位之初，考虑到班超在西域势孤力单，本来已下诏命班超回归。但班超为了进一步完成统一西域的神圣使命，置君命于不顾，一直坚持把西域治理得安定繁荣之后，才以“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的垂暮之年而请归。回归仅一个多月，这位忠良之将，便溘然长逝了。

第七章 东汉建立初期统一东方地区的战争

刘秀自平定了河北地区后，即于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称帝于邑（今河北柏乡），接着进行了统一东方地区的战争，经过的主要战役如下：

刘秀更始洛阳战役发生于更始三年（公元25年）四月，止于刘秀建武元年（公元25年）十月。刘秀军围攻洛阳朱鲔军数月，未能攻克，后以政治攻势，诱降了朱鲔军。

刘秀平定刘永之睢阳战役发生于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前后经过两次大战，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春结束，刘秀消灭了割据睢阳称帝的刘永。

刘秀平定董宪之昌虑战役发生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二月，至建武六年（公元30年）二月，大将军吴汉，率军将割据于郯城一带地区的董宪击败。

刘秀平定张步之临淄战役发生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十月。刘秀的建威大将军耿弁率军，经过连续作战，终于将张步的优势之军击灭，平定了张步割据势力，张步因投降刘秀而免罪。

第一节 东汉政权建立前后的战略形势

一、刘秀集团的急剧发展

刘秀集团在河北地区，平定了割据邯郸称帝的王朗之后，接着便又进行了一系列的作战活动，以求彻底将河北地区完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夺取幽州地区刘秀派出吴汉、耿等，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击杀了更始政权派驻幽州地区的官吏苗曾、韦顺、蔡充等人，迅速占领了整个幽州地区。

残酷镇压钢马等农民起义军铜马农民起义军当时占据了今河北省束鹿及其以南、平乡以东、清河县以西以及附近的广大地区，拥军数十万，兵威势众，对刘秀集团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刘秀集团为了消灭这支农民起义大军，便采取了断绝起义军粮道，长期围困的战略。起义军被困数月，兵疲食尽，撤军而走。刘秀即抓住战机，率军追击，追至馆陶（今河北馆陶），一举将铜马军击破。当铜马军得到高湖、重连等农民军的增援后，又被刘秀军击败于河北大名地区。刘秀随即将铜马军收编，刘秀的兵力因此而猛增至数十万。

镇压青犊、尤来、上洞、大彤、五幡、铁胫等农民起义军刘秀在镇压了铜马起义军后，立即转兵进攻上述起义军。刘秀军经过连续作战，最后，在安次（今河北廊坊）、渔阳（今北京密云），潞东（今北京通县），平谷（今北京通县）等地将青牍、尤来等起义军全部击溃。

消灭更始尚书伞谢躬部刘秀在消灭了王朗之后，即与更始谢躬部，同驻于邯郸地区，因谢躬军强大，刘秀一直术敢动手消灭谢躬军。当刘秀消灭了铜马起义军，力量强大之后，便以调虎离山之计，以与谢躬共同围剿青犊、尤来等起义军为名，将谢躬调出邯郸，随即命吴汉，岑彭袭取了谢躬的大本营，在城中预没伏兵，待谢躬回军入城后，即将谢躬抓捕斩首。

刘秀完成了以上作战行动后，便全部统一了河北地区，乃于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称帝于邑（今河北柏乡），国号仍为汉，年号为建武元年。这时，刘秀集团已基本上羽毛丰满，已拥有雄兵数十万，战将、谋臣云集，人才济济，具备了向河南，河东地区发展，打败更始王朝和赤眉起义军的基本条件，处于十分有利的战略地位。

二、更始主朝的危难处境

更始王朝，在谢躬部被刘秀集团消灭后，于河北地区已无立锥之地，关东只剩了洛阳，南阳等一些地区仍在其控制之下：屏障关中右翼的河东地区，已渐受刘秀集团兵锋的威慑。赤眉大军正向西发展进攻，

已渐渐向关中长安逼进。这样，更始王朝便处于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之中。

三、赤眉军的向西进军

赤眉军对刘秀称帝于邑未与理会，也于更始三年（公元25）六月，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称“汉”，建年号为“建世”。赤眉军建立政权后，仍集中自己的兵力，继续与更始王朝作战。当初，赤眉军向西进军时，已侦知更始王朝于洛阳驻有30多万大军，便决定避开洛阳，绕道陆浑关，直接向弘农地区进发，一路进展顺利，节节挫败更始军的抵抗。赤眉军对更始政权的作战，使刘秀集团获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使其能够进一步巩固河北地区，发展自己的势力。

第二节 刘秀更始洛阳战役

一、洛阳战役前刘秀更始两军的态势

更始王朝迁都长安之后，为了确保洛阳地区的安全，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便派舞阴王李轶，廪丘王田立、大司马朱鲔，白虎公陈侨率兵，号称30万之众，与河南太守武勃，共同防守洛阳周围地区以及整个黄河南岸一带。

刘秀集团自平定河北地区后，为了进一步进兵河南地区，遂一方面命令寇恂为河内太守，防守河内地区、训练士卒、制造军械、储备军粮和各种作战物资；一方面以将军冯异为孟津将军，与寇恂一起统领河内、魏郡两地之兵马，防守黄河沿岸地区，阻止更始军渡河北进。

二、刘秀更始两军的作战序列

刘秀军

统帅汉光武帝刘秀

将领孟津将军冯异

建威大将军耿

大司马吴汉

建义大将军朱

廷尉岑彭

执金吾贾复

扬化将军坚镡

强弩将军陈俊

总兵力约10万人

更始军

舞阴王李轶

廪丘王田立

白虎公陈侨

大司马朱鲔

南阳太守武勃

讨难将军苏茂

将军贾强

总兵力号称30万人

三、刘秀更始双方作战策划

刘秀面对李轶，朱鲔等统率的30万大军，居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虽然这30万大军担负着沿黄河南岸的防守任务，不可能集中于洛阳一座城池，但洛阳肯定是行兵布阵的重点，至少也不会低于5万兵马。如若再加上洛阳城坚池深的自然防护条件，洛阳无疑是一座难攻易守的坚城。因此，刘秀军便采取了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相互为用的战略与策略，通过一些将领与更始军将领的关系，瓦解分化更始军，然后再行击灭。

更始政权自迁都长安后，深知洛阳战略地位的重要，便以洛阳为中心，派遣号称30万大军，防守黄河南岸地区，一方面阻止刘秀集团南渡黄河，另一方面阻止赤眉军向西发展，屏蔽崤函，保障关中地区的安全。

四、刘秀更始洛阳战役的作战经过

约于更始三年（公元25年）三四月间，也即刘秀称帝前两三个月，刘秀集团开始了对洛阳附近之黄河南北地区的作战活动。

将军冯异知道李轶与刘秀同为绿林军和更始的将领，便想将李轶从洛阳守军中分化出来。于是，先致书给李轶，劝李轶温古知今，认清大局形势，离开更始王朝，投向刘秀。冯异指出："今长安坏乱，赤眉临郊，王侯构难，大臣乖离，纲纪已绝，四方分崩，异姓并起，是故萧王跋涉霜雪，经营河北。方今英俊云集，百姓风靡，虽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诚能觉悟成败，亟定大计，论功古人②，转祸为福，在此时矣"。冯异述说了一番大局形势之后，又以威胁、的口吻写道："如果我们萧王率猛将进击，重兵包围洛阳，那时候你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李轶原先与刘秀同为绿林军将领时，关系很好，但后来李轶也是极力主张谋杀刘秀兄刘的人物之一，因而李轶虽愿意投降刘秀，但怕刘秀深记前仇。故他在回书冯异时，除了说明这种顾虑之外，表示愿意投降刘秀。李轶说："今轶守洛阳，将军镇孟津，俱据机轴，千载一会，思成断金。唯深达萧王，愿进愚策，以佐国安人"。李轶从与冯异互通书信之后，便不再与冯异对阵。这时冯异开始放手对周围地区进攻。他首先向北进攻天井关（今山西晋城），攻克了上党郡的两座城邑。接着又率军攻拔了成皋（今河南荥阳）以东13座城邑，逼降更始吏民10多万人。此时，河

南太守武勃，率领1万多人马，开始反击冯异军。冯异引军渡河，与武勃战于士乡（今洛阳市郊区），击破武勃军，斩杀武勃军5000余人，武勃也被杀。这时李轶紧闭城门，按兵不动。冯异见此情景，已对李轶愿意降服深信不疑，遂将情况向刘秀做了报告。

刘秀得到冯异的报告后，认为李轶狡诈，不可轻信，遂告诫冯异说；“轶多诈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领，今移其书”。于是，刘秀便命人故意将季轶的书信暴露给朱鲔。朱鲔知道这一情况后大怒，派人刺杀了李轶。由此引起了洛阳城内守军的动荡，不断有人投奔刘秀阵营。朱鲔派讨难将军苏茂与将军贾强，率3万人渡河北进，攻取河北之温地（今河南温县）。朱鲔自率数万大军攻取平阴（今河南孟县），牵制冯异军南下洛阳。冯异自率主力迎击朱鲔军，并派校尉护军率一部兵力急驰温地，抗击苏茂军。此时，河内太守寇恂也发郡内兵向温地救援，寇恂命士卒登城高呼：“刘公兵到！”苏茂军惊恐，结果将苏茂军击败，斩杀了将军贾强。冯异随之乘胜渡河，进击朱军，朱鲔率军退走洛阳城，冯异与寇恂率军追击，绕洛阳城一圈而还。自此，洛阳震恐，昼夜紧闭城门，不敢出入。

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也即洛阳战役的外围作战结束后两个月左右，刘秀便在部邑（今河北柏乡）称帝。刘秀称帝后一个月，即当年的七月，去怀（今河南武陟县西）部署对洛阳的围攻作战：以建威大将军耿率强弩将军陈俊，防守五社津（今河南巩县黄河渡口），防止荥阳以东地区敌人的进袭，以保障进攻洛阳部队侧背的安全，以大司马吴汉率建义大将军朱祐、廷尉岑彭、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镡等11将军之军，围攻洛阳。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八月，刘秀进至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亲自指挥对洛阳城的围攻作战。此时，更始廪丘王田立归降，刘秀遂专力对付朱鲔军。刘秀军苦战数月，洛阳城坚难下，刘秀此时感到强攻已无取胜把握，于是便派廷尉岑彭充当说客，劝朱鲔归降刘秀。岑彭因过去朱鲔为大司马时，曾在其手下为校尉，与朱鲔有故交。岑彭进至城下与朱鲔对话，先将胜败形势向朱鲔陈述一番，然后劝慰朱鲔归降。朱鲔认为，自己当初先参与杀害刘绩已属有罪，后又阻止更始派刘秀去河北略地，罪过更大，于是，不敢投降刘秀。

岑彭当即返回向刘秀报告了朱鲔的顾虑。刘秀听后说：“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珠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岑彭遂立即返回洛阳城下，将刘秀之言转告了朱鲔。朱鲔听后，半信半疑，随即由城上放下…条绳索，对岑彭说，“如果你有诚意，可攀此绳上城”。岑彭遂走上前去抓住绳索欲攀登，朱鲔见岑彭确系诚心诚意，遂当，即答应归降刘秀。五天后，朱鲔将城中诸事布置妥当，便自缚与岑彭轻骑去往刘秀营地。临出城前，他告诫部下将领，坚守城池等待我的回归，我若回不来，你们就立即率领部队投奔郾王尹尊。刘秀见了朱鲔，亲解其缚，并令其连夜回归，朱鲔于是率洛阳守军投降。这样，刘秀遂解了顿兵坚城之危，更始王朝驻守河南地区的号称30万大军，便冰

消瓦解。

五、洛阳战役后刘秀集团的动向

刘秀劝降朱鲔后，遂于当年十月，将都城由邑迁至洛阳，不久，便大封功臣。

建武二年（公元26年）正月，大司马吴汉率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柏、大将军杜茂、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镡、偏将军王霸、骑都尉刘隆、马武、阴识等9将军之兵，共同镇压了檀乡农民起义军。檀乡起义军10多万人，投降了吴汉军。刘秀因此而封吴汉为广平侯。随后，刘秀再命吴汉率领上述诸将军，进击邺西山之黎伯卿等军，进而掠定了河内地区修武等地，从而，使刘秀的河内地区更加巩固。

刘秀更始洛阳战役评述

刘秀称帝前后，所进行的洛阳战役，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战役，刘秀集团通过此役的胜利，获得了长远的巨大战略利益。

刘秀集团占据于洛阳，拥有了半壁河山的稳固首都。刘秀集团在未占据河南地区之前，尽管已经拥有了河北地区幽州，冀州两个刺史部，但毕竟还是偏居一隅，在人们的心目中，远远构不成一个正统合法政权的形象。而在其跨过了黄河、占据了战略重镇洛阳之后，便使自己获得了入主中原华夏之主的声威。这在赤眉军兵威正盛，更始中央政权已被赤眉军灭亡的战乱局面中，无疑，占有政治上和社会心理上的巨大优势。

洛阳战役的胜利，瓦解了更始王朝最后一个重兵集团，使更始王朝已无东山再起的可能。至此，结束了刘秀集团、更始王朝和赤眉军三方角逐的局面，刘秀集团剩下的唯一强大敌手，只有赤眉军的建世政权了。而赤眉军，由于在政治上陷入流寇主义的严重错误之中，自然难以与刘秀集团相匹敌。因此，洛阳战役的胜利，是刘秀集团夺取全国胜利的标志。从此，便使其沿着胜利的阶梯，登上统一全国的一代雄主的宝座。

刘秀在夺取洛阳战役的胜利中，事实上并没有什么高明的战略指导，最基本的是利用敌人的矛盾与弱点，靠了政治上的分化瓦解。而这种政治上的分化瓦解之所以能够成功，也并非有什么灵丹妙药，主要是借助了赤眉军逼进长安和摧毁更始王朝胜利形势的巨大影响。如果更始王朝还是一个稳固的政权，那么，洛阳集团是否会顺利降服于刘秀，则肯定又当别论了。

刘秀占据了洛阳，对全国各地的割据势力，也是巨大的镇慑。刘秀由于占据了中原，在扫平割据势力的作战中，便使自己师出有名，义正词严。因而，许多割据势力在与刘秀军的对垒中，都畏服于刘秀这种战

略上的优势。或被刘秀军一战而胜，或不战而降，终于使刘秀统一了全国。

第三节 刘秀平定刘永之睢阳战役

一、睢阳战役前刘秀，刘永双方的基本形势

刘秀建都于洛阳后，在扫清洛阳外围的残余势力的同时，即开始筹划向割据势力进击。建武二年（公元26年）二月遣谏议大夫储大伯持节前往并州，命鲍永前来修武降服，鲍永开始不知更始王朝是否尚在长安，拒绝奉召，待派使者去长安探听消息，确知此时更始已被赤眉军消灭，才跟随储大伯投降刘秀。鲍永在更始政权时，曾任尚书仆射，行使大将军职权，平定了河东、并州、朔郡等地区，而且为将清廉，在关东深为众诸侯敬服。因此，鲍永的降服，对刘秀稳定河内，进而攻取河东地区具有重要作用。

刘秀收降鲍永后，便趁赤眉大军尚在关中地区游动之时，想首先平定刘永的割据势力。

刘永得知更始政权内部混乱，便乘机起兵叛离更始，接着招降了附近的豪强势力，攻下济阳，山阳、沛、楚、睢阳、汝南等28城。以后东海的董宪，也起兵割据其郡，刘永遣使拜董宪为翼汉大将军，并拜割据于齐地的张步为辅汉大将军。更始政权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九月灭亡，刘永遂于十十月称帝于睢附（今河南商丘）。这样，刘永、董宪、张步合兵一起，便成了东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

二、刘秀，刘永两军作战序列

刘秀军

统帅虎牙大将军盖延

大司马吴汉

将领将军苏茂

骠骑大将军杜茂

强弩将军陈俊

驸马都尉马武

骑都尉刘隆

偏将军王霸

护军都尉马成

总兵力10万人

刘永军

统帅刘永

将军苏茂（后来降服于刘永）

俊强

周建

董宪

庞明（原为盖延部将，后降于刘永）

总兵力据估算刘永与董宪军不少于10万之众

三、睢阳战役作战经过

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刘秀首先命盖延率军进击敖仓（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再攻酸枣（今河南原武），封丘（今河南封丘），一一攻克。随即再命盖延率驸马都尉马武、骑都尉盖隆、护军都尉马成、偏将军王霸等10万大军，进攻睢阳的刘永。盖延军一路，先攻克了睢阳以西之襄邑（今河南睢县），一路攻拔了睢阳以东之麻乡（今安徽砀山），两路大军随之东西对进，包围了刘永的都城睢阳。盖延军围攻睢阳4个月，未曾攻克，遂命人抢收了睢阳地区的庄稼。围至八月，盖延军发起最后攻击，乘夜以云梯登城，攻入睢阳城内。刘永惊恐，引兵出睢阳东门而走。盖延随即挥军追击广大败刘永军，刘永弃军而逃往谯（今安徽亳州）。盖延军遂继续扫荡刘永盘踞的其他地区，接着攻克了薛地（今山东滕县），斩鲁郡太守梁丘寿。这时彭城（今江苏徐州），扶阳（属于沛郡）、杼秋（今安徽萧县西北）、萧县等城邑惧于盖延的军威，纷纷降服。接着，盖延率军扩大战果，又攻下刘永的沛郡（今安徽宿县西北），斩杀了沛郡太守陈修。

此时，原先投降刘永的更始朱鲔部将苏茂，便与刘永部将佼强、周建等统率3万人马前来援救刘永，共同进击盖延军，两军交战于沛西（今安徽宿县西），盖延一举将苏茂等军击溃，刘永之军逃散溺死者过半。刘永率佼强，周建等，弃沛郡逃往湖陵（今东鱼台东南），苏茂率残军退保广乐（今河南虞城）。建武三年春（公元27年）二月，刘秀将盖延之军调回至轵城（今河南济源），归吴汉指挥，与耿军共击青犊农民起义军，刘永才幸免全军覆没，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时间，得以重整旗鼓。

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刘永为苟延残喘，便进一步拉拢董宪和张步，封董宪为海西王，张步为齐王。当年四月，大司马吴汉在镇压了

轵地的青犊农民起义军后，刘秀旋即命其率盖延、骠骑大将军杜茂、强弩将军陈俊等7将军之兵，第二次进击刘永。

吴汉率军首先包围广乐（今河南虞城）的刘永、大司马苏茂。刘永部将周建率领10余万人前来解围，遂与吴汉军展开激战。吴汉亲率轻骑与周建军交战失利，吴汉堕于马下，摔伤了膝盖，退走营内。周建乘势率大军进入广乐城与苏茂合军，广乐城守军力量增大，大大优势于吴汉军。此时，吴汉部将见吴汉养份卧床，便对吴汉说："大敌在前而公伤卧，众心惧矣"。吴汉见众人劝说自己，重新振作精神而起，并对部下说："贼众虽多，皆劫掠群盗，胜不相让，败不相救，非有仗节死义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诸君勉之！"汉军士气复振，准备与苏茂军决战。第二天黎明，周建、苏茂率军包围了吴汉军，吴汉选了四部精兵及乌桓突骑3000多人，突然向周建、苏茂军突击，周建军大败，争先恐后地向广乐城逃奔，吴汉军猛追，杀入城内，周建、苏茂率兵逃走。吴汉留下杜茂、陈俊等防守广乐城，自率主力协助盖延围攻睢阳城。

睢阳城本已被盖延第一次征伐刘永时夺占，后来，睢阳民众反叛，重新迎接刘永入据睢阳。吴汉与盖延合军包围了睢阳城。吴汉盖延军自五月包围睢阳后，一直围攻至七月，后因睢阳城内粮食已尽，刘永乃率苏茂、周建逃向谯（今安徽亳州）。盖延等挥军急追，刘永部将庆吾将刘永斩首，投降了汉军。苏茂与周建逃向垂惠。（今安徽蒙城），拥立刘永之子刘纡为梁王。佼强退往西防。刘永既死，刘永的主力部队也基本上被歼，于是，刘秀将吴汉、盖延等主力部队调走。

建武四年（公元28年）秋，刘秀命捕虏将军马武、骑都尉王霸率军2万多人，将刘纡、周建包围于垂惠。

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二月，苏茂率五校兵，前来垂惠解救刘纡。苏茂首先攻击马武军，马武军被苏茂、周建军击破，马武逃至王霸营内，急呼求救。王霸说，苏茂兵正盛，我若出兵，咱们两军必同时被其击败。拒绝出兵，闭营坚守。但王霸的部下皆争着出击。王霸对大家说，苏茂兵十分精锐，优势于我，我们不去救马武，苏茂一定认为我们与马武不和，这样，苏茂必乘胜轻进，放手地进攻马武军，马武军处境越危险，他们必定越拼死力战。如此，等苏茂军疲惫不堪之时，我们再出兵，必然获胜。苏茂和周建军果然像主霸判断的那样，与马武激战很久，王霸军中数十人断发请战，王霸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开营出兵，猛袭苏茂军背后，苏茂、周建军前后受敌，遂败退撤军。后来，周建的侄子周诵反，紧闭垂惠城门，不让茂、建、纡等入城。于是三人只好引兵而走，周建死于途中，苏茂逃奔下邳（今江苏宿迁西北），与董宪合军，刘纡逃往佼强处。至此，刘秀平定刘永之睢阳战役始告结束。

第四节 刘秀平定董宪之昌虑战役

一、董宪割据势力的兴起

董宪原为赤眉农民起义军的一校尉。开始起义不久，随着赤眉军的壮大，进占了梁都（今河南商丘地区），其所部发展为数万人的一支力量。后来，逐渐扩充自己的势力，率军东走，以郯城（今山东郯城）为中心，称雄于今山东东南部和今江苏东北部地区，蜕变为割据势力。开始刘永封其为翼汉大将军，当刘永第一次被刘秀军击败后，刘永为了拉拢董宪，便又封董宪为海西王。

二、刘秀平定董宪之昌虑战役作战经过

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二月，苏茂军被刘秀军击破后，苏茂逃向下邳，与董宪合军，刘纡逃至西防后，西防又被骠骑大将军杜茂击破，刘纡与佼强也投奔了董宪。

盖延率军先与董宪军交战于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盖延军被董宪军佯败退走的假象所迷惑，进入兰陵城后，疏于戒备，被董宪突然回军进击所挫败，从而率军向郯城方向疾走。

盖延部将平狄将军庞萌，因与盖延不和，而叛离盖延，斩杀楚郡太守后，进驻彭城，随即向盖延军进攻，将盖延军又击败。盖延慌忙退走，庞萌率军急迫，盖延军北渡泗水，过河后即砸沉舟船，拆毁一切渡河设施，才阻止了庞萌军的追、击。庞萌此时便与董宪军合势，自立为东平王，董宪势力随之大大增强。

刘秀得知庞萌反叛的消息，非常气愤，眼看4年多来征讨刘永的胜利成果，即将遭到全部破坏，遂决定立即率兵征讨庞萌和董宪。

此时，庞萌正率军围攻桃城（今山东宁阳）。董宪听说刘秀亲自率兵前来，便与刘纡、苏茂、佼强至兰陵，派苏茂、佼强率兵3万多人，协助围攻桃城。刘秀命令各路将领集中于任城（今山东济宁东南）。但刘秀为了争取时间，抢占要点，便首先率领3000轻骑，步卒数万，星夜急驰，占据了亢父（今山东济宁西南），进抵任城。庞萌知道刘秀军到达，便率军前去刘秀营垒挑战。诸将都向刘秀请求出战，刘秀不听，命令军队休息恢复体力，等待董宪和庞萌军疲惫之时，再行出战。刘秀所调堵将吴汉、盖延、王常、马武、王霸、王梁等，阽续赶到后，刘秀便率领各路大军进至桃城地区。城中吏民见刘秀亲到桃城督战，斗志大增，士气高涨。这时庞萌等督军更加猛烈地攻城，刘秀见庞萌等军已攻城多日，疲惫不堪，遂挥军向庞萌、董宪军进击，一举将庞萌等军击溃。庞葫、苏茂、佼强乘夜丢弃辎重逃走。

庞萌退向枣庄，欲和董宪主力会和。这时，董宪已与刘纡等率军进

至昌虑（今山东陈县东南50里），两军会合后，董宪亲自率领精锐部队在新阳（约为今山东枣庄西北之诸高地）安营设防，阻止刘秀军南下。刘秀即命吴汉率军先至新阳，击破董宪的锐卒，董宪退还昌虑，汉军占领了新阳。董宪慌恐，联络五校农民起义军数千步骑兵，防守建阳（今山东枣庄西南），以掩护自己的左翼阵地，与自己相距30里，以相呼应。

刘秀率军至蕃县（今山东省滕县城），与董宪相隔近百里，诸将清求再往前进，刘秀认为应暂缓推进。他判断五校之兵虽然勇猛，但当其粮食断绝之后，便不击自退。于是，下令各将领坚壁不战，以待敌粮尽退去。不久，五校军果然粮尽，引兵退走。于是，刘秀亲自督率各军，从四面包围攻击董宪军。经三天三夜激战，董宪军大败，士卒溃散，刘秀命吴汉率军追歼。佼强率其残余部队投降，苏茂率残部投奔张步，董宪及庞萌逃入缯山（今山东枣庄正东40里），在山中隐藏数日。后来，董宪失散的部队得知董宪尚在，又投奔山中找到董宪，共集合了数首骑，将董宪接入郯城，吴汉再率军进围郯城，董宪与庞萌再退走朐城（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刘纡不知逃向何处是好，军士高扈将刘纡斩首，投降吴汉，至此，刘永盘据的梁地已全部平定。

吴汉得知董宪、庞萌向朐城逃逸，便挥兵急追，决心将董宪残部斩尽杀绝。吴汉军迅速进至朐城地区，将朐城团团包围，久攻不下。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元月，城中粮食断绝，董宪、庞萌偷偷率人逃出朐城，袭取赣榆（今江苏赣榆北30公里），琅邪太守陈俊率军进击董宪，董宪、庞萌走入大泽之中。不久，吴汉攻克了朐城，尽掠董宪妻子儿女。董宪闻知，遂率数十骑乘夜出走，欲投降吴汉，吴汉校尉韩湛，率兵追及董宪，将其斩首，庞萌也被黔陵斩首。刘秀封韩湛为列侯，封黔陵为关内侯。

割据势力董宪，至此，也全部被刘秀军平定。

第五节 刘秀平定张步之临淄战役

一、张步割据势力的形成

张步在西汉末年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军发动起义时，亦聚众数千人起兵，转攻附近城邑，自称五威将军，占据了琅邪郡。

更始王朝建立后，正式派遣王闳为琅蚜太守。王阂赴任时，张步率军阻止王闳进入琅。王闳只好四方派人招降愿意归顺更始王朝的吏民，遂获得了赣榆等6个县，然后率数千兵马，征讨张步，反被张步军战败。更始刘玄封刘永为梁王后，刘永见张步兵威势众，想笼络住张步这股势力，便拜张步为辅汉大将军、忠节侯，统率青、徐二州之兵，征讨不归附刘永者。张步因贪图刘永的财物，遂接受了封号，以剧县（今山东昌乐西）为其割据的中心，并分别命其弟张弘为卫将军；以张兰为玄武大将军，张寿为高密太守，派人徇略了太山、东莱、城阳、胶东、北海、济南、齐等郡，势力日益扩大，拥兵20多万。

建武三年（公元27年），刘秀为孤立刘永，争取张步，便派光禄大夫伏隆，持节去张步都城剧县，拜张步为东莱太守。刘永得知这一消息后，也派使急弛齐地，封张步为齐王。于是，张步便杀了刘秀的使者伏隆，再次接受了刘永封其为王的称号。

二、临淄战役前刘秀军的动向

刘秀军于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至当年八月，在东部地区第一次击破了刘永军，刘永盘据的都城睢阳已被刘秀军占领。至建武三年二月，青犊起义军的一部，在轵地（今河南济源）附近地区又迅速发展起来，严重危胁河内地区的安全，刘秀此时不得不急令吴汉，盖延暂时放弃对刘永的作战，回军围剿青犊起义军，后青犊军被汉军击破，投降了汉军。建武五年（公元29年）以后，刘秀军已经先后击败了刘永、董宪、彭庞等割据势力。这样，张步便成了刘秀军在东方唯一强大的对手。建威大将军耿早于建武三年便向刘秀建议说，让他调发上谷军，击灭彭庞、张丰，剿灭富平，获索起义军，再进攻张步，平定齐地。经刘秀批准后，耿于建武四年（公元28年）攻取了渔阳，建武五年（公元29年），刘秀即命耿与吴汉、王常等军镇压了富平、获索农民起义军。9万农民起义军被汉军歼灭了5万，收降了4万之众，随即开始了对张步的作战。

三、刘秀张步军双方作战序列

汉军

统帅建威大将军耿宾

将领骑都尉刘歆

太山太守陈俊

总兵力无确切资料可考，估计在5万人以上

张步军

统帅齐王张步

将领大将军费邑

卫将军张

玄武大将军张兰

高密太守张寿

大彤渠帅重异

总兵力20多万人

四、刘秀张步军双方作战策划

汉军耿弇乘战胜获索、富平农民起义军和董宪部的军威，欲长驱东进，渡过河水，进击张步军的大本营剧县。

张步军张步得到汉军进攻的消息后，便想依托漯水，济水为天然障碍，阻止汉军渡河东进，遂命其大将军费邑率重兵驻屯子历下（今山东历城附近），以其部分兵力屯子祝阿（今山东济南金庄附近）至太山，钟城（今山东长清东北许寺附近），沿济水南岸筑垒列阵数十处，以防止耿宾军的渡河进击。

五、刘秀张步军临淄战役作战经过

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十月，耿奉命后，即统率骑都尉刘歆和太山太守陈俊军向东进发。耿军渡河之后，首先向东阿守军进攻，旋即攻克东阿城。耿弇军在攻拔东阿城时，故意留出一角，放走一些敌军，以让其逃奔钟城，散布战败的消息，瓦解钟城守军的斗志。结果钟城守军果然中计，听说祝阿城失陷的消息，便纷纷逃离钟城营垒。这样，费邑之济水防线便被耿宾军一击而全溃。

费邑为阻止耿宾军的继续东进，便急令其弟费敢防守巨里（今历城境），以控制巨里的险要通道。耿宾挥军追至巨里，山高路狭，难以通过，而费邑又统率大军在后方，不与耿宾军交战。耿弇军为了诱出费邑军交战，便制造假象，迷惑敌人，耿命令部队多多砍伐树木，并散布以

这些树木填满沟谷，以便大军通过。过了数天之后，张步军投降汉军的人员报告汉军说，费邑已经知道汉军要向巨里进攻，正准备率军前来救援巨里。耿弇知道费邑决心援救巨里的情况后，便又下令军中赶造攻城器具，宣布3天后攻取巨里城。同时，又暗中放松了对张步军俘虏的看管，让其逃归。于是，逃归者便将耿宾进攻巨里城的日期报告了费邑，费邑果然在3天后，自率精兵3万前来援救巨里。耿遂对部将说："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诱至邑耳。今来，适其所求也。"于是，耿弇以3000人守在巨里地区佯攻敌人，自率精兵登上山顶，与费邑之军大战，经过激烈厮杀大败费邑军，斩杀了费邑，巨里城守军惊恐，费敢率残兵败将逃走，耿宾收集费邑的军资，连续扫平费邑40余座营垒，从而平定了整个济南地区。

张步令张兰率2万精兵防守西安（今山东桓台东），各郡太守率1万余人守卫临淄，相距40多里。耿率军进至西安城东南，经过侦察发现，西安虽然城小，但城池坚固，且有2万精兵，很难攻拨，临淄城虽然大，而城不坚，兵又少，容易攻克。于是，耿弇决心先攻临淄城。但为了欺骗敌人，耿遂下令通告全军5天以后攻取西安。张兰听到这个消息后，即格外戒备，日夜严守城防，但耿却于当天半夜令全军用餐，黎明即向临淄城进攻。护军梁苟等向耿宾建议说，应当首先进攻西安，不应攻临淄。耿宾则认为："西安守军听到我们将攻取西安的消息，一定日夜严加守卫，临淄自然会放松警惕。我出其不意突然兵至临淄，临淄守敌，必惊慌失措，这样，我一日之内必然攻下该城。攻克了临淄后，西安便孤立无援，张兰距张步又远，他必引兵退走，我可以攻一城而得两城。如若先攻西安，很难迅速攻下，我必顿兵坚城，死伤惨重，最后即使能够攻克，张兰也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引军而退回临淄，与临淄守军合兵一处，静观我之虚实。我若深入敌人腹地作战，没有充足的军粮供应，旬日之间，即使不出兵作战，也已兵疲食尽，将更难战胜张步"。耿说服了众人，遂立即率军向临淄进发，突然进至临淄城下。城内敌人大惊，只用半天时间，就攻下了临淄城。张兰得知临淄失守，只好率军回归剧县。

耿夺占临淄城，又向各将领通告，没有命令，不得去攻掠剧县，要等张步到来之后，再攻掠剧县城。耿这一激将法确实见效，张步大笑耿狂妄，便对其部下说："尤来，大彤10多万大军，都被我一一扫平，今耿宾之军大大少于他们，且远道而来，疲惫不堪，绝不是我们的对手。"于是，张步便率领张兰，张弘、张寿及原大彤渠帅重异等将领，号称30万大军，进至临淄大城东，准备向耿宾军进攻。耿面临强大优势之敌，决定采取深沟高垒，伺机破敌的对策。耿上书刘秀说，"臣据临淄，深堑高垒，张步从剧县来攻，疲劳饥渴。欲进，诱而攻之，欲去，随而击之。臣依营而战，精锐百倍，以逸待劳，以实击虚，旬日之间，步首可获"。于是，耿先率军至淄水上，正好与重异军相遇，耿的突骑想立即向重异军发起攻击，耿予以制止，怕张步军受到冲击，不敢再率军前来。耿为了示之以弱，骄纵敌人，退至小城之内，命都尉陈歆、太山太守陈俊率其所部兵马，分别列阵临淄城下。张步率军到达临淄，立即向耿宾军营垒进攻，在张步军正与刘歆军交战之际，耿却率精锐兵马侧击

张步军于东城之下，大破张步军。飞矢射中耿弇股内，耿拔出佩刀，截断飞矢，继续指挥作战。耿部下，谁也没有发现耿宾负伤，一直大战至黄昏，才收兵。

刘秀在鲁地，听说耿军被张步军攻击，便亲自率军前去营救。太守陈俊听说刘秀将率军来临淄，向耿算建议说：“张步兵威正盛，可暂且坚壁营垒，休养士卒，等待皇帝到来后，再研究对策”。耿算则说：“陛下到来，臣子应当宰牛备酒以款待天子百官，现在反而把一个强大的敌人留给天子，这是很不好的行为”，于是，第二天又出兵大战，再次将张步军击败，杀伤张步军无数，壕沟中都填满了尸体。耿宾判断张步军已十分困难，将会退走，他便以部分兵力，在张步即将撤退的路上埋伏起来。不久，张步果然率军退走，耿指挥伏兵追击，追至钷昧水上（今山东寿光）。缴获张步军辎重2000余辆，张步军尸体沿途布满八九十里地不断。张步退至剧县后，让其3个兄弟各带一部分兵力散走，以图分散耿的兵力，再行反击。

数天后，刘秀进至临淄，赞扬了耿真一番，鼓励他继续追歼张步。刘秀说：“有志者事竟成也!”耿宾又率军追张步至平寿（今山东平度），苏茂率1万多人前来相救。苏茂见了张步，带有责备的口吻说：“南阳兵精将勇，延岑善战，都被耿一一击败，大王为何急忙去主动攻击耿宾，为何不等待我来之后，共同商议对策？”此时张步十分后悔，但为时已晚。

刘秀进至剧县，便派人传话至张步和苏茂军营：“能相斩者，封为列侯”。于是，张步便斩杀了苏茂。张步肉袒负斧至耿弁军门请罪，刘秀遂免除张步死罪，封为安丘侯。

耿宾随后又镇压了五校农民起义军，齐地遂告平定。

刘秀平定张步之临淄战役评述

刘秀的建威大将军耿宾是当时的青年将领，他跟随刘秀北征东战，连战连捷。他以大大劣势于张步的兵力，一举战胜张步的20万大军，为刘秀彻底平定东方的割据势力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刘秀东征时，虽然进占了洛阳，已取得了入主中原正统合法政权的形象，但当时东方、南方、西方、西南等地，群雄割据的局面，对刘秀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刘秀在任何一个方向作战的失利，都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特别是对东方地区的作战，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将他的得力将领吴汉、耿、盖延等人，统统调向东方地区作战，并于关键时刻亲自前去督战，终于平定了东方地区。

耿弇军所以能以劣势兵力战胜了张步的优势之军，除了占据正统之师政治上的优势之外，在战役指挥上，确有其独到之处，很值得借鉴。

善于给敌人制造心理上的恐惧情绪，瓦解敌人的斗志耿深知自己兵

少势弱，长途跋涉之后，又渡越江河，接着便面对敌人数十座营垒的坚守大军，只能勇略兼施，才有制胜的把握。因而，耿宾军在首战东阿时，留出围城之一角，让残敌逃走，散布失败的消息，不战而吓退钟城之军，收到一石双鸟之效。

“用兵之道，以计为首”。兵贵勇，将跺谋，是自古以来衡量士卒和将帅素质的基本标志。耿弁的对张步之战可谓一步一计，对谋略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他从首战东阿，二战调动费邑出兵，三战进攻临淄，直至与张步军决战，都是以高明的计策，步步引诱敌军就范。这使人从张步军一而再、再而三的中计中看到，耿确实是善于利用战场上扑朔迷离，真假难辩的客观条件，制造假象，迷惑对方的高手。

兵以诈立，假戏真做，使敌人深信不疑，听任摆布耿率兵进至巨里，为了制造进攻巨里的假象，以便诱出费邑军交战，他命令部队赶制攻城器械，宣布3天后攻取巨里城，并放走俘虏，逃归费邑军营报告消息。费邑遂信以为真，率自己的主力前来攻击耿算，被耿军一举击溃。耿在攻取临淄时，为了欺骗敌人，两次用诈，向全军宣布5天后进攻屏障临淄的要塞城邑西安。诱使重兵防守的西安要塞，格外警惕，日夜巡逻，不敢离开城池一步。而耿却偷偷命令全军半夜进餐，黎明突然向守备薄弱的临淄城进攻，轻而易举地攻下了名城临淄。

智谋和勇敢是对立的统一所渭智谋，历来就包含着勇敢的因素，一个决定战争胜负的良策，既有胜利的希望，也承担着失败的巨大风险，没有气吞山河的勇气，是决不会提出奇谋制胜之道的。因而，一个杰出助将帅，往往集智谋与勇敢于一身，耿真的东征张步之战，实是东汉战争史上大智大勇的范例。

第八章 东汉建立初期统一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战争

刘秀在南征邓奉和东平刘永的战争期间，北方的彭宠叛离了刘秀。自称燕王，称雄割据于渔阳一带地区，割据天水一带地区的隗嚣，先表示归降于刘秀，后又叛离刘秀；在五原郡称帝的卢芳，北联匈奴，称雄作乱。因而刘秀遂展开了平定北方与西北地区的统一战争，经过的主要战役如下：

刘秀击灭彭宠之战发生于建武二年（公元26年）秋，至建武五年（公元29年）春。刘秀派军征讨彭宠，双方形成僵持状态时，彭宠被部下刺杀，刘秀军顺利平定了东北地区。

刘秀平定隗嚣之陇坻战役发生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五月。刘秀亲至长安，组织建威大将军耿等7将军所率之7万多大军，向隗嚣之陇地进击，刘秀军被隗嚣大将军王元等军击败，退保关中地区。

刘秀平定隗嚣之略阳战役发生于建武八年（公元32年）春，刘秀亲率10多万大军，向隗嚣军发动第二次进攻，在隗嚣军已剩最后两座孤城的情况下，隗嚣大将军王元，搬来5000蜀军，一举将汉军逐出陇地，使刘秀军遭受到平定隗嚣军作战以来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刘秀平定嚣嚣之落门战役发生于建武九年（公元33年）八月，止于建武十年（公元34年）十月。刘秀以来歙为统帅，兵分两路，先后攻克了高平第一城，和隗纯盘踞的落门，最后平定了隗嚣集团的势力。

刘秀平定卢芳之作战发生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延续至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卢芳集团内部众叛亲离，卢芳终于战败，投降汉朝后，又降匈奴。

第一节 刘秀击灭彭宠之战

一、彭宠割据势力的形成

彭宠原被更始政权的谒者韩鸿拜为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当初，在刘秀奉更始刘玄之命，持节至河北地区徇略州县时，以书信招降彭宠，彭宠的部将吴汉，劝说彭宠应归降刘秀。上谷太守耿况，也在此时派功曹寇恂前往彭宠处，动员彭宠联兵归刘秀。彭宠遂归顺刘秀。

更始二年（公元24年），当刘秀率军进攻于邯郸称帝的王郎时，彭宠为协助刘秀军作战，令其部将长史吴汉、都尉严宣、护军盖延、狐奴县令王梁等，率步骑3000多人去邯郸参战。彭宠亲自率人为刘秀军转运粮食和作战物资。刘秀于邯郸战胜王郎后，封彭宠为建忠侯，赐号大将军。后来刘秀率军镇压铜马农民起义军时，进至蓟（今北京密云西南），彭宠拜谒刘秀，自以为功劳赫赫，应当受到刘秀的特别接待.结果未能如其所愿。由此，开始对刘秀不满。刘秀查知这个情况，便问幽州牧朱浮，朱浮说，彭宠以北方主人自居，他来见你，以为你会“迎握手，交欢并坐。”工如今你没有这样对待他，所以引起他的失望和不满。当刘秀于邑称帝，大封功臣时，彭宠的部将吴汉，王梁皆封为三公，唯独彭宠没有加封，愈加对刘秀不满，深感自己不得志，愤愤地叹息说：“我功当为王，但尔者，陛下忘我邪？”

当时北方诸郡县都比较穷困，但彭宠治理渔阳有方，靠盐铁买卖粮食积累珍宝，日益富强。这时，幽州牧朱浮为了收买人心，广泛招募州小名宿和王莽的二千石旧吏，恢复他们的官职，为他们设置幕府，给以优厚的俸禄。为此朱浮下令向各郡县征调钱粮，彭宠对此很不满意，拒绝服从朱浮的征调。这样，便引起了朱浮的忌恨，数次向刘秀密告彭宠私积大量粮食，广聚士卒，有图谋不轨之志。刘秀遂对彭宠产生了戒心，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刘秀下诏命彭宠至洛阳相见。彭宠见诏，心中更加怀疑朱浮暗中潜害自己，便上书请求刘秀让朱浮与其同时进京。同时，又写信给吴汉、盖延，请他们向刘秀转告朱浮潜害自己的情况，但均遭刘秀的拒绝。彭宠由此更加疑虑，彭宠的左右官吏也都怨恨朱浮，没有一人劝彭宠奉诏。刘秀见彭宠不来，便又派宠从弟子后兰卿去面告彭宠，彭宠便将子后兰卿留于渔阳，遂起兵反叛刘秀，成为东北部地区的割据努力。

二、彭宠割据后东北地区的战略形势

彭宠起兵反叛刘秀后，拜置官吏将帅，自率2万多人向朱浮进击，并分路进击广阳（今北京大兴）、上谷（今河北怀来地区），右北平郡的一些城邑，一时之间，势力迅速扩大。

彭宠为了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壮大反刘秀的力量，便想与上谷

太守耿况联合起来，但耿况因儿子耿受到刘秀的重用，而拒绝了彭宠的游说，斩了彭宠派来联络的使者，彭宠想向上谷郡发展势力韵企图，未能全部实现。

刘秀得知彭宠反叛的消息，甚为焦急。但此时刘秀军的主力一部分正在与刘永作战，一部分仍在南阳地区征讨，无力对付彭宠，只能采取限制彭宠进一步发展的措施。于是，便派游击将军邓隆率军去幽州地区与彭宠作战。但由于邓隆军兵微势弱，无法构成对彭宠军的威胁，彭宠得以继续扩展其势力范围，整个东北方的战略形势有利于彭宠。

三、刘秀击灭彭宠之战的作战经过

建武二年（公元26年）秋，游击将军邓隆率军进至蓟地后朱浮便命令邓隆军在潞南（今北京通县东南）守备，朱浮率兵守备雍奴（今天津武清北），两军的营垒相隔百里之遥。刘秀得知这种情况，气愤地对朱浮来使说：“两营之间相隔百里，一旦遭受攻击，根本无法相互支援，待你回去时，幽州军必被彭宠击败。”不久，彭宠果然率军前来攻击邓隆，他以一部兵力利用今北运河为屏障，进行正面进攻；另以3000轻骑绕至邓隆军的背后，从后面突击，一举将邓隆军击破。朱浮军因与邓隆军相距百里，无法及时救援，见邓隆军被歼后，只得引军退走。

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彭宠进一步攻拔了右北平和上谷郡的一些县邑，为扩展其势力，彭宠遣使以美女和丝绸奉献匈奴，请匈奴发兵相助。匈奴单于便派左南将率领7000多骑兵为机动兵力，以支援彭宠作战。与此同时，彭宠又南结张步及富平、获索农民起义军，连横以对抗刘秀势力，旋即攻克了蓟城，自立为燕王。

受彭宠胜利形势的鼓舞，涿郡太守张丰亦起兵反叛刘秀，与彭宠联兵，彭宠势力更加强盛，整个幽州地区大有风雨飘摇之势。

刘秀在稳住了隗嚣，加紧进击刘永的同时，乃于建武四年（公元28年）五月，进至卢奴，派建仪大将军朱祐，建威大将军耿、征虏将军祭遵、骁骑将军刘喜等，率军北上。前锋祭遵军，首战于涿郡地区，将自称为无上大将军的张丰军击败，擒获张丰。接着推进至良乡（今北京良乡），骁骑将军刘喜之军进至阳乡（今河北固安西北）。彭宠见刘秀派大军来攻，遂自统主力数万人，分别进击祭遵，刘喜军，同时以弟彭纯统率2000多匈奴骑兵屯于军都（今北京昌平南）地区，企图防备耿况军的突袭。然而，被耿况之子耿舒击败，彭宠有些惊慌，遂引军后撤，双方暂成僵持状态。

建武五年（公元29年）春，彭宠部下苍头子密等3人，乘彭宠独睡一室之机，将彭宠捆住，并让彭宠书写了放子密等3人出城的手书后，遂将彭宠斩首，连夜投降刘秀军。后来彭宠之尚书韩立等，共立宠子彭午为王，国师韩利又斩了彭午，投降征虏将军祭遵军，刘秀遂平定了彭宠之叛乱，东北地区渐趋安定。

第二节 刘秀平定隗嚣之陇坻战役

一、隗嚣割据势力的壮大

隗嚣通经书，存韬略，在立为上降军后，乘王莽末年的战乱，聚兵10万，击杀雍州牧陈庆，进而派遣兵马攻占了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县，随后便降服于更始刘玄，被刘玄命为御史大夫。

在赤眉农民起义军大军进逼长安之时，隗嚣因参与了图谋劫持更始东归的事件而被更始刘玄派兵围住隗嚣府第，欲擒杀隗嚣。隗嚣乘夜突破包围，逃归又水，复招集其旧部，自称西州上将军，仍割据凉州之陇西邢，天水邢、北地郡、安定郡、武郎郡、金城郡郡、敦煌郡、天水郡等郡县地区。

隗嚣由于谦恭爱士，颇得部下的爱戴和钦佩，因而拥有一批煤臣、战将，如班彪、申屠刚、马援、杨广、王元，行巡等，且有羌族豪强势力的依附，兵精粮足，名震西州。建武二年（公坑26年），邓禹部将冯倍叛变时，被隗嚣率军击灭于高平（今宁夏固原地区），被邓禹封为西州大将军。当赤眉起义军攻取陇西时，隗嚣军又将赤眉军击败。

建武三年（公元27年），陈仓人吕鲔拥众数万，与西南割据的公孙述勾结，侵袭三辅地区。隗嚣出兵帮助征西大将军冯异将其击灭。刘秀遂致书隗嚣，对共协助汉军征战之功倍加感激。自此，隗嚣与刘秀之间关系进一步密切。公孙述为了拉拢隗嚣，派出使者授予隗嚣以大司空、扶安王的爵位。隗嚣斩了公孙述的使者，并数次击败公孙述北上之军，表示自己向背之决心。不久，刘秀便命隗嚣出兵攻打蜀地之公孙述，隗嚣则派长史上书刘秀说，三辅地区兵力薄弱，且卢芳虎视北部边境，不宜出兵南下，拒绝了刘秀的命令。其实，刘秀并非想立即出兵入蜀，只是以此试探隗嚣之心。这样，刘秀便察觉了隗嚣想三分天下，不愿天下统一的真正意图。

二、隗嚣与刘秀之间明争暗斗关系的演变

当初，在公孙述于蜀地称帝时，隗嚣为了探明公孙述的虚实，便派其部将绥德将军马援出使蜀都，马援回报隗嚣说：“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

建武四年（公元28年）冬，隗嚣派马援出使洛阳，刘秀知道马援曾出使公孙述，受到公孙述的冷落，便对马援格外亲切，马援深受感动。因而，马援返回天水后，在隗嚣面前盛赞了刘秀一番，将刘秀比做刘邦，并诚心劝说隗嚣归附刘秀。其后，刘秀数次派遣使者劝告隗嚣入朝，隗嚣均婉言拒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刘秀又派隗嚣好友来歙出使天水，劝说隗嚣入朝归顺，遣子入侍。此时隗嚣已得知刘秀平定了

刘永和彭宠，心中有些惊恐，便派遣其长子隗恂跟随来歙入侍。刘秀任命其为胡骑校尉，封销羌侯。

隗嚣内部对于归附刘秀分歧很大，许多文臣谋士皆劝隗嚣降服。但一些主要，战将则力主南拒公孙述，东阻刘秀集团，占据关中，三分天下，以求自立。隗嚣的大将王元便向隗嚣建议说：天下大局未定，南方有子扬，北方有文伯，“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迹，表里河山。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王元认为，即令是不占据关中称王，我们也应占据天水地区，养精蓄锐，据险自守，静待四方变起。王元比喻说：“鱼不可脱于渊，神龙失势，即还与蚯蚓同。”隗嚣对王元的建议十分赞同，虽然已经遣其长子入侍，但仍抱着称王割据的野心不放。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关东名割据势力被刘秀平定后，刘秀便腾出手来，向西方和西北方向发展。不久，公孙述发兵攻取南郡，刘秀便下诏命令隗嚣从天水出兵征讨蜀地的公孙述，以此再次试探隗嚣之心。隗嚣仍以入蜀作战，关山阻隔，大军难行为借口，拒绝出兵。刘秀遂决心按照其“先陇后蜀、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先行征讨隗嚣，因而，双方处于剑拔弩张之势。

三、刘秀隗嚣陇坻战役双方作战序列

刘秀军

统帅汉光武帝刘秀

将领建威大将军耿大

虎牙大将军盖延

捕虏将军乃武

汉忠将军王常

骁骑将军刘歆

征虏将军祭遵

武威将军刘尚

总兵力7将军所率之军，依每将军万人计算，当不少于7～10万人。

隗嚣军

统帅西州大将军隗嚣

将领大将军王元

大将军行巡

总兵力10万人以上

四、刘秀隗嚣两军作战策划

刘秀军刘秀对平定隗嚣割据势力，一贯采取政治招抚和武力威胁的两手策略。他曾利用太中大夫来歙、马援与隗嚣的旧友关系，多次拉拢和稳住隗嚣。在陇坻战役前，刘秀仍然企图以两手策略制胜隗嚣军。他一方面通过所收买的隗嚣部将马援，去分化瓦解隗嚣集团，以高官厚禄招降窦融，斩断隗嚣的西部支柱，另一方面，在取得上述政治攻势的成功之后，便调集建威大将军耿宾、虎牙大将军盖延，征虏将军祭遵、汉忠将军王常、捕虏将军马武、骁骑将军刘歆、武威将军刘尚等？将军所统率的精兵，以借道天水，南下伐公孙述的名义，大军压境，以求逼服隗嚣。同时派出太中大夫来歙持刘秀手书，劝隗嚣降服。

隗嚣军隗嚣对刘秀的进袭，早有提防，他深知刘秀名为借道天水，进攻公孙述，实为以此夺占天水，削平自己的势力。因而，隗嚣一方面采取北结窦融，南连公孙述的战略；一方面紧急派大将王元，行巡等，率精兵据守陇地险关要隘，阻止刘秀向陇地的进军。

五、陇坻战役的作战经过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四五月间，刘秀亲至长安，组织耿宾、盖延等7将军开始向陇地进军。

刘秀派出的太中大夫来歙，于大军到达陇地之前已进见隗嚣。来歙见了隗2s将刘秀手书交给隗嚣，并晓以大义，说明天子很器重隗嚣，而且隗嚣也已遣长子入侍，这样，就应诚心归汉。接着便怒斥隗嚣：“今反欲用佞惑之言，为族灭之计，叛主负子，违背忠信乎？吉凶之决，在于今日”。来歙说罢，便走近隗嚣，欲将隗嚣刺死，隗嚣急退入内室。隗嚣侍卫要杀死来歙，来歙不慌不忙登车而去。隗嚣震怒，这时，大将军王元劝隗嚣杀掉来歙，并命部将牛邯将来歙包围。但隗嚣部将王遵，力劝隗嚣不要杀死来歙，隗嚣遂命人暂时囚禁了来歙。

隗嚣拒绝了来歙的劝降。便急令其大将王元率军占据陇坻（今甘肃张家川）一带的险要山川隘路，砍伐树木，堵塞汉军进兵之必经道路。

汉军以祭遵为前锋，沿渭北平原开始向陇山地区进攻。隗将王元率军抵抗，祭遵军一举将王元军前锋击退。耿等率大军继至，便与王元军主力展开大战，耿宾等军战败，退至陇山脚下。

刘秀几乎所有精勇战将统率的大军均被王元军击败，使刘秀非常不安，深恐隗嚣乘胜东进，危及长安，遂急令全军收缩，退保关中。以大司马吴汉率军退保长安，耿军退守漆地（今陕西彬县），祭遵军退保湃

（今陕西陇县南），以冯异军进据栒邑（今陕西旬邑东北），以便堵塞隗嚣军从西，西北方向进击长安的路线。

冯异在率军向栒邑进发途中，突然得知隗嚣大将行巡也正率兵向栒邑急进，冯异部将均劝阻冯异停止进军。诸将领说：“虏兵盛而新乘胜，不可与争。宜止军便地，徐思方略。”但冯异却坚定地认为必须尽快抢占邑，阻止行巡军东进，否则将对长安造成严重威胁。于是，对他的众将说：“若得栒邑，三辅动摇⑧，是吾忧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余’。今先据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冯异遂挥军急驰，到了邑后，暗暗潜入城内，偃旗息鼓，紧闭城门，封锁消息，以待行巡军的到达。行巡不知邑已被冯异军占领，便大摇大摆进至栒邑城下。冯异乘其不备，突然挥军杀出城来，行巡军惊慌失措，纷乱逃走，冯异率军猛追数十里，大败行巡军。祭遵军也在汧地数度击败了王元军，于是，北地诸豪长耿定等，皆叛离隗嚣，投降汉军，战局才得以稳定。

刘秀平定隗嚣之陇坻战役评述

刘秀调集了几乎全部著名战将，以大军压境之势，想一举平定陇西的割据势力隗嚣，但却被隗嚣战败，造成了刘秀自发动统一战争以来，第一次严重的失败。

以稳健刚毅著称的刘秀，为何在此次战役中失败，确有令人深思之处。

战略上轻敌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隗嚣这一支割据势力，与其它割据势力确有许多不同之点，其一是他长期占据陇地，有相当的民众基础，颇得民心，统治根基牢固，其二是他的兵多将广，能征贯战。他不仅有北地，陇西的骑兵，还有羌族部落的突骑，军队顽强勇敢，当年赤眉大军西进陇地，就曾败在隗嚣军的手下，其三是隗嚣据地险要，易守难攻。隗嚣军粮食军资充溢，且处于以守待攻，以逸待劳的有利地位，其四是隗嚣本人谦恭下士，深得部将拥戴，部将愿为隗嚣拼力死战。刘秀面对这样的敌人，只简单地想以来歙劝降，并以大军借道的兵威，迫降隗嚣，而没有详细的作战策划。因而，当隗嚣拒降之后，便只好转为强攻。这种战略战役上轻视敌人的错误，不能不导致战役上的失败。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刘秀在吃了败仗之后，为了防备隗嚣乘胜东进，立即收缩兵力，以吴汉，耿宾、祭遵，冯异等战将，分别据守漆、汧、栒邑、长安等战略要地，终于防止了战略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不失为战败中的明智之举。

第三节 刘秀平定隗嚣之略阳战役

一、略阳战役前刘秀隗嚣双方的战略形势

刘秀指挥大军退保关中一些战略要点后，双方已成对峙状态。征西大将军冯异，由于抢占了枸邑，击破了隗嚣大将行巡军，北地各地的豪强耿定等人纷纷降服于刘秀，因而，有效地阻止了隗嚣军由西北方向进逼长安的企图。这样，冯异使胜利进一步发展，向西北略定了卢芳所盘据的上郡、安定等郡县，征虏将军祭遵在汧地也数次击败隗嚣大将王元所率东进之军。关中的战略形势对刘秀又渐趋有利。

隗嚣在行巡、王元先后战败难以向关中推进，西北卢芳又被冯异击破的情况下，为重新组织力量，以利再战，遂致书刘秀，诡称这次交战，是下面对大军突至，惊慌失措，起而自救，他无法禁止，请求刘秀谅解。

刘秀朝臣以隗嚣出言不逊，而要求杀掉隗嚣入侍的长子隗恂。刘秀不允，又派来歙致书隗嚣，以当年柴将军平定韩王信叛乱时，柴将军奉汉高祖之命，劝韩王信投降，便可官复原职一事相比，再次劝隗嚣降服，并保证恢复隗嚣的官号。后刘秀再赐书隗嚣，命隗嚣将其次子也入侍。隗嚣自知其缓兵之计已被刘秀识破，于是，便决定南联公孙述，并于建武七年（公元31年）春接受了公孙述封其为朔宁王的封号，隗嚣便和公孙述联合起来以抗拒刘秀的进攻，隗嚣在战略上又获得了相当有利的支援。

二、略阳战役前刘秀隗嚣两军的较量

隗嚣接受了公孙述的朔宁王封号后，侧背有了公孙述做后盾，便于建武七年（公元31年）秋，亲自率领3万步骑兵进攻安定郡（今宁夏固原），以解除对自己左翼侧的威胁。隗嚣进至阴（今陕西长武）地区时，征西大将军冯异率军迎击隗嚣军，阻止了隗嚣军的东进。这时，隗嚣又派遣部将率军进攻汧地的祭遵军，双方战成平手，隗嚣别将引军而还。隗嚣率军继续向安定，北地两郡各县邑进略。不久，将两郡全部收复，隗嚣此时又占据了战略的主动地位。

刘秀丢失了安定，北地两郡，再次深感隗嚣对长安地区的威胁，于是，决计进一步施展政治上分化瓦解，军事上奇袭隗嚣要害城邑略阳的对策。

刘秀在招降了隗嚣大将马援之后，便很重视倾听马援对平定隗嚣集团的意见。这时，刘秀再次派来歙与马援，去做分化瓦解隗嚣集团的游说工作。因而，来歙首先以书招降了隗将王遵，刘秀封王遵为向义侯。马援则自率5000骑兵，深入陇地，往来游说隗嚣将领高峻，任禹和一些羌族首领。马援为了说服隗嚣的重要大将杨广，并劝杨广规劝隗嚣一起

降服，特致书杨广，反复陈述祸福利害，对瓦解隗嚣集团的军心斗志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刘秀隗嚣两军的作战序列

东汉军

统帅汉光武帝刘秀

将领大司马吴汉

征西大将军冯异

建威大将军耿

征南大将军岑彭

虎牙大将军盖延

太中大夫来欤

捕虏将军马武

汉忠将军王常

征虏将军祭遵

骁骑将军刘欤

武威将军刘尚

将军马援

总兵力判断不少于10万人

隗嚣军

统帅西州大将军隗嚣

将领大将军王元

大将军行巡

大将杨广

将军王孟

将军牛邯

将军王捷

将军金梁

蜀军将领田、李育、周宗

总兵力10万人以上

四、刘秀隗嚣两军作战策划

刘秀军为了战胜隗嚣军，一方面命来歙，马援不断劝降瓦解隗嚣的部将，另一方面决定亲率吴汉，冯异、耿宾、岑彭、盖延、马武、王常、祭遵、刘歆，刘尚等诸将军之兵，首先攻取高平第一城（今宁夏固原地区），同时派出来歙率精锐突骑奇袭略阳。这样，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双管齐下，且迂回高平，避免由湃陇正面仰攻略阳（今甘肃张家川西），上郏（今甘肃天水），力求一战而彻底平定隗嚣军。

隗嚣军为了对付刘秀军的进攻，命令一些重要战将，据守陇山各险要关隘，堵塞刘秀军的进攻路线，同时，与公孙述联兵，形成互为支援之势。

五、刘秀隗嚣略阳战役作战经过

建武八年（公元32年）春，刘秀命来歙与征虏将军祭遵率领精骑奇袭略阳。途中祭遵因病重而返，由来歙独自率领2000骑兵继续向略阳进发。来歙军穿山越谷，伐林开道，过番须（今陕西陇县西北），回中（陇县西北）诸要隘，突然进至战略要冲略阳城下，旋即挥军入城，斩杀了守将金梁，遂夺占了略阳城。大司马吴汉等将领，得知来歙攻克了略阳，都争先恐后地率军向略阳进发。但刘秀认为，略阳乃上面的要害城邑，隗嚣丢失了略阳，必定全力争夺该城，待隗嚣争夺略阳兵疲食尽之时，再向隗嚣进攻，必定可以击败他，遂派人将吴汉等军追回。

隗嚣得知略阳被来歙夺占，十分惊慌，当即亲率数万大军急驰略阳，将略阳城团团包围。为保证对略阳围攻作战的胜利，防止刘秀军向略阳派兵增援，隗嚣命其大将王元率军防守陇坻，以大将行巡率兵防守番须口，以将军王孟防守鸡头山的诸隘路（今宁夏隆德），将军牛邯防守瓦亭（今宁夏固原南）。隗嚣军在略阳城的围攻战打得十分艰苦，虽然有公孙述大将李育、田所率的5000精兵前来相助，但仍久攻不下。隗嚣军见强攻难以奏效、便劈山筑堤，截断河水，引水淹城。来歙军拼死固守，箭矢用尽，便折毁房屋，以木为兵器与隗嚣军厮杀。如此，坚持了数月，略阳城仍然为来歙军所据有。

刘秀根据情况判断，隗嚣军在略阳地区已苦战数月之久，应是兵疲食尽之时，于是，便决定抓住时机，亲自统率大军西进。当大军进至漆县（今陕西彬县）地区时，发现进军的大道已为隗嚣军层层设防所阻，

进展艰难。于是，诸将领都劝说刘秀回军，暂时停止向陇地的进攻。刘秀无计可施，处于进退维谷之地，便紧急召见将军马援询问对策。马援连夜赶至刘秀行营，刘秀当即让马援陈述自己的意见。马援因游说隗嚣将领和羌族部落首领，深悉隗嚣军当前混乱不堪的状况，遂力劝刘秀继续进击。马援认为："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兵进有必破之状"。马援并以米堆制陇山地区的山川地形，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军队往来进退之必经路线。刘秀听后大喜，高兴地说："虏在吾目中矣。"刘秀遂坚定了继续向陇地进兵的决心，旋即率军向西北进发，攻克了高平第一城（今宁夏团原）。

这时，窦融率五郡太守及羌、小月氏等部落的步骑数万人前来会师，继续向陇地发展进攻。刘秀命降将王遵致书将军牛邯，牛邯遂投降刘秀，被刘秀拜为太中大夫。接着，隗嚣军的13员大将和天水郡的16个县邑，10多万吏民皆归降刘秀军。隗嚣见大势已去，便命大将王元入蜀求救，自己携带家属随员投奔西城（今甘肃天水西南）其大将杨广处。田宾、李育率军南走，退保上（今甘肃天水），略阳之围困得以解除。

刘秀进至上邦地区后，再次下诏命隗嚣降服："若束手自诣，父子相见，保无他也。若遂欲为黥布者，亦自任也。"隗嚣仍然拒绝降服，刘秀遂杀了隗嚣之子元。接着便命令大司马吴汉与征南大将军岑彭，包围了西城，耿与虎牙大将军盖延之军，包围了上却。

刘秀见隗嚣势力即将平定，在庆功时特别嘉奖了来歙之功。封窦融为安丰侯，五郡太守也皆封为列侯，竹曾为助义侯，梁统为成义侯，史苞为褒义侯，库钧为辅义侯，辛肜为扶义侯。

建武八年（公元32年）八月，正当刘秀大军进一步扫除隗嚣残余势力时，不料东方局势逆转，颍川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又起，河东地区的守军也叛离刘秀，京师为之震动。刘秀不得不亲自赶往京师前去镇压。刘秀告岑彭、吴汉等说："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岑须、吴汉等本着刘秀的嘱托，继续围攻西城和上。不久大将杨广死去，隗嚣据守的西城已极度困难。隗嚣大将王捷守备戎丘城（在西城西北），在激烈的战斗中，登上城楼向汉军高呼："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无二心！愿诸军亟罢，请自杀以明之。"说罢，便自刎而死。当时，隗嚣军虽已临近彻底战败，但仍忠心为隗嚣拼死力战。因而，汉军围攻两城，久攻不克。于是岑彭引出谷水淹灌西城，西城还剩一丈多未被淹没，仍坚持与汉军作战。这时大将王元、行巡、周宗等，率领5000蜀军突然杀至西城，边冲边高呼："百万之众方至！"汉军大惊，以为真有百万大军在后，来不及列阵，便被王元军杀败。汉军这时粮食已尽，难以继续再战，于是烧毁辎重，引军退下陇山地区。盖延、耿也相继而退兵。隗嚣率军追击汉军，岑彭军担任后卫，拼力掩护全军后撤，汉军才得以安全东归。至此，刘秀军本已胜利在握的略阳战役，反以失败而告终。

六、刘秀隗嚣双方战后的动态

汉军退回关中地区后，吴汉军屯于长安，岑彭率所部还屯津乡，只有祭遵坚持不退，仍退保汧县。

隗嚣在击退汉军后，很快收复了安定、北地、天水、陇西等郡，隗嚣实力又得到一定程度地恢复。

隗嚣部将苟宇在追击汉军时，俘获了汉军校尉温序，苟宇数次劝降温序。温序大怒，斥责苟宇说："虏何敢迫胁汉将！"以兵器击杀苟宇军数人。苟宇军怒，要立即斩杀温序。敬宇制止众人说："此义士，死节，可赐以剑。"温序接过剑，降胡须衔于口中，对左右人说："既为贼所杀，无令须汗土！"遂伏剑自刎。

建武九年（公元33年）正月，征虏将军祭遵病故于军中，这位一贯充当汉军出征先锋的战将，一生廉约小心，克已奉公，所得赏赐皆分给士卒，深得士卒拥戴酌优秀将领的辞世，引起了全军的巨大悲痛。刘秀本人也悲痛欲绝，车驾素服，亲迎灵车和送葬，哭叹道："安得忧国奉公如祭征虏者乎！"刘秀在祭遵死后，命冯异统率祭遵所部。

刘秀隗嚣略阳战役评述

刘秀亲自统率大军征讨隗嚣的略阳战役，在隗嚣势力即将土崩瓦解之时，隗嚣大将王元搬来公孙述5000救兵，一举打败了汉军。汉军不得不再次退回关中地区，使刘秀遭到了平定隗嚣作战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刘秀军的战败，从现象来看，正如史书记载的那样，是王元搬，来的5000蜀兵投入作战的结果。然而，实质上远非如此。刘秀的10万大军，最后包围了西城和上邦两座孤城，任凭王元5000人马无论如何也扭转不了战局已败的乾坤。应当说，刘秀军的战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1.粮食供应的困难，导致了部队战斗意志的动摇

陇西地区地广人稀，无法依靠就地补给，而远程运输又受山川沟谷所阻，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实难保证源源供应部队作战的需要。对此，刘秀早有深切体会。因而，在刘秀东归时，即告诫大将军吴汉说，"诸郡甲卒但坐费粮食，若有逃亡，则沮败众心，宜悉罢之。"但吴汉对刘秀告诫他遣返各郡兵马的上述敕令，在刘秀离去，即置诸脑后，随着作战时间的推移，汉军便出现了"粮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的被动局面，大有一击即溃之势。这样一经王元等的5000蜀兵攻击，自然难逃战败的境地。

2.气候的寒冷，迫使汉军无法长久在陇西高原地区作战

"六腊不兴兵"是自古以来冷兵器时代作战的准则，寒冷的气候对军事活动具有不可克服的制约力，一支强大的军队，往往因为突遭严寒的袭击，而化做风雪路上冻毙的僵尸。汉军在陇西地区由四月苦战至冬

季，风雪高原，气候寒冷，若无充分的御寒准备，决难适应当地的恶劣气候条件。当年，赤眉军进军陇西地区时，就曾因气候突变，败在过隗嚣军的手下。汉军进军陇西地区时，时值夏日将近，自然难有充分的御寒准备，这样，旷日持久征战的疲劳，粮食给养的匮乏，再加之寒冷气候的侵袭，汉军当然就难以在风雪高原站稳脚跟了。

3.汉军战役指挥上的失算

汉军统帅吴汉，对前一阶段作战的胜利缺乏冷静的分析，没有看到隗嚣久踞天水，有其相当深厚的统治基础，虽剩两座孤城，仍有不可忽视的实力。因而急功近利，轻敌恋战，铸成了他一生征战中的重大失败。

第四节 刘秀平定隗嚣之落门战役

一、落门战役前刘秀隗嚣双方的战略态势

建武八年（公元32年）冬，汉军被隗嚣军战败退回关中地区后，大司马吴汉率军退屯于长安地区，岑彭率军退出对隗嚣作战的战场，去往津乡（今湖北枝江）地区，准备而后从水路向公孙述进兵。这样原厩隗嚣军之天水、陇西、北地、安定等各郡县，又均为隗嚣军所收复，使刘秀与隗嚣苦战两年多的战果功匮于略阳一役。于是刘秀与隗嚣双方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战略态势。

但是，由于隗嚣军在略阳战役中，消耗了大量的军资财物，10多员大将率10万之众，投降了刘秀军，故而隗嚣军巳十分虚弱，实际上正濒临崩溃的边缘，战略全局上的彻底失败已是指日可待了。

二、刘秀军的调兵遣将

刘秀鉴于大司马吴汉两度轻敌恋战，招至了战略全局的一时失利，便决定以来歙监护征讨隗嚣的各路大军，于是，来歙便成了汉军的统帅。后来，刘秀又以马援为太中大夫，做为来歙的副手，以便有利于平定依附于隗嚣的陇西各地羌族部落势力。

来歙在担任了汉军的统帅之后，便向刘秀上书混，蜀地的公孙述以天水，陇西为其屏蔽，故能够苟延残喘，待此两郡平定，公孙述便智穷力竭了，当务之急应选调兵马、储积资粮，以便用于下一步作战之用。于是，刘秀下令于汧地积谷六万斛，并调集了相应的转运粮食的牲畜，一场击灭隗嚣集团的最后决战已处于箭在弦上之势。

三、刘秀隗嚣落门战役双方作战序列

汉军

统帅太中大夫来歙

将领征西大将军冯异

建威大将军耿

虎牙大将军盖延

扬武将军马成

武威将军刘尚

武威太守梁统

太中大夫窦士

总兵力8万多人

隗嚣军

统帅隗嚣之子隗纯

将领大将军王元

大将军行巡

将军宗周

将军苟宇

将军赵恢

蜀将田

赵匡

总兵力据判断为5万人左右

四、刘秀隗嚣落门战役作战经过

建武九年（公元33年）春，隗嚣集团的处境已相当困难，长期的战争消耗，使其粮食将尽。隗嚣统治阶层几乎一筹莫展，隗嚣因之悲愤而死。隗嚣死后，大将军王元、周宗等人拥立隗嚣手隗纯为主，这为汉军进攻提供了良好的战机。

建武九年秋八月，汉军刀：始向隗嚣军进击，建成大将军耿真率兵攻取高平第一城（今宁夏固原），高平第一城守将高峻率领1万精兵坚守第一城。耿宾军苦战一年，未曾攻下该城。于是，刘秀亲至湃地（今陕西陇县南）督战，派将军寇恂前往高平第一城招降高峻。寇恂奉刘秀的玺书，进至高平第一城城下，高峻派他的军师皇甫文出城与寇恂相见。皇甫文不卑不亢，拒绝降服。寇恂大怒，下令立即将皇甫文斩首，诸将领劝阻寇恂说：“高峻拥有精兵万人，善操强弓劲弩，据守于进入陇地的要道，我们连攻一年不克。现在既然要招降高峻，反而又杀害他的使者，这不是上策。”寇恂不听，坚持斩了皇甫文。并命令皇甫文的副使回城向高峻报告说：“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高峻听到皇甫文已被斩杀的情况，十分惶恐，即日开城投降了汉军。诸将领在共庆胜利的同时，便问寇恂为何杀了高峻的将领，高峻反而投降了的道理。寇恂回答说：“皇甫文是高峻的心腹之将，为其言听计

从的重要谋士，他出城来与我们相见，言语坚定，毫无降服之心，如果蚊其回城，定唆使高峻顽抗到底，杀了皇甫文则高峻失去了有胆有识之士，他必然投降。”诸将领皆佩服寇恂的胆略。

来歙率冯异、盖延等5将军之军进入陇地后厂于建武十年（公元34年）七月击败了赵匡，田宾统率的蜀军，斩杀了赵匡和田宾，推进至落门（今书肃武山），并于当年的十月攻破了落门城，将军宗周、行巡、苟宗、赵恢等与隗纯一起投降汉军。大将军王元所在冀城已是孤军作战，再无任何取胜的希望，遂率众投奔蜀地公孙述。至此，刘秀平定隗嚣集团的战争，经过4年多的苦战才告全部结束。

五、刘秀隗嚣双方落门战役后的形势

落门战役后，隗嚣集团的势力已被汉军彻底平定，隗嚣之子隗纯在投降汉军后，不甘于刘秀的统治，刁：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率数十骑投降匈奴，至武威，被汉军捕获诛杀。

建武十年（公元34年）先零羌与羌人一些部落进袭金城（今甘肃兰州），陇西，来歙率虎牙大，将军盖延等，将羌人部落击破，陇右一带地区遂全部安定。

刘秀平定隗嚣之落门战役评述

刘秀平定西北地区割据势力隗嚣集团的作战，从建武六年（公元30年）五月起，至建武十年（公元34年）冬十月止，共4年半的时间，经落门一役才彻底战败了隗嚣集团。

刘秀平定隗嚣之作战，经历了陇坻、略阳、落门三次主要战役，其中两次战役都以刘秀的战败而告终，只是最后一战的落门战役才取得了全部胜利。刘秀在平定隗嚣的作战中，几乎集中了他的全部战将和精锐之师，诸如吴汉、耿弁、冯异、盖延、祭遵、马武、马援、来歙、岑彭、刘尚、刘歆等等，尚且两次战败，足见与隗嚣作战的艰苦函难情景。实际上就是最后一战的落门战役，也胜之相当艰巨，如若不是寇恂迫降高峻，则鹿死谁手，恐怕尚须推延一段时间才能定论。

刘秀平定了隗嚣，取得了陇西地区，对完成全国的统一大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陇地处于关中地区的西面，居高临下瞰制关中，平定了隗嚣集团就从根本上解除了关中西面的威胁，陇地是从北面进袭西南公孙述的必经之地，平定了隗嚣集团就使进军西南的门户洞开，陇地背靠匈奴，平定了隗嚣集团就免除了匈奴与隗嚣联兵的危险局面，隗嚣集团是西北诸羌部落的支柱，平定了隗嚣集团，诸羌部落便失去了发动叛乱最大靠山，隗嚣集团占据陇地阻塞了汉王朝通往西域的要道，消灭了隗嚣集团，清除了汉通西域的障碍。

第五节 刘秀平定卢芳之作战

一、卢芳割据势力的兴起

卢芳原系安定三水人，王莽当政的混乱时期，由于天下人心思汉，卢芳便诈称自己是汉武帝的曾孙刘文伯。王莽末年，卢芳乘势与三水属国羌胡起兵。更始进入长安后，以卢芳为骑都尉，命其镇抚安定以西地区。更始王朝被赤眉起义军消灭后，三水地区的豪绅以卢芳为刘氏子孙，便拥立卢芳为上将军、西平王。卢芳称王后，派遣使者与西羌、匈奴结盟和亲。不久，匈奴单于派句林王率数千骑兵迎接卢芳去匈奴，单于遂立卢芳为汉帝，以卢芳弟程为中郎将。卢芳被匈奴立为汉帝后，旋即率领匈奴骑兵返回安定，建都于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夺占了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五郡地区，设置守令，在匈奴的操纵之下，割据称雄，成为东汉初期盘踞北方的又一强大势力。

二、刘秀平定卢芳的作战经过

卢芳虽然依靠匈奴的支持称帝，但其部下的将领，也多系一些小割据势力的头目，这样卢芳虽拥有五郡之地，但卢芳集团实是一群各怀异志，大小割据势力的组合体。

当初，卢芳在匈奴未返回安定时，曾由匈奴单于撮合，将在五原，朔方等地自称将军的李兴、田飒、隋昱、石鲔、闵堪等人，置于卢芳手下为臣。建武六年（公元30年），卢芳集团开始公开火并。卢芳的将军贾览统率匈奴骑兵击杀了代郡太守刘兴，随即卢芳又借故诛杀了五原太守李兴兄弟。其朔方太守田飒、云中太守桥扈惊恐，便率兵举郡叛离卢芳，投降了刘秀，刘秀复命他们为云中、朔方太守。这样，刘秀兵不血刃，便收降了卢芳五郡中的两郡，使卢芳势力大大削弱。

在建武五年（公元29年），刘秀平定隗嚣的陇坻战役中，冯异率军进占栒邑后，曾乘胜击败过卢芳的战将贾览和匈奴奥日逐王之军。后来，大司马吴汉和骠骑大将军杜茂，数度率兵进击卢芳，未获重大战果。杜茂在建武九年进攻卢芳部将尹由时，被贾览统率的1万多匈奴骑兵所击败。此后卢芳屡屡侵犯边境地区，刘秀遂派谒者段忠率军镇守北部边境，杜茂也建屯田，以防备卢芳和匈奴军的进犯。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卢芳率其战将贾览进攻云中，久攻不克。留守子九原的隋昱则密谋胁迫卢芳降汉。卢芳此时自知已陷入众心叛离的境地，于是便丢弃辎重，仅带10余骑兵奔入匈奴，这样卢芳所部尽归隋昱所有，隋昱旋即率众投降刘秀，被拜为五原太守，封胡侯。

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卢芳再次入居高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40公里），派遣使者向刘秀请降，刘秀遂立卢芳为代王，闵堪为代相。后来，卢芳因朝见刘秀的途中，又奉诏改期入朝，引起疑虑，复率

众背叛汉朝，与闵堪互相攻战数月后。匈奴派数百骑兵迎卢芳再入匈奴。10余年后病死，卢芳割据势力最终灭亡。

卢芳集团灭亡后，刘秀遂彻底完成了除匈奴之外的中国北方和西北方的统一大业。

第九章 东汉建立初期统一南方和西南地区的战争

刘秀统一南方和西南地区的战争主要是消灭南阳和庐江一带地区的董、邓奉、延岑、秦丰，李息等势力，和称帝于蜀地的公孙述集团，经过的重要战役如下：

汉军平定董诉邓奉之战发生于建武二年（公元26年）十一月，汉军以征南大将军岑彭为统帅，出动约8万之众，进击南阳郡地区的董诉、邓奉军，经1年作战，将董、邓奉军击灭。

汉军平定延岑秦丰之战发生于建武三年（公元27年）四月，止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夏。汉军岑彭、建成大将军耿等军，经过近3年的作战，扫除了延岑、秦丰两大割据势力。

汉军平定李宪之战发生于建武四年（公元28年）九月，止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正月。汉军以扬武将军马成为统帅，率三将校之军，经1年多作战，将李宪割据势力彻底消灭。

汉军平定公孙述之夷陵战役夷陵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于建武九年（公元33年）春，公孙述派其翼江王田戎等夺取了夷陵、夷道等地，第二阶段发生于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三月，岑彭，吴汉等军，攻克了蜀军之夷陵、夷道，进抵江州。

汉军平定公孙述之成都会战该会战发生于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六月。汉军以岑彭，来歙、吴汉为统帅，以约20万大军于南北两个方向，钳击成都，于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十月，汉军彻底击败公孙述，进占了成都。

第一节 汉军平定董邓奉之战

一、董邓奉之叛汉

南阳郡堵乡（今河南方城）人董，在大司马吴汉于建武二年（公元26年）四月击败宛王（今河南南阳）刘赐和邓王（今湖北襄樊）王常后，同年八月，即于宛城起兵反汉，擒获了南阳太守刘辚。不久，便为扬化将军坚镡所击败，退出宛城，奔还堵乡。

在吴汉率军击败宛王刘赐和邓王王常，以及南阳地区更始政权的诸将领的作战中，由于军纪松懈，对所过县邑侵掠无度，激起当地吏民的反抗。当时，正值破虏将军邓奉回新野（今河南新野）探亲，见家乡被吴汉军略掠的状况，十分震怒，便举兵反汉，一举将吴汉军击破，屯兵于淯阳（今河南新野东南地区），联合了南阳郡地区的反汉势力，拥有相当的实力。

二、刘秀的调兵遣将

刘秀鉴于吴汉军被邓奉军击败，且军纪败坏，不得人心，难以在南阳郡地区继续作战，便决定调回吴汉之军，命令岑彭为征南大将军。并率领建义大将军朱柏、执金吾贾复、建成大将军耿宾、汉忠将军王常、武威将军郭守、越骑将军刘宏，偏将军刘嘉、耿直、积弩将军傅俊，骑都尉臧宫等，前往宛邓地区征讨董，邓奉等叛军。

三、汉平定董邓奉的作战经过

建武二年（公元26年）十一月，岑彭统率诸将军之军，约8万之众，开始向南阳地区进击。此时，董之军正在堵乡，于是岑彭便先指挥大军向堵乡进攻。

邓奉得知汉军进攻堵乡的消息，随即率领1万多人马前往堵乡救援董军。由于董、邓奉所率之兵，均为南阳地区的精锐部队。岑彭的大军，围攻堵乡数月未能攻克，建义大将军朱祜被邓奉军击败，为邓奉擒获。

汉军与邓奉、董之军，胶着于南阳郡地区，刘秀心急如焚，便于建武三年（公元26年）夏，亲至南阳督阵。刘秀率军进至叶（今河南叶县）时，董诉别将率数千人截击刘秀军，切断了刘秀军前进的道路，刘秀被阻于山隘之间无法前进。岑彭闻讯率军奔袭，大破董别将之军，刘秀遂率军进至堵乡，邓奉退还清阳，董投降刘秀军。

岑彭击降董后，刘秀旋即命耿宾、贾复，积弩将军傅俊，骑都尉臧宫等将领之军，尾追邓奉军至小长安（今河南南阳南），刘秀亲自指挥诸将大战邓奉军，遂将邓奉军击破。邓奉见大势已去，便释放了朱，向

刘秀投降。刘秀念及邓奉昔日的战功，其反叛又系由于吴汉军纪败坏而起，便想赦免邓奉。岑彭与耿极力劝阻说：“邓奉忘恩负义，反叛朝廷，使我们妄动干戈一年，贾复负伤，朱祜被擒，陛下亲至，他仍然不思悔悟，一直与我们顽抗到兵败才投降。若不杀他，无以惩恶。”刘秀无奈，下命斩了邓奉。至此，董诉、邓奉的叛乱，遂告平定。

第二节 汉军平定延岑秦丰之战

一、延岑秦丰割据势力的崛起

延岑在王莽末，于更始二年（公元24年），起兵于汉中地区，占据汉中，成为一大割据势力，后来，被更始汉由三刘嘉击败，廷岑投降刘嘉后，又叛离刘嘉并将刘嘉击走，复占据汉中。在赤眉军西进退回长安时，延岑曾击败逄安的10万大军，不久即在蓝田自称为武安王。

秦丰割据势力，占据了黎丘（今湖北襄樊南）一带12个县邑，自称为楚黎王。

汉军平定了董、邓奉的叛乱后，在南阳郡和南郡地区，便剩下了延岑与秦丰这两股较大的割据势力。因而，汉军遂转移兵锋，开始向延岑和秦丰进击。

二、平定延岑秦丰的作战经过

建武三年（公元27年）四月，刘秀在击灭邓奉军后，即命岑彭率领积弩将军傅俊、骑都尉臧宫等将军，共3万余人，向据守南郡地区黎丘一带的秦丰进击，刘秀则带领部分将领回归京师。

此时，盘据于关中地区的延岑被冯异军击败，率其残部退出武关，向南阳郡进发，攻克了数个城邑。建威大将军耿宾与延岑交战于穰（今河南邓州）。延岑军大败，被耿兵斩首3000多人，俘获5000余人，延岑仅率数骑逃往东阳（今河南邓州南），与秦丰军会合。建义大将军朱韬率祭遵军追至东阳，再与延岑军战，又将延岑军击败，延岑护军邓仲况拥兵占据阴县（今湖北老河口），见延岑兵败，投降了汉军，延岑的势力进一步削弱。接着岑彭大军攻拔黄邮（今河南新野），秦丰率其大将蔡宏军于邓地（今新野西南）列阵，阻止了岑彭军的前进，岑彭军苦哉数月，仍来战胜秦丰军。

刘秀得知岑彭军数月被阻于邓地的情况，便派使责备岑彭。岑彭受到责备，遂决定以声东击西之计，调动秦丰之军，力争主动。岑彭半夜命令部队紧急做好作战准备，并明令军中人人皆知明日黎明即向山都（今湖北襄阳西北）进攻，同时故意放纵秦丰的俘虏，以使其逃归，向秦丰报告汉军的这一动向。秦聿得到这个消息后，信以为真，便率领其大军向山都方向急进。岑彭见秦丰军中计，遂暗暗率军渡过沔水，偷袭秦丰的都城黎丘（今湖北襄阳南），首先击破了屯守于阿头山（今湖北襄阳西北）地区的秦丰部将张杨之军，继续沿着川谷伐木开路，向黎丘进击。此时，黎丘空虚，防守兵力有限，岑彭大军突然袭至，黎丘有立即被汉军占领的可能。秦丰闻知京城危急，十分惊慌，率领大军急忙回救黎丘，岑彭与诸将率军在东山一带有利地形布阵，以待秦丰军的到达，秦丰军到达东山地区后，乘夜暗急攻汉军营垒，汉军因早有准备，

立即出兵迎击，大破秦丰军。秦丰率军退走，汉军猛追，擒杀了秦丰大将蔡宏。秦丰相赵京驻守于宜城（今湖北宜城南），惧于汉军的声威，举宜城投降了汉军后，随即与岑彭合军，共同包围秦丰于黎丘。

延岑得知秦丰被围困的情况，便于建武四年（公元28年）二月，率军向黎丘进发，以救援秦丰军。行至顺阳（今河南浙川境），被邓禹军击破，延岑退回汉中，接受了公孙述授予的汝宁王之封号。至此，延岑在南阳地区的势力已被扫除。

据守于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的另一割据势力田戎，得知秦丰军败，黎丘被汉军围困，惧怕汉军不久会南下攻打自己，便欲投降汉军。其妻兄辛臣劝止田戎说：“今四方豪杰各据郡国，洛阳地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观其变”。田戎不听，坚持向汉军投降，遂命辛臣防守夷陵，自己率军自水路入沔水，到达黎丘汉军营地，准备择期请降。而辛臣却于田戎走后，盗取田戎的全部珍宝，从小路捷径先向汉军投降。岑彭于是便命辛臣以书信招降田戎，田戎怀疑辛臣已将自己出卖，而不敢降汉，立即与秦丰军合势，岑彭以部分兵力进攻田戎军，经过几个月苦战，才击败田戎军，田戎的大将伍公投降了汉军，田戎逃归夷陵。

汉军继续围困黎丘，但仍未攻克该城，刘秀亲至黎丘前线劳军，大封吏士有功者100多人。岑彭围攻秦丰军3年多，斩杀秦丰军9万多人，黎丘城内仅剩千余士卒，粮食日渐枯竭，黎丘守军已处于被彻底消灭的绝境之中。

此时，刘秀为了迅速向南方推进，便命建义大将军朱祐军，代替岑彭军围困黎丘，以岑彭统率傅俊等将领南下，进攻夷陵，随即攻拔该城，大破田戎军，将田戎军追至秭归（今湖北秭归），俘获了田戎数万之众，田戎逃奔蜀地，投向了公孙述，被公孙述封为翼江王。

后来秦丰见黎丘城内已无法生存，便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夏，向朱祐军投降。至此，南阳和南郡地区，已全部为刘秀军统一。

三、汉军平定延岑秦丰后的动向

岑彭在彻底战胜延岑、秦丰后，为了下一步向蜀地进军，便以威虏将军冯骏驻于江州（今湖北武昌地区），都尉田鸿屯军于彭陵（今湖北宜昌），领军李玄军驻于夷道（今湖北枝城），岑彭自率主力驻于津乡（今湖北枝江）。岑彭为了招降南方诸蛮夷，一方面致书其旧友交趾牧陈让，一方面派遣偏将军屈充至大江以南，班行诏命，劝说各郡太守归降刘秀。于是陈让、江夏郡（今湖北新洲西）太守侯登，武陵郡（今湖南常德地区）太守王堂，长沙（今湖南长沙）相韩福、桂阳郡（郡治在今湖南郴州）太守张隆、零陵郡（今湖南永州地区）太守田翕，苍梧郡（今广西梧州）太守杜穆、交趾（今越南河内）太守锡光等，均归降汉朝，江南地区也告全部统一。

第三节 汉军平定李宪之战

李宪在王莽当政时期为庐江属令，王莽末年，由于镇压农民起义而被王莽封为偏将军、庐江连率（即太守）。王莽灭亡后，李宪割据庐江郡（郡治在安徽庐江西南）9座城邑，于更始元年（公元23年），自立为淮南王。建武三年（公元27年），又自立为天子，设置公卿百官，拥众10余万人。

建武四年（公元28年）秋，刘秀进至寿春（今安徽寿县），决心进讨李宪，于是便命扬武将军马成，统率诛虏将军刘隆、振威将军宋登、射声校尉王赏等将校，调发会稽、丹阳、九江、六安四郡兵马进击李宪。当年九月，汉军将李宪包围于舒城（今安徽庐扛西南）。汉军将李宪军包围后，采取持久作战的策略，深沟高垒，坚壁不战，以待舒城食尽，使李宪坐以待毙。因而，李宪督军多次向汉军挑战，马成拒不出。战，如此围困舒城一年之久，至建武六年（公元30年）正月，马成见城中粮食耗尽，才向舒城进攻，一举攻克了该城，李宪慌忙逃走，李宪军士帛意追斩了李宪，投降了汉军，随着汉军的胜利进军，江淮间的大小割据势力均一一被刘秀军平定。

第四节 汉军平定公孙述之夷陵战役

一、公孙述割据势力的形成

公孙述于更始二年（公元24年），已占有蜀汉一带的广大地区，当时更始刘玄派柱功侯李宝、益州刺史张忠率兵万余人徇略蜀，汉地区，公孙述自恃地险人众，便想自立称王，于是派其弟公孙恢，率军迎击李宝、张忠军，于绵竹一举将李宝、张忠军击破，自此，公孙述便威震益州。不久，功曹李熊劝说公孙述称王说："方今四海波荡，匹夫横议。将军割据千里，地什汤武，若奋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业成矣。宜改名号，以镇百姓。"李熊之言正合公孙述的意愿，公孙述于是自立为蜀王，建都成都（今四川成都）。

由于蜀地肥沃，兵精粮足，各方志士多来归降于公孙述，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的部落也前来朝贡。李熊见此情景，再次向公孙述建议，应当割据蜀汉地区以称帝。李熊说，北面占据汉中，防守褒、斜进入蜀之通道，东面防守巴郡，拒守扞关（今四川奉节）。蜀地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东下沿汉水可攻取秦地，南顺大江而下，可以收取荆、扬二州。现在大王的声威已闻于天下，乘此建立帝号，定会使天下之士归心。公孙述遂接受了李熊的建议，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四月，自立为天子，建元为龙兴元年。他封李熊为司徒，以其弟公孙光为大司马，以公孙恢为大司空，改益州为司隶校尉，蜀郡为成都尹。由此，公孙述集团便成了独霸西南地区最强大的势力。

二、汉军公孙述军夷陵战役前双方的战略形势

汉军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平定了南阳和南郡地区的割据势力秦丰等人后，岑彭随之又派使南下各郡县，劝降了南方直至交等郡国，汉军在南方和西南方已对公孙述集团形成了战略大包围之势。至建武八年（公元32年）春，刘秀因发动平定隗嚣之略阳战役，将其重要战将如大司马吴汉、建成大将军耿弁、征西大将军冯异、征南大将军岑彭、虎牙大将军盖延等，均调集于西北战场，所以，尽管早已从南方和西南方对公孙述形成了有利的战略态势，但并未向公孙述进击。

公孙述称帝时，已据有今陕西南部，甘肃南部，贵州北部，云南北部和四川全省的广大地区，可谓沃野千里，地广人众，具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战争潜力巨大。公孙述鉴于刘秀势力的急剧发展，便采取了西北联兵隗嚣，北收延岑、东收田戎的战略，以从北面和东面屏蔽蜀汉地区的安全。加之，西南地区山川绵亘、河谷纵横，进入蜀汉地区之陆路和水路要道均为险关要隘所封锁，这使蜀汉地区具有易守难攻天然有利的地理条件。因而，公孙述占有相当优越的战略形势。

三、汉蜀两军作战序列

汉军

统帅征南大将军岑彭

将领大司马吴汉

辅威将军臧宫

诛虏将军刘隆

武威将军刘尚

骁骑将军刘歆

威虏将军冯骏

偏将军鲁奇

都尉田鸿

领军李玄

总兵力水陆兵约10万人，骑兵5000人

蜀军

统帅翼江王田戎

将领大司马任满

南郡太守程

将军王政

总兵力估计为3～5万人

四、汉蜀双方作战策划

汉军在夷陵战役的第一阶段实际处于被动地位。当时因为岑彭，吴汉等军，均在西北战场陇西地区对隗嚣集团作战，故威虏将军冯骏、都尉田鸿、领军李玄等军，只是在江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夷道（今湖北枝城）屯驻，没有进击夷陵的作战策划。岑彭等人率军返回津乡（今湖北枝江县）后，便开始准备夷陵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并按照刘秀从南北两方同时进攻公孙述的作战方针，详细策划以水陆两军攻取夷陵的作战行动。岑彭军鉴于蜀军以浮桥和立桩封锁了大江江面的情况，便决定以敢死之士，首先乘船以火烧毁敌人的浮桥，疏通航道，然后大军继之前进，攻取夷陵城。

蜀军公孙述一方面派兵北上援救隗嚣，阻止汉军实现“得陇望蜀”战略企图；另一方面则想乘汉军主力在陇西大战的有利时机，派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马任满等率军攻取夷陵、夷道等沿江重要城邑，以便占据大江进入巴蜀的险要水道，阻止汉军由水路入袭益州。

五、汉蜀夷陵战役的作战经过

夷陵战役的第一阶段作战建武九年（公元33年）春，公孙述乘夷陵、夷道诸地汉军兵力薄弱，派遣翼江王田戎，大司马任满、南郡太守程等人，率数万水军开始向夷陵进发，大军直取江关（今四川奉节），一举击败了冯骏、田鸿、李玄等军，一一夺占了巫（今湖北巫山）、夷陵，夷道、荆门（即荆门山之荆门城）等沿江城邑。为防守大江，堵塞水道，随即架设了横跨大江的浮酢，浮桥上修筑关楼，在水中植入攒柱，并跨山结营，阻塞陆上通道。

夷陵战役的第二阶段作战岑彭返回津乡（今湖北枝江）后，即于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三月，数度率兵进攻翼江王田戎等军，均未奏效。在此之前，也即建武十年十月，来歙已在陇西胜利地结束了平定隗嚣的落门战役，隗嚣的势力已被彻底扫除。刘秀为了实现其由北面和东面两个方向攻取蜀地的战略企图，鉴于岑彭军难以进展的情况，遂立即命大司马吴汉，率诛虏将军刘隆等3将军之军，并调发荆州军以及桂阳、零陵、长沙诸郡的船工水手共步兵6万，骑兵5000人，与岑彭之军会师于荆门，以便共同袭取夷陵，进兵巴蜀。

此时，岑彭为了增强水上作战的能力，已制作战船数千艘。但吴汉认为这么多船只水手，消耗粮食过多，应废弃水军。岑彭却认为蜀军兵多势盛，必须水陆两军同时作战，二人争执不下，便上书刘秀决断。刘秀遂致书吴汉、岑彭等说：“大司马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为重而已。”由此，汉军进军蜀地的作战，仍由岑彭为统帅。

岑彭为了摧毁蜀军的横江浮桥，开通大江进军的水道，进军之前，便招募军中敢于向浮桥冲击的勇士，规定先登上浮桥者重赏。偏将军鲁奇挺身而出，愿率军为先锋。

汉军开始进攻后，适遇狂风大作，汉军船队逆流而上，直冲浮桥。但当船只将靠近浮桥时，却被攒柱上的反把钩钩住。进退不得。此时，鲁奇便指挥勇士，奋勇力战，乘东凤大作主机，以事先准备之火攻器具，向敌楼纵火，火借风势，越烧越猛，桥楼崩倒，浮桥被大火烧毁。岑彭乘势率领主力船队疾进，所向无敌，蜀兵大乱，溺死者数千人。蜀将王政斩任淌而投降岑彭军，汉军生俘了南郡太守程汎。田戎率军退保江州（今四川重庆嘉陵江北岸市区），夷陵战役遂告全部结束。

六、夷陵战役后汉蜀双方的动向

汉军在攻克了夷道、夷陵、巫县等沿江城邑后，即溯江而进。岑彭

率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长驱直入，进占江关。岑彭军纪严明，严禁掠略，因此，汉军所过之地，百姓均奉牛酒迎劳。岑彭则传令部下，不得收受百姓牛酒，吏民更加喜悦，沿途县邑均开城降服。

刘秀为加大岑彭的权力，下诏命岑彭为益州牧，使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以便更有利于对公孙述的作战。

汉军平定公孙述之夷陵战役评述

汉军平定公孙述的夷陵战役是汉军与公孙述集团之间的首次大规模交战。先是公孙述乘汉军主力于陇西激战的时机，以其翼江王田戎等率军攻拔了汉军夷陵、夷道等堵沿江关隘；后是汉军统帅岑彭、吴汉以10万人军战胜了田戎军，旋即进抵蜀地重镇江州城下，取得了夷陵战役的胜利。

汉军在夷陵战役中取胜，除了兵力上的优势地位之外，最基本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水陆并进作战方针的确立。当大司马吴汉与征南大将军岑彭，就是否运用水军争执不下之时，刘秀洞悉蜀地的山川地理，当机立断，支持岑彭运用水军的主张，并将南方战场的统帅重任委之于岑彭。这无疑是进兵蜀地最正确的战略决策。如若废弃水军，靠从陆路入蜀，想进入被层层山川阻隔的蜀地，不异于有“难于上青天”之比。事实证明，就是主张舍弃水军的吴汉本人，后来也是率军逆江水而进。其二是火攻蜀军浮桥，开通了大江航道；当时横江浮桥，既是蜀军江防的生命线，也是汉军入蜀不可逾越的障碍。然而，岑彭军却以敢死之士，火攻取胜，实是胜敌一筹的高明手段。

蜀军虽然在夷陵战役中遭到惨败，但是，它能在当时的条件下，于浩瀚的长江江面上，横跨长江架起浮桥，且在浮桥之上修筑关楼，既可观察瞭望，又可发射箭矢，这在我国占代战争史上，不能不是一件令人惊叹的创造。此外，蜀军植于水中的攒柱，上安反把钩，一旦钩住船只，既不能进，又不能退，也不失为我国古代战争中，设置水中障碍的奇观。

第五节 汉军平定公孙述之成都会战

一、成都会战前汉蜀双方的基本战略态势

刘秀平定公孙述一直是采取北方战场首先击灭隗嚣集团，然后南下巴蜀，南方战场则沿大江由东而西水陆并进的战略，这一战略使公孙述不得不被迫两面作战。

北方战场刘秀军在建武八年（公元32年）冬，被蜀军5000援兵击败于略阳战役后，被迫退出陇地，建武十年（公元34年）十月，刘秀军以来歙统率诸军，发动了平定隗嚣集团的最后一次战役——落门战役，一举将隗嚣集团的势力全部荡平，只有隗嚣的大将王元投奔了公孙述。刘秀平定了隗嚣集团，便打破了公孙述西北方向的屏障，巴蜀的门户遂暴露于刘秀军的兵锋之下。

隗嚣集团的覆没，引起蜀地吏民的极大慌恐，社会动荡，人心浮动，公孙述为了安抚人心，想出一条妙计，他将秦代时期成都城外一座空废的粮食仓库，改名为白帝仓，公孙述命人四处传播消息说，白帝仓冒出的谷子形如一座座山陵。百姓几乎倾城前往观看，公孙述借此机会大会群臣，高声询问臣下可否看到白帝仓冒出的谷山。群臣皆答“无”。于是公孙述对大家说，“讹言不可信，传说隗嚣已被消灭的谣言，也象传说白帝仓会冒出谷山一样，全是谎言”。尽管公孙如此挖空心思地稳定蜀地军民的情绪，但随着汉军的顺利进军，整个巴蜀地区的民心再也无法安定了。

南方战场，汉军统帅岑彭在攻克了夷道、夷陵，巫县等地区后，逆江而上，大军进展顺利，先锋部队已逼近蜀地重镇江州（今四川重庆），南方战场的战略形势更加对公孙述不利。

二、汉蜀双方成都会战作战序列

汉军

统帅征南大将兵岑彭

将领大司马吴汉

中郎将来歙

虎牙大将军盖延

辅威将军臧宫

骁骑将军刘歆

武威将军刘尚

威虏将军冯骏

扬武将军马成

太中大夫郑兴

护军高午

唐邯

总兵力南北战场共约18～20万人（南方战场大约10万人）

蜀军

统帅蜀成家皇帝公孙述

将领大司徒谢丰

执金吾袁吉

翼江王田戎

汝宁王延岑

将军公孙恢

将军环安

将军公孙永

将军王元

将军吕鲔

将军侯丹

将军魏党

总兵力约20万人左右（南北战场加各要塞守军）

三、汉蜀两军作战策划

汉军在消灭隗嚣集团后，基本上扫除了南下的障碍，因而，更加坚定地贯彻其北、东两个方向钳击成都的战略方针。刘秀一方面责令来歙军攻取武都（今甘肃成县西），迅速南下，另一方面命南方战场的岑彭、吴汉军向成都进逼。同时还数次下书公孙述，劝其降服，企图以军

事打击和政治诱降相结合的手段，制服公孙述集团。在南方战场的岑彭军为了迅速兵临成都，则采取重兵绕过战略重镇江州，奇兵出袭成都背后的战术，以求攻克成都，迫使成都外围诸要塞之军不战而降。

蜀军公孙述，为了摆脱自己两面作战的被动处境，利用北方战场现有的兵力，力图阻止北面汉军的南下，同时欲集中蜀军的主要兵力，对付西进的岑彭军，以解除对成都的最大威胁。为此，将其主要将领和成都地区的全部兵力均云集成都一带地区，与汉军作最后之决战。

四、汉蜀成都会战的作战经过

一、北方战场建武十年（公元34年）十月，在汉军攻破隗嚣军的落门城邑后，隗嚣大将王元即放弃翼城而投奔公孙述，公孙述以王元为将军。不久，公孙述为遏止汉军南下，遂命将军王元，环安等，率军占据河池（今甘肃成县西北），下辨（今甘肃徽县境）两城，以阻止汉军的攻势。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六月，来歙率领虎牙大将军盖延和扬武将军马成等军向河池、下辨进击，大破王元、环安军后，乘胜急进。蜀人大惊，环安遂命刺客刺杀来歙，来歙身负重伤，急召盖延，嘱托代其统军，来歙已自知将死，便支撑身子上书刘秀说：“臣不敢自惜，诚恨奉职不称，以为朝廷羞。夫理国以得贤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鲠可任，愿陛下裁察。”写罢投笔抽刃而绝。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刘秀决定亲自率军征公孙述，秋七月，行至长安。当年十月，马成率军扫平了武都郡（郡治在下辨）蜀军的残余势力，随即以刘尚军南下入蜀，以与岑彭，吴汉军会攻成都。

二、南方战场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岑彭率军进至江州，蜀军翼江王田戎屯驻该城，兵多势众，粮食充足。岑彭料到难以短期内击拔该城，于是便按预定策划，留将军冯骏之军，困守江州之田戎军，自率主力乘胜沿今嘉陵江上行，直攻垫江（今四川合川），下平曲（今四川武胜），缴获蜀军粮食数数十万石。

公孙述对岑彭军的西进，甚为惧怕，急令其，竦宁王延岑、将军吕鲔、公孙恢、王元等，率全部主力大军防守广汉（今四川广汉北）及资中（今四川资阳），以利用今沱江阻止岑彭军的西进；同时，派遣将军侯丹率2万多人防守于黄石（今四川永川），以防止汉军迂回成都的侧背。

岑彭为吸引蜀军的注意力，多处设置疑兵，留下护军扬翕与臧宫军，牵制延岑等军，自率部分兵力沿江退还江州。然后，沿都江而上，袭击侯丹军，一举将侯丹军击破，乘胜昼夜兼程2000多里，绕至延岑，吕鲔，王元，公孙恢军的背后，突然攻拔了犍为郡治武阳（今四川彭山）。旋即以精骑疾驰广都（今四川成都南中心镇一带），进至仅距成

都数十里之遥。岑彭军迅若疾风骤雨，兵锋所至，蜀吏民皆望风而奔逃。

公孙述当初闻知汉大军尚在乎曲，因而，便发大军前去迎击，待岑彭军至武阳，绕至延岑等军背后，蜀地异常震惊，公孙述以仗击地十分惊恐的喊道：“是何神也！”公孙述急派刺客刺杀了岑彭。

辅威将军臧宫，统率东部兵马与降卒5万多人，与延岑军对峙于沈水，臧官兵多粮少，后方粮食运输中断，引起吏卒慌乱，降卒多欲逃散，附近郡县又拒绝供应臧宫军粮食，情况危急。臧宫想率军退走，又怕士卒乘机反叛，正在进退维谷之际，刘秀所派出的谒者正巧率军前往延岑处，并有马700匹。臧宫假传命令，截留了这些部队和所运物资粮食。立即命令部队星夜进兵，多张旗帜，并令人登山击鼓，虚张声势，右路为步兵，左路为骑兵，中间是水军船队，呼声震动山谷，向延岑军进击。延岑对汉军的突然进攻十分意外，登上高地远望，只见汉军汹涌而来，大惊失色，臧宫纵兵猛击延岑军，大破蜀军，蜀军被斩杀和溺水淹亡者1万多人，江水为之变浊。延岑逃奔成都，汉军乘胜猛追，尽获蜀军的兵马珍宝，投降汉军的蜀军达10万多人。臧宫挥军一直追至平阳乡（今四川绵竹县境），蜀将军王元率众投降汉军，遂攻拔绵竹（今四川德阳东北），斩杀了蜀将公孙恢。

岑彭军自岑彭被刺后，太中大夫监军郑兴暂时统领全军，以等待吴汉的到来。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十二月，吴汉自夷陵率3万大军沿江向武阳前进。建武十二年春，吴汉军与蜀将魏党，公孙永交战于鱼涪津（今四川乐山东北），将蜀军击破，遂进围武阳。公孙述又命将军史兴，率5000人前去救援，吴汉又将史兴军击灭，随之挥军攻拔广都城，斩杀了公孙永和史兴。

此时，公孙述的部将皆惊慌失措，不断有人叛离公孙述，公孙述虽然将叛降者的家族诛灭，但仍无法扭转众叛亲离的危亡局面。刘秀这时乘机再次下诏，劝告公孙述降服，但公孙述仍拒不投降。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七月，威虏将军冯骏攻下了江州，生擒了田戎，继续向成都进军。刘秀鉴此，下诏告诫吴汉说，“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然而吴汉却企图速胜，违背刘秀的作战指示，自率兵马2万多人进逼成都，在距成都10余里的江北扎营，架设浮桥，准备进攻成都城。与此同时，吴汉命副将武威将军刘尚，率万余人屯驻于江南，两军相距20多里。

刘秀得知吴汉军做这样的部署，焦急万分，立即使人责备吴汉说：“既不应轻敌冒进，又不应与刘尚两处扎营，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两地将无法救援，如蜀军以部分兵力缠住你部，以重兵攻击刘尚军，刘尚军必破，刘尚军破，你部必败。当前，幸亏没有出现这种局面，你必须立即引军返回广都。”刘秀诏书未到，公孙述果然便命其大司徒谢丰，执

金吾袁吉率10多万大军，分为20多营，向吴汉军猛攻。同时命别将率1万多人攻击刘尚军，使其不能援救吴汉部。

蜀汉两军大战一日，吴汉兵少势孤，败下阵来，退入营垒坚守。谢丰等重兵包围了吴汉军，吴汉为摆脱被敌围歼的危险境地，于是便决定突围，以与刘尚军合兵一处。为此，吴汉召集众将领激励大家说：“我与诸君共历艰难险阻，转战千里，节节获胜。现已深入敌人腹地，兵至其都城城下，如今与刘尚军被敌人分割包围于两地，若不能合兵一处，后果将难以设想。我现在想暗暗潜出敌人包围圈，全军渡过江去，与刘尚合兵，全力抗击敌人，以摆脱我们的危险境地。大家如能同心协力，人自为战，大功即可告成。如若不然，我们必败无疑，成败与否，在此一举。”各将领一致拥护吴汉的决定。汉军遂闭营3天，休养士卒，并多树旗帜，通夜使烟火不绝。3日后的一天夜晚，留下一部尽力守卫营垒，吴汉亲率大部兵马，衔枚渡江，顺利实现了与刘尚会合的计划。谢丰军没有发觉吴汉军的行动，天明，便以部分兵力继续围吴汉军营垒，自率主力进攻刘尚军营。吴汉刘尚军皆出与谢丰军大战，白天明战至午后，汉军大破谢丰军，斩杀了谢丰，袁吉，歼灭谢丰军5000多人。吴汉遂率军退还广都，留刘尚军抗击蜀军。

吴汉率军进入广都，危急局面已经解除，刘秀得知，再次下诏吴汉说：“公还广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若先攻尚，公从广都五十里悉步骑赴之，适当值其危困，破之必矣。”其后，吴汉军与公孙述军反复交战于广都和成都之间地区，8次大战，8次均取得了胜利，蜀军兵势渐弱，公孙述遂退守成都城，吴汉军进逼城下，公孙述被困于城中。

辅威将军臧宫于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秋，在克绵竹，破涪城（今四川绵阳），继而攻拔了繁（今四川彭县境）、郫（今四川郫县）等地，迅速推进至成都，与吴汉军会师城下。

公孙述被久困焦急，便与延岑商议对策。延岑说：“男儿当死中求生，可坐穷乎！财物易聚耳，不宜有爱。”公孙述于是拿出大批钱财招募敢死之士5000多人，交给延岑指挥，准备与汉军决一死战。延岑为欺骗吴汉军，在市桥一带，多树旗帜，击鼓挑战，伪装成大军于此处出击的态势。然后，以奇兵绕至吴汉军的背后，一举袭破汉军。吴汉落入江中，牵住马尾才得以游至岸边。汉军此时还剩7天的军粮，吴汉命部队暗中紧急准备船只，欲很快退走。汉蜀郡太守张堪听说这一情况，急驰往吴汉军营，向吴汉陈述公孙述必败，不宜退师，应示之以弱，引公孙述出战，以斩杀公孙述。吴汉采纳了张堪的建议。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十一月，臧宫率军攻成都的咸阳门，公孙述命延岑率军与臧宫战，延岑军三战三胜。公孙述亲自率数万大军与吴汉军交手，自天明战至日中，公孙述军无法进食，士卒疲惫。此时，吴汉命护军高午、唐邯率锐卒猛烈向蜀军冲击，公孙述军大乱，高午乘势冲入蜀军阵内，将公孙述刺于马下，公孙述被其部下抬入城内后，将后

事托付延岑，当夜即死去。第二天，延岑便投降了吴汉军，汉军平定公孙述的成都会战，即告结束。

五、汉军成都会战后的措施

延岑投降后，吴汉遂率军占据了成都。吴汉杀公孙述妻子，尽灭公孙氏，并族延岑，纵兵大掠成都城，放火烧毁了公孙述的宫室。刘秀对吴汉这一行为严加斥责，并以古人秦西巴放麑。中山国君烹食乐羊之子的例子，教育吴汉不应做丧失人心的事情。蜀郡太守张堪入主成都后，推行仁政，秋毫无私，慰抚吏民，才获得了蜀人的拥护。

汉军平定公孙述之成都会战评述

汉军平定公孙述的成都会战，是刘秀统一中国西南地区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作战。在这次作战中，汉军约出动20万大军，公孙述也倾其20万之众，以水陆两军在南北两个战场展开了决战。割据蜀地的公孙述集团的彻底覆灭，宣告了汉光武帝刘秀统一中国西南地区伟大历史使命的胜利完成。

汉军成都会战的胜利，除了刘秀进行的统一战争的正义性这一决定因素之外，在其作战指挥上确有许多胜于公孙述之处。

1.汉军坚定地贯彻了先夺陇，后击蜀的战略方针

汉军在贯彻这一方针中，先集中共主力战将和兵力于陇西地区，置公孙述于不顾。而公孙述与隗嚣集团又恰是战略上的低能之辈，在刘秀大军集中攻击隗嚣集团之时，隗嚣与公孙述竟不知唇亡则齿寒之道，双方不思同心协力，联合抗汉。待隗嚣集团行将覆没之前，公孙述才派出5000援兵，这点区区之力虽也起了暂时逼退汉军的作用，但隗嚣仍无力追歼汉军，致使汉军随即再次发动了落门战役，一举灭亡了，隗嚣军，使汉军打开了入蜀作战的通道，获得了可贵的战略基地。设若公孙述当时能倾其全力，与隗嚣合军作战，那么隗嚣、公孙述的失败，则肯定会延缓相当的时日。

2.水陆两军并进，南北两个方向钳击蜀军，形成了切合当时战场情况的最佳作战部署

汉军采取的这种部署使公孙述集团始终处于被迫两面作战，顾此失彼的困境之中，而刘秀军却欲进则进，欲停则停，牢牢握有行动的自由权。巴蜀地区纵横密布的山川河网，不但未能成为阻遏汉军进击的天然障碍，反而变做了掩护汉军机动的有利因素。汉军正是依靠天然的江河条件，使自己的水军走江率河，绕山过谷，机动自如，常常置蜀军苦心经营的防线于无用武之地，处处显示了水军的神威。

3.刘秀指挥决策的正确无误

汉军成都战役的胜利，既得利于刘秀当初保留水军，和以岑彭为南征的最高统帅的决定；又得利于会战进程中的正确指导。当吴汉只有两三万军队即轻敌冒进，进击成都公孙述10万大军之前，刘秀即明确诏告吴汉，切不可轻敌冒进，应屯兵广都，待消耗掉公孙述的基本力量后，再依情况的发展变化，逐渐逼攻成都，当刘秀得知吴汉与武威将军刘尚隔江分别扎营时，又紧急下诏吴汉立即改变这种错误部署，退还广都，并与刘尚军成互为支援之势，岑彭率军入蜀之后，刘秀及时派出增援力量和为其补充军食物资，且又巧妙地为臧宫军所利用等等。这些，几乎都对汉军起了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

4.汉军岑彭等将领战场指挥的灵活机智

汉军统帅岑彭等，不失为东汉初期最优秀的将领。事实证明，刘秀以岑彭为统帅，是当时统帅汉军打败公孙述的最合适的人选。岑彭熟知兵法之道，率领主力绕过坚城江州，正是“城有所不攻”的法则；岑彭逆今嘉陵江而上，吸引了公孙述10多万大军布阵于成都以西，做面向东方之防御态势，然后置该军于不顾，而秘密折返江州，再逆江而西，进入都江，以风疾电掣之势，突然绕至蜀军背后，兵锋直逼成都，也是兵法“军有所不击”之理，吴汉的布设疑兵，衔枚偷渡的成功等等，都说明了汉军这些杰出将帅的作战指挥，均胜敌一筹，蜀军的败；比似早已在注定之中。

第十章 东汉时期对兄弟民族战争总论

第一节 东汉时期各兄弟民族的发展概况

自秦、西汉以来，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不断巩固，加快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从而使各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均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各兄弟民族对推动中国历史进程，也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诸兄弟民族

夫余、挹娄，高句丽这些部族进入东汉时期，有的已经进入奴隶制社会时期，有的则仍生活在原始社会的末期。

夫余和高句丽，居住于今黑龙江，鸭绿江流域一带，这两个部族的发展速度大体雷同。他们早于西汉时期即建立了国家机器，有了政权组织、军队、牢狱等典型奴隶社会才开始出现的社会组织。但这两个国家进入东汉时期后，虽然有的还保留着部落组织的某些形式，其国家和政权的组织结构似乎尚处于比较松散的初期阶段，而他们的社会生产水平却比西汉时期有了进一步提高。他们都以勤劳勇敢著称，百姓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对开发今黑龙江和鸭绿江流域之间的松辽大平原做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夫余人有非常严酷的刑法，据近代考古发现，两国都盛行残酷的奴隶殉葬制度，战争均以掠夺为其基本目的，战争时俘获的对方人员，即做为任意杀戮和役使的奴隶。

挹娄人居住于今黑龙扛流域的下游和库页岛（今苏联萨哈林岛）地区。他们在东汉时期仍生活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是夫余的臣属部族。

乌桓原系东胡部族的一支，西汉以前长期处于原始社会，在汉武帝时期，乌桓才归服于汉朝，迁移于上谷、右北平、渔阳等郡之塞外地区，当时即设立了护乌桓校尉，负责监护统领乌桓各部落。乌桓由于内附和迁移的结果，得以与汉族杂居，直接接受了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加快了社会发展的进程。进入东汉时期以后，即逐渐踏上了封建社会的阶梯。

鲜卑原系东胡部落的一支，虽然其生活习俗、语言基本与乌桓相同，但由于其接受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较晚，故其社会发展较乌桓缓慢。其在东汉和帝永元中期，趁北匈奴西迁之机，进占了原匈奴居住地区，势力逐渐发展。汉桓帝时期，鲜卑大人檀石槐，在高柳北300里之弹汗山建立王庭，兵强马壮，拥有精骑10余万，进入其发展的极盛时代，东西部鲜卑大人皆率部归顺。其统治地区北至丁零（今贝加尔湖地区），东至夫余，西达乌孙，南至东汉边塞，东西1.2～1.3万里，南北7000多里。

匈奴自西汉元帝时西域都护甘延寿，陈汤消灭了北单于郅支集团后，匈奴部族遂统一于西汉王朝之下。当时的呼韩邪单于诚心臣服于汉，结束了匈汉之间百年大战的历史。呼韩邪单于死后，先后又经历了六位单于当政，当六传至舆时，适逢东汉初期彭宠反叛于渔阳，单于与彭宠连兵，共同对抗刘秀军。后来，单于又拥立割据势力卢芳为帝，入居汉之五原一带；刘秀建国初期，因忙于平定各地的割据势力，无力统一匈奴占据的北方地区，仍采取遣使赠送匈奴金帛食物，与匈奴妥协的政策。但舆单于自比往昔的冒顿单于，对汉使者傲慢无礼，并与卢芳共同出兵抢掠北方诸郡。建武九年（公元33年），刘秀大司马吴汉率军进击匈奴，未获任何战果，由此，匈奴便日益加紧向汉边境进袭。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单于舆死去，由其子乌达侯立为单于，不久，也死去。后又由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这时，匈奴地区连年遭受旱灾和蝗灾，“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⑧匈奴国力锐减，吏民苦不堪言，单于畏惧汉朝乘机进袭，于是遣使至渔阳向汉请求和亲。

前南单于呼韩邪之孙比，由于几次均被排斥于继承单于位之外，深为不满，秘密派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去西河太守处请求内附汉朝。此事，为单子所知，比惊恐，随即于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率其所统领的南部地区八部部落近万人，占据匈奴南部地区，以与匈奴单于对抗。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春，八部大人共同拥立比为单于，因其祖父呼韩邪单于曾臣服汉朝，使匈奴部族获得了稳定发展的良好环境。于是，以比承袭其祖父呼韩邪单于的称号，也称做呼韩邪单于，匈奴遂又分裂为南北两部。

呼韩邪单子的依附，加强了东汉王朝北部边疆的兵力，使其有了可靠的屏藩。由比，汉王朝恢复了原先已经撤销的边境郡县，内迁的吏民又重新返回故地。南匈奴的许多部落由于与汉族杂居，既对中国北部地区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加快了匈奴部族自身的发展进程，这些部落通过长期学习汉族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逐渐改变了其世世代代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使其社会经济向游牧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建武二十七至二十八年（公元51至52年）北单于两次派使向汉请求和亲。

呼韩邪单于比立9年而死，比弟左贤王莫继立为单于，称丘浮尤单于，立1年又死，其弟汗继立，立2年又死去，比单于之子适继立，4年后又死去，单于莫之子苏继立，数月后也死去，单于适之弟长于永平六年（公元63年）继立，称胡邪尸逐侯单于。元和二年（公元85年），北匈奴国力大衰，部众纷纷叛离，南匈奴攻其前，丁零侵其后，鲜卑袭其左，西域击其右，北匈奴无法抵挡，于是率部众远走。

单于长立23年死去，单于汗之子宣继立，称伊屠于闾单于。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鲜卑人入左地攻击北匈奴，大破匈奴军，斩优留单于，北匈奴大乱，北匈奴居兰，储卑、胡都须等58部，共20万之众，向南匈奴投降。

单于宜立3年而死，单于长之弟屯屠何继立，6年后死去；单于宣弟安国继立1年后，又死去，单于适之子师子继立，4年后死去，单于长之子檀继立，称万氏尸遂单于。单于檀于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受汉人韩琮挑唆而叛汉，后复降服于汉。单于檀立27年后死去，由其弟拔继立，单于拔立4年后死去，其弟休利继立，在位13年。由于内部叛乱，寇掠汉边境，单于受到汉天子的责备，自感无力统治臣下，而自杀身亡，兜楼储单于继立后5年身亡，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居车儿继立，称伊陵尸遂就单于，居车儿单子在位25年，其子某继立，在位6年。以后，又先后由呼徽单子、羌渠单于、於扶罗单于、呼厨泉单于当政。这期间尽管匈奴有些部落头领叛汉，但匈奴单于均未敢公开与汉相抗，基本上都是依附于汉王朝。

二、中国南方和西南方地区的诸兄弟民族

在南中国的广大地区，散居着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部落，这些部落一般地来讲，都较中原地区发展缓慢，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小方面都比较落后。今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地区，分别为不同种族的蛮夷。湖北地区和四川东部的为江夏蛮、沔中蛮、巫蛮，统称为廪君蛮诸部落，也叫巴郡南郡蛮，湖南地区散居的有瓠部族，依地区不同又区分为长沙蛮、澧中蛮、武陵蛮、中蛮、零陵蛮等部族，在陕西的汉中一带和四川北部地区，居住着板蛮部落。这些众多的部族，虽然早巳于秦时即分由郡县管理，但部族内部仍由：君长和部落首领统治。

在今四川西部、云南、贵州地区，居住着西南诸蛮夷。其中最大的部族为哀牢人。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部族5.1万多户，55万多人归附东汉王朝。汉王朝将其设置为哀牢和博南县，划归益州永昌郡统辖。

在今云南西部、四川西南部的一带地区，居住着邛都夷，大羊诸部落，四川西部还居住着都夷诸部落。汉安帝元初三年，大羊等部族3万多户、共约17万人降服于东汉王朝。

南方蛮夷诸部族和西南夷，在东汉时期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有了明显的进步，对于开发中国南方和西南方广大地区，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中国西域地区的兄弟民族

西域地区的36国，在汉武帝时已全部归属西汉，汉设置使者、校尉领护整个西域地区，西汉王朝第一次完成了统一中国西域地区的历史使

命。汉宣帝时设立西域都护府，郑吉为首任西域都护；元帝时又设置戊、己两校尉，屯田于车师前王庭，哀帝和平帝时期，西域分裂为55国。王莽篡位后，眨易侯王，政局混乱，西域诸国怨恨王莽政权，此时，匈奴奴隶主乘机重新控制了西域诸国。西域各国不堪匈奴的严苛盘剥，至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河西的窦融承袭西汉1日制，立莎车王康为西域大都尉，统辖西域55国。后来，诸国纷纷遣使入朝进贡，派遣侍子入京，并请求东汉王朝在西域设立都护。但是，刘秀觉得中原地区尚未稳定，未予应允，将各国的侍子送回。随着匈奴势力的衰退，东汉也暂时无力西顾，西域诸国便出现了混战局面。

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明帝派兵北征匈奴后，设立了宜乐都尉，驻伊吾卢城屯田戍守。不久，班超奉命出使西域。班超自汉明帝永平十六年至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在西域地区与匈奴势力顽强战斗了整整30年，对维护西域地区的统一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其后，班超之子班勇又出使西域，继续为维护西域的统一而战，直至汉顺帝当政时期，西域地区“三通三绝”。在整个东汉时期，西域诸国的情况大体雷同于西汉时代，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所不同的是一些国家之间兼并反兼并战争的不断发生，导致了西域诸国社会长期的动荡不安。

但是，东汉时期的西域各国，由于人心思汉，趋向中国统一的愿望占据着西域诸国的主流，所以尽管不时受到北匈奴的侵袭，仍能不断从各方面推进与中原地区汉族的交流和融合，西域各国对维护古代中国疆域的完整，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四、中国青藏高原地区的诸羌族

居住于中国今青海、西藏地区的羌人诸部族，统称为“西羌”，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西汉末年，羌族人民开始大量迁居塞内，多居于金城（今甘肃兰州等地）、陇西，武都郡。由于羌人与汉族杂居，逐渐向汉族学习了一些先进的文化和农业生产技术。因而，对繁荣陇西一带地区的经济，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其整个部族尚处于氏族部落阶段，其社会的发展相当缓慢。进入东汉时期后，西羌比较大的部族为：先零羌、烧当羌，参狼羌、白马羌等。各较大种落里又分若干较小部落如卑、勒姐、牢姐、吾良、滇零、钟羌、零昌、当阗羌、虔人种羌、陇西种羌、上郡沈士种羌、烧何种羌，巩唐羌、罕种羌、离、狐奴、当煎羌、東中羌、鸟吾种羌等。此外，西藏地区还分布着大羊夷种羌、发羌，唐旄、薄申羌等羌族部落。

东汉王朝在平定了各地的割据势力后，便开始平定西羌未臣服的诸羌部落，并将他们迁徙于三辅地区居住。东汉王朝为了统辖诸羌部落，设置了护羌校尉。

东汉中期以后，政治腐败，对羌族人民进行更为残酷的压榨，因而，激起了羌族人延续近60年的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王朝的反动

统治。

第二节 东汉与兄弟民族战争梗概

东汉政权建立之后，为进一步统一中国，除了平定各地的割据势力之外，还对一些兄弟民族进行了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既有为统一中国而战的进步战争，也有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不义之战。

一、东汉征西羌诸部族的战争

东汉对羌人诸部族的战争，从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公元37年）起，断断续续延续至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以后。在此期间，东汉王朝即平定了羌人的叛汉，也镇压了羌族人民的多次起义。

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发生了先零羌的叛乱，汉光武帝刘秀派遣其陇西太守马援等，率军一举平定了叛军。

自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至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期间，汉军与羌族部落之间主要交战达10多次，先后击败了参狼羌，烧当羌、勒姐、吾良、封养、迷吾、迷唐等羌族部落的反汉军。

自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至汉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年）的11年之间，东汉王朝镇压了羌族人民的第一次大规模起义。

自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至汉冲帝永嘉元年（公元145年），东汉王朝又镇压了羌族人民的第二次大规模起义。

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至汉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东汉军将西羌各部族的第三次大规模起义镇压下去，至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以后，东羌各部族的起义也被汉军剿灭。

二、东汉征南蛮和西南夷的战争

东汉征南蛮和西南夷诸部族的战争，起自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止于东汉灵帝当政期间。在将近140多年的期间里，东汉王朝多次调兵遣将，既平定了南蛮和西南美一些部族的叛乱，也镇压了一些部族的反汉起义。

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东汉王朝命马援为帐波将军，率领水路两军，平定了交趾地区“二征”的叛乱。汉军通过两年的作战，将叛军歼灭，维护了交趾地区的统一。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至建武：二十九年（公元53年）期间，汉王朝两次出动大军，击败了五陵地区五溪蛮的反汉武装。

在汉光武帝刘秀当朝期间，东汉军平定了南郡、巴郡诸蛮夷的叛乱

及西南夷的反叛。至汉章帝、和帝、顺帝、桓帝，灵帝当朝期间，汉王朝又先后出兵，平定和镇压南蛮诸部族的反汉起义。但有些起义一直未被平定，延续至黄巾大起义时，与黄巾起义合流。

汉和帝、顺帝、桓帝、灵帝期间，汉王朝以军事镇压和利诱的两手策略，平定了蛮夷部族的起义武装。

三、东汉征匈奴的战争

东汉时期对匈奴的作战活动，明显地区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对北匈奴的作战，开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止于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在此期间共经历了两次主要战役：第一次战役，发生于汉明帝永平十六年二月，止于同年四月，东汉王朝出动4.5万大军，向北匈奴进击，其中只有奉车都尉窦固所率的一路军队取得了较大的战果；第二次战役发生于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东汉军队的窦宪所率领的汉与南匈奴联军，经三个阶段的作战，彻底打败了北匈奴，北匈奴降服于汉。

二、个时期为对南匈奴的作战，开始于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止于汉顺帝永和六年（公元141年）。在此期间，共经历了三次主要战役；第一次战役、发生刁：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东汉王朝以邓鸿为车骑将军，统率汉、乌桓、鲜卑等部族军共4万多人，满夷谷地区将南匈奴叛军击败；第二次战役，发生于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东汉王朝以大司农何熙行车骑将军，统率缘边十郡兵马及鲜卑骑兵共3万人，将南匈奴单于槐击败，单于槐降于汉朝，第三次战役，发生于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夏，东汉王朝在第一阶段的作战中，以度辽将军马续，统率缘边郡兵与乌桓、鲜卑、羌胡等部族军共3万多人，进击南匈奴叛军，将叛军首领车纽击降。第二阶段作战中，东汉军于通天山地区将叛军彻底击败，羌胡、乌桓等70多万人降于汉。

四、东汉统一西域地区之作战

西域地区，自西汉时代即被统一于中央王朝之下。但在王莽当政后，西域又渐被匈奴势力所侵占。东汉重新统一西域的战争开始于汉明帝，历经汉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等当政时期的多年作战，终于击败了北匈奴在西域的势力，重新统一了西域地区。东汉王朝统一西域地区经历的主要作战活动有：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率36吏士威降鄯善、智降于阗的斗争，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班超击降疏勒、尉头之战；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班超统率诸国之军2.5万人，击败龟兹之战，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班超平定月氏焉耆之战；以及汉安帝，顺帝、桓帝时期的各次作战。

五、东汉征乌桓鲜卑高句丽之作战

东汉征乌桓、鲜卑的作战，多发生于东汉王朝统治的中后期。

乌桓部族多分布于今辽东、辽西一带地区，乌桓部族一直依附于汉，为东汉王朝战胜匈奴立下过战功。但乌桓部族中的一部分势力，却不受汉王朝的节制，在其势力强大以后，便叛离汉朝。因而，东汉王朝便发动了征乌桓的战争。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起，历经汉光武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献帝当政期间的六次主要作战行动，终于击败了乌桓。

东汉征鲜卑的作战，开始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经汉和帝、殇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几代帝王当政时期的作战，均未击降鲜卑。在鲜卑大人檀石槐统一了鲜卑部族，并占据了匈奴的原有疆域后，其势力更加强大，汉军屡战屡败，鲜卑军越战越强，东汉王朝始终未能战败鲜卑军。

东汉征高句丽的作战，发生于汉和帝、安帝当政期间，高句丽王宫，两次率军入袭汉边郡，汉王朝发边郡军与其交战，互有胜负。高句丽王宫死后，高句丽遂复臣服于汉。

第十一章 东汉征羌人诸部族的作战

东汉对羌人诸部族的作战，在东汉建立之初也是统一中国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东汉中后期则多系镇压兄弟民族的起义战争，主要的作战活动如下：

东汉马援军平定先零羌叛乱之战发生于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夏，先零羌数万人在反动头领的策动下叛乱，被陇西太守马援率3000骑兵和扬武将军马成之军平定。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马援再次率军平定了参狼羌人的叛乱。

东汉军连续平定诸羌反汉之作战这些战争断续发生千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至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之间。主要作战活动达10次之多，汉军最终取得了胜利，安定了陇西一带地区。

东汉军镇压羌族人民的第一次起义之作战发生千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至汉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止，前后历经12年之久，汉王朝将羌族人民这次大规模起义镇压下去。

东汉军镇压羌族人民的第二次起义之战发生于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夏，至汉冲帝永嘉元年（公元145年）以后，又被汉军扑灭。

乐汉军镇压羌族人民的第三次起义之战发生于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至汉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西羌各部被镇压，再至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以后，东羌各部的起义也被东汉王朝剿灭。

第一节 东汉马援军平定先零羌叛乱之战

一、河西羌人叛乱前后的陇西形势

汉光武帝建武九年（公元33年），隗嚣死后，隗嚣集团不久便彻底覆灭。当时羌人也是隗嚣集团依靠的一支力量，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隗嚣虽拥兵而不能讨之，乃就慰纳，因发其众与汉相距。”

早在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时，西羌诸部落也纷起反对王莽政权，后来虽被隗嚣安抚，但一直没有稳定下来。因而，当刘秀统一陇西地区之后，羌族原在西汉末年的起义力量，便转化为一支障碍西南地区统一的叛乱势力。

先是五谿先零羌族诸种落多次虏掠金城、陇西等郡县，州郡无力征讨。汉命中郎将来歙率虎牙大将军盖延，将军刘尚及太中大夫马援等，进击先零羌于金城地区，大破先零羌，斩杀数千人，获牛羊，谷物若干。汉平定陇西诸羌后，来歙等鉴于陇西一带灾害严重，遂将仓库之全部粟谷账济灾民，陇右出现了暂时安定的局面。陇西地区，地广人稀，羌族叛乱的形势难以彻底平定，更无一劳永逸之策，故来歙上书刘秀说：“陇西侵残，非马援莫能定。”刘秀接纳来歙建议，遂于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夏，拜马援为陇西太守。

二、先零羌叛乱的再起

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夏，马援接任陇西太守后不久，先零羌部族首领又裹胁诸羌数万人发动叛乱，大军寇略临洮郡（郡治在今甘肃岷县），临洮郡军弱小，不能御敌。

三、东汉军平定先零羌叛乱的经过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夏，汉陇西太守马援，得知先零羌等部落叛乱后，即率3000骑兵前往临洮进击，一举击破羌军，斩杀数百人，守塞诸羌8000人投降于马援军。

在浩亹（今甘肃永登西南50公里）有羌众数万人，凭籍河川谷口的有利地势抗击马援军，使马援无法从正面进攻。于是，马援与扬武将军马成之军，从便道迂回羌军的后方基地允吾谷。羌军的老弱妻儿和给养均集中于此地，羌人得知后方被袭，立即放弃浩将其后方移向唐翼谷中。马援军又追赶而至，羌军以精兵占据北山，马援军以一部兵力从正面摆开进攻的态势，然后以数百骑兵暗暗绕至羌军背后，乘夜暗放火，击鼓呐喊，虚张声势，羌军不知虚实，遂大惊而逃，马援军乘虚追杀，斩羌军1000多人。马援因自己兵力有限，不便穷追，收军而还。

四、平定武都参狼羌的叛乱

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河西地区的武都郡（郡治在今甘肃西和西南）之参狼羌首领，联合起塞外诸羌再次进行叛乱，杀长吏。马援闻讯，遂率4000骑兵急往征讨。马援率军行至氐道县（今甘肃武山东南）时，与参狼羌军相遇，羌军占领山头有利地形。马援见此情景，便占据了水草丰茂的洼地，断绝羌军的人马饮水，参狼羌饥渴难忍，处于绝望境地。于是其豪帅带领数10万多人逃出塞外，有1万多人降于马援军，陇右遂趋于安定。

第二节 东汉军连续平定诸羌反汉之作战

一、诸羌不断反汉的基本概况

自汉光武刘秀建武十一年和十三年（公元37年），汉马援军平定了先零羌与参狼羌部族的叛汉之战后，羌族地区基本趋于平静，约近十年的时间，汉羌各族人民之间未经战乱之苦，无论羌汉杂居地区或羌族聚居区的社会经济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是，自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至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的43年间，由于汉统治势力的逐渐衰落，一些地方官吏的盘剥无度，弓I起羌人部落的不满，因而，便不断起而反抗，掠略郡县，杀伤吏民，汉王朝于是连续发兵征讨。

二、平定参狼羌之战

汉光武帝中元元年（公元56年），居住武都郡地区的参狼羌起兵反汉，杀掠吏民，武都太守发郡兵与之交战，被参狼羌军战败。接着陡西太守刘盱派遣从事辛都、监军李苞，率兵5000驰援武都郡，一举将参狼羌首领斩首，歼灭羌军1000余人。与此同时，武都郡兵也将羌军击败，斩首千余人，其余羌军皆降服。

三、窦固平定烧当羌军之战

烧当羌原系一个弱小的羌族部落，当传至滇良父子为部落首领时，击败了先零、卑浦等部落，斩杀先零等部众3000多人，夺取了其财畜，势力开始强大起来。滇良子滇吾依靠他强大的力量，成为诸羌之雄主。各羌族部落欲袭掠汉边郡时，滇吾均帮其策划作战方略，并充当其渠帅。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七月，烧当羌首领滇吾与其弟滇岸率领步骑兵5000人，进攻陇西塞，进占了罕（今甘肃东乡自治县西南）。陇西太守刘盱率兵前往征讨，未能攻克该城。汉军旋即北上，攻打允街（今甘肃永登南），结果被羌军击败，汉军被斩500余人。羌军的战胜大大鼓舞了诸羌部落的斗志，于是守塞诸羌纷纷起兵反汉。汉王朝为之震动，刘秀遂派遣谒者张鸿率诸郡兵前去围剿，与羌军交战于允吾、唐谷（均在今甘肃兰州西），汉军又被羌军击败，统帅张鸿及陇西长史田飒均战死。天水郡兵也于白石县（今甘肃临夏西南）被牢姐种羌击败，汉军死亡1000多人。

东汉军两次战败，更加引起汉王朝的震惊。此时，汉明帝即位不满一年，汉明帝决心讨平羌人的叛乱，于是，便于当年的十一月，以中郎将窦固为监军，拜马武为捕虏将军，中郎将王丰为副将，右辅都尉陈等

率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和凉州诸郡（包括北地、安定、武威、张掖、酒泉、金城、汉阳、陇西、武都郡）羌胡兵及驰刑，共4万人，向烧当羌进击。汉军至金城郡的浩亹（今甘肃永登西南），与羌军展开激战，斩杀羌军600多人。再战于洛都谷（今青海乐都北），汉军战败，羌军斩杀汉军1000多人后，引军退向塞外。窦固，马武等率军追击，进至东、西邯（今青海化隆南）地区，再与羌军战，始将羌军击破，斩杀4000多人，俘获1600余人，其余均投降汉军。

此次战后，为防止羌军再次袭击汉边郡，汉王朝将羌部落7000人迁移至三辅地区与汉族杂居，并以窦林为护羌校尉，驻守于狄道。

四、平定勒姐、吾良、封养诸羌反汉之战

汉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卑羌人妻被安夷县吏抢走，该县吏为卑涌人所杀，安夷长宗延追赶杀人者出塞，宗延被卑羌人杀死。卑油羌怕被诛杀，遂与勒姐、吾良两羌部落联合反汉。陇西太守孙纯遣从事李睦及金城兵与卑涌等羌众交战，斩羌众数百人。

烧当羌首领迷吾遂与诸羌部落联合，欲叛汉出塞，金城太守郝崇率军追击，与诸羌军战于荔谷，郝崇军大败，死2000多人，郝崇仅率轻骑而逃。于是，诸羌部落及卢水胡均相继起兵反汉。当时的护羌校尉原度辽将军吴棠无法制服诸羌，被免除职务，汉章帝以武威太守傅育代为护羌校尉，屯驻于临羌（今青海湟源南）。

这时，烧当羌首领迷吾又与封养羌首领布桥等率众5万多人，进击陇西，汉阳等县，羌人进军声势浩大，汉章帝乃急派行车骑将军马防，长水校尉耿恭为副将，率北军五校兵及诸郡射士3万多人迎击羌军。

马防率军进至翼（今甘肃甘谷），正值诸羌首领布桥率众围攻临洮（今甘肃岷县）。临洮是汉陇西南部都尉所在地，南部都尉之临洮守军正固守待援。此时，马防欲率军直进，但临洮路险，崎岖难行。于是，马防命两司马率数百骑兵先行，分为前后两军，进至距临洮10余里处扎营，多树旗帜，并扬言大军即刻进攻。羌军斥侯探知这一消息后，急忙返回临洮城下告知布桥说：“汉兵盛不可当。”羌众有些惊慌。果然，第二天黎明，汉军即鼓噪而来，羌军惊乱退走，汉军猛烈追杀，斩敌4000多人，顺利解了临洮之围。马防恩威并施，烧当、迷吾、索西等诸羌部落均降服。

布桥之羌军战败后。布桥率领其余2万人马退守望曲谷（今甘肃岷县西南），十二月，羌军打败耿恭司马及陇西长史军，汉军被杀数百人。

汉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春，马防率军继续围歼布桥羌军，为夺取最后胜利，马防军三路围攻望曲谷。马防命司马夏骏率5000人从大路直取望曲谷，暗中命司马马彭率5000人从小路捣敌心腹营地，命将兵

长史李调率4000人绕至羌军西面，断其退路，马防自率本队进击。三路齐攻，大破羌军，斩获1000多人，获牛羊10余万头。

布桥再率羌众退走，夏骏追及羌军，反为羌军击败。马防大军随即驰至，与布桥羌军大战于索西城（今甘肃岷县东北），布桥羌众战败，降服于马防军。马防军在平定了诸羌之主力军后，遂奉诏还军，被拜为车骑将军。

马防还军之前，命耿恭继续平定诸羌的残余势力，耿恭军击杀羌军1000余人，于是勒姐、烧何等13个羌人部落数万人均降服。至此，勒姐、吾良、封养等诸羌之叛汉战争，遂告结束。

五、平定迷吾羌军之战

烧当羌首领迷吾，在汉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3年），被马防军击降后，又慢慢积蓄力量，联合了一些羌人部落，逐渐强盛起来。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秋，迷吾与弟号吾率诸羌部落反叛，号吾先率轻骑进袭陇西郡界，被汉军俘获。号吾恳求释放，陇西太守张纡遂答应其要求，将其放回，诸羌人各归故地。迷吾也退驻归义城（今青海西宁西南约100公里）。

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春，护羌校尉傅育想彻底平定烧当羌，欲采取以挑动羌、胡相争、坐收渔利的策略。但是，却遭羌、胡部落拒绝，迷吾羌众遂与其他羌、胡部落又起兵反汉。护羌校尉傅育为讨平迷吾等部众，上书汉章帝，请调发陇西、张掖，酒泉各5000兵马，由各郡太守亲自统率，傅育自率汉阳、金城两郡兵5000人，共2万兵马，共同约期会攻迷吾羌军。傅育预定，以陇西郡兵占据河南（黄河南岸），张掖、酒泉兵从西面截击，以求全歼。

傅育部署完之后，便率军前进，进入迷吾部众居住地后，各郡之军尚未到达。三月，傅育便单独进兵。迷吾部众得知汉军来攻，遂率军退走，傅育立即选拔精兵3000紧紧追赶，入夜追至建威城三兜谷（今青海西宁南100公里），距迷吾羌军营地数里处安营，等待天明时进攻敌人。傅育军由于麻痹松懈，未加戒备，迷吾羌军埋伏了300人，乘夜暗突袭汉军军营，汉军惊恐逃散，傅育下马与羌军格斗，斩杀10余名敌人后，英勇战死，汉军死者共880多人。待到各郡兵马齐至，迷吾羌军已引军而走。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傅育，北地郡人，汉明帝初，为临羌长，与捕虏将军马武等击滇吾羌军，功冠诸军，后在武威，声威震撼匈奴。为官数十年，一切奉禄尽给友人，妻子坚持操劳家务。”汉章帝特下诏嘉奖他的清廉勇敢的高尚品质，并嘉封其子为明进侯。

傅育战死后，汉王朝以陇西太守张纡代护羌校尉之职，率万余兵马屯驻于临羌（今青海湟源南）。迷吾羌军杀死傅育，战胜汉军，士气大振。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秋七月，迷吾羌军又联合诸羌部落，以步骑兵7000人进袭金城郡，护羌校尉张纡派从事司马防率千余骑兵及

金城郡兵，在木乘谷与羌军交战，迷吾羌军败退，派人向汉军请降。张纡假装应允，暗设伏兵，请诸羌军首领赴宴，待羌首领饮酒中计，伏兵四起，诛杀羌军首领800余人，又派兵击杀了迷吾余部400人，俘获2000人。迷吾子迷唐痛恨张纡的欺诈行为，复与烧何，当煎等诸羌部落联合，率5000兵马，掠略陇西塞。陇西太守寇盱与羌军交战于白石（今甘肃临夏）迷唐军战败，退还大、小榆谷（今青海循化），又联合了一些羌胡部落，势力增强，张纡无法征讨，汉王朝以张掖太守邓训代为护羌校尉。

六、邓训军进击迷唐羌军之战

汉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冬，迷唐羌军进一步强盛，迷唐率1万骑兵至塞下，欲乘机攻汉边郡，但惧于邓训的兵威，未敢动手，便想先攻击小月氏胡。护羌校尉邓训历来对小月氏加以保护，告小月氏不要与迷唐交战，并命令开放城门和城内吏民住宅，让给小月氏妇女孩子居住，派兵严加保护。邓训部下有些人认为，羌胡相争，于我们有利，不可保护小月氏。邓训告诫部将说，过去张纡失信于羌众，羌众才叛汉，现在小月氏面临危险局面，我们保护他们，必能获得他们长期的信任，众人才不再反对邓训的决定。迷唐羌军虏掠不成，即引兵而去。

小月氏得到保护，避免了一场灾难，湟中诸胡皆称颂邓训的功德，胡羌人说："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开门内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邓训于是进一步招抚赏赐诸羌胡部落，羌人纷纷降顺。迷唐叔父号吾也率其部落800户降服，这就大大削弱了迷唐军的力量。邓训随即调发湟中秦胡、羌军4000人出塞。在写谷（今青海湟源境）一带地区击败了迷唐羌军，迷唐军退返大，小榆谷（今青海循化），再西迁颇严谷。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春，迷唐羌欲回归故地大，小榆谷，邓训调发湟中军6000人，命长史任尚统率，以皮筏渡过黄河，向迷唐军进击，将迷唐军击溃，斩迷唐军1800人，俘获2000人。迷唐率其残余部众向西迁移1000余里，一些原来归附迷唐羌的小部落，纷纷脱离其部落的控制，投向邓训。邓训声威远扬，罢去调发各郡之屯兵，湟中一带暂趋安定。

七、东汉军再击迷唐之战

护羌校尉邓训于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病逝后，汉王朝以蜀郡太守聂尚为护羌校尉。聂尚因见前人屡征迷唐等羌军，仍难彻底降服，遂改变策略，以恩信招抚迷唐羌众，命人告迷唐回归大、小榆谷居住。迷唐返回后不久，又杀使者，联络诸羌部落，袭掠金城塞。

汉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聂尚被免除护羌校尉，汉王朝以居延都尉贯友为护羌校尉。贯友认为迷唐羌众难以用恩德招抚。于是，便派人设法离间迷唐诸部落的联盟，达成目的之后，贯友便派兵出塞，向大、小榆谷地区的迷唐羌军进攻，将迷唐羌军击败，斩杀和俘获羌军

800人，迷唐率部众远迁至赐支河曲地区。

汉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十二月，贯友死后，汉王朝任命汉阳太守史充为护羌校尉。史充到任后，即刻发湟中羌、胡兵出塞进击迷唐羌众，结果，被迷唐羌军打败，汉军损失数百人，史充被撤职。代郡太守吴祉继任护羌校尉。

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秋，迷唐率8000羌军袭掠陇西，杀数百人，乘胜继续进袭，胁迫塞内诸羌部落与之联合起兵，众羌部落合兵一处，共拥有步骑3万人。旋即击败陇西兵，杀大夏县长，朝廷引起震惊，遂派行征西将军刘尚为主将，越骑校尉赵世为副将，率领北军五营，雍营、黎阳营，三辅积射及边郡羌胡兵共3万人，进击迷唐诸羌军。刘尚率军屯于狄道（今甘肃临洮西南），赵世军屯于袍罕（今甘肃临夏）。刘尚派遣司马寇盱监诸郡兵，从四面包围迷唐羌众，迷唐惊恐，丢弃老弱逃向临洮南山中。刘尚等率军追至高山之下，迷唐军已无退路，遂以其精锐骑兵与汉军大战，汉军击败迷唐军，斩羌军1000多人，迷唐引军夺路而走，汉军死伤亦很多，刘尚军未敢再追，率军而入塞。刘尚，赵世以畏敌罪下狱。

汉和帝永元十年（公元98年）冬，汉王朝命谒者王信领刘尚军，屯于袍罕，以谒者耿谭领赵世军，屯于白石。耿谭以策略购赏诸羌，诸羌部落多来降顺，迷唐也慌恐，向汉请降。王信、耿谭接受迷唐率部众来降后，罢兵。

八、周鲔率军击降迷唐羌军之战

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迷唐军在其首领迷唐率领下降汉后，汉王朝令其还居大，小榆谷故地，引起迷唐的猜疑，遂于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冬再度反叛，并胁迫湟中诸胡虏掠而去。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秋，迷唐羌众回归赐支河曲，不久率兵袭塞，护羌校尉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及诸郡兵，属国湟中月氏诸胡部落，陇西牢羌共3万兵马，出塞至允川（约在赐支河曲附近）地区，与迷唐军大战。侯霸军将迷唐羌击败，斩首级400多，烧当羌也瓦解，6000人投降汉朝，分别迁居于汉阳、安定、陇西诸都。迷唐势力锐弱，迷唐率其部众不满1000人，远迁赐支河曲，投靠发羌。后来迷唐病死，迷唐之子降汉，其种落只剩数十户。

第三节 东汉军镇压羌族人民的第一次起义之战

一、羌族人民第一次起义的爆发

东汉后期，政治日趋腐败，统治集团对各族人民都极尽盘剥压榨之能事，羌族人民所受的压迫更为深重。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述，迁居于内地的羌人“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羌族人民忍无可忍，终于奋起反抗。羌族人民的第一次起义从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起，至汉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止，前后历经12年之久，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王朝后期的反动统治。

二、东汉军镇压羌族第一次起义作战连遭挫败

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夏，东汉王朝命骑都尉王弘征发金城、陇西、汉阳等郡羌人，去西域保护西域都护及吏卒内撤，羌人不愿意远征，途中纷纷逃散。各郡县便出动吏卒堵截捕捉，有的乘机抢掠和焚烧羌人房屋，迫使各地羌人流离失所。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起而反抗。居于安定地区的麻奴兄弟也率羌众出塞起义，先零羌、钟羌等部落均相率而起。羌族人民由于归附已久，没有兵甲，“或持竹竿木枝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郡县畏懦不能制。”整个陇右地区燃遍了羌人起义的烽火。

东汉王朝对羌族人民迅猛的起义十分震恐，遂以车骑将军邓骘为统帅，以征西校尉任尚为副将，率五营及三河，三辅、汝南，南阳、颖州、太原、上党共5万兵马，屯于汉阳郡（今甘肃天水地区西）。

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春，正月，车骑将军邓骘进至翼（今甘肃甘谷南），诸郡兵马尚未赶到，羌族起义军遂乘汉军力量薄弱之际，立即以数千人进击邓军，一举将邓军击败，杀死汉军1000多人。

此时，正值梁慬率军自西域回师，行至敦煌时，奉诏为邓骘军之后援。梁率军至张掖，与羌军大战，击杀羌军近万人，300多个羌军首领降于梁慬军。

当年冬，邓骘命副将任尚及从事中郎司马钧，率诸郡兵，与滇零等羌军数万人交战于平襄（今甘肃通渭西），结果，汉军战败，被杀8000多人。

羌族起义军战胜汉军后，声势更加壮大。先零羌首领滇零施即于北地自立为天子，进一步联合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等郡县之羌族部落，力量进一步增强。《后汉书·西羌传》记述当时的情形说：“众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钞三辅，断陇道。”东汉军战败，朝中无计可施。遂诏回邓骘，拜为大将军，留任尚率军屯于汉阳，以节制诸军。

梁慬本已受命屯兵金城，但听说羌军进击三辅地区时，便立即率军前往袭击羌军，转战于武功（今陕西武功）、美阳（今武功西）间，数战数胜，羌族起义军遂退走。

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春，正月，汉王朝派骑都尉任仁督诸郡屯兵支援三辅的汉军作战，任仁几战几败。羌族起义军越战越勇，当煎、勒姐部众攻占了破羌县（今青海乐都东），钟羌部众攻夺了临洮县（今甘肃岷县），俘获汉陇西郡南部都尉。后来，朝廷以任仁屡败，而下狱死。

汉王朝鉴于大军久战无功，农田俱废，于是，诏任尚将吏卒还屯长安，将南阳、颍川、汝南等郡兵均遣返回郡。在京兆地区设虎牙都尉于长安，在扶风设扶风都尉于雍地。

这时，羌族起义军攻打褒中，太守郑勤欲率兵出击。主簿段崇劝阻说，羌人现在兵威正盛，出击难以取胜，应坚守待敌。郑勤不听，领兵出战，汉军大败，士卒死3000多人。太守郑勤等均战死。

羌人起义势力发展很快，迅速进至河东、河内地区，逼近京都洛阳，东汉王朝急调北军中侯朱宠率五营吏卒屯于孟津，以防羌军南下，同时急令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等郡县，赶修坞侯600多所。

羌族人民的起义如火如荼，东汉王朝虽多次调兵遣将，均无法平定起义羌军。于是，朝中以大将军邓骘为首的一群权贵力主放弃凉州，另一群官吏则主张坚持凉州。当时太尉张禹的郎中虞诩，则认为放弃凉州是错误的决策。虞诩对张禹说有三方面的理由不应放弃凉州：其一凉州是先帝开拓的疆域，不应舍弃，其二放弃凉州后，三辅地区便成了边塞，汉代的陵园便暴露于外，其三历来“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自凉州，凉州吏民多勇敢善战，冲锋陷阵，父死寸：前，子战于后。羌胡之所以不敢占据三辅，是由于凉州在后，若舍弃凉州，恐失凉州民心，则函谷以西将不再为汉所有。虞诩的见解，颇有打动统治集团人心之处。于是，汉王朝遂坚定了不放弃凉州的决心。但是，凉州地区的地方官吏，深深惧怕羌人的起义力量，为了保全自身的性命，则不断上书要求内迁，早无坚守作战之心。朝廷无奈，将陇西郡治迁至襄武（仍属陇西郡），安定郡徙于美阳（属于右扶风），北地郡迁于池阳（属于左冯翊），上郡迁于衙（属左冯翊），这样凉州的大部地区，便为羌族起义军所占领。

当时，各地吏民眷恋故土，不愿迁移，官吏强行毁其庄稼和房舍，逼迫迁移，同时又恰遇连年旱蝗灾害，人民“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太半。”

这样，汉阳郡地区的汉族人民，于永初五年（公元111年）九月，在杜琦、杜季贡兄弟与王信的率领下，也发动了起义，杜琦自称汉安将军，攻占了上城（今甘肃天水），他们和羌族人民起义连为一体，起义

力量更为壮大。汉王朝为对付起义力量，便下诏以重赏购买杜琦的首级，汉阳太守赵博暗派刺客杜习，刺杀了杜琦，汉封杜习为讨好侯，赐钱百万。永初六年（公元112年）六月，汉王朝命侍御史唐喜率领诸郡兵战败了杜季贡军，斩王信以下600人，并抄掠了起义军的家属。杜季贡投向滇零部，当年滇零死去，由其子零昌代立。零昌年幼，由羌首领狼莫辅佐，拜季贡为将军，屯兵丁奚城（今宁夏灵武南）。

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夏，骑都尉马贤、侯霸进击零昌别部牢羌于安定，斩羌军1000人，汉安帝元初元年（公元114年）春，羌族起义军零昌、号多、当煎，勒姐等羌人首领分兵攻取雍城，武都，汉中。巴郡板蛮出兵协助汉军与汉中五官椽程信所率郡兵，将号多部众击退，护羌校尉侯霸、马贤再于袍甘肃临洮），汉军大败，被杀800多人。皮扬战败，被朝廷治罪。

汉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春，护羌校尉庞参，以恩信招诱诸羌起义军，号多等率领部众7000多人降于庞参。

零昌派军进取益州，汉王朝遣中郎将尹就，率领南阳郡兵和益州诸郡兵，迎击零昌军吕叔都部。元初二年秋，蜀人陈省、罗横刺杀了吕叔都。接着汉王朝以左冯翊司马均行征西将军，统率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风都尉皇甫旗等领兵8000余人，护羌校尉庞参统率羌胡兵7000多人，分两路进击零昌军。庞参率军进至勇士（今甘肃榆中东北）东，被杜季贡军击败，因而引退。司马钧等率军独进，攻克了丁奚城（今宁夏灵武南），杜季贡率军伪装逃走，司马钧令仲光、盛包，杜恢等率部收割羌人庄稼。不料仲光等不听司马钧节制，散兵深入，中了起义军的埋伏，羌汉军将仲光等军击败，仲光等全军3000人覆没。司马钧在城内，怨恨仲光等，未出兵相救。庞参以失期战败被治罪，自杀身死。

朝廷以任尚为中郎将，率羽林、缇骑、五营子弟3500人，屯兵三辅。任尚临行，虞诩刘任尚说：“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飞，自然之势也。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旷而无功也。”为此，虞诩建议任尚，遣回各郡之步兵，组建一万骑兵，以万骑击羌军数千骑，定能取胜。任尚大喜，遂将虞诩之言奏上，并按其建议以轻骑抄袭杜季贡军于丁奚城，斩400多人。

三、虞诩示弱诱歼起义羌军

汉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朝中听说虞诩有将帅之谋略，便任命虞诩为武威太守。虞诩率军行至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崤谷（今大散关）地区时，得知前面有羌军数千人准备截击他，虞诩遂命全军停止前进，并散布消息说，汉军已上书请兵，要等到援军到达才能再向前进。羌军听到这个消息，便信以为真，分散攻打附近城邑。这时虞翊看到羌军分散而去，立即率领部队前进，日夜兼程100多里，命士卒每人各修两个锅灶，第二天加倍。羌军发现汉军锅灶与日俱增，以为汉军援

兵已到，便不敢追赶汉军，虞翊军顺利到达武都郡。部下将士就此事问虞翊说："孙膑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虞翊说："虏众多，吾兵少。徐行则易为所及，速进则彼所不测。虏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膑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故也。"

虞翊到达武都郡后，兵不满3000，而羌军有1万多人，开始围攻虞翊所占据的赤亭（今甘肃成县西南），攻击数十日未能奏效。虞翊为示敌以弱，命令军中只使用小弩，一律禁用强弩。羌军看到汉军射来的矢小无力，射程很近，便挥军急攻赤亭。虞翊待敌军逼近，便命使用强弩，且每十弩共射一人，这样，射无不中，羌军大惊，引退。虞翊乘势率兵出城奋击，杀伤羌军众多。第二天，虞翊命全部士卒出动，从东城门出，北城门进，然后换一套衣服，再做如此调动，重复数次，羌军见不同装束的部队来回调动，以为汉军众多，心中恐惧。虞翊估计羌军可能要退走，便派500多人，暗中埋伏于羌军必经之路上。不久，羌军果然被汉军惊走，汉军伏兵突然猛击，大破羌军，斩获甚众，1万多羌军损失惨重，残余部队败走益州。

四、羌族人民的第一次起义的最后失败

汉安帝元初三年（公元116年）五月，汉命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单于及左鹿蠡王须沈统领1万骑兵，于灵州（今宁夏灵武北）地区击败羌族起义军的主力零昌军，斩羌军800多人，须沈由此被封为破虏侯。六月，中郎将任尚又派兵将零昌军击败于丁奚城（宁夏灵武南）。十二月，任尚再招募敢死之士，进击零昌军于北地（今甘肃宁县西北），又将零昌军击败，斩700人，并俘获了零昌等人的妻子。至此，羌族起义军的势力大大削弱。

汉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年），汉王朝再次使用暗杀手段，任尚暗派当阗榆鬼等5人，刺杀了起义军领导人之一杜季贡。当年九月，护羌校尉任尚又暗派效功羌之号封等人，刺杀了羌族起义军的核心人物零昌，号封因此而被汉封为羌王。

羌军失去主要领导人之后，零昌所部羌军基本瓦解。当年冬天，任尚率诸郡兵与马贤军开始追歼先零羌的狼莫军。马贤军先到达安定郡的青石岸（今甘肃平凉以东50公里），狼莫军将汉军击败。不久任尚军赶到，汉军兵力大增，狼莫等率军退走，任尚等挥军急迫。至北地郡，两浑相持60多天，后来于富平河畔决战，羌军大败，被杀5000余人，狼莫逃走，余部1万多人全部降于汉军，陇右地区已无起义羌军。

汉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冬，十月，度辽将军邓遵暗派金无种羌之雕何刺杀了狼莫。羌人起义军自零昌、狼莫等首领被刺之后，便彻底失败了。

五、东汉镇压羌族人民第一次起义后的动向

汉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春，勒姐羌和陇西种羌号良等又通谋起兵反汉，马贤率军进击于安故地区（今甘肃临洮南），斩号良及羌军数百人，余众均降汉。

汉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春，上郡地区的沈氏种羌5000余人进袭张掖。六月，护羌校尉马贤率军1万前往征讨，初战失利，汉军被斩数百人。第二天再战，汉军大破沈氏羌军，斩羌军1800人，俘获1000多人，其余部众均降于汉军。

当时，当煎羌首领饥五等，知马贤率军在张掖与沈氏羌激战，便乘虚进攻金城（今甘肃兰州西），马贤战胜后，随即还军反击当煎羌军，斩首数千级，将当煎赶出塞外，便引军返回。

绕当、烧何羌首领听说马贤军战于金城，便率领3000兵马袭击张掖，杀死长史。

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军）春，护羌校尉马贤率兵击斩当煎另一首领卢匆，并纵兵击杀卢匆部众2000余人，另一首领忍良领余众逃出塞外。当年七月，忍良联合烧当羌首领麻奴兄弟，共同出兵以步骑3000人，进入湟中地区，攻击金城郡诸县。八月，马贤率领先零羌军前往迎击，马贤军失败，汉军被斩400多人。接着麻奴羌军又在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打败了武威、张掖郡兵，胁迫先零、沈氏诸羌部落向西进击，攻打武威。马贤率军追至鸾鸟（音雀）（今甘肃武威南），马贤通过政治攻势，招降了数千人，麻奴率其余人马返回湟中。延光元年（公元122年）春，三月，马贤又追至湟中，麻奴出塞渡河，马贤军又追至，将麻奴羌军击败，诸羌散走，投降凉州刺史宗汉。麻奴部落已至山穷水尽，孤弱饥困的绝境，麻奴遂于当年冬天，率其部众3000多户降于汉。

汉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陇西钟羌又起兵反汉，护羌校尉马贤，率7000兵马前往进击，交战于临洮，钟羌大败，被汉军斩首数千余级，余众均降于汉。从此，凉州开始平静。至永建四年（公元129年）秋，汉王朝根据尚书仆射虞诩的建议，将安定、北地、上郡等三郡，迁回原郡治所在地。

东汉军镇压羌族人民第一次起义之战评述

发生于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的我国羌族人民的起义，是中国战争史上少数民族的一次声势浩大的起义。它夺占了陇西、陇右的大片地区，东临魏、赵，南入益州，一度兵至河东、河西，逼近东汉的心脏京都洛阳。东汉统治集团惊恐万状，频频调兵遣将，仍然无法阻止起义力量的发展。

起义前后延续了12年之久，给了东汉王朝后期的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述，东汉王朝由于连年镇压羌族人民的起义，“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东汉王朝

自此更是每况愈下。

当然，羌族人民的起义最后还是失败了，但这种失败，确有其历史必然的因素。

首先，羌族是我国当时的一个发展极其缓慢，经济、文化都极为落后的少数民族，这种起义如若不广泛地与汉族人民的大起义相结合，是很难成功的从古今中外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史来看，以一个弱小的，经济落后的民族，单独战胜经济强盛的大民族的一代王朝，几乎是凤毛麟角。而在东汉当时，仅以羌族人民之力，推翻汉朝的统治则更加不可移易。

其次，羌族人民世代久住塞外，逐水草而居，既无治军从政的起码经验，更无吞吐天下的战略宏图一个部落择一水草丰茂地，以求人畜两旺，已是当时整个部落的最大愿望，这和封建统治观念早巳深入膏肓，并倾天下之人力物力维护自己割建统治的东汉王朝相比，其时代政治观念的落后，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尽管起义首领滇零也曾一时在北地称帝，但人民看不到其有任何夺取政权的希望，因而，便缺乏为夺取政权所必须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第三，汉王朝拥有精兵悍将的辅佐东汉王朝虽有其腐败的一面，但它为镇压羌族人民的起义，却不惜选调精兵悍将，从京师的宿卫军、各郡的善射骑士，直至南匈奴的骑兵和已降服的羌胡精骑，源源调赴战区，多方围堵义军，有压倒羌军的雄厚军事实力。汉军将领虽然不少人曾是羌军手下的败将，但刘尚，任尚，梁慬，虞诩、侯霸、马贤等人，却是英勇善战的悍将，汉王朝正是依靠了这样一批将帅的东征西战，才战胜了羌军。

第四，汉王朝谋略策略的运用，军事镇压与招降利诱两种手段的交替配合，均高出羌军数筹汉王朝除军事打击和不断用利诱手段拆散羌人的联盟外，还多次招诱羌人暗杀起义首领，零昌，狼莫、杜琦、杜季贡等领导人物被刺杀之后，起义的领导核心便已冰消瓦解。因而，起义的后期，分散于各地的起义羌众便成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状态，从而导致了被汉军各个击灭的失败结局。

第四节 东汉军镇压羌族人民的第二次起义之战

羌族人民第一次大起义被镇压之后，一些羌种部落的首领，还接着发动了反汉战争，汉王朝一一派兵进行了征讨。

汉顺帝阳嘉三年（公元134年）七月，钟羌良封等羌军，进攻陇西、汉阳。汉王朝为镇抚诸羌，遂任命前校尉马贤为谒者。当年十月，护羌校尉马续派兵迎击良封等羌军，斩首数百人，接着马贤也于元嘉四年（公元135年）二月，率兵征讨钟羌军，羌军大败，被汉军斩1800多人，良割部众降于马贤军。马贤进而又击败钟羌之且昌等部众，且昌等率诸羌10多万人降汉。

汉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马续任命为度辽将军，马贤再.度被任命为护羌校尉。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春，广汉属国都尉击败白马羌军，斩600多人，马贤又率军击斩其渠帅饥指累祖以下300人。至此，陇右地区被汉平定。

永和三年（公元138年）冬，十月，烧当羌那离等，以3000骑兵进击金城塞，马贤率军迎击，斩首400余人，那离等退走。马贤为彻底击灭那离部众，遂于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夏四月，率湟中义从兵及羌胡1万余骑兵，围攻那离部，将那离斩首，杀羌军1200人，获牛羊10万多头。

二、羌族人民第二次起义的爆发

汉军对羌族部落的征讨，使羌族部落人员与财产损失巨大，加之东汉地方官吏的残暴统治，使羌人倍受剥削、掠夺和杀戮之苦难，诸羌部落终于在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夏，发动了声势更加浩大的第二次起义。

起义首先由且冻，傅难等羌族部落发起，起义军进攻金城（今甘肃兰州），随即联合了湟中，西塞地区的诸羌部落，进攻武都郡。继而以巨大的声势进军三辅（今陕西关中地区），占城邑，杀官吏，汉军难以抵挡。朝廷大为震惊，紧急调兵遣将前往镇压。

三、东汉王朝的调兵遣将

汉王朝派谁挂帅出征，发生了一场争议，汉顺帝命马贤为帅。

大将军梁商认为马贤已年迈，不如派太中大夫宋汉为好。汉顺帝不允，决意以马贤为统帅，以骑都尉耿叔为副将，调发京师附近各郡及各州兵马、左右羽林，五校营共计10万大军，屯兵汉阳，准备镇压起义军。与此同时，又命令在陇道、扶风、汉阳等地区，修建坞壁300所，以便屯兵屯粮。

马贤率军到达汉阳后，便停止进军。武都太守马融上书说：“今羌种四起，到处掠夺，应乘他们尚未全部联合起来之际，速向敌人进兵，以便各个击破，但马贤等却屯兵不前。”并表示愿以精兵5000，拼以死战，在一月之内，一定把羌军击败。但朝廷仍然坚持用马贤为帅。

四、东汉军镇压羌族起义军的作战经过

汉顺帝永和六年（公元141年）春正月，马贤统率6000骑兵，与羌军交战于射（音夜）姑山，马贤军战败，马贤及其两个儿子均战死。羌军战胜汉军后，锐气更盛，东西诸羌部落进一步联合起来。接着巩唐羌起义军3000余人进攻陇西，烧汉代园陵，入于关中，杀伤长史，阳令率兵追击，被羌军斩首。

汉王朝对羌族起义军的进展和马贤等军的战败极为震恐，急派中郎将庞浚选募精勇1500人屯于美阳（今陕西扶风以东），一旦凉州失守后，阻止羌军进军长安。

武都太守赵冲，率军与巩唐羌起义军交战，将巩唐羌军击败，斩首400人，羌军2000人降汉。

罕羌起义军t000多人进攻北地（今甘肃环县），北地太守贾福与赵充共同迎击起义军，汉军战败。当年秋天，羌族起义军近9000骑兵进攻武威，震动了整个凉州。汉王朝于十月，一方面匆忙将北地郡治迁移至冯翊，将安定郡治迁移于扶风，另一方面急命执金吾张禹行车骑将军、率左右羽林、五校营及河内、南阳、汝阳诸郡兵1.5万人，屯于三辅地区，以加强关中地区的防守力量。

汉王朝由于屡战屡败，便改变战略，变单纯军事围剿为招降利诱。于是，护羌校尉赵冲便施展诱降分化瓦解羌族起义军的伎俩。汉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冬，十月，罕种羌人部落5000户降服于赵冲。这样，汉王朝遂罢去行’车骑将军张禹之军，压力稍稍缓解。

汉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夏，四月，护羌校尉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率军镇压烧当羌军，双方战于参（今甘肃庆阳西北），羌军大败，被汉军斩首1500多人。当年冬十月，赵冲再率军镇压诸羌军，斩羌军4000多人。接着汉军又于河阳（今甘肃静宁）再败羌军，斩羌军800多人。羌族起义军遭几次打击后，势力进一‘步减弱，诸羌先后有3万多户降于汉。

建康元年（公元144年）春，护羌从事马玄投奔起义羌军，与羌族部落一起逃出塞外，领护羌校尉卫瑶等率军追击，斩首800多人，掠夺羌人马牛羊20万头。赵冲率军继续追击，追至建威鹤阴河（今甘肃武威以东），其所率之胡兵600多人叛逃，赵冲率数百人追歼，结果为羌起义军预设之伏兵歼灭，赵冲也身亡。至永嘉元年（公元145年）左冯翊梁并，又以利诱的手段，招降了离涌、狐奴等羌族部落5万多户。至

此，羌族人民的第二次大起义，又被东汉王朝镇压下去。

第五节 东汉军镇压羌族人民的第三次起义之战

一、羌族人民第三次大规模起义的爆发

羌族一些部落的头人，在羌族人民第二次大规模起义后，仍不断操纵部落进行反汉战争。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三月，白马羌进攻广汉属国，杀死长吏，益州刺史率板蛮迎击，斩首和招降20万人。

但是，东汉军在平定羌族部落头人发动的反对汉中央王朝的战争中，由于官吏的任意掠杀暴虐妄为，不断使羌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着惨重的损失，再加之地方贪官污吏的任意盘剥和压榨，羌族人民已忍无可忍，于是，便于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爆发了第三次大规模起义。

二、东汉军镇压三次羌族起义军作战经过

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十二月，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8个羌族部落的人民举兵起义，大举向并州、凉州、三辅地区进军。

汉王朝急忙调中郎将段为护羌校尉，率军及湟中义从羌共骑兵1.2万前往镇压。段军一举将羌族起义军击破，起义军败退，汉军追击，南渡河水，段命军吏田宴、夏育率勇卒“悬索相引”，追至罗亭（今青海东南部地区），斩起义军首领以下2000多人，俘获1万多人，起义军被初步镇压下去。

汉桓帝延熹三年（公元160年）春，闰正月，西羌余部又与烧何羌起义军进攻张掖（今甘肃武威以南），攻没距鹿坞，附近千余部落响应，合兵向汉军进击。凌晨时分，突然逼近段颖军，段下马与起义军大战，双方战至日中，汉军刀折矢尽，羌军引军而退。段颖率军紧迫不放，双方战斗极为艰苦激烈，据《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记载，“追之，且斗且行，昼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余日，遂去河首积石山，出塞两千余里，斩烧何大帅，首虏五千余人。”段颏取胜后，接着又分兵进剿石城羌，斩首溺死者1600多人，烧当羌90多人降汉。杂种羌众屯于白石（今甘肃临夏），被歼灭3000多人。当年冬，勒姐和零吾羌起义军包围允街（今甘肃永登东南），段颁军又前往解围，斩羌军数百人。

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六月，零吾羌与先零等起义军，进攻三辅地区。冬，先零羌，上郡沈氏、陇西牢姐、鸟吾等诸羌部落再举义兵，进军并州、凉州。段又率湟中义从前去镇压。这时，凉州刺史郭闳贪功，阻止段继续进军。段军中之义从羌军由刁：离乡日久而反叛，郭闳归罪于段，段因而被下狱治罪。由于除去了一个最强悍的对手，羌族起义军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汉王朝急派济南相胡闹代护羌校尉，率兵前往镇压，但胡闹缺乏统率军队作战的能力，不是羌军的对手，屡挫于羌军。

朝廷对羌族起义军的节节胜利，甚为忧恐，为镇压羌人起义军，三公遂共举泰山太守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率军镇压。当年十一月，皇甫规军击破零吾等羌军，斩首800人。同时以政治攻势招降羌军部众，羌人因早闻皇甫规的威名，遂相互劝降者达10多万人。

汉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春三月，沈氏羌起义军攻打张掖、酒泉。皇甫规调发先零等羌军，与其所率汉军急往围剿。因道路难行，军中发生疾疫，全军死亡十分之三四。皇甫规为安抚军心，亲自巡视每个营寨，稳定了三军的情绪，东羌诸部落遂遣使请求降服，凉州的羌族起义力量，基本被平定。皇甫规为进一步平息羌人的情绪，还将一些贪官污吏100多人或免官治罪，或以罪诛杀。但不久，皇甫规即被一些贪官污吏所诬陷，而调回。

汉桓帝延熹六年（公元163年），汉王朝为镇压向武威、张掖，酒泉进袭的滇那等羌族起义军，复任命段为护羌校尉，派赴凉州镇压起义军。

延熹七年（公元164年）春，段击破滇那等起义军，滇那，割t3，良多等羌族起义军首领355人率其3000个部落降于汉军。当年十月，段颍军又击破当煎、勒姐等起义军，斩其首领，歼其4000余人。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三月，护羌校尉段镇压罕姐羌军，斩400余人，2000余人降于汉。段颊又于当年五月，进兵湟中，镇压西羌，结果汉军战败，被围困3天。后来用隐士潘志张策，乘夜暗，偷偷撤出包围，击鼓回军突袭，羌军大惊败退，被汉军俘斩数千人，段率军穷追，两军辗转交战于山谷间，从春天一直战至秋季，日日较量，最后羌族起义军粮尽饥困而败散。段残酷地斩羌军2.3万多人，俘获数万人，马牛羊800万头，陆续降汉的羌人部落1万余个。

汉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春正月，当煎羌诸部落起兵4000人，欲攻取武威。段颊率兵镇压，双方战于鸾鸟，汉军大胜，斩羌军渠帅，歼灭3000余人，西羌诸部落的起义从此被汉军全部镇压下去。当年四月，东羌先零等部落，数度进入三辅地区，攻占京兆虎牙营和扶风雍营，斩汉军1000多人，汉军难以抵挡。

永康元年冬十月，中郎将张奂遣司马尹端、董卓镇压三辅地区的先霉：羌等起义军，大败先零等羌军，斩其首领，歼灭1万多人，幽、并、凉三州的起义力量至此已大部被镇压。董卓经此一战，被拜为郎中。

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春二月，段颓率领1万多兵马，由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出发，进至高平地区（今宁夏固原），与先零羌另一些部落起义军交战于逢义山（固原县境），起义军兵威势众，直逼段颊军，汉军惊慌。此时，段颊这位镇压羌族起义军的老手，决心拼死一战，他把全军的长矛、短刀、弓箭手列成三重阵势，把强弩手夹于阵

中，轻骑兵布在两侧，以便在正面进攻的同时，轻骑从左右两翼突击。段布完阵势后，对全军将士说："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说罢，即大呼向敌冲去，众吏卒随之而上，羌军抵挡不住，溃败而退，羌军被斩8000多人，掠羌人牛马羊28万多头。段额被拜为破羌将军。

当年六月，段颊追击羌军至走马水上，探知羌军已至奢延泽，于是段颊率轻骑昼夜兼程，与羌军战于奢延泽（今陕西靖边西北），将羌军击破。羌军余部走向落川（约为今陕西洛河），羌军再集结布阵。段乃分别派骑司马田宴率5000骑从东面、假司马夏育率2000骑从西面，同时攻击羌军。羌军派出7000骑围攻田宴，被田宴军击溃退走，段颁引军与田宴猛追，且战且走，至灵武谷（今宁夏银川西北），段披甲先登，士卒均不敢落后，羌军在汉军的猛击之下，大败而逃。段额率军冉追，连续三天三夜，于七月，追至泾阳（今甘肃平凉南），羌部众退入汉阳（今甘肃甘谷东）山谷之中。

朝廷派谒者冯禅劝说汉阳投降。但段颏认为，羌军已败，不如乘胜歼灭，于是，自率军至羌军屯聚之凡亭山（在今宁夏固原山）40～50里扎营，派田晏，夏育率领5000人占据山上。羌军遂全军齐攻该山。羌军对段颖军已恨之入骨，羌军将领大声呼喊道："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义从羌悉在何面？今日欲决死生。"汉军面对羌军的激愤情绪和决一死战的气慨，心中慌恐。田晏等鼓动士卒，殊死人战，终于将羌军击破。羌军败退而走，又占据射虎谷（今甘肃天水西南），分兵防守各险要谷口。

七月，段率军追至射虎谷，想在该地一举歼灭羌族起义军。于是便派1000多人于西县（今天水西南），构筑了长40里的木栅遮障，切断道路，以阻止羌军逃跑，派田晏、夏育等率7000多人乘夜暗衔枚摸上西山，"结营穿堑，去虏一里许"；又派司马张恺等率3000人上东山。但被羌军发觉，于是，羌军遂进击田晏军。颖也启率军进击，羌军战败。段颢又率军追入深山谷中，羌军退路断绝，几乎全军覆没，段颖斩其渠帅以下1.9万余人。羌族人民的第三次大规模起义，至此，全部被汉王朝镇压下去。

三、汉王朝镇压羌族人民起义后的动向

东西羌人民的起义军，经过180多次作战，终于失败，被段须共斩杀3.86万多人，汉王朝为表彰段颁的"功劳"，再封其为新丰县侯，食邑一万户。以后由于段结党于宦官；被朝廷下狱，饮鸠酒而死，家人发配边疆。这个镇压羌人起义军的刽于手，终于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第十二章 东汉征南蛮和西南夷的战争

东汉对南蛮和西南夷部族的战争，在东汉建立之初，是刘秀统一中国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汉中后期对南蛮和西南夷的作战，基本上都属于镇压兄弟民族起义与反抗的战争，这些战争主要有：

东汉平定交趾“二征”叛乱之战发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冬，至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十月。汉命伏波将军马援率水陆两军1万多人，进击交趾雒将之女征侧、征贰发动的武装叛乱。汉军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终于将叛军歼灭，维护了交趾地区的统一。

东汉军平定五陵蛮反汉之战发生于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至建武二十九年（公元53年），汉王朝两次派军苹定五陵地区五溪蛮的反汉武装，终于将五溪军战败。

东汉军连续镇压南蛮诸部族的反汉之战这些战争断续发生于东汉章帝、和帝、顺帝、桓帝、灵帝等帝王当朝期间。汉王朝对诸夷部落的反汉和起义，都采用军事镇压和招降利诱的两手策略，取得了作战的胜利。

东汉军断续镇压日南等蛮夷反汉之战这些战争断续发生于汉和帝、顺帝、桓帝、灵帝当政期间。汉王朝仍以残酷的军事镇压和政治上的分化瓦解，扑灭了蛮夷人民起义的战火。

东汉军断续平定和镇压南郡巴郡诸蛮夷之战这些战争相继发生于汉光武帝、和帝、灵帝当政时期。东汉王朝建立之初，汉光武帝派武威将军刘尚，镇压了南郡山蛮的叛乱；汉和帝和汉灵帝则通过围剿和利诱的手段，使蛮夷人民的起义斗争不断遭受挫折。

东汉军断续平定和镇压西南夷反汉之战这些战争相继发生于汉光武帝刘秀，明帝、章帝、安帝、灵帝当政期间。汉光武帝刘秀派兵镇压了益州郡叛乱的诸夷族部落的首领，维护了汉朝西南地区的统一。东汉王朝后期，南夷人民的起义斗争，给了当时腐朽没落的东汉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但最终仍被汉镇压。

第一节 东汉平定交趾“二征”叛乱之战

一、平定交趾叛乱前汉王朝在南方和西南方的战略形势

东汉王朝继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陇西太守马援军破先零等诸羌叛乱后，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大司马吴汉又率军攻克了公孙述盘踞多年的蜀地。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陇西太守马援又率军平定了陇右地区参狼羌的叛乱。至此，刘秀遂基本完成了中国南方和西南方的统一大业。以后，至光武末虽然还有一些地区时有战乱发生，但多系局部的叛乱，无损于东汉王朝的统一大局。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发生了今安徽省潜山地区巫土李广等人的聚众反抗。攻没了皖城，杀皖侯刘闵。李广自称“南岳大师”，气势一度较盛。汉王朝派谒者张宗率兵数千前往讨伐，但却为李广所败。后来派马援率诸郡兵1万多人再次征战，才冬李广徒众歼灭。南方之江淮流域地区已基本平静。

二、交趾地区“二征”叛乱的兴起

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以来，交趾郡（今越南红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雒越贵族女子征侧、征贰。煽动蛮夷大规模叛乱，攻夺了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等郡，蛮夷一些上层首领也率部众而起，“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

交趾地区的雒越人，原出于我国南方的越族，故自古代以来即与中原地区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为中原历代王朝的边境少数民族。秦和西汉时期在这里设置了郡，尚无县级政权机构，郡以下均由雒王和雒将主宰各部落的军政大权。这次叛乱的首领征侧、征贰就是雒将的两个女儿。

交趾自秦汉设郡治以来，由于更多地接受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文化的影响，整个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些雒越奴隶主贵族，力图保持其原始落后的奴隶主特权，对封建制度给予交趾地区带来的冲击，深感恐惧，因而必然寻找事端，发动叛乱，以阻挡历史潮流的发展。这样，便以交趾太守苏定将雒将之女征侧绳之以法的机会，发动了这次叛乱，目的在于破坏东汉统一的大局。

“二征”的叛乱声势较大，很快传到了京师，东汉王朝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遂决定派兵前往征讨。

三、东汉军的作战序列和作战策划

东汉王朝为了平定交趾叛乱，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下令长沙（今湖南长沙）、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交趾等郡“具车船，修道桥，通

障豁，储粮谷”。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冬，汉王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将，统率楼船将军段志，调发长沙、桂阳（在今湖南郴州）、零陵（在今广西全州西南）、苍梧（在今广西梧州）诸郡兵1万多人，编成水陆两军向南进发。

四、平定交趾叛乱的作战经过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马援受命后，即率领汉军向南进发。马援率军从陆路前进，楼船将军段志率水军沿粤江南下，汉军行至合浦时，段志因病亡故，刘秀下诏，命马援兼统水陆两军。于是，马援率军从合浦人海，从海上进入红河，缘河逆水而上，开道1000多里，进入“二征”叛乱地区。

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四月，马援军进至浪泊（今越南河北仙山地区）。浪泊地处盆地的低洼湖区，二征叛军借助水阻和有限的陆地，布设重兵防守。马援则避开敌人险要地区，顺利进入浪泊，旋即与叛军交战，“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叛军败走禁（今越南永富安乐），马援军紧迫不舍，又数次将叛军击败，终于于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正月，斩征侧、征贰，将其首级传至洛阳。马援因此役的胜利，被封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

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十月，马援又率大小战船2000余艘，土卒2万多人，南上九真郡，追歼“二征”余部都阳等叛军。马援军克服惊涛骇浪，登岸后又劈山开路，自无功至居风（今越南宁平省东南至清化一带地区），兵锋所至，叛众皆降服，斩获5000多人，九真郡遂告平定。

五、平定交趾叛乱后的措施

马援军平定“二征”的残余势力后，为在交趾地区建立和完善封建政治制度，防止落后的奴隶主势力再次抬头，第一项措施是把俘获的300多名雒将迁至零陵地区，以剥夺他们叛乱的基础；第二项措施是郡以下设立的县级行政机构，均以县令、县长等官吏进行治理，废除了雒将统治部落的世袭特权，第三项措施是修订和完善律法，第四项措施是治理城廓、开凿道路、兴修水利，穿渠灌溉。这些，对加快交趾地区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雒越人民及其后世，为了纪念马援平定“二征”叛乱的历史功勋，将马援奉若神明，“伏波庙”遍布越南各地，家家供奉马援的神位。

第二节 东汉军平定五陵蛮反汉之战

一、五陵蛮的反汉

居住于武陵郡（今湖南常德西）的五溪蛮部族，历来以骠悍善战著称。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五溪蛮在其首领精夫单相程的率领下，聚众反对汉王朝的统治。攻掠附近郡县，郡县武装难以与其为敌。东汉王朝深以为患，便命久经沙场的武威将军刘尚军前去平定。

刘尚受命后，立即调发南郡（今湖北江陵），长沙，武陵等郡兵1万多人，乘船沿沅水（今湖南沅江）入武溪（沅江支流），向五溪蛮军进击。刘尚轻敌，冒险深入，进入谷深水疾之地，舟船再难以行进，陷于进退维谷之中。五溪蛮军知道刘尚军轻兵远袭，军粮映乏，道路地形生疏，遂将部队埋伏于险要之处，待刘尚军食尽退兵之际，五溪蛮军突然向刘尚军猛击，一举将汉军击灭。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单相程等，又率众攻克了临沅（今湖南常德）。汉王朝遂派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等率兵征讨，五溪蛮又将汉军击败。如何才能击灭五溪蛮的反汉武装，已成汉王朝的一件大事。

二、东汉的再次调兵遣将

汉军的两次作战失利，使汉王朝惊慌不安，于是决定再派精兵勇将前去围剿。这时，年已62岁的伏波将军马援，在病中得知此事，便主动向汉光帝刘秀请求率兵出征。刘秀念其年迈，不便让他前往。但早已定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草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誓言的马援，却坚持向刘秀请求说：“臣尚能披甲上马”。刘秀只得让马援当场上马一试。马援牵过战马，飞身而上，威风凛凛，不减当年。刘秀被他的忠心感动，遂立即决定以马援为将，统率中郎将刘匡、耿舒、马武，孙永等将校，以12郡兵马及刑徒共4万大军，进击五溪蛮。

马援临出兵之前，以誓死不归的决心，向其友人一一诀别。马援对其至交谒者杜说：“我受朝廷厚恩，年近古稀，活在世上的时间不长了，时时担心不能为国捐躯，这次出征我决心拼一死战，不消灭敌人愿裹尸而还”。马援并向杜表达了自己不愿与耿舒等权贵子弟一起出征的不快心情。

三、汉军的作战序列与作战策划

统帅伏波将军马援

将领中郎将马武

中郎将耿舒

中郎将刘匡

中郎将孙永

总兵力4万多人

汉军在出征之前，对如何镇压围剿五溪蛮军进行了详细策划：汉军预定蛮军遭大军打击，一旦退向山林，汉军应取捷径，切断敌人退路，以求全歼蛮夷军。

四、围剿武陵蛮的作战经过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春，汉军进至临乡（今湖南常德西），正遇五溪蛮军攻取临乡城，马援于是指挥汉军开始镇压五溪蛮军。五溪蛮部众兵遭汉军突然攻击，无法与汉军匹敌，被汉军斩获2000多人，其余败入山林之中。

马援率军向西南方向追歼五溪蛮军，当汉军进至下篇（今湖南沅陵）时，五溪蛮军则已进至壶头山之深山中（约在今沅陵东）。进入壶头山有两条路：一条为近路，但山高路险水深，行进确有一定困难，然而走此路则可直捣壶头，能够乘敌立足不久，抓住战机，剿灭敌人，一条为远路，迂回至充（今湖南大庸西）。再绕向东南而入壶头山，此路平坦、安全，但却多走数百里路程。而这条路线在出征之前，进行作战策划之时，就曾被刘秀否定。但当汉军至下携时，中郎将耿舒却又提出大军应走充县之远路。马援则认为，不如走近路，直捣壶头，这样，能抓住战机，争取时间，少费军粮，且可一举扼敌咽喉，敌不攻自破。二人争执不下，只好上书刘秀，刘秀赞同马援之策。汉军于是在当年三月急进至壶头。五溪蛮众后退充县之路，被汉军切断，故据险而守。壶头山下水深流急，汉军舟船难以靠近，马援军遂弃舟而行，行至山腰，无法再往上攻，两军形成对峙。

这时，天近炎热，疾病流行，汉军士卒多患病而死，马援也身染重病。为躲避炎热，汉军便凿穿石壁为洞，继续监视五溪蛮军的行动。

汉军将五溪蛮军围困于山头之上，水源断绝，粮食不继，处境十分困难。马援虽身患重病，但每当听到五溪蛮军的动静，他便拖着病重的身体，外出巡查，“左右哀其壮意，莫不为之流涕”。

此时，中郎将耿舒见两军这种僵持局面，便又借机参奏马援，他上书给他的哥哥建威大将军耿，述说他原先坚持从充县进军如何如何正确，现在大军困守壶头，不能前进，士卒因疾病死伤严重。说马援好似西域的商人，每到一处便停止前进，以致失去了歼灭敌人的机会。耿宾得到耿舒的书信，便向刘秀禀告。刘秀听后很生气，便派虎贲中郎将梁松，前往壶头责备马援，并充当马援的监军。

当梁松尚未到达马援军时，马援已病逝。不久，五溪蛮部众因食尽水绝，无法坚守，精夫相单程遂率众投降汉军。

五、围剿五溪蛮战后汉军的动向

汉军回师京城后，中郎将梁松因以前探望马援病时，马援没有起床迎接他，他忌恨在心。这次梁松回京，便借机又对马援诬陷了一番，更加引起梁松岳父汉光武帝刘秀的震怒，遂追收了马援生前被封的新息侯印绶。

过去，在马援平定了交趾叛乱回京时，曾带回一车交趾地区出产的薏苡，想回到京师引种。当时，朝臣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便以为是马援私吞交趾的奇产珍宝，但因马援当时功高名盛，深受刘秀宠信，故无人敢说三道四。现马援已死，便有人上书就此事参奏马援，中郎将马武和于陵侯侯昱等，也绘声绘色地上书述说这种宝物的奇特。由此，刘秀更加愤怒。马援家人不敢将马援葬：于祖坟之内，偷偷买了几亩荒地草草掩埋了他。

汉军围剿五陵蛮反汉之战评述

发生于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陵地区五溪蛮部族的反汉战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战争抑或它的反面，当代史学界说去不一。有的说它是为阻碍封建制度在武陵山区推行的叛乱战争；而由朱绍侯主编的我国现行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却说它是蛮族人民的起义，“起义者在饥饿困乏的情况下，被镇压下去”。

用辩证的观点看，封建社会时期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战争并不能被一律看做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起义战争，必须具体分析，具体对待。刘秀中兴，已被公认为是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前进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而公元47年才只是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的第23个年头，整个社会正处于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休养生息的上升阶段。当然，这并非否认当时某些地区还可能存在着超越封建社会允许的对人民群众的压榨与盘剥，由此而引起个别地区小规模的人民群众的反抗，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而五溪蛮的反汉，迫使中央王朝三次调兵遣将前往围剿，不能不产生破坏当时社会安定、影响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的有害作用。同时，由于史料的欠缺，很难说五溪蛮的反汉，不包括以其落后的奴隶制部藩对抗甚或阻止先进的封建制推行的因素。如此看来，把五溪蛮夷在其部落首领领导下，反抗东汉中央王朝的战争，看成是绝对进步的人民起义战争，就大有商榷之处了。

汉军的三次进军，两次被五溪蛮部众战败，并非汉军进行的是不义之战，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地形生疏，民情道路不熟，气候水土不服所致。第三次出征的马援的4万大军，如若不是人多势众，切断了五溪蛮军的退路，并将其包围于绝食断水的高山之上，恐怕也难很快使之降

服。

伏波将军马援，无论在前次平定交趾“二征”叛乱和这次作战中，均表现了其杰出的将帅才能和他忠心报国的高尚情操。马援的“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和“马革裹尸还葬”的壮烈情怀，已成为激励后世流芳千载的宝贵精神财富。然而，一代金戈铁马的名将，却毁誉于一纸谤文，实在令人痛惜。古人说的“居功名之地，谗构易兴，而能免之者少矣”的名言，确有令人深思的哲理。

第三节 东汉军连续镇压南蛮诸部族的反汉之战

一、南蛮诸部族的反汉起因

南方诸蛮夷部族的反汉，绝大部分皆起因于东汉王朝统治集团的残酷盘剥与压迫。这些兄弟民族，本来处地偏僻，经济落后，社会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就远较中原地区困苦。但东汉王朝的大小官吏，却对他们同样征以重税，任意驱使他们服各种徭役，这就使他们背负着难以承受的沉重压榨，所以便不断地起而反抗，劫官府、掠仓廪、杀吏士，寻找求生之路。因而，不管这些反抗行动，是部落人民的起义，还是在头人的率领下反汉，大部分都是代表和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而战。

二、东汉镇压武陵地区诸蛮夷反汉之战经过

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武陵地区的沣中蛮陈从等，率部众反汉，进攻城邑，入零阳（今湖南慈利）界。当年冬，零阳蛮五里精夫，率众协助郡兵击破陈从军，陈从等均降于汉。

建初三年（公元78年）冬，武陵地区的淡中蛮覃儿建等，又率蛮众反汉，攻烧零阳、作唐（今湖南安乡北）、孱陵（今湖北公安西）界中，声势较大。建初四年（公元79年）春，汉王朝调发荆州刺史部之南阳郡、南郡、江夏郡、武陵郡、零陵郡、桂阳郡，长沙郡等七郡，及汝南、颍川郡刑徒吏士5000多人，拒守零阳，招募充中（今湖南桑植）五里蛮4000人，前往镇压。建初五年（公元80年）春，二月，汉军向沣中蛮部众进攻，蛮军战败，覃.儿健等请求降服，汉军不许。汉军遂与蛮军交战于宏下，蛮军大败，覃儿健战死，其部众退还渎中，再次派使请降，汉才答应，遂撤武陵之兵。

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冬，十月，中、沣中蛮潭戍等率部众反汉，杀吏民、攻邑镇，被郡兵镇压平定。汉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沣中蛮因郡县加重徭役赋税，遂联合充中蛮等2000余人起兵反汉，攻城池，杀长吏，后被郡兵和五里蛮兵击破而投降。汉安帝元初三年（公元116年）秋，七月，中、沣中蛮部族4000多人起兵反汉，零陂蛮1000余人也起兵反汉，均被州郡平定。

汉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37年）十二月，武陵太守上书，建议对蛮夷增收租赋，朝廷大臣均认为可行。唯尚书令虞诩认为不可，他说："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后悔"。顺帝不听，沣中，溇中蛮果然起而反抗。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春，蛮族起义军以2万多人围攻充城，8000多人攻打夷道（今湖北枝城）。当年二月，朝廷命武陵太守李进率军镇压，大败诸蛮起义军，斩数百人，其余均降服。

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秋，七月，武陵蛮詹山等4000余人

又起而反汉，捕捉县令，屯聚深山，至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武陵太守应奉才以利诱招降。

汉恒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十一月，长沙蛮反汉，屯聚益阳（今湖南益阳东），攻袭城邑，杀伤长吏，拥众1万多人。同时，零陵（今广西兴安东北）蛮也起兵入长沙（今湖南长沙）。武陵蛮6000多人进攻江陵（今湖北江陵），声势浩大。荆州刺史刘度，谒者马睦，南郡太守李肃皆逃走。李肃的主薄胡爽见李肃欲逃，遂扣住马首劝道：“太守为国家之大臣，连城千里，你一声号令，即可调集十万兵马，不应放弃守卫郡治之重任而逃，甘愿做为朝廷抓捕的罪人！”李肃拔刀相威胁，胡爽抱马死劝，李肃为保全性命，杀死胡爽而慌忙逃走。后来，朝中闻知，处死李肃弃市，刘度、马睦均减死一等，胡爽家一人被拜为郎。为镇压诸蛮族的起义，汉王朝命右校令度尚为荆州刺史，围剿长沙蛮军，终于将长沙蛮起义军剿灭。命车骑将军冯绲率军镇压武陵蛮起义军，经交战，将武陵蛮军击败。但冯绲还军不久，武陵蛮义军再起，进攻桂阳，桂阳郡太守廖析惊慌逃命。武陵蛮遂又攻打武陵郡（今湖南常德），太守陈奉率军击败武陵蛮军，屠杀义军3000多人，逼降2000人。至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武陵蛮再次起兵反汉，汉王朝又派兵镇压。

第四节 东汉军断续镇压日南等蛮夷反汉之战

一、镇压日南、象林蛮夷

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夏，四月，日南（今越南广治北），象林蛮夷部族起兵反汉，郡县发兵征讨，斩其渠帅，部众降服。汉王朝为长期控制这些地区的蛮夷部族，设置了象林将兵长史。汉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苍梧蛮夷在各地蛮夷部族起义的影响下，也起兵反汉，元初三年（公元116年），进一步联合了附近一些蛮汉人民数千人，进攻苍梧郡。后来，被汉王朝招降。

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日南、象林等蛮夷族部数千人反汉，攻袭象林县，烧官府，杀长史，交州刺史樊演发交趾，九真二郡军1万多人前往解救。结果，兵士馏怕远征，遂反叛，攻打州府。侍御史贾昌与州郡兵全力征讨，反而战败，被围1年多，处境十分不利。朝廷欲发4万大军前往镇压，后经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力陈出兵的七大害处，才改由诱降策略，从而招降了数万人。

汉顺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日南蛮夷千余人反汉，攻夺县邑，并联合九真诸蛮夷共同起兵。交州刺史夏方仍以招诱手段，降服了诸蛮夷。

二、镇压长沙、零陵蛮

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当长沙蛮、零陵蛮和武陵等诸蛮夷人民大起义时，居风（今越南清化西北）汉人朱达等率众联合蛮夷也起兵反对居风县令的贪暴无度，汉蛮起义武装达4000～5000人，进攻九真（今越南清化西北），九真太守儿式率郡兵镇压，汉军失败，太守战死。汉王朝随即派九真都尉魏朗统兵进剿，斩蛮军2000多人。渠帅朱达等遂率军屯聚日南，势力有了进一步发展。汉王朝无法派兵镇压，便诏命善于利诱招降蛮夷的老手原交州刺史夏方复任交趾刺史。结果，夏方通过招降，使2万多人停止抵抗，降于汉朝。

三、镇压交趾、合浦蛮

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交耻（今越南河内地区）、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乌浒蛮反汉，并联合九真，日南诸蛮夷共数万人，攻占郡县，声势巨大，直至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才被交州刺史朱俏镇压下去。

第五节 东汉军断续平定南郡巴郡诸蛮夷之战

一、平定南郡蛮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南郡（今湖北江陵）（音屠）山蛮雷迁等，聚众反抗汉朝的统一政权，寇掠吏民。刘秀于是派遣武威将军刘尚，率兵1万余人平定，汉王朝为消除其再次反汉的基础，迁其部落7000余人至江夏郡界中（今湖北武汉以西一带地区）。

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南郡巫县（今四川巫山）巫蛮许圣等以苛捐税赋沉重难忍，聚众起兵反汉。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夏，汉王朝派遣使者督荆州诸郡兵1万多人前往镇压，许圣等率众依托长江巫峡的险要地势，顽强防守，汉军久攻不破，便采取分路迂回，自巴蜀、鱼复会攻巫县，巫蛮军战败逃散，汉军乘胜追击，又大破许圣军。许圣降于汉军，汉遂将巫蛮部众迁至江夏郡。至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江夏蛮起兵反汉，复由州郡兵剿平。汉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即在黄巾大起义的前四年，江夏蛮再次起而反抗东汉末期的黑暗腐朽统治，与卢江黄穰领导的汉族人民的起义联合，共拥众10多万人，攻占附近县邑，声势很大，坚持数年，后来，被卢江太守陆康率军镇压。

二、镇压板楯蛮夷部族的起义

板椐蛮原居于巴中地区，在汉高祖刘邦还定三秦时，板楯蛮部族曾选调吏卒跟随刘邦军夺占关中。由于板栅蛮“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陈（阵）”。光武中兴以后，汉为镇压羌族部落的反抗，常常征发板棺蛮人东征西战，板楯蛮为巩固中国当时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汉王朝的中后期政治越来越黑暗腐败，贪官污吏对兄弟民族肆无忌惮地奴役压迫，从而迫使板蛮人民数起反抗。汉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十二月，巴郡板蛮复起兵反抗，板蛮人民起义军勇不可挡，三蜀及汉中诸郡兵均败在其手下。汉灵帝派御史中丞萧瑗率益州兵镇压，连战连败。

汉王朝面对板蛮人民如火如荼的斗争，深为忧虑，汉灵帝欲调发重兵前去征伐。于是让益州计吏提出进兵征讨的方略。汉中上计程包奏称：“板楯蛮人世代为忠吏顺民，其人勇猛，善于兵战。永初中年，羌军攻入汉川一带，郡县莫能征讨，幸得板楯蛮人相救，羌军才败退，故都称板楯蛮为神兵”。接着又一一列举了板蛮人的战功后，程包认为，不是板蛮人想反，而是被地方官吏的苛政逼迫而反。“长吏乡亭更赋至重，濮役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刭。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苦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有谋主僭号，以图不轨。今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

不烦征伐也”。汉灵帝采纳广程包的谏议，遂派太守曹谦说降了板蛮。

第六节 东汉军断续平定和镇压西南夷反汉之战

一、平定益州郡诸蛮夷反汉的经过

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在王莽当政时期，曾率部众反对王莽的黑暗统治。王莽当时派宁始将军廉丹率兵10余万人前往镇压，交战数年，汉军未能取胜。东汉建立后，太守文齐遣使降于东汉。

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夷渠帅栋蚕与始复（今云南永胜北）、榆、栋（今云南姚安北）、连然（今云南安宁），滇池（今云南澄江西），建伶（今云南晋宁南）、昆明诸部落叛汉，杀长吏。益州太守繁胜率兵征讨，被蛮军战败，退保朱（音殊）提（今云南昭通）。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刘秀派武威将军刘尚等率广汉、犍为，蜀郡等郡军及朱提夷军共1.3万人，前去镇压。刘尚率军渡泸水（即今金沙江），入益州界，诸蛮夷叛军知大军已到，纷纷弃营垒而逃。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汉军与栋蚕等蛮夷军交战数月，蛮叛军屡战屡败。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正月，汉军乘胜追击蛮军至不常县（今云南保山），斩栋蚕以下7000人，俘获5700多人，诸夷叛乱遂告平定。

汉灵帝熹平五年（公元176年），诸蛮夷起兵反抗东汉后期的反动统治，攻下郡治（今云南澄江西北），捉住太守雍陡。汉王朝派御史中承朱龟率军围剿，被蛮军击败。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益州远在边外，且“蛮夷喜叛，劳师远役，不如弃之”。太尉椽李颐积极主张派兵讨伐。于是，汉王朝遂任命李为益州太守，与刺史庞芝调发板蛮军前去围剿，结果将诸蛮夷军击破，雍陡被放回。

二、镇压哀牢夷反汉的经过

汉明帝永乎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今云南盈江东北）王柳貌率其部众5，1万多户，共55.3万多人附汉。汉王朝以其居住地哀牢，博南（今云南永平西南）二县，并将益州郡西部都尉所辖之不韦（今云南保山）、唐（今云南永平西北）、比苏（今云南云龙），揲榆（今云南大理北）、邪龙（今云南巍山北）。云南（今云南祥云东南）六个县合并为永昌郡。郑纯为西部都尉时，为官清廉，哀牢诸蛮夷均诚心依附于郡守的统治。郑纯死后，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哀牢王类牢不满守令的政令，遂杀守令而率部众反汉，攻拔了唐城。太守王寻逃奔楪榆。哀牢以3000兵马攻打博南（今云南永乎西南），声势越来越大。汉王朝为镇压哀牢的反汉，招募越、益州，永昌等郡夷汉人，组成9000人的军队，前往征讨。建初二年（公元77年）春，邪龙县的昆明夷卤成等应募，并率部众与诸郡兵将类牢军击败，类牢被斩。

三、镇压邛都夷反汉的经过

邛都（今四川西昌）夷，聚居于汉武帝所开辟的邛都县一带地区。王莽当政时，郡守枚根调邛人长贵为军侯。更始二年（公元24年）长贵率部众攻杀了枚根，自立为邛谷王，充任太守，以后降服于公孙述。刘秀统一蜀地后，封长贵为邛谷王。并十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授予长贵以越太守印绶。

汉光武帝建武十九车（公元43年），当武威将军刘尚率军进击益州夷时，途径越。长贵惧怕南方由汉统一后，“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纵，即聚兵起营台，招呼诸君长（蛮夷首领），多酿（制）毒酒，欲先以劳军，因袭击尚”。长贵的这一阴谋，被刘尚军侦知，即先分兵占据邛都，击杀长贵，将其家人迁于成都。

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姑复夷又起兵反叛，益州刺史率军平定，斩其渠帅，将叛乱平定。

四、平定永昌益州蜀郡诸夷反汉的经过

汉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卷夷大牛种落封离等反汉，杀死遂久县令。第二年又进一步联合了永昌，益州、蜀郡诸夷反抗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掀起大规模起义。起义夷众达10多万，攻破20余个县邑，以烧官府、毁城廓来发泄他们多年倍受压迫的愤怒。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述说：“骸骨委积，千里无人”。东汉王朝十分震惊，命益州刺史张乔选调能征惯战之将率兵镇压。

张乔遂派遣从事杨竦率兵至揲榆，向诸夷起义军准备进击。但惧于夷军兵盛，未敢妄动。便先以诏书告三郡吏民，招募勇士，许以重赏。于一切准备就绪后，遂于永初六年（公元119年）十二月，与封离等夷军大战，夷军战败，被汉军残酷地斩杀3万多人，被俘1500多人。封离等惶恐，遂杀了其共同起兵的渠帅，被迫投降于杨竦，其余36个种落也降于汉朝，西南夷人民的一次大规模起义遂告失败。杨竦为了缓和诸夷人的愤怒情绪，将任意欺压诸夷人民的贪官污吏90人的罪恶行为，上书汉朝廷治罪。

五、镇压都夷反汉的经过

早在西汉武帝时期，都夷居住区（约今四川汉源一带），即划为都县。到汉明帝永平中年（约公元66年前后），都夷以及与都夷杂居的汶山夷以西的白狼、木、唐等100多个小国部落130多万户，共600万以上的人口，均统一于东汉王朝的统治之下，称为臣濮。当时的益州刺史朱辅，治理这一地区，政绩卓著，颇得汉夷各族人民的拥护。

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蜀郡三襄种夷与徼外衍种夷合兵3000多人反汉，攻夺蚕陵城（今四川省茂汶西北），杀死长吏。汉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春，旄牛夷（居于今四川汉源一带地区）起兵反汉，攻打零关（今四川洛峨边），杀长吏。益州刺史张乔与西部都尉

率兵将其平定。

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蜀郡三襄夷复起兵，攻占蚕陵，杀长吏。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犍为属国夷人部落也起兵反汉。益州刺史山昱，率军击破夷军部众，斩首1400多，其余均逃散。

第十三章 东汉征匈奴的战争

东汉王朝时期，对北匈奴共有两次大规模战役，对南匈奴也有三次规模较大的战役。

东汉征北匈奴的第一次战役发生于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二月，止于同年四月。汉王朝出动四路大军，共约4.5万骑兵，进击北匈奴，三路无所获，只有奉车都尉窦固所率之军，获得胜利。

东汉征北匈奴的第二次战役发生于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六月，止于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二月。汉军统帅窦宪统率汉与南匈奴联军，经三个阶段作战，终于彻底打败了北匈奴。

东汉征南匈奴的满夷谷战役发生于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冬，十一月，止于永元七年（公元95年）正月。汉王朝以邓鸿为行车骑将军，统率汉、乌桓、鲜卑共4万人，与南匈奴叛军逢侯军交战于大城塞、满夷谷地区，逢侯军被歼1.7万多人。

东汉征南匈奴单于檀虎泽战役发生于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九月，止于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三月。汉王朝以大司农何熙行车骑将军，统率缘边十郡兵马及鲜卑骑兵共约3万人，进击叛汉的南匈奴单于檀，南匈奴军战败，单于檀于虎泽降于汉朝。

东汉征南匈奴叛军的马邑战役这次战役的作战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作战，在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夏，汉度辽将军马续，统率缘边郡兵及乌桓、鲜卑、羌胡等军共3万多人，进击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军，当年冬天，匈奴军战败，车纽率其部众降于汉。第二阶段作战发生于汉顺帝永和六年（公元141年）夏，汉军干通天山地区将吾斯击败，羌胡、乌桓等70力人降于汉朝。

第一节 东汉征北匈奴的第一次战役

一、东汉征北匈奴第一决战役前的汉匈基本形势

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冬，平定了蜀地的割势力公孙述。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称帝于五原地区的卢芳残余势力彻底灭亡，中国除匈奴和西域地区之外，已全部为刘秀统一于东汉政权之下。

刘秀在建立东汉政权之初，由于四面受割据势力所包围，因而，首先扫平各方的割据势力便成了他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对于一些兄弟民族统治者的进袭则无力顾及。到建武九年（公元33年），才首次派大司马吴汉率军迎击匈奴舆单于和卢芳的入袭。作战一年，未获任何战果，匈奴舆单于更加骄横，日益频繁地袭略汉北部边疆地区。刘秀为了避其锋芒，将幽州、并州一带沿边郡县吏民内迁至常关（今河北涞源北）、居庸关＜今河北昌平西北）以东地区，并撤除了一些郡县。匈奴奴隶主得寸进尺，将东汉王朝的暂时退守，视为软弱可欺，遂命其左部部落进占塞内一些地区。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匈奴军进袭上党（今山西长子西南），扶风（今陕西兴平境）、天水（今甘肃天水）。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匈奴军再次进袭上登（今河北怀来）、中山（今河北定县）。东汉王朝在此时期，无力回击匈奴的入袭，只能少量增加边疆郡县的兵力，修筑亭侯，完善烽火报警设施，进行消极单纯防御，北部边疆的战略形势，显得极为被动。

西汉时的呼韩邪单于死去后，于新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传至第六位单于舆，称呼都而尸道皋若千单于。他雄心勃勃，自比英武一世的冒顿单于，乘新莽末年的战乱时机，逐渐脱离了汉王朝。东汉初年，渔阳太守彭宠叛变时，舆单干与彭宠连兵。后来，又支持割据势力卢芳称帝，多次向汉边境郡县进袭，给汉造成巨大的威胁，战略上摆出一付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舆单于当政30年，于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死去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互争单于位的斗争，匈奴奴隶主也就无心南犯，暂时停止了对汉边境的袭掠。

二、南匈奴单于的崛起和附汉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春，匈奴日逐王比被其所部八大人立为呼韩邪单于后，由于兵强马壮，北匈奴蒲奴单于不敢进击比单子，比单于为壮大自己的势力，遂决心臣服于汉。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春，南单于派其弟左贤王莫率领万余骑兵进攻北单于弟薁鞬左贤王，将左贤王生擒，进而击破北单于之军，俘获1万多人，马7000匹，牛羊1万多头。北单于震恐，退却1000多里。不久，北匈奴之薁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部众3万多人归降南单干。南单

于接着再次派使者入汉，奉藩称臣，献国珍宝，求汉派使者监护。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刘秀命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出使南匈奴。当年冬天，南单于入居西河，命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汉遂又全部恢复了缘边八郡。南匈奴由于有了东汉王朝的护卫，力量不断增强，其统治集团内部也比较稳固。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冬，北匈奴出动6000~7000骑兵，进攻五原，随后又进袭云中，均为南匈奴击退。

三、东汉征北匈奴第一决战役前北匈奴的节节进逼

汉光武刘秀在位33年，于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病故，汉明帝刘庄继立。刘秀在位期间，匈奴虽有时也派出使者向汉请和，但大部时间却是不断进袭汉北部边疆。刘秀死后，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发展。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74年），也即胡邪尸逐侯鞮单于长即位的第二年，北匈奴依仗其日益增强的实力，数度袭掠汉边境地区，同时南匈奴部分贵族也有叛离汉王朝的迹象，东汉王朝甚感忧虑。不久，北匈奴欲与汉互通关市，派遣使者要求与汉和亲，汉明帝为避北匈奴的锋芒，只好答应了北匈奴的要求。东汉王朝为了防止南匈奴与北匈奴合势，开始设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为度辽将军，副校尉来苗、左校尉阎章、右校尉张国率黎阳虎矛营屯驻于五原曼柏（今内蒙古五原），骑都尉秦彭率兵屯驻于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当年秋天，北匈奴果然派遣2000骑兵至朔方，制作马皮船，准备南渡黄河，以接应南匈奴之部落。后来，因汉军已有戒备，北匈奴不得不引军而还。但不久北匈奴又数次派兵侵掠汉边境郡县，杀掠甚众，边境城邑四门紧闭，人心惶惶不安，朝中为之震动。

东汉王朝，为了缓和与匈奴的紧张局势，不得不再次派遣越骑司马郑众出使北匈奴。但这一出使北匈奴的行动，并未起到安抚北匈奴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助长其侵掠气焰，继续向汉边境进犯。至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谒者仆射耿秉鉴于北匈奴日益加剧的侵袭行动，奏清汉明帝出兵征讨北匈奴。汉统治集团也深感大势所逼，不得不战。

此时，东汉王朝，经过光武中兴，再经汉明帝的16年经营，社会经济得到较好的恢复，百姓殷富，府库充实，有了相当雄厚的战争潜力。因而，东汉王朝决心遏制北匈奴的南犯，打通西城诸国，恢复汉武帝时期的强盛局面。

四、东汉北匈奴两军作战序列

东汉军

将领谒者仆射祭彤

度辽将军吴棠

奉车都尉窦固

骑都尉耿忠

驸马都尉耿秉

骑都尉秦彭

骑都尉来苗

护乌桓校尉文穆

南匈奴左贤王信

总兵力骑兵4.4万人

北匈奴军

将领南呼衍王

匈林王

五、汉北匈奴双方作战策划

东汉王朝此次作战目的明确，作战策划颇为详尽。汉王朝按决定先向天山一带进击，首先夺取伊吾（今新疆哈密以西地区），接着“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同时判定，汉如若出兵天山，匈奴必并其大军前往相助，为分散其兵力，决计以部分骑兵向北匈奴东部地区进击，以阻止其在天山一带集中主力的行动。于是，东汉王朝于汉明帝永乎十五年十二月。以耿秉为驸马都尉，窦固为奉车都尉，以骑都尉秦彭为耿秉之副，耿忠为窦固之副，率兵出屯凉州（今甘肃武威地区），准备向北匈奴进击。

匈奴统治集团对汉军大举进攻，似仍采取退让逃避的对策。

六、东汉征北匈奴第一次战役作战经过

汉明帝十六年（公元73年）春二月，汉军完成作战准备后，即开始向北匈奴进军。谒者仆射祭肜与度辽将军吴棠、南匈奴左贤王信率河东、西河羌、胡及南匈奴1.1万骑兵出高阙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境），向涿邪山（今阿尔泰山东部）进袭北匈奴皋林温禺犊王部。奉车都尉窦固与其副将耿忠统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庐水羌，胡1.2万骑兵出酒泉塞（今甘肃酒泉地区），向白山（今新疆天山北麓）进袭。驸马都尉

耿秉与其副将骑都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1万骑兵出居廷塞，向三木楼山（似为涿邪山西部）方向进攻。骑都尉来苗与护乌桓校尉文穆，率太原，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等郡兵及乌桓、鲜卑1.1万骑兵出乎城塞（今山西大同地区），向匈奴水（今蒙古翕金河）方向进击。

东汉四路大军进入匈奴境内后，进展均较顺利，但战果却廖廖无几，只有窦固一路战绩较大。窦固、耿忠军进至天山地区，击败匈奴呼衍王，斩首千余人，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占领了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地区伊吾），设置宜乐都尉，留驻吏卒屯田伊吾卢城地区，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作战目的。耿秉，秦彭军击败了匈林王部，深入大沙漠600多里，至三木楼山，再未遇敌人抵抗，率军而归。骑都尉来苗与护乌桓校尉文穆军，进抵匈河水附近，由于匈奴部众早已撤走，而未获任何战果。祭彤与南匈奴左贤王信之军他未获战果，当其出高阙塞900里，遇见一小山时，左贤王信妄称此小山即涿邪山，故祭彤到达此山后，即引军而还。至此，东汉明帝征北匈奴之第一次作战，遂告结束。

第二节 东汉征北匈奴的第二次战役

一、东汉第二次征北匈奴战役前汉匈战和形势的变化

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春，奉车都尉窦固，谒者仆射祭彤、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来苗等四路大军进击北匈奴后，当年北匈奴派兵入袭云中，兵至渔阳，太守廉范击退敌军。汉明帝随即遣使者高弘发三郡之兵追击匈奴军，未获战果而归。

东汉夺占伊吾卢地区之后不久，便派假司马班超出使西域，略定西域诸国，以驱除匈奴在西域的势力。

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十一月，东汉王朝命奉车都尉窦固率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共1.4万骑，出敦煌昆仑塞，向西域地区的匈奴势力进攻。首先击败了白山一带的匈奴部族于蒲类海上，接着便向车师诸国进击。窦固当时因车师后王国路途较远，山高谷深，便想先攻取车师王国，但耿秉却认为攻取了车师后王国，前王则不战自降。于是，汉军按照耿秉的主张，攻取了车师后王国，车师前王闻讯而降。东汉王朝按照西汉时期的政策，设置了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以陈睦为都护，司马耿恭为戊校尉，谒者关宠为己校尉。

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春，二月，窦固率军回京后，北匈奴便命左鹿蠡王率领骑兵2万进攻车师，车师后王安得被匈奴军斩杀，后来在耿恭的奋力抵抗之下，匈奴兵被迫撤走。七月，匈奴军又来攻打耿恭军，仍未奏效，撤军而退。当年八月，汉明帝病故，由太子刘炟即位，称汉章帝。此时，匈奴又乘机向西域都护进攻。十一月，北匈奴围攻已校尉关宠，车师诸国又叛离汉朝，归降匈奴，并与匈奴共同进围戊校尉耿恭。耿恭率吏卒苦战数月，兵疲食尽，只好煮铠甲和弩弓上的皮革为食，已处于极度困苦之中。但耿恭与士卒精诚团结，抱定决战到底的决心，城中已只剩数十人，仍顽强坚持作战。单于料耿恭已处绝境，必然降服，便派人劝耿恭投降，许诺赐以白屋王。耿恭怒杀匈奴来使，单于更加震怒，加紧围攻汉军，仍不能取胜。

关宠上书天子求救，汉章帝命公卿议定对策，大司空第五伦认为不应发兵救援。司徒鲍昱怒斥了第五伦的观点，认为耿恭等忠勇抗击匈奴的众兵，已处危难之地，如若不救，外长蛮夷的威风，内伤忠勇将士之志，以后边疆再有战事，将无人拼死而战。章帝遂命耿秉为征西将军屯兵酒泉，行太守事。命酒泉太守段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共7000人前往救援耿恭等军。段彭军击破车师，斩首3800人，俘敌3000余，北匈奴之军惊退。车师又降于汉。接着派兵2000解救被围困之耿恭军，乘夜入城。耿恭军仅剩24人，在返回汉边境的途中，由于匈奴军紧紧追赶，汉军且战且走，耿恭的士卒体力极度虚弱，又死去13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此时期之内，东汉与匈奴战争的残酷景况。

二、北匈奴的逐渐衰落

建初二年（公元77年）三月，东汉撤网伊吾卢屯兵，北匈奴遂又占据车师诸国。但自此以后，北匈奴便逐渐衰落。建初八年（公元83年）夏，六月，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3.8万人，马2万匹、牛羊10余万，至五原塞向东汉降服。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十二月，武威太守孟云奉诏与北匈奴互通关市，北单于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赶牛马万余头与汉客商交易，汉边境官吏盛情接待北匈奴官吏，汉匈关系稍稍趋向缓和。但南单于听说此事，乃秘密派遣兵马出上郡，抄掠北匈奴的牛马。元和二年（公元85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率部投降汉朝。前后降服者73批。北匈奴更加衰落，各部落众叛亲离。当年秋，南匈奴进击北匈奴温禺犊王部，双方战于涿邪山，南匈奴军斩杀了温禺犊王而归。此时，北匈奴已处于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的困境。

章和元年（公元87年），鲜卑人出兵进击北匈奴左地，斩北匈奴优留单于，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部须等58部，共20余万人，胜兵8000人，至公中、五原、朔方、北地郡降于东汉王朝，北匈奴已濒临彻底失败的前夜。

三、东汉征北匈奴第二决战役的起因

汉章帝于章和二年（公元88年）二月病故，由太子刘肇即位，称汉和帝。和帝由于只有10岁，便由其母窦皇太后执政。窦太后精明干练，东汉政权至汉和帝时虽已开始呈现退坡迹象，但窦太后为首的东汉统治集团，仍有乘光武中兴以来的余威，恢复汉武帝时期强盛局面的雄心。

此时，一些有利的外因条件也为东汉征匈奴提供了良好的战机。其一是班超在西域地区已节节取胜；其二是北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争立单干的斗争，内部四分五裂。

南匈奴屯屠何单于，见北匈奴内部大乱，且连遭灾荒，遂想借机出兵并灭北单于，统一匈奴全境。于是，便上书请求汉朝也同时出兵协助。屯屠何在上天子书中说："臣与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帅杂议方略，皆日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戍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须日逐鲜堂轻从虏庭远来诣臣，言北虏诸部多欲内顾，但耻自发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击，必有响应。今年不往，恐复并壹。"屯屠何单于同时建议：发南匈奴国中之精兵，以左谷蠡王师子、左呼衍日逐王须訾率骑兵1万出朔方；左贤王安国，右大且渠王交勒苏率骑兵1万出居延塞；屯屠何自率骑兵万余人屯五原、朔方塞以为拒守。并请求天子派轨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诸太守同时率军北进。请北地、安定太守率兵各屯守要塞，以防不测。屯屠何奏告汉朝说，其各部兵马将于九月调集河上，请天子准其所请。

四、东汉兴兵前的争议和决策

东汉王朝接到南匈奴屯屠何单于的奏章之后，窦太后便以单干之书令耿秉读阅。耿秉看罢进宫说：“过去汉武帝统一天下，欲使匈奴臣服，可惜天不作美，未能如愿。宣帝时期，呼韩邪单于降服，边境安定，全国统一，吏民休养生息60余年。至王莽篡位，变更单于称号，引起动乱，单于遂叛离汉朝。乌桓、鲜卑归顺汉朝后，威镇四夷，其效如此。现在天赐良机，北匈奴内部纷争，南匈奴主动请求倾国出动，征伐北虏，以夷制夷，国家之利，应予准奏”。耿秉并表示深受皇恩，愿为国家效命。

窦太后赞同耿秉之议，但尚书宋意却反对耿秉的建议。认为夷狄反复无常，在其力量强时即侵凌弱者。白汉兴以来，国家数度征伐匈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白鲜卑归顺以后，斩获匈奴万数，夷虏相攻，汉坐享大功，且未费一兵一卒。如若听信南匈奴之策，让其吞并北匈奴，则鲜卑人必然受到限制。鲜卑外不能侵掠匈奴，内不能向汉朝请功，必然侵掠汉边境。宋意建议说：“今北虏西遁，请求和亲，宜因其归附，以为外扞，巍巍之业，无以过此。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指南匈奴），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诚不可许。”

窦太后经过抉择，决意按耿秉议，发兵进击北匈奴，但同时也采纳宋意之议，不使南北匈奴合并为一国，以利分而治之。东汉三公九卿得知太后决意进兵，一齐向太后进谏，力图阻止此次征战，被窦太后回绝，决心以窦宪为车骑将军，统率汉匈联军，戴罪出征。

五、东汉北匈奴两军作战序列

东汉军

统帅车骑将军窦宪

副将执金吾耿秉

将领度辽将军邓鸿

副校尉阎盘

司马耿夔

司马耿谭

中护军班固

军司马吴汜

军司马梁讽

司马任尚

司马赵博

南奴匈军

统帅屯屠何单干

将领左谷蠡王师子

右呼衍日逐王须訾

左贤王安国

右大且渠王交勒苏

汉匈联军总兵力4.8万余骑兵

北匈奴军

统帅北匈奴单于

将领温犊须王

日逐王

温吾夫渠王柳鞮

右温禹鞮王

总兵力失考

六、东汉匈奴双方作战策划

汉军第二次征匈奴战役，从部队的编成到作战目标，都进行了详尽的策划和周密的准备。汉军决定发北军五校之军：步兵，长水、射声、屯骑、越骑，出动黎阳营、雍营之军，调发缘边12郡的精骑（云中、定襄、雁门、代部、朔方、五原、上郡，西河、安定、北地，渔阳、上谷郡）；选拔边境郡县的鲜卑、乌桓等羌胡骑兵，此外还有南匈奴之精锐骑兵。东汉将这些骑兵编组为三路大军，分别向北匈奴进军，约期会师于涿邪山（阿尔泰山东脉及约今蒙古戈壁阿尔泰山西部地区），以期歼灭北单干之军。

北匈奴对汉军的此次进攻，似无恰当对策，故招致惨败。

七、东汉征北匈奴第二次战役作战经过

此次战役历经三个阶段，北匈奴经汉军三次打击，便宣告灭亡。

一、阶段作战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六月，汉军统帅车骑将军窦宪开始率三路大军出发。

车骑将军窦宪与执金吾耿秉各率精骑4000，会同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的1万骑兵，共1.8万骑，由朔方郡的鸡鹿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境）北进；南匈奴单于屯屠何，率匈奴万余骑兵出满夷谷（今内蒙古固阳县境）；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8000骑，会同南匈奴左贤王安国所率之1万骑兵出稒阳塞（今内蒙古包头地区）。三路大军齐向涿邪山进发。为保障主力的安全，窦宪派出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率左谷蠡王师子和右呼衍王须訾等1万精骑为先锋。当汉军进至稽落山（今蒙古吉尔连察汗岭西北）地区时，与北单于统率的主力展开激战，大败北匈奴军。北匈奴军溃散，北单于遁走。汉军猛烈追杀，一直追至私渠比鞮海（今蒙古邦察干湖），斩杀匈奴名王以下1.3万人，获马牛羊等百万多头。温犊须、日逐、温吾、夫渠王柳千等81部率众归降者，前后达20多万人。窦宪，耿秉等登上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远离边塞3000里，令中护军班固刻石作铭，记述汉军的威德和丰功。

窦宪派出了军司马吴汜、梁讽，携带金帛去招降北单于，然后班师回朝。

吴汜、梁讽在追赶单于的途中，又接受了1万多人的投降，进至西海（今蒙古杜尔格湖）才迫及单于。吴汜等向北单于宣明汉朝的威德，赐单于以金帛等物，单于表示降服，愿意仿效呼韩邪单于，做汉的藩属，保国安民，于是，便随吴汜等率众东返。当他们到达私渠北鞮海地区时，得知汉军已班师入塞，单于乃派其弟右温禺鞮王入朝奉侍。

窦宪征匈奴的胜利，朝中大喜，窦太后派使者持节至五原拜窦宪为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两万户。窦宪坚决不受，窦宪回京后，又被封为冠军侯，食邑两万户，仍坚决不受封赏。

二、作战阶段北匈奴单于弟入侍后，汉以北单于未能亲自入朝，认为北单于不是真心诚服，窦宪遂准备第二次征讨北匈奴。

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五月，窦宪派副校尉阎盘率2000骑兵进击屯驻于伊吾卢地区的北匈奴军，阎窦军旋即将匈奴军击破，占领了伊吾卢地区，车师前后王均遣子入侍。

汉和帝永元二年七月，窦宪率军出屯凉州，并以侍中邓叠为征西将军，做自己的副手。窦宪统辖陇西、汉阳、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张掖、敦煌、酒泉等郡兵马。

北单于见汉送回其弟右温禺千王，知道汉王朝责怪，于是便准备亲自入朝，并派出使者入塞通告。窦宪派班固、梁讽前往迎接。这时，南匈奴又上书请求出兵击灭北匈奴，接着便命左谷蠡王师子等率领左右两

部8000骑兵出鸡鹿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境）。中郎将耿谭命从事前往监护南匈奴军。南匈奴军出塞后，顺利进至涿邪山，留下辎重，轻兵疾进奔袭北单于庭。左部兵从北面越过西海（今蒙古杜尔格湖和哈腊湖以北），进至河云（今蒙古乌布苏诺尔省沃勒吉附近）地区；右部兵从匈奴河水（今蒙古拜达里格河）以西，绕过天山（今蒙古杭爱山东脉），南渡甘微河（今蒙古札布汗河）。两军会合后，乘夜包围了北单于本部。北单于大惊，率精兵千余人与南匈奴军激战。北单于负伤落马，又慌忙爬上马去，仅率轻骑数10人而逃。南匈奴军缴获了北单子的玉玺、俘获阏氏及男女5人，斩首8000人，俘虏数千人。这时，南匈奴已相当强盛，拥有人口3.4万户，共23万多人，胜兵5万多人。

三、阶段作战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大将军窦宪鉴于北匈奴遭南匈奴打击后，已极度衰弱，遂想彻底将北匈奴击灭。于是便于二月，派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率军出居延塞，将北单于部包围于金微山（即今阿尔泰山似在今新疆阿勒泰附近地区），大破北匈奴军，俘获北单于母，斩名王以下5000多人。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向。耿夔等率军出塞5000多里而还，这是自汉代出兵以来，最远的一次进军。朝廷为表彰耿夔的功勋，封其为粟邑侯。

北单于弟右谷蠡王子除鞬自立为单于，率右温禺鞬王、骨都侯以下数千人，驻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地区，遣使者入塞。大将军窦宪上书，请立于除鞬为北单于。朝廷允诺，并于永元四年（公元92年），命耿夔出使北匈奴授北单子玺绶，同时以中郎将任尚持节护卫，屯驻于伊吾，与南单于同等对待。至此，实现了窦太后既征服北匈奴，又与南匈奴分而治之的战略企图。

八、汉匈双方战后的动态

北匈奴平定后不久，永元四年（公元92年）大将军窦宪被诛。永元五年（公元93年），于除鞬单于复叛离汉朝，率部众北迁，汉王朝遂派将兵长史王辅，率骑兵千人与中郎将任尚共同追击北匈奴，旋即将北单子于除鞬斩杀，尽歼北匈奴之军。

自北匈奴衰败以来，北方的鲜卑部族势力日渐强盛，乘北匈奴的节节败退，逐渐据有北匈奴的疆域，流散于北匈奴故地的匈奴部落也尽为鲜卑所有，东汉北方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正在孕育成长之中。

东汉征北匈奴第二次战役评述

东汉征匈奴之战，历经汉明帝与和帝两代帝王之奋战，终于于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将北匈奴彻底击败，并于其后两年，灭亡了北匈奴。从而，使汉代北部边患由此暂时解除，中国北方地区遂被东汉王朝统一。东汉王朝这一战争壮举，为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起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作用。

东汉征匈奴战争的胜利，既依靠了统一战争正义性，又有其制胜的一些特定历史因素。基本的有以下几点：

东汉国力的强盛经济实力的强弱是自古以来构成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东汉王朝自汉光武帝刘秀即位，至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1年）窦固第一次征匈奴之前，经历了四五十年的发展经济、休养生息阶段，一扫西汉末年衰微败破的动乱局面，进入了一个国富兵强的兴盛时期。这就为战争准备了较为充足的人力物力条件，从而使战争的胜利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东汉政略和战略的正确东汉时期，从窦固至窦宪两次征匈奴战役，都是以羌胡、鲜卑、乌桓、南匈奴与汉军组成联合部队，这一正确的战略决策，使汉军占有了明显的战略优势。它把汉朝先进的治军和作战思想以及先进的兵器，与羌胡骑兵的骠悍勇猛揉为一体，匈奴骑兵自然不是东汉军队的对手，这是东汉军队制胜匈奴最恰当的科学战略结构。然而，历代史学界有些人却把东汉征匈奴的胜利归结为“以夷制夷”的结果，这不能不是以封建的正统观念推导出来的皮毛之见。

匈奴统治集团的四分五裂，国力的日趋衰落，使其难以与强大的东汉中央政权相抗衡一方面匈奴分裂为南北单于之后，南匈奴附汉，与汉族杂居，不断接受汉族先进政治与经济文化的影响，政治安定，六畜兴旺，吏民安居乐业，对北匈奴诸部日益产生着巨大的吸引力，使北匈奴一些部落不断分化出来，逃归南匈奴；另一方面，北匈奴不断发生单子争立事件，统治集团内部互相猜忌仇杀，难以形成对外作战的整体力量。再加之当时北匈奴连年受到旱蝗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北匈奴失去了起码的战争潜力。因而，北匈奴的国力江河日下，在东汉重兵集团的打击之下，便冰消瓦解。

东汉征匈奴的胜利还仰赖于一批能征惯战之将诸如窦固、窦宪、耿秉，耿夔、任尚等，颇具将帅才能，窦宪、耿秉在统率汉军征匈奴的第二次战役之第一阶段作战中，实际已将北匈奴基本扫平，斩匈奴名王以下1.3万人，获牲畜百万头，匈奴一些显贵王侯81部，共20万众降于东汉，北匈奴的彻底覆亡已是指日可待。第二阶段作战时，窦宪又使南匈奴军几乎将北单于一举歼灭。第三阶段作战，东汉王朝抓住战机，派出精骑，将北单于余部歼于金微山。窦宪等从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六月，至永元三年（公元91年）二月的19个月期间，连续三次进击北匈奴，以及中间穿插的击灭伊吾卢地区北匈奴势力的作战，环环相扣，挥洒有序，充分体现了东汉诸将的统兵御众之能。据《后汉书·耿弁列传》记载耿秉的事绩说“秉博通书记，能说‘司马兵法’，尤好将帅之略”，“秉性勇壮而简易于事，军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结营部，然远斥侯，明要誓，有警，军陈立成，士卒皆乐为死”，“匈奴闻秉卒，举国号哭，或至梨面流血。”然而，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往往使杰出将帅难逃“声威震主”的厄运。窦宪终于在帝后权力之争中，被迫令自杀。耿秉虽早于窦宪先亡，但也被贬入了窦氏党羽之列，撤除了他的封地。

史学家范晔，在论述窦宪之功勋与卫青、霍去病相比时，慨叹之余疾呼，窦宪仅率羌胡边杂之师，一举荡平匈奴，“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对不但不称颂他的功绩，反而遭迫令自杀的结局，愤愤不平，进而引用东方朔的话说：“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暗喻将相之才受重用还是遭遗弃截然不同的下场。这在客观上揭示了封建社会吞噬人才的弊端，包含着值得深思的哲理。

第三节 东汉征南匈奴叛军的满夷谷战役

一、南匈奴内部的分裂

北匈奴灭亡后，南匈奴单子屯屠何在当政6年后死去，由单于宣之弟安国于汉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继立为南单于。

在安国当初为左贤王时，便无人称誉，左谷蠡王师子“素勇黠多知”，以前单于宣及屯屠何都很喜欢他的勇略刚毅。所以，数次命他率兵进攻北单于，南单于和汉朝廷都屡加赏赐。因而，南匈奴人均非常敬服师子，而不附安国。安国由此更加忌恨师子，想将师子诛灭。恰巧新降服的胡人，因已往多次被师子率军袭掠，对师子也很仇视。于是，安国便联络新近降服的胡人共同谋害师子。此事被师子发觉，师子便率其左部迁居于五原界（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一带）。安国单于每次龙会议事，师子都称病拒绝参加，单于的愤恨情绪与日俱增，寻找机会诛杀师子。

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春正月，单于安国与汉使匈奴中郎杜崇不和，单于便上书告杜崇。杜崇也上书告发单于，说安国单于欲诛杀左贤王师子和左台且渠刘利，同时右部新近降服的匈奴人，准备与安国共谋起兵反叛汉朝，请求朝廷下令西河（今山西离石），上郡（今陕西榆林）、安定（今甘肃泾川县境）三郡应加强戒备。汉和帝命大臣商议对策，大臣们认为：“蛮夷反覆，虽难测知，然大兵聚会，必未敢动摇。”应派具有策略头脑的使者出使单于庭，与杜崇、行度辽将军朱徽及西河太守共同戒备匈奴。如果没有重大情况发生，则命安国将其罪恶大的部将斩首。如情况有变，可根据形势的需要，采取对策。于是朱徽，杜崇遂发兵进抵单于庭，以向安国示威。安国夜间忽听汉大军到，慌忙弃帐而走，急调新降之胡兵与其部众前去诛杀师子。

师子已预先得知消息，于是，便率其部众迁入曼柏城（今内蒙芑达拉特旗东南）。安国率军追至城下，师子已将城门紧闭。安国军无法入城，朱徽立即派使者劝安国和解，安国不听，攻城不克，便引军屯于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朱徽、杜崇急发诸郡骑兵追赶安国之军，安国部众大惊。这时安国舅骨都侯喜为等，伯汉军怪罪，一同被诛杀，遂共谋斩了安国。

二、满夷谷战役的起因

单于安国被其部将杀死后，南匈奴便拥立师子即位，称为亭独尸逐侯千单于。当初，与安国单于共谋诛杀师子的新降服的胡人，竺然欲杀死师子，于是，他们集中了500～600人，利用夜暗袭击师子。安集椽王恬率领保卫师子的士卒与之交战，将新降胡人击败。其余胡人均慌乱，于是，15部共20多万人遂反叛，并立前单于屯屠何之子薁鞬日逐玉逢侯

为单于，杀略吏民，焚烧邮亭卢帐，率军重返朔方，并准备远走漠北，一场大战即将拉开战幕。

三、东汉匈奴两军作战序列

汉军

行车骑将军邓鸿

越骑校尉冯柱

行度辽将军朱徽

乌桓校尉任尚

使匈奴中郎将杜崇

南单于师子

鲜卑大都护苏拔魔

乌桓大人勿柯

匈奴叛军

总兵力5.4万人（内含南单于军）

单于逢侯

总兵力据分析不少于2万人

四、东汉匈奴满夷谷战役作战经过

逢侯等率匈奴叛军，将度漠北的情况，引起汉王朝的严重关注，如不及时剿灭后患无穷。于是，便于永元六年（公元94年）九月，命光禄勋邓鸿行车骑将军，统率越骑校尉冯柱，行度辽将军朱徽发左右羽林军，北军五校及郡国之迹射，缘边兵，乌桓校尉任尚率乌桓，鲜卑军共4万人前往征讨。

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冬十一月，南匈奴单于师子与中郎将杜崇正率兵固守于师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逢侯率1万多骑兵围攻不克。此时，邓鸿大军已至关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约40公里），逢侯见汉大军至，便解围，欲率军退向满夷谷（今内蒙古包头市北约50公里）而去。南单于师子见汉军到达，即派其子率1万骑兵及杜崇所率之4000骑兵，与邓鸿所统率的大军，共追逢侯所率之叛军。双方在大城塞（今内蒙古杭锦旗东南）激战，逢侯军战败，被斩4000多人，

逢侯率部继续折向北走，奔满夷谷疾进。此时，任尚所率之乌桓大人勿柯和鲜卑大都护苏拔魔等8000骑兵，在满夷谷敲击逢侯军，一举将逢侯军击破，前后斩杀匈奴叛军17万多人，逢侯率领其余郎众逃出塞外，汉军遂于永元七年（公元95年）正月，引军而还。至此，满夷谷战役遂告结束。

五、东汉匈奴满夷谷战后的动向

汉和帝命越骑校尉率兵留驻于五原，罢归鲜卑、乌桓、羌胡等兵。为表彰鲜卑骑兵英勇作战，封鲜卑大都护苏拔魔为率众王。行车骑将军邓鸿，由于“坐逗留失利，下狱死。”

后来，汉和帝知道了安国单于反叛的原因，系出于朱徽和杜崇二人与单于不和，又禁止单于上书朝廷所致，也将朱、杜二人下狱治罪死。随后，便以雁门太守庞备行度辽将军。

逢侯率部众逃出塞外后，便分为二部，自率右部屯于涿邪山下；左部屯于朔方郡的西北，两部相隔数百里。

南单于师子，怪罪其右温禺犊王乌居战曾与安国同谋，欲追究考问，乌居战恐惧，随即率数千人反叛，逃出塞外，侵掠边境夷民。永元八年（公元96年）秋七月，度辽将军庞奋、越骑校尉冯柱率诸郡兵将乌居战军击败，其部众降汉。汉王朝将乌居战部众及陆续归降者2万多人分别安置于安定、北地郡。

汉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冬，逢侯之左部内部互相疑惧攻叛，1.5万人还归朔方塞，向汉降服。行度辽将军庞奋对其欢迎慰抚，并将其分别安置于北部边境诸郡。后来，逢侯部众饥困不堪，又被鲜卑袭败，无所归宿，逃奔塞内，降者络绎不绝。

第四节 东汉征南匈奴单于檀虎泽之战

一、南单于檀叛汉前匈奴的基本形势

南单于师子在位4年后死去，原单于之长子檀继立为新单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南单于檀便遣兵进击逢侯，逢侯军败，处境更加困难；至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冬十一月，北匈奴逢侯派使者向汉请求降服，愿效法呼韩邪单于，与汉和帝修好。汉和帝只是对逢侯厚加赏赐，不答其使。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6年）十二月，逢侯再派使者至敦煌贡献，同时表示请汉天子派使至匈奴，匈奴即以太子跟随大使至汉入侍。当时，和帝已死，邓太后临朝当政，只是加重赏赐，仍未答其使。

二、南单于的反叛

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夏，汉人韩琮随南单于檀入朝返回后，韩琮对单于檀说：“关东水潦，人民饥饿死尽，可击也。”单于檀信以为真。

促使南单于反叛，还有当时的一些社会原因，并非全是韩琮进言的结果。据《后汉书》等史料记载，在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前后，汉王朝的统治已日益腐朽，国力急剧衰落。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发生了羌族人民的第一次大规模起义，行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统率5万大军，败在羌军手下。不久，羌人又在北地拥立首领称帝。边境少数民族包括羌族、南夷和西南夷等，均不断起兵反汉。汉王朝虽竭尽全力出兵镇压，但是，汉军屡战屡败，已被世人看清汉王朝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前后，全国许多地区灾荒严重，“京师大饥，民相食”，当时三公上书皇帝，为了补救已经枯竭的国库，吏民均可以钱穀买官。永初三年夏，历来降服于汉王朝的渔阳乌桓和右北平胡人，出兵进击代郡（令山西阳高）、上谷郡（今河北怀来东南），沿海地区青州的张伯路率领人民起义，攻占了沿海9个郡。南单于正是在汉王朝烽烟四起，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听信了汉人韩琮的建议而决计起兵反汉的。

三、东汉南匈奴两军作战序列

汉军

统帅行车骑将军何熙

副将中郎将庞雄

将领辽东太守耿夔

行度辽将军梁慬（音勤）

使匈奴中郎将耿种

司马耿溥

司马刘祉

总兵力约3万人（含耿夔统率的鲜卑军）

南匈奴军

统帅南匈奴单于檀

将领南匈奴薁鞬日逐王

南匈奴骨都侯

南匈奴左将军

谋士韩琮

乌桓军率众王无何允

鲜卑军大人丘伦

总兵力判断不少于2万人

四、东汉征南匈奴虎泽之战的经过

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九月，居于雁门一带的乌桓率众王无何允与鲜卑大人丘伦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共统领骑兵7000人，进袭五原郡。五原太守率军于高梁渠谷与之交战，被乌桓率众王等军击败。此时，南匈奴单子檀率军，已将使匈奴中郎将耿种包围于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正在激战之中。

冬，十一月，汉王朝以大司农何熙行车骑将军，以中郎将庞雄为副，率羽林五校营吏士，调集缘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朔方、代郡、上谷、渔阳、辽西、右北平等十郡兵马共2万多人，并命辽东太守耿夔统率鲜卑军，同时以梁慬行度辽将军。

行车骑将军何熙命耿夔为先锋。以其司马耿溥，刘祉率2000兵与耿夔军协同作战。汉先锋军进至属国故城（似在美稷县境内），单于遣薁鞬日逐王率3000兵马截击汉军。耿夔自率主力攻击匈奴军的左翼，令鲜卑军攻击右翼，匈奴军被击败退走。耿夔挥军追击，斩匈奴军1000多人，杀其名王6人，获车辆、马匹甚多。鲜卑军所使用的马匹多病弱不堪，乘俘获匈奴马匹和物资众多的机会，遂将俘获匈奴之马匹、物资裹

胁出塞，叛离汉军，耿夔军不能单独追击。

南单于檀自率主力围攻美稷之中郎将耿种达数月之久，未能攻克，于是，便命其部众加紧急攻，耿种命人急至汉营请求救兵。

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正月，梁慬率8000兵马驰往解救，至属国故城，与匈奴左将军、乌桓大人丘伦所率之军激战，将匈奴左将军与乌桓军击败，斩其渠帅，杀3000多人。单于檀自率骑兵近8000人迎击梁慬军，将梁慬军包围，梁慬披甲率军左右奔击，所向无敌，单于檀遂率兵退至虎泽（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何熙遂统率全军追击。

三月，何熙军进至曼伯（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时，因突患急病，遂命副将庞雄统率梁慬，耿种之军，共1.6万步骑兵进击虎泽之单于檀军。

单于檀见汉军营垒众多，兵威势重，心中大惊，遂派左薁鞬日逐王向汉军请降。庞雄、梁慬等，命全军列陈受降。单于檀随后脱帽赤足，向庞雄等请宽恕反叛之死罪。汉王朝赦免南单于檀，不纠既往，待遇如初。

五、汉南匈奴虎泽战争后的动向

汉王朝将被南匈奴掠走之汉、羌等男女百姓1万多人造归。以平定南单于有功，正式拜梁慬为度辽将军，拜庞雄为大鸿胪，何熙病故于军中。

汉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年），逃往塞外涿邪山下自立为北单于的逢侯所部为鲜卑军击破，部众四分五裂，皆投奔鲜卑。元初五年（公元118年）春，逢侯率百余骑兵至朔方塞降于汉朝，度辽将军邓遵将其迁移于颍川郡。

第五节 东汉征南匈奴叛军的马邑战役

一、马邑战役前汉北方和南匈奴的基本战略形势

自汉安帝元初元年（公元114年）以来，汉王朝北方地区一直是烽火四起，各兄弟民族的反汉战争连绵不断，东、西羌诸部落及鲜卑等部族的反抗，使汉王朝北部地区在战略上处于顾此失彼，穷于应付的被动局面。

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汉王朝免去邓遵的度辽将军，以耿夔为度辽将军，时值鲜卑进袭边境，耿夔遂与南匈奴温禺犊王呼尤徽率新降之匈奴部众连年出塞，讨鲜卑。耿夔的不断用兵，引起了新降的匈奴吏卒的怨恨，暗中谋划叛汉。

南单于檀在位27年后死去，由其弟拔于汉安帝延光三年（公元124年）立为新单于。延光三年夏，新近降服的匈奴大人间族等率众反叛，同时欲胁迫温禺犊王呼尤徽一同叛逃，遭呼尤徽拒绝。使匈奴中郎将马翼派兵与南匈奴军追击，将阿族部众歼灭，汉匈边境暂时趋于安定。

二、南匈奴左部军的叛汉

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夏，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起兵叛汉，率领3000余骑兵进击西河郡，接着又联合右贤王部，共率近8000骑兵围攻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吏，声势逼人，汉王朝遂决定发兵征讨。

三、汉匈两军作战序列

汉军

度辽将军马续

使匈奴中郎将梁并

乌桓校尉王元

五原太守陈龟

中郎将张耽

总兵力先后出动约3万人（含张耽军）

匈奴叛军

南匈奴句龙王吾斯

南匈奴句龙王车纽

右贤王抑鞮

总兵力骑兵不少千2万人

四、东汉征南匈奴马邑战役经过

一、阶段之作战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夏，度辽将军马续与中郎将梁并、乌桓校尉王元，发缘边郡兵及乌桓、鲜卑、羌胡等军共2万多人，前往征讨。两军经过交战，南匈奴吾斯等军战败，转移兵力，继续攻掠城邑，杀伤吏民。

汉顺帝对吾斯等军的叛汉甚为恼怒，便派使者至南匈奴责备单于休利，命其以恩义招降叛军。不久，梁并因病免去使匈奴中郎将，汉以五原太守陈龟为使匈奴中郎将，陈龟责备单于休利无能治国，单于休利及其弟左贤王皆自杀。

大将军梁商鉴于匈奴叛军难服，遂上书顺帝，建议放弃武力征讨，以恩信招降。于是汉顺帝下诏马续，招降吾斯等叛军。不久，右贤王部抑鞮等1.3万多人降于汉。

当年秋天，吾斯等拥立句龙王车纽为单于，东联乌桓、西引羌戎及诸胡等数万人攻破京兆虎牙营，杀上郡都尉及军司马，并进袭并、凉、幽、冀四州。为躲避匈奴兵锋，汉王朝将受袭掠最重的西河郡郡治，迁移于离石（今山西离石），上郡郡冶迁移至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朔方郡郡治迁至五原。

冬，汉王朝遣中郎将张耽率幽州乌桓诸郡营兵，进击车纽军。双方大战十马邑（今山西朔县），匈奴军被斩3000多人，车纽等带领诸豪帅骨都侯降于汉军。至此，马邑战役第一阶段作战遂告结束。

二、阶段作战句龙王吾斯继续率其部众与乌桓军侵袭边境。汉顺帝永和六年（公元141年）夏，汉王朝命使匈奴中郎将张耽，度辽将军马续率鲜卑5000骑兵，与吾斯部众于穀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地区交战，斩吾斯军数百人。

张耽作战勇锐过人，且善于抚慰士卒，军中皆愿为其拼死力战，乌桓军屯于通天山（今山西石楼东），张耽军遂进至通天山下，攀缘绳索登山与乌桓军战，大破乌桓军，尽斩其渠帅，放回被其掠得的汉民。

第十四章 东汉统一西域地区之作战

东汉统一西域地区之作战，也是东汉王朝统一中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进行的主要作战活动如下：

东汉班超威服鄯善发生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春，二月。汉假司马班超率36名吏士，乘夜袭杀了匈奴派往鄯善的使者，使鄯善降服于汉。

东汉班超智降于阗发生于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春。班超智杀巫者，于阗王大恐，遂杀匈奴使者，降于汉。

东汉班超袭击疏勒之战发生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班超在降服了疏勒之后，奉命还京，行至于阗，疏勒被匈奴势力复占。班超立即返回疏勒，击降疏勒和尉头。

东汉联兵平定莎车龟兹之战发生于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冬十二月，至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十月，班超以于阗等国之军2.5万人，以制造假情报，迷惑了龟兹等诸国联军，一举将龟兹等国5万大军击败。

东汉平定月氏焉耆之战发生于东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月氏国遣其副王谢，统率7万大军进攻班超军。班超以劣势之军，坚壁清野，断敌借粮之道，逼降了月氏军。随后，班超以奇计诱杀焉耆王，顺利平定了焉耆。

东汉安帝及其以后时期再定西域之作战经过汉安帝、汉顺帝、汉桓帝时期不断与北匈奴争夺西域的作战，终于维护了西域的统一。

第一节 西域诸图的变迁和东汉统一西域的战略与政略

一、西域诸国的变迁

自西汉统一西域地区后，西域初为36国，到汉哀帝和平帝时期，即分裂为55国。西汉王朝为了统治西域诸国，最初设立校尉，做为其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最高官吏。汉宣帝时已将校尉改为西域都护，汉元帝时期又设立了戊、己两校尉。

西汉时代，匈奴一直将西域看做其右部的支柱，因而不遗余力地夺取西域的控制权。而西汉王朝为了斩断匈奴右臂，彻底战胜匈奴，也在竭尽全力统一西域地区，终于在汉武帝时，统一了西域全境。

王莽当政时期，西域诸国也起而反对王莽的腐败统治。匈奴奴隶主，此时则又乘机控制了西域地区。

东汉王朝建立后，在汉光武帝刘秀当政的初期，由于其全力推进中原地区的统一战争，无力经营西域。后来，匈奴势力衰弱，莎车王贤并灭诸国。贤死之后，各国便互相攻杀，小宛、精绝，戎庐，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阗所征服，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直至东汉的第二代皇帝汉明帝永乎十六年（公元73年）时，将军窦固率军击败北匈奴，进占伊吾庐地区后，东汉王朝才开始了对西域统一战争的进程。

二、东汉统一西域的战略和政略

东汉王朝统一西域的战争，仍然是西汉斩断匈奴右臂战略企图的继续。但东汉王朝的战争实力已远远不能与西汉相比，因而，东汉王朝统一西域的基本战略是依靠西域诸国中渴求统一的力量，来制服倒向匈奴奴隶主的分裂势力，用汉王朝的话来说，即是“以夷制夷”，以便弥补东汉国力不足，人力物力日趋匮乏的困难局面。

东汉王朝在推行统一西域地区的战争中，多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上分化瓦解相结合的策略。而在其统一了西城之后，则保留西域诸国原存的政权形式和社会组织机构，给西域各国以必要保护，防止匈奴贵族势力的卷土重来，这对西域地区的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促进的作用。

第二节 东汉班超威服鄯善

一、班超出使西域前汉匈争夺西域的形势

汉明帝永平中期（大约公元66年前后），北匈奴的势力又控制了西域诸国，并威胁一些国家共同出兵，入袭河西一带地区的郡县，沿西域汉边境郡县都受到严重威胁，城门日夜紧闭。

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春二月，派遣奉车都尉窦固率副将耿忠等，至天山进击北匈奴，窦固命班超率一部兵力攻取伊吾庐（今新疆哈密），与匈奴军交战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汉军斩获甚众，班超引军胜利而归。汉军占领伊吾庐地区后，设立了宜乐都尉，屯田驻守，西域在与汉隔绝65年后，遂又相通。窦固发现班超作战勇敢，遂决定派遣班超与郭恂出使西域，欲借汉军战胜北匈奴之声威，招降西域诸国。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东汉设置了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并以陈睦为都护。

二、班超威服鄯善的经过

班超等，率36名吏士首先到达了鄯善（亦称楼兰，今新疆若羌一带地区）。鄯善王广，惧于窦固所率大军攻占了伊吾庐地，因而开始对班超等人礼仪招待十分隆重。但不久，广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对班超等人冷淡疏远。班超等人分析认为，必定有匈奴使者已来到鄯善，招降王广。班超为弄清事实真象，证实自己的判断，立即逼问却善的侍者说："匈奴使臣已来到鄯善多时，现在他们在何处？"鄯善对匈奴来使的消息，本来是上下严密封锁的，侍者被班超的突然逼问毫无思想准备，只好照直说出详情。于是，班超隔离起侍者，暗中将36位吏士召集在一起饮酒聚会。酒至半酣，便说明了当前的险恶处境，激励大家说："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指匈奴使者）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吏士皆回答说："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班超见众人情绪激昂，即决定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有人提醒班超这件事关系重大，应与从事郭恂商议一下。班超回绝说："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当夜狂风大作，班超命10人持鼓隐藏于匈奴使者居住的营帐背后，看见火光便击鼓高喊，其余人持兵器弓箭埋伏于匈奴营帐两侧。班超布置停当便亲率数骑顺风放火，随之前后鼓声震响，匈奴使者大惊，班超乘机率领众吏士将匈奴使者30多人斩首，100多人被大火烧死。

二、天，班超返回住地，将全部情况告知了郭恂，郭恂大惊，心中害怕这次功劳为班超个人独占，班超猜透了郭恂的心里，遂告诉郭恂，

他们决不会独自占据这分功绩。

班超接着召见了鄯善王广，让他观看了匈奴使者的首级，鄯善王广及其吏民大为震惊。班超进一步向鄯善王广陈述了背叛汉朝的利害关系，劝慰其归顺于汉。鄯善王广遂降服，并遣子入朝为侍。

班超将降服鄯善的经过报告了窦固。窦固大喜，返京后即将班超的勇敢行为向皇帝禀奏，并请天子再派新使者出使西域，以进一步推进统一西域的斗争。汉明帝下诏说，有班趋这样的勇将良臣，还选别的人干什么，于是任命班超为军司马，重新出使西域。

第三节 东汉班超智降于阗王

班超降服鄯善后不久，即率36吏士进至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正值了阗王广德刚刚攻破莎车（今新疆莎车一带），称雄于南道，匈奴遣使者监护其国。广德对汉使者甚为冷淡。

于阗拥有人口8万多，胜兵3万，是西域南道诸国中的赫赫大国。于阗王广德等佶奉巫者，广德就汉使到来一事，召问巫者，巫者说道：“神灵对于阗向汉十分恼怒，为何要倾向于汉？汉使者带有一匹黄黑色的宝马，应把这匹宝马要来给我。”

广德听信了巫者之言，遂派国相私来比，去向班超索要宝马。班超已预先探知了巫者的阴谋，便答应了广德使者的要求，但让使者回去传话，要巫者白行前来领马，以便诱杀巫者。

不久，巫者果然到班超处要马，班超立即将巫者斩首，并随即将巫者首级送至于阗王处，并严厉责备了广德。广德对班超在鄯善诛灭匈奴使者的英勇行为早已敬畏惧服，现在又见班超斩了巫者，则更为惊恐，遂立即诛杀了匈奴使者，降服于汉。

第四节 东汉班超袭击疏勒之战

一、疏勒的战略地位

班超降服了鄯善和于阕之后，南道诸国中就仅剩莎车与疏勒两个大国了。

疏勒首府在今新疆喀门，当时称为疏勒，拥有2万户人，胜兵3万。它地处南北两道的汇合点，是从西方进出西域的咽喉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北道的龟兹为匈奴的附庸，龟兹王建依靠匈奴的力量，将势力范围延伸至南道，攻破疏勒，斩了疏勒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王。疏勒人受龟兹人兜题的统治，大多不满，因而，疏勒虽是南道诸围巾的大国，但力量却并不十分强大。于是，班超降服了于阗王后，便决定绕过中间的强国莎车，先行降服疏勒。

二、降服疏勒的经过

班超率36名吏士进至距疏勒王所居之盘槖城90里时，便先派使者田虑前往说服疏勒王兜题。班超嘱咐田虑说："兜题原本不是疏勒人，国人并不拥护他，你去了就劝他降服，如果他敢于违抗，你就把他捉起来。"兜题见田虑等汉使只廖廖数人，态度傲慢，冷落相待。田虑料其无降服之心，便随机应变，乘兜题不备，将他抓起来。疏勒王左右的侍卫大臣皆惊慌而逃。田虑急命人回报班超，班超遂立即赶至王城，召集疏勒将吏，向他们历数龟兹的横行无道，激励他们应报龟兹杀害疏勒王之仇，当即宣布立疏勒前王兄之子忠为疏勒王，国人大喜，皆要求立即沫杀兜题。但班超出于长远的战略利益考虑，还是放了兜题，让其回归龟兹。

三、疏勒态度的变化

汉明帝于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二月，汉命窦固还军。窦固之兵撤离伊吾庐地后不久，北匈奴便又派出大军，与汉屯田军争夺伊吾庐地区。司马耿恭为已校尉，率屯田兵固守坚城，与匈奴军胶着作战数月之久，匈奴军未能攻破耿恭军。当年八月，汉明帝病故，十一月焉耆（今新疆焉耆）乘汉国丧之机叛汉，起兵攻歼了都护陈睦之军。此时，汉之援军迟迟不至，车师也叛汉，于是，汉在西域之整个形势急剧变化，班超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龟兹、姑墨两国又数度发兵攻袋疏勒。班超守盘槖城，与疏勒王忠互为支援，尚未被龟兹攻破。但班超士卒很少，坚守了一年多，局势已是相当困难。

汉章帝即位后，鉴于都护陈睦军被歼，耿恭仅率13吏士而回的情况，同时汉也无力再调发救兵解救班超之危，遂采纳司空第五伦和校书郎杨终的建议，决计放弃西域，而诏命班超还京。

班超接到诏命不得不归。疏勒知道班超欲撤走的消息，举国忧恐，疏勒都尉黎贪悲愤地说：“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说罢以刀自刎。班超等行至于阗，王侯以下皆痛哭不止日：“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相抱住班超马腿，诚挚地挽留班超。班超深为各国人民的深情所感动，看到形势尚可以扭转，班超顾乎民意，毅然返回疏勒。

但班超离开疏勒之后，龟兹势力就又侵占疏勒，并与尉头（今新疆阿合奇）联兵，抗拒班超。班超返回后，立即捕杀反叛者，并发疏勒之军击破尉头，斩600多人，疏勒遂告平定。

第五节 东汉联兵平定莎车龟兹之战

一、平定莎车、龟兹之战前的西域形势

汉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统率疏勒、康居（今苏联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于阗、拘弥（今新疆于田）等国之兵1万多人，攻占了龟兹的重要属国姑墨（今新疆温宿），斩首700多人。

班超进占姑墨后，西域南道的大国只剩莎车一国尚未彻底降服，北道的强国尚有龟兹（今新疆拜城，库车、轮台等地区）、焉耆（今新新疆焉耆地区）等没有统一。班超为全部完成统一西域的使命，遂上书汉章帝，提出进一步统一西域的战略和策略。班超说，经过前一段的开拓，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均愿归顺，只有北道的龟兹、焉耆尚未归服。这些未臣服的国家不论大国小国，其吏民都心向汉朝，认为“倚汉与依天等”。这一民心所向的大好形势，足可以保证诸国的归顺。班超建议，可拜龟兹在京的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护送其返回，与诸国联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班超并向章帝表示，为完成西域的统一，“诚有万分，死复何恨。”汉章帝知道班超有必胜的把握和决心，遂决定命班超的同乡徐干为假司马，率领缓刑的囚徒和志愿人员1000多人，前往西域支援班超。

班超自建初三年（公元78年）四月上书，时至建初五年（公元80年）初，汉王朝的救兵尚未到达。这时，莎车便以为汉兵不会前来，遂投降于龟兹，疏勒都尉番辰，也起兵叛汉。不久徐干所率之军到达，班超便与徐干率军击破番辰，斩首1000多人，疏勒复归降于汉。

班超为了增强进攻龟兹、莎车的力量，再次上书汉章帝，建议联合乌孙等国的力量，共击龟兹。班超说：“乌孙大国，控弦十万”。汉武帝、汉宣帝都曾与其修好，曾联兵进击匈奴，如今若遣使与其联合，定可击破龟兹。汉章帝答应了班超的请求，并于建初八年（公元83年）十二月，拜班超为将兵长史，准其使用大将的旗鼓，以徐干为军司马，另派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返回，酝酿汉乌联兵之事。

二、东汉平定莎车龟兹的经过

东汉章帝于元和元年（公元84年）冬，十二月，命假司马和恭等率领800吏卒前往西域支援班超。和恭率军进至于阗，班超此时已拥有汉兵1800多人，但仅凭这些兵力，难以战胜莎车。于是班超便调发于阗、疏勒兵进攻莎车。莎车为抗击汉军，以重金诱劝疏勒王忠叛汉，于是忠遂反，率兵西走，固守乌即城。班超改立疏勒府丞成为新疏勒王。并调发未反叛的疏勒吏卒向乌即城进攻，攻城半年，未曾攻克，不久，康居国派遣精兵前来救援疏勒王忠，班超之军更难以攻克。于是班超遂通过康居的姻亲之国月氏国王，做康居王的工作，并赠以缯帛，康居王乃撤

走救援疏勒王忠的救兵，同时也把疏勒王忠接至康居，乌即城遂降于汉。

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秋，九月，疏勒王忠从康居王处借兵，返回疏勒，屯兵于损中（似在疏勒西北方向，靠近康居一带），秘密与龟兹合谋，派遣使者诈降于班超。班超已预先探知其阴谋，便伪装允许，疏勒王忠大喜，于是亲率轻骑至班超营帐。班超早已布设了伏兵，酒席宴间，班超突然命伏兵捕捉疏勒王忠，将其斩首。班超随即挥军击破疏勒王忠所借之康居军，斩首700多人，西域南道遂再次打通。

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冬，十月，班超调集于阗等国兵共2.5万人进击莎车。兹龟王则发温宿，姑墨，尉头兵共5万多人急救莎车。班超于是召集部将及于阗王等紧急商议对策。班超说：“我们现处于劣势之中，要想战胜敌人，只有撤退，于阗军向东撤，我率一部兵力向西走，诱使敌人分兵而击，等到夜间我们再以击鼓为号，回军突然袭击莎车。”班超与众将商议完后，又故意放松了对俘虏的看管，放他们逃回报告汉军的动向。龟兹王听到班超即将撤兵的消息，十分高兴，命温宿王率领8000骑兵于东界截击于阗军，亲率1万多骑兵于西界截击班超。当班超探知了敌军已开始向东西两方向分兵出动之后，便命令各部秘密集中，待到鸡鸣之时即驰赴莎车军营，莎车军遭突然袭击大乱，惊慌而逃，班超挥军追杀，斩首5000多人，缴获大量马畜财物，莎车战败而降，龟兹，温宿等军各自退走。经此一战，班超的声名已威震西域诸国。

第六节 东汉平定月氏焉耆之战

原居于敦煌一带的我国大月氏部族，被匈奴冒顿单子击败后，西迁至今咸海以南和今阿富汗地区建立了大月氏国，也系西域地区的大国之一。月氏为与东汉王朝争夺西域的统治权，以当初汉拒绝其和亲为籍口，于东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月氏遣其副王谢率兵7万人进攻班超。

班超当时驻军于疏勒，南道诸国能够调集的兵力不过3万人左右。班超兵少势弱，吏卒皆惊恐不安。班超镇定地对其部众说："月氏虽然兵力众多，却长途跋涉数千里而来，道路险阻，军资供应必然难以接济，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我们坚壁清野，使它粮尽兵疲，不过数十日必定可以击败它。"

月氏副王谢率兵至疏勒后，便指挥大军向班超部进攻，久攻不下。军食已消耗将尽，遂四处掠略粮食物资，但又无所得。班超判断，敌人粮食断绝之后，必以重礼去龟兹请求救援，班超于是在月氏去龟兹的必经之途中埋伏数百人，准备截击月氏借粮之兵，不久，谢果然派骑兵携金银珠玉而来，班超的伏兵突然对敌进行袭击，将敌人全部斩杀，将月氏使者的首级带回向副王谢示威。谢见使者的首级后大惊，立即遣使到班超营帐请罪，并表示只要班超不进击他们，放他们生还，便降服于汉。班超于是让其使者返回，月氏由此而降服。

班超统率诸国之军战胜月氏7万大军之后，西域北道诸国焉耆，危须（今新疆焉耆东习匕），尉犁（今新疆库尔勒东北）、尉头、龟兹、姑墨，温宿等国，尚未臣服。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龟兹，姑墨、温宿三国慑于班超的声威，向汉臣服。汉和帝为表彰班超的战功，拜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将兵长史，以白霸为龟兹王，命司马姚光率兵送白霸归国。姚光到达后，便与班超合力废除龟兹王尤利多，立白霸为新王。此时北匈奴已被窦宪彻底击败，龟兹王尤利多已失去了后盾，因之，只有降服于汉。班超在控制了龟兹局势之后，便率兵进驻它乾城（今新疆新和县境），徐于率兵屯于疏勒。

东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秋，七月，为平定焉誊，危须、尉头三国，调集了龟兹，郑善等8国之军7万人，吏士贾客1400人，准备向三国进攻。这三个国家都处于西域北道的中央地带，尉犁偏南、危须偏北，焉耆居于中间，势力也最强大。

班超率军欲将三国个个击破，首先进至尉犁边界，便派人向三国宣告说："汉都护到此，前来镇抚三国，如若你们能够认清大局，重新向汉，就赶快让你们的首领亲自迎接汉军，接受汉朝的赏赐，事毕即请你们归国，赏赐各国王踩五百匹。"

焉者王广命其左将北鞑支携带牛酒迎接班超。班超见广没有亲来，

便对北鞑支说："你虽然是匈奴侍子，但现在却掌握焉耆的大权，都护来此，国王不亲自迎接，这都是你的罪过。"为此，布人建议将北鞑支斩首。班超经过思考后认为，以不杀他为宜。因此人权力大于国王，未入其国而先杀其臣，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如若他们要加强守备，则汉军很难顺利到达其都城之下。于是班超对其赐赏以后，命共回归。

随之，班超率军进至尉犁，广乃与其大臣前往迎接班超，并奉献贡物。焉耆国濒临秦海（今新疆博斯腾湖），水泽纵横，入其国境有一苇桥，焉耆王广为阻止汉军入国，命令将苇桥破坏，班超便命部队迂回至另一个方向涉水而过，在距焉耆首府20里的大泽一带扎营。班超统率大军突然兵临城下的行动，使焉耆国王广大惊，便准备将其部众紧急撤至焉耆山中防守。焉耆左侯元孟曾经在汉京师为质，便秘密派人将广的行动计划报告了班超，班超将来人斩首，以造成不听信元孟情报的假象。随即约定大会诸王的日期，并宣告到时将对各王侯大大封赏。焉耆王广、尉犁王汛及北鞑支等30多人均相率而来，但焉耆国相腹久等17个大臣皆怕被诛而逃入海中（今博斯腾湖中），危须王也逃而未到。

待宴会开始，众人人坐之后，班超即怒责焉耆王广说；"危须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缘逃亡？"遂命吏士收捕广、汛等人，皆斩于西域都护陈睦被害之地，传首京师。随即命部队追歼焉耆等国之军，斩首5000多大，户俘获1.5万人，牲畜30万头，立元孟为焉耆王。

班超于平定焉耆等国后，在该地留驻半年，慰抚百姓。至此，西城50余国遂全部统一于东汉王朝之下，西域动乱的历史宣告结束。班超统率36吏士出使西域的伟大壮举，也告完成。汉和帝为表彰班超的功勋，封其为定远侯，食邑千户。

第七节 东汉安帝及其以后时期再定西域之作战

一、班超平定西域返京后西域形势之变迁

班超在安定了西域之后，于71岁时将返回京师前，东汉王朝遂派戊已校尉任尚为西域都护，以接替班超。任尚至西域后，向班超求教治理西域的对策，班超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说："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任尚待班超走后，对他的亲信很不以为然地说："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结果任尚在西域只几年光景，西域又动乱纷起，任尚遂被朝廷治罪调回。

二、东汉王朝对再次统一西域决策的辩论

汉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20年）十二月，敦煌太守曹宗为防御北匈奴，派其行长史索班率军千余人，屯于伊吾。第二年春，被北匈奴与车师后王军歼灭。

鄯善王见北匈奴已略有北道诸国，十分焦急，立即向曹宗求救，曹宗于是上报朝廷，请求率5000人进攻北匈奴，报索班被歼灭之仇，以便再次威服西域。邓太后为此召班超之子班勇和诸大臣行朝堂会议，商讨对策。大多数公卿重臣皆主张关闭玉门关，放弃西域。班勇则力排众人之议，班勇说："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兼总百蛮，以逼障塞。于是开通西域，离其党与，论者以为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遭王莽篡盗，征求无厌，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兴，未遑外事，故匈奴负强，驱率诸国。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孝明皇帝深惟庙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远遁，边境得安，乃至永元，莫不内属。"班勇接着又论说了保持西域统一，治理好西域对汉王朝的重大战略意义。

但长乐卫尉镡显、廷尉綦毋参、司隶校尉崔据等，纷起反对班勇的建议，坚决主张放弃西域，同时质问班勇一旦再度统一西域后，能否保证西域不再背叛，如果能保证西域永不背叛，则汉可以出兵。班勇驳斥他们说，中国在各州郡设置州牧郡守，这些州牧郡守谁敢保证其治理下灼州郡不发生战乱，如若他们敢于保证，那么我也敢做此保证，众人遂无言以对。

太尉属毛轸又发难说："重通西域设置校尉，则西域会不断地派出使者入朝，他们定会无止境地索要朝中的财物。给吧，则难以应付，不给吧，又失去西域诸国之心。一旦西域被匈奴侵袭，西域又要向朝廷求救。这样，就会惹来更大的灾难。"班勇随即辩驳毛轸说："今设以西域归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汉，不为钞盗则可矣。如其不然，则因西域租入之饶，兵马之众，以扰动缘边，是为富仇雠之财，增暴夷之势也。置校尉者，宣或布德，以系诸国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觊觎之情，而无财费耗国之虑也。且西域之人无它求索，其来人者，不过禀食而已。今若拒

绝，势归北属，夷虏并力以寇并、凉，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置之诚便。”朝廷最后终于采纳了班勇的意见，决定恢复敦煌郡营兵300人，设置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但可惜这一决定并未付诸实施。这样，不久匈奴势力便又伸入西域，与车师联兵，进袭汉边郡，河西地区又烽烟四起。

三、东汉王朝再次统一西域作战经过

汉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夏，北匈奴不断与车师联兵，进袭河西地区，朝中关闭玉门关和阳关，放弃西域的论调又起。敦煌太守张珰上书说：臣在京师时，也以为西域应当放弃，现在亲到这里，才看到一旦放弃西域，则河西将不能保存。为此，他进而向朝廷提出上中下三策的建议：“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间，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今甘肃安西南），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五百将士人，四郡供其犁牛，谷食，出据柳中（今新疆吐鲁番东南），此中计也。如又不能，则宜弃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计也。”大臣陈忠也上书陈述应确保西域统一于汉的重大意义，他指出：“西域归属汉朝已久，诸国均心向大汉。今匈奴已破车师，势在必南攻鄯善。假如弃之不救，则诸国必然灰心而归顺匈奴。这样，匈奴之财势日增，气焰日盛。南面再联合南羌，那么，河西四郡当危在旦夕，河西既危，朝廷不能不救，必发重兵出征，耗费的资财将无法估计。主张放弃西域之人，只看到西域的绝远，怕消耗一点资财，却没有看到汉武帝苦心经略西域的巨大意义。现今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如不救助，对内则无以慰劳戍边屯守之吏民，对外则又不能向诸蛮显威，且要丧失大片国土，放弃西域绝非良策。”陈忠并建议应在敦煌设置校尉，按以往的制度增加四郡的屯兵，以镇抚西域诸国。

汉安帝采纳了陈忠等的建议，遂于延光二年（公元123年）夏，四月，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500人出屯柳中。延光三年（公元124年）春正月，班勇至楼兰，鄯善归服于汉，龟兹王白英当时犹豫不决，班勇施以恩信劝其归顺，于是白英也率姑墨、温宿王自缚而降于班勇。班勇在诸国归顺之后，便调集诸国之军1万多人进攻车师前王国，将北匈奴伊吾王击走，车师前王国又复降于汉。

汉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秋七月，西域长史班勇，调发敦煌、张掖、酒泉6000骑兵及郎善，疏勒、车师前王国等诸国之军，进攻车师后王军就，一举将车师后王国击败，歼灭后王国军8000多人。俘获军就和匈奴派驻后王国的使者，把他们押至杀害索班之地，处死，将其首级传至京师。

汉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冬十月，更立车师后王国加特奴为王。同时，派出兵马击杀了东且弥王，另立新王，于是，车师六国全部被汉军平定。接着，班勇又调集诸国军进击北匈奴呼衍王部众。呼衍王败逃，其部众2万多人皆降于班勇军。班勇为使车师与北匈奴结仇，命

加特奴亲自斩了单于之从兄。北单于率万余骑兵突袭车师后部，班勇命假司马曹俊率军救援，单于引军退走，曹俊率军追斩其贵人骨都侯。呼衍王由于彻底战败，迁至枯梧河上游一带。自此，车师诸国已无匈奴踪迹，城廓安定。北道诸国仅有焉耆王元孟尚未降服。

汉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三月，班勇上书请求批准进攻焉耆王元孟。于是，东汉王朝命敦煌太守张朗率河西四郡兵3000多人配属班勇，班勇另调集诸国4万多人，兵分两路前往进击。班勇率军从南道入焉耆，太守张朗从北道率军而进，约期会攻焉耆。张朗因以前曾被治罪，欲争先立功赎罪，于是便兼程急进。进入焉耆后，不等班勇之军到达，便急派司马率军与焉耆军交战，歼灭敌军2000多人。元孟因怕抗击汉军被诛灭，遂遗使迎降于张朗军。张朗顺利进入焉耆受降而还，张朗因而免罪，但班勇却以后期之罪被下狱。这位继承父志，一心为统一祖国西域的战将，竟被罢官，含恨而终。

汉顺帝阳嘉三年（公元134年）夏四月，车师后部司马率后王加特奴等1500人，掩击北匈奴部众于阊吾陆谷，捣毁匈奴庐落，斩数百人，俘获单于毋，季毋等数百人，牛羊10多万头，车1000多辆，兵器物资众多。

汉顺帝阳嘉四年（公元135年）春正月，北匈奴呼衍王率兵袭击车师后部，汉顺帝遂命敦煌太守，调集西域诸国兵及玉门关侯，伊吾司马，率6300多骑兵驰往救援，与北匈奴军交战于勒山，汉军战败。当年秋，呼衍王又率2000人进攻车师后部。

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夏四月，北匈奴呼衍王率3000多骑兵进袭伊吾，伊吾司马恺遣500吏卒，于蒲类海东与呼衍王军交战，汉军兵少势弱，被北匈奴军全歼，呼衍王乘战胜之军威，转兵进攻伊吾屯城。当年夏，汉王朝命敦煌太守司马达率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吏瘁4000多人，前往伊吾屯城增救，行至蒲类海地区时，呼衍王得知汉大军到，便引军而退。

东汉统一西域地区作战评述

东汉王朝统一西域之作战。自始至终都是与北匈奴势力企图分裂割据西域作斗争，东汉王朝一方面直接出兵打击北匈奴的另一方面勋不断剪除北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推进西域的统一，在东汉王朝统治的整个历史时期，虽然北匈奴势力时断时续地进占西域的一些地区，但东汉王朝还是竭力维护了西域的统一局面，这无疑对西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东汉王朝在度过了光武中兴、明帝、章帝的短暂兴旺时期之后，便急剧走向了它的衰落阶段。在其国力日减，反抗其统治的兵连祸接烽火四起的困难局面之下，尚能取得了对西域统一战争的胜利，确实得之不易。夺取这一胜利的基本因素有以下几点：

1.西域各族人民人心思汉，趋向统一，反对分裂西域

自汉武帝统一于中央王朝的治理之下以来，西域地区的各族人民便日益加速了与中原地区汉族人民的融和，中原地区先进的政治思想，经济和文化的传人西域，有力地促进了西域地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虽然西汉末年的反动统治和王莽篡改后的倒行逆施破坏了西域的统一，使匈奴势力乘虚而入；但一经汉光武帝刘秀统一天下，西域诸国便纷纷遣使入朝。可惜，刘秀当时无力西顾，暂时遣回诸国的侍子。然而，这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各国渴求统一的意志，所以当班超仅率36名吏士出使西域时，一些国家便立即投向汉朝。而当以后东汉王朝做出召回班超、放弃西域的错误决策时，西域各国人民挽留班超的动人情景，都是西域人民趋向统一的强烈政治愿望的生动体现。正是人民这一发自内心的渴求，才使他们为维护西域的统一而奋勇力战，成为东汉统一西域的决定性因素。

2.北匈奴的衰败，使西域地区主张割据分裂的势力失去了依托

北匈奴自西汉以来便把西域做为其右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屡派重兵驻守。因而，一些主张分裂割据的西域国家，便仗恃匈奴的势力，对抗汉中央王朝的统一，不断侵袭汉边缘郡县。但汉王朝由于竭力打击了北匈奴，使其急剧衰败，无力继续控制西域，这样，便使一些企图分裂自立的城廓之国，成为茕茕孑立的孤岛，难以抗拒统一的历史潮流。

3.英勇出众胆识超群将帅的奋战

班超等人的出使与西域的统一几乎成为直接的因果关系。班超投笔从戎，自东汉明帝永乎十六年（公元73年）出使西域起，直至东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在西域奋战31年，他以惊人的胆略和超群的智慧，威服鄯善，逼降于阗，击败莎车，疏勒，降服强国龟兹，平定月氏、焉耆，最终统一了西域。但是，任尚在接替班超之后不久，由于其缺乏班超的统御之才，西域复又叛乱。后来，班超之子班勇继承班超遗志，再出使西域，又挽回了一度失利的局面，使西域重归统一。可见杰出将领的奋战，在统一西域的斗争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当然，班超所以能够顺利地层示杰出将帅之才，与全体吏士的同心合力难以分开。没有他们的拼死力战、披旰沥胆的献身精神，仅靠将帅的个人作用，也不可能完成这名垂千古的历史伟业。

事修则谤兴。正当班超在西域奋战之时，东汉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至西域，竟然上书诬陷班超在西域“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幸亏汉章帝识破了李邑的谗言，否则这位统一西域的忠勇之将，定将难以实现其为国家民族统一西域的宏伟誓愿。

第十五章 东汉征乌桓鲜卑高句丽的战争

东汉征乌桓、鲜卑和高句丽的作战，多在东汉王朝统治的中后期，主要的作战活动如下：

征乌桓之作战始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秋。汉王朝经过汉光武帝，汉安帝、汉顺帝、汉桓帝、汉灵帝、汉献帝当政期间的6次主要作战活动，终于将北方的乌桓部族降服，统一了汉代中国东北部分地区。

征鲜卑之作战始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秋。历经汉和帝、汉殇帝、汉安帝、汉顺帝、汉桓帝、汉灵帝几代帝王当政时期，对辽东、辽西、代郡鲜卑诸部落的作战，直至对檀石槐统一鲜卑后的作战。汉军屡战屡败，鲜卑军越战越强，汉王朝始终未能完全统一中国北方地区。

东汉征高句丽之作战发生于汉和帝和汉安帝期间。高句丽王宫，先后于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汉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两次出兵入袭汉边郡，汉军与高句丽军互有胜负。高句丽王宫死后，高句丽便降服于汉。

第一节 东汉征乌桓之作战

一、乌桓部族的崛起

乌桓部族，原为东胡，自被冒顿单子击败后，退居乌桓山地区，臣服于匈奴，每岁贡献于匈奴贵族。后来，被汉征服，才统一于汉王朝的统治之下。王莽当政时，乌桓叛离汉朝。

东汉光武帝初期，乌桓与匈奴连兵袭掠东北边境郡县，代郡以东受害尤其严重，家园被毁，百姓流离。当时以在上谷郡塞外之白山乌桓部落最为强盛，东汉王朝无力对其征讨。

当刘秀完成了全国统一大业之后，便腾出了力量，开始对乌桓进击。

二、东汉第一次征讨乌桓

汉光武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乌桓与匈奴连兵袭掠扶风。当时汉伏波将军马援刚刚平定交趾的“二征”叛乱胜利而归，他在得知乌桓进袭三辅的消息后，马援便对其至交孟冀说：“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

刘秀很快答应了马援的请求，命其率3000骑兵前往征讨。马援九月至京，十二月即率军出屯襄国（今河北邢台），准备出征乌桓。

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秋，马援完成出战的准备后，便率军出高柳（今山西阳高）之五阮关，向乌桓境内进发。乌桓的侦察人员得知马援率汉军前来，急忙回报，乌桓部众遂相率逃走，马援军追斩100多人而还。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辽西之乌桓部落在大人郝旦率领下，降服于汉。

自此之后，历经东汉明帝、章帝、和帝三代帝王当政时期，乌桓均臣服贡献，保塞自安。

三、东汉第二次征讨乌桓

汉安帝元初三年（公元116年）夏，居住于渔阳郡地区的乌桓又与匈奴连兵袭掠代郡，上谷等地，后来，便被汉军击败，乌桓等部众降于汉朝，汉拜其大人戎末魔为亲汉都尉。

四、东汉第三次征讨乌桓

汉顺帝阳嘉四年（公元135年）冬十月，乌桓军袭击云中郡（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劫掠商贾车辆物资。度辽将军耿哗率军2000，与乌桓军交战失利。后双方又交战干沙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汉军被乌桓军斩杀500人，耿晔被乌桓军包围于兰池城，汉王朝急发积射士2000人，度辽营千人及上郡屯兵增援耿晔军，乌桓军遂解围而退。

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乌桓大人间坚与南匈奴句龙王吾斯反叛时，再度被汉军击败。此役，已在本卷第四章中做了详细叙述。

五、东汉第四次征讨乌桓

汉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9年）十二月，居住于朔方郡的乌桓大人与匈奴休著屠各率部众反叛，汉王朝以安定属国都尉张奂为北中郎将，以讨匈奴、乌桓。匈奴、乌桓军烧毁度辽将军门，气势炽盛，汉兵惊恐，想四散逃亡。但张奂却安然坐于帷帐中，与其部将谈笑自若，汉军士卒遂安定下来。

张奂为战胜乌桓与休著屠各军，采用离间手段拆散他们的联盟，张奂暗中派人私许与乌桓结好，命其斩杀了休著屠各的诸渠帅，张奂接着便率军歼灭了匈奴军，诸胡部众皆降于汉。

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春，乌桓听到张奂被调回京师任大司农，便于当年夏天，又与南匈奴和鲜卑军反汉，后来张奂率军至，乌桓降服。

六、东汉第五次征讨乌桓

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十二月，乌桓大人难楼居于上谷地区，拥有9000多个种落，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拥有5000多个部落，均自立为王；辽东乌桓大人苏仆延拥众1000多个部落，自称为峭王，右北平乌桓大人乌延拥众800余部落，自称汗鲁王。

汉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前中山太守张纯叛汉，逃入丘力居部中，自号弥天安定王，遂被乌桓诸部落共立为乌桓元帅，不断率领乌桓军掠略青、徐、幽，冀四州，北部边境深受其害。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幽州牧刘虞收买刺客，将张纯刺杀，乌桓遂暂停进袭边境。

七、东汉第六次征讨乌桓

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前后，丘力居死，其子年幼，便以从子蹋顿代立。蹋顿颇有武略，总领乌桓诸部，诸部也悉听其号令。

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冀州牧袁绍与前将军公孙瓒相争，蹋顿率乌桓军帮助袁绍军击败公孙瓒。袁绍以此假传圣旨，赐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单于印绶，结果难楼、苏仆延率其部众拥立

楼班为单于，蹋顿为王。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乌桓已变为袁绍、袁尚父子的重要依附力量。曹操为扫除袁氏父子的残余势力，争霸中原，安定北方，以解除其后顾之忧，便于当年春，率军千里，奔袭乌桓。

当年夏，曹操大军进至无终（今天津蓟县），阴雨连绵，道路泥泞，乌桓军扼守道路隘口，挡住曹军的去路。曹操遂折向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穿过白檀（今河北滦平东南），平岗（今辽宁凌源西南）等山川险要地带。在进至距柳城（今辽宁朝阳）200里时，蹋顿率乌桓等数万大军迎击，双方在白狼山（今辽宁喀喇沁左翼东）大战。曹军先锋张辽部奋勇猛攻，乌桓军溃败，蹋顿及名王以下多人被斩，乌桓、汉等部众20多万人降于汉。

第二节 东汉征鲜卑之作战

一、鲜卑部族的崛起

鲜卑，是东胡部族的一支。因居住于鲜卑山区一带而得名。西汉初年，东胡这支部族为冒顿单于击败后，即迁居于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东汉初年，匈奴强盛，鲜卑便依附于匈奴，匈奴军常率鲜卑军袭击汉北部边境，成为协助匈奴割据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重要势力。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秋，鲜卑与匈奴连兵，以1万骑兵人袭辽东，辽东太守祭彤率数千人迎击，亲自披甲上阵，率领士卒拼杀，将鲜卑军击败，鲜卑军溃逃时落水淹亡者过半，又被斩杀3000余人。自此，鲜卑震惊，不敢再掠略边塞。

祭彤鉴于鲜卑与匈奴、赤山乌桓联合为害，遂于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以利诱招降鲜卑。鲜卑大都护偏何率众降服于汉。其后，鲜卑偏何率军击破北匈奴左伊育訾部众，斩匈奴兵2000多人，向汉请功。自此，鲜卑偏何军每年都出兵进击匈奴，连连获胜。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鲜卑大人于仇愤、满头等率其种落降汉。汉光武帝封于仇愤为王、满头为侯。

渔阳赤山乌桓歆志贲等数度入袭上谷郡（今河北怀来东南）。祭彤派偏何率军，将赤山乌桓军击破，斩歆志贲。此后，各地鲜卑大人皆率部众前来归附。鲜卑势力逐渐增强，明帝和章帝时期，鲜卑均安于边塞地区，未侵袭边境。

二、东汉第一次征辽东鲜卑之战

东汉第一次征鲜卑，主要是对辽东鲜卑种落的作战。东汉和帝永元中期，大将军窦宪击败北匈奴，北单子远逃之后，鲜卑遂占据了北匈奴的大片地区，匈奴散居于原地的种落尚有10多万个，也皆称鲜卑，鲜卑从此更加强盛。

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秋八月，辽东鲜卑攻袭肥如县（今河北迁安），转而再进攻辽东界。辽东太守祭彤之子祭参率军迎击鲜卑军，被鲜卑军击败，祭参被冶罪下狱死。

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冬十一月，辽东鲜卑进袭右北平（今河北丰润），再攻渔阳（今北京怀柔），渔阳太守率军将鲜卑军击败。

汉殇帝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夏四月，辽东鲜卑复进击渔阳，被渔阳兵击败，太守张显欲率数百人出塞追击。兵马椽严授劝阻说，前方道路险阻，敌人的动向难以估量，我应暂且扎营，命轻骑探明情况后，

再行进击。张显不听，欲怒斩严授，领兵继续追击，结果中了鲜卑军的埋伏，士卒惊慌逃走，只有严授力战，负伤十多处，斩敌数人而死。张显也身小流矢，主簿卫福，功曹徐成等，皆奔向张显护卫，三人均战死。

汉王朝为表彰严授，卫福、徐成的英勇作战精神，对他们的家人厚加封赏。

三、东汉第二次征鲜卑之战

东汉第二次征鲜卑，主要是与辽东、辽西和代郡等地鲜卑部族之作战。东汉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秋八月，辽东鲜卑围攻无虑县（今辽宁北镇南），州郡县邑均坚壁清野，使鲜卑军无所掠抢。鲜卑军转兵攻扶黎营（今辽宁义县东），杀长吏。

元初四年（公元117年）春二月，辽西鲜卑连休等率兵烧了辽西塞，攻入辽西郡（郡治在今辽宁义县西）。乌桓大人于秩居与连休素来不和，便协助辽西郡兵共同向辽西鲜卑军进击，大破鲜卑军，斩1300多人。

元初五年（公元118年）秋八月，代郡（今山西阳高）鲜卑1万多骑兵入塞，攻夺城邑，杀长吏、烧掠而去。汉王朝遂发缘边甲卒、黎阳营兵，屯于上谷，以防备鲜卑入袭上谷郡（今河北怀来东南）。当年冬十月，鲜卑军入上谷郡攻入居庸关，汉再次发缘边诸郡、黎阳营兵、积射士步骑2万人，屯守于各要塞，防止鲜卑军的进一步深入袭掠。

元初六年（公元119年）秋七月，鲜卑军攻人马城塞（今河北怀安），杀长吏。度辽将军邓道发积射士3000人，中郎将马续率南单于军以及辽西、右北平郡兵，出塞追击鲜卑军，大败鲜卑军。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率部众降于邓遵军，汉王朝封乌伦为率众王，其至鞬为率众侯。

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秋七月，其至鞬又叛汉，进至居庸（今北京延庆），然后移兵攻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云中太守成严率军迎击，被其至鞬军击败。功曹杨穆以身护卫成严，与太守同时被斩。于是，鲜卑军复窜入代郡，将乌桓校尉徐常包围于马城。度辽将军耿夔与幽州刺史庞参发广阳、渔阳、涿郡甲卒，兵分两路前往马城解救。徐常乘夜暗潜出城外，与耿夔并力袭击鲜卑军。攻城鲜卑军遭到汉大军的突袭，遂撤围而退。其至鞬部鲜卑屡杀汉郡守，多次战胜汉军，势力日渐强大，有“控弦数万骑”。至安帝延光元年（公元122年）冬十月，又入袭雁门郡（今山西朔县东），定襄郡（今山西左云西），接着乘胜进兵太原，杀掠吏民。廷光二年（公元123年）冬，其至鞬亲自率领骑兵1万多人，分为数路攻击南匈奴，匈奴薁鞬日逐王率部众与其交战于曼柏（今内蒙古东胜东北），日逐王战死，匈奴军被杀1000多人。接着，于延光三年（公元124年）秋，其至鞬鲜卑军又进袭高柳

（今山西阳高），再次击败南匈奴军，杀匈奴渐将王。

四、东汉第三次征鲜卑之战

东汉第三次征鲜卑，主要是征其至鞬部众之作战。汉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秋八月，鲜卑其至鞑率众又攻掠代郡，太守李超率军迎战，兵败身亡。永建二年（公元127年）春正月，中郎将张国命部将率南匈奴步骑兵1万多人出塞，将其击败。

二月，辽东鲜卑6000余骑兵，侵袭辽东玄菟郡（今辽宁沈阳东），乌桓校尉耿哗发缘边诸郡兵及乌桓率众王军出塞迎击，斩数百人，缴获甚重，辽东鲜卑部众3万多人抵辽东郡降服。

永建三四年间（公元128～129年），鲜卑军频繁进袭渔阳郡（今北京密云西）、朔方郡。永建六年（公元131年）秋，乌桓校尉耿晔，命司马率胡军数千人出塞击破鲜卑军。当年冬，渔阳太守又派乌桓豪酋率扶漱官将鲜卑军击败，斩800多人。扶漱官由于屡次与鲜卑作战均取得了胜利，而被汉王朝赐封为“率众君”。

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冬，护乌桓校尉耿哗派亲汉都尉戎末魔率众王侯咄归等，出塞奔袭鲜卑，大胜而还。鲜卑后来又袭击辽东属国（辖区在今辽宁义县、锦西、营口市之间地区），耿晔率军至无虑城（今辽宁北镇南）拒守。

阳嘉二年（公元133年）春，使匈奴中郎将赵稠，派部将率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军，出塞进袭鲜卑，斩获甚众，夫沈由此得到汉王朝金印紫绶的赏赐。当年秋天，鲜卑军又攻占马城，代郡太守率兵迎击，未能取胜。后来，直至其至鞑死去，鲜卑的人袭活动才逐渐减少。

五、东汉第四次征鲜卑之战

东汉第四次征鲜卑之战，主要是征檀石槐之作战。

鲜卑部族被大人檀石槐统一后，立庭于弹汗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以东大青山地区），进入鲜卑部族建国的极盛时期，它向南不断进袭汉王朝边境郡县，向北打击丁零（今苏联贝加尔湖一带），向东袭击夫余（今黑龙江、吉林西部地区），向西攻击乌孙（今新疆西北部及其以西苏联之部分地区），占据了匈奴的绝大部分地区，东西1.2万多里，南北7000多里，成为汉代占据中国北方继匈奴而起最大的反汉王朝的割据势力。

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秋七月，檀石槐率骑兵3000～4000人，入袭云中郡（今内蒙占托克托东北）。延熹元年（公元158年），鲜卑又入袭汉北部边郡，当年冬，汉王朝命使匈奴中郎将张奂率南匈奴军，出塞进击鲜卑军，斩首200人。

延熹二年（公元159年），鲜卑军又入袭雁门郡，杀吏民数百人，掠虏而去。

延熹六年（公元163年）夏五月，鲜卑军骑兵1000多人，入袭辽东属国。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夏六月，鲜卑军数万骑兵与匈奴，乌桓军合兵入袭缘边九个郡，杀掠吏民。汉王朝命张奂率军迎击，鲜卑遂退去。

汉王朝面对鲜卑檀石槐军不断的进袭，十分忧虑，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有效反击，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遂采取妥协政策，派特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并提出与其“和亲”。檀石槐自恃兵精将猛、国力强盛，回绝了汉王朝的要求，并继续派兵入袭汉边境郡县。檀石槐为统治其所占地区，乃效法匈奴旧制，将其疆域分为三个部分，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划夫余、貊二十余邑为东部地区；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地区；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统领，檀石槐成为控制整个鲜卑的最高首领。

汉灵帝当政后，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每年都数次遭受鲜卑军的掠虏，杀伤吏民不可胜救。

熹平三年（公元174年）冬十二月，鲜卑军入袭北地郡（今宁夏吴忠）。北地太守夏育率匈奴休著屠各军迎战，将鲜卑军击败。夏育遂被任命为护乌桓校尉。鲜卑又接着以更大兵力入袭整个并州边郡。

熹平五年（公元176年），鲜卑势力更进一步强盛，汉王朝北部边郡无力抗御其入袭。其后，鲜卑东西中三部不断向汉边郡进击，汉王朝一筹莫展。夏育上书建议说：“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请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一冬二春，必能禽灭。”朝廷经过廷议，未批准夏育的建议。

原护羌校尉田晏因判罪下狱，想待罪立功，于是，请中常侍王甫向汉灵帝讲情，愿率兵北征。灵帝决定拜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准备发兵征讨鲜卑，但朝中大臣大多都不同意，于是灵帝再召百官上朝相议。虽说以议郎蔡邕为首的一伙反对派，力主休战、退让，但汉灵帝最后还是决计出兵北进。

汉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秋八月，汉命护乌桓校尉夏育，率1万多骑兵出高柳，田晏率1万多骑兵出云中，使匈奴中郎将臧旻，率南匈奴军1万多骑兵出雁门。各路大军出塞北进2000多里，以与鲜卑军作战。检石槐闻汉军来袭，遂命其东西中三部大人各率部众迎战，结果汉军皆大败，士卒被歼十分之七八。田晏、夏育、臧旻三将仅率数十名轻骑逃回，军实辎重全部丢弃。三将返回后，被槛车囚禁至京下狱。当年冬，鲜卑军再攻辽西郡。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冬，鲜卑军又袭酒泉邵（今甘肃酒泉），东汉王朝缘边诸州郡均听任鲜卑掠略，无力抵抗。

灵帝光和中年（约公元180年前后），檀石槐死去，其子和连代立。由于和连远不如其父檀石槐勇武，鲜卑势力逐渐衰落。以后和连在入袭北地郡时，被北地人射死，鲜卑内部出现争立王位的斗争，鲜卑势力更趋下降。

第三节 东汉征高句丽之作战

一、高句丽的叛汉

东汉时期的高句丽人，生活于今辽宁省鸭绿江以北及沿江两岸地区，远在西汉时期高句丽人，即臣服于汉中央王朝。但王莽当政时，汉王朝调发高句丽征伐匈奴，高句丽人不愿从征，汉强迫其出征，高句丽兵遂逃亡出塞，辽西大尹田谭率军追击，被高句丽军杀死。王莽命将军严尤率军征讨，严尤诱使高句丽侯驺入塞，将其斩首，并将高句丽改称为下旬丽，遂引起高句丽人不断的反抗。

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高句丽遣使入朝，刘秀恢复了高句丽王的称号，高句丽遂又臣服于汉。

二、汉光武帝时与高句丽之战

汉光武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春，高句丽人复叛离东汉王朝，发兵入袭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诸郡，辽东太守祭彤以恩信招降了高句丽。

三、东汉和帝、安帝时期征高句丽

高句丽王宫当政后，自恃勇壮无敌，数度率军袭掠汉边境郡县，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春，高句丽军再次进袭辽东，掠略6个县，辽东太守耿夔率军迎击，将高句丽军击破，斩其渠帅。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高句丽王遣使入朝奉献，并请求依属玄菟郡。

汉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高句丽又叛离汉朝，出兵进袭玄菟郡。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春，正月，幽州刺史冯焕、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率军进击高句丽。高句丽王宫遣使伪称降服，暗中派嗣子遂成率3000兵马袭击玄菟，辽东等地，焚烧城廊，杀死2000多人。汉王朝急发广阳，渔阳，右北平、涿郡属国等地3000骑兵前往迎击，高句丽军闻知而退走。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夏，高句丽军复与辽东鲜卑8000多人，进攻辽东郡，杀略吏民。辽东太守蔡讽等率军追击高句丽军，双方战于新昌（今辽宁海城东北），蔡讽等战死，汉军被歼百余人。当年秋，高句丽王宫，又率数千骑兵围攻玄菟郡（今辽宁沈阳东），夫余王派其子尉仇台，率领2万多人与州郡兵合力迎击高句丽军，将高句丽军击破，斩首500多人。

高句丽王官于当年死去，由其子遂成即位。辽东太守姚光上书建议，乘高句丽王宫病死之机，发兵袭击高句丽，朝廷众大臣均认为可行。但尚书陈忠则认为乘人之危，发兵攻打，是不义之举，反对出兵。并建议遣使去高句丽吊唁，赦免高句丽寇掠边境之罪，以使遂成向汉，

汉安帝采纳了陈忠的建议。第二年，遂成果然送回俘获的汉边民，臣服于汉。

第十六章 东汉末期的社会状况和农民起义

第一节 东汉末期统治阶级的进一步腐朽没落

一、东汉后期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

东汉王朝后期，统治阶级更加腐朽没落，他们醉生梦死，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盘剥，使社会经济凋敝，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帝、后、外戚、宦官之间无休止的权力之争，使朝政更加混乱不堪，皇亲国戚、贪官污吏横行天下，搜括无度，国库空虚社会财富越发集中于少数权贵之家。据《后汉书·仲长统列传》记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伎乐，列乎深堂。""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汉桓帝梁皇后一门，先后7人封侯，3个女人被立为皇后，6个女人封为贵人，2个人担任大将军，师、将、校，尹57人，聚敛天下财富达30多亿，相当于全国赋税收入的一半。

与富豪权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百姓的极端贫困和悲惨的生活。据史料记载，从东汉中期以来，人民便穷困已极。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时州郡大饥，米石二千，人相食，老弱相弃道路。"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二月，"荆扬二州人多饿死。"元嘉元年（公元151年），京师旱灾严重，"任城、梁国饥，民相食。"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全国发生大灾荒，"百姓饥穷，深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司隶校尉部，豫州两地人民因饥饿而死者达十分之四五，甚至有整户饿死者。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河内（今河南北部）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这种万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父子相弃，夫妇相食的悲惨生活，使农民百姓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使东汉王朝临近了它的末日。

二、东汉中后期人民群众的连续起义斗争

东汉王朝统治的后期，人民群众反抗东汉反动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异常尖锐激烈。东汉统治者对人民的反抗则不断出兵镇压围剿，这就更进一步激起了百姓的愤怒，纷纷起义，杀官吏，抢府库，使东汉王朝内外交困，焦头烂额。

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羌族人民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起义，汉王朝用了七八年的时间，耗费了240多亿钱，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永初三年（公元109）秋，七月，张伯路等率众起兵反汉，攻打

沿海九郡，杀死二千石令，长等官吏。东汉王朝急派侍御史庞雄率领州郡军镇压，张伯路等以势孤力弱而暂时降服。

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张伯路与勃海平原御刘文河、周文光等起义军联兵，再次攻打县邑，杀长吏，烧官府，声威又壮。东汉王朝遣御史中丞王宋持节，发幽、冀州渚郡兵数万人，并与青州刺史法雄之军前往镇压，张伯路军作战失利，退走海中。后来又败向辽东，终于被汉王朝剿灭。

永初年间朝歌（今河南淇县）人宁季等率众起义，攻杀长吏，颇具声势，州郡均不能镇压。汉王朝命虞诩为朝歌长，前去剿灭。虞诩到达朝歌后，通过谋略，诱骗起义军中计，遂将宁季率领的起义军歼灭。

永初五年（公元111年）九月，汉阳郡杜琦、杜季贡、王信等，率众起义，并与羌族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结合起来，声势浩大，节节胜利。东汉王朝派将军邓骘，任尚等率军镇压，汉军屡战展败。起义军逼近京师洛阳，汉王朝惊恐万状，只得改变策略，以暗杀的手段刺杀了起义领导人，才逐渐将起义军战败。

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二月，曾旌等率众起义，攻打会稽郡，杀死句素、鄞、三县的县长。当年三月，扬州章河等起义，席卷扬州六郡（九江、丹阳、卢江、会稽、吴、豫章），起义军连续攻打49个县城，杀死长吏，震动了东汉王朝。

汉顺帝永和四年（公元139年），羌族人民不堪地方官吏的残暴压榨，举行了第二次大规模起义，进攻三辅地区。东汉王朝急忙拼凑了10万兵马，以悍将马贤统率前往镇压，马贤军被义军战败，马贤也被义军斩首。但后来，东汉王朝采取了军事进攻与招降利诱相结合的策略，逐渐瓦解了起义队伍，羌族人民的第二次起义归于失败。

从汉顺帝永和年间至桓帝期间，各地的起义更是连绵不断。蔡伯流等，转战于广陵、九江；广陵的张婴等起义众至数万人，转战于扬州、徐州地区达十多年之久，扬州，徐州的范容、周生等起义声势也很大，将扬州刺吏尹耀，九江太守邓显所率之围剿军全部歼灭，尹耀、邓显也被起义军斩首。

汉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起义于泰山地区的郭窦，公孙举拥众3万多人，于青州、兖州、徐州等地，连挫州郡军，东汉王朝派中郎将段颎率兵前往镇压，将起义军斩杀1万多人；延熹二年（公元159年），爆发了羌族人民的第三次大规模起义；延熹五年（公元162年），长沙，零陵地区的起义军，攻打桂阳、苍梧、南海、交趾等郡县。再攻长沙、益阳，杀县令，烧官府，把御史中丞盛修统率的州郡兵打得一败涂地。接着又将谒者马睦和荆州刺史刘度所率之军击破，起义军声势大振，众至数万人。延熹六年（公元103年）至八年（公元165年），桂阳郡地区的李研，胡兰、朱盖等也率众起义。攻打桂阳，零陵

等郡。发展至数万人，东汉王朝命中郎将度尚统率幽，冀二州军、黎阳营兵，乌桓骑兵2.6万多人，与长沙太守抗徐统率的诸郡兵共同进剿，将起义军击败。

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十一月，会稽人许生，自称越王，率众起义，汉王朝经过3年多的作战，才将许生父子击灭。光和三年（公元180年），卢江黄穰与江夏蛮起兵，攻占4个县城，众至10多万人，同时苍梧、桂阳一带也爆发了人民起义。汉王朝调兵遣将，终于将起义镇压下去。

《后汉书·张法滕冯度杨列传》评论东汉白汉安帝和汉顺帝以后的形势时说：“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讬验神道，或矮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长，未有闻焉，犹至垒盈四郊，奔命首尾。”由此足见东汉王朝中后期，农民百姓遍地举兵反抗的情景。

第二节 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的爆发

东汉中后期，遍布各地此起彼伏的人民起义，虽然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相继失败，但它却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它既为全国性大起义做了舆论上的准备，也在实践上为大起义的形成提供了血的教训。

《太平御览》记述了当时的一首民谣说："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生动地反映了黎民百姓的起义一个个地被镇压之后，人民群众的反抗精神被更大的激发出来。人民起义的内在规律无形中要求人们在更大的范围内联合起来，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在这种客观形势需要的历史条件下，以宗教形式出现的动员和组织人们起义的太平道与五斗米道，便加入了反对封建王朝压迫的行列。

一、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兴起

以宗教为掩护的太平道，在动员和组织人民大起义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所造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即鲜明地主张"易姓受命"，这对当时西汉的刘氏天下无疑是一种水火不容的挑战。东汉顺帝时期琅野人于吉又编了《太平清领书》，后来成为农民大起义领袖的张角，就是利用这部书传经布道，组织动员人民起义的。

《太平经》中虽然有不少宗教迷占观念，但却有明确的宣传人人平等的思想，比如它记述说："积钱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是人生的六大罪状之一，认为这是"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丸。"它还记述说："人无贵贱，皆天所生"，它明确地鼓动人们说"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为之，反使饥寒，负先人之体"，认为假如做不到这一点，也是人生六大罪状之一。显然，这些观点，对当时动员人们起来反对腐朽没落的东汉王朝是有着巨大现实意义的。

与太平道有着相同性质的五斗米道，是东汉顺帝时沛人张陵所创。因人道人必须缴纳五斗米，才能成为五斗米道徒，故称为"五斗米道"。五斗米道的活动地区，主要在巴蜀一带，它与太平道一起，承担了动员和组织百姓反对东汉王朝全国规模大起义的历史任务。

二、黄巾起义军的形成

太平道的教主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张角，号称"大良贤师"，他以传道治病为掩护，派他的弟子去全国各地传道。十几年间，即在青、徐，冀、幽、兖、豫、扬、荆等八个州的广大地区，发展道徒30多万。为了便于起兵的组织指挥，他将道徒分成36方，大方1万多人，小方6000至7000人，每方设帅进行统率，全国的大小方众，均服从最高领袖张角的号令。

张角利用宗教的掩护，进行了起义的长期准备之后，便决定于甲子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举行全国的大起义。他们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起义军规定，一律头裹黄巾，故称为黄巾军。所谓苍天已死，即是指东汉王朝应当灭亡。黄天当立，意即黄巾军当主天下。

起义群众为便于向京师及州郡官府进攻，均派人在官府门上写上"甲子"二字，做为进攻的标志。张角为掌握起义的准备情况，潜进京师洛阳，观察各方动静。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34年），张角命大方首领马元义等先调集荆、扬两州徒众数万人，约期到达邺地（今河北临漳），以便策应京师洛阳的起义。马元义为顺利攻占洛阳，还数次往来于京师洛阳，以中常侍封谓、徐奉等为内应，力争内外配合，一举奏效。

当各地起义力量正在紧张进行准备之时，张角的弟子唐周叛变，密告朝廷。朝廷立即搜捕了马元义，以车裂之刑，残酷地杀害了他。接着又在洛阳搜捕了张角徒众1000多人，也加以杀害。与此同时，紧急下令捉拿张角。

张角等人鉴于起义事机暴露，于是立即决定提前一个月起义。并派人星夜通告各方，立即举行起义。张角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各地黄巾军闻讯，揭竿而起，数十万农民头裹黄巾，拿起武器，攻县邑、烧官府、杀长吏，没收富豪官吏财产，打开府库赈济贫民，起义声势席卷全国。《后汉书·皇甫嵩列传》记述当时的情形说："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一场全国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便拉开了战幕。

第十七章 黄巾起义军的战争

黄巾军起义战争，为分散于各地的作战，黄巾军的主力分别在冀州、颍川、南阳三个地区行动，其它各方义军也均在当地活动。

颍川黄巾军与东汉围剿军的作战发生于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四月。东汉皇甫嵩朱俏等共4万之众，将颍州波才统率的黄巾起义军击败。

冀州黄巾军与东汉围剿军的作战发生于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六月。皇甫嵩以5万兵马，将黄巾军核心集团张角兄弟所率的20万人击败，皇甫嵩竟对张角剖棺戮尸，以发泄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军的刻骨仇恨。

南阳黄巾军与东汉围剿军的作战发生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六月。东汉朱俏统率1.8万多兵马，经五个月的作战，将南阳黄巾军击败。

第一节 颍川黄巾军与东汉围剿军的作战

一、颍川黄巾军起义后的作战形势

颍川黄巾军是黄巾军中的主力军队之一，在起义军领袖之一波才的统率之下起义。这支起义军队于颍川地区起义之后，声势很大，州郡军望风披靡，从东南方向与冀州、南阳两地的黄巾军构成了进逼洛阳的有利态势。

东汉王朝对黄巾军的突然大起义十分惊慌，尤其对黄巾军主力集团以攻击京师洛阳为主要目标，更为紧张。为防止黄巾军向洛阳推进，东汉王朝紧急调兵遣将，布署兵力，以重兵防守洛阳周围的八大重要关隘（函谷、大谷、广域、伊阙、轘、旋门、孟津、小平津），阻止黄巾军的进击。

二、东汉王朝的对策

东汉王朝在洛阳周围重要关隘布防之后，便召集群臣商议镇压颍川等地黄巾军的对策。

皇甫嵩建议，应当解除党禁，拿出府库的钱财，调发西园的厩马，紧急抚慰和装备军队，全力对付黄巾军的作战。汉灵帝采纳了皇甫嵩的建议。于是，“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并以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俏，共发五校，三河骑士及募精勇4万多人，皇甫嵩、朱儁各领一军，向颍川起义军进剿。

三、黄巾汉军双方作战序列

黄巾军

统帅波才

将领彭脱

总兵力10万人左右

东汉军

将领左中郎将皇甫嵩

右中郎将朱儁

骑都尉曹操

总兵力4万多人

四、颍川黄巾军与汉军作战经过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四月，东汉朱儁所率之军，与波才统率的黄巾军交战，被黄巾军击败。皇甫嵩见势不妙，率军进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屯兵不前，波才立即率黄巾军包围了皇甫嵩军。

甫皇嵩军兵少势弱，全军惊恐。这时甫皇嵩召集部将鼓动说：“兵有奇变，不在众寡。今贼（指起义军）依草结营，易为风火。若因夜纵烧，必人惊乱。吾出兵击之，四面俱合，田单之功可成也。”

当天黄昏以后，天起大风。甫皇嵩命其部众以苇草为火把，以一部分锐士偷偷溜出起义军的包围圈，从起义军背后放火大呼，城上的汉军也举火高叫，南皂嵩乘势率军冲入起义军营内，放火烧营，黄巾军大惊而退走。五月，骑都尉曹操率兵赶至，于是皇甫嵩、曹操、朱儁三支军队合兵一处，再与黄巾军大战，黄巾军战败，汉军将黄巾军残酷地斩杀了数万人。

皂甫嵩、朱儁乘胜进攻汝南郡（今河南平与北六十公里）和陈国（都城在今河南淮阳）的黄巾军，又与波才军交战干阳翟（今河南禹州），再次将波才军击败。同时还将彭脱统率的另一支黄巾军击败于西华（今河南周口西）。这样，汝南、颖川、陈国三郡地区的黄巾军遂全部为皂甫嵩、朱儁所镇压。

皇甫嵩等镇压了波才的黄巾军后，再转兵进击东郡（今河南省濮阳南）的黄巾军，于苍亭（今山东阳谷北）地区，将卜已所率的黄巾军击败，斩杀起义军7000多人。

皇甫嵩因镇压黄巾军有功，而被封为部乡侯。

第二节 冀州黄巾军与东汉围剿军的作战

一、颍川黄巾军失败后的形势

颍川黄巾军的失利，对起义力量是一个重大打击。这使得东汉王朝能够将皇甫嵩、朱俏等统率的天下精锐，转向别的战场作战。再加之，黄巾军仓猝起义，准备不足，军队来不及训练和进行严密编组，尤其是对京都洛阳起义计划的暴露，使得东汉王朝可以放手组织力量反击。因而，黄巾军从起义之初，到颍川黄巾军的失败，在比期间，虽然也取得了大败汝南太守刘卫、击杀幽州刺史郭勋、广阳太守刘卫的许多胜利，但却在全局上难免一步步陷入被动困难的境地。

东汉王朝在消灭了颍川起义军后，由于消除了对京师洛阳的最大威胁，便乘胜以皇甫嵩军北上，攻打冀州的黄巾军，以朱儁军南下南阳，镇压南阳地区的黄巾军。

二、黄巾军汉军双方作战序列

黄巾军

统帅天公将军张角

将领地公将军张宝

人公将军张梁

总兵力20万人左右

东汉军

统帅左中郎将皇甫嵩

将领北中郎将卢植

东中郎将董卓

巨鹿太守郭典

总兵力判断为5万人左右

三、冀州黄巾军与东汉围剿军作战经过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六月，东汉王朝先仟命卢植为北中郎将，后以董卓为东中郎将，率军镇压冀州黄巾起义军。

冀州黄巾起义军为张角兄弟所直接统率，有20万之众，力量最为强大。卢植军连续与黄巾军交战，击破张角军，斩首1万多人。张角领军退走广宗（今河北威县东）。朝廷命董卓代替卢植再与张角军交战于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被黄巾军战败，董卓因兵败而获罪。

同年十月，皇甫嵩率军进入冀州巨鹿郡，与黄巾军人公将军张梁所率部队大战于广宗，张梁部众精勇无比，皇甫嵩未能取胜。但皇甫嵩到底是一员精通谋略的悍将，他见力战难以奏效，遂闭营休整，以窥测黄巾军的动静。当他发现张梁军戒备松懈，乃乘黑夜进兵，鸡鸣时突然出现在张梁阵前。张梁军虽遭突然袭击，全军仍英勇与汉军大战，但终因仓猝应战而战败。人公将军张梁牺牲，皇甫嵩军斩起义军3万多人，渡河淹亡5万多人。

汉军尽掠黄巾军家属，军实物资。张角由于先已病故，皇甫嵩军为发泄对人民起义的仇恨，竟“剖棺戮尸，传首京师。”

汉灵帝中平元年十一月，皇甫嵩率军又于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与巨鹿太守郭典军击败地公将军张宝统率的起义军。张宝战死，10多万起义军被皇甫嵩军斩首，子下曲阳城东筑成京观，至此，张角兄弟统率的黄巾起义军的核心集团，遂被汉军血腥地镇压下去。

镇压黄巾军的刽子手皇甫嵩，因此次作战有功，被汉灵帝拜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槐里侯，赐赏槐里（今陕西兴平）、美阳（今陕西武功西）两县八千户为其食邑。

第三节 南阳黄巾军与东汉围剿军的作战

一、南阳黄巾军的发展

南阳黄巾军在张曼成的率领下起义。张曼成称为“神上使”，拥有义军数万人。张曼成军于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一举攻克南阳郡治所在地宛城（今河南南阳），斩郡太守秘贡，起义军在宛下屯军百余日。

后来太守秦颉将张曼成击杀，起义军便以赵弘为帅，兵势更盛，迅速发展至10多万人，遂以宛城做为根据地，不断壮大起义的力量。

二、黄巾军东汉双方作战序列

黄巾军

统帅张曼成

将领赵弘

韩忠

孙夏

总兵力10多万人

东汉军

统帅镇贼中郎将朱儁

将领荆州刺史徐璆

司马张超

太守秦须

总兵力1.8万多人

三、南阳黄巾军与东汉军作战经过

东汉王朝以朱儁镇压汝南，颍川、陈国起义军有功，封西乡侯，迁为镇贼中郎将。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六月，朱备受领南下南阳的任务后，便率军进至南阳郡，与荆州刺史徐璆及太守秦颉合兵一处，共拥众1.8万人。旋即包围宛城，汉军自六月攻至八月，宛城仍岿然屹立，汉王朝见朱俏军无法战胜起义军，便欲将其免职调回。

但是司空张温认为此时不应换将，他上疏说：“昔秦用白起，燕任乐毅，皆旷年历载，乃能克敌。儁讨颍川，以有功效，引师南指，方略已设，临军易将，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责其成功。”汉灵帝采纳了张温的建议，仍命朱备继续在南阳作战。

朱儁率军加紧进攻赵弘黄巾军，赵弘在作战中不幸牺牲，黄巾军以韩忠代赵弘为帅，继续与朱儁军作战。朱儁军兵少。被黄巾军击败，便“张围结垒，起土山以临城内，”以鸣鼓虚张声势，攻宛城西南，黄巾军不知是计，众人皆去西南迎击汉军，城东北出现空隙。这时朱儁留下部分兵力与黄巾军交战，自率精兵5000，绕至城东北，乘虚而入，韩忠见大城已破，遂率军退保小城。后来兵势渐弱，韩忠便派人向汉军表示投降。

汉军司马张超，刺史徐谬，太守秦颉等皆欲应允。但朱儁这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却认为，黄巾乃贼寇，如若接受他们的投降，则等于助长叛乱，应彻底剿灭。他经过观察分析黄巾军的情况对部将说：“黄巾军乞降不成，欲冲出小城，又被我牢牢包围。所以只有与我死战，万人一心，将不可抵挡，何况黄巾共有10万之众，假如拼死力战，我军必危，不如撤销对小城的围困。这样，黄巾见包围已撤，必然出城而走，而其军队一旦出城，抵抗意志定会瓦解，我再向其进攻，则可一举将其击破。”汉军主意已定，便立即命全军解除对小城的包围。黄巾军见敌人撤走，便在韩忠率领下出城，朱儁则乘机突袭黄巾军，果然将起义军击败。黄巾军且退且战，被朱儁军追杀数十里，被斩杀1万多人。

韩忠等丧失气节，向汉军投降，被太守秦颉斩首。其余起义军见首领被杀，立即拥立孙夏为帅，返回宛中屯驻。朱儁率军急攻，孙夏又率军退走，汉军追至西鄂（今河南南阳北40公里），双方展开大战，黄巾军又战败，被敌斩杀1万多人，其余部众均散走。至此，南阳起义的黄巾军也宣告失败。

黄巾军起义战争评述

发生于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大起义，是东汉末期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战争。黄巾军在起义军领袖张角兄弟、波才、张曼成等人的率领下，前赴后继，英勇作战，以摧枯拉朽的伟大力量，把腐败不堪的东汉王朝推向了彻底崩溃的深渊。但是，黄巾军在完成了它的这一伟大历史使命之后，却未能见到自己浴血苦战的成果，而被豪强地主和军阀挟持隗儡皇帝以混战30年的局面所代替。从而，使又一场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流血牺牲的成果，付之东流。

黄巾军以百万之众起义，且遍布全国各地，为什么归于失败，其中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教训。

1.历史的局限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一切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

矛盾。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不断尖锐化，便导致了一次次农民革命战争的爆发。从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到东汉末的这次黄巾大起义，都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尖锐化的产物。这些一次次的农民起义，都想通过暴力彻底剥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权力，以自己的新式政权取而代之。这次黄巾大起义提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战略目标，就是农民渴求建立自己政权的最高愿望的体现。但是，由于农民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即使农民革命一时成功，由于其个体小农经济所决定，也不可能为农民政权提供长久的经济基础，再加上农民起义内部和外部诸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原因，要么不可避免地蜕化为封建政权新的统治者，要么最终为地主阶级所镇压。这是农民阶级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无法改变的时代悲剧结局。它也正是黄巾起义军与其一切农民起义军不能违背的历史必然规律。

2.军事战略的失误黄巾起义军的失败，在军事战略上的直接原因，主要的有三点：其一是黄巾军缺乏明确的战略策划。它在起义前虽然对全国做了36方的部署，但从其起义后的作战行动来看，对起义之后向何处发展，怎样集结起义力量，如何对付东汉军队的围剿等，均无相应的计划。起义军分散在各地孤立行动，缺乏战略上的配合，因而被反动王朝个个击破。其二是起义计划的暴露，形成准备不足，仓猝行动。这使东汉王朝获得了必要的准备时间，调兵遣将，策划反攻。其三是未能取得京师起义的成功。这使得东汉统治集团能够安然坐镇京师，调度全国的力量，对起义军围歼追杀。

3.起义军遇到东汉王朝一批悍将的围剿起于东汉王朝末期乱世的一批悍将，皆都是欲割据称雄之士，诸如皇甫嵩、袁绍、公孙瓒、董卓、曹操等。这些乱世中的军阀，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进而为夺取天下霸业，积蓄力量，都本能地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全力镇压黄巾起义军。他们疯狂地东讨西杀，在作战中表现了罕见的顽强性，常常以劣势之军，击败十几万、数十万的起义军。在他们的身边又聚集了一批文韬武略之士，无论运筹决策能力，还是统兵作战的指挥才干，往往高出起义军一筹，占据了主观指导上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起义军自然难以与其匹敌。

第十八章 黑山白波黄巾军起义战争

张角兄弟统率的黄巾军被东汉王朝镇压之后，黄巾军散布于全国各地的起义力量，又陆续进行了斗争，其中力量最为强大的是黑山、白波等黄巾军。经过的主要作战活动为：

黑山军与东汉围剿军的东光之战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4年）十月，青州和徐州等地起义的黄巾军准备与黑山军会合，中途被军阀公孙瓒截击失败。接着曹操于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春，在东武阳地区战胜黑山军于毒、眭固等部。

黄巾军与东汉围剿军寿张、鹿肠山之战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夏四月，青州黄巾军以百万之众，正向兖州发动进攻。曹操率军经半年的残酷镇压，将这支黄巾军歼灭，以其中的精壮之士，编成了曹操的主力“青州军”。接着军阀袁绍于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夏六月，先后将黑山黄巾军的于毒、左兖、丈八、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氏根等部一一歼灭。

黑山军的最后失败之战发生于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春。黑山军统帅张燕，率领10万大军为公孙瓒解围，被军阀袁绍击败，张燕最后投降了汉军。

五斗米道起义军抗击曹操围剿军之战发生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春三月，曹操亲率大军入巴、汉地区，进击张鲁起义军。起义军英勇作战，阻止了曹军的进攻。后来，曹军在撤退中，误入张鲁军营，引起起义军惊乱而被曹军击败，张鲁投降了曹操，五斗米道起义军彻底失败。

第一节 黑山白波黄巾军的起义

一、黑山军的起义

自张角兄弟率领的黄军巾大起义被东汉王朝镇压后，各地的起义力量仍在继续战斗。在今河北、山西、河南活跃着许多支农民起义军。诸如黑山、黄龙、左校、白波、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椽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晒，等等。这些起义军多以起义首领的相貌特征为其名号，比如声音高者称为雷公，骑白马者称为白骑，行动轻捷者称为飞燕，多髭者称为于氐根。眼睛大者称为人目。其中势力大的有两三万人，小者也均有六七千人，总人数达到百万以上。

这些遍布山野的农民起义军，在各地起义之后，杀官吏，烧官府，砸监狱，劫府库，对东汉王朝的地方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后来，他们在斗争中逐步联合，成为一支实力更加强大的起义队伍，称为黑山军。黑山军的首领最初为博陵人张牛角。

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春，二月，张牛角、褚飞燕合军进击瘿（音影）陶（今河北宁晋西南），张牛角身中流矢而牺牲。张牛角在临牺牲前，命其部众以褚飞燕为帅，改姓张。这时，黑山军已达百万之众，声势浩大，东汉王朝无力镇压。张飞燕不久便派使者去京师洛阳，向汉灵帝上书表示降服。汉王朝拜张飞燕为平难中郎将。

张飞燕军的势力进一步向河内发展，逼近了京师洛阳，东汉王朝明封张飞燕为官，暗中却对起义军的发展十分恐惧，遂派朱儁为河内太守，率兵与起义军相抗衡。

二、白波等黄巾军的起义

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二月，黄巾军余部郭大贤于河西白波谷（今山西襄汾永固镇一带）起义。称白波黄巾军，转战于太原、河东地区，力量逐渐发展至10多万人。董卓命中郎将牛辅率军前往镇压，被白波军击败。

当年六月，益州黄巾军在马相、赵祗率领下，于绵竹（今四川德阳）地区起义，杀益州刺史却俭。进击巴郡、犍为等郡县，旬月之间发展到数万多人，后来被州郡军和地方武装镇压下去。

第二节 黑山黄巾军与东汉围剿军的东光之战

一、公孙瓒阻止青徐黄巾军与黑山军的会合

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十月，起于青州和徐州地区的黄巾军30多万人，在起义军领袖张饶等人的率领下，在大败北海相孔融之后，随之向勃海一带（约为今河北南部和山东北部）进军，准备与黑山军会合，进至东光（今河北东光）南。公孙瓒率领步骑兵2万多人，对青徐起义军进行突然袭击，黄巾军被公孙瓒击败，牺牲3万多人，军实辎重损失众多。

黄巾军战败，决定北渡黄河。公孙瓒又趁黄巾军正在渡河之机，半渡而击，黄巾军又受到很大损失，死者数万人，鲜血染红了河水，7万多人被公孙瓒军俘虏，车甲物资损失不可胜数。

公孙瓒因此次镇压黄巾军南胜利，“威名大震”，被拜为奋武将军，封为刨候。

二、曹操于簇阳和东武阳镇压黑山军的作战经过

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秋，七月，各地起兵的军阀盟主袁绍，与冀州牧韩馥占据冀州后，怀有鲸吞天下之志的曹操，想在黄河以南建立自己的地盘。这时，黑山黄巾军正在黄河以南地区发展起义力量，起义军将领于毒、白绕，眭固等，正率领10多万大军进攻东郡（今山东莘县南）、魏郡（今河北磁县南），东郡太守王肱无力抵抗。此时，做为袁绍部将的曹操率军进入东郡地区，于濮阳（今河南濮阳）与黄巾军展开激战，将白绕部击败，遂继任为东郡太守。

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春，曹操率军驻于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黄巾军将领于毒，乘曹军北进之机，进攻东武阳（今山东莘县南）。

曹军诸将均认为应回军解救东武阳，曹操却坚持进攻于毒军的后方基地。曹操说：“孙膑救赵而攻魏，耿算欲走西安攻临菑，使贼闻我西而还，武阳自解也，不还，我能败其本屯，虏不能拔武阳必矣。”众将听罢，遂不再提异议，跟随曹操向西入山，围攻于毒军的山区根据地。于毒等未曾识破曹操“围魏救赵”的谋略。听说曹操率军进击其山区根据地，便急忙撤军回救。这样东武阳之围解除，曹操还乘机截击了睦固所部黄巾军。

第三节 黑山黄巾军与东汉围剿军寿张、鹿肠山之战

一、曹操于寿张地区镇压黄巾军的作战经过

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夏，四月，青州（今山东省东北部）黄巾军，以百万之众进军兖州，攻城夺邑，斩任城相郑遂，继而向东平一带发展。

兖州刺史刘岱欲率兵迎击，济北相鲍信劝阻刘岱说："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斗志，不可敌也。观贼众群辈相随，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资。今不若畜士众之力，先为固守。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后选精锐，据其要害，击之可破也。"甲刘岱轻视黄巾军的力量，率兵与黄巾军交战，黄巾军大胜刘岱军，将刘岱斩首。

鲍信见势不妙，便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向曹操秉报黄巾军的情况，迎曹操为兖州牧。于是，曹操便率军于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与黄巾军大战，鲍信被黄巾军斩首。

曹军只有1000多人，开始与黄巾军接战，即被黄巾军击败，曹军死数百人，退回营内。

据《后汉书》引《魏书》记述说："黄巾兵精勇悍，曹军新兵多，且未经过良好训练，战败之后，全军惊惧。曹操经过整顿，以重赏激励士卒，军队士气恢复，再与黄巾军战，将黄巾军战败。"双方经过六个月的多次作战，黄巾军到底不是悍将曹操的对手，终于败在曹操手下。

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3年）冬，十二月，黄巾军战败后，全军退向济北厂曹军遂于追击中，以布设奇兵，又将黄巾军击败。结果，黄巾军30多万和男女老少百万口，被迫降于曹操。曹操便将其中的精锐勇壮之士编成新的军队；号称青州军。曹操的势力由此大增，成为他尔后夺取天下的骨干力量。

二、袁绍于鹿肠山镇压黄巾军的作战经过

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夏，六月，袁绍深感黑山黄巾军的威胁，遂率领大军进攻黑山军于毒部的根据地鹿肠山苍岩谷口（今河南淇县西），围攻于毒部五天五夜，将手毒部击败，袁绍残酷地将于毒和其部众1万多人斩首。

袁绍军得胜后，沿山北上（今太行山东麓），继续镇压左髭丈八部黄巾军，又将该部黄巾军歼灭。接着再围剿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氏根等部黄，巾军，夷平了起义军的营地，屠杀了数万名黄巾军士卒。

袁绍乘胜再与黑山军张燕部、屠各、乌桓等兄弟民族的起义部众交战，黑山等起义军以数万大军凭险拒守，屡挫袁绍军，双方连战10多天，伤亡均较惨重，不分胜负而罢兵。

第四节 黑山军的最后失败之战

一、张燕军与公孙瓒的联合

袁绍与公孙瓒是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两大主力集团，也同是镇压黄巾军的刽子手。但黑山黄巾军诸部，被袁绍军逐次镇压后，相比之下，起义军对袁绍更加仇恨。因而，当袁绍与公孙瓒互相火并，公孙瓒被袁绍军围攻，处于不利地位时，公孙瓒便于汉献帝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冬，十二月，派共子公孙续赴黑山军张燕部求救，张燕部遂决定出兵，与公孙瓒共击袁绍军。

二、黑山军的战败

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春，黑山军统帅张燕率领10万大军，前往解救公孙瓒。

在黑山军尚未到达之前，公孙瓒写一密信给其子公孙续，命其搬来救兵之后，以5000精骑埋伏于袁绍军附近，举火为信号，公孙瓒见火便率军出击，以图内外夹攻，一举击破袁绍军。

但这一密信为袁绍军的侦探所截获，袁绍遂布设伏兵后，令人举火，引诱公孙瓒出战，公孙瓒果然率军而出，被袁绍军大败，公孙瓒逃回小城，以火自焚身死。

黑山军与袁绍军接战后，黑山军战败。后来，在曹操将定冀州时，张燕率众投降了曹操。

这样，一场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便以黑山军的战败和张燕的叛变投降，而归于最后失败。

第五节 五斗米道起义军抗击曹操围剿军之战

一、五斗米道张鲁的起义

五斗米道的教主张陵死后，传给其子张衡，张衡死后，再由其子张鲁为首领。张鲁率道众起义后，于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在今陕西省汉中地区建立了农民起义政权。这个政权将政教结合起来，张鲁称“师君”，入道久的人称“祭酒”和“治头大祭酒”，管理政务和统领军队。由于这一农民政权有在当时社会难得的平等思想，深受百姓的拥护，“民夷便乐之”《三国志》称其，“雄据巴、汉垂三十年。汉末，力不能征，遂就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台献而已。”在韩遂、马超等混战时，关西（函谷关以西）民众自愿奔赴巴、汉者达数万家。

二、鲁曹操两军作战序列

张鲁军

统帅师君张鲁

治头大祭酒张卫

阎圃

总兵力不少于4万人

曹操军

统帅丞相曹操

将领大将军张郃

将军许褚

将军朱灵

总兵力判断为5万人以上

三、曹军围攻张鲁军的作战经过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春三月，曹操率军亲征张鲁。

曹军先至武都郡，氐人（一少数民族）欲阻止曹军，被曹军张郃、朱灵部击破，再进而过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北）、出散关至河池（今甘肃徽县），当年七月，曹军进抵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北）。

张鲁闻曹犬军到，欲举汉中投降曹操。张鲁弟张卫不肯，率领数万部众拒关坚守，横山筑城十多里，阻止了曹操的进军。

当初，在曹操未进军阳平之前，曾听人说，张鲁所居之地阳平城，距山很远，无险可守，很易攻取。曹操到了现地，才发现阳平确为险要之地，远不是他人传说的情况。曹操命令部队进攻张鲁军防守的山隘阵地，由于山势险峻，无法攻取，士卒伤亡增多，经多日作战，军食将尽，士气低落，曹操也非常沮丧。于是，曹操便欲率军退返关中。曹操遂命大将军夏侯惇，将军许褚召回在山上作战的部队。曹军夜间返回的，由于迷失方向，误入张鲁军营帐，张鲁军大惊，纷纷退散。曹军侍中辛毗、主簿刘晔等发现这一情况，即告知夏侯惇和许褚说，我军已占据了贼兵要害营地，贼兵现已散走。夏侯惇和和许褚不相信，待他们赶至前面亲自观看了情况后，才信以为真，便急忙返回向曹操报告，曹操遂下令部队向张鲁军进攻，张鲁弟张卫见形势不利，乘夜撤逃，阳平遂被曹军占领。

张鲁得知阳平已为曹军占领，再次欲降于曹操，被部将阎圃劝阻，进入南山。不久，便向曹军投降。五斗米道的起义，至此也告冰消瓦解。

黑山黄巾军起义战争评述

东汉末年，继张角兄弟率领的黄巾大起义之后而起的黑山、白波、五斗米道等起义军，声势之大，人数之众，实力之强，并不亚于黄巾军。然而，却又陷入了失败的复辙，除了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之外，其中的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

黑山军缺乏战略上的紧密联合张角兄弟领导的黄巾军起义被镇压之后不久在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省一些地区，揭竿而起的众多农民起义军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氏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椽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晒等，大小起义军“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大者两三万，小者六七千。这些起义的大小部队，虽然后来统称为黑山黄巾军，但却没有真正联合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也和黄巾军大起义一样广基本上是分散独立作战。这样，自然不是军阀正规部队的敌手。军阀袁绍一次进军，便逐个将于毒，左髭、丈八、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月、于氏根等部一一歼灭。

黑山军缺乏应有的战略谋略思想这几乎成了黑山军战场直接失败的重大因素。黑山军在寿张地区与曹操围剿军的作战中，拥有百万之众，而曹军却居于绝对劣势，且初战中曹军已被斩杀数百人，曹军全军惊惧。起义军如果稍具战略头脑，当乘胜与曹军继续作战，一鼓作气将其全部歼灭。但起义军却让曹军安然撤回营垒休整，给了曹军以重整旗鼓的宝贵时机，经过半年多的作战，精锐的青州起义军30万之众，被曹操

彻底战败。曹操在镇压黑山军于毒部的作战中，巧妙地采用了“围魏救赵”的谋略，也诱使起义军中计战败，这都说明起义军的战略决策水平，较之东汉军阀均棋差一着。

黑山等起义军的一些将领，缺乏起义军将领忠勇不屈，拼死力战的精神。形势稍有不利，这些将领便向敌人降服。名为黑山军最高统帅的张飞燕，受张牛角重托，但不久便向东汉王朝降服，尽管可能出于策略上的原因，但做为起义军的最高领袖而降服敌人，这对起义军的斗志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张飞燕在与袁绍作战失利后，旋即投降于汉。至手五斗米道起义军的首领张鲁，更是农民起义战争中少见的软骨头。曹操大军尚未到达巴汉地区，他便想向曹操投降，由于其弟张卫的阻止，未能得逞。但是，初战失利后，立即做了曹操的座上客。



清代战争史



目录

第一章 假奇缘长白山上藏卧龙 沐祥瑞山海关下定乾坤
第一节 30年战争努尔哈赤建后金
第二节 萨尔浒之战后金乘胜入辽沈
第三节 山海关之战清朝入主中原
第二章 流水落花南明政权朱颜改 壮志难酬各路英豪美名传
第一节 黄河两岸反清之火燎原
第二节 大江南北抗清斗争正酣
第三节 轰轰烈烈惊世英雄起四方
第四节 南京陷落弘光政权土崩瓦解
第五节 昙花一现南明诸朝无力回天
第三章 逐荷夷郑成功收复台湾 大一统宝岛回归祖国
第一节 反清复明国姓爷背父救国
第二节 出兵逐荷顺天意光复台湾
第三节 郑氏顽抗施琅专征台湾
第四章 有恃无恐三藩作乱边关 恩威并用清廷国泰民安
第一节 清廷撤藩吴三桂悍然兵变
第二节 叛军占湖南六省闻风而动
第三节 清军反击剪除东西两翼
第四节 南北夹击主攻湖南
第五章 康雍乾三朝英明决策 青藏川边陲叛乱平息
第一节 雅克萨之战维护主权
第二节 逆者兵临康熙三征准噶尔
第三节 再平准噶尔管辖西藏青海
第四节 准部烽烟再起清廷维护统一
第五节 乾隆出兵伊犁准部叛乱平息
第六节 南服回疆平定大小和卓木
第七节 藏民土司叛乱清军荡平大小金川
第六章 风雷滚滚白莲教徒起四方 战鼓隆隆各族儿女竞抗清
第一节 各路豪强川陕鄂聚首
第二节 鄂女王聪儿聚众起义
第三节 巴山老林义军蜂起
第四节 苗民反清硝烟又起
第五节 各族反清方兴未艾

第一章 假奇缘长白山上藏卧龙 沐祥瑞山海关下定乾坤

莽莽长白山，浓浓塞外情。爱新觉罗氏繁衍生息，子孙相传不绝。各部互争雄长，不相统属。努尔哈赤以兵甲13副崛起，统一了女真各部；其第八子皇太极则于1636年称帝于盛京(沈阳)，改国号为“清”……

第一节 30年战争努尔哈赤建后金

满族的先世居住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自古就和中原地区有密切的关系。据《满文老档》记载：长白山东边有一座布库里山，山麓的布勒和里湖，清澈见底，澄碧如镜。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有三位仙女浴于湖中。第三位仙女天真烂漫，吃了灵鹊衔来的红色果实，结果孕而生子，姓爱新觉罗，取名为布库里雍顺，他是满族传说中公认的始祖。

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明朝时女真内部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满族出自建州女真，它的直系祖先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北岸，后来逐渐向南迁移，并从渔猎转为以农业生产为主。建州女真以苏子河流域为中心，经济日益发展，军事力量日益增强。苏子河西岸土地肥美，山青水秀，成了清朝的发祥之地。日趋腐败的明朝政府已无法改变建州女真由弱变强、由分散到统一的崛起过程。

明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女真的控制，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分而治之、互相牵制的老办法，使女真各部长期陷于分裂、混战不休的状态，明朝政府要实现这一目的，相机使用镇压、招抚和防范的手段。当时确实是“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建州内部敢是攘夺货财，兄弟交嫉”，相互厮杀。这种分裂割据、互相对立、战乱不息的局势，阻碍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发展，给女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女真人民都希望从分裂割据、互相仇杀中解脱出来，实现统一安定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努尔哈赤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

努尔哈赤，生于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出生在建州左卫奴隶主家庭。他是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的六世孙，历代祖先有许多人受明廷册封，担任建州左卫指挥使、都督佥事、都督等官。努尔哈赤10岁丧母，因继母虐待，19岁分家自立。为了生活，他采松子、挖人参到抚顺马市出售，不久又投到明辽东大将李成梁部下，“每战必先登，屡立战功，成梁厚待之”。艰苦的劳动生涯和紧张的戎马生活，把努尔哈赤锻炼成足智多谋、武艺超群的杰出人才。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建州苏克苏浒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导明军镇压阿台，努尔哈赤的祖父左卫都指挥觉昌安，父亲建州左卫指挥塔克世也随军同往，结果在明军攻破阿台的古将城时，觉昌安被烧死，塔克世遭误杀，明廷为了报偿其祖父、父亲冤死，授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于是他强咽仇恨返回建州，以图发展。

努尔哈赤把祖、父的死亡归罪于尼堪外兰。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他以祖、父遗甲13副起兵，攻打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尼堪外兰弃城逃走。从此，努尔哈赤开始了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事业。1584年，他攻占了兆佳城和玛尔墩寨，降服了董鄂部；1585年，进攻界凡寨，击败界凡、巴尔达、萨尔浒、加哈、托漠河5寨联军800人，征服了浑河部；同年，攻破安土瓜尔佳城，杀城主诺莫泥；1586年，攻克鄂勒珲城，杀尼堪外兰，控制了苏克苏浒部；1587年和1588年又收服哲陈部、完颜

部。

努尔哈赤初起时，士卒不到100名，是建州女真中一支弱小的势力，在建州内外有许多强大的敌人，努尔哈赤采用“恩威并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政策经过5年的征战，基本上把分散对立的各部努力统一了起来，一跃而为女真族中最强大的力量。努尔哈赤面对着强大众多的敌人以及部族内外一片争杀的混乱局势，既有坚强刚毅、蔑视困难的勇气，又能冷静地分析形势，部署对策。他勤练兵马，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常常以少击众，屡克强敌，努尔哈赤自己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在攻克鄂勒珲城的战斗中，亲率40人冲入敌阵，受箭伤30处。这种猛冲猛打、勇往直前的战斗作风是他取胜的重要的原因，同时，他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政策即先弱后强，由近及远。开始时他的征讨范围限于建州内部，特别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尼堪外兰，对相对强大的海西女真则暂时避免发生冲突，对蒙古、朝鲜则进行拉拢，表示亲睦。对明朝中央政府更是十分恭顺，“遣使通好，岁以金币聘问”，努尔哈赤还多次亲赴北京朝贡，所以明廷最初对他比较信任。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各部后，明廷于1589年授他为都督佥事，1591年升为左都督，1595年，以“保塞有功”又晋封他为龙虎将军，把他看做是“忠顺学好，看边效力”的良好的地方官。此外，努尔哈赤注意收容降众，整顿内部秩序，发展经济。他“定国政，禁悖乱，法制以立”，“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

建州女真的统一和努尔哈赤的崛起，必然会引起与同样强大的海西女真发生冲突。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海西叶赫部领袖纳林布禄纠集了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瓜尔佳、朱舍里、讷殷9部，组成3万联军，分三路向努尔哈赤发动进攻。这是努尔哈赤起兵以后的第一次关键性战役，9部联军声势浩大，兵力占压倒优势。但是努尔哈赤临危不惧，从容镇静，他正确地分析了9部联军内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认为：“彼部长甚多，兵皆乌合，势将观望不前”，“伤其一二头目，彼兵自走”，“我兵虽少，奋力一战，固可必胜耳”，他满怀信心地鼓舞将士，从容布阵，抢在联军的前头，在古勒山立营，“立险要之处，诱彼来战”。在战斗时，集中优势兵力，重点出击，斩杀叶赫首领布斋，俘获乌拉首领满泰的弟弟布占泰，“叶赫贝勒等见布斋被杀，皆痛哭。其同来贝勒等大惧，并皆丧胆，各不顾其兵，四散而走”。努尔哈赤取得了“破九部三万之众”的重大胜利，这次胜利为进一步统一女真各部奠定了基础。

努尔哈赤破9部联军后，乘胜挥军东进，征服了朱舍里、讷殷2部，力量迅速壮大。此时，努尔哈赤及其弟速尔哈赤，各有战将150余人和40余人，各有战兵1万多人和5000多人，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强大。此后20多年，努尔哈赤为统一女真进行了艰苦斗争，主要就是对付部众很多、力量强盛的海西4部。他认识到自己不可能一举攻灭4部，他说“砍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相等之国，欲一举取之，岂能尽灭乎”，因此，采取了分化和逐步蚕食政策。一方面，与海西4部中较强大的叶赫、乌拉两部结盟联姻，特别是拉拢乌拉部领袖布占泰，努尔哈赤和速尔哈赤娶布占泰的侄女与女儿为妻，速尔哈赤又把女儿嫁给布占泰，目的是拆散海西4部的联合，以便各个击

破。另一方面逐步先攻灭较小的哈达部与辉发部。当时明朝政府害怕女真统一以后，力量强大起来，希望保持各部分立，玩弄力量平衡、分而治之的手段，袒护渐趋衰落的海西4部，压抑正在勃兴的建州女真，努尔哈赤为了避免与明军冲突，仍表示服从明朝的命令。1599年，努尔哈赤已攻灭哈达部，擒其首领蒙格布禄，但在朗朝政府的干预下又不得不在表面上恢复哈达部，立蒙格布禄之子武古尔岱为哈达首领，而自己则在幕后控制。至于对蒙古更是加意笼络，蒙古科尔沁部、扎鲁特部都归附了努尔哈赤，成为他在统一战争中的得力帮手。

在与海西4部长达20多年的斗争中，对东海女真的争夺是个焦点。东海女真分散居住在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两岸，北至外兴安岭的广大地区内，还处在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他们是兵员和奴隶劳动力的后备军，也是财富的来源，无论是海西女真或建州女真，谁能够争取东海女真的归附，谁就能在统一东北的战争中稳操胜劵。因此，争夺沿边各部族、各民族的斗争十分激烈。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东海瓦尔喀部斐优城(今吉林省珲春附近)的首领穆特赫苦于乌拉部的骚扰，自愿归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派弟速尔哈赤及子褚英、代善率兵3000前往斐优城，迎接穆特赫的部众眷属，乌拉部布占泰率兵万人，在图门江一带袭击。速尔哈赤回军途中，在乌碣岩与乌拉兵遭遇，褚英、代善等“缘山奋击，乌拉兵大败”，“斩3000级，获马5000匹，甲3000副”。乌碣岩战斗的胜利，打开了通往东海诸部的大门。从此，努尔哈赤“威行迤东诸部”，乌拉“不敢窥望其去留，兵锋所指，莫敢谁何”，随之瓦尔喀部皆“望风归附”。1609年，派扈尔汉攻占窝集部的瑚叶路(今兴凯湖附近)。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派额亦都率军收抚窝集部的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并攻打了雅兰路(今苏联东海滨的雅兰河)。1611年(明万历三十九年)派阿巴泰攻取窝集部的乌尔古宸和木伦二路。同年，东海瑚尔哈部的扎库塔居民来附。

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在顺利地发展，这就要求建州内部权力的集中和统一调动指挥，原始部落残留下的军事民主的传统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建州内部出现了矛盾。这一矛盾在满族兴起的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由此而产生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阴谋和家庭悲剧。这时，努尔哈赤的同母弟速尔哈赤拥有自己的部众和财产，和努尔哈赤共同掌管着建州事务，他和其兄发生了权力冲突和意见分歧。在乌碣岩战斗中，速尔哈赤虽是统帅，却不同意努尔哈赤对乌拉的态度，因而放弃指挥，消极旁观，“率500人止山下，……未能多斩获”。努尔哈赤斥责他“临阵退缩，时有怨言”，速尔哈赤不服。以后，要他派部众服役修筑城寨，他却叫“部下不赴工”，而自己要另建一城。1609年，速尔哈赤企图率部众“出奔他部居焉”，被努尔哈赤发现，把速尔哈赤拘留起来，没收他的财产和奴隶，并把一些怂恿煽动者处死，清除了内部的分裂势力，为统一女真各部踢开了绊脚石。

努尔哈赤清除内部分裂势力后，把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推向新高潮。1612年(明万历四十年)，努尔哈尔赤率军攻打乌拉，获胜而归。第二年再次进攻乌拉，乌拉灭亡，从而拔掉了通往东海和黑龙江流域的钉子。1614年，遣兵征服窝集部雅兰、西林二路。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元年)7月，努尔哈赤首次派兵进入黑龙江、精奇里江、牛满河

一带的萨哈连地区，攻占52个村寨，同年9月又招服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汇合处以东的使犬部，1617年，再次派兵继续收服东海散居各部，并对那些“岛居负险不负者乘小舟尽取之”，攻占库面岛及其附近岛屿，于是“库面内附，岁贡貂皮，设姓长，乡长，子弟以统之”。1619年，努尔哈赤又派兵收取东海瑚尔哈遗民，同年天叶赫部，统一海西4部。

努尔哈赤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是我国女真族的民族英雄。他以遗甲13副起兵，为女真各部的统一奋斗了30多年(1583—1616年)，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发展到拥有精兵六七万；“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俱征服”，使“诸部始合初一”，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努尔哈赤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利用女真人民的力量，结束了女真长期分裂割据和动荡不安的局面，这对于女真社会的发展，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和巩固我国东北边防都作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女真各部逐渐走向统一，其农业、手工业、采猎业、商业等都得到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更为显著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努尔哈赤为了加强统治，在新的形势下，逐步地弃旧立新，建立各种制度和机构，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采取许多改革措施。

首先是创建“八旗制度”。这种制度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军政合一，又是“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的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行政管理、军事征伐、组织生产的三项职能。它是在统一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是由女真人狩猎时实行“牛录”组织演变而来的。当时“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10人中立一总领，属9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意为大箭)厄真(意为主也)。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在这种“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并参考其先世金朝猛安谋克制度，正式创建旗制，设立四旗，即黄、白、红、蓝四色，规定每300人编为一牛录，每牛录设牛录厄真1人，管理该牛录的一切事务，到了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因“归附日众，乃析为八”，在原有四旗之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均镶红边，红旗则镶白边，合为八旗，并规定300人为一牛录，设牛录厄真1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厄真1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同厄真1人，副职2人称美凌厄真。固山厄真即旗主，领有步骑7500名。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并有巴牙喇(直属精锐卫队)5000余骑，各旗旗主也有人数不等的巴牙喇。当时努尔哈赤领两黄旗，代善(努尔哈赤二子)领两红旗，皇太极(努尔哈赤八子)领镶白旗，莽古尔泰(努尔哈赤五子)领两红旗，杜度(努尔哈赤长孙)领正白旗,阿敏(努尔哈赤侄子)领正蓝旗。他们是每个所辖旗的最高统治者，掌握军事、行政和组织生产的大权，八旗之间是平行关系。所以“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努尔哈赤)令于八将(八旗主)八将令于所属柳累(牛录)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而(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层单位，它是以地缘为主，血缘为辅组成的，牛录厄真下设代子2人为副职，再置4名章京，4名拨什库，并把300人组成牛录，分编成4个塔坦(即村或部落)，一章京和一拨什库管理一个塔坦的各种事情。可见八旗制度是一套完整的军事组织和政权的统治机构，它把分散的女真各部都组织在旗下，进行生产和战斗，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

其次，兴筑城池。努尔哈赤原居二道河村南山上，“土垒方里”，城高10余尺，“无雉堞、射台、隔台、壕子”，该城十分狭小简陋，俗称旧老城。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在苏子河与嘉哈河交汇处的不岸，“因山为城，垒土为郭”，“周四里，南一门，东二门，北一门”，称为赫图阿拉，俗称老城。1605年，努尔哈赤又加筑一道外城，城高6丈，作门8处，该城“杂筑土石，或用木植横筑之，城上环置射箭穴豆、状若女墙，门皆用木板”。由上可见，赫图阿拉有内外城，当时内城居住着努尔哈赤及其贵族，外城居住着旗兵，而奴隶则居于城中，各种工匠皆居城外，全城约有3万多人。赫图阿拉城不仅规模大了，而且有一定的布局，它是努尔哈赤管辖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再次，选人才，设议政，理诉讼。由于统一战争使疆土不断扩大，人口日益增多，管理事务也繁忙了。努尔哈赤为了进行统治，需要大批官员，采取推荐和选拨方式，并指出选择时不要看血统，而要看才德，是否有一技之长，符合条件一人予以录用，使之执政。1615年设议政五大臣，与八旗旗主一同议政，参决机务，“每五日集朝一次，协议国政、军国大事，均于此决之”，这种联席议政制是建州政治、军事的中枢决策机构。与此同时，还颁布法制，命扎尔固齐10人，分任庶务，负责审理诉讼案件。如有刑民案件，先由扎尔固齐10人审问，然后报告五大臣，再由五大臣复查，并把案情告诉诸贝勒，讨论议决。如果原被告一方不服，可以申诉，由努尔哈赤查明情由，最后裁决。虽然当时法规还很原始，有些是习惯法，有打、罚、处死等刑，但是努尔哈赤十分强调要有法规，使每个人预先知道，有所遵循，从而改变了以往随意处分，说打就打，说罚就罚的混乱状况，建立了层层会审制度。

第四，创制满文，开采金银矿产。努尔哈赤早期，原先的女真文已不通行，此时女真人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无本民族的文字，“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这种情形当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两人，以蒙古文字母与女真语音拼成满文，此种满文，又称无圈点满文，尽管老满文的文法不完备，缺点很多，但是作为本民族文字，开始应用推广，这标志着女真社会向前迈进了一步，矿产的开采，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增强了满族的经济实力。

努尔哈赤推行以上各项措施，无疑是为了加强和巩固以他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但是，这些措施是统一战争产物，它又反过来推动了统一战争，而这场统一战争是进步的，对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加强各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都起着积极作用。努尔哈赤顺应历史潮流，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女真诸部的历史使命。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遂称汗登位，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改元天命，他把分散的女真诸部统一在后金地方政权之下，因而使后金力量迅速壮大，成为与明朝中央政府相对抗的强大的地方势力。

第二节 萨尔浒之战后金乘胜入辽沈

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迅速崛起，努尔哈赤筑造宫殿，建立年号，招兵买马，想成就一番大事。明朝政权则加强对后星政权的防犯，对建州实行经济封锁。努尔哈赤在准备了2年之后，命第八子皇左极监国，亲率2万劲旅，于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星天命三年)春，到天坛祭天，领布了讨明檄文："满洲国主臣努尔哈赤谨昭于皇天后土曰：'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修好，设碑立誓，凡满汉人等，无越疆围，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里方吉纳，胁取10人，杀之边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收获，遣兵驱逐，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胁我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成，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助天遣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欺凌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谨告。"

努尔哈赤以杀父祖，遣兵助叶赫防御等"七大恨"作为伐明的檄文，兵分两路，命左翼四固山兵攻东州、玛根丹(均在今抚顺南面)二城，自己率领右翼四固山兵攻抚顺。汉人范文程献计劝降。抚顺守将李永芳本是一个没用的人物，闻满洲军入境攻城，已吓得没有主意，见到努尔哈赤劝降书，就举城投降了。明朝辽东巡抚李维翰急遣广宁总兵张承荫，辽阳副将顾廷相率兵1万来战，双方在抚顺城10里处交战，自日中到傍晚，两边都余勇可贾，不肯退兵。两军阵战坐土飞扬，天昏地暗。明军火炮虽猛，都没有防备多铎见勤率领，后金兵杀来，张承荫腹背受敌战死，士卒十损七八。后金兵获马9000匹，甲7000副，器械无数。7月，努尔哈赤又率八旗兵进入鸦鹘关，围攻清河城，明将邹诸贤固守抵抗，结果城破被杀，接着后金又占领一堵墙，碱场二战。努尔哈赤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不但使"全辽震动"，而且北京也"举朝震骇"，就连饱食终日、万事不理的神宗皇帝也深感"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

明朝为了安定辽东，巩固其统治，早日把后金势力镇压下去，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后金的战争。然而，由于明末政治腐败，驻守辽东的明军业已腐朽不堪，名义上虽有8万多人，实则能作战的不过1万多人，而且兵备松弛，士气颓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缓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这样的军队实在不堪一击。所以明朝政府只好"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沈，又

招合朝鲜、叶赫”，可是从全国各地征调的军队也和辽东明兵一样腐朽，许多人“伏地哀号，不愿出关”，不少将领“哭而求调”。由此可见，明朝出师并无取胜的把握，只是打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战争。

明朝命杨镐为辽东经略，以杜松、李如柏刘蜒等为副，调兵筹饷，经过9个多月的准备，到了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的4月，赴辽的明军都先后到达，再加上胁迫征调的1．3万名朝鲜兵，总共有10万余人，号称47万大军。杨镐与诸将议定，分四路进攻后金，总兵刘蜒率军出宽甸由东；总兵马林率军出三岔口由北；杜松率军出抚顺关由西；李如柏率军出鸦鹘关由南。其中以西路杜松为主力，皆直指赫图阿拉。此外，王绍勋总管各路粮草，杨镐坐镇沈阳，明廷被自己的虚张的声势所欺骗，洋洋得意地认为“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

努哈赤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明军是采用分兵合击，声东击西的战术。努尔哈赤说：“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因此，只派500人抵御和阻滞南路的刘蜒军，而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打击从西而来的杜松的明军主力，所谓“凭尔几路采，我只一路去”。这一部署是正确的，因为从兵力上看明军有10万多人，而后金只有6万人，处于劣势。但明军分成四路，兵力分散，再加上刘蜒，马林和李如柏三路山高水险，行军困难，一时不易到达，只有杜松一路出抚顺，渡浑河，沿苏河而上，道路平坦易行，两日就可到达赫图阿拉。努尔哈赤以6万人对付杜松的3万人，才能够在战役上稳占优势，取得主动权。于是他亲自统率八旗大军迅速开赴西线，阻击明军。两军在萨尔浒一带相遇，揭开了著名的萨尔浒战斗的序幕。

这次战役，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萨尔浒、吉林崖战斗。杜松一路于二月出抚顺关。时值隆冬，塞外天寒地冻，明军出师不利，人马被冻伤大半。杜松立功心切，令军士冒雪西进，于四月抵达萨尔浒山。努尔哈赤急令长大代善率两旗兵力防守构筑界凡城，阻挡明军东进。于是杜松留下2万人驻守萨尔浒，自领1万人攻打界凡城，把已经分散的兵力再行分散。此时，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已到界凡以东，迅速地抓住了各个击破的战机。他说：“先破萨尔浒山所驻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便派代善，皇太极带领两旗截击杜松，自己亲率六旗猛打萨尔浒的明军，明军遭到突然攻击，纷纷逃往萨尔浒河西岸，结果在得力阿哈一带全部被歼。而杜松在吉林崖下，陷入重围，被流矢击中，坠马而死，全军覆没，“伤者漫者遍野，血流成渠，军器与尸冲于浑河者，如解冰旋转而下”。

第二阶段是尚间崖、斐芬山战斗。4月14日，马林率明军与叶赫兵出三盆口，扎营于富勒哈山的尚间崖，派潘宗颜领一军驻守斐芬山，又遣龚念遂率一军守卫斡辉鄂模，互为犄角，彼此声援。

努尔哈赤在西线消灭明兵主力以后，乘胜挥戈北上，十五日，后金兵首先击溃了驻守斡辉鄂模的明兵，随后又攻打尚间崖，明兵大败，马林仅以身免，逃往开原。斐芬山的明军也被攻灭。

第三阶段是阿布达里冈、富察战斗。四月十日，刘一路出宽甸，此路明军虽然出师最早，由于山道陡峭，大雪封山，进军迟缓，迟至15日

才到达深河。后金的少数守军沿途拦截，且战且退，竭力阻滞明军的前进速度。十六日，刘挺进抵阿布达里冈，姜弘立率领朝鲜兵到达富察(富车)距离赫图河拉还有五六十里。

这时，努尔哈赤已在西北两路获胜，立即派扈尔汉、阿敏、代善、皇太极先后出发，日夜兼程赴赴东线，很快在东线集中了3万多人，“隐伏山谷”，待机而动。明军却焚毁村寨，“分掠部落”，并无戒备地前进。后金军“不意突出，冲断前后”，刘战死，全军覆没。辽阳总兵刘，身经百战，临危不惧，挥舞战刀，奋力拚杀，结果战死疆场。代善随之集合八旗兵，攻打富察一带的朝鲜军，姜弘立的军营被紧紧围住，“孤阜狭隘，人马倡侧，屡日饥卒，兼之焦渴，欲走则归路已断，欲战则士皆股栗，至有抛弃器械，坐而不动者，事无可为”，于是姜弘立以下，全军投降。

杨镐惊悉三路丧师，急令李如柏撤兵，明朝四路大军只有这一条路逃脱了败灭的厄运。

萨尔浒战役是集中使用兵力，选择有利的战场和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在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战斗中，充分显示了努尔哈赤机动灵活的指挥才能和后金将士的勇猛战斗作风，在5天之内，在3个地点进行了3次大战，战斗前部署周密，战斗中勇敢顽强，战斗结束后迅速脱离战场，立即投入新的战斗。结果，后金大胜，明军惨败。这次战斗对双方都是十分关键的一仗，从此，明朝的力量大衰，它阻碍女真各部统一发展的政策彻底失败，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后金的力量大增，它的政治野心和掠夺财富的欲望随之增长，由防御转入了进攻。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辽东兵力元气大损，努尔哈赤乘胜挥师西进，先后攻占了开原、铁岭。大掠人口、财物、田禾，八月又攻灭叶赫。明朝政府派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赴辽东督师，责令他进攻后金，收复失地。熊廷弼来后，看到辽东地区，一片混乱，明军“坚甲利刃，长枪大器，丧失俱尽”，将士们“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盼活，不肯出战，“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人人要逃，营营要逃”明廷在辽东长期经营所建立的精兵重镇，完全解体。他认识到：现在明军与后金军的军事力量已不是从前，很不利于自己，唯有“坚守渐逼”之本，采取持久的防御方针，积畜自已的力量，才能削弱后金的锐气，徐图反攻。熊廷弼督率军士，造战车，备火器，修筑城池，屯用积粮，整个辽沈地区固若金汤。但以守为战的策略，都没有得到朝廷的支持，熊廷弼被迫辞职，换了袁应泰来代替他。袁应泰本是进士出身，曾升任巡抚，为人颇有精敏，但不是用兵能手。既到辽东，改变熊廷弼的许多设施，嫌熊廷弼用法太严，“以宽矫之，多所更易”，并且盲目地要三路出师，收复清河、抚顺，攻打后金。明军还没有来得及出动，1620年3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围攻沈阳，经过几次激战，沈阳总兵贺世贤殉职，沈阳失守，后金兵又进攻辽阳，袁应泰令军士沿城掘濠，沿濠环列火器，以便守御，自率总兵候世禄、姜弼、梁仲善等，出城5里迎战。后金“以铁骑四面扑攻”，明军“奋勇迎击，败白标兵，又败黄标兵，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经过3天激战，明军寡不敌众，3月21日，辽阳失手，袁应泰自杀。辽阳既下，辽东附近50寨，及河东大小70

余城，皆望风投降。努尔哈赤为了加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由萨尔浒迁都到辽阳。

辽沈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熹宗仍召熊廷弼还朝，出任辽东经略，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熊廷弼上三方布置策，以广宁一方为陆路界口，拟用马步军驻守，以天津登莱二方为沿海要口，拟各用舟师驻守。但熊廷弼此次仍决定采取守势，而王化贞力主倾关外三兵，同后金决一胜负。王化贞掌握实权，拥兵10余万，唯所欲为，熊廷弼仅有兵4000，无可奈何。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利用熊王矛盾，发兵渡辽河而西，熊廷弼主张集中力量守卫广宁，而王化贞却把兵力分散于各城堡，摆出一副被动挨打的态势。后金兵围攻西平，王化贞派其心腹孙得功前去援救，结果战败，孙得功奔回广宁，蓄意投降后金，“疾呼军民宜早剃头归顺”，于是“一城江然，争夺门走”，王化贞仓皇西逃，广宁失陷。接着后金又连陷40余城，占领了辽河以西的大片土地。以后，努尔哈赤为了便于进一步和明朝作战，又从辽阳迁都沈阳，当时称作盛京。虽是塞外都城，却不亚于大明京阙，城内楼台殿阁，金璧辉煌。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六官后妃、满朝文武移都于此。他还声称：“大而变小，小而成大。古来兴亡变迁之道甚多，……我金汗身行正道，上天眷爱，况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汉人轮流居住之地。”很显然，这时，努尔哈赤兵强马壮，屡败明军，几乎占有全辽之地，已具有和明朝政府争夺全国统治权的力量和雄心了。皇太极继位后，更是“欲得中原”。因此，从努尔哈到皇太极都把进攻明朝、夺取中央政权定为基本国策，因而后金政要必然成为除农民起义军外的与明朝争夺天下的有力敌手。

广宁失守以后，熊廷弼、王化贞下狱处死，明廷派王在晋经略辽东。但他却主张放弃关外，退守山海关，在关门外八里铺修筑重点，设兵防守。这一消极防御的主张，遭到中下级将领袁崇焕等人的反对。袁崇焕原是个下级文官，很有谋略和胆识，广宁失陷时，曾单骑出山海关巡阅，他奉命“往前屯安插辽民，四鼓入城，夜行入荆棘蒙茸虎豹潜伏之地”，不避艰险，敢于任事。他调查了关外的形势，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他认为：若保关内，必守关外，若保关外，必守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因为，宁远在山海之东，广宁之西，当要冲之地，附近大海中的觉华岛可以设水师，屯粮秣，作为犄角，在广宁失守之后，这里是山海关的屏障，不可轻弃于敌。袁崇焕的主张得到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赞同与支持，不久，明廷起用孙承宗代替王在晋经略辽东。孙承宗继承熊廷弼“以守为战”的战略方针，采纳袁崇焕的建议，大力整顿山海关的防务，重点加强宁远的防御力量，派袁崇焕、祖大寿等驻守宁远，兴工修筑宁远城，又修建了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及右屯诸要塞。这样就构成以锦州、宁远为重点的关外防线，使得努尔哈赤无机可乘。1625年(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9月，孙承宗因耀州之役战败，遭到阉党的攻击，便辞职不干了。

明廷以高第接替孙承宗，高第认为关外不可守，一反孙承宗的措施，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袁崇焕劝说不听，不肯从命，坚守宁远孤城。

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又决定大举攻明，正月十四日，亲率大军渡过辽河向西推进，后金主力来犯的消息传开后，锦州、松山(今锦州南)、大凌河(今辽宁锦县)，小凌河、杏山(锦州南)、连山(今锦西)，塔山(锦西北)，七城的明军大惧，“焚房，谷而走”，后金兵直抵宁远城下，并且派出一支军队于宁远城西南5里处切断通往山海关的大路，努尔哈赤妄图倚仗优势兵力不战而下，派被俘汉人进入宁远城对袁崇焕说：“吾以20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袁崇焕大义懔然地回答道：“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且汗称来兵20万，虚也；约有13万，我亦不以来兵为少也。”

努尔哈赤见招降无效，于正月二十四日指挥后金兵奋力攻打，袁崇焕和总兵满桂，会集军士，泣血立誓参将祖大寿凭城固守，“桦炮，药罐，雷石齐下，死战不退”。后金兵失利，被迫后撤。次日，又挥兵力攻，被明军击退。后金兵在攻城时被击毙游击2员，备御2员，士兵500名宁远城上，明军旗帜飘扬，戈矛林立，更有1台火炮助威。袁崇焕全身披挂，金盔耀目，铁甲生辉，威风凛凛。火包响处，炸得满洲士兵血肉横飞。努尔哈赤自从25岁起兵以来，四出征讨，战无不利，攻无不克，特别是在万历四十七年一举击败明朝四路之师，自渭所向无敌，没想到宁远城下损兵折将，败于明朝一个中级官员手下，这在精神上给他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2月上旬，努尔哈赤郁郁寡欢，回到沈阳，不久发病，于8月11死去，这是满清创业时的一大损失。

宁远大捷是明朝对后金作战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它挫伤了后金的锐气，挫败了努尔哈赤进一步夺取整个辽东地区的企图，暂时延缓了山海关和关内的安全。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第八个儿子，四王皇太极即位为帝，改年号为天聪(一六二七年)。皇太极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加强了中央集权。首先。是削夺了三大贝勒之权。1630年，皇太极改变与三大贝勒同受朝拜，共听国政的局面，独掌政权。他幽禁二贝勒阿敏，惩罚了三贝勒莽古尔泰，二人先后死去。他亲自掌握了正黄、镶黄、正蓝旗，又压服了大贝勒代善。皇太极在各旗设立代表后金汗的总管旗务大臣，以分诸王贝勒的实权，其次，中央政治机构的建制。1631年仿明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管理行政，以致变过去的军事与政治不分，行政令白八旗旗主掌握的旧制。1636年，设立了具有内阁形式的内三院，(国史、秘书、弘文院)和都察院。第三，为了吸收汉族的知识分子，从事政权权建议，1629年实行科举考试制度，规定不论蒙，汉和女真等族，均可报考，女真贵族家庭的奴隶，如有儒生愿投考者，不许阻挡。第四，皇太极为扩大兵源以和兵力众多的明王朝作战，又为了平衡满族八旗旗主和贝勒们的军事努力，创立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

本来，八旗属下的人丁并非全是满族，也有汉人和蒙古人。1623年(明崇祯六年，后金天聪十年)，皇太极令满族各户下汉人10丁抽1，组成汉兵一旗，以黑旗为标志，由额驸佟养性统率。第二年，改汉兵为汉军，满语叫“乌真超哈”(“乌真”汉语“重”的意思，“超哈”汉语“兵”或“军”的意思)。1637年(明崇祯十年，清崇德二年)，皇太极把汉军旗分为两旗，以后廷柱为左翼固山额真，马光远为右翼固山额真，也按照满洲八旗编壮丁为牛录。1639年，皇太极又分汉军两旗为四旗，以

马光远、石廷柱、王世选、巴延4人为固山额真，各领一旗。到了1642年，再增设四旗，共为八旗，称为汉军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相同，每旗设固山额真1人，梅勒章京2人，甲喇章京5人。此外，1634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又把八旗中勇敢善战的蒙古人拨出，编成蒙古二旗，1635年，扩编成蒙古八旗，旗色和建制也同满八旗一样。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组成虽然与满洲八旗相同，但是汉军、蒙古的固山额真都是由皇太极任命，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这点和满洲八旗旗主世袭制不同。皇太极是满、蒙、汉八旗最高统帅，他可以直接指挥和调遣这些八旗军。关于满、蒙、汉二十四旗的士兵数目，在入关之前，据统计满洲八旗约有319个佐领，6．3万多人。蒙古八旗约有129个佐领，2．5万多人。汉军八旗约有167个佐领，3．3万多人，共计有615个佐领，约12万多人。

与此同时，皇太极为了加强八旗兵的战斗力，不断颁布军律和加紧制造火器。1634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7月，皇太极认为“师行动众，约束宜严，不可不明示法律，以肃众志”，于是颁布军律，规定“大军按队安驱，毋许喧哗，勿离旗纛，……勿毁庙宇，勿杀行人，敌兵抗拒者杀之，归顺者养之，所俘之人，勿夺其衣服，勿离其夫妇，……勿淫妇女，……勿饮酒。……若有违令者正法”。以后曾多次重申以上军律。此外，虽然八旗骑兵行动机动灵活，但不适于攻坚战，特别是努尔哈赤之死和皇太极两次攻打广宁不克，都是吃了明军火器的亏。所以，1631年(明崇桢四年，后金天聪五年)，皇太极命王天相等人力口紧研制火炮，该年六月造成，命名“天祐助威大将军”。另外还有得自明军的“红衣大炮”多门，配备给各旗服役。这样，皇太极不仅有了善于野战的八旗骑兵，而且又有了能够攻坚的炮兵，所以八旗兵的战斗力大大增强。这些政策和制度的建立需要时间，加上当时后金内部满族贵族与广大汉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后金奴隶主与农奴之间的矛盾，汉权与诸王权力之间的矛盾，在经济上由于明朝停止后金朝贡和互市，“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胜贵”，而且又遭受严重天灾，人民厌战，在军事处于三面受敌的境地，东边有朝鲜，西边有蒙古，南边有明朝。为解除后方的威胁，争取时间，储备力量，待机成熟，进取中原，皇太极多次向明朝表示愿意和谈，甚至允诺放弃帝号，承认明朝皇帝为天下共主，条件是勒索巨额金银财帛，恢复互市，借以达到从经济上加强自己，削弱明朝的目的，同时，大举出兵，东征朝鲜(1607年至1638年)，西征同明朝友好的蒙古察哈尔部(1628年至1635年)，迫使朝鲜和漠南蒙古先后屈服于后金。

皇太极为了入关夺取明朝的中央政权，一开始就打着议和的旗号，借以麻痹和涣散明朝的斗志．但是，他在议和旗帜的掩盖下，从未停止或放弃对明朝的战争。

1627年(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五月，皇太极取得侵朝战争胜利后，立即调兵西进，突然进攻明军，攻打锦州、宁远，未能攻克，便把大小凌河城毁坏掠夺一空，回师沈阳。

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2月，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袁崇焕在宁远和山海关的防区，取道蒙古，以蒙古兵力为先导，兵分三路从喜峰口入关，攻陷遵化，直抵北京城下，明朝上下惊恐万状，袁崇

焕、祖大寿从山海关外领兵急行三昼夜入援。皇太极施反间计，假崇祯之手，杀了袁崇焕，祖大寿率军退回关外。当时，明朝各路援军纷纷抵京，皇太极与明军在京郊会战，杀明朝战将满桂。1630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皇太极从北京撤兵，挥戈东进，攻掠京师外围各州县，占领水平、滦州、迁安等府县，留兵驻守水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自己率军由冷口出关，返回沈阳。不久，驻守水平四城的阿敏，因孤军深入，又无后援，被明军打败，退回关外。

1634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皇太极再次入关，分兵四路进攻明军：一路从尚方堡攻打宣府、大同，一路从龙门口直趋宣府，一路从独石口进攻应州，一路从得胜堡攻打大同。后金八旗兵对各地大肆侵拔破坏，抢掠大批人口和财物，便退回沈阳。

到了1636年，皇太极经过9年的努力，已加强和巩固了后金的统治，基本上消除了来自朝鲜和蒙古的威胁，为夺取明朝中央政权作了准备，是年5月，皇太极称帝，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从此，皇太极把主要力量放在进攻明朝上，明清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同年秋天，皇太极命阿济格从独石口，入居庸关，直抵北京，然后南下攻打保定，连陷城池10余处，掠夺人畜18万返回盛京。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皇太极又命多尔衮，岳托率清军分两路攻明，一军从密云北入墙子岭，一军从青山关入通州，两军在京郊通州会师，然后至涿州，分成八路，一路顺太行山，一路沿运河。中间六路，由北向南进侵。然后，清军从临清渡过运河，进入山东，攻占济南，明德王被俘，攻下城池50多处，虏获人口46万，金银百余万两。第二年春天，清军由天津北上，出关回师盛京。

皇太极称帝前后，数次入关侵扰，掠夺大批人畜财物，却不敢立足于内地，除了清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反抗外，其重要原因是明军仍然控制着山海关及关外锦州等地，所以清军不敢在内地多停留。山海关是屏蔽北京的要塞，而锦州乃是山海关的门户。清朝为了夺取北京，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就必须先打下锦州和山海关。因此，在明朝灭亡以前的几年内，这里成为明清之间激烈争夺的战场。

1640年(明崇桢十三年，清崇德五年)3月，皇太极采取“由远渐近，围逼锦州以困之”的策略，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右翼主帅，多罗贝勒多铎为左翼主帅，带领一半清军包围锦州。守将祖大寿顽强抵抗，清军未能得逞。5月，皇太极亲至锦州城外，督促清兵抢割郊外庄稼。6月，派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率另一半清军接济尔哈朗，多铎所统军队，继续围困锦州。并派兵断绝松山、杏山贩明军援路。此后，每三个月轮换一次，以资休整。祖大寿被围日久，兵力不敌，向朝廷紧急求援。这年年底，崇桢帝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总兵李辅明、王朴、唐通、曹变蛟、白广恩、马科、吴三桂、王廷臣统步骑13万往援。洪承畴吸取了杨镐轻举妄动的教训，采取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术。1641年5月，他率领援军精锐进至锦州城南约18里的松山西北立营，同锦州城内的祖大寿呼吸相应。济尔哈朗令右翼清军向明朝援军进攻，不仅被击退。连他自己在山顶设立的营寨和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驻营地也被明军占领。由于祖大寿英勇善战，洪承畴老成持重，清军在围攻锦州和袭击明朝援军的战斗中一再失利，梅勤章京硕翁等被击毙，牛录章京佛咯向明军投

降。当时，锦州城内的粮食可供守军一二年之用，援军相距不远，人心稳定。洪承畴准备久守，命守军分别驻扎于松山的东、西、北三面，又令总兵曹变蚊在松山以北、乳峰山以西之间，驻扎士营兵力，环以长壕。洪承畴则坐镇松山城，严阵以待。按洪承畴的部署，援军前锋固守松山，待后续部队护送粮草辎重由塔山、宁远抵达松山地区后，再一举突破清军防线，同祖大寿军会师。可是，明朝兵部尚书陈新甲等却迎合崇祯帝速胜心理，力劝下诏促战。兵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麟带着崇祯帝的密诏和兵部文书来到松山，强令洪承畴立即同清军决战，以解锦州之围。洪承畴被迫把大批粮储留在塔山一带，全军向松山集中。

8月，清军前线主将多尔衮，豪格向皇太极报告："敌兵实众，乞遣亲王率兵一半前往，协力拒敌。"即要求改变原先半数兵力进攻，半数休整的部署，全军出战。皇太极知道成败关键在此一举，15日亲统大军赶赴前线，昼夜兼程六日到达锦州。鉴于洪承畴13万大军云集于松山、乳峰山的狭小地区，大批粮草却留在塔山、笔架山和宁远，皇太极当即决定主力进至塔山、松山之间、派阿济格等攻下笔架山，缴获明军积粟12堆。他从情报中行知洪承畴部大军随带粮食不多，饷道切断，势必后撤，就在松山、塔山之间掘壕设障，埋伏重兵，伺机歼敌。洪承畴早已预计到这种危险，陷入绝境后，他力图挽回败局，除留下曹变蛟、王廷臣同自己固守松山地区外，命令吴三桂、王朴、唐通、马科、白广恩、李辅明六总兵回师西南，打开通道。但战略上已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无法挽救朝廷决策的错误了。清兵预先在塔山、松山、杏山、小凌河等要道设伏兵，吴三桂等突围途中，不断遭到清军邀击，几乎溃不成军，被清军追杀和逼入海中淹死的多达数万人，只剩下少数兵马脱出重围。洪承畴打通饷道的方案既已破产，自身也象锦州城里的祖大寿一样陷入重围。为了加强松山的防御力量，他命曹变蚊放弃乳峰山，同自己合守松山。曹变蛟奉令带兵杀出重围，无意中冲入了皇太极的御营，清军"大惊"。从9月起，洪承畴、辽东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所统士卒不过1万多人驻守松山，仍一再派兵出城突击，都被清军击败。洪承畴5次组织突围均未成功。清军在松山外围掘起长壕，将松山紧紧围困其中。明廷派出的几路援军均半路受阻，以至松山守兵弹尽粮绝，士气低落。到1624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2月18日松山副将夏成德叛变，接应清军入城，邱民仰，王廷臣、曹变蛟等被俘杀，洪承畴被俘后降清。3月，祖大寿投降，清军占领锦州。至此，松山、锦州战役以清方全胜结束，明朝在辽东只剩下宁远至山海关一隅之地，没有力量同清方再决雌雄了。

皇太极取得松锦大捷后，整个形势对满清十分有利，他认为"明国粮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明朝末帝崇祯幻想与清军议和，以全力对付李自成的起义军，却不料事情泄露，引起朝野不满。为了进一步向明朝施加压力，清兵于1642年11月自墙子岭、青山口等处越过长城入关，突袭蓟州，并深入到畿南。明为保首都而调集各路大军入京，但明军对清军采取了观望自保的政策，结果清军转战到山东，连破海州(江苏连云港)、丰(扛苏丰县)、沛(江苏沛县)等80多个州县。各地明朝官吏闻风而逃，清军如入无人之地。清军杀明宗皇鲁王．俘获人口36万，牲畜55万头，然后大摇大摆自北京地

区出塞凯旋。明朝在农民起义和清军进攻的内外夹击之下，摇摇欲坠。

第三节 山海关之战清朝入主中原

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清示德八年)9月，皇太极因病身亡，其年仅6岁的儿子福临继位，改元顺治，由两个叔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10月11日，李自成起义军占领西安，平定秦、陇后，于1644年正月初一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二月初大顺军兵分两赂，东渡黄河，一路以刘芳亮率领，东经太行，沿黄河北岸攻占怀庆(今河南沁阳)、潞安(今山西长治地区)、卫辉、漳德(今河南安阳)及大名等地，然后北取保定，向北京进攻。李自成亲率大军从西安出发，取道临汾、太原、大同、阳和(今山西阳高)、宣府、居庸关，进占北京。明大同总兵姜壤、宣化总兵王承胤投降，大顺军长驱直进，于3月中占昌平，围攻北京。

当李自成开始进北京时，明朝京师禁卫部队正在调回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入卫京师。吴三桂统领的“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而彝丁突骑数千，尤骁悍，北门锁钥，恃无恐”，是明朝防御清兵的屏障。吴三桂对明、清、农民军三方面的力量还看不清楚，鹿死谁手，还难以下结论。于是吴三桂带兵驻守在山海关，按兵不动，犹豫不决。援军至丰润，得知京都失守，崇祯已死。即驻军观望，京都被围，明军慌忙以禁卫军分守九门。大顺军一面围攻，一面命投降的太监劝明崇祯归降。城外明朝守军这时多已归降。到3月18日大顺军攻城益急，明太监开新义门迎大顺军入城，崇祯自缢死，明亡。

明王朝虽然已被推翻，但封建地主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它们时刻准备着反扑。在南京的明朝大地主官僚，听到王朝覆亡，崇祯上吊的消息，“北向恸哭”，“誓师浦口，欲长驱死战”，“示天下以必报仇之义”。1644年6月间，他们拼凑了一个南京弘光政权，企图与农民政权对抗，恢复他们在全国的反动统治。尤其在距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还驻扎着明朝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领的精锐兵力，直接威胁着北京的安全。

大顺军进入北京后，明军尚存的宁远总兵吴三桂，统兵数万驻守在山海关，李自成一面令吴父写信劝降；一面派都将白广恩率步兵2万东攻滦州(河北滦县)切断吴军退路。吴三桂击退白广恩的进攻，退回山海关。

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大顺水昌元年)，是风云突变的一年。对于欲等天下的明军、清军、农民军来说，认清形势，把握时机，掌握主动，才有可能入主中原。当时，在吴三桂驻军北面的满族地方政权，大肆发展自己的势力，虎视眈眈，企图取代明王朝，建立满族贵族对全国的统治。掌握权力的摄政王多尔衮，与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之间发生权力冲突。当崇祯帝下令吴三桂撤兵进京保卫他的统治巢穴时，满族统治者认为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时机已到，暂时缓和了内部的矛盾，举兵南下。李自成农民军打进北京后，清统治者立即更改方针，“变抄掠之暴，为吊伐之仁”。改变过去进关内劫掠的暴行，而要夺取农民义胜利果实，实现满族对全国的统治。正于多尔衮道出的：“今此之行，非同昔日，蒙天眷顾，要当定国安民，以成大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清

统治者把矛头指向农民军，扬言要为崇祯报仇，“沉舟破釜，暂不返旌，期必灭‘贼’”。并以此为号召，招降汉族官僚地主一明王朝的残余努力，共同绞杀农民起义。清赎治元年四月初六日，当京师已被农民军占领的消息传来时，摄政王多尔衮认为，入主中原，“成败之判，在此一举”，便于初九率领10万八旗军离开沈阳，向中原进军。

清军以摄政王多尔衮为首，随同豫亲王多锋、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主尚可喜、贝子尼堪博洛、辅国公满达海等满汉将帅，陆续开赴山海关。“山海关，外控辽阳，内护畿辅”，乃兵家必争之地。李自成此时对满汉族贵族官僚地主可能勾结，清军可能入关这些问题认识不足，等到李自成认为形势紧张，不得不出兵时，时机已晚。李自成于4月13日亲统10余万大军带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崇祯皇帝的儿子等，向山海关进发。李自成在清军已经倾巢出动，而吴三桂仍首鼠两端的情况下，出兵山海关。因此李自成对即将发生的山海关之战的结果如何，心中并无把握。因吴三桂仍然顽固不降，从21日开始，李自成下令强攻山海关。

当时，多尔衮因敌情不明，对吴内形势的变化难以预料以及与农民军交战缺乏经验等。未敢妄动，进军途中多次与范文程，洪承畴等谋臣商讨作战方案。对吴三桂的两封求援信件，多尔衮因吴三桂对降清问题上没有明确态度，本不想急于相救，但又考虑到军情紧急，怕行动迟缓会贻误战机，立即令清军昼夜兼程前进。

吴三桂占据山海关天险，却不料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外有清摄政王多尔衮率兵10万杀奔宁远而来，内有李闯王发兵20万亲征。吴三桂走投无路，决心报告满清。对多尔衮答复的“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的优厚待遇吴三桂心有所动。他进一步向清军献策说：“幸王速振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加攻，逆贼可擒，京东四可传檄而定也。”

山海关以关城为中心据点，四面有东西两罗城和南北两翼城，以及长城、关隘、墩台、城堡等。相互连结，彼此护卫，构成一个坚固完备的防卫体系。山海关北面是山，南接大海，是一座东西向的城镇。东面的北翼城、夺罗城和南翼城原为防止清军入关的要塞，如今却成为吴、清之间唯一的通道。其中西罗城面向关内，前有石河，石河以西地势开阔，是理想的战场，所以，山海关战役的两次激战都在这里进行。

第一次，21日上午，吴三桂率领数万明军和乡勇在石河西布阵，与前来攻关的李自成的农民军展开激战。经过多次猛烈的冲杀后，李自成看到吴三桂的阵线已开始动摇，便兵分三路：一路由他督率，继续留在石河西与敌对阵，牵制吴军主力；一路由唐通率领，从山海关东北方向出关，至离关10里的一片石(今辽宁绥中县李家台）驻扎，进逼东面的外城切断吴军退路；一路由数千精锐骑兵组成，冲破敌阵西北有，直扑西罗城，援兵继进，分头围攻北翼城和东罗城。21日晚，多尔衮先派兵击败一片石唐通部，使李自成从关内外夹击吴三桂并切断吴军与清军联络计划遭到破坏。但是，农民军“日夜狠攻，关上炮声，夜深不止”，农民军越战越勇，杀声震天，山摇地动，至次日早晨，吴军“危急劳瘁”更甚。虽然昨天夜晚吴三桂已将主力调来加强城防力量，但军心已乱，“叛降”事件时有发生。农民军乘机发动更猛烈的攻势“竟扑边城直上”。守将一面“防奸”，一面“尽力堵战”，又急请吴三桂“拨兵协剿”，这才暂时保

住了关城。李自成亲率的20万农民军从三面包围了关内城镇一山海城，又派兵2万骑，从山海西一片石北出口，东突外城，进抵关门，截断吴三桂与关外的通道。形势对农民军颇为有利。由于形势危急万分，而清军又屡请不至，吴三桂只得于22日早晨，率领数百亲兵冒险出关，绕向道左驰清军大营。清军从沈阳发兵之后，既不知北京已被农民军攻占，也不知吴三桂已决心投降。故此仍沿以前入关的路线，由沈阳往西出古长城，渡过辽河，取道蒙古入关。而不是沿古长城内侧取道锦州、宁远一线，直入山海关，以致迟迟不到，使得吴三桂在农民军大军压境之时，对清军望眼欲穿。多尔衮虽于21日晚率清军进至距山海关10余里处，并于一片石击溃大顺军唐通部数百人，但他不敢贸然出战，遂扎营于欢喜岭。吴三桂到欢喜岭威远台上与多尔衮相见，剃发称臣，对天发誓，多尔衮令吴军以白布系肩为标志，首先出战，“一以观三桂之诚伪，一以觇自成之强弱，欲坐收渔人之利”。双方达成协议后，清军入关。

清军入关，使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吴三桂所属有精兵4万，加上满汉八旗劲旅14万，力量陡增。21日晚，唐通败于一片石后，“夜遁入关”。此时，李自成已知清兵抵关，对吴三桂勾结清兵也有了思想准备。22日一早，他挥军猛攻关城，想抢在清兵入关前夺下山海关。此计未遂，就改令全军沿石河西边的开阔地带，“自北山横亘至海，列阵以待”。面对李自成摆开的一字长蛇阵，多尔衮令清军“向海列阵，三桂分兵列于右翼之末”，准备集中优势兵力，予以突击。双方列阵时，“时值大风，尘土飞扬，对面不相识”，布完阵后，大风即止”。中午，吴三桂首先率军出战，结果陷入农民军的重围之中，左冲右突，苦战良久，“围开复合”，力渐不支。多尔衮立刻令英王阿济格和豫王多铎率正白旗、镶白旗的2万骑兵为先锋，“三桂阵右突入”。此时，农民军因日夜奋战渐感疲劳，而八旗军却“蓄锐以待”，所以，只见“白旗所至，风卷潮涌，皆披靡莫能当”。李自成正在山上督战，只见大风过后，战场上飘扬着红、黄、兰、白四色旗帜，奔跑的是带甲而辫发的清兵，不觉大惊失色。农民军难以招架，开始由胜转败。下午，多尔衮见农民军阵势已乱，便指挥清军全面出击，吴军也乘机反扑。战局急转直下，李自成本想“麾后军益进”以挽回败局，但被人劝止。农民军经过几番苦战，伤亡惨重，终于全面崩溃。李自成见败局已定，就率“精兵数千，疾走入永平”，26日回到北京。29日称帝，30日即分两路向山西撤退。

山海关战役的意义十分重大，对农民军和清朝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农民军，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正义之师，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李自成在胜利面前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对满汉统治阶级的联合进攻缺乏预见，入京前后，没有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政策，提出新的战略方针，所以很快就从胜利的巅峰上跌落下来，从此一蹶不振。然而，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定鼎燕都，一统之基，实始于石河一战”。有了山海关战役的胜利，他们才有可能一步步地爬上全国统治权力的顶峰。

山海关战役之后，清军直逼北京，形势急转直下。农民军人心动摇，部署已乱。5月2日，吴三桂诳称迎明太子进城，将摄政王多尔衮和清兵引进北京。10月间，清王朝统治者福临迁入北京，10月31日(阴历十月初一日)即皇帝位，“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标志着清王

朝在关内的统治从此开始。

第二章 流水落花南明政权朱颜改 壮志难酬各路英豪美名传

清军入关，风云突变。各种政治力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满清意在挥师南下，逐鹿中原；南明政权大势已去，福王、桂王试图东山再起；李自成、张献忠、李定国等豪杰力挽狂澜，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更有史可法、郑成功等民族英雄，深明大义，视死如归……

第一节 黄河两岸反清之火燎原

清军人关后的社会矛盾清军入关使国内社会矛盾复杂尖锐起来。在复杂的矛盾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之间主次关系的变化，决定着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基本格局和阶级动向的不同趋势。清入关后的一段时间里，民族征服和压迫的威胁虽然开始突出，但阶级斗争仍处于主要的支配地位。农民军面临的强敌，不只是满洲贵族，而是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武装。清朝统抬者占领北京后，起初并没有明确的统一全国的计划，他们甚至说过“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多尔衮进一步拉拢汉族官僚地全阶级，宣称“义兵之来，为不等复君父仇，所谋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于是，在“复君父仇”这个冠冕堂皇的名义下，大批明朝的官僚包括曾向农民低头认罪的，纷纷调转头来，对满清贵族奴颜卑膝，将清军视为“仁义之师”。多尔衮趁机宣布：“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同时，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为崇祯帝服丧，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朱姓各王归顺不夺其王爵，自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等等，以此来调整满汉地主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扩大清朝统治的基础，集中力量镇压农民军。因此，李自成不是牺牲于满洲贵族的屠刀之下，而是被害于丧心疯狂的地主乡兵之手。张献忠在四川建立的大西政权，始终为汉族官僚、地主、乡绅所敌视，四川各处地主集团气焰嚣张，声称要“遂强寇，扫秽氛，报先帝(崇祯帝)之仇”。对在南京叹气的南明福王政权，清廷暂且与之遣使往来，劝其以“讨贼”为急务。清入关后的上述措施，都不过是一种姿态，一种斗争的策略，是服从于镇压和消灭农民起义军，是决定于社会的主要矛盾的。

清军进关镇压农民起义是在“吊民伐罪”，“为崇祯帝复仇”的旗号下进行的，自然使极度仇视农民起义的汉族地主阶级趋之若鹜。等到农民起义大军受到重创、清朝在北京的统治逐步稳定以后，清军开始南下并进行疯狂的民族征服时，就不能不遭到汉族各阶层的强烈反对，清王朝对农民军的血腥镇压，它在进军途中野蛮的烧杀劫掠，它在入关后不久所采取的一系列高压政策，使得满族贵族与广大汉族农民处于严重的冲突之中，也使满汉地主阶级处于矛盾之中，因此，随着清军的南下，国内的民族矛盾特别是满汉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清军在南下过程中对汉族人民的滥施屠戮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演出了一幕幕“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等惨绝人寰的大悲剧。豫亲王多铎占领南京后，明朝生员戴君恩就抗议曰：“闯贼破我北京，若称为我报仇，贼未尝破南京，若来何为?我昔仇闯，今仇若矣。若谓天下无能复仇者耶?”。

清廷在确立征服全国的野心之后，政策上也相应地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多尔衮等满洲贵族在占领西安和南京后，自以为兵强马壮，取天下易如反掌，征服者的凶残嘴脸立即暴露无遗。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农民军还是南方汉族地主政权都不堪一击，江南可以传檄而定了。南方各地农民军和地主阶级政权彼此间蕴积了10余年的仇恨，进行了10余年的战争，但在清军进一步南下时，双方都感受到有一种强大的威胁，它们被

迫互相靠拢，从此开始了农民军联合南明诸政权共同抗清的新时期。抗清联合阵营的形成是国内民族矛盾上升，汉族地主阶级分化出抗清派的结果，继大顺军联明抗清之后，又出现了大西军的联明抗清。不可否认，小部分农民军将领在联明抗清之后，在地主阶级影响下滋长了忠君思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了南明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但这种情况毕竟是有限的。就实质而言，农民军在抗清联合阵营中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正是他们支撑并推动了南明朝廷的抗清斗争，在抗清联合阵营中，与其说是农民军禀承朝廷的旨意行动，不如说是南明朝廷看农民军的脸色行事。农民军在抗清联合阵营中保持了自己相对的独立性，这是不容抹煞的事实。清军入关后，进行的是一场野蛮的掠夺战争，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造成了很大破坏，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抗清是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但他们与农民军一样，都是抗清力量的组成部分。只有在广大下层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高潮中，才会出现象史可法、钱肃乐、张名振、张煌言、黄道周、何腾蛟、堵胤锡、瞿式耜、郑成功等比较英勇坚定的人物，他们是一批具有民族气节或本身利益受到威胁的坚定抗清的汉族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在17世纪中期广阔的中华大地上，自北向南，从东到西，几乎到处都燃烧着反对满洲贵族残暴统治的烈火，斗争的时间长达20年之久，应当说这是满洲贵族竭力推行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所带来的直接结果。

全国各地汹涌澎湃的抗清斗争使满洲贵族认识到汉族人民中蕴藏着的雄伟力量，迫使清朝统治者采取一些缓和民族矛盾，调整阶级关系及恢复生产的措施。清朝统治者还竭力拉拢汉族地主阶级以分化抗清阵线。这样，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清王朝得以渡过全国此起彼伏的抗清斗争的高潮，逐个地击破了分散的抗清力量。这样，经过清初20多年触及社会方面的大动荡，中国终于建立起大清帝国的统一政权。从军事上讲，满洲贵族取得了胜利，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较落后的满族却逐渐被先进的汉民族文化所征服。满汉民族差异日趋缩小，民族矛盾日趋缓和。大致说来，在康熙帝当政的前期就基本上完成了满汉统治阶级的合流，民族矛盾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清军入关使国内社会矛盾复杂尖锐起来，清朝统治者打出了“吊民伐罪”兴天断绝的旗号，努力争取汉族地主阶级合作，把进攻的矛头集中于李自成的农民军。清军初入关时曾以“义师自命”，以“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相号召，宣布“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借以换取汉族地主的支持，麻痹和涣散南明王朝的抗清意识，减少进军的阻力。但当清统治者占领了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以后，自以为兵强马壮，取天下易如反掌，征服者凶恶本性立刻暴露无遗。因此，到了顾治二年(1645年)前后，黄河南北，大江两岸，抗清斗争形势迅速高涨，全国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清军几乎控制了整个华北和中原地区，前锋已推进到四川、湖北、江西、江苏沿长江一线，吴三桂等地主武装由不足百万，增加到200万，民族征服的危险更突出了。因此，在京畿(北京周围)、天津、山东、苏甫，都连绵不断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

京畿一带的抗清斗争清军进入北京后，由于强行“薙发”、“圈地”，掠人为奴仆，京畿一带人民群起反抗。由李自成大顺农民军点燃起来的

抗清烽火，首先在北方地区蔓延开来。

三河县的农民首先发难，接着北京的昌平，海子江门和天津一带农民，持刀枪而起，大有围困北京之势，使“京师采煤西山……两月不至”，直接威胁“辇毂近地”的安全。霸州起义，人民“白昼成群”，出没于丛林中，到处袭击清军。河北保定、真定、霸州等地农民武装，直接配合李自成农民作战，牵制清军兵力，出现“国初以来有积寇盘踞险要，赋税不供，招纳亡命……吏不敢问”的局面。大名、内黄一带农民，占据内黄县城，积极协同刘体纯率领的农民作战，“各称总督、大元帅，并联山东、河南，‘贼寇’势将燎原”。

顺治元年以来，天津沿海一带的贫苦农民和渔民，多次举行反清起义，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最先是活动于天津沧(县)、静(海)、南(皮)、盐(山)一带的农民渔民起义军，以李联芳和张成轩等为领袖，坚持抗击清军的进剿，李、张失败之后，顺治五年(1648年)又有杨四海的抗清活动，他自称是明熹宗的太子；同时，在三河的女英雄张氏则自称是熹宗的皇后，率众反清。三月，起义军攻占了庆云县城(今县北)，并多次击溃清军的围攻。起义军将士愈战愈勇，七月，进攻静海，八月又袭击津东，致使清军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到顺治六年(1649年)，清廷派重兵由英亲王阿济格及吴喇禅统帅，满、汉大军进行水陆“会剿”，起义军被重创，死伤惨重，起义失败。

顺治二年，宣传、大同等地农民义军蜂起，统治者惊呼。“但见满山遍野，俱是‘贼兵’，多持枪刀弓矢，其中又拿椽标者。妇女，腰系红裙，亦各持椽木双刀，飞舞跳跃，各各前来。……我兵对敌，从辰至未，……不能敌众，遂收兵回城”。此外，在河北的绕阳、交河、曲阳、保定、定兴、南宫、平山、承德等地，农民相继自发抗清，攻打县城。怀来县农民，“乘闯‘贼’肆乱已后，负隅啸聚，西‘劫’蔚州，北攻怀来，攻斋塘、杀守备、破马水口，‘抢’保安州，屡败官军，势大炽”。可见，河北及“京畿”要地一带的农民抗清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清军，使清统治者“惶惶靡有宁宇”。

山东各地的抗清斗争山东的农民起义早在明末就已经蓬勃发展起来。1644年8、9月间大顺军西撤以后，闯王的旗帜仍招展于山东各地兖、沂、邹、滕一带的农民军，转入了截击和阻止清军南下的斗争之中，抗清斗争如火如荼。

著名的如满家洞农民军，在嘉祥农民宫文彩率领下占领满家洞(山东嘉祥县境，地连嘉祥、济宁、金乡、巨野四县界)山区为根据地，“聚集数万”，“界连四县，穴有千余，周回二三百里”。农民军尊奉大顺军永昌年号，宫文彩自号“擎天大王”，与附近各地的农民军领袖冲天大王李文盛，扫地大王宋二烟，混世大王杨洪升等联合抗清。满家洞山地绵延，形势险要，多天然洞穴，易守难攻，是农民军绝妙的根据地。他们“建营立寨”，“攻城掠地”，杀官拒捕，附近州县人民相继归附，一呼百应。“五兵火器，件件俱全”，“旗帜上大书闯‘贼’年号”。清廷多次派兵搜捕，进山围剿，都被农民军击败。为此山东巡抚方大猷向清廷献计“招抚”，但被拒绝，清廷已对这支农民军恨之入骨。总兵杨方兴施用了残酷的镇压，对附近村镇人畜、财物洗尽杀绝，以断农民军粮草。农民军坚持斗争，直到顺治二年正月，清廷派肃亲主豪格率满洲军队前往剿灭，

清军采用了压缩包围、重兵围困的办法，并绝其水道，将大小250多个洞口都用土石堵塞，一直围困了5个月。农民军宁死不屈，全部壮烈牺牲。

山东邹、滕一带农民有数10支之多。著名的有滕峄农民军，团结其它农民队伍，以苍山、花盘山、抱犊岗一带为抗清基地，与清军坚持战斗达八九年之久。

鲁东地区的农民于1644年秋在青州杀死清朝的招抚吏，举行抗清起义。登、莱、青三府农民群起响应，“结聚数万，延蔓东海”。有的自称威振山东提调总镇，有的称总兵大元帅等，声势浩大。清命山东侍郎王鳌永进兵青山(山东益都)，攻击胶东一带的抗清武装。李自成旧部裨将赵应元，佯称受抚，率农民军从长山周村偷袭进兵青州的王鳌永，举起反清义旗，招兵聚众，编训军队，打富济贫，周围百姓群起响应，义军发展到数千人，并攻占了索镇(山东桓台)、乐安(山东益都县北)等地。清山东抚、镇诸将束手无策。赵应元自顺治元年九月起义入据青州，相持到十月以后，清廷纠集力量，派和托会同山东巡抚陈锦、总兵柯永盛，都统李率泰等围剿。和托又以招抚慰劳等欺骗手段，诱使赵应元出青州城，结果赵应元被清军俘获而牺牲，起义被清军镇压。

高密的张舆也聚众响应赵应元起义，自称总兵大元帅，但赵应元牺牲后，张舆部因势单力弱，寡不敌众，于十一月间被清军胶州永总柯永盛率兵击败，张舆牺牲。

在顺治元年秋，青州还有以秦尚行、葛东方等领导的数万农民反清起义，活动于昌乐、寿兴等地。这支起义军响应赵应元起义，准备联络占据登州的明朝旧将杨威共同抗清，反清复明，建立帝号。起义军深得人心，势力逐渐扩展到东部海滨各县。秦尚行等领袖将部众编为总镇，协镇各营，于九月分兵三路进攻昌乐。一路直攻昌乐县城，一路列阵城南以阻截清军的援兵，叶路北渡潍河断绝清军骑兵退路。起义军各路按照作战计划，顺利攻占昌乐。但由于清军援兵不断，城内的义军只好退出城外继续抵抗，战斗到十二月，由于内部少数人的动摇叛降致使起义失败，秦尚行等被俘牺牲。

在鲁西曹州一带的榆园农民军起义影响最大。据顺治元年八月山东巡抚方大猷报：“土寇马应试，自(崇祯)十三年作贼，聚众万余，迄今五载，……”榆园农民军原是反明朝腐朽统治的起义队伍，清军打入北京，榆园军转入抗清斗争。1645年李自成牺牲之后，榆园军执行了团结其它阶层抗清力量共同对敌的正确政策，“数日之内，袭陷四城，聚众至数10万”。在山东、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形成抗清的中心力量，榆园军的领袖人物有任七、张七、李化鲸、马应试、范慎行(范次吾)等，他们率领起义者占领了榆园丛林地带作为根据地，筑营寨、掘地道、设官分职、编组军队，并拥有洋枪洋炮等精良武器。起义军广招流散，为民除害，同时又联络了一批反清的知名知识分子作为谋士，从而提高了榆园军的声威。成为清初农民起义中较为有组织、有纪律的农民武装。榆园军以濮州、范县为根据地，活动于朝城、观城、郓城、城武等县，“凡数百里”，众“号百万”。当南明福王政权被清廷剿灭之后，榆园军就独自担负起在江北一带的抗清重任，与清军周旋。清顺治二年，榆园军在李化鲸等人领导下先后攻占了曹州(山东荷泽)、僕州(范县西南)、定陶、

城武(成武)、旧城，拥立明忠义王建都曹州称帝，改元天正，并且“设官置将”，“聚众至数10万”。之后，连克巨野，东明等地，清廷朝野震动，调集河北、山东两省的军队前往围剿，把曹州城包围达两个月之久，却久攻不下。顾治四年，榆园军又西破南乐，开州(河北濮阳)，与河南农民军取得联系，分兵南进归德(河南商丘)，北攻大名，大有进取北京之势，榆园军“结连北直、河南”等地义军，攻城占地，“势如鼎沸”。清王朝统治者又惊又怕，招抚不成，攻战不克，决计采用残酷的镇压手段。顺治五年八月，在攻打兰阳县(河南兰考)战役中，农民军被清兵“焚毁‘贼’楼，杀死2000有余，烧死男妇2000有余”。榆园军范次吾部在东明县黄堌集被清兵包围，经过两天两夜的拚杀，农民军被杀死、烧死1000余名。清军在围攻曹州的两个月当中，各营“得获马骡、器械,留营应用，牛驴赏给伤亡及有功官兵；妇女……并应赏给官兵，以示鼓励”。面对清军的暴行和杀戳，榆园军更加顽强，斗争更加坚决。1649年(顺治六年)，清朝派张存仁为直、鲁、豫三省总督，镇压榆园农民起义军。但张存仁的部队屡吃败仗，无计可施，采用了归德大官僚地主侯方域的“五剿五抚议”，的毒辣诡计。侯方域的五剿议是：逼巢穴，绝径路，困粮食，鼓敌仇，散党援；其五抚议是：固根本，昭激劝，简精锐，信号全，责屯种。张存仁派徐州总兵张胆调查榆园地理情况，采用了火焚丛林、决黄河水灌地道等狠毒手段，并派重兵将榆园四周团团围困，农民军的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大部分农民起义领袖及将士献出了生命。到1655年(顺治十二年)，清军终于镇压了榆园起义军，持续了20年之久的斗争失败了。

与榆园农民抗清的同时，鲁西南还活跃着大小数10股、各有数千人的农民起义队伍，其中以王俊(一说名为王肖武，或王小吾)所领导的一支农民军力量最强。他们占据苍山(山东郯城县北)、花盘山(峄县北)、抱犊岗(临沂县西南)为根据地，与榆园军配合，与大名(河北今县)以苏自兴、邓名扬为首的农民军共同抗清“一日数战”。王俊自称九山王，内黄(河南今县)农民军领袖王鼎铉则自称总督大元帅，彼此相互呼应，“势将燎原”。王俊领导的农民军坚持抗清直到顺治八年(1651年)，才被清三省总督张存仁率军围困在苍山，起义最后失败。

1646年(清顺治三年)，高苑县(山东高青东南)发生了谢迁起义。他于顺治三年十一月聚集农民数千人并联络附近山区农民军起义抗清，经过奋力拚杀，袭占了高苑县城。次年秋天，谢迁又联络淄州(山东淄博市南)起义首领丁可峰，共同攻占了淄川县城，将带头剃发降清的大明进士一一杀死以泄民愤，但对具有民族气节的士族蒲松龄居住的村庄，则加以保护。起义军爱憎分明的做法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这支义军在高苑、淄州、德平(山东商河县北)、临巴等县与清军周旋。到顺治四年，清军发起猛攻企图占领高苑。谢迁率众守城，清军在城外筑壕围攻达两个月之久，终于挖通了地道，用火药炸毁了城墙。高苑城被清军占领后，起义军退守淄川，清军穷追猛攻，用大炮、火药再破淄川城。起义失败。

就在顺治四年冬(1647年)，在兖州(山东今县)一带暴发了由丁维岳、张尧中领导的农民起义，响应者数千人。十月，起义军围攻张秋镇(山东阳谷县东)，城内的百姓主动配合起义军，在城内与清军进行战

斗，从而使张秋镇里的清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黄昏时分激战正酣，由于清军大批援军的来到，使城内的清军气焰嚣张，反而割断了起义军在城内外的互相联系。关键时刻，城外的起义军首领丁维岳又中箭负伤，无奈率部撤退，致使围攻张秋镇的战斗一无所获。十二月，起义军在郓城附近的王象海子整顿时，遭到清将沙尔虎达率满洲八旗兵的突然围攻，起义军被迫应战，但因陷入重围而难以摆脱。结果，清军攻占了王象海子，起义军首领战死，余众溃散，起义失败。

山东人民的抗清斗争连绵不断，顺治五年(1648年)，山东栖霞人于七聚众于锯齿山(山东栖霞东南)，联合周围各地起义军进行抗清斗争。在顺治七年(1650年)起义军攻占了宁海(山东牟平)，一时声威大震。清廷采用了两手政策，阴谋“令其贼自效”，乃授于七为栖霞把总，以引诱、瓦解起义军。但于七不为所动，仍率众在登州、莱州地区继续反清。清廷见诱降不成，乃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春，派兵前往围剿、镇压。于七闻讯，镇定自若，联合附近的各路起义军首领商讨对敌计划。然后，于七和昆仑山(牟平东南)的张振冈、鳌山(即墨东)的段忠渍、招虎山的徐海门等率领的农民起义队伍，先发制人，先后围攻福山、文登、宁海、大嵩卫(莱阳东南)等处，清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屡遭失败，被各路起义军打得焦头烂额。清军纠集力量，于十二月重点围攻于七的根据地锯齿山。于七率起义军不屈不挠，与清军坚持战斗两个多月，被迫撤出锯齿山，率余众入海。此后，农民军余部占据了蓬莱、宁海的沿海岛屿，神出鬼没，声东击西，仍顽强地与清军进行战斗。

清初山东各地的抗清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既反映出山东的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又牵制了清政府的部分兵力，配合了其它地区的抗清斗争。

北方其它地区的抗清斗争1644年(顺治元年)，清军追击李自成的大顺军进入山西后，遭到各地农民的顽强抗击。农民军纷纷占山结寨，与清军周旋。1648年，清驻大同总兵姜瓖也起兵反清。到了第二年，各地义军相互配合，攻城略掠，直逼太原。清朝山西当局惊惶失措，哀号“省城孤悬一土”，“呼吸危亡，朝暮难保存”。

山西朔州(山西朔县)教民张四、李二、邢四、蔡羽、李一梅等人，假借“皇天清净善友会”之名，四处联络群众，名为持斋事佛，暗中组织反清起义。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教民们举行了抗清义旗，迅速占领了朔州蒋家峪作为根据地，清军派军前来镇压，参加反清起义的男女老幼纷纷行动起来，拿起木棍、刀枪、弓矢等，奋力反抗清朝地方官军的进攻，并多次击退了来自朔州镇兵的围剿。清军对起义者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烧杀抢掠无所不作，更激起了起义群众的反抗，清军遭到起义军的顽强反击，伤亡很大。清廷被迫征调山西、陕西两省的军队前采围剿，起义军坚守蒋家峪，寸土不让。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军首领均战败被俘，壮烈牺牲，致使起义失败。

在晋西吕粱山区，自明末以来就有农民起义军不断地举行起义反抗暴政。清军入关之后，这一带的起义军占据吕梁山区作为根据地，又转入了抗清斗争。到顺治五年(1648年)秋天，吕梁农民军在领袖王显明等领导下，对清军发起了频繁攻势，经过短短1年的苦战，起义军连克山西省50多个县，声威大振。清山西巡抚祝世昌无计可施，只得向摄政王

多尔衮告急。多尔衮亲率满洲八旗精兵驻屯于浑源县的寇家寨，同时令阿济格率军北上围攻大同，令博洛南下援救太原。

清军由博洛统领的救援部队由百羊口(代县北70里)火速抵达代州，正值农民万余人围攻代州的关键之时。在刘迁的指挥下，农民军奋勇杀敌，已经攻破了代州城的东关，但由于博洛的援军已到，起义军来不及向代州城内深入，只好匆忙撤退。博洛率清军随后紧迫，双方在平城(代县东40里)发生了激战，农民军伤亡惨重，死伤数以万计，战将郎枋战死沙场，刘迁只好率余部退入黄香寨(繁峙县东南100余里，五台山华严岭东北50里)，继续与清军周旋。另一部分义军则由高鼎、刘永忠率领，进入了五台山区以求发展。

博洛带领清军从代州向忻口(山西忻县北)进逼，忻口、静乐等地的起义军在李茂兰和杨奉山的率领下，在滹沱河东、西两岸的山区与清军对峙，农民军还修筑了营垒。博洛率军绕至鲜沟铺以北，渡过滹沱河，强攻东岸山区农民军的营地，农民军防不胜防，战退弃营而走。占据滹沱河两岸山地的农民军，在首领李茂兰的带领下，放弃忻口翻过西山退往宁化(静乐县北80里)。另一起义军在王显明等率领下，早在四月已经进入了晋祠(太原以南，清除县以北)，并集中力量进攻太原县(今太原南)，使省城太原告急。清廷急令博洛率部驰援，结果清军行至太原古城南(晋祠北10里)遭到了姜健雄所率农民军的伏击，清军的前锋数千人转眼之间就被农民军杀得人仰马翻，死伤无数。由于清军援军赶到，起义军退守晋祠，博洛兵分两路，以主力围攻晋祠，另抽出千余人在白云山下设伏，以防农民军撤退，双方相持数日，晋祠的起义军越战越勇。清军挖通了地道，试图以火药炸城，却不料火药突然爆炸，挖地道的数百名清兵顿时炸得血肉横飞。由于城墙被炸塌，清军随时都有可能涌城而入，农民军只好放弃晋祠，翻过西山而撤，却不料在白云山下遭清军伏击。清军围追堵截，致使起义军死伤万余人，农民军领袖龙玉、王显明等战死，起义军受到毁灭性打击，余部由钟明节等率领转入山区以求生存和发展。

由于山西一带的农民起义甚为活跃，清世祖调集陕西与山西清军合击各地的农民军，四月，吕梁农民在领袖虞印、张五等率领下一举攻占了晋县县城。八月，清山、陕总督孟乔芳率陕军东渡黄河向占据晋县的农民军发起进攻，由于清军人多势众且火力强大，农民军弃城而退。其中的一部在退至晋县东10里的泛狐村后，尚未安营扎寨，即遭到清军的突然袭击，农民军仓促应战，结果有800余人牺牲。

博洛见山西各地农民起义已转入低潮，便上书清廷请求发兵，一举攻克被农民占有的各州县。于是清廷准奏，并下令满达海从朔州移师汾州与英亲王部合兵攻占汾州。清廷派重兵连续进攻农民所占据的地区，直到1653年(清顺治十年)，清廷的宣府总兵刚阿泰击败了高鼎所率的农民军之后，山西各府才陆续被清占有，而吕梁山区，由于山寨绵延至百里，仍是各路绿林英雄大显身手的好地方，直至康熙初年，农民起义时有发生，清廷一直无可奈何。

1671年(清康熙十年)，吕梁山区的农民军势力又有所发展，清廷因山区地形复杂，不明虚实，不敢纵兵深入，于是采用了剿抚兼施、经济封锁和欺骗分化的伎俩。然而山区的各路起义军筑寨自卫，生活自给，

抗清决心坚定。交城县令赵吉士为了讨好清军，一边加紧训练地方上的乡兵，一边派奸细混进山区，蛊惑人心，扬言清军只逮捕造反起事的数10个首领，这些奸细们还摸清了农民军的防御设施。结果，被清军紧紧围困在山区这里的起义军内部出现了一些混乱，人心惶惶。清军于康熙七年冬首先袭击了周洪山寨农民军李宗盛的队伍，各路农民军闻讯后更加慌乱。交城县令赵吉士见时机成熟，会同清守备姚顺率官军1000多人，分兵两路，一路进入独石河，一路直攻烂团山。烂团山告急，各路起义军冒冰雪严寒前往救援，永宁、静乐、临县等地的起义军分别在其首领冯养成、郭三法、张二等的带领下，与坚守烂团山寨的由钟斗领导的农民军共同抗击清军，经过激烈的战斗，终因众寡悬殊，起义军被迫放弃烂团山寨，向西南谷积山方向突围。清军则疯狂追击，在谷积山下，起义军与清军战成一团，由于矢弹皆尽，起义军边战边向山上撤退，以占领山头。但清军大军压境并控制了各山头，农民无处藏身，经过浴血奋战，任亮等起义军领袖和绝大部分起义军战士壮烈牺牲，另一重要将领付青山则被俘，宁死不屈。吕梁山区各地的起义军坚持抗清达28年之久，最后终于失败。山区的各峒寨先后被清军攻占。

顺治二年，徐州(今江苏)任应乾聚众反清，起义军占据山险并与附近山东，河南等地的农民起义相配合，一致抗清。农民军占据了徐州附近的驹嘴、天门寺、黄藏峪、白工洞等有利地形，凭地利人和频繁地杀官绅，劫土豪，农民军每股仅数百人但却英勇无畏，多次打击了清朝的军队。后因各股间独自作战，被清总兵王之纲、苏见乐各个击破，致使各股起义军将士或杀或俘，起义失败。

在徐州，清顺治三年(1646年)又发生了吴任之领导的反清起义。吴任之利用当地乡民的封建迷信思想，号召乡民反清。并且与虞山农民军首领张万紫联络，利用砀山知事作佛事的机会，号召群众夺占了砀山县城，并且俘获了典史江应元，起义者没收官库物资，开仓放粮，附近百姓欢喜不尽，清廷在徐州的地方统治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后由于起义者的麻痹，疏于戒备，被清军和当地的乡绅里外夹击，砀山失守，起义军战败四散而逃，吴任之也逃跑了，起义失败。

在甘肃，1648年(清顺治四年)爆发了由米喇印、丁国宝等领导的回民起义。清军在陕、甘地区击败李自成的反清武装之后，明朝旧臣和西北边疆各族仍继续反清。甘州(甘肃张掖)副将、回民米喇印，趁清军大部入川进剿的机会，联合回民丁国宝等，聚众起义，起义者迅速增至10余万人。回民义军杀死清朝巡抚张文衡等大批官吏，使满清朝野震惊。回民们又拥立原明延长王朱识鋐，以“反清复明”相号召。丁国宝串一部分义军守甘州，并东进攻克附近的地区，杀官劫府打击清军。起义军一鼓作气，连克凉州(甘肃武威)、兰州、狄道(甘肃临洮)、巩昌(甘肃陇西)、岷州(甘肃岷县)、渭源、通渭、洮州(甘肃临潭)等10余个州县。清廷在震惊之余，下令镇压。清陕西总督孟乔芳奉令调集陕、甘清军前往围剿，但遭到起义军的反击。清廷又调满州八旗兵及外蒙古军集中于秦州(甘肃天水)，然后重点进攻起义军活跃的地区。米喇印的义军不敌清军的强攻，退守靖远，但在水泉堡(甘肃靖远东)，义军又与清军遭遇，激战的结果，米喇印战败，被俘牺牲，这一支回民部队因此而溃散瓦解。八月，清军又集重兵围攻甘州，与此同时，在狄道又兴起一支以“闯

榻天”为领袖的回民义军，清军防不胜防。为了保卫甘州，以丁国宝和黑承印为首的回民武装在甘州城内与清军对峙了半年之久(自顺治五年八月至六年正月)。清军一面攻城，一面诱降。然而城内义军宁死不屈，清军无计可施，清军恼羞成怒，下令疯狂进攻。战斗激烈时一日攻达10余次之多，清军和义军伤亡都很大。最后，城内守军因孤立无援，人力、物力损失太大．被迫放弃甘州，退至肃州(甘肃酒泉)。在肃州，义军与当地维吾尔族群众联合抗清，并积极响应山西大同姜壤的反清之变，反清斗争又趋高涨。到顺治六年(1649年)十一月，肃州城终于被清军攻占，丁国宝等起义军将领战败，被俘栖牲。不久，狄道的义军也被清军残酷镇压。这样，关、陇一带轰轰烈烈的抗清起义宣告失败。

清军进剿西安后，陕西各地农民军受到了血醒的镇压，因为这里是明末农民起义的发源地，是清廷重点围剿之地。但西安人民以及西安周围山寨农民奋起抗清，以后又有陕南农民军团结明朝旧将在五郎山起事，并配合其它义军，围攻西安长达7个月之久。

总之，在李自成大顺农民政权反清斗争的影响和推动下，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北方各省的农民纷纷举起抗清义旗。各省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虽然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和协调，并且均以失败告终，但这种抗清斗争发生手清军入关后不久，破坏了清朝统治的稳固性，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阻止和拖延了清军的南下，从而有利地配合了南方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因此北方各地的农民起义是抗清斗争的先锋和主力军。

第二节 大江南北抗清斗争正酣

清军入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打败了李自成的农民政权，又摧毁了南明弘光政权，清军的势力迅速席卷了半个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军事力量，清王朝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令人心惊目眩的胜利，但是，它对农民军的血腥镇压，它在南下胜利进军过程中野蛮的烧杀抢掠，以及由于民族之间的隔阂和社会制度的差距，它入关后采取的一系列高压政策，使得满族贵族与广大汉族农民处于严重的冲突之中。国内的民族矛盾，特别是满汉间的矛盾迅速上升。南方的农民抗清义军和地主阶级政权在清军步步推进的压力之下，由互相仇视和战争转为互相靠拢，并开始了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共同抗清，随着清军的进攻矛头指向浙、赣、闽、粤东南地区，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和许多地主士大夫纷纷卷入了抗清斗争的洪流。抗清斗争中，既有下层农民和市民对清军残酷暴行的自发反抗，也有汉族士大夫为恢复明朝统治的狭隘的图谋。他们有的持城固守，抗拒强敌，有的结寨深山，自保家园；有的困守海岛，矢志不屈，弘光王朝土崩瓦解之日，正是江南抗清武装风起云涌之时。

江南一带，在清军南下之前，就有反抗地主阶级压迫的农民革命组织，如溧阳藩茂、藩珍领导的削鼻、珐琅诸党。清军南下以后，这些农民组织团结广大贫苦农民，同仇敌忾，开展抗清斗争。仅溧阳一地，其力量发展“遂至十六区”。徐州的农民队伍，曾一度占据徐州西部，阻止清军南下。针对清军的野蛮镇压和灭绝人性的大肆屠杀，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宁死不屈。

清军兵临南京后，腐败的南明官军不战而溃，但南京周围的地区，如金牛、六塘、陶村、聂村、邓村等地农民，“借练乡兵为名”，奋起与清军作战。

1646年8、9月间，溧阳、金坛、兴化等县农民军2万人，曾配合明宗室举兵进攻南京，兵抵神策门。抗清力量在江南的迅速兴起和发展，并且敢于攻打大城市，大出清统治者意料之外，农民军不畏强敌，以后又多次袭击南京，使清统治者坐卧不安。

太湖渔民起义太湖地区的广大贫苦农民、渔民、在赤脚张三的领导下，以淀山、长白荡、澄湖为基地，组成抗清义军，他们“虏富家子置山寨，勒千金取赎”以充军饷，对广大贫苦百姓则“仍分子交易”，“故众多归之”。太湖的农民和渔民的抗清斗争威胁了清朝在苏(州)、松(江)一带的统治，鼓舞了当地各阶层人民。1645年7月，太湖的农民和渔军联军参加了吴江进士吴日生等发动的抗清起义。起义战士一律用白布裹头，称“白头军”。“白头军”以农民和渔民为主力，攻打吴江，占据宜兴作为根据地，袭击横山、木瀆等镇(江苏吴县境)，活跃在太湖地区。清廷几次派兵前往围剿，都被起义军击败，清廷被这支神出鬼没的义军牵着鼻子转。清贝勒八王爷亲自督战，率兵到太湖“征剿”，结果遭到起义军的伏击，竟被赤手空拳的起义军用石头打死，起义军主动攻打清军，从而牵制了一部分清军兵力。白头军还曾挥师东破浙江的海盐，回攻嘉善，声震江南。因为白头军严刑镇压官吏富坤，打富济贫，远近百姓争相归

附，白头军借长江等河流的地理、特点，与清军周旋于太湖地区的港口湖汉，出没无常，坚持抗清10余年。只是由于起义军内部成份日益复杂，1647年7月以后清军进攻连连得手，起义军力量有所削弱，吴日生被杀。白头军在赤脚张三的带领下继续抗清，出没于苏、常等地，多次挫败清军。清军对白头军束手无策，因为“湖路梗塞，莫可如何”。从而给吴江吴易等人的抗清斗争树立了榜样，客观上支持了吴易，白头军成为江南抗清的一面旗帜。直到清康熙元年，太湖东山地主朱允恭、韩心康设计宴请张三，乘其酒醉之际，擒获献于清军，赤脚张三英勇牺牲，太湖起义军遂后被清军镇压。

吴江人吴易在顺治二年秋，继赤脚张三起义不久，也在吴江号召人民起义抗清，并迅速组织起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吴江义军，与江阴(江苏今县。)陈明遇、阎应元领导的守城抗清相呼应。平望一战，起义军击败了由清嘉兴总兵李遇春的进犯。起义军还曾在芦苇荡中设伏，突袭并击溃了清提督吴兆胜统领的水陆军的围剿，俘获船只20余艘，与清军在水面上周旋，相持数日。后来，清贝勒博托攻占杭州之后，亲自领兵前往吴江，与吴兆胜军联合进攻起义军，封锁了吴江县城以及水路全部港口矿然后攻破吴江，吴易抗清失败。

同样是在顺治二年，昆山县的百姓怒杀了降清的县丞阎茂才，于七月举行起义。百姓推举当地贡生朱集璜等人为领袖，聚众千余人，立明朝旗帜，号称“其义兵”，并推明旧将王佐才为帅，守城抗清。常熟士民严拭也聚众响应。清军调集了30万之多的大军，兵临昆山县城，以火炮猛轰。城内义军坚持抵抗，清军连向城内发射900余发炮弹，破城而入。义军与清兵展开巷战，结果寡不敌众，起义领袖数10人及全部抗清义军壮烈牺牲，城内百姓也惨遭杀害。不久常熟也被清军攻克。

吴江的吴易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吴易的部将钱应魁(一名钱大)回松江原籍，招集旧部，领导乡民继续抗清。起义军以泖湖(松江县西)为根据地，东与海上义军祁国始联络，南与浙、闽的南明鲁王、唐王政权的反清斗争相配合，再加上泖湖十带水道曲折、千汊万港、湖海交连的优越地理位置，起义军力量迅速壮大，组成了水、陆部队，劫夺清官兵的钱粮以充军用，自备了弓箭器械，后来又接受了南明桂王永历帝的招抚，钱应魁为平南将军。起义军有大小船只300余，活动在江、浙一带，成为清军的劲敌。清巡抚张中元、水师游击杨芳的部队先后被起义击败。起义军在泖湖发展10余年，给清军很大打击。直到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二月，清江南总督郎廷佐调重兵，分九路包围、打击起义，经过血战，钱应魁被俘牺牲，将领大部分伤亡，起义失败。

顺治四年(1647年)，盐城和淮安等地暴发了以周元山、张华山等为首的盐民起义。他们不堪忍受清廷对盐民的盘剥，召集了淮安、盐城一带的盐民数千人，起义反清。盐民们拥立明益王朱，奉南明唐王朱聿键的隆武年号，用以号召盐民和贫苦百姓。起义军首先选中了淮安，于夜间突袭，在给守城的清军以重创之后迅速撤离。九月，起义军又集中兵力进攻滨海要地庙湾(江苏阜宁)，经过一个昼夜的激战，起义军击伤清军庙湾游击潘延吉，俘获清将耿嘉乐，占领庙湾作为根据地，并不断打击清军，清廷于十月夜征调徐、扬、凤、泰各州府的驻军，并由江宁增调满、汉军队，集中“会剿”，起义军战败溃散。十二月，益王朱及起义

军首领孙盛宇等在如皋被俘，起义失败。

江阴人民抗清起义清军在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节节胜利，连续攻灭了南明的几个小朝廷，兵锋所向，如摧枯拉朽，充分发挥了它的战争机器的效能，显示了在军事上的强大和迅捷。但是，清军每攻取一地，烧杀掳掠，“子女玉帛”，捆载而去，供满族贵族的享受和驱使。东南繁华地区到处是颓垣废墟，变成一片荒凉景象，使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更加痛苦。压迫愈深，反抗愈烈，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群众，奋起反抗清军的骚扰侵害，此伏彼起的抗清斗争风起云涌。

清军对江南地区实行军事控制以后，为了实现对全国人民进一步的统治，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的措施，企图从制度到生活习俗等方面，清除明朝统治的痕迹和影响。

1645年8月，清廷下令在江南实行“剃发令”，即强迫汉人仿照满人的习惯，剃去前额和四周的头发，在脑后梳辫。在满清统治者看来，剃发是汉人投降归顺的标志。清统治者竟然规定：自布告下达后10日之内。各地人民一律剃发。凡是不剃的，迟疑的，上表章请求保存明朝制度的，一律“杀无赦”。在州县的命令上，更写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等语。与此同时，清政府还派兵丁巡行街头，武装强迫剃头，稍一反抗，就把头砍下来。

本来，由于清军江南的暴行和一系列民族高压政策的实施，早已激起各地人民的无比愤怒，剃发令的颁布，起着火上浇油的作用，抗清斗争如燎原烈火，在社会各阶层中迅速蔓延。汉族中除一批官僚地主豪绅投诚依附，引导清军加倍压迫和奴役人民以外，广大的农民群众(包括灶丁，渔户)，城市市民，商人和小手工业者，以及不少地主和知识分子，纷纷行动起来。他们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清义军，坚持“头可断，发决不可剃”，开展大规模的反剃发斗争。它是第一个全国抗清高潮的组成部分，许多城市，如江苏的常州、无锡、宜兴、江阴、常熟、松江、昆山、华亭、吴江、崇明、金山卫、浙江的嘉兴、平湖、嘉善、湖州、绍兴等地，都先后举行抗清起义。

反剃发令最激烈的当属江阴。江阴是当时江南屈指可数的大县，素有“三江之雄镇，五湖之腴膏”美誉，是长江下游自采石以东的第一重要门户。1645年6月，清新知县到达江阴，下令剃发。8月初一，儒生许用德在明伦堂高悬明太祖朱元璋的御容，率领众人一边哭一边拜：“头可断，发不可剃！”四乡百姓奋起响应者达10余万人，并要求江阴典史陈明遇允许他们将兵器库中的火药器械等发放给他们。得到允许后，他们手拿兵器，抓住了守备陈瑞之，并四处捉拿城中的奸细，杀死知县方亨。推徽州商人邵康公为将，邵也招兵买马进行自卫，明都司周瑞龙水军驻扎在江口，同邵康公相约一同出兵，由邵康公从东门进攻，自己从北门水路进剿，同清军相遇而战，没能取胜，清军气焰日炽。各乡的乡兵奋加攻杀，每献清兵一首级，城里赏银4两。清军首先抢掠西城一带，然后移至南关，邵康公前往御敌，没能抵档住。清军又火烧东城，抢劫城外的富户，乡兵奋起抵抗，有兄弟两人杀死清骑将1人，乡兵高瑞被清军所缚，不屈而被处死，周瑞龙见大势已去，乘船而逃。

当时江阴典史阎应元已被升为广东英德县的主薄，因母亲生病而没能成行，正逢国家遭此剧变，携家人侨居于邑东砂山。陈明遇说：“吾智

勇不如阎君!此大事，须阎君来。”于是派人星夜奔驰去迎接应元。应元闻之，率家丁40余人入城协同防守。清军围住江阴城，并派人四处焚烧抢劫，乡兵纷纷逃离，没有人再来支援江阴军民，清军集中兵力攻城，而城中的兵员不满1000，户口才1万多户，而且军饷没有出处。

陈明遇和阎应元共同统率防务，指挥守城，命众将士齐心合力，修城池，造火器，储军备，轮流登城防守。城内市民临危不惧，争先恐后地捐钱捐粮，人人抱誓死守，城之志。男人守城，妇女救护，白日御敌，夜间修城。于是，城内的粮食和弹药被迅速集中起来，计有火药300罌，铅丸铁子近千石，火炮近百门，鸟枪千叙，银两千万缗，粟麦豆等粮食万余石。在生死关头，江阴城内士民不畏强敌，反清热情高涨。陈明遇、阎应元等分别率兵防守各个城门，严阵以待，军民士气高涨。

当时，清军已调集重兵10多万兵临江阴城下，进行疯狂围攻，将江阴孤城围困其中。清军仗着兵强马壮，人多势众，气焰十分嚣张。以闰六月到八月门，清军多次发起猛攻，城内外炮声隆隆，确烟弥漫，喊杀声不绝于耳。然而烟雾散去，江阴城仍傲然挺立，城内军民愈战愈勇。清军的火炮对北门城墙破坏很大，阎应六指挥士兵用铁片裹上门板，甚至将空棺材填上土，用以填补城墙的残破之处。清军派明降将刘良佐带兵猛攻。城内的军民用自制的毒矢、火砖、木铳等御敌。毒矢射人即死，火砖碰人即燃，木铳中存有火药，从高处投掷地下，就会木裂而致火药爆炸，杀伤力较强。这些攻防性的武器都是守城士民发明创造的，清军被打得措手不及，畏缩不前，以致刘良佐所率清军攻城数日而无丝毫突破，清军多人被炸或被烧得焦头烂额。刘良佐吩咐将士用牛皮帐篷作掩护，加紧攻城。但牛皮帐篷经受不住石块的冲击，牛皮洞穿，清军伤亡不断。最后，清兵用九梁八柱架起厚达三层的牛皮帐以抵档巨石，而城上的士民自有妙计，他们将烧滚的桐油对准牛皮帐泼下来，刹时牛皮帐被汤得皱成一团，帐内外的清兵则被烫得哇哇乱叫。刘良佐急得抓耳挠腮，无计可施，而城上的士民则欢呼跳跃，群情振奋。江阴附近的乡兵虽已溃散，但又有农民军闻讯前来参战，“距城五六十里者，日入城打仗，荷戈员粮，弃农不顾……虽死无悔”。清廷恼羞成怒，先后调集多达24万清军前来围攻江阴，与此同时前来援助江阴守城的农民军也多达20万，双方攻守争夺，十分激烈。

清将李成栋派人前往诱降，阎应元在城墙上反唇相讥：“大明有降将军，无降典史。”一句话说得李成栋、刘良佐这些降清明将无言以对。刘良佐硬着头皮劝道：“区区江阴，宁能久守。若要计降清，爵位不在良佐下，请足下三思!”阎应元一阵冷笑，义正辞严：“大明养士三百年，不料出汝等侯伯，毫无廉耻。应元犹有心肝，宁为早死，不为刘生。”说完，一声令下，城内万箭齐发，城下清兵抱头鼠窜，刘良佐吓得拍马而回。

最后，清军从江宁等地调运大炮200余尊，集中轰城，清军借火炮的威力从四面夹攻。江阴城守兵死伤无数，城墙崩塌，但仍巍然不动。清兵目睹此景，胆战心惊，“无不以生还为祝”。清贝勒博洛亲自坐镇指挥清兵攻城，命清兵组成敢死队攀云梯而上，要不惜任何代价夺下江阴。阎应元身先士卒，率千余人与从城墙缺口入城的清兵展开白刃巷战。时值天降暴雨，城墙经连日的大炮轰击之后纷纷倒塌，致使清军蜂

涌入城。黑暗中只听刀斧砍杀碰撞的铿锵声，只听炮声昼夜不断，方圆百里为之震动。城内守兵势单力薄，防不胜防，死伤无数，巷内家家都有哭声。阎应元与众人奋力苦战，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清军击败。阎应元身中数箭被清军生擒，他视死如归，挺立不屈，最后英勇就义。陈明遇也是身受重伤而死，他双目圆睁，手握钢刀僵立倚壁，吓得清兵连连后退。

江阴军民坚持守城80多天，先后击毙清三王十八将，杀清兵数万人，打退了清军无数次进攻。终因城内弹尽粮绝而为清军攻破。清统治者下令屠城："满城杀尽，然后封刀。"清军付出了7万人的代价占领了江阴后，城内外的居民被清军残酷地屠杀，尸积如山，井中处处填满死难者的尸体，据史载城内外男女士民被杀者10余万人。只有53人因躲避于寺庙中，方躲过了这场空前的灾难，成为清军暴行的见证人。

嘉定人民抗清起义清军在江阴的暴行并没有吓倒江南人民，抗清斗争持续不断。在距江阴东南约200多里的嘉定城，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剃发易服起义。

清军占领南京及杭州后，命明降将没承畴督师南京，统兵10余万，半驻杭州，半驻南京，负责招抚江南，而明降将吴兆胜，李成栋则率军巡防沿江沿海等地，并强迫推行剃发令。

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清军在苏州击溃明水师总兵吴志葵的进攻之后，兵分两路，一路问淞江方向追击败逃的吴志葵军，另一路则由李成栋率领进军嘉定。

清嘉定知县张维熙强迫当地人民剃发，激怒了城乡人民，他们迅速以各自村庄的单位进行联合，结果约有10多万人奋起抗清。他们赶走了知县张维熙，烧毁前来镇压的清军船只，然后共同推举当地素有声望的进士黄淳耀和侯峒曾为领导，全城紧急动员，集思广议，分兵各路把守城门，并向吴志葵的水师求援。清将李成栋兵至娄塘，安营扎寨，只等大批援军一到，就开始攻城。关志葵尽管自身难保，还是派出了约700人的水师前来增援嘉定，却不料中途被击溃，这样，嘉定成为一座孤城。但城为的士民却决心坚守嘉定城，与城共存亡，他们抢修城墙，日夜巡防，严阵以待。

嘉定城原先是一座泥城，它的四周又用砖头加固，所以较为坚固。七月，清军开始从四面攻击嘉定。一阵火炮轰击之后城墙几乎完好无损，只不过脱落了几块碎砖而已。清军颇为惊讶，又施一计，在正面攻城的同时，悄悄在地下挖地道。经过数日夜的挖掘，地道终于通到了城中心。然而城内的士民已有所察觉，及时堵塞了洞口，这样，清军的诡计又没有得逞。清军再生一计，他们分兵一部分去佯攻东门，暗中却派另一部分从北门水中潜入城内。城内守兵识破了清军的意图，加强了北门的防守，潜入水中的清军纷纷被石块击中。城内义军用石块、砖头、弓箭等向清军还击，坚守孤城半个月有余，致使清军损兵折将，久攻不下。后因连日天雨，城墙倒塌，而守城的军民经风吹雨淋，已经精疲力尽。有的两眼溃烂，有的体不能支，这样城中的防守日益松驰，给了清兵以可乘之机。清军加强了攻势，一些士兵利用云梯爬进了城内。清军首先攻破了东门，然后一涌而入，城中军民被迫展开巷战，死伤遍地，血流成河。侯峒曾镇定自若，仍坐在城楼上指挥反击，他的两个儿子侯

元滨和侯元洁在两旁护卫，眼见城已难保，侯家父子三人投池而死。据记载侯峒曾第一次投水没有溺死，然后令手下的士兵按住自己的头，沉于水中，士兵哭着照办，然而侯峒曾仍然活着，最后被清军抓获，斩首而死，颇为悲壮。黄淳耀及其胞弟黄渊耀也是自缢而死。他们不屈不挠，以死抗争，让那些贪生怕死的降清明将无地自容。

清军攻破嘉定后再次血腥屠城，城中百姓惨遭杀戮。城中几乎没有人迹，只见尸体遍地，自西关至葛隆镇，沿途河面浮满了尸体，以致于行船无处下篙……据记载，嘉定士民不畏强暴，曾连续三次惨遭屠城厄运，嘉定城几乎成为废墟。江阴、嘉定两城人民反剃发英勇悲壮的斗争，表现出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可歌可泣。清军在这一带的血腥征服没有吓倒江南人民，江阴、嘉定两城士民的斗争为反抗民族压迫留下了光辉韵典范。

原明朝军队的抗清斗争江南各州县士民痛恨满清的强迫剃发和血腥的征服，纷纷起而反抗。一部分明朝旧官降将也利用江南民怨沸腾的机会，联合聚众反清旷当时起兵于苏、浙、太湖地区的抗清势力，称为“上下江士民之师”。清军消灭甫明弘光政权，占领南京之后，明吴淞总兵吴志葵正率一部水师驻屯泖湖(江苏金山县西北)，吴志葵义愤填膺，于顺治二年闰六月联合太湖总兵黄蜚的水师，进攻苏州。清苏州守将王国宝等见情况紧急，城内仅有千余骑兵，难敌明军的联合攻击，于是设下计谋，派部分兵力在城外奔走呼号，假诈江宁援兵，同时在城内设精骑防守。吴志葵等犹豫不决，又闻清军援兵已到，急忙退兵，等到清将李成栋、吴兆胜分别攻克嘉定、江阴之后，转而联合攻击吴志葵和黄蜚的水师，双方在春申浦(上诲附近)展开激战，胜负未决。不料清军用计纵火烧毁明军船只，明军慌作一团，清军趁势猛扑而上，俘获了吴志葵和黄蜚，明两路水师联军全军覆没，清军乘胜进攻松江。

在松江一带，正活跃着以原明两广总督沈犹龙为领导的抗清义军。当清军攻占南京和杭州之后，沈犹龙以抗清复明、保卫家乡为号召，募集当地乡勇士民数千人，准备抗击清军。沈犹龙为加强抗清斗争的力量，联络了明驻吴淞水师吴志葵、太湖水师黄蜚的两路部队，以作外援，同时又派参将侯承祖驻守金山卫，互为犄角。清廷立即派在吴淞击败吴、黄水师的李成栋和吴兆胜进逼松江。顺治二年八月间，清军先以重兵强攻金山，侯承祖率义军顽强固守，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清兵破城而入，侯承祖被俘牺牲。接着，清军设计穿上明军水师服装，令黄蜚带队，扮作从吴淞前来援助的明水军。松江城内义军被骗上当，打开了城门，清军一涌而上，沈犹龙见势不妙率军拚死抵抗，与清军展开激烈的巷战，沈犹龙战败牺牲，清军攻占松江。

在江苏的宜兴和溧阳，原明督师卢象升之弟卢象观于顺治二年七月起兵反清。义军拥立明瑞昌王朱盛沥(谊沥)，以反清复明为旗号，招集乡勇达2万人。义军在宜兴起事之后，进图江宁，事先与城内明降将为内应，准备里应外合。不料计划泄露，清督师洪承畴先捕杀了江宁城内的义军内应，然后又设伏等义军上钩。当卢象观率军抵江宁城下时，城内清军举火把联络，卢象观不知是计，率军进城，结果被清军包围在城内，双方展开激战，卢军溃败。洪承畴又派出快马追击卢军余部，在茅山抓获瑞昌王朱盛沥。卢象观率军苦战冲出包围，狼狈退至太湖西山(江

苏吴县境)，与当地的明将王期升会合，共同设防筑营以防清军来犯。清派水师将领吴兆胜从水路进攻，用火炮袭击王期升的船只，王期升不战而败，带兵逃往福建。卢象观率船队正欲前往救援，却不料中途被清军拦截，卢象观战死，余部被清军镇压。

南京福王政权跨台之后，福王本人逃至芜湖，在荻港被清军俘获。南京及附近的明朝官僚或降或逃。徽州的明朝官吏中只有推官温璜自动留在徽州(安徽歙县)，并代行知府之职，沟明朝官吏金声联手招募乡勇，组成抗清义军。温璜派金声率部分义兵镇守严山关(安徽绩溪县北)，金声又指挥副将分领13营，担任绩溪、黄山六岭的守卫，温璜本人则坐镇徽州，亲自筹集粮饷，组织援军以支援黄山守兵。温璜组织的义军训练有素，并制定了攻守计划，一举攻占了旌德、宁国等皖南诸县。此时正是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于是温璜又上疏隆武帝以示效忠明政权。附近各县的明朝官吏及义民也起兵响应温璜，皖南为之震动。清廷闻讯派洪承畴督师前往镇压，洪承畴派都统叶臣和总兵张天禄攻打严山关，守关的义兵凭据地理优势，以一挡十，坚守阵地，双方相持两个多月。到十月份，清军不惜用重金收买当地乡民，绕路避开严山关直抵绩溪城下。这样义军重兵把守的严山关便失去了战略意义。清军又让明朝降臣黄澍穿着明朝宫服，谎称率军援助，骗开了城门，结果清军兵不血刃占领了绩溪。金声猝不急防，束手就擒，宁死不屈。清军又以同样的欺骗手段顺利占据了徽州，然后疯狂屠杀城内义军和百姓，温璜全家惨遭杀戳。

在建昌(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由本在当地乡绅的资助下，募乡勇达七八千人，于顺治二年六月举起抗清义旗。起义军由明永宁王朱慈炎和罗川的王某(不知名)主持军事，并有明云南总兵赵印选部的助战，一时声威显赫、(赵印选本拟率兵救援江宁，但为时已晚，故转到建昌)。义军在建昌城防守严密，精军强攻不成，便使计诈降。来自河南的呀保宁王率部开至建昌，益茁投有防备，却不料保宁王已投靠清军，并与清将王体仁密谋里外夹击建昌。结果，保宁王乘益王率军与清军交战之时，?在明军阵后发射火炮、火箭，明军腹背受敌，死伤无数，益王逃往福建广永宁王则逃往广东、清军乘胜连克建昌、，抚州(江西临川)、进贤等地。罗川王不甘失败，又招募乡勇攻占了抚州，后因兵少力单，而诅往许湾(江西金溪县西)，准备东山再起。罗川王在许湾一带招募了乡民2万，日夜训练，与清军周旋。永宁王朱慈炎逃往广东后，募集粤民数万，从粤北攻抚州、建昌、罗川王也率军前往事援助，约定分兵收复江西。可惜两军为争地盘而兵戎相见，罗川玉被流矢射中身亡，部众溃散。永宁王也因劳师北上，孤军深入而陷于粮饷不继的困境。当永宁王退守抚州后，清将王体仁重兵包围了抚州、结果城破，永宁王战败被杀。

顺治二年，原明陕西副总兵孙守清以及驻固原的付将贺珍。相约起义抗清。他们迅速聚众数万人，附近各路农民起义军也纷纷响应。原驻固原的旧将武大定在固原起事，募集当地士民组织义军以为配合。起义军初起时锐不可挡，起义军将领贺珍率军攻下风翔之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克渭南、蒲城、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北)、同州(陕西大荔)等地，起义军迅速发展到7万多人，并积极备战准备攻打西安。清廷

令肃亲王豪格派军援助兵力尚不足700名的西安清军。起义军们按计划行事。主将孙守清领兵围攻兴安(陕西安康)，同时派贺珍南下攻打汉中。豪格亲王急调兵驰援汉中，于顺治三年五月(1646年)与贺珍的义军激战于鸡头关(汉中西北)，起义军战败溃逃。清军解除汉中之围，然后豪格又分兵乘胜攻打兴安，起义军主将孙守清战败被杀。

顺治六年(1649年)，山西大同发生了明降将姜瓖的反清之战。“清廷为拢洛人心，将明降将姜瓖封为驻大同总兵，二但姜瓖却打算占据大同以为割剧之地。清廷于是派英亲王阿济格率满州兵前往安抚，姜瓖唯恐势力受削，于是在大同起义反清，与阿济格所率的清军相对峙。姜瓖在坚守大同的同时，又出兵攻打附近州县，以扩大地盘和影响，于是山西一带的明旧臣纷纷起事反清，响应姜瓖，山、陕震动。清廷摄政王多尔衮急令博洛和尼堪率军增援阿济格。清军入山西之后，一路攻城略地，先夺得代州，然后向大同方向进军。姜瓖派大将马得胜率5000兵马在中途拦截，激战结果，清军博洛部与鳌拜部分兵夹击以得胜，结果马得胜军惨遭围歼，死伤过半，固守大同的姜瓖闻讯后，下令紧闭城门不敢出战。清军前锋部队一路清剿，先后击败了姜瓖部将姜辉的抵抗，又招抚了姜瓖的另一部将罗英坛，这样使困守大同的姜瓖更加孤立无援。这样，当尼堪率清军围攻大同时，城内守军已是人心惶惶，姜瓖的部将杨振威趁乱谋杀了姜瓖，然后出城投降,这样清军兵不血刃收复了大同。此后，清军又四处剿灭了随姜瓖起义反清的各州县的武装力量，恢复了清朝对山、陕的统治。

在东南沿海，南明政权继续与清朝进行武装斗争。当清军在福建汀州(今福建长汀县)消灭了明唐王朱聿键的政权之后，南明政权受到毁灭性打击。但闽、浙等地的明朝旧臣，趁清军主力调往粤、赣等地，利用当地士民的反清情绪，在当地士民的拥戴下，纷纷聚众起义，他们不畏强暴，顽强地进行抗清斗争。其中以四明山区(浙江余姚县南)的王翊所率的义军力量最强。王翊于顺治五年春(1648年)聚众万余人，在四明山起事反清。义军以四明山为根据地。四处联络各地义军，并多次出兵攻打上虞，多次击败前来围剿的清军，在奉化，义军与清军发后激战，义军勇猛无畏，给清军造成了较大的伤亡。为了长期与清军对抗，王朝率众迁往大兰山区(浙江余姚县南)，安营扎寨，训练起义军，且耕且战，王翊自称为大兰洞主，下设五营、五司，起义军军令严明，训练艰苦，颇得周围百姓的拥护，因而成为四明山区独立的反清政权，清军常常被打得晕头转向。附近各地的清军城门昼闭，不敢下乡，起义军威震浙东。1650年，起义军与活动于浙、闽一带的张名振军联络，互相配合，迫使清军不敢轻易进攻驻舟山的张名振。如果清军进攻舟山，则王翊立即出兵策应，而清军围剿大兰山区时，张名振又出兵袭击其后、这样清军首尾不能相顾，每战则必陷于腹背受敌的困境，清军因此不敢轻举妄动。直到1651年秋(顺治八年 ），清军预先作了周密的布署，决定先攻四明山，解除内忧之后再平舟山。清军于9月间调集大军自奉化、余姚兵分两路合围大兰山，在山下30里的范围内设下重兵，然后在当地山民的帮助下，围剿山区。起义军陷入重重包围，而舟山的张名振军又与郑成功联合出兵攻打吴淞(江苏宝山县东南)，难以出兵相救援，因此，王翊只有率众苦战，以死相拚，结果起义军损失惨重。王翊带余部打算冲

出重围前往天台，募兵再战，不料中途被俘遇害。这样坚持4年反清斗争酌四明山区起义以失败告终。

皖赣湘鄂人民的抗清起义顺治二年（1645年)李自成在湖北通山牺牲之后，一部分起义军将士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分散于湖北蕲、黄山区，结寨筑营，号召农民起义抗清。这支义军“居民多居险，结砦以守，合黄冈、蕲水、罗田、麻成共48砦”起义军与周围各省的起义军相配合，如与安徽英霍山区的农民军以及河南一带的义军都有联络，组成了以大顺军余部与当地农民为主的反清武装力量。此后又有当地士绅聚众起兵，各据一寨，反清形势高涨。其中实力较强的有：以王为首拥戴明宗室朱蕴为号召的义军，据罗田20余寨；以麻城余山的原明兵部尚书周损为首的武装力量；黄冈白石寨的是以王光淑为首的义军。还有蕲水斗方寨的周从助义军，舒城山寨的黄梅诸生黄景松的武装，东山的李有实的义军等等。各寨义军在组织上各不相属,但在军事行动上却互相配合，一致抗清。南明唐王朱聿键封各寨主以明朝官职，并授以复一县即为知县的条款。于是各寨涌跃出击，转战于蕲、黄、罗、麻地区，攻取州县，打击清军。清军调集兵力，在占有了荆、襄之后，派总兵徐勇坐镇黄州(今湖北黄冈县)，指挥来自江西、湖北、四川各省的驻军，分别围剿起义军。顺治四年以后，各路义军由于各自为战而受到清军沉重打击，反清斗争转入抵潮。到顺治五年(1648年)，江西金声桓反清起事之后，蕲黄各寨的义军纷纷响应。罗田义军在王燥率领下与安徽英、霍山区的农民联合，转战于蕲、黄、下英山一带，杀清朝的地主官吏，攻占了罗田。顺治七年，潜山三尖寨的义军首领张福寰主动与蕲、黄各寨皋军联络，共奉南明永历帝，重新把各寨义军联合到一起。各寨共推王为文官之首，李有实为武将之首，湖北的蕲，黄山区各寨义军以及安徽的宁国、桐城等地共300多寨义军纷纷响应，一时间，军容甚盛，清军对蓬勃发展的义军束手无策。到顺治七年冬，随着清军的疯狂镇压和围剿，在安徽的英、霍山农民军起义失败之后，湖北各寨的义军再次陷于困境之中。王率军转战于潜山、太湖，不幸战败，被俘牺牲，从而使各路义军遭到沉重打击。李有实率部分义军转战到山东，力量大衰。蕲、黄各寨的义军失去了统一的领导，结果相继被清军各个击破。只有李有实的一支在山东坚持抗清，然后李有实的儿子李森继续领导反清斗争，直到康熙年间才最后被清兵镇压。蕲、黄各寨义军坚持抗清，前后持续了近20年，极大地鼓舞了附近各地人民的反清斗争。

顺治三年(1646年)秋，安徽池州爆发了以了悟和尚为首的农民起义。了悟和尚和自称为“赤脚黑先锋”的起义军首领拥立居住在永丰(安徽旌德县南)的明王府后裔四王子，号召乡民起义抗清，一时间响应者达数万之众。起义军迅速占领了皖南的池州府属地东流、建德(今安徽东至县境)等地，力量迅速壮大，并联合了江西澎泽、鄱阳、都鲁等地的农民起义队伍，在建德山区建立了抗清基地。“众至数万，弥漫彭都”，并曾西进到江西的饶州、鄱阳、永丰一带。起义军自上而下建立了颇为严谨的军事机构，分设元帅、军师、都督、总兵、付将守备等官职，并拥有枪、炮、车马、弓箭、旗帜、印信、关防、器械等，成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力量。起义军凭借皖南、赣北一带绵延的山区，与清军进行较量，在池州和都阳一带多次击溃清军的进攻。农民军“构结招集，一

线串合，举动甚大”，吓得江南的清朝官吏惊呼：“皖庐地方千里，皆起乱萌，可骇右虞”。九月，永丰一战，被起义军拥戴的四王子不幸于清军的火炮之中丧生。十月，起义军在澎泽又遭到清军的几路围攻，伤亡惨重，士气大衰。了悟和尚和赤脚黑先锋先后负伤，起义军被迫向饶州(江西鄱阳县)败逃，结果被清军拦截，起义军将领大部被俘牺牲，起义失败。

在安徽江北一带，抗清斗争主要以英山、霍山为中心。顺治二年，王六姐占据太湖司空山(安徽太湖西北)聚众反清。随后又有李时嘉在太湖一带组织抗清义军，赵义正在宿松反清，刘和尚则在英山起事。由于这些义军缺乏联系，与情军相持到顺治五年(1648年)之后，大都以失败告终。到了顺治六年初，江西金声桓等原明将叛清，给皖、赣一带受挫的起义军将士以极大鼓舞。庐州(安徽合肥)冯宏图借抗清名将史可法的大名，号召乡民，组织义军，占领天为、巢县之后，又屡败清军，先后攻下于庐江、英山、霍山、六安等县，数十日之内攻占了6城，声威大震。于是英、霍山区农民起义力量蜂起，“内抚有24寨，外联络蕲黄48寨”。这些抗清武装，既有农民起义军，也有地方乡绅官僚拥立的明宗室武装。他们时而各自为战，时而联合进攻。冯宏图牺牲之后，又有天堂24寨群雄并起：英山张福寰以三尖山(六安县西)为中心，侯应龙率众万余名据守将军寨，潜山余尚鉴聚千余人占英窠寨，盐生胡经文招集乡勇占据横山寨，陈伯绍聚众攻占了霍邱县城，余高临则率军攻占了宿松县城……各寨的活动中心大致在潜山山脉四周，掀起了反清高潮。清廷调兵前往围剿，顺治七年(1650年)春，清总督马国柱的军队被各路义军击溃，各路起义军纷纷归附于由张福寰所拥至的明宗室石城王朱统绮。石城王坐镇潜山飞旗寨以为中枢，奉永历帝年号，举起反清复明大旗，定法制，铸印信，设官置将，于是英、霍、潜、太各地义军纷纷归附。石城王派原明安庆知府傅梦鼎(弼)、原明潜山典史傅谦等人坐镇皖涧寨，掌部院要职；又派胡经文率军守卫从龙寨、胡胜进守西关寨，作为飞旗寨的声援和犄角。因此，这支反清武装声威显赫，内有潜山24寨的各路豪杰，外有蕲黄48寨的配合以及金声桓，李成栋等原明将的相呼应，多次给予清军以沉重的打击。在顺治七年冬，由于奸细的出卖，清军绕道进入起义军活动的潜山山区，加上一些乡绅的降清，起义军蒙受了较大损失。清军援军源源不断，四路围攻潜山各山寨，并坚壁清野，断绝水道，纵火烧山，用尽了各种残酷而野蛮的措施，逼得各山寨义军无路可走，军心大乱。顺治八年春，起义军主将之一的胡径文叛投清军并诱俘了石城王朱统绮，于是各路义军迅速瓦解。唯独张福寰率领的一支农民起义军顽强地在潜山山区与清军周旋，相持10多年，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才被清军镇压。

在赣、鄂交界地区居住的柯、陈二姓广大贫苦群众，为反抗清军的暴行，继承了自元末以来就反抗暴政的传统，于顺治三年暴发了反清起义。柯抱冲以兴国山区为基地，依山结寨，招集柯姓的强悍者以及其它乡勇，袭夺郡县，并自立为王，陈珩玉为帅，号称10余万。起义军东征西讨，并与湖南的农民起义军何腾蛟部联系，攻占了兴国州城，又进逼武昌，给清军造成了很大威胁。这支义军以柯姓为主，内部联系密切，且勇士们个个勇猛善战，面对清军的残酷杀戳，起义军将士更加团结一

心，不屈不挠。他们凭借天险，屡败清军，附近的其它乡民们也涌跃参加义军，清军一时无可奈何。当顺治四年正月，清军先后镇压了苏、皖、鄂、赣等地大规模的明军抗清势力之后，才抽出兵力，围剿兴国柯家军，而这时柯家军已是孤立无援了。清湖广总兵柯永盛调集重兵猛攻兴国，起义军顽强抵抗。终因力量悬殊，加上奸细的出卖，使清军深入到起义军的腹地，攻破了起义军据守的山寨和洞穴。柯抱冲被俘牺牲，起义失败。

明清之际，在赣、湘边界的广袤山区里，来自福建和广东的穷苦流浪者，“搭棚居住，种麻、种菁、开炉、煽铁、造纸、做茹为业。谓之棚民”。实际上在此之前的数百年中，赣、湘边界的绵延群山里就已经出现了棚民的足迹。棚民们流落异乡，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文化上受歧视，过着一种“其居如鹿豕，其人即牛羊”的悲惨生活。早在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年)，江西袁州府(今宜春县)就爆过天井窝棚民起义。因此，当清军进入江西境内以后，袁州、吉安、南安、赣州、广信等府的棚民再次揭竿而起，“兵至则深藏木谷，兵退则肆行攻劫”，机动灵活地打击清军。

顺治五年(1648年)，朱益吾首次领导和发动了棚民起义，失利后，即率军进入棚民众多，地势险要的三关九图，在宜春县境内的石子塘一带安营扎寨，作为反清的根据地。因此朱溢吾又被清朝统治者称为“宜春棚寇”，朱益吾擅长拳术，他在种麻糊口之余，召集棚民练习拳术，进行反清的组织和宣传活动，朱益吾由此被推举为“棚民客长”。清军多次进攻棚民起义的根据地，而义军战士和棚民群众则“阳为归顺，阴伺伺隙，客匿奸灾，潜通消息”。棚民起义由公开的反清活动转入地下的秘密活动。顺治十六年(1657年)，南明招讨大元帅郑成功亲率水陆大军北伐，攻打南京。江西棚民欢欣鼓舞，在朱益吾的带领下，棚民义军再次高举反清犬旗，举事于袁州府城，与郑军遥相呼应。然而当郑成功军北伐失败之后，棚军义军再次陷于孤立，很快被清军击溃。然而朱益吾仍不屈不挠，继续从事反清斗争。等到康熙初年清廷陷于三藩之乱的困扰之中，朱益吾认为时机有利，在三关九图重新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棚民武装起义。朱益吾亲率义军数万人“首先攻万(载)，洗掳一月有余”。但义军在进军袁州府城的途中，受到清廷新任袁州镇总兵赵应全部的突袭，义军伤亡惨重，朱益吾只好带余部退回三关九图。清军穷追不舍，赵应全派守备陈素纶、千总金明俊统领马步兵数千人与朱益吾在山区展开激战，义军处处失利，朱益吾不幸阵亡。余部义军在朱永盛、黄乃忠等带领下继续与清军血战，接连取得了破浏阳，捣醴陵，三占万载，三陷新昌，攻破吉安等辉煌战绩。清廷调集重兵，疯狂镇压，成千上万的义军将士惨遭杀戮，千家万户的棚民被强行驱逐出袁州府山区。于是，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朱益吾领导的棚民起义最终被清军镇压下去。朱益吾是清初棚民起义的重要首领，在席卷全国的反清斗争浪潮中，朱益吾多次发动和组织了赣西棚民的武装起义，坚持反清斗争20余年，沉重打击了清廷的高压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其它地区人民的反清斗争。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湖南红头军的反清起义进入高潮。桂阳(湖南汝城县)人王宗早在顺治五年起，就聚众5000余名，头裹红头巾，号称“红头军”，占据了桂阳，开始反清斗争。红头军先后攻占了桂阳附近

的光宁(湖南资兴县)、桂东等地，在浏阳地区灵活地打击清军的势力。红头军还与川、鄂的姚、黄十三家义军以及广东南明的抗清势力相呼应，多次挫败清军的进攻。武冈人王国桂也率众响应，出没于湘、粤间。红头军打击清军，保护乡民，逐渐发展到万余人，先后攻占了武冈、城步(湖南城步县)、宝庆(湖南邵阳市)等地，杀劫官吏，救济百姓，民众多归附红头军。顺治十一年春，红头军转战于兴宁四面山区(湖南桂东县西)，因奸细的出卖，被清军围困于八面山的一个洞穴里，伤亡惨重，红头军将领王宗战死。但起义军余部又在赖龙的带领下继续抗击清军，并向江西撤退，结果被江西总督马国桂率领的湘、赣军合力围攻。起义军寡不敌众而陷入重围，赖龙牺牲，红巾军将士坚持战斗。最后被清军镇压。

两广云贵等地人民的抗清起义随着清军在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节节胜利，南方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迅速开展，赣、浙、闽、粤等地人民起义遥相呼应，此起彼伏，成为清朝对全国实行有效统治的最大障碍。

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在赣、浙、闽三省交界处爆发了以魏福贤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依据仙霞、武夷山等天险，抗击清军的进一步南下，坚持抗清前后达10多年，有力地配合了南明郑成功的抗清斗争，被清军认为是“三省十年来之大患”，到1658年，由于魏福贤战死，起义队伍不久就溃败了。

清军进占福建后，抗清斗争立即遍攻福建的八闽地区：即福州、兴化、建宁、延平、汀州、邵武、泉州、漳州，尤其漳、泉、汀一带，人民起义与南明政权的抗清相互配合，清统治者大惊失色，认为“闽省遍地皆‘贼’”。

广东恩平县的农民王兴聚众抗清，与南明政权相联络，率义军迅速攻占了阳江、阳春、恩平、开平四县，声威大振。顺治十一年九月，王兴又率军与李定国军配合作战，攻克了广东新会。清将尚可喜率3万重兵前来围攻农民军，王兴与清军在顺抬十三年(1656年)春相持了三个月，誓死抗清。到了第二年夏，清将尚可喜乘广东一带灾荒严重，农民军陷入困境之时，再次纠集10万大军前往围剿，从水陆两路合攻王兴军的根据地文安寨。王兴率将士们不屈不挠，坚持抗战达13个月之久，多次击溃清军的进攻，最后因弹尽粮绝，王兴全家自杀，起义队伍随之溃败。

在福建长汀，出现了以女豪杰(姓名不详)为首的农民起义。1657年起义军以宗教相号召，占据左龙坊为根据地，武装抗清，最后被清军镇压。

在广西、湖南交界处，顺治十年（1653年)就活跃着瑶族、僮族等少数民族的抗清队伍。在王心的带领下，起义军以富川(广西富钟)为根据地，四处联络各地的抗清力量，并声援李定国的反清战争。这支农民军兴盛时曾发展到邻近山区的192寨，他们倚险为寨，灵活地抗击清军，到顺治十四年，清军大举围攻富川各寨，王心等农民军将领坚持抵抗，寨破后先后战死，起义失败。

广西人龙韬、龚瑞、龙旗等壮士在柳州、庆远等地，联络乡民，组成了一支以苗民为主的起义军，活动于黔、桂、湘边区，抗击清军，多次给予清军以沉重打击。他们在三省交界处的绵延山区不断发展反清力

量，坚持抗清10年之久，直到顺治十六年九月才被清军镇压下去。

广东沿海的渔民在顺治年间就曾爆发过反清斗争。到了康熙二年，渔民们因不堪忍受清廷的内迁渔民，划界禁止渔民出海等苛刻政策，再次起义反清。番禺渔民周玉以反抗暴政、挽救乡梓、反清复明等口号劝说当地渔民，组织了一支以贫苦的农民和渔民为主的起义军。起义军先后攻占了番禺、新会、顺德、香山等县，并多次击败清军的进攻，力量迅速发展。石龙一战，起义军大获全胜，歼灭清军数千人，获船只数百艘。后清军调集重兵围攻，周玉麻痹轻敌，独率部分水师迎击清军，结果因力量悬殊，援军不继而遭惨败，周玉战死，起义军因而受到沉重打击。李荣率余众突围入海，占据沿海的岛屿，继续与清军作战。不久被清军三路围攻，起义军战死近2000人，起义失败。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云南土司那嵩，联合南明政权以及其它土司起兵反清，攻占了石屏，蒙自等县，并打算配合李定国军收复昆明。清将吴三桂率兵于十月进攻元江，那嵩因城破而全家自杀。在康熙年间，云南又柑继发生了土司王耀祖和司禄昌贤的反清之战。清康熙四年(1665年)，云南迤东地区土司王耀祖趁清将吴三桂远征贵州水西(贵州黔西)之机，攻占了新兴（云南玉溪)，并建元大庆，起兵反清。但好景不长，吴三桂军平定水西之后，迅速回师反击云南，攻破新兴城之后俘获了王耀祖。然后吴三桂又挥师攻禄昌贤。禄昌贤率苗民组成的军队在陇箐(云南文山境)与清军发生了激战，苗军不敌清军的猛攻，溃不成军，清军乘胜攻占了数10座苗寨，结果云南省城以东地区均为清军控制，清廷设永定州，派官治理，几乎与云南地方土司起事反清的同时，贵州一带的地方土司也相继起义抗清；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贵州土司冯天裕以贵州东北山区为根据地号召当地乡民起义，与清军为敌。冯天裕先率义军攻克了湄潭，然后又攻打瓮安，牵制了部分清军力量，客观上配合了云南李定国的抗清斗争。但不久冯天裕战死，这次起义因而失败。清康熙三年(1664年)，贵州水西(黔西)的苗族土司安坤与皮熊联合举兵反清。苗民义军于三月中途拦截了前来镇压的吴三桂军队，把清军包围了约两个月之久。由于清援军的来到，苗民义军撤退往阿作峒、红崖洞等山区，然而清军跟踪追击，与苗军展开激战。结果，带头起事的2名土司安坤和皮熊先后战死，清军顺利地平定了苗民起义，在水西地区设置了平元、大定、黔西、咸宁四府进行治理。但时隔不久，郎岱(贵州安顺境)的苗族土司陇藩联合安坤余部再次起兵反清，起义军迅速攻占了关岑，并猛攻永宁，大定、威宁等府，搅得清军日夜不宁，吴三桂调军镇压，苗民受挫退回郎岱，继续坚持抗清。到康熙四年(1665年)六月。这支苗民武装被清军消灭。云贵地区此后虽为清廷所控制，但实际上是被吴三桂所镇守，为了拥兵自重，吴三桂又在云贵惹起了战乱。

江南和东南沿海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风起云涌，持续不断，沉重打击于满清统治者入关后的嚣张气焰，迫使清廷迅速改变对中原各族人民的统治政策以缓和民族矛盾。总之，涉及全国范围的此起彼伏的抗清斗争，虽然没有形成统一、联合的强大政治军事力量，均以失败告终，但这些起义打击和牵制了大量清军，有力支援了在湖南、四川转战的大西军和大顺军的抗清斗争，也使漂泊不定的南明永历政权得以延续下去。

第三节 轰轰烈烈惊世英雄起四方

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失败大顺军李自成退守西安后，制订了南取汉中，西征甘肃，攻克兰州，确保关中，以关中作为抗清基地的战略计划。并下令命将军刘体纯率领10万大顺军过黄河北上。8、9月间，清军沿太行山南下，并从大同入代州，直逼太原，占领偏关，威胁陕西边境。大顾军由府谷向大同进攻，又在畿南联合义军阻击，切断清军归路，从而抑制了清军的进攻，同时在井陉、宣化、蔚州等地，多次挫败清军。

农民军虽然在军事上做了很大努力，但已不能够挽救全局，由于对原占领区内建立的农民政权没有大力进行巩固，被清军相继摧毁，大顺军失去了可靠的后方。

清顺治二年(一六四四年)十月，李自成为了夺回山西，令大颐军2万余人由山西向河南怀庆府(治所在河内县，今河南沁阳)地区展开反攻。当时，清军正准备兵分两路，一路由靖远大将军英亲王阿济格率领，经山西进入陕北，再南下攻西安，消灭大颐政权；一路由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率领，经山东入江苏，攻南京(今属江苏)，消灭南明弘光政权。多尔衮在得知怀庆地区军情紧急的消息后，临时改变作战计划，令多铎先去救援河南，如将农民军就地消灭，则继续南下进攻南京；如农民军退回陕西，则跟踪追击，与北路清军形成夹攻西安的态势。

多铎依计而行，在河南击败农民军后，便渡过黄河，于12月22日逼近潼关立营。李自成当时正率领主力军北上延安准备抵御北路清军，不料行至洛川县时得知东路清军向潼关进军的消息，颇感意外，中途犹豫不决，最后才决定先南下增援潼关。从29日开始，李自成指挥农民军主动出关与清军展开激战，企图在北路清军南下之前击退清军的进攻。但大将刘宗敏、刘芳亮等相继出击失败，李自成亲自出战也未获成功。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十一日，多铎开始用刚调来的红衣大炮猛攻潼关，农民军坚决抵抗，英勇反击，但未能扭转战局。李自成只得率领主力迅速撤回西安。十二日，清军入关，直逼西安。

李自成回到西安后，深知在两路清军的夹击下，陕西已难立足，被迫于正月十三日带领13万军队进行战略转移。他们从陕西东南部进入河南后，在邓州(今河南邓县)、武昌、九江(今属江西）等地，与尾追而来的阿济格率领的清军接战八次，均告失败。李自成到达湖北后，曾计划水陆并进，夺取南京，击败南明弘光政权，以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东南各省为基地，坚持抗清。但一路上连遭失败，军心不稳，多铎率领的清军又直趋南京，东进的道路已被截断，李自成只得改变计划，从江西西北进入湖南。5月初，行至湖北与江西交界的通山县(今属湖北)九宫山时，李自成仅率少数卫士观察地形，突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不幸壮烈牺牲。李自成牺牲后，余部坚持斗争，不久即与刚从陕北转移过来的大顺军李过，高一功部会师，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改变战略方针，与南明何腾蛟部联合抗清。

崇祯十六年(1643年)冬，正当李自成的农民击败明军主力，入定关

中，收取三边，军威极盛之时，张献忠于清顺治元年(1644年)初，率军至万县，提出“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的口号。整顿部队，休整数月后，利用各地明军士气不振，连下忠州、涪州(涪陵)，在铜锣峡(四川巴县东)击溃明巡抚陈士奇部，一举攻克川东重镇重庆，俘杀陈士奇及瑞朱常浩，川东既下，即由水陆两路进攻成都，8月会师成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建元大顺。

顺治二年下半年，随着李自成大顺政权和南明弘光政权的失败，清朝政权加紧了对张献忠的政治诱降和军事威胁，一面宣称“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权，世世子孙永享富贵”，一面又调兵遣将，“会剿四川”。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清廷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军由陕西入川，欲一举消灭大西农民军。7月，清军已至汉中逼近川北。在清军大军压境，四川各地地主不断叛乱的严峻形势下，张献忠决定弃川入秦，继续斗争。

8月，张献忠率军离开成都，9月9日攻占顺庆(今四川南充)，停留20余日后北上西充（今四川西充)。大西军为了加强即将进入陕西的战备工作，在西充休整了两个多月。不料此时原大西军骁骑营都督刘进忠投降了清军，并带领清军由陕西进入四川，11月26日抵达南部县(今四川南部)。从投清的大西守将口中得知张献忠的御营驻扎在西充县的凤凰山下后，豪格当机立断，令护军统领鳌拜率八旗军先行，自统大军随后急进，日夜兼程，27日早晨到达西充，向凤凰山下逼进。

对于清军的突然到来张献忠毫无思想准备，所以当侦探兵报告对面山上出现清兵时，“献忠闻警不疑，以为谣传”。张献忠在得到探兵再次报告后，仍未引起重视，带着几个士兵骑马出营，亲自探听清军虚实。在一个小岗上，张献忠被清军发来的冷箭射中，壮烈牺牲。清军趁机向大西军发起进行，大西军一片混乱。

因大西军突遭袭击，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伤亡惨重。余部在平东将军孙可望(监19营)、安西将军李定国(监16营)、抚南将军刘文秀(监15营)、定北将军艾能奇（监20营)四将军带领下，组成了新的领导集团，这也是张献忠的遗愿。四将军为保存有生力量，改变了北上陕西在清军腹地抗清的战斗计划，当机立断，由顺庆南下，日夜兼程，努力摆脱清肃亲王豪格军的四处追击。大西军余部以锐不可挡的气魄，强渡长江天堑，歼灭前来堵击的约20万残明军队，一举攻占了军事重镇重庆，又乘胜攻占了綦江(今四川綦江)，从而获得了短暂的喘息。然后，以四将军为主的领导集团在綦江发布了著名的文告，指明了大西军今后的斗争方向：“皇上(指张献忠）汗马血战20余年……，方欲驰骋燕、赵，还定三秦，为天下除残去暴，开万世不拔之基，不意创业未半，中道崩殂……尔等各营大小将领，传渝兵丁人等，各宜同心协力，……克成大事……”綦扛文告”得到了全军将士的理解和支持，“传谕之后，欢声满营”，显示了大西军继续抗清的决心。大西军余部南下云贵，开辟了新的抗清基地。

从1644年6月到1646年底，在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和张献忠的大西农民军的浴血奋战之下，秦岭南北，大河上下，从北方地区掀起了全国抗清斗争的第一个高潮。

农民军联明抗清策略的形成清军入关后，仅用斗年多的时间，就重

创了李自成的领导的农民政权，摧毁了南明弘光政权，显示了年轻的清王朝的实力和优势。对处于逆境中的农民军来说，大顺军和大西军均新遭大败，失去了核心人物，元气大丧。这两支义军面对蓬勃崛起的清王朝和南明政权之间的争夺战，不得不筹划下一步的战斗方针。南明政权迅速败亡，清军在平定中原之后，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浙、赣、闽、粤东南地区。清军铁蹄蹂躏之处，国内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各地的抗清斗争不断涌现，既有贫苦农民、渔民的抗清斗争，也有汉族士大夫和少数民族头领的抗清斗争。大敌当前，农民军和汉族地主阶级被迫互相结拢，虽然彼此之间的仇恨一时难以消除，但只有进行一定程度的联合才能共存亡。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联明抗清阵线孕育而生。

到1646年底，清军已经占领了黄河以北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尽管它的统治还不甚稳定，但清王朝的优势却非常明显了；大顺、大西农民军和南明部队相继失败，撤退到湖南、两广、川南一带，环境艰苦，前途暗淡。但是，席卷大江南北的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给大西军和大顺军带来了希望。清朝军队顾此失彼，疲于奔命，随着清军的推进，其统治力量和进攻的势头也开始减弱。于是，农民军和南明政权面对共同的敌人，开始协调相互的敌对关系，走上了联合抗清的道路，因而在南方出现了抗清力量重新的强大。

当时，南明总督何腾蛟驻守长沙，兵力微弱。而清军占领江南之后，正向闽浙进军，并加紧对江西、湖南的军事进攻。而李自成的大顺军余部虽说还有几十万人，但因力量分散，同样面临被清军各个击破的威胁。农民军领袖们毅然决定改变战略目标，顾全大局，于1645年秋冬之际，郝摇旗、刘体纯等率数万农民军开至湘阴，向何腾蛟部队靠拢，表示合作抗清的意图。何腾蛟鉴于清军压境，自己又兵微将寡，无力再与农民军对敌，于是接受了合作抗清的建议。于是郝摇旗等“招其党袁宗第、蔺养成、王进才、牛有勇皆来归，骤增兵10余万。不久，大顺军余部力量最大的一支，即由李过(李锦)、高一功等率领的军队，拥奉李自成之妻高夫人进入湘西，与南明巡抚堵巍锡联合抗清。于是，大顺军与南明军队的抗清联合阵线初步形成，从而使南方的抗清力量大大加强。到1649年，大西军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之后，也作出了与南明永历政权“联合恢剿”的策略。由于大西军当时已在西南地区建立了较为巩固的根据地，武装力量也得到加强，故而在与南明永历政权的联合中掌握了主动权，强调大西军在联明抗清中的独立地位和继续奉张献忠的“秦王”称号。由于形势危急，到了1651年春，清军开始向广西地区发起猛攻，如果没有大西军保护，永历小朝庭将难以生存。于是双方妥协，永历政权接受农民军的“联合恢剿”、“合师北拒”等建议，大西军则接受永历帝的年号，并负责保护永历政权的安全。这样，在西南以区，以大西军为主掀起了又一个抗清斗争的高潮。

大顺农民军认清了局势，首先采取了联明抗清的策略，阻止了清军的顺利南下，推动了全国抗清高潮的形成。而南明永历政权在大顺军和大西军以及全国抗清力量的共同支持下，虽然一度控制了江西、湖南、两广以及西南等广大地区，但却没能把握住这一有利的时机，致使农民军用鲜血换回的成果付诸东流。因为在抗清联明阵线中，南明政权始终对农民军猜忌、防范，不肯重用并力图捆绑农民军的手脚。再加上南明

政权的腐败和南明军阀部队的霸道，农民驰骋战斗，疲于奔命，徒然损耗了力量而于事无补。结果，抗清形势江河日下。

大顺军余部的抗清斗争大顺军奉行了联明抗清的策略之后，摆脱了孤军作战、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使中南一带的抗清力量大增。除了大顺军之外，还有何腾蛟招来的左良玉余部马进忠、张先壁、黄朝宣等南明军队，有由堵胤锡节制的于大海、李占春、袁韬、武大定等率领的四川义军，还有滇军赵印选、胡一清的部队。具体说来，农民军以郝永忠(摇旗)、刘体仁(纯)所率部众约四五万人归附原明湖广部督何腾蛟、李锦(原名李过，后改名为李赤心)、高必正（高一功)等率众36万归附原明湖南巡抚堵胤锡。何腾蚊将大顺军旧部与明将左良玉旧部以及自己统帅的军队合编为13镇，同奉明永历年号。这些反清力量“雄踞湖南，乘便窥伺”。何腾蚊与堵胤锡分路出兵，郝永忠等随何腾蛟留守湖南，李锦等随堵胤锡进军荆襄，致使清军守将飞报朝廷告急：“我皇上若不急发大兵南下，恐两王已定之疆土，非复朝廷之。有也。”

堵胤锡及李锦的军队将辎重留放于公安、竟陵(湖北天门)，然后由李锦率军攻打荆州(湖北江陵)。守城的清军利用硫璜火炮死守荆州，致使农民军伤亡较大，双方相持不下。顺治二年夏(1645年)，刘体仁(纯)于八月间会合袁宗第的义军在荆州以西进攻清军，略夷陵，过荆门，转战于兴安、郧西(湖北西北部)一带，以牵制清军，配合李锦部队进攻荆州。到顺治三年正月，刘体仁又北攻襄阳(襄樊)、承天(湖北钟祥)，并联络河南南阳一带的农民起义军郝好海、韩榴子等队伍，自襄阳北进，突袭邓县。农民军英勇无畏，冒着枪林弹雨架云梯、挖地道，四面进攻，终于破城而入。与此同时，刘体仁又振兵把邻近前来援助荆州的清军及地方官兵全都围歼。刘体仁的农民军乘胜与高必正军联合，攻占了湖北的当阳、荆门、沙市、远安等城。

1646年春，清廷派平南大将军勒克德率满蒙八旗精兵大举进犯湖广。大顺军务部互相配合，在岳州城下与清军激战10余次，有力地阻止了清军的顺利南下。7月，刘体仁分兵九路开始三面围攻荆州，清荆州守将总兵郑四维仅率3000兵力困守城内待援。农民军一面猛攻，一面挖掘窑洞，修栅筑垒，准备长期围困荆州。直到1647年初，清军的部队在勒克德指挥下从江宁前来增援，农民军的后方公安、竟陵等地接连被清军攻占，进攻荆州的农民军受到了内外夹击。于是农民军只好撤退，堵胤锡退入湖南，李锦则西撤到夷陵，荆州被放弃了。

清廷派出大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大批清军进攻湖南。何腾蛟所属的13镇之一的马进忠部在阳逻(湖南沅江县境)击败清军后，进占岳州(湖南岳阳)，与在湖北转战的李锦部互为声援。1647年3月，清军猛攻岳州，马进忠率军撤至岳州湖口驻防。郝水忠率军趁清军麻痹之时突袭岳州的清军，与清军在滕溪、湘阴展开激战，三战三捷，声威大震，湘南大部分地区被反清的联合力量所控制。何腾蛟踌躇满志，准备大举进攻武昌之后，再收复江西。却不料清军自岳洲下湘阴，直指长沙，协同何腾蚊守卫长沙的明军陷于内乱，“相攻杀，城内焚掠一空”。清军趁乱攻入，长沙失守，何腾蚊败逃。由于明军各镇畏缩不前，大顺军孤立无援，湖南州县大部分为清军所占。大顺军余部在李锦、高一功和刘体纯、袁宗第的带领下分别退入川东的巫山、巴东一带，“将倚深山

密林，勾连川楚‘伪逆’，……势仍叵测”。

南明唐王政权倾覆后，大顺军又支持桂王政府，一直战斗在抗清斗争的最前线。1647年初，明降将李成栋率清军攻入广东，攻克肇庆之后，沿珠扛进犯广西，一直打到桂林。永历帝仓皇出逃梧州，经平乐、桂林、全州、直奔湘西南之武冈。然而4月，清将孔有德等在湖南发起进攻，下长沙，克衡州，与李成栋军配合，步步紧逼。8月，桂王政府的军阀刘承胤降清，清军入武冈，桂王连夜逃命。正当形势万分危急之时，广东一带抗清义军蜂起，攻袭广州，李成栋奉命回师救援。于是郝摇旗等农民军协同何腾蚊所率的明军，于11月在全州(今广西全县)给清军以沉重打击，“大败三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兵，斩级无数”。取得了南明史上最著名的定州大捷(顺治四年十一月)。大顺军声威大振，清军被迫退保湘南。

1648年(顺治五年)是抗清斗争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在全州大捷的鼓舞下，降清明将金声桓反正于江西，降清明将李成栋则反正于广东，清军因之失去了江西和广东，湖广为之勒摇，于是抗清浪潮再次高涨。大顺军与明军乘胜大举反攻，何腾蛟、瞿式耜在广西聚兵，挫败了清军对桂林的围攻，进兵湘桂地区，连克靖州、沅州、全州、武冈、宝庆、常德、衡州等地。李过、高一功率大顺军攻克荆州宜城之后，引兵东进湖南，先后攻克了益阳、湘潭、湘乡、衡山等县。到年底，大顺军联合其它明军，合围长沙，直趋汉水北岸，几乎收复了湖广地区的全部失地。抗清形势为之一变，桂王政府重又迂回了肇庆。几乎与此同时，山西姜襄反正于大同，回民米喇印、丁国栋于甘肃起义反清。因此全国出现了空前大好的抗清高潮，各地抗清活动格外活跃。

但是，腐朽的桂王政权，不仅不能利用抗清斗争的有利形势，反而加剧了内部的斗争，随李成栋反正的官僚绪为“定党”，随永历帝护驾的诸臣则为“吴党”，另处还有什么“扈驾元勋”与“反正元勋”的各路军阀的权力之争。明军内部争权夺利，各图私利，百般刁难排挤大顺军，严重影响了抗清斗争的发展，给了清军以可乘之机。

1648年11月(顺治五年秋)明军阀堵胤锡与何腾蚊为争夺地盘而发生矛盾。堵胤锡命李锦所率的荆、襄十三家军由夔州东入湖南，攻夺常德。而何腾蚊的部将马进忠也奉命进驻常德。马进忠性本骄狂，既怒于堵胤锡的调军，又担心大顺军“并其军”，于是一怒之下，“乃焚刍粮解舍从间道趋湘乡”，“驱百姓出城，纵火一遗一椽”，并焚毁了城庐以及沿扛过往的船只，大掠常德之后走武冈，因而李锦、高一功到达常德时，只见到了无法防守的空城一座。大顺军于是引兵向东，在湘潭击败清军钱国安军的阻击，连克益阳、湘潭、湘乡、衡山等县，进而围攻长沙。李锦率农民军使用了多种办法，如挖壕穿城，绑木为梯，炮火猛攻等，仍无济于事。其它的明军冷眼观望，李锦只能孤军作战。到年底，由于清军的增援，农民军只好放弃长沙。

马进忠等军阀劫常德西走，其它的明军纷纷效法，“守将皆烧营走”，致使新收复的州县为之一空，湖南局面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清廷以都统谭泰为镇南大将军，率兵20万由江宁出发，水陆并进，反攻湖南和江西。1648年3月，清军在九扛击败南明军队7万人的阻击，缴获了大量的渡江船只。清军顺利渡过长江之后，连克南康(江西星子)、饶州(江西

鄱阳），向南昌逼进。金声桓、王得仁顾不上包围赣州的战斗，连忙由水江回师，固守南昌，与清军相持70余天，结果中了清军的缓兵之计。6月，清固山额真谭泰、何洛会率兵围攻南昌，金、王只能困守孤城，他们拥有精兵，但却“不能出寸步，日夜荒宴，而眼穿外援”。南昌城一直被围困到第二年二月(清顺治六年正月)，南昌西门守军投清，引清军入城。明大学士姜日广殉难，金声桓苦战负伤投湖而死，王得仁则被清军俘获后杀害。

南昌告急时，李成栋一拖再拖才率军前往援救，却出师不利，遭到清军中途袭击，1648年11月在赣州城下的初战即遭惨败。1649年初，李成栋再次出兵，兵驻赣州的信丰。谭泰派清军从赣州包围了信丰，李成栋战败溺水而亡。永历政权派出的其它援军也遭到清军的伏击而溃败。清军相继攻占了抚州、建昌（江西南城)等地，重新恢复了对江西的统治。

1649年2月，清军乘虚而入湖南境内。清定远大将军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军进入长抄后，与孔有德联合进攻活动于湖南各地的明军。由于李锦已从长沙撤围东去，何腾蛟坐守湘潭空城，故而被清将徐勇俘获，送至长沙杀害。4月，清军进至辰州(湖南沅陵)，攻占宝庆(湖南邵阳)，连破明军28营，孔有德部攻占永州(湖南零陵)耐歼灭明军数万人，至此，湖南明军只有马进忠守武冈，马进才守清州。永历政权在湖南的地盘几乎全部丢失了。4、5月间，李锦和高一功率领的部分大顺军由湘西分道退入广西。这年冬天，与李自成共同起义的大顺军重要领袖李锦(李过或李赤心)病逝，大顺军又受到一次重大打击。剩下的10万人，由高一功及李过的养子李来亨统领。

李自成的另一部将郝摇旗所率大顺军在黎平（贵州黎平县)、永从(黎平县南)一带孤军作战，并连遭清军打击。清军孔有德部先后攻占了道州、武冈。明军全州守将闻风而逃，清军又顺利地占领了全州，不久进入桂林，并四处打击溃散的明军。至此，湖广全为清军占领。

清军于1650年（顺治七年)2月进围广州。桂王出逃橹州，留大将杜永和、范承恩守广州，李元胤、马吉翔守肇庆。杜永和率明军在广州城外设防，掘壕三道，设置木栅，引通海水，以防清军。清军久攻广州不下，乃在广州城四周筑长堤，紧紧包围了广州。相持数月后，时值盛夏，广州城内士卒多病，眼看难以坚守广州。逃至梧州的桂王急派陈邦傅、高一功增援广州。然而陈、高二人不和，陈邦傅为报私愤，竟然派人挑拨广西土司不听高一功调遣，并与李来亨的大顺军仇杀。于是，关键之时，高一功率众西归，于冬天北入东川与夔东十三家义军联合抗清，置广州于不顾。胨邦集率领的明军驻清远，马吉翔的军队仍驻守肇庆，对广州被困数月均不出兵救援。10月，清军的江西援军开到广州城下，广州守将范承恩因与杜永和有矛盾，密与清军联络，放干了濠沟中的海水，使清军夺占了炮台。清军于12月攻陷了广州，杜永和逃往琼州。清军由广州出兵，迅速兵临桂林城下。守卫桂林的各路明军弃城而逃，只有督师瞿式耜坐守空城，成为光扞统帅，结果在桂林被清军攻陷后，他英勇就义。而水历带已逃至了南宁。大顺军在进入贵州的途中，由于陈邦傅的恶毒挑，受到了大西军孙可望部队的袭击，高一功不幸阵亡。大顺军余部在李来亨领导下，于1651年与郝摇旗、刘体纯的队伍会

师，然后“连寨相结”，放弃了与明政权合作抗清的计划，继续进行抗清斗争。

南明永历政权在清军的步步紧逼之下，四处飘泊，桂王由肇庆仓皇西奔，马不停蹄却无立身之处。这时，李定国等所领导的大西军又出现在抗清斗争的最前线，掀起了新的抗清高潮。

大西军余部的抗清斗争大西军抗清的西充之战失败后，张献忠所建的大西政权遂告失败。大西军余部由他的四个养子即四大将军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率领。1647年2月，大西军从四川綦江出发，进入贵州，破遵义，渡乌江，克定番，并在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配合下，一举攻占了贵阳。4月，大西军乘胜挥师直下云南，5月就占领了昆明。由此，大西军的势力从川南扩大到云、贵一带，在西南地区沉重打击清军的嚣张气焰，把抗清斗争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大西军纪律严明，兵马三日一小操，五日一大操。凡发兵出剿，所到之处，鸡犬不惊，云贵地方的社会秩序安定祥和，生产恢复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由于大西军执行了比较正确的民族政策，不仅很快消除了民族隔阂和误解，而且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大西军因此得到各族农民的拥护和支持。据记载：“定国所将，半为倮猓、倮、儒佬。”由此，大西军在西南地区建立了巩国的抗清基地。

1649年正月，大西军鉴于清军的日益猖狂，南下迅速，主动提出与永历政权联合，起初遭到桂王的拒绝。但到了1651年秋冬之际清军开始进逼广西，桂王走投无路，不得不与大西军联合。1652年2月，孙可望迎桂王居于贵州的安隆所。这样，大西军消除了后顾之忧，独立地领导着西南地区的军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抗清斗争。

1652年(顺治九年)3月，大西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永历政权封孙可望为秦王，李定国为西宁王，刘文秀为南康王，令各率部攻清。大西军领导集团决定孙可望留守贵州居中策应和指挥。李定国率主力8万，由步、骑、象队等组成。出湖序，由武冈、全州直趋桂林，进逼广州，刘广秀率编师6万攻四川，下重庆，取成都、汉中，直逼关中。北伐抗清之前，大西军作了周密的战略部署，并严格军纪，规定军队“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两路北伐大军士气高昂，初战告捷。

刘文秀率领的大西军一路势如破竹，突进四川，攻叙州、泸州，破重庆，然后攻占了成都，并把吴三桂的清军压缩在川北保宁一带。但在攻打保宁时，刘文秀轻敌麻痹，致使吴三桂率部奋战突围退往汉中，而刘文秀的军队则受到重大损失。

李定国所率的大西军由川东入湖南。清将孔有德见大西军来势凶猛，乃以沈永忠率重兵扼守沅州(湖南芷江)，令钱国安、马雄、马全节分守南宁、庆远(四川宜山)、梧州等地。孔有德亲自前往桂林督师，企图与从四川南下的吴三桂军钳击大西军于滇黔。因此，截断孔有德等川湖清军的联系，攻占桂林，歼灭孔有德部，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战役。6月，李定国率8万大西军回师湖广，攻占沅州、靖州、武冈等地，与马进忠都会合。然后，出其不意地，李定国从西延大埠(广西资源附近)急行军袭占全州，夺下了进入广西的门户，进迫桂林，然后走捷径直趋严关。全州、严关的战斗，使得“清兵大败，横尸遍野”。桂林清军甚少，

李定国驱战象攻城，昼夜不息。清将孔有德亲自登城指挥反击。“七月初一(阴历八月四日)，有德再挑精锐，逆于榕江，兵未交而象阵前列，劲卒山拥，尘沙蔽日，马闻象鸣皆颠蹶。有德众逐奔，掩杀大败，有德反以身免，策马入城”。大西军乘胜追至桂林，数10里之城，包围了三匝。大西军军容整齐，旌旗遍野，甲仗耀日，城内清军看得胆颤心惊，丧魂落魄。孔有德眼见局势不可挽回，乃“聚其宝玩于一室，手刃爱妾姬，遂闭门自焚死”。明军攻占桂林之后，李定国乘胜连下柳州、梧州，清军马全节、马雄等军队皆被击溃，很快收复了广西全境。李定国又回师北上，连下永州、衡州，直取长沙，兵锋直指江西吉安一带。同时，孙可望率的白文选以少数民族军为主约5万人，列象阵进攻辰州(湖南沅陵)，清兵徐勇战死。大西军的节节胜利，使清廷大为震惊，急令谨亲王尼堪率清兵10万迎战，增援楚粤。李定国避开清军锋芒，主动撤离长沙。1652年11月，尼堪军进抵湘潭，明军守将马进忠不战而逃，清军先头噶布什贤部追击明军，却在衡州遭到李定国军的4万人的伏击。双方在衡州城下血战四昼夜，大败清军，击毙尼堪。这样，李定国“兵出征七月，复郡十六、州二，辟地将3000里”，收复湘、桂，大破清军数10万，“两蹶名王，天下震动”。

1653年，李定国率大西军主力由广西进入广东，势如破竹，连克开建、德庆，直驱肇庆，眼见大西军领导集团制订的战略计划就要实现。这时活动在闽、浙沿海的郑成功抗清部队，也计划南下惠州、潮州，与大西军会师。”退守荆巴一带的大顺军在郝摇旗，刘体纯、李来亨等领导下，也密切配合李定国在两广的军事进攻、北出商洛，西攻湘鄂，牵制清军。全国各地再次出现新的抗清高潮。

然而，大西军尽管有着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屡挫强敌的辉煌战绩，却无法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加上桂王政权中的党派斗争一直很激烈，使大西军的两大主将李定国和孙可望之间的裂痕日深。孙可望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竟不惜同室操戈，他擅自破坏原定的作战计划，约定李定国至沅州议事，企图杀害李定国，为避免与孙可望发生正面冲突，李定国放弃了在湖南战场上有利的反功时机，率军退往广西，又转入广东，拟与郑成功联合收复浙闽，进攻南京。清军趁李定国撤兵广西之机，进行反攻，孙可望急于求成，率大西军数10万人迎战清军，清廷由贝勒屯齐代替尼堪，从永州(湖南塞陵)向宝庆进军，在周家坡一带与孙可望属下的冯双礼、白文选部遭遇。大西军据险阻击，与清军列阵对峙。孙可望试图趁天下雨在夜间反攻，结果先遭清军袭击，孙可望只好率部退走贵阳。于是，大西军在湖南所收复的州县，均重为清军占领。

李定国联合广东义师，于1653年东围肇庆。清将尚可喜、耿继茂自广州增援，进驻三水(广州西)，同时派出部分清军援救肇庆，与李定国军在四会河口遭遇，结果李定国军被击败。1654年李定国率余部转移进攻目标，东破长乐（广东五华北)后，又回师粤西南，连克高州(治所为今高州)、雷州(治所为今海康)、廉州(治所为今合浦)三府，战果辉煌，李定国军增至20万人。1654年10月(顺治十一年)，大西军围攻广东新会，威胁广州。清军前锋两大战将平南王尚可喜和清南王耿继茂株守广州，一筹莫展，连连向清廷告急。新会位于珠江三角洲广是广州的海上门户。清军一边死守新会，一面从水路向城内供应援兵和粮食。大西军

以陆战擅长，缺乏水战经验和船只，因此李定国约郑成功会师广东。然而郑成功派出的舟师一再误期，大西军久攻新会不下，军中温疫流行，士气低落。清廷调都统珠玛喇为定南将军，率满汉大军从江西增援广东。珠玛喇的大军与驻三水的尚可喜和耿继茂军队会师后，合兵进攻大西军，双方激战于栅洲，大西军连续失败，损失惨重。李定国退保新会，清军攻城，李定国用火炮还击，并用象阵冲击清军，李定国又令步兵4000人随后自山上向下猛冲。尚可喜率军从背后插入大西军阵地，李定国军损失惨重。1655年3月，李定国率军退回广西，清军穷追不舍，大西军退守南宁。在广东的清军趁机收复了高、雷、廉三府及三州八县以及广西二州四县共22城。“定国力屈不能复出，西南之业衰矣！”李定国后来又曾分兵东下浔州、横州，企图重新打开两广的抗清局面，但这时局势已发生了变化。清廷派富有军事经验和剿抚农民经验的洪承畴，“经略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坐镇长沙镇压西南的抗清斗争。经过长期的消耗，李定国军到1656年时仅剩6000余人。时值孙可望称帝心切”永历小朝廷寄居在孙可望篱下，大臣被孙可望随意杀戳。永历帝万般无奈，给李定国送去血诏，要求速往“救驾”。1656年3月，李定国抢先一步，从贵州安隆将永历帝迎往云南昆明。永历政权尽管腐败无能，但它却维系着分散于各地的抗清势力，是各阶层合作抗清的一个象征。留守昆明的军队都归附了李定国，桂王政权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孙可望军仍在贵州东部，眼见废帝自立的阴谋成为泡影，后方又被李定回占据，孙可望恼羞成怒。

1657年秋，孙可望以“清君侧”为名，调兵十几万渡盘江，进攻昆明。孙可望留冯双社守贵阳，以白文选为前锋，自率马进忠、贺元仪等西进。水历政权闻讯后即刻削去孙可望的秦王称号，速派李定国、刘文秀迎战孙可望。双方激战于曲靖的交水。双方隔河对峙，一时胜负难料。李定国兵力虽少但颇得人心，得道多助，关键时刻，孙可望营中的白文选及马进忠、冯双礼等临阵倒戈，孙可望防不胜防，余部大溃，只好率余部东逃。退至贵阳，孙可望投降了洪承畴，成为农民军的可耻叛徒。

清廷因孙可望投降和告密，而摸清了大西军的兵力布署以及南明政权内讧的情况，决定大举进攻云、贵。1658年(顺治十五年)4月，清军分三路进攻贵州：以贝子洛托为宁南清寇大将军会同经略洪承畴，为中路，从湖南向西推进；西路以平西王吴三桂和定西将军墨勒根虾(即李国翰)为首，从四川向南推进；东路以征南大将军卓布泰会同提督钱国安，从广西向北推进。三路清军由郡王多尼统摄，预期在贵州会师。

清军已大军压进贵州，而李定国却逗留在滇西永昌，忙于镇压孙可望残部的叛乱。洪承畴与洛托在常德会师后，4月经沅州(湖南芷江)、靖州(湖南靖县)进入贵州，并攻占了镇远，然后与卓布泰的东路军合攻贵阳。明将马进忠及各官员闻风而逃。吴三桂的两路军在合州(四川合川)击败南明守军，获战舰而经重庆入贵州，迅速攻占了遵义，缴获了大量的粮食，俘获明军约5000人。活动于川南的李来亨等率十三家军会同南明谭洪、谭谊、谭文等部从背后以水师攻重庆，吴三桂又回师救援，谭家军降清，致使大顺军的反清再次失败。

清军总帅多尼于6月率京师禁旅从荆州(湖北江陵)出发，9月进入贵州与三路清军在平越(贵州福泉)会师，然后统一调遣各军，进驻贵阳。直到这时，李定国才从滇西回师。清军经过几个月的休整，于12月兵分三路进攻大西军，多尼自帅中路军，经关岭进攻北盘江铁索桥，直趋水西，攻占曲靖，尔后向云南省城进攻，全程约1000里；北路吴三桂军从遵义进攻七星关，抄袭大西军的后路，向云南省城进逼，全程约1500里，故先中路军10天出发；南路卓布泰军从都匀经盘江、罗平，沿途消灭明军余部，尔后也向云南省城进军，全程约1800里，故又先吴三桂军15天出发。

由于李定国回师云南已耽误了时间，面对清军几路攻击，只好匆忙设防应战。李定国令白文选驻守七星关，阻击北路吴三桂；令冯双礼驻兵鸡公背(约在安顺一带)以抗击清中路军的时犯；令张克望驻扎在南盘江之黄草坝(贵州兴义)，截击清南路军。李定国亲率主力据守北盘江之铁索桥，居中策应各路。

清军各路按周密的作战计划向云南推进。清中路军轻而易举地击溃了冯双礼的阻拦，进至关岭。李定国只好令人焚北盘江铁索桥而撤退，多尼军进驻曲靖。吴王桂率清军绕道乌撤土司的境内，避开大西军驻守的七星关天险，出其不意地从背后袭击白文选军，白文选腹背受敌，不战而退败。清军南路卓布泰军与李定国军遭遇，李定国列象阵迎战，分全军为30营，列栅固守。卓布泰军一举击溃象砗，然后从两翼出击，李定国军连败于罗炎、凉水井(贵林兴义东)，全线崩溃，大营陷落。李定国妻子被杀，将士死难者逃亡者不下三四十万人，大西军的精锐尽失。

1659年1月(顺治十五年底)，李定国率余部退回昆明。清军几路猛追猛打，李定国只好奉永历帝走永昌(云南保山)，清军会师于昆明。吴三桂等率清兵穷追不舍。永历帝出逃腾越(云南腾冲)。李定国在撤退途中，于滇西磨盘山(即高黎贡山)令白文选设伏，阻击清军。清军不知是计，兼程追击而来，约有1．2万人进入大西军的包围圈。但由于叛徒的告密，清军停止追击，并抢先以炮火猛轰大西军的设伏地区，结果使大西军的伏兵死伤三分之一以上。磨盘山一役，清军也有较大伤亡。但这时大西军的败局已定，大西军再也无力抗击清军了。李定国只有率残余力量撤往腾越，而这时永历帝早已越过边界，逃往缅甸境内避难。李定国在中缅边界一带，继续与清军周旋，时刻威胁着清军的边关。但由于李定国一心一意保护永历帝，军中给养无着，且携带眷属，累赘不堪，实际上部队已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1662年(清康熙元年)1月，吴三桂军大举入缅，俘虏了永历帝，不久永历帝被绞死。从而结束了南明的最后一个政权。噩耗传来，李定国悲愤交加，于8月病死。清帝福临向中、外宣布，云、贵、川、广、湖五省平定。

大西军转战西南10余年，建立了巩固的抗清基地，得到了当地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大西军的抗清斗争虽然失败，但将士们在抗清斗争中表现出的英勇品质和作出的英雄业绩是难以磨灭的。李定国死后，剩下的数千名农民战士大都遣散归农，西南地区农民的抗清斗争仍时有发生。

夔东十三家军的抗清斗争大西军抗清的最后失败，标志着西南地区

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基本宣告结束。自此以后，全国范围内的抗清斗争已不多见，清朝已进入顺利发展的和平时期。唯有川、陕、湖广三省边界的夔东十三家军和东南沿海上的郑成功还继续坚持着抗清斗争。

大顺军余部离开了明政权之后，在郝摇旗、刘体纯、袁宗第、李来亨的率领下先后进入荆襄和川东地区。由于南明军队内部争权夺利，互相顷轧，排挤和打击大顺军，所以大顺军毅然放弃了联明抗清的计划。他们在巫山、归州(湖北秭归)、房县一带山区，建立了抗清根据地，众推刘体纯为首领，“听节制”，同时联合驻扎在这一地区的原明朝军队，号称“夔东十三家军”。刘体纯驻军于巴东，袁宗第驻军于大昌(四川巫山县北)，贺珍驻军于大宁(四川巫溪县)，各自屯田自给。从巴东西至四川的夔州，称为西线。郝摇旗驻军于房县，以此为中心占有了附近的保康、竹山、竹溪等地，称为北线。李来亨驻军于归州、兴山，以茅麓山为基地，称为东线。此外．南到靖扛以南的少数民族地区，西南到利川，是原明军阀谭氏三兄弟的驻军之地。周围还有一些零星的各阶层的抗清武装。这一大块抗清基地，位于大巴山、武当山、巫山和荆山四大山系之间，山势险峻，物产丰富，正是农民军生存发展的好地方。十三家军注意开荒生产，招集逃亡百姓令其安居：“来亨等势稍振，屯耕山田，发收麦粟草绵，供粮食衣履，亦遣人市盐铁荆西。居民或与往来市贩。”十三家军对内“则以课农练兵为本”，对外则抗击清军，当地农民纷纷加入十三家军，致军队扩大到几十万人。自1651年以后，十三家军经常主动出击，曾攻打过襄阳、彝陵、归州、宜昌等地，令清军手足无措。

1658年，为打击清军三路进攻云贵大西军的作战计划，十三家军冒着远离基地的危险，两次攻打重庆，试图减轻大西军的压力。第一次是在1658年8月，刘体纯、李来亨、袁宗第等联合谭文三兄弟的明军，从水路攻打重庆，因为吴三桂防守严密而退回。第二次是在次年的1月，十三家军以谭氏兄弟所率明军为先头部队，仍由水路攻打重庆，“战舰蔽扛，势甚猖獗”。再次包围了重庆。后因谭氏军队内讧并投降了清军，十三家军只好收兵。

当清廷镇压了西南以大西军为主的抗清斗争之后，又把镇压的矛头指向了夔东的十三家军。1661年(顺治十八年)，清川陕总督李国英献计“合营进剿”。清廷调集大军30万，以权臣鳌拜之弟穆里玛为靖西将军，国海为定西将军，加上总督李国英，分兵三路围攻十三家军的抗清基地。清军作了周密布署，从1662年(康熙元年)开始，调兴安、郧阳兵为一路，攻打房县、竹山；调四川兵为一路，进攻夔州、建始、巫山、大宁、大昌；调荆州、宜昌兵为一路，进攻远安、兴册、巴川、归州。显然，清军以30万重兵合围巴蜀一隅之地，农民军处境十分不利。为了掌握主动，十三家军首先围攻巫山，清军被困城内。清军增援巫山，并截起义军粮道。起义军只好撤围败退。清军则沿途追击，由于众寡悬殊，主将刘体纯兵败自杀。经过1年多的浴血奋战，十三家军的一些主要将领如郝摇旗、袁宗第等都先后牺牲，许多地区落入清军之手。李来亨率余部退守兴山，虽然曾在房县七里坪大败清军，但终究是寡不敌众，不久，李来亨的军队就被清军团团围困于兴山县西的茅麓山上。这里是李来亨的根据地，将士们凭借有利的地形，继续与清军鏖战。1664

年(康熙三年)从2月至8月，李来亨率领农民军顶住了清将李国英部29余万的围攻，并屡次挫败清军。直至9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引清兵从后山而上，攻进山寨。李来亨带领全军将士不屈不挠，誓死抗击。终因弹尽粮绝，败局已定，李来亨全家自焚。全军万余人，除百余人被俘外，没有人投降。十三家军联明抗清斗争就此结束。这支农民队伍，继承了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英勇斗争的传统，在全国抗清趋于低潮时不屈不挠地继续抗清，坚持战斗达10多年之久，这是非常可贵的。

第四节 南京陷落弘光政权土崩瓦解

明朝灭亡之后，明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起一系列地区性的政权，包括福王弘光政权、唐王隆武政权、鲁王监国、唐王隆武政权和桂王永历政权。清军从入关到消灭南明政权，经过了近20年的战争，终于完成了统一中华大地的战略任务，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历史从此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弘光政权的腐败与偷安李自成攻克北京和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的消息传到南京，因北方农民军强大而南逃的明宗室以及明朝的文武官员惊恐万状。为保住江南半壁江山，继续与农民军对抗，南京的明朝残余势力聚集在一起，商议择君以定南都，然后誓师北上。结果出现了拥潞王和拥福王之争。最后马士英恃势逼史可法等人同意立福王朱由崧为帝。1644年6月(清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由马士英、史可法等奉明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不久即皇帝位，年号弘光。弘光政权是明末大官僚军阀派系斗争的产物。以“讨贼”复仇”为宗旨。弘光王朝当时拥有相当庞大的兵力，总兵左良立、左梦庚父子率领二三十万大军驻扎武汉；总兵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四镇，拥有兵力三四十万，驻扎在江淮一带。在河北、山东、河南、四川等地还有一些明朝的残余势力，一边继续与农民起义军为敌，一面打起了弘光年号，有的则编入了南明朝廷军队系统，拜官封爵。这近百万的南明弘光军队，矛头首先是对准农民的，并没有把清军入关作为主要威胁，因为当时清统治者打着“为尔等复君父仇”的旗号，进驻北京后，把全部兵力投入镇压农民军的战争之中，而对南明王朝则暂作妥协姿态，从而麻痹了南明王朝，并减少了来自汉族官僚的反对。弘光政权是明朝大军阀大官僚派系斗争妥协的产物，它本身依靠着几个对立的军事集团而存在。一边是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左良玉集团，盘踞在长江中游的武汉一带，另一边是江北四镇的高、黄、二刘横行于江淮之间。每个军阀各有地盘，各有军权，相互争夺，鱼肉百姓。如扛北四镇“所在兵民相角，……民以兵为贼，兵以民为叛”。弘光政权的各个军阀集团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争权夺利，互相攻击，势如水火。各派都主张用全力扑灭农民军，而寄希望于和清朝实行妥协。唯有兵部尚书史可法提出大政措施，“迅即召用天下名流，以救国人之心”，不以偏安江南一席之地为满足，而必须“养成气力，恢复神京，澄清关陕，以归全盛”。就是要驱逐占领北京的清兵，收复中原故土，剿灭退守山西、陕西的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以报“君父之仇”。这是史可法力图复兴明王朝的两条方针大计。史可法要求驱逐清兵，是符合当时南北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的，而且从史可法执政时的实际情况看，“复故土以光祖业”也是有可能的。就当时南明的国土来说，还拥有黄河以南广大地区，黄河以北也未被清兵全部占领，而且还有一二百万的兵力，而清兵满汉八旗最初也只有数10万人。况且弘光政权以南京为都，战既可战，守更可守。因此史可法根据“从古守江者必先守淮，守淮者必先守河”的经验，敦促弘光政权在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提出“江北与‘贼’接垠，遂为冲区，议设四镇，分辖其地”。于是甫明政权在

江北设立了四镇：“刘泽清镇淮、海，驻淮安，所属十一州县，经理山东一带招讨事；高杰镇徐、泗，驻泅水(按：或泗州，今安徽泗县)，所属十一州县，经理河南、河北、开(封)、归(法)一带招讨事；刘良佐镇凤(阳)、寿(县)，驻寿州或临睢，所属九州县，经理河南陈、许一带招讨事；黄得功镇滁(州)、和(州)，驻滁(州)、庐(州)或池(州)、和(州)，所属十州县，经理各镇援剿事”。每镇驻兵二三万，各设监军1员，各地州县有司和军民皆听节制和统摄，兵马钱粮自行征取。史可法以督师地位坐镇扬州，居中调遣。此外，又令宁南侯左良玉驻武昌，防守长江中游。总兵郑鸿逵、吴志葵守江、吴淞，并照北京旧例，改定南京营制，加强留都防御力量。弘光政权以四镇作军事据点，以屏障南京。确定如果农民军“在河北，则各镇合力协防淮徐”，“在河南，则各镇协守泗、凤”；“在河北、河南并犯，则各镇严严固守”的战略，然后整装北伐，以期完成扑灭农民起义的“中兴大业”。这一战略布署如果能顺利执行，各镇相互配合，或许能使弘光政权多延续些时间。然而四镇总兵骄横虐民，名义上归史可法节制，实则是马士英的羽翼，对史可法的军令阳奉阴违。四总兵闻听扬州繁华多美女，虽各有驻地却不甘寂寞，争入扬州，彼此兵戎相见，史可法多方劝解才避免了一场内战。史可法原为弘光政权中的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主持朝政。但他目睹福王的无能和腐败以及权臣之间的尔虞我诈，自请前往江北督师，退出朝政(实际上是被马士英之流排挤出朝)，顾全大局，另谋救亡图存的出路。史可法从就任首辅到被挤出国都，还不到半个月的功夫。这十多天只是弘光王朝的回光返照。弘光政权奸臣当道，注定了它灭亡的命运。

弘光政权虽然统治着全国最富裕的地区，并拥有近百万的军队，而且据有江河天堑，但由于坚持维护明朝的腐朽统治，在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庸懦无能，苟且偷安，仍然把农民军当成主要敌人，阴谋勾结清兵消灭农民军后，再向清朝割地求和，偏安江左，故而始终没把清军当作主要威胁而加以防范。

清兵占领北京之后，起初并没有统一全国的战略计划。以摄政王多尔衮等为首的满州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对于汉族居住的广大地区还知之不多，因此他们只是从眼前出发，想在华北地区尽可能地多占领一些地方。据记载，多尔衮刚入北京，就下令为崇祯举哀三日。然后薙发改制，“薙发令下，有言其不便者曰：‘南人薙发，不得归。远近闻风惊畏，非一统之策也’。九王曰：‘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多尔衮颁诏江南，摆出一付吊民伐罪的架势，大骂李自成起义军，自夸功德，对新建于南京的弘光政权也是未置可否。诏书中说：“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清万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实为救中国之计。咨尔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从王，皆怀故国之悲，孰无雪耻之愿。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扬。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戳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惊睦邻之谊。”然后多尔衮又强调说：“若国无成主，人怀二心，或假立愚弱，实肆跋扈之邪谋；或阳附本朝，阴行草窃之奸宄。斯皆民之蟊贼，国之寇仇。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师南讨，殪彼鲸鲵，必无遗种。于戏，顺逆易

判，勉忠臣义士之心；南北何殊，同皇天后土之养。布告天下，咸使闻知。”诏书的措辞具有很大的伸缩性，清统治者一方面统治暂限于河北、河南以及长江以北的扛淮地区，示意“不忘明室”的南方汉族地主可以“辅立贤藩”，“共保江左”。另一方面又设下种种借口，以便一旦条件成熟时，就可以宣布江左政权并非明朝的“贤藩”，而是“民之蟊贼，国之寇仇”，则“移师南讨”就师出有名了。

由于黄河流域饱受农民起义打击的汉族地主纷纷投靠清朝，并为满清贵族出谋划策，所以以多尔衮为主的满清贵族野心急剧澎胀。原明朝的顺天巡抚宋权颇受清廷赏识，首献治平三策，说“四海可传檄而定”。原明朝御史柳寅乐也在甲申六月上言，“时已届秋，庙堂宜早定大计。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欲图西贼，必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收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须先扼蜀汉之路，决策定东南之局”。这样，满清贵族开始窥测江南。清朝统治者看到南明王朝的腐败无能，更坚定了消灭南明王朝的决心。但从当时的局势出发，清统治者对南明暂作妥协姿态，在策略上随机应变，制造和谈与偏安的幻想以麻痹南明统治者，这样南明王朝更寄希望与清朝政府实行妥协，以便携手剿杀农民起义军。1644年7月初，当吴三桂勾结清军入关并击败李自成农民的消息传到南京时，南明统治者急忙晋封已经降清的吴三桂为蓟国公，甚至还准备从海运输米10万石，酬劳他“借”清军之力击败农民军的“功劳”。七月间，当听说占据北京的多尔衮扬言“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宣示清朝要夺取全国统治权的野心时，弘光政权不敢分辩，仅向河北、山东颁发“诏书”，以示南明小朝廷的存在，“以安中外臣民之心”，根本不敢与清朝公开对抗。最初因形势不明朗，力量有限，而且民族矛盾比较尖锐突出，所以清王朝对南明政权“不忘明室、辅立贤藩”的政治野心采取了暂时容忍的态度，甚至打着“为尔等复君父仇”的旗号，愿意与南明“通好讲和”。但同时又发明警告，如胆敢与清对抗，清兵将在“克定三秦”之后移师南讨。8月间，弘光政权派出和谈使臣赴京，携带黄金1000两，白银10万两，并以割地、岁纳白银10万两等为条件，乞求清军不要南下，并建议采取联合行动进攻农民军。

9月初，正当史可法大体做好调停四镇纷争的工作，并着手筹建河防时，收到了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写来的警告信，信中称清朝“国家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国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荼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一矢；平西王吴三桂界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夙好，弃近日之小嫌，妥整貔貅，驱除枭境。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扰。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连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兹乃逆贼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清兵将暂停对农民军的追剿，“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多尔衮的信无异于是最后通谍，明确提出要福王“削号归藩”，从根本上否定弘光政权的合法存在。然而信中的“同以讨贼为心”对南明王

朝又充满了巨大的诱惑，是史可法等梦寐以求的。于是史可法复信多尔衮，开具全衔，“大明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卫殿下”，郑重代表弘光政权表态，“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风遐被，”“今上非他，神宗子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贵国“若乘我国运中微，一旦视同割据，转欲移师东下……亦甚违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矣，”今逆贼未伏天诛，“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贼逆之头，以泄敷天之忿。”史可法的拒降信态度鲜明，义正辞严，既没有妥协也没有后退，表现了民族正气。但此时史可法对清王朝还存在着一丝幻想，公开向清朝提出联合灭“寇”，表现出他对农民军的仇视，希望历史上的“回纥助唐、平安史之乱、契丹和守”消四世兵患的故事重演。然而多尔衮灭明之心已定，拒而不见南明使团，并于10月25日，以江南“擅立福王”为由，命多铎率兵南征。11月下旬，史可法得知与清朝议和破裂的消息，对清的态度才有了清醒的认识和彻底的转变。

史可法是南明弘光的政权中最有声望的人，但是战略眼光有限。直到顺治元年十月(1644年)确信议和失败，清朝已调兵南征之后，才被迫放弃与清朝“连兵西讨”农民军的幻想，意识到清军乃南明王朝最危险的敌人，于是重新提出了“讨贼御敌。以图恢复”的战略方针。史可法坚持“安内乃攘外之本”的立场，认为“贼一日不灭，敌一日不退”，“两者必转而相合，先向东南，宗社安危，决于此日”。所以，他虽有“西征北御”的思想，但实际上仍把“专力讨贼”放在首位，而丧失了进攻清军的机会。因为当清军主力西征李自成之时，其内兵力空虚，明军若能乘虚而入，出兵袭击山东、河北，威胁北京，将使清军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但是南明王朝按兵不动，希望借清军之屠刀剿杀李自成的农民军，以坐收渔人之利。这样就给清军提供了先西后东，从容不迫，各个击破的机会。

弘光政权建立之初，似乎还有些朝气，但史可法等正直官员被排斥出南京之后，朝廷大权落在阉党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之手，“兵骄饷绌，文恬武嬉，顿成暮气”，史可法“受命督师，无日不以国事为念”。比起四镇的不听节制、清摄政王多尔衮的咄咄逼人宋，南京小朝廷的日益腐败更让史可法忧心忡忡，他一次次地上疏苦谏。据不完全统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上疏达20次之多，每次提笔上疏时，都忍不住因忧国忧民而“呜咽不自胜，幕下士皆为饮泣”。然而史可法面对日益腐败的南明小朝廷和日益逼进的南下清军，已无回天之力。马阮一伙祸国殃民，结成死党，注定了南明必然灭亡的命运，给史可法抗清造成无法摆脱的困难。

史可法对朝廷的苦谏无济于事，要把抗清事业进行到底，唯一可行的是靠自己身先士卒，艰苦斗争。史可法为督师期间，千方百计地化解四镇总兵之间的纷争，他在八月份视察二刘军队，在九月份调解黄、高交恶，都是急于要建立抗清防线，以达到“守江北以守江南”的目的。为守江南，在江北应有三道防线：第一道是“河防”(黄河防线)，第二道是“淮防”(淮河防线)，第三道是“江防”(长江防线)。史可法最急于建立的是第一道防线，并且不以防守为满足，一心一意要进兵河南。恢复中

原。为此，他命驻泗水的总兵高杰驰赴河南开封、归德(今商丘地区)，力图进取，并及时抵御清兵南下，并调黄得功和刘良佐二总兵驻兵安徽颍上、亳县一带，这里靠近河南，以便相互支持。根据史可法的奏请，南明朝廷分定整个大扛以北的“汛地”(即防地)：长江上游是左良玉的汛地；天灵州而下到仪征、三叉河，是黄得功的汛地；三叉河以北到高邮境内，是高杰的汛地；从淮安向北到清江浦(今江苏淮阳市)是刘泽清的汛地；从王家营(淮阳市北)到宿迁一段，是督师史可法的汛地，这个边防分工，史可法完全把自己作为普通将领，一样地领受战斗任务，为此曾有幕僚认为这样做有失督师的身份。但大敌当前，史可法要以身作则，他要为南明王朝鞠躬尽瘁。

顺治六年(1644年)十月下旬，清廷决策分兵定向，征服全国。令英亲王阿济格等率军进攻陕北，镇压李自成起义军；令豫亲王多铎等率军南下进攻南明弘光政权。十月二十四日，清廷传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人等曰：“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桢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遣诏，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惟此三罪，天下所其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清廷的决策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的，因为当时清军的战斗力虽然比较强，但人数相当有限。多尔衮等人把自己的主力分别投放在相隔数千里的两地同时发动大规模战役，在战略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仅在一旦受挫时势必呼应不灵，而且大军既出，整个华北地区清军的守御力量非常虚弱。就在清军分兵作战的关键时刻，李自成的大顺军在河南怀庆地区发起了反击战，从而使清廷统治者如梦初醒，急令多铎改变进军路线，调头扑向怀庆，取胜之后再渡黄河攻潼关，与阿济格的军队夹攻西安。否则，即使多铎军南下一举攻下南明政权，但在其腹地的大顺军于怀庆得手之后，则完全有可能乘清军后方空虚，取道长治直指北京。这样一来清廷在北京的统治就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可以这样说，由于大顺农民军在怀庆地区展开反清斗争，几乎吸引了全部清军主力，才推迟了弘光朝廷覆灭的时间。对南明政权而言，这正是背水一战的好机会，如果趁机派兵北上，收复山东、河北，未尝不是一种自强之道，况且在客观上对大顺农民政权的抗清斗争也是一种支援。山东总督王永吉曾派人前往北京附近地区打探消息，得知“建州精骑尽往征闯，北直、山东一带皆单虚”，因此向弘光政权建议：“若简骁劲马、步二枝疾趋沂济，为奇兵电掣星驰，计日可复二城。若二城复，兖、济、临、德遂成为破竹。诸军辐辏，联络犄角，攻其无备，必建奇功。”然而这个合理建议却被弘光朝廷束之高阁。在清军倾巢西向夹攻李自成农民军时，史可法仍念念不忘所谓“君父之仇”，主张“宜速发讨贼之诏，严责臣与四镇悉简精锐，直指秦关……”，从而使清廷有了喘息之机，开始逐步实现其各个击破的统一方略。

当时，清朝统治者对李自成大顺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摄王多尔衮企图令清兵在分兵西攻农民军之后，南下攻打福王政权。但李自成指挥大顺军从山西、河南发起的北伐，却打乱了多尔衮的如意计划。多尔衮不

得不令豫王多铎停止南下，先从河南西攻潼关。1645年初清军占领潼关、西安，大顺农民军被迫南撤，明朝的残余武装力量见大势已去纷纷降清，清军的武装力量由此迅速扩大，于是清朝统治者才可能出兵南下，摧毁弘光政权，夺取全国的统治权。顺治二年三月初七(1645年)，清军分兵三路，自龙门关及南阳并进南下。一路由多铎率领，出虎牢关（今河南蒙阳县西北汜水镇，位于大山之上)；一路由固山额真拜伊图率领出龙门关(一名伊阙，今河南洛阳市南龙门)；一路由兵部尚书朝岱率领，走南阳。不久，三路清军会师后攻克归德(今河南商丘县南)，然后又从归德分两路南下，“如入无人之境”。五月四日清军攻占军事重镇徐州，守卫的明总兵闻风而逃，弘光小朝廷面临“燕巢危幕，朝不保夕”的局面。

许定国叛明降清清朝军队之所以很快渡过黄河，顺利地夺取归德，而后直逼南京，归根结蒂在于南明福王政权的极端腐败。南京的小朝廷里风波迭起，以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代表的阉党压制和迫害东林党人，守备在江北的四镇总兵在清军压境时还在抢占地盘，相互火并。史可法督师北上迎敌，然而黄得功和刘良佐拒不从命，致使率兵北上的高杰孤军深入，高杰本人在睢州(今河南睢县)被明总兵许定国诱杀。当高杰被害，其部下大乱屠睢的消息传到江南以后，史可法“流涕顿足叹曰：‘中原不可为矣’。遂如徐州，以总兵李本身(按：高杰的外甥)为提督，统杰兵”。说明当时许定国诱杀高杰，完全破坏了史可法制订的以开封、归德为根据地进图中原的战略计划，同时由于弘光政权在江北的军队互相攻杀，史可法被迫亲赴徐州去安抚乱军。而此时已到了清朝大军分别从河南、山东大举进攻的前夕，史可法此举，已经挽回不了弘光政权在徐淮等处的败局了。因此可以说，许定国诱杀高杰事件，加速了弘光政权的灭亡。

许定国在明末后任副总兵已有数10年，因明末战乱，许定国逐渐走上拥兵自保的道路。他领兵占据河南睢州一带，拚命扩充军队，很快拥有万余军队，成为屯兵睢州的重要地方实力派将领。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即许定国进入河南大约半年以后，明朝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所推翻。不久，清军进入北京，而这时南京也成立了弘光政权。国内这些重大的政治变化，使河南地区的形．势极为复杂，以至出现了清政权、弘光政权和李自成农民三种政治力量相对峙和割据的地区。处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作为一个故明总兵，许定国自然很快与弘光政权建立了隶属关系，成为弘光在河南的重要将领。到了九月，督师史可法令兴平伯高杰率兵移驻徐州，并节制开封、归德一路，以抵御清军，从而使屯兵睢州的许定国受高杰的统辖。与此同时，弘光政权又授予许定国“镇北将军”印以示倚重．然而许定国对弘光的命令采取了拖延甚至抵制的态度，阳奉阴违，首鼠两端，暗中与清军联络，表示愿意接受招抚。由于弘光方面史可法、高杰对河南地区斗争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对许定国过于轻信，这就不能不铸成大错。许定国诱杀高杰是清初历史上的一次偶然事件，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其中也有某些必然性。许定国代表的这些明朝文武官员的活动，突出表明了明末统治阶级内部的四分五裂、将相离心，这也正是明朝迅速灭亡，清军能在短期内消灭南明残余势力，统一全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如果没有这个偶然事件，清统

治者也会迅速出兵南下消灭南明政权，总之，南明福王政权的灭亡则是必然的了。

睢州守将许定国在清军大举南下的关键时刻，投降清朝，诱杀高杰，从而使弘光前线政局陷于被动，这一不幸事件，严重打乱了史可法的军事部署。史可法以普通将领身份前往王家营到宿迁一带督师时，正值严冬，但史可法与将士们同甘苦，所以士气很旺。总兵官刘肇基一举夺回宿迁，清兵拔营逃走，取得了胜利。清兵不甘心失败，又围攻邳州，史可法令刘肇基驰援，双方相持半个月，南明军队不屈不挠，最后清兵被迫撤退，邳州解围。史可法深入前线，初战告捷，曾打算派人联络正在抗清的山东榆园农民军，却不料出现了许定国的叛乱。高杰被杀死，其部队数万人群龙无首，其它三镇总兵欲争取高杰的士兵，黄得功企图袭击扬州，吞并高杰余部，史可法闻讯顾不上在徐州督师，忙赶回扬州制止内乱。却不料清军乘机自归德攻占了徐州和泅州(安徽泗县)，然后清军顺利由泗州渡过淮河，直逼扬州。四镇中的刘良佐、刘泽清“以入卫为辞，避而南下”，逃之夭夭。

扬州保卫战史可法虽然竭力筹划防御，但江北那些既跋扈又怯懦的将领们，根本不服调度。奸党马士英趁机提拔卫允文为兵部侍郎，削夺史可法的部分兵权。屯兵武汉的宁南侯左良玉，袒护受阉党迫害的东林余党，也在此时率兵几十万东下九江，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内战，声称欲入南京讨伐马士英等阉党，马士英则调江北四镇官兵迎战。大敌当前，明军却不战而内乱，无异于自取灭亡。自清军攻占顺德之后，史可法认为“河险已失”，急欲“提兵赴泗，正思联络凤(阳)、泗，控守淮南，不意复有上游之警”，弘光令史可法火速移师堵截左良玉。史可法连忙上疏忠告弘光帝：“上游不过欲除君侧之奸，未敢与君父为难。北兵一至则宗社可虞。……北兵南来，则历历有据，声势震荡，远近惶骇，万一长淮不守，直抵江上，沿江一带，无一坚城，其谁御之?”此时黄河防线早已全线丢失，清兵已逼近淮河一线，大敌当前，弘光帝却被马士英挟持，令史可法“督诸军渡江入援”。君命难违，史可法只得率所部人马，驰赴南京。在他身后，清军已渡过淮河，正以每日推进50里的速度直逼南京。左良玉大军被黄得功击败之后，渡江北上降清，弘光政权又遭到沉重一击，情势急迫，已经抵达南京近郊燕子矶的史可法，欲求入京面陈军机大计被拒绝，弘光帝又有诏令，令他立即率师返防。此时的史可法身为督师却无师可督，欲北上守淮河而清军已渡河南下。史可法欲哭无泪，仰天长啸，空怀悲切。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初十，史可法火速率部重新奔赴前线，十二日赶到天长，得知盱眙已被清军包围，他急令黄得功、刘良佐和刘泽清及两淮地方军驰援，自己率部先行出发，奔救盱眙。行半路得知盱眙守将已经降清，援军侯万岩部全军覆没，于是昼夜兼程再奔向泗州，谁知泗州守将李遇春又降清。史可法疲于奔命却无处可守，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又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史可法奔回扬州，忽忙部署这个江北重镇、南京屏障的防守事宜，不久，气壮山河的扬州保卫战就开始了。

清豫王多铎进占泅州后，于四月十四日渡过淮河，直扑扬州。打先锋的，正是许定国。多铎因畏惧史可法的威名，对南下还有些迟疑，在许定国的极力怂恿下，多铎才决议尾追史可法，并以兵部尚书汉岱为前

锋，率部杀向扬州。

史可法于四月十四日赶回扬州后，四处求援，可朝廷与诸将无动于衷。史可法一面发布文告，安定人心，加紧修筑防御工事，一面以“血书寸纸驰报兵部”。并向江北各镇将官发出紧急文书，要求火速增援。南明朝廷的兵部尚书要职正被阮大铖窃踞，他正想借刀杀人，除掉史可法，所以血书至兵部，“兵部”不应。刘泽清占据淮安正准备降清，刘良佐入京“勤王”，正暗中与清兵联络；黄得功率兵至芜湖，正全力阻截左庚所率的左军残余；驻高邮的原高杰部将李成栋，也不肯就近援救扬州。扬州是南京在江北的门户，然而城内守兵单弱又得不到外援，史可法只得决议死守杨州城。

扬州城内各路军队加起来总数也不过1．8万人，比起多铎的10万人马，兵力要薄弱得多。除了刘肇基率4000兵自白洋河连夜驰援之外，还有监饷郎中黄日芳召集川将胡尚友、朝尚良，率领所部驻守在扬州东郊茱萸湾(俗名湾头)。先前奔援泅州的督师部属，也由应廷吉统率而来，驻瓦窑铺，和胡、朝二军成犄角之势，互相声援。兵部至事何刚已被任命为贵州遵义知府，但他不忍舍弃史可法，而率领精兵忠贯营驻守瓦窑铺，其它如副总兵乙邦才、庄子固、楼挺等人，都带了有限的人马到达扬州。到二十一日甘肃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歧风率所部4000人到达扬州。难能可贵的是，扬州的四乡农民因遭受多铎前锋部队的骚扰，纷纷要求进城参加扬州城的保卫战，扬州人民的奋起给了以史可法为首的守城官兵以极大的鼓舞，大大加强了城防的力量。

清军从天长、六合长驱而来，其先头部队于四月十五日左右到达扬州西北的竹园，大部清军则于四月十八日前后陆续到达城外，在城北20里处扎营布阵，并夺得300多只民船顺水直逼扬州城下，只因红衣大炮未至，多铎派泗州降将李遇春入城劝降，史可法站在西门城门上怒斥叛贼，守城官兵众箭齐发，吓得李遇春抱头鼠窜，多铎后来数次招降史可法，均遭拒绝。多铎在诱降失败之后，命令加紧围城，把史可法在城外的驻军全部逼入城内，缩入了包围圈。史可法急令总兵李栖凤监军，令副使高岐凤扎营城外，作为援应，自率刘肇基登城阅兵以鼓士气。只见城外清兵如汪洋大海般将孤城扬州围在中间。史可法一声号令，守城官兵炮弹石矢，飞向城下乌压压的清兵。清兵仗着人多，前边的被打死打伤，后面的又往上涌来。这样相持了两昼夜。刘肇基献策，建议利用城内高地之优势，决淮河之水灌入敌营，然后背城一战。史可法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敌军未必丧亡，准扬先成鱼鳖，于心何忍?”他不忍决堤害及百姓，也不同意开城出击，因为敌强我弱，野战必败，只有固守城池等待后援才是上策。

多铎清军接连攻城已达数日，清军伤亡无数，而扬州城依然傲立。多锋恼羞成怒，到四月二十二日，已把扬州新旧两城围得水泄不通。加上从六合、仪真方向赶来的清兵铁骑5万，围城清军已达15万人之多。南京城的弘光帝惶惶不可终日，召见群臣，有大臣提出“准扬最急”，应立即调兵增援，并加强南京的防御，不应该再撤去二镇江防兵去对付左良玉。然而抱定“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的马士英，狂妄之极，对着满朝文武嗔目大呼：“有议守淮者斩”，吓得连傀儡皇帝也不敢吭声，于是史可法的“血疏告急”被冷落在一边，无人过问。真是“朋

党势成，门户大起，清兵之事，置之蔑闻”。在这种生死关头，一些怯懦的将领临阵叛变降清。就在二十二日，进城才一天的总兵李栖凤和高岐凤二将试图以武力挟持史可法出降，被史可法严辞拒绝之后，这两个叛将于夜半时分带本部4000余人马并掠走了川将胡尚友和卦尚良的部分兵马，投降清营。当时，李、高握有扬州城中近半数的兵力，如果史可法以其叛变之名加以镇乱，势必造成内乱，导致清军趁乱而入城。所以史可法只得“听之不禁”，眼睁睁地看着叛军出城投敌而奈何不得。

李、高的哗变，一度使城中军心有所动摇。从二十四日夜开始，清军开始用火炮猛攻扬州城，史可法指挥守军顽强紧守，双方死伤众多。史可法料知城孤援绝，终难持久，于是又以血书力劝弘光帝去谗远色，勉力图存，又写信寄与父母妻儿，不谈家事，只嘱咐死后最好能葬在高祖皇帝(朱元璋)陵之一侧，否则就葬于扬州梅花岭!其精忠报国之心，感天动地，可歌可泣！到了第七天，城内的炮弹矢石已所剩无几。史可法集合全体守城官兵，做最后的战前动员。要求全体守军一致努力，严密防守，挠乱人心者军法治罪!然而中军官两次传渝，士兵们都一声不响。士兵们已陷于绝望之地，史可法痛心疾首，失声痛哭，据说中军官取火照明，只见史可法双眼滴血，战袍上已是血泪斑斑，士兵们终于被感动，于是史可法下令把所剩不多的守军分成三部分：一部分迎敌，一部分守城，一部分巡查，并且宣布了临阵军令：“上阵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尽!”士兵们齐声应和，喊声震天，决心要与清军奋战到底。

扬州城的百姓也自觉组织参战守城，男女老幼四处搜集砖石、石灰，赶制刀箭，甚至拆掉了家中的木捧、门板用以加固城墙。全城军民同仇敌慨，团结一心，决心与扬州城共存亡。

扬州新旧两城共有13座城门，其中旧城西门的城墙比较低矮，容易被清军突破。西城门之外是一块长满树林的土丘，为明朝阁臣李春芳之墓。此前守军曾力主砍除树木以防敌隐蔽，然而史可法拘守礼法没有答应，自己率兵亲守西门。果然，清军的红衣大炮(按：原称“红夷大炮”，最初由红头发的荷兰人传到中国，故称“红夷”，清统治者忌讳“夷”字改称为“红衣大炮”)就架在树林之中。四月二十五日，多铎下令发起总攻，从四面向城内环攻，而西门的攻势最猛，清军人数也最多。史可法下令开炮还击，多铎大怒，命用红衣大炮连续猛轰，炮声如雷，隆隆不绝，硝烟滚滚，遮天蔽日，西门城楼不一会儿就陷入火海之中。清军趁机架起云梯爬城。城内军民向清军投掷砖石，如同飞蝗骤雨。城墙西北角终于被轰开，城外清军一拥而上，于是两方人马短兵相接。守城农民奔向缺口，挺身相迎，与清军展开内博战，只见刀光剑影一片，地上则血流成河。两下激战许久，城内外尸如山积，清军践尸入城，西门终于被攻破。其它各门，军民仍在浴血奋战。刘肇基率余部400勇士与清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在杀死数千名清军之后，全都英勇牺牲。

史可法见清兵已入城，肇基阵亡，大势已去，迅即拔剑自刎，他要实践自己定的军令。众人夺去利剑将史可法紧紧抱住，一起簇拥着他转向小东门，后又向南门突围，不幸被清军俘获。面对清军的威逼利诱，史可法誓死不屈。多铎说“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史可法大义凛然回答说“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多铎不死心，

又令清将宜尔顿继续诱降达三天之久，史可法始终不屈不挠，最后惨遭杀害，清将宜尔顿以薄棺收殓。史可法壮烈殉国时，年仅44岁。

史可法被杀后，他的部属仍在苦战之中。庄子固部下700人，以“赤心报国”为旗号，无不格斗而死。副将马应魁，每战披白甲，书“尽忠报国”于背，以巷战死。还有将官乙邦才、楼挺、江云龙等都战死在沙场。总督淮扬的卫胤文，城破投水而死。史可法部下文武官吏壮烈殉难的在200人以上。多铎攻破扬州，死了数千人，付出了惨重代价。清军进城后，又时时刻刻遭到城中军民的伏击，清军在扬州遇到了自入关以来最顽强的抵抗！为此，清军十分痛恨扬州军民的反抗，多铎为了对扬州人民进行报复，下令屠城，刽子手们在10天内屠杀了几十万无辜的百姓！清军的这一暴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扬州十日”大屠杀惨案。

清军血洗扬州之后，多铎令士兵搜集民间竹木家俱赶制木筏火把，“昏夜乘风放入江中，顺流而下，火光彻天。南兵见之，谓清师济江，遂大发炮击之。然风顺水急，愈击愈下，久之，炮几尽，王乃从七里港渡江”，占领南京的门户镇江。弘光帝连夜逃出南京，夺路奔往芜湖，投总兵黄得功庇护。当时，南明政权尚有20余万兵力，但由于朝廷的腐败，各路将士都无心防守，有意降清。当清军进攻时，明军一触即溃，纷纷逃窜如鸟兽散，南明守将郑鸿逵、郑采率水师经海路逃回福建，监军御史杨文和巡抚霍达逃往苏州。南明武装的基本力量，如左良玉(已死)的儿子左梦庚、刘泽清、刘良佐和高杰(已死)的余部，这时都已投靠清朝。顺治二年五月十五日(1645年6月8日)，清军兵不血刃开进南京城，以忻城伯赵之龙为首的南明文武官员向清军投降。清军继续追捕福王朱由崧，已降清的刘良佐乘机抓住弘光帝，押回南京，成立仅一年的弘光政权就此宣告灭亡。明朝遗民张岱曾说过：“弘光痴如刘禅，淫过隋炀，更有马士英为之颠覆典型，阮大铖为之锨翻铁案。一年之内，贪财好杀，殢酒宣淫，诸凡亡国之事，真能集其大成。”清军攻占南京之后，接着由常州、无锡直取苏州。不久兵临杭州城下，逃避在杭州的明潞王常涝(崇祯帝的叔父)开城投降，然后在绍兴的瑞王、惠王等明朝宗室，也纷纷举表投降。清廷内外则一片欢呼之声：“金陵归顺，福王就擒，统之业已成！”清廷改南京为江南省，应天府为扛宁府，派八旗重兵驻守南京，降清的一大批明朝遗老遗少，“文武百官，争趋朝贺，职名红揭，堆至五尺者十数堆”。清廷于是任命江宁、安庆巡抚以下降官373人，作为其在江南统治的基础，然后继续挥兵南下，扫荡南方各地的抗清武装和明朝残余势力。

第五节 昙花一现南明诸朝无力回天

清军入关，在1年多时间里，打败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摧毁了南明弘光政权，席卷了半个中国，随着清军向前推进，国内的民族矛盾特别是满汉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从而在江南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抗清武装，也使濒于覆灭的明王朝残余势力得到了复苏。南明弘光政权由于腐败和内部纷争，理所当然地迅速灭亡了。接着清军的进攻矛头指向浙、赣、闽、粤东南地区，江南各地抗清武装斗争风起云涌。汉族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标榜“君亲之尊”、“华夷之防”，打着恢复“大明江山”的旗号，披发跣足，奔走呼号，激扬民族感情，一度成为满清贵族统一中国的障碍。但满清贵族建立大一统的帝国已是大势所趋，所以南明政权的抵抗是注定要失败的。

清灭鲁王政权的战争鲁王朱以海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世孙。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嗣鲁王位。清军占领北京之后，明宗室落魄南逃，四月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权令鲁王从山东移驻台州(今浙江临海)。顺治二年六月，弘光政权灭亡之后，潞王朱常淓在杭州称监国仅三天就开城降清。这样在七月，在抗清义军、故明官吏、缙绅钱肃乐等的扶持下，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称监国，重新建立起反清复明的政权。

当时，鲁王政权以浙东为基地，以钱塘江为天然防线，分兵驻守。唐王政权控制着浙东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拥有浙中抗清义师和驻守浙江的明总兵方安国、王之仁的部队。然而妨碍鲁王政权积极抗清的主要原因是它的政治腐败。当时，军阀专横，外戚宦官当权，把持有限的兵饷财源。因鲁王辖地地侠兵众，饷制不一，各不统属，难以一致抗清，真正抗清出力的士兵和“义师”得不到粮饷。正如钱肃乐所说：“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镇之一吸，合藩镇之兵马，不足卫小民之一发。”同时，鲁王政权又与随后在福建建立的唐王政权争夺皇位继承权，内外矛盾重重，更无心抗清。

聚集在鲁王政权旗下的各路力量大致有：兵部尚书张国维起兵于东阳，刑部员外郎钱肃乐起兵于鄞(县)，总兵王之仁起兵于定海，黄斌遣将自舟山，张名振兵自石浦，沈荃、冯无飏则在慈溪起兵响应，一时，鲁王政权声势颇大，兵部尚书张国维提出“克期会战，则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而攻坚捣虚，人无接应之暇，此为胜算。必连诸帅之心化为一心，然后使人人之功罪，视为一人之功罪”。鲁王采纳了他的主张，于是张国维联合方国安、王之仁、钱肃乐、熊汝霖等诸营官兵和义军，“为持久计”，划钱塘江而防御。但总兵王之仁对此举颇为不满，他认为张国维胸无大志，上疏说：“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黄龙之志，乃一败后遽欲以钱塘为鸿沟，天下事何忍言!”王之仁的话有一定的道理。由于清军南下，凶残成性，一反当初以“义师”自诩，以“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的诺言，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戮汉族人民，演出了一幕幕“扬州十日”等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征服者的凶残嘴脸暴露无遗，由此激起了江南人民对满清统治者的切齿痛恨。浙江人民怒不可遏，依凭着钱塘江天险，坚持抗击并打退了清军的进攻。当时，一个住在附近的外国传教士

说："如果他们追过江去，也许会收复省城和其它城镇，但他们没有继续发展胜利，只满足于……，在南岸设置防线同鞑靼军队(清军)对垒，鞑靼远征军就这样被阻挡了整整一年"。但是清军此时已是今非昔比的了，鲁王政权连隔江自保都难以保证，又哪会有出兵江北，收复失地的打算呢?

顺治三年三月初一日，清军大举进犯，水师驱船开入钱塘江水域，张国维急令王之仁率水师在江上迎敌。时值江面上东南风大起，清兵逆水缓慢而来，王之仁率水师乘风扬帆迎战，清军抵挡不住，船翻人亡，乱作一团，只好收兵退回杭州。鲁王政权刚抵御了清兵来犯，又与福建的唐王政权为争帝统而互为水火，互争真伪，唐、鲁两个政权，本是叔侄关系，又大敌当前，同样面临强敌压境的危急关头，本应联合抗清，以图生存。但由于两个政权都操纵在各自地方军阀手中，全然不顾大局，他们都力图以拥立明王政权而揽权和借抗清之名而中饱私囊，所以反对闽浙联合，甚至兵戎相见。张国维甚至说过："今日复有以和闽为言者，臣立剑斩之"。结果，"鲁王既斩闽使，恐闽发兵，又见清兵困守杭州，坚不可破，遂定议抽兵属国维西征"。

南明鲁王和唐王为争权而内讧，从而为清军提供了可乘之机。清军征南大将军博洛得知鲁王军西征，江防空虚之后，便于五月二十日在长江北岸调集各路大军，一面用火炮轰击南岸明军，一面伺机渡江。钱塘守军方国安见势不妙，加上营中的锅灶被清军火炮击中，十分恐惧，认为"此天夺我食也，我自归唐王耳尸便于二十七日夜挟鲁王逃往台州，明军江防阵地不攻自破。清军乘天旱水浅，抢渡钱塘江，一举攻破绍兴。方国安望风而降，鲁王则在张名振的保护下仓皇下海南逃。鲁王政权所属的温州、台州、金华等地相继落入清军之手，因此这个政权存在不过一年就跨台了，鲁王已经是有名无实的了。

鲁王逃离浙江前往福建。拥戴鲁王的钱肃乐、张名振、张煌言等，也招集旧部，重整军旅，继续战斗。1647年6月，钱肃乐、郑彩等联络福建各地义军围攻福州，并先后收复了建宁、邵武、兴化三府和福宁州，以及连江、长乐、莆田、闽清等27个县，一时声势大振，鲁王被拥戴进驻福州。清廷加紧了对福建的军事进攻，与此同进，鲁王的重臣郑彩擅权自恣，排斥异己，谋杀大臣，闹得四分五裂，致使所复州县很快又被清军尽数夺去，鲁王失去了在福建的根据地，无奈又移驻舟山，在张名振等支持下，占据舟山岛以为继续抗清的基地。

张名振、张煌言曾屡次兴师北伐，进军吴淞，给清军以很大的威胁和打击。顺治七年，浙闽督陈锦向清廷提出进攻舟山的建议，正巧这时鲁王政权发生危机，总统水陆两师的张名振突然袭杀统领陆师的王朝先，王的余部将张济明等1000余人降清，从而使"舟山虚实尽泄"，于是清军决定出兵舟山。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清军初袭舟山失利，清将陈锦利用明军的麻痹轻敌思想，决定由"定海，台区及苏松三路同时进师"。陈锦率清军主力利用海上的大雾作掩护。"扬帆誓师，齐出定关"。而守卫舟山的明军水师统领阮俊统水师防御在其它两路，定海一路防守最为薄弱，而清军恰恰选中了这一路作为突破口，结果阮俊率军苦战，兵败被俘，不屈而死。清军不等明军其它两路相会，便大举进攻，分兵登陆。明军顽强抵抗，双方战斗异常激烈，各有伤亡。清军调集火炮，

猛轰城墙，城内守军防不胜防，加上火药告急，使清军破城而入。顽强抵抗到底的明军，以及城内百姓，与清军博斗，或英勇战死，或“发火自焚，阖城尽成灰烬”。鲁王因随张名振、张煌言率军袭击吴淞而离开了舟山，故侥幸逃脱。舟山一战，清军虽以优势兵力和突袭手段取得了攻占舟山的胜利，但却付出了伤亡千余名官兵的惨重代价。舟山之战让清朝统治者认识到江南各地人民的顽强抗战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承认，“我军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阴、泾县合舟山而三耳”。

舟山被清军攻破后，张名振、张煌言等于1651年护鲁王漂海南下金门，投奔郑成功以寻求安身之地。1653年(顺治十年)鲁王除去监国名号，其部将张煌言等与郑成功联合起来，继续进行抗清斗争，但作为一个独立的抗清政权早已名存实亡。鲁王本人于康熙元年(1662年)死于台湾。

清灭隆武政权的战争以明唐王朱聿键为首的隆武政权在建立的时间上距南京弘光政权的覆灭不过一个月，与绍兴的鲁王政权几乎是同时建立起来的。但隆武政权却与其它两个政权在政策上有明显的不同。这不仅是因为朱聿键是位具有民族气节，励精图治的政治家，更重要的是，他出任监国时已是“清逼武林，人目无志。贼臣有屈膝之议，举国同蒙面之羞”，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

唐王朱聿键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在崇祯末年农民起义四起之时，朱聿键请求授权于己，在地方上招募乡勇，以效尊攘，却被奸臣污陷以谋叛罪而囚于南京。在高墙里几乎与世隔绝，朱聿键日夜读书，博古通令，才思敏捷。而且他性格稳重，与人坦诚相处。直到清军进占北京之后，朱聿键才脱离高墙之囚。1645年当弘光政权陷落后，唐王抱愤南下，在嘉禾遇苏观生及抗清义军，“观生说以大计，请称尊以收人心，图恢复”。于是在顺治二年闰六月七日，几乎与鲁王在绍兴监国的同时，朱聿键在福建军阀郑芝龙、郑鸿逵、明尚书黄道周、明故辅蒋德璟、黄景昉等拥戴下，在福州称监国，二十七日即帝位，改元隆武。设六部九卿。

隆武政权在建立之初，对抗清事业做过统筹安排，俨若有一番作为。这个政权诉宗旨是抵御满洲贵族的进犯，恢复汉族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一点从唐王在所封勋臣名号上就可见一斑：如郑芝龙进封为平夷侯，郑鸿逵进封为定清侯，方国安为靖夷伯，黄蜚为靖虏伯，黄斌卿为肃虏伯，等等。不久，唐王下令斩杀了前来招抚的清使马徐厂，以示与满清水火不容。然后唐王政权敕谕文武臣民曰：“朕今痛念祖陵，痛惜百姓，狂彝汗我宗庙，害我子孙，淫掠薙头，如在水火。朕今诛清使旌忠臣外，誓择于八月十八日午时朕亲统御营中军平夷侯郑芝龙、御营左先锋定清侯郑鸿逵统帅6师，御驾亲征”。“时内外文武济济，然后饷战守机宜，俱郑芝龙为政”。芝龙与诸将议定：以建宁(府治在今福建瓯)、天兴(福建福州)、延平(府治在今福建南平)、兴化(府治在今福建莆田)为上游，以汀州(府治在今福建长汀)、邵武、漳州、泉州为下游，各设巡抚，分区布防，而以仙霞关(位于今浙江汇山县南，是浙、闽交界处的要隘)为防御重点，派兵10万分别把守于关内外170处要道。另外加紧训练10万精兵于明春出关，北上伐清，一出浙江，一出江西。隆武皇帝树起的抗清大旗，固然是为民恢复朱明王朝为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政权，但

这种誓死抗清的政策客观上与当时广大汉族人民的愿望相符合，尽管唐王在其发布的诏谕里对农民军仍不会诬蔑之辞，但形势已迫使他由弘光朝廷所奉行的联合清兵镇压农民起义的政策改为争取农民共同抗清的政策。当大顺军将领李过、郝摇旗等与隆武的将领何腾蛟、瞿式耜达成合营抗清协议之时，唐王大喜，一再加以奖谕，并给李过、郝摇旗等封爵授官。李自成的妻子高氏由于支持李过联明抗清，隆武帝、后也大加赞赏。同时唐王还敕谕正在四川的阁部王应熊"善视摇黄诸寇"，"俾为我用"，力图把农民军纳入他重建汉族地主阶级统治的轨道。唐王的政策得到了江南各地义军的欢迎，他们纷纷表示拥护唐王抗清。

当唐王政权建立之初，除领有福建、两广、云贵之外、还兼有安徽、江西、湖广的一部分土地。但唐王政府的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郑芝龙之手，郑芝龙本无意抗清，他之所以拥立唐王，只不过是借其旗号为己争权夺利。郑芝龙又名一官，福建泉州南安县人，原是海盗头子，以后接受明朝招抗，官至都督总兵官，拥兵达二三十万之多，又把持着海外贸易，往来于日本和南洋的商船必须经过他的许可，交纳一定的税款方可通行，郑芝龙因此成为福建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一门声势，煊赫南天"。郑芝龙借筹措军饷为名，大肆搜刮公私钱粮，"令抚按以下皆捐俸助饷，官助之外有绅助，绅助之外有大户助。又借征次年钱粮，又察括府县库存银未解者，厘毫皆解。不足，又大鬻官爵"。当大江南北义军开展艰苦的抗清斗争之时，郑芝龙精兵利器，马肥粮足，却按兵不发，"坐山观虎斗"。因此隆武政权内部同样十分腐朽，实际上无所作为，纵然有黄道周、张家玉这样一意想恢复明朝天下的谋臣，也无济于事。大学士黄道周"素与郑芝龙不协，每事抵牾"，见芝龙把持朝政，每以缺饷为由拒不发兵，气愤不过，身为隆武政权的首辅，首请募义勇出征，督师北伐。"隆武命芝龙助之资，芝龙不与一钱，隆武准给空札百函而已"。黄道周随行时仅有四五个秀才，离福州经延平、建宁至崇安，沿途募得义兵4600余人，皆为流民乡勇，毫无战争经验，其间黄道周又数次上疏请助军饷，均遭芝龙拒绝。十月初一，黄道周率军出闽入江西，分兵三路与清军激战，因为孤军深入而危急万分，请求救援，但郑芝龙仍按兵不救。最后，黄道周义愤填膺，铤而走险，孤军深入婺源，途中中了清军的诱敌之计，兵败被俘，解至南京，不屈而死。

郑芝龙首鼠两端，一面暗中与清军勾结，一面又密表于鲁王，表示"唐非吾愿，唯鲁东西"，因而当唐王与鲁王为争正统而兵戎相见时，郑芝龙又拒绝出兵讨伐鲁王。当清兵攻占了绍兴，鲁王政权跨台之后，唐王政权便暴露在清军面前。清军进入浙江和江西后，逐渐向福建进逼。郑氏兄弟迫于内外形势的压力，虽派兵驻守在仙霞岭各个关口，但却采取了消极的防御措施，或中途停兵候饷，或不战而逃。唐王朱聿键如梦初醒，看到郑芝龙难以依靠，决定以亲征为名，入湖广依靠总兵何腾蛟及抗清义军，力图重新打开抗清局面，于是唐王从福州移驻延平。清廷早知郑芝龙对隆武政权怀有二心，于是派驻南京负责招抚江南明降将的洪承畴，以同乡关系写信诱降郑芝成，许以王爵，总督两广。郑芝龙喜出望外，与洪承畴暗通声息，有"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倾心贵朝"的许诺。果然，顾治三年八月，当清征南大将军博洛指挥清军由衢州(今浙江衢县)、广信(今江西上饶县)，进入福建时，郑芝龙卖主求

荣，“阴受洪承畴约款，托言海寇，驰还安平，尽撤关隘水陆诸防，仙霞岭虚无人”，致使清军如入无人之境，清军兵不血刃直入建宁，并迅速攻占福州。唐王狼狈逃至汀州(长汀)，被清军俘杀。隆武政权的文官武将，或逃或降，未作有效的抵抗。郑芝龙不听从儿子郑成功的苦心劝告，剃发降清，被押往北京。福建很快落入清军之手，隆武政权宣告灭亡。郑芝龙以款附清朝，邀功求赏，得到的回答是：“兵未至而先附，我何所取重于将军?”在治顺十八年(1661年)郑芝龙被处死，落得可怜又可耻的下场。

1646年底(顺治三年)。由明官僚苏观生等拥立隆武聿键之弟聿，在广州称帝，年号绍武。苏观生奉唐王朱聿键之命率军前往江西，当黄道周部战败之后，苏观生率兵返回广州，开始与原明兵部侍郎陈子壮、汤来贺以及当地乡绅王应华、关捷先等会议，拟请唐王从福州迁往广州，却未料福州很快就被清军占领，唐王被杀。然而这个绍武政权不仅从未抗击过清军，反而为了争夺帝统，和永历政权火并撕杀。驻于肇庆的永历政权派给事中彭耀前来广州，与绍武政权疏通关系，聿却派人杀死了彭耀，并派兵部侍郎汤来贺致书肇庆诸臣，警告说“让为上，和次之，战最下矣”，不久派兵攻打肇庆，永历政权猝不急防被打败，绍武政权由此而得意洋洋，放松了对广州的防守。1647年1月清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陷了广州，清将李成栋率17骑过关斩将，杀死绍武帝，苏观生自缢而死。存在不到40天的绍武政权只是昙花一现。

清灭永历政权的战争清军占领江南和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以后，1646年(清顺治三年)9月，又以优势兵力向广东西南腹地发动进攻，马不停蹄，企图一举消灭西南的抗清武装。

隆武政权灭亡之后，南明诸臣不甘失败，经过仓猝筹划，在广东很快又出现两个均以正统自居的南明政权，它们都成立于1646年12月，一个是隆武帝的四弟唐王朱聿在广州的绍武政权，一个是明神宗万历的嫡孙桂王朱由榔在肇庆(今广东高要)的永历政权。在强敌面前，两个弱小的南明政权本身就不堪一击，它们却仍与当年的鲁王与唐王的政权一样，为争帝统而同室操戈，互相削弱，结果清军乘机而入，先占广州，灭亡了仅存在40余天的绍武政权。清军随即由总督佟养甲、总兵李成栋统领向肇庆方向前进。

永历政权由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湖广总督何腾蛟等拥立，准备坚持抗清斗争。桂王政权虽然内部矛盾重重，腐败不堪，但由于先后得到了大顺军和大西军的支持，所以在所有南明政权中，坚持的时间最长，抗清的力量也最强，然而这个政权却始终没有固定的根据地，颠沛流离，四处转移，既反映了抗清斗争的日益艰难，又说明了明朝遗老遗少“反清复明”的愿望正归于破灭。

其时，虽然已处于清军的四面包围之中，但永历政权仍保有两广、湖南和云、贵、川西南腹地，北有大顺、大西两支农民军为屏障，“兵力人情俱有可为”，“中兴”还是有一线希望的。但这个政权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诸多问题，清军的步步紧逼又使得它没有喘息之机。桂王朱由榔懦弱寡断，贪生怕死，苟且偷安，昏庸腐朽，实非拔乱之才，而是一个闻警即逃的皇帝。由于南明疆域日益缩小，明廷大批旧臣，如宦官头子王坤、锦衣卫头子马吉翔和流氓军阀刘承胤、官僚刘仙客等均相继麇集于

朝，永历帝大权旁落，毫无作为。宦官权臣，相互倾轧，矛盾重重。因此，党争、混乱、因循苟安的特点比闽浙政权尤为突出，只是在抗清较为坚决的何腾蛟、瞿式瓛、堵胤锡、郑成功等的拥护和支持下，特别是在大顺农民军和大西农民军的支持下，永历政权得以苟延残喘，维持了十五六年之久。

顺治四年(1647年)初，清军进逼肇庆，永历帝出逃梧州、平乐，抵达桂林。清军由广东进犯广西境内，永历帝见大势不妙，又逃至全州(今属广西)，再逃至武冈(今属湖南西部)、靖州(今湖南靖县)，桂王狼狈之至，“半年之内，三四播迁”，天下之大，竟无立足之地，堂堂帝王，威风扫地。四月，清军在将领孔有德指挥下由湖南发起攻击，直下长沙，占领衡州，与前来追击永历帝的李成栋所率清军相互配合，步步紧逼，企图一举推翻永历政权。正当形势万分危急之际，活跃在广西和湖南一带的农民起义军向清军发起了反击，从而使永历政权转危为安。

清军占领江南以后，一面向闽浙进军，消灭南明政权，一面加强了对江西、湖南的压力，使活动在这一带的大顺农民军余部受到困扰，抗清局面岌岌可危。而南明总督何腾蛟驻守长沙，兵力微弱，“长沙素无武备，腾蛟乃召黄圾宣于攸衡山中……朝圾宣部卒不满2000人，多羸弱”，同样也面临着被清军围剿的艰难局面。随着清军在江南的一系列暴行，加剧了民族矛盾，从而使农民军与南明政权相互靠拢，它们在共同抗清的大前提下开始联合作战。大顺军余部的农民军领袖们，为顾全抗清大局，毅然决定改变战略。在顾治二年(1645年)九月，就同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等人合作、共同抗清，从而形成了大顺军与南明军队的抗清联合战线。在“受抚”的名义下，李锦更名李赤心，高一功更名高必正，郝摇旗更名为郝永忠，起义军被改编为“忠贞营”，表示“以身许国”。郝摇旗等“招其党袁宗第、蔺养成、王进才、牛有勇皆来归，骤增兵10余万”。南明政府对部分义军也无力过分约束，“兵则听其屯聚，将则无所变更，彼其部由依然”，而“李赤心书疏犹称(李)自成先帝，高氏(李自成后妻)太后，(堵)胤锡不能止也”，只求在共同抗清前提下，彼此妥协，一致对外。1646年春，抗清联军接连取得了几次胜仗，使清军一时不敢南进，唐王政权倾覆后，他们又支持桂王政权，在顺治四年(1647年)十一月，取得了南明史上最著名的全州(今广西全县)大捷。郝摇旗等农民军协同何腾蛟所部明军，在全州给清军以沉重打击，“大败三王(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斩级无数”。在这空前大捷的推动下，清将金声桓反正于江西，李成栋于广东叛清归明，还有其它原已降清的明将王得仁、姜壤等人，分别在山西等地反正归明，从而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清高潮，摇摇欲坠的永历政权得以由弱变强，一度拥有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湖广等士省之地，与在山西、陕西活动的姜壤，和在福建、浙江一沿海活动的郑成功，“皆遥相应和，势颇张”。永历帝重返肇庆，春风得意。但好景不长，由于诸多明将降清再归明，致使桂王政权内部权势之争更加复杂，排斥、陷害、打击农民军的事件越来越多，大好的抗清形势迅速逆转。清军纠集各路人马大举反攻，南明诸将离心离德，既无远略又无统一指挥，各自为战，力求自保，结果在桂林、全州、赣州、南昌、广州等地连败于清军。

金声桓，原为左良玉部将，南明的徐淮总兵官，以后随左梦庚降

清，率军进据江西。自以为“未费满州一斗粮，孤军传檄，取13府，72州县，以数千里地拱手归之新朝”，功劳很大，“意望旦夕封公王，次亦不失侯耳”。结果清廷只给了他副总兵兼提督江西军务事，他的副将王得仁只得了个把总，都比在明朝时的官衔低下，于是心有不满。清廷派巡抚章于天对他们进行牵制和监视，更逼得他们走投无路，追悔莫及。于是在抗清形势好转之后，金声桓、王得仁便宣布“奉诏恢复”，杀死清廷的巡抚、巡按等，倒戈抗清，回师攻占九江。但由于缺乏政治远见和军事谋略，固守江西地盘，而没有迅速出击，如果“以清兵旗号服色顺流而下，扬言章抚院请救者，江南必开门纳君，其将吏文武可以立携擒，遂更旗号，播年号，祭告陵寝，腾檄山东，中原必闻风响应，大河南北，西及陕西，其谁得而为请有也?”这种建议虽有些夸大，但抗清力量应打出去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金、王却没有这样做。结果在包围赣州70余天之后，误中了清军的缓兵之计。1648年6月，清军自江宁进讨，连陷九扛、南康、饶州，兵围南昌。金、王狼狈回师南昌，在被围半年之后，清军破城而入，金声桓投湖死，王得仁率兵抵抗则被清军杀害。

李成栋原为史可法部将，以总兵守徐州，清军南下，他率明军降清，充当了清军进军江南镇压农民军和南明王朝的急先锋。1646年李成栋又率先头部队攻下广州，战功显赫，但清廷只授给两广提督，由此“怨望形诸词色”。1647年李成栋在广东由于镇压农民起义而损兵折将，当江西守将归明之后，切断了广东与清廷的直接联系。李成栋权衡利害，终于宣布倒戈归明，奉永历正朔，说“又闻新天子在粤西，……若引兵辅之，事成则易以封侯，事败亦不失为忠义”。李成栋和金声桓一样，他们的叛明降清或叛清归明都以个人得益至上，他们都不去利用大好的抗清形势，联兵反清。相反，李成栋忙于接受永历帝的封爵，“备法驾”，迎接永历帝返肇庆，“自梧州至肇庆结彩楼数百里，旌旗蔽空，楼船相属”，使永历“朝政皆成栋父子掌之”，权倾一时。1648年9月，南昌金声桓受困告急，李成栋受命前往援助，出师不利，20万军在赣州战败，从庚关败退600里至梅岭。此后再次出师，于1649年初守赣州的信丰，被清军围困，李成栋战败溺死。顺治六年，何腾蛟于湘潭战败被杀，永历政权遭到重大打击，失去了一大支柱。顺治七年(1650年)，清兵攻入桂林，瞿式耜被俘遇害。郝摇旗、李来亨等也因紧遭排挤而相继离去，独自坚持抗清。

清军在全国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即令平西王吴三桂驻四川，定南王孔有德驻广西，靖南王耿精忠和平南王尚可喜驻广东，企图将南明势力进一步压迫至云贵，然后一举消灭，以绝后患。

在清军的深入进攻之下，桂王由肇庆仓皇西奔，而梧州，而南宁，席不暇暖。顺治八年(1651年)，清军攻陷梧州、柳州，占有两广之地。桂王进退失据，再也无力周旋。这时，大西农民军余部已在云南、贵州建立了基地。以孙可望、李定国为首的核心领导经过一番争议之后决定，大敌当前，应以民族利益为重，乃效仿大顺军的做法，执行“扶明逐清”的方略，并于顺治九年(1652年)二月初六，迎永历帝至安笼(今贵州安龙)，改名安龙府。桂王惊魂未定，封孙可望为秦王。在大西军的支持下，永历政权又得以延续了一段时间。

五月，大西军领导集团决定北伐抗清，兵分两路，李定国率领由

步、骑、象队共8万多人的主力取道贵州，出湖广、由武冈，全州直趋桂林，进逼广东肇庆；一路由刘文秀率领，有步、骑、象队共6万多人，由滇东出四川叙州，下重庆，取成都、汉中，直逼关中；主帅孙可望居中策应，并将大西军统帅部由云南移驻贵州。李定国率领的一路，由川东入湖南，所向披靡，“兵声大振”。桂林之战，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焚而死。衡州一战，大西军又击毙清敬谨亲王尼堪。大西军节节胜利，“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刘文秀在四川也大败清军，收复叙州、重庆等地，迫使吴三桂退守汉中。然而刘文秀在屡胜之时，麻痹轻敌，被吴三桂反击而败退。李定国孤军无援，又遭孙可望忌害，被迫退回广西。于是四川、湖南得而复失，孙、李决裂渐成定局。

孙可望是张献忠的部下和养子，大西军自从张献忠在四川牺牲后，形成了以孙可望和李定国为核心的领导集团，退守云贵，坚持抗清。李定国认为。“闯、献两定辛苦20年”，结果却让清朝“坐享渔人之利”，应当吸取这一沉痛教训，主张要以“恢复中原”为目的，“严辨华夷之界”，只有联合坚持抗清的南明永历朝廷，“诚心辅佐”，“恢复旧京，荡清海内”，才会有光明的前途。刘文秀、白文选等大西军重要将领对李定国的主张“极赞同”，而孙可望“不听，旦疑其有异心”。因为，在大西军重要将领中，论其威望，“平东将军孙可望，最枭；定国次之，为安西将军；而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能奇，又次之”。张献忠死后，“可望势张，常走使三将军”，逐渐产生大权独揽的欲望。而“三将军以素俦伍，亦率自王，不相下”。这样一来，大西军的领导核心就分裂为以李定国为首和以孙可望为首的两派。孙可望对农民军的力量和前途产生怀疑，对联明抗清恢复中原缺乏信心，所以，抱定“中原逐鹿，人各所得”为主张，力图实现他“称藩于滇、黔、楚、蜀之间”的欲望。当李定国大军北上伐清战果辉煌之时，“孙可望以定国擒斩两王，连复楚、粤诸郡，兵力益强，功驾已上，忌之，乃托词邀赴沅州议事，将图杀之”，多亏“刘文秀之子密遣人告其谋”，定国才未中计。李定国为避开与孙可望的冲突，决定以广西为基地，退保南宁，准备“收集溃众，再作卷土之计”。孙可望为树自己的威望，又见李定国自出兵以来屡建功勋，擅自破坏原定的作战部署，错误地率领留守的军队上前线争功，结果大败于岔路口。再进兵湖广、四川，仍是一败再败，从此退据贵州，再也不敢出征。“可望归贵阳，不敢议北出矣。清兵遂陷武、靖、辰、沅、黎平，大掠千里，民死者将百万人”。孙可望在云、贵大兴土木，建宫殿，修行宫，准备废水历，代明称帝，又派刘镇国、关有才驻守4州，尽焚沿路粮草，以防定国入滇。

在此期间，清军因粮饷不足和兵力不足，尤其慑于“李定国桂林、衡阳之战，两蹶名王”的声威，暂时对永历政权采取了战略防御的方针。为打破僵局，摆脱困境，顺治帝于十年(1653年)闰六月命洪承畴为五省经略，特授总督军务，兼理粮饷，便宜行事之权。洪承畴根据清军在湖广及两广一带往往“进守无兵，驻守无粮，旋得旋失”的教训，提出“安襄樊而奠中州，固楚以巩江南”的战略方针，主张军事上以守为战，采取守势，同时在政治上广行招抚，以瓦解敌军心，经济上开恳田亩，恢复生产。待到兵厚粮足，战守国备，再合师并进，直取云贵。

正当清军迟疑观望之时，大西军的孙、李两派竟发生了内战。顺治

十三年(1656年)，孙可望派军偷袭李定国，未能得逞。李定国随即率兵将桂王接至云南，改云南为滇都。顺治十四年，正当李定国准备大举出兵，与郑成功郑鸿逵“会师南都”，与王光兴、李来亨、刘体纯等义军“会师荆州”之时，孙可望却率军10万进攻云南，同室操戈，挑起了交水之战。孙可望的倒行逆失，引起大西军将士们的义愤，“白文选暨马进忠、维兴等悉叛可望来归”，投向李定国。孙可望全军瓦解，孙可望“狼狈入黔”。当清军得知“滇、黔内讧……西南另是一番世界”的消息时，使立即反守为攻，下令兵分三路，直扑云贵。1657年(顺治十四年)11月，孙可望率残部从贵州逃往湖南降清，“穷蹙乞降”。出于对李定国的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向清军献计，说李定国“此时兵马俱未心齐，正可剿灭。如清朝大兵进取云、贵，我等地理最熟，愿为向导，以报清朝知遇之恩”。孙可望迫不及待地“开列云、贵形势机宜”，画图山川迂曲及诸将情形、兵食多寡献之”，从而使云、贵、川的“虚实险易尽输于敌”。由此可见，孙可望作为一个手握大权的农民军领袖，他所挑起的内战，他对联明抗清事业的背叛，使大西农民军在思想和组织上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孙可望的背叛，加速了李定国的失败。但是李定国失败之日，即是孙可望失运之时。孙可望由永历朝的“秦王”变为清朝的“义王”之后，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突然死去。洪承畴经孙可望提供的情报，对西南形势“明如指掌”，对清廷原先拟定的“等三路兵马收复贵州之后，驻扎贵州，具疏请旨，勿即进滇云，定滇大兵来年内进发”的作战计划作了重大修改，建议“两路大兵同时齐发，又一路大兵前后继进，如有一路大兵先进取贵州省城，则别路大兵拟可就本省进步道路相度贵州、云南道中扼要地方兼有买运米粮处所，或分行驻扎以示即可分进滇云之势，不致三路齐集贵州省城。则我兵既有分合之势，可成犄角之形，又无屯聚拥挤争粮乏食之患，且分路驻兵得以蓄锐养威，各由经路齐进收复滇云，不致大众再有往返奔波之苦，一举而数利皆在于我……一举数害皆在于贼”。

顺治十五年(1658年)正月，清廷命令宁南靖寇大将军宗室罗托等由湖南，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等由四川，征南将军赵布泰等由广西，分兵三路进取贵州，既克贵州之后，即宜乘机进取云南”。进攻云南时，再派多罗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率八旗兵为主力。清廷和各路将领基本上采纳了洪承畴的建议，果然进军很顺利。二至三月，清三路大军向贵州进发。叛徒孙可望派了一些熟悉地形、了解李定国军情的部将充当清军的向导和奸细，清军胸有成竹，士气较高，攻势猛烈，很快攻占贵州全省，洪承畴与罗托率军进驻贵阳。吴三桂则停驻遵义一带，赵布泰军则停驻独山州一带，休整待命。十月初，清军在杨老堡(今贵州福泉县东南)召开进兵云南的会议，决定洪承畴和罗托暂留贵阳，兵分三路入云南。“多尼自贵阳入，三桂遵义入，赵布泰自都匀入，订以十二月会师云南省城。”

交水之战之后，孙可望大部人马投靠子李定国，李定国的兵力反而增强，并逐渐滋长了保守思想和麻痹思想，失去了进取精神。原来把持桂王政权的马吉翔、庞天寿等善于阿臾逢迎，仍受到李定国的重用，特别是在打败孙可望之后，昆明城内，歌舞升平，一片太平景象。当清军大举压境贵州时，李定国还逗留在滇西永昌，弹压孙可望残部的叛乱。当清兵分路并进，攻陷贵阳、遵义等地之后，李定国才从滇西回师，失

去了积极反击的有利时机。李定国率主力在南路与清军卓布泰中遭遇，发生激战，大西军连败于罗炎、凉水井，全线崩溃，大营陷落，李定国的妻子家属被杀，兵民死难者不下三四十万人，大西军的精锐损失殆尽。

1659年1月5日(顺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李定国退回昆明，永历小朝廷人心惶惶。李定国得知清军10余万分三路入滇的消息后，急忙分兵三路迎敌。吴三桂从水西(今贵州黔西县)小道绕到七星关(今贵州赫间县东)后袭击守关明军，明将白文选措手不及，兵败撤退，清军经过乌撒(今贵州威宁)入云南。多尼军进至安庄卫(今贵州镇宁)败冯双礼、刘正国部，造浮桥度过盘江(今贵州关岭西)，又在松岭卫击败白文选的2万明军，然后进入云南。赵布泰从盘江罗颜渡口下游10里处乘夜偷渡后，击败明军李成爵所部万人。随后又在双河口、陆格两次重创李定国军数万人，从普安州(治所在今贵州盘县城西北)间道入云南。三路清军入滇后在曲靖会师，然后向昆明逼进。永历政权狼狈西逃，经滇西永昌(今云南保山)退入缅甸，吴三桂等率清兵穷追桂王、李定国在滇西磨盘山(马龙县西北)设立三层埋伏圈，准备反击，但由于叛徒告密，清兵以炮火轰击伏兵，双方都有伤亡，但大西军这时败局已定，李定国率余部退至孟良(云南边境)，与当地少数民族一起，继续抗清。

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初三日，清军占领云南首府昆明。李定国认为清军会穷追不舍，也退入缅甸境内，并与白文先分屯边界，李定国驻猛缅。清军追至腾越(云南腾冲)西北20余里，至国境线方遇兵。清廷顺利收复了云、贵、川、广、湖五省。

顺治十八年(1661年，南明永历十五年)九月，清帝福临批准了吴三桂消灭南明永历政权以绝后患的奏章，命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与都统卓罗等，率京师禁旅赴滇，会同平西王吴三桂进军缅甸。清军分两路深入缅甸，于十一月在木帮(缅甸腊戍以北)会师。

永历帝入缅后受制于南明官僚马吉翔等人，李定国和白文选在中缅边境多次试图迎回永历帝未果。闻知清军入缅后，文选、定国两军进驻锡箔江边，凭江据守。缅王为平息战争，将永历帝朱由榔及其母，妻子等数百余人送交清军。白文选降清，李定国退走景洪。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永历帝在昆明遇害；五月，郑成功病逝于台湾；六月，李定国悲愤交加，病逝于云南猛腊，其子李嗣兴与刘文秀的余部均投降清廷。至此，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政权灭亡，清军完成了统一大陆的战略任务。

清军从入关到南下消灭南明的一系列政权，用了近20年的战争，终于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清军的胜利不是偶然的。清军入主中原，统一中国，是大势所趋。各地的抗清义军和南明诸政权的抗清斗争已显得软弱无力，只是在时间上延续了清朝统一中国大陆的时间，不可否认，活跃于各地的抗清斗争给清廷以一定的打击，反过来促成这个新的政权吸取教训，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对稳定社会秩序，保证战争的进行，起了重要作用。

从军事上分析，清军消灭南明诸政权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软硬兼施。用政治诱降和军事进攻相配合，有效地瓦解了南

明的抗清力量，同时也加强了清军的力量。清廷在派军对几个南明政权实施打击的同时，竭力笼络招抚南明官僚和将领，任人为贤。例如弘光政权的主力刘良佐、刘泽清、李成栋、左梦庚等所率几十万军队因接受招抚不战而降。郑芝龙也率11万明军投清。降清的明军转而成为清王朝镇压抗清斗争的急先锋。如李成栋率精兵进攻桂王政权，攻占广州等等。清军的招抚政策使清军本身得到加强。除了兵力有所壮大之外，一些明朝的著名将领如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耿继茂等人都受到清廷的重用，他们所率的军队成为灭亡南明的急先锋。

第二，清军在战略策略运用方面和作战指挥方面有许多成功之处。相反南明诸政权一直为内讧所扰，难以精诚团结、一致抗清。由于最初军事力量有限，所以入关之初，清军先以主力镇压农民军，同时给江南的南明政权造成和平相处的麻痹思想。之后，再调集各路大军，多路进攻，南下江南，势如破竹。清军对南明诸政权的进攻，都采用的是多路进攻、包围的战术，如攻扬州、桂林、广州等城市。而且清军基本把握了有利的战机，如当得知永历政权所属的农民军自相残杀时，立刻兴师西进，在这之前却没有轻率冒进。

南明诸政权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政治腐败。各政权内部奸佞当道，派系林立，内讧迭起。其中不乏一些抗清志士，但他们却倍受排挤，不掌握实权，因而无法改变失败的命运。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史可法的悲壮事迹了，还有大学士黄道周的不幸遭遇等。因此，南明各政权虽打出了反清旗号，并有一定实力，而且一度拥有滇、贵、川、两广及湖广等大片地区，但各政权都没采取过任何减轻人民负担、恢复生产、长期抗战的积极措施，所以，它们灭亡的命运是已经注定的。

另外，南明各政权在政治上虽以收复中原为号召，但在军事上既没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军事力量。朝廷苟且偷安，不思进取，一些将领合理的建议不采纳，以至永历政权一度出现的反清高潮成为昙花一现。各政权为争帝统彼此敌视，结果被清军逐个消灭。

第三章 逐荷夷郑成功收复台湾 大一统宝岛回归祖国

台湾是我国东南海上的一大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荷兰殖民者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侵占了台湾，并企图把台湾作为侵略我国大陆的跳板。在台湾人民的支持和配合下，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了台湾。郑成功死后，郑经集团以南明王朝为正统，割据台湾，成为清朝国家走向统一的障碍。清政府正确地坚持了国家统一的立场，出兵统一了台湾，使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又重新统一于清朝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第一节 反清复明国姓爷背父救国

郑成功是郑芝龙的长子。后来得到南明隆武帝的赏识，赐姓朱，改名成功，民间尊称他为国姓爷。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攻占福州后，身为南明唐王政权的南安伯郑芝龙投降清廷，于是隆武政权失败。年仅21岁的郑成功却以民族大义为重，与其父郑芝龙分道扬镳，举起“背父报国”的大旗，继续拥护南明永历政权，在南澳(今广东南澳县，闽、粤交界处小岛)、鼓浪屿等地，收兵数千，附近义军以及明朝旧臣纷纷起而响应，先奉隆武后奉永历的年号，进行抗清斗争，因而被永历帝朱由榔封为延平郡王。郑成功遂以福建的金门、厦门为基地，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一边与清军作战，一边发展海上贸易，逐渐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拥有水陆精兵20多万；大小船舰数千艘，控制着长江口以南的广大海域。

顺治四年七月，郑成功出兵进攻海澄(福建龙海)未下。八月，又与其叔父郑鸣(鸿)逵合军，在椒花共同击败由提都赵国祚统领的清军，然后进逼福建泉州。清延闻讯派王进领兵从漳州前往援救，郑成功为保存实力而放弃了对泉州的围攻。第二年三月，郑成功出奇不意再次率军功打闽安、泉州，当清总督陈锦率大军援救时，郑成功早已率军退回南澳。清军控制了泉州。

郑成功连年不断袭击闽南沿海各城镇，多次击败清军。顺治七年八月，进占厦门、金门(一称梧州)为根据地，不久，势力增强，郑成功联合了铜山(福建东山县)、南澳(广东南澳县)、闽安(福建闽候县东闽江口内)诸岛的各部抗清势力，共分为五路大军，雄踞海上。十一月，清军攻占广州，总兵马保率军袭占了厦门。为了再次收复厦门，顾治八年春，郑成功率领水军从南溪(旧称马口，今闽漳浦县南)登陆，进攻漳浦。清军猝不及防，退守漳浦，郑成功顺利占领了南溪。郑成功又派伏兵袭击了清提督扬名高所率的援军，漳浦守军惶惶失措，再退保漳州(福建龙溪县)，于是郑成功乘胜占领了漳浦。

然后郑军回师厦门，整顿、训练。顺治九年(1652年)，郑成功又率兵攻占了海澄(龙海南)，然后再攻长泰，郑成功部将甘辉率军与清将王进军队发生激战，结果清军退守长泰县城。清廷急调闽、浙总督陈锦，自舟山移师赴援，双方一场海战，清军被杀得大败，不但长泰被郑成功占领，而且平和，诏安、南靖等地也被郑军控制。陈锦惶急万状，急向清廷求援。清廷竟封郑芝龙为闽安侯，令其劝降郑成功。郑成功义愤填膺，下令进攻漳州。

几乎同时，清兵进攻舟山，捉拿势单力薄的南明鲁王，清军由总督陈锦，都统金砺和提督田雄等统领，所向披靡。明鲁王从舟山逃到厦门，穷蹙无归，不得已依附于郑成功。郑成功尊奉的是唐王，所以他对待明宗室的条件很优厚，将鲁王护送到了较为安全的金门。然后郑成功继续率兵围攻漳州。由于清兵援军的到来，郑成功的军队受到清军的里外夹击，腹背受敌，郑军不得已退保海澄，顺洽十年五月，清军大举进攻守海澄的郑成功，双方争夺激烈，郑成功身先士卒，下令士兵死守，

结果终于击退了清军。清军对郑成功在东南沿海的一次次骚扰非常无奈，在加强军事防守和进攻的同时，又对郑成功采取诱降。顺治十一年二月，清使携带着“海澄公”的印诏前往招抚郑成功；八月，清廷又遣使召以及郑成功的两个弟弟郑渡、郑荫前来劝降。郑成功不为所动，坚决拒绝，为此，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南明永历帝特意册封郑成功为延平王、招讨大将。

早在1647年至1649年，郑成功率领海上义师进据金门、厦门之后，郑成功便将厦门一地改名为思明州，设立“六官”，分理庶政，健全行政机构，并团结各方面的扶清力量。各地商民也齐集思明州，“井里烟火，几如承平时景象”。抗清义师力量也迅速壮大。

当1652年大西军掀起反清高潮时，郑成功率兵10万，进攻海澄、长泰、漳洲、漳浦等地，与大西军遥相呼应。1653年(顺治十年)，为了接应李定国进军广西，郑成功派水师南下至潮州，又与鲁王旧臣张名振合师北上，入长江，驻军于崇明岛。此后，郑成功一直在福建沿海作战，屡败清军，并期待着和李定国一起北伐，“卷甲长驱，鼓行迅击。首尾交攻，共焚济河之表，表里合应，立洗腥膻之穴。然后扫清宫阙，会盟畿辅，岂不大符夙愿哉！”郑成功与李定国、张名振的部将张煌言以及刘体纯、郝摇旗、李来亨的夔东十三家军这四支武装力量转战于山区海岛，不屈不挠，相互援助，共同抗清。

到1658年，清廷派兵猛攻西南的李定国军，为解救西南的危急局势，郑成功联络张煌言，举兵进攻浙江沿海，并准备北上长江以牵制清军。郑成功率兵10余万，大小战船数10艘，开始北伐。八月间，船队在舟山以北的羊山海面遇飓风，覆舟丧师，被迫退师舟山修整。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第二年6月(即清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再次大举北伐。郑成功为招讨大元帅，张煌言为监军，率17万水陆大军，兵分83营，由舟山出发，在崇明岛登陆。七月至焦山，破瓜州，进而攻克了长江的重要门户镇江，进逼南京。张煌言率一路军沿江而上，攻克芜湖之后又分兵四路，结果长江下游的徽州、宁国、太平、池州等四府三州22县纷纷归附，江南、皖南地区再次燃起抗清烽火。张煌言的部队，“军不满千，船不满百，但以大义感召人心。而义师所至，禁止抄掠，父老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泗交下，以为15年来所未见”。当时形势对郑成功的军队十分有利，但是郑成功逐渐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思想，认为南京城指日可下，“属邑节次归附，孤城绝援，不降何待”!驻守南京的清朝总督朗廷佐趁机要求郑成功暂缓攻城，待一个后自动开城投降，同时却在暗中调集清军。郑成功的义师围困南京达两个月之久，却无所事事，“日夜张乐歌舞”。清将梁化凤趁南明军战斗意志松弛，率兵从南京城内突然出击，南明军措手不及遭到惨败，甘辉等将领阵亡，全军大乱。郑成功见大势已去，仓卒退出长江，返回厦门，而张煌言所率军队在皖南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内，最后被清廷捕杀于杭州。

郑成功北伐江南，损兵折将。回到厦门之后正待重整旗鼓，清廷已派达素为大将军并调集了三省兵力进攻厦门。郑成功率军奋力反抗，力图守住厦门。1660年(顺治十七年)5月，郑成功在漳州海门港大败清军的围攻，清廷安南大将军达素仓皇撤兵，郑军缴获大量船只。这一战的

结果，恢复了郑军的士气并扩大了队伍，为郑成功率兵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当时，清朝在全国已逐渐形成了统一局面，西南地区李定国大西军的抗清斗争也转入了低潮。北方的基本统一，使清廷有可能调集更多的兵力转剿郑成功，对付东南一角的厦门。同时，郑成功的义师退出江南以后，清统治者为了防范这支部队再次北伐，以便最后消灭它们，已于1661年(顺治十八年)发布“迁界令”，令从山东到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30里。渔舟商舟禁止出海，田园荒芜也不得耕种。清廷为了防范郑成功，不惜以牺牲沿海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作为代价。面对这种局势，1662年年初，郑成功“集诸将密议曰：……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扰。并可生聚教训也”，于是决定暂避清军的攻击，出兵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作为积蓄力量，继续抗清的基地。

第二节 出兵逐荷顺天意光复台湾

美丽富饶的台湾岛自古就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东临太平洋，南隔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群岛相接，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东北与硫球群岛相接。我国的庙岛群岛、舟山群岛、海南岛和台湾岛一起，筑成了东南沿海的海上长城，不仅“为全闽外藩”，而且为“腹地数省之屏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化渊源关系，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旧石器时代。秦汉、三国时，史书上已明确记载了大陆与台湾(旧称夷州)居民大规模交往情况。唐代已有汉人移居台湾，澎湖等岛屿。十三世纪末，元朝政府在潮湖设巡检司，管辖台湾、澎湖等地，隶属于福建泉州路同安县(今福建厦门)。这是我国政府在台湾地区设置地方政权机构的开始，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在我国史籍中，沈莹《临海水士志》和陈寿《三国志?吴志》把台湾称作“夷州”，《隋书?流求传》开始叫做“流求”。自隋迄元的七八百年间，流求、留仇、流虬和璃求，都是指台湾而言。都是同者异写。明朝洪武年间把台湾称为“小琉球”。明代嘉靖以后，由于台湾海峡两岸贸易日趋发达，到过台湾的人越来越多，因而对台湾的称号也就更加形象，生动，如“鸡笼山”(基隆)、大员、台员、台湾等。1661—1662年，郑成功逐走荷兰人，以南部沿海为中立，在台湾设置府县，建立了统治。1683年，清政府就此设立了台湾府，规定与厦门单口对渡，自是，台湾逐渐成为全岛的名称。

16世纪，欧洲通往东方的航路被发现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一批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纷纷东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活动，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掠夺。侵占领土。荷兰是“十七世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语)，它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十七世纪中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它的商船队航行于五大洲的海洋之间，被称为全世界“海上马车夫”。荷兰殖民者在东方侵略的主要对象，除了盛产香料的东印度群岛外，就是地大物博的中国。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在欧洲市场上供不应求，勤勉又能干的中国人则是殖民者急需的劳动力。故此，荷兰殖民者对我国东南沿海虎视眈眈，企图夺取一个足以控制对华贸易和掳掠中国人的基地。当时荷兰人心目中的基地有三个：首先是葡萄牙殖民者占据的澳门，第二为位于中国至吕宋航线中途的澎湖，第三则是距离商业中心略远，但处于不设防状态的台湾。

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八月，侵占我国澎湖列岛的荷兰侵略者被明朝军队驱逐之后，约有2000余人逃往台湾，在台南台江登陆，并修筑台湾城(今台湾南市西安平港)、赤嵌楼(今台湾台南市西北的镇北坊)等城堡。崇祯十五年(1642年)荷兰军队在淡水(今台湾新竹)击败西班牙军队后，迫使西班牙殖民势力从台北地区撤出，从而独霸台湾全岛。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岛上的各族人民进行血腥的镇压和无止境的奴役，不断激起台湾汉族和高山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较大规模的起义就有20余次，其中最著名的是顺治九年(1652年)八月五日郭怀一领导的起义。这些起义虽

因遭到荷兰殖民者的残酷镇压而失败，但却进一步激发了台湾和大陆人民团结对外，反抗侵略和收复台湾的决心和勇气。

台湾各族人民反抗荷兰殖民者的起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台湾各族人民从荷兰侵略者侵入台湾的第一天开始，就纷纷行动起来，拿起棍棒、竹竿、锄头、镖枪以及从荷兰人手里抢来的一些火器，进行了猛烈的反抗。

1645年(清顺治二年)，汉族海上武装首领陶肯率助手3人，潜入台湾岛北部，计划联合土著各族，袭击鸡笼、淡水的荷军。结果计划泄露，陶肯被捕，被荷兰人处以车裂刑。

1649年(顺治六年)，大员汉族人民在安海秘密策划袭击荷兰城堡，逐走荷兰人。

凤山傀儡社人民凭借险峻的山地，胜利地抗击了荷兰殖民军的多次进攻，使他们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狼狈退走。

此外，奋起反抗殖民暴政的还有，最南部的朗峤十八社，南部的旦克都克社，东北部的扫笏和卡比塔板社，东海岸的塔马路干社和北部的波杰颠、沙鹿沙颠、金金格诸部落。反抗的火焰烧遍了全岛各地。

1652年9月郭怀一起义是台湾人民反荷起义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郭怀一本来是郑芝龙留在台湾的旧部之一，担任过多年的土美村长老。当时荷兰人修筑了赤嵌城，背山面海，置巨炮，增加戍卫，对岛上各族群众日夜防范。郭怀一目睹台湾同胞备受荷兰人的种种欺压凌辱，气愤万分。“怀一在台开垦，家富尚义，多结纳．因愤荷人之虐，思歼灭之。九月朔，集其党，醉以酒，激之曰：“诸君为红毛所虐，不久皆相率而死。然死等耳，计不如一战。战而胜，台湾我有也，否则亦一死。唯诸君图之！”原订在阴历中秋节夜宴请荷兰官员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后因计划泄露，起义提前发动。郭怀一率起义群众1．6万余人，顺利攻占了赤嵌市街。“初七夜伏兵于外，放火焚市街。居民大扰，屠荷人，乘势迫城”。起义群众挥舞竹竿，棍棒、锄头奋勇抗击，但终敌不过荷兰人的火枪火炮。结果，郭怀一中弹身亡，其余的起义群众在吴化龙等人的带领下，退到了欧汪、大潮一带，与敌军抗争了七、八天而最后失败。事后，荷兰殖民者疯狂搜捕、屠杀起义的汉族人民，血腥恐怖持续了半个月之久，被杀死的居民达1800余人，约占当时赤嵌地区人口的4／5，而荷兰人不过死了2人。血的教训使台湾人民认识到，要驱逐和战胜这帮殖民强盗，除了坚决反抗外，还要争取大陆人民的帮助与配合。从此，台湾人民的抗荷斗争就走上了与大陆人民联合作战的新的胜利阶段。

何廷赋献图与郑成功的决策郑成功在坚持反清斗争的15年中，逐渐形成了一支拥有大小船舰数千艘、水陆精兵二三十万的空前强大的海上武装，控制着长江口以南的广大海域。显然，郑成功大军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对清朝在东南沿海的统治产生影响，并且对荷兰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构成威胁。”海外诸国惟日本最富强，闻郑氏兵精，颇惮之”。多行不义的荷兰殖民者自然把郑成功的大军看作是保持和扩大其侵略活动的巨大障碍。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开始就很注意搜集郑军活动的情报，并不断加强台湾的防御。

郑成功对台湾有着深厚的感情。早在明末天启年间，其父郑芝龙就

曾组织福建饥民数万人移居台湾。台湾的汉族人民也普遍认为台湾岛是由郑成功的父亲开发的，是完全属于中国的土地。面对荷兰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残酷统治和台湾各族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郑成功早就萌发了出兵逐荷收复台湾的思想，在他的一首《复台诗》里，有这样的诗句："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之复先基"。

郭怀一起义之后，荷兰殖民者认为是郑成功策划的。于是，当他们残酷镇压了起义之后又害怕郑成功大军的报复，荷兰殖民者除了在岛上增强兵力、建筑城堡和严密监视各族人民之外，还开始在公海海面上肆意劫掠郑成功的商船，任意搜查过往船只，扬言"将采取有效措施来破坏殿下(按：指郑成功)士兵军饷，赖以维持之商业活动"。郑成功面对荷兰殖民者的蛮横挑衅，下令以水师封锁台湾，并禁止所有来往商船开往台湾。封锁令实施近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损失惨重，他们在台湾的兵力有限无法展开反封锁，对郑成功大军无可奈何，只好采取妥协，派他们认为是台湾最能干的华人长老何廷赋于1657年(顺治十四年)7月携重礼前往厦门，找郑成功谈判。

何廷斌是郑芝龙的旧部，很有爱国心，他趁与郑成功商谈之机，把台湾岛内荷兰人兵力配备及布置等重要情况告诉了郑成功，还有一张有关台湾港道和荷兰兵力分布、炮台设置的地图。何廷斌的这一爱国行动，代表了台湾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和要求。因为早在郭怀一起义被镇压之后，台湾人民中间就盛传郑成功的大军要来收复台湾的种种传说，这说明他们早就把收复台湾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付在郑成功身上了。只可惜当时郑成功正全力与清廷较量，准备北伐，一时难以分兵去进攻台湾的荷兰殖民侵略者。

1659年1月(顺治十六年)7月，郑成功率大军进攻南京失败后，他看到清朝统一全国之势已经形成是无法扭转的了，而自己则势孤力弱，难以持久。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和客观形式的变化，经过反复深入细致考虑之后，郑成功作出了向清朝寻求妥协，集中全力去收复台湾的决定。这是郑成功所率大军在军事战略上的一次根本性转变，是一个英明大胆的决策，对于收复台湾和结束大陆分裂的局面具有极其重大和现实的意义。7月底，郑成功不顾张煌言、罗子木等将领的反对，下令北伐全军退出长江。8月上旬，在崇明岛驻扎时，郑成功派蔡政前往北京与清廷议和。年底，从北京只身逃回的蔡政带来了清朝拒绝和谈并派安达将军达素率大军来"合剿"的消息。郑成功于1660年(顺治十七年)5月，被迫率军应战，打退了清军的进攻，同时派兵"往平台湾，安顿将领官兵家眷"以留后路。郑成功所率大军击溃了清军的围剿之后，仍担心清廷会派大军卷土重来，所以不敢放松戒备，开始调集兵力，赶修船舰，积聚粮食，准备迫不得已时渡海进攻台湾。所以"成功虽喜大胜，经苦弹丸西岛，难以抗天下兵"，1661年(顺治十八年)正月，清帝福临死讯传到厦门，郑成功估计清王朝在所谓"国丧"期间，不可能大举对外用兵。同时，又闻李定国出师失败，永历帝逃往缅甸，深感日后抗清的艰难。于是，权衡之后郑成功认为立刻出兵收复台湾才是上策，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绝不能错过。郑成功立刻在厦门召开了军事会议，召集诸将密商出兵台湾的大事，对大家鼓动说："前年何廷斌所进台湾一图，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10万。造船制器，吾民麟集，所优为者。近为红夷占

据，城中夷伙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可得者。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了。”但众将意见不一，宣报后镇吴豪认为：“豪闻其水路险恶，炮台坚利，纵有奇谋，亦无所用，不如勿取。”建威伯马信则认为进兵台湾是万全之计，“今乘将士闲暇，不如先统一旅，经视其他，可取则取，否则作为后图，亦未为晚。”郑成功力排众异，决定率兵亲征台湾，把筹划多年的复台大计付诸实施，留世子郑经守厦门、金门。

台湾以“澎湖为门户，鹿耳为咽喉，七鲲身毗连环护”。由外海进港有两条航道：一是北线尾岛与一鲲身之间的南航道，道宽水深，航行便利，但荷兰人在此驻兵船舰，且有重炮扼守，郑军水师难以通过；一是北线尾岛北端的北航道，道狭水浅长数10里，一般稍大船舰惟涨潮时方可通航至赤嵌楼北边的禾寮港。这里原来也有荷兰人建立的炮台，可以用炮火封锁北航道。但几年前炮台遭暴风袭击而倒塌，荷兰人于是将被损坏的甲板船沉入航道，使大船难以通过，以为万无一失，故没有再设防。这两条航路的情报和地图是由何廷斌提供的，郑成功决定先收澎湖作为入台湾的门户，等待鹿耳门一带海水涨潮之时，乘机进入北航道，在禾寮港登陆。

收复台湾，驱逐外敌，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反对把我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这是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郑成功实践了这一符合海峡两岸人民共同心愿的行动，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事业，他因此而成为民族英雄。

巧渡鹿耳门登陆台湾岛1661年(顺治十八年)2月，郑成功从厦门移驻金门，将准备攻打台湾的水师舰队分成两路，前后呼应。郑成功亲率首批复台大军1．5万人，分乘大小战舰200余艘，从金门料罗湾启航，乘风破浪驶向台湾。从祖国大陆派出这么强大的海陆大军前往台湾，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全军将士心潮澎派，斗志昂扬。郑成功大军抵达澎湖之后，曾即刻向台湾方向进发，但由于狂风掀起巨浪，大军又被迫折回澎湖，被迫在澎湖等待了7天，然而天气仍未见好转，全军所储备的粮饷已经告罄。为了不影响全军将士的士气，也为了赶上在潮期来临时进入鹿耳门，郑成功当机立断，令部将陈广等率3000人驻守澎湖，自己率大军顶着狂风巨浪继续前进，终于在四月初抵达鹿耳门港外。

北航道俗称鹿耳门，素有天险之称。港门狭窄，沙石淤浅，航路迂回难行，一向只能通行小舟船，但经过多年溪流和潮汐的冲刷，港内逐渐形成了一条可以航行大船的航道，当地的渔民对此都知道，何廷斌又进一步测绘成图，因此郑成功在准备登上台湾岛之前心中已经有了几分把握。郑成功身先士卒，在漫天浓雾的掩护下，换小船在鹿耳门港附近察看地形，恰好正是每月初的涨潮期，中午，海潮大涨，“何廷斌坐船头，按图纡回”，带着地图和澎湖渔民领航，郑成功的舟师紧随其后，进入鹿耳门航道。由于水位加涨了数尺，船队的大小航舰乘潮鱼贯入港，毫无阻碍。

荷兰殖民者事先已经作了备战的准备，他们在岛上各个战略要道和南北两处港口修筑炮台，堵塞北航道，并严禁商船和渔民出海，同时荷兰人还抢掠和屯贮了大批粮食。然而当郑成功的大军突然出现在荷兰人眼前时，他们还是难以相信，不胜惊骇，以为“兵自天降”。因为郑成功

的大军利用了当天“上午及全夜有浓雾，不能远望”的机会，从敌军认为不能通过的航道，在涨潮进出其不意地绕过荷军的炮台和航道中的淤浅险阻，在北线尾岛和禾寮岛迅速登陆。当时的荷兰人以为郑成功大军真的有什么“天意相助”，在台湾人民闻讯郑成功大军登陆台湾岛的日子里，甚至流传说郑成功是东海大鲸所变，所到之处，潮水随之暴涨等等。其实真正起到相助作用的是人民的意志，是人意而不是什么天意。

赤嵌居民看见盼望多年的祖国军队从天而降，掀喜若狂，奔走相告，纷纷前往帮助大军登陆。台湾的高山族和汉族居民尽其所能，携带着货车、箩框、小舟等运输工具前往海边迎接郑军上岸，不到两小时，已有好几千名士兵顺利登陆。“各近社土番头目俱来迎附”“南北路土社(即高山族人民)闻风归附者接踵而至”，“土民男妇壶浆迎者塞道”。这样，大军很快站住了脚，先头部队立即分头占据了冲要地点，保护市街、房屋和粮食，并包围了荷兰军队在岛内最重要的据点——普罗文查城堡(今台南市赤嵌楼)，同时，郑军的水师也基本控制了赤嵌与热兰遮(今安平)之间的海面，把岛上的荷兰守军围困在两个互相隔绝的据点里。

尽管荷兰人眼睁睁地望着大批郑成功的军队在他们的火炮射程之外登陆，尽管他们看到岛上的居民不顾二切地前往迎接登陆的大军，荷兰人还存有侥幸，希望用他们所拥有的坚船和利炮来战胜人多势众但却以弓弩和大刀加木船为主的中国军队，荷兰人相信他们的优越的军事技术和设备。于是，荷兰军队士兵全副武装，荷枪实弹，在火炮的掩护下，急忙从海陆两方面组织反扑。当时，驻台湾的荷兰殖民军长官揆一在台湾城(今台湾台南市西安平港)，城内有兵1000多名。未嵌楼的荷兰守军由长官描难实叮统领，不过400多名。水军有海克托号和斯、格拉弗兰号2只战船，以及几艘快艇、帆船、平底船，水兵仅数百人。荷兰人的水陆军队人数有限，但装备精良。

荷兰军舰在2艘主力战舰的带动下，辅以小帆船白鹭号和快艇马利亚号，边开炮边向郑军水师船队冲杀过来。郑成功命宣毅前镇侍卫镇陈广和左虎卫左协陈冲率水师中较大型的船舰60余艘迎战。敌舰队的两支主力舰宛若海面上的两座小山，每舰长约30丈，宽6丈，船板厚2尺多，中国人称为“夹板”船，系用园木制成，极其坚固。甲板上有5个桅杆，帆墙可承受海上八面来风，且不惧逆风，行驶迅速。每舰装有火炮20一30门，而郑成功的水师船舰高大约仅为敌主力舰的1／3，每船仅配有2门火炮，一般情况下遭遇敌舰时．往往抵挡不住对方利用风力和船重而被压沉于海面。由于郑军水师官兵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充分发扬了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精神，利用敌舰笨重在港内转侧不便和易于搁浅的弱点，将几十艘灵活的船舰紧紧围住敌舰的核心——最大、最重的海克托号，从四面八方向敌舰轰击。其中有五六艘轻便的小木船，由几位最勇敢的水兵掌舵，船上满装着已冒出熊熊火焰的燃烧物品冲向敌舰，士兵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把这些“火船”钉死在荷舰的船板上，然后跳水泅回。海克托号立刻浓烟滚滚，不久火药舱爆炸，这艘荷军的王牌战舰连同舰上的100多名水兵就此沉入海底。郑军水师使用的是我国古代人民从长期同西方殖民强盗作战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著名“火船”战术。其它几艘大型敌舰见势不妙，调转方向逃出港外，郑军水师则紧迫不舍。又

有五六艘小船连在了一起，搭成了一座浮桥，钩住了斯格拉弗兰号，几位勇士奋勇地爬上敌舰，采用了肉搏战、火攻战、接舷战，差一点把它俘获。另一艘郑军小火船缠住并烧毁了一艘敌舰。荷兰人的水师受到重创，剩余的几艘大船狼狈逃跑，再也不敢在台湾海面露面了。

在陆路，驻守台湾城的揆一观察到北线尾上的郑军戒备不严，立即命令贝尔德上尉带240名士兵袭击。这些殖民者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因为他们有在1652年镇压郭怀一起义的经验，自以为装备优良，城堡坚固，必胜无疑。所以他们口出狂言："二十五个中国人加在一起还抵不上一个荷兰士兵"，"只要放一阵排枪，打中其中几个人，他们便会吓得四处逃跑，全部瓦解"。在北线尾岛登陆后，这些洋鬼子便以12人为一排，连放了三排枪，然后神气十足，目中无人地阔步前进，全不把郑军的力量放在眼里，敌人的骄傲狂妄正好给了郑军以可剩之机。郑成功命宣毅前镇陈泽率领所部迎击，士兵们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弹无虚发，十分英勇。双方混战在一起，箭如雨下，荷军无法招架，措手不及。将士们武器装备虽然落后，但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以一挡十，"士兵低头弯腰，躲在盾牌后面，不顾死活地冲入敌阵，十分勇猛而大胆，仿佛每个人家里还另外存放着一个身体似的，尽管许多人被打死，他们还是不停地前进，从不犹豫"。另一路郑军从后路包抄过来，殖民军腹背受敌，他们初战时的狂傲之气这时已完全被恐惧所代替，惊慌失措，各自逃命。而郑军士兵则乘势猛攻，见人就砍，毫不留情。郑军3000人正面迎敌，另有800人迂回敌后包抄，激战的结果，荷军贝尔德上尉及100多人当场丧命，少数人跳人大海而葬身鱼腹，幸免逃脱的只有80人。

荷兰殖民者不甘心失败，揆一又令阿尔多普上尉率200名士兵乘船渡海为赤嵌楼的荷军解围，然而首先登陆的60名荷军士兵，尚未站稳脚跟就被郑军中的敢死队"铁人"所歼灭。尚在船上的阿尔多普亲眼目睹了岸上发生的一切，惊魂未定，连忙不顾一切逃回台湾城。

荷军投降台湾光复郑成功的大军登陆成功之后，立刻开始了收复台湾，驱除荷兰殖民侵略者的战斗。在台湾人民的支持和配合下，郑成功的水陆两路军队大获全胜。荷军全副武装，有数量充足且装备精良的火枪火炮和大型战舰，而中国军队仅靠弓弩、大马和小型船队就战胜了侵略者，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和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坚定立场。

荷兰侵略者在海陆两路的反击均遭失败后，被迫退缩到两个据点——赤嵌城和台湾城，妄图依据城堡工事作垂死抵抗。郑成功为了减少残敌的反抗，一再勒令荷兰守军从速献城投降，否则必遭毁灭。而驻守在赤嵌城的荷军拒不投降，采用了收缩兵力、固守待缓的方针，赤嵌楼周长45丈，高3．6丈，周围有4座炮台。郑成功在派军围困之后，采取了先弱后强、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方针，让士兵先集中火力攻打4座炮台。荷兰守军顾此失彼，加上粮弹日益缺乏，士气低落，难以长期坚守抵抗下去。揆一见情况急迫，被困荷军毫无反攻或突围的希望，唯一的可以依赖的后台东印度公司的援军又不知何日能到，于是揆一派出两名代表出城与郑成功和谈。他们准备付出一笔赔款劝诱对方退出台湾，如果不成，就同意让郑军暂且进驻台湾，而让赤嵌城守军集中到台湾城附近。双方互不侵犯和骚扰。郑成功识破了敌人企图以"牺牲一部，顾全

大局”的缓兵之计，义正辞严地警告荷军代表：“这个岛(台湾岛)是属于中国的。当中国人不需要的时候，可以允许荷兰人暂时借居，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荷兰人，自应把它交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执事率数百之众，困守城中，何足以抗我军……执事若不敌，献城降，则余当以城意相待……”这时赤嵌城内用水仅能维持8天，而火药还不足应付一次反攻，但揆一的使者却不顾城内荷军官兵的安危，坚持要求把赤嵌城内的守兵撤到台湾城为和谈的条件。郑成功坚决拒绝了揆一妄图保存岛上荷军实力的要求，立即缩紧了包围圈，并调集了数10门大炮对准赤嵌城，勒令城内守军无条件投降。城内敌军负隅顽抗，于是郑军火炮开始猛轰。但赤嵌楼城墙颇为坚固，郑军大炮久攻不下。城内的台湾百姓向郑成功献计说，城外高山上有溪水，自上而下绕过赤嵌城，并从城中穿过，是城中人惟一赖以饮用的水源。如果堵塞溪流，那么赤嵌城里的守军不出几天就会放弃抵抗了。郑成功采纳了这一建议，果然使城内的守军惶恐起来。在郑成功大军登陆的第三天，赤嵌城内的荷兰守军放弃了抵抗，乖乖地交出了城堡及所有军事物资，全部守军从司令到士兵约700人都成了俘虏。

郑成功随即派军包围了荷兰殖民者在台湾的统治首府台湾城。

郑成功命令大军从水陆两路围攻台湾城，先用猛烈的火炮轰击台湾城外围的防御工事，从而缩小了对侵略者的包围圈。台湾城周长277．6丈，高3丈多，共3层，城墙四角外突，居高临下，备有火炮数10门，能用密集的火力封锁四周道路，易守难攻。当时，城内共有居民1700多人，其中荷兰军队870人，其余为普通居民。其中有些是妇女儿童，四月底郑军开始攻城，28门火炮齐发，猛轰4个多小时，城墙多处被摧毁，同时荷军以炮火还击。但因荷军地处优势，火炮精良，而郑军地势不利，粮弹缺乏，伤亡较大。所以，郑成功改强攻为长期围困。郑成功认为“台湾孤城无援，攻打未免杀伤”，决定“围困俟其自降”。因为当时形势对郑成功及其军队极为有利，郑成功认为战争大局已定，胜券在握。岛上各族群众得到祖国军队与荷兰侵略者交战的消息后，精神振奋，不约而同拿起刀剑追杀侵略者，捣毁荷兰人设立的官署和殖民机构，在全岛形成了大规模的人民反荷起义。甚至连荷兰人一向认为最为可靠的信奉基督教的新港、法沃兰等地群众也捣毁教堂。焚烧《圣经》、《十诫》之类的书籍。几天前还是不可一世的荷兰人，而今在台湾岛上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台湾人民站起来了，这种大好形势使郑成功认为荷兰人在台湾已经是秋后的蚂蚱，不足为患，故而采取了“守株待兔”的战术，以少数部队围困台湾城，“待其自降”，而将大部分兵力抽往南北两路开荒自给，以解决军粮不继的问题。

困守在台湾城内的揆一以为有机可乘，自作聪明，派人劝郑成功撤兵，条件是除了年年向郑成功纳贡以外，再送劳师银10万两。郑成功不为所动。尽管荷兰殖民者贼心不死，一再采取种种卑鄙手法，或用“和谈”拖延时间，或是以金钱利诱，或是乞求援兵，甚至妄图勾结清政府进攻郑成功的军队等等，都没有动摇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决心。

在围困台湾城期间，郑成功的第二批部队在将帅黄安等人的统领下抵达台湾，共约6000人。这样，第一批入台的郑军稍稍缓解了粮食危机，兵力也得到了加强，大军加紧修筑防御设施，修造配备攻城用具和

调运火炮，派小部分兵力四处收复其它失地，郑军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台湾各族人民的欢迎。

荷军的通讯快艇马利亚号在海战中被郑成功的水师击败后，从台湾沿菲律宾群岛逆风而行，近两个月才抵达巴达维亚，请求援助。巴达维亚当局派雅科布?考宇为台湾司令官，率战舰10余艘、一批货船和725名水兵出发，在1661年8月抵达台湾海面，因为风浪很大不敢靠岸，其中1艘小艇触礁沉没。郑军水师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制定了作战方案。公历9月10日，荷兰救援军在台湾城附近登陆，会合岛上荷军的残余力量分水陆两路进行反扑。荷兰殖民者还商定了战斗目标和行动计划，以卢特?塔华隆?贝斯为总指挥，以2艘主力战舰迂回到市区后面，用火炮摧毁郑军的炮台和战船；派三四百名士兵进攻市区；另派20只左右的船队，攻击附近海面上郑军水师的10余只战船。于对郑军官兵见一个杀一个，不要俘虏；捕捉或焚烧郑军船只的人将得到重赏。

公历9月16日，荷兰舰队首先在海上发起进攻，于是第二次海战爆发。郑成功指挥水师奋力反击，宣毅左镇官兵和戎旗左右协水师官兵同仇敌忾，勇猛杀敌。双方激战还不到1个小时，郑军水师官兵就用火船烧毁了敌舰“克登霍夫”号，用炮火击碎了“科克伦”号，杀死荷兵300名，另外还俘获了小艇3艘，战果辉煌。在陆战中，荷军也遭到重创。荷军眼见郑军人数众多，满山遍野，声势浩大，不敢主动出击，只好固守待援。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加上粮、药缺乏以及天气酷热，荷军病亡相继，士气低落，斗志消沉，逃亡，投降的事件时有发生，荷军城堡中笼罩着一片绝望的气氛。至此，荷军战死病亡者已达1600多人，仅存700多名缺粮少药的官兵。为挽救垂死的命运，一直漂荡在海面不敢靠近的雅科布?考宇，带着被打败的七零八落的船队(3艘战舰，2只快艇)驰向福建，企图勾结清朝军队袭击厦门，迫使郑成功撤兵。但由于在澎湖遭遇风暴而退回台湾海面，考宇乘机经暹罗逃回巴达维亚，从而使荷军勾结清军夹击郑军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台湾城南侧的小山上，有一处荷兰殖民者精心修筑的城堡，名为乌特利支堡，荷兰人特别加强了对该堡的防守，因为这是台湾城外若干城堡中最重要的一个，如果该堡被攻克，则台湾城必然失陷。郑成功对敌军的意图十分明了，他根据从俘虏中了解的情况，重新布置兵力，在乌特利支堡外围修筑炮台3座。这样，在围困了敌军达8个月之久以后，郑成功决定采取攻势，给负隅顽抗的荷兰殖民者以严惩。

1662年10月，中国军队的火炮再一次轰响，位于乌特利支堡南端和东端的3座郑军炮台，28门大炮齐发，炮弹呼啸着飞向城堡内的荷军阵地。在郑军3个炮台的外围城堡壕里，数千名将士万箭齐射，呐喊者连成一片，惊天动地。郑军在3座炮台里，居高临下，可以用火炮轰击城堡内的每一寸土地，刹那间，2500发炮弹象雨点般落入城堡内，敌军防不胜防，无处藏身，惊慌万状，斗志全无。敌军被迫退回台湾城，郑军顺利攻克乌特利支堡，进一步缩小了对台湾城的包围圈。城堡内的荷兰殖民军头子揆一多次与属下商讨对策。此时他们的外援已毫无希望，即使有援军抵台湾也难能在郑军水师的防范之下登陆，城堡内有战斗力的荷兰官兵仅剩下600人左右。心灰意懒的荷兰侵略者对他们所处的形势已经完全绝望，决定与郑成功和谈，在优惠条件下交出，城堡。经过了

几天谈判后，1662年2月1日(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荷兰侵略者终于被迫在投降书上签字。按照条约规定，荷兰殖民侵略者交出了在台湾城的所有城堡、武器、物资，包括大炮150尊，小铳4000支，足够5个月食用的粮食和价值471．500荷兰盾的珠宝现金。郑成功则遵守诺言，对缴械投降的侵略者采取了宽大政策，允许剩余的五六百荷兰士兵在其长官揆一率领下，分剩船舰8艘(其中4艘由郑军发还)退出台湾，并带走了他们个人的财产。就这样，荷兰殖民军头目“揆一降成功，成功纵其归国，台湾平”。至此，沦为荷属殖民地达38年之久的台湾岛重归祖国怀抱。郑成功在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回台湾的伟大事业中，为祖国和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取得收复台湾的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郑成功进行的是保卫国家、收复失土、驱除敌寇的正义战争，符合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得道多助。其次郑成功的水陆大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将士们不畏难险，不怕流血牺牲，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忱。荷军全副武装，有大量的火枪火炮，而且城堡坚固，船坚炮利，而中国军队只有弓箭、大刀和木船，装备低劣，然而郑军官兵们却用这些简单的装备战胜了握有先进枪炮的侵略者。同时，郑军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与荷军作战的。由于粮饷短缺，为减轻当地台湾人民的负担，郑成功除设法从大陆调运以外。还令部队开荒垦田，自给自足，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第三，郑成功对出兵台湾成竹在胸，制定了较为正确的作战计划，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巧渡鹿耳门，智取赤嵌楼。用火船撞敌舰，水师严守海面断敌外援，然后围困台湾城，使其孤城援绝。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了“十七世纪资本主义的标准国家”、东方的殖民霸主荷兰侵略者，沉重打击了西方殖民列强的凶焰。鼓舞了亚洲及其它地区人民反殖民主义侵略的斗争，具有世界意义。

郑成功在收复台湾4个多月后，于康熙元年(1662年)五月初八病逝。

第三节 郑氏顽抗施琅专征台湾

软硬兼施清兵攻克金厦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立刻在岛上建立政权，以台湾城(或称热兰遮城)为安平镇，改名王城。以赤嵌城为承天府，或称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天兴县管北路，万年县管南路，分别设官置守。郑成功还颁布了垦荒条例，允许文武各官圈占土地，鼓励各镇官兵开荒垦田，自给自足，寓兵于农。郑成功指出："故善为将者不得不行屯兵之法，如充国之屯羌中，诸葛之屯斜谷，姜维之屯汉中，杜预之屯襄阳，而后战无乏粮，守无饥色。……今台湾为新创之地，虽僻处海滨，安敢忘战。故行屯田之法，仅留勇卫、侍卫二旅以守安平、承天，余镇各按分地，分赴南北开垦，使野无旷土，而军有余粮。……"当时，台湾土地新辟，瘴疠流行，"病有十之七八，死者甚众"，又有长达数10丈的巨蟒为患，开荒垦田异常艰苦。如果没有郑军官兵披荆斩棘的耕作，又哪里会有日后台湾农业的迅速发展?针对清廷"五省迁界"的暴政，郑成功又积极鼓励沿海各族人民移居台湾，"闽浙居民附舟师来归，烟火相接，开辟芜土，尽为膏腴"。

郑成功积极开发，加紧巩固台湾的方针，遭到了军队内部两种力量的抑制和反对，一种是以张煌言为代表的南明遗老。他们认为郑成功不继续反清而移师台湾，是不忠于明室的叛逆行为。但郑成功不为所动，一心一意加强台湾的建设和防守。果然，荷兰殖民者不甘心就这样失去台湾，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了空前强大的舰队三次东来：1662年6月10月和1664年10月，企图联合清军，重占台湾，均由于郑军戒备严密而未能得逞。历史证明，郑成功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另一种阻力来自留守后方的郑军高级将领。早在1661年初郑成功决策收复台湾的军事会议上，就有许多人"俱不敢违，然颇有难色"。郑成功收复台湾期间，先后有驻守东山的宣毅左镇万义，右冲镇万禄和其它一些将领叛逃降清。

由于郑成功突然病逝，留台的诸将拥立随军入台的郑成功之弟郑世袭，与留守厦门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相对抗，双方势同水火，郑氏政权一时陷于分裂状态。清廷得到郑成功死讯，以为郑军群龙无首，有机可乘。自从清军于1659年攻入云南迫使南明永历帝流亡缅甸之后。清廷便把注意力集中到对付郑成功军队的身上。1660年7月，清廷命靖南王耿继茂移师福建，又命罗托为安南将军，会同兵部尚书车克率大军讨伐郑成功。当清军一举剿灭郑成功大军的企图未能得逞后，清廷转而采取了消极的防御政策，将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五省居民迁入内地，并严禁渔船，商船出海，以此来断绝沿海人民与郑成功的联系，"如此半载，海贼船兵无可修葺，自然朽烂；贼众许多，粮草不继，自然瓦解"。迁界、禁海虽然给郑军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清廷本身所蒙受的损失更大，清廷此举可谓得不偿失。

郑成功之死，使台湾的局势发生了变化。郑氏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矛盾加深而出现分裂，许多将领和士兵感到前途暗淡，渡海归降了清廷。清廷趁机数次派使臣到厦门"招抚"郑经。清廷的目的是在派人招抚郑经的同时，又"按兵相机，密布间谍，"对其部将"用反谍计间之，使自

相猜疑，然后剿抚兼用。”对郑经来说，他驻守在厦门和金门西岛，其叔郑世袭在台湾，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郑经对于清廷欲其“叔侄相争，势已动摇”之机，一举攻占厦门、金门的企图早有防备。为避免自己内外受困，也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以便集中兵力解决内乱，郑经将计就计，密令郑泰、洪旭等与清廷谈判招抚条件，并上缴明朝所赐敕令、印信和“海上军民土地清册”等以取信清臣，拖延时间。此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兵第一次远征。抵达闽江口外，欲与清军联合攻郑军。清朝靖南王耿继茂和福建总督李率泰正设计降服郑经，于是对荷兰人未加理会，荷兰舰队只好望洋兴叹，失望而去。

不久，郑经平定了台湾的变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回师金厦，并用计杀死暗中支持郑世袭的郑泰，借口“人众登岸，安插难周”，拒绝履行和谈条件，清政府的“招抚”计划完全失败，转而采取武力解决的方针。郑泰被处死之后，郑泰之弟郑鸣骏被迫率领万余名官兵和家属，分乘300余艘船舰从金门驶入泉州港，归附清军，从而使清军水师力量大增。同时，郑经集团执迷不悟，仍以南朝王朝为正统，企图割据台湾，控制金门和厦门。郑氏军队的所作所为已失去了原来抗清斗争的意义和作用，从而成为清廷维护统一的绊脚石。

郑经对于招扶毫无诚意，野心勃勃，清廷担心待其“羽翼丰满、声势肆张之时，则又成一郑成功”，不如“趁其荒乱犹豫之际，神速进兵剿灭之”，恰在此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又派出了第二次远征舰队(包括战船16艘，士兵2600余名)，由海军司令波特率领开抵福建，很快与清廷相勾结并达成了共同进攻郑经军队的协议。郑经闻讯立即商量对策，令大将周全斌率领船20只，防守来自泉州方向的清荷联军，这一路清军是精锐部队，如果击败则海澄各港的清军就会自动退却，为此郑经对周全斌寄于厚望；郑经又令“黄廷带船20只泊南山边，御海澄之海门；林顺领船10只，在高崎一带游场接应，杨梓领船10只，在辽罗一带接应”，另派陈开率步兵守高崎陆路，郑经决定采取当年郑成功大败清将达素的战术，“悉空厦门，背城一战”。

从十月十日开始至二十一日，清荷联军与郑经水师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海战。两军在金门乌沙港附近相持。周全斌认为荷军战舰板船高大，必须停泊在深海，于是率水师从一侧迂回而上，与清荷军发生了激战。二十日清晨，清军正吃早饭，周全斌忽然率舟师驶进金门口。清荷联军来不及整队，匆忙应战。荷兰舰队仗着船舰高大冲在最前面，后面依次是清军水师小型战舰，清军提督马得功的坐船处在最末尾。周全斌派出先头船队在前方引诱荷军战舰，自己则率数10艘小战舰从中间拦截清军船只，马得功的坐船被郑军的5只战船团团围住，而前面的荷清水师却无法救援。双方从早战到晚，“得功四面受敌，火罐、药矢咸尽，兵士伤死，仅存二三，度不能免，恐遭擒受辱，遂投海死”。金门海战，郑军战船仅20只，且有7只被荷军舰阻于南山根下，仅13只船在周全斌的率领下进入金门口，结果大败清军而不失一船，充分说明了周全斌高超的指挥才能和清军水师的无能。令人可笑的是，靖南王耿继茂为了掩盖这次清军失败的真相，向清臣报告说清军的失利完全是由于“南风突发，贼船扬帆顺风而来，直逼我船之后”所至。

清军的泉州水师虽然失利，但由于郑经派驻高崎陆路的陈开降清，

使清军水师在施琅和黄梧率领下，乘落潮之时，从海澄、漳州直逼厦门。郑军将领黄廷率兵迎战结果被打败，清军攻战厦门。这样一来郑军各路将士军心动摇，接着金门也落入清军之手，周全斌带着完好无损的20只战船退泊浯屿，郑经则率兵退守铜山(今福建东山县东北东山镇)。“清军入金、厦，堕两城，弃其地，收宝货妇女而还，两岛之民烂焉”。

清军初占告捷，派水陆两路军直逼铜山，欲一鼓作气攻克铜山。无奈铜山地势险要，加上清军对荷军不加信任，于是清军只好停止了对铜山的进攻。清政府转而展开了大规模的招抚诱降活动，意在乘郑军军心混乱之际瓦解郑军。清廷令兵部、户部各派出满汉郎中两人长驻福建、广东、浙江和江苏四省，专门对郑军中下级将领进行招降，并用高官厚禄加以引诱。于是郑军将士人心浮动；郑经本人躲在铜山却无可奈何。不久，自承天府南北总督周全斌、前提督黄廷、水师统帅忠靖伯陈辉以下的数10名大小镇将总兵、都督相继率所属降清，郑军为此损失了兵力10万多。大小船只900余号。郑军中的精锐将领十去七八，乘余的象周全斌等少数高级将领已无兵可领了。直至康熙三年(1664年)二月，困守铜山的郑经军几乎弹尽粮绝，清军打算等待入春风顺时出兵铜山。情况危急，又面临着全军瓦解的局面，郑经不愿意坐以待毙，不得不放弃沿海诸岛，撤回台湾。三月七日，郑经率残部离开铜山，七日，抵澎湖，十日，至台湾。但郑经万万没料到，奉命断后的周全斌和黄廷两名战将归附了清朝。清军顺利地清除了郑军在沿海五省设立的基地，并相应在沿海各地修筑起界沟、界墙、炮台、营盘等，派兵驻防，以维护沿海各地的安定。

互相争夺拉锯于福建沿海郑经败回台湾岛，清廷决定乘胜追击。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清廷任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为靖海将军，周全斌、杨富为副帅，统帅着郑军的降众，船舰攻取台湾。由于台湾远离大陆，海上气候变化无常，加上清军水师中大多数是刚归降清朝的原郑军的水师，心志不一又缺乏严格训练，所以，康熙三年十一月和四年的三月至四月，施琅统领的水师两出金门但遇风而回，攻台没有成功。清廷于是怀疑这些降将暗中仍与郑氏有联系，如果是内外勾结则为患更大，因此下令将所有郑军的降将都调入北京归旗，其余部众则分散到各省屯垦，并把郑氏的船舰全部焚毁，清臣疑心过重，比举非但不明智而且消弱了自己水师的实力，因此，有关攻取台湾的计划只能拖延下去。

由于强攻台湾难以奏效，在放弃了武力解决方针之后，清廷对台政策再次改为以招扶为主，并两次派使者到台湾去劝诱。第一次在1666年(康熙五年)6月，清延派河南候补道后为招抚总兵的孔元章赴台招抚；第二次是在1669年(康熙八年)8月，康熙帝亲下诏书，由兴化知府慕天颜等送到台湾。在这两次谈判中，郑经不敢轻举妄动，厚待使者。清政府表示承认由郑氏家族世守台湾，并开放沿海各省对台贸易，郑经则表示愿意改奉清廷，称臣纳贡，看来清郑双方颇有诚意，似乎已达成协议。然而郑经坚持说：“倘清朝以海滨为虞，苍生为念，能以外国之礼见待”，他则同意“互市通好，息兵安民”。郑经又举例说，“须援朝鲜倒，不剃发，不易服”，实际上是拒绝清朝的招抚。清廷对郑经的提议坚持不妥协，康熙的招书中指出“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氏乃中国之人”，

根本不能把台湾和朝鲜相提并论，双方争论的实质牵涉到台湾究竟是中国的领土还是中国的藩属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清廷的立场和原则是正确的。

施琅等清将认为郑经的态度如此蛮横，应出兵征讨。早在1688年(康熙七年)四月，施琅就曾上疏康熙，全面分析了台湾的局势和清廷招抚的弊端，指出“郑经得驭数万之众，非有威德制服，实赖汪洋大海为之禁锢，如专一意差官往招，则操纵之权，在乎郑经一人，恐无率众归城之日。若用大师压填，则去就之机，在乎贼众，郑经安能自主?”清廷认为施琅的分析言之有理，但鉴于施琅已两次攻台皆败兴而归，仍决定以招抚为上策。这时，清王朝因三藩割据而暂时放下了台湾问题，郑经由此获得了一个较为长期的和平环境，在台湾休养生息，并加强了各处的防御。

在澎湖，郑经采纳了大将洪旭的提议，因为“澎湖为台湾门户，上通江、浙，下达南洋，必须建设重镇，以固海疆，若澎湖有失，则台湾无所措手足”，派军在澎湖修筑了娘妈宫，在其左右各筑炮台，烟火相望，派兵驻守。在台湾岛上，郑经则改东都为东宁，将天兴、万年设为二州，又在四坊设立府治、郑经在台湾奉行的基本上是郑成功的富兵于农的方针，台湾社会逐渐稳定，生产由此得到发展，并且与英国暹罗、吕宋等国互通贸易。台湾人民在植蔗熬糖，煮海为盐，以兴贸易；粮食有余，布帛无缺，民用殷富。郑经又建圣庙，设立学校。故此台湾岛上一片和平景象。然而，郑经死心塌地地追随南明王朝，妄图割据台湾，这种分裂中国领土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在“三藩”之乱中，郑经不甘寂寞，出兵大陆参与抗清斗争，不过完全是为了独霸台湾，所以郑经的反清斗争性质已发生变化，根本不能与其父郑成功当年的抗清斗争相提并论。

1673年(康熙十二年)底，三藩吴三桂、尚之信、耿精忠等联合判乱反清，郑经以为机不可失。于是应吴三桂和耿精忠之约，率军西渡大陆，积极参加了反对清王朝巩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叛乱战争。

由于三藩之乱，清军无力南顾和耿精忠主力北上浙江，郑经乘机出兵福建，攻占了原属清朝、后已归附耿精忠的闽南粤东全部沿海，占有泉州、漳州、潮州、惠州、汀州、郡武，兴化等7府，从而与耿精忠失和交战。1676年(康熙十五年)10月，清康亲王杰节率清军入闽，耿精忠降清，联合清军向郑经反击，在众寡悬殊、孤立无援的形势下，郑军屡战屡败，7府全失，被迫退守厦门、金门。尽管郑经屡次出台骚扰大陆，但清廷仍将他与三藩作乱区别对待。康熙帝曾向福建总督郎廷佐指出，对耿精忠“宜用剿”，而对郑经则“宜用抚”。这样清廷对郑经又采用了诱降方针。郑经却得寸进尺，提出了“边所海岛悉为我有，赏给粮饷，则罢兵息民”的新条件，拒绝了清廷于1677年(康熙十六年)5月和8月两度派员到厦门的“招抚”。清廷对郑经在坚持招抚的同时，已经作出了重大让步，甚至同意台湾郑氏按“朝鲜故事”处理，但郑氏集团却执迷不悟。

1678年(康熙十七年)7月，郑军发动反攻，陷海澄、围泉州，不久又被清军逐出沿海。于是，郑经以海澄、金门、厦门为据点，与清军隔海对峙。清康亲王杰书、闽浙总督姚启圣等又先后4次派员劝郑经退回

台湾，同意以澎湖为双方通商之地。然而郑经得寸进尺，坚持以海澄为双方往来公所，于是清郑谈判又告破裂。清廷的诱降一再失败，但康熙帝仍令属下继续招抚，并把重点转向郑经的部属。于是，在闽浙总督姚启圣的策划和主持下，清廷从三个方面对郑军展开了攻势：军事方面，调在洞庭湖大破吴三桂水师的万正包任福建水师提督，加紧建造船舰，训练水军，准备渡海攻击金门和厦门，给郑经以血的教训；经济方面，在福建沿海重新执行“迁界”措施，强迫沿海居民迁入内地10至20里，并遍筑“界墙”守望，即“展界诸岛”，断绝内地与沿海的内外交通，对郑军实施全面封锁；政府方面，对郑氏集团的大小将官以至士兵和平民，展开大规模的招降活动，计有“招抚条例十款”；在漳州设“修来馆”，对投降官兵及其家属实行优待政策，“文官投诚，即以原衔题请，准照职推补，武官投诚，一面提请换扎，一面保题现任；……愿入伍者，立拔在营，给以战饷；愿归农者，立送回籍，场尉县安插，不许强豪职凌，宿怨报仇”；下令保护沿海各地与郑军有乡邻戚党关系之人，不许挟嫌陷害，开展反间活动，派人四处离间郑氏集团上下关系，以引起郑军内部互相疑猜，同时对郑经派来的奸细诱以厚利，收为己用。种种花样，不一而足。足可见清廷对郑氏集团的宽大政策。

由于清廷善于用“高位厚禄，买散人心”，所以投诚者接踵而至。仅十七年六至千十一月，清廷就接纳官员1237人，士兵1．1639万名。在清廷全面的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之下，郑氏集团人心涣散，离心离德，先后有五镇犬将廖碘、黄靖、赖祖、金福、廖兴，水师五镇蔡中碉、折冲左镇吕韬、征夷将军江机、杨一豹等率所部10余万人降清。在经过长达5年的拉锯战之后，郑军土地日蹙，财源枯竭，兵力锐减。而连年在台湾和大陆沿海厉行重税摊派和强抽乡勇当兵，又激起群众的不满和反抗。郑经集团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1680年(康熙十九年)2月，清水师提督万正色攻占海坛(今平潭)，乘胜率舟师南下攻打金门和厦门，郑军斗志全无，厦门守将陈昌、海澄守将苏湛、洒州守将康腾龙相继不败而降，献城归清。水师精锐朱天贵率部2万余人和300余只船舰归降，郑经仅带着千余人狼狈逃回台湾，沿海诸岛重又归清朝控制。

正是由于清廷采取了攻心的招抚政策和武力上的收复沿海诸岛的政策，才使得郑氏集团人心瓦解，又失去了进攻大陆的前沿基地，清廷从而争得了统一台湾的战略主动权。

清廷决策施琅出兵郑经退回台湾时，兵力不足万人，而且军心散乱，为此，姚启圣向清朝建议“自往台湾攻取”，然而身负前方军事重任的万正色却认为，台湾港口狭浅，舰船“驻泊无所，粮运不继”，“不可轻议进兵”。姚启圣则坚持已见，又上疏力陈：郑经不灭，广东、浙江、福建等省始终不得安宁，请求“亲督水师进取台湾”。于是康熙令诸臣合议具奏，以求解决台湾问题的万全之策。清廷于1680年初大败郑军之后，又于年底彻底平定了三藩之乱，全国大陆基本上统一于大清帝国之下，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日趋巩固，因此，清廷又开始致力于解决台湾问题，渡海进攻台湾，消灭郑氏剿据政权已成为当务之急。但诸臣合议的结果，兵部侍郎温代、刑部尚书介山、福建巡抚吴兴祚等部赞向万正色的意见，认为攻台时机已成熟，但条件尚未俱备，他们特别强调了进攻台湾将会遭遇到的诸如风暴之类的实际困难，因此康熙决定暂缓攻台。

1681年(康熙二十年)4月，郑经病故，年仅39岁，台湾郑氏集团内部再次发生内讧。郑经遗嘱由长子郑克监国。但郑经诸兄弟不满，认为“克非吾骨肉，一旦得志，吾属无遗类矣”，于是设计谋杀克，另立年仅12岁，的克塽为延平郡王，佩招讨大将军印。郑经之弟郑聪虽为辅政公，但实权却操在武平侯刘国轩和忠诚伯冯锡范之手。清廷得知郑经暴死，诸子争立之事，出兵台湾之事又被提上议事日程。

在统一台湾的问题上，清朝政府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早在康熙亲政以前，以鳌拜为首的保守势力，压制进取台湾的正确主张，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借口，把统一台湾的大事搁置了下来。平定三藩之后，康熙就把统一台湾之事正式提了出来，主张“宜乘机规取澎湖、台湾”，以“底定海疆”，并且在福建沿海调兵造舰，同时重用主张统一台湾的姚启圣为福建总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筹划向台湾进兵。姚启圣得各台湾郑氏“主动国虚”，“文武解体，政出多门，各怀观望”的密报后，立即上疏清廷，欲“会合水陆官兵，审机乘便，直岛巢穴”。康熙立即令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与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力，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分期剿扶并用，底定海疆。”然尔，清廷内外反对出兵台湾的仍大有人在，有人主张“征台湾宜缓”，且极力反对任用施琅，“举朝大臣以为不可遣，会必叛，康熙力排众议，坚持出兵统一台湾，把认为“台湾难攻且不必攻”的原水师提督万正色调为陆军提督，把反对收复台湾，以台湾“断不能取”的福建将军喇哈达调回北京，于1681年(康熙二十年)命福建总督姚启圣“统辖福建全省兵马，会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

施琅到任之后，主张收复台湾，必先攻取澎湖，“以扼其吭，则形势可见，声息可通”，则台湾兵力可不攻自溃。于是积极筹饷练兵造船制器，准备于来年三四月间南风初发时起兵。但姚启圣、吴兴祚等却认为应等到今冬阴历十月间乘北风渡海。根据以往失利的教训和经验，施琅请求清廷将统兵出征台湾的指挥权交给他一人。姚启圣等则向清廷上奏，并提出在今冬“进攻淡水、夹击台湾”的作战案，特别向清廷强调远征台湾需水兵1．1万余名，陆兵2万余名。前方将领意见不一，给清廷朝野反对进攻台湾的人一个攻击的借口，有人又提出不可信任原郑氏集团的降将施琅。1682年5月至7月，户部尚书梁清标，左都御史徐元文等相继上疏请“暂停台湾进剿”、康熙帝再度动摇，遂下诏“十日进剿台湾，暂行停止”。

面对清王朝众说纷纭、举棋不定的情况，施琅又连续向清廷上疏，明确提出必须使前线军事指挥权统一于一人之手，换言之，施琅想争得出征台湾的指挥权。康熙不允，仍令他与姚启圣共同负责。于是施琅和姚启圣之间在作战计划上的分歧愈来愈严重，甚至在铜山召开的水陆高级将领会议上，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众将领们也是莫衷一是。事后姚启圣上报朝廷说，与会众将“皆言不如十月可乘北风分道进兵”。宁海将军喇哈达则直接了当上疏说，“总督、提督称南风不如北风”。施琅面对前线将军、总督依官仗势欺上瞒下的恶劣态度感到深恶痛绝。他不顾一切地再次上疏申辩，明确指出“台湾人心惶惑莫定，内多思叛”，确有“可破可剿之机”。如果一定要等待清廷下旨方可进兵，则一定是“有人借旨意为居奇，迁延岁月，虚糜浩费，……经无可破可剿之日”。接着，

施琅又详述了他拟定的作战方略和兵力部署，称由他所统帅的水师就足以完成任务，“可以无用陆师”。施琅向康熙帝表示，“倘荷皇上信臣愚忠，独任臣以讨贼，令督抚二臣催趱粮饷接应，俾臣整搠官兵，时常在海操练，勿限时日，见利可行，臣即督发进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何难一鼓而下。事若不效，治臣之罪”。施琅所言出自实地调查，发自肺腑，终于感动了康熙帝，况且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大学士明珠也赞同施琅的建议，认为是切实可行的。于是康熙不再犹豫，下诏由施琅一人独任专征，“相机自行进剿”，姚启圣谨传圣旨。至此，施琅才能够大胆放手地实施渡海攻台的战略计划。

以往清廷对台湾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对渡海远征也缺乏信心，所以一直举棋不定以致于错过了不少战机。施琅熟悉海上形势，而且又有专征指挥的大权，他就可以施展所长，相机进取，从而为攻克台湾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前提。当时的形势对清廷来说，无论是在土地、人口、物力、军务等各方面，与台湾相比，都占有压倒的绝对优势。清王朝平定三藩，大陆基本统刁，全国秩序安定，生产恢复和发展，民族矛盾相对缓和。而局促一隅的台湾郑氏政权，虽也有过数年相对稳定的发展，但毕竟是弹丸之地，人力、物力有限。郑经溃败回台之后，不久就暴死，台湾出现内讧，政治腐败，生产衰蔽，不堪一击。在这一点上，清军以大压小，以众攻寡，以强攻弱，处处占优势。

清军往往以陆战见长，士兵们往往长于骑射而怯于海战，而施琅统领的水师主力主要是由原郑军降众和福建新练水师(其中大部分也是来自郑军)组成，水兵们有多年的海战经验。清军又新造了更加高大坚固的战船，行驶便捷，且配有精良的大炮。所以尽管敌我双方兵力(各约2万人左右)和战船数量(各约200余号)约略相等，但清军的装备略胜一筹，战斗力也强得多。这些又是清军拥有的优势。

当然，清军也有些实际困难，清军要渡过宽达二三百里的风浪险恶的台湾海峡，孤军深入，后援不继。如果遇到守军的顽强抵抗，不仅势难持久，而且会重演1665年中途撤兵之局。为此，施琅反复研究，制定了一套切合实际的作战方略。大致如下：首先，确定采取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略方针。以攻取澎湖为第一步，因为澎湖是台湾的门户和咽喉，占据它既可以逼近郑军，控制其通海之路，又可以作为进攻台湾的前沿阵地，便于进取退守。另外，澎湖位于台湾海峡的中途而靠近台湾，东距台湾仅50多公里。清军如果占据澎湖，则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左右的渡海航程(澎湖西距厦门约220公里)，清军可以在澎湖休整补充，养精蓄锐，相机进取。还有就是澎湖地势低平，比港路险恶、地形复杂的台湾易于攻占，水师可以在澎湖附近许多港湾停泊。一举攻占澎湖，也可以大大激发水师将士们的战斗热情。

第二，在战术上决定采用速战速决、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施琅在出兵前就准备最多用7天时间攻克台湾，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在决战时兵分三路，东西两路负责夹击、牵制，施琅亲率主力大乌船56艘为中路，约定每5艘合攻敌船1艘，利用优势兵力逐个歼灭郑军。

第三，在渡海时间上，施琅一改在东北风季渡海的传统打法，而选择在西南风季进兵。这完全是施琅的切身体会。因为东北风风势猛烈，骤发骤散，难以把握。而且如果一战不胜，船队容易被风吹散，难以集

合再战。而西南风比较平稳，船队可以在大洋中抛锚，寻找登陆作战的机会。关于趁东北风还是西南风出兵的问题，曾在前线清军将领中有过激列争论。但施琅坚持自己的观点。事实证明施琅的决策大胆机智而正确。

第四，在渡海路线的选择上，施琅也是与众不同。以往清兵总是从金门或厦门出发渡海，而施琅却选择了靠南的铜山岛(今东山)开船。先往东航行，在澎湖列岛的第二大岛屿(今渔翁岛)的最高点后，向北驹入澎湖海，这样船队就可以充分利用南风，占据上风上流，而置敌军于逆风逆流的地位。

后来攻占台湾的过程和结局证明了施琅制订的这一套作战方略是完全正确的。清军顺利地攻占澎湖，然后一战而胜占据了台湾，这和他们统帅的方针正确、指挥得当是分不开的。当然，清军顺利地收复台湾，也和康熙帝用人得当有关。

澎湖激战台湾回归正当施琅在福建沿海操练水师，积极准备实施出兵台湾的作战计划时，失去了最高指挥权的姚启圣却热心于招抚台湾，重新又使用了以前清廷对待台湾的传统政策。康熙帝认为大清帝国和台湾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况且台湾的郑氏集团执迷不悟，不能再纵容他们了，命令施琅立即进兵。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阴历六月上旬，施琅调集各种战船230余艘，官兵2.1万余名，齐集于铜山。万事俱备，在举行了传统的祭江仪式之后，清军水师船队乘南北由铜山出洋，浩浩荡荡驶向澎湖列岛方向。

郑氏集团得知施琅力主先攻澎湖的消息之后，匆忙采取了应战措施。施琅并没有隐瞒他准备先攻澎湖的计划。照施琅的打算，如果台湾派重兵把守澎湖，则肯定由郑军中唯一威望最高的大将刘国轩全权负责。这样，如果在澎湖击败刘国轩，势必使台湾郑军军心大乱，清军则可一举攻占台湾，而如果是其它将领守澎湖，则“虽败未必灭”，那么进一步出兵台湾将会遭到顽强抵抗。施琅明白，与刘国轩之间的交战是一场硬战，是不可避免的，不如先挫其锐气。

施琅是有先见之明的，他是一位称职的知己知彼的优秀统帅，果不出施琅所料，郑军在侦获了清军的动向之后，派出了军中的精锐部队由刘国轩统领，郑克塽以武平侯刘国轩为正提督，令征北将军曾瑞，定北将军王顺为副提督，率诸镇军驻守澎湖。刘国轩征调了大小炮船、乌船、赶缯船、洋船、双帆踞船等共200余只，精锐官兵2万余人，在澎湖的娘妈宫，风柜尾、四角山、鸡笼山、牛心湾、西屿头、东西峙等关隘要道增修炮台。在澎湖列岛四周大凡小船可以登陆的地方，都筑起了短墙，安置了腰铳，分兵把守。刘国轩又将岛上守军官兵的家属一律集中在台湾、赤嵌二城监护起来，以便胁迫澎湖官兵尽力死战。刘国轩的这些应战措施相当及时，对清军产生了很大的威胁。所以刘国轩不禁产生了骄傲轻敌的心理，认为轻他一手操办的澎湖防御措施“星罗棋布，坚如铁桶”。在澎湖的八罩、水垵澳等处，因有礁石沙线，四面受风，又无淡水可饮，故不设防。

施琅船队于六月十五日上午驶抵澎湖海面。刘国轩方如大梦初醒。因为此前他听到清军将于六月出师澎湖的消息时，认为清军是在虚张声势，蛊惑军心。刘国轩认为“六月风波不测”，施琅不会在这个季节出

兵。然在施琅的进兵计划中却经常有超常规之举，正可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刘国轩在慌乱中紧急传令全面严防，严阵以待，同时聚集众将商量对策。郑将邱辉和黄良骥提出，乘清船“安澳未定，兵心尚摇”之际，派精锐船攻杀，在夜晚落潮时趁机出兵，必能取胜。刘国轩则不以为然，他认为澎湖四处炮城防守严密，清船无处可泊，一旦风暴突起，将不战而溃。不久，清军舟师陆续停泊在猫屿、花屿一带，刘国轩坚信日内必有大风，只要严加防守，清船难以靠岸，则施琅将自败。所以岛上守军仍按兵不动。

十六日早上，施琅舟师齐抵澎湖水面。刘国轩乘快哨小船急驶如飞，于娘妈宫前港内经束布阵。施琅令先锋官蓝理率7只乌船首先冲入敌阵，随后又派出了第二批。刘国轩指挥船队排列迎战，双方开炮还击并互相冲撞。时值南潮初发，清船争先一涌而上，互相冲撞，不成行列，有几只船被海潮冲进炮城周围，从而陷入郑军包围之中。施琅见状亲督诸船力战解围。吴英的战船也随后赶来，实施夹攻。于是两军水师展开了一场恶战，直杀得天昏地暗。血战一天，两军互有伤亡，胜负难分。而清军已稍居下风。因为天晚正逢落潮，风不顺，主将施琅的坐船被潮流所阻，顶风逆行十分缓慢，敌船乘机结队攻击，施琅不顾安危亲自在尾楼上督兵激战，险些被炮弹击中，施琅受伤后又振作精神。施琅的举动感染了清军将士，蓝理率船前来救援，也是奋不顾身，身负伤仍顽强督战。幸得金门镇千总游观光的船队乘风赶来助战，施琅、蓝理才合力击退敌船围攻，率船队退至西屿头洋中抛泊。清军出师不利，在战斗中险象环生，主帅受伤被围，这些事让守澎湖的郑军将士心中欢喜。郑将邱辉见士气旺盛，请求派船队乘胜连夜攻打，刘国轩不听。郑军主将刘国轩缺乏主动进攻精神，把胜利希望完全寄托在变化莫测的海上风暴上，因而失去了几次主动出击的有利时机。这是刘国轩战略方针中的一大失误。

第二天，清军舟师齐集于八罩、水垵澳湾等郑军来设防的海湾。施琅严于治军，他总结了第一天海战失利的教训，批评有些将领“不协力向前，互相观望”，致使陷入敌船包围。施琅严申军令，查定功罪，分别赏罚，及时稳定了军心。部将吴英根据对方船少而清军船稍多的情况，提出用分开列阵的战术迎击刘国轩军，以五船结一队，围攻敌一只船，其余船只则作为预备队在旁游弋，相机行动。施琅采纳了这个建议，列入行动方针之中。接下来的两天，清军先在外围与郑军交战，进取虎井、桶盘屿。清军采用声东击西和分散敌人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遣兵两股佯攻嵵内、内外堑，以分散郑军兵势。施琅则坐着小船详细观察了澎湖内外堑和嵵内的形势。郑军被清军牵着鼻子转，刘国轩只得下令严守八罩水道以北的大山、西屿，北山诸大岛，以防清军靠岸登陆，而对水道以南的八罩、虎井、桶盘、花屿、猫屿诸小屿防守松懈甚至根本不设防，被使清军乘虚而入，这不能不说是郑军的又一重大失策。清军在外围东征西讨，并及时按抚了占据各岛上的岛民，军民皆群情振奋。

经过三天的休整之后，二十二日上午七点至下午四点，双方在澎湖海域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海战。施琅在早上重审军令之后，下令分三路进攻：东路战船50艘，皆为赶缯双帆踞船，从东侧内直入鸡笼屿、四角

山，为奇兵夹攻，由陈蟒、魏明、郑元堂统领；西路战船50艘，从西侧内堑直趋中心湾，作疑兵牵制，由董义、康玉、洪天锡等统领；中路由施琅亲率大船56艘，又分为8股，每股7只船，各作三选，施琅居中为一股，约定各以五船合攻敌一船，直攻娘妈宫。乘余船只80余艘，分为两股，担任后援。郑军炮船虽然数量不多，但装备精良，每船配有红衣大铜炮一座，重三四千斤，在船头两边安发烦20余门不等，鹿铳一二百门不等。交战时，彼此望见，即发斗头烦，郑军有海战的丰富经验，对敌时从容不迫，靠近敌船，则发左边炮，转舵时发尾送炮，再发右边炮，有条不紊。

当清军由施琅率一股直扑娘妈官方向而来时，郑军设在外堑山顶上的了望炮连发警报信号，刘国轩急忙督船迎战。郑军水师于是齐起帆碇，发炮呐喊，迎战清军，颇为壮观。刘国轩见状不免心中得意，这自然是他平日里操练有方的结果，清将林贤、朱天贵等首先冲入敌阵，各船按总帅的命令，以五船合围一船。刹那间，海面上荡出了一朵朵五瓣莲花，郑军船只几乎个个被围困在水中央。只见澎湖海面“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点。烟焰蔽天，咫尺莫辩”，郑军“并力死斗，势穷难支”。经过七八个小时的激战，清军以众击寡，“风利舟快，瞬息飞驶，居上风上流之势，压攻挤击，一可当百，又多用火器火船，乘风纵发，烟焰弥天”。刘国轩见大势已去，只得率残兵败将分乘30余只船，冒险从北边的吼门逃走。守卫娘妈宫炮城的郑军全部缴械投降。清军攻打澎湖一战，先后焚毁、击沉(包括郑军自沉)和俘获郑军大烦船37艘，大乌船52艘，赶缯及其它船只107艘；杀死(包抄浮水溺死)郑军将领300余，士兵1.2万名，尸浮满海，惨不忍睹。守城郑军，除戎族二镇吴潜自刎身死外，其余165员将官和4800多名士兵全部倒戈投降。刘国轩仅带着小炮船3艘，小乌船2艘，赶缯及双帆踞船26艘逃回台湾。清军阵亡官兵329人，负伤1800多人，船只毫无损失。至此，清军大获全胜，郑军主力“不数日而全军覆没”。

刘国轩败逃至台湾，于是郑军惨败、澎湖失守的消息不径而走，“台湾兵民闻知，各怀戒心，市井风鹤”，人心惶惶。郑氏集团的另一实权派人物忠诚伯冯锡范主张出兵吕宋(今菲律宾)另创基业。刘国轩力排众议，认为远征只是远水不解近渴，倘若在澎湖失守前早做准备倒不失为良策。然而现在澎湖已失，众志瓦解，清军大兵压境，唯有无条件的接受清廷的招抚才不失为上策，因为一切抵抗都为时过晚，都是徒劳的。刘国轩说今非昔比，“当此之际，尚且狐疑，倘一朝变起萧墙，将奈何?从来识时务者的豪杰，大事已去，速当顺天”!实际上，郑氏集团的傀儡郑克塽为了保持割据的地盘，早在此之前就曾向清廷“遣使赍书，愿称臣入贡，不剃发登岸”，想要把台湾变成一个半归附半独立的国家。可见随着形势的发展，原先“抗清复明”的意识就是在郑氏集团中也已渐灭。清政府正确地坚持以国家统一的立场，拒绝了郑克塽的荒谬主张。

施琅在歼灭郑军后，立即安辑居民，抚恤降众，对郑军将领以礼相待，士卒给以银米，负伤者代为医治，有欲归见妻子者派小船送至台湾。这些被释放回台的士卒们无不对清军感恩戴德，台湾百姓盼望清军登陆。施琅又派人许以高官厚禄说服刘国轩，所以刘国轩极力主降，并且派兵监视了郑氏子孙。郑克塽、冯锡范等于是上书清廷，表示投降，

派人把投降书送给澎湖的施琅。表中说："兹特缮具表章，并延平王印一颗、册一付，及武平候臣刘国轩印一颗，忠诚伯冯锡范印一颗，敬遣刘国昌、冯锡范赴军前，缴奏版籍土地人民，待命境上，数千里之封疆，悉归土宇，百余万之户口，并属版图。尊海而南，永息波涛之警，普天之下，均沾雨露之濡。"但郑块和冯锡范又想要求继续留居台湾，以便承祀祖先，照管家业，请求清廷"独念臣全家骨肉，强半孺孤，本系南人，不诸北土。合情乞就闽省地方拨赐田园庐室，俾免流移之苦……至于明室宗亲，格外优待，通邦土庶，轸念绥柔，文武诸官，加恩迁擢，前附后顺，一体垂仁。"施琅严辞拒绝，指出郑氏是假降，是缓兵之计，若不无条件投降必出兵剿灭。郑克塽只得再修表，答应无条件投降。康熙帝闻讯下令立刻招抚台湾，"若不许其投诚，则彼或窜处外国，又生事端，不若抚之为善"，并于七月二十七日正式颁布了对台湾投诚人员的赦诏。八月十一日施琅来到台湾收降，十八日，郑克块等剃头易服，率众出降，清军顺利地进驻台湾，清朝统一台湾的事业至此完成。

施琅上疏向清廷报捷，并将郑克块送回北京听候处置。康熙帝对郑氏集团再施宽大政策，一再强调郑成功是明室遗臣，而非乱臣贼子，授郑克塽以汉军公，冯锡范汉军伯，刘国轩为天津总兵，何祐为梧州副将，将郑军其它将室以及明宗室后裔分散到各省安置。康熙帝敕令遣官护送郑成功及子郑经两灵柩归葬其故地安南，并建祠祀之，并追谥郑成功的忠节，在台湾郡建祠宇。从而说明爱国者，即使是抗清志士，也为清朝康熙帝所推崇。

台湾自古以来就属中国的版图。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以此作为抗清基地，配合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其作用也是应该肯定的。然而，在全国已经统一的大前提下，郑氏集团据守台湾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因此，统一台湾，防止西方殖民势力"窥窃边场，迫近门庭"，确保沿海各省"晏然无虞，已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关键所在。统一台湾后，清廷对于台湾的处置又出现了分歧，有人荒谬地提出"宜迁其人，弃其地"，竟然主张放弃台湾。施琅坚决反对，认为"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围"。康熙支持施琅的意见，指出"台湾弃取，所失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因此，清朝政府于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在台湾设一府三县；改东宁府为台湾府，南路设凤山县，北路设诸罗县，在府台设立台湾县，澎湖由台湾府直辖。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台湾厦门道，台厦道每半年分巡台湾、厦门。又在台湾、澎湖设置总兵、副将,派兵万人驻防。至此，台湾统一于清朝政府的管辖之下。

第四章 有恃无恐三藩作乱边关 恩威并用清廷国泰民安

清康熙亲政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三藩”割据。平西王吴三桂、定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占有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等广大地区，兵多财足，朝廷的号令不行。康熙十二年，康熙帝毅然下令撤藩，削去他们的权力，收回他们盘踞的地盘。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悍然发动叛乱。经过8年的战争，康熙二十年，平定了三藩叛乱。

第一节 清廷撤藩吴三桂悍然兵变

清朝初年，明将降清后因功被封为王的有四人，就是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平西王吴三桂。后来又改封孔有德为定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清世祖顺治六年(公元一六四九)七月耿仲明畏罪自杀，由长子耿继茂和长孙耿精忠先后袭封王爵。而孔有德于顺治九年在桂林，因兵败自杀，孔有德因无子承袭除去王爵，余部由其女孔四贞和女婿孙延龄统领。顺治十六年(公元一六五九)三月，南方战事已平，清廷根据五省经略大学士洪承畴的建议，上述诸人以扫除明朝宗室的功劳，各率其部留镇一方。于是任命吴三桂驻镇云南，同时还任命尚可喜驻镇广东，耿继茂驻镇四川。次年七月耿继茂又改驻福建。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清廷又特晋升吴三桂为亲王，任命总管云南、贵州两省一切军民文武事务，其权势和地位显然在耿、尚二藩之上。于是形成了清初的三大藩镇。

三藩各拥重兵，长时期占据数省。平南王、靖南王二藩各有兵力15佐领，绿营兵各六七千，丁口各2万。吴三桂藩属兵力53佐领，绿旗兵1．2万人，丁口数万。吴三桂功高兵强、四方的精兵猛将多由他统管。清廷又擢升他的部将王辅臣为陕西省提督，李本深为贵州省提督，吴之茂为四川总兵，马宝、王屏藩、王绪等10人为云南总兵。三藩的势力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

吴三桂开初镇守云贵时，南明朝在大陆上的抗清势力刚被镇压下去，边防还没有得到巩固，所以清廷给了许多特权：云贵两省的督抚要受他的节制；他任命的官吏将领，清朝政府的吏部和兵部不得掣肘；他的财政户部也不得查核。吴三桂甚至可以向全国选派官员、称为“西选”，“西选”的官员遍及全国各地。“三藩”又以“边疆未靖”为借口，向清廷“要挟军需，以示额饷必不可减”，仅就顺治十七年(一六六○年)户部所奏，云南省俸饷百余万两，加上福建、广东两省一年供需饷银2000余万两，而当时全国一年的军饷也不过1700余万两。邻近各省挽输不够，则补给予江南，致使清廷的财赋一半耗费于三藩的局面，造成了清朝政府财政上的巨大困难。吴三桂自恃势重，越来越骄纵，盘踞明朝桂王五华山旧宫为藩府，增崇侈部，占据了明朝黔国公沐氏旧庄园700余顷为藩庄，圈占农民的土地，又把耕种这些土地的各族农民变为吴三桂的官佃农，恢复明朝末年各种苛重的赋税，强迫农民纳租纳税。他的部属更是为虎作伥，“杀人夺货，无所畏忌”，又“勒平民为余丁”，“不从则诬指为逃人”。又借口疏通河道，修建城廓，广征关税市，榷盐井，开矿鼓铸，垄断其利，他所铸造的钱，当时称为“西钱”。当时有人记载在吴三桂统治下的云南情形说“昆明300里内为刍牧之场，其外为奉养之区者又300余所。其道路之所费，岁时畋猎征求，又不与焉。潴基坟墓，庐其室家，役其妻孥，荐绅士庶及于农工商贾，惴惴焉唯旦夕之莫保”。他遍布私人于水陆要冲，各省提镇多有心腹。其子吴应熊为额驸，朝政的巨细，可以旦夕密报。于是吴三桂自以为根蒂日固不可拔，清廷终究不会从他手中夺去云贵。

耿精忠袭封王爵后，纵领属下夺农商之业，“以税敛暴于闽”，纵使他的部下“苛派夫役，勒索银未”。又广集宵小亡徒，因讥讳有“天子分身火耳”之谣，妄称大耳者，耿也。天下有敌，据八闽以图进取，可以得志”。

尚可喜在广东令他的部下私充盐商，又私市私税。广州为对外通商口岸，每年所得的银两不下数百万。尚可喜对清朝政府比较效忠，但年老多病，把兵事交给儿子尚之信。而尚之信素性桀骜，横暴日甚，招纳奸宄，布为爪牙，罔利恣行，官民怨恨。尚之信又是一个酗酒杀人的狂徒，经常在他父亲面前持刀相拟，所为所行，日益不法。至此三藩各据一方，互通声气，广布党羽，实际上已成为割据势力。

早在顺治十七年间，清朝政府就有削三藩兵饷的廷议，但恐三藩的权势过重难于调制，故此议搁置。及至到了1662年玄烨(康熙皇帝)亲政后，三藩势力的恶性发日益威胁着清廷的中央集权的建立和巩固，康熙皇帝非常重视国家的统一和权力的集中。他说，“天下大权，惟一人操之，不可旁落”；又说：“死生常理，朕新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鉴于历史上地方割据所造成的危害，蠢蠢欲动的“三藩”割据势力，不能不引起康熙的严重注视，“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厪念，曾书而之宫中柱上”。可见康熙皇帝一直把“三藩”视为心腹之患，早已把它列为必须首先解决的重大问题。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当平南王尚可喜向清廷提出自己告老还乡，请令他的儿子尚之信袭封王爵，继续驻镇广东时，康熙帝认为撤藩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同意尚可喜退归辽东休养，并以广东已经平定，该藩不必留驻，宗族父子不必分离为由，除2营绿旗兵留驻外，令该藩的官兵及其家属全部撤回辽东。吴三桂和耿精忠得知尚可喜藩镇被撤的消息后，非常不安，为了试探清廷撤藩的决心有多大，他们也于同年七月初提出撤藩申请。议政王大臣对撤耿藩一致同意，对撤吴藩产生了分歧。刑部尚书莫洛、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等同意撤吴藩到山海关外安插，但建议暂遣满州八旗戍守云南，等满兵到云南时，该藩起程。大学士索额图则不同意。最后由康熙帝裁决说：“吴三桂请撤安插，所奏情词恳切。著王率领所属民兵家口俱行搬移前来。其满州官兵不必遣发，如有用满兵之处，该藩于起行时另行奏请，然后遣发，俟官兵到后，王来也不至迟误”。

吴三桂原以为清廷对自己久握兵权有所猜疑，故上书请撤藩其疑自释，必不再撤。不料清廷立即同意撤藩。九月撤藩使者礼部右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即抵达云南。吴三桂无奈只得答应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起程，但又于左都统吴应麟、右都统吴国贵、副都统高得捷、女婿夏国相、胡国柱等加紧密谋叛乱，派遣心腹将领把守四方关隘，准进不准出，先封锁云南消息。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吴三桂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开树起叛旗，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以“寄命托孤”，复兴明室，“代暴救民”，顺天应人”为号召，派人四处煽风点火，改明年为周王元年，旗帜用白色，蓄发易衣冠。当吴三桂叛乱的消息传至京城时，康熙和王大臣皆无思想准备，康熙帝虽然想不到吴三桂敢于“背恩反叛”，更想不到“伪檄一传，四方响应”，“各省兵民，相率背叛”，参加叛乱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文武官员竟达10余名之多，但他具有非

凡的应变能力，终于变被动为主动，反败为胜，扭转危局。

吴三桂的叛乱事出意外，来势凶猛，以索额图为首的等大臣被吓昏了头脑，意荒谬的认为立即处死同意撤藩的大臣，向吴三桂认错，这样叛乱自然就会平息。但是康熙帝撤藩的决心没有任何改变。他说："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反叛遂诿过于人耶?"故而康熙帝决心坚决平定吴三桂的叛乱毫不动摇。

吴三桂拥兵10万盘据云、贵。他拒绝了清廷撤藩令，举兵叛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杀死云南巡朱国治，逮捕了云南按察使司按察使李兴元等一批抗拒从叛的官员。他为了师出有名，先声夺人，精心制作一道讨伐清朝的檄文，派人奔赴各地传送。他又亲自改书平南王、靖南王、并向贵州、四川、湖南、陕西等省有关系的将官去信，动员他们起兵。向应。

康熙十二年十二初一日，吴三桂自云南发兵北伐，向清朝展开了战略进攻。苣先指派吴国贵、夏国相率步骑为前驱，兵马直，指贵州，他自率马宝等诸将随后进发。当吴兵进入贵州后，当地的军政官员几乎全部投向了吴军，贵州巡抚曹吉申，提督李本深等都乖乖地投靠了吴三桂。吴三桂兵进贵阳，兵不血刃，传檄而得贵州的全境。吴三桂夺得云、贵两省后，便毫不迟疑地挥师北上，其声势振动了整个中原大地。其进军分为两路，一路命其部将王屏藩率军进取四川、再逼陕西；再命部将马宝、吴国柱等由贵州进取湖南。

同年十二月中旬，清廷闻变，康熙速召议政王大臣，商讨对策，当即制定了一系列军事措施：

(一)调兵遣将分守战略要地，康熙考虑到广西与贵州接壤，不得予选设防，立授驻防广西的已故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婿孙延岭为"抚南将军、线国安为都统，责成他们"统兵固守"。

(二)命西安将军瓦尔喀进兵四川，率副都统1员，全部骑兵，选拔将领，星夜赶往四川。凡是云南进入四川的险隘之地，都必坚守，以遏制吴三桂从云南进入四川的道西。接着又命都统赫叶为"安西将军"率兵同瓦尔喀等率兵由汉中入川。

(三)康熙视荆州为最重的战略要地，他特派前锋统领硕岱率领满州精骑3000，兼程前往，保守荆州，然后再由荆州进至常德(湖南常德)，以绝吴兵东进湖广之路。又派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总统一大批满州八旗和部分汉将开赴荆州。

(四)因山东兖州地近江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广；山西太原地近陕西、四川，都属于东西孔道，为适中的地方，分别集结部队，"秣马以待"，随时调遣或应援各近邻地区。特命都督尼雅翰、赫叶席、布根持、穆占、佟国瑶等分赴西安、汉中、安庆、兖郧阳、汝宁、南昌等要地驻守，听命机动。

在采取军事措施、布置兵力的同时，康熙又连续采取了下列政治措施：

1．下令停撤平南王、靖南王两藩。立即召还前往广东、福建办理撤藩的钦差大臣梁清标、陈一炳回京。

2．原属吴三桂的文武官员，以及现仍在直隶各省，无论是在职的，闲住的，虽有父子兄弟现在云南的，"概不株连治罪，自今以后，各

宜安心守职，无怀疑虑”。

3．为防止内外沟通，康熙接受议政王大臣的意见，将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暂行拘禁”，待“事平”再作处置”。

4．向各重要军镇通报吴三桂反叛，指授方略，多方安抚和鼓励他们守御地方。康熙非常重视陕西的省情，因为该省距京师甚近，又控制西北边疆，它的存在对北京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他又给陕西总督哈占，提督张勇、王辅臣发去急紧谕旨：要他们注意发现吴三桂散发的“伪札、伪书”，晓谕官兵、百姓，检举揭发，向上报告。康熙称赞他们是朝擢任的“肱股之臣”，捍御边疆，绥辑军民，唯他们是赖康熙的这种行动，实为思想政治动员的策略，极力笼络他们实心任事，为朝廷效力。

5．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政治措施，是在同年十二月六日正式下诏削除吴三桂的王爵，向云贵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发布通告，揭露吴三桂的叛逆罪行。康熙的这一系列措施都是把吴三桂作为主要敌人和打击目标，而且对吴三桂采取毫不妥协、坚决消灭的决心。

第二节 叛军占湖南六省闻风而动

尽管康熙对吴三桂举兵叛清，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措施，但是还不能很快见效。而叛乱正在迅速的扩大，逐渐的自南向北蔓延。

湘鄂风云突变康熙十二年年终的除夕，马宝等所率领的吴军，东进攻占了清浪卫，逼近了沅州(湖南的芷江)，此处是由贵州进入湖南的要地。在此之前，湖广蔡毓茶曾派彝陵总兵官徐治都，永州总兵李芝兰率兵应援，但两部的兵马迟迟未到。沅州只有总兵崔世录一人防守，康熙紧急指令，要桑娥领兵疾赴沅州，协同固守。但是由于吴军进展迅速，没等桑峨援兵赶到，沅州已被吴兵攻陷，该城总兵崔世录被俘。澧州(澧县)与辰州(沅陵)之间的交通已被吴军切断。这是吴三桂叛清的沅州之战。

吴军的迅猛攻势，吓得清政府的官兵胆战心惊，闻风而逃。驻防长沙的偏沅巡抚卢震为保性命，擅自放弃守土之责，当吴军还远在沅州一带，他竟丢弃长沙于不顾，逃到岳州去了。康熙听到后大怒，下诏逮扑卢震治罪。同时他又马上考虑到“武昌重地，不可不予为防驻”，特命都统觉罗珠满领兵速往武昌，“保固地方”，倘吴兵众多，不得轻战，若吴兵不来，可于岳州(岳阳市)以北，“选水陆要地驻防”。在康熙的严督下，清兵向岳州集结，前锋统领硕岱部于康熙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抵达荆州，护军统领伊尔度齐的兵、护军统领额司泰的兵分别于二月初一日、初二日前后到了荆州。接着康熙又命令他们拨出部分兵力，加强常德(今湖南常德)的防御。卢震虽然潜逃，但长沙仍在清兵之手。康熙很重视长沙，他认为长沙是“武昌咽喉之地，又为武罔(今仍名)、宝庆(邵阳)州郡水陆要途，并且壤连粤西，又命他们进驻长沙。正月二十日吴三桂离开贵阳到了镇廷，督令将士继续北进，指示总兵杨宝应进攻常德，杨宝应奉命直取常德，其父杨道明为内应，一举攻陷常德，知府翁应北投降，清兵四散逃走。

二月初八日，吴三桂又命夏国相率部夺取常德以北的澧州。吴兵到了澧州，兵不血刃，城内的清兵献城易旗投降了吴军，清兵将领桑峨、总兵官周邦宁率部从常德还至澧州城外时，看见吴兵的军容甚盛，自感一旅“孤军不能迎敌”，“不得不退回荆州，向清廷告急，请求“大兵星驰”赴援。

继澧州被吴军占据后，吴将张国柱又率部攻陷了衡(今湖南衡阳市)，然后挥师进据长沙。原来，偏沅巡抚卢震逃走后，长沙只有副将黄正卿，参将陈武衡留下守城，当下吴军近在咫尺，全城人心惶惶，官兵已无心守城．即使康熙虽命吏兵两部传达他对长沙地区文武各官的指示：“逆贼吴三桂虚声恫吓，以致巡抚卢震弃地潜逃，已行孥究。湖南各文武官员仍能保百姓，固守地方，允称尽职，事平之日，从优加典”。但是，援军迟迟不到，当地军民无心守城，守城将领黄正卿、陈武衡不想为清廷出力，连同部属和长沙城池都献给了吴军。长沙的失守，在于清廷的援兵行动迟缓，畏缩不前。当康熙遣派都统觉罗巴尔布、护布统领伊尔度齐等率部到荆州时，常德、澧州尚未失守，如按康熙的指令，兵

马稍事休息，就迅速渡江，赶赴常德、澧州，两州不致于很快的就失陷。但是他们到达荆州后，却“迟迟不前”，给吴军造成了有利时机，长沙空虚，吴军无须进攻。守将就献城投降，所属的士兵和战船统统归属了吴军。吴三桂的大将张国柱与夏国相进驻了长沙。常德、长沙“扼湖湘之险，当水陆之冲”，两城一失，“金楚之势”却转到了吴军方面。

吴三桂于二月间，“日夜兼程，突逼(辰州)城下”，守城的清兵“士卒解体，孤城无援”，辰州被吴军一攻即破。到二、三月间，吴三桂又亲自到常德、澧州等地督战，“兵锋甚锐”。

康熙十三年三月初，吴三桂命大将吴应期与张国柱以水陆大军并进，谋取洞庭湖三滨的重镇岳州。他们到达岳州后，秘密派人遣入城中策反，该城的参将李国栋“私行纳款”，把岳州献给了吴军。

从康熙十二年底，吴军首陷沅州后，到了第二年即康熙十三年三月，在3个月的时间里，吴三桂挥军长驱直入，接连攻陷沅州，常德、辰州、长沙、岳州、衡阳等战略要地，而清兵未集，“处处无备”，“5000里无只骑拦截”，所得之地，清政府的将吏非茁即降。清朝兵部惊呼：“吴三桂反叛以来，湖南绿旗官兵多附贼”。“湖南全境皆属三桂”。这是吴叛清的湖南之战。

吴军在湖南的全胜，就象一道冲击波，引起了连锁反映，那些不满清王朝统治的人们，乘时而起……。

与湖南仅一江之隔的湖北一些地方，已经或正在酝酿斗争。当吴军胜利的进入湖北省的时候，康熙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襄阳总兵官杨来嘉在谷城(今湖北省)宣布起兵、响应吴三桂。关于杨来嘉降吴，康熙早在吴军陷常德、澧州时就有所察觉，特密令大将军顺承郡王勒罕锦密切注视他的动静。康熙指出，杨氏才能平庸，所部官兵大都“藐玩”，恐有变故，要勒尔锦加强襄阳的防御，时刻提防杨氏。果不出康熙所料，在吴军攻占长沙时，他与郧阳(今郧县)副将洪福串通，在谷城密谋起兵。幸亏襄阳早有御防，他的计谋没能全部得逞。

三月十九日，继杨来嘉公开叛清后，与他合谋的郧阳副将洪福也以所部清兵叛于郧阳。在此之前康熙曾指示兵部：“郧阳地介三省(陕西、河南、湖北)中多旷土，山谷拒塞，奸民易于啸聚”，可能有与吴军相呼应的，或可能吴军乘间进犯，将提升佟国瑶为提督，驻于郧阳城内“弹压”。康熙不幸而言中，洪福一起兵，就率所属清兵千余人围攻陨阳提督佟国瑶的衙门。佟国瑶同游击杜英仅以300多名标下亲兵同多倍的叛兵激战。战斗持续20日还没有攻下，洪福怕清军来援，不敢恋战，引兵撤退，投往吴军去了。

四川兵变湖北的杨来嘉、洪福的叛变，都被清兵击退，并没引起更大的骚乱。严重的局势是发生在四川。吴三桂一起兵，康熙就十分关注四川，他认为四川与云南接壤，估计到“贼兵必犯巴蜀”，先调驻守西安的西安将军瓦尔喀火速进川，指示他凡自云南入川的险要之地，“俱行坚守”。原令副都统科尔良驻防太原，他还未及起程，又改赴西安，接替瓦尔喀守西安酌职务。康熙仍不放心，又续增都统赫叶及瑚里布、穆占、副都统廷布率京城官兵同往四川。此路军由赫叶、瑚里布统辖，西安兵由瓦尔喀指挥，两路军应尽快会合，“同心协力”，守住四川。赫叶与新任命赴荆州增援的勒尔锦同一天离京出征。临行前，康熙又亲行告祭

礼，出西长安门，目送两将军出城，又派内大臣，礼兵两大臣在郊外设酒饯行。康熙的这一举动，表明了他对四川省看成如同荆州一样的重要。

正当赫叶等离京动身的时候，四川的巡抚罗森急派人到了京城，报告了全川的军心不稳，颇怀异志。康熙惟恐情况有变，紧急下令催促副将瑚里布等选轻骑先行，速赴四川。

还没有等到援兵赶到四川，已传来四川提督郑蛟麟与川北总兵官谭弘合谋叛清的消息。谭弘和郑蛟麟都是原明朝的将领，他们在满清入关前后分别投降了清廷。吴三桂反清后，于康熙十三年正月派王屏藩进兵四川，策动叛乱。谭、郑合谋响应，接受了吴三桂的官职，谭被封为“川北将军”，蛟麟被封为“总督将军”。

几乎与谭、郑投降吴三桂的同时，四川的巡抚罗，森、总兵官吴之茂也都先后投降了吴三桂，他们降吴后，也受到了重围。由于罗森、郑蛟麟、谭弘、吴之茂是四川的军政长官，他们率先叛清，所以他们属下的官兵和各府州县的官员也都随之而叛了清廷，这时全川都纳入吴三桂的控制之下。他们声言：一出汉中，一下夔州。声势确是逼人。

康熙一面催令将军瓦尔喀继续向四川进兵；一面嘱咐他向郑蛟麟招抚，派人前去传达朝意旨：“你虽反叛，朝廷仍念及你从前效力，卓有成绩，一时处于被迫胁，也是情由可原。你在京的子孙家产并没按法没收和逮扑。可将朝廷派往四川的兵部郎中托必泰尽速遣还。否则大兵压境，克复城池，后悔莫及”。康熙的这番好意，不用兵力，仅用语言是打不动他的心的。直到他兵败以后，才又投顺了清廷。

吴三桂发动的叛清战争，以迅猛之势，继续向中国的北部蔓延、发展，一直深入到畿辅、清政府的心脏——北京！密谋暴动、叛变的事件不断的发生，造成清廷的统治险象丛生。

吴三桂起兵叛乱仅3个多月，已领有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四省，事情还没有到此结束。不久，福建、江西、渐江、广东、陕西等省或地区相继叛清，超越了河南、河北，直到清廷的心脏北京，更远至长城以北，也燃起了叛乱的峰火。这次由吴三桂发动的叛乱，发展之快，来势之猛，波及之广，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它已远远的超出了吴三桂与清廷之间的利益之争。从广义来讲，它显示了汉民族同异民族统治者的再次大较量。各个阶层的汉民族参加了这场斗争，虽然他们各自目的不同，但是在消灭清廷这个总目标上，却是不约而同的取得了一致。所以单是吴三桂一个人的利益不致引起全国范围的大乱，也不是他个人的力量所能动员千千万万的人来参加他的叛乱。他的行动，不过反映了清朝统治下的汉族人民的普遍心理和要求，也是人们对清政权不满的总爆发。归根到底，吴三桂起兵，是代表原明朝官僚士代夫们的根本利益，反映了他们的意志和要求，而且耳是以吴三桂为首的这批人掌握着领导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场战争，是清朝统治阶级中两个集团、即以满族贵族为核心主导派，与原明降官降将为非主导派的权力之争，也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争。另一方面这场战争，重新又给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的农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故吴三桂主动发动的这场内战是不足取的。

称雄广西广西地接云南、贵州形同一体。所以一发难，康熙就想到

了广西，力图固守广西，以牵制和阻止叛军北进。他毫不疑迟的任命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为“抚蛮将军”，令其坚守。他以为加恩重用，孙延龄就一定能效忠于朝廷，不会发生变故。他不时的关注广西方面的军情。康熙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他还给孙延龄、都统钱国安、巡抚马雄镇、提督马雄等广西军政要员发出指示：“保固粤西，唯你们是赖。今大兵已抵武昌、倘贼犯武冈(今湖南武冈)、宝庆(今湖南邵阳)，你们即率所部官兵，进剿叛军之后，大兵迎击于前。量此逆丑，自可克期扑天。你们身在地方，必有确见，要同心协力，谋定而后行动，以副朕倚任之至意。事平之后，自将以至率伍，朝廷都不吝重赏。凡有机密军情，可报告给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康熙的指示，表达了清廷对他们的重托和殷切的希望。他具体指授了方略，要他们捣吴军之后，而清廷的援兵迎击于前，两下夹攻，以消灭叛军于湖、粤之间。但是吴三桂的战略出乎康熙的意料之外，吴军撤下武冈、宝庆等地，直奔沅州、常德一线，清军的增援也迟迟未到，故康熙的战略计划也随之落空。即使如此，如果孙延岭坚守住广西，对吴军的后方也将构成一重大威胁。

康熙万万没有料到，就在他发出上一指示的数日后；二月二十七日，孙延岭据桂林叛变了清廷，投向了吴三桂。二月二十八日，孙延岭诈称议事，把诸将都骗到他的府中，事先埋伏下精兵，准备下手。议事完毕，当诸将起身离座时，孙延岭布置的伏兵齐出，堵住门，并冲上前去，刺杀毫无戒备的参加议事的将官。王永年首当其冲，最先被伏兵杀死。几乎同时，副都统孟二茂、参领胡同春、李一第等30余人都被伏兵迅速地歼灭。紧接着孙延岭又派兵包围了广西巡抚马雄镇的衙署，一点也没有防备的马雄镇和家属被围在他的院内，束手无策。孙延岭出示了吴三桂的命令，要挟马雄镇投降。马雄镇料知自己很难逃脱，只能让儿子设法逃出虎口，趁孙部围守不严，其长子马世济偷偷溜出衙署，辗转到了江西赣州，江西巡抚董卫国将广西情况紧急上报清廷。康熙才知道广西发生了叛变，立即遣使到江西，护送马世济进京，当面听取了报告。

又过了数月后，吴三桂督令孙延岭尽快采取军事行动。他下令出兵攻打平乐等地。两广总督金光祖闻讯，派人火速进京报告，孙延岭起兵月余后，康熙才下令讨伐孙延岭。他对孙延昤的政策是必须予以镇压，特命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两广总督金光祖、提督成雄会商，如有“可剿之势”，即速进兵广西，剿灭孙延昤；如一时不能速进，可等朝延发去大兵后，“协同剪灭”。他又传谕马雄，要固守所守地方，“相机灭贼”，倘抵御不住，可率官兵赴广东，与尚可喜等协守广东。

孙延昤叛清时，广西提督马雄没跟着从叛，他们之间素来就不和睦。当孙延昤派人前往柳州，勒令马雄从叛时，遭到拒绝，孙延岭大怒，率兵进攻，被马雄击败。但是，广西已属孙延岭的势力，马雄独立难支，当吴三桂兵进广西时，声势正盛，他无法守住柳州。他派人前去湖南请降吴三桂。三桂大喜，立授马雄为“怀守公”。广西的都统钱国安亦步其后座降吴。

这个时候，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也叛清作乱，并向江西开展了进攻；吴三桂又在湖南督战与清军相持，牵制了清朝的大批的援军，故此未能如康熙所愿进兵广西，孙延岭也才能得以维持下来，称雄广西。自

称“安运大将军，向广西的平乐、梧州等地各处发布命令，起兵反清。他招收万洋山土寇，派去部分旧军，把他们组成五旗，每旗兵士2000人，纵容他们分掠附近各县邑。他又自封为“安运王”。吴三桂给广西各州府颁发印信，授其党羽傅奇栋为广西巡抚，李迎春为布下政司法,程可则为按察使。

由于孙延昤与马雄相继叛清，钱国安刚刚病死，广西“守土文武官员或望大兵赴援，或被群贼胁从，不复与延岭为敌”。但是孙延岭和马雄仍然对立，互相攻击。据来自两广总督金光祖派人哨探的可靠消息，直到康熙十三年十一月初“孙逆调兵前去征剿马提督”，结果又被杀败。

吴三桂本来就看不起孙廷岭，他很看重马雄。但是为了共同的利益，他还是力图调解两人的矛盾，可是却收效甚微。吴三桂为了夺取湖南战场上关键性的胜利，屡次命令或迫胁孙延岭出兵湖南助战，孙延岭总是“以部众不从”为借口，婉言拒绝。由此吴三桂对孙延岭很恼火，并且逐渐起了疑心，密令人时刻注视孙延岭的动向。

孙延岭叛清原不是很坚定的，起因还是从王永年等人参劾他而引起的，他不过只想借助吴三桂的势力以逞私怨、报私仇，其妻孔四贞由于他父亲在世时与清廷关系密切，也不愿落个“叛贼”的恶名。她还顾虑到孙延岭的所作所为会给父亲孔有德的一生英名带来损害，因此，她感情深处并没有跟清廷彻底决裂。孙延岭在家中俱怕孔四贞，毫无疑问孔四贞的思想对他有所影响。孙延岭起初对吴三桂俯首听命，随着他的势力增长，也不那么听从吴三桂了。这一切吴三桂都看在眼里，表面上，还是一如既往宠信他，心里却在谋划除掉他。

孙延岭的思想转变，又想归顺清廷，这事很快的就被吴三桂侦知，他密令从孙吴世琮赶赴桂林，将孙延岭除掉。吴世琮明里是来调解孙延岭与马雄之间矛盾的，使之讲和。吴世琮到了桂林后，没有进城，把所带官兵都安置在城外，派人进城请孙延昤前来议事。孙延岭不知是计，所以接到邀清后，就出城面见吴世琮。世琮敷衍了一阵，孙延岭也未疑心，他刚上马，吴世琮早已安排好的人，一使眼色，杀手趁孙延昤不注意，从背后一剑刺去，穿透前胸，延岭当即扑倒在地身亡。孔四贞善骑射，吴世琮对他很客气，不准部下伤害她，并把她和有关亲属都护送到昆明。吴世琮派他的属下将官李成栋留守桂林，而孙延昤的部众仍由孔有德旧部将领统辖。吴世琮又召见了被监禁的原广西巡抚马雄镇，转述吴三桂的旨意，好言劝他投降。马雄镇大骂反贼，宁死勿降，结果全家被吴世琮杀害。

吴三桂除掉了孙延岭，杀害了马雄镇一家，从而把广西全省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他解除了后顾之忧，便专力于湖南战场，同清军展开了战略争夺战。

靖南王东南易帜吴三桂发动叛乱时，康熙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湖南、四川、陕西、江西诸省，他频频调兵遣将，意在加强这些地区的防御，而对福建方面还未注意，未发过一道指令。很显然，他未估计到福建方面可能出现不测事件。他大概认为，长期住在北京城的耿精忠，一来年轻，二来清廷给予他的恩蕙不少，料他还不至于挑起事端。事情确实出乎他的意料，正当他正在忙于上述地区的防御。康熙十三年三月，杭州将军图喇传来惊人的消息，耿精忠占据福建反叛。福建总督范承冀被幽

禁、福建巡抚刘秉政从叛……

耿精忠是耿藩的第三代王，康熙十二年，他听清平南王尚可喜将撤藩回辽东,也被迫请求撤藩。吴三桂起后，康熙停撤平南和靖南两藩，仍命他镇守福建。吴三桂起兵，立了旗号，马上派人飞驰福建，呈上他的信，诱耿精忠共同起兵反清。本来，要求撤藩不是他的本意，福建是他利益的根本所在，关外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异域之地，撤藩北返，无疑对他是一个严重的伤害。在撤藩问题上，他跟吴三桂有着共同的利。而吴三桂首先采取行动，向清廷撤藩表示坚决的抗争，这对耿精忠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就是说，吴三桂的行动，充分反映了耿精忠内心的情绪和愿望，代表了他的利益。所以说，吴三桂起兵，至少说耿精忠是同情者、支持者。更何况吴又约他起兵，更是一根导火线，点燃了他内心的不满之火。也可能是他准备不够，或者是看一看形势的变化再说。总之，他没有立即起兵，而是在吴三桂起兵四个月后，才采取行动。

耿精忠接受了吴三桂密约后，进行一番秘密的筹划。参与决策的有他的左翼总兵曾养性、右冀总兵江元勋、参领白显忠、徐万耀、蒋得、王振邦、王世瑜等人。耿精忠的母亲周氏知道了儿子的谋划，很是生气，多次责骂他，力图阻止他的胆大妄为。但是精忠根本听不进去，周氏气愤之极，绝食而亡。

康熙十三年三月十五日，耿精忠在福建宣布同清廷脱离关系，势不两立。

耿精忠属下诸将官都随他叛清，地方的大员也多投降，他把不愿和他从叛的福建的总督范承漠囚禁起来，就再无人敢反对他，若有不从的，马上就被处死。耿精忠大权在握，自称“总统天下兵马上将军”，比吴三桂自称“元帅”自低一格。他效法三桂，蓄发易衣冠，改穿明朝的服饰。自己铸钱，叫做“裕民通宝”。

耿精忠大封从叛的将领，以曾养性、白显忠、江元勋为将军；所属佐领黄国瑞、林芳孙、李似桂、廖廷云、护卫吕应计、夏季旺、陈斌、长史陈羲等一大批人，都加给新的职务，分授都督，总兵官等职。耿部的叛变，进一步加深了清政机的危机，康熙对此当机立断，迅速作出反映。一面削其王位，发通告致讨；一面派“定南将军”希尔根统领大兵由江西、“平南将军”赖塔由浙江、“平寇将军”根特巴图鲁由广乐等三路进剿福建。“耿精忠歼灭，在于旦夕”。另外又用力招抚，使他悔罪顺，他指示兵部，尽速“传谕耿精忠，果能追念累朝恩德及伊父忠荩遗言，革心悔祸，投诚自归，将侵犯内地海贼(指郑氏兵)速剿图功，即敕免前罪，视之如初”。

于是，兵部奏遣工部郎中周襄绪、原耿精忠属下一等护卫陈嘉猷携带康熙的诏书到福建，去招抚耿精忠；康熙又指示进剿福建的赖塔等将领，不要因为派人去招抚而延缓进兵，直至耿投降为止，如不降，就坚决消灭。耿精忠既然反叛了清廷，岂肯轻易投降！康熙派遣的周、陈二人到达福建后，就被耿精忠扣留，对清廷的招抚置之不理。

康熙对耿精忠采取了招抚与镇压的两手策略，他在派使臣去福建招抚的同时，已布置三路兵马进征福建，命浙江将军图喇驻杭州，兼防海疆。到耿属叛乱，全国的形势，已经是叛乱四起，清政府的兵力已是不

够用，不得不调动北部边疆的宣府、山海关等处的兵马，以加强进剿福建的兵力。

正在康熙调集兵马征讨时，耿精忠已经开始了军事行动。他与吴三桂约定，双方配合作战，他主攻邻近的浙江、江西两省；跟广东潮州的总兵官刘进忠联络，命令他煽乱广东、广西；遣使渡海，约台湾的郑锦政权进攻大陆，许以福建两部沿海各郡邑割归郑氏政权；又向南取系琉球王国，索取军需，以为外援。耿精忠的这个战略方针，点燃了东南沿海的熊熊战火。他的兵马还没动，已向所属府州县和其它省份发出起兵的檄文，使福建全省顿时陷入混乱，且迅速的波及到邻近省浙江、江西、广东等省。地方守土的军政官员纷纷响应。从康熙十三年五月到年终，沿海各处叛变的消息不绝于清廷官方的报道。

五月，浙扛平阳兵变，总兵军蔡朝佐被擒；六月，浙江温州所属罗清营相继降精忠，黄岩(即黄岩，今属浙江)总兵官所属太平营亦变；七月，浙江嘉兴、湖州两府“土贼猖獗”；八月，江西饶州(鄱阳)营兵变，“贼势猖獗”；宁海、象山、新昌、余杭(均属浙江)四县“贼众蜂起”。

耿精忠叛清，为吴三桂开辟了东线的第二战场，形势变得对吴三桂更加有利。耿精忠的军事行动，首先是从福建省开始。他派曾养性、白显忠、江元勋等人为将，分别占据福建的中部和偏西北的延平(今南平)、邵武、福宁(今霞浦)、建宁、长州(今长汀)各战略要地。未进兵的地区凡檄文所到的地方，纷纷响应。在很短的时间内，福建全省都背叛了清廷，投降了耿精忠。

接着耿精忠出兵江西、浙江。他以白显忠为将出西路，政江西。白显忠派出部将李连、李太等进犯建昌(江西南城)、广信(江西上饶)等地。以马九玉为将，出仙霞岭中路，进攻浙江金华、衢州(今衢县)等地。又以藩下的都统曾养性率部万余人为东路，攻入浙江，专攻沿海地区。曾养性沈阳人，他是耿精忠叛清的主要参与和策划者之一。此人十分骁勇善战，深为耿精忠所依重。起兵时，封分为都督。他奉命攻入浙江，先至平阳，该城游击司定猷献城投诚，两处兵马合在一起渡飞云江，围攻瑞安。久攻不下，又转赴温州。温州守城的总兵官祖宏勋开城迎降。于是耿兵势大振，聚合兵丁10万，挥师北上直奔台州(今临海)地区，攻战了乐清，长驱直入到了天台、仙居，又北上攻取了绍兴府属嵊县。他联络了宁海、象山、新昌、余姚“土寇”，授于其首领鲁朝全、褚楚白等为总兵官、郝督，指使他们骚扰绍兴、宁波。他又分遣部众攻金华，自率一部攻取黄岩，该城守土的总兵官阿尔泰投降。他又西进到了常山，率兵2万，第二次进攻衢州。到康熙十四年初，曾养性横行浙江，攻势达到了顶点!清军不惜一切代价，与耿藩的叛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联郑联盟台湾的郑氏政权，从郑成功到他儿子郑经，一直坚持奉明朝年号，力图反攻大陆，恢复明朝政权，但是由于兵弱将微力不从心。正巧耿精忠起兵，很想借助郑氏政权的力量来壮大自己的势力，约他重返大陆，共同攻击清政府。郑经和他的谋臣非常高兴，把它看成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便毫不迟疑地委派大臣冯国轩率领1万人马，渡海从福建沿海登陆，占据了漳州、海澄(海龙)、同安、绍安、泉州及建宁等

处，有大小船100余只，驻守洛阳桥附近，招兵买马，号召当地的壮士入伍反清。

耿、郑联盟，时间只有几个月，就破裂了。原因是耿精忠以盟主自居，向郑经发号施令，封郑经为大将军，派人送去敕印。但郑经很不服气，说："靖南王乃食清朝的俸禄，且系明朝的叛逆，为何封我郑经!"心中甚是恼怒。郑经以实力和领有的地盘，自然不肯屈足于耿精忠之下，何况耿为明朝的"叛逆"，而自己是堂堂正正的明朝的海中孤忠，岂肯受他的敕封，他自感受辱。他们之间又在是否尊奉明朝的问题上加剧了矛盾，以致闹到公开指责的地步。进据漳浦，海澄郑经的守将出示布告，在声讨清廷窃据中原的一段文字后，先赞吴三桂"隐忍滇黔，生聚训练，三十余年如一日，合千万姓为一家，静候天时，暗奉嗣立(指朱氏后裔)，孤忠可鉴，大义不磨"。接着布告就指责耿精忠"建旗之后，"颁发命令，"俱称敕旨"，皆用皇家专用的黄绫，"从不遵大明正统"。他"妄自尊大"把我等视为"附唐"，"僭称尊号"，已可见其人之心!布告中还说，他们只"遵照吴王原檄布，中兴大义，惟郑王为监主，复我大明300余年之基业，澄清东南之半壁"。布告要求他们所占领的各邑郡文武官员士绅百姓要"同恩水木本源，共作王家柱石"。

布告反映了台湾郑氏的政权的基本立场，声明不再与耿精忠合作，只愿与吴三桂联合，共扶明后，恢复明朝的基业。可能限于当时的交通不便，郑氏政权还不知吴三桂已无意复明的确切消息。耿精忠很提心郑兵和清军的夹攻，便求吴三桂的帮助。吴三桂从他的利益考虑，当然不希他们之间互相攻击，就派孔曾钱点到福建做两家的和解工作。但在这时，郑氏已经知道了吴三桂的政治意图，已开始对吴不满，郑氏大将刘国轩说："吾家在海外数十年，称奉明号，今吴号'周'，耿称'甲寅'。所以我带兵来是要攻你们俩家的。如你们归正奉明号，我不难进镇江，上南京，否则你们两家都我的敌国。"因吴、郑、耿各持一端，各有企图，政治目标不统一，这就在反清的阵营中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原则分歧，这个分歧，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彻底失败。

正当叛乱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候，清廷方面都加紧了对耿藩的军事进攻。从康熙十三年七月后，清军在江西、浙江战场开始取得进展，不仅顶住了耿军韵进攻，连连取得了胜利，而且还收复了一些失地。虽如此清军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从双方的战斗中，可以看出耿军的战斗力也很强，它借助于军队数量上的优势和各地的响应，使它还能和强大的八旗兵周旋，败而复来，清国剿不胜剿，故而短期内不能有明显的收效。为此，康熙指示康亲王杰书说："浙江贼寇，在在窃发，骚扰地方，皆由耿逆未天之故，若剿除耿逆，则小丑自灭。"他要杰书等将领，"或固守金华诸处，由仙霞岭、分水关入闵；或固守杭州、衢州，从金华进克温(州)、处(州)。平定浙江，剿天闵贼，听大将军酌量速行。

由于耿军在同清军的反复争夺中，实力有所消耗，军需物资供应不足。而清廷对耿精忠又采取了一面不放松军事上的进攻，一面又加紧做招抚工作，所以耿军和清军在江西、浙江战场处于拉剧的形势。

尚之信广东叛清三藩中，已有吴、耿两藩先后叛乱，唯有平南王尚可喜镇守广东按兵不动。在吴三桂起兵的时候，就分别遣使到福建、广

东，策动两藩同反。吴三桂非常需要他们的支持，有了他们的参加，他将如虎添翼，就可以横行天下。他知道，清廷撤藩，伤害了他们的共同利益，所以他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三家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万万没有料到，尚可喜断然拒绝参加叛乱。康熙十三年四月，他把吴三桂的来使和约他起兵的“逆书”一并解往北京，报告给清廷。在广西孙延岭、福建的耿精忠公开叛乱后，尚可喜再次向朝廷表明态度，跟他们划清界限。

广东位于广西和福建之间，北与湖南江西相邻。孙延岭、耿精忠已叛，而吴三桂的兵马又集结湖南境内，这就使尚藩处于叛乱势力的包围之中。当他得知吴三桂派遣2万人马屯扎黄沙河时，立即向清廷报告，如果“孙吴二逆合兵一处，则势益猖獗”，他请求就近调援兵，速来广东会同他一起剿灭“孙逆”。

在尚可喜的支持下，广东的局势还维持着稳定。可是，事隔不久，广东潮州(今潮安)总兵官刘进忠于康熙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公开举兵叛清。刘进忠跟耿精忠早已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一听说耿藩有变，就先派心腹杨峁震赴福州，与耿精忠联络，以献潮州土地为条件，给他将军的名号。精忠大喜，立即答应。于是，刘进忠就在潮州城内密谋发动叛乱。密谋被驻在城内续顺公沈端侦道，就与游击李成功、张善继密商对付刘进忠的办法。四月二十日双方爆发了武装冲突，在城内展开了巷战，沈端兵败被浮，李成功等被杀，耿精忠已派漳浦总兵刘炎统兵应援，二十三日刘进忠把福建的兵马引进了潮州城，兵势大振，精忠授刘进忠为“宁粤将军”。

刘进忠把耿兵引进了广东，直接危及到广东的安全。尚可喜派次子都统尚之孝统兵征讨刘进忠，屡挫叛军。康熙十三年七月，先后收复了程乡、邻近福建的镇平(蕉岭)和邻近江西远(今平远附近)等县。尚军副都统尚之节自程乡间道入福建，沿途恢复了大埔县(广东大埔北)，抵达三河坝，迅速逼近潮州。十月尚藩属下总兵官王国栋在潮州城下同刘进忠部与耿郑军的联军激战三战三捷。十一月，尚之节进兵潮州府，攻下东津笔架山、洗马桥等地方。巡抚刘秉权、王国栋等攻破潮州城南凤凰州木城2座、击毙都督金河臣等．歼灭叛军5000余人。副将何九衢恢复了潮州府的澄海县。

在尚可喜的总指挥下，尚之孝、尚之节和诸将连战连捷，刘进忠、耿精忠及台湾的郑军连连受挫。为此受到了清廷的特殊嘉奖，特命尚可喜进爵亲王。以此鼓励尚氏父子继续效力清廷，这对平定吴三桂的叛乱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尚可喜父子得到了清廷的特殊礼遇，更加拼力征剿。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广东日益严重的局势，以刘进忠为首，在广东掀起的武装叛乱，使广东全省人心惶惶不安，流言四起，隐藏在山中的“土寇”，乘机煽乱，其中也不乏反抗清廷及地方官吏残暴的起义。广东处于极大不稳定状态之中，且大有蔓延之势。尚可喜调兵遣将，剿不胜剿。

广东的形势在继续恶化。尚之孝统兵围潮州，刘进忠负城顽抗，连战连败，如果清军能及时破城，是对平复全省的形势有利的。但是惊慌失措的刘进忠求救于台湾的郑经，郑氏派大将刘国轩、赵得胜、总兵何

祐率众万余来救援。尚之孝因双方的兵马悬殊太大，无力对抗，于是退到普宁(今普宁北)。接着六月又有高州总兵祖泽清叛清投靠了吴三桂。招引来了广西的叛将马雄、董仲民、李廷栋、王洪勋，郭义等将官，并拥有兵马数万，连续攻陷雷、廉、德庆、开建、电白诸郡县，尚军屡战失利，叛军直抵新会、潮州。郑氏将军刘国轩与刘进忠二部合兵一处，又于春节前夕，攻破尚可喜的普宁大营，乘胜追至惠州的博罗。新会和博罗是广州的外围地区，叛军一举占领，使省城广州受到严重的威胁。

广东叛乱的蔓延，正向广州逼近，而尚可喜恰在病中，尚之孝又远在潮州，广州空虚，他焦虑煎熬，计无所以，向清廷连章告急，要求援兵，康熙先下令从江西兵中抽调精锐，由副都统额赫纳统领赶赴广东救援。此后又加派援军，令驻在山东桂州的部分骑兵和蒙古兵700名调赴江宁(今南京市)，而现驻扎在江宁的每佐领骁骑兵1名、蒙古兵600名、以及驻扎在徽州、池州的满州兵和蒙古兵700名，总计约3000余兵马，数量不多，却是精锐，由“平寇将军”哈尔齐统帅驰赴广东，康熙并加严令：“如有稽迟，坐以失误军机之罪。”

康熙的谕旨还没到达广东，援兵也正在调遣中，广东的形势却进一步恶化。吴三桂调遣兵马加紧对广东进攻，矛头直指肇庆而逼临广州。肇广离广州不过200里左右，骑兵急驰不要一天就可以到达。尤其严重的是，尚藩所辖的总兵苗文秀、副将吴启镇、游击李有才等相继叛变，更加剧了广州危在旦夕的局面。吴三桂的意图，无非是一逼尚可喜投诚归顺，二是如果不降，就以武力解决，占领广东全省。能否夺取广东对他至关重要。因为广东邻接广西、湖南、福建三省，而吴兵已进至湖南，广东足以构成对吴三桂北进的后顾之忧，因此他急于拿下广东，志在必得。

由于刘进忠、祖泽清等重要将领的先后叛变，引来台湾郑氏的兵马和广西的叛军，吴三桂从中配合督战，在很短的时间内“粤东十郡，竟失其四。”而广州“省会一区，亡在目前，人情汹汹，俱无固志”。

吴三桂对尚可喜加紧了进攻，一面施加军事压力，目的是继续逼迫尚可喜投降；一面利用尚氏家族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派人游说尚之信，千方百计地收买他，引诱他投降。吴三桂答应他事成之后，封尚之信为王，世守广东。尚之信作为长子没能袭爵，所以很恼怒他的父亲，嫉妒弟弟尚之孝，一肚子怒气。但他又不想变节而降，负于三朝的重恩。但是在广州濒临绝望之际，处于困境的尚藩家族，要么全家自杀，或抗后城破而死，要么投降吴三桂。尚之信并不想死，认为死而无益，名为报国，实无益于国。他内心充满了矛盾。但是谋求王爵的虚荣心，又促使想借吴三桂的势力，夺取平南亲王的承袭权。

康熙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尚之信在广州发动了兵变，炮击清兵的大营，派兵看守父亲的府第，外外封锁，接管了平南王的权利。并接受了吴三桂“招讨大将军”的伪号。两广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也随着尚之信的“叛变”而投降了吴三桂。尚之信虽然叛清降吴，但是始终没有出兵对清军作战，吴三桂屡次催令甚至胁逼他出兵痪岭，开辟新战场，同清军作战，可是他就是按兵不动，实在没法应付的时候，便出库金10万两佐叛军，以塞三桂口。他表面上天天饮酒，不问政事，藉以麻痹吴三桂“以安贼志”，吴三桂也认为尚之信酗酒无度，无大志而不以

为意。

陕甘王辅臣激变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的时候，迅速遣使各地，带着他的信和讨清檄文，约会他的旧部故交，同他一起行动。这中间还有平凉的王辅臣和甘肃的张勇。因为他俩都曾是他的部下，同时王辅臣、张勇都以骁勇善战称著。他们为人正直，忠于职守，为吴三桂所器重。吴三桂非常希望他们起兵，在西北开避新战场，可造成南北夹击清廷之势。这一形势对他将具有深远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因为王张实握西北地区的兵权，手下有强兵猛将，是二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无疑将给吴三桂的叛军增添不可多得的生力军。不仅如此，王与张驻防的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和边防重镇。如果王、张二将在平凉、甘州起兵，一举可以控制西北，而出平凉，举足可以进入陕西和山西两省，迅速逼近清廷的心脏——北京，从而构成巨大的威胁，同时王、张的兵力足以牵制住清廷的大批兵力，吴三桂就可以在湖南从容攻城，而在东南沿海又有耿藩的兵马，这样一来就造成东西、南北夹攻清廷的有利态势，置清廷于不能自拔的绝境。

吴三桂满以为，凭自己往日对王、张的恩情，特别是对王辅臣的特殊礼遇，他们一定会闻风而动，听命于他。可以，他万没想到是，王、张无意从叛，而且予以坚决的拒绝。当王辅臣接到吴三桂派去的特使汪士荣递交的书信和任命扎时，没有犹豫，一刀切断他与吴三桂的个人感情的联系，立即命令属下拿住汪士荣，连同信扎，派他的儿子王继贞押解，星夜驰往北京。

王辅臣父子举发吴三桂的“逆书”，促使康熙对陕西方面警觉起来，十分重视这一地区的防务，他感到有必要派一位得力的大臣前去总揽一切事权，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事变，他选中了刑部莫洛，授以全权，经略陕西。为了提高莫洛的地位，有利于统辖各个方面，号令专一，特加莫洛武莫殿大学士，仍以刑部尚书管兵部尚书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任陕西经略，赐以敕印。

陕西本来就有封疆大员，康熙却又置一经略，位在总督之上。实际上康熙是把莫洛当作他个人的代表派到陕西，行使着朝廷所赋予的最大权力。这表明康熙是多么重视陕西的防务。

尽管王辅臣父子向清廷表明态度，同吴三桂划清界限，却未能赢得康熙的完全信任。因为他知道王辅臣与吴三桂有过密的关系，他确信这种关系不会一下子断绝。康熙对王辅臣的不那么放心，这从他的军事部署和具体任命可以反映出来。

同年七月初，康熙单独给甘肃提督张勇发了一道指示：“秦省边陲重地，恐奸宄窃发，尔乃封疆大臣，朕所简任，可率所部总兵等官，固守地方，有为乱者，严行辑治，以副朕倚任股肱之意”。张勇任甘肃提督，却要让他关注陕西方面的情势，密授以方略，严防逆乱发生。尤其强调张勇是他亲自选任的，以示恩于他，表明皇帝对他的特殊信任。

对张勇如此，相反，对王辅臣却想法把他调离陕西。在对张勇发出上述密旨之前，康熙已命令辅导同将军席卜臣等赴荆州增援。后因情况有变，指示辅导不必再去荆州，或者随将军赫叶等进取四川保宁，或仍驻平凉，具体由莫洛酌遣。莫洛回奏，说四川“逆贼”正固守保宁，而广元所属百丈关诸处，有“贼众盘踞”，前往增援的兵力不足，拟将增擐的

副都统吴国正和马一保的军队发往广元。

这时，突然发生了新的情况：叛军从三路来犯，已经包围了宁羌州(今陕西的宁强)。这个地方属陕西管辖，是清军入川的后路，康熙命令莫洛“速行救援”。正在保宁的莫洛得到命令，急速传令有关将领速援，先在宁羌州城外击败叛军，迫使他们撤围而逃。考虑到宁羌地关重要，康熙及时改变对王辅臣的命令，通知莫洛调遣副将雷继宗与王辅臣部固守宁羌诸处。就这样王辅臣没有去平凉，而到宁羌州驻守下来。

经略莫洛率师进征四川，在陕西的汉中与四川保宁交界的地区受阻。四川的叛军又攻占了七盘关与朝天关(两关在广元和宁羌州之间)，切断了清军的饷道，驻广元的清廷援兵已缺饷二个月，屯聚略阳嘉陵江上的粮船被叛军夺去。粮饷不继，清军无法向前推进。而且处于很危险的境地。康熙急令：“定西大将军”贝勒额、经略莫洛、四川总督固有德、巡抚张德地速撤保宁的清兵，回师广元。要莫洛等人亲自殿后，以利原驻广元的清军安全的回汉中，固守阳平(宁羌西北略阳南)等处，歼除宁羌地区的叛军，“整顿士马，再图恢复”。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初，莫洛率部至宁羌州，驻守南教场，与王辅臣兵营相距2里多路。初四日，王辅臣的标兵突然向莫洛的军营发起进攻，愤怒的呼喊，要粮饷，要好马，蜂拥而来。莫洛猝不及防，他的亲随满兵拼力抵抗，以雨点般的箭矢将乱兵射退。于是王辅臣亲自督战，再次猛冲，砲矢齐发，莫洛也出跑，挥兵反击，一颗鸟枪流弹飞来，正好命中莫洛，当即身死。莫洛所部章京、笔巾式和兵士多死于乱阵之中。

战斗结束后，莫洛的标和运粮兵仍有2000多人，均被王辅臣劝降。十二月七日王辅臣率叛兵自安羌州撤至沔县(今陕西勉县西侧)。又从沔县北上略阳驻守。定西大将军董额随莫洛之后，撤至沔县，得知王辅臣叛变，急忙退保汉中，迅速向清廷奏报。

康熙对王辅臣的叛变，十分震惊，急忙召见王辅臣在京的儿子王继贞，从容地对他说：“你不要害怕，朕知你父忠贞，决不至于做出谋反的事。大概是经略莫洛不善于调解和抚慰，才有平凉兵哗变，胁迫你父不得不从叛。你马上就回去，宣布朕的命令，你父无罪，杀经略莫洛，罪在众人。你父应竭力约束部下，破贼立功，朕赦免一切罪过，决不食言！”

康熙把王继贞放回，赦免其父的罪行，即已确定了对王辅臣的基本方针，力争招抚，和平解决。康熙深知，王辅臣的兵变，已对时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甚至打算亲临荆州，指挥作战。可见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已直接危及了他的整个战略部署，事件很明显，陕西一乱，与四川叛军会合，北进中原，长驱北京，而清廷的兵马云集荆州，北方空虚，从而进一步地加剧了清廷的危机。

康熙在放走王继贞之后，又派遣科臣苏拜携带他的招抚谕旨前往陕西，会同总督哈占商酌，选择干练人员，或亲去辅臣处，或派他人代替，向王辅臣宣布朝廷旨意，招其归顺，并尽快“安抚乱兵”。与此同时康熙又在军事上严加防备。首先加强省会西安的兵力，“以保固秦省”。他把调往兴安等处的兵马改调到西安，令他们“星夜奔赴”，不得迟误。他犹感兵力不足，但“京师禁旅，遣发颇多”，已没有兵马可调，他决定

再调蒙古兵。他指示兵部：“秦省重要”，令理藩院员外郎拉笃祜等3名官员速往鄂尔多斯调蒙古兵3500人，调归化城土默特兵700人皆赴西安驻守备征。至康熙十四年正月，归化城土默特二部、四子部落、毛(茂明安)、吴喇忒三部计七旗兵已放行，鄂尔多斯因天寒马瘦，先行备装，等候调拨。康熙很担心驻守广元(四川广元)、保宁的清军遭到王辅臣叛军的攻灭。为保证这支生力军安全地撤离，顺利撤至汉中，特遣派北京的八旗兵(每佐领3名)，“速催起程”，赴西安协守。进驻西安的各支大军，酌置留兵守西安，其余全部赴定西大将军董鄂军前，接应广元、保宁的清军撤回汉中。

继上述指令发出之后，康熙发现陕西的兴安州(今安康)实为一战略要地，便对议政大臣等人说：“此地“西进汉中，北接潼关，东南直逼郧阳(湖北郧县)，最为要地”。他迅速命令副都统穆舒浑、已任命为云贵的总督鄂善、副都统希福等率兵，包括增援的蒙兵，“驰赴兴安”，共同防守汉中各处的战略据点。

正在湖南战场指挥作战的吴三桂，一直在盼望着陕、甘的王辅臣、张勇起兵的好消息。他知道，他们一旦起兵，将会带动整西北乃至中原的响应，成为又一大战场，那时，将会给清政府造成多么巨大的军事与政治的压力！随着时间的流逝，仍不见任何动静，他派去的使者也一去不复返。一年过去了，他对王辅臣、张勇不再抱有希望。就在康熙十三年底与次年正月之交，突然传来王辅臣在宁羌起兵的消息，吴三桂的精神为之一震，毫不迟疑地拨出白银20万两，铸印“平远大将军陕西东路总管”，交付已叛降的秦州知府巴三纲转赠给王辅臣。吴三桂慷慨馈赠，似乎比清政府的空口安抚更有吸引力。王辅臣驻过的平凉，原属荒凉的边防地区，生活一向很清苦，他的部下更是度日维艰，粮饷不足，本来就对朝廷不满，人心思乱，而吴三桂的诱惑，更助长了其部属与清朝的离心力，反满的民族情绪顿时高涨。吴三桂又指示已入川的大将王屏藩和吴芝芪由汉中出陇西应援，到处散布委以官职的文扎，地方武装及回、蒙古等少数民族都纷纷响应，接踵而起。原先平静的西北地区，迅速地陷入了大动乱之中。

在这种形势下，王辅臣已身不由己。他是一个精细的人，凡事都看得明白。尽管清廷对他表示了高姿态，康熙也做出了非常友好的表示，并保证他本人和家属的生命与地位不受丝毫侵犯，可是他还是疑虑重重，总担心此系清廷的权宜之计，谁能肯定清廷事后不追究往事，特别是莫洛身为朝廷满族重臣，康熙的心腹，能说就让他白白地死掉吗?不管怎么说，王辅臣是不能逃脱责任的。担心、后怕，使王辅臣无意回归清廷，他把清廷的招抚置之脑后，决心铤而走险！

王辅臣抗拒清兵，依附吴三桂，在陕甘地区展开了军事行动。他先说降秦州副将陈善，以秦州城(甘肃天水)叛降。王辅由略阳移至秦州，并毁掉陕甘两省边界的风县(今风县西南)偏桥派他的部下将领王好文率兵把守栈道，清兵的粮道不通，所运出的粮食不能运送。入守凤县的清兵以粮食枯竭突围逃走，王辅臣则留兵守秦州，自己率领部属归驻平凉。

康熙知道了王辅臣安然地回到了平凉，清军的粮道被截断，很是生气，下诏斥责“定西大将军”董鄂诸人：你们到了西安，没有随经略莫洛

取道秦州，却经由栈道绕路而进，托故马瘦，竟驻汉中，致使宁羌兵变；王辅臣回秦州时，你们又不跟迹追击，急忙回汉中，及至保宁清兵撤回，你们又仅留将军席卜臣守汉中，自统大军回了西安。已提醒你们，栈道险要，却不多留兵防守，竟让叛军据守，致使广元、朝天关等处又被叛军占领。这都是董鄂等人“退缩迟延”造成的，理应解除职务。但目前正陷大敌之时，仍令董鄂平定秦州、平凉等地。

康熙的部署及其战略战术，还不能马上奏效，陕甘的叛乱在迅速蔓延、扩大，清军步步退却。由于饷道被切断，清军被逼撤回西安。汉中、兴安等重镇皆被吴三桂的大将王屏藩等占领。王辅臣向各地发出的信函和任命文件，约会起兵。固原道(今宁夏的固原)陈彭受巡抚之职，守边(今陕西定边)副将朱龙受任为招抚总兵，还有巩昌(今甘肃陇西)游击袁承梁献城叛变，副将江有仓、参将潘璠策动阶州(今甘肃的武都)、文县、姚州(今甘肃临潭东)、岷州(今甘肃岷县)叛变；临洮守备鲁女耀反叛；尤其是甘肃省城兰州被游击董正已策动反叛，巡抚所属弁串作乱，占据省城。据甘肃提督张勇得到的可靠情报，甘肃方面最先跟吴三桂、王辅臣通款谋反的，就是董正己。他差心腹先去秦州，跟知府巴三纲通信。其后，守备吴承印又率连鲁文耀、马洪，各与王辅臣联络，表示原意同时起兵。兰州千总杜士黄，充当马洪、吴承印的内应，煽动甘肃巡抚所属各军官和士卒，密谋起事。秦州知府巴三纲派他的弟弟巴五秘密的来到兰州，与任职布政司的笔贴式本家人巴锡谋划，白天在董正己家，晚上住在巴锡家，逐个作巡抚所属的游击、守备各军官的策反工作。

二月五日，王辅臣的兵马向兰州进攻，董正己等人乘机夺取了兰州金城，清廷驻守甘肃的巡抚华善逃出了兰州，奔赴凉州去了。兰州“外控西垂，内接临(洮)、巩(昌)，为秦中要区”。此城一失，西北震动，许多城镇或叛或陷，还有一些城镇和乡村，如当地的武装所把持。诸如三水、溶化、白水、浦城、韩城诸县“土寇蜂起，掠劫乡村”。局势的混乱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随着甘肃各处的叛乱，而陕西各郡邑也随之骚动，叛乱纷起。同州(大荔)游击李师腐占据神通岭起兵，边陷洛川、宜川、鄜州(今富县)等城，延绥镇所属鬻水、鱼河、波罗各营、葭州(佳县)、吴堡、清涧、米脂等县先后叛清，起兵响应。他们攻城略地，绥德、延安、花马池、靖边等地相继被叛军占领。

由王辅臣带头起兵，引起陕西和甘肃两省的连锁反映，绝大多数的地方都参加了叛乱，只有甘肃的提督张勇、总兵孙思克、西宁的总兵官王进宝，宁夏的总兵陈福等没叛清。所以陕西全省未能全部失陷，只剩下西安一府和邢、乾二州。而甘肃也仅保有河西走廓这一狭长地带。康熙十四年三月，康熙为表彰他们尽忠朝廷，特晋升新职，授予张勇为“靖逆将军”、加孙思克左都督、加王进宝都督同知，提升陈福为陕西提督。四月，王辅臣派人携带吴三桂授予张勇的扎印，再次前去诱降，授张勇为“陕西西路总管平远大将军”。张勇大怒，不容分说，下令把来使推出斩首。王辅臣给王进宝送去一封，劝他归降吴三桂，王进宝断然拒绝。他们两人都把此事如实的报告了康熙，康熙看了报告非常高兴，为鼓励他们竭诚效忠清廷，又特加封张勇为“靖逆侯”、授王进宝为一等阿思哈

尼哈番。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吴三桂又亲自发给王进宝扎文，王进宝及时又向康熙作了报告，并把扎文一并交给了朝廷。

康熙已看出，将来恢复陕甘，必须依赖张勇和王进宝等汉将。早在二月，甘肃巡抚华善在奏疏中就极言张勇可用，此疏正合康熙之意，故立授“靖逆将军”，通知兵部、史部各大臣：甘肃省“凡总兵以下的官员，听从张勇的调遣、提拨、补授”。仍兼管甘肃提督事务，总督不得制约。一切征剿事宜，均由张勇便宜行事。张勇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康熙的信赖，把甘肃省的军事托付给他。

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宁夏突然发生兵变，张勇的得力助手和战将陈福被乱兵杀死。次年正月，康熙迅速采取措施，改调西宁总兵官王进宝代替陈福的职务，出任陕西提督，暂驻秦州，继续兼西宁总兵官。宁夏总兵官缺任，责成张勇和巡抚华善推补。很快张勇推荐他的原部将现任天津总兵官赵良栋到宁夏任职。康熙立即批准，还把总兵官一职改为宁夏提督，由赵良栋升任此职。由于西北的军情紧急，命令他兼程上任，赵良栋御任的天津总兵官，由陈福的弟弟、现任泳州参将的陈奇破格出任。赵良栋是甘肃宁夏人，骁勇善战，颇有机谋。称得上是一个优秀的将才，他与张勇、王进宝并称为“河西三汉将”。在张勇的统率下，同王辅臣展开了激烈的争战，最终完成了陕甘的收复任务，并在平定吴三桂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三节 清军反击剪除东西两翼

荆、岳对峙至康熙十三年底，王辅臣叛于宁羌州，在全国已形成了三大战场，这就是：以耿精忠占据福建，攻取浙江、江西为左翼东部战场；以王辅臣、王屏藩占据的四川与甘肃、陕西大部分地区为右翼的西部战场；以吴军占据下的湖南，地当全国中心，为正面的中部战场。在这三大战场中，无疑是以吴三桂所在的湖南战场最为重要。吴三桂自离云南北进，抵达湖南后，来往于常德、澧州、长沙、湘潭之间，最北至松滋，亲临前线指挥。但是吴三桂就此屯兵湖南，不能力主迅速渡江北上，坐失良机。以致使清廷争取到了调兵遣将、集结兵力、加强布防的充裕时间。截至康熙十四年四月，康熙已初步完成了对各战略要地的兵力部署：

镇南将军尼雅输、都统朱满、巴尔布等率师由武昌水陆进取岳州、长沙、直入广西；

都统宣里布等率师驻彝陵，都统范达礼、副都统德叶立等率师驻镇郧襄；安西将军赫叶、副将军胡扎布、西安将军瓦尔喀等率师由汉中进取四川；

副都统扩尔坤、吴国祯等率师进驻汉中；

镇西将军席卜臣等率师驻防西安，复遣尚书莫洛经略陕西等处(不久，即被叛兵击死)，率大军居中调度；

镇东将军喇哈达等率师于山东、河南、江南要地驻防；

安南将军华善等率满汉官兵，同镇海将军王之鼎等于京口水陆驻防；

扬威将军阿密达等率师同江宁将军额楚等防守江宁、安庆沿江险要；

平南将军赖塔率师由浙江平定福建，浙江将军图剌率师驻杭州，兼防海疆；

定南将军希尔根、副将军哈尔哈齐等率师由江西建昌、广信进兵福建；

平寇将军根特巴图鲁、席布等率师赴广东，会同尚可喜进剿叛军。

康熙分遣各方面军，任命各方面军的统帅、将军，迅速进入各自的战区，诸如武昌、荆州、彝陵、郧阳、襄阳、汉中、西安、京口、江宁、安庆、山东和河南等要地，以及江西建昌等地，都被康熙划入战略地区。这些战略据点，凭借长江天险，以荆州为中心，重点布列在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与长江南、山东、河南个别地区互有延伸交错，形成了一道颇为严密的军事攻守防线。

吴军的主力、精锐近20万人都集于湖南一隅之地，分布在长沙、岳州、萍乡、松滋、常德、澧州等几个战略据点。其中，以7万兵力据守岳州，澧州诸水口，与驻守在江北的清军对峙；又以7万兵力，总兵10余人，“猓猓”兵3000驻醴陵、长沙、萍乡诸处，抗拒江西的岳乐部清军。吴三桂驱使云贵土司苗、北等少数民族的土军前来湖南助战，组成一支有四、五只大象的象军，也调来前线。采伐贵州、湖南的山木，造

楼船巨舰，往来水上，控制水路。调拨四川、湖南的粮食以供军需。

吴三桂最重视的是岳州的防守，特派他的侄子吴应期率领数万精兵驻防。吴应期十分骁勇，能冲能拼，是吴军中著名的一员猛将．把岳州交给他，吴三桂感到放心而无忧了。

岳州不只是湖南也是长江中下游“水陆冲要之地”。它们于浩瀚的洞庭湖之畔，长江南岸，三面环水，一面通陆地。而洞庭湖的水又和长江一脉相通，因此可借助洞庭之浪，顺水到长江，出湖南省境，随心所欲。而借一脉之便从长江就可以进洞庭，入湖南省境，必经岳州。南北东西，行旅转运，欲得水陆兼有之利，岳州乃不可逾越之区。在军事上得岳州，可控制湖南的命脉，又可隔断南北的交通，故此城为兵家必争之地。吴三桂刚起兵时，康熙就看出岳州极端重要，严令驻防部队“宜亟固守”；同时，又派出都统觉罗朱满、一等侍卫毕桑阿等率增援部队水陆兼行，速往协守。定料清军未及固守，岳州已为吴军袭取。吴三桂以岳州为他在湖南立足的一个战略支撑点，集兵7万。特令吴应期加强防守。他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岳州城内外构筑防御工事；在城外陆路一面、挖通三道壕堑，筑堡垒，设陷坑、鹿角、换牌，以阻止清军的步兵、骑兵攻城。在洞庭湖峡口处，攒立梢桩，以阻止清军水兵船只进入湖内，守备相当严密。同时，吴三桂又在澧州、石首、华容、松滋等处派驻重兵，与岳州成犄角之势。吴三桂把岳州的存亡，看成是他的生命线，据投诚的吴军守备薛麟光所见，吴三桂时时关注岳州的防御，还特派他的护卫到岳州，向吴应期传达方略，“令贼坚守，且趣进兵”。由此看来，吴三桂作了长期固守湖南的打算，这就是他企图划江为国的计划的一部分。

清军失守岳州后，康熙一再严令催促清统帅尽快夺回。康熙十四年六月，他特派多罗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因山贝子章泰、镇国公兰布率蒙古兵4000、旗下兵的一半攻取岳州。命将军尼雅翰、都统朱满、巴尔布、护军统领额司泰参赞军务。清军俱察岳州城防御情况，深感吴军“据守颇坚，难以进取”。康熙便改变作战计划，命令将军尼雅翰率部赴江西，与副都统甘流海的兵会合，并率袁临总兵赵应奎，由袁州进取长沙，夹攻岳州。

与岳州隔江相望的是清军大本营荆州。康熙一开始就选取此城，作为战略重点进行布防。他正确的估计到吴军北上，必走湖南渡江，因此他力图凭借长江之险，在荆布防，拦腰阻截吴军，使其不得渡江，在此顶住吴军的军事压力，便可以集结大军，作为渡江的反攻基地，进行充分准备。只是吴三桂进到长江的南岸便停止不前，才使康熙的这一战略计划得以侥幸实现。否则，吴军及时渡过长江，长驱直进，荆州还未设防，肯定会使局面为之改观。这就是吴三桂的战略失误，促成了康熙的战略计划的成功。

吴三桂驻兵不进，给康熙充分布防荆州赢得了时间，在康熙亲自指授与调度下，援兵源源而来，蓄积粮饷，制造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船只，以备将来渡江之用。由于双方各自加强这两个地区的战略的防务，因而造成了岳州与荆州的两大战略中心长时间的相峙。很使人料想不到的是吴三桂无意进取荆州，倒是康熙时刻以岳州、长沙为念，不得到此二地誓不罢休。他累下指令，严加督促驻守荆州的统帅多罗顺承郡王勒

尔锦和其他有关将领速取岳州。还在康熙十三年七月，贝勒察尼、将军尼雅输等分别率领满汉官兵，水陆齐进，向岳州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吴军的统帅吴应期、廖进忠、马宝、张国柱、柯铎、高起隆等率7万大军从陆路分别迎战。清军奋勇的进击，“吴军大败，斩首万极，舟师抵七里山，以炮破贼，击其船10余艘”。这次接触战，杀伤了一定数量的吴军，但是从战略上并未能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在这次战斗中，清军无法接近岳州，也就退兵而去。此后康熙就再未得到进军岳州的报告，也不见捷报传来。

到了九月，康熙实在等的不耐烦，就派侍卫吴丹、塞扈立即前往荆州，传达他的指示：

朕一再给你们发去手令，所言似合机宜，又两次派遣侍卫来荆州，向你们面授机宜，至今未你们回奏。大将军出征，战事进止调度，一定等待朝廷发令，这是自古没有听说过的事。因你们与贼相持，朕不顾时间忙否，已屡给你们敕谕，或期望对你们能有新帮助，这并不是朕从中干预。你们刚出兵时，兵力不能说不足。今四路进讨，你们亦知之。四川一路军已夺取朝天关、阳平关，在保宁城与贼相拒，这同岳州的情况是一样的。你们不要以为四川兵将抵贵州，湖南兵可以缓进。保宁城较岳州城更为坚固。康亲王杰书虽屡奏捷，朕不以为喜。吴三桂乃贼首，惟有攻破岳州、澧州，才值得高兴。你们初到军中时，就说‘马未肥’，又说‘天热多雨难行’。如今时节正是可行之时，你们攻取岳州，或渡江取澧州，或令将军尼雅输往江西取长沙。此三件事，你们诸将帅要深思熟虑，议定后向朕报告。你们要勤勉，拿出良策。朕将欣闻捷音。

康熙的这番话，可以看出他对攻取岳州的严重关切。他特别强调，取得其他战场上的胜利不值得高兴，只有夺取岳州等城才是大喜事，总的基调是批评了勒尔锦等统帅进军迟缓。语气虽然相当缓和，但是勒尔锦等前线的将领已感到温和中严厉的分量。康熙还是期待他们熟虑，拿出具体办法，尽快攻占岳州城。

康熙十三年底，康熙得知王辅臣叛变的消息后，一时急得坐不住金銮殿了，他对各路的统帅无所作为深感失望。他无可奈何的说：“在此之前，各将军大臣不遵指授，互相观望，迁延不进，以致逆贼得据大江以南，贼渠未灭，故有此变”。他再也按捺不住了，要“亲至荆州，相机调遣”，指挥作战。康熙不过是作了一番姿态。经大臣们的劝阻，他也就放弃了亲征的打算。他的姿态，强烈地表示出他对各路统帅观望和畏缩不前的不满。

康熙十四年初，康熙向兵部指授破岳州的策略，说：“逆贼吴三桂，据守岳、澧诸处，恃有长沙、衢州之禀。今安亲王(岳乐)率师往江西，可令一到南昌，即简江西军中马匹，由袁州取长沙，断贼粮道，夹攻岳州。”

接着他又说：“今日事势，先天吴逆为要。安亲王宜留兵守江西，亲统大军，或由袁州，或由吉安，乘便进剿湖广，攻取长沙。倘未易(攻)下，即令此兵挠贼耕种，截其挽运，取资于敌，不但我兵无转输之劳，而岳州粮尽，贼可坐困，吴贼自不能久据常(德)、澧。”他责令兵部速移交，通知安亲王执行。

这次谈话，康熙提出一个明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就是“先灭吴逆为

要”，灭掉吴三桂，其他各地的叛军不攻、自破，这就是树倒猢狲散的道理。而要灭除吴三桂，必须首先攻破岳州、长沙。由于作战的指导思想明确、清晰，就使清军在正确战略方针指导下进行作战，逐渐从被动中解脱出来，开始走向胜利。

几天以后，康熙又指示兵部行文，转告正在荆州前线的贝勒尚善：“若岳州可取，急速进兵，如势有未便，不宜轻动。”尚善接到行文，立即回奏：“他们正在准备进攻岳州的战具，岳州的吴军也在加强防御措施，部署周密，无懈可击。他们打算移营进兵，又怕正值霪雨，江水泛涨，营垒前后，都被水包围，而且双方的战船相距很近，荆河口则在清营的后面，吴军又占据上游地段，不免令人十分担忧。按康熙指示，不宜轻动，所以他们就想暂停进兵，以等待时机。康熙得到报告后，只好同意他们暂停进攻，原令湖广总督蔡毓荣率兵前去助战，现仍回荆州等候命令。康熙指示：岳州卒难攻取，若不速取长沙，恐怕叛军又增强守备，先令分兵留守要害，速取长沙。

清军统帅岳乐提出，他想先剿除江西的叛军，无后顾之忧，然后分防险要，率师前往。康熙及时否定了岳乐的建议，再次强调，进取湖南，迅速消灭吴三桂，刻不容缓，不能有任何动摇。这个时候，清廷的兵马全部驻守在荆州，正待发动起总攻击。

针对清军的战略部署，吴三桂采取了以下的对策：

一是在岳州、澧州水陆要冲部署重兵，对抗江北荆州的清朝的大军，借以阻止渡扛南下。

二是由长沙分兵，进入扛西，力图打通与福建的通道，与耿精忠部会合。吴军进攻袁州、接连攻陷了萍乡、安福、上高、新昌诸县城。天三桂又遣派部队7万，“猓猓”兵3000坚守醴陵，外筑木城为护卫，加强此城的防御，目的是保障长沙的安全。康熙得到了这个消息后，即刻命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统帅兵马速进江西先后攻克了上高、新昌、东乡、万年、安仁、新城诸县，再克广信，饶州。吴三桂的女婿夏国相坚守萍乡，清军久攻不下。因此双方在江西的争夺战还在继续进行。

三是由四川进攻陕西，接通兴安、汉中的叛乱部队，进而和王辅臣的兵马会合，威逼京师。当吴三桂得知王辅臣在宁羌起兵的消息，立即采取了上述战略措施，于康熙十四年五月，他从常德到了松滋，亲自部署和指挥作战，他调来大批的战船，分布在虎渡河(今属湖北省境内)上游，截住荆州和岳州清军的咽喉。吴三桂扬言渡江和清军决战，并想决堤以江水灌荆州。荆州城地势低洼，城南门到长江仅5里之遥。为防止江水灌城，在该城的东、南、西三面都筑有长堤。所以它最怕决堤，如“决江水则荆州之人可使为鱼鳖，不可守也”。有人向吴三桂建议，决荆州大堤，必破荆州。但是，吴三桂顾虑到该城数10万生灵，不忍心决堤，水淹清军，殃及百姓。他扬言进攻，用的是声东击西之计，以自己亲临松滋，提出进兵的姿态，来吸引住驻守荆州的清军，暗地里却分出守岳州的部分精兵，进据宜昌(今湖北宜昌市)东北的镇荆山，约集王会，杨来嘉部会合进攻湖北的谷城、郧阳、均州(郧县与均县之间)、南漳等城，目的是打通通往西北的道路，与王辅臣联络。吴三桂的这个举动，没能取得成功，清军的统帅勒尔锦急令贝勒察尼等率部阻击，将吴

军击退，清军的压力稍得缓和。

吴三桂的三方并举的战略决策，使得清军的将领感到十分惊慌，他们一方面拼力应战，一面向清廷紧急报警，惊呼“贼势甚炽，我兵力单”，再次恳请朝廷加派援军，要求“速行赴援”。

康熙看了此奏，十分生气，因为他已掌握前线的军情，主帅勒尔锦明明是在谎报，将真实情况隐瞒。康熙所掌握情报，是礼部员外郎王诏提供的。王诏受康熙的指派，于康熙十三年三月随从顺承郡王勒尔锦到了荆州，参赞军务。他来到荆州快二年了，把荆州的一切情况都了解得十分清楚。他给康熙上了一道密疏，写道：他刚到荆州时，常德、岳州、澧州尚未陷落，只要清兵“鼓行而前”，湖南已失城池是可以收复的。可惜没有作这样的计划。要不然，可“屯兵要害”，长江为我所控制，而彝陵、岳州西路，叛军难以兼顾，可是计又不出此。再不然，亦可乘叛军初到湖南无备，立足未稳，清军乘机渡江，攻取南岸，为可攻可守之计，也不致使叛军深沟高垒，极难动摇。可是计又不出此，逐使叛军得逞，清军数10万，金钱万万计，虽广开财源也无法保证供应。而湖南的米价三倍于前，“民困追呼，又苦转运”，这样下去，恐怕将来叛变的就不止耿精忠、孙延岭、王辅臣、杨来嘉“诸凶”了。眼下，马匹例毙十之五、六。兵士死亡十之二、三，幸存者锐气全销，“羸病相半”，时势令人担忧。“臣请统一旅为诸将先驱，不幸死于疆场，犹胜于坐待乱民刀加于腹！乞请下令勒尔锦赳期进讨，毋稍逗留”。

王诏的奏报情况，的确是实际情况。且不说清军初到荆州不渡江，不敢发动进攻，就是在康熙严厉的催督下，一部分清兵渡过了江，驻守在离岳州7里路远的七里山上，害怕吴军的防备严密，就是不敢进攻。“尝扬言某日进兵，至期寂然，如是者非一”。例如遥见洞庭湖中，有吴军的战船出动，清军的水师仅“鼓棹以待”；听到吴军发炮，清军也“发炮以应之”。统帅尚善等将领，于“军书之暇，唯高卧一笑而已”。这些将领每天除了阅批或上报军书，无事可做，便高卧营帐之中。军情如此紧急，他们却格外轻松!而国家军费开支浩大，“国用大绌”，他们无动于衷。

王诏的密奏，报到了清廷，康熙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他所看过的所有荆州的前线奏报，几乎都是勒尔锦、尚善等人的请兵请饷，不见进兵之期。王诏密报实情，康熙怎能不生气。当即挥笔写谕旨，严厉责备。谕旨写道：当初一得到吴三桂叛乱消息，即发大兵，派前锋统领硕岱、都统巴尔布等人率前锋护军，日给刍秣，令其疾驰。巴尔布到荆州时，叛军尚未至常德、澧州。所率前锋护军，每佐前下出5名，兵力不算弱。可是他们却不急于渡江，迁延迟误，而常德、澧州遂叛。你亲统大军至荆州，仍不立即渡江进取，致令吴三桂一至常德等城遂为他所据。都统朱满率兵至武昌时，岳州，长沙还没叛变。你又不急趋镇守，逍遥武昌，600里路，竟走了一个月!而长沙、岳州又陷落了。巴尔布等人畏缩不前，坐失险要，使叛军从容得据湖南，使我军难以攻取，且糜费粮饷，更信于他处。

康熙在批评勒尔锦等人之后，总结失败原因，说：追究清军寸步不能前进，是因为“贼渠”与我精兵相持荆、岳间，而广西孙延岭、福建耿精忠相继叛变，“贼寇”蜂起。在此之前，曾指示你们在荆河口以内，要

考虑何处设兵防守。你们说，“贼船”上下江中，都取道荆、岳，很容易贞知，等有情况时，就近调遣，可以立时到达。而此刻又说，吴三桂来犯荆州，贼众我寡，特请增兵，为何前后说法不一，一切军机忽略如此地步，现在京中劲旅已遣发很多，即使再发兵，也很难迅速到达，应调附近官兵星驰赴援。目前安亲王岳乐已恢复建昌，大军已回南昌、江苏、微州，又有满州、蒙古兵镇守。令驻池州署副都统苏郎率蒙古兵1000至武昌，留下400人，再抽调驻兵400人，共足1000人，速赴荆州。安亲王或由宁州入湖南，或由袁州进长沙，两者任选便宜而行。

这是对吴用兵以来，康熙对勒尔锦等人畏缩不前的第一次严厉的批评。勒尔锦等人无法推卸责任。

过了几天，勒尔锦又急报：吴三桂在松滋县北山，又增添了4营兵马，沿江一带，“贼船日增”，恐水陆齐犯荆州、彝陵，是很有可能的，康熙也顾不得再批评他们，紧急指示：荆州、彝陵等处，“关系紧要”，除了留兵防守襄阳、均州、南漳等处，由察尼率领，余军“速赴荆州”。

八月末，吴三桂还住在松滋，并且又调来7000余兵马，增援松滋，这使驻守在荆州清军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康熙担心吴军渡江进攻，就会使荆州处于危险之中。他下令抽调进攻岳州的部分清军回师荆州，又命驻守在山东兖州的护军统领查汉太尽率满汉宫军，河南提督佟微年选标下鸟枪手3000同赴荆州，统归顺承郡王勒尔锦统率。清军的兵力不敷用，只好以荆、岳兵往来增缓：荆州危急，调岳州兵；而岳州附近清军有急，则凋荆州兵。

康熙的主导思想，仍旧放在长沙方面。他说：叛乱罪魁是吴三桂，现在不及早消灭他，即使江西、福建之贼全部根除，于事有什么益处!他指示安亲王岳乐，拨出一定数量的官兵固守江西，冬月时“速取长沙”。

吴三桂暗遣岳州的兵马开赴宜昌时，被驻在荆州的清兵探知。这时“安远靖逆大将军”多罗贝勒尚善主动提出向岳州进兵，他在给康熙的报告中说：长沙与岳州，如唇齿相依，若只攻一处，未必能很快攻取。既然安亲王岳乐已得令旨进兵长沙，而岳州也应协力攻取，他乘机又要求给荆州增兵，可调河南、山东的驻军前往增援。

康熙对尚善提出的增兵要求给予否定。其实清朝政府能遣调的兵马已经不多了。各处战场都在进行激战，都需要增援。康熙只能就主要战场投放优势的兵力，其它战场就顾不及了。尚善等人不识趣，只要一进兵，就呼吁增援。康熙以岳州的吴军已分遣宜昌，兵力也减，而荆州的清兵够用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要他考虑“作出攻取”岳州的计划。

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安亲王岳乐为了进取长沙，已进入准备阶段。他请求康熙调拨绿旗兵，非汉兵不能攻破吴三桂的险阻，又非红衣炮不能击破吴军的营垒。康熙满足了他的要求，把熟使火器的提督赵国诈兼统绿旗兵3000，和屯垦都督陈平率部2000，迅赴岳乐军前，准备参加长沙的攻城战。南怀仁监造的火炮轻便，易于运送，也同意他的要求，调拨20门火炮，护送到江西岳乐的军营中。康熙指示：不必等火炮运到，速由吉安，或袁州进兵长沙。康熙把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了长沙，作为夺取湖南的第一大战役。为了保证这次战斗的胜利，他命令驻守在荆州和岳州地区的各军将领，要紧密配合，夹击长沙。同时要摆出进入岳州的架势，移兵逼近。如有机会可乘，亦并攻取岳州。他告诫诸

将领，这次行动不得有误。他提醒他们，驻荆、岳将近二年，“粮费师老，并未得尺寸之地，坐失事机，罪不胜数”，如再不发兵和岳乐配合夹击，你们的罪过就更大了。

正当清军大举进攻长沙之时，顺承郡王勒尔锦又请增兵，再发禁旅每佐领5名，“便可渡江剿贼”。康熙十分生气，下诏斥责：勒尔一到荆州便屯兵不进，使吴兵从容得湖南。等清军齐聚，又不按期渡江，使吴军得以固守要害，进犯宜昌。究其根源，实由勒尔锦、参赞巴尔布、伊尔度齐、硕贷等耽误时日，不急于讨贼，以致叛乱蔓延。在此之前，勒尔锦要渡江击贼，已按请求增添了满州、蒙古兵数千，绿旗兵1万，仍“未得湖南尺寸之地”。现在又请增兵，是果真欲速灭贼寇吗?不过是希图开脱自己逗留不进的罪责罢了。最后，康熙解除了巴尔布、伊尔度齐、硕岱等人的对先职务，留任效力赎罪。

勒尔锦拜读此诏，惶惶不安。他已被康熙批评了数次，逼迫向康熙请求处分。转眼之间到了康熙十五年正月，康熙联想二年来屡次催勒尔锦各军渡江进兵，可就是不进。他看了勒尔锦的奏疏，不由得一阵气愤，再次严厉批评：“勒尔锦统领大军，进剿逆贼，二载有余，未获寸土，以致师老饷匮，坐失良机，今不直陈其罪，又巧饰具奏，殊为不合，应即处分。但见(现)在进兵，候旋师之日，严治其罪。”

战争一开始，康熙就派出大军迅速赶至荆州，扼吴军渡江。此后不厌其烦地指授方略，一再催促勒尔锦统率大军渡江，攻进岳州，夺据长江之险。康熙整整地喊了二年，勒尔锦等将领却以各种借口，按兵不动，致使吴军在湖南坚固了阵地，并能从容联络各方，掀起了更大范围的动乱，因而出现了清军和吴军夹江对峙的局面，这就延长了清军胜利到来的时间，吴三桂得以继续顽抗下去。

西北告捷正当荆州、岳州相对峙的时候，东西两个战场上的清军和叛军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中。

在耿精忠、王辅臣先后发生叛变起兵后，吴三桂曾经试图应援，打通和耿、王的通道，使叛乱地区联成一片，迅速压缩对清军的包围圈。但是，康熙已看出吴三桂的战略意图，毫不迟缓地派出大军，分别在江西、浙江、陕西、甘肃等地阻击吴军，围剿耿、王叛军，最终使他们无法互相靠陇，分别把他们困在各自的独立战场，各个击破。

就东西两个战场来说，西部战场——陕甘地区，为西北边防的重地，又接近京城，对清政府安危尤为重要。因此对清廷构成严重威胁的道是王辅臣的叛军。所以在一定时间，康熙把注意力放在西部战场上，且以恩威并用、剿抚结合的方针，力图尽快扑灭王辅臣的叛乱。这对剪除吴三桂的羽翼、消除近在京城门户的威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康熙十四年底，宁夏兵变，提督陈福被害后，陕西和甘肃的形势更趋严重。康熙认为，陕甘不能平定，主要是因为叛军占据的平凉未破，王辅臣未被灭除的缘故。故而当前最为要紧的是，攻取平凉，“断贼饷道”。早在七月里，康熙就已经明确指出：“底定全陕，惟在速取平凉，逆王辅臣一日不灭，则秦省百姓一日不安”。王辅臣是陕甘事乱的关键人物，实为“乱首”。康熙的策略是“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只要把王辅臣灭除掉，其余的叛军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因此，陕甘的叛乱一发生，康熙就把抚剿的重点放平凉一地和王辅臣的身上，的确是抓住了解

决西北战事的关键。

康熙在第一次对王辅臣招抚失败后，就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他从陕甘全局出发，抓住几个战略地点，先后展开了用兵。康熙认为“欲平陕西诸寇，必先取秦州”，从而确定秦州为第一个战略攻击点。秦州(今甘肃的天水)位于兰州、巩昌(今甘肃陇西)、平凉、汉中等重要的战略要地之间，界近陕西。夺取秦州，从叛军中间突破，切断叛军的声息，在军事进攻上可以左右逢源，进退有据，使清军操有主动权。

秦州的城池坚固，要想攻破这座城，必须得用威力强大的红衣炮，康熙命都统海尔图等率兵护送红衣炮到秦州。康熙十四年三月四日，“定西大将军”多罗贝勒董(洞)鄂奉命率大军抵至秦州城下，并将此城包围。围困了半个月后，即四月二十日，从四川、平凉来援救的叛军1万多人，从包围圈外向清军展开攻击，而城内的叛军8000余人从城内向外蜂拥冲出，企图里应外合，夹攻围城的清军。清军分道迎战，击败叛军的进攻。稍后，双方又数次激战，叛军始终未能得逞。这时清总兵官孙思克奉命率部从巩昌来援，使清军的实力大增，本来已被打得惊慌不安的叛军，便陷入绝望而无心再战的混乱之中。城中的叛军总兵陈万策只好率兵民出城投降，叛将巴三纲等人逃走。来增援秦州的四川和平凉的叛军也急忙逃走。迟至闰五月三十日，清军收复了秦州。董鄂又遣“振武将军”佛尼勒、内大臣坤巴图鲁，总兵官孙思克追剿叛军，一直追到礼县(属甘肃)、西和(礼县东)等处，几经交锋，叛军都被击败，一举收复了秦州附近的孔县、清水、优羌(今革甘谷)、西和等诸县城。

秦州的收复，实现了康熙平定王辅臣叛乱的第一个战略目标，然后，他令一部分兵马开赴栈道，增缓汉中；一部分开赴平凉南的陇州(陕西的陇县)守卫；都统海尔图等护卫红衣炮，向平凉运送。

叛军失去了秦州，军心动荡不安，王辅臣深感恐惧，急忙率领其精锐和秦州溃败的部队收缩到平凉固守。除此之外，叛军还占据庆阳、定边、固原、延安、兰州等几个孤立据点。

在清军围困秦州的同时，别部的清军已向兰州、巩昌的叛军发动进攻。西宁总兵王进宝率部已于康熙十四年五月包围了兰州。兰州是“河西五郡咽喉”，叛军拼命地死守。一个月来，清军连营环攻，屡次将冲围的叛军打回城内，清军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因粮道被切断，城内的叛军无粮可守，只好造木筏百余只，企图渡黄河逃跑。王进宝沿城外黄河岸设置了伏兵，击退了妄图逃跑的叛军。致此叛军已无力发动反攻。王进宝与布政按察使伊图乘机差官到城下，宣谕朝廷的招抚政策，许诺如果投降就可以赦免一切罪过，叛军走投无路，被逼放弃抵抗。六月二十七日，叛军的总兵官赵士升和原任布政按察使成额率城内的文武各官和兵士5000余人献城投降。

张勇所率的一部分清兵在王进宝攻取兰州的同时包围了巩昌。王辅臣认为巩昌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急速派遣副将任国治等率部3000人，由巩昌东门潜入城内援守。守城的叛军总兵陈科、郑元经等得到了增援，便率部6000人，分四门而出，直冲清军的大营。清军给予分头痛击，城上城下炮声隆隆，双方死伤惨重。叛军被俘近500人。清军游击张大选追至城下，被叛军的炮火击中死去。六月二十五日，“安西将军”穆占、总兵官孙思克抵达巩昌增援。清军聚集在巩昌城下，使用了招抚的策

略，派遣已降清的陈万策、谢辉等人进入城内宣谕康熙的赦免诏书。叛军的总兵陈科等愿意接受招抚，率领部众出城投降，总计马步兵4900余人、民兵5600余人，安插城中的居民13．5万余人。清又收复了巩昌城。

继收复秦州、兰州、巩昌以后，清军的捷报频传：六月二十九日，“平逆将军”都统毕力克图进入延安，叛军溃逃。接着，恢复了延安府所属的肤施、保安、安塞、宜川、延长、安定等县。陕甘边境的重镇定边也于六月初收复。

康熙虽一再的严令西北各路将军加紧对叛军的军事进攻，但仍不放弃对王辅臣的招抚工作。他抓住了王辅臣畏罪不敢投降的心理，于七月又给王辅臣发去一道赦谕。分析了西北战场的形势，劝他归降。但王辅臣这时内心很矛盾，如果接受了招抚，又怕清廷事后变卦，心怀疑惧，迟迟的不敢投降。康熙督令：张勇、董鄂诸将乘胜连攻平凉，同时，尽快攻破固原，以便夹击平凉。

清军在西线战场，短期内取得了重大进展，攻取平凉，灭除王辅臣亦是指日可待的事了。不料情况又突然发生变化；兴安游击王可成等重又叛变，总兵官党塞与道臣兴永朝奔赴西安，将军席卜臣率部离汉中，不知去向。不久就得到了席卜臣的报告：因军粮告匮，被迫离汉中，于八月六日至西安。而且兴安的叛军已经和四川的叛军会合，攻陷了旧县关，即将逼至西安，南山“群盗”又分出各口。刚刚有了好转的形势，又逆转直下。

形势的突变，给清军进取平凉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康熙很是生气，下诏严厉的斥责陕西的总督哈占和各将领，他说：“辅臣被叛时，朕以兰州要地，关系“三边”，令哈占发兵镇守。哈占称：西安要地，不便分兵，致使兰州诸地沦陷，“三边”动摇。哈占又以西安重要，屡次请援兵，因而把荆州大军陆续调至西安，致使荆州、彝陵兵力单簿。朕以延安为诸路要冲，曾令鄂善、四川巡抚周有德等驻守，哈占又撒谎说鄂善等兵少，留之西安，致使延安陷落。哈占为封疆大臣，每当议事，不从全局一体筹划，但只顾自所在之地，常欲置之重兵以自卫，不求速定地方，贻误非小。今又称叛军与川寇联合，欲分诸将率部都开赴西安。哈占但知有西安，竟置其它于度外!

康熙在严厉批驳了哈占后，命令“诸将当益急攻平凉，勿得少缓”。为了保证攻取平凉，他令驻守在榆林的土默特、鄂尔多斯兵，“速赴西安”。

在康熙的严督下，董鄂、毕力克图，阿密达等部已于八月十五日抵达平凉。因兵力不足，围城不严。这时，王辅臣给董鄂去一封信，称：他曾派官员王起凤赴西安，谈判受降，已过两月，不见回来，因此士卒都很疑惧不敢降，董鄂为辅臣请命，请求朝廷再颁赦免诏书，遣还王起风，他就会倾心来降。康熙批评了董鄂不速率兵围攻平凉，专主招降，替辅臣求情。他指出了王辅臣的目的“诱我缓师”，诸将不要中其奸计。他要求各将“速行围城，务期剿灭”。至于王起风。可以遣还平凉。

董鄂等率清军到了平凉后，既未围城，也未进攻，而是离城远驻，静现形势而已。王辅臣见此情况，并未过于惊慌，相反，还派出部分兵马分别增援固原、庆阳等地的叛军。这两处的叛军兵力都很强，例如固

原叛军就多达1万余人。王辅臣的增援，无疑的又加强了它的实力。特别是庆阳的叛军已接受清廷的招降，却又被王辅臣派遣增援的周养民部包围，重新夺了回来。

清军向平凉地区集结的消息，使吴三桂震惊，他先后派遣云贵少数民族士兵“猓猓数万到平凉助王辅臣”，命令四川的叛军应援平凉。于是王屏藩亲统大军进犯秦州，吴之茂率部出川，进屯平家和等处，谭弘以所部向平凉增援。还有兴安的叛军也进犯商州大峪口。

本来对清军很有利的形势，又陷入了被动的局面，这正象康熙所分析的情况，因为王辅臣未消灭，大军云集平凉，故而各路叛军乘机发动进攻，意在分散清军的兵力，来支缓王辅臣。从主观上看，康熙认为，董鄂到平凉日久，兵力不少，却“高坐不即攻取”，致使王辅臣敢于分兵援盈其他地方的叛军；由于清军集结平凉，又招致四川的叛军前来会战。如果及早地攻占了平凉，那么各路叛军也不会来增援，窥伺商州之计也不得施展，“陕西可无虑矣!”他质问董鄂：你们拥大军于平凉，“所司何事”?现在不敢攻取，“更待何时”?他又下了一道命令：赶快策划，“速取乎凉，剿除逆贼”。都统海尔图又节外生枝，声称：运炮的屯夫都逃路了，请求从京师调发熟悉火炮的满州军前来平凉。康熙接到报告后不胜恼怒，下旨斥责：董鄂对此事不置可否，只知照传他人请求，拖延时日，他下令解除海尔图的赞军职务，令董鄂仍遵前旨，速攻平凉。

康熙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军和平凉的叛军发生了一次战斗，王辅臣命令叛军出城，双方刚一接战，不料清军副将贾从哲、游击张以经忽然退缩，清军阵势惊乱，战斗失利，提督陈福等于二十八日退到灵州(今甘肃灵武)。康熙看了战报，提笔批示将贾、张二人就地斩首处死，并指示清军或攻取固原、或会合大军取平凉，视具体情况而定。十二月清军再次攻取平凉，攻克了第一关厢，距平凉城3里多，在南山屯营，想前进攻城，奈因沟深地险，难以下营，故平凉城未能攻克。康熙指示，叛军长据平凉，皆因有粮有恃无恐，如断其粮道：叛军自困。城西北通固原要路，你们要速断粮道以困之。

尽管康熙屡令督战，但是董鄂诸将却迟迟不动，夺取平凉仍然看不到希望。而四川的叛军也正在向平凉方向进发，有与王辅臣合兵之势。若如此，将给平定陕西带来极大的困难。另外这样旷日持久的拖下去，势必影响到进剿湖南乃至整个战局。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康熙决定派遣都统、大学士图海尔为“抚远大将军”，授以全权，总辖陕西满汉大军，前赴平凉，剿灭王辅臣。图海离京时，率每佐领护军2名，组成一支数千人的大军，增援围攻平凉的清军。在此之前，新授宁夏提督的赵良栋至京陛见，康熙命他兼程速赴宁夏。同时又授都统毕力克图为“平逆将军”，负责统辖现驻宁夏的满州兵和蒙古兵，镇守地方。

康熙任命图海一事，向董鄂等陕西诸将作为说明，指出，我国家自创业以来，克敌攻城，必是主帅奋勇先登，军士效死苦战，方能建树大功。而你们凡遇敌，大都观望不前，只叫士卒前驱冲阵，其督抚也多坐失机宜，故劳师匮饷，不见成效。因此特命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前往平凉，统帅诸军。你们要痛改前非，殚心图效，若仍蹈前辙，一经图海指示参颏，必置重典！康熙为了鼓舞清军的士气，又特别颁给诸

军一道敕谕：你们年来各处征讨，为国效力，朕已悉知。今闻你们围平凉，屡次冲锋陷阵，奋勇杀敌，严冬掘壕，远道采木为柴，备尝难苦，朕甚为同情。虽然目前国用繁多，经济困难，但惦念你们勤劳已久，特发帑金5万两，由大学士图海带到军中，普增恩赐，以表朕优恤关怀之意。你们同心协力，隘励忠义，速灭贼寇，朕不吝再加优尝，你们勉之！

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二十六日，康熙接见了图海，尝赐了珍贵的御用之物。然后，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仪式，郑重地送他率师离京出征。

图海离京前后，陕甘的形势又加深了危机。四川的叛军正向巩县、秦州逼近。其中，吴之茂所率川军已临秦州城，屯兵于北山，阻断临巩的通道。二月二十五日，陕西提督王进宝会同“振武将军”佛尼勒等向北山的川军发动进攻。吴之茂率师迎战，竟被清军击败，吴之茂的总兵徐大仁被俘，4名总兵在作战中被杀，还有200多名参将、游击也都死于激烈的战斗之中。

三月初，王辅臣命令总兵官陈甲率步骑兵马1.5万多人，进犯灵州，命令总兵官李国良率领叛军8000人由靖宁来增援秦州。四月十六日，叛军万余人直犯通渭县，守城的清军弃城逃跑。自宁夏提督陈福被害后，叛军进攻宁夏，堡镇多被陷落。虽然各处的叛军进攻屡次得逞，但又屡次被清军击退，双方相持不下。而叛军的顽抗，却往往又把清军置于困难的境地。局势仍然是严重的。

三月十七日，图海率部抵达平凉。他首先向广大士兵宣读康熙奖励的旨意，颁发赏银、明军令、申约束，军威大振。康熙前后增调的清军会攻平凉，已达10万人马，全部环绕城外围困。

王辅臣以骁勇善战闻名，清军的将领都惧怕他，不敢轻易进兵。同时王辅臣也不把清军放在眼里，对10万清军的围困毫无惧色。有一次，他登城巡视防务，停在一处，举起一只脚，加一马鬣，斜着眼睛，望着城外密集的清军营垒，轻蔑地说：“这是什么能耐?姑缓其死，稍迟些日子，叫他们都尽了！”目空一切以至于此。

图海到达平凉后，各将领的勇气顿时倍增，纷纷请命攻城。但图海不同意，他说：“仁义之师，先招怀后攻伐。我奉灭威讨兹凶竖，无虑不克，顾念城中数10万生灵，无非朝廷赤子，遭贼劫至此，覆剿之下，杀贼必多。俟其向化归诚，以体圣主好生之德，不更美乎！”于是他放弃攻城，仅是围困不战，实行攻心诱降的策略。

在平凉城北，有一座山冈，叫做虎山墩，登临山冈上，可以俯视全城。这地方十分重要，它是平凉通往西北粮道的咽喉。王辅臣部署了1万多名精兵护守这个山冈，用来保障平凉的安全。

图海严格的执行康熙的战略方针，先夺取虎山墩。他说：“此平凉咽喉，得此则饷道绝，城不攻自下矣。”随即率领大队人马攻虎山墩。叛军前面是步兵，后面为骑兵，布列火器换牌迎战，向清军冲来。战斗逐渐向墩上发展，叛军利用地形的优势，居高临下，清军逼迫往上仰攻。死伤累累。战斗相当激烈，清军不顾伤亡，步步进逼，从上午一直激战到中午，击杀叛军的总兵2人，兵士被杀的，跳崖死亡的，不计其数。图海命令军兵更替轮番进攻，终于以惨重的代价攻占了虎山墩。站在山墩

上向下观望城中，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清军把夺取的大炮和自带的重炮搬运到山冈上，向城中发射，城内的军民一片惊慌。图海趁城内的兵民惶惶不安之际，特派幕客周昌进城劝降。周昌自告奋勇冒死进城劝降，临进城之先，提出了一个要求：母亲孙氏以父死殉节，他愿以身许国，为母请旌。图海感其壮烈，当即同意，特授以参议道名义前去执行任务。王辅臣迫于势穷粮尽，听从了周昌的劝告，便派手下一员副将随周昌出城，面见图海，表示投降。图海派人驰报京师请示，康熙批准，颁发大赦令。六月六日，图海命周昌携带朝廷的赦诏，再次进城抚慰。六月七日，王辅臣派龚荣遇率领士民代表出城，向图海献出平凉城的军民名册，他的儿子王继贞和总兵等上缴吴三桂的扎付二纸、“平远大将军印”、“陕西东路总管将军印”各一颗及各扎文件。

王辅臣虽然已经降清，但是心里仍旧疑惧，不肯去面见图海。六月十三日，图海再次派周昌和他的侄子前锋侍卫保定一起进城，极力地安慰王辅臣，百般地劝说，清除他的疑惧，王辅臣为图海的诚意所感动，便于十五日出平凉城，亲自到图海的营帐，“叩头谢恩”，图海与辅臣“钻刀设誓，保其无它”。辅臣心悦诚服。王辅臣回到城中就剃了头发，表示彻底归降。图海命副都统吴丹入城招抚安定，秋毫无犯。平凉城围困日久，城中粮尽，兵民死亡累累，图海请命赈济。云南土司总兵陆道清等率所属兵士相继来降。

平凉归降的捷音飞报北京，康熙非常满意，对图海仅以半个月时间解决了平凉，消除了西北的战乱，倍加称赞。他对王辅臣父子仍旧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履行已许下的诺言，恢复了王辅臣的原来官职，加太子太保，提升为“靖寇将军”，命其“立功赎罪”，他的部下将吏也一律赦免。吴三桂派来助的同时投降的苗兵，康熙命他们回原籍，给予赏钱，与家人团聚，官员各加一级，从优升赏土司总兵陆道清为左都督兼太子太保，投诚的黄发寿，临时委任的参议道周昌升为布政使，“发往湖南招抚”。周昌的母亲也得到了旌表，遣官至祭，给银建场。

平凉归降，王辅臣接受招抚，使得陕甘的局势急转直下，所有的叛乱都迎刃而解。奉命前来与王辅臣会合的吴之茂闻讯平凉已破，就在六月二十六日夜晚，率部从秦州退却。“振武将军”佛尼勒、张勇、王进宝等统率满汉大军随后追剿，追到牲园大败吴军，再败叛军于西和山，给叛军毁灭性的打击，吴之茂仅有10余骑越山而逃。将军穆占也于六月二十七日进兵乐门，吴三桂的征西大将王屏藩逃跑，追到红崖，把他击败，恢复了礼县。王辅臣原任命的固原巡抚陈彭、庆阳总兵周养民、嘉峪关总兵王好问、关山副将孔萌雄等共率文武伪官900余员，兵丁4．8万余人相继降清。八月三日，张勇等攻取了阶州，叛军总兵陈友功等献城投降，四川的叛军被赶出省境，于是关陇平定，陕西只有汉中和兴安两地仍被叛军占据。清廷的西北威胁基本解除。康熙最关注的仍是湖南战场上的吴三桂，陕西剩下汉中、兴安两地的叛军不足为忧，他顾虑到攻取汉中、兴安运转粮饷艰难，因此命令暂停进攻。由图海率部去湖南征讨吴三桂。图海上疏，建议说，平凉等地，才刚刚平定，而人心未必都能安宁无事，若带精锐赴湖南，陕西空虚，惟恐人心再变。康熙回谕表示同意，将图海和王辅臣留镇陕西、严守各要隘，以前锋都统穆占佩带“征南将军印”率领陕西和河南两省的满汉各军前往荆州，助剿吴三

桂。

平定王辅臣陕甘的叛乱，可以说，全赖张勇、王进宝、赵良栋三位汉将和广大的汉兵的力量。他们在西北战场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图海是满族将帅中难得的人才，他坚决执行康熙的作战方略，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的运用策略，跟汉将紧密地配合，保证了各战役的顺利进行。

清军在西北战场上取得完全胜利，它不仅解除了对清政府的重大威胁，而且更具有战略意义的是，它剪除了吴三桂在西北的羽翼，使他失去了一臂，顿时气势大挫。清政府很快地从西北战场脱身，调出西北的劲旅，开赴湖南战场，进一步加强了清军在湖南的军事进攻能力，从而加速了吴三桂的灭亡。

东南归降同其它战场一样，清军在东南战场也是进攻不力，跟耿精忠叛军的激战反复进行，呈现出相持不下的拉锯状态。在平定王辅臣陕甘叛乱后，这里的战斗仍在交替的继续进行，一时胜负难分，争夺十分激烈。

耿精忠叛清后，把整个福建据为已有，进而兵分三路出击：以总兵曾养性出东路，攻击浙江、陷温州、台州、处州等地；以总兵白显忠出西路，进攻江西、陷广信、建昌、饶州等地；以藩属都统马九玉出仙霞岭(在今福建、浙江、江西三省交界处)进攻浙江金华、衢州，并联络严州、微州“土寇”以壮声势。耿精忠的战略意图是，占领江西，跟湖南的吴三桂叛军连成一片；占领浙江，领有东南沿海地带，据长江下游地区，跟吴三桂所据长江中游地区成椅角之势。

康熙最为担心的是耿兵占据浙江、江西，与吴三桂合军，若此则难以剿除。但由于清军进攻不足，他先采取守势，派遣重兵严守各战略要地，堵截耿军，使之不能进入江、浙。他急命“平南将军”都统贝子赖塔赴浙江；“定南将军”希尔根赴江西，另以杭州、镇江的水师分防海口，阻断耿军北进与西进的道路。随后又命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贝子傅喇塔为“宁海将军”，赴浙江，共同防剿耿军。

从耿精忠康熙十三年三月叛清，到同年年底，连续攻占了江浙的20多个县城。清廷的援兵先后赶来，分占了南昌、杭州、衢州、吉安、袁州、九江、金华、广信、饶州、建昌、萍乡等各战略要地。双方就在这些据点以及附附近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次数之多，规模之大，远远的超出西北战场。双方互有胜负，损失相当。清军没有能阻止住耿军进入江、浙，但却有效地挡住了它的猛烈进攻，致使耿军最终未能进入湖南省境。吴军东进占领了连接江西与湖南的江西省境的萍乡、吉安等要地，也未能达到与耿军会合的目的。

进入了康熙十四年，清军与耿军的交战有增无减，更激烈的战斗则集中在几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据点附近反复进行。还在年前康熙已命令大将军康亲王杰书、将军希尔根分别由浙江、江西“作速进剿闽境”，命平南王尚可喜部队克复潮州后，即发兵救援固守在漳浦的海澄公黄芳度。黄芳度正受到台湾郑经的侍卫赵得胜的攻击。康熙为了防止郑氏在大陆立足，决定必须尽快平定福建。

清军摆出了直捣福建的姿势，除了坚守要地，已开始主动出击，目标是收复江浙失地。

在江西，吉安是一战略要地，耿军一直没有放弃对它的进攻，该郡

的万安县，是“赣南水陆咽喉之地，贼寇出没靡常”，康熙十四年正月清军在西塘击败了叛军，又在诏口罗塘湾大败叛军。

二月间，清廷赣南总兵官刘进宝在黄土关，横岭两处击溃了耿军，收复了龙泉县(遂川)；这个郡的赣州，仍为耿军固守，清廷游击李天柱等分兵，在黄谭地方夹剿，斩杀2000余人，头领20多名。

四月间，招抚奉新、都昌、冷口、南湖、西湖等地的耿军头领91人，兵卒1．98万多人；招抚赣南的宝石寨叛军1．79万多人；又在铜鼓营、强山、余干、奉新、东乡等地招抚叛军头领97人，兵卒3．33万多人。

四月二十五日，安亲王岳乐率师进攻建昌县，路遇耿军在长兴县，双方展开了战斗。这次战争规模很大，以邵连登为统领的耿军有8万多兵马，分水陆迎战。岳乐与将军希尔根分别率领官兵和耿激战，最终耿军被击败，弃城逃跑；于是清军占据了建昌县，与此同时清军又收复了宁州。

这个期间，在浙江战场上，清军与耿军的争夺战也特别激烈。正月，驻守在龙游、蓝溪、寿昌三县交界的深山之中的耿军，在白马、黄塘源等处，被清军击败。同时清军又在下盛村、大堰头、仙洞源击败了耿军。清军的副都统马哈达，总兵李荣、陈世凯等大败耿属总兵徐尚朝，击毙耿军1000多人，乘机收复了永康、缙云两县。

差不多同时，清军在处州附近的桃花岭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地方与缙云县逼近，是通往处州的要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耿精忠派属下总兵沙有祥驻守处州，据桃花岭险要设防，阻止清军前进。清军副都统马哈达、总兵官李荣等奉命前往攻取。战斗从上午一直进行到傍晚，清军奋勇剿杀，毁其栅木而入，当即招抚了耿军的游击张汉皋等将领，击杀耿军500多人，越过了桃花岭，乘胜攻克了处州。

耿军失落了处州后，拼命的向居仙逃窜。清军的副都统穆赫林等奉命统率满汉官兵分三路追击，于正月二十五日追到白水洋地方，与耿精忠部将“镇海都督”林冲部相遇。耿军扎营13座，约兵士1万多人，与清军展开了大战，从午后二时左右开战，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双方还未分胜负，清军的穆赫林等主要将领亲自上阵督战，攻入了耿军的第一营盘，打开了一个缺口，后队的清军奋不顾身勇猛插入，使耿军全线动摇，继而阵势大乱，向后败退，清军一直追到仙居城下，耿精忠的大将曾养性这时派来援军1000人，坚守城池，拒不纳降。穆赫林以署护军的参领额库纳率军埋伏在城西侧，而令署军参领禅拜等率大队人马各架云梯三面攻城，责成署护军参领齐林布等在后督战。清军的攻势猛烈，耿军支持不住，妄图开西门逃跑，被清军的伏兵截杀，结果没有一个漏网，生擒都督领事朱富等人，缴获大小火炮258门以及其它的军用物资不计其数。清军占据了仙居城后，分兵取黄岩。另一支清军在赞将王国祥等率领下，在天峰寺大败曾养性部总兵胡双奇。游击田万侯败耿兵于武义县夏阳地方，追到宣平县(武义县南，处州西北)大王岭，再次击败耿军数千人。

三月三日，在宣平县前坞地方，田万侯率清军同耿军的大将冯公辅展开激战，直抵宜平县城外，把耿军追到宣平的大旗口地方，冯公辅的伏兵杀出，耿军作殊死的拼斗，清军也以死里求生之望，全力抗击，这

一战从早晨一直战斗到中午，清军才把耿军击败，耿军弃营逃走。这次战役双方的死伤都十分惨重。还是在三月间，耿军的大将马九玉部在衢州和清军将领副都统刺哈胡图、总兵官王廷梅等展开了激战，结果耿军被击溃，死伤1000多人。

清军在浙江的战略意图是，准备好舟船水兵、消灭台州的耿军，“再酌机宜，共图进取”。但是到了四、五月间，无论是在江西战场，还是浙江战场，双方争城夺地的战斗越来越激烈，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呈现出反复拉锯的形势，特别是一些战略要地，成了清军和耿军反复争夺的主要目标。

清军攻占了处州后，使耿精忠失去这一战略要地而深感不安。四月，他命总兵官徐尚朝率领兵马由处州东南的温州，骑兵都尉连登云由处州西南的龙泉、松溪两路进兵，想把处州重新取占，但是因清军拼死力防守，击退了耿军的进攻，耿精忠的欲望未能实现。

浙江的衢州是浙江通往江西、福建的重要门户，与它东面的重镇金华甚近，仍被耿军占据。五月初，清军分兵东进，目的是攻取金华。清军在大埂余村，上路源(都在衢州附近)、峡口(衢州北)、汤溪(金华西侧)、周僚，黄塘等处奋力阻击，临时截住了耿军的攻势。

农历五月的江南，已经是炎热的夏季了，这种气候条件，对北军不利，耿军分守各处的要隘，实力仍然较强，以致使清军很难尽快地进入福建。康熙指示：时当炎热，安亲王岳乐酌量留兵固守江西建昌处要隘，率大军暂回南昌养马，等到秋凉，或取湘南．或攻福建，侯旨意再行动。将军额楚、副都统席布应速平定广信(江西上饶)叛军，临分水关(江西与福建交界处)，佯为进兵，断仙霞后路，吸引住叛军的注意力，而康亲王杰书即命将军赖塔等攻取仙霞关，或者杰书与额楚等兵两路并进，夹攻浙江与江西交界的江山县叛军。互为声势，等待机会，进攻福建。仙霞关位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的交界，隶属浙江地界，是进取福建的咽喉之地，康熙时时地关注这个地方，寻找时机，从这里突然进入福建，只要降服耿精忠，其它各处的叛军就可以不攻而破。所以康熙不把别的地方放在心上，而专心于尽快地进入福建。

由于清军暂时后撤南昌休整，耿军乘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闰五月，耿军又攻陷了浙江的武义县，各路叛军相互应援，威胁金华。浙江总督李三芳与“平南将军”赖塔亲自指挥官兵，拼力的奋杀给叛军严励的打击。清国紧急增援，在宣平、武义两县的大王岭、东陇隘口、目套寨、下五塘等地屡攻叛军，招抚叛军头领130多人，兵士1万多人。耿军三路进攻处州，企图夺回该城，又被清军所攻，清军乘势收复了松阳县(处州西)。严重的是，乐平(位饶州东)等各地的耿军乘隙进取饶州，饶州再次被叛军攻占，以致直接威胁了南昌。康熙急令岳乐速回南昌固守，居中调度，分兵收复饶州。将军希尔根奉命夺饶州，希尔根率兵于闰五月二十六日到了余干，大败耿军，二十九日到饶州，耿军已于二十八日晚，撤离逃走，于是清军重新收回饶州。

已退据天台的曾养性已于三月间协同大将祖弘勋率总兵8人、骑兵6000多、步兵数万，进驻到台州附近，在南到长石岭，北到三江，延绵数10里的地带，连屯25营，深沟高垒，暗排大炮地雷，与清军隔江相对，另派大将朱飞熊、都督张恭万、许英率总兵4员、水师1万多、舟船

300余艘、停泊在城东的小梁山下。清将傅喇塔组织了清兵1万多人马进击，由仙居凉棚地方抄山路背后突袭叛军，在茂头地方，把耿军大将朱飞熊斩杀于阵中。逼使曾养性退据茂平岭，据险阻止清国前进。清军在取得仙居地后，就决议进取黄岩。但是曾养性据守此岭，恰好挡住清军进黄岩的道路，使清军无法前进。后清军经过侦察，探明有土木岭可以通过，较北走茂平岭的路程更近。从台州到黄岩总计300里的路程，其中有不能骑马的道路，就有40里路之多，耿军认为这个地方险要，没有派军给予守卫。于是清将傅喇塔和杰书密商从这里进兵。到了八月初，清军副都统率福建提督段应举满汉官兵，从土木岭间道突袭，到了茂平岭的背后，耿军见势十分惊惧，无心恋战，纷纷逃窜，清军乘胜赶到了黄岩。曾养性被逼迫弃营放塞，退入城内拒守。清将傅喇塔指挥清军围住黄岩城，曾养性不敢只守此城，便在晚上冲出清军的包围，逃到温州去了。八月十日，城内剩余的耿军自知守不住，打开了城门投降清军。于是地处沿海要地的黄岩被清军占据。八月十二日，清军又向温州发动进攻，兵到太平县，城内的耿军献城向清军请降。

八月十三日，清军继续向耿军追击，恢复了大荆寨城。二十日清军到了乐清，城内的耿军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清军安然地进入乐清城。原来是，曾养性都把叛军撤到了温州、青田两地固守。清军在乐清作了暂短的休息后，于三十日起兵，从山后的小路抄袭，于九月三日到永嘉上塘地区，与曾养性的3万多水军遭遇，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战，从清晨一直战斗到傍晚，双方都没有退兵之意，各个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拼命地攻击对方。最终仍是清军占了上风，阵前杀了耿军的将官60多员，击毙兵士1万多人，击沉耿军船只9艘，俘虏副将以下的将官35人，兵卒500多人，缴获的其它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十九日，清军直取清田县城。一个月之内，清军连占4城，创造了优异的战绩。

江西的局势在经过短期内的反复之后，从五月下旬，清军开始取得了进展。副都统朱喇禅在江西的北部、临近湖北武义县，打败了耿军；都统觉罗画特从江西东部重镇建昌出击，攻克了新城县(黎川)。将军额楚亲率官兵进攻广信，沿途不断地击溃耿军，收复万年县，继续东进到了弋阳，耿军将领蒋德弘率5万兵马坚守，耿军总兵柯升率5000兵马从广信赶来增援，另立6营，企图以重兵阻击清军，使清兵到不了广信，额楚率领的满州兵和土默特的蒙古兵奋战优势的耿军，歼灭耿军2万多人，迅速进军到了城下，这时耿军早已逃走，广信只剩空城一座，逐被清军占有。此后，清廷的“定南将军”希尔根等用招抚的策略，先后招降了泰和永薪、龙泉、庐陵等县的耿军头领270多员，士兵和家属6．56万多人，还东景德镇等地擒斩耿军参将以下将官10多员，歼灭兵卒8000多人。随即恢复了浮梁、乐平二县。但是，清军在个别战役中也有严重的失利。在清军攻占建昌后，想一举扫除盘踞在建昌附近的叛军，于六月二十五日攻取石峡(建昌东临福建省境)。因为天气炎热，兵马困乏，丧失警惕，误中耿军的埋伏，死伤惨重，副都统雅赖等将官战死在阵中，清军逼迫退回了新城。福建方面，清海澄公黄芳江仍坚守城池，受到郑军的猛烈的强攻，持续了一个多月，康熙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被郑军攻陷了城池，芳度和家属全部遇难、漳州也被郑军占领。

清军个别地方和战役的失利，并不影响整个战局的顺利发展。随着

江浙两省各地战斗的不断进行，并逐渐向各大战略中心地区扩张，战争的结局也取决于双方在这些地区的最后胜负。

在清军事上逐步取得优势，频频地击败耿军的有利形势下，康熙想尽快解决福建问题、以便集中全力对付吴三桂。他抓住时机，直接向耿精忠发出了招抚的信息。康熙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兵部向康熙报告：安亲王岳乐已遵圣旨，曾派陈廉前往福建再次劝告耿精忠接受朝廷招抚。这次精忠没有扣留使者，还给与银两、衣服，放他回来，传话说："我承王(指岳乐)差人来，意欲投顺，但属下人心不一，将我属下人安顿，我差人往王爷处去。我已及王位，反欲何为!我所反者，俱系范(承漠)总督逼反，今仍将范总督留存，俟我何日投顺，面见皇上之肘，将范总督作一对头"。从耿精忠回话中，看出他的态度比前所软化，且有悔改投顺之意，所以康熙又对耿精忠下了一道敕谕，交给精忠的弟弟聚忠，前往浙江，执行招抚任务。不料聚忠到了衢州，耿精忠拒不接纳。耿精忠自己知道所犯罪过重大，不能相信康熙在诏书中说的话算数，种种疑惧，使他不能马上接受投降。

耿精忠既拒绝了招抚，康熙也只能从军事上彻底解决福建问题了，他指派援军继续增加清军的实力。在江西的清军中，除了八旗兵，还在南昌、饶州、吉安、广信等要地增添了绿旗兵，"已足调遣"。到康熙十四年冬，清军先后在浮梁、贵溪等县境内击溃耿军，收复了县城，并招抚了大批的叛军纳降。清军又在浙江温州地区连败耿军，招抚了温州、台州等地叛军总兵官200多人，士兵4000多人，难民11万人。

到了康熙十四年底，耿精忠部的军饷普遍缺乏，大肆的掠夺，充作军饷仍不能满足供应。由于耿军缺乏食粮，兵卒不断的逃亡，百姓怒恨，内部已出现了分裂的迹象：如总兵张存有兵8000，屯兵顺昌，不听耿精忠的调遣，总兵罗元生统兵固守，邵武总兵彭世勋等按兵不动，他们已暗通清军，愿作内应，协助清军进攻福建。

康熙命令清军速进福建。康熙十五年二月，傅喇塔誓师黄岩，向温州进军，所经过的地方，连挫耿军，但到了温州地区时，遭到了曾养性顽强抵抗，耿军凭江固守，双方激战累月，清军也未到了温州城下。清浙江总督李之芳献策：直捣仙霞关，实为摧坚制胜之策。他说："进取之路，不在温、处，而在三衢，今"悍贼"悉萃于此，此处叛军破，诸处叛军必然惊散。虽然敌将马九玉、朱怀德等抗拒河西，而江、常之间有间道可袭，清军进击，使叛军首尾不相顾，从此处入闽，可奏荡平矣"。康熙对这个谋略非常赞赏，当即批准按照此计进行。他命李之芳伤兵固守衢州、金华；命傅喇塔继续进攻温州、处州地区的耿军，命康亲杰书从金华移师衢州，进征福建。

朝廷的圣旨虽下，何时进兵福建，仍无日期。领兵的皇室贵胄迟迟不肯进兵，拖延时日。此时在湖南已发起长、岳之战，突然，吴三桂派大将高大节出醴陵，进江西，经萍乡，一举攻陷了吉安。吉安是通向湖南的咽喉，也是通南康，赣州的水路孔道。吉安一失，对进兵福建受到极大的影响。简亲王逼迫撤离广信，专力攻击吉安。康熙得报，十分震怒，严厉斥责江西方面清军的各路统军将帅，说：江西离京师4000里，朕知之甚悉。简亲王喇布以宋室懿亲，不实心于国家，料理军务，恢复地方，只坐守省城南昌，"日事骑射，经图安逸"，殊负委任之意。今"逆

贼”高大节窃踞吉安，朕旨到日即宜刻期攻取。副将希尔根，“不思报国，日驻省城，安逸自便，性尤偏执”，只偏坦右翼军，今后宜痛改前非，力图报效。还有将军觉罗舒恕、莽依图、穆承格驻赣州、西安。康熙命令他们协助攻取吉安。

康熙十五年六月六日，耿精忠的叔父耿继善突然焚毁营盘，急忙从建昌、新城撤走。康熙认为，耿精忠被“海寇”(指郑经)所逼无疑，我军宜乘机前进。他命令大将军杰书，贝子傅喇塔、赖塔，浙江总督李之芳等“速剿闽寇”，酌量招抚，勿坐失事机”。

七月，康亲王杰书、总督李之芳、赖塔等清国统帅率师到达衢州，各路合军，商议进取福建。

耿军的大将马九玉等统率数万兵马据守衢州府江西岸，扎营在九龙山，另外分兵1万兵马由大将林福等统率，扎营在衢州南，衢江(今港山江)右岸的大溪滩，为马九玉部属保护和押运粮饷的地方。

衢州位衢江右岸，顺流而下可通金华；溯流而上可通仙霞关。此为通福建的孔道，而且从衢州到仙霞关很近，实在是通往福建的一条捷道。耿军集结这个地方，全力阻挡清军入闽，并企图夺取衢州。于是，衢州就成了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

康亲王等人面对实力雄厚的叛军，谋划破敌的策略，决定先截断叛军的饷道，以夺其优势，动摇其军心。八月十五日，赖塔等率领满汉大军乘夜进兵，直扑耿军储粮的地方大溪滩。耿军没有防备，仓促迎战。清军奋勇地进攻，击败了耿军，夺取了大溪滩，乘胜攻克了大溪滩附近的江山县城。马九玉得知饷道被截断，立时荒了手脚，不敢久留，急忙拔营而逃。康亲王杰书派遣副都统胡图等率兵追杀，大败耿军，一举收复了常山县。马九玉看出清军的意图，势必要夺取仙霞关进入福建。他率领残部绕道奔仙霞关，企图依靠险隘阻击清军。不料杰书已派遣赖塔、副都统马哈达疾驰仙霞关，于二十日赶到关前，堵住要路，分路夹攻，马九玉只身仅和30多骑兵逃跑了。守城的耿军参将金应虎势穷力竭，被迫献关迎降，清军长驱直入，涌进福建，从北向南，马不停蹄地疾行，于八月二十三日，进到浦城，挥军攻克。该县石塘地区是由浙江进入福建的要隘，耿精忠派都慰连登云用重兵固守。清军到达石塘，和耿军接连地战斗，连破叛军9营，将耿军杀败，打开了通往福建腹心的通道。

清军进入福建境内后，势如破竹，九月三日到达建阳县城下，击败了守军，占据了县城，再追溃兵到建宁，耿军不守，一哄而逃。耿军已成了惊弓之鸟，闻风即逃。

在这时期内，留守在江西的安亲王岳乐命将军希尔根攻击耿军的大将白显忠，白显忠兵败投顺了清军，恢复了建昌、饶州，“江宁将军”额楚收复了广信。至此耿精忠失去了白显忠一路兵马，势益孤立。加上清军在福建的进军势猛，而台湾的郑军又乘机侵扰他的大后方，这时耿精忠已深感自己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刻，他不再想顽抗到底，最后的出路，只有归降。

清军在东南战场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康亲王杰书根据清廷的指示，再次写信对耿精忠进行招抚。精忠要求朝廷再下一道赦诏，才放心投降。康亲王不予理睬，催动大军直奔福州，路经建宁府，九月底到延

平(今南平市)，守关的大将耿继善献关投降。福州已遥遥在望。精忠听此消息，惊慌失措，急忙接受投降。

十月四日，耿精忠率文武官员出福州城外，迎接康亲王杰书与诸将进入福州城。

耿精忠投降归顺清朝，其它处的耿军将领也纷纷放弃抵抗。固守温州的大将曾养性“势迫无所归”，只好献城降清。广东原潮州总兵刘进忠、碣石总兵苗之秀也相继投降。散落在浙江、江西的残余叛军，失去了依靠，都放下了武器，纷纷前往清营缴械。江、浙两省的战事已停，局势很快地稳定下来。只有沿海一些城镇还被台湾的郑国占据，清兵对郑军发起进攻，于康熙十六年正月，收复了兴化城，二月初，攻克了泉州。郑军闻风丧胆，弃樟州、海澄等城镇，逃回台湾。清军没经过多少战斗，即恢复了漳州等10个县城。至此“闽地悉平”。

“时东西两巨寇(包括王辅臣)既降，乃得以全力办三桂。”康熙和他的议事王大臣对剿灭吴三桂，比任何时候，都充满了信心。

收复两广从康熙十六年初，战争的形势开始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清军在经过暂短的退却和，防御后，很快进入了常态，在西北和东南两翼战场转入了进攻。首先降服了王辅臣，西北的叛军倾刻瓦解，四川的叛军被逐回老巢。康熙十六年十月，耿精忠被迫归降，福建底定，台湾的郑军被驱逐出大陆，浙江、江西的叛军亦告分崩离析。东南地区恢复了清廷的统治。

在解决了东南和西北的叛乱后，清廷对吴三桂展开了战略大包围，从东西两侧逼湖南，向两广进军，切断吴军的后路。同时从内线湖南战场，调兵遣将，准备发动总攻击。

为实现这个战略，必须先解决两广问题。在广东清军进展较顺利。广东的尚之信，虽投靠了吴三桂，实则自保。尚之信不为吴军出一兵一卒，也不和清军作战，而是静观形势变化等待时机，迎接清军进入广东。在耿藩投诚归降后，尚之倍看到清军形势好转，时机成熟，即刻派人携书到简亲王军前“乞降”。

康熙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镇南将军”莽依图从江西赣南统兵入粤，二十九日，到了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南安(江西大余)，叛将严自明献城降清，清军一帆风顺地进入广东，取南雄，直抵韶州(广东韶关)，假降孙延岭傅弘烈“迎降”。尚之信于五月四日率省城的文武百官和兵民“归正”。

由于尚之信率先归正，广东的文武大吏纷纷投诚。在省内其他地方已叛的将官不再抵抗，立即准备投降。因而清军在广东几乎没遇到任何抵抗，就平定了叛乱。

清军进驻广东，尚之信降清，深深地震动了吴三桂，他感到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为了巩固后方，他派出7员大将，统帅3万兵马进至湖南与广东交界的宜章企图分兵进攻乐昌、南安(江西大余)，夺占两城，进而夺取韶州，控制交通线。韶州位居五岭之春，是江西与广东的咽喉之地，为兵家必争之地。吴军的大将马宝、胡国柱等率领劲旅数万，于七月五日向韶州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攻势之猛，志在必得。清军统帅“安南将军”舒恕急速派遣副都统赫勒布率满汉官兵增援。康熙指令尚之信和“镇南将军”莽依图等速率兵赶赴韶州，舒

恕亦相应应援，必保韶州，不得丢失。

莽依图接令后，不敢怠慢，自广州统领清军翻越大庚岭急趋韶州，两广总督金光祖也派遣标下官兵2000增援。莽依，图到韶州后，观察地形，以地北为冲要，筑土墙，每夜从城上悄悄缒卒出城、浚壕通水，并派一军据守白土村，以护卫广州饷道。从七月到九月，吴军日夜攻城，都未攻破。胡国柱等提心清军的援兵四集，于九月二十四日夜率领1万多兵马渡江，到江西岸，切断清军的水运，列营莲花山，居高临下，向城内发炮轰击，女墙都被轰毁，清军退保土城固守。正在危机的时候，江宁将军额楚率援军赶到，与莲花山的叛军对垒。额楚率援兵向吴军发起进攻，城内莽依图乘机杀出，内外夹攻，横冲吴军的营寨，速破4营。九月二十八日，马宝等弃帽峰山，大败而逃，江西岸的吴军也被迫弃营潜逃。清军乘胜追击，到了乐昌的风门澳，三路攻杀，把吴军杀得大败，清军收复了仁化县，而马宝等迁到衡州去了。韶州一战，驱除了吴军在广东的势力，于是广东得到了进一步的稳定。莽依图奉命率属部8000人马，同新任命广西巡抚傅弘烈平定广西，令尚之信出藩兵3000助战。傅弘烈独率所部1万多人马展开军事行动，先后攻占了广西重镇梧州、浔州(桂平)等地，所向奏凯。

吴三桂不能得志于广东，便“悉其骁锐，俱向广西”。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六日，吴三桂来到衡州，亲派马宝取道宜章，进入广西富川，派其孙吴世踪占领了桂林。其意图，在于巩固湖南后方，此为保守湖南战略的一部分。

清军统帅部认为，“平定广西，扫荡云贵，关系重要。”因此决定进兵，迎战叛军。此时傅弘烈尚在梧州，奉命和莽依图部联合取平乐、桂林，正面迎敌；尚之信、将军额楚、都统勒贝等进攻宜章、彬州(湖南郴县)，从后夹攻，使吴军首尾受敌，不能兼顾。十二月十八日，傅弘烈从梧州出发，莽依图率师于二十日，由封川进兵，两路会师于贺县(广西贺东侧)，进取平乐。

康熙十七年初，莽依图、傅弘烈等进抵平乐，将城团团围住。吴世踪率兵5000，分水陆两路赶来增援平乐，与清军夹江扎下营寨，迅即渡桂江，先攻绿营兵。傅弘烈与都统王国栋率军接战，寡不敌众，被吴军击败。适值江水泛涨，莽依图所部满州八旗兵不能渡江，眼看绿旗兵溃败。吴军又占据河道，清军粮饷接济不上，自己感到孤军不能久留，撤到中山镇，再退到贺县、梧州，就饷于德庆。康熙得报，速令尚之信，急发万人精锐增援，同时又调将军舒恕自江西赣州，额楚自肇庆兼程向广西进兵。

正当康熙调兵遣将增援广西时，吴军和广西的叛军趁平乐得胜，大举反攻，把清军已收复的浔州等郡邑先后夺回，到三月，清军仅存梧州一府了。二十二日已投诚的高雷总兵官祖泽清又在高州复叛，广东又为之震动。康熙命尚之信亲征，授权除掉他。尚之信得令，与副都统额赫纳等于四月十一日抵电白，大败叛军，城被攻陷，祖泽清闻讯，乘夜逃跑，十九日，收复了高州，招降了雷州。

清军由于在平乐的失利，在广西的进攻暂时转为防御，固守梧州，待机反攻。吴世踪率兵数万继续追击清军，渡左江，近逼梧州地区。傅弘烈孤军奋战，先后在梧州附近的贺县(今贺县东南)、藤县展开激战，

清军又接连失利。吴军以水陆三路进逼梧州。适时尚之信奉命率军赴援，于康西十八年正月，会同莽依图、傅弘烈各部，在梧州城下，三路夹攻，吴军大败。清军乘锐奋进，长驱直入桂林。吴军转而围攻南宁。此据原为叛将马雄所据，马病死后，他儿子马承荫降清，仍守南宁。吴世踪围攻数月，城池即将被攻陷，清将莽依图等及时赶来增援，才使南宁城免遭攻陷。吴世踪挥军与清军的援兵展开大战。莽依图以额楚部为前锋兵冲击，他和舒恕自后指挥大军继进，事先埋伏了精兵在山后，断吴军的归路。因莽依图指挥得宜，加上满汉兵士的奋力攻占，终将吴军彻底击溃，吴世踪身负重伤逃走，南宁解围，清收复了广西全境。

第四节 南北夹击主攻湖南

夺取茶陵进逼衡州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清军从战略上实现了对吴三桂的外线大包围。这就是从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省的东南沿海到南部，形成了半圆形的包围圈，西北陕甘地区叛军的归降，与南部各省又形成了南北进逼的局面。至于四川的叛军，已被清军切断了它与吴军大本营的联系，陕西汉中，兴安的叛军局限一隅。处于清军的严密监视之中，束手待毙。

在基本完成对吴军的外线包围后，清军在内线开始向湖南推进，仍就采取了南北夹攻的战略：北以岳州、长沙为攻击的重点，南则从广东、江西进兵，目标取衡阳。康熙十六年十一月三日，“征南将军”穆占率部进至江西的永新，矛头直指接近江西省前湖，南的茶陵。茶陵是江西门户重地，“江西通省，所系维在茶陵”。

夺取了茶陵，就可以扩通去湖南的道路。吴三桂于十一月六日进驻衡州(湖南衡阳)。茶陵在衡州的东面，两城相距较近，有水路通往甚为方便，从茶陵乘船，顺流而下，经攸县，进入湘江，转向南行，便可以直入湘江之畔的衡州。故而先取茶陵，就直接地威胁到吴三桂的重镇衡州。十一月十四日，穆占领兵从永新县进兵茶陵，守城的吴军已经弃城逃走，清军不战而占据了茶陵。穆占得此城后，立刻命令都统宜理布等马不停蹄地进兵追剿，这时吴军已跑到了茶陵北，洣水岸边的攸县城，据河岸迎战清军。宜理布挥军奋力猛冲，夺取了城门，吴军又弃城而逃。这次战役歼灭吴军4000多人。吴三桂失去了茶陵、攸县后，很快地陷入了困境，“馈饷不给，军士胥怨，民多远避”。十二月十四日，都统觉罗画特等率部攻克了湖南北部、邻近江西的平江。平江地处岳州和长沙之间，清军可南可北，从中可以截断吴军南北联系的通道。

清军从茶陵、攸县打开了从湖南的东南部进兵的缺口，为迅速扩大战果，加大进兵的缺口。穆占据茶陵、攸县后，又进兵攻克了茶陵南面的酃县，斩获吴军的总兵、副将等10多员。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四月前后，穆占连续攻克湖南的郴州(郴县)、桂阳州、兴宁(今资兴)、宜章等城镇，招抚了吴将总兵官王育民等人，收复了临武、蓝山、喜乐、桂阳(前一桂阳为州，后一桂阳为县，今汝城)，桂东等五县，再进兵到永兴。茶陵等十几个州县都在湖南东部、东南部到南部地区，已联成一片，与江西、广东、广西各省接近，道路已经打通，清兵可以畅通无阻地由这些省境源源不断地进入湖南。清军对已占领的这十几个城镇，决心固守，统帅部不惜派驻重兵，这对即将发起向湖南的总进攻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到茶陵为军事重地，将军穆占特派驻满汉官兵，“有满兵每佐领4人”和总兵官赵应奎与穆占新率领的湖广绿旗兵，还留下简亲王喇布兵的一半，为数不少，约计1万多兵马。对其余的地方也都拨出强兵劲旅据守。

清兵已在湖南东和南部开辟战场，建立了稳固的据点，正在衡州的吴三桂已自在清军的进逼之中，吴三桂的危亡正日益逼近。

吴军动摇清军招降吴三桂在军事上的接连失利，导致了内部军心动

摇，士气低落，内部核心不和，互相倾轧。吴三桂的心腹大将高大节，跟韩大任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兵败，或死或降。

高大节十分骁勇善战，通晓军事，所率部卒都是精兵，临战向来是以少胜多，是吴三桂的一支劲旅。康熙十五年二月，他奉吴三桂的命令，率数万兵马进攻江西重镇吉安，仅数日便将吉安攻陷。因吉安对清军“关系最重”，康熙严令夺回。清重兵攻吉安，高大节“死守”，到六日，清军“尚未克复”。一次高大节仅率百余骑出战，竟把清军杀败。

高大节能战能守，不愧称一骁将！与高大节形成对照的是，吴三桂的女婿夏国相防守萍乡，于康熙十五年二月十六日，破安亲王岳乐统帅的满汉大军速破吴军12寨，歼灭吴军1万多人，他本人弃印败逃，将萍乡丢给了清军。夏国相失去萍乡这一战略要地，损兵折将，弃印而逃，本当重治其罪，吴三桂竟宽容，仅削去两级了事，引起内部的强烈不满。

高大节与韩大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韩大任因献媚有功，被吴三桂晋升为“杨威将军”，其地位与高大节相当，高大节深感受辱，郁郁成疾，不久便病死在吉安。于是，韩大任独掌了吉安的兵权。

韩大任掌握了吉安的大权后，每天以诗酒自娱，对军事只字不提。清军为了夺回吉安，简亲喇布率领江西总督董卫国等10万大军围困吉安，韩大任害怕清军的势大，不敢出战，闭门坚守。

吴三桂得知吉安被围，急忙派遣大将马宝、陶继志、王绪率9000人马赶赴增援。马宝先派人，混进城中，通报援兵的消息。韩大任说，“我听说马帅已降清，你来真伪不可知。”来人说：“马帅已虑及此，临行嘱我以‘棒槌’两字示信”，韩大任沉默良久才说：“马帅如真来增援，可到城下，免去胄帽，有头发在，我当出面会他。”马宝进兵因受江水的阻隔，不能到达城下，而城中却寂然无一炮相应，马宝疑惑，不敢再摧兵前进，便撤兵后退。清军乘机追击，先攻王绪的大营，马宝和陶继忠挥军救援，却被清军击败，救援无效，便退回湖南去了。

马宝等吴军援救失败，而在其他战场上的吴军也日益吃紧，无法再向吉安增援。吉安属于要地，如果失守，将对吴军产生严重的影响。而吴三桂非常忧虑，无计可施，让其一天天拖下去，而韩大任及其将士却天天盼望救兵，终不见一兵一卒。清军将吉安城重重围住，但却攻不进去，就以断其粮饷相持。清军将吉安围困已达200多天，吴三桂无法救，城内的粮饷早已断绝，将士饥饿，眼看支持不下去了，韩大任决计弃城逃走。康熙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夜，韩大任率残部悄悄地出了南城门，渡白鹭州，然后发射大炮，击鼓，清军以为吴兵劫营，各营兵士惊扰，惶乱不安直到天亮，才知道韩大任已弃城逃跑，清军惧怕韩大任的兵精，不敢追剿，任其逃走。康熙得报，以为韩大任是吴三桂的要人，紧急指示简亲王喇布等堵截，一定要将韩大任剿灭。

康熙十七年正月二日，在江西地名为老虎的地方，韩大任被追剿的清兵击败，伤亡6000多人，营寨被清兵烧毁、总兵、副将等300多员被扑杀。这时韩大任力竭势穷，听从了属下的幕客孙旭的劝告，决定到福建康亲王杰书军前投诚。二月间，韩大任和属下部将陈尧先、李懋珠等率官员954员，兵卒1．3319万人到福州，归顺了清军。三月，清军又在万安、泰和等地歼灭韩大任的余部4万多人，招抚了总兵邱大成等300

多员，兵丁4．6万多人。

韩大任携万名精兵和大批军用物资降清，清军又招抚了他的部众4．6万人，总计近6万兵马，骁将和统帅之一的高大节又忧郁而死。这对吴军来说，都是个极大的损失，这标志着吴三桂集团开始分崩离析，从此便急剧地走了下坡路。

长岳决战吴三桂归天长沙、岳州决战，是关系吴三桂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之战，清廷能否最后歼灭吴三桂，重新统一全国，也取决于这次战役。所以长、岳之战，无论是与清廷和吴三桂，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长岳大战，从其酝酿、准备，到爆发，确实是经历了数年之久。

吴三桂占领湖南后，就以常德、长沙、岳州、湘潭、衡州为五个战略据点，其中又以长沙、岳州为战略的重点，派出精锐重兵驻守，各达7万多兵马。特派他的侄儿吴应期驻守岳州，抗拒江北荆州的清军；大将马宝等守长沙、萍乡、醴陵，以拒江西的清军。后以衡州为都城，其心腹大将女婿胡国柱、夏国相、吴国贵等都聚守衡州，吴三桂经常地去长沙坐镇，以坚其将士守御之志。

岳州位于湖南东北部，隔江和江北的湖北省相望，占据着战略位置，长沙是吴军的粮食基地，岳州等处的粮饷“全赖长沙水陆运送”。吴兵的水军所需的乌机船也在长沙制造。岳州与长沙互为依存，皆不可失。吴三桂对长、岳两城时刻给予关注，以两地恃洞庭湖和湘江之险，有水陆之便，设水师、列象阵，与陆军相配合，备有大量的火器、火药，掘重壕，挖陷坑，设水桩，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以护卫全城，吴三桂尽一切可用的手段来不断的加强长、岳的防御，自视为固若金汤，坚不可摧。吴三桂不想渡江北进，想以湖南为根本，要想固守湖南，就必须拼死守住长沙、岳州。

清政府则派重兵坚守荆州，并以荆州，襄阳，宜昌、武昌等处为重点，厚集兵力，迅速的沿长江布防，阻止吴军北上。当吴三桂驻足湖南后，康熙就很快的看出了吴三桂的战略意图，指示：“岳州、长沙势如两足，此蹶则彼不能独立”。他特别重视岳州，说：此城是“湖南咽喉要地，必此处恢复，则长沙、荆州之兵始能前进”。早在康熙十三年六月，他就一再的指令清军的统帅“速取岳州”。

但是战争的发展，很快就证明了，欲速则不达。康熙急于同吴军决战，速取长沙、岳州未免求胜心切，操之过急。虽说他的见解是正确的，可是脱离了实际，因此决战之日迟迟未到，却是一拖再拖。实际情况是，他所任命的清军统帅却是皇族贵胄全无实战经验，临敌怯弱不敢战，八旗兵久不参战，一时不适应突然到来的战争。再者清军兵力不足，大批的援军来到，粮饷未集，无法同兵马众多的吴军相匹敌，吴军正处极盛之时，兵锋锐不可挡。如果当时按康熙的战略决策进行决战，恐怕清军只能招致失败，遭到巨大的损失。

此后，康熙虽然反复向前线的统帅阐述他的战略意图，始终以攻取长沙、岳州为重点，但到决战前，除了康熙十三年七月发动了一次略有小胜的进攻岳州的战斗外，直到康熙十五年三月才对岳州进行第二次进攻。三月九日，大将军贝勒尚善率水陆大军攻取岳州，清兵水师舟舰进入洞庭湖，吴军水师拥腙数百只，横列南浔、君山等处迎战，被清水师

击败，君山落入清军之手，逼岳州城下，又击退来增援的吴军，缴获吴水军船50只。十八日，顺永郡王勒尔锦与诸大臣统率满州、蒙古、汉军、绿旗兵数万出发，至文村，渡过长江，吴军人少，见势弃营逃走，在石首虎渡口焚毁吴军营寨二座，水师逼太平街泊营。二十七日，与吴军激战于丰州(丰县)太平街，吴军被击溃。此时，吴军因调往长沙增援，岳州一带吴军兵力单弱，如清军乘势猛攻，可以收到长驱直入的效果。但是清军渡江后，迁延不进，又不力扼虎渡口，给了吴军可乘之机。吴三桂很快从松滋调来援军，勒尔锦惊荒，丢弃太平街不守，又以暑天为借口，急忙率部退保荆州，尚善的水师也没能断掉吴军的饷道，江湖险隘之地，又为吴军所据有。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清军对岳州发动过两次进攻，都因为岳州防守坚固，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无功告退。在这期间长沙属于腹地，清军还没有力量去进攻它，直到对岳州第二次发动进攻之前，才首先发动了对长沙的进攻。康熙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安亲王岳乐帅大军攻克了萍乡和邻近的醴陵，长沙近在眼前。康熙指令“乘胜直取湖南”，进取长沙。他料定吴三桂必增调援兵固守长沙，其它地方的兵力不足，可乘隙速取岳州，没料想勒尔锦等竟在岳州城下失利。康熙只好改变战略决策，命令尚善分兵由通城陆路增援，会合岳乐攻长沙。尚善委派副都统阿进泰率八旗骁骑兵800、蒙古与绿旗兵各500名共1800兵马，于四月二十六日从通城出发，前往长沙。在安亲王岳乐近逼长沙的同时，另一支清军正在围困吉安。吴三桂急从松滋率诸悍将到长沙增援，他的意图是先击攻岳乐，然后增援吉安。

岳乐的兵马扎营在长沙东、官山的后面，官山在长沙与浏阳之间。自城北跌佛寺后面布阵，到城西南，成半园形，分兵19路，绵延数10里。吴三桂的兵马出城西布阵，结营岳麓山，横区数10里，军容之盛，为近古所未见。吴三桂坐在谯楼上，亲自观战。战斗开始了，吴三桂的大将王绪率先出阵，冲入清军的阵营中，清军分兵合围，把王绪的数千人马围了数重。吴军的旗帜已淹没在数万清军包围之中，也听不到击鼓鸣金声。城上的吴军官兵大惊失色，连吴三桂也很惊荒，以为王绪和他的部众全军覆没。正在惊疑不定，忽听交枪连发，就象急骤的鼓声，白刃排空，涛翻雪舞，喊声振动天地，只见清军的骑兵纷纷落马，王绪和他的将士奋力冲杀，锐不可当，清军无人敢抵挡的。吴三桂的侄儿吴应正，大将马宝、夏国相等一齐冲出搏战。正在酣战中，吴应正忽然中流矢落马，夏国相力战，把他救起回营，清军乘势追至城下，忽然冲出一队巨象，把清军的攻势冲跨，冲到前面的清军骑兵都被象群踩在巨掌之下。清军见势不利，纷纷败退下来。原来吴三桂事先在城下设下埋伏，一群40多头大象伏在山冈下，若清军冲来，即让大象冲击。清军没有提防，吃了大亏。这场血战持续到中午，忽然天降大雨，双方才各收兵而退。吴三桂的本意要气吞官山，先以19路对阵，余驻岳麓，如前军不胜，后军继之，必平官山的清兵而后已。不料吴应正受伤，天又降大雨，吴三桂只好下令收兵回城据守。

这次战斗，双方各投入兵力达10万之众，吴军三路得胜，其余两方死伤相当。清军失利，不敢进攻，便扎营掘壕，与吴军相持。

据安亲王岳乐报告：清军于四月开始围困长沙。但实际上，并没有

把长沙围住。一是兵力不足，无法把长沙的7万吴军围困起来；二是吴三桂把大批的战船调来长沙，占有水上作战的优势，而清军连一条船只也没有，岂能破敌。

为了打赢长沙、岳州这场战争，清廷不惜一切代价，在长沙、江宁等地制造大批的船舰，又从蒙古、京师等地征调了众多战马和红衣炮等军用物资。除了源源不断地供应前线军需，又陆续从其他战场增调兵马，投入长、岳两处。当陕甘叛乱一平定，康熙就令穆占率西北兵马万余人，速赴湖南。穆占奉命疾行，于康熙十五年十二月抵达荆州，大将军勒尔锦又增拨在荆州的满州、汉军、边外蒙古、绿骑兵共6000多人，率领赴岳州、长沙。次年正月十一日抵岳州，二十二日由岳州赴长沙。

同年二月初，调都统鄂鼐，付以“讨逆将军印”，令其统率舟师赴岳州。

经数次的征调，清军在长沙及其邻近地区已经集结了近10万人马，与吴军的人数大致相当，略占优势。

清军分布在岳州、长沙等地，战马、舟船、火器等兵马已备齐。康熙下命令，催促向岳州、长沙发起进攻，康熙十六年五月三日，清军的水师进入洞庭湖，将军鄂鼐率大军驾驶战舰200多只，直越吴船，进入君山(位岳阳西侧洞庭湖中)，吴军水师出战迎敌，双方连续激战数日，清军不能突破吴军湖上的防线，被迫撤退。这次水战，再一次证明岳州吴军防守相当严密，清军仍不得尺寸之功。

吴三桂很清楚清军的意图，必取长沙、岳州。这两城相依为命，彼此互相依赖。他知道如果长沙失地，岳州的饷道断绝，孤立无援，势难自立；如失岳州，清军就会水陆齐进，势哪破竹，长沙不能久存。因此，每逢长、岳两城受到清军的攻击，他就不惜从别处调来大批援军，竭全力保固两城。他采取的另一战略是，以重兵出击，攻占了醴陵，窥测萍乡，切断岳乐兵马的后路，迫使清军从长沙撤出应援，以减轻清军对长沙的军事压力。另遣一军攻取吉安，占据江西与湖南的门户。

康熙识破了吴三桂的战略意图，一再指令清军收复醴陵、吉安，固守萍乡。双方应在这几个战略要地展开了反复的争夺。吴三桂又派精取广东的韶州、广西桂林，其目的是诱使清军兵分各地，借以保护湖南的后路。他的这一策略，使清兵疲于奔命，不得不从长沙战场分出一部分兵力应援。穆占奉命到乐昌等地，以切断进犯韶州吴军的后路。岳乐则分出一部分兵力防守不久刚收复的醴陵。战马不停地奔驰、战斗，极需休整，穆占获得批准率部到袁州养马25天，然后即奉命剿灭正在逃跑中吴三桂的大将韩大任。清军的兵力已分散在各战场，不能聚结兵力进攻长沙和岳州。岳乐请求增派战斗力较强的绿旗兵，先取岳州，再由水路进兵长沙。但是绿旗兵已没有能调之兵。因此只得暂时放弃取长、岳、分兵进取长沙以南湘潭。

从康熙十五年到十七年，双方的战斗日趋激烈，特别是在康熙十七年的上半年，争斗尤为酷烈。清军进入湖南的东部和东南部，先后攻占了茶陵、攸兴等12座县城。又在湖南东北攻取了平江、湘阴。康熙十七年三月，穆占率兵攻下彬州(彬县)、永兴、以数万兵马由永兴北上直取来阳，进逼衡阳。

此时吴三桂正在衡州，急命骁将马宝率部迎敌，他的兵马行至永兴

以北60里，在盐沙岭设伏以待，清军毫无觉察，大队的兵马进入谷口，吴军伏兵四起，谷口被堵住，在岭上安设火器，猛烈地轰击。清兵进退不得，又不能驰驱，无法还击，听任吴军攻杀。吴军大获全胜。清军伤亡1万多人，都统宣理布、统领哈克三被击毙。吴军追到永兴，晚上渡过来水，在永兴城下扎营，虚张声势，仅以少量兵马立营，而以大队人马潜袭郴州。驻扎在郴州城外河南岸的清军大营被攻破，前锋将领硕岱、副都统托岱失利，退到郴州城，硕岱撤向永兴去了。吴军在一些战役中打了胜仗，暂时缓解了日益危机的局势，但是总的趋势不容乐观。吴三桂作为总指挥，以他的军事实践经验，比任何人都清楚目前的严峻形势。他不能高枕无忧，他愤于各将领争战不力，他或冒酷暑，或顶寒风，来往于各个战场，亲自调兵遣将，有时亲临战场，指挥对清军的战斗。在吴军失去吉安后，清顺永郡王勒尔锦率大军直逼长沙城下五里山扎营，吴三桂愤极，亲自临阵督战，没有成功，自家兵溃，往城里逃。幸亏在城下埋伏了6头大象，纵之出城，清军连同战马惊荒，不敢上前追击，慌忙退却。吴军的士气低落，连吴三桂也指挥不灵。在这二三年中，他北到松滋，窥视江北；回师长沙，率领兵马解围，“死守湖南”。康熙十六年四月，他率众去衡州，部署作战，九月他又到了湘潭，部署进攻广西；十一月又去了衡州。

吴三桂奔波于各个战略点之间，虽然一时奏效，却无回天之力。吴军的形势，如江河日下，不可能重振雄风了。

表面上看，岳州、长沙的防御坚固，似乎是无懈可击。然而大批大批的清军一天紧似一天的逼近，吴军在军事上一连窜的失败，给吴三桂广大将士的心灵上笼罩一层阴影，他们各怀心腹事，情绪异常低落。这些都是产生猜疑的土壤，猜忌一旦产生，就势必引为内江，加快了瓦解自身的组织。吴军守岳州的大将吴应期，妄自尊大，贪婪无比，克扣军饷，饱入私囊，引起部众和岳州城中的百姓无比的愤慨。吴军水师大将林兴珠，精通水上作战，因吴应期对其傲慢无礼，投顺了清军。安亲王岳乐等又针对吴军内部相互猜忌，屡设反间计，吴应期不变真假，抓住假证即杀，更引起部属惶惶不安，人人自危。清兵围长沙，断其饷道后，岳州失去了粮食供应，粮食一断，饥饿立即来临，挨饿的兵士想法逃出，没逃出的，也奄奄得毙。岳州危在旦夕。

清军对岳州在实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又不断展开了政治攻势，向吴三桂的将士和被占地区的百姓发出告示，陈述形势，公布清廷的招降政策，指明出路。对吴军的广大官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增大了吴军内部的离心力。岳州吴军的总兵官陈华、李超等先后向清军投诚，其后，“陆续投诚”的络绎不绝。清廷克取岳州的条件与时机已趋成熟。

林兴珠于康熙十七年三月降清后，立即献出破岳州的策略。他根据清军的船舰较多，提出分一半战船停泊君山，用以切断常德的道路，其余的船只停泊香炉峡、偏山、布口袋诸处，沿九贡山陆路立营，截断长沙、衡州的通道，可阻塞岳州吴军陆上的交通。即使城中有粮食，而薪刍器用必致缺乏，可以不战而使吴军毙命。安亲王岳乐将此水陆布署向康熙报告，当即批准，特别嘱咐：水陆大军进攻岳州，既克之日，乘虚速取常德、醴州等城，“勿令贼得为备”。

清军即按上述方略布置，并于五月十八日由“安运清寇大将军”尚

善、湖南总督蔡毓荣、提督桑格统帅水师，浩浩荡荡地驶入洞庭湖，发起对岳州的总进攻。数日来与吴军水师对抗，经过大小战斗10多次，屡次挫败了吴军。六月三日黎明，吴军的水师乘风而来，攻击柳林嘴、居山两处清军水师。清军各路战船一齐出动，分头给予迎击，火炮不断地击沉吴船，擒杀吴军的将领和士兵，终于将进攻的吴水师击退。

在对岳州发起总攻击的前夕，清军统师部加紧做瓦解岳州吴军的工作，争取更多的吴军将官兵士投诚，以减少清兵进攻的对抗力量。他们“大出告示，广布皇仁，更屡次密书悬置高脚庙地方”，向据守此地的吴军水师将官陈碧等人“晓以大义”。他们还请陈华、李起等已降清的吴军将领直接到城下，“高声传喻”清廷对他们的政策。陈碧认真考虑后，决定投诚。同时又有吴军的兵士及家属1000余口背吴投清。

到康熙十七年七月，清军水陆围困了岳州，而九贡山尚未立营，吴军仍然往来这个地方，以采柴木。康熙派到清军营下督察军事的詹事宜昌阿报告说：“如岳州不下，长沙无船可用，而荆州的清兵也不能渡江。应固守长沙、荆州，调余兵困岳州，使之内外不得通，断其樵采，吴军困穷，约十月内外，似可克复”。康熙指示：“岳州为湖南咽喉要地，必恢复此地，围攻长沙及荆州的兵始能前进。大将军顺承郡王所部兵数不少，攻取岳州，“事关紧要”，再增助围，原调江西的陕西兵攻赴岳州，河南巡抚董国兴可遣标下兵1500人、安徽巡抚徐国相遣标下兵500人，令贤能官统领，都赴岳州，还有原军4000人也同往岳州。此诸路兵抵达，可于九贡山设一营，只要有机可乘，即进兵攻取”。

尽管康熙在岳州集结兵力达到六七万人马，战船准备数百只，军需山积、粮饷充足，可是岳州还是迟迟攻不下。到了八月，康熙看到各将军“破贼无期”，又担心满旗士兵不耐水土，因而挫伤士气，再也按奈不住，说：“今日之事，岳州最要。不可可速行攻取”。提出他要亲自统率六师，“躬行伐罪”。但是议政王大臣不赞成康熙亲征，极力阻止。这反映了康熙对他所遣将领不用力攻战的不满情绪，不久吴三桂病死的消息传来。康熙立即指示前线各将军：吴三桂已死，“贼必内变”，各路大军要时分路进剿。

清军从五月进入洞庭湖，到九月初，已有三月有余，虽小战多次，吴军并没受到多大的挫折，但不敢倾巢出战，而清军仍没有把城紧紧围住。问题是，清军将领临阵怯弱，不敢迎战。九月初，一队吴军乘船反20多只。赴湘阴取粮食和火药，经过清军副都统德业立和提督周卜世的防区，有战船130只，竟不敢击，任其出人。

十月二十二日，吴军水师将军巴养元、姜义等人率战船250艘，进攻陆石口，被清军击败；二十九日，清军进攻岳州，击破吴军1万多人。吴军出击的目的，是想打通道路，取得粮饷的支援。九月初吴军虽取粮成功，但据投清的吴军兵士说，取得的粮食也只能支持到十一月。在康熙的严督下，清军水陆两面加紧了对岳州的围困，断绝岳州的粮饷。湖广总督预先购买了数千根木头，打桩做牌，拦截上流，御防吴军水兵的出入。岳州城内粮食的来源已绝。十一月份，岳州吴军水师倾巢出动，意在疏通粮道，进攻柳林咀，双方激战不休。另有一支5000吴军从陆上进攻，从高家庙渡口进攻陆石口清兵的营寨，清军奋力阻击。由于清军在湖上频繁地出战，火炮损失颇多。“安运清寇大将军”贝勒察尼

要求增拨江南子母等炮1000门。在高家庙、君山陆地设营，应调荆州水师营总兵张忠及其标下兵赴岳州。清廷一概应允。洞庭湖每年到冬季水量减少、干涸，部分湖殷露出陆地，不能行船。清兵以水陆相接，因湖水干涸，清军的营寨彼此隔绝，兵力又感不足。察民又要求增兵支援，议政王大臣不同意增派兵马，而康熙为了攻取岳州，仍然同意了察尼的要求。指令将岳乐增援永兴的兵马每佐领出2名可撤到岳州，长沙方面的战事稍缓，可发每佐领兵二三人增岳州，江西总督董卫国标下官兵可选调2500人，就进由铜鼓入武昌，赶赴岳州，立营于要地，都归察尼指挥。江西总督董卫国回奏，自己原率标兵5000，再调江西各营的兵马数千增援岳州。康熙嘉许。这次陆续调清兵总计1．8万人，看来康熙是不惜一切代价，把各地的兵马倾注于岳州一地，以求全胜，至此，岳州已集结清兵达10万左右。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吴军援兵救岳，“势甚猖獗”，但因清军水陆封锁严密，“不能飞渡”，于是败回，“而岳逆在城饥饿日甚”。根据随军的官员宜阿昌的报告，清军已截获的吴应期和各处往来的文书，内容却是呼叫救援，运送粮饷。都足以说明岳州城中的粮食已经断绝。从岳州“相继归诚”的吴军将士也证实岳州城中绝粮的悲惨境况。吴军将士继续潜逃投诚清军，到年底，岳州城内吴军的游击刘鹏等文武官员75人接受招抚，投奔了清廷。

吴应期所属的将士大量叛逃，致使岳州吴军的军事力量正在迅速的土崩瓦解。他已感到不能再支撑下去，但也不愿束手就擒，唯一的办法，只有逃跑。康熙十八年正月十八日，天还没亮，已经约降的吴军将士及家属约数千人，分乘乌船10余只，小船30多只，在前去接引的清军将士的引导下，开到高脚庙一带登岸，众多的清兵事先已在岸上站队迎接。同一天归顺的吴军，还有总兵官王度冲、将军陈珀等，各率舟师来降。当日夜晚，只见岳州城中火光四起，“贼众沸腾”。原来吴应期，在下午四、五时率领余部约数万兵马出城，丢弃了岳州城，向东南方向逃遁。清军急忙追赶200多里，因没有携带炊具而还军。正月十九日早，蔡毓荣、桑格等率领清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岳州古城。

岳州这座坚城，在吴军固守下，历时五年，终被清军收复。岳州的收复，虽说是件喜事，但是康熙并不那么高兴。因为他数年来都一直在关注岳州城的收复，而他的将领们却迟迟地不敢进兵，致使这个胜利来得太迟了。他很清楚，为了岳州，他投入了这么多兵力、财力，竟没把城攻下，而是叛军主动的撤离，竟让吴应期率余部逃跑了，不过是得了座吴军“所弃之空城”罢了。为此康熙极为恼火，斥责贝勒察尼失计，竟让吴应期率数万人马，在清军的眼皮底下逃跑了!使这支有生力量没有被歼灭，势必加强了其它战略据点的防御，将给清军下一步的行动造成很大困难。但是岳州的收复，毕竟使清廷得到了一个战略要地，对全局的影响却具有重大的意义。

收复湖南、四川吴三桂死后，吴军的众将公推吴国贵总理军务，其方略是专力保固云贵，但也不能轻易丢弃湖南，还在尽一切力量力图保住湖南。这对保固云贵仍然是一大关键。原望虽好，但却不能左右形势急剧的逆转。自吴三桂一死，吴军军心进一步涣散，愈发不可收拾。吴应期丢弃岳州，湖南的门户调开，时刻待命渡江的荆州清军于康熙十八

年正月二十七日蜂涌渡江，千帆竞发，漫江而来。康熙下令展开总进攻，遂成破竹之势，吴军全线溃退。

吴应期自撤出岳州城后，率残部投向辰州，于此同时胡国柱也撤出长沙。率部退屯展龙关，与吴应期相犄角，企图力守。

吴军一撤出长沙，清军随之进城，清廷收复长沙。康熙指示：“贼失岳州、长沙诸要地，正当惊惶骚动之时，乘机进攻衡州，击灭逆贼，殊为要务!”他命令大将军察尼，发出水师营总后官等率绿旗兵3800、沙船100、快艇80只赶赴长沙。除外速发满州兵，多带船炮，尽快至长沙。他又给广东的尚之信发布进军命令：“乘此各路贼寇涣散之际，平定广西”。他要求尚之信、将军莽依图、舒恕、额楚、傅弘烈、总督金光祖等“勿失事机，速定广西”。下诏给江西省总督董卫国，率领所部兵马速赴大将军岳乐处，协力攻取衡州等地。

驻守荆州的清军一路由署都统多漠克图等率领度江，据守在大江对岸的太平街、虎渡口等处的吴军放弃抵抗，全都逃走。另一路清军由顺承王勒尔锦率领，较第一路清军晚二日，于二十九日渡扛，驻守之始，前队官兵分路追剿枝江、松滋、宜都(都在湖北境内，荆州上游，长江南岸)，还有石门、慈利诸县与澧州的吴军，闻风逃跑，都被清军恢复，固守百里州(松滋附近)，吴军水兵将官洪福率舟师投诚。二月十四日，清将勒尔锦到了澧州，遣派固山贝子准达等率兵进取常德。吴军弃城，在清军还未到之前，就纵火焚烧城中的房舍和船只，然后逃遁。十八日，清军进驻常德城。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先后攻占华容、安乡、湘潭，二月七日收复衡山县，命令前锋统领希福等进攻衡州。守城的吴军闻风丧胆，吴将吴国贵、夏国相等自度难守，弃城而逃。十三日，喇布率领清军进入衡州城。这座曾被吴三桂即位时更名为“定天府”的行在，吴军固守了多年而一朝失去，没来得及逃脱的官员100多投降。清军占据衡州后，马不停蹄地由衡州继续攻占了来阳、祁阳，三月五日，再克宝庆(今邵阳市)。

从正月吴军撤出岳州后，湖南战场的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各地的吴军纷纷弃城不守，闻风就逃，其势如退潮，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自北向南，吴军毫不停歇的向后退却，而清军则马不停蹄地尾随紧紧追赶，几乎是兵不血刃，遭到一处，就占据一处。于是在湖南广阔的战场上，出现了一种战争的奇规景象：清军铁骑如云，玉轴相接，好似狂潮奔腾，疾风骤雨，盖天铺地地席卷而来；而吴军则是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急急如丧家之犬，狂奔逃命。造成这种局面，其根本的原因是吴军失去丁统一指挥，吴军的将帅已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无心抵抗，于是清兵未到，率先逃跑。到了三月里，吴军的大将吴国贵、夏国相、马宝等自衡州弃城出逃，奔永州(零陵)，被清军击败、又逃向新宁，再逃到湖南的西南部、靠近贵州的武冈，才得到了喘息，驻扎下来。清军继取永州，再南下取就永晚(江永)、道州(道县)、江华(永明东南侧)、东安(今东安南)等诸县城。

吴应期、胡国柱、王绪等经长沙一气逃到辰州、安营下寨，依险固守。这时吴军除占有辰州、武冈、新宁等地区外，其余湖南的绝大部分地区都被清军收复。

残留在辰州等地区的吴军余部处境十分狼狈，武器弹药缺乏，粮饷

没有。据清军侦探报告说，逃到辰州的吴军约上万人马，大部分兵士无甲，仅有窝统四五千只，在此之前所备有的大炮、鸟枪、兴隆等炮都丢弃了。“军饷全无，新从云南发来的两船黄金，每名士兵应摊银五两，折合金子才四分几厘。差派城中的文武官员去乡下买粮，只能买到三五十石，每名士兵给粮二斗。他们的粮晌不足，特别是从云贵征来的苗瑶族士兵大为不满。每天晚上总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逃跑。吴国贵、马宝等诸将每天总是愁眉苦脸，叹息不已。军中将士都怨恨吴应期“将岳州大门打开”，致使清军势大难敌，吴军不断败逃。

吴应期等在辰州等诸城镇的驻兵，都结营在辰龙关到辰州之间，各据险要固守，陆续集结各处吴军溃散的兵马，已达1．3万多人。吴应期等决意在这个地方固守，企图阻止清军进入云贵。辰州(沅陵)地接贵州和四川，位于沅江之畔，由陆路和水路可直通贵州。特别是辰龙关“乃通云贵的孔道”，此关一带，森林茂密，山高地险，人行不易，骑兵不能成列。辰龙关是辰州的门户，此关不破，就不能越过辰州。早在三月间，勒尔锦已经率部来到了辰龙关附近，但是看到群山林立，林深路险，不敢进兵，畏缩不前，又加上雨季的到来，便以此为藉口，“急行退还”，因而使吴军有了宽裕的时间从容部署，构筑防御工事，在这个地方稳定了局面。康熙对勒尔锦以及他派遣去攻取辰州的将领十非不满，下诏严历斥责。

到了康熙十八年七月，清兵仍旧没有攻取辰州。大将军简亲王喇布指挥属部，在辰州南的武冈，向据守在武冈的吴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吴军骁将吴国贵亲帅残部2万多人与清军抗争。喇布令穆占及其所部于八月一日先攻取新宁县，然后与大将军安亲王岳乐部合兵攻击武冈、枫木岭等处。他们知道吴国贵是一劲敌，不敢轻视，特集结优势的兵力；岳乐率每佐领各11人、绿旗兵1方人，约计1．5万人，简亲王喇布所部也不下2万人，总计近4万兵马。双方在枫木岭隘口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吴军尚有战斗力，没能被击退，而是迎战向前，拼力厮杀。新降清的林兴珠和提督赵国祚等将领深知吴军的内情，他们亲率清兵奋力攻击，吴军终被击败。在枪炮相互轰击中，吴军统帅吴国贵误中冷炮，当即倒地身亡。吴军见主帅已死，无心恋战，弃武冈而逃。清军固山贝子“定远平寇将军”章泰(岳乐已调回京师，其职务由章泰接任)等率部追赶到木瓜桥，再次击败吴军。于是，武冈、枫木岭等地随之而被清军攻占。

接着武冈战役后，辰州的战斗也开始了，从辰龙关到辰州，再到辰溪(在辰州南)，吴军沿着沅江分水陆两路固守。胡国柱原守辰州，不久又改调到辰溪驻守，吴应期仍驻守在辰州的来窑铺，其余的吴军将官杨有录、周祯、杨宝荫、祖述舜等各率所部兵马占据要地。为了迷惑清军，他们每天都变动驻守地，“迁移不定”。吴军逃亡情况严重，有的营寨的士兵都几乎逃光了。

清军占领了武冈，切断了辰龙关的后路，吴军非常惊慌。

康熙十九年(1680年)初，大将军察尼挥军向辰州发起了进攻。他指挥清兵从间道突袭辰龙关，关破为清军占有，清兵于三月十三日到了辰州城下，吴军争先弃城逃窜。知府傅祖录献关投诚，守辰州地区的吴军将帅都放下武器，各帅所部归降。计有：

“援剿右将军”杨宝荫标下将官28员，士兵1531人；

“定北将军”杨有录标下副将许龙、石恩2员，士兵1961人；

“亲军后将军”祖述舜标下5营总兵官肖伏成、尹宗仔、何可量、库大有、柳应春等5员、“援剿总兵官”候登甲、“戎旗”副将石虎等所部士兵计2146人，还有游击、守备官舒明申等44员、千总和把总计17人；

“水师在将军”周珍标下“戎旗右营”参将陈长、中营领兵官都司陈贵、左营游击郑防、右营游击等“食俸领兵官”39人、“食全俸随征官”96员、侯被文职兵备道周其泽等8人，总计军官143员、士兵3600人、家属1254人；

水师“右将军”标下中副将吕贵原带随行政都司、守备陈灿等3员、士兵627人；

辰州总兵张敬先标下参将郭海龙带兵950人；辰州水师副将刘顺等带兵400名。

以上，各级军官294员，士兵1．1201万人。辰州不战而降，吴军损失之重，于此可见一斑。

清军得了辰州后，大军继续南下，攻破了沅州(芷江)，吴应期、胡国柱等败走贵阳。“枫木岭、辰尤关一经开辟，则滇黔势同破竹。”道路已经打通，清军就势不可挡地直取云贵了。

湖南全境收复，吴军的余部都已经逃到云贵去了，于是清军下一步的战略目标，立即就指向云南、贵州。

在扫荡湖南残余的吴军，追逐吴应期、胡国柱同时，康熙料到四川的叛军必然震惊，因而使不失时机的对四川的叛军发动了总攻击。

对四川总攻是从兴安、汉中开始的。康熙十八年(1679年)六月二十五日，康熙诏令清军大将速取兴安，平定四川。八月图海分兵四路：图海与将军佛尼勒由兴安出击，总兵官陈福亮为后援，驻守旧县关等地；将军必力克图、提督孙思克由略阳进攻，西宁总兵官朱衣客为后援，驻守西河等处；将军王进宝、汉中总兵官费雅达等由栈道进兵，延绥总兵官高孟为后援、驻守宝鸡；宁夏提督赵良栋等由徽州经巴都山出击。图海请定于九月四日四路兵马齐进，后改为十月初二日，先取汉中，康熙命令将军噶尔汉等自郧阳进取兴安。

张勇、王进宝、赵良栋这三员汉将，已威镇西北地区，他们所部的绿旗兵都是精锐。因而康熙就把最难征剿的四川叛军交给他们去攻取，且让其打头阵，而满兵随其后前进。康熙给张勇的敕书中说得很明白：“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人剿平，彼时定有满兵助战哉！”他所使用的政策还是入关前清太宗制定的“以汉攻汉”的策略、让英勇善战的陕西汉将及其所部去平定四川，而满兵则是“助战”。

早在攻取武冈、辰州和进剿四川之前，康熙就已经给吴三桂的核心人物王屏藩、马宝、夏国相、胡国柱、吴应期、郭壮图等人各写了招抚谕旨，强调：背恩反叛之罪在吴三桂，你们都是“附和之人”，朝廷愿意赦免和保全你们，同已降清的臭将一样“论功录用”，条件是必须归顺，接受清朝的名号。但康熙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王屏藩等人非同其他人可比，他们都是和吴三桂结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盟，在反对清廷的根本立场上完全一致，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即使吴三桂已死，他们始终要坚持到底，直到他们彻底失败而罢休!他们既不投降，那么满廷只有把他们全部灭除掉。

在大将军图海的统帅下，清兵冒着严寒，四路齐发，王屏藩拥兵数万于兴安、汉中等地，实力较为雄厚，叛军吴之茂盘踞在松藩地区。十月下旬，王进宝率部攻克武关，二十七日追逐叛军，直到汉中。王屏藩引兵从青石关撤往广元。清军收复了汉中府。赵良栋率部收复了徽州，又在巴都山击溃了叛军，收复了略阳。康熙催令湖广提督徐治都率水师溯江而上，直取重庆，又增派总督杨茂勋与徐部会师，同力进剿。不久，清兵统帅图海奏报，兴安已被清军收复，吴军总兵王永世率部献关投降。

兴安、汉中收复后，康熙即刻发出命令，各路兵马速进入四川围剿，特授提督赵良栋为“勇略将军”，以重事权。

康熙十九年正月初，赵良栋率兵马1.1万人，直逼成都，而王进宝部已于年前十二月分兵三路，进逼保宁。两位汉将一路势如破竹，迅速前进。赵良栋的兵马八日到达绵竹，叛军“劲武将军”汪文元献城投降。十一日到了成都郊区，叛军巡抚张文德率领文武诸官200多人迎降，清军进入城内。王进宝军却一路遇到了叛军的顽强抵抗。卫屏藩、吴之茂、陈君极等将领都坐镇保宁。王进宝兵马到了距保宁城20里的地方，占据孔道安下营寨。正月十三日，王屏藩出动兵马2万多人向清军进攻。王进宝分兵迎战，大败叛军，一直追到锦屏山，攻破了叛军的营寨4座。叛军追到宝桥，王进宝率兵再次发起进攻，夺桥斩关，一涌而进入城中。王屏藩和他的将军陈君极走投无路，自缢身亡。其余的叛军将官吴之茂等3人及总兵郭天春等17名将官被清兵活捉。康熙命把王屏藩、陈君极的头颅割下，并同被俘虏的叛将吴之茂、韩晋卿、张起龙等首要人物立即解送北京。

三月，这一行囚犯押解到了北京，康熙立即作了处理：将吴之茂、韩晋卿立即凌迟处死，割下首级，与王屏藩、陈君极的首级一起悬挂城门示众。张起龙原为吴三桂旗下属员，赦免一死，命他去云贵招抚，以赎其死罪。

再说四川的战事，继攻克保宁城之后，王进宝率部于同年正月十八日抵达顺庆(南充)，叛军知府彭天寿率部出城迎降。于是，蓬州、合州、广安州、岳池、西充、邻水、营山、遂宁、渠县、蓬溪、仪陇诸州县相继而定。

湖广提督张治都的兵马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康熙十九年二月一日，徐部兵马到了夔州，守将刘之卫，总后瞿洪升等献关投诚。十三日，据守云阳的谭洪以及、“左将军”谭天秘率部属到徐治都军营前请降。十六日，另一支清军到了重庆。叛军没抵抗，守城的文武大员出城迎降，接着达州、太平、南江、东乡、安岳、新宁等州县，的叛军也随之降清。叛军将领杨来嘉、彭时亨等人各派员到清兵营寨缴印投诚。

四川古称天险之国。山险谷深，道路险阻，进兵不易，出兵亦难。因此康熙在先置四川的叛军而不问，首先解决陕西和江西、福建的东西两翼，然后再倾全力而突击湖南主战场，待湖南全境即将收复，就即命将率师入川。乘清军大胜，吴军节节败退的有利形势，一举收复了兴安、汉中，再深入四川内境，除个别的地方遇到抵抗外，其余所到之地皆降。于是四川全境，重新回到了清廷的手中，这给清军兵进云贵，提供了一大方便条件。

清军乘胜入云贵云贵之战，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月，清军大将赵良栋奏请以湖广、广西、四川满汉大军分三路进攻云贵，约期八月底，各路兵马并进，直捣云南。清廷接受了他的建议，立即按此议命官选将，调遣军队。

夺取云贵，是清廷平叛的也是最后的关键性的一战，此次战役势必会遭到吴世藩集团的拼命抵抗，如仍然依靠皇室贵胄来统帅清军，很难完成这一战略任务。鉴于以住一些将帅征战不力，为夺取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对原将帅进行调整，重新选择新的将帅，因此康熙经慎重挑选后，任命担当三路大军统帅的是：

第一路即中路，大军统帅是“定远平寇大将军”贝子章泰。章泰曾随大将军贝勒尚善，参赞军务，以敢战善计谋屡立战功，康熙十八年十一月，清廷命安亲王岳乐解印回京，即以章泰接替岳乐，命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由他接任岳乐的职务。其次是湖广总督蔡毓荣，于康熙十八年十二月被任命为“绥远将军”，总辖常德、武冈等地所有各省调拔的官兵及湖广全省绿旗兵马。总督董卫国、固有德、提督桑额、赵赖、周卜世，俱听其节制。湖南现有的文武百官听其遴选，携赴军前听用。有功者，可“具疏奏闻”，论功行尝；如有临阵退缩、运粮违误者，副将、知府以下各官“即以军法从事”，副将以上各官，“可指名飞章参频”。此路大军都到湖南的沅州集结，由镇远一路，取贵州。总计兵数，“每佐领20人有奇”，再加上蔡毓荣和董卫国等总督及提督所部，兵数“甚多”。

第二路统帅为赖塔。吴三桂叛变时，他以都统被援为“平南将军”，先到浙江平叛，后又到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驻防，屡次立下战功，为清廷所赏识，康熙十九年(1680年)九月被援为“征南大将军”，统领广西满汉大军和选取驻广州清军的精锐，原属平南王藩下的部分官兵，由广南宁出师，速取云南。

第三路统帅为“勇略将军”赵良栋。他以“勇略茂著，操行廉洁”，深得清廷赏识，康熙十九年正月末，被授予云贵总督仍兼将军，统领四川和陕西满汉及绿旗兵，由四川分两路进兵，先取遵义，后取贵州。

三路大军总计40多万，清廷动用如此之多兵力，倾注于云南一隅之地，其意必欲踏平吴世瑶固守下的昆明，云南是吴氏政权的根本，其兵力多于贵州。但由于多年的征战，加之最后的大溃败，伤亡、逃走的，还有被招抚投清的，为数颇多，致使吴军兵员损失相当严重。从湖南撤回的兵员寥寥无几，而一直驻守在云南的吴军，不断增援到前线，不足之数，由当地的壮丁补充。到全线溃退时，守云南的吴军进一步的减少。情廷的40多方兵力对吴士踊的寡兵，真是以石击卵，岂能不破吴士瑶的最后顽抗!

经过充分准备，并制定了攻取云贵的基本战略后，康熙十九年九月二日，康熙下达命令，各路大军“如期进剿”。湖南一路的统帅大将军章泰上谕报告，他所属兵马已完成了在沅州的集结，决定由蔡毓荣等统帅绿旗兵，兵分三路准备在九月十二日从沅州起兵，他自己所率满汉士兵于十八日随后启程，同取贵州。”清廷批准了他的进兵计划，同时通知广西、四川各清军将官、总督等出征的将军，“俱令如期速行剿贼”。

正当清军“士奋马腾”、将要出师时，突然从四川传来发生叛乱的消息。原来，郭壮图等得知清军即将进剿时，便挟吴世瑶进屯贵州，以拒

清廷的大军，并遣派吴军的大将胡国柱、马宝，夏国相、高启隆、王会等人，突袭四川，目的是牵制清军，分散清军的兵力，使之不能进兵云贵。四川的清军猛不及防，连失泸州、全州、怀仁、建昌、永宁等县城。已经投降清廷的叛将谭洪、彭时亨等乘机再次叛变，夔州府的百姓也随之而叛，谭洪一时得逞，率众到巫山，固守万县。

四川的形势出现反复，使清廷感到吃惊，担心四川的叛军若与贵阳的吴军“合势”，一旦“猖獗”难以制服，势必就推迟了清军进兵云贵的战略决策，清廷对此不敢轻视，速令四川的官兵进征，又急忙从进剿云贵的大军中抽调部分兵力扑灭叛乱。敕令徐治都等将官会同将军葛尔汉等部“连赴夔州”，执行“剿贼”任务，另遣将军王进宝等住镇“要地”保宁地区，兼守汉中诸处。康熙起初以为谭洪等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不日歼灭。”但是实际情况却较为严重。谭洪、彭时亨在攻占了永宁各处后，又攻陷了涪州，两军会合一处，继而进到保宁附近地区，切断四川的饷道。清廷又急忙派遣陕西总督哈占速赴保宁。哈占以兵力不足，再请援军。康熙速即指令护军统领佟佳等“束往应援”，甘肃巡抚、提都各臣分兵固守略阳、阳平各处。

四川的再度叛乱，打乱了清军从四川进兵云贵的战略部署，原定赵良栋统帅出征云贵，也“不能如期进定云南”，专力于平息谭洪等人的叛乱。但是四川的复叛并没有影响到其它两路军出征。章泰、蔡毓荣、赖塔等大将军，仍按原定日期属时出师。

康熙十九年九月十二日，蔡毓荣部自沅州率先出兵。沅州在地接贵州东部的湖南境内，有一河，名沅水，可从沅州直通贵州镇远。清兵借助水陆之便，迅速的进入贵州境内，在同后继兵部队将军章泰部会合后，向镇远进发。守城的吴军将领张足发、杨应选等弃城逃走。清军没费一矢一箭，于十月十二日收复了镇远府城。清军派出轻骑兵向西追赶，随之恢复偏桥(镇远西)等地。

康熙自京师发出指令，以700里加急，昼夜飞驰到镇远。他写道：“镇远至贵阳，道平坦，料贼不守贵阻，必据鸡公背、铁索桥诸处。”他要求各将帅、大臣等“务同心协力，以济大事，速取贵阳，即分兵取遵义。”他特别提醒诸将：“遵义乃是叛军的后路，突入四川的叛军“势必退归。”因而，在四川的各军将领要“乘势长驱，荡平疆围”。在这道指令中，康熙还要求赖塔等部统领广西的满汉大军“速进云南”。

章泰与蔡毓荣、董卫国、林兴珠等各将官按照朝廷指授的进军策略，督率满汉大军直取贵阳。清军从镇远起兵，先后攻占了清平等城镇，于十月十七日大破吴将韩天福部，夺取了平越州，同时还收复了平越州面的新添、龙里两镇。贵阳城近在咫尺。章泰、蔡毓荣不给吴军以喘息的时间，挥军奋进，于二十一日直抵贵阳城下。

在清军即将出兵贵阳时，吴世璠急招夏国相、高启隆、王会等速从四川撤军应援贵阳，令马宝、胡国柱等继续在四川作战。援兵尚未到达，清军已进至贵阳郊区。吴世璠惊慌失措，急忙与其叔父吴应期、将领刘国炳等率众乘夜晚逃到昆明去了。于是贵州省贵阳轻而易举被清军占据。吴世瑶的侍郎郭昌同文武官员202人投降了清军，经章泰的招降，原任清廷提督李本琛率大小文武百官上缴伪印扎归诚。

章泰继续挥军奋进，于十一月初，先后攻取了安顺、都匀、石阡、

思南等城，平远(织金)知府郑开枢等献城归降。十日，清军抵达永宁州，击败了吴军，收复了永宁，突至鸡公背。距守的吴军1．3万多人，焚烧盘江上的铁索桥，慌忙逃走。盘江铁索桥是贵州通往云南的咽喉，清军夺据，就可以长驱无阻，直抵昆明城下，普安土司龙天佑、永宁土司沙起龙、礼廷试等迎请清军投诚，并表示愿架设浮桥，帮助清军顺利地渡过盘江。

贵州省境内的叛军基本平定。章泰、蔡毓荣等在贵阳“秣马已经月余”，正在等候圣旨进兵的命令，忽闻平远府又被吴攻占。原来是吴世蟠以高起隆为大将军，会同夏国相、王会、王永清、张足法等，共2万兵马，一举攻陷丁平远府。清军大将穆古统兵反攻，于康熙二十年正月二十二日把吴军击败，高起隆败军逃走，王会等率部下投降了清军。平远府再次被收复。康熙下了一道严令，即速取云南，于是大军浩浩荡荡直奔昆明。

吴世璠逃回云南后，吴氏集团已处于崩溃之中。康熙已正确的估计到“目前逆贼因迫已极，旦夕危亡，若不乘机剪除，恢定滇土，更需何日!”他再次命令章泰尽速进兵，不得推诿延迟。章泰在收复贵州后，先是借白“秣马”，逗留不进；后来又以叛军势大推托，按兵不动。于是康熙下了一道严令：如仍“逼留”，不疾速兵，将以重罪论处。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章泰不得不起兵前进。

当章泰恢复贵州的时候，康熙就下令，赖塔一路广西大军速由南宁进兵云南。康熙十九年十月下旬，赖塔奉命，统领大军从南宁出发，经田州(田阳)、泗城(凌云)、抵达西隆州(隆林各族自治县)，于十一月十五日进入云南边境。吴军将领何继祖等聚结兵马1万多人，在离安笼所30里坚守石门坎隘口。此地高耸云天，羊肠小径，易守难攻。赖塔派遣都统贝勒希福、成奇等率前队清军先进攻，他和金光祖等诸将兵分二队，做为后继。康熙二十年正月一日，清军乘势攻击，吴军被击溃，清军夺取了石门坎隘口，收复了安笼所城，吴军的总兵陈义魁等率部降清。

何继祖从石门坎兵败，逃到了新城所，会合吴军将领詹养等，又聚结了兵马2万多人，固守黄草坝，使用大象迎战。二月二日，赖塔督率满汉清兵进攻黄草坝，从早晨五、六时开战，双方一直激战到午后二、三时，吴军才被击败，夺取吴军营寨22座，俘虏了詹养、王有功和吴士兵3000多人。赖塔统兵乘胜前进，自黄草坝直奔曲靖府，吴军总兵尹士元，道元刘世忠率将吏没作任何抵抗，而归顺了清廷。清军继续收复交水城(云南沾益北)切断吴军的中路，吴将线败走。

线是在北盘江江西坡(今贵州晴隆与普安之间)被章泰部击败后而逃到交水城的。江西坡战斗打得十分惨烈，章泰统军于二月初五日到了安南卫，八日进至江西坡。线率领吴军1万多人拒战。江西坡重山峻岭，曲折盘旋，绕山上去，尤如缧纹。吴军据此险要，使用大象布阵。双方还没有交锋，清兵及其战马就被大象吓惊，回头奔溃，蔡毓荣见势急派正红旗兵督战，却也制止不了清军的奔溃。吴军驱赶象群趁势而进，而清军的正红旗兵也返身奔逃。清军疾走两天二夜，方才停止退却。清军的死尸堆积如山，大约死在吴军的手下的，有十分之二、三；互相践踏，被大象踩死，自相争着逃命而彼此格杀致死的，约占十分之六、七。这次战斗，清兵伤亡惨重，是平叛战争以来少见的。

过了二天，章泰令总兵白进功等再次发动进攻，到达砂子哨，吴军又驱赶大象下山拒战；清兵分成三队继进，战斗从中午开始，激战到傍晚，清军奋力争战，吴军最终被清军击败，线等吴军将士，乘夜逃走。章泰派都统龚图等随后追击，直赶到腊茄坡，双方再战，吴军又被击败，于是线才率领残部退到交水水城固守，结果又被赖塔战败。章泰击败线，清军收得新城所、普安州。同时，穆占也收复了黔西、大岂各州府，活捉吴军的巡抚张维坚，斩首军前。

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十五日，章泰率军到交水城，遂与赖塔所率领的广西军会合。

章泰、蔡毓荣、桑额等所统领的湖广大军和赖塔所率领广西大军，各自突破吴军的种种阻击，终于实现丁战略的大会师，这是清军的一个重大胜利。两军自交水城分路并进，于二月十九日抵至昆明郊区40里外，在归化寺附近扎营。此寺西北的金马山、正北的鹦鹉山、寺的左右为石虎岗，都成了清兵的壁垒，军容之盛，令人望之不寒而慄。

二十一日，郭壮图派遣吴将胡国柄、刘起龙、黄明统领马步兵1万多人出城30里迎战，吴军驱赶大象5只上阵。章泰的兵马排列于左边，赖塔的兵马排列在右边，从早晨至中午，两军在阵前激战不休，由于清兵的力博，最后吴兵大败，清军一直追赶到昆明城下，阵斩吴将胡国柄、刘起龙等首领9员，俘虏吴军士兵600多人。景、赖两军一直推进到昆明城下。吴世璠拒不归降，坚闭城门，等待在四川的吴军大将马宝、夏国相、胡国柱等人的应援。赖塔和章泰顾虑到吴世璠闭门坚守，清军攻城必遭重大的伤亡，于是便决定掘壕围城。清军选取靠近昆明城的南坝、萨石街、走马街、双塔寺、得胜桥、重关等地，“扰吭立营”，连扎营寨数10里。章泰还广布檄文和清廷的旨意，派遣官员招降吴军的将士，在清廷招抚檄文感召下，吴军大理府的“定远大将军”、“东平公”张国柱、姚安府的“亲军车骑后将军”刘汉章、临安总兵徐衷明、范应泰、李玉彬等，以及永昌等各镇的吴将纷纷投诚。接着，还有吴将韩天福率官兵以武定府降清。从四川逃回来的“亲军铁骑左将军”杨洪德、将军赵玉、高启隆、杨开运、刘魁等一大批吴军的将官各率所部官员士兵先后到清营归降。

康熙得知在四川的吴将马宝等将回军云南援救的消息，迅速发出指示。严令将军介尼勒、赵良栋等各统官兵“速行蹑击”，使之不得至云南，就地全歼，如不遵此令，有失军机，将以贻误军情严处。

不出康熙所料，马宝已率部撤军，胡国柱也弃了叙州城，企图回军云南。驻守在永宁的吴军将官宁国辅感到孤军难以支持，随向清军乞降。清兵三月十五日进入了永宁城。

到了四月，四川的叛军基本上消灭，谭洪病死，余部已溃散，不足为虑。康熙立即下令，调将军葛尔汉和总督哈占、将军赵良栋率部速进云南。赵良栋接令后，亲率绿旗兵自雅州起兵，哈占也于五月十一日发兵。

五月里，吴军的大将马宝同将军巴养元等从遵义奔回了云南，携带妻子驻守楚雄。清将章泰派遣都统希福率兵追剿，把马宝等吴军追赶到乌木山，马宝全军覆没，仅以身免，逃到姚安山中，收集溃卒不足百人。此时马宝等感到已无处可逃，便会同巴养元于七月五日到姚安府希

福军营缴印投降。吴将随之投降的还有将军赵国祚、郑旺、李继业、总兵良应基等。

吴氏集团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吴国柱及其属将王绪等，从姚安逃散后，遁入鹤庆(属云南)、江一带的山中，清将赵良栋、哈占奉旨搜拿。都统希福、提督率额统兵追剿。吴国柱一行再次逃到云南龙州(今云南云龙南)青里尼，清军紧迫不舍。胡国柱等自料无法逃脱，便于属将王绪、李匡自缢身亡。余部在吴将王公良率领下到清军营前投诚。

吴三桂的女婿夏国相及其部众，被清军击溃后，带着少数的随从奔入广南(广西境内)，躲避清军的追剿。清兵大将军章泰、赖塔檄令士官侬朋和防守临安总兵官李国梁统兵追击。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初，直抵西板桥，将夏国相和他随从将官包围，堵住逃路。夏国相见无路可逃，便带领将军王永清，杨松魁等及属下的官兵到清军营前，缴印投诚。

吴世璠与郭壮图期待着马宝、夏国相等人的外援都化为泡影，但是他不愿投降，仍在死守昆明城。清军已经围城有半年之多，仍没有破城的希望。由于清兵不服水土，生病的与日俱增，病死的也日益增多。粮饷供给不上，已经发生了饥荒，清军的日子也很艰难。城中的粮食也接济不上，生活也一天天的困难。双方继续缠持着。

康熙二十三年(1621年)九月十六日，清廷向围城的将士又下了一道严渝，催促他们速取昆明：“云南围困已久，若不速为克取，未免劳敝兵民，靡费粮饷。今逆贼外援已绝，株守孤城，穷迫已极”，如果继续“迁延时日，待贼粮尽，恐粮饷渐至于虚糜，兵丁亦苦于疾病”。他要求章泰、赖塔等“速行攻取云南省城”。他特别提到，清军中有不少是投诚的吴军吏士卒，应令他们攻城建功，以赎前罪。

昆明城久攻不破，固然是吴氏集团拼命死守，但主要原因是清军远离昆明城40里安营扎塞，一面临昆明湖，一面倚山，围困不严。特别是昆明城所依赖的水上运输昆明湖南北近百里，并未封锁，任其船只往来，无人查问。原来驻守在昆明一带的安宁、晋宁、昆阳、呈贡回州县的清军大部分都是吴军的旧部，他们不能眼看着昆明城内的亲属和部属同僚挨饿，所以没有严加封锁，随便让城内船只自由往来，转运粮食。城中有粮食供应，便加强了抵御到底的决心。当清军统帅部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即撤换了驻守昆明一带的吴军旧部，改派八旗兵驻守，从而切断了城内的粮食来源。

九月，赵良栋平定了四川的叛乱后，率领宁夏的兵马渡过金沙江，途经武定、绵竹抵达昆明，与章泰、赖塔两路士军会师。赵良栋贯彻康熙的作战方针，力主切断昆明水路，从速进攻昆明。在此之前，虽已加强了对昆明水路的封锁，但仍没有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致使城内的船只仍不时出入。经赵良栋的提议后，在昆明池内置“横筏施楼橹”大船，设置水军，来往巡逻，这才彻底切断了昆明与外界的通路。到十月，昆明城中粮食断绝，“人相食”。在这种情况下，赵良栋坚持速攻，他说：“我等大军连营四布，不就近速战，等到日久，米粮不济，满兵无妨，绿旗兵何立存立?”满洲兵与绿旗兵待遇不平等，凡粮食都先满足满洲兵的需要，而绿旗兵还经常受他们的凌虐，为他们做杂役，备尝苦景。所以围困越久，绿旗兵的生活就越困苦。但是章泰他们却不顾绿旗兵的死活，只是顾全满洲兵的利益，不同意进攻。他说：“皇上豢养的满洲兵，岂可

轻进，委之于敌人?你的军队从远道而来，也应该休养一段时间，怎能让他们再受伤损！”从表面上看，章泰等倒是兼顾了满洲兵和绿旗兵的利益，但是实际上是章泰等人害怕进攻遭到损失。赵良栋见他按兵不动，就率自己所部兵马发动进攻，力战夺取了土桥、新桥、至得胜桥，直抵昆明城下。他的部众远路跋涉，没有休息就投入战斗，确实疲惫不堪。章泰又说，“你部已过度劳累；应先撤回，可叫总督蔡毓荣率兵踞守。”赵良栋拒绝说：“我兵死战所得之地，怎能交给他人看守！”章泰无法，于十月八日，只得下令各军进兵，直至城下，围困数重。

清兵进抵昆明城下，吴世瑶被迫派遣兵马，出城迎战，两军在归化寺附近激战多时，吴军败北，赖塔率部进抵银锭山，蔡毓荣攻占重重关与太平桥，赵良栋、穆占、巡抚王继文夺取玉皇阁。三路清军分拔后，开始连续日夜猛攻，吴世瑶与部郭壮图惊失措，眼看昆明城即将被攻破，却计无所出，一筹莫展。

清兵在昆明城下与城上的吴军相视，已进眼前。章泰等统帅在加紧攻城的同时，又展开了政治攻势，向城内射出一封封招降书，进一步动摇了吴兵的军心。城中粮米已尽，又面临清军日夜的攻击，无处可逃，昆城旦夕可破，却感到没有生路。城内的吴军包括将官也无心守城，打算早日投降，不失为死里求生。十月二十二日，吴将余从龙、吴成鳌悄悄出城投降，并将城中的虚实如数报告了清军的统帅。章泰等人知城内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亲自督战，各路大军猛攻，四面逼城，又秘密的遣派余从龙进城招抚。

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吴将线，吴国柱、吴世吉、原任都督何进忠林、天擎等人密谋，发劝兵变，欲逮扑吴世璠、郭壮图献给清军。吴世璠、郭壮图闻讯自杀身亡。线等人擒住了吴三桂的大学士光琛及其儿子方学潜、侄子方学范首要分子，接管了全城。

十月二十九日，线等人打开昆明城门，向清军投诚。于是云贵全定。

由撤藩而引起的一场战争，使撤藩不能进行，迫使清廷宣布停撤。经过8年的血战，才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吴藩在战争中被武力彻底消灭，耿尚两藩也是通过武力，被强行撤去。被清廷视为隐患和威胁的三藩，最终被以武力铲除，国家重归一统，由大乱走向大治，大清帝国的江山从此得到巩固。

吴三桂掀起的一场政治与军事的大乱，在激烈地争斗持续了8年之后，终于平息下来。吴三桂起兵叛清的原因，大体上可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主观方面，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原明朝一批将吏，摇身一变成为新朝权贵的元勋。他们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他们认为从清朝新主子那里得到富贵、权力、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受顾于清廷，当然的应获得合理的报酬，而一旦停止了这种报酬，象清廷对吴三桂等人那样，他们就会翻脸不认人，不惜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为保护政治上和物质上的特殊利益，是吴三桂起兵主观原因。

其次是客观方面，吴三桂起兵，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是推动他前进的基本动力。他在云南振臂一呼，全国响应，东西南北“在在鼎沸”。既然他反叛朝廷，为何如此得人心?这是因刚刚建立起全国统治的清廷并未得到全国的民心，广大汉族各阶层人民不喜欢这个朝廷，他们

宁愿接受本民族的强人来统治，而不愿接受外来民族的发号施令。清兵入关南下屠杀成千上万的汉人，人们还记忆犹新，那种亡国的遗恨不会在短期内消失。新来的统治者，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光明，相反，清廷的封疆大吏、地方官府想法鱼肉百姓，新仇旧恨，激起人们怒火中烧，他们响应吴三桂起兵，正是这种不满和愤恨的总爆发。

吴三桂以失败告终，所以失败首先是：无论是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和其有关联人，无一例外地都是寄生的腐败的集团，他们仍保持着明时的某些腐败的习性，力图维护过去的旧制度，保持住他们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权力，所以他们掀起的政治动乱，最终不可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广大人民群众中途抛弃他们，这是原因的根本所在。其次是吴三桂，缺乏政略才智，他没能乘起兵时民心士气所形成汹涌的气势，以及由此气势所造成的有利的形势，却徘徊于湘赣之间，失去了时机和优越的气势，人心由振奋而观望，由观望而踟蹰，由踟蹰而丧气，致使陕西的王辅臣、福建的耿精忠受挫降清，清军得以集中全力对付湖南的吴军。形势的急转，导致吴三桂最后灭亡。

再者，还在于政治上的分散，没形成一个核心力量。吴三桂和耿精忠、孙延龄、王辅臣、吴之茂等人，不过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既无集中统一的指挥，统一的步骤，彼此不受约束，各立旗号，孤军作战。又没有一个统一行动纲领和明确的斗争目标。他们都各顾各自的利益，形成不了一个有核心的统一支配的政治力量。

但是战争具有一种无穷的伟力，它能使那些用行政命令而无法消除的陈规旧迹一扫而尽。吴三桂发动的战争，以巨大的力量冲击清廷统治者强加给人民的不合时宜的枷锁，并打破了它的统一，使之在新的基础上再统一，调整和修改了以往不适合时代要求的政策。这些都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清廷倾全国的人力物力来进行这场战争，最后消灭吴三桂等各个政治和军事政权，在全国大地上，彻底铲除了明末以来所形成的腐败封建官僚兼地主的军阀集团，拔掉了植根在封建制度上的一个肿瘤，这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可是，这场历时8年的战争，给人们招致生命和财产的巨大牺牲和损失，是无法补偿的，若从长远看，从社会的发展来看，付出某种代价，以损失的牺牲换来社会的进步，也是值得的。

第五章 康雍乾三朝英明决策 青藏川边陲叛乱平息

第一节 雅克萨之战维护主权

两次雅克萨反击战十七世纪中叶，沙俄的军队侵占了我国东北边境，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威胁了中国人民的安全和清王朝的统治，而且黑龙江流域是满族的故乡，是清朝的发祥地，清朝自然不能容忍俄军侵占这里。虽经过清政府一再提出抗议和警告，沙俄帝国主义多不予理睬。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盘据雅克萨的沙俄侵略军乘船窜出妄图到牛满地区掠夺，被清军兵船截获，俘虏30余人，其余四散逃走，中途又被达斡尔族击杀15人，各兄弟民族也积极投入战斗，击杀俄侵略军甚多。当年底，黑龙江中游地区基本上已没有俄侵略军的踪迹。但是沙俄侵略据战雅克萨仍为沙俄军所盘据。

满清政府对俄奉行的政策是军事斗争、外交谈判和充实边防三者并举。清政府在和俄国长期交涉的过程中逐渐地懂得：没有强大的武装，不建立巩固的边防，不经过激烈的战争，不可能劝说沙俄侵略军放弃侵略，撤出中国的领土。同时清政府也懂得：中俄两国都是封建大国，不可能用军事力量彼此压服，只有通过和平谈判商量两国都可以接受的边界线，才能有边疆上的安定，才能保持长期的和平。所以军事斗争的结果还是要举行谈判，用兵的目的是为了自卫，为了求得公正的和平。正象一个美国的历史学家所说，“康熙不想征服俄国，而是要向俄国表明，自己有力量和俄国进行谈判解决”。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之后，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东北，积极作武装驱逐侵略者的准备。他总结我国军民30多年来和俄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做了细致的准备工作。同年四月康熙到盛京谒陵后，由抚顺、兴京、哈达城，出柳条边，五月到船厂，船行于松花江上，亲自视察边防情况。九月康熙又派副都统郎谈、公彭春率领几百人，以捕鹿为名，到雅克萨附近侦察地理形势和水陆交通情况。1683年1月郎谈等人回到北京向康熙报告，“攻取罗刹甚易，发兵3000足矣”，并建议立即行动。康熙没有同意这种单纯从军事上考虑的意见，认为必须作更充分的准备，先在黑龙江(即瑷珲)和呼玛尔两地建城驻兵，贮存粮食，修造船只，筹划屯田，开辟驿路，以求战而能胜，胜而能守。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夏天，第一批乌喇宁古塔官兵1000人在副都统萨布素率领下到达瑷珲。1684年秋，又有乌喇宁古塔官兵及增派的达斡尔官兵1000人携带家属到黑龙江屯田驻守。这两批清兵共有2000人，是守卫边境，对俄侵略军作战的主力。1683年冬，为了协同作战，又从北京派军队五六百人开往黑龙江。1685年初，为了对付俄国的火枪，又调安插在山东、山西、河南的福建藤牌兵420人到黑龙江。这两批军队共1000人，参加战斗后即撤回原地。

清军到达瑷珲，即在黑龙江东岸古城的废墟上建立城堡，城名墨龙

江，设将军驻守，萨布素任第一任黑龙江将军，又在当地屯田，“康熙二十四年，分盛京官兵至黑龙江垦地1500余垧”，并派人教导不习惯农业的达斡尔、索伦族人，得到了“课耕有法，和稼大收”的好成效。为了保证驻守在黑龙江的清军的粮食供应，还从科尔沁十旗、锡伯、乌喇官屯征集粮食1.2万石，备三年的需要，又派人到索伦族人居住地区购买牛、羊牲畜，以供驻军之用。

要向雅克萨进军，需要大批战船和运输船。清政府积极地准备木料，征调大批工匠，在吉林建设船厂，大规模造船，特派户部尚书伊桑阿监督，造成各种类型的船只，又征调士兵、奴仆和流放的罪犯充当水手。并从盛京(沈阳)到黑龙江(瑷珲)之间组织分段运输，这条运输线路长达5000里，经辽河、松花江、黑龙江，设防兵、招夫役、浚河道、设粮仓，并派人在各段实地勘察道路的远近和河水的深浅，确定要造船只的大小和运载量。还在通州到瀛台之间，装来行船，作了试验性的航行。此外又从乌喇古塔到瑷珲开辟了1340里的新驿站，中途设19个驿站，以传递公文、军事情报等。

清军进驻黑龙江，首先着手扫除俄侵略军在黑龙江中下游设置的侵略据点。1683年7月，萨布素部下的索伦族军官博克率领，的前锋部队，进至精奇里江口，遇到了从雅克萨窜来的66名俄国侵略军，这批侵略军由梅利尼克率领，准备袭击和扰乱黑龙江下游地区。清军在当地人民的协助下，包围了俄国的侵略军，除少数人跳水逃命外，梅利尼克率大部人交械投降。驻在多伦禅和西里姆宾斯克据点中的沙俄侵略军，得知清军出动后，撤出据点逃跑了。在精奇里江上游新泽斯克据点中的沙俄侵略军，没有得到清军出动的消息，被清军包围，很快也投降了。

东北地区的中国各族人民也纷纷拿起武器，展开斗争，狠狠地打击沙俄侵略者。牛满河上的奇勒尔族奚鲁噶奴等打死俄军10余人；精里奇江上的鄂伦春族朱尔铿格等也击毙许多侵略军；黑龙江下游的费雅喀族和奇勒尔族，与沙俄侵略军展开了激烈战斗，“击杀罗刹甚众”，沙俄侵略者急从鄂霍次克海赶来增援，费雅喀族人民也向清军请求增援，清兵将领鄂罗顺率兵300，冒着冰雪严寒赶来支援，与沙俄侵略军交战于恒滚河口，结果沙俄侵略军战败，有的缴枪投降，有的向鄂霍次克海逃跑了。清军在当地人民的配合下拔除了许多俄军的侵略据点，收复了大片的中国领土。

清朝政府并不是单纯的采取军事手段，每次战争都是先礼后兵，派人进行政治劝说，表明只要沙俄军队停止进行侵略，就愿意和俄国保持和平。并且，优待被俘的沙俄侵略官兵，要求“新司加意赡养，时其欲食，毋得缺乏以示轸恤之意”。1684年，让俄军俘虏宜番、未海罗莫罗对两人，携带中国政府的咨文前往雅克萨，咨文内抄录康熙的谕旨，仍就希望沙俄军队撤离中国的领土，免兴干戈。其中说：“今雅克萨、尼布潮(楚)罗刹等若改前过，急回本地，则两相无事，于彼为益不浅。倘犹执未不悟，留我边疆，彼时必致天讨，难免诛罚”。但是许多次的劝说和警告并未生效，单方面的和平意愿并没有能使侵略者放下屠刀，故清政府除了用武力驱逐侵略者以外，已经没有其它的选择办法了。

1685年1月，康熙派都统公瓦山等赴黑龙江和萨布素等会议，决定春暖后出兵收复雅克萨。康熙又发布渝旨：“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

向者罗刹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扰害索伦、赫哲、飞牙喀、奇勒尔诸地，不遑宁处；剽劫人口，抢掳村庄，攘夺貂皮，肆恶多端。是以屡遣人宣谕，复移文来使，罗刹竟不报命，反深入赫哲、飞牙喀一带，扰害益甚。爰发兵黑龙江，扼其来之路，罗刹又窃据如故，不送还逋逃，应即剪灭”。同时，再次表示了中国方面的和平意图：“尔等欲相安无事，可速回雅库，于彼为界，捕貂收赋，毋复入内地构乱。归我逋逃，我亦归尔逃来之罗刹，果尔，则界上得以贸易，彼此安居，兵戈不兴。”

在大军向雅克萨进发以前，清政府又作了一次和平努力，由康熙皇帝直接给沙皇写信，希望沙皇“迅速撤回雅克萨之罗刹，以雅康等地为界居住。朕即令征讨之大军停止前进。如此边界地方可得安宁，而无侵扰之忧，互相贸易遣使，和睦相处”。这封书信由6个沙俄俘虏从喀尔喀蒙古出境，送往俄国。

尽管清政府作了很大的努力争取和平解决边境争端，但是沙俄方面野心不死，准备顽抗到底。俄国政府将黑龙江地区殖民占领的军事指挥机构作了全盘调整，任命熟悉情况并以精悍骁勇称著的弗拉索夫和托尔布津分别担任尼布楚和雅克萨的督军，增调援军，贮存粮食物资、构筑工事、加固城防，准备赖在这里，长期盘踞下去。此外俄国政府又委派一个普鲁士军官拜顿在托博尔斯克召募哥萨克，编组军队，开到中国来作战。

1685年6月，清政府的军队进抵雅克萨，先遣派沙俄的俘虏费咬多里等3人进雅克萨，带去两件公文，一件是康熙致沙皇的信，一件是清军的统的帅彭春给雅克萨沙俄侵略军的咨文，要求俄军撤离中国领土，对侵略者发出最后的警告。6月23日清军统师部移至雅克萨城下和俄方对话，“罗刹负固，出言不逊”，24日，清军列阵，包围雅克萨。25日，有一队沙俄侵略军从黑龙江顺流而下，企图冲进雅克萨，被清截住，在江上展开激战，击毙伤俄军40多人。接着清军架设大炮，向雅克萨猛烈轰击，城内到处火起，俄军伤亡严重，心胆具裂，走投无路。清军又多次把劝降信射入城内，投降条件十分宽大，俄侵略军只要撤出雅克萨，保证不再重来，就可以保全生命，并允许俄军带走自己的武器和财产。至此，沙俄侵略军的头子托尔布津才竖起了投降的旗帜，清军准许700多名俄国人撤出了雅克萨，清军把他们送到额尔古纳河口。另有巴什里等45俄兵不愿回国，要求留在中国，随清军回到瑷珲。雅克萨据点内还有160多名被俄军扣押作人质的中国索伦族、巴尔虎族人民，全部获得释放。第一次清政府和沙俄的雅克萨战争就以沙俄侵略军战败、投降和撤出雅克萨而告终。

托尔布津率领俄军从雅克萨退到了尼布楚，但侵略的野心不死，仍想卷土重来。正在这个时候，由拜顿率领的600名援军来到了尼布楚，沙俄侵略军的力量增强了。同时，他们打听到，清军战胜后已全部撤回瑷珲，并没有在雅克萨留兵驻守，因此，托尔布津和拜顿立即率军重新占据了雅克萨，俄军到达雅克萨后全力构筑城堡工事，妄图负偶顽抗。

沙俄侵略军再次战领了雅克萨，清朝政府就不得不再次出兵。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康熙下令：“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扑剿，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其令将军萨布素等……速修战

舰，统领乌喇、宁古塔官兵，驰赴黑龙江城(瑷珲)。至日酌留盛京兵镇守，止率所部2000人，攻取雅克萨城”。七月，萨布素率清军2000余各进抵雅克萨，先释放沙俄军俘虏鄂克索木果，令他带信入城，再一次警告沙俄侵略军：“你们又偷偷返回重建城堡，据守其中。你们还欺凌我方渔民猎户。……今我大军已兵临城下，我方决不轻易舍弃，你们对此是一清二楚的。你们将被驱逐，无力卷土重来，结局便是如此。”

在雅克萨据点里的俄国侵略军共有800多人，已做好顽抗的准备。俄军的武器较多，又有充足的弹药、粮草，还有坚固的城防工事。他们频繁地从雅克萨出击，不让清军的炮位和攻城的器械逼进城垣。清兵除了一些大炮之外，只有火枪50支，士兵们全用刀矛弓箭作战，杀伤力较小，不利于攻坚战，因此未能迅速攻下雅克萨。但清兵士气高昂，又有当地居民助战，所以屡次挫败出城搦战的俄军，在战斗开始以后的几天里，就打死了100多个沙俄侵略军，连沙俄军队的头子托尔布津也中炮毙命。

在清军和俄军在雅克萨相持的时期，黑龙江上寒冷的季节很快就要来到。清军由于缺少火器，为了避免太大的牺牲，停止了强攻，在雅克萨周围筑垒挖濠，团团围困。经过长期的战争和包围，沙俄侵略军大多战死病死，800多俄侵略军最后只剩下66人，粮食弹药也消耗殆尽，尼布楚方面也没有力量派来援军，困守在雅克萨的俄国侵略军，只有坐以待毙。

清政府的军事行动虽然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为了求得边界上稳定的和平，清朝政府仍努力争取和俄国进行谈判。1686年9月，清政府委托从北京回国去的荷兰使臣宾显巴志带信给俄国沙皇，建议两国休兵，举行谈判。“仍望察罕汗(沙皇)撤回其属下，以雅库某地为界，各于界内打牲，互相和睦相处”。又把同样内容的信件，交于葡葡牙传教士闵明我带往欧洲，设法转送沙皇。总之清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和俄国谈判解决边界的冲突。一个法国的历史学家评论说：“发出这些信件，就足以表明中国方面有希望达成谅解的意愿”。

1686年11月，正当雅克萨围城旦夕可下的时候，一批俄国的信使，由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率领，从莫斯科星夜奔驰，来到了北京，路上经历1年之久。原来，俄国政府已经知道了雅克萨战争的消息，康熙的几封信件也先后带到了莫斯科，俄国政府知道：中国的自卫反击，将会使自己多年侵略所得到的战果化为乌有，因此焦急。可是当时俄国正由彼得一世的姐姐索菲亚公主执政，贵族间争权夺利，统治很不稳定，况且又在西方连年作战，兵疲败尽，不可能再派大量的军队到中国去作战，被困守在雅克萨的沙俄侵军眼看就有被歼灭的可能，因此沙俄政府为了缓和远东方面的紧急局势，决定接受清政府的建议，举行边界谈判，并派出了以戈洛文为首的谈判使团。文纽科夫和法活罗夫奉俄国政府的命令，先期赶到北京，递送沙皇给康熙的书信，要求清政府停止攻打雅克萨，等待戈洛文使团到达，进行中俄谈判。

清政府表现了极大的和平诚意，以礼接待俄国的信使。在雅克萨城唾手可得的情况下，同意了沙俄的请求，停止战斗，解除包围，并实现单方面的撤军。康熙派人向前线的清军将领宣谕：“萨布素等撤回雅克萨之兵，收集一所，近战舰立营，并晓谕城内的罗刹，听其出入，毋得妄

行攘夺，俟俄罗斯后使至定议”。雅克萨围城5个月，俄军死亡殆尽，城内缺少粮食木柴，清军送去了粮食，还准备派医生入城为俄军治病。1687年，清军单方面撤离雅克萨返回瑷珲，等待俄国使团的到来。

由于中国方面倡议和平谈判并停火撤军，第二次雅克萨战争才得以结束。

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第二雅克萨战争俄军失利后，接受了清朝政府的谈判建议，派出了以戈洛文为首的谈判代表团。清政府方面则派出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和都统、皇舅佟国纲为首的谈判使团，谈判地点设在尼布楚。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7月底，中国使团首先到达了尼布楚。使团共有官兵不到3000人，还有水手、仆役、运夫，此外供食用和运输用的大批牛羊马匹。使团分两路行进，一路由索额图、佟国纲率领，自北京出古北口，经达尔泊，克鲁伦河、温都河，至尼布楚；一路由郎谈、萨布素率领，自瑷珲溯黑江龙而上，经雅克萨，至尼布楚。

这时俄国使团1900多人，停留在贝加尔湖东岸，迟迟不来尼布楚，戈洛文一方面还在征伐喀尔喀蒙古，强迫蒙古各部“归顺”俄国；一方面又在加强尼布楚的军事力量，令“伊扎(即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及其附近尽可能构筑工事”，企图利用谈判现场的优势武力迫使中国使团就范。

中国使团到尼布楚已经19天，戈洛文还没有来到，却多次派遣信使到中国使团的驻地，进行指责和刁难。戈洛文指责中国使团没有谈判的诚意，违反国际法准则，说什么中国使团带来的人太多，“是不是要来打仗?”“如果真心要想讲和，恐怕不会带这么多的队伍同来”。又说中国的士兵行为粗暴，“杀人行凶之事也屡有发生”，在路经雅克萨时杀死了两个俄国人，还提出中国使团的驻地离开尼布楚城太近，要求退往额尔古纳河口。

很显然，戈洛文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中国使团耐心地说明了自己的和平意愿，也严正地驳斥了俄方的谰言。索额图说呀，自己“仅带侍从以及派遣使用之官兵”，此外“我驻防东北将军萨布素等，系专为管辖黑龙江等处之人，勘界事宜完毕后，将交付伊管理。故伊等亦由水路从稚克萨前来尼布楚”，使团此行“不是为了打仗，而是抱着缔结永久和约的目的而来的”。故事实上，中国使团所带军队不到3000人，而尼布楚的俄军也有2600人，谈判现场的军事力量大体上相当，中国方面并无以兵多压人的意思。索额图还指出：“你前年来文内称：带官员500、兵丁5万人前来议事”，可见虚张声势，摆出一副打仗的架势，想以兵多压人的恰恰是俄国而不是中国。

中国使团向俄方指出：已严令官兵遵纪律，所谓雅克萨两名俄国人被杀之事，与中国无关。事实上，这完全是戈洛文捏造的。雅克萨俄国当局也承认：“中国人平静地驶过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并没有寻衅”，中国军队路经雅克萨，“似乎是为了进行会谈，而对阿尔巴津及其附近所种的庄稼并未受命采取任何行动”。至于戈洛文要求中国使团撤到额尔古纳河口，更是十分荒谬的，因为额尔古纳河口距尼布楚城约有900里，中俄使团相距如此遥远，怎能进行谈判?中国使团指出：“既然你我以和好之礼相会议事，住于近处，也仅为便于行走议事，并无恶意”。在谈判

前夕，对于俄国使团提出的种种指责和刁难都被中国使团一一地顶了回去。

8月19日，戈洛文使团姗姗来迟，到达尼布楚。接着双方就会谈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进行磋商，决定会谈从8月22日开始，在尼布城外200俄仗处搭设的帐蓬里举行。进入谈判现场的官兵各300人，除刀剑外不得携带火器，另外中国木船载500名士兵停泊于商谈会场200俄丈处，以和尼布楚城内的俄军力量取得平衡。

8月22日双方进入会场，俄方先声夺人，排场阔绰，行进时仪仗森严，鼓乐齐鸣，俄方帐篷内陈设豪华，三名使臣(戈洛文、弗拉索夫、科尔尼茨基)衣饰华丽，神态傲慢。俄方的卫队违反不带火器的协议，暗藏手雷。中国方面搭设了一座比较精致的黑帐篷，但没有什么陈设，也没有仪仗、乐队，七位使臣(索额图、佟图纲、郎谈、班达尔善、萨布素、马喇、温达)并坐在一起，显示朴素、自然和亲密一致的气氛。

谈判一开始，索额图和戈洛文之间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戈洛文一口咬定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即为沙皇陛下所领有”，可是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其实他所说的“自古以来”不过是指40年以前波雅科夫和哈巴罗夫的入侵活动。戈洛文还倒打一耙，指责中国“突然派兵侵犯沙皇陛下国界……制造流血事件”，“由于这样一些小小纷争而挑起战端”，要求中国政府赔偿俄国的损失，惩办有关人员。

索额图严正驳斥了戈洛文的无稽谰言，指出，“黑龙江一带，沙皇陛下的人从未领有过，贝加尔海这面的所有土地都隶属于中国皇帝方面”。他列举了很多确凿的事实，说明“鄂嫩、尼布楚皆为我茂明安等诸部落原来居住之地，雅克萨为我虞人阿尔巴西等居住之地”，又是“我达斡尔总管倍勒儿故墟”，这些土地上的人民一直向中国政府交税，他们的首领和子孙至今健在，由于俄国哥萨克的侵扰而逃到中国内地。

索额图简单回顾了俄国侵略黑龙江的历史，指出当地的中国各族人民“多年以来遭受到不堪忍受的蹂躏，财产被劫走，妻孥被抢去，本人则被打死”。戈洛文把俄军在中国领土上杀人放火的罪行轻描淡写成“小小纷争”，真是荒唐已极。中国政府再三的劝说、警告，俄方置若罔闻，索额图说：“数年以来，等待尔等醒悟”，我圣祖屡次行文宣谕，惟不得回音，反而犯边不息，故于黑龙江等地屯兵驻守”。中国政府忍无可忍，进行自卫还击，逐驱侵略者，这是正义的行动。挑起战端的责任在于俄国的侵略，如果要说“惩凶”、“赔偿”，那么就谈由俄国惩办自己方面的凶手并赔偿中国受害者的损失。索额图表示：中国争取和俄国实现和平，只谈边界的划分，力求达成协议，而不向俄国提出“惩凶”和“赔偿”的要求。

这场争辩涉及到黑龙江流域的归属以及谁是侵略者，谁挑起战争等重大的原则问题，戈洛文在事实和证据面前理屈词穷，哑口无言。

接着戈洛文提出第一个划界方案，即以黑龙江为中俄两国的边界线。索额图断然拒绝了这个荒谬的方案，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尔加湖为中俄国界线，双方再次的交锋，没有结果。

8月23日举行第二次会议。会上戈洛文坚持以黑龙江划界，并施展了种种手段，时而声势汹汹，时而甜言蜜语，但中国使团不为所动。最后戈洛文故作姿态，假装让步，提出以牛满河为界，这个方案仍把黑龙

江上游和中游的北岸划归俄国，中国使团当然不会同意。可是索额图等误以为俄国使团已在让步，立即提出了以尼布楚为界的新方案。一下子就把康熙指示的最后方案摊了出来，把尼布楚让给了俄国，殊不知这就上了戈洛文的当，失去了回施的余地。戈洛文听到中国政府肯于让出尼布楚，心里十分高兴，因为俄国政府予定的目的已可达到，但是在谈判桌上为了勒索更多的利益，他故意地和中国使团继续纠缠，拒绝中国的划界方案。

中国使团不懂得戈洛文的假表演，看到自己最后的方案被拒绝，以为谈判已经破裂，自己已无话可谈，极为失望，准备返回北京。这时，戈洛文买通了在中国使团内充当翻译的两名外国传教士——徐日升(葡萄牙人)和张诚(法国人)，劝说中国使团继续留在尼布楚谈下去。徐日升断言“缔结和约仍有很大希望”，张诚则说“俄国人将放弃雅克萨”。从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六日，两个传教士奔走往来于中俄使团的驻地，进行会外活动。戈洛文在徐日升和张诚的帮助下，把中国使团拴在尼布楚，一方面使谈判不致于破裂，另一方面又迟迟不肯达成协议，在一切问题上讨价还价，极尽哄骗讹诈之能事。中国使团急切希望谈判成功，除了让出尼布楚以外，又作如下的许多让步：第一，中国使团已提出中俄中段边界，即中国喀尔喀蒙古地区和俄国的划界线问题，戈洛文害怕在中段划界会影响俄国正在向南扩张的势头，因此极力反对。中国使团为了迅速划定东段边界，同意了戈洛文的要求，暂时搁置了中段边界的划分。据索额8个多月以后追述尼布楚条约谈判时的情形，“我曾声明欲议定额尔喀事宜，明确地方。你声称喀尔喀尚未定，我察罕汗(指沙皇)又无旨意，暂且不议，以后再议”。第二，中国使团将黑龙江上游北岸的分界线退让至尼布楚以东约四五百的格和齐河，这已超过了康熙的指示。据传教士说，“钦差大臣奉有中国皇帝最后谕旨，即沿绰尔纳河空界线，而钦差大臣已越过其君主的谕旨，把边界划到了以绰尔纳河后面的格尔必齐河”。第三，中国使团又将黑龙江南岸的分界线让到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口距尼布楚几百里，这一广大地区有银矿、盐湖以及大片的耕地、牧场，是俄国沙皇政府最垂涎的富钱地区。

中国使团步步退让，实已无可再让，而戈洛文仍在玩弄外交手腕，勒索不已。在这时候受尽俄国压迫，被俄国驻赶到山林里去的中国各族人民，听到中国使团到达的消息，纷纷前来寻找从祖国来的亲人，他们扶老携幼，带着帐篷，赶着驼羊，突破俄军的封锁，来到了尼布楚附近。中国使团“遇到了大批的喀尔喀人，至少有六七千人，他们已起义反抗俄国人”。戈洛文害怕中国人民抗俄斗争的发展，将会谈自己的一切殖民地利益化为灰烬，赶紧改变策略，拿出沙皇予定的方案划界，迅速与中国使团达成协议，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这样，他才在深夜里急忙派使者到中国使团的驻地，同意撤出雅克萨。

尼布楚和雅克萨的归属是这次谈判中争论的焦点，中国早已同意让出尼布楚，现在俄国也同意撤出雅克萨，问题已经解决。此后在其他问题和细节方面又经过一系列艰难曲折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俄双方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和俄国签订的第一条约。正式的文本是拉丁文本，由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另有满文本和俄文本，都不是正是式

本。条约共六条，实质性部份包括：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越界侵略和逃人的处理，中俄往来贸易的规定等。

中俄边界东段的划分是条约中最重要的部分。条约明确规定以格尔必齐河，石大兴安岭(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两国的分界线。又规定外兴安岭和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后议。清政府在领土方面作了重大的让步，将尼布楚及其以西直至贝尔加湖原属中国的领土让给了俄国，以换取俄国撤出雅克萨。所以条约中又规定了俄国在雅克萨和额尔古纳河南岸的据点全部拆毁、迁移。

《尼布楚条约》严禁彼此越界入侵，双方不得收留逃亡者，以减少边境的争执。又规定：中俄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可以过界来往，贸易互市，这是俄方长期以来的要求。

《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双方代表都在各自政府事先指定的范围之内进行谈判交涉，没有也不可能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最后达成的协议并没有越出中俄两国政府愿意接受的范围之外。条约明确地划分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条约在领土和贸易方面也满足了俄国的要求，二些苏联的书籍中说“一六八九订立的尼布楚条约实质上是莫斯科外交极大的胜利，尼布楚谈判是正式的、平等的谈判”，“该条约巩固并扩大了两国人民的和睦关系”。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和俄国东段边界稳定了下来，边境比较相对的严静，两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往来和贸易也有所发展。

亚梅什湖之战当时，俄国正是彼得一世(1682—1725)沙皇。彼得一世是个“深谋远虑的、向自己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从他在位期间开始(1682—1725年)沙皇俄国便走上了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彼得一世及其继承者对其欧洲邻国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的同时，也在东方积极推行扩张政策。

1713年，一个名叫和卓奈甫斯的土克曼族人，经由阿斯特拉罕来到俄国京城彼得堡，说阿姆河注入里海，可复兴如古代地理学者所说印度洋与里海之间的水路，并传说阿姆河流域有大量的沙金，而这一传说也被当时在彼得堡的基瓦王国使臣阿苏尔伯克所证实。与此同时，彼得一世又接到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递交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中国南疆叶尔羌地区盛产黄金。他建议“由额尔齐斯河起修筑一些碉堡”，直到叶尔羌。得到上述消息后，彼得一世欢喜若狂，为实现“复兴通往印度的通道与得到沙金的野心”，决定对中亚的基瓦王国和中国西北边疆采取侵略行动。

为了实现上述侵略目标，彼得一世组织了两支远征队：一种由近卫军陆军中尉贝柯维奇统率6600人，于1716年，横渡里海，于里海沿岸建立三座要塞；一路由陆军中校布赫戈利茨指挥的4000余侵略军，于1716年10月，侵入额尔齐斯河的中上游，偷偷地窜到我准噶尔管辖的亚梅什湖畔，修筑堡垒，设置工事，准备在那里过冬。

在布赫戈利茨出动之前，加加林根据彼得一世的指示，派人送信给准噶尔部的首领策妄阿拉布坦进行威胁和利诱，“希望他(系指策妄阿拉布坦)对这个远征队的目的不要担心”。并提出如果策妄阿拉布坦“不干涉这一军队，将来他(策妄阿拉布担)便可以得到帮助和声援”。

准噶尔人民与沙俄在长期“交往”中，早已识破沙俄口密腹剑的伎俩，没有听信侵略者的谎言。1716年2月，准噶尔部军民同仇敌忾，集合约有万余人的队伍，在大策凌敦多布率领下开赴沙俄盘踞的亚梅什湖要塞，要求侵略者撤离军队。大策凌敦多布向侵略者发出警告：如果你们赖着不走，“我将围困城堡，不准你们的人外出……待你们粮尽挨饿时，我定将攻占此城”。然而布赫戈利茨非但不听劝告，反而威胁准噶尔军民，说什么“他有大量的供应品，同时援军很快就会从托波尔斯克到来”。

面对着侵略成性的沙俄匪帮，准噶尔军民在警告无效之后，为了维护祖国的神圣领土，不得不拿起武器同侵略者进行斗争。他们以大刀、长茅和弓箭等武器，不断地袭击侵略军，打得敌人丢盔卸甲，溃不成军。与此同时，沙俄从托波尔斯克派出的增援部队也被英勇的准噶尔军民所歼灭。1716年4月，布赫戈利茨不得不炸毁亚梅什湖要塞，率领残部乘船沿额尔齐斯河狼狈逃跑，退至鄂木河口，修筑鄂木斯克要塞。

亚梅什湖之战，是准噶尔人民为保卫自己的领土，反抗沙俄入侵的正义战争。这次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势力，在中华民族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沙俄侵略者虽然在亚梅叶湖遭到可耻的失败，但仍不死心，1719年，彼得一世又派利哈列夫为首的一支440人组成的侵略军，从托波尔斯克出发入侵斋桑湖，于湖边修筑要塞。这支侵略军又遭到了准噶尔军民2万多人的截击，不得不退回托波尔斯克。

1721年至1722年，策妄阿拉布坦在西藏的势力被清军驱逐后，处境十分狠狈，为了摆脱困境，策妄愿意向沙俄让步，保持和平。沙俄政府认为有机可乘，立即把侵略魔爪伸向准噶尔部。彼得一世派翁科夫斯基来准噶尔活动，劝诱策妄臣属于俄国，沙皇“就可以下令象保护自己的臣民一样保护他免遭别人侵犯，并可首先发函说服中国皇帝不要欺凌珲台吉(指策妄)，因为他已是皇上的臣民。假如中国皇帝不听，则要设法用强力迫使他同意”，还要“设法使策妄阿拉布坦让与领土，以便在这些领土上建筑堡垒要塞，修筑一条连续不断的堡垒线会使西伯利亚与前哨站连接起来，并且可以保护探矿队的全部旅程”。对俄国政府的这些要求，充分暴露了它觊觎中国领土，进行挑拨离间的丑恶面目。

沙俄对准噶尔人民和策妄阿拉布坦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他们与清政府作战失败，必定会投靠俄国，这种估计就大错而特错了。准噶尔人民是热爱祖国的，策妄虽然割据了西北，和清朝大动干戈，但在准噶尔人民的推动下，他面对俄国的利诱威胁，仍保持了严正的立场。策妄阿拉布坦“拒绝转入俄罗斯国籍，并且没有接受翁科夫斯基所提出的关于在汗领土上修筑要塞并派俄军驻防其中的建议”。翁科夫斯基使团虽然在准噶尔活动2年之久，但这次出使“收获似乎既含糊，又贫乏的”。沙俄在我国东北和西北边疆的侵略阴谋都没有得逞。

第二节 逆者兵临康熙三征准噶尔

准噶尔是我国西北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长期游牧于巴尔喀什湖以东，天山以北广大地区。康熙初年，准噶尔部以武力吞并了其它三部，又出兵征服了天山以南的回族(吾尔族)，其势力一度扩展到青海和西藏。同时，准噶尔部又与沙俄势力相勾结，策动叛乱，企图统治蒙古各部，割据西北。准噶尔部的叛乱活动，给西北边疆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清朝鼎定中原之后，为了维护边疆的统一和和平，及时出兵，平定了准噶尔叛乱。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统一西北地区与准噶尔贵族进行了多次战争，在清代文献中统称为“平定准噶尔”。

漠北噶尔丹败亡清朝初年，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内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分。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又分为工谢图、扎萨克和车臣三部，大致位于呼伦贝尔以西，阿尔泰以东，南临大漠。北与俄罗斯接壤。清军入关前，喀尔喀蒙古的三大封建主——土谢图汗、扎萨克图汗和车臣汗就与清朝政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厄鲁特蒙古是清代对西蒙古诸部的总称，明代称瓦剌。明末清初，瓦剌各部发展归并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和土尔扈特四大部。其中准噶尔部由于地处伊犁河流域和准噶尔盆地的大草原，水草肥美，牧畜业发达，并与俄罗斯人进行交易，结果强大起来。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即康熙初年)，噶尔丹代为准噶尔部首领，伊犁成为准噶尔的政治中心和各部会宗地。除统治天山南北外，其势力曾远及塔什干，费尔干纳和撤马尔罕等中亚各地。

我国三北地区形势的变化起于明朝末年。当时由于朝政腐败，阶级矛盾激化而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明朝统治者被中原地区的农民军弄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因而无力顾及边陲地区，于是西北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力量不断扩大，并恃强压迫其他各部，“恃其强盛，四出剽掠”土尔扈特部被迫迁往额济勒河流域，和硕特部则移居青海，而杜尔伯特部却沦为准噶尔部的附庸。噶尔丹进攻喀尔喀之战，噶尔丹自立为准噶尔汗时，正值喀尔喀蒙古三部之间发生纷争。在俄国政府的怂恿支持下，噶尔丹于1688年，率兵东攻喀尔喀诸部。噶尔丹的3万兵劲骑越过杭爱山，直入工谢图部境内，“有大批俄国军队并有大量火器大炮协同他作战”。土谢图汗等猝不及防，拒战失利，噶尔丹又剩胜击败车臣部和扎萨克图部。各部“南徙蔽地而来，前后相望60余里”，“遗弃牛马，死者相枕”。

沙俄趁喀尔喀战败，威逼利诱各部，要求他们投靠俄国以求保护。但喀尔喀三部人民清醒地认识到沙俄是噶尔丹的同盟者，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在这一重要关头，哲布尊肥。呼图克图挺身而出，向蒙古的上层人物晓示民族团结的大义，他说“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指康熙)可激万年之福”。于是数10万人逃入漠南蒙古，请求清朝保护。清朝政府立刻妥善安置了喀尔喀各部，但噶尔丹以追击土谢图汗部余众为由率兵南下攻入

内蒙乌朱穆沁地区，与清政府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康熙帝命清廷理藩院尚书阿尔尼率蒙古兵截击，结果被噶尔丹的军队杀得溃不成军。此后，噶尔丹占踞着喀尔喀王庭，募兵数10万，气焰十分嚣张。噶尔丹的叛乱活动，不仅严重地威胁着祖国的统一，同时也给西北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乌兰布通之战清朝前期的历代帝王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相当重视。清朝统治者认为，边疆是他们统治内地的“屏藩”，如果“摇撼我外藩”，就是“坏我屏垣”，就会使、“疆圉不靖”，而“边境一日不宁”，“内地人民一日不得休息”，这就必定要危及到对内地的统治。还在清军入关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就曾以极大的努力，不仅争取了漠南蒙古的归顺，而且与厄鲁特蒙古和西藏达赖喇嘛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对边疆各族，努尔哈赤的方针是“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当漠南蒙古试图反抗时，科尔沁贝勒明安被打得马被陷，弃鞍赤身，体无片衣，骑骣马脱出”。皇太极继位后，对漠南蒙古各部仍执行“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政策。因此到1643年已基本上臣服了漠南蒙古各部，有鉴于此，康熙帝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巩固的统治，决定按既定方针行事，即“逆者以兵临”。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夏，康熙帝议定亲征。康熙帝先命裕亲王福全(康熙之兄)为抚远大将军，率同皇子允提，出长城左北口；又派恭亲王常宁(康熙之弟)，率同简亲王雅布，出长城喜峰口。同时，又命阿尔尼率旧部听从裕亲王调遣。此外，康熙帝还调集了分别来自盛京(今沈阳)、吉林和科尔沁的军队前往助战。康熙帝御驾亲征，调度各路大军。

这年7月，康熙帝启銮出巡，方出长城，忽得前方来报，恭亲王所率军队在喜峰口900里外，被噶尔丹杀得一败涂地，康熙帝闻听不免焦急万分，急令各路人马全速前进。行军途中，又得消息说，噶尔丹的前锋部队已经占据乌兰布通(今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境内)。乌兰布通距北京仅700里，北京震动，人心惊慌，中原也受到了战火威胁，“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枪手派至8名，几乎倾国矣。曲廨尽闭，米价至三两余”。

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余部为名，率精锐骑兵20余万抵达乌尔会河。清军前锋受挫，于是噶尔丹军深入至乌兰布通。康熙帝玄烨镇定自若，急令康亲王杰书屯军归化城(呼和浩特)，截断噶尔丹退路。同时遣内大臣阿密达、尚书阿尔尼、都统阿南达等和康亲王杰书的部队与福全会师；令内大臣索额图、都统苏努进驻巴林，并调大同镇骑兵600人，步兵1400人从福全出征。康熙帝来至博洛和屯(河北省隆化县境内)视师，双方展开激烈战斗。

战斗从8月1日开始，两军隔河相对。叛军噶尔丹诡计多端，将骆驼缚足偃卧，背加箱垛，蒙以湿毡，环列在阵前作为蒙蔽，美其名日”驼城”。“驼城”刀枪不入，清军一时难以攻破，而判军则从驼城的缝阵向外发射矢铳。清军隔河布阵，调集火炮，进行猛轰。一时间，河两岸炮声呼啸，喊杀声不绝于耳。自午至暮，清军一直遥轰驼城中坚，只见骆驼死伤过半，“驼城”终于被推毁。于是，清军发起猛烈攻击，兵分两路越河陷阵，杀入敌群。

噶尔丹叛军的军心大乱，溃不成军，而清军则在强大火炮的掩护下奋力追杀，叛军死伤无数“大战以大炮火枪互轰开始，继而两军士卒肉博”，噶尔丹抱头鼠窜，乘着夜幕越过大碛山而逃，同时遣使向清王朝求

和。

噶尔丹叛军落荒而逃，沿途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为求生路，噶尔丹派喇嘛向清军求和谢罪，发誓不再进犯。逃回科布多时，噶尔丹的残兵败将仅剩数千人。

清政府为了进一步平定沙俄支持下的噶尔丹叛乱，巩固北部的边防，一面在木兰竹围习武，秣马砺兵，教营伍，练攻战，激励将士，申明赏罚，一面对“纷纷溃散，来求归附的”喀尔喀蒙古人民及时采取安抚措施。

1691年5月(康熙三十年四月)，康熙帝亲率三旗官兵，自北京出发，出左北口，溯滦河而上；下五旗官兵出独石口，会师于多伦。康熙帝宣布保留喀尔喀三部首领的汗号，其行政编制，如内蒙49旗，分为34旗，从而结束了喀尔喀各部长期以来，“并无法度，不能约束，以强凌弱，自相劫夺”的混乱局而，以喇嘛教作为统治蒙古的手段。

在沙俄入侵和噶尔丹判乱的形势下，清廷采取的措施是有积极作用的。

昭莫多之战乌兰布通战败后，噶尔丹用缓兵之计逃脱了全军覆灭的命运，在科布多(今蒙古吉尔格朗图)重整旗鼓，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噶尔丹率领东拼西凑组成的3万骑沿土拉河、克鲁伦河东进至巴颜乌兰(位于蒙古达尔汗以北，温都尔汗以西)一带活动，频繁骚扰和掠夺，使清军防不胜防，并且借故挑起事端。噶尔丹多次致函给科尔沁亲王沙津，“保证将派给他6万名俄国生力军。简言之，若他们能打败满洲人，他们得直接进军北京，若他们征服了皇朝，他们将伙分地盘”。噶尔丹又派人诱惑喀尔喀车汗乌默客、赛音诺颜部扎萨克一等台吉阿哩雅，赛音诺颜郡王善巴起兵反清，康熙三十一年，清朝派员外郎马迪赴伊犁回报策妄阿拉布坦，护送官兵及向导一行共35人，行至哈密城郊，8月11日，噶尔丹派军500余人，劫杀了马迪等7人，其余则被囚禁于哈密。这些有碍于清朝统一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恶化了清朝政府与噶尔丹的关系。

更有甚者，噶尔丹里通外国，勾结沙俄，与沙俄狼狈为奸。康熙三十年(1691年)以后，噶尔丹多次派遣使节去沙俄活动。1692年11月，噶尔丹的使者阿钦哈什哈在戈洛文(中俄边界谈判的俄方首席代表)的疏通下到达莫斯科，向沙皇呈递了噶尔丹的信件。在这前后，俄国托博尔斯克行政长官曾派马特维?尤金于1692年赴噶尔丹处活动，1692年、1695年、1696年，俄国又三次遣使会见噶尔丹。因此，噶尔丹凭借沙俄的支持，决心与清朝对抗到底。噶尔丹扬言将领“俄罗斯炮手、鸟枪兵6万，再俟俄罗斯兵6万至，即顺克鲁伦河下”，入侵漠南蒙古和中原。

针对噶尔丹的阴谋活动，为防噶尔丹南下，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在归化、张家口，大同等战略要地派兵驻守，设立火器营，多置驿站传送军令，建立了包围漠北的积极防御的军事体系：任命甘肃提督孙思克为振武将军，在右卫(今山西右玉县)驻扎重兵；令建威将军希福驻守大同，将大同、杀虎口的步兵2244名均改为骑兵；在归化城专设将军1员，总管都统、副都统、训练官兵等事务，任命名将费扬古为安北将军。康熙帝又令内大臣明珠、索额图，都统噶尔玛、副都统硕岱

赴内蒙古中部，调动内蒙古和喀尔喀骑兵，各驻要地侦察防卫。在东北，康熙帝则令盛京(沈阳)、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驻军遇事“可会于形胜之地，科尔沁兵亦令随行”，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以索岳尔济山为三省会兵之地，相机进剿。

经过多伦会盟，蒙古各部相互协条，决心在清政府的领导下，共同抗击沙俄的侵略野心和噶尔丹的进犯。康熙帝对此深为满意，曾说过“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历”。

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噶尔丹为抢掠喀尔喀的牲畜过冬，向克普伦河以东推进，沿途被抢掠殆尽，康熙帝于是设计诱敌深入，令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律将噶尔丹引诱至漠南，然后清军全面出击，康熙帝准备“亲统大军，风驰电击”，一举将其歼灭。当时，汉族大臣担心他的安全，反对康熙亲临漠北，深入绝域。但康熙帝胸有成竹。“夫烈焰弗戢，必将燎原，积寇一日不除，则疆圉一目不靖”，“夫今不图，噶尔丹来侵我49旗，则必调天下绿旗沿边戍守，所扰不益多乎!”

噶尔丹果然中计沿克鲁伦河南下，康熙帝认为：“机不可失，不俟草茁，即应往剿”，遂于三十五年二月三十日率大军亲征。康熙帝令抗俄名将、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东三省军出车路，遏敌前锋；派安北将军费扬古、振武将军孙思克等统领陕、甘兵出宁夏西路。断敌归道；康熙帝则自率中路大军担任主攻，由独石口趋外蒙古。三路大军约定在克鲁伦河会齐，三路夹攻合围，中路主攻，西路堵截，东路拦击，三路大军互相策应，使噶尔丹成为瓮中之鳖，插翅难逃。

中路军：由康熙帝统帅，合官兵厮役，原定3．2970万名，大致有汉军火器营兵2000名及随营炮兵，炮手绵甲军818名及厮役409名，东北之盛京兵2000名，黑龙江兵2000名，宁古塔兵1000名，宣化府绿旗兵3000名(不久减去1000名)，以及后增的内务府佐领兵266名，察哈尔左翼四旗军822名，喀喇沁兵500名，扎萨克王以下，附丁以上1992名，古北口绿营兵1500名等，共计约3．6万名。

此外，中路军还有预备兵8392名，尾随主力前进。

中路军每人自带80日口粮，另发帑金6万两，造车4000辆，续又增造1500辆，每车载米6．6石及炊具营帐粮草等物，调直鲁豫三省夫役充任驭手，运粮队的蒙汉佚役及官兵共约8600名。

西路军：分为归化城军和宁夏军两支。归化城军由费扬占亲自带领，包括右卫兵，大同绿旗兵各5000名，京城增发兵3470名，合官兵厮役兵2．4260万名。另有察合尔右翼四旗军822名，大同养马护军及鸟枪护军280名，归化城土默特官兵854名，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六旗共派兵600兵，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六旗派兵1000名从征。喀尔喀赛音诺部郡王善巴、滚布、镇国公素泰伊勒登三旗也踊跃参战。估计归化城军总计3万人以上，配备了各类火炮100门，绵甲7000领，火箭3000只。

归化城军每人自带80日口粮，康熙帝又令山西巡抚动用正项钱粮督造了运输车1500辆，运粮队总计约3000人。

宁夏军：原定2．24万人，出肃州(今甘肃酒泉)经坤都伦河、额济河赴漠北，后定宁夏军由宁夏(今银川市)经平罗营出口。此路有孙思克的甘州(今张掖)军1800名，潘育龙的肃州军1000名，荠大成的凉州军(今

武威)1200名，殷化行的宁夏军3000名，共有绿旗7000名。另有由西安将军博济率领的西安满洲军3000名，满洲军每人各带仆从1名，绿营马兵2人合带余丁或子弟1人，以供樵汲牵驱之役，这支队伍共约1．7万人。孙思克及将弁捐造了子母炮共80门。

陕甘军人给五月行粮，共合米2．24万石，其中以牛羊带一日之粮，其余1．72万石皆以驼马驮运，以步兵和马兵2500名牵挽护送。

东路军：由盛京、吉林和黑龙江兵组成，共6000名，合厮役约1．2万人。盛京、吉林兵于三月启程，黑龙江兵于四月出发，三省军会师于索岳尔济山，然后直趋克鲁伦河。在这之前，清政府已调内蒙古锡林格勒、昭乌达、哲里木三盟的骑兵驻乌尔会河，以便策应东路军。

粗略估计，康熙帝远征军的规模在14万人左右，为了便于联系和传递军情，清政府还建立了多处驿站，杀虎口、独石口外各置60个驿站；中西两路之间在汛界外设15站，宁夏在部多里一路设了13个驿让，归化城军在噶尔拜察罕库腾一路设立了17个驿站，每站有水井10余处。

由于西行路途纡远，沿线尽是荒漠沙碛和沼泽，噶尔丹又放火烧荒，坚避清野，所以行军极为艰苦。尽管八旗做了充分的准备，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除中路进展较为顺利之外，东西两路则行程缓慢，难以如期到达，所以当中路军于四月九日突进至科图时，东西两路大军却未能如期到达，以致于无法相互策应。为了不迟误军机，西路统帅孙思克只得令“将众军裹带之粮尽行并聚，所乘之马亦摘取膘壮者随之，于所领绿营官兵7000之内，挑选精健者2000以往，其余尽数择将佐之素有威望者带领以归。与孙思克同路的西安将军博霁也挑选2000八旗后与孙同行。四月十一日，孙思克才在察罕和朔(今蒙古巴彦温都尔西边)与费扬古军队会师。

清军虽然处于中路突出、两翼落后的不利态势，康熙仍坚持继续前进、放慢速度、相机而行的正确主张。这时，沙津密遣诱敌的使者从噶尔丹处回报：“噶尔丹有兵2万，又借俄罗斯兵6万”。喀尔喀降者也声称：“前者噶尔丹曾求援兵于俄罗斯国，前月俄罗斯使者20余人来约，至青草出后，助鸟枪手1000，及车炮发至东方克鲁伦河界上。”清军的少数将领闻听后，心怀疑惧，主张退兵自保，让西路军深入前行。这个建议将导致中路军前功尽弃，使西路军偏师受敌。关键之时，康熙帝面谕群臣晓以大义，决定继续进军：“务期剿灭噶尔丹而还。”“我师既至此地，噶尔丹可擒可灭，而肯怯懦退缩乎?”于是全军统一了意志，继续北进，五月五日迫近克鲁伦河。

七日，康熙帝亲率前锋兵突进，“诸军鳞翼张而进，兵威之盛，弥山遍野，不见涯际，整齐严密，肃在无声”。噶尔丹闻讯后登高遥望，见河南驻扎御营，黄幄龙辇，内环军幔，外布网城，精兵强将严阵以待，不觉惊恐万分，自知不敌，于是将器械辎重及体弱伤残者尽皆抛弃，连夜拔营宵遁。康熙率军急迫，但因军粮匮乏，只得令平北大将军孙思克挑选部分精骑，携20日粮饷穷追不舍，与西路军共同夹击噶尔丹。

西路归化城军因中途牲口倒毙，粮饷不继被迫精简，汰弱留强，集中粮、马，选精锐北上。孙思克先率500名精兵赶至翁金附近的察罕和朔与费扬古会师，后继部队则加速行进。五月四日，西路军两支已达土喇河，五月十三日，西路军与噶尔丹军遭遇，双方展开了一场决定噶尔

丹命运的昭莫多之战。

昭莫多是蒙古语大树林之意，这一带地势平旷，林箐丛杂，位于今乌兰巴托以南之宗莫德，在富饶美丽的土喇河上游，“其北大山，千仞壁立，山下平川广数里，树木断续，有河流其间，曲折环绕，其南山差低于北，逶迤而下，有小山横焉，战地也”。西路军在戈壁荒漠，牧草烧绝之地跋涉了77天(宁夏军为73天)，粮食已绝，饥寒交迫，抵达照莫多时将士们已是面带菜色，精疲力竭。费扬古闻讯后令急行军，抢占了昭莫多的有利地形，决定采取以逸待劳，饵敌来攻，后发制人的方针，让先头部队休息待命。随后，又令喀尔喀郡王滚布、副都统阿南达、阿迪，署前锋统领硕代且战且退，诱敌进入特勒尔济口。

噶尔丹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战略家，他并不甘心自己的溃灭，一路边退却边寻找机会反朴，企图歼灭清廷的西路主力军。为防有埋伏，噶尔丹大军在涌到昭莫多时四处侦察，格外留心。忽然密林中火炮齐鸣，杀路一路人马，噶尔丹镇定观察，见不过是只有400来人的部队，而且全是步兵，而他自己手下尚有万余名精兵，于是放松了警惕，下令大军攻击。噶尔丹大军的人数，诸书记载不一，多说是五六千人。费扬古在战后奏报：“噶尔丹率‘贼’万许，向前逆战。”蒋良骐《东华录》也记载，“噶尔丹率‘贼’万计逆战”，但在昭莫多之战以后，除被消灭、俘虏、投降者外，仍有兵五六千人，所以以兵力以万人较为符合实际。

数百名清兵且战且退，佯装败逃，退至特勒尔济口。费扬古将军见敌军来势凶猛，立即登山布阵。以甘、凉、宁、肃四镇绿旗兵2300人抢占小山制高点，作为中间，扼险俯击；以京城、西安满洲汉军官兵、察哈尔右翼4旗、鄂尔多斯6旗、关拉特3旗、毛明安旗、四子部落旗、喀尔喀右翼旗蒙古兵紧靠东方高地列阵，右卫满洲汉军官兵，大同官兵，喀尔喀善巴、滚布、索泰伊勒登了旗就西方沿河布镇，迅速张开口袋，准备一举歼灭叛敌。

激战首先是从争夺小山制高点开始的。

噶尔丹率军抵达昭莫多后，立刻集中兵力抢攻马鞍形的小山头。清兵据险俯击，矢铳迭发，敌兵毫不惧怯，前队倒毙则后队继进，并舍骑仰攻，鸟枪、弓箭齐发。双方从太阳偏西杀至薄暮(未时至酉时，即下午三、四时到晚上七、八时)，杀声震天，但双方仍处于对峙胶着状态。殷化行望见敌人阵后森林中人马丛集，久不出动，断定是敌人的妇稚辎重，于是请求费扬古将军攻噶尔丹军的侧翼，再派一支精兵迂遇到噶尔丹阵地后方，前后夹击。费扬古观敌瞭阵，只见小山头上孙思克据险死守，用火铳、弓弩迎击，而“噶尔丹以及妻子阿努娘子等，亦皆冒炮矢而斗，锋甚锐，不可败”，于是便采纳了宁夏总兵殷化行的建议。清军三路出击，上下夹击，锐不可挡。小山上孙思克激励官兵说：“贼远来，当乘机扑杀，一战成功，有退缩者，法无赦！”殷化行也带着众将士拥着拒马木，执圆盾控矢冲下，矢射如雨呼声惊天动地。一时间，山下烟雾迷漫，但见尘沙陡起，血肉纷飞，敌骑抱头乱窜，哭爹喊娘乱作一团。“‘贼’众遂披靡，坠下山谷者满坑谷，弃杖如麻。”清军剩胜追击30余里至特勒尔济口，费扬古怕人困马乏深夜中伏，下令收兵。回至昭莫多时，已是次日凌晨。此战“斩首2000余级，生擒百余人，俘获子女、驼、马、牛、羊兵器、计物无算”。噶尔丹仅率数骑逃走，其妻阿奴被

杀，逃散之敌有千余人投降大将军马思喀但据费扬古奏报，该战歼敌2000余人，阿南达认为应是3000余人；另获驼马若干，牛2万余头，羊4万只。

噶尔丹昭莫多战败逃亡之后，仍拒不降清，纠集残部5000余人流落在塔米尔河(今蒙古车车尔勒格东北)一带，走投无路，狼狈不堪。噶尔丹唯一可以指望的声援力量，是西藏以第巴桑结嘉措为首的神权势力，但清兵已经驻扎于河西走廊的甘、凉、宁(西宁)、肃四镇，严密控制了漠北通向青藏的通道，而且原为噶尔丹所属的甘州萨里维吾尔族(今裕固族)7400余口，也已降清。此时，沙俄因受《尼布楚条约》的约束，不敢接纳噶尔丹投俄，而占据伊犁河的策妄阿拉布坦与其岳父已调兵屯于阿尔泰山，因此，噶尔丹已无法返回故土。加上哈密回王额贝杜拉达尔汉伯克已于九月降清，并将噶尔丹之子色布腾巴尔珠尔擒获，献给清臣，这样噶尔丹成为无立足之地的丧家犬，惶惶不可终日。

康熙采取了种种措施，将噶尔丹围困于漠北科布多河一带，同时发起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瓦解残敌，争取噶尔丹降清。但噶尔丹仍强项不降，于是康熙帝在1696年和1697年又接连两次亲征。在清军的强大压力下，噶尔丹众叛亲离，忧闷成疾，服毒自杀(一说于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清晨发病，当晚即亡)。康熙帝“务期殄灭，穷尽根株”的目的终于实现，遂凯旋回京。

清朝经历10年(1687——1697)的斗争，特别是由于昭莫多之战的决定性胜利，终于歼灭了噶尔丹的叛军，为统一漠北扫除了障碍。这场战争，颇为艰苦，清政府采用了政治诱导和军事进攻相结合的两手政策，发扬了不避艰险、穷追不舍的精神才平定了噶尔丹的叛乱。另外，为了早日剿灭叛匪，清政府及康熙帝调兵遣将，知人善任，粮饷弹药充足，这些都为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昭莫多之战中，康熙帝总统三军，亲帅中路，不避险途；西路军统帅费扬古谨慎持重，爱惜士卒且熟悉边情，成竹在胸。振武将军孙思克年已七旬，右臂早日伤残却仍身先士卒。而宁夏总兵殷化行则机智多谋，晓畅戎机。清政府由于统治机器健全，号令通行万里，所以能在短期内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为战争服务，使得粮饷充足，战马如云，十三四万大军所用之战马、驮马、辕马、驿马、备用马，粗略估计，在22万匹上下。清政府还调用了大批驼、骡、牛、驴帮助运输，减轻了马匹承受的压力。以米面为例，中路军和西路归化城军每人携80日口粮，官员携百日口粮，两军另备米车达7000辆，每车运6．6石，略去损耗之0．6石不计，共运米达4．2万石。“八旗、绿旗、内府兵及职事人员酌量增给米粮，时营外堆积如山，观者拥塞、内喀尔喀诸人……莫不挢舌惊骇，将士气与京同”。

昭莫多之战的胜利，加速了噶尔丹内部的分裂，促使了噶尔丹的灭亡，同时，有利于蒙古人民的休养生息。康熙帝曾以诗描述：

诸部名王集，扶携绕御营。
皆言清朔漠，从此乐生成。
喜溢车书会，欢腾鼓角生。
朕怀勤抚恤，所志在休兵。

噶尔丹败亡，喀尔喀人返回漠北，各旗领有被清朝分封的固定的牧场、土地，执干戈以卫社稷，清朝的北部边防遂大为加强，内蒙古的安

全也有了可靠的保障，清朝有外蒙古作为“塞上雄藩”，正好以之为军事基地，向天山南北推进。所以，昭莫多之战后，清朝的有效控制权已伸展到青海、套西和哈密等广大地区。噶尔丹败亡，血的教训使一直采取骑墙观望态度的青海蒙古臣服于大清，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青海正式列入清帝国的版图。青海道路的畅通，清朝对西藏的局势才能了如指掌，并迅速控制了哈密通向天山南北的道路，打开了统一天山南北的大门。青海、套西、哈密的有效统一，是清朝有效统一西藏、新疆等广大西域地区的先声。

第三节 再平准噶尔管辖西藏青海

漠北噶尔丹叛乱被清政府平定之后，准噶尔部的割据势力仍负隅顽抗，企图“尽效噶尔丹所为，思吞并四部为一”，于是与清廷的斗争再起。到了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准噶尔部在策妄阿拉布坦的苦心经管下又逐渐强大起来，“潜师入藏，袭杀拉藏汗”，作乱边疆。清廷采取果断的措施，及时出兵西藏并加强西北防务，粉碎了叛军的分裂阴谋，保证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和平和发展。

争夺哈密策旺阿拉布坦是僧格的长子，噶尔丹之侄。远在1653年(顺治十年)，巴图尔浑台吉死，其子僧格继位，但不久巴图尔浑台吉诸子之间就发生了争夺统治权的内讧，噶尔丹趁机夺得了准噶尔部统治权，策旺阿拉布坦被迫依附于噶尔丹。据《东华录》雍正朝《卷十四》上记载：策旺阿拉布坦“与伊叔噶尔丹不相和睦，带领7人潜逃至吐鲁番地方居住。……且圣心(指圣祖仁皇帝)仁慈，不忍遣兵将噶尔丹余剩部落，悉行剿灭，恩加格外，遣使赏给策旺阿拉布坦。彼时，策妄阿拉布坦力弱势微，甚为恭顺”。当时，噶尔丹正勾结沙俄，图谋对喀尔喀的入侵。策旺阿拉布坦一面向清侵政府“请安纳贡”，表示“大凡君有谕旨，俱愿遵行”，一面“用其七友，收集散亡”，积极发展个人势力。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策旺阿拉布坦利用噶尔丹再次东侵的机会，袭取噶尔丹的大本营科布多，“尽收噶尔丹之妻子人民而去”，占据了额尔齐斯河到乌布萨泊的广大地区，实际控制了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占据伊犁之后，向清政府“请安纳贡，”表示为清廷“效力尽瘁”，清政府在1694年(康熙三十六年)消灭了噶尔丹之后，承认了策旺阿拉布坦对准噶尔的统治。

随着准噶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历十余年，部众繁滋，渐骄横”，策旺阿拉布坦开始“尽效噶尔丹所为，思吞并四部为一”，逐步与清廷作对，走上了背叛中央政权，搞分裂割据的道路。当时哈密已正式归附清朝，并擒献了噶尔丹之子色布腾巴珠，故策旺阿拉布坦对此极为忌恨。

康熙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策旺阿拉布坦“以兵2000，掠哈密”，不满足于自己控制的由清廷划定的阿尔泰山以西至伊犁的牧区，企图占有阿尔泰山以东和哈密地区的广大牧场。策旺阿拉布坦率军开进哈密以北地区，拔五寨，复进至哈密城下。哈密扎萨克达尔汉白克额敏向清廷告急。甘肃提督师懿德派兵反击援助哈密，策旺部败走。清廷同时要求与策旺会盟，和平解决分配牧场的纠纷，然而策旺阿拉布坦拒绝。为防策旺南扰，清王朝派总兵路振声驻防哈密，派吏部尚书富宁安率师援剿，分兵赴噶斯口，征外藩兵集中归化，派满军及索伦兵赴推河，右卫将军费扬古总理军务。因清军防守严密，策旺才未敢南下骚扰。

根据1722年沙俄派往准噶尔部的使臣温可夫斯基记载：珲台吉(即策旺阿拉布坦)控制下的诸民族除厄鲁特蒙古人以外，还有哈萨克人、乌梁海八、特楞古特人、叶尔羌的布哈拉人、布鲁特人、马拉宾人等。其军事力量达到了整个新疆地区和哈萨克草原东南部以及锡尔河中游一带。康熙五十四年，沙俄派出一支3000军人的侵略军侵入准噶尔达布逊

淖尔(亚梅什湖)地区，企图建立要塞以作为进一步南下叶尔羌的基地。策旺阿拉布坦派出万余人迎战，粉碎了沙俄的侵略扩张计划。策旺抗击沙俄的亚梅什湖之战是正义的自卫反击战，其意义应予肯定。但策旺的野心越来越大，随着准噶尔部的发展和逐渐强盛，西藏成了他进一步扩张割据的新目标。

侵略西藏清政府和西藏地方的最初联系发生于清兵入关前。1639年(崇德四年)，皇太极致书达赖，宣布清政府尊崇西藏佛教势力最大的教派——黄教的政策。此后，西藏地方各个方面的统治者主动与清朝建立联系，他们的行动在客观上明确地反映了祖国强大的向心力的作用。

十六、十七世纪，西藏的黄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准噶与厄鲁特其它各部都普遍接受了黄教，这种宗教信仰上的一致，把蒙古和西藏两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西藏黄教的最高首领达赖喇嘛在信仰喇嘛教的蒙藏人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两地许多重大活动，诸如会盟、战争、部落间的交往等都是在达赖喇嘛的名义下进行的，正如康熙大帝所言："蒙古素崇佛教，有达赖喇嘛名，皆归响之"。于是，神王达赖喇嘛就成为蒙藏各派政治势力争权夺势的工具，因为凭借达赖喇嘛的教导权威就可以在蒙藏宗教社会产生广泛的号召力。策旺阿拉布坦必然对西藏的局势倍加关注，这是与他日益膨胀的野心相一致的。于是当西藏的政局陷于混乱时，策旺便急不可耐地出兵西藏了。

这时青海厄鲁特蒙古中的和硕特控制丁西藏，建立了由和硕特蒙古与黄教的联合统治。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及其子孙一直与清朝中央政府保持着臣属关系。十八世纪初，达赖汗的儿子拉藏汗继承父位后，更"明确地站到了中国(按：指清朝)一边"。然而由于拉藏汗在宗教策略上的某些鲁莽轻率行为，明显地把自己置于与黄教寺院集团相对立的地位，在围绕达赖喇嘛继承权的问题上，西藏地方两派政治势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乃至兵戎相见，使西藏陷入内乱之中。

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第巴(按：由达赖与顾实汗共同委任的负责西藏政务的官员)桑结公布达赖五世园寂，同时指定自己择定的转世灵童为达赖六世，拉藏汗则视之为假达赖，并向清廷上报他"行为不端"。1704年双方发生冲突，并率兵从其在藏北为驻地进军拉萨，逼迫第巴桑结退位，由他的儿子继位为第巴。1705年战争又起，藏兵战败，第巴桑结被杀。拉藏汗又扶植了新的达赖，然而"青海诸蒙古，复不信之"，于是西藏存在着一股反拉藏汗的强大潜流，局势更加动荡。

西藏局势的动荡和变化关系策旺阿拉布坦的切身利益，因为他对西藏的侵略野心是蓄谋已久的。策旺表面上通过与拉藏汗联姻的关系，先娶拉藏汗姐姐为妻，而后又招拉藏汗长子丹衷为婿，借以麻痹拉藏汗以便插手西藏事务，暗中却与第巴桑结相勾结，所以策旺的分裂活动是与西藏地方割据势力遥相呼应的，他们俩一拍即合，双方在反对拉藏汗，抵制清廷的统一方针方面是互相默契的。1717年策旺出兵西藏的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它是继噶尔丹叛乱之后，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统一集权与分裂割据两派政治斗争在军事方面的具体体现。正在这之前策旺阿拉布坦刚刚取得反沙俄侵略的胜利，并缴获了大量军需充实了自己的力量，然后乘着战胜的余威，策旺发兵南下，发动了对西藏蓄谋已久

的侵略战争。

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冬，策旺阿拉布坦派出了两支军队，一支由其表弟大策零敦多卜率领，另派一支300人的部队穿越新疆东部地方前往青海塔尔寺，企图劫持达赖喇嘛噶桑嘉错。他认为“一旦他掌握了那个灵童，整个西藏就会欢喜若狂地迎接他们，征服西藏就会成为一场不流血的战争”。然而这支东进的小部队还未到目的地，就被清军击败了。

大策零敦多卜所率的6000精兵“徙步绕戈壁，逾和阗南大发山；涉险冒，昼伏夜行”，于次年7月，由藏北腾格里海直入西藏。经过两、三个月的激战，拉藏汗军战败退守布达拉城，同时派使者向清朝求援。11月下旬，准噶尔军队四面包围了拉萨城，并与城内的间谍取得了联系。11月30日午夜，准噶尔军从四面向拉萨发起进攻，围攻布达拉宫，杀死了拉藏汗并凶残地屠杀城内军民，整个拉萨城血流成河。准噶尔军队在占领拉萨城后，抢劫三日，古城拉萨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劫难，辉煌壮丽的布达拉宫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出兵平叛为了维护西藏地方的和平统一，平定准噶尔叛乱，清政府先后两次出兵西藏。

第一次用兵是在康熙五十七年三月(1718年4月)，清廷派西安将军额伦特和侍卫色愣各率兵自青海入藏，由于仓卒进军而且是孤军深入，轻敌冒进，再加上兵力薄弱，在喀喇河(即黑河)一带相持一月，终因“军中食尽”，不幸败没，额伦特战死疆场。

康熙认为：“西藏屏藩青海、滇、蜀”，是中国重要的边防地区，倘为准噶尔部割据，则“将边无宁日”。为了维护边疆的统一，康熙决定第二次出兵平叛。鉴于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清廷对这一次军事行动做了充分的准备，厚集兵力，备足粮饷。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命皇十四子胤为抚远大将军，“驻节西宁，调饷征兵”，指挥进藏平叛的各路清军，以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协助办理军务。以平逆将军延信等出青海，向黑河进兵，是为中路；由定西将军噶尔弼，付将兵钟琪等率军出打箭炉，从四川入藏，是为南路；又派将军傅尔丹、富宁安分别自巴里坤、阿尔泰出师，“以猎其北”，防止准噶尔部向西藏增兵。

为确保战争的顺利进行，清廷又及时地安抚藏蒙人民并顺应当时大多数憎俗民众的意愿，正式册封塔尔寺的噶桑嘉措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宣布派兵送往西藏坐床。同时清廷又责令抚远大将军胤遣使与准噶尔叛军商谈，试图和平解决事端，但却被策旺阿拉布坦野蛮拒绝。

康熙五十九年春，噶尔弼率领南路军从四川出发，六月攻克察木多，从容进军，秩序井然，一路各土邦纷纷率部归顺，势如破竹，准噶尔部的几支军队闻风溃散，八月占领了拉萨，逮捕了101名准噶尔充当间谍的准噶尔喇嘛，将为首5名斩首示众，打击了准噶尔部在西藏的割据势力。

在南路军入藏的同时，中路军在延信的率领下，自西宁出发，青海蒙古各部”汗、王、贝勒、台吉，各自率所部兵或数千或数百，随大军扈从达赖喇嘛入藏，军容甚盛”，受到西藏僧俗民众的热情迎接。大军驻扎在青海南境，先后在薄克河、齐嫩果尔和楚玛拉等地三次打败了截堵的准噶尔军，八月底进驻黑河。大策零敦多卜不敢退回拉萨，“计穷力竭，狼狈而遁”，率残部逃回伊犁。据记载，准噶尔入藏军队6000人，只有

500人得以生还。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在将军延信的坚持下，“在晴朗的天气中，举行达赖喇嘛坐床“大典”，当地僧民欢呼雀跃，各复生业，西藏的社会秩序被逐步安定下来。

这次战争，清朝驱逐了侵扰西藏的准噶尔军，恢复了西藏地方的社会秩序，维护了祖国的统一，解脱了西藏人民的灾难，是一次值得肯定的进军。随后清朝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并开始在西藏留有驻兵，从此西藏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清王朝为了巩固边防，防止策旺阿拉布坦再惹事端，决心增兵吐鲁番，屯田备边。这一举措乃与清廷派兵驻藏是相一致的。康熙六十年八、九月间，清廷先后派副都统庄图、穆克登各率兵2000人进驻叶鲁番，由阿喇纳统一指挥。阿喇纳军在途中与旺军相遇，清军分三路突入准噶尔阵内，策旺阿拉布坦败入林中，弃马步战，边战边退。清军以火器射击，杀死杀伤准噶尔军百余人，准噶尔军溃不成军，清军乘胜追击数10里，俘获了众多的叛军。

准噶尔军民的抗俄斗争准噶尔人民在与沙俄的长期“交往”中，早已识破沙俄口蜜腹剑的伎俩。十七至十八世纪之交，俄国正是野心勃勃的彼得一世在位时期，在与欧洲列强争霸的同时，沙俄也在东方极力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屡次派军侵犯、骚扰我东北和西北的边疆，为此清政府进行了强硬的反击，准噶尔人民也坚决反抗沙俄入侵，亚梅什湖之战就说明了准噶尔人民不容外敌侵犯，保家为国的决心。

但沙俄侵略者贼心不死，在亚梅什湖战败之后，又组成了400多人的一支侵略军。试图侵入斋桑湖，在湖边修筑城池要塞，以伺进侵略我国西北。但这支侵略军又遭到噶尔军民2万人的截击，不得不灰溜溜地退回老巢托波尔斯克。

到了1721至1722年，策旺阿拉布坦的势力被清军逐出西藏之后，处境十分狼狈，为摆脱困难而表示愿意向沙俄让步。沙俄政府以为有机可剩，立即把侵略魔爪伸向准噶尔部，劝诱策旺臣属于俄国以求得到俄的庇护。然而在准噶尔人民面前，策旺拒绝了俄的威胁利诱，坚持了严正的立场，“拒绝转入俄罗斯国籍，并且没有接受翁科夫斯基所提出的关于在汗国领土上修筑要塞并派俄军驻防其中的建议”，这说明准噶尔人民是爱国的，因此沙俄翁科夫斯基使团在准噶尔活动的两年内，处处碰壁，一事无成。

铲除青海叛乱1723年(雍正元年)，准噶尔汗策旺阿拉布坦支持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乘抚远大将军胤回京奔丧之机，公开发动了武装叛乱。

罗卜藏丹津是顾实汗之孙，于1714年继承了其父的和硕亲王爵位并于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作为青海和硕特代表“率所属兵”，参加了清军护送达赖喇嘛入藏的队伍，但在顾实汗死后(顺治十三年，即1656年)，青海和硕特便失去了统一各部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出现了王公贵族相互纷争，成为清政府西北地区的“边患”。直到清政府平定噶尔丹叛乱后，才与和硕特部建立了松散的联系，和硕特部地方割据势力仍十分强大。清军进藏后，加强了对西藏政府的管辖和控制，从此结束了和硕特蒙古对西藏的统治。由此罗卜藏丹津怀恨在心，因他一直怀有“阴觊先人霸

业，总长诸部”的政治野心。罗卜藏丹津本是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中唯一的亲王，爵高位崇，在他看来他理应接替拉藏汗而统治西藏，然而事实都恰恰相反，罗卜藏丹津不仅没在西藏获得任何权势，反而受到了清政府的抑制与削弱。因此，罗卜藏丹津对清廷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代表青海割据势力，与策旺相勾结，悍然发动了反清的武装叛乱。

1723年(雍正元年)8月，罗卜藏丹津胁迫青海各台吉(即首领)于巴尔巴罗海会盟，自称为达赖珲台吉，强令诸台吉“呼旧名号，一律不许呼王、贝勒、贝子、公封号”，拒绝者则遭攻击，于是如亲王察罕丹津等，率妻子及所属百40余人，至河州老鸦关外，向清朝求援。

清廷闻变后，急令川陕总督年羹尧率军前往平叛，一面命侍郎常寿去罗卜藏丹津驻地沙拉图宣布圣谕，令其“罢兵和睦”，遭拒绝，常寿反遭拘禁，罗卜藏丹津与同党阿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等益肆猖狂。

雍正元年十月，叛军首先在西宁府周围的南川申中堡，西川镇海堡与北川新城等发动进攻，“每处有贼二三千人，以势驱逐附近番子，攻城放火，烧毁民间积聚草谷，抢掠财物”，同时，西宁附近喇嘛寺院的僧人也受到蛊惑而叛乱反清。

年羹尧被封为“抚远大将军”，征调川陕官兵进驻西宁。清廷又命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为防叛军内乱，清军分布于永昌布隆吉河、巴塘、里塘，黄胜关等处，防止与准噶尔部沟通。清军部署就绪后，便分兵进攻西宁周边各处叛军。罗卜藏丹津率军西逃。于是镇南、申中、南川、西川、北川等地尽为清军收复。清军在解决了周围的战斗之后，平叛战争便进入专门讨伐罗卜藏丹津叛军的阶段。年羹尧采取岳钟琪“乘春草未生”“捣其不备”的作战方针，于雍正元年二月八日，分兵三路进剿：总兵吴正安由北路；总兵黄喜林出中路，岳钟琪与侍卫达鼐由南路进剿判军，大败罗卜藏丹津于柴达木，罗卜藏丹津“衣番妇衣，携其妻妾，走噶尔顺”，以后又逃到准噶尔策旺阿拉布坦处。

这次平叛战争用兵神速，大获全胜。据清朝官书记载：“计师行深入，自雍正二年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仅旬有五日，成功之速，为史册所未有”，雍正皇帝也把这次战役的胜利，看作“十年以来”从所未立的“奇功”。

罗卜藏丹津叛乱被平定之后，清廷对青海蒙古各族加强了管理，共编为29旗，还规定了会盟与朝贡制度；在经济上采取了发展农牧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的措施；清廷将一度作为地方割据势力主要支柱的喇嘛教寺院置于政府控制之下。不久，清廷对青海地区的行政建制作了重大改革，1725年(雍正三年)改西宁卫为西宁府，从此，青海地区完全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

清军平定西藏阿尔布巴叛乱清军收复青海后，阿拉布坦苏巴泰不肯臣服，经常出兵截饷戕吏，威胁清军安全。年羹尧派兵进讨，追至墨尔，阿拉布坦苏巴泰战败而逃。这时西藏又发生内乱，在准噶尔部的支持下，被封为贝子的阿尔布巴等与清廷册立的贝子康济鼐争权，兵戎相见。

清朝派吏部尚书查郎阿率川、陕、滇兵1．5万人进讨，直捣拉萨。清驻藏大臣马喇、僧格等到布达拉保护达赖，并将叛军首领阿尔布巴擒

获，待查郎阿军抵布达拉时，西藏内乱已平定，清兵对首逆及其家属尽行诛戮，维护了西藏地方的和平。

击退廓尔喀入侵清廷于1727年(雍正五年)设立了驻藏大臣，加强了对西藏的管辖。颇罗鼐在平定阿尔布巴叛乱中因功而被升为郡王，“克尽忠诚”管理藏务。但当颇罗鼐死后，其子诛尔墨特那木扎勒在承袭了郡王爵位，企图独揽大权，与达赖喇嘛发生冲突，于1747年(乾隆十二年)发动了叛乱。清廷密令新任驻藏大臣傅清务必诛杀叛乱分子。然而叛军党羽众多，气焰嚣张，傅清被迫自杀。清廷于是急调四川总督策楞与提督岳钟琪率兵入藏平叛。但在西藏，由七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僧俗人员齐心协力，已经镇压了叛乱。清廷于1750——1751年间对西藏的政体进行了改革，废除了西藏郡王的授封，规定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由4名噶隆联合组成，并相应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此后西藏政局维持了近40年的稳定。

十八世纪末，廓尔喀族统治了尼泊尔之后不断四处扩张，并发动了对西藏的入侵。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族派兵进犯我西藏的聂拉木、宗噶、济咙等地。清廷派巴忠等率兵入藏援助，巴忠办事不力，谎报廓尔喀已退兵以蒙骗清廷，从而使廓尔喀得寸进尺，并与西藏的叛乱分子勾结，派兵侵略日喀则，四处杀掠，使西藏僧俗人民遭受到巨大灾难。而驻藏大臣保泰闻讯不作抗击，却打算将达赖与班弹“移至泰宁”。清廷连派福康安为将军，调兵入藏，得到藏民的欢迎和支持。清军很快驱逐侵略者，廓尔喀统治者向清廷保证，永不再侵犯西藏。清廷决定大力整顿和改革西藏的政治与宗教制度。1793年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从而大大加强了清廷对西藏的管辖。

第四节 准部烽烟再起清廷维护统一

科舍图之战青海和硕特首领阿卜藏丹津叛乱失败后逃亡准噶尔，受到策旺阿拉布坦的庇护。清廷多次令其献出叛贼但策旺拒不从命。

雍正五年(1727年)，策旺阿拉布坦死，长子噶尔丹策零继位，“狡黠好兵如其父，屡犯边”，继续庇护罗卜藏丹津，并且多次骚扰清兵。雍正帝认为，噶尔丹策零的分裂力量迅速扩大，而且气焰嚣张，“若不迅行扑灭，将来必为蒙古之巨害，贻中国之隐忧”，因此，雍正帝决心继承康熙的未竟事业，力排众议，以武力平定准噶尔以维护统一。

雍正七年(1729)年三月，命傅尔丹内大臣为靖边大将军，率2．6万余人屯驻阿尔泰山地区的科布多(今蒙古吉尔格朗图)出北路；命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率2．9万人进驻巴坦克坤(今属新疆)，出西路，准备次年进攻伊犁的准噶尔部。

噶尔丹策零十分狡猾，闻听清廷出兵，立刻向清廷遣使求和，并愿献出罗卜藏丹津，结果雍正帝中了噶尔丹策零的缓兵之计，下令两路军队暂缓进兵，并传傅尔丹和岳钟琪回京议事，两路大军屯驻于哈密至巴里坤之间的科舍图岭，这里有优良的牧场可供清军兵马休整。这样一来，清军丧失了警惕性，四川提督纪成斌和副将巴赛代管西北两路军务也掉以轻心，在科舍图牧场四周并未派重兵防守，而部将们“避寒山谷间，日置酒高会，挟娼妓以为乐”。雍正八年冬(1730年)，噶尔丹策零率2万兵马突袭科舍图岭，清兵措手不及，总兵樊廷、副将冶大雄匆忙以2000兵力拒敌，总兵张之佐则在后夹击救援，力战7昼夜，夺回被准噶尔掠走的驼马大半，其中总兵曹勃在仓卒出兵后全军覆没，仅他1人死里逃生。情况紧急，清廷乃命付尔丹、岳钟琪火速返回科布多、巴里坤，迎击噶尔丹策零军，策零军闻讯溃逃。

和通泊之战清军北路军统帅傅尔丹于四月进屯科布多。雍正九年(1731年)，噶尔丹策零欲伏击北路清军，乃派间谍向清军诈降，诡称噶尔丹策零大军未到，仅有小策零敦多布率军“不过1000”，驻于距清营，“止三日程”的察罕哈达，而大策零敦多布因“途中有病，留驻和博克山”。傅尔丹轻信其言，贸然遣兵万余名前去迎击，将大军分为三路，由科布多河西路轻装前进。同时，令都统衮泰、总兵胡杰率兵7300名，留守科布多。令都统陈泰、副都统阿三率满兵2000，驻扎科布河东，扼守通往奇林的要路，与衮泰互为应援。

傅尔丹率军连夜袭击察罕哈达，结果扑空，又掳敌探，供称有驼马10万、兵2000现屯博克托岭。傅尔丹一再受骗仍执迷不悟，先后共派4500兵力前往袭击，准噶尔军以少数兵力及牲畜诱清军深入，而将主力2万兵力埋伏于山谷中，专等清军上钩。

十八日，清军前锋兵在库列图岭与准军遭遇，一经交锋，敌军即丢下400余具尸体，驱驼马越岭而逃。傅尔丹喜不自胜，下令穷追不舍。十九日清军三队会师，共同往山中剿匪，正入敌人的包围圈。准军居高临下，万箭齐发，顿时“笳声远作，毡裘四合，如黑云蔽日”，把傅尔丹前锋400人马紧紧包围在和通泊地方(位于科布多西200里，也称和通淖

尔，和通呼尔哈诺尔等，意为大湖泊)。傅尔丹又派6000兵马前往援助，但因天气突变，风雨交加，未能缓解危机局面。二十二日，东、西两队清军突围失败，绝大部分官兵被杀，高级将领定寿、素图，马尔齐等皆战败自杀，二十三日，敌军集中优势兵力，环攻和通泊的清军大营，傅尔丹率军苦战，杀死敌兵500多人。科尔沁王所率的蒙古兵临阵脱逃，于是军心大乱，清军全无斗志，顷刻瓦解，伤亡惨重。傅尔丹勉强拼凑起4000名残兵坚持奋战，且战且退，逃回科布多时仅剩散兵2000余人。

和通泊战役，清军的损失十分惨重，西路清军共3万人，逃回科布多时仅剩余2000人。这次战役所以遭到惨败，是“将帅骄慢”所致。由于轻信噶尔丹策零的诡计，丧失警惕，而且冒然出兵，三队人马缺乏密切配合。相反噶尔丹策零则成功地利用了清军自恃强大的弱点，使用缓兵之计，诱敌深入，设埋伏围歼了清军。

战后，噶尔丹策零进一步滋长了扩展势力的野心。他在西、北两路备兵，“令诸台吉环峙乌鲁木齐”，以伺清军的西路，“又屯田于鄂尔齐斯河”，以窥清军北路，并把主攻方向放在北方的喀尔喀。

清郡王额附策凌重创准噶尔傅尔丹兵败回科布多之后，向雍正上书自请处分，被降为振武将军，而噶尔丹连连取得了科舍图及和通泊两次战役的胜利，洋洋得意，又令大、小策零敦多卜和多尔济丹巴统兵3万东征喀尔喀。准噶尔军探得察罕瘦尔和科布多等地均屯驻了清兵，乃取道阿尔泰山迤南向东进军，大策零的军队直抵克鲁伦，掠夺喀尔喀牧民的牲畜，使鄂尔海、喀喇乌苏等地百姓受到惊扰。喀尔喀亲王额驸策凌与亲王丹津多尔津合兵迎击于鄂登楚勒河。策凌派出600骑夜闯准噶尔兵营诱其出击，准噶尔军不知是当，追击时遭到策凌兵的埋伏，于是准军大败而逃。

鄂登楚勒河的战败并没有改变噶尔丹策零的野心，他又于1732年(雍正十年)派兵6000人，自乌鲁木齐进攻哈密。岳钟琪遣总兵曹勤等在二堡截击，结果因坐失良机而放走了敌军，为此岳钟琪受罚连降三级，撤去统帅之职，清廷令张广泗代理大将军。

1732年6月，噶尔丹策零又令小策零敦多卜领兵3万进犯阿尔泰，敌军此行“志欲抢夺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侵掠喀尔喀部落，直越察罕叟尔大营，由杭爱山肆行猎獗”。清廷颇有才干的顺承亲王锡保刚被封为靖边大将中后不久，由于弄不清敌兵作战计划，于是采用分兵把守、伺机而动的战术，在各关口派驻了绿营兵和满蒙兵，以相互照应。

当准噶尔军探知喀尔喀亲王额驸策凌“偕将军塔尔岱青，御之于本博图山”时，决定偷袭塔米尔河额附策凌的牧地，以“掠其子女牲畜”。策凌闻讯，怒不可遏，一面派军向东驰救塔米尔，一面急报锡保，请求派兵夹击。策凌亲率蒙古兵2万，“夜半绕涧道出山背，迟明，自山顶大呼压下”，准军梦中惊醒，弃其辎重，“仓皇奔溃”。策凌率军追击，沿途交战10余次，大败小策零敦多卜。

八月四日，策凌追击小策零敦多卜至杭爱山南麓的厄尔德尼昭(即光显寺)，此地“左阻山，右限大水”，道路狭窄，大喇嘛寺即光显寺横卧于谷中，致使小策零军队拥挤不堪，行动迟缓。清军在此布阵，将小策零敦多卜的3万人马压缩在狭谷中，乘夜猛攻，“乘势蹴之，击杀万余，尸

满山谷，河北数10里皆赤”，清军歼敌2万余人，只有小部敌兵在小策零敦多卜的带领下趁黑夜突围，清军取得重大胜利。

八月九日小策零敦多卜在败退过程中派兵2000进犯西尔哈昭，在这之前锡保已令绥远将军马尔赛、建勋将军达尔济率所部兵马在途中截杀。西尔哈昭城由内大臣马兰泰精选精兵1100名出城迎战，大败敌军。而绥远将军马尔赛却按兵不动，在驻地扎克拜达里克城旁观，而该城万余名将士却“无不踊跃奋经，有灭此朝食之心。而马尔赛立意坐视，按兵不动，同事之大臣等，再三约会陈说，马尔赛坚执不从。傅鼐以机不可失，情急于跪求，而马尔赛始终不允”。次日晨，众将登城亲见残敌狼狈而逃，再次请求开城追击，马尔赛仍固执已见，坚持闭门守城。参赞胡琳、傅鼐出于义愤难忍，不待将令即擅自率兵出城追敌。马尔赛被迫同意出兵，但又领兵缓行，不敢急退，甚至仅派700名士兵前进追击，谎称敌人已逃跑，竟自收兵。

战后，雍正帝赏罚分明，郡王额驸策凌战功卓著被晋封为超勇亲王，赐黄带，并令其“佩定边左付将军印，进屯科布多，授盟长便宜行事”。清廷又从土谢图汗部分分出21旗，隶属于额驸策凌的赛音诺颜部，“由是赛音诺颜部邕为大扎萨克，与三汗部并列”(按：另三汗部是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扎萨克图汗部)。至此，喀尔喀蒙古乃分为4部。同时，清廷斩杀了“闭关不出”，贻误战机的马尔赛；将疏于戒备、战斗不力的锡保撤职削爵；另以平郡王福彭为定边大将军驻守乌里雅苏台(今蒙古扎布哈朗特)。

雍正十二年(1734年)，西路清军又大败噶尔丹策零军于布隆吉大坂。

自光显寺一战之后，准噶尔部损失严重，可谓元气大伤，转而遣使向清廷求和。而清政府连年于西、北两路用兵，也感到要休养生息。雍正帝按照康熙帝的密谕：贼巢逖远，我师往则我师劳；贼师来则贼师困，唯有严兵诱致邀击为万全策，决定休兵议和。

自1734年(雍正十二年)至1739年(乾隆，四年)间，双方派人几经交涉，终于划定了喀尔喀与准噶尔牧区界限，以阿尔泰山为界，厄鲁特各部游牧不得越过界东，而喀尔喀4部则不得越过界西。这样，噶尔丹策零之乱终于平息。清廷与准噶尔部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得到暂时缓和，双方维持了近20年的和平局面。

第五节 乾隆出兵伊犁准部叛乱平息

雍正十二年(1734年)，噶尔丹策零叛乱被平定之后，清廷与准噶尔部休兵议合，并在准噶尔部所属的厄鲁特蒙古和喀尔喀蒙古之间划定了牧场界限，又许通商互市，进藏煎茶。一时间，中国西北边疆出现了少有的祥和局面。清廷虽下令罢征，但仍在北路的乌里雅苏台和西路的哈密、巴里坤等战略要地，留下了一定兵力以屯田戍边。20年之后，准噶尔内部又起内讧，大策零敦多卜之外孙阿睦尔撒纳趁机扩大势力，再次将西北边疆各族人民推进了战乱的深渊，沙俄侵略者意欲趁乱插手。为此，乾隆帝不遗余力坚决、果断地出兵，平定了这次叛乱，从而使自康熙朝开始的历时70年的准噶尔部在西北的叛乱被彻底铲除。

准部起内讧清兵攻伊犁乾隆十年(1745年)九月，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部的封建王公贵族为争夺汗位，出现了纷争。噶尔丹策零留下三子，长子喇嘛达尔札19岁，次子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尔13岁，幼子策妄达什7岁。众方欲立长子喇嘛达尔札，但元老贵族如大宰桑衮布等以长子系庶出不得立为由，要求立嫡出的次子策旺多尔济?纳木札尔，“以母贵嗣汗位”。然而年纪最小的策旺达什却为准噶尔部权势显赫的大小策零敦多卜所拥护。各派之间明争暗斗，愈演愈烈，终于兵戎相见，致使准噶尔部一片混乱。

策旺多尔济?纳木札尔继位后，为政残暴，诬说其姐鄂兰巴雅尔“欲效俄罗斯自立为扣肯汗(即女皇)拘而系之”，并“处死了许多名宰桑”，而且他“童昏无行”，肆意荒淫，不得人心，从而引起准噶尔内部多数贵族的强烈不满，但这时准噶尔部尚与清廷保持着较为正常的隶属关系，所以准部的内讧没引起清廷的重视。

乾隆十五年(1750年)，策旺多尔济?纳木札尔的姐夫萨奇伯勒克联合大宰桑衮布等有权势的人物“助其庶兄喇嘛达尔札攻而弑之”，策旺多尔济?纳木札尔被剜去双目后囚禁在阿克苏，从此喇嘛达尔札取得了准噶尔部的汗位即大台吉之位。

喇嘛达尔札继位后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对外要抵制沙俄的野心：贪婪而强大的北部近邻俄罗斯不断地向南蚕食扩张，侵占了准噶尔在额尔齐斯河及额敏河等地的一些土地，在那里筑堡、捕兽、挖金、取铜……。为此，噶尔丹策零在位时曾向沙俄提出的警告，但沙俄贼心不死，仍在我国西北边疆虎视眈眈。而现在准噶尔部的内乱无疑给沙俄向我国边境渗透带来了绝好的机会，对此，喇嘛达尔札感到对付沙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准部的内乱并没有停止，他无暇外顾。

一直拥戴策旺达什的策零敦多卜的达什达瓦(系小策零敦多卜之子)联合同绰罗斯家族有亲密血缘关系的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与和硕特部台吉班珠尔，共同谋划拥立策旺达什为汗。结果计划泄露，喇嘛达尔札杀死了策旺达什以及达什达瓦，从而造成了准部更大的混乱，却不料给出身于辉特部的阿睦尔撒纳以可乘之机。

阿睦尔撒纳身为辉特部的台吉，却是策旺阿拉布坦的外孙。他身份特殊，自觉有权插手准部的内政。当谋立策旺达什的计划破产之后，他

转与大策零敦多卜的孙子达瓦齐相勾结，双方建立起反喇嘛达尔札的联盟。而这个达瓦齐“依照传统的习惯，达瓦齐有合法的继承汗位的理由”。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率精锐骑兵1500名，突袭准噶尔部的行政中心伊里(即伊犁)，杀死喇嘛达尔札，结果达瓦齐名正言顺地继承了汗位。然而达瓦齐也是一个庸才，终日狂饮，不理政事，很快就失去了人心。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的联合本来是相互利用，当他们共同的敌人被打倒后，他们内部又产生了矛盾。阿睦尔撒纳野心膨胀，为了扩展实力，他袭杀了他岳父并抢占其牧地，从原来游牧的塔尔巴哈台地区迁帐于额尔齐斯河，直接与据守伊犁的达瓦齐势力发生了冲突。据俄国档案资料记载，他们双方发生火并是在1754年春夏之间(乾隆十九年)。这时阿睦尔撒纳已经控制了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当他进一步企图与达瓦齐分辖准噶尔诸部时，双方进行了战争。起初阿睦尔撒纳“集聚各地约6000士兵的部队”进攻达瓦齐，而达瓦齐也调重兵迎战，双方激烈撕杀后，阿睦尔撒纳战败。无奈，他率所部2万余人，投归了清朝政府寻求庇护。

阿睦尔撒纳并不是真心真意投归清朝，而是想利用清朝中央政府的兵力，消灭其政敌达瓦齐。1754年冬，他在热河被乾隆召见，封为亲王，同来的纳默库、班库尔被封为郡王，部属2万余人被安置在喀尔喀扎布汗河一带游牧。阿睦尔撒纳力陈“伊犁可取状”，请求清廷出兵，攻打达瓦齐。随后，杜尔伯特部的三车凌——台吉车凌、车凌乌巴尔和车凌孟克一致认为，准噶尔内乱不止，无法安生，“依准噶尔，非计也，不如依天朝为永聚计”。于是率所部万余人摆脱达瓦齐的迫兵，归附清廷。车凌被封为亲王、盟长，部属安置在扎克特达里克游牧。以后，前来归附清廷的部族接连不断，准噶尔部达瓦齐的暴行已招致民怨沸腾，众叛亲离，事实更坚定了清廷出兵的决心。

清兵攻伊犁从十七世纪以来，准噶尔崛起西北，割据称雄，长期与清政府对抗，并且三番五次在周边付伐侵略，前后进犯过喀尔喀、青海及西藏等，干戈扰攘数10年，成为清政府统一、安定的主要障碍。在乾隆帝看来，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是头等大事，是祖、父(即康熙和雍正两朝)“筹办未竟之事”，“准噶尔一日不定，其部曲一日不安”。还在清军入关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就曾以极大努力，不仅争取漠南蒙古，而且争取厄鲁特蒙古和西藏达赖喇嘛。乾隆继位后，基本上继承了他父辈的方针，不同的是他更强调文治武功两方面同时并举。他认为，“驾驭外藩之外，示之以谦则愈骄。怵怵以威则自畏”，要“宽猛并济，恩威并用”。正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清王朝一方面用军队控制边疆，派大臣驻守各地，修建大量城堡、台站和卡伦；另一方面，又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施以恩德，通过联姻、封爵、给俸、年班、围班等形式进行拢络。在乾隆朝初年，准噶尔部在策旺和策零的统治下，政局通明，兵力强盛，这时清廷如果冒然出兵，长途跋涉，粮运不继，则势难取胜，雍正九年的和通泊之败即是前车之鉴。所以乾隆与准噶尔划定了牧区界线，求得暂时和平，彼此相安无事。到了策零死后，准噶尔内部纷争，局势大乱。达瓦齐夺得汗位，为掠夺财富和牧场，多次兴兵攻打各部，烧杀抢劫，以致众叛亲离。在准噶尔人民和上层统治者中间，归附清朝，拥护统一的倾向迅速地增强，他们盼望摆脱达瓦齐的专横统治，结束长期的混乱局

面。这样，就为清廷进行最后的平准战争，统一西北边疆创造了前提。

厄鲁特蒙古族象杜尔伯特部三车凌这样大规模内迁归清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反映了蒙古族人民对准噶尔部混乱和战祸极为不满以及他们要求统一安定的强烈愿望。乾隆通过三车凌进一步了解了准部的情况，决定出兵平准，剪灭割据势力。乾隆觉得事不宜迟，应该趁达瓦齐失去人心且又与哈萨克相争之机，分兵两路直逼伊犁，击败达瓦齐，然后再将蒙左各部分驻游牧。然而，满洲大臣策楞、舒赫德等都不主张出兵，惟有大学士傅恒支持出兵。乾隆决心已定，指出“天朝之于外藩，恭顺则爱育之，鸱张则剿灭之”。阿睦尔撒纳和玛木特趁机建议：“塞外秋弥时，我马肥彼马亦肥，不如春月乘其未备，且不能远遁，可一战擒之”。乾隆认为言之有理，遂将出兵时间提前到明春。

1755年(乾隆二十年)春，清政府命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分率北路和西路的厄鲁特哨探兵先行，提前三日出发。清廷以班第为定北将军，由乌里雅苏台出北路；以永常为定西将军，由巴里坤出西路，总计北西两路大军各有兵2．5万，马7万匹以及可供两月的粮秣，约定花博罗塔拉(今新疆博乐)会师后，直捣伊犁。与此同时乾隆颁布诏书，申讨达瓦齐的罪过，声明出师理由，号召达瓦齐不要与清军作对，如若痛改前非则将得到宽大处理”，“一体封爵，不令失所”。

在清军两路进攻之下，准噶军纷纷归降，“自大兵前进，准噶尔部落人众，各带领鄂拓克，陆续前来投诚者甚多”。清廷出兵深得人心，一路上大军所至，到处都受到准噶尔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欢迎，“各部大者数千户，小者数百户，无不携酒牵羊以降，兵行数千里，无一人敢抗者”。阿睦尔撒纳和萨喇尔各率数千精骑为先锋，打着本部旧旗，进展尤为迅速。达瓦齐匆忙应战，率兵数万人前往抵抗。5月初，清两路大军在博罗塔拉会师后，立即向伊犁挺进，达瓦齐军土崩瓦解，失去了抵抗力，清军几乎兵不血刃地进抵伊犁，而清军前锋部队都是归附的厄鲁特蒙古军。达瓦齐率亲兵万人退至伊犁西南的格登山(今新疆昭苏县苏木拜河东岸)，靠山临水，负隅顽抗。清军占据伊犁后，兵分两路渡过伊犁河，进军格登山。清军摸清敌兵布阵之后，连夜突袭敌军大营，并鸣枪呐喊以壮声势。敌军从梦中惊醒，不知虚实，惊愦奔散，自相践踏，乱作一团。达瓦齐仅带2000精兵逃往南疆。次日黎明，阿睦尔撒纳收缴敌军数千人，青海叛乱头目罗卜藏丹津也被抓获。

清军一面追击达瓦齐，一面通知南疆回城各部协助。南疆的维吾尔族纷纷响应清军，摆脱准噶尔统治，达瓦齐的小部队成了众矢之的。六月初八日，乌什城的阿奇木伯克霍吉斯得知达瓦齐将经乌什喀什噶尔，便设宴款待，趁达瓦齐等酒足饭饱之际，一举将他擒获．押往清军大营。不久达瓦齐被解押送往京师。乾隆帝为笼络准噶尔部，安抚人心，赦免达瓦齐并封其为亲王，领率旧属四五十户住在北京。

清军首次袭击伊犁，平定了达瓦齐的割据势力。这次胜利贵在抓住战机，进兵神速，而所需军费仅及康熙、雍正时西征的十分之一二。

清兵再攻伊犁阿睦尔撒纳早有图谋割据的野心。清军铲除达瓦齐割据势力，除去了阿睦尔撒纳的竞争对手，阿睦尔撒纳得意忘形了。乾隆一时没有看清阿睦尔撒纳的野心，以他在平叛军达瓦齐战役中的卓着战

功而特地晋封他为双亲王，食亲王双俸。被准噶尔拘为人质的4部首领也被放回天山南路。“于是天山南北二路皆不血刃而定”，西域似乎可以太平无事了。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阿睦尔撒纳又发动了叛乱，再次将西北各族人民推进战争的深渊。

尽管清廷对阿睦尔撒纳宠爱有加，但他欲壑难填，达瓦齐割据势力一旦被平定，阿睦尔撒纳隐藏着的攫夺厄鲁特部统治权的野心必然要显示出来，因为在西北他已经消除了敌手。清廷鉴于以经厄鲁特务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打算在定定伊犁之后，为彻底削弱准噶尔部的割据势力，采取“众建以分其力”的方针，把厄鲁特4部“封为四汗，俾各管其属”。因为乾隆帝心中明白，厄鲁特各部之间，分则力弱，互不统属，相安无事；合则力强，抗拒朝廷，叛乱迭起。乾隆帝主张恢复厄鲁特各部自立旧制，以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策凌为杜尔伯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噶尔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并以喀尔喀蒙古为例设立旗盟制度，以加强厄鲁特务部与朝廷的关系。这种设想是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和睦的，可是却与阿睦尔撒纳“必欲为4部总台吉，专制西域”的狂妄野心恰恰相反。阿睦尔撒纳利令智昏，想要继承达瓦齐的衣钵。当清军大部撤离伊犁之后，阿睦尔撒纳便胆大妄为起来。

一心想成为“四部总台吉”的阿睦尔撒纳，施用一系列阴谋伎俩，想让清廷承认他为厄鲁特4部总汗，清军主力一撤离，阿睦尔撒纳便在伊犁以总汗自居，擅自诛杀掳掠，擅自调兵遣将，“自用浑台吉菊形篆印”，而不穿清朝官服，不用清朝官印，行文各部，“以总汗自处”，四处招兵买马，竭力扩展割据势力，积极准备叛乱。

阿睦尔撒纳的嚣张引起了清廷的警觉，乾隆帝早在下令出兵征讨达瓦齐时，就曾密谕班第等人，要对阿睦尔撒纳“务须留心防范，慎勿任其所行”，又“示以分封四汗之意，以消其妄念”，令科尔沁亲王色布腾巴尔珠尔与之同行，暗中进行监视，色布腾巴尔珠尔等人胆小怯懦，缩手缩脚，并不能奈何阿睦尔撒纳。而班第则以兵少为由不敢向阿睦尔撒纳讨伐，乾隆被迫采取了新的对策。

1755年(乾隆二十年)9月，清廷命阿睦尔撒纳到热河避暑山庄入觐，实则是调虎离山之计，防患于未然。同时乾隆密令乌里雅苏台军营加紧备战，派纳木札勒和阿兰泰急速率兵擒拿阿睦尔撒纳、班珠尔等人的家属，促其部属向内地游牧以便于控制。狡诈的阿睦尔撒纳对清廷的用意已经察觉，在赴热河入觐的路上，一再拖延。阿睦尔撒纳从8月10日起程，沿途与明党密谋并不断打探清廷的动向。8月19日，行至乌隆古河，此地离其旧牧区札布堪不远，阿睦尔撒纳“回避众人，密商竟夜”，发觉自己的阴谋已经败露，处境危险，于是“诡言暂治归装”，将副将军印交给同行负责监视他的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然后绕道逃回塔尔巴哈台，公开扯起了反清叛乱的旗帜。

额琳沁多尔济继续前行，次日发觉阿睦尔撒纳潜逃后才发觉事情不妙，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于是一边派人报告班第，一边率300清兵追捕，但阿睦尔撒纳早已带着自己的320名亲兵逃之夭夭了。

阿睦尔撒纳叛逃之后，煽动同伙袭击清军，抢劫台站。当时驻在北疆的清军大部分已经撤走，仅有班第、鄂容安所率500清兵驻守在伊犁，处理善后，形势危急。8月24日，这500名清兵遭到阿睦尔撒纳的围

攻，班第被迫率百余名清兵从伊犁向崆吉斯撤退。29日，被困在乌兰库图勒，一路转战拚杀，这时清兵仅剩下60余人。因寡不敌众，班第、鄂容安兵败自杀。萨喇尔率兵百人自珠勒都斯撤退，结果全军覆灭，被俘押经伊犁拘禁。西路清军由永常统领尚有精兵5000余驻扎在乌鲁木齐附近，还有反对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准噶尔宰桑扎木参等带领的4000余士兵，人数众多。但永常闻变却不敢赴援，“疑其诈，挟宰桑为质，兼程欲走”，9月8日反而退到了巴里坤，甚至想继续后退到哈密。永常自顾自撤退，却置北路清军于不顾，以致“北路无声援，贼益猖獗”，从而使天山南北叛乱四起。

阿睦尔撒纳叛乱初起时，他仅有2000余兵力，围剿了清廷的数百名北路军之后，屯驻在博罗塔拉河，其余各部尚不敢相从。由于清廷西路军的疑惧退却，使叛军气焰嚣张。不久，喀尔喀和托辉特部封建王青滚杂卜也揭起了反清叛乱，并与阿睦尔撒纳相勾结。青滚杂卜曾随班第平定伊犁有功而被清廷授以喀尔喀副将军，封为郡王。由于喀尔喀大活佛的兄弟额琳沁多尔济因放走阿睦尔撒纳的罪名而被清廷“赐死”，引起了一些喀尔喀贵族的疑惧与不安，因而他们相继叛乱并互相勾结。青滚杂卜“自军营和行逃归，遂将伊(按：指青滚杂卜)卡伦、台站兵丁尽行撤回”，使清政府北路台站，从10台到26台，全部瘫痪，联络中断。

乾隆立即下令将永常革职治罪，命策楞为定西将军，达尔达阿为定边左副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哈达哈、玉保为参赞大臣，从巴里坤进军。在热河新封的绰罗斯汗噶尔藏和硕特汗沙克都、辉特汗巴雅尔、杜尔伯特汗车凌，也率所部兵随征。同时乾隆又命成衮札布等就近出兵，迅速镇压青滚杂卜的叛乱，消弱阿睦尔撒纳的力量。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哈达哈率北路军，策楞率西路军，分别向伊犁进军。行军途中，西路又兵分两路前进。西路先锋玉保率军行至特勒河(今新疆特克斯河)时，得到消息说阿睦尔撒纳已在雅木图岭被台吉诺尔布等擒获，玉保未加证实就信以为真，停兵不前并派人给策楞报捷。策楞立即向京师报喜。乾隆帝龙心大悦，立刻封诺尔布为亲王。直至内大臣鄂尔哲前往伊犁打听消息，才知阿睦尔撒纳被俘纯属误传。这时，阿睦尔撒纳军已离玉保的西路先锋队仅一日之程，于是玉保又请示策楞，策楞以军中缺马为由，与玉保相互扯皮，从而贻误了战机。阿睦尔撒纳见清军中了缓兵之计，便顺利地经过和尔郭斯并翻越库陇癸岭，逃入了哈萨克牧区。

同年五、六月间，乾隆因策楞、玉保谎报军情并且贻误战机、坐守伊犁而无所作为，下令将他们俩撤职治罪，押回京法办。同时，乾隆又令达尔觉阿为定西将军出西路，哈达哈为定边左副将军出北路，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驻伊犁为后援。清军分路追击，达尔觉阿出西路数千清军在雅尔拉遭到大力支持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哈萨克汗阿布赉手下的2000名哈萨克军，经过激战，清军冲破了敌兵的拦截，斩敌近600名。清军乘胜进军到达喇努，与阿睦尔撒纳的队伍相遇，清军一鼓作气再斩敌300多名。混战中，阿睦尔撒纳不敢恋战，生怕暴露身份和行踪，连忙让队伍换上蓝旗，他自己趁乱穿上别人的服装逃进了呢雅斯图山，该山距清军大营仅二三里远。阿睦尔撒纳此次损失惨重，部将宰桑扎南木被俘后，向清军招供了阿睦尔撒纳军队的虚实。这时，众将士要求追击阿睦

尔撒纳，关键时刻达尔党阿却又听信了谣言，坐等士兵们将已经俘获的阿睦尔撒纳送至营中，因而清军停止了追击，再一次中了阿睦尔撒纳的缓兵之计，阿睦尔撒纳再一次从清军眼皮底下从容逃脱。

清军的第二路由哈达哈统领的北路军，中途也同样遭遇到了哈萨克汗阿布赉的数千人军队的拦截，双方激战于巴颜山下，清军俘获了哈萨克族的头人之一昭华什，其余的哈萨克兵败逃。

西路清军会师后，不乘胜穷追，反而异想天开，派刚俘掳的哈萨克族的2名头人楚鲁克和昭华什前往说服近在咫尺的阿睦尔撒纳和哈萨克汗阿布赉。2名头人于是按照阿睦尔撒纳编好的谎言哄骗清军，即请求清军停止进军，哈萨克人愿意擒献阿睦尔撒纳，只等阿布赉见机行事，不可操之过急。就这样，两路大军按兵不动，再一次上当受骗。

清军将领指挥无方，一再受骗上当却执迷不悟，他们好大喜功却无能，有眼无珠愚蠢之至。这样，原来在伊犁战役中纷纷臣服清朝的厄鲁特各部首领更看不起这些清兵的将领了，认为他们是无能之辈，胆小怕事，不足以依赖，于是各族先后叛清。边疆的局势日益紧张，战乱四起，民不潦生。

驻守伊犁的清廷定边右副将军兆惠见局势不妙，急派宁夏将军和起率军讨伐巴雅尔叛乱，不料中途发生厄鲁特兵变，和起将军被杀。兆惠则亲率军队前往济尔哈朗镇压此起彼伏的叛乱，在鄂垒札拉图陷入叛军的包围之中，险象环生，兆惠沉着镇定，在夜间突袭敌军，成功地摆脱了敌人的包围，大败达什策零的叛军。之后，兆惠又带领大军战于库图齐、达勒奇等地，迅速平定这些地区的大小叛乱。二十二年(1757年)正月初五，兆惠军抵达乌鲁木齐，未等大军有片刻喘息，各路叛军已杀至乌鲁木齐城下。噶勒藏多尔济、扎那噶尔布、尼玛、哈萨克锡喇等叛军头目联合包围了乌鲁木齐。危急之中，兆惠率精兵冲出了包围，向巴里坤方向转移，各路叛军则在沿途围追堵截。兆惠军且战且退，伤亡惨重，退至特讷格(今新疆阜康)时，因“军士饥疲，不复能战，乃结营自固”。三十日，侍卫图伦楚率领约800名清兵自巴里坤前来迎接，与兆惠军相会，兆惠军才转危为安，叛军不敢恋战，解围而去。兆惠军重振士气，奋力追击，在穆垒河源追杀巴雅尔的叛军。巴雅尔本人却已逃之夭夭。兆惠军四处转战，历尽艰难困苦，力克叛军，多少换回了清军屡战屡败的名声。为此，清廷特封兆惠为一等武毅伯，授户部尚书，汉军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兆惠受之无愧，乾隆帝因兆惠所部仅千余人，且装备较差但却能孤军奋战，屡挫敌军而厚赏了兆惠，可谓赏罚分明、得当。

阿睦尔撒纳流亡哈萨克自觉不是长久之计，当他得知清军将领无能各部相继叛乱之后，得意忘形。他“闻四部构乱，亦自哈萨克归，会诸贼于博罗塔拉河，欲自立为汗，准部复大扰乱”。沙俄闻讯蠢蠢欲动，欲乘乱插手，阿睦尔撒纳也正需寻找后台，双方一拍即合，暗中勾暗。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上半年，阿睦尔撒纳派出以宰桑达瓦为首的使团去彼得堡，向沙皇奴颜卑屈：“阿睦尔撒纳愿意服从俄国女皇的旨意……请求俄国政府在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湖之间地区修建要塞，以防满洲人。他还请求俄国当局协助，使卫拉特人承认他为汗，并服从他的旨意”。阿睦尔撒纳为达目的不惜卖国求荣，其阴毒之心可见一斑。而俄国正忙于与普

鲁士争夺欧洲霸权，因此被卷入欧洲事务难以抽兵相助阿睦尔撒纳。但俄国决不会放弃这个有利时机，他们诱使阿睦尔撒率部加入俄国籍，迁居伏尔加河，或者在反清失败后到俄国避难。俄国人对中国内政可谓过分热心了，其目的则是不言而喻的。

针对当时喀尔喀蒙古与准噶尔地区愈演愈烈的叛乱形势，清政府采取了相应的平叛措施。当时，厄鲁特务部之间战乱不已，“自相吞噬”，加之“瘟疫盛行，死亡相望”，各族人民苦不堪言，流离失所。乾隆将清军7000人兵分两路：以成衮札布为定边将军，舒赫德为参赞，率北路军从珠勒都斯出发，以兆惠为伊犁将军，富德为参赞，率西路军从额琳哈毕尔噶出发。这是乾隆二十二(1757年)。清军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很快攻占了伊犁。清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克伊犁，震动了叛乱各部。清军锐不可挡，阿睦尔撒纳在清军围剿下仓皇失措，再次逃往哈萨克。

当时天山南路回部的形势也不稳，清军欲平定回部以防患于未然，然而再追击阿睦尔撒纳，为此受到乾隆的指责，乾隆“责兆惠与成衮扎布急回部，缓阿睦尔撒纳，失轻重”，于是兆惠，富德继续追击阿睦尔撒纳，进入了左哈萨克境内。五月底，清军在爱登苏一战击溃了强悍的哈萨克骑兵，昭萨克汁阿布赉被迫遣使到清军大营请降，以保全其百姓不受侵犯。不久，阿睦尔撒纳走投无路，率亲信20余人投奔阿布赉。阿布赉为向清军表白自己与阿睦尔撒纳决裂的决心，暗地设伏准备将其擒献给清廷。狡猾的阿睦尔撒纳有所察觉，于深夜狼狈逃往俄国，随身仅带了8人，犹如丧家犬一般，兆惠的军队对逃入俄境的阿睦尔撒纳无可奈何。

清朝政府对阿睦尔撒纳的漏网脱逃，深感忧虑，是清廷的心腹之患。乾隆认为阿睦尔撒纳虽然败逃，可他“不能久甘穷困，势必滋生事端，为患边境”，而俄国收留他，是准备“抚而用之”，“逆贼一日不获，西路之事一日不能告竣”，决心要把阿睦撒纳逮捕回来。因而下令理藩院向俄国政府发出照会，强烈要求俄国执行中俄两国以前已经议定的彼此不匿逃犯之条约。之前，当阿睦尔撒纳初入俄境后，清军曾两次派人与俄国地方官员交涉，但俄方借口推诿，拒绝交出阿睦尔撒纳。经清朝理藩院一再交涉，要求引渡阿睦尔撒纳。直到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俄方才正式通知清政府，说阿睦尔撒纳已经染天花病死，让中方派人到边境验尸。自阿睦尔撒纳叛逃之后，俄国西伯利亚总督“担心此事会泄露出去，就决定把阿睦尔撒纳安置在离托波尔斯克20俄里已经废弃的库杜斯克酒厂的一所房子里”。阿睦尔撒纳失去人身自由而染病客死他乡，这就是一个叛徒和卖国者的下场。俄国政府本打算借阿睦尔撒纳之手插手中国边境事务的梦想成为泡影。

准噶尔贵族掀起的叛乱虽至此结束，但它给本部人民造成了无比深重的灾难。除少数部民受到清廷保护之外，“计数10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

乾隆时期，在肃清了准噶尔部在青海和西藏的势力之后，于1755年和1757年两次派兵进攻伊犁，彻底平定了准噶尔部的长期叛乱。这样，清政府经过70年间连续对准噶尔部的用兵，最后取得了胜利。至此，在清帝国的康乾盛世之下，西北边疆的蒙古各部开始了祥和安定的生活。

历时70年平定准噶尔贵族的叛乱，清军之所以取得胜利，除了政治

上的原因之外，还有军事上的原因。首先，清廷出兵前，认真做好战争准备。准噶尔及其它蒙古各部地处荒漠，蒙古兵强悍骁勇，能骑善射。而大漠南北的环境对劳师远征的清军来说，却是严峻的考验。这里地广人稀，荒凉而且气候多变，供给困难。为了适应在这样特殊地理条件下的作战需要，清军海战都有针对性地备足所需要的物质、粮秣、马匹等，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当然这也是有清廷强大的物力财力作战争后盾，才能保证供给。所以清兵虽劳师远征，但粮草兵马源源不断调经前线，这些是平定边疆叛乱的物质基础。其次，清不打无准备之战，能依据客观情况，制订出切合实际的作战方针，当然也与一些著名将领知己知彼，富有军事经验有关。康熙时，根据准噶尔地处荒漠、辽阔遥远，清政府实力不足等情况，制定了“诱敌邀击”的方针。诱敌至漠南，断其后路，合击歼灭。康熙、雍正两朝采取的都是这一方针。乌兰布通之战是在叛军进至距京约700里之地的蒙古地区进行的。昭莫多之战，本来也准备将叛军诱至漠南，由于噶尔丹久踞漠北巴颜乌兰地区，康熙帝才根据形势的变化分路出击，取得了胜利。乾隆朝时，相对而言，清朝中央政府的实力增强，而准噶尔部叛乱力量却实力下降，因此乾隆帝采取了分兵两路、长驱直入、直捣伊犁的方针，从而取得了平叛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最后，清军在战争中善于发挥精锐部队的优势和先进武器的威力，在心理上和事实上给叛军以重创。乌兰布通之战，清军集中了大批火炮击破噶尔丹的“驼城”之后，才成为取胜的关键。昭莫多之战中，火炮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乾隆朝两次下令清军长驱直入攻克伊犁，主要靠的是精锐轻骑分兵进剿，叛军不知所措，以为是天兵天将来临。

当然，清军在几十年的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战争中，军事指挥上也有失误之处。主要表现在前线一些将领偏听偏信，多次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另外各路清军经常不能密切配合，有的甚至闭关自保，误了不少战机，致使战争拖延了70年。当然大漠南北艰苦恶劣的地理环境以及叛乱各部军队的凶悍，神出鬼没，也增加了清军平定叛乱的困难。

应该指出，清政府坚持几十年的平准战争对于恢复国家统一，挫败沙俄的侵略阴谋，维护西北边疆的和平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促进和加强了西藏、青海及大漠南北地区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密切联系。但不可否认，清政府实现平叛维护统一的军事手段是十分残酷的。由于准噶尔部几代首领长期割据叛乱，各族对清朝政府充满了敌视和不信任，同样，清朝统治者对叛乱各族也十分仇视和痛恨。因此，清军多次出兵平定叛乱时，驱兵直入，烧杀抢劫，波及无辜，“凡山陬水涯，可渔弥资生之地，悉搜剔无遗”，“草薙禽狝无噍类”。有些部落已经归降但因受清军怀疑，也悉数遭到屠杀。多年的战乱使天山北部一片荒凉。

清朝为加强对西北边疆的控制，在伊犁设立了驻防将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被准尔部逼迫西迁的土尔扈特部也于1771年从俄罗斯内迁回西北边疆，使北疆的形势进一步稳定。

第六节 南服回疆平定大小和卓木

清朝政府在平定了天山北路以准噶部为主的割据势力的叛乱之后，将天山北路归入清室版图，设宫筑城，安置百姓，发展生产。但时隔不久天山南路又爆发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清廷出兵迅速平叛，从而加强了新疆地区与清朝中央政府的联系。

库车之战天山南路的回部与准噶尔部只隔一山，回部政权落入回教上层人物和卓木之手。

和卓木意为穆罕默德之后裔，玛赫杜米?阿扎木，早年自中亚来南疆传布伊斯兰教，以和卓木自居，深受察合台汗后王拉什德汗崇信，其后代则世称和卓木，并形成白山与黑山两派，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察哈台后王伊斯耳汗支指黑山派，驱逐白山派领袖阿帕克和卓木出南疆。阿帕克和卓木向北疆准噶尔部求援，准部首领噶尔丹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派兵进踞南疆，将察哈台汗的后裔诸汗拘禁于伊犁(即迁往北疆)，而令阿帕克和卓木作为傀儡统治南疆。阿帕克和卓木死后，黑山和白山两派斗争又起，漠北的准噶尔部再次出兵天山南路，尽俘两派和卓木的后人并迁往伊犁。噶尔丹败亡后，阿帕克和卓“自拔来归”，清政府送他返归叶尔羌。至策旺阿拉布坦父子统治准噶尔部时，重又控制了新疆，时值阿帕克和卓的儿子玛罕木特为和卓，成为回疆维吾尔族人民“众所尊服”。准噶尔控制了玛罕木特，并令其“总理回地各城”。作为白山派的领袖，玛罕木特企图摆脱准噶尔贵族的统治，结果被噶尔丹策零掠至伊犁禁锢起来。玛罕木特的两个儿子，长子波罗尼都和次子霍集占就是所谓大小和卓木。清军平定准噶尔达瓦齐割据势力，进驻伊犁时，玛罕木特已死，他的两个儿子大小和卓木得到释放。这是乾隆二十年(即1755年)。清政府深知大小和卓木乃“回部头目”，于是派兵护送大和卓木波罗尼都返回故里叶尔羌，“使统回部”，而留小和卓木霍集占在伊犁掌管伊斯兰教事务。

清朝政府本想利用霍集占兄弟在宗教上的影响，去“招服叶尔羌、喀什噶尔人民”，从而和平地统一南疆。波罗尼都本人对清政府感恩戴德，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家三世为准夷所拘，蒙天朝释归，得统所部，此恩何可忘也”?而霍集占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曾参与了阿睦尔撒纳在伊犁发动的叛乱，并且“率众助逆”。及至阿睦尔撒纳的叛乱被平定，霍集占怕受牵连而逃回了南疆叶尔羌。霍集占一心想摆脱清朝的控制而自立，偏其胞兄波罗尼都胆小怕事，愿意归附清朝。于是霍集占反复蛊惑人心地煽动波罗尼都，说他们的远祖摩诃末曾声灵赫濯，天下闻名，传到他们辈子孙时，却受制于人，“若听大皇帝(按：指清朝乾隆帝)谕旨，你我二人中必有一人唤至北京以为质，当于禁锢何异?莫若与中国抗拒，地方险远，内地兵不能即来，来亦率皆疲惫，粮运难继，料无奈我何。且准噶尔已灭，近地并无强邻，收罗各城，可以自立”。霍集占被权力的欲望弄得头脑发昏，低估了清朝中央政府平定叛乱维护边疆统一的力量和决心。清朝毫不犹豫地残酷镇压准噶尔部屡次叛乱的事在波罗尼都的心里历历在目，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所以波罗尼都“欲安集回地各城

人民，听候大皇帝谕者，而霍集占不从”。霍集占反复劝诱其兄叛清自立，在《圣武记》中也有类似记载，霍集占对其兄说，“我祖宗以此受制于人，今喜强邻已灭，无逼处者，不以此时自立国，长为人奴仆，非计。中国新得准部，反侧未定，兵不能来；即来，我守险拒之，馈饷不断，可不战挫也”。波罗尼都终于与霍集占一起发动了叛乱。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大和卓木自立为巴图尔汗，霍集占传令回部各城准备粮草器械，诱杀清使。不久，清政府派往南疆的使臣阿敏道等被杀，南疆的叛乱迅速蔓延起来。

二十三年，清廷因兆惠忙于剿抚北部准噶尔部，尚未峻事，乃令都统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率满汉官兵万余人，由吐鲁番进攻库车。库车城是南疆门户，而且城主鄂对已经只身投清，其家人惨遭杀戳，所以清兵决定首先攻下库车城。

首攻库车，这在战略方针上是正确的。作为通往“回部”的门户，库车一经攻克，“则诸城必溃”，因此库车是清军必攻的战略要地。但库车“其城依山岗，用柳条沙土密筑而成”，修筑坚固，易守难攻。霍集占派其心腹阿布都克勒木率精骑1000守该城。5月7日，清军抵达库车城下，随即开始包围，发起攻城之战。然而城内叛军据城固守，人数虽少但清军却屡攻不下。清军起初依仗人多势众，连日猛攻，同时修造云梯，企图一举攻克。但叛军居高临下，放枪投石，给清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为此雅尔哈善不得不改变了战术，即暂停攻城，避免伤亡，紧围城市，守株待免。不久，雅尔哈善又采用骚扰城内守军的疲劳战，一边攻城，一边在城郊关隘设下伏兵，设计诱出城内守兵出城作战，然后出伏兵断退路，围而歼之，即可占领库车。雅尔哈善令手下的300名哈密士兵装扮成霍集占带领来的援兵，在城郊与清军“交战”，以迷惑城内的敌兵，诱其出城相助。但城内守军坚守城池，在城上摇旗纳喊却并不出城，没有上清军的当。清军无奈，只得继续攻城，同时断其水道。霍集占心知库车被围数日，立即带兵数千人从阿克苏发，向东穿越沙漠走近道前来增援，企图出其不意击退清军。然而清军人数众多，早已在沿途对霍集占的援军围攻堵截，霍集占损失惨重，伤亡大半，在库车城下又遭到围城清军的攻击，慌忙夺路入城，退保库车。此时城内叛军已是人心惶惶，如果清军继续猛攻，则有可能破城而入。然而雅尔哈善又采用了“守株待兔”的办法，“坐守军营”而且“略不设备”，以为城内叛军已成为瓮中之鳖。结果，霍集占在城内稍事喘息之后，趁清军疏于防备，在半夜突围而逃。清军紧迫不舍，在鄂根河边与霍集占军展开了决战，杀死叛军200余人，约有1600名叛军溺死水中，霍集占本人也受了轻伤，又狼狈退回库车城内。

鄂对一直随清军讨叛，作为库车城的回部头目，他渴望早日能攻克库车，所以他向雅尔哈善分析说：“今宵集占困守危城，食、力已尽，必不坐而待缚。其必乘我不备而兔脱之，返其巢穴，整兵复来，其事未可量也。今城西渭干爱曼水浅可涉，又有北山口要路通戈壁，走阿克苏，若于二路各设伏兵1000，则贼酋成擒矣”。雅尔哈善自有主张，副鄂对的建议不以为然，仍旧终日消极防守，坐等城内叛军打开城门归降。甚至当夜间城内传来阵阵驼鸣，人声鼎沸时，雅尔哈善仍不为所动，认为城内守兵已经是黔驴计穷，只等束手就擒了。结果，霍集占再一次趁夜

弃城而出，从城西率400骑涉水潜逃。负责在城西围攻的副都统顺德纳闻讯后不慌不忙，借口天黑不发兵追击，延至次日天明后才派百余人去追击，而霍集占却早已渡过了鄂根河，并撤桥断后，清兵只有望水兴叹了。

库车城内叛军仍据守着城池。清军火炮难以攻破其坚固厚实的城墙，雅尔哈善无计可施。绿营提督马得胜献计挖地道，于是挑选了数百名士兵，由达世朗，常继春专管，从城北1里外的山冈下开挖地道。清军日夜转流渐次刨掘，距城只2丈余，预备火药，待7月19日点放。不意贼人知觉，于17日夜潜出城外，离城10余丈横掘大沟截断，以薪木填塞，焚死掘地兵10名，清军前功尽弃。8月，因城内无粮可食，叛将阿布都克勒木率50骑于深夜开城逃窜。头人阿拉难尔率城中3000老弱妇幼开城出降。

清军占有的库车城几乎是一个空城，而且是以“八九千官兵，驻守三月之久，俟贼首逃去，城中穷蹙出降，始得其城”。乾隆帝闻知大怒，认为雅尔哈善“顿兵城下，不异守株待兔”，而作为全军统帅“军营调度乖方，全无纪律，并无一句引罪”，于是下令将雅尔哈善、顺德纳、马得胜等革职处死。

黑水营之围库车之战后仓皇出逃的霍集占，先逃往阿克苏，然阿克苏的维吾尔人民“闭城拒敌”，其首领鄂对伯克早就归附了清军，这时的阿克苏人已经觉悟，纷纷欢迎鄂对的返回。霍集占走投无路，又逃往乌什，乌什伯克霍集斯亦“闭城不纳”，并派人迎接清兵。这样，霍集占如同一只丧家犬般地逃归了叶尔羌，而其兄大和卓木罗尼都则返回了喀什噶，妄图各据一城，相互犄角，负隅顽抗。

清廷任命刚刚平定天山北路叛乱的兆惠为定边将军，接替雅尔哈善经略回部，率军往天山南路，乾隆告诫兆惠务必全歼顽敌，讨平叛乱。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8月，兆惠率3000兵马从天山北路向南路进发，10月6日抵达叶尔羌(今新疆莎车)。该城比库车更大更坚固，周长10余里，四面共有12门，城东北五六里处筑有高台一座，台前及近城处挖掘了大坎数道，以防敌人骑兵奔袭。坎下设有伏兵，以截击攻城之敌。兆惠吸取了清军库车之战的教训，决定把被动变为主动，不急于盲目攻城，先消灭城外之敌，占据有利地形。兆惠令左右两翼从东西两面夹击坎下伏兵，自率中军向前冲击，令副都统温布率兵夺其高台，坎下回兵放枪阻击，清军一阵猛冲猛打，回兵抵挡不住撤回城内，清军乘胜追至城下，回兵开三门各出500骑与清军激战数次，城墙上守兵则向清军射击，企图逼退清军，由于清军的顽强，敌军最后鸣金收兵，败回城内，闭门不出，不再轻易出战。

兆惠见叶尔羌城大而且守城的叛军多达万余人，兆惠仅统帅着3000兵力，双方力量悬殊，况且清军孤军深入，四野无粮。城内叛军依据优势，气焰嚣张。于是兆惠决定改变战术，将攻城各营撤回，在城东渡过黑水河，在河岸水草茂盛的树林里安营扎寨，修筑工事，坚避清野，故名驻军之处为黑水营，双方在此展开了拉据战。兆惠估计诚内叛军精骑约3000，最好是诱其出城设伏歼灭，先消灭其有生力量，于是清军一面在城南沿途各要道关卡派兵埋伏，一面派副都统爱隆阿率兵500，侍卫奎玛岱率兵300，前去截击从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来的敌人援兵，同时

又派出小股军队在城郊四周搜索粮食和牲畜，坚避清野，既解决了清军的供给又封锁了敌人的出城之路，可谓是万无一失。可是这样一来，黑水营的清军只有2000余人了，兵力分散，使叛军钻了空子。

兆惠从叛军俘虏口中得知，叶尔羌城南有一个大牧场，霍集占有大批驼马等牧群就放养在牧场内的英峨奇盘山，兆惠欲夺驼马充作军用，就亲率官兵千余名离开黑水营，于10月13日抵达通古斯鲁克地方，欲渡河后由东而南袭击英峨奇盘山。殊料清兵500余名刚刚过河，河桥突然断落，清军又被河水截为两部。原来桥下设有叛军的伏兵，他们用铙钩将木桥钩断，并和从城内涌出的5000骑兵一起前后夹击刚刚渡河只有不足500名的清军骑兵，叛军的大部队数万人也从城内不断涌来，大有一口吞并兆惠几百名骑兵之势。兆惠军兵少且被围困，尚未过河的另外几百名清军又难以相援助。兆惠临危不惧，立即令副都统由屯率左翼，温布率右翼，自率中军，三军齐声呐喊，冲入敌阵。敌骑被击退后，又从两翼绕到清军背后，企图前后夹击清军，霎时间，500清兵被成千上万的叛军团团包围，情况万分危急，兆惠急令清军"且战且退，浮水还营"。清兵此时已经陷入重围，只得各自为战，有的被杀，有的则弃马凫水而逃。清军官兵虽然异常勇猛，杀敌数千，但毕竟寡不敌众，总兵高天喜，侍卫鄂实、特通额、副都统三格等百名将士阵亡，伤者数百。兆惠本人左右冲杀，战马负伤，两易坐骑，方突出重围回营。回兵乘胜搭桥东来，后面万名大军步步紧逼，把清军的黑水营围得水泄不通。清军被动挨打，但却士气可嘉，他们"兵处危地，皆死中求生，故杀贼甚力"，无不以一当十。马力疲乏，不能突围，清兵就筑垒固守，不断加固防线。回兵则在黑水营外筑起长围，从四面攻打清军大营，枪炮如雨，杀声震天，然而营内清军却坚如磐石，岿然不动。清军的黑水营由于位置选择得较为合理，才能与人数众多的回兵相抗衡。敌兵从上游决水灌营，清兵就在营内和周围挖沟排水，掘井取水，用之不尽。军中缺粮，清兵就在夜间潜营外，掠敌驼马满载而归，而且清兵又挖地道获得敌兵的存粮数百石，可供军中士兵数月食用。清军驻扎林中，水草茂盛，采薪不愁，回兵向营中射来的铅弹和箭头，多掉在草丛里或射在树枝上，故清兵每砍一树，既可供薪，又可获铅弹数枚，再用来回击敌兵。由于没有粮草及弹药缺乏的后顾之忧，清军人数虽少但却士气高昂，坚守大营，越战越勇。敌人"以苇扫蔽体来犯，即用火焚烧，又掘沟伏身前进，即乘高击退"。敌军虽日夜猛攻，但却久攻不下，黑水营依然耸立在黑水河畔。敌人无计可施，也模仿清军"亦掘濠立寨相持"，企图长期围困清军，待其弹尽粮绝时一举歼灭。敌在黑水营边立高台，四面有护身垛口，既可监视清军动静，又可随时乘高俯射，威胁较大，兆惠亦领清军立高台与之相对，自10月22日至11月10日，不断派兵攻其高台，迫使敌军不敢轻易登台。同时，兆惠派出5人分路向阿克苏告急，催援军相助，大和卓木波罗尼都也亲率步骑5000从喀什噶尔赶来，与小和卓木霍集占会师围攻清军。清军"掘壕结寨"，"筑长围以相持"，同1万多名叛军坚持了长期的苦斗。这就是有名的黑水营之围，叛军施用炮轰、水淹、偷袭火攻等办法，而清军机动灵活，勇敢迎战，粉碎了敌兵的一次次攻击。双方相持3个月之后，黑水营仍岿然不动。兆惠足智多谋，在一个深夜派兵纵火袭击大小和卓木的两处军营。这时回兵里盛传布鲁特人已

抢劫了英吉沙尔城，波罗尼都深感忧虑，怀疑兆惠已与布鲁特有盟约，其袭击自己后方同时借机破围。大小和卓木决定用缓兵之计与兆惠议和。却不料兆惠态度强硬，扣住回兵使者，用箭射书出营，告诫大小和卓木说，议和的先决条件是他们2人必须入京觐见大清皇帝。大小和卓木见兆惠态度如此强硬，以为他必有援军将至，不敢与兆惠再继续作对，甚至提出愿意向兆惠军中资助粮饷，并撤去长围。兆惠仍坚持原则，波罗尼都无可奈何，又担心英吉沙尔城的安危，于是不顾霍集占的反对，率兵返回喀什噶尔。

黑水之战刚开始时，靖逆将军纳木扎勒、参赞大臣三泰率兵200骑急赴兆惠大营援助。不料途中遭3000敌军突袭，一夜激战清军几乎全部阵亡。10月下旬，兆惠的两封告急文书先后送到阿克苏，清廷闻讯一面下令嘉奖有功官员、晋封兆惠为武毅谋勇一等公，一面命富德为定边右副将军，即刻调兵赴援。富德于11月10日得知兆惠军被围黑水河畔之后，立即令付都统鄂博什率兵500为前锋，自己亲率大兵4000人随后前往。富德军中途与从阿克苏出发的舒赫德的3500名大军东合于巴尔楚克(今新疆巴楚东南)，时值12月下旬，西路清军冒着严寒前往赴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正月，清军在呼尔满与叛军大小和卓木率领的5000骑兵相遇，双方激战数10次，杀伤相当，波罗尼都受伤后退回喀什噶尔，清军也损失了较多的马匹。然后在沙漠地带，清军又遭叛军拦截，敌军抢占有利地形，清军则奋力冲杀，边战边走。此地距叶尔羌尚有300多里，富德心急如焚，然而叛军越来越多，清军一时难于脱身，与叛军激战了四昼夜。清军长途跋涉，结队而行，以火器弓箭射敌，战斗异常激烈。但因连日交战，清军人乏马困，而且叛军见清军战马损失严重，三番五次用骑兵冲击清军，并从四面合围，令清兵寸步难行，清兵粮饷告急，又少战马难以突围，人马饥渴难忍，一些官兵只得吃地上的碎冰片；勉强抵达沁达尔时，被叛军包围，清军人马疲惫不堪，无力突围，形势危急。突然又杀出一队人马，自东而至，回兵纷纷倒退。原来是巴里坤大臣阿里衮奉命率兵600、解马2000、驼1000，与爱隆阿率领的1000兵马同时赶到了沁达尔附近。富德喜出望外，乘势杀出重围，阿里衮与爱隆阿便将部队横张两翼，直扑敌阵，里应外合。回兵在夜里不辩虚实，加上清军声势雄壮，喊杀声不断，霍集占不敢恋战，忙下令撤退。回兵军心动摇，不战自溃。清军三路合而为一后又追杀回兵，大败敌军，次日凌晨才收兵回营，至此，三路清军沿途共杀敌千余名，伤敌数千，自己仅伤亡首余名，生俘50余名。清军士气大振，日夜兼程，同趋叶尔羌。正月十四日晨，援军先后赶到黑水河附近。黑水营内兆惠及清军将官对援军望眼欲穿，此时遥听营炮声大响，料知援军已到，兆惠及全军将士们欢喜若狂，集中兵力向外突围。营外清军则早已作了战略布置，以富德、舒赫德军为左翼，阿里衮、爱隆阿军为右翼，与营内兆惠配合默契，内外夹击，回兵则拼命抵抗，战斗异常激烈。几经激战之后，兆惠军终于冲破敌人的重围，几路大军联合杀死回兵数千名，霍集占见势不妙率残部渡河退守叶尔羌。清军会师，北上阿克苏休整过冬，并征集粮草兵马，以备再战。长达三个月之久的黑水营保卫战以清军的胜利而告结束。这次战斗的胜利得来不易，充分反映了清军将领兆惠的优秀指挥水平和全军将士团结一心、不畏强敌、誓死如归的英勇气概。

平定叛乱剿灭残敌兆惠率大军回到阿拉苏之后，立即派兵解了和阗城(即今新疆和田)之围，又先后收复了齐尔拉(今新疆策勒)、克勒底雅(新疆于田)、哈拉哈什(今新疆墨玉)等城。兆惠决定就地解决军队供给问题，用内地的布匹与当地的回民交换粮草，再用节省下来的运粮费近30万两银子购买驼马，结果兆惠迅速调集了2万兵力，战马3万匹，骆驼1万匹，然后兵，分两路，每路各有兵力1.5万，兆惠一路由乌什攻喀什噶尔，击大和卓木；富德由和阗攻叶尔羌，击小和卓木。时值乾隆二十四年春夏之交。

大小和卓木闻听清军将大举进攻，惶惶不可终日。4月份他们开始掠夺回民的粮食和骆马，并组织迁移家属和财产，打算毁城后西奔霍罕(今苏联浩罕)或巴达克山(位于今阿富汗境内)。由于叛乱不得人心，绝大多数回民见清军军纪严肃，决心留在城内迎接清军，大小和卓木无可奈何，只得分别带着少数宠臣和部队弃城逃跑，逾葱岭西遁。

富德率军在向叶尔羌挺进的途中，闻听小和卓木已狼狈逃窜到英吉沙尔，而该城大小伯克却甘心归附清廷，于是立刻遣鄂博什等率500骑为先头部队，迅速前往叶尔羌，富德大军几天后也兵临叶尔羌城下，回民打开城门，欢迎清军入城。

兆惠一路从阿克苏出发后，路途畅通无阻，抵达喀什噶尔时同样受到回民的热情欢迎。大小和卓木汇合后，逃往色勒古勒方向。参赞大臣明瑞率精兵2000，每兵2马，从近路急迫，终于在霍斯库鲁克岭追上敌军。霍集占将6000多回兵列阵于山头，居高临下迎战。清军勇猛冲击，由山下往上猛冲。霍集占边战边退，唯恐清军大队人马追来难以脱身，逃向巴达克山方向。明瑞边率军追击，边派人通知兆惠和富德的两路军队。

7月，富德军终于在阿尔楚山追上回兵。富德见山下尽是老弱残兵，料叛军有埋伏，果然霍集占于两山之间设下了伏兵，又在山谷路口列阵以待，用老弱残兵引诱清军进入山口。富德没有中计，即刻分兵三路，令巴图济尔、鄂齐尔率左翼攻左边山头；由屯、伊柱率右翼攻夺右边山头；富德亲率中军以火炮猛轰谷口敌阵。战斗开始，富德率中路军进入山口，果然伏兵四起，然而清军早有防备，三路同时进攻，从左右两翼，从下向上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设伏的叛军抵挡不住纷纷败退，清军则随后紧迫20多里，又与叛军战成一团，清军杀死回兵无数。清军猛追猛打，一战便歼敌千余名，俘虏50余名，霍集占的心腹战将阿布都克勒木也被清军击毙。清军以日行百里的速度猛追穷寇，大小和卓木狼狈逃至巴达克山，负隅顽抗，并抢占了山势险峻的有利地形。当清军抵达巴达克山脚下时，叛军正用武力掩护家眷和辎重由河边翻山越岭。清军立即展开强攻，逼近敌阵，用大神炮、威远炮轰击，敌军则从山口用枪炮还击，一时间炮声轰轰，飞沙走石遮天蔽日。在强攻的同时，富德又展开了宣传攻势，令随征的回部首领霍集斯、鄂对等在阵前高竖回部旗帜，用回语呼喊，劝回族百姓投降，以保证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山上回族群众原先一直受大小和卓木的欺骗和蒙蔽，听了清军的宣传政策，开始有些回心转意，回民中产生了骚动。富德跟着又采取了第三个步骤，派前锋参领喀木齐布、侍卫齐里克齐率40余名精选出来的鸟枪手，从山的北面迂迴上去，再令侍卫额尔登额、老格率兵随后策应。富德的这套

攻坚和攻心相结合的战术果然有效，只见山上数千回民扶老携幼不顾霍集占等叛乱头目的威胁阻拦，相互护卫着，蔽山而下，声如奔雷，接受清的招抚，先后有数万名回民纷纷下山。北面的2000余回兵被清军堵截，不战而降。大小和卓木见大势已去，众叛亲离，只得放弃抵抗，率领三四百人夹着尾巴逃跑，投奔巴达克山部首领。

富德早已派侍卫向巴达克山汗素尔坦沙说明了清军的立场和政策，劝导素尔坦沙汗不要与叛军勾结。但素尔坦沙起初还犹豫不决，仍将大小和卓木迎入城内。富德只得发出最后通谋，限其在25天内交出大小和卓木，否则清军将踏平巴达克山，格杀勿论。素尔坦沙思前想后，既担心受大小和卓木叛乱的牵连而使自己遭清军进攻，又担心日后大小和卓木会忘恩负义，篡夺自己的国家，因为他素知大小和卓木的野心。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把只有几百人的大小和卓木兄弟团团围住，大小和卓木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束手就擒，被素尔坦沙汗一齐枭首。素尔坦沙汗还想将这些叛军的家属全被处死，正巧清军檄文传到，于是把大小和卓木的头颅、尸体，以及他们的妻孥旧仆等，尽行缴出。清军带着叛军头目大小和卓木的首级凯旋而归。至此，大小和卓木发动的叛乱被清朝政府平定下去了。

乾隆帝命陕甘总督杨应琚，筹办回疆善后事宜，兆惠等有功之臣被召往京师，乾隆嘉封兆惠为一等功，加赏宗室公品级鞍辔；富德封为一等侯，并赏戴双眼花翎；参赞大臣阿里衮、明瑞等，俱赏戴双眼花翎。其余将官则一一论功行赏。

乾隆对于“堂堂大清，兵力全盛之时，不得已用兵西域”，不越五年，而西陲万余里城无不下，众无不降，感到十分得意。他说，对于准噶尔、回部上层贵族发动的叛乱，“不得不明正其罪，以彰挞伐”，是顺乎人情、合乎天理的事，决不是大清帝国“穷兵黩武”和皇帝“好大喜功”。乾隆帝同时承认，他坚持用兵还有两个军事目的：一是时值康乾盛世，安享太平，八旗子弟也多耽溺于安逸之中，缺少了传统的淳朴勇猛之气概，而现在蒙师远征平叛，正可以“借以练我杀敌致果之将材”。

二是以往远征西域边陲，军需供应全由内地承担、征集、调运、押送……劳民伤财。而且战争失利往往与粮饷供应不足有关。现在“西陲大功告成，一应事宜必期熟筹可久……今准噶尔回部荡平，屯田驻兵，自伊犁以达叶尔羌，向日之边陲又成内地”。这样一来，“回部之赋税，屯田之收获，以及沿途贸易、城仓积贮，储胥充裕”，便可就近解决大部军需供应。不仅现在，尤其是将来，一旦西域发生战争，则“不独内地毫无飞鞔馈运之劳，而陕甘两省蠲账之恩有加无已”。

清朝政府统一天山南北后，建立了军府制，设伊犁将军”总统新疆南北两路事务”，派参赞大臣驻喀什噶节制南路各城，天山南北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清政府则加强了对西北地区的统治与边防，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

第七节 藏民土司叛乱清军荡平大小金川

大小金川土司在清朝乾隆年间发生叛乱，清军两次派重兵镇压，维护了西南边疆的和平。

四川藏民反清打箭炉之战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四川藏民反清，占领打箭炉(四川康定)。清王朝派侍郎满丕提督唐希顺率兵进攻，收复打箭炉，于是雅陇江地区、喇滚、革布什咱等诸地首领各率所属共约１．2万余户归顺大清。

清军攻打四川藏族如郎之战1745年(乾隆十年)，清廷川、陕总督庆复派兵进剿上、下瞻对(四川新龙)地方的藏族首领，因为他们违抗朝廷。庆复将大军分为四路，各路之间相互联系：夔州副将马良柱出呈塘，从南路进攻；松藩总兵宋宗漳出甘孜，由北路攻击；建旨总兵袁士弼出沙晋隆(四川乾宁境内)，从东路进军；提督李质粹领兵屯驻东俄洛(四川雅江东)作为预备队。北路清军进展顺利，沿途藏民纷纷归顺，上瞻对藏族首领被迫放弃抵抗，投降清军。南路清军在击败下瞻对的藏族头目班滚的拦截力量之后，也赶到下瞻对附近，三路清军胜利会师。

乾隆十一年，庆复再一次组织清军围剿藏民叛乱，清军由茹色渡过雅龙江包围了藏民居住的尼日寨，攻克了如朗一地，附近各寨迫于清军的声威而相继归顺。只有狡猾的班滚率领残兵败将逃到了金川，继续与清军作对。

初平大小金川大小金川，是大渡河上游的两个支流，地处四川北部，是藏民的土司区域，因沿河诸山和谷地有金矿而得名。这里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东通成都，南接云贵，西连康藏，北界青海，“万山丛矗，中绕訩溪，皮船笮桥，曲折一线”。这里的藏民又称作番民，因气候严寒多雪，物产不多，以青稞，荞麦等杂粮为主食，以石碉为屋。

我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地，历来是少数民族集居或与汉族杂居的地区，社会关系错综复杂。自元明以来，我国中央王朝的统治阶级，就采取土司制度统治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土司制度是兼指土司与土官两种统治制度而言。前者包括有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等，这些官爵职称受封于中央但实际上是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后者包括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是按汉族地区的行政区划设立的而由少数民族头人所担任的官职。这种土司制度，是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交通梗阻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在军事征服或政治招抚之后实行的“羁縻”政策和特殊的统治制度。

清朝初年，由于中央政府忙于巩固国家的统一和抗击沙俄入侵，一时无力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西南地区仍沿用土司制度，造成了社会的动荡。有些大土司，辖地数百里，拥兵数千累万，骄怒暴戾，横行不法，拒不听从清朝的管束，不仅不利于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也不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产的发展。

金川地区，隋属金川县，唐属维州，明属杂谷安抚司，明代所封金川土司实指小金川土司而言。清袭明制，在1650年(顺治七年)清廷授小金川的头人卜尔吉细为“四川直隶杂谷理番府金川演化土司”，即为小金

川土司。康熙六十年(1721年)，土司嘉勒巴的庶孙莎曼奔，因率兵500随清军征剿西藏羊峒(今南坪)有功，被四川巡抚色尔图和提督岳钟琪命为副长官司，专管大金川驻牧事务。雍正元年(1723年)，川陕总督年羹尧认为小金川土司人众势强，为防患于未然，请求清廷委任大金川土司之孙莎罗奔为安抚司，以分其势，清臣同意，遂授莎罗奔以“大金川安抚司印”，即为大金川土司。这样，清朝统治者对大小金川土司实行了以番治番、分而治之的政策。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借用朝廷的支持和纵容，势力日益强盛，逐渐养成尾大不掉之势，经常出兵侵扰同边其它土司的领地，并谋图吞并小金川土司泽旺的领地。莎罗奔先以女儿阿扣嫁给泽旺为妻，泽旺性懦弱，受制于其妻，这样莎罗奔就肆无忌惮地插手小金川的事务。1746年(乾隆十一年)，莎罗奔劫持泽旺及其印信，四川总督下令申斥，莎罗奔因羽毛未丰，“始还泽旺于故地”。随后莎罗奔积蓄力量，气焰日益嚣张，不服四川地方官的劝阻和调解。乾隆十二年，莎罗奔又发兵攻掠杂布什咱和旺正两土司的辖区，并击溃了前往镇压的清军，四川巡抚纪山的军队反为莎罗奔所败，此事惊动了朝廷。乾隆令“征苗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统兵进剿，平定大金川叛乱。

乾隆十二年(1747年)4月，张广泗调集3万大军，计划兵分西南两路进剿大金川，“一由川西入攻河东，一由川南入攻河西”。西路军又分四路，南路内再分三路，各路定于6月28日同时并进，期以一举告捷。清军各路均以当地臣服的各土司的土兵在前，以绿营兵随后。各路初战报捷进展顺利。但纵深入叛乱之地后，山高路险，碉卡并立，叛军恃险抵抗，清军处处被动挨打，几乎寸步难行，而且损兵折将。张广泗以兵3万尚少，要求清廷再增援。乾隆十三年(1748年)4月，清廷又命大学士讷亲前往督师，并起用已被革职的老将岳钟琪以提督衔随行，增兵督剿。讷亲位高气盛，惯于纸上谈兵，一至前线，“限三日克噶耳崖，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极力攻击，多有损伤。讷自是慑服，不敢自出一令，每临战时，避于账房中，遥为指示，人争笑之，故军威日损。有3000军攻碉，遇贼数10人哄然下击，其军即鸟兽散”。讷亲初至军营即下令三日内攻克噶尔崖，结果清军大败，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等战死。此后，讷亲不敢再专权，军事全交张广泗办理。而张广泗对清廷派讷亲为经略来督师，已是心有不悦。见讷亲吃败仗威信全无更是看不起他，“轻讷不知兵而事权出己上，阳奉而阴忮之，诸将无所禀承，率观望不前”。清军高级将领之间互相推诿，将相斗气，军心涣散。张广泗想在讷亲面前露一手，打个漂亮仗以煞讷亲的威风。于是张广泗用良尔吉为向导，不料良尔吉是莎罗奔派遣的奸细，他暗中将军情通报给莎罗奔，莎罗奔对清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清兵四处奔波，四处受叛军袭击，损失严重。“故兵老气竭，株守半载，无尺寸功”。乾隆闻讯十分震怒，将张广泗斩首，赐讷亲自杀，然后又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清廷平叛大金川之乱的大军人数已达4万之众，还有京师八旗禁旅在内，竟然不敌大金川的3000兵力，乾隆实难甘心，遂命傅恒为经略将军，兼四川总督，增兵再战。经过一番研究，十四年(1749年)正月，傅恒上疏乾隆，分析了清军屡战屡败的原因。说以前因为讷亲不懂用兵之道，而张广泗又被奸人所愚，用“以卡逼卡，以碉逼碉之法”，实为下策。现在

与诸将商议之后，决定大兵调齐，即“同时大举，分地奋攻，而别选锐师旁探其道，裹粮直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即以围碉之兵作为护饷之兵。番众无多，外备既密，内守必虚，我兵即从捷径捣入，则守碉之番各怀内顾，人无固志，均可不攻自溃”。由于吸取了教训，傅恒也害怕再有杀头之祸，故此制定了较为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法，从而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傅恒调集清兵3．5万人，采用了岳钟琪的进军方略，兵分两路。由于清兵改变了战术，连克叛军碉卡，军队士气大振，什么道路艰险等困难自不在话下。清军旗开得胜，叛军则节节败退，然而叛军仍依据一个个高耸的山头与清军周旋。清廷在金川已用兵两年，劳师糜饷，损兵折将，杀大臣讷亲、张广泗，革大将哈元生、茎芳，用尽全力却难以平叛，乾隆不想把战争继续下去了，命傅恒撤兵，在谕旨中说：“朕思蕞尔穷番，何是当我王师?经略大学士傅恒乃中朝第一宣力大臣，顾因荒微小丑，久稽于外，即使擒渠扫穴，亦不足以偿其劳！”然而傅恒认为大金川土司的势力已消耗殆尽，平叛指日可待，仍请进兵，乾隆不许，傅恒只好作罢。当时，岳钟琪所率的清军前锋已抵达莎罗奔的老巢勒乌围，莎罗奔惊恐万状。莎罗奔父子尚不知清廷已下令撤兵回朝，当时见清军势不可挡，而打入清军中的奸细又被傅恒处死，情报失灵。眼见清军就要踏平勒乌围，莎罗奔只得放弃抵抗。他从前曾隶属于岳钟琪部下，随之一起入藏平叛，这时就向岳钟琪求情，岳钟琪当即立断，趁叛军尚不知清军已撤军的消息，亲率13骑驰入敌军营中，可谓英雄虎胆。莎罗奔见岳将军威风凛凛不减当年，急忙带着随从“稽颡膜拜，衷甲持弓矢迎”，“请奉约束，顶经立誓”。莎罗奔发誓归还侵占的土地，供傜役，献凶犯，纳军械，归兵民。朝廷采用了宽大政策，莎罗奔的叛乱活动被赦免，仍为土司。这样，清廷在决定正式撤兵之前，得以兵不血刃，平定了大金川。

再战大小金川自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乞降之后，四川藏民聚集地平静了10多年。大小金川两地仍由各自土司管理，土司之间相互争斗，时起战乱，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5月，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病故，由其侄郎卡承袭土司之职。郎卡野心勃勃，经常出兵骚扰侵掠邻近土司领地。四川总督阿尔泰下令劝阻，但郎卡仍“侵邻境不已”。阿尔泰多次令各土司围攻大金川，但心力不齐，无济于事。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阿尔泰奉清廷之命征调与大金川土司邻近的“九土司”之兵进行会剿。阿尔泰希图息事宁人。郎卡见大军得至，表示接受朝廷的调停，并将其女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为妻，并要求清廷颁给他土司新印。阿尔泰自以为是，认为大小金川联姻将有利于战乱平息，因此同意了郎卡的一切要求。实际上，这样反而使“有夙怨，不甚联络”的大小金川土司开始“姻党联结”，互相联合起来，并且“附近18家土司推两金川为雄长”。大小金川的联合打破了这里原有的政治均势，使清廷以番制番，相互制约的政策难以执行。

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莎罗奔之孙索诺木诱杀革布什扎土司，小金川僧格桑也领兵进攻邻近的鄂克什以及明正两土司，于是战乱又起。索诺木是郎卡的第四子，在郎卡病死之后承袭了大金川土司的称号，他年轻气盛，欲继郎卡当年未竟之业，逐渐吞并周边邻近土司。小金川土司也闻风效尤，两者相互勾结，并公然与清廷所派援军对抗。清廷认为

小金川较大金川为弱，又无险可守，易于攻破，所以决定先平小金川，后平大金川。三十六年(1771年)10月，乾隆宣布了出征讨伐小金川的理由："小金川以内地土司敢作不靖，暴侮邻疆，弁髦国法，此而不声罪致讨，朝廷威令安在?况抚驭番蛮，怀畏自当并用，若于梗化之人不大加惩创，则懦弱几无以自存，而犷悍者必效尤滋甚，渐至徼内土酋跳梁化外，何以绥靖边圉?"乾隆帝决心平叛小金川，调兵1．6万余名，分三路进剿：令四川总督阿尔泰率兵7000名出南路，攻约咱；令总兵福昌率兵1700名出西路，向山神沟进攻；令提督董天弼率兵5300名为中路，攻达围。清军初战不利，南路阿尔泰兵抵打箭炉长达半年，却按兵不动，一无所获。乾隆盛怒之下将阿尔泰赐死，又撤换了作战不力的将领，命大学士温福由云南赴四川督师，以尚书桂林代阿尔泰为四川总督，再度令其率兵进讨；战局逐渐被扭转。开始时，清军连夺关隘，但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及时得到了大金川土司索诺木的援助之后，反败为胜，屡败清兵。乾隆三十五年9月，黑垄沟一战，薛琮所率3000名官兵几乎全军覆没。温福和桂林率兵先后入川后，温福由汶川出西路，桂林仍沿阿尔泰走的路线由打箭炉出南路，两路夹攻小金川。南路副将薛琮恃勇轻进，在黑垄沟被番兵包围，由于道路艰险曲折，清军无路可走。薛琮派人向桂林求援，然桂林却按兵不动，导致了薛琮战死，全军陷没的惨败。这时，清廷又下令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丰伸额为副将军，令其攻大金川。当清军逼近小金川土司僧格桑的老巢美诺时，僧格桑携带卫兵妻妾逃往大金川，撇下其父老土司泽旺。清军把泽旺缚献京师，又传檄大金川土司索诺木交出僧格桑，索诺木拒绝。于是温福率兵进逼大金川。大金川地理位置更加险峻，从前讷亲、张广泗屡遭失败，故温福大军也受到了严峻的考验。索诺木"全力抗守，增垒设险，严密10倍于小金川"，清兵分六路进攻，但当地叛军采用以往的战术，遍筑碉卡抗拒清兵，温福明白攻碉卡得不偿失，但他又别无计策，"为人刚愎，不广谘方略"，又重蹈了张广泗的复辙，采用以碉逼碉的办法，令清军就地筑碉卡多达数1000个，结果2万士兵都分散在各个碉卡内，兵力反倒不足了，与大金川的番兵相持不下。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夏，温福屯兵于大金川之东的木果木，"日与荖提督无知辈高宴"，结果索诺木出兵切断清军的粮运，发起了疯狂的反扑。叛军猛攻清军木果木大营和各碉卡中的清军，枪声四起，叛军一涌而出，内外鼓噪，清军军心大震。叛军先夺清军炮局，枪如雨发，温福乱了方寸被飞弹击中身亡，清军见主帅阵亡，霎时四散，"师遂大溃，我兵自相践踏，终夜有声。渡铁锁桥，人相拥挤，锁崩桥断，落水死者以千计"。木果木一战，又有4000名清军官兵战死。

清廷自然不甘心就这样失败，乾隆帝重又布署了军事力量，命阿桂为定西将军，丰伸额、明亮为副将军，征调健锐营、火器营和索伦兵参加战斗，大大增强了进攻的力量。

三十八年(1773年)10月，阿桂率西路军2万余攻鄂克什、底木达、布朗郭宗等土司的叛乱地区；明亮率南路军2万余攻小金川土司的巢穴美诺；丰伸额率北路军1．5万人，由绰斯甲布前进。总督文绶坐镇四川省城，督造劈山等炮运送前线。清军人多势大，几路齐头并进，而且供给及时，转战五昼夜之后，清军抵进美诺，收复了小金川，小金川土司及叛军早已逃往大金川。阿桂主张乘胜进兵大金川，乃奏请朝廷。乾隆

帝也认为四川藏民土司恃险反复抵抗朝廷，清军已经耗费了极大的兵力和财力，所以非大举深入平定不可。于是朝廷先斩了泽旺，以示平定叛乱的决心，然后令阿桂等将领扫穴犁庭，以除后患。

阿桂率大军誓师之后，决定分三路讨伐大金川。三十九年(1774年)正月初十，三路清军同时出发：阿桂一路从谷噶了口出发，攻战巴拉克；明亮一路从河北马奈出发，攻战恩底博堵木城等处；丰伸额一路由卓克采出发，攻占凯立叶。清军三路大军分别从东路、西南和西北并进，声势浩大，所向披糜。怎奈大金川地形险恶，层峦叠山，崎岖不平，加上叛军重重筑碉，层层设卡，战斗极为艰苦，清军行动十分缓慢。但由于清军士气高昂，见碉夺碉，遇卡攻卡，节节进攻，击破敌垒无数，与叛军激战数百次，直到7月份才逼近大金川土司索诺木的老巢勒乌围。

盛夏，清兵围攻勒乌围之外围屏障逊克宗垒，这一仗打了近半年之久。根据《清史演义》中的记载，勒乌围前面皆山，番兵据险扼守，第一重名博瓦山，第二重名那穆山，最是险峻。清军猛博三昼夜，方杀上博瓦山，占了第一重门户。休息两日，又进军那穆山，阿桂仍令清军分前后进攻，数日不克。只见那穆山上守兵分布得密密层层，防守甚严。几路清军会集之后，并力猛攻仍是不下，山下边最高峰有两个极为显眼的战碉，清军选出600名敢死队，乘黑夜猱升而上，趾顶相接，直至黎明时，攀上绝壁到达山顶。守卫石碉的番兵以为清军从天而降，吓得魂飞魄散。西面山峰竖起了大清旗号，顿时整个番兵人心大乱，山下的清兵再次猛攻，杀上山腰，第二重门户又破。清军攻破了番兵重兵防守的逊克尔宗官寨之后，纵火烧毁四周村落200余间，索诺木的老巢乌勒围就在清军眼前。索诺木为保自身安全，毒死小金川土司僧格桑，向清军献尸请降，阿桂拒绝，索诺木无从乞和，只有令部下极力防守，拼个鱼死网破。

时值秋末冬初，天气阴寒，雨雪霏霏。清军只好收兵。过了来年又得等到冰雪消融之后，清军才能在这险峻之地出兵讨伐。清军又转战了三四个月才到乌勒围。四十年(1775年)7月14日，阿桂军与明亮军会师围攻乌勒围官寨。乌勒围靠山临河，四角有战碉，墙垣坚固，内藏大量火药枪弹，坚不可摧。据记载，“其官寨碉坚墙厚，西临大河，迤南有转经楼，与官寨相犄角，木栅石卡，长里许，其东负山麓，有崖八层，层各立碉，各路败回之敌，咸聚守之”。清兵先攻破栅卡，清扫外围，断其犄角，又毁桥断其逃逸之路，然后集中火力，用火炮猛攻石碉。其间炮声隆隆，惊天动地，敌营一片混乱，索诺木兄弟5人表示愿意降清，但阿桂仍不允，清军继续猛攻，中秋底清军终于攻下索诺木的老巢。然而索诺木带着残兵败将已经逃到噶尔崖。阿桂统领的清军自入川讨伐叛逆以来。至此已经历了2年，途中历尽艰苦，他恨不得立刻踏平噶尔崖，1776年初(乾隆四十一年)，清军包围噶尔崖，切断与周围的一切通路，叛军负隅顽抗直至弹尽粮绝。2月，索诺木走投无路，与其祖父莎罗奔及家族部众2000余人出降。乾隆帝数日后在京师御午门收受索诺木兄弟及其它叛乱头目，将罪大恶极的莎罗奔、索诺木等凌迟处死。其余叛者家属，或斩或绞，或永远监禁，或充发为奴。封阿桂为一等诚谋英勇公，丰伸额本袭公爵，加赏继勇字号，明亮封一等襄勇伯，其余将官各

有封赏。

大小金川土司叛乱平定之后，清廷设成都将军专管该地文武官员，下令番民递发，信奉黄教，派兵驻屯。随后在大小金川设立懋功厅，驻同知管屯务。从此，大小金川之地名不复存在。大小金川地仅千里，兵仅万余，然官兵数万，苦征5年，耗银7000万余两，用兵之难甚于平定准、回二部，皆由于地险碉坚，气候多变之故。清军缺乏对山地、碉堡之类的作战经验，一些将领或按兵不动，或硬拼硬打，以致消耗人力、财力巨大。好在清廷及时调增了健锐营等精锐部队，发挥了冲天炮的攻坚之威，终于取得了胜利，当地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第六章 风雷滚滚白莲教徒起四方 战鼓隆隆各族儿女竞抗清

清朝嘉庆年间的一系列人民起义中，1796(嘉庆元年)年的白莲教大起义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起义前后持续了九年零四个月，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徒。参加的人数多达几十万，起义爆发于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斗争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五省，甚至还波及到湖南省的龙山县。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清朝府、州、县、厅、卫等204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全国16个省征调的兵力，歼灭了大量清军，使清军损失一、二品的高级将领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400多人。清政府耗费了白银2万万两，相当于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也给了满、汉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使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逐步走向衰落。

第一节 各路豪强川陕鄂聚首

乾隆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并土地，人口激增，耕地不足导致粮价猛涨，饥民日众，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

明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明朝统治，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因此，清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巩固政权，实行了一系列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措施，康熙、雍正年间尤为显著。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地主阶级也加紧了土地兼并，到乾隆后期土地已经高度集中了。当时以皇帝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通过圈占、强买和高利贷等各种手段吞占了大片土地，许多地方都形成了“富者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的严重局面。仅仅皇室和由封建国家所直接控制的“官田”、“皇庄”已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7，达8000万亩以上。就是一般地主，也都普通拥有千亩以上的土地。乾隆年间，浙江奉化一家姓黄的地主竟占有几十万亩好田；河北怀柔县(今北京市怀柔县)姓郝的大地主占有“膏腴万顷”。大商人及其他高利贷者在兼并土地方面也不甘落后，他们一听到何处受灾，便乘人之危，大放其债，把大片良田强占到手，山西平阳大商人兼大地主亢氏拥资“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矩”。乾隆末年把揽朝政20多年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珅，竟霸占良田8000顷以上，就连他家的两个亲信管家刘全及马某也占田600顷之多，湖广地区(今湖南、湖北两省)50％一60％的土地，也已被地主们瓜分完毕。广西已是“田大半归富户，而民大半皆耕丁”。广大农民丧失了土地，沦为佃户或佣工。河南一带的农民已是“佃种他人田地者居多”，一年到头，辛勤劳作，所得粮食除交完租息外，没有什么剩余。即令是丰收之年，也只能够偿租还债。并且佃户还怕地主夺田另佃，往往有倾其所有，甚至卖儿卖女也不敢欠租。农民们吃不饱，穿不暖；多是今日完租，明日乞讨、借贷。

除此之外，地主豪绅们还规定佃户租种土地之前要缴纳“揽种钱”、“押租钱”；他们还惯用“驴打滚的高利贷”，大斗收租、小斗出贷等非法盘剥手段。地主逼债似狼如虎，更有甚者还私设公堂，对欠租的农民任意打骂，甚至关入私牢。在这种残酷剥削下，许多农民丧失了再生产的能力，到处都是富者越来越富，贫者越来越贫。

在疯狂掠夺土地的同时，统治阶级还拼命加捐派税，以满足他们无穷的贪欲和维持庞大的军队。康熙末年以后，除正税以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加派，花样自出，且各级政府又层层加码，所以贫苦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

乾隆时代，贪污聚敛之风弥漫。当时流传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当3年知府官，就能捞上1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这还算是所谓的“清官”!乾隆时期的大官僚和坤，算是历史上著名的贪官，他当政20年，招权纳贿，除占地80万亩以外，嘉庆四年(1799年)查抄他的家产，仅初步估计就折合白银8亿两以上，相当于当时清政府20年的财政收入。在和坤的纵容下，文官贪脏、武官赶饷，层出不穷。光是地方大吏督抚、布政使就有很多。如国泰、王直望、福崧、伍拉纳、浦霖等人的

贪污案件，每次抄没财产都达数10万两以上。管理治黄工程的官吏，为了便于营私舞弊、克扣公款，寻机贪污，竟多次丧尽天良故意掘开河堤造成水患，致使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湖北、四川两省政治腐败，贪污盛行更是全国闻名。自封疆大吏以下各级官员无不贪脏枉法，欺压百姓。如这次大起义前的二任湖广总督特成额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擢用湖广总督，在任3年之久，首为废弛，所有活埋、冒账各案，俱系伊任内之事”。接任者毕沅“五十三年(1788年)擢为湖广总督，五十九年(1794年)被降补山东巡抚，六十年(1795年)仍授湖广总督。……在嘉庆四年(1799年)九月，有倭什布查奏，胡齐仑经手动用军需底账，毕沅提用银两及馈送领兵各大员银数最多”。毕沅还与湖北巡抚福宁、藩司(布政使)陈淮(望之)等高级官员朋比为奸，因而民谣传说“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至于他们手下的各级地方官吏，更是上行下效地变本加厉。

四川总督福康安与和坤一样，都是乾隆皇帝宠信的重臣，也是有名的贪官。

清朝统治者依靠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敲骨吸髓的剥削，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最高统治者乾隆就是一个挥霍无度的典型。他在全国大兴土木，修筑无数的离宫别苑、寺院庙宇，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驰名中外的圆明园以及北京其他风景区的许多瑰丽的园林宫阙、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等多是乾隆年间峻工的。每当乾隆和他的母亲孝圣皇太后过生日，都要命令大臣和富商从北京皇宫的西华门经西直门一直到圆明园宫门前数10里的道路上，沿途用彩绸和花束搭起一座座牌楼，每隔一段距离还建造起一座戏台、经堂，并且强迫沿街店铺把门面修饰一新。为此，每次都要挥霍白银100多万两。为了给皇帝、太后祝寿，从中央到地方的文武官员争相“献纳”送礼，以取得皇帝的宠信。有—年仅金佛一项全国各地就献了上万个千姿百态、形状不一的小金佛。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乾隆为其母的12根头发，又耗费黄金3000多两造了一个“金发塔”。

一般地主、富商、奢侈腐化也普遍成风，如怀柔地主郝氏，乾隆出巡“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惜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舆台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10余万”；京师米贾祝氏，“富逾王侯，屋宇千余间，圆亭瑰丽，人游十日未竟”。据说江苏泰兴有一个姓季的大地主，夏天晾皮衣服，光是掉在晒场上的毛就有3寸厚。此外还有宛平查氏、盛氏，密云王氏等，“其富丽亦相仿”。“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赀者，不一而足”。还有许多散居南北的盐商、票商、行商也都过着骄侈淫逸的生活。人们曾说习尚浮华是万历一变，乾隆一变。

乾隆六十年，爆发了湖南、贵州苗民起义，清政府从各地抽调兵力、财物进行镇压。由于湖南、四川两省邻近湖南、贵州，所以这两省人民的负担就更加沉重。但地方官“赋外加赋”，残酷敲榨，造成了“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

人祸已亟，天灾随之。在湖北，江、汉河防因长年失修，结果连年发生水灾。据《楚北江汉宣防备览》记载，长江、汉水自“乾隆、嘉庆年间，连年溃堤，岁比不登，民困斯极”。仅就长江来说，乾隆五十三年，

荆州地区江水猛涨，冲毁堤坝，大水从两路冲入城内，水深丈余，两个多月才退，房屋仓库都被淹没，军民淹死无数。同一时期，湖北公安、石首等地也就连年遭受洪水侵袭，收成减半，又继之以瘟疫，结果人口大都逃亡。乾隆五十九年，襄阳地区也发生了大水灾。由于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残酷剥削，使广大人民丧失了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这也就更加重了灾荒造成的影响。致使许多人离乡背井，到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交界的深山老林中寻找生路。四川的情况也和湖北大体相仿。乾隆末年，由于接连几年发生旱灾，土地龟裂，颗粒无收，于是贫苦农民也拖儿带女往南巴老林中寻找生计。

与此同时，清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采取了严禁“私盐”、“私铸”和大量裁减水手的措施，这样就更加扩大了流民的队伍。

四川省的中部和东部本来就是我国井盐的主要产区，这一带盐井密布，大小盐厂星罗棋布。盐厂分官、私两种。官厂规模很大，常有工人千人甚至万人。私人开设的盐厂虽然规模比较小，但数量甚多，所以产量比官厂还多，历代统治都是采取食盐专卖，从中榨取大量收入。乾隆末年，由于盐价大涨，百姓用盐量锐减，造成了盐厂倒闭，工人失业。许多盐工因无法生活，只好私自背运食盐到陕南一带山区贩卖。他们为了对抗巡丁捕拿、以及盐商的欺压和勒索，便结伙成群而行。他们常负重240斤，在崎曲的山林中穿行，偶一失足，坠入陡坡山涧，则人死包烂。清政府不断下令禁止私自贩盐，他们真是忍无可忍，便不断起来反抗。

还有一些无业游民，搞所谓“私铸”。他们因为生活无着就偷偷地开矿冶铜，“以铸小钱”谋生。清政府曾屡次下令禁止，断绝这批人的生计门路，因此他们也不时聚众起事。

另有，在湖北、四川一带破产的农民和流浪者，集中在长江，嘉陵江上当水手。他们虽然一年忙到头，却不得温饱，过着非人的生活，常常连自己身上仅有的衣服都变卖一光，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水手们、渔民们也不断起来，进行反抗。

在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交界的辽阔大地上，长江、汉水奔腾而过，两岸崇山峻立，森林如海，这里是广袤千里的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由陕西南部到湖北西北部高山深谷，千枝万派，统称为南山老林；在陕西、四川、湖北交界地区则千峦万壑，统称为巴山老林。这里历来就是贫苦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根据地。明代中叶，天顺、成化年间，刘通、石龙、李原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曾经营过荆襄地区。后来蓝廷瑞起义、杨文政起义及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也都曾活跃在这些山区。

从明朝中期开始，就不断有许多贫苦破产的农民迁徙到这里，进行垦荒种山。到清代乾隆年间，南方各省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纷纷“襁负而至，佃山结屋，垦土开荒”。据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等6县统计，自乾隆三十七八年后，川、楚两省“穷民就食前来”的就有数10万之多，而河南、安徽等省“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估计当时流落到此的流民不下数百万人。

流民分为棚民、客民、新民。棚民是新到山区的流民，他们多住茅

屋。在这里生活较久有一定产业的则称之为“客民”或“新民”，他们多住土屋。

“该地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老林之中的地主、土豪、恶棍又勾结地方官吏、差役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棚民终年吃的是糠菜，干的是牛马活。厂主叫他为“骡子”，其实他们比骡子还要苦。每逢欠年，万恶的厂主立即停业，解雇工人。在官府的庇护和纵容下，流氓地痞、衙役兵丁更乘机无“风生生浪”敲诈勒索。所以南、巴老林里的棚民整年过着“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徙数处”的极不安定的生活。老林地区成为一座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活火山。

至于那些仍挣扎在故乡的农民，也是天灾人祸，苦不堪言。湖北荆州，人民被洪水淹死无数，当阳人民连树皮都吃光了，枝江、长阳人民只能吃到观音土，枣阳人民甚至以石粉充饥。

在这种情况下，富于反抗精神的流民，经常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他们有时“盈千累百”的去“吃大户”，强迫地主豪绅和厂主们供给吃食；有时拿起武器，强夺地主、富商的粮食、财物进行平分；也有时公开聚众起事，袭击场镇，打击富商。遇有官兵追捕，他们便拒捕抗官，拿起武器和他们斗争。

在这种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一触即发。

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民间的一种宗教结社。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334—416？)在庐山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北宋时期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主持者既有僧侣，也有在家信徒。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规定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它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它的教仪简单，经卷比较通俗易懂。为下层人民所接受，所以常被利用做组织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工具。元末以来，许多人以此为外衣，发动了多次农民起义。

教徒的主要特征是烧香、诵偈(即宝卷)，信奉弥勒佛和明王。他们的经典有《弥勒下生经》、《大小明王出世经》等等，为了适应下层人民白天参加生产劳动的实际情况，白莲教徒多是“夜聚晓散”，愿意入教的人不受任何限制，不分贫富、姓别、年龄，男女老少只要愿意均可加入。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男女杂处”。到了明末清初，白莲教逐渐在教理方面趋于完备，教义也更加体系化了。

白莲教的教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互相斗争的势力，叫做明暗两宗。明就是光明，它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它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最终战胜黑暗。这就是所谓“青阳”、“红阳”、“白阳”的“三

际”。教徒们信奉“无生老母”，以回涅架境地的“真空家乡”拯救人类的劫难。所谓“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言，据说，无生老母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她要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这个天界便是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先后派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下去。他们分别在每一时期统治着人类世界。青阳时期是由燃灯佛统治着，是初际阶段，那时还没有天地，但已有了明暗。明系聪明智慧，暗系呆痴愚蠢；红阳时期是由释迦牟尼佛统治着，是中际阶段，那时黑暗势力占上风，压制了光明的势力，形成“大患”，这就是所谓“恐怖大劫”的来临，这时弥勒佛就要降生了，经过双方的决斗，最后光明驱走了黑暗；白阳时期是由弥勒佛统治着，是后际阶段，明暗各复本位，明归大明，暗归极暗。初际明暗对立，是过去。中际明暗斗争，是现在。后际明暗各复本位，是未来。教首们宣传，人们如果信奉白莲教，就可以在弥勒佛的庇佑下，在大劫之年化险为夷进入云城，免遭劫难。待彻底摧毁旧制度，破坏旧秩序后，即可建立新的千年福的境界，那时人们就可以过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了。

白莲教认为现阶段(中际)，虽然黑暗势力占优势，但弥勒佛最后一定要降生，光明最后一定要战胜黑暗。它主张打破现状，鼓励人斗争。这一点吸引了大量贫苦群众。使他们得到启发和鼓舞。加上教首们平日的传授经文、符咒、拳术、静坐、气功为人治病等方式吸收群众皈依，借师徒关系建立纵横联系。

白连教信徒众多，主要来自社会下层。各派内部实行家长制统治，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明初时严禁白莲教。因为教首成份十分复杂对明廷态度也不一致。有的借兴教欺骗信徒，聚敛钱财；有的凭撰写经卷攀附上层，取悦朝廷；有的在官廷太监、官僚豪门中发展信徒；有的则与下层群众反对官府的斗争相结合，发动武装起义，如永乐十八年(1420年)唐赛儿起义和天启二年(1622年)徐鸿儒起义。永平府滦州石佛庄王森、王好览父子创建的闻香教(又称大乘教)在明代后期白莲教诸教派中处于特殊地位，影响尤大，王氏父子．聚敛钱财，广置田庄，与官府既勾结又矛盾，其后代入清后继续传教，前后历300余年。

白莲教在历史上很长时间都是一个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秘密组织，曾多次遭到禁止和镇压。作为一种异端宗教，它一直在下层人民中间流传。清代官僚黄育楩曾说：“谋逆之源，由于聚众。为教首者，又惑以劫数，诱以逆书，复以符咒迷人，而同教自乐从逆矣。”它曾成为很多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在元末以滦县为中心，冀东及长城沿边一直是白莲教活动的地区，并从这里向全国蔓延，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反元大起义。明初永乐年间有唐赛儿领导的起义，明末天启时期有徐鸿儒、王好贤领导的起义。此外还有很多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明代嘉靖年间的江南太湖流域马祖师领导的农民起义和山西、内蒙一带的农民起义等。到清朝乾隆年间在山东一带爆发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等。

白莲教要人们等待“佛”的降临，这是迷信的、落后的、消极的方面。但是因为它的某些教义能给人以安慰和希望，所以容易为广大穷苦人民所接受。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能成为组织、号召劳动人民起来反抗统治者的工具。但广大劳动人民并没有拘泥于白莲教的教义，虔诚地相信它的说教，而是对它进行了某些改造，并利用它为起义作准

备工作。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例如白莲教中规定“戒酒”，但齐林等人却准备在起义后立刻到襄阳城十字街“和酒盟众”。此外如教义中规定“不杀”，可是愤怒的农民对于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毫不留情，见着必杀。正因为如此，广大人民群众才团结在白莲教周围，举行了多次起义。

白莲教的组织到了清代分布很广，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到处都有，尤其是直隶(今河北)、山东、山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安徽等最为活跃。各阶层人民踊跃参加，在农村中则有“乡约吃教”，在城镇、集市则有“差役书办吃教”。

当时教门派别很多，有清茶门教、牛八教、十字教、焚香教、混元教、红阳教、白阳教、老君门教、大乘教、清香教、圆顿教、八卦教、大阳教等五花八门，其中许多教派都是白莲教的支派。白莲教拥有的群众最多，影响最大。它本身又分为许多别支，各以教主、首领为中心，组织相当复杂。领导人的名称也很多，有“祖师”、“师父”、“老掌拒”、“少掌拒”、“掌教元帅”、“先锋”等等。它的这种组织形式，适应于秘密传教(他们有时也用经文编成歌词，配上民间小调，击渔鼓、打竹板，用说唱的形式传教)，分散活动。但是不利于集中和统一。清代的白莲教大起义就突出地暴露了这一弱点，最后成为导致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白莲教的经卷中充斥了许多封建迷信的糟粕，很多说法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宗教迷信是违反科学的。而当时的农民多有迷信思想，相信宗教，不可能正确地理解自然和社会现象。例如，在白莲教的教义中，有所谓“真空家乡，无生父母”；还有“逢三不开口，逢三不出手”种种咒语、暗记，都是神秘主义的，也是迷信落后的东西。所以它不能深入、持久地和广泛地发动群众。它不能提出鲜明的斗争口号、斗争策略及明确的政治纲领，因而也不能深入持久地发动人民群众与统治者作坚决、彻底的斗争。即使是异端宗教，也不一定必然转化为革命，“要暴动发展起来，必须有世俗的关系牵涉进来”。所以白莲教必须对原有宗教的教主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实际上，在传播过程当中，革命群众常常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在其中加上了一些富有革命精神的口号。如“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等。

另一方面，白莲教的某些教义中，也包含着贫苦人民互相帮助、同甘共苦的思想。例如在白莲教的宣传中：“习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从教者先选供给米若干，入教之后，教中所获赀物，悉以均分”，“习教之人，不携赀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等等。这种关系对于贫苦的劳动人民来说，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就连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小小邪术，足以眩人”。此外，清代的白莲教还宣传“弥勒佛转世，当辅牛八(朱字的分写)，入教者可免诸厄”。这种宣传反映了白莲教利用民族矛盾，达到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由于白莲教在宣传形势上迎合人心，特别对于在清朝统治者残酷剥削和压迫下的漂泊无定的流民来说，更是一种幸福的憧憬，更具吸引力，所以能得到广泛流传，终于成为劳动人民积聚力量、反抗清朝统治的一种组织形式。

白莲教的成员虽然复杂，但基本群众却是贫苦农民、流民和失业的

手工业者，入教的“有田之人”，绝大多数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像湖北枝江、宜都一带的大地主聂杰人这样的“号首富”者，毕竟是极个别的。聂杰人是在武昌府同知常丹葵的“可逼”和“屡索不厌”的情况下才参加白莲教的。

乾隆中期以后，白莲教组织发展的更加迅速。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河南鹿邑县樊明德就在河南一带广为传经授徒，提出了“换乾坤，换世界”等口号。与他同时或稍晚一点的著名教道还有河南的鹿邑县人刘松，安徽太和县人刘之协等。这时期白莲教在河淮江汉等广大地区异常活跃，并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乾隆四十年刘松不幸被捕，流放到甘肃省隆德县。刘松的两个徒弟刘之协与宋之清继承了师父的事业，使白莲教更加发展壮大起来。13年后刘之协来到了甘肃隆德县，同刘松秘密联系，准备以白莲教为纽带发动反清起义。刘之协从甘肃回到河南后，与宋之清一起经常活动在湖北、四川、安徽等省。他们把河南鹿邑幼童王双喜说成是“明裔朱姓”，宣传刘松的儿子是四儿，是“弥勒佛转世，当辅牛八”，借此召集群众，他们分别派出徒弟到湖北、四川、陕西等省主掌教事。在湖北有齐林、樊学明；在四川有谢天绣；在陕西有韩龙。他们利用白莲教经文中反对黑暗，追求光明，光明最终必将战胜黑暗的教义，宣传“大劫在遇，天地皆暗，日月无光”，“黄天将死，苍天将生”，“世界必一大变”。他们还号召信徒以四海为家，把教友关系看成是同生父母的兄弟姊妹关系，号召同教互通财物，互相帮助，男女平等。这些口号直接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和迫切要求。因此对贫苦农民有极大的吸引力，白莲教的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在湖北襄阳地区，已成为白莲教活动的中心。石香农在《戡靖教匪述编》中说：“刘之协……谋逆湖北襄阳……未几当阳、枝江相继作乱，由是勾连裹胁，日聚月滋，而无赖不法之徒，如四川之咽噜子，南山之老户，襄阳之棚民，沿江私盐之枭，各省私铸之犯，乘间阑入鼓煽劫掠，纷纷而起。”

清政府感到白莲严重威胁着自己的统治，决心要彻底根除。从乾隆五十八年开始，对白莲教教徒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极其残酷的大逮捕和大屠杀。刘之协、王双喜在河南同时被捕，王双喜因年幼免死，流放到新疆。刘之协于乾隆五十九年，从河南扶沟逃到襄阳，准备联合齐林等人举行起义。

第二节 鄂女王聪儿聚众起义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湖北襄阳地区的白莲教首领齐林、王聪儿(齐林之妻)、宋之清、樊学明等商定，于正月十五元宵节时，趁人们观花灯、闹元宵而官府有可能戒备放松之时，趁机举行起义，为了加强联络。使起义进行顺利，为此派出许多名骨干。到湖北各地串联，以便起义打响后，各地教众起来响应。不幸他们秘密进行的这些活动，被泄露出去，致使齐林、宋之清等100多名骨干惨遭杀害。刘之协、王聪儿幸免于难，王聪儿藏身于襄阳郊区一座叫做青莲庵的尼姑庙中。“乾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的白莲教首领，又秘密商定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准备刀把火药。因为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所以清政府搜捕白莲教徒非常残酷，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搜查和辑拿邪教为名，进行敲榨勒索。“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则诬以邪教治罪”。所以各地教首就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召集教徒奋起反抗。乾隆六十年，湖北竹溪人民进行了“夺犯殴差”的斗争，遭到清朝统治者的血腥镇压。所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等人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举行起义，揭开了这次大起义的序幕。

孝感、枣阳之战在四川、湖北一带活动的白莲教领袖齐林、宋之清等被捕遇难以后，王发生被发配到新疆。这时，清政府认为白莲教是拥有威胁封建统治的强大力量，所以清朝统治者极为不安，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地方官吏借机进行敲诈勒索，他们挨户搜查，特别是对于贫苦农民，“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也就是说，不是教徒的也得给钱，不给钱，或者给少了，就得按信奉邪教论处。武昌府(今湖北武汉)同知常丹葵，任意敲诈迫害村民，连累数千名无辜群众，1795年他又到湖北荆州、宜昌地区去巡捕，稍得“证据”，立即施以酷刑，用铁锤猛烈砸击农民，甚至还用铁钉把农民钉在墙上，所谓“嫌疑”分子也要押送省城。每只小船上装一二百人，有的因饥寒而死，尸体就被扔进江里，有的被严刑考打，死于狱中，受害者不计其数。这样清王朝对白莲教的镇压，实际上已变成了对广大群众的大屠杀了。

常言道“抽刀断水水更流”，清朝的残酷迫害，不仅使白莲教的广大教徒义愤填胸，而且也激起了各省人民的强烈反抗。再加上清政府当时为了镇压湖南、贵州地区的苗民起义，更加紧了对起义邻省，特别是湖北的横征暴敛。所以湖北宜都、枝江两县人民在张正谟、聂杰人等人领导下，首先起义——于1796年2月15日(嘉庆元年正月初七)，首先举起了白莲教起义的大旗。给了层层紧逼的清朝统治者一个针锋相对、措手不及的打击。接着其他地区接踵而起，枝江的刘盛鸣，长阳的林之华、覃加耀、黄廷柱，宜都的曾广宁以及长乐(今五峰)都相继起义响应。由于长期的组织工作，白莲教徒遍布于各阶层之中，当阳县衙门里的衙役也早就同起义军有了联络，二月十五日，当阳县令还蒙在鼓里时，他听说邻近各县都已发生民变后，便立即升堂，命令县役们赶快严捕本县教徒。没想到县役们齐声答道：“我们都是白莲教，去抓谁呢?”县令一听大

怒，拍桌骂道："你们反啦?!"大家不慌不忙的答道："反就反嘛，发什么火啊!"这个昏愦的县令到这时才算明白过来，站起来就想跑。可是已经晚了。县役们一拥而上，将他拿住，押出县衙门，还勒令他左手拿钱一串，右手抓银一锭，游街示众，最后把他杀死，起义群众胜利地占领了县城。紧接着在来凤、竹山、东湖、远安、保康、宣恩、咸丰、龙山等地都暴发了起义。三月初襄阳、樊城一带的人民在王聪儿、姚之富、王廷诏、刘启荣、樊人杰、张汉潮、张天伦、王光祖、高均德等领导下在襄阳郊区黄龙埔揭竿而起。五月，孝感人民在鲁维志等领导下起兵响应。

在湖北战场上，各支起义军此呼彼应，互相声援，频频出击，战果辉煌。张正谟等人起义的队伍一月之间发展到1万多人。

起义的农民从一开始，就用"白布缠头，白旗为号"，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以清朝皇帝为首的整个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湖北当阳的起义军曾明确提出："天上换玉皇、地府换阎王，另议孔夫子，不用四书五经"的战斗口号，表明了起义农民的斗争决心。

各支起义军还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自立年号，任命了各级官吏。如湖北襄阳起义军以"万利"纪年。襄阳起义军中设大丞相、都督、知府、知县等文职及元帅、先锋、总兵等武职。

为了镇压这次起义，清政府除纠集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等省的军队之外，还先后从山西、直隶(河北)、两广、山东、黑龙江、吉林、盛京(辽宁)等省调来大批清军，并且还动员了索伦兵等少数民族的军队。

清军首先把矛头指向了湖北。企图集中兵力，一举全歼襄阳起义军。襄阳战役从嘉庆元年四月开始，明亮、鄂辉、庆成等带领清军和刚获释放的在河南、湖北两省的"蒙古窃马谪犯"所组成的骑兵包围了襄阳起义军。襄阳起义军在王聪儿、姚之富的领导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起义军曾几度猛攻汉水边上的重镇襄阳和樊城，但由于守军顽抗，均未攻下。但却得到了人民的拥护，起义军很快发展到四五万人，粉碎了清军的多次围攻。接着起义军兵分几路转战于河南、湖北交界地区。襄阳起义军在湖北各路起义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声望也最高。就是在白莲教中论师徒关系，也是各路起义军辈数最高的。因此，它是湖北各路起义军中的主力部队。

《清史稿》载"已亥湖北当阳教匪起戕官西安将军恒瑞率兵2000剿之"。清帝颐琰命西安将军恒瑞率兵赴楚，进攻当阳起义军林之华部；督统永保，待卫舒亮、鄂辉进攻襄阳义军王聪儿、姚之富部；鄂都毕沅及惠龄进攻枝江义军聂杰人部。形势严峻，但襄阳起义军并没有被清军的来势汹汹所吓倒。这期间，清朝统治者认为只要把这支"最为猖獗"的起义军部队消灭掉，其他的农民义军就不攻自破，所以又立即从库内拨出白银200万两，专供湖北军需。又从湖南调来2万名苗兵，配合以上所派部队，对襄阳起义军发动了大规模的重点"围剿"。

湖南襄阳起义军，配合各支起义军，依靠人民群众，粉碎了清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到四月底，除惠龄击败枝江义军俘虏聂杰人外，其余起义军日益强大。永保认为白莲教诸首领均在襄阳义军之中。奏请增兵，颐琰命直隶提督庆成、山西总兵德令各率兵2000，由永保统一指挥

进攻襄阳义军。此时，襄阳义军由王聪儿、姚之富统帅，于五月，他们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出随州经钟祥，兵锋直逼孝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离汉阳只有100来里的地方，“三楚震动”，吓得清朝政府赶快宣布武昌(湖北的省诚)“戒严”。六月，襄阳起义军又在孝感附近设下埋伏，清军中伏，当场击毙清军参将傅成朋。

襄阳战役进行了五个多月，这是这支部队在一个地区作战最长的一次，他们在同敌人作战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日益壮大起来，队伍发展到5万多人。以后，他们转战于湖北的中部和北部地区，开始了长期的流动作战。

八月下旬，王聪儿、姚之富等带领5万起义军在钟样粉碎了清军的“四面夹攻”的诡计，突围北上。九月，在双沟分成两路，各约2万余人。一路向南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从枣阳赴唐县；一路向西北由张汉潮率领经白河西上经吕堰驿赴邓州，但不久又折回，向东南与王聪儿汇合，十一月，齐王氏(王聪儿)又率领大军渡过刘家河，进逼谷城、光化，还把河南巡抚景安包围在魏家集(今湖北与河南交界处)。在起义军的调动下，半年多来清军东突西窜，疲于奔命，一举歼灭襄阳起义军的企图成了泡影。

襄阳起义军为摆脱湖北优势清军，进行战略转移，1797年初，起义军分三路乘虚攻入河南，再经陕西向四川进发。北路由王廷诏率领攻下河南叶县的保安驿后，围清军于裕州(河南方域)。西路由李全率领，攻下河南的信阳后，折向湖北再次进入河南，沿河南，湖北边境进入陕西，直下南山老林中的镇安。为了迅速同北路、西路两军会合，齐王氏、姚之富亲率中路大军，从河南的南阳出发，北进嵩县，旋即回军南下到达陕、楚边境，攻入湖北的郧西，再折入陕西，同北路、西路两支大军会师于镇安。

为了迅速同四川起义会合，襄阳起义军马不停蹄，从镇安经汉阴、石泉，迅速改道汉水北岸的紫阳白马石。义军在行军途中，“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以牵制清军。

在此以前，嘉庆皇帝曾一再命令清军全力加强汉水防御，以便把起义军压在汉北聚而歼之。然而，赵义军轻装前进，如流水疾风，早在清军赶到汉水边的五天以前，就在当地渔民的帮助下，夺得船只，全部渡过了汉水。清河南巡抚景安奉命截击，却龟缩城中不敢出战，湖北追兵逼留途中，不敢急进。清朝皇帝颐琰以永保作战不利，将其逮捕进京治罪。陕西清军奉命全力加强汉水防御，企图阻止义军入川。其实，起义军早以全部渡过汉水，于嘉庆二年五月(1797年)，襄阳起义军终于胜利结束了这纵横5个省区的千里长征，到达东乡，于四川起义军会师。

王聪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率领襄阳起义军，爬山涉水，风餐露宿，穿州过县，长途行军五六千里，战胜了清军的追剿堵截，最后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其主要原因是，起义军得到了各地人民群众的拥护，人们纷纷送粮食、骡马、盐菜给起义军，帮助起义军带路、摇船，有的甚至全家烧掉了茅屋参加了起义队伍，使起义军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八旗兵高级将领养尊处优，生活腐化，对所统帅的队伍不加训练，丧失了战争力。其次，绿营兵的战斗力也大为削弱，作战时往往“虚张声势，稍有斩获，以少报多”。

清军将领“惟酒肉笙歌自娱”，一有战事则“拥兵自卫，或命将弁堵剿，将并也不向前，惟催督乡勇，乡勇亦不踊跃，当时流传“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这是对清军腐败最生动的写照，也是最辛辣的讽刺。而起义军则士气昂杨，作战勇敢，如烈火燃烧，所向披靡，连“妇人孺子、亦矫捷若飞”。

回师襄阳之战起义军东乡会师以后，起义队伍更加壮大，经各路起义军共同协商，决定按地区进行分编，以黄、蓝、青、白等各色为号。湖北襄阳起义军以王聪儿、姚之富为首称为襄阳黄号，包括王光祖、樊人杰、伍金柱、伍怀志、辛聪、辛文、庞洪胜、曾之秀、齐国谟、王廷诏等各部，高均德、张天伦为首称为襄阳白号，包括宋国富、杨开甲、高二、高三、马五，王凌高、辛斗、魏学盛、陈国珠、高见奇、杨开第等各部；张汉潮为首称襄阳蓝号，包括李潮、李槐、再学胜、胡明远等各部，四川起义军徐天德为首称达州青号，包括徐天寿、赵麻花、汪瀛、熊翠、熊方青、陈侍学等各部；冷天禄、王三槐为首称东乡白号，包括张子聪、庹向摇、符日明、刘朝选各部；尤绍周为首称太平黄号，包括唐大信、龚健、徐万福、王国贤、唐明万等各部；罗其清为首称巴山白号，包括罗其书、鲜大川、苟文明等各部；冉文俦、冉天元为称为通江蓝号，包括冉天泗、王士虎、陈朝观、李彬、杨步清、蒲天宝等各部。此外还有林亮功称云阳月蓝号，包括林定相、张长更、萧占国、包正洪等各部。

襄阳起义军与四川起义军会师后不久，宜绵、明亮、庆成等率领清军从三面向起义军包抄。在这一关键时刻，王聪儿决定除李全一部留川外，襄阳起义军全部撤离四川。其实，应该说这一决策是湖北起义军战略性的错误。造成从此长期流动作战，力量分散终归失败。起义军成员中很大一部分为流民无产者，流民本身的不稳定性影响到他们的战斗作风和战斗力。同时由于白莲教支派繁多，造成了组织的分散。他们多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由于起义队伍发展壮大迅速，有一些社会渣滓也卷进了起义队伍。四川起义军中以王三槐为首的极少数人，就是混进起义军队的变节分子。早在嘉庆二年春夏之交，他在清军的压力下，开始与敌人勾结。四川起义军与湖北起义军会师以后，阻碍了他向清军投降的计划，因此，他非常不安，制造事端，反对联合，专闹分裂。说什么“我们四川地方犯不着叫他们湖北人来糟蹋”。他坚持不肯与王聪儿领导的襄阳起义军“合伙”。他还以“官兵追得太紧，大家分路便于逃走”为借口，反对联合作战。加上川东多是山区，土壤比较瘠薄，起义军的给养发生了困难。同时，也可能是湖北起义军怕遭到象在襄阳一带的包围，因而决定撤离四川。当时川陕边界地区的清军扼守较严，于是决定顺长江东返湖北。王聪儿为避免在不利情况下作战，留李全部与四川起义联合作战，自率主力向东转进。嘉庆二年七月。襄阳起义军从东乡一带出发经云阳、万县，在夔州(四川奉节)白帝城附近分兵两路一路由王廷诏率领经远安、当阳进取荆州(湖北江陵)；一路由王聪儿率领，亲自指挥，经巴东兴山到保康、南漳一带，进至白帝城。在白帝城同清军激战了三昼夜。当时，清朝统帅宣锦急令明亮、德楞泰兼程追击。德楞泰自水路直趋荆州，明亮由陆路直至宜昌，清侍卫惠伦、都统阿哈保带索伦兵3000

坛援明亮。清军又今乡勇、村民“沿江树栅筑堡自固”，阻截义军。王聪儿同士兵一起，手持盾牌，“燃炬夜攻，更番迭战”、杀得清军连喘息机会都没有，从而突破了敌人的防线。七月，王聪儿率部进入湖北的巴东、归州(今秭归)一带，随即杀向兴山、保康、南漳、转而又折向东南，由宜城、钟祥直奔襄樊而来。面对起义军的凌厉攻势，清政府慌忙下令“江汉戒严”。由于敌人在荆襄一带预先设置了重兵，构筑了工事。王聪儿知道荆州带有重兵驻守，所以起义军毅然决定放弃攻占城市的计划，齐、王两路重新会合，依然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向西迂回至房县、竹山地区，并在郧西境内大败清军，杀死了护军统领惠伦等将领多人，然后进入陕西。九月，李全率部也转移到陕西，同王聪儿会师于兴安(今安康)。十一月，“襄阳黄号”、“襄阳白号”、“襄阳蓝号”三路义军的各支队伍又会合在一起，翻越险峻的大巴山，连营20余里，转战在川、陕边界。后来，再次进入四川境内。

几个月来，敌人被起义军飘忽不定的流动作战拖得疲惫不堪，嘉庆皇帝恼羞成怒，大骂王聪儿是“贼中首逆”，勒令各部清军云集汉南、川北，务必把襄阳起义军围歼于汉水之南。

三岔河之战嘉庆皇帝认为起义军流动作战，对清军极为不利，乃勒令各军集中于汉南、川北，企图围歼襄阳起义军于汉水以南。

王聪儿识破了清军的企图，就采取调虎离山计，于1798年初，她密令高均德带领一支人马出击东北方向以引诱敌人，清军果然中计跟在高均德后面穷追不舍。王聪儿乘机亲自率领主力北上，抢渡汉水。发动了有名的汉中大战，他们从陕西城固、洋县一带的南山老林出发，迅速插入宝鸡、岐山附近。而后兵分十队，步兵和骑兵相间，猛攻郡县(今眉县)，先头部队由李全率领进攻盩厔(周至)，真逼西安。起义军行动迅速，清军明亮、德楞泰等率部兼程阻击,陕西巡抚秦承恩则慌忙撤回西安加强防守。

不幸，李全率领的先头部队伍在焦家镇、圪子村同清军总兵王文雄部激战，出师不利，遭受了重大损失。王聪儿见清军已有准备。便当机立断，决定暂不取西安，而改由山阳不河铺一带向东杀回湖北，这时，清军紧迫于后，前面，赛冲阿等率清军在高坝店、漫川关等处阻击。而明亮、德楞泰等又由黄陇铺，宽平各处往回兜击，起义军已处在被包围的态势。这种情况下，王聪儿下令分兵三路抗击清军，排列在左、右两山和山下大路前抗击。起义军激战不利，准备向东北方向突围，又遭清军堵截。于是只好向西南的甘沟一带退却。在此又经一场苦战，突出重围，进入湖北。这时，德楞泰、明亮等率满汉清军和地主武装又由郧西的上津堡附近兜回，在郧阳(今郧县)县境内的岔河正好同王聪儿的部队相遇。清军通过侦察，得知王聪儿等起义军的主要首领都在卸花坡时，于是集中兵力，分八路包围卸花坡，简直把卸花坡围个水泄不通。

起义军处境十分不利，情况万分危急。面对德楞泰、明亮、赛冲阿、阿哈保等八路强敌的围攻，王聪儿率领起义军拼死抵抗，当弹药、箭矢用完后，他们就从山上滚下大石头，用以击杀清军。但是由于敌人在数量上占了压倒的优势，真是寡不敌众，起义军的防线终于被突破，清军蜂拥而上。这时王聪儿，姚之富跳下战马，率领身边10多名战士(多为女士)攀登上险峻的山峰至顶，毫不犹豫地相继跳下陡峭的悬崖，

壮烈地牺牲了。这一天是1798年的3月6日，王聪儿年仅22岁。两年来，她率领襄阳起义军转战南北，机智勇敢，杀得清军闻风丧胆，最后矢志不屈，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可谓壮怀激烈、豪气如虹。王聪儿短暂而战斗的一生，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妇女的智慧和胆略及英勇无畏的奉献精神，王聪儿，中国妇女的英雄典范，将永载史册。

第三节 巴山老林义军蜂起

湖北襄阳起义军在郧西三岔河战役的失败，使起义军遭到很大的损失，但从整个战斗形势来看，这时白莲教的起义并不处于低潮，而是在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因为这时四川白莲教起义军的力量发展更加强大了。

“在湖北白莲教起义影响下，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九月，达州教首徐添德、东乡(今四川宣汉)教首王三槐、冷天禄等皆各率众起义。”

清代中叶的白莲教大起义，实质上是以川、陕、楚三省人民为代表的全国人民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在襄阳起义军首先擂起隆隆战鼓声中，四川人民也举起了反抗的大旗。襄阳起义军挺进四川时，李全率领西路军路过陕西商南县，商南人民有五六千人闻风相从。四川达州徐添德起义时，远近百姓带着全家老小加入的竟有数百家之多。起义军还未抵达巴州，巴州人民就纷纷出城迎接；还未抵达通江，通江的老百姓就有许多人跑出城去加入起义军的队伍。

起义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为他们带路、安排住宿、更换骡马、补充衣食火药。因此起义军进军时。可以不带粮食。不带行李，轻装疾走。所以他们充分利用林深山险的有利地形，采取不整队，不走平原，时分时合，忽南忽北，或战或走的战术，不时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使清军惊恐万状，不敢迎战。

四川总督魁伦等，只敢远远地躲在起义军的背后跟踪。“建锐”、“火器”两营京兵奉命去追剿起义军，距达州仅70里，却提心吊胆地走了两天才到。至于地方官兵，则更是不堪一击了。四川长寿县令，还没等起义军攻进城来，就偷偷地坐船逃跑了。起义头两年，地主武装躲在寨堡里，哪怕只见到一两个起义军战士，便马上“连村悉(都)溃”，听到起义战士大喝一声，更立即“弃械就缚”，甚至找一根草绳套住自己的脖子，主动拴在起义军的马尾巴上甘作俘虏!对于那些怯懦的清朝将领，老百姓便奉送给他们一个名符其实的外号——“迎送伯”(只会为起义军迎来送往，而不敢同起义军正面交锋的怕死鬼)。

嘉庆元年(1796年)十月，四川达州爆发了徐天德、王登廷领导的起义，东乡(今宣汉)爆发了冷天禄、王三槐领导的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太平孙赐俸、龙绍周等人领导的起义。十二月罗其清、苟文明、冉文俦、鲜大川、冉天元等人，分别在四川巴州、通江等地起义、不到一年，四川到处燃起起义烽火，清军顾此失彼，连吃败使。四川起义军与湖北、陕西的起义军并肩战斗，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川起义军一般可分为两大支，一支由徐天德、冷天禄、王三槐领导，另一支由冉文俦、罗其清领导。

达州、东乡之战四川徐天德、冷天禄于嘉庆元年(1796年)九月，领导当地人民在东乡(四川宣汉)、达州(四川达县)起义以响应湖北起义军，清朝皇帝嘉庆派四川总督英善，成都将军勒礼善前往镇压。英善等率重兵龟缩达州城内不敢出战，而派游击尚维岳等率2000驻扎在达州城

外的娘娘庙；又派都司清福进驻东乡的天星桥以作呼应，成犄角之势。他们妄图堵死达州起义军的出路，切断东乡起义军的援兵，从而可以一举歼灭达州的白莲教起义军。可是徐天德识破了清军的阴谋，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带领起义军走出麻柳场，预先分兵一部分进攻东天星桥，同时亲自率领主力队伍夜袭娘娘庙。起义军士气旺盛，旗开得胜，一下子就把两地清军全部歼灭，尚维岳、清福等清军将领被当场杀死。

达州白莲教起义军就这样胜利地粉碎了清军的第一次围剿。接着，起义军又多次乘胜沉重地打击了各地地主武装的负隅顽抗，起义军迅速地发展到了太平、新宁(今开江)、东乡一带。

然而清军是不甘心失败的，(1796年)嘉庆元年十一月，英善又派重庆总兵袁国璜率川、湘、陕各路新调来的清军进攻徐天德大营。这时，起义军乘清军立足未稳，便迅速发动猛烈攻击，轮番作战使清军三天三夜不能吃饭、睡觉，致使清军疲惫不堪。清军方面又调来陕西援军到达东乡，也同样被打得不敢出战。清军只好合兵一处，退兵躲进老营湾，利用周围的树木作柱，编上竹竿竹条，捆上牛皮作墙，墙外又挖了壕沟，埋上铁棱。他们整天躲在“墙”内不敢出来，每夜还要派士兵100多人在周围巡逻，以阻击起义军的进攻。起义军首领们机智灵活，利用雾夜以火攻摧毁了清军的防御措施，埋伏在壕沟边的万余名起义军战士突然攻入，向清军营内扔进千万个火球，顿时浓烟四起，清营火光冲天，起义军又摧毁了清军的“墙”，填平了壕沟，万余名起义军战士，杀进清军营房，全歼清军，总兵袁国璜被杀。

不久，东乡起义军韵冷天禄率部前来跟达州起义军会合，掀起了四川白莲教起义的新高潮，各地人民纷纷乘胜而起，清军望风披靡。徐天德又利用除夕之夜一举攻克东乡城。

清朝皇帝嘉庆又派陕、甘总督宜锦率兵入川，以加强清军。1797年上半年，当徐天德率领的四川起义军，在白秀山遭到清军德楞泰围攻时，东乡附近的地主武装也疯狂进攻，这时，刚刚转移到四川的襄阳起义军在王聪儿的率领下，及时赶到了，他们化成黄、白、蓝三队步兵在前，骑兵在后，联合作战。他们突然出现在山沟，向清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山上的达州义军得到了兄弟部队的支援，士气倍增，向清军发动了反攻，乘势击退清军，至此，四川与襄阳两大主力起义军在东乡胜利会师，“分屯山冈亘绵30余里”，声势浩大，蔚为壮观。

大鹏寨之战嘉庆二年十一月，冉文俦、罗其清一路起义军进军巴州、仪陇、营山，“梗绝运道。”徐、冷、王一路起义军进军大竹、长寿，威胁嘉陵江边水陆重镇——合州。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主持镇压的宜绵束手无策，只好向嘉庆哀求加派大员，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嘉庆增派额勒登保总统四川军务，额勒登保到任后，首先招募新兵，并利用刘清、罗思举、桂涵等地方官吏、地主、土豪组织乡勇，与起义军对抗。

1789年初，“东乡白号”起义军在冷天禄率领下，出奇制胜，顺利地占领了在开南县西南60里、拥有几千家商号的临江市。各起义军(除王聪儿一支的一部分外)闻讯后纷纷赶来聚会，在这里载歌载舞，欢度除夕。庆祝起义以来取得的伟大胜利。历来遭受官僚豪绅凌辱迫害的演员们，这时也高兴地为起义军演出了歌舞戏曲。临江市里寒梅怒放，鞭炮

齐鸣，充满了一片欢欣鼓舞、喜迎新春的吉庆景象。

东乡会师和临江聚会，是起义军1年多来英勇奋战，不断成熟的结果，它不仅是一次对各起义部队的大检阅，大整顿，也是一次反清朝统治的大示威，显示了起义队伍的团结和力量，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了川、陕、楚三省人民起义的进一步发展。

襄阳起义军回师河北后，四川义军在巴州(四川巴中)、达州(达县)、东乡(宣汉)、太平(万源)等，20余州县的广大地区，流动作战，使清军“疲于奔命”。嘉庆三年四月，冷天禄部义军在云阳安乐坪；徐天德部在新宁(开江)等地两次击败清军和地主武装。罗其通、冉文俦部于夏秋之际，在营山县箕山屯集粮草建立大本营，并修排栅三层，左右有高均德、王廷诏、李全等各部营寨互相策应。经常在营山、巴州、仪陇、渠县一带袭击清军、截夺军粮，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七月，由于王三槐对敌人抱有幻想陷入勒保圈套，为勒保、刘清等诱捕。但起义军在徐天德、冷天禄、冉文俦、罗其清领导下继续顽强战斗。九月，清军惠龄、额勒登保、恒瑞、德楞泰四路围攻箕山起义军大营，经过激烈战斗，起义军被迫转移到素称天险的大鹏山。十月，起义军与清军在营山县展开了有名有“大鹏寨战役”。该地西北有紫观山、龙台山，东北有双子山，西南有郑家山，在峪中宝珠寺，屯集大批军粮物资，战斗一开始罗其清率领的义军就占领了“天险”大鹏山。冉文俦、徐天德等转战大竹、梁山等地为外援。山上义军在各山险隘之处，修筑木栅、石墙，派兵据守。清军纠集了额勒登保、德楞泰、惠龄、恒瑞等四路大军，包围了大鹏寨，发重兵围攻，多日攻不下，两军对峙达三个多月。清帝颙琰严令额勒登保等“全力以赴”，清军疯狂进攻，又派罗思举带领地主武装、乡勇趁夜从山后悬崖登上山。用火攻突袭，坚持了三个多月的起义军队伍，终于被清军打败，大鹏寨被清军占领，起义军退守到青观山虚空寨，清军继续强攻，十二月义军突围，罗其清被俘就义。次年正月，冉文俦又在通江麻坝寨战役中壮烈牺牲。起义军余部仍在川、陕广大地区继续与清军作战。

苍溪之战面对如火如荼的白莲教起义，清朝皇帝又急又恨，大骂领兵诸将“剿防不力”是不忠之臣，严厉督责他们全力以赴，不仅要生擒“首逆”，而且要全歼“贼众”。于是清军向起义军发动了疯狂的反扑。1798年年底，在四路清军和地主乡勇的联合进攻下，四川起义军的大鹏寨在坚守了三个多月以后被攻破了，起义军的首领罗其清被俘且英勇就义；冉文俦转移到通江后，也在一次突围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但是各地起义军并没有气馁、消沉，他们英勇顽强，继续奋战，忽东忽西，时聚时散，同敌人周旋在川、陕、楚、豫、甘五省的辽阔大地上，战斗进行得威武雄壮，有声有色。

嘉庆四年正月，清王朝加紧扶植地主武装，对起义军实行了“坚壁清野”、“边巡边剿”政策。又宣布额勒登保为清军的最高统帅，可是这一切并没有马上奏效，起义军仍在发展之中，四川起义军与湖北起义军时分时合，四出活动。

冉文俦阵亡后，他的侄子冉天元继续领导这支起义军，东征东乡，北击太平。嘉庆四年九月，在关口坪击败清军后，由定远渡过嘉隆江，迅速发展到1万多人，声势大震，成都、重庆同时戒严，这支部队在进

入了巴山老林后作短暂调整后，冉天元又统率全军直奔苍溪。

十一月，清军主帅额勒登保率军追击，把冉天元部围困在苍溪县的人头山上，并命令杨遇春、穆克登布等率精兵分成三路向山上强攻。冉天元沉着应战，精心指挥，年轻的冉天元面对强敌，从容地组织力量，借居高临下之优势，全力进攻额勒登保的中营，同清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激烈搏斗，把阵前清军杀得血肉横飞。战斗进行到夜幕降临，起义军又从山上扔下千万支火炬，把清军营房上空照得如同白昼，接着就用强弓发射利箭，大量杀伤了清军。这一仗，清军阵亡副将以下将领24人，士兵200多人。在起义军的猛烈攻击下，清军不敢再出战，而冉天元则借黎明前夜色的掩护，突破敌人的重围，挺进到巴州的阴背场一带活动。

高院场之战1800年初，冉天元、张子聪、陈得俸、徐万富、赵麻花五部起义军，在粉碎了各路清军的“围剿”之后，在合州会师。这支数万人的起义大军，从合州出发，转向定远(四川武胜)，于一月十五日到达嘉陵江边的石板沱。这时候，石板沱西岸的清军正在剧场欢庆元宵，欣赏“演春灯”，根本没有想到起义军的前哨部队已经夺船渡过江来，起义军突然出现在剧场，吓得清军四处逃窜。接着，起义军的大队人马便顺利地渡过了嘉陵江。远近的人们闻讯纷纷起来参加起义军，因此，起义队伍又壮大起来，很快发展到了10多万人，起义军又迅速向西突进，四天后，抵达蓬溪县的高院场。

清总兵朱射斗迅立即赶来，用大炮轰击起义军。起义军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匍匐前进，一直杀到朱射斗的指挥帐前，把他们团团围住。朱射斗方知大事不好，慌忙准备逃命，早被起义军拿下，手起刀落，斩于帐下。他所率领的1000多名兵丁，也被起义军全歼。

高院场之战，是一场出色的歼灭战。它使清朝官兵胆颤心寒，威风扫地。充分显示了白莲教起义军的英勇无畏、勇敢善战和各部联合作战的巨大威力。

智渡潼河，猛插川西为了彻底粉碎清军对于四川东北部各支起义军的“围剿”，同时，也是为了接应由甘肃一带杀回四川的各支起义军。高院场战役之后，冉天元率部北上梓潼、江油一带，进击川西一带清军；而张子聪部则直逼成都而来。

当时，四川西部清军很少，只有川西总督魁伦所辖的少数清军。

1800年农历三月的一天深夜，张子聪率领部队已挺进到射洪县的潼河(今梓潼河)渡口太和镇的东岸了。当地的清朝守军比较麻痹，根本想不到白莲教起义军会插翅飞来，当他们还在兴致勃勃打牌的时候，起义军为了迷惑清军，以便乘机迅速过河，就先派了几名战士，打扮成过路商客同他们一起打牌。贪婪的清朝守军赢光了“客商”的铜钱还不过瘾，还要继续玩牌，想把“客商”身上所带的银钱也赢过来。他们越打越上劲。那里还想到什么防守的事。这时，大队的起义军乘机越来越多地大都渡过了河。等到1万多名起义军战士几乎全部渡过河去的时候，这些“客商”便立即拨出雪亮的战刀，对这些糊里糊涂的清军说：“就拿这家伙作赌注吧”!吓得清军目瞪口呆，只好举手投降，乖乖地当了俘虏。

起义队伍顺利地渡过了潼河，便以最快的速度插入中江、金堂一带展开活动。并同各路起义军一道，控制了川西大部分地区，从而在清朝

当局认为最“完善”、最“安全无事”的大后方开辟了新的战场，直接威胁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中心——成都。清朝最高统治者嘉庆皇帝听到这一消息后，大发雷霆，立即迫令四川总督魁伦“自尽”。

白莲教起义军智渡潼河，猛插川西，对发展壮大起义界队伍，粉碎清军的“坚壁清野”的诡计都是很重要的举措。

马蹄岗之战苍溪战役之后，冉天元率领4000多起义军离开川东北，准备经川西北上与甘肃起义军会师。在此之前，王廷诏、杨开甲已率起义军2万多人经陕西城固进入甘肃。接着徐天德也率部进入湖北，起义军之所以都纷纷撤离四川东北部，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清政府实行了“坚壁清野”，使起义军的困难越来越多。据清官书记载：“贼匪往来不但无人可掠，即一切粮食、牛马无不囤养寨内(地主的堡寨)，当此严冬，饥寒交迫，贼数日渐灭亡。”同时清军镇压的重点是在川东地区，为了避开敌人，发展力量，就必须开辟新的战场。

起义军进入川西，不但打破了清政府“坚壁清野”的诡计，而且壮大了队伍。他们很快从4000多人发展到5万多人，其中包括许多刚加入的、战斗力很强的咽噜党，因此，起义军挺进川西，标志着起义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嘉庆五年(1800年)二月，冉天元等部起义军由剑州(今剑阁)的元山场向江岫西进，企图接应甘肃的友军入川。乌龙寨的清军妄想阻挡起义军的去路，结果被起义军猛烈攻击，破乌龙寨，清军游击马元楷也被当场打死。起义军乘胜西进江岫以西的马蹄岗。二月下旬，清军德楞泰分兵五路来攻，与起义军在白家坝遭遇。冉天元立即命令起义军的3万步兵，3000骑兵，火速占领了9座制高的山峰，采取诱敌深入然后包围的战术。在新店子布设伏兵。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在这次战斗中起义军将领陈得俸不幸被俘遇害，冉天元也中了箭伤。但是敌人在新店子中了埋伏，被起义军重重包围，伤亡更为惨重，特别是清军左、右、前三营几乎全部被击溃。双方一直鏖战到黄昏，德楞泰率残部突围退却。

新店子战役使清军大为震恐。使重庆、成都的清军也都为之震动，嘉庆皇帝急令各路清军严守川西、川北等地，防止川陕两路义军会合。三月初，冉天元在梓潼附近游击，先后在洛阳桥、黄连垭、得胜山等处粉碎了敌人的进攻，随即又折回马蹄岗。又在火石垭的山谷中埋伏3万名战士，准备聚歼追击之敌，同德楞泰血战一场。三月六日，德楞泰兵分四路，追踪而来：以赛冲阿部攻包家沟；阿哈保攻火石垭；温春部攻龙子观；德楞泰亲督主力直逼马蹄岗。冉天元以少量兵力诱敌深入，待敌人进入设伏地区后，下令反击，他一声令下，自己带着箭伤指挥八路大军迎敌。起义军弃马步伐，用浸湿的棉絮裹在成捆的竹子上为盾，挡住清军火器的射击，轮番向前冲击，马蹄岗前杀声动地，烟尘漫天，双方激战了三天三夜。清军伤亡惨重，各路清军均都遗退，守备杨春和也被当场击毙。德楞泰慌忙下马亲自督战，这时，他身边只剩几十名亲兵忙于护卫。在这种情况下，冉天元带领义军战士奋勇直前，准备活捉德楞泰。这时，地主武装头子罗思举带领4000名乡勇起来增援，他们用乱石掷击，不幸冉天元连人带马跌入山涧，冉天元中箭被俘遇害。起义军失去统帅，士气和战斗力大为削弱。余部万余人在剑州石门寨又被德楞泰打败。随后起抢渡潼河，占领太和镇，在川西地区流动作战。

马蹄岗大战，是川陕楚白莲教起义中一次最激烈的大战役，也是一次带有影响全局意义的重要战役。尽管此次战役后，起义军由发展壮大逐惭转为失利以致失败，但是，在这次战役中起义军战士五日四战的勇猛作风和誓死无退的顽强精神，使清军不寒而栗。

马家营之战徐天德部起义军于嘉庆四年挺近湖北，又折回四川，在极度艰苦条件下，与王登廷部出没于东乡、太平地区。五年，在湖北南漳县马家营遭到清总兵王凯部围攻，起义军英勇冲杀，击毙清总兵王凯。这时，尽管条件已经非常难苦，形势也极为不利，但他们仍然活跃在川、楚边界，牵制了大量清军。嘉庆六年(1801)，徐天德率军攻打竹溪县城，击毙清军的千总吴瑜恩。嘉庆七年，在向陕西进军途中，徐天德在西乡县渡河时不幸被淹死，他的弟弟徐天寿、徐天培又率领起义军继续坚持斗争。这时，余下的起义军已退入川、楚、陕边区的深山老林中去。

清朝统治者宣布白莲教业已戡定，实际上直到嘉庆十年，白莲教起义军才被镇压下去。

南巴老林地区数千里崇山峻岭、层峦叠嶂处处有险可守，有路可通；这里地处三省边界，犬牙交错，各地官府鞭长莫及，所以是历代封建王朝统治中比较薄弱的地区。历代农民起义军也多活动于此地区，所以这里的贫苦农民有着反抗压迫的斗争传统。这些，都给白莲教起义军在这里开展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再者，还在于白莲教起义军的群众性和正义性，使它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南巴老林才会成为白莲教起义军的根据地。

从1800年夏天开始，马蹄岗大战之后，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起义军力量在逐渐削弱。白莲教起义转入低潮，其主要原因是清朝政府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政策。一些地主也开始“筑堡团守”，妄图分割起义军与广大人民的联系，断绝起义军的粮草、兵源，进而围困起义军。清朝政府又针对清军的腐败无能，起义军的锐不可挡，就把小村的居民强行集中到大村，把平原地区的居民强行迁徙到有险可守的地区，再在这些寨堡的四周，挖上深沟，垒起高墙，用以集中粮食、牲畜和武器。还分派官吏组织团丁清查户口，严防人们逃跑，并要村民抗击前来进攻的起义军。当时四川、湖北、陕西、甘肃等省被迫实行了“寨堡政策”。这就使起义军的处境更为艰难。

嘉庆五年七月刘之协在河南叶县被俘，嘉庆六年二月，王廷诏战死，接着徐添德、冷天禄、高均德、李全、张汉潮、樊人杰等也都相继被俘或牺牲。到嘉庆六年底，起义军只剩下苟朝九、苟文润、王国贤、王世贵、冯天保、余佐斌等小股队伍，在南巴老林中坚持斗争。

为了消灭出没于老林的小股起义军队伍，清军作了周密的部署。从嘉庆八年正月开始额勒登保、德楞泰、穆克登布，杨遇春等先后带兵搜索老林数次。这时，起义军化整为零，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经常出其不意地打击清军。

1800年，襄阳起义军的余部在高二、马五的领导下，在竹子山大败清军，杀死清朝总兵施缙。以后，他们又同张士龙部合兵于甘肃秦州(今天水)在徽县伏家镇夜袭清军，杀死清军将领17名，歼灭清军1000多人，前四川将军富成也被击毙。接着又转向陕西西乡县，在清宝山大败

清军，杀死了提督王文雄及副将鲍贵等。

到嘉庆七年十月，起义军队伍逐渐缩小，只剩下1万多人了，但他们仍然坚持战斗。这年二月“襄阳黄号”的老将樊人杰率部进入湖北竹溪县境，并穿越老林，直逼汉水。巡抚全保带领总兵王懋赏等急忙带兵堵截。起义军勇猛杀敌，围攻松柏塞，夺得大批军粮，随即迁往山峻路险的马鬃岭。敌人又跟踪而来，分三路围剿，用“劈山炮”猛攻，形势非常紧急。樊人杰临危不惧，振臂一呼，全军上下殊死苦战，终于把清军杀得大败，王懋赏等14名将领也全部丧命。

到了1803年，起义军只剩下1000多人，他们仍利用老林的有利地形，忽川忽陕，忽聚忽散。利用奇袭、埋伏、化装为清军等方法继续打击敌人。仅嘉庆八年就打死清朝军官几十人。六月，额勒登保驻开县，督二十路清军大规模“搜剿”老林。七月，宣布“彻底肃清”，并大量裁减乡勇。但乡勇也大多是贫苦的流民组成，一经解散，无家可归，便纷纷投入起义军的队伍，活跃在陕南洋县、平利一带，起义军声势又壮大起来．他们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很勇敢，使清朝统治下的“三省不得解严”。又因为乡勇不愿与往日的同事交战，所以清朝统治者再用乡勇时已经失灵，在这种情况下额勒登保、德楞泰、杨遇春等毫无办法。在一次突袭中，起义军熊老八等还将额勒登保的得力干将、血债累累的提督穆克登布杀死了!

最后，清政府又采取了收买、分化起义军的诡计，起义军内叛徒赵洪周杀死其领袖苟文润投降清军。九月，起义军领袖苟朝九在南郑被俘就义，不久王作经也在四川白岩湾跳崖牺牲。十一月，除个别小股起义军外，其他全部遭到了残酷镇压，直到嘉庆十年五月，起义军最后一个元帅王世贵壮烈牺牲，标志着这场轰轰烈烈的白莲教大起义最终被清朝统治者镇压下去了。

回顾清代中叶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的历史，证明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广大人民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广大起义者认识到，不打倒贪官污吏，人民就永远没有好日子过。他们的战旗上大书“官逼民反”，说明了劳动人民的觉醒。他们在斗争中的英勇顽强，宁死不降的精神，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纯朴、胆略、气概。

这次起义的主要战场是湖北战区和四川战区。从整个起义过程来看，起义的第一年湖北起义军是主力，第二年则是湖北起义军和四川起义军两支主力，从第三年的二月起，四川起义军则成了支撑整个战局的中坚和核心。主要战场也是在四川地区，一直到起义最后失败。

这次起义中，四川起义军在作战方式上有两个比较显著的阶段，即前期多是长期坚守于一地，后期多是大规模流动作战。这两种形式各有利弊。长期固守于一地的战斗方式，既丧失了发展革命力量的大好时机，又使起义军损失严重，这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流动作战，在四川战区内的一段时间内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正是流动作战，粉碎了清军企图把起义军困囿一地，围而聚歼的阴谋，并使起义军在嘉庆三年受到重大挫折后，得以坚持和发展。当然这种流动作战如果和巩固的根据地结合，就更能发挥威力，坚持战斗。然而起义军却是单纯的流动作

战，因此在敌人的团练、堡寨兴起，实行坚壁清野之后，起义军就又陷入新的困境，虽然奋力战斗，最终不免失败。

整个说来，这次白莲教农民大起义，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计划。各部起义之后往往分散活动，各自为战。以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各支起义军也曾多次会合在一起，但也未能联合起来。直到嘉庆五年，四川的起义军才因感到力量单薄而有联合作战的趋势，但也仅是一时，终究没有统一起来。

这次起义最后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清王朝利用新的地主武装——乡勇和团练镇压起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节 苗民反清硝烟又起

苗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成员。十八世纪，苗族在湖南、贵州、云南、四川、广东和广西等省，形成了若干聚居区。这些聚居区内有几千个苗民村寨，还有不少土家族村寨，边缘地区则苗汉杂居。

元、明、清三朝统治者，对西南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土司制度，即各族原来的统治者封以世袭官职，利用他们来统治本族人民，这就叫做“以土官治土民”。

明、清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行直接统治，清王朝在康熙后期，特别是在雍正时期(1723—1735)，用武力强治手段，大规模地推动“改土归流”政策。很自然地又导致了这一地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加强。再加上土地兼并的盛行，千里苗寨苦难重重，所以在这一时期频频发生苗民起义。

雍正时期苗民起义早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王朝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派礼部尚书席尔达、副都统图恩海、徐九如等率荆州驻防满兵1000人，并调广西、贵州、湖南三省部分兵力进逼镇箪苗寨，大部分苗寨被归诚，而天星(湖南凤凰境)、马鞍、山毛、都塘、七兜树、打郎湄、亮老家、两头羊、糯塘山、老旺山等寨苗民、不肯屈服，武装反抗。席尔达都三省满、汉各军并征集保靖、水顺两土司兵分两路进攻，经过清军11天的疯狂镇压，天星等苗寨相继失陷，苗民被杀5000余人，303个苗寨4563户8418人被迫缴械投降。清王朝在辰州(湖南辰溪)府内增乾州、凤凰二厅，分别统治投诚各寨苗民，同时保留土司的原有权利，实行了流官(州、县官)与土司共同统治苗寨民的政策，为尔后实行“改土归流”作了必要的准备。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贵州普安州三江苗民黄柱汉聚众进攻菴章寨(贵州普安境)。云、贵总督贝和诺派兵镇压，起义失败。

雍正四年(1726年)，云南苗族禄万钟发动起义。雍正初年，清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准备实行“改土归流”。因为云贵等地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世袭制，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异常严重，如乌蒙土官禄鼎乾，对他统治管辖地区的人民所摊派的税款超过清王朝规定数额近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更有甚者，土司一家娶媳妇，则土民三年不敢结婚；土民被杀害，其亲族还要为其出垫刀钱数10两。所以清王朝决定实行“改土归流”政策。

雍正四年(1726年)先把东川土目革职，令总兵刘起元进驻东川，并准备在乌蒙(云南昭通)苗族地区继续施行。刘起元招降了掌握当地兵权的禄鼎坤，以加强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实力。禄万钟联合镇雄(云南镇雄)土知府陇庆候出兵3000多人进攻驻守鲁甸的禄鼎坤。云南巡抚鄂尔泰遣派游击哈元生合同四川援兵去帮助禄鼎坤。禄万钟撤退到乌蒙。哈元生指挥各路清军向乌蒙发起进攻，苗军占据有利的地势，据险阻击，经过激烈战斗，终因清军来势凶猛，禄万钟败退到镇雄。这时鄂尔泰又招降陇联星(陇庆候之叔)继续追击苗军，禄鼎坤带领3000人马进攻镇雄侧背，苗军奋力抗击，终因寡不敌众而败，于是镇雄被清军占领。禄万

钟、陕庆候战败后逃往四川。因此乌蒙、镇雄都被清军收复，清王朝在乌蒙设府，镇雄设州，并派总兵驻守。

雍正四年，贵州苗族也发生了抗清之战。广顺长寨(贵州长顺)地处仲、苗各寨之要冲，清朝云南、广西、贵州三省总督鄂尔泰为了进一步推动“改土归流”的进行，向长寨的仲家各寨进兵，遭到仲家、苗家军民的反抗。清军凶残地焚毁了仲家7寨，占据了长寨，但是仲、苗军民不断出兵袭击，清军被迫退出长寨。这时鄂尔泰又改派总兵石礼督兵反攻，攻破36寨，迫使21寨“投城”，招抚苗民500余户3000余口，解除苗民武装，并在长寨设参将，且派兵分别驻守各要隘地带，向贵州边界进军。广顺(贵州长顺西北)、定番(贵州惠水)、镇宁(贵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苗民680寨及永宁(贵州关岭西)、永丰、安顺(贵州安顺)苗民1398寨的苗族首领，被迫纳土投降清王朝设流官治县。

清朝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了清军进攻贵州苗民大小丹江之战。贵州巡抚张广泗为开辟古州(贵州榕江)地区及沟通湖广与广西之间的交通，向清政府倡议置镇诸葛营(榕江境内)，以便更好地控制周边地区。这年夏天，派兵先攻八寨(贵州丹寨)，以打通运送要道，然后分兵进攻大、小丹江(贵州雷山北)沿岸苗族村寨。鸡讲等五寨苗民奋起反抗，皆被清军焚毁，其他各苗寨纷纷请降。雍正七年，清军乘胜沿九股河进攻抵达清水江。当地苗族首领因为农忙，假装接受安抚，被清军巡抚张广泗识破，于是他也将计就计，假装答应。但是他却作了另外的布置，偷偷地利用夜晚乘船渡江，切断苗民退路，而后突然向各苗寨发起袭击，而苗军也想利用夜晚偷袭清军营房，两军相遇，展开战斗，结果苗军吃了败仗，于是清水河及九股河地区各寨都被清军收复。张广泗在清水江、丹江设营驻军，控制水路。令清军士兵到湖南运来盐、布等生活急需品，供应当地苗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商运、经济的发展。

这一年，米贴(云南永善北)苗族妇女陆氏联合雷波土司聚众反清，劫夺军粮，鄂尔泰派哈元生带兵进行围剿，哈元生首先攻破苗军所占据的险要山口，而后又在苗营附近设伏，结果苗军战败，清军直捣其寨，陆氏被俘。接着哈元生又乘胜进攻阿驴(寨名，雷波境内)，击败雷波(四川雷波)土司。阿驴寨一土目投降后又反戈，围攻哈元生。哈元生率游击卜万年等与苗军激战了两天两夜，苗军败退，哈元生又亲自督兵攻占了赤衣台。鹤丽总兵张耀祖这时又派兵增援哈元生，所以哈元生兵力更足，所以他便派小溜带部队搜杀苗民，阿驴一带苗寨居民弃寨逃走，于是这次参加反清的拉金者呢各寨都被清军平定。

清朝雍正八年(1730年)云南乌蒙又爆发了苗民反清之战。清军在雍正六年平定了苗族禄万钟的起义后，便把禄鼎坤提升为河南参将。可是禄鼎坤不愿意离开苗疆到河南去上任，所以内心有些不满。禄鼎坤的儿子禄万福便请求回鲁旬治产。又以总兵刘起元贪污害民为借口，联络归部，一齐反清。禄万福首先进攻乌蒙(云南昭通)。这时期，乌蒙有经商者、居民1万多人，并且地势险要，有险可守，可是刘起元虽然拥有数千名兵丁，但由于他贪污腐化，不注重防守，所以苗兵便很快攻破城垣，杀了不少城内军民。禄成福又鼓动、联络东川(云南惠泽)，镇雄以及四川凉山等地少数民族数万人起来反清。他们杀塘兵、劫运粮、堵要

隘、毁桥梁，屯兵聚守，以抗清军。

鄂尔泰调动清军一万零好几千人，再加上土司兵5000多人，分三路进攻苗寨。参将韩勋率兵400人由镇雄进攻奎乡(云南彝良东南)，和苗军激战了三天，清军得胜，连破4寨，又杀死苗民2000多人，哈元生率兵1000多人由威宁(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进攻乌蒙，清军到达得胜坡正与苗军2万人遭遇，哈元生率兵猛攻，苗军奋力抗击，不幸军首领黑寡、募末等被清军射杀，于是苗军败退。清军进占倚那冈。这时苗军数万人安营扎寨达10余里。哈元生又打伏击战，命清兵3000人再加上土司兵1000多人，趁夜埋伏在苗军营垒左右。拂晓苗军向清兵发起进攻，而这时清军按兵不动隐蔽待机，当大部分苗军进到了清军的炮火威力圈之内时，清军发炮，猛烈轰击，接着伏兵四起，左右夹攻，苗军防不胜防，终于不敌清军，苗兵大败。清军乘胜追击，连破苗寨80余个，打败苗族军民数万人。清军又连克三关，占领乌蒙，缴获了苗军军械武器许多，禄万福兄弟均被俘遇害。

也是雍正八年，贵州古州地区苗族上层分子叛变，准备偷袭清军。贵州巡抚张广泗大量征集苗船，派兵架设俘桥，半夜悄悄渡江，乘苗兵没有准备的情况，突然向古州地区苗军发动进攻，苗军措手不及，刀枪、弓箭等1万多件作战武器尽被清军缴获。张广泗又向上江地区的来牛、定旦等苗寨进攻，结果有4000多苗族军民被杀害，并缴获了大量大炮等作战武器。

雍正十年(1732年)，贵州苗族包利在台拱起兵反清，清王朝贵州巡抚元展成在台拱(贵州台江)筑城，增兵驻守。十月间，包利举兵反清，首先杀死台拱通事郭英、欧玉胜等，然后进攻清军大营，又杀死清外委张壁等人，接着分兵包围了排略(台拱北)。排略距离台拱约15里，是台拱通往清江都匀的咽喉要隘，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苗军勇猛顽强，结果清军守备高本畅战死，排略被苗军攻占。

元展成派督标及黔西、遵义、平越等地游击马世龙、罗资衮等各领所属清军星夜增援台拱，马世龙率部在前，罗资衮保护军需、武器弹药紧跟其后。十一月十四日，清军在排略附近中伏，游击罗资衮以下6名军官均被击毙，清朝兵丁溃不成军。吓得后面清军迟疑观望不敢前进。元展成无奈又增兵，派副将杨馥、宋朝相率部增援。杨馥在进攻排略时战死，清军又败退下来。

台拱被苗军包围，清军粮饷断绝。当马世龙部在排略被围攻时，台拱清军出击接应，把总兵王朝杰战死，于是又退回营中，清王朝为解救危机，派广西左江总兵霍升暂时代理贵州提督急忙赶到贵州增援。霍升率领副将康世显以下汉、土官兵2万多人进入贵州。十二月间，布兵分两路进攻排略，苗兵经过顽强战斗结果败走，台拱被清军攻占。苗兵便转移到丹江高坡一带，在番招(台江东)莲花皇利用险要地形筑城防守，继续斗争。

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军为了撤底消灭包利等反清苗军，便增派湖南兵2000人、广西兵1000人开赴贵州，由贵州提督哈元生统一指挥贵州、湖北、广东、湖南、广西五省兵力向苗军大举进攻。哈元生命康世显、仇龙、霍升等兵分三路向苗寨进军，首先攻下高坡，然后全力以赴向莲花苗军猛攻。由于苗军早已筑城防御，他们凭借有利地形坚强抗

击，所以清军第一进攻受挫。哈元生于是亲自指挥，分兵六路强攻莲花城堡。经过三天激战，清军用大兵压城，苗军抵挡不住，莲花终被清军占领。尔后清便在台拱筑城设防，并派兵4000多人驻守。

同年，思茅(云南普洱复兴镇)苗族首领土把总刁兴国与苦聪、元江等地兄弟民族共同聚众反清，进攻普洱；通关(云南墨江与普尔之间)大寨之摆夷(傣族)也与苦聪人联合渡阿墨河进攻他郎(云南墨江)。清朝云南、贵州、广西总督高其卓派提督蔡成贵、总兵董芳等率兵分道镇压。战场上，清军阵斩苗兵3600多人，又迫降4．26万余人，苗军头领刁兴国战死，这次反清斗争，又遭失败。

雍乾年间古州台拱苗民起义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元年(1735—1736)，由于实行改土归流，清王朝对苗族人民，由间接统治换成了直接统治。苗民的负担没有减轻，土司对农民的剥削极为残酷，而且他们在封建王朝历次镇压苗族人民的反抗时充当帮凶。所以，长期以来，苗族人民一直处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下，这期间，贵州古州(今榕江)九股河地区苗族农民，不堪清朝官吏和土司的剥削压迫，在苗民包利等人领导下，为反抗征粮、派佚发动起义。包利等人于雍正十三年二月，以“苗王出世”为号召，在古州的八妹、高表、寨蒿等苗寨商讨起义事项，到处传播鸡毛火炭信，联合清江(今剑河)、台拱(今台江)等地苗民，一起围攻厅城，捣毁营汛。暴动很快发展扩大到贵州的东部和东南各地，丹江(今雷山)、八寨(今丹寨)、黄平、凯里等地苗民纷纷响应，起义农民迅速增加到40多万，陆续攻克凯里、重安江(今属黄平)、岩门司、黄平、余庆县以及台拱、清扛营讯。据《清史稿》记载：“丁巳以贵州、古州、台拱逆苗滋事命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领四省官兵讨之。”同年六月，清政府调集两湖、两广及云贵川七省兵力数万人，由哈元生、董芳率领，进行镇压。七月，又任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并调河北、河南、浙江等省官兵作后援。由于苗民所聚居的地区多是山地，起义军凭借着有利的地理条件，对清军进行不断的打击，苗族人民的反抗情绪不断增长，男的放枪，女的就帮着装填火药，反抗的激流在千里苗寨的山山水水间涌动着，苗民起义军英勇抗击清军进攻，一再重创敌人，清军虽从多方出兵攻击，围剿起义军队，但起义军的“敌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来”的战术，四处出击，使清军陷入困境。乾隆皇帝即位后为加强对苗民起义的镇压，任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兼贵州巡抚，总管镇压苗民起义事宜。于是清政府多方调兵遗将，大举进攻。残酷的清军一路滥肆烧杀，对起义军采取重点攻击、分路包剿和各个击破的措施，乾隆元年起义军被围困于牛皮大箐(今雷公山)，再加上起义军队伍比较分散，大都各自为战，缺乏有效的配合，且军事素养和作战指挥水平等方面都有很大弱点，终因起义领袖先后被俘或牺牲，起义失败。

乾嘉时期苗民起义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95—1806)，在贵州的松桃，湖南的永绥(今花垣)、凤凰、乾州(今吉首)等地苗族农民在白莲教反清宣传的影响下，为反抗官府、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与压迫，由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吴半生(本名吴天半)等人领导，发动了起义。

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从对农民进行压迫和剥削这个意义上说，流官代替土司，也只是换汤不换药。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加上清政府多次在苗族地区用兵，镇压苗族人民的反

抗。并且是联合邻近土司共同进行的。所以苗族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仍很尖锐，在此以前，统治者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曾不断向这些地方派兵和移民，由于连年战乱，许多军户变成了农户，土地也变为私有。其中有依官仗势者不断侵占他人土地，占田越来越多，逐渐由垦荒自给，变成了出租土地，剥削他人劳动的封建地主。随着清王朝建立后的统治力量的加强，在大力推行所谓“开发苗疆”的同时，又有更多的汉族官使、农民和商人进入苗族地区，从而对当地地主经济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此同时，在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和汉族地主经济的影响下，当地一些寨长、百户、头人等族大富有者，也依仗权势，霸占公共山林，侵占他人土地，并将土地租给贫苦农民耕种，从苗族内部分化出地主阶级。如松桃罗金寨的吴老夭，乾州重阿寨的吴廷梅、吴学仁，永绥厅紫儿寨的石季五等都是当地有名的苗族大地主。他们不仅剥削苗族农民，也剥削从内地去的汉族农民。湘黔邻近几个县，有不少汉族农民给吴老夭当雇工，甚至卖身给他为奴。据史书记载，当时地主阶级从农民手里夺取土地，其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除依官仗势，赤裸裸地公开霸占外，主要还有：(一)通过放高利贷剥削。高利贷有“客帐”、“营帐”和当地苗族地主放的债三种。“客帐”是汉族地主、商人放的债。“营帐”是清朝的驻防官兵放的债。债主以“制钱八百为一桂，月加息五，至三月不完，辄取息作本。计周岁息凡四转，息过本数倍矣。约包谷、杂粮熟时折取息钱，或乘其空乏催讨，将田地折算”。当地苗族地主放的债也是“其息甚大，钱一千，谷一石、一二年加息数倍，不能偿，折以山地……转求佃耕”。(二)通过不公平交易。使用这种手段的，主要是汉族地主商人。他们向苗民赊以布盐什物，秋后还谷并要苗民以土地作押。无力还谷者，土地就归了他们。(三)通过代办田赋。主要是苗寨的寨长百户勾结地方官府，包办田赋，要农民加倍交纳。农民交不出，就得抵以土地。

地主阶级通过上述各种手段，占有大量土地，如乾州厅重阿寨的吴廷梅、吴学仁田地遍布其家周围数10里。农民失去土地，依然要负担繁重的赋税、差役，违者就要遭到毒打、罚钱，甚至坐牢，不少贫苦苗民活活被关在牢狱里。在地主阶级如此压迫、剥削下，苗民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只有奋起反抗，这就是苗民起义的主要原因。

另外，苗民起义同时又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清军入关，在全国建立统治以后，更把贵州东部、湖南西部的苗族地区视为“生界”，屡屡兴师动众，对苗族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在屠杀苗民后设置的各级官吏，骑在苗族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以致苗民“畏隶如官，官如神”。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采取各种手段，挑拨苗汉之间的关系，什么“戒苗条约”、“禁苗条约”、“防苗条约”等满天飞，甚至不许苗人和汉人通婚，造成了苗汉民族之间的严重隔阂。因此乾嘉苗民起义时，曾有“逐客民、复故地”的口号，就连清朝官员和乾隆帝不得不承认，“客民从前重利盘剥，占耕地亩”，“是以亩众转致失业，贫难无度日者多，”所以一场苗民起义又是不可避免的了。

据《清史稿》记载：“贵州松桃厅苗匪石柳邓等，湖南永绥苗匪石三保等作乱。戊午，湖南苗匪陷乾州厅，同知宋如椿等死之，命福康安往剿”，反清的潜流早已在千里苗寨的山山水水间涌动着。松桃厅北面大寨

营的石柳邓，永绥厅西南黄瓜寨的石三保，乾州厅西南平陇寨(或作平隆、坪垅寨)的吴八月，还有凤凰厅西北苏麻寨的吴丰生，他们在酝酿起义时常常互要通气，此外还有大寨营的苗族妇女石乜妹也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当时苗寨中纷纷传言“黄瓜寨出了苗王”，这是他们为号召起义而进行的一种宣传，也反映出群众迫切希望有个敢于造反的带头人。1795年农历年初，一批起义者在大寨营的石柳邓家里集合。附近一个苗族百户石老三察觉后，向松桃厅官府告密。一队清军立即赶往并包围了大寨营，指名要石柳邓把各地起义者交出来。石柳邓组织大家进行武装抵抗，冲破清军的包围，向东到了永绥境内。几天之后，石柳邓回到黔东，以大寨营为中心带领发动起来的武装群众，于2月2日(正月十三日)攻占了附近的大塘汛等若干清军据点，著名的乾嘉年间的苗民起义正式拉开序幕。黔东大寨营首先起义的消息迅速传到湘西后，2月8日(农历正月十九日)，吴八月在平陇寨，石王保在黄瓜寨，吴半生在苏麻寨，吴陇登在鸭保寨，都率领当地群众，起义响应。石柳邓在起义时提出了“驱逐客民，夺还苗地”的口号，它集中地表达了广大苗族人民反对汉族地主兼并土地，要求夺还田地的强烈愿望。这个口号对动员群众起了极大的作用，“穷苗闻风，无不攘臂相从”，“群寨响应，事杀百户起事”。武装起义的烈火，迅速而又猛烈地在千里营寨燃烧起来。

与此同时，当地清政府官员则纠集兵丁，妄图扑灭起义烈火。镇箪镇总兵明安图接到石柳邓攻占大塘汛等据点的紧急报告后，于2月9日，带了800名官兵进行镇压，半路上遇到了从黄瓜寨南下的石三保为首的起义队伍，双方即交战。这时，驻永绥的副将伊萨纳和永绥厅同知彭凤尧，正领兵600多人，朴向黄瓜寨，他们在途中获悉明安图被起义队伍围困，就移兵相救援。这两股清军于2月10日在鸭酉巩会合。当天夜里，从鸭酉东望，“火光数10里不绝”。原来是凤凰和乾州两厅境内许多苗民打着火把，扛起刀矛长枪，起来造反了。鸭酉周围的造反群众，一群一群地向扎营的清军围来，约有上万人．明安图等惊恐万状，于次日向永绥厅城方向撤退。一路上，进行拦截的起义群众，漫山遍野，向清军压了过来。明安图等人一时狼狈不堪，一扫昔日威风，向起义者“求和”，要求让清军返回永绥城。起义者勒令清军官兵一律放下武器，但清兵又不肯完全服从。苗民起义者识破清军求和是搞缓兵之计，于是坚决加以围歼。苗民起义者善于施放鸟枪，他们猛烈地攻击，伊萨纳中枪身亡。明安图仓皇逃脱，起义军紧迫不舍，由于坐骑中枪，被摔下马来击毙，彭凤尧也被义军用石头打死。这是发生在鸭酉巩北面不远的一场歼灭战。1400多名清朝官兵大部分被消灭，起义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2月12日，起义队伍又分别包围了永绥厅城和凤凰厅城，而在11日，乾州起义军也开始围攻厅城，该厅同知宋如椿在腿部受伤后逃回衙门，他已走头无路，只好自杀身亡。巡检(负责所谓“掌捕盗贼”的地方官吏)江瑶抱着官印逃到城外，被起义军队截获后处死。13日起义军的旗帜又胜利地插上了乾州城头。

起义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在贵州东部，石柳邓的队伍在攻占了大塘汛之后，又包围了松桃厅和铜仁的重要据点石营、正大营。刚刚带近进驻正大营的贵州提督彭廷栋被困守营内，束手无策。正在营西面的八十四溪，远到思南府的印江县，也有起义者活动。而在湖南西北部，起义

队伍活跃于酉水两岸，还攻占了永绥北部的大据点花园堡。永顺境内，一度形成了一支近万人的起义大军，进入保靖境内，“扑城夺卡”，声势很大。在沅江以西，起义军攻占了泸溪县的浦市，又北攻泸溪县城和辰州府治所在地沅陵。湘西南部的麻阳县，也出现了起义队伍。湘西和黔东的起义军，还向西北挺进，活动在四川秀山县的大部分农村，如石隄、龙图、梨木场、贵图等地。其中有一支队伍打着写有“统兵元帅”字样的红旗。上述起义地区，包括湖南省沅州府的乾州厅、凤凰厅、永绥厅、麻阳县，辰州府的沅陵县、泸溪县，永顺府的永顺县、保靖县；贵州省铜仁府的松桃厅、铜仁县，思南府的印江县；四川省酉阳直隶州的秀山县：总计为三省六府(直隶州)所属的13个厅县(内四厅后来升为直隶厅)。1795年春天，千里苗寨到处响起了战斗的号角，起义人民狠狠地打击了当地的文武官吏、汉族地主以及依附于清政府的苗族上层分子。以吴八月为首的起义军的口号是：“穷苦兄弟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很好地表达了这次起义的打击锋芒，起了很大的号召作用。山区苗民的反抗性强，打仗勇敢顽强。因为平时苗族男子习惯于佩刀携枪，就连少年儿童也多学会用鸟枪，男子打仗，妇女就帮助装填火药。他们虽然比较分散，但是人数极多，据清方记载，1795年时，“苗倾巢为变，众数10万”，也就是说差不多所有苗寨群众都投入了斗争，在清政府重兵到来之前当地几千名官兵完全陷入武装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起义进入了高潮。

“同年二三月间，清政府调遣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宁率领七省兵力10余万人，分路镇压”。湖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地区苗民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这三省的总督、巡抚、提督等军政大员连连接到告急文书，他们一面飞奏朝庭，一面立即领兵前往镇压。乾隆皇帝谕旨，声称要“痛加剿除”。在湖南西部，湖南巡抚姜晨(音成)先赶到辰州，在泸溪、保靖一带组织防御；新任湖广总督毕沅随后也来到辰州主持军饷供应。贵州东部，提督彭廷栋带兵进驻正大营；贵州巡抚冯兴熊坐镇铜仁，兼督办军需。川东南地区，才卸任的四川总督孙士毅留驻秀山，防守后路并督办粮运。第二步，分三路进攻起义地区：云贵总督福康安(7月间)改任闽浙总督率云贵兵由铜仁北进；四川总督和琳和四川提督穆先登阿率四川兵从秀山东进；已宣布调离的湖广总督福宁留了下来，他和湖广提督刘君辅率湖南、湖北兵从凤凰进兵。清军官员中，以封为一等功的福康安地位最高，乾隆皇帝命他督办军务，充当三路军的统帅。

三路清军，初期到位的只有三四万人，兵力并不十分充足。但是起义者人数虽多，却都各自为战者多。乾隆皇帝看到起义队伍势分力单的弱兵，就命令福康安等在进攻时，“宜肃清一路，再行围剿一路”，采取各个击破方针。起义队伍由于过渡分散而不能形成优势兵力，逐步丧失了作战的主动权；不过他们打的英勇顽强，而且也利用清军兵力暂时不足的形势一再进行反击。在清军进攻的第一阶段。在1795年3月至9、10月间，总的情况是：在起义地区的西部，清军占了上风；中部：起义者反复作战，长期围困永绥厅城；东部，起义者仍居优势，一再重创清军。主要战争的具体经过如下：

清军主帅福康安于3月4日率部到达铜仁，由此向北进攻。10日在盘

塘坳打了第一仗：清军在五更时袭击苗寨，连抛火弹(火球)，凶残地活活烧死了不少寨内的居民。天明后周围起义群众鸣锣吹号，从四面八方起来，冒着敌人的枪箭，奋勇冲杀，清兵惊呼起义者是“铜筋铁骨”。这路清军在得到援军后，好不容易于当天赶到了正大营，解救了被围在营内的彭廷栋；此后继续北进，于4月3日进入松桃厅城。和琳方面，于3月17日领兵到达香山后，首先在这一带对零星的起义队伍进行一番“扫荡”，接着也向东进入松桃境内。福康安与和琳的两路清军会合后，利用他们相对处于优势的兵力，对起义军处于分散的各个据点各个击破。4月17日左右，石柳邓的队伍在大寨营，5月27日至29日，石三保的队伍在黄瓜寨，6月5日至6日，吴半生的队伍在苏麻寨，都分别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战，然后杀出一条血路，冲出重围，向外转移，石柳邓和石三保的队伍，边战边进，向乾州平陇吴八月的队伍靠拢；吴半生的队伍曾一度打到麻阳境内，后来又防守在乌草河(也叫乌巢河)两岸。

清朝军队伍一路打来，肆意烧杀。在作战的头两个月内，就连续发生清军焚毁苗寨26处、100多处、40余处、56处、再40余处等情况。乾隆皇帝为此一再下旨嘉奖说“竟能将沿途苗寨尽行烧毁，甚属可嘉”；“悉行焚烧痛剿，尽数歼除，实属可嘉”。

苗族起义人民没有被清朝军队的气势所吓倒，而是顽强抵抗，寻机反击敌人。清军在攻下大寨营以后，福康安趾高气扬，乾隆皇帝也认为“势如破竹”。于5月初命令总兵花连布率部队去援救被起义军包围的永绥厅城；而在攻下苏麻寨之后，又亲自领兵东犯乌草河，企图过河进攻起义势力的腹心地区——吴八月等起义军所在地。起义者在乌草河“拼命拒守”，曾多次打败清军，这时乾隆皇帝认为形势不妙要福康安考虑绕过乌草河，“另寻别路”进攻。与此同时，起义军在北面又发动了攻势，于7月初曾反攻过黄瓜寨，在永绥北部的张坪马大败刘君辅；并在花连布暂解永绥之围后，再度包围了永绥厅城，城中官兵全部断粮，只好“拆屋为薪，煮糠为粥”。此外，松桃和永绥境内撤离了自己据点的一部分起义队伍，则插向清军后方的四川秀山。致使乾隆皇帝惊呼：“现经三省大兵会剿，尚敢潜至川境，屡肆滋扰，希图抄截后路，并牵制大兵，奸计可恨”。

在起义地区的东部，清军更是屡受重创。刘君辅和福宁先后于2月22日、3月2日领兵进入凤凰厅城，经过几次较量，只能勉强挡住起义军对厅城的进攻。3月17日，福宁等出城作战，先在一场小型战斗中略占上风，再向前走，突然有几千名起义者从前面山后杀上来，直冲清军。福宁吓得回头就逃，但事后却谎报战动，据说曾遭乾隆皇帝下旨痛斥：大队官兵只杀“贼”10余名，算来几及官兵百名，杀“贼”1名，足见无能。

此后，刘君辅领兵一支，从东面经保靖县迂迴到了永绥厅的北部，攻占了花园，一度配合花连布进援永绥厅城，这时(被张坪马战败之后)就一直在花园一带活动。福宁一直在凤凰厅城附近打转转，不敢主动求战，6月中旬，福宁免强领兵北上，企图从东面进攻起义者占领的乾州厅城。途中在泸溪县境内的苟拜岩扎营时，起义军迅速起来迎击，18日和19日两天中，打得清兵溃不成军，还歼灭了不少跟随福宁作战的汉族地主武装。这一次，福宁情急生智，钻在一堆军需品里作为伪装，让士

兵拼死命抬着他逃回凤凰。起义者乘胜追击，再度包围凤凰厅城。“吴八月在乾州狗拜岩战役中，歼灭福宁所率6000余人，福宁仅以身免。吴半生在凤凰厅大乌巢河一带，阻击福安康达半年之久。

在乾州、凤凰的东面，起义队伍发展到了沅江和辰水的西岸，曾攻入过浦市，围攻过泸溪县城，一再威胁自辰溪通往凤凰的清军粮道。福宁自顾不暇，就竭力扶植泸溪、麻阳一带汉族地主组织的“乡勇”武装。例如麻阳的高村是个“民村”，该村乡勇头子滕家瓒反对起义队伍最为卖力。经福宁奏请朝廷赏以六品官衔。滕家瓒在山势险峻、地居要冲的巴斗山(属泸溪县)，设哨卡几十处，建筑了木栅、石城，用以保护清军的运粮道路，并阻挠起义势力向东南发展。高村乡勇还经常攻击起义军队，残杀起义苗民。6月间，吴半生的队伍暂时转移到了麻阳境内。这支队伍在6月底先出动千余人昼夜攻打巴斗山据点，以迷惑敌人。7月1日起义军队伍几千人猛击高村，捣毁了滕家瓒的老巢，给高村地主武装以摧毁性的打击；同时横扫了高村东面沿辰水一带的清军据点，击毙了守备、千总各1名。10月18日，在高村东北面板栗树的一次遭遇战中另一支起义队伍击毙滕家瓒。

在这年的夏秋之际，起义军形势酝酿着重大的变化。7月间，荆州(今湖北江陵)将军兴兆率领2000名满州旗兵进援凤凰，解救了龟缩城中的福宁；清朝政府还派四川将军观成宋胁助福宁指挥作战。凤凰城解围之后，福宁、兴兆和观成率领两湖的清兵向西，协同福康安、花连布(他于8月10日彭廷栋死于军中后升为贵州提督)所属云贵兵，两面夹攻乌草河。这时福康安又增派了7000名贵州兵，清军集中优势兵力，于8月16日攻过乌草河，逐步地向北面的鸭保、平陇方向推进；接着，穆克登阿分兵一支，配合刘君辅，在9月间援救了长期被围的永绥厅城。8月底开始，坐镇辰州的毕沅也派出一支清军，从泸溪出发，向西进犯乾州。这样，到了秋天，清军在湘西已由局部进攻转入全面进攻。进攻的重点是平陇及其周围地区。清朝政府为促使官兵卖力作战，10月间曾大事封赏，福康安由一等公晋封贝子，和琳一等伯;次年1月初，还派现任云贵总督勒保到福康安大营，“共筹军务”。

“大军自四月克黄瓜寨，五月、六月阻大乌草河不进。七月渡大乌草河抵古文坪。八日奏克乌龙巌、杨柳坪，而吴八月据平陇，遂称吴王。”“八月，聚集在平陇的起义军推吴八月为苗王，石柳邓、石三保为将军。”自从石柳邓和石三保的队伍撤退到平陇以后，平陇很自然地成了起义队伍集结的中心。清军主力从乌草河北犯，进展极为缓慢。因为这里是湘西苗民聚居区的中心地带，几乎所有的苗寨都投入起义，清军每前进一步都遭到起义者的有力抗击。8月以后，不仅在乌草河东，而且在乌草河西，都激战不已。9月中旬，在苏麻寨东南的杨柳坪一场鏖战，起义者击毙了清军副护军参领(京师护军营的中级军官)、游击、都司、守备各1名。农历八月(公历9月13日—10月12日)间，平陇一带的各起义队伍，为团结起来，抵抗到底，共同推奉吴八月为“吴王”，石柳邓和石三保各为开国将军和护国将军。这表明。原来极为分散的起义军队伍，在斗争实践中迫切感到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吴王这面旗帜，正是表明了他们同清朝统治者势不两立的意志和要把起义坚持到底的决心。

“清政府为摆脱困境，采用剿抚并用的措施。九月吴半生被奸细俘获。十二月，吴八月因叛徒出卖被俘。嘉庆元年(1796年)元月，石三保又被叛徒诱至坳溪被俘。由于起义军领袖相继遇害，起义开始失利。”1795年夏秋之际起义形势迅速恶化，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一度卷入起义的苗族上层分子，在清军进攻面前纷纷投敌，充当了清政府镇压起义的帮凶。乾隆皇帝在3月5日的谕旨中就说，对苗民起义要“剿抚兼施，以为离散党与之计”。所以，清政府一方面残酷地屠杀起义人民，一方面又宣扬“招抚”，企图以金银财物来诱使起义者放下武器，尤其着力于赏赐官爵的手段来收买苗寨首领。这年春天，在苗族人民“事杀百户起事”的情况下，不少苗寨首领慑于起义风暴的威力，被迫表示拥护起义。清军攻入起义地区后，驻辰州的湖广总督毕沅就积极展开“招抚”活动。于是出现了一股苗族上层分子叛变投敌的逆流。乾州厅西北伟者寨头人石上进带上42个苗寨投降清政府。石大贵等乾州68个苗寨头人在七、八月间到辰州向毕沅投城。永顺境内一个苗寨首领张廷仲父子，曾混入起义阵营领兵几千，有一定的声势。乾隆皇帝下令地方官“设法离间张廷仲，令立功自效”。“可收以苗攻苗之用”，并决定可赏张父子以六、七品官衔。张廷仲父子果然投降，在永顺、保靖境内帮助清军进攻起义队伍，致使这两县境内“抚定”的苗寨达370余处。

起义队伍中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十分激烈，其中最大的一次斗争是吴陇登的叛变引起的。乾隆帝获悉：鸭保寨百户吴陇登，曾在1787年为镇压勾朴寨起义“出力”，他在1795年参加起义，则是由于“怂恿附从”。于是乾隆皇帝在给福康安的谕旨中定计：以吴陇登为主要诱降对象，在他和石柳邓、石三保三人之间进行挑拨离间，“使之互相擒献”。其实吴陇登在清兵攻下大寨营、黄瓜寨后就极度动摇，图谋投降，只是没有可乘之机。11月1日清军大举围攻鸭保东面由吴半生防守的高斗寨。吴半生所领这支队伍一向作战勇敢、出色。而吴半生本人在高斗寨遭受围攻的紧急关头却动摇起来，当天，高斗寨陷落，吴半生在被服后虽有屈服的表示，却仍把他解往京师“献俘”，加以杀害了。

11月22日，清军进攻鸭保寨。这时吴八月已经觉察到吴陇登形迹可疑，于是亲率队伍赶往鸭保寨，一面抗击清军，一面监视吴陇登，但是吴陇登早已暗中向清政府乞降，正在策划吕场叛卖阴谋。在吴八月指挥下，鸭保寨保卫战整整打了10天，直到12月2日起义队伍未能粉碎清军的四路围攻，鸭保寨失守，吴八月撤退到鸭保寨与平陇之间的卧盘寨。13日，吴陇登用欺骗手段，诱擒了吴八月，公开叛变。次年3月25日，苗民起义的重要领袖吴八月在清军大营中就义。吴八月遇难是起义军的重大损失。他的儿子吴廷礼、吴廷义接过父亲的战旗跟石柳邓、石三保等继续领导起义队伍，在更困难的情况下勇猛地战斗着。

1796年初(嘉庆元年)，湘西黔东苗民起义一周年之际，四川、陕西、湖北三省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白莲教农民起义，两地起义虽没有直接联系，但客观上起了配合作用。致使清政府顾此失彼，所以在3月间又从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续派官兵2万多人，开赴湘西。

1796年春，湘西的武水以西以南，包括乾州厅城和平陇一带以及相连的永绥厅东南部，还控制在起义者的手中，起义者曾在鸭保以东的壁多山、高吉山、贵道岭、七星岭、长吉山、茶山、茨岩及结石岗等地，

进行了阻击战，清军主力只能缓缓而进，用了半年时间，才攻入乾州境内；另一支清军则在永绥厅南部进行“扫荡”。6月17日，起义领袖之一石三保，在永绥南部的哄哄寨不幸被俘，解经京师后遇害，为苗族起义献出了生命。他们把起义旗帜插在乾州城头达一年零五个月之久。最后起义者在孤立无援、难以久守的情况下，于7月21日主动撤离了乾州城。

清军打通了乾州东路，然后以主力进攻西路。这时，清军统帅有了变化。福康安因染病在6月17日死于军中，由和琳继任统帅。9月30日和琳病死，由领侍卫内大臣额勒登保和湖南巡抚姜晟在贵州提督花莲布协助下主持大营。10月1日，清军扑向平陇。11月初，清廷又命广州将军明亮和新任湖广提督鄂辉到大营，以加强指挥。当时吴廷礼已病故，石柳邓和吴廷义等带领起义武装奋起抵抗。还派队伍扰攻清军后路，作为牵制。一度打到乾州厅城西南的马鞍山。清军因进展极微，所以尽量从各地哨卡抽调兵力，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进攻兵力，清军分五路围攻平陇，平陇失守，石柳邓等退守西面的石隆寨。

石隆塞是湘黔川三省交界苗民起义的最后的一个重要据点。退到这里的起义者人数已不多，但他们意志坚决，仍斗志昂扬，决心战斗到底。平陇和石隆相距不过10余里，在起义队伍的步步抗击下，清军自平陇西犯，一个半月之后才逼近石隆。1797年(嘉庆二年)1月3日，清军分四路总攻石隆寨，石柳邓率起义战士“抵死守御”，当场击毙清军守备、千总、把总等4名。清军付击了很大的代价后占领了石隆。石柳邓头部受伤，旋遭敌人杀害。他们的口号是“官兵打到哪里，我们抵到哪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石隆保卫战这历史的光辉一页。

接着，由于被出卖，吴廷义和一批骨干分子，以及吴八月、石柳邓和石三保等义军领袖家属，也都惨遭杀害。起义的首倡人之一，苗族女英雄石乜妹，在石隆保卫战后还在永绥境内继续战斗，最终不幸被俘遇害。还有成千上万的苗族妇女们，也在这场起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从1795年春起义爆发到石隆保卫战，湖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的苗民起义总的来说是连成一气的，这是起义和大规模斗争的高潮时期。

1797年初起义军的大规模斗争结束，转入低潮。但是保存下来的一些起义武装仍坚持斗争，新的起义一再发生，苗族人民的武装斗争又持续了10年之久。这一时期。由于白莲教起义不断扩大，清政府。把大部分兵力调往湖北去抵挡白莲教起义军。只留下2万多兵力，企图把剩下来的苗族起义力量完全镇压下去。同时清政府为防止新的起义，对苗族人民加强统治，采取了不少新的措施：在行政方面把府属厅升为直隶厅，以加强政治上的管辖；在军事方面，对于一些哨卡据点，进行裁撤合并，又大修碉堡等工事，对湘西、黔东苗民聚居区实行严密的包围。还在苗寨内收缴武器，禁止自制或贩卖火药；又增派兵丁，采取“以苗制苗”的措施；同时还在土地问题上进行反攻倒算。

清政府以“善后”为名，加紧对苗民的压迫，所以处于低潮的苗民起义，规模虽然较小，每次起义时间较短，但是斗争此落彼起，从1797年至1806年的十年间，从未中断，其中主要起义事迹有：(一)1797—1801年，凤凰、永绥、乾州三厅苗族人民的反夺地斗争；(二)1801年，

4—5月铜仁石岘等14寨起义，(三)1803年初永绥厅陇六生起义。(四)1805年1一3月永绥石宗四、石贵银起义。 (五)1805年(嘉庆十年)冬至1806年春两头羊和高都寨的反缴械斗争。随之，整个乾嘉年间的苗民起义最后结束了。

乾隆年间的苗族起义是苗族人民斗争史上最著名的起义之一，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有名的农民起义之一。起义开始时声势很大，参加群众极多。可是起义队伍极其分散，大都各自为战，缺乏有效配合和统一领导。起义者打仗勇敢，不怕牺牲，然而就进行一场有一定规模和时间较长的战争来说，在军事素养和作战指挥水平方面，都不能同有训练、有经验的清军相比，更不要说在武器装备方面了，至于每一支起义队伍，则未能持久作战，这又同起义的自发性有关。起义军队不仅分散，而且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在政治上除了“驱逐客民，夺还苗地”的口号外，也提不出更具体的政治纲领。

这次苗民起义，既反对封建压迫，也反封民族压迫。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这次苗民起义前后持续了12年，苗族人民在起义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英雄气概，敢于拿起武器来反抗压迫者、剥削者的革命斗争精神，将永远载入史册，激励着后世人民。

第五节 各族反清方兴未艾

中国是多民族的大家庭，我国的少数民族历来多居住在边远山区，那里土地瘠薄，交通闭塞，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特别是高原地区，深山老林，生活在那里的各族人民，大都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清王朝中期，由于实行“改土归流”，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统治。实际上形成了“土流并存”的局面，各族人民遭受流官和土司、汉族地主和本民族地主的双重压迫。残酷的封建统治和剥削，已使各族人民难以生活下去了，因此少数民族人民不断举起反清斗争的义旗，进行武装起义，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苗、瑶、侗族反清之战乾隆五年(1740年)湖南绥宁龙家溪瑶民栗贤宇自称能识别窖银，号召苗民挖掘，于是苗民聚众日渐壮大。清朝地主官吏便派兵拘捕，栗贤宇投奔广西义宁(桂林西北)小江寨。当时小江寨的苗民正酝酿反清斗争，栗贤宇便乘机组织苗、瑶族各寨联合起来，起兵反清。

4月28日，清晨，沅道杨辅臣，靖州副将姜瑞曾派绥宁把总欧国障等率军进剿，中伏而大败，清朝官员多被俘虏。次日，瑶各族义军乘胜反击，把清军游击许天良包围在湖南城步新寨。莫宜峒苗民起杨清保自称太子，与栗贤宇部联合。于是湖南、广西两省边界地区的苗、瑶、侗各族民众起来响应，他们攻击烧毁营讯，反清声势越来越大。清军集中湖南、广西省兵力向绥宁、义宁中间地区进攻。苗、瑶、侗族军民采取“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来”的战术，利用自己熟悉有利的地形英勇抗击清军。清军分三路进攻：一路清军由界溪向白水洞；一路由绥宁向竹岔；一路向长塘。由于苗、瑶、侗各族军队奋力抵抗，所以清军三路均被阻截，数月不能前进。

清王朝立命张广泗统一指挥五省军事。“丁卯，张广泗奏获苗匪栗贤宇等及附瑶匪之戴名扬等，克平溪等寨”。张广泗率兵1．5万多人进到湖南绥宁的六马，就遭到岩款苗军的袭击，又因为山区地形复杂险要无法继续前进。“遍询响导无有应者。”一时找不到向导，张广泗便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在当地群众引导下，由高坪抚过三郎田到达长安坪，然后分兵进攻地灵、长塘、五川隘、岩款等地。苗、瑶、侗军遭到突然袭击，失守后退据十八里兰山。张广泗沿山筑长围，分兵进山搜剿，栗贤宇、杨清保被俘后遭杀害。十二月，清军大部人马撤退，而留兵在城步、长安坪筑营驻守。

苗、瑶、侗族反清失败以后，还有一部分武装在竹岔山一带时聚时散，坚持反清。清王朝为了彻底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便着手在各地招募乡勇。乾隆六年二月，教谕吴中孚率乡勇陈兵于竹岔山下，用以牵制反清各少数民族的军兵，瑶族首领兰某带领他招募的“侗勇”自后山向反清军民进攻，经过激烈战斗，苗、瑶、侗族的武装抗清人员全部战死。为了防止这一地区少数民族起事造反，清王朝便在苗、瑶、侗族聚居地区编立保甲，加强对这一带少数民族的统治。

到了1832年(清朝道光十二年)湖南瑶民赵金龙起义反清。道光十年

十二月，湖南江华(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锦田寨瑶民赵金龙聚众起义，攻占了两河口，很快就发展到二三千人。12月2日，江华县知县林先梁、永州镇左营游击王俊率兵镇压，被起义军击攻。起义军乘胜进军宁远地区。两广总督李鸿宾派提督海凌阿率军进攻。在池塘墟(兰山县境内)中了起义军的埋伏，海凌阿被战死，清军溃退。起义军声势更大，引起强烈震动。

清朝皇帝曼宁急忙调兵遣将，派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率兵进击。而赵金龙在罗思举领清兵还未到达之前，先发制人，亲自率领八排散瑶军及江华、锦田各寨为一路，赵福才率常宁、桂阳瑶军为一路，赵义凤率新田、宁远、兰山谷瑶军为又一路，每路有二三千兵一举攻下新田县城，杀死知县王鼎铭。这时清军主力到达起义军所据守的常宁洋泉镇，清军知道理峒天险而不敢深入进攻。皇帝曼宁命清军把起义军引诱到山外再各个击破，并抽调驻贵州镇篁苗疆清军增援。罗思举集合各路清军进行围攻，而起义军凭借地势险要，墙垣坚厚固守。经过激烈战斗。清军没能攻下洋泉镇，而后清军改用火攻，清军向起义军投掷火弹，围内起火，起义军死伤数千人。赵金龙率部突围，不幸中弹牺牲。余部2000多人由赵子青率领，在锦田濠江中(江华瑶族自治县东北)也被清军打败。起义终于失败。

同年，广东连川黄瓜寨瑶民，因为清朝官府的吏役劫夺财物，摇民非常愤怒，于是聚众响应赵金龙，举行起义。清朝广东提督刘荣庆派兵进行围剿，但是却中了起义军的埋伏，所以清军大败，死都司以下清朝军官数10人，于是清朝两广总督禧恩又改用招抚政策，令按察使杨振麟用银、米、盐、布等生活急用品散发山区瑶民。8月间，起义群众归降。

道光十六年(1836年)湖南新宁瑶族生员兰正樽，以传教授徒，聚众数千人，进攻武冈州城，被清军击败。兰正樽率领余部退走，而与乡勇遭遇，经过激战，起义军失败，兰正樽在作战中牺牲。

回民反清起事清朝乾隆三十年(1765年)，新疆乌什回民发生暴动。清军占领了新疆以后，以哈密伯克阿布都拉为阿奇木伯克与清副都统驻乌什办事大臣素诚同驻乌什。阿布都拉极为暴虐，素诚也荒淫惨暴。当地人民不堪压迫，公众一致推选小伯克赖黑木图拉为首领发起暴动。回民攻杀官吏，烧毁衙署，杀死阿布都拉，素诚自杀。清朝驻阿克苏办事大臣弁塔哈率兵500多人赴乌什镇压，暴动群众开城门出迎，而弁塔哈竟下令向群众射击，于是群众又反把城门关闭。弁塔哈围攻乌什不克，暴动群众2000多人出击。弁塔哈敌不过暴动群众，于是败走。清朝皇帝弘历派明瑞办理乌什回民暴动事件，明瑞继续围攻乌什，回民群众对清营发动夜袭，但因清军已有防备，所以把回民群众击退，并射死其首领赖黑木图拉。群众又推其父额色木图拉为首领继续领导回民抗击清军。明瑞亲自督阵，派600多名清兵乘夜携云梯攻城，但也未能破城。并且从3月到8月多次攻城都未成功。明瑞知回民固守乌什城坚不可摧，于是改变战术，采取了长期围困的办法，作长围断其水道。乌什被困达半年之久，城内暴动群众因缺粮、缺水而无援助，所以内部开始分裂，沙布勒擒额色木图拉等42人出城向清军投降，暴动失败。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兰州回民苏四十三起事。甘肃安定(甘肃宝

西)伊斯兰教教长马明心创立新教，新老教徒之间时常发生冲突。清王朝支持老教。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苏四十三及韩二等率新教教徒进攻老教各村，杀死老教户长韩三十八及老教徒100多人。清朝陕西、甘肃总督勒尔锦派兰州知府杨世机会同河州协副将新柱带兵200多人前往查办。苏四十三等袭杀杨世机和新柱，夺取军械后进攻河州(甘肃临夏)，攻克河州后，率领新教教徒2000多人，夜攻渡洮河后直逼兰州。陕西、甘肃总督勒尔锦率兵增援河州，忽闻回军进攻兰州，便急忙回军守兰州城，并派人飞驰清朝当局，请求援助。

3月30日，清朝皇帝弘历命阿桂赴甘肃督统清军。甘肃布政吏王廷赞逮捕马明心，命令他说服回民起事民众投降，马明心不从，被杀害。因首领被杀，所以回民攻城更急。4月1日，清政府又命尚书和珅、额附拉旺多尔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以及额森特等赴甘肃进攻回军。并命令明亮率四川军从巩昌入甘助战。海兰察等到达兰州后，即督后兵进攻龙尾山并武装老教徒，让他们作为先导。阿桂到达军营后，命海兰察统一指挥各路清军。回军扼守“崖深陡深数十丈，斜经仅通一人”之华林山，并挖掘堑壕，截断小路，坚守要隘。清军多次进攻，都未奏效。作战中总兵图钦保阵亡。

“壬寅甘肃循化厅撒拉尔回匪苏四十三等作乱陷河州命西安提督马彪同勒尔谨剿之癸卯回匪犯兰州命阿桂往甘肃调度剿贼机宜夏四月甲申朔命尚书和珅额驸拉旺多尔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并巴图鲁侍等赴甘肃剿贼”。

5月，海兰察指挥明亮、额森特等各路清军1万多人，分左右两翼，猛攻华林山。回军因水被截，多次突围匀未成功，6月，华林山失守，苏四十三战死。回民余部死守华林寺，清军放火焚寺，回军全部战死。清军击败回民义军主力之后，又攻占河州。对洮河以西安定、河州、循化等地新教徒进行镇压，残酷地杀死许多人。事后移陕西提督于固原，移固原总督于河州，加强了对回族居住地区的控制。

清朝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甘肃回民田五、马四圭起事。据《清史稿》，《高宗纪》记载：“丙午甘肃新教回人田五等作乱，命李侍尧、刚塔剿之”，“已巳命福康安海兰察赴甘肃剿捕回匪”。

苏四十三起事失败后，马明心的信徒新教阿訇(hōng轰)田五，在通渭县石峰保修筑工事，作为根据地，于乾隆四十九年四月起事，攻克通渭，进尔围攻伏羌(甘肃甘谷)。陕西、甘肃总督李特兴命固原提督刚塔率军进攻。回军看清军来势很猛，又众寡悬殊，所以便自动撤退。清军追击到浪山时，田五中弹阵亡。马四圭率领余部退到沼泽地带，诱使清军追击，因清军不熟悉地形，故淹死1000多人。回军转攻靖远，这时总督李侍尧驻军在靖远，急调刚塔救援。回军撤走。清军追击到马家堡时被回军击败，刚塔中箭。清皇弘历以甘肃清军久战无功而龙颜大怒，5月革去李侍尧总督职务，又派大学士阿桂赴甘肃督师，以福康安为陕西、甘肃总督，海兰察为参赞大臣。这时回军主力已退守石峰堡，用一部分兵力驻守靖宁的底店山。海兰察于6月11日率领4000多清兵进攻底店山，经过激烈战斗，回军败阵，死伤数百人。清军又乘胜紧逼，围攻石峰堡。经过20多天的激烈战斗，回军伤亡惨重。马四圭带兵突围中伏，伤亡1000多人。石峰堡又被清军占领，马四圭、张文庆等2000多

人统统战死，起事告以失败。

彝民反清之战清朝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云南彝民高罗衣聚众反清。云南临安(府治云南建水)边区彝民高罗衣自称窝泥王，设官分职，并用汉人为官，聚众1万多人，袭扰瓦渣(云南元阳东南)、溪处(元阳西北)两土司地盘，并渡过元江向内地进军。清朝云南、贵州总督伯麟带领清军镇压，击败高罗衣以后，便议定了一些善后条规，使各土司各自安民，不得互相讨伐、攻击。

次年高罗衣从侄高老五等在藤条江一带又聚众攻扰郡城，也被伯麟俘虏。

清道光元年(1821年)，云南永北厅彝族人民起义反清。云南永北厅(云南永胜)大姚彝族、拉枯族人民因不堪忍受清王朝的官吏的压迫，在唐老大率领下发动起义，清朝皇帝曼宁命令云南、贵州总督庆保派兵镇压；并派呢玛善为钦差大臣督办云南军务。清军先把拉枯族各寨洗劫一空。然后进剿彝各寨，起义军经过2个多月的奋战，终因寡不敌众，首领被俘，起义失败。

道光十三年(1833年)，四川彝民起兵反清。彝民首领桑树格起兵反清，占据越嶲、清溪、峨边等地。四川提都桂涵率兵进剿，到越嶲时病死；扬芳代领涵军继续进攻清溪彝军，经过激战，彝军败走；进攻峨边时，十二姓熟彝全部投降，清军放火烧毁山内彝民所居栅寨，首领数人俘虏后被杀。桑树格也被俘斩首。余部皆降。

山东王伦起义清朝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寿张县(山东阳谷南)人王伦宣传清水教(白莲教别支)，以运气治病，教授拳术，组织群众，提出反对额外加征等口号在寿张起义。

王伦发动起义后，清朝寿张知县沈济义派兵拘捕。9月4日，王伦率领起义军攻入县城；教徒王经隆在堂邑也起义响应。两部分起义军会合后，王伦命其义女乌三娘为先锋，带兵出击，接连攻下了寿张、堂邑、阳谷、临清等城。每到一处，开仓济贫，得到贫苦民众支持。清朝山东巡抚徐绩率兵镇压，清军开至临清南梁家浅，被起义军包围。于是清朝山东德州城守尉格图肯，兖州镇总兵唯一，先后派兵增援，但是各路清军都被起义军打败。清帝弘历闻讯大怒，责其无能，俱都处以死刑。而后乾隆又派左督御史阿思哈，率键锐、火器二营兵增援徐绩，同时命大学士舒赫德以钦差大臣之身份，由天津飞驰山东，督师清军。王伦以为清朝派大部援军会集，是为了给梁家浅解围，于是王伦率军直趋运河，想阻止清军，不料被清直隶总兵万朝兴所率清兵阻击，经过激战王伦所率义军被清军击败，退守临清。这期间舒赫德领兵到来，王伦派义军1000多人北出牵制清军，自己又亲自率领精锐五六百人在归城东门列队迎战。而舒赫德派侍卫音济图等率领禁旅300多人控制北门，自己率军去进攻东门，两军相遭遇，义军英勇作战，但必竟清军人多势众，武器精良，起义军战败，王伦退守城内，清军猛烈攻城，巷战尤为激烈，短兵相接，血肉横飞，乌三娘在屋顶上指挥巷战，不幸中弹牺牲，义军伤亡甚是惨重，王伦自焚而死，起义告以失败。

台湾朱一贵、林爽文等起义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朱一贵起义。据《清史稿》记载“丙寅，台湾奸民朱一贵作乱，戕总兵官欧阳凯。”“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平台湾朱一贵，解京诏奖，淡水营守备陈策

固守功超擢台湾总兵。”

清王朝对台湾人民在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十分惨酷。知府王珍横征暴敛，淫刑勒索，激起人民的反抗。朱一贵是福建漳州府人，于康熙五十二年到台湾，后与黄殿、李勇、吴外、郑宝瑞等来往密切，他们看到台湾地方官员只知道饮酒、赌博，民心和军心都不振，于是认为不如趁此起义。且朱一贵说：“我姓朱若以明朝后裔耸乡村，归者必众。”大家认为可以。夏4月19日，李勇、吴外、郑定瑞、王玉全、陈印等52人在黄殿处结盟，公推朱一贵为大元帅。招集群众近千人，首先乘夜攻占冈山讯。冈山距府城30多里，消息传到郡府，总兵欧阳凯立即召集带兵各将商议出兵，派清游击周应龙率兵800多人前往镇压，这一天，细雨蒙蒙，周应龙率领清兵和土番行5里，驻半路店。第二天又行15里，屯兵角带围，两天仅前进20里。起义军继续进攻糠榔林，汛防把总张文学迎战，被起义军击败。而周应龙率军仅一溪之隔不敢救援。待清军进到冈山时，起义军已转移到山里。周应龙不敢追击，只是纵兵焚掠附近村庄，更激起民众的反抗，各乡群众纷纷聚众反抗清军。风山人杜君英聚众起义，响应朱一贵并攻下淡水讯。他们又招集粤东种地佣工客民，与陈福寿、刘国基等商议掠台湾府库。又有郭国正、翕义在草潭起义，戴穆、江国沦在下埤头起义，林曹、林骞、林琏在新园起义，王忠在小琉球起义，都愿意和杜君英、朱一贵共同共事，他们联合作战在赤山击败周应龙，杀死千总陈元等。府城大震，台湾总兵欧阳凯、副将许云、游击刘得紫等率兵1500多人进攻起义军，5月1日在春牛埔被朱一贵、杜君英等联合抗击，清军忽然内乱，清军百总杨泰响应起义军，刺杀欧阳凯坠马；起义军勇猛杀敌，守备胡忠义、千总蒋子龙、把总林彦都战死。刘得紫率兵援救，也战败被俘。许云与水师游击崇功均被击毙。台厦道梁文煊、知府王珍乘舰出鹿耳门逃走，周应龙逃回大陆。义军当日攻占府城；北路义军在赖地、张岳率领下攻占诸罗，杀死参将罗万春。七日之内，起义军发展到30万人，除清军守备陈策仍守淡水外，台湾全岛都被起义军占领。朱一贵公推为中兴王，建元永和。

清王朝闻变后，大为震动，浙、闽总督觉罗满保进驻厦门，福建水师提督施世标率水师出港，满保又调南澳总兵兰廷珍率水师和陆军约1．2万人，船400艘开赴澎湖列岛与施世标会师进攻台湾。清军商议分三路进军，施世标认为南路打狗港在台湾正南，6月南风较大不宜停泊船舟；北路清风隙距府百余里，粮饷运输困难；决心直捣鹿耳门，进攻起义军的主力要害。施世标派游击张率兵增援，淡水陈策亲自统领水、陆军2万多人，战舰600艘于6月10日出澎湖，派澎湖守备林亮为前锋，率水兵570人，直趋鹿耳门。起义军将领苏天威利用炮台阻击，双方展开激烈的炮战，清军炮火集中火力向起义军占据的炮台火药库轰炸，引起爆炸，炮台失守。清军战舰400余艘，在林亮部的掩护下直抵一鲲身，这期间正值涨潮，所以清军得以迅速登陆，占领滩头，起义军退守平安，兰廷珍率清军攻占平安镇，起义军两次反攻都被清军击败。次日在七鲲身进行了激烈的海战，起义军战败后退守府城，施世标令林亮率兵2000人，兰廷珍率兵5500多人，于夜间分别乘战舰挺进到西港仔，拂晓登陆，袭击起义军侧背，令游击朱文率领部队经过七鲲身，从盐埕、大井头分道进攻府城，经过两面夹攻，起义军伤亡惨重。19日，清

军攻占府城。这时，施世标击败了西、南两路起义军后，也在这一天到达府城。

朱一贵、杜君英等先后被俘牺牲，起义失败。余部退入山中继续坚持反清斗争。

清朝雍正十年(1732年)，《清史稿》载“庚戌台湾北路西番滋事官兵讨伐平之。”

台湾彰化大甲溪人林武力起义反清，台湾北路各社番民多有响应。清朝台湾总兵吕瑞麟率兵镇压，台湾府治空虚。凤山人吴福生乘机于3月28日带兵起义，夜袭冈山汛，又烧毁社汛，又有虎头山、赤山各社也起义响应。4月3日，吴福生率起义军进攻陴头，又另外派遣一部分兵力攻占万丹巡检署，于是凤山全县引起震动。

清政府忙派兵镇压，这时已调福建水师提督、尚未到任的原台湾总兵王郡，急忙率兵星夜兼程，与参将候元勋，守备张玉三路会攻，经过激烈决战，吴福生战败，越日被俘，于是台湾南路起义失败。

吕瑞麟在北路镇压起义军遭遇不利，被起义军包围，王郡又率兵至鹿仔港，派遣参将李随越、游击黄贵等合兵攻阿束社，参将靳光瀚、游击林黄彩各自把守要隘，然后渡过大甲溪进攻起义军。结果林武力败走南日山，该山地势险要，仅有羊肠小道可上山，王郡用炮火掩护，亲自督阵进攻，起义军抵挡不住，内乱，缚林武力向清军乞求投降，因此台湾北路起义军也告失败。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台湾省府大穆降人黄教，多结交流民。因不堪清朝官吏的剥削和压迫，10月间聚众起义。陈宗宝、郑纯等率众响应。夜袭冈山，杀汛兵据守。清朝台湾知府邹应元会同当地镇兵联合进攻，围战数日，双方互有杀伤，经过5个多月的战斗，起义军战败，黄教带领残余部队退入山区，而清军则谎报黄教死于乱军之中。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清台湾知府孙景燧，副将赫生额为镇压天地会，带领400多名清兵到彰化大墩。挨村搜捕天地会信徒，焚烧了附近的村庄，因而激起这一带人民的愤怒，奋起反抗。天地会首领林爽文以安民心、保农业、顺天行道为号召，以大理代(yì亦)为根据地率众起义。11月27日夜，首先袭击大墩，杀死副将赫生额，知县余峻。起义军乘胜又于29日攻克彰化县城，杀死台湾知府孙景燧。起义军把得到的钱米分给广大群众，并且严明纪律，不许有私人有丝毫妄取，因此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起义军队伍很快发展壮大起来。清台湾总兵柴大纪正在彰化，当时知县俞峻请求他留下帮助镇压，而柴大纪却推托说回府城调兵。过了半个月，则彰化已被起义军攻下。12月6日，起义军又攻克了诸罗(台湾嘉义)，连克淡水(台湾新竹)等地。

凤山(台湾高雄)天地会首领庄大田与其族弟庄大韭、庄大麦等领导农民数千人起义响应，并一举攻克凤山。两路义军会合，起义军壮大到10多万人。他们分四路围攻府城。台湾省沙土浮流，经常发生地震，“故城无砖石，皆掘濠树竹为城”。所以府城也是树城而已。总兵柴大纪、兵备道永福等守城。起义军攻城，柴大纪拒战于盐埕桥。起义军进攻失利，牺牲了1000多人，还损失了船只数10艘，桥距府城50里，是水陆交叉点，柴大纪固守，起义军仍继续围攻府城。

清朝浙江、福建总督常青闻讯后，急调水陆各军支援。命水师提督

黄士简到鹿耳门(台湾台南市)，陆路提都任承恩至鹿港(台湾漳化西)，总兵郝壮猷及副将丁朝雄到淡水。各路兵渡海到台湾后，黄士简命柴大纪攻诸罗，郝壮猷攻凤山，一北一南各率兵2000人。柴大纪在当地地主武装配合下，迅速攻克诸罗。而郝壮猷南进仅20里即遭起义军坚强阻击。经过50多天战斗，起义军主力撤离，清军才进入风山。凤山城已空，招民复业，起义军战士混入其中，也没被察觉。内外配合，3月10日，凤山又被义军占领，游击郑嵩战死，郝壮猷又回府城。又任承恩至鹿港，距大里杙代起义军营地仅40里，也不敢进攻。中路起义军庄大田部万余人，以南谭为中心，先后攻占盐水港、笨港，切断诸罗粮道，诸罗告急。

清朝皇帝弘历以两提督久战无功，乃命常青亲自赴台指挥。4月，常清至台后，派总兵魏大斌率兵增援，但被起义军击退。常青屯兵桶盘线，距南潭仅5里亦不敢出战。

乾隆以常青“调度失当”，命福康安为将军，代理常青总统台湾军务，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分别由鹿仔港、笨港登陆，时值起义军围攻诸罗而数月不下。清朝提督蔡攀龙增援，也未能解围。福康安部经新埤，海兰察自笨港分五路向诸罗进军，但沿途屡遭起义军阻击，进展迟缓。

11月柴大纪奏言：“诸罗为府城北障。诸罗失，则‘贼’尾而至府城，府城亦危。且半载以来，深濠坛壘，守御甚固。一朝弃去，克复甚难。而城箱内外，义民不下4万，实不忍委之于‘贼’，惟有竭力固守待援。”上览奏堕泪。诏曰：“大纪当粮尽势急之时，惟以国事民生为重，虽古名将何以加兹。其改诸罗县为嘉义县，大纪封义勇伯，世袭罔替，并令浙江巡抚以万金赏其家，俟大兵克后，与福康安同来瞻观。”福康安中途听说起义军声势很大，也求援兵而后进。

一夜顺风，清兵6000多人，还有乡勇千余人，11月8日，与起义军遭遇于仑仔顶。海兰察率巴图鲁侍卫数十，冲入起义军营地杀伤义军甚多，接着又怒马杀人。起义军埋伏于竹蔗林，清军五路分战，起义军在牛稠山战败。清军解诸罗之围。即日海兰察抵达嘉义城，次日福康安亦至。海兰察跟踪追击，连续攻占大埔林、大埔尾、斗六门等地及起义军根据地大里代。林文爽带领家属走集集埔，退入山区。

12月，清兵伐箐腾险而上，林文爽在老衢崎被俘，4月在北京就义。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清军在攻占凤山，肃清中路义军后，转攻南路，与庄大田部在琅桥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庄大田战败被俘后牺牲，起义失败。

蔡牵反清之战福建同安人蔡牵，因不满清政府对渔民的剥削与压榨，以浙江、福建沿海为根据地，号召渔民起来反抗，他带领沿海渔民，聚众起事，起义者拥有海船100多艘，在沿海一带不断打击清军。清朝浙江提督李长庚与浙抚阮元建造巨船30艘，名为霆船，配备大炮400门，准备进歼海上义军蔡牵之部。

嘉庆六年正月，李长庚所率舰队在定海海面与蔡牵船队遭遇，清军舰队恰乘上风之势，于是发炮攻击，而蔡牵船小失利，只得向福建方向退却。蔡牵便制造了比霆船更大的舰船数10艘，又与朱溃等部联合起

来。增强了实力，拥有巨舰已达80多艘，小船还有数百条，军威空前。于是便进攻温州。温州总兵胡振声慌忙率水师截击，两军在海上展开战斗，蔡牵义军击沉清军舰船许多艘，胡振声中炮沉入大海。嘉庆八年(1803年)，清提督李长庚率领舰队向马迹洋无名岛蔡牵义军舰船停泊处发起进攻，展开了马迹洋之战。清军用炮火猛烈轰击。一面又用巨舰冲击蔡牵的舰队，起义军船舰多艘中弹，队形紊乱，蔡牵所坐舰船也遭炮击，船篷起火损坏，清军又击沉起义军大舰2艘，蔡牵见形势不利，不宜恋战，为保存实力急令舰队撤出战斗。清舰追赶不及，便返航回港。

嘉庆十一年(1806年)正月，蔡牵重整旗鼓率战舰100多艘，一举进攻台湾，先由鹿耳门登陆，并在鹿耳门布置防御工事，以便阻止清军在此登陆，蔡牵登台湾岛后，得到了台湾反清各部吴老四、洪淮四等的响应，联合起来的起义军壮大到2万多人，声威颇大。于是便进击凤山、淡水等地，仅府城尚未攻下。蔡牵在台湾坚持斗争达1年多，此时他已被推举为镇海王。

嘉庆皇帝急命成都将军德楞泰率四川兵3000多人赴台增援。李长庚经过较长时间准备后，率领浙、闽水师及部分陆军赴台，在鹿耳门登陆，被义军阻击，又改为平安港登陆，直接用陆军支援府城。蔡牵率起义军兵分几路抵挡，陆战五次起义军终未取胜，这时蔡牵只好放弃台湾，带领舰队回师浙江海城。

到了嘉庆十二年十二月，在黑水外洋，起义军舰队与浙、闽水兵遭遇，展开一场海战即黑水洋之战。清军在李长庚指挥下用舰艇冲击蔡牵舰船，起义军舰队散乱，恰在这时，蔡牵的坐舰舷篷中炮起火，情况十分危急，幸好蔡牵后船发炮，清提督李长庚中炮身亡。清军水师提都张见陛见统帅阵亡，顿时紧张起来，立即指挥清舰队撤退。蔡牵于是得胜返航。

1809年(嘉庆十四年)9月，清朝浙江、福建水师由提督邱良功、王德禄率领，联合进攻蔡牵，于是在定海渔山洋面展开海战，交战整整一天，不分胜负。第二天邱良功改变战术，采取“分船隔攻”的方法，先分割起义军的舰队令他们首尾不能相互支援，然后用自己的坐舰靠近蔡牵的坐舰，进行激烈的接舷战。邱良功和王得禄都负伤，但仍坚持指挥不退却。可是蔡牵的坐舰得不到其他舰船的支援，弧立作战，铅丸又用尽了，用银元当炮子，继续发炮射击，船上战士已死亡30多人，船尾又起火，这时清军蜂拥而上，蔡牵拉响舰船首尾巨炮，将船炸裂而沉入大海，余部在浙江向清军投降，起义最后失败。

天地会、天理教、先天教的反清起义清朝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天地会首领张念一聚众起义，声称尊奉朱三太子，以浙江大岚山为根据地，曾一度攻占慈豁、上虞、嵊(shèng胜)县等地。浙江巡抚王然派兵镇压，张念一被俘。山东巡抚赵世显在山东拿获明宗室朱三父子解往浙江，与张念一同时被害，起义失败。

台湾天地会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由张丙、陈办等聚众起义，围攻嘉义，把清朝台湾镇总兵刘廷斌困于弧城。清朝福建陆军提督马济胜率2000清兵渡海增援，和起义军在嘉义城下展开激战。起义军撤围退却，清军追击至笨港尾双方又接火激战，起义军伤亡很重，首领张丙被俘牺牲。起义军由陈办、赖满等率领分散活动。清军屯兵盐水港，开始分兵

搜剿。清帝曼宁又命令福建将军瑚松额督师赴台。这之前，起义军集兵1万多人进攻盐水港，马济胜乘义军不备时出击，义军失利溃败。第二年，瑚松额率部抵台后，进行大搜捕，俘虏各战义军首领20多人，战士300多人，起义失败。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山西赵城(洪洞北)先天教首领曹顺，以治病传教，号召群众，并打造兵器准备武装起义。他们约定8月在乎阳府(临汾)、霍州(霍县)、洪洞同时举兵起义。3月，起义的消息被赵城知县侦察得知，于是派兵镇压。首领曹顺知起义之事已泄漏，便提前行动，聚众后先以一部分人潜入赵城城内，里应外合，举火为号，焚烧县城，乘夜间释放“狱囚”，攻入县署，杀死知县杨延亮等。而后又转而围攻霍州，清军鄂顺安率部进剿，起义军败退。曹顺率余部东走山东，在现城与义军战士82人同时被清军逮捕，起义以失败告终。

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李文成、林清起义。天理教是白莲教的支派。李文成、林清等利用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一带天理教在各地的活动，秘密组织群众，准备起义。商定于9月15日在直隶(河北)、山东、河南同时起义。并预定由林清偷袭皇宫，推翻清政权，李文成派千余名义军战士化装进城助战。

李文成命牛亮臣在大伾山下制造武器，机密泄露，9月5日，滑县知县强尧捷将李文成逮捕，进行严刑拷问，但李文成、牛亮臣均拒不吐实。县官准备把李文成、牛亮臣解往省城。李文成妻张氏，人称李四嫂，与宋元成、黄兴宰、黄兴相等提前起义。

9月6日李四嫂率起义军3000多人，乘夜潜伏在滑县城外，第二天拂晓，事先潜入城内的义军战士，在城墙上升起信号，李四嫂指挥战士猛攻，迅速攻入城内，救出了李文成、牛亮臣，知县以下官吏均被杀死。

嘉庆皇帝急速命令直隶总督温承惠率军与河南清军联合行动，镇压起义军。

李文成出狱后被推为天王，建立政权，设官分职，以滑县为阵地，加强城防，派徐安国守道口镇；用一部分起义军队伍北上进入直隶。进军长垣、开州(河南濮阳)、东明之间，攻占三东定陶、曹县(山东菏泽)后，又进而围攻浚县。李文成因为清军即将到达，没有及时派兵增援林清。

林清虽未得到李文成的援军所助，但仍按原计划于9月14日，派起义军200人分成两支，暗藏武器，化装进入北京城、潜伏在酒楼茶馆内，准备袭击皇宫。15日陈爽一队由教徒太监刘德财等引导入东华门，陈文魁一队由教徒太监等引导入西华门。两路义军迅速会攻紫禁城。起义军与宫内护军在“隆宗门”外展开激烈战斗。部分义军冲至养心门，宫内一片混乱，惊恐万状。这时清禁军入宫反击，可是起义军外援未到，双方兵力悬殊太大，起义军寡不敌众，只好退出皇宫，袭击皇宫失败，还牺牲了30多名义军战士。

嘉庆皇帝认为温承惠作战不力，改任陕西、甘肃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提督杨遇春为参赞，统帅直隶、山东、河南清军及吉林、黑龙江马队驰赴河南．镇压起义军。

杨遇春围攻道口镇，义军守将徐安国败退到滑县城，清军追击，进攻滑县，这时定陶、曹县相继失陷，形势对起义军不利，战况十分紧

张。李文成趁清军还未合围，率义军4000多人向辉县转移，以分散清军兵力。清军总兵杨芳率兵追击。11月8日，在司寨白土岗，双方激战，这一仗清军伤亡惨重，那彦成派兵增援，清军集中兵力围攻司寨，义军“据险掷石，枪炮齐发”，清军屡次冲击均遭失败。清朝皇帝严令杨芳不惜一切代价，剿杀起义军，于是杨芳冒重大伤亡，终于攻破司寨。李文城“举火自焚”，起义军战士大部分牺牲。

留守滑县的李四嫂、宋元成、牛亮臣、徐安国等率义军2万多人，多次打退清军进攻。李四嫂还率小分队，夜捣清营，三进三出，杀死清军许多人。清军攻滑县城不下，便掘地道用炸药轰城，起义军在城内用水灌、堵截、抛巨石打陷井等办法阻止清军侵入。经过40多天的激烈战斗，清军突然入城，双方展开了极为壮烈的巷战。李四嫂身负重伤后自杀，宋元成在巷战中牺牲，牛亮臣、徐安国被俘，天理教起义失败。

杨起隆北京反清起事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在北京发生了杨起隆反清起义。认真地说，这只是一个起义计划。因为它在正式爆发以前，就被清朝政府扼杀在襁褓中了。但是这次起义事件就其性质来说，却仍然是一次旗下的奴仆、佃户要求人身解放的正义斗争，反映了八旗主奴矛盾、主佃矛盾的极端尖锐化。

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定都北京后，八旗贵族分驻北京城区各地。他们在入关前后通过俘虏和抢迫汉人投充等方式而拥有大量的奴仆。这些奴仆的社会地位低于正八旗人，婚丧嫁娶都不能自主，担负着八旗的官员、贵族家内的一切劳役。清初法律上虽然规定主人不得随意地杀害奴仆。但实际上却有大批的奴仆在主人的买卖和鞭挞下“锁禁致死”。这种情况直到康熙初年仍在继续。康熙本人就公开承认说：“近闻奉差官员及督抚提镇等大小文武官员，不思尽职，惟图利已，及买良民为奴，甚至多买馈送亲友。”由于主人“逼债过甚”，奴仆“自缢、投水身死报部者甚多”。康熙的话充分证明当时八旗内部主奴关系是很紧张的，旗下的奴仆所受的剥削和压迫非常残酷，无法生存下去。他们大批的逃亡，形成清初严重的“逃人”问题。奴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自发反抗主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武装起义形势正在逐步形成。

杨起隆正是这次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正当杨起隆积极组织准备起义的时候，这时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已经在北京传开，“京师汹汹”，形势紧急。杨起隆显然认为这时候起义是有利的，因此他决定把原定次年元旦起事提前。他诈称明末崇桢皇帝的三太子，组织镶黄旗监生郎廷枢的家仆黄裁缝、正黄旗周公直的家仆陈益等约有干人准备起义。

12月21日晚，杨起隆与黄吉、陈益等30余人在周公直家(北京西城鼓楼西街)秘密开会，布置有关起义事项。会上杨起隆决定建年号“广德”，参加起义奴仆称为“中兴官兵”，并且约定于12月23日五更，“额皆裹白布，身束红带为号”，“约于京城内外放火举事”。

可惜，在奴仆的队伍里并不是团结一致的。就在杨起隆密谋策划的当晚，事机就已泄露。郎廷枢家仆告变，郎廷枢就执缚黄吉等4人首告，周公直也向本旗都统图海处告发，“次早，凡家奴出首，主人执送者不绝”。起义还处在酝酿阶段就遭到致命的打击，这首先是被奴仆自己出卖的。

杨起隆被迫在没有完全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再把时间提前于12月22

日仓皇举火起义。起义地点就在鼓楼西街周公直家。当镶黄旗官员鄂克逊走经鼓楼时，看见大火冲天，跑到高处看时，只见起义者披甲露刃，于是就跑到兵部报告了兵部尚书明珠、都统图海、宏烈、与副都统觉罗吉哈礼，随派兵围住周公直的家，起义者纵火、放箭与官兵大战起来。杨起隆在混战之中与同伙张子房等7骑奋勇杀敌，冲破官兵的包围跑了出来，而陈益等人没能冲出官兵的重围，虽在院内坚持战斗，但终因弧立无援，寡不敌众，被鄂克逊首先冲进院内，陈益与杨起隆的妻子马氏和随从都被清兵捕获。接着清政府进行了大逮捕，大屠杀。逮捕首先针对在逃的首领杨起隆。清政府先下令“缉获假称朱三之杨起隆”，并且一度暂闭城门，因为有人举报杨起隆潜伏在京城之内，故行严缉。同时大规模搜捕余党，城上布满了官兵，关闭城门，按册排甲逐一搜捕。凡是被捕的都用黑布蒙住面孔。城中不准升火煮饭三天，可是仍然到处起火，闹得白天昏黑，城中的百姓惶惶不安。由于捕获的起义者过多无地处决，就用车装满送出九门外斩首，城外的尸首堆积如山。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8天，清政府才下令，不要杀戮过多，凡是只有红布，无扎付和信件的都不予追究。这样放出来就有几千人。这次大逮捕、大屠杀株连了很多完全无辜的平民。因吴三桂没叛乱之前，京城盛传不久当有大难，凡是头和腰裹红布的就可以免灾。所以暗藏红布的平民颇多，于是虽然不在起义者的名册，但只要搜得有红布的人也被处斩无数。

起义被清政府血腥镇压下去了，只有起义首领杨起隆仍然在逃未获。一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九月，又有人自称朱三太子，广散扎付，活跃在陕西汉中、兴安一带，被清政府逮捕。据《清史列传》中说这个被捕的朱三太子就是杨起隆。但又据《清塑祖实录》一书中讲这个被捕的朱三太子不是杨起隆。不管这个被捕者是否是杨起隆，两种说法都证明，至少杨起隆是起义的参加者，多年后还在坚持反清斗争。

杨起隆起义有它的特点：一、它发生在清朝统治的心脏北京，这是140年后在北京爆发的林清天理教起义的前奏。在帝王京城发动起义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了晚清封建统治的深刻危机；二、杨起隆在起义中自称朱三太子，部众号称“中兴官兵”，这是直接借复明之名以反抗清朝统治，争取旗下的奴仆、佃户参加；三、杨起隆的组织、发动工作做得很深入，“八旗下无家不编”，特别是皇帝直辖的上三旗中的镶黄、正黄旗奴仆，形成了这次起义的主力。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充分反映出，八旗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已经达到了即使由皇帝亲自控制也会出现裂缝的程度。

湖北麻城农民起义(黄金龙、何士荣起义)清朝康熙十二年(1674年)九月，黄金龙、刘尹孚等聚结民众数千人在湖北麻城起义。清廷麻城知府于成龙，诱骗刘尹孚投降，受骗随刘尹孚投诚的民众1000多人。黄金龙被迫率领余部1000多人和邹君申等人据守山砦。于成龙率领清兵以刘尹孚为响导，进击山砦。黄金龙战败被俘牺牲。余部大部分都加入另外一支农民起义军，继续反抗清廷的斗争。

十月，何士荣占据永宁乡，陈鼎业占据阳逻，刘启业占领石坡，周铁瓜、鲍士庸占领泉畈，各自聚结民众数千人，先后起义，共推何士荣为首领。起义军与湖口、宁州等地的起义军遥相呼应，准备进攻黄州(今湖北黄冈)。此时黄州的清军都已调走征讨三藩去了，城内空虚．城中清

廷的官吏见势惊慌，提议退守麻城。知府于成龙认为黄州是对三藩作战的补给重镇，一旦失守，势必影响大军作战，所以必须死守。于是，就征集乡勇2000多人，首先命令黄冈知县李径政带领所部乡勇进攻阳逻，来解除起义从四面对黄州的威胁。李径政攻占了阳逻，阵鼎业被俘牺牲。

何士荣率领起义军从牧马崖出发，分兵两路进黄州。于成龙命令千总罗登云率领乡勇1000人在东路阻止起义军；自已率领乡勇1000多人从西路反击，命令千总吴之兰为左翼，武举张尚圣为右翼，自己在中路指挥。起义军首先猛攻清军的左翼，击毙千总吴之兰，清军败退。清军的千总李茂升组织反击，督率清军拼力奋战，起义军的进攻受阻。张尚至所率领的清军袭击起义军的侧背。起义军腹背受敌，向泉畈(fàn饭)方向撤退，清军追击，何士荣亲自担任后卫，战败被俘牺牲。清军攻占泉畈，起义军首领大部分牺牲。起义军经过24天的激烈战斗，终于失败。

蒙古布尔尼反清之战康熙十二年，满清王朝调遣蒙古察哈尔亲王布尔尼出兵平定三藩，布尔尼拒不接受清延的命令，并且搧动奈曼等部叛清。康熙任命信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将军共同督师征讨。此时清廷的八旗兵劲旅大部分南下进剿三藩，图海以八旗的家奴临时组织成的兵卒从征，并率土默特等部的蒙古兵向察哈进军。到了岐尔哈台，侦探到布尔尼屯兵达禄。清军大将军信郡王鄂扎命令清兵轻装前进，攻击达禄。布尔尼在山谷中设下埋伏，以3000人马诱敌，清军在搜山时遇到了埋伏，致使土默特的兵马初战受到挫折，副将军图海率领主力进击，双方激战多时，布尔尼兵大败。布尔尼仅率领30骑兵突围，中途被科尔沁额附沙津射死。察哈尔遂平。

朱统锠反清贵溪之战明朝的后裔朱统锠举兵起事，先接受耿精忠的封号，耿精忠归降清廷后，自称宜春王，率兵攻占贵溪等地，康熙十六年十月遣派他的尾部陈龙攻占光泽。清廷福建按察使吴兴祚率领轻骑兵进攻光泽，陈龙等投降。吴兴祚派遣投降的士卒伪称逃回，以为内应，派陈龙引军进攻贵溪。朱统昌战败，他的部属将领冯珩缚之投降了清军。

江西杨玉泰起义杨玉泰乘三藩掀起战乱，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清廷的统治，他在宜黄、乐安、崇仁等地山区集合了起义的队伍，派蔡仕伯率领一部分起义军进驻宜黄，自己率领起义军主力踞守乐安，以便互相支援。清廷江西总督黄卫国为了巩固对三藩作战的大后方的安全，决心派兵进攻。起义军作战失利，在宜黄、崇仁相继失守后，蔡、沈投降清军，杨玉泰在大岭抗击清军失败后退守乐安。清军攻占乐安，杨玉泰也投降了清军，于是起义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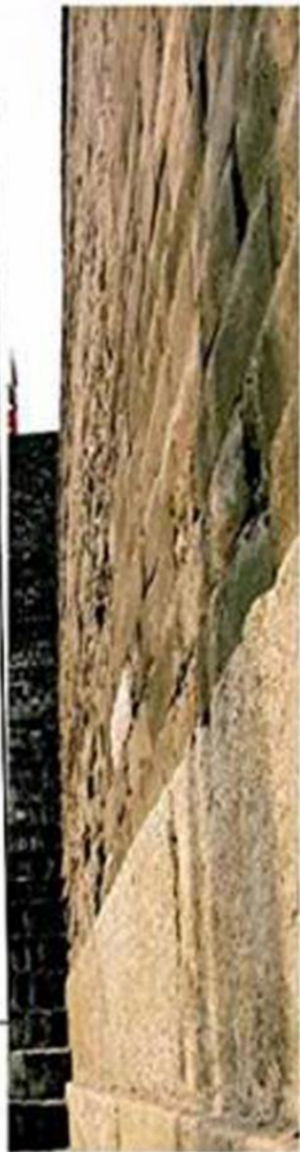
夏逢龙起事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三藩战乱平定之后，清王朝大量的裁减士兵，被裁减的兵勇流落在湖南、湖北之间，无生活门路，聚集在一起密谋叛乱。原清军督标兵夏逢龙向来以和解行伍中的争端为大家所信服，被裁减后被推举为首领率领大众围攻巡府的衙门。襄阳总兵许盛奉令亲督清兵抵抗，被夏兵射伤，清军溃散，巡抚永昌投井自杀。于是夏军占领了武昌。众兵勇又推举夏逢龙为总统兵马大元帅。被裁减的清军相继投入夏军的行列。夏军的声势日益壮大，先后攻了嘉鱼、咸宁、武昌、蒲圻、濮阳等县城。夏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夏逢龙留下所

设置总兵胡耀乾驻守武昌，自己率领主力大军攻占了汉阳、德安，夏军攻击石城未能攻下，向应城方向转移。清帝康熙派遣瓦岱为振武将军调江宁的满、汉各军水陆兼程前进，增援武昌等地。湖广提督徐治都率领清兵进击，到达应城与夏遭遇，双方经激烈的战斗，夏军稍却，清军进入了应城，夏军1万多人围攻应城，徐治都分兵出击，使夏军腹背受敌，就撤围，转攻德安。夏逢龙自率水师战舰20艘顺流而下，到了龙川矶进攻清军。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夏军伤亡惨重。夏逢龙率领余众漂泊鲤鱼潦()。徐治都派郭兴、杨明锦等率部防止起义军登陆；自己率领水师进攻夏军的船队，夏军的船舰多被焚烧，夏军的水兵伤亡很重。夏逢龙率众登陆，又战死700多人，遂单骑逃到武昌。此时他设置的总兵胡耀乾已献武昌投降清军，汉阳也被清军占领，夏逢龙转奔黄州。振威将军都统瓦岱所统领的八旗兵于七月追到黄州，夏逢龙所置设黄州总兵赵得等迎降，夏再逃到黄冈，被清军俘虏斩杀。

吴三桂余部反清起事吴三桂起兵叛乱失败后，其余部窜入山区，等待时机反清起事。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满清王朝在茶陵等地方私增摊派粮款，激起民愤。吴三桂的旧部陈丹书等乘机攻击茶陵，黄明等攻击端州(广东高要)，都遭到了清军镇压，起事失败。



三国两晋战争史



目录

第一章 三国时代全般形势
第一节 三国时代之成因
第二节 三国时代概貌
第二章 群雄讨董卓之战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桓灵二帝以来之政治概况
第二节 群雄并起之导因
第三节 作战经过
第四节 战后州郡割据之局势
第三章 曹魏开国之战一——破吕布与定都许昌之战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
第二节 作战导因
第三节 作战经过
第四节 迁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天下
第四章 曹魏开国之战二——官渡之战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及作战导因
第二节 作战经过
第三节 战后之政局
第五章 东吴开国之战——孙策开拓江东豫章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及孙策开拓江
第二节 袭刘勋击黄祖兼并豫章之战
第三节 战后之政局
第六章 曹魏开国之战三——赤壁之战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与作战导因
第二节 作战准备及战略部署
第三节 作战经过
第四节 战后之政局
第七章 刘备开国之战——袭取蜀汉之战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及袭蜀导因
第二节 刘备开国方略
第三节 袭蜀作战经过
第八章 吴蜀争夺荆州之战——荆州及猇亭之战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及作战导因
第二节 吴谋袭荆州方略
第三节 吕蒙袭荆州作战经过
第四节 吴蜀争夺荆州——猇亭之战
第九章 诸葛亮伐魏之战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及作战导因
第二节 作战准备及双方作战方略
第十章 魏灭蜀之战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及作战导因

第一章 三国时代全般形势

第一节 三国时代之成因

东汉外戚宦官之祸乱，由来已久，及至桓、灵二帝而尤甚。故致政治紊乱，民不聊生，盗贼四起，史不胜书。及至黄巾一起，天下响应，朝廷虽然能旋即平定大乱，但由于政治已极败坏，社会已尽凋残，东汉之崩溃，已入于不可挽救之境地。故自董卓而后，朝野上下，惟权力是尚，上焉者挟天子以令诸侯，次焉者割境自雄。当时有识之士如信都令阎忠劝皇甫嵩有“推亡汉于已坠”之言，政略家鲁肃导孙权有“汉室不可复兴”之语；曾为西园八校尉之一淳于瑗，乃汉青年将校之选，亦作“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之叹。刘表已为宗室，名列时贤八骏，竟有“郊天”，“合乐而庭作之”之僭，刘璋据益州亦有“险图共计”之谋。于是，初则州郡割据，继则强凌弱，众暴寡，互相兼并，最后仅存曹操、孙权、刘备三雄，因此三国之时代出焉。

第二节 三国时代概貌

所谓“三国”者，即魏、蜀、吴三分东汉州郡，各自称王称帝之一段时间而言。其时间，起自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止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共为90年。此90年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各约为30年。第一个“30年代”为三国时代之酝酿，缔造及完成期；第二个“30年代”为三国称王、称帝及鼎峙期；第三个“30年代”则为三国衰败，灭亡及结束期。历史由东汉演变为三国鼎峙，再由三国鼎峙而演变为一统之晋，其间政权递嬗，形势演变，皆视群雄之实力消长而定。而实力消长，则决定于战争；战争之胜败，又取决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准备与运用之人谋；谋之臧者胜，谋臧而尤及于远者大者，则握全胜之权，而收其功。三国人才极盛，谋既臧又能及于远大者曹操、诸葛亮，皆其尤者也。

东汉自灵帝中平6年（公元189年）董卓造乱以来，各州郡以与兵讨逆为由，截留朝廷租税赋贡，以给军用。及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闭关自守，遂形成群雄割据之局。当时东方以袁绍为首之群雄，乃有议立大司马兼幽州牧刘虞为帝，藉为党同伐异之政治号召；及帝虞不成，遂迳行割据自封，州郡从此各自为政。其中野心最大得机最先者惟袁绍，继起而直追之者为曹操。

袁绍藉其先人四世三公之余荫，起兵以来，袁氏之门生故吏蜂起云涌，故得机先割据物产丰饶之冀州，从而扩充军队，收揽豪强，留心治化，肃清盗匪，以攻取并州、青州、幽州。东汉13州天下，绍有其四。其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悉凌驾其他诸雄而上之。政略战略与曹操相埒，惟于其个人之战略修养上，不及曹操。故于汉献帝建安5年（公元100年）10月，竟为兵微将寡之曹操击破之于官渡。孙策乘此时机开辟江东。此为三国时代第一个“30年代”中，最初“10年”三国时代之“酝酿时期”。

曹操雄才大略，用兵作战，仿佛孙、吴。于得失兖州诸战役中，备尝创业艰苦。因而深知忍小谋大，坚苦自励，屯田以求足食，精练以求足兵，挟天子以要民信，故得北破袁绍，东定徐扬，西略三辅，南下荆州。于建安13年（公元208年）9年，曹操已取得江陵（即今湖北省江陵县）战略要地时，本有复天下于一统之势，但由于骄满遂使功败垂成；并失益州之内附，遂使孙权王吴之基业益固，刘备亦得以创其荆蜀之基业，于是鼎足相峙之雏形成。是为三国时代第一个“30年”代中，第二个“10年”之三国时代“缔造时期”。事详于本卷赤壁之战章。

刘备乃幽州涿郡涿县一织席贩履之平民，遭黄巾之乱，纠众起兵，旋乘世乱，转战于幽、青两州，皆依人作嫁而已。及因时势而得徐州，但由于缺乏谋士辅佐，旋得旋失终无所归，而走依荆州刘表。赤壁战后，曹操势力北退，刘备因诸葛亮辅佐，依其隆中之策，得跨有荆、益二州。旋关羽败死荆州，三方势力各有消长。是自建安16年（公元21

年）正月，曹操以其子曹丕为五会中郎将领副丞相之时起，至建安25年（公元2205年）正月，曹操死于洛阳时止，其间“10年”，为三国时代“完成时期”，此为三国时代第一个“30年代”也。此30年代由群雄割据，而互相攻并，结果并成魏、蜀、吴三大势力之鼎峙，以及辽东、西凉、交趾三隅之分离。

汉献帝建安25年（公元2205年）10月，新继曹操为魏王兼汉丞相领冀州牧之曹丕，代献帝自立为魏皇帝。翊年夏，汉中王刘备，亦称帝自立于蜀。孙权则以袭取荆州之故，恐惧孤立于魏、蜀两大敌之间，乃遣使降附于曹魏以拒蜀，魏封之为吴王。此为真正三国时代之始，亦即第二“30年代”，第一个“10年”两帝一王之时期。此期间吴、蜀因争荆州，而有猇亭之战。魏此时欲乘其两敝，举兵袭吴，旋诸葛亮尊蜀国之政，乃乘吴、魏交恶之际，恢复其连吴拒魏之国策，诸葛亮因是项决策之成功，遂对魏展开大举攻伐之图。

东吴孙权，仗父兄开创之基业，初虽以建桓文之业，为政治号召，旋因时变境迁，大可独立自为，但终于缺乏步骑大军，不能在北方战场与中国相周旋，终其极，不过据长江而有之，自建帝号以自固而已。盖江东虽富，兵虽强，将虽勇，一因内有山越为其心腹大患；一因富有远略之将相，皆中年早丧，故仅能偏据江南。惟于开发江南对历史上实具有极大之贡献。盖自秦以来，中国疆域虽远及安南，尤其越族盘据江南苏浙皖赣诸山区者，抗不归服，时相侵扰，孙权剿抚兼施，逐渐平服之。时值魏朝中大臣离心，不暇远略，是为三国时代之“盈满时期”。直至魏嘉平元年蜀后主延熙12年，吴赤乌12年（公元249年）正月，魏太传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自为魏丞相，魏护军夏侯霸奔降于蜀时止，是三国时代第二个“30年代”终末，三国虽仍相峙，但已成残局。

姜维自恃才干，欲继谱葛武侯遣志，于魏嘉平2年（公元250年），约吴举兵伐魏。时值魏之国祚已将移于司马氏之手，吴太传诸葛恪兴师北伐。姜维亦数次出兵伐魏，却因奸佞当朝，动遭谤毁而无功。吴国亦因将相失和，进而互相杀害，是三国时代已各进入第三“30年代”之衰败时期。故自嘉平2年起，至魏甘露5年、蜀景曜3年、吴永安3年（公元260年）5月，魏大将军录尚书事司马昭弑其主曹髦时止，此“30年代”中之第一个“10年”，魏国已名存实亡。

司马懿素有“惊视”“狼顾”之习，为曹操所疑忌。故终操之世不能得其才，及至曹丕知其能而依重之，始得制兵。曹叡为帝，欲专有南阳兵以擒孟达，守关中以拒诸葛，出兵辽东平公孙渊，出奇应变，所向建功，因而取得魏国致柄，遂如曹操图汉之蓝图以图魏。且其父子皆能用贤民，废除魏国严刑峻法诸政，以收揽人心，故其于灭蜀之后，即代魏为晋，与情无，内外平靖。此时则三国仅余一吴。但此仅存之吴，犹在行虐暴民中，是谓三国“灭亡时期”。

羊祜自晋泰始5年（公元269年），奉晋命督荆州诸军事，先以绥怀布信以征吴人之心，然后用王濬等分在各地准备灭吴之实力。吴都督诸

军事之陆抗，深怀戒怖，乃向吴主陈时宜十七条，欲以政治斗争御之，吴主拒而不纳。及抗死，羊祜之六州会兵秣陵计划成，杜预继之，吴遂灭亡，三国统一于晋，是为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之事。故自晋泰始5年至吴国灭亡，其间“10年”，为第三个“30年代”之最后“10年”，是为三国时代“尾声时期”。

魏、蜀、吴三国，各以战争而兴，又各以内政而衰，最后以战争而亡。此为三国时代全般形势之一般。

第二章 群雄讨董卓之战

董卓于中平6年（公元189年）废少帝辩而立献帝协，州郡纷起声讨，其战役有三：

一、献帝初平元平（公元190年）3月，曹操率兵数千首先进击，被卓将徐荣击破于浆阳西南之汴水。集于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以讨卓之诸军旋即瓦解。

二、初平2年2月，孙坚自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进击，先败后胜，进克洛阳，旋以贡绍遣兵袭坚之后，坚撤回鲁阳。

三、初平2年冬，朱儁起兵屯于中牟讨卓，至初平3年春为卓将李傕、郭汜、张济等所击破。自此以后，州郡割据。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桓灵二帝以来之政治概况

东汉末中央与地方政治腐败之甚，为前所未见。上自皇帝，下至郡县及边郡将吏，中则外戚宦官，无不贫狠残民以逞。兹举其事如下：

一、关于帝室贪侈极欲者

1．桓帝延熹2年（公元195年），陈蕃上疏有云：“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见后汉书陈蕃传）。灵帝光和2年（公元179年）中常侍吕强上疏有云：“后宫采女数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百金，比谷虽贱，而户有饥色，案法当贵而今更贱者，由赋发繁数，以解县官，寒不敢衣，饥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见后汉书卷一百八吕强传）

2．灵帝光和元年，灵帝“初开西邸卖官，入钱各有差，2000石2000万，400石400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或诣阙上书，占今长随县好丑丰约有价，富者先入钱，贫者到官然后倍输。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初帝为侯时常苦贫，及即位，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曾无私钱，故卖官聚饯以为私藏。（后汉书卷八灵帝纪及卷一百八张让传）

3．灵帝光和4年“帝好私蓄，收天下之珍货，每郡国贡献先输中署，名为导行费。”（同上）

4．灵帝中平2年（公元185年）“中常侍张让、赵忠说帝敛天下田晦十钱，以修宫室，铸铜人”。“诏发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强折贱卖，仅得木价1/3，因复货之；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又令西园驺分道督趣，恐动州郡，多受贿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资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后汉书卷一百八张让传）

5．灵帝中平2年“3月以廷尉崔烈为司徒”“是时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钱西园丽得之。段颎、强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赀财，乃登公位。烈因传母，入钱五百万，故得为司徒，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万。程夫人于旁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是岁，帝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绘帛积堂中，复藏寄小黄门常侍家，钱各数千万；又于河间买田宅起第观。”（同上）

二、关于外戚，宦官之贫残者

1．桓帝和平年间，大将军梁冀及其妻孙寿，皆贫贱无比。“冀爱监奴秦宫，宫至太仓令，得出入寿所，威权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谒辞

之。冀与寿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金玉珍怪，充积藏室；又广开园圃，采土筑山，10里9阪，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冀寿共乘辇车，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酣讴竟路，或连日继夜，以骋娱恣。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遍近县，起兎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10里，移檄所在，调发生兎，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口，名曰自卖人”。“孙氏宗亲冒名为侍中，卿、校、郡守、长吏者10余人，皆贪饕凶淫，各使私客籍属县富人，被以他罪，闭狱掠拷，使出钱自赎，贺物少者，至于死。”

2．“梁冀一门，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57人。冀等擅威柄，凶恣日积，宫街近侍，并树所亲，禁省起居，纤微必知。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乘与乃次焉。吏民齐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百官迁召，曾先到冀门笺檄谢恩，然后敢诣沿书”（后汉书梁冀传）。“冀虽专朝纵横，而犹交结左右宦官，任其子弟宾客，为州郡要职，欲以自固恩宠”。

3．桓帝延熹2年（公元195年）中常侍单超、徐璜、黄门令具瑗、小黄门史唐衡、左琯等诛梁冀，訾封为侯，世因谓之“五侯”。“自是，权势专归宦官。五侯尤贪纵，倾动内外”。“皆竞起第宅，以华侈相尚。兄弟姻戚宰州临郡，辜榷百姓，与盗无异，虐笔笔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为盗贼”。当时士人病诟之者甚众，如顺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皇甫规对策曰：“伏惟孝顺皇帝……后遭奸伪，威分近习，畜货聚马，戏谑是闻。又因缘嬖幸，受赂卖爵，轻使宾客交错其间，天下扰之，故每有征战，鲜不挫伤，从乱如归，宫民并竭，上下穷虚”（后汉书卷九15皇甫规传）。如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太学诸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有云：“常侍贵宠，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民……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衔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噏则令伊颜化为桀跖”（通监鉴53）。

4．灵帝建享元年（公元168年），外戚大将军实武联合士人与宦官曹节等作生死搏斗，结果窦武、陈蕃等被诛，名士被戮者数百人。宦官曹节、王甫、朱瑀、共普、张亮等皆封列侯。于是“王甫、曹节等，奸虐弄权，扇动内外，太尉段颎阿附之。节、甫父兄子弟为卿、校、牧、守、令、长者，布满天下，所在贪暴”（通鉴卷57）。

三、关于郡县及军政贪残者

1．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1年），尚书令左雄上疏有云：“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办为贤能，以治已安民为劣弱，奉法循理为不化。髡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疢，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谕功不据实。卢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

猾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转选横调，纷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后汉书卷91左雄传）

2．通监卷52载：顺、冲二帝时“西羌叛乱积年，费用80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护野。”

3．桓帝和平元年（公元150年），侍御史朱穆谏梁冀有云：“京师诸官费用增多，诏害发调或至10倍，各言官无见财，皆当出民，榜掠割剥，强令充足，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民如虏，或绝命于箠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又掠夺百姓，皆托之尊府。”（后汉书卷73米穆传）

以上所举，为东汉自顺帝以后政治腐化恶化之一般。而此种腐化之由来，实由于政治制度所使然。初则由三公之相权横转移于尚书台，继乃有因皇帝幼弱，太后临朝，外戚专政之事；又由外戚专政之故，帝权旁落，遂有皇帝与宦官共诛外戚如梁冀之事。宦官既已骄横擅政，乃又产生社会士人群起而攻之党锢之祸，于是“内外骚动”。外戚，宦官既已盘剥官民，于是郡县牧守舍长及边郡之将帅等为巩固禄位，乃转盘剥百姓，以贡奉朝贵。而百姓不堪盘剥，乃群聚为盗寇，如顺帝永和2年（公元151年）象林蛮叛，交趾、九真继之。永和6年荆州盗寇纷起。扬、徐二州盗起，积10余年不能平。汉安2年（公元143年），九江盗贼纷起，自称皇帝。冲帝永嘉元年（公元一四6年）历阳贼起，自称黑帝。巴郡人起兵自称天王。桓帝永寿3年（公元157年）至廷熹6年（公元163年）九真、长沙、桂阳、苍梧、南海、零陵、为等地人民及蛮夷，相继群起叛乱，皆莫不攻杀郡守令长以泄愤。至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东汉政治与社会，既陷入瘫痪之绝境，故有黄巾张角等群起，众数10万，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皆起而响应之大乱。总而言之，东汉末世，上自帝室，下至郡县亭传边郡将吏，朝内外戚宦官，无不贪残，是故国防不修，西羌及其他外患频仍，国内民变迭起，加以水灾、蝗灾频数，民不聊生。凡此，即为东汉末叶一般概况。

至于此期间之外患，除羌患仍甚深外，南匈奴虽时有叛服，但终以势弱臣服于汉。鲜卑、乌桓虽较强，但究以人口寡少，为边郡之寇患，并不严重。

第二节 群雄并起之导因

中元6年（公元189年）灵帝崩。此时帝有二子，一名辩14岁，何皇后所生；一名协九岁，王美人所生。当帝临崩时，以太子未定，又以皇子辩轻佻无威仪，欲立皇子协，遂嘱托之于小黄门上军校尉蹇硕。是年4月帝崩，蹇硕欲先除何后兄大将军进然后立协。事为进所悉，进乃屯兵于百郡邸。于是皇子辩即皇帝位，协为勃海王，何太后临朝，进与太傅袁隗（袁绍袁术之叔父）辅政参录尚书事。进既秉朝政，忿蹇硕之图己，亦阴图诛之。中军校尉袁绍亦素有谋，因进亲客张津，劝进悉诛谱宦官。于是进使黄门令诛硕，而悉领其屯兵。

是年7月袁绍复劝何进尽诛宦官，进以白何太后，后不听；后母舞阳君及车骑将军何苗（进弟）皆屡受诸宦官赂遣，亦数为宦官掩护而言于后，因此事久不决。绍等又为进画策，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引兵指向京师，以胁太后，进竟从之。乃召并州牧董卓于河东（今山西省安邑县），使将兵以向京师，主簿陈琳、侍御史郑泰、尚书卢植皆谏不听。又一面使骑都尉鲍信、府掾王匡还泰山募兵；一面召东郡太守桥瑁屯成皋（今河南汜水县），使武猛都尉丁原将兵数千扰河内，烧孟津，火照城中，皆宣言诛宦官。董卓兵至渑池，然而何进狐疑，不能用袁绍立诛宦官之计。及至8月进再进长乐宫请太后允予尽诛诸宦者时，反为中常侍张让、段珪等所杀。于是，何进部曲将吴匡、张璋及虎贲中郎将袁术，司隶校尉袁绍，车骑将军何苗，董奉（董卓弟）等率兵攻诸宦官于北宫，尽杀诸宦官，无少长皆斩之。张让、段珪等挟帝及陈留王协（即勃海王）夜遁小平津（孟津县西北黄河渡口），尚书卢植等追至，让等投水死。董卓引兵迎帝于北芒阪下（洛阳北10里）。卓初至洛阳，步骑兵仅三千，乃乘乱收何进、何苗（在攻宦官时为王匡等所攻杀）部曲，又阴使执金吾丁原部曲司马吕布杀原而并其众，于是卓兵大盛，控制洛阳。

董卓既拥兵控制朝廷，骑都尉鲍信说袁绍，谓董卓有异志，宜乘其初至袭而擒之，绍不敢发。是年9年卓废帝为弘农王，而立陈留王协为帝，是为献帝。并酖杀何太后。于是，袁绍、袁术、曹操等，皆逃离京师，号召州郡讨卓，讨卓之战以起。

第三节 作战经过

一、双方作战部署

灵帝中平6年（公元189年）9年，董卓已废少帝辩而立陈留王协为献帝，遂自为太尉领前将军事，封郿侯。卓为收揽士人之心，以巩固其专摄朝政之权位，乃率诸公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悉复其爵位。11月，卓又自任相国，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12月，用城门校尉汝南伍琼尚书武威周毖之说，一反桓灵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牧众望。以司徒黄瑰为太尉，司空扬彪为司徒，虚士荀爽为司空。又命毖、琼与尚书郑泰，长史何颙等，汰陈秽恶，显拔幽滞，与桓灵二帝之政较，大有更新政体之概。但以袁绍为首之反废立派，袁术，曹操等皆己逃离京师，号召州那进诛董卓，于是东郡太守桥瑁首先传檄，诈作京师三公移书州郡，陈卓罪恶，“云见逼迫，无以自救，企望义兵，解国患难。”

明年，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月，关东州郡起兵讨卓者，以渤海太守袁绍四世三公，名高天下，乃共推为盟主。绍遂自号车骑将军，授讨卓诸将以官号。当时州郡讨卓之部署如下：

（一）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屯驻河内（今河南省武陟县两南）。冀州牧韩馥留邺（今河南省临漳县西四10里）军约数万。

（二）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邈弟广陵太守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绍从兄）、济北相鲍信与骁骑校尉曹操，俱屯兵酸枣（今河南省延津县北15里）。兵共10余万。

按曹操于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时，卓拜其为骁骑都尉，操变易姓名逃走东归。操至陈留（今河南省陈留县），陈留孝廉卫兹献家财使起兵，有众五千人（见世语）。

三、豫州刺史孔伷屯兵颍川（今河南省禹县）。

四、后将军袁术屯兵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兵约数万。

以上各路州郡兵共约20余万。

董卓以关东州郡来讨之势大兵盛，乃急谋应敌之策，一面部署军事以守备洛阳，一面谋迁都长安以自固，一面谋散州郡进讨之兵。

（一）部署军事守备洛阳：

1．董卓与河南尹朱儁坐镇洛阳。并将主力控置于洛阳附近地区作机动使用。

2．中郎将徐荣守荥阳、成皋、太谷、轘辕之线。

3．东郡太守胡轸守广成、伊阙诸山隘。

4．别将守孟津、小平津。

按董卓原为中郎将，讨羌胡及金掳边章、韩遂时霹汉六军之一，其兵约数万。旋迁并州牧，其兵必增。至洛阳又麓有南北军，故卓此时守洛阳之兵约10余万。

同时卓为清除内患，又收周毖、伍琼斩之。盖当卓初制朝政时，毖等劝卓擢拔名士，荐尚书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隙留孔伷为豫州刺史，东平张邈为陈留太守，颍州张春鸳南阳太守，卓皆用之。

令诸人皆举兵讨卓，故卓收毖、琼斩之，以除内应外合之患。

（二）谋迁都长安以自固：

由于关东州郡群起讨卓，卓惧洛阳不守，乃谋迁都长安以自固。但在长安之京兆尹盖勋，及屯兵三万于扶风（今陕西省与平县东南）之左将军皇甫嵩，皆足为其迁都长安之威胁，卓乃旨勋为议郎，旨嵩为城门校尉。当勋被旨时，勋密与嵩谋讨卓，以与关东州郡乡应之，以安朝廷，嵩不从而就旨。勋因兵弱不能独立，亦不得已就徵，卓改以动为越骑校尉。

卓已旨勋、嵩等，乃于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2月22日逼帝就程西迁，卓则自镇洛阳以指挥军事。于是，卓尽收洛阳诸富豪，以罪诛之，没其财物。尽烧宫庙及官府屠家，洛阳内外200余里，室屋荡尽。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然后悉驱洛阳人民数百万口尽迁长安，使洛阳成为焦土。

三、谋瓦解州郡进讨之兵：卓以袁绍虽能号召关东州郡讨卓，然皆意志不一，各有所图，乃展开其瓦解州郡之谋略措施，兹述其要者如下：

1．是年3月17日献帝已入长安，朝政大小委之于司徒王允（司徒杨彪于2月免）。然后收太傅袁隗、太仆袁基及其家族50余口，尽杀之，以儆关东州郡之从袁氏者。

2．旨幽州牧刘虞为太傅。因划虞为东汉之宗室，名望极高，为关东州郡所拥戴。但道途阻塞，信使不通，未果。

3．使执金吾胡毋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怀赴河内说王匡（班是匡之妹夫）等。遣大鸿胪韩融，少府阴脩赴鲁阳说袁术。但袁绍使王匡尽斩胡毋班等，术亦斩阴修。卓之此谋亦败。

三、作战开始及经过

一、曹操首先进击：州郡讨卓诸军自初平元年正月集中河内、酸枣、陈留、颍川、鲁阳等地以来，历时2月余，时约2月末，适献帝西迁途中，袁绍集诸将议进攻之策，诸将皆畏卓兵之强不敢进击（按卓兵皆西北六郡之兵，且多跷骑，为东汉宋最精锐之军队，加以京师之南北军皆在其掌握）。独操力主立即进兵，其说诸将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诸将皆不听。操遂自引所部中牟大族任竣等兵五千自陈留向西进击，欲攻取成皋（今泛水县）之险而据之，以诱发各军之进击。张邈亦遗其将卫兹，分兵随后继进。操军进至荥阳西南汴水时，立遭徐荣迎击，操率兵力战竟日，以众寡不敌大败。操军士卒死伤甚众，操所乘马亦中矢被伤，还乘从弟洪所乘马率残余兵夜遁酸枣。徐荣见操兵5000，竟能与战尽日，而酸枣之众10余万，因以为酸枣不易攻，亦引兵还守荥阳。

曹操败退至酸枣，见诸军10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操乃责让之，因而建谋曰："诸君听吾计，使渤海（袁绍）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仓敖，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术）率南阳之军，军丹析（二水间），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张邈等不能用。操以州郡诸军不用其谋，又自以兵少，乃率其司马夏侯惇等至杨州募兵，刺史陈温，太守周昕等与兵四千余，率之北返至铚（令安徽宿县西南）又收兵千余，遂往从袁绍于河内。顷之，酸枣诸军食尽，众散。

二、董卓军出击：卓见州郡诸军，各怀异志，酸枣诸军食尽瓦解。而袁绍、袁术又杀其使者，乃举兵分别袭击之。

1．袭击孙坚：是年冬，孙坚率兵自南阳进抵鲁阳，与袁术相见，术表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使治兵于鲁阳，准备进军讨卓。同时遣长史公仇称将兵从坚进击，而术自在后方任督促军粮补给之责。坚遂于鲁阳域东门外设帐幔会饮称及诸将。正饮间，卓遗东郡太守胡轸率步骑数千突至袭击之。胡轸轻骑数10先至，坚乃从容撤饮入城。胡轸袭击无所获，乃引兵还。

2．袭击王匡：当袁绍举兵讨卓时，绍自驻军河内，而合河内太守王匡以新募之泰山兵驻河阳津（今河南省孟县西南30里），准备渡河进击。又令韩馥之从事赵浮、程涣将兵万余人，船百艘强弩万张屯孟津河中（今河南省孟县南18里），以防卓兵北渡。董卓于遣兵袭击孙坚之同时，以一部在平阴津（今孟津县东一里）阳为欲渡之状，而潜精锐从小平津（孟津县西北）北渡，绕击泰山兵之背，大破之，津北之泰山兵被歼殆尽。

董卓上项两次袭击之目标，在打击二袁。盖此际州郡诸军已各怀异志，而领导讨卓者实为二袁，故特予以打击之，逼使南北领导中心之二袁，陷于动摇与崩溃。

三、袁绍立帝及孙坚进攻洛阳：献帝初平2年（公元191年）正月，袁绍一面监于董卓挟天子以令州那，实予州郡讨卓者以一大政治威胁；一面监于虽被共推为讨卓之盟主，而实难于号令，乃谋立汉宗室刘虞为帝。盖虞为宗室之贤儁，声名素著，欲立之以为号召而对抗董卓。曹操首先以为不可，曰："吾等所以举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者，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非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绍不听，并即与韩馥以书与袁术，求术之赞襄，术亦不从。但绍与馥等仍坚执初志，又遣故乐浪太守张岐等，齐书上虞尊号，虞严拒之。绍等又请虞领尚书事，承制封拜，虞亦不听。于是，绍等谋在政治号召上以抵制董卓之举，还无成就，而且从此州郡之背向，益形崩析。

孙坚于上次（初吊元年冬）被袭之后，即整俨军事为进讨之计。是年（初平2年）春2月坚即率豫州诸郡兵约10万，向梁东（今河南省临汝县东）进击，欲自太谷出轘辕以攻洛阳，但为卓将徐荣所包围。坚率教10骑突围而出，全军溃散，复为徐荣军所追击，几不得脱，幸赖亲近将祖茂戴坚之赤帻以眩惑敌军（坚常戴赤帻），故坚得从间道逃脱。是役颍川太守李旻被擒而烹之。

孙坚遭此大败后，又即收容散卒分道向太谷阳人（今临汝县西）进击。卓闻之，即以胡轸为大督护，吕布为骑督率步骑数万出广成迎击。广成距阳人数10里，胡轸等至阳人时日已暮，士马疲极，乃宿营休止，欲于明拂晓攻阳人城。是时孙坚军亦正抵达阳人，入驻城中。是夜胡轸军野营时，既无堑垒掩护而释甲休息；吕布原与胡轸不睦，布欲败胡轸，乃于是夜突宣言孙坚军来袭，因此全军溃乱。坚乘势出军攻之，遂斩其都督华雄，胡轸率溃军败退。

孙坚获此一意外之胜利后，立即乘胜进击，同时进攻太谷之一路亦已攻克之，遂向洛阳急进。董卓惊于孙坚军卒至，乃道其将李傕说和，坚拒之。并另遣一部兵向新安、渑池挺进，以邀截卓西退之路。卓遂自率诸军与坚战于诸陵墓间，卓军复败，留吕布在洛阳掩护西撤，而转守渑池及陕城等险要。孙坚进至洛阳，再破吕布于宣阳门（南门），乃一面派兵追击会师邀击卓后路之军于新安、渑池间；一面扫除宗庙，为之祭祀，并于城南甄宫井中获得传国玉玺。

当孙坚攻克洛阳，正谋继续西击之时，袁绍突命其将会稽周昂为豫州刺史，渡河袭夺孙坚之豫州刺史治所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并断绝孙坚之粮道。孙坚乃回军击昂而破走之，遂还镇鲁阳。

董卓于洛阳败退后，即令其军西撤分守险要，以阻孙坚诸军之进击，而卓本人则入镇长安。其部署如下：（一）东中郎将董越，屯守渑

池。（二）中部将段煨屯守华阴（今潼关以西）。（三）中郎将牛辅（卓婿）屯守安邑。（四）孙坚撤回鲁阳后，卓使河南尹朱儁复进据洛阳。（五）其余中郎将校尉驻屯关中各要县。时为初平2年3月也。

四、朱儁陶谦讨卓：河南尹朱儁为讨黄巾之宿将，声望极隆。当董卓初擅朝政时，以儁宿将，外甚亲纳，而心实忌之。及议徙都长安，儁以为不可。但卓虽恶其异己，然贪其名重，乃表迁儁为太仆，以为己副，儁不受。及卓入关，留儁守洛阳。于是，儁于初平2年冬，反连结山东诸将，既而以兵弱惧为卓所袭，乃率部奔荆州，卓遂以弘农杨懿为河南尹。儁闻之，复引兵还洛，懿走；儁亦以洛阳残破军无所资，乃东屯中牟（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并移书州郡，发动讨卓。但除徐州刺史陶谦表儁行车骑将军及仅遣兵三千赞助之外，其他州郡亦仅略有所给而已。此显示州郡各自为谋，讨卓之事，已不欲为。及卓闻之，即使将李傕、郭汜等将数万之众，东出击儁于中牟。儁以兵力寡弱，于初平3年正月为傕等所击破。于是，州郡讨卓之举，至此遂告瓦解，无复有再讨卓者。

第四节 战后州郡割据之局势

州郡讨卓，各怀异志。此时大势与人心，有如秦末及新莽之末时期。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得之者王；新莽崩溃，群雄并起，据地自雄，称王称帝者，比比皆是。州郡讨卓时，亦皆怀据地自雄之心，是以讨卓之役，形同幻影。及卓入关之后，州郡互相攻伐，各谋割据之形势，乃益为显著；而在此初期所形成相互争斗之中心，则实由二袞兄弟相火拚而形成。袁绍据邺（冀州治所。今河南省临漳县），南连荆州刘表以制袁术；袁术据南阳，则北连公孙瓒以制袁绍。以后曹操据兖州，乃由绍之所育孕；孙策据江东，则由术之所育孕。盖二袁以四世三公之声势，当时州郡，实曾莫能与之争衡。然二袁离析，遂使雄者得以观变待时，二袁皆非缔造王业之才，尔后乃有曹操、孙策之兴起；至于刘备，则在此种相互兼并之瑕隙中，辗转而起者。此即以后三国形成之所由来。

兹将讨卓后割据之大势分为：（一）董卓帝据司隶州。（二）袁绍据冀州。（三）袁术据南阳。（四）曹操据兖州。（五）刘表据荆州。（六）孙策据江东。

（一）董卓据关中及洛阳：董卓西入长安后，自任太师，号尚父，专制朝政。筑垒于长安城东以自居，又筑郿坞为永久之计，自谓“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其分兵守险，以防关东，已见上节。

初平3年（公元192年）正月，当朱儁在中牟起兵讨卓时，卓分适其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等将兵东击。于是，司徒王尤乘卓重兵营已东出之际，与尚书仆射士孙瑞联合中郎将吕布于是年4月，诱卓入朝而杀之。

王允已杀董卓，以为大难已除，又自以为关东举兵讨卓者，皆其生徒，遂对卓将李傕等所就之军，迳欲解散之，则天下可以复定，而对新附将校，亦不加抚慰。李傕等在颖川、陈留等地，闻董卓被诛，心怀疑惧，又闻王允对彼等不予赦宥，益为忧惧，违用贾诩自为救死之计，转兵西向长安。及至，董卓故将樊稠、李蒙等应之，合兵10余万以围长安。经八日之围攻战，城破，吕布走南阳，王允被杀。于是李傕、郭汜、樊稠等再专朝政，关中仍为董卓之余孽所据。

（二）袁绍夺据冀州：中平6年（公元189年）12月，盖卓已废少帝辩而立献帝协，袁绍出走，卓用周毖、伍琼之谋，拜绍为渤海太守以安抚之。绍在渤海，冀州牧韩馥遣人监视，使不得变动。及东郡太守桥理发动讨卓，州郡响应，馥乃转而从绍举兵讨卓。尝赖至河内时，云中张扬率并州兵数千自上党与南单于于扶罗臂往归之而驻兵漳水，州郡又共举绍为讨卓之盟主，因此馥以豪杰多归心袁绍而忌之，乃阴贬节其军粮，欲使其众离散。会馥将义叛，馥与战而败，绍乃与义相结以制馥。至初平2年（公元191年）7月，绍客逢纪遂进计，谋夺冀州以为根据。

但绍恐粮乏士疲，不敌冀州之强兵，若一旦发动众馥之事败，则无自立之地，因又用逢纪之计，密约幽州降虏校尉公孙瓒来取冀州。盖此时公孙瓒已统幽州精兵，举足轻重于北边，幽州牧刘机虞不能制；若公孙瓒强兵南下，韩馥必惧，因再遣辩士说之，馥素庸弱迫于仓卒必将让冀州于绍。绍从之，即以书招瓒。瓒遂引兵南下，外托讨卓为名，而阴谋袭馥；馥与战不利。适是时董卓入关，袁绍遂引军北至延津，而使其外甥高干与馥所亲信辛评、荀谌、郭图等进说馥曰：“公孙瓒将燕代之卒，乘胜来南，而诸群应之，其锋不可当。袁车骑引军东向，其意未可量也，窃为将军危之。”于是，韩馥大惧，外迫绍，瓒南北夹击之威胁，内惑于谌等之说，乃让冀州与绍以求苟安，袁绍遂为冀州牧。以后袁绍又击灭公孙瓒，而尽据有幽、冀、青、并四州，遂为群雄中之最强大者，事另群于本卷会渡之战章中。

（三）袁术据寿春江淮地区：袁术当董卓谋废立时，卓以术为后将军。术胃卓之祸，出奔南阳。及州郡讨卓，遂起兵于鲁阳。及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术遂得南阳以为根据。当荆州刘表助绍时，术乃于初平3年遣孙坚击刘表于襄阳。及坚战死为表所逼，于初平4年术又转而图北，进军陈留封丘间，但为曹操所击败，而退守雍丘（今河南省杞县）。于是，术以南进受阻，北图又败，乃转兵东向，逐扬州刺史陈瑀于九江（今安徽省寿县）而自领扬州据寿春，并兼称徐州伯，遂尽据有南阳及江淮南北之地。

（四）曹操据兖州：先是州郡讨卓，曹操独进为卓将徐荣所败；及赴扬州募兵，仅得数千人，以兵弱而走伏袁绍于河内。及袁绍夺据冀州（初平2年7月），济北相鲍信乃建议于操，取大河以南之地为根据，以观时变，操善其议。是时，适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10余万众略东郡，太守王肱（初平元年当曹操至扬州募兵时，驻屯酸枣之州郡兵，以粮食不给瓦解。时兖州刺史刘岱原与东郡太守桥瑁相恶，岱乃杀瑁而以肱领东郡太守）不能御，操乃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阳破之。袁绍因表操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今山东莘县南）。

初平3年春，曹操为平定黑山于毒等而驻军于顿丘（今河北省清丰县西南），于毒等乃进攻东武阳以牵制之。但操并不引兵回救，而驱其军两入山疾扑黑山之巢穴。毒等闻之，弃东武阳而还。于是，操要击眭固，又击匈奴于扶罗于内黄（今河南省内黄县西北），皆大破之。

是年4月，青州黄巾百万入兖州，陷任城，入东平，兖州刺史刘岱迎击之，为所败而岱战死。于是，操部将东郡陈宫说操曰：“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宫请说州中纲纪，明府寻往牧之；资之以牧天下，此霸王之业也”操然之。宫乃往说兖州别驾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无主，曹东邹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鲍信等亦以为然，乃与州吏迎操领兖州牧。操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不利。黄巾众盛精悍，操兵寡躬；操乃抚循激励，明设赏罚，以振士气，然后设奇伏，昼夜会战而破之。是役，鲍信战死。操乘胜追黄巾至济北（今山东省长清县北），悉降之，得降卒30余万，男女百余万口。于是，操乃牧其精锐者

号青州兵。操因此兵势强盛，遂得以兖州为基地而进图天下。

（五）刘表据荆州：刘表乃汉之宗室，东汉末名士，在党人中为八顾之一。何进为大将军时，辟表为掾。初平元年，孙坚杀荆州刺史王教，董卓以表为荆州刺史。表至宜城，时适宗贼大盛（宗党共为盗），乃请南郡人蒯越，襄阳人蔡瑁共谋安定荆州之策。表用越策，诱斩宗贼帅15人，而降其众。旋又击破孙坚之进攻。至初平3年于平定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之叛乱后，遂尽有长沙、零陵、桂阳、江陵、武陵、南郡、章陵等七郡之地；南接五岭，北据汉川，除南阳郡仍为袁术所有外，尽奄有荆州之全域。

（六）孙策据江东刘焉据益州：孙策据江东。

刘焉据益州：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汉鲁恭王之后。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历洛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焉见灵帝政衰，王室多故，乃建言："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叛离。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焉求牧交趾，欲避世乱，议未即行。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闻扶言，又欲求益州牧，会益州刺史却俭，赋歙烦扰，谣言远闻；时并州杀刺史张益，梁州杀刺史耿鄙，焉因谋得出为监军使者颁益州牧，扶亦求为蜀郡西部属国都尉及太仓令。是时，凉州乱民马相、赵只等在绵竹自号黄巾，聚民数千人，杀绵竹令李升，吏民从之，合万余人，便前破雒县，攻益州杀却俭，又到蜀郡、为，连破三那，相自称天子。州从事贾龙，颌兵千余人自为东界攻相，破走之。龙乃迎焉，徙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阴图异计。时焉于范、诞、璋，俱从献帝在长安，范为左中郎将，诞为治书御史，璋为乘车都尉，惟小子别部司马瑁随焉。荆州刺史刘表告焉在益州阴图异计，献帝乃遣璋往谕之，焉遂留璋不遣。及马腾在郿反，焉及范与腾通谋，引兵袭长安（时为李傕郭汜等操纵朝政），谋泄，范诞皆见杀。焉以二子俱死，又以绵竹城失火全城被焚，于兴平元年徒居成都，旋发病死。州中大吏赵韪等贪璋弱，遂拥之继为益州牧。

第三章 曹魏开国之战一——破吕布与定都许昌之战

（一）初平4年（公元193年）秋，曹操东击徐州牧陶谦。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夏，曹操复征陶谦于郯城，吕布等乘机袭兖州。是年5~8月与吕布战于濮阳，9年两军罢。

（二）兴平2年春，曹操攻定陶，败吕布军。夏击斩吕布将李封、薛兰于钜鹿，再破吕布陈宫军，收复兖州。是年8月围张超于雍丘，12月破之。

（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1月，曹操攻武平，袁术所置陈相袁嗣降，遂下陈地克许而定都之。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

献帝初平3年（公元192年）冬，魏太祖武帝曹操破黄巾数10万众，遂领有兖州，据鄄城（今山东省濮县境），至兴平元年（公元194年）4月，陈留太守张邈迎吕布袭取兖州。在此1年余之时间，各方面之状况，概述如下：

冀州幽州方面：初平2年夏，袁绍夺韩馥之冀州，据邺（今河南省临漳县）。是年冬，青州黄巾10余万攻渤海，公孙瓒击破而歼之，瓒威名大震。于是，瓒遣其将田楷与刘备徇青州，以楷为青州刺史，刘备为平原相。自此绍、瓒遂有两雄不并立之势。瓒继向绍展开攻击，冀州诸县因多叛绍从瓒。初平3年袁绍使袁遗领扬州，袁术击破之。初平4年瓒击灭幽州牧刘虞后，与绍之攻战益烈，直至官渡战前建安4年（公元199年）3月，公孙瓒败死，绍始并有幽州。

荆州、扬州方面：自初平2年冬，袁术据南阳遗孙坚击荆州刺史刘表于襄阳，坚战死后，术在南阳以奢淫重敛，民渐叛离，又为刘表所偪，遂于初平4年正月北联公孙瓒，东联陶谦以进图袁绍，并策动黑山贼及于扶罗等以扰绍之心腹。于是公孙瓒使刘备屯高唐（今山东禹城县西南），单经（瓒以为兖州刺史）屯平原，陶谦屯发干（山东省堂邑县西南23里），术屯封丘以击绍。绍自击陶谦等而使曹操击卫，刘表断术之粮道，皆大破之。操追术至宁陵（今河南省宁陵县南），术南走九江逐扬州刺史陈瑀而自领之，据寿春。至兴平2年冬，术遣孙策平定江东。

关中方面：董卓于初平2年4月为孙坚所败西撤至长安后，是年9年南匈奴单于于扶罗劫张扬以叛绍，屯兵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北），卓乃因而利用之，以扬为河内太守。初平3年春正月，董卓遣将李傕等击破朱儁于中牟后，是年4月司徒王允与中郎将吕布诛卓，旋卓将李傕等自中牟回军围长安，城破，吕布走南阳，傕等杀王尤再据朝政。初，卓入关召韩遂马腾与共图山东，至，会卓死；傕等乃以遂为镇西将军还驻金域（今兰州），腾为征西将军，驻兵于郿（今陕西省郿县东北）。旋李傕、郭汜、张济、樊稠等内哄，互劫天子公卿，关中大乱。

益州方面：刘焉据益州。兴平元年冬，绵竹城为火所毁，焉徙治成都。是年病卒，州中大吏赵韪等利用焉子璋仁弱，拥以为益州刺史。璋以韪为征东中郎将屯朐忍（今四川省雲阳县西）以备刘表。

徐州方面：徐州刺史陶谦，字恭祖，丹阳人。少为诸生，仕州郡，四迁为车骑将军张温司马，西讨边章。会徐州黄巾起，以谦为徐州刺史，破走黄巾，境内晏然。及董卓之乱，河南流民多归之，因以百姓殷盛，谷实甚丰。然谦信用非人，刑政不理。初平2年冬助朱儁讨卓。初平4年3月谦用治中王朗，别驾赵昱之说：“求诸侯，莫如勤王”，因遣使奉贡，得拜为徐州牧。于是，谦以昱为广陵太守，朗为会稽太守。是年

秋，为曹操所攻击，因此与曹战斗连年不息。

第二节 作战导因

初平3年（公元192年）夏，曹操已取得兖州，自东郡进据鄄城。冬，用治中毛玠之策，遣使至长安。初平4年春，曹操击破袁术于封丘。是时徐州陶谦与诸守相共推朱儁为太师（儁此时仍驻军于中牟。），并移檄州郡，共讨李傕，谋迎天子。旋以朱儁受旨入朝，其事不果。谦乃用治中王郎等之建议：“求诸侯莫如勤王”之策，遣使奉贡，谦受诏为徐州牧。夏，曹操自封丘还军定陶后，遣使迎其父前太尉嵩于琅玡。嵩道经黄县，谦别将利嵩资财而袭杀之，及少子德。秋，操乃举兵击谦于彭城，大战破之。谦败走郯。操杀男女数10万口于泗水。又攻虑、睢陵、夏丘三县（即今山东省沂水县西南，江苏省胜宁县，安徽省泗县）皆屠之以泄愤。

兴平元年春正月，陶谦求救于青州刺史田楷，楷与平原相刘备救之，适曹操亦以军食尽，引兵还。于是谦增备丹阳兵四千，备原自领有兵数千，遂屯兵小沛（令江苏省沛县东）以备操，谦并表储为豫州刺史。是年夏，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鄄城，陈宫守东郡，东郡太守夏侯惇守濮阳。复亲征陶谦，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邀击操于郯东，操击破之，遂攻拔襄贲（今山东省临沂县西南百20里。）

先是陈留太守张邈，素与袁绍曹操友善。讨卓时袁绍为盟主有骄矜色，邈正议责之。绍因使操杀邈，操不听。当操第二次击陶谦时，邈终畏操为绍害已，乃用操将陈宫之言，叛操而迎吕布以袭兖州。

按吕布于长安为李傕等击败后，率数百骑出武关诣袁卫，卫不相容，遂北投袁绍。与绍击破黑山帅于常山，求？益兵众，其将士多钞掠，绍患而欲图之。布觉复归张扬于河内，途过陈留，适张邈陈宫谋叛操，遂与合谋。于是，吕布曹操争夺兖州之战以起。

第三节 作战经过

兴平元年4月，曹操已击破谦将曹豹。刘备于郯东而略地至襄贲。陶谦守郯孤城，恐惧，正欲弃郯而走归丹阳之时，会吕布进袭兖州，曹操回军，徐州得以不失。

张邈、陈宫与吕布已合谋，乃推布为兖州牧，并联豫州刺史郭贡共举兵乘兖州空虚之际而袭之。邈等之谋已定，邈乃一面造其党刘翊至鄄城告荀彧，谓吕布来助操击陶谦，使不为备，一面以大军随之。以吕布进袭濮阳，郭贡进击鄄城，陈宫进袭东阿，泛嶷进袭范县。但彧疑之，勅兵设备，并急召夏侯惇来酆。惇至，夜诛谋叛者数10人，鄄城乃定。于是，吕布袭濮阳（故址在今濮阳县南）克之。郭贡率军数万至鄄城下，要荀彧出见，人或言贡与吕布同谋，夏侯惇亦劝阻彧曰："君一州之镇，往必危！"彧曰："贷与邈等，分非素结，今来速，计必未定，及其未定说之，纵不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将怒而成计。"遂出见。贡见彧无惧意，谓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

时兖州各地皆叛操从布，惟鄄城、东阿（今山东省阳谷县东北50里阿城镇）、范县（今范县东南20里）三城为操守。程昱东阿人，彧以其地方人望，乃使之往说范令然后回守东阿，以固此三城待操。昱至范县说其令斩允，时泛嶷亦已至范，允乃见嶷，伏兵刺杀之，勅兵守城。于是，昱又急遣别骑绝仓亭津（当时漯水自范县东北流过故东阿县北，津在范县界，去故东阿60里），以阻陈宫之进入东阿。昱至东阿，东阿令颍川枣只已率厉吏民，拒城坚守。只是故陈留大守，操初得兖州时从操为东阿令。

吕布已克濮阳，以郭贡引兵去，乃自引兵攻鄄城，不能克退回濮阳。时曹操亦已自引大兵回救，抵东阿执昱手曰："微子主力，吾无所归矣。"遂以昱为东平相，使守范县。并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塞亢父，泰山之道（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东20里。亢父，今济宁县南50里），乘险要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乃进军攻吕布于濮阳。自是年5月至8月，两军苦战百余日，会蝗虫之灾，百姓大饥，布粮食亦尽，乃各引兵去。9年操还鄄城，布到乘氏（令山东省钜野县西南）为县人李进所破，东屯山阳（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四10里）。

10月操至东阿，袁绍使人说操，欲操遣家居邺，藉以控制操。操以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程昱曰："意者，将军临事而惧，不然何虑之不深也？夫袁绍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将军自度能为之下乎？将军以龙虎之威，可为之韩彭邪？今兖州虽残，尚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以将军之神武，与文若（荀彧）昱等牧而用之，霸王之业可成也，愿将军更虑之！"操乃止。

12月徐州牧陶谦病笃，谓别驾东海麋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

也”。谦卒，竺率州人迎备，备未敢尝，谓可迎袁术。典家校尉下邳陈登曰：“公路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为使君合步骑10万，上可以匡主济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见听许，登亦来敢听使君也。”北海相孔融此时亦在徐，谓备曰：“袁公路岂忧国忘察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备遂领徐州，居下邳（今邳县东）

兴平2年春，操因东阿乏粮而引兵袭击定陶，济阴太守吴资保南城，未拔，吕布来救定陶，击破之。夏，操进击布将薛兰、李封于钜野（今县南），布来救，未及，兰败，遂斩兰等。操军乃进据乘氏。时操以陶谦已死，刘备新领徐州，遂欲乘此时机进取徐州，然后还军定布。荀彧建策曰：“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兰，若分兵东击陈宫，宫必不敢内顾，以其间收熟麦，约食蓄谷，一举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后南结杨州（刘县），共讨袁术，以临淮泗。若舍布而东，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虚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术（惩阳）可全，其余非已之有，是无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将军当安所归乎？且陶谦虽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惩往年之败，将惧而结亲，相为表里。令东方皆已收麦，公坚壁清野以待将军；攻之不拔，略之无获，不出10日则10万之众，未战而先自困耳。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故有弃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权一时之势，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惟将军熟虑之！”操以彧此策切实精要而具远见，乃从之。

时吕布在东缗（今金乡县东北20里）得陈宫兵万余增援，乃向操军发动反攻。操兵适皆已外出牧麦，在营者仅千人，屯营亦不固。屯营之西有大堤，其南树木幽深。于是，操乃伏兵于堤里，以一部在堤外警戒。布军进至操营，令轻兵挑战。既令战，操伏兵悉乘堤出击布军之侧背，于是步骑并进，遂大破布军。布与陈宫夜遁，走依刘备于下邳。操乃分兵平定诸县，并还攻定陶克之。

张邈在陈留，以吕布陈宫已败走徐州，操军将自定陶南击，邈乃使其弟超率家属退保雍丘（今河南省杞县），自往与布合，转九江请救于袁术，未至为其部下所杀。是年8月，操引兵进围雍丘，12月拔之。超自杀，操夷邈三族。遂东略陈地。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正月，操军推进武平（今河南省鹿邑厩西北），袁术所置陈相袁嗣降。时颖川汝南之黄巾残余何仪等附袁术，2月操再进击破降之，遂据有豫州之全域，而以许（今许昌县）为其首府。

第四节 迁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天下

一、曹吕争夺兖州期间之政局

关中方面：董卓为王允吕布所杀（初平3年公元192年4月）后，时三辅民尚有数10万户。经李傕等破长安，诛王允，走吕布后，傕等放兵劫掠，加以饥馑，2年之间，地方凋敝。而李傕、郭汜、樊稠等，各相与矜功争权，发生内哄。至兴平2年（公元195年）1月，李傕杀樊稠，于是李傕、郭汜各将所部相攻。傕挟持献帝，汜则挟持公卿太尉杨彪、司空张喜、尚书王隘、光禄勋刘渊、术尉士孙瑞、太仆韩融、廷尉宣璠、大鸿胪荣部，大司农朱儁等为质，各挟天子公卿以自重。傕、汜相攻连月，死者数万。6月，傕将杨奉（原白波贼帅）叛傕，镇东将军张济自陕至，欲和傕、汜，迁献帝于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县南40里），献帝及公卿皆从之。时李楼以杨奉叛，所召来之羌胡兵又去，势力单弱，乃许与汜和解。7月献帝至霸陵（长安县东），从者皆饥，张济赋给相迎，李傕出、屯池阳（今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于是，朝廷以张济为骠骑将军，开府如三公；郭汜为车骑将军；杨定为后将军；杨奉为兴义将军，皆封列侯。又以故牛辅部曲董承为安集将军。8月6日献帝及公卿至新丰（今陕西省临潼县东），郭汜欲胁帝都郿，谋泄，侍中种辑密告杨定、董承、杨举等会军新丰，郭汜乃弃军走骊山（是月曹操啊雍丘），汜党夏育，高硕等仍谋劫帝，杨定、杨奉力战破之。10月初五（是月以曹操为兖州牧）帝至华阴，享辑将军段煨迎之。煨与杨定有隙，是月10日，杨定、杨奉、董承等攻煨营，战10余日，李傕、郭汜开之，合兵来救煨，因欲劫帝而走。定闻傕、汜将至，欲还蓝田，为汜所遮，单骑走荆州。是时，张济与杨奉、董承不相协，复与傕、汜合谋。12月张济、李傕、郭汜共追帝，与承、奉战于弘农东涧，承、奉军败，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弃御物符策典籍无遗。建安元华（公元196年）1月6日帝露宿于曹阳（在今河南省陕县西石桥沟）。承、奉乃一面阳与傕等谋和，一面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等于河东，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等率数千骑来援，遂击傕等大破之。奉等乃与车驾东走，傕等复来追，奉等大败，被傕等围困于陕。帝与李乐等夜渡河逃大阳（今山西省平陆县南二里渡口）。1月9日抵安邑。是时，河内太守张杨谋迎车驾还洛阳，诸将不听。旋董承与张杨合谋，诸将几经相争，始于是年6月，杨奉、韩暹等奉帝东迁，7月抵洛阳。张杨还屯野王（令河南省沁阳县），扬奉出屯粱（令河南省临汝县东），韩暹、董承留卫洛阳。于是，以张杨为大司马，杨奉率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领司隶校尉。是时以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各拥强兵，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穞（自生之禾），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士兵所杀。

幽冀方面：兴平2年12月，公孙瓒已杀刘虞，尽据有幽州之地，而与袁绍争战仍相持不息。旋袁绍将趜义与鲜卑联合，合兵10余万攻瓒于鲍丘（令河北省密云县西南），大破之。于是代郡、（今河北省大兴县

西南），上谷（今察哈而省怀来县南）、右北平（今河北省丰润县东）皆叛瓒，瓒遂徙镇易（今河北省雄县西北）。

袁绍此时，已统冀、并、青三州，资富兵强为诸割据势力之冠。于是监军奋威将军广平沮授说绍曰："将军累世台辆，世济忠义。今朝庭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民之意。今州域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笃即宫邺郡，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但颍川郭图淳于琼则议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备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授又曰："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绍以献帝之立，非其意，且内实然郭图等之说，故不从授计，而仍专力于进攻公孙瓒。

江东方面：孙策请于袁术，进击扬州刺史刘，遂据有江东。

淮南方面：袁术于献帝败于曹阳之际，即会群下议自称帝尽寿容。

徐州方面：陶议死，刘备领有徐州，袁术正与吕布联合以攻备。备降于布，布自为徐州刺史。

二、定都于许之远策

建安元年7月1日献帝远都洛阳，操在许谋迎之。诸将以为山东未定，韩暹、杨奉负功恣堆，未可卒制。荀彧乃说操曰："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遑远赴。今銮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北民怀感旧养之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韩暹、杨率安足恤哉？若不时定，使豪杰生心，后虽有虑，亦无及矣。"操从之，乃遣扬武中郎将曹洪将兵而西，以迎献帝，董承等据险拒之，洪不得进。旋韩暹、杨奉、董承、及张杨等不和，议郎董昭乃为操内应。昭以杨奉兵马最强，而少党援，因为操作害与奉，奉欲利用曹操之粮，乃联操以张己势，遂共表操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是时董承以患韩暹之专恣，亦潜召操。于是操获得内外之赞助下，乃将兵入洛阳。帝以操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操拥帝以图自展之功，于以初步告成。随后操乃展开如下之步骤：

（一）巩固掌握朝政之步骤：

1．奏韩暹、张扬之罪而诛之，暹惧诛单骑奔依杨奉。

2．诛尚书冯硕及议郎侯祈侍中壶崇等之反己者。

3．封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伏皇后之父），侍中丁种辅，尚书仆射钟繇、尚书郭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刘艾、冯翊韩斌、东

郡太守杨众，议郎罗邵、伏德（后兄）、赵蕤等13人为列侯。

4．赠射声校尉沮儁为弘农太守，矜其死节。按儁于弘农之役战死。

（二）迁都于许：操拟迁帝于许，乃间计于董昭，昭献策大要如下：

1．洛阳诸将入殊意异，未必服从；留洛匡弼，事势不便；唯有迁都于许，始能成“辅翼”之功。

2．厚道杨奉，并说京都乏粮，暂徙鲁阳，以免见阻。

3．用董昭计，建安元年8月27日奉车驾出轘辕，杨奉自梁欲邀绝之，不及。9年7日抵许。于是，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10月征杨奉，奉南弃袁术。

4．袁绍当献帝为操迁都于许时，颇悔不用沮授之谋，乃书操使徙献帝于鄄城欲夺之。操乃以诏害责袁绍，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动王之师，但擅相讨伐。绍上书自愬，乃以绍为太尉封邺侯。绍耻在操下，怒责操挟天子以令彼，表辞不受。操惧于力不敌绍，乃以大将军让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以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令。

（三）展开挟天予以令诸侯之大策

1．求人才：操为揽集人才而问彧以策谋之士，彧荐其从子荀攸，颍川郭嘉。又尚山阳满宠为许令，北海太守孔融为将作大匠。

2．奖农业：以东阿令枣只为屯田都尉，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用只“分田之术”，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推广于兖豫各郡，皆例置田官，所在积谷，仓稟皆满。故尔后征伐四方，无还粮之劳（减少后方运输补给之累），遂能兼并群雄，所谓“东国之饶，起于只而成于峻”。

3．平定近乱：东平徐州吕布、九江袁术，羁縻江东孙策，西平南阳张绣，然后北谋强大之敌袁绍。见次章。

第四章 曹魏开国之战二——官渡之战

（一）建安5年（公元100年）1月，曹操讨刘备于徐州，平之。

（二）绪战：建安5年2月，袁绍将颜良攻白马城，曹操破斩之。再斩绍将文丑于延津，操于绪战中全胜。

三、决战：曹操绪战获胜后，还军官渡、袁绍进军延津。建安5年8月，绍大军进攻官渡，展开攻守战。是年10月，曹操袭乌巢，遂大破绍军。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及作战导因

州郡讨卓时，黄河南北两大势力为二袁。河北袁绍据冀州，继并有青、并二州，以邺城为中心雄视北方，与幽州公孙瓒对峙。河南袁卫据豫州，继并有扬州，雄视南方与荆州刘表为敌。旋袁术在豫州一再为曹操所击败，实已局促于以寿春为中心之淮河南北地区。此时，代术雄据河南者，为以许都为中心而据豫兖二州之曹操。徐州则陶谦死后，吕布、刘备、袁术互争未已。至袁曹官渡作战之前，公孙瓒已为绍所击灭，徐州及淮河南北亦最后为操所得，成为袁曹南北对峙之局。

至官渡作战前之阙中、凉州、汉中张鲁等，皆已表面归附于操，釜州之刘璋，荆州之刘表，及江东之孙策，则各持中立以观变。因此，曹操欲贯彻“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大业，必须先击来灭袁绍，然后始能达成其目的。然以声望远胜于曹操之袁绍，地广兵强亦皆优于操，自不甘为操下，必当举兵击灭之以求独尊。于是，袁曹在此种两雄不并立之形势下，遂导致官渡一决雌雄之战。

第二节 作战经过

一、袁招声讨曹操檄

袁绍于建安4年秋，已用郭图审配之谋，决策攻许，乃使陈琳作檄，其檄文如下：

“左将军”领“豫州刺史”，“郡”“国”“相”“守”。

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拟也。曩者强秦弱主，赵高执柄，专制朝命，威福由己；时愉迫胁，莫敢正言。终有望夷之祸，祖宗焚灭，污辱至今，永为世鉴。及臻吕后季年，禄产专政，内兼二军，外统梁赵，擅断万机，决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内寒心。于是绛侯、朱虚，兴威奋怒，诛夷逆暴，耸立太宗，故能道化兴隆，光明融显，此则大臣立横之明表也。

“司空”曹操，祖父腾故“中常侍”，与左、徐璜并作妖孽，号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匄携养，因赃买位；与金辇璧输货权门；切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穗，僄狡锋协，好乱乐祸。“幕府”（绍为大将军自称）董统鹰扬，扫夷凶逆，续遇董卓，侵官暴国；于是提剑挥鼓，发令东夏，广罗英雄，弃瑕录用。故遂与操参谘策略，授以裨帅；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虑，轻进易退；伤夷折衅，数丧师徒。“幕府”辄复分兵命锐，修完补辑，表行“东郡太守”、“兖州刺史”，被以虎文，奖蹙灭柄，冀获秦师一克之报。而遂乘资跋扈，肆行凶，割剥元元，残贤害善。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伟，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论不阿诏，身被枭悬之戮，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指刘备），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幕府”惟强干弱枝之义，且不登叛人之党，故复援衿擐甲席卷起征，金鼓响震，布众破沮。极其死亡之患，极其方伯之位。则“幕府”无德于兖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

会后銮驾反旆，群贼寇攻。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翼卫幼主。操便放志专行，胁迁当御省禁，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形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戳；百寮钳口，道路以目；“尚书”记期会，“公”“卿”充员品而已。故“太尉”杨彪历典二司，享国极位。操因睚毗，被以非罪，楚并兼，五毒俱至，触情任慝，不顾宪章。又“议郎”赵彦，忠谏直言，义有可纳，故圣朝含听，改容加锡，操欲迷夺时明，杜绝言路，搜收立杀，不俟报闻。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置“发丘中部将”，摸金校尉，所遇毁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宫，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如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罾缴充蹊，阬穽塞

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蹈机陷，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呼嗟之怨。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

“幕府”方诘外奸，未及整训；加绪含容，冀可弥缝。而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摧挠栋梁，孤弱汉室；除灭忠正，专为枭雄。

往岁伐鼓北征讨公孙瓒，强寇桀逆，拒围1年，操因其未破，阴交书命，欲托助王师，以见掩袭。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济，会行人发露，瓒亦枭夷，故使锋芒挫缩，厥图不果。尔乃大军过荡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质，争为先登，犬羊残丑，消沦山谷。于是操师震慑，晨夜远遁，屯据敖仓，阻河为固。乃欲运螳螂之斧，御隆车之隧。

“幕府”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胡骑千群，奋中黄育获之士，骋良弓劲弩之势；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雷霆虎步，并集虏庭，若举炎火以焫飞蓬，覆沧海而沃涂炭，有何不消灭者哉！

又操军吏士，其可战者皆出幽冀，或故营部曲，咸怨旷思归，流涕北顾。其余兖、豫之民，及吕布、张扬之遗众，覆亡迫胁，权时苟从；各被创夷，人露仇敌。若迴旆反徂，登高岗而击鼓吹，扬素徽以启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令汉室陵迟，纲维弛绝；圣朝无一介之辅，股肱无折冲之势；方畿之内，简练之臣，皆垂头搨翼莫所凭恃；虽有忠义之佐，胁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节？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托宿卫，内实拘执，惧其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也，可不勖哉！

操又矫命称制，遣使发兵。恐边远“州”“郡”过听而给与。强寇弱主违众旅叛，举以丧名为天下笑，则明哲不取也。

即日幽、并、青、冀四州并进。昼到荆州便勒见兵，与“建忠将军”（张绣降曹前衔名）协同声势。“州”“郡”各整戎马罗落境界，举师扬威并匡社稷，则非常之功于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户侯”赏饯五千万，部曲偏裨将校诸吏降者勿有所问。广宣恩信，班扬符赏，布告天下，成使知圣朝有拘逼之难。如律令。

二、两方态势及军队编组

（一）两方态势：袁绍方面：绍据有幽、冀、青、并四州，冀州魏郡之邺城（今河南省临漳县西）为其发号施令之首府。实际上控有冀州全部，幽、并二州之大部，青州之一部，以及兖州之东郡、濮阳、顿丘（今河北省清丰县西南）、东阳武（今山东省朝城县西）、阳平（今山东省莘县）、乐平（今山东省堂邑县东南）、聊城（今山东省聊城县西北15里）、博平（令山东省博平县西北30里）等七城。

曹操方面：操据许都挟天子以发号施令，控有司隶校尉部、徐州、豫州三州之全部，兖州之大部，青、扬、荆三州各一部。

交州、益州、凉州以道路远隔，与本战不发生直接关系。江东孙策，亦正镇抚江东进图豫章，不能干预本战役。

（二）军队编组：

袁绍方面：汉献帝建安5年（公元100年）正月，袁绍已于其所辖之四州30郡国三百余县中，选将精兵10万人，骑兵一万，另有胡骑八千。分别建制为步兵五校尉部屯骑二校尉部，越骑二校尉部；长水一校尉部，射击校尉部，别部骑之一部，编组为南征军。并于其所辖之各“州”“郡”“县”，各置司马，分别统制地方“民兵”，以镇抚地方，而按时征发地方上粮草，督饬“民兵”运送前方，支持作战军之作战。绍军之编制，沿用后汉北军五营之制，分别编为“步兵”，“屯骑”，“越骑”，“长水”，“射击”五营，每营官兵11346人，设校尉，司马，假司马，以统率之。时绍多步骑，乃建步兵为五校尉部，屯骑越骑各二校尉部，长水、射声各一校尉部，其上分置“将军”以行指挥。“将军”之上则设置“监军”。故其编制系统如下：

各校尉部除校尉、司马、假司马外，计有八百24人。

故各级单位各辖四小单位，成为四四制，惟合其指挥官亲兵队计之，实相等于五五制。即连主管单位合计为五单位，各校尉率其所辖为一作战最大单位，其不足一校尉之兵力，而在一“曲”以上之兵力者，则以司马率领之，称为别部司马。步兵单位，各着铠甲，戴头盔，执短兵，以行近战，时为军中之主兵。步兵校尉所辖，与射声校尉所辖者，皆是军中之主兵。惟射声校尉所辖之单位，操轻兵用弓矢，衣薄甲，专司布阵时之射阵角及伏击，是与步兵异，因有“轻步兵”之称。

骑兵单位分为屯骑越骑二种：屯骑人衣甲，马着铠，用长枪马刀，以行冲突，是亦称为突骑。以集团向一点冲锋而使用之。越骑亦稳之为轻骑，着薄甲，用弓矢，多使用于搜索，警戒及追击。

长水校尉所辖之兵，犹今之工兵，担任水上作战、渡河、攻城及阵内战为其专事。其后方押运粮草诸勤务，在有水运地方亦其业务之一，但仅以兵为之管制，其勤务多由地方轮卒工作。

袁绍亲统南征大军，以三子袁尚守冀州，中子袁熙守幽州，甥高干守并州，青州别驾王脩守青州，军师审配，行军司马逢纪主后方留守运输诸事。前锋、骑前锋、左右武卫营、中垒营、后军、运输及留守七部，计为：

前锋（向由监军指挥运用，此次因分监军沮授之权为三，故亲自指挥之）：

将军颜良。

步兵校尉马延。

越骑别部司马韩定。

骑前锋（向由监军指挥，此次因分监军权为三，乃由绍亲自指挥之）：

将军文丑。

豫州牧刘备。

越骑校尉王摩。

左武卫营（等于三军之左军）：

监军将军谆于琼。

步兵校尉眭元进（固）。

屯骑校尉韩莒。

越骑别部司马赵叡。

右武卫营（等于三军之右军）：

监军都督沮授。

步兵校尉蒋奇。

长水校尉苟谌。

中垒营（等于三军之中军）：

中军元帅大将军袁绍。

兼大将军幕府长史青州督袁谭。

主簿陈琳。

参谋许攸、辛评、苏由。

中垒营监军都督代行军司马郭图。

步兵校尉高览。

屯骑校尉部，司马何茂。

越骑校尉韩荀，司马韩猛。

射声校尉吕旷，司马吕详。

后军：

总管将军蒋义渠。

步兵校尉张顗。

运输及留守：

运输总管行军司马兼护军逢纪。

督运校尉孟岱。

邺城留知后方事冀州“治中”审配。

其余随征诸将吏，多在中军侯命。

（三）曹操方面：

防御部署概略如下：

河南尹建武将军夏侯惇率步兵五千守敖仓，派一部守孟津。平虏校尉益筹亭侯于禁率步兵四千守原武，派一部守获嘉、延津。

东郡太守刘廷率步兵千人守白马。

东平相知兖州事程昱卒步兵七百守鄄城。

偏将军徐晃，裨将军张辽率步骑万人屯官渡。

扬武将军张绣率步骑五千屯巳吾、陈留。

琅琊相藏霸以徐州精兵万余进图青州以掩护右侧。

加阳安都尉建功侯李通为征南将军，率步骑万人与汝南太守满宠屯汝南以防孙策。

厉锋将军国明亭侯曹洪率步骑万人屯宛以防荆州刘表。

威武将军蔡阳率步骑五千屯叶，以御豫西黄巾刘辟、龚都等。

越骑将军领广阳太守兼议郎曹仁屯颖川，以掩护左侧背。

曹操自将徐晃、张辽、关羽、许褚诸将，及郭嘉、荀攸、贾诩、董昭、毛玠诸谋士屯官渡。

后方勤务：

使讨虏校尉乐进，中郎将李典及步骑万人屯许都。

侍中兼尚书令荀彧留守许都，知后方诸事。

司棘校尉兼督关中监运使司钟繇督运关中粮草。

督运校尉行颢川太守夏侯渊，督还徐豫兖三州粮草。

典农中郎将领长水校尉事任峻典造军器与运送。

及闻袁绍大军业已南来，而江东孙策为人刺死，操以对荆州刘表顾虑减少，乃抽调南阳曹洪军，颍川曹仁军，悉集于官渡，以备与绍决战。

曹操之军队编制与袁绍之军概同，亦分为步兵、屯骑、越骑、长水、射击五兵种，惟营数操仅有步兵三校尉，屯骑、越骑各一校尉，长水及射击皆不足一校尉。是知曹操当时实有兵力，与袁绍11万8千较甚为劣势。在装备上，绍有步兵着用之大铠万领，操只有20领；绍有马铠三百具，操仅有不足10具。在作战准备上，绍攻击，操防御，操所备之处甚多，兵力势须分散，所谓所备者多，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故在曹操与袁绍初相拒于官渡时，绍连营稍前，依沙堆为屯东西数10里；操亦分营与相当，“兵不满万，伤者十之二三”，此盖指其未曾集中兵力之前而言。及其既知战地战日之后，操亦集中其三万余兵力于官渡之正面上，依鸿沟水及洧川道运粮给军，故军中人员补充粮卓补给，均不虞匮乏。为防止敌来绝钞：乃编千乘或千船为一起，采用10道方行为辅陈，以营卫护运之法，以行运输。

三、绪战

汉献帝建安5年（公元100年）正月，袁绍以进攻许都为目标自邺城出兵南进，知操以东郡太守刘延率步兵千人驻守白马城。绍欲先行驱逐此一途上障碍，乃先遣大将颜良率其前锋军万二千余攻白马城。沮授谏曰：“颜良性促狭，虽骁勇不可独任”。绍不听，是年2月竟遣颜良前往攻白马城，并道屯骑司马何民率屯骑一部，轻骑一部，沿黄河攻获嘉，窥孟津等地。绍亲率大军至黎阳荡阴（今河南省汤阴县）间。

时曹操军于官渡，探知袁绍引大军将从黎阳津南渡，先遣颜良率万余人渡河围攻刘延于白马。4月初，操欲北救刘延，军师荀攸说操曰：“今兵少，不敌，必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绍必而应之。然后轻兵东应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擒也。”操从之，引兵向延津。绍闻操军到延津将渡兵而北以袭其后；乃急遣骑前锋文丑趋延津，绍亲率大军推进朝歌（今河南省洪县），图予曹军以迎头痛击。但当文丑兵赶至延津时，曹操已转兵兼行，疾趋白马，而袭颜良军之后背。颜良此时正督兵继续攻白马城，不意操军卒至，距白马仅10余里，良大惊，仓卒迎战。操乃使先锋偏将军汉寿亭侯关羽，裨将军张辽率数百骑疾攻良军中。关羽望见颜良麾盖，策马突入良军申，斩颜良而还，良军莫能当者，遂解白马之围。（上引荀修言见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曹操已解白马之围，乃徙其民，循河南岸向西南撤走。民众随军移家，扶老携幼，车马行囊，络绎于途，成为战场上显明目标。袁绍乃渡河追击之；沮授叩马谏曰：“胜负变化，不可不详；今宜使文丑军屯延津，分一军由东道覰官渡；更由西道以向上游取河南。若其各有克获，还报以迎大军，大军再行渡河前进亦不为晚。若以忿而渡河追击，求敌决战；决战而胜，固所愿也。设有其难，众弗可还矣。”绍不听，欲急日延津渡军包围截击操军之侧背，乃令文丑与刘备急急渡河。文丑率越骑校尉王摩渡河后，向南急追，至酸枣（今河南延津县治）北之南阪。操勒兵驻营南阪下，使侦卒登垒望之，报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报曰：“骑稍多，步兵不可胜数”。操曰：“勿复报”，乃令骑解鞍放马。是时自白马南撤之辎重已就道，诸将以为敌骑多，不如还保营，荀攸曰：“此所以饵敌，如何去之？”操目攸而笑，蓬以辎重诱敌。文丑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诸将曰：“可上马”，操曰：“未”。有顷文丑骑至稍多，争趋辎重，操乃令上马。时操骑不满六百，余皆步兵，操纵兵乘绍军伍之乱，攻击大破之，遂斩文丑。袁绍在绪战中，损失两员名将，军中大震。曹军追击30里，斩首数千级，得马数千匹，尽收回所失之辎重。遂选骑一千，使讨寇校尉乐进率之，往获嘉助于禁以击袁军之西路，操自率大军，回守官渡。关羽乘操军南撤时脱走归刘备于绍军。乐进率军至获嘉（即今河南省获嘉县），知于禁正与袁绍之别军激战中，乃纵骑夹击破之，遂与于禁自延津西南沿河至汲县，焚烧绍军堡聚30余屯，斩首，获生各数千，收降绍将何茂、王摩等210人。然后于禁还守原武，乐进归还官渡。（上引沮授言见通监卷六十三）

袁绍进驻延津南，7月汝南黄巾刘辟龚都等叛操而响应袁绍，绍乃遣刘备南下助之，以攻许都，袭曹操之后方根据地；并遣使拜阳安（今河南省确山县东北），都尉李通为征南大将军，使叛曹操，通斩绍使。刘备略汝颖之间，以兵逼强（今河南省临颍县东），诸县多举众应之，自许以南，吏民不安。曹操在官渡忧之。曹仁因建议曰：“南方以大军方有目前急，其势不能相救，刘备以强兵临之，其背叛宜也。备新将绍兵，未能得共用，急击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将骑击备，破走之，役牧诸叛县而还。刘备败归袁绍。曹仁于归官渡途中，更击破袁绍所遣之骑将韩荀于鸡洛山（令河南省密县东南之径山），斩韩荀。刘备还至绍军后，阴谋离去，乃说绍南连刘安，绍遣备将本部兵役至汝南与垄都等合众数千人。操再造将军蔡杨击之，为备所杀。然备虽斩蔡杨，并未有若何作为，盖其志在另谋发展也。

四、官渡决战

袁绍已遣刘备，乃进其大军至阳武（今河南省阳武县古博浪亭），沮授又说绍曰：“北兵虽众，而劲果不及南；南军谷少，而资储不如北；南幸急战，北利在缓师，宜徐持久，旷以日月。”绍不从。遂于8月连营而前，依沙堆为屯，东四数十里，以攻原武及宵渡。操一面分营与相当以对抗之，一面急调屯于原武之于禁军回守官渡。于禁在原武，击绍别营于杜氏津（令获嘉县北修武县东）破之，适奉操令还官渡，乃经温县渡河而南，出平睪奔中牟，至于官渡（以上沮授言见三国志卷六袁绍

传）

9年初一，日食。操利用兵家所忌之日，出击绍军，不利，复还坚壁以守之。于是绍大军进临官渡，起土山为高橹（露楼无覆者）以射操营，操营中皆蒙楯而行。绍以为官渡必破，令军中各持三尺绳，操军破当擒缚之。操亦于营中起土山，使于禁于土山上以相对抗。操又制霹雳车去绍露楼皆破。绍又为地道以袭操，操于营内为长堑以拒之，于是绍操两军相峙百余日不决。绍校尉张郃说绍曰："公虽连胜，然勿与曹战也，密遣轻骑钞绝其南，则其兵自败矣。"绍不从。时会操军粮将尽，操欲退守许都，乃以书与许都留守荀彧议之。彧自许都复书曰："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进已半年矣。今兵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困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此天下之大机也。且绍能聚人而不能用，情见势急，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操得书，又与军师荀攸，参军贾诩等议之，诩曰："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者，但显万全故也。公决其机，则须臾可定也。"于是，操决计向绍军反攻，夜引渠水自莨荡泽以灌绍营，绍退后30余里，因成莨荡渠。徐晃部将史涣，于莨荡渠作战中俘得绍军"仓储吏"，交军师荀攸问之，知绍军有运粮车队旦暮且至，运粮官韩猛，系一锐而轻敌之将。攸乃建议使人往袭绍粮车。操问何人可使？故举徐晃史涣可任。晃与涣至故市（今河南省封邱县西北30五里），截击绍运粮队，击破韩猛，烧其辎重而归。绍军亦因以乏食。时操军粮将尽，输卒疲于奔命，操见而抚之曰："却15日为汝等破绍，不复劳汝等矣。"10月，袁绍遣车千乘运粮，使其左武卫营主将淳于琼率步兵与屯骑两校之兵万余人，北迎运车。沮授又说绍曰："今以淳于琼等五将往接粮，虽较把稳，却非万全。可再遣步兵校尉蒋奇率其军为表于外，以绝曹操之钞。"绍不从。参谋许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于此，其许下余守，势必空弱。若分诸军持之，而遣轻军从他道星夜掩袭，许拔迎天子，以讨操，操为擒矣。如其未溃，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绍又不能用。会许攸家中人犯法，绍之留守审配收系之，攸怒，遂奔降于操。操闻许攸来降，大喜过望，跣足以迎之，抚掌而笑曰"子卿（攸字）远来，吾事济矣"。攸因说操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日粮乎？"操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实也？"操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1月，为之奈何？"故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扎，八时淳于琼已接运至，宿营于此，距绍营四十里，无严备，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烧其积聚，不过3日，袁氏自败也。"操大喜，乃即选精锐步骑五千人，皆用袁军旅帜暗号，各把束薪衔枚、缚马口，将亲率往袭取之；左右疑而阻之，而荀攸、贾诩劝操行。于是，操留曹洪与荀攸守营，亲率诸将士夜从间道出，所历道，有间者，则语之曰："袁公恐曹操钞略后军，遣兵以益备。"闻者借以为然，因一路无阻。既至乌巢泽旁之营地，围其屯大放火。淳于琼营中惊乱，操遂急攻之。会天明，琼等望见操军少，乃出陈门外，操令击之，琼退保营，操复逼攻之。时

绍营于阳武，距乌巢四十里，夜见乌巢火起，校尉张郃进言曰：“乌巢有警，必曹操亲率精兵往袭鸟巢。曹操亲往，是志在必破琼等，不急往救，大事去矣。”中军监军郭图曰：“郃非计也，不知夫孙膑攻魏以救赵乎？故救乌巢，不如攻其官渡本营。”郃曰：“曹操亲自出外远袭，其营中虽空，却必严备以待，倘若我军攻之急切不拔，而琼等已成擒，则吾属尽为虏矣。”袁绍谓其长子谭曰：“就彼攻琼等，我拔其官渡营，彼固无所归矣。”因使张郃高览各驾高橹往攻官渡曹营，但仅遗轻骑司马赵叡往救乌巢。操攻琼营，越叡救骑亦至。操左右或言：“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操怒曰：“贼到背后乃白。”于是士卒皆殊死战。遂斩绍之步兵校尉睦元进，屯骑校尉韩莒，及莒子威璜，杀士卒千余人皆取鼻，牛马割唇舌，生获淳于琼，尽烧其辎重。然后回战赵叡斩之，乃回军官渡。

张郃等兵至曹营前，天已破晓，急攻之，曹垒坚固不能拔。继续围攻之，将至午时而曹操已自乌巢还师。郃等欲退，“督军”郭图为掩饰其失计，乃谮郃等“有快军败”之语。郃闻之大惧，乃焚其攻具，就操营乞降。曹洪疑之不敢受。荀攸故谓洪曰：“郃必与许攸相同，上计不用，被迫来攻，退不见谅，途穷请降，君何疑焉。”会曹操返，迎郃而笑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岂若微子去殷，韩信归汉耶！”即拜郃为“偏将军”。绍营中获知乌巢军粮尽为曹操烧毁，淳于琼等皆死，而张郃高览等铁铠万领，悉已降曹。于是各惊失色，互相奔告，军中士气，为之所夺。正在纷扰中，曹操以其在乌巢所割之人鼻牛马唇舌陈示绍军，绍将士益惶惧。操蓬乘势攻绍营，绍军以是未战先乱，不能抵御。袁绍急率其长子袁谭，幅巾乘马与所率八百骑弃军北走。绍军无主，因而大溃。曹操率军悉力追杀，1日夜追至延津，尽虏绍军十余万，及珍宝财物、图书、辎重，累值巨亿，悉落入曹操之手。

第三节 战后之政局

曹操既破袁绍军，袁绍与其长子袁谭幅巾乘马率几百骑北走，自延津渡河逃至黎阳北岸，入其后军将军蒋义渠营。绍至蒋义渠帐下，把鹑渠之手曰："孤以首领相付矣！"义渠避帐而处之，使宣令以收容各逃散之军。在逃诸军闻绍在黎阳北岸，遂稍复集。曹操已破袁绍，声威所至，冀州各郡县多举城降。但操军实已力竭，知袁绍在黎阳北岸，亦无力追击，只追至延津黄河南岸而止。

曹操在所获袁绍遗弃之文书中，有许都人及操军中人致书于绍，以为通欵者。操左右欲将特别检出，以备归治诸人通敌之罪。操开之叹曰："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可将该书类，尽数烧之，以灭其迹、而安众心也。"沮授为曹军所执，以见操。操以授乃旧友欲降之，授大呼曰："授不降也，为所执耳。"操谓授曰："分野殊异，遂用圮绝，不图今日，乃相得也。"授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为见擒。"操曰："本初（绍字）无谋，不相用计。今丧乱过纪，国家未定，方当与君图之。"授曰："叔父母弟，悬命袁氏，若蒙公灵，速死为福。"操叹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寻谋归袁氏，操乃杀之。绍已降之军士，闻绍在河北各有归心，及见曹军疲乏及恶食状，多思胁众以走。操就可疑为伪降，或有复为叛变之迹者，因尽坑之，前后所杀八万余人。（上引见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及卷六袁绍传）

当官渡未战之初，曹操闻袁绍将田丰下狱，会喜对其左右曰："田丰不从戎，绍必败矣。"及袁绍败走，操复语左右曰："向使绍用田丰计，胜败尚未可知也。"袁绍退黎阳北岸，消息传至邺狱中，狱吏向田丰贺曰："今主公败归，别驾必为见重。"丰曰："公貌宽而内忌，不谅吾忠，而吾数以至言迕之，若胜而喜，必能赦我；战败而气，内忌将发；若军有利，当蒙全耳，今既败矣，吾不望生！"绍在黎阳谓逢纪曰："冀州人，闻吾军败，皆当念吾。唯田别驾前谏比吾，与众不同，吾亦斩之。"逢纪曰："丰闻将军之退，拍手大笑，再其言之中也。"于是绍遂杀丰。绍留守邺城之冀州治中审配，有二子随军，官渡之败，皆为曹军所虏，督运校尉孟岱与审配有隙，乃因蒋奇言于绍曰："配在位专政，族大兵强，且二子在南，必怀反叛。"绍以问中监军郭图，参谋辛评，图与评皆以为然，绍遂以孟岱为监军代审配守邺城。护军逢纪素与审配不相得，闻而谏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节，不以二子在南为不义也。公勿疑之。"绍曰："君不恶之耶？"纪曰："先所争者私情，今所陈者国事。"绍善之，因不废配。配因得以守邺之兵力，镇压反侧，固全根本。而绍因得牧收容败兵，讨平已叛之郡县，遂千里复有冀州。绍回至郑城，再集结青、幽，并三州人马，图再与曹操决战。（上引署见三国志卷六袁绍传）

官渡战后之翌年，即建安6年（公元201年）夏4月，袁绍复集其军

进于黎阳，曹操自官渡进军，以轻骑诱致绍军至仓亭（今河南濬县东南五十里处），复大破绍军。是年秋9年，曹操移军南击刘备于汝南，刘备败走荆州依刘表。又翌年，即建安7年正月，曹操再自官渡进击黎阳克之。至此，袁绍以忧忿呕血，遂于是年夏5月死。

袁绍既死，审配与逢纪乃缘绍素意，奉绍少子袁尚代绍位为冀州牧领邺侯兼下“督四州军事”。绍长子袁谭。因不得立，乃自号举骑将军。谭被曹操击败，自黎阳后退，尚自邺出兵救之，操又击破之，追至邺城下，但谭与尚互为犄角之势，犹难卒下。于是“谋士”郭嘉进曰：“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今权力相侔，各有党羽。急之则相保，纷之则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操善之。乃留贾翊守黎阳，以大军收冀州之麦而不。

袁谭见操退兵，乃谓袁尚曰：“今操军退，人怀归志，及其未济，出兵掩之，可令大溃，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许。谭大怒，因以兵攻尚，于是兄弟大战。旋谭败，引还平原。建安8年（公元203年）秋8月，袁尚出兵攻围袁谭于平原。谭被围急，遣使请降于曹操，并请曹操攻鄂以相救援。操乃出兵黎阳。袁尚闻之，释平原还邺，而操亦因而退军。建安9年正月，曹操自朝歌向邺城开沟，欲遏淇水使入白沟，为新运粮渠。袁尚在邺，以胡歌距郓百数十里，非一、2年之力，水道绝不能通，乃复出兵围潭于平原，而留审配与苏由守邺。夏4月，曹操以巨木为椿，过淇水通入白沟遂由水道进军以围邺城。秋7月袁尚自平原还救邺，去邺城十七里而败，北走幽州。于是操克邺城。操入邺自为冀州牧。召袁谭，谭不至，遂移军而东征讨之。

建安10年（公元205年）正月，操攻破袁谭于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北），杀谭。并策动幽州将领焦触张南等叛袁氏。于是幽州刺史袁熙、及袁尚东奔辽西，由是青州全部及幽州大部皆为操所有。翌年3月，曹操又破并州刺史高干于壶口关（今山西省壶关）。高干失并州，走匈奴求救不得，欲南奔荆州，途为上洛（今陕西省商县）尉王琰所杀。曹操遂尽有宜绍四州之地，而北方大定。

曹操以绍之二子皆枭杰有勇力，逃在辽西，势必勾结乌桓侵扰边疆。为求彻底安定北边，永靖后方，乃开凿平虏，泉州之渠，以通粮运，而运兵北上，以便远征乌桓。诸将参谏曰：“袁尚亡虏耳，夷狄贪而无亲，蹋顿岂能为之用。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一有变，事不可悔。”独司主军祭酒郭嘉赞成之曰：“袁绍有恩于辽北民夷，而袁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袁尚因乌桓之资，招其死主之臣，民夷俱应，恐青冀非吾有也。刘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于是操遂决北征辽西。（上引见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及卷十四郭嘉传）

建安12年（公元207年）秋7月，曹操兵至蓟北，为水所阻不得进，乃访求进兵道于田畴。畴曰：“无终（今河北省蓟县）之道，秋夏每常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为难久矣。旧右北平邪治在平刚（今热

河省平泉县），道出卢龙（古塞名在无终山北黑峪关东今热河省平泉县南柳河口处），达于柳城（今热河省凌泉县）。自建武（汉光武年号）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今虏将以大军，当由无终不得进而退，懈弛无备。若嘿回军，从卢龙口，越白檀（汉县名在今热河省滦平县，此白檀乃指滦河上游，时名白檀水而言）之险，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备，蹋顿之首，可不战而擒也。”于是操以田畴为向导，进兵至白狼（汉县名郎今热河省平泉县东北之八里翠），登白狼山（令八且翠甸子），乌桓率众来战，操挥众突击，斩蹋顿及其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袁尚袁熙奔辽东，辽东公孙康诱斩之，送其二人首于操。于是袁氏灭，北部各州郡悉统于操。

第五章 东吴开国之战——孙策开拓江东豫章

（一）与平2年（公元195年）12月孙策破刘繇于曲阿，破许贡于吴郡，据有今安徽省宣城县亘江苏省镇江，丹阳，吴县等县地区。

（二）建安元年（公元196年）8月再破会稽王胡，据有今浙江省北部地区。

（三）建安4年6月袭刘勋于皖城克之，是年12月大破黄祖于沙羡，继下豫章庐陵，据有今武昌、岳阳、吉安以东亘九江南昌之地区，东吴国基因以奠定。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及孙策开拓江

东之导因献帝初平3年（公元192年）春，孙坚奉袁术之命击刘表，表遣将黄祖御于邓樊之间，坚击破之，追渡汉水，还围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县为刘表荆州治所）。表遣祖潜出发兵，及祖将兵还，坚迎击，祖败走入岘山（今襄阳县南九里）中，坚乘胜夜追之，为祖部曲兵从竹木板暗射坚杀之，坚时年30七。坚已死，术收领其众。于是，袁术为刘表所偪，弃南阳而北走，复为曹操击破于封丘而南走寿睿（详见前章）。

孙坚世居吴郡富春（今浙江省富阳县），娶钱唐吴氏，生四男策，权，翊、匡，及一女。当朱儁讨卓时，表坚为佐军，坚遂留家寿春（今安徽省寿县）。策字伯符，时年十七与舒（今安徽省舒城县）人周瑜同年。益尔英达夙成，闻策声名，遂往访策，因相结好，义同断金。策因与母徙居舒，收合士大夫，江准间人咸向之。及坚死，策还葬曲阿（今江苏省丹阳县），己乃渡江居江都（今江都县四南46里），结纳豪俊，有复仇之志。时丹阳太守（治今安徽省宣城县）会稽周昕与袁术相恶，术乃以策舅吴景领丹阳太守攻昕，夺其郡，并以策从兄贲为丹阳都尉。策乃以母弟托广陵张纮，而自至寿春见袁术，请领其父兵报仇，卫虽奇之，但不肯授兵而使就丹阳召募。策遂与汝南吕范及旗人孙河迎其母至曲阿依舅氏，因召募得数百人，恨为泾县（今安徽省殁县西）大帅祖郎所击破；策乃复往见术，术始以坚余兵千余还之，并拜策为怀义校尉。

策在术所，术甚奇其能，许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阳陈纪。旋术欲攻徐州，求粮三万斛于卢江太守（治今合肥县）陆康，康不兴，术遣策攻康，并许为卢江太守。及策攻康拔之，术复用其故吏刘勋为太守，于是策益失望。是时汉廷侍御史东莱刘繇素有盛名，诏用为扬州刺史。繇以旧州治寿春，已为袁术所据，乃欲南渡江，吴景孙贲迎之，置治曲阿。及策破康，繇以景、宝本衡所置，惧为袁术所并，因迫逐景、贲，景贲渡江退屯历阳（今安徽省和县），繇乃遣将樊能，于麋守横江（今安徽省和县东南，对江南之釆石，为津渡虑），张英守当利口（今和县东南大江中之浦渡口历）以拒袁术。术乃以其故吏惠衙为扬州刺史，以吴景为督军中郎将与孙贲等将兵以攻英等。吴景等攻张英樊能岁余不能克，于是孙策自请攻之，遂开拓其江东之其业。

第二节 袭刘勋击黄祖兼并豫章之战

先是孙策已以书绝袁术，术乃于建安3年12月（术于建安2年春称帝于寿春）遣间随齐印绶与丹阳宗帅祖郎等（在今太平县地区），使激动山越，共图孙策。又刘繇弃丹徒泝江西上至彭泽时，使太史慈入芜湖山中（今繁昌、南陵以南之山中）至泾县自称丹阳太守，以阻吴景之西进。是时宣城以东，皆已属孙策，惟泾县（今泾县西）以西六县未服。慈在泾县大为山越所附。因此，孙策为开拓豫章，西讨黄阻，必先破除太史慈、祖郎等之阻梗。于是，策自将击祖郎于陵阳（今安徽省青阳县东南六十里陵阳镇）擒之。策谓郎曰："尔昔袭孤，斫孤马鞍。今创军立事，除弃宿恨，惟取能用，与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郎叩头谢罪，遂释郎署门下贼曹。再进击太史慈于勇里（今泾县西北），又擒之。策释慈而握其手曰："宁识神亭时耶？若卿尔时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闻卿有烈义，天下智士也，但所托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忧不如意也。"即署慈为门下督军。时适刘繇卒于豫章，士众万余人欲奉豫章太守华歆为主，歆以为因时擅命，非人臣所宜；众待候连月，歆卒谢遣之。孙策闻其众未有所附，乃遣太史慈往抚安之，而谓慈曰："刘牧往责吾为袁氏攻庐江，吾先君兵数千人尽在公路，许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属意于公路而求之乎？其后不遵臣节，谏之不从，丈夫义交，苟有大故，不得不离。吾交求公路及绝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时与共论辩也。今儿子（刘繇儿子）在豫章，卿往视之，并宣孤意于其部曲，部曲乐从者与俱来，不乐者且安慰之，并观子鱼（华歆字）所以牧御方规何如？卿须几兵，多少随意。"慈曰："慈有赦之罪，将军量同桓文，当尽死以报德。今并息兵，兵不宜多，将数十人足矣。"策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还。"策曰："子义（慈字）舍我，当复从谁？"饯送于昌门（今苏州西门），而把慈腕曰："何时能还？"答曰："不过六10日"。慈已往，议者犹纷言遣之非计。策曰："诸君勿复言，孤断之详矣。太史子义虽气勇有胆烈，然非纵横之人，其心秉道义，重然诺，一以意许知已，死亡不相负，诸君勿忧也。"至建安4年春，慈如期还报策曰："华子鱼良德也，然无他方规，自守而已。又丹阳僮芝，自擅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南），番阳（今江西省鄱阳县）民帅别立宗部（即所谓江南宗贼，县民数千家自相结聚，作宗伍壁），言我已别立郡海昏（今江西省奉新县西——时策以太史憨为建昌都尉治海昏），上缭（今永修县），不受发召，子鱼但靚视之而已。"策拊掌大笑。盖以豫章可兼并也。（上引语见三团志卷四十九太史慈传）

建安4年（公元199年）6月，袁术已死，其长生杨弘，大将军张勋等将其众欲就孙策于江东，庐江太守刘勋邀击悉虏之。术从弟胤及婿黄猗晏畏操亦不敢居寿春，率其部曲奉术柩及妻子就刘勋于皖城（今安徽省潜山县）。至是年11月，刘勋以袁术部曲众多，不能赡给，乃遣从弟偕告难于豫章。太守华歆以素缺少米粮，遣吏与偕就海昏、上缭，使诸宗帅共出三万斛与偕。偕往历月，始得数千斛，偕乃报勋请举兵袭取

之。时孙策正在谋图豫章，闻勋将袭取上缭，乃设计先袭取勋，因遣使致书卑辞于勋曰："上缭宗民，数欺鄙郡，欲击之路不便。上缭甚富实，蹑君伐之，请出兵以为外援。"且以珠宝葛越（葛布）赂勋，勋大喜。时淮南名士刘晔劝勋曰："上缭虽小，城坚池深，攻难守易，不可旬日而举也。兵疲于外而国内虚，策乘虚袭我，则后不能独守，是将军进屈于敌，退无所归。若军必出，祸今至矣。"勋不听。蓬自将兵潜入彭泽以袭上缭，至海昏，宗帅知之，皆空壁逃迁，勋一无所得。

当刘勋潜兵入彭泽时，孙策乃扬言引兵击黄祖，溯江西上，至石城（今安徽省贵池县西七十里）。闻勋在海昏，乃即分遣从兄贲、辅，将八千人进据彭泽（今江西省湖口县），自与领江夏太守周瑜将二万人，袭皖城克之。得术妻子及部曲三万人。上表以汝南李术为庐江太守，予兵三千以守之，皆徙所得民居吴。

刘勋闻策袭皖城，急自海昏回军，至彭泽为孙贲孙辅邀击破之。勋走保流沂（今湖北省鄂城县），求救于黄祖，祖遗子射率船军五千助之。策复击破之，勋率数百人北走归于曹操，射亦退走。策收得勋兵二千余，船千艘，遂进攻黄祖于夏口（今汉阳县）。祖退守沙羡（今湖北省嘉鱼县北江中之沙州）。是年12月初8日策军至沙羡，适刘表遣从子虎与南阳韩晞率长矛兵五千援祖为前锋。是月11日黎明，策率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将周瑜，领桂阳太守行征虏中郎将吕蒙，领零陵太守行荡寇中郎将程普，行奉业校尉孙权，行先登校尉韩当，行武锋校尉黄盖等诸将向沙羡黄祖水军及营屯展开攻击，策亲自跨马跃阵手击战鼓以兴战势。于是诸将"各竞用命，越渡重堑，迅疾若飞，火放上风，兵激烟下，弓弩并发，流矢雨集"（见三国志吴志孙策传之江安传）。战至是日辰时，祖兵大溃，韩晞战死，黄祖乘乱脱身逃走。是役，策斩黄军二万余级，赴水溺死者万余人，俘祖妻子七人，船六千余艘，财物山积，实一大歼灭战也。

孙策已破黄祖，乃即留周瑜屯巴丘（今湖南省岳阳县治西南），自率兵东下以取豫章郡（南昌）。策兵至椒丘（今江西省新建县北），遣功曹虞翻曰："华子鱼，自有名字，然非吾敌也。若不开门让城，金鼓一震，不得无伤害。即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见华歆曰："窃开明府，与鄙郡故王府君（王郎）齐名中州，海内所宗，虽在东垂，常怀瞻仰。"歆曰："孤不如王会稽。"翻复曰："不审豫章资粮、器仗、士民勇果，孰与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会稽，让光之谭耳，精兵不如会稽，实如尊教。孙讨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刘扬州（繇），君所亲见，南定鄙郡，亦君所闻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资粮，已知不足，不早为计，悔无及也。今大军已次椒丘，仆便还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与君辞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匿，孙会稽（策）来，吾便去也。"于是，策遂入豫章。以华歆年德名望，远近所归，策乃修子弟之体，拜礼为上宾。又分豫章西部为卢陵郡（今江西省吉安县），以孙贲为豫章太守，孙辅为庐陵太守。时适童芝病，辅遂进取庐陵。时为建安4年12月也。于是，东吴开国之基，于以奠定。

第三节 战后之政局

江东方面：孙策在平定严白虎等后，东吴开国之基大定。时策以其于西击黄祖时，广陵太守陈登（陈瑀之经）在射阳（登治所——今江苏省淮安县）阴诱殴白虎等余党，图袭孙策之后。及策已破黄祖定豫章回吴，乃于建安5年4月举兵北击登，军到丹徒须待粮运。策性好猎，在此待粮间，数出驱驰射猎，在出猎中，策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因单骑卒遇前吴郡太守许贡客三人，射策中颊。是年6月5日策因重伤卒，卒时年二十六。于是其弟孙权继立。

策临卒时，召张昭等谓曰：“中国方乱，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韦昭曰：吴松江、钱塘江，浦阳江也。）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又呼弟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遂卒。

孙权已继立，周瑜将兵自巴丘赴爽，遂留吴，以中护军与张昭共掌政事。时虽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江、庐陵六郡，然深险之地，犹未尽服。而天下英豪在州郡，实旅寄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张昭、周琼等以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服事之。权待张昭以师傅之礼，以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帅。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皆为宾客。镇抚山越，讨不从命，东吴之国基，因以益固。

袁曹方面：是年4月袁绍曹操正激战于黎阳、白马之黄河南岸地区，7至10月正相持于宵渡，此时之一般政局，已详述于官渡之战章中。

第六章 曹魏开国之战三——赤壁之战

（一）建安12年（公元207年）11月，操破袁尚袁熙，公孙康斩尚熙首降；又破乌桓，凯旋至易水。

（二）建安13年1月，曹操还邺，作玄武池以练水军，准备南征。6月，操自为丞相。7月，开始在许都集中军队，以征刘表。8月，表卒。9年，操驻大军南下，刘备逃走，刘琮降，遂至江陵。

（三）建安13年12月，孙权与刘备联合以拒操，战于赤壁，操军败还。三国鼎峙之局成。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与作战导因

建安12年（公元207年）曹操平定冀州，继续北征乌桓。时刘备在荆州，劝刘表乘操北征，许都空虚，出兵袭许，表不听。备乃用诸葛亮隆中策，急谋自图发展，罗揽人才以自辅。及曹操自柳城（今热河省凌源县）还军，刘表谓备曰：“不用君言，故为失此大会。”备曰：“今天下分裂，日寻干戈，事会之来，岂有终极，若能应之于后者，则此未足为恨也。”实则备已知刘表不能有为，聊以此语应之耳。是时，鲁肃向孙权建议谋取荆州曰：“汉室不可复典，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耳。若因北方多务，剿除黄祖（时为江夏太守），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楹，据而有之，此王业也。”甘宁原为黄祖将，是时已投孙权，亦向权建议曰：“今汉祚日微，曹操弥骄，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将军当早规之，不可后操为图；图之之计，直先取江夏（汉郡名以令湖北省黄冈县为治所）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其本人务于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致使舟船战具顿废不修，怠于耕农，军无法伍，将军令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或云系指令湖北长阳县南七十里之古捍关言，亦有谓指三峡中关口言，当以后说为是）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矣。”孙权甚纳其计，张昭却阻之曰：“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宁曰：“国家以箫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慕古人乎？”权举酒属宁曰：“兴霸（甘宁字）今年行讨，如此酒矣，决以付卿，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则卿之功。何嫌张长史之言乎？”于是，孙权于建安13年春第三次西攻江夏，斩太守黄祖，尽获江夏士众，遂准备西进以取荆州。（按孙策于建安5年卒，孙权继策立。建安8年10月第一次伐黄祖，破祖舟军，未克江夏城而山越复乱，还师。至建安12年，再伐黄祖，虏其人民而还，是年权母吴氏卒。）

荆州既失江夏郡于东吴，人心震惊，不可终日，刘表商请刘备，欲使备移兵往御之。备以曹操有南征之势，孙权用兵江夏，情势虽急，但以北边门户，不便开放为辞。表犹豫至再，乃遣长子刘琦率兵反攻江夏郡。

曹操久欲进取荆州，只以北方未靖，无暇南征，今见孙权攻取江夏，深虑若荆州为吴有，则其势益难摇动，乃急派军出合肥（即今安徽省合肥县西）以牵制孙权，使不得全力西进。并问计荀彧，彧因建取荆州策曰：“今华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显出宛（即今河南省南阳县）叶（即今河南省叶县），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荆州可一战而定。”于是，曹操于建安13年7月开始南征，而集大军屯南阳。会刘表病卒，表妻弟蔡瑁，外甥张允立表少子琮为嗣。操闻表卒，即自将轻骑疾趋襄阳，9年操至新野，刘琮用诸将之议，请降于操。时刘备在樊城，不意曹操轻骑压境，又不知刘琮已降。及琮遣使来告，乃率步骑狼狈渡江南走，又令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欲取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县）而

据之。备过襄阳，欲会刘琮，琮不应，荆州吏民亦多有随备南行者。操以江陵有军实，恐为刘备所据，乃释辎重，率轻骑急驰襄阳，及至，闻备已过南走。时荆州从事王威说琮曰：“曹操以将军既降，刘备已走，必懈弛无备轻行单进。若给威奇兵数千，缴之于险，操可获也。获操即威震四海，坐而虎步，中夏虽广，可簿檄而定，非徒收一胜之功，保全今日而已。此难遇之机，不可失也。”琮不从。操在襄阳稍事息足间，为控有荆州，急即改刘琮为青州刺史，又封荆州降将蒯越等15人各为列侯，以琢郡人李立为荆州刺史，使尽收刘表羽翼，分拨诸军以便监视。（以上诸引语见三国志刘表、鲁肃、甘宁、荀彧等传及通监卷五十六）

曹操已处置刘琮之后，即自将轻骑五千兼程急追刘备，1日1夜行300里。追及当阳之长阪（今湖北省当阳县东南沙洋十里铺间）之际，备仅使张飞将二十骑断后，自与诸葛亮、赵云十骑奔走，东趋汉津就关羽之水军，并得江夏太守刘琦所将万人前来接应之军，转赴沔口（即今湖北省汉口），以收容其逃散士众。

曹操兵至江陵，刘备奔投孙权。时众议以为权必杀备，惟奋戚将军程昱曰：“孙权新立，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赏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时操已传檄远近，益州牧刘璋得檄，先遗使至江陵向操致敬。操因加璋为振威将军，璋更遣其别驾从事张松送兵军粮于曹操。时操适闻孙权、刘备联合，将以相抿，乃即欲资荆州之军，乘势东下取吴，因致孙权以招降书（上引程昱语见三国志卷十四本传）

先是，建安5年（公元100年）曹操与袁绍相峙于官渡时，孙策即欲以江东之众，乘许都空虚袭之，以成其桓、文之业。此时适策为刺客所伤而死，孙权继主江东，上表朝廷，表示附顺。曹操此时欲因其丧伐之，以定江东，侍御史张纮谏曰：“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其不克，成仇弃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并令张弦出任会稽郡尉，辅权内附。按张弦乃孙策之故人，前奉策命使操者。纮既回吴，思维补察，知无不为，以报知已。曹操既破袁绍，兵威日盛，乃下令责孙权送子弟入都为质。权召诸臣会议，张昭、秦松等主听命，张纮则劝权与中护军周瑜议之。瑜在吴太夫人前献议曰：“昔楚国初封于荆山之侧，不满百里之地，继嗣贤能，广土开境，立基于郢（今江陵县）遂据荆阳至于南海（今广东省番禺县，时为南海郡治），传业延祚九百余年。今将军承父兄余资，汇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泛舟举航，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有何逼迫，而欲送质？质一人，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为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观其变。若曹氏能率义以征天下，将军事之未晚；若图为暴乱，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将军韬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质之有？”权母吴太夫人曰：“公瑾（周瑜字）之言是也。”于是，孙权拒送质子。周瑜旋荐其友鲁肃于权，权问计焉。肃对曰：“昔高祖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

也。今之曹操犹昔之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思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耳。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而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权心嘉之。及甘宁自江夏来投，说以“荆州国之西势”之论，故孙权图谋荆州之心益急。及建安13年春2月孙权攻灭江夏黄祖，正欲乘胜西进以取刘表之时，曹操却于4月以兵出合肥，进觑权后，权乃进守历阳（今安徽省和县）。于同年6月曹操罢三公自为丞相，7月兵向荆州。此曹操之招降尝抵达，孙权决策拒战，于是赤壁之战，因以发生。盖赤壁之战，乃曹孙刘雄争夺荆州之战也。（上引见三国志张纮周瑜鲁肃传）

第二节 作战准备及战略部署

一、曹操方面

建安13年（公元208）春正月，曹操自易水还邺（今河南省临漳县），作玄武池，以肄舟师，准备南征荆扬。是年9年至新野，刘琮举荆州降，操遂拥有荆州全部水师，蒙冲斗舰，乃以千计，且又势居上流，水陆俱下，以为据此优势足以平定江东。时操“丞相掾”王粲言：“河东（汉郡名，即山西南部）人裴潜，避难在荆，曾对刘表有“刘牧非霸主之才，乃欲西伯（文王）自处，其败无日矣”。等评语，其人当熟知州事，可辟用之。”操因征为“参丞相军事”，因问潜曰：“卿前与刘备俱在荆州，卿以备才略如何？”潜对曰：“使居中国，能乱人而不能为治也。若乘间守险潜足以为一方主。”于是曹操乃决心不伺全面进攻江东之形势完成之前，先破刘备。及闻孙权以兵西上，乃根据前所下之决心，部署其在荆州之军，沿汉江与长江东下，直向江夏郡之夏口前进，其军队编组与部署如下：（上引语见三国志卷二十三裴潜传）

汉江方面自襄阳出发向夏口前进，其次序为：

水军左武卫先锋，讨逆将军江夏太守文聘率襄阳水军。

陆军左武卫先锋第一军虎威将军于禁。

丞相主簿护七军都督赵俨。

奋威将军程昱（统御射声二校尉）。

丞相军祭酒杜袭、袁渔。

第二军荡寇将军张辽。

第三军平狄将军张郃。

第四军平虏将军朱灵。

第五军折冲将军乐进。

第六军扬武将军路招。

第七军奋威将军冯楷。

长江方面。自江陵出发向夏口前进，其次序为：

水军右武卫先锋，荆州水军副都张允。

右武卫营本军：

横野将军徐晃。

长水校尉任峻。

中军水军先锋荆州水军都督蔡瑁。

中军陆军先锋奋威将军满宠。

中军元帅汉丞相曹操。

军师荀攸，长史陈矫。

太中大夫贾诩。

丞相军祭酒董昭。

军谋祭酒王粲。

丞相西曹掾陈群，东曹掾徐宣。

参丞相军事华歆，王朗、裴潜、刘广、桓阶、和洽。

虎骑宿卫军许褚。

豹骑宿卫军曹休。

龙骑宿卫军曹真。

后军与支军：

广陵支军威虏将军藏霸，自淮阴入广陵攻吴郡。

东城支军平东将军陈登，自东城入历阳攻丹阳郡。

合淝支军破虏将军李典，自合淝攻庐江郡。

信阳支军征南将军汝南太守李通，攻江夏郡之北。

襄阳支军厉锋将军曹洪屯襄阳。

后军都督征南将军曹仁，屯江陵。

军粮督还使夏侯渊。

许都留守汉侍中尚书令荀彧，汉前将军夏侯惇。

邺城留守汉丞相西曹掾崔琰，东曹掾毛玠，主薄司马朗。

以上操军水陆军总共将不超过二十万人。包括信阳、合淝、东城诸军，亦不过二十余万人。

二、孙权与刘备方面

孙权既决定迎击曹操，乃以周瑜为“左都督”，程普为“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以助书方略，率精兵三万人西上，与刘备，刘琦联兵，自江东出发，向赤壁山、乌林峰、临嶂山之线前进，以迎击曹军。孙权自统后方诸军以为策应，并派兵防守广陵、历阳、庐江、蕲水，以御淮阴、东城、合肥、信阳各方面之敌人。其军队编组与部署大约如下：

西征军水陆军左都督周瑜，右都督程普，赞军校尉鲁肃。

先锋丹阳都尉黄盖。

左卫承烈都尉陵统。

右卫长水校尉孙匡。

水军本队当口令甘宁（丁奉属之）。

横野中郎将吕蒙。

中郎将韩当。

宜春长周泰。

奋威校尉全琮。

鄂长胡棕。

督军校尉吕岱。

陆军本队征虏将军豫章太守孙贲。

竟威校尉陆逊。

武猛校尉潘璋。

后队运转都督扶义将军朱治。

运转副都督裨将军彭泽太守吕范。

广陵守军左司马顾雍、丹阳太守孙静，武卫校尉孙桓守御京口、江西及广陵郡地。

历阳守军左长史张昭，横江将军严峻守御横江当途。

庐江守军中司马诸葛瑾，偏将军董袭守卫庐江郡。

给事朱桓屯于柴桑，以准备支援各方作战。并分令各郡太守，县令长征兵输粮，分别给军，与安定后方。

刘备在樊口，先以关羽水军屯夏口汉阳，张飞率步兵屯鲁山以为防御，并使刘琦派兵北守平靖、武胜、大胜三关，西守应城、应山。

刘备在荆州为客数年，荆州人多归之，又有刘琦为之号召。曹操因而向荆州人公告曰：“楚有江汉山川之险，后服先强与秦争衡，荆州则其故地。刘镇南（刘表为镇南将军）久用其民矣，身没之后，诸子鼎峙，虽终难全，犹可引日。青州刺史琮（时刘琮已调任为青州刺史），心志高洁，知深虑广，轻荣重义，薄利厚德，蔑万里之业，忽三军之众，笃中正之仇，敦命名之誉，上耀先君之遗麈，下图不朽之余祚。鲍永之弃并州，实融之离五郡，未足以喻也。虽封列侯一州之位，犹恨此宠未副其人，而比有牋求还监史。虽尊秩禄未优，今听所孰。表琮为“谏议大夫参同军事”。是一反其从前“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之论。操之此项公告用意，在利用刘琮作傀儡，以与刘备刘琦等争夺荆州人心。由此观之，足见刘琦刘备在荆州颇有影响力，使曹操感到威胁，不得已而留灵兵于江陵、襄阳等地以为之备。因之减少操军前方战力不小。

刘备自樊口与周瑜军同时溯江西上时，已有关羽水军近万人，张飞，赵云各四千余人；江夏太守刘琦万余人，合计亦二万余人。

第三节 作战经过

一、赤壁对峙

周瑜率三万水军自柴桑西上，刘备遣人慰劳，欲邀致瑜共识，瑜曰：“有军任不可得委署”，于是刘备迎之于樊口之东。因问瑜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备又欲邀致鲁肃，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见子敬（鲁肃字）可别过之，又孔明（诸葛亮字）已俱来，不过三两日到也。”备深愧异瑜，但以为瑜未必能破操军，乃差池在后，将二千人进会关羽张飞军，自为进退之计。周瑜自率其水陆军溯江而进。曹操初欲以大兵压境之势，以害胁降孙权，及闻吴军西上，时操军多以水土不服患病，操乃留主力镇江陵，自率荆州水军及一部陆军，顺流东下以观吴军之势（上引见刘备传）建安13年（公元208年）10月10日中午，操、瑜两军前头逻船在赤壁江中遭遇，而发生战斗，荆州水军败退，操遂引次江北扎下水寨，其陆军抵达者亦在江岸驻营，欲待冬期已过，来春再图进取之计。周瑜所率之吴军，则驻营于南岸，隔江对峙。

曹操因初战失利，又因军中疾疫盛行，故在乌林结下水陆大寨。为固结水寨计，将船舰首尾相接连锁以固定之。以便治练水军。欲待冬期已过，来春再谋进取之计。

二、战斗经过

周瑜数往江北曹营前挑战，曹军不出，瑜乃乘楼船以侦察之。见曹营中将战船连锁为水城，城中以竹筏作竹排成道路，其军士就中操舟竞射以训练技艺其上，如平川焉。瑜部将黄盖建议火攻之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曹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瑜从之，遂谋以假降之计。于是盖即还蒙冲斗舰数十艘，装燥荻枯柴于冲舰上，再灌以鱼膏，覆以幔幂，上建旌旗龙幡于舰上，一切准备就绪，乃密使人致书于曹操约降。书曰：“盖受孙氏厚恩，常为将帅，见遇不薄。然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东方将吏无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鲁肃偏怀浅憨，意未解耳。今日归命，是其实计。瑜所督领，自易摧破，交锋之日，盖为前部，当因事变化，效命在近。”操得书特召见行人密间之曰：“但恐汝诈耳，盖若信实，当授爵赏超于前也。”操以降者，纵或不实，亦不偾事，乃信听之。然后集诸将于中军，置酒高会以待；不觉高兴，仍信口为短歌，以舒其志（上引皆见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江表传）

是年11月13日甲子，晨起江上雾开，晴空风暖，时值前一日冬至，六管灰动，一阳方升，午后酷热，傍晚始有微风自南吹向北岸。午夜时风稍急，黄盖率其所备之船舰，又豫走舸，各系大船后，举帆乘风，引

次俱前，至曹军水寨前二里许，黄盖举火为号，各船舰上战士齐高呼降焉。曹军水城上皆引颈南望，指言黄盖来降。盖乃放各舰舸同时发火，时火烈风猛，顷刻间烟焰张天，延及岸上营寨，曹军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吴军之轻锐者，继盖军之后雷鼓大进，另又造兵自洪湖东北登陆；同时刘备亦自蜀山向乌林峰进攻。操此际以营中多病兵，水寨被烧，陆寨亦将难以为守，乃焚余船移军西走，军士之病者亦扶杖散乱随之。及天明冒暴风豪雨，涉水西行，辎重杖械鞍马尽失，士卒饥寒，病弱不能支持者多死。吴军聚随其后追击，刘备更遣赵云、张飞、关羽各率军驾小船自州陵（今湖北省污阳县）方面向西南以行截击之，曹军士不能作战者多为所虏。

曹操率败兵，西行4日夜，走上华容道（道在今湖北省监利县之西北），而道路一经踏践泥泞不堪，马疲且饥，多滑倒以毙。操军正行之间，会山洪绝松林间之险路，人马不得进，操乃悉使羸兵负草木填道，操欲涉水过之，不得通；适张辽许褚等率一群骑兵接应，操乃换乘骑驰过，弃羸兵于水中，为人马踏藉泥中，死者甚众，操与辽等且战且走，以出松林。操既出松林，奔走郝穴，大喜谓诸将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烧松林，吾徒无类矣！”旋备军果放火烧松林，但操率诸将已去。操寻得南郡江陵守军曹仁之接应，遂从郝穴回江陵。

周瑜在击破乌林之曹营后，即以水军杜截曹操企图逃走船只，并以大军溯江西上，追击曹军运输船只，兵到巴邱（今湖南省岳阳县）探知曹操之船团皆屯在其南四十里之金沙堆（今名曹公洲）一带，瑜以兵绕道偃虬（在今曹公洲西北）截击之，操之长次校尉任峻知不可免，乃举火焚船，自驾小舟以逃。周瑜率其大军直追操至于江陵城下。

第四节 战后之政局

曹操自乌林退回江陵，深惧周瑜刘备等沿汉江而上直取襄阳，以遮断其归路；又虑孙权进攻合淝（今安徽省合肥县北），以策动北方各州郡起而叛己，而变乱许都。乃留曹仁、徐晃守江陵，以阻止刘备与周瑜之追击。曹操退至襄阳，始知刘备与周瑜皆追往南郡。只有兵力单薄之刘琦，向襄阳方向进击，乃留乐进守襄阳，自引军退回南阳。于途中又将自荆州退回之骑兵大部，使张辽率领，由南阳增援合淝。然后操自率主力北还。从此曹操节衣缩食，以优恤孤寡；礼贤下士，以广求贤才，重新准备为图吴之计。

周瑜与刘备追至江陵，知操已留曹仁据守，刘备乃谓周瑜曰："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张飞号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2000人随我，相为从夏水入截仁之后，仁闻吾入，必走。"瑜以2000人与之，另遣甘宁随备绕江陵而西，入据夷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东，曹操于此置临江郡，后刘备改为宜都郡，孙权改夷陵为西欧，隋改彝陵郡）。刘备则志在略取荆州之地，旋即自夷陵渡江南，徇荆州江南诸郡。并表朝廷请以刘琦为荆州刺史，以徇定荆州江北诸郡。未几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皆降于刘备。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督诸郡赋税，以充军实。

周瑜在江陵，屯兵江中，与曹仁隔江对峙。及开甘宁已下夷陵，即令宁据守之，以牵制江陵。曹仁以夷陵威胁江陵，乃分遣步骑进图夷陵甚急。甘宁遣使请救，诸将以兵少不宜分，瑜将吕蒙向瑜建议曰："甘宁有急，宜分兵救之。可留凌公绩（统字）于江陵，蒙与君往夷陵行解围，释急，势亦不久，蒙保公绩能10日守也。"瑜从其计，自与蒙西救之，大破曹仁之兵而还；然后渡江围曹仁于江陵，相战岁余，仁不支委城北走。孙权遂以周瑜为南郡太守，屯江陵。以程普为江夏太守，屯沙羡（在今汉口西南）。刘表旧部雷绪等以备在收容旧部，率2万余人往依之。南郡太守周瑜因分南郡江南部份枝江、郡山两县之地（今其地有石首、公安、松滋、枝江、宜都、长阳等六县）与刘备。备遂屯兵于油江口（后改为公安即今湖北省公安县油江口），军势大振。会荆州刺史刘琦病卒，孙权表刘备领荆州牧，更以其妹妻刘备，用固姻好。刘备亦表孙权为汉车骑将军领徐州牧。此尽鲁肃、诸葛亮政策之实现也。于是荆州遂分为三部份：刘备领有南部四郡，南郡江东二县，及操置之临江郡一部；孙权占有南郡，江夏郡及操所置之临江郡（治夷陵）；曹操割有南阳郡，并以南阳之南部，南郡北部，置襄阳郡，以南阳西部置南乡郡。是即曹、孙、刘争夺荆州之结果也。

曹操自江陵北归之后，孙权即以其准备增援赤壁之兵，自率之以进攻合淝，并遣张昭进攻九江郡（今安徽中东部治在东城，后改义成，今怀远县东北之涡口城），皆无功而还。

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

诣孙权，求都督荆州军事。周瑜因上疏于权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谓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而分羽、飞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犹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雾雨，终非池中物也。”吕范亦劝权留备不使回荆州。但鲁肃以为不可曰：“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操威力实重，我军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借备以土地，使抚安之，以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从肃计，遂调周瑜还镇巴邱（湖南省岳阳县），以南郡借予刘备，以共扼曹操，备因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在南郡，赵云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刘备已据荆州，遂积极谋“隆中策”之实现，而谋取益州日亟。（上引见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及晋宣传汉晋春秋）

第七章 刘备开国之战——袭取蜀汉之战

（一）建安16年（公元211年）12月，刘备因刘璋之迎而入蜀，驻军于葭萌关以击张鲁。17年12月袭刘璋，18年5月围攻雒城，19年5月雒城破，进围成都，6月刘璋降，备领益州牧。

（二）建安213年1月，刘备北攻汉中夏侯渊，24年5月，魏撤汉中守陈仓，备遂有汉中之地。蜀国之建造于以完成。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及袭蜀导因

按刘备袭取益州刘璋，乃在建安17年（公元212年）12月；而赤壁之战，则在建安13年12至12月间。故本节所述刘备袭蜀前之一般形势，乃自建安13年12月至建安16年12月刘备入蜀，3年间之一般大事，兹列述于左：

曹操力面：操于赤壁之战后，感于欲统一全国，必须征服孙权；欲征服孙权，必须有优良之水军。于是，于建安14年3月率军至谯（今安徽省亳县），作轻舟，治水军以图吴。是时，适孙权久围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县北）不下，霹慑州别驾蒋涛之密计所吓退。盖操自江陵北还时，曾遣将张喜率兵自南阳向东赴援合肥，但以路程遥远，久而未至，而合肥被围急。是时扬州（治寿春）别驾蒋济，乃向刺史献计，伪为得张喜书，云张喜步骑四万援军，已到达雩娄（今河南省固始县东南），一面遣主簿迎喜，一面遣三使者先后驰告合肥守军，一使者得入城，二使者故为孙权围城军所得。于是，孙权急烧围城工具，撤军南走。此为建安14年1、2月间之事。

是年秋7月，操乃引水军自涡河入淮，以增强合肥之守备。8月24日下令安抚军民曰："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并增置扬州郡县。又开芍陂（今安徽省寿县南）屯田。按芍陂亦名期思陂，又名安丰塘，为春秋时楚相孙叔敖所筑，以灌溉稻田。后汉王景为庐江太守，又倍垦之，境内益为丰给。曹操为巩固合肥寿春战略据点，故复开芍陂屯田，安抚军民，为长久之计。盖曹操于赤壁之败后，即计划以襄阳、合肥二地为对南方攻守之战略据点，故有此项部署也。至是年12月，庐江人陈兰等煽动群舒蠢动，操使张辽讨平之。然后留张辽与乐进李典将七千人守合肥，自复还军于谯。（上引三国志卷一魏武帝纪）

操在合肥时，因知九江人蒋干，才辩独步于江淮间，又与周瑜同州里，乃密遣往说瑜。瑜此时正围攻曹仁于江陵，干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往江陵说瑜。瑜出迎之，立谓干曰："子翼（干字）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邪？"干曰："吾与足下州里，中间别隔。遥闻芳烈，故来叙阔，并观雅规，而云说客，无乃逆诈乎？"因延干入，为设酒食毕，遣之曰："适吾有峦事，且出就馆，事了别自相请"。后3日，瑜请干与周观营中，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还宴饮；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因谓干曰："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郦叟复出，犹抚其背，而拆其辞，岂足下书生所能移乎？"干但笑终无所言。干还报，谓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关。操图吴之计遂罢。

建安16年3月，操遣司隶校尉钟繇讨张鲁，使征西护军夏侯渊等将兵出河东与繇会师，实则谋先服关中诸将，然后再进图汉中张鲁也。操

此举果引起起关中诸将疑虑，于是马超、韩遂、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粱兴、成宜、马玩等10部，皆举兵拒操，合众10万，屯据潼关。于是，曹操决亲将兵西取关中，乃即一面令安西将军曹仁督谱将拒马超等于潼关，但舍坚壁勿与战。一面部署后方，命五宫中郎将曹丕留守邺，以奋武将军程昱，参丕军事；门下督广陵徐宣为左护军，留统诸军；乐安图渊为居府长生，统留事。是年7月，操以后方各种部署已毕，乃自率诸军西进，8月抵潼关曹仁营，与马超等夹关而阵。操一面阳示以急攻之状，一面潜遣徐晃、朱灵以步骑四千渡蒲坂津（今陕西省朝邑县东大庆关），入据河西为营，巩固自河东渡河之桥头阵地，以掩护主力渡河。

闰8月，操率主力北渡河，遂自蒲坂津渡河西，然后循河连车树梧为甬道而南，以击马超等军之北侧翼。因此，超等被逼退拒渭口（渭水入河之口，在令华阴县东北）。操又多设疑兵，以眩惑超等；而潜以舟载兵入渭水作浮桥，夜分兵南渡渭水结营，再威胁超等军之左侧，而绝其归途。超等发觉，即夜攻营，操伏兵击破之。超等退屯渭南（今渭南县东南四里），遣使求割河以西请和，操不许。9年，操进军悉渡渭为坚垒，超等数挑战，不出。于是，超等又固请割地，求送质子为和。贾诩以为可伪许之；操再问计策，诩曰：“离之而已”。操曰：“解”。操与韩遂有旧交，适是时韩遂请与操相见。操乃约期在阵前相见，至期操遂交马相语移时，并未言及军事，但说京都旧故。语言间，操拊手欢笑。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遂曰：“无所言也”。因此，超等疑之。他日操又与韩遂书，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猜疑之。操乃与克日会战，操以虎骑两翼布阵。及战，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然后从两翼虎骑夹击之，而超、遂两军因互相猜忌，不相救援，操遂大破之，斩成宜、李堪等。遂、超败走，奔過凉州（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杨秋奔安定（今甘肃省镇原县南五十里）。10月，操自长安进攻安定，秋降；操复其爵位，使留抚其民，12月，操自安定还邺，留夏侯渊屯长安；以议郎张既为京兆尹。既而召远流民，兴复县邑。于是，关中遂定。（上引三国志卷十贾诩传）

孙权方面：建安14年3月，孙权围合肥，为蒋济用计所退。是年12月曹仁委城北走，周瑜遂克江陵。孙权、乃以瑜为南郡太守治江陵，以程普为江夏太守治沙羡，吕范领彭泽太守，吕蒙领寻阳（今江西省九江江县）令。会刘琦卒，权以刘备领荆州牧，以其妹妻备，周瑜分江南岸地给备居之。刘备亦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

建安15年12月，刘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遂至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县）见孙权，求都督荆州。瑜上书于权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随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吕范亦劝留之。孙权以曹操在北方，当广擥英雄，不从瑜、范之计，备得以还公安（今湖北省公安县东北油江口）。旋周瑜谋取蜀，至京口向孙权献策曰：“今曹操新

败，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相事也。乞与套威（孙璟）俱进取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从之。周瑜还江陵准备西征军事，途中得疾甚，为害与权曰：“脩短命矣，诚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复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场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瑜至巴丘（今湖南省岳阳县）卒，年306。于是，孙权取蜀之计暂辍，而以鲁肃为奋武校尉，代瑜将兵，令程普领南郡太守。鲁肃劝权以荆州借刘备共拒曹操，权从之。权已将荆州（即南郡）借让刘备，乃分豫章为鄱阳郡（治今江西省部阳县），分长沙为汉昌郡（洽今湖南省平江县西）；复以程普领江夏大守，鲁肃为汉昌大守，屯陆口。

于是，孙权再谋取蜀，因遣使于刘备曰：“米贼张鲁，据王巴汉，为曹操耳目，规图益州。刘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则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进讨张鲁，首尾相连，一就吴楚，虽有十操，无所忧也。”刘备乃集诸将谋议，有以为“宜听许吴，吴终不能越荆州有蜀，蜀地可为已有。”荆州主簿殷观则曰：“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吏蜀，逞为吴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赞其伐蜀，而自诠所据诸郡，未可与动，吴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如此进遏之计，可以收吴蜀之利。”备从之报权。但权决心取蜀，乃欲独取之，并即遣孙瑜将水军进驻夏口。于是，刘备致书拒权曰：“益州民富强，土地险阻，刘璋虽弱，足以自守。张鲁虚伪，未必尽忠于操。今暴师于蜀汉，转运于万里，欲使战克攻取，举不失利，此吴起不能定其规，孙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虽有不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议者见操失利于赤壁，谓其力屈，无复远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将欲饮马于沧海，观兵于吴会，何肯守此，坐须老乎？今同盟无故自相攻伐，借枢于操，使敌承其剩，非长计也。”又遣使谓孙瑜曰：“汝欲取蜀，吾尝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乃使诸葛亮关羽屯兵江陵，张飞屯兵秭归（即今县），备率兵自驻潺陵（今湖北省公安县油江口西25里）以拒孙瑜水军之西上。由是，孙权取蜀之举，卒为所阻而罢。（上引语见后段末注）是时，苍梧太守吴巨与交州刺史（治今广西省苍梧县）零陵辍恭（皆为刘表所任）不和，巨举兵逐恭，恭走还零陵；孙权乃乘此时机收交州置为领域，以鄱阳太守临淮步陟为交州刺史，治笼编（令越南河内）吴巨犹外附内违，陟诱而斩之。时朝命以士燮为绥南中部将董督七邵领交耻太守（治今越南东京州）。按士燮苍捂人初为交阯太守，交阯刺史朱符为夷贼所杀，州郡扰乱，燮乃表其弟壹领合浦太守（治今广东省合浦县），领九真太守（治今越南北部），武领南海太守（治今广东省番禹县），震服百蛮，朝廷乃以南阳张津为刺史，旋津又为其将区景所杀，刘表乃以赖恭代津为刺史。及恭为吴巨所逐，朝廷又以燮董督七郡，而燮遣子入质内附会吴；于是吴孙权加燮左将军，遥尽就有交州之地。（上引诸语见：三国志周瑜、鲁肃、及先主备等传）

刘备方面：赤壁之战后，周瑜以江南岸地予备屯军，备乃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于是，备乃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徇四郡，武

陵（郡治今梱南省常德县西）太守金旋，长沙（郡治今长沙县）太守韩玄，桂阳（郡治今湖南省耒阳县）太守赵范，零陵（那治今湖南省零陵县北二里）太守刘度皆降。建安14年12月刘琦卒，群下推备为荆州牧。于是，刘备以公安地少，不足以容众为词，往见孙权于京口，求都督荆州，权遂表备领荆州牧。及周瑜卒，鲁肃代瑜，备还顿有南郡，旋阻孙瑜伐蜀，而积极谋自取之。

当曹操下荆州时，声威所及，益州牧刘璋，乃遣其别驾张松致敬于操。操是时以遽下荆州，三分天下已有其二，遂自骄伐，故不复存录张松，主簿扬修劝操辟松，而操竟又不听。松由是怨操，及归乃劝璋绝操而结刘备。璋曰：“谁可使者”？松因与法正友善而荐之。是时法正正不得志于刘璋，及使刘备遗，乃密与松谋，欲奉戴备为州主。会刘璋闻曹操遣钟繇取汉中，内怀恐惧，因用张松之谋，迎刘备为助以取张鲁，备遂获得袭蜀之机缘。

第二节 刘备开国方略

建安12年（公元107年）冬，刘备因司马徽徐庶之庶之言，三访诸葛亮。既见，备问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乃献策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远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取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抚和戎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执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为诸葛亮在隆中熟筹之策，刘备闻而善之。及建安16年12月，曹操已平定关中，法正奉刘璋命，使于刘备，因阴献策于刘备曰：“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张松，州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凭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备疑未决。庞统因言于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奈何？”统曰：“乱离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古人所贵，若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从之，于是袭取蜀汉之计定。

第三节 袭蜀作战经过

建安16年（公元22年）12月，益州牧刘璋，闻曹操将遣钟繇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别驾从事蜀郡张松说璋曰：“曹公兵强，无敌于天下，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谁能御之者乎？”璋曰：“吾固忧之而未有计”。松曰：“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今州诸将鹿义、李异等，皆恃功骄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则敌攻其外，民攻其内，必败之道也。”璋然之。遣法正孟达将四千人迎刘备。璋主簿巴西黄权谏曰：“刘左将军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闭境以待时清”。刘巴亦谏曰：“备雄人也，入必为害。”璋不听，出权为广汉长。从事广汉王累，自倒悬于州斗以谏，刘巴复谏，璋一无所纳。遂令法正孟达各将二千人迎备，并勑在监供奉刘备，前后赂遣以巨亿计。刘巴因是闭门称疾。（先主黄权传）

一、作战经过

刘备取蜀之计已定，及法正来迎，因问“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正皆具言之，并献地图山川处所。于是，俯以关羽董督荆州事，与张飞、赵云留守荆州，而以诸葛亮辅之。自与庞统法正率黄忠，魏延等将步卒数万入益州，备至巴郡（今四川江北县），巴郡太守严颜拊心叹曰：“此所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者也。”备遂自巴郡沿垫江水（今浩水）至涪（今绵阳县）。璋率步骑三万余人，车乘帐幔，精光耀日，往会之。张松令法正曰备及庞统进说，便可于会所袭璋。备曰：“此大事不可仓卒。”庞统曰：“令因会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坐定一州也。”备曰：“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备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备亦推璋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所将吏士，更相从适。欢饮百余日，璋增备兵厚加资给，使北上击张鲁。又令督白水军（白水关守军，即杨怀、高沛之军。白水关在今四川省昭化县西北一百二十里川陕交界处，故曰水县界，西接阴平，东达宁羌，最为要隘）。于是，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齐货甚盛。璋还成都，备与庞统法正北至葭萌（今昭化县东南五十里），未即讨鲁，而厚树恩德，以收众心。（上引语见三国志卷30七庞统法正传及华阳国志）

建安17年12月，刘备在葭萌已屯兵1年，庞统复献计曰：“今阴选精兵书夜兼道，侄龚成都；刘璋既不武，又素无豫备，大军卒至，一举便定，此上计也。杨怀、高沛，璋之名将，各杖强兵，据守关头，闻数有牋谏璋，使发遣将军还荆州。将军遣与相闻，说荆州有急，欲还救之；并使装束，外作归形；此二子既服将军英名，又喜将军之去计，必乘轻骑来见将军，因此执之，进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计也。退还白帝（今四川省奉节县东白帝山上）连引荆州，徐还图之，此下计也。若沉吟不去，将致大困，不可久矣。”（三国志卷30七庞统传）

是时曹操正亲统大军征孙权于潘须（今安徽省巢县东南东关镇），攻破权江西营，擒权都督公孙阳，权因呼备自救。于是，备乃采其中计，一面准备行装，一面致书刘璋曰：“曹公征吴，吴优危急，孙氏与孤本为唇齿。又乐进在青泥（失考。按当在今浊北省襄阳县东南。）与关羽相拒，今不往救羽，进必大克，转侵州界，其优甚于鲁。鲁自守之贼，不足虑也。”乃从璋求万兵及资宝，以焉东归之费。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给半。张松闻之，致书与备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奈何释此去乎？”松兄广汉太守肃，恐祸及己，因发其谋，于是璋收斩松，并敕关戍诸将文书，曾勿复与刘备关通。（上引语见三国志卷30二先主备传）

璋自水军餐杨怀高沛，闻备东归，果来见备，备责其无主客之礼斩之。因激怒其众曰：“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勤瘁，不遑事居。今积币财之藏，而悋于赏功，望士大夫为出死力战，其可得乎？”乃勒兵进据怀、沛所据之关头并其兵，质其诸将士卒妻子。然后一面召诸葛亮率兵入蜀，一面留中郎将南郡霍峻率数百人守葭萌城，以黄忠、卓膺为前锋，自率主力在后继进，疾趋成都，所过辄克，逐至涪（即今绵阳）。（引语先主传注引魏书）

刘备至涪，以功在目前，大喜；因大会诸将，置酒作乐，谓庞统曰：“今日之会，可谓乐矣。”统以其功未就而骄，乃抑之曰：“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备醉怒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旨不当，宜速起出！”于是，统逡巡退。备寻悔，请还就复故位；统不顾谢，饮食自若。备谓曰：“向者之谕，阿谁为失？”统曰：“君臣俱失。”由是复喜。（上语见三国志庞统传）

益州从事广汉郑度闻刘备举兵南攻时，向刘璋献计曰：“左将军悬军袭我，兵不满万，士卒未附，军无辎重，野谷是资。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仓库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此必擒耳。”备闻其计，甚忧之，以问法正。正曰：“璋不能用，无忧也。”璋果谓其群下曰：“吾闻拒敌以安民，未开动民以避敌也。”遂不用度计。（上引三国志法正传）

建安18年5月，刘备自涪向成都进击，璋乃一面遣其将扶禁、向存等将万余人由阆水（今嘉陵江）上，攻霍峻于葭萌，一面遣刘瞶、冷苞、张任、邓贤、吴懿等拒备。瞶等皆败，退保绵竹（今德阳县北），吴懿降。璋复遣护军南阳李严，江夏费观督绌竹诸军拒备；严观等，竟又率其众降。于是备军益强，分遣诸将平定属县。刘瞶张任与璋子循退守雒城（今广汉县），备进军攻之，任勒军出战于雁桥（广汉县城南雁江之桥），军败任死，备遂围雒城。

建安19年诸葛亮在荆州得刘备召令，乃留关羽守荆州，自与张飞、赵云将兵泝流西上，克巴东（今湖北省巴东县西北江北岸）。是年闰5月，至江州（今四川江北县），攻巴郡破之，擒巴郡太守严颜。张飞呵颜曰：“大军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曰：“卿等无状，侵夺我

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牵出斩之。颜容止不变曰：“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以上三国志卷30六张飞传）

巴郡已破，诸葛亮乃分遣赵云从外水上江阳（今泸县）、为（洽武阳，今彭山县东十里），遣张飞定巴西（令关中县西）、德阳（今辽宁县）各郡县，然后与刘备会师攻成都。

是时，刘备围攻雒城已将1年，犹未攻下，庞统在围城之攻战中，为流矢所中卒，时年30六。备使法正致书刘璋，为陈形势强弱，曰：“……今国事已危，祸害在速。……明将军本心，正之所知也，实为区区不欲失左将军之意；而卒至于是者，左右不达英雄从事之道，谓可达信黩誓，而以意气相致，日月相迁，趋求顺耳悦目，随阿遂指，不图远虑，为国家深计故也。事变已成，又不量强弱之势，以为左将军县远之众，粮谷无储，欲得以多击少，旷日相持。而从关至此，所历辄破，离宫别屯，日自零落。雒下虽有万兵，皆坏阵之卒，破军之将，若欲争一旦之战，则兵将势力，实不相当。各欲远期计粮者；今此营守已固，谷米已积，而明将军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敌对遂多，所供远广，愚意计之，谓必先竭，将不复以持久也。空尔相守，犹不相堪；今张益德数万之众，已定巴东，入犍为界，分平资中、德阳，三道并侵，将何以御之？本为明将军计者，必谓此军县远无粮，馈运不及，兵少无继。今荆州道通，众数十倍；加孙车骑遣弟及李异甘宁等为其后继。若争客主之势，以土地相胜者；今此全有巴东、广汉、为，过半已定，巴西一郡，复非明将军之有也。计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坏，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为乱者，十户而八；若敌远，则百姓不能堪役，敌近则一旦易主矣，广汉诸县，是明比也。又鱼腹（今四川奉节县东北，后移治白帝城）、关头（即白水关），实为益州福祸之门，今二门悉开，坚城皆下，诸军并破，兵将俱尽，而敌众数道并进，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势，昭然可见。斯乃大略，其外较耳；其余屈曲，难以极辞也。以正下愚，犹知此事不可复成，况明将军左右明智用谋之士，岂尝不见此数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虑远图，英肯尽心默反计耳。若事穷势迫，将各索生，求济门户，辗转反覆，与今计异，不为明将军尽死难也；而尊门犹当受其忧。正虽获不忠之谤，然心自谓不负圣德，顾惟分义，实窃痛心！左将军从举兵以来，旧心依依，实无薄意；愚以为可图变化，以保尊门。”璋不答。雒城旋溃，备遂进围成都。诸葛亮、张飞、赵云皆至会师。是时霍峻已击破扶禁向存之围，斩存。马超亦自氐中来降备，备使在城北攻城，城中为之震怖。（法正书见三国志卷三七法正传）

时成都城中，尚有精兵3万，谷帛足支2年，吏民咸欲死战。刘备围城数10日不下，乃遣从事中郎涿郡简雍入说璋降，璋从之，乃宣告城中曰：“父子在州20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3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6月，遂与简雍同与而载，出城降备。群下莫不流涕。备乃迁璋于公安，尽归其财物，佩以振威将军印绶。

二、战后概况

刘备已入成都，益州大定。备乃大赏功勋，及收用璋之大吏以安人心。其措施概如下述：

赏功：

（一）置酒大飨士卒，尽取成都城中公私所有金银，分赐将士。分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

（二）备自领益州牧。

三、赏诸将吏：①以军师中郎将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益州太守（治成都）②拜庞统父为议郎，追赐统为关内侯，谥曰靖侯，并录统子弟等皆为吏。③拜法正为蜀郡太守（治成都）外就都畿，内为谋主。④张飞领巴西太守。⑤黄忠为讨虏将军。⑥赵云为翊军将军。⑦马超为平西将军。⑧魏延为牙门将军。⑨简雍为昭德将军。⑩孙乾为秉忠将军。糜竺为安汉将军。分广汉郡为梓潼郡，霍峻为梓潼太守，裨将军，收用刘璋大吏：（一）拜刘璋益州太守董和为掌军中郎将、并署左将军府事。（二）广汉长黄权为偏将军。（三）蜀郡太守许靖为左将军长史。（四）鹿义为司马。（五）李严为为太守。（六）费观为巴郡太守。（七）刘巴为西曹掾。（八）广汉彭漾为益州治中从事。

刘备任用以上诸人，董和、黄权、李严等，曾本刘璋所信用。吴懿，费观等，为璋之婚亲（璋兄瑔娶吴懿妹，璋母费氏）。彭漾，璋之所摈弃；刘巴，璋宿昔之所忌恨者。备皆处以显任，尽其器能。因之，有志之士，无不竟劝，益州之民，是以大和，人心大定。

处理财政土地：（一）当刘备围成都时，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与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财物。因是，军用不足，备甚优之。刘巴乃建议曰：“此易耳。但当铸值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因此，数月之间，府库充实。（二）益州已定，时议者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兹外西地桑田，分赐诸将。赵云驳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返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桑，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不宜夺之以私所爱也。”俨从之。人心益固。

北取汉中作战经过

（一）战前一般形势

曹操方面：建安16年（公元211年）12月，曹操已击走马超、韩遂，安定杨秋降。此际操忽得河船民田银、苏伯煽动幽冀反叛之报，乃留夏侯渊镇长安，而自急还邺。未至，其子丕既遣将军质信时平之。明

年1月操至邺，奉诏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尔何故事。5月，乃诛卫尉马腾（马超父）并夷三族。7月，夏侯渊又讨下马超余众于蓝田，及县韩遂马超余梁兴等，关中益固。10月操亲统大军号称四十万攻吴。时司空军祭酒董昭献议“丞相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旬彧“以为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悦彧。及击吴，乃表请彧劳军予谯，因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操军指向濡须时，彧以疾留寿春，饮药而卒。盖此时操已急谋代汉，故凡大臣，顺者擢之，逆者死之。（上引见三国志卷十荀彧卷十四董昭等传）

建安18年1月（前月刘备自葭萌袭成都），曹操进军濡须口，号称步骑四十万，攻破孙权江西营，获权都督公孙阳，又令乐进自襄阳进兵于青泥（失考，按当在襄阳县东南）。孙权将兵七万御之，相守月余，操见其舟船器仗，军伍整齐，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如刘景升儿子，豚犬耳。”权致书与操曰：“春水方生，公宜远去。”别纸言：“足下不死，弧不得安。”操见东吴实不易攻取，乃语诸将曰：“孙权不欺狐，”遂撤军还。是时，操乃以诏并十四州复为九州。十四州，即司隶豫、冀、兖、徐、青、荆、扬、益、梁、雍、并、幽、交。复为九州，即割司隶之河东、河内、冯翊、扶风，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凉州所总，悉入雍州，又以司隶州之京兆入焉。以司隶之弘农、河南郡入豫州，交州入荆州。共省去司、凉、幽、并、交五州，而为九州。盖操自领冀州牧，欲广其所统，以制天下也。是年5月，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加九锡。

当曹操定关中，留夏侯渊镇长安，而自还邺时，参凉州军事杨阜言于操曰：“马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军还设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及操还邺。建安18年1月马超果率羌胡击陇上诸郡县，郡县皆应之，惟冀城（今甘肃省甘谷县南，当时涣阳郡及凉州刺史皆治此）出凉州刺史韦康与杨阜固守，超遂尽兼有陇右之众，张鲁复遣大将军杨昂助之，凡万余人。攻冀城。康等守冀城自1月至8月，救兵不至，乃遣别驾阎温告急于夏侯渊。温出城为超兵所获，杀之。于是，韦康与太守欲降，杨阜哭不听，开城迎超。超入城遂杀韦康及太守，自称征西将军领并州牧督凉州军事。曹操使夏侯渊救冀，未到而冀城降。渊军距冀二百余里，超引军迎战，渊军不利，氐王千万（氐王名）亦叛屯兴国（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响应超，夏侯渊遂引军退还长安。时适扬阜丧妻，就超求假以葬之，遂至历城（今甘肃省成县北）说其外兄抚夷将军天水姜叙举兵讨超。叙乃与同郡赵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谋讨超；又使人密入冀城结安定人梁宽，南安（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北渭水之北）人赵衢，使为内应。是年9年，阜与叙进兵入南城（今天水甘谷县间），昂、奉则据祁山（今西和县西北）共讨超。超闻之大怒，赵衢因谲说超，使自出击之。超出，衙与梁宽闭冀城门，尽杀超妻子。超进退失据，乃进袭历城破之。复为杨阜所败，乃南奔张鲁。韩遂在显亲（今天水县西北），坐视不救，盖因前次渭水之战，遂、超为操所离间，故互怀猜忌，各不相显也。操封讨超之功，侯者十一人，特赐杨阜爵关内侯。是役，操因杨阜等之力图内向而有陇右南部之地。

马超已走汉中，依张鲁，鲁以超为都请祭酒，欲妻之以女，有谓鲁曰："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鲁乃止。明年建安19年春，马超从张鲁求兵北取凉州，遂进围祁山。姜叙告急于夏侯渊，渊以张郃将步骑五千为前军，从陈仓狭道（今陕西省宝鸡县南）入，自率主力辎重为后继，大破马超。渊因欲袭韩遂于显亲，遂知之，退走；渊收遂军粮，追至略阳（今秦安县东北九十里），轻兵袭长离（长离水在秦安县，按长离因水得名，渊所攻当在今通渭县东南），攻烧羌屯。长离诸羌，多在遂军，闻长离被攻，各还种落；遂乃趋救长离，渊因纵击大破之，遂退走金城（今兰州）。渊乃进围兴国，氐王千万奔投马超，余众悉降。渊又转击高平屠各（今甘肃省固原县等地），皆破之。于是，操尽有陇右北部之地。

是年10月，曹操又便夏侯溉自兴国纣袍罕（今甘肃省临夏县）宋建，月余拔之，斩建。乃另遣张郃等奉兵渡河，入小湟中（今青海省西宁市东南湟水两岸一带地区），河西诸羌皆降，于是陇右尽入曹操势力范围。是时，刘璋降，刘备方入成都。

建安210年（公元215年）3月，曹操以陇右悉定（今兰州以南诸地），遂欲南取汉中。乃自将夏侯渊、夏侯惇、张郃、徐晃、朱灵等自陈仓出散关进击张鲁，将自武都（今甘肃省礼县西和县，即欲自祁山沿西汉水上游东下）入氐（今成县境。白马氐豪族杨氏，居今成县境仇池上），氐人塞道抗拒，操乃遣徐晃、朱灵为前军，攻破之。4月，操至河池（今微县西南），氐王宝茂率众万余据险拒御，5月操攻破屠之。是时，金城诸将麴演、蒋石等，亦慑于张郃等之攻势，共斩韩遂首降。

是年7月，曹操进军至阳平（今陕西沔县西北），张鲁遣其弟卫率数万人据关拒之。操军攻之不能拔，乃引军退（8月孙权率军十万攻合肥），卫等因懈守备，操乃密遣将解僄高祚等乘险夜袭之，大破张卫军。张鲁闻阳平关已陷，欲降。鲁功曹巴西阎圃曰："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濩（夷族。居今四川省平昌、营山、渠等县地），赴朴胡（夷族。居今四川宕水上游及南江县等米仓山脉一带）与相拒，然后委质，功必多。"于是，鲁乃退保南山，自米仓道入巴中（今四川省巴中县），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弃城而去。曹操乃不战而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乃遣使慰喻鲁。9年，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杜濩等举巴夷良民来附。11月，张鲁亦自巴中出降。于是，拜鲁为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为列侯。复汉宁郡为汉中郡，分汉中之安阳、西城为西城郡，置太守，分锡上庸郡，置都尉。又分巴郡，以朴胡为巴东太守，杜濩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

曹操已定汉中及巴诸地，丞相主薄司马懿因献计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郡人未附，而远争江陵（与孙权争，见下），此机不可失也。今克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可失时也。"操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刘晔亦曰："刘备人杰也，

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少缓之，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优。”操以关陇不稳，孙权又常大举攻合肥，诚恐深入蜀中作战难返，故不从懿晔之计。居7日，有蜀郡降者，说蜀1日数十惊，守将虽斩之，而不能安。操因问晔曰：“今尚可击不？”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12月，操乃以夏侯渊为征西将军督张郃徐晃等屯汉中，自引大军还邺。夏侯渊在汉中，一面使徐晃守阳平关，一面使张郃别将诸军下巴东巴西二郡，徙其民于汉中，进军宕渠（今四川省渠县东北）。建安21年5月曹操进爵为魏王。明年1月魏王操军居巢，2月攻濡须，3月引军还邺，而留夏侯惇都督曹仁张辽等二十六军屯居巢。孙权因遣使请降于操，于是吴魏修好。孙权决心争夺荆州亦自此始。（上引语见晋书卷一宣帝纪及三国志十四刘晔传）

刘备孙权方面：建安16年12月，刘备入益州时，孙权闻之，曰“猾虏乃敢挟诈如此”。乃遣舟迎其妹，欲因而携备子禅还吴。张飞赵云勒兵截江阻之，孙夫人不得已还禅，而自回吴。是年，孙权移都秣陵，改称建业。18年春，孙权兴曹操大战于濡须口（见前）。19年闰5月，孙权攻曹操之庐江太守朱光于皖城克之，从此魏对吴之战略据点，遂以淮水区域之合肥、寿春为最前线。（三国志吴书卷九鲁肃传）

建安20年4月，孙权以刘备已定蜀，乃遣中军司马诸葛瑾向刘备索还荆州诸郡，备婉拒之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相与耳。”权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虚辞引岁也。”（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

当刘备入蜀时，使关羽守江陵，与鲁肃为邻，羽数与肃生疑贰，肃为执行其联刘抗曹之策，常以欢好抚之。及至刘备拒还荆州，是年5月，孙权乃即置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关羽竟尽逐之。因是，权大怒，遣吕蒙将兵二万，以取三郡。蒙移书三郡，长沙、桂阳望风归附，惟零陵太守郝普守城不降。于是，刘备闻之，急自成都引兵五万至公安，并过关羽将兵三万争夺三郡。孙权亦自秣陵进驻陆口，指挥诸军，并使鲁肃将万人屯益阳（今县西）以拒羽，同时飞书召吕蒙，使弃零陵，急还助北，准备大战。蒙得书秘之，夜召诸将授以方略，宣言：“晨当攻零陵。”又使郝普故友南阳邓玄之曰：“郝子太闻世间有忠义事，亦欲为之，而不知时也。今左将军在汉中为夏侯渊所围，关羽在南郡，至尊（孙权）身自临之；彼方首尾倒悬，救死不给，岂有余力役营此哉？今吾计力度虑，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后，身死何益于事？而令百岁老母戴白受珠，岂不痛哉？度此家（指普）不得外问，谓援可恃，故至于此耳。君可见之，为陈祸福。”玄之见普，具宣蒙意。普惧遂出降。吕蒙乃留孙河守零陵，自即引军赴益阳。（上引见三国忐卷五十四吕蒙传）

鲁肃取进至益阳，与关羽对峙。肃邀羽会语，各驻兵马相距百步，双方诸将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以不反三郡。羽曰：“乌林之役（赤壁之

战），左将军身在行间，戮力破敌，岂得徒劳无一块土？而足下来欲收地邪？”肃曰：“不然！始与豫州观于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无有處所，不爱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荫，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堕好；今已藉手于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羽无以答。适是时曹操将攻汉中，刘备惧失益州，乃遣使求和于权。权复命诸葛瑾为使，分荆州以湘水为界，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属吴；南郡、武陵、零陵三郡属蜀，遂复盟好。（上引语三国志吴书卷九鲁肃传及注吴书）

刘备已与吴和，即引兵还江州，并遣黄权将兵迎张鲁，鲁已降曹操。时操亦已还邺，但夏侯渊，张郃频侵巴界。刘备乃率张飞将精卒万余进兵宕渠（今四川省渠县东北），与郃等战于瓦口（失考，按当在今四川省平昌县地区），相拒五十余日，飞袭击郃大破之。郃收兵还南郑，刘备亦还成都。孙权则于是年8月率众十万围合肥。

综观以上魏蜀吴三国，皆处于两面作战之困境。曹操于建安24年4月自陈仓出散关，征张鲁，5月平诸氏，7月克汉中，9年巴地各夷族附操，11月张鲁出降。刘备则于建安19年夏定蜀，建安210年五、6月间与孙权争荆州，11月使黄权击巴夷朴胡、杜濩，12月张飞破张郃于宕渠。孙权于建安18年1月为曹操所败于濡须口。建安19年5月，权攻皖城克之。7月，曹操举十万之众攻权，无功而还。建安210年夏，与刘备争持荆州，8月皋兵十万围合肥。建安21年春曹操进爵为魏王。建安二12年操举大军进驻居巢，攻濡须，孙权请降。此为刘备取汉中之战前，魏、蜀、吴三国互相争持与牵制之概况。

三、作战经过

建安二12年（公元217年）10月，法正说刘备曰：“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远，力不足也，必将内有优偪故耳。今策渊郃方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刘备善其策遂发兵。（三国志蜀书卷七法正传）

建安213年春，刘备使诸葛亮总理后方兵粮补给，自偕法正率诸将进兵。别遣征虏将军领巴西太守张飞，平西将军马超等率二将吴兰、雷同等先攻下辨。自率翊军将军赵云，讨虏将军黄忠，牙门将军魏延等主力，向南郑进攻。

是时，曹操之征西将军夏侯渊与益州太守赵颙进驻阳平关，以平寇将军徐晃守马鸣阁道，边寇将军张郃守广石（今陕西省沔县西），以厉锋将军曹洪，偏将军曹真，骑都尉曹休守武都（治下辨——今甘肃省成县西30里）。

是年2月吴兰、雷同攻下辩，张飞进兵固山（失考，按当为今成县南之山），声言将断曹洪军之后（张飞、马超似为溯嘉陵江北上），因是洪军众议狐疑。曹休曰："贼实断道者，当伏兵潜行。今乃先张声势，此其不能明矣。及其未集，促击兰；兰破，飞自走矣。"洪从之，进击兰等，破斩之。3月，张飞、马超引兵退走。

4月，刘备本军攻马鸣阁（今四川省昭化县西北），另遣将陈式等十余营绝马鸣阁道，徐晃别遣将击破之，式军投山谷死者甚多。曹操闻之，甚喜！假晃节，令曰："此阁道，汉中之险要咽喉也。刘备欲断绝外内，以取汉中，将军一举克夺贼，计善之善者也。"但马鸣阁旋仍为刘备所攻破。（以上三国志魏书卷九曹休、卷十七徐晃传）

刘备已破马鸣阁，遂进击阳平关及广石；夏侯渊与徐晃张郃集兵拒之。备攻之，不能克，遂急书发益州兵。诸葛亮以发兵事问从事为扬洪，洪曰："汉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亮乃尽发蜀中之兵，增援于刘备。是时，魏王操以汉中危急，虽北方有代郡上谷乌桓之反叛，乃决计自将以击刘备，而另遣其子曹彰击乌桓。操7月发自邺，9年至长安。但10月宛守将侯音又反，与关羽遥为声势，因此操竟不能至汉中。（上引三国志蜀书卷十一杨洪传）

建安24年1月，刘备以攻阳平关广石不下，乃引军南渡沔水，缘山稍前，营于定军山（今陕西省沔县东南）。夏侯渊引兵争山，筑围与备军相对峙，以张郃守东围，自率轻兵守南围。备乘夜烧围鹿角，先攻东围，郃战不利，渊乃分所将郃。于是备用法正之言，率黄忠等急袭夏侯渊之南围，渊兵甚精，黄忠劝率士卒摧锋进击，渊军大败，逐斩渊及赵颙。

夏侯渊已死，张郃乃急还军守阳平关。是时，魏军中以新失元帅，军中扰扰，不知所为。幸督军杜袭与渊司马太原郭淮收敛散卒，而号令军中曰："张将军国家名将，刘备所惮，今日事急，非张将军不能安也。"遂权推郃为主将。郃乃出勒兵按阵，诸将曾受郃节度，军心乃定。（上引三国志魏书卷十七张郃传）

明日，刘备复渡汉水（即沔水）攻阳平关。是时魏诸将以为众寡不敌，欲依水为障以拒之（直接配备）。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敌，非算也。不如远水为阵（间接配备），引而致之，半济而后击之，备可破也。"郃乃一面用淮计布阵，一面报于魏王操。操善之，遣使假郃节，并复以郭淮为司马。刘备见魏军远水布阵，因迟疑不敢渡。（上引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六郭淮传）

3月，魏王操在长安，以曹仁已破斩叛将侯音，屠宛，南阳之乱悉平（时曹仁屯兵樊城，操在长安令仁回军讨平之），乃自长安出斜谷道，先以军遮要害之处，掩护前进，以临汉中，而另调遣平寇将军徐晃屯兵宛城，以助曹仁，而防关羽之进攻。刘备闻之曰："曹公虽来，无能

为也，我必有汉川矣。”乃集中兵力，扼险拒守，终不交锋。操还粮于北山下，备使黄忠引兵袭取之。忠过期未还，又遣赵云将数十骑前往侦视，适魏军扬兵大进，云猝与相遇，即前突其阵，然后且斗且却。魏兵散而复合，追至云之营下，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魏兵疑云有伏兵，引去；云又雷鼓震天，惟以劲弩于前追射之。魏兵惊骇，自相蹂践，坠汉水死者甚多。明日，备至云营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上引三国志卷二先主传卷六赵云传注）

曹操与刘备对峙月余，魏军士卒多有逃亡。是年5月，操乃尽撤汉中诸军回长安，而以张郃守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县东），又遣曹真至下辨，撤曹洪等军还陈仓。同时为虑刘备北取武都白马氏以逼关中，乃遣雍州刺史张既赴武都，撤迁氏民五万余落居于扶凤天水界。刘备遂有汉中。

四、战后概况

刘备东取房陵（今湖北省房县）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备已有汉中，即于是年5月，使宜都太守扶凤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杀房陵太守蒯祺。又遣养子副军中郎将刘封自汉中乘沔水而下，以统达军，会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郡降，备加耽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以耽弟仪为建信将军西城（今陕西省安康县西北）太守。又令关羽进攻襄阳樊城（详见次节）以打通与荆州之连系。欲于尽有荆益两州后，北取凉州，以实现诸葛隆中之策。

河西诸郡叛乱：魏已撤汉中武都之守，而退保陈仓，于是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今青海省西宁县）演等地方势力，各据郡自号将军，且相互攻击。颜俊遣使送母子诣魏王操为质以求助，操以问张既，既曰：“俊等外假国威，内生傲悖，计定势足后，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两存而斗之，犹卞庄子之刺虎，坐收其敝也。”操从之，俊、鸾等遂自相攻杀。（上引三国志魏书卷15张既传）

刘备自称汉中王：是年7月，备自称汉中王于汉中，立子禅为太子，拔擢牙门将军义阳魏延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镇守汉中。主簿雍茂、西曹掾刘巴谏曰：“今中夏人情未一，闻将军在蜀，四方多廷颈以期望于将军。如将军即王此汉中，划地自封，则示天下以不广矣。”备不纳。雍茂再谏，备竟借他事以杀之。备还成都，以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军师将军如故。又为自固之计，于白水开起，至成都之间，大起馆舍，巩亭障，计四百余区。至于关羽与东吴间之情势，竟不顾及之，故关羽于被吕蒙所袭时，蜀竟毫无援救之措施，此可见刘备之器量。由于器量之小，则为谋不远，荆州之所以轻失者，此实为最重大原因之一也。（上引语三国志蜀书卷九刘巴传注）

第八章 吴蜀争夺荆州之战——荆州及猇亭之战

（一）安24年（公元219年）7月关羽攻魏襄樊久未克，闰10月吴吕蒙袭荆州克之，12月擒斩关羽父子，荆州复为东吴所据有。从此吴蜀破裂，互成敌国。

（二）黄初2年，蜀章武元（公元221年）6月，刘备举兵伐吴，对峙于猇亭。黄初3年闰6月，吴陆逊进击破之，刘备退走白帝城。黄初4年3月刘备卒于永安（即白帝城），蜀之国势因此大衰。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及作战导因

建安19年（公元224年）8月，刘备取成都，建安24年5月，备再克汉中，魏、蜀、吴三国鼎峙之势完全告成，既如前章所述。

至于吴蜀争夺荆州之明争暗斗，则自赤壁之战后即已开始。

建安15年（公元210年）12月，周瑜卒后，孙瑜代周瑜统兵，仍欲实现周瑜西进之策；而溯江西上时，为刘备所阻而罢。建安16年12月，刘备率兵入蜀时，孙权愤然曰：“猾虏何敢挟诈如此！”并即遣舟船迎还其妹孙夫人，且欲携备子禅以归为质。建安210年夏，孙权以刘备已袭得益州，遣使索还荆州，备复拒之。因之权即遣兵袭取长沙、桂阳、零陵三郡，鲁肃与关羽两军则在益阳对峙；刘备又自成都急率兵东下至公安，权亦亲至陆口，吴蜀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旋刘备以曹操克汉中张鲁，蜀中危急而求和，孙权亦以曹操在汉中，欲乘机攻取合淝，乃互罢兵，划湘水为界分治之。建安二12年3月曹操举大军自居巢进逼濡须口时，孙权竟请降于操，遣使修好，重结姻亲，此足见是时孙权欲夺还荆州之志益坚。及至是年冬，鲁肃卒，吕蒙代之，蒙是素主夺还荆州者。是时，刘备正北攻汉中，战于下辨。吕蒙谋取荆州之计，因以日亟，于是吴、蜀荆州之战以起。

第二节 吴谋袭荆州方略

按吕蒙在吴将中，除周瑜甘宁外，为主张取荆州之最力者。当鲁肃代周瑜将兵时，彼即曾向肃建议："兄今代公瑾，既难为继，且与关羽为邻。斯人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气；然性颇自负好陵人。今与为封，当有单复，以卿代之。"因密陈三策。（上引三国志吴书卷九吕蒙传注江表传）

鲁肃已代周瑜，进驻陆口，以曹操尚存，劝权宜且抚辑关羽，与之同仇以敌操。但吕蒙以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国上游，势难久安，因密建策于权曰："今令征虏（孙皎）守南郡（江陵），潘璋住白帝（今四川省奉节县东。与甘宁"据楚关之计同"），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优于操？何辑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心腹待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复欲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之。又咨以先北取徐州之策，蒙曰："今操远在河北，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上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策为赏。及建安二12年鲁肃卒，蒙代肃至陆口将兵，于是谋荆州益亟，因外示与羽倍加修好。（上引三国志吴书卷九吕蒙传）

建安24年7月（是月，刘备已克汉中，自称汉中王），关羽举兵北攻襄樊，于是又向权上书献策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蒙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同上）

第三节 吕蒙袭荆州作战经过

一、关羽攻襄阳樊城之战

建安24年（公元219年）7月，关羽留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士仁守公安，自率主力北攻魏之征南将军曹仁于樊城及其将吕常于襄阳。是时，曹操已自汉中退还长安，乃遣左将军于禁率七军三万人及立义将军庞德等，增援曹仁，而屯军于樊北。8月，会大霖雨，汉水暴涨，平地水深数丈，禁等七军曾皆淹没，禁与诸将登高避水。是时，关羽即率水军乘大船攻禁等，禁等穷迫即降，羽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惟庞德在堤上率部力战，箭不虚发，自平旦战至日过中，羽攻之益急，矢尽继之以短兵相接；及水益涨堤没，吏士皆降，德乃乘小船欲赴仁营，船又为狂涛所冲覆，德仍抱覆船于水中，因之为羽为擒。羽谓德曰：“卿兄在汉中（德从兄柔在蜀），我欲以卿为将，不早降何为？”德骂羽曰：“竖子！何谓降也？魏王带甲百万，威振天下；汝刘备庸才耳，岂能敌邪？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羽遂杀之。于是，关羽率水军进围襄、樊二城而急攻之，别遣将深入郏下（今河南省郏县）及煽动陆潭之民（即春秋时陆浑之戎，在今河南省嵩县东北）孙狼等，以扰洛、许。魏、荆州刺史胡修，南乡（令河南省浙川县东南）太守傅方皆降于羽，因是华夏为之震动。（上引三国志魏书卷18庞惪传）

曹仁被围于樊城，城为水所冲，往往崩坏，兵众皆因而恐惧；于是，仁集议对敌之策。或谓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能支，可乘羽围未合，乘轻船夜走。”汝南太守满宠时受操命助仁守樊城，则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掎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君宜待之。”仁从宠之议，乃沈白马与军人盟誓，激厉将士，示以必死，将士感之，皆无二心，同心固守。然城中人马才数千人，城不没者数板（城高二尺为一板）。关羽乘船临城立围数重，内外隔绝，形势甚为危殆。

9年，曹操以襄、樊危急，洛许不安，乃留杜袭为留府长史驻关中，自将兵至洛阳。10月陆浑民孙狼等杀县（陆浑县）主簿，响应关羽，羽授狼印，给兵使还就许洛，自许都以南，亦往往有遥应羽者。于是，魏王操惟恐许都有失，献帝为刘备所挟，不利于己，乃议徙许都，以避其锐。丞相军司马司马懿，西曹属蒋济言曰：“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疎，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操从之，乃一面遣使赴吴，一面使徐晃自宛南下救樊。同时自率六军至摩陂（今河南省郏县境），指挥救援军事，调各方援军以救樊。（上引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六满宠，蜀志卷六关调传）

是月，徐晃以所将兵多新卒，故至阳陵陂（在今偃城西北十里）屯止，操又遣将军徐商，吕建等援晃。并令曰：“须兵马集至，乃俱前！”关羽得悉徐晃军至，即率军进驻偃城（今湖北省襄阳县北五里）以

拒晃。晃乃诡道作通堑，亦欲截羽军之后，羽遂烧屯退走，晃克偃城。

徐晃已克偃城，水势渐退，复连营稍前，魏王操又使议郎赵俨参曹仁军事，与晃俱进。此时魏王操陆续增援之军，尚未全部抵达，晃以所部兵不足以解樊城之围，乃稍待之。魏诸将责晃速救，赵俨乃谓诸将曰："今贼围素固，水潦犹盛，我徒卒单少，而仁隔绝，不得同力，此举适所以敝内外耳。当今不若前军偪围，遣谍通仁，使知外救，以励将士，计北军不过10日，尚足坚守，然后表里俱发，破贼必矣。如有援救之戮，余为诸君当之。"于是，晃连营稍前，距羽围三丈，因作地道并以渐射书与仁，互通消息。（上引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二赵严传）

此时孙权已得魏王操使者之说，乃为书与操，请以讨羽自效，并乞不漏消息，免羽有备。操因咨于群臣，群臣咸言宜密之。惟董昭曰："军事尚权，期于合宜，宜应权以密，而内露之。羽闻权上，若还自护，围则远解，便获其利，可使两贼相对冲持，坐待其敛。秘而不露，使权得志，非计之上。又围中将吏，不知有救，计粮怖惧，俨有他意，为难不小，露之为便。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江陵、公安）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即敕徐晃以权书射入樊城及羽屯中。于是，曹仁及诸将志气百倍；羽果犹恃江陵公安能守固，非权旦夕可下，又因水势结围，以临樊城，有必破之势，释之而去必丧前功，故亦犹豫不去。（上引三国志魏书卷十四董昭传）

徐晃旋得魏王操所遣援军段暑、朱盖等十二营，前后俱到，晃乃即发动攻击。时关羽围攻樊城之军，在高地筑围堑以攻城。围头又筑有屯（土丘），又别筑四冢（大土丘）。晃乃扬言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及羽见四冢将破，即自率步骑五千出击，晃击退之。晃因驱军追羽，破羽围堑鹿角十重，入围堑中再破之，羽遂撤围退走。然羽犹以舟船据沔水，以隔绝襄樊。综计关羽自7月至10月，前后凡3月余与魏军相持于襄阳、樊城间。

二、吕蒙袭荆州之战

建安24年10月，昌蒙已奉权召还吴，蒙途经芜湖，定威校尉陆逊往见之，谓蒙曰："关羽接境，如何还下，后不当可忧也？"蒙曰："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逊曰："羽矜其骄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得务北进，未嫌于我，兼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若见至尊，宜好为计。"蒙为秘其计而答曰："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及蒙至秣陵见权，权问："谁可代卿者？蒙对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合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权乃召逊即拜为偏将军右部督代蒙。（上引吴书誊十三陆逊传）

陆孙至陆口，致书与羽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度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

以不敏，受任来西，廷慕光麈，思秉良规。”又曰：“于禁等见获，遐迩欣欢，以为将军之勋，足以至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兹。闻徐晃等步骑驻旌，窥望麾葆。操猾虑也，忿不思难，恐潛增众，以逞其心；虽云老师，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裙，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傥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览逊书，有谦下自托之意，意遂大安，无复所嫌。是时，羽正与徐晃激战，乃稍撤江陵公安之兵以赴樊城。孙权为使关羽更懈于戒备，又遣使赴樊说羽，愿助之攻魏，并勅使者莫速进，又遣主簿先致命于羽。羽忿其淹迟，又自以已擒于禁诸军，乃骂曰：“貉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又托以粮乏为由，擅取吴之湘关来。

是时，陆逊报权，以羽可进袭之情况。于是，权于是年闰10月，即以吕蒙为大督与陆逊为前部，以孙皎为后继。开始作进袭之行动。吕蒙至寻阳（今江西省九江县），率津右护军蒋钦、偏将军潘璋、朱然，平虏将军周泰、中郎将韩当，骑都尉虞翻等诸将西上，尽伏其精兵于舳舻舟中，使摇橹者，穿商贾白衣，昼夜上驶，至江夏，即分水军一部使津右护军蒋钦率之入沔，以阻关羽水军之南下。蒙至陆口会陆逊军并进，入公安境，即将羽所置江边屯侯，尽擒缚之。及至公安城下，将军士仁闭城拒守，蒙乃遣骑都尉虞翻往说之。翻至城门，谓守者曰：“吾欲与汝将军语”，仁不肯相见。翻乃为书致仁曰：“明者防隅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知得知失可与为人，知存知亡足别吉凶。大军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举，此非天命，必有内应。将军不先见时，时至又不应之，独守萦带之城而不降，死战则毁宗灭祀，为天下讥笑。吕虎威欲迳到南郡，断绝陆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将军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则失义，窃为将军不安，幸熟思焉！”仁得书，流涕而降。于是，虞翻谓蒙曰：“此谲兵也，当将仁行，留兵备城。”蒙从之，还将仁同至江陵。蜀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士仁示之，芳亦开城降。先是，麋芳、士仁素皆嫌关羽轻己，及羽出军，留芳、仁守江陵公安供给军资，芳、仁因不悉供给，羽言还当治之，因此芳仁咸惧。旋南郡城中，又因失火焚烧军器颇多，羽又责芳，芳益恐惧，故见士仁已降，亦降。（引陆逊关羽吕蒙传）

吕蒙已入江陵，即遣陆逊西取宜都，蜀宜都太守樊友弃城走，诸城长生及蛮夷君长，因皆于1月之间尽降于逊。逊乃遣将军李异、谢旌等将三千人攻蜀将詹晏、陈凤于枝江，夷道（枝江，今枝江县东百里洲上。夷道，今宜都麻西北）稀归（今县）。李异将水军，旌将步兵，断绝险要，即破晏等，生擒陈凤，然后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务备蜀。另遣周泰、韩当等转攻蜀房陵太守邓辅，南乡（今河南省浙川县东南）太守郭睦，皆大破之，前后纳降数万计，荆州各地士人，亦皆附之。孙权遂以逊为右护督，镇西将军，封娄侯。

吕蒙入据江陵城后，即释于禁之囚，安抚老弱，尽得羽及其将士家属，皆抚慰之。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与蒙同郡，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

废法，而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僳，道不拾遗。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

关羽在襄樊间与魏军相持，及闻南郡破，即撤军南还。曹仁会诸将议，皆以为可因羽危惧而追擒之。赵俨独曰："权邀羽连兵之难，欲掩制其后，顾羽还救，恐我秉其两疲，故顺辞求效，乘衅因便，以观利钝耳。今羽已孤进，更宜存之，以为权害。若深入追北，权财改虞于彼，将生患于我矣。王必以此为深虑。"仁从之，遂不追击。是时，孙权恐魏军乘其两疲，向魏王操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在王"。及操闻关羽退走，恐诸将追之，果疾敕曹仁一如赵俨之策。（上引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三赵俨传）

当关羽引军南还时，数使人与吕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及羽之使人还至军，军人咸私相参问，皆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因此羽吏士皆无斗志，多弃军散走。11月关羽自知孤穷，乃走当阳（今当阳县东）保麦城（今当阳县东南五十里），欲以待救。孙权（10月权抵江陵）遣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羽西走漳乡（今当阳县东北），余众皆散走而降吴，随者仅十余骑。权乃使潘璋、朱然将兵断其径路。12月，羽与子平及都督赵累等遂为璋部下司马马忠所擒获，权斩之，以其首献捷于魏王操。操葬羽首如诸侯之礼，拜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吴遂复尽有荆州之地。

三、战后之政局

建安24年12月，孙权已底定荆州，遂暂都于公安，大会赏有功之士，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今湖南省安乡县北）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封爵未下，而蒙疾发，权迎置于所馆之侧所，亲临视疾，治护万方。是月蒙卒，时年四十二。权哀痛殊甚，为置守冢三百家，使蒙子霸袭爵。后孙权与陆逊谕周瑜、鲁肃、吕蒙三人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然难继，君今继之。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弧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之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张子布（张昭）秦文安（秦松），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也。又子明（吕蒙字）少时，弧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营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超，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资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不拾遗，其法亦美也。"陈寿亦为之评曰："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杰，新汤荆城，仗威东夏。于时议者，莫不疑贰。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吕蒙勇而有

谋，断识军计，谲郝普，擒关羽，最其妙者。初虽轻果妄杀，终于克已，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乎！”（皆见三国志吴书卷九之末）

是时孙权犹欲专力进图蜀汉，以实现周瑜之遗策，故分别为如下之措施：

（一）遣校尉梁寓入贡于魏王操，又遣还魏前庐江太守朱光等，上书称臣，称说天命，以固吴魏之盟和。又令王惇购马于魏，欲建步骑陆军，以图蜀汉。

（二）以陆逊为镇西将军，驻军夷陵（今宜昌县），以周泰为汉中太守，奋威将军，以图汉中。

（三）以刘璋为釜州牧，驻秭归（未几璋卒。按璋为刘备袭破于成都，备迁璋于公安。孙权灭关羽，得璋，因以利用之）以图蜀。

魏王操于襄樊之围已解，孙权上书称臣，乃还军洛阳。并以孙权称天命之书示群臣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侍中陈群尚书桓楷奏曰：“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士一员，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退迩怨欢！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曼天知命，无所与让也。”夏侯惇亦曰：“天下咸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30余年，功德者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操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故仍不代汉。操于明年1月崩于洛阳，其年10月子丕始受汉禅而为魏文帝。（上引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注魏畧、魏氏春秋）

刘备方面，于关羽没后之明年秋，将军孟达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和，以上庸降魏。旋魏遣将袭刘封，封败走还成都。刘备于是年曹丕称帝后，旋亦称帝。

第四节 吴蜀争夺荆州——猇亭之战

一、战前一般形势

魏王操于襄樊之围已解后，遂于建安25年（公元2205年）1月，自摩陂还军洛阳，旋即寝疾，于是月13日卒，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是时太子丕在邺，军中骚动，群僚欲秘不发丧，谏议大夫贾达以为不可，乃发丧。或言，宜易诸城守，悉用谯沛人（曹操沛国谯人），魏郡太守广陵徐宣厉声曰："今者远近一统，人怀效节，何必专任谯沛，以沮宿卫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击鼓相引去，众以为宜禁止之，不从者讨之，贾达以为不可；乃作长檄，令所在给其廪食，以安之。鄢陵侯彰从长安来，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所宜问也。"凶问至邺，中庶子司马孚（懿弟），尚书陈矫佐丕，以王后令策太子丕即王位。献帝寻遣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授太子丞相印绶，魏王玺绶，领冀州牧。2月，丕以太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助为御史大夫。置散骑常侍侍郎四人。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遣弟彰等皆就国，贬临淄侯植为安乡侯，诛右刺奸掾沛国丁仪，及仪弟黄门侍郎廙并其男口。盖仪等植党，为植争立为太子者。

5月，丕以安定太守邹歧为凉州刺史，西平麴演连结张掖张进，酒泉黄华以拒歧，武威三种胡亦乘机复叛，金城太守护羌校尉扶风苏则与将军郝昭讨平之。（上节引三团志魏书卷二十二徐宣传、卷15贾达博传注魏署）

6月，丕治兵于东郊，7月率大军南下至谯，将有进击孙权之势，于是孙权遣使奉献。是月，蜀将军孟达屯上庸，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和，封侵陵之，达率部曲四千余家降魏。丕以达有容止才观，甚器爱之，引与同辇，即以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并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郡治房陵，以达为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行军长史刘晔进曰："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新城与孙刘接壤，若有变态，为国生患。"丕不听，并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刘封，上庸太守申耽叛蜀降魏，因此刘封败走，西还成都。封本罗侯寇氏之子，刘备初至荆州时，以未有继嗣，养之为子。及封败还成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备因此际除之，备遂赐封死。

是年10月十三日汉献帝告辞高庙，使行御史大天张音持节奉玺绶诏册，禅位于魏王丕，丕三上书辞让，乃为壇于繁阳（今河南省临颍县西北），是月二十九升坛受玺绶即皇帝位。11月初1日以献帝为山阳公，行汉正朔，用天子礼乐，封四子为列侯。山阳公奉二女以妓于嫔，东汉名号，至此遂绝。丕追尊父操为武皇帝。改相国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与太尉复员三公之制。12月初营洛阳宫，都洛阳，改元曰黄初元

年。

黄初2年（公元221年）3月，魏加辽东太守公孙恭为车骑将军。是时，蜀中传言，汉帝已遇害，汉中王刘备乃发丧谥曰孝愍皇帝。群下竞言符瑞，劝刘备称尊号，前部司马费诗谏阻之，备不悦，左迁诗为永昌郡（今云南省保山县北五十里）从事。许靖等上言“伏唯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宜即帝位”。于是4月初六日，备遂即皇帝位于武担山之南。改元章武。以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马超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张飞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置百官，立宗庙。立吴氏为皇后，子禅为皇太子。

是月，孙权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并筑武昌城。盖权于取荆州灭关羽之后，常虑刘备东击，故暂以鄂为都以备刘备也。

二、作战经过

魏黄初2年，蜀章武元年6月刘备将出兵东征孙权，其车骑将张飞率兵万人，将自阆中（今四川阆中）会师江州（今四川省重庆）；临发，为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所杀，持其首奔降孙权。于是孙权一面遣诸葛瑾求和于蜀，一面即为如下之作战部署：

命镇西将军右护军陆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诸葛瑾、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余人，其编组为：

固陵郡（权以巫、秭归、兴山、信陵、沙渠五县为固陵郡后改建平）方面：

振威将军领固陵太守潘璋督诸军镇守秭归。

将军陆议守巫（今四川奉节东之巫山）。

将军李异守巴山（今巴东县东北）。

郎将刘阿守兴山（今典山县南）。

夷陵方面：

右护军镇西将军宴侯陆逊守夷陵。

将军宋谦督水军屯枝江（在今湖北枝江东北之江北）。

安东中郎将孙桓率万人屯夷道（今宜都县西北）。

南郡方面：

虎威将军西安乡侯朱然守江陵。

偏将军领永昌太守韩当辅之。

当阳方面：

建武将军都亭侯领庐江太守徐盛守当阳。

公安方面：

绥南将军领南郡太守宣城侯诸葛瑾守公安。

建忠郎将骆统率三千人屯孱陵。

兴叶都尉周胤（周瑜次于）率千人屯公安。

武陵长沙方向：

武陵郡都尉鲜于丹。

平武将军广信侯步陟督万人屯长沙。

其余诸将士多随孙权在武昌，以备向各方支援。

当刘备将举兵东征孙权时，诸葛亮以吴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乃为其隆中之定策，谏之不听，被留在成都辅太子以守国；赵云亦因数谏以先讨国贼曹魏，次伐孙吴，而亦被留在江州为后军督。蜀中群臣，无能谏阻，故诸葛亮叹曰："法孝直（法正字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也。"（三国志卷30七法正传）

备自率四万余人，以张南为前部，冯习为大督，赵融、廖淳、傅彤各勋别督，杜路、刘宁等各以所部随中军领军吴班，及将军陈式，以侍中关兴为中监军，尚书舍刘巴，侍中张绍、马良，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柱，少府王谋，大鸿胪何宗，太中大夫宗玮，益州从事祭酒程畿，从事王甫、李朝等曾随备出征。于是备督诸军自白帝以攻吴军所守之巫县（今四川省巫山县）秭归（今湖北省秭归县）。时吴将陆议、李异、刘阿等屯守巫县与秭归，为蜀将军吴班、冯习等所击破，刘备遂自白帝城前进，军次秭归，并即自秭归继续东进。于是，偏将军黄权乃向备建议曰："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遂于黄初3年2月以黄权为镇北将军，使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刘备遂自白帝城进次秭归，并郎欲继续东进。

荆州武陵郡有堆谿、樠谿、无谿、酉谿、辰谿、夹谿等量夷聚族居，住于今湖南省沅陵、泸溪、麻阳、保靖、辰谿、黔阳等县一带，时人称之为五谿蛮。刘备在荆州时曾在各谿中设置黔安郡，颇有恩泽于各谿谷蛮夷之人。故五谿蛮之各君长，闻及刘备出军伐吴至秭归，乃各遣使到军中诸命，愿为先马驱。刘备因使待中马良率人担金锦自很山（今湖北省长阳县西六15里同昌市西南旧兴山城）入武陵，绕道各谿，抚慰

诸蛮，赐以金锦，授以官爵，因此武陵郡诸县各道民夷皆反吴为蜀。备以为自己旧有恩德于荆州人民，令武陵蛮夷皆起义从己，则荆州人士亦当有群起以响应自己者。于是，在秭归东北依山即坂筑一临江之城，自居其中以待之；但荆州对刘备有所失望，因而久无声响。备亦对荆州人士大失所望，遂令将军吴班、陈式率水军自秭归顺流东下以攻夷陵（一称彝陵即今湖北省宜昌县），吴镇西将军领宜都太守陆逊坚守夷陵城不肯出战，吴、蜀水军遂形成对峙之局。备乃以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进出夷山（在夷陵之北）达于临沮与当阳之间（今湖北省当阳县东安逮县附近），以北拒曹魏，南监当阳。更以将军张南率诸军为先锋，自秭归南岸由陆路进攻夷道（今湖北省宜都西北，原有群之一县后改为宜都郡之一县），吴安东将军孙桓（孙河之子，孙权之族弟），以兵迎击蜀先锋于夷道之北，为蜀将张南所破，退守夷道城，而为张南等所围。

是月，刘备见各路进兵顺利，乃自秭归渡江而东，缘山截岭分立营数十屯，以达于猇亭（今湖北省宜都县之西，长阳县之南名虎脑背市之地是）。为兼顾攻守之计，于是吴、蜀两军遂形成对峙之势。及诸葛瑾使蜀不得要领而返。8月孙权为求能以一意对蜀拒战，使魏不制其后，乃遣使称臣卑辞奉章于魏，并送于禁等还。

先是，魏文帝丕诏群臣，“还料刘备尝为关羽出报孙权否？”众议咸云：“蜀小国耳，名将唯关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独侍中刘晔曰：“蜀虽陕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矣。”及孙权奉章称臣，群臣皆贺；刘晔独曰：“孙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杀关羽，刘备必大兴师伐之。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往乘其衅，故委地求降，一以劫中国之兵，二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耳。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之，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日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之半以与蜀，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帝曰：“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不若且受吴降，而袭蜀之后也”。晔又曰：“蜀远吴近，又闻中国伐之，便还军，不能止也。今备已怒，兴兵击吴，闻我伐吴，知吴必亡，将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必不改计抑怒救吴也。”帝不从，遂受吴降，遣使拜孙权为吴王加九锡。并遣使向吴求贡大贝、明珠、象犀、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吴群臣以荆扬贯有常典，魏求非礼宜不理会。吴王孙权曰：“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谅总，而所求若此，宁可与言礼哉。具以与之！”于是，孙权拒蜀之部署，完全告成。（刘晔谋见三国志本传）

曹丕既封孙权为吴王领荆州牧，即划分以荆、扬江表八郡为荆州，以荆州江北诸郡为郢州，权虽不快，不敢言也。丕更遣使至荆州，询问有关刘备进兵情况。及闻备在秭归至猇亭间弥山盈谷以树栅连营七百余里，以与吴军相争，吴军亦分军与之峙。乃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湿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擒，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将至矣。”（三国志卷二文帝纪）

陆逊既奉命为吴大都督，督诸军以战蜀，乃下令各军就其与蜀相峙之局，坚守不得出战。诸将以孙桓被围于夷道，求救甚急，皆主张集军前往救之。逊曰："未可！"诸将曰："孙安东公族，见围已困，奈何不救？"逊曰："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吴诸将以陆逊怯敌。自以为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恃，心为不服。及闻陆逊是等语言，群起哗然，不相听从，逼问欲展何计？逊立起按剑以向众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敌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随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也！"众乃寂然，各守不战，一如军令。惟各皆怀于危亡，只恨主上用人不当，对此懦弱骄横之大都督，各人敢怒而不敢言。（上引三国卷五18陆逊传）

会蜀军先遣其将吴班率数千人于平地立营，欲以挑战。诸将复向陆逊建议，皆争欲出兵击之。逊曰："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猝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励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驰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疲于木石之间，徐制其敝耳。此一小军突立营平地，必有谲计。且观之，不可以击也。"诸将不解，以逊畏战各怀愤恨。

刘备既知其立营平原之计不可以诱致敌人，乃引伏兵八千，从谷中出。陆逊因指告诸将曰："所以不听诸君以击吴班者，即揣知其必有巧计故也。"诸将唯唯。逊因令部将宋谦等随蜀军后，攻其五屯，斩其将而归。诸将遂稍服之。孙权得密报，亦遣使向逊问，何以在夷陵不动之计。于是逊上疏曰："夷陵（今宜昌）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自此吴军坚守，蜀军欲进下得，遂相峙于高山大川之间，自是年（黄初3年公元222年）正月至6月末，彼此不得决战。

闰6月陆逊将集诸军进攻，诸将并曰："攻备当在于初，今已令敌深入五六百里，以与我军相衔持经七8月，其诸要害，曾落入敌人固守中，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故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将士兵卒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便通令诸军，同时俱攻。虎威将军朱然，首破蜀军前锋，继续进攻，遂遮断蜀军后道。振威将军潘璋进斩蜀军护军冯习，偏将军韩当与朱然并击蜀军于涿榔（在今灭北宜都西北马鞍山下）大破之。绥南将军诸葛瑾、建忠郎将骆统、兴某都尉周胤亦自孱陵（今灭北公安西）进击猇亭，与陆逊大军共攻破蜀军主力于猇亭。及吴军主力齐集于猇亭，连

破蜀军四十余营，蜀将张南等力战死之，蛮王沙摩柯阵亡，杜路、刘宁穷逼降吴。刘备全军已败，乃登马鞍山（在今湖北宜都之西长阳之南），陈兵自卫。陆逊督诸军四面围攻之，一日一夜，死者万数，降者数万，蜀军遂土崩瓦解。备因夜率轻骑突围，遁向西北而走。（上引陆逊传）

吴安东中郎将孙桓被围于夷道，见吴军反攻已破蜀营，乃率军奋力出战，得见陆逊，乃前谢逊曰："前实怨不见救，直至今日，乃知调度自有方耳。"桓闻刘备已遁走，度必自长江南岸还蜀中，乃奋不顾命，自后追之。备至石门山（今湖北省巴东县东北30五里）为之逼甚，乃令驿人以行囊军需铙铠塞道，发火烧之以为断后。因此一追一阻，蜀军各部益离散不得集，各军未奉军符不敢擅动。吴兵突至，蜀卒四散，致使其军中船只、器械、水军资，尽委之于吴。而因追杀争渡，更使江上尸骸漂流，遮江而下。备因大惭恚曰："吾乃为陆逊所折辱，岂非天耶？"乃收容散卒徐迟于巫县（今四川省巫山县）之南。不意孙桓已率吴轻兵百余人，连夜西进，超越在刘备之前，竟在夔道（今四川省奉节县东南长江南岸上）狭处，斩土填道，截住去路以邀击刘备。备不得已，乃弃马踰山险以走。会翊军将军赵云自江州来迎，孙桓始退，备乃得免。备忿恚曰："吾昔初至吴城，桓当小儿，而今迫朕，乃至此也。"（上引三国志陆逊传、卷30二刘备传、卷五十一孙桓传）

刘备步行至白帝城，始知其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之黄权因不得回蜀，已投降于魏，其侍中马良督五溪诸蛮之进取武陵者，业为吴将军步陟攻破，马良死之。蜀将军傅彤为后殿，兵众尽死，彤于激烈抗拒之后，被吴军所擒斩之。备从事祭酒程畿，见军皆江而退，因未奉到军符不肯走，众劝之走，畿曰："吾在军，未习为敌之走也！"亦死之。

孙权在武昌，闻陆逊已破蜀军，刘备遁走，诸将军正事追击中，乃亲赴前方以劳陆逊及诸将。诸将述及事先各不心服，而率如逊谋因以破蜀诸事。孙权乃问陆逊曰："君何以初不启诸将违节度者耶？"逊对曰："臣受恩深重，任过其才。又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虽驽懦，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权大笑称善！加拜逊为辅国将军。盖取孙子所谓"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之义也。（上引陆逊传、孙子谍谋第三）

时将军徐盛、潘璋、宋谦等，各以其前锋李异、刘阿等踵蹑蜀军至于白帝城之南山，又各以蜀军之情况回报，盛等各竞上表言"刘备必可成擒，请复攻之！"权以问陆逊，朱然、骆统、逊等皆以为曹丕已在大合士众，虽外托助国讨众，而实有奸心，不宜一意西向而忽视大敌也。权因召刘阿等还守巫县（今四川省巫山县）。

三、战后之政局

孙权已大获战胜乃以是役中，所得蜀军之印绶、首级、土地、以及

将士所有功勋，宜加爵赏者，皆表列装运，报捷于魏。魏曹丕以鼲子裘，明光騂、騑马、及其所作之典论与诗赋各一事赐孙权。并与权以诏书曰："老虏边窟，越险深入，旷日持久，内迫疲弊，外因智力，故见身于鸡头，分兵拟西陵，其计不过谓可转足前迹，以动摇江东。根末著地，摧拆其支，虽未刳备五脏，使身首分离，其师降诛，亦足使虏部众凶惧。昔吴汉先烧荆门，后发夷陵，而子阳无所逃其死。来歙始袭略阳，文叔喜之，而知隗嚣无所施其巧。今讨此虏，正似其中。将军勉建方略，务全独克！"以嘉之。

黄初3年9年，魏欲遣其侍中辛毗，尚书桓阶与孙权为盟誓，并征任质子，权坚辞不受。

时魏已平定塞外乌桓、鲜卑之乱。曹丕以孙权诚心可疑，将起兵伐之。刘晔谏曰："彼新得志，上下齐心，而阻带山湖，不可仓卒制也。"歪以问贾诩曰："吾从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对曰："攻取者先兵权，建本者尚德化。陛下应期受禅，抚临率土，若绥之以文德，而俟其变，则平之不难矣。吴蜀虽蕞尔小国，依山阻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逊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臣窃料群臣无备权对，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臣以为当今宜先文后武。"丕皆不从。乃命征东大将军曹休，前督军张辽，镇东将军臧霸出洞口（在今安徽和县江边）；大将军曹仁步骑数万出濡须（在今安徽省巢县东南含山县之西）；上军大将军曹真，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左将军张郃，右将军徐晃等围南郡。孙权乃遣建威将军吕范督五军以舟师拒御曹休等；以左将军诸葛瑾，平北将军潘璋，将军捣桀救南郡；以裨将军朱桓为濡须督以拒曹仁。同时吴王孙权以扬、越、蛮夷及荆州桂阳、零陵各蛮夷皆起为乱。权为求弭定内难，稍缓魏之进势，乃因魏使浩周问质子之便，向曹丕重新称臣卑辞上疏，求自改厉，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云云。丕报之曰："朕之与君，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若登身朝到，夕召兵还耳"。于是，孙权决心抗拒，改元黄武，临江拒战。丕亦自许昌亲征，是年11月至宛。孙权为拒此大敌，乃谋西和蜀，遂遣太中大夫郑泉往聘蜀汉，汉亦遣太中大夫宗玮报之，于是吴蜀复相通好。至黄初4年2月曹仁攻濡须败，3月夏侯尚诸军围江陵不下，适又大疫，丕遂引军北还。曹丕智术短浅，不用刘晔、贾诩之谋，故有此失。（上引三团志卷十贾诩传卷十四刘晔传）

是年3月汉王刘备于永安（即白帝城）病笃，遂召丞相亮至，命辅太子；又以尚书合李严为副。备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业。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又为诏敕太子曰："入五十不称天，吾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但以卿兄弟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丞4月殂于永安。5月太子禅即位，时年十七，改元建兴。封诋相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皆决

于亮。（上引三国志卷30二先主传）

第九章 诸葛亮伐魏之战

（一）第一次伐魏——街亭之战：太和2年（公元228年）春2月诸葛亮使马谡进军街亭，为魏将张郃所破，退还汉中。

（二）第二次伐魏——攻陈仓之战：太和2年12月，围攻陈仓不克。明年春，亮与魏将郭淮战于建威，获胜，追至祁山。

（三）第三次伐魏——首阳之战：太和4年7月，魏攻汉中因霖雨中止，退军。再击败魏将郭淮于首阳。

（四）第四次伐魏——围攻祁山之战：太和5年2月亮率军进围祁山，粮尽引军还，魏将张郃追击，亮回军击斩之。

（五）第五次伐魏——吴蜀连兵伐魏及武功对峙战：青龙2年（公元234年）1月，亮大举伐魏与司马懿对峙于武功。8月亮卒，蜀军还汉中。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及作战导因

魏吴方面：黄初4年（公元223年）8月，任城威王曹彰，寿肃侯贾诩皆卒。黄初5年7月，曹丕以去年10月，吴绝魏和蜀，乃大兴师伐吴，侍中谏毗辣之，不听。以尚书仆射司马懿镇许昌，8月，亲统水军御龙舟自许昌循蔡颍浮淮水至寿春；9年，至广陵以伐吴。吴安东将军徐盛，乃用诡计，植木以苇为城，自石头（秣陵）至于江乘（今江苏省句容县北）绵延相接数百里，一夕而成，又大集舟舰于江。时适江水盛涨，丕临江望而叹曰："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遂罢兵。

黄初5年10月，丕自广陵还至许昌，11月鲜卑轲比能始数扰边境，幽并二州皆苦之。

黄初6年3月，丕又大举伐吴，8月丕自谯（今安徽省亳县）亲统舟师循涡水入淮，10月至广陵，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有大举渡江之势。吴严兵固守，时适天寒水冰舟不得入江，丕见江水波涛汹涌，叹曰："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乃自邗沟引兵还。是为曹丕自代汉以来，第三次大举伐吴之举。

蜀汉方面：刘备已死，签州南部益州郡（治滇池今云南省昆明）耆帅雍闿，杀太守正昂，因吴交趾（今越南）太守士燮，求附于吴。吴遂于黄初4年6月以闿为永昌郡（治不韦，今云南省保山县北）太守。闿又诱永昌郡人孟获，使煽惑诸夷叛蜀。于是柯郡（治故且兰，在今贵州省镇享县西南永宁镇南）太守朱褒，越嶲郡（治邛都，今西康省西昌县西北）夷王高定，皆叛患之。诸葛亮以新遭刘备之丧，且吴人为其后援，不便加兵，因抚而不讨，而积极从事内治，约官职，修法制，发教言，集众思，事必躬亲，以务农植谷，闭关息民，欲使民安，食足，恢复猇亭战败后之国力，然后用之。

是年，魏曹丕以蜀不能征其四郡之叛，又知蜀诸葛亮承此疲敝之余，处于主少国疑之中，可以言词动之。乃使其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等，各作书致亮，陈说天命人事，欲使亮举蜀国称藩。亮不报其害，而书正议一文，以示国人曰："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虚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魏不審鉴，今次之矣。免身为幸，破哉子孙。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齿，承伪指而进书，有若崇竦称莽之功，亦将偪于元祸苟免者耶？昔世祖（指刘秀）之创述旧基，夺羸卒数千，摧莽强旅四十余万于昆阳之郊，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及至曹操以其谲胜之力，举数10万之师，救张郃于阳平，势穷虑竭，仅能自脱，辱其锋锐之众，遂丧汉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获，旋还未至，感毒而死。曹丕淫逸，继之以篡。纵使二三子多逞苏张诡靡之说，奉进驩兜滔天之词，欲以诬毁唐帝，讽解禹稷，所谓徒丧文藻，烦劳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听不为也。"又作军诫曰："万人必死，横行天下。昔轩辕氏整卒数万，制四方，定海内。况以

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可得干拟者哉。”亮使尚书邓芝使吴，以离间吴魏间之连系，再争取吴为与国。（上引三国忠卷30五诸葛亮传注亮集）

黄初4年10月，诸葛亮遣尚书邓芝往与吴修好，吴王孙权以吴与魏尚未绝交，狐疑难决，不见芝。芝告其左右曰：“芝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权乃见之。权曰：“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国小，势偪，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预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入朝，下求太平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诃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权默然久曰：“吓君言是也。”吴由此绝魏，专与蜀汉连和，并使张温报聘于蜀，吴遂放弃对益州南部四郡之支持。（上引三国志卷四15邓芝传）

黄初6年，蜀建兴3年，吴黄武4年（公元225年）3月，诸葛亮声讨南中。遣马忠伐柯（今贵州省平越县）；李恢向益州（今贵州省仁怀县南）；亮亲率诸军自水道入越巂（今西康省西昌县东南），破斩高定，进兵永昌（今云南省保山县北五十里）。越巂太守马谡送亮出境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阻，不服久矣，虽今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争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心，又见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5月渡泸（今云南省保山县西北），擒孟获，使观营阵，纵之使再战，深入不毛之地，凡七擒七纵，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益州、永昌、柯、越涛四郡皆平。亮即其渠帅而用之，于是丞相亮在南中不设官，不留兵，使当地人粗定纪纲，夷汉相安而还。自此南中后杰多为蜀之官吏，各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蜀以富饶，终亮之世，夷不复反。南中民欲为兵者，蜀募编之为一军，以登山涉险见长，号之曰“飞军”。（上引三国志卷30九马谡传、诸葛亮传）

于是，蜀汉丞相诸葛亮已做到：“守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诸政，依其隆中计划，即开始准备北伐曹魏。（上引三国志卷30五诸葛亮传）

第二节 作战准备及双方作战方略

蜀汉方面：诸葛亮北伐之准备与方略，仍一本其隆中所画之策而行，“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即命将北伐以秉之。兹述其事如下：（隆中策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一）内修政理：当刘备袭刘璋克成都时，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益州太守，署左将军府事，佐备治蜀。是时，亮即已策定“治蜀尚严”之原则而付诸实施。故尝时法正谓亮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王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致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齐。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思，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士人每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及刘备卒后，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益能发挥其政治主张。故“至于吏不容好，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之政绩。（皆见三国志卷30五诸葛亮传及注）

（二）足食足兵：刘备死（黄初4年4月）后，益州郡（今云南省曲靖县）耆帅雍闿叛蜀，因吴交趾太守士燮求附于吴，吴以闿为永昌太守（郡治在斗云南省保山县北五十里），永昌功曹吕凯、府丞王伉，率吏士闭境拒守，闿不能进。闿使郡人郡孟获诱煽诸夷，诸夷皆从之。柯太守朱褒（郡治故且兰，今贵州省平越），越溜夷王高定（居今西康省小相岭，大凉山脉一带）等，曾叛应闿。诸葛亮以新遭大丧，皆抚而不讨。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民安食足而后用之。

（三）东连孙权：刘备卒后之是年9年，遣尚书邓芝使吴，与吴恢复故盟。吴因绝魏连蜀。

（四）西和诸戎南抚夷越：黄初6年3月，诸葛亮以内政已定，乃帅大军讨雍闿斩之，至秋抚定孟获，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五）部署后方政事：魏明帝太和元年，蜀建兴5年，吴黄武6年（公元227年）3月，诸葛亮统率诸军北驻汉中，使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统留府事，并上疏部署诸事（即出师表）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藏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

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1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勤，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5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遗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尤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责攸之祎尤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书，深追先帝遗诏，臣下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遂率军北上汉中，屯军于沔北阳平、白马山，准备北攻。（上引三国志诸葛亮传）

（六）策反孟达：达原焉刘封所迫而降魏。今为与吴协同攻魏，乃诱使达归蜀，以便与吴在战略上连成一气。

魏国方面：黄初7年5月，魏文帝丕卒，太子叡即位，是为明帝。帝以曹真为大将军，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都督荆豫州诸军事镇于宛。及闻诸葛亮驻军汉中，乃欲大发兵攻之，而谋于散骑常侍孙赛，赛曰：“昔武皇帝征南郑取强鲁，阳平之役，危而后济；又自往拨出夏侯渊军，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险，喜出渊军之辞也。又武皇帝圣于用兵，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挠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用精兵及转运：镇守南方四州（荆徐扬豫），遏御水贼，凡用15六万人，必当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慑强寇，镇静疆场，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有罢敝。”遂决采取守势以备蜀（魏书孙资传）。

初孟达降魏，为文帝所宠，又与桓楷、夏侯尚亲善。及文帝卒，楷尚皆卒，于是达心不自安，诸葛亮书而诱之，因数与亮书，阴谋归蜀。其中致亮书有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此相及覆，1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辦，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时达适与魏兴太守（郡治在今陕西省安康县西北）申仪有隙，仪表告达反状，是年闰12月帝乃诏司马懿讨之。达闻之惶惧，欲举兵反，司马懿以害慰解之，达因是犹豫未决。懿乃潜冤进袭，诸将言达与吴蜀交通，宜观望而后动。懿曰：“达无信义，

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达遣使告亮请救曰：“吾举事八日，而兵到城下，何其神速也？”亮遣偏将向阳城（今陕西省安康县西北）、木兰塞（今安康县东），吴亦遣偏将向安桥（失考，按当在今湖北省保康县境）以救达。懿乃一面道遣拒阻吴蜀援兵，一面围攻孟达所驻之新城（今湖北省房县），攻十六日拔之，斩孟达（太和2年1月）。按诸葛亮诱孟达，本欲使汉中与吴之南郡连成一气，以便吴蜀协同以攻魏者。及孟达被斩，新城复为魏所有，于是诸葛亮在战略上之损失实甚大。（上引晋书卷一宣帝纪）

魏已克新城，于是一面仍使司马懿屯兵于宛，一面遣大将军曹真进屯长安，遂完成其战略守势之部署。

第十章 魏灭蜀之战

（一）魏景元4月，蜀炎与元年（公元263年三5月，司马昭遣四路军十余万攻蜀，是年11月蜀后主刘禅降，蜀平。

（二）魏成熙元年（公元二六4年）正月，钟会欲据蜀反，平之。遂形成魏吴南北对峙之势。

第一节 战前一般形势及作战导因

魏景元4年，蜀炎兴元年，吴永安6年（公元263年八月。魏伐蜀，是年11月灭之。本节所述战前一般形势，乃自魏青龙2年，蜀建兴12年，吴嘉禾3年（公元234年）诸葛亮卒后，至魏景元2年，魏准备伐蜀之前后217年间，魏蜀吴三方面之一般大势。兹分述如下：

魏国方面：

（一）魏明帝之奢侈腐化及司马懿进讨辽东：魏明帝叡自诸葛亮卒后，遂渐有逸乐宴安之志，故于青龙3年4月，即大起土功，既作许昌宫，又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力役不已，农桑失业。司空陈华上疏谏曰："……况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汉一大郡。加以边境有事，将士劳苦，若有水旱之患，国家之深忧也。昔刘备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傅舍，兴费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国劳力，亦吴蜀之所头，此安危之楼也，惟陛下虑之"。叡不听，仅稍为减省工役而已。少府扬阜亦谏。叡又耽于内宠，妇官秩。石，拟百官之数，自贵人以下，至掖庭洒扫，凡数千人，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廷尉高梁复谏，以为宜罢宫观之作，使民就农；后庭宫女过多，是以圣嗣不昌，宜妙简淑缓，以备后官之数，余尽造还家，以育精养神，子孙可众。又中书侍郎东莱王基上书谏，以事役劳苦，男女离旷，……今寇贼未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以临敌，久之则难以遗后……云云。叡不仅不从，旋且诏收夺民之妻女，以充后宫。又于荥阳广畜糜鹿，使荥阳左右周数百里之地，农无所收获，且猎法严峻，杀禁地鹿者身死。又以马易吴珠玑、翡翠、玳瑁以自娱，及徙长安钟楼橐佗、铜人、承露盘于洛阳。又起土山于芳林园，使公卿群僚皆负土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杂兽置其中。财力不敷，竟减将士俸禄；国用不足，又增赋税。其奢糜一致如此。

明帝叡无子，养曹芳、曹询为子，青龙3年八月立芳为齐王，询为秦王。

青龙4年（公元236年）秋，辽东公孙渊自立为燕王，景初2年（公元238年）春，使司马懿将兵四万讨之，是年八月斩公孙渊父子，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皆平。

（二）司马懿曹爽辅政及开淮南屯田与漕运：景初2年（公元238年）12月，明帝欢寝疾，深虑后事，乃以武帝（操）子燕王宇为大将军，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真子）、屯骑校尉曹肇（休子）、骁骑将军秦朗等相辅政。宇固辞大将军位，叡因谘询于中书监刘放及中书令孙资。放、资以与献、肇有隙，惧有后害，因阴图间之。时适曹爽在侧，放、资因荐爽，且言宜召司马懿与相参，叡从之，遂免燕王宇等官，以爽为大将军；又以爽才弱，乃拜尚书孙礼为太将军长史以

佐之。时司马懿自辽东还师在汲驻兵，奉召至京。叡乃遗嘱以齐王芳继位，令司马懿曹爽同辅政。景稠3年一月，明帝叡卒，芳即帝位，时年8岁。加曹爽、司马懿侍中，假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文武大权尽归之。爽、懿各领兵三千，更宿殿内。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谘询，不敢专断。旋爽引擢并州刺史东平毕轨，及名士邓飏、李胜、何宴（河进子）、丁谧等为心腹。于是，宴等咸推戴爽，以为重权不可委之于人；丁谧为爽画策，使爽白天子，发诏转司马懿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实夺懿权以自专。于是，爽弟羲、训、彦等，分任中领军、武衙将军、散骑常侍等要职，爽由是大权独揽。何宴等亦皆为尚书，毕轨为司隸校尉，各依势用事，排除异己。（下段引三国志春四齐王纪注引王纪及誊二十八鄧艾传）

正始2年（公元241年）夏4月，吴主孙权大举伐魏，5月吴军犹攻城樊。（详见吴国方面、）于是，太傅司马懿曰："相中民夷十万，隔在水南，流离无主，樊城被攻，历月不解，此危事也，请自讨之。"6月懿遂督诸军救樊，吴军闻之夜遁，懿追之，大获而还。自是，魏为巩固江淮防线，以为进攻遏守之资，乃使尙书郎汝南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以察江淮战线之形势。艾至寿春与将军王凌商讨之后，乃赉表建策曰："昔太祖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出征，运兵过半，功费巨亿。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汝水、颖水、蒌荡渠水、蒗荡渠水，淌水皆経陈蔡之间而入淮），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什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岁丰常收，三倍于许。益开河渠，以增溉灌，通漕运，每东南有事，大军泛船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如此计除众费，成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67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北，此则十万众，5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曹爽司马懿皆善其议。乃即施行。是年即引河水入汴，开广漕运，灌溉东南。吴国为破坏魏国此项重大措施，会合诸葛恪（瑾子）举大军进扰与破坏，其事详见本节吴国方面。

（三）曹爽伐蜀与专政：正始5年正月征西将军长史李胜，与尚书邓飏欲令曹爽立威名于天下，劝使爽伐蜀，太傅司马懿止之不能得。3月，爽至长安，发卒十余万，与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谱军事夏侯玄（爽之姑子），自骆口入汉中。

时蜀国在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皆恐，欲守城不出。前监取镇北大将军督汉中王平曰："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深祸。今宜先遣刘護军（敏）据兴势（今陕西省洋县北），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谷名在洋县东北），平帅予千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亦至，此计之上也。"诸将皆疑，惟护军刘敏与平意同，遂帅所领据兴势，多张旗帜，弥亘百余里。闰3月，汉主遣大将军费樟督诸军救汉中。4月，曹爽兵攻兴势不得进，时阴中及丘羌转输连月，不能供应，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司马懿又致书夏侯玄，谓"兴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邀绝，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玄言于爽。5月，爽无功，乃引军还。蜀大将军费樟进据三岭以截爽，爽争险苦斗，仅乃得过，失亡甚

众，关中为之虚耗。（上引三国志卷四十三王平传及卷九曹爽传注汉晋春伙）

正始7年春，幽州刺史母丘俭，以高句骊王位宫数为侵叛，督诸军讨之，位宫败走。俭遂屠丸都（今安东省辑安县北）。未几复击之，位宫奔买沟，俭遣玄太守王拓追之，过沃沮千余里，至肃慎氏南界（今松江省宁安县东北u，刻石纪功而还，所诛纳八千余口。

正始8年2月，太尉蒋济以尚书何宴等朋附曹爽，好变改法度谏之。3月大将军爽用何宴、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因与爽有隙。5月，懿乃称疾，不与政事。帝芳好亵近群小，游宴后园。是岁雍凉羌胡叛降蜀，蜀汉姜维将兵出陇右以应之。与雍州刺史郭淮，讨蜀护军夏侯霸，战于洮西（洮河之西），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部落降维，维徙之入蜀。维追击羌胡余党皆平之。

曹爽已专政，骄奢无度，与其兄弟数俱出游，司农沛国桓范谏曰："总万机典禁兵，不宜并出，若有闭城门，谁复内入者？"爽曰："谁敢尔邪"？（三国志卷九曹爽傅注引世语）

正始9年9月，冀州刺史孙礼以清河平原争界事上疏，辞辩刚切，曹爽信清河之诉，因大怒劾礼，结刑五岁；久而复为并州刺史，礼往见太傅懿有忿色而无言。懿故作不明之言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礼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礼虽不德，岂以官位往事为意邪？本谓明公齐踪伊吕，匡辅魏室，上报明帝之托，下建万世之勋。今社稷将危，天下匈匈，此礼之所以不悦也。"因涕泣横流。懿知其愤闷于爽，因抚之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曹爽以河南尹李胜为荆州刺史，过辞太傅懿，懿故作老病沉重，言语错乱。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复济，令人怆然。"故爽等不复设备。于是，懿乃阴与其子中护军师、散骑常侍昭，谋诛曹爽。（上引三国志卷二十四系礼傅及眷九曹爽博、晋书宣帝纪）

（四）司马懿杀曹爽夺取政权：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正月，帝芳谒高平陵（明帝陵），大将军曹爽，与弟中领军羲、武术将军训、散骑常侍彦，皆从。于是，太傅司马懿以皇太后令，闭诸城门，勒兵据武库，授兵出屯洛水浮桥，召司徒高柔假节行大将军事，据爽营，太仆王观行中领军事，据羲营。因奏爽罪恶于帝。爽得懿奏事，不通于帝，乃留军驾宿伊水南，伐木为鹿角，发屯田兵数千人以为卫。懿使人说之，"宜早自归罪，唯免官而已"。桓范劝爽兄弟以天子诣许昌，发四方兵以自辅，爽兄弟不能用。是夜爽乃投刀于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乃将懿书白帝，请下昭免已官，奉帝还宫。爽等归家，懿发兵围守之，然后再构其谋反之罪，遂擒爽兄弟及宴，风飏，谧、胜、轨、桓范等，俱夷三族。

司马懿既诛灭曹爽及其党羽，乃自专朝政，诏以懿为丞相加九锡，

懿固辞不受。又以征西将军夏侯玄驻长安，右将军夏侯显（渊子）为爽所厚驻陇西。懿乃召玄远京师，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霸以素与淮不睦，恐祸及已，因奔降于蜀。蜀后主禅问霸曰："司马懿既得彼政，当复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营立家门，未遑外事。有钟士季（会——繇之子，时为尚书郎）者，其人虽少，若管朝政，吴蜀之忧也。"

（五）三道攻吴及司马懿讨淮南王凌之叛：是年，司空王凌与其甥兖州刺史令狐愚，皆典重兵于淮南，凌驻寿春，愚驻平阿（今安徽省使远县西南六十里）专淮南之任。凌因与愚阴谋，以帝弱，制于强臣，闻楚王彪有智略（武帝操子，黄初3年徙王白马城），欲共立之，迎都许昌。9月，愚遣其将张式至白马，以其谋告彪。凌又遣使至洛阳，语其子广。广以"司马懿情雄汉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已（谓蒋济、高柔、孙礼、陈泰、郭淮、邓艾等），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损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听。（上引三国志誊二十八王凌传注汉晋春秋）

嘉平2年12月，征南将军王昶以孙权流放良臣，嫡庶分争，可乘隙击吴。朝廷从之，遣新城太守南阳州泰袭巫秭归，荆州刺史王基攻夷陵，昶攻江陵，三路并进，大胜而还，斩狄颇众。王昶以是役之功，进封征南大将军。明年4月，太尉王凌（元年12月迁太尉）以吴人塞涂水（作堂邑涂塘，见后），遂欲因此发兵讨懿，遗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兖州刺史黄华（元元年11月分狐愚病死）弘华连名以白司马懿。懿一面先下赦令，赦凌罪；并致书谕凌。一面自将中军乘水道南下掩袭之。懿大军突至百尺（今河南省淮阳县），凌自知势穷，乃乘舲单出迎懿，遣掾王或谢罪。懿军到丘头（今河南省沈邱县），凌画缚水次。懿遣主薄解其缚。凌已蒙赦，加恃旧好，不复自疑，乘小船欲趋懿，懿使人迎止之。遂遣步骑六百送凌至京师。凌试索棺钉以观懿意，懿命给之。5月，凌行至项，遂饮药死。懿进抵寿春，张式等皆自首，懿穷治其事，诸相连者悉夷三族。嘉平3年5月以扬州刺史诸葛诞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6月又赐楚王彪死，尽录诸王公置郑，使有司察之，不得与人交关。7月，以司马孚为太尉。8月，司马懿卒，诏以其子卫将军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

（六）三道攻吴，司马师废立魏帝及讨淮南毋丘俭之叛：嘉平4年正月，以司马师为大将军。10月，吴太传诰葛烙会兵家趋趣东兴堤（今安徽省台山县西南，接巢县界），更作大堤左右结山侠筑两城，各留千人，使将军全端守四城，都尉留略守东城，然后引军而还。镇东将军诸葛诞乃上言于司马师曰："今因吴内侵，使文舒（王昶字）逼江陵，仲恭（毋丘俭字）向武昌，以羁吴之上流，然后简精卒攻其两城，此救至，可大获也。"是时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等，各献征吴之计。朝廷以三征计异诏问尚书伟暇，暇以持重远计对，司马师不从，是年11月，遂令三道击吴。12月，王昶攻南郡，毋丘俭攻武昌，胡遵、诸葛诞举众七万攻东兴。吴太傅恪将兵四万晨夜兼行救东兴。胡遵等会诸军作浮桥以渡，阵于堤上，分兵攻两城。城在高峻，不

可卒拨。为吴军所攻，大败，死者数万，损失车马牛骡驴各千数，资器不可胜数。王昶、毋丘俭闻东军败，皆烧屯退走。明年，嘉平5年正月，朝议欲贬黜诸将，大将军师曰："此我过也。"悉宥之，唯安东将军司马昭时为监军，仅削昭爵而已。以诸葛诞为镇南将军都督豫州，毋丘俭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嘉平5年2月，诸葛恪以东兴之役大胜，遂有轻敌之心，因复欲出军，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3月恪遂大发州那兵二十万进攻淮南。是时，蜀姜维以费祎已死，继掌大权，亦率军数万以攻狄道。于是，魏东西两面皆急，司马师乃以太尉司马孚率军二十万赴救淮南；使郭淮、陈泰悉开中之众救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西南）。陈泰军至洛门（今甘谷县南），姜维粮尽退走。诸葛恪围新城，魏守将张特率三千人坚守，吴军起土山攻城，历九十余日而城不拔。会大暑，吴军疲劳，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魏毋丘俭以吴军已疲，乃进救兵，诸葛恪还引军退走。恪是役虽败，骄横尤甚，因尽失吴上下之心，而乃诛戮。

正元元年（公元254年）2月，魏大将军司马师以帝芳与中书令李丰谋己，师击杀丰，并连及诸异己者夏侯玄、张缉（张皇后父）等人，皆夷三族，废张皇后而立皇后王氏。是年6月，蜀姜维再攻陇西。秋，帝芳召安东将军司马昭使击姜维，帝欲于昭辞行时即杀之，然后勤兵以拒大将车师，诏已具不敢发。于是，昭引兵入城，师乃以皇太后合召群臣议废帝芳，而迎高贵乡公髦（文帝丕之孙东海定王霖之子），10月即皇帝位，时年十四。姜维自狄道进拔河关临洮，魏将军徐质与战，斩蜀荡寇将军张嶷，维军遂退。

正元2年正月，镇东将军毋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矫太后诏，起兵于寿春以讨司马师。文钦与曹爽善，是时常为司马师所抑，毋丘俭素与夏侯玄、李丰善、及玄等死，俭亦不自安，故相与举兵讨师。俭又遗使邀镇南将军诸葛诞，诞斩其使。于是，俭钦联兵五六万，渡淮至项（今河南省项城县东北）以守之。司马师乃以其弟昭兼中领军留镇洛阳，召三方（东西北）兵会于陈许，闰1月1日，师车次于桥（今河南省商水县境）以荆州刺史王基进据南顿（今项城县北五十里）。俭将史招、李续相继降。是时，吴丞相孙峻知魏寿春之变，亦即率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留赞袭寿春。于是，司马师使诸葛诞督豫州诸军自安风（今徽省霍丘县西南一百三十里）趋寿春，使征东将军胡遵督青、徐诸军出谯、来之间，趋汝阳（今河南省新蔡汝南素间）以绝俭等之归路。师与文钦战于乐嘉（今河南省商水县境），钦败退。师遣骄骑八千张左右两翼以追之。俭闻钦败退，恐愲夜走，众遂大溃。钦与其子鸯退至项，以孤军无继，不能自立，欲还寿春，寿春已溃，乃奔降孙峻于案皐（今安徽省合肥县东巢县界）。峻闻诸葛诞已据寿春，乃引军还，以文钦为都護镇北大将军幽州牧。毋丘俭北走至慎县（今河南省經上县西北），左右离去，乃躲藏于水边草中，为安风津民所杀。师遂夷俭三族，并治其党。又以诸葛诞克寿春之功，以诞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军事。

乐嘉之役，师以新割目瘤，因惊骇而目珠突出，及疾笃乃还许昌，

而留中郎将参军事贾充监军事。卫将军昭自洛阳往省师，师令昭总统诸军。是月二十八日师卒于许昌。中书侍郎钟会从师典知密事，中诏敕尚书傅嘏，以东南新定，权留卫将军昭屯许昌，为内外之援，会嘏率诸军还。会与嘏谋，使嘏表上，辄与昭俱发，军还至洛水南屯驻。盖会恐京师有变，故谋使昭鸵军至京。2月五日，诏遂以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会由是常有自矜之色。

（七）司马昭讨淮南诸葛诞之叛：甘露2年（公元257年）4月，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谋反。诞素与夏侯玄、邓飏等友善，玄等已死，又见王凌毋丘俭相继诛灭，因内不自安。及为征东大将军在寿春，乃倾帑藏振施，曲赦有罪，以收众心，畜养扬州轻侠数千人，以为死士，阴国异计。是月，因吴人砍寇徐揭（今巢县东南），乃以备吴为名请众十万守寿春，又求临淮筑城。是时，司马昭初秉政，长史贾充（远子）请遣参佐慰劳四征，且观其志。昭遂遗充至淮南。充见诞论说时事，因曰："洛中诸贤，皆愿禅代，君以为如何？诞厉声曰："卿非质豫州子乎？世受魏思，岂可以社稷输人乎？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充默然，还还于昭曰："诸葛诞再在扬州，得士众心，今召之必不来；然反疾而祸小，不召，则反迟而祸大，不如召之。"昭遂于是月二十四日诏诞为司空还京。诞得诏书愈恐，疑杨州刺史乐琳间己，遂杀琳，即一面集淮南淮北郡县屯田官兵十余万，及扬州兵四五万，聚谷1年，为闭门自守之计。一面造长生吴纲率少子靓至吴，称臣请救，并愿以诸将子弟为质。吴纲至吴，吴大喜，使将军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将三万人与文钦同救诞，并以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击州牧，封寿春侯。

司马昭闻变，乃奉帝髦及太后讨诞，6月二十五日四驾次项，昭督诸军二十六万进趋丘头（今河南省沈丘县），以镇南将军王基行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与安东将军陈骞等回寿春。基军始至，围城未合，文钦、全怿等从城东北因山乘险，将众突入城中。于是，昭令基敛军堅壁，合围寿春。旋吴将军朱异又率三万人进屯安丰（今河南省因始县东），为文钦外援。司马昭乃使奋武将军监青州诸军事石苞、督究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质，简选锐卒进击朱异于阳渊（今寿丘县西），破走之。7月，吴大一将军孙琳大军至镬里（按在巢县西北），吴主责其不进，琳乃再使未异帅丁奉、黎斐等五将军复进救寿春。异遂留辎重于都陆（今安徽省寿县东南）进趋黎浆（今寿县西南）。石苞、州泰一面进击，一面遣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袭都陆，尽焚异资粮。朱异因前后受敌复大败，将败残兵食葛叶，遁归孙琳。孙琳斩异于镬里以卸责，扬言回吴发兵，乃引兵还建业，吴人因是怨之。于是，司马昭曰："异不得至寿春，而孙琳杀之，非其罪也；欲以谢寿春而坚诞意，使其犹望救耳。今当坚固，备其越逸，而多方以误之。"乃纵反间，扬莒吴救方至，大军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势不能久。诞等因宽恣食，城中之粮因以渐乏，外救不至。诸葛诞之心腹将蒋班、焦彝因进言曰："朱异等以大众来而不能进，孙琳杀异而归江东，外以发兵为名，内实坐须成败。今宜及众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决死，攻其一面，虽不能尽克，犹有可全者；空坐守死，无为也。"文钦曰："公今举十余万之衆，归命于吴，而钦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尽在江表，就孙琳

不欲来，主上及其亲戚，岂肯听乎？且中国无岁无事，军民并疲；今守我1年，内变将起，奈何舍此，欲乘危徼幸乎？”班彝固劝，钦怒；诞欲杀班、彝，二人惧。11月，二人乃越城出降。（上二段引皆书贾介传文帝纪）

是时吴将全怿之兄子辉、仪，在建业与其家内争讼，因摧母将部曲数十家奔寿春降魏，而悍与兄子靖，及全端弟翩、缉，皆将兵在寿春城中。于是，司马昭用黄门侍郎钟会之计，密为辉、仪作书，使辉、仪所亲信康入城告悍等，说吴中怒悍等不能拔寿春，欲尽诛诸将家，故逃来归命。12月，懌等乃帅军数千人开门出降，城中因以震惧，不知所为。是月，蜀姜维闻分关中之兵以赴淮南，亦率数万骑出骆谷击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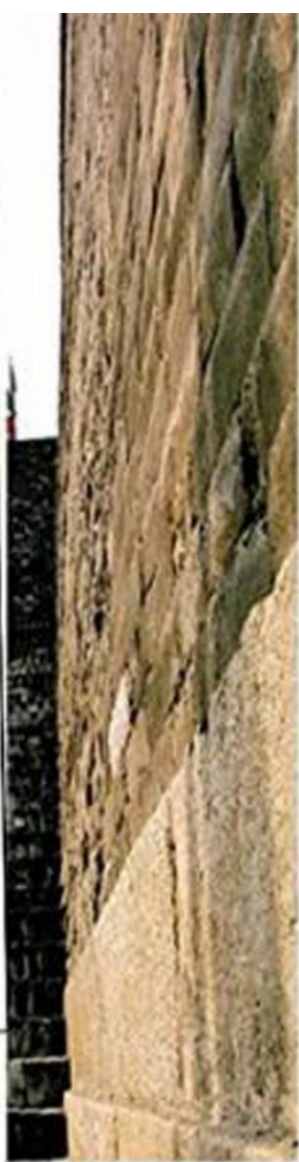
甘露3年正月，诸葛诞、文钦、唐咨等，大为攻具，出攻司马昭之南团，昼夜猛攻五六日，欲突围出。围上诸军临高发石车（炮车）火箭，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伤蔽地，血流盈壍，乃复还城。是时城内粮食将竭，出降者数万口。钦欲尽出北方人省食，与吴人坚守，诞不听，由是争恨。钦原与诞有隙，事急愈相疑。钦见诞计事，诞因杀之。钦二子鸯、虎将兵在小城中，闻钦死，勒兵赴之急众不为用，遂单身越城出降。司马昭乃使鸯虎率数百骑巡城呼曰：“文钦子犹不见杀，其余何惧？”又以鸯虎为将军，赐爵关内侯。于是，城中兵多怀归命之心。司马昭亲自临围观城，见城上持弓者不发，乃曰：“可攻矣！”遂四面进军，同时登嫡攻击。是年2月二十日遂克寿春城，诞窘急，单马将其麾下，突小城欲出，魏军司马胡奋追击斩之。夷诞三族。吴将于诠免胄冒阵而死，唐咨、王祚等皆降。是役平淮南之乱，凡历8月余，诚司马昭当政后一最艰巨之事。5月，诏以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食邑八郡（太原、上党、西河、乐平、新兴、雁门、河东、平阳），加九锡，昭前后九让乃受。司马昭之克寿春，钟会谋划居多。昭因此亲待日隆，委以心腹之任，时人比之子房。是役，王基以破寿春之功，昭以基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进封东武侯。（上引三国志卷二十八诸葛诞传及晋书卷二文帝纪）

（八）司马昭废立魏帝：景元元年（公元260年）4月，魏帝髦时年二十，见威权日去，下胜其忿。5月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經，散骑常侍王业等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皆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愿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帝出镶中黄素诏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惧，况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告昭，呼经欲与俱，经不从。帝遂拨剑升辇，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鼓噪而出。昭弟屯骑校尉伷，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率兵自外入，逆与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司马公畜养汝等，更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闻也。”济即抽戈前刺帝，殒于车下。魏帝髦既死，司马昭遂迎燕王宇之子（武帝操之孙）常道乡公璜（改名奂）为帝，是

为元帝。时年十五。



宋代战争史



目录

北宋史
第一章 北宋的社会矛盾
第一节 北宋的统治制度
第二节 北宋的民族矛盾
第二章 北宋前期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第一节 川峡地区是北宋初年阶级矛盾的焦点
第二节 王小波、李顺起义
第三章 北宋中期的农民战争
第一节 北宋中期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
第二节 北宋中期以兵变为特征的农民起义
第四章 北宋后期的农民战争
第一节 北宋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第二节 方腊起义
第三节 宋江等其他起义军
南宋史
第一章 金兵南侵与来金战争的初起
第二章 南来初个抗金斗争的高涨
第三章 南宋新军的壮大与宋金军事形势的转变
第四章 南宋抗金战争的空前有利形势与绍兴年间的两次和议
第五章 海陵南侵与抗金高潮的再起
第六章 南宋境内的农民战争
第一节 钟相、杨幺领导的农民起义
第二节 范汝为领导的农民起义
第三节 南宋中后期的农民战争
第七章 宋元战争爆发前的形势
第一节 蒙古统一北部中国及蒙、宋、金三国格局的形成
第二节 蒙古、南宋之间的关系
第八章 宋廷议取三京，宋元战争爆发
第一节 金亡后的蒙、宋态势
第二节 宋廷冒险决策出兵
第三节 端平入洛之役
第四节 宋蒙败盟及其影响
第九章 蒙哥南征，宋元战争进入新阶段
第一节 蒙哥汗南征的准备
第二节 忽必烈灭大理之役
第三节 兀良合台转战川滇
第四节 纽磷在四川的征战
第五节 蒙哥汗图蜀攻宋
第六节 钓鱼城之役
第十章 元军对南宋的战略进攻
第一节 元军攻宋战略的转移

第四节 南宋战略防御的解体
第十一章 元军发动总攻，南宋全面崩溃
第一节 元军发动全面进攻
第二节 郢州、沙洋之役
第三节 阳逻堡渡江之役
第四节 荆湖南北之役
第十二章 伯颜取临安，宋廷降元
第一节 元军南攻基地的建立
第二节 宋廷和战不定
第三节 伯颜进军取临安
第十三章 残宋势力覆灭，宋元战争结束
第一节 元军初定东南
第二节 宋末行朝播迁闽粤
第三节 文天祥的抗元斗争
第四节 四川战事告终
第五节 南海之平与崖山之役

北宋史

第一章 北宋的社会矛盾

第一节 北宋的统治制度

一 北宋的政治制度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以后，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在“五代十国”五十多年的时间内，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五个短命王朝，而在南部中国及四川等地也先后出现了十个政权，在边疆地区还有契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因此，当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政权之后，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便是如何使北宋政权长久存在下去，不致成为五代以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并进而统一全国，赵匡胤为此事日夜思虑，不能安眠，并与心腹大臣进行过多次讨论。建隆二年（961年）七月，他曾问赵普：“天下自庙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赵普的回答使他受到很大启发，于是，他采取许多措施，建立了一套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一）将地方权力收归中央

为了解决藩镇割据和防止节度使拥兵夺权，宋朝统治者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收藩镇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八月，“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将地方各藩镇的精兵选拔到中央，充实禁军，只留一部分老弱军队，维持地方治安。这样，就使藩镇失去了对抗中央的军事力量。第二，收地方财权于中央。五代时期，各藩镇在其管辖范围内征收赋税，自行支用，不上缴中央，大部分用于养兵。为解决这一积弊，于各路设转运使，专管一路的赋税征收，各州县的赋税，除留一小部分供地方开支外，大部分都送往中央。这样，就使地方失去了对抗中央的经济力量，第三，收地方司法权，五代时期，藩镇节度使专横跋扈，随意杀人，草菅人命，中央法令难以贯彻，为了集中司法权，在各路设提点刑狱公事，专管各州司法，死刑案件要经中央审批才能处决。第四，取消“支郡”，唐末以来，节度使除本镇外，往往兼管其他州县，习惯上称之为“支郡”，有的藩镇管辖数州，自任官吏，自收赋税，俨然独立王国，宋初依然如此，北宋令各“支郡”直属中央，长吏得自奏事，这就大大削弱了藩镇的力量。第五，任用文臣知州。赵匡胤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于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为了便于控制地方和不使节度使在地方为害，赵匡胤选用文臣到各镇担任知州，而将

节度使调到京城闲住，给以很高的俸禄，让他们养老。第六，设置通判。对派往各地的知州，北宋统治者也不放心，深怕他们与地方势力勾结在一起形成新的割据力量。于是，规定知州的任期一般不超过三年（实际为三十个月），期满就要调往别处任官；另外，为了便于监视知州，还派遣心腹官员至各州担任通判。通判“既非副贰，又非属官”，但权力很大，州府文书必须通判签署才能有效，实际上是皇帝的耳目。知州在通判监督下办事，因而不敢为非。

通过这些措施，赵匡胤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并将地方权力集中到了中央，从而解决了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问题。

（二）对宰相权力加以限制

在封建社会中，宰相是最高的官员，他统率百官，处理全国政务，是皇帝的助手，素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说；唐朝时，宰相权力虽已远不如秦汉，但仍能了解全局，处理国家大事，在一般情况下，皇帝对宰相的意见也比较尊重。赵匡胤认为，地方割据势力解决了，权力集中到了中央，一旦中央大臣掌握了实权，对自己的皇位将是更大的威胁。为了防止朝中大臣夺权，他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分割，限制宰相的权力。

宋朝建立之初，为稳定形势，赵匡胤仍用后周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为相。乾德二年（964年）正月，三人罢相，由开国元勋赵普一人为相。三个月后，赵匡胤又感到赵普权力过大，“欲为赵普置副而难其名称，召翰林学士承旨陶谷问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一。”于是，任命薛举正，吕余庆二人为参知政事，作为副相以牵制赵普。这样，就限制了赵普的权力。另外，赵匡胤还将中央枢密院作为常设机构，置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专掌军令，“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从此，宰相无权过问军事。又置三司，设三司使、三司副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不预，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财权也从宰相手中分割出来。这样，宰相就只能管一般的行政事务了。宋初还规定，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三司使要分头上殿奏事，相互回避，所奏事互不知晓，只有皇帝才能了解全面情况，作出决定。这样，中央大权便集中到了皇帝一人手中，从而大大减少了朝中大臣夺权的可能性，宋朝虽然也设有谏院，置谏官，但宋朝谏官只能监督宰相和百官，已不能规劝皇帝，皇权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因此，宋朝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较前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使机构重叠和官、职、差遣分离

赵匡胤为了便于控制百官，还建立了一套庞大重叠的官僚机构在任官上则采取官、职、差遣分离的办法。《文献通考》卷四十七《职官总序》：“宋朝设官之制，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然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于禁中，是

谓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领，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左右谏议无言责，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执事之笔：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至于仆射、尚书、丞、郎、郎中、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确实如此，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后，为了减少对立面，尽快稳定局势，他将后周的全部官员都接受了下来，并仍然留在原官位上。但对这些旧官员，又不能放心重用，因此，在保留原有官僚机构和官员的前提下，又另外设置了一些新的机构，任命一些心腹官员来掌握实权。如枢密院、三司等的设置，实际是剥夺了兵部、户部、工部以至太府寺，将作监、都水监等机构的权力。真宗时宰相王旦曾经说：“今之三司，即尚书省”。尚书省及其下属六部机构，竟成了无事可做的闲散机关。

在官员的任命上，则采取了官、职、差遣分离的办法，“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官是官员的品级，如六部的尚书，侍郎，九寺五监的卿、监等，是用以表示官员品级的高低和俸禄的多少的；职是一种资格，如观文殿、资政殿的大学士、学士，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的学士、直学士、待制等，职也称为“贴职”，只是一种荣誉称号，没有实际的意义；差遣才是官员实际担任的职务，如枢密使、三司使，知州、通判等，一位官员若只有官职而无差遣，就无事可做，北宋为什么要实行这种政策呢？主要也是为了控制官员。因为这种办法，不仅使有差遣的官员高兴，而无差遣的官员也因可以拿到俸禄而安心，这样就能取得广大官员的支持，政权就可稳定。

二 北宋的军事制度

北宋的军事制度与其政治制度一样，基本特点，也是高度的集权。为了削弱大将的兵权和加强皇帝对军队的控制，赵匡胤建立了一套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军事制度。

（一）设“三衙”以统军

所谓“三衙”，就是统率全国禁军的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是由后周时的两司演变而成的。

五代时的皇帝都是军阀出身，他们夺权靠军队，掌权也靠军队，当皇帝之后，都有一支侍卫军队。后周时，皇帝的侍卫军队已扩大为中央军队，由殿前司，侍卫司分别统率。赵匡胤以殿前司统帅殿前都点捡的身份夺取政权后，也深怕其他高级禁军将领以同样的方式夺取他的政权，因此，他于建隆二年（961年）召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等诸大将饮于禁中，以“杯酒释兵权”的和平方式剥夺了他们的兵权，随后，又在统兵体制上进行改革，赵匡胤认为，军队由两帅统率，远不如分为三帅统率安全。因为两个长官容易相互勾结，而三个长官则可以相互牵制。于是，为了使原侍卫司的两个下属机构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

军司各自独立，分统马军和步军，便不再任命侍卫司的高级将领，这样，中央禁军的实际统辖机构，便由两司变成了三司（亦称“三衙”），中央禁军的统率权便分割为三了。真宗时，更明确规定，殿前司的都点检，副都点检及侍卫司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五个高级军职全部取消，只保留了一些品级较低的职务，使殿前司的最高长官都指挥使为从二品，而侍卫马军司和步军司的最高长官都指挥使仅为正五品。三衙统帅的品级降低而又互相牵制，这就便于皇帝控制。

（二）置枢密院以发令

唐朝代宗时，开始设枢密使，最初由宦官担任，其主要职责是“承受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可见，它是皇帝联系大臣的中介，其职掌也并不限于军务。五代时，枢密使的权力增大，并逐渐变为专管军事的官员。后汉大将郭威曾担任枢密使，主征伐之事。郭威建后周，也任命武将担任此职，主持兵事。北宋建立后，设枢密院，专管军事，“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

北宋枢密院虽然专管军事，但它的权力较五代时却大大缩小了，知枢密院事李纲指出：“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帅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北宋将军权一分为二，“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密院、三衙互相牵制，最终听命于皇帝，当出现军事警报时，皇帝下诏于枢密院，枢密院按旨发出兵符调三衙有关军队出征。再者，宋代的枢密使、枢密副使，或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也与五代时不同，一般都由文臣担任，很少任用武臣。其所以如此，也是为了防止武臣拥兵自重，同时也是为了根除唐末五代以来武人跋扈、文臣受制于武夫的弊病。以文制武，就把武夫横行的局面颠倒过来，正如汪藻所说的，“祖宗时，武臣莫尊三衙，见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非文具也，以为等威不如是之严不足以相制。”这对于维护中央集权，安定社会秩序，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实行募兵制

赵匡胤非常重视养兵，他曾对赵普说：“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把养兵看作是防止农民起义和维护其统治的好办法，因此，北宋保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

我国封建社会前期，主要推行征兵制，成年男子都有当兵的义务。隋唐时期的府兵制也是一种征兵制，府兵通过均田得到一块土地，他们免除租庸调，但要轮流服兵役，服兵役期间，兵器、衣粮等都要自备。唐中期以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发展，府兵的土地亦被兼并，便无力承担兵役了，于是纷纷逃亡，府兵形式的征兵制也就崩溃了。府兵制破坏后，募兵制发展起来，经过唐末五代至北宋，募兵制正式形成。宋朝的军队主要有四种，一为禁军，这是中央正规军队，负责驻守京城和征战；二为厢军，为地方镇兵，负责镇守各府州，但很少训练，实际上多

用于服役；三为乡兵，属于地方上的民兵，主要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四为蕃兵，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兵民，用以维持地方治安和协助守边。这四种军，除乡兵，蕃兵主要是征调外，禁兵、厢兵大都为招募的，还有少数是配隶的罪犯。

北宋有一套完整的募兵制度。北宋建立之初，赵匡胤即“拣军中强勇者，号兵样，分送诸道，令如样招募。后更为木梃，差以尺寸高下，谓之等长杖。委长吏、都监度人材取之”。招募新兵，要进行体格检查，体检中最主要的一项是量身长，身材高大者为禁军，较矮者为厢军，另外，还要检查跑跳能力和视力。《嘉泰会稽志》卷四：“方募时，先度人材，次阅驰跃，次试瞻视。”一旦应募为兵，便立即刺字，所以宋代募兵也称为“招刺”。刺字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逃亡，故多刺于面部，也有刺于手臂和手背的。募兵为终身职业兵，士兵都领取军俸，作为本人及家属生活费用的来源。

募兵制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征兵制下，兵农合一，农民虽然占有一小块土地，但繁重的兵役却使他们不能安于田亩，因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兼并使农民失去了土地，破坏了兵农合一的基础，农民被抛出土地，社会上出现了许多闲散劳力，成为募兵对象，因而募兵制发展起来，兵农分离。募兵制的出现，是土地兼并的必然结果。募兵制使农民免除了兵役和大部分劳役，能够安于田亩，有利于农业生产。

三 北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

北宋统治者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建立了一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这些制度在北宋初年，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后也带来了许多弊病。

（一）北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消除了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势力，维护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统一，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这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的。对于赵匡胤夺权，当时有许多人内心不服，当年四月，原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就起兵反抗，赵匡胤亲自带兵讨伐，用很大力量才平定叛乱；刚刚平定李筠之乱，同年七月，原后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又在扬州起兵，赵匡胤先派石守信、王审琦分道进讨，后又亲自带兵南征，才将叛乱平定。这说明，北宋政权建立之初，是极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最高统治权的风暴还会不时刮起。但从第二年开始，赵匡胤采取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后，形势就大为改观，再也没有发生李筠、李重进这样大规模的叛乱事件，随后又逐渐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正如南宋的陈亮所说：“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各归于郡。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自管库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一矣。”确实如此，赵匡胤调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才结束了长达二百多年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在统一局面下，社会比较安定，通过人民的辛勤劳动，我国的经济在宋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不论垦田面积、农业产量、手工业产品的种

类和数量，以及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都大大超过了唐代，在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二）北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加强了对农民的统治。北宋政权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专政，它建立的一系列制度，归根到底还是旨在加强对农民的统治。北宋的各级官府和分驻全国各地的军队，监视着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农民一旦反抗，立即受到镇压。北宋的募兵制度更是直接窒息了农民的反抗斗争。北宋统治者把荒年“募兵”看作是“防盗”的最有效方法。欧阳修曾说：受灾农民，“不收为兵，则恐为盗”。遇到灾年时，政府便在灾区大量募兵，将饥饿农民召募为兵，就可使“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在其他王朝，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往往成为流民，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宋代的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是严重的，也曾出现过流民，但始终未成为社会问题，这与宋代荒年凶岁大量募兵是有直接关系的。募兵制度间接阻碍了农民起义的发展。

（三）北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带来了政治的腐败。北宋在保留原有政权机构的同时，又设置了许多新的机构，在官员的设置上，又增添了许多副职，一项政务要由几个机构管理，职责不明，互相推诿，“三司官吏积习依违，天下文牒，有经五七岁不为裁决者。”国有的机构同时任命数名官员，权力相等，官员之间争权夺利，谁也无法工作。陕西永兴军，“一府三守，公吏奔趋往来，不胜其扰”。北宋所任官员的频繁调动，也使官员无法施展其才志，正如王夫之所讲的，一位官员到任，“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官员任期一般不超过三十个月，有任职一年、半年，甚至几个月、几十天就调任者，因而官员多抱临时观点，大多应付了事，许多能办的事情也不办。官员到任，忙的是营私，想的是升官，贪污腐化，賂賄公行，致使北宋的政治极端腐败。

（四）北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也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北宋募兵虽然有体格检查标准，但应募者达到标准的很少，再加以募兵多者有赏，因此在招募时，便往往降格以求，甚至作弊，用怯弱不及等之人充数，“或以老小为丁壮，或以病患为强健”，致使许多不合格的人进入军队。李觏说：“今之卒伍，例非健劲必也。少有材力，自己别营衣食，安肯涅墨而就拘哉!唯无聊之人填壑是惧，不得已而为之耳!谓之怯也，不亦宜乎……观其罢輭之容，动皆取笑，……虽无武功，自谓禁旅。”晁补之也说：“尪孱贫屡，不任田亩，徒博饮酒，计穷力尽之人乃起而为兵。”因此，北宋军队的素质是极差的，再加以宋代军队行“更戍法”，军队驻地经常更换，兵将分离，军队缺乏严格训练，因而战斗力很弱。北宋统治者对将帅又一贯猜忌防范，命将出征，不委以全权，临行之前，往往授以方略，给以阵图，使将帅不能独立指挥，因而作战多败。上述种种，都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在对辽、夏的战争中，一败再败，不得不订立屈辱的和议，以换取苟安的局面。

（五）北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使官员和军队的数量不断增加，形成了冗官、冗兵的局面。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北宋设置了许多新机构，致使政府机构叠床架屋，官员数量逐年增多。右拾遗王禹

偁在一次上疏中曾经指出地方官的冗滥情形，他说：“臣本鲁人，占籍济上，未及第时，一州只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当时未尝阙事。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太平兴国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监酒、榷税算又增四员。曹官之外，更益司理。问其租税，减于曩日也；问其人民，逃于昔时也。一州即尔，天下可知。”十几年的工夫，官员竟增加六倍之多。中央官员同样增加很快，李淑指出：“太平兴国之初，朝臣班簿才二百人至咸平初四百人，天圣元年乃逾千人。”四十年内，朝官增加五倍之多，全国官员的冗滥可想而知。募兵制则带来军队的冗滥，北宋建立之初的开宝年间（968～975），有禁军十九万三千人，厢兵十八万五千三百人，总兵力不过三十七万八千人。太宗至道年间（995～997），禁军增至三十八万八千人，厢兵为三十万零八千人，总兵力六十六万六千人；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禁军增为四十三万二千人，厢军四十八万人，总兵力达到九十一万二千人；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禁军增至八十二万六千人厢军四十三万三千人，总兵力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募兵制下，将领和士兵都领取军俸，而宋代军队的俸禄又高，因此，军费开支浩大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宋仁宗时，富弼曾经说：“自来天下财贷所入，十中八九赡军。”曾任三司使的蔡襄也说：“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王禹偁也说：“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官员、军队数量不断增加，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

第二节 北宋的民族矛盾

北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十分复杂，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时代，北宋立国伊始，就遭到契丹贵族的不断侵扰；宋太宗以后，与西夏党项族的关系又趋恶化，战争连年不断，北宋一败再败。宋徽宗时，东北的女真族又强大起来，北宋统治者妄图借女真力量收复幽云失地，采取了联金灭辽策略，结果饮鸩止渴导致了自身的灭亡。面对复杂尖锐的民族矛盾，北宋政府一贯采取“守内虚外”政策，用大量银绢来换取暂时的和平，结果给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带来严重危害。

一 宋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一）宋初攻取幽云之役

后唐末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幽（北京）、云（山西大同）等十六州（河北、山西北部）换取契丹军队的支持，夺取政权，建立了后晋。幽云地区为中原北方的门户，割十六州之后，河北北部便无险可守了，因此，契丹骑兵不断南下，掠夺中原地区，给人民带来很大灾难。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率兵北伐，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之地，结果只攻占了瀛（河北河间县）、莫（河北任邱县）、易（河北易县）三州及瓦桥（河北雄县境）、淤口（河北霸县境）、益津（河北霸县境）三关之地，便病死了。

北宋政权建立之初，赵匡胤正集中力量对南方用兵，无力北顾，所以对辽采取了守势，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幽云。史称：“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府，曰封桩库，每岁国用之余，皆入焉。尝语近臣曰：‘石晋割幽燕南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遗使北虏，以赎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即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在统一南方后，认为北伐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开宝二年（969年）亲自率兵进攻北汉，结果败于太原城下，只好退兵。终太祖之世，北宋始终未能攻取幽云。

宋太宗即位后，经过几年的准备，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春，亲自统兵攻北汉，“契丹救北汉，寇石岭关，郭进邀击，大破之”。当年五月，太原城破，北汉灭亡。攻灭北汉的胜利，使太宗产生了轻敌之心，他认为，只要乘胜进兵，幽云可指日而下。六月十九日，宋军来加休整，即由太原进兵幽州。一开始，进军顺利，宋军连下易州（河北易县）、涿州（河北涿县），包围幽州。辽兵来援，“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嫔尽陷没，股上中两箭”。宋军第一次攻取幽州的战役以失败而结束。

经过几年休整、准备，雍熙三年（986年）三月，宋太宗又分兵三路攻辽，东路曹彬、崔彦进，米信出雄州（河北雄县），中路田重进出飞狐，西路潘美、杨业出雁门关。东路曹彬为主攻，持重缓进，待西路

得手后，南北夹攻幽州。战争开始后，西路进展顺利，很快攻占寰（山西朔县东）、朔（山西朔县）、应（山西应县）、云（山西大同）等州；中路亦攻取飞狐（河北涞源）、灵丘、蔚州（河北蔚县）等城。东路军进占涿州后，由于贪功冒进，粮道为辽兵所断，曹彬退兵雄州取粮，太宗命令继续前进，曹彬不得已，再攻涿州，结果为辽将耶律休哥所乘，大败于歧沟关（河北涿县西南），“死者数万，弃戈甲若丘陵”。东路大败，中路与西路亦只好退兵，宋军第二次攻取幽云的战役又失败了。

两次幽云战役的失败，使宋太宗完全丧失了取胜的信心，于是他下令：“自今缘边百姓，不得辄入北界劫掠”。并向近臣表示以后决不再干攻取幽州这类蠢事了!北宋还在西起保定东至塘沽九百里宋辽边界上，连接原有的湖泊港汊，挖成一条界河，岸边值树以阻辽兵南下，对辽完全采取了守势。

（二）澶渊之盟

宋采取守势后，辽对宋则加强了攻势，不断侵扰宋的边境。雍熙三年（986年）十二月，萧太后与辽圣宗带兵攻瀛州，宋将李敬源。杨重进战死，先锋将贺令图被俘，辽兵连陷邢州（河北邢台），深州（河北深县）等地：雍熙四年（987年）正月，辽兵破文安（河北文安）、束城（河北河间东北）等处，大掠而还。端拱元年（986年）冬，萧太后与辽圣宗率军南下，又攻陷满城、祁州（河北安国）、新乐等地；端拱二年（989年）春，辽兵陷易州（河北易县）；咸平二年（999年）十二月，萧后、辽圣宗率兵南侵，宋镇、定、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傅潜“畏懦，拥步骑八万，闭门自守，未尝出战”，辽兵长驱南下，攻遂城（河北徐水），“破狼山寨遂攻威虏，掠宁边军及祁、赵，游骑出邢、洺，真定路不通者逾月。”傅潜令部将范廷召、康保裔出战，范廷召不战而逃，康保裔为辽兵包围，力战身亡。辽兵自德州（山东德州）、棣州（山东惠民）一带渡过黄河，深入到齐州（山东济南）、淄州（山东淄川）一带大掠后，满载而去。

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萧太后与辽圣宗又率兵南侵，攻真定、大名（河北大名）等重镇不下，绕道南进，十一月抵澶州（河南濮阳）。

澶州地处黄河北岸，渡河即达东京开封、北宋朝廷大为震惊，一片混乱，参知政事王饮若、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等人主张迁都逃跑，同平章事（宰相）毕士安、寇准则力劝真宗亲征。十一月二十八日，真宗勉强到达澶州。真宗亲征，鼓舞了士气，宋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辽孤军深入，河北许多州城并未攻下，先锋将萧挞览又被宋军射死，士气日益低落，陷于进退两难的局面，于是向宋方提出议和。议和，这是宋真宗求之不得的，自然欣然同意，并派曹利用作为和谈代表。在和谈过程中，辽方提出割关南地等要求，后经往返交涉，于十二月达成协议，双方约定：第一，宋辽结为兄弟之邦，宋主为兄，辽主为

弟，宋尊萧太后为叔母；第二，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第三，双方不接纳对方逃人，不在沿边修筑堡寨等。这一协议，史称“澶渊之盟”。可以看出，“澶渊之盟”实际上是宋对辽的一项妥协性和议，从此宋正式放弃了幽云，并把自己置于辽的附庸地位。

（三）“澶渊之盟”后的宋辽关系

“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在交界的雄州、霸州（河北霸县）、安肃军（河北徐水）等地设立榷场，进行贸易。北宋对辽输出稻米、茶叶、纺织品、手工业品及香药、犀角、象牙等等，辽的马匹，骆驼等牲畜及皮毛制品也输入北宋，人民之间保持了密切的经济联系，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虽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小规模的磨擦依然不时发生，辽朝统治者也并未因得到三十万“岁币”而满足，依然不断对宋进行掠夺、敲诈和勒索。

庆历二年（1042年），辽使萧英、刘六符至宋，以索回周世宗攻占的关南地相威胁，对宋进行敲诈。宋朝派富弼使辽，经过艰苦交涉，宋朝答应岁增二十万银绢，才算平息下来。增币之后，契丹贵族仍不满足，依然不断侵扰，在边界上挑起争端。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又派萧禧至宋，要求重划河东边界，并调集军队，对宋施加压力。面对辽的无理要求，宋神宗不顾大臣的反对，对辽屈服，派出代表，重新划定了河东边界。“往时界于黄嵬山麓，我可以下瞰其应、朔、武三州，既以岭与之，虏遂反瞰忻、代，凡东西失地七百里。”

总之，北宋一代就是这样一直处于辽国契丹贵族的不断骚扰、掠夺、威胁之下的。北宋统治者向辽“岁贡”大量的银绢，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只能换取一时的苟安。

二 宋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一）西夏王国的建立

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党项人属于羌族的一支，很早以来就游牧于我国西北高原上，唐朝中叶，迁徙到今甘肃、宁夏及陕西北部一带。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时，党项羌人的首领拓拔思恭因出兵助唐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被唐朝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李氏，并将银（陕西米脂）、夏（陕西横山）、绥（陕西绥德）、宥（陕西靖边）四州之地划归其管辖。从此，以夏州为中心的定难军藩镇便成为西北一支割据势力。五代时期，中原内乱，无暇顾及夏州，而党项李氏也表示“臣服”，因而得以保存实力，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封党项首领李彝兴为定难军节度使，李彝兴也对宋称臣。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亲征北汉，李氏也派兵助战。夏州一带产池盐，色青味美，为汉人所喜食，党项人乃以盐交换汉人的粮食、茶叶和其他手工业品，互通有无，羌汉人民间友好相处。但是，由于宋朝地方官员抱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偏见，对其歧视和百

般勒索，因而引起了党项人民的怨恨和反抗，民族矛盾加深。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夏州李氏内部由于节度使的继承问题发生了矛盾，第二年，李继捧率领族众五万余人归宋，并献出银、夏、绥、宥四州之地。但是，当宋朝派人前往夏州接收时，却遭到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的反对，并拥兵抗宋，宋亦派兵征讨，从此开始了连绵不断的宋夏战争，李继迁利用了党项人民反抗北宋民族压迫的心理，得到党项各部落的支持，因而力量迅速发展，很快攻占银州，并自称定难军留后，成为北宋的西北劲敌。李继迁在对宋战争的同时，还西攻回鹘及吐蕃各部，其统治范围扩大到河西走廊一带。

景德元年（1004年），李继迁死，其子李德明向宋称臣，宋朝厚加赏赐，封其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宋夏战争暂时停息下来。李德明当政二十多年，他利用战争停息的机会，保境安民，注意发展生产，并于保安军（陕西志丹县）设立确场，扩大，党项人与汉人之间的贸易，从中获得大量物资和铜钱。他还派人携带货物到北宋境内贸易，购买禁运物品，甚至还在内地打造武器带回西夏。他还经常派使者到东京向北宋朝廷献马、牛、羊等畜产品，得到来的大量回赠物资和银两、钱币等，在经济上得到很大好处。李德明统治时期，西夏的力量更加强大起来。

天圣九年（1031年），李德明死，其子元昊即位，进一步向外发展势力，其统治范围扩大到十余州，包括今天的甘肃、宁夏及内蒙、陕西的部分地区。随着势力的发展，其野心也越来越大，他首先废除唐宋赐姓，改姓元氏，取名嵬名吾祖，下令恢复鲜卑族的习俗，又取消西平王封号和北宋的纪年，改元广运。元昊还扩建宫殿，建立官制，中央设中书、枢密、三司、御史台等机构，总理全国政务，又置十二监军司，分统各地军队。经过一番准备之后，便于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正式称帝，定都兴庆府（宁夏银川市），西夏王国正式建立起来了。

（二）元昊的侵宋战争

正当党项族势力迅速发展时，北宋王朝却日益腐败，武备废弛，财用窘迫，因此，西夏对宋的掠夺战争也就势不可免了。

早在景佑元年（1034年）正月，元昊就开始进攻府州（陕西府谷），揭开了掠夺战争的序幕。当年七月，元昊又攻庆州（甘肃庆阳），败宋沿边都巡检杨遵，生俘宋环庆路都监齐宗矩。元昊称帝建国的消息传到开封后，宋廷认为这有损于大宋王朝的尊严，是不能容许的，举朝上下主张兴师问罪。宝元二年（1039年）六月，宋仁宗下诏削元昊官爵，撤消国姓，以夏竦、范雍为统帅，负责对夏作战。当时陕西的北宋驻军有二十万人，兵力不能算少，但夏竦、范雍却毫无取胜的信心，他们在陕西前线既未主动出击，也未能组织有效防御，而是将二十万大军分散驻守于各城镇寨堡，没有攻守计划，战争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状态。夏竦、范雍畏缩不前，元昊却对宋发动了攻势。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声言攻延州（陕西延安），知延州范雍束手无策，既不

敢出战，也无守城之策，只知派人四处求援。庆州（甘肃庆阳）守将刘平、保安（陕西志丹）守将石元孙等率兵一万多人日夜兼程进援延州，三月二十三日至延州附近的三川口，中夏兵埋伏，突围失败，刘平、石元孙被俘，其全军覆没。由于连日大雪，元昊主动撤兵，延州才未陷落。

延州惨败，北宋朝廷震动。宋仁宗下诏将范雍贬官，以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共同负责陕西防务。但是，对夏战争应采取什么对策，朝廷意见却很不一致，有主攻者，有主守者，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正当北宋朝廷内部争论不休的时候，元昊却于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对宋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进攻。韩琦闻讯后，派大将任福率兵一万八千人迎击，其作战方针是迂回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以逸待劳，待元昊退兵时伏击，以求全胜。但是，任福却恃勇轻敌，率轻骑数千人直趋前线，与后方粮草供应脱离，军中乏食三日，元昊施诱敌之计，任福穷追不止，终于在好水川（宁夏隆德县北）陷于夏兵主力的埋伏圈内，宋军孤军深入，寡不敌众，任福战死，全军覆没，将士死亡六千多人，北宋又遭到一次惨败。

好水川战役后，元昊更加紧了对北宋边境的侵扰，当年七月攻麟州（陕西神木）、府州（陕西府谷），大掠而还。又攻破丰州（陕西府谷县北），麟、府二州粮道也被切断，给北宋造成很大压力。北宋无力打败西夏，乃分陕西为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以庞籍知延州、韩琦知秦州（甘肃天水）、范仲淹知庆州（甘肃庆阳）、王沿知渭州（甘肃平凉），各兼本路兵马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分统各路军马防守，完全采取了守势。

庆历二年（1042年）九月，元昊率军攻镇戎军（宁夏固原），王沿令大将葛怀敏率军抵抗。在这次战役中，宋军又轻敌冒进，葛怀敏在定川寨（宁夏固原县西北）被夏军主力包围，突围不成，葛怀敏等将校十多人战死，余军九千四百多人，马六百匹，全部被俘。夏军乘胜东进，直抵渭州，在六七百里的地区内进行大肆抢掠后退兵。北宋又遭到一次惨败。

（三）宋夏和议

在宋夏战争中，元昊虽然一再取得胜利，但他本身也遭受很大损失。战争爆发后，北宋关闭沿边榷场，停止“岁赐”，不准西夏青盐进入宋境，宋的绢帛、茶叶、粮食和手工业品也禁止输出西夏，使西夏在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同时，连年的战争，也增加了西夏人民兵役和战费的负担，人民对侵宋战争普遍不满，因此，西夏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元昊感到，结束战争向宋进行经济勒索对自己更为有利，于是，便派代表至宋，表示愿息兵议和。随后，双方进行了多次谈判，于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达成协议，规定：元昊对宋称臣，宋封其为夏国王；宋每年赐给西夏绢十五万三千匹，银七万二千两，茶三万斤；开保安军及镇戎军高平寨为榷场，恢复双方贸易。长

达十年的战争暂时结束。

但是，时隔不过二十几年，西夏对宋又发动战争，宋夏之间，时战时和，和时要赐大批银绢，战时要花大量军费，都成为北宋政府的沉重负担。

三 民族矛盾的影响

由于契丹、党项贵族经常侵扰北宋边境，并不时深入内地掠夺，甚至发动大规模战争，致使北宋时期民族矛盾一直严重存在，有时还非常尖锐，对北宋王朝影响很大。

首先，由于北宋统治者采取“守内虚外”政策，不能有效地抗击辽夏的侵扰，因此，给沿边人民带来沉重灾难。面对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北宋统治者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政策，他们认为：“国家若无外扰，必有内患，外扰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把国内农民的反抗和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夺权者当作心腹之患，百般防范，一旦爆发农民起义则立即调集军队进行镇压，而对少数民族的侵扰，则看作是皮毛之疾，无关大局，往往采取妥协投降政策，不能有效地进行抵抗，使沿边人民深受其害。“河北之民，每为戎人所困者，有土地不暇耕凿，有稼穑不暇收获，杀戮俘虏，其辱已甚，兄弟父子，流离绝域。”陕西前线，也莫不如此，元昊攻麟州，破宁远寨，“焚仓库楼橹皆尽，复领兵攻府州。……纵兵四掠，刈禾稼，发窖藏”。葛怀敏定川败后，西夏兵“长驱抵渭州，幅圆六七百里，焚荡卢舍，屠掠民畜而去”。沿边人民被杀，财物被劫，战争过后，一片残破。

其次，辽夏侵扰，战争连年，使北宋每年付出大量军费，从而增加了人民的经济负担。为了应付战争，北宋王朝在河北、河东、陕西一带屯驻了数十万军队。宋朝边兵的待遇优于内地驻军，除优厚的正常俸钱、月粮外，边兵还有许多其他的待遇，如“因屯戍之劳”所发之“特支钱”，“戍兵两月一赐”的“薪草钱”，“念边戍劳苦，月赐士卒”的“月头银”，军队出征时计口发给的“口券钱”，以及临时的“军赏”等等，数目都相当可观，因此，边防驻兵越多，军费开支越大。庆历三年（1043年），权三司使王尧臣曾作过比较统计，他说：元昊侵边前，陕西每年支出钱帛粮草一千五百五十万，而侵边以来，每年支出达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河东原来每年支出钱帛粮草八百五十九万，而战争以来，每年支出增至一千三百三万。这庞大的开支，自然首先落到沿边人民身上，正如淳化元年（990年）太仆少卿张洎所指出的：“国家自戎马生郊，边防受敌，兵连祸结，属载于兹。邯郸致蹂践之虞，上谷失藩离之固。飞刍挽粟，千里而遥，丁壮毙于转输，膏血涂于原野。”仁宗时欧阳修也上书说：“夏人初叛命，天下苦于兵，而自陕以西尤甚，吏缘侵渔，调发督迫，至民破产不能足，往往自经投水以死。”内地人民的负担也很重，谏官蔡襄说：“自关陕用兵以来，修完城垒，馈运刍粟，配料百端，悉配州郡”。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

再次，民族矛盾也加深了阶级矛盾。辽夏贵族的掠夺及战争，使人民承担了赋税、徭役、壮丁、弓手等各种征调，人民无力负担而官府急如星火，再加以旱灾、水灾、蝗灾的不断发生，致使民间。十室九空，……皆厌赋役之烦，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妇携手赴井而死者。”因而促使阶级矛盾日益加深，农民的武装反抗也不断发生，枢密副使富弼说：“西鄙用兵以来，骚动天下，物力穷困，人心怨嗟，朝廷不能抚存，遂使为盗。”民族矛盾虽不能制约阶级矛盾，但它却影响着阶级矛盾的发展。

第二章 北宋前期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第一节 川峡地区是北宋初年阶级矛盾的焦点

一 土地高度集中

王小波、李顺起义，是北宋初年爆发于川峡路的一次农民大起义。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一般都发生于一个王朝的末年，为什么这次起义却爆发于北宋王朝的初年？这是由于这一地区的阶级矛盾特别尖锐造成的。

北宋灭蜀后，初设西川路，后分置峡西路，981年又合并为川峡路，相当于今天四川省的汉族人民居住区及陕西、甘肃两省南部和湖北西部的一部分地区。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以雷霆万钧之力，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国十多省，向唐朝的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等一切封建反动势力进行了猛烈冲击。他们杀死贪官污吏、地主恶霸，打开官府和地主的仓库，救济贫民百姓，涤荡着一切封建污泥浊水，“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给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但是，黄巢农民军攻占长安后，未能进入四川地区，便被封建统治者镇压下去了。因此，四川地区没有经受唐末农民战争的洗礼，原有的封建豪族庄园大地主没有受到任何触动，原封未动地保存了下来。另外，在唐末农民战争中，中原地区的地主，为了躲避农民军的打击，也纷纷迁居四川：一大批封建官僚、士大夫，在黄巢农民军攻占长安前，也跟随唐僖宗逃到四川，史称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这些人，在四川地区广置田产，兼并土地，成为一支新的兼并势力。

川峡地区，四周为高山环抱，地势险峻，东有三峡之险，北有剑门之固，易守难攻，中部是一块大盆地，土质肥沃、物产丰富，号称“天府之国”。唐末五代时，中原地区战乱较多，中原地主由于受到农民战争、藩镇混战等的冲击，以及地主阶级内部相互斗争的结果，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因此，北宋初年的土地集中，从全国来看，并不严重，《宋史》卷一百七十三《食货》：“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京城附近的荒地竟然这样多，其他地方一定更多，在荒地很多的情况下，农民占有一小块土地，应当不是很困难的事。川峡地区则不同，这里的地方势力，依靠地势之险，物产之富，挡住了中原封建军阀的侵扰，黄巢农民起义军又没有到过这里，因此，这里环境一直比较安定，在这种情况下，自唐中期发展起来的土地兼并，便没有受到阻碍，一直向前发展，因此，这里的土地集中，也就特别严重。后蜀节度使田钦全，仅在成都一地就占有土地一万多亩，后来他将这些土地全部施舍给了成都正法院作为寺产，其占地之多，可以想见，任过永康军知军的吕陶也曾说：“成都府界，四境之土相距皆百二三十里，昔为十县，

县之主户各二三万家，而客户数倍焉。”川峡多数农户是不占有土地的。川峡路的土地集中情况，我们从北宋政府的主客户统计中，就可以了解，据乐史《太平寰宇记》的不完全统计，宋太宗时川峡路的总户数为1，167，872户，其中客户为487，902户，约占百分之四十一强，客户之多，已远远超过全国其他地区，还有些州县的客户竟多达百分之七八十以上，如嘉州（四川乐山）总户数为29，168户，其中客户为23，207户，占百分之七十多：昌州（四川大足）总户数为13，880户，其中客户为12，700户，占百分之九十多；普州（四川安岳）总户数为15，410户，其中客户为13，144户，也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由主客户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川峡地区的农民大部份不占有土地或占有土地很少，这里是全国土地集中最严重的地区，因此，贫富对立和阶级矛盾特别尖锐。

二 庄园农奴制盛行

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土地占有形态的变化，自唐代开始出现的契约租佃制，到北宋时便成为农业生产中占支配地位的租佃形式。佃客与地主间通过契约建立租佃关系，地主向客户提供土地，客户向地主纳租，可以添租划佃，也可以退佃，一切都按契约规定办理，主客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松弛，客户可以离开地主的庄园。但是，川峡地区，由于土地高度集中，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成都府外，大部份地区生产关系还比较落后，佃客对地主的封建依附性还很强，基本上还处于封建庄园农奴制阶段。

川峡路的地主集中了大量土地，同时也奴役、剥削着大量的劳动人口，这些劳动人口在川峡路被称为“旁户”。《宋史？刘师道传》：“川峡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户。”《宋会要辑稿？刑法》也说，“巴蜀民以财力相君，每富人家役属至数千户”。大地主役属的旁户很多。旁户不同于一般的佃客，《太宗皇帝实录》卷七十九：“旁户素役属豪民，皆相承数世”，是世世代代被束缚于豪族地主庄园上的劳动者，他们与地主之间是世袭的封建依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农奴。原籍川峡的苏洵，曾对此有过描写，他说：“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相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使，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力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旁户是在豪族庄园主的指挥、监督之下劳动；他们在生产中没有自由，在这里还存在着严重的超经济强制。旁户所受封建剥削也是很重的，《宋史？刘师道传》：“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即田税、布帛、徭役等所有的国家征调，都要旁户承担，其剥削量超过了同时代其他地区地主对客户的剥削。

川峡路的豪族地主，为了增加供他们剥削的劳动人手，除兼并土地外，还采取暴力手段？把普通农民变为他们的旁户。南宋史学家李焘曾记载说：“南川巴县热夷李光吉、王衮、梁承秀三族，各有地客数千家，间以威势诱胁汉户，不从者屠之，没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户，谓之‘纳身’。”熟夷，就是已经汉化了的少数民族，李光吉、王衮、梁承秀三

族，占地客数千家，当是豪族庄园大地主，但他们仍不满足，依然不断抢占农民土地，强迫农民“纳身”，变为他们的农奴，他们不仅是农奴主，同时也是地方恶霸。

落后的庄园农奴制，使农民受到残酷的压迫剥削，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能离开庄园主，世世代代当农奴，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促使川峡地区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

三 北宋政府的横征暴敛，

川峡盆地物产丰富，盛产稻谷、茶叶、丝、麻、布帛、绫锦等，有所谓“罗纨、锦绮等物甲天下”之称，特别是蜀锦，更是闻名全国。后蜀时，孟昶加紧对人民榨取，府库中积存了大量的财富，乾德三年（965年）北宋灭蜀后，宋太祖组织了水、陆两支运输队伍，用十年多的时间，把后蜀府库中的宝货、钱币、布帛、粮食等，全部运走，“悉归内库”，使川峡人民受到一次空前的浩劫。

后蜀统治时的川峡人民，对孟昶的统治极为不满，如在成都，即“满城诵朱长山《苦热诗》，曰‘烦暑郁蒸何处避，凉风清冷几时来!’上（赵匡胤）曰：此蜀民思吾之来伐也。”的确川峡人民对北宋统一是表示欢迎的。川峡人民之所以欢迎北宋，一是希望统一后能减轻封建压迫剥削，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北宋政府不仅运走了后蜀府库中贮存的全部财富，而且对后蜀时的各种征收都继承下来，使之合法化了。如梓州，“州承旧政，有庄宅户、车脚户，皆隶州将，鹰鹞户日献雉兔，田猎户岁入皮革。又有乡将、都将、镇将辈互扰乡里”与后蜀时没有什么不同。再如所谓头子钱，开宝“六年，诏诸仓场受纳所收头子钱，一半纳官，一半公用。……是岁令川峡人户，两税以上输纳钱帛，每贯收七文，每匹收十文，丝绵一两，茶一斤，秆草一束各一文”。还有牛皮钱的征收，开宝八年（975年）三月，宋太祖在一个诏令中说：“四川尚存伪制，牛驴死者，革尽输官，宜蠲去之。每民租二百石，输牛革一，准钱千五百。”各种名目的征收，不胜枚举。

川峡地区二税的征收，也较其他地区为重，因为宋政府规定，川峡人民的二税，不收本色，一律折为绢帛缴纳，最初绢价较低，后来绢价提高，但所纳数量不变，加重了人民负担。另外，豪族地主还往往与封建官吏勾结，上下其手，千方百计隐漏赋税。宋太宗就曾经指出：“今州县城郭之内，则兼并之家侵削贫民，田亩之间，则豪猾之吏隐漏租赋，虚上逃帐。”其所隐漏的赋税，自然转嫁到了小农身上，“征役不均于苦乐，收敛未适于轻重”，赋役负担极为不均。

川峡地区，特别是成都府等地，纺织业非常发达，蜀锦名闻中外。这里的农民，除农业生产外：大多从事家庭纺织业，以补农业之不足。对于农民的家庭纺织手工业，北宋政府也不放过，为了搜刮到更多的绢帛布匹，淳化年间，北宋政府规定：“成都除常赋之外，又置博易（买）务，诸郡课民织作，禁商旅不得私市，日进上供，又倍常数。”从此，布

帛的生产和销售受到国家的控制，不准私自买卖，国家还强迫农民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帛，低价卖给国家。博买务的设立和禁私市布帛的规定，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把农民从事家庭副业这一生路也给断绝了。

茶叶是川峡地区的特产之一，许多农民以种茶为生，没有土地的“旁户”也在庄园主的土地上种茶。吕陶说：“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赋税一例科折，役钱一例均出，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即茶农按规定缴纳税役钱帛后，才可出卖茶叶。川峡地区虽无茶禁，但北宋政府为了能够收购到大量茶叶用以交换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却“禁其出境”，不准私自贩运到外地出卖，必须卖给官府的茶场或经国家准许的大茶商；国家对茶商购销茶叶的数量、地点、时间、运输路线等，都有严格规定，不准违犯。茶场及茶商收购茶叶时，都压低茶价，茶农深受其害，许多茶农因此破产；由于茶叶的购销为国家所控制，不能自由贩运出境，因而大量中小茶贩失业。

四 小股农民起义不断爆发

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加深了川峡地区的阶级矛盾，但祸不单行，北宋初年又连续发生自然灾害，水旱不断袭击着川峡地区的劳动人民。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八月，“嘉州言：江水暴涨，坏官寺庐舍，溺死者千计”。淳化二年（991年）七月，“嘉州江涨，溢入州城，毁民舍。……九月，邛州蒲江等县，山水暴涨，坏民舍七十区，死者七十九人。淳化四年九月，梓州玄武县涪河涨二丈五尺，壅下流入州城，坏官私庐舍万余区，溺死者甚众”。淳化四年（993年）冬），“东西两川旱，民饥，吏失救恤”。频繁的灾害，激化了阶级矛盾，使川峡地区成了全国阶级矛盾的焦点，因此，北宋初年这里便爆发了农民起义。

川峡人民反抗北宋统治的斗争，从北宋灭蜀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乾德三年（965年），王全斌、刘光义、王仁赡率领宋军灭蜀后，以胜利者自居，他们在蜀“日夜饮宴，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蜀人苦之”；王全斌还克扣原蜀兵的军饷，对其进行种种凌辱，甚至屠杀降兵，终于引起了川峡人民的反抗。以全师雄为首的原蜀降兵在绵州（四川绵阳）发动兵变，号称“兴国军”，有十多万人。三月，“两川贼群起，先锋都指挥使高彦晖死之。”；966年，“渝州（四川重庆）贼杜承褒劫众围州城”；开宝六年（973年）“朱昂权知广安军，会渠州妖贼李仙众万人劫掠军界”；这年在果州（四川南充）、合州（四川合川）、渝州（四川重庆）、涪州（四川涪陵）等州县，也发生了人民起义；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绵州（四川绵阳）妖贼王禧等十人以妖法惑众；淳化二年（991年）“贼任诱等寇昌、合州”；淳化三年（992年），在荣州（四川荣县）、戎州（四川宜宾）、资州（四川荣县）、富顺监（四川富顺）等地，又发生武装起义；淳化四年（993年），在荣州、资州再次爆发起义。

小规模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说明北宋初年川峡地区的阶级矛盾已经很尖锐，随着阶级矛盾的逐渐激化，至淳化四年（993年），便爆发

了王小波、李顺为首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第二节 王小波、李顺起义

一 青城举义

青城县（四川灌县境内）在北宋初年属于川峡路永康军，这里群山环绕，可耕地本来很少，而大部分又为豪族庄园大地主和寺院占有，广大农民主要靠租种地主的土地为生。这里盛产茶叶，中外驰名的雀舌、鸟嘴等细茶，就是这里所产，更有大量的粗茶，价格低廉，为少数民族所喜爱。

川峡路的茶叶生产受到政府的控制，一般是政府预先支一部分“定钱”给茶农，作为茶叶生产的基金；收茶后，茶农要将茶叶卖给国家，拖欠不卖或私卖者有罪。由于政府禁止茶叶出境，所以茶叶的销售实际上也控制在政府手中。国家为了收集到更多的茶叶，便不断增加茶农的交售量，并一再压低价格，茶农完不成交售任务，往往被关押治罪。

王小波是青城味江的一位贫苦茶农，他要缴纳很重的茶税，还要把茶背负到很远的茶场去卖给国家，受大秤低价的剥削，生活极为贫苦。淳化年间，青城先是发生了水旱天灾，随后又发生饥荒，到淳化四年（993年）二月，这里的茶农已经绝粮断炊，眼看交售茶叶的日期又快到了，交不足茶叶要吃官司，王小波再也无法忍受了，便于二月二十八日，串连一部分贫苦农民，在味江发动了武装起义。

王小波起义后，针对川峡地区土地高度集中和贫富不均这一普遍的社会问题，向贫苦农民宣传：“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个明确的口号，道出了人民的心愿，因而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贫者附之益众”，农民军队伍迅速扩大，“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很快攻占了青城县城。攻占青城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群众，各地“旁户”纷纷参加起义，从此，在川西山区燃起了农民革命的熊熊烈火。

王小波攻占青城后，很快挥兵南下，攻占了蜀州（四川崇庆）、邛州（四川邛崃）的一些地方。随后，王小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攻彭山县城，彭山知县齐元振，负隅顽抗，城破被农民军活捉。齐元振平日“与民为仇，受赇得金帛，多寄民家”。是贪污受贿、残害百姓的一个大贪官，北宋政府却称赞他“清白强干”皇帝也对他“赐玺书奖谕”。人民对齐元振极为痛恨，首先将他处以死刑，并“剖元振腹，文以钱刀”，将他的肚子里填满了铜钱，使这个贪残的家伙受到了应得的惩罚。随后，农民军又没收了他的全部家产，分给贫困农民。农民军所到之处，“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农民军的“均贫富”行动和良好的纪律，深深得到农民的拥护，他们纷纷参军，农民军“由是愈炽”，起义队伍更加扩大了。

淳化四年（993年）冬，“东西两川旱，民饥，吏失救恤”，流民遍野，“饿殍相望”，许多饥民参加了起义军。这年十二月，王小波率领农民军北上，进攻江原县城（四川崇庆县境）。西川都巡检使张玘驻守江原，他不敢正面与农民军相抗，便使用空城计阴谋，结果农民军中计，王小波陷在城内，城门也关闭了，形势非常危急。王小波的妻弟李顺，听到这一消息后，带领后军迅速赶到，冲进城去，在县府前的大街上与官军展开激战，战斗中，王小波的额部被张玘射伤，但他毫不退缩，带伤拼搏，将张玘打下马来杀死，报了一箭之仇，农民军里应外合，把官军打得落花流水，官军大部被歼灭，只有四百余人狼狈逃窜。江原城被农民军攻占了，但王小波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很快便死去了，他为农民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

二 建立大蜀政权

王小波牺牲后，农民军推举李顺为自己的领袖。李顺也是一个贫苦茶农，他为人忠厚，作战勇敢，又善于团结人，因而得到起义军的拥护。王小波的牺牲，使农民军感到无限悲痛，农民军战士一个个义愤填膺，决心高举“均贫富”大旗，用更大的胜利来悼念自己的领袖。

淳化五年（994年）正月，李顺率领农民军攻破蜀州（四川崇庆），杀监军王亮等封建贪官十多人；破邛州（四川邛徕），杀知州桑保仲、通判王从式等，巡检使郭允能领兵顽抗，被农民军打死，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随后，农民军分兵两路，一路攻克永康军（四川灌县境）、双流、温江、郫县；另一路由李顺亲自带领，对成都作试探性进攻，烧西郭门。正月五日，李顺攻占汉州（四川广汉），六日破彭州（四川彭县），对成都完成了包围。

成都府，是川峡路的首府，也是最大的都市，自唐朝以来即以繁荣富庶著称，历来与东南大都市扬州齐名。时任成都知府的吴元载，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专尚苛察，民有犯法者，虽细罪不能容”，人民动辄犯禁，许多人被关押折磨致死。面对农民军的蓬勃发展，他束手无策，“不能扑灭”，成都很快被包围，成都人民日夜盼望农民军进城。成都被包围的消息传到朝廷，宋太宗十分惊慌，下诏将吴元载撤职，令其回京听候处理；另派郭载知成都府，并提升梓州（四川三台）知州樊知古为西川转运使，协同郭载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

樊知古昏庸腐朽，十分怕死，接到任命后，他根本不敢前往成都，仍呆在梓州（四川三台）观望形势。郭载行至梓州，有人劝他说：“成都必陷，公往亦当受祸，少留数日，则可免”，但坚决与人民为敌的郭载那里肯听，他妄自尊大，认为凭他的武力就可一举消灭农民军，他催樊知古上路，一起到了成都。

成都府虽有高城深池，但却无重兵防守，只有监军宿翰的少数兵马支撑局面，梓州都巡检使卢斌前来支援，也只有六百人，总兵力还是不多，根本不是农民军的对手。农民军数十万人向成都发动了进攻，战鼓

声、喊杀声响彻云霄，箭镞、炮石像雨点般射向城头，城楼着火了，城墙倒塌了，农民军战士跨过城壕，奋勇爬上了城头，与官军展开了肉搏战，官军大部分被歼灭，一月十六日，农民军攻克成都府。城破时，知府郭载，转运使樊知古等人狼狈出逃梓州，卢斌也带领残部返回，宿翰则一直逃到剑门（四川剑阁）。不久，樊知古“忧悸卒，年五十二”，郭载则“忧患成病卒，年四十。”这两个反动官僚，都是由于农民军的打击而惊吓丧命的。

为了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李顺自称蜀王，建立了大蜀政权，改元“应运”，并建立了中央政权机构，任命了中书令、枢密使、仪鸾使、军帅等中央官员；任命了知州、刺史等地方官，还铸造了自己的铜钱“应运元宝”和铁钱“应运通宝”。

大蜀政权建立后，李顺立即分兵四出，向周围地区发动攻势，不断扩大战果。以杨广为统帅，领导数万人向川北进攻，很快攻占绵州（四川绵阳）、阆州（四川苍溪县东南）、巴州（四川巴中）、剑州（四川剑阁）等地；东路军攻遂州（四川遂宁）、合州（四川合川）、广安军（四川广安县北）、渠州（四川渠县）、达州（四川达县）等地，“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两路军队很快占领了川峡路的大部分地区，北宋官军溃不成军，不敢与农民军接战，只能龟缩固守梓州（四川三台）、眉州（四川眉山）等少数城市。

农民军在胜利进军的同时，还在“北抵剑关，南距巫峡”的范围内，进行了“均贫富”斗争，他们没收地主官僚的“财帛”，在人民群众带领下挖掘“豪家收藏地窖”，将这些不义之财分给贫苦农民。在农民军的打击下，往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封建统治者们，“人心恐悚，投死无地”，广大农民群众扬眉吐气，欢天喜地。

大蜀农民军的胜利，也鼓舞了其他地区人民的反抗斗争。如在秦陇地区，农民军领袖赵包，即“聚徒数千，将趋剑阁以附之”。打算与李顺的农民军汇合。北宋政府的长江运输兵，在农民军影响下，也动摇了，“峡路诸漕卒数千人聚江陵……谋变以应蜀寇”。

在李顺的领导下，几个月的时间，农民军取得了巨大胜利，把这次农民起义推向了最高潮。

三 剑门、梓州战役失利

杨广攻占剑州后，随即北攻剑门关（四川剑阁县东北）。剑门关位于崇山峻岭之中，只有栈道一线可通，是川峡路的北方门户，为陕西入川的必经之地。只要控制了剑门关，进可北攻陕西，退可守卫川峡，剑门形势险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农民军进军剑门关，从战略上看，十分必要，是完全正确的军事措施。

驻守剑门关的官军数量不多，听到农民军打来，人心惶惶，许多人主张弃关逃跑，都监上官正看到军心动摇，便采取高压争段，宣布：“有

议北归者枭首，有不用命者支解”，勉强维持残局。农民军攻取剑门关，应当是不困难的，但投入的兵力过少，只有几千人，另外，又事不凑巧，从成都溃退的官军宿翰、郭延睿两支军队也赶到了这里，农民军腹背受敌，死伤很多，结果失败。剑门关战役的失利，不仅使农民军失去了控制川北天然屏障的机会，而且为北宋官军的大批进川敞开了大门，“自是阁道无壅，王师得以长驱而入”。

淳化五年（994年）二月，李顺还派相贵率领农民军二十万人东攻梓州（四川三台）。梓州位于川峡盆地的中部，北宋剑南东川节度使就驻在这里，历来也是一个军事重镇，它的周围有凤凰山、牛头山、三台山，是天然屏障，涪江、罗江绕城而过，可以引水护城，形势非常险要。知梓州张雍，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农民军还未到梓州，他就早已“谋为城守计，训练城中兵，得三千余，又募强勇千余，令官属分主之，辇绵州金帛以实帑藏，销铜钟为箭镝，伐木为竿，纫布为索，守械悉备”。从成都府溃退的梓遂十二州都巡检使卢斌率领残部来到梓州，张雍对他热情接待，并“委以监护之任”，他还派观察推官星夜赴京城请兵。因此，梓州城虽然不大，但形势险要，守兵虽不很多，但已有备。

相贵率领农民军进抵梓州后，首先攻占了凤凰山、牛头山等城外的几个制高点，这样，城内的一切活动，便尽收眼底了。农民军感到，梓州城高池深，不便硬攻，宜用智取，诱卢斌出城将他歼灭。农民军攻城，队伍不整，且多老弱，卢斌感到可胜，就要出城接战，结果被张雍制止，城内的农民军内应“依敌楼呼啸，与外应和”，也被张雍逮捕杀害，计取失败。随后，农民军将梓州团团围住，“大设梯冲火车，夜鼓噪攻城”，城内“发机石碎之，火箭杂下”，战斗十分激烈，农民军损失很重。全面攻城失利后，农民军又集中攻城器械，准备攻城之西北角。老奸巨猾的张雍，急调骑兵五百人于东门，摆出要从东门杀出的态势。农民军在牛头山顶望见，信以为真，便将精锐万人埋伏于牛头山下，待其出城，张雍却暗中派精壮一百多人，潜出城外，将农民军集中在城西北角的攻具全部放火烧掉，农民军攻取一角的计划也没有实现，从此，进入了相持阶段。一日北风大作，农民军又“乘风纵火，急攻北门”，也没有成功。由于农民军的长期围攻，城内也开始动摇，其“同幕者皆谋图全之计”，官员有的已准备投降或逃跑，但这时官军的援兵到了，宋将石知颙率兵赶到，农民军受到内外夹击，损兵数万人，被迫撤退。

农民军以二十万人的兵力受阻于坚城之下，长达八十天之久，不仅消耗了自身的力量，而更为严重的是贻误了战机，使之不能抽出更多的兵力进攻剑门关和向外发展，对整个战局危害很大。

四 成都陷落

淳化五年（994年）二月一日，北宋朝廷接到农民军攻占成都府的报告，举朝震动，宋太宗对宰相说：“岂料贼势猖炽如此”!随即任命王继恩为剑南两川招安使，作为总统帅，以雷有终、裴庄并为峡路随军转运使，分兵两路，一路以马步军都军头王果统领攻剑门，一路以崇仪使带

御器械尹元统领攻夔门，从北面、东面向农民军发动进攻。

王继恩是一个大宦官，受到宋太宗的赏识，最初为宫苑使、河州刺史，曾参加收复幽云的战役，后任皇城使、田练使、镶定高阳关三路排阵钤辖，淳化五年又加昭宣使、勾当皇城司，是宋太宗的心腹。宋太宗让他统兵，“军事委其制置，不从中覆，管内诸州系囚，非十恶正赃，悉得以便宜决遣。”给他全权处置的权力。除军事镇压外，宋太宗还采取“招抚”欺骗政策，宣布农民军“有本非同恶，受制凶徒，先被协从，今能归顺者，并释其罪，倍与安存”，以血腥屠杀与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向农民军反扑过来。

由于杨广攻取剑门失利，王继恩得以顺利与上官正、宿翰等汇合。淳化五年（994年）四月中旬，王继恩分兵两路，一路为主力，他亲自统领，由石普、马知节为前锋广进犯川北军事重镇剑州（四川剑阁）；另一路由曹习统领为偏师，自葭萌（四川广元境）出发，南攻阆州（四川苍溪县，东南）。由剑门关至剑州，一开始是上坡路，不易攻取，狡猾的王继恩没有从正面进攻，而是绕道小剑门，从西路旁攻；破研口寨，杀农民军五百人，随后东攻汉源坡、青强岭，控制了南下剑州的道路，随后以主力，居高临下，猛攻剑州，农民军虽然全力进行防守，但终因力量对比相差太多，剑州失守。农民军五千人，又在剑州城南四十里的柳池驿设防，也失败了，六百多人被杀，“溺死者不可胜计”。四月十八日，王继恩犯绵州（四川绵阳）境，由于地主分子王华组织地主武装千余人对绵州进行突然袭击，农民军遭受很大损失，四月十九日王继恩得以顺利夺取绵州，农民军三百五十七人被俘，受到“凌迟处死”的酷刑。另一路官军由曹习统领，四月十日自葭萌（四川广元境）出发，沿嘉陵江南犯，指向阆州（四川苍溪东南），农民军自动放弃青山镇，以“万余众依险为寨”守老溪。四月十二日，曹习犯老溪，农民军依险据守，英勇战斗，三千多人牺牲，余众投江而死，老溪失守。不久，巴州（四川巴中）也被巡检使胡正违攻占，农民军守兵五千人，大部牺牲。

王继恩侵占剑州、阆州、绵州、巴州等川北重要城市后，便集中兵力进犯大蜀政权的中心城市成都府。当时，以大蜀王李顺、枢密使计词、吴文赏为首的农民军十万人守卫着成都，与官军相比，兵力太少，同时，城内的粮食和守城器械也不足，周围的一些州县，有的已为官军攻占，有的被官军包围，农民军也缺乏外援，因此，形势对农民军极为不利。虽然如此，但农民军毫不畏惧，他们誓死保卫大蜀政权，决心与成都共存亡。

五月六日，王继恩对成都发起围攻，农民军奋起还击，在成都人民的支援下，打退了官军一次次进攻。但是，终因兵力不足，外援未至，农民军大部分战死，成都陷落。农民军领袖李顺率众与官军激战，壮烈牺牲，为农民革命献出了生命。农民军将领计词、吴文赏、卫进、李俊、徐师中、吴利涉、彭荣等十二人被俘，五月二十五日在凤翔被杀害。

北宋官军进入成都后，“杀人如戏谑”，对农民军和守城群众，进行了野蛮大屠杀，农民军三万多人被杀，许多无辜群众被害。王继恩还“纵卒剽掠子女玉帛”，大蜀府库中的金帛一百四十多万，被抢劫一空，成都人民遭到一次空前的浩劫。

五 农民军在川东的斗争

北宋的东路官军由雷有终、裴庄、尹元统领，沿江西进，经夔门进犯川东。尹元攻新宁（四川开江），农民军英勇抵抗，三千多人牺牲，新宁失守。农民军退守梁山（四川梁平）、广安军（四川广安县北）、果州（四川南充）、渠州（四川渠县）一带，坚持斗争。雷有终犯广安军，“军垒濒江，三面树栅”，严加防守，夜里遭到农民军袭击。四月，尹元、裴庄犯果州，农民军将领田奉正、苏荣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主动撤退，向东转移至渠州。尹元、裴庄进犯合州，合州地处三江汇口处，交通方便，北可沿江至川北，南下可抵渝州（重庆）进入长江，是川峡的军事重镇之一。东路官军合兵攻合州，地主分子袁延度，也率领地主武装千余人，协助官军攻城，在城东的一次大战中，农民军失利，四月十九日，合州陷落。但不久，合州又为农民军将领黄广儒收复。随后，双方对合州进行了多次反复争夺，战斗激烈，六月十三日，农民军数千人牺牲，合州最后一次失守，未能再复，从此，川东的大部分州县，相继为官军占据。

成都陷落后，农民军退到了农村，成都“郭门十里外，犹为贼党所据”，成都郊区依然为农民军的天下。另外，围攻梓州、眉州的农民军，听到成都陷落的消息后，也自动撤退，化整为零，转移到广大农村活动。农民军将领张余，对形势作了分析，他看到，入川官军大部分集结于成都、合州、梓州、广安军等几个中心城市，并且“孤立无援”，而分散潜伏在农村的农民军还相当多，还有发展的余地。于是，张余重新集结分散在农村中的起义军战士，得一万多人，向官军防守比较薄弱的长江沿岸发动了攻势，他们顺利攻克嘉州（四川乐山）、戎州（四川宜宾）泸州、渝州（四川重庆）、涪州（四川涪陵）、忠州（四川忠县）、万州（四川万县）、开州（四川开县）等八州，占领川东大片地区，发展到十万多人，又掀起了农民战争的新高潮。

在进军川东的过程中，以攻取忠州、开州的战役最为激烈。农民军攻忠州，知州崔遵度据城顽抗，农民军“逾堞以入”，冲进城内，他无处躲藏，眼看就要成为俘虏，便投江自杀，结果部下救起，狼狈逃窜。巡捡使秦传序守开州，农良军攻城，他“督士卒，昼夜拒战，婴城既久，危蹙自甚”，在农民车打击下，城内官员和士兵纷纷向农民军投降，他成了光杆司令，开州城破，投火自焚死。

开州战役后，张余率领农民军十万人，战船千余只，经云安军（四川云阳）攻夔州（四川奉节东白帝城），计划东出三峡，进行战略大转移。夔州知州慕容德琛，乘农民军不备，进行突然袭击，战于龙山，农民军战败，千余人牺牲。北宋朝廷得知张余再起的消息后，深怕农民军

进入荆湖地区，立即任命白继赞为峡路都大巡检，统精卒数千人，日夜兼程，进援夔州。五月十九日，张余率领农民军与慕容德琛战于西津口，“矢石如雨”，胜负不分之际，白继赞与巡检使解守颐领兵数千人突然向农民军袭来，农民军前后受到夹击，两万多人牺牲，“流骸塞川而下，水为之赤”，战船千余只，也全部丧失，甲铠损弃无数。农民军东出夔门的目的未能实现。

张余从夔州撤退后，屯驻云安军，与官军形成对峙局面，其间，农民军曾进攻施州（湖北恩施），但没有攻下，八月十九日，云安军也为官军攻占。张余东不能出川，便且战且退，又返回了嘉州。

六 农民军的失败

李顺牺牲后，农民军失去了统一指挥，从此各自为战，既不能互相配合，也削弱了自身的力量。

淳化五年（994年）八月，宋太宗任命张咏知益州（成都府）。九月，又任命亲信宦官卫绍钦为同招安使，让他们协助王继恩围攻各地农民军的残余力量。张咏、卫绍钦到益州后，首先把矛头指向成都附近的农民军据点，在官军的不断围攻下，城郊的学射山、双流相继失守；农民军据守的蜀州，也被杨琼攻陷；曹习攻温江，农民军军帅马太保牺牲，温江陷落。这时，各地的地主分子也纷纷组织反动武装，向农民军进行反扑，如雅州（四川雅安）地主曹克明，即“集溃兵得七千人，又募丁壮三千”，攻击农民军，占据了“名山、火井、夹江等九县”，后又占据雅州，使农民军遭受很大损失。十一月十五日，大蜀政权中书令吴蕴又率军攻眉州，张余也率领农民军前来支援，激战中吴蕴不幸牺牲，攻城失利，张余退回嘉州。

嘉州是农民军坚守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眉州战役后，宿翰南犯嘉州，农民军为保卫嘉州，与官军进行了殊死搏斗，但在战斗的紧要关头，大蜀政权的嘉州知州王文操，经受不住朝廷“招抚”政策的引诱，十二月十三日，他变节投敌，并将嘉州献给了宿翰。王文操叛变后，张余依然在城外坚持斗争，至道元年（995年）二月二十日，兵败被俘，面对敌人的屠刀，他威武不屈，被残酷杀害。嘉州陷落后，川西地区各州县，相继为官军占据，农民起义斗争进入低潮。

至道二年（996年）五月，张余的余部王鸬鹚又重新举起了义旗，他自称“邛南王”。这一消息传出后，隐蔽于丛山密林中的农民战士，纷纷响应，重新集结到邛南王旗下，向邛州、蜀州地区发动了进攻，北宋朝廷慌忙任命石普为“西川提举捉贼使”，调集军队围攻，不久，王鸬鹚起义军也被镇压下去。至此，王小波、李顺为首的川峡农民大起义，便最后失败了。

第三章 北宋中期的农民战争

第一节 北宋中期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

一 北宋“三冗”的发展

北宋王朝建立后，宋太祖、宋太宗两朝，曾奖励垦荒，减轻赋役，并取消了五代时期的一些杂税，因此，在农民的辛勤劳动下，北宋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发展，经过六七十年的时间，到宋真宗统治时期，便达到了它自身发展的顶峰。宋仁宗以后，由于冗官、冗兵、冗费等三冗的发展，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不仅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遭受阻碍，而且激化了阶级矛盾。

北宋政府建立了一套庞大、重叠的官僚机构，设官多如牛毛，太宗统治时期，官员已经过剩，真宗以后至仁宗时，便形成了冗官局面。宋代之所以形成冗官，首先是由于科举取士人数不断扩大。北宋初年，科举取士人数较少，进士科每年不过数十人，太宗以后，取士人数逐渐增多，真宗时期更加扩大，咸平三年（1000年）真宗亲自主持考试，一次就录取进士、诸科等一千多人。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前后举行科举十三次，仅进士科即录取了四千五百七十人，而诸科人数更多；宋代还有所谓“特奏名”，专门录取多次参加科举的高年龄落榜者。宋代又取消了“释褐试”，一经录取，即可授官。因此，随着科举取士人数不断扩大，官员的数量便日益增多。“恩荫”的泛滥，是宋代官员膨胀的另一重要原因。北宋规定，除科举外，皇室贵族、后妃、姻亲、五六品以上官僚子孙及其亲朋门客等，都可以通过三年一次的大礼及圣节、致仕、改元等机会得到“恩荫”为官。庆历七年（1047年）一年之内，皇族因恩荫得官者即达一千多人，有的官宦子弟还在襁褓之中就已经恩荫为官了。受荫者当官之后，又可再荫别人，因此，文武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叶梦得说：宋初“三班例员止三百，或不及。天禧后，至四千二百有余，盖十四倍。元丰后，至一万一千六百九十，合宗室八百七十，总一万二千五百六十，视天禧又两倍有余。以出入籍较之，熙宁八年入籍者，岁四百八十有余，其死亡退免者，不过二百，此所以岁增而不已也。右选如此，则左选可知矣”。文武官员的数量都超过了官位的许多倍，宋祁曾经说：“天下有定官无限员，……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清人赵翼，对宋代官员的冗滥也作过评论，他说：“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右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至北宋中期，官员冗滥已经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

北宋王朝是通过发动军事政变建立起来的，因此，北宋统治者非常重视军队，把军队看作政权的主要支柱。北宋立国之初，各种军队总数不过三十多万人，由于北宋采取募兵制，特别在荒年时又大量募兵，因

此，军队的数量便逐年增多，太宗时达到六十六万多人，真宗时达到九十一万多人，至仁宗时，便猛增到一百二十五万多人。庆历八年（1048年）北宋全国总户数为一千零七十多万，每户按五口计算，总人口不过五千多万人，除去老、幼、妇女，不过一千多万人，可见，占很大比重的男劳力都已应募为兵，成了坐衣待食之辈。北宋军政也极为腐败，将领大多是贪财黩货之徒，他们忙的是兼并土地，经商营利，根本不把军队的训练放在心上。大将石守信解除兵权后，“专务聚敛，积财矩万”，他们还远自陕西贩运竹木到东京谋取暴利，“所过矫制免关市算”。仁宗时大将杨崇勋“尝役兵工作木偶戏人，涂以丹白，舟载鬻于京师”。神宗时，陕西禁兵“其间至有匠氏、乐工、组绣、书画、机巧，百端名目，多是主帅并以次官员占留手下，或五七百人，或千余人”，武将私役士兵为自已经营工商业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仁宗时张亢说：“国家竭财用以赡军，今军士有手艺者，管兵之官每指挥抽占三分之一”。国防前线的士兵也不例外，同样有许多人变成了将官们的役人。薛向说：“陕西之兵，厢、禁军凡二十五万，其间老弱、病患、伎巧占破，数乃过半。”这些士兵虽然挂名军籍，但由于长期缺乏训练，对战阵却一窍不适，因而成为冗兵，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冗官、冗兵又带来了冗费。北宋官员数量多，待遇也很优厚，《宋史？职官志》：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冬绵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月二百千，绫十匹，绢三十匹，绵五十两。节度使，月四百千，节度观察留后，三百千，观察二百千，绫绢随品分给。其禄粟，则宰相、枢密使月粮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权三司使七十石。节度使一百五十石，观察、防御使一百石。熙宁中，又诏县令、录事等官，三石者增至四石，两石者增至三石。俸钱禄米之外，又有职钱，御史大夫、六曹尚书六十千；翰林学士五十千。俸钱、职钱之外，又有元随、傔人衣粮，宰相、枢密使各七十人，参知政事至尚书左右丞各五十人，节度使百人，留后及观察使五十人。衣粮之外，又有傔人餐钱，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诸司使副等官九等。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还有所谓公用钱，自节度使兼使相，有二万贯者，其次一万贯至七千贯，凡四等；节度使自万贯至三千贯，凡四等；观察、防团以下，以是为差。由于俸钱、禄米等的开支很大，因此，官员的薪俸供给成为北宋财政上的沉重负担。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曾经说：“方今天下凋残，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滥者多。”

北宋军队冗滥，待遇却很优厚，据《宋史？兵志》记载，“凡上军都校，自捧日、天武暨龙卫，神卫左右厢都指挥使遥领团练使者，月俸钱百千，粟五十斛；诸班直都虞候、诸军都指挥使遥领刺史者半之。自余诸班直将校，自三十千至二千，凡十二等；诸军将校，自三十千至三百，凡二十三等，上者有傔；厢军将校，自十五千至三百五十，凡十七等，有食盐；诸班直，自五千至七百，诸军自一千至三百，凡五等；厢兵阅教者，有月俸钱五百至三百，凡三等，……自班直而下，将士月给粮，率称是为差；春冬赐衣有绢绵，或加布、缗钱”。除正式军俸、月

粮、衣料外，遇郊祀、寒食、端午、冬至等，还有各种名目的赏赐、特支等钱物的发放。一百多万的庞大常备军，将士待遇又如此优厚，因此，军费成为北宋财政上的又一沉重负担。仁宗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曾指出："臣昨曾约计天下财利出入之籍，知天下之所以困，本于兵"。军费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

二 土地集中和赋税不均

由于北宋实现了统一，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局面，出现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北宋统治者又多次下诏，"垦田即为永业"，鼓励农民垦荒，因此，在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下，大片荒地和废弃耕地被开垦出来，许多农民拥有了一小块土地。小自耕农数量的增加，这是北宋前期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但是，这种状况维持的时间不长，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许多农民又纷纷破产，沦为客户。

北宋地主阶级把兼并土地看作是致富的主要途径。《文献通考，田赋考二》："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以钱购买和仗势占夺，这是兼并土地的两种主要方式。每当荒年凶岁，或青黄不接时，农民为生活所迫，往往向地主借取高利贷。高利贷利息很高，农民一旦陷于高利贷的网罗，便无法摆脱，最后只好变卖田产还债。如真宗时，永兴军的豪民，即"多贷钱贫民，重取其息，岁偿不逮，即平入田产"。欧阳修说："有力者，乘其急时贱买其田宅，而贫者立券举债，终身困不能偿。"农民遇有丧葬嫁娶，也是地主兼并土地的时机。如福建路，其俗重丧礼，父母死后，办丧事"以尽力丰侈为孝"，一些游手好闲之徒，也借机前来大吃大喝，动辄数百人，三等以下农民，多因此而欠债破产，变卖土地。有的农民，为了一时逃避赋役，在官僚地主的诱骗下，将土地寄托于地主、里胥门下，久而久之，其土地便被霸占，自己沦为客户。还有的地主利用伪造卖地契的手段夺取农民的土地。如四川眉州（四川眉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案子，"眉州大姓孙延世伪为劵夺族人田，久不能辨，转运使按治之。（章）频视劵墨浮朱上，曰：'是必先盗印然后书。'既引伏，狱未上，而其家尺复诉手转运使，更命知华阳县黄梦松覆按，无所异。"这个大地主才低头认罪。宋仁宗统治时期，是北宋土地兼并的高潮时期，仁宗即位之初，刘后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吕夷简为相，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发展起来。官员"王蒙正恃章献太后亲，多占田嘉州，诏勿收赋"。刘后的亲戚仗势兼并卑地，不仅不受限制，反而受到免赋优待。他"侵民田几至百家，有诉者，更数狱，无敢直其事"。官员马季良，"家本茶商，娶刘美女"，他仗势"冒立劵，庇占富民刘守谦免户役"，结果，刘守谦的土地全为马季良占夺。一般官员也不甘落后，如"比部员外郎郑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余顷"公卿大臣兼并土地有至千顷者。一般地主、富商大贾，僧尼道冠也莫不大量兼并土地。地主兼并土地的结果，不仅广大农民失去土地纷纷破产，而国有土地也大片被占，使官田日益减少。仁宗统治晚期，土地兼并已发展到极严重的程度，全国有半数以上的土地为各级地主阶级所占有。北宋政府中也有许多人曾建议"限田"，但均未能实行。

土地集中不仅使农民破产，同时也带来了赋税的严重不均。宋代的官户、寺院等，因享有减税免役的特权，故他们虽兼并了大量土地，但却很少负担赋役。一般大地主，虽然拥有很多土地，但由于他们采取各种办法逃避赋税，实际负担的赋税仍然很少。他们逃避赋税的办法很多，有的购置田产后，并不办理过税手续，赋税依然由原主承担，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因而成为无产"税户"；有的地主为了降低户等和减少赋税，便将一部分土地和人丁分散为许多子户，分立户籍，称为"诡名子户"；还有的将自己的土地假称施舍于僧寺、道观，以求免除赋税，称为"诡名寄产"；还有的地主伪造卖田契约，将土地"假售"于"形势户"或"官户"，自己成为佃户，以避赋役，称为"诡名挟佃"这样一来，赋役便主要落到了自耕农、半自耕农身上。农民承受不了封建赋役和高利贷的盘剥，只好变卖田产而成为"客户"，更有的弃家逃亡而成为流民。农民逃亡之后，州县官员为了保证赋税征收的数量，便将逃亡者的赋税分摊到未逃亡的农民身上，这样，便使未逃亡者也走上了逃亡的道路。因此，宋仁宗时期赋税不均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国家控制的土地和人口大为减少。

对于土地集中带来的隐田漏税，一些有见识的官员已经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纷纷要求"均田"、"均税"，大理寺丞郭咨、秘书丞孙琳还在洺州（河北永年县）肥乡县用"千步方田法"对土地进行清丈，"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赋八十万，流民乃复"，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庆历年间，谏官王素建议"均天下田赋"，欧阳修也认为郭咨、孙琳的"千步方田法。行之有效，可以推广；三司亦认为可行，并建议于亳州（安徽亳县）、寿州（安徽风台）、汝州（河南临汝）、蔡州（河南汝南）四州中，选择"尤不均者"先行试点，于是选定了蔡州上蔡县，让郭咨、孙琳前往清查，结果"上蔡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余顷，均其赋于民"。但清查工作并未坚持下去，更没有推广到全国，"咨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由于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清查工作半途而废。后来田京知沧州（河北沧州市），曾对赋税严重不均的无棣县进行土地清丈；蔡挺知博州（山东聊城），曾对聊城、高唐的土地进行清丈，都敢得了很好的效果，也因"民不以为便"而罢，在大地主们的反对下停止了。嘉祐年间，三司使包拯，又主持"均田"，遣官分行诸路，清查隐田，均定赋税，也由于大官僚们的反对，"才均数郡田而止"。土地集中，赋役不均的结果，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富民买田而不收税额，谓之有产无税，贫民卖田而不推税额，谓之产去税存"。这样就更加速了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农民的破产。

三 封建剥削加重和阶级矛盾激化

北宋立国之初，虽然在四川地区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但从全国来看，由于宋初奖励开垦、减免赋役、废除五代十国留下来的某些苛捐杂税，农民的负担还是有所减轻，因而阶级矛盾也是比较缓和的，故农民起义和兵变的次数较少，涉及的范围也较小。随着地主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封建剥削的加重，至宋真宗统治时期（997～1022），这虽然是北宋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表面上好象天下太平，但

实际上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间的矛盾，开始逐渐加深。宋真宗是北宋的第三位皇帝，在位期间，他大搞迷信活动，大肆挥霍浪费，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澶渊之盟签订后，北宋不仅放弃了收复幽云的努力，同时还每年送银绢三十万于辽，真宗初以结盟为荣，后认为是一大耻，为了“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他与宰相王旦、王钦若等密谋，造出谣言，声称有“天书”降于承天门，演出了迎“天书”的丑剧。随后又举行封禅，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真宗带领百官和大批护卫队，浩浩荡荡东封泰山，沿途大吃大喝，随意赏赐，用钱八百多万贯；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真宗又率领百官入潼关，渡渭水，西祀后土于汾阴，费钱二十万贯；为了存放所谓的“天书”，真宗下诏修建玉清昭应宫，规模宏伟，金碧辉煌，有房二千六百多间，集中各地能工巧匠，原计划十五年完成，真宗迫不及待，修宫使丁谓勒令日夜施工，七年而就，耗资矩万。由于真宗的提倡，朝廷上下，京师地方，大小官员纷纷进献“祥瑞”，有所谓“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等，名目繁多，不可胜计，真宗也一一收下，重加赏赐，造成极大的浪费。真宗的迷信活动，也曾遭到一些正直官员的反对，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指出：“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毕东封，便议西幸，轻劳圣驾，虐害饥民，冀其无事往还，谓天已成勋绩。是陛下以祖宗艰难之业，为佞邪侥幸之资，臣所以长叹痛哭也”。他还警告真宗皇帝，若不悬崖勒马，陈胜、黄巢那样的农民大起义就要爆发了，但真宗置之不理。当时，“会岁旱，京师近郡谷价翔贵”，人民处于饥饿之中，而真宗东封西祀不止，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

北宋统治者还以为，宗教“有裨政治”，因而对佛教、道教都大加提倡。北宋政府在京师和各地名山修建佛寺，广渡僧尼。真宗时，全国佛寺达二万五千多所，僧徒增加到将近四十万人，尼姑达六万多人；仁宗时，佛寺又增加到近四万所，僧尼达到五十多万人。大量的劳动力脱离了生产，成为坐衣待食的寄生者，这不仅是社会人力的极大良费，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北宋统治者尊玄朗为始祖，故大力提倡道教，在各地修建道观，赏赐土地，“道场斋醮，无有虚日，且百司供亿，至不可赀计”，崇信佛道，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仁宗即位后，宋夏关系日趋紧张，特别是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称帝以后，不断侵扰陕西边境，宋夏战争连年。为了抗击西夏，北宋在陕西、河东前线，派驻了数十万大军，每年要付出大量军费。庆历三年（1043年），权三司使王尧臣曾经作过统计，他说：在元昊侵边前，每年支出钱帛粮草，陕西一千五百五十万，河东八百五十九万，元昊侵边以来，每年支出陕西达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河东增至一千三百三万。庞大的战费，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冗官、冗兵带来的冗费，以及封建统治者的挥霍无度和宝元以来对夏战争频繁，使北宋的财政开支逐年增大，很快出现了赤字。仁宗庆历以后，每年财政赤字银绢近三百万缗。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和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北宋政府除加重“和籴”“和买”、“折变”等变相田赋外，还扩大了商税、盐税和酒税，为了增加收入，对各种商品，甚至瓜果蔬菜都

收税，据仁宗时曾任过三司使的张方平统计，商税在景德年间收入为450万贯，庆历年间便猛增至1975万贯：盐税景德年间为355万贯，庆历年间增至715万贯；酒税景德年间为428万贯，庆历年间增至1710万贯，时隔不过四十年，税收增加三倍多，其增长速度实在惊人!这些税收自然都直接或间接落到了农民身上。北宋立国之初，虽曾取消了一些五代时期留下来的杂税，但也有些继承了下来，也有的取消之后又恢复了。仁宗统治时期，杂税名目多至数十种，上至土地房屋买卖，下至家畜牛羊、猪鸭，甚至兄弟分家，无不收税，各种名目的盘剥都落在农民身上。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谏官余靖指出：“今天下自西陲用兵以来，国帑虚竭，民间十室九空。……天下之民皆厌赋役之烦，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妇携手赴井而死者。”人民被推向绝路，阶级矛盾激化，终于爆发了一连串的兵变和农民起义。

第二节 北宋中期以兵变为特征的农民起义

一 沂州王伦起义

庆历年间，京东路沂州（山东临沂市）一带，发生自然灾害，农业收成减产，饥民为求生存，以武力夺取官府仓库粮食、财物，很快发展成农民起义。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巡检使朱进带领“捉贼虎翼卒”前往沂州镇压。虎翼卒大多出身于贫苦农民，他们痛恨北宋政府，同情起义的农民，不愿为镇压农民起义而卖命，因此，推军卒王伦为首，杀死巡检使朱进，发动了武装起义。

王伦起义后，很快与附近的小股农民军汇合，他们向北进攻，进入青州（山东青州市）境内。京东安抚使、知青州陈执中立即组织兵力守城，并威胁京东都提举巡检使傅永吉说：“沂州，君所部也，今贼发部中，又不能获，君罪大矣”!责令他率兵镇压。京东路靠近北宋京畿地区，又与地处国防前线的河北路相距不远，这里驻兵较多，青州又是京东路的军事重镇之一，有重兵把守，故王伦在青州受到围攻，不易发展，于是便挥兵南下，经密州（山东诸城）、海州（江苏连云港市）进入江淮地区。

王伦初起时，只有四五十人，进入江淮地区后，由于沿途小股农民起义军的参加，人数很快增加到二三百人，他们渡过淮水，经楚州（江苏淮安）、泗州（江苏盱眙）、高邮军（江苏高邮）至扬州（江苏扬州市），“所过巡检、县尉，皆畏避不敢出”，“历数千里，若蹈无人地”。有些地方官吏，“宁是畏贼，不畏朝法”，他们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进城，还设宴招待，仓库内的衣甲、兵器、绢帛、粮食等，任起义军取用。王伦为了号召群众，乃“置官称，著黄衣，改年号”，其部众“皆面刺天降圣捷指挥”，他们沿途开仓济贫，受到贫苦农民的热烈欢迎。

王伦起义军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进入江淮地区后，“江淮州县频有奏报，朝廷不欲人知，召进奏官等于枢密院，奏状不令漏泄，指挥甚严”。对起义军的消息进行严密封锁，深怕传到外地会引起更大规

模的起义和影响宋兵的士气。

王伦起义军渡淮南下后，傅永吉带官军也尾追到淮南。王伦在扬州山光寺南为官军所败，后经真州（江苏仪征）至和州（安徽和县），又遭到傅永吉等官军的围攻，再次战败，王伦率余部西走，在历阳县又遭到地主武装张矩的袭击，战败被俘，惨遭杀害。其余部散于蕲州（湖北蕲春）、黄州（湖北黄冈）一带，起义失败。

二 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京西、陕南农民起义

庆历三年（1043年），京西、陕南“属岁大饥，群盗啸聚”，小股农民起义军遍布陕南各地。同年八月，各支分散的小股起义军逐渐汇合到一起，他们推举张海、郭邈山、党君子等人为首，在陕南商山（陕西商县东南）一带活动。欧阳修在一份奏疏中指出：“臣闻张海是李宗火内恶贼，郭邈山在商山已及十年，其骁勇凶奸，不比王伦偶起之贼，纵使官兵迫及，亦其胜负未知，天下之忧，恐自此始。”可见，他们与封建官府已进行了长期斗争，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被推举为领袖是很自然的。

张海、郭邈山率领农民起义军，向京西、陕南各城镇发起了强大的攻势，他们进攻虢州（河南灵宝县）之长水（河南洛宁县西）、河南府（河南洛阳）之卢氏（河南卢氏）、商州（陕西商县）、金州（陕西安康）、房州（湖北房县）、均州（湖北均县）、光化军（湖北老河口）、邓州（河南邓县）之南阳、顺阳一带，“京西十余郡，幅圆数千里，官吏逃窜”，各地的州县官员都不敢与农民军对抗。农民军攻金州，金州人民欢迎农民军的到来，没有人守城，知州王茂先“年老昏昧”，无计可施，只好弃城逃跑，“放贼入城”。农民军攻邓州顺阳县，知县李正己无力守城，便“用鼓乐迎贼入县饮宴，留贼宿于县厅，恣其劫掠”。地方官员逃跑和迎降的事例是很多的。农民军攻下州县城镇后，打开仓库，救济贫苦农民，因而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

张海、郭邈山起义后，北宋朝廷深怕农民军打到京城，十分恐慌。八月二十六日，乃派曹元喆、张宏、黎逐等率领禁军前去镇压。九月一日，仁宗下诏“置开封府诸县巡检各一员，又分东西二路，置提举捉贼各一员”，以加强京城周围的防务。九月二十九日，又下诏令诸路提点刑狱司，“专管勾巡检盗贼公事”，全力以赴镇压农民起义；十月二十三日，仁宗又任命资政殿大学士知河南府范雍兼都大提举京西四路诸州军兵甲巡检贼盗公事，统一指挥镇压农民军正面对官军的围攻，张海等“尽有甲兵，日行一二百里”，采取流动战术，避实击虚，官军尾追，疲于奔命，望尘莫及。官军不能取胜，便屠杀平民充功请赏。故“官军所至，甚于盗贼”，因而更加激起人民的反抗。后来，仁宗又责令陕西宣抚使韩琦督兵镇压，并下诏悬赏，韩琦调集各地军队，采取围攻堵截的办法，同年十二月，张海、郭邈山等不幸牺牲，起义失败。

三 光化军邵兴起义

邵兴是北宋光化军驻兵宣毅军的一个小军官。光化军是京西路的军事重镇，这里由宣毅兵驻守，知光化军韩纲兼任统帅。韩纲自恃官高权大，“酷虐士兵”，终于引起了士兵的武装反抗。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张海、郭邈山农民军到达光化军，韩纲令宣毅士兵守城。城内地主、富商“献蒸葫酒肉以享甲士。纲以饼肉之半犒士，及赐酒人一卮，而斥卖其余，欲以其钱市兵器为守备，军士营远者，或不时得饮食，而纲所给饼，常至月旰，燥硬不可食”。这件事成了起义的导火线，十月三日，怒不可遏的士兵，拒绝食用千饼，他们纷纷把千饼扔进韩纲的院子。韩纲下令把扔饼者逮捕关进了监狱，并“追捕其党”，声称要严加惩处，一时造成了白色恐怖。邵兴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便带领宣毅士兵五百多人占领了兵器库，用武器武装了自己，宣布起义。韩纲听到起义的消息，“自宅后踰城逃出”，其他官员也纷纷逃跑，邵兴不战而占领光化军城。

邵兴起义后，附近的贫苦农民热烈响应，起义队伍很快扩大到一千多人，他们离开光化军向西进攻，连败官军，杀商州巡检使。永兴东路都巡检使上官珙率军前来镇压，邵兴又在商淤（河南淅川县）击杀上官珙，全歼这支官军。随后，邵兴又在饶风岭打败兴元府官军，杀其主将，迫使员僚赵明率残部一百多人投降。邵兴的胜利，使北宋政府深感不安，慌忙调集更多的军队前来围攻。邵兴看到附近官军兵力较强，为避开官军主力。邵兴便率部众由洋州（陕西洋县）城北循山西去，官军尾追。十月二十九日，邵兴在渭水为李方率领的虎翼军所败，不幸牺牲，赵明亦战败被俘，起义群众全部被杀害。

四 湖南瑶族人民起义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在荆湖南路又爆发了瑶族人民的起义。“蛮瑶者，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纡千余里，蛮居其中，不事赋役，谓之瑶人。”瑶族人民起义，是北宋政府的食盐专卖政策引起的。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北宋政府对食盐实行专卖制度，食盐的生产与销售由政府控制，瑶族人民居住的山区不产食盐，离盐的产地又远，国家专卖的官盐价高质劣，人民不愿购买，而愿食用价廉物美的私盐，因此当地私盐贩很多。为了禁止私盐，北宋政府经常派出官军盘查、追捕，因此，私盐贩也多携带兵器自卫。吉州（江西吉安市）人号黄捉鬼者，是私盐贩的首领，在一次与官军的对抗中，他“杀官军，逃匿峒中”。知衡州陈执方用“招安”手段，将黄捉鬼等骗出洞加以杀害。他又强迫山下瑶民迁居他处，终于激起了瑶族人民大规模的反抗。九月一日，瑶人五千多人，以唐和、盘知谅等人为首，于桂阳监蓝山县华阴洞起义。

瑶族人民起义后首战告捷，打败前来镇压的官军，杀巡检李延祚、都监张克明。十月一日，宋仁宗派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刘沆知潭

州，率兵镇压起义；十月十四日，又任命杨畋为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公事，调集大军围攻起义军。瑶族人民面对大队官兵，毫不畏惧、英勇战斗，在丛山峻岭中与官军周旋，官军处处受阻，“久之不克”。杨畋亲临指挥，但他的“士卒多畏慑，及战孤浆峒，前军却，大兵悉溃，畋暗岩下，藉浅草，得不死”。官军大败，杨畋靠岩石草丛才得以逃走，险些丧命。庆历四年（1044年）正月二十四日，宋仁宗任命周陵为荆湖南路转运按察使，三月三日，又任命王丝为荆湖南路体量安抚使，让他们全力镇压瑶族人民起义。六月七日，仁宗下诏：“桂阳监蛮贼，有来首身者，并与等第推恩”，进行政治诱降。北宋政府还定下“杀二人头，赏钱十千”的赏格，企图用这一办法消灭起义军。但结果适得其反，由于官军不敢与起义军交战，为了得赏，进山之后，便“见牛人尽杀，平人惊惧，尽起为盗”。结果起义的人数更多，范围也更加扩大了。

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二十七日，宋仁宗“诏荆湖南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司，应蛮事申覆不及者，听便宜从事”，给以机动指挥全权。九月十五日，杨畋等调集大军，分兵八路围攻起义军，起义军初战失败，遭受很大损失。但随后，他们又化整为零，分小股活动，官军人数虽多，却无用武之地。同年冬，瑶族起义军又汇集在一起，与官军战于华阴峒隘口，杀官军将领胡元等，取得巨大胜利。刘沆、杨畋也因这次战役，双双受到贬官处分，八路围攻以惨败而告终。

刘沆、杨畋贬官后，刘夔继任荆湖南路安抚使知潭州。他看到官牢进山处处阻险，又多染瘴疫之疾，死亡很多，而瑶人出没溪峒，涉险越阻，如履平地，因此，难以用大兵取胜。于是，他改变策略，以“招安”为主，用“补溪峒首领”力钓饵进行诱降，同时辅之以军事进攻。庆历六年（1046年）五月六日，唐和在银江源战败。十月，桂阳知监宋守信上疏朝廷，指出：“瑶贼唐和啸聚千余众，为盗五六年，朝廷不许穷讨，以致未能平殄。今衡州监酒黄士元颇知溪洞事，欲选取战士二千，引路土丁二百，优给钱帛，不以远近，使逐捕之。仍令本路钤辖开赟等合力以前，其贼势既穷，必有投降之心”。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由土人引路，深入溪峒围攻。瑶人起义军遭到很大损失，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进入郴州（湖南郴县）黄莽山，后又转战于韶州（广东韶关市）、英州（广东英德）境内。庆历七年（1047年）五月十三日，唐和、盘知谅、房承映、承泰、文运等率起义军残部投降。庆历八年（1048年）春，瑶族人民起义军余部又以阳山为根据地树起了反宋的大旗，荆湖南路钤辖杨畋“领众出岭外，涉夏秋，凡十五战”，至十一月，起义军最后失败。瑶族人民起义前后坚持斗争达六年之久。

五 贝州王则起义

庆历七年（1047年）十一月，在河北东路的贝州（河北清河县）又爆发了王则领导的宣毅士兵起义。王则原籍涿州（河北涿县）人，幼年因家庭生活贫困，流亡到贝州（河北清河），自卖为人牧羊，后应募入伍，在宣毅军中当一名小军官。

贝州一带，民间广泛流传弥勒教，弥勒教义说：“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到那时，社会上就会无水火、刀兵、怨贼、劫窃、饥馑、毒害之难，意思是反动的黑暗统治即将结束，人民很快就会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当时，河北一带连年发生灾荒，收成很少，而封建赋役不减，人民生活困苦，阶级矛盾激化，人心思乱。贝州的驻军，多数出身于破产农民，他们对北宋统治也极为不满，因此，给人民以希望的弥勒教，便在农民与士兵中秘密流传。《宋史？王则传》：“初，（王）则去涿，母与之诀别，刺‘福’字于其背以为记。‘妖人’因妄传字隐起，争信事之”。王则很快成为当地弥勒教的首领。

王则看到河北一带农民生活困苦，人心思乱，感到起义时机成熟，便与州吏信徒张峦、卜吉等人秘密联络河北、京东一带徒众，准备于庆历八年（1048年）元旦同时起义。他们的计划是先断澶州浮桥，攻大名府，占据河北，进而南下推翻北宋统治。为了兵不血刃攻占大名，王则派教徒潘方净潜入大名，对北京（大名）留守贾昌朝进行游说，劝他献城投降，贾昌朝是一个阴险、狡猾的反动官僚，他立即将潘方净逮捕，并令高阳关路总管王信、大名府路钤辖郝质，真定府路钤辖孟元等率军向贝州集中，准备围剿。王则获悉起义计划暴露，乃决定提前起义。

十一月二十八日，王则利用贝州知州张得一带属官到天庆观进香的机会，率领士兵中的教徒攻占武器库，将器甲发给徒众，宣布起义。张得一妄图逃走，被起义军抓获，兵马都监田斌率兵顽抗，与起义军巷战失败，只身逃走，提点刑狱田京弃家缒城而出，通判董元、节度判官李浩、清河县令齐开、主簿王湙等一大批封建官僚被镇压，很快占领了贝州城。起义军打开了贝州监狱，将犯人全部放出，并打开仓库，把粮食、绢匹分给贫困农民。王则自称“东平郡王”，以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建国号曰“安阳”，改元“德圣”。贝州人民欢天喜地，纷纷走上街头，庆祝起义的胜利。

十二月一日，贝州起义的消息传到开封，宋仁宗急令“中书、枢密院，亟择将领往扑灭之”。十二月二日，北宋政府派麦允言、王凯等率兵前往贝州镇压，但他们多次攻城，均被起义军打败。十二月十日，仁宗又任命明镐为河北体量安抚使，统一指挥各支官军攻城，亦未成功。官军攻城失败后，便改变战术，在城外筑“距闉”，预计用工二万人，三十日可与贝州城齐，能俯瞰城内动静。起义军也针锋相对，亦于“城上设战棚，与官军相当，名曰喜相逢”，距将成，起义军以火攻，将其全部焚毁，大火三日不灭，官军又失败了。距闉战术失败后，官军又佯攻城北，而暗中在城南挖地道，通向城内。这时，贝州城内地主分子汪文庆、郭斌等，暗通官军，“自城上系书射（明）镐帐，约为内应，夜垂以引官军”，将数百官军偷偷引入城内，企图一举破城，但一被发现，很快也为起义军歼灭了。

庆历八年（1048年）正月八日，宋朝统治者又任命参知政事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前往贝州督战，给以指挥全权，得以“便宜从事”。闰正月一日，官军暗中挖掘的地道通到城中。在一个漆黑的深夜，大批官军

通过地道潜入城内，内外夹攻，王则率众力战，众寡不敌，率众突围，又败，张峦、卜吉战死，王则被俘，槛送开封，受到肢解酷刑，壮烈牺牲，起义失败。

六 其他小股起义

除上述几次起义外，北宋中期较大一些的起义，还有数十起，如宝元二年（1039年）广州人民起义，起义队伍曾“至三百余人”；庆历二年（1042年）开封府界农民起义达六七百人；庆历四年（1044年）宜州（广西宜山）区希范起义，区希范拥立其叔父正辞为奉天开基建国桂王，自为桂州牧，以区绩为宰相，他们夺取官仓的粮米，救济贫民，起义军扩大到六七百人；“保州（河北保定市）云翼军杀官吏据城叛”；庆历八年（1048年）齐州（山东济南市）禁兵马达，张青等欲起义响应王则，事泄被杀；河朔一带也盗贼大起，百十为群；皇祐三年（1051年）齐（山东济南市）、郓（山东郓城）、棣（山东无棣）、博（山东聊城）等州人民起义；濮州（山东范县）人民起义，俘通判井渊；宿州（安徽宿县）人民起义，“郡县不能制”，发展到千余人；嘉佑四年（1059年虔州（江西赣州）戴小八起义，杀虔化县令；嘉祐七年（1062年）虔州、汀州（福建长汀），漳州（福建漳州）爆发了私盐贩起义。他们“百千为群，公然被铠甲，拥旗鼓，肆为剽掠，吏莫能禁”；神宗熙宁年间，河北、京东一带，“盗贼充斥”；元丰元年（1078年）岳州（湖南岳阳）有詹迂为首的起义，曾攻至袁州（江西宜春）、洪州（江西南昌市）一带；元丰二年（1079年）沂州（山东临沂）一带有何九郎，郭进为首的起义；元丰三年（1080年）开封府界“盗贼甚多”，京畿地区也出现了农民起义：这一年在虢州（河南灵宝）还有张晏为首的起义；元丰七年（1084年）汀州又出现了兰载起义，并攻入梅州（广东梅县），杀惠州归善县巡检；商州（陕西商县）、虢州一带有王冲起义，众至数千人；元佑元年（1086年）王冲余部戈俊率众又起：新州（广东新兴县）岑探率众起义，有众四五千人，一度包围州城；元祐六年（1091年）尹迁、陈兴子起义，活动于颍州（安徽阜阳）一带。正如欧阳修所指出的，起义军“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起义。但是，这些起义的规模都比较小，坚持斗争的时间也较短，很快都被镇压下去了。

第四章 北宋后期的农民战争

第一节 北宋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一 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死后，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当政，起用司马光为相，变法派官员吕惠卿、章惇等被贬斥，废除王安石的熙宁新法，全部恢复旧法，守旧派官员被重用，史称“元祐更化”。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死去，哲宗亲政，又决定继承神宗遗志，改元“绍圣”，起用变法派章惇为相，守旧派官员又被贬斥、流放，变法派官员被重用，又逐步恢复熙宁新法。在哲宗统治的十几年中，为了取得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俸禄，不仅守旧、变法两派官员之间进行了激烈斗争，而两派内部各官员之间，也存在着激烈争夺。元佑年间，守旧派官员分裂为所谓“洛党”、“蜀党”、“朔党”等几个小集团，相互倾轧；绍圣年间，变法派官员内部也矛盾重重，章惇、李俏臣、曾布等官员之间，相互攻击。在相互倾轧和斗争中，变法派虽然依旧打着恢复新法的招牌，但实际上，他们已经远离王安石的新法，如免役法，对免役宽剩钱的征收，章惇规定不得超过一分；对青苗法，则禁止抑配，并只收一分利息；对出免役钱超过一百贯的大地主，还每一百贯减免三分，等等，实际上对大地主更为有利。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病死，无子，其弟端王宋徽宗赵佶即位，神宗皇后向氏当政。向太后一向反对新法，因此，她当政后，起用守旧派官员韩忠彦为左相，曾布为右相，变法派官员章惇等又被贬斥，绍圣年间受到除名，贬官等处分的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等三十多名守旧派官员，已死者全部恢复名誉，生存者被安排到重要官位上，新法也被全部废除。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向太后病死，徽宗亲政，他厌烦两派官员之间的争斗，“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乃改元“建中靖国”，表示不偏不倚，两派并用，以求政局安定。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保守派官员任伯雨对徽宗说：“人才固不当分党与，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可以致治者。盖君子易退，小人难退，二者并用，终于君子尽去，小人独留”。变法派官员起居郎邓洵武则对徽宗说：“陛下乃先帝子，今韩忠彦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尝论其非，今忠彦为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彦能继父志，陛下为不能也。”他的这番议论对徽宗影响很大，乃复问计于给事中徐，回答说：“姑务两存，臣未见其可也”，亦反对两派并用。徽宗乃决心“绍述”。1102年，改元“崇宁”，表示崇法神宗熙宁年间的改革，将保守派宰相韩忠彦等一一贬斥，变法派官员又被重新起用，并安排到重要的官位上而。蔡京利用这一机会，当上了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成为宰相。徽宗下诏废除元佑旧法，恢复绍圣年间新法。这年九月，蔡京还将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韩忠彦、李清臣等一百二十人列为奸党，并御书刻石于端礼门，已死者剥夺了谥号官位，而生存者则被贬斥，永不

录用。所列党人的子弟，也不准到京城，不准参加科举当官，进一步加以迫害。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使政局动荡不安，为了打倒对方，官员之间不择手段，甚至将对方置于死地，对国家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则无人过问，从而使人民陷于更加痛苦的深渊。

二 宋徽宗的腐朽统治

宋徽宗是北宋末年最腐朽的皇帝。徽宗即位后，起用蔡京为相。蔡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劝徽宗要尽情享乐，因而深得徽宗信任，前后把持朝政近二十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

徽宗迷信道教，蔡京便引道士进宫，道士地位日隆，有的还被授以官位。政和四年（1114年）正月，徽宗更正式确立道士官位为二十六等级。道士林灵素上书说，天有九霄，神霄为最高，神霄玉清王者是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就是长生大帝君下降于世；仙官有八百名，当今宰相蔡京就是左元仙伯下凡。徽宗大为高兴，赐号通真达灵先生，“赏赉无算”。徽宗还在皇宫附近修上清宝箓宫，“密连禁署，宫中山包平地，环以佳木清流，列诸馆舍台阁，多以美材为楹栋，不施五采，有自然之胜，上下立亭宇，不可胜计”。徽宗为了斋醮方便，特开景龙门，城上作复道，直通宝绿宫。政和七年（1117年）正月，徽宗于上清宝录宫会见道士两千多人，又让林灵素于宝摄宫讲道经，徽宗亲临听讲，京城士庶也都列席旁听，“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媟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每一大斋，往往费钱数万缗，当时，道士皆有俸，仅京城之内就有道士近两万人。道士们还上章册封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徽宗又采纳蔡京的建议，“集古今道教事为志、纪，赐名道史”，立为道学，道士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作道官。在徽宗的倡导之下，全国各地大修道观，每一道观给田“不下数百千顷”。徽宗迷信道教，造宫观，做醮事，浪费了大量财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宋徽宗为了个人的享受，还在京城开封扩建宫殿修造花园，在苏杭设“造作局”，由宦官童贯主持，集中工匠数千人，制作象牙、犀角、金银、藤竹、装画、雕刻，织绣等物，供应宫中需要，所用材料，“悉科于民”。徽宗还在苏杭设“应奉局”，由宦官朱主管，在东南搜集奇花异石，用大船分批经运河运往京城，以应皇家园林修建的需要，号称“花石纲”。应奉局的人员闯入民家，凡一石一木可供玩赏者，即用黄纸加封，指为御用之物，由原主看护，稍有不慎，即被加以“大不恭”罪。花石搬运时，若不行贿，即撤屋掘墙以出，“民预是役者，中家悉破产，或鬻卖子女以供其须”。运一块大石至京，所需费用达三十万贯，役使船工数千人，沿途供应酒食，舟人“倚势贪横，陵轹州县”，人民深受其害。为了取得徽宗的欢心，蔡京主持新建延福宫，号“延福五位”，位于大内北拱宸门外，东自景龙门，西至天波门，“其间殿阁亭台相望，凿地为海，疏泉为湖”，又跨旧城修筑“延福第六位”，在城外挖壕，上作二桥，桥下引

舟相通，桥上行人，名曰景龙江，夹江皆置奇花珍木，穷极华丽。徽宗又在景龙江以南仿杭州凤凰山式样，修建“万岁山”，峰高九十尺，周环十余里，所用山石以万计，全由外地运来。

宋徽宗身为皇帝，却不把治国安民放在心上，他长于书画乐舞，于宫中成立画院，集中全国第一流书画家，与他们一起书写绘画；每逢大小节日，都要聚集百官，大摆宴席，山珍海味，应有尽有，还张灯结彩，盛陈百戏，乐舞，君臣上下，尽情挥霍，过着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

三 封建压迫剥削不断加重

宋徽宗荒淫腐朽，尽情享乐，他最崇信的官员是被时人称为“六贼”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等人，他们是一伙骄奢淫逸、无恶不作的家伙，在他们的统治下，封建剥削不断加重，政治日益黑暗，阶级矛盾越来越激化。

以“六贼”为首的官僚地主，在北宋末年土地集中已经很严重的情况下，他们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农民土地的兼并与掠夺，蔡京广占土地，其田产遍布各地，仅永丰圩一处，就有良田九百六十顷，后来他的土地被没官出卖，直到绍兴年间还没有卖完。朱身为宦官，却官至节度使，他的土地。跨连郡县，岁收租课十余万石，甲第名园，几半吴郡，皆夺士庶而有之，守令为用，莫敢谁何”。钦宗时被贬，“籍其赀财，田至三十万亩”。宦官杨戬拜官节度使，后升至太傅，为了增加政府收入，他还向徽宗建议成立“西城所”，搜刮民间的所谓“无主土地”为公田，其办法是“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转究寻，至无可证，则度地所出，增立赋租”。括田初行于汝州（河南临汝），后来逐渐扩大到京东、京西、淮西诸路，凡“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皆勒民主佃”。将这些土地作为官田，强迫农民租佃，向政府缴纳地租，租额确定后，这些土地不论被大水冲毁或淹没，均要按数纳租，不能减少。杨还在梁山泺，古矩野泽一带向渔船征税，遇灾荒也不减免。杨死后，宦官李彦主管西城所，更进一步扩大对农民的土地掠夺，凡民间美田，便让他的党徒指为荒地，田主拿出地契也不承认。鲁山县的土地，用这种办法竟全部被括为公田，原有地契一律焚毁，田主被变为佃客，按亩向政府纳租，上告者被处以重刑，因此而死者上万人。土地一经没为公田，便不再负担赋税，但这些土地的原有二税却不能减，各路的转运使便将这些土地的原有赋税转嫁到其他农民身上。名为括荒，实际是公开掠夺农民的土地，括田使许多农民破产。

宋朝统治者还想尽各种办法加重对农民的赋税剥削，如和买绢帛，虽然宋初已有，但最初是在青黄不接时预先付钱给农民，随后收绢，每匹绢定价不过一千二百文，价格比较合理，因此还不是害民之法。但是，后来由于和买的数量日益增多，定价又不合理，便逐渐成为农民的负担。到北宋末年，“自崇宁（1102～1106）行盐钞法，和买民帛，率不得偿，虽朝廷会借封桩钱，而钱特空名”。因此，马端临说：“折帛原

出于和买，其始也，官给钱以买之，其后也，则官不给钱而白取之，……倒置可笑如此!”和买绢帛已不给钱，完全成为二税以外的“布缕之征”，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支移折变也加重了。支移本是加给农民的一项额外负担，是让农民将“二税”交到指定的地点，实际是一种“力役之征”，到徽宗崇宁以后，又在“力役之征”以外加征“地里脚钱”，每斗粮食加征五十六文，已相当于元丰年间（1078～1085）的正税。但仍不满足，随后又“反复纽折”为其他物资，结果越折越多，“数倍于昔，农民至牛易产犹不能继”。

蔡京手中的新法，也完全背离了熙宁变法的精神，由“抑兼并。变成了剥削农民的手段，如免役法，由于免役钱的数量不断增加，反而使农民的负担更加重了，巩州的役钱，元丰时每年不过四百贯，这时却增加到将近二万九千贯。方田均税法，原先旨在相对平均赋税的负担，到蔡京手中便变了样，势家地主的土地丈量之后减少，而农民的土地却越丈越多，如会昌县有一户农民，原先他只负担十三钱的赋税，丈量之后，却猛增到二千三百钱，提高了一百六七十倍。

宋徽宗时的商税也增加了。以茶税为例，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总论东南茶法》统计，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每年共收茶税钱为三十三万八千余缗，徽宗政和（1111～1117）以后，便猛增到四百余万缗了，其他商品的税收也莫不如此。所增商税，自然也都转嫁到了农民身上。

在以宋徽宗及“六贼”为首的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下；农民纷纷破产，生活日益贫困，愤怒的人民道出了“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的呼声，强烈要求推翻赵宋王朝的统治。北宋末年，“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胡马未南牧，河北蜂起，游宦、商贸已不可行”。阶级矛盾已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农民起义的爆发不可避免了。

第二节 方腊起义

一 摩尼教的流传

摩尼教，也称明教，是公元前三世纪由波斯（今伊朗）人摩尼创立的，唐宪宗元和九年（1814年）传入中国，唐武宗“会昌灭佛”中被禁止，受到毁灭性打击。此后，虽被严加禁止，但在民间依然秘密流传。北宋时，在东南地区流传的“吃菜事魔”教，就是摩尼教的一支。

摩尼教在被官府取缔之后，所以仍能秘密流传，主要在于它的教义反映了贫苦农民的愿望，符合农民的要求。摩尼教义，其核心思想是所谓“二宗”、“三际”之说。“二宗”指光明、黑暗两种势力，“三际”则是指这两种势力对立、斗争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即初际、中际和后际。人世间的善美、智慧、和平、友爱等都是光明势力的体现；而丑恶、愚昧、争战、侵夺等，则是黑暗势力的体现。《摩尼教残经》说：“初际

者，未有天地，但殊明暗，明性智慧，暗性愚痴，诸所动静，无不相背。”即认为远在还没有天、地之前的混沌未开的“初际”阶段，光明与黑暗这两种势力就已经存在并且相互对立；而“中际者，暗既侵明，恣情驰逐，明来入暗，委质推移。大患厌离子形体，火宅愿求于出离。劳身救性，圣教固然。既妄为真，孰敢闻命？事须辨析，求解脱缘。”即认为中际阶段黑暗势力大泛滥，超过了光明势力，并压迫着光明，因而各种灾难降临。这时，摩尼教徒就应当“劳身救性”，挺身而出，帮助光明战胜黑暗；“后际者，教化事毕，真妄归根，明既归于大明，暗亦归于积暗，二宗各复，两者交归。”即光明再胜黑暗，二者分离，各归本位。诚然，摩尼教的“二宗”、“三际”之说是唯心主义的虚构，而其最终的“后际”阶段，光明也未能消灭黑暗，教徒们“劳身救性”斗争的结果，只不过是帮助光明取得合法存在的地位，使光明与黑暗各复原位并存下来，毫无疑问，这是有很大妥协性的。但是，摩尼教义认为当今正处于“中际”阶段，它要求教徒们“劳身救性”，勇敢地去与黑暗势力作斗争，这就具有强烈的反抗性，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农民来说，却有很大的感召力。因此，它吸引了大批破产农民。

另外，摩尼教之所以能秘密广泛流传，还与其简朴的宗教仪式有关。据庄季裕《鸡肋编》记载，该教断荤酒，主素食，不事神佛祖先，只拜自己的首领及“魔翁”、“魔母”，因此被封建统治者称为“吃菜事魔”教。该教还主张死则裸葬，丧事从简；教徒之间互称“一家”，外出时，不论是否相识，当地教徒都无偿地提供饮食住处，友爱无间；对于经济困难的教徒，则“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这种简朴的宗教仪式与贫苦农民的经济地位是一致的，教徒之间的团结互助精神，也是贫苦农民的共同愿望，因此，深得农民的信奉，在民间广为流传。

由于摩尼教采取秘密方式传播，因此文献记载留下的材料很少，目前我们还难以对北宋末年摩尼教的传播状况作全面了解。但根据一些零星材料的记载，仍可以了解到一些情况。宣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臣僚言：‘温州等处狂悖之人，自称明教，号为行者。今来明教行者，各于所居乡村，建立屋宇，号为斋堂，如温州共有四十余处，并是私建无名额佛堂。每年正月内，取历中密日，聚集侍者、听者、姑婆、斋姊等人，建设道场，鼓扇愚民男女，夜聚晓散。’”可见温州是摩尼教广为流传的地方。宣和三年“闰五月七日，尚书省言：‘契勘江浙吃菜事魔之徒，习以成风，自来虽有禁止传习妖教刑赏，既无止绝吃菜事魔之文，即州县监司不为禁止，民间无由告捕，遂致事魔之人，聚众山谷，一日窃发，倍废经画。若不重立禁约，即难以止绝，乞修立条’”。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北宋末年至少在东南两浙路、江南东西路，摩尼教广为传播，信徒很多。方腊起义后，这里的摩尼教徒纷纷响应起义，也说明了这一点。由于摩尼教义中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因此，宋王朝对它采取了严厉镇压政策，“有犯者，家人虽不知情，亦流远方，财产半给告人，余皆没官”。虽一再严禁，但仍秘密流传，信徒很多。

二 方腊誓师帮源洞

帮源洞位于青溪县（浙江淳安）西北七十里的山谷中，周围群山环抱，山峦起伏，地势非常险要；这里土地肥沃，除盛产稻米外，还有丰富的漆楮竹木资源，自西北流向东南的新安江，横贯山区，是一个物产富饶。交通方便的地方，农民领袖方腊就住在这里。与东南其他地区一样，这里也遭受到“花石纲”的骚扰。另外，这里还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地方，远在唐永徽四年（653年），农民革命女英雄陈硕真就曾经在这里举起了反唐大旗，发动了武装起义，并自称“文佳皇帝”，使唐朝统治者大为震惊。陈硕真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她的革命精神和斗争故事却一直培育着青溪农民，这里还有陈硕真起义时留下来的天子基、万年楼等遗址，无疑对方腊等人也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方腊不堪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他利用摩尼教秘密地组织农民，准备发动起义。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当地的里正、大地主方有常发现了方腊的秘密活动，把方腊关押在自己的谷仓内，并派儿子方世熊赶往县城报案。但是，机智的方腊却设法逃出了虎口。方腊的逃脱，使方有常大为震惊，他感到形势不妙，便带领全家逃往歙县（安徽歙县）七贤村。宣和二年十月九日，方腊率领数百个贫苦农民砍下山上的竹子，做成刀枪，冲向七贤村，杀死了方有常这条恶狼。随后，方腊带领群众，又返回帮源。帮源的贫苦农民热烈欢迎英雄们凯旋归来，又有许多人加入了起义队伍。方腊率众来到帮源，召开誓师大会。会上，方腊激昂慷慨地说：

“‘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弗恤，于汝甘乎？’皆曰：‘不能!’”。

腊曰：‘靡荡之余，又悉举而奉之仇雠。仇雠赖我之资，益以富实，反见侵侮，则使子弟应之。子弟力弗能支，则谴责无所不至。然岁奉仇雠之物，初不以侵侮废也。于汝甘乎？’皆曰：‘安有此理!’

腊涕泣曰：‘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糜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诸君以为如何？’皆愤愤曰：‘惟命!’

腊曰：‘三十年来，元老旧臣贬死殆尽，当轴者皆龌龊奸佞之徒，但知以声色、土木淫蛊上心耳，朝廷大政事，一切弗恤也。在外监司、牧守，亦皆贪鄙成风，不以地方为意。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弗堪。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守臣闻之，固将招徕商议，未便申奏。我以计縻之，延滞一两月，江南列郡可一鼓下也。朝廷得报，亦未能决策发兵，计其迁延集议，亦须月余，调习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年）矣，此时当已大定，无足虑也。况西北二虏，岁币百万，朝廷军国经费

千万，多出东南。我既据有江表，必将酷取于中原，中原不堪，必生内变，……我但画江而守，轻徭薄赋，以宽民力，四方孰不敛衽而来朝，十年之间，终当混一矣。不然，徒死于贪吏耳，诸君共筹之。’皆曰：‘善’”。

方腊的演说，是一篇反抗封建统治的战斗檄文，它深刻揭露了北宋统治者残酷压迫剥削农民的罪行，号召农民起来推倒这个反动政权；方腊的演说，也是一篇充满战斗激情的爱国主义文献，它揭露了北宋统治者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本质，也控诉了辽、夏贵族贪得无厌的掠夺罪行，号召人民起来为生存而战。方腊的演说，吹响了向北宋反动政权进军的号角，各地农民纷纷响应，方腊的队伍很快从几百人扩大到上万人。一场反封建的农民战争烈火在东南大地上点燃起来了。

三 农民军的发展

为了便于领导起义军进行反抗斗争，十一月一日，方腊自称“圣公”，以方肥为宰相，又“置偏裨将，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建立了“永乐”政权，表明了与北宋政权对立、斗争的决心。

方腊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县城，青溪知县陈光十分恐慌，立即向上司报告求援。两浙都监蔡遵、颜坦接到报告后，率兵五千人向青溪扑来，妄图一举消灭农民军。面对来犯敌人，方腊毫不畏惧，他感到，这是起义以来的第一次大战，至关重要，若取得胜利，不仅可以鼓舞群众斗志，同时还可以乘胜向外发展。经过周密计划，在息坑设下了伏兵。息坑背山面水，上有悬崖峭壁，下有滔滔东流的新安江，只有一条小路可通，地势险要，是一个理想的伏击地。蔡遵、颜坦带领宋军到达离息坑不远的威坪镇，还未来得及安营扎寨，就遭到农民军的袭攻。蔡遵发现农民军人数不多，便率兵反击，农民军迅速撤退，宋军则尾追不放，很快进入埋伏圈。方腊一声令下，农民军伏兵突起，前堵后截，把宋军团团围住。宋军东奔西突，企图冲出重围，农民军哪会放过，经过激战，杀死了蔡遵，颜坦也兵败自杀，五千宋军全部被消灭。

息坑大捷后，方腊乘胜前进，指向青溪县城，知县陈光弃城逃命。十一月二十一日，顺利攻占县城，农民军的声势更加壮大了。

青溪战役后，农民军开始进攻睦州（浙江建德）。睦州地处钱塘江上游，是通往杭州的门户，也是衢州、歙州之间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农民军攻打睦州，知州张徽言不敢守城，一心逃跑，县尉童淑，口出狂言，说农民军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他带领五百名刀斧手冲出城来，要与农民军决战。农民军针对其有勇无谋的弱点，事先设下伏兵。童淑果然中计，被农民军团团围住，五百名宋军大部被歼灭，童淑落荒逃走。知州张徽言见大势已去，收拾起平时搜刮的金银珠宝，也偷偷溜走了。十二月一日，农民军顺利攻占睦州城，睦州通判叶居中，县丞曹央负隅顽抗，被农民军俘获处死。州城攻破后，睦州所属的寿昌、分水（浙江武盛）、桐庐、遂安等县的宋朝官兵，望风而逃，这些

县城全为农民军占领。

为了扩大战果，方腊率领农民军又向西进军，首先攻占休宁县城，随后包围歙州（安徽歙县），代理知府毛粟，县尉洪造，匆忙布置守城，城外一战，农民军击杀东南将郭师中，宋军溃散，毛粟、洪造还想顽抗，城内人民奋起响应起义，将他二人扑杀，打开城门，迎接农民军进城。歙州所属的婺源、绩溪、祁门、黟县等地官吏纷纷逃亡，农民军不战而下四县，随后又北攻宣州（安徽宣城），占领了宁国、旌德、泾县等城。

方腊在西进的同时，还派妹妹方百花带领一支部队东进，攻占了新城（浙江富阳西南）、富阳等城，作为进攻杭州的先头部队，一直打到杭州城郊。西线的胜利，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方腊率领主力东进，十二月二十九日，进抵杭州城外，与方百花的先头部队会师。

杭州，是两浙路的首府。两浙路是北宋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盛产大米，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这里的纺织、造纸、制茶、制糖、瓷器等手工业生产，也居全国之冠，在全国赋税收入中，两浙路也占很大比重，是北宋财政的主要来源地区之一，素称“国用所恃，全仗于此”。因此，杭州是东南重镇。为确保这一地区的安全，北宋政府在这里驻有重兵，并派高级官员担任知州。当方腊率领的农民军接近杭州时，身为知州的赵霆，为了保命，弃城而逃。制置使陈建、廉访使赵约，率军顽抗，陈建还亲自到涌金门督战。农民军女英雄方百花身先士卒，冲上涌金门城头，陈建见势不好，妄图逃走，方百花正要追赶，不幸中箭，壮烈牺牲。方百花的牺牲，激起了农民军的极大愤怒，他们同仇敌忾，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杭州城发动了猛烈进攻。他们架起了数百副云梯，农民军健儿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终于登上城头，打开了缺口，迅速攻占杭州城，全歼北宋守军，陈建、赵约，双双被俘处死。

农民军进入杭州后，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进行了镇压，又打开府库赈济贫苦人民，杭州人民欢天喜地，奔走相告。

四 威震两浙

方腊起义军攻克睦州、歙州、杭州的巨大胜利，鼓舞了两浙地区的广大农民，他们纷纷组织武装响应，向当地官府发动了进攻。

苏州、湖州地区，石生在苏州起义，陆行儿在归安（江苏吴兴）起义，有众千余人。他们的起义，壮大了农民军的力量。台州（浙江临海）仙居人吕师囊在方腊起义之后，组织了一支义军，攻占仙居县城。随后，吕师囊又多次攻打台州。在温州（浙江温州）乐清县，永嘉人俞道安，也响应方腊起义，组织了一支军队。后来，吕师囊也攻入温州境内，破乐清县城，杀宋巡检陈莘，乡豪李徽等，大败官兵。俞道安还与吕师囊取得联系，协同作战，进攻永嘉县城。在越州（浙江绍兴），以仇道人为首，也组织了一支起义队伍，响应方腊，他率领起义军，攻下

了剡县（浙江嵊县），杀死知县宋旅，随后又攻下新昌，上虞等县城，并进而集结军队，攻打越州。处州（浙江丽水）霍成富也起兵响应方腊，他还用方腊的“永乐”旗帜来号召群众，贫苦农民纷纷前来投军，很快攻占东阳、义乌、武义、浦江等城。另外，还有兰溪县灵山人朱言、吴邦起于处州；陈十四在方岩山，起兵响应方腊，并向温州、台州等地发起进攻。当时，响应起义者，多打着方腊的旗号，正如朱熹所描写的，“方腊之乱，愚民望风响应，其间聚党劫掠者，皆假窃腊之名字，人人曰：‘方腊来矣!’所至瓦解”。短短几个月之内，东南地区有数十万农民参加了起义队伍。

方腊攻克杭州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大将方七佛率领六万人北上，宣和二年（1121年）正月十九日，攻占崇德，随后进围秀州（浙江嘉兴）；另一路由方腊亲自统率，南向婺州（浙江金华），这是农民军的主力。方腊进抵婺州城外，婺州地方官员望风逃走，农民军顺利攻占婺州城。接着西攻衢州（浙江衢县），衙州知州彭汝方，平日贪赃枉法，搜刮了大量财富，农民军打来，州将已经逃跑，他却爱财如命，不愿离开。农民军围城不过两三天，城内百姓起义，杀死了彭汝方，打开城门，迎接方腊的队伍进城。

农民军在连下婺州、衢州之后，又东攻处州（浙江丽水）。这时，处州地区的暴动农民也与方腊的队伍密切配合，很快攻占了松阳、缙云、青田等县城，完成了对处州的包围。处州是通向沿海城市温州的必经之地，城高池深，又有两方多宋军把守，农民军看到处州易守难攻，便采取正面佯攻和背后偷袭的战术，终于在二月二十九日攻克处州城。另外，攻占婺源的一支农民军也向南发动攻势，攻占开化、常山、江山等县城，一直打到信州（江西上饶市）城下。

方腊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与各地农民军互相支援，在两浙、江东两路的广大地区内，与北宋封建统治者展开了角斗，攻占了睦州、歙州、杭州、婺州、衢州、处州等六座州城和五十二个县城，农民军的打击范围，包括了苏州、湖州（江苏吴兴）、秀州（江苏嘉兴）、越州（浙江绍兴）、温州、台州（浙江临海）、宣州（安徽宣城）、信州（江西上饶市）等广大地区，起义军扩大到上百万人。农民军所向，势如破竹，封建官府和土豪劣绅，望风瓦解，“东南大震”，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

五 宋军反扑

方腊起义爆发后，朝中宰相王黼正粉饰太平，“恶闻外寇至，且峻责浙西提刑张苑，勿张皇生事”，所以，两浙地方官不敢上奏朝廷，偶有奏至，也被王黼一伙扣留，而奏事者辄受惩处。因此，直到寅和二年（1120年）十二月初睦州被农民军攻占后，朝廷才得知方腊起义的消息。消息传来，朝歌夜舞、醉生梦死的宋徽宗大惊失色，君臣上下如热锅上的蚂蚁。惊魂稍定之后，徽宗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任命童贯为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谭稹为制置使，王禀为统制，率兵前往浙江镇

压。当时，正值宋金海上结盟，共同攻辽，北宋正集中十五万禁军待命出发，接到方腊起义的报告后，即停止攻辽，并调转矛头，很快向农民军扑来。童贯等离京时，宋徽宗还微服相送，临别握着童贯的手说："东南事尽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笔行之"，给他镇压起义的全权。

在出兵镇压的同时，北宋统治者还进行政治诱降，徽宗下诏说："二浙安于承平，不见兵革，垂二百年。属者狂寇窃发，凭恃山险，然念无知之人，或被胁从，两州吏民，或为诖误，或因逃亡，败衄军卒，情有可矜，……应千前项人及凶贼眷属，并见在贼中徒伴，如能束身自归，或告言动息，捕致贼党，并特与免罪，一切不问，内稍有功绩，即优与推赏。"对于统治者的"招安"伎俩，革命人民嗤之以鼻，根本不予理睬，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继续向封建统治者进攻。

农民军攻占杭州后，北宋统治者又企图用悬赏的办法杀害方腊等农民军领导人，徽宗立下重赏，说："生擒或杀获为首方十三（方腊），白身特补横行防御使，银绢各一万两匹，钱一万贯，金五百两"。看到悬赏诏书，起义军战士义愤填膺，将它撕得粉碎，踩在脚下；地主士绅们觊觎官位和赏金，但又不是农民军的对手，宋徽宗的悬赏诏书，只能是一张废纸。

童贯率十五万宋军南下，宣和三年（1121年）一月二十一日渡过长江。童贯到苏州后，了解到"花石纲"是导致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乃令幕僚董耘代徽宗作罪己诏书，为宋徽宗开脱罪责，假惺惺地说花石纲之扰是朱父子所为，根本不是徽宗本意，并立即宣布罢苏、杭造作局，停止花石纲，将朱父子撤职等等，企图欺骗农民，瓦解农民军的斗志。但是，起义农民根本不相信这一套骗人的鬼话，他们继续攻城略地，英勇战斗。

宋军渡江后，随即分兵西上，进驻军事重镇金陵（江苏南京市）。金陵，是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若能够占据金陵，南下可收两浙、江东，北上可取中原。方腊起义军攻占杭州后，在富阳参加起义军的太学生吕将，曾向方腊建议，应"直据金陵，因传檄尽下东南郡县，收其税赋，先立根本，徐议攻取之计，可以为百世之业"。这个建议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方腊却没有接受。方腊认为，北宋政府非常腐朽，起义消息不可能迅速传到京城，即便"朝廷得报，亦未能决策发兵，计其迁延集议，亦须月余，调习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年）矣，此时当已大定，无足虑也"。认为北宋军队不可能迅速打到江南来，农民军应当利用这一机会先占江南财富区，再北上攻取金陵，这是有把握的。于是，方腊乃集中兵力向婺州、衢州、处州等地发动进攻，又派方七佛由杭州北上进攻秀州，这就失去了乘虚攻取金陵的战机。方腊万万没有想到当时北宋朝廷正集结了十五万大军准备与金南北夹攻辽国。童贯带兵迅速到达江南，使农民军陷入被动。

六 保卫杭州的战斗

南下宋军兵分两路，东路军王禀率领由苏州南下，指向秀州：西路军刘镇率领由宣州南下，指向歙州，企图东西两路夹攻睦州。

宣和三年（1121年）一月二十八日，王禀东路军到达秀州。时方七佛攻秀州尚未攻下，秀州南面的海宁、崇德也被宋军占领，形势急剧逆转，农民军南退的道路也被切断。在这一危急形势下，方七佛毅然主动撤离秀州，向南转移。王禀、辛兴宗、杨惟忠几支宋军尾追，又将农民军包围在秀州、海宁、崇德之间的三角地带。方七佛毫不畏惧，英勇奋战，杀伤大量敌人后，终于冲出了重围，转移到太湖边的乌镇，但农民军本身也遭受很大损失，伤亡过半，后只有两万人回到杭州。

二月七日，童贯率宋军主力到达杭州。守卫杭州的农民军有方腊率领的六方人，还有刚刚从秀州前线撤回来的方七佛部两万人，兵力比宋军为少，而且城内粮食奇缺，农民军的装备也很差。因此，在力量对比上，农民军处于劣势。但是，面对强大的敌人，农民军英雄们并不畏惧，他们积极备战，决心保卫杭州。

宋军攻城，战斗非常激烈。城外的北关堰是第一个争夺点，王渊率宋军来攻，农民军迎战，小校韩世忠见力攻难以速胜，建议王禀改用伏兵，农民军不幸中计，损失惨重，只好退入城内。在保卫杭州的战斗中，农民军克服了种种困难，打退了敌人一次次的进攻。方腊、方七佛等日夜巡视在城头，很少休息。但是，敌我力量的对此终究相差悬殊，再加以城内的粮食不足，战士忍饥守城，一日不知要进行多少次激烈的战斗；久守已不可能，因此，吕将曾建议主动撤出杭州，但方腊舍不得杭州，认为杭州失守，其他城镇也难保住，没有接受这一正确建议，依然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坚守杭州。后来，农民军战士由于饥饿，实在不能支持了，方腊才被迫率领一部分战士突围，计划到外地组建兵力，回救杭州。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农民军的战斗人员越来越少，而宋军攻城则日夜不停，城内粮食已经完全断绝，无法再守。于是，二月十八日，方七佛被迫率军突围，经过激战，仅有一千多人冲出城外，后经富阳转移到了青溪。杭州之战，王禀以惨重代价换取的只是一座空城。

七最后的战斗

宣和三年（1121年）三月一日，方腊曾反攻杭州，但兵力太少，在城外即为王禀所败，五百多人牺牲。

王禀侵占杭州后，沿富春江西犯，占领富阳、新城等县，分水陆两路进攻桐庐，农民军在江边设防，三月二十四日，桐庐失守，农民军一千五百多人牺牲。王禀攻睦州，农民军坚守，三月二十七日，王禀暗挖地道，用炸药炸倒城墙，睦州失守。王禀恨农民军固守，进行野蛮报复，杀被俘农民军一千多人；四月十五日，王禀攻占建德县，杀农民军九百多人，夺取粮船一百艘。四月十九日，王禀侵占青溪县城。

刘镇为首的西路宋军，三月十三日侵占歙州，三月十六日，刘镇、

杨可世在歙州潘村遭到农民军一万多人的阻击，“复有万众冲后军”，宋军被打得晕头转向，伤亡很多，但终究宋军人数众多，激战至半夜，农民军先胜后败，一千五百四十多人牺牲。四月二日，宋将刘光世犯衢州，农民军大将郑魔王率一万余人出城迎战，二千六百多人牺牲，郑魔王也兵败被俘。四月七日，刘光世向婺州进犯，农民军乘虚反攻衢州，宋将叶处存兵败落水而死，刘光世被迫退兵。四月十二日，刘光世攻占龙游县，农民军二千二百多人牺牲。十五日，兰溪失守，农民军损失一千多人。十七日，刘光世率兵到达婺州城下，农民军两万多人出城迎战，短兵相接，农民军战败，损失四千多人，婺州失守。至此，农民军主力已损失殆尽，余部乃北退进入帮源。

帮源，是方腊起义军的根据地，这里山峦环绕，地形复杂，农民军可以利用熟悉地形这一有利条件与敌人周旋，以使保存力量和寻机发展。但是，当地恶霸地主方庚、方世雄以及土豪钱岀、钱鬻等丧家之犬，这时却从阴暗角落里钻了出来，他们一个个“投身军前，为之向导”，“指天说誓，倾心报国”，表示愿为童贯效劳，决心与农民军为敌。在这些地主分子的引导下，东西两路宋军很快包围了帮源。

农民军退入帮源后，分兵守卫帮源外围各山口，其中北山口是进山的主要通道，方腊亲自守卫，宋军多次进攻都不能进入。童贯看到强攻不能取胜，便改用偷袭办法，一面虚张声势进攻北山口，同时却暗中派兵向帮源南面的门岭（又名箭门山）进发。

门岭地形险要，山口不易找到，方腊只派去少量兵力把守，因而童贯偷袭得逞，在地主分子的带领下，四月二十三日傍晚，“刘镇将中军，杨可世将后军，王涣统领马公直并裨将赵明、赵许、宋江，既次洞后，而门岭崖壁峭拔，险径危侧，……刘镇等率劲兵从间道掩击”。农民军六百多人牺牲，宋军进入帮源。方腊闻讯回救，已经来不及了。四月二十四日，宋军“平且入洞，纵火为号，王禀、辛兴宗、杨惟忠、黄迪，望燎烟而进，与刘镇合兵”，农民军腹背受敌，经过一天的激战，“流血丹地”，一万多农民军牺牲，宋军也伤亡惨重。战至傍晚，帮源沦陷，方腊带领少数农民军将士，转移到了帮源东北隅的岩洞中。宋军不见方腊，便四处搜查，第二天，搜山一天，也未见踪迹。

四月二十六日，由于方庚收买了农民军内部的意志薄弱者方京，他供出了方腊的据点。于是，小校韩世忠率领一支部队，攀山越涧，找到了洞口，方腊、方肥以及方腊的妻子邱氏、儿子方亳和农民军的将领三十九人全部被俘。方腊等被押到东京（河南开封市），八月二十四日，全被残酷杀害。

方腊等被俘后，其余部数万人仍然散处帮源各山中，他们凭借险要的山谷与宋军周旋，继续战斗。大将吕将兵败自刎，农民军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全部壮烈牺牲。帮源英雄们，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他们的英雄形象永远激励着后世的革命人民，他们不怕牺牲，战斗到底的革命精神，万古长青。

攻占帮源后，童贯又分兵镇压两浙地区的其他各支农民军，吕师囊、仇道人、俞道安等各支起义军，也都先后被镇压下去。

第三节 宋江等其他起义军

一 宋江起义

当方腊在两浙地区起义的时候，黄河流域的广阔土地上，也爆发了一连串的农民起义，其中以宋江为首的一支起义军，人数虽不太多，但战斗力却很强，他们转战于黄淮平原，对北宋统治者形成很大威胁。

宣和元年（1119年）十一月，宋江农民起义爆发，十二月二日，徽宗下诏，“京东东路盗贼窃发，令东西路提刑督捕之。”二十四日，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可见，这次起义爆发于京东东路（今山东地区）。宋江起义后，曾经以梁山泊作为根据地，出没于青州（山东青州）、济州（山东巨野）、濮州（山东鄄城），郓州（山东东平）各地，所以被称为“京东贼”、“山东盗”。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方腊在睦州起义后，知亳州（安徽亳县）侯蒙上书徽宗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可知，宋江起义后的第二年，他们的活动范围已由山东扩大到河北各地，数万官军都不敢与他们对抗，重要首领三十六位。对侯蒙的建议，徽宗非常赏识，连声称赞：“蒙居间不忘君，忠臣也。”遂任命他知东平府，负责招降宋江，但侯蒙“未赴而卒”，招降计划未能实现。

宣和二年，宋江由河北又向南进攻，《蒋园墓志铭》载：蒋园“徙知沂州，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避匿，公独修战守之备，以兵扼其冲，贼不得逞，祈哀假道，公吪然阳应，侦食尽，督兵鏖击，大破之，余众北走龟蒙间，卒投戈请降乙。”蒋园曾知濠州（安徽凤阳），宣和三年，（1121年）始改任知沂州（山东临沂），可知宋江农民军到沂州境内的时间，当在宣和三年前后。墓志铭的作者多为死者生前友好，墓志当中自然多溢美之词，因此，墓志所载，往往言过其实，这里所说的“祈哀假道”、“投戈请降”，是不足信的。事实上，宋江也没有向蒋园投降，墓志只能说明宋江南下攻入山东，各州县望风瓦解，到沂州时，为蒋园所败。

后来，宋江起义军又进入江苏地区，《王师心墓志铭》：“公讳师心，……授迪功郎、海州沭阳县尉。时承平日久，郡县无备，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既转掠京东，径趋沭阳，公独引兵要击于境上，败之，贼遁去”。据此可知，宋江农民起义军从河北南下，经过京东路，一直打到沭阳境内，在这里受到王师心的阻击，战败退走。

宣和三年二月，宋江起义军进入淮阳军（江苏邳县南），《宋史》卷二十二《徽宗纪》载：“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扑，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关于宋江被招降的过

程，《宋史？张叔夜传》中有详细的记载：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

张叔夜接到“招安”宋江的诏旨后，进行了周密策划，五月三日，设下圈套，农民军被包围，宋江进退无路，只好接受“招安”，向张叔夜投降了。

宋江投降后，北宋朝廷对起义军将领都授以官位，进行笼络。这一情形，李若水在其《扑盗偶成》诗中曾作过描写：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廓。

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李若水是北宋末年人，北宋灭亡时死难，南宋初谥为“忠愍”，他的著作由其子编为《忠愍集》，这首诗见于《忠憨集》第二卷。他仇视农民起义军，反对“招安”，却又亲眼目睹了宋江受“招安”后的情形，因而写了这首诗。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宋江投降并非出于本意，而是为了保存实力。所以，当时机成熟时，宋江再次起义，重新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关于宋江第二次起义后的情形，由于缺乏史料记载，我们还不能全部了解，但从1939年陕西省府谷县出土的《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中可以得知，宋江确实发动了第二次起义，墓志铭称：

“公讳可存，……宣和初，……方腊之叛，用第四将从军，诸人借才互以推公，公遂兼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士皆用命，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足俞月继获，迁武功大夫。”

可见，宋江第二次起义后，于宣和四年（1122年）又被折可存镇压下去。宋江的结局，同方腊一样，也遭到残酷杀害。

宋江农民起义军的人数不多，但战斗力很强，他们转战南北，给宋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二 张仙、贾进、高托山等起义

宣和四年（1122年）五月，宋军按宋金联兵灭辽的协议，开始发兵攻辽。为了对辽用兵，“括天下丁夫，计口出算，得钱六千二百万

缗，”以充军用。灭辽后，丁夫钱不免，且限期交纳，违期问斩，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北宋政府用数十万军队和数千万缗钱财，换得的只是幽州（北京）等几座空城。为了镇守这些空城，北宋政府每月却要付出十几万斛军粮，另外还有食粮军和各州县官吏的开支，这些粮食“悉出河朔、山东、河东之力以应办，才一年，而诸路皆困矣”。联金灭辽和收复幽州，给北方人民带来了灾难，激化了阶级矛盾，于是，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

张迪首义于洺州（河北永年），有众五万，宣和五年后，“京东，河北盗争起”，起义地区更加扩大，有郓州（山东东平）李太子起义；咸河何子威起义；魏博（山东聊城一带）杨天王起义；青州（今属山东）、沂州（山东临沂）、密州（山东诸城）、徐州一带有高托山起义，连兵数十万；沂州徐进起义，有众五万；擂鼓山张仙起义，众至十万，集路山有贾进起义，临沂武胡起义，有众数万；水鼓山刘大郎起义；济南孙列起义，“据华子山，众号十万”；山东起义军曾一度围攻济南；东海有张夔起义，等等，各地“巡尉不敢抗，县镇不赂守”，黄河南北，一时形成农民起义的高潮。

农民起义爆发后，北宋统治者依然惯伎重演，一方面任命宦官梁方平为河北、京东制置使，率领刘光世、张俊、杨惟忠、辛兴宗、王渊、韩世忠等将领，分头镇压；另一方面，又采取招安政策，对农民军进行分化瓦解和诱降活动。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宋徽宗下诏：农民军“如能出首，应已前罪犯，一切不问，并与释放，……内有系首领人，当议优与补授官资。”宣和七年（1125年）正月的诏令中又假惺惺地说：农民造反是由于政府“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表示农民军只要不杀人放火，“余一切不问，并与放罪”，还可以免除宣和六年农民未交纳的各种赋税，只要投降，义军首领还可“具名闻奏，当授以官爵”等等。

在北宋政府的军事镇压和政治诱降下，农民军内部一些意志薄弱者便动摇了。张仙有众数万人，是一支有影响的起义军，宣和七年（1125年）二月，在擂鼓山战败后，便失去斗志，接受招安，向北宋朝廷投降了，宋徽宗也下诏“补官犒设”。活动于山东的起义军贾进，有众十万，曾南进抵达淮上，“朝廷遣使招安，率不生还，”劝降使者全被杀死，宋将辛昌宗率兵围攻，也被打得“军败身没”。但后来这支队伍也没有坚持到底，宣和七年三月，在张仙被招安之后不久，贾进与五十多位首领也投降了，十多万农民军从此瓦解。

但是，也有一些起义军拒绝招安，坚持斗争，如起义于洺州的张迪，有众五万人，曾围攻浚州（河南浚县）五天之久，后又进攻洺州城。浚州离京城开封不过一百六十里，给北宋政权造成很大威胁，后被刘光世镇压下去。以高托山为首的起义军，众号三十万，这是一支力量较大的起义军，也是坚持斗争时间比较长的起义军，他在河北及京东路的青州、徐州、密州、沂州等地转战，多次受到梁方平为首的宋军的围攻，虽然屡次遭受挫折，但拒绝招安，一直坚持斗争。北宋灭亡后，高

托山又投入了抗金斗争，曾率领十五万农民军，与金的徐、宿、邳三路军马都统王伯龙战于清河，给女真入侵者以迎头痛击。

三 倪从庆等起义

在镇压方腊起义的过程中，北宋官军为了取得首级报功领赏，他们进入起义地区后，不问是否起义军，见人就杀，甚至有的士兵还闯入农民家里，将全家杀死。因此，“是役也，用兵十五万，斩贼百余万，自出师至凯旋，凡四百五十日，……所杀平民不下二百万”。官军的大屠杀，激起了人民的更大愤怒，许多人逃入深山，决心与北宋统治者斗争到底。另外，在镇压方腊起义之后，宋徽宗很快又恢复了“应奉局”，让宰相王黼和宦官梁师成两人主持，继续对江南人民进行勒索。在东南地区作恶多端的朱，方腊起义中一度被撤职，这时也被起用，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总之，在镇压方腊起义之后，东南人民所受封建压迫剥削依然很重，阶级矛盾并未得到缓和。因此，农民的反抗斗争自然也没有停止，只不过化整为零罢了。另外，不堪压迫剥削的农民，还发动了一些新的起义。

方腊起义失败后，其余部散于两浙各地，采取分散的形式，坚持武装斗争。靖康元年（1126年），淳安县咸平洞（原帮源洞，方腊起义失败后改名）一带农民，为了报仇，他们又“集结死社”，并“侵掠州县”，浙西安抚使慌忙调集严州（原睦州，方腊起义失败后改名）禁军二百人及土豪方庚等前往镇压。永平乡管村农民管孙众等人也。啸聚报怨”，他们打进地主唐三十六家，杀死了这个恶霸地主，并毁其房屋，剿了他的家。农民徐横、徐机、徐公爱等人，也“各有纸甲器刃，结集贼众”，抢了一家汪姓地主的钱米，并与前来镇压的土军、团丁等进行战斗。

靖康元年（1126年）一月，金军渡过黄河，包围了京城开封。北宋朝廷下令天下军民勤王，严州遂安县（已并入淳安县）民倪从夫、徐周等人，于十二月十五日，以勤王为名，在广洲源赵侯庙，“鸣鼓聚众”，发动了起义。十八日，县尉曹献可带领弓手前往镇压，被倪从庆打败，曹献可身受重伤，不久死去，知县张柟也被俘虏。靖康二年（1127年）一月，农民军“五百余人，突入淳安县仁寿乡灵囿等界，烧劫屋宇，杀伤保甲”。安抚使叶梦得下令调集七州的巡尉、保甲、弓兵，四面围守把截，依然不能取胜，农民军很快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并在广洲源荡内“扎大寨三处，小寨十一处，倪从庆戴黄凉伞，称呼赵侯王”，在浙西称王，并在深山里建立了根据地。他们还派遣徐二十三等五人，前往杭州、严州（浙江建德）、衢州（浙江衢县）、婺州（浙江金华）、越州（浙江绍兴）等地进行侦察活动，计划向外发展。在倪从庆起义的影响下，“浙部东西两路，所在皆有方腊余党，阴怀顾望”，他们时刻在寻找机会东山再起，倪从庆的起义，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已有开化县农民一千二百多人响应起义，有的则正在组织队伍，准备响应，一时造成了很大声势。

二月九日，叶梦得调集附近数县弓手等地方武装，对倪从庆起义军

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面对敌人的进攻，农民军毫不畏惧，他们主动迎战，“威势甚猛，官军退却，因致溃散，杀死二百余人，部辖官吏，九人未见下落。”官军损失惨重，大败而归。叶梦得失败后，非常恐慌，他在给钦宗的上奏中说，若不迅速消灭倪从庆，“复如方腊之时，则不惟本路生灵，再遭屠陷，实恐声摇远近，震动人心”，后果不堪设想。他感到“严州土人，多不可用”，要求外地增兵，除截留福建邵武军枪杖手勤王路经杭州的八百二十五人外，还计划再截留福建泉州、建州勤王的枪杖手九百二十四人，协助围攻农民军。另外，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叶梦得也向农民军发布文告，进行“招安”活动，声言只要投降，即可免罪，还可得到官位等等。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自二月十三日开始，叶梦得纠集了一支四千多人的军队，由詹大和统领，连续向农民军进攻。当时，阴雨连绵一月有余，柴草尽湿，农民军长期被围困，供应不足，粮食用尽，再加以面对数倍之敌，众寡悬殊，伤亡很大，农民军七个首领，牺牲了四个，倪从庆本人也“左肋中刀三处”，身负重伤。后包围圈也越来越小，倪从庆无力再战，便接受“招安”投降了。但是，很多农民军战士却分散潜伏到各地深山之中，继续坚持斗争。

北宋末年，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若不是由于女真贵族的入侵和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广大农民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金斗争，很可能会形成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

南宋史

第一章 金兵南侵与来金战争的初起

一 金兵第一次南下与保卫东京的战斗

女真贵族侵略宋朝，蓄意既久；宋朝弱点的暴露，又多而且快，金兵南侵，自然很快就会实现。

1123年8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死，依兄终弟及的制度，由吴乙买继任，这便是金太宗。宗翰等掌握兵权，侵宋更加积极。宋朝来讨西京所属各州，他们不顾前约，只还武（宜化）、朔（朔县）两州。宗翰驻在云州，更积极进行军事准备。1124年，马扩到云州索地，交涉不得要领，但是看到金国训练汉儿乡兵，增加飞狐、灵丘戍兵，知道不久会发生事变。他在12月里还到太原，向童贯报告，劝他加强边防。童贯却不以为意，说道："他国内人心未附，岂敢如此!"1125年（徽宗宣和7年），河北、河东边境不断得到谍报，知道金国征发丁口、收积粮草、调动军马，南侵的形势已很明显，只是朝廷人员不把国防当做正经事情，并不认真设防已。

1125年10月，金国正式宣布南侵，任命"谙班勃极烈"完颜杲（斜也）兼领都元帅，以下分为两路，从西京入太原的一路，宗翰做主将；从平州攻燕京的一路，宗望（斡离不，阿骨打的儿子）做主将。

金兵一动，宋的统治者立即慌了手脚。他们原本睡在梦中，如今只有"降、走"两字在心目中了。使者马扩奉命到云州交涉交还土地的事情，宗翰嘲笑他说："你们还想要土地吗？"招待使者的金国官员也笑道："招待使人只此一回了!"马扩赶回太原，告诉童贯。童贯大惊道："金人立国不久，怎敢做如此大事!"接着，金使者到太原，说道："只有赶快割让河东河北，以黄河为界，才可以保存宋朝社稷!"这个一向作威作福、自命名将的"童大王"，不曾见得一个金兵，听了几句恫吓，就自称奉命"宣抚"，没有守土的责任，急匆匆逃回东京去了。金使者在东京公然威胁朝廷，大臣白时中、李邦彦吓得面无人色，低声下气，问怎样可以避免战争，使者高声道："不过割地称臣罢了!"宋朝的大臣吓得不敢向他们讲一句硬话，立即派出了第一个求和的使者李邺，皇帝也考虑南迁了。

金兵推进得非常迅速。东路军从平州出发，早在关内，宋人无险可守。10月，宗望攻下檀州、蓟州。12月初，郭药师叛变，金兵不战而入燕京。从此金兵命郭药师做先锋、引导金军大踏步南下了。西路军在12月初出兵，朔州、武州、代州等地，到处都发生义胜军内应的事件，18日便到太原披下，开始围攻。

紧急军报不断传到东京，中山府（河北定县）连奏三次：金兵分道

南下。12月22日，金兵越过中山南下，宋政府估计：敌军可于10天内到达京师附近。徽宗义气又伯）一度香厥过去，匆匆下了一道罪己诏，禅位給太子（钦宗），自己带了蘖京、童贯、朱等人，逃往南京（河南商丘），准备继续逃往东南。

12月23日，钦宗赵桓即位，明年改元靖康。他怎样来应付这局面呢？执政大官都在作"走"的打算。钦宗派何灌、梁方子统兵2万把守浚州（河南濬县）黄河侨（当时的河道在今道以北，流过浚州的南面）。兵士缺乏训练，不会骑马，两手抓住鞍子不放，惹得东京的居民都好笑。宋朝的军事政，治实在太糟了。不是这个样子，女真贵族的灯略如何会得逞，中原人民如何会遗到大灾难!

一部分爱国的官吏儒生再也忍不住了，他们挺身而出，要求保卫国土，要求改善政治。太学生陈东等上书说：今日之事都是蓊京等六贼败坏国宗的结果，请求杀这六人，"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太常少卿李纲早在直和元年就上书请朝廷防外患，这时又建议："攘除外患，使小国之势耸；诛锄内奸，使君子之道长。"他极力强调："祖宗疆土子孙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钦宗穴刮升他做兵部侍郎，但还没有资格参预决策。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2，金东路军攻破浚州。梁方平往北岸，见敌兵到来，便仓皇逃走。南岸守兵望见金兵旗帜，便放火烧桥；接着也垒部溃散了。黄河天险竟没有一人防守。金军在河边寻得几只小船，花了5天工夫，骑兵方才渡尧，步兵大牢还在北岸，一边渡，一边走，队伍混乱不堪。这样子的金军竟丝毫不受抵抗，到达东京城外。原因很简单，他们渡河的时候，来人议论还没有决定哩!

正月初3，濬州失守、金军渡河的消息报到东京。钦宗和大臣们于初4日商议出走，李纲看见事势危急巳极，要求见驾奏事。知东上合门事朱孝庄诅："照例，宰相执政没有退出，从官是不能求见奏事的。"李纲道："这是什么时候，还能讲旧例吗？"这样，他才能进殿，立在执政的下首，向皇帝提出坚守京城的主张。大官僚地主们千方百计想要逃走，白时中先说；"京城哪里守得？"宦官陈良弼也竭力夸大缺乏守城器械，企图证明防守的不可能。李纲驳斥他们道："天下城池拥有比得上京城的，如何不可守？"狡辩被驳倒后，白时中索性耍无赖起来，他提高了喉咙道："李纲，你难道能出战吗？"他自己贫生怕死，却想借此来恐吓李纲。李纳答道："陛下不以臣为庸儒，若使治兵，愿以死效!不过人微官卑，不足以镇服士卒而已!"钦宗立即升他做淘书右丞，这是执政官了。李网又再三说明坚守的必要，最后，钦宗已经倾向留守了。宦官王孝竭在旁奏道严陛卞怎可留在此地!"这个皇帝又吓得而孔变色，流泪要走。李纲再三哭拜要求，才有转机。

当天夜里，皇帝又变了卦，传令天明出发。初5日早晨，李纲上朝，见禁卫军都巳披甲，宫人们正待上车，已是行色匆匆的模样了。李纲高声对兵士们说："你们愿意死守京师呢？还是愿意保驾出走？"将士

们一致高呼："我们愿意死守!"在禁卫军士气激昂的情势下，李纲才把皇帝勉强留住。钦宗知道将士家属都在城里，强迫他们出走，半路上一定溃散，那时候"敌人知道皇帝走得不久，用快马来遗，如何抵敌？"李纲这几句话打动了钦宗的心，于是决计守城。李纲被任命做亲征行营使，指挥守城军事。这一着的成功，关键在于士兵群众的支持，是很明白的。

李纲接受任命的时候，金兵已经将近渡完。京城防御工作，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他在每一面城墙上，布置守兵12000余人，准备下礮、弩、砖石、檑木、火油等物件。另外设立前后左右军共4万人，中军8000人。前军保住通津门外延丰仓；后军守住朝阳门外濠问最浅狭的樊家冈，补救城防的弱点；其余3个军留在城里，策应四方。布置才有头绪，敌人便于初7日兵临城下了。

金军到了东京城外，就直奔西北角的牟驼冈。此地有养马两万匹的天驷监，粮贪饲料，堆积如山。金军根据郭药师的情报，占据这个地方，吃宋朝的粮食，打宋朝的首都。他们自己也好笑道："南朝真是没有人，如果用一、二千人守住黄河，我们怎么渡得过来!"

南朝真的没有人吗？不是的，只是人的手脚被统治集团束缚住了，舒展不得。束缚略为松些，手脚就会发出巨大的威力。金兵第一天玫宣泽门，几十只火船顺流而下。李纲派两千名敢死队，用长钩子钩牢火船，再投掷石块，把它们全部打碎，斩获了100多人，给敌人一个小小的下马威。

以钦宗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依旧畏敌如虎，基本以妥协投降为国策，一面守城，一面派入到金营求和。金人的主要条件是500万两、银6000万两、缎百万匹和割太原、河间（河北河间）、中山（河北定县）三镇。这笔金银在当时是骇人听闻的数字，李纲指出："竭天下人的财产还不够，何况一个都城呢？"三镇实陈上包括十多郡，山西的山地，河北平原上限制骑兵冲突的池塘湖泊，都在其中，割让以后，东京一无屏障。这样的条件，皇帝却答应得下来，立郎下诏害给三镇，要他们归金；立郎在京师搜括民间金银，得金20万两、银400万两，运往金营。

皇帝畏惧敌人如此，实陈上的形势却并不可怕。金人原定计划：西路军下太原，取洛阳，隔断西北边防军到东京的道路；东路军从河北直扑东京，然后两路会师，打破东京。但是东路军虽照原定计划到了东京，西路军围攻太原，却始终不能得手。于是宗望的东路军变成孤军深入，6万人围攻京城，数量还不及宋朝守城兵，河北重要城池都在宋人手中，西北边防军以及各地驻军，纷纷入援，共达20多万人。照形势看来，应该害怕的是金兵，决不应该是宋人。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金军初到，在京城附近各县，到处横行；后来勤王兵逐渐到达，金军的小部队就不敢出营独立行动了。

的确，京师被围以后，形势逐渐转变得对来有利。援军逐渐结集，

士气也很高。西北老将种师遣在途中遇见统制姚平仲的7000人马，便一同进发。他们到洛阳，听见金兵已到京师，有人认为兵马太少，不如留屯泛水，师道说：“不对，我们鼓行而前，敌人那里料得到虚实。都城中知道梭兵到达，士气自然百倍。”于是沿途散发榜文，声称种少保领西兵百万出来。他先濒20个全装披带的骑兵，带了蜡丸密书，直奔京师。当时金军游骑，到处骚扰，这20骑碰到敌兵，直闯过去。金军知道西兵耍到，连忙牧兵入营。这20名骑士毫无损失，安叠进入京城。正月20日，种师遭到京。他对钦守道：“京城周围八十里，如何可围？城高数十丈，粮食可以支持几年，是攻不破的。”他又说：“金人不懂兵法，那有孤军探入重地而能安然撤退的!”钦宗道：“已经讲和了。”师道答道：“臣领兵打仗，为国效劳，其他的事不敢问讯。”他已经清楚地看到金兵的弱点，也明白表示对和议的反戚。

侵略战争激起了广大军民杀敌卫国的决心。燕山府官员沈琯诈称讲和，金兵把他放回。他受冻忍饥，步行到京师，把所见金军虚实，告诉政府。他指出金兵调集中年，组成这样一支军队，如能把他歼灭，金便不容易再举兵了。他又指出：到京后在茶馆里休息，听人们谈话，都愿意出战，只恨没有出击的命令。从这里可以看出围城中军民的心理。

这个有利的局势，宋朝并没有加以利用。议和一直在讲行，实际上是边守边谈。谕军事，事杖也不统一。李纲要求使种肺道、姚平仲等受他节制。钦宗不许，另设宣抚司，使种师道做宜抚使，姚平仲做都统制，指挥勤王皋马，又将前后军拨归宜抚使，于是李纲主持的行营司，只管得左右中军。

种师道与姚卒仲对作战方略，意见不同。种师道主张以逸待劳，只等金兵吃光粮贪、不得不退之时，乘势追击，可保万垒。姚手仲主张速战，直接向钦宗提出意见。2月初1日，姚平仲领兵1万，夜袭金营。这一着太冒失，金兵悬军深入，怎会不做准备呢!平仲既败，种师道认为本来不该夜袭，既已做了，索性第二夜再来一次，出其不意，很有成功可能；如果仍旧不得手，那么以后每夜派几千人轮流进攻，使敌人无法睡觉，不消10天，敌人自然逃走。这也是切实可行的好办法。

一心只想投降或逃走的大官僚们却利用夜袭失败的机会，造谣诠西兵被敌人垒部歼灭了。钦宗吓得赶紧罢种师道兵权，把李纲革职，改任蔡懋做行营使。这个蔡懋下令禁止守兵施放箭右，闹得人心恐慌。宗望派使者进城质问夜袭的事情，宰相李邦彦当着钦宗的面，无耻地向使者道：“用兵是大臣李纲和姚手仲自作主张，不是朝廷的意思。”

割地议和，眼看就要实现。东京军民非常愤怒，挺身出来斗争。2月初5日，太学生陈东等数百人，到宣德门下，伏阙上书，要求坚持抗战，恢复李纲、种师遗宫职，罢免奸臣李邦彦等。他们明白指出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等初得警报，便送家属出京，造成京城中骚动不安的局面；又指出他们主强投降，见李钢小败，不以为忧，反以为喜。陈东代垒城人民表示了大多数人的态度。他说：罢免李纲的命令传出，土

大夫失色，兵民骚动，大家流涕相吊，都说不久要为敌人所掳了厂他最后坚决地要求钦宗考虑人民的意见，说道：“陛下若以臣等之雷为未足取信，试御楼呼耆老一问之，呼军民一间之，呼行道商旅一间之，试杏百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纲可用，而邦彦等可斥也!”

东京军民听得太学生上书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几万人自动集合起来，跟太学生站在一起。那时恰巧李邦彦退朝出来，军民罵道：“李邦彦，你是浪子，岂能做得宰相!”原来李邦彦浮薄没有品行，出名叫做“浪子”，向来为人民所瞧不起，如今卖国求和，怎么不惹人痛恨!众人一边骂，一边拾石手投过去打他。这个浪子见机，赶紧逃进朝堂，才得没吃大亏。钦宗命令宦官宣布接受军民要求，有人想散了，群众喊道：“知他是真是假，必须见了李右丞、种宣抚才退!”群众把宫门外的登朋鼓，打个不停，把鼓面也打穿了。数万人，叫喊的声音震天动地，而且人越聚越多，后来据说竟有数十万人之众。开封府王时雍带了几十名兵士和刽子手，妄想弹压，责备太学生“胁迫天子”。太学生理直气壮地道：“以忠义胁天子，不此以奸佞胁天子好吗？”众人拥将上来，王时雍见势头不妙，连忙逃走。主管殿前司王宗础怕事情越闹越大，劝钦宗接受。钦宗没法，才宣布重新起用李纲、种师道，立郎宣召进宫。内侍朱拱之宣召李纲太迟，立即被群众打死。李细和群众见了面；群众还要求见种师避。种师道乘车进城，群众揭开帘子，看见真是“老种”，才欢呼解散。

这一次闹了一整天，群众终于达到了目的。这是我国历史上士民第—次自动团结起来，制止投降的光荣史迹。

李纲复了职，便命令杀敌者受重赏。金兵知道城里发生的事件，看情形不妙，不等金银数足，取了割让三镇的诏书，于2月初8日退兵了。宋朝宣布京师解严，一重难关总算逃过了。

金兵满载而归，种师道请求乘他们渡河时猛攻。李纲请隶派大军“护送”出境，令将士看有机会便攻击。宋朝政府拒绝这些请求，禁止各军对敌作战，并派使者到军中监视。统制马忠有二次与金军遭遇，金兵挑衅，杀伤数人。宋兵眼睁睁地看着，非常气愤。有一个土兵忍耐不住，自动杀敌一人。马忠怕使者报告朝廷，只得把这兵士斩首，井向敌人陪罪。在这种情形下，金兵才能安然退去。然而无论如何，侵略军终于撤退了，大官僚地主认为不能守的京城毕竟守住了。这是李纲、种师道等的功绩，是广大爱国军民的功绩。后者是更其重要的，因为不是军民自发的起来抗敌卫国，制止宋朝统治者的投降阴谋，李纲、种师道是建立不出任何功绩来的。

二 两次围城之间

东京解围之后，皇帝和大官僚地主以为危机已经过去，不考虑怎样抗敌，只做“安内”的打算。从他们看来，即使敌兵再来，只要献上土地金银，可以使他们满意而去；人民敢聚众威胁天子，却是心腹之忧；李

纲、种师道受群众的拥护，决不是可靠的人。李邦彦虽已罢免，钦宗和他任用的大臣唐恪、耿南仲都是这样看法的。耿南仲更露骨地讲过：士民伏阙上书是李纲指使出来的。因此，他们的急务就是怎样来巩固钦宗的地位。

由这个目的出发，他们也做过一些“好”事。钦宗在解围以前，便流放王黼，使武士在东京附近的雍丘县村中，把他杀死，假托被盗所杀。接着斥逐梁师成，在路上觞死。解围后，道君皇帝回京，钦宗叉把蔡京父子放逐到广东，蔡京死在中辽，蔡攸后来也被杀掉。童贯也受到同样处分，先被斥逐，然后正法。钦宗杀这些人，实在并不是杀贼，不过因为门己做了皇帝，而蔡、童等人是站在父亲一面的，他害怕徽宗复辟，因此才赶紧清除这批人物。

对于抗战有功的重要人物，一解围，就用年老做理由，解除种师道的兵权。李纲是文官，有大功劳，只得暂时从缓，慢慢寻事害他。至于士民聚众上书，更明令：“士庶有以伏阙上书为名者，意在作乱，今后如更有似此之人，仰三衙收捉，并从军法，令王宗磓斩讫奏闻。”人民挽救了宋政权，宋政权却以严刑来报答人民!

他们全心全意搞这些花样的时候，敌人的军事行动扔旧在进行。金西路军还在攻太原，而且宗翰听见东路军在东京发了大财，眼红得很夕派使者到东京来讨。东路军向北撤退，想接收中山、河间两镇，受到两地军民的抵抗，河北也在进行激战。腐朽的统治集闭在对付外患问题时，略见转机就乐观得以为马上可以胜利，一过挫折就害怕得立即屈膝投降，这是他们的规律。此时金军不在城下，没有什么可怕，两河都在抵抗，于是主战论抬头；钦宗于3月土6日下认，高唱“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俨然是抗战的样子了。

这时，主战的御史中丞许翰同知枢密院事；种师道出任河北宜抚使，驻在滑州；姚古、种师中分援河东、河北，似乎颇有作为了。姚古是姚平仲的父亲，也是西北边将；种师中是师道的兄弟，种家在西北三代将家，师中老成持重，很有威名。论将帅人选，在当时不能算差。姚古收复一度被金兵占领的威胜军（山西沁县）；种师中进入河北，围攻中山、河间的金军怕被夹攻，都解围退走。他们不能诠完垒没有战绩。然而军政不修是当时的通病，这些部队也不能免；事权不一，将帅常被掣肘，更不可避免。因此，他们最后都不觅溃败。

金军还在围攻太原，政府便令种师中从井陉进河东，救太原。师中连胜几阵，收复寿阳、榆次等县。然而金军毕竟是强敌，要解太原之围，还该作万全的打算。许翰不明白这道理，一味催促进兵，甚至二夫打发六、七逼人下书，责备师中“逗挠”。师中不愿意在晚年因“逗揍”得罪，便冒险进兵。5月9日，他走到寓太原106里的杀熊岭，被优势敌军围攻。来兵缺粮，战士每天只得到一勺豆，吃木饱肚皮。军犒银两又不够，战士用种臂弓打退了敌人，要赏赐却拿不出东西，将士心怀不满，溃散的很多。师中率领几百名亲兵宛战，身妥四伤，为祖国牺牲了。金

军乘势向南，迎击姚古。这支兵马也很快地溃散了。

军事上受了挫折，耿南仲一班主和派又抬头了。他们主张依旧割让三镇，乞求和平。李捆反对，他们就乘种师道以老病请求辞职的机会，推荐李纲做河北河东路宜抚使。这是他们借抗敌之名，寻事害人。他们明知李纲是文官，做不来人帅，要他失败，就加得上罪名了。李纲要兵，没有兵；耍钱，没有钱；集结起来的部队，被朝廷下令遣散。但是，进兵的日期却不准“迁延”。李纲不得已，只得于6月27日，出京师。他进到太原附近，指挥各路军队，约了日期，一同进兵。但是将领们都另受朝廷直接指挥，对李䌹的命令，置之不理。结果，自然是打了一场败仗，这时巳在8月中了。于是李纲以“专主战识，丧师费财”的罪名被放逐；许翰也被排挤出政府了。

就在这时，金军两路主力又南下了。9月初3，被围250天以上的太原陷落。太原防御战是抗金战争初期的光辉史页。宋将王禀等领导军民，拒绝敌人的招降，誓死固守。金兵最后猛攻时，架炮3座，发射的石块此斗还大，力能破坏城上的防御设备。王禀在城上架了木栅，下放盛糠的布袋，掩护防御设备。金军用木料填没壕沟，都被王禀放火烧掉。金军一切办法都使尽了，太原城依然象山岳般屹立着。然而外无救应，内无粮草，皮甲、野草都吃光了，军民力尽，终于被金军打破城池。王禀率颌饿兵巷战，还能突围而出，因金军追得很惫，投汾水而死。这—战证明中原军民有决心、有力量，可以打败任何敌人的侵略。他们的失败完叠是统治集团所造成的。太原的死难将士是光荣的。张孝纯是太原总帅，斥责过童贯的逃跑，也与王禀共同坚持了8个多月，可是城破之后，做了俘虏，却不能坚持不屈，后来做了伪齐大官，终于遗臭万年。

10月里，东路军也于初5日攻陷河北重镇奠定（河北正定）。知府李邈、兵马都钤辖刘翊坚守40天之久。他们在金军将来的时候，就派使者带了蜡书（把文件藏在蜡丸里）走小路去报告朝廷，后来又陆续派人求救，前后34次，都没有回音。城破之后，敌人捉住李邈，要强迫他做汉奸，用火烧他的须眉肌肤，他绝不屇服，最后被敌人残杀。刘翊率兵巷战，突围不出，不愿落灭敌人手中，自缢而死。

金兵攻破太原、翼定夕都费了不少时间，付了不少代价。两地军民抵抗的猛烈都足以振奋人心。金兵的烧杀抢劫更激起人民无此的愤怒。河北、河东一带的抗金斗争从此一天天的高涨起来了。然而对于北宋统治集团来说，军事的挫折只造成了投降派抬头的结果。唐恪、耿南仲等决心割地议和，下令禁止各地军队勤王。将头们因为讲和，都闭上营门，不再出战。金军却一面假意谈判，一面长驱直入。于是东京第二次被围的局面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件了。

三金兵第二次南下与靖康“北狩”

太原、奠定失陷以后；两路金军长驱南下。宋朝李纲被斥逐到南方

去了；种师道患重病，在10月中死了。朝廷派出一批批的使者，到军前求和。金兵一面答应讲和，一面照样攻城夺地。宋军将领因为议和，涫极怠战。在这种消沉的空气中，在军政腐败、待遇恶劣的条件下，士兵看不到前途，军队几乎瓦解了。

太原失陷后，山西南部的平阳府（临汾）是河东重镇，北面有回牛岭天险，可以防守。金兵到岭下，怕宋兵居高临下，施放筛石，不敢进攻，不料守兵会得自行溃散，天险竟同虚设。当时有人目睹河东的官军，伤病士兵枕籍于路，没有医药，没有粮食。士兵的口粮常不足数，菜钱中夹杂没人肯收的铁钱。9月天气，已银寒冷，士兵预不到服装，还有赤膊的。将校每日酗酒，不问兵事。上面发下犒赏，多被官吏中饱。回牛岭的守兵每天只簏到一点碗豆陈麦，大伙儿冷笑道：“吃这样的东西，打什么仗!”这样一个失败的局面完全是宋朝封建统治阶级造成的。他们把士兵群众陷入绝望的境地，才引起一次次的溃败。

金兵过了回牛岭，10月24日，打破平阳府。于是金西路军从泽、潞（山西晋0s9、长治）进兵，下太行山，破怀州（河南沁阳），到河阳（孟县），与宋军隔黄河对峙。南岸宋军有12万人，兵势不弱。金将娄实知道可用虚声恫吓，便集中战鼓，通宵打击。宋营听见鼓声不停，果然惊慌逃散。金军不过抵抗，安然渡过了大河。这时是11月13日。

宗翰过了河，攻陷西京（洛阳），分兵扼守潼关，断绝西北援军的来路，一面向东进军汴梁。这时东路军宗望也从大名府（河北大名）方面渡河南下了。

东京城里，不断得到金兵逼近的操报，人心惶惶。统治集团还是相信：只要屈膝，便可保全自己。汉奸王云曾经做过求和使者，竭力主张派康王赵构（钦宗的哥哥）到宗望军中求和。朝廷果然照办十条件是除割三镇外，尊金主做皇伯。金人派使者来要求以黄河为界，又要求派亲信大臣办理割地事务。朝廷果然派耿南仲、聂昌前去。

然而，金军还是在向京师进兵。11月24日，宗望军到城下；闰11月初2，宗翰也到了。这一次，金军两路会师，宋军虽则还有7万守兵，只是事前毫无战守准备，此起上一次来，形势坏得多了。府恪、耿南仲对这要负主要责任。他们一心求和，命令各地军队不得“妄动”，所以没有勤王兵马前来。

封建统治者到了穷途末路，霓相信一个自称使六甲法的郭京，打算靠神兵退敌了。这个无赖骗了大量钱财，招人当“神兵”，不管技艺，只问“八字”，7779人，10天便招足了。金兵攻城，他只是谈笑，自称要选“好日子”才能进兵，包管一举成功，恢复太平。闰11月25日，郭京决定出战了。他令城上守兵下城，不准偷看，然后大开宣化门出战凸“种兵”出城和金兵一接触便溃败了，“郭京在城楼上看见，推说下城作法，领着一些党羽溜走了。金兵乘此机会，打破了城池。

当时局势其的毫无挽救余地吗？不是的。金人的侵略越深入，人民抗金的热情也越高涨。黄河南北，京师内外，跟着金军敛骑的足迹，一面是腐朽统治集团的土崩瓦解，一面是抗金斗争在沸腾起来。

先看两河，康王路过长垣（河南长垣），就有人民拦路叫喊，劝他起兵。到了磁州（河北磁县），人民又拦路劝他不要自投虎口，守臣宗泽也竭力挽留。汉奸王云是康王的随员，他曾夸张金兵攻城的力量，说翼定城此京城高一倍，金兵一下予就攻破了。这分明是胡说，京城天下无比，怎会此奠定低；金兵攻直定40天，何尝一下子攻破!磁州人民为义愤所激，便杀了这汉奸。康王因此能够留下，没有白投虎口。割地使者耿南仲、聂昌知道两河人心激昂，受命时便很害怕。耿南仲陪金使到卫州（河南汲县），乡民要促他们，两人吓得狙狈而逃。聂昌到绛州（山西新绛），当地军民闭门不纳。他硬婴进去，结果被军民拿住，碎尸万段而死。

河北、河东各地城池，多数仍在宋军手中。中山孤立敌后，也仍在坚持。宗泽更指出：邢（河北邢台）、沼（河把永年）、磁、赵（河北邯郸）、相（河南安阳）五州，如各有两万精兵、敌攻一郡，四郡同去救应，那就等于一郡有10万大军。宗泽的意见是正确的。宋朝地大人参，有深厚的潜在军事力量，武装起来，团结起来，就可以发挥作用。当时出问题一般是没有把人民武装起来，有的地方武装了一部分群众，也只是以乙城一地的力量，单独作战，终于免不了失败。宗泽的主张得不到实行的机会，是极可惋惜的。

廉王留下后，就到相州，奉命组织大元帅府，领兵1万，渡河救京师。政府却又派使者通知他：正在议和，暂勿进兵。当时汪伯彦和宗泽都是副元帅，汪伯彦相信和议；宗泽主张直趋澶渊（澶州即河南濮阳），进兵解围，不要中敌人的狡计。汪伯彦等不愿进兵，劝康王派宗泽先行出发。宗泽领了2000人单独前进；康王和汪伯彦等却向东躲到东卒去了。

宗泽从大名到开德，连打13个胜仗。他劝康王号召各路大军到东京会师，又通知附近几位大将合兵前进，他们却以为宗滓发狂，置之不理。宗泽到卫河以南，陷入敌军包围，他下令道：“今天进也死，退也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土兵都拚命作战，人人以一当百，杀敌数千。宗泽预料敌人不甘心失败，获胜后立郎转移。金兵连夜赶来反击，扑着一座空营，大威惊奇。这一支小小的队伍，使敌人大为头痛，生动地证明宋朝人民有足够力量可以打败金军。

黄河以北有这样的军民，有这样的将领，但是东京只下“开门出降”的命令；康王只采取沼极逃避的手段。军民的力量没有充分发挥的条件，斗争的心情是火热的，但是行动却只能限于一些分散的活动。

在东京城里，即使城垣失守，事势还有可为。东京的军民和部分爱国官吏始终激昂慷慨，坚强不屈地对金兵进行斗争，也对投降派进行斗

争。城破之前，防军几次打退进攻，破坏金兵攻城的器械，如果不用什么“神兵’，决不会很快陷落。宰相唐恪从钦宗巡城，人民耍打这个主和卖国的官僚，使他不得不自行辞职。金兵破城，占领了城垣，因为受到军民猛烈的抵抗，竟不敢向城中推进，只是痴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城里军民的情绪不因局势危急而低落，相反地，却更加高涨起来了么卫士们冲进都亭驿，杀死金侠刘晏。几万军民用大斧劈开宫门，求见皇帝，要求继缤抵抗。卫士长蒋宜带头几百人，要保护皇帝突围出去。人民并没有向强敌低头，坚决地准备抵抗下去。但是反动统治阶纽不肯相信人民，他们始终认为对敌人可以屈服求和，而人民势力的抬头是最大的危险。钦宗劝告请愿的群众解散。大臣吕好间强调突围的危险，使卫士们放弃这企图。事后，朝廷还害怕他们“作乱”，丧心病狂地把为首的蒋宜、李福杀害了。

在圣城军民要求决战的呼声中，金兵有所忌惮，不敢乘势占领垒城，只是要求皇帝亲自到营中讲和。钦宗去后，人民都站在泥泞的雪地中等他回来。这实质上是当时人民爱国心的表现。可是在古老的时代里，数千年当中，一直有个问题：好人没有组织。因此一时为义愤所激，群情激昂，显得雄伟有力。时间稍久，临时结集的群众解散了，力量也就发挥不出来了。当时的群众就是如此，没人领导，没入组织。既然朝廷决心屈服，金兵就可以要金银，要土地，要骡马，要宗室，要文物。金人要什么，统治者就给什么。要金银，就尽量搜括民间的金银；要土地，就派出20多个使者到两河割地。皇帝和部分大官僚幻想金人欲望满足后会自行撤退；另一部分大官僚进一步认贼作父，热诚地为新主子服务了。钦宗第二次进金营后，金人就宜布把徽钦二帝废为庶人。他们耍太上皇（微宗）太后太子，大将范琼就威迈一行人等上车，人民望见了号哭，范琼立刻杀死数人示众。金人要成立伪组织，留守王时雍等立刻拥护金人指定的张邦昌做“大楚皇帝”。要宗室，开封府徐秉哲命令五家联保，不准人民藏匿，搜出3000多人，押到军前。北宋政权就是这样被卖围贼们断送了!

在金人勒索榨取的期间，人民并没有届服。金兵向城中人买酒，军民鲶他们的是尿。皇帝被扣留了，军民到留守司请愿，要求发给武器，准备作战。留守司不肯，人民就私自制造。所有这些白发的反抗都被统治集团禁止了。留守司逮捕带头要求分发武器的李宝等17人，杀头示众。封建官僚就是这样子对新主子忠心耿耿的。

少数爱国官吏在万分困难的局面下，设法组织抵抗。吴革是其中的一个主要人物，也是常为后人所记忆的一位英雄。吴革这人，年轻时就喜欢谈论兵事，考进士不中，就往西北边防军中纣个出路。金兵第一次围京师，他在陕西做统制官，便领兵动王，后来又解过辽州之围。金兵第二次围京师，他会屡次献计出兵，都没有实现。破坡以后，他以设立账济所为名，招募勇士，组织了几万人，隐藏军器，练习弓箭。太学生臭铢、徐伟等数十人也都参加。他们准备在靖康2年3月初8起事，先杀汉奸范琼等人，然后分兵冲出城门，杀进金营，夺还二帝。不料张邦昌的伪组织就耍戌立，吴铢等都劝他赶紧发动。初6天朗以前，卫土数百

人武装前来，说张邦昌来日就要即位，非即刻起义不可。吴革不得已，彼甲上马，就领着这几百人出发。可是事机不密，早有人报告了范琼。吴革等走到金水河西，就被范琼的部队包围。汉奸左言假意表示跟他合作，骗他下马议事，乘势把一行人拿住杀了。这位将军死时面不改色，骂不绝口。泊息传出去后，满城人听见了，都为他流泪。

金兵胜是胜了，然而两河各城大多拒绝投降，东京民气激昂，勤王军宗泽离京不远，范致虚颌陕西兵进迈西京，形势使金兵不能久居中原。他们匆匆地建立了伪楚，就从3月27日起开始撤退，到4月初1，才完全离开京师。那一天，东京居民听见金兵退完，叉悲又喜，登城观看，人人都有无穷戚慨!

金军撤退时，带走了彻钦二帝、宗室妃嫔几千人、法驾仪仗、礼乐器具、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所藏书籍，天下州府地图、各色有技艺的人、工匠倡优。汴梁城中公私蓄积，一扫而空。大批的赵氏贵族男女，完全做了女真贵族的奴隶，他们是自作自受，丝毫不值得怜惜。封建统治阶级的史书把这件丑事叫作“北狩”，聊以遮羞，然而羞又如何遮得化呢!

北宋政权灭亡了，人民受到了金军的屠杀掠夺，激起了反抗的怒火，抗金斗争没有灭熄，反而越来越高涨了。

在另一方面，女真贵族在搜括汴梁财富人口时，表现了无比的贫欲。他们受了投降的官吏宦官的教唆，指名索取。他们索取仪仗，使金图君主学会中原皇帝的摊场。他们索取宫中与蔡京、童贯等家的歌童舞女，激坊乐工，好让女翼真族享受中原君主大官的荒涅奢侈生活。他们索取打造金银玉器的工匠、弄影戏、小说、以至弹筝、琵琶等艺人，使这些工匠艺人成为女真贵族的奴隶，供其取乐。宫中玩好物件，小至奕棋博戏的器具，一样不肯放过。从这些财物人口，可以想见女真贵族以后的生活。战争正是为这些贵族的利益服务的，广大的女真族平民从战争能够得到什么呢？完颜阿骨打宣布反辽时，女真人进行过正义的反压迫的斗争；然而此刻却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寸。

第二章 南来初个抗金斗争的高涨

一 南宋政权的建立与和战两派的斗争

金兵退后，张邦昌这个“皇帝”也只得退位了。五月初一，康王赵构在南京（河南商邱）即位，把靖康二年改做建炎元年（1127）。南宋政权出现了。康王后来被叫做高宗。他将怎样来收拾这个残破的局面呢？

论当时的形势，新出现的南宋政权很是软弱。金军在两河分兵驻防太原、真定等重要城市，继续进攻河中（山西永济）、河间、中山等地。黄河南北两岸产生了无数自发的武装集团，其中有溃散的兵士，有从各地赶来的勤王队伍，有官吏豪强组织的，也有灾民自动团结起来的。这些部队要存在，首先要解决军粮问题。要粮，只得自行筹措，其间是不免有些扰民的事，这在当时是没法避免的。南方因北宋末年阶级矛盾的尖锐，也动荡不定，所谓“盗贼”常能攻陷城市，纵横往来。宋朝的地方官逃的逃了，不逃的只能自行设法来应付时局。国家的情形如此，要防止金兵再度南下，显然是不大可能的。为了抗金，一个巩固的政权是需要的。

高宗能不能建立这样的政权呢？从表面上看，作为北宋政权主要支柱的禁卫军所存无几，赵构自己的兵马大元帅府也兵微将寡，似乎是毫无希望的。然而比较深入地考察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关键在于是否抗金。南宋政府只要能够真正抗金，就会有力量。自从金兵南侵以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黄河南北的人民受到金兵屠杀、俘掳、掠夺的痛苦，激起了爱祖国、保乡土的热情。在那个时代里，人民要抗金，就拥护赵宋。上面提到过钦宗进了金营，东京人民站在街头等他回来，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并不是说人民真正一向拥护这个皇帝。所以高宗如果真的决心抗金，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可以号召那些自发的武装集团，组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完成保卫国土的任务。

这是当时可能办成功的事业，然而不是赵构和大官僚地主所能做的事业。宋的统治集团早已腐朽到了极点，他们一想到金人，就胆战心惊，只打算逃走；他们一看到任何人得到多数军民的拥护，就以为这人“有震主之威”；他们对于广大的义军，认为是心腹之患，只想消灭他们。就皇帝个人而言，他更有不可告人的衷情。钦宗即了位，就防父亲徽宗复辟；高宗即了位，就不希望徽钦二帝回国，害怕别的宗室出来争位，更害怕出现异姓的竞争者。为了保持皇帝的地位，为了保持大官僚地主们的安宁与秩序，他们宁可偷安，不想恢复。因此，降、和与逃跑是南宋政权的基本政策，是代表大官僚地主阶级利益的路线。高宗和亲信大臣黄潜善、汪伯彦就是这条路线的忠实执行人。

试看新政府对待一些重大问题的态度。

新政府决定遵守靖康原约，把黄河做国界。黄潜善命令，军队不准

过河，命令刑部不准把即位赦文发到河东河北，准备派遣使者往金国求和。这是对和战大计的态度。

张邦昌等一批汉奸，人民恨如切齿。金人宣布将要建立伪政权时，东京城里议论纷纷，留守司怕百姓“作乱”，令将领范琼弹压。范琼大声对人民说：“自家懑只是少个主人，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譬如营里长行健儿，姓张的来管着是张司空，姓李的来管着是李司空，汝军民百姓，各各归业，照管老小!”这种无耻论调，当时人人痛骂。高宗将怎样对待这些人呢？起草赦文的官员对这些人批判得严厉一点，高宗就换人改正，宣布一切不问。黄潜善强调张邦昌是不得已，高宗更明白地说是为怕金人质问，所以必须优待张邦昌。这是对待汉奸的态度。

这种极端反动的政策是不得人心的。一部分官员上疏反对，相当地反映了人民的心理。如赵子崧说都城人民指范琼等10人为国贼，要求把他们明正典刑。张所上疏说靖康割两河，“使两河之民，烦冤沉痛，怨流骨髓”，反对留驻南京，预先准备南渡。在公论的压力下，高宗知道黄、汪两人“不厌人望”，不得不召众望所归的李纲，请他做宰相。这明明是装点门面罢了。

李纲在六月初一到了南京。从六月初二到八月十七日，他做了75天宰相。在这75天之中，南宋政府确实办了一些足以振奋人心的事情。然而反动的逆流毕竟占着统治地位，李纲的措施绝大多数都在短期间化为画饼了。

李纲的主要措施是罢和议、严守备、利用民兵、援助两河，惩办汉奸，以明是非。他每有措施，都必须与投降派作一番严重的斗争。他主张严惩汉奸，大臣们却都反对，如吕好问竟以为“王业艰难，正纳污含垢之时，遽绳以峻法，惧者众矣”。再三争辩的结果，宋廷把几个大汉奸放逐出去，了结这事。两河州郡沦陷的只有十几处，其余还在抵抗，山寨义兵更是不计其数。李纲劝高宗下手诏，鼓励两河军民继续抵抗；又建议派张所、傅亮经制两河，使他们先招募民兵，逐步进兵收复失地。这工作是艰巨的，必须选用适当的人。靖康割让两河时，张所做御史，主张傅蜡丸招募河北民兵救京师，河北人听见了都喜欢，所以他的名声传遍河朔。李纲要用旭，但是知道黄潜善与他有仇，不能不费上一番疏通的工夫。他想用宗泽守东京，但是宗泽已被投降派调到襄阳去了，又不得不努力说服高宗。朝廷以为人民武装是“盗”，是心腹之患，李纲竭力陈述：“今日盗贼，正当因其力而用之”。他是主张利用人民力量来抵抗金人、保卫国土的。

坚守两河的诏书发出了。大汉奸张邦昌等被放逐了。宗泽到东京，恢复京师秩序。金国间谍来到东京，自称出使张邦昌政权，被他断然扣留。危城小的人民渐有生意了。张所、傅亮决定分别在大名、陕州设立招抚司，招集民兵，两河军民响应的日益增加。所谓“群盗”接受招安的在短期间达到十多万人。复兴宋朝、抵抗金人的事业显然已有基础。

然而就在这些措施一一举办的时候，投降派破坏的阴谋也没有停顿过一天。大金通间陕的派遣不因李纲执政而停派。

放弃中胀、逃往东南的主张在朝廷小始终占着优势。李纲暂驻南阳与宗泽的还都东京两策，内容虽有不同，宗旨都在便于号召四方。一股大官僚们对于两策，都同声反对。张所、傅亮被任命了，黄潜善父建议加派别人，分割他们的权力。

8月中，投降派硬说设立招抚司后，河北“盗贼”更多，不如取消这个机构。傅亮兵马不甘齐备，不能立刻出发，投降派就加以攻击，说是“逗留”。李纲为张、傅两人再三辩护，高宗始终不信，于是李纲只得自行要求退职了。

投降派取得了完全的胜利。8月18日，李纲罢相，他的措施一律被取消。政府严令：为盗军民立即投降，如敢抗拒，本身和父母妻子并行处斩；鼓励地主阶级率领乡兵，帮助讨荡。这个政权不再作抵抗金人的打算，一心一意进行“安内”了。

太学生陈东、进士欧阳彻上疏攻击投降派，主张挽留李纲，还都东京，出兵北伐。高宗见了大怒；黄潜善更激怒高宗道：“如果不严办，必然重演鼓众伏阙的事件。”高宗果然把两人立即斩首。陈东是名震一时的爱国志士，死时年42岁。路上行人见他被害，都流泪嗜哭。只有皇帝和大官僚深恨人民“要挟”朝廷的举动，才会把李纲看作野心家，把与李纲面不相识的陈东看做他的死党，一定要把李纲逐出政府，把陈东置之死地。

十月初一，高宗上船，逃往扬州。宋政权非但不想恢复两河，连中原都准备放弃了。

二 北方人民抗金斗争的高涨

从1126年拒绝割地投降的命合以来，从太原、真定等地坚守抗敌以来，黄河以北的军民掀起了抗金斗争的高潮。随着敌兵的深入，黄河以南的军民也接着奋起。李纲、宗泽等的号召和领导，使斗争发展得更加波澜壮阔，声势浩大。建炎元年和2年，正是斗争极度高涨的期间。

河东、河北、京东、京西身受踞杀掠夺的痛苦，人人“怀冤负痛，戚愤激切”，因此，“慷慨之气，直欲吞此强敌”。在这时候，任何人能够抗金，就会受到群众的拥护，李纲、宗泽、张所就是突出的例子。反之，人民对东京城破时为敌奔走的官僚，指为国贼（见上文），可见人民反对是非是分得很清楚的。高宗即位后，不进驻东京，军民都愤恨议论。宗澤在这年7月中上的回銮表说得好：“臣窃闻将士籍籍，皆愿陛下回京师，云京师是众兵驻劄之本根也；商旅籍籍，皆愿陛下回京师，云京师是天下贾版之要区也；农民籍籍，皆愿陛下回京师，云京师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怀忠义者籍籍，皆愿陛下回京师，云京师是陛下朝宗之域也。”由此可见，只有不忠不义的士大夫畏敌如虎，望风而逃，迎敌而

拜。民心士气，如此激昂，武装的抗金斗争自然蓬勃地到处展开了。

农民自发的抗金武装红巾军在河东崛起了。他们到处攻击城邑，旗帜上都用建炎年号。在实际斗争中，他们认识到金兵并没有什么特别可怕之处，因此作战更勇。红巾军曾在泽潞之间（山西晋城长治一带）袭击宗翰大营，差一点捉住了这个元帅。金人竭力搜捉红巾，而真红巾不可得，只是屠杀平民，于是人民参加义军呐口益增加。这种头裹红巾的农民武装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建炎2年，河北各地到处都有红巾了。

张所用王彦做都统制。王彦是小军官山身，竹在种师道部下保卫西北边疆有功，奸读兵书，善于骑射，很有才气。这时他自求抗金，率岳飞等7千人渡河，进驻新乡，号令各地。金人以为宋大军前来，发兵数万人围攻王彦。这枝新军人数既少，装备又坏，只得突围杀出，大半都被冲散。王彦与部下数十人杀山出重围，收集散亡，屯兵太行山。这时情况很紧张，士兵们为表示决心，自动在睑上刺“赤心报阔，誓杀金贼”八字，于是著名的八字军出现了。王彦收集散亡的部众时，只有700多人，后来逐渐吸收两河忠义民兵傅选、孟穗、刘泽、焦文通等部，在太行山地中，建立连系数百里的山寨，形成了敌后的一支强大武装力量。岳飞在突围后与王彦有些意兑，一度自成一军，但是势力孤单，效不成什么事业。他后来虽向王彦谢罪，然两人终于不能合作。不久，岳飞便投宗泽去了。王彦为了与宗泽商议，率领1万余人渡河剑东京。这支人马就留在河南守卫沿河据点。这是八字军在河南活动的开始。

红巾、八字两军以外，两河各地还有无数义军。马扩领导的五马山（在河北赞皇）山寨是很朽名的。金军发动侵宋战争之初，马扩到到真定招募兵士，和地方官刘、刘子羽父子意见不合，被他们监禁起来。真定失守时，他从监狱中跑出来，就上山组织民众抗战。后来战败被俘，宗望想软化他，准他开酒店过活。他利用这机会，结识往来人士，与五马山山寨首领旧官员赵邦杰通消息。继炎2年（1128）初，他终于逃入山寨。这时宗室信赵榛（赵构弟）逃在民间，马扩访得消息，把他迎到五马山，请他总制诸山寨。两河遗民知道了，异常兴奋，闻风响应，愿意受他指挥的有救十万人。

其他以一城一地进行局部的斗争的，更不计其数。宗室赵士珸在北迁途中逃山金营，走到武安县，坐在酒店中休息，宣布了身分，立刻纠合少壮百余人。走到磁州，不消10天，就组织了义军5000人，陆续归附的有好几万，逃兵一战，击退了围攻洺州的金军。安邑人邵兴（后改名隆）捻解州神山抗金。金将从了他的兄弟，劝地投降。他不顾一切，饮泣死战，大破敌军。两河许多城市在继续作战。河中府（山西永济）址晋西南虫镇，扼晋秦豫的冲要，守军坚持到高宗即位之后，只因南宋救兵不渡河，才终于失陷。河北重镇的河间府一直支持到建炎元年11月。中山府的防御继续到建炎2年3月，达座孤悬敌后的城市从靖康未被围，坚守3年，直到城中粮尽，兵民俄得连武器也拿不动时，方才失陷。敌人逃城后，看见这俏形，也为之叹息。

两河军民就是这样英勇顽强地保卫祖国的。

在人民的支持下，宗泽努力经营东京防御工作，把一座危城变成了铜墙鉄壁。他在建炎元年6月到东京，第二年7月中逝世，一共只有1年多一点的时间。他之所以能取得成绩，就是因为他能够依靠人民。这位老人在北宋时常因爱护人民，和上司抬杠。这时以69岁的高年做了东京留守，上疏24道，劝高宗还京，与高宗谈民心士气，为被大官僚地主所诬蔑的义军辩护。他反对和议，扣留闯到东京的金使，拒绝朝廷优待所扣使者的命令，强硬地质问：“巧；知二二三大臣，于金入情款，何如址之厚!”他劝高宗询问左右将士，便可知道士气的高涨。朝延诬蔑义军，就是“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这位70老翁（这时建炎2年了）气愤愤地出来争辩。他指出靖康之末，四方忠义之士，梯山航海，赶到京师勤王。大臣非但不加帮助，而且一概斥逐，使他们饥饿流离，不得已而为“盗贼”，这不是勤王人的过失，而是朝廷措置错误的结果。如果朝廷把勤王人叫做盗贼，那么两河山寨义军岂不要为之解体!我们应当承认：这是当时最公正的议论。

宗泽自己做的，主要就是团结人民武装的工作。濮州人王善聚众数万，号称“河东亘寇”。宗泽单骑到他营里，流着眼泪说：“国家危急的时候，有一两个象你这样的将军，如何会弄得如此!”王善受了他的戚动，立即归降。其余象号称没角牛的杨进，寿春“贼”丁进，以及王贵、王再兴等“群盗”，都受招抚。于是宗泽集结百万大军，积蓄半年存粮，在京城附近筑起许多堡垒，进一步结连两河忠义，非但河南可守，而且有进军河北的可能了。

然而高宗南迁扬州了。中原人心动摇，一部分民军首领眼昆大局瓦解，逐渐滋长个人野心，只打算攻城掠地，割据白为。金兵也乘此帆会，于建炎元年12月分兵进攻山东、河南、陕西了。

这是南宋建立以后金兵第一次的南侵。金军分为三路：宗翰统中路军攻河南；宗辅（窝里嗢、阿骨打子、世宗父）与兄弟宗弼（兀术）统东路军攻山东；娄室和撒离喝（完颜杲）统西路军攻陕西。金军的行动看起来还是很顺利。中路军在洛阳附近渡河、银术可深入京西，连破唐邓等州（河南沘源和邓县）。富庶的邓州在被搜括一空后，居民全被赶往北方。东路军深入山东，攻破青、潍等州。西路军深入陕西，连破长安凤翔等地。金兵是在横行，然而中路军进犯东京，被宗泽击退；山东陕西的两路也乃回到程度不等的打击。宋朝的抵抗力显然是增强了。

山东守军没有主帅，因此抵抗显得较弱，然而千乘一个小县城，民兵和沿兵结合起米，竟击败了宗弼。而这个宗弼正是金国日后的主帅。陕西在长安失陷后，情形混乱，东起陕州（河南陕县），西至秦州（甘肃天水），被攻陷了许多城池。在这困难的日子里，脚延经赔使王庶毅然出来号召抵抗。王庶是庆阳（甘肃庆阳）人，1106年中进士后在泾州当个县宫，受种师道推荐才逐渐升迁。他是一个坚决的抗战派，当时响应号召而起的义兵不下十多支。金兵望见了渭河南岸满野的义兵，竟不

敢渡河。可惜陕西众将多数不听王庶号令，拥兵观望，使敌兵能够从容撤退到黄河边上。王庶号召众将迫击，他们也不出兵。泾原统制曲端是西北有名的将领，手下兵马极为精锐，但是他不愿受王庶指挥，采取了消极态度，使陕西的抗战事业受到很大的损失。

跟这些将军们相反，在新起的义军中间，却出现了一个对抗金有相当贡献的李彦仙。李彦仙本来叫李孝忠，住在西北宋夏边境上的巩州（甘肃陇西），武艺很精，常常出外考察山川大势，有机会使袭取西夏人放牧的马匹。靖康元年，参加勤王兵，当个小军官。大官僚们陷害李纲、派他到河北顿兵，孝忠上书反对。一个小军官敢对国家人事发表意见正当时是犯法的。因此朝廷下令拿问。他就逃走山去，改名彦仙，再去投军，这时在当一个小小的石壕尉。陕州失守后，他便闭结军民，起来抗战。他先用埋伏计，杀败敌人，分兵攻下据点多处，乘胜收复陕州。这时是建炎2年3月。他进一步渡过黄河，在晋南的中条山建立营寨。许多志士都闻名前来归附，他们中间有上文所讲的邵隆，有聚众数百起来保卫家乡的龙门人邵云，有做过和尚又从军杭金的吕圆登。这些人都成为李彦仙亲密的战友。这一枝异界军突起的武装部队插在晋、秦、豫之间，对侵略者形成了极大的成胁。此外，洛阳大陷后，统制翟进领兵上山，扼险防守，屡次袭击金兵，也不失为一个爱国的将领。

金军主帅宗翰渡河后，屯兵洛阳，和宗泽相持。从12月到2月，交战多次，金人始终占不到便宜。正月里，金军进袭东京，宗泽下令照旧张灯，庆祝元宵，来解除居民的恐慌，一面发兵迎击，打退来犯的敌人。2月中，部将王宣在滑州又大破金军，从此打消了敌人进犯东京的企图。不久，各路金军纷纷撤退，基本上结束了这次攻势。

这时，两河州郡虽因苦战太久，陆续沦陷，然而各处山寨，声势正盛；东京已经变成坚强的堡垒；从山东到陕西，新生的抗敌力量正在成长。人氏在实际斗争中消除了战争初起时的恐惧心理，发现了敌人的弱点。有人作了一篇劝勇文，说敌人有王呈易杀：连年战争辛苦易杀，马倒便不起杀，深入重地力孤易杀，多带金银易杀，作虚声吓人易杀。这是人民群众在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因此，虽则在敌兵初退的时候，却不失为趁势大举反攻的机会。宗泽号召众将，使他们准备渡河；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抓到了俘虏，如果是契丹人或汉人，既问他们谈杭金的道理，谈通了、放回去，进行瓦解敌人后方的工作；他又派人联介两河山寨，准备利用炎夏敌人马瘦的时候，大举兴兵。王彦与他会商，也准备以八字军进攻太原。五马山的信王榛派马扩经开封南下，到扬州见高宗，要求始河东河北兵马元帅印，子进一步发动敌后的战争。马扩在敌后经过许多山寨，他都去求见山寨的首领，说明南下用意，并要求他们的合作。这些首领都表示欢迎。他渡黄河，就是他们派船送的。从大河南北这样的俯形，宋朝政府如肯大举反攻，必叮获得巨大的胜利这是可以断言的。

三 南宋朝廷出卖了北方的抗金斗争

流亡在扬州的南宋朝廷始终仇视人民，把义军看做盗贼，把抗战领袖看做野心家。他们不但不支持北方的抗金斗争，反而加以破坏，使英勇的北方军民从孤立苦撑逐渐走向失败。毫无疑问，南宋朝廷在实质是出卖了北方的抗战。

宗泽从初到东京时起，就因为扣留金图使者，受到大官僚地主们的攻击。他上疏谈恢复的策略，被黄潜善、汪伯彦当傲发狂。他驳斥“遂假勤壬之名：公为聚寇之患”的谬论，朝廷置之不理。他准备大举渡河，连绩上疏要求高宗回京。朝廷不但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怀疑他有其他作用，派郭仲苟做副留守去监视他。这位抗战老将限见事与愿违，气愤成病，背上生疽，琶于建炎2年7月中逝世了。他病重的时候，将领杨进等到卧室内探病，他还鼓励众将道：“只要你们能歼灭强敌，我虽死无恨。”将领们听了，都感动流泪。他逝世前，对家事一句都不问，只是念唐朝爱国诗人社甫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汨满襟。”快断气了，他还连喊三声“过河”!他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武装的信任，是处极可钦佩的。东京人民听得他逝世的泊息，号哭不绝。太学生1000余人写了祭文哭他。他的儿子宗须在军中受到兵士爱戴，东京人士就请求用他继任。宗爷爷的威信确实高极了。

南宋朝廷既然不信任宗泽，不信任义军，又如何肯用宗颖呢!子继父职，不要变成拥兵割据的藩镇吗？于是“酷而无谋”的杜充前来做东京留守了。

杜充到东京后，一切措施叠与宗泽相反。义军首领们失望，纷纷散去。宗颖和他争执几番，都没有效果，最后恨恨地离开了东京。杜充非但不团结众将，甚至因为统制官张用兵势很盛，而出兵袭击。百万义军瓦解了，东京也不再可守了。不久，杜充也弃城南下。东京粮运不通，人口散亡，变成一座被人抛弃的危城，最后终于被敌人所得。

八字军首领王彦在东京与宗泽商议进取的方略，情绪很高。宗泽死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他赶到扬州，见黄潜善、汪伯彦，竭力反对和议，请求利用两河人心，大举北伐。他的话说得异常愤激，因而受到降职的处分。从此以后，南下的八字军划归御营，留在河北的没有人领导，逐渐瓦解了。

五马山的山寨，也在这时候失败了。建炎2年4月，马扩到场州，把信王的奏疏交给高宗。南渡君臣害怕信王团结北方抗金军民，形成与高宗对抗的势力，根本不愿意支援五马山义军。他们想硬说信王是假的，但是亲笔文件逼得高宗无法否认，只得口头上宣布封信王做河外兵马都元帅，发缓兵，给器械，准许马扩过河后便宜行事；一面设法破坏，给马扩一些乌合之众，密令将官们监视他的行动。马扩北上后，又受到听各路帅臣节制的命令，把原来的诺言完全取消。马扩儿形势垒变，到了大名，就无法前进了。5月里，谣传信王将渡河到东京，扬州小朝廷因此大起恐慌，一面下诏准备回京，一面禁止信王部下过问。宋朝决心不支援信王；金国却恐怕马扩引兵北上，和义军合势，发大军围攻五马

山。这年秋天，山寨因被敌人截断水源，无法支持而陷落，信王失踪，这一个河北抗金的中心就此泊灭了。不久，马扩也兵败南迟了。

在这种形势之下，两河和山东陕西街未失陷的各城，孤立无援，纷纷陷落了。金兵歇过了炎暑，又得了宗泽的死讯，才决计用兵。金太宗表示：康王走到那里，就打到那里。可见这一遭金国有一举灭宋的意图。这是南宋建立后企兵第二次的南侵，金军的主帅仍是宗翰，陕西方面的指挥官仍是娄室。

这一次与上次时间上相隔虽近，形势却大不相同。金兵长驱直入，虽则各地军民与爱困官吏誓死抵抗，有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他们是被南来政府抛弃不顾的，孤立的斗争终于挽回不了大局。

在陕西，王庶虽得到了节制各路军马的名义，其实号令不行，金人看准这弱点，便进攻他管辖的延安一带。王庶连下文书催曲端去救，曲端自称“直捣巢穴，攻其必救”，收复了两座并无金兵防守的城池。王庶要收拾散亡，亲自去救，走到半途，延安已失。王庶不得已，前去投奔曲端。曲端却把失延安的罪加在他的身上，将节制使的印夺去。

金兵破了延安，又去攻打晋宁军（陕西葭县）。晋宁军在陕北的黄河边上，正在晋陕之间，是一个重要据点。知军事徐徽言是西安人，兼通文武。1108年，朝廷求材武之士，徽言被人推荐，徽宗赐他武举绝偷及第。以后，他在西北保卫边境，颇有战功。从太原失陷时起，他便在晋宁军准备战守。他知道河东沦陷各地的居民不愿从金，秘密派人联络地主武装，应允成功后保举他们做守长，世袭职位。这个办法大有恢复魏晋时“堡坞”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的意味，但无论如何，徐徽言总是为着抗金，这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南宋政府没有批准他的计划，一直搁着。金兵却认定他是一个强敌，于建炎2年（1128）11月前去攻打了。陕西降将折可求是他的亲戚，被金人派到城下招降。徐徽言张弓搭箭，大骂道：“你对国家无情，我对你还有什么情谊可说!”一箭射伤了这个汉奸。他派善于游水的人偷渡黄河，招募逃亡在山谷中的河东人民数万人，结了木排过河，与金兵在黄河边上苦战，杀伤了很多敌人。由于依靠了人民的力量，这座塞上孤城一直坚守到建炎3年（1120）2月。在晋宁军保卫战的最后阶段中，城中水源断绝，既饿且渴、多半伤病的军民，拿了断枪折刀，依旧死战。城将破时，徽言下令，焚毁炮帆等防守器械，不让它们落入敌手。金人进了城，他还率兵巷战，被俘后坚决拒绝诱降，把金人送上的酒杯向敌帅劈面掷去，最后英勇就义。这时候，扬州已沦陷、高宗已经逃亡过江了。

在中原，许多地方的军民也传下了许多光辉事迹。

河北冀州（冀县）弧悬在金兵后方，将官李政领导守城，纪律严明，有时出兵袭击金苗，得了战利品，就赏给士兵，自己一点都不要。有一次金兵攻城很急，少数敌兵上了城，在门楼上放起火来。数十名勇敢的士兵在李政的激励下，用湿毡裹了身体，挺着器械，从火焰中冲杀

过去；击退了这次进攻。9月里，金人买通汉奸，暗害李政，攻陷了这座城市。

馍州（山东濮县）是一个小郡，宗翰亲自颁兵来攻。将官姚端出共不意，乘夜劫营，杀入中军，吓得宗翰赤足逃走。这个小郡抵抗了酝天，才被攻破，姚端预敢死队突团走脱。

大名府是宋朝北京，是河南的屏障。提点刑狱郭永反对大部分官只投降或逃跑的主张，亲自率兵守城。金兵用发行帆抛射断碑残础，猛攻破城。郭永被俘后骂敌被杀，被俘的大名人见了都流泪，遗尸也为城中人自动收块。对于抗敌卫国的英雄，人民永远是尊敬爱护的。

英勇的抗战事迹是说不完的，更多的事迹被埋没了。许多英勇军民的斗争在文献中只有片言只语的流传，如济南的关胜便是一个例子。建炎，2年初，刘豫奉命知济南府。刘豫因山东局势紧张，想换江南一郡，执政不肯。他心中怀恨，就存着投敌之心。这时济南是国防要冲，朝廷却派了这个懦夫去做守臣。12月，金兵来攻，刘豫想要投降；善用大刀的守将关胜却屡次出战。刘豫只得先假意抵抗一下，寻个机会，暗害了关胜，然后开门投降。关胜这位英雄人物被暗害了，连他的事迹也被埋没了。

这无数英勇的军民不论死于敌人之手，或死于汉奸之子，实际上都是被南渡君臣所出卖的。当人民在中国北部的土地上抛头颇、洒热血的时候，高宗和黄潜善、汪伯产等，正在扬州粉饰太平，醉生梦死，派遣求和的使者，诬蔑抗敌的义军。东京留守杜充正在汴梁攻山民军，削弱抗战力量，使金兵得以毫无顾虑地攻陷山东各地，长驱南下。个别抗战的将颁，如上节所讲的翟进，他—面在洛阳附近和金人夹河交战；一面却把脱离杜充的杨进当作国家大患，发兵攻击，自相抵销抗战力量。这是地主阶级一贯的作法，不足为怪。翟进结果死于内战，兄长翟兴收拾部队，在京西山地中继续抗战。离开东京的各枝民军在中原各地自由流动，为了吃饭，不免攻城掠地。他们失去了领导，不再能团结起来，组织整顿，成为正规军队；反之，在自由的流动作战中，若干首领发展成为流氓军阀，对社会起破坏作用。这个恶果，论它的究竟，也是南渡君臣所造成的。

中国北部的抗金斗争低落下来了，金兵长驱南下，南宋政权又面临崩溃的危机了。

四 人民挽救了南宋朝廷

高宗当年在河北，要到金营求和，这明明是自投虎口，如果没有磁州百姓和宗泽，他早已做了俘虏，那里谈得到什么中兴!这个明明是得力于人民而能苟延残喘的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偏最怕人民；受了金人无限的压迫，偏对敌国作毫无根据的幻想。要讲个人恩怨，高宗眼睁睁地看着包括母亲妻子在内的全部皇族、被掳到北方去做俘虏，真正可说是血

海深仇。然而大官僚地主和他们的首领皇帝最重视的是保持剥削农民的特权，只要这个保得牢，尽不妨傲小朝廷、儿皇帝。由皇帝本人看，特别要防止任何可能取而代之的人物的出现。根据这原则，南渡君臣不愿意看见人民在抗金斗争中抬头，更不愿意看见任何有威望的抗金颁袖的存在。最后剩下来的一条路就只有割地求和了。

在建炎年间（1127～1230），割地求和还是南宋主观的空想。金入侵入中原不久，每次兴兵，掠夺所得都极可视。各地白发的抗战虽纷他们一些钉子碰，但都没有碰到头破血流的程度，教训还不够滦刻。南宋政擦的步步退让却使得女翼贵族日益狂妄白大，侵略野心越来越高涨。建炎3年春天，完颜宗翰乘上年秋冬下太行山、横行河北山东的声势，狠狠地进犯扬州了。

这支金军转战几个月，表面上很强有力，实则已经成为“强弩飘风之末”，是可以被击败的。宋朝君臣根本不相信金兵会来，对于敌人的行动，莫明其妙。宗翰亲率重兵对付淮阳（江苏邳县）的韩世忠军，分骑兵5000人，从滕县直奔扬州。兵到泗州，高宗方才得到消息，仓皇之间，只有逃跑过江的一法。建炎3年（1129）2月初3，金兵先锋500骑，长驱而入扬州，竟没有人加以抵抗。公私船只挤满在运河里，无法通行，所有财富，垒被金人夺去。军民逃出扬州，自和践踏，已经死了许多人。金人迫到瓜州江边，来不及渡江的难民十余万人，大半死在江中，留得性命的都被金人掳去，丢下的金帛珠玉在江边堆积如山。留在扬州的人被杀被掳之后，只剩下几千人。垒城建筑物都被焚毁，几乎化为废墟。这一番灾难是应当山统治者负全部责任的。当时人都怨恨执政，司农卿黄锷逃到江边，军土们当他是黄潜善，驾道：“误国害民都足你的罪过!”他来不及分辨，头已落地。军士们虽则杀错了一个人，所判断的是非却是正确的。他们受时代限制，对高宗仅限于不满。卫士们在护卫高宗逃走出坡时，不冤口出怨言，高宗竞亲手杀死1人。卫士的冤死，叉一次证明高宗行径的可耻。

高宗过江后，逃往临安。淮北的韩世忠敌不过宗翰大军，退到沫阳，部队溃散。世忠自己从海遇收兵南下，部下将倾李彦先等纷纷在沿海和淮南各地收兵聚众。少数将领和所谓“群盗”也在江北大事活动。金兵孤军深入，不能久留，掠夺一番以后，就向北撤退了。

尚宗过江以后，不能不罢免黄、汪两人。接着，扈从高宗到临安的军队队不满朝廷的措施，将颁苗傅、刘正彦2人领导一次暴动，强迫高宗退位，立他的不满3岁的儿子做皇帝。大臣吕颐浩、张浚等领着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将颁鏌压了暴动，杀死苗、刘2人。高宗才能恢复帝位。

新进的大臣张浚是一个坚决主张抗金的官真，他在建炎3年受命知枢密院事时，只有33岁，从寇准以后，宋朝不会有这样年轻的执政。他原籍汉州绌竹，中过进土，建炎初年受黄潜善的提拔，在黄的指侠下攻击过李纲。后来因为喜欢讲主战的话，为黄潜善所不喜。他认为中兴事

业必须先经营川陕，如果金兵得了先着，下陕取川，东南就难保守。高宗接受他的意见，任命他做川陕宜抚处置使。重视西北防务，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然而高宗不接受张浚进驻武昌的建议，述建康也不敢住，仍旧躲在临安。杜充自动放弃东京，却被任命做建康留守，负扭江防重任。朝廷议论，只害怕江北“群盗”过江，对金仍想求和，这年8月里所发求和书信，竟说：“今以守则无人，似奔则无地，此所以谵謥謥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已!”他请求削去皇帝名义，只保持一个南方藩蜀国家的地位。这在实陈上就是说：只要允许他和大官僚地主们保持剥削南方农民的特权，其余一切都可以服从。

女真贵族侵略的气焰正高，那里肯考虑这种办法。10月里，金国大量征发北方人民当兵，使宗弼傲统帅，大举南犯。兀术掌握兵权，这是第一次。南宋建立以后，金兵南侵，这是第三次了。一连三年，秋冬南下，春暖后退兵歇夏，成了规律。

宗弼知道高宗在临安，隆裕太后（哲宗废后，靖康时因皇族名册中没有她的姓名，不会掳去）在洪州（江西南昌），就分兵两路：一路从和州附近渡江打江浙，一路从黄州附近渡江打江西两湖。当时金国大体上统治了河北山东；河南与淮南北的情况非常复杂。东京满目荒凉，人口稀少，但是还有个权京城留守上官悟；翟兴乘虚收复了西京；李彦仙、邵兴等以陕州为中心，形成了一支相当强的力量。淮南北打着宋朝旗号的地方不在少数。徐州人赵立在本地做武卫都虞候。上一次金兵南下，打破过徐州。赵立在战时受伤昏倒，醒后到乡间起兵，于3月间截击北退的金军，夺获大批战利品，收复了徐州。承州（江苏高邮）有出身“群盗”的薛庆，聚众数万人，已受南宋招安。山东梁山泊渔民张荣，在泊子里枣了几百条船，袭击金兵，军中唤他张敌万。杜充曾和他联系，给以官爵。金兵攻陷扬州时，他引船队南下，驻在鼍潭湖里，有兵1万多人。济南人邵青，做过艄公，也做过“水贼”，聚众在楚州、泗州一带的水上活动，受杜充招安，做了水军统制。以上只是几个例子，其余分散的武装集团还有许多。宋朝官军在河南两淮经常和流动的武装集团进行混战。金兵这次从山东而来，直奔长江，这些部队便都处于故人的后方了。

南宋主持江防的大官，建康（南京）是杜充，江州（江西九江）是刘光世Oo社充平日里只是杀人，刘光世只爱置洒高会，都不把国防当正经事看待。10月26日，黄州的金兵寻得一些小船，又拆了民历，编成木诽，就这样渡江了。等到刘光世知道，金军已经过近江州，这个大将只有逃走一条妙计了。隆裕太后得报，匆匆逃亡，在吉州险些被金兵追着，卫兵全部溃散，弄得狙狈不堪。这支金兵深入江西、两湖，到处烧杀掠夺，再加上溃散的官军的骚扰，人民受到了极大的灾害。宗弼的主力，于11月21日在和州附近的马家渡渡江，也没有受到丝毫抵抗。杜充第一步阀门不出，第二步是逃到江北，第三步就投降了。这位大宫平日杀人太多，一旦逃亡，很多人想乘机报仇；于是他就靠女真侵略军来保护自己了。

11月29日，金兵攻陷了建康，从广德、发言直取临安。12月15日，就打破了临安。赵构逃到明州（浙江宁波），跳上海船，才不曾做俘虏。金兵到处烧杀掳掠。他们攻下明州，拽山检海，连平日人迹不到的地方，都去搜索杀掠，最后一把火，烧得全城只剩下几个佛寺。建炎4年（1130）2月，宗弼退还临安，一把火烧了三天三夜，然后带了全部赃物，沿着运河，水陆并进。兵到平江（苏州），大官周望、郭仲威弃城逃走，于是这座城高池滦兵甲充足的城市轻易地落入了敌手。金兵抢了金帛子女以后，又是照例放一把火，直烧得百余里外都望得见烟，5天后方才熄灭。建康也被大烧大抢，化为废墟。东南各大城从中唐以后日渐繁荣，三、四百年没有遭遇过重大的兵灾，只到此时，才受到重大损失。金围侵略军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南宋政府祸国纵敌，也应负相当责任的。

皇帝飘零在大海上，南宋政杖在实际上已经瓦解了。人民对逃跑主义表示了强烈的恰恨。杜充将逃时，建康市民叫吵："杜相公冤枉杀了多少人，今天倒要先逃吗!"周望逃出苏州时，市民骂不绝口。高宗决计航海，规定卫士每人只准带家蜀两口，卫士们都说："我们有父母，有妻子，带谁好呢!"他们拦住宰相吕颐浩，反对逃跑。残忍的统治者先由皇帝出面，用欺骗手段缓和了局势，最后用阴谋杀害带头的卫土，镇压了反抗。

人民也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团结在任何愿意饭导抗战的人物的周围，顽强不屈地打击了仗略军。就是这些斗争才阻止了南宋政权的彻底崩溃，使金人不能肆无忌惮地立刻征服全中国。

一个在江西逃难的官员码秽亲眼看见乡村居民内动抗敌、常能得胜。他激动起来，写信劝刘光世伏兵掩杀，使敌人匹马不还。这个懦夫却不肯听。建吕军（江西南城）的大官都跑了，军民推一个小军官蔡延世领导守城。他们杀了前来招降的金人，击退了来犯的金军。东南人民也纷纷起来迎战。余杭县尉阳汝为与和尚梵仁起并兵自卫。临安的一个小小的县舍朱跸率颐民兵英勇地迎击完颜宗弼。权府事（代理知府）刘诲想投降，立即被军民所杀。余姚知县李颖士和把隘官陈彦率民兵数千抵抗，敌军不知地势，又不知兵有多少，竟因而一天一夜停兵不进。这些是各地自发的小规模抵抗的片断记载。

少数将颐和他们部下的士兵群众坚持抵抗，也使金军吃到不少苦头。杜充逃跑后，军队溃散，统制官岳飞率兵二三千人，在广德、常州一带，屡次袭击敌军。这位忠勇的将军在杜充放弃东京时，就竭力反对过，现在已经退到了江南，只有自动起来保卫国土的一条路可走了。在兵荒马乱的时候，军队的给养很难解决，他和部下宁可忍着饥饿，不肯扰害农民厶这支小小的部队已经开始放出日后的强大的岳家军的光芒了。过去曾在京西淮北抗击过金人的韩世忠军也在实际斗争中逐渐坚强起来了。韩世忠是延安人，很有勇力，身材魁梧，少年时家境劣困，18岁投军，在西北边境与西夏人作战；勇冠三军，立过不少功劳。金兵侵宋后，他从河北转战到江南，从偏裨升到大将，这时，他年41岁，率领

了8000兵士，驾着大海船，在镇江扼住宗弼退兵的道路。黄天荡的大战，韩世忠的妻子梁夫人亲自打着战鼓，指挥部队。宋军仗着海船高大，使壮士拿着带有大钩的鉄索，敌船靠近，一钩搭住，就把它拖宋俘获。宗弼想纳贿买路，被韩世忠坚决拒绝。同时，建康附近牛头山的金军，被岳飞两次袭击，也吃了两次大亏。金援军到了长江北岸，对着江水，无法援助南岸的部队。如果不是汉奸王某教宗弼在海船没有风不能动的时候，于4月25日，用火箭射击的计策，金兵是无法渡江的。韩世忠虽则终于败了，然而8000人抗击10万大军达到48天之久，使金人深知渡江南犯不是轻易可以尝试的，不失为一大功。

建炎4年的夏天，金兵退过长江了，西路金兵也从湖北向北撤退了。江南军民的抵抗起了阻击的作用，长江以北各地的抵抗起了牵制的作用，这是金兵深入之后不能不迟的原因。金军初退时，还留在淮南，只由于长江以北军民继续的抵抗和张浚在陕西发动了攻势，才使他们终于在绍兴元年（1131）渡淮而去。

在中原牵制敌人的力量以李彦仙和翟兴两军为主。金人认定李彦仙是劲敌，认定陕州是他们进攻陕西、四川的障碍。建炎3年12月，陕西诸路都统娄室带大军围攻陕州。一直相持到4年正月，城中粮尽，将士仍旧拚命抵抗，拒绝任何劝降的引诱。娄室在最后一次的攻击中，用极残酷的方法，强迫兵士进攻。他下令每打一下鼓，前进一步。渡过城壕之后，鼓越打越急，兵士死伤满地，却不敢回头一望。娄室就是这样大量牺牲女真兵士的生命来打下陕州的。正月14日，陕州失守，李彦仙在巷战时受伤，然而仍能改装突围。已经到黄河北岸了，他听得敌人屠杀居民的消息，恨恨地道；“我有什么面活在世上”竟投河而死，死时年仅36岁。这位将军对人民有真挚的同情心，确是一个光明俊伟的人物。部下将校邵云，吕圆登等也都英勇牺牲。这支部队扼守陕州，将近两年，大小200余战，起了很大的牵细作用。西京方面的翟兴一军在这时仍在活动，他的儿子翟琮渡河袭击晋南的敌人，联络太行山的义士，对敌人也是个不小的威胁。

淮南军民的抵抗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上述的赵立、薛庆、张荣等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

赵立于宗弼南下时，因徐州缺浪，敌人又滦入南方，就引兵到楚州（江苏淮安）。这条路并不好走，沿路金兵不少，他且战且走，连打7次胜仗，才能带几千人进入楚州。这时薛庆驻兵承州，张荣水寨也在附近。此外还有其他的武装部队，如李彦先是韩世忠旧邯，沭阳兵溃后，他在海上聚众，有水军数千人，在海上种淮河下游活动。这些部队合起来，力量不弱，加以宋兵也乘金军撤退的机会，进驻扬州，要跟金军一战，兵力是有条件的。

然而这些部队问的关系并不是很好的。薛庆是从人民中蝴起的人物，在承州竭力减轻人民负扭，本部人马除衣食以外，不关饷银，对驻承州的官军则照例发饷。他袭击金人，得到几百头牛，全部发给农民。

他和他的部下既善于战斗，又受人民拥护。他与张荣联络，关系很好。赵立对抗金非常坚决，杀死为金人游说的几个老朋友，讲起金人就咬牙切齿。但是他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认为张荣是“贼”，经常和他磨擦。因此这座孤城与附近的乡村对立起来，收不到赋税，城中粮食异常缺少。金兵来攻，赵立坚决迎击，曾打破完颜昌（挞赖）和宗弼的部队。金兵退了，他却引兵去打张荣、抢夺粮食。这样做法的结果是刚弱了抗战力量，使保卫国土的事业受到重大损失。

情况虽则如此，这些基本上各打各的抗金部队毕竟在建炎4年到绍兴元年间（1130～1131）打消了敌人继缀南犯的企图。

金兵在建炎4年5月中完全撤到江。南宋朝廷为敌人的撤退而欢喜，又为敌人可能再来而害伯，略有警报，就作解散百官、准备逃跑的打算。淮南军民面对着敌人，却坚强不屈地进行着斗争。宗弼刚到江北，就遭遇和州军民的抵抗。领导抵抗的来昌祚、郑立等是在金兵渡江南下后被地方上公推出来的首顿。他们打得很坚决，最后城破牺牲。在激战时，军士胡广发弩射中了宗弼的左臂，给他吃了点苦头。兵士们突围而出，结了水寨，继续抵抗。进士龚楫9率民兵2000，袭击敌营，歼敌数百人，解放了大批被掳的人民。这支部队撤退时，遇到敌兵主力，大半苦战牺牲。22岁的青年英雄龚楫被俘后駡不绝口，竟被残酷的敌人碎割而死。

宗弼屯兵六合，因为掠夺的物赛太多，必须走水道，打算从运河北上。楚州在运河、淮河交会的地方，是在所必争的据点。金兵便在8月里大举进攻楚州。这时陕西军情紧张，金国兵力不足，飞调宗弼前往。淮南只留下左监军完颜吕一军，兵力打了折扣，然与无论那一支宋军比较，还是处于优势的。

从8月到9月，金军围攻楚州40多天。宋军扬州守将郭仲威，就是放弃平江府逃跑的家伙，他那里敢去援助赵立。薛庆亲到扬州，劝他出兵，见他只顾宴会作乐，根本不想打仗。这位忠勇的将军怒道：“如今哪里是吃酒的日子？我做先锋，你跟我来。”他手下所带骑兵，不满百人，毅然出了扬州，遇见敌军，交战一阵，郭冲威却不发援兵。薛庆兵少，要回扬州，郭仲威又不肯开城门。薛庆因此被敌兵俘获杀死。金兵乘机打破了承州。楚州孤立，形势更加紧张了。

楚州城里，被阐的日子一长，军民便靠树皮草根果腹了。赵立鼓励士兵尽力作战，看儿畏惧退却的懦夫，常常亲手当场斩首，自己也亲自上阵杀敌。他的家属都死在徐州，单身到楚州，山直保持着朴素的生活。对于抗金，他的确是坚决的；只是他对农民武装很敌视夕被围前不久还出兵攻击张荣，削弱了抗金力量。九月中，他在城上督战，中炮而死（被发石机掷出的石块打中）。他死后，部下还抵抗了好几天，到9月25日才失守。城破时，将士还进行了激烈的巷战。金兵虽则得胜，损失却极重大。李彦先在楚州危急时，引水兵来救，后来也被金人打败，死在淮河里。

淮南的抗金部队迭遭损失。郭仲威放弃扬州，又做了一次迤将军。被派做通泰镇抚使的岳飞兵力薄弱，在江北立脚不牢，也在11月中撤退了。完颜昌的眼中钉只有一个张荣了。他乘天冷水浅的机会，打破褴沼湖水寨。张荣退到通泰一带，在缔头湖里再建水寨。绍兴元年（1131）3月，完颜昌引兵来攻，被强荣打败。完颜昌只带2000人趋回楚州。这是淮南抗战的一次大胜。金军遭遇了这次挫败，才放弃淮南，向北撤退。不屈的人民毕竟保障了躲在江浙的南宋朝廷的安全。

五 富平战役

争陕西在战略上有极大的意义。建炎2年夏秋间金国商议用兵次序，宗翰会经主张先取陕西，他的意思不但在宋，还有进一步兼并西夏的企图。宋朝方面，张浚竭力主张经营关中，已见上文。的确，陕西退可以屏障四，川，进也便于反攻中原，而且宋代精兵猛将，大多出在这个地区，所以是非争不可的。

建炎3年（1129），张浚入陕，他的雄心很大，要大有一番阼为。他很注意收罗人才，请刘于羽参议军事，以王彦做前军统制，因曲端有威名，拜他做成武大将军宜州观察使都统制。刘子羽曾随父亲刘饴守真定，后来被召到东京。京城失守时，刘殉国。南宋建立后，子澜就主张：天下兵势应以秦陇为根本。他确是有才略、有胆气的人物，主张也和张浚相合。王彦是八字军名将，八字军划归御营后，曾受范琼指挥。范琼是卖国贼，也是害民贼，从中原颁兵到江南，不敢打金人，只会害百姓，又不听从朝廷命令。张浚建议把他杀死，高宗许可。他死后，八字军才还给王彦。这支部队跟张浚到了汉中，驻在金、均、房等州（陕西安康，湖北均县、厉县），扼守中原与川陕的接合部分。至于曲端，是陕西有名的实力派，张浚要倚重他，也有道理。

张浚在10月里到兴元（陕两南郑），正是金兵开始大举南侵购时候，陕西都统娄室也引兵打破长安，又往东围攻陕州的李彦仙。金兵决心要先拔掉这个钉子，然后全力往西，取陕西，下四川。张浚派人送搞军金币到陕州，写信给彦仙，劝他放弃城池，扼守山险。彦仙没有接受，只请求派骑兵帮助突围。张浚不赞成这办法，但是仍令曲端出兵去救夕曲端却毫无出兵的意思。张浚要自己引兵前去，长安在敌人手中，道路不通。这样一耽搁，陕州就被打破了。娄室和撒离喝长驱进陕西。建炎4年（1130）3月，曲端派部下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吴玠在彭原店击败金兵。陕西宋朝正规军在野战中得胜，到达时为止，还是很少见的。企兵败了一阵，再来反扑，宋兵毕竟又退却了。曲端先领大兵在宜禄（陕丙长武），号称接应，看儿兵败，便退到泾州（甘肃泾川），把兵败的原因，说成是吴玠违反命令，降他的官职。

当时正是金兵深入江南的时候，张浚整顿兵马，准备东下勤王，走到房州，知金兵已退到江北，才还到汉中，理会西北的军事。张浚与高宗分手的时候，本有3年以后进取的约定。从一个战场的情况看，确实需要时间来经营筹划，轻易动手不得。然而整个的大局危急已极，春暖

迟兵，秋冬再来，眼看金兵有再侵东南的可能。上一次，高宗逃到海上，勉强脱身，再来一次，南方偏安的局面大概就得完结。因此张浚决心不顾西北本身的条件，大举反攻，来分金国的兵势。8月13日，他命吴玠进兵收复长安，发檄文到金国问罪。

张浚的主张大为部下所反对。曲端高唱10年以后才能一战的谬论。吴玠也主张据守山险，此校稳妥。刘子羽也说：“相公不记临行天语乎？”把三年之约来提醒他。张浚为了应援东南，不听这些意见，对刘子羽道：“事有不可拘者，假如万一有前日海道之行，变生不测，吾侪虽欲复归陕西，号令诸将，其可得乎广。”

张浚要贯彻抗金的主张，便不能不对付手握兵权而对抗金一贯抱消极怠工态度的曲端。他下令解除睫曲端的兵杖，召集仅永兴军经略使吴玠、环庆经略使赵哲、熙河经略使刘锡、秦凤经略使孙渥、泾原经赂使刘纺五路人马，合兵40万（一作20万），马7万匹，任命刘锡傲都统制，大举反攻。从宋金战争开始以来，宋军以堂堂正正之阵，发动攻势，这是破题儿的第一遭。

金国娄室在陕西连年作战，打破过许多州县，但是这些州县不久又归附宋朝了。宗翰在政府里建议：陕西宋兵强劲，应当增加兵力，调宗弼前往。这建议起初没有受到多数人的拥护。等到张浚集结军队，金国才不得不飞调宗弼前去。不论陕西的胜败如何，这一个调动的本身，便是张浚所企求的。江浙的危机减轻了。

建炎4年（1130）9月24日，富平之战爆发了。

当时张浚亲驻邠州督战。诸路农民运送粮草到前方去的。接连不断，到了军中，用车马掩护，结成小寨。金钱粮帛，堆积如山，人力物力都很充裕。都统制刘锡引着五路大军，进到富平（今陕西富平县，在西安的东北而），与金军遭遇。全军人数远不及宋，每次约期会战，到了期总是闭营不出，这是故作胆怯引起宋军轻敌心理的诡计。

这一着儿了效力。张浚知道了，果然以为娄室是不敢出战。前方将领中，吴玠竭力主张在高地扎营，使金军骑兵不容易发挥冲杀的威力；众将却以为我军超过敌人几倍，营寨虽在平地，好在前面有片长满苇草的沼泽，可以防御骑兵，便不听吴玠的话。

24日那天，金军宗弼在左，娄室在右，发动了攻击。娄室选3000骑兵，带了土囊，填平沼泽，打开进兵的道路。金兵首先直扑农民的小寨，使农民四散奔走，引起来营一阵混乱。尽管如此，宋军并没有立刻失败。刘锡指挥众将迎战，泾原经略使刘锜身先士：卒，从浸时到未时（辰、上午6~8时，未、下午2~4时），差不多激战了一天，还没有分出胜败。宗弼一度被宋军围困，大将韩常被箭射伤眼睛，金的左翼军形势已很危急。在这紧要关头，金右翼军竭力死战，扑攻环庆军。宋军各路人马临时集合，配合得不好，一路被攻击，其他各路不能及时援助。

经略使赵哲担怯，临阵脱逃，部下将士见主将已走，当做兵败，也跟着逃走。—路溃散，牵动大局，造成丁全军溃败的恶果。将士们都叫道：“环庆赵经略先走!”直退到邠州，情势才稳定下来。金军虽得了胜利，然也没有兵力追击，只收得了大批军实。

富平之战以宋军大败结束了。张浚追究责任，斩了赵哲，贬斥刘锡。这时各军新败，不能再战，只得下令各归本路。金兵乘势尽取关中土地。宋军败是败了，然而并非没有收获。掩护东南，这件大功，首先应该肯定。对于陕西的军队来说，富平之战是一次考验。将颁缺乏抗金信心，部队容易溃散，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在空前激烈的宋金战争中，这些腐朽的旧东西一定会在战火中烧掉，只有最坚强的人们才会因受到战火的锻炼而更加坚强起来。张浚从邢州退秦州，再迟兴州，手下只得1000多人。幕僚有主张逃往四川的，刘子羽反对道：“议者可斩也，宣抚司岜可过兴州一步!”他主张留在兴州（陕西略阳），坚持抵抗，“系关陕之望，安垒蜀之心!”张浚采纳他的主张，留在兴州。刘子羽又单骑到秦州，寻访众将。将士们本来无所依归，忽然听见刘子羽来了，又听见宣抚司在蜀口，都引兵前来。于是强浚收缩得十多万人，慰问伤病，记录过去的功劳，批评自己的过失，使大败后的人心逐渐安定下来，保住了汉中。吴蚧和他的兄弟吴璘更不愿退入汉中，收拾部队，扼守秦岭北麓大散关附近的和尚原，扭当起保障汉中四川的重大责任。这些经得起斗争考验的人们终于成为西北抗战的首领，终于守住了秦岭山地的战线。

从此以后，东起淮水、西到秦岭的战线渐渐稳定下来，南宋朝廷才脱离了经常逃亡的局面。

第三章 南宋新军的壮大与宋金军事形势的转变

一 金在北方的统治及其内部矛盾的发展

金国崛起东北，十余年间，所向无敌，一时确是强盛无比。然而征服战争的胜利，结果使女真族的内部矛盾加速发展起来，同时又激起了被征服的人民的反抗。这些矛盾的发展，使得金国在1130年以后的数年中间，表面上虽甚强大，实际上却丧失了军事上的优势地位。

据宋人记载，金朝上京会宁府（黑龙江宁安县两南）的城邑宫室，不过像中原的州县衙门；君主的威仪礼貌，也不过像州县守令。前朝门是居民出入往来的道路。拦驾告状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至于贵族中间，仅有君臣的名义，平时“携手握臂，咬头扭耳，至于同歌共舞”。所以非但贵族内部很团结，全军也不致太隔阂。特别是在对方抵抗力薄弱、战事顺利的时候，从军的人掳获很多，平民也觉得战争对自己有利益，打起仗来，都能勇往直前，容易得胜。

1130年以后，情形逐渐改变了。宗弼渡江之役是最后一次大有收获的远征。以后淮南、陕西的战斗，掳获不像从前那样丰厚了，战斗越来越艰苦了，兵力损失不小。女真族对远征日益怨恨。这种厌战心理产生得很早，吕颐浩于金兵入燕京时陷敌数月，他就了解到：金军士兵每夜嗟怨，都说跟契丹交兵10年，还要向南去，不知何日可以还军。战事顺利，掳获丰富，这种心理会被冲淡；反之就要发展。不但如此而已，金国为兵力不足，从1127年起，大量征发两河汉人从军，这些兵士根本不愿战斗，渡江一战，逃到宋军中去的有一万多人。由于这些情形，金军的士气日渐低落了。

在女真贵族的内部，由于沾染了汉族封建统治阶级的习气，由于争夺掠夺的果实，矛盾也在滋长。完颜昌征服山东，到处抢夺土地，常把山东当作他的地盘。汉奸刘豫经常送大量财帛给宗翰和大汉奸高庆裔。他们就把山东封给刘豫，使完颜昌又气又恼。金熙宗完颜亶（阿骨打嫡长孙，1135～1148年在位）幼时即学习汉文经典，吟诗写字，即位后装成中国皇帝的模样，轻易不接见贵族大臣，惹起很多人不满。女真贵族间钩心斗角的斗争日益发展，造成了很多问题，不久便出现了相互屠杀的局面。

女真族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既然有了这么许多矛盾，内部一致、上下不隔的特点便不再存在了。

汉人的反抗使金国的统治无法巩固，这是女真贵族统治区内最大的矛盾。女真贵族用严刑峻法进行统治，结果是引起了更多的反抗。

1129年，金人下令禁止人民穿汉服，强迫人民依照女真风俗剃发，违令的处死。汉奸知代州刘陶对人民逐个查验，头发式样略有不合，立

刻斩首。各地人民无故被杀的不计其数。一时布帛大贵，穷人没法改装，只得闭门不出。这是一场灾难。

由于女真族社会的落后性，金人把大量汉人转化为奴隶。1130年，宗翰令两河州县，搜捕南方籍人口，把全部客户拘留起来，在耳朵上刺官字，用铁索连锁，押到云中。这批人后来有的被卖到蒙古、西夏、高丽等地的。一时民间妻离子散，到处一片哭声，；因而自杀的很多。这又是一场灾难。人民受不了压迫和榨取，不知多少人流亡南下，不知多少人上山起兵，两河各地经济衰落，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女真贵族用严刑峻法来对付人民。宗翰用高庆裔的建议，下令盗贼脏值一钱以上都处死刑。有人在街上拾得别人遗失的钱，有人在菜园子里拔了一点葱，都被斩首。更多的人因此参加了义兵。敌人要阻止百姓逃亡，要防止义军混入统治区域。高庆裔又提出办法：禁止人民自由移动，要旅行的说明人数行李，从五家联保起，逐级上报，由州县发给番汉文字的公据，方准出门。在途中，吃饭住店，都要查验公据。每天只准走30里，不得超过。违背规定的要受重罚。于是人民因事出门，为了办理申请手续，动辄要等待十来天，而且常常需要纳贿。小商平民坐在家里，动弹不得，道路之上，冷清清的绝少人迹。在整个金国统治区内，充满着一片恐怖气象。

女真贵族自己也知道无法治理庞大的统治区域，他们明白汉族地主阶级是最好的帮手。因此，他们非但尽量任用降官降将，而且在1130年封汉奸刘豫做伪齐皇帝，统辖旧黄河以南的土地。女真贵族想用这办法缓和汉人的反抗；想用刘豫与南宋对抗，节省兵力，好集中力量稳定两河的占领区。这步骤是金国承认无力征服全中国的表示，也是用宋朝人打宋朝人的大阴谋。以后几年间，刘豫招收了一批流氓军阀李成、孔彦舟等，在中原强制签军，组成了数量很大的伪军。在淮河沿岸与宋对抗的，主要是伪齐军了。金军主力除陕西方面外，一般不进行大规模的攻势。事实证明：以女真族的力量不可能在短期间灭亡文化和经济都很发达的宋朝。连续不断的大攻势在1130年达到了顶点。不管女真贵族愿意不愿意，相持的局而在实际上是形成了。

这个相持局面是宋朝南北各地人民抗金斗争赢得的结果。没有这些抵抗运动，女真军队尽可以爱征服多少地方就征服多少地方。人民继续在斗争。这使得以后数年间的相持局面逐渐向有利于宋的方面发展。就金与伪齐的统治区域的情形来说，各地山寨的义军仍旧是不可忽视的力量。1130年，金大将韩常在真定附近被太行义士石子明打败。翟兴派亲信拿了蜡书，到河北联络义兵，愿意受他指挥的山寨有几十处之多。这些义军长期坚持，牵制敌人的兵力。1135年，河东义士张横打败金军，俘获它的首将。梁青也大破敌军，杀死都统制乌玛剌。这些零碎的记录告诉我们：北方人民一直在战斗。金人使尽一切毒计，镇压、招安、屠杀，但是他们在北方的统治仍旧不很稳定。他们要扩大侵略，为后方人民的斗争所苦，要先巩固已得的地区，人民为恢复的信心所鼓舞，一直不肯停止斗争。于是汉奸刘豫得出了结论：只有占领长江以北的全部土地，没有南顾之忧，两河才会“安定”。他们想以继续侵略的手段来稳定

自己的地位，表面上很凶猛，实际上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了。

二 绍兴初年南宋对内对外的政策

伪齐政权建立了，淮南金军撤退了，川陕战局虽很紧张，东南的情形却显然有了转饥。在绍兴4年（1134）9月以前，敌人没有向淮河方面发动过攻势。偏安的局面保得住了，南宋政权就坚决推行对金伪主和、对人民镇压的政策。

从高宗和大官僚地主们看，当时内部的情形是很危险的，而伪齐政权的建立却是金兵无意南侵的表示。他们把伪齐当做藩篱，而且因为害怕触怒金人，竟把它叫做“大齐”。北上求和的使者一批批地被派出去。绍兴3年的冬天，金使者第一次到江南，谈判虽则没有什么结果，然而无论如何，这是金国承认南宋的正式表示。高宗和大官僚地主们自然非常高兴。这几年间，义军领袖桑仲和大臣吕颐浩都提出过讨伐刘豫的建议，都因有碍和局，被搁置起来了。除非金伪军进迫太甚，否则南宋朝廷决不肯向北发一箭了。

对于内部的情形，高宗和大官僚地主们既要对付满地的“盗贼”，又要防范大臣的“跋扈”。

前面讲过，金兵窜扰大江南北的时候，南宋政权在事实上已经瓦解，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地出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武装部队。

就地区来划分，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在金兵没有窜扰到的地方出现的义军，这完全是农民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福建的范汝为起义便是一个例子。第二类是在金兵窜扰过的地方，人民自卫的武装组织。他们既反对封建地主阶级，更反对金兵的侵略，以锺相、杨么为首的洞庭湖义军是主要的代表。他们杀官吏，但当伪齐来招降时，他们便既拒绝伪齐，又主动与宋朝联系，要求抵抗侵略了。

第三类是大河南北的民间武装势力。他们之中又各有不同，有北方的许多山寨，多以军官为首领，武装了农民自保家乡，太行山一带最多这种情形。有地主豪强组织武装来抵御金人的，上文所讲徐徽言所结“汾晋土豪”便属于这一类了。又有武装的流民集团，他们或是中原义军，或是从正规军溃散叛变而来，首领多半出身将领。这种武装集团有兵士，也有老幼，从北向南流动，攻城夺地，要求解决生活问题。在长期流动作战中，他们主要有两种发展倾向。一种要求抗金，争取与宋朝合作的机会。如桑仲，是种师道部下小校出身，在京西一带聚众，发展到十多万人。他们跟宋朝官吏冲突，抢占襄阳、邓州等地，然而基本立场则是他自称的：“桑仲本王官，终当以死报国。”这支部队后来接受南宋招抚，与伪齐对抗。另外一种倾向是堕落为毫无原则的匪帮首领，投向敌国，如王善降金，李成、孔彦舟降伪齐。至于其流动或暂时割据的过程，实际倒是一种中间状态，如果不为官军剿杀消灭，在当时形势之下，最后归宿总是上面所说的两条道路。

不论他们的归宿如何，其实这种武装集团的群众都是“河北百岁忠义之民，勇悍敢战之士”。他们的首领有不少是称得上豪杰的，以后来堕落的李成而言，起初也是一个人物。他原是雄州（河北雄县）弓手，骁勇过人，立功做到知县。雄州失守后，他领导一个数万人的武装集团南下。南宋政府见他兵力太强，要分割他的部队，才引起了冲突。道士陶子思说他有割据之相，野心渐盛。南宋政府也因为这传说而非消灭他不可。建炎2年（1128）10月，刘光世在上蔡驿口桥、新息县击败李成，夺得他所用兵器。高宗看了，也称赞道：“看其刀重七斤，成能左右手轮弄两刀，所向无前。”至于其他武装流民集团的首领，更有不少传奇式的人物。上章提到的张荣、邵青，令人仿佛想见《水浒传》中的英雄。邵青于金兵渡江时，曾以一船18人与敌兵对抗。他的事迹被当时说书人当作题材，曾传到高宗的宫廷里。

对于各式各样的武装部队，南宋政府一概看成为“盗贼”，采取以镇压为主、收编为辅的政策。绍兴元年、2年（1131、1132）中，张俊、刘光世、韩世忠、岳飞等将领全力对内，解决了一部分，收编了一部分。江北、福建等地的独立武装部队基本上不存在了，如张荣、邵青受招怃，范汝为被镇压。两湖、江西问题本来最大，许多部队从北向南，流动到这方面去，此刻除洞庭湖义军外，都已消灭。岳飞杀败李成，不久，李成便投奔伪齐去了。岳飞又招安了号称张莽荡的张用和其妻子一丈青，这个张用过去曾在宗泽部下保卫东京，与岳飞原是旧相识。岳飞又深入湘南，扑灭了曹成。上文提到过的一些人，王善投敌最早，在宗弼南下时就变节了；孔彦舟受过招安，又叛变了去降伪齐。桑仲接受招抚，做了襄邓镇抚使，但仍与金房镇抚使王彦经常互相攻击。后来桑仲被部下谋杀，李横率领余部，仍在京西抗击金伪。

宋朝继续贯彻“安内”政策；把洞庭湖义军看做心腹之患，几次派兵进攻，都没有达到目的。绍兴4年（1134），张浚执政。明年，张浚亲自督领岳飞一军，进攻洞庭湖水寨。张浚、岳飞是比较不多杀人的，他们招降了黄诚、周伦、杨钦等部。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付农民起义的策略，当然不值得称赞，但是比一味屠杀的将军们总略胜一筹。他们最后攻入水寨，逼得杨么投水自杀。这是洞庭湖义军悲剧的结果。张浚、岳飞虽是抗金英雄，在这件事上总是对人民有罪的。

以当时人心要求抗金的时代里，南宋内部的阶级矛盾不是不可能缓和的。洞庭湖义军原有共同抗击金伪的要求，武装的流民集团首领不少做过宗泽的部下，有一部分受了南宋招安。但是南宋政府坚持消灭一切民间武力的政策，虽以招抚为辅，然除地在边境无法控制者（如桑仲）以外，招抚后必分散其部队，以消除“后患”。南宋政府对金国退让容忍，无所不至；对民间武力却如此坚决强硬。这是当权者坚持封建反动立场所致。

当然，这些冲突也产生了一点积极影响。上述的“河北百岁忠义之民，勇悍敢战之士”，分别被吸收到张俊、刘光世、韩世忠、岳飞等的部队中。以后金伪入侵，南宋就有了抗击的资本。这本来是在南宋初建国

时就可以做到的，只因为统治集团坚决与人民为敌，所以一定要在几度流亡，长期自相吞灭之后，才把中原义军的孑遗，化成南宋新军的主力。多少可以用来对付金人的力量白白地被浪费掉了，这是南宋统治集团的罪恶!

这个政权对于抗战军队的成长，由于害怕大臣“跋扈”，也经常采取防范的措施。第三章里提过张浚出镇川陕的事情，他领导刘子羽、吴玠、吴璘、王彦、王庶等人，虽丢了关中，毕竟守住秦岭一线，在川陕方面培养出一支强大的抗金力量。权力太大了，大官僚们就攻击他，说他想造反，说他跋扈，说他所用都是小人。有一个常同，甚至说只要杀了张浚，不必出兵，就可以恢复陕西。高宗把他召还，却没有杀他，因为他是文官，没有直属部队，召还到朝廷，就没有什么可怕了。

在南宋政府实施上述政策的几年中，金伪军实际上并没有停止过侵略行动。他们在淮河一线保持现状，在陕西和京西却发动过好几次攻势。川陕、京西的官军义军连年苦战，南宋新军中最强大的两支——吴玠、吴璘部队和岳家军，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了。

三 保卫川陕的英雄们

富平战役以后，以吴玠，吴璘兄弟为首的一支新军在陕西成长起来了。

吴玠年轻时，善于骑马射箭，读书也能通大义，参加泾原军，防守边疆，立有战功，从下级军官中逐渐升迁起来。金兵进犯陕西时，他在曲端部下。张浚到了陕西，刘子羽首先赏识他的才能，竭力推荐。张浚找他一谈，也非常赏识他。兄弟吴璘，比他小九岁，一向从他攻战。富平战时，吴玠年38岁，正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兄弟两人，败了毫不气馁，收拾了散兵几千人，扼守大散关东面的和尚原（陕西宝鸡西南35里）。有人劝他退守汉中，扼守蜀口，以安定人心。吴玠不肯，宣布他的宗旨道：“我在这里，敌人怕我从后面袭击，决不敢越此南下，这是保卫巴蜀最好的办法。”他过去做过知凤翔府，能够招抚流亡，恢复生产，人民对他很有好感。这时凤翔虽在敌手，人民知道他在近处，都在夜里运粮食接济他。敌人知道了，伏兵截杀，又用连坐法严令禁止，人民却依旧源源运粮。没有人民的支持，以富平战后后方混乱的情形看，他的部队很少获得粮食的可能，要坚持下去，是不大可能的。这支守军起初兵力既弱，又与后方不通音讯，情形很危险。吴氏兄弟和将士歃血为盟，大家感动流泪，精诚团结，一心抗敌。于是一支新军在战斗中开始出现了。

这时候，女真贵族对陕西方面的压力增加了。从绍兴元年到四年（1131～1134），金兵东守西攻，妄想进入四川、造成对长江下游的包围形势。吴氏兄弟领导将士，在人民的支持下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建立了辉煌的战绩。

绍兴元年5月13日，金将没立从凤翔，乌鲁折合从阶州、成州（甘肃武都、成县），两路进攻和尚原。吴氏兄弟鼓励将士，扼守险峻的山谷，使两路敌军无法会师。几千人打退几万骑兵，这是保卫川陕的头一个大胜仗。

这时，娄室死了，宗弼做了陕西金军的统帅。10月里，金兵十余万人，在宝鸡县架起浮桥，渡过渭河，猛攻和尚原。吴氏兄弟领导将士，选了强弓硬弩，输流发射，使箭象雨点般的密集，号称"驻队欠"，给金兵以很大的损失。他们又派兵截断敌人运粮的道路，在敌人撤退必经的地方布置了伏兵。连战3天，敌人打得精疲力尽，只得撤退，在路上遇到埋伏，直杀得大败溃退。宗弼自己身中两箭，狼狈逃去。这一仗使敌人安静了1年以上。宗弼回到燕山，新任统帅撒离喝屯兵凤翔，与吴氏兄弟对峙，却不敢进攻。

绍兴3年正月，撒离喝避开和尚原正面，主力东攻占商州（陕西商县），直取洵阳，沿汉水西上，进攻汉中的兴元府。汉水中游是王彦的防地。他的部队虽是著名的八字军，只是这几年惯用短兵器，不听刘子羽用硬弓守险要的忠告，因此被敌军所败。知兴元府刘子羽得到警报，一面派统制官田晟守住饶风关（在陕西西乡县以北160里汉水的北岸），一面派使者向吴玠求救。

这时候，吴玠驻河池（陕西凤县东），吴璘驻和尚原，互相呼应。吴玠接到了兴元使者的报告，立即出兵，一天一夜赶了300里路，只带得几千人赶到饶风关。洋州（陕西洋县）义士13000人加入他的部队，兵力才比较充裕。王彦也从西乡带了八字军前来，共同扼守汉中的大门。

吴玠为打击敌人的气焰，派人送黄柑给撒离喝道："大军远来，聊奉止渴。"撒离喝听了大吃一惊，恨恨地把手杖在地上顿着道："你来得怎么如此之快!"于是进兵猛攻。金兵身披重铠，顽强地攀登山岭，前面的死掉，后面的立刻补上。宋军弓弩乱射，再用大石滚压。苦战六天六夜，敌人的死尸堆积如山，却没法攻上山去。眼看关是守得住了，不料有个因违背军令受到责罚的偏将，投降敌人，领他们走小路，绕到饶风关后面的高地，居高临下，两面夹攻。疲劳的军队支持不住了，纷纷溃退，失掉了关隘。王彦退往达州（四川达县）吴玠退到兴州的仙人关，通知吴璘，放弃和尚原，合兵一处，筑垒防守；刘子羽退出兴元府，屯兵三泉县（陕西沔县西南70里）。四川震动，一时形势非常危急。

怎样挽救局势呢？刘子羽手下残兵不满300人，粮食不够，他和兵士都吃草根树芽。他写信给吴玠，要他一同来守四川的门户。信上说："子羽决心死在此地，与你永别了!"吴玠看了，泪流满面。部将杨政在营门口大叫道："节使不可以对不起刘待制，否则我们也丢下节使走了!"于是吴玠带兵走小路到三泉，和刘子羽见面。他对刘子羽说："关外的土地不可轻易放弃，金兵怕我截断他的后路，所以不敢深入。如果大家都退到南方，敌人步步深入，大局就要败坏了。现在让我留在敌人的

后面，敌人料定我要用奇计，设埋伏，其势非退不可。那时我出兵攻击，可以逼他逃走。这是兵法所说善败者不亡的道理。”策略就这样决定了，吴玠回到仙人关；刘子羽收拾溃兵，退到潭毒山（四川广元县北90里），筑垒防守。这山下临大江（嘉陵江上游），山上地形宽平，又有水源，是蜀口的险要。驻在四川的张浚也在同时派王庶赶到巴州（四川巴中），招抚流亡军民，巩固米仓山的防御。由于这些措施，宋军败虽败了，但是并没有混乱。金军到了川陕界上，听见四川有准备，知道吴玠在后方，害怕不敢深入，退回兴元。在这里停留了1个多月，进退两难，最后只得从斜谷撤走。吴玠派兵袭击他的后队。山高路险，敌人跌到山涧中死掉的有1000多人，所有辎重，全都抛掉。于是刘子羽进兵收复兴元、洋州等地；王彦进兵收复金州等地；恢复了战役开始前的势态。金兵得不偿失，不光荣地结束了这次战役。

绍兴四年2月，宗弼、撒离喝和伪齐的刘夔率领10万大军，进攻仙人关。这时，张浚、刘子羽等都被召还到东南去了，但是吴氏兄弟对于防守，却作了更周密的准备。他们在仙人关旁边，预先收拾好战场，筑好堡垒，把它叫做杀金坪。根据吴璘的建议，他们又修筑好第二道防线，在思想上打好坚守防地的基础。这一仗，连战多日，宋军又赢得了光荣的胜利。

金军确实是强敌。他们依仗着数量上的优势，把宋军压退到第二道防线。金的生力军披着两重甲，用铁钩相互连结，不顾一切地鱼贯而上。个别的懦夫动摇了，主张退却。吴璘把刀击地，严正地对将校们说：“死就死在这里，敢退走的斩首!”杨政也说：“此地址四川的门户，宁死不可失守!”于是全军死战，密集的驻队矢射得敌人尸如山积。激战中，吴玠派田屈、杨政，率领精兵，都用长刀大斧，杀入敌阵，左右冲杀。相持到了晚上，宋军在四面山里，点起无数火把，战鼓打得震天动地。王庆、王武等将领，率兵出击，杀得金兵营中大乱。宗弼手下的大将韩常被箭射伤左眼。顽强的敌人屈服了，进攻变成了溃退。宋军劫营伏击，又继续获得了胜利。

敌人的野心本来是很大的。他们狂妄地以为一定能够进入四川，元帅以下，连家属都带了同来，结果却碰得头破血流。从此这条战线上的敌人变得安静起来了，绍兴10年以前，他们不曾敢在这里轻举妄动。

吴氏兄弟的功绩不是偶然得来的。广大人民和士兵支持了他们，实际斗争丰富了他们作战的经验，再加上他们的勇气和才能，才可能建立这样的功绩。

四川人民连年运来了粮食，支援保卫蜀口的几万大军。他们兄弟二人也能节省不必要的人员和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他们修复了褒城的水利工程，使数千顷土地获得灌溉的利益，几万户农民得以恢复生产。这些设施使他们更加获得了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在部队里，他们执行着严格的纪律，但是也能赢得士兵的敬爱。特

别是吴玠，丝毫没有大将的架子，常常到部队中去，和普通的士兵站着谈话，虚心听取他们的说话。他们两人选用将校，不问关系，不信空谈，只凭功绩高下。因此部下将士都愿意在他们的领导下作战。

在长期的斗争中，他们摸索到敌我的短长，逐渐创造出一套作战的经验。吴璘指出金人有4个长处：骑兵，坚忍，重甲，弓箭。然而宋军的硬弓强弩，可以在几百步外射穿重甲，只要选择有利的地形，利用弓弩的力量。使士兵轮流换班休息，就不怕敌人的顽强和冲突了。他后来更提出所谓的迭阵法，是凭借有利地形的以静制动的防御战术。每逢作战，用长枪的在第一列，坐在地上，用拒马做掩护；硬弓在第二列，强弩在第三列，都跪着等候发射；神臂弓在最后一列。敌人到百步内，射程最远的神臂弓先发；到了70步内，再发硬弓强弩；长枪手依靠着拒马的掩护，来对付经过大量杀伤后的残余敌人。这种战术的长处在战士心定，发箭准确，可以充分发挥宋军武器的特长。他们并不消极地从事防御，常常选精兵轮流出击。上述绍兴4年的仙人关战役就是先以防御挫敌人的锐气、后以出击争取胜利的战术的范例。这是吴氏兄弟从全军将士多年苦战的实践中获得的经验。事实证明：中国人民是善于克服困难的，是有充分力量打退强敌、保卫国土的。

吴玠死于绍兴九年（1139），年龄只有47岁。青年时代在西北边境上抗击夏军；壮年时代与金军打了十多年仗。他一生都在保卫祖国，应该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死后，吴璘代他统兵，继续进行保卫川陕的事业。

四 岳家军的成长

岳飞是宋朝人民抗金斗争中最杰出的英雄人物，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岳家军是南宋初年最强大的一支新军。这支部队是在绍兴初年壮大起来的。

岳飞是一个真正从人民中产生的英雄，出身于农民的家庭。他是相州汤阴人，相传还是北宋大官僚韩琦家的佃户。少年时，家境虽很贫苦，仍能刻苦学习，喜爱《左传》和《孙吴兵法》，又从周同学射箭，完全学会了他的本领，气力极大，能拉300斤的硬弓。他对师父有深挚的感情，周同死后，每逢初一月半，都在家中祭祀。父亲看见了，鼓励他道：“你将来出去办事，能为国家牺牲一切吗？”在亲身参加劳动的生活中，在父亲师父的教导下，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在逐渐成长起来。

宣和四年（1122），军事参议官刘翰在河北招募敢战之士，那时岳飞刚好20岁，应募参加了军队。他入伍后，当了一个小队的队长，跟刘延庆征辽的军队出发，经历过芦沟河上的溃败。后来他跟刘到真定，没有等到宋金战争发生，便退伍回乡了。

1126年，康王做大元帅时，招募军队，岳飞再度入伍，从此开始了抗金的事业。他起先只做得一名承信郎的小武官，在黄河沿岸作战。有

一次，他领了100名骑兵，突然和敌人遭遇。他对部下说：“敌兵虽多，不知我的虚实，应当乘他立脚未定，迎头痛击。”于是冲进敌兵中间，亲手斩获一敌将，大破敌军。在这次初露头角的小战中，他已经充分表现了勇敢和机智，证明他是优秀的将才。由于这次胜利，他被提升做秉义郎，受宗泽指挥。宗泽以孤军向东京挺进，连战都胜，是与岳飞的战功分不开的。宗泽爱惜人才，见他智勇双全，教他阵法。他回答道：“布了阵作战，是兵法的常规，至于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宗泽听了，暗暗称奇，非常钦佩他的见识。

南宋建国了，他因上书攻击主和派，连小武官都被革职，只得去投河北招讨使张所。岳飞是一个赳赳的武夫，张所闻他；“你敌得过多少人？”他答辩：“勇敢是靠不住的，用兵第一要定计。”接着又举了两个《左传》上的例子。张所大惊道：“你恐怕不是行伍中人。”岳飞乘此机会，向他献计道：“国家建都汴梁，靠河北做屏障，如果各地都练兵作好准备，一城被围，各城都去救应，金人无法深入，京师就可以安全了。”这是他从学问中、从斗争中发现的策略，使张所听了，大为高兴，给他一个借补武经郎的官职，从王彦渡河北伐。

从此以后，他先后在王彦、宗泽、杜充的手下，转战南北各地。以一员战将的身分，他在战斗中表现了英勇无敌的姿态，赢得手下战士和一般将领们的敬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不顾地位的低下，总是向统帅陈述自己的意见。

他的英勇事迹是很多的。在太行山时，他单骑挺丈八铁枪，刺杀黑风大王。跟宗泽保卫东京时，在竹芦渡与敌人相持，他选300精锐，伏在山下，半夜里点起有4个头的火把。金人望见，当做大军到达，惊慌溃退。杜充专门与民军冲突，岳飞在他手下，不免参加作战。南薰门之战，他带了800人和强大的民军对垒，左手拿弓，右手使矛，横冲入阵，把对方杀得大败溃退。岳飞勇敢善战的名气从此传开去了。后来绍兴元年，他跟张俊招降民军首领张用。张用号称张莽荡，是一员勇将，听见岳飞前来，竟不敢不服。由此可见，当时确有无数人衷心钦佩这一位英勇的战士。然而他何尝只是一员战将!他劝杜充不要轻易放弃中原，在建康又劝他迎击敌人。为了抗金，他经常毫无顾忌地向上级表示自己的意见。事实证明，他有远大的目光，深厚的爱国热情。

南宋朝廷逐渐重视他了。绍兴元年到三年，他奉命转战南方各地，消灭“群盗”。作为一个封建皇朝的将军，岳飞是忠实地执行任务的。他确实对人民犯了罪，逼死了农民军首领杨么。然而这些事情在他毕生的事业中究竟不好算主要方面，而且就是在他执行这些任务时，他也不主张大规模的屠杀。虔州（江西赣县）人曾经使隆裕太后受过惊吓，朝廷密令屠城，岳飞请求赦免胁从，不准，他又连续请求了三、四次，终于争取到高宗勉强的同意。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将军中，能够这样做的，终究要算是比较好的。

在这些战斗中，由于招抚降人，岳家军的质和量都在提高，岳飞本

人的地位也渐由偏裨升做大将了。绍兴3年春天，他驻兵江西，部队已发展到14000余人，是一支不小的力量了。部下将校出现了张宪、王贵等敢战有功的人物。曹成手下的勇将杨再兴在战斗中杀死过岳飞的兄弟岳翻，被俘后，岳飞爱他勇武，留在部下。这位将军后来在反攻中原时有非常英勇的表现。岳飞的官职已升到江西制置使，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的地位虽还差一筹，声名实已相等了。

绍兴三年秋天，岳飞奉命到临安去朝见皇帝。高宗非常赏识这位将军，赐给他许多东西，其中有一面军旗，上面綉着“精忠岳飞”四字。皇帝喜爱的是：岳飞镇压人民有功，然而，这何尝是岳飞的主要事业呢!

岳飞朝见皇帝以后，仍旧驻军江州。这年冬天，他接受了收复襄阳的任务。这是岳家军进一步发展而且成为中原抗战的领导力量的关键性战役。

绍兴三年，京西一带的义军遭遇重大的挫折，襄阳等地纷纷沦陷，这是一件不小的事变。京西的抗战力量，除陕州李彦仙早已失败外，北面洛阳一带以翟兴为主，南面襄邓一带先以桑仲、后以李横为主。刘豫把东京做了“都城”，因为翟兴据守伊阳山寨，使河南陕西间的交通不能不绕道黄河北岸，认定他是心腹之患，买通将官杨伟，在绍兴2年把他害死。老将军牺牲后，儿子翟琮收拾旧部，仍旧扼守着山寨，而且曾经一度攻入洛阳。桑仲、李横也是坚决抗金的英雄。桑仲被害以前，曾派人到临安，表示夺回东京的决心。李横从黄河埽兵出身，勇敢善战，继承桑仲的事业。绍兴2年冬天，他领兵北上，收复了汝州（河南临汝）。绍兴3年春天，正在金军主力进入汉中、威胁四川的时候，京西义军以李横为首，联合了翟琮、董先（翟兴旧部）、牛皋等部，对伪齐发动了一次大攻势。这些部队都在京西一带坚持多年，如著名的牛皋本来是一名射士，金人入侵，他就在故乡汝州鲁山聚众抵抗，后来成为岳家军的主要将领。他们收复了颍昌府（河南许昌），要求宋朝出兵接应，并派大员主持；一面发表檄文，宣告收复东京的决心，推进到京城附近。汉奸刘豫害怕得不得了，赶紧向金人求救，于是宗弼会合了伪齐李成进兵迎敌。义军是勇敢善战的，可惜有散漫的缺点。他们夺获了敌人的大量财物，高兴起来，吃酒快活，毫不戒备，因此被金伪军袭击打败。攻势失败后，伪齐军进攻京西，翟琮、李横各军新遭挫折，加以没有粮食，只得退到荆南、江西去了。

襄阳一带在战略上有重大意义。宋人保住了襄阳，进可以出击中原，退可以掩护长江中游地区。现在落到了金伪手中，宋朝从汉水通陕南的路已经断了，敌军前进一步，就可以进攻荆州、鄂州（武昌），完全切断东南和四川的联络。因此这是势所必争的地方。岳飞对于这点，是看得很明白的。他向朝廷建议：襄阳等6郡（襄阳、郢州、随州、唐州、邓州、信阳军）是恢复中原的根本，必须立即收复。宋朝看见事情重大，也赞同进行一次局部反攻，就派岳飞进兵。原来的京西义军，除李横等到临安见驾，部队被拨归张俊外，牛皋、董先等部拨归岳飞指挥。这批将士非但久经战斗，而且熟悉京西地理人情，他们的加入，对

于岳家军的壮大，很有作用。岳飞得到了他们，非常高兴。绍兴四年（1134）5月，他带着新旧将士，开始进军了。

这是岳飞独当一面，进行卫国战争的第一个战役。多年来的希望，有了实现的可能，他该何等的高兴。渡江的时候他在船上对幕僚们道："飞不擒贼，不再渡江!"我们在800多年后的今天，从这两句话，还可以想象到将军当年的英风雄姿。

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岳家军完全收复了6郡土地。在行军中，部队遵守严格的纪律，绝不践踏田里的作物。对于甘心做汉奸的无耻之徒，岳飞毫不容情地把他们处死，如登城辱骂的伪知长寿县刘某，据随州顽抗1个多月的伪知州王嵩，俘获后都磔死。把这事与上述的拒绝屠城合看，可知岳飞的爱憎是分得很清楚的。作为一个统帅，他在作战前锐利地看出敌人的弱点，抓住了它，痛快地一下子粉碎敌人。襄阳之战，伪齐大将李成迎敌，岳飞看了他的阵势，笑道："步兵需要险阻，骑兵需要平地，才能发扬威力。李成把骑兵排在江边（汉水），把步兵布置在平地，即使有十万人，也没有什么可怕。"举起马鞭，指着王贵道："你用步兵长枪攻击敌人的骑兵。"指着牛皋道："你用骑兵攻击敌人的步兵。"两军合战，敌军的战马纷纷被长枪刺死，后面的要逃，都自相推拥，落到江中；平地上的步兵被骑兵冲杀践踏，死的不计其数。这一战杀得李成胆战心惊，连夜逃去。岳飞在作战时，对于新得的将校，能够放手运用，使他们发挥各人的长处。张宪是岳飞的爱将，攻随州1个多月，还是打不下来。牛皋要求前去，只带3天粮草，果然一战成功。岳飞重用了这些熟悉京西情况的人，作战才能非常顺利。

岳家军比过去强大了，又得了六郡做根据地，1140年中原大进军的基础在这时初步奠定了。宋朝政府也升他做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32岁的岳飞，身为大帅，与韩、刘、张三大将的地位完全相等了。

岳飞接着向朝廷提出两条见识远大的建议，一则乘女真贵族骄傲自满和中原人民不忘宋朝的机会，用20万大军，直捣中原，收复失地；一则利用六郡肥沃的土地，发展屯田。大举进军虽没有被采纳，屯田却从此发展起来了。岳飞花了许多心力，积极经营，招抚流亡，免掉人民所欠的公私债务，由公家发放银钱，解决农民缺少耕牛粮食等问题。除帮助农民恢复生产外，又推行军队屯田，实行结果，可以减少漕运军粮的一半。从此直到南宋末年，襄阳号称西陲重镇，人口众多，城高池深，这是岳飞经营的成效。

岳飞志在抗金，宋朝却要用他来对内。绍兴四年秋冬两季，金伪进攻淮南。岳家军只参加了庐州（安徽合肥）一战，牛皋、徐庆带2000人，击退了来犯的金军。不久，金军撤退，岳飞就奉命去招捕"湖寇"了。

洞庭湖的战役结束后，岳飞还军驻在鄂州（武昌）。岳家军的实力

又有一些增加，洞庭湖农民军中善于游泳的人很多，这批人的加入使鄂州的水军大为增强。

岳飞的心是一直向着中原的。从临安回江州后，他就着手进行“连结河朔”的工作了。这时岳飞的威名既盛，中原义士来投奔他的便不在少数。河东忠义军将赵云来了。这个人，金人捉住他的父母来招他，用大官来引诱他，都不动心，确实是个硬汉。深受人民爱戴的太行山忠义社梁兴被金军围攻，率领了一百多人夺路渡河，到了岳飞军前。他后来在岳家军与太行义军的联络工作中起了不少作用。山东忠义人李宝也投到岳家军中，后来奉命到山东招兵，回到楚州，被韩世忠留下。李宝对世忠痛哭，希望回到岳飞部下。世忠写信去问，岳飞答道：“均为国家、何分彼此。”一时岳飞在忠义人中的声望和他自己的度量从这事例中都可以想见了。

强大的岳家军是由各地的忠义人民所构成的。岳飞本人在这支精兵的形成中也起了重大的作用。他的声望吸引了无数志士，他在部队的组织训练上所花的心血又使这些志士们构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上面讲过，旧日的京西义军虽则勇敢善战，但是过于散漫，因此经不起严重的战争的考验。岳飞军纪极严，号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士卒擅自拿人民的一根麻来缚柴草，立即被斩首号令。他特别注意练兵，日常操练时，要求像实战一样严格。冲山坡，跳壕沟，都穿着重铠练习。儿子岳云在演习时，一不小心，战马失足跌倒，就受到鞭打。伟大的俄罗斯统帅苏沃洛夫说过：“在操场上很困难，打仗时就容易了。”岳飞的做法正符合了这原则。将士受过严格的训练，习惯于依照命令而行动，即使突然遭遇敌军，也不会惊慌动摇。“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结果就是这样得来的。

严格并不意味着冷酷，岳飞决不全靠杀头来维持纪律，那仅是不得已的行动。他经常替病号调和汤药，凡有赏赐都平均分给部下。将士远征，他经常慰问他们的家属；牺牲了，抚养他们遗下的子女。他充分发挥了中国优秀将领与士卒同甘苦的传统。他也是善于和群众商量的，作战之前，总要召集众将，共同讨论方略。大家的意志统一了，打仗就容易得胜。由这些事情来看，岳飞受到军民一致的拥护，决不是偶然的事情。

然而这样一个优秀的将军，当他初做大帅的时候，已被不少人妒嫉了。岳飞年轻，初从偏裨中被提拔起来，升迁太快，旧日的大将都很不满。岳飞要和他们合作，破洞庭湖后，送给韩世忠、张俊每人一艘配有兵士器械的楼船。韩世忠人很爽直，只是起初气量狭了一点，见岳飞对自己极意联络，就高兴了。张俊却因此更加妒嫉了。大将中也有例外，吴玠远在西北，听见岳飞的功绩，非常敬服，反而主动和他往来。皇帝和大官僚对于岳飞，本来认为是粗人，提拔他，目的是要他做皇朝的鹰犬，根本不欢迎他在国家人事上作什么主张。绍兴7年（1137）春天，他到临安，密奏请立皇太子，就碰一个钉子。不久，因与张浚闹意见，要求解除兵权，又大为朝廷所不满。秋天还军之前，高宗向他“解释”，

表示对他信任，然而言语之中，实在含有警告的意思。“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这是高宗要他死心做奴才、做鹰犬的表示。

岳飞碰了这些钉子，对于旁的问题，自然不大开口了。然而对于抗金大业，他决不肯缄默。他不断发表反对和议，进取中原的议论。他在人民中的声望正在不断增长。因此这位英雄不能不为投降派所忌，不能不于最后为抗金而死于内部的敌人手中。

五 绍兴4年至7年间金伪南侵的失败

以高宗为首的大地主阶级是一贯主和的。建炎4年秦桧归国，绍兴3年金使第一次到江南，宋朝一心解仇议和了，金也表示承认南宋了。然而金人对川陕的野心不死，因此在绍兴初年发动了多次进攻。至于整个大局，还有一个刘豫和赵构争做儿皇帝的问题。赵构很愿意做儿皇帝，但是中原却有一个百分之百的傀儡政权。金人要扶植刘豫，所以第一次南下的金使提出以长江为界的条件，绍兴4年宗翰给宋朝的信又要求淮南不得屯兵。刘豫自己更希望金人扩大侵略，以巩固他的地位。这种热烈希望敌人扩大侵略的想法，是为一切卖国贼所具有的。进攻襄阳，是伪齐独力进行侵略的尝试。这个尝试垮台了，他就竭力要求金国出兵，与他联合南侵，于是有绍兴4年（1134）秋冬金伪合兵南侵的战役。

9月中，完颜昌、宗弼等领兵5万人（主要是北方的汉人）与刘麟、刘猊（都是刘豫的儿子）从汴梁南下，在泗州渡淮河。南宋朝廷为保持统治地位，不得不抵抗一下，实际上是一面抵抗，一面讲和，所以使者魏良臣不因战事而召回，反而到完颜昌处声明江南只要保全现有的土地。金伪军略为进逼，南宋的几支主力军就分别移动到建康、镇江、常州等地，目的无疑只在保江。淮南只发生过几次小规模的冲突。韩世忠移兵过江前曾于10月13日在大仪打了一个胜仗。他把金兵引入泥淖中，埋伏的精兵“背嵬军”突起，用长柄战斧上劈人胸，下斩马足，消灭了敌人一支小部队。14日，他的部将解元在承州城下埋伏了600人，围攻金骑兵150人，只走掉两个，其余全部解决。庐州地位偏西，不是金人主要的目标，只受金军偏师的攻击，被来援的岳家军一打就逃走了。

金兵占领滁州已在11月里，因为宋军扼守江岸，天气恶劣，进兵不便。相持到12月里，粮食断绝，签军怨恨，有哗变的可能。金军不敢停留下去，匆匆撤退。刘氏弟兄听得金兵已退，吓得丢了辎重，狼狈逃去。

抵抗既有成效，主战派在南宋朝廷中抬头了。从川陕回朝后谪居福州的张浚被起用了。绍兴6年（1135），他做了宰相，努力作恢复中原的准备工作。他对大将最满意的是韩世忠和岳飞，最不满意的是贪酒好色、无意恢复的刘光世。他检阅各军，鼓励将士，部队的战斗意志因此有显著的高涨。

他派韩世忠进兵楚州，准备进取山东。韩世忠本来是员勇将，黄天

荡之战，打垮了宗弼的锐气。绍兴初年，他跟其他的大将一样，参加招捕“盗贼”的战争，吸收了许多勇敢善战的士兵，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显著的提高。此刻到了淮河边上屡遭战火的楚州，竭力经营。他和士兵共同操作，建立营房梁夫人也参加了工作。他又招抚流散的人民，恢复生产，发展工商，使楚州成为淮南重镇。到绍兴11年（1141）解除兵权时，楚州军中积储钱100万贯、米90万石之多。他对练兵造械都很注意，他所制造的克敌弓、连锁甲、狻猊鍪等器械和训练骑兵跳涧、要求弓手洞穿标的等方法，为以后宋军所沿用。他象岳飞一样，也派遣间谍，到山东太行各地，联络山寨，许多地方都愿意受他的指挥。一支强大的抗金力量在淮东成长起来了。

绍兴6年（1136），在张浚的鼓舞之下，韩世忠一度进兵围攻淮阳军（邳县）。韩世忠兵少，要求张俊援助，他却不肯出兵。淮阳军有重兵防守，敌人的援军又赶来救应，韩世忠只得暂时撤退。

张浚又使岳从鄂州进驻襄阳，准备恢复中原。他对岳飞道：“此君素志也。”于是岳家军在京西出动了。牛皋领兵到蔡州（河南汝南），烧掉伪齐所积的粮草。王贵、董先等攻克虢州卢氏县，杨再兴也进兵到长水县，连战都胜。这还不是主力的进攻，用意在深入黄河以南的京西各地，打开联络太行山寨的通路，是一次大进军的序幕。

刘豫被宋军的攻击吓破了胆，赶紧向金人求救，建议先向长江北岸进攻。女真贵族因上一次进攻失利，不肯发兵，要刘豫单独干一下。刘豫不得已使刘麟、刘猊率领李成、孔彦舟等汉奸，签兵30万，于1136年9月，冒险南窜。敌兵分做三路，东路军到淮东，被韩世忠阻击，不敢前进；西路军围攻光州（河南潢川），也被守军击退；只有中路军在淮西渡过淮河，东路军也向这方面靠拢。刘光世扼守庐州，正对着敌人进攻的方向。这个胆小无能的将军听说敌军进兵，就擅自撤退。张浚得报，立刻派人赶往传令，禁止刘部渡江，违令者斩，而且督促他还到庐州去。这时淮西的情形确有几分混乱，幸而张浚所派援军杨沂中部赶到藕塘（在安徽定远东南面），在10月10日打败了窜向淮西的东路军刘猊，顿时扭转了局势。刘猊本来无用，一见战况不利，就带了几个侍从，逃命去了。部下兵士本来不愿作战，纷纷乘势投降。一路垮了，其余两路也望风逃去。一次声势浩大的攻势很快地完结了。

刘豫惨败后，大为金国所不满。女真贵族立他的宗旨是用宋人打宋人，让他们从容巩固在两河的地位，此刻见他太不中用，自然要不满意了。加以宗翰已死，完颜昌执政，这人对刘豫向来没有好感，于是取消伪齐政权的时机逐渐成熟了。

在宋朝方面，主战派更加热心进取。绍兴7年（1137），岳飞到临安，同高宗谈恢复的方略，主张进兵陕州潼关一带，号召各路，收复陕西、河南，进而经略两河，捉刘豫，灭金人。高宗根本不愿意让大将干如此的大事业，张浚也认为太急，这计划就搁下了。岳飞所依靠的是民心士气，因此主张立刻大举。张浚就南宋政府的军队着眼，因此认为先

要做整顿、准备的工作。二人主张的区别在此。

张浚的整军工作首先是罢免刘光世。刘光世是应该被罢免的，然而让谁代他呢？张浚曾与岳飞研究过这问题。刘光世部下有王德、郦琼两大将，张浚提出的人选有王德、张俊、杨沂中、和不懂军事而主张抗战的文官吕祉，岳飞认为都不适当。张浚发脾气道：“那么非你不可了!”两人大闹意见，岳飞曾因此辞职（见上节）。岳飞兼统淮西，兵权太重，朝廷当然不会答应，结果毕竟派王德做都统制，又使吕祉去节制郦琼一军。郦琼这人骄横得很，既不愿王德做上司，更讨厌高高在上的吕祉，后来怕吕祉寻他的错处，竟杀了吕祉，带全军4万人投降刘豫。张浚因此免相。主和派乘机抬头，高宗甚至批评恢复的主张道：“张浚措置三年，何尝得到尺寸土地，反而坏了多少事，这种议论是毫无可取的。”

绍兴7年（1137）11月，金人正式取消伪齐政权，宋金关系转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四章 南宋抗金战争的空前有利形势与绍兴年间的两次和议

一 特务宰相秦桧与绍兴9年的和议

绍兴8年（1138），南宋与金暂时构和的时机成熟了。

话得从金国的内部讲起。1137年中，久掌兵权的宗翰死了；接着，刘豫的伪齐政权被取消了。

宗翰的死是女真贵族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熙宗是太祖阿骨打的孙子，朝中大臣多半是伯叔一辈，其中宗弼等是阿骨打的儿子，关系最近；宗磐、宗雋等是太宗吴乞买的儿子，稍为远一些；宗翰关系最远。此外，完颜昌（挞懒）辈份长而关系最疏。熙宗已失“女真之本态”而“宛然一汉家少年子”，对于勋旧大臣，渐有“无如夷狄”的看法。这话虽不免是敌国诋毁，言过其实，然而女真贵族的首领逐渐变成中央集权帝国的皇帝是事实，皇权与依照旧俗权力极大的贵族发生矛盾是必然的结果。于是熙宗首先杀死宗翰的亲信高庆裔，致宗翰愤恨而死。宗翰一死，完颜昌暂时掌了国政。然而这仅是暂时的事情，熙宗是非把关系较疏的当权大臣（包括吴乞买的儿子在内）除去不可的。因此女真贵族的内部矛盾方兴未艾，对宋的进攻自然要缓和一些了。

金国政仅内部有了变动，刘豫这个没有用的工具也就跟着被赶下台了。中原人民把这个变动，理解为金国统治的不稳，不但人心向南，连刘豫的伪齐军也多有逃往南方的。据南来刘锜的估计，合肥一年中可以吸收降兵四、五万人之多。金对河淮之间地区的统治显然有了问题。于是完颜昌等主张暂时与宋议和，甚至愿意把屡经兵火、人烟稀少的黄河以南地方还给宋朝。这正投合了南宋以高宗为首的投降派的心愿，于是大特务秦桧出任宰相，一心一意投降了。

秦桧字会之，江宁人，一度以爱国者的姿态出现过。靖康2年，他做御史中丞，反对立张邦昌，自称愿意为此牺牲性命，俨然是一个志士。金兵把他带回北方，配在完颜昌的部下，当时（1127）他年38岁。他很快变了节，当了完颜昌的亲信，起初做一名“任用”，后来于建炎4年（1130））随军南下时，便是参议军事、随军转运使了。兵到楚州，秦桧与妻子王氏带了亲信仆人，于9月25日乘小船到涟水军水寨，自称杀了监视他的金兵，夺船逃回。

这段不合情理的逃走的故事，显然是伪造的。1214年（宋宁宗嘉定7年、金宣宗真祐2年），有一个金官孙大鼎上疏说：“天会八年冬，诸大臣会于黑龙江之柳株，陈王兀室忧宋氏之再隆，其臣如赵鼎、张浚，则志在于复仇；韩世忠、吴玠，则习知于兵事。既不可以威取，复结怨之已深，势难先屈，阴有以从，遂纵秦桧以归。”这是金朝人自述的谋宋密策，是秦桧确系特务汉奸的铁证。至于他们选定秦桧这人的原因，想

必是为他在靖康时扮演过“爱同志士”，容易取信于人。当时宋朝很多人不相信“夺船逃回”的故事。然而他那一套“南自南，北自北”的谬论，却能打动高宗的心。原来高宗是心甘情愿做偏安江左的儿皇帝的，但是金人不断进逼，使他不得不抵抗一下，保持自己的地位。此刻令人派来的奸细秦桧传达了女真贵族的意思，使高宗知道偏安可保，求和的心就坚定了。绍兴元年（1131），秦桧一度拜相。不久，被金人扣留的使者王伦也被放归，传达“息兵议和”的意思。但是当时反对议和的声浪太高，高宗只得把秦桧免职，暂时不谈议和。此刻，在河南失地可以恢复的幌子下，投降派自己认为有了理由，就此公开进行了。

1137年春天，徽宗在金国逝世的消息到达江南，王伦又以“迎奉梓宫使”的身份到金。冬天，王伦回宋，传达完颜昌的意思，愿意归还“梓宫”、皇太后和河南诸州。1138年，秦桧以枢密使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这就是正式做了宰相了。王伦再到金国；接着，金使乌陵思谋南下谈判。双方一谈即合，乌陵思谋回国后，金国就再派张通古、萧哲做江南诏谕使前来议事。不消几个月，和议就谈得差不多了。

这正式投降的阴谋不能不激起南宋军民和爱国官吏的无比愤怒，反对投降的斗争立即在江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在南宋朝廷的内部，爱国官吏词严义正地指斥秦桧。魏矼奉命做馆伴使，招待金使，他立即表示自己反对和议，不愿充当。秦桧当面质问他，他反复说明敌情难保。秦侩无耻地诡辩道：“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魏矼驳道：“相公以诚心对待敌人，只怕敌人不以诚心对待相公吧!”两句话像匕首般的刺入秦桧心中，驳得他闭口无言，只得改派别人。在陕西领导过抗金的王庶，这时做枢密副使，他6次见高宗，反对和议，秦桧和他争论，他对秦桧说：“你忘了在东京忠心耿耿保全赵氏时的事了吗!”一句话吧这个特务变节的真相揭发了出来。这是两个当面痛责秦桧的硬汉。

更多的官吏提出了反对议和的主张。王庶接连上了7次奏章，被放逐在永州（湖南零陵）的抗战派主要人物张浚连上了50疏，长期被歧视的李纲不顾利害，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其他如权尚书礼部侍郎张九成、吏部侍郎晏敦复等都一致反对。这些爱国的官吏认为金人一贯用“和议”做谋人之国的毒计，人人都知道无故而还河南其中必有阴谋，人人都不愿意高宗像伪齐刘豫一般对金人屈膝受令。

大将们也一致提出了反对议和的主张。韩世忠坚决表示不能接受金人的“诏谕”，要求调查王伦等勾通金邦、出卖祖国的情状。岳飞在和议进行前，已对朝廷不积极北伐的态度，表示不满，此刻上疏道：金人不可信赖，和议是靠不住的，宰相误了国事，恐怕要被后世责备。这两位将军都指斥到卖国贼，因此与秦桧结下了深仇。

枢密院的一位编修官胡铨慷慨激昂地写了一道奏疏，说得尤其痛

快。他一开头先骂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指出“宰相无识”，使王伦进行卖国的和议。他沉痛地道：无知无识的三尺童子，叫他拜仇敌，尚且要发怒；现在堂堂大国相率而拜仇敌，毫无羞耻之心。因此禁不住向高宗提出质问：“而陛下忍为之耶？”他揭穿和议的阴谋，所谓一屈膝就可以收复失地，就可以迎回徽宗的棺木和太后、钦宗，全是骗人的胡说。他又进一步指出王伦本不足道，主要的负责者应当是秦桧和专门趋奉秦桧的副相孙近。他代表千百万人的要求，大声疾呼地道：“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日。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倍留敌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羁。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

这一篇字字响亮的文章立即轰动一时，到处传诵，非但南宋境内争相翻刻，而且传入敌境，使女真贵族不能不为南方民气激昂而震动。

南方的民气确实是异常激昂的，反对议和决不单纯是某些文武官吏的要求；反之，他们的表示却是千百万人民的愿望的反映。没有人民自发的愤慨的表示，许多官吏们是不会这样说得深刻而激动的。

金使张通古、萧哲等进了宋境，向北遥拜金帝，宋朝军民看了，想到陷入敌手的中原，往往流泪。大家听见和议将要成功，到处议论纷纷，上到百官，下到庶民，谈到王伦、秦桧，人人恨得咬牙切齿。部队中的将士，很多是北方人，他们的父兄子弟多被金兵屠杀，天天想报仇雪耻，恨不得要吃敌人的肉。如今秦桧亲敌卖国，将士们异常愤怒，一致痛恨秦桧。临安禁卫军的将领杨沂中、解潜、韩世良进见秦桧，表示如果高宗亲身对金使屈膝，恐怕军民汹汹，无法弹压，如何是好!当时临安军民口出不平之议，据说有“闻之可骇”的话。城中百姓，有很多人终夜不睡，注视着事势的发展。附近各地，以至常州、润州（镇江）、会稽（绍兴）等处，民心不安，反对和议的情绪很高。胡铨的奏疏一出，临安满城人都热情高涨，议论更多。事势很明白，人民群众自发地起来制止投降的斗争很有发生的可能。晏敦复向高宗警告：当年磁州人民反投降杀王云的事件，大有在临安重演的可能。胡铨奏疏中也说：“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秘书省正字范如圭写信对秦桧说：宣和、靖康以来，被金兵屠杀的，不是将士的父兄，就是他们的子弟。将士们跟金兵有血海深仇，今天议和，万一“奸雄”利用众心愤怒，拥数十万之众，向你问罪，请教你有什么话可以回答!

有了这样沸腾的民心，才会有这样多的官吏反对和议，这是非常明白的事实。许多官吏认为投降将激起民变或兵变，在群众的压力下，他们不能不起来反对。

民心如此，军心如此，刘豫被废后中原人心向南又如上述，南宋朝廷如能出兵北伐，胜利是有把握的。然而以高宗、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决心卖国，对于各方面的反对，不是镇压，就是采用欺骗手段，以缓和空气。高宗装得哭哭啼啼，对人说是为了迎回徽宗棺木和太后、钦宗，不得已而暂时讲和，这是塞大臣们的嘴的办法。对于拥有重兵的韩世忠，

高宗亲笔答复，用的也是这套鬼话。对于话说得最直的硬汉，采用镇压的手段，王庶自请解职后被放逐了，胡铨被押解出京了，其余被流放革职的还多，另一位宰相赵鼎因为不愿意过分屈辱，也被挤出政府了。只有对于异常激昂的民心军心，政府不能不设法缓和下。绍兴八年12月28日，举行受国书的仪式，高宗不亲自出场，由秦桧出面，到金使馆中受书。皇帝总算没有亲自对金使屈膝。金使者虽则不愿，但是看见江南军民愤慨的情况，只得算了。

绍兴9年（1139）正月元旦，宋朝正式宣布和议成立。宋朝对金称臣，每年贡献银25万两、绢25万匹；金允许把河南、陕西还给宋朝，送还韦太后和徽宗的棺木。至于钦宗，高宗本来不要他回国，所以从来没有向金人提出过送回的要求。无耻的宋政府同时下令禁止诋斥金邦的文字，接着宣布大赦，又赦免张邦昌、刘豫等大汉奸的子孙。

忠勇的韩世忠将军痛恨和议，派兵假扮红巾，埋伏在洪泽镇，打算袭击金使。不幸被汉奸走漏消息，使者临时改变路线，一场心机又是白用了。岳飞上表，幕僚张节夫写道："谓无事而请和者谋，恐卑辞而益币者进。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称藩。"秦桧见了大怒。同时上疏表示反对的人还有不少，这是反议和斗争的余波。

二 1140年南宋抗金战争的空前胜利

1139年的秋天，女真贵族的内部矛盾又有新发展。7月，太宗吴乞买的儿子太帅领三省事宋国王宗磐、太保领三省事兖国王宗隽、虞王宗英、滕王宗伟，被熙宗以谋反的罪名杀死。跟他们关系密切的左副元帅鲁国王完颜昌先被降职，接着便以与宋朝交通的罪名被杀。执行这任务的右副元帅沈王宗弼升做都元帅、越国王。和议是在完颜昌等手中实现的，于是宗弼撕破和约，于1140年6月，发动全部兵力，四路并进。聂史呼贝勒出山东，撒离喝入陕西，李成入河南，宗弼亲自领兵取汴京。和议的不可靠，终于被事实所证明了。

事实很明显，侵宋是金的国策，不管是完颜昌或宗弼，都是一样的，不过手段有缓急之分而已。完颜昌的一派认为无力灭亡整个宋朝，所以暂时议和。宗弼的一派轻敌自大，认为可用武力解决问题，所以立即撕毁和约。汉奸郦琼为了博取宗弼的欢心，把宗弼说成"命世雄材"，又把江南将帅说成"才能不及中人"的贪生怕死之徒。宗弼向他征求意见，他说："江南军队都是败亡之余，又没有良将可以敌我。大军一到，他们君臣将要心破胆裂，连哀鸣都来不及。好比被射中过的鸟，听见弓弦响，就会跌下的。"宗弼听了大喜。侵略者和汉奸就是这样来估计宋朝实力的，因此他们敢于轻举妄动。

他们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金国本身弱点很多；反之，宋朝有激昂的民气，精锐的军队，优秀的将领。如果没有投降派的破坏，宋朝是完全可以取得全胜的。

金国侵略宋朝，已有15年的历史，旧日的精兵良将多半不在，加以女真族人口不多，非强制征发汉人，不能组成大军。汉人不愿从军，怨恨不满，自不必说。女真人也厌倦战争，希望过和平的生活。早在1137年，金国为了废刘豫而发兵南下时，女真人以为又要与宋朝打仗，都很害怕。有人在太原府祁县女真千户斜也孛董营里，看见斜也与家属痛哭。他们杀了一口猪，用斜也穿的衣服裹好，埋在后营，祝告道："斜也已经阵亡，安葬好了!"这是迷信，然而从此可以想见女真人多么厌战。金政府发动战争，是根本违反广大的女真族人民的利益的。至于金国境内各地的情形问题更多。1139年，北方收成极坏，金政府的榨取却毫不放松，民不聊生，纷纷起来反抗。太行山一带，义兵大起。从秋到冬，以王忠植为首的义兵攻下过石州等11郡。海上的义兵首领张青到辽东登陆，自称宋朝官兵，被掳到辽东的中原人多起兵响应。黄河北岸一带，从河南归宋之后，民间就盛传高宗亲征，大家秘密团结起来，购置军器，准备响应。沿河居民每遇天阴月黑的晚上，常向南了望，指道："御营火光亮了!"金人有什么动静，北方义士就向宋军报告，让他们好作准备。河南府兵马钤辖李兴因此早知金人发动战争的阴谋。金人对于这些反抗行动，采取种种措施，封锁中条山，不准人民出入；沿河驻兵，防止河北人南渡，甚至下令：替人摇船渡河的处死刑!然而反抗行动还是不断的发生。女真贵族统治集团的内争，又加深了金国的矛盾。完颜昌等的死党也逃亡到山谷中，反抗官府。一部分的统治者已经感觉到时局值得忧虑。乌陵思谋常常脉不着觉，为大局的败坏而叹息。宗弼手下的大将韩常认识到南军的勇锐象旧日的金军，金军的懦怯象旧日的南军。金人的内部情形就是如此。宗弼在这种情形下硬要发动战争，结果当然要碰得头破血流。

侵略军的进兵起初似乎是很顺利的。宋在河南陕西并没有驻屯重兵，州县地方官吏多半是旧时金和伪齐的人员，一见金军，立即投降。一部分官吏决心抵抗，而手脚被人束缚，不能发挥力量。李兴知道敌人的阴谋后，招集忠义民兵，几天就招到1万多人。他的上司副总管孙辉不以为喜，反以为惧，要想杀他。金李成军渡河，孙辉和权留守李利用匆匆逃走，李兴独力迎战，受了重伤，昏倒在地。金军就此占领了洛阳。李兴醒后，走往外县，招集部队，继续抵抗。宗弼率主力十余万人直取汴京，留守孟庾不知所措，竟开门降敌。金军继续前进，兵不血刃，取了归德。河南各地，纷纷投降。这是以宗弼为主力的金东路军进兵的情况。西路军撒离喝从河中（山西永济）渡黄河入同州（陕西大荔），飞马疾驰250里，直到长安。副都总管郝远也来一个开门迎降。金兵一直向西挺进到凤翔。

在南宋统治集团毫不注意边防的情形下，金兵取得了一些表面上的胜利，然而他们再进一步，就要大吃苦头了。从东到西，韩世忠、刘锜、王德、岳飞、与胡世将统辖的吴璘等军，迎头痛击了敌人。刘锜顺昌之战，岳飞郾城、颍昌之战，都大获全胜，使整个战局为之改观。

刘锜是新任的东京副留守，率领八字军，带了将士家属，从临安走水路往东京。6月12日，刘锜和部下18000人到达顺昌（安徽阜阳），

得到警报，知金兵已破东京，前队进入陈州（河南淮阳），离顺昌只有3OO里了。刘锜和知顺昌府陈规决定坚守。他下令凿沉船只，表示没有退走的意思。全军都踊跃愿战，男子准备作战，妇女磨刀剑，大家喊道："平时人家欺负我们八字军，今天要为国家杀贼立功!"这一支在江南飘泊多年、受尽统治集团歧视排挤的抗金武装部队扬眉吐气的日子到了。

顺昌原是一座毫无防御设备的小城，刘锜亲到城上，督率战士，修筑工事，一连做了6天，刚才完成。这时，金的哨马已经到达城外了。5月20日，金葛王完颜褒和龙虎大王等军3万余人进到城下，包围顺昌。刘锜大开城门，使敌人摸不着头脑，不敢轻进；宋军用神臂弓和强弩射敌，敌兵稍退，宋步兵冲出攻击，杀伤金兵数千人。敌军吃了一点苦头，就退到距城20里的东村。刘锜派勇将阎充，带500壮士，趁夜斫营。那晚，天将下雨，闪电不绝，宋兵看见有辫子的就杀，又杀了一个乘朱红漆车子的大将。敌军受到了打击，又退15里。第二天晚上，天气仍然如此，刘锜派一百个壮士再去袭击，电光一亮，壮士就奋力攻击；黑暗的时候大家就伏着不动。金兵不知虚实，自相攻击，乱了一夜，死掉了无数兵士。败报传到东京，宗弼亲统大军，赶往顺昌，和八字军决战了。

刘锜听见宗弼将到，召集众将，商量对策。有人主张乘连胜几仗的势，备下船只，全军南归。刘锜说："朝廷养兵15年，正为缓急要用。如今虽众寡悬殊，然有进无退。吾军一动，兀术追来，前功尽弃，使敌人进犯江淮，那么我们平生空有报国的志向，反而造成误国大罪了。"将士们听了，一致拥护，都愿意决一死战。

宗弼到了城下，大骂众将无用。众将都说："这番的南兵非昔日可此，国王临阵自然知道。"宗弼不信，又看见城垣低小，竟夸口道："那只消靴尖就可以踢倒了!"下令：明天拂晓攻城，破城之后，成年男子，全部屠杀；玉帛子女，诸军任便掳掠。敌人的狂妄和残暴，就是如此。

这一次，金军十余万前来攻城，刘锜所却不满2万，可以出战的不过5000人。然而英勇的八字军将士却毫无退缩之心。顺昌城外就是颍河，刘绮派人送信给宗弼，声明代金兵搭5道浮桥，请他们渡河决战。宗弼得信大怒，真的从这5道浮桥上渡河，耀武扬威地杀到城前。刘锜早已派人在颖河上流和城外草中，撇下毒药，嘱咐军士，无论怎样口渴，也不要喝河里的水。当时正是6月11日，天气炎暑，金军昼夜赶路前来，人马都疲劳不堪。刘锜以逸待势，命部队轮番歇息，养足气力。从清早相持到午后，金兵人马又饥又渴，喝了水，吃了草，中毒的很多。刘锜见时机成熟，发兵出战。他嘱咐士兵不要叫喊，专用刀斧劈击。来兵杀入敌阵，直扑宗弼主力。金军中的河北兵在阵上对宋兵说："我们本不愿战，你们只拣拐子马杀好了。"拐子马是金军铁骑，全是女真族兵士、号称长胜军，这一仗，被杀得七零八落。宗弼的牙兵3000人，号称铁浮图，铁盔铁甲，异常精锐。宋军想出办法，先用长枪挑去铁盔，然后用大斧去劈，把他们杀得大半断臂碎首。宋军将士人人

死战，统制官赵撙、韩直，身中数箭，依然奋力向前，刘锜只得派兵把他们扶回。士兵和敌人肉搏，有的抱住金兵，和敌人一同滚到濠内，光荣牺牲。这一仗杀敌5000，遍地都是敌尸。宗弼大败，退到城西扎营，打算再战。恰巧当夜大雨，平地积水1尺多深，宋军又来袭击，金兵营中，人人心慌，宗弼不得已，拔营逃去，抛弃的车辆旗帜器械甲仗，堆积如山。6月12日，顺昌解围，这就是顺昌大捷。宗弼又气又惧，只是鞭打众将，来发泄怒气。金的政府得到消息，吓得丧魂破胆，把燕京珍宝，悉数运往北方，已经在作逃走的准备了。

这时候，宋的各路军队也先后取得不少胜利。淮东的韩世忠派统制官王胜等北伐，收复海州。王胜进城后，向父老宣布吊民伐罪的宗旨，令人民各安生业，不接受犒军金银，只吃了老百姓一顿饭。这是韩世忠的好处。他每次出军，都下令秋毫不得扰民。所以军入伪境，百姓并不逃避。淮西的张俊派勇将王德收复宿州、亳州。汉奸郦琼眼完颜褒在亳州，听见王德兵到，对完颜褒说：“夜叉（王德号称夜义）来了!”两人就狼狈逃去。陕西的胡世将虽是文官，却能信任吴璘，团结固守。大将杨政，母病将死，他不顾家事，立即赶到前方。撒离喝打破凤翔后，隔渭河望屯兵大虫岭上的吴璘军不敢进攻；向西去攻泾州，又打了败仗；第二次再战，由汉奸引路绕到泾州宋军扼守的山头后面，泾原经略使田晟所领兵将有当过伪军的，望风溃退，牵动全局，全军才打了胜仗。然田晟所统右护军1万人始终死战，死伤虽多，却没有一人后退。敌兵号称得胜，而伤亡惨重，退回凤翔，不敢再出兵攻击了。宋军粮缺，不能进攻，退守山险，暂时出现了相持的局面。

京西方面的岳家军在顺昌大捷后，大举前进，取得了更大的胜利。高宗本来派了一个李若虚，到岳飞军前，合他不准轻动。岳飞不愿服从，李若虚被他的爱国精神所感动，毅然表示：“既然事势如此，你只顾进兵，有什么问题，由我负错传旨意的责任。”两人商议既定，岳家军就从德安府（湖北安陆）出发了。闰6月20日，岳家军收复了颖昌（河南许昌），24日，又收复淮宁（河南淮阳）。部将张应、韩清等于25日收复郑州，又配合了在洛阳附近坚持抗战的李兴，于7月初二收复洛阳。岳飞连获胜利，自己率领轻骑，驻于郾城，派诸将分路出战，声势很盛。宗弼听见金兵屡败，亲率拐子马15000人，于7月初八日到郾城决战。岳飞知道这是敌人的精锐，不可轻敌，叫步兵拿刀冲入敌阵，不许抬头，专斫马脚。拐子马变成了蹩脚马，金兵就此大败。勇将杨再兴单骑杀入敌阵，几乎活捉宗弼。敌兵还想拚命，岳飞亲自率40骑突战，终于把敌人完全打垮。这是郾城大捷。

宗弼打了败仗，更加气愤，率兵12万，进逼临颖。岳飞进兵迎击。7月13日，杨再兴等领300骑做先锋，小商桥一战，杀敌2000余人，再兴也英勇牺牲。战后，寻得尸首，把来火化，发现他所中的箭，竟有两百枝之多。张宪率兵赶到，于次日一连接仗两次，都得大胜，杀得敌兵连夜逃走。岳飞估计敌人打不赢自己，一定会还兵去打颖昌，赶紧派儿子岳云去帮助守将王贵。果然，不出岳飞所料，宗弼真的于14日亲自来攻颖昌。王贵领游奕军，岳云领背嵬军，在城西大战。岳云是岳家军中

一员猛将，手执一对铁椎，领800骑兵，当前决战，在敌阵中往来冲杀十多次。步兵分左右两翼，也包抄前进。一场恶战的结果，当场杀死金的副统军粘罕等，宗弼再一次大败逃走。这是著名的颍昌大捷。岳家军在中原威名远震，只要各路宋军能够配合，便可以向东京作最后的攻击了。事实上宗弼已战意尽失，遣送老小渡河，在准备弃城而走了。

这是岳家军发展到顶点的时候，也是宋朝抗金战争形势最为有利的时候。主力进到东京附近了。牛皋、董先等在京西、郑州、黄河沿岸，连战都胜。梁兴渡河联络义兵，与太行忠义两河豪杰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在垣曲、沁水二地，连破金军，乘势收复怀州（河南沁阳）、卫州（河南汲县）。山寨首领李通、胡清等都率众响应。磁、相、开、德、泽、潞、晋、绛、汾、隰各地（河北、山西两省南部）人民都约期准备起兵，旗号都用岳字。大河南北百姓都自动运粮，接济大军。河南人民更加公开地顶了香盆，牵牛拉车，运送粮草，欢迎岳家军。燕京以南，金政府的号令已无法推行。宗弼要在河北签军，人民都逃散，没有一人服从。甚至金军内部也有接受岳飞的旗帜榜文，准备投降的。这是北方人民抗金斗争的又一次高潮。岳飞兴高采烈，以为成功就在目前，对部下道："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这决不是空话。从军事上看，这时确实已经发展到长驱渡河、收复北方的前夜了。抗金战争以宋朝的全胜结束，就在目前，然而政权掌握在投降派的手中，高宗秦桧那里肯让岳飞成此大功呢!退兵令下，将士们百战的心力，完全归于虚掷了!

三 绍兴11年的和议

南宋军民奋勇杀敌，大破金军的时候，统治集团的投降派却在加紧进行破坏活动，硬要把胜利变成失败。当宗弼南侵之初，御史中丞王次翁怕秦桧的地位动摇，上奏道："以前国事小有变更，就改用别人做宰相，后任未必比前任好多少，纷纷调动，反而引起许多麻烦。"高宗看了，大为赞同，因此一手促成和议的秦桧仍旧留在政府里。这说明即使在金人食言毁约的时候，以高宗、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并没有改变卖国投降的政策。从以后一系列的行动看，他们决心以放弃河南、陕西为谋取可耻的和平的代价。高宗只在金人进攻得太厉害时，略为抵抗一下，以保全小朝廷为唯一的目标。特务秦桧则勾结金兵，肯为他们干任何坏事。

顺昌大战之时，宋政府一面发表檄文，悬赏捉拿宗弼、撒离喝，以遮盖世人耳目；一面下令使刘锜选择有利时机，撤兵南归，使岳飞不准轻动。大将之中，张俊一人趋奉秦桧，赞成和议，所以淮西一路收复亳州之后，主力就撤退了。刘锜接到诏书时，金军还没有退却，他暂时没有执行命分。金兵退后，刘锜正想乘势进兵，秦桧却下令退兵，把八字军调到长江南岸的太平州。号称淮北宣抚副使的杨沂中奉令退到镇江府，号称三京（指洛阳、开封、归德）招抚制置使的刘光世奉令退到池州（长江南岸的安徽贵池）。各军都撤退了，然后秦桧以孤军不可久留的理由，一天发十二道金字牌，命令岳飞退兵。岳飞气愤道："十年之

功，废于一旦!”没奈何，只得从郾城退兵。中原百姓拦住军马，哭道：“我们顶香盆，运粮草，欢迎大军，金人全都知道。你们一走，我们都完了!”岳飞也悲痛流汨，只得拿诏书给百姓看，说：“我不能违抗命令!”一时哭声振动原野，在哭声中，岳家军沉痛地退出了中原。于是河南境内已经克复的各州，重新落入金人手中，中原豪杰灰心失望，抵抗运动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李兴镇守洛阳，屡次打退汉奸李成的进攻。9月里，李成向宗弼讨得蕃汉军数万人，大举来攻。李兴兵少，只得忍痛放弃城池，退守白马山，与敌人相持。敌军包围山地，在山下屯兵积粮，表示有长期作战的决心。李兴家属在襄阳，身边只有一个男孩，在形势危急的时候，他对将士说：“我们应当死守山寨，万一失败，我决不屈服，决定抱了孩子，投崖自杀。”将士们被他感动，都一致坚守。李兴又派壮士下山袭击，烧掉敌人所积粮食，使李成的主力不得不退回洛阳。这一支孤军在山上坚持了几个月，渡过了严寒的冬季，后来接到宋朝政府退兵的命令，军民万人，突围南下，于1141乍6月中，才回到鄂州。

河东忠义民兵首领王忠植一度收复过若干地方，这时接到胡世将的命令，率部下到陕西。走到延安，汉奸赵惟清假造诏书，把他捉住，交给撒离喝。金军正在围攻庆阳，撒离喝把他押到城下，使他劝守军投降。忠植高声大叫道：“我乃河东步佛山忠义人，被金兵所捉，来到这里，愿将士们决心坚守，我就在这里牺牲了!”撒离喝大怒，忠植拉开了衣襟喊道：“快杀我!”这一位在敌后苦战多时的英雄就在这里杀身成仁了。

大军撤退了，重要的义军受到挫折了，女真贵族的气焰自然高涨起来了。他们创立屯田军，武装移民，把女真、奚、契丹各部族移居中原，夺取汉人田地，和百姓杂处。燕京以南，淮河以北，到处都有武装移民在村落中建筑堡垒，构成无数星罗棋布的据点，以监视汉族人民。宗弼留在汴京，强制征发两河人民和蕃部，纠合十余万大军，作继续南侵的准备。

绍兴11年（1141）正月，河南金军南犯，破寿春，渡淮河。刘锜率兵2万人，马数百匹，从太平州渡江，去救淮西。他到达庐州，见城中无人负责（知州即曾在顺昌与刘锜合作的陈规，时已病死），官吏军民大半逃散。他巡视了一周，知道无法防守，只得退兵。宋军退出庐州的第二天，金军就进了城池，派骑兵追击。刘锜见敌兵已到，令部队结成阵形，徐徐行动，自己率精兵断后。金军追兵望见旗号，想起顺昌城下的战况，心中害怕，不敢逼近。刘锜退到东关，依水靠山，扎定营寨。金兵主力怕他从侧背攻击，因此不敢直逼江岸，只派些小部队到无为军、和州一带掳掠。宋军杨沂中、张俊等到达时才从江南出发。张俊是与韩、岳并列的所谓三大将之一，对时局的态度却与韩、岳截然不同。他在建康，一味拖延，不肯进发。文官江东制置大使叶梦得催他道：“敌兵已过含山，万一被他占了和州，长江不可保了!”张俊不得已，下令出兵。勇将王德自请做前锋，手下将士都鼓舞讙噪，渡过长江，进屯和

州。他和将官赵密、张守忠等在含山、全椒、昭关一带屡次击破金兵。2月18日，杨沂中、刘锜、王德等在庐州以东的柘皋镇和金兵大战，获得全胜。这一仗，金军韩常等部有十余万人之多，柘皋地形平坦，骑兵容易活动，又有宽两丈余的石梁河，妨碍宋军的前进。地形是有利于敌人的，但是宋军各部发扬团结合作、顽强苦战的精神，终于取得了胜利。刘绮军在敌前架桥，先派披重甲、用长枪的步兵几队过桥。大战进行的时候，杨沂中军从上游水浅处渡河，作战不利。王德见敌人右翼是精锐所在，就挥兵渡河，直扑敌阵。王德亲手射杀一员敌军大将，乘势大呼冲杀。敌兵拐子马分两翼包抄前进。两军恶战之中，平庸的杨沂中也有了勇气，有了主意，派1万人挥长斧对付骑兵，打退了拐子马。刘锜、王德继续追击，终于完全击败金军，收复了庐州。

这是一次偶然的胜利。金军的南犯，作用本在示威。宋朝派张俊、杨沂中等渡江，也不过是装个样子。所以柘皋战后，张俊来到前方，立即会商退兵之计。一切事情，张俊说怎样，杨沂中便怎样；刘锜什么也作不了主，甚至他的部队也得不到应有的赏赐。金军退兵，打破濠州，烧杀一番以后，就从涡口渡淮而去了。交战双方，一方北归，一方南退，其中俨有默契。这一点虽则没有确实的文献可作证据，然而蛛丝马迹是显然可见的。

张俊退兵的时候，还打了一个败仗，这就是濠州城下之战。他吩咐刘锜领兵先退，自己和杨沂中到濠州，准备在淮河边上耀武扬威一番，再行南归。他作这决定时，是根据金军已全部北退的消息，走了几里，才知道濠州被围正急。这一下把他吓得手足无措，只得赶紧把刘锜追回来，一同进兵。到了离濠州60里的黄连埠，听见城池已被打破，刘锜主张安下营寨，做好防御的准备，再出兵袭击。营寨安扎好了，张俊派出的侦探都胡说城内没有金兵，于是他又得意起来，认为不必借重刘锜，只派杨沂中和王德领两千多骑兵前往。兵到城外，还没有列阵，就和敌人大队遭遇。杨沂中做主将，挥军便退，造成一幕狼狈溃退的丑剧。

这个和秦桧一鼻孔出气的大将又要卖国，又要贪功，把战争当作儿戏。抗金战争就是被这些人所出卖的。

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南宋统治集团就着手解除大将兵权，并阴谋陷害主张抗战最激烈的岳飞，为彻底投降铺平道路。4月里，宋政府以论功行赏为名，召韩世忠、张俊、岳飞到临安，宣布任韩、张二人做枢密使，岳飞做枢密副使，剥夺了他们的兵权。接着，又派张俊、岳飞到楚州，把原由韩世忠指挥的淮东全军，调回镇江府。于是长江以北的两淮地区完全没有宋军主力了。这是秦桧准备投降的步骤之一。

其次，陷害岳飞的阴谋就展开了。岳飞是对抗金事业最忠诚的人物，十多年中间，始终如一的坚决抗金。对于投降逃跑的路线，他总要挺身出来反对。绍兴9年和议成功后，他还上表反对和议，主张夺回燕云，复仇报国；对于朝廷因庆祝和议成功而升他的官，三次谢绝不受。1140年的河南大战，杀得宗弼丧魂落魄。他这样一个人物，自然要为金

人所忌，为投降派所恨。宋军从中原撤退时，秦桧先撤其他各军，造成“孤军不可久留”的口实，再下撤退岳家军的命令。秦桧做的是卖国的勾当，自己心中有数，非常害怕岳飞的反对。解三大将兵权时，岳飞到临安较迟，秦桧和他的心腹王次翁就神经紧张了六、七天。金都元帅宗弼给秦桧的信上说：“你天天要求议和，岳飞却在打算进取河北，必须先杀岳飞，方可议和。”敌国的主子这样想，卖国贼也这样想，高宗不愿将帅有兵权，不愿打败金人，怕胜利后钦宗回来争位，也怕胜利后岳飞会“尾大不掉”，把岳飞看做眼中钉。加以秦桧捏造消息，硬说岳飞在中原作战时，和住在临安的宗室赵士通信，“踪迹诡秘”，于是高宗更加认为岳飞对于他的统治地位有危险，非杀掉他不可。在这种形势之下，岳飞怎么能不死呢!

秦桧的走狗万俟高第一个起来攻击岳飞，何铸、罗汝楫像疯狗似地乱咬，硬说岳飞奉旨起兵，徘徊不进，妄自尊大，怨恨朝廷。这些空话咬不死人，秦桧、张俊竭力在岳家军中寻觅叛徒，于是王俊向都统制王贵诬告副都统制张宪将在襄阳发动兵变，要求岳飞还军。王贵本来不愿意参与这阴谋，被秦桧的党羽抓住了他的阴私，加以威胁，因此他做了岳家军的叛徒，把这消息向张俊报告，张俊即刻把张宪逮捕起来。秦桧根据这理由，扣留岳飞父子，发交大理寺审讯。岳飞撕破衣服，露出背上所刻的“尽忠报国”四字，以明心迹。然而问官们都是秦桧党羽，把3人百般拷打，搞了两个月，终因毫无证据，搞不出结果。时候将近年底了（公历已在1142年），卖国贼们急于了事，哪里管得什么证据，捏造岳飞有“自己与太祖都是30岁做节度使”的话，加上“拥兵逗遛”的罪状，就胡乱定了死罪。三个将军就这样在12月29日（公元1142年1月27日）被害死了。岳飞死时只有39岁。这件事，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认为冤枉，当时的天下人也都认为冤枉。韩世忠曾与秦桧当面力争，秦桧无法肯定罪状，只能说“莫须有”（也许有）三字。韩世忠道：“莫须有三字如何能使人心服!”话虽如此，高宗、秦桧都要杀他，岳飞仍不能免于一死。

这一面在解兵权、杀岳飞；那一面金人也在配合着行动。9月里，宗弼放还过去扣留的宋使者两人，表示愿意讲和，又发兵渡淮河，打破泗州、濠州等地，催宋朝赶快投降。枢密使张俊在镇江，十分了解对方的用意，不发救兵，以免妨碍和议。岳飞下了狱；韩世忠再三反对和议，毫无结果。韩怕秦桧陷害，辞去枢密使官职，闭门谢客，绝口不谈兵事，以西湖山水排遣愁怀。只有川陕一方面，胡世将念念不忘恢复，指挥吴璘、杨政、郭浩三路军马进兵。吴璘收复秦州，在剡家湾大破金统军呼珊的主力，一时议论都说此战可与和尚原杀金坪相比。杨政收复陇州，郭浩收复华、同二州。陕西、河东忠义民兵数十起都与世将联络，准备内应。这番举动是与南宋国策相矛盾的。退兵令下，三路军马都撤退了。投降的障碍完全被排除了。

11月里，和议成熟，被派到宗弼军前的投降使者魏良臣带还了具体条件。金使萧毅接着南下，船上旗帜，大书“江南抚谕”四字。船只过江，知镇江府刘子羽是抗金多年的爱国官员，见了大怒，派人乘夜换了一面旗。第二天清晨，接伴使魏良臣威胁子羽，向他讨旗。这位官员愤

怒地说：“我做地方官，不能违背朝廷决策，然而在我管辖的地界内，要扯这旗，我是宁死不屈的!”这几句话中含有多少沉痛愤恨的心情啊!这面旗毕竟被扣留到出镇江府境后，才还给他们。金使到临安、宋朝一切都唯命是听，和议很容易地谈成了。

绍兴12年（1142），高宗进誓表给金邦，对金称臣；答应每年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两国领土，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做国界，淮水上游的唐州、邓州和西方商、秦二州的一半都割给金人。和尚原是吴氏兄弟抗金的要隘，胡世将再三强调它的重要，然而金人即一定要，朝廷自然乖乖地给了他。

中国历史上一幕最丑恶的皇帝和大官僚地主降敌的活剧闭幕了。当时人的公论，所世人的公论，一致唾骂秦桧。只有少数别有用心的家伙才众对这公论提出异议。秦桧自称只知道“了天下事”，把主战派说成“诸公争取大名以去”，俨然只有他一个人对国事负责。这种话，没有人不知道是遁辞。只有鼓吹投降的奴才才会赞成高宗和秦桧。在清代，“廿二史劄记”的作者赵翼就认为高宗的投降是不得已，秦桧的话，“不能以人而废言”。他对于秦桧的翻案还不算彻底。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在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投降的政策下，秦桧议和有功、岳飞抗金有罪的谬论就时有所闻了。抗战期间，反动派为了要赶紧投降，好一心反共，美帝蒋帮的走狗胡适就公然出来替南宋政府算帐，认为岳飞是军阀，秦桧是功臣，可说集谬论的大成。站在岳飞的一面，还是站在秦桧的一面，成为爱国者和卖国贼的分界线。人民永远不会为谬论所迷惑，西湖边上岳武穆墓前秦桧的鉄象说明了这真理。一切卖国贼都只能得到这样一个下场：永远为人民所唾骂!

四 20年暗淡的日子

从绍兴11年和议成功，到绍兴31年（1161）金帝完颜亮发动新的侵略战争，这20年使人窒息的岁月，无耻的皇帝和大官僚地主洋洋得意，一切爱国的人士则无不悲痛欲绝。

绍兴13年，高宗生日，宰相率百官上寿，依照承平时的制度奏乐。在他们看来，中兴的事业已经完成，尽可以粉饰太平了。长期被敌扣留的洪皓被释放回南，他对于南宋君臣的用心还很不了解，禁不住问秦桧道：“张浚最为敌人所害怕，为什么不用？钱塘不过是暂时居住的地方，而宫殿太庙建筑得非常华丽，难道不要中原了吗？”秦桧听了，非常不满意。刚从北方回来的人一心只知宋金是敌国，怎知道“南渡君臣轻社稷”的决心呢!

皇帝与大官僚地主对于偏安江左早已十分满意。只要保得住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要什么中原呢!林升旅邸题诗说得好：“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管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诗虽是若干年后的作品，然而诗中所讲的情况这时已经出现了。

无耻的投降派对敌国提出的一切要求，尽量使他满足。金要索取在南方的北人，高宗、秦桧以“守信”为理由，都一一遣返。军官白常被迫北迁后，拒绝为金人服务，不顾危险，自写头衔叫“前熙河经略使白常”，始终不屈。这种情形当时一定很多，可惜大部分都湮没不传了。陈康伯做接伴使，与金使者宗永争了一些仪节小事，宗永向朝廷提出抗议，陈康伯立即以“酬对辱国”的罪名降职。

这一切不能不使爱国的官吏军民愤怒万分，人们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斗争。高宗、秦桧对于爱国者毫无例外地加以严厉的镇压，使这20年的岁月更显得阴森可怕。

岳飞被杀的一年，由于上疏而险被斩首的胡铨第二次被贬，放逐到新州（广东新兴）。张元幹填了—首“贺新郎”词送他，非常悲愤。“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摧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太白，听金缕。”他因此得到大名，也因而受到除名的惩罚。

绍兴13年，洪皓反对遣返北人，又对秦桧提起：金官实讷托他寄语秦桧。实讷深知秦桧在金国的活动，他既认识洪皓，又和洪皓讲到过他，那么阴私大有暴露的可能。于是宋廷把这个初回朝时被称做苏武的人物放逐出去。绍兴14年，将领解潜因议和后常常不快乐，辛永宗因喜欢讲不满议和的言语，不能住在金使往来必经的平江，都被放逐。一时因为语言小事得罪的人极多，秦桧以为这样就可制服天下人了。然而事实证明这是妄想而已。天下人反对议和、反对卖国的正多着哩!

有一个张伯麟在太学的墙上写道：“夫差，尔忘越王之杀尔父乎？”这是代表天下人向高宗本人提出的质问。结果，张伯麟受到了刺配的处分。

有一个保卫商州10年之久的邵隆，于州城割让给金人后，常常秘密派兵，化装出境袭击。秦桧知道后，把他调到内地，后于绍兴15年用毒酒把他害死。这是秦桧惯用的杀人方法。岳飞的旧将牛到绍兴17年时，年已61岁，秦桧对他放心不下，竟使都统制田师中乘宴会把他毒死。

有一个小军官施全，在绍兴20年正月里，在街上拦住秦桧，想把他刺死。他在被捕后慷慨激昂地说：“全国人和金为敌，只有你一个人要屈服，因此我要杀你!”这是代天下人泄愤的行动。秦桧吃了这次惊吓，以后出门，必带5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来保他的狗命。

抗战派大臣张浚被放在闲散的地位多年了，绍兴16年，他打算对时事有所表示；但是他知道说了话一定会得罪，恐母亲年老，受不起刺激，有些顾虑。这位老太太见儿子容貌消瘦，料定他有心事，问明白后毅然鼓励他说话。于是张浚上疏，说明今日的事势像头目心腹间生了大

疽，日子拖得越久，越是危险，劝高宗好好准备应付突发的事变。秦桧见了大怒，把他放逐到连州（广东连县）。以后数年之中，经常指使走狗们诬害他，想要断送他的性命。绍兴26年（1156），秦桧病死，张浚才得安全。

秦桧虽死，和议仍旧是南宋的国策。当时颇有一些天真的人，以为大局将有变化，荆、鄂一带，甚至流传起用张浚的消息。高宗特地下诏，申明政策没有改变。秦桧的死只冲淡了一些恐怖的气息，黯淡的状态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南宋境内的情形如此，在沦陷的中原，空气自然更加阴森可怕了。大规模的武装反抗运动在南北议和后转入低潮。女真贵族正用全力巩固他们在中原的地位。散布中原的武装移民夺取农民的土地，强占农民的耕畜。这是暗无天日的时期，然而也是抵抗的暗潮潜滋暗长的时期。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爆发。1161年完颜亮南侵的前后，中原果然又掀起抗金斗争的高潮了。

第五章 海陵南侵与抗金高潮的再起

一 海陵南侵与女真贵族统治的危机

1161年，荒淫残暴的完颜亮发兵南侵，妄想统一天下。这时女真贵族在北方的统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危机，战事一起，统治集团的内争，各族人民的起义，都立即爆发。侵略反而造成了南宋恢复中原的大好机会。

女真贵族统治北方30多年，对以农民为主的劳动人民，榨取压迫，越来越厉害，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日益高涨的愤怒。在残酷的民族压迫之下，一部分汉族地主阶级光复故国的心愿也长期地存在着。女真贵族本身却迅速地腐化，内部也滋长出深刻的危机。当时北方的形势，总的说来，就是如此。

武装移民是女真贵族压迫汉族农民最主要的手段。前面曾经提起，这办法是从1140年开始大规模推行的。这年以后，移民陆续南下，数量逐渐增加。“金史”“食货志”记海陵正隆元年（1166），派大员11人到山东、河北一带括地，分给所迁的猛安谋克户。这一条简单的记载中不知隐藏了多少中原人民的血泪!

女真贵族为了巩固他们的地位，竭力吸引汉人的上层分子参加统治，封建地主阶级基本上是与他们合作的，但也有少数的爱国者始终没有屈服。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在1140年诞生于敌占区的济南。这时山东陷在敌手多年了，然而他仍从祖父辛赞受到抗金的教育。辛赞在南渡时因族人众多，不能脱身，做了敌方的官吏，然在闲暇时常引子孙们登高望远，指点山河，表示抗金复仇的决心。辛弃疾的岳父范邦彦在金中了进士，设法求得边境上蔡州新息县县令的职位，后来利用完颜亮发动战争的机会，开城欢迎宋军。这些人的行动确实流露着一片爱国的热诚。

少数在金朝做了大官的人，有时也会透露几分天良。1160年，金使施宜生到杭州，宋命张焘招待他。宜生见左右无人，对张焘说：“今天北风很大”又拿笔在桌子上敲着，说：“笔来，笔来。”（笔谐毕音，暗示金将大举南下）宋人因此预先知道戒备。

在北方人民愤恨的环境中，1149年完颜亮杀金熙宗自立，这个以荒淫无道著名的统治者，变本加厉地加深和扩大了女真贵族统治的危机。

这个完颜亮后来被叫做海陵庶人。海陵贞元元年（1153）开始把燕京做国都，改称中都。他又把汴梁做南京，在两地大造宫殿。他狂妄自大，梦想灭掉南宋。他手下的一批混蛋天天谈国家富强，又谈江南如何富庶，临安河山何等可爱，甚至无耻地谈论宋的刘贵妃何等美丽。完颜亮希望得到这一切，不但继续营建宫殿，还要加紧进行军事准备。

金的境内，到处伐木凿石，运送建筑材料的车充塞道路。筑汴京宫室时以2000万的费用运一根木头。—辆车有用500人拖拉的，民夫们往往因劳动过度，死在路上。统治者任意挥霍，用黄金做宫殿的装饰，金屑在空中飞散，好象落雪一般。殿筑成了，视察的宦官对任何地方稍不满意，就命令拆去重造。他们对人力物力的浪费，毫无半点顾惜。他们又要许多物料来制造军器。箭翎的需要量太大了，每1尺值得1000钱。要皮革，要筋，人民不得不杀掉了牛，甚至杀狗杀猪，来供应他们无厌的需索。

为了侵略，从1159年起就征发丁壮马匹了。被征发的马匹沿路践踏田地，把作物当做饲料。女真、契丹、奚3族丁壮，悉数签发，共得24万人，又强征汉族壮丁，蕃汉混合，编成部队。金国又在沿海造战船，强征水手3万多人，妄想从海道进攻南宋。

金国境内的汉族人民无法生活下去了；女真、契丹等族的平民也无法生活下去了。只有女真贵族才能不受征调的骚扰。于是汉族、契丹族的起义不断发生。“金史”“李通传”说当时“盗贼蠭起，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长城以北的契丹族各部以耶律斡罕为首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抗，部队发展到数万人，车辆帐蓬，布满旷野，好象出现了一个敌国。完颜亮的大军还没有出发，他的后方已经到处燃起反抗的火焰了。

女真贵族内部矛盾的发展进一步加深了这危机。女真族从一个小小的部落，发展到灭北宋，再进而占领河南、陕西等地，前后不过10多年。侵略和掠夺进行得太顺利，贵族阶级在极短促的时间里累积大量的财富和奴隶（根据“金史”“食货志”的记载，完颜亮以后的世宗时，在京宗室贵族170户、932口，有奴婢27800人；同书又记猛安谋克户615624，正口4812669，奴婢1345967人），很快地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恶习。太多太快的胜利使他们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以为自己的暴力可以达到任何目的。在统治集团的中间，由于争权夺利，更钩心斗角地自相冲突，演出许多事变。

绍兴年间的两次和议，发生于金朝第三个皇帝熙宗完颜亶的中叶。那时最高级的贵族大半沉溺于富贵之中，能够担任军国大事的只有兀术一个，自相屠杀的政变已经开始发生。熙宗晚年酗酒乱杀，完颜亮乘此机会，夺了帝位。他做了皇帝，首先屠杀大批宗室。太宗吴乞买的子孙被杀的有70多人。完颜亮“淫嬖不择骨肉，刑杀不问有罪”（“金史”“海陵本纪”），闹得人人自危。萧裕是他的死党，首先劝他杀熙宗，后来做了丞相，权势极大。海陵本来极信任萧裕，萧裕却因为海陵的兄弟完颜兖常常注意自己的工作，怀疑海陵本人对自己起了杀心，竟阴谋发动政变，结果被杀。太后徒单氏反对侵宋，海陵勾结她的侍婢高福娘，把她的一言一行都向他报告，最后竟杀害了太后，因此又大杀了一批太后方面的贵族。大贵族们对于这个暴君早已恨极了。

完颜亮发动侵宋战争时，对女真、契丹、奚3族的丁壮，完全征发，人家有父母年老、兄弟多人，要求留一人在家的，也不准许。地位

低的贵族和3个民族的平民没有一个能够逃避兵役负担。这些人怨声载道，都想挣脱这个暴君的束缚了。大兵一动，逃亡的将士就在路上络绎不断地向北去了。万户完颜福寿等在河北大名领到了衣甲兵器，就带着全部人马逃走，跟着走的一共有万余人，在路上公然宣称："我们到东京（辽阳）去立新天子了!"完颜亮大军才到淮河北岸，金世宗完颜雍已在东京即位，把正隆6年改做大定元年了。采石大战的前夜，黄河以北已完全接受新政府的命令，留守汴京的金官已把这消息飞报军前。海陵虽则仍旧盲目南进，事实上他的统治已经瓦解，继续作战不过是垂死前的挣扎而已。金世宗初立，大杀完颜亮方面的贵族，境内汉族、契丹族的起义正在发展，各地官员和南征军队对新政府的态度一时还不明朗，这个政权也不能算是很巩固的。事情很明白，只要南宋政府略有决心，略有办法，恢复中原绝不是一件难事。

二 采石大捷

1161年的战争，宋朝是很早就得到警报的。1159年底，金使施宜生已经泄了兵机。1160年中，各方谍报都证实金确有南侵的决心。高宗虽将信将疑，也不得不令两淮诸将加强戒备了。然而所谓戒备，只是一句空话，实际上没有做什么。绍兴31年（1161）五月，金使高景山、王全到来。两人态度骄傲，使人测量沿淮闸面阔狭，察看淮河水面。到了临安，王全上殿，目中无人地高声传达金国旨意，索取淮南土地。这一番虚声恫吓，是完颜亮的心理攻势。

宋朝政府匆匆议论对策，宦官首领张去为献计，主张逃往福建四川，人情惶惑，动摇不定。这时大臣中主战派陈康伯等得势，高宗为了半壁江山的统治权，也只能倾向抵抗，然而他基本上希望委曲求全，所以一面调兵遣将，一面派遣使者，想进行谈判。不料金国决意用兵，拒绝使者入境，于是高宗只得硬着头皮抵抗一下了。

论当时南宋民心，抗金复仇，应当是有把握的。奉命去交涉的周麟之说："天下人不论贵贱老幼，智愚勇怯，告诉他用兵复仇，就面有喜色；告诉他屈服求和，就怒发冲冠。"这是当时人的一般情况。太学生宋苞主张：杀金使，下诏宣布复仇决心。凡以往主张和议的大臣，一律明正典刑，开秦桧的棺木，戮他的死尸，抄没秦家财产充军费。恢复岳飞的官爵，录用他的子孙，来激励军民。使诏书下后，东南的人民无不怒发冲冠；西北的人民无不感激流涕。其余太学生程宏图、布衣何宋英等也都上书主战。他们要求的不是不死不活的消极防御，而是主张乘此机会，改变国策，动员全部力量，实现恢复中原的中兴事业。

腐朽的南宋朝廷是不足以语此的。高宗一面下诏，希望官兵捐躯报国，"共雪侵凌之耻，各肩恢复之图"一面却在沿海建造御船，预办一条走路。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到建康督视江淮军马，是大帅的身份。他口头上主战，但是不懂军事，又没有胆量。到了镇江，听得金兵已到对岸，慌慌张张地令民夫在江边沙滩上掘1尺多深的沟，沿沟插些木头做鹿角。民夫们一面做工，—面笑道："枢密吃肉，见识却不及我们吃糠的，

一夜涨潮，沙沟全平，木头全流去了。”北岸激战时，他吓得面无人色，下令立刻出发，口说：“往建康府催诸军起发。”镇江居民眼见这等卑怯的形态，忍不住高声辱骂。他走到下蜀镇（镇江西30里），得到金兵占领北岸瓜洲渡口的报告，再也耐不住惊慌，连忙问：“有山路可通浙东否？”将士们大叫道：“枢密不可回!”他手下亲信恐怕兵变，劝他勉强逃到建康。

皇帝和督视军马的枢密如此，重要的将军们也很少出色的。议和20年了，当年的宿将韩世忠早就死了，刘锜、吴璘都老了，都身有疾病。淮西一路，地形平坦，是金人进兵的主要路线。担任守备的都统制王权接到进兵命令，就对姬妾啼哭，把细软家私收拾上船，准备逃走。刘锜几次令他进向寿春，他先设法拖延，后来没法了，也只进到庐州。等到听见金军势大，他先退和州，再退就过江到采石了。韩世忠旧部农民出身的成闵，过去是一员难得的勇将，此刻也富贵了，腐朽了。宋朝用这等人掌握重兵，如何能打胜仗!

8月里，完颜亮发32总管的大军，分路南下。西路金军并非主力，不过是佯攻。四川宣抚使吴璘一得警报，这位年将60、身患疾病的老人却立即上杀金平，布置军事。不久，因病势关系，暂时还到兴州（陕西略阳）。双方情势如此，所以在1161年内，这方面的战事没有什么重大发展。金军的主力出寿春，走淮西一路。身患重病、只能吃粥的老将刘锜从扬州到淮阴，守住淮东一面。他这里和金兵隔一道淮河，相持不下。王权却已经大踏步后退，10月初9日深夜，退出庐州；21日，已从和州登船渡江了。刘锜得到金字牌传下退军备江的命令，也只得一步步地后退，16日从淮阴退兵，19日到扬州，23日放弃扬州，迟到瓜洲镇。金统军萧琦进了扬州，便金军来争瓜洲渡口。26日，发生了皁角林之战。刘锜部下的左军统领员琦在运河沿岸阻击金兵，在林中设下埋伏，用强弩射击。萧琦陷入重围，死战得脱。河岸狭仄，骑兵冲突不便，金军只得后退。这一战，宋军俘敌数百人，是个小胜仗，但是一向却号称中兴十三处战功之一。刘锜在瓜洲留了4天，便退回镇江。到11月4日，瓜洲也失守了。这时北岸各地相继失守，将军们一面败退，一面不断报捷。建康街上人都说：“天天听见捷报，可喜；但是一报近如一报，也很可忧。”高宗听见兵败，打算解散百官，上海船逃跑。如果不是陈康伯、虞允文等坚决主战，金军内部危机虽深，江南人民是不免要吃到一番苦头的。

11月里，完颜亮在和州赶造战船，准备从采石渡江。宋军王权部原有5万人，迟到采石的只有兵18000人、马数百匹。王权已被撤职，新任都统制李显忠还没有到任，部队没人统率，形成无政府状态，一时局势非常危急。

这支宋军原是能征惯战、愿意保卫国土的部队，只因王权望风先逃，造成溃退的局面。部分将士在撤退的过程中，曾经主动地给敌人以一些打击。退出昭关时，金兵铁骑追到，统制姚兴领本部兵力战，孤军苦斗，杀敌数百人，最后壮烈牺牲。退出和州时，王权早已弃军先走，

情势非常混乱。统制时俊断后，用弩伏击追兵，掩护部队撤退。将士们渡江时，都愤怒叫喊，骂王权不战误国。他们有打胜仗的潜在力量，只恨没有人领导。虞允文在这个严重的关头赶到采石，临时担当了指挥官，发挥了将士的力量，于是出现了采石大捷。

虞允文是个文官，以中书舍人参谋军事的身分到采石犒军。11月初七，他在离采石十余里的地方，就看见官军零零落落地坐在路旁，问他们，大家都说："我们都是骑兵，王将军弃了马匹过江，现在没有了马，我们不会步战。"一味逃跑的将军把兵士都弄得心灰意懒了。允文的手下都劝他还建康，不必代人负责。允文不听，一直飞驰到采石江边，望江北敌营，看不见它究竟延伸到什么地方，检点部队，却只有这一点人。然而虞允文并不退缩，召集将士，鼓动他们道："万一敌兵过江，后退也没有生路，现在有长江天险，何不死中求活!朝廷养兵30年，难道不能一战报国吗？"统制们都说："谁不肯战？只恨没有人做主!"于是允文宣布朝廷已另派李显忠做主将，显忠素来有忠勇的名气，将士们听了都高兴起来。允文进一步慨然表示在显忠到军以前，自己暂时负责，和将士们努力与敌人决一死战。经过这一番工作，垂头丧气的散乱的人群变成了磨拳擦掌、踊跃争先的队伍了。步骑兵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江边，海鳅船排在江中，准备迎头痛击来犯的敌兵。

这边布置刚完，金兵已在渡江了。敌人把和州民房的木料，都拆下来造船，所造的船，底很阔，到了江中，摇摆不稳。完颜亮不顾本身的一切弱点，只看到王权望风逃走的情形，以为南岸的宋军，看见金兵渡江，自然会得逃光。11月初八，他耀武扬威地手执小红旗指挥兵船，一艘艘首尾相衔，从杨林河口进入长江。船上兵士的视野起初被南岸的高地阻隔，看不见宋军，等到将近南岸，见宋军队伍整齐，大吃一惊，要想后退，也来不及了。少数敌兵上得南岸，冲击宋军。允文勉励将士出力，勇将时俊见允文亲临战地，就挥双刀出阵迎战，将士们人人死战，把这股敌人消灭干净。江面上官军的海鳅船都由当涂县的民兵踏车，军人和民兵们谈论，都说："只有齐心力战，才能求得生存。"敌船杀到，海鳅船冲入船群，把他们截成两段。官军高呼道："王师得胜了!"将士们勇气百倍，痛击金兵。渡江的敌人大半死在江中，少数逃回去的也都被完颜亮发怒打死。第二天，虞允文指挥舰队，监视杨林河口，用神臂弓射敌。船中敌兵逃上岸去，多半被射杀在烂泥中间。允文又派人在上流放火，彻底消灭了金兵残余的船只。这就是著名的采石大捷。

凶暴的完颜亮惨败之后，妄想用高官厚禄，招降王权（他还不知道南军换了统帅）。信到南岸，恰巧李显忠也到，允文写了一封回信，即由显忠署名，大意说："现在统兵的是李显忠，你岂不知他的名字!如果敢往瓜洲渡江，也不必虚声恫吓，但备一战，以决雌雄。"两名女真俘虏把信带到江北，完颜亮见了大怒，就移兵瓜洲渡口，想夺镇江了。

镇江原有刘锜镇守，但他的病势很重，事实上已经不能办事。虞允文知道防务空虚，把部队移交给李显忠后，就分兵赶往镇江。他到防地后，恐怕车船临时发生障碍，派人试踏。这种船不用橹桨，装有车轮，

用人脚踏，行驶如飞，是中国古代人民重要的创造发明之一。车船在江中绕金山上下试航3圈，行驶回转都迅速灵巧。金军在北岸望见，都觉得害怕。他们眼见这里江面比采石宽广，南岸早有防备，渡江明是一条死路。完颜亮用惨酷的军法，下令逃亡的要杀，限期渡江，敢落后的要杀。军中人心动摇，于是一部分将领率众起事，杀了完颜亮，派人送信到南岸，用都督府的名义，表示退兵讲和。于是金兵陆续撤退，江淮方面的战争基本上结束了。

论这时的形势，宋朝如果大举北伐，确实可以建立中兴事业。但是高宗本来没有决心，他虽于绍兴32年正月进到建康，似乎准备恢复中原了。然而这时金新政府的使者南来，于是高宗对宰相们说出真话来了，“朕料此事终归于和”。他随即回到临安，恢复的大事业又化为画饼了。

三 北方抗金斗争的新高潮

1161年江淮方面的战争，以东南激昂的人心，全部的国力，只得到一个保全偏安局面的结果。这全是南宋政府所造成的。在北方，人民自发的抗金斗争，在完颜亮南侵以前，早已发动；到南侵发动以后，斗争的波澜发展得更加壮阔。极少数宋军将领发动的主动的攻击，又替他们增添了不少声势。这一番斗争的高潮，如能好好发挥其作用，女真贵族的统治决计是保不牢的。

北方人民武装的抗金斗争实际上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不过在金的统治较巩固、压迫榨取不十分严重的时候，形势此较缓和。1160年，完颜亮准备南侵，榨取空前严重，斗争就逐渐走向高潮了。

东海县人民张旺、徐元首先举起了义旗，使完颜亮不得不派新编的水军去进攻。这次起义虽则不过支持了3个月，然而声势并不算小。义民李秀曾派人到楚州求宋军援助，宋朝官吏害怕生事，竟不敢理会。太行山一带契丹族人民边六斤、王三等起义，他们10多个人，骑了马，张起旗帜，白天公然在大道上行走，金军都不敢惹他们。宋使者叶义问到北方时听得他们攻破卫县，回国途中又听得他们攻破邯郸。北方各地，义军到处起来。他们打破了州县，把府库中的财物拿出，使人民自由选择，爱拿什么就拿什么。穷苦的人民都欢迎起义军，只有地主阶级和女真贵族反对他们。当然，爱国的汉族地主为了抗金，也有参加义军的，不过他们的行动与穷苦人民的行动是有区别的。

为了镇压起义，完颜亮派24名护卫，各率5000兵士，分驻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各处冲要地方，专门捕捉“盗贼”。然而这种措施根本没有什么效果，随着备战工作的进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起义军的声势越来越浩大了。

1161年，北方契丹部落的起义，等于平添一个敌国，已如上述。宋朝的忠义人魏胜克复海州、也在山东淮北开创了一个不算小的局面。这

些起义都牵制了相当大的一部分金军。

魏胜原从弓箭手出身，宿迁人，住在淮东重镇的山阳（即楚州）。他曾经私渡淮河，借经商为名，打探金国情形。这时他见金兵即将发动南侵，知道有机可乘，就带了平日团结着的300个义士，渡过淮河，兵不血刃，取了涟水军。淮北人民本来不甘忍受压迫，常有渡河归宋的，此刻魏胜一到，自然纷纷响应。他率众进攻海州，宣布用兵的宗旨。被金官强迫守城的人民听了，就开门迎接义军。郡守率少数兵士顽抗，很快就被歼灭了。他继续招降了附近的东海、沭阳等县，自称都统制，扩充部队，编成5军。这时还在8月初，完颜亮的大军还不曾出发。魏胜虽把消息传达到宋境，官吏们害怕生事有罪，非但不接济，甚至于不向临安政府报告。一连几个月，魏胜一军独力作战，一度攻入山东沂州（山东临沂），夺获大量军器衣甲，用来武装自己。金兵用1万多人反攻海州，被他击败。山东人民听得风声，都想前来归附，到处建立山寨，自行结集。沂州苍山的山寨被围，魏胜亲自提兵去救，手执大刀奋战，敌兵无人敢当。完颜亮要渡淮南下，怕魏胜军从后面袭击，派重兵围攻海州。宋将李宝恰于此时到达，和魏胜一同打退了这股敌兵。

李宝早年是岳飞部下的忠义人，奉岳飞的命令回山东招兵，后来就近改受韩世忠指挥。这时李宝虽已做到浙西马步军副总管，却还保持着20年前勇锐的气概。他得了金国在山东造船，准备由海路进攻的消息，就向高宗要求出其不意，发动一次主动的袭击。他带水军3000人、海船120艘，8月初就打算出发，被刮风所阻，延迟到9月中。他的儿子李公佐带着心腹部下老早就到北方侦察敌情，已经带回了魏胜的消息。临安因此而知道敌后有这一支兵马；李宝因此而知道前去接应。10月初，李宝在东海县登陆，亲自拿了槊，走在兵士前面。战时，人人出力死战，都能以一当十，和魏胜里应外合，打了一个大胜仗。

战后，李宝派人到各处联络义兵。当时山东豪杰开赵、明椿、刘异、李机、李仔、郑云等都起义聚众，他们听得宋朝正规军前来，都非常高兴，派人和李宝联系。济南耿京也在这时发展了一支强大的义军。他起初结合李铁枪等6人上山，逐渐发展到几十人。另有一个贾瑞，纠合了几十人，和京合兵。这一支小小的队伍迅速地扩编到26万人。22岁的辛弃疾就在这时聚了2000人，参加了耿京的部队。一时山东境内，义军声势浩大，金朝的统治已经接近崩溃了。

山东以外的地方，义军也在起来。高平（山西高平）人王友直联络豪杰，自称承宣使河北等路安抚制置使，招得义军数万人，在9月里一鼓作气，打破了河北大名府。一个管盱眙军淮河渡口的小军官夏俊，和一个退职官员张政，聚了180人，在战争刚爆发时，渡淮河，夺得了泗州。其余起义的多到无法计数，总之，黄淮两大流域的人民都已奋起，形成一个抗金斗争的高潮了。

他们的斗争不断的取得胜利，李宝歼灭金的全部舰队，魏胜保卫海州的一系列胜利，是有文献可据的主要战绩。

李宝北上的目的原在打击金舰队，以主动的攻势消灭可能由海道来犯的敌人。他在海州做了一番联络义军的工作后，就登船出发，到密州（山东诸城）胶西县唐岛去了。这支金舰队有几百艘船，扯超帆来，一连好几里路，望上去象锦绣一般，声势是很盛的。但是女真人到了船上，畏惧风浪，只是睡在仓里，动弹不得。水手全是被强制征发出来的汉人，对金兵恨得咬牙切齿，一心希望宋兵到来。因此这支敌兵，表面上虽很强大，其实一点都不可怕。李宝到离唐岛30里的石臼岛，就有几百个水手前来投降，把金军的虚实讲得清清楚楚。宋军知道了敌人的底细，士气格外高涨，便于10月27日发动进攻，一路上大家预先执了兵器，准备一见敌人就好厮杀。舰队逼近了，对方船上的女真人问是什么船，水手骗他们说是自己人，于是金兵照旧躺在船里，静候灭亡了。宋船直开到敌舰附近，才突然擂起震天的鼓声。敌人措手不及，慌慌张张地起锚张帆，前来抵敌。宋军用火箭乱射，风紧火急，船又都靠在一起，顷刻之间，数百艘船，大半起火。少数没有着火的还想上前，宋军跳上敌船，用短刀击刺，把敌人全部歼灭。汉族水手大半脱去衣甲，跳水游上岸去，其中自然不免沉死了一些。这一仗，宋军大获全胜，俘获敌高级将领完颜郑家奴等6人，消灭了敌人的全部舰队。完颜亮的从海道直指临安的梦想完全破产了。英勇的将军、英勇的士兵，尤其重要的是始终反抗女真贵族的中原遗民，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因此争取到了这个光荣的胜利。

魏胜守住海州，向南与宋朝联系，向北呼应山东义军，都很便利，加以兵精将勇，成为完颜亮后方的一大威胁。金兵一次次派遣重兵来攻，都被魏胜打退。这个善用大刀、能够左右开弓的将军的威名一天天响亮起来。他的旗帜上大书“山东魏胜”4字，金兵望见了，就害怕逃走。在长期的战斗中，他创造了如意战车、炮车等战具。如意战车行军可以装载辎重武器，作战时可以掩护士兵。野战时，把如意车排在阵外，炮车、弩车排在阵中。敌人在几百步以外时，先放弩、炮。他用的床子弩，箭镞有凿子般大，一箭可以杀伤好几个人。他用的炮，用火药的力量发射石块可达200步。在使用火药作战的历史上，魏胜也是一个重要人物。敌兵逼近时，步兵突出阵门迎战。骑兵等两军混战时，从两翼包抄夹攻。得胜就拔阵追击；如果战况不很顺利，士兵可以退入阵内，轮流休息。这一套作战的方式，进退都很方便，是他和将士们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这—切都说明魏胜是从人民中产生的天才军事家。

当金军后方斗争非常剧烈的时候，当完颜亮主力已经进到淮南的时候，以统制赵撙为首的一支宋军，看出河南空虚，可以乘机袭击敌人的后方。这支兵从信阳军（河南信阳）出发，渡过淮河，一鼓作气，攻下了蔡州（河南汝南）。武昌令薛季宜献计，主张乘势下颖昌，直取汴京。这条计如果真能实行，和南宋主力军沿江的抵抗以及大河南北义军的活动相配合，大局将完全改观，至少宋朝可以收复黄河以南的失地。然而湖北京西宣谕使汪彻不用这条计，大将成闵已经奉命策应健康，他暮气已深，只要能够东归，就非常高兴，那里有进取汴京的意思。赵撙一支兵，只有6000人，扼守蔡州，被金军数万人所围，苦战100天，战死400余人，受伤的3700人，能战的只剩下2000人，仍旧把优势的敌人

打退。金兵一度攻入城内，赵撙率领士兵巷战。效用王建带了11个敢死队，冲上敌兵占领的南部城垣，死战了几个时辰，还相持不下。小将王世显又带了40名敢死队，继续杀上城垣，杀死两名敌将。城上的金兵大乱，大半跌下城去。城内金兵溃退，争先恐后地逃出城门。逃不走的聚在毬场中有1000多人，全被歼灭。宋军这种顽强苦战的精神证明了人民拥有强大的潜在军事力量，足以打败任何强敌。然而大官僚不愿意进取，绍兴32年（1162）2月，赵撙奉令班师，艰难百战收复的土地又被放弃了。不愿意再被奴役的蔡州居民大半跟着宋军撤走，人民以实际的行动表示了坚强不屈的态度。

四川宣抚使吴璘虽则年老多病，却不断指挥各军进攻。到绍兴32年6月为止，金州路收复了商（陕西商县）、虢（河南灵宝）、陕（河南陕县）、华（陕西华县）4州；兴元路收复了甘肃东部秦州（天水）等12郡；只有大散关方面因金人重兵扼住凤翔，没有多少进展。采石大捷的统帅虞允文接受了川陕宣谕使的新职，和京西、荆南、四川的统兵大将会商，作进取中原的打算。被废弃多年的抗战派领袖张浚在各方面的要求下也被起用了，他坐镇建康，一心要谋恢复。这一切事实表示大局正在好转，人民雪耻报仇的日子似乎已在眼前了。

然而希望很快都落空了。求和是南宋朝廷的基本政策，少数爱国将领不能使大局起根本的变化。敌人后方的义军组织力不够强，分散作战，号称联络，而不能真正地组织各部，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宋军的北伐上面。北伐成为画饼，义军的声势就逐渐衰落了。

深入山东的李宝在知道完颜亮渡淮南下的消息时，就从海道退兵了。这一次撤退在海州曾引起人民的惊慌。1162年中，议和使者南北奔驰，义军知道恢复无望，渐渐泄气了。金世宗为瓦解义军，下令：“在山者为盗贼，下山者为良民。”失望的人们渐渐散归家乡。某些品质恶劣的分子甚至贪金人的赏赐，变节投降。耿京就因此被手下的叛徒张安国所杀害。从地主阶级出身的义军首领缺乏坚持斗争的信心，多数利用时机南归宋朝。王友直的部队散了，到江南的只有30多人。辛弃疾起义后劝耿京南下，奉命到江南接洽。他在建康见过高宗，完成任务，要回军中，才到海州，耿京已经被杀。这位勇敢的青年约了王世隆等50骑冲入金营，乘叛徒张安国和金将宴会的时候，把他抓到马上，就飞驰而去。辛弃疾毕竟把叛徒押到临安，明正典刑。然而瓦解了的义军却无法恢复了。

西北方面的虞允文和吴璘是在继续战斗，然而金使已到临安，宋也决定派使者去贺金世宗登位。虞、吴两人的行动显然并不代表南宋的国策。绍兴32年12月，班师令下。这时高宗已经禅位给孝宗赵昚。孝宗隆兴元年（1163）正月，吴璘奉令退兵，被金兵从后袭击，损失很重。新收复的土地又沦陷了。士兵忍不住痛哭，声振原野，然而大官僚地主阶级只要保得小朝廷的苟安，就心满意足，谁去关心人民的哭声呢!

北方抗金斗争的高潮就是这样地衰退下去了。

四 符离战役与隆兴和议

孝宗初立时，南宋政府内部和战两派曾有一番斗争，主战派暂时取得一点优势，于是有隆兴元年的北伐。符离之战，宋军大败，投降派乘机抬头，重订和约，这就是所谓的隆兴和议。

隆兴元年的北伐决定于4月中，完颜亮的战败和被杀发生于绍兴31年11月，时间上的距离将近一年半。这一年多的时间是值得珍惜的啊!本章第一节曾经指出：金世宗初立时，政权很不稳固，是南宋恢复中原的最好机会。这个政权明知本身的弱点，一面用议和做缓兵之计，—面设法巩固自己的地位。它用欺骗的手段来瓦解中原义军；它派大军先去解决长城以北的契丹人。一年以后，中原义军的声势衰退了，契丹人的起义已被扑灭了，金世宗的政权渐趋稳固。绍兴32年11月，金国大将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移北征大军南下。金国安然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宋朝大官僚地主主和误国，使北方人民无法摆脱残酷的民族压迫，他们的罪恶实在大极了。

隆兴元年3月，那时吴璘已经退兵了，纥石烈志宁向宋朝索取海、泗、唐、邓、商五州土地和岁币，要求一切依照秦桧所订和约办事，否则发兵夺取两淮。这俨然是战胜者的口吻。宋朝主战派首领张浚竭力主张主动地发动攻势，于是出现了一次小规模的北伐。

在宋朝内部，由于1161年的战争，主战派确有抬头的现象，废弃多年的张浚、胡铨等都被起用了。然而这仅是表面现象。前面讲过，高宗的抵抗，本来是不得已而出此的，所以金世宗的使者一来，和议就开始了。以后朝廷中所关心的主要是在什么条件下讲和的问题。绍兴32年6月，孝宗即位，召见张浚，封他做魏国公，似乎有恢复的意思。然而在政府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主和的史浩等，和议仍在进行，退兵令仍在发出。到了这时，张浚和史浩在孝宗面前反复争论。最后，孝宗同意了张浚的主张，不通过宰相，直接发出进军的命令。主战派暂时占了上风，然而在大官僚地主阶级中是没有坚实的基础的。

这次北伐规模很小，实际上是一种尝试性质的行动。当时李显忠、邵宏渊2将献计进攻虹县、灵壁（安徽泗县、灵壁），孝宗就命张浚指挥2将，先取两城。

两将分路出兵，隆兴元年5月12日，李显忠一战收复了灵壁，进城以后，宣布吊民伐罪的宗旨，不杀一人，于是中原遗民又不断前来归附了。邵宏渊围攻虹县，打不下来；李显忠派降兵前去劝说，金国守将马上投降。这个邵宏渊见显忠有功，已经十分不快。恰巧他手下的兵士抢夺降将的佩刀，被人告发，李显忠要整顿军纪，要收拾降人的心，立刻把这兵士斩首。因此邵宏渊对他格外不满，非但不想怎样协同作战，而且处处跟他捣蛋了。

李显忠继续进兵，在宿州附近大破金军。邵宏渊在战斗结束后到

达，只是假意恭维李显忠道：“招抚真关西将军也。”显忠引兵攻城，他又不肯助战，仍由李部于16日独力收复了宿州。

这次出兵，连下3城，孝宗写信给张浚道：“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关西将军的功劳确实不小。这位将军当时已有55岁，他原是绥德军（陕西绥德）人，在20岁以前，就跟父亲永奇在陕西抗金。延安失守后，金人使他们继续做军官，他们时刻不忘寻觅反正的机会。绍兴8年（1138）12月，显忠在同州，乘金左监军撒离喝路过的机会，捉他上马，带了几十名心腹，想逃往吴玠军中。金兵发觉来追，他见众寡悬殊，料想不能抵敌，就和撒离喝折箭发誓，要他不杀同州人民，不害李氏家属。撒离喝一一应允，显忠把他留在路边，疾驰而去，一面派人飞马去告诉永奇，叫他逃走。撒离喝后来把赌的咒赖得干干净净，李永奇全家200口因为得到消息较迟，走到延安城郊，就被追兵赶上捉住。他们大部分被杀死，也有被掳去做奴隶的。显忠要归宋朝，有金兵挡路，只得先奔西夏。到绍兴9年6月，他借了夏兵，到延安报仇，不料宋金已经讲和，陕西已属宋朝。他只得退了夏兵，自己到临安见高宗。归朝的目的达到了，在延安也杀了两个害他父母的汉奸，然而国难家仇，实在都没有报得。归朝之后，秦桧当国，一直没有他扬眉吐气的机会。然而他忠义勇敢的声名却早被天下人所知道，因此采石战前，部队听见他来统军都高兴；虞允文答复金人劝降的书信，也举出他的姓名来。这一次，在张浚的支持下，统兵北伐，雪三、四十年的国耻，报20余年的家仇，都在此一举。关西将军应当痛快极了。

但是北伐并没有得到整个朝廷的支持，宋朝将领又多半腐朽，关西将军的努力很快就落空了。宿州克复后，宋朝任命李显忠做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做副使。这个为私废公的邵宏渊一心一意要破坏显忠的事业，造成了一次大溃退。当时金将仆散忠义在汴京，纥石烈志宁和孛撒领兵10万反攻宿州。5月22日李显忠率兵迎战，用克敌弓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邵宏渊非但不战，反而煽动将士们道：“这样炎热的天气，在阴凉地方打着扇子还当不住，那里能够在烈日下披甲苦战呢？”于是人心混乱，阵绥动摇起来了。这一天，整日苦战，相持到夜里，宏渊的儿子统制官邵世雄和其他几个军官带兵逃走，显忠不得已，退入城内。好几个统制官见两个大将不合作，乘乱逃走，溃兵自相践踏，损失已是不小。第二天，金兵攻城，显忠和本部将士竭力抵敌，杀敌2000多人，尸首堆积如山。城东北角敌兵20余人已经冲杀上城，显忠亲自拿了兵士的大斧斫击，才完全打退了一次猛烈的进攻。邵宏渊继续进行破坏，宣称金添生力军20万人前来，如何是好!显忠知道大势已去，只得乘夜退兵。金军占领了宿州，派兵追击。宋军士气沮丧，在符离被敌兵追上，大败溃乱，跳到河里溺死的不计其数，军实辎重尽都丧失。胜利的进军变成混乱的溃退，邵宏渊实在可杀。这决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因为邵宏渊式的将领正多着哩!

一败之后，北伐没有希望了，然而张浚收拾残部，分派诸将，防守两淮，保持一个对峙的局面是不成问题的。朝廷中的投降派却乘此抬头，大官僚地主纷纷攻击张浚，秦桧的党羽汤思退做了宰相。主战派王

十朋昂然起来，为张浚辩护，就被调到外面去了。隆兴2年（1164），张浚解职，不久即死，他得病时，写了一封遗书给儿子道："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淮北的海、泗、唐、邓4州被放弃了，名将魏胜被调到楚州，受庸懦无能的刘宝节制；议和使者北上了；边境的防御也都松懈了。

这年冬天，金兵进犯淮南。魏胜引兵迎战，派人向刘宝求救。刘宝认为正在议和，决无此事，按兵不动。魏胜孤军苦战，中箭而死。这位将军明是死于金兵之手，实际上是被大官僚地主们害死的。

孝宗听得金军犯境，居然把汤思退撤职；然而同时却派使者到金军，答应割让商州（海、泗、唐、邓已放弃），称叔侄之国，岁贡改称岁币，银绢此旧约各减5万。金人满意，于是战事完全结束。明年（乾道元年、1165），使者到金呈递国书，和议成功，这就是所谓"隆兴和议"。

孝宗是比较倾向恢复的，为什么也这样做呢？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汤思退被撤职后，太学生张观、宋鼎、葛用中等上书，要求杀汤思退等，重用虞允文、王十朋等，以全力抗金。这些人的言论是符合于当时人民的要求的。人民要干涉政府的决策，皇帝和大官僚地主是最恨的，所以孝宗勃然大怒，打算严厉镇压一下。大官僚地主们恐怕激而生变，竭力劝解，才没有闹出大事。统治集团既然这样仇视人民，自然要以对外求和、集中全力安内为上策了。从徽钦二帝到高宗、孝宗，从李邦彦、白时中到汤思退，都是这条路线的拥护者，因为这是与他们的阶级利益最符合的政策呀!

第六章 南宋境内的农民战争

第一节 钟相、杨幺领导的农民起义

一 南宋初年两湖地区的社会矛盾

北宋灭亡后，北中国陷于女真贵族的野蛮统治之下，民族矛盾一度上升为主要矛盾，汉族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金起义，他们组织了“红巾军”、“八字军”等人民武装，到处打击金朝统治者。在南中国，情况就比较复杂，一方面，新建立的南宋政权，从本质上看，它是北宋政权的延续，依旧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剥削，因而阶级矛盾并未缓和；另一方面，由于女真贵族不断南侵，对汉族人民进行烧杀抢劫，特别是地处战场之一的荆湖地区，更是饱受战争之害，因此，民族矛盾也严重存在。

《钟相杨幺佚事》：“靖康之难，中原衣冠，随皇舆而南迁，其寓鼎州者，比比皆是，州县希旨，备加优容。而一二扈从之臣，其子若侄，倚势恃强，鱼肉细民，侵占湖沼淤地，筑垸为田，延袤百里，悉为势家所有，而本土桀黠之民，投充爪牙，献谋割剥，凡港汊舟船停泊及捕取鱼虾，悉勒索利贿，有不从者，立施箠楚，官府曲庇，莫敢谁何。势家收田租，视他地倍蓰，虽遇凶年，亦无减免。故佃户终岁勤耕，而完租之日，即有枵腹之虞，遂称贷于势家，至明年谷熟，倍数还之，往往以负债多，迫于催索，或典贴妻女，或自经沟渎，或沦为乞人。……民不独苦于赋役，尤苦于赋外之赋，役外之役，颠连憔悴，无所告诉。所谓赋外之赋，乃于正赋之外，以犒军而赋，以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而赋，吏胥追呼，虽鸡犬不得宁矣。所谓役外之役，乃民户既出庸钱，复有差役，名色不一，难以究诘，差一及身，既废耕稼，又耗资财，而民无以聊生矣。”这段文字，简明地概括了南宋初年洞庭湖周围劳动人民所受封建压迫剥削的状况。宋高宗建立南宋政权后，慑于金人武力，不敢抵抗，一味南逃，中原地区的地主官僚们，也纷纷南迁，其中有许多人在洞庭湖滨的鼎州定居下来。这些南迁的官僚地主们，得到当地政府的庇护，他们霸占田产，以地痞流氓作爪牙，到处欺压农民，农民稍有不满，即遭毒打，哭诉无门。势家地主们，还依仗权势，向佃户征收重租，地租高于别处十倍，遇到荒年，也不减免。农民终岁勤劳，但交租之后便绝粮了，为了活命，只得取高利贷，来年收成之后，以数倍偿还。农民无力还债，只好典卖妻子儿女，或走上绝路，或沦落为乞丐，十分悲惨。南宋统治者还以犒赏军队，制造武器等为借口，在赋外加赋，役外加役，加重对农民的剥削，结果，农民的土地荒芜，家产耗尽，生计断绝，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因此，这里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女真贵族占领北中国之后，并不满足，他们依然不断南侵，妄图一举灭亡新建立的南宋政权。金兵每次南犯，都大肆烧杀抢劫，给人民带

来沉重灾难。金兵破健康（江苏南京市），纵火大掠，见人即杀，致使“城中头颅手足相枕藉，血流通道，伤残宛转于煨烬之间”。金兵过后，“悉为灰烬”。金兵破平江（江苏苏州市）。“劫践官府民居、廪积聚，虏掠子女金帛，乃纵火延烧，烟焰二百里，凡五昼夜”。“士民前后迁避得脱者，十之二三，迁避不及或杀者，十之六七”。荆湖地区，地处长江中游，占领这里可沿江东下，能置临安（浙江杭州市）南宋政权于死地。女真贵族多次南犯荆湖，人民累遭蹂躏，繁华的岳州（湖南岳阳）金兵过后，“民户所存，百分之一，州城烧毁殆尽，商贾不通，税赋无入。在州只有些小凋残贫民，四周并无城壁。钱粮储积，无分文颗粒”。重镇潭州（湖南长沙市）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为金兵攻破后，“大掠，屠其城”而去。李纲目睹金兵掳掠屠杀六天之后的潭州，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昔年假道过长沙，烟雨蒙蒙十万家，楝宇只今皆瓦砾，生灵多少委泥沙。”数十万人口的潭州，几被毁灭。金兵的烧杀抢劫，激起了洞庭湖周围人民极大仇恨，因此，民族矛盾激化。

另外，这一地区还有军贼的骚扰，军贼是由军队转化而来，如孔彦舟，他原是北宋东平府的一个钤辖，两宋之际，他率领一支军队，在淮西、荆湖一带流窜，他“占用官私仓库，劫掠民财”，流窜到哪里，哪里的百姓就受害，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他由江陵南下犯鼎州（湖南常德），遭到人民的抵抗，鼎州城陷后，他与金兵一样，实行“屠城”，他离开鼎州时，“城壁一空，但有所屠尸骸，头颅相枕，填街积巷，秽气充盈”。另外，李成、曹成、桑仲等人，也是打着官军旗号的军贼，他们叛服无常，率领军队在两湖地区流窜抢劫，桑仲有兵十万，“其军食绝，乃以人为粮”。他们与金兵一样，同样给人民带来沉重灾难。

在南宋官府的搜括和金兵，军贼的抢劫烧杀下，荆湖地区受到极大摧残，监察御史韩璜曾到过这里，他在给高宗皇帝的奏折中说：“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破残，十室九空。询问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逐袭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殊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江西安抚大使朱胜非由广西去江西，陆行一千七百多里，经过湖南，他见到的情景是：“入衡州（湖南衡阳）界，有屋无人，入潭州（湖南长沙）界，有屋无壁；入袁州（江西宜春）界，则人屋俱无。”荆湖地区一片残破，人民生活无着，封建统治只知勒索搜刮，不管人民的死活，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使农民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只有武装起义求生了。

二 钟相领导的起义斗争

钟相，武陵（湖南常德）唐封乡水连村人，其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有许多种说法，《宋会要辑稿》兵十之三十六、《中兴小纪》卷八，称其为“土豪”；《杨幺事迹一》称其为“土人妖巫”；《十朝纲要》卷二十一《高宗纪》又称其为“湖贼”；《三朝北盟会编》说他“家赀矩万”，由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其家庭应是比较富裕的人家，但他不同于一般的地主，他的家产多来自为人治病的收入，而且好接济穷

人，史称钟相“从里之巫者游，数载，尽得其术”，他为人治病，“自言神附体，为驱邪魔，病者愈，酬以金帛，相以是致富。相虽多财，而好施与，里之鳏寡孤独废疾有艰于生计者，辄存恤之”，可见他是一个与贫苦农民息息相通，善于帮助穷人的人，因此，他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

钟相通过行医团结了群众，他看到“里人多贫苦，乃倡设社会，以等第醵资，不足则自出金以益之，人有缓急皆往贷焉”。钟相倡导建立“乡社”组织，经济上参加者能“田蚕兴旺，生理丰富”，因而深受人民欢迎，参加的人很多。钟相对众人说：“法者，天意也，天于人无厚薄，而今之法，则分贵贱贫富，其违天大矣。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尔曹以为然乎？”钟相针对广大农民要求，第一次从法的角度明确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大胆否定了分贵贱贫富的封建法权，要求建立政治上“等贵贱”，经济上“均贫富”的理想社会，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洞庭湖周围的农民纷纷前来，“拜爷”入社，钟相被称为“钟老爷”。钟相的组织宣传活动进行了二十多年，为以后的武装起义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靖康二年（1127年），正当钟相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时，金兵大举南侵，钟相基于民族大义，组织了一支三百人的队伍，号称“忠义民兵”，由其儿子钟昂率领，随同武陵统制郑修武一行民兵一千五百人，北上“勤王”，但行至邓州（河南邓县），北宋已经灭亡。同年五月，宋高宗在南京（河南商邱）即位，钟昂率领三百“忠义民兵”又赶到南京，但宋高宗害怕金兵，决计南逃扬州，于是命令各支“勤王”兵“归原来处，各著生业”，遣散回乡，钟昂报国无门，只好率民兵返回武陵（湖南常德）。在北上“勤王”过程中，钟昂目睹了宋朝统治者的妥协投降，在返回途中，也看到了溃兵，军贼、游寇们烧杀抢劫的暴行，因此，他们的“忠义民兵”没有解散，“依旧将元募人团聚在家，结成队伍，各置旗帜器甲”，决心用这支队伍保卫家乡。

建炎二年（1128年）春，正当钟相积极武装起义的时候，一个地主分子王靖以“拜爷”为名，混入了“乡社”组织，并经常“出入钟相之门”，他发现钟相家里藏有大量武器、盔甲等，即以“图谋不轨”向鼎澧路兵马都钤辖唐悫告密，钟相被捕入狱。钟相在狱中受到种种折磨，但他英勇不屈，后经多方营救，才从轻发落，以“私置军器罪”，发配衡州（湖南衡阳），不久“放还”。

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军贼孔彦舟率兵十万人，由江陵府（湖北江陵）向澧州（湖南澧县）和鼎州（湖南常德）杀来，这支军队剃发留辫，打扮成金兵的模样，专干烧杀抢劫的勾当。这年正月，穷追隆裕太后的西路金兵，在江西烧杀之后，进犯潭州，二月二日破潭州，大杀六天，“满城生灵，尽遭屠戮”。孔彦舟的烧杀抢劫和金兵的蹂践，使鼎州、潭州一带变成了一片血泊火海，南宋的地方官和军队，却早已逃之夭夭。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死里求生，别无出路。于是，二月十七日，钟相在武陵县唐封乡水连村后的天子岗树起革命大旗，正式宣布起义了。

钟相起义后，向各州县发出《檄告》，指出："卧榻之侧，竟容异类鼾睡，廊庙之上，胡引奸宄猖披。爰举义旗，拯蒸黎於水火；矢清妖孽，系禹甸於苞桑。洞庭之狂澜不倒，君山之樵叟长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南宋的反动统治和抗击金兵的侵扰，保卫家乡。钟相起义的消息传开后，立即得到鼎州、澧州、荆南等地人民的响应，农民革命的烈火迅速在鼎州、澧州、荆南府、潭州、峡州（湖北宜昌市）、辰州（湖南沅陵）、岳州（湖南岳阳）等六州一府十九县的范围内燃烧起来。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巩固革命成果，二月二十一日，钟相建立了政权，自立为楚王，妻伊氏为皇后，钟昂为太子，国号楚，年号天载，发布命令称"圣旨"，任命官员用黄牒，并任命了太尉等官职。大楚政权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的革命斗志，增强了他们的胜利信心。

大楚政权建立后，钟相开始实施自己的"等贵贱，均贫富"主张，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三十七记载，他们"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谓'贼兵'为爷儿，谓国典为邪法，谓杀人为行法，谓劫财为均平。……人皆乐附而行之，以为天理当然"。从这段文字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起义军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封建官僚、反动儒生、不法地主和僧道等迷信职业者，相反则保护"执耒之夫"，保护劳动人民。可见，农民军并不乱杀，杀人是有选择的。农民军对封建典章制度、法律、道德规范等全部加以否定，一律视为"邪法"加以批判。农民军在"行法"镇压反动官僚士伸的同时，还没收他们的财产，实行"均平"，这些政策，得到了农民的热烈拥护。洞庭湖地区的人民，在钟相领导下，向封建统治者展开了猛烈攻击，农民军在原有"乡社"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七十多个水寨。后来，他们利用这些水寨作据点。"春夏则耕耘，秋冬水落，则收粮于寨，载老小于船中"，四出攻战。这里"无税赋差科，无官司法令"，真个成了农民的天下。

钟相起义时，驻守洞庭湖地区的宋军，力量比较薄弱，因此，南宋统治者把希望寄托于军贼孔彦舟身上，湖北制置使傅雱为了拉拢孔彦舟，便任命他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让他镇压钟相起义。孔彦舟有兵十万，虽人数不少，但却是一伙专事抢劫不善征战的乌合之众，他流窜到洞庭湖地区后，在澧阳南八十里的药山平，被农民军打得大败，损兵折将，尸横遍野，孔彦舟本人仅以身免。因此，他虽欣然接受了捉杀使的官职，但却不敢与农民军交战，他依靠鼎州城池坚固，死守在城里，每天只派出少量人马对农民进行骚扰。南宋政府看到农民军采势迅猛，便一方面向洞庭湖增派援军，同时也敦促孔彦舟"围剿"农民起义军。孔彦舟感到正面交战难以取胜，便另生一计，"阳为好词，若将避相者"，花言巧语，放出烟幕，表示要撤离鼎州，并且"聚竹为筏"，摆出即将他去的架势。他还削竹为签，上书"爷（指钟相）若休时我也休，依旧乘舟向东流"，让人带到钟相大营中。钟相见到这些书签，也误认为孔彦舟真的不敢与己相抗。更为恶毒的是，孔彦舟还让其士兵装扮为贫苦农民，作为奸细，声称"入法"，混入农民军内部。由于军事上的节节胜利，钟相

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放松了对敌人的防范，因而对孔彦舟的这些阴谋没有及时识破；对前来“入法”的奸细，钟相“受之不疑”，并且“信之不为备”，对此，杨幺曾提出反对意见，他说：“我观来者，农蓝缕，献谀词，殆非善类，愿大王察之”。对这样忠实的劝告，钟相也大不以为然，说“入法皆为兄弟，毋相猜嫌，苟萌恶念，神必殛之”。

由于钟相思想上解除了武装，结果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上了大当，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二十五日深夜，正当农民军熟睡之际，孔彦舟的十万匪兵“乘筏夜渡”，向农民军大营突然杀来，以“入法”为名混入的奸细也从中配合，在农民军营内部放起火来，自背后杀出，敌人里应外合，农民军仓促应战，结果战败，损失很大。钟相为保存实力，率领余众突围，向山谷转移。二十六日，又遭到地主分子范颜的突然袭击，再次战败，钟相及妻子伊氏和儿子钟昂、钟全，钟绪等被俘。钟相等被俘后，孔彦舟“乃造法物仪仗，张大其功，欲解赴朝廷”，行至攸县，为湖南安抚使向子所杀。

钟相从起义到失败被杀，前后不过四十日，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攻占了七州府十九县，农民军发展到四十万人，把农民革命推向了高潮，但由于他的骄傲自满，麻痹轻敌，结果使农民军遭受严重挫折，这是一次沉痛的历史教训。

三 杨幺领导农民继续战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钟相牺牲后，洞庭湖地区的人民，在杨幺领导下，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起义斗争。

杨幺，名太，鼎州龙阳人，当地人称幼为幺，因太在兄弟中最小，故人们称他杨幺。他出身于贫苦的雇农家庭，父亲曾给地主当佣工，也曾为船主当船工，又曾租种地主土地为佃客。杨幺家境贫寒，自幼参加劳动，受到地主的压迫剥削，因此，他痛恨地主，养成了朴素的反抗性格。钟相以“乡社”组织群众，后来他来到武陵“入法”，加入了钟相的“乡社”组织。钟相天子岗起义后，他参加了起义军，成为龙阳一带起义军的一名重要首领。建炎四年（1130年）六月十日，程昌寓被南宋朝廷任命为鼎澧镇抚使兼知鼎州，负责镇压钟相起义军的余部。程昌寓原驻荆南府（湖北江陵），接到委任状后，他收拾行装，分作两路路由部将杜湛率兵由陆路去鼎州；一路为他本人及随军官员家属和一些逃亡在外的地主士绅，乘船由水路经洞庭湖向龙阳扑来。龙阳曾是农民军的重要据点，钟相失败后，杨华、杨幺、杨钦、刘诜，周伦、杨广、夏诚、黄佐、刘衡等农民军将领潜伏了下来，仍在坚持斗争。程昌寓一行的船队到达龙阳附近的鼎口后，看到这里物产丰富，市场繁荣，便跳上岸来，“悉去争买，以至纷拿，渐行攘夺，遂成作闹”，顿时秩序大乱，农民军趁其不备，突然出击，给前来抢劫的匪徒以迎头痛击，他们被打得晕头转向，狼狈逃奔大船，农民军追上前去，将船拦住，官僚、士绅、家属及大批金银物帛，全为农民军所俘获。程昌寓的座船在船队的最后，他一听得前面发生了战斗，船队人马已战败被俘，便慌忙跳上一艘

小船，带着家属亲信逃回公安去了。杜湛、程昌寓不敢再由水路赴任，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由陆路到达鼎州。但是，早在程昌寓到达鼎州之前，农民军已把这里的官衙、府库烧毁，他得到时只是一座空城。

杨幺的家乡龙阳，位于洞庭湖的西南岸，沅水下游，这里湖河港汊纵横，地形复杂，便于活动，起义军在这一带建立了许多水寨，钟相牺牲后，这里的革命力量损失较小，因此，在对程昌寓的斗争取得一些胜利后，他们很快又控制了龙阳的形势。《杨幺事迹》写道："钟相余党，多是龙阳县市井村坊无赖之徒，杨华、杨幺、杨钦、刘诜，周伦，全琮、杨广、夏诚、刘衡、黄佐、杨二胡、高癞子、田十八十余辈，各为头领，占据龙阳县，分布于所居村，分置立寨栅。"他们"恃水出没"，进可攻，退可守，很快扩大到八万多人，水寨三十多个。这些水寨"去鼎州止三、二十里，远者不过五六十里"。严重威胁着鼎州，龙阳成为新的革命根据地。

在龙阳各水寨中，以杨华、杨广两支起义军力量为最强，杨华有众一万多人，但当他两次率兵攻打鼎州失败后，却对起义前途失去了胜利信心，政治上动摇了，再加以这时程昌寓又不断派人到他的寨中许以高官厚禄，劝其投降，绍兴元年（1131年）冬，杨华终于叛变，成为农民军的叛徒。不久，杨广也为叛徒杀害。

杨华叛变，杨广被害，龙阳地区的各支农民军就数杨幺、黄诚两支最强大了，因此，领导各支农民军的责任也就落到了他们身上，史称"（杨）幺主诛杀，（黄）诚主谋画，据江湖以为巢穴。其下又有周伦、夏诚、刘衡，分布远近"。杨华叛变，杨幺十分愤怒，他大骂"杨华不是丈夫汉"，决心要"与钟老爷报仇"为了武装自己，杨幺发动各支起义军到鼎州城东的德山"采砍松杉万株"，又"往澧州钦山、药山、夹山，倒伐松杉樟楠木万本，又发掘所在坟墓，取板材"，大造战船，农民军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水军，他们"出没重湖"，到处打击敌人，使程昌寓无计可施，"日逐焦躁，不能自安"。绍兴二年（1132年）二月八日，宋高宗任命李纲为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湖南长沙市）；二月二十七日，又任命刘洪道充荆湖北路安抚使，指令他们合力围攻农民军。在官军的进攻下，杨钦、夏诚等的水寨受到很大损失。

杨幺看到，农民军人数虽多，但水寨分散，缺乏强有力的统一指挥，不利于对敌作战。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绍兴三年（1133年）四月，杨幺重建政权，杨幺自称"大圣天王"，拥立钟相少子钟仪为太子，作为各支起义军的首领，自杨幺以下皆臣事之，"官属名号，车服仪卫，并拟王者。居有三衙大军，所居之室称曰内，文书行移，不奉正朔。"任命刘衡为殿帅，黄诚为马帅，夏猫儿为步帅，杨钦为军马大尉，夏诚为左仆射，周伦自称统管乡社水陆兵马，张彦通、黄缺子、白德等八十多人为统制。由于当时正处于紧张的战争之中，因此这个政权所设置的官职多是军职，各职务也都由农民军将领担任，表现出了战时军事组织形式的特点。

农民军重建政权后，在杨幺统一指挥下不断主动出击，进行外线作战，扩大了政治影响，许多贫苦农民和渔民纷纷前来投奔，农民军人数很快扩大到二十多万人，“占据龙阳、武陵、沅江、湘阴、安乡、华容诸县，水陆千里，操舟出没，东犯岳阳至临湘县，西犯江陵之石首，至枝江，北犯江陵至荆门，南犯潭州至巴陵，官军陆攻则入湖，水攻则登岸”。打击扫荡着各地封建反动势力，又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

四 陆耕水战

农民军重建政权以后，对各水寨进行了整顿，杨幺的大寨设在鼎口（湖南汉寿县西北）南岸，“据陆向水，维舟岸侧”，作为最高指挥部，夏诚的大寨也在附近。另外，在洞庭湖周围还建立起了数十个水寨。农民军各大寨都严加警卫，除派兵把守寨门外，还日夜巡逻，防止奸细混入寨内。

为了坚持长期斗争，农民起义军还实行劳武结合，兵农合一，“春夏则耕耘，秋冬水落，则收粮于寨，载老小于船中，而驱其众四出为暴”。春夏生产季节，农民军努力“作田”坚持生产劳动，秋冬水落，收获完毕，将老少载于船，便四出主动攻击敌人。农民军缺少土地，就“占据民田”，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耕种。农民家家有地种，养上了牛、羊、猪、鸡等家畜家禽，还养蚕缫丝。冬个村寨都“茅竹为舍，密比如栉”，过上了“田蚕兴旺，生理丰富”的日子。各乡社之间还有定期的集市贸易，相互进行农副产品的交换，呈现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由于农民军坚持一边打仗，一边生产，这样就打破了南宋政府的经济封锁，保证了物资供应，使农民战争得以长期坚持下去。

在陆耕的同时，农民军还充分利用洞庭湖水及其周围河湖港汊交错纵横的地形特点，发展水军，以“水战”的形式对南宋官军进行了英勇战斗。水战，离不开船只，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军在水战中还大量使用了车船。从文献记载上看，唐代已经发明车船，《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一《李皋传》：李皋“常运心巧思为战舰，夹三轮踏水，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所造者易而久固”。但这种船只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也未用于水战。程昌寓没有水军，面对杨幺的陆耕水战无计可施，其部下有一名木匠高宣，向他献车船图样，他立即下令按图制造，竟造出了宋代的第一批车船。程昌寓依仗有了车船，便让杜湛统领步兵，又以覃敌为统制，带领两只车船和二十多只海鳅战船，从水陆两方面进攻夏诚的大寨。夏诚早有准备，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将官军打得大败，当时正值沚江水落，车船搁浅，动弹不得，两只车船及船工高宣全被农民军俘获。农民军获得车船样品后，又进一步加以改进，造出了各种更高更大的车船，史称“杨幺打造和州载二十四车大楼船，杨钦打大德山二十二车船，夏诚打大药山船，刘衡打大钦山船，周伦打大夹山船，高癞（子）打小德山船，刘诜打小药山船，黄佐打小钦山船，黄琮打小夹山船，两月之间，水寨大小车楼船十余，制样愈益雄壮”。车船，从文献记载来看，皆分两层或三层，高数十丈，在船体两侧的近水部份安装由桨片组成的车轮，一车两轮，轮半浸水中，外有护板，用人力踏轴带动两轮击水，可进可

退，船行如飞。车船上还设有拍竿，形如桅杆，高十余丈，上置巨石，顶系绳索，下安辘轳操纵，敌船靠近时，即放倒拍竿，以巨石将其击碎。车船上还装备了弩子、鱼叉、木老鸦等武器，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农民军用车船装备之后，如虎添翼，在水战中更加处于优势地位。

面对杨幺农民军的壮大，南宋统治者十分恐慌，宋高宗接连下诏调兵遣将，增援围攻洞庭湖的官军。绍兴三年（1133年）六月，任命王䜣为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黄州（湖北黄冈），汉阳军制置使，置司鄂州，统领六万多宋军向农民军发动进攻。十月二十三日进犯鼎口，杨幺水军接战，农民军的高大车船和弓箭、巨石、木老鸦等武器，把官军打得落花流水，死伤无算，王䜣本人也被流矢和木老鸦击中，他带领神武前军万余人，狼狈逃回鼎州，农民军取得鼎口大捷。

十一月初，王䜣再次大规模进犯，宋军分兵两路，西路由陆上进攻龙阳大寨，东路为水军进驻洞庭湖东岸及湘江口一带，其计划是西路得手后，当农民军败退到湖东岸时，东路水军拦截，东西两路夹击，企图全歼农民军。西路龙阳周围的战事非常激烈，经过十几天的战斗，农民军从龙阳大寨撤退入湖，农民军探知东岸官军水兵多为小舟，不利湖中作战，使用几只车船隐藏旗帜军兵，打扮成空船模样，引诱南宋水兵入湖，十一月十三日；宋军果然中计，他们认为是败下阵来的空船，便争先恐后出港迎击，当宋军的小船靠近车船时，伏兵四起，拍竿、弩子、木老鸦，乱箭齐下，宋军的几百只小船“尽碾没入水”，顿时船破人亡，带兵的两个统制官崔增、吴全也被农民军杀死，“一日之间，万人就死”，水军主力全被歼灭，这就是有名的阳武口大捷。

阳武口大捷后，农民军又回兵进攻湖西岸的宋军。王䜣、程昌寓尚不知阳武口大败的消息，农民军一百多人已进抵鼎口岸边，这些人衣着鲜丽，“打鼓板，吹羌笛，弄气球”。根本不像水寨中农民军装束，他们用竹竿一根，上系文字一卷，插在沙滩上，叫覃敌派人来取，宋军原以为是农民军的，“受招安文字”，但打开一看，“却是官告两轴，随军钱粮司印一颗，御前小钟子器甲牌一包，计百余枚，并王四厢（璎）令人所画洞庭湖口岸图子一本。”覃敌看到这些物件，大吃一惊，农民军见此情景，齐声高喊：“崔家水军一万来人，前日晚被我们杀了一个不存。衣甲、枪刀、战旗，钱粮，一齐属了我也!”宋军得知东岸大败的消息后，十分恐慌，无心再战。当天晚上，杨幺水军分乘八只车船，“全装铁甲，各执雁翎长刀，光彩射目”，向宋军发起攻击，宋军退却，农民军无数车船尾追，将近二更，追至风金口江面最宽处，与宋军展开激烈战斗，宋军被打得“头破额裂，满身中箭”，狼狈逃回寨内，龟缩起来，不敢与农民军交战。

王璎一败再败，进退失据，遭到许多人的弹劾。绍兴五年（1135年）闰二月二十六日，被解除军职，三月一日，又受到“降三官”处分。

五 坚持民族斗争

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兀术率金兵深入江南，穷追宋高宗失败后，女真贵族失去了用军事力量消灭南宋政权的信心，于是，便于当年九月立汉奸刘豫为伪齐皇帝（初都大名，后迁开封），让他统治黄河以南地区和新占领的陕西地区，作为宋金之间的缓冲地带，企图以汉人统治汉人。

伪齐政权建立以后，除对内镇压汉族人民的抗金力量外，还不断对南宋进行政治诱降活动，在伪齐的政治诱降下，绍兴元年（1131年）五月，南宋叛将李成率领数万人降齐；绍兴二年（1132年）六月，孔彦舟复叛降伪齐：绍兴三年（1133年）南宋水军都统制徐文率海船六十艘，官兵四千人降齐。将领的不断叛变，给南宋政府造成很大压力。伪齐统治者见诱降活动奏效，便把诱降的黑手伸向洞庭湖，他们以为杨幺农民军树起了反宋的大旗，就是自己的友军，联合攻宋，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于是，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便令汉奸李成派使者到周伦的大寨，要求与农民联合攻宋，水陆并进，“得州者做知州，得县者做知县”。他们又“结杨幺，欲裂地而王之”，结果遭到周伦、杨幺的断然拒绝。但李成仍不死心，一个多月以后，“又差三十五人来，内有郑武功、胡大夫二官员，又将官告、金束带、锦战袍并羊羓之类，再三相约诸寨首领，尅日会合”，共同攻宋；农民军大怒，他们“将来人以酒醉倒，尽行杀戳，沉尸入江中”，狠狠打击了伪齐的阴谋活动，从此，招降使者便不敢再到洞庭湖来了。农民军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已坚定的民族立场，与南宋官员将领的纷纷叛降，形成了鲜明对比。

农民军坚持反民族投降主义的同时，还善于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结合起来，妥善处理二者之间关系。当农民军了解到李成的使者是从南宋军队的防区中偷渡过来之后，便立即通报南宋岳州（湖南岳阳）守臣，批评他们“讥察不严”，并让他们转达朝廷，严防金、齐新的侵略活动。农民军的民族立场是明确的、坚定的，而南宋统治者却造出谣言，说农民军与伪齐相勾结，计划水陆并进，共同攻打临安，这完全是贼喊捉贼。

六 战斗到最后

绍兴五年（1135年）二月，宋高宗以宰相张浚亲自主持镇压杨幺起义事宜，并调抗金主力部队岳家军到洞庭湖地区，以岳飞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全力镇压农民起义军。

南宋统治者经过多次失败之后，他们感到，单纯的军事镇压是难以取胜的，于是，他们便采取了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相结合的策略，张浚、岳飞一方面令“湖南安抚使，统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屯湘阴，保护湘江粮道，统制官郝最屯桥口，王俊屯益阳旧县，吴锡屯公安，崔邦弼屯南阳渡，马津、步谅留潭州，其鼎州官兵，令程千秋分拨紧要屯驻”，以大兵压境，实行军事包围；另一方面，则以授予湖南北路知州为钓饵对农民军将领进行诱降活动；在经济上，岳飞对农民军占领区又“断其粮道。严行禁止博易”，实行封锁，而在春夏农忙季节，他还不断派出军队

骚扰，使农民军不能生产，农业荒废。这样一来，农民军在物资供应上便遇到了许多困难，由于“乏食，酋卒有菜色，于是老妪稚子，皆节食以助军饷，而杨幺亦命群卒觅食物，鱼虾螺蚌，充船舱，鼎煮健啖，谈笑自若”。面对岳飞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杨幺领导农民军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斗争，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但是，也有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人，经受不了经济封锁和大军压境的威胁，在高官厚禄的引诱面前动摇了。绍兴五年（1135年）四月，农民军重要将领黄佐首先叛变，他跑到潭州，拜倒在岳飞脚下，岳飞称其知逆顺祸福，是大丈夫，希望他为朝廷立功，以酒相待，并让他潜回水寨，在农民军内部进行劝降活动，黄佐受宠若惊，满口答应。在黄佐的诱骗下，不几天，就有二千三百多农民军战士投降了岳飞。随后，黄佐又突然进攻周伦的大寨，周伦无备，统制官陈贵等九人被俘，周伦败走，许多农民军战士牺牲，武器、衣甲、粮食全被劫去，农民军受到很大损失。六月二日，杨钦在黄佐的劝诱之下，率领农民军战士三千人，老小一万多人，大小船只四百多艘向岳飞投降。杨钦被授为武义大夫，并受到高宗金带、战袍的奖赏。在扬钦的影响下，农民军将领全琮、刘诜又向岳飞投降。山于许多将领的叛变，农民军力量大大削弱，处境更加困难了。

六月十一日，岳飞向杨幺的大寨发动大规模进攻。起义军虽大为削弱，但杨幺毫不畏惧，他指挥车船奋力迎击，叛徒杨钦向岳飞献计，说大车船非一丈深水不能行，杂草乱木也能阻止车船行进，于是，岳飞乃开闸放湖水，又派人“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汊，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引农民军车船至浅水处，农民军听到叫骂，义愤填膺，驾车船追击，结果中计，车船进入腐木乱草之中，“草木壅积，舟轮碍不行”，车船失去了作用。农民军企图奋战突围，各港口又为巨筏堵塞，水路不通，农民军进退失据，岳飞又以优势兵力，分乘巨筏，张牛皮挡矢石，向农民军发起猛攻，农民军战败。在这紧要关头，农民军统制陈瑫又叛变，他劫钟仪所乘大船投降了岳飞。杨幺见大势已去，便将钟仪推入湖中，自己也跳湖自杀，但未及死，就被宋军水手孟安入水救出。杨幺被俘后，英勇不屈，被岳飞杀害，“枭其首，函送都督行府”。杨幺被杀时，连呼数声“老爷”（钟相称号），表现了他对钟相革命事业坚贞不屈的信念。

杨幺牺牲后，较重要的农民军将领尚有黄诚、周伦、刘衡、杨收、杨寿、石颗等，随后也有的投降，有的被俘，最后剩下的就只有夏诚一人了。夏诚，绰号“夏猫儿”，是农民军将领中很有智计的人，素为杨幺所依重，担任了农民军步兵司的统帅，他的大寨设在芷江口，背依高山，三面临水，形势险要，易守难攻。岳飞对夏诚的水寨，也采取了以杂草腐木将大寨水路堵塞的战术，使大寨陷于绝境，随后又以大量军队冲进了水寨，经过一场激战，夏诚兵败被俘。至此，杨幺领导的农民起义，便最后失败了。

第二节 范汝为领导的农民起义

一 南宋初年福建地区的社会矛盾

范汝为起义爆发于福建。福建山多田少，一向以“民贫”著称。在正常情况下，福建人民生活已很困苦，南宋初年，封建统治者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更加以兵荒马乱，给人民带来种种灾，难，因此，激化了阶级矛盾。

女真贵族占领中原后，南宋统治地区大大缩小，但其军政费用不减，因此，便加重了对江南人民的剥削，在二税、和买、和籴、身丁钱米等征收之外，更以“军期所需”为名，不断摊派和征收名目繁多的杂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谏议大夫黎确说：“福建盗起，本于科敛诛剥，民不堪命。”确实如此，封建剥削的日益加重，这是促使福建人民发动武装起义的根本原因。

叛兵、军贼的烧杀抢劫，也给福建人民带来了灾难。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金兵南侵，宋高宗逃亡杭州，御营使都统制苗傅、副都统制刘正彦发动叛乱，以武力迫使宋高宗退位；另立太子赵旉为帝，改元明受，隆裕太后垂帘听政。江淮制置使刘光世、江浙制置使韩世忠等率兵平乱，叛将“苗翊、马柔吉拒战不胜，傅、正彦引兵二千夜遁”转攻富阳（浙江富阳）、新城（浙江富阳西），韩世忠尾追，苗刘又窜入福建，沿途烧杀抢劫。五月，韩世忠俘刘正彦于浦城县（福建浦城县），苗傅流窜到建阳（福建建阳），为土豪詹标抓获，叛乱才平息下来。苗刘叛乱，“所过燔桥”，“黥民充军”，使福建人民受到一次大浩劫。同年冬，由于金兵渡江南侵，南宋军队节节败退，许多溃兵进入福建，不成部队，他们结队抢劫，变为军贼，当时的情形是“兵日益重，盗日益多”，“粮食乏绝，死亡无日”，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南宋时，与北宋一样，对盐、茶、酒、香、矾等实行专卖，盐从生产到销售都由官府严加控制，违者处以重刑，十斤以上处死。福建内地的建州（福建建瓯）、南剑州（福建南平市），汀州（福建长汀）、邵武军（福建邵武）称上四州，不产盐，其沿海的漳州、泉州、福州、兴化军（福建莆田）称下四州，出产海盐，上四州人民主要食用下四州所产之盐，本来上、下四州相距不远，盐价不应太贵，但由于官府对食盐专卖，低价向盐户收购，运往内地后往往以十倍原价出售，因而上四州盐价很高，农民深受其害。在这种情况下，私盐贩便盛行起来，私贩以高于官价向盐户收购，以低于官价卖出，故民喜食私盐，官府虽禁而不能止，侍御史张致远说：“剑、汀诸郡为上四州，地险山辟，民以私贩为业者，十率五六”，可见私贩很多。为了严禁私贩，南宋经常派军队缉查，私盐贩也成群结队，以武装相抗，因此，两者经常发生冲突。范汝为之所以以私盐贩为主体发动起义，其原因也在于此。

对南宋初年福建的社会矛盾状况，身任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的廖刚

曾作过一次很简明的概括，他说：“福建路民贫地狭，从来远矣。他日不为盗，而迩来相视蜂起，……初缘建州军贼作过，既而苗傅贼党、王躞叛兵，相继入本路，大兵又蹑其后，屋庐储积，焚荡掠取。既尽于贼，又须供亿大兵，实无从出。自是迁徙散亡，濡足南亩者无几。食日益阙，民日益困，桀黠无赖者，遂乘之鼓倡群小，驱率柔懦，聚为盗贼。贫困的福建农民，受军贼、叛兵的蹂躏之后，又受到南宋繁重赋税的催逼，其房屋烧毁，生计断绝，阶级矛盾激化，农民只有“铤而走险”，起义求生了。

二 范汝为领导农民军在闽北的斗争

范汝为，福建建州人，出身于私盐贩家庭，“其诸父以盗贩为事，而号黑龙、黑虎者，尤善格斗，群不逞附焉。每数百人负盐横行州境，官不能扑。有选人建阳江铟……郡守谓铟有谋，使摄令瓯宁，以图二范。未几，果擒之，皆毙于狱。其徒无所归，复依汝为。一日，因刃伤人至死，遂作乱”。可见，他的父辈是武装私贩，为官府所杀害。杀父之仇，激发了范汝为的阶级仇恨，再加以他“粗知书”，有文化，有计谋，因此，很自然地便成为领导这次农民起义的首领。

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二十三日，范汝为在福建瓯宁县的回源洞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之初，人数较少，只有四十人，大多是私盐贩。瓯宁知县黄光邦、建阳县令王昌等“不能讨，时方艰食，饥民从之者甚众”，建州知州韩珉率领州兵前来镇压，也被农民军打得大败，范汝为的队伍很快扩大到数万人，并攻占建阳（今福建建阳县）。九月，南宋政府派神武副都统制李捧率领禁军三千人来攻，也被农民打得落花流水，“官军皆溃，捧等遁去，与其军相失”。在这次战役中。范汝为以机动灵活的战术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使敌人疲于奔命，最后歼灭敌人。朱熹对这次战役有过详细的描述，他说：“朝廷遣官军来平贼，时秋稼已熟，贼闻官军且至，放水灌田，又以禾穗相接连，已而决塍去田水，官军室，不谙其山川道路，贼纵之入山，山路险隘，骑卒不能前。贼觉官军已疲困，乃出平原，以诱官军。军官出山，争趋田中，既为结穗牵绊，又陷泥淖。贼因四面鏖击之，官军大败。这次战役，表现了范汝为的军事才能。

农民军的一系列胜利，促使了建州地区地主阶级内部的分裂，一批在政治上失意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向农民军靠拢，由同情农民军而倒向农民军，如“善文章，多才艺，或已登科”的欧阳颖士、吴琮等人，即加入了农民军。他们以肖何、曹参自许，为农民军出谋划策，劝范汝为学汉高祖，以布衣取天下，还帮助农民军“置伪官”，建立政权机构，范汝为也言听计从，“偃然当之”。

建州地接两浙，是临安的“后院”，因此，起义军的迅速发展和官军的一再失败，使南宋朝廷大为震惊，十一月，宋高宗乃派神武副都统制、大将辛企宗带一万人前往福建镇压。为了防止范汝为进入江西，又派神武前军统制王躞率全军到信州（江西上饶）驻扎，企图将农民围歼

于福建，但是，辛企宗率兵进入福建后，慑于农民军的威力，却不敢前进，至远离建阳二百里的邵武军（福建邵武）即驻扎下来，他派兵作试探性进攻，结果大败而回。

在军事镇压遭到一连串失败之后，南宋统治者与对付其他起义军一样，也采取了政治欺骗手段，派出朝散郎谢响，修职郎陆棠“持金字牌往招之”，花言巧语，许以官位，结果遭到范汝为的拒绝。谢响、陆棠“招安”不成，后在农民军的影响和欧阳颖士、吴琮等动员说服下，反而态度开始转变，逐渐由“招安”说客变为农民军的一员，他们力劝范汝为向五代十国时在福建割据的闽王王潮学习，并表示愿意“佐命”，做农民军的谋士。

为了迷惑敌人，谢响等向南宋政府上奏，说范汝为已经接受“招安”，宋高宗也信以为真，立即下诏嘉奖，授范汝为武翼郎，任福建民兵都统领，受辛企宗节制；范汝为部下的农民军将领，也有一、二百人被授以官职。但是，当南宋朝廷下令“放散汝为下见团结人兵。又诏民兵愿归农者，许自便”时，范汝为却并“不听命”。农民军没有解散，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

绍兴元年（1131年）十月初，范汝为令部将陆强率军攻政和县，政和农民热烈欢迎农民军的到来，城破，三千多农民加入起义军。十月十九日，范汝为率农民军主力攻建州（福建建瓯），守臣王浚明以下官员弃城逃走，范汝为不战而下建州城，瓯宁知县叶棐被俘虏，农民军扩大到数万人。十月三十日，农民军西攻邵武军（福建邵武），守臣吴必明，统制官李山兵败，狼狈逃窜。吴必明逃往光泽，李山远窜信州（江西上饶市），农民军浩浩荡荡进入闽北重镇邵武军。辛企宗身为制置使，镇压起义无功，以“懦怯玩寇”罪受到撤职降级处分。范汝为起义军控制了建州、邵武为中心的广大闽北地区，队伍扩大到十万人。

在范汝为起义的同时，福建地区还有其他几支起义军，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南剑州（福建南平）顺昌县的余胜起义，发展到数千人；建阳县有刘时举起义，发展到上万人；建安县有张毅起义，曾攻古田县城；崇安县有廖公昭起义等。但是，由于受到地域的限制和统治阶级的调拨离间，彼此之间非但不能密切联系，相反还矛盾重重，因而不能团结对敌。

三 韩世忠的血腥镇压和起义失败

辛企宗撤职后，南宋朝廷任命参知政事孟庾为福建、江西、荆湖宣抚使，神武左军都统制韩世忠为宣抚副使，让他们统领军队，全力镇压范汝为起义。

碉堡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福建地区各支农民军，由于彼此之间矛盾的发展，后来竟互相攻杀，范汝为擒杀廖公昭，张毅又不断攻击范汝为，而范汝为与另一支农民军张万全之间也不时互相攻打，这样，便

削弱了农民军自身的力量，为官军各个击破提供了方便。

为了分化瓦解农民军，南宋统治者在调兵遣将镇压的同时，又玩弄花招，十一月八日，高宗下诏："自范汝为外，余皆与免罪，许令归业。"十二月七日又下诏："王师到日，其诸徒众能执汝为请命者，当重赏，其余咸赦除之。"但是，宋高宗的诏书等于一张废纸，得到的回答是农民军更加勇猛的战斗。

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韩世忠率官军三万人，由台州（浙江临海）出发，经温州至福州，随后沿闽江逆流而上，水陆并进。范汝为农民军获悉韩世忠进犯后，毫不畏惧，他们在离建州一百里的地方建立了第一道防线，"尽塞途路，埋巨木，为鹿角，散布竹签、铁蒺藜、陷马坑，凡可以旅拒王师者，无不用其至"。使官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韩世忠不敢由大路进犯，乃改走小路，"命诸军偃旗仆鼓，舍正路，俾各择便利，沿山堑溪，披践榛棘"，偷偷摸到建州城外的凤凰山，绕到农民军背后，于绍兴二年（1132年）一月四日包围了建州。凤凰山在建州城外二十五里外，是建州的门户，凤凰山失守，建州即被包围，立凤凰山上，可"下瞰城邑，如在井底。"官军以"火楼，巨石、天梯、云梯百道齐攻"，范汝为指挥农民军顽强固守，经过六个昼夜的激战，杀伤大量敌人，终因农民武器不足，又无外援，一万多人牺牲，一月九日建州失守，范汝为率领一部分农民军突围，张熊等五百多人被俘。

范汝为突围后，转移到起义的发祥地回源洞坚持斗争，又遭到官军的围攻，范汝为兵败"自缢死"，为农民革命献出了生命。农民军将领陆必强，叶铁骨、陆必先、张弓手，熊致远等率领起义军残部，企图向外转移，也受到官军的追击，不久相继失败。韩世忠在镇压范汝为起义的过程中，前后杀农民军三万多人，他是抗金名将，屡立战功，但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却欠下了人民一笔大血债。

范汝为牺牲后，他的余部有一千多人，在范忠的领导下，转战于福建、浙江边界。绍兴二年（1132年）十一月，他们还进攻龙泉（浙江龙泉），松溪（福建松溪），杀死松溪县尉吴某，又一度进攻处州（浙江丽水），声威大振。南宋朝廷害怕农民军进一步"滋长"，慌忙调神武前军左统领申世景、御前忠锐第六将单德忠率二千人镇压，但这支官军不是范忠的对手，结果失败，"处州复告急"。南宋朝廷又增派忠锐第一将张守忠带精兵二千人增援，合兵围攻，十二月初，农民军与官军展开激战，范忠不幸中流矢牺牲，农民军失败，坚持两年半之久的范汝为起义，至此便最后失败了。

范汝为起义军之所以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支农民军之间非但不能互相联合配合作战，反而互相攻杀，视若仇敌，结果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另外，范汝为起义后，其活动范围只限于建州一隅之地，不能向外发展，结果在遭到大军围攻时，便缺乏外援，使自己陷于十分孤立的境地，最后失败，也就成为必然了。

第三节 南宋中后期的农民战争

一 横征暴敛激化了阶级矛盾

宋孝宗即位后，虽取消了秦桧的官爵谥号，恢复了岳飞的名誉，纠正了秦桧当国时的一些弊政，免除绍兴三十年（1160年）以前的所欠赋税，但实际上农民并未得到什么实惠，得到好处的只是那些大地主。随后，赋税征收又逐渐增多。南宋中期，旧税未免，复增新税，而支移、折变、和买等各种巧取豪夺的名目有增无减。杨万里曾经指出："民输粟于官谓之苗，旧以一斛输一斛，今以二斛输一斛矣。输帛于官谓之税，旧以正绢为税绢，今正绢外有和买矣。旧和买官给其值，或以钱，或以盐，今皆无之，又以绢估值而倍折其钱矣。旧税亩一钱输免役一钱，今岁增其额，不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数倍其帛，又数倍其钱，而又有月桩钱、版帐钱，不知几倍于祖宗之旧"。南宋中期后，农民的负担更加重了。

南宋领土比北宋大大缩小，其经济承受能力有限，但为了维持它的反动统治，却保持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孝宗乾道初年，其军队已超过四十万人，每年用于养兵之费达八千多万缗。赋税收入大部用于养兵，州县无余，便另立名目加征于民。淳熙七年（1200年）夏，知南康军朱熹说："今民间二税之入，朝廷尽取以供军，州县无复赢余，于是别立名色巧取。"自然加重了对农民的盘剥。荆湖南路各州县的税米南宋政府还要求"馈荆、鄂、襄阳诸军"，要农民将税米直接送往前线，而运送粮米的费用却要农民自己承担，如潭州（湖南长沙市），岁输米三十万斛，额外又增运输费十万缗。

苛捐杂税，更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其中以月桩钱最为民害，它的征收范围很广，有所谓曲引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折纳牛皮筋角钱等等，如曲引钱，虽规定"乡村有吉凶聚会者，听人户纳钱买引，于邻近酒户寄造酒曲，不得非理抑配"，法令虽这样规定，但征收时，却采取了按田亩摊派的办法，上等三千文，中等二千文，下等一千文，最下等五百文，"皆随夏秋税送官，自田二十亩而上，无能免者"。另外，还有乳香摊派，乳香是一种奢侈品，对广大人民来说，是一种无用之物，封建统治者却通过州县政府向农民摊派购买，限期强卖。贫苦农民衣食都很困难，那有能力购买乳香，这等于置民于死地。

茶叶专卖制度，也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激化了阶级矛盾。北宋时，茶叶专卖已经引起王小波、李顺起义，南宋时，种茶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南宋政府对茶农、茶贩的控制也更加严密，规定茶农要将生产的茶叶低价卖给官府，官府却以高价出卖"茶引"于茶贩，茶贩凭"茶引"取茶，运销各地。这种制度，不仅使茶农深受其害，而茶贩也获利很小，因此，茶农茶贩之间便私相买卖，私贩盛行起来。茶贩往往成群结队，人数"多辄千余，少亦百数，负者一夫，而卫者两夫，横刀揭斧，叫呼踊跃，以自震其威，使人有所畏而不敢迫"，将茶运往外地以至渡淮北去，售于金朝境内，获利极厚，广大茶农，也依靠私贩"资以为生"。南宋政

府严禁私贩，并派兵缉捕，因此，许多茶农、茶贩被迫起而反抗，参加农民起义，有些起义还是茶贩领导的。

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使农民纷纷破产，失去生计，哭诉无门，终于铤而走险参加起义，正如辛弃疾所说：“斯民无所诉，不去为盗，将安之乎？”

二 李金领导的起义

乾道元年（1165年）春，湖南地区发生旱灾，饥民遍地，封建官府不仅不加救济，反而向各州县灾民派实乳香，农民无比愤怒，灾情最重，生活无着的郴州（湖南郴县）宜章县农民，在李金的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

宜章县地处荆湖南路的最南端，地连广东，“二广诸郡，城垒兵备，率皆单寡”。这里官军兵力薄弱，有利于农民军发展，因此，李金起义户，很快发展起来。乾道元年（1165年）五月，农民军已发展到上万人，他们“分道犯英（广东英德），韶（广东韶关市）、连（广东连县）、广（广州市），德庆（广东德庆）、肇庆（广东肇庆市）、封（广东封开）、梧（广西梧州市）、贺（广西贺县）之境，旁入道州（湖南道县）、桂阳军（湖南桂阳），杀掠万计，州县不知所为，至敛民间金帛赂之以免”。农民军攻入广东、广西两路，在九州范围内，杀地主，没收其财物，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随后，农民军又返回家乡湖南，经道州（湖南道县）攻占郴州（湖南郴县）、桂阳军等城。农民军“鼓行面前，直捣县邑”，有些地方官无力相抗，便献出伞帛，要求农民军不要到他们那里去。在农民军的打击下，这些老爷们的往日威风，扫地以尽。

李金起义后，“数道大震，朝廷忧之”，乾道元年（1165年）三月，南宋朝廷任命刘珙为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让他全权负责镇压农民起义军。同年五月，刘珙到达潭州，拟调集各州军队，但却遭到各州官员的反对，他们认为，“非湖南材官所能了也，非鄂渚羽林不可”。安抚司的官员也畏缩不前。刘珙感到，湖南官军力量很弱，远不是农民军的对手，只好向朝廷告急，要求增派援兵，同时写信给湖北、京西制置使沈介，要求他发兵协助，并且向他保证：“道远贼炽，比下诏，且不及事，请以便宜出师，即朝廷以擅兴为罪，吾自当之。”这时，在李金起义的影响下，湘阴县桥口又爆发了刘花三、李无对为首的起义，有众数百人，攻击刘珙的后方，农民军大有席卷湖南之势。面对农民军的南北夹击，刘珙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纠集了一支由州县兵组成的三百人的军队，由部将赵彦率领向桥口的农民军反扑，刘珙还出重赏号召地主武装起来镇压，他贴出布告：“民有得盗斩首者，皆厚其赏，盗所隐赃者无多少，官一不问”。这张布告，吸引了当地的地主分子，他们配合官军，向这支小规模起义军发动进攻，使许多人惨遭杀害。

六月，沈介令游奕军统制田宝率兵一千人，鄂州水军统制杨钦率兵

一千五百人到达湖南。刘珙："发夫数程外迎之，代其负任；至则犒赐过望"，杨钦原是钟相、杨幺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将领，后叛降，成为南宋统治者的忠实走狗，刘珙看到杨钦可用，便下令各路军队均受杨钦节制。田宝、杨钦两支军队的到来，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军由优势转为劣势。在官军的进攻下，李金接连战败，六月三十日，郴州战役，农民军又遭惨败，被田宝追杀二十多里。七月，官军攻桂阳，农民军将领田欧、尹宽战败。农民军力量一再削弱，而"鄂将谷青，王翌又各以二千人至"，农民军退守宜章。八月，农民军数万人与官军在龙冈发生决战，"自辰至申，官军稍却"，农民军即将取得全胜时，农民军叛徒杨钦又带领大队官军杀来，"钦被发大呼，策马横冲之，贼分为两，共前列精兵歼焉。"农民军被冲为两段，结果大畋，李金率领农民军残部退往莽山之中。

在军事镇压的同时，南宋统治者对李金起义军同样也进行了诱降活动，刘珙发出文告："贼徒相扑杀诣吏者，除罪受赏。"当农民军办量削弱，形势恶化时，农民军内部的一些不坚定分子，便经受不住敌人的威胁利诱，发生动摇。八月七日，曹彦、黄拱叛变，李金、黄谷等农民军领袖被执送官军，壮烈牺牲。官军进入宜章山区后，进行了血腥大屠杀，许多劳动人民惨遭杀害，地主分子也进行了反攻倒算，"复故田宅者以千数"，造成一片白色恐怖。但是，劳动人民并没有被血腥镇压所吓倒，他们把农民军战士掩护下来，化整为零，分成许多小股，继续战斗，直到这年十二月，才最后失败。

三 赖文政领导的起义

南宋时，政府对茶叶实行专卖，通过压低收购价格以盘剥茶农，以茶引、缉私控制茶贩，千方百计增加政府收入。由于收购价太低，茶农"不得以自赡"，纷纷破产；又由于官府的"茶引"定价太高，使茶贩无力购买，因而私贩盛行，官府对私贩进行武力镇压，终于酿成所谓"茶寇"的起义反抗。

南宋中启期，"茶寇"起义此伏彼起，一直没有停止，但规模都比较小，其中人数较多、影响较大的是淳熙年间赖文政领导的荆湖茶贩起义。

淳熙二年（1175年）四月，湖北茶贩以赖文政为首在荆南发动武装起义，有众四百多人。湖北境内官军较多，起义军不易发展，赖文政乃率领起义军进入湖南，又入江西，沿途杀官员，烧官府，连败地方官军。南宋政府慌忙调集鄂州（湖北省武昌）及江西的军队前往镇压，但官军尚未集结起来，起义军已经到达吉州（江西吉安），吉州宋军顽抗，被起义军打得大败，后起义军又转入禾山（江西永新县西北）。知隆兴府兼江西路安抚使汪大猷派副总管卖和仲领数州之兵攻禾山，他老而无能，轻举冒进，故一进山就被起义军打垮了。后官军集中大队兵马攻山，起义军又采取缓兵之计，声称可以谈判招安，但暗中却立旗帜为疑兵，由乌道窜去"，两天后官军才发现起义军转移，已经望尘莫及了，

围剿失败。六月，南宋朝廷又任命辛弃疾为江西提刑、节制诸路军马，镇压起义。贾和仲兵败被罢官除名；送贺州（广西贺县）编管：汪大猷也受到降职处分。

赖文政率起义军离禾山后，由吉州（江西省吉安县）、赣州（江西赣州市）进入广东境内，“其锋甚锐”。广东提点刑狱林光朝立即调集本路军队拦截，摧锋军统制路海，广东钤辖黄进“各以兵分控要害”，赖文政起义军接战失利；损失很大。为保存实力，起义军又返回吉州，在永新县的禾山一带山区隐蔽下来。

八月二十六日，赖文政率领起义军由安福县经娘子坑进入萍乡（江西萍乡市）境内，潜伏于“东冈之周氏家”。江西宋军将领解彦祥率军尾追，并派兵四出侦探起义军的去向。八月二十九日，起义军的住处为宋军侦知，解彦祥乃自率大军，以巡检使马熙为向导，扑向东冈，以优势兵力向起义军发动突然袭击。在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的情况下，赖文政仍沉着应战，与官军激战于周氏门前田中，起义军伤亡很大。日落后，赖文政率部转移，转移中，起义军又遭到马熙的袭击，乃退回安福，在安福寺休整和治疗伤病。这时，解彦祥也尾追不放，由宜春（江西宜春）越过仰山追至安福。赖文政则由安福南下，经永新进入兴国（江西兴周），将宋军远远抛在后面。

九月，辛弃疾在以大军围攻的同时，也加紧了诱降活动，不断派人到起义军中劝降。赖文政由于在萍乡战役中受到很大损失，在转移途中，又受到土豪彭道的袭击，起义军人数大减，伤病员又多，已无力再战。兴国县尉黄倬前来劝降，许诺了许多条件，赖文政信以为真，结果上当，被骗到江州杀害，起义失败。

赖文政起义前后坚持斗争半年之久，南宋统治者动用了上万人的军队，“将尉死者数十人，为费以六万计”才镇压了这次起义，可见对南宋王朝是一次沉重打击。

四 陈峒领导的起义

李金起义被镇压以后，南宋统治者将鄂州兵一千多人留驻于郴州和桂阳军，用以监视，镇压人民的反抗活动。随后，湖南安抚使刘珙又要求“增置新兵”，因而，“调度百出”。镇压李金起义后，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剥削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加重了。正如辛弃疾在给孝宗皇帝的上书中所说的：“陛下不许多取百姓斗面米，今有一岁所取，反数倍于前者，陛下不许将百姓租米折纳现钱，今有一石折纳至三倍者，并耗言之，横敛可知。”杨万里指出，“郴寇之作，亦守臣和籴行之不善之所致也。”是封建压迫剥削太重导致了陈峒农民起义的爆发。

淳熙六年（1179年）正月，宜章县人陈峒，领导农民在太平乡发动了武装起义，旬日之间，发展到数千人。陈峒“剿悍善战，颇有策划，据岽山深谷，多施偏驾弩、礌石手炮，又有小盾，皆其长技”，他们还“遣

人入溪峒，买毒药之可为药箭者”，制造了杀伤力很强的毒箭，因此，农民军所到之处，屡败官军。陈峒与李金一样，起义后很快南下攻入广东连州，随后分兵两路，一路由陈峒率领返回湖南，进入道州境内，攻占江华县，又破桂阳军（湖南桂附）之蓝山、临武二县；另一路则由邝深率领，攻取连州（广东连县）阳山县，并把矛头指向广州的怀集县（广东今县），大有南取德庆（广东德庆县），肇庆（广东肇庆市）二府之势。农民军的迅速发展，使郴州、道州、连州、永州，桂阳军等地“皆警”，湖南，广东两路震动。

陈峒起义爆发后，湖南路安抚使王佐，一面向南宋朝廷报警，要求调拨荆鄂兵三千人来援，一面就地拼凑军队讨伐，他起用流放到湖南的犯罪将领冯湛代理湖南路兵马钤辖、节制诸路军马，指挥潭州将兵八百人，又从各州县调集土军、弓手、义兵共五千余人，前往镇压。

这时，广东方面，当邝深率领农民军攻下阳山并指向广州怀集县的时候，广东安抚使周自强，也调兵遣将对农民军进行围攻堵截，由摧锋军正将刘安、训练官巫迕等，“领兵往击，败之于怀集县界郭溢村，又败之于连州界大镬村”。农民军一再失利，又有官军追逼，邝深感到在广东难以发展，便进行战略转移，率领农民军由间道撤回了宜章。

邝深返回宜章后，陈峒也率兵由道州回到了太平乡，两路起义军又汇合到一起。农民军的战略转移；—是为了集中力量，利用熟悉的地形，有效地打击敌人；但南宋统治者却误认为农民军已经计穷力尽，四月十三日宋孝宗也借机下诏“招安”。但老奸巨猾的湖南安抚使王佐却反对盲日乐观，他身临其境，了解农民军的情况，认为农民军虽遇小败，但主力并未受到损失，因此，他坚决主张武力围剿，并上书朝廷，要求迅速调兵支援。宋孝宗乃以王佐节制诸路军马，统一指挥镇压农民军事宜。这样，农民军就处于湖南、广东两路军队的南北夹击之中，形势对农民军十分不利。

面对敌人的夹击围攻，农民军毫不气馁，他们主动迎击来犯之敌，在宜章县的黄沙寨，与冯湛相遇，农民军“大呼奔突”，大败冯湛临时拼凑的三千军队，并乘胜追杀，但不幸中伏，陈峒之弟中箭牺牲，农民军退兵。

黄沙寨战役后，冯湛不敢再长驱直入，便改变策略，“敛兵闭垒”不战，“筑室聚粮，为久驻计”，对农民军进行围攻同时，又派出奸细，刺探农民军的虚实和进行诱降活动，还将俘虏的农民军放归，并宣布，若“能诛灭首恶，不惟宥罪，抑有醴赏”，以削弱农民军的斗志。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军“欲战不得”，日子一久，军心开始涣散，再加以敌人的诱降，使得农民军“内自相疑，无复斗志”，战斗力大大削弱。这时，冯湛又乘机向农民军发动进攻，“五战五克”，农民军接连失败，几天后，湖南安抚使王佐也来到宜章，他亲临前线，指挥各路军队围攻农民军，四月二十三日，命冯湛移屯何卑山，并命刘横、张立、李献率兵三百人，从间道偷袭农民军的重要据点空冈，烧毁了据点内的存粮和房屋。

鄂州军统领夏俊、田升及冯湛，率领“敢死军”直抵律头洞。五月一日，官军“分五路进兵”，向农民军发起猛烈攻击，农民军企图以“诈降”争取时间，修缮营垒，结果事泄，王佐督兵急攻，农民军战败，退保空冈寨，但寨已被烧，无法固守，再退至十二渡，又为官军所败。第二天，农民军反攻，欲夺回旧寨，与官军展开激战，“自辰至申”，农民军失利，“溪流为赤”，许多起义军牺牲，五百多人被俘虏。

空冈、十二渡等根据地失守后，陈峒率领农民军余部冲出重围，转移到英州境内。冯湛等率领官军“攀缘险绝，穷追数日”。农民军又败，陈峒不幸被俘，惨遭杀害。陈峒牺牲后，农民军余部又在副领袖李念九（又名李曦）的领导下坚持斗争。五月十八日，起义军内部又出现叛徒，将李念九杀害，投降官军。至此，陈峒起义便最后失败了。

五 李接领导的起义

宋孝宗统治后期，广西地区“百姓凋弊日甚，而官吏贪残无已，连年荒歉，饿殍满路，而州县不肯检放租税。……百姓嗷嗷，无所控诉”，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和吏治的败坏，激化了阶级矛盾，农民无以求生，终于爆发了李接为首的农民起义。

李接，又名李辑，他原是陆川（广西陆川）的一名弓手，受县尉统辖。任弓手期间，由于“官兵俸给，数月不支”，受到将官克扣钱粮的盘剥，无法生活，便团结一部分弓手，于淳熙六年（1179年）五月十六，“奋臂而起”，“杀九州巡检”，发动了武装起义。

李接起义后，针对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明确提出“不收民税十年”的斗争口号，起义军“所至州县，不专杀戮，往往开发仓廪，振施贫乏，招纳亡命，伪补官资，愚民翕然从之”。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农民纷纷参加起义，很快扩大到数千人。李接起义军顺利攻下容州（广西容县）、雷州（广东海康）、高州（广东今县）、郁林（广西玉林）等地，在陆川，博白等八县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他们“屠将官高居弁，执郡守刘长福”，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李接的反封建斗争，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支持，他们称李接为“李王”，称官兵为贼。附近的小股农民起义军陈子明，陈南容、徐铁条、杨寿、彭四十、苏生，陈方寄、谢宁、周回生等人，也各自率领部众加入了李接的队伍，农民军的力量更加壮大了。

李接起义军的发展，使统治者异常恐慌，广西经略安抚使知静江府刘焯深怕农民军南去下海，乃以沙世坚将效用军，自悟，藤趋容，效用粟全五人为之导。陈玄国以高州戍兵，自化与世坚会，调雷、化州水军截海道，趋漕司转饷，募白霞土丁，调巡尉吏士，以至增邮兵”，对农民军进行围攻堵截。淳熙六年（1179年）七月，宋孝宗命刘焯“节制诸军马督扑”，大批官军进入广西，“分军薄贼营，为连珠寨十三，以断贼往来”，将农民军包围。在大军包围的同时，刘焯也进行招降活动。由于敌众我寡，农民军伤亡很大，未能打退官军的进攻。同年十月，李接率众

突围，计划向海上转移，又因宋军“有备不得前”，未能成功，李接战败被俘，同时被俘的还有农民军将领彭四十及农民军战士二百六十五人。十一月八日，刘焯“喋接等于静江市，脍其肝心”，李接遭到残酷杀害，为农民革命献出了生命。历时半年之久的起义，至此失败。

李接起义后，未能与同时爆发于湖南的陈峒农民起义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因而影响了农民军的发展，这是这次起义很快失败的主要原因。李接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对封建统治的打击还是沉重的，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淳熙七年（1180年）正月，南宋政府不得不下令“减广西诸州岁卖盐数”。对农民起义地区，也减免了一部分赋税。

六 晏梦彪、陈三枪等领导的起义

绍定年间，在福建，广东一带又爆发了晏梦彪、陈三枪等领导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主要是由南宋政府的食盐专卖政策引起的。真德秀说：“盐法乃致寇之源。缘福盐溯流而至南剑，又自邵武溯流而上汀州，其搬运甚难，故盐到汀州，不胜其淆杂，不胜其贵，所以汀人只便于食私盐，自循、梅、潮、漳来，颇近又洁白，价又廉，故汀人每至冬春间，千百为群兴贩，因而行劫。官司一遣人追捕，便至拒捍杀人，比盐寇所从起也。”南宋政府对盐的生产和销售进行控制，低价由亭户（盐户）手中收买，高价卖给盐商，由盐商运往各地加价出售于民户。官盐价高质劣，民户不愿购买，因而私贩盛行。官府派兵缉查，终于引起武装对抗。绍定二年（1229年），晏梦彪（又称晏彪）为首于汀州（福建长汀）发动了武装起义。晏彪起义后，很快攻下了宁化（福建宁化），清流（福建清流）、将乐（福建将乐）等城，进迫南剑州（福建南平市）。起义军还分兵北上，破建宁（福建建宁）、泰宁（福建泰宁）、邵武军（福建邵武）；南攻泉州（福建泉州市）、兴化军（福建莆田市）等沿海一带，其他州县的农民也纷纷响应，福建一路，几乎都爆发了农民起义。

晏梦彪起义后南宋福建地方兵力薄弱，无力与起义军对抗，安抚使王居安上书朝廷求援，并推荐在家守制的陈韡为将领兵镇压，朝廷乃任命陈韡为南剑州知州。陈韡到任后，立即征调民兵抵抗起义军，并要求淮西派五千精兵支援。南宋朝廷又任命陈韡为捉刑招捕使，淮西将陈万率三千五百人也来到福建。宋军在力量对比上占到优势后，即围攻起义军的根据地潭飞磜，起义军不支，潭飞磜失守。随后，莲城（福建连城）七十二寨也被宋军占领，晏梦彪被俘遇害，起义被镇压下去。

绍定六年（1233年）八月，在江西赣州（江西赣州市）还爆发了陈三枪领导的农民起义。陈三枪起义后，据松山寨，在江西，广东边境进行流动作战，“所至屠残”。江西安抚使陈韡曾多次派“遣官吏谕降，贼辄杀之”，遭到农民军的坚决拒绝。陈韡“招安”失败后，凶相毕露，一面向朝廷求援，一面调集江西各地军队，向农民军发动围攻。十一月，南宋朝廷让陈韡节制江西、广东、福建三路扑寇军马，给以指挥三路军队的大权。从此以后，陈三枪农民军便受到了三路宋军的进攻，宋将刘师直

驻梅州（广东梅县），齐敏驻循州（广东龙川县），堵住了农民军南下的通道；陈靴统率淮西兵及亲军指向农民军的根据地赣州山区。十二月，农民军的外围据点下平、小平等四寨及百丈峒失守。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官军将领苗秀荣进犯田平，缩小了对农民军的包围圈。三月，官军侵占大石堡，随后，农民军的重要据点松梓山被包围。陈三枪毫不畏惧，“悉精锐下山迎敌，旗帜眼色甚盛”，与官军展开激战，官军以骑兵冲突，又用火攻，农民军寡不敌众，战败，松梓山寨失守，农民军大将张魔王自焚死，十二名将领被俘，一千五百多起义军战士被杀。激战中，陈三枪中箭，身负重伤，率领余部杀出一条血路，“缒崖而遁”。

陈三枪冲出重围后，又遭到宋军统制齐敏的截击，随后，又败于下黄，部众仅存数十人，转战至兴宁（广东兴宁县），兵败被俘。陈三枪与另外六名农民军将领被送到隆兴府（江西南昌市），惨遭杀害，起义失败。

第七章 宋元战争爆发前的形势

第一节 蒙古统一北部中国及蒙、宋、金三国格局的形成

13世纪初年中国版图上多国格局的形势，很快就被新兴的蒙古国所进行的征服和掠夺战争所改变。

成吉思汗的人生哲学，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不甘受人欺压，把反抗奴役和压迫看做是人生的美德，二是总想在胜利之后去欺压别人，把掠夺财富，强占美女看作是无尚光荣的事业。这种极其强烈的掠夺、贪婪、占有欲望，促使成吉思汗及其麾下将领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扩张战争。就是这些战争的结果，打破了中国的旧格局，出现了新格局。

蒙古灭西夏

成吉思汗立国后，第一个攻掠目标本来是以中都为统治中心的金朝。但由于金是上邦大国，南宋对金发动的“开禧北伐”并没有给成吉思汗带来理想的消息，加上远隔广漠，对金朝的情况若明若暗，所以“未敢轻动”。因而改变打击方向，首先进攻小国西夏。这样做，一来可以分裂金、夏“交相救援”的联盟，铲除攻金的牵制力量，为尔后图金创造有利条件，二来可以初试蒙古军对外作战的锋芒，从实战中进一步提高蒙古军的作战技能。于是，继1205年第1次攻西夏大掠人民和牲畜凯还之后，蒙古军又于1207年第2次攻西夏，1209年第3次攻西夏，进围夏都中兴府，迫夏襄宗纳女请和。1217年，成吉思汗征调西夏出兵随从西征，遭拒绝，于是蒙古军于次年春第4次攻西夏，夏神宗逃离都城，遣使求和。1224年，蒙古深恨西夏与金朝议和，并称“兄弟之国”，第5次攻西夏，杀夏军数万人，掳掠人口及牲畜数十万。1226年，蒙古军第6次攻西夏，夏献宗惊而死。次年六月，西夏末帝睍被迫投降，西夏国亡。从此，蒙古与南宋由远邻变成了近邻，由原来交往极少逐渐变成交往较多。

蒙古征服毗邻地区

成吉思汗建国后，即向蒙古草原北面的“林木中百姓”驻地扩展势力。1207年，遣使降服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流域的吉利吉思部。1218年，又遣兵征吉利吉思等林中百姓，各部均表臣服。与此同时，蒙古势力也向西面扩展。1208年，成吉思汗遣兵越过金山，击溃乃蛮，蔑儿乞联军，从而鼓舞了西辽控制下的畏兀儿人。1209年，畏兀儿人杀死西辽少监，投附成吉思汗，受到款待。同年，哈剌鲁人也乘机杀死西辽少监归降蒙古，受到优待。此后，畏兀儿和哈剌鲁人在蒙古西征、蒙古攻西夏以及蒙古攻宋战争中，都尽力而为之。

蒙古灭西辽

乃蛮太阳汗子屈出律篡夺西辽政权后，继续倒行逆施，自然是成吉思汗所不能容忍的。1218年，特遣大将哲别率兵征讨屈出律，在当地居民的协助下，捕杀屈出律，西辽境土尽归蒙古。此后，这里便成了蒙古西征的跳板以及班师的重要基地。

随着西夏，西辽的灭亡和吉利吉思，畏兀儿，哈刺鲁的归服蒙古，13世纪初年中国大地上曾经一度出现过的多国格局的形势，起了巨大的变化，逐渐为蒙古、金朝，南宋三国格局所取代。当然，三国之中，也不是平分秋色。在三国格局中，蒙古是中心，是矛盾的主导方面。蒙古的行动，始终左右着三国格局的发展的变化。

蒙金关系

蒙古原来是金朝的属部。在三国格局形成过程中，成吉思汗了解到“金国不治戎备，俗日侈肆，亡可立待”等情况后，便于，1211年发动了历时24年的蒙金战争；战争的起因，从现象上看，是成吉思汗宣称要为父亲、祖父辈“报仇”，而根本的动因则是为了满足蒙古贵族的“最大的乐趣”——掠夺财富，骑人骏马，纳人美女，扩大营盘，”占领国土。在战争中，蒙古人说打就打，说谈就谈。1214年迫金朝献金帛，主公乞和。1215年攻占中都。1217年成吉思汗准备西征；将攻金的指挥大权交给木华黎。1221年金宣宗遣使奉国书去西域向成吉思汗请和，“称帝为兄"，遭拒绝。金哀宗即位后，以全力西守潼关，北沿黄河2000里派兵坚守，于是蒙金形成隔河对峙。1231年，窝阔台、拖雷遵父借道宋境、联宋灭金之遗旨，兵分三路，实施战略大迂回，历经1232年的三峰山之战，南京（今开封）之战，郑州之战等，歼灭金军大部主力，继而蒙、宋联兵，于1234年攻破蔡州（今河南汝南），金亡。从此，蒙古与南宋疆域相联，交往更为直接。

宋金关系

在三国格局中，宋、金关系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情况。自从蒙金战争开始后，蒙古军踏入金朝国土，逼得金朝南迁国都，在此形势下，一向对金卑躬屈膝的南宋朝廷也开始直起腰杆。宋人高兴“金国有难”，并且乘蒙古军进攻金朝之际，拒绝向金交纳“二年岁币”。金人多次遣使督交岁币，宋人不理不睬，所以“盖自金有蒙古之难，岁币不至者六年（1211～1217年）”。实际上，从蒙金战争开始后，南宋再也不向金朝纳币输贡了，1217年，金宣宗在术虎高琪的促使下，乘蒙古军攻势减弱的机会；为达到寻求补偿，索要岁币和“以广疆土”之目的，发兵大举攻宋，其结果，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损兵折将，“士兵折耗十不存一”，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宋金战争的历来结局，一向都是以宋军的失败而告终，然而唯独1217～1224年的金攻宋战争，恰是以金败，宋胜而结束。这其中的奥妙，固然与金军屡遭蒙古军重创、战斗力削弱有着直接的联系，更重要的还是南宋军队以战斗在黄河之北的蒙古军作为不结盟的盟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故打得英勇顽强，以致取胜。1231年起，南宋借道给蒙古军实施战略大迂回，包抄金南京的后路。1233年，南宋

派兵，运粮与蒙古军一起参加蔡州会战，次年蒙、宋联军共同灭亡了金朝。至此，宋、金近百年的世仇得以了结，又开始了宋、蒙争斗的新时期。

第二节 蒙古、南宋之间的关系

蒙古、南宋之间，初期因有金朝、西夏的隔离，两国不相邻、不相属，也不直接交往。早先，南宋虽然曾经借助蒙古崛起之威对金发动“开榴北伐”，但蒙宋两国之间不曾有过官方联系。之后，随着蒙古降服西夏，蒙古迫使金朝迁都南京（今开封），以及蒙、金战争的发展；蒙古和南宋两国之间开始有了官方交往。蒙宋交往大体经历了建立联系，出现矛盾，蒙古借道和蒙宋联兵灭金等四个阶段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第一阶段双方建立联系

宋廷观望

南宋人早期对蒙古人的了解甚少，仅是听到某些传闻而已。《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曾列举《松漠记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旧闻证误》等书目，就有大量关于蒙古传闻的辑录。既为传闻，显然同史实有许多矛盾之点，但却带有某些事实的影子。1211年六月，即蒙古军获得野狐岭之战的胜利后，南宋人派户部员外郎余嵘出使金朝，“贺金主生辰”。行至中都西南的良乡附近，目睹从前线败退下来的金兵，“溃军累累”，“号泣”不止的情状。溃兵哭诉说：“鞑靼到宣德县，去此只三四百里”。余嵘很想亲眼看一看蒙古人到底是什么样子，便自制蒙古使节旗帜藏于身上，备遇蒙古军时证明自己的身份，继续北行。但是，他的愿望由于受到金人的阻拦没有实现，不二月，余嵘回到南宋，述说：“今鞑靼坚锐，即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丧销要，有旧辽灭亡之势”。这一次见闻，记入《使燕录》一书，比以前对蒙古人的了解稍微深了一层。所以，宋兼礼部郎官真德秀奏报宁宗说，“金有必亡之势，亦可为中国忧。……多事之端恐自此始”，1213年，宋廷继续与金朝有使节来往，但由于蒙古军对金加大攻势和金朝发生内乱，南宋使金的三任官员都是“不至而还”。因而对蒙古的了解，主要还是靠间接渠道。在此情况下，曾经使金的南宋官员真德秀，通过对中原局势的分析，主张对新起的蒙古势力要存以戒心，因为“崛起者（蒙古）难驯”。南宋大员乔竹简则主张：“中国宜静以观之。”意思十分清楚：南宋既不能得罪蒙古人，也不主动与蒙古人结好，只能是等待观望而已。

蒙古使宋

蒙古人早期对南宋的了解，也是靠金朝这一间接渠道传播，所以同样是十分肤浅的。金人称南宋人为“南家”，蒙古人沿用此名，并加复数语尾—S，称“南家思”，即是一例。蒙，金战争开始后，尤其是到了1213年底，蒙古军俘，降大批金朝的汉将，如郭宝玉、王掀、刘伯林、史秉直史天倪父子等“金虏叛亡之臣”，再加上蒙古军3路扫荡已深入中

原腹地，兵锋接近南宋边境，因而加深了对南宋的了解，知道了南宋与金朝有“世仇”，是可以联络，利用的力量。于是，亲率蒙古中军的成吉思汗，从济南派出使者3人：一是蒙古通事速卜罕（一译主不罕，搠不干、绰布干、苏巴尔罕），一是降蒙的金莫州同知，一是汉人，由300士兵，17骑护送，于次年（1214年）正月九日到南宋“纳地请兵”。据史家分析，蒙古3位使者的使命，应是要求南宋出兵，联合攻金。但是，由于宋廷消极地吸取“海上之盟”（1118年）联金灭辽的教训，加之“开禧北伐”（1206年）的创伤记忆犹新，故对蒙古采取冷漠，暧昧、置身局外的方针，只由守边的统领李兴出面，“以本州不奉朝旨不敢受”为理由，把蒙古使者遣回去了。蒙古第一次使宋遭到拒绝。

时隔四年（1218年）之后，成吉思汗“使葛葛不罕与宋议和”。因史料记载语焉不详，《元史》上只提到“庚辰（1220年），宋果渝盟”。说明，到这时，南宋尚未真正接受蒙古要求通和、联盟的主张。

蒙、宋通使

在蒙、宋通使问题上，蒙古人不仅麦现了主动性，而且表现了耐性。他们对朝廷首鼠两端，争论不休。然而自从金、宋战争复起（1217年），宋廷要求靠拢，联络蒙古以对抗金朝的呼声则越来越高了。1219年，有人“献策北通鞑靼”，为宋廷所重视，从此加速了南宋靠扰、联络蒙古的步伐。1219年后，随着金朝对南宋的攻势益加猛烈，也逼迫南宋不得不改变拒绝通好蒙古的观望政策。因此，便有了1221年宋使苟梦玉抵西域觐见成吉思汗之行。当时，蒙古军正在西征，成吉思汗正在西域铁门关驻夏。他拒退了金国使臣，却会见了宋使苟梦玉。之后，成吉思汗还专派宣差葛合赤孙，伴同苟梦玉一起回国报聘。显然，蒙、宋双方此次会谈取得许多成果。关于苟梦玉此次出使蒙古的使命，《元史？太祖纪》称其是“来请和”。然蒙、宋双方并未交战，无“和”可“请”。因此，推测苟梦玉此行之目的是沟通联系，在抗金斗争中取得蒙古的谅解和支持，并顺带了解蒙古的实情。看来，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与苟梦玉出使西域的同时，南宋以淮东制置使贾涉名义，派遣都统司计议官赵珙前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拜见了蒙古驻汉地的太师国王木华黎。木华黎待宋使十分热情，说：“你来我国中，便是一家人”，还称颂“你大宋好皇帝，好宰相”。蒙古人虽然“礼文甚简，言辞甚直”，但在行动上却表现了极为友好的态度。在宋使离开蒙古军营时，木华黎还特地向伴使交待：“凡好城子多住几日，有好酒与吃，好茶饭与吃；好笛儿、鼓儿吹着打着”。另外，木华黎特遣速不罕至宋淮东制置司处报聘。可见，赵珙此次使蒙取得了成功。

南宋在同一年（1221年）中，派出两个使者，分别到西域和中原去拜会蒙古首脑人物，说明宋廷有着急于了解、联络蒙古的迫切愿望。成吉思汗和木华黎在两地分别会见南宋使臣，并且夸赞“大宋好皇帝、好宰相”，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友好热情，也说明蒙古人有着联宋攻金的迫切心情。事隔二年（1223年，苟梦玉第2次出使西域，拜见成吉思汗。返回

后，写了《使北录》（已佚）。据史家分析，苟梦玉在两次出使中，曾与蒙古讨论了联兵灭金的秘密协定。这一点更加清楚地表明，蒙、宋双方已经把金朝看作共同的敌人，并把对方视为攻金作战的同盟军。

第二阶段蒙、宋、出现矛盾

在蒙古、南宋的交往关系之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起着支配作用。这两个因素，一是双方有着金朝这个共同的敌人，在反金这一点上，蒙、宋存有一致性，二是双方有着根本的利害冲突，尤其是在招纳、利用金境内的义军和民间武装这一方面，蒙、宋存有对抗性。前者，支配着蒙、宋双方的靠拢，通使，甚至达成某种军事协议，后者，支配着蒙、宋双方的疏远、冷漠，甚至出现间接的军事交锋。从1217年宋、金战争复起，到1227年蒙古灭夏的年间，前半期。（1223年前），在蒙、宋关系中，一致性多于对抗性，所以显得较为友好，一些利害冲突仅属局部性的。后半期（1224年后），在蒙、宋关系中，对抗性多于一致性，所以显得较为冷淡；一些利害冲突已经直接影响到全局。

蒙古、南宋这一时期的利害冲突，主要集中在争夺金境内的义军和民间武装身上。

蒙、金战争爆发以后，内外交困的金朝，对外恶化金、宋和金、夏关系；对内加重对民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尤其是刮地、掠民为驱丁等措施，致使民众“连年饥馑”，“百姓离散”，“众不胜其酷，皆怀报复之心”。于是，一场民众反抗金朝黑暗统治的武装起义爆发了。起义者多以红袄为标志，故称“红袄军”。史料记载，1212年，金朝各地已“盗贼纵横”，“莒、淄、潍（属山东），河中（属山西），陕西之寇动数万人，所在屯结”。山东是武装起义声势最大的地区。益都杨安儿，众至数十万，“蹂践山东数郡，依山负海，时出时入”；潍州李全，由数千人发展至数万之众，泰安刘二祖，众至数万；刘二祖，遭金杀害后，其女刘小姐“亦聚众数万”；兖州郝定，“僭号大齐”，众至10万……。这些义军虽然先后遭到金朝的镇压或重创，但义军的斗争烈火仍在继续燃烧。杨安儿败亡后，其妹杨妙贞（四娘子）与李全结为夫妻，合为一军。刘二祖败亡后，其部众由彭义斌等率领，继续转战山东、河北等地。尽管各支义军和民间武装“未有定属”，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系统，但人心归宋却是共同的愿望。

南宋朝廷对义军的态度和政策，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开始时，对义军极为敌视，统称之为“山东群盗”，“盗贼充斥”。一些廷臣更认为，义军是同金朝、蒙古一样的祸患。所以，当义军南投时，宋廷一律拒之于门外，企图想借助金人之手将义军铲除，或置之于蒙古军的锋镝之下。然而从金、宋战争复起（1217年）后，南宋朝廷才逐步认识到，义军是可以借用的力量。所以，对义军变敌视和拒之门外的政策，为招纳、利用、分化的政策。1217年秋，宋楚州（今江苏淮安）知府应纯之首先接纳了南来就食的部分义军。宋丞相史弥远接到奏报后，鉴于有“开禧北

伐”的创伤未复，命令江淮制置使李钰及应纯之，在不要大事声张的情况下，可以“慰接”义军，编为“忠义军”，供给“忠义粮”。此后，金境义军辐辏而至，都愿归附南宋，李全，石硅、夏全，裴渊等于1218年起先后附宋。这样南宋则是不战而取大片领土。1219年涡口大捷，李全击败金将纥石烈牙吾达，更使宋廷从义军身上尝到了甜头。因而，从1220年起，南宋从暗暗接纳义军转为公开“招谕”，且对义军的诬称“贼盗”改为“豪杰”，命令沿边守臣，采取主动，“以待豪杰之来归者”。宋廷在招纳义军的同时，也积极招纳金境内的地方性民间武装。如山东长清令严实归宋后，宋授济南治中，太行山之东的广大地区皆受其节制。这样，由于义军和民间武装纷纷归宋，原本姓“宋”，后来姓“金”的大片地区，在名义上又复姓“宋”了。

但是，从蒙古军南下后，一批批归宋的义军和民间武装又改归蒙古，使大片名义上姓“宋”的地区，又改姓“蒙古”了。由此，蒙古和南宋双方的利害关系，在义军和民间武装的归属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撞，双方的矛盾便由此出现并扩大化了。

蒙、宋争夺的第一个目标是石珪。南宋曾授石硅为“涟水忠义统辖”继而卢用陕西义勇祛”，对义军各部士兵进行汰简后，在手背上刺字，实际是一种分化、削弱政策。石硅对宋不满，于1219年特派亲信刘顺到西域去见成吉思汗，约定“永结一家”。次年。（1220年），宋将把石硅的妻子沉死于淮河，迫石硅毅然率部到燕北归附木华黎。1221年，木华黎授石硅光禄大夫、济兖单三州兵马都总管、山东路行元帅、佩金虎符。同时，蒙古遣使葛合赤孙（即宣差噶哈）至南宋议事。1223年，成吉思汗得悉石硅屡立战功后；下诏：“石硅弃妻子，提兵归顷，战胜攻取，加授金紫光禄大夫、东平兵马都总管、山东诸路元帅”。同年七月，石硅在与金军作战中马仆被俘，解往南京（今开封），金廷诱降不成，蒸杀于市，蒙古人却作忠义祭祀。

蒙、宋争夺的第二个目标是严实。南宋曾授严实为“济南治中”。1220年，木华黎率军攻山东，严实认为宋廷不可靠，便以其控制的8州30万户归降木华黎。善于招纳降将的木华黎，立即拜授严实为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省事。随同严实来归的部将刘通，被授予齐河总管，很快又命为镇国土将军、左副都元帅、济南知府、德州总管、行军千户。严实的女婿张晋亨及兄张颐，授安武军节度使。严实的外甥齐显荣，时称“神童”，9岁代父任金千户，从严实归蒙古后，因功升为权行军万户。蒙古接纳严实之举，复将姓“宋”的8州之地改姓“蒙古”。

蒙、宋争夺的第三个目标是彭义斌。南宋曾授彭义斌为大名路总管。彭义斌竭力为南宋而战，1222年，率部克复京东一带州县，已归蒙古的严实所控制的地区也多为他所得。1224年，宋廷赐钱30万缗劳军，兵势大振。次年，彭义斌围攻东平（今属山，东），迫严实约和。旋提兵西进，联合金将武仙取真定（今河北正定）。严实与蒙古将领孛里海合兵，大败彭义斌于内黄。彭义斌被俘，不屈而死。由此，名义上归宋的大片地区，再归蒙古。彭义斌之死，对南宋来说是一大损失。

蒙、宋争夺的第四个目标是李全。南宋曾授李全为广州观察使、京东总管。李全打着宋朝旗号，获宋粮饷的资助，率兵北返山东，收复大片地区，并把许多支义军收罗在自己的控制之下，累进承宣使，成为南宋在山东的一股巨大势力。但李全其人，随着势力的扩大，逐步走上拥兵自重，割据称霸的道路。1225年，杀宋淮东安抚制置使许国。1226年，捕捉降蒙的张琳（蒙古授为行都元帅），送交市宋，夺占益都（今属山东），这是有损于蒙古利益的军事行动。因此，蒙古将领带孙（木华黎弟）与严实合。兵包围李全于益都。李全“大小百战，终不利，婴城自守”。孛鲁（木华黎子）率蒙古军参战，遣使招降，使者被李全所杀。战事持续到次年（1227年歹四月，城中食尽，李全被迫出降。当时，蒙古军诸将力主诛杀李全，以泄愤。孛鲁则力排众议。他说：“不然，诛一人易耳。山东未降者尚多，（李）全素得人心，杀之不足以立威，徒失民望”，便命李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随之，“郡县闻风款附”，山东全归蒙古。

李全降蒙古，彭义斌遇害，标志着南宋在金境内的借用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名义上姓“宋”的山东，河北地盘，全部改姓“蒙古”。不久，李全南归楚州，表面上恭顺于南宋以取得钱粮，实际上畏惧于蒙古，并把宋人钱财贡奉于蒙古，这意味着蒙古的势力正在向淮河以庸地区渗透，这对已经通好并订有密约的蒙，宋关系，不能不笼罩上一片乌云。所以，在这段时间内，蒙古，南宋之间，不仅没有看到履行密约，联兵夹金的行动，交聘也甚少，而且侵害对方利益的事件却接连发生。一包话，矛盾和对抗多于一致性，是这一时期蒙，宋关系的主流。

第三阶段蒙古借道宋境攻金

如果说，蒙、宋争夺义军和民间武装的斗争，还是属于间接的武装冲突的话，那么，蒙古强行借道宋境攻金，则发展成为蒙宋双方直接的武装冲突了。

丁亥年之变

丁亥年（1227年）春，蒙古军以武方侦察道路为目的，在宋之“利州路”抄掠“五州”，与宋军发生武装冲突，这是蒙，宋关系史上的第一次武力交锋。

1222年，木华黎大举进攻陕西之时，曾遣部将蒙古不花“引游骑出秦，陇，以张声势，且视山川夷俭强弱处”。蒙古不花。遵命南越秦岭牛岭关，兵至凤州（今陕西凤县东）而还。丁亥年（1227年），二月初，成吉思汗遣一支“游骑偏师”，以“取金，夏”为名，突入南宋管辖的利州路。在当地“羌人”的向导下，首先攻克阶州（今甘肃武都县东）。三月初，蒙古偏师包围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县西南）。西和的地位至为重要，在关外五州中，“乃腹心之地”。宋守军初期不明宋军为何部，后来得知是蒙古军，便吓得不敢出战。另一支蒙古军与宋军相遇于阶州东部之皋兰城，蒙古铁骑一举击溃宋军，南宋“西边良将”麻仲、马翼，王平

皆战死，程信败归。宋四川制置使郑损，闻皋兰，之败，惊慌失措，轻率下令“弃阶、凤、成、和、天水五州，画守内郡”。蒙古军掠遍五州，进而南下，破文州（今甘肃文县）石靴关。纵横数月之久，至七月北去。蒙古此举，一方面使宋之“五州焚荡”利州路大片地区受到摧残，另一方面探得蜀陇地区的关隘密布和阵地险要。

当时，正在指挥灭夏战争，谋画灭金方略的成吉思汗，从“游骑偏师”在宋之利州路的探路活动中，已经清楚地洞察了灭金的进军路线，必须向南宋借道，这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一个利用宋、金世仇，借道宋境，联宋灭金的迂回大战略形成了。这就是下面那篇著名的成吉思汗临终遗言，“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很明显，蒙古与南宋的第一次军事交锋，对南宋来说，知道了蒙古铁骑的厉害，对蒙古来说，使成吉思汗的灭金大战略日渐成熟起来。

至于说，为什么会发生此次武装冲突？史家认为，这与蒙古，人把“和好”理解为“投拜”直接有关。蒙古人所理解的“和好”就是“投拜”。在五州战事过程中，蒙古军曾派遣两名使者，分持金牌，“大书伪号于牌上，自谓为天所赐，付以幅纸几百有余言”。一名使者至西和州，一名使者至秦家坝。二使共同特点是“狂僭异常，悖慢无礼”。总其大略，蔽以一言，盖欲臣妾我也，欲使吾国中尽行投拜也”。南宋虽与蒙古有使节往来，但不曾把“和好’当作“投拜”。蒙古人见南宋人不驯，便以武力来压，于是便爆发了丁亥之变。

还应当指出，丁亥之变的发生，是蒙古军一次有计划的预谋活动，是成吉思汗蓄谋已久的灭金方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据《金史》卷120《完颜合达传》记载，早在金宣宗发动金、宋战争期间（1217～1223年），金宣宗使奥敦阿虎出使蒙古，一员蒙古将领指着一幅舆地图对金使说：“商州到此中军马几何？”又指着兴元（今陕西汉中）说，严我不从商州，则取兴元路入汝界矣。”可见，在成吉思汗临终遗言前几年，蒙古军已经酝酿绕道宋境攻金的计划。此次丁亥之变，只不过是蒙古军为实施借道攻金而采取的一种武装侦察性的行动罢了。

争夺蜀口

1280年冬至1231年秋期间，蒙古军强行借道宋境，在宋之蜀口主关（武休关、仙人关、七方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内，与宋军展开了一系列的激烈战斗。这是蒙，宋关系史上的第2次武，力交锋，也是蒙宋战争爆发前的一次最大的武装冲突。

1230年秋，窝阔台和其四弟拖雷，亲率蒙古军由漠北辗转进至陕西作战。为了打开关陇的大门，进而为实施借道宋境攻金的战略计划，首先发动了围攻凤翔之役。凤翔，与宋之利州路毗邻。所以，在此役打响后的十一月，蒙古军一部从宝鸡（今属陕西）南下，进入宋境，兵至凤

州（今陕西凤县）城下，留下一封“嫚书”后便自行退去。次年正月，蒙古遣使者速不罕，与宋四川安抚制置使桂如渊的代表在武休关谈判，蒙古方面向南宋提出借道和“索粮二十万斛。的要求。桂如渊在蒙古武力威胁面前，委曲求全，一面下令“诸将毋得擅出兵沮和好”，一面派遣王良能、李大攀为使，前往凤翔的蒙古大营“回报”，同时，还命令“汉中趣办牛羊酒以犒鞑师”。桂如渊以为此举可以挡回蒙占军，其实，蒙古军决不以取“五州”为满足。所以，当桂如渊作出“弃五州，守三关”的决定后，自然是招引蒙古军继续进兵，同时引起“五州民众，痛入骨髓”，“边民扼腕切齿”，大骂桂如渊无能。

蒙古军在西线围攻凤翔，兵入宋境、遣速不罕使宋期间，也在东线遣使李邦瑞（字昌国）赴宋，先至宝应（今属江苏），“不得入”，继由李全派兵护送，又遭宋“拒之”。之后，李邦瑞道出蕲、黄，“宋遣贱者来迎”，经过几番周折，“乃议如约而还”。李邦瑞使宋目的，据《宋季三朝政要》卷1记载：“欲假淮东以趣河南”，“约夹攻金”）。

同年（1231年）二月，蒙古军攻占战略要地凤翔，建立了甫下入川作战基地。李邦瑞向拖雷建议：“金主迁汴，所持者黄河、潼关之险尔。若出宝鸡，入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金人闻之，宁不谓我师从天而下乎”。很显然，李邦瑞的建策，为实现成吉思汗“假道于宋”遗言提出了具体的进军路线。所以，拖雷深表赞同，并转告于窝阔台。自此，遂有蒙古军3路趋南京（今开封）之决策。担任蒙古军右路军统帅的拖雷，于是年（1231年＞三月；率骑兵3万由凤翔南下，穿大散关，入宋境。三月十八日，蒙、宋两军展开马岭堡之战。宋守将忠义军总管田燧，率1400（一说3000，一说2000）名民兵与蒙古军数万“血战三日夜”，终因“矢尽援绝”，田燧英雄战死，马岭堡为蒙古军所占。接着，蒙古军发起凤州之战，宋守臣知州李实、通判张度、教授张叔寅等死之。四月二十七日，蒙古军攻占凤州。后人赋诗盛赞田燧、李实等人：“凤州文武浑无愧，马岭英灵只自哀，后夜魂归何处寓，陇头蒲洒一支梅”。

五月六日，蒙古军主力兵临武休关，迫宋守关大将潘福“不施一矢，而仓皇以溃”。继之，蒙古军分路东进、南下，分取洋州（今陕西洋县）、兴元（今陕西汉中）并屠城。

五月八日，蒙古军发起沙窝（兴元西南方）之战。宋将郭正孙“三战三却，死伤几半”。九日，宋军溃败，郭正孙战死，随从民众数十万死于兵火。

在拖雷进军凤州、兴元一带时，蒙古军一部在宋利州路西部地区攻掠。曾在天水军（今甘肃天水市西南）击退过蒙古军的儒生曹友闻，又在秦家坝一带击退了蒙古军。西和（今甘肃西和西南）之战，蒙古军围城，宋知州陈寅、推官和摄通判贾子坤誓与城池共存亡。宋授兵以路梗为由观望不进，陈寅“率民兵昼夜苦战”，终因寡不敌众，九月十四日城破，陈寅自刎。蒙古军旋破仙人关和七方关，先后横行17州。时至十月二十一日，南宋的蜀口三关，全部为蒙古军所控制。

蒙军袭川

1231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间，蒙古军为报复宋将杀蒙古使者速不罕，深入利州路南部，袭掠四川内境，与宋军展开一系列的战斗。这是蒙、宋关系史上的第3次武力交锋。

是年十月十七日，拖雷派出的使者速不罕，在一队蒙古兵的护送下，来到宋地沔州（今陕西略阳），与南宋沔州军都统张宣谈判“假道”和“索粮”事宜。张宣部将冯泽以“伪降”为手段，诱杀了速不罕。拖雷得知，大怒说：“彼（指南宋）昔遣苟梦玉来通好，遽自食言背盟乎!”于是，军分两路：东路留驻兴元、洋州一带，西路南下。十月二十日，西路蒙古军发动沔州之战。南宋沔州都统、知州杨起在屯戍“孤单”、难守情况下战死，文臣武将均表现出无畏的气概，城陷。

十月二十四，西路蒙古军发起大安（今略阳南）之战。南宋守将、利州副都统何进，初杀蒙古兵700余人。蒙古军绕至何进后方，陷宋军于被动。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何进及统制王浩，王侃等皆战死。西路蒙古军击溃何进部后，继续南下，“撤屋为筏”渡过嘉陵江，连破葭萌（今四川剑阁东）、阆州（今四川阆中）的西水和南部，方令北撤。此役蒙古军总计“破城砦百四十”。身为四川安抚制置使的桂如渊，面对蒙古军长驱深入川境，临阵先逃，使得“四川震动”。

另一部蒙古军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攻破同庆府（今甘肃成县），南宋知府李冲等死之。二十五日，蒙古军又进攻仙人关外的杀金坪，南宋统制赵章战死。

东、西两路蒙古军会合后，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进军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由于桂如渊应蒙古军的约请，派去宋军作先导，故蒙古军得以顺利穿过饶风关，直趋金州（今陕西安康），并继续沿汉水东进。蒙古军大举进入宋之京西南路，烧毁房州（今湖北房县）、竹山（今湖北竹山）两城，并在武当山地区大败宋军号十余万。宋京湖制置司命驻军枣用（今湖北枣阳）的盂珙率精锐万人阻截蒙古军，。使其不再东进。十二月十七日，拖雷指挥蒙古军在光化军（今湖北光化西北），以“乘骑浮渡汉水”而北，至二十日，历时4天；全部毕渡，离开南宋国境，集中全力对金作战。从此卜结束了蒙、宋双方在蒙、金战争期间的3次武力交锋。蒙古军也完成了假道宋境，对金实施战略大迂回的预定计划。

蒙古军此次借道宋境，并与宋军展开3次武装冲突，给南宋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宋之蜀？口的作战部队6□9万余人全部溃败，有“十七州”之地遭蒙古铁骑横行，兴元，洋，天水，西和、同庆等5城被屠，“民人死亡十之六七”，宋地“弥望数万里无炊烟”。总之，南宋失将士，失险关，失仓廪，失民人，忧患交加，元气大伤。

第四阶段蒙宋联合灭金

1232年，蒙古军实现了成吉思汗灭金大战略的第1步计划——“假道

于宋”之后，紧接着便开始了第2步计划——“联宋灭金”。在此之前，尽管在蒙，宋之间发生过3次直接武装冲突，使南宋遭受极其严重的损失，尽管有降蒙的李全在扬州之战（1231年）中被宋将杀死，宋军恢复了江淮沿线的控制，尽管蒙古使者速不罕遭到宋将的杀害，惹得蒙古统帅大发雷霆，但是，金朝末灭，蒙宋双方的共同敌人存在，他们的一致性就不会消失，合作的前提就长期起着支配作用。因此，蒙，宋联合灭金就城了双方共同的选择。

蒙宋协议联兵

1231年，李邦瑞使宋“约夹攻金”无结果，速不罕使宋“假道”被杀，乍看蒙、宋双方关系已经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局，面。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次年正月，三峰山之战，“金之精锐尽灭于此”，三月，南京（今开封）之战，因兵火与疫疾交加，城内90万人死难，八月，郑州之战，金军援兵十余万被击溃，十二月，金哀宗逃离南京，1233年初，在蒙宋兵围攻之下，南京（今河南开封）守将崔立向蒙古军献城投降。南宋方面，看到这种战局，从皇帝，宰相到边将，都以讨好蒙古作为他们的共同心愿。宋理宗在蒙古军的节节胜利形势的鼓舞之下，也“屡有中原好机会之叹”。权相史弥远的侄子史嵩之，以及史嵩之的部将孟珙，处在襄阳前线，对蒙古胜利进军的消息了解最早，最多，所以都主张同蒙古和好。孟珙在同史嵩之对话时曾说：“倘国家事力有余，则兵粮可勿与，其次，权当以济事。不然，金灭无厌，将及我矣”。这种主张讨好对方的言论，在宋当权者中占了主导地位。当1232年底，蒙古遣使王楲至襄阳，与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谈判联兵灭金时，史嵩之便很快派邹伸之出使蒙古，“报聘北朝”。邹伸之见到蒙古大汗窝阔台之后，言词十分谦恭和友善，说："本朝与贵国，素无仇隙……。贵国今上服天心，下顺人心”，因此，同意宋蒙联兵灭金。《宋季三朝政要》卷1记载：蒙古“许以河南地”归南宋，于是双方达成了联兵攻金的协议，由此即构成了历史的悬案——是何方背盟问题（详第2章第2节）。当金哀宗得知蒙宋达成“约夹攻”的协议之后，竟吓得“惊悸无人色”。可见，蒙宋联兵是关系到金朝命运的一大举措。

蒙宋联兵协议的顺利达成，显然是与王檝的妙盲善辩，从中说和有着直接的联系。王橄的妙法是：“言于北（指蒙古）则以为降”——这正符合蒙古大汗窝阔台的心愿，“言于南（指南宋）则以为和”——这又恰好符合宋廷的愿望。然究其实质，还是宋蒙双方各有所求：宋廷很想借助于蒙古势力，对金朝“雪耻”，实现梦寐以求的“恢复之说”。在蒙古方面，由于在川陕和河南地区长时间进行攻坚作战，“军力减削，粮援不继”，很想求援于南宋的兵粮接济，及早结束灭金战争。在这一点上，宋蒙双方麦现出的一致性，使得各自加快了，联兵作战的步伐。

南宋出兵攻金

就在南宋使者邹伸之去蒙古谈判的同一年（1233年）四月，南宋为显示自身对宋蒙联兵的诚意，乘金朝之危，特遣大将孟珙率军进攻金将

武仙等人。当时，武仙收集金军溃兵10万人，另一金将武天锡收集溃众20万人，金邓州（今河南邓县）总帅移剌瑗有兵1.5万余人，三将驻军于唐（今河南唐河），邓地区，相为犄角，他们企图奉迎逃离都城南京的金哀宗去四川图存，因遭到南宋的拒绝，使出兵进攻宋光化。孟珙率军对金军发动反击，展开了唐邓之战。先败武仙，武天锡于光化，阵杀武天锡，俘降其兵众12万余人；继败武仙于吕堰（今湖北襄樊市北），斩其兵众3000余人，俘降其兵众3万余人，迫使移剌瑗以1州、5县、22镇和马步军）1.5万余人，民众12.5万余口投降，再败武仙于顺阳（今河南淅川境），迫使武仙率其残部逃往马蹬山。七月，孟珙利用金军降将提供的情报，派兵一部乔装金兵，乘夜突入武仙兵寨，大呼纵火，杀金军一小元帅，俘降金兵7万余人，取得了此役的决定性胜利。武仙狼狈逃窜，次年（1234年）五月被人杀死。

武仙的败亡，是宋军的一大胜仗，也是为蒙古军除一大患。此前，武仙于1220年投降蒙古，后杀蒙古汉将史天倪投金。1230年，武仙文杀蒙古汉将任存，故武仙其人深为蒙古所痛恨。更为重要的是，孟珙出师唐、邓，粉碎了金哀宗逃亡四川的计划，切断了金哀宗南走的去路，断绝了金、宋的一切交往厂对蒙宋联兵灭金创造了良好条件。

蒙宋联兵破蔡

1233年六月，暂驻归德（令河南商丘）的金哀宗，因粮绝遂辗转入蔡州（今河南汝南）。蔡州距南宋边境不到百里，无险可依，，廪粮不足，精锐只万余人。金哀宗以此为临时国都，是极大的失策，实属有“六不可”。蒙古军都元帅塔察儿率师跟踪而至，包围蔡州城。八月，塔察儿遣王檝再至宋地襄阳，与宋京湖安抚使史嵩之约攻蔡州，消水出兵，出粮助战。从事后宋军的行动来看，史嵩之满口答应了蒙古的两项要求。当月，南宋再次发兵与金军战于唐州，金将鸟古论黑奴战死，宋军收复唐州等地。在宋军的攻势面前，金息州（今河南息县）刺史鸟古论忽鲁，胆颤心惊，奏请金哀宗增兵。金哀宗罢了忽鲁的职，还大发议论，说，“北兵（指蒙古军）所以常取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这里充分表露了金朝的惧蒙，欺宋的一贯心理。但处在危难之中的金哀宗，还是不得不与南宋求和。八月初七日，金哀宗遣使者完颜阿虎带至南宋“借粮”。使者临行，金哀宗再三叮咛说：“宋人负朕深矣。……今乘我疲敝，据我寿州，诱我邓州，又攻，我唐州，彼为谋亦浅矣。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他谕示阿虎带一定要把上述道理向宋理宗讲清楚，使之改变联蒙攻金之策为与金连和抗蒙。这一主张，遭到宋理宗的拒绝。

十月，正当围攻蔡州的蒙古军屡屡失利之时，史嵩之命孟珙、江海率师2万，运粮30万石，来到蔡州城下，与蒙古军会师。蒙古大将塔察儿（倴盏）大喜，与孟珙“约为兄弟”。两军并肩作战，同备攻城器具，同决江水济师，同攻蔡州西城，同在西城立栅自蔽。金哀宗而对蒙宋联军的凌厉攻势，在金兵伤亡严正的情况下，只好凭借民丁防城。民丁不

足，又令妇女扮男装参加作战。还驱赶老幼熬成油，号为“人油炮”。反击蒙宋联军。

1234年正月初九日，被围困中的蔡州已成为“无食无粮”的孤城。“城中绝粮已三月”，“老弱互食”，活着的人，每天“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金哀宗眼看末日已到，便传位于完颜承麟。次日，承麟即帝位。正当金朝举行庆典时，孟珙率宋军攻破蔡州南门，随之，宋蒙两军入城。金哀宗自缢死，末帝承麟为乱兵所杀。金亡。金朝共10传，120年。至此，成吉思汗的利用宋金世仇、假道于宋、联宋灭金的遗言，终于全部实现。

第八章 宋廷议取三京，宋元战争爆发

第一节 金亡后的蒙、宋态势

蒙宋双方撤军

1234年正月，南宋与蒙古联军攻破蔡州（今河南汝南），灭亡金朝。蔡州大战结束后，以宋称“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今商丘）为中心的河南大地，因屡遭战火摧残，满目疮痍，一片破败凋零的景象。正如当时人所描绘的那样：“中原蹂践之余，所在空旷”。所以，蒙、宋双方不约而同地均从河南战区撤出自己的军队。当然，双方的撤军都是暂时的，都是为了尔后的进军。

蒙古方面，早在1232年“三峰山大战”结束后不久，便按照蒙古人大战由大汗亲征，小战由将领出征的惯例，由大汗窝阔合及其弟拖雷率领主力部队返回漠北。在河南地区留下了蒙古矢将速不台，塔察儿，指挥汉将张柔、史天泽等统领的汉军主力部队承担灭金作战任务。历经2年转战，尤其是联宋攻金，加速了灭金的进程，终于1234年初了结了金朝的命运。蔡州大战一结束，主将塔察儿率领所部撤离蔡州，向黄河北岸开进，其新任务是“镇抚中原”。另命汉人刘福为河南道总管，处理此一新区的行政事务。汉将，都元帅张柔，在蔡州大战中曾经会同宋将孟珙激战南门有功，战斗一结束，奉诏去漠北朝见窝阔台，被升为军民万户。汉将、五路万户史天泽，在破蔡大战结束后，率所部北还其基地真定（今河北正定）。大将速不台，原是围攻汴京的蒙古军主将，1233年夏金军守将崔立向蒙古军献城投降，速不台率军入城。当时避兵在汴京的居民有140万户之多，因采纳耶律楚材建议，免于屠城。在破蔡大战结束后，速不台回到汴京，看到此城“受兵日久，岁饥人相食”，遂下令驱赶城民北渡黄河以就食。汴京城只留下降蒙的自立为太师、都元帅、尚书令、郑王的崔立，以及都尉李伯渊、李琦，李贱奴等人，率兵六七百人守卫一座破城。当时，城内“止存居民千余家”而已。

南宋方面，主谋出兵助蒙灭金大战的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因获蔡州大捷，自然欣喜若狂。他为了让四方军民速知金亡“大捷”，特地发表平金露布，把宋军的战功大大夸耀二番，“具述得蔡之由，若尽出于我者”。参加破蔡大战的宋军主将孟珙，与蒙古军主将塔察儿瓜分了金哀宗的尸骨，带着金朝参知政事，俘虏张天钢及金朝谥宝、玉带等战利晶，奉命还军襄阳，因功升武功郎，又升建康府都统制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在孟珙撤军以后，南宋朝廷为了鼓舞士气和民心；还专门大事庆贺灭金大战的胜利。

蒙宋疆场相望

金朝灭亡之后，中原大地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此，蒙古取代金朝成了北方的统治者，蒙古和南宋成了邻国，并形成了疆场相

望的态势。虽然此刻有人说，蒙古人在金亡的当年就想要继承金宋不乎等条约。但是由于亡金后蒙古军和宋军各自撤兵，这就使蒙宋间出现了...个缓冲地带，因此两国关系上仍能保持一个短暂的和平共处时期。

蒙古和南宋两国的交界线，与金宋时期相比，北移了数十至数百华里不等。根据蒙宋两国联兵灭金作战中达成的“约以陈（今河南睢县）、蔡为界”的协议，以及在灭金后两国的实际控制线，“以陈，蔡西北地分属蒙古”，而以南宋在灭金作战中占领的“泗（今江苏盱眙）、宿（今属安徽）、涟（今江苏涟水）、海（今连云港西南），亳（今安徽亳县）、蔡，息（今河南息，县），唐、邓诸郡”归宋所有。分属南宋的部分，大约相当于金朝南京路的地幅。这实际上是蒙宋两国对亡金领地的一次瓜分。这次瓜分，对百余年来倍受欺凌的南宋来说，是一次不小的补赏，同其在灭金作战中所作的贡献相比，也是绰绰有余的。当然，蒙古人如此慷慨，是出于其自身的需要：一来，灭金战争24年之久，战后需要休整，内政需要治理，新的国策需要制订；二来，先给南宋人一点甜头尝尝，对尔后的攻宋战争有利，即所谓“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

蒙古军和宋军撤离河南战地后，双方都没有放松戒备。

蒙古军主将塔察儿，受新命镇抚河南以后，提出了部队部署建议，被窝阔台批准实施，“并大河两岸，东首曹（今山东荷泽）、濮（今11东鄄城北），西抵秦陇，列屯置戍，以备宋人”。蒙古军一向以善攻著称，眼下却在千余华里的漫长战线下摆开守势，说明其灭金战争结束后，有一个由进攻转入防御的短暂战略转变阶段。与此同时，另一员主将速不台，“增屯设伏于陕府、潼关”，备御尚存于秦（今甘肃天水），巩（今甘肃陇西）一带的金20余城残余势力。

南宋军队的部署，在西线（利州、夔州、潼川、成都路）和中线（京西路）取守势，而在东线（两淮）似是取攻势。西线，因迭经蒙古军攻破，无力发动进攻。中线，宋边帅史嵩之对蒙古是主和派，他已从同蒙古联兵作战中尝到了甜头，况且还对1120年北宋与金朝“海上之盟”的严重教训记忆犹新。所以，他不再谋复河南失地，而是“以陈、蔡两地之地分属蒙古”，只谋自保而已。为此，在兵力部署上，采取分点屯兵的方略。他命孟珙屯襄阳，江海屯信阳（今属河南），王曼戍随州（今湖北随县），王安国守枣阳（今湖北枣阳），蒋成守光化，杨恢守均州（今湖北均县西北），并且增兵饬备，经理屯田于唐、邓地区。如此高度分散兵力，显然不是为了进攻，而是为了防御。此后不久广孟珙被命为兼镇北军都统制，“招中原精锐百战之士万五千余人，分屯北（似为汉北——引者注）、樊城，新野，‘唐，邓间”。从孟珙的军名（“镇北军”）及其分散配置来看，显然也是防御的姿态。惟有不同者是东线。宋边帅赵范、赵葵兄弟，早在绍兴中，就曾统兵攻灭李全，夺取楚州（今江苏淮安）因功兄升淮东安抚使，弟升兵部侍郎，旋任淮东制置使，知扬州。金亡后，赵氏兄弟见史嵩之、孟珙获蔡州大捷，分外眼红，故想再立新功，跃跃欲试。然两淮部队主力，多在庐州（今合肥）、滁州、

和扬州以远，如要向三京发动进攻，须要作较大的调整才能奏效。

第二节 宋廷冒险决策出兵

赵氏兄弟请复三京

1234年上半年，南宋朝廷展开了一场“收复三京”的激烈争论。主战派的头面人物赵范，赵葵兄弟，受到宋理宗的器重，连连升迁。兄赵范，正月命为沿江制置副使，权移司知黄州（今湖北黄冈），由东线调往中线，不数日，又兼任淮西制置副使，五月命为两淮制置使，节制巡边军马，仍兼沿江制置副使。弟赵葵，由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升兵部尚书、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京（商丘）留守兼淮东制置使。就在此期间，赵氏兄弟听了降人谷用安提出的“非扼险无以为国”之建议，于是，“欲乘时抚定中原”，向宋理宗提出了守河，据关，收复三京的建策，掀起了“守河据关”的大讨论。赵氏兄弟的极力主战，与宋理宗热衷于“恢复”有关。宋理宗于1225年即帝位后，因权相史弥远专擅朝政、权倾内外，皇权被夺。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死，宋理宗开始亲政。他在追述赵宋王朝的基业之后叹道，“继述惭非称，规恢动慨思”，时刻不忘“恢复”大业。同时，他还“急欲洗濯三十年积弊”，所以，从端平元年（1234年）初起，便“诏求直言”，诏举将帅，罢斥史弥远的亲信，召还被史弥远贬逐的真德秀，魏了翁等10余儒臣，委以要职，时号“小元枯”，亦称“端平更化”。与此同时，宋理宗的对外政策也有所调整。先前，宋理宗幸依蒙古之威，制定夹攻之策，灭亡金朝，“可以刷会稽之耻，复齐襄之仇”，而以三京为中心的河南大地，乃大宋王朝的开国奠基之处，又是：“宋朝陵寝所在”，丧失百年有余而未“恢复”，这对急功近利的宋理宗来说，实为一大心病。所以，就在金亡的当月（正月）遣官“按循故壤”，“汛扫祖宗诸陵”（河南境内北宋诸帝陵墓），三月，又专门派出大员到洛阳“省谒八陵”，四月，再遣大员到八陵“相度修奉”。如此频繁的相同活动，一方面说明宋廷急于“恢复”故土的要求，另一方面又透露宋廷对三京地区正在进行军事侦察，酝酿着一次新的军事行动。同年夏（一说四月），宋理宗下令朝内百官“集议和战攻守"，又令“在外执政从官，沿边帅府并实封以闻”。史家认为，至迟到此时，宋廷已在谋划收复河南的军事行动了。宋理宗提拔重用赵氏兄弟等主战派将领，便是这种谋划活动的最好证明。

赵氏兄弟的极力主战，亦与宋廷新当权的宰相郑清之大力支持有关。宋理宗亲政之初，继史弥远之后任相的郑清之，竭力迎合宋理宗的需要，“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而企图获取“边功”，则是他最为关注的大事。另外，郑清之早年是赵氏兄弟之父，南宋大将赵方的朋友，曾与全子才一起做过赵氏兄弟的老师。因此，郑、全，赵范、赵葵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1231年，赵氏兄弟攻灭李全之后，就曾得到时任参知政事的郑清之的“赞决”。赵氏兄弟后来连连晋升，成为边疆大帅，与掌枢密大权的郑清之不能说毫无关系。学生做边帅，恩师做宰相，他们心目中所想又都是“邀边功”，自然在行动上，”便上下呼应，“鸣剑抵掌，坐谈山河，鼻息所冲，上拂云汉。

赵氏兄弟的极力主战，还与宋廷掌权者错误地判断形势有着直接的联系，突出的表现：一是对国内穷困情况视而不见。南宋百余年来，倍受金朝欺凌，又迭经兵火，加上朝廷内外、宗戚官豪的奢侈腐败，弄得“军国空虚，州县罄竭”；“耕夫无一勺之食，织妇无一缕之丝，生民熬熬，海内汹汹。天下之势，臂如以滴胶腐纸，粘缀破坏之器，而置之几案，稍触之则应手堕地而碎耳”。“至于治兵足食之方，修车备马之事，乃缺略不讲”。“兵不如昔之强，将不如昔之勇”，更是不言而喻。上述情况，宋理宗不是不知，尤其是“诏求直言”之后，许多有见识的文臣武将，通过多种形式，衷述了对此种危难形势的看法，可是，宋廷掌权者却听而不闻，熟视无睹，二是对蒙古之强视而不见。赵氏兄弟不曾直接与蒙古军交战，故不曾尝到蒙古铁骑的苦头：后曾与降蒙的李全争锋，“数战皆捷”，并杀李全，这不能不助长其傲气。金亡之后，宋廷大事渲染胜利，“动色相贺，，却把强邻蒙古的潜在威胁置之一边。宋理宗也智“嘉纳”大臣所言，“今残金虽灭，邻国方强，益严守备犹恐不逮，岂可动色相贺，涣然解体，以重方来之忧”？但很快就被“鞑人已归，中原空虚”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把蒙古军北去及其暂时没有较大的军事行动，误认为是对方虚弱的表现。其实，就在宋廷为谋取三京进行激烈辩论之际，在漠北达兰达葩之地的窝阔台，正在大会蒙古诸主百僚，制订“条令。，治理内部，酝酿新的军事行动。三是对三京地区的残破状况视而不见。宋廷曾多次派员到河南“省谒八陵”，了解情况，京湖置制司还送了八陵图。另外还有不少逃到宋境讨饭吃的河南难民，对于三京地区禾食，无稼，少炊烟和尸骨遍野、所在空旷的残破景象，定会反映到宋廷当权者的脑子中。在如此凄凉的情况下，宋理宗等人还在重温金人西据潼关、北阻黄河、长期与蒙古军对峙的旧梦。所以，当金亡后，降人谷用安向宋廷献计“谓非扼险无以为国”，便很快为宋廷所接受，“于是，守河据关之议起矣”。

众多臣僚反对出师

1234年上半年，在宋廷内外展开的要不要出师收复三京的大辩论中，虽然不是“独有”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一个人支持赵氏兄弟的主张，然确实绝大多数臣僚是反对出师的。

首先，宋廷内被宋理宗启用的大臣们绝大多数人不赞成出师。监察御史洪咨夔在金亡后，分析南宋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与大敌为邻，抱虎枕蛟，事变叵测”。主管官告院张煌则认为：“蒙古非金仇可比”，主张“选将、练兵、储财，积粟，自固吾圉”。监察御史李宗勉认为：眼下宋朝“士卒未精锐，资粮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修缮。于斯时也，守御犹不可，而欲进取可乎？”他主张”以逸待劳，以主御客，庶可保其无虑”。秘书少监，太常少卿徐侨，有一天特地穿着破衣烂衫去见宋理宗，宋理宗惊奇地说；“卿可谓清贫。”徐侨对曰：“臣不贫，陛下乃贫耳。”宋理宗问，“联何为贫？徐侨说，“陛下国本未建，疆宇日蹙，权幸用事，将帅非材，旱蝗相仍，盗贼并起，经用无艺，帑藏空虚，民困于横敛，军怨于掊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国势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贫，陛下乃贫耳”。这段似是滑稽的对话，足以表明徐侨不赞同出师的基

本立场。以“见微虑远’著称的儒臣叶味道认为：眼下”饷日迫，民一不堪命。，如果出师，势必“是先摇其本，无益于外也”。以“直声震朝廷”著称的儒臣真德秀，听到赵氏兄弟等人主张出师河南的倡议后，表示极为忧虑，特地向宋理宗报告：“移江、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富蔗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见。惟陛下审之重之”。

其次，赵氏兄弟的谋僚也不赞成出师。赵范的参议官乒岳，劝说主将要考虑出师的严重后果，他说，“方兴之敌（蒙古），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肯捐所得以与人耶!我师若往，彼必突至，非惟进退失据，开衅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长驱，以争空城，得之，当勤愧饷，后必悔之”。知安丰军杜杲，也陈述“守境之利，出师之害”。他说，“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无粮可因。若虚内事外，移南实北，腹心之地，必有可虑”。

再者，其他战区的主将也反对出师河南。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曾从龙，“极论南兵（宋军）轻进易退”，不赞成出师，江西安抚使陈，因领兵镇压陈三枪等起义武装，也不赞成出师河南。对出师持反对态度最为坚决的是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史嵩之。一方面，他已在破蔡灭金大战中荣立大功，不想再当赵氏兄弟的配角，另一方面，他亲自派往蒙古的“小使”邹伸之尚未回归，不能置使者的生死于不顾。因此，便以“荆襄连年水潦螟蝗之灾，饥馑流亡之患”为理由，提出宁可“迕旨’受诛，也不同意出兵。

另外，已经休假的叁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乔行简，听说朝议收复三京之事，特地上疏，申述“三忧”，一是“臣不忧出师之无功，而忧事力之不可继”，二是民众对官府“蓄怨含愤”，常常暴动，此所谓“萧墙之忧”，三是“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丽者几人？勇而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国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图，而南方已先骚动矣”。

总之，反对出师河南之声，响彻宋廷内外。尽管持此见者，说法不一，动机相异，但综合起来看，他们的基本观点有两条，第一，收复三京的条件不具备，第二，出师河南的后果不堪设想。

宋理宗悍然命将出师

宋理宗是一个志大才疏的无能之辈。他在国家面临着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不顾国情，民情，军情，不作敌我双方力量的基本对比，不计一切后果，对所有反对出师河南的建议“皆不听”，悍然决定出师河南。从已发现的历史资料来看，南宋出师河南，仅仅是做了以下准备：

（1）确定战略目标。宋理宗根据主战派臣僚的主张，确定此次出师河南的战略目标是，“据关，阻河，为坚守计”。所谓“据关”，即指夺占潼关天险，派兵据守，扼住要冲。所谓“阻河”，即指夺占黄河南岸一

切地区，把蒙古势力统统赶到黄河以北去，从而派兵占据黄河险要，凭借黄河天堑阻止蒙古军南进。所谓“坚守计”，即指在“据关”、“阻河”，两个条件实现后，便可长期与蒙古军对峙，保持一个新的南北朝的局面。很显然，这一战略目标，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在重温金哀宗守关、据河的旧梦。当时太府卿兼权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东安抚留守吴潜，在其奏议中曾经提到：“自潼关至清河三千余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忍如金人，乃可持久岁月。”然宋廷当权者并不清楚，金人所以能够守关、据河，并同蒙古军对峙十数年，是由当时的许多主客观因素构成的。其中主要的，一是那时蒙古军主力已去西征，留在黄河以北的部队大多是新降蒙古的汉军及其他部族军，战斗力不如蒙古军强；二是当时西夏还没有灭亡，在一定程度上对金人起了屏障作用，三是金哀宗即位后一反金宣宗的错误国策，停止攻宋战争，与西夏和好，集中力量抗蒙，四是金朝当时还有数十万精锐部队作为战略预备队，配置于黄河沿线，五是潼关，黄河屏障，在百年来一直处于金人的控扼之中。如此等等。而今南宋面临的形势；已经大不同于当年的金朝。宋廷在各方条件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重温前人的旧梦，只能是一厢情愿罢了。

（2）任命将帅和区分任务。宋廷筹画端平入洛之役，组织了两套指挥班子。

一套指挥班子，是以宋理宗为核心、以郑清之等人为左右手的软弱无力的最高统帅部。宋理宗是一个志大才疏之辈，郑清之是一个不懂战争之道，然要图立战功的宰相。另外，任命不赞成出师的乔行简为知枢密院事，曾从龙为参知政事，郑性之为-签书枢密皖事，陈贵谊兼同知枢密皖事。更令人发笑的是，在出师之前对史嵩之的任用。初期，宋理宗想命史嵩之与两淮边将“协谋持角”，共同完成入洛作战任务，但史嵩之却上疏6条，“力陈非策”，坚辞不干。继而，宋理宗又命其筹画此役之粮饷，但史嵩之却以荆襄连年饥馑和出师“误国”为由，拒绝办理。郑清之还致书劝说史嵩之接受皇帝的任命，但同样也遭到了拒绝。当“诸军数道并进”之后，宋理宗想用“兵部尚书”的官衔来吸引史嵩之参与指挥“端平入洛”之役，但史嵩之仍然拒不接受。这种在临战前和战役开始后将帅对任俞还处于推三让四的悄况，在战争史上也是少见的现象。

宋廷另一套指挥班子，是分散在战区的以赵范，赵葵，全子习等人为代表的前线指挥官。五月，宋理宗任命赵范为两淮制置使、节制巡边军马，仍兼沿江制置副使，战役开始后，旋命其为京河关陕宣抚使，知开封府、东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他的部队，配置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光州（今河南潢川）一带，准备进兵陈州（今河南睢阳），蔡州，“以张声势”，从左翼牵制蒙古军。但赵范其人在此役开始后，由主战派“改图异谋，不胶前说”，也反对出师，所以，他的牵制任务也没有执行。另外，宋理宗还升四川制置副使赵彦呐为正使，郑清之促其出兵以侧应入洛之师，也遭到了拒绝。宋理宗命赵葵为权兵部尚书、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兼淮东制置使，指挥淮东所部5万人，先取泗州（今江苏盱眙）、宿州，尔后进兵汴京。宋理宗又命知庐州全子才指挥淮西所部1万余人，为此役之先锋，此役开始后，又升授关陕制置

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从上述可以看出，南宋参加此役的兵力，仅是两淮的6万部队而已。

（3）调整军队部署。南宋出师之前，军队的部署总情况不是进攻的态势，而是处于防御的态势，必须在部署上作较大的调整变动，方能利于作战任务的完成。当时，南宋军队邻近河南战区的兵力，一是属于京湖方面，飞是属于两淮方面。而京湖方面的部队，因为已参加过蔡州大战，此次不承担进攻的任务，因而部署可以不变动。但两淮方面的部队则有所不同，一来他们承担主攻任务，二来他们的驻地远离河南前线，所以必须作很大的调整，方能使主攻部队的部署适应当前任务的需要。

可是，在此之前，蒙古军已决开黄河南的寸金堤，让河水淫溢，使豫东广大地区（从寿春到汴京一带）变成了泽国，“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颈处”，迫使宋军不能如愿调整部署，而仅是办成两件事。一件是命淮东部队夺取盱眙、宿州，使之稍稍缩短其至汴京的距离，二件是命赵范移司黄州，也就是说把左翼部队的指挥部转移至远离汴京上千里的长江边上，没有实现靠前指挥的目的。东线，赵葵的指挥部仍在远离汴京千里外的滁州（今安徽滁县），全子才所部，仍在远离汴京近千里的庐州（今安徽合肥）。如此，前线指挥部和主攻部队都远离战区的进攻部署，势必要迫使部队官兵把兵力，体力和物力大多消耗在进军途中，这显然是一种笨拙的用兵方略。

（4）发布出师檄文。宋理宗为了进行战争的舆论准备，激励将士和吏民的斗志，“抚谕东京等处官吏遗黎”，特地发布了-出师檄文。内开，“蠢兹女真，紊我王略，遂至同文之俗，半为左袵之污。列圣中兴，惟兼爱于南北。积年养晦，不轻用于千戈。因彼（指金，蒙）鹬蚌之相持，甚于豺狼之交噬。百姓至此极也，多亡罔堪顾之。嗟彼故疆，皆吾赤子，痛念君师之责，实均父母之怀。乃敕元戎，往清余孽”。

这篇出师檄文，虽然文字艰涩，但有两个意思是较为清楚的。第一个意思是，讲出师河南有两条理由：一条理由是女真（金朝）霸占了中原大地，“遂至同文之俗，半为左椎之污”，改变了汉族民众的风尚，另一条理由是蒙古和金朝在中原地区的激烈争夺，比豺狼吞噬还要厉害，弄得民众痛苦不堪，第二个意思是，讲南宋出师的目的，要“往清余孽”，收复“故疆”。

这篇出师檄文，为人们弄清此役的起因，是一个极好的佐证。以往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在浆，宋联兵灭金时，蒙古许俟成功，以河南地归南宋，金朝灭亡之后，蒙古背约，所以南宋“端平入洛”是如约出师争夺。然而，南宋的这篇檄文，作为此役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宫廷文书，对“蒙古背约”或“南宋如约”出兵之事，在理应申明的地方，却只字没有提及，而是讲了另外两条理由。善于舞文弄墨的南宋廷臣和宋理宗，是不会疏忽到此地步的。这里告诉人们，所谓“蒙古背约”或“南宋如约”之说，连宋廷自身也没有承认，也不去宣传和张扬。另外，对于所

谓“蒙古背约”或“南宋如约”之说，一部长达496卷的《宋史》竟没有一处相近的记载。然却在《宋史》卷474《贾似道传》中写有“孟珙帅师会大元兵共灭金，约以陈、蔡为界”等文字。另据史家考证：南宋文臣武将的许多奏札及流传后世的女集，也都没有讲到所谓“蒙古背约”或“南宋如约”之事。可见，所谓“蒙古背约”或“南宋如约”之说，是完全可以推倒的。

第三节 端平入洛之役

端平入洛之役，从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十二日南宋出兵起，至八月十一日宋军遭到惨败止，历时3个月。在此期间，南宋和蒙古之间的重要军事活动有以下几项。

汴京之变

宋军预定进军的第一个目标是汴京（今河南开封）。宋军出动的总兵力约6万人，号称20万大军，兵分两个梯队。第1梯队，由淮西兵1万余入编成，由知庐州全子才为主将，于六月十二日离庐州，先期向汴京进发。第2梯队，由淮东兵5万人编成，由赵葵为主将，其任务是先期夺取泗州、宿州，尔后与全子才在汴京会师。宋军第1梯队，在全子才率领下，于六月十八日从寿州（今安徽寿县）北渡淮水（今淮河），踏着泥泞的道路前进，有时还要涉过深至腰及颈的氾水。六月二十一日抵蒙城。此县有2城，依涡水而立，然，“城中空无所有，仅存伤残之民数十而已。”全子才率部沿涡水向西北方向进发，“沿途茂草长林，白骨相望，蝱蝇扑面，杳无人踪。”六月二十二日军至城父（今安徽亳县西南）。此城墙高池深，旧号“小东京”。然因战火摧残，城中未毁官舍只有两三处，民舍只剩十余家，是一片残破的景象。六月二十四日，全子才抵亳州（今安徽亳县），守军官兵7人降，这算是宋军出师以来的第一次收获。与此同时，黄河北之单州《今山东单县），原先降蒙古的出戍军600余人；闻宋军进兵河南，便自动出降，这是宋军的第二次收获。尔后，全子才继续沿涡水西进，过卫真（今河南鹿邑），泰康（今河南太康）诸县，“皆残破无居人”。宋军第1梯队在水网地区长途跋涉20天，终于七月初二日抵达汴京城东20里处安营扎寨。

汴京城内，原先投降蒙古的金朝官吏李伯渊等人，得知宋军进兵河南的消息，便酝酿发动兵变。李伯渊等人，先期以文书私通降宋的谷用安，范用吉，约定预做宋军在汴京的内应。当全子才所部抵近汴京城东郊时，李伯渊与李琦，李贱奴等人密谋杀死了崔立，范秀、折希颜，倾城兵六七百人及城民千余家出降迎宋军。七月初五日，全于才率部整兵入汴京。

在宋军第1梯队西进的同时，由赵葵率领的第2梯队5万人，在夺取泗州，宿州等地后，于七月二十日赶至汴京，与全子才会师。捷报传至宋廷，立刻对前线将帅加官晋爵，赵范，赵葵，全子才分别被命为知开封东京留守，知应天南京留守。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好象是说东京，南

京、西京等地已经归南宋所有了。

从表面来看，宋军不费一枪一矢就夺取了被金朝占领达百余年，后又被蒙古人占领一年半的汴京，好象是一个了不起的巨大胜利。但实际上，一来汴京是一座遍地是“荆棘遗骸”的破城，宋军不仅从这里捞不到半点好处，而且还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大包袱；二来宋军粮饷已经不继，只能“以俟粮夫之集”方能行动；更为严重的是，一场恶战之前的平静，对宋军来说预示着潜在的灭顶之灾。

蒙古军对宋军的长驱直入，并不是置若罔闻，蒙古大将速本台、塔察儿，在闻悉宋军进兵河南的消息后，为粉碎宋军的进攻，预先采取了下列措施：

（1）决开黄河南旧有寸金堤，使河水淫溢。结果，把汴京到寿春的大片豫东地区变为泽国。“道路水深有至腰及颈处。”这对宋军的西进起到了迟滞作用，对宋军的粮饷输送也增大了困难。

（2）在三京及其附近地区遍布“哨马”和“增屯设伏”。正如当时京湖制司得到的情报说：“虏中传南朝来争河南，哨马，已及孟津、陕府、潼关、河南，皆增屯设伏。”

（3）实行“空城”诱敌之策。前已叙述，在灭金大战结束后，蒙古主力已经撤离河南。在得知宋军进兵河南的消息后，留驻洛阳的蒙古军队也主动撤离，使之变为一座空城，给宋军造成一个“示弱”的印象，促其骄纵，为尔后反击创造有利条件。

（4）命部将刘亨安率部，在洛阳城东朱军进兵的必经之路，配置伏兵，待机给宋军以重创。

洛阳之复

求功心切的宋军主将赵葵，进入汴京之后，不问军饷馈乏之状，也不察蒙古军情，一味督促部队继续西进。他还指责先入汴京暂驻待粮的全子才说：“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趣洛阳，潼关何待邪？”全予才以实情相告，粮饷未集，难以进兵。赵葵听不进去，益加起劲地督促全于才快快西进。当时实际情况是：蒙古军已经做好了反击宋军的准备。宋军军饷已经十分艰难，6万部队进入饥馑的河南大地，所需粮饷，全靠两淮供应。而淮西方面，“自合肥部舟至京口支装，涉湖而江，又溯湖而淮，北过徐泗，南过盱眙，历濠梁，抵寿春”，转了一个圈子仍然没有出淮西境。然后，再征用大批民夫转运河南，其用民夫之众，仅桐城1县出夫即达1□5万人。在淮东方面，因“河失故道”，船运不及，也得征用民夫。加上沿途，么所过丘墟，寂无烟火，骨殖横道，蓬蒿蔽空，”又因为正逢雨季，路途的物力和人的体力精力消耗甚大，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真正运到目的地的粮饷为数就不多了。

就在上述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赵葵硬是把来自远方的数支队伍，临

时拼凑成两个梯队继续西进。第1梯队，由范用吉所部3000人、樊辛所部4000人、李先所部2000人，胡显所部4000人，共计1。3万人组成，命淮西师机徐敏子为监军，率之先行西上。第2梯队，由杨义率庐州强勇等军1，5万人组成，随第1梯队之后跟进。各部只给5日粮食。诸部受命后，纷纷叫喊粮少，难行。赵葵不得不令各部“陆续起发”。

七月二十一日，徐敏子率领第1梯队启行。为解决部队携粮之不足，徐敏予下令官兵，5日粮留作7日食。当行至中牟县时，徐敏子一面遣人回汴京筹粮，一面遣勇士先去洛阳宣谕宋军消息。七月二十六日，和州宁淮军正将张迪，奉徐敏子之命，率兵200人潜赴洛阳。入夜后，张迪等人逾城大譟而入，然城中却寂然无应者。二十八日，徐敏子率领第1梯队整兵进入洛阳城。二十九日，宋军所带5日粮在过去8日内已经食尽，只好“采蒿和面作饼而食之。”可以想见，如此饥疲之师，可以不攻自破。从作战指挥上看，宋军进入空城洛阳，只不过是自投陷阱罢了。

龙门之战

富有用兵韬略的蒙古军将领，成竹在胸。预先配置在洛阳城东南之龙门地区的蒙古军骁将刘亨安所部，先是以空城之策把宋军第1梯队诱入洛阳城中，使之师老粮馈兵疲，不攻自破，继而集中兵力专打宋军第2梯队。

七月二十九日，宋将杨义率领的第2梯队1□5万人，经过五六天的长途跋涉，到达蒙古军设伏的龙门地区。杨义不明本军已陷入蒙古军的伏击圈内之情状，命令部队就地休息。宋军官兵刚刚散坐蓐食，刘亨安便指挥蒙古伏兵，从山巅上立起黄、红大伞，发出攻击的信号。宋军官兵为蒙古军的突如其来之举动所惊惧，立即军乱。蒙古伏兵纷纷从深蒿中跃起，刘亨安“横槊驰突而前，”众皆从之”，直扑宋军，宋将杨义猝不及防，全军大溃，四散落逃，纷纷拥入洛水之中，大多溺死，部分逃出伏击圈后，又遭到蒙古追兵杀伤大半。蒙古军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凯旋时，主帅塔察儿抚摩着刘亨安的脊背，赞叹道，“真骁将也!”还当场给予厚赏。

龙门一战，宋军第2梯队遭到蒙古军的歼灭性打击。个别逃生者，连夜奔至洛阳城中，向徐敏子报告杨义丧师消息，“于是，在洛之师；闻而夺气。”

洛东之战

八月一日，蒙古军在取得龙门之战的胜利后，即派前锋进至洛阳城下扎寨。宋军在洛之师，一无粮草，二无外援，正处于危难之际。徐敏子召集诸将商讨进止之策，议来议去，只有“回师”一途。宋军鉴于蒙古军主力已经逼近洛阳城东南洛水沿岸的形势，徐敏子一面下令遣兵袭击蒙古军前锋营寨，一面自率主力东渡洛水，背水而阵。蒙古军多次发动

小规模进攻，宋军官兵十分顽强，坚守不动。八月初二日黎明；蒙古军以团牌为掩护拥进接战，把徐敏子所部分割为三。战至中午，宋军杀伤蒙古军400余人，夺得团牌300余只，双方打得难解难分。这时，宋军官兵已有4日没有进食了。徐敏子见形势不妙，召集诸将再议突围事宜。有的部将主张突围而东，然范用吉所部归顺人楚却献策说，“若投东面，则正值北军（蒙古军）大队，无噍类矣。若转南登封山，由均、许走蔡、息，则或可脱虎口耳。”徐敏子无奈，只好采纳此策，指挥宋军向南方突围。蒙古军察觉宋军突围的行动后，立刻纵兵尾击，“追奔百余里”，杀伤宋军十之八九，来将樊显，张迪等死亡，徐敏子中流矢几乎丧生，所乘战马死之，改为徒步从小路决出险地。沿途收集溃散兵众300余人，边逃边战。徐敏子等300余官兵，吃了2日桑叶，7日梨蕨，方得生还。

先前，宋军进兵洛阳时，徐敏予遣去汴京督粮的官兵，自汴京督粮赴洛阳途中，适遇杨义军溃卒，方知龙门之战粕洛东之战宋军大溃的噩耗，遂驰返汴京，报告赵葵，全子才。赵、全二人见大势已去，便于第2天开汴京东门，“班师而归”。至此，宋廷“收复三京”之举，遂以丧师近3万之众的代价而告终。

第四节 宋蒙败盟及其影响

宋廷危机四伏

南宋入洛之师大溃，给了宋理宗为首的主战派当头一棒，也给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带来更加严重的危机。正如时人所说：“三京退师之余，朝廷惩创甚。”因而迫使宋廷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国策。

首先，宋廷掀起罢官风潮。宋廷对入洛之师溃败的原因，交口斥责，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一种说法，认为前线主将赵葵、全子才等人犯了“贪功冒进之罪”，然也有人认为此说“恐亦非至公之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史嵩之的责任重大：一是入洛之师需粮，而史嵩之“立和中沮之，不肯运粮，卒至误事”；二是史嵩之已探得蒙古军在三京地区遍设“哨马”和。“增屯设伏”。等情报，但他“所主在和，既不以实相告，而惟欲以和而策勋”，没有及时通报赵葵、全子才，致使其敌情不明而贸然轻进。看来，较为熟知内情的人是赵葵之兄赵范。赵范，在此役之初是主战派，在此役开始时，他“反悔前议”，未曾出师参战。在战败之后，赵范就此役中将帅的责任作了分析，上疏朝廷：一是指责赵葵、全才子“轻遣偏师”入洛，致有龙门，洛东之败；二是指责赵楷、刘子澄“参赞失机，师退无律”，致有丧兵折将，三是指责徐敏子、范用吉对危难中的杨义一军“怠于赴援，致不能支。”赵范的分析，除了有意回护宋理宗和赵萃、的责任之外，显得较为全面，并合乎宋理宗的心愿。于是，宋理宗下诏：赵葵、全子才各削1秩，赵楷、刘子澄、徐敏子各削3秩，放罢，范用吉降武翼郎；杨义削4秩，勒停自效。宋理宗对重臣史嵩之处理得比较宽容，一面表示自己“始悔”不用其言，一面罢史嵩之的京湖制置使要职，命为刑部尚书。然史嵩之却以“母病乞侍医药”为由，“不俟报

可而归。”这实为宋廷为入洛之役败北而展开的内部政治斗争的一个插曲。南宋词人评论入洛之役败因时，说；“所失在于主帅成功之心太急，入洛之师无援，粮道不继，以致败亡”。词人在指出主帅失误、部队协调失措，后勤保障不及诸方面的责任后，归结到一点，叫做“此殆天意”。这是一句十分含糊而又寓意深刻的话。其中，既可能有怪罪“天子”宋理宗悍然决策出师之意，又可能含有南宋朝廷没落不堪，失败纯系必然之意。

其次，南宋财政经济益加危机。入洛之役期间，南宋把大量物资、粮食转运河南，结果事与愿违，“兵民死者十数万，资粮器用悉委于敌”，使得两浙地区“人户版空”，国库和民众所储，“中外空虚，公私赤立”。宋廷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以租例钱代替”身丁税，又‘权宜一切之，如裁半减俸，科鬻僧牒之类，虽有伤事体者，亦不暇顾恤矣。”当时南宋朝廷的整个财经政策是：加剧赋税剥削，不仅有正税，而且有更刻苛的临时性的“加耗”。长江以南，两浙、江南东西，福建，广南等路，“一石之苗有量至二石五六者，有至二石二三者，少亦不下二石一二者。折纳之价有一石至二十者。”是时，南宋的土地兼吞也达到了高潮。“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半有及百万石者。”“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财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亚乎此者，又数家焉。”民众不堪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反抗活动此起彼伏。“以盗为俗，农事有暇则为盗，守令不惬其心则为盗”，官府闻之胆寒。整个南宋的形势，正如宋理宗所说的那样：“想疮痍之溢目，如疫病之在身。”

再则，宋理宗下罪己诏。端乎入洛之役丧师后，南宋朝野怨声载道。宋理宗为缓和国内矛盾，安定民心，被迫下“罪已诏”，山大骂自己“朕以寡德”，“朕猥以眇躬”。他承认“兵民之死战斗，户口之困流离，室庐靡存，胳胔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烛，德有未孚，上无以格天心，下无以定民志。”“托予小子不替上帝命，欲图绍复之功，岂期轻动于师干，反以激成于边祸，至延强敌，荐食神州。……宅里墟于青烟，”甲卒屠于白刃，凡三百年之生聚教训，与数十郡之城郭封疆，凭陵无厌，荼毒甚惨。斩桑伐枣破屋流离之状，朕既不得见，慈父幼子寡妇哭泣之声，朕亦不得而闻。其如关头溃散之军，塞外畔亡之将，或者抚循之失道，因而怵迫以从夷。序言其情，准执斯咎？皆由朕责治太速，知人不明，误信佳兵之言，弗思常武之戒。拊心若厉，欲悔何追？朕今退自省躬，益皇敬德……。下诏以陈轮台之悔，益申儆于边防。”宋理宗还就对蒙古的政策，不得不作出180度的大转弯，由进攻转为防守，即所谓“可严守御之备”。先前那种“规恢故疆”的雄心壮志，早已烟消云散了。

蒙古先礼后兵

端平入洛之役的结果，不仅是以蒙古蒙古先礼后终，的胜利而告终，而且还宣告了宋蒙联盟已经不能破镜重圆。从这个意义上说，端平入洛之役的发生和发展，是宋蒙战争爆发的导火线和起始点。

当然，宋蒙之间，由联盟变为仇敌，并不仅仅是端平入洛之役造成的结果。实际上，蒙古人在灭金之后，已经调转枪口对准南宋，并欲一口将其吞没，这已成为蒙古的既定国策。就在端平、入洛之役开始的同年（1234年）、同月（七月），蒙古大汗窝阔台与大将塔思（木华黎之孙）在诸王大会上的一段对话，是说明这个问题的最好例证。

蒙古诸王大会期间，窝阔台问大将塔思曰，“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塔思对曰：“臣家累世受恩，图报万一，正在今日。臣虽驽钝，愿仗天威，扫清淮，浙，何劳大驾亲临不测之地哉!”窝阔台听塔思说出了自己的心愿，大为高兴，立俞塔思“与王子阔出总军南征”。不久，蒙古军遂向河南疾趋。

其实，在端平入洛之役的消息尚未传到漠北之前，窝阔台的谋臣耶律楚材已经向大汗呈报了“平南之策”。李实也献策窝阔台，“劝其先谋犯蜀，顺流而下窥江南”。所以，水有蒙古诸王大会上窝阔台“自将伐宋”之议和“遣达海钳卜征蜀”之命。

蒙古人一向十分注重策略。在发兵攻宋之前，先派出使者五檝于同年（1234年）十二月到江南“通问”。王檝的使命，从其“挟昔年金使例册”的举动来看，主要是想按照金朝与南宋的历年条款，向南宋索取岁币，实现其“想南宋人以事金之礼事蒙古”之目的。这里，充分暴露了蒙古人想继承金朝在南宋特权的企图，是要把南宋变成自己的臣属和仆从。

蒙古人的想法，是南宋人无法接受的。南宋既然从蒙金战争（1211～1234年）之初就已拒绝向金朝输送岁币，后来又在宋蒙联合灭金作战中出了大力，表明自己已经从亡金的锁链中挣脱了出来，那么，它怎么可能会答应蒙古人继承金朝特权的要求呢？所以，蒙古使者王檝只好“辞于后殿”，闭门等待形势的发展。不久，南宋遣邹伸之、李复礼、乔仕安、刘溥等出使蒙古“报谢”。次年（1235年）正月，南宋又遣御前宁淮军统制、借和州防御使程芾为蒙古“通好使”。尽管使节往来数次，但实质问题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蒙古汗廷看清了这一点，所以，早在派遣王檝出使南宋之前，一场大的军事行动就已在酝酿之中了。

在端平入洛之役后，蒙古人便抓住南宋“开衅致兵”、“肇始祸端”的把柄，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第九章 蒙哥南征，宋元战争进入新阶段

第一节 蒙哥汗南征的准备

蒙宋战争初期（1234~1251年），蒙古政权经历了元太宗窝阔台（1241年），元定宗贵由汗（1248年）等皇位更迭。在贵由汗即位之前，太宗六皇后乃马真氏称制4年（1242~1245年），及至1246年元定宗贵由泞即位时，“朝政犹出于六皇后”。元定宗贵由汗在位3年（1246~1248年），1248年初，他以和林气候不宜为借口，亲自率军前往封地叶密立，想借机攻袭藐视大汗权威的诸王拔都。不料贵由却在途中丧命，蒙古汗位因而再次空悬。政权暂时由贵由妻斡兀立海迷失执掌。由于正式推举大汗的会议迟迟召集不起来，汗位一直空虚了3年之久（1248~1251年）。

蒙古军初期的战争方式，以及蒙古阜位的频繁更迭，不能不影响到对宋作战的形势。在窝阔台时期，蒙古军曾经以急风暴雨的方式，从长江上游的巴蜀，陆续蹂践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但是，由于当时蒙古刚刚取代金朝，对北方汉地的统治方式尚在适应之中，要把蒙古军有限的力量同时在3个战场上施展，既受到实力的限制，也受到经验的制约。因此，在这一阶段上，蒙古军的进攻策略是，“惟利剽杀，未拓土地，抄掠以后，即弃之而去”，在窝阔台去世以后的一段时期里，蒙古国内因帝位的纷争，致使“法度不一，内外离心”，加之蒙古草原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河水尽涸，野草自焚，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蒙古统治者无暇对南宋部署全面主动的进攻。这些就是蒙古哥汗即位以前，蒙古初期对宋作战的一般概况及其原因之所在。

1251年，在斡难河头蒙古传统选汗之地，由于诸王拔都的推荐，大将兀良合台的拥戴，蒙哥被正式推举为蒙古第4任大汗。蒙哥是成吉思汗守业的幼子拖雷的长子。即位时，他正是一位“青春鼎盛妙的“青年”。他素“以他的机智和刚毅而知名，以他的贤明和英勇而著称”。即位前，他就有过总戎机，征讨钦察，斡罗思诸地，的经历。他雄心勃勃；决心继续推动蒙古前任可汗扩张疆域的政策，企图迅速建树超越其父；祖辈的业绩。

蒙哥即位后，首先平息了定宗后及太宗皇孙失烈门的反叛阴谋，巩固了统治地位。鉴于过去10年来朝纲废弛，蒙哥汗颁布了一系列稳定政治局势的措施。他以晃兀儿留守和林宫阙，以皇弟忽必烈领治蒙古、汉地民户，命其将驻地南徙到同中原接近的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对几个已经建置蒙古官署的地区，蒙哥汗分别任命了执政的官吏，如以牙刺瓦赤、不只儿、斡鲁不，靓答儿等充燕京竿处行尚书省，以讷怀，塔剌海、麻速忽等充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境内）等处行尚书省，以阿儿浑充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

在军事上，蒙哥汗还积极进行布置，以为南征之计。他命察罕、也

柳干统两淮等处蒙古、汉军，命带答儿统四川等处蒙古、汉军，命和里解统土蕃等蒙古、汉军。各路攻宋之军，“皆仍前征进”。

与前任蒙古大汗不同，在蒙哥汗部置的对宋攻势中，他尤其强调在临近南宋边境的地区建立屯驻基地，以此作为进一步南征的准备条件。对此，宋理宗曾经证实：“近闻北骑之来，往往储糗粮，立寨栅，以为因利乘便之计。”

关于这一阶段蒙古军在与宋临界的3个战场屯驻立寨的情况，因资料分散，仅能作如下的缕述：

在巴蜀战场方面，巩昌便宜总帅汪德臣最早于1252年春，奉命在宋人废弃的沔州（今陕西略阳）筑城，设置官署进行统治。沔州居嘉陵江的上游，蒙古首先在沔州筑城，正是为的从上游控制四川，“取蜀漕源”。1253年，忽必烈奉命治理京兆（今陕西西安）分地，着手经理陇蜀地区。负责巩昌，沔州一带屯戍的便宜总帅汪德臣，在六盘山面见了奉命征大理的忽必烈。汪德臣向忽必烈正式提出了以嘉陵江上游的沔州为基地，进一步深入蜀境，经理“益昌之事”的计划。益昌，即古益昌郡，宋利州治地——秦蜀咽喉的广元。为了使南进利州的军事行动有一个巩固的后方基地，汪德臣建议在沔州设漕运司，同时请求“免徭役，捐课税，运粮屯田，为久贮之计”，“造楮币，给盐引，以通商贩，以贮军储”。汪德臣的建议得到批准后，便把巩昌便宜总管府事交由其兄汪忠臣负责，他自己则带着由他弟弟所统的锐卒千余人向广元进发。汪德臣在南宋利州立城的行动，得到了忽必烈指派的土蕃人赵阿哥潘、陇西人李忽兰吉，以及蒙哥汗派来的：蒙古人拜延八都鲁、阿脱的支挣和协助。当时，“宋兵屯两川，堡栅相望，矢石交击”。汪德臣选择利州东宝峰山（今广元东山）筑城，而以汪良臣之兵戍于嘉陵江之南，以为外援。汪德臣在利州“经营之始，百废未完，应援亦寡”，面临的困难很、多。但是，蒙古军终于击溃宋军的阻击，“历五年而城始完”，其基本规模终于在1254年奠定。接着，汪德臣又将巩昌汪良臣所部之兵，“屯田白水”，在四川龙江一线大力发展屯田，实行耕战结合，“寓兵于农”，从而终于在四川北境建立了第一个立脚的据点。蒙古军这一“取蜀之计”的实现，不仅堵死了宋军北进的大门，使宋军再也“不敢越脚北向”，而且奠定了蒙古军节节进取蜀中的基础。宋人为此忧虑说：益昌“为秦蜀之冲，四会五达不可失也。今汪口所城，则亡形具而人寒心矣……敌进七百里而城利，岂曰无谋。……若置之度外，敌反用此计，出没于剑、阆之间，抄掠困我，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绝矣”。

在荆襄战场方面，诚如谋士姚枢所分析指出的，在蒙哥汗即位以前的“二太子（阔端）总大军南伐”期间，蒙古虽然“降唐邓、均，德安四城，拔枣阳，光化，留军戍边，襄、樊、寿、泗继亦未归”，但由于归附之民“尽于军官分有”。“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城无居民，野皆榛莽”。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姚枢建议采用这样的策略：将“秋去春来之兵，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寇至则战，寇去则耕”。“积谷高廪，边备既实，俟时大举，则宋可平”。蒙哥汗接受这一建

议，开始在边境遍置屯田。于是，蒙古遂置河南经略司于汴，以史天泽，杨惟中、赵壁主之，派史枢为征行万户，驻军唐，邓。修复所占枣阳、光化、均州等城堡，与南宋的襄樊相对峙，以为经久之计。

在两淮战场方面，蒙哥汗命张柔自杞县移镇亳州。由于“环亳皆水，非舟楫不达”，张柔为了沟通亳州至汴城的粮道，又开筑甬路，筑堤120里，为桥15座，并置2堡以戍之。张柔还“瓮城壁为桥梁属汴堤，以通商贾之利”。与此同时，河南道经略杨惟中也在河南与两淮沿线大力屯田，使得屯田遍于“唐、邓、申、裕，、嵩、汝、蔡、息、亳、颍诸州”。在此基础上，张柔遂分遣部将张信屯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逼两淮。

经过蒙哥汗即位初期的这一番经理，蒙古军终于在西起穰、邓，中经襄阳，东连陈亳，清口、桃源一线，皆置重兵，“列障守之”。
加’之，“又置都运司于卫，转粟于河，继馈诸州”，在陕西四川方面，又移陇右汪德臣戍守利州，在沔州一线“转粟入手利”。这样，蒙古便能在南宋沿边一线，做到既屯重兵，又有粮饷，从而改变子过去10年间“秋去春来”，没有重大建树的局面。

第二节 忽必烈灭大理之役

蒙哥汗即位后，对四方大事征伐。1252年，蒙哥一方面派旭烈兀西征，一方面派诸王也古征高丽，再一方面则是派他的弟弟忽必烈经营汉地，率军远征大理。

受命出征大理

大理国的前身是唐代的南诏。在唐末五代时期，白蛮（今白族）段氏平定诸部，建都大理（今云南大理），建立大理图。大：理国的统治区域，包括今云南全省，贵州，广西西部，四川南部，以及缅甸，泰国，老挝的一些地方。在宋代，大理国势衰微，国王段兴智大权旁落，由权臣高祥，高和兄弟代摄国政，内部矛盾日益激化，正处在分崩离析之中。

蒙古统治者之所以要远征大理，主要是出于征服中原的战略需要。早在成吉思汗伐金时期，金降人郭宝玉在回答成吉思汗提出的“取中原之策”的问题时，即献计说：“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金朝灭亡后，蒙古虽然占据北方，但对于以江立国的南宋王朝，因限于长江天险，屡次南征均无力抵及其首脑要害之区。因此，绕从长江上游进兵，先取“西南诸蕃”，然后借助少数民族的人力物力，对南宋实行战略大包抄的作战计划，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大理国作为南宋的西南屏障，首先攻取这一战略要地，无异从侧后洞卉了通向南宋腹地，进而对之实行南北夹击的门户。然而，对于立国北方，已经占领河西走廊和今青海、甘肃部分藏区的蒙古统治者说来，要统领一支大军进取大理，也殊非易举。因为，这其间还要通过吐蕃部落所控制的草地雪山、大渡河、金沙江等复杂自然条件的地区，以及由南宋军队控制

的川边地带。这的确是一条“出没不测”，“从古所未有”的行军路线。

在忽必烈受命远征大理之前，蒙古军曾经试图多次穿越吐蕃，地区和四川沿边地带，绕道进攻大理。见于记载的有：1239年，据南宋四川安抚制置使陈隆之报告，蒙古军“欲由大渡河攻破大理等国，斡腹入寇”。据他分析，蒙古军此举的“奸谋诡计”，未必不是在盘算“江之尾亦必有路可以窥我”；1244年，一支蒙古军不直接经过“四川地分”，而是取道“吐蕃界中”，进入大理国境，“直至大理之九和镇”（今云南丽江九河）；124霄年，蒙古军“舍九和熟路”，通过四川西边，欲“取青羌”，以窥黎，雅，过大渡河以攻大理。不意遭到青羌部落（今藏族）的坚决抵抗，蒙古军“失利于西臬光诸蕃”，1248年冬，蒙古将。秃懑率兵出四川西边，进攻大渡河东岸的岩州（今泸定县北）。四川制置使余玠派嘉定守将、“西帅”俞兴，发兵5000进行“西征”，以事阻击。从播州前来增援的杨文，率“步骑三千”，经、碉门（今天全县西）越出雪山之外，在岩州北面的马鞍山与秃懑军相遇。宋军“三战三捷”，擒秃懑于大渡河。蒙古军以上这些进军虽未完全达到预定的作战目的，但是它却为后来忽必烈的远征大理铺平了道路。

忽必烈于1252年夏，在曲先脑儿（今蒙古人民和国乌兰巴托正南）入觐蒙哥汗时，受命帅师远征大理，以名将速不台子兀良台台总督军事。1253年夏，忽必烈率师济河，经盐州（今陕西定边），出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驻六盘山，牧兵养马，以待秋高马肥，再行出厩进军。关于忽必烈出征的情况，伊朗史家志费尼记载说，“他从东，西大军中每十人抽二人”，“并派一位宗王”。在忽必烈所征集的军队中，除了有诸王抄合、也只烈、诸王哈丹、朵欢。脱脱，以及兀良合台所率的蒙古骑兵外，还有汉将董文用、董文忠以及郑鼎所率之部。忽必烈还特别选择有如刘秉忠、姚枢、张文谦这样具有政治才能和善于谋略的汉族知识分子从军随征。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力陈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戮一人而得天下的历史经验，建议忽必烈采取怀柔政策以征大理。忽必烈当即连连表示答应：吾能为之!吾能为之!”

师至临洮

1253年八月，忽必烈率军进至临洮（今甘肃临洮县），这一地区早在1238年阔端镇守河西时即已降附蒙古军。故当忽必烈抵达临洮时，有同知临洮府事赵阿哥潘前来迎接。赵氏为土波思乌思臧掇族（藏族之一支）人，世居临洮，“富甲诸羌”。赵氏全力支持忽必烈征滇，将其子重喜送至军中，随忽必烈远征大理。他本人还奉忽必烈之命，移军进至四川，协助汪德臣在利州筑城，以牵制四川的兵力。临洮之南，即与四川邻界的叠州（今甘肃迭部县），为吐蕃部落聚居之地。吐蕃鲁黎族帅冷京传6世至青宜可，率叠州18部降金。早在1236年，阶，岷，叠，宕的18部即已降蒙。忽必烈兵临叠州时，叠州安抚使为赵阿哥昌。由于在这一二百公里的藏区内，有忠心事蒙的赵阿哥潘、赵阿哥昌的协助，故忽必烈军得以顺利通过。这时，先期派往大理进行招降活动的蒙古使臣玉律术、王君侯、王鉴，带回了因道阻、招谕未成的消息。于是，忽必烈

便指挥大军，从临洮出发，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转战川滇的历史大进军。

忒刺分兵

征滇大军离开临洮，进入藏族地区，到达白龙江支流包座河旁的忒刺（别译作塔拉，今甘肃省迭部县与四川若尔盖县接壤之达拉沟）。忒刺是位于“汉蒙交界之处大河旁边”的一个地方，后来被封为元代帝师的八思巴在这里再次与忽必然会合。近人吴景敖在《西陲史地研究》中，列有“塔拉隘路”一节，专门对忒刺的语义和位置作了考证。吴氏指出，塔拉为蒙语，义为旷野，为一般较为宽阔之谷地平原的通称。达拉沟是甘川间最重要的交通门户，地处白龙江南岸，土地肥沃，出产丰富，宜于驻兵出击。根据这些条件，忽必烈自临洮攻蜀必经此境。加之达拉沟一线尚存有当年蒙古军行经此地的“残留之迹象”，因此其蒙古裔及蒙语地名之遗存，“必为平滇元兵南下时所播植”。蒙古军师次忒刺后，接着便分兵3路向蜀边进发：

西路军

兀良合台率兵自达拉沟西进，取晏当路（今四川阿坝草原），沿草原大道入吐蕃境内。从吐蕃至云南，中经今四川色达、甘孜二新龙、理塘、稻城，得荣，这一线是水草丰茂的大草原。蒙古骑兵沿此线通行，容易解决给养，绝少遇到阻挡，所以进军最为顺利。这年秋天，兀良合台首先率西路军自旦当岭（今云南中甸境）进入云南境内。位于大理北400余里的金沙江边的摩些等部酋长唆火脱因：，塔里马，麦良等前来迎降。于是，西路军遂济金沙江进逼大理北境之丽江。兀良合台既分兵入察罕章＜即白蛮），所在寨栅；皆依次攻下之。独阿塔剌所居之半空和寨，依山枕江，牢不可拔。兀良合台率精锐“立炮攻之”。阿塔剌遣人来拒；兀良合台遣其子阿术迎击之，寨兵退走。西路军遂拔其城，并进取大理都城北面的龙首关。

中路军

忽必烈率中路军离开忒刺后，经阿坝草原循大渡河西岸草原南下，随地招降牧区部落。大渡河西岸部落中的鱼通（今康定东部），长河西＜今泸定县大渡河西）、宁远（今石棉县与九龙县境）等地方最先归降。，后来忽必烈在这里设置土蕃长河西宁远等宣抚司进行统治。接着，中路军自泸定东渡大渡河，进入宋界黎、雅之境。负责防守的青羌五姓土司之一的杨土司的部将高保四率先迎降，导军招降了东岸部落。九月乙巳，忽必烈自岩州出兵进攻黎州，过飞越岭（今汉源县西北），抵达满陀城（即宋盘陀寨，今汉源县西北飞越岭至古城间）。这时，正好西路军驰报摩西部落迎降，兀良合台亟待忽必烈入滇主持战事，以资号召。于是，忽必烈决定把辎重留在满陀城，迅速督军南下。第二天，十月丙午，忽必烈率中路军自富林渡口，再次跨越大渡河，取古清溪道，经安宁河谷而南，“经行山谷二千余里”，于十一月进至金沙江。忽必烈“乘革囊及栈”渡江，有“摩娑蛮主”、丽江北胜府的高俊前来迎

降，“其地在大理北四百余里”。中路军自北胜府汴头（今云南永胜境）济江后，经罗邦至罗寺，围攻大匮等寨，招抚了当池土司头人，并给这个寨子赐名为“察罕忽鲁军”。接着，中路军由丽江石关南进。

由于忽必烈所领中路军的进兵路线，选定在西部草原与东部宋朝沿边州县之间，其所经行的又是大渡河河谷地带，沿途山路崎岖，悬崖绝壁。跟随忽必烈远征的汉将，留下了穿越此艰险行程的深刻印象：“下西域诸城，抵雪山，山径盘屈”，马不能行，军队不得不“舍骑徒步”，忽必烈经常是被汉将郑鼎背着前进的。汉将董文炳为中路军殿后，至吐蕃境，46骑中，“止两人能从”。由于道路踯躅，“日行不能三二十里”，其行程之艰辛可见一斑。

东路军

诸王抄合、也只烈率领东路军自忒剌南下，取川西北草原通往内郡的古隘道，进至松，茂二州之境。当时南宋茂州官员申报说：蒙古军“自曲纳族节节透入，已至渭节村、风节村，十八族多已投拜。若得此蛮，？长驱而往，则大理危矣”。当东路军沿着宋边沿州县，南下，出岷江故道经成都，进攻与四川南境相邻的大理白蛮地界，时，正值四川安抚制置使余蚧抱恨死去，新任蜀帅余晦无能，四川局势动荡，防务废弛之际，所以东路军得以毫无阻挡地穿越这一防地，经雅、黎二州，渡大渡河南下。东路军后于中路军进至大渡河，为此，忽必烈曾派出“东使”与之联络，以督促和策应其追随中路军渡过大渡河。

灭大理国

大理国在拒绝忽必烈使，臣的招降后，加强了对北部边界的防御，由相国高祥亲自率军屯戍于金沙江沿线，又由高通领一军驻扎在会川（今四川会理西），与蒙古东道兵“伯颜不花、虎儿等柑持”但是，由于兀良合台所率之西路军，首先取得摩些部落的支持，进入察罕章（今云南丽江），依次攻下尚在抵抗的部落寨栅，完全打乱了大理国重点防御刚11方向进兵的部署。高祥退兵大理都城，坚城固守。忽必烈再遣使者招降，又被大理国所杀。十二月十三日，当忽必烈包围大理城时，兀良合台所率的西路军，抄合、也只烈所率的东路军也赶来了。卧忽必烈下令攻城，首先夺取了大理都城东岳锁钥上关，高祥“背城出战”。在三路蒙古军的合力进攻下，十五日大理城破，国王段兴智奔善阐（今昆明市），高祥逃至统矢逻＜今云南姚安）被迫杀。接着，忽必烈指挥蒙古军四出略地，迅速占领了除善阐以外的大理国土。侣弘年春，忽必烈班师北返，留下兀良合台率军戍守大理，并继续征服大理境内尚未归附的部落。

云南之平

1254年秋，兀良合台领兵东征，进攻大理国附都善阐。善阐城临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兀良合台选骁勇部队发炮摧毁北门，并纵火

攻之，皆未能克。兀良合台改而虚张声势，“大震鼓钲，进而作，作而止”，使城内“不知所为”。“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遣其子阿术于夜五鼓严潜师跃入”，终于攻陷善阐城。大理国王段兴智在城破时被俘，随即遣送入阙，朝见蒙哥汗，蒙哥命令段兴智及其叔父段福协助兀良合台安辑大理。1255年，兀良合台命其子阿术领兵进取赤秃哥（今贵州西部）、罗罗斯（今四川凉山地区）等地。自兀良合台出师至此，凡2年，蒙古军终于陆续征服大理各部。凡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等蛮王十七部。兵威所加，无不款附”。1256年，段兴智献给蒙哥大理地图，蒙哥大喜，重新给予段兴智以“摩诃罗嵯”（大王）的梵名称号，让其继续管理云南各族。接着，兀良合台在大理国的基础上，建立了19个万户府，万户下又设千户、百户，确立了蒙古贵族对云南的军事统治，为后来建立云南行省奠定了基础。

蒙声军用武力平定云南，从政治上看，结束了云南自8世纪中叶南诏割据以来的分割局面，对于促进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对于推动云南地方经济的开发、文化的进步，都具有积极意义。从军事上看，忽必烈平大理之役，还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行军路线。为此，蒙古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据波斯史家拉施特的统计，忽必烈在征大理之役中，“由于路途漫长、行军艰难，该国又举国为敌、气候恶劣，他们每天都要打：两三次仗，以解救自己”，因此10万军队最后剩下不到2万人。魏源也说忽必烈“绕乌斯藏，穿蚕丛数千里而至大理，士马死者十余万”。忽必烈通过远征大理之役，为蒙古军迂回包抄，从长江以南进攻宋朝开辟了新的战场。虽然从短暂和局部利益看，蒙古在一段时间内削弱了攻蜀的实力，但从长远和全局看，这一前所未有的进军，无疑使南宋王朝陷入南北夹击，腹背受敌的境地。

第三节 兀良合台转战川滇

自滇攻蜀

1255年秋，兀良合台奉命自云南移师攻蜀，“以便宜取道”，配合留驻陕、蜀的蒙古军，对四川实行北南夹击。据南宋四川当局派往汉中的通事罗守禄探悉，自滇攻蜀的兀良合台军，其意“欲哨重庆，聚嘉定”。兀良合台为了实现聚嘉定的战略意图，于八月自云南出兵，九月攻占了滇蜀要冲乌蒙（今云南昭通一带）。据《元史》记载，兀良合台的入蜀路线是“出乌蒙，趋泸江”。泸江即金沙江，自云南剌川流入蜀境，又东北入叙州，与岷江相会，下流即为长江。由于今屏山以上金沙江，水势汹猛，河道险阻，自古不便通船，更不容水师出没。蒙古军自滇攻蜀，既从乌蒙出发而趋泸江，必然是从陆路取石门道，而以泸江下游的重镇叙州为目标趋进的。

石门道是秦、汉时开辟，隋唐时自四川盆地通往云贵高原的一条重要通道。石门道北僰道（今宜宾市附近），经古庆符县（今高县符江镇）南10里之石门山，过高县，筠连，向南继经云南昭通，再经贵州威宁，复经云南沾益，曲靖而抵昆明、大理。在宋代，庆符为叙州徼外

地，石门关外即是夷区。在大理匌与南宋四川之间，有许多发展程度不同的彝族先民部落。其中，大渡河以南的邛部川蛮与小云南相邻，马湖江外的叙州诸蛮（大江蛮等）与乌蒙部毗连，纳溪河（今永宁河）一带的泸夷（吕告，阿永、罗鬼等）皆与云南接近。九月下月，兀良合台军进至叙州横江以外的诸蛮部落地界。接着，兀良合台便率军向石门关逼进。

铲秃刺蛮三城

十月二日，兀良合台军在“近蕃兵”的支援下，“战胜俘获”，穿出“小江蛮地”。早在1255年春，南宋四川当局就听说蒙古军“在云南，颇迫叙州、长宁，以裹诸蛮，汹汹来告边”。当兀良合台军进至诸蛮部落境内时，沿途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挡。在十月二十四日之前，兀良合台军进入秃刺蛮地界。阿术所率蒙古前锋部队的哉马50匹，夜里被秃刺蛮惊走。阿术对兀良合台说：“吾马尽为盗掠去，将何以行？”阿术即分军搜访，发现战马藏在3寨的山颠上。阿术亲、宰将士攀援而上，破其3寨，生擒秃刺蛮首领，并“尽得前后所盗马千七百匹”。这就是兀良合台自滇征蜀过程中所发生的“铲秃刺蛮三城”的事件。这3座城，就是秃刺蛮境内山颠上的3个寨子。秃刺蛮，即《元史》所称之“秃老蛮”、“土老蛮”，其地域在庆符县与高州之间。

叙州之战

十月二十四日，兀良合台军攻破石门关，“透出叙州庆符县”，向叙州逼进。宋都统张实遣军与蒙古军相拒于清平洞下（今安边至宜宾市的金沙江上）。兀良合台既至金沙江，原拟北进岷江，会聚嘉定，由于有张实的堵截，蒙古军只好“便宜取道”。张实不断以水、陆兵进行堵截，两军在金沙江上展开激战。兀良合台在“却宋将张都统兵三万，夺其船二百艘”后，临时改道东进，循长江南岸，水陆并进，向四川军政大营重庆奔袭。

帖哥火鲁赤的行动

1254年，蒙哥汗命速哥等将，“从都元帅帖哥火鲁赤等入蜀”。帖哥火鲁赤会合汪德臣、拜延八都鲁的利州屯驻军，沿嘉陵江南下，其重大的行动是“继略阴平（今剑阁县西）、彰明（今江油县境），而云顶（今金堂县南）。接着，又于五月突然袭击紫金山（今盐亭县北），大破宋新任蜀帅余晦所部鹿角寨，夺其军饷器械。宋军措手不及，死伤不计其数，宋都统甘闰仅以身免，余晦大败而归。六月，蒙古军入合州，广安军境，宋守将王坚，曹世雄等战御有功。帖哥火鲁赤在结束这一年在嘉陵江沿线的扰掠行动后，复返回利州。

1255年春，帖哥火鲁赤奉命南下，与兀良合台北进之军会合，遂以宋降臣、原隆庆府（今剑图县）守将南永忠，高贵为前驱，由利州出苦竹隘，败蜀将焦达，尽获其所运资粮。五月十三日，进至阆州城，半月

后，“出没于果，阆、蓬、巴之境”。蒙古军进至蓬州运山城，受到宋军的坚决抵抗。蒙古军在“东城门”外停留了十多天，没有进展，便继续向南进兵。十一月十一日，蒙古军迫近顺庆（今南充市），“沿嘉陵江两岸而下”，不久便抵达合州境内。

带答儿的行动

在蒙哥汗即位之初，带答儿（又作大答，太答儿）是统率四川等处蒙古、汉军的都元帅，驻节汉中。1254年，带答儿曾率一支蒙古军向四川西境进发，“攻碉门、黎、雅等城”。1255年春，带答儿奉命率军入蜀，与兀良合台北进之军会合，自米仓山而入。蒙军万户刘七哥，阿刺鲁阿力与宋军激战于巴州（今四川巴中县），失利，被困于巴州。蒙古将速哥，忽都，扎里等领兵驰援，越巴州之境而过，宋朝因此宣布“巴州捷至”。接着，蒙古军沿渠江南下，十月二日，渠州（今四川渠县）告警。十一月，这支蒙古军也进至重庆附近地区。带答儿在。率军进入重庆地区后死去，其部遂由敏珠尔头项率领。

南北合兵

据《元史》记载，兀良合台在叙州击败宋军后，“遂通道于嘉定、重庆，抵合州，济蜀江，与铁哥带儿会”。铁哥带儿，即铁哥火鲁赤与带答儿之速读省称。当南北3支蒙古军于十十月相会在重庆附近地区时，曾击败过前来堵截的“宋将张都统”。兀良合台军既在蜀江（嘉陵江、渠江）交会之地的合州一带，与铁哥带儿之军相会，遂于次年（1256年）正月初旬，渡江返回云南。敏珠尔头项则率原带答儿所部军，。于正月二十五日从壁山（今壁山县＞拔寨退去。由帖哥火鲁赤所率之部，最后按原路撤退，二月二十五、六日相继离开利、阆诸郡。于是，四川当局便向南宋政府“奏捷”表功，宣布“南北两岸之兵，早遂肃清”。

这一次南北3支蒙古军在四川内地会师的过程，前后持续了半年之久，影响深远。这是蒙、宋战争以来，蒙古军在建立云南基地后，首次开辟的自南而北，南北夹击的作战局面。自此以后，南宋四川战场便陷入“南北相合，上下分哨，腹背受敌，咽喉中梗”的困难境内。

宋军对云南的防备

鉴于过去南宋防御集中备北，“蜀兵尽在江北渚城与敌对垒”，“北边诸城规模已定”，而江南根本没有设防，以致蒙古军得以自云南“深入夷腹，绕出蜀背”，“乃越川江而在南”的情况。从1256年开始，宋廷不得不把加强蜀江以南地区防御，结约南方“诸蛮”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宋廷经过1255年～1256年初腹背受敌的教训之后，更深刻地理解到“结约诸蛮”，“俾为捍蔽”的道理，因而对临近云南的泸、叙对境的吕告、阿永诸蛮，曾专门“差人赍礼物抚犒”。1256年夏，宋廷委派朱禩孙知泸州兼潼川路安抚使，任责泸，叙、长宁边防。之后又相继派遣大员进入南边措置防务。次年（1257年）十月，知靖州吕文德奉命入播州，“责令措

置”。1258年初，宋理宗又诏枢密院编修官吕逢年往蜀阃督视，专门趣办关隘、屯栅、粮饷，并“相度黄平、思、播诸处险要”。四月，再招土司田应己“往播州共筑关隘防御”。七月，吕文德再度奉命进入播州。措置关险防务。

经过上述措置之后，南宋政府终于在四川蜀江南岸建立起了一道防备云南的新防线。在这道防线上，确知已有如下一些重要城寨关隘：（1）凌霄城，位于今四川兴文县城西20公里的凌霄山顶。1257年，四川宣抚制置使蒲择之奉命、令泸州帅臣朱禩孙措置，由长宁守臣易士英任责、潼川路总管朱文政督工修建。1258年，朱棋孙奏言，“长宁军自办钱粮，创造器具，修筑凌霄城圆备”。在修城纪事碑上，明确记述了该城修建的原由和经…过；“宋宝祐乙卯（1255年）鞑贼自云南斡腹，越明年（1256年）蒲泽（择）之以天子命，令帅臣朱祀孙措置泸、叙，长宁边面。又明年（1257年）城凌霄，为屯兵峙粮，出攻入守据依之地”。（2）思州三隘，1257年筑。（3）播州关隘，1257年筑。（4）龙岩城，又名马脑城，位于今四川南川县城东南90里的马脑山上。1256年由南平守臣史切举奉命创筑。其筑城碑记云：“宝桔四年？（1256年），上有旨筑南郡四城（指施，黔、珍，南平四郡城）。南平守史切举奉捆（阃）命城马脑山”。（5）倚子山城，1259年知施州谢昌元“自备百万缗，米麦千石”创筑。（6）黄平、清浪、沅溪三屯，1257年，有《黄平图》呈宋理宗，其间险要处：“皆当置屯”。经宋廷讨论决定，“当审度缓急，分置大小屯。”次年（1258年）十一月，吕逢年督办修筑建栅工役，黄平新城落成，赐名“镇远州”。正如《宋季三朝政要》所说，黄平等隘的修筑，全在于“戍兵守备，以防云南”。

第四节 纽磷在四川的征战

袭扰剑阆

汪德臣在利州立足之后，不断派兵向剑、阆袭扰。利州是一个“四会五达”的要冲之地。出利州而南，从陆路经剑门可以通东、西两川，从水路沿嘉陵江，经阆州、顺庆，可以进抵重庆，夔峡。周此，剑、阆二州便是蒙古军南下的陆路和水路的大门。汪德臣罕如果不能突破宋军设在这两州的剑门关、苦竹隘，大获城等山城寨堡，便不能为蒙哥汗的图蜀灭宋计划打开局面。于是，在这以后一段时间里，蒙、宋两军不能不首先集中在剑，阆二州展开争夺。

1254年春，利州天旱，嘉陵江水枯，漕运极艰，汪德臣无法获得从沔州水运来的粮食供应，于是，便纵令兵将四向袭截。此前，蒙古军食不济时，汪德臣曾命令每名外出的军士，到剑、阆境内去抢粮3升，“以备日食”。这年四月，蒙古军进入剑州境内，擒获宋提辖崔忠，郑再生，命他们持檄招渝苦竹隘。守将南永忠、高贵以隆庆府投降，苦仍隘及其附近“山寨相继输款”。蒙古军进抵阆州，守将王惟忠败绩，弃城而遁。五月，新任蜀帅余晦强令推行不得人心的措施，致“蜀士蜀民皆不安”，他以紫金山的败绩被撤职。六月，蒙古军入合州，广安境，另一支蒙古

军围嘉定城达五旬之久。宋臣董槐上疏说："蜀事孔棘，愿假臣宣抚之名，置司夔门，以通荆、蜀"。宋理宗"优诏答"，决定派李曾伯为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进司夔路。此后，南宋四川的防御战，便是由李曾伯具体指挥的。

当时，剑、阆之间的隆庆堡，安西堡、吉平寨，长宁山、鹅顶堡等宋军驻守的寨堡，皆因苦竹隘的失陷而被蒙古军攻破，只有介于利州宝峰山与苦竹隘的孤垒，在守将王佐的坚守下，"屡挫北锋"。降将南永忠似兵薄城下，王坚怒斥其变节行径，使之"流涕而退"。八月，宋军从蒙古军手中收复安西堡，赵葵上疏报告："今蜀事孔艰"。宋理宗说：自1252年以来，"狄难孔炽，今安西之垒虽复，而宝峰之虏未退"。十月，隆庆府守，臣、统制段元蕴又从隆庆堡传来捷报。十二月，原南永忠部下、官兵周德荣，既被蒙古军擒获，复思效忠宋廷，遂密约段元鑑"入隘解围"。不料事被发觉，周就擒，"不屈而死"，宋将马徽、白端战殁。段元鑑巩固安西堡的基地，宋理宗并"普犒在城居一次，复租赋五年"。最后，经过宋军的苦战，终于使"苦竹隘捷至"。段元鑑在收复失守8个月的苦竹隘后，进一步加强了该城的防御工事，迄今苦竹隘遗址上，仍保存有段元鑑宝祐乙卯（1265年）七月镌立的题名碑记一通。由于安西、苦竹、隆庚诸堡相继为宋军收复，所以蒙古军不得不从剑州境内撤退。

1257年初，驻利州的蒙古军再次出动，大举进攻苦竹隘，有占筑堡寨，进窥剑门之谋。守将杨礼不能支，弃苦竹隘而守吉平寨。宋廷臣程元凤奏："向来段元鑑克复此隘，极为不易，杨礼不应轻弃。"为了克复苦竹隘，以破蒙古的"奸谋"，宋理宗诏蒯湖调兵应援，令蒲择之"急作措置"。蒲择之于闰四月初旬，以朱撰孙为监军，调蜀中各戎司兵前往剑门应援。蒲择之继又提制司兵奔赴。为备不测，宋廷又调京湖援兵5000入蜀。在各路宋军的救援下，经过两个月的争夺，蒲，择之终于五月收复苦竹隘及剑；门诸寨堡。六月，蒲择之乘胜北上，进取利州宝峰，以拔除蒙古汪德臣部的据点。然而，"以粮运不继，又值霖雨，器械损弊，因此中辍"。为此，宋理宗叹惜说："可惜失此机会。"

成都之战

1257年秋，宋廷得知蒙古军"有窥东川之意"，于是命令四川"制帅诸司，严为之备"。蒙古都元帅带答儿之子纽磷，奉蒙哥汗之命，"将兵万人略地"入蜀，自利州下白水（今白龙江），过阆州大获山，出梁山军直抵夔门。而另一支由刘黑马和夹谷龙古带率领的蒙古汉军，则乘西川防务空虚之际，一举占领了宋人早已废弃了的成都城。刘黑马是窝阔台时所立汉军3万户之首，他在进见蒙哥汗时，明确提出："请立成都以图全蜀"。刘黑马部下一员契丹将耶律买住也向蒙哥汗进言："今欲略定西川下流诸城，当先定成都，以为根本，臣请往相其地"。蒙哥汗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决定在成都立城设署。夹谷龙古带有在汉中立城的经验，他只用了7天时间，就在成都旧城的废墟上，新建了一座"楼堞隍堑皆具"的成都城。刘黑马奉命管理成都"新旧军民大小诸务"。随后，蒙哥汗又遣都元帅阿答胡率领一支蒙古军戍守成都，初步确立了蒙古对成都的

统治。

1258年春，宋理宗认为“成都系蜀安危，不可不亟图之”，命蒲择之率领驻蜀诸军进取成都。当时，蒙古军在四川境内，北有利州的汪德臣部卜东有夔州一带的纽璘军。为了阻挡这两支蒙古军的救援，蒲择之在亲率主力围攻成都之前，预先在剑门关派遣都统杨大渊率领一军把守，在东、西川要道二—遂州灵泉山（今遂宁县东10里），江箭滩（今遂宁县东涪江渡口）派遣都统段元鑑，刘整各率一军把守。正当南宋四川各军集中攻取成都时，坐镇成都的蒙古帅阿答胡死，城内守军陷入群龙无首之境。诸王阿卜干与诸将脱林带等谋曰：“今宋兵日逼，闻我帅死，必悉众来攻，其锋不可当。我军去朝廷远，待上命建大帅，然后御敌，恐无及已。不若推纽磷为长，以号令诸将，出彼不意，敌可必破。”于是，驻守成都的蒙，汉诸军遂推纽磷为长。

这时，纽璘正好从东川至钓鱼山，欲引军西向，以解成都之危。军至江箭滩，受阻于宋军，不能渡。蒙，宋两军从早到晚大战了一整天，纽磷军终于突破宋军防线，“斩首二千七百余级”。由石抹按只率领的汉军，也在灵泉山大败宋军，并乘胜追杀宋都统韩勇。蒲择之兵溃，纽磷军长驱直入成都。纽璘既帅成都，遂率众军坚城拒守。时值成都“夭久不雨”，攻城宋军“暴露日久”，士气逐渐松懈。及至五月，突然出现“拔木之风，石子之雨”，连日霖雨，“在处沾足”。对宋军十分不利。纽磷乘机突围，与应约从利州来援的汪德臣军，内外夹击，终于冲破蒲择之的重重包围。

云顶之战

纽磷军既破重围，遂反守为攻，引军进围成都东北的云顶山城，以扼蒲择之的归路。云顶城位于金堂县南、沱江西岸的云顶山巅，最初由潼川府路将都统使司修城提振官孔仙和潼川府路兵马副都监肖世显规划修建。1243年以后，四川制帅余蚧移利戎司驻此城，并将成都府的治所搬迁其上。该城东西宽2公里，南北长2□1公里，总面积1□5平方公里，周长约7□2公里。由于此城正当成都的北路和东路的要冲，有着重要的军事价值，遂成为兵家必争之地。1249年，蜀将姚世安镇守此城，对云顶山城进行“改建”，使该城防御更加坚固。1252年，余蚧在嘉定斩杀悍将王夔后，曾亲率部将至云顶山，企图接管利戎司的部队，因遭姚世安的抗阻，余蚧终未能进入云顶城。1254年，汪德臣率军南下，曾遭到云顶城守将吕达所率5000人的截击，汪德臣在擒杀吕达后，一次即“获粮五千石”，当纽璘遣车里部进围云顶城时厂宋将刘整曾率一军进行阻挡，“遣裨校出战”，不利，蒲择之败走，经简州向东撤退。于是，蒙古军遂围云顶城。云顶城陷入孤立无援之中，守将姚德“仓卒失计”。不久，“城中食尽”，纽璘部将彻里率部兵“由水门先登”，“破其壁”，守将姚德遂向蒙军投降。在姚德的导引下，西川各城相继归附。于是，“成都，彭（今彭县）、汉（今广汉）、怀（即淮安），绵（今绵阳）等州悉平，威（今理县西北薛城），茂（今汶川县威州镇）诸蕃亦来附”。经过此战之后，宋军势力最后退出西川，成都府南迁至嘉定（今乐山

市），蒙古军进一步巩固了在川西平原的统治。

抢渡马湖

1258年秋，当蒙哥汗亲率的征蜀大军进至汉中之时，在成都的纽磷奉命抢先攻占马湖江口的重镇——叙州，以便顺流进趋重庆，封锁下游江面，杜绝南宋增援之兵。当时，纽璘军只有2万，为配合蒙哥的征蜀行动，以5000人由密里火者、刘黑马、拜延八都鲁等守成都。纽磷自将15000蒙汉军，号5万，战舰200艘，以宋降将张威所部500人为前锋，水陆并进。纽磷军的路线是“缚桥资州以济师”，即沿着今沱江向南推进。纽璘军没有沿岷江南下，以渡马湖江口，这是因为自1252年以来，蒙古军多次进攻嘉定不下的缘故。为了绕过南宋这一西边重镇，纽磷军在资州济沱江而南，分兵两路：一军由千户暗都剌“率舟师而下”，另一军由纽璘本人“将步骑而南”。当纽磷引军行至岷江与金沙江交会的叙州时，遭到了南宋守将，都统张实的阻挡。为迎战纽磷军，张实“先以五百艘控扼江渡”，“连舰绝江不得进”，“横截江津，军不得渡”，主要是采取封锁江面的战术进行堵截。当时，纽磷部下长于水战的契丹将石抹按只以战舰70艘赶至。他一面选择地形，架设浮桥，另一面又收集军中牛皮，赶制浑脱、皮船等渡江器械。纽磷组织水师，与宋军在江中激战。石抹按只在击破宋军后，“夺其渡口，为浮桥以济师”。完颜石柱为争夺浮桥，“与宋兵战”。探马赤率领2000精兵，一举夺得宋军舟船以济。纽磷军在突破了宋军的水上防线后，指挥军队深入两江交会的三角地带，与宋军在阵地上作战。宋军腹背受敌，被蒙古军分割包围。忽都，步鲁合答领兵在老君山（今屏山县西北）及其附近的马老山击败叙州兵，取得决定性胜利，江面上的宋军溃败，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统兵主帅，四川宿将张实被蒙军所俘。

纽磷军突破马湖江防线以后，声威大振。蒲择之率部“分道要遮”，难以招架，一触即溃。蒙古军一路上浩浩荡荡，“旌期辎重百里不绝”。纽磷军乘胜东进，“鼓噪渡泸”，终于突破重庆上游最后一道险关——泸州神臂城，直奔重庆及其下游江面而去。

马湖江之战，显示了蒙古舟师的实力。从此以后，在川江航道上，经常可以看到蒙古舰只出没。纽磷抢渡马湖江的成功，实现了蒙哥汗封锁长江下游江面，杜绝宋军增援的战略意图。南宋理宗对此连连惊叹：“蜀中之警，皆因马湖江不能设备，纵其偷渡。今江之南北皆有哨骑，所以重费区处。”

第五节 蒙哥汗图蜀攻宋

攻宋计划的制订

1256年，蒙古汗在蒙古地区中部的哈不儿哈不黑举行忽里勒台会议，召集诸王百官，商定大举伐宋之计。诸王移相哥（即亦孙哥），驸马帖里干等一批蒙古贵族，首先请求出兵攻宋，并且质问说：宋朝距我

们这么近，“并与我们为敌，我们为什么置之不理，拖着不去出征彼国呢？”鉴于蒙古这时已在沿宋朝的边境地区建立了一系列驻兵据点，蒙、宋战争历20余年，积3个战场对宋作战的经验，已使蒙古统治者有可能进入以灭宋为目标的全面战争的阶段。在全面伐宋时机日渐成熟的形势下，蒙哥汗想急于建立超过父祖的功业，同时也出于要与忽必烈争夺中原控制权的动机，于是他决心全面进攻南宋，并且“亲自出征”。

蒙哥汗的攻宋计划，分左、右两路军和大江南北两条战线陆继展开。具体部署是：由幼弟阿里不哥和他自己的一个儿子玉龙答失，留守和林。左翼军（即东路军）由诸王塔察儿率领，进叉目标为荆襄，右翼军（即西路军）随蒙哥汗出发，进攻目标为巴蜀。留驻云南的兀良合台，率军在长江以南配合进攻，经广西，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北上，以图与东，西两路南下东进的大军，对南宋形成3面包围的态势。如上，中游得手后，3路蒙古大军会师鄂州再顺流东下，直趋临安，灭亡南宋王朝。显然，这样的攻宋计划，已不是前20多年间那种旆取旋去，分散出击的军事行动，它已经发展到以灭亡南宋政权为目标的步调统一的大进军。

蒙哥汗为实施这一攻宋计划，采取了以下3个步骤的行动：第1步，在1257年春“诏诸王出征”，九月开始“出师南征”第2步，在1257年底，“议分道攻宋”，在1258年春，决定分兵征蜀、征鄂，第3步，蒙哥汗自六盘山进兵，再次部署兵力，“分三道而进”。

诸王出征

1256年，蒙哥汗决定分左，右两翼军大举攻宋，命令“诸王出征”。左翼军由诸王塔察儿统率，参加左翼军的渚王贵族计有：也松格（即也孙哥），察忽剌、忽林池，纳陈驸马、帖里干驸马、怯台、不只儿、忙哥一忽勒察儿、察罕那颜。此外，还有由张柔4部将王安国，胡进、田伯荣、宋演所率的汉军。据波斯人拉施特记载；由诸王塔察儿“所统率的军队总共有三十万人”。这显然是一个夸大了的数字。

右翼军由蒙哥汗亲自率领，参加右翼军的诸王贵族计有：窝阔台系的合答黑（即也可一合丹）、秃塔黑，察合台系的忽失海：和其他诸王阿必失合，纳邻一合丹，合答黑赤一薛禅，拖雷系的末哥（即穆哥，莫哥）、阿速带，以及答兀秃家、火儿赤那颜氏族的军队。1258年二月，蒙哥颁诏天下，征诸道兵。四月，驻六盘聚兵。这时，应召从征的有：诸王末哥、莫都哥，附马君不花，万户孛里叉（即八里赤），扎剌亦儿部将脱欢，阿速氏部将拔都儿、也烈拔都儿，阿答赤、别吉八，薛亦氏部将哈八儿秃，蒙古将曳剌秃鲁雄，乞台不花，率领“探马军万人”的畏兀儿亦都护马木剌的斤，宁夏人术速忽里与其子末阿八赤等。此外，还有来自北方4大汉将史天泽，张柔、董俊、严实所派遣的汉军。原来在蜀中屯驻的蒙古汉军还有4个系统：—由汪德臣、赵阿哥潘、李忽兰吉所率的利州戍守部队，由汉将刘黑马、夹谷龙古带所率的原成都留守部队；由都元帅纽磷/诸王阿卜干所率的驻守成都的蒙古军2万人（号称5

万人），以及由按竺迩子彻里，国宝所率的阶州、沔州戍军。总之，当时从驾征蜀的蒙古右翼军，兵强马壮，力量雄厚。据拉施特记载，“随着蒙哥合罕出发的军队总数〔为〕六十万”。实际上，由蒙哥汗亲自统领的征蜀军人数为4万，号称10万。如果加上留在蜀中的4支兵马在内，估计征蜀的右翼军总兵力只有7万人左右。

东路战况

1256年秋，塔察儿率左翼军南下，路过东平（今山东东平），“掠民羊豕”。这支军队一开始就因为军纪不严，而受到蒙哥汗的谴责。1257年秋，塔察儿率军进至汉江，并以“十万骑兵”攻打襄阳和，樊城。由于塔察儿军热衷于掳掠财物，恣情享乐，围攻襄樊数月，皆未能攻取一城。此刻，正值襄樊“霖雨连月”，塔察儿弃城不攻，班师北撤，回到他们原来各自的营地上屯驻下来。蒙哥汗对此勃然大怒，并决定要严厉地惩罚他们。

1258年春，蒙哥汗将亲自率军攻蜀，为了分散宋军的兵力，命塔察儿出军进攻荆山（今安徽怀远西南），佯攻两淮，“掣肘淮海。”四月，蒙哥汗诏征益都行省（今山东省）李璮之兵南征。李璮为避免削弱自己的实力，以益都是“南北要冲，兵不可撤”为理由，拒不派兵从征四川。于是，蒙哥改遣李璮从山东出兵南下，进攻南宋东海一线。从这以后，配置在江淮战场上进行牵制性作战的蒙古汉军，就有塔察儿和李璮两部。五月，这两支部队分别进攻怀远、涟水（今山东涟水），不克，南宋守将夏贵因此奏功，迁官两转。十月，李璮军进攻通（今江苏南通），泰（今江苏泰州）二州。十一月，塔察军改攻颍州（今安徽阜阳）又遭失败。李璮军进展顺利，曾一度攻占过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南宋枢密使、两淮宣抚使贾似道为此不得不引咎自责。李擅出兵东海本来只是为了敷衍蒙哥，逃避从征巴蜀，在月的达到以后，他很快便退兵山东，巩固自己的防地。诸王塔察儿无功受阻，被蒙哥诏赴四川行在之所，于是，这支军队也就“略地至江而还”。

南线战况

兀良合台自蜀返滇后，又陆继从云南出发，经播州、思州，向南宋的腹心地带沅州（今湖南芷江）、靖州（今湖南靖县）一线发起新的攻势。1256年夏，据“罗氏鬼国”（今四川南部与贵州西北部的少数民族）遣报恩、播说，蒙古军屯大理国，即将取道西南，大举入犯，并，“招养蛮人为向道”。1257年春，蒙哥汗命诸王出师征南宋。兀良合台亦受命自云南出兵进攻交趾（今越南）。九月，军至“罗氏鬼国”。播州事态颇急，连连向宋廷“乞兵”。十二月，蒙古军入播州，宋理宗再次增派“诸将提兵征讨”，进入播境追袭。兀良合台军经播州进入交趾，与陈朝军队作战，至1258年初，复由陈朝撤军，途经播州返回云南。

蒙哥驻六盘山

1258年秋，兀良合台自云南发兵，对南宋广西进行试探性军事进攻。关于这次军事情况，《宋史》失载，《元史》语焉不详，今据宋知静江府兼广西转运使李曾伯的有关奏章，及今人研究成果表明，兀良合台于当年八月十日自云南发兵，取道特磨（今云南广南、富宁一带），于九月十三日进入宋境，在田州（今广西田东西）、横山（今广西田东）一带与宋军对峙。当时，李曾伯集广西的军、政、财权于一手，加强了对广西前线的统一领导。南宋政府还任命淮将刘雄飞为广南西路融、宜、钦三郡宣抚使，兼知邕州（今广西南宁），以建立前线指挥部。南宋政府还对前线地区钦（今广西钦州）、宜（今广西宜山）、柳（今广西柳州）、融（今广西融水）诸州的守臣作了相应的调整。由于南宋政府在广西增兵布防，广修城池关隘，并抽调数千民丁“贴助城守”，使得蒙古军的这次进攻战绩甚微。至十一月底，兀良合台以病旋师，撤离宋境，自归仁隘、峨州隘取特磨道返回云南。不若取道关东夷途，直临江汉。”但是，蒙歌拒绝了游显关于取道关东，直临江汉的建议，坚定地表示说：“朕业至此，势无回轸”。这时史天泽部将史枢赶来朝见，蒙哥汗慰劳说：“卿久镇东方，兹复远来，勤亦至矣。”史枢表示道：“今陛下亲御六师，暴露万里之外，臣独不能出死力，以报万分之一邪!”于是，蒙哥壮其言，遂以史枢为前锋。蒙哥率大军进攻宝鸡至汉中间的重贵山，“所至辄平”，九月，蒙哥驻跸汉中，整军继向利州之境进发。

入利州

蒙哥既至汉中，随即取金牛道，向利州推进。金牛道上险阻重重，“悬崖万仞”，“前马不行”，在度过三泉县（今陕西宁强县西北）至利州之间的19318间桥阁，途经47134间护险编栏回之后，蒙哥手十月七日进至利州宝峰山，次日入利州城，周览城郭。当时，利州之东有巴州，西有剑门，阴平，南有大获，长宁，与利州“相距不远”。利州城池并非深固，但由于汪德臣能坚守，终使“蜀不敢犯”。为此，蒙哥汗对汪德臣赞赏备至，“赐以金币，勒功于石”，并且感叹说：假如不是蒙古军戍守利州，让宋军先据之，“则四川领喉之地，可必能岁月平哉？”在蒙哥入利州之前，汪德臣为迎候“宪宗自将讨蜀”，问计于诸将。汪德臣苦于利州“凋伤之余，玉帛无所于得……何以为资？”其兄汪忠臣认为：“吾曹拔身健儿，惟有能将率士众，效死前驱，何至为是媚人”。汪德臣终于以其“胆若山大”的威名，赢得蒙哥汗的信任，被擢为征蜀军的前锋将。

取苦竹隘

接着，蒙哥移师西南，渡嘉陵、白水二江。蒙哥在昭化见嘉陵、白水交会，“势甚湍急”，遂问汪德臣，须“用船几何？”汪德臣回奏：“大军百万，难于运济，当别议规画”。旋即“令鸠工架舟为梁，一夕而办"。蒙哥称赞说：“汪总帅言不虚发，今济大江如履平地”。于是，蒙哥遂赐汪德臣白金30斤，“仍命刻石江滨，以纪其事。”

蒙哥既渡嘉陵、白水，遂挥军选至苦竹隘。苦竹隘，今名朱家寨，

位于剑门关西的第2道关隘上。据记载，苦竹隘“岩壁峭险”，“前阻绝涧，深数百尺，恃险而不备”。其“西、北、东三面崭绝，深可千尺，猿猱不能缘以上下者”，“其南一途，一人侧足可登，不可并行”。实地考察表明，该隘所在之山，“呈四棱”。“东靠梁家寨，深壑隔断，西临隘口，峭壁矗耸，北屹衙门口，状如城廓，南抵诸王山，岩塞雍口，而西、北两壁，形似截削。隘口如一劈中开，两壁铮铮比肩。悬岩腰中丛生榛莽，虬枝交错，蓬荫蔽日相漫十里狭谷”。当时南宋苦竹隘守将为杨立。他在“蜡丸书”中，自称拥有“骁骑万群。蒙哥先遣汪德臣部将李忽兰吉以兵“趋剑门觇伺”，乘机追夺宋军从长宁山运出的粮食，以切断通往苦竹隘的补给线。随后，蒙哥亲自伐鼓督战，指挥各路军马进攻苦竹隘。蒙古军久攻不克，面对苦竹隘的“岩壁峭险”，“有请建天桥者”。汪德臣则表示说：“先登陷阵，臣所不辞，桥之成否，臣不敢知”。已而，“桥果未成”，而汪德臣遂率将士“鱼贯而进”。不得已，蒙哥只好把在马湖江战役中被俘的蜀将张实放出来，要他作为“蜀导”，劝说苦竹隘投降。一直设法脱身的张实乘机对蒙哥说：“吾能诱此栅令降”。张实与杨立素来“相友善”。张实至苦竹隘，对杨立说：“实受宋氏恩久矣，可斩实首级以降”。杨立回答说：“公不死而受遣以来，何不斩立首而降之”。于是，二人互盟心志，“共誓死守”。蒙哥恼羞成怒，“为书系筒”。用箭射入隘内，“令必生致”张实。蒙哥把长于山地作战的史天泽部调来，命其部将史枢率健卒数十，从悬崖上缒下，进行侦察，发现苦竹隘东南门是攻城“致师处”。于是，蒙哥命史枢“急取之”。在蒙古军的强大攻势下，十月戊子，苦竹隘裨将赵仲武献东南门（今卷洞门）以降。杨立巷战牺牲，张实再次被俘，遭到肢解。苦竹隘破陷后，宋将徐昕，王佐走长宁山、鹅顶堡，据险固守。蒙哥下令“夷其城”。

拔长宁山城

蒙哥攻下苦竹隘后，留精兵500守之。随即登隆庆高峰，指挥诸军沿嘉陵江东下，攻吉平隘，向潼川府治长宁山（今剑阁县东南、苍溪县西北）进逼。宋守将王佐与裨将徐昕领兵与战，失利，退守山南鹅顶堡。十一月五日，蒙哥督军攻鹅顶堡。八日，力战于望喜门。不克。日暮，宋知县王仲叛变，自鹅顶堡开栅出降。是夜，长宁山城告破，王佐不屈战死。九日，王佐之子及徐昕等40余人遇难。汪德臣部最先攻登长宁山城，诸将议欲将山城之民分为已有。汪德臣上奏蒙哥说：“负固不服，罪在守臣，其众何辜”蒙哥制止了诸将“欲分其众”的行为，抉定设官署统治，并命彭天祥为达鲁花赤，以王仲副之。

降大获城

十一月十二日，蒙哥车驾沿嘉陵东下，命汪德臣为“御前先锋”，率军进攻阆州大获城。大获城位于苍溪县东南40里之大获山上。城因石岩为之，嘉陵江支流宋江环绕其下，石城四周，峭壁蝇岩，天生奇险。“宋人阻山为城，带江为池，恃以自固”。蒙哥先遣宋降臣王仲入大获城，企图招降阆州总兵、宋守将杨大，渊，大渊杀之。蒙哥大怒，遂督诸军力攻，严实部将张立统锐卒，攻陷外堡，夺战船百余艘。汪德臣部抢先攻

占大获城水门。杨大渊惧，当夜遣其子出城求降，“乞活数万人命”。次日，杨大渊挈城投降，推官赵广死之。已而，杨大渊纳款后又逃归，蒙哥怒欲屠其城，汪德臣急遣部将李忽兰吉单骑追入城内，知杨大渊并无反意。于是，蒙哥遂以故宫授杨大渊为侍郎、都行省，命他率所部兵从征，大获城居民也因此“得生全”。3天后，蒙哥车驾至和溪口，十一月二十八日，御营过阆州。

降运山、青居、大良诸城

蒙哥离开阆州，别遣游骑攻掠青居城，自率大军向蓬州运山城推进。为了牵制嘉陵江左右两面的宋军，蒙哥命纽磷别遣一军攻简州，命杨大渊、汪德臣领前锋兵向相如县（今蓬安县周口镇）境出击。蒙哥率大军于十二月乙酉进至运山城下。运山城（又名云山城，俗名燕山隘），位于蓬安县东南30里，其上高险，四壁陡绝。蒙哥命杨大渊派人招降，守将张大悦降，转运使施择善死之。

接着，蒙哥军进至顺庆府青居城。青居城位于南充市南30里，山势高耸，直上数十仞，岿然杰峙，嘉陵江绕其下。宋裨将刘渊杀都统段元鎰出降。位于渠江流域南岸的大良城守将蒲元圭也挈城降附。大良城位于广安县东北60里，石岩四绝，天然险固，广安军移治其上。一时间，“顺庆、广安诸郡，破竹而下”。此外，蒙古军还招降了龙州（其时移治今江油县北雍村河西岸），隆州（今仁寿县）、雅州（今雅安市）、石泉（今北川县）等地方。据元人统计，在蒙哥初入蜀中的两个月中，蒙古军新攻占了“龙、剑、阆、蓬，巴、达、果、渠、长宁、大安（良）诸城”

莫哥攻巴渠

诸王莫哥及史天泽所率的蒙古汉军受命由洋州入米仓关，攻渠江沿线诸城，从侧翼。牵制南宋四川之军。1258年九月，此军“道由陈仓入兴元”，继“度米仓关”。米仓关是由汉中进入四川巴州的咽喉之道，“其地荒塞不通”，李进率汉军“伐木开道七百余里”，于十一月进至定远七十关。“其关上下皆筑连堡，宋以五百人守之，巴渠江水环堡东流”。史天泽派李进往关下劝降，不从。夜二鼓，史天泽遣李进率勇士70人，从间道进攻，“掩其不备备”，捣毁悬门，追至上堡，宋兵不能敌，弃堡逃走，夜将旦，李进遂夺得其堡。“关路始通”，“诸军尽度”。于是此军遂与蒙哥的主力军相会于钓鱼城下。

第六节 钓鱼城之役

钓鱼城的防御形势

1258年底，蒙古军沿嘉陵江南下，进攻南宋四川军政大本营——重庆。当时，在四川数十座山城中，或降或陷，或围或困，能够担负起屏蔽重庆，支撑四川抗战局面责任的，只有距重庆北面70公里的钓鱼城。

“钓鱼城”的名称，最早出自南宋绍熙辛亥二年，（1191年）的一通碑记。此后半个世纪，由于防御蒙古军的需要，它才逐步发展成为一座防御性质的坚城。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命大尉甘闰于合州筑钓鱼山寨，以为重庆府屏障，1243年，四川制置使余阶采纳播州冉琎、冉璞之谋，筑城于合州钓鱼山，并徙合州治所和兴元戎司于其上。按照冉氏兄弟酌设计，钓鱼城不是一般防御山城，而是重庆的屏障和守御巴蜀的的防御要点。

钓鱼城之所以能够在蒙古军的进攻面前，成为支撑四川局面的防御要点，是与它本身所具有的重要的战略地位分不开的。一方面，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交会之冲，正面控扼三江展开的扇形地区，背依华蓥山脉，既可阻止南下的蒙古军的长驱直入，以蔽重庆，也可以连结渠江，组成一道封锁开达、夔峡之路的防线。宋蜀人阳枋在1240年甘闰筑钓鱼寨时，曾作诗表达钓鱼城的这一战略地位。他写道：“吴门捍蔽重夔渝，两地藩篱属钓鱼。自昔无城当蜀屏，从今有柱壮坤舆。”另一方面，钓鱼城坐落在州东10里的钓鱼山上，山势险绝，四围峭壁悬崖，东西南3面据江，是易守难攻之地。无名氏《钓鱼城记汐对钓鱼山的天然形胜作了如下记载：“山在州治之东北，渡江十里至其下。其山高千仞，峰峦岌岌，耸然可观。其东南北三面据江，皆峭壁悬崖，陡然阻绝。修城之后，凿山通路，路曲次之，方可登临。其西南稍低，于此筑城，高二十仞。城之门有八，曰护国，青华、‘镇西，东新、出奇、奇胜，小东、始关。其山周回四十余里……此山三面据岩，渠，嘉陵二江自西北而来，冲于山之西，流至合州城下则与涪江会同，皆浩浩荡荡环绕山足而东下”。正因为钓鱼山对于蒙宋争夺巴蜀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所以冉氏兄弟敢于断言：“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也正因为如此，余蚧敢于为钓鱼城承担责任：“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蚧独坐之。”

王坚的防御部署

蒙哥大举攻蜀时，合州钓鱼城守将为王坚。王坚原是南宋名将孟珙的部将。孟珙任四川宣抚使时，王坚随孟珙入四川。入蜀后，王坚曾参与余玠指挥的北伐汉中之役，战功卓著，1254年被宋廷任命为兴元都统兼知合州。王坚知合州后，展布筹策，简辑兵民，在继承二冉创筑的钓鱼城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加强了对钓鱼城的防御。王坚“发郡所属石照、铜梁，巴川、汉初、赤水五县之民，计口八万，丁一十七万，以完其城。西门之内因沟为池，周回一百余步，名日天池。泉水汪洋，旱亦不涸，池中鱼鳖可掉舟举网。又开小池十有三所，井九十二眼，水春夏秋冬足备不干”。与此同时，王坚采取“保民练武”的方针，率领城中之民，“春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则收粮运薪，以战以守”。经过这番努力之后，使得钓鱼城终于成为一座聚集秦，陇。蜀民，“人物愈繁，兵精食足，兼获池地之利”的军事重镇。在加强钓鱼城的防守方面，王坚“素恃江险”，在山的的南北面各筑一条“一字城”伸至江边，可拦截敌军于城墙与江流之外，同时，又在江过建水师码头，经常在江上布置“数百余艘”战船，以加强对山城的警戒，同来犯之敌接战。以上情况表明，城

坚、粮丰、水足，布置得当，钓鱼城确实具备了可供城内军民长期坚守、独立作战的条件。

蒙古的战略决策

1259年初，蒙哥汗驻跸重贵山，欢度新年，并召开前线军事会议，商讨进一步伐宋的军事方略。，蒙哥首先问诸王、驸马、百宫说，“今在宋境，夏暑且至，汝等其谓可居乎？”群下百官议论纷纷。扎剌亦儿部人脱欢说：“南土瘴疠，上宜北还。所获人民；委吏治之”。阿儿剌部人八里赤则认为脱欢畏怯，表示“臣愿望居焉”。蒙哥赞同八里赤的意见，决意继续进兵。唯独宁夏人、奉命“居宿卫”、“掌膳事”的术速忽里进言说：“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末附者，巴江以下数十州而已。—地削势弱，兵粮皆给东南，故死守以抗我师。蜀地岩险，重庆、合州又其藩屏，皆新筑之城，依险为固，今顿兵坚城之下，未见其地。曷若二城之间，选锐卒五万，命宿将守之，与成都旧兵相出入，不时扰之，以牵制其援师。然后我师乘新集之锐，肘降人为向导，水陆东下，破忠、涪、万、夔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水涸，瞿塘三峡不日可下，出荆楚，与鄂州渡江诸军合势，如此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其上流重庆，冶州，孤立无援，不降即走矣”。但是，当时诸将恃强好胜，邀功心切，认为“攻城则功在顷刻”，反而以术速忽里的见解为迂阔，竟未采纳这一颇有远见卓识的计谋。适逢蒙哥派去招降的晋国宝，遭到王坚的拒绝，在归至峡口时，又被王坚派人捉了回去，并押至钓鱼城阅武场处决。这一事件，更促使蒙哥下决心用武力征服钓鱼城，以扫除其进军的障碍。于是，一场钓鱼城攻坚战开始了。

蒙军的攻城部署

当蒙哥决意攻取钓鱼城后；首先作出了切断钓鱼城与外界的联系，堵绝吴蜀交通的部署。一方面，派遣谙王莫哥都攻渠州礼义山城（今渠县东北70里，俗称三教寺寨），曳剌秃鲁雄攻巴州平梁山城（今巴中县西15里），以切断钓鱼城与渠江流域诸城的联系，派遣降将杨大渊攻合州旧城，一次俘走男女居民8万余，以切断钓鱼城与旧城的联系，陷钓鱼城于独悬之中。另一方面，蒙哥又命令纽磷加紧向重庆下游江面进攻，“犯忠，涪，侵迫夔境”，以造成“蜀道梗绝”。

针对蒙古军的这一部署，宋廷为了牵制蒙哥进攻钓鱼城的兵力，亟令蜀帅蒲择之“以重兵攻成都”，企图通过捣虚牵制手段来解合州之围，但是没有成功。与此同时，宋廷加强了对长江下游的应援，命贾似道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抚大使，提举两淮兵甲，湖广总领，知江陵府。命荆湖制置使马光祖移司峡州，命向士壁移司绍庆府（今四川彭水县）。向士壁不俟朝命，进师归州，捐家资百万以供军费。马光祖不待奏请，招兵万人，捐银万两以募壮士。马光祖命京湖制司参谋官王登“提兵援蜀”，与蒙古军战于房州，王登“功未及成而殁”。宋勇胜军统制官詹钧，还一度率偏师深入思、播，在与纽磷军的战斗中被俘，后“遇害”。

钓鱼城战斗经过

蒙哥汗在部署停当之后，便“合诸道兵围合州，凡攻城之具无不精备”。二月，蒙哥率军从钓鱼城东北渡过渠江鸡爪滩，在东南角的石子山扎营。蒙哥先派军扫清江上的宋军外堡和船只。李忽兰吉与怯里马哥领战船200艘，掠钓鱼山，夺其粮船400艘。张立统锐卒，攻陷钓鱼城外堡，夺战船百余艘。史天泽的军队在城南夹江而阵，专门封锁嘉陵江面，李忽兰吉则在江上“作浮梁，以通往来”。蒙哥还派李忽兰吉等领蒙古汉军2500略重庆。汪德臣的军队部署在城的西南角，负责夺取城外山寨。蒙哥还从汪德臣以及北方诸侯军中各抽调“锐士若干，以备宿卫”。另遣郑温率军4000在钓鱼山周围专事巡逻。此外，蒙哥还对“桥道馈饷”和“麴药”医疗等事宜作了安排。

根据《元史？宪宗纪》记载，蒙古军在二月至四月间的战斗日程是：三日，蒙哥督诸军战钓鱼城下，战斗开始。七日，蒙古军从东面猛攻东新门（土地垭门）与护国门（小寨门）之间的一字城。九日，蒙古军猛攻镇西门。两战不，克，受挫回师。三月，蒙古军从东、北、西三面对东新门，奇胜门（范家门）和镇西门外的“小堡”发起强攻，再次失败。四月，接连出现20天的大雷雨，暂停攻城。二十二日，蒙哥督军强攻护国门，败归石子山。二十四日夜，蒙哥率师绕道从西北进攻外城，一度登上城头，伤宋兵甚众，但最终被打退。

在上述战斗中，宋军利用钓鱼山的天然良险，“坚壁不下”，从容进行防守。“宋卒乘壁而诟，傍有坐而张盖者”。蒙古军采取困守“环攻”战术，并不时派遣敢死士卒，冒险强攻。但由于钓鱼山“石邑入云”，地势险峻，蒙古军虽有精良的攻城器具，仍“炮矢不可及也，梯冲不可接也”，因此，其结局不是因伤亡惨重而“苦战不前前”，就是因后军不继而败还。例如，董文蔚率邓州之“选兵”，长驱而前？至钓鱼山，“崖壁风峭，惟一径可登，恃险阻未即降”。蒙哥命董文蔚攻之。董文蔚“以次往攻，乃激厉将士，挟云梯，冒飞石，履崎岖以登，直抵其寨，苦战不能前。顷之，兵士被伤，乃还”。接着，董士元请代董文蔚攻之，“将所部锐卒先登。力战良久，以它军不继而还”。五月，蒙古军屡攻不克，士气大为低落。而此时城内军民则群情激愤，斗志高昂。王坚白天率军抵抗，夜晚不时派兵“斫营”，袭扰蒙军。王坚百折不挠抗击蒙古军的事迹，受到了南宋朝廷的表彰。宋理宗颁诏称赞他：“婴城固守，百战弥厉，节义为蜀列城之冠。”

吕文德援蜀

鉴于蒙哥汗大举入蜀，蒲择之帅蜀无功，宋理宗改以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寻命兼湖北安抚使，派他率军入蜀，以解合州之围。五月下旬，吕文德以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率舟师万艘，溯江而上。蒙古军早巳由纽磷率领，在涪州蔺市和重庆附近的铜罗峡布置两道水上防线，堵截从下游而来的南朵援军。当吕文德率军进互涪卅时，纽磷军早在州西60里的蔺市大造浮桥”，“驻军桥南北”，“夹江为营，长数十里，

阻舟师不能进至浮桥。”吕文德率兵攻浮桥，数战皆克，纽磷部将火尼赤陷入重围，“速哥破围出之”。时值“蜀江雪涨，水冒桥趾”，浮梁“中绝”。宋将曹世雄、刘整出奇斫桥，终于攻断蒙古军设在莔市的浮桥。吕文德乘胜率舟师逆战，进至铜罗峡第2道防线。其时，来阿八赤奉命监纽磷军，“遏宋人援兵，驻重庆下流之铜罗峡，夹江据崖为垒”。宋将甘顺乘舟来攻。来阿八赤“预积薪于二垒，明火鼓噪，矢石如雨，顺流而进，宋人力战不能支，退保西岸，敛兵自固”。黎明，来阿八赤“身率精兵，缘崖而下，战舰复进，宋人败走”，经过激烈争夺，吕文德终于“乘风顺战胜”，冲破蒙古军的层层封锁，于六月初率兵进入重庆。

接着，吕文德“以艨艟千余，溯嘉陵江而上”，蒙古军迎战于三槽山（今合川县南）西，不利。蒙哥命史天泽御之。当时，宋兵以“战舰三百余”，停泊在黑石峡东，以“轻舟五十为前”，向北进逼。蒙古军之船？0余泊于峡西，两军“相距一里许”。蒙哥汗“立马东山，拥兵二万，夹江而阵”，指挥蒙军进行堵截。史天泽“乃分军为两翼，跨江注射，亲率舟师顺流纵击”。蒙古军独创的这种3面攻击的水上战术，在川江里运用得相当成功，史天泽“三战三捷”，夺得宋军“战舰百余艘”。宋军，“前溃走，战舰继乱”。吕文德入援钓鱼城不成，只得领兵退守重庆。

蒙哥之死

蒙古军围攻钓鱼城5个多月，仍不能下。汪德臣派人“谕人祸福”，多次进行招降，又遭到拒绝。汪德臣发誓说：“今乘舆所至，诸臣风靡，独此旅拒。捐躯图报，正其时也。”于是，汪德臣挑选锐卒乘夜进攻外城马军寨。王坚率兵进行抵抗。两军相持到天亮。汪德臣单骑进逼城下，大声喊话说：“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话还没说完，城上飞石击来，致使汪德臣负伤“感疾”。时值大雨，攻城梯折，后军因失利而撤退下来。蒙哥遣丞相兀贞赐给汤剂，并把汪德臣送往“高爽”的“缙云山寺”（今重庆北温泉）养伤。汪德臣“见山多大木，犹命工度材造舟，为东下计”。六月二十一日，汪德臣“以疾薨。蒙哥汗得知讣闻后，“拊髀叹惋，如失左右手”。

汪德臣殁于军，极大地挫伤了蒙古军的锐气。宋军抓住这个机会，“水陆昼夜接战”，但皆被“殿后”的李忽兰吉部所击败。其时暑热已至，蒙古军开始“疫矣”。七月初，久旱酷暑，南宋境内普遍奇热热，“山中从前无此热，旱禾焦死晚禾枯”。蒙古“军中大疫”。“士马不耐其水土”，军心涣散。蒙哥扦命畏兀儿人月举连赤海牙“修麴药以疗师疫”。但是，仍不能制止这种疫病的漫延。对此，拉施特作了更加详细具体的记述：“随着夏天的到来和炎热的加剧，由于那个地区的气候恶劣……在蒙古军中出现了霍乱，他们中间死了很多人”。在霍乱流行，而又无法医治面前，蒙哥汗下令“用酒来对付霍乱”。这样，军疫不仅没有控制住，反因饮酒而损伤了蒙古军的战斗力。

与此相对照，钓鱼城内粮草丰足，士气高涨，斗志正旺。为了显示城内的储备和必守的信念，宋军发炮，向城外抛掷了各重30斤的鲜鱼二

尾，以及蒸面饼百数，并谕以书曰："尔北兵可烹鲜鱼食饼，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

蒙古军既无力强攻取胜，又不愿弃城撤军，只有加强对钓鱼城的封锁和监视，以待有利时机的到来。为了探知城中虚实，蒙古军在"西门外筑台建桥楼，楼上接桅，欲观城内之水有无"。城内宋军"俟缘桅者至其竿末，方欲举首，发炮击之，果将桅人远掷，身殒百步之外"。亲临现场督战的蒙哥，"为炮风所震，因成疾"，遂班师至愁军山（待考）。

据《元史》记载，从六月起，蒙哥汗即"不豫"。拉施特也记述说，当蒙哥汗"坚持饮酒"以对付霍乱时，"他的健康状况恶化，病已到了危急之时"。七月上旬，蒙哥为了稍事调养，遂将前军由钓鱼城南调，转攻重庆，御营亦随之转移。不料在前往缙云山寺休养营地的途中，次过金剑山温汤峡（今重庆北温泉）时，蒙哥驾崩。

蒙哥汗之死，是"历史上一个难猜的谜"。对此，中外史书上有各种不同的记载。在蒙哥死的时间上，有说死于七月癸亥的，七月癸未的，还有说死于八月的，乃至十一月的。但是，根据郝经的《班师议》，他在七月十二日随忽必烈军行至汝南淮河之滨，即已得到蒙哥死于合州的消息，因此推断死于七月土旬是可以成立的。在蒙哥死的原因上，或谓染疾，或谓中箭，或谓中飞石，或为炮风所震等等。在死的地点上，有谓钓鱼山，有谓钓鱼城下，有谓死于合州城下，有谓崩于军中@等等。根据地近易核的原则，无名氏《钓鱼城记》所载蒙哥"过金剑山温汤峡而崩"，详细具体，且符合历史地理情况，较为可信蒙哥既能由钓鱼城东南角扎营之地，转移至温汤峡，起码说明他并非是在钓鱼城战役中直接毙命的。而"为炮风所震，因成疾"，记载此事的万历《合州志》的作者，仅称蒙哥"为炮风所震"，或称"元主惊悸而死"，都未包含中箭箭、中飞石的成分在内，因此，也显得较为客观公允。

蒙哥死后，跟随他征蜀的蒙古军除留3000人牵制钓鱼城外，其余部队由他的儿子何速台率领，向北撤退。据说蒙哥在临死前曾说："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蒙哥死后，史天泽和群臣奉丧北还，"尸体送回葬地，所经沿途，有两万多宋人被杀死"。所有征蜀的蒙古军，除留驻四川的汪氏部队和纽磷军外，其余各军皆随阿速台撤至六盘山。随着蒙古军的撤离钓鱼她蜀江南北两岸的局势顿时缓和下来。九月，宋廷宣布"合州解围"，升王坚为宁远军节度使。十月，又以"蜀道稍宁"诏谕四川守臣"恤军劳民，庶底兴复"。至此，钓鱼城战役宣告结束。

钓鱼城战役在战争史上，创造了以山城设防击败蒙古铁骑的奇迹。这一战役还在政治上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一方面，它对延长南宋王朝的统治时间起了直接的影响作用。在蒙古倾国来攻的紧急关头，由于蒙古军的主帅在钓鱼城战役中身亡，直接影响了蒙古统治者顺流东下，乘势以定江南的作战计划的实现，从而使南宋王朝免遭灭国之祸。正如明人邹智所说："向使无钓鱼城，则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宋之

宗社，岂待崖山而后亡哉？!”另一方面，蒙哥汗死，加速了蒙古诸王贵族内部的汗位之争，为忽必烈君临北中国的宝座，提供了历史的契机。而忽必烈即位后，急速地改变了蒙古人统治东亚汉地的态度和政策，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蒙哥汗之在钓鱼城战死，“不但是对于中国的儒教大同文化，东亚列朝一系的中国历史是一件奇迹，即是对于世界史说，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

第十章 元军对南宋的战略进攻

第一节 元军攻宋战略的转移

战争性质的变化

忽必烈时期，宋元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1251年他受命主持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以来，“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罗致了一大批汉族和汉化很深的其他民族知识份子和军将，开始用汉法治理汉地。忽必烈即位及其与阿里不哥的战争，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一大批汉族地主和军将参与忽必烈政权，使忽必烈政权成为蒙古贵族、汉族地主阶级和其他民族上层份子的联合专政。1271年，忽必烈根据刘秉忠等人建议，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把它看成是尧舜禹汤、秦汉隋唐的继承，申称要“绍百王而纪统”，把自己看成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不久，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把国家政治中心由漠北迁到中原。因而从忽必烈开始，蒙宋战争成了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更迭的战争。

刘整的建议

忽必烈时期，蒙古灭宋战略进攻的重点，改以襄樊作为突破口，实现了由川蜀向荆襄战区的转移。

1259年，忽必烈虽然采纳杜瑛，商挺的意见，认为应把战略进攻的重点从川蜀转移到荆襄战区，但他当时只是一个方面军的统帅；还无权作出实现这一转变的战略决策。促成这一转变的，是降将刘整的建议。

忽必烈即位之初，史天泽的部将郭侃曾上平宋之策，其主要内容是：“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1267年冬，刘整入朝，向忽必烈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捍蔽。”他的意见遭到一些人反对，于是又进一步说：“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刘整本是“尽知国（南宋）事虚实”的“南宋骁将”，他的意见自然更为忽必烈所重视。而且他的建议迎合了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宿愿，所以忽必烈？当即表示：“朕意决矣”。刘整认为“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下也”，提出“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这一转移战略主攻方向的建议。这项建议为史权所支持，史权认为攻取襄阳以后，“驻兵嘉定，耀武淮泗，事必有济”。

吕文焕降元

1272年春，元军破樊城外郭后，襄樊形势已十分危急。自1267年以来，襄樊防御战已持续了5年。吕文焕秉节守襄，“捍御应酬，备殚甚力，粮食虽可支吾，而衣装、薪蒭断绝不至”，城内军民皆“撤屋为薪，缉关（会）为衣”。吕文焕多次派人告急，贾似道虽表面上“上书请行边”，却“阴使台谏上章留己”，根本不把边事放在心上。他整天在西湖葛岭过着腐朽生活，其所狎诸客戏称子他把“与群妾踞地斗蟋蟀”视为“军国重事”。吕文焕困守孤城，得不到朝廷的援助，每次巡城，皆“南望恸哭”而后下。二张冒死入援，虽曾一度鼓舞了襄阳士气，但旋亦失败。及樊城陷落，襄阳如齿之失唇，陷于内无力自守，外无兵入援的困境。

同年（1273年）二月，元军一面派唐永坚入襄阳，招，降吕文焕，一面由阿里海牙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阳，一炮中其谯楼，声如震雷，城中汹汹，军心摇动，诸将纷纷逾城降元。初，刘整曾骑马临城下，与吕文焕对话，为宋兵伏弩射中，幸未丧命。至是，“欲立碎其城，执文焕以快其意”。阿里海牙不赞成强攻，自率张庭珍等人至襄阳南门，对吕文焕喊话：“君以孤军城守者数年，今飞鸟路绝，主上（忽必烈）深嘉汝忠。荐降，则尊官厚禄可必得，决不杀汝也。”吕文焕颇犹疑未决，阿里海牙又折矢为誓。适其帐前将田世英，曹彪执其总管武荣降元，吕文焕更感孤绝无助，但称“得张济南（张宏）一言，吾无盟矣”。涨宏前往招谕，吕文焕遂遣黑杨都统来元军营议降。张庭珍以黑杨都统乃吕文焕心腹，怀疑其真，怕是来探听军情的，建议阿术留之为质。第二天，吕文焕举城投降。

与张顺，张贵一起入援襄阳的荆湖都统范天顺，参加襄阳守御虽不足1年，但日夜守战，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及吕文焕出降，他仰天大呼：以好汉谁肯降!便死，也做忠义鬼。”说罢，便在所守阵地，自缢殉难。

持续了5年多的襄樊战役，至是宣告结束。

第四节 南宋战略防御的解体

襄樊战役时期的川蜀战场

襄樊战役开始前，四川原有60余州多已残破。但忽必烈平息内乱再次南下攻宋时，把战略进攻的重点移往荆襄战区，并全力以攻取襄樊为突破口，元军只以偏师在川蜀战区维持着稳定的均势。因而整个襄樊战役期，间，川蜀战区没有大规模战斗，双方继续处于相持态势。

这一总的形势，给朱禩孙经理四川提供了条件。1268年十月，甫朵以广西经略使知静江（今广西桂林市）府朱棂孙调任四川制置使。他到任前后，四川军民在原有据点基础上，又新筑了一些防御性质的山城塞堡，分布于沿江和东川一带，其防御重点是嘉定、泸川、重庆、合州、涪州、夔州等处。这种防守态势大体上维持到南宋灭亡以后。

襄樊战役前期，蒙古对四川的进攻没有碗定的战略目标，并带有明显的骚惊性质。1269年，成都路管军副万户刘恩随从赛典赤瞻思丁进攻嘉定，在九顶山与宋军相遇，俘其部将18人，送回京师。1270年夏，陕西佥省也速带儿、严忠范与东、西川统军司率兵对嘉定、重庆、钓鱼山、马湖江各地进行骚扰，打败宋军，攻拔三寨，俘都牛宣，惊获人民及马、牛、战船无算。同年，郑鼎改佥西蜀四川行尚书省事，领兵巡东川，在嘉定同宋军相遇，与战江中，俘其将李越，缴获全部战船。这一时期蒙宋将领之间敌对情绪并不强烈。1270年赛典赤分镇四川，宋将昝万寿拥有强兵，守御嘉定，双方对垒。赛典赤“一以诚意待，不为侵掠”。后来赛典赤召还，昝万寿还设酒宴为之饯行。

1270年底，蒙古军完成了对襄樊的战役包围。为了牵制南宋从川蜀、两淮调兵援助襄樊，第二年五月忽必烈颁布诏旨；“大军见围襄阳，各道宜进兵以牵制之”。于是，命赛典赤赡思。丁、郑鼎提兵水陆并进，以趋嘉定，汪良臣、彭天祥出重庆，郝札剌不花出泸州，曲立吉思出涪州，以牵制南宋兵力，使其不得出夔、峡应援襄樊。南宋这时困于襄樊之役；只以韩震带行御器械、知江安州（泸州）兼涪州东路安抚副使，马堃带行御器械、知咸淳府（今四川忠县），节制涪，万州，沿江防御略有加强。

元军至嘉定，俘宋将2人，适逢五月。至七月“江水凡三泛滥，自嘉而渝，漂荡城壁，楼橹圮坏”，加之“嘉定地震者再”，未占据嘉定，便乘势“顺流纵筏，断其俘桥，获战舰二十八艘”。攻重庆的元军，只有石抹狗狗随从佥省严忠范进围重庆，打下了朝阳寨。其余战果甚微，不过虚张声势而已。不久，忽必烈即改签也速带儿，郑鼎军前行尚书事，赛典赤行省事于兴元，专门负责转输军粮。宋四川制置使朱禩孙以“被灾害为甚”，请求罢职的要求，也未获准。双方对峙仍旧。

襄樊战役时期，元军在四川较重大的军事行动有4：征服建，都、安定西川、窥视合州、袭扰东川。

建都是当地民族对建昌（今四川西昌一带）的别称，包括今四川西昌积大凉山地区，居住着彝族部落。这里在蒙哥汗时期已降服蒙古军。彝族首领建蒂利用蒙古军的影响和同白蛮首领联姻，成了罗罗斯地区举足轻重的势力。1264年，建蒂杀叔自立，并杀死蒙古派往邛部川的六番安抚招讨使都王明亚。这一地区与蒙古军自云南进袭四川的必经之地马湖江毗邻，因而忽必烈要控制四川、云南间的通道，必须降服建都。1267年秋，即命招讨怯绵征建都。次年三月，怯绵率兵2000人前往招谕。建蒂不但拒绝蒙古招谕，而且将怯绵打败。这次败仗后来成为怯绵被处死的原因之一。当时蒙古主要力量都投入了襄樊战役，征建都的事几年没有进展。直到襄樊完全被元军围困，1272年初，忽必烈遂命皇子西乎王奥鲁赤、阿鲁帖木儿，秃哥及南平王秃鲁所部军，与四川行省也速带儿的部下，以及忙古带等18族、欲速公弄等土番军，同征建都，接着又给奥鲁赤部给养。也速带儿军是这次征建都的主力。部将速哥领千人充当先锋，取道黎州（今四川汉源县北清溪镇），所过水尾寨、连云

关等关寨皆为所破，至建都东山斩其酋布库，与合剌军在不鲁思河会合。部将探马赤以锐卒1500人，在梅了岭大败建都兵。与速哥部会合后，直持建都营寨，俘杀甚重，获其辎重以归。继增兵至3000人，与左丞曲立吉思乘胜进击，建都之势，日益蹙迫，从征的成都路总管军副万户刘恩率匆游兵与建都兵周旋，遭建都夜袭，死千余人。这时刘恩部长久转战，军粮不继，便设法招谕沿江诸蛮，夺得粮3万石、牛羊2万头，士气才振作起来。建都因山为城，据守着7个山头，刘恩占领了其中5个，又“断其汲道”，建都更为穷蹙。到襄樊战役结束后，即至1273年冬，也速带儿和奥’鲁赤合兵攻建都蛮，俘酋长下济等4人，获其民600，建都乃降。蒙古军征服建都后，解除了进攻南宋四川尚存州县的后顾卑忧，也方便了云南蒙古军向四川的侵袭。

襄樊战役开始前，蒙古在西川的统治本已巩固下来。但当蒙古夫部兵力都用于进攻襄樊，尤其是西蜀都元帅也速带儿的骑兵征建都未归时，蒙古对西川的统治暂时显得虚弱。1272年冬，宋知嘉定府、四川都统昝万寿率军奔袭成都，进至成都东郊，佥省严忠范遣步鲁合答将兵700人迎战于沙坎（今成都市东沙和堡），大败其军。成都惟建有子城，军民皆止于外城厂别无城壁，昝万寿乘虚攻外城，元军“失于不备，军官皆年少不经事之人”，严忠范出战失利，退保子城。同知王世英等8人弃城逃遁，外城数千居民皆为昝万昝俘虏。元西川副统军刘思敬（即哈八儿都）领兵邀击，在青神大败宋军，夺所俘2000人以归。元朝以边城失守，罪在主将，“遣使缚忠范至京师”。次年三月，严忠范以此罢职。谭澄受命代为四川佥省，经他一番努力，后来罗罗斯又内附，西川民心才安定下来。

合州钓鱼城是元宪宗蒙哥大举攻宋丧身之处，忽必烈虽然把进攻重点转向荆襄，但它仍然是蒙古军夺取东川的障碍，因而继续加强对它的包围。襄樊战役前夕和初期，蒙古军以合州钓鱼城为中心，采取了一些行动；（1）大规模袭扰。如前已述及的1265年二月钦察派元帅按东、部将赵匣剌与宋兵战于钓鱼城，获战舰146艘，俘军士57人、老幼340人。（2）招谕南宋军民。1267年招谕四川沿长江州郡和钓鱼、礼义、大良等处官吏军民，“有能率众来降者，优加赏擢”，进行分化瓦解的政治攻势。（3）筑城进窥钓鱼城。1267~1268年，蒙古在青居与钓鱼山之间，增筑武胜、定远二山城于武胜山、母得章山，把防定据点向南推进了90里，并加强守御。一时间，蒙古军在钓鱼城附近云门、虎头、渠口、鱼村、富峪、石子山等处，“连营对垒，攻围甚急”。宋合州守将张珏往往“出奇制胜，或击却之，或掩袭之，斩获累捷”。因而从1259年合州战役到襄樊战役结束的10余年间，蒙古兵只是“春去秋来，出没无常，”并无太大进展。钓鱼城南宋将士，多有攻取马琮、虎头两山，以解除元军威胁的主张。但张珏认为武胜（芜菁坪），定胜（母得章）两城，乃“汪帅劲兵之所聚”，正面强攻，不如智取。他一面“张疑兵嘉渠口”虚张声势，吸引马踪山筑城元军的注意力，一面“潜师渡平阳滩攻二城，火其资粮器械，越寨七十里，焚舡场”!，迫使元军放弃马骔城。宋元双方在钓鱼城势均力敌。

东川夔州扼川鄂要冲，“据荆楚之上游，为巴蜀之1喉吭”，乃是四川宋军东援荆襄必由之道。蒙哥时期，术速忽里即有舍合州不攻，水陆东下，破忠、涪、万、夔诸州，出三峡而入荆楚，与忽必烈围鄂诸军会合之议。虽然襄樊战役期间，南宋未从此道调川兵援襄，蒙古攻略荆襄也未动用两川窥宋诸军，但蒙古军持继不断地袭扰东川诸州，对其夺取襄樊的战略进攻，起了牵制配合作用。1268年，杨文安任蒙古阆州夔东路安抚使、军民元帅，派千户马才，张琪略达卅，俘宋将范伸等人。1269年，派兵略达州之朱师、郑市、泥坝，大宁（今四川巫溪），均有，俘获。1270-年，从严忠范攻重庆，战士龙坎，攻铧铁寨，俘宋将袁宜，何世贤等。同年秋，攻达州之圣耳城，遣元帅蔡邦光略开州。1271年春，遣蔡邦光攻达州，战于圣耳城下，又战开州之沙坪。秋，杨文安会合东川统军匣刺攻达州，三战皆捷，不久遣于户嵇永兴攻开州，战于平嫩、曲水等地，亦有所俘掠。东川统军司派兵攻宋铜钹寨，降守寨总管李庆等人。襄樊包围圈形成后，杨文安于1272年领兵出小宁，措置屯田，遣韩福攻达州九君山，遣蔡邦光与蓬州兵会合，邀击宋军于永睦，又遣嵇永兴等追袭来裨将刘威等，破达州圣耳外城，焚掠而还。同年九月，，杨文安筑金汤城积粮，且逼宋龙爪城；估计宋军将前来争夺，遣韩福出兵通州（即达州）加以牵制，战败宋兵于锉耳山，同时出兵达州牛门，以断宋兵归路。宋兵输粮达州，遭杨文安派兵邀击，统制孙聪，张顺被俘。1273年夏，杨文安遣元帅李吉略开州，与宋军战于泻油坡。这时宋兵复由罗顶山输粮开、达，杨文安派蔡邦光、李吉设伏兵拦截，俘宋将吴金等人，覆其粮船。闰六月，元蓬州兵攻拔龙爪城，东川统军司命杨文安兼领其地，宋都统赵章又来争夺，双方发生战斗，俘宋总管王元而还。秋，宋军都统阎国宝等又运粮于达州，杨文安邀击于泻油坡，夺其粮运，俘其二将。宋开州守将鲜汝忠断其归路，双方又发生战斗。直到元军在荆襄突破襄樊，伯颜浮江南伐，宋元双方在东川开、达一带，大体上处于胶着状态，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从整个川蜀战场看，元军虽又筑了一些山城据点，但宋军仍保持沿江各据点的防御，并在东川与元军维持着犬牙交错的对峙态势。

襄樊战役时期的两淮战场

在忽必烈进攻南宋的整体战略计划中，川蜀战区虽然对荆襄战场起着牵制配合作用，但相对较为独立，而且其攻守态势仍然是前一阶段的继续。由于忽必烈战略进攻计划是在突破襄樊后，浮汉入江，并顺江东下临安，必然要同时对南宋两淮和沿江各防御据点用兵，因而两淮战场从襄樊战役一开始，就与元军攻宋的主要战场，即荆襄战场、沿江战场，进取临安密切相关。山东统军司主要统领淮东前线诸军，兼反淮西。河南统军司主要统领进攻襄樊诸军，兼顾淮西。元军进攻襄樊的主要兵力，又来自河南、山东、河北。南宋守据荆襄的主要兵力，除吕文德、吕文焕；高达以外，担任援襄重任的范文虎，夏贵、李庭芝和两淮都统张世杰等人，都是淮军出身。凡此种种，使荆襄战区和两淮战区的关系尤为紧密。

襄樊战役发动前后，宋元大体相持于淮河沿岸。后来蒙古为了加强荆襄战场的进攻力量，把史天泽、史权、史格、张荣，以及平李璮之乱的大批蒙古、汉军，如千户怯怯里及其子相兀速，宣武将军、益都淄莱新军万户李恒，亲王哈必赤，山东路统军司怀都，淄莱水军万户帖木儿不花，万户木花里，钦察人完者都拔都，行军千户何玮，山东诸翼军总管赵贲亨，冠氏县（今山东冠县）军民弹压岳天祯，济南诸路新军千产张懋，驸马忽刺出，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张弘范，河南行省都事程思廉，河南等路统军贾文备，淄莱万户府副都镇压隋世昌等，调往襄樊前线。当时南宋担任两淮防务的，是持节扬州的两淮制置安抚大使李庭芝、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黄州夏贵。前者是颇有韬略胆识的名将，后者则以水军见长。

李嬗之乱平定后，淮河沿岸形势有所缓和，边境马匹走私活动一度猖獗。经唆都建议，籍其3000人为兵，唆都以其中1000人守备蔡州。1269年，千户昂吉儿上言："河南边郡与宋对境，宋兵时为边患，唐州东南皆大山，信阳在蔡州南，南直九里，武阳、平靖、五水等关，宋兵必经诸关以入，信阳实其咽喉，守御莫急焉。往年金亡，朝廷得寿、泗，襄，鄂，而不留兵守，卒使宋得之。请城信阳以扼宋。"遂受命率河西军1300人筑城据守。1270年，昭勇大将军、山东统军使塔出，镇守莒、密、胶、沂。郯、邳、宿、即墨等城，"设方略，谨斥候"，防止宋军乘虚北侵。驻扎沂州的山东路统军副使董文炳，以沂州与宋接境，奏言不宜在边境和籴饷军，以稳定边境；这时，夏贵、范文虎均已率军前往襄樊赴援，李庭芝也于1270年受命为京湖制置安抚使知江陵（后徙郢州），接替他们的是淮西安抚副使兼知庐州吕文福、上了年纪的两淮安抚制置使印应雷和淮东安抚副使知淮安州孙虎臣。所以蒙古虽降大批兵力调往襄樊前线，却仍保持着沿淮防务攻守上的优势。

在上述对峙局势下，宋元双方在两淮只有局部战斗，而且规模都不大。

五河口的争夺。五河口为淮河北面支流汇入淮河的隘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269年，山东统军帖赤攻五河，袭职为万户、镇守沂郯的孟义从战，宋军拒守南岸，孟义率兵渡河进击，几次均无结果。左丞董文炳旋率山东兵攻五河口，不下，转战至濠州（今安徽凤阳）北，遇宋伏兵，淄州镇守张均率众力战。这时，在襄樊前线的怀都军次淮南天长（今江苏天长）袭扰，从南面到达五河口，打败宋军，才得解围。1270年，怀都仍返回襄樊前线，改董文炳为山东路统军副使，治沂州。阿速人阿塔赤率领一支宿卫军在淮南袭扰，一度将五河口攻下。与此同时，宋军进攻胶州，胶州守将贺祉将其战退，却无力乘势一举将五河口这一战略要地占领。1271年夏，山东统军司塔出、董文炳侦知宋军欲据五河口，请筑城以守。但塔出、董文炳错失事机，宋军已在其地树栅。直到九月，元军才勉力筑成五河城堡，而庐舍尚未竣工。右卫亲军都指挥使忽都等人自请带领精兵，分道抄掠守境，以劫取材甓等建筑材料。五河口一带仍处于双方争夺之中。直到吕文焕以襄阳降元，宋军士气大挫，贺祉才带领舟师500艘为先锋，再次进攻五河口城。还军时，贺祉殿

后。时宋兵以巨索横截淮水，贺祉用大刀砍断绳索，并打退宋军援兵，迫使清河城投降。

攻掠金刚台。金刚台位于今河南商城县东南，是宋军袭扰淮北的前沿阵地。蒙古军为了牵制淮军西援荆襄和深入淮北山东、河南诸路，在襄樊战役开始不久，就派人夺取金刚台。1268年，阿术命千户唆都外出骚扰宋境，曾“夺宋金刚台寨”等地。同年，阿塔赤和塔不台在淮西袭扰，也曾与宋军战于金刚台，并一度将其攻破。1269年，“宋输粮金刚台，意将深入”，略地淮南的千户昂吉儿“将兵驰往，断其输道”，却未攻占。昂吉儿有见于此，建议筑城信阳以扼宋兵，实际上放弃了夺占金刚台的打算。

争夺涟海。涟海是淮河以北南宋控制的唯一地区，是争夺徐、邳、五河口，乃至整个淮东的战略要地，在宋，元战争中数次易手。1262年李璮叛蒙，以涟、海三城献于宋，自是复为宋有。襄樊战役期间，双方在两淮大体处于相持均势，这里又远离主要战场，没有发生大的战斗。1269年蒙古王昔剌升任海州万户，度带兵攻取盐林山寨，但忽必烈一意突破荆襄，未予注意。

1270年，宋兵乘蒙古山东兵力空虚，由此出发攻胶州，胶州守将贺祉固城坚守，打败宋军。1272年，襄樊战役大局已定，元沂、郯州守将怯怯里、万户纳解，出兵略涟、海，属抄掠性质。同年元朝改山东统军司为行枢密院，塔出佥枢密院事，一面签徐、邳、二州丁壮1万人戍守邳州，一面振步骑趋涟州，攻破沿淮河的射龙沟、五港口、盐场、白头河等四处城堡，杀宋兵300余人，掳获人、牛以万计。1273年，董文炳部将张均攻涟州，夺取了孙村堡，但仍未控制涟海地区。这时元军已占领襄樊，正在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没有急于争夺涟、海。直到元军沿江东下，涟、海诸城才为元军占领。

筑城正阳。1270年底，元军完成对襄阳的战役包围后，由于其力量对比处于绝对优势，便从1272年开始，在逼降襄樊的同时，准备实施下一步行动计划，即开辟江淮新战场。这一年，元朝将河南，山东统军司改为行枢密院，任命董文炳为枢密院判官行院事于淮西，“筑正阳两城，两城夹淮相望，以缀襄阳，及持宋腹心”。又调河南等路统军贾文备到蔡州，“兼水陆漕运”。1273年襄阳降元后，忽必烈派阿术“略淮东，抵扬州城下”，宋军以千骑出战，阿术设伏兵于道旁，而佯为败北，诱宋军深入，然后伏兵出击，俘其骑将王都统。第二年，派刘整行淮西枢密院事，驻军正阳，“南逼江；断其东西冲”，据有淮西战略要地。

襄樊战役的影响

襄樊战役中元军的胜利，破坏了南宋战略防御体系，使之陷入混乱。如前所说，南宋的消扭防御是由它苟安江南啪基本国策所决定的。不过，李庭芝，夏贵分守淮东、西，吕文焕、吕文德固守襄、汉，川蜀尚有沿江各据点和以钓鱼城为中坚的东川州郡，如能及时洞察蒙古军将

战略进攻重点转向荆襄，并选择襄樊为突破口，建立以守备襄樊为重点的一体化战略防御，蒙古军是难以骤破的。然而南宋君臣既无远谋，三边制帅又各自为守。昏君权臣坐视襄樊之围日严，光调夏贵以应四川之急，复派夏贵、范文虎、李庭芝以救荆襄之危。范文虎贪功冒进，闻难怯战，又与吕文焕同为李庭芝援军掣肘。襄樊失陷、元军新辟战场于江淮后，南宋先以夏贵为检校少保兼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庭芝被罢官居住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后两淮制置使印应雷告老致仕，又将李庭芝和夏贵派到淮东、西，分置两司，并以陈奕为沿江制置使兼知黄州，捉襟见肘，困于应对，其长江中游防线完全暴露在元军面前。宋金对峙以来，南宋藉以为国的三边乞备，至是被元军切割，不得互为照应。南宋本来就不牢固的防御，至此溃乱不堪。

元军攻占襄樊，不仅破坏了南宋的战略防御，而且使之丧失了苟安江南的屏障。对南宋王朝说来，“京襄沦没，祖宗之基业莫能保。”宋元战争开始以来，蒙古军虽在川蜀取得一些进展，却始终未找能到对南宋政权有直接威胁的突破口。襄樊既为元军所下，蒙宋30余年对峙僵局即被打破，从而带来宋元战局根本性变化。元之对宋已在战略上处于优势，南宋败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襄樊战役前，南宋在战术上以水军和坚守城池见长，这是习惯于骑兵野战的蒙古军所不及的。蒙古军在长达五六年之久的裹樊之战中，“造战舰，习水军”，“周于围而缓于攻，以待其自毙”，针锋相对地实施“夺彼所长”的方针，终于打破了宋军的战术优势，取得了水上作战和进行攻坚战的经验。从而元军完全实现了对南宋的战略转变，得以乘胜长驱，浮汉入江，沿长江而下，直趋临安。

所以，襄樊战役是元军战略上对南宋全面进攻，南宋全线溃败以至灭亡的转折点。

第十一章 元军发动总攻，南宋全面崩溃

第一节 元军发动全面进攻

南宋调整防务

吕文焕在襄阳“为虏诱胁，竟以城降”的消息，一个月以后即三月二十五白才由贾似道根据荆湖制司李庭芝的报告奏上。不过贾似道利用“自围襄阳以来，每上书请行边，而阴使台谏上章留已”造成的假象，申称“臣始屡请行边，光帝皆不之许，向许早听臣出，当不至此”，把自己对襄樊失守的罪责，推卸得一千二净。襄樊失守直接关系者之一的范文虎，援襄不力，“闻难怯战”，临阵脱逃，本当予以重惩，但因贾似道的包庇，仅降一官，“依旧知安庆府”。当时吕文焕的侄子吕师夔知静江府，从弟吕文福知庐州，得知吕文焕投降的捎息，起初亦颇不自安，上书请罢，也因为贾似道的庇护，仍其官职。以致吕文福明目张胆地辩称，“文焕为人扶拥，以囊阳降非己心”。只是李庭芝的报告根据“来归人”吴旺等人提供的消息，已把吕文焕父子“先纳筅钥，旋献襄城，且陈策攻郢州，请自为先锋”的情状，陈述在案，度宗赵棋才下诏“文福勉力捍御，毋坠家声”，阻止了甚嚣尘上的“投降有理”论的蔓延。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南宋君臣显然不可能认真地从襄樊失败中吸取任何有益的教训。

襄樊失守对南宋朝野都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因而不断有人上书对边防发表意见。1272年三月，太学生郭昌子即上守备6策：“一曰分游击以屯南岸，二曰重归、峡以扼要冲，三日备鄂，汉以固上流，四日调精兵以护汉、江，五日备下流以绝窥伺，六曰饬隘口以备要害。”五月，孝感县丞关应庚上书言边防20事，布衣林椿年等上书言边防10数事。六月，前四川宣抚司参议官张梦发向贾似道上书“陈危急三策：曰镇汉江口岸，曰城荆门军当阳界之玉泉山，曰峡州宜都而下联置堡寨，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图上城筑形势”。“左藏东库蹇材望上书言边事大可忧者七，急当为者五”。闰六月，“前临安府司法梁炎午陈攻守之要五事”。这些上书无论是否切实可行，是否切中时弊，起码反映了人们对危难时局的关切，应当引起南宋君臣的重视，从中吸取有用的意见，彻底改善与加强全面防御。但它们大多为贾似道截留不报，或推到下面制阃“审变”，毫无结果，南宋防务仍然陷于被动应付局面。

这时，南宋亦采取了一些调整措施，使战略防御的重点退移至长江一线，其表现是：

首先，加强京湖、两淮和川蜀地区某些据点的防御。1273年春，四川制阃上言，“近出师成都，刘整故吏罗鉴自北复还，上整书稿一帙，有取江南二策：其一日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曰清口，桃源，河淮要冲，宜先城其地，屯山东军以图进取。度宗看了这份奏折，急忙命令淮东制司前往清月，筑城以为备御。同年（1273年）三月，宋廷还

派金吾卫上将军阮思聪行视平江、镇江，黄州城池。六月，应京湖制司之请，选拨内军器库之犀利器械，并给钱百万以备修缮。闰六月，命殿前指挥使陈奕总统舟师，加强鄂州、黄州江防。又命大理寺丞钟蜚英点视沿江堡隘兵舡。1274年初，城鄂州汉口堡和沌口西岸堡。五月，应张珏之请，筑马骏山或虎头山城，“以据险要”。先是刘整降后，献计自青居山进筑马骏、虎项（头）两山，扼三江口以图合州，派统军合剌帅兵筑城。张珏设疑兵于嘉渠口，潜师渡平阳滩，焚其资粮器械船场。城筑终不就，马骏为张珏所复，因有是请。六月，以银2万两命寿春府（今安徽寿县）措置边防。七月，诏抚3边将士。

其次，对有关制置使作了调整。1273年夏，以汪立信权兵部尚书、京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夔路策应使、湖广总领，并给钱200万开阃犒师。以赵渭为淮西总领兼沿江制置、建康留守，并给钱60万加强江防捍御。以高达为宁江军节度使、湖北安抚使、知峡州。十月，重新任命李庭芝为两淮安抚制置使，并赐钱200万以犒赏激励军士，加强备御。备御。十一月，命夏贵为淮西安抚制置使，并赐钱百万犒赏军士，以激励其，备御。1274年初，以留梦炎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四月，以吕文福为常德等五郡镇抚使、知沅州（今湖南芷江）。五月，以高世杰为湖北安抚副使兼知岳州，总统出戍军马。七月，汪立信罢职，又以朱禩孙为京湖、四川宣抚使兼知江陵府。

这时、宋元边境呈犬牙交错之势，其对峙之战线如下：

胶东：宋水军活跃于胶州湾，与元之胶州对峙。

淮东：制司设扬州，前线为海州、涟州，淮安、盱眙一线。

淮西：制司设庐州，前线为五河口、濠州、寿春、霍邱、固始一线。

京湖：制司设江陵，前线为信阳、汉阳、复州、郢州、均州、金州等地。

川蜀：制司设重庆，前线为涪州、合州、泸州、叙州、嘉定等地。

南宋之防御重点，则退至沿江一线之扬州，镇江、建康、太平、庐州、安庆、江州、黄州、鄂州，岳州、江陵、峡州、夔州、涪州、重庆、合州、泸州、嘉定。

蒙古南伐之议

就在南宋调整防御之时，元军也对全面进攻南宋进行了讨论。

蒙古占领襄樊后，渡江灭宋宋战略目标已明显地展现在忽必烈面前。当时将相大臣，纷纷请求以拘留信使名义，征伐南宋。这是符合忽必烈“扫清六合，混一车书之意”的。因而忽必烈于1273年春，驿召姚

枢、许衡，徒单公履等人问计。徒单公履认为，“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此其时矣”。忽必烈颇以其言为是。但许衡却“以为不可”。次年（1274年）正月，阿里海牙又上言于忽必烈，指出元军战略地位之优势c“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阿术进一步说明了南宋的劣势，“臣久在行间，备见宋人兵弱于昔，削平之期，正在今日。”忽必烈交付将湘大臣讨论，久不能决。阿术于是又奏称：“今圣主临御，释乱朝不取，臣恐后日又难于今日”。他把襄樊战役的胜利，看成是平宋混一的良机，认为“今不取之，时不能再”。

于是忽必烈就择帅与征兵两个问题，征求诸将相大臣的意见见。史天泽认为：“朝廷若遣重臣如丞相安童、同知枢密院事伯颜者一人，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立待也”。姚枢也奏称：“如求大将，非右丞相安童、如枢密院伯颜不可”。阿术和阿里海牙提出：“我师南征，必分为三，旧军不足，非益兵十万不可”。此外，刘整入朝时奏道：“襄阳破则临安摇矣。若将所练水军，乘胜长驱，长江必非宋所有”。忽必烈采纳他们的意见，决定大举伐宋，派伯颜总领其事，史天泽副之，展开对南宋的全面进攻。

南伐准备

元军伐宋的各项准备工作，早在讨论胜南伐时就开始了。

首先是将黄河以南的行政机构，按作戠需要进行调整。1273年春，罢河南等处行中书省，以平章军国事史天泽、平章政事阿术、参知政事阿里海牙行荆湖等路枢密院事，镇襄阳，左丞相合丹、参知行中书省事刘整、山东都元帅塔出、董文炳行淮西等路枢密院事，守正阳。罢四川行省，以巩昌便宜总帅汪良臣行西川枢密院，东川阆、蓬、广安、顺庆、夔府、利州等路统军使合剌行东川枢密院，东川副统军王仲仁同佥行枢密院事。六月，并罢东西行统军司。据元朝规定，“方面有警，则置行枢密院事。”这就把地方行政机构，纳入战时体制，实行军政合一，以一号令。1274年初议定伯颜都督诸军后，三月，又改荆湖淮西2行枢密院为2行中书省，伯颜，史天泽并为左丞相，阿术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于荆湖，合答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塔出，董文炳为参知政事，行中书省于淮西。伯颜赴职后，史天泽又堤出：“今大师方兴，荆湖、淮西各置行省，势位既不相下，号令必不能一，后当败事”。忽必烈以其言为是，复改淮西行中书，省为行枢密院。

其次是作相应的人力物力准备。1273年春，为了适应对南宋的战争将在遍布河流湖泊的荆湖、江淮和江南地区进行的需要，刘整建议教练水军五、六万，并于兴元，金州、洋州、汴梁等处造战船2000艘，从之。六月，命襄阳造战船若干艘。闰六月，命诸道造甲1万，弓5000，给淮西行院。九月，设立河南宣慰司，供给荆湖、淮西军需。又立正阳诸驿站，命河南宣慰司运米30万石，给淮西合答军，供应淮西、荆湖军需仍旧。十月，以西川编民和东川义士军屯田，供应潼川、青居戍兵粮

饷。1274年初，设置西蜀四川屯田经略司，董理屯田以供两川军饷。又命荆湖行院以军3万，水弩炮手5000隶属淮西行院。复以阿术、阿里海牙建言，下诏中书省签军10万人。二月，造战船800艘于汴梁。三月，因河南宣慰司建言，以军兴转输烦重，征赋于军户、匠户，以胁财用。六月，应刘整之请，增加甲仗及水弩手若干。又敕合答从所属蒙古军中选调5000人，与汉军一起分戍于沿江堡隘，以保证使传往来。

第三是优抚将士，稳定军心。1273年春，派察不花等人抚治西蜀军民。四月，以钞5000锭赐荆襄前线将士及赈济新附军民。五月，赏襄阳有功万户奥鲁赤军人银钞衣服。九月，派人前往荆湖行省，奖励有功将士。十月，以也速答儿，奥鲁赤部征建都蛮有功，赏赐其有功将士。十二月，赐襄樊战役中受伤军士钞1000锭。1274年春，赐阿术所部将士银钞。四月少，赐襄樊战役中战死士兵249人之家，每家银百两。五月，汪帷正部逃亡者众，从民户和站户中征选人员，加以补充。命将所签新军原负担的丝料和包银之摊派于民者，一并免除。八月，谕枢密院派人分括凛粟，给远戍两川的太原新签军家属，以示悯恤。

第四是善遇降将。收编降军，瓦解敌人。除刘整外，吕文焕是宋元战争中另一名著名降将。襄樊战役后，元朝十分重用吕文焕。1273年春，吕文焕应召入朝，与之同往大都的除阿里海牙外，还择蒙古、汉军有才力者护视之，一起奉召陛见的共有蒙古、汉人万户20人。吕文焕被授为昭勇大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襄汉大都督，并赐其将校有差，令还镇襄樊。对其生、熟券军，也分别不同情况进行收编，防止其继续抵抗。吕文焕入朝耐，令熟券军仍居襄阳，给其田牛，生券军则分隶于各万户翼。后来将一部分生券军调回大都，释其械系，免其死罪，听自立部伍，往征日本。另一部分生、熟券军，则由金州招讨使钦、察率领，镇戍于襄阳郊区鸭池。次年七月，敕枢密院将无妻子的生券军发往京师，年老多病的则遣还其家。八月，给襄阳生、熟券军发放冬衣。发动全面进攻后，经行中书省建议，派吕文焕率其麾下对江汉未下州郡临城招降，使其“知我宽仁，善遇降将”。通过这些措施，起到瓦解分化敌军的作用。

元军全面进攻的开始

从1273年春至翌年六月，机构调整和人力物力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忽必烈命古不来、拔都、翟文彬牢兵1万人，“掠荆南雅山，以缀宋之西兵”，阻绝了江陵东援。便仍似拘留郝经为口实，问罪于南宋。忽必烈诏谕行中书省及蒙古、汉军万户、千户、军士曰：“爰自太祖皇帝以来，与宋使介交通。宪宗之世，朕以藩职奉命南伐，彼贾似道复遣宋京诣我，请罢兵息民。朕即位之后，追忆是言，命郝经等奉书往聘，盖为生灵计也。而乃执之，以致师出连年，死伤相藉，系累相属，皆彼宋自祸其民也。襄阳既降之后，冀宋悔祸，或起令图，而乃执迷，罔有悛心，所以问罪之师；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陆并进，布告遐迩，使咸知之。无辜之民，初无预焉，将士毋得妄加杀掠。有去逆效顺，别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其或固拒不从及逆改者，俘戮何疑”。这项诏书是

全面伐宋的动员令。

是年七月，南宋度宗死，四岁的嘉国公赵即位，是为恭帝，谢太后临朝听政，封皇兄赵星为吉王，皇弟赵昺为信王，贾似道得到“独理起居”的特殊待遇。南宋朝廷的腐败，更自不待言了。不过在两淮、荆湖、川蜀，南宋还有相当兵力，可以抵抗元军的进攻。正如汪立信所分析：“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君臣晏安不以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从古以然，此诚上下交修以迓续天命之几，重惜分阴以趋事赴工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岁愒日，缓急倒施，卿士师师非度，百姓郁怨非上，以求当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挥而折冲万里者，不亦难乎!为今日之计者，其策有三：夫内郡何事乎多兵，宜尽出之江干，以实外御。算兵帐见兵可七十余万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为选民五十余万人。而沿江之守，则不过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有总督，其尤要害处，辄参倍其兵。无事则泛舟长淮，往来游徼，有事则东西齐奋，战守并用。刁斗相闻，馈饷不绝，互相应援，以为联络与固。选宗室亲王、忠良有干用大臣，立为统制，分东西二府，以莅任得其人，率然与势，此上策也。久拘聘使，无益于我，徒使敌得以为辞，请礼而归之，许输岁币以缓师期，不二三年，边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战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行，则天败我也，若衔璧舆榇之礼，删请备以俟”。贾似道闻其奏，大怒，罢去汪立信京湖制置使诹务，以朱禩孙为京湖、四川宣抚使兼知江陵府。幼幼君权臣，朝政腐败，使南宋朝廷无法组织尚存兵力进行有效的抵抗。

当时“宋之兵力多聚两淮”，重新起用的淮东帅李庭芝“筑清河城”，作了一些抵抗的准备。但按刘整建议，元军在攻占襄樊以后，将浮汉入扛，顺江东下以趋临安，这是元军全面战略进攻的主要战场。朝议也都以？为“淮上诸郡，宋之北藩，城坚兵精，攻之不可猝下，徒老我师。宜先渡江翦其根本，留兵淮甸绝其救援，则长江可乘虚而渡也”。

为了保证南伐大军在战略进攻主要战场的胜利，元朝分军为二：“其右受伯颜、阿术节度，左悉委卿（博罗欢）”。不久，博罗欢以中书左丞兼淮东都元帅，军于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古邳镇）。一个月内，攻下海州、石秋、东海、清河四城。淮西行省参政塔出率兵攻安丰，庐、寿等州。徐邳屯田总管下丁庄千户刘通领兵巡逻泗州，至淮河九里湾打败宋军，夺船30余艘。忽必烈估计元军渡江，宋军“必移师拒守”，遂命右卫指挥使秃满歹率轻锐二万攻淮安，以牵制之。高丽人洪君祥以蒙古、汉军都镇抚从行。两淮的军事行动，有力地配合了伯颜主力军的进攻。这时元四川总帅汪惟正上言：“蜀未下者数城耳，宜并力攻余杭。本根既拔，此将焉往!原以本兵由嘉陵下夔、峡，与伯蹰会钱塘。”忽必烈以“四川事重”，没有同意他的意见，令其在四川采取攻势，以牵制宋军，配合伯颜等主力军的进攻。

—七月二十一日，伯颜等人出师。临行前，忽必烈以远征大理和渡江围鄂时刘秉忠，姚枢、张文谦等人“不可嗜杀”的意见，告诫道，“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九月初一日，伯颜

大会兵于襄樊。元军在荆湖，两淮两大战区，分3道展开全面进攻，伯颜自率主力由襄阳沿汉水攻取郢州，初以吕文焕、刘整为向导，博罗欢由东道取扬州，不久改刘整行淮西枢密院事，驻军于正阳，时董文炳以枢密院判官行院事，筑正阳两城，夹淮相望。宋淮西制置使夏贵，率舟师10万来攻，与董文炳部激战。淮东阃帅李庭芝也为博罗欢军牵制，亦无力应援郢州。

九月十三日，伯颜军自襄阳出发，传檄谕宋州郡官吏将校士民，复分3道而进，伯颜将一军趋郢州，唆都将一军入淮，翟招将一军趋荆南。伯颜与阿术率军水陆并进，旌旗延袤，前后数十里，“，由中道循汉江趋郢州”。伯颜出兵，标志元军全气攻宋的开始。

第二节 郢州、沙洋之役

军次盐山

伯颜、阿术所率蒙古、汉军，其行阵以铧车弩为先导，众军继后，分水陆两路，向郢州进发，伯颜以万户武显为前锋，行至溧水，适大雨淋漓，河水涨溢，无船可渡，遂驻兵于溧冰之滨。伯颜大军继至，武显等趋迎于马前道：“溧水泛滥，兵马惧其漂没，以故待之”。伯颜大怒，斥责道：“吾且飞渡大扛，而惮此潢漆耶!”遂伫马于军中，强令一壮士肩负甲仗，骑马涉水为前导，指挥军马长驱而渡，竟无人被洪水漂没，诸将见之皆服其威武，渡过溧水后，伯颜申严：“有敢杀马者，以罪罪之。”时有一军士杀马，当即诛死。通过这两件事，伯颜很快建立了自己在军中的威信。

进军中，伯颜命监战万户忙兀台与万户史格率麾下会军于盐山岭。九月二十日，军次盐山，距郢州20里。

舍郢而去

在盐山，元军从俘民口中才知，郢州旧城在汉水东岸，张世杰率军驻屯于此“宋人复于汉水西筑新郢”。其“沿江九郡精锐，尽聚郢江东、西两城”。郢城浓山而筑，以石为城，矢石皆不能近，无法强攻。新郢宋军于江水中密树桩木，以断绝舟楫往来。又“布战舰数千艘于江中，陈兵两岸”。郢州宋军以“恃江为固”和“兵粮食足”的有利条件，使元军无法；接近江岸。监战谒只里领数骑侦候，与宋兵相遇，都卒皆堕马被俘，谒只里单骑横戈冲入宋军，救出俘卒，杀获宋军4人，赶忙退还。上万户阿刺罕率军攻郢，夺南门堡，亦无以继进。

伯颜才知郢州下流黄家湾堡以西，有沟渠深阔数丈，甫通藤湖，距汉江仅数里。趁淋雨水涨，战舰可避开郢州守军，由此而入汉江。但宋军在黄家湾亦筑有堡垒，设兵守备。伯颜派李庭、刘国杰等人领兵攻之，总管刘二、李劳山首获成功，攻占了黄家湾堡。伯颜一面派兵围郢，但却“耀兵不攻”，一面派兵修治平江堰，破竹为蓆地，拖船入湖，

纡行几百余里，进入汉江。

元军准备舍郢而进，诸将言于主帅伯颜，“郢城乃我之喉襟，今不取而过，后为归路患，必当取之。”伯颜不以为然。诸将又几次提出舍郢不攻之不妥，均被伯颜拒绝。。他申言道：“汝曹为困襄阳之计，俱为龙断者耶!用兵缓急，我具知之。况攻城乃共家之下计，大兵之用，岂惟此一城哉。若攻此城，大事失矣。”于是元军遂舍郢顺流而下，伯颜、阿术及诸将不满百骑，殿后而进，与大军相距数里。

十月十五日，进至大泽中。宋郢州都统赵文义、范兴率2000精骑追来，伯颜、阿术急忙回军迎击追兵，知印百家奴深入敌阵，身受数创。伯颜手杀赵文义，俘杀范兴，生获数10人，其士卒死者500人，追兵被击溃。

沙洋之战

十月二十一日，大军进次沙洋。二十二日，伯颜命断事宫杨仁风（即黑杨总管）去招降，宋沙洋守将不肯与之，对话。又遣一俘虏持黄榜和檄文，并带上赵文义人头，入城捂降。守将王虎臣（串楼王）、王大用（构索王）斩俘焚黄榜，坚壁不降。这时，其裨将傅益带水军17人乘船降元，接着，又有军船7艘投降元军。王虎臣等将欲降而未及者，全部处死。相持至9暮，元军架设巨炮12座，准备攻城。

次日，伯颜命吕文焕至城下招谕，城中弓弩乱发。。元军见招降不成。便水陆并进，发起强攻。百家奴立云梯于东角楼，登城力攻，夺其旗帜，弓矢、衣甲。监战万户忙兀台也竖云梯登城，焚其楼橹，拔羊角坝。易州等处管军总把巩信，率领勇士50人，纵火焚寨，宋军大乱。这时刮起北风，伯颜命炮手张元帅等人，顺风掣金汁炮（一种火炮）助攻，焚其庐舍，烟焰燎天，“城中民舍几尽”，沙洋堡被攻破。宋将王虎臣、王大用等人被忙兀台俘获，其余抵抗的人，全部被屠杀。

沙洋堡以南5里为新城，由京湖制置帐前都统边居谊驻守。边居谊，随州人，初在李庭芝麾下，以战功升为都统制。他善于用兵，又善于守城，颇得人心。十月二十四日，吕文焕至城下，以为新城乃一小堡，可不攻而破。边居谊率舟师拒战，拒绝吕文焕招降。二十五日，伯颜令万户帖木儿、史弼2人，列沙洋所斩首相威胁，并缚王虎臣，王大用至城下喊话：“边都统急降，术然祸即至矣!”边居谊仍拒绝出降，元军又射黄榜和檄文入城中，边居谊要求：“吾欲与吕参政语耳。”吕文焕以为边居谊降己，骑马至城下。伏弩乱发，飞矢如雨，吕文焕身中三箭，右臂受伤，所乘马亦中箭仆倒。吕文焕坠马，几为宋军钩获，幸为元军挟救，怆惶奔还。二十六日，伯颜见说降不果，调兵攻城，宋总制黄顺挟1人开东门出降。二十七日，伯颜派黄顺前来招降，边居谊回答道：“若欲得新埔耶？吾誓以死守此，何可得也。”黄顺遂呼降其部曲，有人欲缒城出降，被边居谊邀截入城，当门轿杀。接着宋军统副任宁来降，伯颜督兵乘势进攻，占据周围堡塞，并下令说：“如降者悉免，应拒

敌者皆斩之。”边居谊仍不为其威胁所动，但以火炮，石炮、弓弩、箭凿进行顽强抵抗。克军水陆并举，伯颜令总管李庭攻破新城外堡，竖立云梯，蚁，附而上。边居演将自家财物全部散发给将士，往来督战；坚持到傍晓，元军破侵汉楼，楼火延绵，毁及民居。边居谊估计力本能支，遂走还宅第，拔剑自杀。不死，乃赴火自焚。元军在沙洋堡，所俘王虎臣、王大用等4人，也均遭杀害。边居谊所部3000人，除黄顺、任宁外，皆尽力死战，直至悉为元军所屠。新城陷落。十一日，伯颜遣万户帖木儿入秦沙洋、新城之捷。黄顺亦随同入见，授湖北道宣慰使。

复州之降

元军占据沙洋后，即进入汉水下游。同年十一月，元军进逼复州（今湖北沔阳）。宋复州副将翟国荣在烂泥湖与元军相遇，战败而死。汉军千户囊加歹在风波湖战斗中，打败宋军。伯颜派人前往复州招谕：“汝曹若知几而降，有官者仍居其官，—吏民安堵如故，衣冠仍旧，市肆不易，秋毫无犯，关命铜钱，依例行用。”及大兵至，安抚使翟贵出降。

翟贵既降，诸将言于伯颜：“自古降礼，当要降表须知，计点钱粮军数，差官镇守。”伯颜不听。为了奖励投降者，伯颜省谕所部诸将：“勿令一军入城，违者斩之。”手是无人敢犯。翟贵亦美文其降元行为，“贵今守复州，如是不降，一郡生灵，必遭殄灭。”只是颇耽心其“家属在鄂州，必不能免”。伯颜宽慰道：“汝今迎师而降，鄂州亲属可令无虞。”又召翟贵曰：“复州去江陵不远；：汝遣粳去招谕。付汝蒙古文字，今使江陵之人赍之。如遇后军见之，不敢为害。”诸将仍坚持要翟贵交出降表须知、钱粮军数。伯颜分析道：“不然。倘复州不肯归附，亦不宜攻击。自今时日相逼，前去大江不远，我军悉战力争，不在于斯，在于渡江耳”。元军的下一个战略目标，是飞渡大江。

复州“襟带襄、随，腹背郢，鄂”，为控制汉水之要地。元军既降复州，就得以径下鄂、汉了。

第三节 阳逻堡渡江之役

军次蔡店

元军逼降复州的同时，阿术已率先头部队，疾趋蔡店（即蔡甸，今湖北汉阳）。其间阿术两次派阿里海牙往复州与伯颜讨论渡江日期，伯颜均未作答。阿术乃亲自去见伯颜。伯颜说：—“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余人知吾实乎!”遂秘密商定了渡江日期。十一月二十三日，大军至蔡店。

伯颜到达蔡店的第二天，即召开诸将会议，共议渡江之事，决定遣总管刘深、千户马福观察沙湖水情，自己亦往汉口观察形势。当时，宋淮西制置使夏贵率领汉鄂舟师，都统高文明、刘仪以战舰万艘，分据诸

隘，都统王达守阳逻堡，荆湖宣抚使朱祀孙以游击军扼守大江中流，控制长江30余里。汉口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加之宋军守备严密，元军难以泛渡。

这时，元军在鄂，汉周围柳子、鲁湫，新滩、沌口等地，对宋军进香了试探性进攻，但埸效果。

渡江之战

十二月十一日清晨，伯颜遣人前往阳逻堡，招谕宋军将士来降。夏贵不予答理，并以战舰数千余艘，列于大江之下，横截江面，其势甚壮，若不可近。十二日，伯颜又派人前往敷陈祸福，威胁夏贵。宋军将士坚决答道："我辈累受大宋重恩，政当戮力，死图报效，此其时也。安有叛逆归降之理!备吾甲兵，决之今日。我宋之天下，赌博孤注，输赢在此一掷耳!"；于是伯颜指挥诸将，进兵攻阳逻堡城。竟日不克。

十三日，伯颜一面派阿里海牙督万户张弘范，忽失海牙，折的迷失等以步骑继续攻袭阳逻堡，以麻痹宋军，一面与阿术密谋："今宋将之心，谓我心拔此阳逻堡，（方）可以渡江。况此堡坚，攻之徒劳。若今夜令汝以铁骑三于，泛舟搠流而上，趋视其阵，料彼上流虽有备而不坚，当为持虚之计。以来日诘旦，且渡袭江南岸，速遣人报我。"阿术也说："攻城，下策也。若分军船之半，循岸西上，对青山矶止泊，伺隙持虚，可以得志。"于是阿术将25万户为前锋，趁云低月黑，率万户晏彻儿、忙古歹、史格、贾文备4翼军，溯流40里（当为10余里），泊于青山矶对岸。

当晚下起大雪，夜半遥见南岸，多露沙洲。阿术即登舟指示诸将，令直趋沙洲，载马后随。万户史格一军先渡，然因"后继未集"，为宋军都统程鹏飞所败，身受3创，丧师200。阿术"横身荡决，蹀血中流"，俘宋都统高邦显、房某等。程鹏飞也？处负伤，"肩舆走鄂"。伯颜又派张荣实等人率舟师来援，打败宋舰。元军得宋战船千余艘，遂得南岸。阿术与镇抚何玮等数十人，攀岸步斗，开而复合者数4，宋军渐次败退。万户史弼率健卒直前，宋兵前来迎战，为史弼军奋呼击走。诸将驱马登岸，宋兵联舟进行抵抗，管军千户隋世昌舍舟师，率领蒙古哈必赤军进行步战，打败宋军。管军总把巩信也"领军由陆进"。宋军不敌，退至鄂州。元军渡江成功，追击至鄂州东门。

第四节 荆湖南北之役

阿里海牙留戍鄂州

元军攻占鄂州后，伯颜召集诸将议曰："鄂襟山带江，江南之区也，且兵糖皆备。今蜀、江陵、岳、鄂皆未下，不以一大将镇抚之，上流一动，则鄂非我有也。"遂以兵4万，遣阿里牙戍鄂，并率万户张兴祖军"分徇湖广地"。1275年初，元廷以宣抚使贾居贞签行中书省事，与阿

里海牙同戍鄂州。二月二十日，又以阔阔出率其部下军千人及亲附军500，听阿剌海牙（即阿里海牙）节制。阿里海牙在鄂州宣上德惠，禁将士毋侵掠”，以减少军民反抗。又传檄寿昌、信阳、德安诸郡，皆下。信阳娄安邦投降后，入觐大都，元裨将陈思聪屠其家，贾居贞询得其情，将陈思聪诛死。

伯颜浮汉入江时，为了达到元军总的战略目标，曾舍郢而去。大军东下后，阿里海牙戍鄂，郢州遂成鄂州隐患。当时主要战场，已由长江中游转移到下游，但长江以北的南宋许多边郡，尚“阻兵自守”，郢州即其中之一。枢密院臣因此提出“降玺书招谕”的意见，为忽必烈所采纳。正月十七日，忽必烈派伯术、唐永坚带诏书招谕郢州，由襄阳统军司调兵3000护送。二月十九日，又命阿失罕、唐永坚、綦公直等人与脱烈，将甲骑千人，持诏招谕郢州。二十八日，复遣伯术、唐永坚等，宣谕郢州官吏士庶。三月四日，命万执中、唐永坚固前所遣阿失罕等，将锐兵千人，同往招谕郢州：已降，则镇之，不降，则从陆路与阿里海，牙、忽不来会于荆南。郢州守臣张世杰，约在二月下旬带领万人赴卫临安，但郢州有江陵高达，朱祀孙，岳州高世杰为依托，元军迄未攻占。因而要稳固鄂州镇戍，不得不对荆湖用兵。

攻占岳州

贾居贞到职后，与阿里海牙商议曰:“江陵要地，乃宋制阃重兵所屯。闻诸将不睦，迁徙之民盈城厂复皆疾疫，刍新乏阙，杜门不敢樵采。不乘隙先取之，追春水涨，恐上流为彼所乘，则鄂危矣。”明确指出了用兵荆湖的重要性。阿里海牙甚以为然，即驿报忽必烈：“江陵，宋巨镇，地居大江上流，屯精兵不啻数十万。若非乘此破竹之势取之，江水泛滥，鄂、汉之城亦恐难守。”这时，宋湖北安抚副使兼知岳州高世杰受朱祀孙之命，复窥汉、沔，他以知州孟之绍的妻子作为人质，并将复州降将翟贵的妻子送到江陵，又聚集了郢、复、岳3州以及上流诸军战船1600艘、兵2万人，扼守于荆江口（洞庭湖入长江处，今湖南岳阳市城陵矶），准备袭击鄂：州。忽必烈接到阿里海牙的报告，一面派人招谕宋江陵府制置司及高达已下官吏军民，面命令阿里海牙领兵取江陵，以贾居贞佥行省事留戍鄂州。贾居贞在鄂州发仓库赈济流亡，对流寓鄂州仰食于宫的宋宗室子孙加以照顾，不变其服，行其楮币，东南未下州郡滞留鄂州的商旅，给引使归，免括商税，并解除湖荻之禁，稳定了社会秩序。又造舟百余艘，建立水军，做好作战的准备。

三月，阿里海牙分兵出御，在荆江口与高世杰军相遇。二十一日，阿里海牙屯军于东岸，高世杰夜半遁去。次日黎明，至洞庭湖口，兵船成列而阵。阿里海牙命水军张荣实持其中坚，解汝楫以舟师分为左右两翼与之配合，宋军溃散，商世杰大败而走。追至桃花滩，遣郎中张鼎召之，高世杰降。阿里海牙又以高世杰招谕兵州。孟之绍以城降。但高世杰以力屈而降，元军占江陵后仍被磔杀弃市。二十七日，遣山东经略使五俨戍州。

泸州降元

元军占领嘉定后，以镇戍眉卅的万户刘恩移戍嘉定。西川行院其余军队，则仍由也速带儿，汪良臣，忽敦等人率领，沿岷江，沱江、马湖江顺流而下，继续征服沿江诸城，并以沈答罕为中使，随军进行说降。面对强大的元军，“下流诸城，皆望风来附”。

紫云城随嘉定降元，为速哥和石抹不老占领。六月十六日，知叙州郭汉杰以治所登高山城（今四川宜宾市东2里）“挈城归附”。元军占领叙州后，速哥，旦只儿，秃满答儿、石抹不老等人率领水军，忽敦部将也速答儿，步鲁合答，拜延和刘思敬等人率领陆军，顺流而下，向泸州进发。长宁军郡守黄立和少数民族首领，“俱效顺”。二十一日，知富顺监王宗义以虎头城降。

泸州为川南重镇，宋复泸州后改名江安州，设治所于神臂山城，守臣梅应春以礼部尚书衔任潼川安抚使，知江安州。在元水陆大军压境下，早有降意的梅应春，于二十二日与赵金、吴大才、袁禹绳一道，杀判官李丁孙、推官唐奎瑞，向元军投降。珍州守将江彦清闻之，竭力守御，率部抵抗，城陷，巷战而死。

梅应春降元后，元朝复改江安州为泸州，梅应春被任命为泸州安抚使，与西川行院军将家属并伤病人员共同戍守神臂城。赵金，吴大才，袁禹绳则充当元军向导，向重庆推进。

占领东川诸城

1274年秋，东川元帅杨文安与蒙古，汉军万户，怯必烈等攻夔东，拔高阳（今四川云阳县境），夔、巫等寨，俘获守将严贵、窦世忠、赵兴等人，并跨江为桥，以阻断宋兵往来之路。宋派兵来争，被杨文安打败退却。十一月，杨文安与青居山蒙古万户怯烈乃、也只里等会兵达州，直趋云安军（今四川云阳）、大破宋兵，遂拔云安，罗拱、高阳诸城堡。

1275年初，东川副都元帅张德润攻破渠州礼义城，杀宋安抚使张资，招降军民1500令人。先是元军遣蔡邦光略九君山，俘守将孙德，柳荣、赵威，谋攻开、达二州。时原宋开州守臣鲜汝忠与达州守臣赵章换防，鲜汝忠家属尚留在开州。杨文安认为“达未易攻，若先拔开州，俘其家属，以招汝忠，则达可不烦兵而下”，便派蔡邦光率千户呼延顺等人往攻开州，而以盛兵驻蟠龙城为声援。至是，元军连夜进至开州城下，遣死士斩关登城。城中人得知城破时，元军千户景畴已占领城中制高点，宋军溃，散，知州赵章被俘。守将韩明父子犹率领所部进行巷战，亦丸屈就擒。杨文安将鲜汝忠家属迁至蟠龙城，遣元帅王师能持檄前往达州招降曰：降则家属得全，不降则阖城涂炭。鲜汝忠遂派赵荣来约降，王师能以兵入据达州城，鲜汝忠率所部将士至杨文安军门投降。赵章之子赵桂楫守师姑城，遣兵招之，亦降。杨文安又遣元帅李吉、嵇永兴、千

户王新德等，以鲜汝忠为向导，带兵往招由山等处8城，皆望风迎降。不久，杨文安又遣其侄杨应之，往招都胜，茂竹，广福3城，自将大军示威，皆降之。

七月，杨文安所率元军至乐胜城，宋将薄济川降。进攻梁山军（今四川梁平），宋将袁世安坚守，杨文安焚其外城。梁山军以忠胜军为固，杨文安力攻破之，杀守将王智，擒部辖景福。元军围梁山40日，袁世安"随方备御，竟不降"。杨文安只好放弃梁山，移兵进攻万州牛头城，杀守将何威，进围万州。守将上官夔战守甚力，于是杨文安遣监军杨应之，镇抚彭福寿，会合东川行院兵，出小江口，以牵制援兵。果与援兵相遇；但虽战败援军，俘总管李皋、花茂实等人，并招降万州附近诸城寨，而万州仍固守不下，杨文安只得解围而去。是年冬，杨文安率军进攻白帝城，宋夔帅张起岩据险坚守不出。杨文安因连攻梁山、万州均不得手，军士转战东川高山深谷数月，战斗力大减，遂以师老撤退。张起岩与其部将弋德领兵复据开州。杨文安无意再争，乃筑神仙山城，令元帅蔡邦光、万户纪天英驻兵屯守。

攻占重庆计划的失败

1275年初，忽必烈束纳枢密院臣关于招降南宋边郡军事重镇的建议，诏谕宋重庆府制置司及所属州郡城寨官吏军民，举城归附。但四川山城防御还相当坚固，尤其是合州、泸州、夔州还均为宋将驻守，元军暂时还不能直接威胁重庆。五月，宋廷升张珏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但六月，元东、西两川行院在军事上都取得重大胜利，"泸、叙、长宁，…富顺、开、达、巴、渠诸郡，不一月皆下。"与此同时，元朝对重庆展开政治攻势，遣使招谕宋四川制置使赵定应："比者毕再兴，青阳梦炎赴阙，面陈蜀阃事宜，奏请缓师，令自纳款。今遣再兴宣布大信，若能顺时达变，可保富贵；毋为涂炭生灵，自贻后悔。"还派元重庆招讨使毕再兴持诏前往招降合州节使张珏，江安（泸州）潼川安抚张朝宗、涪州观察阳立、梁山军防御马堥。

是年秋，忽敦率领的西川行院2万水陆大军自'泸州东趋重庆，会同自合州南下的由合剌统领的东川行院军，合围重庆。忽敦分派秃满答儿镇守嘉陵江与长江的合江口，作浮梁三江中，并"以舟师塞龙门潦，遏其援兵"。石抹不老"以战舰三百艘列阵于观滩，绝其走路"汪良臣用兵忠州，"命拜延将兵二千，往涪州策应之"。速哥以所部舟师镇守白水（嘉陵江）、马糊江。（长江）口。也罕的斤督长江"两岸水陆军马"，步步进逼重庆。重庆在元军严密包围之中，"自秋徂冬，援绝粮尽"，张珏身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竟无法入重庆赴职，只能留守钓鱼山城，多次"以死士间入城，许以赴援，且为之（赵定应）画守御计"。重庆城内宋军突围出走至铜锣峡（重庆市东20里），忽敦派步鲁合答追击至广羊坝，宋军200人为其所斩。突围而出，赤难奏功。

为解重庆之围，张珏于1276年初遣赵安勒兵出战，北袭元东川行院据点青居。元将赵匣剌出兵迎击。赵安虽受挫。仍俘元安抚刘才、参议

马嵩而归。二月，又派部将张万以巨舰载精兵、断内水，（嘉陵江）浮桥，破围进入重庆。四月，张珏会同重庆守兵出击驻守凤顶诸寨的元军。张珏所采取的军事行动，虽未能改；变重庆被围的困境，却遏阻了元军进古合州这一军事要地。

这时，临安南宋朝廷已向元朝投降。降表所奉境土，包括四川在内。忽必烈以此再次加紧对四川的招降活动，派脱术、教化的持诏谕降重庆守臣，宋军不听。元军乃分兵为5道，水陆并进。石抹不老率领随翼军500人，会同招讨使药刺海，竖栅于白水江岸以为备。又乘夜袭击宋军，直抵重庆城下，攻于斯门，宋军惊溃，溺死甚众，生擒30余人，缴获旗帜甲仗。东川行院总帅汪惟正率军助战，夺其洪崖门，获宋将何统制。速哥所率一军获战舰300艘，俘其众130人。宋涪州守将阳立，自率舟师来援，石抹不老击败之于广阳坝（即广羊坝），俘60余人，夺船10艘，闰三月，东川汪惟正略地至涪州，克山寨溪洞23所。

元东、西两川行院率部各自为战，虽合围重庆，却无统一指挥。初以为重庆指日可下，争相为功，遇到职力，复互相观望不前，甚至彼此交恶。诸军虽各有小胜，却无大建树。当时宋军困守重庆的主帅赵定应，并无坚守决心，以致向荆南行省“越境请降”，张珏义被阻隔在合州的钓鱼城；元军5路进攻，处于绝对优势，竟致“众军不利”，未能一举攻下重庆。四月，忽必烈遂省罢东川行院和成都经略司，以其事划归西川行院领导，企图调和军前矛盾。但这时“军士久围重庆，逃亡者众”，士气逐渐低落。

梅应春以泸州降元后，义士先坤明与刘霖在泸州聚事，“率乡人起兵自保”，合谋收复泸州。先坤明请刘霖前赴合州，“与州守张珏乞师为外援，留己于城中作内应”。刘霖亟走合州，向张珏“献长计，乞兵恢复泸州。起初张珏“疑其反复，未之许”。刘震“恸器儿绝，原以身为质”。张珏为其意所感，确信刘霖并无二心，“乃深相结纳”，派部将赵安，王世昌等，随刘霖“引步卒兼程潜行”，于六月三日来到神臂城下。时已夜半四鼓时分，刘霖、赵安遣勇士数十入，梯墙呼啸。留为内应的先坤朋，纠集壮士，杀守门者，开神臂门，迎纳援军入城。先坤朋与刘霖熟悉城内情况，督兵巷战，尽歼元军，俘获梅应春，“数其罪而杀之”，收复了泸州。刚到泸州治疾的元将赵匣剌，于城破之时率从者“舆疾出战”，遂为所获，死之。一批元军将领和南宋将的家属也同被俘获。此外，在这次战斗中，合州将王立占有了蒙古千户熊耳之妻宗氏。

张珏收复泸州，给围攻重庆的元军以沉重打击。首先，泸州是西川行院自成都漕运重庆前线的后勤供应中继站，虽然元军于九月“遣泸州屯用军四千，转漕重庆”，可应一时之需，但漕道长期阻隔，将给重庆前线物资供应造成困难。其次，西川行院军将一批家属在泸州被俘以及泸州再次为南宋收复，动摇了军心士气，使久围重庆的西川将士无心在重庆恋战，致使“逃亡者众”，军队大量减员，忽敦不得不请求增兵。在这种情况下，西川行院诸军急忙撤离重床，速哥、步鲁合答、拜延、旦只儿、也罕的斤、秃满答儿，刘思敬、石抹不老等皆还围泸州。东川行院

本与西川院有矛盾，也不顾单独围攻重庆，力量也不够，遂解围撤退。元军占领重庆的计划于是失败。

元军在重庆撤围，给张珏在东川；提供了收复失地的良机。他派部将张万前往打通重庆至夔州的道路，先是宋涪州守将阳立遣书纳降，速哥率兵1000人察其真伪，至涪州，阳立果降，遂入城受降。军是张万率众来袭，速哥与之进行大小18次战斗，斩首300余级，张万败走。不久，张万复集3000兵来攻，击走阳立，俘其僚属冯巽午等，收复涪州。张珏以都统程聪镇守涪州，主世昌任泸州安抚使。时赵星、赵呙二王逃亡福州并建立政权的，消启传到东爪，张珏派出数百人设法与之联系。涨万进入夔州，联忠、涪2州兵，攻拔石门及巴巫寨，俘获将士百余人；又连破18寨，解大宁（今四川巫溪）之围。十二月，赵定应迎张珏入重庆，担任四川制置使。东川形势暂时稳定下来。

第十二章 伯颜取临安，宋廷降元

第一节 元军南攻基地的建立

进占建康

元右丞相伯、颜所率水、陆大军在丁家洲击败宋贾似道、孙虎臣所领的13万军队后，沿长江大举东下，势如破竹。然而，由于长期征战，元军兵力、物资消耗甚大，沿途重镇留下驻守军队，亦减少宁进攻部‘队的兵力，加之，临近宋都，宋军必以》0倍的努力、进行：防御，激烈战斗在所难免，故元军不能冒然进军，有必要调整军事部署，先建立巩固的南进基地。

1275年春，元步、骑兵进驻龙湾（今南京市下关江边），水军停清于江面，截断宁建康与外地的水陆通路。宋沿江制置大使、建康留守赵溍已弃城逃遁，都统、权兵马哥事徐王荣及翁福、茅世雄等至元军营请降；迎亢军进城。伯颜一面禀承忽必烈“毋妄杀掠”的旨意，整肃军纪，命窅队不得入城，违者以军祛惩处；一面采取措施，以巩固建康地区。

伯颜选择建康作为进军宋都临安（今杭州）途中的息足地，主要是因为，其一，此地是江东要地，西、北擗大江河可以固守，能阻扼两淮宋军南援，其二，此地是“经营四方之根本”，水陆交通便利，利于军队调度，其三，此地距离宋都临安较近，南去有水陆通道，亦有丘陵、旷地，可以发挥步、骑、水军的威力，确是对临安发起攻击的理想之地，其四，元军自襄阳出发，沿途多次与宋军激战，至此实需休整。因此，伯颜进占建康后，为巩固已获战果，于三月初二日即命部将唆都为安抚使入据建康，负责安抚城内外军民。进城后的第17天，伯颜立行中书省于建康，以慰抚新附军民和筹备军需。是月，正值青黄不接之时，加上战事困扰，灾情严重，江东民众困于饥荒、瘟疫，饿死、病死者甚众。伯颜即命打开建康城内粮仓，发放蓄粮，救济灾民。这样，建康城内外民众得以安居，很快消除了对元军的恐惧心理。

元军进占建康后，伯颜即遣军四出，进攻建康周围的重要城镇，以防宋军乘隙反扑，稳定该地区的局势。

江东之战

江东诸城是拱护建康重地的要塞，要在建康立足非扫平宋军在该地的势力不可。故伯颜接受建康守军请降后，即遣多路出击。他命部将忙兀台率一部进军溧水（今江苏溧水），宋建康留守赵溍之弟赵淮领守军抗击。两军战于丰台庄（今溧水北），宋军溃败，被俘斩500余人，赵淮亦被俘杀。元将脱脱率一支精骑进攻广德（今安徽广德），击败宋守军，占领该城及周围小镇。参政董文炳率一部水军顺江直插镇江（今江苏镇江），守臣洪起闻讯胆颤，率，小部潜逃，—统制石祖忠以城降。

镇江是控扼长江的要塞，南宋词人陈亮曾写有“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之词描述其地势之重要。元军进占该城后，伯颜即命行院副使阿塔海、参政董文炳在此建立行枢密院，以加强建康地区的军事指挥。

另外，趋向常州之元军，亦进展迅速。宋守臣赵汝鉴闻讯元军逼近，即带领随从匆匆逃遁。钤辖戴之泰与十人玉良臣开城迎降。与此同时，进军江阴之元军亦已收降宋守军。不及10天时间，元军夺得江东府2、州5、军2、县43，控制了该时区的重要城镇。

三月十九日，伯颜遣左右司员外郎石天麟进京，向元世祖忽必烈陈报攻宋战况，世祖非常高兴，同意了右天麟的奏请事项。

元军在占领江东要城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两淮宋牢的攻势，全力牵制宋军的行动。

进兵扬州

两淮地区是南宋的重要防线：不仅是“拱护腹心”建康的要地，亦是阻挡北车护卫临安的、“藩篱”，故宋廷“东南兵力，尽在江北”。忽必烈深知，“宋重兵皆驻扬州，临安倚之为重”，应全力牵制两淮宋军南援，以消除进取临安的后顾之忧。所以，在占领建康后不久，他即子四月初命阿术偕同许多“勇而有谋者”，率一部兵渡江，进围扬州，又命昂吉儿进兵淮西，驻和州（今安徽和县），与博罗欢一起密切注视宋军的行动，吸引住两淮宋军的兵力。

阿术渡江后，即遣部将李虎带着招降榜文入扬州劝降。宋守将李庭芝斩杀元使，并烧了招降榜文i然后急调部将苗再成、许文德、姜才等分3路抵御元军。

四月十九日，阿术军进至真蚶（今江苏仪征）老鹳嘴，击败苗再成军，斩杀2000余人，遂进至瓜洲扎营。

瓜洲位于扬州东南45里处，地当运河之口，与镇江斜对，是控扼长江，运河的要地，亦是扬州宋军入江的必经之地。当年，李庭芝被任为淮东制置使、驻守扬州时，即强迫瓜洲民众迁入扬州，焚烧了民舍。阿术到瓜洲后，赶忙“造楼橹，修战具，漕真州之粟，以守之。”这样，瓜洲成了驻守淮东元军的大本营。元军行院右丞阿塔海根据当地地形又建议，“扬子桥乃扬州出入之道，宜立堡，选骁将守之。”所以，伯颜授史弼3000人，命其在扬州外围树栅。不多日，粗高的木栅“自扬子桥竟瓜洲，东北跨湾头至黄塘，西北至丁村”，筑成了坚固的长围，并在湾头立堡，与瓜洲大营相互犄角，组成一道强有力的防线，阻截外地宋军对扬州的支援。

是年（1275年）五月，阿术为防止宋军水师占据长江，形成夹击之势，就集中行省诸翼万户的战船于瓜洲江面。阿塔海、董文炳也集中行

院诸翼万户的战船于南岸西津渡。这样，元军水师南北呼应，堵截江面，完全消除了宋水军顺江西上支援的可能，亦进一步控制长江天堑，断绝驻淮宋军渡江南援通路。

宋廷自南迁以后，一直视“江为堂奥，淮为藩篱”，多年经营，集重兵于淮地，设水师于江上。长期以来，江淮地区确实起了防御北兵的重要作用。然至此时，元军既已歼灭了长江上的大部宋军水师，并且在沿江重镇江陵、鄂州、安庆、江州、采石等地，派兵镇戍，又“俱选素有威望万户人员与新附官同镇守抚治”，从而完全控制了沿江地区。这时又有阿术驻兵瓜洲，昂吉儿驻兵和州，更使两淮宋军难以向南机动。因此，昔日的宋军防线，此时已成了元军隔绝宋军主力与宋廷联系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使“宋之北藩”，更加破碎。当时的形势正应验了忽必烈在1261年诏谕高丽王供时的预言：“……宋所恃者长江，而长江失险，所藉者川广，而川广不成，边戍自撤其藩篱，大军已驻乎心腹，鼎鱼幕燕，亡在旦夕。”

伯颜赴阙

正值伯颜部署元军继续南进之时，于四月二十四日接到忽必烈诏书，以“时暑方炽，不利行师”之故，命其暂时息军，俟秋再举，“毋轻敌贪进”。伯颜、阿术、阿剌罕董文炳等将领，分析了当时对宋战争的形势：宋主力已大部被歼，长江要堑已为元军控制，宋两淮重地亦被截断，四川，荆湖地区之宋军也被元军牢牢牵住，不能自拔，无力东援；宋廷内部人心惶惶，四分五裂。感。到此时是继续进军、一气灭宋的极好时机。所以，伯颜向忽必烈凑曰：“宋人之据江海，如兽保险，今已扼其吭，少纵之则逸而逝矣”。可见，当时伯颜及其他将领不甚了解北方的形势，也投有理解忽必烈的用意。

原来，北方还有一股反忽必烈的力量，那就是与忽必烈争夺汗位，并反对其实行蒙汉兼有的统治政策的诸王阿里不哥（忽必烈老弟），海都（窝阔台汗之孙）等人。阿里不哥的势力虽早已平息，但曾支持阿里不哥的海都，自从1268年在金山（今阿尔泰山）挑起战端以后，势力不断扩大，经常袭扰忽必烈所控制的西北边地。忽必烈于1271年派皇子那木罕和宗王昔里吉、脱脱木儿等去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北）镇守，但仍不能阻止海都侵扰。时至1275年，海都势力不断向东伸展，甚至逼近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是年初夏，忽必烈在上都避暑时，险些遭到叛军袭击。叛王的势力越来越严重威胁着忽必烈的统治。在此南北两线须同时用兵的危急形势下，忽必烈出于无奈，才决定调调回“极有方略”、“可属大事”的伯颜商讨军情；以处理当时日益复杂的局势。

忽必烈派奉御使爱薛到建康面传旨意，伯颜只好即日奉旨起程。临行前，他命阿剌罕为参政，轩琪、刘江为议事，共同治理行省事务。伯颜尤为担心的是，宋军可能会乘机反扑，元军在节节胜利面前是否会丧失应有的警惕而好逸恶劳。故他特地于五月十二日到镇江会晤阿术、阿塔海等将领，嘱咐“所部水陆士卒甲杖务要严整，缓急适用，毋令怠

惰”，要乘此战隙之良好时机，抓紧水陆训练。次日，伯颜偕同石天麟在吕文焕的护送下，渡江北行。

五月底，伯颜到了上都（今蒙古正蓝旗东北）。忽必烈很快召见了他，“亲问以军前事势”。伯颜汇报了攻宋的进展情况，并陈述了下一步的平宋部署。忽必烈听后甚为高兴，同时也指出北方叛王势力的发展状况及对王朝的危害，要伯颜领军北征。伯颜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平宋乃是统一全国之举，只有乘胜进军，方可收到全功，而“北边之事，尚可徐图”。忽必烈虽然感到北方叛王的势力直接威胁着他的统治，然也觉得伯颜分析在理，故完全同意伯颜的意见，并对伯颜及时术，阿里海牙等前线将领在攻宋战争中所建立的功勋，大加赞赏。七月十四日，忽必烈提升伯颜为中书右丞相，并命阿术为中书左丞相，以表彰他们的功绩。

伯颜赴阙陈述军情，转变了忽必烈先平诸王叛乱、后灭南宋的计划，促使其下了加快灭宋步伐舶决心。于是，忽必烈于七月牛旬同意伯颜南返，命其“率诸将直趋临安”。如果说，忽必烈在此以前对能否迅速灭亡南宋还存有疑云的话，而此时则对灭亡宋廷、统一全国充满了信心。为配合伯颜所率的元军主力的行动，忽必烈又命行省右丞相阿里海牙进取湖南，蒙古万户宋都带与汉军万户武秀、张荣实，李恒，以及兵部尚书吕师夔等进取江西，以牵制其他战场上的宋军。

伯颜领受任务后，于八月初五日离上都南行，经大都（今北京），过河间，然后取道山东路，沿益都及沂（今山东临沂）、涟，海等州南下。并趁此机“巡视边陲要害，壁垒坚脆，用兵设备，”督促元军加强战备，配合大军行动。

接着，伯颜又组织了几次战斗，以削弱宋军兵力，试探宋军的虚实。

淮安之战

伯颜发现，位于淮东中部、运河边上的淮安城，是控扼宋军南援的要地，故决定夺取该地。他调淮东元帅、右丞博罗欢，左副都元帅，右丞阿里伯所部万余人会师淮安。九月十一日，伯颜挥军围困淮家城后，即遣新附官员孙嗣武至城下招降，遭宋守将严词拒绝。伯颜遂于十四日发起攻击。他命招讨别吉里迷失率本部兵进攻北城西门，自己与博罗欢、阿里伯等亲临南城堡，“指挥诸将，分道进攻”。由于宋守军的坚决抵抗，元军没能占领全城，只攻下南堡就解兵而去。这或许是由于伯颜考虑攻宋大局，而不愿在夺取此城上多花时间。

九月十七日，伯颜率大军离开淮安继续沿宝应、清江、高邮（均属今江苏）南下，途中在白马湖、高龄等处与宋军接战，均获胜利。伯颜在南下途中，抓紧进行大举南攻的准备，尤其是到了扬州附近的湾头新堡时，更加紧各方面部署。

兵力调整

伯颜、阿术所率的元军主力虽然控制了长江防线，扼住南宋之襟喉，然而，从整个形势来看，由于元军进兵势如破竹，有限的兵力准以应付形势的迅速发展，“新下江南三十余城，俱守以兵，及江北，淮南、润、扬等处未降，军力分散，调度不给，以致镇巢军、滁州两处复叛。”江东之战后，广德、常州、平江等地的得而复失，也说明此种情况。而且，要组织对宋都临安的最后冲刺，不进行适当的兵力调整，就难以适应当时局势。因此，伯颜曾派急使去向忽必烈奏告，攻宋之“军队不够”。由于“一时征集不起足够多的军队来，（忽必烈）便降旨把乞台国’（即金国）的全部囚犯都送去。他们约有二万人”忽必烈还亲自召集他们训话，鼓励他们到攻宋前线去冲杀。这批“带罪立功”的亡金囚犯经过一番组训后，就被派到前线，与伯颜的军队会合。

另外，伯颜也从辽东及襄阳、平阳（今山西临汾）、西京（今山西大同）、延安等地募兵，以充实攻宋元军的战力。为加强元军海上作战的能力，平章政事阿术派招讨王世强建造了100艘白鹞海船，并自左翼41万户内选调汉军3500人、新附军1500人，由哈剖解和王世强率领，增补给董文炳所部水军。

六月十二日，忽必烈下令将鄂州戍兵及李璮旧部交付行中书省指挥，并把“前河南已签军万人后免为民者，复籍为兵”送到前线参战。二十六日，伯颜又令搜集涟州、海州新降附军民的船只1000艘，送淮东都元帅府，加强江淮元军的水战力量。

伯颜自上都南返、到达湾头新堡时，一方面与阿术所部会师，进一步围困扬州，以防宋军出袭，另方面召集阿术、右丞张惠、参政敏珠尔丹等将领，宣布忽必烈的诏令，指授攻宋的下一步方略。驻守建康，代理伯颜统管军政事务的阿剌罕也专程赶到湾头，会见伯颜。这次攻宋前线指挥官的大聚会，无疑对胜利进取临安具有重要意义。

元军在建康经过一番休整，兵力更加雄厚，斗志更加旺盛，这就为迅速攻取宋都临安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第二节 宋廷和战不定

宋廷的抉择

面临亢军大兵压境，腐败的南宋朝廷内部矛盾重重，驻守各地之将领相互倾轧，庞大的赵宋统治机构已成了一盘散沙。正如后来有人感叹的那样：“社稷无人物，湖山养祸胎。前朝亡国恨，遗迹后人哀。”当时，宋廷君主午幼，重大事宜均决于权臣。丞相贾似道、陈宜中等主和者，一味乞和，总将希望寄托手元荤会接受议和条件，而停止进军，好让其苟安于江南一偶。而以文天祥、张世杰、李庭芝等为代表的主战者却竭力奏本朝廷，集宋荤全力，抗击元军。但由于权力掌握在主和者手

中，故文天祥等难以实现其夙愿。也正是由于两者的激烈斗争，面对元军战抚兼施的战略，宋廷战和不定：出战时，方略失当，议和时，坐失战机，以致节节败退、损兵失地。这是南宋朝廷在政治军事上更趋腐败的表现。

宋军在丁家洲之战前，主和派早已占了上风。及丁家，洲一战溃败，贾似道逃到扬州后，主和派更制造逃跑舆论，又上书朝廷提出迁都。虽然由于陈宜中、文天祥，张世杰等人的反对，贾的意见未被采纳，但对朝廷官员的影响颇大，一时间更增加了临安城内的惶恐气氛。元军乘宋廷内部紊乱之机，迅速进军，继取鲁港、芜湖、太平以后，进占建康及其周围要城。后来在朝野舆论的压力下，在主战将领的坚持下，宋廷不得不重振旗鼓，组织兵力，保卫都城临安。

宋军力卫都城

自从元军占领长江一线重要城镇、控制了江淮天堑以。后，宋廷数次下诏，要各地宋军勤王，带兵入卫临安。但是由于元军控制了长江防线，又驻兵瓜洲、和州，两淮宋军“无一旅渡江勤王者”；四川、荆湖地区宋军亦受元军牵制，不能自拔，故当时勤王者寥寥无几。先后入卫的有：

郢州守将张世杰率所部万余人东行，道过饶州（今江西波阳），击败元军，收复该地，随后入卫临安。

江西安抚副使文天祥，闻诏涕泣，即聚部下万余人，又令部将陈继周，方兴，在赣州、吉州（今吉安）等地招募当地豪杰万人，合2万余人，誓师勤王，宋廷即命其为江西提刑安抚使。不久，文天祥率兵东行，进驻临安西湖边，后被派往平江。（今苏州）守御。

湖南提刑李芾“择壮士三千人，使士豪尹奋忠将之勤王，别召民兵集衡（今湖南衡阳）为守备。”

另外，末廷还征调两浙、福建诸郡的厢禁兵之半数到临安守卫。

1275年春，当元军入建康之际，宋廷曾调兵加强临安外围要地的防守，命浙西提刑司遣刘经戍吴江（今属江苏），两浙转运司遣罗林，与浙西安抚司参议官张濡同戍独松关（今浙江余杭西北）；山阴县丞徐垓、正将郁天兴戍四安镇（今浙江长兴西南）。

但是这些部署态势，仍然是消极防御的。

与此同时，宋廷毕竟慑于元军的强大攻势，不得不挖空心思找乞和息兵的途径，以求元军缓兵。三月四日，朵廷诏谕降元的吕文焕、陈奕、范文虎，想通过这些特殊的关系去沟通与元军议和息兵的渠道，但是没有成功。

元使被害

当然，元方也不是一味使用武力；遵照忽必烈的旨意伯颜每至一城必先招降，尽量减少战火的浩劫。

1275年春，忽必烈扼出由礼部尚书廉希贤、工部侍郎严忠范、秘书丞柴紫芝等人组成的高级使团，持国书使宋。他们途经建康时，伯颜派了500。人护送。三月十五日，元使团到达独松关（今浙江余杭西北），遭宋守将张濡袭杀。此事件的发生，更激怒了元军将士，加快了元朝灭宋的步伐。

伯颜得到此讯，即致书谴责宋廷。宋廷深知理亏，复于四月派人致书给降元的建康留守徐王荣，求他在伯颜面前转运宋丞相陈宜中的申言："杀使之事，太皇太后及嗣君实不知，皆边将之罪。当按诛之，请输岁币，罢兵通好。"事实上，张濡袭杀了廉希贤等元使后，还"以为已功，爰赏，知广德军。"可见，陈宜中的解释乃是掩饰之词，当然不会产生多大作用。

具有文韬武略的伯颜，不相信宋廷这番表白。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宋人谲诈为计，以视我之虚实，吾当就而用之。"但伯颜认为需要进一步"宣布威德，令彼速降"，故没有断绝宋廷的议和希望，仍派出行省议事官张羽、行院令使王章，带着徐王荣给陈宜中的答书，随同宋使去临安。张羽料定此去凶多吉少，当他们行至平江（今苏州），不出所料，又被宋守军杀害。

尽管元使一再设宋军所杀，伯颜仍能冷静处事。他在准备分兵南下、进取临安之前，看到诸将士情绪高昂，争先出战，在欣喜之余，意识到"诸将刊虏掠，争趋临安"的不良倾向，于是便请教谋臣，采取防范措施。他召见谋臣孟祺，询问进取临安的对策，孟祺答道："宋人之计，惟有窜闽尔。若以兵迫之，彼必速逃，一旦盗起临安，三百年之积，焚荡无遗矣。莫若以计安之，令彼不惧，正如取果，稍待时日耳。"伯颜表示同意说："汝言正合吾意。"随即令人写了草书，遣使去临安，稳住宋廷。伯颜摸透了宋廷战和不定的态度，有理有节地"就而用之"，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宋军反击

面临元军步步迫近、领地日益缩少之危局，宋廷迫不得已命主战将领张世杰为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军，期望他能挽回败局。张世杰见临安外围的许多要地已被元军占领，甚为担忧。他认为要想保住临安，挽救垂危的南宋朝廷L—必须组织力量，夺回外围陈地，进而以全力与元军决一死战。因此，他遣部将阎顺、李进进军广德，谢洪永进军平江，刘师勇、李三进军常州。

阎顺率军行至安吉（今浙江安吉北），遭到元军阻击，经激战，宋军虽斩获不少，但难以攻克该城，只收复了附近的凤平镇。然后，阎顺

继续北上攻广德军，由于元军立足未稳，宋军终于是年（1275年）四月十五日收复该地。刘师勇一部也于五月七日，在姚訔的配合下收复了常州、吕城。

接着，宋廷于五月二十六日又命张世杰、张彦、阮克巳、仇子真等分率大军再次出击。但是过月余，诸路宋军接连遭到元军打击，进展甚缓。

杨子桥之战

六月二十七日，宋淮东制置使李庭芝，闻张世杰等统军不断出战，也命都姜才、副将张林率步、骑兵2万乘夜进攻扬子桥元军木栅，欲打通增援扬州的通道。阿术得到守栅万户史弼告急，当夜率军往援，次日清晨即赶到扬子桥，与宋军分列邗河两岸。姜才挥军以三叠阵列于河之北岸，欲寻机攻击。元军将领张弘范率领13骑冲过邗河，插入宋战阵。几经激战，宋军阵势丝毫未动，元军却丧失了数骑。张弘范，见势，佯装撤退，然后乘追击之宋军不备，回马大呼应战。阿术亦令弓手一齐发箭，配合张弘范反击。宋军突然遭此猛烈还击，惊慌失措，相互践踏，大溃。宋将士死伤万余，张林被擒，姜才仅带数骑，杀出血路，逃回扬州。

宋军的反击虽然连遭挫败，收获甚微，但张世杰、刘师勇、孙虎臣等一批主战将领，仍不气馁，希望通过决战挽回败局。不久，又倾宋军战力在焦山（今江苏镇江）江面与元军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作战。

焦山之战

为了确保此战的成功，张世杰作了一番筹划。约定殿帅张彦率步骑兵自常州趋镇江，控制长江南岸，约物州李庭芝领兵出瓜洲（今扬州东南），自江北配合，自与刘师勇、孙虎臣等率水师列阵焦山以东江面，预定以“三路交进，同日用事”，与元军展开决战，谁料时至约定之日，扬州宋军失期，常州张彦竟不发兵，致使涨世杰等率水师孤军迎战。他率战船万艘列阵预定之地，每10船连成一舫，互相系上链索广沉碇于江，横截扛面，并规定、“非有号令，不得起碇。”决意孤注一掷，与元军死战。张世杰等人估计，宋军如此阵容，对长期以骑兵为长的元军来说，会是一个威胁。再者，元军主帅伯颜离职赴阙，定会削弱指挥力量。此时，应为大好战机，如能一战取胜，即可与两淮宋军会聚，打开新的局面。岂知此时的元军水战能力已大大加强，不仅有大量训练有素的水兵和数以万计的战船，而且在实战中已锻练出一批如阿术、董文炳、张弘范等善于水战的将领。

阿术、阿塔海、张弘范等元军将领，面对宋大军邀战，沉着运筹。阿术、阿塔海带着几名部将登上南岸石公山瞭望，发现宋水师虽然战船众多，兵卒云集、旌旗招展，其势堂堂，但是船大且密，相互连锁，不善机动。阿术高兴地指着前方对阿塔海说：“可烧而走也。”然后，他命

张弘范率兵千人，乘船西掠朱金沙（今镇江西），控制上游江面，又令万户怀都带步骑兵列于江岸，防止宋军登岸袭击。

大战前，阿术、阿塔海坐镇石公山上，居高临下，指挥诸军出战。他命万户刘深沿着北岸，东趋夹滩（今焦山东北）绕至宋军船阵之后，行院判官董文炳直插焦山南麓，宫右边进攻，招汁使刘国杰自焦山左边进击，万户忽剌出直捣其中；这种以两面夹击、中间猛冲之战法，乃是过去元军骑战常用的，现在阿术根据当时的态势，将此战法移用于水战，确实证明元军将领的军事才能已大有进步。

开战后，由于宋军多为海船，体大且相互连接，无风难以机动，而元军乘着名为“水哨马”的小型战船，往来如飞，攻击灵活。两军激战一个上午，难分胜负。阿术适时地投入预备队，命张弘范自上流顺风而下，循焦山北麓横冲宋军船队。又选用千各强健的弓箭手乘大船接近宋军，顺风发射火箭。宋船蓬樯纷纷起火，烟焰蔽江，阵势大乱。因无令“发碇”，宋船欲战无力，欲逃不能，仅“赴江死者万余人”。张世杰眼看有全军覆没之危险，乘隙跳上小船，突围向圌山（今江苏镇江东北）逃去。张弘范等见宋军东逃，急率一队轻舟紧紧迫杀，；又夺得宋战船80艘，俘斩千余人。经此一战，元军共获战船700余艘，“宋人自是不复能军”。

宋廷分崩离析

宋军反击失利，尤其是焦山之战大败以后，南宋朝廷内部更加分崩离析，准备逃遁者有之，提议迁都者有之，抱首哭泣者亦有之。然而，也有心怀复兴大奉者。文天祥就是其中之一。他于焦山之战后不久特地赶到临安，向朝廷上疏曰：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郡色，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亦以寖弱。故敌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中原陆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内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似广西益湖南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阃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无退，日夜以图之，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却也。”

文天祥在危难之时提出此充满信，独有建树的退敌策略，精神可颂，但是，他没有细虑，在当时朝廷腐败、诸将领各怀异志，元军步步进逼的局势下，虽有宏愿，又怎能付诸实践呢!结果，反被陈宜中等人指责为高谈阔论，不适时宜而不予理采。

陈宜中既受命建都督府于临安，将“檄召诸路军马勤王，并令溃军务归所部。淮东隶李庭芝，淮西隶夏贵，沿江隶汪立信，京湖、四川隶朱祀孙，江西隶黄万石，”然而，溃军归队者为数不多。

后来，王愉与陈宜中意见不合，宋廷又命陈宜中为左丞相，留梦炎

为右丞相，王愉为平章军国重事。王愉曾就如何对付元军数次提出建议，均未被采纳，大为不满。他上奏宋廷揭露陈宜中用兵失误，指出，“今世杰以诸将心力不一而败，不知国家尚堪几败邪？”王愉的儿子也唆使一些学士，罗列陈宜中的过失，揭露“其误国将甚于似道。”并指出：“张世杰步兵而用之于水；刘师勇水兵而用之于步，指授失宜，因以败事。”这些说法，虽不甚全面，但点封了当时宋宰出战不利、屡战屡败的要害之处。陈宜中一气之下，离职而去厂腐败的宋君主无可奈何，赶忙罢了王爚，处罚了上奏的学土，清回陈宜中，致使正确的建议得不到支持，在军事上又失去了避免进一步失败的转机。

就在此期间，宋廷大事封官加赏，如升夏贵为枢密副使、两浙宣抚大使；加张世杰为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总都督府兵，加刘师勇为和州防御使，又以文天祥为浙西、江东制置兼知平江府。是年（1275年）十月，张世杰又被任命为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阴军和浙西策应使。同时，向全国各地发出诏书，号召诸将帅“有习兵略者，各以书来上”，企图以这些措施来摆脱困境。更为可悲的是，由于兵源不足，陈宜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下令把临安城内15岁以上的民众籍以为兵，号称武定军。但所征之兵老的老，少的少，大多是些孩子，不满4尺高，更无军事素。质，令“观者寒心”。

宋廷再次乞和

南宋朝廷闻元军分3路向临安挺进，更加丧胆。是年（1275年）十二月初五日，末廷遣将作监柳岳等带着宋主和太皇太后的谕书去无锡求见伯颜。在伯颜，柳岳梆岳声泪俱下地说：“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幼冲，且在衰经中。自古礼不伐丧，望哀恕班师，敢不每年进奉修好。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贾似道失信误国耳。”宋使想以哀乞感动伯颜退兵言和。当时，伯颜遵循忽必烈谕示，已不是满足于一城一地，而是要“直趋临安”，灭亡南宋王朝，统一全国。所以，他直截了当地对宋使说，“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盖天道也，不必多言。”

宋廷在派人乞和的同时，又在充实兵力，调整军队，力图保住临安。一方面，遣宗正少卿陆秀夫、邢部尚书夏士林、兵部侍郎吕师盂去军前视察、鼓气。另方面，开仓出钱，充实浙东诸郡县的兵备，以备与元军对垒。但这些努力，丝毫不能阻滞元军水陆大军的挺进。

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元军已占领独松关、平江、澉浦的危急情况下，宋太皇太后又命陆秀夫等再次去元军军营中乞和。陆秀夫等到平江求见伯颜，表示愿尊元世祖忽必烈为伯父，世代行子侄之礼，并答应年交岁银、帛各25万两匹。然而南宋君臣的哀求，终究挽救不了其即将灭亡的命运。

第三节 伯颜进军取临安

精心部署

伯颜接受了“率诸军直趋临安”的御旨后，深感责任重大。为此，他精心部署，周密运筹。首先，重视保证主力军南进的侧后安全，严密注意两淮宋军的行动。是年（1275年）十月二十四日，伯颜进一步视察了杨子桥和瓜洲一带元军的战备状况，并命部将博罗欢、阿里伯等率所部精锐步骑兵1万人据守湾头堡，严密注视扬州宋军的行动，防止他们乘隙出袭。

其次召集诸将布置南攻方略。倌颜到扬州附近的湾头堡时，召集阿术、阿剌罕、张惠、敏珠尔丹部将，传达了忽必烈的旨意，指授攻宋方略，以统一渚将帅的意志。到了镇江后，又召集阿术、阿塔海、董文炳等人进一步商讨，确定了“分诸军为三道，会于临安”的作战部署。另外，他按照忽必烈的旨意，罢了行抠密院，命阿塔海，董文炳同署行中书省事。建立起以伯颜为首、可以节制诸军的统帅部，以便统一指挥，协调行动。

第三，选择好进军时机。巧择进军时机乃是夺取作战胜利的重要顺素之一。根据忽必烈“俟秋再举”的意见，伯颜先于十月底调整了军队力量，巩固了建康、镇江、江阴一带基地，使军队度过炎热酷暑季节，避免行军中各种病疫的伤害。入秋后，天高气爽，人健马壮，有利于步骑兵快速机动作战。加之，当时进军湖南的阿里海牙已克湘阴（今属湖南）等地，进围潭州（今长沙）；进兵江西的宋都带、李恒等已占领隆兴（今南昌），抚州、端州（今高安）、建昌（今南城）、临江（今靖江西南）等地，屯驻瓜州的元军也多次击退扬州宋军突围，使之不能动弹。这样，助攻战场上已牢牢牵制住宋军，迫使他们难以增援临安。因此，伯颜选择了十一月初开始行动，其时机和条件便完全成熟了。

三路进发

是年；（1275年）十一月初九日，伯颜分军3路，分别自建康、江阴、镇江出师，会攻临安。西路军以参政阿剌罕，四万户总管奥鲁赤等率蒙古步骑兵号称10余万人，出建康，趋溧阳，广德，独松关方向，东路：军号称数十万人，由参政董文炳。万户张弘范、都统范文虎等率领，以水师沿江入海，向上海、海盐（今浙江梅盐）、澉浦（今海盐西南）进发；伯颜亲率中路军l万余人，出镇扛，水陆并进，向常州，平江进发，节制诸军。与此同时，伯颜又特地嘱咐阿术加强镇遏扬州宋军，防止他们乘机突袭南援。伯颜之所以选择上述路线分3路进军，这是因为：

（1）溧水、溧，阳、广德；独松关一线，是建康至脑安最近的通道，沿途丘陵星布、河湖甚少，而且宋军把守之城堡不多，利于骑兵驰突。伯颜以大队铁骑循道挺进，能充分发挥蒙古军善于野战的特点，快速进逼临安，大量消耗宋军战力，威慑宋廷，动摇宋廷的抵御信心。

（2）东边水道是宋水军能得以发挥战力之域，钱塘江口既是宋廷守卫临安的水上门户，也是其一旦失败后的主要退路。伯颜从大部水军

顺江入海，占领澉浦海口，就能阻上宋水军增援临安，堵截宋廷海上逃路。这是忽必烈接受当年金元兀只从陆路攻临安、致使宋高宗赵构自海上逃遁的教训后采取的有效措施。

（3）常州，无锡，平江、嘉兴一线，是宋军重点防守地带。沿途虽城堡密布、河汊成网，宋军守备甚严，但运河南北相通、道路纵横，利于水陆配合攻击。伯颜意识到，如不突破此线，难以摧毁宋军的防御力量，如避开此线，陆上单路进军，既有纵敌溃逃或侧后被袭之危险，故非打通此道不可。伯颜料定此路担当之任务关系重大，故亲自指挥水陆军自镇江出发，沿运河南攻。

溧阳伍芽山之战

元西路军主帅，参政阿剌罕受命后，即同奥鲁赤、千户高兴等率步骑大军自建康南行，进至溧瞄（今属江苏）时遭宋守军抗击，经一番激战，守将吴、杜、李三总管战死，溃军急向南撤。元军追击，至溧阳西南的银林东坝时又与宋军大战。因元军气锐，宋军再次败溃，退向伍芽山（亦称护牙山，位于东坝东南）。此时，宋援军赶到，在伍芽山之庆丰圩阻击元军，两军激战多时，宋军难以阻挡元军铁骑的冲杀，最后丢下伤亡将士，突围南逃，此战中，宋将祝亮等72名将校被俘，宋兵前后降亡者近2万人。阿剌罕乘胜追击，占领建平（今安徽郎溪）。

独松关之战

元军在伍芽山获胜后，紧随宋溃军南追，十一月千九日攻克广德。随即马不停蹄，继续南进，迫进独松关（今浙江余杭西北）。此关，东西有高山幽涧，南北有峡谷相通。关南10里处，左看百丈关，右有幽岭关，合称独松三关，是建康经广德通向临安的咽喉要地。宋将张濡以数千精兵扼守该地，拱卫宋都，二十一日，张濡向朝廷告急，宋丞相陈宜中急命驻守平江（今苏州）的文天祥移军增援独松关。当时，中路元军已攻破常州，文天祥欲在平江组织抗元，但因陈宜中一再严令催促，不得已将守平江的任务交给部属王举之和王邦杰，自率帐兵2000人移守余杭。

二十二日，张濡率军北上，欲阻击元军。至吉安州上柏镇与南下的元军骑兵接战。宋军虽奋勇冲杀，仍难以抵挡元军马队的两面夹攻，不多时就纷纷溃败。副将冯翼被俘杀，损兵2000余人，张濡仅带数骑杀出血路，突围而逃，后亦被迫兵所杀。次日，元军占领独松关，附近郡县守军闻风丧胆，或遁或降，土崩瓦解。

常州之战

常州地处运河要襟，北有吕城为屏，南与无锡、平江连成一线，唇齿相依，实是护卫临安的前沿堡垒。早在1275年三月元军占领建康后，即分兵进攻常州。当时，宋常州知州赵汝鉴迫于元军的威慑，弃城逃跑，安抚戴之泰开城投降。元丞相伯颜即命戴为该处主管，又进驻部分

元军。然大多宋军民不服元军控制，在姚訔、陈烟策划下，组织了2万义军。他们在来自江阴的援军配合下，设计杀尽守城元军，一举收复常州，俘获戴之泰。

宋廷得知常州收复，下诏褒奖姚訔等人，授姚为常州知州，陈炤为通判，负责坚守该城。另又派副统王安节带兵到常州协助守御。晋陵人胡应炎也“选民之壮勇者三千人，自将乘城。”并说服父子、兄弟一同进城抗元。还有护国寺的万安，莫谦之长老组织的500名和乓，也参加抗击元军的行列。常州城内外出现了军民联合守城的壮观景象。

是年八月，伯颜自上都南返后，得知常州被宋军民收复，立即派元帅唆都带领大量军队去攻，并派部将怀都与万户忽刺出、帖木儿率一部军夺占吕城，宋军突围南逃常州，元军追击，获战船100余艘，先拔除了常州的前哨阵地。

由于常州城内外军民的坚决抵抗，唆都围攻该城4个月，难以得手，使元军整个进取临安的军事行动受到滞阻。伯颜遂手十一月初三分路南攻时，亲自率中路军进攻常州。

常州守城主将姚訔见元军日增，急派人向朝廷求援。不久，宋援军自平江（今苏州）北上，至五牧、虞桥（今江苏常州东南）时，遭到元军的有力阻击。（详见后“五牧之战”）至此，常州成了一座孤城。

十一月十六日，伯颤亲临城南督战。他命降人王良臣胁迫当地民众运土堆台，垒至与城头相齐。然后置炮其上，向城中昼夜猛轰，摧毁了城内外的抵御工事，又发火箭焚烧城内建筑，使常州城陷入一片烟火之中。十八日，伯颜命架云梯，绳桥，指挥帐前军带着帅旗先登，其他将士亦大呼而上，不久即占领城头。姚詈亲在阵前指挥，与诸将士一起浴血奋战，但终因粮尽攘绝，寡不敌众，英勇战死。城南亦被元军攻破。然而，常州军民抗击元军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万安、莫谦之长老得知南门被破，急率所部兵高举“降魔”大旗，直奔商门，与元军厮杀。伯颜见部下与和尚兵作战有些胆怯，就迫令投降的宋军领先冲杀。500名和尚兵终因孤立无援，全部战死。守将王安节’（合州守将王坚之子）、陈熠、胡应炎等在城破后转入巷战，功；因体力不支，先后阵亡。刘师勇自东门转战到北门，乘战乱拔栅突围，带着数骑溃逃平江。常吵》，军民宁死不屈、坚决抵抗的行动，激怒了元丞相伯颜。他下令屠城，一时间常州城内烟焰弥漫，死尸遍地，大部军民惨遭杀戮，“止有七人，伏于桥坎获免。”后来，文天祥战败被俘，押送北上，途经常州时，曾写诗悼念常州军民当年的壮烈行动。

由于常州所处的战略地位，关系到能杏顺利进取临安，故伯颜不惜一切代价要先攻取此城。抿史料记载，在进攻常州时，‘除了伯颜亲临指挥外，参与率军作战之将领还有行省右丞阿塔海、权行枢密院事怀都、建康安抚使唆都及其子管军总把百家奴、万户忽剌出、万户忙古歹等10余人。所用之兵力，前后总计约20万之多。常州之战是宋元战争史中最

激烈、最有影响的战，役之一。

五牧之战

1275年冬，常州守将姚訔等人指挥城内军民依险击退元军多次进攻。由于城内情况危急，曾几次向朝廷求救，均得不到有力支援。时至十月二十六日。宋廷才派张全率淮兵2000人赴援常州。文天祥视张全所率的兵太少，无济千事，即命部将尹玉、麻士龙、朱华等率广军、赣军3000人，偕同张全支援常州。

正在常州指挥攻城的伯颜闻报宋军来援，即命部将怀都、王良臣领军数千至五牧阻击。五牧，位于常州东南约40里处，与西边之虞桥隔运河而立，是常州的屏障。宋将麻士龙率所部在虞桥与元军接战，张全却握兵自保，不发一矢，致使麻士龙寡不敌众，战死。张全见元军向己方运动广赶忙退至五牧。时尹玉、朱华驻军五牧山之东西。欲掘堑壕、筑鹿角，以备攻守，却被张全阻止。元军乘胜追击，渡运河攻击朱华所部。朱华牢广军奋战，自辰至未，不分胜负。当晚，元军乘夜暗绕至山后，，欲袭击尹玉麾下赣军。尹玉，原为宋镇守江之将，后随文天祥入卫。此时，他抱着效忠朝廷之志，？指挥宋军与元军死战，使元军损失惨重。后因元将王良臣以水陆配合进攻，加之宋将张全按兵运河西岸，坐视虎斗，尹玉所部遂大败。宋俾将曾全、胡遇、谢荣、曾玉等率所部军逃遁。溃军争相泅水逃命。有些入挽住张全的战船求救，却被张全下令斩去手指，使许多士卒溺死水中。

尹玉视朝廷将官如此腐败，义愤填膺，收集残军500人，复与元军死战。元军除以骑兵挥刀砍杀，又用大量弓弩手放箭，宋军纷纷中箭倒地。尹玉挥剑左右拼杀，身上多处中箭，血染战袍。他奋战一夜，终因力尽被俘杀。其所部将士继续与元军激战，大部战死。张全见势不妙，急率所部匆匆逃离五牧。文天祥在平江得知张全贪生怕死，坐失战机，欲斩张全以警告溃逃之人，激励将士抗元，但为宋廷所阻。

五牧之战，元军虽然成功地阻击了宋援军，使常州更趋孤立无援，保证常州之役的胜利，但也损兵千余，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进占无锡、平江

元军中路攻破常州，拔除了进取临安的主要障碍，宋都的外围防线随之解对诸将所说，“师勇所过，城守者胆落矣。”然而，宋军少部水师和反元民众武装仍在太湖中活动，时常出袭南进的元军。方平息这股抗元势力，伯颜于十广月二十一日遣万户忙古歹、晏彻儿率所部水军数千人进入太湖追捕，平息了抗元军民。

为了稳住宋廷君臣，伯颜在常州派降人游分实带着诏书副本去临安敦促宋廷股降。诏书指明只要宋执政大臣降附，即可保证奄宋族属的安全。伯颜知道，宋廷君主年幼，权力全在军政大臣脨宜中，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人之手，只要招降上述权臣力将，那就不怕宋廷不降。

伯颜在安抚常州军民的同时，派都元帅阇里帖木儿、万户怀都等率部先趋无锡，招讨使唆都、宣抚使游显等先往平江。无锡守军及平江守将王邦杰，王举之先后降元。当时，元西路军遣使来报已攻取广德，逼近独松关，东路军亦报告说已占领江阴，正准备东进入海，伯颜闻报，甚为满意，特别是对西路军的战绩“深然之”。

十二月四日，伯颜留任宋行省都事马恕为常州尹，治理该城，自率大军南进，次日到了无锡。十一日，平江守将王邦杰，王举之等至寒山寺南迎降。于是，伯颜顺利进入平江，登城视察，随即撤了守城宋军，代之以元军布防。随后，他召集部将，通令“诸军不得辄入人家，扰害百姓，犯者重罪。”

伯颜在无锡、平江驻军1个月，在此期间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一是召集诸将分析战局，传达了忽必烈对进取临安奏议的复旨。译史阿里自京师（今北京）返回，报告皇上“俱准所奏”的旨意，进一步明确取临安的策略。二是数次接见宋使，表示强硬的态度，催促宋廷速降。三是嘉奖有功将领。任命范文虎、忙古歹同行两浙督事；王邦杰充安抚使，王举之为温州安抚使，又命张弘范等军留驻平江待命。四是整顿军纪。“号令诸将，将所部军兵序各翼行伍，俾令前行。其旌旗戈甲等事，务要精整。其全家属辈留之于后。仍省会严禁诸军不用抄掠生口、侵夺人财、焚烧民屋。如有犯者，即以军令从之。”这一系列行动表明，伯颜是在做进取临安，接受宋廷投降的准备了。

进占江阴

江阴，位于长江入海咽喉之地，“北眺维扬，南挹姑苏，东窥海虞，西京口（今江苏镇江），一方之大观，列郡之雄胜，”是控扼长江之要塞。宋军留有重兵把守，亦是南宋水军的重要基地之一，宋将张世杰兵败焦山以后就曾带着部分战船逃至该处。伯颜深知江阴地势险要，故在1275年春占领建康后，就派人去招降。宋江阴军佥判李世修迫不得已请降，但不久复变。

是年十月，元参政董文炳再次派人往江阴招降，李世修在援军被截、粮草奇缺的情况下，迫于威慑，才无奈献城投降。董文炳即报请伯颜，授他为江阴军安抚使。元军进驻江阴后，修葺江防，扩充兵力，增造战船，使之成了元水军的重要基地。十一月，元军3路南进时，董文炳及万户张弘范、张祇，都统范文虎、王世强、管如德等分别率所部水军在江阴集结，号称数十万之众，以范文虎为先锋，浩浩荡荡，顺江东下。

招降朱清、张碹

当时，江阴以下之长江两岸已无采军扼守，小股抗元民众也无济于事，故元军能顺利挺进。然而，长江口却有一支水军出没，战力甚强，不得不引起董文炳的注视。这支水军就是由穷苦渔民组成的、由朱清、

张瑄统领的海—亡游击军队。他们“甫自通海（今江苏南通至海州），北至胶莱（今山东胶州湾至莱州湾），往来飘忽，聚党至数千人，海泊五百艘，”常使那一带豪富达宫惶恐不安。宋军曾派人招安，命其为防海民议，隶提刑节制水军，但朱清、张碹不顾受朝廷制约，一直漂掠于数千里沿海水域，劫富济贫，深得民众支持。

董文炳摸清了这支水军的内情后，感到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便遣招讨使王世强和董士选去招降朱清、张瑄。董士选侦知张瑄的驻所后，即单舸前往，谕以威德、陈以利弊，终于说服了他们，招降了这支海上武装。朱清、张碹带着全部人员和海船，随同董文炳南下，进取临安。董文炳招降朱、张，化阻力为勘力，增强了元军的海战能力和海上运输力量。

随后，董文炳所部水军沿海南下，进军迅速。虽然自江阴出发时，西路军已逼近独松关，中路军已攻克常州，但时至十二月十一日，董文炳“所部军已下许浦，澉浦”，控扼钱塘江口。可见，后来的进军速度也是非常迅速的。

三路会师

至元十二年（1275年）十二月中旬，3路元军已按照预定方案迫近宋都临安（今杭州）。东路军庞大的船队已占领澉浦海口，截断了宋廷海上逃路；西路军不但巩固了已占领的独松关，而且控制了武康（今浙江德清西）、德清及安溪（今杭州西北）等地，随时受命进取临安。伯颜所率之中路军亦加快了进军速度，不久就夺取了湖州、嘉兴、崇德，进占临安郊区之要地。

在伯颜统率的3路元军接近临安的同时，其他战区的元军也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荆南，江西、两淮等次要战场的配合下，伯颜所率的主力不仅完全控制了宋都临安，而且还进一步巩固了已夺取的地盘，为继续追歼南宋残部打下了基础。

次年（1276年）正月，元将董文炳率一部兵登陆，抵盐官（今浙江海宁西南），即向守军招降，宋守将不予理采，再次促降，仍无动静。元军副将请攻城屠杀，为主帅董文炳阻止。他说：“（此）县去临安不百里，声势相及，临安约降已有成言，吾杀一人，则害大计，况屠一县耶。”元军之“大计”就是要宋廷投降，董文炳力戒节外生枝，正是为了避免防碍全局。董文炳再遣人入城劝说，宋守军终于降服。

十六日，董文炳率将士至长安与伯颜会师。次日，西路军阿剌罕也率部会师于皋亭山（今杭州东北郊）。

在大军压城的态势面前，临安城内的宋廷君臣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片混乱。丞相陈宜中哭着向太皇太后乞请移宫出逃，仍被拒绝。张世杰、文天祥等主战者却认为“京师（指临安）义士，可二十万，背城借一，以战为守”，或有求存之机。并请求三宫入海，由他们组织军民拚死

守城，还是没有被接受。宋帝和太皇太后知道，海道和浙江（今富春江）已被元军堵截，整个宫廷；人员南逃已不可能。如组织抵御，，只能落得个生灵涂炭。所以，就一面准备投降，一面着手送赵星，赵昺二王南逃，以留赵宋之根，欲图东山再起；十七日，宋帝封赵星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封赵昺为广王，判泉州兼南外宗正事，并于当夜在陆秀夫、杨镇等人护送下出嘉会门，自陆路经婺州（今浙江金华），南逃温州。陈宜中，张世杰等也乘夜带一部遁去。

宋廷降元

此时的宋廷，求和不成，反击无力，欲守无望，欲逃不能，只留下一条投降之路。

正月十八日，宋帝赵、太皇太后谢氏派遣知临安府贾余庆，同宗室保康军承宣使尹甫、和州防御使吉甫等；人奉传国玺及降表至皋亭山（今杭州市东北）向元丞相伯颜清降。降表中写道："宋国主累谨百拜奉表言:眇然幼冲，遭家多难，权奸贾似道，背盟误国，至勤师兴问罪。非不能趋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归，将焉往!谨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四卅，两淮见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慈垂念，不忍三百余年；宗社遽至殒绝，令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

伯颜接受了宋的国玺、降表，即派千户囊加带、省掾王送往大都（今北京）。对宋的降表，伯颜虽欣然受之，但对其中某些词语仍感不满，如降表仍书宋号、没有称臣等。故他遣程鹏飞、洪君祥随同来使贾余庆回临安交涉，要求重写降表，并约定宋丞相陈宜中至长安镇面议降事。

正月十九日，宋廷因丞相陈宜中逃遁，只好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让其代替陈宜中出使元营。次日，文天祥偕同吴坚、贾余庆，谢堂去长安会见伯颜。双方坐定，文天祥严词以对："北朝若以宋为与国，请退兵平江或嘉兴，然后议岁币与金帛犒师，北朗，全兵以还，策之上也。若欲毁其宗社，则淮，浙闽、广尚多未下，利钝未可知，兵连祸结，必自此始。"

伯颜谈了元帝忽必烈诏谕的意思，衷示保护宋廷宗室的安全，不杀掠百姓。他发现文天祥才华出众，不服招降，放之会有。后患，就留文天祥在军营中，让吴坚等人回去。

二月初五日，宋廷按照伯颜的要求，修改了降表，宋帝赵黑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到祥曦殿"望阙拜伏"乞称藩辅。这样，伯颜才表示满意接受。随后，伯颜又令程鹏飞进城取了宋太皇太后酌手诏及三省，枢密院官员吴坚，贾余庆等人的檄文，以便派人去各处诏谕未降之州郡降附。

对临安的控制

南宋二王及陈宣中、张世杰等人逃遁后，伯颜急忙派兵据守临安西南面，并沿路追击逃跑的宋廷人员。随后，他进一步作7部，对临安严加控制，以防止宋残部卷土重来。二月，他“令诸将分兵镇守临安”。在近郊，遣阿刺罕、兀鲁齐所部蒙古汉军镇屯西湖，钱塘门等处，阇里帖木儿，怀都所部镇守临安城西之钱塘，晏彻儿、刘源等镇守临安城北之湖州市。并在湖州市北布屯了水弩炮部队及其他万户麾飞下之兵。此外，伯颜又遣军控制临安四周要城。命万户昔里伯、史枢镇守湖州，总管孙嗣、唐拾镇守建德（今浙江建德东北）；总管高兴镇守婺州（今浙江金华），孟安抚镇守衢州（今浙江衢县）；部将仁和、黄头所部屯驻富阳，部将相威等所部驻盐官（今浙江海宁西南）；部将焦兴、黄顺军屯驻德清（今浙江德清）。这样，多层次驻防，“如犬牙柑御”，完全截断了临安对外的联系，亦为下一步继续南进、追歼宋廷残部做了军事上的准备。

对宋廷之处置

宋廷投降以后，摆在元丞相伯颜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处置好宋廷君主、宗室、官员及军队；物资等。伯颜禀承世祖忽必烈的旨意，为了不使宋都临安城内“三百年之积，焚荡无遗”，在受降后的第二日，目口正月十九日，就分别遣董文炳，吕文焕、范文虎等人率轻骑至临安北关（今杭州垦山门一带）巡视，安抚城内外军民。次日，他下令“禁军士入城，违者以军法从事。”同时，又遣吕文焕持黄榜进城谕陆安全体军民“安堵如故”，严禁乘乱杀掠、扰乱民众、破坏宋氏财物。从而，很快安定了临安城内外的秩序。

二月十一日，伯颜接到忽必烈诏谕临安新附官员、士民、军卒的诏书。书中写道：“……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觐之礼；已遣使特往迎致。尔等各守职业，其勿妄生疑畏。凡归附前犯罪，悉从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征理。应抗拒王师及逃亡啸聚者，并赦其罪。百官有司、诸王邸第、三学、寺、监、秘省、史馆及禁卫诸司，各宜安居。所在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余物权免征税。秘书省图书，太常寺祭器、乐器、法服；乐工、卤簿、仪卫、宗正谱牒，天文地理图册，凡典故文字，并户口版籍，尽仰收拾。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闻。名山大川，寺观庙宇，并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拆毁。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赡给。”这样，就进一步明确了对宋廷各方面处置的具体做法。

当时，临安城内除了宋君廷的侍卫军外，还有文天祥招募的2万余名勤王军及陈宜中招的部分“武定军”。尤使伯颜不放心的是文天祥所部军队，所以他于正月二十五日，专派都镇抚唐古带、赵兴祖等进城先遣散了文天祥所招之兵，发给文榜，令他们各还乡里。接着，于二十八日，又派人去处置宋廷的侍卫军及其他兵员。有的当即被分置到元军部下，有的被调至城外另行派遣，有的则发给文榜令其还乡，各有归宿。

对于临安城内宋廷的财物，伯颜按照忽必烈的旨意实行保护政策。

元军3路会师后，伯颜即令诸军严禁“抄掠生口，侵夺人财，焚烧民屋，”重申“如有犯者，即以军令从之。”宋廷投降后，他又下令禁止军队入城，从而使宋廷财物免遭兵乱浩劫。二月五日，伯颜在安抚了宋廷君臣、稳定宫内秩序后，派张惠、阿刺罕、董文炳及左右司官石天麟、杨晦等入城，阅实仓库，收缴宋百官诰命符印，罢去宋廷各个官府，并运取了军队所需之钱粮。十一日，又遣原宋内侍官王埜入宫，收缴了宋廷的衮冕、圭璧、符玺及宫中图籍、宝玩、车辂、辇乘、帐册、麾仗等物。后来，又把宋秘书省所封存的禁书图籍一并收走。三月初二日，伯颜亲自入临安视察时，还派郎中孟棋把宋祖殿庙及有关院、寺中的祭器、乐器、册宝、仪仗等物加以登记造册。伯颜“悉收宋之所贮宝玉”，北返时命部将张瑄把大批财宝、器物。图籍等用海船运往大都（今北京）。

对宋主、宫室及官员的处置，关系到下一步的战局，伯颜在处理时尤为慎重。他曾与谋臣孟祺议论取临安之大计，特别强调要注意防止宋廷人员南逃闽，广。于是、伯颜振人去临安安抚，注意他们的动向。宋廷投降后，伯颜一面遣囊加带把宋的国玺降表送往大都，向忽必烈请示如何处理面临的问题，一面派宣抚程鹏飞。千户洪君祥等入宫，安谕宋谢太后，并派兵对宋宫廷实行监护措施。

二月二十四日，伯颜接到忽必烈的诏书，要他带宋君臣去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觐见。忽必烈的这一决定，显然是为了防止南宋的残余势力与已降君臣联系，打消他们的复宋企图，消除后患。

伯颜完全理解忽必烈的旨意，在部分宋廷人员南逃的情况下，仍再三派人入宋宫做幼帝及太皇太后的工作，以稳定他们的情绪。三月二日，伯颜亲自入临安。他在万松岭驻地召集诸将，按照忽必烈的诏旨，布置了北返行动。他预料，此次行动，人众路远，责任重大。为保途中安全，他于三月十日先离临安，去瓜洲部署，密切注视两淮未降宋军的行动。随后，阿塔海，阿刺罕，董文炳、张惠等于十二日带着军队入宫，宣示忽必烈的诏旨“兔系颈牵羊之礼。”然后，乘夜把宋幼主赵、皇太后全氏及其他宫人、学士等带出城外，在北新桥上船。谢太后因疾暂留。次日，船队在元军的监护下启程，浩浩荡荡，凄凄泣泣，水陆兼。行，缓缓北去。至此，立都临安的南宋朝廷宣告覆灭。

元军分路自建康南下攻取临安，是宋元战争中一个关键性的。阶段。由于元军运用战抚兼施方略冲垮了宋军的道道防线，因而取得战略决定性的胜利。另一方面南宋军民英勇抵抗，视死如归的悲壮情景，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十三章 残宋势力覆灭，宋元战争结束

第一节 元军初定东南

南宋降元后的东南态势

宋室降元并不意味着宋元战争的结束。当时，尚未降附的州郡，还有，“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两淮、四川见存州，郡”。继续为赵宋王室战斗的抵抗力量，包括三部分：一是由陈宜中、张世杰等臣僚先后拥立的赵是、赵昺二王建立的逃亡政权，及其所率之军队，二是由原南宋将领李庭芝和姜才在淮东、马塈在广西、文天祥在江西、张珏在东川所率之军队，三是由在元朝占领下的江南各地各族人民，响应二王政权所组成的抗元武装。这些抵抗力量分散于各地，缺乏统一的指挥部署，难以互相联系配合，因此其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很难持久的。

另一方面，从元朝来看，由伯颜、阿里海牙、宋都带及其后继者所率的元军，在战略上已将亡宋残余力量完全分隔，并始终处于进攻追击的态势。由于有元王朝的统一的政令和军令，有丰裕的物资供应和可靠的兵源；有辽阔的回旋地域和交通运输，有多年积累的攻城和招降的经验。因此，最后阶段的宋元战争，是一场力量十分悬殊而又充满激烈抵抗的战争。

下面，先将宋室降元后，元军相继攻占东南各地的情况作简要的介绍。

两淮的平定

焦山战役后，淮东制使李庭芝、、淮西制使夏贵虽被驻守瓜洲、镇江的阿术部封锁，又为长江天堑阻隔，与宋浙西、江东割断子联系，但直为宋守土。1276年宋室投降后，伯颜于二月十九日招谕李庭芝、夏贵及其所辖州、军、县、镇官吏军民，令其投蜂。夏贵早在从丁家洲败逃庐州时，就曾向元军表示过愿意“内附”。至是，夏贵即派人向伯颜申称：“公毋吾攻为也，吾主，降吾即降矣。”于是夏贵遂以淮西州郡来降，元将昂吉儿进入庐州，受命为淮西宣慰使。但夏贵家僮出身的洪福，时为镇巢雄江左军统制，镇守江北，与其子大渊、大源、下班祗侯彭元亮，联络夏贵余部，一举收复镇巢，继续抵抗。夏贵既已降附，便以主子身份招谕洪福，被洪福拒绝。又派其从子前往，为洪福所杀。元军攻城，久不能下，便派夏贵亲至城下，与洪福通话。夏贵请求单骑入城，洪福信以为真。待打开城门，伏兵四起，将洪福父子俘获。洪福在刑场上大骂夏贵，历数其不忠，请身向南而死，以示不背叛南宋朝廷。至此，淮西尽为元有，得府2、州6、军4、县34，户513，82F万、口1，021，346万。

驻守扬州的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在抗元斗争中屡立战功，是元军的

广大心腹之患。1276年宋室降元后，谢太后及瀛国公诏渝李庭芝降元，李庭芝登城拒之曰：“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不久，宋室两宫被押送大都，至瓜州，谢太后再次诏渝李庭芝曰:“此诏卿纳款，日久未报，岂未悉吾意，尚欲固圉邪？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之？”李庭芝不予回答，但命弩手射杀使者一人，其余的人才连忙退去。李庭芝又与姜才截夺两宫，以4万人夜持瓜洲欲救驾，鏖战3时，元军连夜解押两宫：北去。姜才追战至浦子市，仍穷追不舍。阿术派人招降，姜才答道:“吾宁死，岂作降将军邪!”三月，阿术派大军驱使夏贵降兵至扬州城下，一面进行政治诱降，一面炫示军事威势，派人带着诏书前来招降。李庭芝杀使焚诏，表示：“吾惟一死而已。”不久知淮安州许文德、知盱眙军张思聪、知泗州李兴祖都因粮尽援绝而降。李庭芝不得已，“犹括民间粟以给兵，粟尽，令官出粟，粟又尽；令将校出粟，杂牛皮、蘖以给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犹日出苦战。”

在此之前，扬州靠真州、泰州、通州、高邮、宝应接济粮食，但自从阿术立木栅子扬子桥，截断淮东粮道以后，扬州南面交通完全被元军封锁。后来，阿术又在北面湾头筑城堡，以“断通、泰往来之路”。南北两营每日派哨马巡查，早晚合哨，企图困死扬州。为解扬州之围，姜才于四五月间屡派兵攻湾头堡均无成效。冯都统从真州率兵2000、战船百艘袭击瓜州，也被阿术派昔县里罕、阿塔赤打败，冯都统被追至珠金沙，赴水而死。各州只有趁哨过之后，潜运粮物入扬州，或由姜才自真州、高邮武装运米，以给军食。六月十一日晚，姜才带领步骑数千运粮，趋丁村堡，与元将史弼、苫彻兵相遇，双方激战达旦，阿术派大军从湾头堡前来援救，史弼等始险脱，并截获米5000余石而去。

长期围困，使李庭芝一度产生动摇，一日，他屏退左右，与姜才密计，二人发生争执。从此，姜才派兵守卫李庭芝宅第，“期与俱死”。七月，忽必烈采纳阿术建议，下诏赦免李庭芝“焚诏之罪，使之降”。由于姜才的坚持，李庭芝终于拒绝了元军的招降。

这时，在福州建立逃亡政权的宋帝赵昰，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李庭芝，以龙神四厢都指挥使，保康军承宣使召姜才。二人决定泛海南下，继续为宋室效力。李庭芝以朱焕代理淮东阃帅，留守扬州，与姜才一起带7000兵东至泰州，准备取道通州入海。不料朱焕在李庭芝一离开扬州后，就投降了元军。七月，阿术驱赶扬州兵士妻子追至泰州城下，将城包围，派人招降。适姜才因病不能作战，陴将孙贵、胡惟孝等开城门投降。李庭芝闻讯，急赴莲池，水浅不得死，遂被俘，姜才病卧在床，亦被俘，一起被解押回扬州。阿术见姜才忠勇有为，欲说降以为，己用，姜才肆以谩言相对；阿术呵责李庭芝不降，姜才答称：“不’降者（姜）才也。”降将朱焕竟刁嗾道：“扬自用兵以来，积骸满野，皆庭芝与才所为，不杀之何俟？”于是李庭芝被斩首、姜才被剐于扬州。

泰州降时，咨议官宋应龙夫妇自经而死。不久，提刑司咨议褚一正在高邮督战负伤，投水而死；知兴化县胡拱辰于城破时死。通、滁、商邮等州相继投降；淮东尽为元军占领，得州16、县23，户542，624

万、口1，083，217万。

静江之役

1275年秋，忽必烈派伯颜率兵直趋临安时同时，又命令右丞阿里海牙进取湖南，蒙古万户宋都带等人进取江西。

到伯颜兵下临安之时，阿里海牙已夺取了岳州、江陵，所部正向潭州逼近。是年（1276年）正月初一潭州为元军占领，旬日之间湖南州郡相继降元。三月，根据荆湖南路行中书省建议，分命诸将镇守湖南各州郡，初步稳定了元朝对荆湖南北的统治。闰三月，阿里海牙应召赴阙。六月八日，受命出征广西，增选3万兵，交他指挥，加强了湖广战场的攻击力量。七月个四日，诏谕广西路静江府等大小州城官吏，令其投降。

静江守将马塈，出身于名将世家。咸淳中，马暨知钦州，后徙知邕州。邕州与大理、安南接壤，傍通诸溪峒少数民族。他在任期间，政绩显著，边陲晏然。后以左武卫将军征召入朝，会宋室投降，滞留静江，总领屯戍诸军，掌广右经略司。阿里海牙扔定湖南后，派总管俞全等前往静江招降马暨，为其所杀。至宋室降，降谢太后手诏遣湘山僧宗勉往谕马塈，又为其所杀。阿里海牙致书千余言，反复以天命、地利、人心劝降，并许以广西大都督官职，马塈仍不为所动。阿里海牙遂持元朝招降广西静江府等，大小州城官吏诏书，前往静江。

十一月，元军先遣部队至严关（今广西兴安县西南17里）。严关自古有“重险”之称，“两山壁立，中为通道”，“实为楚粤之咽喉”，严关失守，则静江不保。马竖立即组织所部和诸峒少数民族兵丁据守静江，自将3000兵开赴严关。到严关后，凿马坑，断岭道，阻扼元军南下。阿里海牙攻不能克，乃以偏师绕道平乐（今广西平乐），溯漓江而上，过临桂＜今广西临桂），夹攻严关。马暨兵败，退保静江。元军继败都统马应麒于小溶江，逐逼静江。阿里海牙录忽必烈招谕静江诏书，派。人以示马塈，马塈焚诏斩使，以示不降之决心。静江依水为固，元军进攻凡3月，皆不得要领；马塈衣不解甲，前后凡百余战，城中死伤相藉，讫无降意。元军“乃筑堰断大阳、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派大军佯攻西门，以精兵。“决东南埭，（土坝），以涸其隍”，攻其东门。元将史格所部以犊辒（攻城用战车）攻城，但因炮（擂）蔽地，辒无法靠近，史格“乃伺隙率众攀堞，蚁附而上。”于是，元军不但破坏了宋军设在静江水上防线的优势，而且采用声东击西和攻坚战术，将外城攻破。安抚李梦龙率众降元。马塈率兵退守内城，元军遂得利用其兵力优势，又破内城。城内百姓纵火焚毁居室，多赴水死。马塈率领死士进行巷战，因手臂为刀所伤，遂被俘。其总制黄文政（又作贺文振）、总管张虎欲率残兵突围，亦被俘。邕守马成旺及其子马应鳞降。马暨部将娄钤辖犹以250人坚守月城继续抵抗。阿里海牙以为不足攻，派兵围困10余日。娄钤辖站在墙壁上喊话：“吾属饥，不能出降，苟赐之食，当听命。”元军信以为真，送牛、米入内。月城内将士饱餐一顿后，鸣角伐鼓，燃一火

炮，“声如雷霆，震城土皆崩，烟气涨天外”，娄钤辖与250名将士遂与月城同归于尽。城外元军也多有惊死者。

静江破后，阿里海牙认为“静江民易叛”，不同于潭州，“不重刑之，则广西诸州不服。因悉坑之”。马塈、黄文政、张虎皆被斩首示众。接着，分遣万户脱温不花徇宾（今广西宾州）融（今广西融水）、柳（今广西柳州）、钦（今广西钦州）、横（今广西横县）、邕（今广西南宁）、庆远（今厂西宜山），齐荣祖徇郁林（今广西玉林）贵（今广西贵县）、廉（今广西廉州）、象（今广西象州），脱邻徇浔（今广西桂平）、容（今广西容县）、藤（今广西藤县）、梧（今广西梧州），皆为所下。阿里海牙以史格留守静江，郑何，朱国宝、刘五刚、赵五刚、赵挂、赵修已分戍贺（今广西贺县）、昭（今广西昭平）、梧、融、邕等五州，马天鳞等10名千户戍浔、宾等10州，然后返回潭州。

静江战役前，广西西部诸溪峒少数民族领袖，原已投降云南行省，维持着羁縻关系。史格认为，左右江地区犹如邕州手足；归降云南，乃是认为广西无力控制，必然经常寇扰。在静江战役后，他遣人往说诸部，于是特磨道（今云南广南）将军农士贵、知安平州（左江支流黑水河边）李维屏、知来安州（今广西田阳）岑从毅、南丹州（今广西南丹）牧莫大秀，督各以所属州县，溪峒户25□6万来附，其官职依旧。

江西的平定

进攻江西的行都元帅府由蒙古万户宋都带、汉军万户武秀、张荣实，李恒、兵部尚书吕师夔等人组成。当阿里海牙在湖广战场向潭州逼近时，宋都带（又作逊都台）为首的江西都元帅府也采取军事行动，向隆昌（今江西南昌）进军。1276年初，元军至瑞州（今江西高安），知州姚岩弃城逃跑。接着，知临江军（今江西清江）腾岩瞻亦逃遁。二月初三日，元军进占临江军。

这时，隋从文天祥勤王的，“郡中豪杰”和“溪洞蛮”在浙江富阳被遣散，大多返回江西。但他们满怀入卫宋室热情赴援，却倍遭冷落败兴遣归，加之群龙无首，-也难以立即在江西组织有效的抵抗。不过李恒并不轻视这支散乱的力量，他拿出一纸所谓军中截获的《宋相文天样与建昌故吏民书》，当众焚毁，以示不疑，安定人心。宋都带还以隆兴，建昌、抚州虽已降附，“而闽、广诸州尚阻兵，乞增兵进讨。”忽必烈敕命调襄汉军4000人交他统率，加强了进攻力量。

经过2个多月稳定民心和兵力调整工作，李恒于闰三月南攻吉州，知州周天骥投降。接着，又攻下赣州和南安罕（今江西大余），“平堡栅六百余所”，进达大庾岭。广东经略使徐直谅慑于元军威势，连忙“奉蜡书纳其所部十四郡”降元。黄万石身为江西制置使，坐视境土丧尽，竟由建昌军逃亡邵武军（今福建邵武）。

建昌军治设在南城。当时南城领村人吴楚材纠集民兵，请求黄万石

派兵援助，组织抗元斗争。黄万石正欲投降元军，拒绝吴楚材请求，而授以迪功郎、权制置司计议官，加以安抚，却申戒不得兴兵。吴楚材不听，二月，在领村组织民众，准备攻城。当钲鼓震响，进至城郊龟湖，元军分3道而至，夺走攻城器械，迫使吴楚材退回领村，竖木栅以拒元军。此事传到赵呈元帅府，帅府承制迁吴楚材宣义郎，带行太社令，知建昌军，使其再次举兵抗元。但这项任命为黄万石扣压。吴楚材受挫后，因缺乏援助，在元军诱降下，许多人皆散去，吴楚材带领其子吴应登逃亡光泽（今福建光泽）。不幸吴氏父子在光译为人所执，黄万石派录事娄南良讯问曰：“汝何为错举？”吴楚材义正辞严答辩道：“不错，不错!如府录所为，乃大错尔。府录受宋官爵，今乃为敌用事，还思身上绿袍自何而得？吾一鄙儒，特为忠义所激，为国出力，事虽不成，正不错也。”后吴浚任江西制置招讨使，竟将吴氏父子杀害。四月，黄万石在邵武降元。降后，还极力帮助元军说降战俘。先是元军进攻江西时，江西制司帐前都统制米立迎战于江坊，被俘不降。至是，元江西行省遣黄万石说降曰：“吾官阶一个先牌写不尽，今亦降矣。”米立讽刺地回答：“侍郎国家大臣，立一小卒尔，何足道。但三世食赵氏禄，赵亡，何以生为？立乃生擒之人，与投拜者不同。”黄万石再三劝降，终不屈，遂被杀害。江西府州6，军4、县56，户1，05l，829，口2，076，400，大部沦入元手。

第二节 宋末行朝播迁闽粤

福州逃亡政权的建立

1276年初，文天祥除知临安府，辞而不拜，请以吉王、信王昺镇守闽广，但未被采纳，只命二王出阁。这时元军已近迫临安，宗亲大臣见事不可为，才同意这个请求。正月十七日，太皇太后谢氏乃进封赵呈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赵昺为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事，并以杨亮节为福州观察使，和驸马都尉杨镇提举吉王府行事，俞如琏为环卫官、提举信王府行事。

正月十八日，即元军伯颜在皋亭山接受南宋降表玉玺、其先遣部队已进达临安北关时，杨镇等人奉二王出嘉会门，渡钱塘江，逃往婺州。是日夜晚，丞相陈宣中以违约不敢前往元军营议降，逃往温州之清澳。张世杰、刘师勇、苏刘义因朝廷不战而降，各以所部离去。元军以为陈宜中等挟二王同逃，便在下令禁止元军擅自入城乏同时，派右军阿刺罕、奥鲁赤，左军董文炳，范文虎率军扼守钱塘口；似劲兵5000追陈宜中，过钱塘江，不及而还。

二月，伯颜得知二王逃往婺州，派范文虎领兵趋婺。同时，派刘颉、程德辉往淮西招降夏贵，又遣别将徇地浙东、西。知建德军（今浙江建德）方回，知婺州刘怡、知处州（今浙江丽水）梁椅、知台州（今浙江临海）杨必大纷纷投降；范文虎召杨慎等2人挟二王降元；杨镇得报即去，曰：“我将就死于彼，以缓追兵”，遂被俘。杨亮节等负二王。及杨淑妃徒步行走。藏匿于山中7日。统制张全以兵数十人追及，同走

温州。闰三月，陆秀夫、苏刘义等得知二王逃往温州，也追及于途中。遣入召陈宜中于清澳，“共议兴复”。又召张世杰于定海，世杰遂率所部兵来温州。到温州后，一个抵抗中心很快建立起来。陈宜中，陆秀夫、苏刘义等奉赵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赵昺副之，以宋室名义相号召。都元帅府一建立，即发兵除吏，以秀王赵与檡为福建察访使兼安抚、知西外宗正，赵吉甫知南外宗正兼福建同提刑，先入闽中安抚吏民，晓渝赵氏宗室。适太皇丈后谢氏派商名宦官到温州，召二王还归临安。陈宜中等人沉其兵于江中，以示拒绝，然。后进入福建。

原宋江西制置使黄万石自建昌（今江西南城）逃入福建后，就已决心投降元朝。他因曾任福建漕使，拟取全闽以便向元军邀功请赏。时汀（今福建长汀）、建（即建宁府，今褥建建甄）诸州正打算隋从黄万石投降元军，听说赵呈、赵昺将至阀，复闭城门以拒黄万石，南剑（今福建南平）守臣林起鼇派兵逐之，迫使黄万石败走，其将刘俊、宋彰，周文英等人多率军来归。于是二王兵势稍振，控制着福建。此外，东川、淮东、浙南、广东也尚未降附元朝，诸将犹为宋守。鉴于此种情况，伯颜于赴阙前夕，即以董文炳留治行省事，从经略闽粤，忙古歹以都督镇守浙西，唆都以宣抚使镇守浙东。

五月初一日，陈宜中、陆秀夫等人拥立赵星于福州，改元暴炎，是为端宗。册杨叔妃为太后，同听政，封信王赵呙为卫王。陈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李庭芝为右丞相，陈文龙、刘黻为参加政事，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改福州为福安府，温州为瑞安府。适文天祥二月十九日在镇江脱险后，辗转两个多月，于四月八日逃至温州，闻二王已逃亡福州，尚未立帝，即上书劝进。至是，召文天祥至福州，五月二十六日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至此，福州逃亡政权建立起来了。这时闽广犹在宋手地区，大体连成一片。只有东川不通信息，但张珏仍为宋守，淮东被阻隔于长江以北，李庭芝、姜才还在坚持斗争，江西，湖广的争夺也还未结束。

福州政权恢复江西、浙南的失败

赵星逃亡政权建立以后，福建诸“郡县豪杰，争起兵应之”。为了与元军争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权，福州政权遂乘机“传檄岭海，欲复其地”。福州政权的部署是，命吴浚、赵浯、傅卓、李珏、翟国秀等人分道出兵，企图进据江西和浙南的一些失地，并巩固逃亡政权在福建和广东的基地。

1276年夏，吴浚受命以后，聚兵于广昌（今江西广昌），北取南丰（今江西南丰）、宜黄（今江西宜黄），南取宁都（今江西宁都）。翟国秀取秀山。傅卓进军衢（今浙江衢州）、信（今扛西上饶）两州，民多响应。文天祥因与陈宜中、杨壳节等人意见不合，受命为同都督诸路军马。七月四日，文天祥从福安出发，十三日到达南剑，聚兵积粮，建立同都督诸路军马府。他选辟的文武人才，“皆一时名士”，其骨干力量多是原赣州勤王义军旧部。文天祥想利用这支队伍在江西的广泛社会基

础，先取江西，然后再与江淮、浙东、闽广联为一片，支撑东南半壁，江山。为此，他派杜浒前往台、温“招集兵财”派吕武“结约江淮道”，作为日后进取两浙、，两淮的基地，派陈龙复“往漳糊计事”，一方面保持与福州政权的联系，一方面作为进取江西的后盾。

元江西都元帅宋都带见宋军“聚兵福建，以攻我师”，请求增援。时淮西夏贵已降，元朝遂调安庆、、黄、宿兵至江西交宋都带指挥。七月，李恒派部将破吴浚于南丰。翟国秀闻元军到来，引军而回。傅卓兵败后，向元军江西帅府投降。八月，张世杰力图挽回败局，遣都统张文虎与吴浚合兵10万，企图一举攻克建昌，不幸在兜港（又作“兜零”）为李恒部大败，逃奔宁都。至此，福州政权收复江西的努力宣告失败。

在浙东路南部，两浙闽广察访使赵与檷自以为是国家亲贤，见杨亮节“居中秉权”，“多所谏正”，遂犯忌嫉。不久元军进攻浙东路，赵与檷遂被派赴瑞安，（即温州），与守臣方洪共任备御。八月十二日，赵与樟围婺州。十四日闻元兵至，遂解围返回瑞安。十一月，元参政阿刺罕、董文炳领兵至处州，李珏以城降。十四日元军围瑞安，形势危急。赵与檡以3万之众迎战。阿刺罕宰高兴，撒里蛮等渡江，鏖战40余里，斩宋步帅观察使李世达。赵与檷、方洪誓以死守，小校李雄于夜间打开城门，迎纳元兵。赵与檷和方洪率领余众进行巷战，兵败，赵与檷、弟与虑、子孟备，监军赵由，察访使林温及将吏180人皆被俘。董文炳问：“汝为秀王耶？今能降乎？”赵与檡厉声回答：“我国家近亲，今力屈而死，分也，尚何问为？”于是，赵与檡、方洪和被俘将吏皆为元军所杀。十二月，元复改瑞安府为温州。至此，福州政权收复浙南的斗争文告失败。

二王逃奔广东

宋军在江西、浙南战场的失利，直接影响着福州政权的立足地——福建的安危。虽然，在用兵江西、浙南之时，福州政权曾以王积翁为福建提刑、招捕使。知南剑州，备御上三郡；黄恮为同提刑，招捕使，知漳州，备御下三郡。但这种安排对元军之南下并无有效的防御能力。元军一进入福建，王积翁就弃城，逃往福安。十一月十五日，陈宜中、张世杰也拥赵昰逃往海上。二十三日，唆都几乎未遇到抵抗，至福安府，知府王刚中以城降，王积翁也一起投降。

赵行朝从福安逃出后，欲入据泉州。泉州自唐朝以来即为对外贸易港口，设有市舶司，大批阿拉伯商人定居于此。回回商人蒲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宋授以闽广招抚使，驻泉州，与知州田子真共守。宋廷降元后，伯颜于是年一月即曾派人“招泉川蒲寿庚、寿晟兄弟”，蒲氏“见术事不支”，亦有降意。加之“泉州素多宗子”，宋设南外宗正司管其事，而南外宗官“挟势为暴”…，至夺贾胡浮海巨舰”，宗室与贾胡的矛盾由来已久。至是，赵呈等至泉州，“宗子纠集万余人，出迎王师”，为蒲寿庚所阻，闭门3日，不予接纳。继而因船只不够，张世杰竟施南外宗官故技，掠蒲氏船只而没其资财；蒲寿庚被激怒，杀在泉州的

宗室，士大夫与淮兵。陈宜中、涨世杰只得奉赵星逃亡潮州。十二月，蒲寿庚及知泉州田子真正式以城降元。董文炳以“寿庚素主市舶”，仍以他提举泉州市舶司事，使其为元“捍海寇，诱诸蛮臣服”。在元军追逐下，赵星行朝在潮州无处立足，又浮海到惠州。二十五日，次惠州陆丰甲子门（今广东陆丰县境）。至此，福建各州郡相继为元朝所占帝跸驻官富场雄飞，奉蜡书钠其所部14郡，向驻节江西的元隆兴帅府请降。1276年夏，徐直谅知赵星已在福州称帝，遂改变态度，拒梁雄飞于石广东经略使入据广州。广州第一次陷入元军之手。未几，福州政赵溍曾一度攻入广州。但是不久，元将吕师夔，张荣实即带兵从梅岭进入广东。元军进围韶州，守将刘自立以、城降。熊飞巷战兵败，赴水而死。次年（1277年）正月初一，即赵行朝进次甲子门后5天，元军突破汀关。元军一路招降纳叛，终于二月再次占领广州。这样，当刘应龙引导赵呈舟船途经广州时，终不果入。

在元军更略广州，诸郡多降的形势下，帝等舟乃移驻梅蔚（今广东东莞西南）。四月，帝呈等进驻官富场（今香港九龙城。南），并在其地营建宫殿。由于官富场早以产盐著称，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仍有盐官严益彰驻管，具有较丰富的物质基础，加之此地早有摧锋水军驻守，所以在经过一段海上死亡之后，南宋行朝终于选择官富场作为行宫骅驻之地。帝等欲经营此地以为恢复之计。迄今行宫遗址、传说犹可稽考。六月，二帝及大臣分领一部移驻距官富场不远之古瑾（在牛池湾与九龙仔之间的马头围一带）。

第三节 文天祥的抗元斗争

文天祥入江西

南宋降元后一年内，亡宋残余势力在淮东、浙南、福建、江西、广东先后受挫，元军已初步平定东南各地。赵量行朝逃奔海上，便丧失了继续指挥尚存抗元力量的能力，元朝即将夺取歼灭亡宋残力的完全胜利。但由于这期间发生了蒙古河平王甘里古的叛乱，忽必烈亲赴上都指挥作战，并诏平宋之军大量北撤。元军的大批北撤，相对地削弱了它在东南的守备力量，这就为文天祥抗元斗争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时机。

1276年冬，文天祥奉命率同督府离开南剑，进入汀州。次年（1277年）正月，元兵大入，汀州失守，文天祥被迫撤至漳州龙岩县，旋由龙岩移屯梅州。在梅州期间，文天祥整顿军纪，将跋扈不法的同督府都统钱汉英、王福2人斩杀，从而使得“军政一新”。五月，文天祥率领同督府军，“自梅（州）出岭”，进入江西，收复了赣州会昌县（今江西会昌），“赣，吉兵皆来会”。六月三日，与元军战雩都（今江西于都），获大捷。攻兴国县，得到邹飒配合。邹飒在去年宁都失败时被俘，隐蔽其招谕副使身份，“变姓名为卜者”，在赣州得脱，不久又集义军于永丰、兴国之间，有兵数万。至是协同文天祥作战，攻下兴国，并派军攻打永丰。二十一日，文天祥入兴国县，并将同督府移驻于此。

同督府军在赣南的初步胜利，鼓舞了江西的抗元势力。抚州何时，自元军占领抚州后，即隐居家中，这时“聚兵入崇仁（今江西崇仁）返正”，以应同都督府。分宁（今江西修水）、武宁（今江西武宁）、建昌3县豪杰派人远道前来兴国，请文天祥指挥。吉州贡土萧明哲“监赣县义兵，收复万安县”，又配合孙收复龙泉。文天祥的长妹夫孙桌，在龙泉县（今江西遂川）邑人支持下，“以邑返正”。次妹夫彭震龙，联络萧敬夫，焘夫兄弟，“以永新县返止”。吉水武举刘伯文，至兴国同督府，接受文书，结约远近义民，准备在袁州（今江西宜春）起义，事泄遇难。

文天祥因势利导，派张汴率领赵时赏、赵孟涤等主力部队薄赣州，诏谕使邹率兵攻永丰、吉水，招抚副使黎贵达率领吉蚶诸县兵攻太和（今江西泰和）。赣州所辖10县，收复了会昌、兴国、雩都、虔化、信丰、瑞金、石城、安远、龙南九县，“惟存孤城”赣县，为元军所守。吉州所辖8县，“吉水、永丰、万安、永新、龙泉，以次皆复”，其余几县也指日可下。吉、赣的胜利，推动了江西抗元形势的发展。临、洪、袁、瑞诸郡豪杰，纷起响应，“送款无虚日”。文天祥自开府兴国，“连破诸邑，围赣州尤急”。一时之间，“大江以西，有席卷包举之势。”

江淮湖南起兵抗元

在文天祥开府兴国，举兵扛西的形势鼓舞之下，淮西野人原寨（今安徽潜山县西北15里）原南宋下级军吏刘源、张德兴和“鄂属县民”傅

高，亦乘势起兵响应。他们利用野人原和司空山互为犄角的有利地形，立寨于司空山，建立反元基地，以图恢复。张德兴、傅高首先攻克黄州、寿昌军，并准备向鄂州进军。义军并派人“请命”于文天祥，一时大江南北诸城邑，多乘势杀守将，声势大盛。这时元朝设行中书省于潭州，忽都帖木儿和郑鼎以荆湖北道宣慰使驻戍鄂汉。郑鼎原率领的侍卫军已经北还，驻鄂兵力较为薄弱。1277年夏，郑鼎带兵征讨傅高、张德兴，战于樊口（今湖北鄂州市境），兵败，舟覆溺死。败归的元军惊魂未定，但称“贼盛且锐，将攻阳逻堡”，鄂州为之大震。行省参政贾居贞采纳陈天祥的建议，集冲精兵，宿屯青山，大败进攻阳逻堡的义军。接着，贾居贞又采用分化瓦解的策略，派陈天祥知寿止府事，由陈天祥惑使义军各归田里，而将其首领毛遇顺、周监捕杀于鄂州。七月，湖北宣慰司调兵攻司空心，安庆府达鲁花赤张君佐与之配合，元军收复寿昌、黄州。九月，淮西宣慰使昂吉儿月忻都、唐兀带等引兵进攻司空山，张德兴兵败被杀。傅高逃往江西武宁。元军下令通辑，申称“敢舍匿者，诛及其邻”。傅高无处可去，只得改名换姓返家，“为尉吏缚致，磔死”。人们为了纪念这次反元起义，称司空山寨为张安抚寨。

在江淮起义的同时，湖南也发生了起兵响应文天祥的抗元斗争。1277年春，张虎在室庆府（今湖南邵阳市）起兵，周围郡县，争起响应。不久，文天祥同督府徙驻兴国，彭震龙以永新县返正。湖南抗元声势，迅速扩大。张虎组织的抗元武装，收复了新化，安化，益阳，宁乡，湘潭诸县。这时“全、永诸州与潭属县之民文才喻、周隆（又作龙）、张虎、罗飞之伦，大或集众数万，小亦千数，在在为群”，与江淮张德兴、刘源、傅高等在司空山的义军“相煽以动”。潭州行省连忙派萨里蛮几次领兵镇压，张虎屡遭失败，“失马动以百计”。

五月初一日，衡山进士赵瑶与其叔父赵漂在湘乡起兵，写信给文天祥同督府取得联系，文天祥又将此信送达行朝，“授（赵）瑶军器监，号召勤王”。于是朝奉郎张唐，前赣州通判熊桂，刘斗元皆起兵响应，收复衡山，湘潭、牧县3县。吴希爽、陈子全、王梦应等人“亦自通于同督府，与赵瑶相应。”七月二十一日，吴希爽等收复江西袁蚶萍乡县（今江西萍乡市），准备与在袁州发动起义的同督府部将刘伯文合军，惜刘伯文因事泄败露，已于七月上旬被俘遇难。袁州总管聂嵩孙，宣差来万户举兵来争夺萍乡，王梦应率兵数百人与之相遇于明府岭，交战数合，杀曹千户大小头目，元军败走。不久元军增兵再来，又被打败，杀来万户之子及头目6人“僵尸蔽野，余兵奔袁州”。不幸这时传来“永新兵败，督府师溃”的消息，吴希爽等人度“事未可图”，便留下陈子全“据险待命”，将大军撤回湖南。

空坑之败

文天祥在江西取得的胜利，以及在其影响。下兴起的江淮，湖南的抗元斗争，使他十分兴奋。他寄希望于赣吉，想以此为起点，恢复赵宋国祚。但他的这种幻想，很快就在元军的攻势面前破灭了。

是年（1277年）七、八、九3个月，元军再次发动了对亡宋残余势力的进攻。主要有3个战场：一是由潭州行省发动的史格对广西、湖南南部的再征服，二是由江西行省发动的李恒对文天祥同督府的袭击，三是由福建行省发动的忙兀带、唆都对福建的进攻。

七月二十一日，元朝置行中书省于江西。以参知政事行江西宣慰使塔出为右丞，参知政事行江西宣慰使麦术丁为左丞，淮东宣慰使彻里帖木儿，江东宣慰使张荣实、江西宣慰使李恒、招讨使也的迷失，万户昔里门、荆湖路宣抚使程鹏飞，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蒲寿庚，并参知政事，行江西省事。八月，江西宣慰使李恒一面派大军救赣州之急，一面“自率精兵潜至兴国”。当时文天祥部下进攻太和（今江西泰和）的黎贵达，带领偏师在钟步与元骑兵相遇，这支军队包括同督府正军千人，民兵数千。由于没有战斗经验，民兵惊演，自相蹂践而死者甚众。几天后，张汴、赵时赏，赵孟涞率领的主力军逼近赣州，仍抵抗不住元军骑兵猛冲，亦溃散。赵盂溁收聚残兵，退保雩都。兴国同督府兵力薄弱“天祥不意（李）恒兵猝至”，缺乏准备，寡众难敌。时邹聚兵数万于永丰（今江西永丰），文天祥急忙带兵与之会合不料邹等在永丰亦为元军所败。李恒乘胜穷追不舍，追及文天祥于庐陵东固之方石岭（今江西兴国县境）。都统制兼江西招捕使巩信率准兵数十人，据守在方石岭，拼死与战。李恒见其似寡拒众，“疑山中有伏兵，敛兵不进”，只以箭射之。巩信身冲数箭，伤重而死，士卒也全部牺牲。俟元军腧岭到山后，才得知并并无伏兵，然“以此北骑稽滞”，文天祥遂得脱去。

八月二十七日，文天祥至空坑，军士大多溃散，少数溃卒因过于困惫，席地而睡，文天祥住在义士陈师韩家里乙半夜突然得知元军追至，陈师韩即送文天祥由间道逃向吴溪。元军至空坑，未见天祥，“遂攻破其寨屠之。”。次日清晨，大雾弥漫，一丈远即不能看清，元军追兵只能搜索前进，其喧闹、之声文天祥都隐约可闻，几为追及。突然元军发现几名士兵跟着一乘轿子，“轿中人风姿伟然”，即问：“是谁？”轿中的赵时赏答称，“姓文”。追兵以为是文天祥，即俘获而归，文天祥因此又一次得免于难。

在这次战役中，涨汴换上士兵“皂衣，伏草中”，为乱兵所杀。缪朝宗“自经于山间”。谢杞、许由，李幼节3位闽士“不知所终”。吴文焕、林栋被俘遇害。刘沐（洙）与其长子，被俘至隆兴杀害，次子死于乱兵之中，孙“为亲党所陷，遇害于隆兴”。彭震龙被俘于永新，“遇害于郡城”。萧敬夫、焘夫兄弟于永新陷落时，未免于难。萧明哲于行督府败后，入野坡，连结诸LLI寨坚持抵抗，被俘，“死于洪（都，即隆兴）”。陈子敬到汀州投奔文天祥后，即返江西招集义兵，置屯子赣州下流的皂口，控扼元军船只往来，对行督府诸军在江西作战，“功效甚著”。空坑之败后，又举兵于黄塘，连结山寨不降，后遭重兵袭击溃败，“不闻所终”。文天祥之妻欧阳夫人和一子一女，被俘于空坑。

空坑之败是文天祥抗元斗争的又一重大挫折，至此，聚集在文天祥身边的这支残宋武装抗元力量遂告彻底溃散。

五坡岭被俘

文天祥自空坑脱险后，于同年（1272年）十月入汀州，十一月“出会昌，入安远（今江西安远），赵循州”，经过辗转行军，终于次年（1278年）二月出惠州海丰县，三月驻丽江浦，并活动于惠、潮之间。文天祥复入广东，并没有改变抗元斗争的形势，宋末行朝对他觐见的请求一再加以拒绝。于是，他只好困留手潮州至惠州一带。

残宋势力在广东的存在，对元王朝的一统天下构成威胁，留下后患。在北方叛王的威胁解除之后，元廷又可以集中兵力解决南方的残宋势力了。同年（1278年）六月，忽必烈决定对亡宋在广东的残余势力发动最后的进攻。于是，他颁诏“发蒙古军千人从江东宣慰使张弘范由海道讨宋余众”，并拒绝了参知政事忙兀带“请颁诏招宋广王昺及张世杰等”的建议？张弘范“荐李恒为己贰”；到扬州后，“选将校水陆二万，分道南征”。七月，忽必烈“以江西参知政事李恒为都元帅，将蒙古、汉军征广，命扬州行中书省分军三千付李恒”，同时以塔出、吕师夔、贾居贞行中书省事于赣州，福建、江西、广东皆隶属其下，把消灭亡宋势力的战场集中到广东一地。又命“塔出留后，以供军费”。这时文天祥军驻地海丰、惠州一带疾疫流行，同督府军士死者数百，部队大量减员，文天祥也多次染病。九十月间，文天祥母曾夫人和长子道生相继病故。同督府的前途使文天祥颇为忧虑。文天祥同督府下部将陈懿兄弟五人，号称“五虎”，本为“剧盗”，占据潮州，叛附不常，虐害百姓。文天祥为他们向行朝请了官，却又不听同督府节制。潮州士民深为痛恨，请行督府移驻潮州。文天祥正在惠州境内处于困境，遂派兵声讨，陈懿逃入山寨，行督府于十一月进屯潮州潮阳县。潮州另一“宿寇”刘兴，也叛服无常，恣肆跋扈，杀掠尤惨，也被文天祥”诛杀。于是，“稍平群盗，人心翕然。”

闰十一月，张弘范开始攻漳州，并谍知文天祥驻屯子潮阳港，亟遣先锋张弘正、总管囊加带率领轻骑500人往追。元军所到之处，“濒海郡邑皆望风降附”。适元军一艘海船遇大风漂至潮阳，水军20余人为行府俘获。文天祥由是得知张弘范“以水军自明、秀下海，以步卒自漳、泉入潮”，即将这一重要军情报告行朝，并于十二月十五月将行府移往海丰，准备入南岭，“结寨据险以自固”。及元军至潮阳县，受到文天祥部将邹㵯、刘子俊追剿的陈懿兄弟五人，“以畲兵七千人、降”。当时元军隔着海港，陈懿为之迎导，并济之以海舟。张弘正在陈懿帮助下，宣向行督府追来。

二十日中午，文天祥在向海丰转移途中，次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县北境），准备吃饭，张弘正追兵突至。时已行军数日，“不为备，仓卒溃散”，军士皆顿首潜伏于草莽之中。文天祥仓惶出走，为千户王惟义所俘，吞脑子，（冰片）自杀不果。邹洞自颈，被众人扶入南岭，十天后死去。只有赵孟溁为前锋，先行十里，得以遁去。徐榛脱身逃往惠州。其余在空坑之败时脱难的官属士卒，如刘子俊、杜浒、张唐、熊桂、吴希爽、陈子全等，“至是俱遭执戮”。其中刘子俊被俘时，自称文天祥，想用空坑之败时赵时赏救文的办法，使文天祥再次脱难。不料文天祥已

为元军俘获，被押送到和平市见张弘正，途中相遇，互争真伪。乃至，文天祥木骂求死。二十七日，解押至潮阳张弘范处，真伪文天祥始明，刘子俊被烹而死。元军命文天祥“跪拜”，文天祥誓死不屈，答曰：“吾能死不能拜”。张弘范无奈，只得以“长揖相见”。

五坡岭兵败被俘，标志着文天祥空坑之败以后1年多重新聚集的抗元武装的彻底瓦解，标志着文天祥赣州勤王近4年来武装抗元的完全失败。

第四节 四川战事告终

安西王总结四川未下的原因

当临安降元之时，四川合州，重庆、泸州、涪州、夔州等几个沿江城市的军民仍在为宋坚守。在宋朝已亡，江南已平的情况下，为何四川反而未下呢？这个问题引起了节制四川军政大权的安西王府的重视。根据“宗王出镇”的祖宗成法，忽必烈于1272年封其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分地，驻兵六盘山。1273年，忽必烈罢四川行省，以东、西两州行枢密院隶安西王府。继又罢东、西两川统军司；把四川的军事节制大权交由忙哥剌。1275年，忙哥剌派李德辉以安西王相至成都巡视，当时东、西两川行枢密院正合兵数万困围重庆。李德辉对前来争受兵食方略的东，西卅枢密院使说：“宋已亡矣，童庆以弹丸之地，不降何归。政以公辈利其剽杀，民不得有子女，惧而不来耳。响日兵未赏战，中使奉玺来赦，公辈既不能正言明告，严备止攻，以须其至，反购得军吏杖之，伪为得罪，使惧而叛去，水陆之师雷鼓继进，是坚其不下也。中使不渝诈计，竟以不奉明诏复命。如是者，非玩寇而何!况复军政不一，相訾纷纷，朝夕败矣，岂能成功哉!”未几，东、西两川果然从重庆溃败而归。重庆溃围后，安西王忙哥剌亲自在六盘山召问先锋将刘恩：“江南已平，四川未下奈何？”刘恩回答说，“若以重臣之不徇私者诏督责之，则半年可下矣。”李德辉、刘恩等人分别从平蜀的政策、将帅的任命和军政的统一等方面，总结了元军久攻四川不下的原因。忙哥剌把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禀报给忽必烈。忽必烈深表赞同，并对攻蜀的政策，机构，人选等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调整。1277年，忽必烈罢免了东、西两川原任枢密院使忽敦和合刺的职务，并改命丞相不花和李德辉行西川抠密院事？李德辉仍兼安西王相府，命合丹和阔里吉思行东川枢密院事。此后，四川最后平定的进展情况便直接由安西王相府向朝廷奏报。

泸州陷落

1277年春，从重庆回师的元西川行院军，抵达泸州驻节的神臂城下。在溯江奔赴泸州的过程中，旦只儿部在红米湾（今合江县）打败了宋军的拦截部队，接着又在安乐山（今合江县西）再次击溃宋军，“斩首五百余级、获战舰四”。宋军打算邀击元军的漕舟，也遭失败。元军乘势攻破了宋军固守的水上寨堡石盘寨（今合江县赤水河与长江会合处之石盘角）。元军各路兵马登上神臂江岸后，同宋军开展了外围据点的争夺战。步鲁合答首先从城西北的宝子寨（今老泸城西北角的保子寨）发动进攻，“造云梯先登”，破寨后，“杀俘殆尽”。刘思敬率军攻打盘山寨（今神臂山东北），生擒守将任庆，俘获9000余户。刘整子刘垓，与元军万户拜延领兵进攻珍珠堡（今神臂山北15里），击败宋军王世昌部，“俘掠其民人孳畜”，然后移兵屯戍暗溪寨（今神臂山西北大暗溪）。元军各路兵马进一步缩小了对泸州的包围。

在江面上，元军除了石抹按只部以外，擅长水战的将领张万家奴，

也“诣阙自陈，请自任以攻取之效”。由他率领的以150艘战舰组成的水军，驻守在神臂山下的桃竹滩（今名小桃竹滩）至折鱼滩（今名叉鱼滩）的江面上，“谨烽火，严号令”，大大加强了元军攻城的声势和力量。宋军布置在神臂江南的阵地以及与之相连的江心水寨，很快便被元军所控制。

在元军东西夹击，水陆合围的形势下，神臂城军民在安抚王世昌、守将刘雄、李都统的率领下，分守要隘，英勇堵击王世昌亲自率部增援珍珠堡、盘寨。这些努力，终因众寡悬殊而遭失败。唯一的希望是等待合州派兵前来救援。但是，由合州将史训忠，赵安等率领的赴援部队，却在路上遭到元军拜延部的阻击，被“拜延生擒百余人”，未能抵达泸州。

泸州神臂城经历了一年多的重兵困围，至是年（1277年）十一月，已经到了“食尽，人相食”的绝境。但是城内军民仍然坚持战斗，拒绝投降。最后，元军、全线同时发起进攻。西南角上的神臂门一线，元水军石抹不老担任主攻，“蚁附以登”，一度冲上城楼，都为宋军所击溃。宋军为此牺牲了50余人。东门一线，由于地形不如神臂门那样险固，必然成为元军的主攻方向。攻城的刘思敬部，乘激战了一天的宋军疲惫之际，发动夜袭，终于攻破东门。当晚秃满答儿也率兵从南门夺水城突破宋军防线，“黎明，先登，入泸城”。天亮以后，江面上的水军诸将，听说东门已被攻破，更加紧攻打神臂门。元军万户也罕的斤也亲自上阵，指挥水军，“攻神臂门，先登拔之”。同时攻入神臂门的，还有石抹不老和张万家奴所部的水军。守卫神臂门的宋军将士，英勇拼杀，有200多人捐躯城头。在经过激烈巷战之后，泸州城破，宋安抚王世昌、李都统死之。次年（1278年）正月，安西王相府报告朝廷：“万户秃满答儿、郝札剌不花等攻克泸州，斩其主将王世昌，李都统”。

重庆之破

1278年初，西川行枢密院副使不花，率兵会东川行院之军，再次进围重庆。元军主力屯驻佛图关（今重庆市西佛图关），分遣“一军驻南城，一军驻朱村坪，一军驻江上”。元军派遣泸州降将李从招降重庆，张珏不从。李德辉又把囚禁于顺庆狱中的合州俘虏放出去，让他带话给张珏说：“宋室既亡，三宫皆北，我朝含弘，录功忘过，能早自归，必取将相，与夏、吕比。”李德辉还亲自写信给张珏说：“汝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之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彼子孙已举天下而归我，汝犹偃然负阻穷山，而曰吾忠于所事，不亦惑哉!且昔此州：之人不自为谋者，以国有主，耻被不义之名，故尔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矣，犹欲以是行之，则戏下盗遇君，窃君首以徼福一旦，不难也。”。号珏又加以拒绝，“未及报”。

当年（1278年）正月，张珏遣总管李义将兵从广阳（今重庆市东）方向出击，“一军皆没”。二月，张珏率兵出薰风门，与元将也速答儿之军战于扶桑坝（今重庆市东），元“诸将从其后合击之”。“张珏悉众鏖

战”，元西川行枢密院汪良臣奋勇出击，“身中四矢”。元将秃满答儿进围重庆，“守将张珏搏战，败之城下”。不花由佛图关移屯堡子头，指挥元军大“造梯冲”加紧进攻重庆各城门。“也速答儿率二十余骑攻其门，宋都统赵安出战，也速答儿三入共军，再挟猛士以出，大兵四集，斩首五百余级”。石抹不老领兵攻重庆太平门，先登之，“杀其守陴卒数十人”。塔海帖木儿以拔都鲁军200人，“破宋军于白水江（指嘉陵江）夺战船一，俘其众十三人”。元军督战益急。宋军势穷援绝，“城中粮尽”。部将赵安以书劝张珏投降，张珏仍不听。于是，赵安“乃与帐下韩忠显夜开镇西门降”。张珏率宋兵巷战，又遭失利，乃乘小舟出逃，欲下夔州，投奔张起岩。元军乘胜追击，速哥“虏百余人及其舟二十余艘”。石抹不老追擒宋总管黄亮，“及其兵士五十人，夺战舰五十艘。”张珏兵败，自尽未果，在东走涪州的途中，为元军万户铁木儿追及，被擒获后送往京师。至此，重庆遂告陷破。汪良臣下令“禁俘掠，发粟赈饥”。三月，西卅行枢密院向朝廷报告，共招降西蜀，重庆等处，得府3、州6、军1、监1、县20、栅40、蛮夷1。

东川之平

1276年，元廷派安西王相李德辉到东川经画课程，宋梁山守将袁世安遣使约降，李德辉大喜，即遣元将杨文安将兵，“奉王旨往招之”，袁世安遂降。秋七月，元东川军进攻万州，先遣经历徐政招谕宋守臣上官夔投降，不从。元军“围之数匝，逾月，攻拔外城”。这时，宋夔州帅张起岩领兵采救，杨文安遣慎抚彭福寿迎击，大破宋军，“尽歼其舟师，俘其将宋明。万州夺气”。杨文安再传“王旨”招降，上官夔“终不屈”。八月，杨文安“尽锐攻城，潜遣勇士梯城宵登，斩关而入”。上官夔“巷战而死”，元军遂克万州。万州既定，杨文安随即遣使招降铁檠、三宝两城。是冬，元军分兵过江，冒着大雨略定了施州。

次年（1277年）七月，元东川右副都元帅张德润率军进攻涪洲。守将程聪因“力主守城之议”不为张珏采纳，被张珏出守涪州。程聪“至郡快快，不设备”，及元军大至，遂被擒。涪州于是告破。接着，杨文安率军进攻咸淳府皇华城（今忠县东）。马塑以六郡镇抚使为守臣。杨文安与马望均系宕昌人，遣使招僻，马堃不从，杨文安乃“列栅攻城”。十二月，杨文安“潜遣勇士蹑云梯霄登，斩关纳外兵”，城破。马望悉力巷战，次晨，“宋兵大败，堑力屈被擒”。

1278年春，杨文安遣部将王师能率军攻绍庆（今四川彭水县），守将鲜龙迎敌。二月，王师能潜遣勇士，“夜以梯冲攻破其北门”，鲜龙兵败被擒。王师能克绍庆城，并奉命驻守。其时，蜀境已定，独张起岩帅夔州，与张珏共为固守，夔府与重庆“屹然双城。张起岩扬言“将出兵攻荆南”，忽必烈即命涪州降将阳立与荆湖都元帅达海共同防御。重庆城破后，守将张万定夔府，以兵固守。元廷命达海由巫峡进兵取夔州，西川行院不花遣佥院刘恩，挟夔州守将亲属往招之。杨文安又命王师能领东川舟师赶至，张万与张起岩遂以夔州城降。旬月之间，元军竟得四川“大小州邑六十四”。

合州降附

重庆城破之后，绍庆、南平、夔、施、思、播等“诸山壁水皆下”，只剩下合州钓鱼城尚在为宋坚守。忽必烈“诏枢府分兵取之”。合州安抚使王立在元朝的捂抚政策面前犹豫动摇，重庆破陷前他没有出兵救援，重庆失陷后，他准备向元朝投降。这时，东川行院军正打算独军围合州，以便坐取垂成之功。王立与东川军有深怨，东院围困钓鱼城已有多年，王立“自谓尝阻宪宗兵，意城破必屠夷俘虏，以故负圃不可下”。这时，元潼川招讨使刘伟，将俘获的合州“侦卒”张郃等12人上李德辉，将杀之，四川行枢密院都事吕劝阻说:“彼不即降者，以昔尝抗命，城降，惧诛耳。今宜释郃等，俾归谕立”。张郃等人既释放回合州，未几王立果遣张郃等带蜡书至成都，告诉李德辉说：“能自来，即降”。于是，李德辉遂“从五百骑至钓鱼山，与东院同受立降”。由于李德辉仅带西院兵数百人赴之，“东府害其来”，劝阻李德辉说：“公昔为书招（张）珏，诚亦极矣，竟无功而还。今（王）立，珏牙校也，习狙诈不信，特以计致公来，使与吾争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诚降”。李德辉反驳说：“昔合以重庆存，故力可以同恶，今已孤绝，穷而来归，亦其势然。吾非攘人之功者，诚惧公等愤其后服，诬以尝抗跸先朝，利其剽夺，而快心于屠城也。吾为国活此民，岂汝嫌怒为哉!”于是，李德辉遂单舸济江，进至钓鱼城下，呼王立出降。王立果挈城向李德辉投降。东川行院“耻其无功，诬德辉越境邀功”，便将王立械送长安狱，将诛之。后西院从事吕至大都，以兵事告先师许衡，许衡再通过贺仁杰将王立“降附本末”，以及李德辉“受降之故”上奏忽必烈，忽必烈这才改变决定，召王立入觐，并命为潼川路安抚使，知合州。为宋朝坚守了36年（1243~1279年）的合州钓鱼城，至此最后陷落了。

‘1278年秋，安西王相府向朝廷报告说：“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其渠州礼义等处凡三十三所，宜以兵镇守，余悉撤毁”。钓鱼城的陷落，标志宋朝在四川的武装力量最后被消灭，宣告元朝平定巴蜀战争的结束。

第五节 南海之平与崖山之役

二王奔硐州

二王移驻官富、古瑾期间，宋将张镇孙进复广州，文天祥、赵时赏由梅州分复吉、赣诸县，张世杰进讨蒲寿庚于泉州，遣将高日新复邵武，淮兵在福州者，亦欲谋杀王积翁以应张世杰，局势渐有好转。1277年秋，元福建宣慰使唆都向朝廷禀报说，据“密探得残宋建都广州，改咸熙（景炎）元年”。鉴于宋人以官富为基地，陆续收复闽粤沿海诸城，元世祖忽必烈遂决定出兵扫平之。

当时，元廷的部署是：由唆都率一军，取南剑州进援泉州，寻机与张世杰决战，由左丞塔出率一军入大庚岭，直取广州；由参政也的迷失率一军进取邵武，以入福州，由元帅刘深以舟师下海，进攻官富，合歼二王。

在元军的强大攻势下，南宋在闽粤的残余势力遭到彻底失败。在福建方面，唆都遣招讨使百家奴，丁广取建宁之崇安等县及南剑州。张世杰得知元军大至，遂从泉州撤围，退至浅湾（今香港新界荃湾），唆都率军追至同安县答失寨，逛海县镇悉为之招谕而下。接着，唆都遣其子百家奴率一军，配合塔出军进攻二王驻地宫富场。

在广东方面，瘩出军年九月入庚岭，十月围广州。十一月，在唆都与吕师夔的会攻之下，广州城陷厂张镇孙死之。

这时，江西宣慰使李恒亦奉旨，与右丞阿里罕、左丞董文炳“合追益王”。众议所向，皆谓旨趋福建。李恒却说：“不可。若诸军俱在福建，彼必窜广东，则梅岭，江西非我有矣，宜从厂东夹攻之”。李恒遂率军至梅岭，“幂与宋兵遇，出其不意败之”。

在闽粤各地皆失的情况下，宋末行朝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张世杰军。张世杰从泉州退到浅湾，遭到元帅刘深舟师的进攻。这时，正在进攻潮州的唆都，由于宋知府马发不降，唯恐“失富场之期，乃舍之而去。”在官富场的基地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张世杰只好挟二主走秀山（今广东东莞市虎门）。十一月，陈宜中、张世杰等奉二王幸沙冲，暂宫于马南宝家。居数日，元兵陷广州，秀山有极袭的威胁，乃自秀山西潭珠江口而过香山县（今广东中山市）境。十二月，二王入海，至井澳（今广东中山市南大洋中）。“飓风坏舟几溺死，遂成疾。旬余，诸兵士始稍稍来集，死者四五”。元将刘深复发兵袭井澳，张世杰力战却之，二王迁舟于谢女峡（与井澳同在中山市南大洋中）。刘深追至七州洋，（又作七星洋）。大战洋中，夺船200艘，执帝舅环卫官俞如鞋以归。

在刘深水师的追袭下，陈宜中欲奉帝呈走占城，乃先入：占城；谕意。及陈宜中入占城，宋节度使苏刘义不以为是、擢舟追之，不及而

返。1278年春，御舟既“往居占城不果；遂驻硐州”。

帝昺即位

同年（1278年）四月，帝自井澳遇风，惊悸成疾厂及至移驻硐州之后，病势转危，十五日遂崩于舟中，时年仅11岁。帝呈病崩前，曾由陆秀夫草拟《景炎皇帝遗诏》，诏以其弟卫王昺继位。由于时局日非，“解臣皆欲散去。”独陆秀夫仗义执言说：“度宗皇帝一子尚存，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邪？”于是，乃与众共立卫王为帝。即下诏于四月二十一日登极，改元祥举，是为帝昺。时昺年方8岁，乃以陆秀夫为左丞相，苏刘义为殿前都指挥使，与少傅，枢密使张世杰共秉朝政。升硐州为龙翔县，升广州为翔-龙府，并奉杨太后垂帘听政。“时世杰驻兵崖山，秀夫外筹军旅，内调工役，凡有所述作，又尽出其手。虽匆遽流离中，犹日书《大学章句》以劝讲”。

雷州陷落

宋末行朝帝星病崩、帝昺继位之地硐州，“屹立海中，当南北道，隶化州”，“六军所泊，居雷、化犬牙处”，与雷州相距不远，固此，雷州的存亡对宋末行朝的安危关系极大。

先是，阿里海牙初定广西后，以史格为广南西道宣慰使，留抬静江。为了稳定元军在广西的统治，史格即派郑何、朱国宝等5方户镇戍贺、昭、梧、融、邕5州，马天麟等10名千户分戍浔，宾、横、容、象、柳、廉、钦、高、化10州。正是在此背景下，故有广甫西道宣慰司遣总管崔永、千户刘澄、王德用“招降雷、化、高三州”的记述，而其时宋元交相争夺，雷、化等州实未落入元人之手。

宋末行朝移居硐州后，宋臣曾渊子自雷州至行朝，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广西宣慰使，开督府于雷州。元军攻之，曾渊子奔还硐州。五月，张世杰派张应科，王用将兵数万再次攻取雷州，元万户刘仲海出击，张应科3战皆失利，王用投降。王用并向元军报告：“已死，世杰等立昺，改元祥兴。士卒止万人，而硐州。无粮储，闻琼州守臣欲给粮二万石，海道滩水浅急，难于转运，止有杏磊浦可通舟楫，宜急以兵守之”。于是，雷州总管忙兀等得其说，即命将进军，为战守之计。六月，王应。科再战雷州，死之。知高州李象祖也投降元朝。张世杰悉众”包围雷州，“城中绝粮，士兵以草为食”。但由于史格已牢牢控制了附近州郡，并调兵漕钦、廉、高、化诸州粮供应雷州。张世杰久攻不下，遂撤围而去。

元军占领雷州，不仅给驻硐州的南宋行朝以极大韵威胁，而且也取得了进军海南岛的必不可少的跳板。十月，阿里海牙奉诏来到雷州前线，派史格亲自镇守雷州，以遏止张世杰向西突围逃亡交趾。阿里海牙率军航海500里追袭海南岛。其时，宋安抚赵与珞犹为宋坚守，并率兵

拒之于白沙口（今广东海口），元军不能登岸。十一月，州民执赵与珞降元。接着，元军谕降苏州（今广东琼山）、南宁军（今广东儋县西北），万安军（今广东万宁）吉阳军（今广东崖县镇）。至此，海南岛悉平。由于赵与珞“素有胆略”，深得“海外诸蛮小国”尊重，赵与珞既死，“由是四州县及外蛮皆附于元”。

宋季行宫崖山

是年（1278年）六月，张世杰以雷州既失，六军泊居雷、化犬牙处非善计，不如崖山（别作厓山）在大海中安全，于是，乃自硐州“北还至崖山止焉”。“崖山乃海中之山，两山相对延袤，中一衣带水，山口如门，世杰以为形胜安之”。

崖山在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县南80里的古井区官冲乡境，为珠江之出海口之一。其山与崖西之汤瓶山对峙如门，故谓之崖门。门阔仅里许，形成天然之港口，可以藏舟。每大南风起，水从海外排闼而入，浪涛汹涌如山，复为门所扼，其势益大。又“崖山东西对峙，其北水浅”，每日早午潮水涨落，既可“乘潮而战”，又可“颐潮而退”。

张世杰既以崖山为形胜之地，乃屯驻于此，并大造行宫。“六月，入山伐木，造军屋千间，起行宫三十间，内正殿以杨太妃故，立名慈元殿。时官民兵除逃窜死亡外，犹计二十万，多于船上住坐。资粮取办广右诸郡、海外四州。拘刷人匠，盖海院，造船支，治兵器，自六月至十月始罢”。张世杰等于崖山所建之行宫，其原本建筑早已摧毁，然杨太妃所居之慈元殿，故址犹存。现建有慈元庙，陈列宋季文物，以供后世凭吊。

宋元战争最后一役

帝昺徙居崖山后？形势急转直下，对于宋末行朝极为严峻。是年（1278）年十月，蒙古汉军数路并进，江东宣慰使张弘范以舟师由海道出漳、潮，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李恒以步骑出梅岭。由于李恒之兵较近，故最先攻入广东。闰十一月，宋将王道夫弃广州遁，李恒军追击凌震于海上，获船300艘，擒将吏宋迈以下200人，又破其余军于茭塘。元军遂入广州。十二月，文天祥走海丰，兵败五坡岭，被元军所俘。

李恒入据广州，坐等张弘范军至。闰十一月十四日，宋降卒戴宝报告行朝动向说:“益王死硐洲（州），广王屯新会县之崖山，缚草架木为宫殿，凡千余楹，有船七百艘，军士尚众，山海道渡，两昼夜可抵其所，舍舟莫能往也”。

次年（1279年）正月六日，张弘范从潮阳港下海，八日过官富场，十三日至崖山，围张世杰军。十六日，李恒闻张弘范已赴海道，“即率麾下战舰一百二十艘入海。二十二日，恒会弘范于—崖山”。当时，张弘范先至山北，因水浅不通，复军“由山之东转南入大洋”，在崖门之南面控扼，李恒“以战舰二”，在北面镇守。从而对张世杰驻屯崖山之军，构成

南北夹击之势。

当时宋元两军的兵力对比情况是：宋末行朝自福州入海时，有正军17万，民兵30万，内淮兵1万。及至崖山，除逃窜死亡外，官民兵尚有20万。元军追歼崖门的兵力，仅其中张弘范部从扬州出发时，有“水陆二万”。双方舰只对比情况是：“行朝有船千余艘，内大船极多”；张弘范军只有“大小船五百，而二百舟失道，久而不至”。“北人乍登舟，呕晕，执弓矢不支持；又水道生，舟工进退失据”。

因此，从整个宋元战争形势看，元军是以强军聚歼孤敌，但从崖山战役的具体兵力和舰只情况看，宋军并非处于劣势。在这种形势下，如果宋军部署指挥得当，加之为元军驾舟的船工，“皆闽浙水手，其心莫不欲南”，因此，正如文天祥所分析的：“向若南船摧锋直前，闽浙水手在北舟中必为变，则有尽歼之理？!”然而，张世杰“不知合变，专守法”，从一开始就在部署指挥上犯了大错误：

（1）不守崖门，放弃海口。当元军进至崖山时，有人告诉张世杰说：“北兵以舟师塞海口，则我不能进退，曷先据海口。奉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张世杰恐军士久在海上有离心，则动必散，因此决计放弃海口死守。他说：“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

（2）布长蛇阵，不可复动。张世杰既作死守计，遂“悉焚行朝草市，结大舶千余作水砦”。张世杰的作法是：“以舟师碇海中，綦结巨舰千余艘，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棚如城堞，居昺其中。”这种结阵方式，被文天祥称之为“长蛇阵”或“一字阵”。由于“行朝依山作一字阵，帮缚不可复动”，很容易遭到对方的火攻，因此“人皆危之。”

（3）初战告捷后，没有乘胜出击。当元军初至时，张世杰曾“以游舟数出，得小捷”，但张世杰“不知合变，专守法”，没有“摧锋直前”，处于“不可以攻人，而专受攻”的被动挨打境地。

针对宋军的部署，张弘范及时调整了作战方针，先采取一系列措施，扫除大举进攻的障碍：

（1）焚宫断汲，摧毁行朝的后方基地。张弘范根据宋帝昺“栖于崖山之西山”，依靠山泉供应军队饮水的情况，“潜舟载骑兵登麓”，一举“断其汲路，烧其宫室”。

（2）坚决挫败宋军恢复汲路的努力。元军既断行朝的汲路，于是，张世杰遂“以斗舰号快船者”前来争。张弘范为了不给宋军留下汲路，又命乐总管在山麓“立寨断其汲路”，李恒则“以拨都船当之？，使前来争接水道的宋军皆败去。“自是樵汲日梗”。

（3）攻击宋军的机动小舟。元军既于山麓立寨，接着便“自寨以炮击昺舰”。这时，宋军阵中“有乌蛋船救昺”。为了消灭这批小舟，张弘范“夜择小舟，由港西潜列乌蜑船北，彻其西岸，且以战舰冲之。乌蛋皆

并海民，素不知战，昺又不敢援，进退无据，攻杀靡遗”。

（4）击退宋军的挑战。元军先以缴获的乌蛋小舟，“载草灌油，乘风纵火，欲焚昺舰”，但由于昺舰预作防范，“水泥涂舰，悬水桶无数，火船至，钩而沃之，竟莫能毁”。于是，张世杰遣将周文英“日挑战数十余次，皆为弘范所败”。

在元军“据海口”，“断汲道”的团团围攻面前，宋军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兵茹干粮十余日，渴甚，下掬海水饮之，海咸，饮即呕泄，兵大困”。张弘范遂通过在元军中的张世杰的外甥韩某，3次到宋军中去招降，都被张世杰所拒绝。张世杰说：“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耳”。这时，张弘范部下谱将请以炮攻之。张弘范却说:“炮攻，敌必浮海散去，吾分追非所利，不如以计聚留而与我战也。”李恒也建议应该“逐潮水上下，宜急攻之。”

二月五日夜，张弘范指挥元军，将船开赴宋军战舰的对面列阵，“发碇与昺相对”，作好了决战的准备。

二月六日平旦，决战开始了。张弘范分其军为4，从西。南，北3面将宋军包围：李恒领一军“当昺北及西北角楼”；另外两军“分居呙南及西”；张弘范自将一军“居西南，去昺里许”。张弘范下达命令规定：宋军待“潮退必南遁”，这时部署在南面的元军“急攻，勿失之”；部署在西北方的元军，则须等待音乐声大作时“乃战”。敌舰如果从西南方溃围，则由张弘范引军“自攻”。倾刻，潮退，水南泻，李恒从北面顺流冲击，突入其阵。张世杰以“江淮劲卒”殊死战，至巳时，元军始夺3船。李恒率拔都军复与快船战。中午，潮水上涨，水北流，张弘范指挥南面军“复顺水势进攻”。张世杰“南北受敌，兵士皆疲不能战”。这时，张弘范乃乘舰“布障四匝，伏盾作乐”。宋军先是懈怠，以为元军正在宴乐，未及作备，待发现情况有诈，这才向来舰放箭。张弘范“度其矢尽”，始命“撤障去盾”，于是元军“弓弩火石交作，顷刻并破七舟。”在元军的夹击之下，“自朝至日中，战未决。会日暮，雨暴作，昏雾四塞，宋师队伍大乱。”陆秀夫知大事已去，先沉妻子于水，继登昺船曰，“官家事危矣，奈何”!遂抱帝昺赴海，俱死于水。后宫及百官吏士从死者万数。承宣使翟国秀及团练使刘俊等解甲就降。“焚溺之余，尚得海舰八百余艘”。张世杰、苏刘义等突围、“乘间开南壁，率十六舟夺港门遁去。”杨太后闻呙死，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尔，今无望矣!”遂赴海死，张世杰葬之海滨。

张世杰等乘潮而遁，欲往占城，五月，遇飓风，舟遂覆，死于海陵港（又作平章港，隶南恩州，今广东阳江县）。六月，张世杰所部：降校168人降元，至此，亡宋的残余势力彻底覆灭。“自是岭海间无复宋军旗帜矣”。

崖山海战是历时45年（1234～1279年）的宋元战争的最后一役。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史上的又一次王朝更迭战争的最终结束。



隋唐战争史



目录

隋史
第一章 隋杨之先世及其统一
第二章 隋代各族人民起义
唐史
第一章 李唐之先世及其统一
第二章 唐前期农民战争
第三章 唐中期农民战争
第四章 唐后期农民战争
五代十国史
第一章 五代十国农民战争

隋史

第一章 隋杨之先世及其统一

经济情势较稳固，即造成统一较有利之条件，而统一之形成，又可以发展经济。因之分裂时期之长短，与经济破坏之大小密切相关。

由十六国并为南北朝，又由东魏、北齐而合为北周，北方诸民族早融会于鲜卑帜下，加以魏孝文帝力求汉化，异族之歧见渐泯，百姓苦兵革已二百余年，想望太平甚切，南北之统一，业成为必然性。但统一事业落于隋杨之手，则是偶然性。

杨坚自称汉太尉震之十四世孙。震八世孙，燕北平太守铉。铉子元寿，魏初为武川镇（今内蒙武川县）司马，因家于神武树颓焉（即朔州神武郡殊颓县，今山西寿阳县北境。《廿二史劄记》一五谓元寿家于武川，误）。坚父忠，西魏恭帝初，赐姓普六如氏，北周时封随国公，官至泾州总管，娶吕氏，生坚。坚娶独孤信第七女（后号文献后），生五子，勇、广、俊、秀、谅。

独孤氏出自鲜卑。鲜卑或云东胡种。缪凤林因谓文献后为汉胡之混合种（母崔氏），炀帝为汉人与混合种之后裔。此种断定，其意向实注重在“北方之汉族，因与杂种混合，再造其新生命”之推论，因名隋、唐两代为“汉胡混合之北统”。但对于手创统一事业之杨坚，并未觅出混合种的凭据，仍是立论不完。如果吾人能向上古追寻汉族的起源（春秋时晋有狄，燕有山戎，王畿有伊雒之戎，例不胜举），则杨、李之为混合，譬诸沧海一粟而已。

坚承袭家荫，无赫赫勋绩，其得篡周立隋，实以受遗辅政为一大枢纽。周武帝功业方隆，平齐之后，正将饮马江南，乃不半年而殂折。嗣子宣帝，立未二岁而卒。初膺疾时，坚以后父奉诏入侍，于大象二年（五八○）五月，与刘、郑译等合谋，矫制令坚受遗辅政。静帝年仅八岁，完全为所播弄，登位之后，即晋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百官总己以听。同年九月，丞相去左右之号，坚为大丞相。外镇如相州尉迟迥、申州李慧、荥州宇文胄、青州尉迟勤、郧州司马消难、益州王谦等，虽后先发难，然以缺乏联络及计划，不久即被平定。周之宗室，则毕王贤（六月）、赵王招、越王盛（七月）、陈王纯（十月）、代王达、滕王（十二月）均以谋执政之罪名而被诛（除毕王系明帝子外，余五王均文帝之子）。随于大定元年（五八一）二月篡位，自其受遗诏起计，不出一年，便移周祚，得国之易，无有如杨坚者。

坚以父忠封随国公，因改朝号曰随，又恶“随”字带“走”，故去走为隋。清代金石家见初唐石刻常作“随”，遂疑旧说之误。近年石刻大出，则隋石刻无不作“隋”。往日新朝，往往反胜朝之所为，初唐间作“随”，实因此之故。然初唐以后，又作隋者多，作“随”者甚少，苟非杨坚先曾改定，则无以解此等异同之迹也。

公元581年，相国杨坚篡周，建立了隋王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文帝出兵攻灭江南的陈王朝，南北统一，从而结束了汉末以来长期分裂的政治局面。

为了加强封建统治，隋文帝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初步形成了以尚书省为首的三省六部制，分掌全国兵、刑、钱谷等事。又将地方上的州郡县三级，简化为州县二级，裁减了许多官僚机构，规定所有大小官吏原则上由中央的吏部任命，不复由地方官辟举，以加强对全国的统治。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部分。隋初沿袭魏周的府兵制。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隋文帝把军户编入民户，改由州县直接管辖，不再存在单独的军人户籍。兵士和民户同样受田，进行农业生产，只是兵士一般不向封建国家交纳租赋，而是自备军人的资粮等。各地府兵由军府统领，轮流去京师长安充当宿卫。府兵直接由朝廷指挥。除禁卫军与戍守四方的军队外，其余军旅戎器全部停罢，而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了强大的镇压农民的专政暴力。

北周时，很注意计帐、户籍之法，使国力日趋强大。而北齐境内，却是豪富兼并，户口多有隐漏。北周灭北齐，未遑清理。隋初，“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朝廷在全国采取“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等办法予以清理。明文规定，如果存在隐漏脱籍，户口不实，有关官吏解职，乡正、里长配流远处。允许人们互相检举揭发，让被揭发者替揭发者代输租役，清理出大批隐户。朝廷控制的户口增多，使国家征收赋役有了充实的源泉。因此，隋王朝成为甲兵强锐、财富丰盈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盛国家。

第一节突厥之起源及为患中国

突厥为现在“突厥族”中之一系，近世学者多信其即上古涂兰（Turan）族之苗裔，本语作Türk（Türük），复数Türkl r，蒙古语写作Türküt（新疆翻佛经Twrk，于阗文作Ttrrūki，Tturki；西藏文Drug，Dru—gu；希腊文Toürkōü），汉文翻作突厥（只《续通历》及《册府元龟》四一曾见“突屈”之异译），其意义则力也，权也，能也。

此族初起之地，相传是金山（或阿尔泰山）一带，西魏大统八年（五四二），从连谷（榆林）入寇，是为突厥出现于汉史之首次。（《周书》二七）

突厥自称是狼种，无疑即上古之狄（字从犬）或翟。（《史记·赵世家》“翟犬者代之先也。”）酋长首见于中史者曰土门（Tum n）可汗（Qaghan），土门之原语，据我所见，应即突厥语之tüm n，此云万也（吐火罗语tumane，tmane，tman），匈奴最初之单于名头曼，实同语异译，《史》、《汉》意译为“万骑”。后来赫连勃勃有统万城，即肖音而兼孕义者。（见拙著《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金人称忒母，蒙古称秃绵或万户（《史记·李广传》有万户侯），此可汗必原来任万夫长，故以官为名。《新唐书》又作大吐务，亦称伊利可汗，伊利（il）犹云王也。

土门始至塞上市缯絮，大统十一年（五四五），宇文泰遣酒泉胡使其国，翌年，土门遣使来献方物，是为两国建立外交之始。

土门先破铁勒，继因被茹茹（蠕蠕、芮芮）蔑视，转而向西魏求

婚，魏以长乐公主妻之。废帝元年（五五二），灭茹茹。

其后（约五五三年），木杆可汗立，西破哒（挹怛，Ephthalies，Hephthalites），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坚昆Q rk z，满、蒙人称为布鲁特‘Burut’，今称吉尔吉斯），领域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

据波斯史，五五四年，木杆与波斯王Nushirvan（五三一一七九）始发生关系，波斯王得突厥助，攻灭哒，遂共分其国土，以乌浒（希腊文Oxus；伊兰文Vaksa缚刍；阿剌伯文Jihun；今Amudaria阿母河）河为界，并娶木杆女为妻，突厥势力由是伸至中亚，西突厥室点密（Ist mi）可汗即于是时始。室点密者，土门之弟也。现时于阗、疏勒等地附近住有一种民族，名为Abdal，所说者天山南路突厥语，但其中杂有来源不明之字。亦作Habdals，Lattimore以为导源于吉卜赛（Gipsy）族，余往日疑其与阿不旦（Abdal，罗布泊附近之地名）有关，今再以Ahdal，Hahdal及Ephthalites，Hephlhalites之对比观之，颇信此一民族即中古时代哒之遗裔。

西魏恭帝三年（五五六），假道凉州，与西魏合兵破吐谷浑于青海。

此后，齐、周争相结纳，保定五年（五六五），可汗以女妻周武帝，周人每岁给以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人在京者又优礼相待，衣锦食肉，常以千数；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縻之。突厥遂坐收渔人之利（隋文帝诏有云：“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遂安危。”），他钵可汗（木杆之弟）至有“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之自大语。大象二年（五八○），周封赵王招女为千金公主，以妻他钵。

第二节突厥与东罗马之发生

关系——丝绢贸易羽田亨言：自南北朝至隋、唐，善于经商之粟特人（Sogdians），其往来漠北，不单在商货贸易，且谋政治方面之携手以达其大欲。突厥及回纥勇悍而朴直，因信用彼辈，对中国之种种要挟或侵略，率此等狡黠者为之策划而坐收其利，平时又操纵对华贸易，取得非法利润。换言之，中国实为粟特人所苦。同样，彼辈亦用其对华之手段以对付西方。

中国丝绢之输出，自古即为亚洲一种重要商业，其取途有二：（一）西向出粟特（Sogdiana）即康国（Samarkand）等处，为最古之道。西方学者称为“丝路”。（二）通印度诸港之海道。当日以波斯及罗马人为主要顾客，而参预居间转贩者，则中亚之粟特人及印度洋之海舶。商胡东来之不断，中、印贸易之促进，皆与此有直接关系。

罗马人欲扫除波斯居间剥削之害，东罗马帝Justinian（五二七——六五，魏明帝至周武帝时）曾培养蚕种而无功，乃谋令阿剌伯西面土人与印度诸港直接交通，波斯沮之，且设法妨碍陆上之转运，以便其专利操纵。

粟特人见哒既灭，即请其新主室点密可汗，要求波斯许彼辈在其辖境内经营丝业。可汗因遣使至波斯（约五六七，即周武天和二年前），为波斯王Nushirvan所拒，突厥使至波斯者又多被毒死，由是二国交恶。

商人不得志于波斯，又怂恿可汗别辟东罗马的销场，五六七年底，有商人名Maniach者，行抵东罗马都城，呈突厥文可汗书，外附许多缯帛，略言突厥分为四部，大权操于室点密。

翌年初。东罗马帝JustinII（五六五——七六，即周武保定五至建德五年）遣使臣邪马克司（Zemachos）报聘，达可汗所驻之白山（应在今库车之北，特克斯（Tekes）流域，即伊犁之东南）。可汗帐幕，饰以杂色绸缎，陈列许多金器。适其时可汗往击波斯，为波斯所败，突厥与东罗马之交好，因是而益深。五七一年（天和六），突厥使二次至东罗马，要求Justin帝撤废九年前罗马与波斯所立之和约，演成东罗马、波斯间之廿年战争（五七一——九一，天和六至开皇十一年）。

五七六年（建德五），罗马使臣Valentin至突厥，告Tiberius帝之继位，且谋重修五六八年之旧约。此使臣与前使邪马克司均有残片旅行记留存。前使言突厥人持铁向其兜售，且令行逾火焰以清净其身。后使到突厥时，适遭室点密之丧，迫令依突厥习惯，用刀剺面，参与葬礼，葬时以死者生前所乘马四匹及俘虏四人为殉。

五七九年（大象元），波斯王HormizdIVorIII即位（五七九一九十），木杆可汗女之出也，与突厥亲虽甥舅，而并不相好（隋文帝诏有云：“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即叛。”攻酒泉在宣政元年年底；即五七八——九年）。五八七年（开皇七）沙钵略卒，弟叶护可汗立，因波斯用兵罗马，遂于五八八年率众三十万，往攻波斯，同时东罗马亦自叙利亚反攻，波斯两面受敌，其势颇危，幸藉大将之威望，以少敌众，叶护中箭而卒。

第三节突厥之内争、分裂及南附

初土门死，子（非弟）逸可汗立（逸即il之急读）。逸可汗不久卒，舍其子摄图而立弟木杆。木杆在位廿年卒（约五七二），复舍其子大逻便而立其弟他钵。他钵在位十年，病且卒，谓其子庵罗曰：“吾闻亲莫过于父子，吾兄不亲其子，委地于我，我死，汝当避大逻便也。”然大逻便母贱，众不服，庵罗母贵，突厥重之，摄图长且雄，尤力排大逻便，庵罗遂立。大逻便心不服，庵罗弗能制，以国让摄图，国中相议，摄图最贤，因立之，是为沙钵略（始波罗）可汗。此一段经过，无形中酿成东方式家庭间叔侄、兄弟之不和（隋文帝诏有云：“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昆季争长，父叔相猜，外示弥缝，内乖心腹”），是为突厥中衰之主因。往年他钵之所以玩弄周、齐者，隋朝乃得觊其隙而施行报复。

摄图之立，有待于国人相议，此与蒙古时代之也可库利尔台（Y k.quriltai犹云大会）制度，颇为相类。此制在元太宗、定宗、宪宗三汗即位之前，均尝举行，后来虽真意已失，然下至元末，犹保全其形式，即继立之君，须经大会推定是也。他如突厥前之乌丸、鲜卑，突厥同时之契丹、新罗，历史上亦表示其有类此之习惯。今按周武王崩而周公摄政，厉王奔而周、召共和，我国古制，当与此种习惯有密切之联系。

隋文帝即位，待突厥稍薄，沙钵略妻周千金公主，怀覆隋之心，屡言于可汗。开皇二年（五八二），遂悉众四十万分两道（今之陕、甘）入寇，凉、秦、泾、兰、敷、延诸州六畜咸尽。既而沙钵略攻大逻便，大逻便败，西投达头可汗（室点密之子），国中互相攻击，且各遣使来隋请和，千金公主亦上书愿为父女，隋使报之。沙钵略复书云：

辰半（开皇四年甲辰——五八四）九月十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使人开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语，具闻也。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则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

隋特使虞庆则、长孙晟往聘，沙钵略跪受诏书称臣，隋因赐千金公主姓杨氏，改封大义公主，更许沙钵略入猎恒、代，数年间边境稍安。

继叶护者为都蓝可汗，沙钵略之子也。叶护之子染干，号突利可汗（小可汗），居国之北，遣使赴隋求婚，隋以宗女安义公主妻之，并特厚其礼。都蓝怒，数为边患，又与达头合攻突利，突利败，只身入朝（开皇十九——五九九）。隋拜为意利（即伊利之异译）、珍（弥）豆、启民可汗，使游牧于夏、胜两州之间（今河套东边），以河为固。东西距河，南北四百里，在朔州为筑大利城（今山西、内蒙交界），再妻以宗女义成公主，部落南来者殆二三十万，其情形与东汉建武时南单于内附相类。旋都蓝被麾下所害，达头自立，国内大乱，达头奔吐谷浑，东西突厥由是分立。

西突厥之分藩，始于灭哒（见前四节），犹诸成吉思汗西征之分封长子术赤也，初时犹奉事宗邦，后因内乱而形成分裂。其国分十部，又曰十姓，每部赐以一箭（oq），故称十箭。十箭又分左右厢：左厢号五咄陆，各置一啜（čur）领之，右厢号五努失毕，各置一俟斤（irkin）领之。设南北廷，南廷当在今天山北路，北廷则在千泉即屏聿（b　ng-yul）附近。“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大唐西域记》一）其地即今哈萨克（Kazax）共和国Aulieata之附近，有良牧、美蔬及无数清泉，近世哈萨克人仍视为吹（Chu）、锡尔（Syrdaria）两河间避暑最胜之地。余依沈曾植氏《西王母国考证》求之，《穆天子传》二所云：“丙午，至于鄄韩氏，有乐野温和，穄麦之所草，马牛羊之所昌，宝玉之所□。……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其与此一区域相当，可无疑也。

第四节平陈

突厥中衰，北边无警，而又经济稳定，则隋之统一，有可能性。近人冀朝鼎提出我国历史上经济要区之论，以为政治统一之获得，只有一道，全国分为许多区域，“众区之中，有一区焉，其本地之农业出产，其接受他地转漕之利便，均优于余外诸区，以是故，凡取得此区者即取得征服统一全中国之钥。”按农产、转运二事，即在六朝之末，江南亦视关中为优胜，且同是汴水，刘裕用之以定秦，如冀之说，则北方无统一南方之理。《孟子》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双方条件相等或稍相等之情势，则胜负之券，应以能适应环境、能发动及领导群众为标准。

文帝既移周社，志得意满，遂萌统一之想，即位未一月，便任声名素著之韩擒虎为庐州总管，贺若弼（贺若复姓）为吴州（扬州）总管，委以平陈之事。弼承父敦遗志，献取陈十策，适北边不宁，未遑发动。

平陈方略多本自崔仲方。开皇六年，仲方论取陈之策，大致言武昌

已下，蕲、和、滁、方（今六合县）、吴、海等州宜驻精兵，密营渡计。益、信（今巴东）、襄、荆、基（今钟祥）、郢（同上）等州速造舟楫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为上流必争之冲要，若陈令精兵赴援，则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其拥众不出，则上江诸军可鼓行以前。（《隋书》六○本传）

陈宣帝卒（开皇二——五八二），子叔宝立，是为陈后主。即位之翌年（五八四），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并以沉檀香木为材，又饰金玉、珠翠。唐魏徵云："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初惧阽危，屡有哀矜之田，后稍安集，复扇淫侈之风，宾礼诸公，惟寄情于文酒（如江总、孔范辈，称为狎客），昵近群小，皆委之以衡轴（施文庆、沈客卿辈），……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见《陈书》）其速亡宜也。

叶护可汗继沙钵略之政，隋北边无警，开皇八年（五八八）三月，遂下诏伐陈。十月命晋王广、秦王俊、杨素，并为行军元帅。广出六合，俊出襄阳，素出信州，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蕲春（黄州），韩擒虎出庐江（安徽），贺若弼出吴州，燕荣出东海（海州），合总管九十，兵五十余万，皆受晋王节制，文帝驾幸定城（华阳），陈师誓众。

明年正月，弼自广陵济京口，擒虎济采石（当涂），以钳形攻势，夹攻建康，陈军束手无策。二月，擒虎先入城，获叔宝，陈亡。

素与仁恩引舟师趣三峡（瞿塘、巫、西陵），陈将吕肃守险滩，经四十余战，卒破之，又破肃于荆门，乘胜东下至汉口，与秦王会。时建康已下，晋王命叔宝为手书招上江诸将，于是上江皆平。世积以舟师自蕲水趣九江，驰书谕降豫章诸郡。荣自东莱傍海入太湖，取陈之吴州（苏州），随宇文述略定晋陵、会稽诸郡。

谯国夫人者高凉冼氏之女，世为南越首领，所属部落十余万家，嫁为高凉太守冯宝妇，佐夫治理，政令有序。及宝卒、陈亡，岭表未有所附，数郡共奉戴夫人，号为圣母。会文帝遣韦洸安抚岭外，夫人得叔宝书，乃遣其孙魂帅众迎入广州，岭南悉定。隋册冼氏为谯国夫人，许开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部落六州兵马，俱听发落，若有机急，便宜行事。夫人尝疏劾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致于法，至仁寿初始卒。

第五节杨氏家庭之变——专制之毒

文帝子五人，皆独孤后出。避后之妒忌，后宫有子者皆不育。即位后，立勇为太子。又惩宇文氏以孤弱而亡，开皇二年，于并州置河北道行台，广为尚书令。洛州置河南道行台，俊为尚书令，领关东兵。益州置西南道行台，秀为尚书令，总管二十四州诸军事。又以诸王年少，特选精良有才者为之僚佐。

勇初立，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皆令参决之。后因冬至勇张乐受百官朝贺，恩宠始衰。勇多内宠，尤嬖云昭训，独孤后代选之元氏妃又暴卒，益招母后之忌。广觊其隙，深自矫饬，务为俭素，临还扬州，入内辞后，自称恐被勇暗算，后信之，益恶勇。广又内联杨素，横加媒蘖，开皇廿年，遂废为庶人，改立广为太子。及文帝崩，广伪造遗敕赐勇死，所生十男皆被杀。至文帝之崩，史文犹有疑辞焉。

俊平陈后，授扬州总管，转并州，出钱求息，民吏苦之。又盛治宫室，穷极侈丽，颇好内，妃崔氏毒之，遇疾征还（开皇十七），数岁而

卒。生二子，后皆为宇文化及所害。

秀封蜀王，其镇蜀也，奢侈违制，车马被服，拟于天子，为广及杨素等所构，仁寿二年（六○二）征还京师，幽闭之。化及之乱，秀及诸子皆被害。

谅封汉王，开皇十七年（五九七），出为并州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特许以便宜，不拘律令。翌年，起辽东之役，谅为行军元帅，无功而还。常以勇、秀幽废，怏怏不平，阴有异图，会文帝崩，诏徵入，不赴，发兵反，兵败而降，竟以幽死。子颢亦于化及之乱遇害。

《隋书》（卷二）称文帝“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参看《隋书》二四《食货志》）然开皇十三年岐州仁寿宫之筑，“颇伤绮丽，大损人丁。”（《隋书》四八《杨素传》）已不能以身作则。且诸子就藩，年方弱冠（开皇元年，广年十三），声色货利，诱惑易进，一也。辅佐之人，依草附木，贡谀献媚，引入邪途，二也。广以欺诈而得立，启蜀、汉觊觎之心，三也。由于封建制度内在的矛盾，方谋享国之延长，反促杨家之寿命。古称：“知子莫若父”，文帝既不能察广之诈，而家庭之间，复多嫌忌，更陷于“父不父”之讥。弥留之际，乃言“独孤诚误我”，则所谓至死不悟也。身死之后，未及十五年（炀帝孙越王侗以唐武德二年被王世充缢杀）而仅存正道（炀帝子齐王暕所生）一脉，侗临终有言，“从今以去，愿不生帝王尊贵之家”，专制之流毒惨矣！

第六节炀帝之穷奢极欲

陈平后，广为扬州总管，前后十年，以北方朴俭之资，熏染于江南奢靡之俗，重以北塞宁晏，府库充实，遂沉湎而不能自拔，（通鉴，言帝“好为吴语”（一八五），即位之后，三幸江都，可相证也。

大业元年（六○五），于洛阳旧城西十八里营建东京，仍命宇文恺董其事，每月役丁二百万人，效法秦始皇，徙豫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巨贾数万户以实之，劳役虽巨，而规模则不及大兴。“乾元殿大木多自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贞观政要》二）又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多间，每三间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厨扉皆自启，帝出则垂闭复故。（《通鉴》一八二）其显仁宫则采海内奇禽、草木之类以实之。宫内筑西苑，周二百里，内有海渠，缘渠十六院，各以四品夫人主之，宫树冬凋，缀以剪彩，海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好乘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作《清夜游》曲。

将幸江都，遣官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黄龙、赤舰、楼船等数百艘。（参四八《杨素传》）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上重有正殿，中二重凡百二十房，皆饰金玉。以元年八月行幸江都，挽船士八万余人，相接二百里，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

炀帝无日不营宫室，元年于临淮营都梁宫，有曲河以安龙舟。（《太平寰宇记》一六）三年八月，太原营晋阳宫，四年四月，汾州起汾阳宫，十二年正月建毗陵宫。（《通鉴》一八三）此外涿郡有临朔

宫，北平有临榆宫，渭南有崇业宫，鄠县有太平、甘泉二宫，江南有丹阳宫，皆其所营造者。

性又嗜猎，四年九月，征调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

六年正月，诸蕃酋长悉集洛阳，因于端门街盛陈百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光烛天，终月而后罢。

帝既醉心奇巧，宇文恺、何稠等皆希旨以应。北巡之役，恺"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辽东之役，稠制行殿及六合城，"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围置阙，面别一观，下三门，迟明而毕。"（均《隋书》六八）徒供个人之娱乐，于国计民生无关焉。

史称周穆王欲肆其心而周行天下，断章取义，诚可施之隋炀帝，然穆王西行万里，自有原因，不可相比也。计炀帝即位后仅三月，便幸洛阳。

大业元年八月，如江都。

二年四月，还洛。

三年三月，还京，四月即北巡，（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由榆林出塞，入楼烦关，经太原，九月还至东都。

四年三月，经太原（《本纪》三及《通鉴》一八一均讹五原，兹据一八《律历志》及《太平寰宇记》五○校正）、交城，幸汾阳宫，因出塞，巡长城，东至于恒岳。

五年正月，自东都经京，西巡河右，涉吐谷浑界，西出张掖（甘州）。九月，还京，十一月，复幸东都。

六年三月，幸江都。

七年二月，御龙舟，入通济渠，至涿郡。

八年，伐高丽，九月，还东都。

九年三月，幸辽东，九月，还次博陵。（还东都否，未详。）

十年三月，复幸涿郡，东至怀远镇，十月，经东都还京，十二月，又如东都。

十一年五月，幸太原，巡北塞，被突厥围于雁门，十月，还东都。

十二年七月，幸江都，至十四年三月，被弑。

通计居京时日，不足一年，而"从幸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需，皆仰州县"，（二四《食货志》）劳民极矣。

第七节疆域之开拓

好大喜功。往往与穷奢极欲相表里，大业三年三月，遣朱宽使流求，四年三月，遣常骏使赤土，致罗刹，（此据二四《食货志》。《本纪》三及《北史》一二刹皆作厨。）皆足表示炀帝之个性。

流求或以为即今琉球，或以为台湾，说者各异。据《隋书》八一，大业六年，陈稜、张镇州击流求，系自义安郡渡海，义安即今潮州，非进攻琉球之适当口岸，不合者一。同传又言，"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其方向为东行（如赴琉球，须向东北），高华得为南澳（汕头至南澳一百二十里），得为澎湖列岛，由南澳至澎湖，约经度两度，确可二日便至，澎湖一日到台湾，亦符事实，若以拟

琉球，未免太近，不合者二。陈、张“献俘万七千口，颁赐百官”，（《本纪》三）台湾北部，隋时想已有不少汉人流寓，故有此数，琉球则未必得如许俘虏，不合者三。

用兵之地，更有林邑（即占婆Cˇampa）。文帝末，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乱（此据《隋书》五三《刘方传》；唯《越史略》一云，梁时九德参军李贲，本中国人，其七世祖于西汉时徙居太平，大同十年，自称南越帝，建前李朝，再传至李佛子，则佛子非俚人也。“俚”字之用法，曾于拙著《释俚》揭之，今得此证，更见旧史之不可呆读。开林邑事，可参冯译G.Maspero《占婆史》三八——四○页），刘方讨平之，因使经略林邑。方率舟师趣比景，大业元年正月，军至海口（灵江口），击走其王梵志，度黎江，入国都，获金庙主十八枚，佛经五百六十四夹，凡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并崑仑书（即占婆文），刻石纪功，士卒脚肿死者十四五。（参《方传》、《隋书》八二及《续高僧传》二《彦琮传》）将其地分置荡、农、冲三州（后改比景、海阴、林邑三郡），隋兵引还后，梵志复得故地，遣使谢罪。（参《隋书》三一及八二）

次为吐谷浑（可读原音，不必如宋人读“突欲魂”），急言之曰退浑，就其被统治之人言之，则羌种也（或以为唐古特族，不确，唐古特系党项之转），旧称曰阿柴（或阿赀Aza）虏。大业初，铁勒犯塞，遂请降，帝使裴矩讽令击吐谷浑以自效，铁勒即勒兵往袭，大败之，其主伏允东走保西平（鄯州，今乐都县）。三年，又命杨雄、宇文述等往征，四年西巡时，更分兵数道围之，来降者十余万口，六畜三十余万，自西平以西，且末（Cˇercˇen）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分置郡、县（五年六月，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各统两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

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交市，裴矩掌其事。四年，帝将巡河右，先令矩赴敦煌，矩知帝勤远略，遣使说高昌（Cocˇo）王及伊吾吐屯设（Tudun□ad），啖以厚利，导使入朝。明年西巡，次燕支山（张掖附近），高昌王、伊吾设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伊吾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六年，置伊吾郡，使薛世雄城之。

最应记者为俀国之交通。“委”“妥”二字在古往往通用，俀国即倭国也。开皇廿年（六○○——推古八），其王多利思北孤（即推古女王）遣使诣阙。大业三年，又遣使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炀帝览之不悦。明年，诏文林郎斐（即裴字）清往使，度百济（今朝鲜半岛西南部），行至竹岛（今珍岛，在全罗南道西南海中），南望罗国（即耽罗，今济州岛），经都斯麻国（今对马岛），迥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今壹岐岛），又至竹斯国（今筑紫山）。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又经十余国（即小岛），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俀云。（《隋书》八一，参丁谦《＜隋书＞四夷传考证》）

突厥既分裂，其势渐衰，居西方者曰处罗可汗，屡与铁勒相攻，卒为所败。炀帝采裴矩离间之策，可汗遂以七年底入朝于临朔宫，赐号为曷萨那可汗，留居中国。十年正月，将宗女信义公主嫁之。

第八节三伐高丽

高丽自号高句骊，北齐废帝封其王阳为高丽王，始去“句”字。

（《东北通史》一七四页）初，燕盛时，略属真番、朝鲜。及汉兴，以路远，修辽东故塞，仅至水（今鸭绿江，或云大同江）为界。有燕人卫满东渡水，据其地而自王。元封三年，武帝遣兵定之，开为玄菟、乐浪、临屯、真番四郡。元帝时（公元前三七）北夫余之高句骊人朱蒙（《好大王碑》作邹牟）始建国，渐残汉郡，东晋安帝元兴三年（四○四——好大王十四年），其十九世朝广开土境，平安好大王卒掠有辽东之地。继位者长寿王之十五年（四二七——宋元嘉四），始迁都平壤。北朝之末，其国东至新罗，西北渡辽水至营州，南至百济，北至。周武时改封阳为辽东王，隋文受禅，仍封高丽王。阳卒，子元嗣，开皇十八年，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隋以汉王谅为元帅，水陆三十万伐之，师次辽东，遇疾疫，死者什八九，会元亦上表谢罪，遂罢兵。

大业三年，炀帝幸启民可汗帐，适高丽使在彼，帝谕令还国，促元早入朝，元不奉诏。七年，帝遂亲征，驻涿郡。八年正月，大军既集，分为左、右两翼，每翼各分十二军如次：

史称士卒总一百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馈运者倍之，是月第一军发，终四十日，引师乃尽。诸将各奉旨，不敢越机，至七月，九军并陷，将帅奔还，遂班师。

九年春，二次征兵，三月，驾幸辽东，四月，渡辽，六月，杨素子玄感反于黎阳（今濬县），渡河直逼东都，帝遂急去高丽而回。

十年，又发天下兵，时民军蜂起，军多失期，帝以三月幸涿郡，七月次怀远镇。会饥馑，六军递相掠，复多疾疫，高丽亦困弊，遣使请降，并归上年叛人斛斯政，乃息兵，仍征元入朝，而元卒不至。

《东北通史》以为致败之因有四：一、万乘亲征，遥为指授，二、未立统帅，事权不一，三、劳师远袭，饷馈难继，四、敌势方强，无隙可乘（一九八——九页）。以如许之众，钤辖之远，而欲发纵指示，一切操于日事玩乐之独夫，根本已构成必败之条件。况当日“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通鉴》一八一）敌稍能坚壁，旷日持久，就非退军不可。尤有进者，远击异域，利在精兵疾前，炀帝挟童稚之见，以为众必胜寡，殊不知师无纪律，阻手碍脚，稍有摇撼，牵动全军，人越多则致败之机亦愈多也。

第二章 隋代各族人民起义

第一节社会矛盾的发展和炀帝的暴政

在隋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贵族官僚不仅根据均田令占有大量土地，而且通过皇帝赏赐、仗势强夺民田等途径，获得巨额田产。如大贵族杨素，先后受赐田一百三十顷，在两京及诸方都会处的“邸店、水并利田宅以千百数”。来和、陆知命、樊子盖、卫玄、张衡和柳庄等官僚，也有不少赐田。隋统治者佞佛，赐予寺院许多土地、寺户和其他财物。如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隋文帝诏令于诸州名山之下置寺，“并赐庄田”。赐宣州妙显寺寺户五十。寺院还以宗教迷信等手段，巧取豪夺农民的土地。贵族官僚和僧俗地主都对农民进行封建地租剥削。农民从均田令中受田比贵族官僚少得多，又多不足应受额，衣食艰难。

隋文帝执政前期，比较节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帛丰盈，他也日益奢侈。如开皇十三年建仁寿宫，“夷山堙谷，营构观宇，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役使严急，丁夫多死……死者以万数”，并称赞监造官杨素是“忠臣”。其后又自京师至仁寿宫置行宫十二所。对农民的剥削也不断加重。史称开皇年间国家“仓库盈溢”，至仁寿末年，天下仓库的存粮，可供五六十年食用。它虽反映了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暴露了隋王朝对农民压榨的苛重。甚至发生天灾，隋文帝都“不怜百姓而惜仓库”，不许赈济。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隋文帝从开皇末年起，就开始使用严刑峻法。及至晚年，“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官吏则以残暴为干能，守法为懦弱，竞相鱼肉人民。

这一切，促使社会矛盾日益发展，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

开皇年间，“河东多盗贼”，蒲州刺史河间王弘将百余名起义者流放到边远地区。东阳（今浙江金华）陶子定、吴州（今江苏苏州）罗慧方聚众起义，围攻婺州永康、乌程等县，为检校括州事韦冲击破。华阴（今陕西华阴）地区“多盗贼”，隋王朝特选“世号为能”的殿内监荣毗前往镇抚。冉龙羌起义，攻打汶山、金川二镇，被资州刺史苏沙罗打败。

由于岭南刺史、总管等多贪赃枉法，如番州总管赵讷、刺史陆让，为政暴虐，聚敛大量财物，引起当地人民的怨恨，“请俚獠多有亡叛”。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二月，桂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林）俚李光仕聚众起义，隋文帝命上柱国王世积出岳州（今湖南岳阳），征发岭北军；前桂州总管周法尚驰往桂州，调集岭南兵，共同镇压。李光仕迎战不利退走。王世积部多遇瘴疠不能前进，遂顿兵衡州（今湖南衡阳）。周法尚部继续追击。李光仕保守白石洞。周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等家属，凡来降附者即还其妻子，诱降了数千义军将士。周法尚一面出兵与李光仕对阵，一面亲帅奇兵埋伏林中。当两军开始交战，周法尚立即驰击义军营栅，栅中人溃散，李光仕被杀。义军余部仍坚持斗争。隋文帝又遣员外散骑侍郎何稠募兵往剿。师至衡岭，何稠派使者招降起义军洞主莫崇，并用酒食和甜言相骗。莫崇为其所惑，回洞后不复设备。何稠深夜领兵掩袭其洞，消灭起义军。象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

象州东北）起义军首领杜条辽、罗州（今广东廉江北）起义军首领庞靖等，相继投降。何稠又分遣建州开府梁昵进攻罗寿起义军，罗州刺史冯暄围剿李大檀起义军，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隋文帝鉴于岭南夷、越等少数民族多次起义，出现"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总管府"的严重局面，任命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特许便宜从事，刺史以下官可承制补授。令狐熙改变过去仅"以兵威相胁"的武力镇压办法，加强玩弄更加狡猾的"大弘恩信"的策略，一些起义军首领受骗归附，起义被瓦解。

当时，由于起义繁多，甚至在隋王朝统治中心——长安也不太平，尽管官府白天在长安进行大搜捕，但是，"人间强盗，亦往往而有"，隋文帝十分忧愁，向群臣询问"断禁之法"。诏令：凡是盗一钱以上皆斩首，或三人共窃一瓜也处死刑；如能告密，则将起义者家产赏给告密者。不久，又以吴越之人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的借口，将江南诸州民间三丈以上船支统统收入官府，加紧对人民反抗斗争的防范和镇压。

严刑峻法并不能使人民屈服。起义仍在各地不断爆发。开皇十七年七月，桂州人李世贤起义，隋文帝命右武侯大将军虞庆则为桂州道行军总管率兵镇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三月，熙州（今安徽潜山）李英林起义，署置百官。隋文帝以扬州总管司马张衡为行军总管，帅步骑五万围剿。同年，越巂（今四川西昌西南）蛮也聚众起义。

仁寿年间，人民反抗斗争在岭南和蜀两大地区进一步开展起来。

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十一月，潮（今广东潮安）、成（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梧州市东南）等五州僚起义，隋文帝命高州酋长冯盎征发江南和岭南兵，将起义镇压下去。翌年十二月，交州俚帅李佛子起义，占据越王故城、龙编城和乌延城等地。隋文帝命瓜州刺史刘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统领二十七营进剿，至都隆岭，起义军二千余人主动出击，刘方打退义军后乘胜进逼李佛子大营，"先令人谕以祸福，佛子惧而降，送于京师。其有桀黠者，恐于后为乱，皆斩之"。桂州山越起义军被洪州总管苏孝慈打败。番禺（今广东广州）夷僚起义军为右亲卫车骑将军薛世雄镇压。

益州总管蜀王杨秀，自开皇十三年后，更加奢侈无度，"多捕山獠充宦者，车马被服，拟于乘舆"，又令熟僚出奴婢，多杀无辜，聚敛民脂民膏，引起蜀民、尤其是夷僚等少数民族的愤怒。仁寿年间，"西南夷僚多叛"。隋文帝命通州刺史郭荣领八州诸军事行军总管征讨，义军坚持斗争一年多。嘉州（今四川乐山）僚起义军，袭败前来镇压的行军总管段文振于山谷，后因义军懈怠不备反为其所败。不久，嘉州夷僚又奋起反抗，向官军发起主动进攻，行军总管元褒率步骑二万，将起义军击垮。为了镇压再次起义的嘉州僚，隋文帝派将军周法尚和武通围剿。在起义军的英勇抵抗下，周法尚部失利，武通部归路被切断，武通被打死。遂州（今四川遂宁）僚起义时，隋文帝复以周法尚为行军总管。镇压起义后，又诏其便道征讨攻占巂州（今四川西昌）城的乌蛮起义军。起义军主动撤离州城，散于山谷，周法尚见武力不行，就使出"遣使慰谕，假以官号，伪班师"手腕。当起义军首领为其所骗，尽归营栅聚饮相贺时，他立即发兵偷袭，俘起义军将士数千，男女万余。资州（今四川资中）山

僚起义，众至十余万口，声势颇大。起义军围攻大牢镇，资州刺史卫玄前往起义军营游说利害，起义军首领为其所惑，撤围退走而溃散，山僚起义，蜀王遣骠骑将军王仁恭镇压。

隋文帝为人刻薄，猜忌大臣，“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其诸子为争权夺利而暗斗明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晋王杨广勾结杨素等除掉了太子杨勇，谋害了卧病的隋文帝，于仁寿四年（公元604年）窃取了皇帝宝座，他就是中国历史上以荒淫和残暴著称的隋炀帝。

隋炀帝以天下承平日久，国富民强，“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上台伊始，便大兴土木，百役俱兴。仁寿四年十一月，征发山西、河南丁男数十万，在洛阳之东掘一弧形长堑，自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东接长平（今山西晋城南平县）、汲郡（今河南汲县），抵临清关（今河南新乡东北）、浚仪（今河南开封西北）、襄城（今河南襄城），达于上洛（今陕西商县），以置关防，拱卫洛阳。次年三月，隋炀帝命杨素和宇文恺于伊洛营建东京，“每月役丁二百万人”。由于“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仅九十天就建成了举世闻名的洛阳城，以便更好地控制关东及江南广大地区。大业二年（公元606年）为营造舆服仪仗，课天下州县献骨角、齿牙、毛羽，朝命夕办，百姓被逼到处网罗，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又用高价购买。“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帛巨亿计”。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五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七月，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西起榆林（今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东至紫河（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南），长千余里，“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八月，又于太行山“开直道九十里”。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七月，发丁男二十万筑自榆谷以东的长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底，修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八百余里。

史称隋炀帝五日不修宫室，并“广召良家，充选宫掖”，穷奢极侈。大业元年三月，他于东京修显仁宫，“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自西京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所。五月，于东京筑西苑，周围二百里，内有人造海，海内高百余尺的蓬莱、方丈和瀛州三仙山上，琼楼玉宇，向背如神。北来的龙鳞渠，蜿蜒注入海中。渠畔立十六院，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事，堂殿楼观，华丽非凡。秋冬宫树凋零，则翦采如华叶，缀于枝头，色旧易新，使其常如春天。池塘剪彩为荷芰、菱芡。苑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无处不满。十六院争用花样翻新的办法献媚求宠。隋炀帝则喜欢月夜里，在数千宫女簇拥和“清夜游曲”的丝竹声中，骑马游西苑，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大业三年在太原建晋阳宫。“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但是隋炀帝“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于是又营汾阳宫等。

隋炀帝“年年历览，处处登临”游玩。在他执政的十三年半里，呆在皇宫不足一年。他“西出玉门，东逾碣石”，南达江都（今江苏扬州市），北至塞外，足迹几遍神州。每次巡游，都有大批军队护卫，还有

许多贵族、官僚等侍从，仪仗舟车均极端豪华。所至之处，民众要为他开路、修河、营建行宫别馆，供奉水陆殊味，献食“丰厚者进（官爵），疏俭者获罪”。官吏为求恩市宠，无不百般搜括，甚至“逆折（预收——引者注）十年之租”，并从中渔利，千百万民众为此倾家荡产，生计断绝。如大业元年，隋炀帝为出游江都，征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黄河，复引黄河入汴水，引汴水入泗水，达于淮河，又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杨子入长江。通济渠广四十步，渠旁筑御道，植柳树。接着，隋炀帝又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建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一切准备就绪后，隋炀帝于同年八月出游江都。他乘坐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上下四层，殿堂全由金玉装饰，豪华无比。皇后所乘翔螭舟，比龙舟稍小，而装饰一样。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道和蕃客等所乘漾彩等船，也都金碧辉煌。挽船士八万余人，称殿脚，都穿锦彩制成的袍。四十余万步骑夹岸而行，整个船队绵延二百余里，旌旗蔽野，干戈如林，浩浩荡荡，亘古未闻。所经州县，五百里内奉命献食，多者一州至百抬，皆水陆珍奇，吃不完的，出发之际，多埋弃地下。隋炀帝在江都，每次出游，仪仗羽仪，均填街溢路，绵亘二十余里。第三次游江都，新造龙舟等船只，比杨玄感起兵烧毁的旧龙舟等还要大，耗费资财更甚于前。

为了满足好大喜功的贪欲，隋炀帝“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他不惜耗费巨额钱财，不断亲率数以十万计的庞大军队，巡边耀武，炫夸威风和富有。“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如大业三年出巡榆林时，拥兵五十余万，马十万匹。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七月，西幸回归，在凉州之西的大斗拔谷遇暴风雪，“文武（百官）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太半，马、驴什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为了诱引少数民族首领和西域商人向他顶礼膜拜。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起，每年正月在洛阳端门盛陈排场极大的百戏散乐，为了夸富而以绢帛缠树，免费供应酒食，“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西域诸蕃往来相继，“所经州郡，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对于高丽隋炀帝“恃众怙力，强兵黩武，惟在并吞”，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三次征讨高丽的战争。

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起，隋炀帝就开始了攻打高丽的准备工作。正月，“诏发河北诸军百余万，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作为进攻的大本营。“丁男不供，始役妇人”。大业六年，严令检查、更新兵器，滥恶者处以死刑。在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二月，隋炀帝从江都亲临涿郡（今北京西南），声称“高丽（王）高元，亏失藩礼，将欲问罪辽左”，诏令天下士卒，不论远近，必须按期到达。陆军集于涿郡。由征发来的江、淮以南水手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组成的水军，则集于东莱（今山东掖县）。又命幽州总管元弘嗣在东莱海口造战船三百艘，限期急促，监工凶残，逼迫工匠“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同年五月，隋炀帝命河南、淮南和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东），供将士推运衣甲幔幕。征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需。七月，命江淮以南民夫和船只，运送黎阳、洛口等粮仓之米于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

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隋炀帝还征发民夫运粮积于泸河、怀远二镇（均在今辽宁西北部），“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又发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当时有不少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谓之“福手”、“福足”。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春，隋炀帝下诏亲征高丽。隋军分左、右两路，每路十二军，从涿郡出发，水军则由东莱渡海，共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每天发一军，相距四十里，四十天发完。旌旗亘千里，刀枪如林，鼓角震天，由于高丽军民凭险坚守，以逸待劳，而隋军一切行动均由不懂军事的隋炀帝指挥，馈运不继，麦铁杖等大将阵亡，陆军主力被阻于辽东城（今辽东辽阳县内），“六军冻馁，死者十八九”。宇文述、于仲文率领的进攻平壤的三十万五千人，攻至距平壤三十里处，粮尽引还，被高丽军四面截击，溃散于萨水（即清川江）畔，仅“二千七百人”逃回辽东城，辎重损失殆尽。来护儿统率的水军，渡海至平埌城下，遭到伏击，也几乎全军复没。隋炀帝不顾臣下谏阻和人民反对，于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发动了第二次对高丽的战争。六月，正当他在辽东城下亲督大军与高丽激战时，突然传来了杨玄感起兵黎阳（今河南浚县）的告急消息，兵部侍郎斛斯政又叛逃高丽，隋炀帝慌忙退兵回救老巢。高丽蹑后全军出击，隋军损失甚重。

杨玄感是大贵族杨素之子，任礼部尚书，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隋炀帝第二次打高丽时，命他在黎阳督运军粮。他看到隋炀帝的暴政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百姓苦役，天下思乱”，隋炀帝远在辽东前线，后方兵力空虚，以为这是取隋代之的良机，遂打出“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的旗号，起兵反隋。苦于徭役、兵役的农民“纵乱者如市”，不少贵族官僚子弟也投奔他，众至十余万，声势颇大。由于杨玄感信用贵族官僚子弟和降官，不可能真正依靠广大民众。他采取“袭取东都，以号令四方”的“下计”，因而在隋炀帝从辽东撤回的隋军主力打击下，迅速失败了。杨玄感起兵虽是隋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但它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已激烈到公开对抗的程度，很难继续统治下去了。骄横愚蠢的隋炀帝仍不死心。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初，又发动了第三次攻打高丽的战争。由于“盗贼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绝，军多失期”，大举进攻已不可能。而连年频遭战祸的高丽，亦极其困弊，遣使求和，隋炀帝遂顺水推舟，允其所求，以便集中全部兵力镇压国内的人民反抗斗争，稳固他的统治。因高丽王高元不遵隋炀帝命其亲来朝拜的诏令，隋炀帝大怒，欲重开战端，兴师问罪。然而农民大起义的风暴已使隋炀帝自顾不暇，这次讨伐化为泡影。隋炀帝对高丽的战争使中国和高丽人民蒙受了难以言喻的苦难，在客观上一次比一次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大起义的发展，加速了隋王朝的彻底灭亡。

由于无休止的繁重徭役和兵役经常在农忙季节征发，行者不归，“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上连年水、旱灾害、瘟疫流行，而隋炀帝根本不管民众死活，“王纲弛紊，吏多赃贿，所在征敛，下不堪命”，民众“弱者自卖为奴婢”广大民众实在活不下去了，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大起义，就

是在这样背景下爆发的。

第二节义师蜂起

隋亡以经济崩溃、农民起义为主因，无待再论。然“内忧外患”与革命相影响者尚有二事：其一为杨玄感之变，已见前十七节，其二为雁门之围。初，东突厥启民汗卒，子咄吉世立，曰始毕可汗，表请尚义成公主，诏从其俗，部众渐盛，裴矩献策，欲分其势，又诱杀始毕谋臣史蜀胡悉，始毕憾之，大业十一年八月，乘帝北巡，围帝于雁门，官军频战不利。帝惶惧，欲溃围，群臣谏止，乃征诸郡率兵赴难，并遣使驰告义成公主，几及一月，突厥始解围去，然其声势益张。玄感父素，本帝之死党，启民事隋亦极恭顺，经此两役，隋之声威于是一落千丈，帝复撤废总管（见前三节），地方军务须秉承中央意旨，远水不济近火，“郡县微弱，陷没相继”，（《隋书》七一《杨善会传》）不为无因。

《新唐书》一著录之隋末群雄，计四十八人，然合诸《隋书》及其他记载，实不止此，惜其归并降灭，多不可知。兹就炀帝被弑之前见于史册者，略依起事年份及地域，次为简表如后：

一、京畿及关西

二、山东西及河南（古之山东，即今之河北）

三、东南及长江流域

四、岭南

以上共百余人，山东西及河南占其过半，盖三伐高丽，最为荼毒，大河南北，受害极烈，故民众起而抵抗者亦特多。就中白榆妄、王须拔、魏刀儿、刘武周（均《隋书》四）、郭子和（《元和志》四）、窦建德（《旧唐书》一）、薛举、李轨、高开道（均同上五五）、梁师都、刘季贞（均同上五六）、张长逊（同上五七）、王世充（《通鉴》一八八）等，因接近北边，恐强敌拊背，往往连好突厥，或且受其官命，倚以自重。即李渊（唐高祖）起太原，亦卑辞厚币，改书为启，乞借马匹，及突厥使来，礼见于晋阳宫东门之侧舍，不惜一时屈辱，他复何论。大抵始毕兄弟虽欲释憾于隋炀，亦欲效他钵故智，挟隋以自重（周武帝建德六年，既灭北齐，范阳王高绍义奔突厥，他钵举兵南向，声言与高宝宁共立绍义作齐帝，为其报仇，见《北齐书》一二《绍义传》），故宇文化及败后，处罗可汗即遣使往窦建德处，迎取隋炀之萧后及其孙政道，处之定襄，号政道，为隋王，凡中国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为部落。（《隋书》五九《齐王暕传》）李渊起兵之初，与始毕书云：“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指隋炀言）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隋）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温大雅《创业起居注》一）盖已窥突厥之隐，不敢昌言亡隋，一面又以子女、玉帛饵之，免其乘我后也。

群雄出身，多不可稽考，知其曾为隋朝官吏者有梁师都、薛举、李轨、郭子和、刘武周、翟让、李密、罗艺、时德、朱粲、萧铣等十余人。桑门（即沙门）一人（向海明），稽胡三人（刘步禄、刘苗王、刘季贞），中亚胡二人（何潘仁、王世充），就中世充乃安禄山一流，觊觎汉土，不得与于义师之列。

群雄中可纪者：王薄据齐济之郊，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

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动，避征役者多往归之。（《通鉴》一八一）

刘霸道家平原东之豆子，累世仕宦，资产富厚，食客常数百人，及义师起，有众十余万，号阿舅贼（同上；按即《隋·本纪》之李德逸一支）。

余杭民刘元进起兵应杨玄感。会帝发三吴兵再征东，兵皆相谓曰：“往岁天下全盛，吾辈父兄征高丽者犹大半不返，今已罢弊，复为此行，吾属无遗类矣。”由是多亡命，郡县捕之急，闻元进举兵，亡命者云集，旬日间众至数万。（《通鉴》一八二）

章丘杜伏威起事，年十六，每出则居前，入则殿后，故其徒推以为帅。伏威使人谓下邳苗海潮曰：“今我与君同苦隋政，各举大义，力分势弱，常恐被擒，若合为一则足以敌隋矣。”海潮即帅众降之。隋将来整击伏威，伏威败，其将西门君仪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负伏威逃，更有壮士十余人卫之，与隋兵力战，由是得免。（同上）伏威常选敢死士五千人，称为上募，宠遇甚厚，攻战辄令先击之，战罢阅视，有伤在背者即杀之，谓其退而被击也。获得资财，皆以赏军，故人自为战，所向无敌。（同上一八三）

较特出者为窦建德及刘黑闼。建德，漳南人，高丽之役，以勇敢选为二百人长。同县孙安祖亦被选征士，安祖辞以家为水漂，妻子馁死，县令怒笞之，安祖刺杀令，匿建德家，官司踪迹至，建德谓安祖曰：“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但为亡虏耶。”乃集少年数百人，使安祖将之，入高鸡泊。郡县疑建德与群雄通，收其家属悉杀之，建德亡归高士达。久之，安祖为张金称所杀，余众尽归建德，兵至万余。建德能倾身接物，与士卒均劳苦，由是人争归附，为之致死，拥兵十余万，大可有为。卒以违势愎谏，舍易（收河东）取难（救王世充），一战被擒，起军六年而灭。黑闼初隶建德，建德败，据其故地，为秦王世民（太宗）所破，奔突厥。既而借突厥兵入寇，武德六年二月，建成、元吉合兵败之。

割据稍久者唯梁师都，屡引突厥入寇，并为主谋，颉利之直逼渭桥，固其计也。使诸附突厥者皆如师都所为，中国之统一，必大受妨碍。贞观二年，太宗乘颉利政乱，遣柴绍等攻之，其部将斩师都以降，自起至灭，凡十二岁。

坊间旧说部盛陈瓦冈寨（在东郡界）之绩，然言其人物，则有李玄霸，此太宗之弟也，事已不可信。（“四十八路烟尘”似因《新唐书》举出四十八人而发生。）秦琼（叔宝）、程咬金（知节）、单雄信等虽尝事李密，然未必皆瓦冈旧人（如秦琼）。翟让既破隋将张须陀，便欲“还向瓦冈”，则亦陈胜之流而已。

陈寅恪《述论》谓宇文泰所创之关中本位政策，经北周及隋，维持至于唐初；政策之最主要者曰府兵制，“唐代在关中本位政策即内重外轻之情形未变易以前，其政治革命惟有在中央发动者可以成功。”（一五及五一页）按内重外轻，莫如炀帝，其时府兵制又未破坏，依陈氏之论，宜若炀帝时地方革命无成功之望，而炀帝竟为地方革命所推倒（炀之被弑，实由革命势力所促成）。由是，知地方革命之成功与否，别有其主要原因，不系于所谓“关中本位政策”。

大致言之，革命军之共同目标，最初是推翻专制魔王。迨隋炀丧身，目标猝失，除去少数利用时机别有野心者外，一般人愤气骤平，急思安静；且其认识限于时代性，无能冲破严固的封建关锁，提出新政策、新口号以相呼召，或困于乡土思想与地盘思想（如《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一六六页所云），或则举棋无定，进退失据（如《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一四六——九页之批评建德），全局遂转入混乱与割据时期。

第三节隋末农民大起义的蓬勃发展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三月，长白山（今山东章丘、邹平境内）大洞内，“有狂冠数万”，隋炀帝命陈杲仁将兵“平之”。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正月，数十名素冠练衣之人，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出世，闯入洛阳皇城端门，夺卫士兵仗，突入宫中起义，与齐王的卫兵遭遇，战败被杀。“于是都下大索，连坐者千余家”。同年六月，雁门（今山西代县）人尉文通“聚众三千，保于莫壁谷”，隋炀帝遣鹰扬杨白泉击破义军。十二月，朱崖（今广东儋县）人王万昌“作乱”，隋炀帝诏陇西太守韩洪讨伐，王万昌被镇压。不久其弟王仲通继起反抗，也被韩洪击败。以上星星之火，虽旋起旋被扑灭，但它却预示着农民大起义的燎原烈焰行将腾起。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秋，农民起义在山东一带不断爆发。邹平（今山东邹平县）人王薄和孟让，拥众据长白山，进行反隋斗争。王薄自称“知世郎”，表示自己是通晓当今世事的人。他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在民间传唱：

长白山头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

横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食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号召民众不到辽东为隋炀帝打高丽送死，拿起刀枪造反。它唱出了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民众的心声，“避征役者多往归之”，众至数万。官军前来围剿，屡被义军击败。

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聚众千余人在清河（今河北清河北）境内进行反隋斗争，不久，义军扩至数万。

县（今山东夏津县东北）人张金称，聚集百人在清河之曲反隋。

平原郡（今山东陵县）豪富刘霸道，“有众十余万，号阿舅贼”，以豆子（今山东陵县东）为根据地，进行反隋斗争。

此外，“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余人，攻陷城邑”。

大业七年开始兴起的这些农民起义军，都发生在今山东、河北一带。他们均在本地活动，比较分散，彼此没有密切联系，规模也不大，它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初级发展阶段。尽管这时隋炀帝的注意力集中在准备打高丽上，但他对广大人民的反隋斗争十分仇视，“帝乃更立严刑，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他还下令“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想用血腥屠杀的高压手段遏止人民反抗斗争。但是，“百姓转相群聚，攻剽城邑，诛罚不能禁”。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隋炀帝不顾天下义军竞起的严重局

势，发动了第一次规模空前的侵略高丽的战争。由于战争的不义性质，隋炀帝指挥无能，在高丽军民顽强抵抗下，隋军大败。又遭“大旱，（瘟）疫，人多死，山东尤甚”。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不仅依然骄奢淫佚，密诏江淮南诸郡每岁为他贡纳民间“姿质端丽”的童女；而且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正月，又迫不及待地诏征天下兵于涿郡前线，大肆募兵为骁果，修缮辽东古城贮军粮，准备发动第二次大规模攻打高丽的战争，这就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社会矛盾，“盗贼四起”，掀起了第一次农民起义高潮。其中比较大的义军有：

平原郡李德逸，“聚众数万，称阿舅贼，劫掠山东”。

灵武（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白瑜娑领导的“奴贼”，“劫掠牧马，北连突厥，陇右多被其患”。隋炀帝遣将军范贵讨之，“连年不能克”。

杜彦冰（一说杜彦永）、王润率领的另一支义军，攻破平原郡，“大掠而去”。

江宁（今江苏南京）乐伯通，聚众十万，朝请大夫陈杲仁奉隋炀帝之命讨伐。

济北（今山东聊城一带）韩进洛，聚众数万起义。

渤海（今山东阳信西南）孙宣雅，在豆子聚众数万，进行反隋斗争。

齐郡（今山东济南一带）裴长才、石子河率义军二万攻打章丘城，毫无准备的齐郡丞张须仓促拒战，被义军“围百余重，身中数创”，援军赶来，张须才侥幸未死。

北海郡（今山东益都）郭方预聚众三万，攻陷郡城。又与秦君弘等义军联合围攻北海郡，兵威强盛。由于他们恃强无备，为张须等袭破，数万义军被杀，损失辎重三千辆。

济阴（今山东曹县西北）孟海公，保据周桥（今山东曹县东北）城，“众至数万，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

河间（今河北河间）格谦，在豆子进行反隋斗争，有众“十余万”。

当时，天下承平日久，人不习战，“郡县吏每与贼战，望风沮败”，唯有张须十分凶悍负隅顽抗。王薄进攻鲁郡（今山东兖州），张须蹑其后，乘其恃胜未设备，选精兵出其不意地在岱山（今山东泰山）下击败义军，杀数千人。王薄收亡散万余人，将北渡黄河，张须追至临邑（今山东济阳西南），又败义军，杀五千余人，获牲畜数以万计。王薄遂联合“孙宣雅、石柢、郝孝德等众十余万”，进攻章丘，张须率步骑二万袭击义军，失利的义军在散走时，又遭其舟师的拦击，义军辎重丧失不可胜记。

隋炀帝命金紫光禄大夫段达征讨张金称等义军。县令杨善会向他献计，不被采纳，为张金称等所败，“亡失甚多”，义军轻蔑地称他“段姥”。段达后用杨善会参谋军事，才摆脱困境，并多次打败义军。其后，张金称复引“孙宣雅、高士达等众数十万，破黎阳而还，军锋甚盛”。

隋炀帝又命武贲郎将王辩、平原通守杨元弘和擢升清河郡丞的杨善会联兵进剿。杨元弘和杨善会率马步偷袭张金称军大本营，王辩出兵助战。张金称立即从进攻冠县（今河北冠县）的前线撤军回救，击败王辩军，保守大本营，各路隋军不得已退走。

济北人甄宝车，“聚众万余，寇掠城邑”。

隋炀帝在暴力镇压的同时，又玩弄“抚慰”伎俩，以瓦解义军。如命越王长史崔颐“抚慰高阳、襄国，归首者八万余人”。《隋书》卷七二《李德饶传》又云：隋炀帝允许聚众渤海的格谦、孙宣雅等“十余头”起义军归降，格谦等遣使上书炀帝：若使德行为当时所重的金河长李德饶来，“即相率归首，”后因其行至冠氏县被其他攻城起义军杀死，格谦等归降事遂不了了之。

同年六月，大贵族杨玄感起兵，客观上大大削弱了隋统治阶级力量，有利于广大民众反抗斗争，反隋炀帝暴政的斗争从此掀起第二个高潮。当时“山东遂成大乱”。河北有“张（金）秤（称）、王须拔等凡二十七项，多者十余万，少者不下十万人，屯据州县，建营山泽，其下首帅也有名称，或云乞见敌、嫌头方、彻春顽、勿惜死，又结聚村落，百十为群，如黑社、白社、青特、胡驴之号，浮云贼、忽律贼”。江南一带也是“百姓思乱，从盗如市”。

余杭（今浙江杭州）刘元进举兵响应杨玄感，“三吴苦役者莫不响至，旬月众至数万”。吴郡（今江苏苏州市）还俗道士、昆山县博士朱燮，带领数十名学生举兵响应杨玄感；隐居常熟的晋陵（今江苏常州）人管崇，亦聚众起兵，自称将军，他们共“拥众十余万”，迎刘元进为盟主。刘元进遂据吴郡称天子，朱燮、管崇俱任尚书仆射，署置百官，建立政权，“毗陵、东阳、会稽、建安豪杰多执长史以应之”。隋炀帝命左屯卫大将军吐万绪、光禄大夫鱼俱罗率兵进剿。刘元进攻打丹阳，败于吐万绪，进击润州也遭挫折。吐万绪进屯曲阿，与刘元进相持百余日。刘元进失利，义军赴江水而死者数万。吐万绪乘胜攻打屯兵毗陵的朱燮、管崇，义军退保黄山。吐万绪围攻，管崇等五千余人战死，三万余口子女被俘，但是“贼势浸盛，败而复聚”。不久，吐万绪和鱼俱罗获罪于朝廷。隋炀帝改命江都郡丞王世充发淮南兵继续镇压义军。王世充初战不利，退保延陵栅，后因风掩击义军获胜，从此频败义军，刘元进和朱燮均被王世充所杀。王世充“召先降者于通玄寺瑞像前焚香为誓，约降者不杀。散者始欲入海为盗，闻之，旬月之间，归首略尽。世充悉阬之于黄亭涧，死者三万余人”。血的教训擦亮了民众的眼睛，幸存者，“复相聚为盗，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

梁郡（今河南商邱县南）民韩相国，举兵声援杨玄感，被其封为河南道元帅，旬月间，众十余万，攻打郡县。杨玄感兵败，韩相国军随之逐渐溃散，韩相国本人为隋吏执杀。

隋炀帝在不断调兵遣将镇压各地农民起义的同时，又命天下郡县和驿站筑城，加强防卫力量。在平定杨玄感起兵后，对御史大夫裴蕴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裴蕴和东都留守樊子盖，遂以搜捕杨玄感党羽之名，大肆镇压民众。三万余人被杀，并“皆籍没其家，枉死者太半，流徙者六千余人”。杨玄感在东都开仓赈给百姓时，“凡受米者，皆阬之于都城之南”。此后，隋炀帝对造反民众的惩处更加野蛮。《隋书·刑法志》云：“及杨玄感反，帝诛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轘裂枭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已下脔噉其肉”。隋炀帝以为用此严刑峻法可以根除民众反抗，而效果却适得其反，民众更加愤怒，“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皆盗武马，始作长枪，攻陷城邑”。

信安郡（今广东高要）人陈瑱，拥众三万，攻占本郡。

济阴（今山东菏泽）人吴海流、东海（今江苏连云港西南）人彭孝才聚众起义，有“众数万”。攻占怀仁县后，转入沂水，保五不及山，为彭城（今江苏徐州市）留守董纯所败，董纯将被俘的彭孝才车裂而死，义军溃散。

梁慧尚率众四万，攻占苍梧郡。

东阳郡（今浙江金华）人李三儿、向但子起义，众至万余。

吕明星率众数千围东郡（今河南滑县东），被隋虎贲郎将费青奴击破。以长白山为根据地的王薄和孟让等领导的义军，这时已发展到十余万人，渤海格谦义军和孙宣雅义军也都拥众十万，四出攻打郡县，沉重地打击了隋炀帝在山东的统治。

右侯卫将军冯孝慈讨张金称于清河，反为义军所杀，张金称有众数万。

唐县（今河北唐县）人宋子贤善幻术，能变佛形，自称弥勒出世，远近信奉，“日数百千人”，准备以召开佛教的无遮大会为名，举兵袭击隋炀帝在高阳（今河北高阳）的乘舆。后因泄密，宋子贤被捕遇害，千余家受到连坐处罚。

桑门向海明（一说向海公）于扶风（今陕西凤翔）自称弥勒佛出世，以“人有归心者，辄获吉梦”，吸引信徒，被三辅地区民众称为大圣。向海明遂倡议反隋，众至数万。他自称皇帝，改元白乌，在扶风与安定（今甘肃泾川北）之间活动。后被隋太仆卿杨义臣镇压下去。

东阳娄世干义军，共有二十万人，在婺水一带反隋。司徒陈杲仁奉诏率兵征讨。

在这一年里，农民的起义不仅在广度上大大超过以前，并从山东、河北一带迅速扩展到西北和广大江南地区，而且在深度上也有明显的提高，不少义军开始突破孤军奋斗的圈子，与其他义军联合作战，反映出农民起义军的思想水平和作战能力都有了很大进步。隋末农民战争在向纵深发展。

由于隋炀帝在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初，再次在全国征兵，妄图发动第三次大规模的攻打高丽的战争，弄得民众更加困苦不堪，促使更多的人起来造反。“山东思乱，从盗如市，郡县微弱，陷没相继”，“秦陇盗贼蜂起”。因此，在大业十年里，人民反抗斗争掀起了第三个高潮，又新崛起了许多支义军。

扶风人唐弼“立陇西李弘芝为天子，有徒十万”，自号唐王。

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张大彪（一说张大虎），聚众数万，保悬薄山，进攻徐、兖。榆林太守董纯起初闭营不战，待义军不设备时，出精兵攻打义军，义军失利，张大彪牺牲。

鄱阳（今江西波阳）义军群起，隋炀帝命被阻于此的新任南海太守刘权募兵征讨。他用“说以利害”的欺骗手段将义军瓦解。

宋世谟（一说宗世谟）义军攻占琅琊郡（今山东临沂）。弘化、延安（今陕西延安）等郡义军群起，所在屯结。延安人刘迦论拥众十万，与稽胡刘鹞子率领的义军相呼应。隋关内讨捕大使屈突通帅关中兵围剿。屈突通屯兵于安定，不与义军交锋，军中均以他为怯懦，屈突通遂杨言旋师而潜入上郡（今陕西县），乘刘迦论无备，夜袭其营，杀刘迦

论等万余人，男女数万口被俘。

郑文雅、林宝护等率义军三万，攻陷建安郡（今福建福州），杀太守杨景祥。

隋炀帝从攻打高丽的前线怀远镇回师，邯郸（今河北邯郸）人杨公卿（一说阳公卿），率八千人袭其后卫第八队，俘得飞黄上厩马四十二匹。

离石（今山西离石县）胡刘苗王举兵反隋，自称天子，以其弟六儿为永安王，众至数万。将军潘长文讨伐，不能取胜。当时这里百姓饥馑，相聚起义，离石郡太守杨子崇进行镇压，捕杀义军数千。

司马长安义军攻破长平郡（今山西高平南）。

汲郡（今河南汲县）人王德仁聚众数万，以林虑山（在今河南林县西）为中心，四出活动，声震数州。

齐郡人左孝友率领的义军，“众将十万”，屯蹲狗山（在今山东招远北），张须陁列八风营逼压，复分兵扼其要害，左孝友窘迫投降，“其党解象、王良、郑大彪、李等众各万计”，均被张须消灭。转战于沂水的彭孝才，也被彭城留守董纯打败。有“众十余万”的涿郡卢明月，在祝阿（今山东禹城南）与张须相持十余日，张须陀兵少，粮尽退兵，使其将秦叔宝、罗士信分领千兵伏芦苇间。当卢明月追击张须时，伏兵偷袭卢明月大营，纵火焚其营栅，卢明月闻报仓促奔还，张须回军夹击，大破义军，卢明月仅以数百骑突围。

吕明星、帅仁泰（一说师仁泰）、霍小汉等众各万余，攻扰济北郡，被张须击走。

隋炀帝鉴于国内人民反抗斗争日益高涨，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集中兵力镇压义军，他乘高丽王乞和之机，答应了他的请求，将攻打高丽的主力部队撤回，以镇压人民起义。因此，山东、河北地区的义军，遭到不少挫折。加上这个地区经济破产，灾荒连年，缺吃少穿，义军的活动难以继续开展，许多义军遂向隋王朝兵力比较薄弱的江南一带转移，以图发展。大业十年底，孟让率军“十余万”，自长白山南下江淮，至盱眙（今江苏盱眙），据都梁宫。隋炀帝遣江都丞王世充讨伐。王世充据都梁山设五栅，佯示羸弱，相持不战。至孟让轻敌懈弛，便移灶撤幕设方阵，毁栅出击，义军大败，孟让以数十骑投奔瓦岗军，部分溃散义军归附在淮南地区活动的张善安领导的起义军。张善安是兖州方与（今江苏鱼台西）人，年十七便聚众起义，有众百人，至此壮大为八百人，袭破庐江郡（今安徽合肥），渡过长江，依附林士弘义军。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初，隋炀帝大宴百官，并“大会蛮夷，设鱼龙曼延之乐，颁赐各有差”。就在他夸口“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的同时，隋炀帝下令“民悉城居，田随近给，郡县驿亭村坞皆筑城”，企图把民众强行迁徙到城里来，实行坚壁清野，割断民众与义军的联系，同时使“穿窬无所厝其奸宄，萑蒲不得聚其逋逃”，以防止越来越多的民众逃亡和参加义军。但是，“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徭役既重又急，无法生存，这就逼使更多的民众铤而走险。所以在这一年里，农民起义继续发展，又有一些新义军兴起。

齐郡颜宣政聚众起义，为隋武贲郎将建毗击败，数千男女被虏。

上谷（今河北易县）人王须拔，自号漫天王，国号燕，其亚将魏刁

儿（一说魏刀儿），自称历山飞，“众各十余万”，北连突厥，南攻燕、赵，为隋将段达、郭绚击败。

上谷宋金刚义军有众万余人，在易州边境与魏刁儿义军互为表里。

幽州（今北京市一带）杨仲绪率义军万余攻打北平（今河北卢龙一带），被隋将李景击败，杨仲绪牺牲。这时北平一带“盗贼蜂起，道路隔绝”。

彭城魏骐义军，有众万余人，据单父（今山东单县），攻鲁郡，被隋将董纯击败。

卢明月率领十余万义军进攻陈（今河南淮阳）、汝（今河南临汝）一带。

谯郡（今安徽亳县）人朱粲，原为县小吏，大业末年从军讨伐长白山义军时，转而聚众起义，后“拥众数十万”。他迁徙无常，引军渡淮，攻打竟陵、沔阳，转战荆、襄等地，所向披靡，汉南诸郡多为朱粲攻占。

绛郡（今山西新绛）敬槃陀、柴保昌义军有众八万人，隋汾、晋地区长吏难以将其镇压。

隋炀帝特别诏令以“果于杀戮”著称的樊子盖发关中兵进剿，“汾水之北，村坞尽焚之……有归首者，无少长悉坑之”。对于他的疯狂屠杀，“百姓怨愤，益相聚为盗”，樊子盖的数万大军，一直不能取胜，隋炀帝无奈，只好走马换将，以李渊代之。李渊改用剿抚兼施策略，在频繁攻打义军的同时，对“来（降）者，引置左右，推赤心待之，……遂相率归者，前后至者数万余人，贼散去他郡”。

在这一年里，关中一带和宜阳（今河南宜阳西）等地，也兴起了不少农民起义军，有的义军声势还相当大。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正月，大朝会，照例应来京觐见隋炀帝的天下诸郡朝集使，不至者二十余郡。而“反者，多如毛，群盗所在蜂起”，整个政治形势更加不利于隋王朝。隋炀帝分遣使者十二道，发兵讨捕义军。又诏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数万人筑宫苑于其郡东南，周围十二里，内为十六离宫，仿洛阳西苑之制，而奇丽又过之。还欲修皇宫于会稽，以便南逃。新崛起的义军有：

雁门（今山西代县）人翟松柏聚众于灵丘，众至数万，转攻附近郡县。

东海人卢公暹率众万余，保于苍山（今山东苍山）。

此外，以前兴起的各地义军，这时也有新的发展。张金称义军先后攻占平恩（今河北馆陶西北）、钜鹿（今河北钜鹿）、武安（今河北武安）和清河等地。魏刁儿部将甄翟儿复称历山飞，拥兵十万，转攻太原，“巧于攻城，勇于力战”，实力相当强大。隋将潘长文奉旨征讨，被甄翟儿击毙。

隋炀帝问宰相苏威征讨高丽之策，苏威不愿其行，并欲使炀帝知道当时天下义军群起情况，答称若“诏赦群盗，自可得数十万”，其中特别提到“关内奴贼”山东历山飞、张金称、河南王薄、孟让等，说明“关内奴贼”也是一支势力相当强大的著名反隋义军。

从大业七年秋开始发动的农民大起义，至大业十二年七月，除前述上万、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的这些较大起义军外，其它小股造反队伍，

则比比皆是。农民起义军虽人多势众，士气高昂，但终究是一哄而起，武器简陋，组织涣散，不懂兵法，缺乏必要的将领，故其“莫识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师用兵之势”。又由于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乡土地域观念较强，致使起义军往往互不联系，力量分散。而当时的隋王朝，却有比较强大的国家机器，上百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经济力量也十分雄厚。因此义军兴起后，遭到隋炀帝的残酷镇压。然而残酷镇压是不可能将这些“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的民众压制下去的。他们“人自为战”、“败而复聚”，形成一股攻无完城、野无横阵的铁流，隋王朝虽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将”，也逃脱不了“连踵覆没，莫之能御”的惨败下场，更不用说那些色厉内荏的郡县长吏了。

在这种形势下，隋炀帝表面上“耻有盗窃之声，恶闻丧乱之事”，内心深处，却“魂褫气慑”。据史载，自大业八年以后，他“每夜眠，恒惊悸，云旮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大业十二年四月，大业殿西院发生火灾，隋炀帝“以为盗起，惊走，入西苑，匿草间，火定乃还”。至五月，当他听说农民起义军已近在距洛阳仅一百八十里的汜水（今河南荥阳县内），就再也不敢呆在皇宫里了。七月，江都新造龙舟等船支送到洛阳，大臣宇文述劝隋炀帝去江都（今江苏扬州市），右侯卫大将军赵才谏阻：“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师，安兆庶”，隋炀帝大怒，“以才属吏”，十天后，怒气消，才将他外放。朝臣皆不欲行。而为了自身的安全，并镇压江淮一带蓬勃发展的农民反抗斗争，“（隋炀）帝意甚坚”，隋炀帝于朝堂杖杀上书极谏的建节尉任宗。奉信郎崔民象又“以盗贼充斥”上表谏阻，也被隋炀帝怒斩。然后胡诌了一首“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的诗，留别宫人，带着小朝廷，匆匆逃往江都。车驾至汜水，奉信郎王爱仁上表请还西京；至梁郡，郡人再次拦车驾极谏，已成惊弓之鸟的隋炀帝一概不听，杀王爱仁等而后行，“谋窜身于江湖，袭永嘉之旧迹”，妄图割据江南，作垂死挣扎。

全国农民起义方兴未艾。除原来各支义军不断发展外，又有不少新的义军勃兴。

冯翊（今陕西大荔）孙华聚众起义，其实力之强，为关中诸义军之冠。

恒山（今河北正定县南）赵万海义军，“众数十万”，攻打高阳（今河北高阳东）。

郭六郎率三千义军攻打并州平城县（今山西太原东南）。

东海杜扬州、沈觅敌等聚众起义，众至致万，为隋右御卫将军陈稜击败。

安定人荔非世雄杀临泾令举义，自号将军。

河池郡（今陕西凤县西）山区，有一支万余人的起义军，后被郡守肖击降。

鄱阳人操师乞聚众起义，攻占豫章郡（今江西南昌），以其同乡林上弘为大将军。隋炀帝命治书侍御史刘子翊将兵征讨。操师乞不幸中流矢而死。林士弘代统其众，杀刘子翊于彭蠡湖，义军发展至十余万。不久，林士弘称帝，以王戎为司空，攻夺九江（今江西九江）、临川（今江西抚州市）、南康（今江西赣州市）和宜春（今江西宜春）等郡，“豪

杰争杀隋守令，以郡县应之”，北起九江，南及番禺的广大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

郝孝德、孙宣雅、高士达、张金称、杨公卿、时秀康和魏刁儿等部义军，攻打河北诸郡，隋将败亡相继，只有虎贲中郎将王辩和清河郡丞杨善会曾多次打败义军。

隋炀帝命王世充将兵攻打格谦，义军失利，格谦被杀。其部将高开道收集余部，继续进行斗争，先后攻占北平、渔阳二郡，自临渝至怀远，皆破有之”，众至万人，北连突厥。

怀戎（今河北涿鹿西南）浮屠高昙晟，杀县令起义，号大乘皇帝，以尼静宣为耶输皇后，建元法轮，遣使约高开道为兄弟，封齐王。高开道率众归附。居三月，杀高昙晟，“并其众，复称燕王，建元，署置百官”。

隋炀帝命太仆卿杨义臣征讨张金称。张金称扎营于武安郡平恩东北，杨义臣引兵据永济渠为营，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张金称挑战，杨义臣约与其战，至时又不出战，“如是月余，义臣竟不出”。张金称以为杨义臣胆怯，屡次“逼其营詈辱之”。杨义臣声称明日决战，张金称以为又是谎言不加戒备。杨义臣挑选精骑二千，深夜偷渡清河，伺张金称离营，立即攻入其营。张金称引兵还救，杨义臣从后追击，义军大败，张金称与左右逃于清河之东。不久张金称为杨义臣所俘。“吏立木于市，悬其头，张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农民英雄张金称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未死间，歌讴不辍”。

内史侍郎虞世基，以隋炀帝“恶闻贼盗”，诸将及郡县有告求救者，虞世基皆不以实情上奏，诡称“鼠窃狗盗，郡县捕逐，行当殄尽，愿陛下勿以介怀”；隋炀帝信之不疑，反而仗责使者，以为妄言。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弹劾虞世基，反被降职。因此“盗贼遍海内，陷没郡县，帝皆弗之知”。

隋炀帝逃往江都后，江淮郡官谒见时，“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迁丞、守，薄则率从停解”。如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升任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由是郡县竞务刻剥，以充贡献”，广大农民所受压榨更加厉害，“生计无遗”。因此，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里，农民起义军继续在各地进行反隋斗争，并有不少义军崛起。

卢明月进攻河南，转战淮北，“众号四十万”，隋炀帝命王世充征讨。两军会战于南阳，义军失利，卢明月牺牲，义军溃散。

弘化（今甘肃庆阳）人刘击成聚集万余人起兵反隋，声震傍郡。

徐圆朗率数千义军攻破东平郡，分兵攻郡打县，占有琅邪以西、北至东平一带，义军发展到二万余人。

王子英聚众起义，攻破上谷郡。

庐江（今安徽合肥）张子路义军，被隋右御卫将军陈镇压。陈复渡清江击宣城义军。李通德率义军“十万寇庐江”，被隋左屯卫将军张镇州击破。

房宪伯义军攻占汝阴郡（今安徽阜阳）。

原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奴贼”数万人，围攻扶风郡，太守窦据城顽抗。经数月围攻，义军食尽，多有离散，其中千余骑归附起兵

岐、雍间的地主武装首领丘行恭。丘行恭利用归附的酋渠进行劝降，同时率五百人携牛酒、米麦伪装慰劳，杀害奴帅，兼并了这支奴军。

太原（今山西太原）人阳世洛聚众万余人攻打城邑。武贲郎将高毗败济北郡甄宝车义军于山（在今山东聊城东南）。颍川（今河南许昌）沈柳生义军攻打割据罗川的隋官肖铣，后者作战不利，遂以中兴肖梁相欺骗，沈柳生归附肖铣，旋被杀害，义军溃散。

康老和聚众起义于张掖（今甘肃张掖）。南海（今广东广州）义军竞起，多次攻打郡城，太守刘权倚城固守。

桂阳（今湖南郴县）人曹武彻举兵反隋，建元通圣。

张善安义军攻占庐江郡。

灵寿（今河北灵寿）郗士陵聚众数千反隋。

大业末年聚众起义，或活动于这个时期的农民起义军则有：

李青蛙起义于淮左（今安徽境内），后为隋将刘德威杀害。

起义丹阳（今江苏南京）的吴棋子义军，俘获奉隋炀帝之命于上江督运的原丹阳留守刘子翊，“子翊说之，（吴棋子）因以众降”。

长白山义军在淮阳郡（今河南淮阳）城大败隋军。

虢州卢氏（今河南卢氏）张士贵聚众起义，“攻剽城邑，远近患之”。

邵江海据岐州（今陕西凤翔）起义，号新平王，隋炀帝命陇州刺史叔孙老征讨。

并州（今山西太原）王君廓，大业末年聚众反隋，攻打夏县（今山西夏县）、长平（今山西晋城东北），河东丞丁荣一面拒战，一面遣使招降。王君廓伪称归降，“（丁）荣轻之，因陈兵登山，君廓悉伏甲山谷中。荣军还，掩击，破之”。王君廓又与韦宝、邓豹等义军联合攻打虞乡（今山西永济）等地。

杨厚起义军进攻北海县，生俘前来刺探军情的石门府队正松，义军后被隋炀帝派来的户曹郎郭子贱击败。

此外，尚有一些起兵者，因史籍记载简略，仅言某人据某地，难以判断其为农民起义还是地主起兵，只好留待以后查考了。

总之，从大业七年开始的农民大起义，到隋末，除“剑南独无寇盗”外，其他地方几乎无处不有。史称农民起义“星离棋布，以千百数”，“相聚萑蒲，毛而起，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小盗阻山泽者万数”，“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入于襄、邓，东周洛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僭伪交侵，盗贼充斥”。参加起义的人，有“避征役者”、无产业者、渔猎之手、盐户、奴婢、儒生，下层僧道、少数民族、逃兵、商人和中、小地主等，就是说，隋炀帝的暴政及其对民众造反进行血腥镇压，激起了不同阶级，阶层和各民族人民的普遍愤怒，几乎全体民众都加入了这场反暴政的斗争行列，其势犹如大海的怒涛，席卷了神州大地，猛烈地冲击着隋王朝的反动统治。色厉内荏的隋炀帝见天下危乱，“意亦扰扰不自安”，终日长醉浇愁，贮毒药以备随时自尽，对镜哀鸣“好头颈，谁当斫（砍）之”。

第四节瓦岗、河北和江淮三大义军的斗争

从大业七年起义爆发以来，经过七个年头的战斗洗礼，农民起义军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逐渐克服地域观念，加强团结，相互支援，从分

散活动、走向联合作战。至大业十三年左右，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三支强有力的起义集团军，这就是翟让和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窦建德和刘黑闼领导的河北义军，杜伏威和辅公领导的江淮义军。这三大义军的形成，标志着隋末农民大起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翟让和李密领导的瓦岗军

瓦岗军是隋末农民大起义中举义最早、发展最快的义军之一。创始人翟让，东郡（今河南滑县东南）韦城人。自称“起陇亩之间”，曾任东郡法曹，“坐事当斩”，狱吏黄君汉“奇其骁勇”，放他逃走，翟让遂在大业六年底，聚众起兵于东郡之瓦岗寨（今河南滑县内）。同郡人单雄信“骁健，尤能马上用枪”聚少年前往参加。济阴郡离狐（今山东菏泽北）人徐世，年十七，有勇略，家富于财，也参加了瓦岗军。翟让接受徐世提出的在汴水所经的荥阳郡（今河南郑州）和梁郡（今河南商丘）边界，夺取公私行舟的货物的建议，因而“资用丰给，附者益众，聚徒至万余人”。瓦岗军不少是“齐、济间渔猎之手，善用长枪，华骍龙厩细马所向江都者，多为（翟）让所劫，故其兵锐于他贼”，曾多次粉碎隋王朝围剿。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翟让在李密的辅佐下，攻下金堤关（今河南荥阳东北）及荥阳侧近诸县、城堡，直接威胁东都洛阳的安全与运河的畅通。隋炀帝命荥阳太守王庆，及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张须率二万隋军征讨。张须曾血腥镇压过山东地区许多支义军，号为“名将”，深受隋炀帝器重，由齐郡丞擢为仅次于太守的通守，“画须、（及其部将罗）士信战阵之状而观之”，其部素称隋军劲旅。曾屡为张须所败的翟让，听说他又来征讨，“大惧”，欲远走逃避。李密说，张须骄狂寡谋，可以智取。翟让遂“阵而待，（李）密率骁勇常何等二十人为游骑，伏千兵莽间”。张须一贯轻视翟让，引兵打阵，翟让迎战不久即佯败而去。张须驱兵追击十余里，及至大海寺（今河南荥阳东北），伏兵自丛林中骤起猛攻张须后队，翟让亦率军回马反戈围击隋军，隋军大溃。张须反复突围，终不能出，乃仰天哀叹：“兵败如此，何面见天子”，被瓦岗军斩杀于阵。付将贾务本“亦被伤，帅余众五千余人奔梁郡，务本寻卒”。义军乘胜攻占河南地区军事重镇荥阳。这是瓦岗军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大长了农民起义军的威风，而隋王朝的“河南郡县为之丧气”。

义宁元年（公元617年）二月，天下饥馑，隋王朝粮仓里粟米山积，却不赈济饥民，民众异常愤怒。李密对翟让说，东都空虚、兵不素练，越王年幼，政令不一，士民离心。倘若将军亲帅大军，轻行掩袭，攻占兴洛仓，“如拾遗耳”，发粟济赈穷人，“百万之众，一朝可集”，然后枕威养锐，以逸待劳，檄召四方，天下则指麾可定。翟让采纳了这个夺取粮仓、壮大义军的正确策略。并与李密一起亲率精兵七千出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北，方山（今河南登封东北），自罗口（今河南巩县西南），一举袭取兴洛仓。“开仓恣人所取，老弱襁负，道路不绝，众至数十万”。由于翟让袭占兴洛仓不仅救济了广大饥民，获得了大批军粮，壮大了队伍；而且切断了东都洛阳的重要粮食供应基地，使其失去了一个有战略价值的要地。

洛阳留守、隋炀帝之孙越王侗，急命贲郎将刘长恭，光禄少卿房率东都步骑二万五千，屯兵虎牢（今河南汜水西北）的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等率所部，约于二月十一日会师仓城南，前后两面合击瓦岗军，妄图

夺回兴洛仓，以稳定河南政局。

翟让侦知越王侗的作战计划，遂把骁将劲卒分作十队，以四队伏于横岭（今河南巩县东），对付从虎牢而来的裴仁基，其余六队布阵于巩县东南石子河东岸，迎战隋军主力刘长恭部。刘长恭率领的东都兵先到，士卒未食早饭，他便驱使士卒渡过洛水，布阵于石子河西，见瓦岗军少，不等裴仁基军会师，就攻打义军。翟让所率义军失利稍退，李密率部从侧翼猛击刘长恭，隋军饥疲大败，死者十之五六，刘长恭易服潜逃。裴仁基闻风“惧不敢进”，屯兵百花谷（今河南巩县东南），固垒自守，“东都震恐”，瓦岗军声威远扬。

在取得这次大捷后，翟让等推李密为主，上其号魏公，设坛场即位，称永平元年，其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魏公府置三司、六卫，元帅府置长史以下官属。李密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亦置长史以下官，减元帅府之半。以房彦藻、邴元贞为左、右长史，杨德方、郑德韬为左、右司马。命筑洛口城，方四十里而居，建立农民政权。又命护军田茂广造云三百具，以机发石，号“将军炮”，进逼东都。于是赵魏以南，江淮以北的农民起义军莫不响应。“孟让、郝孝德、王德仁及济阴房献伯、上谷王君廓、长平李士才、淮阳魏六儿、李德谦、谯郡张迁、魏郡李文相、谯郡黑社、白社、济北张青特、上洛周比洮、胡驴贼等”，均前来归附，李密一一拜官，使统其众，“置百营簿以领之，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有些反隋地方武装首领也归附李密。

李密遣将攻取安陆、汝南、淮安和济阳，河南诸郡相继多为瓦岗军控制。同年四月，李密命孟让率步骑二千夜入东都外郭，袭扰隋军。巩县长柴孝和、监察御史郑、淮阳太守赵陀和裴仁基等投降瓦岗军。李密命裴仁基等帅二万余人袭破回洛东仓，烧东都天津桥，后为隋军击败，还保巩县。李密亲自率兵攻打偃师、金墉，失利，撤回洛口（今河南巩县东北）。当时，东都守军尚多达二十余万，越王侗使人运回洛仓米入城，又在东都之北的北邙山、城东上春门和丰都市等地扎营九座，首尾相应。隋军昼夜不解甲，防御十分强固。李密率三万义军复据回洛仓，大修营堑，以逼东都。隋将段达等出兵七万拒战。两军战于回洛仓北，段达败走。

在瓦岗军积极围攻东都的同时，各地义军也都有很大发展。徐圆朗义军攻占鲁郡，封民赡义军席卷平原之境，郝孝德义军据有黎阳仓储，李士雄义军虎视于长平，王德仁义军扬威在上党，刘兴祖义军起于北朔，崔白驹义军发难颍川，房献伯义军占领谯郡，孟海公义军又破济阳，“各拥数万之兵，俱期牧野之会”。李密遂乘此大好时机，向天下郡县发布檄文，列举隋炀帝杀父害兄、乱伦、沈溺酒色、广营宫苑台榭、科税繁重、游览劳民、征伐高丽、嫉害忠良、政以贿成和言行无信等十大罪状，号召民众推翻这个“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独夫民贼及其黑暗统治，并鼓励隋官见机而作弃隋归降，“天下震动”。隋炀帝在江都，风闻瓦岗军的浩大声势，“惧留淮左，不敢还（东）都”。

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达赴江都求救，说李密有众百万，围逼东都，城内无食。如果陛下速还，瓦岗军必定溃散，否则东都肯定陷落。

为解洛阳之围，义宁元年五月，隋炀帝命监门将军庞玉等将关内兵

援救东都。柴孝和说李密曰：关中阻山带河，地势险要，西楚背之而亡，汉高祖建都于此以成霸业，又是杨隋西京，若亲率精锐袭取长安，业固兵强，然后东向平定河洛，传檄而定天下。李密虽说这“诚为上策”，他也考虑很久了，却又说义军都是山东人，见洛阳未下，不肯随他西行，留下的诸将，必然“各竞雌雄，若然者，殆将败矣”，没有采纳这个富有远见的谋略，仅命柴孝和率数十骑西行试探，瓦岗军主力仍继续围攻洛阳。所谓义军不肯西行乃是藉口，实际上是李密本人“顾恋仓粟，未遑远略”，一心想入东都称帝。越王侗使段达等与李密战于回洛仓西北，李密大败，死伤甚众，弃回洛仓遁回洛口。六月，李密帅众又与隋军大战于平乐园，复取回洛仓。七月，隋炀帝复命江都通守王世充“率劲卒五万”，将军王隆帅邛黄蛮，河北大使韦霁、河南大使王辩等各率所部共同驰援洛阳。九月，河南、山东大水，灾民“死者日数万人”，饿殍满野。徐世乘机对李密说：“天下大乱，本是为饥，今若得黎阳一仓，大事济矣”。李密遂命徐世率兵五千自原武（今河南原阳西南）渡过黄河，会同郝孝德、李文相、张升和赵君德等部义军，共同袭取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西南），“开仓恣食，一旬之间，胜兵二十万余”。武安、永安、义阳、弋阳和齐郡相继降于李密。窦建德、朱粲等部义军，亦遣使归附瓦岗军，李密以朱粲为扬州总管、邓公。

同年十月，王世充率各路隋军十余万击李密于洛口。二十五日王世充夜渡洛水，扎营黑石（今河南巩县西南）。翌日，两军在洛水北岸会战。王世充军戈矛多，利于险隘。李密军长枪马骑占优势，宜平原作战。而会战之地，北限大山，南临洛水，地势褊促，骑兵难以驰骋。王世充则充分利用有利地形，扬其所长，纵兵猛击李密，瓦岗军迎战失利，大将柴孝和溺死于洛水。可是当王世充围攻月城（今河南巩县西北）时，李密出奇兵偷袭王世充黑石大本营，惊恐万分的守军“连举六（次）烽（火）”告急，王世充狼狈撤围，狂奔四十余里回救，被瓦岗军击败，大丧师徒。十一月初，李密与王世充夹石子河再战，瓦岗军先败后胜，王世充惨败西逃。十二月，王世充芻粮将竭，夜袭仓城，中瓦岗军埋伏大败，“斩其骁将费青奴，士卒战溺死者千余人”。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正月，王世充在补充七万兵力后，营于洛北，令诸军临岸布兵，各架浮桥，准备大举进攻瓦岗军。由于桥成有先后，先成者即渡，缺乏统一指挥，混乱不堪，虎贲郎将王辩击破李密外栅，营中惊扰将溃，王世充不知，鸣角收兵，李密帅敢死士乘势出击，隋军大败，“士（卒）争桥，溺死者数万，洛水为之不流”，大将王辩等被杀，洛北诸军皆溃。是夜疾风寒雨，冻死者数以万计，王世充率残部数千人逃至河阳（今河南孟县），不敢还京都，自系于狱请罪。越王侗遣使慰抚，赐以金帛、美女，召还。此后，王世充龟缩于洛阳北的含嘉仓城，不敢出战。

李密则乘锐攻占偃师，修金墉城（今河南洛阳东），有众三十万，征鼓之声，闻于东都。瓦岗军阵于北邙山，南逼东都上春门，继续围攻，隋金紫光禄大夫段达、民部尚书东都留守韦津出兵拒战。段达见瓦岗军势盛，惧而先退入城，李密顺势追击，隋军大溃，韦津死于阵。于是隋将作大匠宇文恺子儒童，河南留守职方郎柳续，河阳独孤武郎，河内郡丞柳燮等投降瓦岗军。“东至海、岱，南至江、淮郡县，莫不遣使归

（李）密”。窦建德、朱粲、杨士林、周法明、卢祖尚、孟海公、徐圆朗等，均遣使通表，劝李密建尊号，李密属官裴仁基等，也上表请其正位号。这时瓦岗军已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一股政治势力，它是瓦岗军最兴盛的时期。

李密，字法主（或云玄邃），本辽东襄平（或云陇西成纪）人，后徙家长安。出身贵族名将世家，开皇年间袭爵蒲山公。大业初为隋炀帝左亲卫府大都督，东宫千牛备身。李密“多筹算，才兼文武，志气雄远，常以济物为己任”；礼贤下士，散家资养客，深得权臣杨素器重，与其子杨玄感为“刎颈交”。因遭炀帝猜忌，称病失意于家。杨玄感起兵时，奉李密为谋主。但谋略未被采纳，不被重用。杨玄感败死后，李密被隋王朝逮捕。在押送高阳途中，以金贿使者而穿墙脱逃，投奔平原义军郝孝德，因其出身、经历，义军对他不大放心，故郝孝德“不甚礼之”。李密又见王薄，“亦不之奇也”，当时正值饥荒，李密落魄，至削树皮而食，亡匿淮阳村舍，变姓名为刘智远，聚徒教书。因吟诗哀其遇云：“此夕穷途士，空轸郁陶心，眺听良多感，慷慨泪襟”，为人告发，逃至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处，又为丘君明从子告发，被官府追捕。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十月，通过王伯当献“指罪诛暴，为天下先，杨氏不足亡”之策，翟让才允许李密进了瓦岗寨。

翟让根据当时斗争形势需要，派李密游说侧近小股义军，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当时在今河南一带，有外黄（今河南民权西北）王当仁、韦城（今河南长垣北）周文举、雍丘（今河南杞县）李公逸等部义军，李密往采其间，说以取天下之策，“所至皆降”。翟让很高兴，“始尊敬焉，召与计事”。他虽然谢绝了李密提出的席卷二京，诛灭暴虐夺取杨隋天下的建议，却接受了他提出的“不如取荥阳，休兵馆谷，待士逸马肥，乃可与人争利”的策略，取得一系列胜利。李密“形仪眇小、（翟）让弗之忌”。杀张须陁后，翟让准许李密建牙，别统所部，号“蒲山公营”。破刘长恭后，李密被翟让推为瓦岗军最高首领。

出身大贵族的李密，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尽管他起初投奔瓦岗军，完全是为了找个人出路。他为翟让出谋划策，在巩固和壮大瓦岗军的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瓦岗军的迅速发展，不断获得翟让信任，尤其是逐步掌握了这支义军的大权后，李密的私人打算遂日益暴露出来。为了保住个人独揽大权，他挑选“勇士尤异者”八千人为“内军”，使骁将秦叔宝、程咬金（二人原为张须旧将，曾残酷镇压过农民起义军）等统领，作为私人武装，常说：“此八千人可当百万”。重用贵族豪强地主和隋朝降官降将房彦藻、郑、祖君彦、时德、常何等，并“厚抚初附之兵”。

李密的这些作为，引起了翟让等瓦岗军老将士的疑忌、不满和反对。大业十二年十月，翟让部下与李密之兵发生磨擦，翟让对李密说：“今资粮粗足，意欲还向瓦岗，公若不往，唯公所适，让从此别矣。遂帅辎重东行，李密亦引兵西进。后翟让虽“寻悔，复引兵从密，但彼此之间已貌合神离。义宁元年九月，瓦岗军捉住奉隋炀帝诏令“安集、洛，追兵击（李密）”的摄江都郡丞冯慈明，李密待以客礼，慰其劳苦，温言相劝，反被冯慈明斥为“不义之言”。李密虽不高兴，犹盼其回心转意而“厚加礼焉”。后知其“潜使人奉表江都，及致书东都留守，论贼形

势”，仍然“义而释之”后，冯慈明被翟让乱砍而死。翟让旧部司马王儒信劝翟让为大冢宰，“总秉众务，收（李）密权”。翟让之兄翟宽也不满其大权旁落，说：“天子止可自作，安得与人，汝若不能作，我当为之”。翟让“但大笑，不以为意”。而李密却“闻而恶之”，遂与心腹房彦藻、郑等策划谋害翟让的阴谋。义宁元年十一月，在击退王世充进攻后的宴会上，李密先将翟让左右侍卫引出，然后拿出良弓让翟让赏玩，“让引满将发，（李）密遣壮士蔡建自后斩之”，翟让兄、侄、司徒府长史摩侯和王儒信等同时遇难。李密虽亲为受重伤的徐世上药，抚慰欲散的翟让麾下，命徐世等分领其众，但李密的“将佐始有自疑之心矣”。

起初，尽管李密为翟让所推，恐其图己，故比较谨慎，“恭俭自励，布衣蔬食，所居之室积书而已，子女珍玩，一无所取，赈贷贫乏，敬礼宾客，故河、汴间绝粮之士，多往依之”。而谋杀翟让后，李密以兵强粮足，炀帝远在江都，“颇自骄矜，不恤士众；仓粟虽多，无府库钱帛，战士有功，无以为赏”。又蓄“美人珍宝”。李密复排斥异己，如徐世曾在宴会上讥刺李密的短处，他很不高兴，让徐世镇守黎阳，“虽名委任，实亦疏（远）之”。“人皆谓明公（指李密——引者注）弃恩忘本”。这一切，严重破坏了瓦岗军的内部团结，致使组织涣散，士气不振，伏下了失败的祸根。同时，由于瓦岗军内外一些首领对李密的阿谀奉承，李密的政治野心更加膨胀，自恃兵强，妄自尊大，以“四海英雄共推盟主”自翊，以“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在望，根本不把包括李渊父子在内的任何人放在眼里；且“注意东都，无心外略”，打算攻下东都称帝。当时李密虽据洛口仓等大粮仓，却“无防守典当者，又无文券，取之者随意多少；或离仓之后，力不能致，委弃衢路，自仓城至郭门，米厚数寸，为车马所践。群盗来就食者并家属近百万口，无瓮盎，织荆筐淘米，洛水两岸十里之间，望之皆如白沙”。泰山道士徐洪客献书于李密，认为“大众久聚，恐米尽人散、师老厌战，难可成功”，劝其“乘进取之机，因士马之锐，沿流东指，直向江都，执取独夫，号令天下”。由于李密满足于粮食如山，就食者如流的表象，盲目乐观于“东都兵数败微弱，而将相自相屠灭，谓旦夕可平”，并认为只要占领东都，天下就易为己有。因而没有乘当时有利形势，采纳徐洪客提出的南下江都、推翻隋炀帝夺取政权的建议；而是长期顿兵防守严固的坚城之下，与隋王世充军“前后百余战”，贻误了发展机会，又极大的消耗了自己的力量。

义宁二年（公元618年）三月，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利用禁军将士思归的不满情绪，在江都策动兵变。缢杀隋炀帝后，立秦王之子杨浩为傀儡，率隋百官及禁军十余万人北上，欲回长安。“来次彭城，所经城邑，多从逆党”。五月，称帝于洛阳的越王侗（即皇泰主），异常恐惧。他采纳了太府卿元文都献的一箭双雕计：以高官厚禄招降李密，“使击（宇文）化及，令两贼自斗，化及既破，而密之兵固亦疲矣”，再“徐承其弊”，消灭瓦岗军。皇泰主命李密先“平化及，然后入朝辅政”。李密不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使他们在相互厮杀中被削弱乃至同归于尽，反而认为这是实现自己政治夙愿的天赐良机，“遣使报谢”。皇泰主授其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还特意另写一信“以伸厚意”。李密“见使者大悦，北面拜伏，臣礼甚恭”，结果为敌人所用，堕入陷井之中。李密投降隋皇泰主，使瓦岗军丧失了反隋的斗争大方向，涣

散了斗志。六月，宇文化及攻占黎阳，并包围镇守黎阳仓的徐世。李密发兵二万援救徐世。李密知宇文化及乏食利速战，故深沟高垒，与徐世烽火相应，以疲其兵，又遏其归路。宇文化及攻打黎阳仓城，徐世于城外掘深沟固守，并穿地道不断出兵袭击宇文化及，焚其攻城战具。宇文化及屡攻不下，复中李密伪与其和、使其粮尽之计。七月初，两军大战于卫州童山（今河南浚县西南）之下，自辰至酉，李密被流矢射伤堕马，闷绝，为秦叔宝所救。宇文化及也“力竭粮尽，众多叛之”，其将陈智略、樊文超、张童儿以及留守滑州（今河南滑县）的刑部尚书王轨等接踵降于李密。宇文化及势穷，率残部掠汲郡后北逃魏县（今河北大名西）。李密认为宇文化及已无所作为，遂留徐世备御，西还巩洛。

李密在与宇文化及作战时，每获胜，必遣使告捷于隋皇泰主。此时则遣记室参军李俭朝东都，献杀炀帝的于弘达。皇泰主召李密入洛阳，师至温县（今河南温县东北）王世充杀元文都等，在洛阳抢先发动了宫廷政变。李密入东都称帝的打算化为泡影。

王世充占据东都后，“厚赐将士，缮治器械，人心渐锐”。九月，王世充欲乘瓦岗军在与宇文化及军作战中“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又未获必要休整之机，一举消灭它。他恐人心不一，遂诈称周公“显圣”，令其急讨李密，当有大功，否则“只皆疫死”。王世充部下多楚人，信鬼神，皆请战。王世充挑选精锐人马二万余人，屯兵通济渠南，在渠上架桥三座，以便进攻瓦岗军。李密亲帅主力出偃师，北阻邙山迎战。在商议作战方案的诸将会议上，裴仁基说，王世充全军而来，洛阳必定空虚，可分兵防守要道，使其不得东进；再挑选三万精兵，西逼东都，王世充势必还救，我则按甲不动，王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则此有余力，彼劳奔命”，必能取胜。李密觉得裴仁基话“大善”，认为王世充军有兵仗精锐、决计深入和粮尽求战三不可当，如果我们乘城固守，使王世充军欲斗不得、求走无路，不过十天，可以稳拿其头。而陈智略、樊文超、单雄信认为，王世充人少，又屡经摧破，全已丧胆，我军已超过敌人近一倍，而新归附的江淮将士也希望立功，可乘锐立即与其决战。“于是诸将喧然，欲战者什七八，（李）密惑于众议而从之”。裴仁基苦争无效。会后魏征再次提出以逸待劳奇策，指出瓦岗军元气未复，王世充“计穷，意欲死战，可谓穷寇难与争锋”，但也被人讥为老生常谈。

王世充发数百骑攻打单雄信营于偃师城北，瓦岗军行俨、孙长乐、程咬金等骁将十余人皆遇重创，当时，李密“新得志于（宇文）化及，有轻世充之心，不设壁垒”，王世充夜遣二百余骑兵潜入北邙山，伏谷中。次日凌晨，誓众曰：“今日之战，非直争胜负，死生之分，在此一举。若其捷也，富贵固所不论；若其不捷，必无一人获免”，未等李密军成列，即抢先发起猛烈进攻。在两军酣战不已的紧要关头，王世充将事先物色的一名貌似李密者缚至阵前，大喊“已获李密矣！”在全军狂呼震耳欲聋的“万岁”之声中，埋伏的骑兵从北邙山突然发起冲锋，驰压李密营垒，纵火焚其庐舍，瓦岗军信以为真，顿时大乱而溃。王世充乘胜夜围偃师，守军纷纷出降。他又利用所俘洛口仓城守将邴元真家属和李密诸将子弟等，招降了邴元真，进据该城。这次的北邙之战，王世充共俘降瓦岗军十余万人，瓦岗军将领裴仁基、祖君彦等数十人被俘，陈智略、张童仁、单雄信等投降。李密率残部欲奔黎阳，虑徐世报昔日刀砍之仇而不敢去。逃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后，“犹（想）南阻河，北守太行，东连黎阳，以图进取”，但情绪沮丧的诸将都认为兵败如此，难以成功。李密悲叹“孤道穷矣”，拔剑欲自刎。最后，李密在进退维谷的窘境下，率残部二万人进入关中，投降了唐王朝，其他将帅和州县，则多归降王世充了。

十月，李密入关，李渊遣使迎劳，冠盖相望。至长安后，拜上柱国、光禄卿，封邢国公，呼为弟，妻以表妹独孤氏。但李密嫌官卑爵微，无实权，尤其耻于侍候皇室贵戚兖兖诸公进食之光禄卿职事，“殊怨望”。加上部下累日不得食，朝臣多轻视他，“礼数薄，执政者又求贿，滋不平”。十一月，在魏征游说下，徐世以“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的原李密旧境降唐。十二月，李密上书李渊，请往山东收抚旧部，攻取王世充，名曰报效朝廷，实欲逃出关中东山再起。李渊风闻李密故将多不附王世充，也想派遣他去收抚。许多大臣谏阻，认为李密狡猾好反，派他去不啻放虎归山。李渊说，帝王自有天命，即使李密叛去，让他与王世充交斗，我可坐收其弊。于是命李密和王伯当等赴山东。当他们即将出潼关时，李渊突然传令李密留一半部下于华州（今陕西华县）。而在李密等行抵桃林（今河南灵宝北）稠桑驿时，李渊复命他“留所部徐行，单骑入朝，更受节度”。李密认为若回长安必无活路，遂将骁勇数十人，衣妇人服，乔装妻妾，藏刀裙下，袭据桃林县。又扬言往洛州，实去襄城，潜命旧将伊州刺史张善相前来接应。李密过陕州后，以为已脱险境，踰熊耳山南徐行，唐将盛彦师伏兵数千于要道——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县南山谷，弓弩夹路于山，刀伏于溪谷。待李密进入伏击地后，盛彦师发起突然袭击，李密之众首尾断绝，不能自救，李密被杀，时年三十七岁。

瓦岗军是隋末农民大起义中势力最强大的一支义军。曾聚众至百万。“七国之地，四为我有；五都之所，三在域中”，“威之所被半天下”。它以“呼吸则河、渭绝流，叱咤则嵩、华自拔”的英雄气概，在以洛阳为中心的广大中原地区，长期拖住并歼灭了隋王朝的大量精锐部队，沉重地打击了隋统治者，极大的支援了其他地区人民的斗争，在摧毁隋炀帝暴政的史册上，占有最显赫的地位。翟让是瓦岗军的杰出领袖。李密虽犯有谋害翟让等严重错误，但他在瓦岗军的发展，壮大的光辉业绩

中是有很大贡献的，对他不宜全盘否定。

二、窦建德和刘黑闼领导的河北义军

窦建德，贝州漳南（今山东德州西南）人。其家“代为农夫”，本人“耕于田中”，为人仗义，曾任里长，犯过法，是乡里颇有影响的人物。

大业上年（公元611年）隋炀帝募兵征讨高丽，本郡选勇敢尤异者充小帅，遂补窦建德为二百人长。当时山东发生大水灾，人多流散，同县人孙安祖，家为大水漂没，妻子饿死，县里以孙安祖骁勇，还是将他选入从征高丽的行列。孙安祖向县令辞贫，县令大怒，笞孙安祖，他气极，刺死县令后逃奔窦建德。窦建德对他说：高祖文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讨伐辽东，尚为高丽所败，如今水灾民困，皇上不恤，又亲征高丽，加上往年西征，疮未复，百姓疲弊，易可动摇。大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能为逃亡之虏。我知高鸡泊中广大数百里，莞蒲阻深，地势险要，可以避难，“承间而出虏掠，足以自资，既得聚人，且观时变，必有大功于天下”。孙安祖以为言之有理。窦建德遂招集数百名逃亡士兵和无产业者，让孙安祖率领进入高鸡泊，进行反隋斗争。孙安祖号“摸羊公”。

往来于漳南的农民起义军，都不侵扰窦建德乡间，“郡县疑建德与贼通，悉收其家属杀之”。窦建德无比悲愤，率麾下二百人投奔高士达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被任为司兵。孙安祖被张金称杀害后，其部数千人尽归窦建德，自此他的势力渐盛，兵至万余人。窦建德“倾身接物，其执苦与士卒均，由是能致人死力”。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高士达自号东海公。隋炀帝命将军王辩击高士达，虽屡败义军，但无法将其彻底消灭。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余人来讨高士达，高士达自以智略不及窦建德，擢升他为军司马，授以统帅全军兵权。窦建德初负重任，欲立奇功树立威望，遂请高士达防守辎重，自选精兵七千迎战郭绚。他诈称与高士达有仇隙而叛，“遗绚书约降，请前驱执贼自效”，高士达也扬言窦建德背信弃义而取虏获妇人，伪称其妻杀于军中。郭绚信以为真，立即引兵随窦建德至长河县（今河北故城县）界结盟，并商讨共同攻打高士达大计。窦建德乘其懈怠不备，发起突然袭击，大破其军，杀数千人，获马千余匹，郭绚以数十骑逃走，窦建德遣将追杀郭绚于平原（今山东陵县），“威振山东”。

十二月杨义臣击杀张金称后，溃散在草泽中的残部相聚投奔窦建德。杨义臣乘胜至平原，妄图入高鸡泊“穷划根穴”，将这块诸部义军的发祥地彻底捣毁。窦建德对高士达说：“历观隋将，善用兵者唯义臣耳，新破金称，远来袭我，其锋不可当。请引兵避之，令其欲战不得，空延岁月，将士疲倦，乘便袭击，可有大功。今与争锋，恐公不能敌也。”高士达不采纳这个避敌锋芒、以逸待劳、伺机破敌的正确策略。他留窦建德守营，亲率精兵反击杨义臣军。窦建德得知高士达初获小胜便纵酒高宴，有骄矜轻敌之心后，预感到“祸至不久矣”。遂留人守营，自率百余精兵据险以防不测。五天后，高士达果然被杨义臣击杀，隋军乘胜将围窦建德义军大营，营中守军既少，又闻高士达败讯，众皆溃散。窦建德率百余骑转移至饶阳（今河北饶阳），见城中隋军无备，一举攻占该城。他抚慰士众，人多愿从，又得三千余人。

杨义臣既杀高士达，认为窦建德不足为忧，收兵回朝。窦建德回到平原，收葬死难将士，为高士达发丧，招集散亡义军，自称将军，“军复大振”。窦建德每获士人，必加优待，得饶阳县长宋正本，引为上客，与参谋议。此后隋郡长吏归降者不断，义军军容益盛，胜兵十余万人。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窦建德筑坛于河间乐寿（今河北献县），自称长乐王，建元丁丑，委任百官，以孔德绍为中书令，刘斌为中书舍人，建立政权。窦建德攻打信都（今河北冀县）、临清（今河北临西），王安率领的数千起义军，“与（窦）建德相影响”，被清河通守杨善会袭败，王安牺牲。窦建德攻占信都后，进攻清河，经过四十天的围攻，终于占领清河，生擒杨善会。当时山东地区“能抗贼者，唯（杨）善会而已。前后七百余阵，未尝负败”，窦建德将这个双手沾满起义军鲜血的大刽子手处决，是起义军取得的一大胜利，为广大义军将士出了气，而清河地主老财则莫不伤痛。

同年七月，隋炀帝为解瓦岗军急攻东都之围，命涿郡留守薛世雄将三万幽、蓟精兵南下，会同王世充等驰援洛阳，“所过盗贼，随便诛翦”。薛世雄行至河间（今河北河间），安营于郡城南七里井。河间诸县均征集军队，依薛世雄军为营，欲乘机讨伐窦建德义军。

当时，窦建德军因乏粮而分散各地，窦建德本人在武强（今河北武强西南）收麦。风闻薛世雄军来，遂撤出诸城，扬言逃回豆子，麻痹敌人。当窦建德侦知薛世雄以为自己怕他而懈怠不设备后，率敢死士一千人，星夜急行一百四十里，奔袭薛世雄。翌日凌晨，窦建德进抵营前，恰巧云雾迷漫，咫尺莫辨。他先向兵力较弱的河间诸县兵突然发起猛攻。溃敌向薛世雄大营狂奔。敢死士们直捣中军大帐。惊恐万状之敌只闻杀声震天，不知义军虚实，乱作一团，皆腾栅逃命，自相践踏，死者山积，身中数枪的薛世雄与左右数百骑狼狈逃入河间城，“惭恚发病，归于涿郡，未几而卒”。这就是隋末农民大起义中著名的“河间大捷”。

窦建德乘胜进攻河间，郡丞王琮拼命顽抗，义军频攻岁余不下。城中食尽，又闻隋炀帝被杀，王琮乃率士吏为炀帝发丧，窦建德遣使祭吊，王琮遂率属官素服面缚请降，窦建德亲解其缚。谈及隋亡，王琮“俯伏悲哀，（窦）建德亦为之泣”。有的义军将领对窦建德说，王琮抗拒我军久，杀伤甚众，计穷才出降，“请烹之”。窦建德却说，“此义士也”，正要加以擢用，以奖励忠君者，如今欲安百姓，以定天下，岂能害“忠良”。下令军中，“先与王琮有隙者，今敢动摇，罪三族”，并于当天任命王琮为沄州刺史。“河北郡县闻之，争附于建德”。窦建德始都乐寿（今河北献县），号金城宫，备置百官，准（隋）开皇故事。十一月，窦建德改元五凤，称夏国。当时在乐寿西的义军领袖魏刁儿拥兵十万，自称魏帝，据深泽（今河北深泽），活动于冀州（今河北冀县）和定州（今河北定县）之间。窦建德伪与其连和，后者因弛守备，窦建德袭破其军，进围魏刁儿于深泽，“其徒执刀儿降，建德斩之，尽并其众”。易州（今河北易县）、定州皆降，唯冀州未下。窦建德进攻冀州，刺史麴稜之婿崔履行说，他有奇术，可使窦建德自败，麴稜信以为真。崔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斗，曰：‘贼虽登城，汝曹勿怖，吾将使贼自缚’。于是为坛，夜设章醮，然后自衣衰绖，杖竹登北楼恸哭，又令妇女升屋四面振裙”，窦建德率军急攻，麴稜将出战，崔履行坚决制止，义军旋破

其城，时“履行哭犹未已”。

窦建德率军十万进攻幽州（今北京西南），罗艺拒守。用其将薛万均之策，以羸兵弱马阻水背城为阵诱窦建德，待其引军渡水，伏于城侧的精骑突袭邀击，大破义军，窦建德竟不能至幽州城下。窦建德乃分兵攻打地主武装霍氏所筑堡垒——霍堡、雍奴（今河北武清北）等，复败于罗艺。窦建德击幽州凡百余日，终未得手，遂撤回乐寿。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正月，宇文化及称帝于魏县（今河北大名西），窦建德对纳言宋正本、内史侍郎孔德绍说：我为隋民数十年，隋为吾君已两代，“今（宇文）化及杀之，大逆无道，此吾仇矣。请与诸公讨之”。得到孔德绍的赞同后，立即出兵，连战皆捷，宇文化及退保聊城（今山东聊城）。窦建德用撞车抛石，四面攻城。闰二月，在归附宇文化及的王薄打开城门接应下，攻占聊城，生俘宇文化及。窦建德入城，“先谒隋（炀帝）肖皇后，语皆称臣，素服哭炀帝尽哀”，“抚存隋之百官”，并在他们面前处决了参与谋害隋炀帝的宇文智及等。在河间斩宇文化及和其子承基、承趾，窦建德还“数以杀君之罪”。

窦建德每次陷城破阵，所得资财，尽散赏诸将，无一所取，“不喜食肉，饭脱粟加蔬具，妻曹未尝衣纨绮。及为王，妾侍裁十数”。破宇文化及所得“并有容色”的宫女，即时遣散，俘获的近万名隋文武官及骁果，“听其所去”，并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尚书左仆射，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右司郎中柳调为左丞，内史侍郎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自余随才授职，委以政事”，不愿留用者，一律释放，“仍给资粮，以兵援之出境”。又与王世充结好，遣使朝拜隋皇泰主杨侗于洛阳，视其为隋王朝的正统所在，接受他册赠的“夏王”封号。四月，王世充废黜皇泰主自立为帝，国号郑，窦建德认为杨隋已亡，才“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下书称诏”。同时，还追谥暴君隋炀帝为闵帝，封其孙杨政道为郧公，依附突厥。突厥始毕可汗之妻隋义成公主遣使迎肖皇后和甫阳公主，窦建德派兵千余骑送之入蕃，“又传宇文化及首以献义成公主”。

六月，窦建德攻占沧州（今河北沧县东南）。八月，又将兵十余万进攻州（今河北永年东），唐淮安王李神通率诸军退保相州（今河南安阳）。窦建德攻占州，总管袁子干投降。窦建德乘胜趋相州，淮安王神通率诸军退依黎阳李世。九月，窦建德攻占相州，杀刺史吕珉。继破赵州（今河北赵县），俘总管张志昂和淮安王神通所遣镇守赵州的慰抚使张道沅，怒其和半年前俘获的邢州刺史陈君宾坚守不降，欲加杀害。国子祭酒凌敬以他们为“忠臣”相谏阻，窦建德“即命释之”。十月，窦建德在衡水（今河北衡水西南）败于李艺后，引兵进击卫州（今河南汲县），途经黎阳，李世遣骑将丘孝刚将三百骑侦伺，与窦建德遭遇，丘孝刚被杀。窦建德怒攻黎阳，一举破城，生俘淮安王神通，唐高祖妹同安长公主和唐使魏征。李世率数百骑逃走，因其父也被俘，数日后来降，窦建德以其为左骁卫将军，仍使守黎阳。以魏征为起居舍人，置淮安王神通于下博（今河北深县东南），待以客礼。卫州闻黎阳陷落而被迫投降。滑州刺史王轨为奴所杀，奴携其首投奔窦建德，可是他却说“奴杀主为大逆，我何可纳之”，下令立刻杀奴，并将王轨头送回滑州，该州隋官吏和地主豪绅深受感动，“即日而降”，于是齐州（今山东济南）济

州（今山东聊城一带）随之而降，附近其它州县“皆望风归附”，窦建德尽有山东之地。旋师还州，筑万春宫，迁都于此。遣使往灌津，祭祠窦青之墓，置守二十家。

王世充率军向东拓地至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兵临窦建德的黎阳。十一月，窦建德率军袭破王世充的殷州（今河南沁阳），焚毁其积聚物资，进行报复，他与王“世充遂结深隙，信使断绝”。李世欲归唐，怕窦建德有疑，故立功取信。他袭破王世充的获嘉（今河南获嘉），“多所俘获，以献建德，建德由是亲之”。十二月，李世对窦建德说，曹州（今山东曹县北），戴州（今山东成武）户口完实，孟海公占有其地，与王世充外合内离，若以大军攻打，指日可取。既得孟海公，以此兵临徐州（今江苏徐州），兖州（今山东兖州），河南之地则可不战而定。窦建德认为有理，欲亲自将兵经营河南，于是先遣行台曹旦等率兵五万渡过黄河，李世引兵三千助战。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正月，李世打算在窦建德至河南时掩袭其营，杀害窦建德，并以其地归唐。由于窦建德妻产子，迟迟未至。李世遂结李文相为昆弟，与其母霍氏密谋反叛。李文相夜召曹旦偏将二十三人杀于宴饮，于河中杀曹旦兵三百人，又北袭曹旦别将阮君明，高雅贤。由于曹旦闻变严警戒备，李世难遂其谋，便率数十骑逃回长安。执法者请杀其父。窦建德却认为李世不忘其主，是忠臣，乃父何罪。曹旦攻占济州。二月，窦建德攻杀李文相。窦建德在其势力所及地区，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以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如大业十三年在广平郡（今河北永年）疏竣清漳渠，导水入柳沟，使其“与永济（渠）合流”。在州“劝课农桑”，发展农业生产。因此出现了“境内无盗，商旅野宿”的兴旺景象。这是窦建德领导的河北义军最兴盛的时期。

如前所述，窦建德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较深，在对待隋炀帝降官降将以及奴隶参加起义等重大问题上处置不当，大批官僚地主进入义军，有些还身居要职，伏下了隐患。而在武德三年二月以后，窦建德又犯了一些错误。纳言宋正本，是一位直谏有为的谋士，窦建德听信诬陷将其杀害，“是后人以为诫，无复进言者，由此政教益衰”。大将王伏宝，“勇略冠军中”，“群帅（妒）嫉之”，窦建德又轻信“或言其反”的谗言，不听王伏宝“无罪”的申辩，“自斩左右手”，故王伏宝死后，“用兵多不利”。五月，窦建德命大将军高士兴进围幽州，总管李艺告急于高开道。高开道率二千骑兵驰援。高士兴攻城失利，退屯笼火城，为李艺袭击，高士兴大败，牺牲五千人。十月，窦建德亲帅二十万大军复攻幽州，在义军已攀上城堞的关键时刻，李艺之将薛万均、薛万彻率敢死士百人从地道而出，从背后袭击义军，义军大惊溃败，牺牲一千余人。李艺频胜而骄，复滨故技偷袭窦建德营，中伏兵而败。窦建德进击幽州，城坚不克，不得已收兵回洺州。在此前后，叛变者相继有：窦建德共州县令唐纲杀刺史以州降唐，普乐令程名振降唐，官居行台尚书令要职的胡大恩，也投入唐高祖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窦建德不仅没有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以稳定内部，而且于同年十一月，亲自帅兵渡永济渠，进攻据周桥（今山东曹县东北）的农民起义军孟海公。当时受到秦王李世民率领的十余万大军进攻的王世充，向窦建德乞援。唐攻郑，乃是李渊与王世充所代表的地主阶级两大势力争夺重建封建王朝的权力再分配之争。

作为农民起义军，窦建德不应卷入，而应当利用敌人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力量，将起义大业推向前进。可是，中书侍郎刘斌献策："郑亡，则夏不能独立矣。不如解仇除忿，发兵救之，夏击其外，郑攻其内，破唐必矣。唐师既退，徐观其变，若郑可取，则取之，并二国之兵，乘唐师之老，天下可取也"。窦建德大喜，誉为良策，遣使与王世充和好，并表示救援之意。王世充派其兄子琬及内史令长孙安世报聘。窦建德遣礼部侍郎李大师等使唐，请退军潼关，还郑故地，重新和好，李世民留使不答。

窦建德在攻克周桥，虏获了孟海公及其三万义军后，使其将范愿守曹州，亲率孟海公、徐圆朗之众，以及王世充派来的数千人，共计十余万人，号称三十万，西援王世充。窦建德至滑州（今河南滑县东），王世充行台仆射韩洪开门迎接，军屯酸枣（今河南延津西）。接着，窦建德攻占管州（今河南郑州），杀刺史郭志安。又攻占荥阳（今河南荥阳）、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县，水陆并进，泛舟运粮，河西上，军于成皋东原，筑宫板渚（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并遣使与王世充相闻。

李世民召集诸将商议对策，"皆请避其锋"。郭孝恪却认为：王世充穷途末路，即将被擒，窦建德远来助战，这是天意让他们灭亡，"宜据武牢之险以拒之，伺间而动，破之必矣"。记室薛收也认为退兵自守是下策，并献计道：王世充兵皆江淮精锐，乏食求战，窦建德亲总军旅，来拒我军，如果二者相连，转河北之粮以相资给，则伊洛之间战斗不已。今宜深沟守营，不与交战。秦王亲率猛锐，先据成皋之险，待窦建德以疲弊之师前来进攻，一战必胜。"建德既破，世充自下矣。不过两旬，二国之君可面缚麾下"。肖、屈突通、封德彝说，我军疲老，王世充据守坚城，难以猝拔，窦建德乘胜悉众而来，锋锐之势难挡。我军腹背受敌，不如退保新安（今河南新安），以承其弊。李世民认为，王世充粮尽，兵被摧残，上下离心，不需力攻，可以坐等其败。窦建德新破孟海公，将骄卒惰，我据武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扼其咽喉。如果窦建德冒险争锋，战胜他很容易；若其狐疑不战，一个月至十日之间，王世充也会自我溃败，城破兵强，可一举打败两个敌人。倘若不速进，窦建德入武牢，诸城刚归附，必不能守，窦、王会合，其势必强，哪有弊可承。于是李世民决定，留齐王李元吉等继续围困洛阳，亲率步骑三千五百人，入据险要武牢关。王世充登城远望唐军经北邙山，抵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南），趋巩县（今河南巩县东北）而去，以为"莫之测也，竟不敢出"。

李世民出武牢，伏兵于路旁，仅率四骑侦察窦建德营。及至离其营三里处，与窦建德游兵相遇，李世民大呼"我秦王也"，引弓射击，窦建德军大惊，出五六千骑兵追逐，中伏，骁将殷秋、石被俘，三百余义军牺牲。李世民致书窦建德，说王世充"唯利是图"，不宜"以三军之众仰哺他人，千金之资坐求外费，理如画饼"，劝其与唐和好，"若不获命，恐虽悔难追"。

窦建德在武牢关前，与李世民相持二十余日，不得前进。李世民遣将军王君廓率轻骑千余抄窦建德粮道，俘其大将军张青特，虏获甚众。由于屡战不利，粮草馈乏，将士思归，谋士凌敬建议：全军渡过黄河，

攻取怀州（今河南沁阳）、河阳，使大将据守，然后鸣鼓建旗，逾太行山，入上党（今山西长治），收河东之地，这样，“一则入无人之境，师有万全；二则拓土得兵；三则郑围自解”。窦建德在王世充告急使者相望于道，及受贿于王世充使者的众将阻挠下，没有采纳这个正确策略。凌敬坚持己见，窦建德怒，令人将他扶出。其妻曹氏也为凌敬说情，并提出乘虚西抄关中，唐必回救，郑围自解的作战方案，也被他斥为妇人之见。集中全力进逼武牢。五月，李世民侦知“建德伺官军刍尽，侯牧马于河北，因将袭武牢”，亲自北渡黄河，南临广武，察看形势后回到武牢，并留战马千余匹于黄河北岸，诱骗义军上钩。翌日，窦建德果然率全军进逼武牢，“自板渚出牛口置阵，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属鹊山，（绵）亘二十里”，王世充之将郭士衡结阵其南，擂鼓而进，声震遐迩，唐将大为恐惧。李世民登高丘察看后对他们说：窦建德未见过大敌，今渡险而嚣张，是无纪律；逼武牢城而引阵，有轻我军之心。我按兵不出，窦建德锐气乃衰，阵久卒饥，必将自退，乘机追击，无往不胜，“吾与公等约，必以午时后破之”，窦建德轻视唐军，命三百骑涉汜水至距唐营一里处，遣使声称请李世民选锐士数百相戏，李世民派二百骑与其周旋。窦建德将王又乘隋炀帝的青白良马至阵前耀武扬威，被唐将尉迟敬德等俘获。李世民又迅速召回留在河北的战马。窦建德大军“自辰至午，士卒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逡巡欲退”。李世民命其将宇文士及将三百骑经窦建德阵西，由南而上进行试探，窦建德为之而动。李世民认为战机成熟，下令出战。他亲率轻骑先行，大军接踵涌进，东涉汜水，直扑窦建德阵。正受群臣朝谒的窦建德忙召骑兵拒战，骑兵被群臣遮道无法通过，窦建德叱令让路，进退之间，未及整列，唐军已至，众军合战，嚣尘蔽天。窦建德退依东陂，仓惶应战。唐太宗率史大奈、程咬金、秦叔宝、宇文歆等突出其阵后，义军溃败，“俘虏十余万，斩首三千级”。窦建德本人也中槊受伤，匿于牛口渚（今河南荥阳北）。唐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追逐，窦建德坠马被俘，曹氏和左仆射齐善行将数百骑撤回州。

义军将士中，有的“欲立建德养子为主，徵兵以拒唐”。有的提议放弃州，转移到地形复杂的海边继续坚持斗争。齐善行却说，以夏王的英武，平定河朔，士马精强，也不免一朝被擒，这是“天命有所属，非人力所能争”，“今丧败如此，守亦无成，逃亦不免……不若委心请命于唐”。归附窦建德的原隋官隋将裴矩、李公淹、魏征等，极力怂恿齐善行和曹旦降唐。五月，齐善行等将库藏的数十万段帛分给义军将士，予以遣散。齐善行、曹旦率百官奉窦建德妻曹氏、传国八玺，破宇文化及所得珍宝、并举山东之地归降唐朝。唐推安王李神通又攻下三十余州，窦建德原先所有之地全部为唐所有。

唐王朝发布《平窦建德赦》，声称赦免山东诸州参加窦建德起义者。“既而责其党与，并令配迁”，将他们流放到恶地去。七月，窦建德被杀于长安，时年四十九。义军将士也受到地方官吏的虐待，“或加捶挞，建德故将皆惊惧不安”。高雅贤、王小胡家在州，欲举家而逃，官吏往捕，他们逃至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恰遇唐王朝徵召窦建德旧将范愿、董康买、曹湛和高雅贤等赴长安，范愿等疑惧，商议说，王世充降唐，其将相段达、单雄信等皆被夷灭。夏王昔日待淮安王神通以客

礼，也被杀害，我们到长安，必无活路，“今不为之（窦建德）报仇，将无以见天下之士”。于是决心重新起义。他们“卜以刘氏为主吉”，就到漳南请窦建德故将刘雅挑头。刘雅说，天下已平，乐在丘园为农夫，起兵之事，非其所愿。他们怒杀刘雅而去。范愿说：刘黑闼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恩结士卒。“今欲收夏王亡众集大事，非其人莫可”。

刘黑闼，贝州漳南人，少年时就与窦建德友善，“家贫无以自给”，窦建德常周济他。隋末跟随郝孝德进行反隋斗争。后归李密为裨将，李密在东都败于王世充时，刘黑闼被俘，王世充素闻其骁勇，以为骑将，镇守新乡（今河南新乡），但刘黑闼不满王世充的作为。他在新乡被李世俘获后，窦建德署其为将军，赐爵汉东郡公。窦建德存军事行动，必令刘黑闼专知斥侯，常入敌方侦察虚实，或将奇兵出其不意突击，屡建战功，军中号为神勇。窦建德失败后，刘黑闼匿迹漳南，闭门种菜。范原等至漳南，说明来意，刘黑闼大喜，杀牛欢宴，聚众百余人，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袭破漳南，活捉县令，重新树起义旗，起兵反唐。

唐王朝听说刘黑闼起兵，立即设置山东道行台尚书省于州，以淮安王神通为行台右仆射，魏、冀、定、沧等州并置总管府，以便镇压。

八月，刘黑闼攻占贝州县（今山东夏津），贝州刺史戴元祥、魏州（今河北大名县北）刺史权威，联兵拒战，二人均被义军击毙，刘黑闼尽收其器械及余众“窦建德旧党稍出归之”，于是设坛漳南，祭窦建德，告以举兵反唐之意，自称大将军，义军发展为二千人。

唐王朝诏发关中步骑三千，命右武卫将军秦武通、定州总管李玄通征讨刘黑闼，复命幽州总管李艺引兵会剿。但都被义军击败。刘黑闼杀屯卫将军王行敏，占领贝州历亭（今山东武城东）。原窦建德所署深州刺史崔元逊等，伏甲士于车中，盖禾于上，直入深州刺史所，伏兵从禾中呼叫跃出，杀刺史裴晞，响应刘黑闼。刘黑闼与兖州总管徐圆朗通谋，徐圆朗执安集河南的唐朝使臣盛彦师响应刘黑闼，攻陷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围虞城（今河南虞城），不克而去。旋自号鲁王，进击济州。刘黑闼以徐圆朗为大行台元帅，“兖、郓、陈、杞、伊、、曹、戴等州豪杰皆杀吏”响应。

九月，淮安王李神通将关内、邢、、相魏、恒、赵等道州及李艺之兵五万余人，与刘黑闼战于饶阳（今河北饶阳东北）城南，布阵十余里，刘黑闼兵少，倚阻单行为阵相抗，“会风雪，神通乘风击之，既而风返，神通大败”，士马军资亡失三分之二。李艺居阵西，进破高雅贤，追逐数里，风闻淮安王李神通大军失利，遂退保藁城（今河北藁城）。刘黑闼引兵进击，李艺败，俘其将薛万均、薛万，李艺逃回老巢幽州，刘黑闼“兵势大振”。十月刘黑闼乘胜攻取州（今河北河间），杀刺史卢士。观州（今河北东光一带）人执其刺史雷德备，以城降于刘黑闼。毛州（今河北馆陶）刺史赵元恺“性严急，下不堪命”，州民董灯明等杀赵元恺响应刘黑闼。十一月，杞州人周文举杀刺史王文矩归附刘黑闼。刘黑闼攻占定州（今河北定县），俘总管李玄通。又联合占据渔阳（今河北蓟县）的高开道，众至数万。

十二月，刘黑闼攻占冀州（今河北冀县），杀总管刺史麴，移书赵、魏一带，号召民众起来斗争。“故窦建德将卒争杀唐官吏以应黑

闼”。而唐官吏一见风吹草动，则如惊弓之鸟，“官民小大，弃城逃隐”。

唐王朝再遣义安王李孝常率兵征讨，刘黑闼将兵数万进逼宗城（今河北威县东），黎州总管李世难以抵御，弃宗城走保州，刘黑闼追破其军，杀五千人，李世、秦武通仅以身免。州土豪翻城响应刘黑闼。刘黑闼筑坛于城东南，告天及祭窦建德后入城。又引兵攻占相州（今河南安阳），执刺史房晃，右武卫将军张士贵突围而逃。刘黑闼南取黎州（今河南浚县），卫州（今河南汲县），“不半年，尽有建德故地”。刘黑闼“遣使北连突厥”，颉利可汗遣俟斤宋邪那帅骑兵助战。唐将秦武通、州刺史陈君宾、永年令程名振等，皆自河北狼狈逃回长安。

唐王朝命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将兵征讨刘黑闼。刘黑闼相继攻占邢州（今河北邢台）、赵州（今河北赵县）、莘州（今河北莘县一带）、魏州（今河北大名北），杀魏州总管潘道毅。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定都州。以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左领军，王小胡为右领军，王琮为中书令，刘斌为中书侍郎，“窦建德时文武（百官），悉复本（职）位，其设法行政，悉师建德，而攻战勇决过之”，重建了农民政权。

东盐州（在今河北沧县）治中王才艺杀刺史田华，归附刘黑闼。李世民至获嘉（今河南获嘉），刘黑闼弃相州，退保州。李世民复取相州，进军肥乡（今河北肥乡），阻水列营进逼刘黑闼。幽州总管李艺发兵数万助李世民。刘黑闼留范愿守州，亲率大军抵御李艺。夜宿沙河（今河北沙河北），唐将程名振于州城西二里处猛击六十面战鼓，范愿惊告刘黑闼，刘黑闼急忙回州，遣其弟十善与行台张君立将兵万人攻打李艺，两军战于徐河（今河北保定市东北），义军大败，损兵八千。

二月，刘黑闼还攻洺水城，为唐将秦叔宝击退。李世民复取邢州。李艺夺取刘黑闼的定州、赵州、栾州（今河北隆尧东）和廉州（今河北藁城），俘刘黑闼尚书刘希道，引兵与李世民会合于州。刘黑闼急攻水城，该城四面环水，广五十余步，深三、四丈，刘黑闼在水城东北筑二甬道以撞车攻城，李世民三次引兵援救，均因刘黑闼拒战而失利。李世民遂以勇将罗士信突围入城防守。经过八个昼夜的急攻，刘黑闼终于占领水城，杀罗士信。可是水城又旋为李世民夺回。三月，李世民与李艺合兵营于水之南，分兵屯水北，别遣奇兵截断刘黑闼粮道，冀、贝、沧、坛等州的水陆粮运舟、车，均被唐军沉焚。刘黑闼屡次挑战，李世民均坚壁不战，以挫其锋，相持六十余日。刘黑闼粮尽，遂率步骑二万南渡水，结阵而压唐军。李世民先遣轻骑迎战，继而亲率精骑破刘黑闼马军，乘锐蹂其步卒，同时掘开事先所壅上流水的堤堰，水淹义军，浊流汹涌，水深丈余。义军虽处险境，但毫不畏惧，刘黑闼帅军“殊死战，自午至昏，战数合”，牺牲万余人，溺死者数千，刘黑闼领二百骑北走突厥。李世民“尽复（刘黑闼）所陷州县”。

唐统治者对刘黑闼义军“杀伤太甚，其魁党皆县名处死，妻子系虏，欲降无繇，虽有赦令，获者必戮，不大荡宥”。武德五年六月，刘黑闼再次起义，并借突厥兵进攻山东。唐高祖“怒，命太子建成取山东男子十五以上悉之，驱其小弱妇女以实关中”。此令虽因李世民谏阻并未执行，但却进一步暴露了唐高祖对起义群众的凶残面目。他又命令燕郡王李艺征讨刘黑闼。七月，刘黑闼进攻定州，曹湛、董康买等旧将复聚兵响应。

唐王朝以淮阳王李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与原国公史万宝进剿。九月，刘黑闼攻占州，杀刺史马匡武。东盐州人马君德，以其州归附刘黑闼。十月，唐王朝以齐王元吉为领军大将军、并州大总管，讨伐刘黑闼。当时“山东州县多为黑闼所守，所在杀长吏以应之”。贝州刺史许善护与刘黑闼军战于县（今山东夏津县东北）全军复没，许善护被杀。右武侯将军桑显和破刘黑闼于晏城。观州刺史刘会以城归附刘黑闼。淮阳郡王李道玄与刘黑闼战于下博（今河北深县东南），李道玄率轻骑先行，命副将史万宝督大军继进，“万宝与之不协，及道玄出战，万宝拥兵不进”，李道玄被杀后，史万宝将战，但士卒已无斗志，全军大溃，仅史万宝脱逃，“山东震骇”，州总管庐江王李瑗弃城西逃，河北诸州皆归附刘黑闼，“旬日间，悉复故城，复都州”，声势复振。

十一月，沧州刺史程大买为刘黑闼所迫，弃城逃走。由于齐王元吉“畏黑闼兵强不敢进”。唐王朝复命皇太子李建成督兵进讨。其陕东道大行台、山东道行军元帅及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齐王元吉攻占魏州。刘黑闼拥兵甫进，自相州以北州县皆归附，还攻魏州，不下。十二月，刘黑闼攻陷恒州（今河北正定），杀刺史军公政。燕郡王李艺收复廉、定二州。并州刺史成仁重破刘黑闼军范愿部。魏州总管田留安死守该州，俘刘黑闼的莘州刺史孟柱及将卒六千。

正当刘黑闼久攻魏州不下，李建成和李元吉所率大军至昌乐，刘黑闼引兵抵御，唐军阵而不战。李建成接受魏征所献之策，改变以前打败刘黑闼时一味武力镇压办法，采用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辅以招降手腕：“罪止凶渠，诖误胁徒并无所问，其有弃恶思顺，自拔而来，随即安置，给其优赏，咸使附业，各令安堵”，立功者，“量才授任”，执迷不悟者，“齐以大刑”。对于所俘义军，则“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坐视离散”，以分化互解义军。结果，果然收到义军之“众乃散，或缚其渠长降”的成效。李建成不失时机地向刘黑闼发动进攻，在魏州城下击败刘黑闼，刘黑闼退至毛州（今河北馆陶）背永济渠而阵，又被唐军击败，赴水死者数千人，义军大溃。刘黑闼被追击不得休息。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正月驰至饶阳（今河北饶阳东北），骑兵能跟上者仅百余人。义军疲馁求食，刘黑闼所署饶州刺史诸葛德威叛变，假意“涕泣固请”刘黑闼入城，当刘黑闼进至城旁，诸葛德威将他执送李建成。二月，刘黑闼就义于州，余部为唐军击破，河北义军至此最后失败了。

以窦建德和刘黑闼为首的河北义军，从隋炀帝大业七年，至唐高祖武德六年，在山东河北广大地区前扑后继地进行了约十二年的反隋和反唐斗争，是隋末农民大起义中一支重要力量，在推翻隋炀帝暴政的斗争中，作出了光辉的贡献。窦建德虽因缺乏政治远见等原因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农民领袖。唐人说：“河北山东皆所奄有，筑宫金城，立国布号，岳峙虎踞，赫赫乎当时之雄也。”又说：当时李密在黎阳，王世充据东都，萧铣称王于楚，薛举擅权于秦，“然视其并割之迹，观其模略之大，皆未有及建德者也”。将窦建德与王世充、萧铣和薛举等相提并论并不合适。而他与李密相比，确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窦建德俭朴的生活作风，治理州的良好政绩，赢得了广大农民的爱戴。农民崇敬他、纪念他。从他武德四年七月遇难，直到唐文宗太和年间（公元827—835年），在二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山东河北之人，或

尚谈其事，且为之祀，知其名不可灭，而及人者存也”。夏王庙里，“父老群祭，骏奔有仪，夏王之称，犹绍于昔”。

刘黑闼起兵，是河北起义军和广大农民群众反抗唐王朝残酷镇压的正义斗争，是河北起义军继承窦建德未竟大业的继续和发展，给新上台的唐统治者以沉重一击，对初唐政治有一定影响。尽管当时隋末农民大起义已趋尾声，李渊父子已基本上统一了全国，整个政治形势已由长期乱世开始转入人心思定的时期，广大农民希望重建家园、过安宁生活，刘黑闼兵难以掀起更大的波澜并长期坚持下去；但这种不屈服于封建统治者淫威的反抗精神则是可贵的，自不应为肯定李渊父子统一中国而视刘黑闼起兵为统一战争的障碍。

三、杜伏威和辅公领导的江淮义军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后，江淮一带的反隋斗争蓬勃发展。义军大者数万，小者千百成群，依托山林川泽，攻郡打县，各自为战。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李子通、左才相、杜伏威和辅公领导的几支起义军相继南下后，大大促进了江淮一带的反隋斗争。在共同战斗中，逐渐形成了以杜伏威和辅公为首的江淮起义军。

杜伏威，齐州章丘（今山东章丘）人。“家贫无以自给”，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年仅十六的杜伏威参加农民起义。他有谋略，“众用其策皆效”；作战勇敢，“每出则居前，入则殿后，由是其徒推以为帅”。大业九年，杜伏威率众入长白山，投奔义军领袖左君行，“不被礼，因舍去，转掠淮南，自称将军”，当时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有苗海潮领导的一支义军。杜伏威派辅公对他说：“今我与君同苦隋政，各举大义，力分势弱，常恐被擒”，如果联合起来，“君能为主吾当敬从，自揆不堪宜来听命，不则一战以决雌雄”。苗海潮既有同感，又畏惧，遂率众归。

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颢来攻。杜伏威佯装战败，将其诱入芦苇荡中，顺风纵火，迫其步骑陷于大泽，烧死殆尽。

海陵（今江苏泰州）义军领袖赵破阵风闻杜伏威兵少，有轻视之意，遣使召其归附麾下。杜伏威命辅公柘严阵居外以待变，持牛酒亲往谒见。欢宴时，趁赵破阵不备袭杀了他，辅公柘率兵亦至，兼其全部人马，众至数万，旋克安宜（今江苏宝应），兵威稍盛。与杜伏威合兵的李子通，“恶伏威雄武”，又趁他不备，“使骑袭之”，杜伏威受重伤堕马，部将王雄诞背其逃芦苇中。杜伏威收集残部，攻打郡县，其势复振。

隋王朝利用义军内部互相火之机，命虎牙郎将来整进攻杜伏威。杜伏威在黄花轮大败，身受重伤，部将西门君仪之妻王氏，驮杜伏威而走，在王雄诞率领的十余名勇士护卫下，杀出重围。义军突围后仅剩八千余人。杜伏威在盐城（今江苏盐城）击溃拦截的隋虎牙郎将公孙上哲军。攻占六合（今江苏六合）时，队伍又扩大至数万。来整又击李子通，战败的李子通奔海陵，收散兵得二万人，自称将军。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正月，隋炀帝命右御卫将军陈棱将精兵八千攻打杜伏威。尽管他号称名将，但不敢与义军交锋，杜伏威“遗棱妇人之服”，以激怒之，并致书称其为“陈姥”。陈棱果然大怒，倾巢而出进攻。杜伏威亲至阵前挑战，被隋裨将射中前额。杜伏威怒曰：“不杀射者，终不拔此箭”，遂驱马驰入敌阵，大呼冲击，生擒裨将，令其拔箭，

然后杀死。复率军奋击，隋军溃败，陈棱仅以身免。杜伏威乘此大捷进破高邮（今江苏高邮北），攻占历阳郡（今安徽和县），自称总管，以辅公为长史。分遣诸将攻打属县，所至皆下。“江淮间小盗争附之，”义军声势很大。杜伏威挑选骁勇敢死者五千人，号为“上募”，待遇优厚，并与其同甘苦。作战时，命他们出击，战罢若见背有伤者便杀。所获财物皆赏赐士卒，“战死者，以其妻妾殉葬，故人自为战，所向无敌”。

义宁二年（公元618年）四月，宇文化及从江都带领十余万隋军主力西归长安时，以杜伏威为历阳太守，杜伏威不受。这时，隋王朝在江、淮一带的军事势力极为薄弱，但他没有利用这个难逢的有利时机，联合雄据海陵的李子通等义军，消灭为宇文化及据守江都的陈棱及沈法兴等割据势力，彻底扫荡杨隋统治，将起义大业推向前进。而是于同年八月，上表称臣于洛阳称帝的越王杨侗，接受这个残隋小朝廷授予的东南道大总管和楚王的官爵，模糊了斗争目标，涣散了人心。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九月，李子通攻打江都，陈棱南求救于“自称梁王，都毗陵”的沈法兴，西乞师于杜伏威。沈法兴使其子纶将兵数万与杜伏威共同驰援。纶军屯扬子（今江苏扬州南），杜伏威军扎营清流（今安徽滁县）。李子通用纳言毛文深之策，募江南人诈为纶兵夜袭杜伏威营，后者怒，遣军袭前者，“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进”。李子通遂尽发精锐击江都。占领江都后，乘胜进攻纶军，纶军大败，杜伏威军撤走。李子通“即皇帝位，国称吴，建元为明政”。宇文化及守丹阳（今江苏南京）的乐伯通部义军万余归附李子通，乐伯通被任为尚书左仆射。杜伏威和辅公遣使长安请降于唐朝。唐高祖以杜伏威为淮南安抚大使、和州总管，封楚王。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六月，李渊从削平各地割据势力、镇压农民大起义的政治需要出发，以特殊优宠进一步拉拢在江南举足轻重的杜伏威，授其“持节总管江淮以南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淮南安抚大使、上柱国，进封吴王，食邑五千户，赐姓李氏，附属籍”，委任他主宰东南半壁军事，并封其子德俊为山阳公，赐帛五千段，马三百匹。以辅公为行台左仆射，封舒国公。

在这一年里，李子通渡过长江，进攻沈法兴，占领京口（今江苏镇江）。沈法兴令其仆射蒋元超率兵抵御，两军激战于亭（今江苏常州西北），蒋元超战死，沈法兴弃毗陵（今江苏常州），奔吴郡（今江苏苏州西南），丹阳、毗陵等郡降于李子通，“隋郡县及江南人士多归之”。

同年十二月，杜伏威遣行台左仆射辅公及将军王雄诞、阚棱率精兵数千渡江进攻李子通。辅公打破丹阳后，进屯漂水（今江苏溧水），李子通帅众数万拒战。辅公用千名长刀兵为前锋击破李子通的方阵战术后，乘胜追逐，反为李子通所败。王雄诞因风纵火，夜袭李子通营，才转败为胜。加上军粮已尽，李子通被迫“弃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尽入于伏威”。李子通东走太湖，收集残部二万人，袭破沈法兴于吴郡，沈法兴弃城而逃。起兵于苏州（今江苏苏州西南）的闻人遂安，遣其将叶孝辩迎沈法兴，沈法兴中途而悔，欲杀叶孝辩，改道会稽（今浙江绍兴），叶孝辩发觉，沈法兴窘迫，赴江溺死。李子通徙都余杭，“北至太湖，南至岭，东包会稽，西距宣城”，尽收沈法兴之地，军势复振。

杜伏威移居丹阳，自称大行台，开始“进用人士，大修器械，薄赋

敛，除殉葬法，其犯奸盗及官人贪浊者，无轻重皆杀之”。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正月，杜伏威遣其将陈正通、徐绍宗帅精兵二千会秦王李世民击王世充。

同年十一月，杜伏威复命大将王雄诞攻打李子通。两军大战于苏州，李子通退保独松岭。王雄诞遣其部将陈当世率兵千余，乘高据险，多张旗帜，夜则系火炬于树，布满山泽间，以为疑兵，李子通惧而烧营，走保余杭。在余杭城下战败的李子通被迫投降。杜伏威尽收其地，并将李子通和乐伯通执送唐王朝首都长安。王雄诞乘胜进攻据歙州（今安徽歙县）“称王十余年”的汪华，汪华出新安洞口抵抗王雄诞，“甲兵甚锐”。王雄诞伏精兵山谷间，率老弱数千攻打汪华之阵，稍战即阳败还营。汪华攻不能克，日暮归洞时，伏兵已据其洞口，“窘急，面缚而降”。对于据昆山（今江苏昆山）险隘难以力胜的闻人遂安，王雄诞“单骑造垒门，陈国威灵，因开晓祸福，（闻人）遂安即降”。于是杜伏威“尽有淮南、江东之地，南至岭、东距海”，成为江淮地区最强盛的势力。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七月，李世民乘打败刘黑闼之机，移师曹、兖围剿徐圆朗，声震淮、泗，威胁杜伏威，令其入朝。杜伏威“首应诏，不悦于躬”。幕僚李百药劝伏威入朝。及渡江至历阳，杜伏威狐疑后悔，将害李百药。僧徒慧“为说宿因、释杜伏威忧愦，达顶生之非固，晓吴（王）濞之失图，威乃接足乌咽”，不得已应诏前往长安。唐王朝拜其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位在齐王元吉之上，留于京师。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正月，又以杜伏威为太保。

杜伏威在去长安前，留辅公坐镇江南，却将兵权交给了任副职的心腹王雄诞，并私下授意道：“吾至京，不失职，无容（辅）公为变”。辅公是齐州临济（今山东高苑北）人。隋末，跟随同乡杜伏威参加农民起义，为刎颈之交，任义军长史。辅公年长，杜伏威“每兄事之，军中咸呼为伯，畏敬与伏威等”。因而早就遭到杜伏威的暗中忌妒。杜伏威擢其养子阚棱为左将军，王雄诞为右将军，以增强自己势力。他推辅公为仆射，“外示尊崇，而阴夺其兵权”。辅公知其意，怏怏不平，与故人左游仙假装学道辟谷而韬晦。

杜伏威走后，辅公与左游仙等“负阻称兵，潜图反叛”。八月，辅公用反间计，诈称得杜伏威之命，责备王雄诞有贰心，王雄诞“信之，乃归卧疾，公夺其兵”。辅公还“诈言伏威不得还江南，贻书令其起兵（反唐）”。于是辅公称帝于丹阳，自称宋国，建元天明（后改乾德），修南陈故宫而居，署置百官，缢杀反对起兵的王雄诞，以左游仙为兵部尚书、东南大使、越州总管。大修兵甲，转漕粮馈。又与洪州总管张善安连兵，封其为西南道大行合，树起了反唐大旗。

唐王朝以赵郡王李孝恭为行军元帅，岭南大使李靖为副元帅，齐州总管李、怀州总管黄君汉、徐州总管任瓌、舒州总管张镇州、光州刺史卢祖尚等并受节度，征讨辅公。李孝恭以舟师趋江州（今江西九江），李靖以交、广、泉、桂之众下宣州（今安徽宣城），黄君汉出谯、亳（今安徽亳县），李由淮、泗、任自扬子津渡江，卢祖尚为前军总管下宣、歙（今安徽歙县），水陆俱进，由南、西、北三面进攻辅公。

九月，辅公遣徐绍宗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陈政通击寿阳（今

安徽寿县），唐王朝向天下发布《讨辅公诏》，一方面命秦王李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率兵征讨（实际上并未亲征）；另一方面，以“凡此罪恶，止在魁渠，胁从之徒，一无所问，纵有已陷贼党，非其本心，拔难而来，因立功效，此等之类，皆与官赏”相诱降。

十一月，黄州总管周法明进攻辅公，张善安据夏口（今湖北汉口）拒战。屯兵荆口镇的周法明“登战舰与所亲饮酒，善安遣刺客数人诈为渔者，乘轻舟而至，见者不以为虞，遂杀法明而去”。张善安攻打孙州（今江西南昌县），擒总管王戎。舒州总管张镇州等，在猷州黄沙（今安徽泾县东南），大破辅公之将陈当世。十二月安抚使李大亮进攻张善安，两军隔水而阵，李大亮“谕以祸福”，并入其阵，“与善安握手交言，示无猜意”。当张善安将数千骑高兴地至李大亮营归降时，李大亮却将他捉送长安。后被杀害，其众溃散。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正月，李孝恭攻占枞阳。二月，辅公围猷州，他曾遣使说猷州刺史左难当共同起兵，遭到拒绝。辅公“发众数万攻之，不克而还”。李孝恭攻拔鹊头镇（今安徽南陵）。唐将权文诞击败包围猷州的义军，攻占枚洄等四镇。三月，李孝恭破辅公于芜湖（今安徽芜湖），进拔梁山等三镇。卢祖尚攻占宣、歙二州。任环占领扬子城，广陵（今江苏扬州）城主龙龛投降。李世将兵万人渡淮河，拔寿阳，攻硖石，进逼辅公柘早已设置的水陆防线：冯慧亮、陈当世率三万水军屯博望山（今安徽当涂西南），陈正通、徐绍宗率步骑三万扎营林青山（今安徽当涂东南），并在与博望山隔长江对峙的险要——梁山，连铁锁以断江路，傍江筑却月城，延袤十余里，又结垒江西，水陆互为犄角，以逸待劳，而拒唐军。

冯慧亮等坚壁不战。李孝恭出奇兵绝其粮道。冯慧亮军乏食，遂夜间发兵进击李孝恭营，“孝恭坚卧不动”，形成僵持局面。李孝恭召集诸将商议对策，诸将认为冯慧亮等拥强兵，据水陆之险，攻之不可猝拔，如果直捣丹阳，“掩其巢穴，丹阳既破，惠亮自降”。李孝恭欲从众议。李靖却认为，辅公的精锐虽在此水陆二军，但他自统之兵也全是劲勇。现在冯慧亮，陈正通的城栅尚且不能攻拔，辅公“既保石头，岂易取哉”。又说，倘若我军进攻丹阳，旬月不下，冯慧亮等从后面攻打我军，腹背受敌，“此危道也”。冯慧亮等奉令持重，欲不战以老我军，“今攻其城以挑之，一举可破也”，李孝恭遂用其策。李靖率黄君汉等先击冯慧亮，经过激战，义军失利，伤亡万余人，冯慧亮单船逃走。唐军乘胜击陈正通。交战中，降唐的原江淮义军将领阚棱脱头盔对义军说：“不识我耶？何敢战！”，义军“多（阚）棱旧部，气遂索，至有拜者”，因而大败，陈正通以十余骑奔丹阳，水陆防线全面崩溃。李靖军进至丹阳，辅公拥兵数万弃城东走，欲趋会稽，与左游仙会合。李世进击，辅公至句容（今江苏句容），随从兵仅五百。夜宿常州（今江苏常州）时，其将吴骚等谋捉辅公投敌。辅公斩关而出，行至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为敌所擒。在囚室中，他“诬（阚）棱与已通谋”，促使唐统治者杀死这个叛徒。因“好神仙长年术，饵云母被毒”，已于武德七年二月“暴卒”于长安的杜伏威，也被李渊以其与辅公同谋的传闻而“追其官，削属籍，没入家产”。李孝恭杀辅公于丹阳，“分捕余党，悉诛之，江南皆平”。

杜伏威和辅公领导的江淮义军，从大业八年至武德七年，前后十三

年，在江淮广大地区英勇奋战，消灭了隋王朝在这一地区的隋军主力，直接威胁着在江都的隋炀帝，同时又扫荡了江淮一带的反动地主割据势力，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在推翻隋炀帝暴政的斗争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杜伏威是江淮义军的领袖。对这支义军的发展、壮大起了重大作用。但他在宇文化及缢杀隋炀帝后，不能清醒地看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及时地提出正确的政治目标。相反，他却先后向隋越王和唐高祖称臣投降，放下了农民起义的旗帜，到封建王朝去做官，把农民起义引向了失败的道路。尽管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江淮义军最后不可能逃脱失败的历史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应苛求于杜伏威。然而他的行为毕竟是错误的。因为降隋是杜伏威主动的。降唐虽对他有一定压力；而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人物中，比他受到更大压力犹奋战不已者不乏其人。何况杜伏威尚据有强大义军，占有江左广阔地域，完全可以与对手周旋。

辅公起兵反唐，是江淮义军的组成部分。是江淮农民群众反抗地主阶级封建统治斗争的继续。只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与刘黑闼起兵时一样，辅公又没有提出吸引广大农民的政治纲领，并立即遭到优势唐军的镇压，故很快失败了。

第五节隋官起兵与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失败

大业十二年底、十三年初（公元616—617年），一些隋官看到除长安、洛阳和江都等少数孤立据点外，全国四分五裂，遍布全国的农民起义军形成了瓦岗、河北和江淮三股强大的势力，隋王朝土崩瓦解之势已成，纷纷扯起反隋旗号，割据一方，称孤道寡，妄图窃取农民起义胜利果实，取隋而代之，以重建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

大业十二年底，幽州（今北京西南）虎贲郎将罗艺，隋贬为留守官，割据涿郡及其附近诸郡，自号幽州总管，成为燕地一大势力。

大业十三年二月，朔方（今陕西横山西）鹰扬郎将梁师都，杀隋郡丞唐世宗，据郡反隋，自称大丞相，既而攻占雕阴、弘化和延安等郡，即皇帝位，国号梁，改元永隆，勾结突厥贵族，被其封为大度毗伽可汗。

马邑（今山西朔县）富豪、鹰扬府校尉刘武周，以马邑太守王仁恭关闭粮食不救济饥寒交迫的百姓为口实，激怒百姓，杀死王仁恭，并开仓赈济饥民，收买民心。刘武周北连突厥，被立为定杨可汗，他即皇帝位，建元天兴，署置百官。

三月，同州（今陕西大荔）蒲城人郭子和，曾任左翊卫，因犯恶徙榆林（今内蒙自治区托克托县）。郡中大饥，郭子和与同伙袭杀郡丞王才，开仓赈济饥民，自称“永乐王”，建元正平，“南连梁师都，北事突厥，纳弟为质”，被突厥封为平阳天子，郭子和辞不敢当，改封屋利设。

四月，金城（今甘肃兰州市）校尉薛举等，劫金城令郝瑗，囚郡县官，开仓赈济贫乏，自称西秦霸王，改元秦兴，“招集群盗，掠官牧马”。宗罗喉、岷山（在今甘肃岷县境内）羌锺利俗等部义军，都归附薛举。薛举先遣使招降唐弼义军，继而乘其无备袭并其众。又分兵掠地，尽有河西陇右之地，众号三十万，成为雄踞西北一大势力。

五月，太原留守李渊在晋阳（今山西太原东南）起兵。

七月，武威（今甘肃武威县）鹰扬府司马李轨与同郡曹珍等谋议：郡官庸怯，薛举必来侵暴，“不若相与并力拒之，保据河右，以待天下之变”，共推李轨为主，结交民间豪杰起兵，执郡丞韦士政等。李轨自称河西大凉王，署置官属，并拟隋文帝开皇故事，建元安乐，攻占河西武威、张掖、燉煌、西平和抱罕五郡之地。

十月，萧梁后裔罗川（今湖北宜城西南）令萧铣，在巴陵（今湖南岳阳）校尉董景珍等支持下，自称梁王，改元鸣凤，拥众四十余万，后称帝，成为割据“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川”的一大势力。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三月，吴兴郡守沈法兴，以讨宇文化及为名，攻占余杭、毗陵、丹阳，“据有江表十余郡”，自称江南道大总管，署置百官。

在这些起兵的隋官中，李渊是其中的佼佼者。自称十六国凉武昭王李后裔的李渊，是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李之子，唐国公、西魏八大柱国之一李虎之孙，隋文帝独孤皇后姨侄，袭爵唐国公。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命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坐镇北方战略要地——太原，北御乘隋末天下大乱进行骚扰的突厥，镇压农民起义军。

大业十二年十二月，隋炀帝以李渊为太原留守，将兵征讨甄翟儿义军。李渊率数千隋军与甄翟儿遭遇于雀鼠谷（今山西介休），义军“围（李）渊数匝”，李世民率精兵援救，“拔渊于万众之中”。他虽是与隋朝有亲属关系的大贵族，但受隋炀帝猜忌。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隋炀帝随意诛杀失利将帅，以图谶李氏当王而族灭李金才，也使李渊不安。李渊是有政治经验的老官僚，早有取隋而代之的计算。但他直到大业十三年初，隋王朝已岌岌可危、隋官竞起逐鹿时，才在次子李世民、晋阳宫监裴寂、晋阳令刘文静的促进和协助下，将打算付诸实际行动。义宁元年四月，李渊假传隋炀帝征召太原、西河、雁门和马邑四郡年二十至五十者从军伐高丽诏令，煽动民众反隋。又以防御突厥贵族和刘武周南下为口实，扩充兵力，积极备战。把逃亡在太原城里的隋官和地主豪绅刘弘基、长孙顺德、窦琮等罗致其下。五月，又以“潜引突厥入寇”的假罪名杀死隋炀帝派来监视他的太原留守付使王威、高君雅。六月，李渊命李建成和李世民将兵击杀反对他起兵的南河郡（今山西汾阳）丞高德儒，开仓济贫，招兵买马。李密遣使“请合从以灭隋”。李渊利用李密的踌躇满志，“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东都之兵，我得专意西征。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李渊致书恭维李密道：“天生蒸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将自己装扮成“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无意南面称孤的老朽。李密得书，果然喜形于色地说：“唐公见推，顾天下无可虑者”。从此专意攻打东都，不复注意李渊。李渊遂乘瓦岗军与隋军主力在洛阳城下鏖战，关中兵力空虚，用“若入长安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的代价，请兵突厥，于七月率兵三万，誓众军门，移檄郡县，打着“废昏立明”旗号，挥师南下，沿汾水进军关中。

镇守长安的隋代王杨侑，命虎牙郎将宋老生、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率大军屯驻霍邑（今山西霍县）、河东（今山西永济西），阻遏李渊。由于阴雨连绵，道路难行，粮食匮乏，又风闻突厥和刘武周将袭扰晋

阳，李渊大惧，欲回师以保老窝。裴寂等也认为“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李世民认为，宋老生轻躁，可一战而擒。又正值禾熟，不愁无粮。突厥与刘武周外虽相合，内实互猜，不必过虑。应继续西进，“先入咸阳，号令天下”，否则实难自全。李建成赞同其说。在李世民反复劝说下，李渊遂取消退兵令。八月初，雨过天晴，军粮亦至，李渊率兵向霍邑进军。他用激将法将宋老生诱出城外，经过激战，斩其于城下，攻占霍邑。唐军乘胜入临汾（今山西临汾），克绛郡（今山西新绛），进围河东，屈突通凭，坚婴城自守，唐军久攻不下。于是李渊遂留部分兵力继续围攻，主力则从龙门（今山西河津）西渡黄河，进军关中，直指长安。

他在进军关中时，通过罢除沿途隋离宫别馆、释放宫女并予以抚慰，对所俘将士愿回家者授以散官，不乱杀官吏，“开仓赈饥民”，严申军纪，“各依壁垒，毋得入村落侵暴”等措施，收买人心，同时，李渊还通过节缓授官、引见劳问等政治手腕，笼络地主阶级；用高官厚禄，招降隋地方官吏。因而，李渊获得了地主阶级、尤其是关中地主阶级的热烈拥护，他们把李渊看成中兴隋王朝的希望所在，故“义旗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凑，赴者如归。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绪余，侠少良家之子弟，从吾投刺，咸威后时”。

在进军关中时，李渊父子对活跃于关中广大地区的农民起义军十分重视。李世民认为，“关中群盗，所在屯结，未有定主，易以招怀，贼附兵强，何城不克”，他向李渊提议：“请进师入关，取永丰仓以赈穷乏，以群盗从围京师”。李渊至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以书招关中义军最强者孙华，“渊握手与坐，慰奖之，以华为左光禄大夫、武乡县公、领冯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华以次授官，赏赐甚厚”。土门义军首领白玄度，率军送款，“并具舟楫以待”李渊军。李渊命孙华与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引兵渡河，宜君（今陕西宜君）刘，也率数千义军归降李渊。李世民至渭北，令长史殷峤招抚关中农民起义军，“所至皆下”。至泾阳（今陕西泾阳），击破稽胡刘鹞子义军，收编其众。起兵鄠县（今陕西户县）的李渊之女平阳公主，也很注意利用农民起义军。她使家僮马三宝招降活动于屋（今陕西周至）、司竹园（今陕西周至东）的义军领袖何潘仁。起兵鄠县的李渊从父弟李神通，与何潘仁合兵攻占鄠县。平阳公主又遣马三宝去活动，乃至“绥辑群盗，多来归。她以这些义军扩充实力，众至七万，隋西京留守多次派兵讨伐，皆为所败。及李渊渡过黄河，平阳公主等遣使迎接，“关中群盗皆请降于（李）渊，渊一一书慰劳授官，使各居其所，受敦煌公（李）世民节度”。

在关中地主、隋降官降将和关中一些农民起义军支持下，李渊进军比较顺利。八月，占领了著名粮仓——永丰仓。九月，控制了战略要地——潼关，切断了长安与关东的联系。李渊之婿左亲卫段纶聚众万人于蓝田（今陕西蓝田），响应李渊，平阳公主又占领了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屋和始平（今陕西兴平东南）等地。长安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十月中旬，李渊在其亲属平阳公主等密切配合下围攻长安。十一月初，轻易地占领长安，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年仅十三的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自己独揽大权。“与民约法十二条”，废除隋王朝苛酷法令，以稳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十二月，迫降屈突通，关中和河东遂

为李渊所有。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正月，李渊以书招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的广大地区，都兵不血刃地纳入李渊的势力范围。隋炀帝死后，李渊一脚踢开隋恭帝，自立为帝，定都长安，建立了唐王朝。

李渊在夺取关中，巩固后方后，从武德元年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镇压农民大起义，削平各地割据势力的斗争，以统一全国。

（一）镇压农民大起义

在镇压农民起义军方面，李渊父子使用的是剿抚兼施策略。对起义军，他们首先使用武力进行血腥镇压（参阅本书其他有关章节）。其次，在军事围剿的同时，辅之以政治诱降，利用自己的强大声势、农民起义军的弱点，以高官厚禄收买农民起义军领袖人物。在隋炀帝已死、李渊建唐的新形势下，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少农民起义军领袖人物缺乏清醒头脑，不能对农民起义军的政治任务作出正确估计，对李渊父子存在幻想，或迫于唐军之威胁，或战败无奈，因而接受招抚，或自动归降唐王朝。降唐后，他们已由原来的农民反抗斗争带头人，变成了封建王朝的大小官僚。其中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又脱离唐王朝，重新进行反抗斗争，或归附其他割据势力。也有些人，则积极参与唐王朝镇压尚在坚持斗争的农民起义军，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得力工具，加速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失败进程。

（二）削平各地割据势力

对于起兵于各地的割据势力，李渊采取军事进攻和招抚相结合的方针，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武德元年七月，郭子和自动归唐。同月，薛举死。十一月，其子薛仁杲战败降唐。武德二年五月，唐使安兴贵诱降李轨未遂后，起兵执其至长安斩首。十月，罗艺降唐。武德三年四月，李世民大败刘武周，后者逃奔突厥，后为突厥所杀。武德四年五月，王世充被迫降唐。十月，唐将李孝恭围江陵，萧铣穷蹙屈膝。至此，割据势力基本上被削平。

唐史

第一章 李唐之先世及其统一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父子起兵反隋，攻占长安，建立唐王朝，然后逐步镇压了农民起义军，消灭了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富强的国家。

涉李唐世系，近人曾提出两项问题：其一为缪凤林汉胡混合之北统，兹列举李氏之血统如下：

除独孤、长孙都属鲜卑无疑外，窦氏之先，相传自后汉奔匈奴；故说者亦视如漠北之族。吾人对上古史能深入研究，此等问题，已觉不甚重要。

莱忙脱氏言："德人自夸为优越人种，且是纯粹的诺曼种；实际上则彼辈已是最复杂的混血，此种现象，世界上各民族殆莫不皆然。"刘盼遂曾著《李唐为蕃姓考》三篇，最后又自取消其说，然犹有人深信不疑者。

其二倡自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彼以赵州昭庆县原有宣皇帝（熙）、光皇帝（天赐）合茔，其地与赵郡李氏祖居之常山郡相接，因谓"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十一页）且宇文泰入关之后，曾令相从之汉人，改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李唐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即在是时云云。（十二页）

同姓而因缘攀附，是陈氏所承认之事实，（十一页）如果李唐出自赵郡，则赵郡之李，方攀附不暇，庶姓更不敢小觊，何以皇族反不及赵郡之可贵，而太宗有"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之语。（《旧书》六五《高士廉传》）宇文泰入关，下距唐初仅八十年，如其改自赵郡，高祖尽应知之，即使彼不自言，他人亦当记忆，公私著述更少不免透露真相，如李密之例，（见《述论稿》一六页引文）今竟无之，此为李唐非原出赵郡之反证。况随宇文泰入关之北族，虽暂改河南郡望为京兆，但到唐时已大都恢复其河南郡望，唐室如真出自赵郡，又何爱于陇西而坚持不改？陈氏之说，殊未可信。

吾人试从当日整个局势观察，便知统一要求之十分急切；缘突厥在秦、晋边缘已固植其廿年（自开皇十九年起）来之实力，西边新兴之吐蕃，又方跃跃欲动（唐立国之第十七年，即领兵廿万，要求尚主），如果我国内部再混战下去，则五胡之乱，燕、云之割，或不难搬演于中原。凑巧着，始毕兄弟勇而寡谋，一般起义者之志愿，多不过要求换一个好首长，而李唐于篡隋之翌年（武德二），立能宣布明令，规定租庸调法，（《新唐书》一）一方面谋巩固自己财政之基础，另一方面则示群众以扫除隋炀之暴敛，其措施总比余子为较有条理，因而取得多数拥护，趁着人心思治，遂不数年而六合复定。

唐自太原起义，武德元年降薛仁杲，二年执李轨，关西悉定，三年走刘武周，四年擒窦建德，降王世充。五年又破斩建德余党刘黑闼（小股如梁师都等可不计），仅六年而海宇大定，白居易诗：“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本自《贞观政要》十）以武德四年为四海清，则仅及五年。

犹有易储一事，隋以储位之争而勇、秀废锢，唐以储位之争而建成、元吉被杀，二十余年间故事重演，太宗诸子，复有承乾与泰之相倾。原夫专制君主，无不欲万叶永基，然因此一念，遂生矛盾。勇为太子，未尝建立武功，而广则有平陈之大勋，建成虽屡次临戎（武德三、四、五、六及八年），而勋业远非太宗之比，储位之危，实为父者有以启之。幸唐高祖即行禅位，犹胜隋文一筹。考周初，泰伯、仲雍，远征吴地，突厥习俗，亦长子远征（后来蒙古即习其俗），隋、唐狃于儒家储贰镇中之说，家庭变故，所以不断产生也。

平阳公主，高祖第三女也，隋末，与其夫柴绍在长安，高祖起事，绍间行赴太原，公主自归县庄所，散家资，招引亡命，得数百人；遣家僮马三宝说降胡人何潘仁、民军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又取厔、武功、始平数县，申明法令，禁无侵掠，得兵七万人。后与秦王会于渭北，置幕府号曰娘子军。（《旧书》五八）我国女子能立武功者少，故特记之。

第一节太宗克定突厥及漠北

（一）东突厥始毕自雁门之役，气焰益张，隋末群雄又多倚为奥援，愈有凭陵中原之志。维时东自契丹、室韦，西至吐谷浑、高昌，皆为臣属，恃功骄倨，请求无厌。曷萨（婆）那可汗当宇文化及将败时，奔回京师，始毕以旧嫌之故，要唐杀之。

始毕卒（武德二年四月），弟处（叱）罗继，未几亦死（三年春），弟颉利嗣，来寇益急。高祖遣李瓌赍帛数万段与结和亲，然仍拘留唐使，协助唐敌，兵不少戢。处罗子郁射设又入据河南五原、榆林之地，接于灵州，高祖至欲迁都樊、邓以避之，秦王力谏而止。七年秋，率始毕子突利举国入寇，秦、齐二王出屯豳（ ）州，而器械不足以御敌，城池不足以据守，突厥万骑，奄至城西。秦王冒险，率百骑驰诣虏阵，与颉利对语，又遣骑别责突利，因之，叔侄携离，颉利请和，结盟而去。

盟血未干，故态复作，九年八月，乘太宗新立，领兵廿万，直逼京师，至于渭水便桥之北。太宗亲率六骑出渭水，与颉利隔津而语，责其负约，颉利再请和，刑白马设盟，引兵退。

贞观初，颉利遣十万骑讨回纥于漠北，反为所败，又内攻突利，宠信胡人，部下携贰，降唐者相属。三年冬，命李靖、李（世）将分道出师讨之。翌年正月，靖袭颉利于定襄，获炀帝后萧氏及其孙政（正）道，颉利退保铁山。靖出其不意，疾行掩之，遂擒颉利送京师，碛南大定，漠南诸蕃君长请上号为天可汗。突厥可汗衔有t nrit g，义为似天，即《尚书·尧典》郑注之稽古“同天”也，又有t nrid ，义为由天，即天生或天子也，唐译作登里或登利，天可汗之义本于此。近人有证天可汗本自Tabghac者；按此名亦拼作Taghac，Tawghac（蒙古时译作桃花

石）。突厥人用此名以称中国，早在五九八年以前（《西突厥史料》一七六页），下去贞观初，逾三十载，与太宗称天可汗何涉，学人缺乏历史时间性，此其一著例也。

第一节太宗平服西域

西突厥之领地，略见前《隋史》六节，在汉以来所谓“西域”之内，强盛时往往与我争霸而扼我之吭，故首叙西突厥。

（一）西突厥西突厥自处罗归隋，后来别有统（Tona）叶护继起，勇而有谋，并铁勒，下波斯，控弦数十万，徙庭于千泉，遂霸西域。武德五年，遣使来请昏，时颉利势方张，高祖采远交近攻之策，许之，遇西方路梗而未果。贞观初，统叶护卒，国内大乱，分裂为两部。约贞观十三年顷，其部长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均室点密五世孙）先后来归。及唐师伐高昌（见下文），有阿史那贺鲁者屯兵可汗浮图城，惧而来降。因以其地为庭州。

（二）天山南路三国：

（甲）高昌即汉之车师（又作姑师），东汉西城长史及戊己校尉并居于此。晋以其地为高昌郡。吕光及沮渠蒙逊皆因之。魏太武时，有阚爽者自为高昌太守，太平真君中（约四四二以后），爽为沮渠无讳（蒙逊子）所袭夺。无讳死，弟安周代立，文成和平元年（四六○），又被茹茹所并。茹茹以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称王自此始。孝文太和五年（四八一），高车王逐杀阚氏之后人，以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国人杀之，改立马儒。二十一年（四九七），马儒请于魏，举国内徙，群情不愿，相与杀儒而推其长史麴嘉主国政。嘉，金城榆中人也，其后亦尝表求内徙，魏廷却之（《北史》九七）。文泰，贞观四年（六三○）曾来朝，然与西突厥通，西域使来中国者稍被阻绝。伊吾尝臣西突厥，至是内属，文泰与西突厥共击之，又合兵破焉耆五城，虏其人，焉耆诉诸唐，屡责不改。贞观十三年，命侯君集等讨之，翌年（六五四），文泰忧惧而卒，子智盛（后赐名智勇）出降。于其他置西州及安西都护府。

高昌，今吐鲁番一带，在西域诸国中，汉化最为深入。近年考古发掘，得氏朝墓砖百余，（黄文弼编《高昌专集》）其传世年号等乃渐可详考，兹据罗振玉《增订高昌氏年表》，撮录如次：

嘉，魏孝文帝太和廿一年（四九七）——孝明帝孝昌三年（五二七）？

光，魏孝庄帝永安元年（五二八）——废帝建明元年（五三○）。

坚，魏普泰元年（五三一）改元章和（凡十八年）——西魏文帝大统十四年（五四八）。

玄喜，西魏大统十五年（五四九）改元永平（凡二年）——大统十六年（五五○），又改元和平（凡四年）——西魏恭帝元年（五五四）。

宝茂，西魏恭帝二年（五五五）改元建昌（凡六年）——周明帝武成二年（五六○）。

乾固，周武帝保定元年（五六一）改元延昌（凡四十一年）——隋文帝仁寿元年（六○一）。

伯雅，隋文帝仁寿二年（六○二）改元延和（凡十二年），又改元义和（凡六年）——唐高祖武德二年（六一九）。

文泰，唐高祖武德三年（六二○）改元重光（凡四年），又改元延寿（凡十七年）——太宗贞观十四年（六四○）。

氏有国，至智盛凡九代，一百四十四年而灭。（《唐会要》九五）

（乙）焉耆高昌之役，焉耆王引兵助唐，故高昌破后，还其侵地。寻叛归西突厥，十八年，遣郭孝恪讨之，执其王，以其地为焉耆都督府。高宗时使前王归国。

（丙）龟兹初臣西突厥，焉耆之叛唐，又发兵助之。廿二年，遣阿史那社尔等讨破之，执其王归，别立王弟主国政，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兼统焉耆、于阗、疏勒，谓之四镇。

唐初舶运未盛，我对西方，凡物品运输，官私往来，都以遵陆为主道；尤其高昌至龟兹绾毂丝路，是经济大动脉所在，不能不出全力以维持。十箭雄踞西北，领导高昌三国，梗我交通，唐用兵力对付，势非得已。（《新书》二二一下称，太宗谓安国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其重要可想。）质言之，唐太宗讨东突厥（西突厥未直接用兵），讨高昌三国，系为自卫而战，为经济争生存而战，近年来有些作者或不研讨事实，统置于侵略之列，（屡见于《历史教学》）而编纂者曾未提出讨论，岂必要唐朝束手待毙而后免于侵略之罪名耶？高昌八城皆有华人，（《北史》九七）北庭原属车师（即高昌），故平定之后，开置郡县。焉耆、龟兹之设镇，止驻兵以维交通，仍立国王主持政事，臣其人而不有其地，焉得以侵略目之？

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论》，谓大体上至唐代止，西域所住之汉人，皆以屯戍军及官吏为主，数目甚少，且不与土人杂居，故东西文明各维持其传统，无显著的融合。及唐经营西域，实际始有发展。惟是中国经营，又不彻底，都护、长史无民政关系，从属之最大目的，只在防止北方民族之占据，保护汉土与葱岭西诸国之交通，免贸易上发生障碍，初不夺取其地之统治权。西域最初对汉之文明，亦取排斥态度，如各国人因龟兹王摹仿汉天子仪节而有驴非驴、马非马之讥，是也。此一连串的批评，纯从帝国主义侵略的观点出发，不能深切认识汉、唐民族所以成其伟大。据管窥所及，汉、唐对待兄弟民族之政策，其特点有四：1.不强迫同化，只顺其自然。2.不掠取俘虏分散为奴婢。3.不使杂处通婚。4.不排斥各族不同之宗教，任其自由信奉。（如隋炀不许启民易汉族冠服，唐太不把突厥迁往江南，都是最好的例子。）唯如是，故汉文化之铺开，比较迟缓，然终不至因暴躁冒进而换取异俗之深恨。蒙古时代有回鹘“亦都护”，余证为伊兰语翻译西汉“都护”一词之遗音，伊兰语开口好用i，加于“都护”之上，遂成idiqut，及回鹘西迁，又从伊兰人转贩得来。汉化之深，经千余年而不坠，惜一般历史家之数典忘祖也！

往西南及远西，可附记者二事：

我国与印度向无直接战争，间接者惟王玄策之役。贞观十七年三月，卫尉寺丞李义表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奉命送婆罗门返国，十二月，至摩伽陀（Magadha）。十九年正月，至王舍（R.jagrǐha）城，登耆崛（Grǐdhrak.ta）山，勒铭其地。二月，又奉敕立碑于摩诃菩提（Mahabhodhi）寺。此次往返，皆经泥婆罗（Nepal，近译尼泊尔，清人称为廓尔喀“Gorxa”）国。翌年，玄策复使摩伽，从骑三十人。未

至，王尸罗逸多（HarshaSil.ditya）已死，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从骑皆没，遂剽诸国贡物。玄策奔吐蕃西鄙，召诸国兵，泥婆罗以七千骑、吐蕃弃宗弄赞赞普（KhriSrongbtsonSgam—po）以千二百人来会，玄策率之，破摩伽兵，禽阿罗那顺及其妻、子，虏男、女万二千人，杂畜三万。东天竺王尸鸠摩（Sri—Kumāra）送牛马三万犒军，迦没路（Kamarupa，地在东印度）王献上地图。廿二年五月，阿罗那顺逮至阙下。其后显庆二年，玄策三次使天竺，送佛袈裟（kasaya），亦取道泥婆罗；此行曾西至厨宾（龙朔元）。所著有《中天竺行记》十卷，今不传。

贞观末尚有一外国来贡，迄今犹未决定其主名。《旧书》一九八《拂蒋传》载："贞观十七年（六四三），拂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水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旧书》夺"水"字，据《新书》补。）拂国王是某国之王，解者凡有四说：（一）东罗马王Heraclius之弟Theodorus，但其人已于六三八年被杀。（二）东罗马之大臣ValentineCaes r。（三）罗马教皇Theodorus，即位于六四二年十一月。（四）叙利亚总主教之号，即Patriarkis。我往日亦曾提意大利王Rotari之一说，但第一音组Ro究不能对"波"。前文四说之中，我早说对音以Patriarkis（省去尾音）为最近。今考《旧书》称："拂国一名大秦"，而《景教碑》则云："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贞观九祀，至于长安"，景教固来自叙利亚，是此之"拂"得为叙利亚也。阿罗本之来，与波多力之贡，后先仅九年，谓其接踵而至，事亦甚类，当日有"拂国诸蕃"之称（见下七节），可知拂不定指东罗马；以称号为人名，又以大主教为王，亦旧日言语不通常有之误会。综合观之，此王名为叙利亚文之大主教，殆可无疑。

第三节高宗继成大业

高宗本庸懦，然以承贞观余荫，武将多材，且获降附突厥之效力，故其前半叶之开疆辟地，有时且过于太宗，是则时势造成，非彼之力量所致。兹分西北、东北两项记之。

（一）西北

西突厥阿史那贺鲁降而复叛（永徽元），前后遣梁建方、契何力、程知节等进讨，皆无功（永徽及显庆元）。显庆二年，更以苏定方为帅，领回纥等兵，分南北两道进军，先破之于金牙山，乘胜追击，十二月，复大战于伊丽水（今伊犁河）上，杀获略尽。贺鲁西走投石国（Ta kand），副将萧嗣业追擒之，收人畜前后四十余万，西域悉定。诏分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以步真为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分押五弩失毕部落，弥射为崑陵都护、兴昔亡可汗，分押五咄陆部落。其所役属吐火罗等国遣使内属。龙朔元年六月，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参《圣心》二期拙著《课余读书记》三四——三七页）隶安西大都护府，仍于吐火罗立碑纪德，我国声威之远暨，蒙古前所未有也。各府名如下表：

各都督府之名称，除波斯外，均是唐人采用古语，无关实际。惟国及州城所在，则表示当日西域诸国之领域。此一次建置，向来不为我国史家所重视；一则因囿于闻见，对八九十个地名，无法探讨。二则不明

历史之过渡性，以为悬隔万里，事同儿戏。法国学者沙畹曾谓所置府州，具重要科学性质，亦不过就中亚地理立言，对于唐代声威之影响西域，毫无阐发，殊为憾事。考西突厥统叶护盛时称霸西域，授诸国以颉利发（ilt bir）之号，每国派驻吐屯（tudun）一人，收其征赋。及显庆三年（六五八），西突厥全境悉隶我国，以前监统之权，亦自然随战胜而归我国继承。唐朝如依此执行，最低限度亦可监督各国之财政。然中国对外，向主怀柔，不主侵略，今只在名义上设立州府，免去苛赋，诸国应无不乐于顺从，其立碑颂德，可信言出由衷，惜此古迹与拂林碑，均湮没不得见也。（显庆年中，波斯人阿罗喊（Abraham）曾充拂国诸蕃招慰大使，于拂西界立碑，见景云元年《阿罗喊墓志》。）

此十六国之今地，就大体言之，吐火罗、哒、诃达罗支、厨宾、失范延、石汗那、护时健、多勒建八国均在阿富汗，怛没、乌拉曷二国在乌兹别克共和国，解苏、骨咄施、俱密、久越得犍（亦作Kabudian）四国在塔吉克共和国，波斯即伊朗，护密多之一部应在我国境内。

在龙朔元（六六一）之前，西方各国先后来归，亦尝分设府州多处，并以次记之：

康国康居都督府永徽年（六五○——五五）设，今乌兹别克共和国。

何国（ko anyah）贵霜州永徽后设，今地同上。

拔汗那（Ferghāna）休循州显庆初设，今地同上。

葛逻禄（Qarluq）阴山、大漠、玄池三都督府显庆二年（六五七）设，原居金山之西，北庭西北，今新疆北部至蒙古西部。

龟兹龟兹都督府显庆二年设。

石国（Ta kand）大宛都督府显庆三年（六五八）设，今乌兹别克共和国。

米国（Ma margh）南谧州显庆三年设，今地同上。

安国（Buxara）安息州显庆时设，今地同上。

东安国（Xarghan）木鹿州显庆时设，今地同上。

史国（Ke ）沙州显庆时设，今地同上。

（二）东北

（1）百济本马韩故地（伯济），汉成帝鸿嘉三年，扶馀族人温祚率众南王其国，因以百济为号，当今朝鲜半岛之西南部，东至新罗，东南渡海至倭国，北至高丽。与新罗世仇，高祖、太宗屡遣使和解之，其王义慈不听。显庆五年，高宗命苏定方统兵伐之，虏义慈及其太子隆等。百济旧分五部，因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卅七州，二百五十县，立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及县令，设熊津都督镇之，得户廿四万，口六百廿万。同年八月十五日，定方立纪功碑，碑为五层花岗石塔，高三十五尺；文刻于塔之第一层，高四尺五寸，题《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字作正楷，径一寸五分，今存忠清南道扶馀县南二里，俗呼为平济塔。及大军西旋，余部复叛，围留守郎将刘仁愿于百济府城，并请援于倭，倭遣秦田来津帅师五千赴之。刘仁轨奉诏发新罗兵救仁愿，龙朔三年（六六三），孙仁师又领兵浮海至，各军既合，遇倭人于白江口（今东津江流入熊津江处），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秦田来津战死。（参《旧书》八四及蓝文徵《隋唐五代史》上编一二三——

二八页）今亦有刘仁愿纪功碑存扶馀县，惟末截已残缺。朝廷于是授扶馀隆熊津都督，遣还本国，隆惧新罗，寻归京师，自此益为新罗所兼并。

（2）高丽先是，贞观十六年，西部大人泉盖苏文（泉是姓，盖苏文为三字名）性凶暴，诸大臣与其王建武（彼国称为荣留王）谋密除之；事泄，盖苏文假校阅为名，邀请大臣参观，勒兵尽杀之，并弑王而立王弟藏为王（彼国称为宝藏王），自号莫离支，专国政。十七年，唐遣使谕令勿攻新罗，盖苏文执不从。太宗谓左右曰：莫离支贼弑其主，尽杀大臣，用刑有同坑，百姓转动辄死，怨痛在心，道路以目，因其弑君虐下，败之甚易也。十九年，命分水陆并进，御驾亲征，先后破盖牟（盖州，今辽阳、沈阳之间）、辽东（今辽阳）、白崖（或白岩，今辽阳东五十余里太子河北岸）诸城，进次安市（今海城南十五里之营城子），城坚弗能克。会仓储将竭，士卒寒冻，乃班师。此后廿一、廿二年及高宗永徽六、显庆三年（均程名振），虽有小接触，无大功。龙朔二年，统兵者任雅相卒于军，庞孝泰与战于蛇水，军败，孝泰及其子十三人皆没于阵。乾封元年，盖苏文死，子泉男生为两弟所逐，脱身来奔，因命李伐之；总章元年九月，拔平壤城，虏高藏，设安东都护府，统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仪凤二年，散徙其一部人于河南、陇右，自后新罗，渤海渐并其地。

唐得高丽而不能守，《述论稿》以为“实由吐蕃炽盛”（一三九页），余谓此非主要之原因也。其一在“辽东道远，粮运艰阻”（郑元踌对太宗语），海航操纵，难得其人。其二、突厥脱离，北边屡警，环顾内外，情势迥殊。其三、东北两蕃（契丹、奚），渐多作梗，顾此失彼，有同捉襟。圣历间（六九八——九）拟命高氏子孙自统安东旧部，事不果行，唐遂永失其控制高丽之实力，开元廿四年更明令“坝江已南宜令新罗安置”，（《元龟》九七一）且进一步承认新罗之吞并。

第二章 唐前期农民战争

第一节社会矛盾的日益发展

从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是为唐前期。

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全国尚未统一。时值隋末丧乱，社会残破，经济凋敝，又因镇压农民起义，削平群雄而征战不已，加之水旱频仍，广大农民赋役负担十分沉重。因此，在唐高祖李渊执政的武德时期（公元618—626年），尽管唐王朝已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革隋弊政，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但是究属草创，故农民反抗斗争时有发生。

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唐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他以隋为鉴，接受魏征提出的偃武修文治国方针，比较认真地推行了“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政策，调整了生产关系，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执政后期，逐渐骄奢，好尚珍奇，纵情畋游，不乐谏诤，昵近小人，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赋役负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发展，农民反抗斗争在全国各地不断爆发。

唐高宗即位后，在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辅佐下，朝政比较清明，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到其执政后期，为了防御吐蕃和突厥的不断进扰，征发数十万大军前往西北地区戍守和作战，“征科赋役，差点兵防，无钱则贫弱先充，行贷则富强获免”。繁重的兵役和徭役，几乎完全压在农民身上，以致“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养，自剑以南，爰至河、陇、秦、凉之间，山东则有青、徐、曹、汴，河北则有沧、坛、恒、赵，莫不或被饥荒，或遭水旱，兵役转输，疾疫死亡，流离分散，十至四五，可谓不安矣。”

武则天执政期间，重视农业，发展生产，进一步发展科举制，破格用人，抵御吐蕃、突厥和契丹侵扰，户口由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的三百八十万户，增至六百一十五万六千千百四十一户，为唐王朝在开元年间臻于鼎盛奠定了基础。

武则天执政期间，尤其是晚年，由于任用酷吏，奖励告密，滥封官吏，佞佛建寺，筑明堂、天枢，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批农民破产逃亡，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加深。

公元705年，宰相张柬之等发动宫廷政变，迫使武则天下台，唐中宗恢复帝位，但朝政大权却落入皇后韦氏和安乐公主之手。她们结党营私，卖官鬻爵，广占田园，苛剥封户，骄奢淫佚，“盛兴佛寺，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甚至企图步武则天后尘，僭称女皇。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短短八年间，宫廷政变迭起，皇帝屡易，朝政腐败，加剧了社会矛盾。

唐玄宗上台后，政局才趋于稳定。他在著名宰相姚崇、宋辅佐下，锐意求治，澄清吏治，限制直接掠夺封户，沙汰僧尼，捕杀蝗虫，发展生产，减轻农民负担，防止边将闹事，因而社会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至开元、天宝之际，“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户口增至八百

余万户，号称“开元盛世”。

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更加激烈。由于官僚机构愈益臃肿，养兵越来越多，与边境各族战争连绵不绝，不堪繁重赋役而破产逃亡的农民难以数计。在表面繁荣的背后，是“闾阎困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应当指出的是，唐前期少数民族、尤其是岭南、剑南和黔中等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深受阶级和民族双重压迫。少数民族首领、官僚和富豪蓄养和掠卖奴婢比较盛行。如贞观初，岭南少数族首领冯盎，占有“奴婢万余人”。唐睿宗时，监察御史李知古欲掠姚州（今云南姚安）蛮“子女以为奴婢”。在镇压少数民族反抗斗争时，唐统治者更是乘机大肆掠夺人口。如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四月，大丞相府谘议参军窦轨镇压稽胡起义时，掳男女二万口。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五月，行台仆射窦轨打垮始州（今四川剑阁）、巴州（今四川巴中）、阆州（今四川阆中）等山僚起义时，又掳男女二万口。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三月，益州行台尚书郭行方击破眉州（今四川眉山）、“洪，雅二州”山僚起义时，俘男女五千口。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夔州都督齐善行围剿巫州（今湖南黔阳西）僚民起义时，俘男女三千余上。同年，右武侯将军上官怀仁镇压巴州、洋州（今陕西西乡）、集州（今四川南江）和壁州（今四川通江）僚起义时，掳男女万余。翌年四月，上官怀仁将巴、洋、集、壁四州僚起义平定时，又掳男女六千余口。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三月，广州总管党仁弘讨伐罗州（今广东廉江北）、窦州（今广东信宜南）僚起义时，掳男女七千余口。唐统治者将掳掠来的少数民族男女，有些作为奴婢，赏赐给“有功”将领和达官贵人，供其驱使。这就更加激起少数民族的不满与反抗。唐前期少数民族起义较多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总之，唐前期虽是李唐王朝创建并日益向上发展和繁荣的时期。但是，在这一个多世纪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这个社会基本矛盾不仅依然存在，而且随着李唐统治者的压榨逐渐强化而日益发展，民族矛盾也不断发展，在有些时候和地区还比较尖锐。

第二节开元之治及乱机所伏

前人少所儆惕，故极盛往往转入始衰。开元之治，在历史上号称隆盛，旧纪开元十三年，“东都米十钱、青、齐米五钱。”《新书》五一，“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论者多归功于贤相姚（崇）宋（璟）。崇奏十事，如政先仁恕，不倖边功，宦竖不与政，绝外边贡献，停道、佛营造，皆切要之图；璟却谀尚实，不事虚文；比之初唐房、杜，确加一等。然二人执政各不过三年有奇（崇，开元元年十月——四年闰十二月，璟，开元四年闰十二月——八年正月），窃以为有更要之偶然性存焉。

先是，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堆神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会突厥默啜尽众西击突骑施（Türgi　，即西突厥十箭之一），朔方总管张仁愿奏请乘虚夺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绝其南寇之路；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守黄河，恐劳人废功，终为寇有。仁愿固请不已，中宗许之，遂以景龙二

年（或误景云三年）筑三城于河北，三旬而就，以拂云祠为中城（约今包头左右，突厥文呼佛为Burxan，拂云即其音译），与东、西两城相去各四百余里，首尾应接，北拓地三百余里，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及开元四年，默啜被铁勒九姓所杀，骨咄禄子小杀与其弟阙特勤收集余部，继立为毗伽可汗。于时旧部酋长南投者颇多，西方十姓亦不为之用，毗伽方事抚绥，无力南犯。开元六年两次下诏，期以八年秋大举北伐，无非志在恫吓；而八年秋突厥入侵甘、凉，亦不外先发示威，双方政策，可谓针锋相对。毗伽有谋臣暾欲谷（Tonjukuk），年已七十余，号称足智。毗伽欲入寇，暾欲谷曰："我众新集，犹尚疲羸，须且息养三数年，始可观变而举。"又毗伽闻唐定期北伐，大恐，暾欲谷曰："王晙兵马计亦无能至此，必若能来，候其临到，即移衙帐向北三日，唐兵粮尽，自然去矣。"（《通典》一九八）质言之，两方均不欲战，故数年后毗伽便认玄宗为父，偃旗息鼓，言归于好，唐亦得以休养生息，《旧书》本纪赞所以提"虏不敢乘月犯边"也。

突厥之外，西北患在吐蕃，惟开元末以前无大争战。东北两蕃（契丹、奚。奚原称库莫奚，始见于《魏书》二登国三年——三八八），虽时服时叛，然影响极微。乘武后峻法之余，易以宽仁，民尤得各安其业，凡此种种皆造成开元致治之要素也。然中唐以后之危机，亦于是形成。

（1）藩镇"节度使"非官也，终唐之世，不列于品秩，故除授之制只曰"充"，都督乃其本官也，自隋炀罢总管，唐兴复旧，仍加号"使持节"，武德七年，改总管曰都督，（《通典》三二）不过名义上之变更，权限如旧。大都督从二品，中正三品，下从三品，并为职官。睿、玄继统，官制渐紊，差遣尤繁，天宝之末，杨国忠至身领四十余使。（《旧书》一○六）

节度使名目之流行，既非如总管改都督经过明诏颁布，复废置无恒，缺厘正之条例，是以追溯其朔，书说不同。（参《十七史商榷》七八）原夫"节度"字最初之用法，只是术语，换言之，即规定其职权之范围；试观贞观三、四年诏诸军并受李靖节度，（《会要》七三）太极元年有诏令幽州都督裴怀古节度内发三万兵赴大武军（《册府元龟》二五九；于时幽州未设节度使），开元二年制姚崇可持节灵武道行军大总管，管内诸军咸受节度，（《文苑英华》四五九）三年制郭虔可持节充朔州镇军大总管，和戎、大武及并州以北缘边州军并受节度，（《元龟》一一九）又李邕《臧怀亮碑》，"复拜公朔州军副大使，节度河东道诸军州兵马"，（《全唐文》二六五）上项之"节度"字皆是"节制"之谓，可见直至开元九、十年顷，犹有用"节度"作术语而不入使衔者。惟因其语已流行，"节度使"之称，遂变为不成文之惯例。质言之，节度使本初唐都督所嬗化，至于晚世，然后"都督""节度"之名，参差互见。据《唐六典》，开元廿五年顷节度使有八。藩镇之祸，不由于有节度使而由于赋与之职权太重，故酿成尾大不掉之势。

元朱礼论方镇云："其所隶之州，初无定域，或兼十余州，或只三四州，今日以其州隶于彼，明日又以其州隶于此"；（《汉唐事笺》后集三）此则唐代因承六朝弊习，将区域作调剂之具，对行政系统，确属纷

纭，但非如朱说“自太宗启之”耳。

（2）宦官中唐以后，宦官之祸，与藩镇同烈，其弊则肇自唐初，至开元、天宝，乃更进而干预政事矣。贞观时，宦官张阿难官至监门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封汶江县开国侯，食邑七百户（《昭陵碑录》下；将军、银青、开国侯均从三品）。贞观四年，内侍王某授右监门将军，进爵为公，曾与李靖同征吐谷浑及出使吐蕃。（《关中金石记》二）武后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新书》一二四）又神龙三年，吴文授镇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开元九年《吴文残碑》；镇军从二，大将军正三品），势力日增，故姚崇有宦竖不与政之要约。考唐制内侍省置内侍二人（据引日唐书》四四。《旧书》一八四及《新书》二○七作四人）管领，阶不过从四品上。武后时宦官数稍增，中宗时更至三千余，《旧书》一八四）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在位既久，中官衣朱紫乃至千余，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门施荣戟。杨思勗亲行阵，黎敬仁、林招隐奉使宣传，尹凤祥主政书院，其余尚有牛仙童（使幽州，受张守厚赂被诛）、边令诚等；凡殿头供奉、监军、入蕃、教坊、功德主当，皆为委任之务。监军权过节度，较富之地，一至军所，便冀千万。《南诏德化碑》称，玄宗“降中使贾奇俊详覆，属竖臣无政，事以贿成”，则更因任宦官而招致属国离叛。尤甚者，政事可否皆操于高力士，每四方进奏，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宇文融、李林甫、李适之、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拱、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辈皆因之以取高位。玄宗在禁中呼为将军，（《语林》一）肃宗在春宫时呼为二兄，诸王、公主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旧书》一八四）其妻（唐代宦官常有妻，见《潜研堂，吴文碑跋》）吕氏之祖处贞，且烦张说、张九龄为作碑志，势焰熏天，不言而喻，遂开中唐以后宦官干政之先声。

第三节自府兵起源以至于隋

自中唐以后，至最近以前，一般人对于府兵制度，常常发生极大的误会；其一认府兵为“兵农不分”或“兵农合一”。白居易《复府兵置屯田》云：“于是当要冲以开府，因隙地以营田，……俾乎时而讲武，岁以劝农，分上下之番，递劳逸之序，故有虞则起为战卒，无事则散为农夫。”（《白氏集》四七）刘蕡《对策》言：“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居闲岁则弓力穑，将有事则释耒荷戈。”（《旧书》一九○下）杜牧《原十六卫》云：“三时耕稼，……一时治武。”孙樵《复佛寺奏》：“开元之间，率户出兵（率若干户共出若干兵也），籍而为伍，春夏纵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将，以成武事，如此则兵未始废于农，农未尝夺于兵，故开元之民力有余也。”（《可之集》六）以上皆唐人之言，因之，宋张洎奏：“唐承隋制，置十二卫，府兵皆农夫也。”（《宋史》九三）司马光《通鉴》目张说建议召募为“兵农之分从此始”。最近专研者如柳诒徵、谷霁光、陈寅恪诸家亦认唐之府兵为“兵农不分”或“兵农合一”。

其二认为府兵兵力极强，禄山之叛，方镇之祸，皆废府兵制所促成。《玉海》一三八李繁《邺侯（繁之父李泌）家传》云：“隋受周禅，九年而灭陈，天下统一，皆府兵之力也。时晋王与杨素等凡十八人总管，率师五十万伐陈。……后北破突厥，西灭吐谷浑，南取林邑，东灭

流求，皆府兵也。”又云：“自置府兵，未有能以之外叛内侮及杀帅自擅者。自废以来，召募长征健儿而禄山得以为乱，至今不定。”又杜牧《原十六卫》云：“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诏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搏四夷，诏曰可。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宋叶适《习学记育》三九亦将周之灭齐，隋之统一，归功于府兵。

上引多唐人言论，闻见较近，似乎少可致疑，试平心静气察之则不然。《家传》云：“府兵之制，史册不甚详”，与李泌同时之刘秩、杜佑，在《通典》内并未替府兵立专节，可想安史乱前，材料已极端缺乏。且就实际上论，府兵废于开元十一而杜牧以为开元末，孙樵还盛称开元府兵如何如何，可为失笑。且据《家传》自言，唐盛时府兵约六十八万，而彼又谓隋文伐陈之师尽属府兵，则是空室以行，殊难置信。《家传》之“郡守以农隙教试阅”，陈氏已驳其非西魏当日真相，“农隙必不能限于每隔十五日之定期”，可疑者断不止此，抑开元初朝端尚多明识之人，假府兵如此可恃，张说改制，何未闻交章论奏？甚至无一人出而阻止，偏于六七十年后，乃大夸其功烈，可信乎？不可信乎？

为要解决此项疑问，非再度作深入分析不可。惟是事历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其间不无若干变化，每朝史料复多寡弗齐，如概括论述，或无当于实际，故依各朝先后分言之。

（一）北魏兵制

陈氏谓府兵为鲜卑兵制，已无可疑，故北魏兵制，吾人所知虽有限，要不可不先观其究竟。据《魏书》一八淮阳王深（渊）言：“昔皇始（三九六——七）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又《北齐书》二三，正光末（——五二八）魏兰根说李崇曰：“缘遏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又《魏书》五八《杨椿传》称：“自太祖平中山（皇始二），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务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余。”综此数条观之，“镇”是兵队之驻地，“府”是兵队之泉源，故镇之外有府户。所谓“军府”、“府户”，正府兵所自昉。

漠北民族以游牧为生，其制总是兵、牧合一，有事则合而防御，无事则散而归家。又所习者骑，千里非遥，逮乎南迁，渐成土著，情势大异，故“以移防为重”，或则“渐割南戍”。固定于一处者乃末年流弊，谷氏断为“兵士土著”，实非初制。谷氏又将“府户”同于“民”，且云：“镇领民户，田守兼重，在这种情形之下，兵农未尝分离，……军镇为兵民合一”，镇兵是否业农，今姑不论，果府户同于民户，兰根又何须请府户悉免为民？《魏书》八七《刘侯仁传》又何以有“有司奏其操行、请免府籍、叙一小县”之建议？知“军镇为兵民合一”之不确也。唯谷谓府户“世执兵役，非中旨特许，不得请免府籍”，申言之，即府兵为世兵制度，所见最的。

复次，太和十九年（四九五），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魏书》七下）显因迁洛而有此选充，是值得注

意之一点。

（二）西魏府兵（附东魏、北齐）

《周书》一六称，大统十六年（五五○）以前，除宇文泰、元欣外，任柱国大将军者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北史》六○称，“每大将军督二开府，凡为二十四员，分团统领，是（为）二十四军，每一团仪同二人，自相督率，不编户贯。都十二大将军，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弓、弩，并资官给。”同时大统八年（五四二），“仿周典置六军，合为百府。”（《玉海》一三七引《后魏书》）九年，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十六年，籍民之有材力者为府兵。（同上《玉海》引）此即一般史家所谓府兵之始，其制度无疑是自北魏，可从北齐方面比较知之，《魏书》一○六上云：“前自恒州已下十州，永安（五二八——九）已后，禁旅所出，户口之数，并不得知。”所言为东魏及北齐初之情形，惟其归入“府户”，不编户贯，故口数弗详；吴廷燮谓管兵之人，多收户口以为兵，西魏与东魏同，是也。又近世出土墓志，发见北齐许多兵府名号，如非东、西魏同承北魏，无缘两朝制度甚相类。由是知陈氏称宇文泰别采取一系统之汉族文化，以异于高氏之系统，不尽合于事实，两国相争最要莫如兵，然其制皆出自鲜卑，无特殊对立之处，十二将军即永兴五年之十二将，（《魏书》三）犹未脱鲜卑气味也。

《家传》又记府兵缘起云：“初置，府不满百，每府有郎将主之，而分属二十四军。海军以开府一人将焉，每二开府属一大将军，二大将军属一柱国大将军。……等六家主之，是为六柱国，共有众不满五万。……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郡守农隙教试阅，兵仗、衣驮牛驴及糗粮旨蓄，六家共备，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此一段文字首须除去疑障者三处：（1）“六户”，《文献通考》一五一改作“六等之民”，陈氏从之，且据《魏书·食货志》献文帝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谓西魏依此分民为九等，“六户”盖指九等户中自中下至上上凡六等之户而言。余从其文义推之，六户既有“中等以上”，同时自有“中等以下”，换言之，“中等以上家”只“六户”之一部分。假依陈释，直须云“六等户以上”，何必构成“六户中等以上”之艰涩辞句？考《隋书》二四《食货志》：“寻而六镇扰乱，相率内徙，寓食于齐、晋之郊，齐神武因之以成大业；……是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又“及文宣受禅，多所创革，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六坊旧无成说，《通鉴》一五六胡注：“魏盖以宿卫士分为六坊”，犹是拟议之辞。滨口重国称，六镇反后，魏末禁军之组织，统之者为领军将军，下置左右卫将军务二员，每辖武卫将军各三员，共为六员，各掌一坊之羽林虎贲，是为六坊，说见《东洋学报》二四卷一号四九——五一页，亦举不出明确的书据。寻绎隋志文义，六坊之众，显即六镇内徙之鲜卑，其中一部随魏孝武西入关，惟不如留东者多，《家传》之“六户”，同于《隋书》之“六坊”，宇文泰设六柱国，似用以适应六坊之分隶，仿周典云者汉文人为之缘饰而已，简言之，东西魏最初之兵源，均取六镇鲜卑为骨干，必限于中等以上家者犹诸北魏之取强宗子

弟。三等九品乃输赋多寡之分级，与兵制完全无关。（2）“郡守农隙教试阅”之误，陈氏已辨之（见前文），所谓“唐人追述前事亦未可尽信”也。柱国之下，更有大将军、开府、仪同等节级督率，何劳乎郡守？（3）“六家共备”之换言，即许多物资须由府兵本人自备（参下节），其代价为“无他赋役”，即北魏时之“偏得复除”。《通鉴》一六三误改为“六家供之”，须知六柱国皆奔随入关之人，焉能家家都有大宗财产以供如许之府兵设备。

大义既明，则知“门栏陛戟，警昼巡夜”，西魏府兵所任者纯属禁卫军职务，同于蒙古时代之怯薛歹（K　ikt　i，华言禁旅）。然数不满五万，不逮太和三分之一，时方频岁战争，警卫犹虞未足，岂敷疆埸调遣？大统九年之募自关、陇，于势不得不然，北齐处优势，既有百保鲜卑，尚须“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夫，以备边要”，（《隋·食货志》）可以相例。抑入关之六坊，不满万人，而西魏府兵将达五万，其间显曾取汉人为之扩充，非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三六页）所云始自周武。又谷氏认西魏府兵为兵农不分及兵农合一，按十五日上则任警卫，十五日下则习战事，不知从何觅余隙以务农也。

（三）北周府兵

涉北周兵制，得如下之史料数条：

保定四年（五六四）九月，命宇文护伐齐，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及秦陇巴蜀之兵，诸蕃国之众二十万人，（《周书》一一）

建德三年（五七四），十二月丙申，改诸军军士并为侍官，（《周书》五）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隋书》二四）

六年（五七七）十二月，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周书》六）

宣政元年（五七八）十二月，命宇文逌伐陈，免京师见徒，并令从军。（《周书》七）

此项材料，首先表现出府兵数并不多，故保定伐齐，宣政伐陈，都要向各方极力张罗，乃能出发。职是之故，统治者遂悬一免其县籍之优待条件，以广招徕。然赋役凭籍帐，狡黠者乘机钻隙，于是相率挂名兵籍，借以逃避赋税，结果兵源之获益无多，课入之损失反极大。《隋·食货志》所谓“是后夏人半为兵”，实含讥讽语气（据大象中户数与口数之比例，每户平均只得二口半，亦可作尖锐之反映，参前《隋史》十八节72页注），不知者竟谓北周得此大量华人补充，因成其平齐之大业。则由昧于《隋·志》言外之意也。再简括一句，北周府兵除募华人扩充之外，其余制度，相信与西魏无异。

更有与府兵无关而陈氏误会以为改制者。《周书》五，保定元年三月，“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役”，《通鉴》一六八胡注云：“八丁兵者，凡境内民丁分为八番，递上就役，十二丁兵者，分为十二番，月上就役，周而复始。”此是成丁平民每岁应征工作（即力役）之规制，与府兵无关，胡注大致不误，盖依西魏制定，府兵半月上半月下，并非八番、十二番也。陈氏讥胡注以“民丁”释“丁兵”，不知此时为兵民分治，则由于误将“丁兵”一词析为二事；按《周书》七，大象元年二月，“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洛阳宫，常役四万人以

迄于晏驾”，此之“兵”系指应役之平民，盖暂时取消保定元年所减定之三十日役，恢复以前之八丁兵制，故增为四十五日役也（一年三百六十日，以八人轮番，则每人应作工四十五日，以十二人轮番，则每人只作工三十日）。其后开皇三年，“减十二番每岁为二十日役”，（《隋书》二四）又比保定再减少三分之一，然此皆属于庸役之制，于府兵无关，故附正之。

（四）隋府兵

隋制改革之重要者在开皇十年。北周末扩充府兵，致国家财政大受损失，隋文为救其弊，故十年诏曰：“魏末丧乱，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隋书》二）论其作用，正如吴廷燮所云：“隋开皇时尽放军户为民，故户口大增于前。……兵军还民，荫庇自绝。”因之，有应辨正者二事：

1.谷氏认隋“非兵民合一”，而陈氏却以为然；陈据垦田二句，谓“与《北史》所载府兵初起之制兵士绝对无暇业农者，自有不同。此诏所言或是周武帝改革以后之情状，或目府兵役属者所垦，而非府兵自耕之田，或指边地屯垦之军而言，史文简略，不能详也”，既曰史文不明，岂能即据以立兵民合一之断论？抑此二句不过谓每侍官占田若干及其家庭状况，都应依照平民一样，造籍造帐，并未包含侍官业农之意味（“垦”之意义不是“自耕”），安见其与府兵初起时不同？盖授田、还田，皆凭户籍，军无户籍，乃破坏均田制之最大阻力，然此诏所要求者只其籍帐同于民，若夫指挥调度，仍一循北周之制，“军府统领，宜依旧式”，已明白指出，无用犹疑。何况“农”仅“民”之一分子，纵让一步言之，“兵民合一”讵能引申为“兵农合一”之结论耶？开皇三年，“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军人即军民之讳改，陈说同，明明“军”与“民”分举，陈氏竟解为“境内兵民合一”，是陈说已内在矛盾。如果开皇三年军与民已无区别，又何需如陈氏所解释至十年而特令合一。

2.谷氏以为撤罢新置军府系维持重首轻足之形势，是亦不然。果如其说，何不全罢某某边区的军府而所罢者只限于“新置”？军府之设置愈多，斯避赋之途径愈广，旧置者本有若干年历史及曾立功绩，朝廷为维持此项制度，当然予以照顾、保存。新置者则否，彼辈蜂拥而来，目的多为逃避赋役，开皇十年所处置，一则增国课之收入，二则塞逃避之途径。炀帝昧于此旨，征辽之时，增置军府，扫地为兵，自是租税益减，（《元龟》四八四）又大业九年，募民为骁果，置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将官以领之，骁果之家，蠲免赋税。（《隋书》四）前后对照一下，便活现出开皇十年废新府之目标所注矣。

其次，隋以府兵分隶于左、右卫等十二卫及东宫率府，置卫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将军即西魏开府之任（《家传》）。诸府皆领军坊，置坊主，乡团置团主（坊、团之名，均源自西魏），大业三年，改原有之骠骑将军府为鹰扬府，归十二卫统辖。（均《隋书》二八）以上所举，无非名目、阶等，隶属之更改，实质上无大变化，陈氏乃云：“隋代府兵制变革之趋向，在较周武帝更进一步之君主直辖化即禁卫军化”，殊

不知西魏初置，职主禁卫，北周因之（见前文），于唐亦然（见下节），隋处于承上起下之时期，无所容其“化”也。

第四节唐之府兵及骑

唐制之大要如下：贞观十年置折冲府（即隋之鹰扬府），分上、中、下三等，府置折冲都尉，其副曰果毅都尉，管有卫士一千二百人者为上府，一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会要》七二）府皆有名号，（《新书》五○《兵志》）“成丁而入，六十而免”。“总名为卫士，皆取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点充”（《六典》五，易言之，即子孙非白丁而有职役者不点，故用“及”字）。“拣点之法，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唐律疏议》三）番上之法，在五百里内者五番，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外八番，各一月上。二千里外九番，倍其月上。若征行之镇守者，免番而遣之。（《六典》五）凡充府兵者“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毡帽、毡装、行縢皆一，麦饭九斗，米二升，皆自备”。十人为火，“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五十人为队，“仪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新·兵志》）。总数约六十八万人（《家传》）。

武后以后，府兵法寖坏，卫佐以之给姻戚之家，为僮仆执役，京师人相诋訾者即呼曰侍官。（《家传》）其家又不免征徭，番役更代，亦多不时，遂渐逃匿，宿卫不能给。（《会要》七二及《新·兵志》）元深（渊）称北魏镇兵之坏云：“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魏书》一八）“役同厮养”，事虽隔世，覆辙相同。先天二年（七一三），曾令卫士取年二十五已上者充，十五年即放出，频经征镇者十年放出，（同上《会要》）竟不实行。开元十一年（七二三），张说为兵部尚书，因简京兆、蒲、同、岐、华等州府兵及白丁共十二万人，号曰长从宿卫，一岁两番，令州县毋得杂役使。十三年，更名骑，分隶十二卫为六番，皆免征镇赋役。天宝时骑法又稍变废。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此后但存官吏、兵额而已。（《会要》及《新·兵志》）

根据前文来分析，我对唐之府兵，得到如下五点的结论：

（一）府兵不是普遍的征兵普遍征兵说发自何兹全，其不能成立，理甚浅显；果为普遍征兵，关内之府数断不至五六十倍于岭南、江南之府数也（见乙表）。陈氏《略论稿》又引《通典》六龙朔三年七月制：“卫士八等以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军，仍免庸调”（陈引误为“每年放还，令出军”），谓八等指户籍等第，“然则此制与其初期仅籍六等以上豪户者不同，即此制已推广及于设置军府地域内全部人民之确证也”。按“六户”非六等以上户，已辨见前节；府兵之家既不免征徭，自然有户等之别，从何见得府兵制普及于军府地域内之全部人民？且全部人民包含各种阶级，就让一步而言，只能证为“兵民合一”，不能证为“兵农合一”，一言以折之，无论普及全国或军府地域，都不至弄到无兵可交之地步。

（二）府兵之主要任务为宿卫武后时岁旱，兵当番上者不能上，苏瓌奏宿卫不可阙。（《新书》一二五）《家传》言诸卫将军称番上府兵为侍官，言侍卫天子也，又府兵为卫士，神策等为禁军。《新·兵志》

云："其番上者宿卫而已。"谷氏撰文亦称："当日军备中，至少府兵一项，最重宿卫一点。"再从其隶属观之，左右卫领武安等五十府，威卫领宜阳等五十府，骁骑卫领永固等四十九府，武卫领凤亭等四十九府，领军卫领万年、万敌等六十府，金吾卫领同轨、宝图等五十府，太子卫率领广济等五府，司御兵率领郊城等三府，清道率领绛邑等三府，此十二卫之职掌为宫禁宿卫。又从其后身观之，骑初名长从宿卫，分隶十二卫为六番，职务仍是宫禁宿卫。夫府兵原日所隶者及后来代之而起者均以警卫为主要任务，府兵不应独异，于理甚明，《唐律疏议》二八云："卫士于宫城外守卫，或于京城诸司守当，或被配于王府上番"，可为的证。若夫调拨征镇，事属偶然，故《唐律》分为卫士或征人（《疏议》一六："征人谓非卫士，临时募行者"），军名或征名（同上："军名先定，谓卫士之徒"，同上二八："名属军府者总是有军名"，又"征名已定，谓卫士及募人征名已定讫"），科罪有轻重之别，由此，更可见府兵之非普遍征兵制。

（三）府兵不是兵农合一《疏议》一六云："《春秋》之义，春、夏苗、秋弥、冬狩，皆因农隙以讲大事，即今校阅是也"，只是援引古义以缘饰今制。自《家传》呆读旧文，有"郡守农隙教试阅"之言，《新·兵志》更坐实其"居无事时耕于野"，遂造成兵农合一之长期误解。按《疏议》，征人冒名相代者罪在里正、县典、州典等，卫士以上冒名者罪在队正以至折冲，系统厘然，顾陈氏仍信《家传》所言为唐制，则未知折冲上隶诸卫，非郡守权力所及，况（1）侍官同于清之"侍卫"，在乡居缙绅之列，安知其下番之后，全事耕农；唐制明言拣自六品以下子孙，尤见府兵之选，多来自士族，焉得谓之农？（2）农民系于田，离田则无以自活，不易亡匿；即稍有逃避，兵源窘乏，亦断不至达到"宿卫不能给"之地步。（3）府兵制之坏，"番上者贫羸受顾而来"，（《家传》）农民常贫农居多，岂易有力雇人代替？陈氏《略论稿》又引《贞观政要》二，简点使封德彝等欲中男十八已上简点入军，魏徵执不可，且云："若次男以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以为从租赋一语推之，"则当日人民未充卫士时亦须担负租赋杂徭之义务，是一人之身兼充兵务农之二业也，岂非唐代府兵制兵农合一之明证乎"？按唐制贵族及士农工商阶级均可受田，惟自耕或否则非政府所过问，有受田之权利，自然有纳租赋之义务，故点府兵之家不见得定是农家，尤其纳租赋之家更不尽是农家。如谓未充府兵时须纳租赋便是兵农合一，论理上太说不过去。此外有须附带说明者，唐制中丁为户主者可受永业田（见下均田节），杂徭中又或指定以中男充当（见下租庸调节。中丁、中男均即魏徵所谓次男），故魏徵有从何取给之驳诘。总言之，叶适谓府兵为"兵农各籍，不相牵缀"，大体上无可非难。

（四）府兵在原则上为世兵的征兵制唐代最初之府兵，似有一部分接受自隋朝，又一部分是太原元从（据《家传》："太原从义之师，愿留宿卫为心膂不归者六万，于渭北白渠之下，七县绝户膏腴之地，分给义师家为永业"，又"元从军老及缺，必取其家子弟、乡亲代之，谓之父子军"），观于成立骑时加入潞州元从，（《新·兵志》）固可互证。但当扩充过程中，亦似尝于指定区域采取拣选征充方法（如《文苑英华》四六四载天授二年增设郑、汴、许各八府，汝二府，卫五府），但一经拣

定，仍为世户。换言之，州内住有此项世兵者便为军府州，凡军府州地域都可适用乡亲递补的条件，其立法颇与清世八旗兵相类。唯其如此，然后唐代各道军府数目何以互相悬绝，同一道内之军府分布何以疏密迥殊，突厥、吐蕃入寇之冲途何以毫无布置，方可豁然明白；盖（1）开皇十年勒军人属县籍，此辈须供职长安，除关内之外，必多改属较近之河东、河南二道。（2）太原从义之师必多原籍河东，故河东道府数反居河南道之上。后人不明其故，于是陆贽疏以为军府八百而关中占五百，乃太宗居重驭轻之意，《会要》谓“关内置府二百六十一，精兵士二十六万，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玉海》二三八引）《十七史商榷》七九谓“京兆郡多至府百三十一者，以其为京师也，河南郡则三十九稍多，以其为陪京也”，近人谷氏更推波助澜，都不足深辨。至于《会要》称，“河北之地，人多壮勇，故不置府”，（《玉海》引）《家传》又称，“玄宗时奚、契丹两蕃强盛数寇，河北诸州不置府兵番上，以备两蕃”，对河北不置府，解说各异。按兵取强悍，古今通则，前说之妄，不辨而明。河北诸府是否玄宗时全废，现无确证，但改骑前宿卫已不给，各道之府同为若有若无，不独河北然矣。王夫之《读通鉴论》二二云：“唐之府兵，世著于伍，垂及百年而违其材质，强使即戎。”认府兵为世兵，固不自我始。

（五）府兵是游牧社会的落后兵制充兵者要自备许多物资，以现在眼光看之，颇觉可怪，而不知游牧部落皆如是也。俞正燮之《作丘甲义》云：“古足兵皆在民间，《誓》，乃甲胄，乃干，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官不与也。《周礼》，师田军旅，族师简其兵器，县师使皆备旗鼓兵器，是皆在民也。……秦始皇收天下兵器，……亦六国民兵。”盖春秋至战国期间，我族尚未脱离游牧兵制。府兵防自鲜卑，故后来契丹、蒙古，大致与之相同，朱礼云：“当唐盛时，天下户口八百余万，而府兵四十万，皆自食其力，不赋于民。凡民之租调以奉公上者二十分之十九，其一为兵，是以国富、民裕，亦不失其兵强也。田制既坏，府兵亦废，而唐常有养兵之困。”（《事笺》后集七）甚至西域人志费尼（Djouv□ini）对于蒙古战士不特无饷，且每年还有定额献纳，亦极致钦慕。然而环境不同，方法就未必能钞袭，《魏书·燕风传》称，“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之所以疲弊而北方之所以常胜也。”北族战胜后准其军队虏掠，俘虏又得配给，反纳殊不为苛；我国文化前进，以秋毫无犯为口号，岂能适应？若徒因府兵可省度支，不从整个制度作深入之分析，此与保守派之空想唐、虞、三代，曾何以异。其次，漠北人惯于马上生活，倏忽百里，内地则交通匪易，旅费不资，“多惮劬劳，咸欲避匿”，（先天二年诏）朱礼云：“其余隶他道者其隔远又何如？……武后时，兵当番上者以贫不能致，则其远，故败吾法也。”（《事笺》七）又《文献通考》一五一引章氏云：“唐以远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纷扰。……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坏也。”府兵之不适合于住国，番上尤其要因，制度本身确自有内在的矛盾，不复能继续维持下去。或误为吐蕃强盛促使府兵崩溃，则须知府兵之主要任务，在宿卫不在守边，统治者不可一日无宿卫以自固，故府兵去而骑立，骑废而禁军起，改变者只兵源及其组织，初非直接受吐蕃侵略之影响。

经此分析，唐代府兵之渊源，可以下一断论：即西魏、北齐同防自鲜卑（北魏），历周、隋以传于唐，是也。陈氏《略论稿》大致主张隋、唐制度承北齐不承北周，论兵制时亦不能扫除成见，一方面谓“后世史家以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遂不能辨析名实真伪，往往于李唐之法制误认为（西）魏、周之遗物，如府兵制即其一例”，别方面又谓“后期府兵之制全部兵农合一，实于齐制始见诸明文”，按所谓“明文”系指河清三年（五六四）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隋书》二四）宋陈傅良《历代兵制》五据之以为府兵法之始基。按“兵”字可训作“民丁”，说见前节，“力役”与“军人”异，令文绝未提及“出军”，傅良实误将赋役令与军役令混而为一，明乎此，则齐制兵农合一之说完全失其根据；未见有异于西魏之制矣。

由是言之，府兵之属，如仍代列缙绅，自可雇人替上，如其沦为破落，又易逃亡，直至“侍官”恶詈，视若畏途，府兵已达到不能不变之境地，王夫之云：“府兵者犹之乎无兵也”，确一语破的。虽然，隋、唐保留此制，亦自有其用意。文官迁转，出途许多，武员则诸卫军将各有定额，容纳无几，贞观承奠定之余，前在战阵立功者如任其置散投闲，一则无以示奖劝，二又不足备警急。上府折冲都尉正四品上，果毅从五品下，别将正七品下，中下府以次递降，其余校尉、旅帅、队正、队副亦是品官，皆储材之选，升转之阶，府兵废而官吏仍不废，读史者可以悟矣。

随废府兵而连带引起者尚有募兵、边兵两个问题，今请先论募兵，边兵则于下节专言之。

征兵与力役同一性质，同出于原始社会，后世乃有志愿募兵，两者孰利，为争讼未决之问题，或又主寓兵于屯（今军队协助生产，即其遗意之变通）。世无久远不弊之制，是在乎随时刷新。《荀子·议兵》：“人主欲得善射、射选中微者，悬贵爵重赏以招致之。”首见选募之法（即职业兵），汉武帝以后常行之。入唐则贞观十八年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旧·本纪》三）太宗对群臣曰，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通鉴》一九七）龙朔元年，于河南、河北、淮南六十七州，募得四万四千余人，往平壤带方（《通鉴》作镂方）道行营。（《旧·本纪》四）咸亨三年正月，发梁、益等十八州兵募五千三百人往姚州击叛蛮。（《旧·本纪》五）《唐律》亦早有“征人”之规定。据是观察，知封建时代，常不得不兼用募法；盖人口既多，如普遍征兵，国家无需此巨大之军备，抑亦费用太大，官吏又易因缘为奸，不如召募之便利也。谷氏以为府兵之利在众强长久，“募兵的弊病甚多，兵的分子不良，亦其一种。府兵得免此弊。1.简点丁壮，须验才力。2.入籍以后，不得改业。3.农隙工余，须行自习，府有冬试，番上有校阅……4.后备丁壮增多，可养成全国皆兵而无以兵为职业的风气”。其实募兵亦可挑选。1、2两点，并不见得募兵弗如府兵，以言操练，则职业兵更优为之，谷氏所提，未足以判二者之优劣。

邓广铭在其《试谈唐末的农民起义》一文，追论骑之召募，又以为开元时失业农民已非常众多，将要纠合起来，打击李唐统治，“李唐政府

当局在这一可能还只是一种可能而尚未成为事实的时候，先已体察出这危机，便把军事制度作了一番改变，诱使逋逃之人，争来应募。”吾人试回头一看，宿卫不给，除召募外有何救急之法？又再往后一看，安、史之乱，曾引不起农民大起义，是知如此分析之尚难成立也。

第五节边兵

未进入讨论之前，首须明了初唐时期国际间之大势与夫国防情形之急剧转变。自太宗平定突厥，三方大致无虞，而且边境得突厥诸族之拱卫，非徒无需乎边兵，有时藉其协助，还可向外伸展。高宗中叶以后则不然，始而西及西南受吐蕃之严重威胁，继而突厥脱离，北边复树一劲敌，最后则东北两蕃，亦时思蠢动。为布置国防，大增边兵，自是环境所驱使，绝非主在宿卫的府兵可以兼揽此重任。

吕振羽对此一问题的观点是：“为着加强对被统治者的武装镇压，又助长藩镇制度的发展。”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是对立的矛盾，唐代藩镇之祸，完全导源于安史，其原因下文再有论及；现在所欲说者矛盾并非无法统一，如果把藩镇单纯地看成是无可避免之流弊，辩证法的作用岂不是因此而削弱？何况依下文表列，武后、玄宗两朝的增兵，都设在外敌可能入侵之要道，并非设在内地，只说为对人民镇压，也不符合事实。

抑府兵之数，是否足以内巩京畿，外备征御，尤为亟须展开讨论之问题。假依《家传》约六十八万人，只是可能征用之总数，然府兵为番上制，试酌中取八番算之，则同时上直者不过八万人，能否肩负此两项重任，大有疑问。职是之故，不得不取资于别项兵源。朱礼云：“一再传后，府兵内铲，边兵外作，伐叛讨逆，多倚镇兵，此与汉之调发郡国何以异”，（同前引）似憾其不能利用府兵者。但假使不依番例，多发府兵，则必须变制。况一经战阵，逃亡、伤虏复多，禁卫之旅，将益缺额，又何以善其后？而且太宗伐高丽用突厥及兰、河二州降胡，（《元龟》一一七）拒薛延陀用突厥兵马，（同上九九一）是亦镇兵之流，太宗已自开其例，非一再传始破旧制。再从边兵方面观之，天宝初，河西节度领兵七万三千，陇右七万五千，原以备吐蕃，未几，安史难作，兵皆东调，吐蕃由是乘虚内侵，陇右十数州相继陷没。以我国幅员之广大，当日寇敌之环绕，缘边必须置兵，断为不易之论。汉踵秦制，郡国置材官，（《汉书·刑法志》）属于秩比二千石之都尉，（同上《百官表》）本文、武分途，建武以后，乃渐并尉（或都尉）职于太守。（《后汉书》三八《百官志》）唐初，州郡兵马原令刺史掌之，自至德后节度使权重，各置镇将领其事，收刺史之权，遂尔自作威福（见元和十四年乌重胤奏）。其弊不在乎有边兵，而在节度使之权过重。安史弄兵之得以蔓延，不在乎府兵之废，而在乎无良好兵制以善其后。

朱礼云：“人以为府卫之法坏而后有方镇之兵，不知府卫之法成而方镇之形已具，府卫坏于内而方镇遂成乎外，内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于倚镇兵，其来非一日之积矣。盖太宗既分天下为十道，又于军、镇、城、戍之兵，为十二道而置使处之，总之以都督者，此其为方镇之兆，特待时而张尔。”（《汉唐事笺》后集三）推方镇之祸于太宗，对唐制殊未了了。

太宗分十道，只地理上之区划，初与兵制无关，更未尝有十二道之

设置（见下文）。景云二年（《通典》一七二及《旧书》七同，惟《旧书》三八讹三年），拟分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统诸州，时议犹以权重不便而罢，太宗何曾有此倒行逆施？

开元廿一年，分国内为十五道，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西汉之刺史，此为监察上之分区。天宝元年，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备西边。曰朔方，曰河东，曰范阳，以备北边。曰平卢（原治柳城），以备东边。曰陇右，曰剑南，以备西（南）边。曰岭南五府经略，以备南边。（《唐语林》八）次焉者有经略使一，曰长乐，福州刺史领之。守捉使二，曰东莱，莱州刺史领之，曰东牟，登州刺史领之。（《通典》一七二及《旧书》三八）此为兵防上指挥之分划，只施行于沿边地域，腹内如河南、江南、山南等都未设节度使，且与当日地理区划之十道，采访区划之十五道，其用各异，读史者最应分别清楚，无使混淆。至于边州军镇，除设置年份未详者外，如

玉门军属河西，武德中置。（高祖）

合川郡守捉属陇右，贞观中置。

江源郡（即当州）属剑南，贞观廿一年置。（以上太宗）

河源、莫门、积石三军均属陇右，仪凤二年置。

云中郡守捉及大同军均属朔方，调露中置。（以上高宗）

建康军属河西，嗣圣初置。

清夷军属范阳，垂拱中置。

丰安军属朔方，万岁通天初置。

威武军属范阳，万岁通天二年置。

天兵军属河东，圣历二年置。

新泉军属河西，大足初置。

岢岚军属河东，长安中置。（以上武后）

定远城、中城、东城及西城均属朔方，景龙中置。（中宗）

平卢军属平卢，开元初置。

绥和、平夷二守捉均属陇右，开元二年置。

洪源郡（即黎州）属剑南，开元三年置。

白水军属陇右，开元五年置。

安人军属陇右，开元七年置。

瀚海军属北庭，横野军属河东，恒阳、北平二军属范阳，振威军属陇右，宁远军属剑南，均开元中置。

临洮军属陇右，昆明军属剑南，均开元中移置。

威戎、宁塞、镇西三军属陇右，均开元廿六年置。

天宝军及平戎城属剑南，均开元廿八年置。

宁寇军属河西，天宝二年置。

振武军属朔方，天宝中置。（以上玄宗）

知者四十，其置在贞观前者只三处，何因而归咎太宗？再就地域分析之，则西南边十九处（陇有十三，剑南六），北边十五处（朔方八，范阳四，河东三），西边五处（河西四，北庭一），东边一处（平卢），西南边最多，置于开元年间者占十四，以其时吐蕃最可虞也。

朱礼之误，误于《新书·兵志》；《兵志》既将部分设置兵防之十节度使，混同于原日全国地域分划之十道，复大错特错，于十节度之外，

无端创出“江南道”、“河南道”二名，连十节度为“十二道”，于是有“福州经略军一日江南道，平海军一、东牟、东莱守捉二、蓬莱镇一曰南道”之误文。钱大昕《考异》四五曾引《新书》三八，登州“有平海军，亦曰东牟守捉”，以辨《兵志》之误一为二；又引莱州刺史领东莱守捉，登州刺史领东牟守捉，辨天宝以前初无河南节度之名。余按不特河南无节度，江南亦无节度，长乐只福州刺史兼领之使。《新书·地理志》莱州云：“又有蓬莱镇兵，亦曰挽强兵”，蓬莱镇疑亦莱州刺史兼领。《新·兵志》种种错误，朱礼非徒不省，更以归咎太宗，可谓不白之冤。

朱氏一面致慨河北、陇右折冲府之少，一面又痛斥河北（范阳、平卢）陇右（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分镇之大，且申言：“其曰军、曰守捉、曰城、曰镇，隶焉者大者二十余，小者亦不下十余，以天下之极边，为天下之重镇，而抚之以都督，其品秩与十六卫将军同，乃在六尚书之上，而与左右仆射为一流，所为五大不在边者，果若是乎？”按府兵之主要任务为禁卫，道远则难致，朱氏亦既知之（见前廿一节），是不应慨边地置府之少也。都督有大（从二）、中（正三）、下（从三）之异，仆射从二，六尚书及卫大将军皆正三，大都督只有扬、幽、潞、陕、灵（幽州即范阳，灵州即朔方），如就中都督言之，则阶低于仆射，又非在六尚书之上。若高宗以后，吐蕃跳梁于西南，两蕃觊觎于东北，突厥猖獗于朔漠，边置重兵，由大将就近指挥应付，实迫切之图。惟通十节度镇兵凡四十九万，而范阳、平卢约占十三万（加入河东则为十八万余），则分配数目未免太大，玄宗之误，在于不善运用此种制度，而不在于边置重兵，吾人安得因噎而废食也。

或又批评唐代“其先也欲以方镇御四夷，而其后也则以方镇御方镇”，（《唐语林》八）朱礼亦云：“于是外镇盛强，其反者以镇兵，而讨平之者亦以镇兵”，其观念无非深信陆贽“居重驭轻”之原则。然中唐时除去长久分裂之河北及短期割据之数镇外。其余镇兵饷项，依然仰给中央，唐朝仍可以指挥调度，所失只在无久远处置之方；试观裴度平淮蔡，李德裕平泽潞，可作明确之反证。假如认定兵必驻内而后能消弭叛乱，则历史上变生肘腋者例固不少。神策军之地位固同于府兵（见上节），唐代迄未见其如何得力，且成为政治上之蠹虫，是知握指挥之权，尽操练之素，则无论外兵、内兵，同一收效，如其不然，内兵之为害，与外兵等。例如元和七年李绛奏，唐之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镇兵，原以备御吐蕃，使与节度使掎角相应。今则每有寇至，节度使邀与俱进，辄云申取中尉处分，比其得报，虏去已远。纵有果锐之将，闻命奔赴，节度使无刑戮以制之，相视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请据所在之地，士马及衣粮器械，皆割隶当道节度使，俾号令齐一，如臂使指，斯吐蕃不敢入寇云云；府兵纵使保存，未必即能却安、史之凶锋也。

大抵朱礼论兵制诸端，都不切要，唯云：“凡天下之物，极于成者必坏，而萌于始者必极于成而后已，犹言人之生也，稚而壮，壮而衰，衰而老，老而亡，此其常也”；颇与今世发展、矛盾之说合，则其一节之可取者。

第六节农民的反抗斗争

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除瓦岗、河北和江淮三大义

军等仍在继续战斗外，各地还有一些农民反抗斗争。关中地区，隋末以来，战乱不已，又频遭天灾，饥荒严重，农民“往往聚结”起义。“厔、司竹，余氛未殄；蓝田、谷口群盗实多，朝夕伺间，极为国害，虽京城之内，每夜贼发”。土门（今陕西蒲城西）“境多盗贼”，县令李大亮用招抚和捕杀并用手段，将这些迫于饥饿的起义群众镇压下去。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吕宝生率义军七千攻破厔（今陕西周至），骠骑赵钦领兵征讨，义军损兵百余。稽胡义军进攻富平（今陕西富平），被将军王师仁击败；义军五万人又进攻宜君（今陕西宜君），与大丞相谘议参军窦轨战于黄钦山，义军从山上纵火，官军后退，窦轨斩其部将十四名，亲帅数百骑督战，下令“闻鼓声有不进者，自后斩之”，官军被逼前进，义军弓射不能阻敌而失利。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初，张子惠义军打败右骁卫将军王老德。唐王朝复命左屯卫将军何潘仁来攻，义军击杀何潘仁于司竹（今陕西周至一带），又在厔阵斩骁骑将军赵钦、王娑罗。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初，唐高祖命太子李建成将兵征讨稽胡刘成义军。两军遭遇于州（今陕西县），义军失利，损兵数百，千余被俘。李建成设诈释放义军渠帅数十人，并授官爵，令还本部招抚起义群众，刘屳成等首领请降。李建成以起义军尚多，恐夜长梦多，遂扬言增置州县，命起义群众前往筑城，趁机“阴勒兵士皆执之”，加以杀害。刘屳成闻其阴谋逃走。李建成“竟诛降胡六千余人。”为了彻底消灭转移到山林的刘屳成义军，唐高祖复命李建成率军“跨谷弥山，穷其巢穴，元恶大憝，即就诛夷”。十一月，林州总管刘大破义军，“（刘）成仅以身免，部落皆降”。在这一年里，蜀中农民起义军聚结于各地，被益州道行台右仆射窦轨先后镇压。因“南方寇盗尚多”，唐高祖以左武侯将军张镇州为淮南道行军总管，大将军陈智略为岭南道行军总管进行镇抚。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六月，瓜州总管贺若怀广至沙州（今甘肃敦煌西），该州人张护、李通起义，贺若怀广倚子城待援。凉州总管杨恭仁发兵往救，被义军打败，贺若怀广也被杀死。义军立沙州别驾窦伏明为主，进逼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长史赵孝伦击退义军。九月，窦伏明以沙州降唐。渝州（今四川重庆）人张大智起义，刺史薛敬仁弃城逃走。十月，张大智攻打涪州（今四川涪陵），刺史田世康、益州行台尚书郎郭行方和开州刺史冉仁德等联兵围剿，张大智“以众降”。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二月，始州僚起义唐王朝遣行台仆射窦轨率兵进讨。洋、集二州僚起义，攻占隆州（今四川阆中）晋城。四月，通事舍人李凤起打败万州（今四川万县）僚起义军。六月，泷州（今广东阳春西北），扶州（今广东罗定西南）僚起义军，被南尹州都督李光度等镇压。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十一月，眉州（今四川眉山）山僚起义，至翌年三月，被益州道行台尚书郭行方镇压。正因为各地农民起义“尚繁”，所以唐高祖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十月，特别下《阅武诏》，“大集诸军，朕将躬自迅抚，亲临校阅”，“欲畅兵威”，以便镇压农民反抗斗争。

唐太宗执政初期，农民反抗斗争就零星地出现了。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山东大旱，青州（今山东益都）“有谋反者，州县逮捕支党，

收系满狱”。唐太宗命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前往处理。崔仁师用严罚首领、释放其他人的手段，将起义镇压下去。贞观初年（公元627—631年），京师长安有造反者，唐王朝命广德郡公李安远统领逻骑督察。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农民起义军在长江里活动，唐王朝以江州刺史左难当为静江大使进行镇压。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罗、窦二州诸洞僚民起义，众至“数万，屯据险要”。唐王朝派重兵进剿。诸军先锋高罗总管冯盎，率部落兵二万，攻破险要，义军失利。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八月，龚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平东北）东西五洞僚民起义，翌年正月被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击败。

在唐太宗执政中、后期，农民反抗斗争逐渐增多，规模也不断扩大。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二月，巫州（今湖南黔阳西），夜郎（今湖南芷江西南）僚民起义，被夔州都督齐善行打败。八月，霸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僚民起义，“烧杀刺史向邵陵及吏民百余家”。同年底，巴、洋、集、壁四州山僚起义，攻打巴州，唐王朝遣右武侯将军上官怀仁率军征讨，在壁州击破义军。贞观十三年（公元609年）四月，巴、洋、集、壁四州山僚起义被上官怀仁镇压下去。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三月，罗、窦二州僚民再次奋起反抗，唐王朝以广州都督党仁弘为窦州道行军总管，率重兵进剿，义军失败。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正月，唐太宗幸洛阳，行至温汤，卫士崔卿、刁文懿“惮于行役，冀上惊而止，乃夜射行宫，矢及寝庭者五”。这是服役的府兵对唐太宗游幸无节的反抗，崔卿等被处死。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四月，松州（今四川松潘）松外蛮起义，右武侯将军梁建方奉命发益、眉、荣、梓、利、绵、遂、巴、卢、渠、达、集和渝等十三州大军前往围剿，“下其部落七十二所”，杀千余人，松外蛮义军逃至山谷坚持斗争，梁建方用“谕以利害”和“威信”的手腕，将义军瓦解。七月，剑南地区人民反抗斗争又掀起一大波澜。直接导火线是唐太宗为明年大举攻打高丽，命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船，大者长百尺，广五十尺，每艘大船需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州县督迫严急，百姓被逼得倾家荡产，“剑外骚然”。苦于造船之役的眉州（今四川眉山）、邛州（今四川邛崃）和雅州（今四川雅安）僚奋起抗役，声势浩大。唐太宗诏发陇右、峡中兵二万余人，以茂州都督张士贵为雅州道行军总管，与右卫将军梁建方联兵镇压，起义失败。

唐高宗统治时期，人民反抗斗争始终不绝。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十月，爆发了著名的陈硕贞起义。睦州清溪（今浙江淳安）女子陈硕贞，“自言仙去”，后“自天还，化为男子，能役使鬼物，转相荧惑，用是能幻众”。这种讲神仙，有召神劾鬼法术者，是道教符箓派特征。唐婺州司功参军事崔玄籍镇压陈硕贞起义，被封建文人喻为“破张鲁于汉中，殄卢循于海曲”。张鲁是东汉末年以天师道（即五斗米道）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政权三十年的首领。卢循是东晋末年孙恩、徐道覆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起义也是利用天师道组织的。说明在唐人眼中陈硕贞是张鲁、卢循一类人物。睦州又是属于汉魏以来天师道广泛传播的滨海地域，利用早期道教发动的黄巾等起义，都与这一地区有关。就是说，这个地区有利用民间道教进行反抗斗争的历史传统。同时，唐代江浙滨海地区，属于天师道系统的符箓派比较流行。因此陈硕贞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是顺理

成章的。《续高僧传·法融传》关于陈硕贞起义“傍误良善”，使僧徒遭到官府搜查的记载，也反映了它是利用道教，而不是利用佛教的农民起义。

起义发动后，陈硕贞自称文佳皇帝，以妹夫章叔胤为仆射，建立农民政权。同县人蒋宝率众响应。起义军杀死官吏和地主，攻陷睦州属县、桐庐（今浙江桐庐）、于潜（今浙江昌化东南），进攻歙州（今安徽歙县），不克。陈硕贞命童文宝率四千义军掩袭婺州（今浙江金华），“凡在僚属，莫能拒捍”。婺州刺史崔义玄率兵顽抗，义军大败。十一月底，崔义玄与扬州长史房仁裕联兵进攻义军，陈硕贞、章叔胤不幸被俘，英勇牺牲。这次起义，是唐前期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一次农民反抗斗争，给上台不久的唐高宗沉重打击。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起义领袖陈硕贞是一位女子，说明中国古代妇女在反封建斗争中作出了杰出贡献。

姚州（今云南姚安），自龙朔年间（公元661—663年）设置都督府以后，官吏“唯知诡谋狡算，恣情割剥，贪叨劫掠，积以为常”，引起当地蛮民强烈不满，长史李孝让、辛文协被杀。唐王朝遣郎将赵武贵讨击，被蛮民打败。又命将军李义总等征讨。蛮民首领设蒙俭、和舍等凭借山险，连接十部蛮首，徒众五万，攻扰边疆。左三军子总管刘会基率军暗设伏兵，右三军子总管高奴弗率军扼南山南部要害之地，左一军子总管孙仁感率军阻北山北部，切断义军退路，妄图一举消灭义军。义军毫无惧色，英勇抗击官军。翌日，中郎将令狐知通、银州刺史李大志、嶲州都督府长史梁待辟，右成卫龙西府果毅都尉康留买等，又分别领兵增援，战斗十分激烈，“飞尘埃而匝地，白日为之昼昏”，自卯及申，转战三十里，结果义军失利，损兵千余。义军夜间收集余部保守重岩，准备乘机突围。官军诸路齐进，将义军四面围困。次日，义军又与官军激战。义军再次失利，义军首领诺没弄、杨虔柳等壮烈牺牲，首领和舍等降敌，首领蒙俭等突围，继续坚持斗争。

胜州（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西南）州界，长期以来一直有依托山险劫夺富豪财物的义军。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胜州都督田仁会发骑兵将义军镇压。

乾封二年（公元667年），琼州（今广东海南岛安定东北）都督李逸，“控驭失所”，当地洞僚起兵反抗，攻占该州，唐王朝一直无法将其镇压下去。

咸亨初（公元670—672年），关中发生旱灾，饥民遍地，“盗贼公行”。咸亨三年（公元672年）正月，姚州蛮民又奋起反抗，唐王朝发梁、益等十八州兵募五千三百人，以太子右卫副率梁积寿为姚州道行军总管前往镇压。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在缑氏（今河南洛阳东南）景山，为太子弘营筑恭陵，陵将竣工，又嫌其不够壮丽而改筑，“功费钜亿，万姓厌役，呼嗟满道”。留役滑、泽等州丁夫数千人，过期不让回家，丁夫“夜中投砖瓦以击当作官，烧营而逃”。

仪凤中（公元676—679年），形势险要的崖山（今广东新会南）兴起一支起义军，潮州（今广东潮安），泉州（今福建泉州）人群起响应，声势浩大。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关中水、旱、蝗灾相继，瘟疫流行，“死者枕藉于路”，京师长安人相食，“盗贼纵横”。唐高宗被迫就食东都，“虑道路多草窃”，特命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以防农民起义军袭击。攻打潮州的义军被官军击降。

唐高宗在位末年，农民反抗斗争掀起新波澜。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四月，绥州（今陕西绥德）城平县人白铁余，率领部落稽人发动起义。这是一次利用佛教、经过长期准备的反抗斗争。白铁余先埋金铜佛于地，聚乡民发掘，乡民以为神，白铁余乘机说：“见圣佛者，百病即愈”。一、二年后，数百里内，“乡人归伏”。白铁余遂正式发难。起义军占领城平县，进攻绥德、大斌二县，杀官吏、豪富，焚毁其住宅财物。白铁余自称“光明圣皇帝”，置百官，建立政权。所谓光明圣皇帝，大约是比喻唐高宗是黑暗皇帝，白铁余本人是光明皇帝，光明必定战胜黑暗。唐高宗诏右武卫将军程务挺、夏州都督王方翼将兵征讨。官军攻打城平县，火焚义军营栅，义军失利，白铁余被俘牺牲，起义失败。

眉州（今四川眉山）蛮民聚众起义，唐王朝多次讨伐，均以失利告终，遂以名将徐世之孙徐敬业为刺史。义军风闻新刺史至，闭营以待。徐敬业带一、二佐吏前往义军营寨，对义军说：“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可悉归田，后去者为贼”。又召义军首领，杖数十后让其回家，其余人一律不问。起义就这样被瓦解了。

文明元年（公元684年），绥、宋二州，“屡奏乱常之党”，荆（今湖北江陵）、并（今山西太原）两府，“频言构逆之徒”。武则天敕令天下州县长吏提高警觉，防止民众“或妄说妖讹，潜怀聚结”，“或自衒医占，诱惑愚昧”。如果爆发起义而又不能镇压，或本地造反事为外地告发，情节轻者、州县长吏年终考核时贬为下等，情节重者、则随时解除官职。她还派遣御史和台郎至各地访察州县长吏执行情况。

尽管各地官府加强对民众的控制，但是起义仍在不少地方不断爆发。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潮州蛮民又聚集起义，漳州镇将陈元光征讨，被义军杀死。长寿年间（公元692—663年），姚州、嶲州（今四川西昌）蛮民起义，武则天命监察御史裴怀古前往招抚。在他“申明赏罚”的欺骗下，不少起义者归附朝廷，裴怀古遂俘获起义首领。果州（今四川南充）起义军，夺取富豪钱财，官府视其为患，屡次讨伐，也无法消灭义军。唐王朝应果州流溪县丞邢昙之等奏请，将利州刺史于知微调至果州，才把义军镇压下去，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武则天命容州都督张玄遇进讨岭南僚民起义军。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宰相狄仁忧心忡忡地上疏武则天：“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本根一摇，忧患不浅”。圣历年间（公元698—700年），由于契丹和东突厥的残酷杀掠，武则天频征赋役，官吏又从中牟利，致使广大农民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家道皆破，逼得河北地区许多农民“露宿草行，潜窜山泽”，而“山东群盗，缘兹聚结”。在蓬州（今四川仪陇南）、渠州（今四川渠县）、果州、合州（今四川合川）和遂州（今四川遂宁）等地的深山老林里，则有被统治者诬为“光火大贼”的三万余逃走户，他们是“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容，因此侵渔，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而逃亡到这“不属州县”管辖之地的贫苦农民。这支起义军不仅使朝廷失去了三万余户缴纳的巨额赋

税，而且“攻城劫县，徒众日多”，被视为“蜀川大弊”。武则天接到臣下这一报告后，自然不能容许他们存在下去。新任眉州刺史冯元常对起义军“喻以恩信，许其首露，仍切加捕逐”，虽有一些义军将士面缚归降，但无法彻底摧毁这支起义军。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因不满地方官吏“侵逼”，始安（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林）欧阳倩聚众数万举兵自救，“剽陷州县”，夺取财货。武则天以裴怀古为桂州都督充招慰讨击使。裴怀古行至南岭，就“飞书招诱，示以祸福”；及至始安，又亲赴义军营寨“慰谕”，义军溃散。

唐中宗恢复帝位后，不仅没有革除武则天统治时期、特别是晚年的一些弊政，而且朝政更加腐败，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因米价上涨，东都洛阳“盗窃甚众”。唐王朝不开仓赈济饥民，左屯卫大将军兼检校洛州长史张仁愿还“一切皆捕获杖杀之，积尸府门”。翌年六月，姚州蛮民又起兵反抗唐王朝压榨，被姚嶲道讨击使、侍御史唐九徵击败。唐中宗时爆发的宣州（今安徽宣城）钟大眼起义，声震常州（今江苏常州），刺史薛登惧而“严备”，诬之为“狂寇”，足见其威势之大。原汝州武兴县主簿张昭奉命征讨。他用“明之以信，示之以威”策略，使起义农民各归乡党，将起义瓦解。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也有起义军行踪。

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底，监察御史李知古奏请发兵攻打姚州西贰河蛮民，蛮民降附后，他又奏请筑城，征收重税。唐睿宗不顾大臣反对，发剑南兵筑城，置州县。李知古“因是欲诛其豪杰，没子女以为奴婢”。姚州西贰河蛮民愤怒无比，酋长傍名联合吐蕃攻杀李知古，“相率反叛，役徒奔溃，姚、嶲路由是历年不通”。同州河西县（今陕西合阳东）有起义者。太极元年（公元712年）五月，益州（今四川成都）僚民起义。

唐玄宗继位后，立即改革武则天晚年以来弊政，力图振兴李唐王业。由于积弊较深，难以迅速消除，所以农民反抗斗争继续在一些地方出现。

先天年间（公元712—713年），广州都督周利贞，肆无忌惮地压榨岭南夷僚，夷僚忍无可忍，群起反抗。唐玄宗被迫下诏按问，将周利贞贬为涪州刺史。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唐王朝发布《禁断妖讹等敕》称：“比有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或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或辄蓄弟子，号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闾阎”。这是指农民利用弥勒下生发动起义。由于隋末农民大起义时，有些农民和僧人利用弥勒下生发动起义，故初唐统治者曾严禁弥勒净土弘扬，只许弥陀净土传播（其实二者均属净土宗系统信仰，无本质区别）。敕令所说上述活动“触类实繁，蠹政为甚”，并责成地方刺史、县令“严加捉搦，仍令按察使采访，如州县不能觉察，所由长官并量状贬降”，说明弥勒净土仍在民间广泛流传，在开元初年被农民当作组织起义的工具。

开元七年（公元718年），抚州（今江西抚州）刺史卢元敏奏请复置南丰县，以加强对农民反抗的控制，因为这里“川谷重深，时多剽劫”。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四月，六胡州爆发了一次规模相当大的康待宾领导的少数民族起义。“苦于赋役”的兰池州胡，在康待宾领导下，据长泉县发难。他自称叶护。攻占六胡州，有众七万，进逼夏州（今内蒙古自治区白城子）。唐玄宗命常侍赵元通、御史大夫韦抗前往招慰，以防事态扩大。可是，起义群众“俱不禀承”。于是唐玄宗诏朔方大总管王晙、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共同围剿。王晙贪功求赏，上表声称“朔方兵自有余力，请敕（郭）知运还本军”。而郭知运已领兵来会。二人不和。王晙所抚降者，郭知运复纵兵击之，故降者再抗。唐玄宗又以太仆卿王毛仲为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相知镇压康待宾，并于同年五月发布敕令：如能“生擒及斩获康待宾等一人，白身授五品，先是五品以上授三品；如临阵先锋能破北胡部落，所获资财、口马、牛羊，并使入立功人等，一切不须官收，仍别加官赏”，为其将卒打气；同时，又用“叛人内有能自杀获送者，应酬官赏，乱尝（常）之罪，一切并原”作诱饵，分化瓦解义军。为了打破官军的围剿，康待宾联合党项攻打银城（今内蒙古自治区神木南）、连谷（今内蒙古自治区神木北），“以据食粮”。张说将一万步骑出银城东合河关掩击义军，康待宾大败。唐军追至骆驼堰，党项叛变，反戈击康待宾，义军西撤入铁建山。讨击使阿史那献以“党项翻覆，请并诛之”。主张“伐叛柔服”的张说向朝廷奏置麟州，镇抚党项余众，孤立康待宾。七月，王晙击败义军，康待宾不幸被俘，押送京师，唐玄宗召集四夷酋长，将康待宾残酷地杀害，还屠杀义军将士三万五千骑。

康待宾余部退至山谷沙薮间坚持斗争。唐玄宗命夏州都督阳钦明、左监门将军安庆前往招辑，各令复业，并威胁道：若不顺从，犹豫观望，则另加处分。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八月，康愿子在庆州方渠县（今甘肃环县）再次起兵反抗，自称可汗。攻打州县，“谋掠监牧马，西涉河出塞”。唐玄宗命朔方军节度大使张说率兵征讨。九月，官军与义军大战于木盘山，义军失利，三千余人被俘，康愿子及其家属被解往长安杀害。为了防止这里少数民族继续反抗，唐玄宗将河曲卞州残存胡民五万余口，强行迁往许州（今河南许昌）、汝州（今河南临汝）、唐州（今河南泌阳）、邓州（今河南邓县）、仙州、豫州（今河南汝南）等地，空黄河以南朔方千里之地。

康待宾起义是唐前期规模较大的一次少数民族反抗斗争。唐统治者动用了陇右诸军、河东九姓马骑、三城士卒和六郡骁骑的重兵，费了一年半之久，才将起义勉强镇压下去。

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朝廷欲废仙州建制，中书侍郎崔沔极力反对。认为该州历来是逃亡农民聚集之处，“旧多劫盗，兼有宿寇”，故特意“置州镇压”。一朝废弃此州，恐后患无穷。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溪州（今湖南永顺东）蛮覃行璋领导的起义，拥众数万人。从唐玄宗称其“破伤州县，残害吏人”来看，这支义军曾攻占州县，杀死官吏和地主豪绅。唐玄宗以监门卫大将军大宦官杨思为黔中道招讨使，率六万大军征讨。义军战败，覃行璋被俘，杨思残酷杀死三万余义军将士。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正月，邕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南宁）僚梁大海、周光等，据宾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宾阳南）、横州（今广

西僮族自治区横县）等地，反抗唐王朝的统治。二月，唐玄宗又命杨思统兵征讨。年底，梁大海等三千余人被俘，杨思又惨杀义军将士二万余人。然而，岭南各族人民未被吓倒。二年以后，春州（今广东阳春）、泷州（今广东罗定南）等地僚民首领陈行范、广州僚民首领何游鲁和冯璘等发动起义，攻占四十余城，陈行范自称皇帝，何游鲁称定国大将军，冯璘称南越王，“割据岭表”。唐玄宗再次起用杨思，命其统领永州（今湖南零陵）、连州（今湖南连县）、道州（今湖南道县）及淮南弩手十万重兵进讨。十二月，杨思与义军大战于泷州，何游鲁、冯战败牺牲，陈行范撤至深州云际、盘辽诸洞。杨思倾巢追击，陈行范被杀，杨思再次屠杀六万义军将士，抢掠“口马金玉巨万计”，起义失败。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歧州（今陕西凤翔）发生孙象反抗事件。翌年，这里又发生防丁高元逃避徭役，郎光、郎隐聚集朋友“捉里正殴打，转将高元隐藏”反抗事件，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醴泉（今陕西醴泉北）人刘志诚（一说刘志成，一说刘诚）起义，从史称他为“妖人”，“颇解杂占”，进攻咸阳（今陕西咸阳）时，“见昭陵（唐太宗陵墓）山上有黑云忽起，志诚谓其凶徒云：‘此云将有暴风，若冲头立，恐有破败”的记载来看，刘志诚懂阴阳五行和占卜等方术，故有“妖贼”之称。他率义军将进攻长安，咸阳官吏“烧便桥以断其路”，长安为之震动。起义旋被京兆府镇压。歙州休宁县回玉乡人洪贞聚众起义，坚持斗争两年左右。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的农民反抗斗争，还有活跃在豫州郾城（今河南郾城）一带的起义军，在山林坚持斗争多年的蜀中山南起义军等。

唐前期农民反抗斗争，是在唐王朝从建立到不断巩固、发展和兴盛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由于当时阶级矛盾只是在某些时期和地区比较尖锐，所以在一个多世纪里，没有出现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战争。不过，地区性的小规模反抗斗争却一直不断，也有少数声势较大的起义。这个时期农民的反抗斗争，有助于促进当权统治者革除某些弊政，或多或少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贞观末年农民反抗斗争，尤其是雅、邛、眉三州僚民起义，给唐太宗以深刻教训，因此他在去世前的遗诏中，特别提及停止攻打高丽的战争准备，同时罢“诸营作土木之功”，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以缓和当时比较尖锐的阶级矛盾。永徽初年睦州陈硕贞起义，震撼了唐王朝在浙江一带的封建统治。唐高宗执政初期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继续发展，被誉为有“贞观遗风”，与贞观末年至这个时期农民反抗斗争有一定关系。此外，那些由于土地兼并、繁重赋役而破产的大批逃亡农民，在山林川泽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从事垦荒生产，推动了这些穷乡僻壤的经济开发，扩大了全国的耕地面积，是唐前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章 唐中期农民战争

第一节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从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至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是为唐中期。

从开元末年起，唐玄宗自恃承平，以为天下大治无复可忧，遂怠于朝政，深居宫中，沉湎于声色和求长生之中，特别是得到杨贵妃后，更是成天与她一起过着骄奢淫佚的腐朽生活，朝政为“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十九年之久。李林甫贿赂宦官和嫔妃，得知唐玄宗的动向，迎合其意，恣其所好，以博取唐玄宗的宠信。在朝中，他杜绝言路，妒贤嫉能，屡起大狱，诛逐贤良，谄附者虽为小人也予以重用。继其后任宰相的杨国忠，是无赖赌棍，依仗杨贵妃的裙带飞黄腾达后，颐指气使，贿赂公行，穷奢极侈，权势煊赫，朝政更加败坏。

开元、天宝以来，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也为募兵制所取代。加之与吐蕃、契丹和南诏等的战争，不仅耗费了大量资财，增加了人民的赋役负担；而且使地方军阀的势力大大膨胀起来，加深了中央政权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和斗争。

历时近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北部中国社会经济遭到浩劫。战后的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田园荒芜，人口锐减，城邑毁灭，极目所见，到处都是一片凄惨的景象：“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西北一带，在潼关失守、河洛阻兵后，由于唐玄宗急忙将这里防御吐蕃、党项等的朔方、河西和陇右的精兵调往平叛前线，吐蕃遂乘虚而入，数年之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陷，广大人民“或为虏掠杀伤，或转死沟壑”。

南部中国地区，因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灵坚守南阳（今河南南阳），使欲南侵江南一带的安史叛军无法得逞，“南夏得全”。真源令张巡，与睢阳太守许远，率领当地军民在雍丘（今河南杞县）、宁陵（今河南宁陵）和睢阳（今河南商丘），“抗方张不制之虏，鲠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南”，因而南部中国没有遭到安史叛乱的直接祸害。但是，在此期间，这个地区也先后受过一些兵火的袭扰。如唐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十二月，永王璘起兵东南时，唐王朝命高适等将兵征讨。永王璘在吴郡、广陵和当涂等地与官军交战。翌年二月，永王溃败于新丰，被杀。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十一月，淮西节度使王仲升奏请除掉倔强不受命的副使刘展，刘展起兵反抗，相继攻占润、升、宣、湖、濠、楚、舒、和、滁、庐等州，所向披靡，横行江淮间，地方长吏望风溃逃。唐肃宗敕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帅军讨伐。田神功击刘展“及楚州，大掠，杀商胡以千数，城中地穿掘略遍”，以抢劫商人窖藏的钱财。次年正月刘展叛乱被平定时，田神功军又“大掠十余日。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蒙受了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从此，这个封建王朝就由它的兴盛顶峰跌落下来，并一蹶不振。安史叛乱前，全国有户九百六十万余户。由于战祸酷烈，加上农民逃亡、地主隐匿户口，至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叛乱平定时，全国有户仅二百九十余万户，比原有户数减少了三分之二强，交纳赋税的民户也相应地大大减少了。藩镇割据之地的赋税又被截留，朝廷财政十分困窘。

唐王朝为了应付巨大的军费开支、满足统治集团腐朽生活的需要，想方设法地搜括民脂民膏，“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又铸造当十、五十的大钱，强令百姓使用，引起物价飞涨，饿殍遍野。时人指出：“今天下残破，苍生危急，受赋役者多寡弱贫独，流亡死生，悲忧道路，盖亦极矣”。

唐统治者对东南地区的榨取尤为苛酷。还在平叛期间，就以“今方用兵，财赋为急，财赋所产，江淮居多”，加强搜括。叛乱平定后，唐王朝的财政来源主要仰赖江淮一带，因此搜括更加变本加厉。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征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负之有无、赀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谓之‘白著’”。这种追征安史之乱期间八年积欠租调的“白著”，实际上是官府赤裸裸地抢劫民众。时人高云作《白著歌》讽刺曰：“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多白著”。唐王朝对“不服者，严刑以威之”，致使“民有蓄谷十斛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此外，州县官还强迫富人督办漕运江淮钱财于京师，“谓之船头”。又“主邮递，谓之捉驿”。使有些富人的利益也受到损害，这就逼使更多的人“去为盗贼”。

江淮地区广大人民，在蒙受上述诸种人祸残害的同时，又不断遭到水、旱、蝗虫等天灾的袭击，禾稼无收，瘟疫流行，痛苦不堪。如乾元中（公元758—760年），“江淮凶饥”。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三吴饥，人相食”。广德年间（公元763—764年），常州（今江苏常州）“岁仍旱，编人死徙踵路”。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巴南诸州“仍岁水旱，迫于冻馁，或至流寓”。吴楚大旱。

对于广大人民所遭天灾，唐统治者不仅不予赈恤，而且催赋逼税、差科徭役更甚于前。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左拾遗独孤及上疏说：自安史叛乱以来，战争不断，农民无法安心生产，“贫人羸饿就役，剥肤及髓”。唐代宗在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的一份诏书里，也不得不承认巴南诸州近年以来“子弟困于征徭，父兄疲于饷，赋益烦重，人转流亡”。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宦官主持的“宫市”，尤为害民。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京畿官吏不顾旱灾欠收，无情搜括民赋，激起人民的极大义愤，“至有县令为部内百姓殴击者”。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上半年大旱，关中欠收，京兆尹李实“方务聚敛进奉，以固恩顾，百姓所诉，一不介意”，“人穷无告，乃撤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优人成辅端作歌讽刺，李实诬其诽谤国政，德宗杀之。唐中期人民反抗斗争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于全国各地发展起来的。

第二节唐之中衰

全氏书又谓高宗长期幸洛，因而维持国威于不坠，如从整个局势来

观察，其说亦不能成立。

太宗尝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通鉴》一九八）高丽白崖城之役，阿史那思摩中弩，亲为吮血，契何力疮重，自为傅药，（同上一九七——八）太宗一生无狭隘民族之褊见，不徒发诸言论，兼能躬自实践，故征讨四方，常获得异族之效力。继体者，高宗昏庸，武后阴鸷，尤其武后诛锄异己，勇悍之士，栗栗自危（汉人如王方翼之流徙，程务挺之被杀，外族如泉献诚、阿史那元庆，均为来俊臣所构陷），老将凋零，新进又暗于兵事，故在内则有突厥之脱离复立，在外则有吐蕃、契丹之侵略事张。

（1）突厥自贞观初（六三○）降附，垂五十载，至仪凤四年（六七九），阿史那泥熟匐自立为可汗，同时二十四州首领并叛，唐兵往讨者初虽小胜，然旋蹶旋起。永淳元年（六八二），阿史那骨笃（咄）禄收集亡散，势益猖狂，此后（不知确年）遂徙回漠北。武后荒淫，屡用白马寺僧薛怀义统兵以抗突厥，其毫无战绩，不问可知。

骨咄禄卒（天授二——六九一），弟默啜（B　k—cor）继立，对唐益轻视，要索六胡州及单于都护府（即永徽时瀚海都护之后身）之地，则天赐以杂彩五万段，粟数万石，以求息事（圣历初——六九八）。默啜无厌，仍长驱入河北，陷瀛、檀、定、赵、恒、易，掠财帛亿万、男女万余人而去。

（2）吐蕃其语原为何，迄今无定论（大约与古突厥文Tüp□t有关，参《史地译丛续编》六一——三页），西藏人自称其地曰Bod，我曾证其即隋之附国（附之古音为biu），或谓藏语stod—bod即“上国”之意，本属西羌族类，据说始祖名鹘提野（伯希和还原为Ol—de—sbu—rgyal，余据Thomas之拼法，谓应与藏文Ho.lde—spu—rgyal相当），犹言“来自天上君临人类之王”。贞观八年，其赞普弃宗弄赞遣使求尚公主，太宗不许，于是勒兵二十万，入寇松州，声言不得公主且深入。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弄赞亲迎于柏海，羡慕华风，归则筑城郭、宫室以居公主。高宗即位，奏请蚕种、酒人与碾硙等工，皆给之。龙朔三年，侵并吐谷浑。

先是，隋炀平吐谷浑后，留其质子顺不遣，及大业之末，前王伏允悉收故地，复为边患。唐高祖虽遣顺归国，而入寇如故。贞观九年，诏李靖等合突厥、契苾之众，分六道往攻，大破之，顺斩其相，举国来降，伏允自缢死。顺继立，以久质于隋，国人不附，未几被弑。子诺曷钵嗣，太宗封为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十四年，又妻宗女弘化公主。至是，为吐蕃所攻，诺曷钵不能御，携公主走投凉州，高宗诏徙其余众于灵州，置安乐州以处之。

于时，吐蕃方面，禄钦陵（Khrihbrin）兄弟方当国，频岁入边，尽破西羌羁縻诸州，北服于阗（麟德二），取龟兹（咸亨元），安西四镇并废，薛仁贵复丧师于大非川。仪凤三年，特以中书令李敬玄督师，与战青海上，王师大败，敬玄仅得脱，高宗召群臣会议，阖朝无善策。吐蕃屡寇不休，万岁通天二年，始遣使请和，朝令前梓州通泉尉郭元振往。钦陵力言，安西四镇即旧日突厥五俟斤辖境，与吐蕃唯界一碛，汉兵易从此侵入，要求唐朝拔去镇守，使各国离立，作为汉、蕃之中间地带，元振婉辞却之。既而赞普害钦陵专国久，讨之，钦陵兵溃自杀，边

患始稍纾。

（3）契丹始见《魏书·献文帝纪》（五世纪后半）。古突厥文作Kitai。贞观廿二年十一月，契丹帅窟哥、奚帅可度者同内属，以契丹为松漠都督府，奚为饶乐都督府。万岁通天元年（六九六），松漠都督李尽忠因被营州都督赵文翙所侮，杀文翙而据营（《旧书》一九九下讹“荣”）州，后遣兵讨之，死大将数人，契丹攻陷幽、冀诸州。尽忠死，别将孙万荣代领其众，翌年六月，被突厥及奚在后掩击，万荣死于部下之手。

武后之世，得以支持不至于大乱者，厥有两因：（一）继承平之后，民生尚未大困。（二）一般人受佛教之迷醉。

第三节风起云涌的人民反抗斗争

一、唐中期人民反抗斗争的主要特点

唐肃宗时，全国各地就开始出现了人民反抗斗争的大好形势：“今山谷江湖，稍多亡命，今所在盗贼，屡犯州县；今天下百姓，咸转流亡；今临敌将士，多喜奔散”。此后，东起徐、海，西迄陇右，南抵岭表，北至幽燕的广大地区，人民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其主要特点如下：

人民反抗斗争主要集中在江淮以南，北方较少。至德年间，“江淮多盗”。南充郡（今四川南充）民何滔执其太守杨齐曾起义，被剑南节度使卢元裕攻破。乾元中，澧州（今湖南澧县）一支不到百人的起义军，打得“州将失守”。上元、宝应间，“许钦等乱江淮，十余年乃定”。苏（今江苏苏州）、常等州“草贼寇掠郡邑”，唐代宗遣中使马日新与李光弼将兵征讨，一个名叫张建封的人，向马日新表示，愿去“说谕”义军。他“入虎窟、蒸里等贼营，以利害祸福喻之。一夕，贼党数千人并诣日新请降”。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舒州（今安徽潜山）人杨昭，因岁饥无食，聚众杀刺史刘秋子，官军溃败。洪州观察使张镐用偷袭战术击败义军，杨昭牺牲。新安（今安徽休宁）大豪沈千载，趁当地发生天灾，人饥相食，聚众起义，战鼓之声，闻于州郡，当地长吏难以对付，洪州观察使张镐派重兵才将其镇压。广德初，宣州（今安徽宣城）农民起义军“连陷县邑”，地主豪绅“罹难者比肩”。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朱潭义军进攻余杭（今浙江杭州），唐将辛孜筑城于吴撼山，以镇压朱潭和姚廷等义军。大历初，江南东道的潘狞虎义军，以小伤为据点，胡参义军以蒸里为中心，进行反抗斗争，整个江南东道为之震动。左武卫中郎将柏良器率兵征讨潘狞虎、胡参义军，义军失利，牺牲三千人，被俘一千人，起义失败。永泰初年，剑南东川“寇盗充斥”。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桂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万重光，发动临桂等九县起义。

在北方，均州（今湖北均县西）和房州（今湖北房县）的农民起义军十分活跃。梁（今陕西南郑）、宋（今河南商丘）之间二千余人聚集起义，蕲县令李澜到义军中诱降，义军受骗归降。徐州刺史曹升乘机领兵掩袭义军，义军突出重围后，攻入蕲县，杀李澜。大历年间，南阳（今河南南阳）地区农民起义军势力颇大，一些与起义军对抗的僧徒等“尽被诛戮”。莫州（今河北任邱）受灾欠收，“人饥多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泽州沁水县（今山西沁水县）李有经聚众三千余人，进攻翼城县（今山西翼城），绛州刺史李宪率州兵和神策镇军打败

义军，李有经不幸被俘。元和九年，河南府尹、县令和捕贼官等，因镇压当地农民起义军无能，“各罚一月俸料，其捕贼官至较考日，仍书下考，其留守下本巡所繇，宜委权德舆节级科罚”。

不少农民起义军，凭借山岭险要，机动灵活地进行反抗斗争。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汝（今河南临汝）、蔡（今河南汝南）等州，有高晃等领导的五千余人的一支义军，在山区活动，战斗力很强，后被山南西道节度参谋元结招降。乾元中，睦州（今浙江建德）饥民“相扇啸聚，而新安县负山洞之阻，为害特甚”。常州张度利用饥荒聚众起义，以阳羡西山为据点，进行反抗斗争。官军进逼，义军便散于坡谷隐蔽，官军懈怠后，他们就出来攻州打县，“累年吏讨不克”。新任刺史李栖筠，“部设权略”，将起义军根据地捣毁，张度六和七个儿子皆牺牲。颖州（今安徽阜阳）义军夺取经过州界的舒（今安徽潜山）、庐（今安徽合肥）、寿（今安徽寿县）三州送往京师的租赋。三州都团练使张万福领轻兵偷袭义军，义军没有料到他会突然来到，被迫仓促应战而失败。宝应初年，蜀中大乱，“山贼拥绝县道”，甚至引起唐代宗的忧愁，剑南节度使严武推荐利州刺史崔旰将兵征讨，义军溃散。广德初年，余姚（今浙江余姚）龚厉父子趁唐统治者忙于平定安史之乱，依据山岚之险起义，“劫明州之人，掠余姚之地，负阻海口，凭陵江干”，坚持斗争两年多，并不断壮大，斗争也日益深入，“将拟得东瓯故地，窥南越僭迹”，地主豪绅坐卧不宁。江东节度使鉴于义军聚散无常，山潜海匿，难以力制的特点，采用计攻之策。使军将潘景兰领辎驮数十，假扮为商旅，在山谷间来往，作为诱饵；又遣军将吕道光领陌刀手一百名伏于便道，军将左璋率弩手一百五十名为左翼，军将余能变率弩手一百五十名为右翼，军将张思览率陌刀手二百名为中军，攻至青烟洞口，龚厉父子率义军出战，先遇伏兵袭击，继而左璋等军将率领的官军联合夹攻，义军虽处恶境，但毫不畏惧，“转战数十里”，在牺牲三百余名义军将士后，龚厉父子仍收集余部八、九十人“更登高冈，背勇借势”，继续抵抗，直至英勇战死。广德中（公元763—764年），苍山（今山东苍山）李浩起义军五千人，在今山东胶东地区活动，被沂州刺史郑云逵“谕降”。永泰初（公元765年）宣州（今安徽宣城）王万敌（一说王方）义军，是由于官府“征赋，或有不供者，因聚而为盗”。这里山谷深邃，舟车不通，义军据险为根据地。王万敌被镇压后，为防止人民再以此处造反，唐王朝割太平九乡置旌德县镇抚。建中年间（公元780—783年），溪州（今湖南沅陵西北）向子琪义军，“连结夷獠，控据山洞，众号七、八千”，被黔州刺史郗士美“设奇略”镇压下去。东阳（今浙江东阳）县有“山寇”，梁（今陕西南郑）、汉（今四川广汉）之间，自安史之乱以后，直至唐德宗建中、兴元之际（公元764—785年），一直有“山贼剽掠”。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处州（今浙江丽水）山区农民起义，“荡覆城寺”。贞元十四年，栗锽发动山区农民造反，攻“陷浙东郡县”，杀明州刺史卢云，声势颇大。这支义军后在台州（今浙江临海）败于浙东团练观察等使裴肃，栗锽不幸被俘。

依托江河湖海反抗唐王朝的农民起义军也很多。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二月，吴令光聚众于四明（今浙江宁波）之间，以大海为掩护，经常出没于台州、明州和温州等沿海地区，抢夺地主豪绅的财物，

地主豪绅惊恐异常，“海路塞，公私断行”。尽管唐玄宗声称吴令光义军是小小的“草窃，固当自毙，岂足在怀”，但他却为此特别颁布《遣裴敦复往江东招讨海贼敕》，裴敦复会同晋陵郡太守刘同升、南海太守刘巨鳞率军进剿。四月，义军失利，吴令光被俘牺牲。至德年间，江东的海陵一带，有一些起义军屯聚洲岛，没收附近乡村地主的财物。乾元、上元之际（公元759—760年），开州（今四川开县）饥民聚集河湖，杀死当地地主豪绅，烧毁其宅舍等。上元元年，自洛阳至淮水、泗水，缘汴河州县一带，农民起义军到处可见，严重威胁着唐王朝的漕运要道。唐代宗特别指令宰相王缙与沿线有关地方长吏会商，于夹河两岸每两驿置防援兵三百人，并拨给侧近肥田沃土屯种，以保卫这条财政命脉，镇压农民起义军。广德年间，浙西有活动于海上的张三霸起义军，江中有“横江之盗”。浙东有“海盗”。舒州（今安徽潜山）濒江傍山，也有农民起义军出没，足迹及于城市。刺史独孤及用“惠以柔之，武以之”的手腕将其镇压。信州贵溪（今江西贵溪）以西，“山水回合，群盗潜藏，舟行舡，人不自保”。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吴、楚地区大旱，饥民聚于河湖起义者十之七、八。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江贼三千余众入寇”洪州，江南西道节度使曹王皋遣大将伊慎击退起义军。

在唐王朝政治中心的长安城内外，不断爆发人民反抗斗争。唐肃宗时，“京师多盗贼，有通衢杀人置沟中者”，官吏为之丧胆。广德元年冬，吐蕃进攻长安，唐代宗狼狈逃至陕州（今河南陕县），百官藏匿，一些溃卒和长安郊区农民，在高玉领导下，以长安南边的终南山子午等五谷为据点，在东起虢州（今河南灵宝），西迄歧州（今陕西风翔）一带，攻打乡村，剥夺豪富的资财，有产者惶恐不安。唐代宗以太子宾客薛景仙为南山五溪谷防御使将兵围剿。由于起义军凭借山险，又“西与犬戎连接，北与逆竖交通，更唱迭和”。故薛景仙虽素以勇猛知名，但出兵数月，耍尽招抚和追捕伎俩，均不能将起义军消灭。唐代宗又命兵部尚书李抱玉兼风翔节度使，率重兵围剿。李抱玉探得义军将领行止之处后，先分兵屯守终南山诸山谷，再使牙将李崇客将精骑四百，自洋州（今陕西西乡）发动突然袭击。高玉正与诸将在桃虢川聚会，猝不及防，高玉突围至南梁州城固县（今陕西城固），为山南西道观察使张献诚所俘，被杖杀于长安，义军牺牲四千五百人，高玉之妻等被擒，牛马八千头匹被官军掳掠，义军溃散。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长安城里又有“白昼椎剽”而“吏不敢诘”的起义者。永泰中，在奉天（今陕西乾县），邠州（今陕西郴县）一带，有“草贼数千人”。大历末年，长安城里也有“盗贼”踪迹。贞元年间，被宦官抢走驴和柴的农夫，愤“殴宦者”。永贞元年（公元805年）残害百姓的酷吏嗣道王李实被贬通州长史时，恨透了他的长安市民“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吓得他偷偷溜走才免遭惩罚。唐宪宗元和初年（公元806—810年），“京师多盗”。长安郊区起义军的活动更加活跃。唐王朝为了防止义军混入长安，危及其统治，规定京畿内，军镇将卒出入不得持戎具，诸王驸马权豪之家，不得按试鹰犬畋猎之具，诸县镇军放牧牛马也禁带兵器。

在唐中期人民反抗斗争中，少数民族起义占有重要地位。乾元元年，左拾遗李鼎祚奏请割剑南的泸、普、渝、合、资、荣六州界设置昌州，以便更好地控制当地农民和少数民族。翌年，昌州城为张朝等领导

的起义军焚毁。大历十年，西川节度使崔宁又奏请重置昌州，“以镇压夷、僚”，说明这里的少数民族仍在坚持斗争。广德元年，州（今陕西富县）、坊州（今陕西黄陵）稽胡起义。由于吐蕃多年进扰，巴南地区征役繁重，又连年天灾，巴州（今四川巴中）迫于饥寒的夷僚，于大历七年“相聚山泽，围州掠众”，巴州刺史于邵驱州兵拒战十二日后，于邵遣使“说喻”，并亲自出城见义军，义军受骗归降。资州、泸州的夷民起义军，攻打巴川县，受到巴川县令兼南镇军兵马使赵延之的袭击。巴南的蓬、渠、集、璧、充、通和开等州，也有夷僚起义。唐代宗在《大历七年大赦》中，虽然承认巴南诸州起义是“迫于冻馁，或至流寓”，但对起义者仍采取软硬兼施：“如能相率来归，各安生业，并无所问，咸许自新，敢以赦前事相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泽，挟藏军器，百日不首，复罪如初”。由于这次起义声势不小，故唐王朝在起义平息后，特别放免巴南诸州二年租庸及诸色征科，并责成本道观察使和刺史、县令切实加以招抚。元和元年，由于边将贪残刻薄，对党项族百般压榨，“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劳苦既多”，遂引起河西党项族的反抗。黔中观察使窦群为政烦苛，元和六年（公元811年），黔中大水坏城郭，窦群征发谿洞少数民族修城，“督役太急”，辰州（今湖南沅陵）、锦州（今湖南铜仁东）生蛮十分愤怒，溆州（今四川宜宾）蛮首领张伯靖乘机聚众起义，“杀长吏，据辰、锦诸州，连九洞以自固”，窦群镇压不了被贬官。朝廷又命黔中经略使崔能、荆南节度使严绶、湖南观察使柳公绰联兵围剿，仍“三岁不能（平）定”。这次起义后被宰相李吉甫的“压以大兵而招之，可不战自定”的阴谋瓦解。

下层军官和士卒的起义，也是唐中期人民反抗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以兵变形式出现的起义，是由上层军将和唐王朝的压榨造成的，唐王朝也不得不承认“战士暴露，颇闻阙乏，或有结聚，及有违军令”。有的这类起义并有不少贫苦农民参加。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唐王朝流亡政府所在地的蜀郡（今四川成都）连续发生剑南健儿贾秀等五千人、行营健儿李秀，以及蜀郡军人郭千仞等发动的兵变，唐玄宗甚至亲自“招谕”，也无济于事。这些兵变最后都被唐统治者武力镇压。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绛州（今山西新绛）将士因“粮赐多阙（缺）”，突将王振利用他们的怨怒鼓动闹事，夜烧牙门，劫杀朔方等诸道行营都统李国贞父子及三员大将。广德年间，江左兵荒，领汴滑军的宦官马日新贪婪暴虐，萧廷兰“乘人怨诉，逐之而劫其众”，发动兵变，大历初年，番禺（今广东广州）冯崇道、桂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林）叛将朱济时等“阻洞为乱，前后累岁，陷没十余州”。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泾原兵五千，在奉命征讨卢龙朱滔等藩镇叛乱时，因不满朝廷的菲薄待遇，在长安哗变，推举原幽州节度使朱泚为主，国号秦，改元应天，德宗狼狈逃至奉天（今陕西乾县），后天逃至梁州（今陕西汉中），唐王朝调集重兵，经过八个月的苦战，才将泾原兵镇压下去。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沧州刺史李固烈离任时，准备拿走军府绫、缣和珍宝数十车，士兵们愤怒地说：“马瘠、士饥死，刺史不弃毫发吾急，今刮地以去，吾等何望”，遂共杀李固烈，举行兵变。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振武节度使李进贤不恤士卒，判官严澈“以刻剥为能，边军苦之”，出兵备回鹘时，所给资装多虚估，将官杨遵宪住在屋里，而

士卒露宿屋外，怨气满腹的士卒们，在苏国珍倡议下，夜间焚杀杨遵宪，回军驱逐李进贤，不久这次兵变被朝廷血腥镇压。

此外，还有手工业者的反抗斗争。如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七月，商州（今陕西商县）红崖冶铜丁匠李藏芬等三十一人，杀死长吏，他们后被官府杖死。下层僧徒发动的起义，如大历末年，东阳捍狼山僧惟晓等，联合数郡的造反。

二、三大起义

在唐中期人民反抗斗争中，规模最大的重要起义有以下三次：

1.浙东袁晁起义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八月，台州（今浙江临海）人袁晁据翁山县（今浙江舟山岛）起义。他原是一名县衙小吏，因同情起义农民受到鞭背而造反。起义军攻占台州，刺史史叙狼狈逃走。九月，攻占信州（今江西上饶）。十月，攻占温州（今浙江温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尽有浙江之地”。袁晁改元宝胜，以建丑月为正月，建立农民政权，数十名公卿，均由百姓担任。起义军攻城陷州，烧毁和没收官府、地主豪绅及寺院的厅、钱财，有些地方长吏被杀死，不少有钱人纷纷逃亡，“江介大恐，民斯绎骚”。而广大“疲于赋敛者多归之”。德清县（今浙江临溪南）人朱、沈皓等聚众响应袁晁，分守两洞，攻占城垒。“宜春盗帅，家兵遍山，吏不敢问”。袁晁起义军迅速扩大为二十万人，声势浩大。

东南地区燃起的这一团巨大烈火，使唐统治者极为惊恐和仇视。因为自从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兵燹连年，州县为墟，社会经济残破。朝廷的兵食所资在东南，而东南地区的军事力量一直比较薄弱。“江淮三十余郡，仅征兵二万，已谓之劳人。将卒不相统摄，兵士未尝训练”。地方长吏也不大称职，“淮左江东三十余郡，无一良二千石，岂唯不才，乃皆中人以下之不逮，其间败衄，略难胜述”。如果东南半壁为农民起义军所据，朝廷财政主要来源被切断，不仅即将平定的安史之乱有卷土重来之患，而且唐王朝的统治也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尽管当时唐统治者内忧外患不迭，但刚即位的唐代宗，还是急忙从平叛前线抽调李光弼的军队渡江镇压袁晁起义。李光弼遣其部将张伯仪将兵，与袁、王栖曜、李长荣、柏良器等诸军从衢州（今浙江衢县）和婺州（今浙江金华）两个方面向起义车发起攻势。

李光弼是与郭子仪齐名的所谓“中兴”名将。所部兵将是平定安史叛乱主力之一，战斗力较强。浙西和其他一些州的地方长吏整军配合作战，有的地主豪绅也据险自保，对抗农民起义军。袁晁起义军人数不少，却是一哄而起，缺乏必要训练和作战经验。袁晁又没有及时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宝应元年十二月，唐军与起义军大战于衢州（今浙江衢县），起义军失利。翌年四月，起义军与唐军再次会战，经过“联日十余战”的殊死搏斗，起义军战败，袁晁不幸被俘，后在长安就义。其弟袁瑛率领五百骑兵，突围至宁海县（今浙江宁海），占据县西北四十里的险要紫溪洞。唐军驻兵洞口，封锁粮道。袁瑛和义军将士在外无援兵，内尽粮草的情况下，英勇奋战，不肯屈膝，最后全部饿死洞中，表现了农民英雄的高尚气节。

这次起义对唐统治者的打击十分沉重。因此袁晁被镇压后，唐王朝

将其首义之地——明州翁山县废除，并留下一些镇压袁晁起义的将领兼任当地州县长吏，以继续镇压人民反抗斗争，如张伯仪任睦州、杭州刺史，王栖曜任常州别驾、浙西都知兵马使。此后，来浙江供职的官员，也往往以袁晁起义为戒。如唐德宗时，出任浙江东西观察使的韩，“时里胥有罪，辄杀无贷，人怪之。曰：‘袁晁本一鞭背史，禽贼有负，聚其类以反。此辈皆乡县豪黠，不如杀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为恶。’又以贼非牛酒不啸结，乃禁屠牛，以绝其谋。婺州属县有犯令者，诛及邻伍，坐死数十百人。又遣官分察境内，罪涉疑似必诛，一判辄数十人”。贞元年间任台州刺史的陈皆，“以台州有连山负海之固，尝为袁晁、龚厉所据，不有备预将虞后艰”，出钱募兵，以加强武备。

2.宣歙方清、陈庄起义

唐代宗广德初，苏州（今江苏苏州）人方清“因岁凶诱流殍为盗”，义军依黟（今安徽黟县）、歙（今安徽歙县）间，“据山守险，州郡不能制”，发展到数万人。与占据广德县（今安徽广德）山洞的陈庄和陈五奢领导的义军联合，以宣州秋浦县（今安徽贵池）西一百四十里的乌石山，并太平等古城为据点，“遂绝江路，劫掠行旅日久”，严重威胁长江航道。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方清义军攻占歙州，歙州人杀其刺史庞濬以应义军。吴仁欢组织地主武装，据八乡之地，倚休宁山险对抗起义军。方清屯兵祁门县，并于此“置昌门县，以为守备”。陈庄连陷江西州县，及长江以北的舒州（今安徽潜山）。淮南节度使崔园以张万福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盗贼，连破其党”。官军偏将吕太一、武日升相继倒戈，归附义军，义军声威达于今江苏、安徽和江西的七州之地，并有“跨据大江，吞噬东土之计”，所谓“残害生人”，“东南厌苦”，说明义军对地主豪商等的打击十分严厉。唐代宗采用江西观察使判官李芃提出的“以秋浦置州，扼衿要，使不得合从（纵）”，亦即用置州防守要地，将方清与陈庄两支义军分割开来，以便各个击破的谋略，将宣州的秋浦、青阳、饶州的至德合置池州，命李芃摄行州事。并命正在江南镇压人民反抗斗争的李光弼分兵围剿方清、陈庄起义军。李光弼在镇压袁晁起义后，立即遣其行军司马袁傪将兵前往宣、饶，同时征调诸道兵协同作战。左武卫中郎将柏良器、江西观察使李勉、歙州刺史长孙全绪等相继出兵。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官军攻破起义军据守的石埭城，方清牺牲，陈庄在乌石山降敌，起义失败。

3.西原人民起义

唐代西原，在“广、容之南，邕、桂之西”，即今广西僮族自治区西部左、右江流域一带，是我国古代僮族聚居的主要地区之一。

唐初，唐王朝在此设置羁縻性的西原州，领罗和、古林、罗淡三县。州县长吏均由原溪洞首领充任，推行“以夷制夷”的政策。西原人民不仅遭受本族首领压榨，而且要向唐统治者“纳质供赋”。

安史之乱后，由于财政困难与日俱增，唐统治者对西原人民的搜括也显著加紧。有的地方官不按“夷獠之户，皆从半输”的规定征收税米，私自“遂勒全输”。一些贪官污吏还“别竖名色，妄配乱征”，邕管经略使“多不得人”，这些封疆大吏的“侵欺虏缚”，在西原人民中积下了深重的“怨恨”。特别是其中某些将官为了“邀功求赏”，向朝廷“争献谋计，惟恐后时”。因此镇压西原人民的战争连绵不绝，弄得州县残破，田畴多

荒，抛妻弃子，“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此外，邕、容、桂、广等道“观察使所奏监州官，多是本土富豪百姓兼杂色人……既不谙熟文法，又皆纵恣侵欺，多取良家以为奴婢，遂使豪酋搆怨，溪洞不安……，生人转困”。据史籍记载，这种“虏劫溪洞或典买平民”为奴婢供官吏家内使唤，和转卖给长安等地贵族官僚和富豪之家充当奴婢的现象十分盛行。正是这种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和剥削，逼使西原人民不断掀起大规模反抗斗争。

安史之乱爆发后，尽管岭南一带远离叛乱前方，但唐统治者仍多次下达诏令，强行征发丁壮，命其自备资粮奔赴北方参与平叛。唐玄宗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由岭南、黔中丁壮组成的五万唐军，在河南叶县（今河南叶县南）地区，被安禄山的叛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军资器械，弃如丘山。败讯传至岭南，引起西原人民极大愤怒，他们立即拿起刀枪，“相挺为乱”，掀起了反抗唐王朝的英勇斗争。

唐肃宗至德初（公元756年），西原人民在黄乾曜、真宗郁领导下，与陆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合浦西）、武阳（今广西僮族自治区罗城北）、珠兰（今广西僮族自治区珠兰）、金溪和黄澄（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扶绥）等一百余洞共同起义，推举武承斐、韦敬简为帅，号中越王。其他领导者也多称王侯：廖殿为桂南王，莫淳为拓南王，相支为南越王，梁奉为镇南王，罗诚为戎成王，莫浔为南海王。署置官吏，建立政权。义军旌旗蔽野，鼓角沸天，攻州陷县，焚烧地主和官家宅舍，诛杀地主官吏，并将他们掠夺来的财帛分给穷人。“方圆数千里，控带十八州”，义军迅速壮大为二十万人，并打算“先破岭南，后图岭北”，声势十分浩大，地主豪绅之家坐卧不安。

由于西原义军凭借山险与官军周旋，使官军往往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历时四年，也未将义军镇压下去。唐统治者遂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加强政治欺骗。乾元初，先后派遣中使魏朝璨等，对起义军领袖“慰晓”，饵以官爵，“赦其罪，约降”。义军领袖不予理会，率领起义军进攻连州（今湖南连县）。唐统治者恼羞成怒，增调广（今广东广州）、柳（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柳州）、梧（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梧州）等州兵，以及西原、环（今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古等州首领的部众共二十万人，向西原起义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在强敌面前，西原起义军毫不畏惧，英勇抗敌。“自春徂冬，凡经二百余日，前后苦战，各三十余阵”。在敌人以昼继夜，或围或攻的打击下，起义军终于战败，黄乾曜、真郁崇、廖殿、莫淳、梁奉、罗诚和莫浔等不幸牺牲，五千余名将士惨遭杀害。尽管武承斐、裴敬简面缚降敌，但是广大起义军将士誓死不屈，“或连袂坠谷，自成积观之尸；或带刀投江，有同漂杵之血”，显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

“农民被打败了，但是他们还要不断地起义，他们决不会因为第一次的失败而灰心丧气”。张侯、夏永、梁崇牵、覃问和吴功曹等，将被打散的义军重新集结起来，并联兵向官军发起新的攻势。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十二月，西原义军一举攻占了道州（今湖南道县西）“据城五十余日”。桂管经略使刑济击败西原义军，执吴功曹等。翌年，西原义军复围道州，刺史元结坚守一百余日。遂转攻永州（今湖南零陵），打下邵州（今湖南邵阳市），留数日而去。

唐代宗大历初年，唐代人民反抗斗争的浪潮在全国、尤其是江淮一带更加汹涌澎湃。在此大好形势鼓舞下，西原人民的斗争也逐渐与当地汉族等民族的斗争相结合，彼此呼应，共同杀敌，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战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湖南观察使辛京杲命其牙将王国良戍守邵州武岗（今湖南武冈西南），阻遏西原义军北上，因辛京杲染指王国良家财，遂加以死罪，并“虐其士卒”。王国良“因人所苦，遂散财聚众，据县以叛”。他与西原义军联合，保守山险，攻州打县，声势所及，“濒湖千里”。唐王朝命荆南、江西、黔桂出兵共同镇压，却“连年不能克”。

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岭南蛮酋梁崇牵自称平南十道大都统，占据容州，与西原义军张候，夏永等连兵攻城陷邑，前容管经略使陈仁、李抗、侯令仪、耿慎惑、元结和长孙全绪等，虽任容州刺史，都不能至容州，而寄任于藤州或梧州。新任容州刺史、容管经略使王，至藤州后，对其僚佐等说：“吾为容州刺史，安得寄理他邑”。于是出私财招募将官，并以请好爵激励士气。不到数月，杀义军将领欧阳。王又亲至广州，向刺史兼岭南节度使李勉请求援兵，收复容州。李勉畏惧西原义军，不愿出兵，但答应移牒诸州，并扬言出兵驰援，以壮王之势。接着，王翃与义州刺史陈仁璀、藤州刺史李晓庭等，缔结军事同盟，复募兵三千余人。经过这番紧张准备后，王翃藏起节度使“止用兵”之牒，向西原义军大举进攻，经过“大小百余战”，破义军数万人，梁崇牵等七十余名将领被俘，容州失守。王复驱军分别袭击西原义军，占领郁林（今广西僮族自治区贵县东南）等州。

大历八年（公元773年）九月，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吕崇贲，为其部将哥舒晃所杀，“五岭骚扰”。唐王朝命江西观察使路嗣恭为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自江西统兵征讨。王遣其将李实率部参与围剿，西原义军领袖覃问，乘王兵力薄弱之机，全军偷袭容州，为狡猾的王的伏兵所败，覃问被擒，义军大败。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潘长安领导西原人民继续斗争。他自称安南王，联合夷蛮，昼伏夜聚，打击地主豪绅，拥兵二十余万，声威所被，“南距雕题、交趾，西控昆明、夜郎，北泊黔巫、衡湘，弥亘万里”。唐王朝命领桂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李昌夔，持节招讨，潘长安被俘，其他人均被强令还旧居。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以嗣曹王李为潭州刺史、湖南都团练使，率军征讨王国良。李一方面“城叙州以断西原”，即切断西原义军和王国良的联系，对王国良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三次遗书软硬兼施，然后趁王国良犹豫之机，亲自假称使者，混入其营，进行策反。王国良在“错愕迎拜”中降唐。

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七月，西原黄洞人民在黄少卿领导下，奋起斗争，不断攻打邕管，围经略使孙公器，攻占钦（今广西僮族自治区钦州北）、横（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横县南）、浔（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平）、贵（今广西僮族自治区贵县）等州。黄少卿子猛将黄昌沔，先后击破十三州，大大动摇了唐王朝在岭南地区的统治。唐王朝诏令桂州观察使杜式方围剿，接着又命郎中裴某前往招抚。黄少卿厚待传达“招令归复”诏书的说客，并以小婢二人换取说客的佩刀。元和三年

（公元808年），黄少卿投降朝廷，被封为归顺州刺史，其弟少高，做了有州刺史，唐统治者长期无法镇压下去的这支英雄义军，被招降了。可是不久，黄少卿等“复叛”。

出于镇压西原义军的需要，唐王朝“合邕、容为一道”经略使治所设在容州。有些朝臣认为这一措施不当。邕州刺史李元宗，也对途经该州的监察御史杜周士说，从他本人在岭南五管为官三十载之经验来看，这种处置不宜。而一心贪功求赏的容管经略使留后严公素，遣人“盗其槁（稿）”，杜周士忧愤而死。严公素还弹劾李元宗曾擅自将罗阳县归还西原义军将领黄少度。李元宗无奈，“引兵一百持印章依（黄）少度”。

元和中（公元810—815年），黄少度、黄昌率西原义军攻占宾（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宾阳南）、峦（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横县西）二州。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又攻打钦、横二州。邕管经略使韦悦击退义军，夺走宾、峦二州。这年，义军复攻岩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来宾东南）。“利虏掠，幸有功”的桂管观察使裴行立、容管经略使阳，向朝廷上奏进一步围剿西原义军的建议。而企望“中兴”唐王朝的唐宪宗，也想凭借当时平定淮西等藩镇之势，一举消灭长期坚持斗争的西原义军。于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迫不及待地大发江、湖兵马，会同容、桂两管进讨。西原义军奋勇反击两年多。官军既遭义军顽强阻击，又“被雾露毒，相枕藉死，百无一还”，大量军费的消耗，更加深了朝廷财政的困窘，朝野莫不归咎于裴行立和杨，这两个刽子手“皆无功忧死”，“岭南嚣然”。

唐中期，唐王朝一再调兵遣将，反复围剿西原义军，有时也取得某些胜利，但始终无法将他们彻底镇压下去，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唐王朝方面来讲，其本身存在以下主要弱点：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如在如何对付西原义军问题上，有“尽诛叛者”和侧重慰抚、羁縻的不同主张。有些刺史为自己打算，不能协同作战。有的地方长吏则乘镇压西原义军之机陷害别人，加深了隔阂。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从敌人营垒中分化出来，有利义军。此外，岭南地区官军兵力单弱，而远从中原等处征调而来的官军，又往往不谙山川，不服水土，战斗力较差。

唐中期西原人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唐统治者始终无法将其镇压下去的根本原因。而西原人民反抗斗争之所以走着曲折的道路，有时遭到失败，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义军领袖对唐王朝剿抚兼施的手腕缺乏深刻认识，有时为其招抚所惑，上当受骗。

唐中期各族人民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进行的连绵不绝的反抗斗争，尤其是唐代宗大历年间风起云涌于江南一带的农民起义军，攻城陷邑，打得官军损兵折将，“邕容兵连败，缩首不出，犹鼎鳖耳”。义军还广泛地焚毁官府和僧俗地主的宅舍，地主豪绅“罹难者比肩”。不少义军还多次截断漕运，严重威胁了唐王朝的财政命脉。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江南义军杀死了不少残酷掠夺人民财产的“豪吏”，迫使唐统治者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赋税征收的混乱状态，采取一些减轻赋役的措施，直接推动了唐王朝以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租庸调法的破坏，是由均田制瓦解引起的。而农民的逃亡斗争，又是导致均田制瓦解的重要因素。两税法的实施，在法律上承认客户的合法性，田产少或无者少纳或不纳两税的规定，也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唐中期农民逃亡斗争规模比唐

前期更大，聚集在山林川泽中的这些逃亡者，垦辟了大量荒地，开发了当地经济，安史之乱以后江南一带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并日益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与此密切相连。

第四节四镇始末及其南方屏障

龙朔设府后（见前七节）不久，吐蕃即觊觎四镇，弥射于龙朔末被杀，（《元龟》四四九）步真亦以乾封二年（六六七）死，其余众遂附于吐蕃。（同上九六七）咸亨元年（六七○），四镇并废（见前十二节）。西藏文字母相传系七世纪中叶弃宗弄赞普时代自东印度摩揭陀国所输入，近年经佛兰克（Francke）之探究，乃知彼时吐蕃方陷于阗，藏文字母实由于阗婆罗门传授。（Hoernle著《佛学艺文遗卷·序言》一七——八页）四年（六七三），弓月、疏勒二国王入朝请降。（《旧书》五）上元二年（六七五），于疏勒置疏勒都督府，焉耆置焉耆都督府，于阗置毗沙都督府。（同上四○）仪凤二年（六七七），西突厥复连吐蕃寇安西。（《新书》三）裴行俭乘送波斯侍子之便，执其可汗，立碑碎叶。（《张说之集》一四。碎叶即Su-ab，今之Tokmak，属吉尔吉斯共和国。据《新书》三，事在调露元即六七九年）其副王方翼随筑碎叶镇城，（《旧书》一八五上）乃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元龟》九六七）此为四镇再置之颠末，与前异者用碎叶代焉耆。

永淳元年（六八二），十姓复反，方翼破之于热海（Issik-kul，今属吉尔吉斯共和国），屡次奏捷。（《说之集》一六）会东突厥离唐独立，北方多难，无暇西顾，武后垂拱二年（六八六），又弃安西。（《全唐文》一六五员半千文）长寿元年（六九二），王孝杰大破吐蕃，克四镇，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遣汉兵三万镇之，（《旧书》一九八）是为四镇之第三次设立。

小勃律（今Gilgit）国东南三百里为大勃律（今Baltistan），南五百里失密（Ka　mir），北五百里当护密（Waxan）之娑勒（Sarhad）城，东少南三千里距吐蕃都城。（《新书》二二一下）吐蕃每假其道以攻四镇，开元十年（七二二），又夺其九城，国王使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曰："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因遣疏勒副使张思礼将蕃、汉步骑四千，昼夜倍道往，与国王合击吐蕃，大破之。（同上及《通鉴》二一二）天宝初，吐蕃卒诱使附己，都护田仁、盖嘉运、夫蒙灵三次往讨，均无功。六载（七四七），又诏安西都护高丽人高仙芝领马步万人征之。仙芝自龟兹出发，行十五日至拨换城（大食文Barxuan，今温宿县），廿余日至疏勒，又廿余日至葱岭守捉（Sarikul），又廿余日至播密（Pamir）川，又廿余日至五识匿国（Sighnan）。乃分为三军：一军统三千骑趣吐蕃连云堡，自北谷入。一军自赤佛堂（未详）路入。仙芝自护密国入，约于连云堡相会；堡城下有婆勒川，仙芝率军径济，破之。三日，追至坦驹岭（DarkotP.海拔四、五七六公尺），恐兵士不肯下，使人假装胡服来迎，且言娑夷河（张以为GilshitR.）藤桥已斫讫，仙芝遂传令下岭。下岭后四日至阿努越城（Arniah），遂破小勃律，虏其王，沿婆勒川、连云堡路而归。诏改其国曰归仁，置归仁军，募千人镇之。（《旧书》一○四及《新书》一三五）沙畹尝言，万人之高原行军，即今世计划最精之参谋部，亦难

为力，其艰巨可想。

别有羯师国（Ka　kar或Xasa，又称杰师，今之Mastuj），天宝八载（七四九），吐火罗叶护称：邻境有师国，居在深山，恃其险阻，亲附吐蕃，知勃律地狭人稠，无多田种，镇军在彼，粮食不充，于失密市易盐、米，然得支济，商旅来往，皆著师国过。其王遂受吐蕃货求，于国内置吐蕃城堡，捉勃律要路，自高仙芝开勃律后，更益兵三千人，勃律困乏，师与吐蕃拟乘危而入，请饬安西兵马进攻，玄宗许之。（《元龟》九九九）翌年二月，仙芝破朅师，虏其王归。

第五节突骑施兴废及大食东侵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六八五——八）以来，为东突厥所侵略，散亡略尽，天授元年（六九○），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入居内地。留彼方者突骑施（见前十九节）首领乌质勒于圣历中（六九九）移衙碎叶，（《元龟》九六七）神龙中（七○六）死，子娑葛立。（同上）景龙二年（七○八），自立为可汗，（《旧书》七）与他部阙啜阿史那忠节不和，请徙之内地，时宗楚客等用事，取忠节赂，不纳其奏，乃陷安西，四镇路绝。（同上九七及《元龟》三三八）唐随赦之，册为十姓可汗，赐名守忠。（同前《旧书》及《元龟》三六六）后为默啜所败而被杀，开元二年（七一四），十姓来降者前后数万帐，（《玄宗实录》）内乱故也。

苏禄者突骑施部人，颇善绥抚，十姓渐附之，众二十万，遂雄西域。七年（七一九）十月，唐册为忠顺可汗（《元龟》九六四），请居碎叶，因改以焉耆备四镇，（《新书》二二一上）此为四镇最末次之改制。十年（七二二），封阿史那怀道女为金河公主以妻之。后与安西都护杜暹不和，十五年（七二七），引兵寇四镇。（《旧书》八）晚年，国用不足，部下渐携贰，百姓又分为黄姓（娑葛部）、黑姓（苏禄部）两种，互相猜阻。廿六年（七三八），大首领莫贺达干攻苏禄，杀之。别一首领都摩度立苏禄子吐火仙为可汗，与莫贺互相攻。翌年，北庭都护盖嘉运与莫贺率石、史两国王破吐火仙于碎叶，擒之。嘉运又遣夫蒙灵率拔汗那王攻入怛逻斯（Talas今属吉尔吉斯共和国）城，收得散落数万人，悉付拔汗那王。唐于是册拔汗那王为奉化王，石王为顺义王。廿八年（七四○），吐火仙俘至京，乃立怀道子昕为十姓可汗，明年，遣兵护送赴任，至俱兰城，为莫贺所杀，天宝三年（七四四），灵讨之，斩莫贺，更立黑姓人为可汗。余按喀拉喀尔巴克自治共和国（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北部，里海稍东）之原语Kara—kalpak，义犹“黑帽”（参《隋史》一四节（己）项3.九离伏条），十七世纪末其人尚住吹河流域，与《新书》二一五下所云黑姓至“大历后，葛罗禄盛，徙居碎叶川（即今吹河）”恰相当，应即黑姓突骑施之裔，华人不达其全义，故称曰“黑姓”也。自此之后，国内纷扰，中国遂与东侵之大食相接触。

阿剌伯人（Arabs）为闪族（Semitic）三大支之一，外人对之有种种异称（亚美尼亚文Tacik，叙利亚文Tayi，中波斯文Tk，新波斯文Tājīk，Tāzī，于阗文Ttasīki，西藏文Stag-gzig），犹云“耕种者”，唐人呼曰多食（见前十四节）或大食、大实、大石，盖通过于阗或西藏文之音译，犹诸清初通过蒙古语而有“俄罗斯”之音译也。林斡云，“这里所谓大食国，就是指今日之波斯、阿剌伯及中央亚细亚一带而言，唐宋时，

对这一带地方都称作大食”；按中唐以前所记大食，率不包举中亚，林氏之言，近于淆混。

摩诃末（谟罕默德，Mohammed）生于陈太建二或三年（五七○——一），首创天方教，其经曰《可兰》（Koran或Al-Koran），历法以六二二即武德五年为元年。总教务者称哈里法（Caliph），义为“代天行事”，类于天主教之教皇。摩诃末卒后（贞观六——六三二），总教一席，屡生争执，其徒分为两派。一为其婿阿里（Ali），流行东方者皆此派，号称“十叶”（Siyi）教。一为其从昆之裔阿拔斯（Abbas），衣尚黑，唐人称曰黑衣大食（Abbassides）。至龙朔元年（六六一），哈里法位又旁落于倭马亚（Ommia）族之人，衣尚白，曰白衣大食（Ommiades）。天宝八年（七四九），阿蒲罗拔（AbulAbbas）大杀倭马亚族，自立为哈里法，是名阿拔斯朝。此天方教创立及内哄之经过。

在政治方面，则波斯、东罗马同疲于多年战争，大食得以新兴力量，四向扩展，贞观十年（六三六），取东罗马之叙利亚（Syria），未几，又击走波斯王伊嗣俟（YezdegeriIII），萨山（Sāsān）王朝遂亡。其子卑路斯（Piruz）奔吐火罗，遣使来唐告难，高宗以道远难出师谢之，会大食内乱，侵掠稍阻。卑路斯后入居长安（在咸亨四即六七三年，见《元龟》九九九），死于中国，调露元年（六七九），裴行俭谋讨西突厥，携其子泥涅师师（Narses）以行（见前廿五节），因客吐火罗廿余年，景龙初（七○七）复回长安。

同时，武后初叶，唐弃安西（见前节），与大食最前线接触者乃为西突厥。自神龙元年（七○五）起凡十年，是为大食名将异密屈底波（EmirQutaiba）东侵时期，景龙元年（七○七）破安国，先天元年（七一二）降康国，皆尝击败突厥军队，开元三四年间（七一五——六），东、西安厥皆内乱（参前十九节及前文），又会屈底波叛其哈里法苏利漫（Suleyman），故三年安西都护张孝嵩偶有击走大食、吐蕃所立拔汗那王之捷。

七年（七一九）二月，安国王上表言，年来被大食侵扰，请敕突骑施救护。俱密国王表言，吐火罗、安、石、拔汗那等国并属大食，臣国内库藏珍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征税将去，望免臣国征税。康国王表言，三十五年来每共大食斗战，不蒙救助，去今六年，被屈底波部侵入，臣部兵士大损，为寡不敌众，入城自固，请派兵救助。又十五年（七二七）吐火罗叶护表言，父被大食统押，身被大食重税，请敕突骑施可汗发兵除却大食。（均《元龟》九九九）凡此呼吁，都无非苦大食之苛征，回想到唐对属国之不事搜索，故切望援助，俾解倒悬。然其时苏禄方强，唐岂能越疆而理；抑大食东侵，西突厥固感切肤之痛，亦非坐视不顾也。巴尔托勒（V.Barthold）云：“苏禄既奄有中亚西部，自不能以缚刍河外（Transoxania）地方，拱手让于大食。盖如大食人既视粟特为‘天授首领之乐土’，则此富盛省份，在突厥自亦相当重要，故苏禄一朝，均协助酋豪以抗大食。大食深为所苦，因而称苏禄曰AbūMuzāhim，犹云挑战者或头触者，以象或牛喻之也。”

明乎此之关系，则知保护中亚，抵抗侵略，自吐火仙之灭，其责任乃由突骑施而移转于唐。由是，唐除册封拔汗那及石王外（见前），天

宝元年，（七四二），封西曹（I　　tixan）王为怀德王，三年（七四四），以宗室女和义公主妻拔汗那王，都多少示安怀之意。日人佐野猥说商业资本发达为唐代外侵一个动机，显未尝作过全面的观察。最误事者仙芝屡胜而傲，贪得无厌，玄宗复老耄昏愦，弗知应付中亚的危局，九载（七五○），仙芝绐石国王为好，随引兵袭破之，杀其老弱，虏其丁壮，掠其金宝，取石国王以献，斩于阙下。一时群胡忿激，王子乞援大食，大食遣Ziyadibncalih来援。仙芝将蕃汉兵二万深入至怛罗斯城，葛逻禄（Qarluq）部叛，与大食夹攻唐军，十载（七五一）七月，大败于怛逻斯河附近之Athlac城。唐代百年来在极西所树立之基础，遂因昧于国际情势而面临崩溃，不数年，唐亦有安、史之乱。

是役也，中国俘虏将造纸术输入康国，成为彼国之重要出产，往日西方所用“皮纸”及埃及草纸，以缺乏美观及便利，遂渐被淘汰。又有杜环者亦被虏西行，宝应元年（七六二）循海道还至广州，著《经行记》，其书早佚，惟《通典》曾采入数条。

有不可不顺带提示者，今塔吉克共和国之原语亦作Tajik，《元史译文证补》二六上曾因其音读相同，将塔吉克与阿刺伯混而为一。考塔吉克族最初见于国史者为《后汉书》之德若国。又别出噶勒察（Galca）一支，（名见《西域水道记》一）即《汉书》之依耐，《佛游天竺记》之竭叉。塔吉克与噶勒察为对举之辞，后者指山民，色白而发黄，前者犹云耕种之民或农民，皮肤及发均黑。

第六节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近年史学界有种种看法，或以为对国内部落和种族实施军事镇压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所酿成，或以为唐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或认为无数农民参加了那个造反，其中亦已有人提出异议。余尝细思之，此一动乱实深关乎中外之大防，应先分清敌我，勿庸轻易作公式的断论也。

要抉出禄山谋叛的动因，先须明了东北发展及其住民之历史。周代燕国领地达于朝鲜，汉元帝以后乃渐收缩（见前《隋史》十七节），然辽水以西营、平、燕诸州，自汉至隋，皆吾有也。

隋文时，粟末有厥稽（突地稽）部渠长率数千人内附，处之柳城郡（营州）北，炀帝为置辽西郡，（《通典》一七八）后改燕州。开皇初又置玄州，处契丹李去闾部落。（《旧书》三九）入唐以后，增设尤多。

东北在百余年间，已招致许多外族（契丹、奚、、室韦、新罗、突厥、胡人等）入居，大有喧宾夺主之势，此等人原为照顾其有家可归，特辟地安顿，与开皇末之突厥情形相同，但与久处边疆非新近迁入之弱小民族有异；既属托庇，自应服从主人，若其诡谋弄兵，阴期夺国，直是侵略举动，岂能视为敌对斗争？如果把安史之乱如此处理，则武德、贞观间突厥之对我侵略，亦得以振振有辞矣，乌乎可。

以如是复杂之边区，分应慎选忠诚爱国之干才，为之监护，玄宗老年昏愦，溺宠艳妻，信任黠胡，遂启狄人之贪，累民生之涂炭。《旧唐书》三九云：“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蕃诸降胡散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参《寰宇记》七一）其为胁从作乱而非农民起义，事迹甚明。正

如桑原藏所指出，从禄山者孙孝哲、李怀仙等为契丹人，阿史那承庆、阿史那从礼为突厥人，安忠志、张孝忠为奚人，达奚为鲜卑人，苟读李泌“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通鉴》二一九）之语，则知贼军之中坚，大半为外来异族。再从官军干部检之，高仙芝、王思礼均高丽人，哥舒翰，突骑施人，与郭子仪齐名之李光弼，契丹人，浑惟明、浑释之、仆固怀恩均铁勒人，荔非元礼，西羌人，论惟明，吐蕃人，白孝德，龟兹人，对安史之乱，均曾在官军下建立相当功绩。由此观之，其能简单地公式地承认为民族压迫之后果耶？必持此论，则是溃中外之防篱而为敌作伥也。陈珏人曾大致说，农民决不能是这回主要参加造反的人，禄山所凭藉的兵马，依《新书》本传，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是最基本的队伍，后来又并吞了阿布思的部落，故兵雄天下，主要是以畜牧为生的，不会都是汉人。吾人试再看颜真卿辈振臂一呼，河北响应者十五郡，求诸公私史乘，并未见农民乐意参加禄山行列之痕迹，主张农民起义说者亦可以休矣。

说至此，吾人可进行审查禄山之履历。九姓胡于后汉为粟弋，北魏为粟特（Sogd），言语属吐火罗语系，与月氏无关，惟五胡之羯，从其以石为姓及多须两点观之，可能属于此一种，羯（古读ki　　t）之语原则未详。俗呼其战士曰柘羯或赭羯，但非必善战之军队，吾人研究安史之乱，首须要廓除此类误会及成见。

禄山胡父而突厥母，生于突厥，开元初逃来，为互市牙郎（即今之经纪），给事幽州。廿四年失律，幽州节度张守请诛之，大约武惠妃、高力士受其贿，为之缓颊（详说见拙著《通鉴唐纪比事质疑》），幸免于戮。性狡黠，常厚赂往来，为之延誉，天宝元年，遂擢为平卢节度，初无赫赫之边功也。越二年，递升范阳节度，交结内宠，请为杨贵妃养儿。七载赐以铁券，进封东平郡王。九载兼河北采访，听于上谷铸钱五垆，十载入朝，求为河东节度，又许之，权兼三道，阴作反计。国忠及太子屡奏禄山必反，玄宗不听，反授以陇右群牧等都使，十年不调。十四载（七五五）十一月，反于范阳，以讨国忠为名。先三日，集大将观绘图，起燕至洛，山川险易攻守悉具；又下令，有沮军者夷三族，可见其蓄反谋非一日。陈寅恪谓：“安史叛乱之关键，实在将领之种族”，未尝无片面之理由；然封建时代将领称兵以反抗其统治阶级者，常多为同族之人，而当时异族派兵援唐者数却不少（见下文），则亦未可一概论也。窃谓中亚胡族自古习于贩贸，东来者多唯利是图（可参看下卅二节九姓胡之屡屡生事），禄山本出身市侩，复加以玄宗不次超擢，宠任无间，遂欲效法王世充而作统治汉土之计。突厥可汗之击波斯（见前《隋史》五节），成吉思汗之西征，均以中亚胡商为发动原因之一；更观禄山事起，阿史那从礼说诱六胡州诸胡数万，拟寇朔方，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合河西兵马使共杀节度使周泌，武威大城中七小城，胡据其五，（《通鉴》二一八——九）事前则“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百万数”，（《禄山事迹》上）又肃、代间曾官安南都护之商胡康谦被告谋叛，（《新书》二二五上）此种潜势力，吾人不应忽视。禄山既抱野心，其亲信部属热中利禄，当然乐听驱策，但以异族之故，汉将随附者无多，（《新》一三九《李泌传》）且承开元之盛，农民经济，尚属优裕，非群众所归，所以亡不旋踵而唐祚得延也。简言之，国内阶级矛

盾，未算尖锐，故引不起农民起义，从另一面看，经济尚属繁荣，故惹起禄山之野心，其情况恰可互相说明。

用兵最要有统一之指挥，如各自为政，则军队愈多，溃败愈易。九节度之师（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因郭、李皆元勋，难相统属，不置元帅，已现必败之征；又复使昧于军旅、毫无功绩之阉人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牵率之，更非败不可。且当日九节度之师，号称六十万，转饷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势以速战为利，光弼主张分军逼魏州，阻思明南下，期早日拔邺，本是上策；奈被妄人朝恩所阻，使思明得觊官军之弱点，以少破众，此二失也。

思明入邺，杀庆绪而夺其位，贼军根本未固，（见《通鉴》二二一）使唐朝当日能收拾残旅，专任大将，乘其未定，再行急击（据《通鉴》，光弼、思礼全军以归），未始不可雪丧师之耻。而乃任其从容整军，致洛阳再陷，此三失也。

安史虽乱，唐代过去之声威，犹未尽落，外方入援者除回纥外，尚有于阗（至德元）、安西、北庭、拔汗那、南蛮、大食（至德二）、吐火罗及西域九国（乾元初）。回纥之对唐，与突厥无异，止贪财货而非贪土地，诚能利用回纥兵力，对幽州策乱地，扫穴犁庭，忍一朝之痛，仍可易百年之安，乃见不及此，此四失也。

讨叛须拣忠诚之将，代宗竟毫无抉择，入宦官程元振、鱼朝恩之言而任仆固怀恩，发端已错。及朝义授首，所余李怀仙、田承嗣、薛嵩、张忠志辈，乘战胜之威，本可更易，即曰赏功，予以一州足矣；更不然则废去节度名称。而乃一误再误，听怀恩言（李抱玉、辛云京已上言怀恩有贰心），各授大节（如怀仙授幽州节度使，承嗣擢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承嗣辈俱图自固，修缮兵甲，署置官吏，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庭，河北三镇非复唐有，此五失也。

总言之，肃、代昏暗，辅弼无谋，安、史虽死，而安、史之乱却未定，于是形成晚唐藩镇之祸。

第七节藩镇之祸

投降之将而升授节钺，固益启割据之野心，杀其主将而即予留后，更昭示威信之扫地（乾元元年，平卢节度王玄志卒，裨将李怀玉杀其子而推立侯希逸，唐因以希逸为节度。军士废立节度由此始）。顾唐廷外治方镇，一若舍此而外，别无良法者，故其祸愈演而愈烈。兹略表其割据经过如左（名外有□者，是唐朝自动除授）：

已上谓之河朔三镇（又有所谓四王，即朱滔、王武俊、田悦及彰义之李希烈）。其中如李怀仙、王武俊为契丹人，李宝臣、史宪诚为奚人，李茂勋、王廷凑为回纥人，皆东北之归化人也。又如幽州之朱泚、刘怦、张仲武、张允伸，皆幽州人，魏博之韩允忠、乐彦祯、罗弘信皆魏州人，田承嗣平州人，余或无可考见，亦必多久寄其地。计五十七人中，由唐所任者只四人，又五十四人中（除去最末三人已入五代），被其部下逐杀者乃廿二人，李泌尝论士兵之善，以为顾恋田园，恐累宗族，不敢生乱，又云："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亡身徇利，祸乱遂生。"（《通鉴》二三二）由前观之，殆不其然。三镇之祸，非师不

士著之患，正师率士著之为患也。（并参下引《旧书》）
各镇领州之数，时有增减，上文第记其大概，可参《新书·方镇表》及《唐方镇年表》。
河朔三镇及淄青之割据，始自代宗，除淄青外，三镇虽均中间一度曾由朝廷选任，然不旋踵而复失，成德之王氏，继世至八十余年，魏博田氏五十余年，是其最久者。此外横海、宣武、彰义，均启自德宗，宣武为时最暂，余两镇皆宪宗所收复。若泽潞则中唐割据之最后者。
若夫镇使跋扈，初无非挟军士以自重，久之军士得势，镇使反为其所左右，稍失控制，危亡立至。《旧书》一八一《罗弘信传》云："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寖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事同儿戏，如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有类于春秋时代国君之政，下移大夫，大夫之政，又下移家臣，后浪推前浪，孕生自己崩溃之矛盾。《廿二史记》二二云："藩帅既不守臣节，毋怪乎其下从而效之，逐帅、杀帅，视为常事"，下至五代诸帝，亦多由军士拥立，直至陈桥兵变（九六○），风始衰歇，计传习至二百年之久。由此而观，知参加方镇运动者无非骄兵蹇将，全为自己打算；希图夺取富贵，并不代表一定阶层；同时国计民生却大受损害，驯至国力疲弊，燕云十六州奉献于外人，辽、金、元、清之入侵，胥于是基始。或者批评，"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则由过于短视，未深察乎当日东北住民组织复杂所由造成之原因；盖幽、营一带在天宝以前内附之部族，为时不过三数世，各成聚落，只知有当地之节帅，与中央联系极弱，逮燕、云割地，陷溺愈深，反观西北，陷吐蕃虽及百年，唯其陇右人民，念念不忘祖国，故张义潮攘臂起义，不崇朝而十一州归朝，诚能比较其异同，自会豁然而领悟。陈氏《述论稿》云："安史之霸业虽俱失败，而其部将及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与中央政府相抗，以迄于唐室之灭亡"，（一九页）按对抗唐室者只方镇及其部将之首领，唐室固剥削，然有时地方之剥削，或比中央更甚，在广大群众视之，同是一丘之貉，初非予以支持，故部将旋起而旋蹶也。
抑藩镇之祸，多以为不可救药，观察亦误。始终怙恶者惟河北三镇，综观经过，非无转机，惜人事不臧，如下文所举耳。
1.宰相无谋幽州为始乱之区，去京亦最远。刘氏居燕三世，穆宗时，刘总归朝，群龙无主，既籍军中素有异志者朱克融等，遣至阙下，（《旧》一八○《克融传》）则宜宠以虚位，移于他方，或更正其罪名，使留者知警。乃宰相崔植、杜元颖等毫无谋略，既不能餍其欲望，反而勒令归镇，（同上及一五四《刘总传》）有同于纵虎还山，幽州再失之咎，崔、杜实尸之。
继而幽、镇两藩之乱，王涯献议先讨镇冀而后及幽蓟，策本可行，然朱克融、王廷凑竟能以万余之众，抗官军十五万余，则统制不一，玩寇邀利，宰相昧机，胶柱鼓瑟，亦崔植等之过也。（《旧书》一四二）
文宗时，杨志诚之乱，非谋定后动者，牛僧孺乃言，"安、史之后，范阳非国家所有，前时刘总向化，朝廷约用钱八十万贯，而未尝得范阳尺布、斗粟，……且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

……则爪牙之用，固不计于逆顺”，以见解如此幼稚之人任宰相，国事安得不坏？理全国事，应见其大，岂能效市井商人锱铢之计？抑以八十万易八州归朝，价并不贵，如长为唐有，每岁八州所赋，何止此数？来得尺布、斗粟者，崔、杜之无能耳（说见前）。欲养叛藩以御外寇，懦弱无能，何一至于此！回纥自肃、代以后，绝少入寇，彼似了无闻知者，故曰幽州之三失，实牛僧孺之罪，后世犹多助牛以排李（德裕），世论之失其平者久矣！（僧孺毫无远见，可参拙著《会昌伐叛集编证》）

2.将帅失策德宗建中三年，田悦之役，马燧、李抱真、李三师破之于洹水，悦归至魏州，初为部下所拒，假使官军长驱直进，魏州指顾可复，奈燧与抱真不协，（《通鉴》二二七）顿兵弗前，坐失良机，宜乎识者所痛。（《旧》一四一《悦传》）

3.计臣短视穆宗时，田弘正由魏博移师成德，请留魏兵驻成德，其粮给出于有司，度支使崔固阻其请，魏兵甫归，王廷凑即叛。倓不知大体，成德遂非唐有矣。（《旧》一四一《倓传》）

4.宦官误事李宝臣遗中使马承倩百缣，承倩诟詈，掷之道中（大历十）。李纳遣二弟入质，中使宋凤朝欲邀功，说德宗拒其请（建中三）。穆、敬两朝则有如讨廷凑之役，每军遣内官一人监军，内官悉选骁健者自卫，以羸懦应战，因而兵多奔北；刘悟节度泽潞，监军刘承偕常对众辱悟，及悟卒，中尉王守澄及宰相李逢吉又受其子从谏之赂，为奏请留后，皆贻误大计之彰彰者。

总言之，代、德两朝京畿之内，累遭创夷，无所振作，犹有其困难之因。元和藉廿年安定之基，财赋稍充，复得毅决如宪宗，佐以杜黄裳、李吉甫、裴垍、李绛、裴度诸谋臣，中央威权，于是一振。凡阻挠淮西军事，如韦贯之、钱徽、萧俛、独孤朗辈，皆行罢黜，故能勒夏绥韩全义致仕，讨其留后杨惠，专任高崇文讨西川刘辟（皆元和元），斩镇海（浙西）李（二年），逮昭义卢从史（五年），发夏州兵诛振武乱军（八年），用裴度、李擒吴元济（十二年），杀沧州刺史李宗，平李师道，复淄青十二州（十四年），在藩镇方面，则有易定张茂昭（元年及五年）、山南东于（二年）、魏博田弘正，宣武韩弘（十四年）之入朝，与夫田弘正之申领籍，请官吏（七年），程权之奉还沧、景，王承宗之愿献德、棣（十四年）。故元和之治，为中唐冠。

王夫之《读通鉴论》以为安史之后，各镇相继为乱，“而唐终不倾者，东南为之根本也”；余则谓开元之世，米斗不过十许钱，谷贱固可伤农，同时亦易免于饥饿。安史及各镇之乱，结果所至，适以破坏百姓之长年生息，群众不获其利而先获其害，比诸晚唐时代，农民久居水深火热之中渴望苏息者，情况显有不同。换言之，东南财赋之供给唐室，犹是次要，中唐得以不倾者，其主因实在大多数农民对唐作消极之支持，另一方面对野心军将不作积极之支持，故乱事无法扩大。

第八节安史乱中之回纥——不与吐蕃合作

我国古代往往受北方强邻之侵略，当危急之际，不受侵略而反得其援助者史册上确是罕见（可与吐蕃之侵夺河、陇比观）。

回纥（Uighur，景教徒作Ighur，Iaghur，《海屯纪行》作Ioghus）隋时称韦纥，《隋书》列作铁勒之一种，德宗时改译回鹘，或谓即汉之乌揭。其开化似比突厥较早。唐初居独洛（Tohgula）河北之娑陵水

上，部内分为十姓；属部中别有九姓乌护（ToguzOghuz见《回鹘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后世又分为黄头回纥（SalikUigur）等支派。拉施特谓“回纥”之义为“联合帮助”。

回纥，于阗文或拼作Hve：hvu：ra，其前两音相当于“回回”（见拙著《回回一词之语原》，《史语所集刊》十二本），彼族徙居天山后多信奉天方教，明、清人遂呼天方教为回回（或回）教，更进一步混称天山各种部族为“回人”，至今犹称奉天方教者为“回族”。羽田亨云：“回教”系因回纥人最先信奉而得名，立说最为得当。林幹以为“当时所谓回回，系指大食国，即现今的波斯及阿拉伯而言”，又引《正字通》云：“回回是大食种”。实未能追溯其原义。

回纥与突厥世仇，可从古突厥文碑见之。突厥内部历次乱事，回纥几无不为积极分子。但两族之语言，差异极少（据伯希和说）。当武后初，突厥徙回漠北，回纥又尝拔刀助唐，合谋突厥（参拙著《突厥集史》八）。后来回纥破败，一部来投，居甘、凉间，一部仍为突厥所役属，此点最宜分辨清楚。

天宝初，其酋骨力裴罗可汗，兼并漠北，唐封为怀仁可汗（《旧书》误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为阙毗伽可汗），其全衔应为登里啰没蜜施、颉翳德蜜施、毗伽可汗，天宝六年卒。

子磨延啜立，击破西北边之拔悉密（Basmil）及三葛逻禄（□cQarluq）。会禄山叛，请助讨，自率兵与郭子仪合击同罗突厥（即禄山部下自长安逃赴朔方者），破之榆林河上（至德元）。遣太子叶护将四千骑至凤翔，肃宗命广平王俶与约为兄弟，率朔方、回纥、大食等军收复长安（至德二）。回纥继随子仪追贼，破于陕州之新店，庆绪大惧，弃洛阳走河北。回纥大掠东都三日，意犹未厌，耆老复以缯锦万匹赂之，乃止。既而叶护还长安，请自归取马扫范阳余孽，帝令岁遗回纥绢二万以报之（均至德二）。明年（乾元元），磨延啜请昏，帝妻以幼女宁国公主，是为破格之例（唐代前所外降者皆宗室或外戚子），并册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其本国全衔曰“×登里啰汨没蜜施、颉咄登密施、合俱录×”，寻卒。国人欲以宁国殉，公主拒之，后以无子得还。

继位者少子牟羽（Bügü）可汗。宝应元年秋，受史朝义所诱，方率兵向阙，遇唐使告知代宗即位，时兵已过三城（即三受降城），见州县丘圩，有轻唐之意。上亟遣药子昂往迎劳，遇于忻州南，又令仆固怀恩（九姓铁勒人，其女为可汗之可敦“qatun”）往见之，乃允助讨朝义。回纥欲入自蒲关（即蒲津关），由沙苑（同州冯翊县南）出潼关东向，子昂阻之，请自土门（井陉）略邢、洺、怀、卫而南，不可。又请自太行南下扼河阴，亦不可。乃请自陕州大阳津度河，食太原仓粟，回纥从之。诏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会师进讨。回纥辱雍王，引左右厢兵马使药子昂、魏琚、判官韦少华、行军司马李进，各鞭一百，琚、少华均死。既而会同诸道兵进攻，复收洛阳。回纥兵大掠，人皆遁保圣善、白马二寺，回纥火之。屠杀万余人，可汗留营河阳三月，乃去。唐于是（广德元）册为“登里罗汨没蜜施、颉咄蜜施、合俱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t ngrid qutbulmy 为天赋庄严，iltutmys为以功绩御国，又alpkülüiqbilg 为神武、光荣、贤智）。永泰初，怀恩反，诱回纥、吐蕃入寇，会怀恩死，二虏不和。子仪自叩回纥营，与其帅握手（握手如平

生欢，见《后汉书》），让其背约。回纥请击吐蕃以报，子仪取酒共饮，回帅请设誓。子仪酹地曰："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互祝之词，与近世欧俗同）有负约者身陨阵前，宗族灭绝。"因与回纥合击吐蕃，大破之。然其人留京师者率负功，横行无忌。大历十三年，入寇太原，河东节度鲍防与战，不利，死者万余。及德宗立，又入九姓胡之言，欲悉师向塞，宰相顿莫贺达干（tonbaghatarqan）持不可，弗听。莫贺怒，因击杀之而自立，并诛其支党及九姓胡几二千人，建中元年（七八○），册为武义成功可汗。

先是，回纥来者常参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值其酋长还国，逗留振武三月，耗供给甚巨，军使张光晟知其用囊盛女子阑出，因勒兵尽杀回纥及群胡，收驼马数千，缯锦十万，送女子还长安，可汗虽知之，卒未责偿。贞元三年，来请和亲，德宗积旧憾，初欲不许，继用李泌言，妻以八女咸安公主。四年，可汗上书自称子婿，愿以兵助除吐蕃，又请改"回纥"为"回鹘"，于是加册为汩咄禄（qutluq庄严幸福）长寿天亲毗伽可汗，明年卒（七八九）。

以后国更数主，贞元十一年（七九五）奉诚可汗卒（即汩咄禄毗伽可汗），无子，国人立其相跌跌骨咄禄为可汗，即登里啰羽录没蜜施、合、汩咄禄、胡禄、毗伽可汗（胡禄＝ulugh，神圣），唐称怀信可汗，永贞元年卒（八○五）。

继位者曰保义可汗，中文全衔为"爱、登里啰、汩没蜜施、合、毗伽可汗"（爱即Ai之音译，义为月神），据此可汗之汉文圣文神武碑，其在位时为回纥极盛之世。曾北击坚昆，殪其可汗；西收北庭，越大患鬼媚碛；吐蕃攻围龟兹，汗自领兵赴援，败吐蕃兵于于术；西方某族不贡，汗复征之，遂北至真珠河（Jincüügüz，NarynR.），俘掠无数；又进攻葛禄，西追至拔汗那国；此其大较也。元和三年，来告咸安公主丧。既而屡请昏，有司度费当五百万，宪宗方内讨叛藩，不之允。及元和末，始许以太和公主下嫁，长庆元年来逆女，纳马二万，橐驼千。

上文所言汉文碑，旧史未之及，清光绪十六（一八九○）年，芬兰人Heikel始访得之，文甚残缺，今所据者为罗振玉《辽居杂著》校本。沙畹等谓是保义可汗所立（《摩尼教考》二四页），殊有语病；考碑文言唐"×帝蒙尘"，上空二格，与称其"天可汗"同，"俘掠人民"之民字缺末笔，则知碑为歌颂保义功德而立，其文由唐人撰书者，碑阴粟特文所志之年为马年，由是可推定立于元和九年甲午（同上引书二四页）。

回纥自有国以来，曾助唐一收长安，两复东京，殄灭朝义，除大历十三年一役及后来亡国时外（见下文），未尝扰唐边，前后三尚帝主，明以前我国北邻之最为亲善者也。至于助唐牵制吐蕃，除前文所举外，贞元六年，其相颉于伽斯（ilug　si国光荣之义）拟合北庭节度杨袭古复取北庭，不幸大败，七年，吐蕃攻我灵州，回纥败之，十三年，回纥取凉州，元和十一年，吐蕃向漠北进攻，于时李绛曾言，"北狄、西戎素相攻讨，故边无虞"，（《李相国论事集》）宪宗末年，亦因吐蕃比岁为边患，故许降公主。惜肉食者无远谋，卒不能与北邻作有计划之密切联合，以消弭西边之大患。

第九节唐之马政

我国产马无多，尤其不产良马。周穆王之八骏，《左传》晋国屈产

之乘，据余考之，皆西北方之马也。汉武向大宛求。

第十节吐蕃乘虚攻陷河、陇及安西、北庭

要了解唐代藩镇之祸之延长，同时就要明白当日对外之紧张关系。安、史之乱，各国都向唐声援（见前廿七节），独吐蕃取乘危态度。吐蕃往日以我河、湟一带设备充实，故用兵侧重争取外围（如安西四镇），及安、史乱起（七五五），侦悉河西兵内调，守备空虚，于是改计从内围进攻，河、陇先沦，西方路断，安西、北庭遂为彼囊中之物。又复结合南诏，窥伺西南，使唐常处于心腹受胁之劣势。外忧内患，相逼而来，唐之一蹶不振，亦吐蕃牵制有以致之，朱礼记陇右分镇之大（见前廿二节），观此而益知其非审时度势之论。

吐蕃此时侵势，系取河、湟路入。广德元年十月，破泾、邠二州，直薄长安，代宗经华奔陕。吐蕃入京，立章怀太子贤之曾孙承宏为帝，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众归国，适传郭子仪引大军将至，仅留城十三日，即悉数遁去。

建中之后，大食诃论（Haroun-al-Raschid，七八六——八○九年天方教之大主教）与吐蕃数相攻，吐蕃岁西师（《新书》二二一下）。然自时厥后，陇道不通，赴西域者须取道回纥。北庭、安西初时犹为唐守，迨贞元六年（七九○，据《通鉴》二三三。《新书·地志》作贞元三），北庭沙陀部酋朱邪尽忠降于吐蕃，节度使杨袭古率部二千人奔西州，安西道绝，莫知存亡。（据《通鉴》二三三。《元和志》四○称："贞元七年没于西番"，大约因此。）

唐蕃边界说

长庆二年（八二二）唐遣刘元鼎入吐蕃会盟，五月六日盟成，吐蕃人以汉、蕃文合刻于石碑，现存拉萨，汉文已多剥泐。《西藏图考》三所录，略云："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封疆，洮岷之东属大唐国界，其塞之西尽是大蕃地土。……唐差、蕃使并于将军谷交马，其洮岷之东，大唐供应，清水县之西，大蕃供应。"大致同《清一统志》，他本所录，文字又不尽相同。吴景敖专据《图考》，作出如下之考证：

……惟盟文既首载各守见管本界，复载洮岷以东大唐所管，其塞以西方是蕃境，又秦、渭、洮、岷诸州地方，蕃人统以"墨儒"称之，《藏史》纪清水勘界事曾云："于唐土墨儒地方，甥舅各修一庙，画日月于石，以为盟誓。"是双方均认当时洮岷边塞以东之地为唐土甚明。其远在洮岷以东千里之清水故县，自不能又为两界地所在。且盟文原有洮岷以东大唐供应之规定，苟以此清水界址确为清水故县，则唐何能越界千里以事供应？反之，清水西至洮岷间既明为唐境，则清水以西大蕃供应之规定，又宁非矛盾？……长庆以后，吐蕃落门川讨击使尚恐热曾一度窃据秦、渭、洮、岷间，内向求封请援，吐蕃相尚思罗保洮河以拒之，迨恐热败，九州亦悉复，可知长庆间唐蕃两地之清水界址，原必不在清水故县，（《西陲史地研究》一五——六页）

吴氏因本其身历，断定唐蕃国界应在今岷县西之大沟寨一带（同上一六——八页；按大沟寨应即《申报图》之大沟寨），颇坚人信，余初亦以为无可非议，近再取唐史细勘，始知吴说之谬，其证有六：

一、盟文既别本不同，如非取得别项强证，即不能专信《图考》。据吴氏引《武备志》及《西宁新志》，均作"二国所守见管封疆，××属

大唐国界，其塞以西，方是大蕃境土，……其绥氐栅已东，大唐祇应，清水县以西，大蕃供应”（同上），“封疆”下只阙两字，显非“洮岷之东”，否则正如吴氏所指出，《图考》著录之文，为何前后矛盾？此《图考》作“洮岷之东”之大可疑者一。

二、藏语之“墨儒”，依吴说既包秦州在内，而清水又是秦州属县，是《藏史》所谓“于唐土墨儒地方”，译汉得为“于唐之清水县”。且唐蕃建中四年正月会盟于清水，正是约定疆界之首次，谓“唐土墨儒”实指清水县，尤与历史事件吻合，初无蕃人认洮岷以东为唐土之痕迹，此吴氏解释之不合逻辑者二。

三、建中四年正月张镒与吐蕃盟文曰：“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旧书》一九六下，并参本篇四六节。凤州今凤县。大渡河即岷江西支，近世所谓大小金川者是。）此约定吐蕃极为重视，其累次悔盟，亦以疆埸未定为藉口，长庆初彼国未弱，多年争持之界线，何故忽肯退让至数百里以西？此吴说之不合当年事势者三。

四、再从吐蕃之侵略观之，自洮岷以东至清水县，其武、秦、渭、成四州均陷于宝应元（七六二）或以前，原州陷于广德元（七六三）（参本篇三十节），如果长庆初蕃人愿退守洮岷，则是将六十年前吞并之五州，一旦无条件的复归之于唐，此是如何亲善之举，何以唐人竟漠然视之？且何故秦、原二州至大中三年（八四九）而后称其来归？（本篇四六节）成、武二州更至咸通中而后收复也？（《新书》四十。此外渭州有无收复，史乏明文）此吴说之显背史文者四。

五、吴氏又称长庆后尚恐热曾窃据秦、渭、洮、岷间，因以证长庆时两国界址必不在清水；按恐热内乱是会昌二年（八四二）以后事，距长庆初已廿年，且尚恐热所据，当时是“吐蕃辖下的渭州”，非取之自唐，何能借此影射长庆间秦、渭之复为唐地，此吴氏之误解史实者五。

六、唐秦州在今秦安县东，《元和志》三九称清水县西南至秦州一百二十五里，《九域志》则称清水县在秦州东九十里，合此推之，唐清水与今清水当相距不远。依《申报图》，今清水在东经一○六度，西去洮岷只二度或二度有奇，何尝如吴氏所云相隔千里。《元和志》又称秦州西至渭州三百里，渭州西南至岷州二百二十六里，充其量清水至岷州亦六百余里耳，此吴说之里地失实者六。

总之，长庆盟书之国界，断与张镒约定无大出入，吴所考定，只此已可以推翻，任乃强氏认盟碑之清水即今清水县西，与旧史正相合也。

稿既成，始知姚薇元有《唐蕃会盟碑跋》，其第三项《长庆唐蕃疆界考》研究已颇详尽。（一九三四年六月《燕京学报》十五期九六——九页）彼谓碑文“今但云谨守如故，各守见管，是必所守之界，仍遵建中清水之盟。”实是定论，吴氏盖未参及也。彼又引《甘肃新通志》一三：“清水故城在今甘肃省清水县西十五里牛头山下，俗名西城。”更求出实址，不必但作推测。

前引碑文末四句，姚校为“其绥戎栅已东，大唐应，清水县已西，大蕃供应”，与《八琼室金石补正》七一无甚出入（《补正》只“”字写法略

误），吴书作“绥氏栅”者非是。姚氏引《旧书》八三《薛仁贵传》，推定绥戎栅必居大非岭即陇山之上；（九七页）按《仁贵传》云：“军至大非川，将发赴乌海，仁贵谓待封曰，……彼多瘴气，无宜久留，大非岭上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等并留栅内。”大非岭无疑在大非川之旁，与乌海均是今青海地方（参本篇十二及六十两节），姚氏乃以之相当于甘肃之陇山，未免疏忽。姚氏又谓陇州源西大中六年改名之安戎关，即栅之故址，（九七页）然据《新书》三七，此关本名大震关，与“绥戎”名称不近，故其说亦待证实。

姚氏又云：“是介于绥戎清水中间之地，必不属任何一方”，“建中之盟，在蕃盟于清水，是其证”，（九九页）此数语亦须略作修正。据《旧书·吐蕃传》，建中三年原约“以十月十五日会盟于境上”，清水的地点显未划入蕃界，换言之，此一通道上东自绥戎栅起，西至清水县止，均属于姚氏所谓“缓冲区域”，出了清水县的地点，才算蕃界。非谓到清水县城即入蕃界也。约文解释，分应慎重，故特拈出之。

姚文曾引《旧书》一一八《元载传》：

今国家西境，极于潘原（姚云，今平凉东四十里），吐蕃防戍，在摧沙堡（姚云，今固原西北），而原州界其间。及《沈下贤文集》一○《元和末对策》：

又尝与戎降人言，自瀚海已东，神乌（姚误“鸟”）、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南至于上、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令宁、泾原军皆出平（姚误“乎”）凉，道弹筝；宁军北固崆峒，守萧关；泾原军西遮木硖关；凤翔军逾陇出上，因临洮取凤林南关；南梁军道凤逾黄花，因狄道会陇西。

皆可供研究天宝以后唐、蕃国界之参考，并附录于此。

第十一节宦官之祸

唐之亡，或云由方镇，或云由宦官，其实两者兼有之。然藩帅不恭，河北为烈，河北失于处置，怀恩之携贰实致之，怀恩得副雍王适，则又因程元振、鱼朝恩之沮子仪，推原祸始，方镇之乱，亦宦官所造成者。

贞观十一年顷屡遣阉宦充外使，妄有言奏，事发，太宗怒。魏徵进曰：“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无此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即诏自今已后，充使宜停。（《政要》五。并参《通鉴》一九五贞观十四年十一月韦元方事及前第十九节）

宦官揽权，酿于玄宗（见前十九节），而完成于肃、代、德。开、天之际，宦官几若无所不能，直开前古未有之奇局。尤甚者监军持权，节度反出其下（高仙芝征勃律，与边令诚同行）。后来愈变愈坏，“戍卒不隶于守臣，守臣不总于元帅，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皆承制诏委任”；（《宣公集》一八）例如河东帅严绶，贞元、元和间在镇九年，军政补署，一出监军李辅光之手。又如淮西之役，诸道皆有中使监阵，进退不由主将，胜辄先使献捷，不利又陵挫百端，苟非裴度奏请完全罢去，恐无成功之望。

肃宗时，李辅国以扈从灵武功，还京后拜殿中监，兼闲、五坊（、鹘、鹰、鸡、狗为五坊）、宫院、营田、栽接总监、陇右群牧、京畿铸

钱、长春宫等使；凡有刑狱，必诣取决，随意处分，皆称制敕。于是谮死建宁倓（至德二），矫诏移上皇（玄宗）于西内（上元元），杀张后及越、兖二王（宝应元），以阉宦而官司空、中书令，渎秽朝纲甚矣。究其横行之由，则专掌禁兵实为之。

宠任宦官，汉、唐之弊政相同；汉以宦官典中书，是政权归之（汉初禁卫有南、北军，盖因方位而得名，与宦官无涉），唐以宦官典禁兵，则兵权归之，前者易制而后者难图。代宗身受辅国之逼，不能明正其罪而出以贼杀，既贼杀矣，犹复多方掩饰，追赠太傅，彼辈小人何惧而不作恶耶？程元振虽有翼戴功，然惩前毖后，假不再令专制禁兵，何至吐蕃入犯，诸道坐视，仓皇幸陕，府库荡空（广德元）。去一辅国，复养一元振，去一元振，复养一朝恩，宦官之害，遂根深蒂固，牢不可拔，故谓唐亡由于自杀，可也。

鱼朝恩初以观军容使莅九节度之师（见前廿节），卒致滏水（乾元二）、邙山（上元二）之败，宜若有所戒矣。及又令朝恩统神策军（本临洮西之军，禄山反后，卫伯玉率之赴陕）驻陕；只因陕州迎驾功，代宗回銮后，遂超擢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朝恩于是率神策军归禁中，自充将领，且收管好峙、麟游、普润、兴平、武功、扶风、天兴诸县，势力益盛。

唐代十六卫（左右卫及骁骑、武、威、领军、金吾、监门、千牛等七卫，后七卫亦分左右，故共成十六），本以府兵为基本队伍，府兵制渐坏，自须别谋补充；如高宗龙朔二年置左右羽林军，玄宗开元二十七年扩置左右龙武军（用唐隆功臣子弟充之），肃宗至德二载置左右神武军（因羽林军减耗寇难未息之故。《新唐书·兵志》称，禄山反，天子西驾，禁军从者才千人），仍不失为因时制宜之策，可议者，后来都付诸阉竖之手耳。羽林等军统称北衙六军，与原有十六卫对峙，故称十六卫为南衙；因此又常称宦官所领之兵为北衙。柳伉尝劾元振，兼及朝恩，请悉出内使隶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及朝恩既诛（大历五），内官不复典兵，其权本可以日削。讵泾卒溃变（建中四），德宗恨禁军本不集，仅得窦文场、霍仙鸣诸宦者从行，遂将左右神策，悉委诸窦、霍，特立护军中尉两员，则不悟其过在自己误用白志贞，初非外边武臣之全不可恃，猜疑成性，飞蛾投火，宜乎阉祸之卒不可纾矣。

尤无识者，唐廷之纵容宦寺，不徒付以兵，抑又听其贿。代宗时，内官使四方者求赂弗禁，某次，遣使赐妃族，所得颇少，代宗滋不悦。又建中二年，振武监军刘惠光贪婪，军士共杀之。夫内使恣苞苴，为守令者苟不能敝屣一官，持正守法，势必悉索以应；内官既可贪，外官宁复廉洁自葆，由是上行下效，重重剥削，民被压迫而生变，此必然之势也。

中唐以后，志清阉宦者有三人：其一曰王叔文。顺宗即位，叔文谋夺神策军权，用宿将范希朝为京西北禁军都将，其事殆与顺宗有默契。顺宗在位，仅及七月，然甫继大祚，即禁宫市之扰民、五坊小儿之横暴，及盐铁使之月进，又出教坊女伎六百还其家，追左降官陆贽、郑馀庆、韩皋、阳城还京师，起姜公辅为刺史，德宗秕政，廓然一清，“人情大悦”（此语见《顺宗实录》），只此小小施行，已为李唐一朝史所不多见，躁进小人，岂愿办此？岂能办此？若叔文引用者如柳宗元、刘禹

锡、陆质、吕温、李景俭辈，皆知名于时，非佥壬可比，而论者乃诋以居心不正（宋洪迈），冤枉极矣！《旧唐书》一八四，称赞俱文珍忠荩，尤为无识；此因唐末留下之记事，多属小人秉笔，史家不精别择，便昧是非。余尝著论云："宪宗中官者计，惑于不愿立太子之谮，切齿叔文（《十七史商榷》七四《程异复用》条，谓'宪宗仇视其父所任用之人，居心殆不可问。'犹未澈见其私欲。刘禹锡《子刘子自传》谓，上素被疾，诏下内禅，宫掖事秘，功归贵臣，于是叔文贬死云云，即欲为叔文此案辩护；不过禹锡晚年深自引晦，故有匣剑帷灯之隐耳）。文人需次稍久，郁郁不得志如韩愈辈（清《陈祖范文集》一《记昌黎集后》云：'退之于叔文、执谊，有宿憾，于同官刘、柳有疑猜'，正诛心之论，亦持平之论，吾人不能因彼负文名而从恕也），更诋以新进（按柳、刘同于贞元九年举进士，历十二年而授从六上之员外，尚非甚躁进者），从而群吠之，酿成君臣猜忌，旧新轧轹，阉寺乃隐身幕后，含笑而作渔人。然叔文暨八司马辈非真丑类比周、党邪害正（语本前引《商榷》条），大有公论在也。"（见《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自序》。八司马即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程异。又《顺宗实录》虽有改写，然观愈作《柳子厚墓志铭》，责宗元"不自贵重"，及不能"自持其身"，可推知《实录》固不以叔文为然者）。

以论叔文个人，则尤有可纪者："刘辟以剑南节度副使将韦皋之意于叔文，求都领剑南三川，谓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诚于公，若与其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当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将斩之，而执谊固执不可。"（《顺宗实录》四）此叔文遇大事而能不自私且有裁酌于其间者也。得韦皋之助，或足以抗宦官，然去宦官而长藩镇，则犹饮鸩止渴、拒虎进狼耳。抑使无韦执谊之固执而终斩刘辟，又何至辟据蜀邀节钺劳朝廷征伐之师耶。

次为文宗。宪、敬两宗之弑，唐廷无一人敢抗言其事。大和二年，刘应直言极谏试，策凡五千余言，其切论黄门太横，则言："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其恶如四凶，其诈如赵高，其奸如恭、显，陛下又何惮而不去之耶？"其论贪官污吏，则言："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又主张"斥游惰之人以笃其耕植，省不急之费以赡其黎元。"考官惮宦官，不敢取，物论皆为叫屈（《旧书》一九○下）。大和末文宗谋去宦官，未始不为刘之言所感动。换言之，此一举措，文宗实主其事，郑注等不过居辅成地位（昭宗天复《昭雪王涯等十七家诏》，有云："并见陷逆名，本承密旨"，可证），阉寺处此，上无所施其主君摇惑，下无可其两派交争，洎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流徙远州，陈弘志杖杀，王守澄赐鸩，王守涓被诛（弘志即弑宪宗之人，皆大和九年事），事机日逼，兔死狐悲，遂不得不挺而走险，是酿甘露之变。《十七史商榷》九一《训注皆奇士》条，辨《新唐书》本传诡谲贪沓之说，语最公允。当日阉人势盛，士夫固多为作鹰犬者，《新唐书》仅据旧籍转录，正王氏所谓史官曲笔，不可尽恃也。《通鉴》二四五云："训、注本因守澄进，卒谋而杀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训、注之阴狡"；又二六三评训、注二人云："况李训、郑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谲诈之谋，翦累世胶固之党"；按处变用

权，圣贤所许，因守澄而进，固未能定训、注终身。旧说谓训、注反覆，无非为其谋杀守澄，充彼辈之说，则邪正不分，示人以从恶须终，而绝人自新之路，其为悖理，无待蓍龟。文宗既与郑、李有密谋，（见《通鉴》二四五）则请问头巾书生，应背守澄以诛奸恶乎？抑应念私恩而忘国事乎？大义尚可灭亲，以谋守澄而目郑注曰反覆，直不啻为宦官泄愤。行谲诈之谋，犹不克翦，而谓凭三数人之公言（充其量不过一刘，于国事无大补救），可以翦恶乎？狄仁杰荐张柬之，论者极称其保唐有功；夫五王（柬之与袁恕己、敬晖、桓彦范、崔玄），武后所用，而幽武后者五王，未闻责五王之背武后也。司马光之论郑、李，与《新唐书》之论叔文，同一鼻孔出气，质言之，迂儒不可与言大事而已。然阉宦之怒郑、李、王（涯）、顾（师邕）诸君子，犹未息也，即《翰林学士壁记》之小小留题，亦芟除务尽，藉口曰“文字昧没”，美称曰“粉绘耀明”（皆丁居晦《翰林学士壁记》中语），读史者稍一失察，便为居晦之曲笔所蒙，阉寺之用心，不既阴且狠乎！阉寺之手段，不既毒且辣乎！文宗得不至灭烛之弑（敬宗），少阳之幽（昭宗）者，徒以外乏奥援（如泽潞刘从谏表请王涯等罪名），有所顾忌耳。幸奸邪虽炽，正谊终存，寺人之阴狠、毒辣，可以掩当日之目，不能盲后世之心，可以箝百官之口，不能断史家之腕，吾人生千百年下，犹得发其覆，揭其私，使郑、李、王、顾诸君子之名，不至终于“昧没”。（“阉寺处此”以下一大段，原见前引《壁记注·序》，惟字句先后，略有更动）李潜用记甘露之变，谓之《乙卯记》，李商隐诗只题《乙卯年有感》，都不敢显斥其非（《渔隐丛话》前二二引蔡宽夫《诗话》。大和九是乙卯年），可见当日宦官横行，人敢怒而不敢言之状。

第三人为崔胤，别见下文。

宪宗英武，视肃、代、德三宗稍胜，故元和之治，陵驾中唐，如斥刘光琦之分遣敕使赍赦书（元和三年），允许孟容之械系神策吏李昱（四年），抵许遂振于罪（五年），赐弓箭副使刘希光及五坊使杨朝汶死（六及十三年），杖死王伯恭（六年），听裴度言，撤回诸路监军（十二年），又吕全如擅取樟材治第，送狱自杀，郭醉触夜禁，即予杖杀，未尝不奋其刚断，振彼朝纲；然宠任吐突承璀，始终不悟，卒死小人之手，复何闵焉。

自宪宗而后，除敬宗以太子继位外，无不由宦官拥立：

穆宗梁守谦、王守澄等。

文宗梁守谦、王守澄、杨承和等。

武宗仇士良、鱼弘志。

宣宗诸宦官。

懿宗王宗实。

僖宗刘行深、韩文约。

昭宗杨复恭、刘季述。

宦官之中，又以神策派占多数，握兵权也。穆宗之立，神策军士每人赏五十千，六军人三十千，金吾人十五千。敬宗之立，神策军士犹每人赐绢十匹，钱十千，视藩镇之拥立留后，曾无以异，夫何怪复恭有定策国老、天子门生之夸语，而文宗至于泣下沾襟也。（《新唐书》二○七《仇士良传》）

第十二节武宗之攘外安内

（一）攘外者逐回纥也。回纥自太和公主出降后，国更三主。开成末，其酋帅与黠戛斯合兵，攻杀可汗，诸部溃散，或奔葛逻禄，或入北庭（时属吐蕃。《新唐书》作安西，非也），唯乌介特勤一部劫公主南来，请假振武以居。武宗听李德裕言，弗欲乘人之危，遣使资以粮二万石，但不允借振武（会昌元）。别有嗢没斯（Ormuzd）特勤一支，于开成五年先至塞上，率二千六百余人来降，特命德裕裒集秦、汉以后外国归化建立功业者三十人，作《异域归忠传》赐之，并赐姓名曰李思忠。

乌介本军渐逼把头烽（马戴诗作爬头，经余证为今之包头），掠横水，杀戮至多。唐廷对付之法，议论不一，德裕援元和中讨王承宗、李师道，长庆中讨李齐（宣武留后）例，请令公卿集议。奈两次议覆之状，词意空洞，不切事势，于是授刘沔为招抚回纥使，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纥使，相机驱逐，兼令蕃将何清朝、契通领沙陀、退浑马军六千人助讨（会昌二年九月）。既而沔破回纥于大同军之杀胡山，迎太和公主回京，乌介走依黑车子室韦（会昌三）。其别支那颉啜特勤，先已东逼幽州，为仲武所破（约二年七月），共招降三万人。乌介旋为室韦所杀，余部被黠戛斯收去。走北庭者，后来逾天山取西州，今土鲁番一带之维吾尔，即其遗裔。

黠戛斯之源流，有加以详述之必要（参《隋史》十四节及《唐史》二节）。其族在汉为坚昆或鬲昆，北周曰契骨，隋曰纥骨，初唐曰结骨，会昌时或翻作纥扢斯，元时常称吉利吉思或乞儿吉思，即前清布鲁特之一，今人亦译柯尔克子，乃极古民族之一。自太宗之后，高宗世再来朝。景龙中，遣使献方物，中宗引使者劳之曰，而国与我同宗，非它蕃比。玄宗世凡四朝献。肃宗乾元初，为回纥所破，遂被隔绝。（《新书》二一七上下及《旧书》一九五）元和时，回纥保义可汗再败之，杀其可汗（参前卅二节）。至开成末，始将漠北回纥逐走，遣使奉太和公主回，中途为乌介劫去。德裕代武宗《与纥斯可汗书》云，“闻可汗受氏之源，与我同族，汉北平太守材气，天下无双。……至嫡孙都尉提精卒五千，深入大漠。……我国家承北平太守之后，可汗又是都尉苗裔”。又云：“但以惜可汗宗盟之国，愿保先名，……便以坚昆为国，施于册命，更加美号，以表懿亲。”“须示邻壤情深，宗盟义重。”（《会昌一品集》六）直视黠戛斯为李陵之裔。余尝谓外族华化，近年研究者颇不乏人，独华族蕃化，尚少人详考。开元年，安西都护盖（汤）嘉惠《西域记》云：“坚昆国人皆赤发、绿睛，其有黑发、黑睛者即李陵之后。”（《会要》一○○）《酉阳杂俎》四云：“其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其兵众之胤也。”又《元史》六三《地理志》云：“吉利吉思者，初以汉地女四十人，与乌斯之男结婚，取此义以名其地。”按突厥语qirq此云“四十”，苏俄学者Czaplicka一九一八年著书，亦言北方有此传说。考汉世匈奴屡次入寇，俘虏至多，此等俘虏在漠北曾构成若干突、汉混种（匈奴应为突厥族，别有说），自无可疑。然汉已见坚昆之名（们希和以为坚昆即qirqiz之单数音译），然则上项传说，应发生于汉前，谈民族学者所宜注意之点也。近年苏俄革命后，具居住叶尼塞河（YeniseiR.）之部分，特取我国旧译黠戛斯（Khahes’今哈卡斯自治省）以自称（《回教百科全

书》九○七页，苏俄学者巴尔托勒说），而我国人则鲜有知者。

黠戛斯平回纥后，初时不留居其地；咸通四年（八六三），曾遣合伊难支表求经籍，并拟每年走马请历。又欲讨回纥，使安西以来悉归唐，唐未之许。（《通鉴》二五○）七年，遣将军乙支连岁入贡，派鞍马迎册立使及请明年历日（同上）。中和二年（八八二）与高骈诏云，“黠戛、单阐，并至梯航”。（《旧书》一八二）又大顺元年（八九○），云州赫连铎引其众数万攻遮虏军。（《通鉴》二五八）同年韦昭度等亦有“黠戛斯举勤王之众”语。（《旧书》二○上）自是以还，直迄蒙古崛起（十二纪末），漠北情况只于辽太祖西征（十世纪初）及宋王延德使高昌（十世纪末）两事略见之，各部落如何转徙，殊不明了。

（二）安内者平泽潞也。回纥甫定，复有泽潞继帅问题：会昌三年四月，刘从谏死，其侄稹秘不发丧，觊觎真授，朝臣多以回纥尚存余烬，请任稹权知军事。德裕独谓泽潞近处心腹，与河北三镇不同，向无承袭，敬宗不恤国务，以从谏继悟，今如再授稹，诸镇谁不思仿效。稹所恃惟在三镇，如得镇、魏不与之同，稹无能为矣。武宗从之，使谕镇帅王元逵、魏帅何弘敬，二人皆听命；于是制削从谏及稹官爵，分命元逵为北面招讨，弘敬为南面招讨，与河中陈夷行、河东刘沔、河阳王茂元合力进攻。弘敬迟疑不出师，乃令忠武（陈许）王宰自相、魏趣磁州以胁弘敬。时稹将迫近怀州，议者鼎沸，谓刘悟有功（斩李师道），不可绝其嗣，从谋又养精兵十万，如何可取？德裕劝帝勿听外议，传谕朝士，有沮议者斩之，众喙乃息。更令王宰改援河阳，使石雄代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节度使，互相钤制。翌年八月，稹内部不和，邢、、磁三州相继降，未几，稹亦为部下所杀，泽、潞等五州平。宋孙甫《唐史论断》下云：“上党拒命，举朝惧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势，奏遣使魏、镇，先破声援之谋，且委征讨之任。魏帅迁延其役，使王宰领师，直趋磁州，据魏之右，魏帅惧，全军以出，又以王宰必有顾望，令刘沔领军直抵万善（怀州），示代宰之势，宰即时进兵。……此皆独任其策。不与诸将同谋，大得制御将帅用兵必胜之术。”又范祖禹《唐鉴》二○云：“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镇，如运之掌，使武宗享国长久，天下岂有不平者乎。”

此两役之所以成功，皆由武宗能专信德裕，不为浮议所摇惑。德裕以为自德宗后，将帅出兵屡败，其弊有三：一、诏令下军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预闻。二、监军各以意指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三、监使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参战者皆怯弱之士，每战，监使乘高立马，自有信旗，视军势小却，辄引旗先走，余卒相随而溃。因与枢密使约，监军不得与军政，每军千人，听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凡回纥、泽潞两役，皆用此制，自非中书进诏意，更无他诏自中出，故能成其功。毛凤枝评云：“每见赞皇之料事明决，号令整齐，其才不在诸葛下。”（《关中金石文字逸编》九）余谓学者能细读《文饶集》之条议诸作，当助长辨事见识不少。

以短短四年期间而解决两项困难问题，成功之速，为天宝乱后所仅见。此外武宗朝尚有可纪之两事：

（三）淘汰僧尼据开元末统计，全国共有寺五千三百五十八所，内僧三千二百四（或三）十五所，尼二千一百一（或二）十三所（《六

典》四）。天宝八载闰六月册尊号，度僧尼十二万人。（《沙州文录补》）自元和二年后，累诏各州府不得私度僧尼，敬宗时徐使王智兴在泗州置坛，江淮人闻之，意在规避征徭，影庇资产，趋之若鹜，浙西李德裕奏，如不特禁，江淮已南，将失却六十万丁壮。（《旧书》一七四）大和九年七月，亦诏不得度人为僧尼。（《旧书》一七下）及武宗即位，益恶僧尼蠹国，会昌四年三月，先敕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王寺并不许置供、巡礼。（《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同年七月，再下诏力陈释教之弊，毁寺四千六百余区，招提、兰若（aranya，皆私立寺之称）四万余区，勒归俗僧尼廿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余人，收良田数十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比北魏更为澈底。此事虽说道士赵归真等曾与推动，然取寺材葺公廨、驿舍，取铜像、钟磬铸钱，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孙樵云，“民瘼其瘳，国用有加”，允为笃论。宣宗务反武皇所为，诏营废寺，自即位至于大中五年，斤斧之声不绝，樵奏称中户不十，不足以活一髡，（《可之集》五及六）盖有痛乎其言之者。

（四）裁抑宦寺武宗虽为仇士良拥立，然颇裁抑之；会昌二年将宣赦，或告士良宰相作赦书，欲减禁军衣粮、马草料。士良曰，必若有此，军人须至楼前作闹。德裕等诉于上。上曰，奸人之词也；召两军中尉谕之曰：赦书出自朕意，不由宰相，况未施行，公等安得此言？士良惶恐称谢。翌年，士良遂出宫归第，又明年，追削其授赠官阶，家财籍没。使非武宗消弭未然，何难重演甘露之变，此一事也。旧例，宣学士草制，必经枢密使，时枢密使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悫，不敢预事，故三年崔铉之相，枢密不知。老宦官尤之曰：此由刘、杨懦怯，堕败旧风故也。合前文德裕与枢密约法观之，便见武宗尚能慎选其人，此二事也。会昌五年四月初，敕索左右神策军印，（《巡礼行记》四）此三事也。蓝氏顾谓“不见有任何抑制”，（五五页）未免疏于考史。

专制君主所不能必得者为寿命，故佛教玄想之涅槃，终不敌道家长生之金丹。宪宗饵柳泌之药而遇弑，穆、武、宣均以饵丹而促寿（穆年三十，武三十二，宣五十），覆辙相寻，曾不少悟。武宗御宇仅逾六载，此后唐事益无可为矣。

第四章 唐后期农民战争

第一节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

从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至唐昭宣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是为唐后期。

唐顺宗“永贞革新”失败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以及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在中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南衙（朝官）北司（宦官）相争，在地方，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宦官、朝臣与藩镇之间既互相勾结，又彼此争夺，朝政异常黑暗。在苛重赋役，剧烈土地兼并和不断自然灾害重重打击下，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家破人亡。

唐后期严重的社会危机，首先表现在统治阶级的极端腐朽，及其内部的矛盾尖锐复杂上。

唐后期最高统治者大多是纵情享乐、昏庸残暴的皇帝。如唐懿宗，每月举行十余次盛宴，“听乐观优，不知厌倦”，经常在十余万扈从的前呼后拥中，到处游玩。为迎佛骨，“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凤翔法门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其女同昌公主出嫁，“赐金五百万贯，仍罄内府宝货，以实其宅。至于房拢户牖，无不以珍异饰之。又以金银为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釜铛、盆瓮之属，仍镂金为笊篱、箕筐，制水精、火齐，琉璃、玳瑁等床”。两年后，她病死时，唐懿宗又极其奢侈地大办丧事，并惨杀无辜御医韩宗劭等二十多人，囚其亲属三百余名。

为了维护李唐统治，镇压人民反抗，唐王朝大力强化国家机器，官僚机构无比臃肿，雇佣军队数量惊人。

早在唐玄宗执政时期，全国官吏已多达三十六万八千余名。“自中世已后，盗起兵兴，又有军功之官，遂不胜其滥”。官僚可从朝廷得到优厚俸禄，享有免除赋役等特权，还能利用职权贪赃枉法，以饱私囊。如唐懿宗时，人们讽刺宰相曹确、杨收和徐商：“确确无余事，钱财揔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贿几时休”。宰相路岩的亲吏边咸，家财“可赡军二年”。甚至一个小小的长葛县令严郜，罢职后能置“良田万顷，桑柘成阴，奇花芳草与松柏交错，引泉成沼，即阜为台”的偌大庄园，其如何吮吸民脂民膏可想而知。唐后期官僚奢侈腐化成风，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沈酣昼夜。

自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后，唐王朝养兵常八十余万。这些召募的职业兵，不事生产，一切靠朝廷供应，军费开支浩大。唐宪宗元和年间“率以两户资一兵”。至唐穆宗长庆年间，养“兵九十九万，率三户以奉一兵”。

如此众多的官僚、军队，加上以皇帝为首的贵族、地主、商人和僧道等，组成了一个异常庞大的寄生阶级。元和年间已是“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这种情况，至唐末更加严重。

唐后期，统治阶级内部为了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尔虞我诈，暗斗明争，闹到乌烟瘴气。

（1）宦官专权。唐代宦官专权“祸始开元”。宦官稍称旨者，即授三

品官，列戟于门。高力士尤受重用。四方进奏，先呈他，后转唐玄宗，小事由其直接裁决。唐玄宗说：“（高）力士当上，我寝乃安”。朝政开始落入宦官之手。

安史之乱时，宦官李辅国挟太子李亨北走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建立流亡政府，掌管军权。收复长安后，又押署制敕，政权亦为其操纵。唐代宗时，李辅国恃定策功，更加跋扈，公然对唐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其后宦官程元振“权震天下，在（李）辅国右”。宦官鱼朝恩之放肆又比程元振有过之而无不及。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任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后，中央禁军“全归于宦者”。唐王朝用宦官监军，戍卒不隶于守臣，守臣不总于元帅，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均派宦官监督，全国各地兵权也被宦官把持。宦官还掌握了出纳皇帝诏令的枢密使要职。因此，“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畜，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其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唐后期的穆、文、武、宣、懿、僖等皇帝，均为宦官拥立。唐文宗曾泣下霑襟地哀叹：“朕受制于家奴”，比“受制于强诸侯”的亡国之君周赧王、汉献帝“殆不如！”至于恣意诛戮诸王、妃主和宰相等，更无人敢言了。

有些皇帝不甘当傀儡，利用朝臣打击宦官。一部分朝臣不满宦官独揽大权，欲借天子招牌以谋取而代之。另一部分朝臣则趋炎附势，以遂私利。太和元年（公元831年），唐文宗与宰相宋申锡密议翦除宦官，为宦官知，便诬宋申锡谋反，迫使唐文宗贬其为开州司马。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唐文宗又和宰相李训、郑注等精心策划了一个以观看天降“甘露”而一网打尽宦官之计，由于关键时刻露了马脚而失败，大批朝臣被杀。大中年间，唐宣宗与宰相令狐绹等再次商量尽除阉贵，亦因密漏未遂。宦官权势更加煊赫。他们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广占田宅，横征暴敛，生活靡烂，是唐后期统治阶级中最反动、腐朽的势力。

（2）朋党之争。唐后期，科举竞争激烈，士人只有奔走权门，靠其荐举，才有较大及第希望。荐举者、考试官（座主）、新进士（门生）和同年进士之间，相互提携，逐渐形成朋党。他们与凭借门荫入仕者，彼此轻视、排挤。双方之争，肇端于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制举考试，表面化于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科举舞弊，史称“牛李党争”。李党首领李德裕和郑覃，出身门阀士族，瞧不起庶族地主出身的新贵，说他们“祖尚浮华，不根艺实”，主张朝廷显官宜用公卿子弟，这些人从小熟悉官场，“不教而自成”，庶族寒门纵有出众人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不能尽悉。因此李党秉政时，多拔擢笃守礼法者，而“抑退浮薄”之人。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则认为遴选官吏，应以词采为重。他们不把那些仅凭高门望族或父祖官荫而入宦海的士族后裔放在眼里。其实，两党中人出身并不严格，李党里既不乏进士出身者，牛党里也有靠门荫入仕之辈。唐文宗时，牛李两党相互掣肘，争吵不休，许多政事无法解决。唐文宗深有感触的说：“去河北贼（藩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唐武宗继位后，李德裕为宰相，尽斥牛党的官僚。唐宣宗上台后，李德裕被贬死于崖州（今广东琼山）。牛党东山再起，同样不容李党中人于朝廷。牛李党争表面上围绕科举问题，实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唐后期的朋党斗争一直持续至唐亡。

（3）藩镇割据（请阅本书第一章第一节）。

唐后期，由于朝政腐败，战乱不已，水利失修，水、旱、虫、风等天灾接连不断，有些地方官出于升迁私利，不准农民报灾，如咸通八年（公元867年），怀州（今河南沁阳）百姓报灾，刺史刘仁规“揭牓禁之”。陕州（今河南陕县）观察使崔荛，对于报灾百姓更加蛮横无理，“指庭树曰：‘此尚有叶，何旱之有？’乃笞之”。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关东发生特大旱灾：“自虢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蓬实为面，蓄槐叶为齑，或更衰羸，亦难收拾，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在这样的灾荒年月，官府不仅不予赈济，而且依旧征收赋税，“督趣甚急，动加捶挞”。百姓撤屋伐木，雇妻鬻子，也仅能供催税官吏的酒食之资。百姓对唐统治者“畏之如豺狼，恶之如雠敌”。

唐僖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在其著名的《直谏书》里所说的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正是上述唐后期统治阶级极端腐朽，政治异常黑暗的写照。

唐后期严重的社会危机，更突出的表现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的激化上。具体来说，就是（1）苛重的赋税和差役，（2）剧烈的土地兼并（这两方面，请阅本书第七章第三节）。刘允章《直谏书》中所说的人民“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典型地反映了唐后期广大劳苦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处境。这就是唐末农民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唐后期严重的社会危机，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个方面同时表现出来了，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阶级大搏斗即将来临。

早在唐文宗时，刘于太和二年（公元828年）应贤良方正科的著名对策中就向唐统治者发出了警告。他说：“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加以国之权柄，专在左右，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如果遇上天灾、瘟疫，则“恐陈胜、吴广不独起于秦，赤眉、黄巾不独起于汉”。刘的话，切中时弊，但执政者恶而不听。

“不忍见国难危”的刘允章，唐僖宗时再次冒死上书，尖锐地指出，唐末“（人）有八苦而无一乐，国有九破而无一乐”，对于那些“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的天下黎民，如果朝廷再“不理，何以归哉？”终日只知“专务游戏”的唐僖宗，报本“不理”。当然，几声逆耳的忠言岂能打动昏君之心；病入膏肓的唐王朝，也不是任何人间的灵丹妙药所能起死回生的。将它抛入坟墓的历史任务，就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揭竿而起的千百万唐代劳动人民的肩上。

第二节唐后期人民反抗斗争

唐王朝进入后期后，人民反抗斗争进一步发展，唐末爆发的以王仙芝、黄巢大起义为中心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将有唐一代农民战争推向最高峰。

唐后期人民反抗斗争主要集中在江淮地区。自安史之乱后，江淮地

区成为阶级矛盾最尖锐地区，人民反抗斗争也最为剧烈。尽管唐中期人民反抗斗争被唐统治者用剿抚兼施的手段镇压下去了；但是导致起义的各种社会矛盾没有消除，至唐后期，这些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在藩镇割据越来越严重，唐中央势力越来越衰弱的趋势下，唐统治者在江淮地区的军事力量仍然不强。农民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不断发动新的斗争。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和川（今安徽和县）发生饥荒，乌江县“百姓杀县令以取官米”。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和舒州（今安徽潜山）的农民起义军，劫持向京师长安运输贡物的船只，亳州（今安徽亳县）农民起义军，攻打地主豪绅的宅舍，没收货财，历届刺史擒捕不获，被统治阶级诬为“剧贼”。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九月，新任刺史李繁“潜设机谋”，袭击义军大本营，才将其镇压下去。唐文宗太和初，鄂州（今湖北武昌、岳州（今湖南岳阳）一带农民起义军众多，他们利用这里“囊由带江，处百越、巴、蜀、荆、汉之会”的有利地理条件，夺取来往舟楫上官府或富商的财物。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新任鄂岳观察使崔郾，训卒治兵，依据江湖萑蒲丛生不便巨舟航行的特点，建造灵活快速的蒙冲小舰，采取严刑竣罚、跟踪穷追策略，将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吉州（今江西吉安）赤石、徐庄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凭借险要的山地洞穴，筑栅七所，一面从事农业生产，一面进行反抗斗争。

唐武宗时，全国各地农民反抗斗争掀起新高潮，江淮一带更是如此。刘大扑领导的数百名义军，以江州与洪州交界的彭蠡湖附近的山洞为据点，进行斗争。从其被统治阶级诬称为“剧贼”，并作为镇压者江西观察使周墀的一大所谓“政绩”来看，这支队伍相当精干、善战。在江南西道和岭南地区，因天旱乏食，饿殍遍野，农民为求生存而相聚起义，“荡覆乡县，势如燎火”，唐王朝命诸道节度、防御使，在辖区山河江海“切加警备，仍差巡检，更于要害处，加置军镇捉搦”，“如能设计擒获贼党二十人已上，并获赃物推问行劫纵迹分明者，量其功绩节给优赏，仍与迁职；如界内有劫杀不能捉获者，亦节级重加惩责，仍委出使郎官御史及所在巡检院切加访察，不得更使因循”。

唐宣宗大中年间，衡州（今湖南衡阳）邓裴“以湖湘旱耗，百姓饥荒”而聚众起义。起义军“剥乱乡间，陵惊郡邑，徒坚党合，事巨寇牢，或据深山，或闭官道，遂使湖岭之外”的地主豪绅惶恐不已。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四月，在湖南团练付使冯少端的围剿下，邓裴被俘，起义失败。寿阳（今安徽寿县）发生饥荒，农民聚众起义，被司农卿浑偘镇压。山南西道的蓬州（今四川仪陇南）、果州（今四川南充）农民，迫于饥寒，依据州境内的鸡山，不仅进攻剑南东川、四川和山南西道广大地区，而且言辞悖慢，深深地刺痛了唐宣宗，他极为愤怒，欲发兵围剿。宰相崔铉建议遣使招降。而当起义军受唐王朝使臣招诱，皆投弓列拜请降时，唐将王贽弘与宦官率领的官军，已偷偷进至山下，将已解除武装的起义军将士竟击灭之。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午），山南东道“封疆险阔，素多盗贼”。该道的襄州（今湖北襄樊市），每年秋天，常有众多的农民起义军“张旂结党，夜出昼藏，谓之山栅”。他们焚烧地主豪绅的庭院，没收其资财，遭到冲击的有产者惶恐不安，到处设置警备。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挑选精兵，别置营屋，列垛设摽，经常训练，又不

杂抽差，故行动迅速，作战能力较强。徐商依靠这支“捕盗将”，把起义军打垮。

在江淮地区人民反抗斗争中，私盐、茶贩占有突出地位。唐后期，随着朝廷对盐、茶控制日趋严格，对私盐、茶贩的镇压也不断加强。唐文宗时，已不是把私盐、茶贩视为一般走私活动，而是按“光火贼例处分”，即视为与农民造反一样血腥屠杀了。但是，无论朝廷刑法怎样苛酷，私盐、茶贩的斗争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益活跃。

唐武宗执政初，江淮地区私盐、茶贩的活动更加频繁。池州刺史杜牧在“寻穷询访”后，向执掌朝政的李德裕上书，详细论述了“群盗如麻”的私茶贩概况：一、江淮私茶贩都是结伙而行，挟持兵杖，与巡查官府进行武装斗争。二、私茶贩在江中劫取财物，入山博茶水劫不便时，则于草市陆劫，杀死富豪，取其钱财。濠、泗、亳、徐、汴、宋等州私茶贩多劫江南、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等州私茶贩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都是尽贩私茶，北归本州货卖。三、私茶贩与江淮船夫、小商贩及广大民众互为表里，乡村均有兵仗，地方官吏不敢冒然前往捉拿私茶贩。四、江淮镇戍兵力单薄，戍卒宁愿纵容私茶贩而自身受罚，也不敢与其相斗，故难镇压。杜牧认为，“若令宣、润、洪、鄂各一百人，淮南四百人，海船以三十人为率，一千二百人分为四十船，择少健者为之主将，仍于本界江岸，创立营壁，置本判官，专判其事，拣择精锐牢为舟棹，昼夜上下分番巡检，明立殿最，必行赏罚。江南北岸添置官渡，百里率一，尽绝私载。每一宗船，上下交送，是桴鼓之声千里相接，私渡尽绝，江中有兵，安有乌合蚁聚之辈敢议攻劫”，这样，不仅能将私茶贩彻底镇压，而且茶利尽入朝廷公室。李德裕等大臣也向唐武宗当面奏请于淮南、浙西、宣歙、江西和鄂岳等五道，设置游奕船，沿江要害处扎营，经常在江中巡查，严惩贪赃和纵容私茶贩者，酬赏能将私茶贩完全镇压下去者。

唐宣宗即位后，“茶、盐之法益密。粜盐少私盗多者，谪观察、判官，不计十犯”，“有盗坏与鬻鹻，皆死，盐盗持弓矢者亦皆死刑。”为加强巡查缉捕之力，唐统治者还命专管盐务的巡院，与当地州县联防。又与群臣杂议镇压措施。史称，“今日刑法颇峻”，而“盗贼益烦”，寿阳“有货茶盗斗变难制”。

唐王朝戒备森严的宫廷屡遭冲击。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四月，在即帝位仅三个月的唐敬宗身边，爆发了一次宫廷工匠起义。染工张韶与占卜者苏玄明“阴结诸工（匠）百余人，匿兵车中若输（染）材者，入右银台门，约昏夜为变。”守卫者疑其载重而诘查，张韶以为事已暴露，遂杀其人，拿出车中兵仗，大呼攻入皇宫。正在清思殿与宦官击毬的唐敬宗“震惊”万分，急忙关闭殿门，狼狈逃至左神策军避难，旋将二太后也接至军中。阉臣仓猝由望仙门出奔，“宫门皆闭，上（唐敬宗）宿于左军，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骇”。张韶等攻入清思殿，登御榻而食皇帝御膳，将各种宝器分给大家。他们又攻打弓箭库，击败卫士的抵抗。左神策中尉马存亮遣左神策大将军康艺全、将军何文哲、宋叔夜、孟文亮，右神策大将军康志睦、将军李泳、尚国忠等率骑兵前来助战。日暮，张韶和苏玄明不幸中箭而死，起义者仍英勇搏斗，至翌日，起义才最后失败。唐敬宗回宫时，宰相帅百官诣延英门庆贺者，亦不过数十人，充分

暴露了唐统治集团的腐朽和虚弱。史称张韶是“染坊供人”、“染署工”，则他当是在皇宫染坊服役的工匠。唐代官府手工业中的工匠，有短期服役的短番匠和长期服役的工匠，有些短番匠也常被以“和雇”的名义强迫留下继续服役。服役期间，倍受压榨，“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亦官人婢”的民谣，就是唐代工匠痛苦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张韶一挑头，就有许多染工毅然随着他造反。

三个月后，染工们的壮举在李唐统治集团中引起的惊悸犹未完全消除，宫闱深处又发生了一次“妖贼马文忠与品官季文德等凡一千四百人将图不轨”的事件。

唐文宗即位时，京师行政长官就向他奏报长安郊区经常有农民起义军出没，建议官健子弟若要习射，请令本司各制射垛教试，不得将弓箭出城，以防止有人假托习射把兵器送给农民起义军。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底，“如闻近日京城频有寇贼”的诏令，说明唐文宗认可的上述禁令难以阻遏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壮大，并由京畿逐渐潜入京师活动了。深感威胁的李唐统治集团，认为现有京兆府县的有关镇压机构太少，“防制实难，须假军司，共为捕察”，同时指令皇帝的御林军——左、右神策军，与京兆府联兵追捕农民起义军。凡是他们认为“是杀人及强盗罪迹分明，不计赃之多少”，便予决杀，并将这一诏令颁布全国，“其外县有军镇处，亦准此处分”，妄图以此高压手段，扑灭京师和天下的人民反抗斗争火焰。

唐武宗崇奉道教，热衷烧炼金丹，以求长生不老。为便于向道士询问神仙之事，迎其“下凡”，他命左、右神策军每日派军健三千于皇宫内苑运土，兴建高一百五十尺富丽堂皇的望仙楼，唐武宗求仙心切，欲楼早成，每日下敕令催筑，甚至取消每年寒食节放假七天的惯例，强迫军健拼命干活。军健“怨恨，把器仗，三千人一时衔声”愤怒抗议，唐武宗非常“惊怕”，急忙赏赐每人绢三尺，放假三天，以免事态扩大。

少数民族反抗斗争十分活跃。唐后期少数民族起义主要集中在剑南、关陇和岭南三个地区。

剑南。唐文宗开成年间，剑南东川一带“岁饥，盗赘结，酋豪自王，伪署官吏，发敖，招亡命，联蓬、泸、嘉、荣诸州，蛮落摇乱，根株磐炽”。剑南东川节度使卢弘宣发布告示，进行招谕和威胁，受骗投降的起义群众，强壮者被编入官军，体弱者被遣归乡里，首领遭到捕杀。唐宣宗大中末年，昌州（今四川大足）、泸州（今四川泸州）刺史贪残，以弱缯及羊强迫僚民购买，米麦一斛得钱不及一半，僚民愤怒异常，遂立酋长始艾为王，焚掠梓、潼一带，后被刺史刘成师诱降，七十余名首领牺牲。余部撤至剑南东川，又为节度使柳仲郢招降。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862年），资州（今四川资中）。泸州夷起义，攻打巴川县。

关陇。唐文宗太和开成年间，由于封疆大吏禁止商人贩卖党项羌需要的弓矢铠甲，并“恣其贪婪，不顾危亡，或强市其羊马，不酬其直（值），”引起党项羌的怨恨，遂相随聚众反抗，以致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盐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定边）之路梗塞不通。唐宣宗执政初年，居住在夏州（今陕西横山）和松州（今四川松潘）的党项羌，也经常起兵反抗唐王朝的统治，骚扰附近州县。唐统治者发诸道兵征讨，连年无功，劳民伤财。右补阙孔温裕上疏劝谏，唐宣宗大

怒，贬其为柳州司马。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十一月，唐宣宗以翰林学士刘瑑为京四招讨党项行营宣慰使。十二月复命凤翔节度使李业（一说李安业）、河东节度使李栻并兼招讨党项使，合两节度之兵进剿。唐宣宗也很清楚，党项羌起而反抗，皆因边帅“多怀贪剋，部落好马，悉被诛求，无故杀伤，致令怨恨”。因此，翌年正月，又以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进行招抚。然而进剿与招抚都难以将党项羌的反抗怒火扑灭。同年三月，唐宣宗以宰相白敏中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发兵时，还亲往安福楼饯行、赐物，开府卫之以禁军，礼与唐宪宗元和年间裴度讨伐淮西时相埒。四月，白敏中军于宁州（今甘肃宁县），远城使史元破平夏党项于夏州三交谷。唐宣宗一方面命夏绥节度使李福继续存抚平夏党项，在银、夏二州境内授以闲田，让其从事生产；另一方面，选择比较廉洁的儒臣，代替原来贪暴的边帅，以平息党项之怨。八月，南山党项也请降。多年的积怨是不可能立即消除的，故第二年四月，党项复扰边。

岭南。唐后期，西原人民继续进行反抗斗争。唐穆宗长庆初（公元821—822年），容管经略使严公素再次向朝廷上表，建议围剿黄少卿领导的西原义军。自称热悉岭南事的兵部侍郎韩愈，认为他的建议是重复裴行立、阳旻的错误，若行其议，则岭南决无宁日。他主张：（一）将容管经略使从容州迁至邕州，西原义军不敢轻易来攻。（二）在当地招募容邕人为兵，以利攻守，又免劳师费饷之弊。（三）以改元赦免西原义军，并择有才能威望和熟悉岭南事者为经略使，如果处置得当，西原义军必定望风降伏，岭南地区永绝叛乱。唐穆宗没有采纳韩愈的主张，而是坚持进行武力镇压。

西原义军在黄少卿领导下，不仅打败了官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而且主动出击。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六月，西原义军进击邕州，破左江镇。继而移军钦州，攻克千金镇，刺史杨屿抱头鼠窜于石南栅。翌年正月，西原义军复攻钦州，杀将吏。十一月，西原义军与环王合兵攻占陆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钦州东南），杀刺史葛维。东起今广东西南部，西迄今广西僮族自治区西南部的十八州，均为西原义军之天下。

唐文宗太和年间（公元827—835年），经略使董昌龄父子多次打败西原义军，“首恶皆擒”，“讨平峒穴，夷其种党”，被俘的起义群众和义军将士，有些被强行分配到附近州县，令自营生，有些则以奴婢之名，赏赐给屠杀义军“有功”的刽子手们，从此，西原义军人民反抗斗争转入低潮。

西原人民反抗斗争在沉寂了二十七年后，在唐懿宗咸通初（公元860—862年）又重新活跃起来。当时南诏在岭南地区频频进扰，咸通二年（公元861年）南诏入邕州，城邑居人什不存一。连年不绝的战争，使这里的人民遭受了空前浩劫。与此同时，为了更好镇压岭南人民反抗斗争，唐王朝于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分岭南道为东、西两道，后者的治所设在离西原州较近的重镇邕州，又将桂州管内龚、象二州，容州管内藤、岩二州划归岭南西道，以改变过去“委人太轻，军威不振”状况，加强对西原义军的镇压。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贪虐残暴，“设炮烙之刑，阖境怨之”。因此广大人民只好横下一条心，拿起武器再斗争，“远近罹盗扰”见于皇帝诏书，充分反映了人民反抗斗争的广泛开

展，及其对唐统治者的沉重打击。

唐王朝将从血腥镇压庞勋起义起家的著名刽子手辛说，调任岭南西道节度使。他到邕州后，派使者与南诏结欢，拆散它与义军中兵力最强的西原浓洞义军的联盟；同时又以美货收买义军的某些首领，妄图扑灭斗争烈火。但是，久经考验的西原义军将士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他们在广大人民支持下，一直坚持斗争到李唐王朝的覆灭。

从唐肃宗至德初兴起的西原人民反抗斗争，使一面反抗唐王朝封建统治的鲜艳战旗，在幅员辽阔的岭南地区上空，迎风飘扬了百余年，它不仅为有唐一代农民战争史增添了光彩，而且在中国农民战争的辉煌史册上亦属凤毛麟角。西原人民起义的历史，雄辩地说明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色厉内荏、人民的力量不可战胜，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

具有反封建性质的兵变不断发生。唐后期，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为了争权夺利，镇压人民反抗，竞相养兵。由于朝政腐败、士卒待遇菲薄，妻儿不免饥寒，又受将官欺凌，在连绵不绝战争中，充当统治者的牺牲品。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唐秘宗采纳宰相萧俛的建议："密诏天下军镇，每年限百人内破八人逃死"，称为销兵。被裁减的士卒，生活更加没有着落。有些地方藩镇，是用钱买的官。得官后，千方百计搜括民财，掠夺麾下士卒，以捞回更多东西，时人讥之曰"债帅"。在藩府代移之际，他们又往往奏称仓储丰实，朝廷则以"羡余"多为政绩优，褒其美职高秩，"藩府财赋，所出有常，苟非赋敛过差，及停废将士，减削衣粮，则'羡余'何从而致，比来南方诸镇数有不宁，皆此故也"。士卒的反抗采取兵变方式。士卒们杀死切齿已久的上司，烧毁官衙、抢掠钱财后，一哄而散。其结果，大多旋被镇压，或为朝廷新任命的节度使用屠杀与欺骗的手段镇压。也有一些兵变士卒逃往山林川泽，或加入当地农民起义队伍。如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六月，河阳军卒愤恨节度使李泳"寓籍禁军，以赂得方镇，所至恃所交结，贪残不法，其下不堪命"。士卒们焚毁节度使衙门，杀死李泳二子，"大掠数日方止"。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五月，湖南军乱，都将石载顺等逐观察使韩琮，杀"待将士不以礼"的都押牙王桂直，被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镇压。六月，洪州都将毛鹤（一说毛合），逐其观察使郑宪。唐宣宗以光禄卿韦宙为江西观察使，征发襄、鄂、许、蔡等邻道兵征讨。韦宙攻克洪州，杀毛鹤等五百余人。同年八月，宣歙将康全泰（一说康全大）逐其观察使郑薰，攻掠郡县，郑薰逃往扬州。淮南节度使崔铉兼宣歙池观察处置使率兵讨伐，康全泰被杀。这些兵变，是统治阶级营垒的分裂，削弱了镇压人民的军事实力。"潭、广、宣、洪，士马纷扰，得以恣其杀戮……贫富相易，父子不相保，人不聊生"的记载，反映了士卒们的反抗对当权统治者的打击，以及后者的恐惧心理。

北方人民反抗斗争较少。唐后期，北方人民反抗斗争比较沉寂，在西北和广大黄河流域，只有以下规模较小的零星起义，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87年）唐州（今河南泌阳）起义者"昼劫县官"。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起义军相当活跃，以致当地官吏不得不向朝廷奏请将已废的天平、平阴两县，复置平阴县，加强治安，镇压起义军。唐武宗会昌年

间，西北边陲的沙州（今甘肃敦煌）爆发了驿户氾国忠、邢兴和张清等倡首的起义。当时占领沙州的吐蕃奴隶主贵族残酷压榨当地人民，其中驿户又受驿将王命铨等的虐待。氾国忠等劫马取甲，夜越重城，千里奔袭沙州。由于蕃官防务松弛，没有料到起义者猝至，人吏散乱，难以抵御。起义者攻入子城，杀死监使，判咄等数名蕃官。蕃官节儿等被迫纵火烧舍，伏剑自裁。氾国忠等后被沙州贺□勾结寺院上层僧侣设诈擒获，钉枷押往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起义失败。唐宣宗大中七年（公元853年）底，华州（今陕西华县）一支力量颇强的农民起义军劫下邽县。

第三节浙东裘甫起义

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十二月，浙东“起自农亩”，的裘甫（一说仇甫、求甫）率百人起义，攻陷象山（今浙江象山），屡败官军。明州（今浙江宁波）地方官惊恐万分，昼夜紧闭城门。起义军进逼剡县（今浙江嵊县），“浙东骚动”。浙东观察使郑祗德遣讨击使刘勍，付将范居植将兵三百，会同台州（今浙江临海）军进剿。

咸通元年（公元860年）正月，裘甫义军与官军大战于台州唐兴县天台山桐柏观前，杀范居植，刘勍仅以身免。裘甫乘胜率千余义军攻打剡县，该县素无武备，“官吏奔骇”，义军据有县城。“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千人，越州大恐”。当时浙东、浙西长期安定，人不习战，兵器甲胄多朽钝，士卒不满三百，兵力十分薄弱。郑祇德召募新兵，“军吏受赂，率皆得孱弱者”。他派子将沈君纵，副将张公署、望海镇将李珪率领新兵五百进攻裘甫。二月，两军大战于剡西。裘甫设伏兵于三溪（今浙江嵊县西南）之南，而列阵于三溪之北，拦截溪水上流，但使有水可涉。交战不久，裘甫假意败走，当官军追击半涉溪水时，义军立即决截放水，大水滚滚而至，官军猝不及防，大败，“三将皆死，官军几尽”。裘甫义军取得这些胜利以后，声威远扬，于是原先战斗在山岭海岛间的小股农民起义军，以及其他流亡农民从四面八方前来聚义，裘甫义军迅速壮大到三万，分为三十二队，队有小帅，小帅中刘暀最有谋略，刘庆、刘从简则以勇力著称。远地的农民起义军也“皆遥通书币，求属麾下”。裘甫遂“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废弃唐王朝年号，“改元曰罗平，铸印日天平”，建立农民政权。又大张旗鼓地聚资粮，购良工，治器械，“声震中原”。

郑祇德一面不断向朝廷上表告急，一面向邻道求救。浙西派牙将凌茂贞（一说凌茂正）将兵四百，宣歙遣牙将白琮将兵三百驰援。这些兵将骄横不法，郑祇德“馈之，比度支常馈多十三倍，而宣、润将士犹以为不足”。他又要当地土军充当与起义军作战的挡箭牌，同时，“诸将或称病，或阳坠马，其肯行者必先邀职级”。这样腐朽的军队，无法派遣，只好龟缩在城里。义军的游骑至越州会稽县平水镇东的小江，城中豪富之家，“储舟裹粮，夜坐待旦，各谋逃溃”。

“每以越盗为忧”的唐懿宗，见郑祇德懦怯无能，地方官军难以镇压裘甫起义军，决定选派“在安南威服华夷，名闻远近”的前安南都护王式，代替郑祇德为浙东观察使。三月，王式在唐懿宗召见他时说，只要多给他兵，必能节省军费，并迅速镇压裘甫。如果兵少，不能打破义军，拖延岁月，义军势力会更加扩张，江淮一带的义军必将蜂起响应。

朝廷财赋尽仰江、淮，如果阻绝漕运，“则上自九庙，下及十军，皆无以供给”。唐懿宗乃摒弃了近臣所持“兵众则餽多”的异议，立即诏发忠武、义成和淮南等诸道兵。

袭甫分兵进攻衢州（今浙江衢县）和婺州（今浙江金华），婺州押牙房郅、散将楼曾、衢州十将方景深将兵据险拒守，义军难以攻取。袭甫又分兵进攻明州，该州地主豪绅为了保护货财和身家性命，串通一气，“出财募勇士，治器械，树栅，浚沟，断桥，为固守之备”。裘甫又遣兵进攻台州，破唐兴（今浙江天台）。接着，裘甫亲率万余义军攻夺上虞（今浙江上虞），入余姚（今浙江余姚），杀其县丞、县尉，东破慈溪（今浙江慈溪西南），占奉化（今浙江奉化），进诸暨（今浙江诸暨），据宁海（今浙江宁海），诛其县令陈仲通（一说陈仲翁），分兵重新围攻象山，势如破竹，地主豪绅惶惶不可终日。

朝廷命王式将兵围剿裘甫的诏令下达后，地主豪绅才心神稍安，而正与义军将领饮酒的裘甫却“闻之不乐”。义军将领刘晊对他说：我军有如此旺盛之众而策画未定，实在可惜。又说风闻王式智勇无敌，四十天内一定到来。建议裘甫立即引兵攻占浙东政治军事中心越州（今浙江绍兴），借其城廓，据彼府库，遣五千义军把守西陵（今浙江萧山县西），循浙江筑垒以拒王式，并大集舟舰，伺机长驱进攻浙西，飞跃大江，夺取扬州货财，充实自己，然后还军修守石头城（今江苏南京），“宣、歙、江西必有响应者”，再遣刘从简领兵万人循海袭取福建，这样，国贼之地尽入我手，则终身无忧。刘晊这一建议，在当时有利于打破唐王朝的围剿和起义事业的发展。但是裘甫没有采纳，佯称“醉矣，明日议之”。进士出身的王辂却说“今中国无事”，刘晊之策难以成功，故提出拥众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的所谓“万全策”，这实为一个被动挨打的不安全策。史称裘甫畏惧王式，“犹豫未决”，而事实上他是赞许后者的。

四月，王式至浙东。与一般将帅发兵后立即围剿农民起义军不同，他按兵不动，首先在官军内部修军令，严军纪。经此整顿，“告馈饷不足者息矣，称疾卧家者起矣，先求迁职者默矣”。其次，捕杀为保全身家性命而与义军暗中往来的文武将吏，处罚将吏中横滑者，严门禁、警夜周密，使义军难测其动向。第三，不置烽燧，“选懦卒，使乘健马，少与之兵，以为候骑”，以安定民心，并防止操利刃的勇卒轻易与义军交战而贻误军机。第四，选用龙陂监好马二百匹，召募“习险阻，使鞍马”的吐蕃、回鹘比配江淮者为骑兵，这些人原来处境穷困，王式既犒饮，又赒其父母妻子，皆泣拜欢呼，愿效死”，以加强官军战斗力。第五，“集土团诸儿为向导”，充分利用浙东地主武装配合作战。第六，令义军叛将洪师简、许会能为前锋，使其“立效以自异”。第七，“命诸县开仓廪以赈贫乏”，缓和阶级矛盾，企图以小恩小惠阻止农民起来造反，从根本上切断义军与农民的联系，并防止义军获得粮仓后更加壮大。第八，在上述基础上布置兵力：从诸营士卒及土团子弟中，选拔四千人，使导军分路进攻义军，而府下无守兵者，则以土团千人补充。命宣歙将白琮、浙西将凌茂贞帅本军，北来将韩宗政等帅土团，骑将石宗本率骑兵为前锋，从上虞趋奉化，以解象山之围，号东路军。以义成将建、忠武将游君楚、淮南将万璘帅本军与台州唐兴军合，号南路军。从东、南两面向裘甫义

军推进。同时下令“毋争险易（避免打硬仗，减少伤亡），毋焚庐舍，毋杀平民以增首级（与义军争夺民心），平民胁从者募降之（进行诱降），得贼金帛，官无所问（纵容官军抢劫财物，以鼓励士气），俘获者，皆越人也，释之（瓦解义军）”。由此可见，王式在镇压裘甫起义军时，不仅重视军事，而且非常重视政治作用，并将二者结合起来，说明他确实是一个极其阴险狡猾的家伙。

一切准备就绪后，王式向裘甫义军发起了大举进攻。南路军首先攻占义军的沃州寨（今浙江新昌东南）、新昌寨。四月二十三日，检校尚书工部郎中，前兼台州刺史李师望，奉诏分统义成、武宁、兖海、宣润等道兵一千七百人，与义军大战于天台观前，义军失利，官军占领唐兴县。五月，又大破义军刘暀、毛应天部于唐兴南谷，毛应天牺牲。东路军在宁海破义军孙马骑部。这时，应王式之请，唐懿宗又增派忠武、义成和昭义三道兵至越州助战。王式令忠武将张茵将兵三百屯唐兴，截断义军南出之道；义成将高罗锐将兵三百并拨部分台州土军，直趋宁海，攻打义军。昭义将跌戣将兵四百，助东路军阻遏义军进入明州的道路。接着，王式向义军发起了新的攻势。南路军大破义军于海游镇（今浙江宁海南），起义军退入甬溪洞（今浙江宁海西南）。官军屯于洞口，义军出洞拒战，失利。高罗锐袭破义军别帅刘平天寨，“自是诸军与贼十九战，贼连败”。刘暀对裘甫说，原先如果听从我的计谋入越州，就不会陷入今日困境。他愤怒地杀死王辂等进士，并说：“乱我谋者，此青虫也”。

不久，高罗锐攻陷宁海，虏逃散之民七千余人。裘甫率万余义军退屯宁海西南陈馆下。东路军在宁海西北的上畽村，击败义军孙马骑部，收降义军将领王皋后，移军大破裘甫，数千义军将士牺牲，裘甫委弃大量缯帛于路以阻追兵。由于王式为防止裘甫撤至海岛坚持长期反抗斗争，已命高罗锐把守宁海东北入海口，又令望海镇将云思益、浙西将王克容将水军巡逻海上，在宁海东与义军将领刘从简率领的水军相遇，刘从简不知官军猝至，弃船走山谷，义军的战船被焚毁十分之七。裘甫遂由险峻的黄罕岭（今浙江奉化西北、剡县东）悄悄撤退，于六月初重新回到剡县。张茵在被俘义军叛徒带领下，翌日跟踪追至，置营垒于剡县东南。越州风闻裘甫又入剡，“复大恐”。王式命东、南两路官军急趋剡县，共同围攻裘甫。

剡县城防坚固，义军守备严密，官军云集围攻，终不能破城。为粉碎官军欲断剡县水源阴谋，裘甫率军出击，“三日，凡八十三战”，城中的“女军”，也“乘城摘砾以中人（打击敌人）”，打得官军十分疲敝。裘甫“佯讫降”，以便突围。被王式识破后，裘甫又与官军接连鏖战三次。六月二十一日夜，裘甫、刘暀和刘庆率百余将士复以出降的形式打算突围，当裘甫“遥与诸将语，离城数十步”时，被王式早已伏下的官军“疾趋，断其后”，裘甫等措手不及，不幸被俘。刘暀、刘庆等二十余人在越州被王式残酷杀害。义军将领刘从简乘诸将陶醉于“擒（裘）甫，不复设备”，率领五百将士突围至大兰山（在今浙江奉化西北），据险自守。七月初，官军战败义军，刘从简撤至台州，为叛徒杀害。八月，裘甫在长安英勇就义。

浙东“倚山濒海，易以捍守”，自魏晋至唐，一直是农民进行反抗斗

争的重要据点。这种悠久的革命传统哺育了这里农民。裘甫起义前已有不少小股义军活跃在山海间，反映这里阶级矛盾尖锐，革命时机业已成熟。在这样好的条件下，裘甫本可做出更理想一些的起义事业来，但是作为义军领袖的裘甫，缺乏远大目标和战略眼光，没有看清全国起义高潮即将到来，不能根据蓬勃发展的斗争形势，将起义从浙东一隅引向全国并及时提出推翻唐王朝的鲜明战斗口号。浙东官军虽弱，但王式率领大批援军到来后，官军实力已大大增强。裘甫在强敌面前，缺乏敢斗必胜信心，犹豫观望，坐失战机，陷于被动挨打困境。王式仅用六十六天就一步一步地将起义镇压下去。

裘甫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唐末农民战争的战斗序幕。这次起义，前后八个月，革命烽火燃遍今浙江一带，屡败官军，杀死地方长吏，严重威胁唐王朝的漕运，威震东南，给予唐末统治者第一次沉重打击。

第四节庞勋起义

唐王朝虽将裘甫起义镇压下去，但唐末以来，各种社会矛盾仍在继续激化，农民反抗斗争在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如唐懿宗咸通初年（公元860—862年），寿州枞阳（今安徽六安）义军“四起，其邑将危”，义军设伏于丛莽间，一举击杀裨将何武，“兵尽骸（骇）逃”。咸通三年（公元862年）九月，邕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南宁）军卒发动兵变，驱逐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他狼狈逃至藤县（今广西僮族自治区藤县），“诈为敕书及攻讨使印，募乡丁及旁侧士军以攻邕州”，这种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动辄溃败”。蔡京又到桂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林）避难，“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纳。（蔡）京无所自容”。咸通八年（公元863年），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驱逐刺史刘仁规，“相与作乱”，刘仁规藏匿村舍，“民入州舍，掠其家赀，登楼击鼓，久之乃定”。至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在桂州爆发了著名的庞勋起义。

为了防御南诏的不断进扰，唐王朝曾于咸通三年敕徐、泗二州募兵两千至岭南戍边，分其中八百人守桂州，约定三年代还。六年过去了，徐、泗观察使崔彦曾等仍以所谓军帑空虚，发兵所费颇多为借口，拒绝戍兵多次提出的代还要求，并要他们再戍守一年。戍兵家人将此消息飞书桂州，平时受尽都押牙尹戡，教练使杜璋、兵马使徐行俭等将官欺凌的戍兵们忍无可忍，都虞候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王幼诚、刘景、付寂、王弘立和孟敬文等九人遂乘当地桂管观察使易人而新使未至之机，带领戍兵，于咸通九年七月哗变，杀死都将王仲甫，公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突入监军院，抢出兵器，“卷旂而归”故乡徐州。

戍兵们在庞勋率领下，从桂州结队出发，沿途“剽掠，州县莫能御”。朝廷风闻桂州戍兵哗变北归，于八月派高品张敬思“赦其罪，部送归徐州”。庞勋等以为朝廷不追究擅归之事了，故当崔彦曾的使者不断前来“慰抚”时，也多次回书致意，“辞礼甚恭”，并停止剽掠”。九月，庞勋的队伍行抵潭州（今湖南长沙），唐监军“以计诱之，使悉输其甲兵”，要解除戍兵们的武装。而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则严兵把守要害之地，企图将戍兵们一举歼灭。他们不敢入境，并开始认识到“朝廷所以赦之者，虞缘道攻劫或溃散为患耳，若至徐州，必菹醢矣”。于是庞勋等人拿出私财，打造兵甲，虚张舟航旗帜，“剽湘潭，衡山两县”，沿江东下，

经过浙江西部，进入淮南。

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懦怯，“以不奉（诛讨庞勋等）诏令”为借口，没有采纳都押牙李湘提出的伏兵高邮县、尽擒戍兵的建议，还“遣使慰抚，供给刍米”以求苟安。庞勋吸收逃亡士卒和贫苦农民加入戍兵行列，“招集银刀等都窜匿及诸亡命，匿于舟中，众至千人”。庞勋等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北），刺史杜一面“飨之于毬场，优人致辞”，一面严加戒备，故戍兵不敢轻举妄动。行至徐城（今江苏盱眙西北）时，庞勋和许佶等对戍兵们说：“吾辈擅归，思见妻子耳。今闻已有密敕下本军，至则支分灭族矣。丈夫与其自投网罗，为天下笑，曷若相与戮力同心，赴蹈汤火，岂徒脱祸，兼富贵可求。况城中将士皆吾辈父兄子弟，吾辈一唱于外，彼必响应于内矣。然后遵王侍中故事，五十万赏钱，可翘足待也”，除赵武等十二人忧惧欲逃外，皆呼跃称善。庞勋杀赵武，遣使携其首于崔彦曾，声称庞勋等远戍六年，怀念乡里，而赵武等“因众心不安，辄萌奸计，将士诚知诖误，敢避诛夷”，以麻痹对方。十月，使者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崔彦曾用严刑逼知真情，乃囚使者。庞勋在符离（今安徽符离），通过邮路致书崔彦曾，提出停止尹戡、杜璋、徐行俭职任，还徐戍卒“别置二营，共为一将”的要求。当时庞勋等离彭城仅一百二十里，阖城惊惧。崔彦曾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对策。团练判官温廷皓说：攻打戍兵有“三难”，而原谅他们有“五害”。“三难”是“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钩连，刑戮必多，三难也”。“五害”则是，“当道戍卒擅归，不诛则诸道戍边者皆效之，无以制御，一害也，将者一军之首，而辄敢害之，则凡为将者何以号令士卒，二害也。所过剽掠，自为甲兵，招纳亡命，此而不讨，何以惩恶，三害也。军中将士，皆其亲属，银刀余党，潜匿山泽，一旦内外俱发，何以支梧，四害也。逼胁军府，诛所忌三将，又欲自为一营，从之则银刀之患复起，违之则托此为作乱之端，五害也。”诸将也都认为，若放庞勋等入城，“必为逆乱”，后患无穷，不如乘其远来疲弊，将他们镇压。崔彦曾遂一面命牙将田厚简“慰劳”戍兵，进行欺骗，一面命都虞侯元密等将兵三千讨伐庞勋，并命宿州（今安徽宿县）出兵符离，泗州屯兵虹县（今安徽泗县）互为犄角助战。元密等至任山（在今江苏徐州西南）以北数里外埋伏，欲于戍兵进入驿馆后擒杀。庞勋捕得元密的“逻子”（暗探），遂作“偶人”为兵列于山下，悄悄离去，还攻宿州。至深夜，元密始知庞勋已撤走，又恐中伏击不敢追。次日，庞勋至符离，宿州乔翔将兵五百出战于虹县灵壁东的濉水上，望风奔溃。庞勋进击宿州。当时宿州缺刺史，又没有剩余兵将，观察副使摄州事焦璐决汴水以断北路，妄图阻止庞勋进攻宿州。由于水流尚浅，庞勋率军涉水而进，宿州遂为庞勋占领，焦璐狼狈逃走。当时“淮北大水，征赋不能办，人人思乱”。庞勋将从官府没收的货财分给百姓，同时募兵，“亡命者从乱如归”，一日之间参军者数千，大批农民加入庞勋军，桂州戍卒兵变开始向农民起义转化。庞勋加强城防守备，自称兵马留后。次日，元密军始至宿州城外，其时汴水水流已深，元密引兵渡水围城，“会大风，贼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延及官军营，士卒进则冒矢石，退则限水火，贼急击之，死者近三百人”。当天夜里，庞勋使妇人打更，搜集三百艘大船，满载资粮，在夜色掩护下悄悄撤离宿州，顺汴水而下，向泗州驶去。翌晨，元密始

知，“狼狈追之”。由于未暇进食，追及庞勋时，既饥又乏。庞勋停舟河堤下，伏兵千人于舟中，列阵堤外迎敌。元密军将至，阵上的庞勋军都走投陂中，元密以为怯战而逃，纵兵追击。这时，伏兵从舟中突然杀出，前后夹击，“自午及申，官军大败”。元密始知中计，慌忙引兵逃走，“陷于荷渲，贼追及之，密等诸将及监阵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余皆降于贼，无一人还徐（州）者”，“亡命者归贼如市”。庞勋从被俘官军知彭城无备，遂乘胜北渡濉水，踰山直趋彭城。崔彦曾一面移牒附近州县求救，一面堵住城门，强迫百姓上城防守，“悉诛贼家属”，但“内外震恐，无复固志”。唐朝末年，彭城结聚山林的小股农民起义不断出现，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农民起义军还曾一度攻“入徐州，杀官吏”。唐统治者对他们或血腥镇压，或招入军中，或遣送到岭南戍边，庞勋麾下的骨干许佶、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等就是当年“徐州群盗，州县不能讨，招出之，补牙职”。庞勋带领六、七千人的队伍，打回彭城，慰抚城外居民，“无所侵扰，由是人争归之”。义军很快攻克外城，崔彦曾退保内城。广大民众帮助义军攻城，“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庞勋率军在大火浓烟中四面斩关而入，拿下彭城，活捉崔彦曾等文武官员，将戍兵们痛恨的尹勘、杜璋和徐行俭“刳而剉之，尽灭其族”，当天就有一万余人参加庞勋队伍。庞勋以许佶为都虞候，赵可立为都游奕使，“党与各补牙职，分将诸军”。又命原徐州旧将刘行及将千五百人屯濠州（今安徽凤阳东），李圆（一说李员）将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将千人屯宿州，“自余要害县镇，悉缮完戍守”，建立政权。

由于彭城向为关东重镇，感化军节度使治所，“自隋氏凿汴以来，彭城南控埇桥，以扼汴路，故其镇尤重”。庞勋占领该城，沉重地打击了唐统治者，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民众的反抗斗争。因此，庞勋扩军，民众踊跃参加，“至父遣其于，妻勉其夫，皆断组首而锐之，执以应募。”“不旬日，其徒五万”。原先活跃在光州（今河南潢川）、蔡州（今河南汝南）、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兖州（今山东兖州）、密州（今山东诸城）、沂州（今山东临沂），以及淮浙一带的小股农民起义军，也相继投奔到庞勋的旗帜下，桂州戍兵哗变已发展为戍兵与农民相结合的农民大起义了。

庞勋命谋士周重起草了一道表文，上奏朝廷，声称“臣之一军，乃汉室兴王之地，顷因节度使刻削军府、刑赏失中，遂致追逐。陛下夺其节制，翦灭一军，或死或流，冤横无数。今闻本道复欲诛夷，将士不胜痛愤，推臣权兵马留后，弹压十万之师，抚有四州之地。臣闻见利乘时，帝王之资也。臣见利不失，遇时不疑，伏乞圣慈，复赐旌节。不然，挥戈曳戟，诣阙非迟”。就是说，庞勋打算拥兵徐州，要求唐王朝承认现状，任命他为节度使，否则就要率军打进长安，称王称帝。

尽管唐统治者不同意庞勋提出的要求，但却要利用这一点因而抚之，一面派人不断与庞勋周旋，一面利用争取到的时间，调兵遣将，以便时机成熟时，一举将起义镇压下去。庞勋对唐统治者的阴谋缺乏认识，没有乘攻下彭城、广大农民革命热情高涨的大好时光，猛烈扩大战果，把斗争推向新高潮，而是相反，在政治上，消极等待唐王朝的任命，他因而不杀崔彦曾等也是出于求节钺的需要。在军事上则采取满足于抚有四州之地的保守主义方针。总之，把自己局限于徐州及其附近一

隅，没有及时提出符合广大农民愿望和要求的明确斗争钢领，涣散了斗志，整个起义陷于被动局面。因此，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尽管庞勋义军打了一些胜仗，但进展显然迟缓。

刘行及攻打濠州，至涡口时，“道路附从者增倍”。濠州兵仅数百，刺史卢望回素无设备，不知所措，遂“开门具牛酒迎”义军。而泗州刺史杜却早已“完守备以待之，且求救于江、淮”。故当义军将领李圆的百名前锋至该州时，杜假意迎劳，诱入城中全部杀害。李圆率军围攻，杜凭坚拒守。由于泗州地当淮河与通济渠交会处，向为兵家必争之冲要，庞勋增兵至万余，但终不能攻拔。十一月，徐州邻近诸州也纷纷派兵占据要害之地，以对抗义军。不过，因其兵少，义军势众，故屡败于义军，义军攻破鱼台、金乡、砀山和单父等十余县。

唐王朝派高品康道伟赍敕书至彭城，进行“抚慰”。庞勋亲至郊外迎接，“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陈甲兵，号令金鼓响震山谷，城中丁壮，悉驱使乘城，宴请康道伟于毬场，使人诈为其他义军降者数千人，“诸寨告捷者数十辈”。庞勋这样做，一是以示欢迎，二是（更主要的）显示自己的实力。康道伟回京时，庞勋“复作求节钺表，附道伟以闻”。有人见庞勋热衷求节钺，就乘机进言：“留后止欲求节钺，当恭顺尽礼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内抚百姓，庶几可得”，庞勋“虽不能用”，但颇为欣赏，故在唐皇帝死亡的所谓国忌日，遵照朝廷惯例至寺院行香，犒劳将士时，也象地方节度使一样，先向朝廷所在的西方拜谢。

唐王朝一切准备就绪后，又遣敕使至徐州，继续与庞勋周旋。庞勋以为必赐旌节，“众皆贺”。而敕使带来的只是“但赍崔彦曾及监军张道谨，贬其官”，而无节钺。庞勋大失所望，“遂囚敕使，不听归”。

接着，唐王朝以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当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征发魏博、延、义武、凤翔诸道兵以隶三帅。同时命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浑、达靼和契苾酋长各帅其众，共“二十万”人，分南、北两路讨伐庞勋义军。又诏司农卿薛琼出使淮南、庐、寿、楚等州，“点集乡兵以自固”，利用反动地主武装协同作战。

当时“两淮郡县多陷，唯杜守泗州”。庞勋因李圆久攻泗州不下，以吴迥为将，昼夜“百道急攻”。敕使郭厚本将淮南兵一千五百人救泗州，至供泽镇（在今江苏淮阴县境），畏惧义军，逗留不进。泗州团练判官辛谠，夜乘小舟潜至洪泽镇求教，郭厚本不答应。吴迥攻泗州更急，城中几不能御。辛谠复往郭厚本处求救，受到淮南都将袁公弁反对，经辛谠力争，又“恸哭终日”，郭厚本才发兵五百（一说三百）。辛谠驱兵至淮北进攻吴迥，杜倡于泗州城上布兵与之呼应，义军败走。庞勋命刘佶将精兵数千驰援吴迥，再攻泗州。濠州义军将领刘行及遣其将王弘立引兵前来助战。唐镇海节度使杜审权也命都头翟行约将四千官军救泗州。义军歼翟行约于淮南后，进围郭厚本和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派来援救泗州的李湘率领的五千官军于都梁城（今江苏盱眙南）。义军致书于令狐绹，表示只要朝廷赐予节钺，就立即归顺，令狐绹在向朝廷奏请节钺的同时，命李湘戍守淮口，不得随意行动，因而李湘军。解甲安寝，去警彻备，日与贼军相对，欢笑交言”。十二月初，义军发起突然袭击，步骑直捣李湘营垒，其军猝不及防，“五千人皆被生絷（活捉）”，一举攻占

都梁城，并将俘获的李湘，郭厚本押送徐州。义军遂占据淮口，切断了东南漕运入长安之路。此后义军设置水寨，用铁索横断淮水，昼夜不息地急攻泗州。

为了打破唐王朝的战略包围，庞勋乘诸道官军尚未到齐之机，主动出击。当时，康承训军扎营新兴镇（今河南宁陵县南），屯兵柳子镇（今安徽宿县西北）的义军将领姚周出兵拒战。仅万人的康承训寡不敌众，退屯宋州（今河南商丘），以待援兵。庞勋分遣其将丁从实等各将数千人南攻舒州（今安徽潜山）、庐州（今安徽合肥），北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占领沭阳（今江苏沭阳）、下蔡（今安徽风台）、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巢县（今安徽巢县）、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杀滁州刺史高锡望，和州刺史崔雍望风而降。

闰月，戴可师将兵三万（一说二万）在淮南进攻义军。义军多次失利，“尽弃淮南之守”。戴可师进而围攻都梁城。城中义军很少，遂诈称“方与都头议出降”。他以为义军窘迫欲降，就主动后退五里。义军于深夜从城西涉水撤出都梁城。翌日清晨戴可师入空城，恃胜不设备。恰逢大雾弥漫，濠州义军将领王弘立抓住战机，率军数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捷径奔袭都梁城。戴可师正大醉，“官军不及成列，遂大败，将士触兵及溺淮死，得免者才数百人，亡器械、资粮、车马以万计，贼传可师及监军、将校首于彭城”。庞勋借此大捷之威，进围当时江、淮往来唯一要冲——寿州（今安徽寿县），夺取诸道向朝廷缴纳的贡献和商人货财，再次切断了唐王朝的汴路漕运，给唐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庞勋又“作露布，散示诸寨及乡村，于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

庞勋不仅以凌厉的攻势一举打垮了官军的南面进攻，而且在北面战线上也粉碎了敌人的政治诱降，王晏权“数月招携，啗之以利，民口卒无革心者”。王晏权是王智兴侄儿。唐王朝以其为北线之帅，本欲借王智兴原在徐州多年为将帅的“威名”，“以怖贼，及是，反为贼困，不敢战”。义军向王晏权发起多次进攻，“王晏权兵数退衄”。

在有利形势下，庞勋没有趁势转入外线作战，而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都梁城大捷后，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进围寿州后，“勋益自骄，日事游宴”。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惧怕义军继续进攻淮南，利用庞勋求节钺的弱点，遣使表示“许为奏请节钺”。对唐统治者仍抱有幻想的庞勋，“乃息兵俟命”，令狐绹则“收散卒，修守备”，伺机卷土重来。

唐王朝在命诸道兵急赴战场的同时，又走马换将，把丧师怯战的王晏权和令孤绹撤职，以左卫大将军马举（一说马士举）为淮南节度使，充徐州南面招讨使，以泰宁军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招讨使，屯兵于滕县（今山东滕县）、沛县（今江苏沛县）。前天雄节度使何全皞也遣其将薛尤将兵一万三千人助战，军于丰县（今江苏丰县）、萧县（今安徽萧县西北）从西北威胁义军大本营——徐州，康承训则将诸道军七万余人屯柳子之西，自新兴至鹿塘（今安徽永城南）三十里，壁垒相望，从西南进逼徐州。在官军重兵压境三面包围下，义军处境十分不利。因为义军分戍四境，兵力分散，徐州城中义军不到数千人，义军诸寨还纷纷要求增加兵力。由于应募者寡，“民多穴地匿其中”，庞勋派人“搜掘为兵”。同时，与庞勋一起哗变的桂林戍兵“尤骄暴，夺人资财，掠人妇

女，勋不能制”，逐渐丧失了人心。因此，义军控制的。境内之民皆厌苦之，不聊生矣”。当时江淮地区又有旱灾和蝗虫，野心勃勃的义军将领孟敬文甚至企图取庞勋而代之。

咸通十年（公元869年）正月，官军进攻丰县，庞勋命心腹将将兵三千驰援。进攻海州的义军，因遭官军破坏桥梁的暗害和伏兵的突袭而全军覆没。进攻寿州的义军也被从淮、浙而来的官军所破，损兵数千。辛说搬来的浙西官军携带米、盐，则在楚州（今江苏淮安）突破义军水陆防线，进入被围的泗州城。

二月，义军将领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请独将所部三万人破康承训军，得到庞勋赞同。王弘立引兵渡过濉水，袭围鹿塘寨，“自谓功在漏刻”、麻痹轻敌，在沙陀骑兵和寨中官军的反击下，义军大败，“官军蹙之于濉水，溺死者不可胜纪，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斩首二万余级。弘立单骑走免，所驱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复还营，委弃资粮器械山积”。为了瓦解义军，唐王朝救令“诸军破贼，得农民，皆释之”，故此后每当义军与官军作战时，有些义军就溃散。三月，康承训打败王弘立后，率军进逼柳子，与义军守将姚周“一月之间数十战”，其后康承训因风纵火，姚周弃寨撤退时，又遭沙陀骑兵追击，“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姚周将麾下数十人（一说十骑）奔宿州。该州义军守将梁丕“素与之有隙，开城听入，执而斩之”。周重声泪俱下地对庞勋说：“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谋，今一旦覆没，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号，悉兵四出，决力死战”，又劝庞勋杀崔彦曾，义军将领都表示赞成。

在此生死存亡关头，庞勋当机立断，接受了周重的建议。四月，庞勋杀死崔彦曾及其幕僚等，并“断淮南监军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训军”，同时召开大会，对大家说：“勋始望国恩，庶全臣节；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勋与诸君真反者也，当扫境内之兵，戮力同心，转败为功耳”，“众皆称善”。庞勋的言行说明他在残酷的斗争中逐渐认清了唐统治者的虚伪面目，毅然改正求节钺的错误，决心与敌人血战到底，因而得到了广大义军将士热烈拥护。庞勋命全城男子集于毬场，挑选丁壮，得三万人，重新制办了旗帜，组建了新军。许佶等共推庞勋为天册将军、大会明王。他谦逊地辞去了王爵。此后庞勋再也没有向唐统治者求节钺，并以极大努力领导义军顽强战斗，但为时已晚，当时整个局面已不利于义军。

由于魏博官军屡围丰县，庞勋决定首先从此打开缺口。他深夜潜入城中，纵兵围困近丰县城的一座官军营寨作诱饵，伏兵要害之地，以消灭运动中的大量援敌。另外四寨官军果然来救，被伏兵杀二千人。魏博军畏惧义军势众，“知（庞）勋自将，惊而溃”。正在围攻滕县（今山东滕县）的曹翔风闻魏博军溃散，赶紧引兵退保兖州（今山东兖州）。义军“悉毁其城栅，运其资粮，传檄徐州”，出师数日，“摧（敌）七万之众”，声势复振。

庞勋乘丰县之胜引兵西击康承洲，至萧县，又约襄城、留武、小睢等寨义军共五、六万人，准备于四月二十九日夺回柳子。庞勋的进一军事计划不幸被混在义军中的淮南败卒密告康承谰，后者立即秣马整众，暗中设下伏兵。襄城等地义军先至柳子，中伏败走。庞勋仓促引兵自三十里外奔赴柳子时，诸寨义军已败，庞勋军“皆不战而溃”。康承训倾巢

而出追击，以骑兵邀前、步兵蹙后，两面夹击，义军损失数万人，“（庞）勋解甲服布桥而遁，收散卒，才及三千人，归彭城”。

马举将精兵三万，分三路北渡淮河援救泗州，他用纵火焚栅之法，打败义军，义军大将王弘立英勇战死，吴迥退深徐城，义军不得不从围攻七月之久的泗州撤围。五月，当沂州（今山东临沂）官军围攻下邳（今江苏邳县南）时，庞勋命郑镒率所部援救，郑镒见庞勋屡败、官军势强，率部投降了官军。

六月，唐王朝又诏黔中观察使秦匡谋参与围剿。马举从泗州出兵攻打濠州，占领濠州管辖的招义（今江苏盱眙西）、锺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定远（今安徽定远东南）。义军将领刘行及在濠州城外筑寨拒守。马举用佯攻其西、猛击其东南之策，焚毁其寨，刘行及退入城中坚守。马举在城东、南、西三面掘堑，继续围攻濠州。庞勋命吴迥屯兵淮水北岸，助刘行及御敌。马举派兵攻打吴迥，义军损兵数千，营寨被平毁。唐王朝又以神策军将军宋威力徐州西北面招讨使，将兵三万屯军丰县与萧县之间。曹翔引兵相会，共同进遥徐州。

七月，康承训攻克临涣（今安徽永城东南），进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占领滕县（今山东滕县），进击丰县、沛县（今江苏沛县）。

在敌人步步进逼、义军不断失利情况下，义军内部矛盾也日益暴露。一些义军叛逃，保据山林，反过来劫杀义军，其中尤以五八村最甚，叛徒陈全裕拥叛卒数千人，“战守之具皆备，环地数千里”，深为义军之患，后被康承训招降。沛县义军守将李直诣彭城计事，裨将朱玫举城降于曹翔，并在其指使下，攻占义军的丰县、徐城和下邳。庞勋兵攻打陈全裕和朱玫，皆不克而还。小校诸葛爽见庞勋势衰，遂裹胁百余人，与泗州守将阳群（一说汤群）降唐。蕲县（今安徽宿县南）土豪李兖也杀义军守将，举城降于康承训。

康承训乘机长驱直进，攻拔宿州之西的第城驿，围困宿州。宿州是义军拱卫大本营——徐州的重要屏障。义军将领张儒、刘景、张实等将兵数万，列壁相望，环水自固，以拒官军。张实向庞勋建议道：“今国兵尽在城下，西方必虚，将军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围而西，将军设伏要害，迎击其前，实等出城中兵蹙其后，破之必矣”。庞勋采纳其策，命其父庞举直和许估镇守徐州，亲率二万义军西征，力图扭转不利战局，挽救起义大业。

同年八月，康承训焚毁宿州外塞，义军退保罗城。康承训见硬攻不行，就“遗辩士以威动（张）玄稔”。宿州把守子城的义军将领张玄稔，原系徐州旧将，“尝戍边有功，虽胁从于贼，心尝忧愤”。见官军攻城甚急，宿州危在旦夕，遂夜召亲信数十人谋划投降。他派心腹张皋深夜前往康承训营联络，以便里应外合。九月，张玄稔一伙用突然袭击的诡计杀害张儒、刘景等人，开门出降，康承训兵不血刃地垂手而得宿州。张玄稔还引狼入室，向康承训献毒计道：“今举城归国，四远未知，请诈为城陷，引众趋符离及徐州，贼党不疑，可尽擒也”。他纵火焚宿州，如城陷军溃之状，引兵至符离，符离义军不知其诈，张玄稔杀守将，收兵万人。张玄稔至徐州，围而不攻，先向城上义军发起攻心战，说“朝廷唯诛逆党，不伤良人；汝曹奈何为贼城守？若尚狐疑，须臾之间，同为鱼肉

矣”。潜伏在徐州城里的崔彦曾亲信原徐州故吏路审中，偷偷打开徐州“南白门，官兵入”，庞举直、许佶率领义军将士坚守子城，“拒守者三日”。在从北门突围时，庞举直和许佶不幸被追兵击杀，义军将士临危不惧，奂勇杀敌，宁愿赴水而死，也不屈膝。

康承训占领徐州后，立即引步骑八万追击庞勋。庞勋奔袭宋州（今河南商丘），虽陷其南城，终因城中有备，难以攻取，遂强渡汴水，南攻亳州（今安徽亳县）。康承训军先锋朱邪赤心所将数千骑兵尾追而至。庞勋引兵循涣水东进，将归彭城，未进饮食，至蕲县，将渡涣水。唐将李兖“发桥，勒兵拒之”。九月九日庞勋至县西，官军大队人马赶到，向义军发起总攻，庞勋及义军将士忍饥英勇抗敌，终因众寡悬殊而失利，庞勋英勇战死，近万名义军将士捐躯，其余绝大多数义军将士宁投水死也不苟活，表现了农民起义军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宋威攻取萧县，宿迁等寨降于军官。但是，濠州义军在吴迥率领下巍然屹立于敌人深堑重围中，孤军奋战，儿童和妇女也“运薪塞隍”御敌，马举“自夏及冬不克”。十月，义军粮尽，才不得已夜中突围，吴迥在招义牺牲。至此，庞勋起义失败。

庞勋起义是继裘甫起义后又一次大规模人民反抗斗争，是对唐末统治者的第二次沉重打击。在短短的一年零二个月里，起义军转战于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湖南、安徽、浙江、江苏、河南及山东广大地区，攻占过徐、宿、濠、滁、和等“十余州”，拥“众二十万”。庞勋起义军“斩官吏”，打得官军数易将帅，狼狈不堪。特别是庞勋起义军一再截断江淮至长安的漕运通道，卡住了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几置其以死地。由于“庞勋盗据徐州，久屯戍卒，连年飞，物力方虚”，“罄国币以佐军”，不仅大大加剧了唐王朝本已极其困窘的财政危机，而且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如专权宦官以镇压庞勋为借口，讽令地方藩镇贡奉助军钱，并从中索贿。检校兵部尚书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牛蔚，“尽索军府之有三万端匹，随表进纳”，没有另给宦官重贿，“中官怒，即以神策将吴行鲁代还”，庞勋起义还打乱了唐王朝封建统治秩序，咸通十年正月，“以徐州用兵罢元会”，甚至不得不破例，“礼部贡举，宜权停一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天下缘此以至瓦解”的史论，就是这次起义在有唐一代农民战争史上重要地位的写照。

正因为庞勋起义猛烈地冲击了唐王朝的反动统治，唐统治者恼羞成怒，在将起义血腥镇压下去后，还要对起义军将士和起义军群众报复，如官军攻占徐州后，“悉捕戍桂林者亲族斩之，死者数千人”。在《平徐州推恩制》中，凡庞勋亲属及桂州回戈逆党为贼胁从、及纵因战阵拒敌官军、招谕不悛、惧法逃走”者，列为惩处对象，并特别规定：徐、宿、濠三州城内，“庞勋及桂州逆党亲属，并为庞勋腹心谋议凶徒，须加刑戮”。对于逃亡义军将士，张贴告示，要他们“两月内所在陈首”投降，还要对起义将士和起义群众在起义过程中捣毁、或没收的地主豪绅的田宅、仓窖等产业归还原主。

广大义军将士和起义群众没有被唐统治者的血腥屠杀和经济剥夺所吓倒、征服。幸存下来的部分义军将士和起义群众，继续坚持斗争。史称：庞勋“余党犹相聚闾里为群盗，散居兖、郓、青、齐之间”。唐统治者十分恐惧，宰相路岩、韦保衔上表弹劾康承训“不能尽其余党”之罪，

唐懿宗将其贬为蜀王傅、分司，旋再贬力恩州司马。又命徐州观察使夏侯瞳“招渝”。义军将士不为所骗，依然进行反抗斗争。唐传宗即位初，反抗斗争更加活跃，“州县不能禁”，朝廷“敕兖、郓等道出兵讨之”。这时新的革命高潮已经来临，王仙芝、黄巢起义相继在山东爆发。这支队伍，有可能和王仙芝、黄巢率领的起义大军相结合，一起进行彻底推翻李唐黑暗统治的新斗争。

第五节王仙芝起义

裘甫、庞勋起义虽然先后被镇压下去，由于促成这些起义爆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并未解决，并且日趋激化，所以农民反抗斗争仍在发展之中。

庞勋起义失败不久，光州（今河南潢川）农民就把刺史李弱翁驱逐了。翌年四月，宰相路岩充西川节度使，当他出长安时，“路人以瓦砾掷之”，为防止遭到百姓更历害袭击，路岩请求权京兆尹“发人防卫”。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十二月，商州（今陕西商县）刺史王枢，“以军州空窘，减折籴钱”，不堪压榨的民众“相帅以白挺殴之，又殴杀官吏二人”，新任刺史李浩杀民众李叔汶等三十余人，尽管朝廷谏官们污蔑农民造反是“乱上下之分”，要“严诛以惩来者”，然而，也不能否认“刺史不道，百姓负冤”的事实。正因为百姓“无所控诉”，遂相聚起义，“所在蜂起”，终于发展为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五月，濮州（今山东鄄城东北）人王仙芝在濮阳（今河南濮阳南）聚集数千人起义（一说有众三千），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向天下诸道发布声讨唐王朝的檄文，“言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号召全国广大农民起来造反。王仙芝手下有尚君长、柴存、毕师铎、曹师雄、柳彦璋、刘汉宏和李重霸等骁将，在今河南、山东等地攻州打县，夺取地主豪绅的财物。

六月，王仙芝攻占濮州、曹州（今山东曹县北），天平节度使薛崇出兵镇压，被义军击败。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人黄巢，与其兄弟黄思邺（一说黄邺）、黄思厚、黄万通、黄揆、黄秉、黄存、黄钦和外甥林言等聚众数千人起义，响应王仙芝。他与王仙芝一起“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在王仙芝、黄巢起义军的推动下，农民反抗斗争迅猛发展起来，至同年十一月，农民起义军“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

刚上台的唐僖宗急忙诏令淮南节度使、忠武节度使、宣武节度使、义成节度使、天平节度使和监军，加紧“讨捕及招怀”，妄图用军事镇压和政治诱降的软硬兼施手段，将方兴未艾的农民起义扑灭。

同年十二月，王仙芝攻打沂州（今山东临沂），官军守城拒战。平卢节度使宋威上表朝廷，请求以步骑五千别为一使，兼帅本道之兵讨伐农民起义军。唐僖宗遂以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特赐禁军三千，甲骑五百，并命河南地区藩镇所遣诸军均由宋威指挥。

乾符三年（公元876年）正月，天平军节度使遣将张晏等援救沂州，当该军还至义桥时，“闻北境复有盗起”，留其抵御，张晏等不服从命令，并叫闹着回天平军节度使驻地郓州（今山东东平）。都将张思泰、李承祐走马出城“裂袖与盟”，以美酒佳馔慰谕，才将他们敷衍走。为防止事态扩大，唐王朝只得诏令本军进一步抚慰，不许追究。

二月，唐王朝诏令福建、江西、湖南诸道观察、刺史，都要训练士卒；同时诏令天下乡村设置弓刀鼓板，组织地方武装，“以备群盗”。四月，又密诏宣武节度使、感化节度使和泗州防御使挑选精兵数百，于巡内游弈，“五日一具上供钱米平安状闻奏”，以免东南地区运往长安的漕运网船为农民起义军夺取。

七月，宋威将兵击王仙芝于沂州城下，义军失利。鉴于官军势强，义军兵力尚弱，为了保存实力，王仙芝遂避开优势之敌，化整为零。宋威捕捉不到义军去向，便向朝廷谎报战功，奏称“（王）仙芝已死”，遣散诸道人马，他本人也回青州（今山东益都西北）老窝去了。王仙芝迅速集结队伍，继续攻打州县，故为时不过三日，正当朝廷文武百宜弹冠相庆“胜利”时，州县的告急奏报已纷纷飞入京城。唐僖宗复命诸道兵进讨，而刚得休息的兵士皆忿，思乱。

王仙芝乘敌人兵力空虚之机，于同年八月长驱西进，攻占阳翟（今河南禹县）、郏城（今河南郏县）。上任伊始的郏城令陆存，“微服将遁”，为义军俘获。他伪称做饭的“庖人”，义军首领命其溲面煎油作食。因久作不成，吓之以剑。陆存惊慌失色，“急撮面，两手速拍曰：‘祖祖父父，世业世业”，狼狈不堪，“众大笑”。王仙芝“不十日破八县”，兵锋直指东都。

唐僖宗大为恐慌，急命忠武节度使崔安潜主动出击，从义军背后插一刀，同时火速调兵增援。他命昭义节度使曹翔，将步骑五千，与义成节度使共卫东都宫。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镇守洛阳。又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二千北上驻军汝州（今河南临汝）、邓州（今河南邓县）要道。凤翔节度使令狐绹和邠宁节度使李侃选步兵一千、骑兵五百进屯屏障长安的战略要地陕州（今河南陕县）和潼关（今陕西潼关），拼凑起一条以洛阳为中心的防线，妄图阻遏王仙芝西进，并将义军聚歼于洛阳东南部一带。在官军云集、敌强我弱形势下，九月初，王仙芝毅然率军猛攻汝州城，在城东苦慕店，除一骑漏网外，官军全部被俘，占领汝州城，取得杀死唐将董汉勋、刑部侍郎刘承雍，生俘刺史王镣的重大胜利。“东都大震，百官脱身出奔。”有产者也纷纷“挈家逃出城”，整个洛阳城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唐僖宗“弥切警忧，心如纳隍，手若驭索，便罢重阳内宴，以示焦怛之怀”。下诏“赦王仙芝、尚君长罪，除官，以诏谕之”，妄图以高官厚禄收买王仙芝等。王仙芝没有理会唐僖宗的引诱，也没有攻打洛阳，而是北上攻占阳武（今河南原阳）。继攻郑州（今河南郑州）时，在中牟（今河南鹤壁西）败于唐昭义监军判宫雷殷符。十月，王仙芝攻打唐州（今河南泌阳）、邓州。十一月，又继续南进今湖北，一举攻占郢州（今湖北京山）、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十二月，王仙芝以凌厉攻势北上攻克申州（今河南信阳），向东击破光州（今河南潢川）、寿州（今安徽寿县）、庐州（今安徽合肥）、舒州（今安徽潜山）等地，声震江淮。惊恐不已的淮南节度使刘邺，急忙向朝廷乞求救兵。唐僖宗命感化节度使薛能发精兵数千驰援。王仙芝命尚让率军入据查牙山（在今河南遂平西南），官军退保邓州。

在近半年里，王仙芝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以高昂的斗志，“出彼入此，鸟逝风驱”的迅猛动作，在今山东、河南、湖北和安徽等省广大地区流动作战，打得官军顾此失彼，损兵失地，到处奔波，穷于应付。畏惧义军的招讨使宋威，为保存自己实力而滞留亳州（今安徽亳县），他私下对曾元裕说：“昔庞勋灭，康承训即得罪。吾属虽成功，其免祸乎？不如留贼，不幸为天予，我不失作功臣”，故其“殊无进讨之意”。曾元裕则拥兵蕲州（今湖北蕲春）、黄州（今湖北新洲），“望风退缩”。关东诸道兵，“但守城而已”，彻底粉碎了唐王朝的围剿，义军迅速壮大到三十万人，声势浩大。

宰相郑畋上书朝廷，猛烈抨击宋威和曾元裕，说宋威衰老多病，自其妄奏祈州“大捷”后，王仙芝愈益兴旺，如果扬州失守，则“江南亦非国有”，要求罢工人之官。唐僖宗遂以陈许节皮使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以前鸿胪卿李琢代宋威为招讨使，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代曾元裕为招讨副使。在继续调兵遣将重新布署围剿王仙芝义军的同时，加强政治攻势，以名利进一步收买义军领袖人物，从内部瓦解义军。

王仙芝攻打蕲州，该州刺史裴偓是宰相王铎知贡举时所中进士。义军所俘原汝州刺史王镰是王铎堂弟。他写信给裴偓，要其为王仙芝向朝廷请求封官。又劝王仙芝答应裴偓提出的“敛兵不战”的要求。

王铎是朝廷中主张招降起义军的代表人物。他完全支持王镣和裴偓的行为。其他宰相却多持异议，说“先帝不赦庞勋，期年卒诛之。今王仙芝小贼，非庞勋之比，赦罪除官，益长奸宄”。经过一番争吵盾，唐僖宗批准了裴偓的奏请，派专使到蕲州授予王仙芝左神策军押牙兼御史大夫的官街。左神策军押牙，是皇帝御林军里掌管仪仗负责警卫的军官。监察御史“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寮，巡按州县、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皆莅焉”。

裴偓邀请王仙芝入蕲州城，王仙芝带领黄巢等三十余人前往。裴偓置酒设宴，“大陈货贿以赠之”。王仙芝对朝廷授予的官街，“得之甚喜”。随从将士甚为不满，“喧噪不已”。黄巢质问王仙芝：“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并怒不可遏地“殴仙芝，伤其首”。王仙芝见众怒难犯，被迫表示不接受朝廷宫街。于是义军占领蕲州，杀死大批官吏豪绅，焚其宅舍，裴偓逃往鄂州（今湖北武昌），专使逃往襄州（今湖北襄樊市）。唐王朝的诱降阴谋虽未

得逞，但义军内部却从此分裂，王仙芝率三千余人，黄巢领二千余人分道扬镳了。在当时敌强我弱形势下，这种分兵，削弱了义军实力，不利于农民反抗斗争。

乾符四年（公元877年）正月，主仙芝攻取鄂州。二月，唐王朝将浙西王郢起义（后详）镇压下去。三月，向天下发布《讨草贼诏》，动员全部官军和地方武装镇压王仙芝及各地义军：命诸道帅臣“选练骁勇将卒，分兵截道，并力合威，必务剪除，不得纵玩。其主兵大将，若全擒戮得一大草贼，数至三百已上者，超授将军，仍赏见钱一千贯文。如斩首级稍多，攻破徒党，收夺资财、器械，复验摭实者，据其功绩高下，授官赏财。如逢寇不追，临阵不战，贪黩逗挠，败失师徒，宜令本州道勘寻，准军法处分”。地方武装有功者，“亦与官职沈赏”。同时向义军发动政治攻势，说什么庞勋、王郢等起义时降唐的“诸葛爽今为刺史，朱寔见作将军，弘霸任郎职于禁营，宋再雄策名于淮海，莫不身名光显，家族又安”，如果王仙芝及各地义军领袖“洗心悔祸，解甲收兵，诣所在州府投降”，“必当超授官爵，厚赏资财”，“其节级自补职掌等，亦于大藩镇内量材与职额衣粮”，否则，就要“除害”，进行镇压。唐王朝又重新起用宋威、曾元裕为正、副招讨使，宦官杨复光为监军。

四月，王仙芝部将柳彦璋攻打江南西道，占领抚州（今江西抚州），旋为高安镇抚使钟传所夺。六月，柳彦璋又占领江州（今江西九江），生擒刺史陶祥。柳彦璋受唐王朝招降影响，使陶祥上表朝廷求官，同时“亦自附降状”。唐王朝授其右监门将军之职，令其解散义军，到长安去做官，另派左武卫将军刘秉仁为江州刺史。这是一个以封官之名、行瓦解义军之实的阴谋。柳彦璋没有上当。他以战舰百余艘结水寨于湓江，继续进行斗争。

七月，王仙芝与黄巢合兵攻打宋州（今河南商丘）。这里是战略要地，防守严密。义军击败宣武、平卢和忠武三道兵抵抗后，进围宋威于宋州。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将忠武兵七千驰援，义军失利，王仙芝、黄巢遂解围而去。

八月，王仙芝率所部义军攻占安州（今湖北安陆）、随州（今湖北随县），生擒随州刺史崔休徵，杀死率兵前来救援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之子。李福向朝廷飞表告急，唐僖宗命左武卫大将军李昌言将凤翔兵五百骑增援。王仙芝遂转攻复州、郢州，兵锋威及山南东道节度使驻地——襄州，吓得奉命入援这里的忠武大将张贯等四千人，与宣武兵。自申（州）、蔡（州）间道逃归”。九月，唐王朝发布《遣使宜慰蕲黄等州敕》，对汝、随、申、安、蕲、黄等州百姓假惺惺地表示抚慰，酌量“减放租税”，放免今年至来年春天差役，赈济饥危，以此小恩小惠收买人心，阻遏他们支持和追随王仙芝等造反。

由于王仙芝没有彻底改正向唐王朝求官的错误，所以在蕲州事件后，传说他曾向宋威“七状请降”，老奸臣猾的宋威认为王仙芝已不足虑，既不允其降，也不奏报朝廷。杨复光极力主张招降王仙芝，派其判官吴彦宏前去进行诱降。同年十一月，王仙芝写了降表，命大将尚君长、蔡温球等至邓州，请降于杨复光，而妒疾其功的宋威派兵劫持尚君长、蔡温球等，诡称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西南擒于战阵，向朝廷邀功请赏。杨复光要求朝廷查处宋威欺罔之罪。侍御史归仁绍等奉旨前往调

查，竟不能明。唐王朝遂将尚君长等解至长安杀害。

十二月，江州刺史刘秉仁突然亲至柳彦璋水寨，柳彦璋出乎意外，上前迎拜，被刘秉仁杀死，义军被遣散。

尚君长等的牺牲，使王仙芝异常愤怒，率军进攻荆南（今湖北江陵）。坐镇此地的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是个不懂军事的文官。幕僚告诉他义军来攻，杨知温“以为妄，不设备”。当时正值枯水季节，汉水浅狭，王仙芝自贾堑而渡，进至荆南城下。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正月初一，大雪。杨知温正在接受将佐等恭贺，义军攻占罗城，官军退守子城。至傍晚，杨知温仍不出面，将佐一再敦请他出来安抚士卒，他才纱帽皂裘而行，见士卒作战，“犹赋诗示幕僚”。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倾巢来救，并在沙陀骑兵配合下，击败义军于荆门（今湖北荆门），王仙芝解围而去。王仙芝在申州（今河南信阳）东，又被招讨副使曾元裕击败，损兵万人，被遣散万人。

唐王朝以宋威“杀尚君长非是”，镇压农民起义军“无功”，解除其兵权，擢升曾元裕为招讨使，颍州刺史张自勉为招讨副使。又将以屠杀南诏人民和蜀中兵变著称的西川节度使高骈，调任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集中优势兵力，加紧围剿王仙芝。同年二月，王仙芝率领的义军被曾元裕包围于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经过激战，义军五万余人壮烈牺牲，在突围中王仙芝不幸殉难，余部由尚让等率领继续战斗。

在唐末农民大起义刚刚兴起的，王仙芝首先高举起义大旗，他提出的“均平”口号，在揭露唐王朝的黑暗统治、动员广大农民起来斗争中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他是唐末农民大起义初期领袖人物。由于王仙芝受封建思想影响较深，在义军取得一些胜利后就经受不住唐王朝高官厚禄的诱惑，一再乞降，涣散了军心，削弱了对敌斗争，导致了义军内部分裂，他本人率领的义军迅速失败，自己被杀，使整个起义大业蒙受了重大挫折。

第六节黄巢起义

王仙芝牺牲后，官军气焰嚣张，义军处境十分困难，在关系整个起义大业存亡的严重关头，杰出的农民领袖黄巢，毅然挺身而出，更高地举起王仙芝揭起的“均平”大旗，带领广大义军继续战斗。

黄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曾屡至长安应试，均因科场黑暗而落第，于是继承祖业，贩卖私盐。他为人豪爽，轻财好义，喜欢结交江湖豪杰，一些遭受官府追捕的私盐贩寄住其宅。这种生活经历，使黄巢接触到广阔的现实生活，逐渐看清了唐王朝的腐败，广大农民的疾苦，促使他立志推翻唐王朝的黑暗统治。《不第后赋菊》一诗，就是抒发他这一宏大抱负的：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在这首气势磅礴的诗篇中，黄巢用暗喻的艺术手法，将自己比作深秋傲霜怒放的菊花，唐王朝为凋谢的“百花”，寄托着诗人有朝一日率领身披金光闪闪盔甲的起义大军打进长安，建立一个光明新世界的雄心壮志。

乾符三年底蕲州分兵后，黄巢率领义军北上作战。翌年二月，攻克郓州，杀天平节度使薛崇。三月，夺取沂州，义军壮大至数万。接着，

黄巢向河南挺进。四月，黄巢与原王仙芝将尚让合兵保据查牙山。七月，从宋州解围后，他又与王仙芝分手。十月，黄巢进攻蕲、黄二州，被曾元裕击败，四千义军牺牲，黄巢遂回军河南。十二月，他攻占匡城（今河南长垣西南）、濮州，唐王朝命张自勉将诸道兵进剿。为了摆脱敌人重兵堵击，乾符五年初，黄巢率军南下，进围亳州。二月，尚让等率领黄梅战役中突围出来的王仙芝余部，前来投奔黄巢。黄巢被义军将士拥载为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废弃李唐乾符年号，改元王霸，署置官历，建立农民政权，唐末农民大起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黄巢率义军从亳州出发，连克沂州、濮州，其后则屡为官军所败，黄巢遂给天平节度使张杨（一说张裼）下书，让其转奏朝廷“乞降”，实乃缓兵之计。当唐僖宗下诏，以黄巢为。右卫将军，令就郓州解甲”时，黄巢置之不理。黄王王霸元年，唐乾符五年（公元878年）三月，黄巢发起新攻势，自滑州（今河南滑县东）攻打宋、汴二州，进击卫南（今河南滑县东）、叶（今河南叶县）和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地，兵锋再次直指东都，又一次极大地震惊了唐王朝。

唐僖宗慌忙命令屯兵荆、襄地区的曾元裕还卫东都，发昭义、河阳、宣武三镇兵三千，火速赴洛阳“共卫宫阙”。复命义成军三千人把守伊阙（今河南洛阳南）、轘辕（今河南偃师东南）、河阳（今河南荥阳北）和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等洛阳外围重要关隘，以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东都应援防遏使，统领三镇兵，并于东都募兵二千。

正当唐王朝紧张拼凑保卫洛阳的军事防线时，黄巢率领数万大军突然挥戈南下，向江南地区进军了。黄巢的这一战略决策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强攻设防坚固的东都于己不利。江南是唐王朝主要财赋之地，军事力量比较薄弱，而转移到江南的王仙芝余部已在今江苏、安徽和湖南等地打开了局面。曹师雄攻打宣州、润州。王重隐攻占饶州（今江西波阳）、洪州（今江西南昌），江西观察使高湘奔湖口。不久，王重隐死，部将徐唐莒继领其众。因此，挺进江南不仅有取胜的可能，而且可以卡断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充实自己，并与王仙芝余部更好地联合起来，壮大起义力量，进一步推动全国反抗斗争。黄巢率领义军从和州，宣州横渡天堑长江。四月，进攻宣州，被宣歙观察使王凝击败于南陵（今安徽南陵）。曹师雄进攻湖州（今浙江吴兴），被镇海节度使裴璩所破，其余部攻占信州（今江西上饶）、吉州（今江西吉安）、虔州（今江西赣县）等州。六月，王仙芝余部攻打浙西。义军在江南的蓬勃发展，极大地震撼了唐王朝在这里的反动统治，唐王朝以高骈过去在天平军有成名，王“仙芝徒党郓（州）人也”，遂将他调任镇海节度使，旋授诸道兵马都统。高骈遣其将张璘、梁缵分道攻打黄巢，屡败义军，为了避免与强敌作战，保存实力，黄巢遂率军继续南进。八月，攻占杭州（今浙江杭州）。九月，攻占浙东首府越州（今浙江绍兴），观察使崔璆投降义军。接着，黄巢准备从海路攻入今福建，但一时难以弄到足够的海船。十月，黄巢率领义军将士们，顽强战斗在仙霞岭的丛莽里，披荆斩棘，开拓出一条从衢州（今浙江衢县）至建州（今福建建瓯）长达七百里的山路，突然进入今福建地区，攻州打县，建州刺史李乾佑闻风而逃，新任刺史李彦圣被义军击毙。十二月，义军攻占福建首府福州（今福建福州）。福建观察使韦岫弃城逃走。整个福建迅速为义军占

领。

在福延期间，黄巢杀贪官污吏，没收其财产，给个别与义军敌对的儒生遭到应有惩罚外，一般读书人都得到了优容。

黄王王霸二年、唐乾符六年（公元879年）五月，黄巢包围广州（今广东广州市），并通过崔璆和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向朝廷请求天平节度使之职。未得同意，又上表“求广州节度使”。宰相郑畋认为：黄巢起兵“本国饥岁……一遇丰岁，孰不怀思乡土。其众一篱，则巢贼几上肉耳，此所谓不战而屈人兵也。若此际不以计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忧未艾也”，故他主张招降黄巢，“欲以南海节制縻之”。大多数朝臣赞同其策。而另一宰相卢携却坚持武力镇压，他依靠所荐的高骈，“欲立奇功以图胜”。左仆射于琮说：“南海有市舶之利，岁贡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唐僖宗既难舍这块宝地，又寄幻想于高骈，遂择卢携之议。及至中书省起草制救时，郑畋冷嘲热讽卢携与高骈误国，卢携大“怒，拂衣而起，袂染于砚，因投之。”人臣之极的堂堂宰相，如此不顾体统的大打山手，被同时罢除政柄。八月，高骈又提出一个方案，以权舒州刺史郎幼复充留后，守卫浙西，都知兵马使张璘将兵五千屯郴州（今湖南郴县），兵马留后王重任率兵八千于循州（今广东惠州）、潮州（今广东潮安）邀击义军，同时敕令王铎以所部三万人于梧（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梧州）、昭（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平乐）、桂（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林）和永（今湖南零陵）四川守险，高骈本人事兵万人自大庾岭趋广州攻打黄巢。池狂妄地认为，只要按照他的这一稳住老巢、封锁西北、东邀义军、直取广州的方案作战，黄“巢闻臣往，必当遁逃”，也未被采纳。最后，唐僖宗决定授予黄巢率府率之职。黄巢大怒。九月，率军急攻广州，“即日陷之”，生俘广州节度使李迢，镇压贪官污吏和地主豪商。

黄巢乘胜分兵四出攻打州县，不久，整个岭南地区都飘扬着黄巢义军的洁白战旗。

黄巢率领的义军，从公元878年3月出发，至翌年9月占领岭南，在一年半里，以高速流动作战方式，机动灵活战术，由北向南进军，中经今河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僮族自治区等地，义军攻州夺县，镇压贪官污吏，焚毁官僚地主园宅，没收其资财，扫荡了江南地区的封建势力，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壮大了队伍，义军发展为数十万人的大军。

经过几年的奋斗，当时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起义军由小到大，从弱变强，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唐王朝则受到极大打击，更加虚弱了。

为了防止黄巢北上，早在公元879年4月义军向岭南挺进时，唐王朝就任命宰相王铎为南面行营招讨都统、荆南节度使，坐镇江陵。江陵地处长江中游，东接江淮，西连巴蜀，“南通五岭，北走上都（长安）”，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王铎命其副手泰宁节度使李系率领十余万大军屯驻江防重镇潭州（今湖南长沙），“以塞岭北之路”。江陵与潭州之间，“烽驿相望”。唐王朝又以高骈为淮南节度使，充盐铁转运使，守卫江淮一带。

王铎是个不懂军事的老官僚。其幕僚也多为纨袴子弟。他认为有了

这样一道军事防线，就能将黄巢义军阻遏于长江以南，然后逐步将其消灭。于是他在江陵日夜纵情酒色，其妻闻知大怒，扬言要至江陵问罪。王铎先是大惊，继而对幕僚说："黄巢渐以南来，夫人又自北至，日夕情味，何以安处？"一个幕僚打趣地答道，"不如降黄巢。"

黄巢在广州，曾一度萌动过割据岭南的念头。由于广大义军将士反对，加上当地自春及夏，疫病流行，军中"死者十三、四"，黄巢遂决定北伐。出征前夕，他以义军百万都统名义发表露布（文告），痛斥唐王朝政治腐败，"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等罪恶，提出了"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的政治主张。同时勒令唐统治者立即归降义军。这一露布深刻揭露了"当时极敝"，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为即将开始的北伐指明了方向，赢得了广大义军将士和农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同年十月，黄巢率领数十万大军，从桂州分乘用竹木编成的数千支大筏，趁湘江暴涨，顺流而下，蔽江之筏，竞渡如飞，声势浩大。官军闻风丧胆，义军顺利地接连攻占永州（今湖南零陵）、衔州（今湖南衡阳），兵临潭州城下。潭州守将李系，虽为唐代名将李晟后裔，但却是"有口才而实无勇略"之辈。他见义军气盛，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战。义军发起猛攻，短短一天就打进潭州城，全歼守敌，李系狼狈逃至朗州（今湖南常德）。

义军乘胜进占澧州（今湖南澧县），杀刺史李绚。尚让率领号称五十万人的大军直逼王铎的大本营江陵。王铎风闻李系惨败，惊恐万分，他命部将刘汉宏留守江陵，自己则诡称"欲会刘巨容之师"而逃至襄阳（今湖北襄樊）。刘汉宏原先参加过农民起义，后降唐。他见主帅逃之夭夭，遂"大掠江陵，焚荡殆尽，士民逃窜山谷。会大雪，僵尸满野"，义军兵不血刃地占领江陵。

十一月，黄巢率军进攻襄阳，当义军进至团林铺（今湖北荆门南）时，江西招讨使曹全晸率沙陀兵接战不久，便佯败退走，义军紧追不舍，遭到埋伏在丛林中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率领的数万官军的突然袭击。曹全聂也回戈夹攻，义军大败，被俘和牺牲者"什七八"。官军诸将欲追击义军，刘巨容对他们说："朝家（廷）多负人，有危难？不爱惜官赏，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贼，为富贵作地"。

荆门遭到严重挫折后，由于官军又据险坚守，不易攻取，黄巢遂果断改变一直北上西取长安的战略意图，率军沿江东进，迂回作战。义军一举攻陷鄂州（今湖北武昌）外郭城。继而转攻今江西、安徽和浙江等省的饶、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众至二十万"。

黄王王霸三年、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三月，大宦官田令孜感到末日将临，"阴为幸蜀之计"，奏请以其兄左神策军大将军陈敬瑄及腹心杨师立、牛勖、罗元杲镇守蜀中三川。唐僖宗命他们击毬赌三川，结果陈敬瑄首先进毬，遂得西川节度位之职。

唐僖宗将败军失地的王铎撤职，以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高骈征调兵马，纠集七万之众，以扬州（今江苏扬州）为中心，设置了一条新的军事防线，妄图堵拦黄巢由江淮而西捣长安的进军。高骈派其大将张璘等攻打义军，义军多次失利，退保饶州，义军将领王重霸、常宏等降唐，饶州也旋为张璘攻陷。

五月，黄巢屯兵信州，因瘟疫流行，“卒徒多死”。张璘乘机加紧进攻，义军处境十分困难。为了争取必要时间，使染病将士康复，捕捉有利战机，黄巢利用高骈频胜骄狂心理，“以金啗（张）璘，腾书于（高）骈，丐归命”，麻痹敌人。高骈以为黄巢势穷，也想诱其归降，就“许为求节度”。为防止当时已至淮南的昭义、感化和义武等军“分其功”，他向朝廷谎报军情，说义军“不日当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朝廷许之。”黄巢侦知诸道兵已撤至淮北，立即断绝与高骈的联系，并向他宣战。高骈恼羞成怒，命张璘迎战，双方在信州会战，结果黄巢得胜，全歼官军，阵斩张璘，消灭了高骈的精锐主力，义军声势大振。

六月，黄巢乘胜一鼓作气地相继攻克池州（今安徽贵池）、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华）和宣州等地。七月，黄巢率领十五万人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强渡浩浩长江，进围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离扬州城不足五十里，吓得高骈急忙闭城，并向朝廷乞求救兵。过去宰相卢携大肆吹嘘高骈“有文武长才，若悉委以兵柄，黄巢不足平”，朝野虽有人认为高骈不足恃，“然犹庶几望之”；及见高骈告急，“上下失望，人情大骇”。唐僖宗下诏责备高骈遣散诸道兵，致使黄巢乘官军无备渡江。而高骈则上表声称，其事已奏闻，并非自专，还假称患风痹，不复出战。至此，唐王朝阻挡义军北伐的军事防御体系土崩瓦解了。

黄巢将渡淮河，宰相豆卢瑑以诸道救兵未至，请授黄巢天平节度使，使他不得西进，再以精兵戍守宣武，阻塞汝州与郑州之间道路，可以击破义军。卢携反对这样做，他奏请朝廷急召诸道兵扼守战略要地泗州（今江苏盱眙北），以宣武节度使为都统，黄巢既不能入关，必然还攻东南，徘徊救死而已。唐僖宗同意其策，命新任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曹全晸率兵六千防守泗州，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汝郑把截制置使，屯兵汝州，徐州兵三千驻扎溵水（今河南商水），阻止黄巢强渡淮河，进攻东都。

这样临时拼凑起来的小小防线，自然不堪一击。八月，义军击败曹全晸，攻占泗州。“齐克让惧兵见袭，亦还兖州。溵水诸军皆散”。淮北告急相继，卢携称疾不出，京师大为恐慌。

黄巢率军渡过淮河后，自称“率土大将军，整众不剽掠，所过惟取丁壮益兵”。十月，义军攻占申州（今河南信阳），进入颍州（今安徽阜阳）、宋州（今河南商丘）、徐州（今江苏徐州）、兖州（今山东兖州）之境，“所至吏民逃溃”。十一月，唐王朝诏河东节度使郑从谠以本道兵授渚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讨黄巢。黄巢亲自率军攻打汝州，向诸道官军发布文牒：“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即利用唐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分化瓦解敌人，减少进军阻力，矛头直指唐传宗。唐倍宗。怖而流泪”，忙召宰相商议，决定悉发神策军检阅，以神策军左军马军将军张承范为兵马先锋使兼把截潼关制置使，右军步军将军王师会制置关塞粮料使，左军兵马使赵珂为句当塞棚使，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东都留守刘允章见大势已去，被迫率文武官员开门投降。义军入城后，“劳问面已，闾里晏然”，人民安居乐业。

黄巢率军进取陕州（今河南陕县），号州（今河南灵宝），向戍守

潼关的官军发布檄文曰，“吾道淮南，逐高骈如鼠走穴，尔无拒我。”

义军西进攻打潼关。潼关北濒黄河，南倚悬崖，自古号称天险，关中锁钥，长安门户，潼关的失守，直接关系到唐王朝的生死存亡。当时潼关只有从汝州溃散下来扎营关外的齐克让军万人。这些人“屡经战斗，久乏资储，州县残破，人烟殆绝，东西南北不见士人，冻馁交逼，兵械刓弊，各思乡闾”。齐克让奏请唐僖宗赶紧派援兵，运资粮。唐僖宗下令挑选左，右神策军出征。神策军待遇优于其他官军，都是长安城里官宦富豪子弟，平日“侈服怒马以诧权豪”，未经战阵，听说要点名出征，“皆哭于家，阴出赀雇贩区病坊以备行阵”，这些被买来充当出征的替身，是“不能持兵（器）”的病弱者，人们看到这种情形，“寒毛以栗”。张承范直言不讳地对亲至章信门楼送他的唐僖宗说：“闻黄巢拥数十万之众，鼓行而西，齐克让以饥卒万人依托关外，复遣臣以二千人屯于关上，又未闻为馈饷之计，以此拒贼，臣窃寒心。愿陛下趣诸道精兵早为继援。”

张承范率军至华州（今陕西华县），当地刺史裴虔余已徙宣歙观察使，军民部逃入华山（今西岳华山），州里官仓尘埃鼠迹遍地。张承范命官军将残存之米包扎三日粮，“不能饱，无斗志”。十二月初，张承范抵达潼关时，当地百姓也早已躲藏起来。他强迫从茂草中搜捕出来的一百余名村民运石汲水，为守御之备。潼关整个守军绝粮，“士卒莫有斗志”。当天，义军前锋同时开至潼关，洁白的战旗如云，千军万马不见其际，并立即向齐克让发起猛攻。不久，义军领袖黄巢亲临前线，全军将士欢声雷动，巍巍华山和滔滔黄河为之震动。

饥饿的齐克让军抵挡不住，烧营而溃，逃往关内，将潼关左边“禁坑”中丛莽踏为平地。义军急攻潼关，张承范据关拒战。千余百姓帮助义军掘土填平关前防御工事“天堑”。义军进至关下，纵火焚毁城楼。当张承范派兵防守“蔡坑”时，尚让和林言所率义军已通过“禁坑”绕至潼关后，与关前义军主力呼应，夹击官军，官军倾刻溃散，王师会自杀，张承范换上士卒之服，率残兵逃走。黄巢乘胜攻占华州（今陕西华县），留义军将领乔钤镇守。唐河中留后王重荣向义军投降。

潼关失守的消息传出后，长安立即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当时从开往潼关途中折回的博野、凤翔军至渭桥（今陕西西安东北），见所募新兵衣裘温暖鲜艳，愤怒地说：他们有何功劳，“我曹反冻馁”，遂抢其衣裘，纵火焚烧长安西市。

田令孜惧怕唐僖宗责备自己，乃归罪于宰相卢携面贬其为太子宾客、分司，另荐户部侍郎王徽、工部侍郎裴澈为宰相。卢携绝望之余，深夜“仰药而死”。

唐僖宗发布任命黄巢为天平军节度使的诏令，作为缓兵之计。又至长安郊外祭天，哀求神灵保佑。

十二月五日，文武百官退朝时，“闻乱兵入城，布路窜匿”。田令孜带领神策兵五百人，护卫着唐僖宗从长安城西的金光门苍惶潜逃，“惟福、穆、泽，寿四王及妃嫔数人从行，百宫皆莫知之。上奔驰昼夜不息，从官多不能及”。乱兵、功市恶少等，趁火打劫，大肆抢掠宫廷，官府及居民财物。

当天傍晚，义军前锋将柴存率军进入长安城。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带领数十名文武官员，恭迎黄巢于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黄巢“乘金

装肩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衣锦绣，执兵以从，甲骑如流”，“辎重自东都抵京师，千里相属”，极其英武壮观。长安市民扶老携幼拥上坊市聚观，热烈欢迎黄巢及义军将士。尚让对他们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李唐王朝两个世纪半的京城变成了农民起义军的天下，黄巢的夙愿终于变成了现实。

十二月十三日，黄巢在太清宫斋戒后，于金碧辉煌的含元殿举行即皇帝位的隆重大典，“画皂缯为兖衣，击战鼓数百以代金石之乐”，列长剑大刀为卫，亲自登上丹凤楼，颁布大赦书，国号大齐，建元金统。以尚让、赵璋、崔璆和杨希古为宰相，郑汉璋为御史中丞，李俦、黄谔、尚儒为尚书，方特为谏议大夫，皮日休、沈云翔、裴渥为翰林学士，孟楷、盖洪为尚书左、右仆射兼军容使，费傅古为枢密使，张直方为检校左仆射，马祥为右散骑常侍，许建、米实、刘瑭、朱温、张全、彭攒、李逵等为诸将军游奕使，林言为功臣使，王璠为京兆尹，“其余以次封拜”。唐官三品以上停职，四品以下留用，禁止军人乱杀人，建立起以黄巢等农民起义军领袖人物掌军政实权的农民政权。

黄巢命在长安的原唐官至“赵璋第投名衔者复其官”，同时严密搜捕抗拒者。来不及跟唐僖宗逃走而藏匿民间的原唐宰相豆卢瑑、崔沆、左仆射于琮、右仆射刘邺、太子少师裴谂、御史中丞赵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汤等大臣，均被捕获处决。表面归降于义军，暗中“多纳亡命，匿公卿于复壁”的张直方，对抗义军的于琮之妻广德公主等贵族官僚被镇压。对唐王朝绝望的将作监郑綦、库部郎中郑系，“举家自杀”。此外，还有人于夜深人静时，偷偷地在大齐政权的尚书省门上题诗，攻击义军。

唐僖宗逃至骆谷（今陕西周至西南），命前来参见的凤翔节度使郑畋东拒义军，“西抚诸蕃，纠合邻道”，以图复辟。郑畋回到凤翔后，召集将佐策划。将佐认为，义军正值势盛，“宜且从容以俟兵集，乃图收复”。郑畋见他们意志消沉，气急败坏地说：“诸君劝畋臣贼乎？因闷绝仆地，甃伤其面，自午至明旦，尚未能言”。恰遇黄巢使臣来下赦书，监军袁敬柔等诡称郑畋得风痹病，代其草表署名为谢。郑畋乃“完城堑，缮器械，训士卒”，密约邻道合兵会于凤翔，共同对抗黄巢。

义军占领长安时，溃散于京畿等地的官军为数不少，郑畋将其搜罗起来编为部下。当时分镇关中的禁兵尚有数万，他也派人前去联络，予以收编，并用金银珠宝结其欢心。因此凤翔“军势大振”，成为关中地区官军麇集的巢穴，直接对抗新生的大齐农民政权的大敌。

郑畋自以为羽翼已丰满，遂秘密串通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联兵讨伐黄巢。黄巢遣将王晖征召郑畋，郑畋不应召，杀王晖。对郑畋的嚣张气焰，黄巢却“殊不介意”，说“我行却半天下，所至无不收克，直至高令公（骈），犹不敢出军敌我，郑相国（畋）拟作何计”。郑畋利用黄巢的骄傲，进一步聚集力量，伺机反扑。

唐僖宗经壻水（在今陕西洋县）逃至兴元（今陕西汉中），“诏诸道各出全军收复京师”。大齐金统二年、唐中和元年（公元881年）正月，唐僖宗过绵州（今四川绵阳）、汉州（今四川广汉），于二十八日抵达成都（今四川成都）。

唐僖宗对拥有相当军事实力的军阀高骈仍抱有很大希望，给其巡内

刺史、有功将士，“自监察御史至常侍，许墨制除授”的特权。接着，又擢升他为检校太尉，东面都统，京西、京北神策军诸道兵马等使。“亟命出师”，而高骈有个人打算，“欲兼并两浙，为孙策三分之计”，故终不出兵。

其他一些藩镇，过去虽与唐中央有这样那样矛盾，但在唐王朝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特别突出时，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就必然促使唐中央与地方藩镇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农民起义军了。所以不少藩镇发兵入关，参加对黄巢的围剿。如义武节度使王处存听说长安失守，举军入援。代北监军陈景思率沙陀酋长李友金及萨葛、安庆、吐谷浑诸部入关助战。宥州刺史拓跋思恭与鄜州李孝昌结盟讨伐义军。巳向黄巢请降的河中节度副使王重荣，也杀害黄巢使者，黄巢派健将朱温率舟师下冯翊（今陕西大荔），黄邺率兵自华阴（今陕西华阴）合攻王重荣，被王重荣击败，他又与屯兵武功（今陕西武功西）的忠武监军杨复光联合，积极参与围攻长安。

及至三月，黄巢攻占长安时来不及随唐儒宗逃跑的官员，已陆续窜入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诸道及四夷贡献不绝”，加之蜀中自古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故“府库充实，与京师无异，赏赐不乏”，唐僖宗在此西南一隅建立起流亡小朝廷。

唐僖宗在蜀中站稳脚跟后，立即进一步组织力量，以枢密使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并给其“几蕃汉将士赴难有功者，并听以墨敕除官”之权，妄图卷土重来，摧垮黄巢大齐政权，恢复李唐在长安的统治。

这时，黄巢也逐渐看到了政治形势的变化，向唐军发起主动进攻。他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侯，将兵攻打邓州（今河南邓县），生擒朝史赵戒，以扼荆（今湖北江陵）、襄（今湖北襄樊）要道，拱卫长安。接着，又命尚让、王播等率领五万义军进攻凤翔。

郑畋命行军司马唐弘夫伏兵要害处，自己则领兵数千，多张旗帜，在高冈严阵以待。而尚让等“以（郑）畋书生，轻之，鼓行而前，无复行伍”，结果，中伏，大败于龙尾陂（今陕西蛟山东），二万余义军将士牺牲。

郑畋乘龙尾陂之胜，命唐弘夫屯渭北（今陕西渭水北），王重荣驻沙苑（今陕西大荔南），王处存居渭桥（今陕西西安西北），拓跋思恭营武功（今陕西武功），而他本人则坐镇盩厔（今陕西周至），在长安西北形成一道弧形包围圈。

与此同时，郑畋向全国各地藩镇发了一道檄文，在对黄巢和农民起义军进行诬蔑、恫吓之同时，号召诸道藩镇出兵，共同镇压农民大起义。在此以前，由于驿路阻绝，有些地方藩馈以为朝廷不能复振，及见郑畋檄文，以为复辟有望，遂发兵入关参战。

四月，为了打破敌人的包围，黄巢不动声色地撤至长安城郊的石井。程宗楚部官军，先自禁苑西面南门——延秋门窜入长安城，唐弘夫继进；王处存也率以白为号的五千兵夜间混入城里。受过义军打击的豪富者流，欣喜若狂，“争欢呼出迎官军，或以瓦砾击贼，或拾箭以供官军”。程宗楚等唯恐诸将分其“功劳”，不报告郑畋和鄜延李孝昌、夏州拓跋思恭等军。其军士又“竞掠货财子女”，坊市无赖之徒也以白为号，冒

充官军趁火打劫，闹得乌烟瘴气。露宿长安城东灞上的黄巢，侦知“官军不盗，且诸军不相继”，知道这只是部分官军攻入长安，而不是官军发起的总攻，因此当机立断，“引兵还袭之，自诸门分入，大战长安中”。官军猝不及防，身上装满抢掠来的钱财的官军，“重负不能走”，“死者什八、九”，程宗楚和唐弘夫也被义军杀死，王处存收集残敌狼狈逃出长安，长安城上重新飘扬着义军的洁白战旗。“于是渚军皆退”，义军声势”愈炽”。

黄巢任命的同州刺史王溥、华州刺史乔谦（即乔钤）和商州刺史宋岩，风闻黄巢弃长安而走，“皆率众奔邓州”，依靠朱温，朱温杀王溥、乔谦，使宋岩还商州。

黄巢回到长安后，对于那些协助官军反对义军的人进行了镇压。义军将士给黄巢上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尊号。

由于黄巢没有乘胜追歼官军以彻底打破官军对长安的包闲，不久，官军又卷土重来，不断进攻长安。拓跋思恭、李孝昌与义军战于士桥，官军失利。忠武节度使周岌，在黄巢攻克长安时虽投降义军，但“貌奉而心图之”，与监军杨复光结盟，杀害黄巢使者，又游说盘据蔡州的秦宗权共同起兵，攻打黄巢。秦宗权派兵三千随杨复光进攻邓州，朱温失利，邓州被官军占领。五月，昭义节度使高浔与王重荣联兵进占华州。五月十二日，东面都统高骈也突然移檄四方，声称将入关讨伐黄巢，悉发巡内兵八万、舟二千艘，出屯今扬州城东的东塘，颇为引人注目。可是，“诸将数请行期，（高）骈托风涛为阻，或云时日不利，竟不发（兵）。”李克用率兵万人，“称奉诏赴难入关”讨黄巢，至太原，河东节度使郑从谠供给粮料，李克用又求赏军钱，郑从谠给钱千贯、米千石，他犹感不足，纵兵抢掠，郑从谠求救于振武节度使，李克用败走北归。

同年六月，邠宁节度副使朱玫屯兴平（今陕西兴平），义军将领王璠围兴平，朱玫退屯奉天及龙尾陂，西川黄头军使李铤将兵万人，巩咸将兵五千进逼兴乎，与黄巢战，屡捷。七月，李孝昌和拓跋思恭屯兵东渭桥，唐王朝以王处存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加强对长安的围攻。八月，武宁节度使支详遣其将时溥、陈璠将兵五千入关助战，时溥、陈璠至洛阳后，屠河阴，掠郑州，然后返回彭城。

当时，黄巢势力尚强，在防御中也多次取得胜利。八月，义军将领李详在石桥击败昭义节度使高浔，夺回华州。九月，尚让和朱温在东渭桥战胜李孝昌和拓跋思恭。唐僖宗多次诏促高骈速赴关中，而实无出兵意的高骈，借口镇晦节度使周宝和浙东观察使刘汉宏是其后患，滞留东塘百日后罢兵还扬州。十月，义军打死大刽子手——南面招讨使曹全晸。十一月，孟楷和朱温袭破鄜、夏二军于富平（今陕西铜川东南），二军遁归本道。凤翔大将李昌言利用府库空虚、粮饷匮乏、将士不满，发动兵变，驱逐郑畋。至此，黄巢再次粉碎了郑畋对长安的围攻，捍卫了大齐政权。然而黄巢仍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地将长安附近的敌人一一彻底消灭，铲除隐患，而只是满足于击退某一股官军的进攻，或夺回某一处失地，如同一张弹性的网，虽不时被撑开，甚至戳破一两个洞，但这张网始终未被断然撕烂，所以它一直张在长安城下，并在一步步收紧。

义军手下败将王铎，以高骈无心讨伐黄巢，郑畋“累表辞位”，主动

请战。大齐金统三年、唐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正月，唐僖宗罢高骈都统及诸使之职，但领盐铁转运使，以王铎兼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都统，并允其自辟将佐，以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周岌、王重荣为都都统左右司马，诸葛爽、康实为左右先锋使，时溥为催遣纲运租赋防遏使，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使，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都监，拼凑了一个新的班底，策划新的进攻。

黄巢似朱温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命其自去攻取。二月，该州刺史米诚（一说米逢）逃往河中，朱温进据同州。他攻打河中时，被王重荣击退。

四月，王铎率领两川、兴元之军驻灵感寺，泾原军屯京西，易定、河中二军屯渭北，邠宁、凤翔二军屯兴平，保大、定难二军屯渭桥，忠武军屯武功，再次包围了长安。

当时“黄巢势已蹙，号令所行不出同（州）、华（州）。”在官军与义军长期对峙的拉锯战中，“民避乱皆入深山，筑栅自保，农事俱废，长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缗”。数十万义军挤在这样狭小的地区里，粮食供应和兵员补充均极困难，甚至“尚让厨中食木皮”。但是，黄巢和广大义军将士，不畏强敌，不怕困难，继续英勇抗击官军的不断围攻。

五月，唐僖宗以侍中的虚衔换掉了高骈的盐铁转运使美职，高骈“既失兵柄，又解利权，攘袂大诟，遣其幕僚顾云草表自诉，言词不逊”，大骂王铎是“败军之将”，崔安潜“贪残”，暗喻唐僖宗为亡国之君。唐僖宗“命郑畋草诏切贵之”。此后，高骈“贡赋遂绝”。

六月，黄巢命尚让将兵攻打河中，朱温进击西关，败堵葛爽、王重荣，乘胜夺取坊州宜君（今陕西宜君），适降盈尺雨雪，义军“冻死什三”。

八月，朱温屡为王重荣击败，与义军左军使孟楷有矛盾，又“见（黄）巢兵势日蹙，知其将亡，亲将胡贞、谢瞳劝温归国”。朱温遂于九月杀监军严实、将领马恭，以所守同州投降王重荣，并以舅事王重荣。由于他是义军重要将领，同州为长安东部屏障，故唐僖宗欣喜如狂地说：“是天赐予也”，特赐朱温名“全忠”，授其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之职，从此这个农民起义的叛徒成为唐王朝围剿义军盼忠实奴才。

朱温降唐，不仅使长安东大门洞开，而且在义军内部带来极坏影响。华州防御使李详，“以（王）重荣待（朱）温厚，亦欲归之”。黄巢及时识破了他的叛降企图，将其处死，以黄思邺慎守华州，因未将李详余党王遇等一网打尽，十一月，王遇等在华州再次策动叛乱，逼走黄思邺，以华州投降王重荣。

朱温等人的背叛，同、华二州沦丧敌手，使当时已不利于义军的总形势益趋恶化。不过黄巢兵势尚强，官军的进攻仍不断被击退。

王铎深知要攻占长安，消灭大齐农民政权，并非易事。因此，他一方面遣使游说已受黄巢官爵的平卢留后王敬武出兵参加围攻长安；另一方面采纳杨复光的建议，乞援于李克用，封其为雁门节度使，并主动调节他与河东节度使郑从谠的仇怨。十二月，李克用率领四万沙陀步骑，自夏阳（今陕西合阳东）渡过黄河，屯兵同州。

沙陀族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放西突厥的一个部落。善骑射。早在唐懿宋咸迈九年（公元868年）庞勋起义时，沙陀酋长朱邪赤心曾助唐血腥镇压庞勋，被唐王朝封为雁门节度使，特赐名李国昌。李克用是其子。他一目微眇，故其时号为独眼龙，是个“扩悍横暴”的军阀。他的军队“皆衣黑，故谓之鸦军”，是围攻长安唐军中兵势最强者。李克用的参战，加速了黄巢起义的失败。

大齐金统四年、唐中和三年（公元885年）正月，李克用军败黄巢弟黄揆于沙苑，进驻其地，唐王朝以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大宦官田令孜为加强宦官威权，以王铎讨黄巢久无功，奏请唐僖宗解除其统帅兵柄，而以宦官杨复光等掌实权。

二月，李克用进军乾阮（今陕西大荔西），会同忠武、河中、易定等军，与尚让等率领的十五万（一说十万）义军，大战于梁田陂（今陕西渭南东南），“自午至晡”，战斗异常激烈，义军失利，搁兵数万。李克用驱军进围华州，环州城掘堑而击。由于义军不断失利，军粮阻乏，形势险恶，黄巢遂命三万义军，据守通往河南西南部的交通要道兰田关（今陕西兰田东南），以备紧急时突围，因遭唐军顽强阻击未遂。

三月，黄巢命尚让将兵驰援华州，在零口镇（今陕西临潼东）被李克用等击败，华州旋为李克用等打破。李克用窜至渭桥，饮马于渭水之阴。每夜令其部将薛志勤、康君立潜入长安，进行纵火焚毁起义军的粮草、暗杀等搅乱人心的骚扰活动，泾原节度使张钧，说吐蕃、吐谷浑结盟出兵，参与对长安的围攻。诸镇官军相继麇集长安附近，长安危在旦夕。

四月初，李克用与忠武将庞从、河中将白志迁等引兵先进，与义军鏖战于渭水南岸，一日三战，官军皆胜。义成、义武等军继进，义军大败。

四月八日，衙队前锋杨守宗等三十都，随李克用自禁苑东面南门——光泰门攻入长安，河中将刘让等七十都接踵涌入。黄巢在城里列坚阵拒战，从卯至申，进行顽强抵抗后，率领十五万人马，于当天夜里撤出长安，声言趋徐州，实出兰田，入商山（今陕西商县东南，用散金银珠宝于路，诱敌争取而缓追之针，顺利地向河南一带转移。官军入城后，大肆抢劫，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

黄巢以孟楷率军万人为前锋，进击蔡州（今河南汝南），节度使秦宗权大败投降。接着，孟楷攻打陈州（今河南淮阳），刺史赵犨知道黄巢如不败亡在长安，必定东走，陈州首当其冲，宋威等又曾统领这里的忠武军围剿起义军，所以他早就招兵买马，“培城疏堑，实仓库，峙藁薪，为守计”，并将六十里之内有资粮之民强迁城内，加强战备。六月，孟楷屯兵项城（今河南沈丘），赵犨先伪示以弱，待孟楷轻敌无备、偷袭义军，孟楷不幸被俘，英勇就义。孟楷是义军重要人物之一，黄巢的爱将。他之死，是很大损失。黄巢既惊又怒，为替孟楷报仇，他亲率全军扎营激水，与秦宗权合兵，“掘堑五重，百道攻之”。赵犨依托坚城，用斩首的酷刑，胁迫陈州人死守，并多次开城出击义军。黄巢见一时难以取城，遂在陈州之北“起八仙营，如宫阙之状，又修百司廨署，储蓄山峙”，为持久之计。

十二月，赵犨遣人突围，乞救于邻道，东北面都招讨使朱全忠。东

面兵马都统时溥、许州节度使周岌，引兵驰援。朱全忠与义军战于鹿邑（今河南鹿邑西），胜，进据亳州。

大齐金统五年、唐中和四年（公元884年）正月，黄巢兵力尚强，朱全忠等招架不住，遂频发书牒，请求李克用出兵。二月，李克用将蕃、汉兵五万，自蒲州、陕州渡过黄河前来陈州。三月，朱全忠攻占义军瓦子寨，义军将领李唐宾、王虔裕投降。李克用会合许、汴、徐、兖诸道军于四月攻占尚让屯军的太康（今河南太康），继而进攻黄思邺扎营的西华（今河南西华），黄思邺败走，黄巢眼看攻克陈州已不可能，遂退军故阳里（今河南淮阳北）。黄巢“围陈州几三百日”，“大小数百战”，始终未能攻拔其城。

五月，故阳里地区大雨滂沱，平地水深三尺，黄巢营寨为水所漂。又听说李克用将来进攻，黄巢遂引兵向汴州（今河南开封）转战。义军破尉氏（今河南尉氏）后，尚让以骁骑五千为前军进逼汴州，在该州东南的繁台为宣武将朱珍等击败。朱全忠向李克用告急，李克用与忠武都监使田从异从许州（今河南许昌）出兵，在中牟北王满渡（今河南开封西），乘黄巢义军强渡汴水时，纵兵猛击，义军牺牲万余人。在此危急关头，尚让率万人投降时溥，义军将领李谠、葛从周、张归霸和张归厚等，也裹胁了所部义军投降朱全忠。

农民革命领袖黄巢临危不惧，坚定不移地率领义军继续战斗，向北转移。在封丘（今河南封丘）与李克用的追兵激战，义军失利。复逢大雨，继续东走。李克用尾追不舍，黄巢率军过胙城（今河南延津东北）、匡城，东奔兖州。义军这时只剩近千人，李克用追至冤句时，骑兵能跟上者仅数百人，昼夜狂奔二百余里，“人马疲乏、粮尽，乃还汴州，欲裹粮复追之”，俘黄巢幼子和大齐政权的乘舆、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万人。李克用至汴州，扎营城外，朱全忠固请其入城，馆子上源驿。由于李克用在宴会上乘酒使气，触朱全忠“从黄巢为寇”之忌，后者遂于前者大醉时，围攻上源驿，谋杀李克用，李克用脱险后率军返回晋阳。时溥遣其将季师悦将兵万人继续追击黄巢。

六月，黄巢在瑕丘（今山东兖州），与唐将李师悦和叛徒尚让激战，终因敌众我寡战败，黄巢宁死不屈，自刎于泰山狼虎谷襄王村（今山东莱芜西南），黄巢从弟黄思邺、黄揆等义军将领也同时自刎而死。

黄巢殉难后，义军余部在黄巢侄儿黄浩率领下，继承其遗志，继续坚持武装斗争。这支七千人的队伍，“自号浪荡军”，转战于今湖南一带，坚持反唐王朝的斗争。天复初（公元901—902年），黄浩攻占浏阳（今湖南浏阳）。其后在山里为湘阴（今湖南湘阴）反动地主武装邓进思之伏兵所杀，义军失败。

第七节王郢、阡能起义

在王仙芝、黄巢起义时，全国各地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唐末五代人皮光业说：唐季乾符，中和之际，“其始者王仙芝结衅中土，首构祸阶，虽已诛夷，犹残支党，自此，蘖祠乌合，草泽蜂飞，轻薄者固自披攘，谨厚者亦为傈悍”。罗隐也说：“天下自懿考僖皇之后，纲领不振。庞勋、王郢抵触于前，仙芝、君长践踏于后，寻乃黄巢大掠于京城，所以齐寇攘臂一噪，四海瓦解。自尔枝牵蔓引。”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弘霸郎起义于齐州（今山东济南）、棣州（今山东惠民东南）之

间，乾符四年（公元877年）三月以前降唐。宋再雄起义于淮海，后为高骈招降。柳超据常熟（今江苏常熟）。王敖据昆山（今江苏昆山）。王腾据华亭（今上海松江县）。宋可复据无锡（今江苏无锡）。周了髻攻打武义（今浙江武义），刘文聚众于镜湖（今浙江镜湖），这两支义军均被宣歙观察使崔玹镇压。“群盗二十余辈”起义于岭海间。道州蛮民蔡结，与鲁景仁等“诱工商四、五千人”据连州（今湖南连县）。乾符五年（公元878年）三月，不知名的一支义军攻占朗州（今湖南常德）、岳州（今湖南岳阳）。而“其或一坐之不谨，一版之不严，则刳剔之不暇，虽十室之邑，三户之乡，必壁堑以备之，篱落以抗之”的史载，充分反映了农民反抗斗争的普遍，以及唐统治阶级的恐惧。

在上述农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是以下两次：

（一）浙西王郢起义

乾符二年（公元875年）四月，浙西狼山（今江苏南通南）王郢等六十九人立有战功，镇海军节度使赵隐赏以职名而不给衣粮，王郢等申诉无效，遂劫库兵起义，众至近万人，许多饥寒交迫的农民也参加了他的队伍。王郢率义军攻克苏州（今江苏苏州）、常州（今江苏常州），乘舟泛江入海，转攻浙东、浙西，南及福建。翌年六月，唐上朝发布《讨伐王郢诏》，进行诱降：“其王郢部下徒党等，或本同谋议，或偶被胁从，或因穷饿依投，或遭俘缧指使，所宜舍逆就顺、去暗趋明，勉图富贵荣华，勿受驱除翦戮。如生擒及斫得王郢头归顺者，当授四品正员官，并赏钱一万贯，赐庄宅各一区；如能率众于所在解甲归降者，亦当厚与爵赏，明垂信誓，必不斯渝。”同年七月，唐王朝以前岩州刺史高杰为左骁卫将军充沿海水军都知兵马使，讨伐王郢。十一月，王郢通过温州刺史鲁寔（一说鲁实）请降，“寔屡为之论奏，敕郢诣阙”。王郢拥兵半年之久不至长安，并求望海镇使之职，朝廷仅授其“右率府率，仍令左神策军补以重职”。乾符四年正月，王郢诱俘鲁寔于舟中，其下官军奔溃，“两浙震惊”。

唐王朝以右龙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诸道招讨使，除先征诸道及福建、南海并虔、吉、衢、婺等州兵外，更发忠武、宣武、感化三军及宣、泗二州兵，新旧共一万五千余人，围剿王郢。二月，王郢攻占望海镇（今浙江镇海），攻明州（今浙江宁波），继取台州（今浙江临海），刺史王葆退守唐兴（今浙江天台）。唐王朝又诏二浙，福建各出舟师增援。镇海节度使裴璩“严兵设备，不与之战，密招其党朱实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输器械二十余万，舟航、粟帛称是。敕以实为金吾将军。于是郢党离散。”王郢东至明州，被甬桥镇遏使刘巨容用筒箭射杀，起义失败。

王郢起义在唐后期财赋供应重要基地二浙一带蓬勃兴起，坚持斗争近两年，沉重地打击了唐统治者，有力地支援了王仙芝，黄巢起义。

（二）邛州阡能起义

以唐僖宗为首的流亡小朝廷，在成都不仅照旧过着骄奢淫佚的腐朽生活，而且为了镇压全国农民起义，加紧搜括蜀中财物，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

中和二年（公元882年）二月，邛州（今四川邛崃）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避仗”而聚众起义。仅一个月，众至万人，“立部伍，署职级，

横行邛、雅二州间，攻陷城邑”。在阡能起义影响下，蜀中义军“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宰相陈敬碹遣牙将杨行迁等率兵五千围剿。

同年六月，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又各聚众数千人响应阡能，多次打败杨行迁。杨行迁向陈敬碹乞援，“府中兵尽，陈敬瑄悉搜仓库门庭之卒以给之”。义军与官军大战于乾溪，后者大败。杨行迁为掩其败绩，“多执村民为俘送府，日数十百人，敬瑄不问，悉斩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妇女？观者或问之，皆曰：‘我方治田绩麻，官军忽入村，系虏以来，竟不知何罪。’”唐末官府之黑暗，军将之残忍，农民之悲惨无辜，由此可见一斑。

七月，蜀人韩求又聚众数千人响应阡能。十一月，“阡能党愈炽”，并发展到蜀州（今四川崇庆）境内。陈敬瑄因杨行迁等久而无功，遂以押牙高仁厚为都招讨指挥使。他以武力为后盾，利用所捕降义军牒者，先在义军中做孤立阡能等少数首领，诱骗义军将士投降的策反宣传，说什么高仁厚“愍汝曹皆良人，为贼所制，情非得已。尚书（高仁厚）欲拯救湔洗汝曹，尚书来，汝曹各投兵投降，尚书当使人书汝背为归顺字，遣汝复旧业。所欲诛者，阡能、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韩求五人耳，必不使横及百姓也”。然后，高仁厚引兵进攻阡能。阡能派罗浑擎立寨五座于双流（今四川双流西），伏兵千人野桥箐以邀官军。高仁厚围而不战。遣人入义军中再次宣扬上述牒者语，有些义军受骗弃甲投兵而降。高仁厚“悉抚谕，书其背，使归语寨中未降者，寨中余众争出降”，降者并将罗浑擎执送官军。高仁厚用同样办法先后将句胡僧、韩求、罗夫子三处营寨瓦解，阡能也是这样被降者缚送官军的。一股相当大的反抗斗争烈火，就这样被狡猾的敌人迅速扑灭了。阡能等五位义军领袖，则被陈敬瑄极其野蛮地杀害了。

阡能等牺牲后，韩秀升、屈行从率领义军继续斗争。中和二年（公元883年）二月，他们打败峡路招讨指挥使庄梦蝶、应援使胡弘略，“江淮贡赋皆为贼所阻，百官无俸”，流亡小朝廷受到严重威协。唐僖宗急忙起用高仁厚为西川行军司马，将兵三千征讨。三月，韩秀升、屈行从大败官军庄梦蝶部。高仁厚收集溃兵散卒，针对义军精兵尽在舟中，老弱守卫辎重和营寨，一面扬兵江上，作欲攻之态，义军昼夜备御；出兵挑战，高仁厚则按兵不动。一面“潜发勇士千人执兵负藁，夜（间）由间道攻其寨，且焚之”。义军分兵往救，为时已晚，“资粮荡尽，众心已摇”。高仁厚乘机派善游者凿沉义军之舟，发兵于要路邀击义军，并进行诱降，义军溃降，韩秀升、屈行从被叛徒执送官军。当高仁厚问他们为何造反时，韩秀升大义凛然地答道：“自大中皇帝（唐宣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表现了视死如归伪英雄气概。

阡能起义是在唐王朝正集中全力镇压大齐政权，各地藩镇纷纷派兵入关围攻长安，黄巢义军处境日益困难时，于敌人后院点起的一股烈火，它直接打击了敌人的大本营，牵制了部分官军，搅乱了敌心，极大地支援了浴血奋战的黄巢义军，在唐末农民战争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唐僖宗结束了流亡生活，带领小朝廷从成都回到了长安。以黄巢大起义为中心的唐末农民战争基本上被镇压下

去了。李唐王朝又一次险渡难关，死灰复燃了。如果说，广德年间唐玄宗从成都回到长安后，李唐王朝尚维持了一个多世纪，那末唐僖宗及其后继者的末日却屈指可数了。当时新、旧藩镇势力更加恶性膨胀：“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方立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耐溥据徐、泗，朱埴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

唐昭宗即位后，国势更趋衰败，李唐统治摇摇欲坠，农民反抗斗争仍在各地继续开展，“岭表多盗”。

五代十国史

第一章 五代十国农民战争

第一节五代递嬗与农民反抗斗争

天祐四年（公元907年）四月，朱全忠废唐哀帝自立为帝，国号梁，史称后梁。此后，在北部中国黄河流域相继递嬗了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至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正月，赵匡胤灭后周建立宋朝，凡五十三年，是为五代。

五代时，皇帝多出身军阀，刺史也多以军功拜，王朝更迭犹如走马灯，统治残暴，刑法苛酷，军阀为争夺地盘连年混战，农民所受兵役、徭役和赋税的负担特别沉重。北方契丹奴隶主贵族与中原地区一些军阀拐勾结，不断南侵。北部中国广大农民既受本朝封建统治者的残醋压榨。又受西北少数民族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乃至野蛮抢掠和杀戮，加上唐末以来长期战乱造成的水利失修，水旱灾害肆虐，特别是朱全忠父子为与李克用父子争霸而多次扒开黄河大堤，造成滔滔浊水横流、黄河改道，使其中、下游一带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生产大体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农民生活极为痛苦。总之，五代时，除个别王朝的统治者实施过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出措施，个别地区和较短时期内社会生产有所起色外，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因而农民的反抗斗争比较普遍、激烈，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都有一些农民起义，有的农民起义规模还相当可观，斗争矛头直指五代统治者，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同时，这个历史时期的农民反抗斗争，还带有浓厚的反民族压迫的时代特征，有些则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交织在一起。五代农民起义，是唐末农民大起义的继续和发展。

不过，由于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唐末农民大起义失败后，农民反抗力量遭到封建统治者的严重摧残，元气大伤，力量比较薄弱。而五代统治者的军事力量比较强大。如果说，在镇压农民反抗斗争时，唐统治者一贯使用武力镇压为主，并辅以政治诱降的手腕；那末，五代统治者则除个别执政者继续使用这种办法外，大多数执政者主要使用屠刀，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围剿。因此五代时期农民起义一般不易发动，势力较小，当其尚未进一步发展，壮大，就在较短时间内被扼杀了。

（一）后梁（公元907—923年）

后梁创建者朱全忠（公元852—912年），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人，原名朱温。据《旧五代史》卷一《太祖本纪二》云：朱温“昆仲三人，俱未冠而孤，母携养寄于萧县人刘崇之家。帝（朱温）既壮，不事生产，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崇以其慵惰，每加谴杖”。唐末参加黄巢义军，后降唐。黄巢起义失败后，朱全忠以汴州（今河南开封）为基地，先后消灭了秦宗权、王师范、朱瑾、朱瑄等军阀，占据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当时势力最强大的军阀。天祐元年（公元904年），朱全

忠杀唐昭宗，立其子李祝为傀儡皇帝，三年后自立为帝，改名晃，建后梁，定都汴州。

朱全忠为与其他军阀争夺地盘，掠夺财富，特别是与宿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父子争霸中原的战争，长达四十余年，兵燹造成的破坏极为惨烈，战祸殃及今山西南部，山东西南部、河北北部及河南西北部等广大地区。朱全忠又用脸上刺字等酷法，逼使大批农民当兵，担负沉重赋役，河南之民“因于辇运”，激化了阶级矛盾。除诸道、尤其是河朔、青（今山东益都）、齐（今山东济南）一带农民用“截指割股”、“自残肌肤”的方式进行反抗外，广大农民纷纷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史称“梁、晋兵争山东，群盗充斥道路”。许多逃亡士卒，“聚山泽为盗，大为州县之患”。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底，尽管朱晃下诏“自今虽文面亦听还乡里”，但仍有一些人继续坚持斗争。李虔领导的汝州（今河南临汝）起义军，被刺史蔡从训击败，李虔牺牲。张率领的义军，战斗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四月，这支义军在蔡州西平县界，被叶县镇遏使冯德武击败，张等被俘。

乾化元年（公元911年）正月，朱晃在与李存勖的柏乡（今河北柏乡）之战大败后，为泄其愤，竟惨无人道地将深（今河北深县）、冀（今河北冀县）“二州之人，悉为奴掳，老弱者皆坑（杀）”。乾化二年（公元912年），朱晃亲率大军围攻枣强（今河北枣强东）、蓨县（今河北景县），为报复枣强守军顽强抵御、杀伤数以万计的梁军，攻破枣强后，“无问老幼皆杀之，流血盈城”。他的这些暴行，激怒了这一带百姓，因此，当朱晃的军队被晋忻州（今山西忻县）刺史李存审等出奇兵夜袭其营，复误信断臂者所云“晋军大至”的谎言，惊慌失措的朱晃烧营逃至冀州时，当地百姓乘机奋起报仇，“蓨（县）之耕者，皆荷铅奋梃逐之，委弃军资器械不可胜计”。事后才知晋军仅为少数游骑，朱晃“不胜慙愤”，驰归贝州（今河北南宫东南）杀丧师之将张正言、许纵实和朱产柔，而他本人，“先抱痼疾，因是愈甚。”

同年六月，朱晃为其次子郢王朱友珪谋杀，朱友珪自称皇帝。翌年二月，均王朱友贞利用禁军发动宫廷政变，杀朱友珪，称帝，是为后梁末帝。他在位期间，皇族争夺帝位不已，诸将之间矛盾重重，特别是继续与李存勖在今河北、山东和河南一带的激烈争战，弄得“食储已竭，飞輓不充”、“肺无宿饱之馈，家无担石之储，而又水潦为灾，虫蝗作沴”，而地主豪绅又乘机进行“纳利及一倍已上”的盘剥，民不聊生，奋起反抗。徐州（今江苏徐州）属邑几乎全为农民起义军“所剽”。贞明元年（公元920年），爆发了规模很大的著名的陈州（今河南淮阳）毋乙、董乙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的导火线是陈州刺史朱友能倚仗他是皇族惠王，“动多不法”，恣意欺压民众。摩尼教则是发动这次起义的工具。《佛祖统纪》卷四二《法运通塞志》云：“陈州末尼聚众反，……其徒以不茹荤饮酒，夜聚淫秽，画魔王踞坐，佛为洗足，云佛是大乘，我法乃上上乘”。“末尼”，即摩尼。“夜聚”是指摩尼教夜间进行秘密活动。所谓“夜聚淫秽”，是封建统治者污蔑参加起义的男女群众一起活动。“佛为洗足”之类，则是摩尼教中渗入佛教思想的反映。当毋乙等在农民中进行宣传时，农民“望风影附”，很快聚集上千人。同年六月，每乙正式发难，“攻掠乡社，长吏不能诘。是岁秋，其众益盛”，义军声势遍及陈

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和蔡州（今河南汝南）等地，并“南通淮夷”，建立起以母乙为天子，“其余豪首，各有树置”的农民政权。朝廷屡发州兵讨捕，反为义军击败。十月，后梁统治者搬出皇帝的御林军，并正数郡大兵配合下，才将起义镇压下去，母乙等首领八十余人被俘牺牲。这次起义摇撼了腐朽的后梁统治。其后不久，这一王朝就灭亡了。

（二）后唐（公元923—936年）

后唐创建者李存勖（公元885—926年），沙陀族人。开平二年（公元908年）其父李克用死后继任河东节度使，袭晋王爵。同光元年（公元923年）四月，李存勖称帝，是为庄宗。因曾受李唐赐姓，故国号仍曰唐，史称后唐。十月，李存勖亲率大军袭击汴州，灭后梁，定都洛阳。他骄横昏，宠信宦官、优伶，沉缅酒色，所重用的租庸使孔谦，“滥承委寄，专掌重权，侵剥万端，奸欺百变”，将搜括来的大量民脂民膏，供其挥霍，并进行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史称：“是时，庄宗失政，四方饥馑，军士匮乏，有卖儿贴妇者，道路怨咨”，“民多流亡”，而李存勖仍“游数不息”。闪光四年（公元926年）三月，又诏河南府预借今年秋夏租税。当时年饥民困，百姓不胜其酷，“京畿之民，多号泣于路，议者以为刘盆子复生矣”。刘盆子是西汉末年赤眉起义军拥立的皇帝。所谓“议者以为刘盆子复生”，就是认为后唐将亡，农民起义军将兴。实际上，当时的邺都（今河北大名）一带，农民起义军已经“蜂起”。镇守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的魏博军，因踰年代归，朝廷惧其至邺都作乱，遂命其留屯贝州，他们愤而发动兵变。李存勖犹不愿拿出内府金帛抚慰诸军。后见事态愈趋严重，才被迫拿出一些金帛赐给诸军，但为时已晚。军士们背着赐物大骂道：“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为”。四月，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利用军士们不满情绪，在洛阳发动叛乱，李存勖中流失而死。权臣李克用养子李嗣源乘机率军至洛阳，号监国，旋称帝，改元天成，是为后唐明宗。

后唐明宗革除李存勖的弊政，政治比较清明，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但是，他姑息藩镇，滥赏军士，用人不当，安重诲、任圜等奸佞之辈受到重用，因而农民反抗斗争仍不断发生。天成年间（公元926—930年），深州（今河北深县）农民聚众起义，属邑豪绅惊恐不安，刺史陆思铎亲领骑兵讨捕。安远节度副使范延策上奏朝廷，“请于山林要害置军镇，以绝寇盗”。

后唐时，契丹统治者南下骚扰更加频繁。契丹铁骑所至之处，烧杀抢掠，数以万计的边民被掳为奴隶，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深受其害的河北一带农民十分愤怒。天成三年（公元928年）四月，定州（今河北定县）义武节度使王都勾结契丹南下骚扰，遭到后唐军打击。八月，当契丹残部狼狈逃至幽州（今北京）散投村落时，“村民以白梃击之，其得脱归国者，不过数十人。自是契丹沮气，不敢轻犯塞”。

长兴元年（公元930年），东川节度使董璋等在蜀中发动叛乱，后唐明宗命天雄节度石敬瑭率军征讨。川路险阻，关右之民疲于转饷，往往逃匿山谷，聚众起义。而后唐明宗又命宰臣安重诲督战，他“日驰数里百，远近惊骇，督趣粮运，日夜不绝”，农民苦于输送，“毙踣道路者，不可胜数”，激起更大反抗，长兴三年（公元932年），“或有亡命山泽，及为事关连逃避人等，并放归乡”的诏令，就是这种写照。

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十一月，后唐明宗死后，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朝政益趋腐败。翌年三月，潞王李从珂举兵驱逐闵帝，旋称帝，是为后唐末帝。由于他以重赏换取悍将骄兵支持，百般搜括民脂民膏，怨声载道。清泰元年（公元934年），蚕麦不熟，天雄军管辖地区农民起义军活动频繁，“剽劫坊市乡村”。翌年，后唐末帝却以防御契丹需要而诏令“借河东人有蓄积者菽粟”，镇州（今河北正定）输绢五万匹籴军粮，镇冀人车千五百乘运粮于代州（今山西代县）。又诏令魏博市籴。当时水旱民饥，石敬瑭遣使“督趣严急，山东之民流散，乱始兆矣”。清泰末（公元934—936年），濮阳（今河南濮阳）义军攻入郡城，被刺史孙彦韬击破。从当时一些文臣武将认为“严刑条法则无盗”，并向朝廷上表建议：“今后捕盗，权行重条，俾其知惧，易为禁止”，法令规定“窃盗不计赃多少，并纵火强盗，并行极法”来看，后唐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农民反抗斗争激烈。

（三）后晋（公元936—947年）

后晋创建者石敬瑭（公元892—942年），沙陀人，清泰三年（公元936年），为了取代后唐称帝，他不惜以割让幽（今北京市）、儒（今北京延庆）、顺（今北京顺义）、檀（今北京密云）、沄（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蔚（今河北蔚县）、涿（今河北涿县）、武（今河北宣化）、妫（今河北怀来）、蓟（今河北蓟县）、新（今河北涿鹿）、应（今山西应县）、云（今山西大同）、寰（今山西朔县东）和朔（今山西朔县）等十六州，即今河北和山西的北部、北京市一带，每年输帛三十万匹的高昂代价，认比自己小九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帝的卖身投靠，求援于契丹。耶律德光十分高兴。亲率五万骑兵帮助石敬瑭。同年十一月，后唐末帝兵败自焚。契丹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建都汴州。

用这样特殊方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必然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一开始就相当尖锐。因为广大人民痛恨石敬瑭的卑劣行径；而后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必然加强对前者的控制，实行高压政策。为了向契丹纳贡，岁时赠遗，乃至贿赂契丹权贵，石敬瑭加紧掠夺人民，聚敛频繁，徭役重叠，天下州县，无不凋残。而契丹统治者得到幽云十六州和丰厚贡品后，不仅经济实力大为增强，胃口更大了；而且扫除了进一步南扰中原的地理障碍。因此经常出兵南扰，肆无忌惮地抢掠人口和财物，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再加上后晋政治腐败？官吏贪残，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不已，故在石敬瑭统治时期，农民反抗斗争一直不断。

天福元年（公元936年），慈州（今山西吉县）起义军“攻城，三日而退”。翌年，由于后晋王朝搜罗“官健”，抓民为乡兵，引起天下诸道州府农民的震惊，乡村骚动，许多农民被逼弃家结伴逃入山林。石敬瑭一再发布诏令，要这些逃亡者限期还乡复业，并威胁道：“如限内不来者，其物业许邻近人请射承佃”，“当务绪集者，委逐处差兵掩杀”。但是，招诱和屠杀都难以遏止农民的反抗。宋州（今河南商丘）仍出现农民起义军。天福四年（公元939年）十月，金州（今陕西安康）起义军在度从说等率领下，进攻洵阳（今陕西旬阳北）。翌年正月，后蜀出兵攻打后晋，起义军张达、任康等“劫清水、德铁之城以应之”。天福七年（公元

942年）六月，石敬瑭死，新继位的后晋出帝石重贵，对契丹不象其叔父那样唯命是从，“与契丹绝好，契丹主连年伐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民馁死者数十万口，流亡不可胜数”。后晋统治者不仅不予赈济，反而派出使者六十余人，搜刮诸道农民粮食。开运元年（公元944年）三月，契丹主自澶州（今河南濮阳县南）北分为两军，“一出沧、德，一出深、冀而归，所过焚掠，方广千里，民物殆尽”。后晋出帝又命借乡兵，“每七户共出兵械资一卒”，遣使三十六人于诸州搜括。这些使者在大批吏卒簇拥下，携刀杖、锁械，直入百姓家，掠夺钱财，“州县吏复因缘为奸”，中饱私囊。不堪沉重赋役的农民纷起反抗。

开运二年（公元945年）正月，契丹南掠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水年）、磁（今河北磁县）三州，兵锋及子安阳河，千里之内，焚掠将尽。后晋出帝又下令刮籴民粟赡军。成德军节度使杜重威，不仅不积极抗击契丹骚扰，“部内城邑相继破陷，一境生灵受屠戮”，甚至契丹数名骑兵驱使千百汉人从其城下经过，杜重威也“但瞋目延颈望之，无意邀取”；而且在其辖区内，“刮借钱帛，吏民大被其苦，人情咸怨，重以境内凋弊，十室九空。杜重威还与归德军节度使李守贞纵容麾下兵将，“行营所至，居民豢圉一空，至于草木皆尽”。开运三年（公元946年），河南、河北先是大旱，继而霖雨不止，川泽汛涨泛滥，损害秋稼，“秦州雨，两旬不止，邺都雨水一丈，洛京、郑州、贝州大水，邺都夏津、临清两县，饿死民凡三千三百”，曹州饿死三千人，河南、河北诸州郡饿死者数万人。饱受人祸天灾摧残的广大农民，掀起新的斗争风暴。四月，沂（今山东临沂）、密（今山东诸城）、兖（今山东兖州）、郓（今山东郓城）等州义军竞起，“所在屯聚，剽劫县邑，吏不能禁”，兖州节度使安审琦出兵讨捕，反为义军击败。五月，定州“部民相次掳杀流移，约五千余户”。六月，“大饥，群盗起”。七月，河南、河北诸州义军“蜂起，剽略县镇”。八月，农民起义军攻入临濮（今山东鄄城南）、费县（今山东费县）。定州孙方简兄弟，用佛教组织民众，以该州西北的狼山为据点，进行反抗斗争。他们还经常率军出击契丹兵，颇获其甲兵、牛马和军资，有时甚至深入契丹境内袭击，多有杀获。同年底，杜重威和李守贞向契丹屈膝，并随契丹攻后晋，入据东京时，“出入扬扬，市人诟之，略无惭色”，京东诸州义军竟相兴起。义军急攻宋州，契丹主遣大将高行周前去镇压。后晋原置乡兵罢废时，令七户输钱十千，铠仗交官府，有些农民遂逃亡山林起义。

开运四年（公元947年）正月，契丹主耶律德光废后晋出帝为负义侯，后晋亡。耶律德光称帝，同号辽。他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不通政事，华人之狡狯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敛货财，民不堪命。”又刮率京城钱帛，“都下士庶，若在涂炭”。复遣使诸州，进行搜刮，“胡兵人马不给粮草，遣数千骑，分出四野，劫掠人民，号为‘打草谷’。东西二、三千里之间，民被其毒，远近怨嗟。”这就使得原已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农民的反抗斗争也增添了反民族压迫的时代特色。

当时，“所在相聚为盗，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攻陷州县”，杀死官吏和地主豪绅，没收其财物。宋、徐二州义军风起云涌。“东方群

盗大起，陷宋、亳、密三州”，耶律德光急遣泰宁节度使安审琦、武宁节度使符彦卿等归镇，并以契丹兵护送。符彦卿至桶桥（在今安徽宿县），正值李仁恕率数万义军急攻徐州，符彦卿与数十骑至城下，企图招降义军，李仁恕乘机欲劫持其为人质以取徐州，但未成功。磁州滏阳人梁晖，在契丹入汴时，率领数百义军先入磁州，义军纪律严明，无所侵犯。他侦知相州（今河南安阳）兵仗储存甚多，又无守备，遂率义军于三月二十一日深夜，逾城攻入相州，杀契丹数十人，夺器甲数万件，占领该城，守将逃走。澶州节度使契丹人耶律朗五，性贪虐，吏民苦之。王琼率千余义军夜袭澶州城，占领其南城，围耶律朗五于子城，并断浮桥。耶律德光派兵驰援，义军退屯近郊，被契丹兵打败，王琼牺牲。河南嵩山张遇率义军万余攻打郑州（今河南郑州），契丹所署遥领洋州节度使充洛京巡检方太，和前洛州团练使李琼率兵拒战，义军流矢射杀李琼。义军攻打洛阳，契丹留守刘曦弃城逃往许州（今河南许昌），方太与巡检使潘环击退义军。伊阙（今河南洛阳南）义军领袖自称天子，领众万余将入洛阳城，誓众于郊坛，也被方太击溃。此外，还有一支由四十岁左右妇人“白项鸦”领导的数千人义军。

广大农民如火如荼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契丹统治者，耶律德光派到州县搜括钱谷的爪牙，有些被当地农民捉住杀死。如晋州（今山西临汾）的刮钱使、谏议大夫赵熙，被晋州百姓杀弹。委任的武官，有的也被谋害。如屯驻陕州（今河南陕县）的将领刘愿，被奉国小校王晏等处斩。冀州（今河北冀县）刺史何行通，被当地民众打死。耶律德光对左右侍臣说，“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遂命契丹诸帅各归本镇。他本人也不得不撤出中原地区，狼狈北归。在北撤途中，耶律德光一方面供认自己“有三失：杀上国兵士，打草谷，一失也；天下括钱，二失也；不寻遣节度使归藩，三失也”。另一方面，为发泄其不甘失败的仇恨，极其野蛮地屠杀农民起义军将士，乃至普通百姓。如他亲自率兵攻打梁晖据守的相州，“悉杀城中男子，驱其妇女而北，胡人掷婴孩于空中，举刃接之以为乐”，仅七百余人幸免，遇难者“十余万”。耶律德光的兽行，激起广大人民更加猛烈的反抗。不久，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暴君，在惊悸中病死于栾城杀胡林。

（四）后汉（公元947—950年）

后汉创建者刘知远（公元895—948年），沙陀人，原为后晋河东节度使。开运四年三月，他乘耶律德光北撤之机，于太原称帝。同年六月，迁都汴州，国号汉，史称后汉。

后汉建立初，面临的是一副经过后晋以来长期人祸天灾所造成的乱摊子：广大中原地区田园荒芜，人烟断绝，满目疮痍。后汉统治者不仅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除弊兴利，招抚流亡，以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国家富强，反而变本加厉地压榨农民，朝政又日趋腐败。掌禁卫兵权的侍卫亲军骑军都指挥使史弘肇，“出兵警察，务行杀戮，罪无大小皆死。是的，太白（星）昼见，民有仰观者，辄腰斩于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斩之。又为断舌、决口、斮筋、折足之刑。”掌财权的三司使王章，搜括农民特别厉害。旧制：夏秋苗租，农民交税一斛，另加二升，称为“鼠雀耗”。乾祐年间（公元948—950年），王章不仅恢复以前就有的每斛更输一斗

的“省耗”，而且加倍征收，即每斛更输二斗，“百姓苦之”。原先官库出纳缗钱，均以八十为陌，“至是，民输如旧，官络者以七十七为陌”，因而一陌钱中农民就亏损三文钱。民间发生土地诉讼时，“虽无十数户，（王）章必命全州覆视，幸其广有苗额”，以增税收，致使“民力大困”。“民有犯盐、矾、酒之令，虽丝毫滴沥，尽处极刑。吏缘为奸，民不堪命。”地方长吏也千方百计榨取民脂民膏。如青州节度使刘铢，“擅行赋敛，每秋苗一亩，率钱三千；夏苗一亩，钱二千”，“部内（百姓）畏之，胁肩重迹”。西京留守王守恩，“丧车非输钱不得出城。下至抒厕，行乞之人，不免课率，或纵麾下，令盗人财”。

因此，后汉立国不久，阶级矛盾就非常尖锐，农民起义遍及四面八方，“朝廷患之。”后汉高祖用严刑峻法镇压起义群众，诏令规定：“贼盗捕获，不计赃物多少，按验不虚，并宜处死”，并分命使者逐捕。“喜为杀戮”的宰相苏逢吉，草拟诏书，规定凡是参加农民起义军者，“所居本家及邻保皆族诛”。有人对他说，族诛已非王法，而邻保同罪，岂不太过分了。苏逢古不以为然，“但去族诛而已”。于是郓州捕贼使臣张令柔，尽杀乎阴县十七村民数百人。对于卫州（今河南汲县）境内义军，刺史叶仁鲁“每亲自擒捕，随意杀戮，滥死者众”。而苏逢吉却以叶仁鲁这样的刽子手为“能干”，由是天下“因盗杀人滋滥”。但是，高压并不能吓倒反抗者，斗争仍在各地继续进行，甚至天子眼皮底下的“京畿，多盗，中牟尤甚”。权判开封府李谷，“诱邑人发其巢穴”，发兵数千，协助中牟主簿刘德舆，将义军镇压下去。

后汉隐帝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复杂、尖锐，朝政更加腐败。从乾祐二年（公元949年）制书所说各地农民起义军“抛弃耕农，聚集林薮，昼伏夜动，害物残人”来看，义军仍在坚持斗争，活动方式更加灵活。鉴于武力镇压行不通，后汉统治者同时“继行招谕”，表示在“边烽少弭，国患渐除”后，逐渐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淮北一带的义军不相信这些诺言，而寄希望于南唐：“多送款于（李）景，景遣皇甫晖出海、泗诸州招纳之。”其实，这时的南唐朝政也已趋腐败，义军即使被其招纳，依然摆脱不了受压榨的命运。

（五）后周（公元951—960年）

后周创建者郭威（公元904—954年），原为后汉天雄军节度使，邺都留守。因后汉隐帝厌为大臣所制，将史弘肇、王章和掌机要的枢密使杨邠三大臣杀死，又密令谋害郭威。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十一月，郭威抢先发动叛乱，率军进攻汴州，后汉隐帝亲自出战，为乱兵所杀。适值契丹进扰，河北诸州告急，太后命郭威领兵抵御。十二月初，在澶州发生兵变，“或有裂黄旗以被帝（郭威）体”。拥其为帝，仍都汴州。

郭威所建后周，是在后汉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基础上脱胎而来，故农民起义军仍在各地活动。郭威在即位赦文中就向义军进行诱降：“诸处有犯罪逃亡之人，及山林草寇等，咸许自新，一切不问，各还乡里，自务营生，仍仰所在切加安恤，所繇节级不得衷私妄有恐动，如赦到后一月不归本业者，复罪如初。”义军置之不理。广顺元年（公元951年）正月，忠于后汉皇室，反对郭威篡位的原徐州教练使杨温等，在徐州曾“招唤草贼同力守把”。从“朕以村墅小民，倜被煽诱，念其庸贱，特与含容，其招入城草贼，并放归农”来看，这些所谓“草贼”，乃是被杨温等利

用的农民起义军。广顺二年（公元952年），登州（今山东蓬莱）的农民起义军攻打地主豪绅。郓州巨野（今山东巨野）的义军众至千余人。庆州（今甘肃庆阳）刺史郭彦钦，对州北党项野鸡族，“扰之以求赂”，又擅加榷盐钱，引起该族怨恨反抗。同年十月，郭威命环、宁二州合兵征讨。十一月，又徙保义节度使折从阮为静难节度使，加紧对野鸡族的镇压。郭威并特别指令折从阮“野鸡族能改过者，拜官赐锦；不则进兵讨之”。对后周统治者的这种手腕，除酋长李万全等受诏立誓外，群众犹不服。起初，党项杀牛族与野鸡族有隙，听说官军围剿野鸡族，馈饷迎奉官军，而“官军利其财畜而掠之”，杀牛族大失所望，遂反与野鸡族联合抗击官军，败宁州刺史张建武于包山。郭威怒黜郭彦钦于家，贬张建武为右司御副率。

显德元年（公元954年）正月，郭威死，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后周世宗。他在郭威改革朝政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励精图治，朝政比较清明，国内阶级矛盾较为缓和，但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依然存在，农民反抗斗争不绝于史乘。

显德元年十月，鉴于累朝分命使臣巡检，藩侯守令皆不尽力镇压，故“诸道盗贼颇多，讨捕终不能绝”。柴荣将其全部召回，“专委节镇、州县，责其清肃”。出于消除农民反抗斗争和加强禁军战斗力的双重政治目的，柴荣在整顿官军时，“诏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于阙下，仍目之为强人。帝以捷勇猛之士，多出于群盗中，故令所在招纳有应命者，即贷其罪，以禁卫处之”。

但是，柴荣只能将一部分义军招纳进官军，更多的义军则继续进行斗争。显德初（公元954—956年），卫州（今河南汲县）、赵州（今河北赵县）、邢州（今河北邢台）和馅州（今河北永年）等地之间，有许多逃亡者，“以汲郡依山带河，易为出没，伺间椎剽，吏捕之，辄遁去，故累岁不能绝其党类”。卫州谰史郭进根据逃亡者的上述活动特点，“因设计发擿之”，将他们瓦解。活跃在济州（今山东巨野南）灌莽萑蒲之中的义军，也被刺史任汉权在当地地主武装配合下，用严令和收买义军叛徒相结合的手腕镇压。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彰武留侯李彦颧，“性贪虐，部民与羌胡作乱，攻之”，柴荣被迫将其召还朝廷，以息民愤。显德四年（公元957年）九月，中书舍人窦俨上疏献所谓“止盗”术：“令盗贼自相纠告，以其所告赀产之半赏之，或亲戚为之首，则论其徒侣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则盗不能聚矣”，他还以新郑乡村组织地主武装，并用连坐法镇压农民反抗的事例，“请令他县皆效之”，得到柴荣的赞赏，也反映了当时还有不少义军。

第二节五代十国社会矛盾和农民反抗斗争

与五代大约同时，先后在南部中国建立的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亦称荆南），以及山西的北汉，史称十国。

十国时期，尽管诸国林立，处于分裂割据局面，但各国之间并非闭关自守，互相隔绝，而是经济交流，与北部中国中原王朝的商业贸易也相当密切。由于十国创建者大多在本国采取一系列招抚流亡、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减轻赋役、发展商业和海外贸易，推行保境息民政策等措施，社会比较安定，战乱比五代少。此外，黄巢大起义时，一大批北

方农民徙至南方。此后，为逃避军阀混战和契丹统治者的杀掠，又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南方，他们不仅给这里增加了大批劳动人手，而且带来了中原地区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从而使唐中期以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江南一带的社会生产，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吴越、吴、南唐和闽等国，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尤为显著。因此，农民起义除在个别国家较多外，其余各国农民起义较少。但是，至创建者执政后期，他们骄奢淫佚起来，尤其是他们的继位者则更加荒淫腐朽，为满足其无底欲壑，横征暴敛，刑法苛酷，统治集团争权夺利成风，激化了阶级矛盾，农民反抗斗争日益增多。

（一）前蜀（公元907—925年）

前蜀创建者王建（公元847—918年），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乡里称其为“贼王八”。唐木应募从军，从讨王仙芝有功，擢为忠武军八都校之一。唐僖宗逃往蜀中时，王建为随驾五都之一，被大宦官田令孜看中，收为养子，官拜壁州刺史。大顺二年（公元891年），王建攻占成都，为西川节度使，逐渐击败陈敬瑄等蜀中大小军阀，尽有两川之地。天复三年（公元p03年），被封为蜀王。朱全忠以后梁代唐，王建也称帝于成都，史称前蜀。前蜀辖有今四川、鄂西、陕南及甘肃东南地区，僻处西南一隅，受中原战乱波及较少，土肥物丰。王建又实施了一些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政治经挤措施，故前蜀经济发展，社会比较安定。但是，由于王建在争夺两川过程中，征战多年，社会经济遭到破坏。建前蜀后，尤其是他晚年，信用宦官，贪恋女色，猜忌文臣武将，诸子又争权夺利，朝政日趋腐败。因此，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发生。

王建与东川节度使顾彦晖争夺地盘三年，士卒疲于矢石，百姓困于输轭，义军群起，“多据州县”。武成元年（公元908年）正月，王建发布大赦，命“挟藏军器，亡命山泽”的农民起义军，百日之内向官府自首，否则“复罪如初”。永平三年（公元912年）四月，董琢发动维州（今四川理县东北）羌族起义，后被王建派遣的保銮军使赵绰镇压。天汉元年（公元917年），戎州（今四川宜宾北）蛮胡连等起义。

光天元年（公元918年）王初继位后，沉溺酒色，宠信宦官，不理朝政，“衣朱紫音皆盗跖之辈，在郡县者皆虎狼之人，奸谀满朝，贪淫如市”。蜀都表面上繁华，边庭无烽火之警，实际上国内却有“腹心之疾”，“诸州虐理处多，百姓失业欲尽，荒田不少”，农民起义军“成群”。乾德四年（公元922年）五月至九月，天旱，“林木皆枯，千里赤地”，农民实在活不下去，在许多地方掀起反抗浪潮。渠州（今四川渠县）渠江人杜处齐，聚集逃亡者，占据巴王城，后被梁州都指挥使、知州事潘在迎击败。鸡子槽义军，败于武信军节度使王宗寿，义军领袖李茂章被俘杀。

（二）后蜀（公元926—955年）

后蜀创建者孟知祥（公元874—934年），邢州（今河北邢台）龙冈人，李克用侄女婿。同光三年（公元925年）九月，后唐以魏王继岌充西川四面行营都统，郭崇韬充东北面行营都招讨制置等使，率军攻打前蜀。王衍无防御准备，不少地方长吏望风归降，痛恨其腐朽统治的蜀人欢迎后唐军，故后唐击前蜀，犹如摧枯拉朽，“自出师至降（王）衍，凡

七十五日”。

两川新定，农民起义军群起，布满山林。郭崇韬怕撤军后义军更盛，命其将任圜、张筠分别率兵招讨。至天成元年（公元926年）三月，蜀中义军犹在活动，“烧劫镇戍”，地主豪绅十分惊恐。万州（今四川达县）杜景温率领的义军，“劫东乡豪，杀县令牟孟”，焚烧地主豪绅的宅舍。新任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一方面择廉吏，宽法令，除横赋，安抚流民，以收买人心；另一方面，遣左厢都指挥使赵廷隐、右厢都指挥使张业和补万州管内诸坛点枯指挥使石处温等，将兵分谴义军。张业用五家为小保，五十家为大保的连坐法，隔绝义军与农民的联系，将义军镇压。

应顺元年（公元934年）闰正月，孟知祥称帝于成都，建元明德，史称后蜀。半年后，孟知祥死，子孟昶继位。其执政前期，以王衍亡国为戒，颇勤政事，纳谏，节俭，重农，轻刑，朝政尚好。及至后期，“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装之”。广政十八年（公元955年），秦（今甘肃秦安西北）、凤（今陕西风县）等州民，“怨蜀之苛政，相次诣阙”，请后周世宗发兵解民倒悬之苦。广政十九年（公元956年），陵州（今四川仁寿）、荣州（今四川荣县）僚民起义，为弓箭库使赵季文镇压。翌年，昌州（今四川大足）僚民起义，杀巡检使赵汉琼等，左界巡检使申彦瑭将其击败。广政二十七年（公元964年）前后，雅州（今四川雅安）夷民张忠乐率义军数千攻占州城，杀永平军节度管内捕盗游奕使曹光实亲属，曹光实勾结宋将王全斌夺回州城。广政二十八年（公元965年）正月，宋灭后蜀，王全斌等专杀降卒，擅开公帑，广纳货财，“竞取民家玉帛子女”，引起蜀民极大不满，纷起抗争，义军遍及各地。

（三）吴（公元892—937年）

吴的创建者杨行密（852—905），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唐末参加农民起义，曾被捕，后应募为军卒，以战功逐渐成为新军阀。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唐昭宗任其为淮南节度使。天复二年（公元902年）进封吴王。据有今江西、安徽以及江苏、河南和湖北等省部分地区。

这个地区自晚唐以降，一直军阀争战不已，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圜幅数百里，人烟断绝”，阶级矛盾尖锐，农民反抗斗争始终不绝。杨行密统治时期，实施招抚流亡、劝课农桑，政事宽简，睦邻息民等政策，社会生产得以发展，几复昔日富庶之旧。但是，农民起义仍时有发生。如夏韶领导的淮南义军，“自海入淮，转掠沿岸郡邑，至濠、梁间，众至数千人，军势颇盛，郡邑与战，多为所败”。杨行密亲自出马，义军才被打败，夏韶不幸被俘。杨行密又遣卢州冲山指挥使陶雅平定本乡秦定过修已等义军。虔州（今江西赣州）溪洞，有许多农民起义军。江都（今江苏扬州）也有不少义军，法令虽严，难以禁止。后来淮南右厢马步军都虞侯李简，用黥俘者面之法，将义军镇压下去。唐、梁之际，一支数千人的义军攻打抚州（今江西抚州），攻势凌厉，“虽锺传都督江西八郡，不能制御”，后为危全讽兄弟等组织的地主武装击溃。

天祐二年（公元905年）杨行密死后，诸子只知搜刮享乐，军政大权旁落于权臣徐温之手。徐温继行杨行密治国方略，社会经济获得进一

步发展，但吴的阶级矛盾仍较尖锐。武义元年（公元919年），“吴禁民私蓄兵器”，企图消饵农民的反抗，而“盗贼益繁”的史载，反映出农民反抗势不可挡。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吴民还用各种方式揭露和打击统治者。如庐州民痛恨横征贪暴的观察使张崇。当他入觐吴王时，州民以为他将改任，喜形于色地说“渠伊（他）不复来矣。”张崇风闻后，就计口征收“渠伊钱”，以为报复。翌年，当张崇再次觐见吴王时，州民遂以目相视，捋髭为庆，表示他们对他的厌恶。张崇回庐州后，又征“捋髭钱”。金陵（今江苏南京）伶人采取更巧妙的手法讽刺张崇：“戏为死获谴者云，当作水族去，阴司遂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獭’”。宣州（今安徽宣城）刺史徐知训，是徐温之子，倚仗父势，聚敛苛暴，州民恨之入骨。当他觐见吴王时，伶人扮作绿衣大面者说，“我宣州土地神，吾主入觐，和地皮掘来，故得至此”。

（四）南唐（公元937—975年）

南唐创造者李升（公元888—943年），徐州人，吴权臣徐温养子，名知诰。顺义七年（公元927年）徐温死，他代为辅政。天祚元年（公元935年），封齐王，置齐国。天祚三年十月，徐知诰废吴王杨溥为让皇，称帝于金陵，建元升元，自称唐玄宗子永王璘之裔，还姓李，改名升，国号大唐，史称南唐。南唐承袭并扩大了吴的势力范围，李升在位七年间，朝政比较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阶级矛盾比较缓和，农民起义较少，见于记载者，只有升元年间（公元937—943年）蕲州（今湖北蕲春）诸祐（一说诸佑）起义。他“自言不茹晕者数世，能使贫者富，富者贫，俚民稍稍效之。其徒十数，男女揉杂，互易匹耦，谓之忍辱。……行之数年，积数百众，夜行昼息，取资于盗。”黄梅县令陈起，倚靠巡抚之兵将这一起义镇压。

南唐中主李璟执政时期（公元943—961年），虽曾一度击灭闽、楚，但他骄傲，且宠信奸佞之臣陈觉等“五鬼”，赏罚不当，重税，“以茶盐强民而征其粟帛，谓之博征”，又在淮南大兴营田，营田官吏虐用民力，“民甚苦之”。在常州（今江苏常州）和楚州（今江苏淮安）营田的内臣车延规、傅宏，“处事苛细，人不堪命”，逼得营田民群起造反。李璟命祠部郎中徐铉乘传巡抚，捕杀倡首者。虔州（今江西赣州）常有义军出没。其溪洞犷民，凭借险要，攻打地主豪绅宅舍，没收其资财。保大十一年（公元953年），南唐大旱，饥民涉淮水逃入后周求食者不绝如流。南唐濠、寿二州发兵阻遏，饥民愤怒反抗，冲入后周境内。此后，后周世宗连年发兵进攻南唐，李璟割地、纳贡，以求苟延残喘。而苦于南唐腐败统治的民众，则“争奉牛酒迎劳”周师。然而周师却以战胜者自居，视南唐民众为“奴隶俘虏”、“犹如草芥”，恣意劫掠民财，村无炊烟。民众于失望之余，愤而相聚山泽，义军布满江淮一带。他们糊纸为甲胄，操农具作兵器，利用废弃堡垒，打击周师，时人呼为白甲军（又称“白甲子”、“甲军”），周兵讨之，屡为所败。江州（今江西九江）柴克宏率领诸郡屯田民起义，“周师苦之”。江淮人民的英勇斗争，使南唐统治者得以将后周所占诸州收复，暂避亡国之祸。这表明广大农民不仅不屈服于本国的腐朽统治，而且也不允许其他统治者恣意奴役。

上江赵晟、萧荣和彭先等聚众数百，以深山岩穴为依托，反抗朝廷，“郡县捕之，弥年不获”。后来郡将利用曾参加义军，后为官卒的刘

茂忠，打入义军，“与捕吏为内应”，经过多次作战，才将赵晟等击败。庐陵（今江西吉安）是义军十分活跃之地。州兵难以征讨。南唐主颇感忧虑，特命赵仲申为奉化军节度判官判吉州事镇抚。吴先领导的一支义军，占据险要鹧鸪洞，四出攻打官军，没收地主豪绅的钱财。刘茂忠使用苦肉计，鞭打两名士卒，使他们伪装有罪逃奔吴先，吴先误信，将他们收留。一个月后，他们谋害吴先，义军溃散。

（五）吴越（公元893—978年）

吴越创造者钱缪（公元852—932年）临安（今浙江临安）人。唐末在军阀董昌麾下为将，其后势力渐强。乾宁二年（公元896年），唐王朝以其为镇东军节度使。六年后封越王，不久更封吴王。朱全忠以梁代唐时，封其为吴越王。在钱镠发迹期间，吴越地区一直是军阀角逐之地，兵燹造成的杀掠、破坏，使农民遭到极大苦难，因此农民起义军不断崛起。

钱谬建吴越后，由于他实施了一系列有利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阶级矛盾比较缓和，农民起义较少。见于记载的有发生于唐，梁之际的处州（今浙江丽水）溪洞民起义等。

（六）闽（公元893—945年）

闽的创造者王潮、王审知兄弟，光州固始（今河南固始）人。景福二年（公元893年），唐昭宗以王潮为福建观察使。乾宁四年（公元897年）任威武军节度使。同年，王潮死，弟王审知袭位。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后梁封王审知为闽王，尽有泉、汀等五州即今福建。他们统治时期，政治比较清明，“三十年间，一境晏然”。闽国后期，统治者穷奢极侈，诸王及武将争夺王权的宫廷政变迭起，赋敛苛重，力役无节，农民反抗时有发生。同光三年（公元925年）十一月，汀州（今福建长汀）民陈本聚众三万围攻汀州城，闽王王延翰命右军都监柳邕等率军二万征讨。翌年正月，义军失利，陈本牺牲。开运三年（公元945年），南唐攻打建州（今福建建瓯），百姓“争伐木开道以迎之”；但是，南唐攻占建州后，“纵兵大掠，焚宫室庐舍俱尽，是夕寒雨，冻死者相枕，建人失望”。

（七）南汉（公元905—971年）

南汉创建者刘隐（公元874—911年），祖籍上蔡（今河南上蔡），后寓居闽。天祐元年（公元904年）任清海节度使。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后梁太祖封其为大彭王。开平五年初，刘隐死，弟刘岩袭位。贞明三年（公元917年），他自称皇帝，国号大越，建元乾亨。翌年改国号曰汉，史称南汉。

南汉统治者刘氏横征暴敛、骄奢淫佚，作“玉堂珠殿”，以金银为地衣，设“生地狱”，置灌鼻、割舌、水牢、镬汤、烹蒸、支解、剖剔和炮炙等酷刑，民不聊生。“由是山海间盗贼竞起”，岭南地区农民起义军尤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张遇贤领导的农民起义。

大有十五年（公元942年）七月，农民起义军共奉张遇贤为领袖，称中天八国王，改元永乐（一说长乐），置百官，有众数万，义军均服绛色衣，号“赤军子”。南汉主刘玢以其弟越王洪昌为都统，循王洪杲为副都统率重兵征讨。张迟贤趁洪杲所率官军正进食于钱帛馆之机，发动

突然袭击，与洪杲、洪昌之军激战，义军围官军“数重，矢下如雨，军人多死”，“流血满袖”的洪杲等，狼狈逃走，“东方州县多为（张）遇贤所陷”。同年十月，义军攻克循州，杀刺史刘传。光天二年（公元943年）七月，南汉指挥使万景忻败张遇贤于循州。后者遂率义军越过大庾岭进攻南唐的虔州（今江西赣州）。虔州节度使贾匡浩轻视义军，不为设备，被义军打败，张遇贤攻占虔州属县，贾匡浩昼闭城门，不敢出战。张遇贤置宫室于白云洞，命将四出活动。苦于南唐腐朽统治的农民纷纷参加义军，众至十余万（一说十万）。南唐中主李璟命洪州营屯都虞侯严恩、通事舍人边镐将兵救援，同时发布诏令，一方面用“有能斩获茂贤（即张遇贤）、杀戮反党，官赏之制，并越常规”，为其士卒打气；另一方面，又对义军开展政治诱降攻势：张遇贤“若能束身归降，亦与洗涤收录。如闻命之后，因循未宾，即令招抚诸军，分路进讨。如所在百姓，及徒党中有能擒斩茂贤者，不计有官无官，并赐三品，赏钱一万贯、庄一区，并已分产业，并永放苗税差役，传主子孙，此恩不改。若能同心计画，及数内或擒获得称王、称统军军使之属，并次第首级，止于一队一寨头领者，即约此例等降优赏，放免苗税差役。或能自出身归投，有田亩者各令归业，仍放三年赋租；无田者委本道录奏，各与逐便优稳安排，及重加赏赉”。对于不投降的被俘义军，则“不问人数，即便处斩。”边镐又用虔州人白昌裕为谋主，攻打张遇贤，义军多次失利。在白昌裕策划下，南唐军伐木开道，从营后偷袭白云洞，义军溃散，张遇贤投奔别将李台，李台叛变，执遇贤以降，张遇贤就义于金陵。

张遇贤起义是五代十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在一年零三个月里，起义由分散逐渐走向统一，并迅速壮大为一支浩荡大军。改元“永乐”或“长乐”，则是广大农民反对南汉统治者的苛赋酷刑、要求生存权利、永远安居乐业的集中表现。张遇贤义军不仅震撼了南汉的黑暗统治，没收了循州等地地主豪绅的财物，而且将斗争烈火引向南唐境内，制书所云“诱惑我黔黎”、“结聚愈忝”，反映了义军对南唐农民的巨大影响，“暴害吏民，攻围县邑”、“肆为剽掠”、“烧毁仓储”，则是对南唐统治阶级沉重打击的真实写照。

南汉末年，宦官当权，朝政更趋腐朽、大宝十二年（公元970年）九月，宋军进攻南汉，南汉主刘以吴怀恩为桂州团练使，命造战舰。吴怀恩“驭下方严，临事精至，每舟成，必自临视，材有良窳不等、及制度不如法者，必榜役工，役者多怨之。”在吴怀恩临视新造龙舟时，工匠匡彦希“运斤斩之，首坠船中，左右皆惊走”。翌年二月，宋军攻占广州，刘投降，而农民起义军仍斗争不息，宋王朝以曹光实为岭南诸州都巡检使，将义军镇压下去。

此外，在刘崇（公元895—954年）创建的北汉（公元951—979年），由于“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其民反抗，“逃入（后）周境者甚众”。乾祐七年（公元954年），后周世宗征讨北汉时，“其民争以食物迎周师，泣诉刘氏赋役之重，愿供军须，助攻晋阳。北汉州县继有降者。”可是，后周军抢劫钱财，北汉百姓大失所望，遂相聚山谷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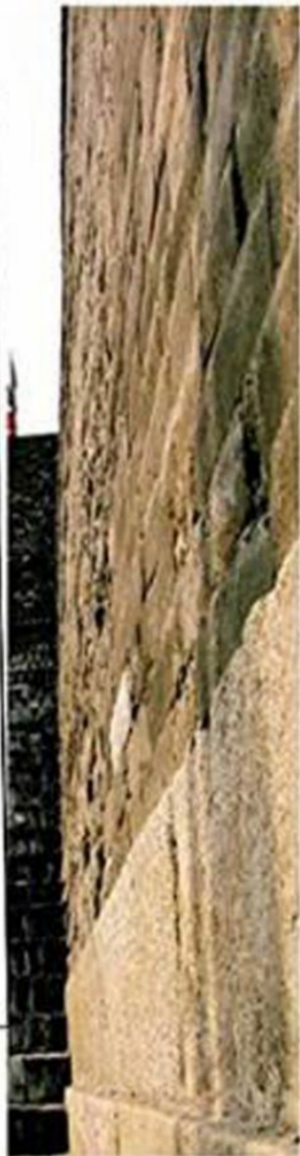
在马殷（公元？—930年）创建的楚（公元896—951年），朗州（今湖南常德）也有农民起义。

尽管五代十国时期农民反抗斗争均被封建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促使这些王朝一代比一代更快地倒台，这一点，在五代表现得特别明显。后梁兴亡只有十六年，后唐减至十三年，后晋减至十一年，后汉仅及四年就覆灭了。后周太祖郭威及其后继者周世宗柴荣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为缓和阶级矛盾、巩固自己统治而实行的。正是这些改革，使唐末、尤其是后梁以降在刑法、赋役、盐麴、营田、租牛、影占人户和寺院等各方面酌弊病有所革除，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对结束长期分裂割据局面、使中国复归于统一，都有重要作用。

特别应当一提的是，五代农民抗击契丹统治者的英勇斗争，不仅极大地教训了契丹统治者，而且遏止了他们的铁蹄蹂躏江南，使这个广大地区的人民免遭空前浩劫，保障了江南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元代战争史



目录

第一章 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族战役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
第二节双方战略指导
第三节作战经过
第四节战后之政局
第二章 铁木真减克烈部王罕之战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
第二节战场地理形势
第三节双方战略指导
第四节铁木真汗奇袭王罕之作战经过
第五节战后之政局
第三章 铁木真减乃蛮大阳汗之战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
第二节双方战略指导
第三节作战经过
第四节战后之政局
第四章 五征西夏之战
第一节战前一般情势
第三节双方战略指导
第四节作战经过
第五节战后之政局
第五章 蒙古侵金之战——边堡塞内诸战役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
第二节双方战略指导
第三节作战经过
第四节战后之政局
第五节战前一般形势与战略指导
第六节作战经过
第七节战后之政局
第六章 蒙古灭夏、金诸战役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
第二节双方战略指导
第三节作战经过
第四节战后之政局
第七章 蒙古西征之一——成吉思汗征花刺子模诸战役及初期四大汗国之建立
第一节蒙古与西方各国一般形势
第二节作战经过——征花刺子模诸战役
第八章 蒙古西征之二——拔都西征欧洲诸战役
第一节征俄罗斯之役
第二节征匈牙利之役

第三节战后之政局
第九章 蒙古西征之三——旭烈兀征木剌夷、报达诸战役及后期四大汗国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
第二节战争之导因
第三节作战经过
第十章 蒙宋战争之一——蒙古二大汗侵宋各战役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及战争导因
第二节窝阔台大汗征宋之战
第三节蒙哥大汗征宋之战
第十一章 蒙宋战争之二——忽必烈灭宋各战役
第一节战前一般情势
第二节战争之导因及战略指导
第三节蒙军中央突破——襄樊攻防战
第四节元军人举南征——鄂州、丁家洲、江陵之战
第五节江淮战役及临安外围攻防战——宋亡
第六节战后之政局
第十二章 元朝前期和中期的农民战争
第一节元朝前期的农民起义
第二节元朝中期的农民起义
第三节元朝前期、中期农民战争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第十三章 元末农民战争
第一节元末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白莲教的传播
第二节元末农民大起义的
第三节龙风政权领导的反元斗争
第四节天完政权领导的反元斗争
第五节朱元璋领导的反元斗争和江南根据地的建立
第六节张士诚、方国珍的反元斗争及其蜕变
第七节朱元璋的统一和建立明朝

第一章 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族战役

自铁木真二十五岁为汗起。至其四十八岁，始统一蒙古各部落，经过数十次大小战役，为时二十四年，即自宋孝宗淳熙六年、金世宗大定十八年、公元1179年岁次己亥年起，至宋宁宗嘉泰二年、金章宗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岁次壬戌年止。铁木真在此二十四年中，常运用突厥克烈部王罕之力，屡战蒙古不服之各部。终于盎数收降蒙古各部落，编为自己摩下之一部。待其统一蒙古各部族之后，遂进击突厥各部，而统一亚洲大草原地带。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

一、成吉思汗建国前之亚洲大势

掳冯承钩所谭之“蒙古史略”（原著是法国还东历史学家格鲁赛所著之远东史蒙古篇）所载，兹摘述如次：

十二世纪中叶时，满洲北部、蒙古全部、与土耳其斯坦等地，是些半开化而以游牧为生之部落之居域。此等部落之语言，属于阿尔泰系之三部语言：东胡部语，蒙古部语，突厥部语。

在黑龙江支流额尔古纳河右岸，有两部落游牧：一是确属东胡种之塔塔儿（一作远鞑），一是有时属突厥种，有时属蒙古种或蒙古难种之宏吉剌、在秃兀剌、斡难河怯缘连河等河之上源肯特山一带，是蒙古族孛儿只斤族所居地方。此族即是产生成吉思汗之蒙古族。在孛儿只斤族周围，斡难河与音果运河流域一带，东迄怯缘运河，西抵贝加尔湖散处者，则为其他蒙古部落。其中与孛儿只斤部有血统关系者有六部：即泰赤乌部、札只剌部、巴鲁剌思部、八憐部、朵鲁班部今作杜尔伯特、散只兀部、哈答斤部。与学儿只斤部关系较疏者有五部：阿鲁剌惕部、伯岳吾部、火鲁剌思都、亦乞剌思部、拉施哀丁、曾将弘哲剌部也加入此部落。另有居于同一地带之札剌亦儿部来历不明，拉拖真丁未将其列入前两类，或者是一种与蒙古人同化之突厥部落。在贝加尔湖东岸者是蔑儿乞部，此部是突蹶种，或是与突厥难居之蒙古种。在贝真加尔湖西岸者是斡赤剌部，是纯粹蒙古种。在贝加尔湖斡儿寒河与肯特山之南，一直到长城，则属突厥种克烈部。此部似包含有秃兀剌河流域与现在之土谢图汗全盟之地。此种克烈部在十一至十二世纪末年（辽金时代），是当时蒙古之最强盛之部落。另有一种与克烈同属突厥而与克烈为敌之乃蛮部，居于斡儿塞河上，与大金山（阿尔泰）之门（科布多），乃蛮部之西南，是突厥畏兀儿部，此部在九世纪时（震按应为七八世纪，即隋唐时代之间纥部）。曾经统治蒙古全境，此时正踻于哈密、蒲类、别失八里（今新疆省孚远北）、吐鲁番、哈剌沙尔、库车等地（今新疆）。其西伊黎河一带，海押立附近，是哈剌鲁部居住。当时阿力麻里国（今之伊宁），必是出于哈剌鲁部。长兀儿与哈剌鲁两部，皆臣属西辽。

西辽建都于吹河附近之八剌沙衮，其直接统治地，为伊犁河与塔里木河流域诸城，如碎荚、答刺速讹迹邦合夫合儿也里虔、斡端等城。此外属国，东有长兀儿与哈刺鲁，西有撒麻耳干即河中及花刺子模国（阿母河裹海间）。西辽统治中亚一直到古尔罕（耶律大石）、直鲁古（火石之子）之时（一一七八至1211），及花刺子模与撒麻耳干叛离，遂失河中（1207至二一○八），此时西辽的南境，败以锡尔河为界。锡尔河以南，是一个信奉回教之突□NC141□帝国——花刺子模沙（犹言王）所统治之国。他于122○年取得西辽之河中，及阿富汗族王朝之阿富汗，与将波斯之色尔柱朝减了（1194）后所属之领地之等地酋长夷为臣蜀，故其尝时已将伊蔺完全征服。此时祇有古大食帝国之黑衣大食朝，尚君临报运跼蹐于此强之旁而已。

此时极东之东亚，则南北二国分立，南方为汉族之（南）宋、北方为汉化之女真族之金。宋金两国之西，又有唐兀建立之西夏国。至在西亚，则之突厥色尔柱朝，与希腊人共争小亚细亚，埃及之朝。这在攻取叙利亚。印度境中，则突厥朝，将继承阿富汗之朝，而向之印度教开始其宗教战争。

二、铁木真为汗后之十年生聚教训

元朝秘史中谓："铁木真与札只剌部长札木合共处一年有半，因扎水合喜新厌旧，逐乘夜离去，次日黎明、诸部之人相约来归。"云云。查该书为当时人用突厥文所记，盍类似实录，却非实录。其笔记时间多事后追记，听当事人追述而笔记之者居多，说旧事者赏有所语言不书实在之处。实际上铁木真与札术合共处年余，极可能铁木真所图谋之"诱结诸部豪强以从己"事、业已成熟，始藉故离开札木合，以求自立而另行开创其大基业。秘史中不便明言其勾引别人部众诸事。仅记其统率自己所部夜去，其他各部之人志愿缔顺而前来投靠，特以此表示"夫与人缔"以赞美之而已。

在宋孝宗淳熙六年，即金世宗大定十八年（公元1179）岁文已亥，秘史所谓"猪儿年"。此年方二十五岁之铁木真，已脱离札木合之笔下，自也儿古纳河（今与安省额尔古纳河）流域，携其家眷与部众，连夜西走，来到不儿罕山（今外蒙古肯特山东部一主峰）之东南，客鲁达河（即怯缘连河今名克鲁伦河）发源地，其地名叫阔阔海子（即青海子位于克鲁伦河上源为一大蓄水池）之虑，以及必尔额领，与黑山等地方。停留下来。蒙古各部，缔附之者日多，遂自称为铁木真汗，即是蒙古各部落之王。

铁木真即汗位之后，即遣使者以"子即汗位往告其父"之態度，往告克烈部王罕；以"弟即汗位往告其兄"之態度，往告札只剌部札木合。王罕表示将全力支持；札木合则表示大为不满，但亦不便说出铁木真曾勾引其属下，拆散其势力等话，只是发些牢骚，指出有人从中挑拨离间。使者还报，铁木真汗因知非使用武力先征服蒙古未附各部，则自己无以自存，更无法集结蒙古全部力量以一致对外。但以自己新进起事，实力

尚属微弱，统点缔者人数，当不足三万人，故必须继续招诱诸部投顺；并得借重突厥克烈部王罕之助力以为后援；再济之以生聚教训之十年计划，方克成功。于是，乃为此而埋头苦干以作尔后发展之准备。

铁木真汗为要巩固自己政治地位，首先急务，是编组近街队及外街队和巡察队。乃命忽必来、别勒古台、合儿孩脱忽剌温，同其弟拙赤合撒儿四人，各率头带刀勇士八十名，分班轮值，以为其近前侍街队，称之为“宿街”。

更命孛斡儿出之弟斡歌来，同合赤温、哲台、多豁勒忽四人，各率领持弓箭勇士七十名，分班轮值，以为其外围侍街队、称之为“护卫”。又命阿儿该合撒儿、塔孩、速客该、察兀儿罕四人，各率领持刀带弓箭勇士七十名，分班轮值，以为内外巡察队，称之为“散班”。然后，命孛斡儿出为内侍街宿街总队之长；命者勒蔑为外侍街护卫总队之长；命速不台为内外巡察散班总队之长。复命汪古儿、雪亦客秃，合答安答勒都儿罕三人，各率领膳者、工匠、艺人等七十名，分别按时均分，以供愿此三个总队，及铁木真全家与不时之宾客用度需求，以及饮食寝处等事。

铁木真汗为求人口增多，财富繁殖，用度改良，技艺精进，并能大量生产、储存与供应，乃命朵歹率领通晓各地语言之人，擅长交际之人，具有特技之人，来总管各部落户口；接待并招来宾客；以及经管对外交易等事。铁木真汗更命其弟别勒古台、与合剌勒歹脱忽温二人，集合擅长骑射技术诸勇士，掌管训练人马及编组围独等事。又命泰亦赤兀歹忽圖、抹里赤、木特合勒忽三人，分率骑士，以掌管各地马为之繁殖，地区划分以及警佣等事。更命迭该率领骑士，以掌管各地放牧牛、羊、山羊，骆驼等繁殖、屠宰、准备交易诸事。

诸事分派已毕，铁木真汗乃召集其属下求人而言曰：“尔众人离开札木合，来随从于我，我得必相天地护佑众人一般的护佑着你们。你们中的年轻诸人，我已经都委付了职务，各自去努力。去组织训练你们分得的百姓，各自锻炼成一个能征惯战的作战团体，来共同争取最好的前程。你们中的年长诸人，都是我的吉庆伴当，得各盅心竭力，来为我参议诸事，随时随地来告诉我去办，以共谋大家伙儿的盛强壮大而光荣之事业。”于是，其部众各大欢喜，各自分头召聚友朋前来，共谋努力立功。（元朝秘史卷三）

铁木真汗部众，以比日有增加，其却大为惊恐。

三、铁木真汗与札木合冲突

蒙古札只剌部，居于也儿古纳河（今与安省与西伯利亚闻之额尔古讷河）流域，区内水草登盛，故其部众人数亦多。部长札木合继其叔之业，青年有为，蒙古各部皆尊重之。并台一度将铁木真收缔于其笔下，视为部属之一部。不意铁木真之野心，比他还大，组织部众之手段也比

他敏捷而有魄力，因而在暗中大事活动，结果，竟诱致诸部豪强，脱离札木合，而西去自立为汗。札木合因惧于铁木真所依附之克烈部王罕臭奥援，一时不敢贸然向铁木真西征。蹉跎光阴，转眼十年。

在此十年中，札木合采用孤立铁木真之政策，故一手拉住铁木真死敌泰亦赤兀部长塔儿忽台等人，使之西聊蔑儿乞各部，以牵制铁木真之北方。另一手拉住为金人世守长城之塔塔儿部、汪古部、使之由南方牵制铁木真之南面。并从另一方面，遣使西交居于今科布多之突厥乃蛮部，希望乃蛮部牵制突厥克烈部王罕之后方。然后，札木合组织东方各部落之联军，以准备西征此孤立无援，四面皆敞之铁木真汗。

札木合为求进行其渗透颠覆政策，对铁木真、王罕之内部，派人率众去伪作投顺，徐徐进行其挑拨离间，暗作颠覆工作，其间谍在各地造谣说："铁木真之称汗组合，志在消减蒙古各部落，而实行他自己的大独裁政治。札木合的聚众为盟，却是职在扶道各部落的均富和康乐，以求大家都能以分途为政，繁荣发达。"等等。铁木真汗属下之主儿勤部诸人，即因此而对铁木真汗携贰，转向于札木合，札木合乃与之暗中连络。但此时铁木真汗实力方与，且因对金朝廷恭顺，按时人实而当受到金朝赏赐，诚恐其获得金朝之援，于己实为不利，故未敢贸然对铁木真汗用兵，主儿勤部亦不敢公然分裂，而停留在依连与观望中。（元朝秘史卷四）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金世宗卒，世宗太系完颜继立，是为金章宗。泰亦赤兀诸部长汪忽哈忽出，忽里勒、忽都答儿、塔儿忽台、乞里勒秃黑等，因欢札木合乘机攻击铁木真汗。札木合亦认为金国值此国衰，内部必然忙乱，将无暇过问边疆上蜀国间之料粉。于是，即以寻衅之姿态，试探铁木真汗东方警备力量，派人分批前去劫夺马灵中之马。

札木合派出之劫马人，向铁木真属部马场行劫之后，札木合之弟塔合察儿之牧地在斡列该泉（即今岛刺改泉地在外蒙古车臣汗喀喇莽乃山南），西铁木真汗属下札剌亦儿人拙赤答儿为剌之牧场。因此塔合察儿亦率人来抢拙赤答儿马剌之马系，塔合察儿因被射死。于是札木合大怒，即集结其约盟之各部落，起之西征。

此次西征铁木真汗者，共十三部落，有泰亦赤兀、亦乞剌思、兀鲁兀、布鲁特、忙忽特、那牙勤、巴鲁剌思、巴、合塔斤、撒勒只冗，乃儿边、塔塔儿、和札只剌十三部，人马三万，兼程西进，以袭击铁木真汗之不备，欲一举擎减铁木真汗属下之全部人员，而尽取其马匹资财。

札木合十三部中有亦乞剌思部，该部中有木勒客脱塔黑、索罗勒歹二人，已早心向铁木真汗，因而将进龚之秘谋星夜驰告于铁木真汗。

斯时铁木真汗已早组成其十三翼军队，称为十三个"古阑"。"古阑"意为"圈子"，后来发展为军团，在初组织时每"古阑"仅有千人。其组

织为：每古阑千人，由千夫长为其将，以统率之，千夫长有亲兵近街九十九人，自兼一百夫长，另辖九个百夫长。每百夫长辖下九十九人，分为十个组，百夫长自兼一十夫长，另外辖有九个十夫长。每十夫长率领骑士九名。故合计铁木真汗十三“古阑”全军共有一万三千人，不及札木合联军兵力之半。但铁木真汗为求迎敌于境外，乃麾其全力向东北方去，沿着斡难河（今鄂嫩河）南岸，客鲁连河（今克鲁伦河）北岸，进至奎屯河流域，以迎击札木合之联军。

札木合统率其十三部落三万人之众，自也儿古纳河向西南而来，方越过阿剌兀特岭及土儿合兀岭（二岭皆在今兴安省与外蒙古交界之处，即今阿敦撮勒山及哈尔温圃尔岭一带），即发见铁木真汗军之前哨。及再前进至答兰巴勒主持（即今外蒙古克鲁伦北二百里处之白云东山之东一带平川地），更发见铁木真汗已率领其军，停在白云东山之前，正在严阵以待。札木合知进袭之计已泄，正踌躇间即有敌突击队前来探阵，于是札木合乃督其众军攻击前进，杀死铁木真汗属下之将察合安不洼于阵中。铁木真汗见敌人势重，不可以力敌，乃欲退往西河狭窄之山地中与敌决战，遂即下令后退。

札木合知前面不远即为多山之两河间狭窄地，对己之进攻不利，乃不敢再事进逼，而悬所斩察合安不洼首级于马尾之上，下令还军岭东。札木合还军后知内部奸细泄漏密谋，乃亲率其本部人马，连夜遍搜其余之十二部人马，以搜捕通敌嫌疑之人，而名之曰“捕大王”，盖蒙古呼狼为大王也。乃将所捕捉嫌疑之人，皆指为大王，分于七十大锅，当众贾杀之。此等惨忍行为，虽使得塔塔克部与蒙古诸部懦夫恐惧，而勇敢之士却因此而更为离心。

四、铁木真汗之周围境况

铁木真汗以众寡悬殊，不能取胜，为求主宰战场，乃主动后退。当其军队退至斡难河与客鲁连河二河窄处之哲列捏（即今都图龙山以东山地一带），准备与敌决战时，但等侯三日，不见敌人前来，及派游骑搜索，方知敌已退出。于是铁木真汗正在整顿队伍，抚慰患伤中，忽有归属札木合之兀鲁兀人主儿扯歹，与忙忽特人忽亦勒答儿二人，率领其部落来投。随后，又有晃豁壇人蒙力克（即铁木真之后父），率领其七个儿子前来，均言札木合暴虐。由是铁木真汗虽以战事未曾获胜，但却增加许多部众，于是大喜过望，乃在斡难河畔林中大举宴享。

筵席间，曾因二件小事，与主儿勤部发生不愉快之事，主儿勤部长撒察别乞，与其弟泰出，在外表上虽然一再向铁木真汗认错道歉，请求海涵，但暗中则怀恨在心，因而用“耳语”方法，将铁木真汗如何骄盈!如何盛气凌人!如何不讲道理，胡作匪为，并非帝王之相等等，四处宣传，以打击铁木真汗之声望。

各部之人知铁木真汗初年曾射杀其异母之弟别克帖儿，今后志骄气盈，是亦别无大志之人。

且主儿勤部乃合不勒汗长子之后人所领导，铁木真汗之孛儿只斤部乃合不勒汗次子之后人。乃皆自认为部落中新分出之两个旺枝之兄弟族，尚且如此不睦，于是许多人认为以前传说铁木真汗才德如何，实不堪置信，因而许多久想前来投奔之部落，或中途停止；或中途改变主意，反希望札木合改过向善，再去拥戴札木合为汗。

铁木真汗察知此项恶意破坏之后，知是因自己骄傲所招致。乃与别勒古台、孛斡儿出、者勒蔑、忽必来、速不台数人商议。有人主张整肃主儿勤部，以拔除未来之祸根。别勒古台曰："今将举大事于天下，岂可以小不忍耐，而掀起宗旅间的衅隙？应试自行修德，以感化主儿勤，使之能以再生向心之力。"商议结果，乃谋用对外之功，以消除内部之矛盾，于是选定塔塔儿部为肇始衅端之目标，因该部乃蒙古之世仇也。（元史卷百十七别里古台传）

塔塔儿部向为金朝守御长城，不参加其职守以外之纠纷，今竟参与札木合所组织之联军，是一种叛金行为。铁木真汗乃建谋遣使往告于金，请金出兵讨之，若金朝不信，而不肯出兵，则即乘机制造塔塔儿与金边境上之纠纷，暗遣小队冒充塔塔儿人侵扰金之边境，金人怒责塔塔儿不能止，则必将出兵声讨。金声讨塔塔儿必以金朝右丞相完颜襄（即金史中之内族襄）将大军，而完颜襄又必将徽兵于各属国，以证各属国之顺逆，然后乃用援天子以令诸侯之计，来号召东胡、突厥、蒙古各部，皆出兵助金讨塔塔儿，有敢不从号召者，则用金朝之命以讨之，如此便可造成自己为领导北方各部族之长。且塔塔儿部曾缚遥蒙古乞颜部长俺巴孩于金，是为蒙古诸部之世仇，因此俺巴孩子孙主儿勤部必将与己合力共同报仇，否则即以其忘报砠仇之罪讨之，使之无所狡辩。

铁木真汗算计已定，乃依计而行，于是金边境上塔塔儿侵据边堡之事件，即层出不穷。

第二节双方战略指导

一、铁木真汗统一蒙古之战略

铁木真汗四十岁时（即公元294）之战略目标，乃如何统一蒙古各部，使成为全蒙古之皇帝。因此，凡有助于他此一目的之事，他都欢迎；凡是有益于统一蒙古之事，他都热心。换言之，凡有碍于达成此目的者，都视为敌人。故泰亦赤兀部、札只剌部、主儿勤部、甚至突厥克烈部，他都视作可友可敌之间，却将塔塔儿部列为头一号敌人。

铁木真汗幼年阅历甚丰，少年时代经过甚多坎坷，受过极多灾难，懂得游牧人群之心理反愿，故知如何笼络人心，当然更知采用不同样方法，去对付不同敌人。仇恨不是一旦便可报雪，大事业更不能一蹴而成，必得利用多数人之智慧，设计出敌意表之方法，因人而施，因地制宜，因时求变，因事造势，用时时刻刻之积累，去争取主动地位。使用荣誉可以拴牢勇士之心，使用惨忍可以镇压儒夫之心胆，然后才能以用勇士为自己出死力，向敌进攻：使懦夫为自己出势力，助威成势。故其对智勇之士，推食食之，节衣友之；对儒弱之人，也曾伐木燃火，执所俘泰赤兀部众，投入八十铁大锅中煮人给大家看。

主儿勤部人，乃铁木真汗之血亲部族，因其关系于事业成败甚大，故必须设法团结之。于是乃在围场中，常故意驱赶禽兽使人主儿勤人之围场中，但主儿勤领袖仍不肯与和。于是铁木真汗乃想出一套执行金朝命令，助金讨叛，及为祖宗报仇的之策略。想在此策略下，用报仇来号召蒙古各部之团结，一齐前来听从自己之指挥。不然，就借用违抗朝命，或忘掉祖仇为罪名，在名正言顺中征讨之。而今主儿勤部已拒绝合作，因知其必然为乱。但同时断定札木合必不敢行动，而泰亦赤兀部与主儿勤部之合作，却不能不防。因此在战略行动上，选定斡难河（今鄂嫩河）

南岸之奎屯河一带为夹击塔塔儿之战场，因其位置正临泰亦赤兀部牧地东南，随时可以攻挚泰亦赤兀部之后方，亦使泰亦赤兀部不敢有所行动。

铁木真汗明知泰亦赤兀部与札只剌部不会听命前来，但仍遣使前往昭告，这是一种政治作战作用，也是一种心理上之威胁。其功用不仅使之不敢再公然援助金朝之叛逆，自认为叛逆之党；更为自己留下随时可以加之以罪名之口实。如此，将使塔塔儿之盟友袖手旁观，使其孤立无按，则自己出兵攻战，必然用力小而成功大。待自己立功之后，自然声誉复振，事业日隆，威武增加，实力壮大，然后再表达出良好风度，以金朝属国之立场，适时指定某一部未曾助金讨逆，并忘掉祖仇之罪名，而加以征讨，以各别击破之。

在此等策略之下，也将不奉诏命，忘掉祖仇之罪名，专加于其部族

领袖之身，使之脱离其所率群众，而成为孤立之个人，然后铁木真汗即可率领部众，以联合此批有罪领袖属下无罪名之百姓，一起声讨有罪之部族领袖。由此，使得各未参加讨逆复仇之部落人们，下怨其上，而注定必然失败之命运。

二、金朝与札木合等之战略

当蒙古铁木真汗施展其用金攻打塔塔儿之战略，使金人自坏其活动长城，是时金朝已进入中原，统冶中国北方将及七十年之久。因金朝受中原文化薰陶既久，其对北边诸游牧部落政策，亦承袭柔远、怀来之作风，欲用德化，不愿用兵，在金章宗前之世宗，即常以此种政策自得，故有人称之为“小尧舜”，彼变更其祖先北守南攻政策，而实行南北皆守政策。金章宗以塔塔儿连年累月入寇北边，是存心为叛。虽或入寇边地者不完全为塔塔儿人，但总是塔塔儿部已不能尽到守边职责，而成为扰边之主角或帮凶。因此不能再事姑息，故命枢密使右丞相完颜襄立行省于临潢，但仍想绥靖之而已，未欲即加征讨，故其带兵不多，而作战必得向各部徵兵。因此就中蒙古铁木真汗之计，弄得非征讨不可之局面。

完颜襄以塔塔儿部长不肯前来听命，一怒兴师，而未推想讨减塔塔儿部以后之情况。此可由金人之不惜重资修筑金边堡长城一事衡之；再由筑长城之“军民并役”，“募饥民以佣”衡之；更就金人在东北路（今嫩江省）西边、泰州路（今辽北省）西边、临潢路（今热河省北部）北边、西北路（今察哈尔省中南部）

北边等地，一齐修筑长城一事衡之；而知金讨塔塔儿之战略，绝对错误，故金朝之见灭于元，其种因实始于攻塔塔儿之役。

札只剌部长札木合，亦一善能聚众者。他为报铁木真汗属下射杀其弟之仇，一呼之下，立集泰亦赤兀，亦乞剌思、兀鲁兀、布鲁特、忙忽特、那牙勤、巴鲁剌思、巴邻、合塔斤、撒勒只兀、朶儿边、塔塔儿等十二个部落，应是有能力与铁木真汗争衡者，可惜其未能保密军机，未能齐一诸部人战志，致使敌人有备，奇袭变成进击，所战无功（其事见前）。他同军之后，又不知急其所急，缓其所缓，一味寻求内奸，弄得离心离德，是其精于小事，疏忽大略，处处落在后机，时时失掉主动，予铁木真汗以从容部署，完成逐次断其手足之大方略，他只好坐视塔塔儿等同盟诸部逐次被宰割。后来，他虽发动几次联军组织，打算前后突击铁木真汗，可惜其左右就近之人不中用，每次多将军机泄漏而失败。

泰亦赤兀部长塔儿忽台、主儿勤部长撒察别乞，亦具有野心，想要统治蒙古诸部。塔儿忽台最先取得优势，已具有统治之规模，第以勇有余而智不及，故在战略上不及礼木合，后愿接受礼木合之领导，是其明智处，及札木合也不是铁木真汗之对手时，便铸定其失败命运。撒察别乞已率主儿勤部投顺在铁木汗笔下，在依附中暴露其野心，是极其不智，尤其是在曾经依附过札木合下之铁木真汗之下，步人后塵，拾人牙惠，虽其宣传方面颇能得法，是其一是，但在策略上，北之札木合，塔

儿忽台，则又次一等，宜其不旋踵而败。

三、克烈部王罕之战略

突厥克烈部长王罕，其部中实包括赤儿乞儿、董合亦特、秃马兀特、撒乞阿特、额里阿特、克烈特共六个部落，其中以克烈部落最为强大，而统治其他五部，因统称为克烈部，实则各有部长，不过统一于王罕而已。突厥语中呼统制各部兵马大位之人曰“不亦鲁”尚不称能汗，是金朝封之为王，故蒙古人尊之为王罕。王罕之祖马儿忽思不亦鲁，为塔塔儿部诱执，而默之于金，金以叛逆之刑钉于木驴上杀之。马儿忽思遗有二子，长曰忽儿察忽，继立为克烈部不亦鲁，次名曰古儿罕，二人曾分别统兵，欲向金朝及塔塔儿部报父母之仇，不久忽儿察忽死，其三子中之脱忽黑勒（即王罕）杀其兄弟二人及侄男数人，夺得部长统兵之位，而入贡是金，金册封其为王，故称之为王罕。其叔古儿罕乃西联乃蛮兵，常来袭击之，王罕一度失利，由铁木真之父也速该为之复国，以此他与也速该为盟友，以义子视铁木真汗。王罕虽然在位年久，但其叔及诸弟、侄，时时欲借其西邻乃蛮之力，来争夺其位，故必须结合强邻，以为支援。

王罕以内部不稳，外敌伺隙，自然要想借报祖仇为名，以号召其内部团结。又因外敌伺隙，皆由其叔等勾引招致而来，亦可以借复祖仇为号召，使勾引外敌之人暂寝其谋。更因金国与铁木真汗皆来求兵往会，以剿叛逆，声势甚佳，且塔塔儿甚富，作战中更有实利可图，由于多种方面，均对自己有利，故决计出兵相劝。至于灭塔塔儿以后局势之变化与掌握，则王罕未尝虑及，故王罕之战略，比较近视，重视现实而未能远虑。

王罕之与铁木真汗，以保持义父子名义为满足，铁木真见其妻孛儿帖用一袭貂裘，几声乾爸爸，便嘎得王罕无限助力，是王罕完全为名利所役使。铁木真汗，总是以名利笼络之。

因此，王罕与铁木真合作，深信铁木真汗不会让他吃亏，且此次困剿塔塔儿部，更有言明厚利可图，所以王罕治军三日，立即出师东上，而与铁木真汗会兵一处，准备远出逐利，却未想到黄鸟捕蝉，而有持弹者在后袭击之事，因而前方虽获利，但却失掉其全部牧地于后。是王罕之战略，始终为其名利所误，瞻前失后，顾此失彼。故其曾一战而胜得铁木真汗，但在一战之后，却掌不住继续再战之战略，故终于失败，而走死道途。

第三节作战经过

一、铁木真汗助金击塔塔儿之战

金租密使完颜襄，于金章宗明昌四年（宋光宗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正月，率军自临潢，出赤山口（即内兴安岭蘇克斜鲁山之赤山口）

北进，以进攻塔塔儿部之南。塔塔儿人在其部长蔑古真薛兀勒图不亦鲁之指挥下，即自今察哈尔省东北部，沿语勒扎河（今乌里盏河），溯河向北且战且退。及塔塔儿部众向北逃过孛岳济岭（今察哈尔省与外蒙古、兴安省交界处之孛岳尔济山）后，金军复向北追击，塔塔儿部即沿阿儿顺河（令兴安省与外蒙古交界处之哈刺欣河）北退，而至怯缘连河（今克鲁伦河亦称客鲁连河）下游之南岸集结，准备与金人决战。

是年2月，完颜襄进军至捕鱼儿海子（今与安省贝尔池）之南，得到东胡宏吉剌部之支援，遂进攻塔塔儿部于怯缘连河之南，大败塔塔儿部之兵。塔塔儿部溃众北逃，由冰上渡怯缘连海，欲往语泐札河（即今外蒙东北奎屯河下游之乌里杂海）流域且事整顿以行抵抗。不意蒙古铁木真汗与突蹶克烈部王罕之军，适由奎屯河南东东来，正好攻击到塔塔儿溃退中军之侧背，遂大破塔塔儿溃众。

时塔塔儿部长蔑古真薛兀勒围方使人在忽速秃失秃延地面（在今外蒙古东北角析各勒围一带），建立围寨，乃率其溃败之余，逃入未能完成之围寨中为守。铁木真进军围攻之，王罕则率军东向，以追逐逃散之塔塔儿部众，而掠夺其财物。

铁木真汗在围攻塔塔儿部长蔑古真薛兀勒围中，特别强调报祖之仇，故令其众曰：“塔塔儿人为杀祖之仇，并曾毒害我父，必尽屠其族，勿留一人。”于是塔塔儿人死守，围攻半月始将寨攻下。寨破后，铁木真汗尽系其人口，并尽得其辎重，遂杀塔塔儿部长蔑古真薛兀勒围。惟铁木真汗在塔塔儿辎重中，见一银制摇篮，篮中有一鼻戴金环之幼儿，覆以金锦之衾，衾角镶真珠串及大珠一颗。揭衾视之，见幼儿明限巨口，神浚清逸，身戴有金丝貂鼠裹儿兜肚。铁木真汗为此贵重装饰惊呆，知为富贵人之子，乃取之以付其母诃额伦收养之，取名曰失吉忽秃忽，作为第六个弟弟，此事很快传遍后帐各眷属中。（元朝秘史卷四）

蒙古诸将领之妻多有塔塔儿人，此役皆随在后军中，听到铁木真汗在行将屠寨前，在敌营中拾得弃儿，乃纷纷率人就俘虏中去争抢塔塔儿部儿童及自己亲友。铁木真汗胞弟拙赤合撒儿时颁前军，其妻亦塔塔儿人，因劝其夫免杀所俘。其他诸将士或见塔塔儿财货太多，只显掠夺，忘记尽屠其人之命令：或同情塔塔儿无辜民众同就死地，故意网开一面，令其强者壮者易名降附，补为士兵，弱者纵之使去。因之，得免于被屠者不少。铁木真虽怒诸将之违命，但为急欲回军，以处主儿动部叛乱之事，旋亦置之不问。

此役完颜襄嘉铁木真汗建立大功，承制封铁木真汗为“扎兀忽里”。按“扎兀忽里”为女真语，为“招讨使”之意。并赏及王罕为王。从此铁木真汗成为金之招讨使。

二、铁木真汗讨主儿勤部之战

当铁木真汗围攻塔塔儿部长于忽速秃失秃延寨（今外蒙古东北角析

各勒围附近）时，判知塔塔儿寨破亡在即，不需用大军攻击，塔塔儿溃众向东北远逃，有王罕率军去追，即或追之不及，将来也不至再成大敌，故不遗大军去追，同时考虑后方主儿勤部，必将举兵为叛，须早作准备。于是乃尽量抽调军队，连夜沿奎电河南岸西行，各军成为分进台击态势，向自己老营而进，以期一举而尽俘主儿勤部。

主儿勤部长撒察别乞，与其弟泰出，不知铁木真汗已对其布设陷阱，故闻铁木真汗正率军攻打塔塔儿部栅寨时，以为有机可乘。因而，泰出建议其兄，乃尽发主儿勤部落诸人，连夜南驰，突袭铁木真汗留后老小营寨。待攻破之后，始发见为一空寨，所留后老小在营寨中者不过六十人而已，乃杀其十人，将其余五十人尽剥去衣服，使之东去奔告铁木真汗。万不料尚未驱逐剥衣之五十人出寨完毕。铁木真汗各军已由四面攻入寨来。

主儿勤部之人，以为铁木真汗大军白天而降，登时失掉抵抗之力，而为铁木真汗之军尽数俘掳。主儿勤部长撒察别乞与其弟泰出，兄弟各夺得一马，死命冲出寨外，向北逃去，欲勾引蔑儿乞部，为复此仇。铁木真汗诸将见其二人罄身出走，乃瓳载骑按踪迹追之，至迭烈秃口子（元史太祖本纪作帖列图，其地即今外蒙古北恰克图东方第四山口）。卒将二人奴住，解还。

铁木真汗自东方圆至留后老小营地，将主见勤部众分给各将领为百姓。在主儿勤营地中又拾得一个俊秀小儿，为许兀慎部人，名叫孛罗兀勒。铁木真汗亦交付其母诃额伦收养之。计前后在战地中拾得而收养者四个弟弟：一为在蔑儿乞之营所拾得之蔑儿乞人曲出；二为在泰亦赤兀营中所拾得之别速特人阔阔出：三为在塔塔儿寨中所拾得之塔塔儿人失吉忽秃忽；其四即此孛罗兀勒。

铁木真汗将主儿勤部长撒察别乞，与其弟泰出，擎到面前，数其罪曰：“前在斡难河（即今鄂嫩河）林边做筵席时，你的人将厨子打了；又将别勒古台肩甲砍伤，我看见兄弟行分上，都已不深究，而求和平相处了。今番为祖上报大冤仇，你们是正头香主，你们却忘掉祖仇，等了六天都不来。不去报仇也罢，你们倒倚着仇家，帮助仇家，来把本家当作敌人。当日你们推选我为汗时，与我说些什么来，该应你们自己的誓言去罢。”于是二人自愧，因引颈受戳。（元朝秘史卷四）

铁木真汗一连杀死其三个堂兄弟，心中不免快快。此时恰有旧识之扎儿部老人帖列格秃颜，率其子孙，前来投顺。此老人先向铁木真汗介绍其长子古温兀阿，及古温兀阿是子木华黎（后为元朝第一等大将）与次子不合；次介绍老人之次子赤剌温孩亦赤，及赤剌温孩亦赤之二子统格，合失；接着老人又说明老人之第三子名者卜客，现在未归，当不久也来蹄顺。最后，老人当着铁木真汗面前，教其子孙们，要永世且永远服从铁木真汗之命令，作不二之臣。因此铁木真汗又复大喜。

三、铁木真汗为王罕恢复克烈部之战

铁木真汗在击破塔塔儿部之后，因其有后顾之忧，所以放弃追击，而间军击败其后方叛乱之敌主儿勤部，因而转祸为福，使其属下从此心安。王罕因为贪得塔塔儿人财富，悉力北追塔塔儿余众，以是回军较迟，其秃拉河（今外蒙古士拉河）流域之牧地西方之突厥乃蛮部长亦难赤，探知王罕率军远出逐敌，后方空虚，便用兵帮助王罕之异母弟额兄客合剌，攻击王罕留守牧地之王罕同母弟札台敢不。札合敢不战败，向北方退走。

于是乃蛮人与额儿客合剌便为王罕设上埋伏网罗。王罕不察其国内变化，辇其在东方战场上所得，满载而归，就在得意凯旋途中，走入埋伏，遭受到乃蛮人与其弟额儿客合剌伏击。王罕在毫无准备下大败。他知敌人必不容其投奔铁木真处，为求出敌意表，乃率领少数人向敌方之南逃去。

王罕西逃，绕过乃蛮牧地之南，投奔西辽（辽亡后宗族耶律大石在西域所建之辽国，已详前卷）。乃蛮人便夺取工罕之全部牧地，以付额儿客合剌，使之为克烈部长。王罕之同母弟扎合敢不，只得率领其众，东奔于铁木真汗。克烈部中之秃别干部（即秃马兀特），与董合亦特部，不服乃蛮人之安排，战而溃败，其两部溃众，亦皆东向投降铁木真汗。因为突厥克烈部人风俗习惯以及语言信仰，皆于蒙古人相近，而又多世为邻，故这些部分从此即变成蒙古人之一部分。

王罕求援于西辽国，西辽不能助其复国，失望东归，在道上资粮悉绝，仅余瞎马一匹山羊数头，骆驼三匹，日取羊乳或刺骆驼血为食，穷困潦倒，志气全灰。至龙儿年（公元1196年）春，行至古泄兀儿海子（在今外蒙古杭爱山之南），万不得已，乃使人北去告难于铁木真汗。

铁木真汗为求利用突厥克烈部之力，助其统一蒙古各部，乃尽力以谋恢复克烈部为与国。知王罕所在，即令勇士辽客该，率领轻骑往迎王罕。然后发兵与额儿客合剌作战。额儿客合剌以新造势力，内部不稳，一战而败，逃回乃蛮部。铁木真汗乃与王罕相曾于秃拉河上，徵牲畜于蒙古各部，以账济之，使王罕复能成军，去收复其克烈部所余部众。

王罕既得铁木真汗助力，又凭其多年为克烈部部长号召力，更以战胜塔塔儿部报得祖仇之功，其部众百姓，多闻风来附，声势因而稍振。至是年（公元1196）秋，王罕遂复有克烈部，令部众数量较强盛时减其少半而已。

他乃特意邀铁木真汗到秃拉河之黑林于王罕仅时驻处，重申父子之盟，王罕暗许以后不以其百姓傅于儿子而准备交铁木真汗接管。

自此以后，王罕实力衰微，对于铁木真汗自然盛恩图报，每有征伐，他皆愿随铁木真汗出征。铁木真汗已深知克烈部实况，故仍尊王罕为父，权视之为元老重臣，借其余力，来达成统一蒙古各部之日的。王罕之部属本不愿王罕以铁木真汗为其死后之继承人，惟以克烈部势力未

复，且内部不稳，复西有乃蛮人帮助王罕诸昆弟侄儿们伺隙不已，又有蔑儿乞部人声势复振，已卷土重来，由是克烈部也愿结铁木真汗以为后援，更希望铁木真汗能为克烈部西击乃蛮，西北击蔑儿乞，故乃勉与共处。

铁木真汗接收克烈部人之愿望，于蛇儿年（公元1197）秋，与王罕军北征蔑儿乞，与蔑儿乞之兀洼思部、木丹部、秃达哈邻部、亦温部四部相战，败之于薛灵哥河（今色楞格河）之木枝彻地面（今色楞格河与波戈尔岭之间）。铁木真汗尽以其战地所得，悉给王罕。于是王罕旧时势力，始逐渐恢复。

四、铁木真汗与王罕共击乃蛮之战

札只剌部长札木合，与泰亦赤兀部长塔儿忽台，本常遣使西结蔑儿乞各部，与突蹶乃蛮南北两部，打算结成包围态势，一举将铁木真汗包围而击减之。因为各部意见不一，彼此互存观望，都希望别方先行动手，而自己坐收渔人之利，故未能成“攻守同盟”，及铁木真汗劝金击破塔塔儿部，塔塔儿余众在察兀忽儿等领导下，东奔依札木合。札木合等皆感于唇亡齿寒之惧，乃再度遣使西连蔑儿乞及乃蛮，甚望彼此间成立军事同盟。此时铁木真汗亦惧于东西北三面作战，乃定谋，与王罕先往击蔑儿乞各部，战胜之后，即先装备起王罕之军。使之能有继续作战能力。

而铁木真汗则立即自蔑儿乞地图军，以巩固自己基地。故泰亦赤兀部与札只剌等本欲出兵进袭铁木真汗之后方，以策应蔑儿乞者，至此，因铁木真汗及早图军，计划遂成泡影，因此，蔑儿乞各部皆怨札木合等自食其言，军事同盟之说，因又涣散。

铁木真汗欲趁此四方敌人涣散未合之机，实行各别击破之内线作战，乃选定各个击破之最先目标。于是就在羊儿年（公元1199）秋，与王罕联军，西往袭击乃蛮。

先是突厥乃蛮部长亦难赤必勒格汗死，其二子长名台不花，次名古出古敦，兄弟二人因争父妾结怨，古出古敦未争得胜利，便率所部退居大黑山，即今唐努乌拉山一带，自称古出古敦不亦鲁，意即另一皇帝。台不花保有其父之人民财产物业与牧地。仍居于阿勒台山（今阿尔泰山）南方附近，因其向金朝廷入贡请封，金册命其为乃蛮大王。

突厥人不知汉文大王何意。以为是女真语，即哗为“大阳”，遂称为大阳汗，以别于“不亦鲁”。由是乃蛮从此分为南北两部，“兄弟阋墙外招其侮”。但乃蟹牧地极为宽大，其南北两地中间有大山，互为支援不易。铁木真汗细问各突厥人，知古出古敦不亦鲁驻地，即在今科布多，其牧地为科布多及唐努乌梁海两个盆地。而古出古敦不亦鲁自认其地多高山大川大湖长隘，与东方铁木真汗及王罕之牧地相隔千里，只有他出兵支援王罕之弟与侄以扰乱东方，却以为王罕等不可能越过杭海大山（今杭

爱山）、唐努大山（今唐努山）来攻，是以未作防备。但是，铁木真汗认定，敌既可来，我定亦可往，乃派人详探进兵道路，决定先去袭击乃蛮北部。

铁木真汗与王罕之联合大军，由向导率领，沿薛灵哥河（今色楞格河）南岸，溯河西上，至于河之西源，在塔儿巴山北边，越过山岭，进入兀拢古河（今科布多乌布沙泊东源之帖斯河上游之东源河）流域，更顺河西行，直达乞湿泐巴失海子（今乌布沙泊），一举而袭破古出古敦不亦鲁之大营，夺其人畜极多。古出古敦不亦鲁率其溃逃部众，北奔谦谦州部（今叶尼塞河流域之突厥部落）。王罕厚获，怕铁木真汗分其所得，乃令其子及弟等押运之取南道先还。不久，铁木真汗因惧于后方有失，也尽驱所得乃贷之人畜，顺原道向东凯旋。

乃蛮大阳汗，闻其弟被袭，即遣其骁将撒卜剌黑（别号可克薛兀，言其病肺之人）率军，由南向北，以邀击铁木真汗大军之归路。因遇王罕押送掠获品之军于额垤阿勒台（今外蒙古乌里雅蘇台），王罕家属及其弟必勒格、札合敢不等人，尽失其部众及财物。王罕遣其子亦勒格鲜昆率军往救，并遣使求助于铁木真汗。铁木真汗在同军中听到消息，立即派遣其四将孛斡儿出（亦作博尔术）、木华黎、孛罗忽勒（亦作博尔忽）、赤剌温（亦作赤老温）率军急往。此四节将到达，王罕之子亦勒格鲜昆正在全军被围行将覆灭中，生力军到达，遂一战大败撒卜剌黑之军。

不仅尽数夺同王罕已失人畜财物，更俘得乃蛮人马不少。孛斡儿出将所夺回之物，悉数归还于王罕。王罕衷心感激，乃解下自己新衣一袭，金盏十只，以报孛斡儿出救还其人畜财物及其家属子弟之德。

五、铁木真汗与王罕共击泰亦赤兀之战

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之二子，先降于王罕，在王罕军为乃蛮军邀击作战中，乘机北走逃归其父所。蔑儿乞各部已离散之人，因而又聚成众，全力再行南牧。铁木真汗因遣其弟拙赤合撒儿，率兵再往袭之，至又大败蔑儿乞诸部。脱黑脱阿因遣其二子忽秃、斡儿章克，求援于泰亦赤兀部。

时泰亦赤兀部长塔儿忽台，已聚合数部，打算与铁木真汗争衡，故每当铁木真汗离其牧地外出远征时，泰亦赤兀诸部多出兵进袭其后方。铁木真汗感于背腹受敌已久，每思大举攻之，又惧其与札只剌等部联合，或虑其不战北走，使自己不便深入北追，致无战果。在猴儿年（宋宁宗庆元六年，金章宗永安五年，岁次庚中，公元2100年）春正月，铁木真汗侦知泰亦赤兀部长塔儿忽台已召集诸部长汪忽哈忽出、忽里勒、忽都答儿、乞里勒秃黑等会让于斡虽河（今鄂嫩河）与温连河间沙滩上（今西伯利亚尼布楚之南），决定不待联合札木合，即向铁木真汗大举进攻。铁木真汗乃召回其弟拙赤合撒儿西征之军，使之守御牧地，自己则与王罕约会，将会师于撒里川（今赤塔之南鄂嫩河偏西伊里河流以东

之平川地带），求敌而攻击之。

铁木真汗率其大军，顺斡难河向东北前进时，认为泰亦赤兀诸部中，以塔儿忽台最为雄杰，且为自己死敌，必须擒贼擒王，先将之除去，方能解除东北方之大患。于是，乃令孛斡儿出、木华黎、孛罗忽勒、赤剌温四杰所将之军，部署在伊里河以东之多山地带中埋伏，自己则率领锐师，向泰亦赤兀部突击，欲诱致敌人深入自己预设之伏阵。

在两军方接不久，泰亦赤兀部长塔儿忽台之攻势甚锐，颇有斩获。铁木真汗乃率军且退且战。塔儿忽台乘锐追击，进入孛斡儿出等四滦之伏阵中。斯时，敌王罕之军自南向北挺进方到战场，一经冲击，竟自泰亦赤兀诸部军之侧背遮断为前后两段，因此泰亦赤兀诸部前后不及相救，塔儿忽台遂被赤剌温所斩。

铁木真汗与王罕挥军追击，敌军溃故，遂擒忽都答儿于月良兀特秃剌思（在今赤塔东南喀里穆斯克雅附近）。

汪忽哈忽出等，率其残部，与蔑儿乞之两乞援使者忽秃，斡儿章克，共越过亚布山（今雅布罗诺威岭），逃往巴尔忽真隘（今贝加尔湖东北岸之巴尔古辛山下）。忽里勒率数十骑，自战场间隙中逸出西进，而奔往乃蛮。于是，泰亦赤兀部从此失掉其领导上之中心人物，而依附于札木合及蔑儿乞与乃蛮之间，不足重视矣。

六、铁木真汗与王罕迎击札木合之战

札只剌部长札木合，自以为强于铁木真汗。及王罕败逃之后，更以为铁木真汗已是自己襄中之物，正处于自己掌握之中。待铁木真汗重新扶植起王罕，与之北击蔑儿乞各部，西征乃蛮北部时，泰亦赤兀诸部欲进袭铁木真汗之后背，札木合犹以为铁木真汗之物业早晚为自己物业，不顾别人染指，故千方百计阻止泰亦赤兀诸部出兵。比及铁木真汗与王罕大败泰亦赤兀诸部，擒斩塔儿忽台与忽都答儿时，札木合方大梦初醒，始惊惧自己之失策。因乃星夜遣使约会东方位余诸部，及败逃复聚之塔塔儿，泰亦赤兀等残部，要求联盟，共讨大敌。

东胡部族之哈塔斤部，撒勒只兀部、宏吉剌部，蒙古部族之亦乞剌思部、火鲁剌思部、朵儿边部、卫拉特部、撒儿劝特部与突厥部族之蔑儿乞脱黑脱阿，乃蛮古出古敦、台不花等，共有十个部长，也同感唇亡齿寒，而不自安。于是皆原蜀除成见，共力争先，以应和札木合联盟倡导，齐集于阿勒压不剌地面（今兴安省奇乾县之西方乌洛夫河之上游），相与同盟。

在札木合所领导之同盟中，首先扶植起塔塔儿部，命察兀忽儿继任塔塔儿部长；继又扶植起泰亦赤兀部，命哈儿汗太石继为泰亦赤兀部长。更组合起主儿勤部，命客连黑儿为新主儿勤部长。复组合王罕所诛戮之蔑儿乞只温部，命阿剌兀都儿为蔑儿乞只温部长。然后，诸部长共毕刀，斫一马、一牛、一羊、一犬、一山羊，而为誓曰：“天地听之，兹

以诸牲之血为誓，其背盟者，有如诸牲。”遂相约合击铁木真汗。议定：由泰亦赤兀部、蔑儿乞诸部，与塔塔儿部，合兵进击铁木真汗于北面；其余各部由札木合率领为主力集团，自东向西，进击铁木真汗的东方。

蒙古鷄儿年，即宋宁宗嘉泰元年，金章宗泰和元年，公元1201，岁次辛酉，春正月，札木合与合塔斤等十余部长，自会盟地沿也儿古涅河（今额尔古纳河）向西南行，至刊木连河（今兴安省之根河）河洲之上，集结各部兵力，实行联合作战之演练，诸部长以札木合既为联军统帅，应有汗号，乃议立札木合古儿汗。于是，再会盟兀勒灰河（今额尔古纳河西支流乌鲁圭河，其河口在根河口之西北方，是自西北流入额尔古纳河之水）南岸之上，共立札木合为古儿汗。诸部长皆举足踢岸，挥刀砍林，然后集为誓约曰：“凡吾同盟，有泄此进兵之谋者，就如岸之摧，如林之伐。”然后挥军向西挺进。（同上书）

铁木真汗已先得其妻父宏吉剌人特薛禅之密告，已与王罕分别集合大军，顺着怯缘连河（今克鲁伦河）北岸，徐向东北前进，准备迎击札木合之联军。途中，又得火鲁剌思人豁黑歹前来奔告，于是铁木真汗与王罕，分督大军益向东急进。

双方对进，因相遇于阔亦田（元史速不台传作阔出檀山，是即今外蒙古东北之奎屯河口南边之奎屯山）之南，金长城（指金长春外边长城）之北。双方正在布阵，行将接触之时，会有一大暴风，突然吹来，登时天昏地暗。札木合诸军以为乃是天所护佑，战志顿馁，而齐向后退。铁木真汗之军亦向后退中，突然发见敌已后迟，因即反军追击，一战而扎木合联军大溃逃走。

时铁木真已知泰亦赤兀诸部之军，即将进至自己之侧背，乃停止向当面之敌追击。而遣使将王罕因风回军而走之军邀回，使之东去追击札木合诸军，自己则回军，以待自西北而来之敌。

七、铁木真汗再破泰亦赤兀诸部之战

泰亦赤兀诸部，自上次被铁木真汗与王罕击破之后，逃至贝加尔湖东北岸地区，经过年余之生聚教训，又重新推举哈儿罕太石为总领袖。哈儿罕太石为求扩大阵容，即以客连黑儿为新主儿勤部长，以阿兀虫把阿秃儿为新寨亦赤兀部长。并且更西联贝加尔湖西岸之蔑儿乞各余部，东联塔塔儿余部，以及再东之札木合所率领之十余部众，共同积极整军，准备向铁木真汗及王罕报仇雪耻。

哈儿罕太石于参加札木合之东方联盟后，便约定与札木合东方大军有策应之义务，即讲求与札木合呼应，以实行前后夹击纤木真汗与王罕之军。今知札木合已统率大军，将与铁木真汗及王罕之军对战于呼伦湖之西、奎屯河之南。因而即集结其新造之全力，自外兴安岭之西，向东越过外兴安岭，直向斡难河（今鄂嫩河）以东挺进，将需求铁木真汗大军之侧背而攻击之，好使其主力军札木合等作战容易。不料札木合会为

一沙漠旋风而自溃退，使得铁木真大军已早转向自己而布好阵式，变侧背之支战场，而成为主战场。幸而泰亦赤兀部中多勇将，其部众尚不知战场变化之详情，于是就在斡难河南岸，相对布阵准备迎击渡阔亦田河（奎屯河）北攻之铁木真汗之军。

铁木真汗为不使泰亦赤兀部再得死恢复燃机会，乃自阔亦田河之南分遣诸将，使各率军远出，对泰亦赤兀诸部之军，实行大迂回包围之攻击。由于诸军远出，其正面攻击力量极为薄弱，因而铁木真汗自率之军，乃想牵制敌人正面，故在广正面渡河之后，与敌连战至晚，未分胜负。黄昏时分，突有泰亦赤兀之将自岭上一箭射中铁木真汗之项颈，被创甚重，人已昏迷。其友右皆死命向前进战，只有者勒蔑一人，将铁木真救起，负之退入林中。汗因流血过多，者勒蔑依用口吮其壅血以急救之，以致与诸将相失，及至半夜，终将铁木真汗救醒。

但醒悟之后，便呼血液已乾，只觉口渴腹音。者勒蔑以敌我正在膠着中过夜，寻从人不到，自己又不敢远离，无从取得饮食。如此者久之，乃思得一使敌我皆不能辨认以取得饮食之策。于是他便裸身径去敌人营内，于各车箱中逻寻，终寻不到马匹，仅得酪一桶。然后寻水将酪调开携回，与铁木真汗饮用。在他往来中间，也遇到许多人，人皆以为夜睡寻水或解便之人，竟无人阻止之。

铁木真汗饮酪之后，体力渐复，其侍从诸将亦徐有寻来者。天明后，连络诸将，且令人侦察战况，方知半夜后已合围，敌军业已溃散，敌方诸百姓自料不能逃去者，皆坐在车旁，静待处分。于是，铁木真汗心情兴奋，裹伤上马，往宣抚之，并令人追回已走诸部之人。

锁儿罕失剌之女合答安，会在泰亦赤兀部俘掳铁木真汗时，救过铁木真出险，现在铁木真汗属下要斬其夫，特地来寻铁木真汗求情，铁木真汗立刻往救不及，乃收合答安为妃以慰之。因而得知其恩人锁儿罕失剌所在消息。后日锁儿罕失剌率一敌将至，名只儿豁阿歹，铁木真汗问之曰：“在阔亦田对阵时，射毙吾马者谁？”只儿豁阿歹对曰：“是我射来，如今教死，不过污手掌大块地；若教不死，我愿为你出死力，将深水可以横断，坚石可以撞碎。”铁木真汗喜道：“但凡敌人害人事，多不承认，你不隐讳，可以作我的伴当。”乃为之改名曰“者别”，取利箭之意，言其一往直前，无坚不摧也。后竟为蒙古名将。（元朝秘史，卷四）

八、铁木真汗统一蒙古诸部之战

铁木真汗将泰亦赤兀部留下之百姓与财物都牧归自己管辖之下，便以继续剪除札木合之羽翼，用报复祖父及父仇为名，移兵而东，围攻塔塔儿余部。他自斡难河（今鄂嫩河）进军时，便先号令诸军二事：第一：不许掠夺，所有敌人财物，将听从中军之命令分配。第二：凡战场上诱敌撤退，到预布阵处，必得翻回力战，否则死罪。

征塔塔儿余部之军，于狗儿年（公元1202）秋起行，沿斡难河向东北顺流前进，过兀勒灰河（今尼布楚岭东为鲁圭河）上流，进至失鲁格只待地面（今尼布楚东北之石勒喀河流域至黑龙江省汉河县以西之地面），终于尽俘塔塔儿部之人而归。

在作战中，铁木真汗之叔答里台、堂叔阿勒坛、从弟忽察儿三部分人辽令掠物，又不肯归公。铁木真汗使其侍从者别，忽必来等夺之，尽均分与各参战者。三人以此怨恨，其后于听说王罕西征蔑儿乞脱黑脱阿大胜而归时，乃相率共帅所部亲信连夜逃奔于王罕，并劝王罕进袭铁木真汗之后方。王罕虽未即听信其言，但亦不拒彼等之来投。

札木合知铁木真汗已尽收塔塔儿余部，并将收降东胡宏吉剌部，心中大惧，知祸行将及己。

嗣以宏吉剌部又叛离铁木真汗而重来蹄顺于己，则又以为此是天与人归之兆，乃役使人远去联合蔑儿乞各部及突厥乃蛮各部，约定于本年（公元1202）冬月底开始，东西同时起兵，以夹击铁木真汗及王罕。

时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方为王罕击破未久，正乞援于乃蛮北部古出古敦不亦鲁。古出古敦不亦鲁又得到札木合的约定，乃集其所有的兵力，同蔑儿乞残部，泰亦赤兀残部，塔塔儿西逃之残部，自巴尔古精海子（今贝加尔湖）之西，向东方进军，欲自肯特山与外典安岭之间，东越大岭，以趣阔亦田河（今奎屯河）

流域，寻求铁木真汗王罕之侧背而攻击之。但是，是年（1202）11月下旬大雪严寒，将士四肢僵冻，雪封山谷道路，在前进途中，多有失陷雪谷，或堕沟中或滑落涧下者，如此行军十余日，方得出大岭之险，但其队伍尚不及成列，即为铁木真汗预先设下之埋伏，逐一所俘。

札木合此时，以孤注一掷心情，已率其大众，进攻王罕军于合蔑温赤敦山（今兴安省胪演县东阿尔滚岭）之南，闻其西方之联军已为铁木真汗各个击破于阔亦田河（奎屯河）之北，乃大叹："天不佑我!"战志顿灰，不顾友军，而率本部退走。因在慌急中，未及携带辎重，其部众在雪地行走中缺乏食物。至此他竟下令掠夺宏吉剌部之牛羊以为食。王罕探知札木合单独退走，即起兵从后追急，札木合因而全军溃散。札木合计穷，乃向王罕投降。追随札木合作战之各部落，惧被屠杀，亦各纷纷向王罕投降。此时王罕所得降众已多，因怕铁木真分其卤获，便分批向其后方运送财货。由是种下尔后之分裂。（元朝秘史、卷四）

铁木真汗与王罕，各以大军清扫战场，约会于阿蔑勒河（今与安省海拉尔河上游）畔相会，然后同越金之边临（今与安省胪演县北之金长春外边堡长城）去过冬，待明年春初，再同往征取不肯投降之宏吉剌部。但王罕心虚，不敢与铁木真汗相会，乃推说其西方有警，连夜起兵西去。

至是，铁木真汗尽有蒙古各部落之牧地，只剩下蒙古各部族之残余

军队及各首脑人物，投匿在突厥克烈部与乃蛮部中，留待以后设法解决。

第四节战后之政局

一、铁木真汗之防止蒙古诸部再起

铁木真汗在消减蒙古诸部之后，其东方只剩下东胡族宏吉剌部，其西方只剩下突厥乃蛮部，与克烈部，其余蒙古诸部，皆为其逐个征服，统一蒙古之战，至此大致完成。惟有蒙古各部落之中心领导人物，如札只剌部之札木合，泰亦赤兀部之汪忽哈忽出、忽里勒、哈儿罕太石、客连黑儿、察兀忽儿、塔塔儿部之忽秃帖木儿，以及铁木真汗之叔父答里台、阿勒坛，其从弟忽察儿等，皆藏在突厥克烈部，或乃蛮部中。这些人多为部长多年，各有其号召力量，故随时都有使其蒙古各部死恢复燃之势。加以铁木真汗之义父王罕，竟公然掩护此辈逃亡之人，用意所在，自使铁木真汗日夜不安。尤其王罕收纳札木合之降，带札木合之部众财产西去，更使铁木真汗大为不悦。

在王罕西去之后，铁木真汗使人至王罕处照常问安之余，因传语于王罕曰：“我之附于父王，犹沙漠中的白翎雀，多夏皆居在北地；至与父王其他诸臣，则其中有如鸿雁者，冬近则南飞了。”王罕因疑札木合等人，遂不甚听信札木合等之言。（多桑蒙古史，一卷二章）

铁木真汗以蒙古诸部投降于王罕者，乃迫于形势之不得已，欲使人引诱之，使悉数归附于己。又想不使克烈部对己发生疑心，乃想相互联婚，使人以联婚为由，前往王罕营地，为其长子术赤，乞婚王罕之女察兀儿别乞。王罕以铁木真汗为其义子，术赤乃系孙辈，其女察兀别乞与术赤为姑侄以为担婚理由。铁木真汗再使人往说，愿以自己之女豁真别乞求字于王罕之孙，即亦勒格鲜昆之秃撒合，以为换亲。王罕与其子亦勒格鲜昆，以为如此换亲可以两下拉平，将允许之。札木合闻之，即进谗言，说术赤乃蔑儿乞人与铁木真汗之妻孛儿帖之私生子，不配为婚。而铁木真汗之女豁真别乞既醜且骄纵，亦难为妇；更言铁木真汗之求婚使者，只以求婚为名，却暗中勾引蒙古之降者，逃往铁木真汗处，并引出各蒙古诸降服首领以为左证。王罕因之大怒，遂坚绝联婚，而逐使者。

札木合屡劝王罕防范铁木真汗，以破坏其合作，因王罕心中有亏，故颇见成效。但劝王罕击取铁木真汗，则王罕却未肯。时王罕之子亦勒格鲜昆驻冬于西方山地中，是王罕东征时留其军守御在西，以防范乃蛮者。札木合乃求往见而离间之。向亦勒格鲜昆指证铁木真汗与乃蛮大阳汗使者往来交通，以图谋克烈部，但表面却称父子之盟，实欲以义于名义，独吞克烈部之全部继承。故必须设计将铁木真汗除去，大家分掳其部众与财富，才是共谋和平相处之道。

亦勒格鲜昆听信札木合之谗言，乃使人往商于其父王罕。王罕则以

为克烈部强敌是西方乃蛮，必得以铁木真汗为有力之后援，方足以抵御之，因不肯对铁木真汗用兵，自壤同盟。于是，札木合又想以兵谏之计，建议率兵东去与王罕合兵进击，王军如再不从，则强之以行。再不然，就以其年老不宜过劳为由，请其让位。亦勒格鲜昆从之，遂掀起克烈部对铁木真汗奇袭之战。

二、铁木真汗与王罕之失和

上次作战时，王罕因惧铁木真汗分其所得，更惧怕突然见击，所以在东方战场上，不辞而别。但因连夜起营，仓皇急促，又求行动上密秘迅速，故不能尽数携走其已受降之各部百姓，更不能尽数驱走牛羊。只是选取良马、骆驼，驮载其所得珍货西去。同时因恐铁木真汗起兵追赶，又只好连夜兼行，以此，使得其本部人马，因驮载过重，多数落伍在后。

铁木真汗不知王罕所得财货之多，故不在意，还认为王罕真为西方有警，留弃大量财货、牛羊以及百姓，是其厚爱，极可感激，初不疑有他。及其遣使者及援军随之西上，沿途收容落后者，以及投降王罕之蒙古各部将领之家小车辆等，始知其中或者有诈。后来，许多蒙古降王罕之将领，因家小为铁木真汗所得，乃偷着逃回，转降于铁木真汗。由是铁木真汗始知王罕西方并无乃蛮之警，因而知道王罕必是受人离间。乃即将计就计，派出许多寻乞家小之将领，分别带其家小再投往王罕处，刺探王罕营中一切行动，及勾引别人来归。于是父有许多人逃离王罕来降，仍留在王罕处者，则多是铁木真汗为王罕设置之内奸。

王罕亦老奸巨滑之人，对铁木真汗此种手段，防之极为严密，甚且用各种方法，故意示好于铁木真汗，使之传入铁木真汗耳中。于是，此父子之盟，成为间谍战场，表面上义父义子，各致问侯安抚，骨子裹却勾心斗角。此时二人心中，各有研判，王罕以为铁木真汗不致决裂来袭，自己亦有备无患。铁木真汗则认定王罕必得依靠自己为其后援，否则必为其西方乃蛮部所吞并，故亦判定其必不肯决裂来袭。因而，铁木真汗便安心在东方捕鱼儿海剌（今儿尔池）与阔速海子（今呼伦池）之间过冬，准备来春东征宏吉剌部，完全平定东方之后，再回西方之基地。由是铁木真汗便专务东方，组织其蒙古帝国之东方基地，以统一今兴安省西部、辽北省北部、察哈尔省北部、外蒙古东部、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东之广大地面，使之成为蒙古之统一大牧地。

第二章 铁木真减克烈部王罕之战

铁木真自称汗后，经二十五年，始统一蒙古诸部。蒙古旧部长逃亡于突厥克烈部王罕之下者多人，铁木真汗一向父事之王罕对此批逃亡者皆收留之，对于向其投降者亦收受之，又听信若辈之谗言，欲围害铁木真汗。于是双方由相责而相战。在一边作战一边和谈中，铁木真汗对之实施奇龚，一举而击减克烈部，王罕父子走死道途。此宋宁宗嘉泰三年，金章宗泰和三年，公元1203年秋之事也。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

一、铁木真汗与王罕闻之失和

突厥克烈部长王罕，为人贪财，蒙古铁木真汗则贪得实力，其二人所欲不同，冲突较少，在他们东西各有强敌伺隙时期，各需要外力支援，故二人可以彼此尊重而合作无闻。等到东方之屈敦多被消减后，王罕又于贪财之外，也贪得实力，收纳铁木真汗之叛逃者，又单独接受札只剌部长一度会为东方古儿罕之札木合之降，于是，他们间之合作，便发生裂痕。

札木合投降在王罕手下，王罕待之如上宾，使札木合有机施展其阴谋。因而相机向王罕进谗言，以挑拨王罕与铁木真汗问之感情，王罕作贼心虚，怕铁木真汗真会突然向他进击，乃乘夜拔营，离开金边着阿剌勒河（在今外蒙古克鲁伦西北阿尔新之东）畔之与铁木真汗共同驻冬地，溯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南岸，连夜向西急行，回到其秃拉河（即今土拉河）流域旧牧地。因此遂招致与铁木真汗之破裂，已见前章战后之政局节中。

斯时，王罕之子亦勒格鲜昆驻冬在者者额温都山（一作折额儿山，元史本纪作折连都山，亲征录作彻彻儿运都山，蒙语高山意思，在今外蒙古西库伦西南杭爱山之东，今名花高山）北，以防御乃蛮。

王罕回到秃故河（土拉河）上游黑林之地，其父子两军虽尚距离数百里，但总可互为支援，不怕西方或东方之袭击。况有王罕之弟札合敢不投降于铁木真汗后，即驻在秃拉河上游之东北，其东即铁木真汗胞弟拙赤合撒儿罕军驻冬之地。彼此一向合作，常作友好之支援，即使铁木真汗要来袭击，至少札合敢不会念手足之情，向王罕暗中通消息，故王罕斯时，有恃无恐。

铁木真汗东征札木合时，会留下十三翼军之五军，守在斡难河（即今鄂嫩河），怯缘连河（今克鲁伦河）、秃拉河（今土拉河）三河源头原根据地之基地上。其五军之将领是，其弟拙赤合撒儿在西北方；其伯父主儿扯歹在东方；其后父蒙力克在南方；其第三弟窝阔台在西方；其从弟忽亦勒答儿在北方。各选定向阳之平川地驻冬，以防乃蛮与蔑儿乞

人之优袭。而铁木真汗自己，则率领其十三翼军之八军东征，于消减蒙古各部之后，留在东方驻冬。其两地相去约有一千五百余里，虽传骑络绎于道，终是实力分散，故不便开罪于王罕，仍诚心恭事之，问安入贡，信使往还，藉求暂时相安。欲等待东方完全平定之后，再行处理过去彼此不愉快、不融洽诸事。盖以为王罕西受乃赞威胁，绝不敢冒腹背两面受敌之险。

二、札木合之离间成功

札木合投降王罕之径，会千方百计，离间王罕与铁木真汗之感情，使之发生冲突，自己好乘间图利以复其国。

他首先促使王罕不告而西归；继又阻止铁木真汗向王罕亲上加亲之提议；随后，想促使王罕乘铁木真汗所部东西分离之际，袭取他西部留守在三河源头之五翼军。王罕由于显虑较多，执意不肯。

元朝秘史中记载王罕之言曰："在前他的父亲（也速该），将我输了的百姓，救与了我。如后他儿子（指铁木真汗）将我输了的百姓，又注四杰来，救与了我。欲报他们的大恩，天地获助知也者。也速该安答（盟友），他父子两个为谁这般辛苦来？我如今也老了，后来这百姓敌谁管？我的弟们都无德行，止有一子桑昆（即亦勒格鲜昆）亦如无有。可教帖木真（即铁木真汗）做桑昆之兄，使我有二子，岂得不安。"札木合心知这些言语，必为王罕之子亦勒格鲜昆所忌，因乃改变计策，去说其子。（元朝秘史，卷五）

猪儿年（宋宁宗嘉泰三年、金章宗泰和三年、公元1203、岁次癸亥）元旦之日，札木合以贺年为名，西往者者额儿温都山（今杭爱山东之花高山）的山地中，为王罕之子亦勒格鲜昆拜年，蒙古诸部逃亡者阿勒坛，忽察儿、答里台、汪忽哈忽出、忽里勒、哈儿军太石、客连黑儿、察兀忽儿、额不格真，合儿塔阿特，脱斡邻、合赤温别乞，忽先札木儿等，皆随之往。这群人各以花言巧语，先告亦勒格鲜昆诃谀称赞，然后说出其父王罕欲将百姓教铁木真汗管理等言语，最后鼓动必将与铁木真汗一战，不然势难生存。元朝秘史中记载其言语有："札木合同桑昆谗说："铁木真与乃蛮塔阳（即大阳汗）使臣往来通话。他口裹虽说父子，动静却恁。莫还倚仗他么？若不预先除了，你行如何肯服？若除帖木真呵，我自横街入去。"阿勒坛、忽察儿话："阿额伦（铁木真汗之母）母的众儿子们，俺与你杀。"额不格真、合儿塔阿特说："他的手脚，我与你孽。"脱斡邻说："不如去掳他的百姓，若掳了百姓，他待如何？"合赤温别乞说："桑昆你想做甚么呵!长的梢头，深的水底，我与你同去。"……这些言语，亦勒桩鲜昆听后，尚在犹豫，札木合说道："不乘其分故的千载一时机会击他，他将来要作你的兄，就管你的百姓了。"亦勒格鲜昆遂心中大动，认为其父确是人老糊涂，引狼入室。（元朝秘史，卷五）

第二节战场地理形势

一、王罕父子之战略观点

王罕之子亦勒格鲜昆，听信札木合诸人之言，觉得自己处境，已是前门有虎，后门进狼之局面。更觉得有“为求打虎必得先行除狼”之势，于是，乃下定决心，要与铁木真汗决一死战，便派人暗地连络已投顺铁木真汗之叔父札合敢不，及已降铁木真汗之旧克烈部中之秃别干（即秃马兀特）与董令亦特两部之人。其叔父札合敢不此时也正欲脱离铁木真汗而去自立发展，遂与秃别干、董合亦特两部人取得连络，原为其侄亦勒格鲜昆作内应。并告知铁木真汗在西方基地五个军及老小等驻冬地分散实况，与可以进袭之详细道途，以及如何可以形成包围攻击，一举盛俘其全部力量等。

亦勒格鲜昆因有彼等为内应，又明了铁木真之详细兵力驻地实情，取胜信心大增，遂使其左右手撒亦罕、脱迭额二人为使者，前往秃拉河（土技河）黑林，去说其父王罕。王罕听二人所说，即道：“我的铁木真儿子行，你们为什么那般想？现在倚仗他了，若如今那般歹想呵，天必不爱让咱们。札木合的言语，狂诞不可信。”亦勒格鲜昆使人往说其父，王罕仍坚决不从。亦勒格鲜昆觉得其父人老昏庸，只好用“兵谏”一策。乃尽起其守在西方之兵力东行，亲自往说其父。他到秃拉河黑林，入见其父说：“你如今现存，他俺行不当数。若父亲老了呵（指去世），将俺祖父辛苦着收集之百姓，如何敌他管？”王罕道：“你在忽刺安忽特（地在今乌里雅蘇台之东）地面，与乃蛮澈卜剌黑作战，马腿中箭，几乎被人拏去间，咱们的妻子百姓都为乃蛮得了，铁木真在途中闻变，立遣其四桀之将往救你，将咱们输了的妻子百姓都救回来与了咱们。我欲报他的恩，天地护助知也者。你自的行，我怎生弃舍得。现倚仗他，想歹呵，不宜，天必不爱护咱们。”亦勒格鲜昆乃对其父分析引狼入室，克烈部将被铁木真污灭亡吞并，以及目前之战略形势，是唯一得能保国术民，转败为胜之机会，并怪其父不该不辞而离开东方战场；不该收容对方叛逃，不该据受札木合之降，更不该听谗言拒绝联婚等，今器隙已成，裂痕已一再扩大，如不动手，早晚将为敌擒之局势下，犹视敌人为义子，认为自己亲生骨肉不足继承，要把祖宗遣留之百姓交给义子，而舍弃亲生儿子，故今不忍坐视不问，更不能坐以待毙，只好早些逃命远去。说罢之后，便烦恼走出。王罕知将发生变乱，乃急唤回，沈默许久，然后说：“天莫不不爱护么!儿子行，你怎生要舍弃!你但去做可以胜他的事。你自知者，现在倒是胜他的好时机呵!”于是，父子乃共商如何作战。（上引见元朝秘史，卷五）

二、铁木真汗之判断错误

王罕父子商量一毕而袭取铁木真汗之战略，因设计，首先诳取铁木真汗之信任，使之轻骑西来，自投罗网，质其本人，然后直以兵袭取其西方基地及东方基地。甚至于怎样分兵，怎样利用道路，怎样连接内应，怎样裹应外合，怎样壮大声势，怎样怎样不战而屈其东方之军，以收全胜之功。

王罕认定，铁木真汗远在东方捕鱼儿海子（即今兴安省贝尔池）以北，拒其西方基地，有一千五百多里，其闻变西还救援，需得5日方到，能与自己开始接战时间，总在第六天以后。现今王罕父子兵力已合在一处，距离铁木真汗三河源头基地，仅半日行程，一旦动手，又有内应，可以一举而尽取之。然后乘胜余威，用以逸待劳之势，迎战远道疲敝之救兵，但此一胜算虽多，尚不及不战而胜，不战而胜之策，就乃设计先将铁木真汗诳来擒获，使其大军失掉统率，便可在一袭之后，闻声而溃。因为王罕知铁木真汗正准备东征宏吉剌部，不会移军而还，便在不动声色之中，设计引诱铁木真汗必愿西来见面相会之计，以便从中取事。

铁木真汗对于王罕行动之判断，则以为王罕虽独纳札只剌等部札木合等人之降，因得财物过多，怕自己朋分其肥，故其称西方有警，先行回军西去，因王罕在与铁木真汗西袭乃蛮北部时，会有此种行动，以致其弟其子将家属财产几乎尽失于乃蛮南部撒卜剌黑之截击。人老而益贪，实为可笑而已。及自己提出联婚要求，系受札木合之蛊惑与破坏，始遭王罕拒绝，但并非王罕对自己怀有惑心。因此认定，王罕之西方，隔杭海大山（即今外蒙古杭爱山）

就是乃蛮，乃蛮虽与克烈部同为突厥人，但与王罕却有深仇，绝无和解与合作之可能。王罕之西北方，隔斡儿寒河（即今鄂尔浑河）本是蔑儿乞诸部之牧地，王罕几次对蔑儿乞战争，已将斡儿寒河流域占领，将蔑儿乞人逐退至薛灵哥河（即今色楞格河）以西，是王罕与蔑儿乞已结有深仇，彼此也不可能妥协。既有强敌伺隙其旁，在此情势下，以王罕之老谋深算，绝对不可不头一切，冒险同其盟友挑战之理。是故，铁木真汗对王罕未加防范。

铁木真汗也闻王罕之子亦勒格鲜昆已放弃其西方驻多之地，移军东来，与其父会兵一起。但认为斡儿寒河上流地处山阴，冰雪融解较迟，非是防御西方敌人，本不甚适宜大军驻冬之用。秃拉河（土拉河）流域地较向阳，冰雪融化较速，春季早到，枯草早荣，适于初春融雪季节放牧。且其东来之后，别无动作，可见无甚特殊原因，只是为牧畜方便，而例行移军，较往年稍早月余者，或亦偶然与会。故铁木真汗对此也未作深思。

东方之宏吉剌部乃金朝女真族之一支，为东胡各部落之领袖，久与札木合部合作，前虽会一度疏远札木合，旋又参加札木合之同盟。其后当札木未投降之前曾大掠其部，在札木合投降王罕之后，宏吉剌部持有金朝为其后援，未投降王罕，也不肯投降铁木真汗。铁木真汗此时决定准备征服东方宏吉剌部，完全清除后顾之忧以后，再行转回西方基地，以与突厥人争衡。

第三节双方战略指导

一、王罕之阴谋及其泄漏

王罕父子与札木合及蒙古，東胡各逃亡领袖等，在秘密研究中所得之结果，以为铁木真汗既未对克烈部发生疑心，当设法投其兴趣所好，使之毫不疑心坦然西来，请君入瓮而自就死地。于是，亦勒格鲜昆对其父王罕说：“铁木真汗会索咱妹子察兀儿别乞，为其长子术赤之妻。如今旧事重提，可遣人去许婚，而约定铁木真汗亲自来吃许婚酒。铁木真汗必愿前来面释前愆，与咱你亲上加亲，以增其势力。咱们待他到来时，就这里将他拏了。然后进袭他的西部根据地，而尽取之，使其东方大军不战而溃，遣人往招之来降。”于是王罕首肯，即由王罕出名，差人东去，约定日期，请铁木汗准时前来吃许婚筵席。

铁木真汗果中其计，以为王罕老于世道，深明利害，必不生见害之心。为表示坦诚，乃率领十骑，欣然离开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池）驻冬营地，残踏化冻猾寒之冰泥，向西而行，欲到秃拉河（即土拉河）南岸黑林中之王罕营地，赴许婚筵席，以当面解释前此一切嫌隙，免得小人在其父子板加入谗言。也使义父义予之好，一变而成为姻亲之好，所谓“疏不问亲”，从此可免去许多可疑传言。因而一路兴高采烈，行走5日，在其后父蒙力克营地中住宿。

在蒙力克营中，铁木真汗与蒙力克炉边夜谈，蒙力克老人对铁木真汗道：“王罕他家的女子行，咱索时，他做大，下觑着，不肯予，如今怎生特地请叫许婚筵席，其中莫非有诈？我看，你且先回东方军中去，在此地只遣二名使者前往，推说春问马疲，难以远行，待将养马力后，才能向西远行，看他们如何反应？待探得王罕真意之后，再行定夺为妥。因为我军中的突厥降人董合亦特部中有与外暗通消息嫌疑，是不能不防备的。”于是，乃与之述说俺巴孩如何以许婚而塔塔儿所诈，塔塔儿部长如何以婚姻诈取王罕祖父等故事。铁木真汗听了悚然惊心，乃令不合台、乞剌台二人为使，往王罕处赴筵，自己即连夜回转东方营地。

亦勒格鲜昆探知铁木真汗率十骑西来，更探知其宿于蒙力克老人营地，及见不合台、乞剌台二人西来，知自己事机，已为蒙力克与铁木真汗所觉察。他判定铁木真汗去必未远，可用突骑追及之。乃一面款待二使；一面准备一组强大有力之突击队，于明晨绝早出发，向东方突进，追赶铁木真汗，将其擎住。

阿勒坛之弟也客扯连，参与其突击队知其计划，回家对其妻说：“如今共议定了，明晨起早要捉铁木真汗去。

若只今有人报与铁木真汗，不知将来怎生赏呵是？”其妻阿剌黑亦特便说：“你那泛滥言语莫说，别人听得，恐做真话。”因问铁木真汗现在何地，何以要明早去捉等等，不意斯时为送马乳人巴歹，完全听到，巴

歹回到马场，又说与其同伴乞失里。乞失里去查听，看见也客扯连正与其子纳邻客延磨磋箭镞。见乞失里到来，便分付他道：“将我那白马与栗色马夜晚拉来拴好，我要绝早有急事乘骑。”乞失里应声而回。便呼巴歹将马套好，牵入自己帐内，商量争此立功机会。于是他二人宰杀羔羊，用牀木煮熟，吃的了，将剩余装妥，连夜乘马向蒙力克营地奔去。到蒙利克营地，知蒙力克已拔营而走，判断铁木真汗必东去，乃直奔东方急驰，过了半夜之后，终于寻到铁木真汗营地，遂将所听所见之事告诉铁木真汗。（上引见元朝秘史，卷五）

二、王罕之袭取铁木真

铁木真汗听巴歹、乞失里的报信，知已落入王罕的阴谋中。又知自己非急往就一个强硬军队中，致死力战，已不可能脱出王罕魔掌。并且更知王罕父子必然灾其全力，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同时袭击其西方根据地之五个军，并更判知此种袭击必是包围歼灭，不使漏网。

于是，铁木真汗立即集合其全部之九骑人员，告以严重情况，令木华黎西往去通知蒙力克；合孛罗忽勒北去通知窝阅台；令孛斡儿出西北去通知拙亦合撒儿。命他们抛弃一切，急速率领所部，齐向卯温都山阴（今外蒙各车臣汗北，今名翁都尔山）主儿扯歹驻冬地集合，与我相会。然后才会合赤温去通知近处之忽亦勒答儿，命急速集军到卯温都山，以迎击克烈部之袭击。最后，铁木真汗连两个报信人还有七骑，就令者勒蔑一骑断役，舍弃帐幕，连夜向北急走，投奔卯温都山阴主儿扯歹驻冬地而来。于是，王罕父子亲自率领之特种突击队，在这日天明之后赶至，发现帐幕已空，只好追踪寻找。

主儿扯歹之军。系以蒙古兀鲁兀部为基幹；忽亦勒答儿之军，系以蒙古忙忽特部为基幹；蒙力克之军，保以蒙古孛儿只斤之一部与突厥克烈部董合亦特人为基幹。此三军战力比较拙赤合撒儿与窝阔台之军为强，内部团结力也较坚固。蒙力克军中虽有突蹶降人董合亦特等众，但因蒙力克警觉力高，管理方面良善，能适时清除内部间细，并在铁木真汗东归之后，即拔营起寨北走，成为这五军中唯一最早行动之军，因其行动早，故战力高于其他各军。待铁木真汗差木华黎通知时，他已离开原驻参地半日之行程，他得到通知，即急远向卯温都山急进，故王罕所部来袭时扑空，他已与铁木真汗会合于卯温都山以北地区。

拙赤合澈儿之军驻冬在三河源头之西，肯特山区中，待孛斡儿出赶去通知时，已被王罕分遣之军包围，孛斡儿出队入围中，告诉详细实况，命他即速突围，到卯温都山集合，不能等候任何救援。但旭在突围中却与孛斡儿出失散。听说孛斡儿出骏马中节倒毙，他回敦未能寻获。

窝阔台之军驻冬在北方，斡难河源头之上，待孛罗忽勒赶到他驻冬地通知时，已被王罕分遣之军所围攻，孛罗忽勒冲入团中，与之共同向外突围。窝阔台为箭伤堕马，孛罗忽勒拼死抢救于自己马上，街出重围，向卯温都山而来。

合赤温到达忽亦勒答儿军驻冬地，即令远集军往卯温都山去与铁木真汗及主儿扯歹会合。忽亦勒答儿知有巨变，立即起军向卯温都山行去。故在半日多之间，他已与合赤温在其军先头，先到主儿扯歹军营之驻冬地。经间之后，知铁木真汗亦是方到此营地中。不久，蒙力克之军同木华黎，也来到主儿扯歹营地。

独自断后之者勒蔑，在天明之后，寻到几处牧马、牧牛羊之牧人，他即令牧牛牧羊者，放弃其牛群、羊群，随他充当后卫；令牧马者即速领其马群向卯温都山去与铁木真汗会合。故不半日工夫，他已有后街二十余人。他登高远望，尚未见敌人踪迹，便徐徐退到卯温都山。

三、合刺合勒只特之战

者勒蔑在向卯温都山后退中，已退到卯温都山前之合刺合勒只特地面，有放马人赤吉歹报说：他在卯温都山南之山上，看见西南方向远处，有尘土飞扬，似是一阵狂风。者勒蔑判知必是王罕大军自后追来，立即驰至主儿扯歹营中，报告铁木真汗。铁木真立刻上马，集合其诸将出营备战。

这时突有一骑自西南方奔来，至切近下马，铁木真汗认得是札木合从人，问其来意，来人说是奉主人札木合之命，代表札木合之言云：“王罕与亦勒格鲜昆，因追捉你不到，便问你将何所投？札木合便告以必往兀鲁兀部或忙忽特部去了。因为这两部人都能厮杀，虽在混乱时其战志不乱，是从小就从铸刀弓箭中过惯的人，他们的旗纛是花色，是黑色，见时可多加提防。王罕便令其只斤部的勇士，和合黑吉部的勇士在前为前锋，令其士锦，士别干姓的阿赤黑失伦、干蛮董合特的勇士，与豁黑失列门太子三个人各领一千护卫的人，以次应援其前锋，此队的后方是大军。札木合在前常不敌缎木真安答（盟友），如今王罕却教札木合整治他的军马，来统帅大军，看来王罕父子之能为，还不及札木合。所以铁木真安答休怕，谨慎着一战还可以战胜了的呢。”铁木真汗心知此乃札木合存心欺骗，计在防铁木真立即逃走，而求一战。惟敌人征尘已见，不出二时，当即到达，虽想逃走，也不可能，为求安然脱离战场，只有死力一战。（元朝秘史卷六）

铁木真汗将使者交给蒙力克后，对主儿扯歹说：“主儿扯歹伯父，我欲教你作先锋，对敌迎战，你意如何？”主儿拉歹未及回话，忽亦勒答儿抢先说道：“我作先锋，日梭将我孤儿拾举，就好了。”主儿扯歹说：“在大汗面前，我们要求的是胜利成功，不是一死便了，我们兀鲁兀特、忙忽待两部人，同为先锋，去厮杀就是。”于是这两军便在营前排好阵式，各用密集队形，向敌尘起处方向迎击，在合刺合勒只特地面与王罕之前锋，发生战斗，是谓合刺合勒只特之战。（元朝秘史卷六）

整个下午已过其半，忽亦勒答儿之军与主儿扯歹之军，共同迎击王罕之前锋只斤部勇士，因为以两军对付王罕前锋之一部，又以逸待劳，王罕前锋只斤部勇士被歼，继只斤部到达战场之王罕合黑吉部勇士也为

铁木真汗之先锋所击减。王罕军之第二波阿赤黑失伦之千骑种向在右方之主儿扯歹军：其同来之干缓董合特与豁里失列门太子合二千骑直冲在左方之忽立勒答兄之军，在交战不久，将忽亦勒答儿刺下马来，其部下忙忽特人备死力战，将敌击散，救出忽亦勒答儿。主儿扯歹斯时在右方激战中，见其左方之军阵式大乱，立即分遣一支队驰往支援。此支队徙侧而横冲敌之侧背，终于将王罕军之第二波兵力也击破。

亦勒格鲜昆到达战场，见前锋将没，不腾其忿，乃不待王罕到来，也率领所带千余骑卫队，逐次加入战斗。主见扯歹认识亦勒格鲜昆，乃从旁瞄备，尽力向之射出一箭，因用力过大，这此箭由亦勒格鲜昆人左腮射入，而由其右腮穿山。亦勒格鲜昆登时落马，克烈部诸将奋勇抢救，擁之后退。

铁木真汗斯时已命蒙力克之军护送各家小东去，命其直去东方基地捕鱼儿海子（即今与安省贝尔池）一带去整军来迎。故铁木真汗手下已无兵可以支援其先锋，又见天色已晚，拙赤合撒儿与窝阔台之两军及孛斡儿出与孛罗忽勒二人皆不前来，判断必多损伤，在此久战无益，便乘敌人攻势顿挫之际，传令撤退，将伤者扶持上马，空张营火，连夜东上。此乃铁木真汗雄阴蒙力克营地东走后第三日发生之事。

四、铁木真汗之责王罕

铁木真汗退出合刺合勒只特战场后，东行一夜，天明后点视人马，仍不见孛斡儿出、孛罗忽勒到来，知是拙赤合撒儿与窝阔台二军已被王罕袭取，乃合军中老小伤患先沿着怯缘连河（今克鲁伦河）北岸东去，自己率领精壮以为断后，并收容各地溃散，及未及召集之军马。忽亦勒答儿伤势虽重，但不肯先退，一定要裹伤在军继续作战。这1日夜，敌并未追来。

铁木真汗徐徐东退中，军中乏食，只好打猎以为军量。第三日中午，始见西方有一人一骑追来，来至切近，认出是孛斡儿出骑一匹驮马。据孛斡儿出言：他与拙赤合撒儿已冲出被围之管地，在奔驰中坐马为敌人射死，乃抢夺驮马，推翻驮载之货架，跨上驮鞍东走，遍寻拙赤合撒儿不着，到卯温都山时，见是敌军，乃按踪追来，闻拙赤合撒儿未来，他要回马寻找，为铁木真汗所制止。

这日傍晚，更见孛罗忽勒与窝阔台共骑一马追来，窝阔台受箭伤甚重，孛罗忽勒抱他在马上，防他流血，得以不死。铁木真汗流着泪，用火将窝阔台箭伤医疗。然后，复启军东行。点视人马，只有二千六百人，夜屯在巴泐渚纳海子（在克鲁伦河北边一支流上源处为时乾之池）边上，忽亦勒答儿因纵马逐兽，箭伤复发而死。铁木真汗失声恸哭之后，伏饮池内化次之河水，仰天发誓，定对王罕复仇。

铁木真汗间至其东方主力军中，便使人往宏吉剌部去召降。宏吉剌部知其失败于西，必将肆毒于东，如不降难以自保，共推举特薛祥老人

（铁木真之岳父）为新部长，以降附于铁木真汗。铁木真汗乃西移两军，使阿儿孩合撒儿，雪格该者温二人为使，往责王罕，以进行其离间之策。

史人记其使者向王罕致词曰：“俺在统格黎小河（在今外蒙古车臣罕东北）东边住下了，草也好，马也肥。父罕，我有甚事，责怪可敌我怕了，若怪俺呵，何不安然怪责，如何这般怪责，将俺家业破坏了，莫不有人离间？当初在勺儿合勒昆山的忽剌阿讷屼山（指进袭乃蛮北部之途中）行中，不曾会说：若有人离间呵，不要信；对面说话了时，方可信。如今咱们曾对面说话来么？我虽少呵，也似多的般来；虽歹呵，也似好的般来。且我与你，如车的两辕，一辕折了呵，牛曳不得；如车的两轮，一轮坏了呵，车行不得。在前，你的父有四十个儿子，你将你弟弟们杀的杀了，逃的逃了，你叔父古儿汗气不过，搬兵来征你，你止有一百人逃来合刺温隘（在今外蒙古巴颜乌拉山之南），献女与蔑儿乞，仍不得助。我父为你领兵赶走古儿汗，将百姓还了你。后来你弟弟又借乃蛮军马征你，你逃往回方（指王罕逃往西域之役），一年多不得救，穷乏得挤羊乳，扎骆驼血吃，我差人接到时，你是衣不蔽体，骑个瞎沙马来。我科饮着自己来养济你，又将在蔑儿乞所得的百姓、头口，都给了你。后来与你同行追击乃蛮不亦鲁，你怕我分你财物，在对阵中虚着营火退走了。当你退到南道途中，遭到撒卜刺黑的截击，你所得的，和你所有的，以及你的妻子百姓都被掳去了。我遣四桀将军为你夺了回来，全数还给你，你是如何的知感来着。我如山鹰，常为你捕青足灰羽之鹤，今鹤还未捕尽，你却就射鹰了。如今有什么原故责怪，使人说出来好了。”王罕听了这些言语，叹息良久说：“我与铁木真汗有不可离的道理，我已离了。”乃用刀刺小指出血，滴入小韡皮囊中。令使者持回给铁木真汗看，以为谢过之证。（上引见元朝秘史卷六）

五、铁木真汗之宣传攻势

铁木真汗要离间札木合与王罕父子间之合作，使人往王罕军去责札木合说：“王罕义父从前待我极好，现今却将我嫉恶者，是谁教分离了的？在前时，每日谁早起呵，将义父的马乳用青锺饮有来，为我早起的上头嫉妬了。如今你将义父的青锺满饮呵，看他能待费得多少时间的真心待你。”这是说：我义父一下变成你之义父，他怕我分家业，他们不怕你分家业？又示意说王罕狼心狗肺，对我犹如此，他早晚也要害你，该早加小心。

铁木真汗之使者，又使人传话于此时盘据在三河源头的阿勒坛，忽察儿二人道：“你们二个不知如何要弃我？

忽察儿你是揑坤大石的子，当初咱们敬你当汗，你不会肯；阿勒壇你父忽图刺汗会管达达（蒙古人自称）百姓，因此教你当汗，你也不肯，在上辈有巴儿坛的儿子撒察、台出，他两个也不肯做。你众人硬教我作汗，我不得已做了，你们如今却离了我。在王罕处你们要好生做伴者，休要有始有终，教人议论你们全倚仗着铁木真，如无铁木真呵!便不

中用了。你们在那三河源头也守得好着，休教别人作营盘呵。”这是敌克烈部人对这些反覆无常之人要当心；又要蒙古人要守住祖先牧地，不要被克烈人兼并去；同时也示意自己马上就要反攻。

铁木真汗听说王罕已用脱斡隣来当蒙古诸部之统兵首长，他便道使到王罕处，以制造其内部纷纷。使者托王罕之人转话于脱斡隣说：“我所以唤你作弟弟的缘故，是因在前屯必乃察利该，领忽二人，原掳来的奴婢名斡黑达。

斡黑达的儿子名造别该，速别该的儿子名阔阔出乞儿撒安。开阔出乞儿撒安的儿子名也该晃脱合儿。也孩晃脱合儿的儿子就是你。你是我祖代的奴婢，我宠了你唤你做弟弟的缘故如此。你如今将谁的百姓，去要才媚著王罕，那是你主人我的百姓呵。你是奴婢，阿勒壇，忽察儿再不济，也不会听你管的……”如此，使王罕上下都知道错用奴隶作蒙古领袖：更使蒙古人之投降王罕者，认作王罕有意在侮辱人，用蒙古奴隶来充蒙古王汗，如不即速换人，于势必将引起蒙古已降者，发生变乱。

王罕惧于铁木真汗之报复，故常抱怨其子亦勒格鲜昆不该轻信外人之言。铁木真汗之使者，便求见亦勒格鲜昆，代铁木真汗说：“我是王罕带衣服生的儿子，你是王罕赤裸生的儿子，父王曾将我们俩一般抬齐。你生心恐怕我才在你先，才将我赶走了。如今你可休教父王心理艰辛，早晚出入消愁解闷些，你若照样嫉妬心不除，莫不是你要在父王现在时，要当皇帝么？不然，你又何必如此教父王内心受苦，促他早死呢？你要当皇帝呵，也用不到去找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去结安答，何不还了我的银鞍骈色马来，派两个使者来捕鱼儿海子（即今兴安省贝尔池）与我议和，释解误会，我会拥戴你的。”这些话是说明亦勒格鲜昆要篡夺王罕之王位，故激得亦得勒拾鲜昆大怒说：“他几会说是皇帝父亲来？只说‘好杀人的老头子’，我几会要与脱黑脱阿结安答（盟友）来，只说脱黑脱阿可以为师。你们这些言语，我省得了，是求厮杀的言语，你们回去告诉铁木真汗，将进攻的旄纛立起来吧，把马儿放得肥些吧。无有疑惑的，惟有竭力作战，我胜了则并彼，彼胜了则并我就是了。”（上引见元朝秘史卷六）

这时克烈部上下都惧怕铁木真汗，答里台，阿勒坛，忽察儿，札木合及塔塔儿部长忽秃帖木儿等，怕情况有骤然转变，便暗地中商议，要谋害王罕。王罕本就不喜这些人，又生疑心，暗中刺探，待知其谋已，乃立即起兵追讨他们。于是，答里台带着克烈部之撒乞阿特部人北逃，投降于铁木真汗。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与忽秃木儿等，西奔乃蛮。

第四节铁木真汗奇袭王罕之作战经过

一、施用诈降以稳住对方

是年，即公元1203年夏，铁木真汗移驻斡难河（今鄂嫩河）西岸，为纪念在三河源头之失败，乃名其驻地曰巴泐渚海子（此指名之地在今

鄂嫩河西方一支流名巴尔哲尔河，原巴泐渚海子则为克鲁伦河北边一小支流中时乾之池）。7月初，其胞弟拙赤合撒儿率数人寻至。因历述其自春间被袭经过，今其妻及三子也古、也松格、秃忽和部属财产都被王罕俘虏。并述说他随带几个伴当，遍寻各地，独粮不济，便嚼牛皮筋度日，经夏至秋方寻到此地。

铁木真因与他设计，要他去诈降，使大军能秘密接近王罕，而制造有利之奇袭机会。

于是，拙赤合撒儿便令其伴当沼列歹种人合里兀答儿，与兀良合歹径人察兀儿罕，两个去作其诈降使者。他二人往王罕所，假作拙赤合撒儿之言：“我儿的形影望不着，踏遍道路也寻不见，叫他呵!他又不听得，我孤身野宿已数月了，庇以树枝，枕着土块，夜望星辰，无处可投。我的妻子儿女都在汗所，我欲与妻子相聚，不知大汗之意许不？若差一个可倚饮的人来呵，我即束手来归了。”意思是你肯容纳我，我便向你投降。

王罕这时正立起金撒帐，作筵席，能得这些言语，知是实情，当然信以为真。他便不假思索说道：“果那般呵!教他到这里来吧!”因就筵席桌上取一牛角杯，盛盟誓用之血酒，就用其左近侍卫亦秃儿坚持着，也就便差亦秃兄坚跟着二使东去，代表王罕以接受拙赤合撒儿投降。（元朝秘史卷六）

这双方之三个使者，出王罕大营东行，绕出者者头儿温都山（在外蒙西库伦之西南方杭爱山脉东支之花高山）

之北，向怯缘运河（今克鲁伦河）南岸，河身向南弯曲处（今外蒙巴颜孟特附近）驰来，途经沙磺广漠，行非1日，方见到怯缘连河岸，便沿河南岸东走，以寻觅拙赤合撒儿之踪迹。

合里兀答儿马行在前，他向东途望中，看见前面大军西来之旄器，他怕王罕使者亦秃儿坚，发生疑心而哧跑，于是他便引导亦秃儿坚注意他事，使之不暇东望，乃故意下马，搬视马前蹄，伪言马蹄高中有石，请亦秃儿坚也下马助他除去马蹄之石。亦秃儿坚以情不可却。便下马帮他搬着马蹄，合里兀答儿挖弄着并用臀肘挡着，良久良久，始得完成。待他们重新上马后，铁木袭真汗大军已来到切近，亦秃儿坚看见，先是一呆，心知有此大军而来，定是设定奇袭之计，乃急围回逃。合里兀答儿马快，急速赶上他，即超越在前，不便拏他，只是横马挡阻住他之逃路，使他不得走。察忽儿罕之马慢，自后追来，追到用箭射到之处，便一箭射中亦秃儿坚之坐马。于是，两个人扶驾亦秃儿坚，来迎接铁木真汗，述说诈降所见所闻之情况，可以担任大军西进之向导。

铁木真汗自遣二使西去后，即命主儿扯歹阿儿孩两军为前行，由斡难河（鄂嫩河）北岸、徐徐移动大军到怯缘连河（克鲁伦河）北岸。沿途使用游骑封锁任何可能西去之人马，以防走漏消息。他遇到王罕派在

怯缘连河（克鲁伦河）担任守御之突厥族豁鲁剌忽部人，不过该部长掤斡思察罕，已与铁木真汗妥协，故不曾冲突，便率领所部向铁木真汗投降。于是，铁木真汗大军，自北方南行中，一路无阻，直到怯绿连河（克鲁伦河）南岸，转向而西，来到该河向西北转角处，适逢到使者返来，并将王罕之使者扣留。铁木真汗问明王罕内部情形，及其所居地之详细道路，遂决定用二使为向导，率领大军，连夜西进，而对王罕父子之大营，实行奇袭。

二、奇龚王罕之战

其时是7月上旬以来，迄中旬之初，铁太真汗先锋主儿扯歹与阿儿孩二军，由合里兀答儿与察兀儿罕二人向导，向西前进。在途上，他们各派侦骑四出，以搜捕沙碛草地内所有之少数牧马人牧牛羊人，使进军消息，不致泄露。王罕在此东方道上，本设有多处哨望所，拙赤合撒儿带十余骑在前，都设法将其捕俘或杀戮，故铁木真汗进军偷袭，王罕大营中毫不知情。

铁木真汗大军进入折儿合不赤孩地面（即今外蒙古西库伦以西地带），便乘着月夜分军前进，用分进合击态势，以接近王罕父子之者者额儿温都山山阴以西之大营。时为7月（公元1203年阴历7月）十二口夜晚。翌日天明为7月13日，王罕大营之人们发现敌情时，他们已被铁木真汗大军从四面包围。

铁木真汗大军，在王罕大营之外，呼唤王罕父子出来，王罕父子不应，铁木真汗乃下令，四面齐攻。王汗大营外筑有栅寨，凭以为守，颇不易突破。铁木真汗自13日上午开始攻击，王罕之军抵死拒战；栅破之后，重筑新栅；守者伤亡，立刻由营中补充，如此激战三昼夜，直到是月（公元1203年7月）16日天明，王军营中才高呼投降。

铁木真汗令王罕营中之降者，每百人为一组，徒手分批走出营来，分置各地以清点人数。点查完毕，惟不见王罕父子。乃向各清点处问讯，皆来见：又在各处查寻之，亦无所知，追讯王罕属下投降之诸将，来以合答黑巴阿秃儿知道。铁木真汗寻合答黑巴阿秃儿至面前侦讯，答曰：“我于正王，不忍教你们拏住杀掉，所以在你开始围攻以前，便先放走了他们，然后再和你们战上三日三夜，好让他们走得远些，不容你们去追赶了。如今杀我呵，便死!恩赐教活呵!出气力者。”铁木真汗知事已如此，无可挽回，乃喜对合答黑巴阿秃儿说道：

“不肯弃他主人于死地，而与我战上三天三夜，教他主人得逃命走得远些，这样行为，岂不是一个大丈夫吗？你这人，极可以钦敬，你可愿意做我的伴当!如果愿意，那你就领着你的旧伙伴，永远充任我的侍卫吧。”于是，乃清查王罕之一切军事玫治经济设施，不再准备追击王罕父子。（元朝秘史卷六）

王罕父子自大营中带少数人遁走西行，奔走1日，克烈部与乃蛮部

交界处，名克撒合勒地面（在今外蒙古杭爱山北与岱横察干山之间，以及布坤萨拉山之南，察察尔来格之西北一带地面），涅坤水（即今流入贝加尔湖之鄂尔浑河之西源伊海塔米林附近之水）南之山林中。他父子见后方无人来追，便下马整顿。王罕因口渴，走下林去，到河边饮水。为乃蛮哨兵发现，报告于守将豁里速别赤。守将以此等行径必是奸细，即率领众人，将王罕捉拏。王罕自称是克烈部长，但豁里速别赤认系冒充，将他杀死。其子亦勒格鲜昆等十余人正藏在林中，知其父王罕已被乃赞守将杀害，便从林中逃遁。

第五节战后之政局

一、铁木真减克烈部

亦勒格鲜昆率领从人翻山越水逃往西域。1日行在莽林中，亦勒格鲜昆与其妻在寻水，见乘马被蝇蚊咬伤之状甚惨。因而夫妻下马，令其伴当阔阔出夫妇将各马牵入林空通风地乘凉。阔阔出夫妇见其主人在远处，其他从人多失去不见，便和其妻商议，也要弃主人，逃回投降铁木真汗，并要乘走各马，带走马上所有财物。其妻说："在前好茶饭好衣服会予你吃穿，如今主上逃亡在外，如何可以这样的不留匹马的弃了他。"不肯同走。阔阔出怒道："你不想走，莫不是想要嫁给主人吗？"其妻无奈，乃要求将金器留给主人些，然后随之上马，各携带副马向东回走。待亦勒格鲜昆夫妇寻水回来，方知已为其伴当阔阔出夫妇所弃。乃锅所遗金器，南走入西夏国，西夏国不接纳，他又市得马匹行囊南去吐蕃（即今青海地方），吐蕃也不接纳，他便再回西夏，川资用尽，便剽掠自资以转往西域，后为西域哈刺鲁部长黑邻赤合刺派人们追杀，并其妻子皆死，至是突厥克烈部王罕一支完全诚亡。（元朝秘史、卷七）

王罕之弟札合敢不，在王罕失败时，原投降于铁木真汗，因与王罕意见不甚相洽，王罕复国后，不愿回国。当王罕以兵袭铁木真汗西方基地时，他知情不报，与王罕父子有暗同声息之嫌。及铁木真汗进袭王罕时，战事未决，札合敢不既献其二女亦巴合、莎儿合里塔妮以求自首。铁木真汗见其二女皆极美好，因准其请，不追既往。乃自娶其长女亦巴合为妃（后来以之转赐给主儿扯歹为妻）将其次女莎儿合里塔妮，赐予其四子拖雷为妻（后生蒙哥、忽必烈、旭烈兀诸子）。以此，未分札合敢不辖下之百姓，而将克烈部王罕父子辖下之百姓、牲畜、财产、悉数分给作战有功之诸将领。突厥克烈部从此在大漠之北澈底消灭。

牧马人巴歹、乞失里二人，以立下挽救蒙古被灭亡之大功，铁木真汗将王罕之金繖帐，并铺陈金银器皿，以及主管王罕库藏、饮撰、裳帐、内帐、侍候诸人，悉数分给二人享用。又将克烈部汪豁真姓之人，也悉分给二人作宿卫。更准许他二人揣带刀枪弓箭随时可以出入中军铁木贞汗之帐。再规定自他二人本人以及其后代子孙，都在中军帐饮酒时有座位，在战阵上抢得财物，在围猎获得禽兽，不许任何人去分，以示特别优待。

这时，抛弃亦勒格昆于林中之阔阔出夫妇，见铁木真汗，说明回来投降之意，并详细说明在与其主人逃亡中及抛弃主人详细经过。铁木真汗又分别细讯其夫妇二人，查出这对夫妇言问有矛盾出入，终于明了其抛弃其主人真实情形，因而对阔阔出说：“似你这等人，如何可以教你充赏伴当，留你这样无义的人没用处了。”乃杀阔阔出，而厚赏其妻子，使之随意择人改嫁，以作为对其良善心意之报答。（元朝秘史、卷七）

二、铁木真牧地与乃蛮接壤

突厥乃赞部之牧地东边，旧与突厥克烈部牧地西边接攘。乃蛮部长大阳汗，闻铁木真汗兼并王罕所有之牧地，成为东方之新邻国，因忌铁木真汗之强盛，乃与部下将领议论对付之策，突接东边守军指挥官豁里速别赤遣人来报，说有冒充王罕之老人，窥探边境，已被哨望之人捕杀。大阳汗心知此老人即王罕，而不是冒充，今已杀死，甚是可惜。（下引见元朝秘史、卷七）

大阳汗之妻古儿别速，乃大阳汗不鲁花之后母。是父死后兄弟争夺为妻之对象，大阳汗获胜，极宠惧之。在昔年王罕逃难西域时，古兄别速居其母家甘见过王罕本人。因是，古儿别速对其现夫大阳汗说：“王罕是在前的你岳老皇帝的安答（盟友），我能让他得出。可取他的首级来看，让得果然是呵，祭祀他，为他报仇。”大阳汗遂即差人取同其首级，古儿别速认定是真王罕，人虽死，仍有号召突厥克烈部人民作用，当用香料薰之，用银镶之，嵌在盘上大事祭祀，声明向蒙古人为他报仇，欲以号召王罕之旧各部。

这1日，乃蛮部准备妥祭奠事，动起乐器，聚集众人，祭奠王罕。当大阳汗亲自拜祭时，看见王罕人头在笑，他不知是装嵌工人之化装，以为有妖怪作祟，认为大不吉祥，便将人头摔在地上，打踏残碎。然后，遣使去阴山（即今绥远省东部之阴山）以东，约会汪古部长阿剌忽失的斤忽里（阿剌忽失是姓，名的斤忽里是真语镇守使之意），约他定期起兵为右手军，与乃蛮部会兵北上，共同击灭林中之王蒙古铁木真汗。惟汪古部不愿与蒙古铁真汗为敌，拒绝乃蛮部之约请，而将其事遣使转告于铁木真汗。

斯时铁木真汗已尽有外蒙古杭爱山以东之地以为牧地；南与为金守御长城之奚族后裔汪古部相接：其东至于鄂霍次克海及白令海峡；其北至贝加尔湖之北，常年结冰之北伍圈附近。在此地域之间，虽尚有多处未为铁木真汗征服之部落，但因铁木真汗已消灭突厥克烈部王罕，声威大盛，城内各部落，深恐遭受“后至之诛”，均争先恐后向铁木真汗投降纳贡，请求使令。辽代奚族遗裔汪古部，虽为金朝世守长城，却早已向铁木真汗入贡纳款。故将乃蛮部大阳汗使者月忽难来约之言，遣使悉告铁木真汗。铁木真汗判知乃蛮部既约汪古部为右手军，必也约蔑儿乞部为左手军，是场战争，势在不免。又何况有札木合、阿勒坛等人皆在乃蛮都中，不去讨伐，他们也会鼓动乃蛮来攻，乃决心准备对乃蛮之战争。

为北方诸游牧部落之宗主国金朝，此时正与南宋大将韩胄作战中。以为北方主要长城线防守完固，属国朝贯不缺为已足。对于其属国与属国板之互相攻伐，不暇过问。而金朝西方邻国西夏王朝，此时正酝醛内部政变，更不暇注意其北方国外诸事。因此，铁木真汗得以从容整顿其军力，将突厥克烈部旧有势力，编组到各军中，以进攻突厥乃蛮部之大阳汗。

第三章 铁木真减乃蛮大阳汗之战

铁木真汗东降宏吉剌部，西灭突厥克烈部后，乃于公元1204年、即宋宁宗嘉泰四年、金章宗泰和四年春，谋擎其西方之突厥乃蛮大阳汗，一战而击破之。于是塔塔儿余部，朵儿边部、合塔斤部、撒勒只兀部皆降。惟蔑儿乞除部大阳汗之子屈出律逃去。铁木真汗追击而西，大破乃蛮北部，尽降蔑儿乞诸部，并获札只剌部是札木合，与蔑儿乞脱黑脱阿之二子、兵威所至，收降西域四个国家以为蜀国，凯旋中以兵攻西夏，大掠而还，回至其斡难河源、乃筑众大会，自立为成吉思汗。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

一、铁木真西方新邻乃蛮

铁木真汗袭波突厥克烈部王罕之后，昔日与王罕接壤之突厥乃蛮部，于是成为铁木真汗之西方新邻国。

这新邻国正是旧日之强敌。因为铁木真汗之父也速该，会帮王罕疆逐乃蛮之侵略；铁木真汗自己，不仅曾帮助王罕驱逐乃蛮之侵略，并会与王罕同出大军西征乃蛮北部古出古敦不亦鲁。更在击破乃蛮北部大掠而还途中，击破乃蛮截击王罕军之乃蛮大将撤卜剌黑之军。当铁木真袭灭王罕时，与王罕为敌之王罕诸弟与王罕诸侄，多在乃蛮日夜图谋王罕之位与牧地、人民、财产中，今在数日中盅数落入铁木真汗之手，当然誓死不甘。故极力鼓动所有突厥人，当为突厥人颜面一战。乃蛮人虽憎恨王罕，但却喜爱王罕之牧地、人民与财产，今一旦落入蒙古人之手，真是突厥人之大损失，不惟大阳汗心存嫉妬，更使每个乃蛮人、蔑儿乞人、吉尔吉思人等，心都不甘。故突厥人与蒙古人间之大战，乃势所必然。

铁木真汗东方之敌札只剌部长札木合，此时逃在乃蛮。叛离铁木真汗之阿勒坛、忽察儿，也逃在乃蛮。塔塔儿部长忽秃帖木儿、泰亦赤兀残部之汪忽哈忽出、忽里厥、哈儿罕太石、客速里儿、察兀忽儿，还有朵儿边部长额不格真、合塔斤部长合儿塔河特、撒勒只兀部长合赤温别乞等，也都逃在乃蛮。乃蛮大阳汗悉收容之，以为搜集铁木真汗情报之用，并为维系蒙古各部落人心归向之号召，其目之在要求与铁木真汗一战。铁木真汗为防止旧日势力死恢复燃，为追捕此辇逃亡诸人，也正准备西征乃蛮。双方都在求战，故此一战迅即发生。

因为乃蛮乃是西方大国，牧地极广，人口众多，其主要心脏地带不在今科布多盆地与唐努乌梁盆地，更不在杭爱山南各小盆地，而在今新疆省北部准噶尔盆地中。乃蛮与铁木真汗世仇，于势已不能两立，他不向铁木真汗进击，铁木真汗也会向之进攻。但是两方实力距离甚远，大阳汗不能一举而攻铁木真汗，铁木真汗也不能一举而攻击大阳汗，必须

双方都向前推进，才能举行决定性之大战。

乃蛮大阳汗企图旺盛，想采用战略包围形势，他自己为中军，约汪古部为右手军，约蔑儿乞诸部为左手军，准备分头向三河源头之铁木真汗根据地推进，将铁木真汗势力包围而歼灭之。于是，他遣使者往阴山（即今绥远东部之阴山）东方，约会奚亲后裔之汪古部。汪古部长阿剌忽失的斤忽里（的斤忽里为女真语镇守使之意，乃金所封之号），因不欲开罪于铁木真汗，便遣使者往铁木真汗处，将乃蛮使者约会之言，悉以告知铁木真汗。铁木真汗因而也遣使报聘于汪古部，约为亲好，以共图乃蛮。

二、乃蛮内部状况

乃蛮是突厥语系在当时最大之一个部落，一译乃蛮为“奈曼”，其生活习惯大致与蒙古人相近似。牧地在今新疆省北部、外蒙西部，连唐努乌梁海盆地，皆其范围。西邻鹹海以北的康里（即汉书西域传之康居）；北接乞儿吉斯、谦谦州二部落；南方有哈鲁刺、畏吾儿二国；东南与西夏国接壤；东北邻接四种蔑儿乞部落；其东部则旧为克烈部，今为蒙古。是乃蛮部之牧地中实跨有阿勒台山（即今阿尔泰山），山南称为乃蛮本部落；山北称为古出古敦部落，合山南山北两部称为乃蛮部。自乃蛮老部长亦难赤必勒格死后，其二子长名台不花，次名古出古敦不亦鲁，因争父妾古儿别速而结怨，古出古敦不亦鲁因率所部退居山北乞湿泐巴失海子（在今外蒙古西北科布多及唐努乌梁海一带）地面之古敦部分，人称之为乃蛮北部。台不花则保其父业，居于山南平川地带，并保有今阿尔泰山、杭爱山等附近各山区与各小平原地，人称之为乃蛮本部。因台不花即汗位后，曾遣使入贡请封于金，金朝廷册封之为大王，突厥人译金语，将“大王”译为“大阳”或“塔阳”，故皆称之为大阳汗，或塔阳汗。

乃蛮大阳汗常扶植王罕之弟阿邻太石为克烈部长，派兵助之以攻王罕，旋为铁木真所逐回。

及克烈部为铁木真汗所吞并，王罕西走，竟为乃蛮消望将领豁里速别赤所误杀，使得大阳汗未得加以利用，甚为可惜，乃蛮守在东方之老将可克薛兀卜剌黑闻之，因向其部将言之曰：“死人的头，已割下来镶好，是为了复仇以号召人心的，却踏残碎了，又有什么号召力呵!如今狗吠的声又不好了，真是自减战争力量。记得从前亦难赤必勒格老王会说道：‘我老了，这妇人年少（指其妾古儿别速后为大阳汗争得为妻），儿子又柔弱，还是我祷神生来的，久后恐将我多年收集的百姓，守不住。’现在的夫人古儿别速，行的法度严峻少恩，我们的大阳汗又柔弱，每天除了飞放打猎之外，别无技能心性，其兄弟又不肯和睦起来共御外侮，真的是犬吠将有败亡的声么？”于是乃往谏大阳汗，应加意对铁木真汗实行防守。

可克薛兀撒卜剌黑晋见大阳汗，苦口婆心谏说很多，大阳汗道：“你

说的事，我都知道，并且我早都做了，目前的要紧事，是这东边有些达达（指蒙古人），用筒箭将在前的老王汗唬得走出营来，死在道途上了。看来那铁木真，他敢要做皇帝么？天上只有一个日月，地上如何可以有两个人？如今，咱去将那达达们取了来!”其夫人古儿别速，便在一旁插嘴撒娇说：“那达达百姓歹气息，衣服黑暗，极为脏污，取将来，你要这种人做什么？可得教那些人离我远点。若有生得好的妇女，将来洗沐了，教他们挤牛羊乳呵，还可用。”大阳汗高声笑道：“那般呵!有甚难，咱去将他弓箭夺来，就可以了。”可克薛兀撒卜剌黑，知再谏无益，叹息而出，一路苦恼，因而病倒。于是大阳汗不顾一切准备起兵东征。（上引见元朝秘史、卷七）

第二节双方战略指导

一、铁木真战略指导

乃蛮大阳汗遣脱兄必塔失为使，使于汪古部，约合汪古部出兵共击蒙古铁木真汗。汪古部长阿剌忽失的斤忽里对使者说：“我做不得你们的右手军。”同时即遣使对铁木真汗说：“乃蛮大阳汗要来夺你的弓箭，教我作右手军，我不会肯从。我如今提省你，若不提防呵，恐真的夺去你的弓箭呢。”时铁木真汗正在帖蔑延客额儿（在今土拉河上流肯特山西麓之西，元史本纪作帖麦该川）地面围猎，闻听此言，就在圈猎场中集合诸将商议。诸将多以此时冬季已尽，春即到来，马匹正瘦，不便作战。

当俟今秋（时公元1204年春）秋高马肥时，再与之战争。铁木真汗之四弟帖木格斡特赤斤道：“你们如何推辞马瘦!我的马却肥，我们的敌人的马，远道而来，可能比你们的马更瘦，至少是与我们的马一般的瘦。我们既得到了敌人这等说词，而且敌人业已与兵前来，我们如何坐得住，难道要不战而走么？”铁木真汗之异母弟别勒古台说：“若生时教人将弓箭夺了呵，济甚事，男子死呵与弓箭一处岂不好？如今，乃蛮恃其国大民众，敢发大言，却是不足怕的。我们可乘他远来至此，夺他的弓箭何难。咱去呵，他多马早必安然撒下，房帐空了，百姓必然逃入山林，咱如今便可上马去，迎着去打他，使后人知道我们是擒了大阳汗的一些人。”铁木真汗从其言，但却提示敌人不会马上到来，乘此时机，得善为整顿各军人马。于是，乃创所谓“牌子头”制度；设立六等“扯儿必官”；重新添拔护卫、散班；以及组织特种突击部队。其兵制已详本卷第一章。（上引见元朝秘史卷七）

所谓“牌子头”，元史兵志称之为“探马赤军”，即向蒙古以外之各投降人群徵兵之制。徵诸依附者凡年满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之男子，尽仓为兵。每邻近十人为一牌，推选一人为长，是为“牌子头”。牌子头领导九人，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在指挥系统上，由牌子头领其九兵听命于百户牌子头。

百户牌子头领九个牌子头自兼一牌子头，而听命于千户牌子头。千户牌子头领九个百户牌子头自兼一百户牌子头，听命于将军。将军中有

镢九个千户牌子头者为“领万户”；将军中有身兼千户牌子头者为“领千户”。其“领二千户”以上者，皆由军功及能力分给之。在蒙古以外之“探马赤军”后分有十级将军，其待遇与蒙古本族军完全一样。

所谓“设立六等扯儿必官”，蒙语“扯儿必”为桨，指桨水使船行动之意。扯儿必官今称连络官或传令官。凡各万户、千户，派往铁木真汗左右的子弟，皆充任此侍从、传令、连络之职。此群人设一将军集合统率之，分为六等。其人选必须有技能，身材好，有勇力，并得偕妻子带兼马（换乘之预备马为兼马）及从人，常居在汗所。平常担任护衙，有事则听候差遣回其派出部队，以传达命令，或连络事务。

所谓重新添拔护卫敌班，乃指铁木真初为汗时组有四个带刀之内宿卫队，每队八十人；有四个持弓箭之外护卫队，每队七十人；有四个持刀带箭之散班巡察队，每队七十人。铁木真汗又从此各再增添二个队，并扩大厨工等队。元朝秘史中记载其规定说；“带弓箭的人，并散班、护卫、厨子，把门人等，日裹入班来，至日落时，将管的事物交付给宿卫的，出去宿者。若管马的守着马，宿卫的帐周围宿，守门的轮着门口立，至次日抬汤时，却人来，管自己的事务。每三日一次交换。”（上引见元朝秘史卷七）

所谓组织特种突击部队，即古所称之“选锋”。铁木真汗见王罕之特种突击部队，确有打破战场对峙局势之特别作用，只是王罕不会运用。于是，乃命阿儿孩合撒儿，先选一千勇士以为组织训练之基幹，准备组织勇士军，如战斗时则使在前，平时则作护卫之用。

铁木真汗将军队整顿完毕，于鼠年儿年即宋章宗嘉泰四年、金章宗泰和四年（公元1204岁次甲子）4月16日午时祭旗出军，要乘敌人各地之军未合之前，先西征乃蛮。用者别、忽必来二人做前卫，在撒里阿客额儿（即今外蒙古西库伦一带平川地）地区，与乃蛮之前进防哨发生接触。朵歹扯儿必因对铁木真汗建议道：“敌据山为守多日，咱人少远来，只可于此牧马，多设疑兵，将这撒里阿客额儿地面布满，夜舍每人各烧火五处，使敌居高瞰望，知我极为强大，彼人虽多，其主软弱不曾外出过，必是惊疑而不敢作为。如此则我马已饱，然后追袭哨望的，直捣其大营，击其不整，必然可胜。”铁木真汗深然其计。（上引皆见元朝秘史卷七）

二、乃蛮战略指导

在乃蛮前哨与蒙古前卫之互相追逐各小型作战中，乃蛮前哨捉获一个骑破鞍子瘦白马之人，见这马特别瘦，便连人带马一并送到杭爱山（即今杭爱山）下大阳汗大营中来。于是，大阳汗部众皆知：“达达的马瘦，无力作战。”因此大阳汗益发轻视蒙古人。等到前哨第二次来报，望见蒙古军遮地而来，大阳汗使人到前方瞭望，回说：“只道达达们兵少，如何白天到处是牧马人，夜里烧的火如星般多。塞潇了撒里阿客额儿地面。”大阳汗道：“达达们的军马如此之多，想是每日增添了。”于是心怀

恐惧（见元朝秘史卷七）

大阳汗驻札康孩地面（在今杭爱大山之西）之合池儿水（即今塔米尔河上游之呵索郭特河）

边，对当前状况，甚费踌躇，心中犹疑许久，终于下定决心，要採用后退之作战指导，引诱敌人深入内地，再与之决战。命令到达前方，其子屈出律抗命，命使者回大营中请示退军理由。大阳汗遣使对其于屈出律说："达达们马瘦，但烧的火如星般多，其人必众。人们常说达达们刚硬，眼上刺呵不转睛，腮上刺呵不躲避，今若与他连兵，后必难解。莫若现说马瘦，不好与他相战，教咱百姓起了向回走，越过康孩山（即杭爱山），间望金山（指今阿尔泰山），整顿军马，诱引着他行。比到了金山，他的马更瘦乏了，我马正好肥壮了，然后复回与他厮杀，定可以获得全胜的。"但其子屈出律不同意。

屈出律一向不满其父大阳汗之行为，更不肯听从他之命令，便当着来使骂道："那妇人般的大阳汗又是怕了，达达们多，从何处来？多是大阳汗又与札木合那个达达在一起，听了他为达达们吹的大话。

我父亲大阳汗他于妇人更衣处，和牛犊吃草处，都没到过，如今听说达达们点起几把火，便怕了起来，真是不中用已极，回去这样说，不能撤退，只有前进。

大阳汗听说其子屈出律，比他作妇人，心中很难受。使臣解释道："那有力有勇的屈出律，不是有意违令，而是要在军人面前表示他的求胜心，好在厮杀时休将这等勇气弱了，所以说了这些冒失话。"大阳汗之将领豁里速别赤，因误杀王罕，一心要对蒙古人作战，乃在旁鼓动说："你的父亦难赤必勒格老王在时，同敌人作战，从不教敌人看见我们儿子的脊背，和马的后胯。如今你如何就先怕了敌人，要向后退，早知你这般呵!该请夫人吉儿别速为全军指挥了。你的夫人吉儿别速，虽是妇人，教管军队呵倒很行的。可惜的是那可克薛兀撒卜剌黑老了。咱军的法度，好生怠慢，莫不是达达们的运气来了？"说罢，叹息不已，出帐上马，回往前线。

大阳汗听此话，甚怒说道："人死的性命，辛苦的身体，都一般。你们那般说呵，咱迎去他厮杀就是了。"遂下令其各军，不要后退，准备前进，他自己也率领中军，沿塔米儿河（即今鄂尔浑河最西之水源是大阳汗已越过杭爱山分水岭），渡过干儿豁河（即斡儿寒河今名鄂尔浑河），进至纳忽山崖（在今巴颜乌拉之东）间之察乞儿马兀特地区（地在今西库伦北约二百里处），依傍夹谷，札下大营，准备扼此咽喉地，与敌一战。

第三节作战经过

一、间谍及宣传战

乃蛮部长大阳汗，与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克烈新部长阿邻太石、斡亦剌部长忽秃哈别吉、札只剌部长札木合、塔塔儿部长忽秃帖木儿，以及朵儿边、哈塔斤、撒勒只兀诸逃亡部长等，已合兵在察乞儿马兀特（今外蒙古西库伦西北二带西方地区，与铁木真汗大军形成对峙之局。上述诸部长每天登山，东望铁木真之军容。大阳汗素来妄自尊大，故言语中将敌人视作一群羔羊，要将他连蹄带皮一起吃进腹中去。其意思是认为蒙古人不堪一击。札木合等动其切勿轻敌，本是善意，大阳汗便指责札只剌部、蔑儿乞部、克烈部等所以被铁木真汗击破，乃因本身脆弱，领导人无方，也不肯努力所致。各部长受此面责，皆觉难堪，只好谢过，而大阳汗益得意忘形，大放厥词。札木合为自己过去失败事，多方解释，大阳汗斥他是被铁木真汗唬怕，再不然就是受铁木真汗间谍之鼓动。于是札木合老羞成怒，便认真警告大阳汗，并详细说明铁木真汗实在是个智多星式之活阎王：铁木真汗之诸将都像铜头铁臂生吃活人夜叉，蒙古兵都像杀人不眨眼之恶鬼。他疾言厉色，说得大阳汗心惊胆战，六神无主。

大阳汗以札木合言词，讯问其他逃亡部长，他们也为掩饰自己失败羞辱，且受铁木真汗间谍暗中宣传之毒，各争用使人必信之言词，来证明扎木合之言，不是“长敌人威风，减自己志气”，铁木真汗实为一少有之天才用兵家，其诸将如孛斡儿出，木华黎、孛罗忽勒、赤剌温四人，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机智过人，用兵如神，统称四桀之将，远近皆知。还有者别，忽必来、者勒蔑、速不台四人，真像铁木真汗用人肉喂养之四条狼犬，铜额凿齿，锥舌铁心，用环刀做马鞭，饮露嘶风，不知疲劳，不避艰险，像是放了铁索之狼犬，张口垂涎，奔攻其敌，战斗时，最好远离这等人。

他们这些对话，很快传遍乃蛮军中，大阳汗在此两军对峙，尚未决战之两个多月中，几乎天天听到类似铁木真汗如何强，其军队如何狠等言语。不但使大阳汗本人对敌心存畏惧，即其军中上下，也一天比一天更惧怕敌人。

这是铁木真汗与乃蛮大阳汗无形战争之第一回合，无疑是铁木真汗大胜，大阳汗大败。

乃蛮各级官兵，都景慕并崇拜乃蛮名将可克薛兀撒卜剌黑；乃蛮北部古出古敦不亦鲁亦为英雄人物，但此二人都会为铁木真汗击破。如今铁木虽汗大军匪阵，相持不战，究竟等待何事，无法判明，在焦急不耐中，谣言纷起，大家虽知其为谣言，都照传不误，久之谣言足可动摇军心。当札木合等心不自安，乃蛮部上下将士，心存恐惧，在离心离德中，铁木真汗发起突击。

二、察乞儿马兀特狭谷之战

札木合先是被乃蛮人所疑，继又为乃蛮大阳汗当众所侮，心有不甘，乃决心私率其所部离开战场，向后方别作投奔。他为打击大阳汗，暗中使亲信伴当，去见铁木真汗，将乃蛮大阳汗之最近实况，及其争辩言语，告知铁木真汗。重嘱铁木真汗云：“大阳汗如今听了我说的话，已是惊得昏了。其部众都争上高山顶上自守，并无巅杀的勇气。我已自离了他。铁木真安答（盟友），你谨慎者。”铁木真汗认为宣传战已成大功，可用兵力来收宣传战之成果。乃令其弟拙赤合撒儿主持中军，命忽必来主左手军，命窝阔台主右手军，而铁木真汗亲率选锋前军及特种突击队在前，突然发起，向敌攻击。（上引见元朝秘史，卷七）

时乃蛮军在不前进不后退之防守中已两个多月，其进攻锐气业已消尽，各部队各在其创定之山头之上，自相守御，均无出击企图。今蒙古军突然发起攻击，乃各自为守，不想也不敢帮助其邻近友军。当蒙古军于是年（公元1204）7月初1日早晨，选定目标包围攻击时，乃蛮各军皆各固守其原地不动，不能相互支援。因而蒙古军前军所向皆克，将乃蛮军防守阵地突破一条狭道，使得前锋突击队，率领蒙古中军之一部，由此狭道直向乃蛮之深后方突进，直逼大阳汗札在祭乞儿马兀特夹谷之大营，竟将大阳汗在该地之大营包围攻击。

乃蛮诸军，闻知大阳汗已被蒙古军包围攻击，即放弃原来固守之山头，回军想救其主子大营。蒙古中军主帅拙赤合撒儿统率中军，分别迎击当面之敌。于是乃蛮军前后受敌，在徬徨瞻顾中，遂遭蒙古军务个击破，分别在各地被俘虏。其中有能转进到大阳汗大营附近者为数本已不多，又因为大阳汗大营是在夹谷中，谷侧沿山道路无多，早已为蒙古大军封锁。其由前方回到夹谷之乃蛮军，人谷之后即遭到夹击，多是一战而为敌歼灭。只有向此夹谷西侧之山上爬越者，对蒙古军作战尚有威胁，但是山高林密，待越过高山后，战事早已结束，故此翻山之军队，未发生作用。

是夜是公元1204年晨历7月初1日夜，乃蛮大阳汗望救不至，便乘黑夜率众突围，因山谷中路窄山险，其人马甚多，突围不易。待突破重围后，多半负伤累累，更多有被拥挤堕落山涧陡崖者。大阳汗在突围中，遭乱箭射击，负伤甚重，由下臣等将之夹在马上西行，驰至一山，他因流血过多，昏迷过去，诸将呼之不应，摇之不醒。豁里速别赤因语诸将曰：“与其见之死，勿宁回战，使汗得先见我等确已力尽而战死。”诸将齐诺。遂即请大汗夫人古儿别速，看守大阳汗，豁里速别赤率众下山，拒守谷道与蒙古军之追击者激战。战至天明，蒙古大军云集，而乃蛮诸将有死无退。铁木真汗见彼等勇不畏死，极敬爱之，使人高呼劝降，无一应者。又使高呼休战，听其退走，亦不听。继续战斗至午，遂皆殁于阵中。（上引见多桑蒙古史，一卷二章）

铁木真汗率大军追击，乃获大阳汗及其夫人古儿别速。铁木真汗见大阳汗垂死，古儿别速犹在盛年，因诘之曰：“听言你说达达们歹气息，

现在你擢乾了眼泪，看看如何？”遂在大阳汗未死之前，纳之为妃。（秘史，卷七）

三、追击屈出律之战

乃蛮大阳汗之子屈出律，因不在大阳汗军中，得在察乞儿马兀特山夹谷之北方山道，率军西走。他退至塔米尔河（即今鄂尔浑最西之源），札营未定而蒙古军追至，只得继续西走。铁木真汗为求不容乃蛮军有重新聚合机会，即指挥其中军由正面追击，今其左手军由杭爱山之南，向西方实行超越追击。

经十余日之追击作战，蒙古军之左手军与前军中军皆到达阿勒台山（即今阿尔泰山）以东地区，将阿勒台山以东之乃蛮百姓尽数俘掳。并沿阿勒台山向北，以追击乃蛮屈出律所率领之残部人马。蒙古军擒获大阳汗掌印官长吾儿人塔塔统阿者，铁木真汗问其怀金印欲何所往？塔塔统阿答曰：“是臣之职，欲求故主之子以授之而已。”铁木真汗深嘉其忠。又问其此金印何用？塔塔统阿答曰：“出纳钱穀，委任人材，一切国家政事，皆用此印以为信验。”铁木真汗甚羡其制度，因劝之降，而命其为蒙古实行此种印验制度。此印验制度，便使用纸张文书，得认识文字，因以畏吾儿文为蒙古人创造字母，制造文字，是为蒙古人有文字之始。（多桑蒙古史，一卷二章）

在追击屈出律作战中，东胡及蒙古逃在乃蛮部之诸部长及其所部，如塔塔儿部、朵儿边部、合塔斤部、撒勒只兀部，皆被迫无处可逃，而向铁木真汗投降。惟札只剌部札木合以先退，犹保留其实力与屈出律一同北走。

铁木真汗之右手军，由窝阔台统率，原在斡儿寒河（即今鄂尔浑河）以西，与薛灵哥河（色楞格河）北源乌黑河流域一带，与蔑儿乞人及乃蛮北部之军对峙，当蒙古前军突破乃蛮军之同时，开始攻击，在大阳汗被包围后，乃蛮北部及蔑儿乞军亦被击退。蔑兄乞部长脱黑脱阿，退至撒阿里（今色楞格河西源台尔该尔河之北）地区，为蒙古军追及，脱黑脱阿同其二子忽都、合勒赤剌温，带十余骑突围逃走，所有家属百姓，悉数被俘。铁木真汗将脱黑脱阿于忽都之妻，赐与窝阔台为妻，后生元定宗贵由。兀洼思蔑儿乞部长歹亦儿兀孙，自知不敌，乃献其女忽兰于铁木真汗以乞降。铁木真汗乃分其部众百人为一队，共置一将统之，命之防守辎重。

不久兀洼思蔑儿乞人有一半叛去，达到台合勒山（即今库蘇古尔泊以北此勒斯基果尔勒赤山），筑寨以守，期望与乃蛮北部取得连络。就在此时，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与其二子，和乃蛮屈出律、札只剌部长札木合等，都逃到乃蛮北部古出古敦不亦鲁处，正商议重整军队，起兵与大阳汗报仇时，闻兀洼思蔑儿乞部人选至台合勒山，亦欲前往接应之。铁木真汗闻之，为争取先制，乃命锁儿罕失剌之子沈白，领右手军攻台合勒山；自率大军，自阿勒台山（阿尔泰山）以东北上，以进攻乃蛮北

部（即今外蒙古科布多与唐努乌梁海地区）。因与古出古敦不亦鲁之军，在额儿的失石黑都儿庸地区（即令科布多乌兰固木以东），设哨对峙。铁木真汗即以其大军在汗呼赫岭（即今科布多鸟布沙泊南之汗呼赫山）以南过多，使乃蛮北部及札木合、脱黑脱阿等不敢分其军往援台合勒山。

明年即公元1205年春3月，多雪尽融之后，铁木真汗率大军越汗呼赫岭向敌进攻。此次袭击作战中，袭杀新为乃蛮大汗之古出古救不亦鲁。并射杀蔑儿乞部长晚黑脱阿。脱黑脱阿之二子，不及抢走父尸，只将其父之头割下擕走。蒙古军追击乃蛮军至额儿的失河（即今流入乌布沙泊的帖斯河），适值雪山春洪暴下，河水高涨，乃蛮人与札只剌部人争渡后退，人马溺死者过半。札只剌部长札木合仅率伴当得渡河北去，其余乃蛮之不及渡者，悉为蒙古军所俘。

屈出律渡过河北，即北越唐努乌拉山，向西逃往阿勒台山（阿尔泰山）之西。

兀洼思蔑儿乞人守在台合勒山者，闻脱黑脱阿败死，其二子远逃而西，守志涣散，遂为沈白所攻破。

第四节战后之政局

一、铁木真劲敌札木合之死

铁木真汗一向视为劲敌之札只剌部长札木合，于太阳汗失败后，闻大阳汗之子屈出律逃出，便寻往与之合兵，一同北去投奔乃蛮北部古出古敦不亦鲁，拥立古出古敦不亦鲁为乃蛮新汗，准备整顿兵备，东山再超。却不料在额儿的失河一战，乃蛮北部迅即失败，致使自己部众，也随之盅失。只剩下五个伴当随他脱出战场，逃入北部唐努乌拉山中。他再也寻不到友军，只有流为劫贼，以谋求生存。因上偿鲁山（即唐努山）再去寻友军不到，寻一只羱羊烧吃，自怨自艾，壮志灰懒，性情却忽而暴躁，折辱其五个伴当。因此其伴当商议拏此暴君，捆于马上南行，送到铁木真汗营中，以求富贵。

札木合不顾被捆着去见铁木真汗，便请求将领为他传言：“黑老鸦会拏鸭子，奴婢能拏主人，皇帝安答（指铁木真为其蓄日盟友），必不差了。”铁木真汗说道：“自己的正主，都肯拏了的人，如何留得，将这等人并他的子孙，尽典刑了吧。”于是令人当着札木合之面，将其五个拏他之伴当尽杀。（元朝秘史卷八）

铁木真汗使人传话给札木台道：“我先曾教你做一只车辕，你分离去了。如今既相合，我们可以作伴了。但在忘了时共提说，睡著时共嗅着。在前你虽另行，却是我有福同享有患同当的安答（结盟友）

时的誓言，若真实厮杀时，你却自的心痛。我初与王罕厮杀时，你

将王罕的言语说与了我，是一次有恩于我。及与乃蛮厮杀，你以言语将乃蛮惊动，又是一次有恩于我。所以我将这些对你说知。”札木合请原使者传言：“咱少年效安答时，不可消化的饮食会吃，不可忘的言语曾说。因人将咱离间，所以分离了。想起在前说的言语，自羞面，不敢与安答相见。如令安答欲教我做伴，做伴时不曾做得伴如今你将众百姓收了，大位子定了，已是无可做伴的了。你若不杀我呵，似衣领上蝨，底衿内刺一般，反使安答日闻心不安，夜间睡不稳。你母聪明，你又俊桀，弟们有技能，伴当们豪桀，又有七十三匹骟马（指诸将为卫队者）。我自小亡了父母，又无兄弟，妻好说长话，伴当不终依仗，为这般，所以有天命的安答胜了。如今恩赐教快死呵，安答得心安。倘又教不出血死呵。我死后于你子孙行，永远帮助也者。”铁木真汗闻言，遂对诸将说：“札木合安答虽是另行，不曾有真实害咱的言语，是可以学的人。他不肯活，是为了誓言。待教他死，占卜呵又不入。他又是大名头的人，无缘故不可将他害了。如今教他做伴他不肯，虽是爱惜他生命，也不能得了，就依着他的言语，就便他不出血而死，然后好生葬埋了他吧。于是，札木合随死。（上引见元朝秘史，卷八）

二、速不台及忽必来之分军西征

札木合已死，铁木真汗造一辆铁拦车，命速不台率领右手军之一部，越过阿勒台山（今阿尔泰山），捉捕蔑儿乞部脱黑脱阿之二子忽都，合勒赤剌温两人。并命忽必来率领左手军之大部，在速不台之后，征讨乃蛮本部（即今准噶尔盆地）各留后未服之百姓，并充作速不台之支援。

铁木真汗面对速不台说：“忽都，合勒赤剌温两个，他与咱厮杀败着走出去了，如带套竿的野马，中箭的鹿一般，有翅飞上天呵，你做海青（东海大鹰之名）拏下来，如鼠赞人地呵，你做铁锹掘出来；如鱼走入海呵，你做鱼网捞出来。你越高山涉大河，可趁军中马未瘦，行粮未盎时，先要爱惜，路间不可轻易围猎。若要因猎做行粮呵，也要斟酌着，马的鞦并闸环不许套上，如此军们不敢走马，若有连你号令者，我认得的便拏将来；不认得的就那里典刑了。可谨慎者，若获天助，将脱黑脱阿之儿子们拏住呵，就那裏杀了也可以。当我幼小时，被三种蔑儿乞拏我，将不儿罕山（今肯特山东部之一山）绕了三遭，这般有仇的人，如今又发言语去了。我欲教你追到极处，所以造与你铁车。你虽离得我远，如在近一般，去吧，天必护助你。”（上引见元朝秘史，卷八）

速不台军自哈喇岛苏泊（即今科布多慈母湖）附近出发，西越河勒台山（阿尔泰山），进入今准噶尔盆地，闻蔑儿乞之忽都、合勒赤剌温兄弟二人，已逃往康里（即古康居国在今中亚细亚巴尔喀什湖以北地面）。速不合即率军自库额尔济斯河，沿喀喇额儿济斯河（一河皆在今新强省北部境内）南岸，经斋桑湖（即今哈萨克境内之斋桑泊）之南，到塞颉普（即今亚雅哥斯），遣使至康里王前，要求准许追捕仇敌。

忽都与合勒赤剌温闻之，知康里不可复留，即逃离康里，欲西奔钦

察（在今中亚细亚咸海及裹海以北之国家）。途中为速不台游骑所遏，终于追至垂河（即今中亚细亚流入咸海之楚河，亦名吹河）北岸上及之，将二人孥获，装入铁车，运回东方，献于铁木真汗，汗杀之。

忽必来率大军在准噶尔盆地内征服各地，兵威所及，四邻惊惧。盆地之南吐鲁番低地一带（天山南路）的回回畏吾兄部，惧于蒙古军征讨，乃骗逐乃蛮大阳汗之子屈出律等出境，而遣使请降于铁木真汗。忽必来闻屈出律已往伊犁河以北之阿剌鲁部落，即向西南进兵，哈剌鲁部长阿儿思阐，即速起兵肇逐屈出律等人西去，屈出律逃往西辽帝国（即哈喇契丹）境内，然后杀克烈部王罕之子亦勒格鲜昆，而迎降于蒙古军。忽必来方始回军。

三、铁木真回军攻西夏

铁木真汗既追获仇人之于忽都、合勒赤剌温二人，取得乃蛮本部广大牧地；又于不意中降服盆地南方之是吾儿、哈剌鲁两国；更料不到取得克烈部王罕之子亦勒格鲜昆之首级。铁木真汗大喜之余，乃分遣使者远出，去责问各邻近诸国。一住萨彦岭北之乞儿吉思（即古黠戛斯）部；一往乞儿吉思西之谦谦州部，责问二国不应收容乃蛮人及蔑儿乞人，来和蒙古人为敌；继告二国，如不顾为敌，应即投降。乞儿吉思部长亦纳勤，与谦谦州部长兀鲁思，知突厥族人凭此仅除之二部力量，已不足以与蒙古人相抗，乃皆向蒙古投降。

铁木真汗使者南往吐蕃（今青海、西藏地方），亦以同样言词，以谕吐蕃部长。吐蕃拒绝投降，驱逐蒙古使者出境。于是铁木真汗欲南征吐蕃，惟虑西夏国为党项族，是吐蕃之一支，南与吐蕃和好，恐为远征吐蕃时后方之害。乃决定先清扫南征吐蕃之道路，尔后再进征吐蕃。于是，铁木真汗乃自乃蛮北部间军而南，以西夏国曾收容克烈部王罕之于亦勒格鲜昆为进讨藉口，向此城市之国西夏，开始进兵。

西夏国，蒙古人随金朝人呼之为河西吐蕃，或称之为唐兀特，其建国之历史，及与宋之战争，已详于本史第十四卷第五章中。此时方与宋和好，久无战争。（宋宁宗开禧元年、金章宗泰和五年，夏桓宗天庆十一年、公元1205年）忽受蒙古铁木真汗之大军侵略，顿惑意外。

西夏国王李纯佑，为西夏国第七世主，史称夏桓宗，知其力不足与蒙古人战于境上，乃预令各城饮兵为守，而不出战。铁木真汗因无攻城作战经验，不知准备攻城用具，围城不下，势不能久留，只有大掠西夏国各城之四野，盘取其野外之人口、牲畜、财物而去。

此为铁木真汗第一次进攻西夏，以后还有多次进攻，详下章。

四、铁木真之为成吉思汗

铁木真汗既统一大漠，拥有中国北方所有各游牧人之诸部落人民，故当其大掠西夏之后，还军至斡难河（今鄂嫩河）上，觉得神圣不可侵

犯之金朝皇帝之国土，当亦如西夏国，可大掠其野，使变为游牧人灵之牧地。因而，乃思与金朝廷抗衡，要组织自己力量，成为一个游牧人群之大帝国，做一个适合当前权势最尊称之大汗，对于臣属金朝之事，不再虑及。于是，乃与其后父蒙力克之子卜者阔阔出商议当游牧人群新皇帝之方策。

卜者阔阔出，别号帖卜腾格里，每给蒙古人说：他常乘一灰斑色带翅之马，飞上天去，与天神相会，故其所言者，皆为代表天意，即天神之言。蒙古人群尚停留在神权社会里，因而崇拜他，称他为卜帖腾格里，意即言其为天之代言者。今铁木真汗与他商议称尊号问题，他要藉此弄权，乃建议铁木真汗召开诸部长族长大会，建立九斿白林霖，筑起九级坛台，搭建九间大棚等事。乃择定虎儿年，即宋宁宗开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夏桓宗天庆十二年（公元1206年岁次丙寅），阴历12月15日，开选汗大会。在铁木真汗之本意，则要求真实之推选，完全依于人心之归向，不必探取装神弄鬼之天意。但卜者阔阔出在表面上接受铁木真汗意旨，在内心里却另有打算，以求表现自己之权威。

选汗大会开始时，卜者阔阔出抢先发言，说奉天神之命，传达天神之旨云：“昔日具有‘吉儿汗’尊号之数主，皆已败亡，其称呼已不详，不宜直探使此等带有污迹之同样称号。兹奉天种之命，诏命铁木真汗为成吉思汗”（冯承钧成吉思汗传，谓其义即“刚强”或“海洋”之意。）于是，诸部长族长皆赞其词，遂上铁木真汗尊号，群呼之为成吉思汗。但虎吉思汗本人，却有说不出之委屈。

阔阔出还自以为建立不世大功，因而益发迷信自己实能代表天意，而自己之势力不仅可以与成吉思汗相等，且连成吉思汗本人也将受自己权势所摆布。于是，他放言无忌，且欲试探以种道设教之权力，乃假神命，强成吉思汗之四弟帖木格斡赤斤跪其面前，以承认自己轻视种力之过。又掌掴成吉思汗二弟拙赤合撒儿面颊。成吉思汗心恶其人，却故意纵之，在暗中命拙赤合撒儿，俟其再入帐出言无状时，数其罪以惩之。1日，成吉思汗方与诸将议事，阔阔出后入，又发妄言，成吉思汗怒斥之，拙赤合撒儿遂一脚将其踢倒，数其无礼而扭其衣拖之出帐。时其父蒙力克亦在座，以其罪不致死，乃俯身拾其帽于手中而出，及出见其子阔阔出已被折断脊背而死，遂以其帽盖于其头，闭口不言。但以其为成吉思汗之后父，故仍效忠于成吉思汗如旧，不再提阔阔出事。

成吉思汗即大位后，乃大封功臣，授千户号者九十五人。功最大者为孛斡儿出、木华黎、孛罗忽勒，赤剌温、忽必来，者勒蔑、者别，速不台，主儿扯歹，及因战伤而死于王罕袭击之役之忽亦勒答儿之后裔，号为十大功臣之家，其十家受封之户口，号曰十投下。另外，又以孛斡儿出为右手万户，木华黎为左手万户，纳矛阿（亦作纳牙）

为中军万户，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见冯承钧译成吉思汗传第五章）

从此，是为元代王朝之真正开始，亦即铁木真开国成功，由蒙古族之汗，一变而为成吉思汗。

第四章 五征西夏之战

成吉思汗征西夏，是自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第一次征西夏始：宁宗开禧三年（公元1207）秋再征西夏；宋宁宗嘉定二年（公元1209）三征西夏，西夏主纳女请和；嘉定四年（公元1211）第四次征西夏，夏主逃奔西凉，至宋理宗宝庆元年（公元1226）春五次征西夏，翊年（公元1227）夏6月、夏主投降国亡。

自初征西夏至西夏主出降，前后凡二十三年，此期间，有以下诸大事：铁木真被推选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北征乌梁海诸部，西征乃蛮余众。战斩蔑儿乞首领脱黑脱阿，使速不台西征追捕脱黑脱阿之二子；使忽必来西征收降畏吾儿国；成吉思汗南征金国；西域哈刺鲁国投降于成吉思汗；蒙古兵败金兵于野狐岭，攻取金乌纱堡，大破金兵于会河川，入居庸关；命者别突袭金之东京辽阳府；取金中京，木华黎攻金北京大定府及辽东；攻金潼关，命木华黎率兵南征；者别西征。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西征花刺子模、钦察等国，渡阿母河，入雪山，战印度河西；命者别等踰高喀斯山大破奇卜察支等部，并进击破俄罗斯。成吉思汗自西域东回等等。在此二十三年中成吉思汗灭亡四十余国，但竭其全力仅降此一西夏国，可见西夏国，守城战术之进步。

西夏国能以拒止成吉思汗大军如此之久，其与金宋同属中国军事思想之体系，质言之，金宋亦皆以守城战术见长者，此所以在成吉思汗父子手中，虽能取得欧洲之大半，却未能拥有全部中国。

第一节战前一般情势

一、蒙古铁木真汗势力之长成

蒙古铁木真，蒙古诸部中孛儿只斤部落部长一十三岁之孤儿也。归纳以前各章所述，其势力之成长，简约之如下：幼得者勒蔑之父札儿赤兀歹老人之照拂，又得宏吉刺部特薛禅老人之赏识而妻之以其女（即孛儿帖），更得蒙力克（铁木真之后父）察刺合老人之教导，使他渐知时势。他在大难中得速勒都思部理发老妇，及锁儿罕失剌老人之暗中帮助，使他得脱泰亦赤兀部塔儿忽台之毒手。他在追求失马途中，遇到甘愿追随他之青年孛斡儿出。他在娶得孛儿帖为妻之后，渐知如何运用权谋，以求其父执突厥克烈部长王罕，助其恢复其父孛儿只斤部落部长之基业。

当铁木真方集得斡部未久，突然遭到其父仇人蔑儿乞部人之袭击，他虽脱大难，但敌人却将其妻孛儿帖劫夺而去。铁木真为营救其妻，乃面乞克烈部长王罕出兵。并乞得其“安答”（盟友）札只剌部长札木合出兵，终于合此两部之力，击败四种蔑儿乞部众，寻回其妻子，但为情势所迫，只得依附札只剌部之札木合以求生活，欲求再为孛儿只斤部长，

竟不可得。及见札木合能聚众而不能用众，其所属智能之士，皆思得明君，他便宣扬自己实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志，而引起札木合疑心。铁木真在不得已情势下，为求逃脱死罪，连夜率其众自札只剌部向西遁走。回到故乡今外蒙古地方克鲁伦河、鄂嫩河、土剌河（亦作土拉河、秃拉河）三河发原之地不儿罕山东南地面，采取札木合聚众方法，招聚各部中不满于其酋长、部长、盟长之众，然后再对各部施用渗透、宣传、分化、颠覆等方法，以削弱四周敌对势力，而扩张自己势力。

铁木真会逃过泰亦赤兀部长塔尔忽台之捕杀，逃过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之突袭。他在独立成业后，又揭穿札只剌部长札木合料合东方诸部族之奇袭阴谋，而帮助金国击破其东方之塔塔儿部，金朝封其为招讨使，遂从此借金朝之势而发展，当起铁木真汗。

主儿勤部为蒙古诸部族之强者，暗受札木合主使已叛铁木真汗而袭其后，不意铁木真汗有备，因而吞并主儿勤部。然后铁木真汗极力拉住突厥克烈部以为外援，逐个吞并蒙古各部，于是蒙古泰亦赤兀部被其击减，札只剌部之札木合投降于克烈部王罕，铁木真汗遂统一蒙古诸部，又脱过克烈部王罕父子之袭击，反而一举袭减克烈部，迫使王罕父子率领数骑而逃死在道途中。于是铁木真汗乃以蒙古人之合力，督率突厥克烈部之众，以对抗其西方大国突厥乃蛮部，及北方蔑儿乞诸部。

是时乃蛮英主亦难赤必勒格已死，其二子分其地为南北二部，长子台不花胜利于南部故地成为乃蛮部长大阳汗。次子古出古敦不亦鲁据居今科布多及唐努乌梁海一带，成为乃蛮北部。当铁木真汗与王罕往袭乃蛮北部时，大阳汗念在兄弟之故，犹曾出兵救援，但大阳汗亲率大军东征蒙古以恢复突厥克烈部时，古出古敦不亦鲁却在其地坐观成败。于是，铁木真汗乃趁乃蛮大阳汗停留在杭爱山区观望时，暗施诡道，极尽渗透、宣传、分化、颠覆能事，然后奇袭，一点突破，竟将大其数倍之乃蛮军粉碎，击毅大阳汗，俘虏大阳汗夫人古儿别速，逐走大阳汗之子屈出律，尽俘乃蛮南部资财，以及逃在乃蛮之蒙古各部余来与克烈部余众。

铁木真已统有漠北大地及诸游牧部族，于是乃挥其全力南征西伐，遂创建其在东方历史上亘古未有之蒙古大帝国。

二、此时西夏国概况

西夏国本在乃蛮部之东南方，东北与突厥克烈部为邻，西北与乃蛮为隣，东隣金国，南隣南宋之西北疆，西南隣接吐蕃（即今青海、西藏），西方接畏吾儿等国。其建国已久，曾与辽、宋三角鼎峙，金灭辽后，又与金、宋鼎足而立。

当蒙古铁木真汗于架宋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西灭突厥乃蛮部大阳汗时，正值夏桓宗赵纯佑天庆十年之时，其国家承平已久，武备失修，故未作战争准备。

第三节双方战略指导

一、西夏守势作战

初西夏桓宗赵纯祐，接得乃蛮大阳汗约会出兵共击蒙古铁木真汗，以恢复克烈部之使者时，赵纯祐以自己在位十年，国内兵精粮足，拥有进可攻退可守之形势，对于北方隣国战争事，正好坐山观虎斗，准备收取实利，不宜出兵助乃蛮恢复克烈部，因胜不得实利，败足以自损，而且结下蒙古铁木真汗之深怨，招来蒙古强敌。又知乃蛮部已遣使者东去约会居在其东北之东胡汪古部，且看汪古部如何行动，再定自己行止，故对乃蛮大阳汗使者，口头允许出兵协力东征，而实际上全无出兵之诚意。及闻汪古部已拒绝乃蛮使者，且已遣使洩其谋于铁木真汗，使之预作准备。于是即以防备汪古部及金国将出兵帮助蒙古来侵为藉口，愿坚守国土东境，以掩护乃蛮东征大军右侧安全为理由，拒绝出兵。同时也拒绝铁木真汗求协力之约，而守中立，以坐观二虎相门之成败，而图从中取利。

及铁木真汗擒斩乃蛮大阳汗后，大阳汗之弟古出古敦不亦鲁及大阳汗之子屈出律在今外蒙古地方科布多及唐努乌梁海一带，集聚势力，准备再与铁木真汗决战时，乃密遣使南来，以约会西夏对铁木真汗施行前后夹击。赵纯祐此时以铁木真汗之实力，已不可轻侮，乃仍前策答允乃蛮所请，却希望乃蛮在北方先与蒙古决战，以观成败。又为本国安全计，乃一面集结国中骑兵，控制在国土北部，一面令国内步兵，督率各州县人民，坚筑城池，严备防守，以为是期作战准备。

西夏对新邻国蒙古决定此防守政策后，乃逐年增强其城寨工事设备，因而从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

与蒙古开始作战起，直到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17）6月，西夏南平王赵睍出降蒙古，被杀为止，实际防守二十二年之久。

二、蒙古攻势作战

成吉思汗过去作战之对象皆为游牧部落，在助金攻塔塔儿之战中，也仅是攻打临时土寨，从未有进攻城池之经验。在其仅有之攻打土寨经验中，知寨中财富极厚，不像所得游牧地区之只有人畜水草而已。又前曾在破坏札木合与塔塔儿联盟作战中，曾数度进出金之泰州边堡长城，虽深知长城内之富足，却也得悉长城进出不易。故此时对进攻城池，既具有羡心，又有戒心。

西夏为半农半牧之城池国，初与成吉思汗牧地隔有突厥克烈部落及汪古部落，彼此无甚相干。待成吉思汗袭破克烈部，拥有其全部牧地后，始与邻接。迨成吉思汗与乃蛮及蔑儿乞诸部在杭爱山与色楞格河流域对峙时，见西夏国未曾听从乃蛮大阳汗之约，遂派人前往试行拉拢为

自己之盟友，但结果被拒。

成吉思汗既战胜乃蛮，拥有其游牧场地，于是与西夏国之邻接面更加宽广，对此不友不敌之强邻，乃有“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之慨。及北追大阳汗之子屈出律战役中，又闻西夏国增筑城池，因认其有与蒙古为敌之可能。

于是乃决心自阿尔泰山之东回军，进攻夏国。但对此中立国家实行攻击，出师无名，于势不顺。因乃采用兀洼思蔑儿乞部长歹亦儿兀孙之女忽兰之建议，藉词夏国曾“容留突厥克烈部部长王罕之子不勒格鲜昆之罪”为藉口，而兴师致讨。

第四节作战经过

蒙古兵征西夏前后凡五次，第一次为铁木真被推选为成吉思汗之前，其他四次皆在为成吉思汗之后。

第一次征夏：在夏桓宗天庆十一年，即宋事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蒙古称牛儿年，铁木真汗于是年秋自今外蒙古科布多额儿的失不黑都儿麻地区（今名额尔济斯河）回军沿匝盆河流域而南，转东，经今三音诺颜汗之邦察罕泊、鄂洛克泊南下至今宁夏省之居延海东南，以大军围攻夏国之力吉思城（在今宁夏省居延海东南五十里处），城坚不能即下，又不见夏国援兵来救。乃分兵四出寻找其主力，竟亦未获。不得已，乃分兵一半东攻西夏定州（今宁夏省定远营）之乞邻古古撒城，凡六十余日仅克此二城。铁木真汗自此方知攻城之难。乃率其大军东行，至夏之龙州（在今绥远省临河县）落思城下，大掠黄河西岸北岸人畜，然后还军斡难河（今外蒙古鄂嫩河上游）营地。

第二次征夏：铁木真汗应选成吉思汗之后，将欲进攻金国，知其更多城池，必将研究攻城方法，因于宋宁宗开禧三年（即西夏襄宗应天二年，公元1207，蒙古成吉思汗第二年蒙古呼冤儿年）秋8月亲率大军南下，进攻夏丰州（在今绥远省包头市南）之斡罗孩城。在围城以前，先将路上俘得夏之牧羊人放入城内，令彼等传言城中诸人，“如敢据城为守，城破之后必屠尽城中之人。”但斡罗孩城人坚守至四十余日始陷，成吉思汗乃尽屠之，悉载城中财货而去。

第三次征夏：在宋宁宗嘉定二年（夏襄宗应天四年，成吉思汗第四年，蒙古称蛇儿年，公元1209，秋7月，成吉思汗引军南下，再克夏斡罗孩城，然后进至夏国都兴庆城（即今宁夏省银川市），以大军围其城，欲以招致西夏各州勤王之师而击减之。围城月余城既不下，勤王之兵亦不来。成吉思汗为求必下此城计，乃筑堤引河水以灌城。但按未及淹而外堤溃决，反淹没蒙古人马不少。因此久不下，乃遣使以优待条件，招致夏主出降。夏主赵安全（即夏襄宗）拒降，只求纳女以和。成吉思汗不得已允之，引军退去。从此夏与蒙古和好十年。在此期间蒙古乃转兵攻金，西定今新疆省及贝加尔湖以西之各国。

第四次征夏：事在宋宁宗嘉定十一年（夏神宗光定九年，成吉思汗十三年，蒙古称鼠儿年，公元1128，成吉思汗要夏国出兵随同西征，夏主拒命，而使其臣阿沙敢不答蒙古使者曰：“力既不足，何必为汗？”成吉思汗闲之大怒，遂亲率西征大军来攻夏都兴庆城。夏君臣以其不能久停，悉力守御。及见蒙古军二十余日不去，乃夜率精兵突出重围，直奔西凉（今甘肃省武威县）而去。至此，成吉思汗既不便继续攻城，又不便分兵追击夏主，乃认定“此乃不能移动的国家，再过几年仍留存此地等待攻击，何必急在此时？”遂复整军西征，而向中西亚及欧洲进军。（上引见元朝秘史续集卷一）

第五次征夏：成吉思汗远征欧洲七年，日夜不忘西夏君臣奚落之言，故于从西方返回漠北之翊年（即宋理宗宝庆二年，夏献宗乾定四年，成吉思汗二十一年，蒙人所谓狗儿年，公元1226春，即对西夏实行第五次之全力进攻。先命各军分别攻打各州城，于连破黑水、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县）、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县）、西凉（今甘肃省武威县），兀剌海等诸城之后。是年秋，成吉斯汗方始亲征。途中坠马受伤，将回军，乃遣使者往诘责夏主，夏主答词又不逊，成吉思汗乃扶疾进兵，大破夏军于贺兰山，将阿沙敢不及西夏在贺兰山区之百姓悉数俘虏，然后进兵以围攻灵州城（即元秘史的朵儿蔑该城今宁夏省灵武县）。夏主令其大将嵬名令公率五十万军自都城兴庆往援，未至城下，竟为蒙古军逐步击破，灵州遂陷。蒙古乃还攻夏都。

翊年，即成吉思汗二十二年春，成吉思汗留其军围攻夏都，而亲率各军往攻未下各州城，5月拔临洮、西宁等州。时夏国土几为蒙古铁蹄夷为平地，人民无处可逃，只是穿凿土石以避锋镝，但得免于死者百无一二，白骨蔽地，掺绝人寰，闰5月底夏主以久被围困，穷促不支，乃遣使乞降，惟请限一个月以后献城。

成吉思汗许之，于是，夏国遂亡。

第五节战后之政局

当西夏第一次遭到蒙古军攻击后，铁木真汗回到斡难河上被推选为成吉思汗之后，即出兵西去，将可为西夏作战盟友之乃蛮部、蔑儿乞部、乌梁海部分别击破，西夏国从此再无牵制成吉思汗行动之盟军。西夏在孤立无援下，遭到成吉思汗第二次进攻。

蒙古第二次进攻西夏，西夏有一城遭到洗劫，其时成吉思汗因北征蔑儿乞，西追乃蛮屈出律，未暇在西夏长时停留。

第三次征西夏，是蒙古侵金之前奏，此次成吉思汗虽想引水以淹夏都，却反而淹及自己，乃不得已允夏请和。

因为只有与之言和，方可抽出全力与强大之金国作战。故夏蒙之和议成，金蒙之战争即开始，成吉思汗与夏和议之第二年开始侵金，绕出

金长城以西，从西夏东方边境上向金国进军，围金西京大同府，袭破金长城内之乌沙堡，破金军于野狐岭，取金大水泺、丰利县，与金援军大战于会河川，绕道南出以袭取居庸关，取金昌州、桓州、抚州，遣大将者别率军突袭金之东京辽阳府，成吉思汗亲率诸军以围攻其中京（即今北平），分兵攻取河北、河东诸州县，蒙古大将木华黎攻取其北京大定府（即今热河省宁城县）。计蒙古与西夏言和之后，八年期间，攻取金国城池八百六十二座，并收降西北数国，于是西夏国更为孤立无援。

蒙古军刼掠之子女玉帛，一向是组成商队运往西域去换取良马，以为补充战力之不二法门。

但当成吉思汗进攻金之南京开封府时，逃在西辽国之乃蛮大阳汗之子屈出律，却在西辽形成势力，阻止蒙古商队换取马匹之行动，使蒙古马匹从西域补充之源断绝，成吉思汗乃中止东方战争，移军西征。西夏君臣以为蒙古人西出远征，成功之公算不大，国家雪耻复仇之转机就在此时之战略运用，因而不惜先为接受成吉思汗大军之攻击，也不肯允许与之随军西征。

成吉思汗第四次进征西夏，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兵力虽大，战势虽强，皆限于大局而不能轻易使用，只好放弃攻取西夏之机会，引军而西，是为蒙古第一次之西征。

蒙古大军西去，西夏国如能与金国合作，足以消减成吉思汗留在东方之势力。因成吉思汗交付其南征统帅木华黎之军队，是临时收降之杂乱军队，各在降叛不定中；而交付给留守漠北基地之拙赤合撒儿之军队，也皆是外族降者，其北方及西方之秃满部（即秃马特族）、乞儿吉思部、蔑儿乞残部，正起兵为叛，战乱方酣不暇南顾。可惜在西夏神宗赵遵顼向金宣宗提出合作建议时，金宣宗不肯接纳，致使七年大好良机，平白放过。

成吉思汗西征七年返回漠北，念念不忘西夏君臣奚落之耻，决心攻取西夏，他以大军分取西夏各州县城，自己往来亲自督战，在坠马负伤之后，其将脱伦建议：“唐兀（蒙古呼西夏为唐兀）是城池的百姓，不能移动，如今且回去，待皇帝（指成吉思汗）安了时，再来攻取。”成吉思汗不同意道：“唐兀百姓见咱回去，必以我为怯。且在这里养养，先差个人去唐兀处，看他回甚么话。”遂差人对西夏主说：“你曾说要与咱做右手军，及我西征回，你却不从，又将言讥讽我。如今已取了回国，我与你折证前言。”夏献宗赵法旺知西夏国已无逃避大难机会，惟有力争，才有挽救刼运之可能，乃对蒙古使者说道：“讥讽的言语，我不会说，是阿沙敢不，说是我说来。现在，要与我厮杀时，你到贺兰山来战，要金银缎疋时，你往西凉来取。”于是，第五次征西夏之战，势须决战。

成吉思汗第五次征夏战争，为时长达一年有半，西夏人力已耗尽，夏献宗时，其弟子南平王赵睍继立，改元宝义。新夏主以为既不能支持，当及早请降，又为集珍宝金银以备犒赏蒙古诸军之用。特请宽限献

城期间一个月。

在宋理宗宝庆二年即成吉思汗二十二年（公元1226）7月初1日，新夏主捧金佛，使人抬金银器皿，及男女马驼等物，皆以九九为数，出城投降，成吉思汗令其在帐外行礼，行礼时大汗突觉内腹恶心，使命脱伦将夏主杀死，并尽杀其父母子孙亲友，更令从征之蒙古人，每次饮食之前，必须先自提说：“唐兀惕尽绝了。”方可饮食。由此可见成吉思汗对夏国屡攻不下，痛恨之深。（上引见元朝秘史续集卷二）

成吉思汗灭夏后，月余伤重不治死于六盘山。蒙古大中军统帅之承继人为窝阔台汗，但窝阔台远在西域，不能短时回来就大汗之位，遂暂由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代行蒙古大中军统帅。

西夏灭亡之后，蒙古北西两方再无牵制蒙古后方之力量，故蒙古可以一意南向，攻取金、宋。

第五章 蒙古侵金之战——边堡塞内诸战役

蒙古本为金朝属国，其牧地亦为金朝属地。成吉思汗在与塔塔儿作战时，金朝以其立功，封其为招讨使，于是始号为铁木真汗。按夏真特译元史及纲目云："1206年，铁木真未称帝以前，金帝命卫王允济往净州受贡。铁木真见允济不为礼。允济奇铁木真状貌，归，欲请兵攻之，金主不许。"是蒙古向金称臣纳贡是实。元人修金史，尽改其隶属关系欲消灭其反叛之迹而已。

蒙古侵金，自西夏纳女请降后之第二年，即宋宁宗嘉定三年，成吉思汗五年（公元122）

自金居庸外边堡长城西端与西夏国间隙中开始。本章仅记乌沙堡之战、会河川之战，及者别袭取金东京之战。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

一、蒙古之初兴与金之结怨

蒙古部族，向受金朝统辖，其部族中始有汗号则自合不勒汗（成吉思汗三世祖）起，统辖蒙古诸部。金主闻蒙古有合不勒汗其名，召见之，欲使之安定北方以为屏藩，故礼遇甚优。合不勒汗体健，食量过人。1日合不勒汗酒醉失态。金廷左右呵其无礼。及酒醒谢罪，金主笑释不问，厚赠而遣之归。合不勒汗甫行不半日，金之大臣，谓："纵去此人，将为边患。"金主乃复遣使者要之返。合不勒汗不受命。使者执之。合不勒汗乘闻脱归，使者踵至。遂杀使者。由是金蒙交恶。后来合不勒汗病卒，七子不立，而立从弟俺巴孩继汗位，是为俺巴孩汗。

初蒙古与塔塔儿因事构兵，塔塔儿酋长为蒙古格杀，塔塔儿饮恨于心。其后俺巴孩线女于塔塔儿，自往送之。塔塔儿为报杀酋之仇，遂执俺巴孩献于金主。金主以合不勒汗会杀其使臣，乃钉俺巴孩汗于木驴之上而杀之。至是蒙古部众共立合不勒汗第三子忽图拉为汗。（上引冯承钧成吉思汗传二章）

先是合不勒汗之长子斡勤巴尔哈汗，亦经为塔塔儿执送金朝处死。于是忽图拉汗纠集诸部谋复仇，举兵与塔塔儿大战者十三次，又侵入金界，败金兵于境上。金遣兵讨，连年不能克，乃议和，并割地之让之，筑长城以防之。至是蒙古声威始盛，遂与金国抗礼争衡。忽图拉亦成为蒙古之英雄，时金熙宗皇统七年，宋高宗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前后之事也!当女真族金朝之与也，统制之广，已遍及蒙古全境。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以后，即金世宗大定元年（公元261）以后，燕京有童谣曰："达达来!达达去!赶得官家没处去!"金世宗闻之，惊曰："必是蒙古鞑靼人将为我患。"乃下令出兵剿之，极于大漠穷荒。尔后岁岁出兵北边态行杀戳蒙古族人颇众，谓之"灭丁"。直至金章宗明昌年间（以宋光宗绍

熙元年公元一一九○年为元年），始停止“灭丁”政策，蒙古人方敢滑回本土，重行繁聚。而蒙古民族对金人之残酷手段，则怨恨入骨，“灭丁”之仇，累世不忘矣!（蒙兀儿史记卷二）

二、蒙古之叛金

蒙古铁木真初起，因惧于塔塔儿与札只剌部之合作而联军征讨，乃使出离间之计，以造成金人出兵声讨塔塔儿。铁木真又以“挾天子令诸侯”姿态，帮助金军击破塔塔儿。以此军功，受金朝封为北方招讨使。于是铁木真一变而为铁木真汗，集兵四出征讨，统一汉北，遂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编练所属及收降之各部族俱成为军队，故其实力日日雄厚。兼之成吉思汗宽仁有度量，深为部众所爱戴，于是归附者日众，乃进而向西南两方面拓展疆域。命长子术赤征西北部族，自己亲征西夏。同时他派出人员笼络本国已亡而投降于金之契丹人，冀协力解脱金朝之压制为理由，据劲他们为蒙古工作，到处作颠覆金朝之活动。会金国新易君王，亦有机可乘。缘宋宁宗嘉定元年，即元太祖三年（公元二一○八）参，金章宗璟卒，无子，其叔衎王永济嗣位（即金废帝）。永济柔弱无能，不孚众望，朝中将士多离心。时铁木真虽已称尊于漠北，在名义上仍奉金为上邦。成吉思汗以前曾见过衎王，卫王即位后，循例传使所属藩国。使者至蒙古，成吉思汗问金使曰：“新君为谁”？使曰：“卫王也”!成吉思汗遽南面唾曰：“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作，此等庸儒者亦为之耶!何以拜寻为？”言罢，即乘马北去。卫王闻之，大怒。乃遗兵分屯山后（今山西大同及察省张北万全一带），欲俟成吉思汗入贯，就其进场之时而杀之。然后引兵深入。会金守西北之礼军，有降于蒙古而泄其事，成吉思汗遣人伺之，果实，遂与金绝，并严兵以僻南征，（多桑蒙古史，一卷四章）

金国自从与南宋在宋孝宗乾道元年（公元二六五）和议后，金宋双方，维持和平卅年。此卅年期间，金朝南宋南北社会，都保持承平气象，可以说是宋金对峙中一段难得之黄金时代。

金世宗于大定廿九年去世。（即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二八九）。宋孝宗于是年亦倦勤退位。及光宗即位不久，因病不能视事，内舜嘉王，是为宁宗。宋宁宗以韩佗胄用事，欲乘金章宗怠于政事，边患起于蒙古之机，大倡恢复中原之论。在开祷二年（公元2106）宋宁宗下诏北伐。金兵卅万，亦分九路大举南下，是年多西蜀吴曦降金，东路金兵直迫锡州，江南大震。佗胄见局面不可收拾，乃遣使求和，是为嘉定和议，时为宋嘉定元年（公元1208）和约重要条款如下：（1）两国境界如前，金以所侵土地还宋人。（2）恢复靖康故事，金宋仍为伯侄之国。（3）增加岁币为银绢各卅万两匹。（4）宋另以犒军银三百万与金。

三、蒙古侵金之谋

宋宁宗开禧二年春（公元2106），蒙古斡难河上大会，铁木真被选为成吉思汗，岁次丙寅。是为我国史上元太租元年（按蒙古太祖至宪宗，皆未建年号，此乃后人追述）。成吉思汗既即大位，乃大封功臣，明定位序。以孛斡儿出为右翼万户，木华黎为左翼万户。纳矛阿为中军万户，计功臣封万户千户者共九十五人。

蒙古对金人杀其宗亲大仇，迄未忘怀。会金降俘来报，具言金主肆行暴虐，乃定议对金南征。成吉思汗察于大军渡漠，远程南伐，势必准备需时，策划万全，方克奏效。于是彼为完成此一远程艰巨作战，确实把握胜利计，乃于积极作战准备外，且善为谋略，以开战胜之先河。其显著之策划，概为：

一、拓展疆域，以巩固基地，先排除西方及北方之乃蛮及蔑儿乞等残余敌对力量，使远征军无后顾之忧，背侧安全，可以放胆南进。

二、争取与国，招降邻近小邦，拉拢守在绥远之东胡汪古部，西夏和识，鼓动契丹人反金复国，以孤立金廷。

三、征召各国降服之军从征，以壮大声势，对金人在精神上先予以严重之打击。

四、用间策反，暗中结纳为金守御长城以北之汪古部长阿剌忽失的斤，期于战争开始时，率众来附，作为进军向导及内应。

五、封锁情报，同时以假意敷衍金人，而掩匿整军出征诸企图。（下引见续资治通监卷百五十九）

当蒙古积极备战之际，此项情报，终为金守北鄙边将纳哈买住所侦悉。纳哈买住以此情报极为重要乃奔告于金主，金主永济曰：“彼何敢然？且无衅，何能人犯？”纳哈买住曰：“近见蒙古已迫服其邻邦，而修弓矢甲楯不休，凡行营则令男子乘车而惜马力，其意非图我而谁？”金主以其擅生边隙，囚之。盖金承平日久，人皆畏战求安，金主基于此种内情，故藉此以抑止典边事者。此为金大安二年，成吉思汗之五年（公元1210）事也。

第二节双方战略指导

一、金国战略指导

金人占有中以后，其女真族主力陆续内移。金熙宗时（公元二三五——一一五三），创行“屯田军”制度，其法系将女真人契丹人内徙，在各村落间筑垒以居，给以括收之民户良田，有如驻防或武装移民，用意端在监视汉人，军费直接徵用于被征服之民户。及杂居既久，互通婚姻，不惟汉化渐深，终于被汉人所同化。或则耕而不芸，任田荒芜，纪律既弛，战斗技能亦渐退，不复为昔之雄捷。

至于金之军队，犹保存昔日英名而已，仍以千人长为猛安，三百人，或百人长为谋克，谋克之副为蒲里衍，士卒之副曰阿里善，以十谋克即三千人（或千人）为一猛安，并限定非是女真人不得为猛安、谋克，以保持其主令之柄。其他各降人军队，则用其旧法，置长史以监其军，使分隶于诸总管府、节度使，以听猛安调用而已。自金章宗即位以来（却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二八九），欲其女真人才兼文武，乃令各执掌兵柄的谋克猛安要科举进士，从此将士各习文弱。及后兵将皆难满额，乃改为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猛安，是由三千人改为百余人了。而每谋克二十五人中，除旗鼓各一人，火头五人，其任职者不过十八人耳。

是金女真之旧军制已不能成军。

此外金国尚有因袭辽军遗制，改编其异族投降之人为轧军，更保留有地方性之投降军队称为义军，如花帽军等。其军备可谓相当复杂，而纪律亦不严整。女真族俗本笃劲，壮者悉以为军，自备武器兵粮，以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统之，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堪称为强者。然金于短期内，吞并契丹，摧噬北宋，发展过速，所得成果过大，而其成果非一时所能消化，为求急速生效，乃以汉制汉，延用中国习俗，是后女真络续内移，汉金杂处，潜移默化，汉化益深，武备因而日渐退化。

金主永济闻蒙古主成吉思汗来攻，大惧。乃命西北路招讨使钮祜禄哈达请和于蒙古，而成吉思汗不许。金主乃命平章政事（丞相）独吉思忠、参知政事（副丞相）完颜承裕，行省事（得专兵事政治之权）于抚州（今察哈尔省张北县北）。西京留守胡沙里、执中，行枢密院事（得专兵权于西京方面），以备蒙古。

金主又集三品以上官共议兵事，争论莫决。尚书令史（朝房秘书处长）李英上书言："比来增筑城廓，修完楼橹，事势可知，山东、河北不大其声援，则京师为孤城矣。"金主召平定州刺史赵秉文论备边之策，秉文言："我军聚于宣德（府名治在今察哈尔省宣化），城小列营其外，涉暑雨，器械弛散，人且病，深秋敌至，将不利。可遣临潢（在今热河省林东县，时为临潢府屯大军以备长城之防）一军，捣其虚，则山西之围（指蒙古围夏事）可解，兵法所谓"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金主不能用。（上引见续通监卷百五十九）

初，金主不知蒙古之将大举入侵，故对蒙古军南征之情报，不特置诸不问，反而加罪于报告之人，以致对蒙古军之作战情报，一无所知，故亦未缮备军备，而疏于对北边之警戒。

二、蒙古侵金之战略指导

蒙古族以游牧为生，部落组织，概同军旅，民众全年野居，生而战斗，孩提即习骑射。其初兴也，军伍编组未备，兵役制度，沿袭女真之

全民皆兵制，乘马武备，率由自备。每兵随身行李，计有革制甲一，兜一、小帐一、革囊一、锅一，囊以盛乳、锅以炒米，武器则有弓一、斧一、刀一、矛一。其进军时，则有畜群随军，以补给乳肉，至于马匹，则从不带草秣，仅寻水草以供畜食，其军队编组，概于金军仿佛，千户以上，更有万户，分层统隶诸军。其军制详本卷第一章。

成吉思汗为复金人杀其从曾祖俺巴孩汗及其叔祖斡勤巴儿哈汗之仇，于继承汗泣之始，即议优金，当时蒙古部众及附属部落一致拥护此一报仇雪耻之政策，但远隔广漠，大军南征，准备需时，未敢轻动，更加对于金之边堡长城望之生长，知难突破，既突破亦不便袭击，故成吉思汗基于伐金之决议，以五年时间，从事在金边堡长城以外地区作战争准备，其准备要项：

一、为肃清西北边境：太祖元年命忽必来征合儿鲁，者别追击古出鲁克，明年复遗长子术赤饭右翼军征和林西北诸部，剿抚并用，以至诸部纳款请降，西北宁靖。

二、排除进军南伐之右侧障碍：成吉思汗二年，即宋宁宗开禧三年金章宗泰和八年（公元1207），成吉思汗亲自西征，并劝吉儿吉斯来降，至成吉思汗五年（即宋宁宗嘉定三年金街王大安二年，公元1210）西夏请和，大军南进，右侧有所保障。

三、安定后方：太祖三年，续向西北拓展，四年畏兀儿来降，六年哈刺鲁来降，至是背侧悉定，予南征大军以后方安定之保证。

同时一面造箭制盾，秣马厉兵，勤修军事，以备战争，一面遣使分赴藩属诸部，徵兵助战从征，以壮大声势。一面运用谋略，一以掩蔽金主之视听，而秘匿自己之备战企图，一以招抚金之戍边部将，策反来归，以为大军进讨之内应，另一方面则积极罗致贤才，弃嫌仇，任智勇，于是将有四杰，即孛斡儿出、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战有四犬：为忽必来，者勒蔑、者别、速不台，实则皆是能冒险犯难，智勇兼全之辈。

第三节作战经过

一、乌沙堡之战

金子章政事徒克单镒，知蒙古行将侵金，乃建议于金主永济而胃曰：“自与蒙古用兵以来，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必然败，不若领兵入保大城，并力备御昌州（今察哈尔省宣化境）、桓州（在今察哈尔省多伦县）、抚州（在今察哈尔省张北县）三州，三州素号庶富，人皆勇健，可以内徒，益我兵势，人畜财货，不至亡失。”参知政事梁理不同意曰：

“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不能辨别是非，即斥责徒克单镒。徒

克单镒复奏曰："辽东国家根本，距中都（即中京今北平市）数千里，万一受兵，州府顾望，不便发兵救援，必须报可，误事多矣，可遗大臣行省（朗授以军政之权）以镇之。"金主不悦曰："无故置行省，徒摇人心耳。"竟置于不理。贬徒克单镒为北京留守。（金史卷九十九徒克单镒传）

及金大安二年，即宋宁宗嘉定二军，成吉思汗五年（公元二二○）春，成吉思汗统兵南向，由金居庸外边堡长城外之汪古部为向导，绕道长城西端今绥远省陶林县东北土城子之西，转向东南，直趋今绥远省兴和县西北二百里处的岛沙堡（蒙古呼为旺兀察都），是为鸟沙堡作战之开始。

金大定年间（公元1161～1189），曾修筑西北路屯戍六百里，起自桓州（今多伦）

东北，经桓州北界、昌州北界（即今察哈尔宝昌以北）、抚州北界（今察哈尔康保，新明以南），止于陶林，中间设界壕长城以及堡障，因工程促追，虽有踏隍而无女踏副堤，在金承安年间（公元1196～1201）乃增缮城隍加筑女踏及副堤，成为坚强之长城。金大安初年（公元1208）金平章玫事独吉思忠，与参政完颜承裕，将兵屯居庸边堡之宜德府（今宜化），为求对突破长城之敌人，后方能有拘束及打击之力，以及对由长城西端迂回而南之敌，有对之拒止掩护作用，乃在今兴和县西北二百里处，修建屯重兵的堡垒，是为乌沙堡及乌云堡，并于乌沙堡附近暗道可通之处，修建乌月营以为补充支援基地。因堡极坚牢，又有金平章政事独吉思忠亲率金兵守之，自宋嘉定三年、金废帝大安二年、成吉思汗五年（公元1210）春3月中旬，蒙古军开始攻起，至7月初止，蒙古攻百余日不能下。

成吉思汗深惧金朝援军大至，乃登兴和西北土城西堡之山引领东望，因不见征尘，乃解带置项后跪北向天祷告曰："长生之天，金杀我宗亲，若天许我报仇，请命人种助我。"祷告毕再东望，偶见兴和北山离乌沙堡数里处有多股炊烟如密林上升，知为军营所在，乃命左帅者刷绕道东南往攻之，方知即为金之乌月营。

乌月营金守将完颜胡沙，为者别击败，蒙古因攻取乌月营，独吉思忠因乌月营已失，乌沙堡人力物力已竭，知不能守，乃退兵东走，于是，成吉思汗入乌沙堡，下令毁之。（冯承钧、成吉思汗传第六章）

二、会河堡之战

乌沙堡之战，金主专责独吉思忠失机，诏以完颜承裕继主西北战事。完颜承裕时屯兵于野狐岭（在今张家口北三十里），未及前进，而蒙古前锋业已大至岭下。当地土豪请以士兵为前锋，愿官兵为后继以迎击蒙古前锋，完颜承裕不敢用其计，但问此去宣德（今宣化）间这里程。土豪乃面嗤之曰："该涧曲折，我辈谙知，行省（指承裕）不知用地

利力战，但谋走耳，今败矣。”于是，完颜承裕退兵至宣平（即今张家口），蒙古前锋不战而取野狐岭。大肆劫掠然后退去。（续通监卷百五十九）

明年即金大安三年成吉思汗六年（公元1211）3月，成吉思汗再发兵南下以侵金，屯于金居庸外边堡长城西端之土城及红土山一带，分兵以攻取金大水滦（今察哈尔省商都县南）、丰县（今察哈尔尚义县）、利县（今察哈尔省尚义县南乌兰大堤），闻金军正在净州（今绥远省兴和西北）西重新大事修筑乌沙堡及乌月营。乃命将率重兵往攻之，7月再克金新乌沙堡。8月初乃以大军东攻，于是而有会河川会河堡之战。

金完颜承裕自去年蒙古军退去之后，即调集各路精兵良将三十万，号四十万，齐集于西北路，以准备北征蒙古。为进可攻退可守计，分兵往乌沙堡，再修复之，并增筑居庸内堡各寨栅以及城池。及本年春3月，蒙古不待金军往征，已率大军再来，于是完颜承裕便集结兵力准备与蒙古实行决战。

成吉思汗知金军主力在会河川（今察哈尔省万全之西），乃集其大军东向攻之。自将中军以攻会河堡各寨。以左军进攻金貛儿嘴（今得胜口北之山嘴一带）。攻打竟日，金军战力极强，蒙古军无所得，而损失惨重，翊日再兴攻势，蒙古左手万户木华黎誓其众曰：“彼众我寡，不致死，不能克也。”即亲率敢死队，策马挺枪入陷敌阵。成吉思汗挥大军继之街入阵中，金之女真兵，契丹兵、汉军一时溃乱，蒙古兵却喊声震天，往来冲突，金军遂后退。成吉思汗以大军尾追，杀得伏尸徧野。金将胡沙虎迟至会河堡，为蒙古军包围攻击，竟全军覆灭。金之精兵良将大半尽于此役。（蒙兀儿史记，卷三）

是年9月，蒙古军进拔金之兴德府（即今察哈尔省涿鹿县），攻至居庸城下而去。11月，有金汾阳郡公郭宝玉屯兵在白登城（今山西省阳高县），向蒙古洽降。而蒙古后军已突开金居庸内外边堡长城南来与自乌沙堡东来之军会合。成吉思汗因令大军由白登山两面，以直扑金之西京大同府（即今山西省大同县），至围西京，力攻之7日夜，金西京留守胡沙里执小知不能守，乃率麾下百骑弃城东南奔。金西京各军群龙无首，亦向东退，成吉思汗派者别率三千骑追蹑之。至翠屏山口（在今察哈尔万全县北）大败之，遂溃不成军以选往居庸关。金居庸关守将开城收容败兵中，不意蒙古突骑追至，致为蒙古将者别冲入居庸关内，指向金之中都以北而进。金中都大震，城门为之尽闭者数日，但蒙古仅有游骑斥候至城下而去，不知其主力之所向。

成吉思汗因停留在金之西京，分遣诸将往取云内各州。不久皆下之，遂分别大掠而还。

三、蒙古经略辽东

辽东乃广指辽河以东及辽河以北之地而言，今东北九省当时皆呼为

辽东之地。其当时治所在今哈尔滨市东南称为上京，及金迁都至中京以为国都，上京之名遂废。然虽不名上京，而金人以其发源地所在。故其地之得失，关系于金之民心士气者至钜。6成吉思汗岳父特薛禅，乃宏吉剌部族，与契丹人有旧，正在策反辽东区内契丹降金之为官者，惟金人势厚，苦无机缘。及蒙金在翠屏山口战后，金诸将退守居庸关，蒙古诸军受阻，不得弃进，但左先锋者别之一军，却曾冲入居庸关内。

先是有辽人霸州（在今热河省朝阳县）舒穆鲁额森者，为报金覆灭辽国之仇，而率其党百除人投降于蒙古，向成吉思汗献十策，因言于成吉思汗曰："东京（即辽阳）为金国之根本地方，如以轻骑兼马（带空马为替换乘用马歇人不歇之谓），绕中都（今北平），出抚甯（今河北卢龙县），遵海而北行，不足千里，可袭东京，荡其根本，中原传檄可定。"成吉思汗然其计，以授友帅者别。者别遂选轻骑带兼马，夜随金之溃军，行入居庸关内，派出远哨，见中京金人无出兵阻拦意，乃东去抚甯，在舒穆鲁额森向导下，沿渤海西岸北行，于坚冰上渡大陵河，辽河，如入无人之境，而直达于东京辽阳域下。但金辽阳城门禁森严，守备极严，城又极固。攻之，不能拔。年将尽，者别无奈乃退兵，在归途中游骑获金往东京傅诏使者，蒙古部将索济伦布哈与者别及舒穆鲁额森计议曰："东京金之旧都，备严而守固，宜用计取之。请易服与使者偕往，俟其开门，继以大军赴之，则可以克之矣。"是夜除夕，金东京以蒙古巴退走。见朝廷使者来，开城迎之。不意蒙古军突然倍道驰还，东京遂陷。大掠月余，然后由原道退往中京而去。（续通监卷百五十九）（下引见蒙兀儿史记卷三十一，耶律留哥传）

辽人舒穆鲁额森以取东京之功，成吉思汗授以千户，军中呼之为霸州元帅。

初蒙古军之伐金也，目的侧重于敌野战军之歼灭，城堡之残破，及子女玉帛财货之掳掠，而不事于土地城池之占据，是以蒙古军于残破城堡之后，并不留兵戍守，引兵他去，蒙古军既去，残破城堡则复为金军据守之。

当蒙古将者别袭破金之东京以后，辽东之契丹亦叛金响应，时辽宗室有耶律留哥者，仕于金，为北界千户。蒙古军典，金人疑辽遗民有他志，下令契丹户以二女真户夹居，以防变乱。

耶律留哥，遂不自安，遁至韩州（今安东柳河县）。至宋宁宗嘉定五年即成吉思汗七年（公元一二一二）春正月，闻蒙古者别袭玻东京，为向应计，乃聚众以叛。自称都元帅，待成吉思汗麾下千户宏吉剌人阿勒赤略地至辽东，周耶律留哥，问所从来？留哥曰："我契丹军也，欲往附大国。道阻逗留于此"。阿勒赤曰："我奉命讨女真，适与尔会，岂非天意乎!然尔欲效顺，以何为信"？留哥乃率部会阿勒赤登山，刑白马、白牛，北望折矢以盟，金主遗完颜胡沙率军往讨留哥，留哥得成吉思汗三千骑之助，大败金兵，以所俘辎重，献成吉思汗。明年（1213）留哥取契丹故地。从者甚众，成吉思汗封之为辽王。

第四节战后之政局

金人已集得可期必胜之兵力，但在会河川一战，竟为劣势之蒙古军所击破。是金人所倚恃之万里长城失去作用，所倚恃之军备亦一战而丧失其大半。至此，金人最后所恃者惟各京城所管辖下之各府州县城池。自西京大同府陷落之后，又有东京辽阳府为蒙古三千骑兵所袭破，五京城亦破去其二，其各州府县城池不及京城之城高池深者，又能支持几时，因而金对蒙古在乌沙堡、会河川、西京、东京战败之后，金国上下皆已失去信心。

金北京留守徒克单镒，以金兵屡败，京师需兵，乃抽调其北京屯兵二万人，命将军乌克逊鄂屯率领，入卫中都。金主嘉其功，徵拜徒克单镒为右丞相，但仍不能用其建议。金西京留守胡沙里执中之弃西京而还也，途中为蒙古击破，逃至蔚州（今察哈尔蔚县），擅取官库银五千两及友币诸物，夺官民马以与从行之人，入紫荆关，擅杀涞水令选到中都，金主仍以其为右副元帅。胡沙里执中益无忌禅，向金主请分其兵二万，北屯宣平。金主与之兵三千，令屯于嬀川，彼又大为不满，口出怨言。而金主闲之，竟亦不问。

金主以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参知政事完颜承裕，作战失机，坐以覆军之罪，独吉思忠除官籍之名，完颜承裕贬为咸平路兵马总管，于是上下皆以金主赏罚不明，军心士气因而日益低落。

蒙古军连年侵金，每次皆大获全胜，将降俘之金军辽民及汉人，皆带之北去，分与诸将用作奴隶。因蒙古斯时尚无领土关念，更无长久占领意图，每攻取一城一堡，以杀人抢掠为能事，欲荡平城池，尽杀人民，造成一片广大牧地，为其所愿。惟因所掠得财货过多，需人为之运输。又中原子女可以运往西域以换取马匹。因而乃将收降之金军官兵，从事整编，皆保留其职衔，使之担任押运财货工作，能忠心于任务者，则倍加优礼，分别改隶于蒙古诸军之中以为战斗营伍官兵之补充。又因漠北缺乏各种技术匠人，在俘虏之中，凡能显一技之长者，皆尤其估带家属，予以安置，俾为打造生活及战斗使用之工具，并使追随作战军之后方，随时听候调用，以坟强战斗之力。由此，蒙古军中工匠日多，工具日伙，其战力亦愈战愈强。

自宋宁宗嘉定五年，即成吉思汗七年金废帝大安三年（公元1213）年除夕，蒙古者别袭取金东京辽阳府后，翊年秋蒙古取金宜德等州，败金兵取居庸关，拔金河北、河东诸州县。

并围攻金之中都。

宋嘉定七年（公元一二一五）春金与蒙古言和，5月金徙都汴梁，蒙古复围金中都。各，遣木华黎北征辽西。

第五节战前一般形势与战略指导

原来金西京（在今山西省大同）留守行枢密院事胡沙里执中（一作纥石烈执中或胡沙虎），平素对于金主永济，并不敬服。乌沙堡——会河堡——野狐岭之大败，他放弃西京，逃回中京（即今北平市）。金主自然不满，便另派大将完颜纲去抵御蒙古，结果完颜纲亦失昌州（今察哈尔宣化北），桓州（今多伦）抚州、（今张北之北），败逃而归。完颜纲与胡沙里执中一向不睦，为掩饰败绩，乃诿称得密报，蒙古兵之所以能长驱入关，是胡沙里执中私受蒙古人之贿赂，故意放纵入关。胡沙里执中闻之大惧，恐被罪诛，即先发制人，于金至宁元年（成吉思汗八年，公元1213）8月，率兵叛变，攻入皇宫，执杀金主永济。然后召集番汉群臣会议，迎立升王完颜珣（金世宗孙），是为金宣宗。金宣宗既即位，敍拥立之功，以胡沙里执中为都元帅以执掌全国军政，胡沙里执中乃调派大将术虎高琪（一作珠赫呼果勒齐）以北御蒙古。术虎高琪奉命失期，胡沙里执中欲斩之，幸赖宣宗说情，谕令免死出战，将功折罪。不料术虎高琪又大败于怀来而回。此时中都，人心恟恟，术虎高琪又恐获罪，遂率军回中都，再发动一次政变，将胡沙里执中杀死。至关请罪。时蒙古军已兵临城下，大敌当前，金宣宗乃赦术虎高琪之罪，而委以左副元帅，使召集将士，共图救亡御敌之策。

成吉思汗伐金之战，胜利之速，俘获之丰，出乎意料之外，自此对金朝愈加轻视。金人方面则自蒙古军撤走后，亦加强京师战备并回守长城各边堡，中原州县并纷纷编组义军，冀图自保。成吉思汗率军北归后，休养整训，业已经年，乃乘金人内乱政变之际与秋高马肥之时，挥军再入长城，扫荡黄河以北，进而有倾覆金室之意。

第六节作战经过

一、居庸关之战

金至宁元年（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复行南进，继续伐金，先攻取前所弃而为金兵复据之长城边堡。秋7月，蒙古军南下入宣德府（今察哈尔省宣化县），进薄德兴府（今察哈尔省涿鹿）由成吉思汗四子拖雷与驸马赤苦（亦作赤穴屋）会攻拔之，成吉思汗进军至宣德东南之怀来县。金主派完颜纲、术虎高琪等统兵拒敌，两军相接，几经战斗，金军退却，向南溃遁，蒙古军乘胜追杀，诛戮殊众，金军惨败，伏尸遍野，蒙古军复捕捉金军逃遁之主力于居庸关北口而包围歼灭之。于是蒙古军遂叩居庸关。

居庸关俗称天险，关分南北二门口，北斗亦称北口，即今居庸关，南门称南口，迄今犹名为南口，两者相距四十里，其间右两山夹峙，中有巨涡，悬崖峭壁，称为绝险，金人正严守其中。蒙军侦知金人在居庸屯戍重兵，严阵守隘，开门原极狭，且金人熔铁以锢之，并布铁蒺藜于居庸开外百余里地区之中，益发造成形势险阻。蒙军熟料若由此进攻中

部，势必遭遇坚强抗拒，危险异常。于是成吉思汗仍留兵一部，看守居庸北口之外，佯作攻击，以始金兵。

而自将大军沿桑乾河西行，经山西省之广灵、灵邱等地，然后绕道東出经涞源，凉圆峪以出太行山之紫荆关，以迂回居庸关地堑天险之大后方。

金人既侦知蒙古军之迂回企图，乃亟派奥屯襄率众驰往紫荆关，企图杜蒙古军于关内隘阻之中，奥屯襄军比至，成吉思汗军已逾隘矣!成吉思汗见金军来拒，乃令木华黎攻击之。两军战于五回岭，金军大败，蒙古军乃乘势东出。8月，金主永济遂被杀。于是年冬10月，进拔中都西方之涿易二州，而进据中都之南面。金廷方面遂又有术虎高琪杀胡沙里执中之变，正所谓危亡当前而内难未已也。

当成吉思汗自将大军作迂回运动之际，分遣者别，速不台各卒所部从间道袭居庸南口，破之。金守关将讹鲁不花至是亦献居庸北口以降。居庸既克，蒙古南北会师。进入居庸之蒙古军乃遗精兵五千骑，至涿易两州去攻敌人侧背，于是涿易等州尽克，蒙古军遂进围金之中都（即今北平市）。

二、蒙古军河北平原扫荡战

成吉思汗鉴于中都形势险固，难以遽下，乃留兵一部围困中都，于是年宋宁宗嘉定六年金齐帝至宁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八年（公元1213）秋，分兵三道，以扫荡黄河以北诸州。其作战区分如左：一、右军——以其三子术赤、察哈台、窝阔台将之。此军之作战，概自易州循太行東麓（按即今之平汉铁路线）南下，扫荡山左之定、邢、洺、磁、卫、孟等州。至黄河折而西北，返入山西。右军进入山西，复分兵三路：一路北向泽州、潞州、辽州、沁州，沿今之同蒲铁路东侧向北扫荡；一路沿平阳、太原、忻州，代州道，向北扫荡；一路溯黄河东岸，沿吉州、隰州、岚州这向北扫荡。三路兵马约期于西京以南会合。再转而东下，趣向中都，与主力军会合。

二、左军——以拙赤哈撒儿（成吉思汗之弟），斡陈（新元史作阿拉赤）、布札将之，循海边东进，取蓟州，平州，辽西走廊诸郡。

三、中军——由成吉思汗与拖雷及木华黎将之。中军之作战，亦分兵为三；该军发自涿易二州，右路军沿今之平汉铁路以东向南扫荡蠡、祁、深，冀、濮、开、滑诸州，直抵黄河，循北岸而东南进与中路军会合于徐州附近。中路军则沿霸州、雄州、莫州（今河北省任邱）、河间，献州、景州、恩州，南取济南、泰安、济州而趋徐州。左路军则沿渤海南下沧州，无棣、滨州，循淄、潍，莱、登诸州向膠东扫荡。再折向沂州，企与中路军会合于徐州附近。

当时金军诸路兵马，皆已仓往北边防戍，中原州府则佥乡民为兵，上城守御，蒙古军每临其家属攻城，父子兄弟往往遥相呼认。由是守

兵，人无固志，蒙军所向，山东河北数千里之地，望凰瓦解，州府尽破，惟蒙古左军遭受极大抗拒，进展甚缓。斯时，金黄河以北，能自保者，仅中都，通州、顺州（今河北愿义）、真定（今河北正定），清州（今河北天津南）、沃州（今河北赵县）、大名、东平、德州，邳州及海州等十一城耳!河东（指今山西省）州县，亦多残破。木华黎复独率一部，进略密州，屠之而返。

冬10月，蒙古诸路军马开始北返，合屯于中都以西之大口，以逼中都。

三、蒙古取金中都

翊年即宋嘉定七年、成吉思汗九年春正月，蒙古扫荡河北平原诸军，集于中都近郊，诸将咸请乘胜破中都，成吉思汗不以为然，而遣使阿剌浅告金主曰：“汝山东、河北州县，尽为我有。汝所守惟中都耳!天即弱汝，我复迫汝于险，天其谓我何干？我今还军，汝不能犒师以弭我诸将之怒耶？金主与丞相廷臣计议，丞相术虎高琪曰：“彼兵力已疲，今与之决战何如？”完颜承晖曰：“不可。此孤注也!败则不能复振，况我军身在都城，家属各居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战败必散，苟胜亦思妻子而去，祖宗社稷安危，在此举矣!今莫若遣使议和，待彼还军、再为战守之计。”金主然之。乃奉金发帝永济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人，马三千匹，以献于成吉思汗。蒙古军乃解中都之围，全军北返。（上引见新元史卷三太租本纪下）

5月，金主既与蒙古议和，大赦国内，以国蹙兵弱，财用匮乏，不能守中都，乃议迁都汴京（即今河南省开封）。汴者金之南京也。群臣谏不可，金主不纳，6月命平章政事完颜承晖、左丞相抹然尽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自与六宫启行南迁。

金主行至中都西南之良乡，今扈送之契丹降军，将原先发给之铠马悉复还于官。于是契丹降军知金朝已不见信皆出怨言，遂作乱。杀其主帅金人详衮，而推契丹人斫答、比涉儿、札刺儿三人为帅，还兵向中都进攻。金平章政事完颜承晖在中都闻变，以兵阻叛兵于芦沟桥，为斫答所败。契丹军势既盛，遣使乞降于成吉思汗，并求援助。时成吉思汗驻夏于鱼儿泺（今察哈尔张北县西北，即金史地理志之大鱼泺），闻知金主南迁及斫答之变，怒曰：“金主既与我和好共处，今复南迁，是有疑心，特以和议款我耳!”乃决弃和约，命撒木合率蒙古军。石抹明安率女真投降之军入古北口，往会合斫答之契丹军，共围中都。同时命木华黎进兵辽东，以援耶律留哥。缘金兵已复取辽东之大半也。（元史一卷太祖本纪）

金主闻蒙古复进兵压境，恐太子有失，秋7月，召之至南京，太子既行，中都人心意危。后中都被围既久，城中饥馑、承晖悉以兵付石抹尽忠，而自总特大纲，同时修表向汴京告急。

金主得承晖告急文表，乃决定派兵往援中都。（下引见元史卷一太租本纪）

翊年即宋宁宗嘉定八年金宣宗贞佑二年、成吉思汗十年（公元一二一五）春，成吉思汗遗阿剌浅谕金主曰：“以河北山东未下诸城来献。并撒去金主帝号，改封金主为河南王。”金主不从。3月，金主遣其将永锡庆寿率军三万九千北上，李英运粮大名，以救中都，并以重军护送。援军人各负粮三斗，庆寿李英亦不例外。李英进至霸州北，与蒙古军遇，大败，尽失所运粮。英亦战死。时永锡庆寿军，已进抵涿州，亦为蒙古军击溃。自是中都援绝，内外不通。饿困益甚，人以相食。5月，承晖与尽忠议，期同死国难，尽忠不以为然，金右丞相兼都元帅承晖仰药殉国。尽忠欲南奔，中都妃嫔，皆欲偕行，尽忠恐为己果，绐之曰：“我当先出，与诸妃启途。”乃与爱妾及所亲出城，不复返顾，众乃于是月初2日庚申以城降。石抹明安首入中都，时成吉思汗驻夏于桓州之凉陉，石抹明安遣使默捷，成吉思汗遂命失吉忽都忽、汪古儿阿儿孙、合撒儿三人赴中都劳明安，并检视小都帑藏，时金守藏官奉金币为拜见礼，失吉忽都忽独不受，及还。成吉思汗问忽都曰：“曾否受贿”？对曰：“未敢受之”。汗问其故，对曰：“今既城陷。其物悉属我君，他人不得私有。”成吉思汗以忽都忽知大体，厚奖之而责另外之二人，蒙古从此始有皇帝癖有全国土地城池财产人民诸概念。（上引见多桑蒙古史一卷四章）

成吉思汗俘得辽东丹王实欲之八世孙名耶律楚材者，精通辽、金，蒙、汉诸事，俘楚材父仕于金，终尚书右丞，楚材为中都左右司员外即，中都陷，辽降。成吉思汗召见，语之曰：“辽金世仇，朕为卿雪之!”对曰：“臣父祖尝委质事之，既为之臣，政仇君耶？”成吉思汗重其书，乃处之左右。先是蒙古灭乃蛮时，得畏吾儿人塔塔统阿，始知西坡文化，至是得耶律楚材，因又知中国文化矣!（上引见多桑蒙古史一卷四章）

当金完颜承晖之殉国也，会作遗表付尚书省余史师安石奔呈金主，金主得遗表，尽忠亦至汴。乃追赠承晖为郡王，但未罪尽忠，仍以为平章玫事，未几尽忠谋逆，始伏诛。

四、蒙古军占领黄河以北各地

蒙古军既克中都，金室声威急转直下，蒙古挥军南下，并占领大河南各州郡城邑，冬10月蒙古调其留在西夏之军东来对金潼关实行对汴京前后夹击。翌年（公元一二一六）春成吉思汗自鱼儿滦还卢卢河行宫，旨在就近驱策诸军，尽速残破辽西及中原州县，以加重对南京方面之压力，而追促金室之早日崩溃。于是派脱仑扯儿必扫荡山左，木华黎略定关东，未及半载，诸方敉定。8月乃命撒木合率兵万骑，假途西夏，以趋关中，威胁汴京之右侧，参10月，撤木合军自西夏趋京兆（今西安），攻潼关，不能下。仍挥军进入南侧山地，自留山小径（今河南省召县西）趋汝州（今临汝县），前进间，路途险阻，山道崎岖，遇溪辄以铁枪相锁，连接为桥以渡。金军以为坚守潼关，汴都兵多，有恃无

恐，乃蒙古军突然出现于南京西南、实出金人意外，是以金军震惊，无敌御者，相率溃散。撒木合挥军直迫南京（今河南开封），军进至距南京二十里之杏花营（开封西二十里）时，适金蔚州人郭忠所率之花帽军（地方性之义军）自山东来援，撒木合与之战不利，乃率部退还陕州（今河南陕县），值黄河冰结，遂全军渡河而北。稍事休整，于11月再攻泣关克之，遂取陕州等城而续东进，与金将蒲察阿里不逊军遭遇于渑池附近，击破之，乃乘胜东趋，进迫南京附郭。撒木合侦视之下。

审于金以重兵屯戍南京，势难骤破，乃决意不攻，趋军北上，渡黄河，围平阳府（即今山西省临汾县）。（下引见续通监卷百六十）

金主感于遍地残破，人民涂炭，遣使乞和，成吉思汗欲许之，乃诏撒木合曰：“譬如围场中，獐鹿吾已尽取，只余一兔，盍舍之!”撒木合耻于无功，乃遣使命金主去帝号，及献河北山东未下诸墟。金主不从，和议遥寝。

初金主只顾固守南京，防扼关隘，而置州县于不顾，是以蒙古军不扣城索战，但以游骑轻军遮绝道路，残破州县，所向披靡，计是年蒙军略贩金室城邑，凡八百六十二，由是阿骨打所建立之不绣金国，遂濒危亡之境矣!当撒木合军之进迫金南京也!金室君臣，朝野震恐，战守之念，极不一致，对权臣术虎高琪之事守方略，亦多所诤谏：时金御史等会上言金主曰：“蒙古军踰泸关淆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师屯宿重兵，而不扣城索战，但以游骑遮绝道路，而以别兵攻击州县，是犹火在腹心，而拨置于手足之上。若专以城守为事，中部之危，又将见于今日，况南京之公私蓄积，视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为寒心，愿陛下察之!请以陕西兵扼潼关，与副元帅蒲察阿里不逊为掎角之势，选在京勇敢十数将领，各付精兵数千、随宜伺察，且战且守。复谕河北，亦为此待之。”金主未作抉择，而付尚书省议之。时金朝所采“以重兵屯驻南京以自固，不顾州县残破”之政策，乃术虎高琪所力主，至是术虎高琪奏曰：“臺官素不习兵，备御方略，非其所知。”御史所谏，遥不为金主所用。

五、木华黎北征辽西

成吉思汗伐金大军，初以木华黎为副统帅。木华黎者，出自札益持札刺尔氏，祖父帖列格秃伯颜，父孔温窟洼。孔温窟洼生五子。木华黎居三。木华黎已长，身修七尺，虬髯面黑，沉毅多智略，猿臂善射。成吉思汗四十岁时征主儿勤还师，帖列格秃伯颜使孔温窟洼率木华黎及其弟不合谒成吉思汗于行在，自是留事成吉思汗左右，孔温窟洼为成吉思汗殉忠，追赠推忠効节保大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王。木华黎自事成吉思汗，屡建殊功，旋以功擢封左万户、位列诸将之上，与孛斡儿出称为成吉思汗之两臂，于成吉思汗六年（公元1213），对野狐嶺一役，曾进言曰：“金军号称四十万，彼众我寡，弗致死，未易破之!”成吉思汗然之。木华黎遂率敢死士，大呼陷金障，成吉思汗麾诸军继进，大败金军，金军自此役之后，不能复振。其后复随成吉思汗自德

兴府（即今察哈尔省涿魔县），入紫荆关，又追随成吉思汗扫荡中原。九年（公元一二一六）从成吉思汗围金中都。金主珣请和，成吉思汗北还，是年冬10月，木华黎衔命统诸军自顺州（今河北省顺义县）北攻辽西之金北京辖下地面。

木华黎率军北出古北口，收兴州（今热河滦平），安州（今热河隆化），绕金北京（今热河宁城），而直趋高州（在今热河省赤峯东北张扬子河口东峯上），金高州守将卢瑞、金朴以城降，蒙古军遂向东南攻取惠和（今赤峯东建平北部，新惠之西时为金大定八县!）而独高州富庶寨（在今赤峯南部旧为县）守将攸兴哥拒降，且屡袭蒙古军后背、蒙古军往攻之，知富庶寨堡坚固，不宜力取，木华黎乃下令曰："城内军民人等、若能斩攸兴哥首级以献，则城人皆免死。"攸兴哥闻知，乃挺身自归于木华黎军门，蒙古诸将欲杀之，木华黎曰："攸兴哥壮士也，留之麾下，以为吾用。"后果屡建殊功，成吉思汗赐名攸哈刺拔都。

高州既定，木华黎于翌年即宋嘉定八年，成吉思汗十年、公元一一二五年，率军自北而南以进攻金之北京（即今热河省宁城县）。金守将奥屯襄率众二十万出城北拒战，木华黎麾军与战于北京之郊，大破之，斩首八万余级，造成歼灭战空前战绩。金军既溃，北京乃陷于重围，城中食且尽，人心惶恐，奥屯襄之裨将完颜习烈，高德玉等鉴于势危，共谋自救，乃杀奥屯襄，并推寅达虎为帅，以北京降。末华黎怒其降迟，欲并金军将卒尽坑之。其部将石抹也先进曰："北京为辽西重镇，今坑其众，后岂有降者乎？"木华黎然之，乃以寅达虎为北京留守，以吾也而为兵马都元帅，以抚定其地。（上引见多桑蒙古史，一卷五章）

木华黎旋又遣高德玉、刘蒲速儿往兴中府（今热河省朝阳县），招谕与中府同知兀里卜布降。兀里卜布不从，并杀蒲速窝儿，高德玉逃回。但兴中府城内人心浮动，对兀里卜布咸不爱戴，已而城内杀兀里卜布，推石天应为帅以城降。木华黎授石天应为兴中府尹兼兵马督提控，以事镇抚。然后分遣降将往各地招谕各州县纳款。于是金北京五府之各州县皆降。

锦州张鲸，聚众十余万，杀节度使，自称临海郡王，亦来降，于是辽西皆定。

六、木华黎歼灭张致

张鲸既降，木华黎命其总北京十提控，使从脱伦扯儿必南征，攻略未附州县。鲸怀反侧，为木华黎察知，乃派石抹也先监其军，鲸称疾逗留不进，石抹也先乃执鲸送行在。张鲸服诛，其弟张致据锦州以叛，旋陷平州（今河北遵化）、滦州（今河北滦县），义州（今辽宁义县）、广宁府（今辽宁北镇县）、兴中利州（今凌源县东部）等地，声势十分猖獗，木华黎乃自大宁（即金北京今热河省宁城县）率军东讨之，被诱州郡多与蒙古军送款。当时木华黎决意自两翼进军，包围张致叛军于锦州附近，以聚歼其众，于是分其军为左右二路：

右路军由木华黎与蒙古不花将之。

左路军由史进道将之。

右路军自北京取南道东进，军抵今锦西朝阳间之红罗山（今名虹螺蚬山），张致部将杜秀迎降，木华黎即以杜秀为锦州节度使。斯时蒙古左路军已分兵攻广宁府，拔之。

成吉思汗十一年，即来嘉定九年，公元一二一六年，张致军攻陷兴中府后，见蒙古军以迂回方式向其两翼同时进攻，强致乃集中兵力于中央，续向西进犯。木华黎军既已取得外线，乃决心诱致张致军于锦州以西而聚歼之。其包围部署如左：

使吾也而等率一部急攻溜石山（在今朝阳县东南）。谕之曰：“急攻之，贼必赴援，我截其归路，致可擒也!”又遣蒙古不花屯永德县（即今朝阳东南巴图营），以邀击张致援军。木华黎引军驰神水县（即今朝阳东南松岭门西北蘇家营古城）以东，完成外线作战分进合击之有利态势，以待张致军。（续通监卷百六十）

张致时已自兴中府进军至利州（即今凌源东之大城子），闻蒙古军攻溜石山甚急，以溜石山乃锦兴要道路口所在、势宜必救，果遣张鲸之子东平率骑兵八千，步兵三万自西而东赶来赴援。木华黎所部进抵神水以东时，张东平向东而来之援军已入其术中，木华黎乃与蒙古不花军左右夹击之。木华黎更选善射者数千人，令之曰：“贼步兵无甲、疾射之!”比张东平之步队被射而乱，木华黎麾骑兵突击，于是张东平大败。蒙古阵斩东平及士卒之首，凡万三千余级。张致知其侄东平败亡，乃即集其军回到锦州。木华黎麾军进围锦州。张致遣张太平高益出战，又败，斩首三千余级。锦州城被围数月，高益缚张致出降。张致伏诛后、广宁刘炎、懿州田和尚亦来降。木华黎曰：“此叛贼，不杀之无以惩后。”遂尽戳其众。乃东进军攻拔复州（今辽宁复县）等地。辽东辽西悉平。（元史，木华黎传）

第七节战后之政局

宋嘉定十年，即成吉思汗十二年（公元一一二七年）春，木华黎立下“平定辽西，重定辽东之功”乃还漠北，覲成吉思汗于土拉河上，秋8月，成吉思汗诏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

先是木华黎在金人境内，金人威呼之为国王，成吉思汗闻知，曰：“此嘉兆也”!至是遂封木华黎为国王，赐誓劵金印。文曰：“子孙传国，世世不绝”。又以汪古特万人、兀鲁特四千人编为木华黎亲军。亦乞剌思人二千，由孛徒古儿干统之。兀鲁特人一千，由木勒格哈儿札统之。宏吉剌人三千，由阿勒赤那颜统之。札剌亦儿人二千，由木华黎弟带孙统之。其余之契丹兵及女真兵，由吾也而与蒙古不花统之。以上诸军，皆受木华黎节制，并谕木华黎曰：“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

南，卿其勉之，”赐大驾所建九苏大旗。仍谕诸将曰：“木华黎建此旗以号令诸将，犹朕之号令也。”木华黎遂承命建行省中都，以经略中原。（上引见多桑蒙古史，一卷五章）

宋嘉定十一年，金宣宗典定二年、成吉思汗十三年、公元一二一八年，木华黎挥军攻取河南诸州郡，金遣使向蒙古乞降，成吉思汗不允。因蒙古主力西征，木华黎战力薄弱、蒙金战事遂陷于停顿状态，至宋嘉定十三年成吉思汗十五年木华黎以收降各军之力，竟略定河北，进取山东。翌年又引军北上，自东胜州涉黄河，转军西上，会蒙古留在西夏军五万，引之而束，历取陕北、关中、晋南等地。嗣后金以河北久经战事、地多残破，遂尽弃河北、山东、关中，惟并力守河南，保潼关。东西二千余里，立四行省，以二十万金兵守御之，由是蒙金遂形成隔河对峙之局势。

金国至此，黄河以北土地，全部丧失。金军虽仍有零星留驻河北者，只以蒙古军力未到，或尚未及撤退之故。残兵败将，唐集潼关——洛阳——开封东西狭长地带，已形成必败将亡之悲惨颓局。若非蒙古有事于西域，成吉思汗大军西征，其亡国命运，旦夕间事耳。

金以北边遭受蒙古攻击，不能两面作战，乃遣使与南宋约和，因而成立“嘉定和议”，是为宋金最后一次和议。宋朝函送韩佗胄首级于金，完全接受了金人条件，时在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公元1208年）。翌年成吉思汗大举伐金，金人忙于应付北敌，再无力南顾。成吉思汗九年（金贞祐二年宋嘉定七年公元一二一四）金主接受蒙古皱下之盟，宋宁宗亦采纳起居舍人真德秀建议，毁“嘉定和议”，罢所纳岁币。韩佗胄死后，史弥远用事，政治消沈如故，宋因之亦不能向金朝有所乘机复仇之举。

西夏自宋嘉定元年，即金大宋元年（公元1208年），其主安全（夏襄宗）纳女向蒙古请降以和后，其后两年，安全去世，族子遵顼继立，是为夏种宗，从宋嘉定六年即金宣宗贞祐元年（公元1213）起，夏金忽然失和，金国不惜于两面作战在西陲与西夏大起干戈，迹战多年，两败俱伤。诚乃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也。

金蒙战争到兴定元年（公元1217）止，金人中都北京均告沦陷，黄河以北，数百城池，均为蒙古人所有。此时蒙古军如一鼓作气，定可席卷汴洛，灭掉金国。不料此时忽在西域方面，发生纠纷，成吉思汗不得不将中国方面战争，暂置于休战状态，而以全力西征。金人亦幸于获得此一机会，以苟延残喘。

兹将蒙古西征动机，概述如下：成吉思汗统一诸部以后，征服乃蛮（今科布多地方），其汗之于屈出律亡走西辽，西辽君主直鲁古见屈出律父死国亡，非常可怜，优予款待，并将女儿妻之。直鲁古年老好游乐，不理政事。屈出律遂乘机篡位，更企图复与乃蛮，因派人图归故土，拟乘蒙古伐金机会，重整旧业。成吉思汗虑其死恢复燃，乃遗者别

带领大军，扫荡乃蛮残部，并进击西辽屈出律，是为蒙古军西征之先声。

第六章 蒙古灭夏、金诸战役

自宋嘉定八年，即成吉思汗十年金宣宗贞祐三年（公元一二一五）正月，蒙古败金进援中都之师，5月遂拔金中都，是年秋取金城邑八百六十二。翊年10月克金潼关，旋失之。

宋嘉定十年（公元1217），成吉思汗准备西征，命木华黎总帅保持所得金国五分之四地面。以待其西征归来。

宋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成吉思汗自西域班师，翊年回到漠北，宋理宗宝庆二年（公元1226）第五次征西夏，田年6月灭西夏：8月成吉思汗死，宋绍定二年（公元122九）窝阔台继为蒙古大汗，翊年再由陕攻金，取秦晋，绍定四年（公元1231）蒙古假道于宋以伐金，有钩州三峯山之战，绍定元年（公元1233）金主走蔡州，翊年蒙古灭金。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

一、金国方面

金之中都既陷于蒙古，金朝之宗庙社稷陵寝宫室府库，以及圉籍重器，百年累积，一朝尽弃，庙议群情，影响至钜。即闾阎细民，亦颙望朝廷，早整师旅，指日北上，速为恢复北方收复故国之计。况金原起自东北，东京、北京及中都沦陷，其国家根本业已动摇。宣宗痛悼之余，规复心切，于是亟诏百官，针对当前情势，议计所以为长久之利者。当有翰林士徒单镐等十六人进曰："制兵有三：一曰战，二曰和，三曰守，今欲战则兵力不足，欲和则彼不肯从，惟有守耳。河朔州郡，兹既残破，不可一概俱守，宜取愿就迁徙者，屯于河南，陕西，其不愿者，许自推首长，保聚险阻。"刑部侍郎奥屯胡撒合等人。以为上并意见，过于保守，乃进言曰："河北之于河南，有辅车之势。蒲（时州名即今山西久济）、解（今山西解县）之于陕西，有襟喉之要，若尽徙其民，是撤其藩篱也，宜令州郡，遴选才干出群能料众迁徙者，屯戍河北，防守险隘，量给之食，授以旷土，尽力耕稼，置侨治之官以抚循之，择其壮者教之战阵。勅晋安（今山西省东南部），河中（今山西省永济县古蒲州时为河中府）守臣、檄石、岚、汾、霍（指今山西省西部各县地）之兵，以谋恢复，莫大之便。"兵部尚书乌林答兴等二十一人进曰："河朔诸州，亲民掌兵之职，择土著之曾居官有材略者授之，急则走险，无事则耕种。"移剌光租等进曰："度太原之势，虽暂失之，顷亦可复，当募士人威望服众者，假以方面重权，能克服一道，即以本道总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长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复业。"而宰臣则欲置公府重赏，以致效命之士。宣宗意未决。御史中丞完颜伯嘉曰："宋人以虚名致李全，遂有山东实地，苟能统众守土，虽三公亦何惜焉。"宣宗曰："他日事定，公府无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节镇何不可者。"宣宗意乃决，于是广封诸公，除总帅各本路兵马兼事宣抚外，并

持准署置官吏，徽敛税赋，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事。仍赐诏曰：“乃者边防不守，河朔失宁，卿等自总戎昭，备弹忠力，若能自效，朕复何忧!宜应茅上之封，复赐忠臣之号，除已划定所管州县外，如能收复邻近州县者，亦听管属，”同时高悬赏格，召示中外，以奖励忠勇，寄冀规复中都于万一。

（续通鉴卷百六十一）金宣宗为规复中都，所设定之赏格如次：

一、主帅及官军与义勇将校，有能率众从取中都者，封王。

二、能从战中怯敌，或善诱降人，取附近诸州县者，予本处长官。

三、其余州县，递减二等。

对于在作战中，能以“以寡击众者，亦优列赏赐如左：

一、能以一千人，败敌三千人者，赐及绍麻（家族五服中最轻者，凡本宗之高祖父母，异姓中中表兄弟，妻父母，外孙等皆为缌麻亲）以上亲。

二、能以一千人，败敌二千人者，赐及大功（本宗堂兄弟，在室堂姊妹，已嫁姑，已嫁姊妹、众孙、众子妇、侄妇等皆为大功亲）以上亲。

三、能以一千人，败敌一千人以上者，赐其全家（即包括其本人及本人之妻，父母、祖父母、兄弟、姊妹、子女、诸侄及侄女，孙子女等）。

金宣宗离中都迁于南京汴梁之初，黄河以北人士，愤于蒙古军残暴，率相团结，以求自保。

其间更有揭竿而起，挺而走险者，即或为义民，或为盗贼，但皆以抗拒蒙古为大旨。际此重赏号召之下，一时河北、山东忠贞之士，更争率众起义，若苗道润、王福……等人，乃其中佼佼者也。苗道润初为河北义军队长，以功授宣武将军，旋迁怀远大将军，加中都留守，兼经略使。前后抚定凡五十余城。然终以草莽乍起，节制不一，其内部自相倾轧，法纪漫散，而义军规复中都之努力，亦成泡影。

二、蒙古方面

蒙古成吉思汗自宋嘉定十年，即成吉思汗十二年（公元1217）起，乃命木华黎总帅对金南征，而自己则锐意经略西域。同时将蒙古兵力几乎全数使用于西征方面，术华黎手下，仅剩下一些由蒙古将领统领之收降外族之军队，如孛徒古儿干所统之二千亦乞刺思人；本勒格哈儿札所统之一千兀鲁待人；阿勒赤那颜所统之三千宏吉剌人；带孙所统之二千札剌亦儿人；吾也而所统之契丹人；蒙古不花所统之女真人；木华黎自

领之一万汪古特人，四千兀鲁特人等，皆非蒙古正式军队。不过成吉思汗将征金之全权付诸木华黎，许其便宜行事。故木华黎得利用各种力量，以保有既得之成果，而逐日扩张之，其伐金之军事经过，概略如次；木华黎奉命后先敉定山西，次勘定河北，于来嘉定十三年、即成吉思汗十五年、金宣宗典定四年（公元122○），略地至真定府，明年秋，金主遣乌古理仲端往成吉思汗西域行在乞和，成吉思汗以“割付潼关以西未下数城，降封金主为河南王作条件”。金主不能从，木华黎乃趋军至陕西，于宋嘉定十六年、成吉思汗十八年、金宣宗元光二年（公元1223）略地至凤翔，木华黎虽卒于军次，但金蒙间之军事街突，仍持续于秦陇河朔间（续通监卷百六十一）

翌年（公元1224），成吉思汗自西域班师，回至漠北土挽河上。金宣宗殂，金哀宗守绪立，改元正大。宋宁宗崩，宋臣史弥远拥立新帝是为宋理宗。翊年，成吉思汗为便于大举伐金，乃先举兵尽力攻打西夏。秋7月，西夏不支而亡。8月，成吉思汗亦死。遣命其第三于窝阔台继位，并命设法联合南宋，以夹击金朝。

蒙古旧制：家有男子，十五至七十岁者，无众寡皆为兵。窝阔台继立为大汗，乃先致力于统一军制，诏“兄弟诸王诸子并诸官人等所属去处，佥军事理，有妄分彼此者罪之。”同时广徵兵马，以备远征军事。

蒙古由于疆域日广，民丁益众，原有佥军法制，仅适用于蒙古，对同、汉人等必得加以修正。使之广用；其所谓新愈军法制大要：

一、兵员：每一牌子，佥军一名，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者充之。仍立千户，百户，牌子头，分层节制。其隐匿不实及知情不报井隐匿逃役军人者，皆处死。同时徵集各处人匠充军（织匠及建宫殿人匠除外），制造衣甲、箭杖、弓矢，刀斧、辎重，置之仓府，以备急用，此外并仓新附州县兵丁从军，复从新册籍民户，以备佥军。

二、马匹：蒙古马政，初成吉思汗定制，其法为：千百户之子选为护卫，傔从十人或五人，所乘之马，于千百户内取之，牌子头则取于十户之内。窝阔台仍其旧制，同时更增括牛马。

令蒙古人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NC164牛一，羊百者输羚羊一，以充实军用。

三、对于赋税则规定：中原人以户计出赋调，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以各适其情。复增编军旅，立三万户，分统漠兵，以刘里马、粘合重山、史天泽分任万户长，分屯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州各路，以镇抚新归诸地，并肃清金人留置河化之残军。窝阔台更采耶律楚材之建议兴建仓廪，广备军需，普设驿传，以利通讯，制定课税，充实府库。时山东河北底定伊始，有欠宁靖，丧乱频年，民不聊生。窝阔台熟知中原之地，乃财赋所本，足以一面安排百姓，劝民勤耕，以足民食；一面严禁州县，擅行科差，以恤民困。继则均定天下赋税；商贾三十而

一，丝绢依户纳赋，酒醋监铁山泽之利，验实课息，计每岁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疋，栗四百万石，南征军需，足用有余。诸凡州郡长之副贰，则悉用当地或熟悉当地民情之人，用杜蒙古或西城人揽权跋扈之渐。于是华北地区，农事复兴，蒙古于武功之除，亦开始于政治生活焉。

第二节双方战略指导

一、金国战略指导

当蒙古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时，蒙古对金国只留木华黎统帅杂牌军队继续作战，实力单薄，控制广大地区，实是金朝反攻之良机，况在金国沦陷地区中，东京北京尚有张致之变，中都附近有苗道润等之变，惜金皆不能支援之。及金宣宗既明乎恢复中都之无望，复感于蒙古势力之难于扼阻，乃集军储备河防，确保河南，巩固秦陇，争取时日以恢复实力。于是对外敦睦邦交，屡遣信使周旋折街于宋夏蒙古之间，对内严兵利器，广徵各路义士士兵，番汉弓手人匠，并预徙街要州郡牲畜民粮于寸守之处，没修城砦，以固防守。惟宰相术虎高琪，阿谀曲从，附下罔上，喜吏恶儒，好兵厌静。阻迁移之议，效和宋之谋。且宣宗寡断，将相怯弱，终至兵连宋夏，怨结三方，内致困惫，自速灭亡，犹之肛羸病夫，元气所存无几，复为缪医投以乌彖附子，只祇其亡环!待至哀宗，无足为矣!按术虎高琪，初充护卫十人长，山职河问都总管判官，旋迁宿直将军，又除建州刺史，后因与宋人力战，奋勇有功，累官镇州防御使权元帅右都监，贞祐（金宣宗年号以公元1213为元年）初迁元帅右盟军，施被诏自镇州移军，守御中都，海战辄败，而术虎高琪以畏死竟擅杀权相胡沙里执中，宣宗赦其罪，且以之为左副元帅，并召示中外，曲为之说，以息术虎高琪专杀之议。顷拜平章政事。术虎高琪既乏功勋，亦无公望，邀功委过，爵位日隆，权威日重，中外吴之。臣有谏者，宣宗辄曰：“既委之权，安得不重？”自是益妬贤能，树党羽，窃弄威权。自作威福。孰拂其意，辄杖杀之。灭乱纪纲，祸害忠良。自此金室军国利害，无复敢言者。初息州透漏宋人，术虎高琪请伐宋，以广疆上。宣宗曰：“朕但能守租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讨？”术虎高琪谢曰：“今雨雪应期，皆圣德所致，而能包容小国，天下幸甚!臣言过矣。”其阿谀若是。然旋遗将经略南边。寻复诏罢兵，而自是与宋绝矣。半載以后，右司谏许古谏曰：“宋见吾势大，必坚守不出，我军仓猝无得，须还以就粮，彼役乘而袭之，使我欲战不能，欲迟不得，宋有江南策蓄之余，我止河南一路征斂之弊，可为寒心，愿陛下隐忍，远行止战，果通和好，则蒙古闻之，亦将斂跡，以为吾能掣肘故也!河南既得息肩，然后经略朔方，则陛下享中兴之福，天下赖涵养之庆矣!惟陛下略近功，虑后患，不胜幸拄!”宣宗命古草诏，以示宰臣。龙虎高琪曰：“辞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事遂寝。胥鼎再谏伐宋。术虎高琪曰：“大军已进，无复可议”其跋扈专权，有如是者。（金史术虎高琪传）

二、蒙古战略指导

当时中国，金扼中原，宋领江汉，夏据河西。三大势力，彼此烦轧，正好让蒙古坐收渔利。

初西夏结于辽而兴，每合辽以扼宋。辽亡金兴，西夏又依附女真，仍与赵宋敌对，顿收远交近攻之效。及至成古思汗称帝，西夏复转而藩服蒙古，仍欲师其故智，惟成吉思汗卧塌之旁不容酣睡。而实力固日益衰弱矣!居于江东之宋朝，与金世仇而不能雪耻，自南渡后，积弱不振，只能偏安江南，已无恢复中原之志，及金室未年，亦晚连衰飒，欲振无力，而金一般臣民却对宋轻视，惧北凌南，但对南部边将之自动侵扰宋边，金主却未尝不切责深戒。蓋金主深知蒙古新兴于朔北，日益隆盛，兵行万里，灭国四十，将及于己也。金亡必及于宋，故当时金夏宋三国，应唇齿相依，互为表里，惟蒙古却在暗中使人破坏三国之团结。

金哀宗守绪，固会围联南宋，结西夏，企图合踪以拒蒙古。然有术虎高琪擅权于内，蒙古威胁分化于外，兼以三国间，迄未建立共同谅解，故最后终为蒙古强敌各个击破。

成吉思汗知宋与金为世仇，久欲联宋以反击金国，因有西征之举，未及实现其理想，待其西征归来，于势必得先行击灭西夏，然后才可以运用大军，继续攻金，而联宋攻金之国正在念念不忘之中。

蒙古对于攻城作战，已知非万不得巳时，应避免强攻。因有对西夏攻城经验，对金黄河以北之攻城作战经验，城池可以用不攻而自破之法以驳之，即席AB5城以外各地，长期孤立而困之，城中粮尽，自然出降。惟此法旷日持久，为蒙古人所不能耐也。但对于席卷城池以外之各地，即对于城池所实行之包围迂回，则正是蒙古人之所擅长。成吉思汗不欲对金实行逐一城池之攻略战，故而想出由金国之侧背整个迂回以攻金之背后，甚至于与金之敌国联合，以孤立金国，假道于宋以攻金后等想法。

蒙古与金人为世仇，成吉思汗早有灭金之志。此次西征，大获全胜，班师归来，分封四子，岂有再容完颜立国之理，故于还和林之秋（即宋理宗宝庆元年成吉思汗二十年公元122五）即兴兵南下欲击灭西夏，盖伐西夏，乃攻金之前奏也。成吉思汗不幸于灭西夏途中病殁。

当年蒙古伐金之作战方略，可于其遗嘱中，窥其全貌。“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唐邓（时唐州在今河南唐河县邓州在今河南邓县），直NC162大梁（即汴梁，今开封，时为金临时国都），金急必徵兵潼关，然后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元史卷一太祖本记）

第三节作战经过

一、西夏之亡

宋理宗宝庆元年，即成吉思汗廿年（公元122五）春，成吉思汗自西域班师返回其在土拉河滨的和林（今库伦西南）旧帐，计自十三年（公元1228）出征，凡历七年始还。当其班师时，他即将所征取的西域土地及其基地，分配于四个儿子，以蒙古发祥地封四子拖雷，蒙古西北方叶密立河梳域封三子窝阔台，小亚锡尔河流域封次子察合台，西方宽田吉斯（里海）封长子术赤。（此为初封，并非后之四大汗国。）就在当年秋，以西夏背约不听命，再发兵征之，于是蒙古与夏金之战，再度展开。

成吉思汗先会四伐西夏，攻至夏都兴废城下，夏主安全（夏襄宗）纳女请降以和。越两年（金大安三年，宋嘉定四年，公元1221），安全去世，族子遵顼继立，是为夏种宗。忽与金人启衅，大起干戈，结战十年，两败俱伤。就因与金有战争而不肯出兵随成吉思汗西征，于公元一二一八年曾遭到成吉思汗的第四次攻击，一因夏主逃离夏都，二因成吉思汗忙于西征不便多事停留，故战无结果而散。夏主惧于两面受敌，乃于宋宁宗嘉定十七年、即金正大元年（公元1224），夏与金两国罢兵言和。先一年夏主遵顼自称太上皇，传位于其子德旺，是为夏献宗。德旺即位后三年（公元122五），即成吉思汗大兵伐西夏之年（成吉思汗二十一年），蒙古人藉口，夏于投降之后之不守诺言，未纳质子，不肯派兵从征西域。翌年（公元1226）连陷西凉府（今甘肃武威），朔罗（今称黑水域）、阿罗诸城。献宗德旺惊悸而死，其弟南平王继位，是为夏末帝。成吉思汗曾在此次作战中坠马受伤，扶病继续指挥，是年（公元1226）参攻下灵州城（今宁夏省灵武县。蒙古史称为朵儿蔑该）。夏人起倾国之兵五十万来战，为成吉思汗大败于黄河之滨。

据说皮吉思汗在病中，自变将不起，1日召窝阔台、拖雷两子至前，屏人密语道：“一我寿已将终，赖天人之助，为汝等建一大国。自国之中心，达于诸方边极之地，皆有一年行程。汝等如欲长保此国，必同心御敌。大位必有一人继承，我死之后，应奉窝阔台为主，不得违背我命。”来年即宋宝庆三年，成吉思汗二十二年（公元1227）春，蒙古尽取西夏黄河南北之地。是年秋，成吉思汗便病死在六盘山之萨里川，时为成吉思汗称汗之第廿二年，（宋理宗宝庆三年，金哀宗正大四年，公元1227）8月。享年七十三岁。留有遗嘱二：一为未能灭金为憾事，因指示伐金机宜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唐邓，直NC162大梁。金急必徵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二一是令诸将守秘，必待俘杀西夏主后发丧。（上引见元史卷一，太租本纪）

此时西夏国土，已完全陷落，军民死伤殆尽，白骨蔽野，只剩下一

个兴庆府，（夏首都即今宁夏省银川市），夏主终于力屈投降，于向蒙古叩首中而被蒙古杀死，西夏从此诚亡。计自元吴称帝，凡传十主，共一百九十年。西夏既亡。蒙古诸皇子大臣乃为成吉思汗发丧成礼，共奉灵柩，回到漠北三河源头故乡，葬于一棵大树之下，不起坟垅，而遍植树木，使人不知陵墓所在。

二、蒙古军底定秦晋

金蒙之和议未成

成吉思汗死后，暂由拖雷监国。明年召开库里尔台大会（蒙古选汗会议），察哈台、拔都（时术赤已死，子拔都继之（窝阔台及诸王公来会。因遵遣命共奉窝阔台为大汗，是谓元太宗。

窝阔台即位之后，即召集将士，共议伐金。时蒙古军仍在陕南继续作战，金人则集聚精兵二十万众，并力守河南，保潼关、对陕西关中仅以一部兵力备之。是以陕西方面之作战，数年来虽在持续进行，迄无激烈战斗，其双方主要行动概如左：

在成吉思汗二十二年（公元1227年）春，蒙古军下平阳，5月，金廷庙议乞和，蒙古军续陷临洮。时金陕西行省向朝中进献三策：上策请金主自将出战；中策请金主幸陕州，就近擘划战机；下策弃秦陇，保潼关，以利战御，金主均不从。6月金遣完颜合周为议和使，向蒙古乞和，7月蒙古军自凤翔徇京兆（今长安市），关中大震，金陕西行省，于是仓民军，劝率富民，入保城寨，且通令百姓知避兵之计。12月蒙古军下商州。翌年（公元1228）正月，金遣知开封府事完颜麻斤出，往蒙古弔慰成吉思汗之丧，12月金主以麻斤出奉使不职，免死除名，改遣兀颜纳申充国信使，往蒙古致成吉恩汗之赗，窝阔台却之不受，元太宗元年（公元122九）冬10月，蒙古将赤佬温率师屯庆阳（甘肃今县），金复遣使奉羊酒币帛，乞和以缓师。明年（公元1230）夏，窝阔台遣唐庆等往金议和，复遗斡骨栾为小使，迳赴陕西行省议事，几经折街，和议垂成。当斡骨栾北还复命之际，金陕西左副元帅矛吾塔者，因解庆阳之围，志气骄满，谓斡骨乐曰：“我已准备军马，战则请来!”语出不逊。斡骨栾归以实闻。窝阔台怒，决自将伐金，金复遗完颜纳申来聘，窝阔台拒之。

窝阔台进军秦晋

宋理宗绍定三年、即元太宗二年（公元1230）7月，窝阔台既决意自将伐金，乃率群臣诸王大将，祈祷于天，行9日敬礼。礼毕，命斡赤斤留守，皇弟拖雷携其子蒙哥及诸将从行。其战略指导：先命万户长史天泽就近攻衙州（今河南省汲县），威胁金都汴京，以掩蔽大军前进之企图。8月史天泽下街州。窝阔台自率大军渡漠而南，越阴山，自山西东北角入晋，经大同，循黄河东侧南下。由拖雷率子蒙哥及诸王阿勒赤等各部兵马为前锋，远出窝阔台本队之先前进。冬10月，一面进军，一

面遣速哥使于金，以松懈金廷之抵抗情绪。11月命原在陕西南部作战之蒙古军，袭击潼关，攻取蓝田关，以取策应大军之进攻晋南。12月，拖雷以所部在河津附近渡黄河而西，袭取韩城（陕西今县）、蒲城（陕西今县），傍渭河西向凤翔挺进，窝阔台所部之主力军，当时屯于平阳（今山西临汾县）以牵制河中府方面之金兵。

拖雷取陕西

截至元太宗二年（公元1230）冬季，金室对陕、陇、河中、河南各方面之防备，概作如左之调整：一、对秦陇方面之京兆、凤翔、庆阳、平凉诸州府，增益步卒，抽调忠孝马军入关，以加强京畿外围之突击力。二、改置陕西两路行省于阌乡，以备潼关。三、部署大要：

以平章政事完颜合达，权参知政事移刺蒲阿行省事于阌乡。忠孝军总领完颜陈和尚统颁忠孝马军入关，屯于均（今河南省新郑县）许（今河南许昌），恒仙公武仙屯戍卫州（今河南汲县）尚书右丞白撒增筑归德（今河南商邱）城隍，权签枢密院事完颜讹可屯军邠州（今陕西邢县），总帅纥石烈矛吾塔屯戍京兆（即今陕西西安），凤翔知府本路兵马都总管元帅左都监兼行兰，会、洮、河四州（今甘肃黄河南岸之线）元帅府事郭虾蟆屯戍甘肃南部。权签枢密院事草火讹可二兀帅板子讷可屯戍河中府（山西永济），总帅那合买住屯守潼关。翌年（公元1231）春正月，蒙古拖雷以按察儿率军围凤翔。金完颜合达、移刺蒲阿二相宴然不动。金室宰相台谏，皆以枢院瞻望逗留为言，京兆士庶横议鼂起，以致诸相力奏。金哀宗曰：“合达、蒲阿必相度机会，可进而进耳!若督之使战，终出勉强，无益而反害也。”因遣枢密院判官白华往，道宰相百官所言。并问以：“自今2月过半，敌有怠归之形，诸军何故不动？”合达言曰：“不见机会，见则动耳。”蒲阿曰：“彼军绝无粮饷，使欲战不得，欲留不能，将自敝矣。”而合达对蒲阿及诸帅，则言不可动，见土大夫，则言可动。白华观二相，见北兵势大，皆有惧心，遂私问樊泽、定住、陈和尚以为如何？三人皆曰：“他人言北兵疲困，故曰可攻，此言非也!大兵所在，岂可轻料？”白华遂以二相及诸将意奏闻。金哀宗曰：“我故知其怯，不敢动矣。”即后遣白华传旨谕二相云：“凤翔围久，恐守者力不能支，行省当领军出开。宿华阴界，次日及华阴，次日及华州，略与渭北敌军交手，计元兵闻之，必当奔赴，以少纾凤翔之急，我亦得为掣肘计耳!”金二相回奏：“领旨。”白华东还，及中牟，已有两行省纳奏之人追及，白华取报枢密院副本读之。言：“顿旨提军出关二十里，至华阴界与渭北元兵交战，是晚收军入关。”白华为之仰天浩叹曰：“事至如此，无如之何矣!”不二三日，拖雷军遂攻克凤翔。（绩通监卷百六十五及金史百一十四白华传）

凤翔府既陷，金陕西两行省放弃京兆，命牙吾塔起迁京兆居民于河南，命元帅庆山奴以行省官衔防守京兆，合达、蒲阿东走洛阳。时京兆行省止有病卒八百，瘦马二百，庆山奴惧不能守，屡上奏请还，朝廷不许。9月窝阔台进迫河中府。金元帅庆山奴弃京兆还朝，留保义军提控苟琪守之，金主召合达，蒲阿引兵趋河中府，金二相惧不敢进，值师次

陕州，以为凿援。

蒙古军攻河中府时，金二相遣元帅王敢率兵万人救之。12月窝阔台军陷河中府，金权签枢密院事草火讹可战死二兀帅板子讷可提败卒三千夺船走阌乡，金主怒其不能死节杖杀之。

三、蒙古假道伐金

蒙古军作战部署

元太宗三年（公元1231）春，蒙古军既克凤翔，金平凉府、庆阳府及邪州等处皆向蒙古迎降。5月，拖雷及诸王大将齐集窝阔台前，议伐金之策。计议之始，窝阔合谓群臣曰："人言耗国家者，寅由敌寇，今金未殄，实我敌也，诸君宁无计乎？"施雷进曰："臣有愚计，非众可闻。"窝阔台屏左右，亟临问之，施雷曰："金主迁汴，二十年矣，所恃者黄河渔关之险耳!若出宝鸡，道汉中，不1月，可抵唐、邓，金人失险，首尾不相顾，我取之如采蠹践物矣。"窝阔台大喜。语诸大臣曰："昔太祖临崩，尝留遗志，嘱尔后伐金，应假途于宋，由唐邓以捣大梁，今拖雷能言之，真赛因（赛音顶好之意）也。遂议定假道于宋以优金侧背。（蒙兀儿史记，卷三十三）拖雷传。

蒙古诸王诸将，计议既定，窝阔台乃决策三路伐金：

一、以一路为左军，附以山东、河北原驻汉军，由斡陈那颜领之，由济南进军，向汴京东方挺进。

二、主力军由窝阔台大汗亲将，先拔河中，强渡孟津，以进追汴京。

三、以三万骑为右军，由拖雷总之，假道于宋，迂回唐邓。

三路大军期以明年春（元太宗五年），会师于汴京。

拖雷军作战指导（下引见多桑蒙古吏二卷一章）

拖雷既受假道于宋之命，乃自凤翔进屯宝鸡，并先遣搠不罕往宋假道，且请宋室出兵协力伐金。8月，搠不平至宋境沔州青野原（在今陕西略阳县），为宋将张宣所杀。拖雷及闻宋杀使人，曰："宋自食言，背弃盟好，今日之事，曲直有蹄矣!"遂总三万军马，渡渭水，入大散关，破凤州（凤县），趋华阳，出武休关（在凤县东南百里处），进入宋境，围兴元府（即今汉中南郑），屠洋州（今洋县），于是宋室军民散走，死伤数十万。

拖雷为求大军东进，背后需要安全，对于四川北部之敌对力量，势须先予扫荡。于是分军为二：西军别路入沔州（今陕西略阳），以取四川，军士撤屋为筏，渡嘉陵江而入川，取葭萌（在今四川昭化），破四

川北部城寨百四十而还。11月，此军回至兴元，洋州间，与东军合，然后，拖雷乃率其全军东进，出饶风关，取金州（今陕西省安康县），房（今湖北省房县）二州。破宋兵于武当山，而趋均州（今湖北省均县），一面准备渡汉水，一面遣夔曲涅帅千骑，以进军情形，驰报窝阔台。窝阔台方欲渡河，分兵南下以接应拖雷军，会夔曲涅来报，即日遣之返，约定期南北会师。

金屯军襄、邓

元太宗三年（公元1231）11月，蒙古军进至饶风开。金主乃急召诸臣入议。枢密院建议："今京师积粮数百万斛，以重兵屯睢、郑、昌、武、归德及京畿诸县。以大将守洛阳潼关怀孟等处。严兵备之。今河南州郡，坚壁清野，使敌欲攻不能，欲战不得，师老食尽，不击自归矣!敢请吾主以逸待劳，不可迎战。"金哀宗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竭肝脑以养军，今敌至不能迎战，止以自护，京城纵存，何以国为？天下其谓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与亡，有天命，惟不负吾民可也。"遂不从诸臣议，而召诸将屯军襄邓。

12月，河中府破，金将潼关二相合达、蒲阿率诸军南趋邓州。杨沃衍、陈和尚，武仙亦引兵来会。步骑凡十五万之众。以步军多，骑兵少，乃合电于今河南内乡之顺阳城。

完颜合达与移剌蒲阿侦知蒙古军于17日戊辰渡汉水，乃召诸将议，问诸将曰："由光化截汉江与战为便？抑纵之渡而后战为便？"张惠按得木皆进曰："以截江为便，纵之渡，我腹空虚能不为所溃乎？"蒲阿麾之曰："汝南人也，但知南事，于此事何知？"合达乃间按得木，按得木亦以截江击之为便。金军中以按得木为北人，必知北军情，颇重此言，然不能夺蒲阿之议。遂师屯顺阳。20日辛未，蒙古军渡毕，金光化探骑报云："蒙古千骑已北渡。"两相是夜进军，比晚进至淅川县南三十里之禹山。

钧州三峯山歼灭战（续通鉴卷百六十五）

12月17日戊辰，拖雷挥所部于光化附近北渡汉江，至20日辛未，计四天，全军渡毕。

合达蒲阿列步兵于禹山之前，屯骑兵于禹山之后，分踞地势二相立军高山，日未出，拖雷军至金兵阵前，即以两小旗前导，来至山前，观察形势。既而麾其军，散如汇翎，转山麓，出金骑兵之后，分三队而至。蒲阿犹谓其将曰："今日之势，尚不当战，且待之。"俄而蒙古骑兵突阵，金兵不得不战。至以短兵相接，战三交，蒙古丘爹却，蒙古兵在西者，复向蒲阿亲军环绕甲骑之梭突击之，金兵力战，蒙军始却，营于三十里之外。蒲阿乃以旗聚众将议，张惠曰："彼虽号三万，而辎重三之一焉!又相持二三日，不得食，秉其却退，常速摧之!"蒲阿曰："江路已绝，黄河不冰，彼入重地，将安归乎？何以速为？"故按兵不进。

明日，蒙古兵忽不知所在，营火寂然。金两相及诸将议：“四日不见军，又不见营，邓州津渡及路人不绝，独不见蒙古军，岂南渡而归乎？”已而逻骑还报，始知蒙古军在光化对岸枣林中，已四日，昼作食，夜不下马。林外不闻音响。（金史卷百十二，移剌蒲阿传）

初禹山战罢，有蒙古二骑，迷入金营，金军问之。复有蒙古十人，敝友羸马，泣诉难苦，两省信之，易以肥马，饮之酒，及煖衣食，而置之阵后。十人者皆鞭马而去。二相始知其为觇骑也。合达、蒲阿议入邓州，补充粮食，30日辛已傍午两相率军行至林后。蒙古军忽至。

合达蒲阿麾军迎战，交绥之际，蒙古军以百骑邀金军辎重而去，金军几不成列。是夜二鼓，合达，蒲阿引军入邓州城，惧军士迷路，鸣钟召之来集。二相隐其败，以大捷报闻。金廷百官表贺，诸相置酒以庆。当时左丞李蹊曰：“非今日之捷，生灵之祸，可胜言哉!”（续通监卷百六十五）

先是河南闻蒙古军出饶风，百姓入城聚，保险固，及闻蒙古军败退，民之入城堡者，皆敌还乡社。不数日蒙古游骑突至，民无所逃，多被俘获。拖雷既尽得金军虚实，并夺获金军辎重，乘夜追蹑金军，比至邓，金军已入城，围之。三日不下，相持至岁除。元太宗四年（公元1232年）正月初一日壬午，金人耀兵城外，拖雷不与战，集诸将议：以顿兵坚城下，非计，乃悉帅大军险邓州而北，命札剌儿率三干骑殿后。于是泌阳、南阳、方城、襄城、陕州（今陕县）诸城皆破，金军积聚，焚毁无余。合达蒲阿惧蒙古军乘虚袭京城，乃谋入援，途亦弃邓州，蹑蒙古之后。

金主既知金军败绩，乃遗完颜麻斤出等部民兵万人，决河水以卫京城，初2日癸未，金主置尚书省枢密院于宫中，以便召问议事，应付非常，同时驰召合达蒲阿率两省军赴汴，命总帅撒合将步骑三万巡视河津，迁近京诸邑家属五十万口入京。二相率骑军二万，步十三万分数路北上，同（正）月12日蒙古军次五朵山（今河南镇平县西北九十里），明日晓行、大雾、迷途，金军以万骑抄袭蒙古军后卫，札剌儿战失利，蒙古军多所拆伤，拖雷怒其失律，以额勒只吉歹代之。

拖雷进军沙河（今汝河）北，问其将蘇布特以方略，答曰：“城居之人，不耐辛苦，数挑以劳之，乃可战也。”遂命失吉忽都忽以五千骑诱敌，而亲率本军待于河北，金军至，夺桥以过，蒙古军不与战，即自西首敛避。金军纵击，蒙军不战，复南渡沙河。金军欲盘营，蒙古军复渡河来袭，于是金军不得食宿，合昏天两，明且变雪，拖雷自以万骑尾金军之后。金军且战且行，至黄榆店，望钩州（今河南禹县）三十五里矣!雨雪交加，军不能进，乃与敌对垒相持。拖雷命终夜鼓噪以扰金军。（续通监卷百六十六）

16日丁酉雪益甚，金兵僵立，刀槊冻不能举，且以奉旨急于援汴，乃绩北进，及军已行，蒙军毕集前后，用树木塞道。金将杨沃衍挥军拔

树开道，武仙，高英为前锋，冲撞北进，蒙军却向三峯山（今禹县近郊）之东北及西南，武仙、高英军于山之西南、樊泽，杨沃衍军于山之东北。张惠、按得木军于三峯山之上，拖雷即欲击之，诸将请俟车驾至（即窝阳台大汗时已取郑州），破之未晚也，拖雷曰：“机不可失，脱彼入城，未易图也!况大敌当前，敢以遗君父乎？”乃麾军佯却以诱之。金将张惠、按得木立山上，望蒙军二三十万（此数不实），约厚二十里（窝阔台军自郑州来到），见敌军势却，谋曰：“此地不战，欲何为耶？”乃率骑兵万余，乘高临下而进，蒙古军回拒之。须臾雪大作，白雾蔽空，人不相见，时雪已三日，战地多麻田，雪融泥泞，人马所践，泥淖没腥，时金军有三日不食者，军士被甲胄，僵立雪中，枪槊结冻如撴，冻馁疲惫，交集金军。（上引见蒙兀儿史记卷三十三拖雷传）

先是窝阔台既定河中府，率军于同（正）月初5日丙戌由河清县白坡（在孟县西南五十里）

渡河，至13日丙午入据郑州。窝阔台先遣口温不花等帅师万骑往会拖雷军，至是拖雷合南北军围金军数重以困之，舍军土更番休息，炽薪蘸火、燔牛羊肉，炙而啖之。久之，料金军困惫已极。乃故放开往钩州之路，纵之，而伏军于前路夹击之。金军遂溃，声如山崩。正在此际，天忽开霁，日光皎然，因而金军无一人得逃者。武仙以三十骑入竹林中，杨沃衍，樊泽、张惠三军争路，蒙古军复进围之，高英残部亦弃战。杨沃衍，樊泽、高英三将先后战死，蛋惠亦步持大枪、奋战而殁，完颜合达以数百骑走入钧州城，移刺蒲阿走汴京。（下引见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初窝阔台在郑州，闻拖雷军与金军相持，毁遣军赴援，至则金军已溃，于是合军，堑钧州城外而会攻之。城破，合达匿窟室中，蒙军发而擒之。合达问速不台安在，请一见之，速不台出谓曰：“汝须臾之人耳，识我何为？”合达曰：“卿天生英豪，非偶然也，今见卿，吾死亦冥目矣。”言毕就死。

陈和尚趋避隐处，战势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国大将，欲见主帅。”蒙古兵以数骑夹之，诣拖雷，问其姓名。曰：“我忠孝军提控陈和尚也!我死乱军中，人将谓我负国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腥折之。划口吻至耳：醮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将有义之者，以马湩贫之曰：“奸男儿，他日再生，当令我得之。”移刺蒲阿于奔向汴京途中，亦为蒙古军所追获，械之至窝阔台行在，欲降之，不从，曰：“我金国大臣，惟当金国境内死耳!”遂杀之。金之健将锐卒，自是俱尽。

正月17日戊戌，窝阔台来拖雷营，拖雷为言自凤翔进兵南下，所经种种险阻，士卒饥困，至以草及人肉为食，窝阔台奖其能，谓“非吾弟，不能竟此功。”拖雷谢曰：“此虽士卒之坚忍勇敢，有以致之，然亦托可汗之福也。”金钩州既下，潼关亦降，扶沟民变，许州军，叛乱四起，金军益不复振，而金室从此披靡矣。

四、汴京外围之战

先是金室内族庆山奴弃京兆还朝，代行省事于徐州（即今江苏铜山），当钧州三峯山会战之际，自徐州分兵一万五千人援京师，过归德（今河南商邱），行次阳驿店（今名阳驿铺），遇蒙古兵，战败，庆山奴被擒死之，睢州城遂陷。东部蒙古军徇临焕集（今安徽宿县西南九十里），西部蒙古兵次卢氏（河南今县），全面展开激战。

初，金主自闻拖雷兵入饶风关后，即召行省阌乡之徒单兀典援汴。兀典遂与总帅纳合合润及秦蓝总帅完颜重喜等率军十一万五千，尽撤秦蓝诸关之备，从虢（今河南卢氏县）入陕（河南今县），搜盘同、华、阌乡一带军粮，数十万斛，备关船三百余艘，拟顺流而东。阻以蒙古兵近，粮皆不及载，船悉空下，复尽起州民，运灵宝、硖石（在陕县东南八十里即古崤陵关之地）仓粟，会蒙古游骑至，尽遭杀掠。（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金潼关守将李平于正月20日辛丑，即以潼关降，于是蒙古军出潼关，长驱入陕。兀典发阌乡军士，军士各以老幼自随，由西南纽入大山冰雪中，部将多叛去。蒙古军侦知，窝阔台乃自卢氏派数百骑追之，山路积雪，昼日冻释，泥淖及胫，随军妇女，弃掷老幼，哀号盈野，军至铁岭（即今河南卢氏县西南之铁镇关），蒙军追及，欲战而饥惫，于是重喜先降，被斩于马前，金军大液，兀典，合润均败死，于是秦陕方面次第为蒙古军所敉平。（同上书）

五、蒙古陷汴京

金哀宗汴京防卫及和谈

钧州会战直后，蒙古军绩下河南诸州郡，迄3月初，汴京周围，仅归德，洛阳两城未陷。窝阔台既取汴京四周诸城，遂还郑州，而命速不台围攻汴京。汴京城周百二十里，宫城门一十有四，金军不满四万，从集卫州（今河南汲县）义军四万并京内丁壮两万，合力御守，金主复命平章政事白撒宿上清官，枢密副使赤盏合嘉宿大佛寺，以备缓急。

3月，窝阔台自郑州遣使赴汴谕降，使者至金廷，立呈国书，以授译史，译史以授宰相，宰相跪呈，哀宗起立受之，以付有司。国书除招降外，且索翰林学士赵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归顺蒙古军之金人家属，蒲阿妻子，绣女、弓匠、鹰人等数十人，并令纳皇子为质。金室遣谏议大夫裴满阿虎带，太府监园世荣为讲和使，尚书左丞李蹊送曹王讹可出质，同时命户部侍郎杨糙权参知政事，分军防守四城。速不台闻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仍立攻具，沿濠立木栅，驱汉俘及妇女老弱负薪填壕，顷刻平壕十余步。金平章政事白撒以议和不政与战，城中喧哄。哀宗闻之，从六七骑出端门，西南面军士五六十辈进曰：“敌军填壕过半，平章传令忽放一镞，恐坏和事，岂有此计耶？”金主曰：“朕以生础之故，称臣进奉，无不顺从，上有一子，养未

长成，今往作质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鞑粗不退，汝等死战未晚。”是日曹王至蒙古营，蒙古留曹王而遗李蹊等还。是月22日癸卯，蒙古用礮并力进攻。蒙军所用之礮，破大磴或NC163碡为巨石块，填以发射。攒竹礮有至十三梢者，每城一角，置礮百余具，更迭上下，昼夜不息，数日，石几与裹城平。城上楼橹，皆故宫所拆旧木为之，合抱之木，随击而碎。蒙古军中并有火礮者，随击随蒸，不可扑敦。惟汴京城，乃周世宗所筑，取虎牢土为之，坚密如铁，受礮所击，呈一凹形而已。蒙古兵又于冻外筑城，围百五十里，城有垛口楼橹，濠深丈许，阔亦如之，约三四十步置一锈，铺蹬百余人守之，蒙古又作“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为宠。间可容人以攻城。城上金兵则用“震天雷”以铁罐盛药，用铁绳悬之，顺城而下，以火点之，爆声如雷，人与牛皮洞俱碎。

又有“飞火枪”注药，以火点之，輒前烧十余步（犹今之喷火器）。蒙军惟妥此二物。蒙古军攻城十六昼夜，相传内外死者以百万计。哀宗为鼓舞士气，出承天门，抚各面将士，亲缚战伤者药于南薰门下，仍赐巵酒，出内府金帛器皿，以赏战士。（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4月，窝阔台北还，留速不台攻金，金复遣使奉金帛乞和，速不台许之，乃退兵屯河洛之间（速不合驻汝州）。汴京之围遂解。7月18日丁酉，蒙古遗唐庆至金，令金主自往议和，因出语不逊，金飞虎军卒申福、蔡元等，是夜潛至使馆杀唐庆等三十余人，金主诏货其罪，和让遂绝。

初钧州会战，武仙败走南阳，收溃军，得十万人，金主诏恒山公武仙人援汴京，以台喜将万人出城接应之，两军未遇，相继为蒙古院军击败，溃散。至是汴京粮按俱绝，军民饥困，京城人相食，军士亦多叛走，至多12月汴京情势危急，哀宗决心出走，乃调整汴京作战部署。

汴京陷落

金哀宗既决心出走，乃以完颜奴申参知政事兼枢密副使，完颜习揑阿不以枢密副使兼知开封府权参知政事总诸军留守京师，以户部尚书完颜珠颗兼裹城四面都总领，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兼镇抚军民都弹压，谏议大夫近侍行省即中乌古孙奴申兼知宫省事，以把撒合为外城东面元帅，木甲咬住为外城南面元帅，崔立为外城西面元帅，孛术鲁买奴为外城北面元帅。12月初10日辛酉，除拜既定，以京城付之，又以户部侍郎刁壁为安抚副使总招抚司规运京外粮斛，发府库及两府器皿、宫人衣服赐将士，哀宗遂出开阳门东去。

速不台闻哀宗已出走，复合兵团汴，初汴民日听捷报，且以奴申、习揑阿不二相持重，幸以无事，及闻军败卫州，哀宗走归德，民始大恐。时汴京内外不通，米一升价银二两，百姓粮尽，殍者相望，缙绅士女多行乞，至有自食其妻子者，诸皮器物，皆贫食之，贵家第宅，市楼、肆馆，皆撤以爨。及归德遣使迎两宫，人情益不安，于是民间有立王监国，以城归顺之议，而二相皆不知也，明年（公元1233）正月，左

司都事元好问谓习捏阿不曰："自车驾出京，今20日许，又遣使迎两宫，民间汹汹，皆谓国家欲弃京城，相公何以处之？"答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曰："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如其不然，徒死何益？"习捏阿不叹曰："今日惟吾二人，何书不可？"好问曰："闻中外人言，欲立王监国，以全两宫与皇族耳!"习捏阿不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即命困京城官民，明口皆聚省中，谕以事势危急。当如之何？众议皆欲以城降。二相不决。但曰"死守而已"。是月23日戊辰，西面元帅崔立等与其党为变，率甲士二百横刀入省中，拔剑指二相曰："京城围困已极，二公坐视百姓饿死，恬不为虑何也!"二相大骇，曰："汝辈有事，当好议之，何遽如是？"崔立挥其党先杀习捏阿不，次杀奴申等。即谕百姓曰："吾因二相闭门无谋，今杀之，为汝一城生灵请命"众皆称快。是日乌古孙奴申、裴满阿忽带、完颜诛颗等皆及于难。（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崔立既率民为变，遂遣送二相所佩虎符，诣速不台纳款请降。立自称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郑王。厚封其党从。即服御衣仪卫，亲往速不合青城（汴京城南薰门外）军次，速不合喜，饮之酒，立以父礼事之。立还，悉烧京城，楼橹火起，和议遂成，立服天子衮冕，大活城内宫中金银，对守摩人搜索薰灌，讯掠惨酷，贵族富人，不堪其苦毒悉出所藏以予之。3月崔立以金哀宗之太后、皇后、诸王、诸妃嫔，凡车三十七辆，宗室男女五百余人，及孔元措、梁陟，及三教、医流，工匠、绣女等赴蒙古营，速不台杀诸王及宗室，而送后妃等于和林。

4月蒙古军入城。崔立时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宝玉以出。

速不台既入汴，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发即屠之。乃请于大汗请屠城。耶律楚材闻之，驰见大汗曰："将士暴露数十年，所争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大汗不许，楚材再请乃许之。下令"除完颜氏一族外，余皆原免。"时避兵在汴者，尚有百四十万户，（震按太平寰宇记开封府户口为：主户九，二三二客户八八，三九九，且系含府属各县之总数。今只汴城竟达百余万户，显系因蒙军杀掠过甚，河南北之民户，奔来避难者），皆得保全，是耶律楚材之功也。（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六、蔡州破金亡

先是金哀宗既将京城交付诸将相留守，自服绛纱袍，乘马，导从如常仪，留守官及京城父老，从至城外，及至外城门附近，即麾百官退，并诏谕戍兵曰："社稷宗庙在此，汝等壮士也，毋以不预于进发之数，便谓无功，若保守无虞，将来功赏，顾岂在战士下乎!"闻者皆洒泪!是日巩昌元帅完颜忽斜虎（一作仲德）率援兵至，书于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间，无并宠，不可住。"于是东行之议遂定，即以完颜忽斜虎为尚书右丞，从驾东行。遂次陈留。

元太宗四年（公元1231）12月27日次杞县。30日诸将请幸河朔。翌年正月初1日丙午，金主渡河而北，风大作，后军不克济。明日速不台部，追及于南岸，元帅贺都喜战死，金兵溺者近千人。（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金哀宗既渡河，谋取卫州，白撒败绩东走，哀宗弃军，夜渡河，从六七人走归德（今河南商邱），诸军遂溃。哀宗既入归德，遣使往汴京迎太后及后妃。

2月初1日，蔡州元帅乌古论镐，以蔡州城池坚深，兵众粮广，请哀宗幸蔡州（今河南汝南）。随驾海州军帅官奴以忠孝军为乱，谋劫驾幸海州，杀右臣李蹊等以下三百余人，哀宗被禁。叹曰："自古无不亡之国，不死之主，恨朕不知用人，致为此奴所囚!"未几，金主与近臣谋，阳召官奴议事也，伏兵杀之，遂决议迁蔡。（哀宗本纪）。

是年6月18日辛卯，金真宗率朝臣发自归德，经亳州向蔡州进发。从者仅二三百人，马五十匹而已。时久雨，众皆步行，至6月26日己亥，始入蔡州。以完颜忽斜虎为尚书右臣，总领省院事，于是忽斜虎选士括马，缮治甲兵，又遣使分诣诸州郡，选兵诣蔡，得精锐万余，兵势稍振，时蒙古兵去蔡较远，商贩渐集，金主安之，命选室女备后宫，及修建山亭为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谏乃止。远谋西走，欲从拖雷进路，出饶风关，趋兴元。9月9日庚戌，蒙古兵突至，金主乃分军守四面及子城，以总帅孛术鲁守东面，内族承辚麟之。参知政事乌古论镐守南面，总帅元志副之，殷前都检点兀林誉胡士守西面，忠孝军元帅蔡八儿副之。

忠孝军元帅王山儿守北面，纥石烈柏寿副之三兀帅女奚烈完出守东南，内族斜烈守子城。9月中旬蒙古大将塔察儿麾军分筑长垒，围困蔡州。至10月中旬，因蔡州城内缺食，金主给饥民船，听采菱芡水草以食。是时，宋遣孟珙。江海帅师二万，运米三十万石，至蔡州给蒙军以副夹攻金人之约。于是南北两军以攻具薄州城。金乃尽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复括妇人壮健者，假男子衣冠，运木石。哀宗亲出抚军。

12月宋蒙南北两军力攻6日，至初9日己卯，破外城。至第16日南北两军合攻西城，又破之，而坠其城。完颜忽斜虎仍摘三面精锐，日夕拒战宋蒙两军仍未能入。金哀宗谓侍臣曰："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恨矣!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独为此介介耳!"又曰："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则往往为人囚系，或为俘献，或辱于庭阶，或闭之空谷，朕必不致于此，卿等观之，朕志决矣!"困战日久，粮食不及，杀马犒将士，并散御用器皿以劳军。已而金主黴服，率兵夜出东门，谋遁去，及栅，遭敌兵被迫而还。（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元太宗六年（公元一二三四）正月初7日丙午，宋蒙两军会饮，歌吹声相接。城中饥窘，绝粮已3月，鞍靴败鼓皆糜贡，且听以老弱互

食，诸军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斩败兵全股，取其肉以食，故欲降者众。金自被围以来，将帅战殁甚多，至是金主近恃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属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军凿西城为五门，整军以入，督军鏖战，及暮乃退出城外，声言明日复来。是夕，金主集百官，传位于宗室东面元帅完颜承辚。（按承麟于战斗间升为东面元帅，世租之后，拜牲之弟也）承麟固让，拜泣不敢受。哀宗曰：“朕所以付卿者，岂得已哉，良以朕肌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卿平日蹻捷，有将略万一得免，胤祚不绝，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玺，即皇帝位，百官称贺礼毕亟出捍战。而宋将孟珙之师已入南门，立宋帜矣!俄顷江海、塔察儿两军亦入。完颜忽斜虎精兵一千，巷战不能御。哀宗知事已急，命近诗曰：“死便火我。”遂自缢于幽兰轩。完颜忽斜虎闻之，谓将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御战？吾不能死于乱军之手，吾赴汝水，从吾君矣!诸君其善为计!”言讫赴水死，将卒五百余人皆从死焉。完颜承麟退保子城，闻哀宗崩，率群臣入哭。哭奠未毕，于城已陷，诸将禁近举火焚之，收其骨，将瘗之汝水上。骨为蒙古军及宋军所分，完颜承麟亦为乱兵所杀，金遂亡。（多桑蒙古史二卷一章）

第四节战后之政局

金国自阿骨打称帝，至哀宗之死，凡历九主，共一百廿年。蔡州既下，蒙古与宋国暂时相约，平分金人河南之地，陈蔡以北属蒙古，陈蔡以南属宋朝，于是两国各自撤兵。宋将孟珙还师屯襄阳，史嵩之以所获金哀宗之遗骨及金被俘参政张天纲等献于临安，告捷太庙，大事庆祝。时临安知府为薛琼，向张天纲曰：“汝有何面目到此？”天纲曰：“国之兴亡，何代无之!我金之亡，比汝国二帝如何？”薛琼以其语告理宗，理宗召问天纲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纲对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节耳!何畏之有。”因求死不已。（续通监卷百六十七）

宋理宗一朝四十年。可分为两个段落，前十九年为汉奸史弥远当政时代，史弥远死后为理宗亲政时代。下蔡州时，（宋端平元年公元一二三四）乃理宗亲政之始，郑清之当国，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内在之革新与外在之胜利，好像带来国家复兴气象。于是淮东制置使赵范赵葵兄弟，以为蒙古兵北归，汴京、洛阳一带，地方空虚可乘机收取中原，光复故国，然后凭河为守。因上书作规复三京之计。有人以为蒙古兵强，未可造次，独郑清之力赞其说，宋理宗也欣然同意，即诏令赵范进驻黄州（今湖北黄冈），尅日兴兵。这时许多有识之士，都上书力谏，参议官范邱岳说：“方兴之敌，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可捐所得以与人邪？我师若往，彼必突至，非唯进退失据，开衅致兵，必自此始!”乔行简亦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复之机，以有为之资，当大有为之会，则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忧师出之无功，而忧事力之不可继，有功而至于不可继，则其忧始深矣!”宋理宗皆不听，并促赵范自黄州北进，赵葵自滁州（今安徽滁县）北进。又命知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全子材带所部淮西兵，与赵范、赵葵会师攻打汴京，于是三路大军，蜂拥北上。这时蒙古兵大部撤走，汴、洛一带，果然空虚，蒙古留

守汴京之崔立与诸将不合，诸将李伯渊、李琦等闻宋师至，遂杀崔立而迎宋兵人城。时在宋端平元年6月（公元二一三四年），距蔡州失陷仅5月耳。（续通监卷百六十七）

同年7月，赵范，赵葵遣徐敏子、杨谊率领一支偏师，又乘虚攻下洛阳，不料竟中蒙古人空城之计，徐敏子等方入洛阳，附近之蒙古伏兵突然而至，结果杨谊、徐敏子等大败而退，洛阳城得而复失。在汴京之宋军，因为粮饷不继，饥饿无法支持，附近州县，又都是空城。驻在汴京北方之蒙古兵，又决黄河水以灌宋军，宋军死伤无数，赵范、赵葵等终于翌月（八日）间，亦放弃汴京，撤兵南归。所谓收复三京之计，损兵折将，完全失败，反落得毁约启衅，大遭蒙古责难。是年多，蒙古窝阔台汗遂遗王檝来责宋人败盟之过。宋廷不得已，遗邹伸之报聘向蒙古谢罪，但终不能获得蒙古人谅解，从此兵连祸结，南宋偏安之局亦不能久矣。

第七章 蒙古西征之一——成吉思汗征花剌子模诸战役及初期四大汗国之建立

蒙军西征，前后三次，初为成吉思汗征花剌子模。次为拔都征俄罗斯及匈矛利。三为旭烈兀征波斯。史称为蒙古人三次西征。

成吉思汗征服花剌子模后，分建窝阔台汗国，及察哈台汗国，封长子术赤于咸海以西。

拔都征服俄罗斯及匈矛利，扩建钦察汗国。

旭烈兀征服波斯，建立伊儿汗国。

蒙古三次西征，建立四大汗国，征战持犊，达四十余载，始自宋宁宗嘉定十二年，元太祖十四年，（公元1229年）止于宋理宗景定五年，元世祖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祖孙三代，锐意经营，灭国数十，拓地万里，雄跨两渊，丰功伟绩，古今所未有也。

第一节蒙古与西方各国一般形势

蒙古西征，破灭大国，计有花剌子模、俄罗斯、匈牙利、波兰、木剌夷、铰利亚及黑友大食王朝，本节仅就其疆域，兴替概况，国家政策，重要军事设施作一般性之叙述。其余如布里阿耳、奇卜察克、阿兰、康里等诸小国则略之。

一、蒙古疆域

当十二世纪中叶，满州北部，蒙古全部以及土耳其斯坦等地，均为半开化而以游牧为生各部落之居域。在语言方面，属于阿尔泰系之三部语言：即东胡部语、蒙古部语、突厥部语，其用蒙古部语者，则称为蒙古族，而此蒙古族，部落纷歧，区域辽阔，计散布于斡难河、克鲁伦河、土拉河诸河之上源，亘肯特山一带，以迄贝加尔湖诸地域。初蒙古部族，自相吞并，至铁木真崛起称汗，始统一蒙古诸族，以和林为首都。蒙古内部既定，成吉思汗，转而拓外：乃兴师攻西夏，略金京，于是辽东，河朔、山东及关右诸地，尽攘入蒙古版图。进而复灭西辽，破西域，几已奄有亚洲半壁，全欧皆为之震撼。成吉思汗见于属地既广，乃分封诸子暨其昆弟，至拔都平定里海西北，战败俄罗斯、波兰以及匈矛利等国，蒙古领域遂拓展西与波兰为界，尔后旭烈兀平定波斯，复于波斯建立伊儿汗国。蒙古疆域在西方，遂西至地中海，南临阿拉伯海。同时忽必烈亦在东方领有黄河南北中国诸地，自铁木真称汗至伊儿汗国开建，为时五十余载，拓地之广，普及欧亚两洲，武功之盛，疆域之广，史无前例，其他被征服，被破灭诸国诸部族之当时领域，容于以后各节中述之。

二、各国闻之兴衰概况

成吉思汗之兴起：蒙古族先无文字，世采事迹，全凭口远相传，无史册以为徵籍，蒙古族自朵奔巴延至成吉思汗凡四百载，其间记述，参访合徵，迄乏定论。相传蒙古人朵奔巴延死后，其妻寡居中生孛端察儿，自是繁衍，几十世而生铁木真，（朵奔巴延亦作朵奔蔑尔干）。

先是铁木真屡扼于泰亦赤兀族，数年之间，历经艰险。但天佑其安全，而韶族来归者且日众，宋哲宗淳熙十五年，（公元118年）铁木真曾耕集数部与泰亦赤兀部人战，战而胜之，是为铁木真得志之始。时铁木真仍隶于克烈部，至宋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铁木真吞并克烈部独立自主，翌年（嘉泰四年）乃蛮族瓦解，部众多投归于铁木真，铁木真至是遂成为蒙古全境之新主人。公元1206年春，铁木真大会诸部族于斡难河源，建九节白旗即皇帝位，群下共上耸号曰成吉思汗，于是声威日盛。实力日强，是为肇兴之始。其事已详本卷第二、三、四章。

花剌子模之兴替：货利习弥之名，唐代已习见之，其氏族在唐称大食，都于乌尔达赤，元史始作花剌子模，又间称西域。唐朝初季（七世纪初），大食灭波斯，分设大台，以治其地，将及三百载，主权日替，诸酋弱肉强食，僭号启土，国姓屡易，塞尔柱克即其一支派也。当塞尔柱克为部长时，其部族居于錫尔河及咸海里海间，北宋中叶（十一世纪中叶），攘地自立，是为塞尔柱克王朝之始。其后传至玛里克沙为王，有仆曰奴世的斤执兵卫左右，甚见宠任，旋封为花剌子模酋。奴世的斤之子库脱拔丁乘塞尔柱克王朝之衰，诸酋裂土自王之际，亦僭称花剌子模沙（犹言国王），西辽兴兵西攻，败塞尔柱克之梭，复遣将攻花剌子模时，库脱拔丁已卒，其子阿切斯战败被获，誓臣服于西辽，岁贡方物，始得释归。凡敷传至塔克施，于南宋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灭塞尔柱克，受报达教主那昔儿之封，是为花剌子模称王之始，其所以称为花剌子模者，盖沿用其起始部落之名，又所以别于塞尔柱克也。公元1200年，塔克施卒，子阿拉哀丁谟罕默德、词位。阿拉哀丁野心勃勃，吞并近境，囊括邻近诸部之地，实力日长，自谓地广兵强，乃叛西辽，举兵以伐，然为西辽所败。公元1209年至1120年间，阿拉哀丁复与撒马尔干酋锷斯满合兵，再伐西辽，败之。凯旋之后，复轻兵掩袭撒马尔干，锷斯满死焉。于是撒马尔干，布哈尔悉为阿拉哀丁所有，乃建新都于撒马尔干，改称乌尔达赤为旧都，以阿拉哀丁曾助乃蛮攘西辽，故土耳其斯坦之地，向属西辽者亦蹄于花剌子摸矣。至是其国东北至錫尔河，东南至印度河，北至咸海鬷海，西北至亚塞尔拜然，西邻报达，南滨印度海，国势大盛，几奄有中亚全部。于是阿拉哀丁，踌躇志满，乃遣使告于报达，欲如塞尔柱克故事，请专以教事属于教主，祈祷文中應增列阿拉哀丁之名，并请封己为苏尔滩（犹言皇帝），教主那昔尔不允，阿拉哀丁乃自僭号，国人复于苏尔滩之上加以“地上上帝之英灵”之尊号，并分封诸子。于是东惟蒙古，西惟花剌子汉两大帝国，壤错界接。但阿拉哀丁之母，赋性刚强，党于戚族，暗中与阿拉哀丁争势，亦自号曰“世界与信仰之保护者”。以是阿拉哀丁大权旁落，政令不一。但阿拉哀丁仍处心积虑，多面树敌，遂置花剌子模西运于危亡。

俄罗斯：俄罗斯为斯技夫族，北齐末年，公元1570年左右，日尔曼人南侵罗马，日尔曼之地遂为斯拉夫人所据。唐代以前为一散漫部落，唐末斯拉夫人柳利哥兄弟三人，皆有智勇，侵凌他族，乃为众部之长，其所居之地曰俄罗斯，遂以地名其部落。柳利哥建国在唐末威通三年，公元1862年，其部初无城郭，至是筑诸夫郭罗特，义谓新城。柳利哥卒，予依哥而立，拓地而南，迁都于基辅。传与其子，乃分立郡县，设宫征税，国体具备，境内大治。数传之后，兄弟阋牆，诸部皆疑兵自立，于是壤土分裂，形成联邦。俄罗斯之共主，则仅领有物拉的米儿一区。如是历数十王，至威司埃兀技第二，与诸部连和，兵争始息。威司绥兀拉卒，子攸立第二嗣立。时成吉思汗已平花刺子模（公元1222年），值蒙古遗者别，速不台二将进军里海之西，以讨奇不察克，奇不察克酋遁入俄罗斯境，乞援于加里西亚王穆斯提斯拉夫。穆斯提斯拉夫能用兵，屡胜同族，视蒙古蔑如也。乃与俄罗斯诸王谋于基辅，议决：“出境迎敌，勿待其至”。并请酋邦共主攸立第二出兵为援。遂与蒙军战，大败于喀勒吉河。是役俄罗斯战死六王、七十侯、士卒八万二千悉被歼灭。饮立第二闻败讯，亚将所派援军引退。是时俄罗斯列城无备，不能为战守，惟俟敌至乞降，毕国大震。幸而者别、速不台二将，未躏全俄，而卒军东返，俄罗斯始得苟全。然俄罗斯虽败于蒙古，境内被兵未甚，造蒙古军退去，各部内哄如故，不复虑外患。迄拔都西征，已十有四载，俄入久不以蒙古为意，仍不为防范。当时俄罗斯联邦，东界布里阿耳，西邻波兰，南以喀尔帕阡山与匈矛利界栉。

匈牙利与波兰：俱在俄罗斯之西南，两国相依如辅车。匈矛利三面环山，形势险固，北宋时始建国。当拔都西征之时，国王别剌当政，武事不备，群情未孚。至于波兰情势，诸王割据，内乱频仍，普鲁思老四世，年幼而号令不行，虚擁主君之号，是以蒙军所向皆下。

木剌夷及叙利亚：木剌夷乃同敦中另一种教派，初创于天方敌主阿里之第六代继承人，自称为亦思马因教。宋至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亦思马因敎酋曰哈山沙巴哈者，首夺阿剌模特堡，旋又筑堡于里海西南及里海东南库希斯坦境内诸山中，声势始盛。哈山得此根据地之后，复占有附近诸邦，而组成一名曰鲁德八儿之特别区，境内诸堡，或以情诱，或以力取。其时适逢邻境多乱，亦思马因派之势力，遂急遥膨胀，数年间，除确切领有鲁德八儿，及库希斯坦两区域外，复乘势侵入叙利亚。然以其敎派，专务杀人行刺，行为诡谲，为世人所鄙弃。哈山卒，两传及其孙哈山第二。哈山第二性放诞，多嗜欲，且奖诱同恶者，故为当时之诸善良回敎徒所嫌恶。又以其广蓄刺客，手段毒狈，亦为邻近话国所畏惮，由是阿拉伯语，遂有木剌夷之称，盖所以示讥诮也。叙利亚当时为埃及属国，境内既有亦思马因教传布，敌民亦奉行亦思马因敦之教规，故同为世人所厌憎，仅不曰木剌夷，而曰哈失歆而已。当成吉思汗大军渡錫尔河之际，木剌夷敌主札勒哀丁哈散，首先遣使称臣输款于蒙古。札勒哀丁卒，其子阿老瓦丁谟罕默德嗣立。阿老瓦丁幼时惯养，不理政事，国内盗贼蜂起，人民横遭匪迫，至公元1255年12月2日，阿老瓦丁被杀，其子鲁克赖丁即位于麦门底司堡。此即亦思马因敌派最终之敎主也。

黑衣大食王朝：建都于报达，亦以报达名其国，称其国君曰哈里发，为回教徒之最高领袖，君临诸国之上，视话奉正牧之君主，如同其委任之臣子，以报达为上邦，视埃及，罗耳、毛夕里等若干小国为藩属，诸园君长，即位之时，统应由敌主册封。此教初创于阿位伯人谟罕默德，几相残并，至阿拔斯篡位自立，称为阿拔斯国，以其友尚黑，唐人称之为黑衣大食。

是时叙利亚，埃及、阿非利加、阿拉伯，波斯、小亚细亚等部皆属黑衣大食。唐代尝向之借兵，以平两京之乱。至唐德宗贞元间（八世纪宋年）始迁都于报达，敌主世袭相传，屡经篡杀，久而为亲军大将所挟制，于是纪纲陵替，国势式微。当成吉斯汗西征之际，其东方属国，已相继叛去。其时教主为那昔儿，以其国历史悠久，根基稳固，文化发达，曾历经变故，迄未为外势所倾，故自以为报达，得天独祐，其国祚應延至世界末日而后已，其子民亦每以此妄想而妄自骄大。

第二节作战经过——征花刺子模诸战役

一、西征之序幕

先是成吉思汗灭乃蛮时（公元1204年），乃蛮太阳汗之子屈出律西走，投奔西辽。是时西辽君主直鲁古（西辽始租耶律大石之孙），在位已三十年，见屈出律父死国亡，怜之，优予款待，并将女儿妻之。直鲁古年老，好遊乐，不理政事，加以畏吾儿、哈剌鲁等国，相继叛离，国事日非。屈出律乃乘机招集乃蛮旧部，树立本族势力，并勾结花刺子模国王阿拉丁（回教国，当时臣属西辽），共图西辽。遂乘直鲁古老王与附近叛离者作战之时，与阿拉丁内应外合，袭占西辽国都虎思干儿朵（丁谦氏考定，在吹河南1日程）。时为宋嘉定四年、金大安三年，亦即成吉思汗之第六年（公元1211年）。屈出律遂么直鲁古，灭西辽而代之。

屈出律己篡有西辽，遂谋恢复其乃蛮故国，抵抗蒙古。时成吉思汗正在与金作战中，乃乘机遣人还乃蛮境（今蒙古科布多一带）招收旧部，展开活动。但在同时，屈出律受其妻影响，信奉佛教，而与信奉回教之当地人民，发生宗教争乱。屈出律用政治力量强逼人民放弃回回，人民不从。屈出律遂将回教教师钉死于回教寺门之上。于足到处激超强烈反抗，花剌子模王阿拉丁亦不同情屈出律之此一措施。

宋嘉定八年、成吉思汗十年（公元1125年），成吉思汗攻占金之中都（今北平）之后，闻悉届出律篡据西辽，并遣人间乃蛮故地图谋恢复。汗深虑其死灰复燃，乃于公元1217年，开始遣兵西征。所遣大将速不台、者别及皇子术赤三路大军，于扫荡屈出律遣人在乃蛮故地所招集之残部后，即向西征进。翌年，者别等又大破屈出律于碎叶城附近（今新疆西俄境伊斯色克湖西端），屈出律向西北逃遁。者别许人民宗教自由，于是当地人民纷纷迎降。

者别追杀屈出律至撒里黑尾地方（震按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据徐星伯谓即今叶尔羌西八百里之色勒库勒。）斩之。由于蒙古已有西辽之地，途与花刺子模（都城撒马尔干）接壤。一二一八年乃因“一商税问题”，征花刺子模之战，因之而起。

二、成吉思汗与花刺子模之绝交

蒙古国境既与花刺子模接壤，成吉思汗也知花刺子模是西方一个大回教国，领土东北自锡尔河，西南至波斯湾，东南至于印度河，西北抵阿哲儿拜占，便致书花刺子模国王阿拉丁，修和言好。其国书中大意说：“我知道贵邦国大兵强，甚愿修好，我爱贵国之君，如父之爱子，君当知我已征服女真，统治中国诸民族，战士如蚁垤之众，财富如金穴之乡，无须觊觎他人土地，所望者，彼此修好互市为利，想正同也。”花刺子模王阿拉丁，对于蒙古之威势，亦有所闻，然而半信半疑，及见蒙古

国书，言词骄狂，颇为不快，但因蒙古使者之善于言词，乃以好言遣还，并允互相通商。此后不久，成吉思汗因花剌子模之商人来贸易，亦遣信仆数人与畏吾儿商一百多人（一说四百多人，秘史作百人），携带东方货贺，往花剌子模购易珍物。此批商人到达锡尔河附近之讹答剌城地方时，不料为花剌子模之守将亦纳勒术号哈亦儿汗者（阿拉丁母后族人，大将权重），欲没入其赀货，而指认他们是蒙古之间谍，执而杀之并夺其财货。

成吉思汗闻报，大为震怒，认为奇耻大辱，当即免冠解带跪祷于天，誓死复仇。乃起烦国之师，大举西征。时为公元1217年。（多桑蒙古史，一卷六章）

三、锡尔河诸城之攻略

蒙古军之机动：蒙古军众号六十万（“蒙古史略”谓十五万至二十万人），于成吉思汗之十四年（公元1219，此为冯承钧成吉思汗传所载之年。震按丁谦氏“元秘史考证”则为庚辰，成吉思汗十五年，122○）如期于额尔齐斯河源集中驻夏，休息士马，准备入秋进军。当誓师时适当祃牙之日，雪深三尺。思吉思汗疑虑之（震按丁谦氏“兀秘史考证”谓：“旋以马乏刍秣缓师期”）。耶律楚材曰：“玄冥之气，见于盛夏，克敌之征也。”汗喜。遂挥军前进。大军自额尔齐斯河源出发，直向南行，经乌鲁木齐（今迪化属），至伊犁，巴尔克什湖以南地区集中后，乃以主力直趋锡尔河，而另遣者别一军，自合失合儿（今疏勒）取道拔汗那（小国名。今新盔疏勒北及西）进袭锡尔河南岸敌军之侧背。旋花剌子模得悉者别军之行动，惶惧，“乃将（锡尔河沿岸防线）军队调向拔汗那。等待錫尔河战线空虚之时，蒙古的大军（主力）遂出现于锡尔河。”（见冯承钧译“蒙古史略”第一卷第五节）。故者别此一行动，实成吉思汗误敌之计也。（下引见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一下）

成吉思汗初期作战指导：是年秋。蒙古军进抵锡尔河，未遇抗拒，遂围讹脱技耳城。成吉思汗已知“撒马尔干，城堞高峻，守兵充足，非一载不能破”。“西域主志气沮丧，企图消极，凝固守城寨”。于是成吉思汗对其初期作战下定如下之决心：

“先分兵攻取各处城堡，而自取布哈尔，然后会师”。按成吉思汗之先取布哈尔，因布哈尔位于西域新都撒马尔干，与旧都乌尔达赤之间，得此线可以截断花剌子模王与河中府之交通，且可断绝锡尔河上受围各坟之外援。

成吉思汗之作战指导：元太祖十四年秋（公元1229年10月），成吉思汗分兵为四：

第一军：命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将之，留攻讹脱拉耳城。

第二军：命长子术赤将之，为右手军，循锡尔河而西北，攻略锡尔河岸上沿河城寨，进攻目标为氈的。

第三军：命阿剌黑。辽客图，托海三将将之，为左手军，兵力五千人。循锡尔河东南攻伯讷克特、浩罕等地。

第四军：由成吉思汗与四子拖雷将之，迳渡锡尔河，直趋布哈尔，以断阿拉丁与河小府之交通，而绝其錫尔河受围各城之援。

限期各军，完成任务，会师撒马尔干。

第一军攻围讹脱拉耳：讹脱拉耳，位于錫尔河滨，扼东西交通孔道，城分内外。缮守完筛，粮储充足。原由西域将哈伊尔汗率步兵三万驻守。阿拉丁鉴于形势紧急，乃再分兵万骑，令哈拉札汗率往助守。

察合台及窝阔台，自成吉思汗十四年9月率军围攻讹脱拉耳（丁谦元秘史考证为十万年秋）

经5月不下。然守城军民志气消沉，内心惶恐，以是哈拉札汗坚主“力困议降”。惟哈伊尔汗则以前次杀使刼货，得罪蒙古，自度无生理，乃扬言以死守报主恩。由于二将意见不合，致部分守军，战斗意志为之瓦解。未几哈拉札汗率所部精兵突围欲遁，被蒙古军掳获。因询得城内虚实，遂攻克其外城。哈拉札汗欲降，察合台等以其不忠于其主，并其部众斩之。

又驱其民于野，纵掠城内。哈伊尔汗以外城已破，乃率亲兵退守内堡。屡屡出战，相特又1月，死亡几尽，内城遂陷，然仍鼓勇巷战。蒙古军欲生致之，诸面肉搏以进，哈伊尔汗犹率从卒二人，登星格斗。而从卒亦死。箙中无矢，犹持瓦以掷敌，妇女在墙下授砖以劝，卒以力竭一，为蒙古军所俘获。（多桑蒙古史一卷七章）

第二军之战斗：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率第二军，沿锡尔河北进。先至昔格纳克城遣使谕降，城民杀使者。术赤乃下令进攻，不许休止，士卒更番迭进，连攻七昼夜乃下之；屠其城。自是连下八儿真、额失那斯诸城。

当客失那斯之被攻也，警讯至毡的，守将库特鲁克汗夜遁，渡锡尔河而走岛尔达赤（一作玉龙杰赤）。术赤遣使谕降，毡的城中无主，人民混乱，不知所从，见使者至，欲杀之。使者伪与约，誓引蒙古兵他去，不入城内，城民乃释之。已而蒙兵至，城民惟恃城高不为备。术赤即督师树云梯环登，踰城而入，遂占领之。以未受拒抗，城民得不杀，驱之于野，纵掠9日，然后许居民还城。以布哈尔人阿里火者，为毡的长官守其地。旋分兵下其邻城养吉干。

阿里火者，西域之商人工耻曾与成吉思汗所遣百余商人资送珍品与阿拉丁者。（多桑蒙古吏一卷七章）

第三军攻围伯讷克特及浩罕：阿拉黑等三将率兵五千，于10月周围伯讷克特城。急攻三日，守将伊勒格圆阵殁。第四日城民始降。蒙古军

先是许其不死，既降之后，驱城中人于城外，别置其将卒于一处，尽杀之，分其工匠于诸军，而驱其壮丁，以攻浩罕。

西域将帖木儿蔑里克骁将也。率兵守浩罕。城滨锡尔河，河有中洲，上筑堡垒，与城为掎角，洲距两岸远，矢石不能及。帖木儿分精兵千人守之。另造甲板舟十二艘，形如写屋，裹以轻毡，涂泥泼醋，以御火纺。每日出舟六薄两岸，从舟隙发矢，以射蒙古军。阿拉黑三将，既围浩罕，又鉴于中洲据点距两岸远，矢石不能及，遂先以铁索封锁河道，以绝敌援。同时感于兵力不足，请增援。寻蒙军自堤脱技耳等处援师二万至。且于四乡掳民五万，编组什百为队，以蒙古将校督之。于三十里外之山中、运石构河筑堤，期达于洲。帖木儿乘蒙古军实施攻击准备之际，每利用夜暗，屡袭蒙古军，蒙古军多所损折。

误古三将以河堤渐成，攻击开始，炮石纷集，守军势不支。帖木儿见势不支，计穷，乃夜以七十二舟，载辎重、军士，自率精锐，驾甲板舟、列垣烛，顺流而下，逃向伯讷克特。

当帖木儿之撤退也，一面扫除河川封锁，一面对两岸追兵作战。奋力撤退。既而，闻知术赤军已于毡的附近，夹锡尔河置重戍，两岸置弩，并结舟为桥，阻绝川道。遂舍舟登陆乘马而行。蒙古兵追至，则止而与战，待辎重前进，然后再行，如是数日。部族本少，及是益灭，不得已乃弃辎重。已而从卒次第亡失已尽。乃单骑遁走，逃往乌尔达赤。（多桑蒙古史一卷七章）

四、阿母河诸城堡之攻略

布哈尔之占领：成吉思汗与四于拖雷，率领主力军，以速不合为先锋，迳渡踢尔河，驰袭赛鬲奴克居民咸入堡拒守。成吉思汗遣使者丹尼世们招降，守军困辱之。丹尼世们谓曰：“成吉思汗率大军，距此不远，汝等若稍抗拒，霎时堡垒居舍将平，血淹田亩矣：降则身家得保安”。居民遂降。成吉思汗令居民出城外，签其壮丁为兵，编作一队，备攻布哈尔。又熟习路径者为向导。从人迹罕经之沙汉僻路，闻道急趋布哈尔。成吉思汗十五年春正月（公元1220年3月），成吉思汗大军突然出现于布哈尔附近。（成吉思汗传第八章）

布哈尔分内外二城，外城甚大，堡垒园囿村庄尽在其中。水经其附郭。城池坚厚阔大，四周有十二门，民居房舍率以木建之。地扼东西交通咽喉，为撒马尔干西方唯一屏障、西域将库克汗率部将数员，兵二万守之。

成吉思汗大军既抵布哈尔，先屯于城之四周。迨准备完成，即督军攻城。昼夜不息，其势甚锐。守城诸将度不支，夜率全军突围遁走。蒙古军不意被袭，阵棺挫急退。嗣见敌不乘胜进击，反遁走，遂整列追之，及于阿母河畔，鏖杀殆尽。

明日、城中间教敬长及绅耆人等，出城投降。成吉思汗入城，蒙古

兵运可兰经横置庭中，以代马槽，践其经典于马谛下，又召集歌女在大礼拜寺，歌舞劳军、蒙古兵亦欢呼歌唱为乐。

如是取乐一2日成吉思汗出城，赴布哈尔民众祈祷场，传集民庶，告以西域王背约，杀使臣，及己不得已起兵复仇之事。令蒙古官员，弹压大军，勿使扰害。已而籍富民，征财富，余民则出丁赋以瞻军。

其时犹有康里兵四百骑，据内堡。蒙古军遂焚城内民居，驱壮丁使执内堡填壕之役，悉成平地，以进追之。已而置礟环攻，战况惨烈，为空前所未有。凡攻12日内堡破，守者悉死：

而蒙古兵及居民为守兵所伤亡者，亦甚众。城既拔，成吉思汗驱民于野，尽掠其财物，焚其居屋，或流或徙、丁壮则使从军。成吉思汗焚布哈尔后，春末，乃循水，东趋撒马尔干。

庄定撒马尔干：撒马尔干，位于水上，距布哈尔5日程，沿河风景甚丽，园林别墅相望，舟车福辏，为河中一大政治中心，经济重镇。北面广汉红沙、南凭铁门板天险，在远方有锡尔河，阿母河三面凭藉，形势天成，又当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西域王于此建为新都。

至二十世纪初期，该城人口仍在十万以上。

当西域王之驻跸撒马尔干也，督民修城濬池，竣濠蓄水，缮增堡垒，盖为长期固守之计。及闻蒙古师众，乃大惧。谓左右曰：“敌军锋甚锐，我不可以居此”。即先遁去（另详下节），留兵五万（一说有突厥兵二万，波斯兵五万）拱卫新都。命其将阿尔泼汗婴城固守。

成吉思汗自布哈尔，驱俘民随军东进，行5日，骑兵先抵撒马尔干坟下。翌日部队与俘虏继至。时其他三军，亦相率自锡尔河北诸地至于城下，亦驱土著壮丁至。于是成吉思汗自结营于库尔萨来。复先分军，攻下河演寨堡。以削弱其外势。同时令诸军分别开进，配合会攻。

又编俘虏十人为一队，队执一旗，陆续经行城下，以示其兵众之盛。成吉思汗乃亲自周巡城外。相视形势者两日。令阿拉黑、毕远尔牢兵一部向铁门关、塔里堪，以截断敌之外援，第三日遂围合。

当蒙古军合围之日，公域将阿尔泼汗、匈赤汗、巴郎汗三人乘蒙古军尚在展开间，转取攻势。但成吉思汗事前已派有掩护部队，当即接战。西域军以塔起克兵先进，中伏。初康里兵自以为与蒙古兵同类，事亟则降。故康里兵不为援。以此，西域军大败。由是城中人为之气夺。然蒙古军遭此突袭，伤亡亦众。至夜，双方罢战。

第四日蒙军攻城，城民恂惧。第5日续攻，康里兵乃有携眷投降者，城内故士亦出城纳款。

成吉思汗均善谕之。越日，西域军停止抵抗，开城请降。时太租十

五年（公元1220年）4月中。至是蒙军首先隳其垣堞堡垒，命康里兵三万聚于一处，收其马匹器械，至夜尽杀之。

当康里兵之洽降也，他部守兵不从，殆至康里兵开城，塔起克兵及波斯兵乃入内城续守。是夜，蒙古军仍攻城。内城人惧，知不得免，阿尔泼汗乃率千人，乘夜潜出、突营而遁。次晨蒙古军编组攻城队，迫攻内城，隳其垣堞，塞城河之源；至夜城破，内城悉成灰烬。

撒马尔干城既隳，成吉思汗乃命太师国公耶律阿海，组设军政府，以降官巴克曷勒蔑里克，牙剌瓦赤等主收赋税，兼辖降民。选取工匠三万人，分置各营，签发民丁三万，补充攻城队。余民五万，令输二十万的那（西域敝名），许复还城赎命。派兵一部，任该城之卫戍与绥靖。成吉思汗则自屯兵于撒马尔干、那黑沙不两地之间。

乌尔达赤之攻瞻：是年（公元1220年）夏，成吉思汗既定撒马尔干，乃令三子就地整军，自与拖雷亦暂于铁门附近驻跸休息。

乌尔达赤，一名花剌子模城。市区广大，形势雄伟，农耕茂盛。突厥人名之曰，阿拉伯语则谓为，花拉子模之旧都也。在当时为西坟名城。自王母土尔堪可敦出走径，城中无主。旋花剌子模王阿拉丁之子札勒哀丁（又作札兰丁）自里海逃至该坡（时阿拉丁王被者刷所追，迁入里海一小岛，于是年12月死。详见下节）。城中原遣有兵丁甚众，稍事号召，即有兵九万，复集于诸王麾下。然将士多康里人，对札勒哀丁，并不衷诚拥戴。札勒哀丁乃于公元1221年2月10日，率帖木儿以三百骑出奔。

另一王子鄂斯拉克沙，亦在坟中，鉴于乌尔达赤，诸将争权造势，各欲谋拥立（阿拉丁死后，尚有三子）情势叵测，亦出奔，乌尔达赤将领颇有从之行者。是时乌尔达赤尚余兵六万，其绅民皆愿并力守城，遂公推忽马尔为帅，以其为王母亲族也。

蒙古军于河中作三阕月之整补，军容一新，军威大振，成吉思汗乃于十五年秋，命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军十余万（一说五万）及所俘丁壮，往攻乌尔达赤。其行军序列，依窝阔台，察合台，术赤之顺序行之，似以术赤为总帅。公元1221年春，成吉思汗又闻阿拉丁诸子走乌尔达赤，乃又遣兵戍呼拉商北境，以防其南逃。2月13日，术赤军近追乌尔达赤，游骑至城下。城人出城逐之，中伏，城兵死者甚众。蒙军尾随败卒入海阐门，因日已西沉，仍退出。

术赤昆弟，既至城下，即环视乌尔达赤城形势，城跨阿母河，为桥以通往来，垣堞坚厚，猝不可破，术赤下令军中："我父将以此地封我，毋许焚掳"，乃遣人招降，守将及兵民拒之。（新元史卷二百五十四章外国传西域上）

术赤以招降无效，乃退治攻具，境内无石，不能炮击，乃令伐大木，浸水增其重量，以代炮石之用，又命所掠诸地丁壮执填潦之役，限

10日而工毕以备攻城，诸攻击准备已毕，乃即遣三千人，欲先攻夺横跨阿母河上之桥梁，但为城兵困围，全部战殁，至是守军益振。既而术赤，察合台二人失和。号令不一，纪律亦弛，士气不振。守军以是屡用逆袭，与蒙古军以重大损折。历时6月，而城不下。

成吉思汗于塔里堪，先后接获三子报告，知乌尔达赤方面，久攻不下之主因，首在三弟兄间之不睦，乃遣使各加斥责，并改命窝阔台穗诸军。

蒙古军由于窝阔台出任统帅，彼极力和解两兄，并申诫部众。严守约束，于是军威复振。乃于太租十六年（公元1221年）秋下令，并力亟攻，守者遂不支，蒙古兵梯登入城，以石油浇房屋，纵火焚之。西域兵虽败，仍鼓勇搏斗，节节为守，城中妇女亦直接参与战斗。巷战七昼夜，守兵终乃乞降。蒙古兵遂尽驱其民出城，以技师工匠从军，壮丁愈军，计民之充军者数逾五万，妇孺夷为奴婢。余民则悉配诸军屠之。屠后焚毁殆尽。并决阿母河堤，引水淹城，庐舍尽毁。又选工匠十万人送至东方，相传此为东方各地有回教侨民之始。

乌尔达赤既平，察合台、窝阔台率队赴塔里堪会师，术赤军仍驻咸海、里海间。

五、追击阿拉丁之战

先是当成吉思汗大军甫抵撒马尔干时，已侦知西域王阿拉丁已出城西走，乃遣者别、速不台各率万骑往追。命之曰："穷追勿舍，如彼势众敢抗，而汝等力薄，即不前进，飞报我大军定夺。屡闻人言，彼畏怯殊甚，谅必不敢抗也。如彼势蹙而遁，虽入山穴，亦必穷其所往，所过之地，降者安抚之，为置官吏。有阻遏我军者，必摧破之，以三载为期，回至蒙古，与我相见"。后命将曰："汝等之后，我复今拖雷剿抚呼拉商、蔑尔甫、海拉特、你沙不耳等处。并令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攻取乌尔达赤。赖天之佑，必竟全功，乃可凯旋"。（元史译文證补卷一下当成吉思汗十五年春，蒙古军进攻布哈尔时，阿拉丁驻于NB052尔迷（成吉思汗传，谓：一退避于哈里甫），安的胡两地之间"，其意似在防止蒙古兵渡阿母河。

撒马尔干被围时，又曾选遣万骑，后遣二万往援，然无一军敢至撒马尔干城下，既而集将吏议进止，诸将以撒马尔干已无可敦，应调集全国之兵守阿母河。别又有人劝阿拉丁赴哥疾宁，盘兵以抗，纵不胜可奔印度。阿拉丁以比策万全，从之。遂向哥疾宁，道经巴尔黑，其于屋肯哀丁遣国相阿马都木勒克，自伊剌黑阿者迷来见，献议，言伊剌黑（伊拉克）人财马足，可以御敌，不如西向，阿拉丁又从之。

阿拉丁离巴尔黑前，遣一支队赴NB052尔遂北之般札卜侦敌情，及还报布哈尔陷，继报撒马尔干降，遂急离巴尔黑。扈从军事皆康里人，诸将皆土尔堪可敦之戚也。中途谋杀阿拉丁，事泄，阿拉丁夜易寝

幕防之。晨起视空幕，攒矢已满，遂疾行。4月28日抵你沙不耳，勤官民严守，以为蒙古兵不敢遽渡阿母河。在此居留三周，消磨其光阴于晏乐饮舞诸事而不为战守之备。

者别、违不台二将受追击阿拉丁之命后，尾追阿拉丁之后，抵烹绰布欲渡阿母河，而无舟。

伐木编枝干为箱箧，置辎重器械于内，裹羊皮于外，系马尾，驱以泅水，得不沉没，将士攀援以随。举军截流而济，西域王阿拉丁侦知蒙古兵已渡河，进入呼拉商（呼罗珊）乃伪言出猎，于5月12日逃赴伊拉克。二将既渡河，先至巴尔黑；城人迎降，遂为置守吏。募导者，复分道追击。

者别以太石勇士为前锋，经蔑而甫，于6月5日抵你沙不耳城下。你沙不耳以三人来迎降。

者别乃复折向徒思，速不台军腊大路追击。徒思以东各寨堡皆望风而降，惟徒思拒命，乃力攻下之，杀伤甚众。遂由徒思往达蔑干，西模娘诸城，继往伊斯法楞，皆不周西域王。乃欲西赴伊垃克。时者别军自马三德兰踰山而南，两军遇于合耳拉耳（按合耳拉耳在德黑兰城东，城已废）。军复合。

西域王阿拉了与其予屋肯哀丁率数万人，守伊拉克之可疾云城。召集诸将，方共谋防御之策，而合耳拉耳之警适至，父子遂分路遁走，随从之王侯贵人，一闻此讯，亦争先出奔，士卒亦溃。其他酋首，无不相率逃逸。阿拉丁与次子吉亚代丁，辗转奔至马三德兰，行李尽失，几孑身无畏物矣!时蒙古兵已入马三德兰，破其都会阿模里及其商桨城市阿思塔剌巴。阿拉丁询诸土酋，何地可以避兵？谱酋劝其暂避于里海中之岛上。阿拉丁从之，至海岸一村落中；居数日，其仇家导蒙古兵至，阿拉丁急登舟出海。蒙古兵在岸上射之，有数骑躍马人海逐舟，皆溺死焉。（下引见成吉思汗传第八章）

阿拉丁于乘舟离岸时，以土地财货尽失，又闻奏女皆被浮，幼子被杀，且其时已身已患肪膜炎症，自知将死，乃叹曰：“君临之国家不少，乃无数尺之地可作坟墓!”既而登一名阿必思见之小岛，喜其地安宁，结幕居之。马三德兰沿岸居民，以粮物来献，阿拉丁皆授以官职食邑。及病势日重，乃立子札勒哀丁（札兰丁）为嗣，使光复故国。遂死。时在仓卒无殓服，乃即以其衬衫裹葬之。时为成吉思汗十五年（公元1221年）1月也。阿拉丁已卒，札勒哀丁乃潜往故京乌尔达赤，其弟鄂斯拉克沙从往。星肯哀丁自可疾云出走，复为蒙古兵所杀。

初西域王母士尔堪可敦居乌尔达赤，成吉思汗曾自撒马尔干遣使招降。士尔堪不答，而且避居于马三德兰山中赤刺勒堡中。速不台追阿拉丁，经此堡下，留兵一队攻破了，尽俘以献于成吉思汗。汗杀其幼子，掳其母妻妹于蒙古。

六、扫荡高加索山南北诸役

成吉思汗十五年多，者别、速不合二将，既迫阿拉丁走死海岛，复获其母及妻，乃由马三德兰，南至伊拉克，掠库木、定哈马丹。二将复引军而北，进逼亚赛尔拜然之都城台白里司，国王月即伯厚币请和，二将乃退出其境外。是各甚寒，以里海沿岸木罕之地，水草丰美而气温，乃驻参于此，而分兵入库拉河逼乔治亚（亚赛尔拜然西北）。初，乔洽亚（成吉思汗传载“谷儿只”）以为蒙古兵驻参于木罕，天塞必不即出动，方分遣使者往约亚赛尔拜然、者疾烈两国主，埃来春并力合击蒙古军，不意蒙古军突至，其地之突厥蛮、曲儿NB052两部人，平时颇受基督敌徒凌虐，蓄怨已深；闻蒙古兵进略基督教之国，多應募而投麾下，冀乘机报复，且可饱掠富饶之地以自肥。蒙古兵即以此二部人为前锋，入库拉河部落之境，所向焚杀，将抵帖弗利斯，乔治亚部众万人来拒，蒙古前锋力战不利，多所损伤，谷儿只军亦因以疲弱。蒙古本军遂乘势继进，突击败之，斩杀过半（1221年2月）。既而蒙古兵以乔洽亚境内路隘林密，乃还向台白里司，月即伯后以重币馈献，蒙古军又舍之，进围马刺合，驱回教俘虏攻城，退缩者斩：越数日，城陷，蒙古以其杀所置官吏，遂屠其居民，焚城而去。时为1221年3月30日也。

未几，蒙古军复还至哈马丹。结营城外，命其所置戍将征发银布以饷军，城民不堪一再苛索，乃杀戍将拒守。蒙古兵攻至第三日陷之，城民犹短兵巷战，终于不敌，皆受屠戳。蒙古兵又焚城而去。

既而蒙古兵又旋兵北还，破阿儿塔比勒，而第三次进至台白里司城下。月即伯闻警留将守城，自避往纳黑出汪。蒙古兵知城防甚固，仅索银布而去，进拔撤剌卜，屠之。遂进攻阿儿兰境内之拜勒塞，拔之。以其背约杀使者，乃尽杀其男子，女子则辱而后杀之。时为1221年10月也。遂进军阿儿兰都城干札，旋闻干札城民常与谷儿只人战，勇敢善斗，知不易与，乃索金帛而去，以兵入谷儿只境。

时谷儿只屯兵于忽难之地，蒙古兵分为二队，者别以五千人设伏，速不台迎战佯败，诱敌人入伏中，谷儿只军三万多半覆没，谷儿只人大惧，委其南部之地于敌，而退保占布利斯。（下引见多桑蒙古史一卷八章）

蒙古兵以谷儿只险隘遍国内，不敢深入，遂饱载卤获，东掠设里汪境，破其都城沙马乞，进拔打耳班。此时蒙古二将奉成吉思汗之命，以西域底定可待，令其乘胜北征奇卜察克，遂捨其子城不取，欲北踰太和岭而苦无乡导。乃伪与设里汪沙（王）约和，请遣使来议。及使者十人至，皆其国中贵人也。乃杀其一人，而胁其除人曰：“其不善导蒙古军踰太和横北，视此!”遂踰横进军阿兰都（奇卜察克之南）。阿兰科合奇卜察克（即钦察，突蹶之游牧部落也，居黑海，太和岭、里海之北，十二世纪初年武川北库莫奚韶西徙与钦察合斡罗恩人遂名钦察）诸部合兵来拒。两军接战，胜负未决。者别等鉴于众寡不敌，复迫于险，乃以甘言诱奇卜察克人曰：“彼此皆突厥，曷必助异族而害同类。不如言和，吾曹

愿以金帛相馈。”奇卜察克人为其甘言重币所饵，遂弃其同盟军而去。蒙古兵乃进击其他诸部，败之，而躏阿兰诸部之地。大施掠杀：

奇卜察克人既已散归，遂不为备。者别与达不台复出其不意，攻入其部，尽取还所馈物，其诸部众多仓皇委牧地而去。奇卜察克有部长名迦迪延者，曾以女妻斡罗思（即俄罗斯）部之迦里赤王密赤思老，遂率其部众遽入乞瓦（即基辅）境内，求援于婿。蒙古兵亦尾追至斡罗思界上。

七、破斡罗思联军之役

（下引见新元史卷二百五十七章斡罗斯传）

当时斡罗思部据地尚小，其东境不逾窝勒迦河（即伏尔加河）之支流斡迦河，境内分为数国，其主皆斡罗思人鲁里克之后裔。九世纪时，鲁里克统一的涅培儿（即聂伯河）河之诸撒吉剌（今称斯拉夫）民族，嗣后遂概称其民曰斡罗思人。鲁里克之后裔以国分属诸子，分国而治，惟奉一有大公之号者为主君。大公以乞瓦为都城，一一六九年时，徙都于兀剌的迷儿。

至是诸藩已多不奉号令，互相争战。伽里赤王宙赤思老因妻父之乞援，遂集斡罗思南部诸王于乞瓦，议御敌军，并遣使请兀剌的迷儿大公以兵来相劝。既而密赤思老料合乞瓦等部之兵，进至的涅培儿河畔。蒙古军遣使十人来言：“无犯斡罗思部意，所讨者其邻奇卜察克；况奇卜察克侵扰斡罗思有年，不如同蒙古合兵，同分卤获。”斡罗思诸王不从，杀蒙古使者，渡的涅培儿河，虏蒙古前锋将，以畀奇卜察克人杀之。于是者别与速不台决心攻敌，如欲诱敌远离其境，乃不战引军东退，至窝勒迦河，告捷于术赤，并请增援。时术赤驻军于里海之东，部众多暇，乃分兵大半往助。

当蒙古兵东退时，斡罗思联军以敌不敢战，乃蹑迹追逐12日至端河（即顿河）邻近之迦勒迦河（即图上之喀勒吉河）。成吉思汗十七年多，者别等以增援之新军已至，而伏尔加河冰合，遂下里海北岸之阿斯塔拉干，分军为二，复行西向，一军过端河列阵以待（似一部）。

一军至亚速海东南，履冰渡亚速海至黑海，大掠而北，两军复合。者别等复遣使至斡罗思，“谓前言诳。我已誓于天，决不相犯。请勿用兵。”斡罗思释使者还以约战。（元史译文證补，卷十八）

斡罗思游里赤（一作哈力赤）王自信可以胜敌，不与乞瓦诸部之王相约，独率所部万骑渡聂伯河进战，败蒙古军前锋。诸王皆随而东渡，蒙古军退，追至喀勒口河，联军八万，分屯南北。南军为乞瓦，扯尔尼哥等部，北军为哈力赤及奇卜察克等部。北军复先渡河。战于孩儿桑之地，北军大败，迦里赤王弃其将卒，尽焚迦勒迦（即喀勒吉）河上之舟而逃，其军几尽覆没于河滨。据云其中有六个国王阵亡。时为成吉思汗十八年（1223）5月31日也。乞瓦王营于河畔一高冈上，目击迦里迦赤

军之败而不进。蒙古军已破北军而至，乃仓卒谋守御，然已无及矣。抗守三日，不敌，乞降，唯求免死。蒙古伪许之，获之以后，缚其诸王于地，覆板其上，然后使将卒坐于版上宴饮以压毙之。此役，为举世闻名之各个击破歼灭战，亦称孩儿桑会战。

兀剌的迷儿大公已遣军在道，闻败讯，遽行退。蒙古军殿长驱直入斡罗思境，蹦其南境，进掠克里米半岛而还。

是年终，者别、速不台二将，奉成吉思汗之命，班师东归。遂蹦窝勒迦、哈马二水上流不里阿耳部所居之地，不里阿耳人率军来拒，二将设伏败之，阵斩甚众，既而取道撒速惕之地，进至康里部，败其部长霍霍脱思罕之兵，遂与就归途之大军会合。

八、底定阿母河以北诸地

成吉思汗十五年（公元1220年），成吉思汗驻夏于那黑沙不（撒马尔干附近），大军整补完毕，士饱马腾，乃于是年秋命术赤，察哈台、窝阔台率军往攻乌尔达赤，而自将大军，自驻夏地南进。一路游牧，过铁门关。遣拖雷将兵往定呼拉商，自率主力赴特尔迷，至城下谕降，不从，攻10日破之。尽驱其民出城，分配诸队屠之。乃分军收巴大喀伤半藉军事，半用招抚，阿母河以北诸地，率皆平定。特尔迷既定，巴大喀伤亦平，乃造舟渡阿母河。十六年春，成吉思汗军至巴尔黑，城民遣使迎降，献重币。既而闻札勒哀丁（札兰丁）聚兵于哥疾宁之报，念留此大城于后路为非计，遂以检括户口为名，驱其城民出城，尽屠之。纵火樊庐舍，夷其堡垒而去。于是趋塔里堪，攻其寨取之。

九、拖雷军扫荡呼拉商

初拖雷受命往定呼拉商，为者别、速不台后援，平其未定之地。拖雷以脱忽察儿为先锋，自统中军，命他将率左右翼，以并列态势渡阿母河。十五年11月，先锋至你沙不耳，攻城三日，成吉思汗命夺其职。因先是汗有命，来降者勿扰其民，也里城长官额明木勒克曾纳款于蒙古军，而脱忽察儿违令抄掠其境，额明木勒克因复投札勒哀丁，汗因是大怒而夺其职。脱忽察儿已去，代将者以兵力薄不能克城，遂解围而去。而分军为二队，自率一队攻撒卜咱瓦儿三日拔之，杀其居民七万人，另一队入徒思境，取诸堡。

明年春正月，拖雷本军七万人进迫蔑而甫。蔑而甫者，塞尔柱克王朝之故都也，城在平原，土地肥沃，处马鲁水之岸傍。拖雷先击败屯于城外之突厥蛮军万骑。次日（2月25日）

拖雷率五百骑周视城堡，7日之间，全军悉集，乃下令进攻。守兵二次出城突击，均被击还。守将木直耳倭尔知不支，乃乞降。拖雷佯允之，以其曾杀蒙古留置官员将士，大军入城，并其亲族悉诛，继驱居民出城尽屠之，死者数十万。唯工匠四百及童男女若干得免。遂置戍将一人镇之，然后引兵向你沙不儿。

拖雷军至你沙不耳城，城为呼拉商首都。先是蒙古游骑至于城周附近，辄为城民所害，城民因逆料蒙古必来复仇，遂坚其守备，城上布置发弩机三千，发石机五百。拖雷军亦有发弩机三千，发石机三百，投射火油机七百，云梯四千，礮石二千五百担，密布城外。攻具既多。

士卒复众，城中人望见，气为之夺，遂请降，并许纳岁贡献。拖雷不许。明日（1221年4月7日星期三），拖雷巡视一周，训励将士，遂命令环城同时进攻，弩机齐发，昼夜不息，至4月9日晓，潦堑已平，城垣裂七十口，蒙古军乃从各方面攀登而入，街巷屋舍，皆成战场。至于是脱忽察儿之妇（按为成吉思汗之女），亦率万人人城，人畜悉杀。以报夫仇，如是屠杀四日，猫犬无遣。唯工匠四百获免。毁城历15日，城市辽墟。拖雷军又率军趋海拉特，力攻八日，克之。（多桑蒙古史一卷七章）

初成吉思汗召集拖雷于大暑之前回营，至是拖雷遂啣命东返塔里堪会师，时察合台、窝阔台亦自乌尔达赤来会。

10、巴鲁安会战扎勒哀丁重整西域军：成吉思汗十六年（公元1221年）春，札勒哀丁与帖木儿率三百骑自乌尔达赤向东南走，横断花剌子模沙漠二人呼拉商，在纳撒击退蒙古逻骑以后，进至你沙不儿，居三日复走，行甫一时，蒙古兵蹑踪而至，亟追之（1221年2月10日）。札勒宜丁遣一将拒之歧路，自从刷道经海拉待遁逸，蒙古兵遂失其踪。札勒哀丁于是日，1日间奔四百里，至柔赞，欲入城息鞍马，城民拒不纳，遂即夜行。翌日，蒙古军追至也里道上，不及而还。三日后，札勒哀丁乃安抵喀斯尼（一作哥疾宁）城，其地诸部之众多奉之。遂广事号召，奋力软亡。有蔑而甫酋阿敏蔑里克，率所部三万人来从，于是突厥蛮赛甫哀丁阿各拉黑等亦各率众来会。喀布尔土人亦揭竿云起响应。遂共聚兵六七万骑，花剌子模军声势由是复振。札勒哀丁以女妻也敏蔑里克。

瓦里安遭遇战：是年夏，成吉思汗已克塔里堪，即驻夏于其附近山中。是秋闻知札勒女丁拥重兵，据喀斯尼（又作哥疾宁）。乃集诸子议往平之。道经客儿端塞，留攻1月，拔而夷之。遂踰兴都库斯山，进攻范延，其孙木秃干（察合台之子），在城下为矢所得而卒。成吉思汗钟爱此孙，悲愤之极，下令进攻，陷之。不赦一人，不取一物，尽夷灭之。此城百年以后，尚无居民云。

时札勒哀丁亦已率军北向范延附近之巴鲁安前进。成吉思汗闻讯，立遣失吉忽秃忽，率兵三万（一说四万五千），往喀布尔山中，威胁札勒哀丁之侧背，并掩护大军之侧翼安全。失吉忽秃忽部将四员，曰谟喀哲、曰谟尔哈尔，曰乌克尔古耳札，曰都斯古尔札。当其率军向喀布尔前进时，先遣谟喀哲、谟尔哈尔，率部攻取瓦里安，札勒哀丁侦知蒙古军南来，乃自璇斯尼北进，两军遂遭遇于瓦里安。蒙古兵败，伤千余人。二将以众寡不敌，退而渡般失儿河，毁桥而退，驻营以守；继而被迫复退，盗与主力军合，札勒哀丁亦率师归巴鲁安。八日以役，失吉忽秃忽奉命，率军向巴鲁安前进，札勒哀丁亦合众前进，于是两军周于巴

鲁安之原。

巴鲁安之战：札勒哀丁，见战机已迫，乃急将大军展开，以阿敏蔑里克将右翼，阿喀拉黑将左翼，自率中军，命骑士尽下马，各系马于腰，以行步战。右翼军初为蒙古军万人所攻，势渐蹙，旋得中军及左翼支援，态势复整。两军反复冲杀，各有斩获，激战终日，胜负未决，相持入夜，各退还营。失吉忽秃忽乃思以计取之，令各骑缚毡像人，置手牵从马上，连夜制成，以助势欺敌。次日，又战，西域军见偶人，果疑援兵至，议退：札勒哀丁持不可，下令，仍如昨日步战。蒙古军见昨日之战，阿喀拉黑所部最勇斗，乃以重点指向西域军左翼。阿喀拉黑见敌集注锐力来攻；攒射之，节如雨注，蒙古军攻势顿挫。继而攻势再兴，西域军勇士五百人阵歿。札勒哀丁见势已急，乃命令全军上马，大呼："我众甚盛，远击蒙古军!"自两翼围攻之。于是众大奋，围亦渐合。失吉忽秃忽，仍镇定如恒，命令军士旗所向，冲突敌阵。然已四面受敌，力不能支，遥奔溃。顾原野中，溪涧纷错，马多软跑，而西域骑较健，驰而追杀，死者无算，失吉忽秃忽乃大败，军士得脱者无几。是为巴鲁安之战。（元史译文證补卷一下）

巴鲁安会战双方之得失

蒙古军败后，成吉思汗据报，忧而不形于色。评失吉忽秃忽曰："彼素能战：扭于常胜，未经挫折。今有此败，当益精细，增阅历矣!"。及至失吉忽秃忽败归来见：诉部将不识战瘁机宜，平日言兵事，极似有才，造临阵乃毫无布匮，以致败报。成吉思汗乃自将起师，全军急趋喀斯尼，至巴鲁安战场，询失吉忽秃忽，部将列阵何处？敌列阵何处？汗乃以其不善择地切实之。

是役也，札勒哀丁既胜，意气矜张，乃这人往告成吉思汗曰："如汝欲指定战场在某处，余将赴之"。并分所掳获，以犒三军。是时阿敏与阿喀技黑，欲争一阿剌壁种骏马，相持不让。阿敏怒，且自恃其为西域王母弟，乃举鞭挞阿喀技黑之首。札勒哀丁知康里人不服过，未加诘责。阿喀技黑愤恚，即夜率所部而去。札勒哀丁挽之归，不从。喀布尔众亦敌。由是札勒哀丁军事顿弱，乃退返喀斯尼。既而闻成吉思汗大军将至，乃谋渡印度河远遵。（下引见成吉思汗传第九章）

成吉思汗军至喀斯尼，面札勒女丁已行十有5日矣!城民不抗而降，置一长官治之，乃疾进而追及于印度河畔。札勒哀丁知事急，欲于次日渡河。成书思汗知之，而乘夜准备，疾进追之。于击溃花剌子模殿后军后，命布阵数列，对河作偃月形，进围札勒哀丁之余众。拂晓（1221年11月24日，一说在12月9日），挥军前进，先败其右翼，右翼将阿敏见士卒死伤大半，自败走，为蒙古军所追杀。俄而左翼亦败。时中军仅余七百人，犹奋勇进战。屡欲突围出，均不得逞。成吉思汗欲生擒札勒哀丁，令诸军不许发矢。因此酣战至日中，札勒哀丁见重围不开，乃易健马，复作最后一次之突击。蒙古军后却。札勒哀丁忽回马首，脱甲负盾，执麾盖，策其马自二丈高崖上跃马下投印度河，绝水而逸。蒙古军

万目共瞻。成吉思汗立河畔，告诸子说：“此人可为汝曹法也!”止诸将之欲泳水往追者。蒙古兵发矢射其从渡之兵，死者甚众。又尽歼岸上之残兵，获札勒哀丁妻子亦杀之。

122二年6月，成吉思汗以西域大定，设达鲁花赤（蒙古语，义为长官），监治其地。秋，班师北返。明年春，循进军原路还师。9月丙午朔，渡阿母河，至122五年乙酉春正月，成吉思汗返蹄和林。

第八章 蒙古西征之二——拔都西征欧洲诸战役

成吉思汗既灭花剌子模，并分封诸子，旋兴师伐西夏，灭之。太祖廿二年（公元1227年）

8月18日成吉思汗驾崩六盘山。窝阔台继位后，假道连宋伐金。金亡。窝阔台遂发动远征，拔都西征即其远征之一。

拔都西征，史称蒙古人第二次西征，本战争分为两大段落：第一阶段为征俄罗斯之役，凡五年，起自窝阔台八年（公元1236年），上于十二年（公元1240年）。第二阶段为征匈牙利之役，起自窝阔台十二年，至窝阔台死后一年，凡二年。

（按术赤封地，在咸海西南之花剌子模及其附近地区，术赤汗薨，长子鄂尔达以才不如弟，禅让拔都承嗣汗业。）

第一节征俄罗斯之役

一、战前一般情势及战争导因

西夏之亡：成吉思汗于成吉思汗廿年（公元1225年）西征花剌子模后，东返和林，乃以征服疆土，分封四子。翌年春复亲率大军再伐西夏，大败西夏军于贺兰山，冬陷兴灵二州（今宁夏银川市及灵武县）灭之。此次作战期间，成吉思汗曾因冬间错于阿儿不合之地，坠马受伤。后复扶病作战，旋遂病没于六盘山（丁谦氏元秘史考证，谓成吉思汗崩于库伦东方之纳领，哈柳图二河相会处之行宫），时为成吉思汗廿二年（公元1227年）8月18日也，享年七十三岁。临终遗嘱以未能灭金为憾，并指示伐金机宜，须假道于宋，从关西进兵，然后南北会师，以取大梁。

窝阔台连宋灭金：成吉思汗死后，暂由拖雷监国，明年召开库里尔台大会，诸王公咸至，遵遗嘱共奉窝阔台为大汗，是为蒙古太宗。太宗即位后，即召集将士，共议伐金。是时金朝仅保有河南开封洛阳及其以南等地，蒙古为伐金，曾作一伟大进兵计划，太宗统领大军由潼关进兵，命其弟拖雷率骑兵三万迂回豫西南，经过宋境，北上与窝阔台会师，金兵大败于三峯山，汴京经速不台攻下（太宗五年公元1233年年），金主逃往蔡州，旋被蒙宋合围，金主自缢死，金途灭。（太宗六年）蒙古与宋人共分河南之地，以陈蔡为界，各自撤兵。

花剌子模王朝之灭绝：初花剌子摸王阿拉丁既殁，其于札勒哀丁嗣位，旋为成吉思汗大败于印度河畔，只身走亡印度。而阿拉丁之第三子吉亚代丁，俟蒙古军东还，潛出耕合余众；遂复据有伊拉克，呼拉商，马三德兰三部。旋札勒哀丁亦潛自印度还，而夺据吉亚代丁之地。

太宗三年札勒哀丁被杀，吉亚代丁亦为其部将所缢死。至是蒙古统将绰儿马汗已征服波斯全境，花刺子模王朝子孙，亦悉绝灭。

布里阿耳之地誌：布里阿耳在里海北，乌拉山西，当伏尔加河东、卡马河滨。都城曰布里阿耳：离喀山城三百五十华里，按拔都西征，先驻节于布里阿耳，城于此役中被毁。

奇卜察克叛附无常：奇卜察克，亦译作钦察。其主矛在顿河入黑海之口。初于太祖十九年（公元1224年）冬，为者别、速不合二将所征服，兵去复叛。有八赤蛮部，抗命拒敌，形同流寇。久苦蒙古军。

俄罗斯诸王内哄：初俄罗斯（斡罗思）联军，为者别、速不台二将大败于阿勒吉河。当时俄国虽丧师于外，然境内则铍兵未甚。至是已十四载，俄罗斯侯王惟事内争，不复虑及外患。

其人纵极勇猛，然专意自相攻伐，殊少团结对外之意识，故对于整体国防，显然疏于防范。

伏尔加河下游诸国：毛而杜因与波而塔斯诸部落（洪承钧认为均系芬兰一类人），聚族于伏尔加河下游建国，而毛而杜因曾被斡罗思侵扰，故与之有嫌怨。

战争之导因：初窝阔台令拖雷亲王率军假道于宋伐金，至太宗六年（公元1243年），金亥宗死于蔡州，金亡，窝阔台还自中国，次年大会诸王百僚于和林，宴乐阅1月，散赐其即皇帝位以来所获之财货。已而决定：遵守成吉思汗遗敦，开拓疆土，遣派数路大军，远征诸国，一军侵宋，一军征讨高丽，窝阔台则欲自率军征平里海、黑海之地。当时亲王数人谏曰：

“不可，既登帝泣，不应服战征之劳。否则安用话王诸将为？”由是窝阔台乃命拔都为统帅，率长子军西征。（多桑蒙古史二卷二章）

三、作战经过

一、蒙古西征军之集中：太宗八年（公元1236）春，蒙古西征人马，集结完毕。诸王各自其地。率领所部新军迳向拔都统帅部报到。（按术赤分封西北，建矛何地，虽无可征，然彼时俄罗斯、奇卜察克全境未定，且术赤于攻略毡的后，屯兵养吉干，是则拔都统帅部似在里海之东吉尔吉斯草原一带）。待大军推进后，拔都之鄂尔多始进展至布里阿耳，嗣后再建金帐于撒来，是年夏。大军自拔都封地，向集结西进。其行军部署，概为分进并列态势：

（一）右纵队（行军序列同）

第一梯团：拔都军——以速不台指挥鄂尔达部为战略前卫。（按不里军暨阔列坚，在何纵队，虽无可徵；然拔都为统帅，自应位于主力纵

队。故应以右纵队为主力纵队。而不里军为右纵队之第二梯团。阔列坚亦应在右纵队为是）。

（二）左纵队：（两纵队虽以并列态势前进，但纵队稍向后梯次）

第一梯团：蒙哥军，以不者克所部为战略前卫。

第二梯团：贵由军，在第一次梯团后续进。

是年秋，右纵队之鄂尔达军，先抵布里阿耳境上之伏尔加河畔，完成集结之警戒与掩护配备，已而诸王军马相继而至。西征军遂全队集中于伏尔加河的东部。

二、拔都之作战指导：西征军既疑中于伏尔加河下流草原地带，统帅拔都于其麾下招集首次作战会议，研讨其作战指导诸要点。

（一）敌情分折：

①西征军感受两大威胁，布里阿耳在右，奇卜察克在左，而波而塔斯，毛而因等小部则错介于俄罗斯与集中地带之间。

②敌方诸部落，彼此构怨，相互倾轧，不相和睦。

③敌方作战准备，在时间上颇为充分；但在装备配置训练诸方面，则欠周密积极。

④敌方战斗技术，侧重剑击。

㈡本军方面：

①新征之兵，在精神上、在纪律上以及战斗技能等，均需要短期的训练。

②集中地带草原丰富，对远程跋涉疲劳之马畜，正适宜于畜牧休养。

③对敌情地形，仍须侦察搜索。

④作战时间，可自由选择，把握主动。

（三）达成任务方案之分析。

任务既确定为征讨奇卜察克及俄罗斯诸地。其达成任务之方案，就可能性说，概分如下：

①同时一并进击俄罗斯及奇卜察克，暂置布里阿耳于不顾。

②先以全力取布里阿耳，然后以左旋回席卷毁罗斯及奇卜察克。

③先各以一部分取布里阿耳烟奋卜察克，然后全力进击俄罗斯。

（四）擦都对当时状况之判断，采取如下之决心。

西征军应先以一部摊除翼侧之障碍，然后并力击破俄罗斯。

三、扫荡布里阿耳及奇卜察克：拔都依议定之策略，于太宗八年冬，遣速不台一支有力部队，进击布里阿耳。于是速不合率军先进取布里阿耳，旺其都城布里阿耳，此部诸酋迎战不胜，乃纳款请降，当拔都之受命也，窝阔台讯之曰“闻奇卜察克别部酋八赤蛮者，有胆勇，速不台可以胜之”。明年春夏之间，蒙哥军进击奇卜察克，灭其一部份部众。其别一部西徒，余聚归降蒙古。而八赤蛮所部，形同流寇，抗命拒敌，待蒙古大军至。败匿于伏尔加河深林中，1日数迁，以避踪迹。蒙哥令众军合围其林。擒之。八赤蛮为不者克手刃而死。（元史卷百二十一速不台传）

奇卜察克东北部，伏尔加河沿岸诸部族，若波而塔斯，若毛而杜因等小落部。皆震慑款服。

里海以北威定。（按此段作战目的，首在清除大军两翼之阻力，使尔后主力作战有利。故远不台及蒙哥两军，均作有限目漂之攻击作战）。

四、物拉的迷儿之攻围：西征军既领有里海及高加索山以北诸地。右翼布里阿耳之威胁亦已排除，于是拔都统帅再召开会议：议定全军征讨战罗斯。太宗九年（公元1247年，12月），蒙古军因毛而杜因向导之便，自东南进入俄境，于是首先进追物拉的米儿王国之边陲。

当蒙古军之进击俄罗斯也，俄国诸王曰幼里、日罗曼，分守勒也赞、克罗姆纳二城。二蚊位于物拉的米儿公国东南，与布里阿耳及奇卜察克相界。蒙古军压境，二城首当其冲。幼里、罗曼鉴于蒙古军凶猛，乞援于物拉的米儿共主攸利大王第二、攸利大王以须兵守境，未能派援军至。蒙古军既进，先迫勒也赞城。令出民赋十分之一为岁贡，诸王子十人以一人入质。

幼里不从。蒙古军遂围城，乃筑长围绝俄军出路，力攻五昼夜至6日破城，蒙古军掷火罐冒烟呼噪入城。幼里阖门殉难。城亦被焚。（按城破之日，华尔甫作公元1237年年12月27日，俄史作21日）。

当勒也赞之被攻也，攸利大王遗子勿赛夫洛托率众来援，兵至中道，勒也赞已破，乃改援克罗姆纳城。蒙古军既下勒也赞，续迫克罗姆纳，与勿赛夫洛托军战于城下。罗曼阵殁。勿赛夫洛托败归物拉的米儿，未几克罗姆纳城与其南之勒乐斯城亦相继下，是役因蒙古亲王阔列坚受伤而硕，故屠城甚惨。

蒙古军自此而北，进追莫斯科城，城虽建百年。守具未备。蒙古军长趋直入，攻5日拔之。

获攸利大王之孙（或作子）物拉的米儿。

蒙古军乃继续东趋物拉的米儿都城，攸利大王求援诸藩。令其于勿赛夫洛托，木思提斯拉夫守国都，而自引兵壮驻锡第河。以待诸藩王之援兵。未几兄康士坦丁之二子遏罗思托王瓦里西，雅洛斯洛弗哀王扶赛服洛特务以师来会。其弟诺夫果罗特王及匹尔斯拉夫哀王，以道远未派援兵。

太宗九年（公元1238年）冬（或作十年春2月2日），蒙古大军薄物拉的米儿，拔都与诸王将轻骑绕城一匝，相其形势。已而率兵一队至正门外，似问守陴者：“攸利大王伺在？”不答。注矢下射，诸王各发一矢，射钟楼十字架以报。旋出攸利孙物拉的米儿以招降。守城者不从，乃杀之。于是拔都分军先下其北方数城，途合围物拉的米儿城。力攻之。俄诸王妃主。见城将破。尽逃避教堂中。2月八日（或作14日）。蒙古军破城而入：纵兵杀掠，攸利二子皆战死，嫔御官绅同殉。

五、扫藩北俄：蒙古军于攻下物拉的米儿都城后，乃分数军，于2月闰，连下莫斯科外围十二城。攸利大王在锡第河闻知物拉的米儿城陷落，及眷属尽死之情报，大恸；即谋北窜。而北方之路已为蒙古军所断绝。既而蒙古军至，一战大破之，牧利战死瓦里西。蒙古军乃北趣诺夫果罗特。此城与物技的米儿、斯摩棱斯克两国为邻，北抵白海及波尔米亚、与亚洲及波罗的海通贸易，故在北方最为强盛。俄罗撕始立国时曾建都于此。然蒙古军进至臣离拔百数十里时，因春暖雪滨，道路泥泞，不能前进，乃复退去。故是城归服，反在最后。

六、屠郭尔在斯科：蒙古军北进既阻于泥水。乃退转而趋西南，择水草甘美之地，休军屯牧。以一军攻郭尔在斯科，其王瓦夕里据城坚守。蒙古军死亡凡四千众，且殒其三王。拔都大怒，令哈丹、不里往劝攻。阅两月始克之。遂屠其城，血流感渠，获瓦夕里，掩于血渠中淹毙之。

七、牧平俄罗斯东南睹部族：蒙古军毡向伏尔加河、顿河下流东南进。秋，败奇卜察克，其部酋库滩西北遁，率帐四万逃往匈牙利，余众不及逃者，皆降附充军役。时届寒冬，大川封冻，拔都分军，遣万户数人北徇物拉的米儿近境，东涉伏尔加河，略布里阿耳以北，直至乌拉山西北麓。同时命昔珏及不者克、不里扫荡奇卜察克近黑海之蔑里姆部。是年11月，贵由、蒙哥与不里、哈丹围攻阿速部蔑却思城。明年（太宗十一年公元1239年）正月拔之。

并取其旁近诸部落，阿速等韶悉平。

八、路定南俄：拔都于扫荡俄罗斯东部俊，避暑休兵：已而乃谋南俄。基辅为南俄之大都会，先是全国奉为首都，尔后大势北移，虽两都

并建，而以物技的米儿为上邦。基辅位于聂伯河之中流西举，利用聂伯河及黑海与东罗马通贸易，商货四集，故甚富庶，缘故利大王既战殁，基辅王雅洛斯拉夫往援不及，乘蒙古兵退，遂人物拉的米儿，嗣其兄位。而扯耳尼哥王米海勒亦乘雅洛斯拉夫北行，而据基辅。太宗十二年（公元1240年）拔都军至匹尔斯拉夫哀城。降之。继攻扯耳尼哥城，守城者以沸汤浇攻坡人，蒙古军多被伤。年少诸王，一人战死。然蒙古军终克之。复东北掠棚娄矛城，枣至于顿河，以绝基辅之旁按。拔都军遂追基辅，围攻之前，使蒙哥率师往侦其形势，而聂伯河河防甚严，且未冰冻，故不得波。蒙哥驻师河东，立马于扯耳尼哥岩岸，遥望基辅，崇雪白，城内敌堂三十区，金塔摩空。艳其壮丽，思瓦全之。乃遣人谕降，使者被杀，守城主将米海勒惧祸，弃城出亡，由匈矛利转走波兰。斯摩旋斯宽王罗斯的斯拉夫，有胆勇，入守基辅。旋为加里西亚王达尼尔所逐。达尼尔不自守，遣其部属狄米脱里守之。冬，聂伯河的冻合，拔都将全军俱渡，约五十万众，进筑长堤，缮备攻具，昼夜力攻，克之。12月6日城破，城民犹巷战，终日不休。既而占夺全城，城民复抢筑新寨拒战，次日更战，教士市民，争出死战。最后走入敌堂，登楼乘星以御。

人多势沉，牆崩柱折，一时死者如麻。狄米脱里，伤而未死，执见拔椰。拔都佳其忠勇，释而不诛。蒙古军由此遖至加里西亚。加里西亚国，北界立陶宛，南抵喀尔帕阡川及普鲁士、西来特河口，其君主达尼尔，闻警亦走匈牙利，城遂下。至是，南俄之地悉定，而俄罗斯全部至是概行敉平。拔都大军乃集结于加里西亚境内。休息整补，准备对波兰甸矛利作次一步的攻击。

第二节征匈牙利之役

一、战前一般形势及战争导因

一、波兰政治军事概况：先是公元1139年年，波兰王普勒恩老三世死，遗命分国于四子。

自是以后，内争时起，骨肉残杀。当蒙古军进攻之际，虚拥共主之君号者，为普勒思老三世之曾孙普勒思老四世；而年幼简樸，威德不振，虽君临克拉克，然仅保有克拉克、森的米儿。境内其他诸王，各自为致，皆不奉其号令。昔勒思老四世之叔父孔剌德君临马卓维亚、若札维亚两地，而定都于普洛兹克、亨利二世。亦普勒思老三世之诸孙也，君临西里西亚，及大波兰之地，已有三年。普勒思老四世之从兄米赤思老，蒙兀儿史记卷二十五，则谓是亨利二世之从弟。则据有斡彭，拉迪贝尔二公国。（多桑史二卷三章）

二、匈牙利政治军事概况：公元1240年终，蒙古军残破俄罗斯以后，进至加里西亚境，准备西侵匈牙利及波兰之时。匈矛利王别剌四世在位已五年矣。别剌信天主教甚笃，而不好战争，彼对蒙古军之征俄，已有所闻，而不知尽力防备，仅遗少数军队扼守边遥隘口，伐木塞道，以阻敌人之侵入，乃至灾年斋节中，俄罗斯败警频传，始集合教士贵族于布达城，计议防守大计。

初别剌即位之前。国中贵人有谮使别剌与其父王安得烈不和者，别剌曾治其罪：又先王所赐诸贵人采地，别剌悉收归国有，于是贵人多怨别剌，及蒙古军压境，别剌拟议国防。诸将遂以返还采地为条件，而别剌则坚持采地不能因要挟而退还。以是君臣将帅间颇不在睦。

尚有别一原因，而使全国之人怨其国王者，即在二年前有奇卜察克酋长车滩者率部众避蒙古军，徙入匈境，其数共有四万帐。别剌仅与众约，敢奉天主教。即收容之。国王且亲赴边地，迎迂酋长库滩汗，厚礼款待。然此部众入境后，所过之处，扰害居民，甚有强奸妇女者。

由是国内嫌恶新客之声群起，因而亦怨恨国王。

三、战争之起因：据巴克霍森所著成吉思汗帝国载称：远在太租十九年（公元1224年），速不台追击军从东欧凯还时，在班师途中，速不台曾提出有关位于乌拉山，里海各附近地区黄种牧人之情报。并建议成吉思汗征讨多恼河，以解救与蒙古人同种之黄种人，盖此或即成吉思汗以后蒙古一再西征之远因。

当蒙古军之征俄罗斯也，拔都以匈牙利收纳奇卜察克部酋库滩，曾遣使前往诘问，又闻俄罗斯扯耳尼哥王米海勒，加里西亚王达尼尔均逃匿甸矛利，遂更与拔都之进军匈牙利之口实。

蒙古军既略定全俄，速不台曾对中亚实力作精细确切之研究，彼认为：如不击破欧洲中部之现存力量，则蒙古军对俄罗斯之占领，实非安全，于是拔都在战略要求之下，遂决定进击匈矛利。

二、战略指导及作战经过

1.蒙古先遭军威力搜索：太宗十二年（公元1240年）冬，西征军就加里西亚境内从事休整，统帅拔都对远不台继续西征之建议，颇为赞赏，乃派遣一部兵力，进入波兰境内，搜索敌情地形（太宗十三年）。此一部蒙军，首先进入波兰之吕不邻（今作卢布林）州，肆意蹂购，然后携其卤获，退向加里西亚基地。冬寒，乘维斯杜拉河冰合，蒙古军使一部涉河大掠森的米儿城，至迫近克拉克七英里之地，为克拉克守将物拉的米儿率少数军所袭击，蒙古乃驱其所俘男女，而退还加里西亚。

2.战略指导：拔都一面在加里西亚休兵秣马，一面搜集研判有关征讨匈牙利之作战情报。

至太宗十三年1月，拔都统帅乃策定其作战指导如下，并将大军迫近波兰边境集中。

（一）为达成击溃波兰，波希米亚、日尔曼及甸牙利各国之目的，大军迅速由三方面分别向波兰，匈牙利两国突入，期于佩斯特附近会合。

（二）以强有力之一部军队，迳趋波兰，先击破波兰，日尔曼、波希米亚，以阻止彼等对匈牙利可能之援助。而后向多恼河进展，期于佩斯特附近与主力军会合。

（三）另以一部牵制留住东罗马帝国对匈牙利之接兵为主要任务，先向匈牙利东南方面推进。尔后指向佩斯特。

（四）以主力迳向匈矛利中心突入，突袭佩斯特，完成初期作战之目标。

于是乃作如下之战略部署：

（一）以三至四万骑之众，命贝达尔帅之，为右翼军。先在波兰境内行支作战，以策应匈牙利方面之主作战。

（二）遗哈丹卒兵一部为左翼军，掩护主力军南方面之翼侧，且以之牵制由东南方面可能援匈之敌军。

（三）拔都与速不台率主力约六七万骑，分两纵队，迳趋佩斯特，求匈牙利军主力而击破之。

3.右翼军之作战（一）贝达尔军之进军：贝达尔率领右翼军，突入

波兰、克拉克及森的米儿，两地官员，搜兵抵御。太宗十三年春（公元1241年3月18日），战于夕特罗物城，波兰兵溃北，主将阵殁，士卒多战死。普勒思老四世不敢居克拉克，偕其母、妻逃亡。贵族亦效其所为，相继出走日尔曼及匈牙利。人民则逃匿山林川谷间。3月24日蒙古军焚毁克挟克，进取枪迪贝尔。其酋长米昔斯拉夫哀，兵寡不能御，北遁里格尼志，合于其兄亨利二世。只达尔军沿奥得河西北行，至西里西亚都城布累斯劳。城民自焚其城，与士兵退守河州中坚堡。坚堡不易攻，蒙古军先曾分军扫荡苦札维亚，至是来会，遂并力西向，以至里格尼志。

（二）德波联军之编组：当时西里西亚大公亨利二世，集聚三万屯于里格尼志，区分为五军以备战。此军系由日尔曼，波希米亚、波兰三个国籍合组而成，故史称波、日、波联军：亦有称德波联军者。由于里格尼志歼灭战而有名。此军之编组概如下：

第一军：为日尔曼之义勇兵，与戈勒得堡鑛夫，合编而成，以莫利维亚侯匠勒得之子普勒思老将之。

第二军：为大波兰之志愿军，与不罗姆阿鲁（此地属波森，波森属波甜）人及克拉克军一小队，合编而成，以克拉克长官物拉的米儿之弟速里思老将之。

第三军：为斡朋、拉迤昆尔之军，由米赤思老公爵自将之。

第四军：为日尔曼骑士，由骑士长鲍培将之。

第五军：乡属西里西亚之精锐及波兰之精壮，辅以外籍之兵，其中以日尔曼人为多，亨利二世自将之。

㈢里格尼志附近之歼诫战：举世闻名之里格尼志会战，亦称瓦勒思塔特会战。经双方之紧急部署，迄公元1241年4月9日于焉爆发。联军指挥官为亨利二世，蒙古军指挥官为贝达尔。双方兵力相埒；而实力则优劣互见，联军装备古老，单位编组亦不均衡：蒙古军亦区分为五军，士气旺盛。

4月9日，亨利二世与诸侯王，诸基督教长等，于举行弥撒后，共出里格尼志城迎敌，两军列阵于距城一程之地（姚从吾氏注汽车十五分钟），位于里格尼志城西南奈思河所灌溉之平原中（后即于其地建一村名曰瓦勒思塔特，故亦称瓦勒思塔特会战）。

波兰之第一军请先击敌，接战之下蒙古军前锋伪若不胜，退走。波兰此军尽为步兵，且兵甲不完，士卒半身裸露，追敌既远，蒙古军忽还攒射之，主将普勒思死之，日尔曼兵亦尽殁。

波兰第二第三两军急往援，亦败还。初亨利二世之部署：以第四第五两军为预备队，使专事收容溃卒。兹以情势危殆，即以之出战，亦失

利。至是波兰全军尽溃，亨利二世仅率四骑脱走，为蒙古军追骑刺杀于马下。是役也，波兰军全军覆没，相传蒙古军在战场上计算死者之数，每杀一敌，割其一耳，所得之耳，盈九大皮囊云。

蒙古军既胜，乃以枪贯亨利之首，徇示里格尼志堡前。时城民已焚城，退守内堡。蒙古兵谕降，不从。遂残破附近各地，舍之而去。进屯奈思河附近，稍事休整。4月15日复趋军拉迪贝儿境内，驻军八日。继入莫利雄亚，肆行焚杀。达于波希米亚、奥大利边境时，波希米亚王温赤思老以国内兵少，又不敢召波希米亚等地戍兵。仅遣步骑五千人，往援莫利维亚。

至则为蒙古军围困。而此五千人负隅固守。迄6月27日蒙古军解围去。贝达尔军遂进向匈矛利与拔都大军会合。

4.主力罩之作战（一）匈矛利王别剌之拒降：太宗十三年，贝达尔军残破西里西亚、莫利维亚之时，拔都率主力军，侵入匈矛利。拔都进攻前，首作书劝别剌向蒙古军没降。别剌不愿蹄附，然亦不设战备，仅遣数小队守喀尔帕阡山隘口，从事擒极防御而已。拔都既率军压境，匈民以别剌不谙兵略，且招致外族，本已啧有烦贯。此闻蒙古人系因匈容纳逃亡而来攻，民乃大哗。别剌不得已，乃下库滩于狱。（下引见多桑蒙古史、二卷三章）㈡别剌之作战部署：太宗十三年、公元1241年3月2日，匈牙利守边军归报：“边军尽殁，鞑靼兵已入境。匈民大惧。时别剌正召开国防会议。乃急遣莅会显要各还防地，徽集军队以御敌。并遣使谕库滩之众共同御侮。别剌则纠集阿耳伯、思特里尼矛两地之军队，率之赴布达，而待诸藩兵之至，自营于布达城对岸之佩斯特城。命瓦陈主教护送王后子女细輭珠宝，避往奥大利边境。

（二）赛育河会战暨会战前奏：拔都军分二路进击匈牙利。一路自将之，从斡罗斯关隘口前进。

一路由远不台将之，从罗马尼亚达兰西勒宛尼亚山隘前进，拔都一路经趋佩斯特，结营于距佩斯特半日程。蒙古军游骑达城下，诱守兵出战。别剌坐待援师，避不出兵。游骑旋去，后三日复来，城兵见之，踊跃求出击，别剌仍固止之。玉果麟大主教，率少数部众出城与蒙古军接战。蒙军佯不支败退。过一池沼地，大主教迳追不舍，顾其士卒身环重甲，遂陷淖中，进退失据。蒙古军攒射，歼之。得脱还城者，仅大主教等四人而已。匈民见大主教败归，询问究竟。民又大NE061。谓蒙古军乡奇卜察克人，不杀库滩，将为内变。于是库滩死于狱，其部众故去，而趋保加利亚。至是匈矛利不但失却一支战斗力量，且招致许多纷扰。

当佩斯特城内乱时，拔都与远不台两军会合，而匈矛利军亦旋集，别剌自佩斯特率之击蒙古兵。拔都大军引退，别剌进至赛育河，营于河西。附近有桥，以为蒙古军只能在此处渡河，乃以千人守之。时蒙古军退至河东五英里之地，附近多沼泽，地险而易守。其集结地三面绕水，

有险可扼；且林木丛杂，蔽敌窥望。别剌既营于河西，環车为管，悬盾于上，俨如堡垒，而戒备甚懈。且地形开阔。举动暴露。相持数日。拔都见敌虽众，有瑕可擎，乃决心乘夜进袭。其作战部署，以一军夺桥，一军迂回下游潛渡陶击。于桥之左岸，树礮七具。夜袭之先，有蒙古军中之俄虏逸入匈营，以夜袭情报相告。而别剌不省，仍不预为措施。惟别剌之弟戈罗门与玉果麟大主教，对此情报极重视。乃引军夜巡，至桥西，蒙古军适争桥，亟攻退之：增卒守界而归。匈营中以为无患失，遂酣寝。

既而蒙古军以礮逐守兵，凌晨渡河，下游之军亦渡而成列：遂围匈军营。（按争夺桥头堡之蒙古军，系由拔都指挥。先是奇袭，继之以强袭，占领此石桥，而挥大军以渡。迂回军则由速不台指挥）。

匈军不意被袭，军中顿形混乱，不敢迎战，仅戈罗门、玉果麟及圣堂骑士长，率部份士卒出战，失利还营。再出战，后负伤而还：圣堂骑士尽殁。由是匈军益惧，至日午，戈罗门又出战，战正酣，营中匈军乡出营溃走，蒙古军故开围以纵之，营中余众，见有路可逃，争相出走，惟匈军结帐甚密，幕阻挠，溃兵遥难尽出。别剌见势急，亟以士卒应战，继见不战而溃，乃自夺路逃逸，从蒙古军缺围之处出走。蒙古军乃自后驱逐，待匈军疲惫，次第歼之于道，其死于沼泽者，为数亦夥，逸者无几。积尸亘2日程，赛育河水为之尽赤，大主教战死。

别剌以有良骑，遁入深林中，辗转以至喀尔帕阡山麓，合于其婿克垃克公普勒恩老。至是举世闻名之赛育河歼灭战，遂告终结。时公元1241年4月末也。

蒙古军获胜后，迳迫佩斯特。时乡恼河畔居民，乡避兵于此，城民虽缮治守具，期在必保。

然蒙古军至城下，攻数日即下之：尽杀城民，焚城而去。（多桑蒙古史，二卷三章）

5.左翼军之作战：当蒙古军残破匈矛利国都之时，哈丹一军则从达兰西勒宛尼亚境内，间道蹦山林入鲁丹城。民兵出战，蒙古军退去。民兵以为怯，乃还城燕乐，不登陴、不闭城。

已而古蒙军掩至，一鼓而下之。军之所至，望风披靡。

6.西征军完成任务是年夏，西征军各路兵马，复会合于赛育河上，驻营休整。拔都分遣士人，主治各城，以饮民赋，而供军需。直至严冬，复派两军过多恼河向西扫荡。同时对别剌之残部亦派兵追搜。

其进击奥境之蒙古军，曾进抵维也纳附近之纽斯泰特，未下而引兵还。至此匈境仅三堡未下，实际上拔都已完成对匈牙利之占领任务矣!

三、西征军班师

公元1242年4月，窝阔台驽崩之凶讯传至蒙古军中，窝阔台之子侄，皆在西征军中，必须回归本土参加库里尔泰大会，拔都乃下令，全军东返。至是为时七载之拔都西征，于焉终结。（按公元1242年为蒙古马真皇后称制之第一年，亦即宋淳祐二年，岁次壬寅。）

第三节战后之政局

一、定宗贵由即位之始末

蒙古太宗窝阔台在位十三年，死时五十六岁。窝阔台死时，诸子侄皆从征在外，遂由太宗六皇后乃马真氏称制，暂行代理国政，等待诸王子回朝，再由靡里尔泰大会决定新君。此时诸王子将士正在东征高丽，西征欧洲，南伐南宋，闻悉太宗驾崩，乃纷纷同归故土。因为道路遥远，直到乃马真氏称制之第三年，诸王子始集中和林。时成吉思汗子孙中，以拔都（西征统帅）年岁最长，权势最大，又是嫡长孙，在会议中患有最高发言权：但拔都因与乃马真氏有嫌，托故不到，于是库里尔泰大会，竟久不能决，一直到乃马贝氏称制之第五年，因君泣不能久虚，途不待拔都而遵循乃马真之暗示，公推窝阔台长予贵由（乃马真氏所生）为大汗，是为蒙古定宗。贵由原为西征将领之一，为拔都部属，从征时尝称病逗留不进，及至拔都班师东归奔丧，贵由亦竟就程先行，拔都甚为不满。及其立为大汗，因益加不快。遂一直留在西方，不复东归，而作钦察汗国之统治者。

二、钦察汗国之建立

钦察汗国为拔都西征胜利后所建立者，亦称为术赤后人之王国，因为封在钦察汗国之诸可汗，皆是术赤之子孙。术赤为成吉思汗长子，生于十四人，其著名者为前五子，长子鄂尔达，次子拔都，三子别儿哥，四子脱哈帖木儿，五子昔班。蒙古宗王兄弟常自相残杀，唯术赤诸子皆甚友爱。鄂尔达自以才不如拔都，早年即将长子权让于其弟拔都，所以当年太宗发动长子西征，是由拔都率领。拔都感念长兄相让之恩情，乃将东北锡尔河以北地方封予鄂尔达及其后裔，其所居之大帐为白色，故西人称之曰白帐汗国。又念其五弟昔班有从征俄罗斯之功，将东方乌技河地方封子昔班。昔班所居大帐为青色，西人称之曰青帐汗国。拔都自建大帐（斡儿朵）于伏儿加河下游之萨来地方，称为“冬牙”，另外在同河中游左岸不里阿尔地方，建立“夏牙”，作为避署之地。大帐以白毡为质，黄金饰顶，西人称为金帐汗国。拔都又在伏儿加河上游，不里阿尔之北喀山地方，再建一大帐，令其子撒里答，统兵居住，以镇摄俄罗斯诸部。其余诸弟如托克帖木儿、土斡儿等，亦均有封疆，遍于钦察国境内，皆统辖于拔都，而以金帐汗为钦察大汗，享有境内诸民族诸封汗之最高宗主权。

钦察汗所统治之疆域在四大汗国中为最广，包括锡尔河、咸海以北的古尔吉斯平原里海迤北之乌拉河流域（以上为白帐青帐汗国），及欧洲之伏尔加河（一作窝瓦河）流域，黑海以北之顿河流域，帖尼博尔流

域之俄罗斯诸部（以上金帐汗国），其势力范围则及于波兰（孛烈儿）及多脑河流域之匈牙利。当时俄罗斯诸公园之王公，皆称臣于金帐可汗，年年入朝，国内大事，皆听命于蒙古可汗之裁决，不得自主。诸王谒见蒙古可汗，亦皆遵从蒙古礼节，屈辱备至。钦察汗国在西方之统治，比元朝在中国之统治为久，是四大汗国中，寿命最长之一汗国。

三、蒙古与南宋之战局

蒙古诚金作战，到蔡州攻下，金哀宗自缢后，战争告一段落。蒙古与南宋暂时相约，平分金人河南之地，以陈蔡为界，两国各自撤兵，时在蒙古太宗六年，宋端平元年（公元1234）。太宗八年，拔都开始西征，此后宋蒙闻虽不断仍有战争，蒙古铁骑蹂躏面积虽广，但宋蒙一直在和议之中，边谈边打，作战并不积极，直到太宗驽崩，乃马真氏称制，拔都班师东蹄之际，蒙古在四川之塔海所部，自成都南下，破泸州，围叙州，杀死宋都统杨大全。其东方张柔所部，则越过淮水，攻到扬子江边，规掠和滁扬等州，并攻入通州，屠其城。江北与川中人民大遭涂炭，百姓流亡，成为一片荒凉之战杨。其事详本卷宋蒙战争两章。

第九章 蒙古西征之三——旭烈兀征木刺夷、报达诸战役及后期四大汗国

宋淳佑十一年（公元1251年）蒙哥即汗位，遵奉成吉思汗之遗训，拓展疆域，乃发动两大远征：一为进军西南，作灭宋之准备，一为西征波斯。因蒙哥即位之际，波斯境内，尚有木剌夷，报达两国独立，故遣旭烈兀征讨之，史称此次西征为蒙古人第三次西征。

旭烈兀大军的先锋部队，于元宪宗二年（公元1251年）出发，主力军于宪宗三年西进。先征讨木刺夷，至宪宗六年（公元1256年）11月，木刺夷敌主鲁克赖丁投降。续征报达，至宪宗八年（公元1258）2月，报达教主木思塔辛降服。

旭烈兀复于宪宗九年，进兵铰利亚，明年估价其京城大马士摹。至此波斯一统，蒙古伊儿汗王朝肇建。

元世祖于至元元年（公元1384），遣使者至波斯，册封旭烈兀为伊儿汗。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

一、蒙古方面

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帝国之实力，已自中亚扩及欧洲，此际，察合台、窝阔台两大汗国，仍如成吉思汗遗命之状况，分别在锡尔河以东至畏兀儿故地，及在伊犁河流域，承袭汗国之统治；而钦察汗国，则已自康里、奇卜察克、花刺子模故地，由拔都拓展北至白海，西抵多脑河流域，而有俄罗斯故地。至对于南方之宋朝，亦大施压力，代有进展，迄蒙哥即皇帝位，蒙古君权之承袭，已由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其政治情形，已由游牧部落，进而为有组织有文化之帝国统治。至其内部，虽已显露分化倾轧之征象，然其军国力量，则犹克秉成吉思汗之遗志，一致对外，以开拓疆土。

当时蒙古本部，正逐渐繁荣，一派新兴气象。察合台、窝阔台、钦察三大汗国，各对其封地之统制，亦十分稳固，南方宋室，势力衰微。蒙古实力，已拓展至四川两淮等地。西方小国，如亚赛尔拜然、乔治亚，小亚细亚、阿波勒等国，均归属称藩。其间容有稍存犹豫观望之意者，然一旦蒙军临境，则悉伏地降服，莫敢抗命者。故此际情势，在蒙古方面，实属后方稳固，国势方张，而木刺夷，报达等国，其地理形势，虽属有利，但彼此不相支援，地位孤立。

蒙哥即位后，励精国强，任命忙哥撒儿为大断事官，以孛尔该掌文书省及财政内政两部事。分文书省为数局，设波斯、畏兀儿，汉地、西

番、唐兀等令史，使之主往来文书。以晃忽儿为和林长官，典守宫殿帑币。命皇弟忽必烈，总治汉南诸路军民，以马合木总治汉地，以阿儿浑总治波斯。并减轻藩属各邦税赋，豁免欠缴租税。曾云："与而充盈岸帑，不如抚慰民心"。对三皇后及诸王等所发命旨，及前此旧令之不适合者，均一律明令废止。

蒙古肇起，兵制简易，部众画佥为兵。宿卫之制，始自成吉思汗，其后世因之。其法为选千户百户及自身之子弟以编护卫亲军。迨至窝阔台则又创军之制：蒙古户每一牌子盒军一名，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上。对于外藩及汉地，则通验丁数，每二十名佥一名。贵由皇帝复诏蒙古户"百户一兵"。至蒙哥即泣：除仍旧制外，则续佥汉人从军。

元初用兵四方，士卒以私财自瞻。至忽必烈入统中原，军户之制始定。故蒙哥时代之补给制度，正为由"自瞻"变为"军户"之过渡时期。至于马政，此际乃系谕户"分著"，其难买牛马之地，许拆价以代实物。延至中统年间，始演变为"和买"之制。其他如训练，编组、兵器战法等，则率有先例。

二、木剌夷及报达方面

一、木剌夷：木剌夷乃亦思马因人之另一称谓，原义为迷途者。初天方教另一派之教主亦思马尔主子名别者，嗣父位，首创亦思马因教，后以名其国。北宋年间、其敌民相率徙至波斯，先侵据阿剌谟特堡，继筑堡于里海西南之山中，组织一名曰鲁德八儿之区域。凡险峻之地，皆建堡以守之。整势始盛，尔后并在库希斯坦招收信徒，据险建堡。迄公元1092年，塞尔拄克帝国内乱开始之际，亦思马因派之势力，逢日见其张。此派教规，凡党徒必奉教，专务杀人行刺。传至哈中山第二，蓄刺客愈众，杀人益多，行为诡谲，故为善良同教徒所唾弃，且愿为诸邻国所畏惮，由是阿剌伯语遂呼之为木刺夷。当成吉思汗西征之时，木剌夷教主札勒哀丁，曾称臣辕款。至公元1255年，其教主阿老瓦丁被弑，其子鲁克赖丁忽而沙，即教主位于麦门底司，此一为当世所嫌恶之国家，其政治宗教之势力范围，仅限于鲁德八儿、库希斯坦及叙利亚三地之部份区域，其党徒数量有限，故其实力，当远不能与蒙古帝国相比。但其文化程度，则较蒙古民族为高（按木刺夷之天文仪器及医术以及有价值之著作等，均极发达）。又由于其工商业发达之故，经济情形，亦甚良好。然阿老瓦丁不理政事，百务废弛；且民性凶狠。故国内盗贼充斥。至鲁克赖丁嗣位之际，旭烈兀西征大军，已通过撒马尔干，向其国境近迫。当此之时，鲁克赖丁虽亟谋整顿，然已迫不及待矣。

报达：天方教之正统，于七世纪中，已拓地东至印度，西并叙利亚，远及埃及。初建都于巴士拉城，至公元750余年，阿拔斯即教主位（按此处所称之教主，乃同教徒之最高首领。通常直译为哈里发或哈利发，原文作，本为继承者之义）。以其衣尚黑，唐朝称之为黑衣大食。后迁都于巴格达，故又以报达名其国。（按元史通译为报达，今译巴格达，本史称国时仍沿用报达，称都会时则敢用巴格达）黑衣大食东邻花

刺子模，以两河流域为其发祥地，建国五百年，文化最昌明，内部交通便利，水利良好，故农商业均极发达。其极盛时期，辖地甚广。计有：报达（巴格达），敍利亚，坎及，阿非利加、阿剌伯、波斯、土尔其斯坦，小亚细亚，北至黑海。藩国既多，疆域亦广。迨花剌子模灭亡，东方属国尽失，国势衰弱。至公元1242年木思塔辛即教主位。木思塔辛，为人长厚，少决断，乏毅力，喜游乐歌舞，以政事委诸大臣。左右尽属谄佞，内部逻伏危机：重臣怀二，亲信叛离：迨内乱大起，反招抚叛逆，昭为忠贞；其暗弱如此。

第二节战争之导因

昔蒙哥在西域时，可疾云之大法官苫思丁来谒，苫思丁身着锁子甲，蒙哥怪而询其故。对曰："常着此甲，用以防亦思马因人之匕首"。因详述此派教徒之暴行。蒙哥由是深恶亦思马因人。及蒙哥继定宗即位为帝（庙号宪宗），即立意首先殄减亦思马因教徒。所谓木剌夷人，即属于亦思马因教徒是也。

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蒙哥皇帝思遵祖父成吉思汗之遗训；拓展疆域，以为皇弟忽必烈，旭烈兀开藩建汗。乃决议两大远征：一为南侵，一为西征。因窝阔台在位时，曾遣元帅绰儿马汗经略波斯，几年征讨，仅使札兰丁（前章为札勒哀丁）覆没，高加索及小亚细亚等部称藩：对波斯问题，迄未解决。盖当蒙哥即位之际，波斯境内。尚有两个国家保持其独立：一为立国于马三德兰地方之刺客派之木剌夷国，一是建都巴格达之黑衣大食王国。其中木剌夷人凶狠残暴，屡劫蒙古商旅。蒙哥皇帝为维护蒙古帝国之权益，乃决定远征波斯，以国在该地建立一统一政权，以消灭此等大食之余孽。

一、划定战区规定序列：蒙哥皇帝基于既定国策，任命旭烈兀为西征之统帅，分西域为四部：曰呼拉商，马三德兰，伊拉克，亚赛尔拜然。皆统辖于旭烈兀。原在西域方面征讨或镇抚诸军，亦皆划归旭烈兀西征军之序列；如征印度之诺颜撒里，及现正经略西域之毓兵元帅贝住，镇抚呼拉商、马三德兰之岱儿巴圆诸将，皆令听命于旭烈兀。（按上述三将统率兵力：贝住元帅为三万骑，其余不详。然撒里征印度为独立任务，岱儿巴图为地方军事长官，故其所部兵力，各在万人以上。此处划入序列之兵力，可能在五万人以上。又贝住原为绰儿马汗之副帅，绰尔马汗卒，贝住擢升为元帅）。

二、编组西征军及布置前进补给等事宜：蒙哥皇帝为编组西征军，命成吉思汗系诸宗王所部兵马，各十佥其二，以近亲统率之，从旭烈兀西征。并由中国招致工程师千人，管理投石，发弩，放射石油等攻城机械。（按此军兵力多少诸史册均漏佚，只知旭烈兀之先遣部队为万二千人。但至少察合台及术赤两系所领之兵，宜各在万人以上，连同旭烈兀自身部队及诸宗王部队，假定为五万人，合西域现任兵马，共为十万，似无不可。不过此种数字，究为假定）同时命令保留和林，别失八里间之统阿特山以西之草地，以供驻军之用。原驻之军，惠即将诸地让出，

并善修道路，设备船桥。又命西域驻军退驻罗耳边界。且为大军修桥道备粮储，复令波斯官吏，应为每兵卒一人预备面粉百“门”，酒五十“门”。豁免大军所过之地，当年租赋。

三、西征军作战构想：旭烈兀既受命统帅西征军，蒙哥谕之曰：“应谨守祖父教训，并以祖父为榜样。此次征伐，对诸民族之自愿归顺者，善遇之。抵抗者则殄灭之。灭亦思马因人以后，应强迫报达臣服：然后回归蒙古、凡事应与汝妃脱古思同议。”并以金银宝石，分赐旭烈兀及其诸妃诸子，且厚赐从征诸将。（多桑史四卷四章）

旭烈兀基于蒙哥之指示，及有关诸情况，乃策定其作战构想如下：

（一）以蒙古军为基干，附以藩王从征诸军，一举殄灭木剌夷。进而征讨报达、叙利亚、埃及诸国，以底波斯全境，而开建一新大汗国。

（二）先谕敌以恩威，招降绥抚为主。如敢抗拒，即摧灭之，必致堡堕城屠而后已。

四、旭烈兀率军前进：元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西历7月，旭烈兀遣乃蛮人怯的不花率万二千人之军，先期出发，为尔梭大军作战作所要之准备。其本人仍留和林，筹组西征军。至公元1253年5月2日，还其封地。又数月后，始完成其出发诸准备。以其封地委其次子出木哈儿。自率其全军，于公元1253年10月十9日，开始西进；命宗王巴剌寒、秃塔儿二人，率拔都从征之军为先锋，令沿途官吏，皆备粮储马，以待旭烈兀军至阿力麻里，察哈台汗国王妃倭而干纳宴劳之。又西行，土耳其斯坦、河中两地长官马思忽惕，偕两地官吏将领来迎。

宪宗四年夏，大军留驻于土耳其斯坦。明年9月，大军进抵撒马尔干，马思忽惕献金锦帐，结营于撒马尔干附近草原丰美之地，旭烈兀留此实乐者凡四10日。续西进，军抵铁门关，波斯长官阿儿潭偕呼拉商之贵人达官来迎，留居此地1月。分遣使者谕藩属诸王曰：“今奉命来灭木剌夷，其自率军队来从征者，事后必有赏，其犹豫不决者，必严酷以待之。”公元1256年1月2日，旭烈兀大军，从船桥渡阿母河，罗耳使者来贺。伊拉克、呼拉商，亚赛尔拜然，乔治亚诺部主君，皆来迎。因多寒，大风雪7日，马多冻死。遂于阿母河畔驻冬。阿儿浑入觐过此，留其子克烈蔑比掌印官阿合马与阿老瓦丁诸员从征。及春，旭烈兀始率大军向作战地进迫。

木剌夷方面

当亦思马因派，传至教主阿老瓦丁之际，因阿老瓦丁有心疾，精种错乱。兼之阿老瓦丁幼时即受惯养，不容人违背其意，无人敢以恶讯告之，恐触其怒，所以阿老瓦丁不知外事，以致国内盗贼充斥，人民横受压迫。

初阿老瓦丁立其子鲁克赖丁忽儿沙为嗣，及鲁克赖丁年长，众望属

之，视若未来教长，奉之如同其父，阿老瓦丁忌之，欲改立他子为嗣，然其民不附，盖根据其教派之说，初次指定不能挽回也。阿老瓦丁由是虐待鲁克赖丁，而鲁克赖丁后以其父不能理事，致蒙古兵入侵（此指怯的不花军攻库希斯坦事），欲背其父遣使向蒙古输诚。诸贵人多从其意，由是父子两党对立。

公元1255年12月2日，阿老瓦丁卧醉，夜半为其幸臣哈散所杀。

鲁克赖丁忽儿沙即位以后，命其臣民遵守正教习惯，清除道路盗贼，亟谋整顿，初木剌契有兵约十余万；计库希斯坦境内有兵六七万，鲁德八儿区守兵约五六万，元宪宗三年会为蒙古军击破五万。鲁克赖丁既执政，鉴于实力薄弱，无力与战，乃自其主堡麦门底斯遣使赴旭烈兀营中纳款，以遂其假降图存之素愿。同时亦严整其众堡之守备。

按新元史列传："千户郭侃，从宗王旭烈兀西征，宪宗三年至木剌夷，敌堑道置毒水中，侃破其兵五万"。以事时计，郭侃应为怯的不花帐前一大将，且此役应属于攻库希斯坦作战中。不过新元作史者以为："元之兵制，汉人无将蒙古兵声，旭烈兀平木剌夷及报达，郭侃之功，在怯的不花诸将之右，其事或虚妄不实。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傅疑，今仍采旧史之文为列传云。"又冯承钧以宪宗六年旭烈兀所遣会攻库希斯坦之库喀伊尔喀疑为郭侃。此说与新元史年序不合，仅并注如上。

鲁克赖丁，慑于蒙古军之声威，欲求瓦全，拟作有条件之投降，屡遣使臣，往返折衔，而不得要领。

第三节作战经过

一、灭亡木剌夷之役

一、怯的不花先锋军之攻击：怯的不花于宪宗二年，受命为西征军先遣部队指挥官，乃率队先行。明年此军进抵木剌夷国境；即先侵入摩希斯坦，攻下数堡，进围其要堡吉儿都苦。该堡高踞山巅，径绝攀援，矢石仰攻，皆不能及。怯的不花乃筑营两重，掘壕两道，令其将布里围困之。而自引兵攻掠左近城堡。宪宗四年吉儿都苦堡守军逆袭，布里被杀，蒙古军伤亡亦众。怯的不花闻警亟同军，仍遣别将四出攻掠。旋吉儿都苦堡病疫、木剌夷教主阿老瓦丁遣精锐百余人，备药及临、突围而入，完守如故。迄旭烈兀大军进抵波斯时，此堡仍坚守未下。然怯的不花军，先后杀伤木剌夷军在五万以上，使鲁克赖丁之实力，大为削减。

二、旭烈兀率军进迫木剌夷：元宪宗六年旭烈兀军至撒瓦，旭烈兀遣摩喀伊尔喀率兵往助怯的不花会攻摩希斯坦诸堡。二将略取秃温，屠其居民，虏其妇孺而还。至是怯的不花归还建制。旭烈兀继经徒思至沙不耳州之哈不衫。乃令其大军稍稍集结。一面听取怯的不花呈出之有关作战诸情报，一面与贝住元帅建立直接指挥体系。同时遣贝克帖木克赴末剌夷谕降。

三、鲁克赖丁洽降：木剌夷原拥有重兵，凭险据堡，未可即下。故旭烈兀在战略上取逐次消耗之方策。（按木剌夷国军兵力，虽不可考；但在宪宗三年既被残五万，故其总兵力应在十万以上）。迨至宪宗六年，鲁克赖丁鉴于敌军压境，无力自保；乃于西历6月，遣其弟沙歆沙，造蒙古军门洽降，旭烈兀因致书于鲁克辍丁云：“只须履行二项条件，则汝父虐待蒙古人之罪可有：“一为尽毁所有堡垒，一为阁下亲来纳降。”鲁克赖丁乃堕其数堡，并将部份要塞削平。旭烈兀亦命只住帐前统将牙撒兀儿，退出木剌夷边境。（按公元1256年6月，牙撒兀儿驻军哈马丹城，会遣其子偕沙歆沙往旭烈兀军中洽降。然数日后，牙撒兀儿以一军进攻阿剌模特，猛攻不下。故此军以在可疾云附近为是）。但鲁克赖丁对出谒一事，则请宽限一年。

9月，旭烈兀军于此斯塔姆，再对鲁克赖丁，谕以恩威，命其来见。鲁克赖丁仍以宽限为请，并求除保有阿剌模特，兰巴撒耳、剌勒三堡外，其他诸堡一律献出，并谓已命吉儿都苦堡及库希斯坦守将，赴营纳款。盖鲁克赖丁以为冬寒将至：蒙古军将不能冒寒在山国作战：故作此口头退让，以冀延宕时间。

四、旭烈兀进军逼降：旭烈兀鉴于鲁克赖丁缺乏诚意，且洞悉其情，旨在缓兵，乃一面进军，一面促其来见。并谕如因事不能遽来，可缓数日，先以子来。鲁克赖丁闻讯，颇为狼狈，佯谓将遣子来谒，并佥军三百以从；又求国内不受兵侵，允将堡垒尽毁。乃遣其庶弟，冒为己子，偕大臣数人，于10月26日至蒙古军。旭烈兀知其诈，抚慰而遣之归。鲁克赖丁遣其弟沙歆沙愈军三百复来见。旭烈兀命沙歆沙归谕其兄，即堕其麦门底斯要塞，并亲自来见，将厚待之。否则未来之事，只有上帝知之。然鲁克赖丁仍托词不敢出见。

五、对饔门庭司堡之攻击部署：旭烈兀鉴于鲁克赖丁之不愿输诚，乃决心以武力解决。当时西征军对鲁德八儿区，亦已完成包围态势，其攻击部署之大要如下：

1.北军：以不花帖木耳，库喀伊而喀将之，已集结于右翼马三德兰方面，待命沿海岸向西攻击前进。

2.南军：以捏克答而斡兀勒，怯的不花将之，已集结于左翼，待命向西模娘以北进击。

（按此军为察合台系所衾之军）。

3.旭烈兀自将中军万人，已进追于秃马温，待机前进。

（按以上三军为主力，预备由东方面进攻。）

4.支队：命巴剌寒、秃塔儿两王，率术赤系从征诸军，待命向阿剌模恃进出，以策宪主力军之作战。

各军之攻击目标，同为麦门底司堡。

旭烈兀部署诸军既定，乃命诸军攻击前进，同时为配合大军作战，征发所有牲畜，转运粮食。将鲁克赖丁所佥之军三百人，密屠之。

六、攻麦门底司墟及鲁克赖丁之降：11月9日旭烈兀进抵麦门底司堡，一面命诸军就开进配置，一面亲率诸将侦察地形。当时适值冬寒，马秣不足，粮储亦少。乃召集诸宗王将帅会议；归纳之有二种意见：

1.“待来春日暖，粮足，再为进攻”。此为多数宗王及将帅之意见。

2.“敌意在缓兵，冬寒缺食不足虑，应立时进攻”。此为不花帖木耳之意见。

旭烈兀则采取后者。于是命诸军就攻击准备位置。旭烈兀仍遣使至麦门底司堡，召鲁克赖丁出降，告曰：“王已亲至，设其出降，仍宽有如前，限期5日，期满进攻”。堡人答：“教主不在堡中，无命不能出降”。

旭烈兀大军就近采伐树木，以造投石机，架于麦门践司堡四周山头。旭烈兀自设总指挥部于附近最高山峰之上。攻击准备既毕。乃下令攻击：堡内守军亦发弩以御。明日再攻，鲁克赖丁遣使出城来见旭烈兀曰：“兹请停战，鲁克赖丁将于当日或次日出见”。及至次日，鲁克赖丁又约次日出阵，时至又食言。于是堡之四周，攻击再起；守者亦投岩石以拒。至夜始止。（新元史卷百八，旭烈兀传）

鲁克赖丁原冀冬季雨雪，所予蒙古军以极大之困难，不意此时天气温和，且延宕计穷，终乃决定出降。

11月18日，先命其子偕大臣数人赴蒙古军营。十9日自率诸大臣及著名天文家纳速刺丁、名医谟瓦非法的来，与来速迪来诸科学家出降。既见旭烈兀，鲁克赖丁献其宝藏，旭烈兀以之发散诸将。次日麦门底司堡军民皆退出，蒙古军入堡，时公元1256年11月20日也。

七、木刺夷睹墟悉降及其屠城：鲁克赖丁既以娈门司庙堡献降，旭烈兀待之甚厚，鲁克赖丁遣人偕蒙古使者，谕下四十余堡，毁之。仅阿刺模特堡拒守不从，旭烈兀乃亲至阿剌模特，遣鲁克赖丁至城下谕降，堡将仍不听命。及蒙古军围攻，堡人乃允于三日内退出。第四日蒙古军偕波斯民团入堡抄掠焚毁。于此城中蒙古曾获得著名之可兰经本、天文仪器，及其他有价值之著作等图书。并将关系此教派教义之抄本焚毁。

阿刺模特降后数日，摩希斯坦长官亦来降；旭烈兀命官守原战，偕同鲁克赖丁使者还库希斯坦，谕下诸堡。堕堡凡五十余。

公元1257年（宪宗七年）1月5日，旭烈兀自还可疾云统帅部，仅留少数部队，肃清残敌，其余诸军，宴乐休息。未几旭烈兀移节哈马丹，复遣人谕叙利亚之屡于亦思马因人之诸堡守将，速以堡献降。迄于是

时，旭烈兀待鲁克赖丁甚厚，盖方利用其谕降诸堡，以节省兵力，否则必须多年争战，且疲惫波斯之人力物力。及木剌夷已定，意欲除之，然既已阴许其不死，拒可公然毁约？适鲁克赖丁自请入朝蒙古皇帝，乃遣校随之入观。后鲁克赖丁竟死于途中。

当鲁克赖丁入朝后，旭烈兀乃下令杀先此分隶诸营中之亦思马因人；虽在襁褓中者亦不免。其未从军者，复以仓发民兵为名，聚各地境内之亦思马因人而悉屠之。

自是以后，木剌夷人之幸存者，遂如犹太人分散于各国。然受此类刺客之威胁者，至是遂安。

二、灭亡报达之战

旭烈兀于灭木剌夷后，将大军集结于哈马丹附近，从事整补。贝住元帅于宪宗六年春，率所部来听命。于是乃进而谋征伐报达。

战前信使往还：公元1257年（宪宗七年）9月21日，旭烈兀鉴于大军休整已毕，乃遣使致书报达敌主曰：“吾人讨伐木剌夷，征汝兵从征，而汝不以兵至，其实惠以兵助，始能表示汝为余之盟国，乃以藉词，终不发兵。汝朝立国，虽远而著名，国势虽强，然汝应知之，日入之后，月始有光。蒙古军队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秉承天命，花剌子模，塞尔拉克诺朝，以及其他诸强大君主，莫不被泽。此类国君皆会居住报达，而报达皆未闭门不纳，以我之强，缘何见拒？吾人前此业已有所劝谕，今再向汝进言，应避免战争，勿以拳触锥上，勿视太阳为灯火。否则必贻后悔。然已往者皆不可咎；设汝堕巴格达之城而平其壕，使汝子治国事，亲来纳降，抑不欲亲来，则遣丞相苏黎曼沙及掌印官三人来，俾其能确实转达吾人口谕。汝若能从，则可保汝之土地人民军队，然若不从，如愿战斗，则集汝军，指定战地，吾人已严阵以待也。但汝应知，吾人一怒之下，进兵报达，汝虽藏伏天空地腹，亦不能逃。如汝欲保全汝身汝朝，须敬聆吾等之言，否则吾人将见天意之所属也。”（上下引见多桑蒙古史四卷五章）

报达教主木思塔辛得书，毅然拒绝。乃作书覆旭烈兀曰：“青年人得志甫10日，汝便自信为世界之主，以为汝之命令如同可命裁判之不可抗拒，殊不知汝所求者皆汝之所不能得。具见汝不知自西往东凡崇奉上帝信仰正教者，皆为余之臣仆，设余意有所欲，只须以古民之遗众，余将为伊兰之主，进兵突阙恢复原状，特此皋将足以变更世界之面目。故余之不欲战，而欲避免人类之灾，且不欲以余之用兵而使余之臣民遭受涂炭。余诚为蒙古可汗及旭烈兀王之友，设汝如余之散布友好种子，则余之城池于汝固无碍焉!愿汝遵守和平之途而还呼拉商。”遣使奉书诣蒙古军营。而蒙古使者于归途中，为巴格达城外民众所诅咒。旭烈兀闻其使者受辱，甚怒。及见木思塔辛覆书，更怒。乃遣其来使归，而告之曰：“汝主既不降附，往告其备战可也。”二、木思塔辛议战并作书慑吓旭烈兀：木思塔辛既见旭烈兀迫其宣战，乃集重臣，议退敌之策；会议

间，意见纷歧，和战参半，而木思塔辛亦莫能执一。初主和，续又主战。而其结论，亦甚空洞而不切实际，云：“蒙古人不过以虚声夺人，必不敢以兵至。设其敢于攻击君临上邦之黑衣大食朝，是无异自速其亡。”大将军苏黎曼沙，独不以为然，尝对众曰：“教主若再不自强，吾人无论贫富贵贱，将同遭诛戳。不如乘此未受敌之前，征调一军往袭敌军，或不胜，死亦有名”。木思塔辛闻其言，胆为之一壮。乃命相征军，以付苏黎曼沙统率。然其相木矛代丁谟罕默德伊宾阿勒迦密坚欲主和，且因事素怨其敌主，故命征兵使者，迁延其事。（按西洋史家谓阿勒迦密已通于旭烈兀，且曾劝旭烈兀进攻报达。）逾5月兵始集。巴格达城内集军七万，其他各地为数亦众，皆统于大将军苏黎曼沙，但因为时过迟，袭击计划遂不果行。且木思塔辛吝啬，债欠军队薪饷，由是士气低沉，缺乏斗志。当报达征兵备战之际，木思塔辛复作恫吓信致旭烈兀，期以此退敌。其书曰：“从来攻黑衣大食都城之各国君主，无论其国势如何之强，终必得不幸之结果。本朝根基甚固，应延存至于世界末日，此事汝或不之知，汝可询熟习此国之历史者，彼等必告汝。古时曾率大军进攻报达，未抵此城而身先死；其弟，亦欲进攻，然为朝之捕送巴格达。虽自埃及侵入巴格达，拘守哈里发，然逾二年即为塞尔拉克朝所击杀。别一塞尔擦克朝之谟罕默德国王，曾进兵报达而败还，死于退军之际。最后花剌子模沙阿剌哀丁谟罕默德在进兵报达途中，其一部份军队，死于风霾，终因天怒而退走。设汝亦欲进攻报达，殆难逃此同样不幸之命运。”旭烈兀对此怪书并未置理，但报达备战之事，却使旭烈兀之军事行动更为积极。（多桑蒙古史四卷五章）

三、旭烈兀准备攻击：旭烈兀既知巴格达城防守力甚强，乃增调西域军队，以备进攻此城。其攻击准备中之第一要务，既为须将伊拉克伊朗间之山地，先行略取，以打开哈马丹通巴格达之大道。此道经行高山，山顶终年积雪，山中有打儿坦克堡形势险要，亦伊拉克阿拉伯之门户也。乃先遣怯的不花以骑兵一队往袭取之。

四，旭烈兀进覃报逮：初蒙哥皇帝命星者胡撒木丁从行于西征军，使卜进兵结营吉凶之事；至是旭烈兀以进攻报达之事询之。胡撒木丁答曰：“观星象不宜攻取，前此进兵报达之人，皆失其位而忘其身。

设王不信余言，必欲进兵，则将见灾难之至：（一）战马皆死而军中有疫。（二）日不出。（三）雨不降。（四）风霾地震扰乱全球。（五）年岁必荒。（六）同年皇帝死。”旭烈兀命其笔锋之，设在一定期间内预言不应，则将其处死。（按此后在公元1262年1月23日胡撒木丁伏诛。）而佛教博士及诸蒙古统将皆主张进兵，旭烈兀从之。（新元史，卷二百五十六，外国传报达）（多桑蒙古史，四卷五章）

旭烈兀决策既定、途令诸军并进：其军队区分如下：

1.右翼军：命贝住元帅率其部在毛夕里渡底格里斯河，自报达西北进攻，在巴格达城西附近，与不花帖木耳，速浑察所统之军合。是为右翼军。复以巴剌寒、秃塔儿、忽里诸宗王将所率之军以从。指挥官为贝

住元帅。（按此军兵力应在五万人左右）。

2.左翼军：命怯的不花，忽都孙统左翼军。自报达东南罗耳之地进攻。

3.中央军：旭烈兀自将中军，从开尔曼沙、火勒完一道进攻。统将库喀伊而喀、乌鲁克圃（Ouroudoc）阿儿浑、哈剌海，蓝波斯之诸王贵人官吏皆从，诸藩国亦多遣王子等率军前来助战。

旭烈兀留其家属辎重于哈马丹附近，使哈察克守之。

旭烈兀部署既定，于公元1257年11月间，命令三军，同时向巴格达城前进。

五、蒙古军进迫巴格达城：旭烈兀统中央军，自哈马丹出发，首残破开尔曼沙，一面搜集情报，一面召集右翼军诸宗王及贝住元帅，协定攻击实施计划。

12月18日，旭烈兀率军进至火勒完，将纵队稍事集结。此时怯的不花已占有罗耳之地大部份；而右翼军，已在塔克利特附近之底格里斯河渡河。该地居民都避兵进入巴格达城，情形恐怖纷乱。

六、报达军逆袭：当蒙古军在外线，由三方面向巴格达城作向心运动时，报达教主遣副掌印官艾伯格偕统将费度丁，率军万二千人，驻守体格里斯河东之火勒完道上。该军侦知蒙古兵已出现于河西，乃渡水，攻击贝住元帅之前锋速浑察军于安八儿，时公元1258年1月16日也。辽潭察乃率军退至小体格里斯河附近与其大军会合。费度丁老于军事。不欲轻追：艾伯格则欲乘其无援时袭之，促费度丁进击。比追至朵者勒附近，蒙古军亦闻。遂交战。战至晚，胜负未决。两军相持澈夜，蒙古军乘夜决堤，致报达军营后方之平原，尽为水淹没。次日蒙古军进攻，报达军尽覆；费度丁亦战死。仅艾伯格只身遁回巴格达城。

七、巴格达之合围：木思塔辛见艾伯格惨败逃跑，乃亟命修缮城墙戍楼，沿街布置障碍，并征集全城居民参与国都之保卫。然蒙古军贝住之前锋统将三人已进占巴格达城河西之附郭。怯的不花军已进抵撒儿撒儿，旭烈兀在1月18日已将中央军集结在城东。

蒙古军既合围，乃在河之两岸筑垒，垒外掘壕向城，一昼夜工业，并取砖筑座，置炮机，炮石、大油瓶于其上，以备攻击。此时各军之攻击准备位置，概如下述：

1.旭烈兀营于阿只迷门外。

2.库喀伊而喀营于克勒瓦的门外。

3.忽里，巴剌寒，秃塔儿，失烈门、乌鲁克图等营于苏克算端门

外。

4.不花帖木耳营于南面。

5.贝住、速浑察营于西面。

1月30日，旭烈兀下令诸军同时进攻，阿只迷门之戍楼最低，一部为礮石所毁。

八、木思塔辛洽降：阿只迷门上戍楼，既部份毁于礮石，木思塔辛知事已急：乃遣其丞相借幸臣及大主教等，齐赔物使蒙古营，谒：“今谨使丞相至，乞如前约。”旭烈兀答曰：“此我在哈马丹时提出之条件，现已报达都门，除丞相外，应遣大将军偕掌印官惧来。”次日，丞相偕内政部长官及居民代表至蒙古军营。旭烈兀拒而不见。

九、木思塔辛出降：旭烈兀命令诸军继续攻城，2月1日卜阿只迷门上戍楼，全被击毁：诸军进攻，夜以继日，情形至为激烈。旦以矢转害射入城中，对法官、律士、司教，阿里族人，皆许以不死。（按丞相阿勒迦密为阿里派之热烈信徒，故旭烈兀以此害离板之。）巴格达城郊缺石，乃伐椰树以代礮石。2月5日，中央军在阿只迷门附近登城；而术赤诸孙亦于是夜攻占苏克算端门；于是蒙古军尽据城之东壁。旭烈兀为防城中人逸出，乃在城上筑土垒，设礮机、在体格里斯河上，列兵船巡逻于巴格达城之上下流。报达掌印官曾企图从水上逃逸，结果舟人尽被击毙；不得已，仍退还城内。至是木思塔辛见倩势危殆，不能不降，然仍图拖延。屡遣吏及其子出城纳款求免，但均为旭烈兀所拒。

2月7日，旭烈兀命：“苏黎曼沙偕掌印官，二人出见。木思塔辛来否听之。”二人不得已乃去，又遣其还，挈其所属诸官并出。会旭烈兀帐下有名欣都者，为流矢伤目，旭烈兀乃命亟攻下其兹。

2月八日，杀副掌印官艾伯格，并大将军苏黎曼沙及其家属七百人悉杀之。攻城愈急。

2月10日，木思塔辛，知事已不济，遂挈其三子：奥都故合门、阿合马，木八剌，及阿里族人、教长、法官，贵人等三千人出降。旭烈兀礼接之，致寒暄后，命其传谕城中诸民出城，俾籍其人数。

2月13日，蒙古军入城，开始杀掠，焚庐舍。惟基督教徒及外国人得免。

十、黑衣大食王朝灭亡：2月15日，旭烈兀入城，大宴诸将于巴格达宫中，召木思塔辛至。语曰：“君为主人，我为客，将何以享我？”木思塔辛惟战傈，不复识其宝藏之锁钥，乃破锁出衣二千袭，金底纳（按底纳币名）

一万，暨宝石无数以献。旭烈兀曰：“此为可见之宝货，不难觅取

之，只可犒吾从者。应出尔伏藏之物。”木思塔辛指示宫庭一处，命人掘之，见一池，满藏金银，每锭各重一百两，宫厨之内金银食器无数，蒙古军视之如铜锡焉。

旭烈兀旋命人籍其后宫，得宫嫔女奴七百人，宦者千名，木思塔辛求将此种未见日光之妇女什之。旭烈兀许留百名，木思塔辛乃选其亲属，而挈之去。

旭烈兀至夜还营，命速潭察徙木思塔辛宝藏于城外，于是黑衣大食五百年之蓄积，遂陈列于旭烈兀营帐之四周焉。当木思塔辛献其宝藏以后，旭烈兀命以盘满盛黄金，置于木思塔辛前，命之食。木思塔辛曰：“金不可食。”旭烈兀曰：“何故不以金散给尔军，乃自守之？何以不将此铁门，镕为节镞？若然，汝将可进至阿母河。与我争渡矣!”木思塔辛曰：“是天意也。”旭烈兀曰：“今日之事，亦天意也!”巴格达城中之烧杀，延续凡7日，回教堂多毁于火，居民遣代表三人乞免；旭烈兀以城既属己，乃命人止杀。

计死者八十万人。

2月20日。旭烈兀遣将平未靖之地，并命人召木思塔辛。木思塔辛知不免，欲求救于其相阿勒迦密。阿勒迦密答曰：“余髯长，安能为力？”缘当初阿勒迦密劝木思塔辛主和时，副掌印官艾伯格曾力阻之，并讥其髯长见短。木思塔辛未用其意。至此，木思塔辛知事已无望，乃决就死。请先沐浴，于是旭烈兀置木思塔辛及其长子并宦者五人于囊中，驱马践之，至死而止。盖蒙古人杀君主亲王不使见血也。越日，杀木思塔辛随从诸人。22日，杀木思塔辛之次子，及黑衣大食朝之诸宗室，惟木思塔辛之幼子获免，后娶蒙古女，生二子焉。黑衣大食王朝，计传三十七代，五百零三年，至此灭亡。

三、继续西征及回军

报达既灭，蒙古兵又西行千里，进至天方（即阿拉伯），又攻下一百八十五座城池，降巴尔苏丹。旭烈兀再进兵至纹利亚时为元宪宗九年（公元1259），分军三路进攻其都城大马士革不曾攻下，乃折而北走小亚细亚，又击败巴尔干诸国之联军。旭烈兀复命郭侃渡海，陷富浪国，地中海诸国，为之震动。东罗马朝廷与西欧之耶稣教国家，纷纷遣便与旭烈兀连络，欲与联盟，共讨回教国家。旭烈兀所率大军，进至亚细西南端之地时，犹欲进攻埃及。正在此时，突然得到蒙哥大汗（宪宗）去世消息，乃命怯的不花镇守叙利亚，自行撤兵东归，时为宪宗九年冬也。

第十章 蒙宋战争之一——蒙古二大汗侵宋各战役

窝阔台汗征宋：

一、宋进取河南：1234年6月进兵，8月为蒙古所反击，退还。

二、1235年7月，蒙古三路南征。至1241年12月，窝阔台汗卒，战事遂呈休止状态。

蒙哥汗征宋：

一、忽必烈进军大理：1253年8月征大理，12月破大理都城，留兀良合台征未服者，忽必烈自还中国。1257年6月，兀良合台尽平云南后征安南。明年3月安南降。

二、蒙哥亲征：1258年9月入蜀。1259正月，云南蒙军攻潭州。2月，蒙哥围合州，7月卒于合州城下，解围北还。8月，忽必烈围鄂州，11月以内乱解围北还。

第一节战前一般形势及战争导因

蒙宋之战，由金宋之战启其端。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公元1161）采石战胜之后，翌年禅位于孝宗眘。孝宗在方胜之余，遂锐意乘机谋复中原。旋以北伐军事大败，乃复被逼与金议和，时为乾道初年，公元1165年事也。自此以后，历光宗惇，至宁宗损嘉泰四年（金章宗泰和四年，公元1204四），宋廷因韩侂胄当政，欲乘金人外则有北边之扰，内则有群盗蜂起之患，因谋恢复，遂于是年定议伐金。于是金宋相安四十年，战争复起。开禧二年（公元1206六）4月，各路北伐军正向北挺进之际，而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反，竟献其所辖阶、成、和、凤四州之地于金以求封。明年，曦为四川转运使安丙所袭杀继而江淮方面之北伐军，大败于宿、寿等州，江汉方面亦大败于唐、蔡等州。金兵乘胜，东方则陷员州（今江苏仪征），寇六合；中路方面则下樊城，窥荆襄；西方则入大散关，陷西和、成州。于是宋廷被逼，遣使求和于金。金人开出五条和平条件：（一）割两淮，（二）增岁币，（三）索归正人（四）犒军银，（五）斩送宋太师韩侂胄首级。诧胄因此复主用兵，俄而礼部侍即史弥远杀住侂胄（公元1207，11月），翌年（宋宁宗嘉定元年，金章宗泰和八年，蒙古铁木真三年，公元1208）。遂斩韩侂胄及领关门事苏师旦之首送金以乞和，和议乃成。此又一次辱国之和议也。

自嘉定三年（公元1220）以后，连年金为蒙古所侵，山后诸州蛊陷，燕京被迫徙都于汴，金之国脉岌岌可危。于是，宋朝廷中报仇雪耻，图谋自立之议复起。如嘉定七，八年间（1214~1215年），真德秀

一再上奏，初则罢贡金之岁币，继则因金兵分道入寇，而下诏伐金（1217年）。自是宋金战争复起，东起山东，西至秦陇，互有胜负。旋且结连西夏，进攻金人秦陇之地。至嘉定十四年（金宣宗兴定五年，铁木真之十六年，公元1222年），蒙古军已取山东进逼汴京，与宋北伐之军，开始接触。在胶西之宋军逃窜南归，而在京东之宋军，则纷纷归降于蒙古。由是宋朝廷被逼遣使通好于蒙古，蒙古亦遣使报之。是诚为宋蒙联合攻金之先声也。 至嘉定十七年（金哀宗正左元年，铁木真之十九年，公元1214年），宋宁宗崩，右丞相史弥远矫诏立沂王子赵贵诚为帝，是为理宗。宋绍定四年（金正大八年，蒙古窝阔台三年，公元1232年），蒙古遣使来假道侵金，沔州统制张宜殷其使，于是蒙古军乃入寇兴元（今汉中）诸州县，穿越而过，疾趋金之唐、邓而进。明年，蒙古遣使至宋，议合军以攻金，许之。蒙古遂许灭金之后，以河南之地归宋。绍定六年，宋蒙联军取金唐邓二州遂合兵围金主于蔡州，明年（宋理宗端平元年，金哀宗大兴三年，蒙古窝阔台六年，公元1234年）正月，破之。

宋蒙已破蔡州，金亡。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印以陈蔡西北之地，分属蒙古。并即命京西兵马钤辖孟珙与诸将江海、王曼，王安国、蒋戍、杨恢等，还守襄阳、信阳、随州、枣阳、光化、均州等地，增兵饬备，及经营屯田于唐邓等州，以防蒙古。盖此次南宋连蒙攻金，因有前此北宋连金攻辽之教训，故所采政策大异于前。北宋时积极谋复燕云之地，目的至为积极，此次南宋则只谋自保而已，故虽出兵与蒙古兵攻蔡州，而目的仍为自保也。宋人此一目的与决策，可于嘉定八年江东转运副使真德秀之奏议知之。其奏共五项，第三项云："幸安之谋不可恃。今之议者，大抵以金虏之存亡，为我欣戚。阻（金）危蹙之报，则冀其非宝；得安静之耗，则信其必然。是犹以朽壤为垣，而望其馄障盗贼也。"由此可知当时宋朝上下，极殷望金朝能在河南抗拒蒙古，以为南宋北方之屏蔽。至于出兵唐邓，以与蒙古合兵，实亦以防备蒙古入侵为主旨，报雪金人之仇，乃其次也。是以吏嵩之于灭金之后，并不敢向蒙人要求河南之地，反且以陈蔡西北之地属蒙古，又撤军还守江汉增戍以备之，则南宋此时之意图，只谋自保，固无疑也。（宋史卷四百三十七真德秀传，续通鉴卷百六十）

但蒙古此时所获过多，而夏暑之时令又将届临（蒙人畏暑，亦如金人），故当宋以陈蔡西北的地分属时，并不自占之，而命汉人刘辐为河南道总管、以统摄此一新领地，而迁军于大河以北。

由于蒙古空河南而去，遥引起宋朝君臣侥幸之心，而欲乘时进取之。盖此时理宗方亲政（绍定六年公元1133年，史弥远卒，帝始亲政），励精图治，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收召贤才，纳之朝廷。故理宗亲政仅7月，即以"边计"问于主管官告院张煌。煌对曰："蒙古非金仇可比。但和议难恃，须选将练兵，储财积粟，自固吾圉，俟小使回，可和则姑与之和。然不可撤备。"意即一面讲和，一面备战也。于是，未几而淮东安抚使赵范，与淮东提刑赵葵，皆倡乘时抚定中原，建守河据关，收复三京之议（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

商邱）。虽朝臣多以为未可，而郑清之则力赞其说，于是宋蒙之战起焉。（续通鉴卷百六十七）

第二节窝阔台大汗征宋之战

一、宋军进取河南之战

当赵范等倡收复三京之议，理宗与郑清之亦主其说之时，淮东安抚司之参议官邱岳曾上言阻其事，云：方兴之敌，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肯捐所得以与人耶？

我师若往，彼必突至，非惟进退失据，开衅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长驱以争空城，得之当勤魄饷，后必悔之赵范不听。史嵩之亦言，荆襄方饿馑未可与师。淮西转运判官杜果更言“边郡”之不可用兵之实况，云：

“臣备员边郡。切见沿淮旱蝗连岁。加以调发无度，辇运不时，生聚萧条，难任征发，中原板荡，多年不耕，无粮可因，千里馈运，士不宿饱。若虚内以事外，移南以寅此腹心之地，岂不可虑。”（续通鉴卷二（十七）致仕官乔行简，则就内忧问题，进言不可用兵，云：

方今境内之民，困于州县之贪刻，扼于势家之兼并。饥寒之氓，常欲乘时而报怨。盐茶之寇，常欲伺叛而窃发。萧墙之忧，凛未可保。万一兵兴于外，缀于强敌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复有如江闽东浙之事，其将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内郡武备单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时江闽东浙之寇，皆藉边兵以制之。今此曹猾多窜伏山谷，窥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于北方，其势不能以相及，宁不动其奸心，臣恐北方未可图，而南方已先骚动矣。

淮西总领吴潜亦劝告执政，略云：

以金人既灭，与蒙古为邻，法当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自荆襄首纳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开调度寖广，百姓狼狈，死者枕藉。得城不过荆榛之区，获俘不过暧昧之骨；而吾之内地，荼毒已甚。近闻有进恢复之画者，可谓俊杰。然取之若易，守之实难。征行之具，何所取资？民穷不堪，激而为变，内郡率为盗贼矣。

理宗与郑清之皆不听，一意用兵。遂于端平元年（蒙古窝阔台六年、西1234）6月，命赵范移司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刻日进兵陈蔡。命知庐州（今安徽合肥）全子才，会淮西兵万人，赵葵自滁州率淮西兵五万取泗州（今盱眙县西北，淮北岸），会师汴京。

先是金叛将崔立据汴京降蒙古时，有汴京都尉李伯渊等，为立所侮，乃共谋杀之。及闻宋将全子才之兵将至，渊等即以书约降，而阳与崔立谋备御，遂袭杀之，以城降宋。时约在6月之中下旬。

全子才已克汴京，赵蔡亦至，谓子才曰：“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阳、潼关，何待耶？”子才以粮饷来集对。葵督促益

急。乃舍钓辖范用吉、樊辛，季先、胡头等，提兵三千，以淮西制置司机宜文字徐敏子为监军，先向洛阳。又命扬谊将庐山强弩军万五千，继之而进。各给5日之橙。

7月，徐敏子所遣前军，和州宁淮军正将张迪所率二百人，至于洛阳城下。城中寂然无应者。至晚，有民庶三百余家，登城投降。迤与敏子遂率众入城。

当时形势，虽宋人不北上争河南，蒙古亦将征宋，故是时窝阔台大汗曾谓其群臣曰：“先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鹧诸国，皆已臣附，唯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如何？”塔思（木华黎之孙）请将兵南征，大汗即许之，蒙古军遂直向河南疾趋。（新元史卷百十九，塔思传）

徐敏子军在洛阳，时汴堤决，水潦泛滥，粮运不继。所复州县，又皆空城，无兵食可因。因此，敏子入洛阳之明日，军食告竭。乃采蒿和面，作饼而食之。

当扬谊所率后继之兵，至于洛阳之东三十里，方散坐进食时，蒙古前锋军已突至，谊部军立即奔溃，拥入洛水死者无数，谊仅以身免，于是洛阳城内之宋军震惧。

8月初，蒙古兵临洛阳城下立寨。时洛阳乏粮，宋军杀马而食，乃突出而走。师退无律，而后阵又遭覆没。是时赵蔡与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运粮接济，而蒙古兵又决黄河寸金淀（今开封县北。黄河泛滥之水所汇），从淹宋军，多有溺死者，于是亦引军南还，所谓收复三京之议，至今遂告幻灭。

宋朝廷以是役之败，赵蔡削一等秩，措置河南京东营田边备。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邓、息州营田边备。徐敏子削秩放罢。杨谊削四秩，勒令自放。罢史嵩之，以赵范代京湖制置使。盖转攻为守以备蒙古也。此以孟珙在襄阳，亦积极为备，招中原精锐之士万五千余人，分屯漅北樊城新野唐邓间，虢为镇北军。明年正月，又下令沿京湖、四川、两淮制臣、帅臣，严为防备，常如敌至。并奖励中原忠节来归之人。

二、蒙军南征

端平元年12月15日己卯，蒙古遣使者王捻至宋，来资败盟。27日辛卯，宋即遣使邹伸之等，前往报谢，但已不能迟缓蒙古南征军之南下矣。

窝阔台大汗，于宋端平二年（大汗七年，公元1235年）6月，开始命将南征。兵分三路：命次子阔端（一作库端）与元帅塔海绀孛，由秦巩入蜀，为西路。三子阔出（一作库春）与侄呼图克（或作胡都突）张柔等，直驱荆襄，为中路。大将口温不花与史天泽等进军江淮，为东路。三军悉选蒙古、契丹、汉军之精锐编组。蒙古军每十人调发一人，

中州户每十户调发一人从征。三军编组既毕，分别向宋境进击。

（一）西路阔端军攻略四川先是金室灭亡之后，郡县皆降。独金之总帅汪世显坚守巩昌不下。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10月，阔端军进次巩昌（旧府名，后汉陇西郡地，陇改制巩州元改巩昌路，属甘肃省，治今陇西县）之际，汪世显迎降，阔端使汪世显仍旧职，即日率所部从征。

沔州战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月，阔端军自凤州，沿甘肃两当、徽县道入蜀（陕西凤县，位于秦嵌大散关之西南约五十华里。又大故关亦作散关，又称峭谷，在陕西宝鸡县城西南约五十华里，大散岭上，两旁山势夹束，曲折陡峻，为陕南天险，当秦蜀交通孔道。）汪世显为先锋，渡嘉陵江，直趋大安（宁羌），阔端本军攻沔州（今略阳），军至西池谷，距沔州九十里矣，宋吏民议退保大安，沔知州高稼言于制使赵彦呐曰："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若能进据险地，以身捍蜀，敌有后顾，必不深入，倘仓皇召兵，退守内地，敌长驱而前，蜀事去矣!"已而彦呐竟然之，而留稼守沔。蒙古兵自白水关进至六股株（即白马关，在略阳县燕北），距河六十里。蜀无域，依山为阻。高稼升高鼓噪，张旗鼓以为疑兵，赵彦呐旋又遣何邻王宣等率兵援稼。俄而蒙古兵大至，回何等遁走。高稼被围困战死。赵彦呐闻稼死，沔州破，乃进屯青野原。（按青野原蜀之咽喉，在沔州北），蒙古军围之，利州守将曹友闻以军往接，半夜截战，败蒙古兵，遂解其围。既而蒙古先锋汪世显攻大安，曹友闻又回师救之，指挥甫毕，蒙古军数万突至，友闻迎战，又败之，蒙古兵稍引退，曹友闻遂引兵扼凤州西南百二十里之仙人关。

宋军所败者，盖阔端之前锋军，既而蒙古军主力尽集，宋军众寡不敌，乃退守由秦入蜀之诸山隘，10月阔端大败宋军于典无府西南数十里之阳平关。（多桑蒙古史二卷二章）

阳平关战斗：是年（1236）9月，宋御前诸军统制曹友闻，驻守仙人关，谍报蒙古合番汉军五十余万至（按蒙古每攻坚，辄驱民为工役），曹友闻以为众寡不敌，不敢迎战，应乘高据险，出奇设伏以制之。蒙古军攻凤州东南之武休关，宋都统朋显忠军败北，遂陷兴元（今汉中）。蒙古将攻大安军，赵彦呐召曹友闻退守大安，以保蜀口。友闻乃遣弟万及友谅引兵上鸡冠（今沔县南，龙门山之隘口），多张旗帜，示敌坚守，曹友闻自选精锐万人，夜渡江（即汉江），密往流溪（汉江东小溪）设伏。两军相约：敌至，内以鸣鼓举火为号，外呼杀声，内外夹攻，以歼敌兵。蒙古兵东至，曹万出而迎战，蒙古八都鲁及达海，帅步兵万余人搏战，矢石如雨，曹万身被数创，余诸军举烽，友闻即分兵为三部，自率精兵三千人，急驰至隘下入龙虎头（即龙尾坡，在沔县龙门山西南），先遣统领刘虎帅敢死士五百冲锋，敌不动。友闻乃伏三百骑于道旁再令刘虎冲突敌阵，会大风雨，泥泞没足，诸将请俟少霁再战，友闻叱之曰："敌知我伏兵在此，迟必被歼"。遂拥兵齐进，宋军素以锦袭代铁甲，经雨濡湿，不利步战。黎明，蒙古军以铁骑围攻宋军，血战益厉，曹友闻与弟万相继战死，宋军尽歿。蒙古兵遂长驱入蜀。

（续通鉴卷百六十八）

文州及全蜀陷落：阔端既殄灭曹友闻之军，遂分军自利、文等州入蜀。其自文州（今文县）入蜀之军，于残阶州（今武都），破宕吕（今岷县南）之后，翌（十）月遂攻文州。宋知州刘锐，通判赵汝曏，乘城拒守，昼夜搏战。阔端将按竺迩（一作安笃尔）率炮手为先锋攻之，久不下。谍知城中无井，乃夺其汲道。城中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卒无叛志。按竺迩率勇士梯城先登。至此，刘锐度城不能守，先使家人饮药死，并聚其尸及公私金帛悉命焚之。是月22日丙午，城破，锐及二子自刎死。赵汝曏被执被杀之。军民同死者数万人。

蒙将按竺迩已破文州，乃招徕吐番诸部族（今洮河及文县以西，皆为吐番族游息之地），赐以银符，略定龙州（今四川江油县西北），途与阙端合兵，进破成都。于是宋军望风披靡，1月之间，利州，潼州（今梓潼），成都三路皆陷，宋惟守夔州（今奉节县）一路，及潼川（今三台县）阆庆府（今南充县）而已。时阔端闻阔出卒于中路军次，乃弃成都而去。盖此时以陇西州县初下，人心携贰，有不稳之情势故。且此时对南宋土地，仍无占据之意，故其后数次仍屡进屡退也。

复攻成都：宋嘉熙三年、窝阔台汗十一年（公元1239年）8月，阔端将塔海帅兵复入蜀，宋制置使丁黼闻之，先遣妻子南归，自誓死守。塔海军自新井（今四川南部县）入，为竖宋军旗帜，黼以为溃卒，以放榜招之。既审知其诈，黼乃顷兵夜出成都城南迎战，至石荀街（成都西门外）兵散，力战而死。蒙古军遂陷汉、印、简、眉、蓬州、遂宁、重庆、顺庆府等地。

12月，宋将孟珙在京湖谍知蒙古将塔海等，帅众号八十万南下。策其必道施、黔（施州，今湖北恩施。黔州，今四川彭水县），以渗透湖湘。乃请粟十万石，以给军饷。以二千人守峡州（今湖北宜昌县东南，江南岸），千人守归州（今佑归县），命其弟孟瑛以精兵五千驻松滋（湖北今县），又增兵守归州隘口万寿谷，以为蔓州声援。只以千人屯施州。又沿江增置营砦，分布战舰，并遣兵间道至均州（湖北今县）防遏。未几，蒙古军渡万州（今四川离县）湖滩（万县西，水势险急），由是施、夔等州震动。孟珙之兄璟，时知峡州，遂率师迎拒于归州大垭砦（在州西），战捷于巴东（今县），夔州遂得保全。

明年2月，宋以孟珙为四川宣抚使。蒙古将按竺迩，复窥万州，宋军遣舟师数百艘，溯流迎战。按竺迩顺流率劲兵，乘巨筏，浮草舟于其间，弓矢雨射，宋兵不能敌，败续于夔门。蒙军旋又北还。

宋理宗淳佑元年，（窝阔台十三年、公元1241年）11月，蒙古将塔海部将注世显复督丘入蜀，进围成都，宋制置使陈隆之，誓与城共存亡。固守弥旬，部将田世显潜送款于蒙古，夜开北门纳蒙古兵入，隆之举家数百口皆死，送隆之至汉州（今广汉），命谕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尔，勿降也。"遂被杀，汉州兵三千出战，战败。夔驱

火牛突围出奔，汉州遂为蒙军所屠。（续通鉴卷百七十）

明年12月，阔端军以一部攻叙州（今四川宜宾县），宋杨大全战死。是后，阔端军甚少进展，战事遂入于休止状态。盖此时窝阔台大汗新卒（宋淳佑元年、窝阔台汗十三年、公元1241年11月）其后称制，庶政多紊，耶律楚材以忧卒。而宋朝方用任二能将，以固西陲也。时京西湖北路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孟珙又兼四川安抚使，兼知夔州，固守均（今湖北均县）、开（今四川开县），万（今县）、夔（今奉节县）、施（今湖北恩施县）之线，尤以后二者，为西防之要区。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四川本有“财赋甲天下”之称，自端平三年为蒙古所残破后，所存州县无几，宋之国用，因而益穷。阶至，除遴选守宰，大更弊政外，积极于地形险要之地修筑城堡。于利（今广元）、阆（今阆中兰州之间，城大获山（今苍溪县东南山上筑城），以护蜀口蓬州，并城营山以为州治（今营山县界云山上）。在渠州（今县）则城大良平（今广安县东北），将嘉定府治（今乐山县）徙于泸州旧治（今县）。泸州治则城于神臂崖（在州东）。其他亦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列，如臂使指，气势联络，屯兵聚粮，为久守计。民亦有安土之心。蒙军因此无法再进。

（二）中路阔出军侵襄汉蒙古军伐宋之战，攻击军分为三路，阔端居右，直取四川；阔出居中，口温不花居左，中左两军，直叩襄樊，再侵武汉。于是右军左旋，出巴东与中军会合，领有荆楚：再与左军会合，进窥吴越。此似为蒙古军之既定计划。而宋室北边，东西数千里，东恃江淮，中扼江汉，西方初恃秦横之险，次扼大巴巫山三峡，以为抗拒。兵力分配，偕以上诸险要形成重点，但就全般地势言，东部多沼泽河川，蒙古缺乏舟师，不能大有作为。西部多山岳关隘，蒙古骑兵运动亦甚困难。是以宋室亦将重兵配置于中略之江汉方面。

宋理宗于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9月，为收复三京失败之后，于是命赵葵措置河南京东管田边备，全子才措置唐（今河南唐河），邓（河南今县）、息（河南今县）州营田边备。翌年2月，复命孟珙为襄阳都统制，训练精锐之师万五千人，分屯樊城、新野，唐、邓间，以防卫汉淮之线。

蒙古口温不花军先于窝阅台汗之七年（公元1235年）7月，自唐邓进军，直趋江淮。阔出军于翌年正月亦自唐邓南下，指向樊襄，沿汉水以趋荆澈。口温不花军自唐州奔东南时，因地形便利骑兵之机动，故作广正面前进，犯固始（河南今县）、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再左旋扫荡江淮。此两军在时间上，稍有先后。兹先就出军之作战，叙述如下：

洪山江陵诸战斗：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7月，在中路方面，首先发动攻击（蒙古西路军因攻金巩昌汪世显，及安抚陇西费时，至是年12月，始向兴元进攻）。阔出先遣其将口温不花攻唐州（今河南唐河县）。宋将金子才，赵范等弃唐邓之地南走。

翌年（宋端平三年，1236）正月，蒙古阔出遣汉军张柔将曹武攻洪山砦（今湖北京山县北），及缘山诸砦，宋将张顺、翁成大等，又拒止之。窝阔台汗又命应州（今湖北应山县）郭胜、钧州（今河南禹县）孛术鲁九住，邓州赵祥，从阔出军，以充先锋南征。镇此时蒙古军在今钟祥京山安陆之线（宋水军发挥与陆军协同战力），遭遇坚强之抵抗故也。

襄阳陷落：端平四年3月，宋叛将王旻，竟以襄阳降于蒙古。此事对宋之国防影响极大，因襄阳乃江汉战略重镇，此地一失，则两湖震动。因当时宋之京湖制置使赵范，以北军主将王曼、李伯渊、樊文彬，黄圃弼等为腹心，朝夕酣狎，民事边防一切废弛。既而南北两军交争，赵范失于抚御。是月，王曼等遂焚襄阳城郭仓库，降于蒙古。南军大将李虎等，亦因乱劫掠襄阳一空。于是一方重镇，未经战斗，即为蒙古所有。宋左司谏李宗勉因上言，略谓："均、房、安、（湖北安陆）、蕲、光化等州，兵祸甚烈（蒙古分兵攻掠）。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及江之险不恃。江陵或不守，则事迫势蹙，必有危亡之忧。"理宗因下罪己之诏。（续通鉴卷百六十八）

随郢江陵诸战斗：端平三年4月，阔出军陷随（湖北今繇）郢（今钟祥县）二州，宋荆门军（湖北今县）败北。8月蒙古军复又陷枣阳军（湖北今县）德安府（今安陆县）。11月阔出殁于军中，12月蒙古将贴木触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援（时宋廷以史嵩之守淮西，赵葵守淮东，陈转守江。赵范守江汉已败走）。

当随郢陷落之后，李宗勉复上奏，略谓："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绝，莫知存亡。诸司退保夔门，未必能守。襄汉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门又破，辽陵孤城，何以能立？两淮（淮东淮西）之地，人民奔进，井邑邱墟。分上流淮东、淮西为二帅，而以江淮大帅总之，分地而守。不然，（蒙古）将水陆俱下，大合荆楚之索，扰上游，江以南震荡矣。或谓其势强盛，宜于讲和，钦出金缯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国与敌也。"（同上书）

先是，孟珙与蒙兵破蔡州灭金之后，还屯襄阳。招中原精锐之士万五千人，分屯汉北樊城、新野、唐、邓间，以备蒙古，名曰镇北军。诏以珙为襄阳都统制。旋珙还京赴枢密院禀议，理宗召问和战之策。珙答以战（恢复中原）则须俟机会，和则非甲胄之士所当书。遂遣珙还屯黄州（今湖北黄冈县），赵范代守襄阳。时为端平二年正月。珙至黄州，即增阵波隍，搜集军实，招徕北方遣民。及得史嵩之遣援江陵之令，珙乃先遣尾兵部将张顺先渡汉水，而自率全师继之。珙度蒙古兵众而善战，应以智取。乃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硬则列垣，照耀数十里相接，以示宋军势之盛。又遗其将赵武等与蒙古军战，洪亲往节度。几经冲杀，遂破蒙古二十四砦，夺还所俘二万口而归。明年10月，蒙古口温不花乃自光州（今河南潢川县）下复州（今湖北沔阳县西），而转攻黄州，蕲州，安庆府守臣张可大李士达等，皆弃城走，幸孟樊还救，击却之。宋遂以孟珙为京湖制置使，使恢复郢州荆门。（此时蒙古攻真州江

苏仪征），亦败绩。四川方面，宋亦于蒙军去后恢复成都）。

孟珙反攻，克复江汉诸地：

克复郢州宋理宗嘉熙二年（窝阔台汗十年公元1238年），宋因江陵之胜利，遂拟收复襄樊。10月，宋令孟珙收复京襄。孟珙以为必先得郢，然后可以通魄饷；得荆门然后可以出奇兵。及军至岳州，珙檄江陵节制司进军襄郢，召诸将亲示机宜。部署既定，挥军直前，遂一举规复郢州、荆门军。

克复襄樊：宋军在孟珙指挥下，连年在江汉方面造成连续胜绩。珙乃于宋理宗嘉熙一二年（公元1239年）3月，复遣兵反攻，三战皆捷，遂克复信阳、樊城、襄阳。寻又复光化军，息、蔡二州亦来降。于是孟珙上奏曰：“取襄不难而守为难，非将士不勇也，非车马器械不精也，实系于事力之不给耳!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与其抽兵于敌来之后，孰若保此全胜。上兵伐谋，此不争之事也。一边以蔡息降人置忠衔军，襄郢降人置先锋军，以增强襄樊之防守战力。（续通鉴卷百六十九）

克复夔州：蒙古军在荆湖地区之作战，并不顺利，且由于孟珙之足智多谋，樊城襄阳，为宋军相继收复。但蒙古在四川方面之作战则长驱直入。塔海军于宋嘉熙三年，窝阔台汗之十一年（公元1239年）8月，复破成都，陷汉、邛、重庆、顺庆等地，乘势直追施、黔，欲出湖湘，以完成楚湘方面之军事胜利，以便服流而下建康、临安。孟珙在是年12月，知阔端军塔海部有侵湖湘之企图，乃对其左翼方面，增强其作战部署，并增加军需供给，首先请粟十万石，以给军饷。派二千人进屯峡州，千人进屯归州，派精兵五千驻松滋，以为夔州声援。部署既定，孟珙认为已完成宋军方面之不可胜，进而寻求敌之可胜。于是增兵守归州隘口，又以千人屯于施州（今之恩施），且堆置营砦，分布战舰，同时派兵驱均州，掩护右侧。盖孟珙军已自对北面之作战，转而向西面作战矣。未几蒙古军渡万州湖滩，施、夔震动。洪乃帅师迎击之于归州大堙砦附近，得捷于巴东，遂克复夔州。

破坏蒙古攻势准备：明年（公元1140年）2月，孟珙遂在京湖大兴屯田，为长期防拒之计。会谍知蒙古于襄樊、信阳、随州等处，招集军民布种。积船材于邓之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东），准备造船，展开水陆攻势（过去蒙军攻至江汉沼泽河川地区，不能进展，即以缺乏水军之故）。珙为粉碎其再发动攻势潜力，乃分兵进袭之。一面潜兵焚其所积船材，一面遣兵烧其在蔡州之屯粮。因此，珙受命为四川安抚使、知夔州（因此时蒙古将按竺迩击破万州之宋蜀军，而直抵夔州，江汉为之震动故也），节制归、峡、鼎（今湖南常德）、澧等州军马，于是东起信阳：西至均、归、夔三州，南至鼎州之战区，政治军事皆归珙统一指挥。珙乃招筑散民为宁武军，以降人回鹘爱里八都鲁为飞鹘军。又理蜀政之弊，为条例颁诸州县，立赏罚以课殿最，使诸州奉行之。寻又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调夫筑堰，募晨给种，自秭归，至汉口，为屯二十，垦

田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顷。又创南阳，竹林两书院，以处襄汉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权施州建始县（今县）。庭芝训晨治兵，选壮士，杂官军敌之，期年，民皆知战守，善驰逐。无事则植戈而耕，战至则悉出而战。珙下其法于所部地区行之。由是防区巩固。

拒敌入寇：宋理宗淳佑二年（蒙古太宗后乃马真氏称制二年，公元1242年），蒙古欲复寇蜀，以也可那颜、耶律朱哥自京兆（今长安）取道商（陕西今县）房（湖北今县），以趋三川遂攻泸州（今四川泸县）。孟珙遣一军屯江陵及郢州，一军屯沙市，一军自江陵出襄，与诸军会合。又遣一军屯涪州（今四川涪陵县）。且下令应出戍主兵官，不许弃寸土。灌开州（四川今县）梁栋，以乏粮还司，珙以其弃城，斩之。明年，朝廷又命余玠为四川制置使，由是上流之势益固（其详已见前述），蒙古之攻势益不能展。

巩固江陵：淳佑四年12月，宋廷又以孟珙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以望城守之形势，叹曰：“江陵所恃三海（在今江陵县东北。孙吴时引诸湘及沮漳水汇江陵以北，阻拒魏兵，号称北海），不知沮洳有变为桑田者，故敌一鸣鞭，即至城外。盖自城以东，古岭、先锋直至三汊（海有上中下，古领等即其名）无限隔。”乃修复内布隘十又一，别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数十里者。沮漳之水，益自城西入江，因障之而东，使绕城北入于汉。而三海遂通为一。其高下为匮蓄泄，三百里间，渺然巨浸。由是江陵遂固。故终孟珙之世（珙于淳佑六年卒），蒙古不得展其技也（三）东路口温不花军进攻江淮口温不花军于窝阔台汗七年（宋理宗端平二年，一二三五），7月进取唐州后，似即在唐蔡闻掩护及协力阅出主力军向江汉进击，故至明年始再东向江淮也。

江淮战斗，开始于宋端平三年10月。是年4月，宋朝廷中已议“分上流淮东淮西，为二帅（两战区），而以江淮大帅总之。”故于5月，宋廷以赵葵为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葵积极垦田治兵，以加强守备。同时宋廷又作后方部署，以署官知庆元府（今浙江鄞县）沿海制置，理宗并嘱之曰：“庆元控制海道，如招军造船，团结训练等事，宜留意施行!”盖南宋自高宗以来，每与北方来犯之寇作战，皆必作此等准备也。

10月18日壬寅，口温不花开始攻陷淮西固始县（河南今县）（9月蒙军陷德安府，亦属宋淮南战区），宋淮南将吕文信，杜林，率溃卒数万叛，于是六安、霍邱（皆今安徽县），皆为叛军所据。

11月口温不花开始大举进入淮西，蕲（春）、舒（今安徽怀宁）、光州（今河南潢川县）等地宋守臣皆遁。口温不花乃合三州人马粮械趋黄州（黄岗），游骑自信阳趋合肥，宋令淮西制置使史嵩之援光州（本驻舒州），淮东制置使赵葵援合肥（本驻扬州），沿江制置使陈转趣和州（本驻建康），以援淮西。

是月口温不花将察罕部陷定远（安徽今县）、六合（江苏今县），遂攻真州（仪征），知州邱岳，部分严明，守具周悉。察罕军薄城辄

败，邱岳乘胜出战于胥浦桥（今仪征县西），以强弩射杀其致师者（指挥官）1人，蒙古兵稍却。岳曰："敌十倍于我，不可以力胜也"。乃为三伏，设炮石待之。蒙古军至西城，伏起炮发，杀其骁将，蒙古军聚大扰。邱岳又选勇士袭敌营，焚其庐帐，越2日蒙古军遂引去。盖察罕之军，乃一种强力搜索掳掠之哨骑，志在扰乱，避免攻坚者也。

但此时江淮间，凡被蒙古军所扰之处，流民纷纷蚁聚，弱者困毙，强者剽掠。于是诏沿江州县，安抚流民，强壮者头充军者，填刺军额，弱者救济。因此，凡流民过江者，令陈韩存卹，强壮留江淮者，史嵩之招募；不顾者发还本籍，以为民兵。常之并采清野之策以御敌。

壮者此次察罕在江淮间之攻袭，给予宋江淮防线以最重打击。故宋左司谏曹豳上言："陛下以方面付三关，而和战之议，私自矛盾（蒙宋数有使往返和议，末成），忧未艾也。史嵩之在淮西，用清野之说，敌末至而民先罹其祸；用撒花之说，民欲战而禁其不得往。盖以和误国也。赵葵在淮东，定远之破，近在葵境，六合之破，政在属部，葵乃闭城自守，不出一兵援之。是畏怯以辱国也。陈韡在金陵，旷口（似在六合县市）之，天殆少警之。...今宜卖嵩之以收复襄阳，为江陵捍蔽，经理上流，为下流防拓，葵则结邻闽以御哨骑（蒙古哨骑渗透），备舟师以防海道。鞴则以沿江并颌淮西，以安淮东。若秋冬可以遏敌，乃为报效。"理宗从之。

宋理宗嘉熙元年（窝阔台汗九年，公元1237年）10月，口温不花围光州（今河南淡川县），史天泽先破外城，攻子城又破之，进次复州（今湖北沔阳县西）。宋以舟师三千封锁湖面为栅。天泽曰："栅破则复将自溃。"乃亲执桴鼓，督勇士四十人攻之。不逾时栅破，复州降。于是口温不花攻黄州，荆湖制置使史嵩之赴援，孟珙引军还救，遂击却之。转攻安丰（今安徽寿县南）。宋知军事杜杲，缮城守御。蒙军以火攻楼橹。杲随陷随补。蒙军招敢死士为巴图鲁攻城以自效。呆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巴图鲁多伤而退。蒙军又填壕为二十七坝，杲分兵扼坝拒之。蒙军乘凰纵火，俄而风雪骤作，杲募壮士夺坝路。士皆奋跃力战。会池州都统制吕文德，突围入城，合力捍御。赵葵亦自扬州遣兵救援，蒙军乃退。明年（1238年）正月12月已未，宋廷遂下诏以黄州、安丰二城获胜，赏赐将士，并命收复光州、信阳，以固淮西。又诛知蕲州张町大，谪知安庆府（今怀宁县）李士达于雷州，以彼等于蒙军攻黄州时，皆闻风弃城霄遁也。旋以史捞之为参知政事督视京西荆湖南北江西路军马。俄又使嵩之兼督砚光，蕲、黄、夔、拖诸州军马。盖以其救援江陵黄州有功也。（上引见续通鉴卷百六十九）

宋嘉熙二年（1238年）9月，口温不花将察罕帅兵号八十万，进围庐州，期破庐后，造舟于巢湖，以窥江左。既合围，于庐州壕外，筑土城六十里，穿两壕，攻具皆数估于攻安丰者，杜杲复膺命守庐州，杲极力备城隍，缮守具，蒙古军筑坝，高过城楼。果以油灌草，即坝下焚之，皆为煨烬。蒙军不得逞。呆又于串楼内，立雁翅七层，炮中坝上，蒙古军惊骇。杲乘胜出战，察罕败走，宋军追蹑数十里。杲随辣舟师，

以扼淮河，另遣吕文德等伏精锐于要害，蒙古军不能进，察罕遂督师北返。呆以是役之功，诏加淮西制置使。

（四）战争之休止宋理宗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宋帅孟珙遗师与蒙古军战，三战皆捷，宋遂光复信阳、光化、樊城、襄阳。明年2月，蒙古将张柔等分道侵宋。同年5月，蒙古复使王檝入宋，檝前后凡五次奉使使宋，以和议未协，檝隐忧致疾，卒于宋境，宋适使归其于蒙古，翌年（公元1242年）元太宗窝阔台死，（按元太宗窝阔汉台于公元1241年12月出猎于鈋铁NC160胡兰山，进酒欢饮，极夜乃罢，翌日卒（12月11日，年五十六岁，在位十三年，葬于起辇谷。语见多桑蒙古史上册一二三页，原注云：“见冯秉正书同册二三三及二三四页，元史及纲目译文二八四及二八五页”。）俟后蒙古乃马真皇后称制，迄贵由即位（定宗）之五年间，宋与蒙古，只有零星局部战斗，呈休止状态。

三、战后之政局

窝阔台病逝，乃马真氏称制和林，此时蒙古正大举用兵欧州及中亚，同时并分兵讨伐高丽。闻窝阔台可汗驾崩，拔都等都纷纷班师东归。翌年（淳佑二年），蒙古在四川之塔海部，又自成都南下，破泸州，杀死宋都毓杨大全。东方之张柔所部则越过惟水，攻到揭于江北，轫掠和州、滁放、扬州，并攻入通州，画屠其民，江北大道蹂躏，只有寿春久攻未下。到淳佑五年，乃马真氏将张柔调回，改派都元帅察罕率骑兵三万，代替张柔。察罕再围攻寿春，仍不克，乃纵兵大掠，从此淮水流域，成为一片荒凉战场。

西方侵入四川之塔海，也和前次阔端一样，在攻到长江边上。像旋风一样，呼啸而去。留下四川西北一片残破。淳佑三年（公元1241年）宋理宗派兵部侍即余玠续任四川制置使，令收复蜀中地方，部署防卫力量。余玠到重庆，大加整饬，筑招贤馆，选揽英豪，并于关隘山险，筑城堡为要塞，尤其合州之钓鱼山，居重庆上游，在四川中心，当三江（涪江，嘉陵江、渠江）之会，地势险要，构筑最为坚固。蜀中自余蚧整顿后，一切军政秩序，渐次恢复，民心亦定。北方之蒙古因国内有事，没有南侵，为防宋人北攻，亦在沔州，利州筑拭屯田，且耕且战。宋蒙在川陕之栅，成为相持之局。

蒙古太宗窝阔台在位十三年，死时五十六岁。斯时诸子侄都从征在外，遂由皇后染列格揑可敦乃马真氏（六皇后）称制，暂行代理国政。等待诸王子回朝，再由库里尔台大会重新决定新君。此时蒙古诸王将士，正东征辽韩，西征欧洲，南征宋人，闻太宗驾崩，都纷纷回朝，因为路途遥远，拔都缺席，直到乃马真氏称制之第三年，诸王宗室才集会于和林。

招集大会之所，在阔哈湖畔（按元史译文证补谓在达兰达巴之地），窝阔台驻夏之所。宋淳佑六年（公元1243年）春，大会始开成，因拔都与皇后及贵由有嫌，途托病足不来赴会，而拔都为诸宗王之长，

其他诸王，欲待其至，始行推戴新君，乃马真皇后屡遣人促驾，拔都虽许赴会，终托词不至。最后大会遂不待其来而举行。诸王凡百数十人，各将所部将卒来会，拖雷之寡妻莎儿合黑帖泥吕，亦参与大会，其他如鲁木之塞勒术克朝算端鲁克那丁，俄罗斯大公牙罗斯老、波斯长官阿儿浑、突厥斯单河中长官马思忽惕，阿勒波王之弟、报达敌主之使臣、亦思马因派教主之使臣，毛夕里、法儿思，起尔曼三国之使臣，皆奉币而入朝，尚有罗马敬帮所派之修士二人参与大会。开会之地，曰昔刺斡尔朵。置毳帐二千，聚会大帐可容二千人。贵由在受推戴以前，已受特别礼遇，选举之时，皇后与莅会人员群赴距离营刺斡耳朵三四程之金斡耳朵中，盖帐柱贴金箔而钉金钉，故以名也。宗王诸部长诸统将等，共议推戴新君，首先决定选窝阔台之后人承大位，又因乃马真皇后主张以贵由嗣位，贵由受推戴，唯贵由以大位须传之其后人为条件。于是莅会者签署文约曰："汝后人虽仅存一块肉，置之草中脂内，而狗牛不取者，吾曹决不奉他人为汗"。誓毕，脱帽解带，奉贵由坐金座上，共以汗号上之，是为元定宗，时为同年（淳佑六年）8月也。（多桑蒙古史二卷四章）

莅会人员对新君九拜，其在帐外之藩王及使臣，以及平野之民众，皆同时跪拜称贺。贵由受朝贺毕，率诸宗王统将等出帐，对天三拜，会毕大宴7日，贵由然梭取其父皇所藏之金银财帛，令皇婶拖雷遗孀散予众人。

宋嘉熙三年二元太宗十二年，（公元1239年）史嵩之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督两淮四川京湖军马，总揽军政大权，可是史嵩之与当时所谓君子之士，不能融洽，如杜范，刘应起、李韶等，皆以不合而去。翌年礼部进士徐霖上书力陈嵩之植党专国奸深之状。理宗置之不理。是年（嘉熙四年）9月，嵩之以父死请假守丧，理宗特诏"起复"，一般理学家认为大违礼法，掀起与论之批评。最后嵩之自知为众议所不许，自萧终制，理宗本身又是一个理学君主，遂准其终三年之爽。综计嵩之自嘉熙三年为相，至淳佑四年（公元1246年）去职，在位不过六年。纵有擅权营私之处，其情形与韩伦胄，史弥远亦不相同。何以会因为"起复"一事而起波澜，实因当时政治上是非潭沌，内幕复维。主要还是门户之见，党派倾轧，部份群隶起哄之心理形成，所谓义理者，不过是标榜而已。接着又发生了大全之用事，贾似道之误国，南宋政局，益不堪问矣。

第三节蒙哥大汗征宋之战

一、战前一般情势

蒙古定宗贵由原为一病夫，身体虚弱。宋淳佑八年二元定宗三年（公元2148年），贵由赴叶密立河畔养病，途中崩驾于别失八里附近，在位不及三年。定宗贵由崩后，由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称制，初贵由之西巡也，拖雷遗书窦莎儿合黑帖泥，以拔都未入朝，疑贵由有图之之意，密遣人告拔都，嘱自为备，拔都乃发自基辅东迎贵由。行至途中，闻贵

由凶讯，乃托词休养，停驻于阿剌塔黑山，（今新疆省精河县南），召集大食于阿剌塔黑。窝阔台系诸王，藉词选举大会应在蒙古地举行。皆拒不赴会，仅遣哈剌和林长官帖木耳代表预议。命其附合拔都及诸王多数之决定，时大会中列席者，主要为术赤，拖雷系诸王。会既开始，札剌儿部之伊勒只夕首先提议曰：“前奉窝阔台即位时，已有成约，只有此釆尚存一块肉，不奉成吉思汗他系之王为君。”宗王忽必烈曰：“此言诚是，汝辈首先违法，不从窝阔台遗命。按据成吉思汗法令，皇族有罪者，须经亲会龠飘定讞，而后正其罪，乃汝辈违法，而擅杀阿勒堵伦（成吉思汗之爱女，察威儿之妻也。见成吉思汗传冯承钧注），其一事也。窝阔台遗命失烈门嗣帝位（按窝阔台生有五子：曰贵由、曰阙端，曰阙出，曰哈剌察儿、曰合失。先是窝阔台钟爱三子阙出，欲以位传之。不意于宋端平三年（公元1232年，阔出殁于湖广征宋军中，遂移爱于阔出之长子失烈门，养之宫中，欲使之承大位，乃马真皇后则主持立贵由。）乃汝辈违命敢立贵由，此又一事也。”其不欲窝阔台后人嗣位者，皆执二事为词。拔都与窝阔台系有旧怨，曾与莎儿合黑帖泥同谋推戴蒙哥。蒙哥系莎儿合黑帖泥之长子，在军中颇有权势（按成吉思汗，分所部兵与子弟时，拖雷所得独多，故其势最强。拖雷死后，以所部兵分属蒙哥、忽必烈，阿里不哥、末哥四子。诸王幼时，事皆决于其母。莎儿合黑帖泥有才智，能收揽军心，拔都与诸王亦耸敬之，故推其一子登大位，其事较易。）时窝阔台系诸后王皆幼弱，尚未得众心，此系争位者，除失烈门外，仅有贵由于火者斡兀立。

会既开始，忙哥撒儿首先在大会中推戴蒙哥，以其智勇，曾从其父立功于中原，又从拔都立功于西域也。然诸王则以拔都为成吉思汗系诸王之长，当立。拔都不可。诸王乃请其审择一人，以备推戴，并立文约，许对其所挥之人，不生异议。次日大会，拔都曰：“治此大国，非才能出众而热习成吉思汗法令者不可。”因推戴蒙哥。蒙哥逊让数日，其弟末哥斡兀立（冯承钧注斡兀立，犹言子，蒙古人名后常加是称）起而言曰：“吾人既已约定，遵从拔都之推戴，若蒙哥不能践书，将来恐开恶例。拔都曰：“末哥之言是也”。议乃定。到会诸人，遂依俗奉蒙哥为大汗，由拔都献盏。大会约定于来年春，在斡难河克伦鲁河源成吉思汗故地中重开大会，使受诸王及诸将之全体推戴。开会以前，仍由皇后海迷失称制。时皇后与其二子火者，脑忽共摄国政，专事征求贺财。海迷失嗜巫术，终日与珊蛮共处，政纲极为紊乱!火者、脑忽闻大会之决议已推戴蒙哥，大不悦，使告拔都曰：“会议不在成吉思汗故地，诸王亦未全集，义不能从。”拔都乃请其赴来春之新会。且曰：“莅会诸王。以国土广大，特推皋一堪承此大任之人。今推皋已定，未能挽回也。于是双方使者往还，迄于年终，议尚未定。拔都乃命其两弟别儿哥，脱合帖木儿将大军，卫护蒙哥至克鲁轮河畔，命于来春莎儿黑帖泥所召之大会中，奉之承大位。及期窝阔台系诸后王及察合台子也速蒙哥，以蒙哥之推戴不合法，而帝位应属于窝阔台后人，皆不莅会。拔都及莎儿合黑帖泥，数遣使往劝，拔都且言：“童稚不能治成吉思汗之大国”。仍不纳。别儿哥待之一年，恐久延生变，请命于拔都，拔都乃命其立蒙哥即位，违者诛之。

如是术赤、拖雷两系诸王及成吉思汗诸侄至，集会于所定之地（冯承钧注元史载为阔帖阿兰之地），对于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作最后之劝请，遣使赴海迷失及火者，脑忽所，别遣使赴也速蒙哥所，告以诸王皆集，仅待其至。失烈门、火者、脑忽三王见其反对无效，允赴会，并示以期。及期而不至，乃不复待，择定宋淳佑十一年（公元1251年）7月1日，诸王奉蒙哥即大位，是为元宪宗。谱王皆解带置眉上，对之九拜，帐外战士万人，亦随之而拜。蒙哥命是日，人皆休业息争，宴乐终日，并使万物皆同其乐，是日不可乘马，禁以牲畜蓑物，禁杀牲为食，禁渔猎，禁破土，不许扰动水之静源，如是大宴7日。由是蒙古帝统，自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系，转入第四子拖雷系统矣!蒙哥即依次日（7月2日），窝阔台第三子阔出之是予失烈门，结合火者、脑忽二王（按火者、脑忽二王皆跺由之子），谋称兵作乱。拟乘宴会中，蒙哥及诸王酒醉之际，袭除之，而夺袭帝位。事为骡夫克薛侦知，驰归告密。蒙哥当遣诸将之长忙哥撒儿，率三千尉，往迎二王，于距大会地2日行程之外，以兵围之，强三王经从未曾，密捕其党羽数十人，皆伏诛。蒙哥以三子皆成吉思汗子孙，宥其死，谪从军远征。

二、战地形势及战略指导

宋理宗淳佑元年（公元1241年）12月，蒙古乃马真皇后称制时，遣月里麻思使宋，议和好。从行者七十余人。临行，月麻里思示众曰：“吾与尔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诈，当誓死，勿辱君命”。既发，抵淮上。南宋守将以兵胁之曰：“尔命在我，生死顷刻间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尔贷”。月里麻思曰：“吾持节南来，以通国好，反诱我以不义，有死而已”。宋守将知其不可逼，而囚之飞虎寨。至蒙哥即位为帝，已十有一载之久，尚未见使团北还，若非蒙古内部，继承发生问题，早已与南下问罪之师。（上引见续通鉴卷百七十）

南宋自进军汴洛，恢复三京，而招致丧师辱国后，对蒙古大敌，惟有应战退守，觅致偏安，并无彻底整军复国之大志。幸而江淮方面杜杲、吕文德等军之力撑危局。襄汉方面有孟珙一军，孟珙公忠体国，肝胆照人，治军严而得军心，故能将襄樊收复。川陕方面则赖有余阶，锐意整顿，局面一新，屡扼蒙古军之南侵，且曾一度北伐汉中。及至宋理宗淳佑六年，孟珙不幸去世，诏以贾似道为京漠制置使，余玠在川日久，自然不免有专断之处，使有人谗毁之，说他专制西蜀有无君之心。理宗竟于翌年（宝佑元年）5月，召余阶回京，玠奉命后暴卒，朝廷且下令抄其家，此事令忠义气短，大失人心。从此宋室，自毁长城。而蒙古军遂长驱南入无阻矣!蒙古宪宗蒙哥可汗，鉴于十年来国内纲纪废弛，即位后，对于军政措施，大加整顿，并积极布置，以为南征之计。以忙哥撒儿为相，总断军国大事，以翁古儿典守和林宫阙，以斡鲁不覩塔刺浑充燕京行尚书省事，以皇弟忽必烈统治漠南军民之政，开府于金遂川（今察哈尔沽源县北）。以察罕总统两淮蒙兀汉军。忽必烈用汉人姚枢为谋士，采纳姚枢的建议，置经略司于汴京。分置屯田，西起唐邓，东至桃源（今江苏泗阳县），所在筑碉堡，设兵驻守以图宋，遂一变往日之游动战法，而为稳扎稳打之正规战法。

此时蒙古人已尽得西域之地，蒙哥大汗鉴于宋长江防线不易突破，乃用郭宝玉大包围之战略，先从西南进兵；期得大理西南夷（今云南）与吐蕃（今西藏）之地，再迂回到南宋后方，然后与自河南南下之兵夹攻之。宋淳佑十二年（公元1252年）秋，命皇弟忽必烈带领兀良合台等南征大理，同时命皇弟旭烈兀率领大兵西征木剌夷，后来旭烈兀一直攻到地中海，大理即现在之云南，唐代南诏地方。此地自唐末五代以来，一直和中国脱离，成为化外之邦，南诏政权，初改国号曰大长和，后晋时有段氏掌握政权，始称大理国。其后该国内虽迭有变乱，但直到南宋时，仍为段氏之大理国。

取之，藉以图宋，必得志焉。

三、忽必烈征大理

元宪宗二年（宋淳佑十二年，公元1152）7月，蒙哥命忽必烈统军经略大理，是年终又遗汪德臣将兵入蜀掠成都，薄其南三百里之嘉定（今四川乐山县），为忽必烈之进军云南开关进路也。

翌年八宪宗三年公元1253）8月，忽必烈自甘肃之临洮进兵，速不台之于兀良合台为副（按速不台于参加窝阔台死后大会毕，还居土拉河上，殁年七十三岁，兀良合台在诸将中推戴蒙哥为最力，至是蒙哥命其主持南征军事）。9月次塔拉（吐蕃境），然后军分三路以进，兀良合台出西道，由晏当路（在今丽江府），诸王抄合也只烈出东道，由白蛮（自今姚安）忽必烈自将大军由中道（从越隽入大理），经西番界山谷，行经二千余里，阴历10月，军过大渡河至金沙江，乘革囊及枞以济（在今丽汇县西北石门关、石鼓渡等渡江），摩沙蛮王唆火脱迎降（摩沙今云南之丽江）师至白蛮（今大理附近地区），其主将出降，主将之侄，坚壁拒守，攻拔其城杀之，不及其民。同年11月遣玉律术等往谕南诏国来降，不报，12月12日丙辰，忽必烈军围南诏都城大理（今大理县）。南诏国王段兴智，懦弱无能，国事皆决之于权臣高祥，及城被围，高祥乃乘夜率部遁姚州（今姚安县），段兴智走陪都鄯阐（今昆明）。忽必烈入城，谓左右曰：城破而玉律术等不出，使者必死矣。15日已未，西道兵亦至。俄而得使者之尸，诸将以大理杀使者欲屠城，忽必烈幕僚汉人姚枢、张文赚谏止之。忽必烈乃命姚枢裂帛为旗，害止杀之合，分号街陌，由是全城获免。未几，获高祥于姚州（云南姚安县），杀之。至是忽必烈以何时中为宣抚使，留兀良合台征服南方未平诸地，然后率中东两路之军班师。（续通鉴百七十四）

兀良合台平吐番及交趾：大理既平，兀良合台遂挥军（本部西路）入吐番，土番酋惧而出降。吐番有民三万户，兀良合台签发土番军为先锋，进取其他诸部二元宪宗四年（公元1254）终，兀良合台入朝蒙哥皇帝于蒙古。翌年复还云南，先克鄯阐（大理陪都，今云南昆明），擒其国王殷兴智。降白赞，鬼蛮（今曲靖县东北贵州西部地区）等部，鲁鲁斯（今昭通，会泽等县地），阿伯（今临安，通海、蒙自等地），阿鲁（今汉中楚雄，威楚等地）诸国皆慑于兵威而降，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

府四郡，及乌蛮，白蛮、鬼蛮等三十七部落，献俘阙下。于是兀良合台奉诏，以便宜取道入蜀，以夹攻宋人。遂自乌蛮（都押赤城，在今尾阳县境，城际滇池，三面皆水，颇险固）趋泸江（自今石屏东入建水县至开远入于盘江），破秃刺蛮三城（经今昭通县），击破宋张都督兵三万，夺其船二百艘于马湖江（今屏山县。宋对大理方面设防，另详下述），通道于嘉定、重庆、合州，与蒙古之蜀帅汪德臣之军会师。

元宪宗七年（宋宝佑五年，公元1257年，8月兀良合台受封为大元帅还镇大理，悉置郡县。9月，遣使安南招降，安南囚其使。翌月遂进兵交趾（即安南，都今北越河内）。时安南称藩于宋也。交趾国王陈日照隔洮江（即富良江）列象骑步阵甚盛，兀良合台分兵为三队渡江：命部将彻彻都从下游先渡，兀良合台居中，附马忙都与阿术居后。仍授彻彻都方略曰："汝既济，勿与之战，蛮必逆我，俟其济江，我使怀都断其后，汝伺便夺其船。蛮败而反走，无船以济，必为我禽"。彻彻都达命，登岸即纵兵击之。日熙虽大败，然得乘舟逸去，兀良合台怒曰："先锋违我节制，国有常刑"彻彻都惧，仰蔡死。兀良合台入交趾，日熙遁走海岛。得前所遣便于狱中，以破竹东体入肤，比释转，一使死焉。兀良合台怒，因屠其城。留9日，因天暑，班师。翌年（宪宗八年公元1258年）3月，安南王请降。（多桑蒙古史，二卷七章）

四、蒙哥亲征

进军构想：元宪宗七年（公元1257）6月，蒙哥谒成吉思汗行宫，祭旗誓师。10月，蒙哥督师南征。命皇弟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蓝真答儿辅之。军既发，渡漠面南，至玉陇栈，忽必烈及宗主数人来迎，大实。翌年（宪宗八年）1月，军至黄河，适冰合，以土覆之而渡，军入陕西，驻跸于六羹山，时皇弟旭烈兀已平波斯，蒙哥以阿母河以西之地交旭烈兀管理，是为伊儿汗国。蒙哥驻六盘山3月，留辎重，率军四万，号称十万，分三道而进。蒙哥军出陇州（今护西陇县）趋敞开。皇弟末哥军由洋州（今陕西洋县）趋米仓（米仓道。自南郑南越米仓山至甫江入巴中。或越禾仓山后，沿白沙河谷至闽中，古之米仓道也），万户孛里叉由渔关趋沔州。别遣两军入湖广江南：张柔从皇弟忽必烈攻鄂州，斡赤斤之子塔察儿攻荆山，又诏兀良合台自交广引兵会于鄂。于是宋境三面被兵，形势危殆。（多桑蒙古史，二卷七章）

蒙古进攻蜀地，自窝阔台汗以来，曾数次取之旋即离去。直至宋宝佑二年、蒙哥汗四年（公元1254）正月，蒙哥汗已遗其弟忽必烈征大理（上年9月）之后，为准备入蜀，乃命降将汪德臣，筑利、阆二州（今广元，闯中）之城以守之，且耕且战。以后蒙宋战争，遂演成阵地之攻防战。

蒙古军攻保事府：元宪宗八年（公元1258年，宋理宗宝佑六年）1月，蒙古前军之将纽璘，欲会都元帅阿答胡于成都，宋四川制置使蒲择之遗安抚刘整等据遂宁，江筋滩渡以拒之，以截其东路之军。纽璘军至不能渡。自且至暮大战，整等军败，纽璘遂策军长驱至成都，蒲择之命

杨大渊等守剑门（今剑阁县东北）及灵泉山（今遂宁县东十里），自将兵取成都，会阿答胡死，纽璘率诸将大破杨大渊等于灵泉山，进围云顶山坡（今金堂县南五十里余阶侨置利州于此），扼其归路，择之军溃，城中食尽，亦杀主将以降。于是成都所属彭汉绵等州，及威（今四川理睬）茂（今县）诸番悉降蒙古，纽璘以功受都元帅。

10月纽璘闻蒙哥帝次汉中，留部将密里火者、刘嶷等守成都，自率众渡马湖（今金沙江畔）接应之。11月帝渡嘉陵江至白水，命总帅汪德臣（守利州，今庆元县，随征）造浮梁，蒙哥军次剑门。纽璘自率军进取（在小剑山顶，小剑山在今锎阁县北），蒙哥军亦至，隘中裨将赵仲窃献东门，蒙古兵入，宋守将杨立败死，守众皆溃，越2日，蒙哥挥军进围长宁山（今昭化县西南九十里），宋将王佐徐听战败，蒙古军进攻鹅顶堡（今昭化县西南），知县王仲降，披遂破，王佐死焉。蒙哥入城，杀王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余人，诺王末哥，塔察儿并略地还，引军来会。

蒙哥战死：蒙哥续驱军进至大获山（苍溪县东三十里，余玠城于山上，徒闯州治之），遣王仲人闽州招守将扬大渊降，大渊杀使者，蒙古诸军攻城，大渊惧，以擦降，蒙哥以为都元帅。12月上旬蒙哥命大渊率所部兵与汪德臣分击相如（今蓬安县）等县。纽璘则攻简州（今简阳县）。蒙哥师次运山（今营山县西，接蓬安县界，余价移蓬州治此），大渊遣人招降其守将张大悦，亦以为都元帅。初10日乙酉，蒙哥师至青居山（今南充县南），宋裨将刘渊杀其都统殷元鉴出降。22日丁酉破隆州（今仁寿县）及大良山相继降，攻雅州（今西康雅安县），拔之，石泉（今北川县）守将以城降。宋开庆元年（蒙哥九年，公元1259）正月，蒙哥驻重贵山北（似在合川附近），置酒大会因问诸王附马百官，略谓：“今夏暑且至，南土瘴症，汝等以为可居否？”托鞬谓：“帝宜北还。”巴勒齐谓托驩怯，我颐留之。蒙哥从之。于是遗宋降附晋国宝招让合州（今合川县东钧鱼山上，三面循水，上有天泉，余阶徒州治于此）守将王坚，坚辞之。当时远征安南之兀良合台军方北上。兀良合台由云南派兵自马湖渡金沙江入蜀，至今屏山县，由重庆进攻涪州（今涪陵）、忠州，渐薄藖州境。（多桑蒙古史，二卷七章）

晋国宝说降王坚不果，缔次峡口，王坚追还杀之，蒙哥遂命汪德臣进围合州，俘其男女八万。蒙哥命大将潭都海以兵二万守六盘，乞台不花守青居山，命纽璘造浮棵于涪州之兰市（今涪陵县西六十里），以杜援军，自将大军，直趣合州城下，王坚力战固守，蒙古合兵围之。攻至2日，蒙古军中大疫，议班师而未果。蒙军屡攻不下，四5月之交，蒙古军在合州城下，过大雷雨凡20日，由是攻势停顿。

宋四川制置使摆择之在蜀无功，宋以吕文德代之。是年6月文德乘顺攻涪江浮梁，力战得入重庆，即率舟千余，溯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泽分军为两翼，顺流纵击，文德败绩，天泽夺战舰百艘，追至重庆而还。7月汪德臣复选兵夜登外城，王坚率兵战，迟明，汪德臣单骑大呼曰：“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语未竟，为飞石所中，因得

疾死。会天大雨，攻城梯折，后军不克进，乃俱退。蒙古军攻城，死伤甚众，而军中痢疫盛行，宪宗蒙哥亦染病。8月，乃留精兵三千守之，余悉攻重庆。越12日，蒙哥卒于合州钓鱼山下。（按宋君荣书谓蒙哥中流矢），年五十二，庙号宪宗。合州之围遂解。（多桑蒙古史，二卷七章）

由于蒙哥军攻合州无功，故兀良合台自大理进至重庆，忠州之军，亦徒有远程迂回夹攻之名，而未能收其实效。

南宋国防设施：宋朝经闻及蒙古取大理消息，对西南之设防，亦颇有设旅。兹述其大要如下：

宝佑二年（蒙古宪宗四年，公元1254）7月，宋廷已自广右（今广西）获知蒙古攻大理之消息，是月即下诏，以“思、播二州（今贵州思南、遵义），连年悍御，其守臣各进一秩。”明年7月，命吕文德知鄂州，节制鼎浓辰沅靖五州（今湖南常德，澧县、沅陵、芷江、靖县）。宝佑四年（一二五六）5月，宋朝以思、播州得罗鬼国（今贵州普安、普定、威宰等地）之报，谓大理蒙军招养赞人为响导，将入寇。于是谋加强泸，溆（今四川泸县，宜宾）以上，盐井设险以待敌。及使思，播二州，约罗鬼为援，播州以兵助罗鬼。是年秋，又闻溪蛮为蒙古所用，欲窥伺邕（今广西南宁），因令守臣徐敏子守险要，以防不虞。宝佑六年正月，宋廷又遣枢密院编修官吕逢年赴蜀，督办关隘、屯栅，粮饷，相度黄平（贵州今县），思、播诸处险要缓急事宜以设防，并列具工役报闻。是年5月，宋朝因安南求救，始知蒙古进攻安南之事。因遣兵万人，屯于钦州（广东今县），为安南声援。综观宋对西南之国防线，仅重视思，播方面，对邕地之防，则甚为疎略，盖以其道远也。

五、忽必烈攻鄂州

江汉、江淮战区方面，蒙古自窝阔台汗攻宋以来，由于江汉、江淮水域之限制，大集团骑兵大失其效用。反之，宋朝在长江多舟颐，与步兵协同，则大为发挥其价值。因此蒙古在江汉，江淮间，又不得不敢为阵地战。如宋宝佑二年（蒙哥汗四年，1254），蒙古汉军之将张柔，即以连年用兵两淮（淮东淮西），艰于粮运，奏请攘亳之利（今安徽亳县）。蒙哥乃命柔驻亳州，率山前（河北省北部）八军（即汉人所组成之军）建州城以为根据。柔又以涡水北线（上流）不利漕运，曹、狭、魏，博之粟（今鲁西及翼南大名等地之粮），皆不能至于淮上。乃筑甬道，自亳至汴百二十里。或以河流深，不能筑甬道之处，则筑桥十五以通之，而于桥之两头，筑堡以戍之。

又命在汉降人中，选有将才者，以守前线城堡，如罗史枢（天倪之子）为征行万户，配以真定、相、街、怀、孟睹军（今河北之正定，河南之汤阴、汲县、沁阳，孟县所组成之汉军），驻守唐、邓及光化等地（即淮西）。

未几，张柔又以百丈口（今安徽宿县北汴河），为宋舟师往来之道，可容舟万艘，适足以资宋师。乃集大军于符离，筑南道，自亳而南六十余里。有河流之处，则筑横江堡（桥头堡）。又以路东六十里皆水，宋舟师易由此进袭。乃立楫水中，密置侦骑于所达之略。由是鹿邑、宁陵、考城，拓城（皆河南今县），楚邱（今山东曹县东南）、南顿（今河南项城县北），无被宋袭之患。陈（今河南淮阳县），蔡（今上蔡）、颖（今安徽阜阳），息（河南今县），粮运畅通。

宋朝在以蒙古长期战争以来，亦不断加强其防线。除其西南防守点，概如上述外，其东自海州（今江苏束海县）、淮安、濠、寿（今安徽凤阳东北、寿县）、光（今河南潢川）、信阳、随、枣、襄阳、均、金（今陕西安康），西亘蜀之阆（侨置营山县西）、利（侨置金堂县东南）、雅（西康雅安）州之线。此防线各区之战略要点，则为：扬州（今江苏江都）、庐州（安徽合肥），建康（今南京）、江州（今江西九江）、安庆、黄州（今湖北黄冈）、鄂州（今武昌），襄阳、江陵，夔州（今四川奉节县）、重庆等地。（下引见续通鉴卷百七十五）

围鄂州扰江西：元宪宗九年（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8月15日丙戌，忽必烈会兵渡淮，令汉人王维忠郝经宜抚荆湖江淮，率归德军先至江上。自率主力至光山（河南今县），由大胜关（河南罗山县南百四十里，与湖北禄山县交界处）入。张柔由虎头关（今湖北厂城县北百里）入，分道并进。宋兵皆遁。时忽必烈得南宋沿江制置司榜文一纸，有云今夏谍者阅北兵会议，取黄陂民船攻伐，由杨罗堡（今镇，在黄陂东南）以渡江，会于鄂州。（今武昌）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愿如其言而行之”。时宋沿江制置副使衮玠徽渔利甚虐。及蒙古兵至黄陂，渔人乃献舟，且显为响导。9月初1日壬寅，末哥自合州造人以宪宗蒙哥凶讣来告，请北还以服人望。忽必烈日：“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而还”，自登香炉山（今汉阳县西南九十里），俯瞰大江，大江以北曰武湖，武湖之东曰阳罗堡，其南岸即浒黄州，宋军以大舟扼江渡，军容甚盛，汉军之将董文炳书于忽必烈曰：“长江天堑，宋所恃以为国，势必死守，不夺其气不可，臣请试之”。乃帅死士百数十人当其前，令其弟文忠文用载艨艟鼓櫂疾驶跟进，且叫呼助势，锋已交，文炳乘势挥众登岸搏战，宋军大败，明日忽必烈率诸军渡江，遂进围鄂州（今武昌），且分兵趋江西，入临江（今江西清江县），拔瑞州（今高安县），宋室朝野大震。宋廷一面诏诸路出师御敌，出内摩钱七千七百万缗，银帛各一百六十万两匹，以犒师：一面团结首都临安义勇，捂募新兵。坩筑平江（今江苏吴县）、绍兴、庆元（今浙江鄗县）城堡，以备海隅之战。内侍董宋臣则请理宗迁都四明（山，今部县西南）以避蒙古锋锐。

蒙古内乱忽必烈北归：是年10月，宋贾似道以右丞相兼枢密使军汉阳以援鄂。11月蒙古军围鄂州至急，宋都统权州事张胜，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谕之曰：“城已为汝家有，请绥攻，以便议降。”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将退，会高达引援乒至，贾似道亦率军驻汉阳为援。蒙古军乃复进攻，遣苦彻拔都儿领兵同降人谕鄂州使降，抵城下，胜杀使者，以军出袭苦辙拔都儿。蒙古兵势盛，胜战败死之。高达婴城固守。

蒙军攻城益厉，城中死伤者至万三千人，贾似道大惧，移驻黄州，乃密遣宋京诣蒙古营议和，请称臣纳币，忽必烈不许。会合州守将王坚使阮思聪由蜀走鄂，以蒙古宪宗战死相告。而贾似道并不乘机反击，仍一味求和，许以称臣，划江为界，岁奉银帛各二十万两匹。此时忽必烈听说阿里不哥拟称帝于和林，深恐漠北有变，遂接受宋京和约留张杰，阎旺以偏师侯湖南兀良合台之兵，班师拔营北返。

兀良合台北宋会师：宋宝佑六年（蒙哥八年，一二五八），兀良合台奉命还军潭州（今长沙），与忽必烈会师鄂州，乃于是年约10月初，亲率骑兵三千，蛮爨万人（大理之白族人所组成之军，亦曰十白军），由云南出广西，攻横山寨（南宁东八十里）。宋广南制置大使司镇抚刘雄飞，将兵绝之，颇有斩获。至明年10月间，蒙军卒破横山，入老苍关，徇宋内地，守将陈兵六万于昆仑关地区拒之，兀良合台潜遣兵白闻遗街其中坚，大破之，遂乘势破宝州（今窦阳县），象州（今象县境），入静江（桂林），连破匴（沅菠）、沅（芷江），宋将以兵来拒，断其归路，兀良合台滑出官军之后，命其予阿术横击于前，宋军迟走，遂围潭州（长沙）。闰11月蒙军攻城甚急，宋湖南制置副使知潭州向士壁极力守御，既置飞江军，又募斗努社，朝夕亲自登城抚劳拒战，会忽必烈已允宋之求和，班师北去，特遣铁蔿赤迎兀良合台于岳州，兀良合台遂解潭州之围，引兵趋湖北。宋景定元年，春，蒙古将张杰阎旺作浮梁于亲生机（今崭州西二里）以备兀良合台济师北返，贾似道听刘整计，命夏贵以舟师袭攻浮粱，兀良合台力战，始得渡江北去。蒙古大迂回战略，至此遂功亏一篑。

第十一章 蒙宋战争之二——忽必烈灭宋各战役

忽必烈伐宋：公元1259年，蒙古宪宗蒙哥战死于合州后，诸王争立。翌年，忽必烈即帝位开平。内乱稍定，1262年，命阿术南征。

襄樊攻防战：1259年围襄樊，至1273年陷之。

鄂州攻防战：1274年12月渡江攻鄂州，即陷之，遂下沿江州郡。

丁家渊会战：1275年，宋宰相贾似道抗大军拒元军于丁家洲，大败二元军遂陷建康。

江陵亦陷。

攻临安之战：1275年10月二元分兵三道攻临安，翌年1月陷之。宋亡。

元追捕宋二王之战：1276年追捕宋二王，经三次发动追击，自温州而福州、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广州沿海，至于雷州。最后于二一七九年，追至匼山（今广东新会县南）会战，始灭之。

第一节战前一般情势

一、忽必烈自立于开平

先是宪宗蒙哥，指定桓州为其驻夏之所。意宗六年（一二五六），忽必烈命博学之佛僧刘秉忠相地于桓州东滦水北，独石口东北约二百二十里之能岗，建立城郭。中毓元年（一二六○）工毕，定名开平府（按中外地名典注：开平府本金桓州时，元置开平府为上都路治，清于其地置多伦诺而应，民国改为多伦县）。当蒙哥皇帝之崩也，忽必烈方围攻鄂州（今武昌）。宋贾似道密遣使谒蒙古营求和，请称臣纳币，忽必烈初不许。会闻脱里赤，阿蓝答儿等谋立阿里不哥，因召讲将议事，郝经曰："阿里不哥已据和林，今脱里赤行省事于燕都（今北平），既据两京，若称受遗诏，便正位号，欲帝得乎？愿大王与宋议和，率轻骑早归，迳造燕都"。忽必烈从之。会宋使复至，请称臣割江南为界，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忽必烈许之。遂拔营北返。留张节，阎旺以偏师候湖南兀良合台之兵。（上引见多桑蒙古史，三卷一章）

中统元年（一二六○）1月，忽必烈营于燕都城下，以阿里不哥调发人丁银苦，遣使责之。阿里不哥报以好言，用安其心，计语忽必烈及其征属，赴其在阿勒卜山蒙哥之大斡耳朵中所召集之会葬大会。乃遗脱里赤往延忽必烈及其军中诸王，诸王答称："俟将所部军队送还驻地后，然后赴会"。脱里赤使人以告阿里不哥，而自随忽必烈赴开平。迨至，忽必烈弟末哥，窝阔台子合丹斡赤斤那颜子脱合察儿及左手诸王统将等开大

会，群以亲王旭烈兀既在波斯，术赤察合台两系诸王，因道远未能召集，情形急迫，难以展期，遂一致推戴忽必烈，不必再开车里尔台大会，依用习俗礼仪，奉立即位，同年（中统元年、宋理宗景定元年王（月四日也。忽必烈年方四十有四。诸宗王统将等并将推戴忽必烈事，遣使往告阿里不哥。脱里赤闻变逃走，被执，投之狱逼讯之，遂尽吐宪宗蒙哥死后，阿里不哥在和林之阴谋。忽必烈命不里子阿必失合主察合台汗国（今新疆及俄属中亚细亚各地）事，偕其弟还国，道出陕西，为阿里不哥所因。（上引见多桑蒙古史，三卷一章）

二、阿里木哥自立于哈剌和林

阿里不哥所进行之争位行动，正积极进行中，一方面命阿蓝答儿发兵于汉北诸部，同时分遣腹心，易置将佐，敝金帛，签士卒，又命刘太平霍鲁梭拘收关中钱谷。时浑都海自先朝即将兵屯六盘山，刘太平等阴相结纳。浑都海复分遣人约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同皋事。阿里不哥遂自立于哈剌和林。其党拥戴最力者为蒙哥之正后忽都台，蒙哥子阿速台、玉笼答失。昔里吉及察合台孙数人。

三、忽必烈先定关陇（下见多桑蒙古史三二卷一章）

中统元年（一二六○）夏，忽必烈、阿里不哥遣使往还，皆无要领。及秋，阿里不哥命旭烈兀子出木哈儿偕哈剌察儿所将忽必烈军之前锋，战不胜。阿里不哥后军闻之惊溃。阿里不哥杀所囚之二王及使者百人，率残众退走乞儿吉思之地（乞儿吉思潮，在外蒙科布乡东北二百里），盖其驻多之所也。其驻夏之所则在阿尔泰山中，其领地即为其母沙儿合黑帖泥之领地，地广三日程。

阿里不哥之党徒之在陕西者亦遭失败。忽必烈即位之初，命畏兀儿人廉希宪为陕西四川抚宣使，处太平霍鲁怀闻廉希宪将至，急入京兆（今长安），谋为变，越2日，廉希宪亦至，宣示诏旨。未几，尽得刘太平霍鲁怀等阴谋，遂分遣人掩捕之，会有赦诏至，廉希宪命杀刘太平等于狱，方出迎诏。

廉希宪遗刘黑马诛密里霍者于成都，遗汪惟正株乞台不花于青居。又命宗王合丹与汪良臣入春分三道进讨潭都海，潭都海退渡黄河，与阿蓝答儿合兵于甘州。合丹及二将之兵合击败之。杀浑都海阿答儿，于是关陇悉平。

四、忽必烈进军哈剌和林

中和二年（宋理宗景定二年、公元1261）10月，忽必烈自率军进向哈剌和林，驻各于汪吉河。哈剌和林恃中国之食为食，兹粮道既为忽必烈军所断，因苦饯。阿里不哥军之兵械食粮俱匮，遂于危急中命拜答儿子阿鲁忽主察合台汗国国事。阿鲁忽时在其所，阿里不哥乃与之约以二事：一以兵被粮食来济，二守只浑河境（按多桑蒙古史译锡尔河为细浑河或只浑河），以阻拒旭烈兀、别儿哥二王求援忽必烈之军东进。阿里

不哥尚在谦州之地，恐忽必烈乘机来袭，乃遣使至忽必烈处，谬言颢悔所为，奉兄为主，将入觐，惟须俟马肥。并待所约阿鲁忽、旭烈兀、别儿哥（术赤之子嗣位钦察汗），及其他诸宗王等至，同来解决帝位继承事。

忽必烈答之曰：“我信弟言，显弟于三王到达以前，先圃一晤。”乃命其从弟也孙哥率一军留屯哈剌和林之地，以待阿里不哥之至，迎之赴斡耳朵，自返开平，遣余军务蹄驻所。（上引见多桑蒙古史二二卷一章）

五、阿里不哥之乱平定

中统二年（公元1261）春夏两季既过，阿里不哥休养士马毕，辽进兵，遣使给也孙哥，言来归命，也孙哥信之，不设备，阿里不哥以兵掩至，击溃其军，乘胜踰漠而南，迳迫忽必烈住所。忽必烈闻惊，亟集兵，进御其弟。同年（中统二年）终，此兄弟二人战于戈壁边界附近，阿里不哥全军败绩，忽必烈下令诸军勿追，曰：“是为轻躁之徒，或者思而自悔”。越10日，阿里不哥闻其兄兵退，遂还军，再与其兄军战，战甚剧烈，及夜各收军退。翌年（中统三年）全年，双方无战争，盖以阿鲁忽既奉阿里不哥命主察合台汗国事，遂赴别失八里（今新疆迪化东），取权于哈剌旭烈兀（察合台汗之继承者）寡妇斡尔合纳之手，时其统治地自阿力麻里（今新疆伊犁）之地，达于只潭河畔，当时有兵十五万人。阿里不哥战败以后，百物奇缺，遣使者三人至阿鲁忽国中，征发牲畜兵械货财，所徽既富，因启阿鲁忽之贪心，欲不与焉。乃杀阿里不哥使者，而归命于忽必烈。阿里不哥不意阿鲁忽之出斯皋也，闻之惊怒!乃皋兵讨阿鲁忽，败之。阿里不哥，纵兵大掠，军心离散，由是阿里不哥兵财俱缺，遂于至元元年（一二六四），归命忽必烈，蒙古内乱以平。时蒙古西北三大藩王为钦察汗别儿哥、伊尔汗旭烈兀、察合台汗阿鲁忽。未几阿里不哥与三大藩王相继死去。忙哥帖木儿，阿八哈，木八剌沙分别主三大汗国。至于海都继阿里不哥扰乱于西北之事，则另于次章群述之。

第二节战争之导因及战略指导

一、郝经之被拘留

阿里不哥之叛变虽平，海都仍在构兵作配。但并未能阻止忽必烈之征宋野心。盖忽必烈欲完成虞吉思汗诸子从未放弃之筑一中圃之企念也。食有宋人拘留使臣之事，忽必烈遂有所藉口。先是忽必烈在鄂州与贾似道和议，北还，就帝位于开平。夏似道剐自鄂还朝，语败为胜，谲顼鄂功，宋理宗被蒙蔽，及至元世祖忽必烈遣翰林侍讀士郝经为国信使，入宋告即位，且徵前日鄂州讲和之议。经既入宋，贾似道深恐其泄前此议和真相，遂命人拘郝经于真州（今江苏仪征），时为一二六○年7月。且尽除知此和议之人。蒙古遗详问官来访问经等所在，因以稽留信使，侵扰疆场、诘问于宋。宋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

如何处置？亦不报。此事遂成为宋元此次战争之衅端。

二、李坛之反正（下引见多桑蒙古卷二章）

忽必烈既知使臣被留，乃于中统三年（一二六二）9月谕将士举兵攻宋。诏曰：“朕即位之后，深以戢兵为念，故年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务远图，伺我小隙，反启边衅，东剽西掠，曾无宁日。朕今春还宫，诸大臣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朕重以两国生灵之故，犹待信使还归，庶有悛心，以成和议。信使留而不返者，今又半载矣，从来之礼遽绝，侵扰之暴不已。彼尝以衣冠礼乐之国自居，理当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见，今遣王道贞往谕，卿等当整尔士卒，砺尔戈矛，矫尔弓矢，约会诸将，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倘赖宗庙社稷之灵，其克有勋。卿等宣布朕心，明谕将士，各当自勉!毋替朕命”。忽必烈虽有此作战准备命诏，然因北御阿里不哥之变，当时并未南征。及两败阿里不哥军后，同年2月，南入燕京，又闻李璮叛于山东，以地投归宋室。李璮者李全之子也。先降于蒙古，官拜江淮大都督，尝攻陷宋海州涟水军。忽必烈即位，璮始萌南归之志，密召其子彦简于开平，修筑济南益都等城壁，遂歼蒙古戍军，以涟海诸城归宋，献京东州县，请赎父罪。宋廷诏授李璮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诸路军马，封齐郡王。忽必烈乃于是年4月，命诸王哈必赤，右丞相史天泽总诸道兵击李璮，围济南。璮固守，粮尽以人为食，被围4月，璮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投身水中，水浅不得死，为蒙古军所获，史天泽杀之，宋虽遣兵往援，然救军至鲁南不敢进，不战而还，山东遂复为蒙古所有。

三、刘整降元

宋景定五年（蒙古至元元年、公元1264）10月，宋理宗死，太子赵禥即帝位，是为度宗。先是宋潼川安抚副使刘整，以贾似道诛边将异己者，既惧祸将及己。景定二年（1261）4月，贾似道又以素与整有隙之俞兴为四川制置使。兴以会计边费，遣吏于整。刘整自遣使诉于朝，又不得达，心益不安，遂于是年终，籍泸州十五郡户三十万，降于蒙古。忽必烈即以整为夔路行省兼安抚使。整宋之骁将也，蒙古既得之，由是尽知宋之虚实。当时李璮之反正，宋人不能掌握，而刘整的北降，却被蒙古所利用，这一出一入，对于双方之作战影响极大。

四、作战准备与战略指导

当蒙哥皇帝既崩，忽必烈以阿里不哥之谋位，而尤贾似道之请和，蒙古内哄，无暇南图者凡六年之久。但南宋既不乘此有利机会，以充实战备，巩固边防，亦不图敦邻修好，弭兵息民，休养国力。惟贾似道是信，谲败为胜，粉饰太平，兵丧于外，民怨于下，自毁长城，挑启衅端，而自速其破亡。反之忽必烈虽以敉平阿里不哥为当前急务，但迄未松弛其对南方之注意力，且将元室统制中心南移（至元元年，自开平入都于燕，号为中都，开平为上都），俾对南宋之军事行动，得为适时适

切处理（中统二年以江淮经略使史天泽为中书右丞相），同时广事欲询伐宋之作战意见。并检讨过去对宋作战之得失，从事诸种作战准备，期于策划周密，计出万全。其荦荦大者，如信用史天泽、刘整等（以中国人图中国），置榷场于襄阳。缘刘整既降于蒙古，乃献计于忽必烈曰：“宋人惟恃吕文饶耳!然可以利诱也!请遣使赂以玉带，求置榷杨于襄阳城外以图之”（吕文德弟文焕知襄阳）。使者至鄂，请于吕文德（知鄂州）。吕文德果许之。遂开榷场于樊城，筑土城于鹿门山（今襄阳县东南三十里），外通互市，内筑堡垒。蒙古又筑堡于白鹞（襄阳县南）。由是军有所守，遏宋南北之援，并时出兵哨掠襄樊城外，蒙古军势由是益炽，及文德既悟，但无及矣!（上引见新元史卷百七十七，吕文焕传）

当刘整之叛宋也，宋亦欲羁縻刘整，抑或欲施以离间，乃授刘整为卢龙军节度使，封燕郡王，遣僧窦告身金印矛符，期致之。僧人蒙古，事觉。忽必烈使人问整，整自军中人见忽必烈，自明其忠。忽必烈赏之使还，诛僧。自是刘整益忠于蒙古。宋度宗成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一二六七）12月，整遂献伐宋方略曰：“襄阳吾故物，弃而勿戍，使宋得窃筑为强藩。若复襄阳，由汉入江，再取荆楚，定江淮，而追临安，以亡宋室。掩有华夏。”中书平章政事宋于贞亦上言。略谓“本朝威武有余，仁德未洽。若投降者不杀，胁从者勿治，则宋之郡邑可传檄而定也。”（多桑蒙古史三卷二章）

第三节蒙军中央突破——襄樊攻防战

一、蒙古军筑城造船、宋军初创

忽必烈既决意伐宋，途于至元四年，宋威淳三年（公元1267）11月，征诸路大兵，命都元帅阿术（兀良合台之子）与刘整进攻襄阳。阿术言于忽必烈日：“所领者蒙古兵，若遇山水砦栅，非汉军不可，宜令史枢率汉军协力进征。”从之。阿术驻马虎头山（今襄阳县西南），顾汉东白河口（今襄阳东北白水入汉之口）曰：“若筑垒于此，以断宋粮道，襄阳易图也”。遽城其地。知襄阳吕文焕大惧：遣人以蜡书告其兄知鄂州文德。文德以为襄樊城池坚深，兵储支十年。来春水发，即可往取之，不以为意。翌年9月刘整又与阿术计曰：“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若夺彼所长，造战船、习水军，则事济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划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遂筑围城，以逼襄阳。阿术又继筑台于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自是宋军援襄者，皆不能进。至元六年（一二六九）正月，蒙古重又括诸路兵，增兵襄阳，遣史天泽与宗王大臣往经画之。天泽汉军名将也，畏兀儿、波斯、阿拉伯、钦察、阿速等部之人，皆乐为之用。天泽至襄阳，观其形势，见城坚可久守，须断其粮道，乃筑长围起自万山（今襄阳西北），包百丈山（襄阳南），令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聊亘诸堡以立久驻必取之基。3月，阿术自白河率兵开始围樊城，筑城于鹿门山。宋荆湖都统制张世杰将兵拒之，战于赤滩浦（襄阳东南，汉江上），败绩。宋沿江制置鄙使夏贵，率师再援襄阳，乘春水涨，轻舟载粮至襄阳城下，惧蒙古军掩袭，仅能与守将吕文焕交语而还。及秋7月大霖雨，汉水溢，夏贵分遗舟师出没于东岸林谷间。阿术谓诸将曰：“此虚形也!不可与战，宜整舟师，以备新拔（蒙古围襄阳，筑十城。此其一在襄阳东南十里）”。明日夏贵果趋新城。军至虎尾州（襄阳县南），为蒙古万户解汝楫等舟师所败，士卒溺汉水死者甚众，战舰五十艘皆没。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贾似道之婿）复以舟师援贵，进至灌予滩（今襄阳县鹿门山南，汉江西岸），亦为阿术所败，文虎以轻舟遁去。（上引见续通鉴卷百七十九）

12月，知鄂州吕文德以忧卒。文德以许蒙古置榷场为恨，每曰：“误国家者我也!”因疽发背，致仕，是月卒。（同上书）

二、蒙军断襄樊粮道

威淳六年（一二七○）正月，宋以两淮制置大使兼知扬州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樊。时夏贵范文虎相继大败，恐李庭芝成功。范文虎依贾似道为内援，书似道曰：“吾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愿无使听命于京阃，事成则功归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由朝廷直接指挥。庭芝屡约进兵，文虎但与妓妾嬖幸宴饮为乐，以圣旨未至为辞。宋左丞相江万里屡请增兵援襄樊，贾似道不答，万里遂于是月求去？起居即王应麟亦以为言，贾似道欲逐之，应麟以忧去。2月，襄阳出步骑万

余人，兵船百余艘，攻蒙古万山堡（襄阳西北十里），为万户张宏范所败。8月，宋度宗问贾似道曰：“襄阳围已三年，奈何？”对曰：“北兵已退，陛下何由得此言？”帝曰：“适有女嫔言之。”似道诘其人，诬以他事赐死，由是边事虽日急，无敢言者。12月，张宏范（张柔之子）书于史天泽曰：“今规取襄阳，周于围而缓于攻者，计待其自毙也!然夏贵乘江涨，送衣粮入城，我无御之者，而江陵归峡，行旅休卒，道出襄阳，南北相继电。宁有自毙之时乎？若筑万山，以断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则庶几毙之之道也。”史天泽从之，遂筑城于万山，徙张宏范军于鹿门。自是襄樊道绝，而粮不继矣!（续通鉴卷百七十九）

三、宋军两度援襄失败

范文虎赴援：是年（一二七○）10月，宋廷诏范文虎（贾似道之壻）总中外诸军救襄樊。明年（一二七一）4月25日戊午，范文虎统率两淮诸军赴援，与阿术等战于湍滩（在襄阳南）军败，统制宋胜等百余人，为蒙军所擒。5月，元世祖忽必烈诏东道兵围襄阳，西道宜进兵以牵制之（淮东方面，因宋水军绝对优势，故未发动）。于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恩丁率诸将水陆并进；郑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庆，北剌不花出泸州，所至顺流纵栰，断浮桥，获将卒战舰甚众。6月范文虎再将殿前司卫卒及两淮舟师十万，进至鹿门，时汉水溢，阿术夹江东西为阵，别令一军趋会舟滩（今襄阳县东南），犯其前锋，诸将顺流鼓噪，文虎军逆战不利，弃旗鼓钟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军，获战舰甲仗不可胜计。7月，襄阳遣将米兴国，攻蒙军百丈水蓄，为阿术所败，进至湍滩，杀伤宋军二千余人。

李庭芝赴援：至元九年3月，元将（去年11月改蒙古国号曰大元）阿术刘整，攻破樊城外郭，守将犹守内城，阿术等增筑重围以困之。5月，襄阳被围已五年，援兵不得至，吕文焕竭力拒守，幸城中稍有积栗，所乏者盐薪布帛耳，张汉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置蜡书于髻，隐积草下，浮水而出。谓鹿门既筑，势须自荆郢救援，至溢口，元守卒见积草，多钩致，欲为焚爨之用，泅者遂被获。于是荆郢之路亦绝。至是宋廷诏荆湖制置使李庭芝移屯郢州、（今钟祥），将帅悉驻新郢（郢州汉南岸）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侦知襄阳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出均房，即其地造轻舟百艘，以三舟联为一舫，一舟装敏，左右两舟则虚其庄而掩覆之；出重实募死士，得襄邓山西民兵之骁悍善战者三千人，又求得民兵部辖张顺张贵二人俱智勇，素为诸将所服，使为都统，号张贵曰矮张，张顺曰竹围张。

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辈或非本心，宜亟出，毋败吾事”。人人感奋。是时汉水方涨，乘顺流发舟百艘，稍进团山下，又进高头港口，结方阵，各船置火枪火炮炽炭。巨斧劲弩，夜漏下三刻起碇出江，以红灯为号，贵先登，顺殿之，乘风破浪，迳犯重围，至磨洪滩，元兵布舟蔽江，无隙可入，顺等乘锐断铁絙攒栰数亘，转战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锋。黎明抵襄阳城下，城中久援绝，闻顺等至，勇气百倍，及收军独失顺。越数日，有浮户逆流而上，被甲胄、执弓矢，直抵

浮梁，视之顺也。身中四枪六箭。张贵入襄阳，吕文焕固留共守。

贵恃其骁勇。欲还郢，乃募得死士二人，能伏水中，数日不食。持蜡书赴郢，求援于花文虎，时元兵增守益密，水路连镇数十里、列撒星椿，虽鱼虾不能过，二人遇椿即锯断之，竟达郢还报。范文虎许发兵五千驻龙尾州（今襄阳东南汉江中）以助夹击。刻日既定，9月初9日甲子，贵乃别文焕东下，点视所部军，洎登舟，帐前一人亡去，乃有过被挞者。贵惊曰：“吾事泄矣!亟行，或彼未即知”。复不能衔枚隐迹，乃举炮鼓噪发舟，乘夜顺流断絙，破围冒进二元兵皆辟易，既出险地，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术刘整分率战舰邀击，贵以死拒战，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烛天如白画，至勿林滩，渐近龙尾洲，遥望军船旗帜后撤，贵以为郢兵来会，喜躍而进，举流星火示之，军船见火即前迎，及势近欲合，则来舟元军也，盖郢兵前2日以风水惊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军得逃卒之报，先据龙尾州，以逸待劳，贵力困，且出不意，与之战，所部杀伤殆尽，贵身被数十创，力不能支，遂被执，阿术欲降之，贵誓不屈，乃见杀二兀令降卒四人，畀贵尸至襄阳城下曰：“识矮张都统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丧气，文焕斩四卒，以贵附葬顺冢，立双庙祀之。（续通鉴卷一七九、一八○）

四、襄阳陷落

宋度宗威淳八年（元至元九年，一二七二）11月，元将阿里海牙奏予元世祖，书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宜先攻樊城，断其声援。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忽必烈以为然。会回回创作亘石炮来献，用力省而所声甚远，命遥襄阳军前用之。

是月，刘整又筑新门子鹿头山（似即鹿门山，在襄阳东三十里，樊城郊外），使千户随世昌总其役。樊城出兵来争。世昌且拒且筑，不终夜而就。整授军二百，令世昌立炮帘于樊城拦马墙外。夜大雪，城中矢石如雨，元军校多死伤。达旦，而炮帘立。宋军列舰江上。世昌乘凰纵火，侥其船。樊城出兵盅战扩马桥下，世昌奋战，击退之。此为迫攻樊城之战也。

明年（一二七三）正月，樊城守将范天顺（文虎之侄）及部将牛富已被围四年，力战不屈，牛富常射书襄阳城中，期吕文焕相与固守，互为唇齿。初文焕守襄樊，汉水相隔，文焕置一大木江中，缫以铁桓，下造浮桥，以通援兵，樊亦恃此为固。元将阿里海矛得西域圆回阿剌卜丹，伊斯玛因等制造火炮，乃以之攻樊城，破其外郭，张宏范为流矢中其肘，束创谓阿术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陆攻樊，则襄出舟师来救，终不可取，若截江道，断援兵，水陆夹攻，则樊破而襄亦下矣!”元水军总管张禧曰：“断镇毁木，樊城必下。”阿术从之!以机锯断木，以斧断絙，燔其桥，襄兵不能敦，乃以兵截江而去，锐师薄樊城，是月11日乙丑，城遂破。天顺仰天叹曰：“生为宋臣，死焉宋鬼”，即所守地缢死。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战，元兵伤者甚众，渴饮血水，转战而进，遇民居烧绝街道，牛富身被重伤，以头触柱赴火死。裨将王福亦绝之。（上

引见续通鉴卷百八十）

襄阳至此，亦以久困援绝，撤屋为薪。文焕每一巡城，南望痛哭而后下，是年2月阿里海牙率总管唆都等移攻樊之攻具以向襄阳，一炮中其谯楼，声扣雷震，城中汹汹，诸将乡喻域出降，初刘整常跃马独前与文焕语，为文焕伏绎所中，幸甲坚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执文焕以快意。阿里海牙不可，乃亲至城下，宣元主招降诏曰："尔等拒守孤城，予今五年，宣力于主，固其宜也。然势穷援绝，如数万生灵何？若能纳款，悉赦无罪，且加迁擢。"文焕狐疑未决。阿里海牙因折矢与之盟，文焕乃出降。忽必烈以文焕降，命如诏迁擢，授襄阳大都督，赐其将校有差。（上引见多桑蒙古史，三卷二章）

第四节元军人举南征——鄂州、丁家洲、江陵之战

一、襄樊突破后宋军战线态势

襄樊已失，宋廷大震!给事中陈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京湖制置使汪立信则言，上流吏民皆以襄樊之失，痛哭流涕；谓其祸源，皆由范文虎及俞与父子。文虎以三卫长，闻难怯战。俞兴奴隶庸材，激叛刘整。因降文虎一官，逻单知安庆府，以张世杰督诸军代守郢州。俞兴子大患除名，循州拘管。于是重新部署江汉、江淮军事。遂于是年11月，仍调返李庭芝为淮东制置使袭知扬州，夏贵为淮西制置使兼知庐州，陈突为沿江制置使兼知黄州。

明年（宋威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7月，宋度宗崩。贾似道入宫议所立。众以度宗长子建国公是是当立。似道主立嫡子嘉国公悬，时年方四岁，似道利其幼，以便专权也。显遂立，谢太后临朝称制。度宗为太子时，以好色闻。既为帝遂耽于酒色，崩年五十三。君耽于逸乐，权臣贾似道欺君罔上，宋廷由是不振，外寇莫之能御矣。

是月，汪立信移书贸似道，略谓："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为今日之计老，其策有三：宜尽出内郡之兵予江干，以实外御。算兵帐，见（现）兵可七十余万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为选兵五十余万。而沿江之守，则不过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有总督；其尤要害处，辄参倍其兵。无事则泛舟长淮，往来游徼；有事则东西齐奋，战守并用。刁斗相闻，既饷不绝，互相应援，以为联络之固。选宗室大臣忠良有干用者，立为统制。分东西两府，以莅任得其人，率然之势，此上策也。久拘聘使，无益于我，徒使敌得以为辞。请礼而归之，许岁币，以缓师期。不二三年，边运稍休，藩篱称固，生兵日增，可战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则天败我也。街壁与衬之礼（古投降礼），请备以侠。"似道得书大怒，遂罢立信，而以朱禩孙为京湖四川宣抚使兼知江凌府。（续通鉴卷百八十）

当时宋元战争双方相对峙之战线，如下：

一、膠东方面：宋水军活跃子胶州湾青岛等水面，与元之胶州（今山东膠县）对峙。

二、准东方面：宋据扬州为总策源。前线东自海州（今江苏东海），涟州（今涟水县），淮安，至于盱眙之线。

三、淮西方面：宋以庐州（今合肥）为总策源，前线兖自五河口（今安徽五河县南），濠州（今凤阳东北）、寿春（今寿县）、霍邱、固始（光州，今汉川县已陷于元）、大别山北麓、信阳之线。

四、江汉方面：以辽陵为总策源。东自汉阳，经复州（今沔阳），郢州（今钟祥）、均（今均县）、金（今安康）之线。

五、川蜀方面：以夔州（今奉节县），重庆府为策源。前线北自阑（今闽中县东）、蓬（今营山县西）、合（今合川县东、泸（今县）、叙（今宜宾）、嘉定（今乐山）、成都（咸淳八年，至元九年，公元1272，12月，收复）之线。

全线与元军所据之战线，犬矛相错。宋沿江战略要点，则为建康（今南京市）、镇江、太平州（当涂）、安庆、江州（九江）、黄州、鄂州等地。

二、襄樊突破后元廷乘势大举南征

元征南都元帅阿术，既取襄樊，郎奉命东略淮东。盖元廷以取得江北之地，如约划江为界为满足，是时忽必烈方有事予北方，讨诸扳王，尚无渡江之计也。

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正月，阿里海牙上言于忽必烈，谓："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阿术亦言："臣略地江淮，见宋兵弱于往昔。今不取之，时不能再，"刘整亦言："襄阳破，则临安摇矣，若以水军乘胜长驱，则大江必非宋有。"元主趣召史天泽同议。天泽赞南征之谋，并推荐安童、伯颜可为大将，都督诸军，可成事功。阿里海牙复言，大举南征，必分三路，旧军不足，非增兵十万不可。遂诏中书省签军十万以益之。（上引见续通鉴卷百八十）

元主南征决策已定，乃予是年3月，改荆湖淮西枢密院为行中君省，伯颜、史天泽（天泽至鄂，病笃，召还）

并为右丞相？阿术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行省事予荆湖。合答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塔出、董文炳并参知政事，行省事于淮西。兵共二十万南征。于是下诏其诸将曰："爰自太祖皇帝以来，与宋使介交通。宪宗之世，朕以藩职奉命南伐，彼贾似道复遣宋京诣我，请罢兵息民。朕即位之后，追亿是言，命郝经等奉书住聘，盖为生灵计也。而乃执之，以致师出连年，死伤相藉，系累相属，

皆彼宋室自祸其民也。襄阳既降之后，冀宋悔祸，或起令图，而乃执迷，无有悛心，所以问罪之师，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陆并进，布告遐迩，使咸知之，无辜之民，初无与焉。将士勿得妄加杀掠，有去逆效顺，别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其或固拒不从，及逆敌者，俘戳何疑!”（上引见多桑蒙古史，三卷二章）

8月，史天泽又言：“今大师方兴，荆湖淮西，各置行省，势位即不相下，号令必不能一，后当败事。”忽必烈从之，复改淮西行中书省焉行枢密院。天泽又以病，表请专任伯颜。乃以伯颜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诸路并听节制，伯颜，八邻部人，阔阔出之子，随军宗王旭烈兀西征波斯。因还奏事，元主留之，自右丞进左相，遂为南征元帅焉。

时元四川总帅汪惟正亦上言，谓“蜀未下者效城耳。宜併力攻临安。根本已拔，此将焉往？愿以本兵由嘉陵江下夔、峡，与伯颜会钱塘。”兀主以四川事重，勉之，盖留以牵制宋上流之兵也。

元中害省又言，“江汉未下之州，请令吕文焕率其麾下临城谕之。舍彼知我善遇降将，亦策之善者也。”元主于从之，（上引见续通鉴卷百八十）

三、邓州战斗

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9月，伯颜分军三道并进，自率主力军由襄阳沿汉水取郢州，初以吕文焕、刘整为向导。旋别命整自淮西出淮南，博罗惧由东道取扬州，监淮东兵。淮东西皆采牵制攻势，使宋在淮东淮西方面之兵，不得转用其他方面（川蜀方面亦然）。

是月13日丙戌，伯颜自与阿术由襄阳入汉渡江，以吕文焕将舟师为前锋。当伯颜主力军自襄阳南下时，又分为三道而进：唆都将一军由枣阳哨司空山（今南漳县西北与郧阳府—今郧县—接界），翟招讨将一军，由老鸦山（今南漳县南山最险隘）徇荆南，以牵制江陵方面之宋军。自与阿术率阿剌罕、张宏范诸军，水陆并进趋攻郢州，旌旗廷袤，前后数百里。

陆路军前锋万户武秀，在前进中遇水泊，霖雨水温，无舟不能涉。伯颜曰：“吾且飞渡大江，而惮此潢潦耶？”使一壮士骑而前导，遂麾诸军毕渡二一10日癸巳，军次盐山，距郢州二十里。宋大将张世杰严兵以拒之。郢在汉水北岸，以石为城，新郢州在汉水南岸，横铁桓锁战舰。密植椿水中，夹以炮弩。凡要津皆施枞设攻具。元军袭城，世杰力战，无军不得前。遣人招世杰，不应。阿术获俘民言，沿汉九郡精锐，皆集于二郢，若舟师出其闻，骑兵不能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下流黄家湾堡（钟祥县南），堡西有沟，南通藤湖（荆门县东南），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转而下汉，仅三里。吕文焕亦以为便。诸将则以为郢为咽喉之地，不取恐为归途患。伯颜采前者之议，遗总管李庭、刘国杰即攻黄家

堡，拔之。诸军遂破竹席地荡舟，由藤湖入汉。伯颜、阿术殿后而下，所率不满百骑。宋副都统赵文义帅精骑二千追之。伯颜、阿术还军迎击之于泉子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在钟祥县东，似不确。应在钟祥县南），文义力战而败，伯颜擒而杀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余众皆溃。10月23日乙丑，元军进至沙洋（今镇）遣俘持黄榜檄文入城招降，守将王虎臣、王大用斩俘焚榜，婴城拒之，伯颜后命吕文焕至城下招之，亦不应。24日丙寅，日暮风大起。伯颜命颐风掣金汁炮，焚其庐舍，烟焰张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余悉屠之。进薄新城（吕文焕部将边居谊在沙洋所筑之新城），都统制边居谊力战，文焕列沙洋所馘子城下，传虎臣等至，使招降，居谊不答。明日又至，居谊曰：“吾欲与吕参政语耳。”文焕以为降己，驰马至，伏弩乱发：文焕人马俱中箭，马仆，几为城内钩得之，赖众救得免。文焕攻城，居谊以火具却之。27月己已，元总管李庭攻破外堡，诸军蚁附而上。居谊自度力不能支，赴火死，毕家自焚。所部三千人，皆力战死之。

11月，伯头军逼复州（今沔阳县），宋知州翟贵以城降。诸将请点视仓库军籍，伯颜不听，谕诸将不得入城，违者以军法论，盖以奖励降者也。

当复州降时，阿术已先急驰至于蔡店（今汉阳县西六十里），命阿里海牙来请渡江之期，伯颜不答。明日又来，又不答。阿术乃自来，伯颜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余人知之乎!”阿术潜刻期而去。是月23日乙未，伯颜至蔡店大会诸将，准备渡江。25日丁酉住视汉口形势。时宋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汉鄂舟师万艘，分据要害；都统制王达守阳逻堡（今汉口市东）；京湖宣抚使朱禩孙以游击军扼中流。元军不得进。阿术部将马福言：“自渝河口（今孝感县东南）穿湖中，可从阳逻堡西沙芜口（今黄坡县南，上通武湖，下达大江）入江。”伯颜遣人觇沙芜口，亦已为夏贵精兵所扼守。乃进围汉阳，声言取汉口（宋在汉口筑有城堡，以街鄂州）渡江。贵果移兵援汉阳。12月初四日丙午，伯颜乘闪遣阿剌罕将奇兵倍道袭沙芜口，夺之。初9日辛亥，遂自汉口开坝引船入沦河，转沙芜口以达江。初10日壬子，战舰万计，相踵而至。以数千艘泊沦河湾口。屯布蒙汉军数十万骑于江北。11日癸丑，伯颜遣人招谕阳逻堡，守将王达等拒之。乃麾诸将以白鹞于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颜因密谋于阿术曰：“彼谓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坚，攻之徒劳。汝今夜以铁骑三千。汎舟直趋上流为捣虚之计，明日渡江袭南岸，已过则急遣人报我。”阿术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军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矶下（今武昌县东北二十五里大江演），伺隙而动，可以如志。”伯颜没于13日乙卯遣阿里海矛督万户张云范等进薄阳逻堡。

夏贵夜率众来援，阿术即以昏时率四翼军溯流四十里，至青山矶。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术遥见南岸多露沙洲，即发舟指挥诸将，令径渡，载马后随。万户史格一军先渡，为荆鄂都统程鹏飞所败，格中三创，丧师三百。阿术引兵继之，大战于中流，格中流矢，战益力，鹏飞军却，阿术遂登沙洲，攀峰步斗，散而复合者数四，出马于岸力战，追至鄂东门，鹏飞被七创而走，阿术获其船千余艘，遂起浮桥，列成而

渡。然后遣人还报。伯颜大喜，挥诸军急攻阳逻堡。夏贵闻阿术渡江，大惊，引笔下三百艘，先遁，沿流东下，纵火焚西南岸，大掠还庐州。阳逻堡守军王达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军统制刘戍，皆战死二兀诸将请追贵，伯颜曰："阳逻之捷，吾将遣使往告来人，今卖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与阿术军会。元诸将议师所向，或欲先取蕲黄，阿术曰："若赴下流，退无所据，上取鄂汉，虽迟旬日，可以万全。"遂趋鄂州。17日已未焚战舰三千艘，炳焰涨天，城中大恐，时朱禩孙帅师援鄂，道闻阳逻堡已失，夜奔远江陵。18日庚申，知汉阳军王仪以城降元。鄂恃汉阳为蔽，及禩孙已遁，汉阳复失，鄂势遂孤。吕文焕列兵城下曰："汝国恃者，江淮而已。今大军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辈不降何待？"权守张宴然与都统程鹏飞度不能守，遂以州降。因檄下信阳诸郡，以鹏飞为京湖宣抚使，撤宋守兵分隶诸将，取寿昌（今鄂城县）粮四十万斛，以充军饷。是月28日庚午，伯颜又命鹏飞至黄州，招降陈奕。奕使人过江求名爵，伯颜许之，以为沿江大都督。又以书招宋知蕲州管景模，景模拒之。明年（宋帝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正月初1日癸酉，元兵遂入黄州以攻蕲州，景换乃以城降。是月贾似道召提举江州（今江西九江）兴国宫吕师变（文德子）为都督府（似道开督府见下）参赞，任中流调遣。师夔拒命，即于是日13日乙酉，与知州钱真孙，遣使至蕲州降元。元军遂顺流入江州。20日壬辰，知安庆军范文虎亦以城降。（上引见续通鉴卷百八十）

宋洽江州郡已望风而降（皆原是邑文焕兄弟旧部曲之故），于是元军乃下江淮，以取宋都临安。

四、江淮之战

贾似道出师：鄂州既破，宋廷大惧，群臣上疏以为非师相（贾似道）亲出不可，乃于是年12月诏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似道不得已，始开都督府于临安。以孙虎臣总统诸军，以黄万石等参赞军事，所辟官属，皆先命后奏。

发国库金十万两，银五十万两，阻子一千万贯，充都督府公用。王侯邱第，皆输助军钱穀。且霰释道租税，收之以备军用。盖宋府库匮乏故也。并认天下州郡发兵勤王，明年（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年十二年、公元1275）正月，贾似道上表出师，抽诸路精兵十三万以行，装载金帛辎重之舟，舶耪相街，百有余里。命宰执小事寡决，大事则阻白督府，不得寡行。以亲信韩震为殿帅，总禁军，出屯安吉州（即湖州，今浙江吴与县），然后自率大军由新安（今安徽歙县）池口（今贵池县西北）以进，决于芜湖。遣人使知江州吕师夔与元议和，盖此时尚未知江州降元也。

2月，知庐州夏贵引兵会似道于江上。袖中出一书，示似道曰："宋历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初2日癸卯，似道以汪立信为江淮招讨使，使就建康府库募兵，以接江上诸郡。似道又遣元俘曾安抚还报伯颜，且以荔枝黄柑遣赠，后遣使宋京如元军，请称臣奉岁币，如前鄂州

之约。阿术谓伯颜曰："宋人无信，当进军，若避似这不击，恐已降州郡，今夏难守"，伯颜乃答书曰："未渡江时，议和入贡则可，今沿江州郡已降，欲和当来面议"。

似道不答。和议遂绝。（上引见多桑蒙古史，三卷二章）

已而元军攻池州，知州王起宗遁走，都统张林开城降。

丁家洲会战：贾似道以池州已陷，乃以精锐七万余人尽属孙虎臣，军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今安徽铜陵县东北）。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似道自将后军军鲁港（鲁港在芜湖西南长江南岸），以拒元军之东下。

伯颜自池州分步骑夹岸而进，麾战舰合势冲孙虎臣军。阿术与虎臣方对阵，伯颜命举巨炮击虎臣中坚，阿术以划船数千艘，乘风疾进，呼声动天地。虎臣先锋将姜才方接战，虎臣远过其妾所乘舟。众见之，噪曰："步帅遁矣!"军遂乱。夏贵不战而走，以扁舟掠过似道船，呼曰："彼众我寡，势不支矣!"似道闻之，错愕失措，遂鸣征收军。舳艫簸动，乍分乍合。阿术与镇抚何璋、李庚等，以小旗麾将校左右夹击之，杀溺死者不可胜数，水为之赤，军资器械靐为元军所获。似道是夜退驻珠金沙（今繁昌西北五十里），召贵计事，顷之虎臣亦至。似道抚膺哭曰："吾兵无一人用命者。"因问计将安出？贵曰："诸军已胆落，吾何以战!师相惟有入扬州招溃兵，迎驾海上，吾当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与虎臣单舰奔还扬州。明日溃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扬旗招抚，皆不应，至有以恶语缦骂者。24日乙丑，似道至扬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驾，上书请迁都。太皇太后不许，乃止。

江淮招讨使汪立信在建康（今南京），闻贾似道师溃，伯颜军迫，乃自杀。宋沿江制置大使建康行宫留守赵僭弃城南走，都统徐王荣、翁福等遂以城降。于是，太平（今当涂）、和州（今县）、无为军，及兴国府（今宣城）、与隆府（南昌）守臣，皆或遁或降。（上引见多桑蒙古史，三卷二章续通鉴卷百八十一）

时蒙古信使郝经街留仪真，忽必烈复使经为行移密院都事，弟郝庸来问拘使者之罪。贾似道震恐，乃遣人送经及其随使诸人归还于元。是月29日庚午，贾似道遂被黜。

五、元军荆湖扩张战果

伯颜与阿术率主力军自黄、靳二州颖流东下之后，宋德祐元年（一二七五）正月20日壬辰，元宣抚使签书行中书省事贾居贞谓阿里海牙（伯颜留二人守鄂州见前）曰："江陵乃宋制关（朝廷所命之方面军）重兵所屯。闻其诸将不睦（朱禩孙先为京湖四川宣抚使兼知江陵府。禩孙敦鄂失败，宋廷乃去其兼职，而以高达为湖北制置副使，知江陵府）。迁徙之民盈城，复皆疾疫。刍薪乏缺，杜门不敢樵采。当乘隙取之。"阿里海矛以为然。2月，阿里海牙请于元主曰："江陵，宋之巨镇，地居大

江上流，屯精兵不啻数十万。若非乘此破竹之势取之，江水泛滥，鄂汉之城亦恐难守。”元主从其请，乃夏书遣使招降。3月，阿里海牙留贾居贞守鄂州。自率元军溯江而上。是月21日壬辰，阿里海牙攻岳州（今湖南岳阳）。宋湖南安抚使高世杰，会郢（张世杰军）、复、岳三州，及上流诸军，战船数千艘，扼荆江口（今岳阳东北）以拒之。阿里海牙督诸翼水军屯东岸，高世杰乘夜退阵于洞庭湖中。阿里海牙分避击之，世杰败走，方屈乃降。阿里海牙斩之。岳州总制孟之绍（一作子缙）举城降。

阿里海牙乘胜攻江陵，高达迎战屡败。四月初5日丙午，元军攻陷沙市城（今镇），屠之。初7日戊申，朱禩孙与高达等遥以江陵降。阿里海牙入城，命禩孙檄所部州郡归附，于是蹄、峡（宜昌）、郢、役、随、荆门、均、房、施、鼎（常德）、澧、辰、沅、靖、等诸州军，相继皆降。

元主得阿里海牙捷报，谓近臣曰：“伯颜东下，阿里海牙孤军守鄂，朕常忧之。今荆南定，吾东兵可无后患矣。”乃亲作手诏褒之。又授高达参知政事（禩孙至上都死）。阿里海牙以江陵地图上奏，请命海牙开大府以镇江陵。元主急召廉希宪于北京，使为行省事以镇之。希宪录旧官，禁剽夺，与学垦田，民情大悦。

第五节江淮战役及临安外围攻防战——宋亡

一、扬州、焦山战役

伯颜先攻江淮；宋德祐元年（一二七五）3月初2日癸酉，伯颜入建康。时江东大疫，居民乏食。伯颜开仓赈之，遣医治疾，宋民大悦。

伯颜报捷。元主诏伯颜，谓以时方暑，不利行师，命俟秋再举。伯颜奏曰：“宋人保据江海，若虎负蜗。今已扼其吭，稍从即逸。”元主曰：“将在军，不从中制，兵法也。”（此时忽必烈已赞孙子兵法）。遂诏伯颜以行中书省驻建康。于是伯颜分兵四出，一以略定周围要地以固建康，一以准备进攻临安。命阿术渡江趋扬州，与博罗欢、塔出绝宋淮南之援。分兵略银江、常州（今武进）、无锡、平江府（今吴县）、金坛、广德军皆降（当涂、宣城等城降元，说见前）（续通鉴卷百八十一、蒙兀儿史记卷九十）

是月30日辛丑，阿术分兵取扬州。宋知滁州（今滁县）王虎臣以城降。4月21日壬戌，阿术渡江攻真州（今仪徵），宋知州苗再成率兵迎战于老鹳嘴，大败。29日庚午，阿术乘胜趋扬州。先是宋淮东制置使李庭芝统量兵守扬州，元兵东下，所过皆阵，庭芝率励所部固守。及阿术遣使招降，庭芝杀之。至是阿术来攻扬州，庭芝遣都统姜才为三叠阵，拒之于三里沟，击败之。阿术佯退，姜才逐之。阿术还战至扬子桥（江都县南江演津要），两军夹水而阵。元将张弘范率十三骄渡水来攻。才军坚不可动。弘范引却以诱之。才将来追，弘范还战斩之。阿术与弘范乘势街击。才军遂溃，自相蹂踏与陷濠水死者甚聚。才为流矢所中，遂入城死守。阿术筑长围以困之，自扬子桥经瓜州（皆在江都南江演），东北跨渗头（今江都东北仙女庙附近），至黄塘，西北抵丁村务（江都西北）欲久困之。

焦山食战：当常州、平江、东海州（今东海县东北十九里原在海中）、西海州（今东海县）为元所攻而降敌之时（德祐元年3月11日壬午至14日乙酉间），宋廷因诏诸叛将吕文焕、陈奕、范文虎等，使通知于元以求息兵不得（是年3月初四日乙亥），乃决心抗拒。诏张世桀（原守郢州，是年2月将兵入援，攻复饶州，遂至临安）总都督府诸军分道拒敌。世桀建阎顺、李存二将进军广德，谢洪水进军平江，李山进军常州。是日（3月15日丙戌）遂克复广德军（是时宋趣五郡银抚使吕文福——文德兄，屯卢州——将兵入援。文辐杀使者，叛入江州），4月十9日庚申，克复金坛及宁国。5月初7日丁丑环卫官刘师勇，又克复常州（初三日癸酉，复失宁国）。

是月，会元有海都之患，元主忽必烈急召伯颜北还大都（今北平），以拒讨之。暂以万户阿剌罕代伯颜权行中书省事。此时阿术方围扬州。李庭芝在扬州，见张世杰各路反攻，颇有进展，且世杰亲率舟师万余艘，进至镇江江面。乃即命扬州都统姜才等亦乘势反攻。6月27日

丙寅，姜才与副将张林，宁步骑二万乘夜攻元军扬子桥木栅。守栅万户史弼，告急于阿术。阿术率总管管如德等，自瓜洲（江都县南江边）将兵赴援，诘且至于栅下。才军夹水为阵。阿术挥骑兵渡水夹击，阵坚不可动。阿术引却。才进逼之，战不利而走。阿术挥步骑乘之，遂大破才军。

张林被擒，士卒死者万余人。

7月初2日辛未，张世杰与刘师勇，孙虎臣等，大出舟师万余艘，次于焦山（镇江东北，江中），令以十舟为方阵，碇江中流，非有号令，毋得发碇，准备与阿术决战。阿术登石公山（今丹徒县东北，与焦山对峙）望之，曰："可烧而走也。"遂遣健卒善彀者千人，载以巨舰，分两翼夹射之。阿术居中，合势进攻，继以火矢。蓬樯俱焚，烟焰蔽江。宋诸军已碇舟死战，至是欲走不能，前军争赴江死。元将张弘范、董文炳、刘国杰复以锐卒横街。世杰不复能军，而奔阔山（今丹徒县东北，山在江滨）。阿术弘范追之，掳黄白鹞船七百余艘。师勇还常州。虎臣还真州。世杰请济师，不答。

张世杰焦山之战失败后，宋平章军国重事王爚弹奏左丞相兼枢密使诸督诸路军马陈宜中擅权专决致败。又谓"6月出师，诸将无统。""世杰以诸将心力不一而败。"又谓"张世杰步兵而用之于水，刘师勇水兵而用之于步，指授失宜，以致败事。"云云。（上引见续通鉴卷百八十一）

二、元攻临安、宋亡

伯颜自上都南下：元将伯颜入建康之后，宋廷君臣以敌骄已逼都郊，乃急急准备临安之保卫战。于是命浙西提刑司准备差遣刘经戍吴江（即吴淞江）。两浙转运司准备差遣罗林贝浙江安抚司参议官张濡戍独松关（今浙江安吉县东南四十五里）。山阴县丞徐垓与正将郁天兴戍四安镇（今长兴县西南七里）。太府寺丞赵淮戍银林东坝（今江苏高淳县东）。

宋德祐元年夏秋间，元朝海都之患已息。伯颜在上都乃向元主忽必烈面陈形势，乞复进兵攻宋。元主遂拜伯颜为右丞相。伯颜以阿术功多，自请居后，乃进阿术左丞相。仍诏伯颜进兵直趣临安。于是伯颜命阿术仍攻淮南，阿里海牙攻潭州（今长沙）取湖南，万户宋都触与武秀、荣宝、李恒、吕师夔等取江西。忽必烈并授伯颜灭宋后之方针曰："宋君相率来附，则赵氏族属，可保无虞，宗庙悉许如故。"（上引见续通鉴卷百八十一）

常州、平江争夺战：宋虽经焦山水战之败，仍极力固守常州及平江，以阻元军之渡江南下。是年（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8月12日庚戌，刘师勇又攻复吕城（今丹阳县东五十里），于是常州益固。是月末，又命文天祥知平江府。旋又命天祥为都督府参赞官，总三路兵，仍知平江。

天祥，江西吉水县人。宋帝淳祐四年（一二五六）进士。至德祐元年2月，贾似道已败于丁家洲，宋廷出天祥为江西安抚副使知赣州。及奉勤王诏，乃发郡豪杰，及结溪峒山蛮万余入街。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使满前。至是痛自抑损，尽以家货为军费。8月二16月甲子，天祥至临安，上疏请建藩辅曰：

本朝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都邑。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寝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破，中原陆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内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南，而建阃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板于隆兴（南昌）；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阃于番阳（今江西鄱阳县）；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阃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地大力众，乃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无退，日夜以图之。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却也。朝议以为迂阔，不报。使知平江府，与刘师勇在常州共同拒敌。（上引见续通鉴卷百八十二）

元军三路攻临安；9月，元兵攻破泰州（今江苏泰县），守将孙虎臣自杀。是时宋扬州都统姜才将步骑万五千人，攻元湾头堡（濒江之堡），为阿术所败。江南岸元军又攻陷吕域，遂攻常州。10月，伯颜次湾头。阿剌罕自建康会之，伯颜令复还建康进兵。遂留孛鲁花、阿里伯守湾头。阿术仍攻扬州。而自帅大军渡江，是月25日壬戌，至于镇江。并郎分军三道进政：

阿剌罕为右军，自建康出广德、四安镇（今广德东，与长兴县接界，郎今泗安镇）。趋独松开。

董文炳、姜街帅左军，出江入海。以花文虎为前导，以道江阴，趋澉浦（今浙江海县南）、华亭伯颜及阿塔海将中军，以吕文焕为向导，趋常州。

三路大军约期会于临安。

是月26日癸亥，元军攻常州正急。宋廷遣将张全将兵二千救之。文天祥亦自平江遗部将尹玉、麻士龙、朱华等将三千人赴援。士龙战虞桥先死，玉战五牧（今武进东南），经鏖战之后，亦死之。朱华率广军在五牧继续拒战。及晚，元军边出山后，攻赣军。尹玉力战。张全隔岸不战，尹玉遂败，被擒杀。张全不战而退。天祥欲斩全以儆众。帅府不许，宥之使赎。

11月初1日丁卯，宋将攻溧水者，亦败死。是月12日戊寅，元右军阿剌罕军破银林东坝（今江苏高淳县东），戍将赵淮被擒。元军遂至护牙山（今安徽郎溪县东北），而趋广德军及四安镇。宋右丞相兼枢密使，仓皇发临安民年十五以上者为兵，号武定军。并召文天祥自平工入卫都城。是时湖南潭州，亦已被围。江西隆兴府已降元。

抚州（今临抚县）被攻中，扬州亦仍在被围中。

是月18日甲申，伯颜至常州招降刘师勇等，譬喻百端，终不听。伯颜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运土为垒，上至并人以筑之。且杀之煎油作礮，焚城守者牌杈，日夜力攻不息。又命其帐前诸军奋勇争先，四面并进。如此猛攻2日，城破。师勇仅以八骑走平江，其余诸将尽皆死节。伯颜命屠城。

23日己丑，元右军破独松开，守将张濡遁走。邻疆守者亦皆望风而走。于是宋廷大懼。时宋之勤王师约三四万在临安。文天祥与张世杰义，以淮东坚壁（扬州），闽广尚全。

若郎反攻，万一得捷，则淮师以截其后，国事尚有可为。世杰大喜。但陈宜中启太后降诏止之，遂不果。此时元右军独进深入，实予宋以各个击破之机会，世杰、天祥不得行其志，至为可惜。盖此时元中军始破常州，左军始陷汇阴军也。

12月初10日丙午，平江通割王矩之、都统制王邦杰以坟降。明日伯颜遂入平江。是时陈宜中一再遣使于伯颜，求称侄孙纳币请降。伯颜不许。求封为小国称臣，岁贡绢银二十五万两匹，并约伯颜于长安镇（浙江今镇）以议和。宋太皇太后所遣使工部侍郎柳岳，见伯颜于无锡，曾有如下泣请之言：“嗣君幼冲，在哀絰中。自古礼不伏丧。凡今日至此者，皆奸臣贾似道失信误国耳。”伯颜却曰：“汝国执戳我行人（宋德佑元年3月，元使者廉希贤、严忠范至独松开，守将张濡部曲杀忠范，执希贤送临安。旋希贤亦病创死），故我兴师。

钱氏纳土，李氏出降，皆汝国之法也。汝国得天下于小儿。亦失之于小儿，天道如此，尚何多言!”（上引见多桑蒙史三卷二章）

宋廷当乞哀求和之时，亦作南走闽广之准备。故于德佑二年（元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正月初5日辛未，嘉兴府诸关兵溃，知府刘汉杰降元。元右军亦围安吉州之时，于17日癸未，封吉王罡（度宗子，帝系之兄）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为广王判泉州。是时陈宜中又以元不许和，计无所出。乃率群臣入宫，请迁都。太皇太后不许。宜中泣请，乃许之。

俄而伯颜至长安镇，宜中违约不往议和。18日甲申，伯颜进次皋亭山（今杭县东北），阿剌罕、董文炳之师皆会之，游骑至于临安北关。于是张世杰、文天祥请三宫入海，而己帅众背城一战。宜中不许。白太皇太后遣监察御史扬应奎，上传国玺以降。降麦略云：悬眇焉幼冲，遭家多难。权姦贾似道背盟误国，至勤兴师问罪。谨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四川、两淮，见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

伏望圣慈垂念，不忍悬三百余年宗社，遽至陨绝，曲赐存全。（上引见续通鉴舰卷百八十二）伯颜受降，遣使召陈宜中出议降事。是夜宜中遁归温州。太皇太后乃以文天祥为右丞相，与左丞相吴坚使元军议

和。其后留文天祥，拘之北去。

时张世杰、刘师勇及苏刘义等，以朝廷不战而降，遂各率所部离去。次于定海（今县）。元遣使说降，世杰斩之。而师勇则旋郎以时不可为，忧愤纵酒而卒。

2月初，伯颜承制，以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命忙古带、范文虎入城治都督事。又令程鹏飞取太皇太后手诏，及三省枢密院吴坚、贾余庆等檄，谕州郡降附。又令张惠、阿剌罕、董文炳、张弘范、唆都等，封府库，收史馆秘省图书，及百司符印告敕。能宋官府及侍卫军。

3月初，伯颜入临安城，建大将旗鼓，率左右翼万户巡视，登狮子峯，观临安形势，部署诸将。遣管如德招谕诸郡。然后伯颜承制留阿剌罕，董文炳经略闽浙，忙古带镇断西，唆都镇浙东，自取宋全太后及宋帝㬎北还。闰3月，伯颜与宋后、帝等至瓜洲，李庭芝与姜才出兵欲截夺之，不果。帝至大都，元主善待之，封瀛国公，全太后、太皇太后谢氏，并封郡夫人。

三、元追击益、广二王

二王南逃：宋驸马都尉杨镇等，乘太皇太后遣使与伯颜议和、朝廷混乱之际，奉益王昰、广王昺秀王与择、及扬淑妃选出临安，欲走婺州（今金华）。当彼等自嘉会门出，渡钱塘江而南时，伯颜闻之，郎遣范文虎将兵追之。杨镇得报即还曰："我将死于彼，以缓追兵。"遂被执。杨亮节等负二王及杨淑妃，徒步走匿山中凡7日。统制张全率兵数十人亦之，乃同走温州（今永嘉县）。宗正少卿陆秀夫、苏刘义亦追及于道。及至温州，遣人召陈宜中于温州清澳，召张世杰于定海，皆至。于是遂于是年闰3月，共奉盆王昊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昺副之。以秀王与择为福建察访使，先往闽中抚吏民，檄召诸路忠义，同奖王室。寻二王遂入闽。（续通鉴卷六八十二）

时宋降臣黄万石（原为江西制置使，德佑元年12月降元），从当为福建漕使，欲取全闽以为已功。汀、建诸州，方谋从万石输诚。闻二王至，后闭门以拒万石。南歙（今福建南平）守臣林起鳌遣军逐之，万石败走，其将士乡有来归者。于是二王兵势稍振。宜中等遂傅檄嵌淮，言夏贵（淮西制置使，是时犹守庐州。李庭乏狭守杨州）已复濒江州郡为号召。是年5月初，益王遂即位于祖州是为端宗。遥上尊帝尊号为孝恭懿圣皇帝。尊度宗淑妃扬氏为皇太妃，同听政。改元景炎。升福州为福安府，以王刚中知福安。改封广王为卫王。以陈宜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陈文龙、刘黼参知政事，张世杰为镊密副使，陆秀夫为直学士院，苏刘义主管殿前司。召李庭芝为右丞相，姜才为保康军承宜使（2月，夏贵在广州已降元）。又下诏，以赵缙为江西制置使，进兵邵武（今县），谢枋得（原为江西提刑，隆兴、饶州陷后，走至安仁——今余江县——调淮士张孝忠拒战，又败。走信州——今上饶县——元军追至，遂弃妻子，负母变姓名走建宁——今福建建瓯县——至是被召）

为江东制置使，进兵饶州，李世达、方与等进兵浙东，吴俊为江西招谕使、邹凤副之，毛统由海道至淮，约兵会合。时文天祥自镇江循海逃还温州，亦至福州，遂以文天祥为枢密使同督诸路军马。

6月，吴俊等将兵出江西，白广昌（今县）进克南丰（今县），周元军败遵。

是月，元将阿里海牙遣宋降将梁雄飞攻广州。宋广东经略使徐直谅遣将拒于石门（今广东南海县西北），败绩。直谅弃城遁，广州遂陷。

7月，文天祥欲还温州，以图进取。陈宜中欲使张世杰复浙东西之地，乃命天祥开府剑州，经略江西。

是月，扬州守臣李庭芝奉召，欲自海道至闽。而令制置副使朱焕守扬州，自与姜才将兵七千趋泰州，将东入海。庭芝已行，焕郎以城降阿术，阿术遣兵追庭芝至泰州，遂擒之。二人皆不屈死。

是月，宋秀王赵与择进图婺州，为萤文炳所拒却。

元第一次追捕宋二王：9月，元军开始追击端宗，阿剌罕、董文炳、忙古带、唆都率舟师出明州（今浙江鄞县）。塔出与吕师夔、李恒等将骑兵入闽广。阿里海牙自静江（今桂林）入广西。

10月，文天祥师次汀州，遗赵时赏（宋宗室子）等将一军取宁都（江西今县），吴俊将一军取鄂都（今县），刘洙（庐陵人）等自江西起兵会之。是日旋以元军已至，退走漳州。

是月，广州为宋将赵溍与东莞豪杰熊飞所克复，吕师夔遂将兵自梅岭（今大庾岭）入广，连战于南雄、韶州，大破宋军，赵溍弃广州遁，元复取之。

11月，阿剌罕、董文炳入虑州（今浙江丽水），秀王赵与择迎战于端安（温州西南今县），大败，与弟与虑、子孟备，及观察使李世达、监军赵由璃、察访使林温皆被擒不屈死之。知虑州李珏，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同月，塔出与李恒之骑兵，亦自江西入陷邵武军建宁（今建甄）。于是进逼福州。

陈宜中、张世杰，以元军已逼，乃备海舟，奉端宗及卫王、杨太妃等登舟。时军十七万，民兵三十万，淮兵万人。出海之后，与元舟师相遇，幸值天雾晦冥，乃得遁走。于是王刚中与福建招抚使王积翁，以福州降。

端宗等至泉州（今晋江县），泉州港招抚使蒲寿庚（提举市舶三十年，擅利甚厚）迎谒，并请留驻。张世杰不可。或劝世杰留寿庚并取其渔舶，世杰不从。经而以舟不足，而掠其舟，并没其货。寿庚怒，因杀宋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州者。陈宜中等乃奉端宗趋潮州（今广东

潮安县。时为12月）。寿庚遂与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陈宜中等决于惠州之甲子门（今广东陆丰东海口），以势已穷，乃遣倪宙奉表诣元军前请降。

宋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2月，元主忽必烈因诸王昔里吉之叛走和林与海都合势，乃急召其在东南之诸将班师。于是宋君臣乘机复振。4月，使惠州人张镇复取广州。张世杰亦将兵入潮州。文天祥则自梅（今梅县。天祥自漳州至梅州）将兵出江西，复取会昌县。6月取鄠都。7月遂围赣州。张世杰亦攻蒲寿庚于泉州，遣将克复邵武。然是月伯颜已讨平昔里吉之叛乱。于是元军复追击端宗。

八日，元将李恒遣兵援赣，自将袭文天祥于兴国（今县）天祥兵溃，走循州（今广东龙川县），其将赵时赏等皆死之。于是陈宜中奉端宗退还潮州之浅湾（今南澳岛附近）。

元第二次追捕二王：9月，元主忽必烈诏塔出与吕师父、李恒等，将步兵由大庚岭入广东。忙古带、唆多、蒲寿庾及元帅刘深等，以舟师追宋端宗。唆多援泉州蒲寿庚，张世杰解围还浅湾。

塔出令唆多，自泉州泛海，会于广东之富场（今宝安县东南）。唆多途自泉州取漳州（今福建龙溪县），而攻潮州。宋守臣马发竭力拒守。唆乡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今惠阳县）与吕师夔合军，遂趋广州，与塔出会师。广州宋制匮使张镇馒以城降元。

是月，元将刘深将兵袭浅湾。张世杰奉端宗走秀山（今宝安县西北虎门镇），遂至井澳（今中山县南海中横琴山下）。旬余士卒桧集，死者过半。刘深后追至井澳，世杰与端宗走谢女峡（亦在中山县境海中），后人海至七里洋（似在今上下川岛附近），欲往占城（今越南境之顺化、广平、广治、广南、广义、平定等省地）。陈宜中请先往谕意。及至，度宋事已不可为，遂不复返。

明年（元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3月，世杰奉端宗迁于洲（今吴川县南，屹立海中，当南北道。似郎今洲岛）。4月，端宗正卒（时年十一岁），群臣乡欲散去。陆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与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末欲绝宋宗，此岂不可为国邪!”乃与众共立卫王昺为帝（时年八岁）。杨太妃仍同听政，改元祥兴。升询洲为龙翔县。5月，世杰围攻雷州（今海康县）。城中绝量，其士卒以草为食。元将史格漕钦（今县）、廉（今合浦）、高（今茂名）化县之粮以给之。世杰途解围而退，时宋军所泊，居雷、化犬牙虑，不可以自守。世杰以厓山（今新会县城西南大海中，亦曰厓门山）在钜海中，与奇石山相对立如两扉，潮汐之所出人也，旧有镇戍于此。因此以为天险，可扼以自固。乃于是年6月奉帝昺移驻之。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宫，军屋千余间。时官民兵尚二十余万，多居于舟，资粮取办于广右诸郡。海外四州，复令人匠造舟楫，制器械，至10月始能。时闽广湖南乡有喜壅者。（上引见续通鉴百八十三）

元第三次追捕东二王：元主忽必烈为防宋之残余死灰复燃，再命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副之，以追击宋朝之残余。是年6月，弘范至扬州选将校，发水陆之师二万，分道南进。元主又命塔出留后，以供弘范军需。是年闰11月，弘范袭擒文天祥于五坡岭（今海丰县北）。先是文天祥已自江西败走循州，嗣以母及弟壁在惠州，乃于至元十五年3月趋赴之，并行收兵，出海壹县，遂次丽江浦（今海丰县南）。至是天祥屯兵潮阳（今县），进讨觑盗陈懿等。懿遁，以海舟导张弘范兵来攻。天祥引兵西走海曼，弘范先锋将张弘正（弘范弟）追之。天祥方饭于五坡岭，弘正兵突至，天祥不及督兵迎战，即被擒。

元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正月，张弘范自潮阳港乘舟人海，至甲子门获宋斥堠将，因知宋帝昺所在。乃至涯山。有人建议张世杰据海口以拒战，则不胜犹可西走。世杰恐久在海中，士卒离心，动则必散。乃曰："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遂焚行朝草市，结大舶千余，作一字阵，碇海中。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棚如城堞。奉帝昺居中为战死之计。人皆危之。厓山北浅，舟胶不可进。弘范乃由山东转而南人大洋，与世杰之师相遇，薄之。且出骑兵断其汲路。世杰舟坚，突之不能动。乃以舟载茅茨，沃以膏脂，乘风纵火焚之。世杰战舰皆涂泥，缚长木以拒火舟之来攻。弘范已无如之何，乃以舟师据海口以困之。世桀兵士食干粮十余日，取海水以饮。水咸，欧即呕泄，兵士大困。世杰率苏刘义方与等，旦夕大战。既而李恒自广州率师来会，弘范遂命恒守厓山北以困之。（续通鉴卷百八十四）

2月，宋都统张达乘夜出击，袭弘范军，败还。弘范乃四分其军，相去里许。会诸将曰："宋舟西舣厓山，潮至必东还，急攻之；闻吾乐作，乃战。违令者斩!"时黑气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杰以淮兵殊死战。至午潮上，元军中作乐，世杰以为敌军且懈，遂不戒备。弘范猝以舟师攻其南。于是世杰南北受敌，兵士皆疲，不能复战。俄有一舟拨旗仆，诸舟之樯旗皆仆。世将知事已去。乃抽精兵入中军，诸军遂溃。弘范率兵进攻宋之中军。会日暮风雨，昏霾四塞，咫尺不能辨。世杰乃与苏刘义断舟缆，卒十六舟夺港而去。（多桑蒙古史三卷二章）

陆秀夫走至帝昺所居舟中，以其舟稍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先驱其妻子沉之入海。然后谓帝昺曰：

"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佑皇帝（即恭宗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负帝同溺于海死之。后宫诸臣从死者甚众。余舟尚八百，尽为弘范所获。越7日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因得赵昺之尸及印玺。

世杰已出港，复行收兵。遇杨太圮，欲奉以求赵氏之后再奉之。杨妃知帝昺已死，亦赴海死。世杰葬之于海滨，然后趋占城。占城土豪强之还广东，乃回办艤于南恩之海陵山（今广东阳江县西南七十里海中。今为海陵岛），再行收兵。散滨稍集，图谋入广，而飓风大作。将士劝世杰登岸。世杰曰："无以为也。"登柁楼，露香祝曰："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

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风涛愈甚。世杰盐水溺死。至此，宋之残余亦尽矣。（续通鉴卷百八十四）

第六节战后之政局

蒙古人灭宋，征服中国，与蒙古大帝国统治之完成，皆在元世祖忽必烈之时。而蒙古之一切开国规模与各项政治制度之建立，亦在元世祖之时。忽必烈是继承铁木真窝阔台后之一位英明君主，在位三十五年（公元1260~1294年）活到八十多岁，是元朝入主中国之第一任皇帝。兹将元世祖之开国规模、政治建设、军事改革分别说明如下：

一、建国号、定都邑：以前中国历朝所用国号，如周、秦、汉、唐、宋，都是渊源于当初封邑之名。到元世祖时候，在至元八年，采纳刘秉忠建议，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文义，建国号曰“大元”，这是以文义为国号之始，这种创制，正是为一新耳目。

元世祖正式以燕京为大都（今北京），而以开平为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并规定饮时巡辕之制。盖上都为夏都，大都为冬都，皇帝春夏在夏都，秋冬在冬都。从地理上说，大都（燕京）是控制中国本土之政治中心，而上都（多伦）则是控制北方蒙古本土之政治中心。

二、制文字，定国政：蒙古人本来只有言语而无文字，自成吉思汗灭乃蛮后，乃采用乃蛮所用之畏吾儿文字作为蒙古文字。（畏吾儿即回鹘）到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吐蕃后，尊事吐蕃高僧八思巴为国师。八思巴博学多才，运用吐蕃文法，另造蒙古新字，也是拼音字，一共四十一个字母，又叫八思巴字或蒙古国字。属于梵文系统，但为直书如汉文。（现存于曲阜孔庙之元圣旨碑，便为八思巴字）

蒙古初起时，除原始之民族迷信外，无所谓宗教信仰。成吉思汗对宗教虽不重视，但对各种宗教亦相当宽容。

所以蒙古兵到处蹂躏宗教之同时，也接受各种不同宗教之影响。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对一切宗教都很尊重，特设宜政院掌管佛教、回教、道教、也里可温教（天主教）等。而在这些宗教中，最受国家尊敬者，是佛教中之喇嘛教。该教为西藏型之佛教，与中国型之佛教不同。忽必烈征服西藏时，颇得力于吐蕃喇嘛之合作，同时吐蕃有一圣僧“八思巴”者，前来谒见，深为世祖所敬重。“八思巴”七岁，便能诵佛经十万言，藏人称为“圣童”，其祖先世代，都是辅佐吐蕃国王，是权威世家。后来元世祖即位，便将八思巴请来中国，尊为国师，而喇嘛教也就无形中成为蒙古人之国教。至元十一年，八思巴辞归吐蕃，世祖又延聘其弟“亦伟贞”为国师，从此成为定制，每逢一位帝师死去或回藏，便再自吐蕃延请一位帝师继任。

三、行政区划：元朝疆城，可分为四大汗国与元朝本部两个范围。元朝首都本在和林，建都燕京（今北京）

后，于和林置行中书省，自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其历代皇帝所真正统治者。仅有本部地方，所谓四大汗国，实际各自为政，自成一系统，而与元朝中央政府，逐渐脱离关系。元朝本部，计分为三个区划：（一）为腹里，（二）为岭北，㈢为中国本部诸行省。腹里为京畿地方，包括今之河北、山东、山西、内蒙一部，由中书省统治之。岭北就是外蒙古，这是蒙古人之发祥地，设岭北行中书省统辖之，省府设在和林。中国本部地方，则分设为十省统辖之，名为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浙江、湖广，征东等省。地方行政是三级制，省下为路府州，路府州下为县。

蒙古初起，完全是部落组织，官制简单，大别之只有掌管军事之万户统帅与行政之达鲁花赤两种长官，另外辅佐大汗之宰相，叫大必阇赤。世祖统一中国后，乃命中国学人刘秉忠许衎等，模仿汉人，详定官制，以宋为蓝本，而略加改变。中央以中书省总揽行政，以枢密院总揽军事，以御史台总揽监察，形成三权鼎立之中枢，颇似秦汉之丞相、御史、太尉三权分立原则。元朝之宰相，名义甚多，曰中书令，曰左右丞相，曰平章政事，曰参知政事，都是辅佐天子以发布政令，而以中书令为首揆。亦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隶属于中书省。地方行政第一级是行中书省，其行政首长也和中书省相似，有丞相、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左右丞等。第二级是路府州，路府设有总管府为行政机构，达鲁花赤下设有都总管、同知、判官。州县均分上中下三等，达鲁花赤下设州尹、同知、判官；县尹、县丞、县尉等。其官制最大特点，即无论中央或地方，首长都是蒙古人，而以汉人南人为副贰。达鲁花赤者，为蒙古语地方行政长官之通称。

四、兵制：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征服金、宋，遂征发中国人为兵。在北方黄河流域一带之民兵，谓之“汉军”；在长江流域之宋人，谓之“新附军”：另外在辽东地方，有所谓“行军”、“契丹军”、“高丽军”；云南有所谓“寸白军”；福建有所谓“佘军”，都是地方性之乡兵。

蒙古人是人人皆兵制。汉人南人则为抽丁制，二十人或十人始出一丁为兵。兵役年龄亦较蒙古人为晚，大抵廿以上始充派兵役。蒙古特别重视工匠技艺人才，每征服一地，常征取该地技艺人才，编为特殊部队，名为“匠军”。又为控制异族降将，尝收容降将子弟充军，福为“质子军”。世祖将禁卫军改为“五衙”，正式定名为“侍卫亲军”。又重新编定天下百姓之兵籍，并将精兵集中于中央为捍卫。腹里大河南北一带，派遣亲王统率蒙古探马赤军分别屯驻。远方如南海之地，则以汉军及新附军屯戍。各路立万户府，各县立千户所。从蒙古之地方军制与行政制度之配合看来，大元帝国，完全建筑在军事力量之控制上。另外蒙古赖以统冶其庞大疆域，保持其全国政治军事与交通之联系，有一项最严密之制度，即是遍于全国各地之“驿站制度”，蒙语为“站赤”。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可以称为一代宏规。

第十二章 元朝前期和中期的农民战争

第一节元朝前期的农民起义

蒙古贵族在灭南宋的过程中，进行了野蛮屠杀和掠夺，使许多无辜的人民被杀害或被掠为奴。元朝统一后，又推行民族统治政策，对江南人民政治上加强统治和奴役，经济上加重剥削，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蒙古贵族的反动统治，自然也激起了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并发动了一连串起义。

一、陈吊眼起义

在江南地区一系列的农民起义中，福建地区陈吊眼为首的起义时间最早，规模也较大。陈吊眼，亦名陈弟眼、陈大举，福建畲族人，南宋末年，曾率畲兵隶张世杰部下抗蒙，兵败被迫降元。陈吊眼浲元后，屯戍漳州山区，他日睹蒙古贵族的种种暴行，内心充满了仇恨，他暗下决心，寻找机会，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8月，率众起义，攻占漳州城，“杀招讨傅全一家，官军死者十八、九”。陈吊眼起义后，附近农民纷纷响应，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山洞山寨八十余所，据险相维，内可出，外不可入，以一当百”。起义队伍发展到十余万人。陈吊眼还建立政权，改元昌泰，声威大振。

陈吊眼起义后，元兵前来镇压，起义军据险固守，久攻不下，元政府又调集闽、粤、浙、赣四省军队，以完者都为镇国上将军、福建等处征蛮都元帅，高兴为右副都元帅，率大军围攻。

畲民是力逃避赋役和战乱而进入山区的一些贫苦农民，他们居于洞穴和山寨中，没有积畜，在元军的围困下，十五座山寨失守，渐渐不支，陈吊眼乃杀其妻子，走保千壁岭，决心斗争到底。高兴攻千壁岭不能下，乃大耍阴谋诡计，“诱吊眼释兵而语，吊眼下至中半中，公（高兴）上与语，遽接其手，掣下吊眼”，将他逮捕，押解到漳州杀害，起义失败。

陈吊眼起义一度攻占漳州，进兵汀州（今福建长汀），占领了大片地区，队伍发展到十万人，坚持斗争近两年之久，使“闽中震动”。响应陈吊眼起义的很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邵武的高日新起义，福州的林天成起义，南剑州有丘细春起义等，沉重打击了元朝统治。

二、黄华、欧南喜、黎德起义

黄华，福建建宁府政和县（今福建松政）人，至元十五年11月，曾“集盐夫，联络建宁、括苍及畲民妇自称许夫人为乱”，后失败降元，曾被元政府任命为建宁路总管。蒙古贵族在福建横征暴敛，任意杀人，激起福建人民的不断反抗，在人民反抗斗争的推动下，至元二十年

（1283年）8月，他又重新起义。

黄华起义后，据政和县城（今属福建），用宋祥兴年号，起义军“剪发纹面，号头陀军”，由于各地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军很快扩大到十万人，分兵攻打崇安（今属福建）、浦城（今属福建），破松溪（今届福建），攻古田（今属福建），并包围建宁府（今福建建瓯）。起义军到处攻杀蒙古官员，“杀掠不可胜计，声摇闽粤”。在黄华起义军的影响下，12月，浙东有“吴提刑者，居青田之鸬鹚，与政和贼华通，复谋叛，用宋祥兴年号，铸两浙安抚司印”。有些元朝地方官也起而响应，可见这次起义的声势和影响是很大的。

当时，元朝政府正准备进攻日本，以扬州为基地，集中了以刘国杰为首的大量军队和战争物资。元世祖获悉黄华起义后，立即下令刘国杰率精锐部队，会同江淮参政伯颜前往福建，又令两浙、福建的地方驻军配合，共同镇压。浙西道宣慰使高兴率兵向起义军反扑，激战于铅山（今属江西省），起义军失败，损失八千多人。再战于武夷山分水岭，起义军又败，高兴侵占嘉禾。黄华率领起义军急攻建宁，高兴率军南下，与福建军队南北夹击，起义军再败，叶都统，梁都统被俘，黄华撤离建宁，走保江山洞，高兴尾追，至正二十一年（1284年）正月，黄华最后的根据地赤岩山，也被元军攻破，黄华鏖战半日，杀伤大量敌人后，赴火自焚死，其妻子及二弟也被俘牺牲，起义失败。

在镇压黄华起义的过程中，蒙古兵“所至辄杀掳平民”，在杀掠之后，还“多奴良民以归”，把许多劳动人民掳去当作奴婢。因此，“兵后市井丘墟”，荡然无存，严重破坏了生产，造成一场大的灾难。

黄华起义时，在广东地区还爆发了、欧南喜、黎德领导的起义，这次起胀由元朝府推行食盐专卖政策引起的。食盐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由于元朝政府垄断了食盐的生产和销售，盐价很高，质量很差，因此，私盐流行。为了确保盐税收入，元朝政府严禁私贩，对私盐贩处罚很重。为了对抗官府的追捕，他们往往携带武器，因此，私盐贩很容易与农民的反抗斗争相结合，形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至元二十年（1283年），私盐贩陈良臣就曾经组织东莞（今属广东）、香山、惠州（今属广东）等地的私贩一万多人起义，但很快被镇压下去。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2月，欧南喜又在这一带发动了起义。

欧南喜的身世，蒙古贵族称他是“群盗”，很可能也是私盐贩出身。欧南喜把被打散了的起义群众又组织了起来，据记载，他“聚其党至十万人，僭称名号，伪署官职，攻陷城池，戕杀吏民”，已是一支相当大的队伍。欧南喜起义后，自称王，并设立丞相、招讨使等官，他们进攻地方官府，大杀封建官吏和地方豪绅，表达了人民反抗元朝残暴统治的愿望。欧南喜率领起义军南下，2月十9日，到达东莞、博罗（今属广东）两县交界处，元广东道都转运盐使合刺普华率兵来犯，起义军分据要害，给元军以迎头痛击，经过一场激烈战斗，起义军获得全胜，生擒合刺普华，并将其处死。当时元朝正对占城（今越南南部）用兵，南运粮

道也被起义军切断。欧南喜乘胜进兵广州，起义军声威大振。

这时，在广东还有黎德为首的一支起义军，这支起义军主要在海上活动，他们拥有“战船至七千艘，众号二十万”，以海州（今海南海口市）为根据地，四出攻击，不断拦截元朝运粮交趾的海船，给元朝统治者以很大打击，黎德还与欧南喜的起义军联合作战，陆战、海战互相配合，广东全境为之震动。

后来，元朝统治者抽调大量军队，从四面对起义军发动围攻，起义军人数虽多，但武器不足，逐渐由优势变为劣势。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11月，欧南喜、黎德攻广州，“其别将吴林以八百艘围冯村”。双方水军在海上展开激战，结果攻广州未成，永军也为元将王守信战败，起义军伤亡惨重，又未能突围转移，欧南喜、黎德与其都督，丞相、兵马钤辖等主要将领被俘，均惨遭杀害，起义失败。

三、钟明亮起义

钟明亮，福建汀州（今福建长汀）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封建士大夫称他力“草间匹夫”，可见他是一个贫苦农民。元朝统治者远征交趾、占城等一系列的战争，在江南沿海各地征集粮食、船只，所任官吏又“皆贪饕邀利之人”，因而激化了阶级矛盾，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冬，钟明亮率众于汀州发动了武装起义。

钟明亮起义后，“拥众十万，声摇数郡”，他们主要活动于今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处。在福建，起义军活动的中心地区是“南剑及邵武渚道”，并攻打漳州等地；在江西，主要活动于赣州、南安（今江西大余）、建昌（今江西南城）诸路；在广东，起义军主要活动于循州（今广东龙川）、梅州（今广东梅县）等地。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3月，循州起义军万余人攻淖浦；泉州起义军攻长泰（今属福建）、汀州、赣州等地。在钟明亮起义军阶影响下，今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人民，包括少数民族在内都纷纷起义，如畲族起义军千余人，攻龙溪（今属福建）；广东的邓大獠、刘大撩分据前后寨，率领少数民族起义军攻肇庆（今广东肇庆市）；4月，广东的董贤举等七人，亦“皆称大老，聚众反，剽掠吉（今江西吉安市）、赣（今江西赣州市）、瑞（今江西高安）、抚（今江西抚州市）、龙兴（今江西南昌市）、南安（今江西大余）、韶（今广东韶关市）、雄（今广东南雄）、汀诸郡，连岁击之不能平”，元朝政府虽然从江淮、福建、江西等地抽调大量兵力，但仍然不能将各地起义军镇压下去。

在反抗元朝统治的斗争中，钟明亮丰富了白己的斗争经验，当元朝大兵压境，敌我力量悬殊时，他从不正面出击，而是采取迂回战术，避开敌人的优势兵力，击其薄弱环节，这不仅保存了自已，而且往往能歼灭敌人，取得胜利。元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王恽说：钟明亮“出没叵测，东击则西走，西击则东轶”，使官军疲于奔命，无可奈何。因此，他

建议在军事镇压的同时，还应派“重臣”劝降，软硬兼施。后来，在招降失败之后，元朝统治者又增派军队，并“立主帅，专号令”，以优势兵力向起义军发动围攻。钟明亮在敌强我弱，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5月，率起义军一万八千多人向元政府伪降。伪降果然奏效，元世祖即下令“江淮、福建，江西三省所抽军务还本翼”，解除了对农民的包围。经过一段休整，同年闰10月，钟明亮又“以万人寇梅州（今广东梅县）”，再次起义。钟明亮重新再起后，“江罗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韶、雄诸贼二十余处皆举兵应之，声势张甚。”在钟明亮的影响下，各地的反元斗争又进入高潮，“婺州（今浙江金华）贼叶万五以众万人寇武义（今属浙江），杀千户一人”，“漳州贼陈机察等八千人寇龙岩，执千户张武义”，广东则有陈大獠、阎大獠，曾大獠、萧大獠等瑶族人民起义，湖南地区的瑶人也纷纷起义，外攻破酃县城（今届湖南），连州（今广东连县）、道州（今湖南道县）等城。

钟明亮再次起义后，元世祖下诏，斥责月的迷失：“钟明亮既降，朕令汝遣之赴阙，而汝玩常不发，致有是变”，要他立即与江西，福建合兵围剿。11月，湖南、广东、江西的瑶族人民起义军遭受重大挫折，形势又复恶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2月，钟明亮为摆脱困境，再向元政府伪降。元世祖下令将钟明亮解送大都（今北京市），江西行省管如德久留不遣，明亮复率众攻赣州，第三次举起反元大旗。但随后不久，钟明亮就病故了。

钟明亮的再降而复起，元朝士大夫颇为感慨地说：“上烦庙堂应接，渚省奔赴，竭数载之力，仅得明亮至军前一面。而诈降无实，做睨反复，气凌威铄，未尝获一交锋决胜，明亮竟偃然得保首领以殁。”承认镇压钟明亮是失败了。

钟明亮死后，其影响依然存在，“众犹畏服，止奉一木主尔，藉其虚声余烈，尚能统御所部，不即降溃。”可见他在起义军中的威望，但是，起义军务部之间，总是不能密切配合，缺乏统一的行动方针，因此，当元军以优势兵力围攻时，便被各个击破，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钟明亮起义便完全失败了。

第二节元朝中期的农民起义

1294年，元成宗即位后，元朝进入它自身发展的中期阶段。

这时，蒙古贵族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已经基本稳定下来。在这一时期内，元朝统治者加重了对各族人民的搜括，税额不断扩大，至延祐初，税额“比国初已倍五十矣”，因此，农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这一时期内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却此伏彼起，连续不断。

一、田万顷领导的施溶州人民起义

湖南西部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居住着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他们不堪蒙古贵族的统治，早在元兵进入湖南之初，保靖州（今湖南保靖）泊崖洞田万顷，楠木洞孟再师等就曾举行武装反抗，后田万顷因失败降元，泊崖洞被改为施溶州，以田万顷任知州。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春，田万顷以施溶州为据点，又重新发动了反元起义，与楠木洞孟再师、桑木溪鲁万丑等起义军互为声援。4月，元世祖病死，元成宗即位，大赦天下，并派人招降田万顷、鲁万丑、孟再师等起义军领袖，被坚决拒绝。

9月，元成宗令湖广行枢密院副使刘国杰率佥院唆木兰及诸翼万户前往辰州（今湖南沅陵）镇压，元军犯明溪，鲁万丑据会溪之上游，毫不畏惧，率领起义军从水陆两路迎击元军，杀千户崔忠信、百户马孙儿。10月，元军增兵犯桑木溪，鲁万丑以一千人迎击，为元军所败。元军沿溪逆流而上追击，万丑又以二千人阻击，也因寡不敌众，未能取胜，起义军退往石农次。石农次地形峻险，起义军分道扼守，元军不能入。

11月，元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答剌罕统率沿边隘丁增兵辰州，刘国杰会集各，路元军，问计于诸将，元将田荣祖说：“施溶，万顷之腹心，石农次、三羊峰，其左右臂也，宜先断其臂，而后腹心乃可攻。”这一毒计被采纳，刘国杰以土人为向导，并绘制地图，标以路径，“命佥院唆木兰、万户阔脱、忽都海牙、拜兰、马继祖从澧州武口道进，身率万户别里哥不花、朵落解、倪全、田兴祖从会溪、施溶口入”，以优势兵力，分路向田万顷的根据地进攻。不久，石农次失守，施溶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

12月28日，施溶，楠木洞陷落，田万顷等被俘牺牲。随后，其他据点也相继失守，鲁万丑降元，起义失败。

二、刘六十领导的赣州人民起义

元成宗即位之初，元贞元年（1295年）6月，即“昭、贺、藤、邕、

澧、全、衡、柳、吉、赣、南安等处，蛮寇窃发”，在今江西、湖南、广西等广大地区内爆发了少数民族的起义，但由于这些起义非常分散，各自为战，力量未能集中起来，所以不久便被元军各个击破，镇压下去。

元贞二年（1296年）7月，江西赣州又爆发了刘六十为首的起义。刘六十，又称刘季、刘贵，赣州兴国县（今属江西）笼坑人，他“撰妖言，张伪榜及刘季天旗，自称刘王，刻‘皇汉高祖广新之帝’并‘行王’二印，设朝殿，开行省，置丞相、左右丞、将军、军头等官，宣言止杀宫中人”。刘六十称王设官，建立政权。这支起义军提出了“止杀官中人”的口号，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各级封建统治的代表——官僚，因此，深深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很快发展到上万人。8月，起义军进攻吉州（今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今属江西）。元朝统治者派兵镇压，但“主将观望退缩”，不敢与农民军对阵，因而起义军“势益盛”。后来，元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增兵赣州，他看到起义军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感到单靠武力是难以取得胜利的，因此他决定用政治欺骗与军事进攻相结合的反革命两手对付起义军。他不用大兵，只带了亲信掾吏李霆镇、元明善二人前往。到达赣州后，他首先“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惩治了几名贪官污吏。这一欺骗手段果然有效，“民相告语曰：‘不知有官法如此’”。董士选至兴国县，当到达离起义军据点不远的地方时，他“择将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变之人，悉置于法”，进行武力威胁，软硬兼施，结果“民争出请自效”，不少起义军上当受骗，放下武器，向元军投降。10月，董士选乘机向起义军根据地猛攻，刘六十兵败被俘，遭到残酷杀害，同时被杀的还有起义军将士一百多人。

这次起义前后坚持了四个月，最后失败。

三、蔡五九领导的宁都州人民起义

刘六十起义失败后，农民起义虽然进入低潮，但人民的反抗斗争并没有停止，只是采取了不同的斗争形式而已。人民由公开的武装反抗，转入佃户抗租、驱口逃亡以及通过宗教结社等形式，秘密组织群众，等待时机再起；每遇天灾，农民乏粮，面临饿死的威胁时，饥民们便采取聚众抢粮的形式，与封建统治者斗争。

经过一段表面的沉寂状态后，延祐二年（1315年），在江西赣州路宁都州，又爆发了以蔡五九为首的农民起义。《元史》卷二十五《仁宗记》：“台臣言，蔡五九之变，皆由呢匝马丁经理田粮与郡县横加酷暴，逼抑至此。信丰一县，撤民庐千九百区，夷墓扬骨，虚张顷亩，流毒居民。”这次起义是由元朝政府的括田增税引起的，延祐元年（1314年），元朝政府为了增加税收，下令“经理江浙、江西、河南田粮”，名义上是为了检括隐漏赋税的田亩，而实际检括中，“富民黠吏，并缘为奸”，地主勾结官吏，具田愈检愈少，而贫苦农民的土地则愈检愈多。为了增加税额，弊端丛生，检括中指荒为田，或借机敲诈，甚而平毁墓地，拆掉房屋，虚报田亩。当时江西的情况最力严重，“江西经理田粮，民不堪命，赣为甚，宁都又甚。”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且逼死不少

人命，终于使阶级矛盾激化，爆发了农民起义。

延祐二年（1315年）4月，宁都农民蔡五九召集一部分贫苦农民，聚会于兔子寮五王庙，杀猪置酒，执锡楞枪刀，祭告天地，蔡五九自称洞主，宣告起义。6月，蔡五九率众向周围地区发动进攻。7月，宁都知州率兵镇压，被农民军打败，杀同知州事赵某。农民军乘胜追击，逼近州城，蔡五九指挥攻城，很快占领四关，元兵来援，农民军主动撤退。元兵尾追，与农民军激战于延福里，农民军佯败，设伏兵，大败元军。农民军乘胜反攻，再次包围宁都城。8月，农民军不断扩大战果，进军福建，破汀州宁化县（今属福建）城，蔡五九自称蔡王，汀州、漳州、泉州等地农民纷纷起义响应，将乐县地方官吓得弃城逃亡，农民军声威大振。

蔡五九起义军的迅速发展，使元朝统治者大为震惊，9月，江浙、江西两省联合镇压，增兵宁都。为保存实力，农民军突围，元军尾追不放，农民军力“不能支，奔散渡溪，水涨不可渡，溺死过半”，损失严重。农民军再战于石城（今属江西），又败，蔡五九退往兔子寮木麻坑，复为元兵包围，战败被俘，惨遭杀害，持续半年之久的宁都农民起义，至此失败。

四、云南彝族人民起义

大德五年（1301年），在云南地区也曾爆发彝族人民的起义。蒙古贵族为掠取金银宝物，成立征八百媳妇万户府二，设万户四员，由四川、云南等省调集军队二万余人，以中书右丞刘深为统帅，远征今云南南部的八百媳妇地区。元军进入云南八番地区后，不断“调兵供馈”，不仅向彝族人民勒索钱粮、马匹，还向他们征调夫役，致使“民为竭产，役夫死者相枕藉”，许多人破产身亡。彝族人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终于爆发了反元大起义。

5月24日，云南彝族土官宋隆济，顺应人民的要求，号召彝族人民起义，人民在“身死行阵，妻子为虏”的威胁下，举起了义旗。起义人民以宋隆济为首，团结八番地区的苗、仫佬等少数民族，向元朝统治者展开武装斗争。6月18日，宋隆济率起义军四千多人攻杨黄寨，“杀掠甚众”。另外，云南水西彝族也遭到元朝统治者金币、马匹的勒索，元“师过其境，不堪蹂躏”，彝人在土官阿那之妻折节（又名蛇节）的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史称折节“健黠而能兵”，“有权略，诸蛮咸听其命”。折节很快与宋隆济联兵，向元朝统治者发起进攻，破贵州（今广西贵县），杀知州张怀德；元河南诸翼征行万户、昭勇。

大将军张弘纲率兵前来镇压，也被起义军打死。在起义军一连串胜利的鼓舞下，乌撒（今贵州威宁）、乌蒙（今云南昭通）、东川（今云南会泽）、芒部（今云南镇雄）、武定（今云南武定）、威楚（今贵州楚雄）、普安（今属云南省）等地的少数民族人民“望风皆叛”，纷纷响应起义。各地起义军利用熟悉山川地形的优势，神出鬼没，烧府库、杀

官吏，到处袭击元军。在彝族人民起义军的打击下，以刘深为首的元兵“军中乏粮，人自相食，计穷势蹙，仓皇退走，土兵随击，以致大败。（刘）深弃众奔逃，仅以身免，丧兵十八九，弃地千余里。”不仅远征未成，且损兵折将，几乎全军覆没。

11月12日，元成宗下诏增兵云南，令湖广行省平章刘国杰为统帅，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也先忽都鲁为副，统兵二万镇压云南彝族人民起义。大德六年（1302年）春正月，刘国杰至沅州（今湖南芷江），2月，与四川宣慰使汪惟勤会兵于播州（今贵州遵义）。10月，刘国杰率湖广、云南、四川三省蒙、汉军三万人及思、播二州土兵一万人，分道向起义军发动围攻。在军事进攻的伺时，刘国杰也“遣使扭谕”，妄图瓦解起义军，但遭到折节的严辞拒绝。彝族起义人民在折节的率领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前后四十余战：“贼兵劲利，且多健马，官军失利。”起义军虽初战取得了胜利，但11月后，形势出现逆转，折节为元将宋光所败。大德七年（1303年）2月，折节再败，被包围于何加寨，力尽被俘，惨遭杀害。

折节失败后，宋隆济起义军孤立无援，在优势元军的围攻下，也接连失利，后兵败被俘牺牲。至此厂彝族人民起义失败。

五、朱光卿、棒胡领导的农民起义

元朝中期，除各地少数民族纷纷起义外，广大汉族人民也多次发动起义，但由于蒙古贵族对汉族居住区统治比较严密，驻军较多，一旦发生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因此都未能发展成为较大规模的起义。在一连串的汉族人民起义中，以朱光卿、棒胡领导的起义影响较大。

后至元三年（1337年）正月2日，广州增城县（今属广东）

朱光卿发动了武装起义，同时起义的还有石昆山、钟大明等。朱光卿起义后，改元赤符，宣布建立大金国。在朱光卿起义的影响下，4月5日，惠州归善县（今广东惠阳）农民戴甲、聂秀卿、谭景山等秘密制造武器，“拜戴甲为定光佛”，以宗教形式组织群众，响应朱光卿起义。两支起义军互相配合，向博罗城（今属广东）发动进攻。元朝统治者立即命令江西行省左丞沙的，指挥使狗札里率兵镇压。7月，朱光卿、石昆山、钟大明等战败被俘，惨遭杀害，起义失败，其余众散于民间，等待时机再起。

这年2月1日，在汝宁信阳州（今河南罗山）还爆发了棒胡领导的起义。棒胡，又名胡闰儿，陈州（今河南淮阳）人，“好使棒，棒长六七尺，进退击技如神，远近闻者称棒胡。”他“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的形式组织群众，有信徒一百多人，其徒胡山花等都善于使棒。可见，棒胡也是利用宗教秘密组织发动了群众。起义后，开州（今河南濮阳市）人辘轴李、陈州人棒张等皆起兵响应。棒胡起义军很快攻破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市）、鹿邑（今属河南）等城，并焚陈州，屯兵于杏冈。元朝政

府令河南行省左丞庆童率兵镇压，农民军在鹿邑冈战败，棒胡被俘，后送到大都（今北京市）被杀。起义不到一个月，便失败了。

朱光卿、棒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震撼了中原元朝统治，也加深了蒙汉之间的矛盾。在他们的影响下，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到处都爆发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即将在沉睡的中原地区爆发。

第三节元朝前期、中期农民战争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从1279年元朝灭南宋统一全国开始，直到1351年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为止，这七十年内，虽然是元朝统治的相对稳定时期，但各族民反抗元朝统治的斗争却一天也没有停止。由于时代和元朝统治自身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呈现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的特点；这些农民起义虽然都被镇压了下去，但对元朝的统治政策和元朝社会的发展，却有重要意义。

一、起义特点

（一）农民起义的次数多、地域广

历代王朝建立之初，不论时间长短，都有一段比较稳定的统抬时期，但元朝不同，从它建立伊始，就存在着人民的武装反抗。1279年元灭亡南宋统一全国后，人民的反抗斗争依然此伏彼起。元世祖统治时期，号称元朝的“至治”时代，但人民的武装起义也是接连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在灭宋后，元世祖统治的十五年内，见于记载的较大规模的起义就有上百次之多。其后的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统治时期，农民起义也是无年无之，而元顺帝统治的前期，各地更是“群盗纵横……寇贼猖獗”，元朝农民起义次数之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从起义的范围看，不仅江浙、湖广、江西、云南等行省，即原南宋统治的中心地区，人民起义也接连不断，而山东、河北、山西等元朝统治的中心，即直属元中央的腹里地区，人民的武装反抗也不断发生，即使地处极北的辽阳行省的库页岛以及岭北行省的蒙古高原上，也发生了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各族人民武装起义，起义地域之广也是历史上少有的。元朝统治时期，以蒙古贵族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地压迫、剥削各民族的人民，各地区的阶级矛盾一直没有得到缓和，因而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就一直没有停止，所以，元朝的农民起义便呈现出次数多、地域广的特点。

（二）少数民族起义特别多

在元代前期和中期的农民起义中，少数民族起义特别多，而有些起义还是土官或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发动和领导的，这是这一时期农民起义的又一特点，元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广袤的元朝疆域内，居住着许多民族，民族成份复杂，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也很不一致，但

许多民族先后都举行了武装起义，反抗元朝的统治。居住在江浙行省的畲族，在蒙古军攻占临安后不久的至元十三年（1276年）4月，便在许夫人的领导下，组织畲军，进行了反元斗争，支援了在福建抗元的张世杰。至元十五年（1278年），许夫人又联络建宁（今福建建瓯）的黄华起义军，畲汉两族人民共同进行了反元斗争。至元二十年（1283年）

在广东起义的黎德，是一个“洞獠”，也有的记为“士豪”，可见他是少数民族首领。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7月，云南乌蒙彝族人民在其酋长阿蒙的领导下，发动起义，进行武装反元，元朝政府调四川、云南行枢密院的军队将共镇压下去。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活动于福建、广东一带的钟明亮起义军也是以畲族为主体的。

至元二十六年（12s9年）后，湖南瑶民发动的武装起义，其领导入曾大獠、廖大獠、萧大獠、陈大獠等，也都是各地瑶族首领。

大德五年（1301午）云南土官宋隆济领导瑶族人民起义，反抗元朝政府的征发调遣，另一位瑶人起义女领袖折节（蛇节），是一位土官的夫人。泰定二年（1325年）在广西起义的潘保也是一位“瑶酋”。总之，元朝中期，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等山区的少数民族的武装反抗斗争，此伏彼起，接连不断。少数民族起义之所以如此频繁，主要是蒙古贵族加重对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压迫剥削造成的，宋朝时，少数民族地区赋税较少，徭役更轻，而元朝则不同，它不仅加强对汉族人民的统治与搜括，同时对各少数民族也不放过，土官酋长也遭受损失，所以，一些首领人物也起来反抗元朝统治。

（三）起义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

元朝前期的农民起义，往往将主攻矛头指向蒙古贵族和元朝的各级文武官员，而对南宋的抗元残余力量则给予支持。至元十四年（1277年）陈吊眼和畲族妇女许夫人起义后，有众十万人，他们曾支持张世杰的抗元斗争。在湖北一带领导起义的傅高，也曾支持陈宜中、文天祥的抗元斗争，因此，“鄂之大姓多与傅高通”。厓山战役陆秀夫负赵昺投海后，一些农民起义军有的仍然打着赵宋的旗号，如至元二十年（1283年）西川赵和尚起义，甚至自称赵宋宗室之后；东莞县张强起义，还以复宋相号召。因此，不少元朝的汉族官和地主也同情或支持农民起义，至元二十年（1283年）12月，“吴提刑者居青田之鸬鹚，与政和贼（黄）华通，复谋叛。”这位吴提刑，当是一位汉族地主。至元三十年（1293年），扛西行省发生农民起义，2月26日，“江西行院官月的迷失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盗贼”由于汉族地主有人暗中支持起义军，因此元朝统治者“申严江南兵器之禁”，严禁汉人持兵器。后至元五年（1339年），11月，在河南行省，还发生了以小吏范孟为首的起义，河南“行省掾范孟”，假传圣旨，杀河南行省平章月鲁帖木儿、左丞劫烈、廉访使完者不花、总管撒里麻，占据开封，调集军队，把守河渡关隘，“孟自称大元帅，寓公、富民及小吏之桀黠者悉授伪官”，设立了新的官员机构，与元朝统治相对抗。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对元朝统治打击很大。农

民的反元斗争之所以得到一些汉族地主的支持或同情，其主要原因在于元朝社会中，汉族地主与蒙古族地主之间始终存在着民族矛盾，蒙古贵族为了确保其统治地位，对汉族地主的权利进行了种种限制，蒙古统治者不准汉人当高官，不准汉人持兵器，不准汉人掌兵权，只有少数汉族地主上层分子例外；科举是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当官的主要途径，元朝长期罢废科举，后虽一度恢复，但在考试内容、录取名次、数量等方面，对汉人又加以种种限制，这就堵塞了他们的仕途；在法律面前，蒙汉也不平等，犯同样罪，对汉人处罚比蒙古人重得多；即便当了官，汉宫在政治权力及子孙荫叙等方面，也比蒙古人低得多。因此，蒙汉地主之间始终存在矛盾，汉族地主某些人对农民起义的同情、支持以及地方小吏发动反元起义，正是这一矛盾的反映。

二、历史作用

（一）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

元朝初期，中期的农民起义虽然多数规模不大，坚持斗争时伺不长，但同样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农民起义爆发后，其矛头首先指向平日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各级官吏，他们“掠郡县，烧府库，杀县长吏”，所到之处“斩刈剽寇，飘荡震汹……贵臣重将、裨校士马，因是物故者甚众”，农民牢杀文武官吏，没收府库财物，以充军饷，以济贫民，有的还派出小股部队，“突入富家，计其家资”，席卷而去。农民军“朝齐暮赵，朝廷不能制”，州县无可奈何。有些地方官无力对抗，便向农民军求饶，如封丘县尹许义夫，“闻贼至近境，乃单马出郊十里外迎之，见贼数百人，义夫力言：“封丘县小民贫，皆已惊惶逃窜，幸无入吾境’”，农民军笑其无能，乃避而去他，在农民军的打击下，封丘官僚们的狼狈相可想而知。

（二）在农民起义的推动下，促使元朝进行了政治改革，加速了蒙古族封建化的进程

蒙古进入中原之初，大肆掠夺人口为奴，南宋灭亡后，“江南新附……强籍新民以为奴隶”，蒙古贵族也曾圈占汉族农民的土地作为牧场。这些野蛮做法，引起了汉族农民的强烈反抗，在各族人民起义的打击下，蒙古贵族感到他们的统治方式不适应汉族地区的情况，迫使他们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元世祖统治时期，积极推行“汉法”，不断下诏要蒙古军民在中原进行农耕，禁止破坏禾苗桑枣；禁止掠民为奴尹不准买卖人口，“卖买者两罪之，官没其值，人复为良”；在政治上也沿袭汉族封建统治制度，颁布成文法律《至元新格》，使官员有法可循，改变了政治混乱局面。元世祖还大力兴办学校，提倡蒙古人学习汉文化等。这些改革，促使蒙古族很快完成了封建化的进程，使其统治与汉族地区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相适应，从而促进了蒙汉民族的融合，对元朝经济的恢复发展，有积极的意义。这些都是农民起义推动的结果。

（三）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元朝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让步政策，

以缓和阶级矛盾。

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封建统治者一般都采取某些让步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元朝也不例外。导致欧南喜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元朝政府的食盐专卖，这次起义，直接打击了元的食盐政策，因此，在镇压起义后，参与镇压起义的官员便提出“请革盐法之不便者，并劾按察使脱欢奸利之事，罢之。”钟明亮起义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7月，元朝政府“以南安（今江西大庚）、瑞（今江西高安）、赣（今江西赣州市）三路连岁盗起，民多失业，免逋税万二千六百石有奇”。同年12月，泉州爆发起义，元朝政府也下令“免泉州今岁田租。”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8月，世祖下诏：“彬（今湖南彬县）之宜章为广东寇所掠，免今岁田租。”瑶族人民起义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2月，世祖下诏：“江西贼华大老，黄大老等掠乐昌诸郡……

常宁州（今湖南常宁）民遭群盗之乱，免其田租。”钟明亮再次起义后，至元二十七年（1390年）3月，世祖下诏：“以建昌路广昌县（今属江西）经钟明亮之乱，免其田租九千四百四十七石。”同年6月，因“广州增城、韶州（今广东韶关市）乐昌以遭畲贼之乱，并免其田租。”这些诏令中所免田租，是指土地税赋，并非地主所收地租。蔡五九起义，直接打击了元朝官员在“经理田粮”中“虚张顷亩”，增加税赋的反动行径，因此，在镇压起义之后，延祐二年（1315年）12月27日，仁宗下诏：

“江西、福建因值贼人蔡五九，李社长作乱……百姓合该夏税秋粮，自延祐二年为始，与免二年。若已纳到官者，准下午数。”这样的免税减租诏令，在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屡见不鲜。免税、减租，虽然不可能根本改变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但对于在饥饿中挣扎的农民来说，则可以多少改善一下生活和生产条件，这对社会经济发展也是有利的。

总之，元朝前期、中期的农民起义，打击了蒙古贵族的统治，遏制了元朝一系列反动政策的推行，使其不得不采取一些让步政策，以减轻对农民的压迫剥削。在人民的辛勤劳动下，元朝的社会经济因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第十三章 元末农民战争

第一节元末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白莲教的传播

一、开河、变钞激化了阶级矛盾

元朝社会中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趋激化，终于导致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收有一首《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这首小令不知为何人所作，但流传很广，"自京师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谣，以其有关于世教也，今此数语，切中时病。"掏宗仪为元末明初人，他亲眼看到了元朝的社会状况，认为小令所写"切中时病"。考之史实，也确实如此，引起元末社会矛盾走向激化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开河"与"变钞"两项。

元朝时，奸佞专权，政治腐败，不注意水利的兴修，因此，经常发生水灾，特别是黄河，为害最大。至正四年（1344年）5月，大雨连下二十多天，由于河堤失修，黄河暴溢决口，平地水深两丈多，北决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6月，又北决金堤，造成特大水灾，沿河郡邑，如济宁路（今山东巨野），单州（今山东单县）、虞城（今河南虞城北）、砀山（今属安徽）、金乡（今属山东）、鱼台（今属山东）、丰县（今属江苏）、沛县（今属江苏）、定陶（今屑山东）、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成武（今属山东），以至于曹州（今山东菏泽市）、东明（今山东东明南）、巨野（今属山东）、郓城（今属山东）、嘉祥（今属山东）、汶上（今属山东）、任城（今山东济宁）等处皆受水灾，"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溢出的河水北入会通运河，又使运河决口，济南路（今山东济南市）、河间路（今河北河间）

的一些州县遭受水患。大水过后，农田颗粒不收，8月，山东已经"民饥相食"；随后又发生旱灾、蝗灾、瘟疫。余阙说：

"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田莱尽荒，蒿蕀藜没人，狐兔之迹满道。"严重的灾害，使人民大量死亡，土地荒芜，饥民数百万，挣扎在死亡线上。

黄河决口，不仅给广大人民带来灾难，同时，由于运河淤塞，也影响了漕运，江南粮食不能北运大都（今北京市），京师出现粮荒。再者，河决不修，也"坏两漕司盐场，妨国计甚重"，漕运、盐场遭到破坏，使元政府的收入大为减少，财政发生危机，元廷深以为患，至正九年（1349年）冬，脱脱再任丞相，力主治河，顺帝集百官廷议，都漕运使贾鲁亦言当治，并提出具体修治方案。至正十一年（1351年）乃任命

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市）、大名（今河北大名南）等十三路民工十五万人，以庐州（今安徽合肥市）等十八翼两万多军队进行监督，调往河上，进行大规模治河。贾鲁的治河方案是“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即开齿黄陵岗一带白茅新河，堵塞决口，使河水经徐州东会淮河入海。

连年的黄水泛滥和各种自然灾害，已给黄河沿岸人民带来灾难，现在又被强迫征发去开河，这等于火上加油，人民怨声载道。民工到达工地之后，他们的粮食和工钱又受到治河官吏的克扣，处在半饥饿状态中的河工，在军队的皮鞭下，从事极沉重的劳动，人民愤怒极了。

元顺帝统治时期，由于皇室、贵族、官僚们竞相奢侈浪费和皇帝滥行赏赐，终于造成了国库空虚，出现财政危机，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元朝统治者便企图通过变更钞法，用嫁祸于劳动人民的办法解决，至正十年（1350年）11月，元顺帝下诏“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对变更钞法，当时也曾有人反对，但无济于事。在权臣右丞相脱脱的主持下，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10月，设宝泉提举司，鼓铸至正通宝钱，并印造至正交钞，令民间通用。但实际上鼓铸铜钱甚少，主要印造交钞，竟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交钞、宝钞并行，比值不同，交钞为宝钞的一倍，因此，变更钞法，人民以“钞买钞”，宝钞贬值一半，政府发行交钞，实际上成为从人民手中搜刮宝钞的一种手段。更由于发行交钞数量太多，“行之未久，物价腾贵，价逾十倍”，造成物价飞涨，京师交钞十锭（五百贯），竟买不到一斗粟，人民视交钞如废纸，“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总之，变钞使人民受到一次空前的浩劫，而“因用遂乏”，元朝政府的财政走向崩溃。

“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根本原因，虽然是元朝的社会矛盾，但开河变钞却是促使社会矛盾激化的导火线，直接导致了元末红巾大起义的爆发。

二、白莲教的传播

白莲教，又称白莲宗，其渊源为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得名于东晋庐山东林寺僧慧远所建的白莲社。南宋绍兴（1131—1162年）年间，昆山（今届江苏）僧人茅子元（法号慈照）创立了白莲宗，即白莲教。

白莲教崇信阿弥陀佛，其教义比较简单，认为信徒只要不断地念阿弥陀佛，死后即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还要求信徒做到三皈（皈佛、皈法、皈僧）、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由于它的教义。戒律简单易懂，因而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为了发展巩固白莲教组织，茅子元建立了一套师徒关系，宗门关系，他在昆

山淀山湖建白莲忏堂，作为白莲教的中心，自称导师，坐受众拜，其徒众以“普、觉、妙、道”四字排辈命名，这样就建立了密切的师徒关系。从此，白莲教就不再象白莲社那样松散，而形成了打较为严密组织的教门。另外，白莲教为了更广泛地吸收信徒，它还改变了僧人必须出家的旧传统，接纳有妻室的人为僧，这些人木穿僧衣，不剃发，可以娶妻生子，专靠传教吃饭，成为一种职业僧人，当时被称为“在家出家”，或称“有发僧”。这样，就大大便利了白莲教的传播，许多人因为它的教义通俗易懂，又不必出家而入白莲教门，僧徒逐年增多。

白莲教在南宋时已传到北方，元朝统一后，对各种宗教采取保护政策，白莲教因而得以更为广泛的传播，时“南北混一，盛益加焉。历都过邑，无不有所谓白莲堂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更少犹数十。”白莲教的发祥地庐山东林寺也受到保护，元贞元年（1295年），元成宗还封其住持祖訚为白莲宗主，茅子元创建的淀山白莲堂也扩建为普光王寺。十三世纪末，白莲教进入其发展的全盛时期，东林寺、普光王寺是它的两个中心。

元至十七年（1280年）4月，在江西都昌爆发了白莲教徒杜万一领导的反元武装起义。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广西柳州爆发了高仙道的起义。稍前几年，在彰德（今河南安阳）还爆发了朱帧宝领导的起义，他们均以白莲教的名义发动起义。白莲教的一连串起义，使元政府大为震惊，至大元年（1308年）5月，武宗下诏、以白莲教徒“夜聚明散”，“煽惑人众”，娶妻生子，身子不净等为由，下令取缔，“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许多白莲道人因此而家破人散，白莲教受到沉重打击。随后，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武宗死，仁宗即位，当年7月，曾解除白莲教之禁，但至治二年（1322年）又下令禁止白莲教。经过这两次打击，白莲教徒人数减少，并被迫转入秘密状态。

元末北方白莲教的首领是韩山童，他出身于白莲教世家，其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今属河北）”，遂为永年人。韩山童继承祖业为北方白莲教主，他宣传天下将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世间就太平了。这些宣传大大超出了“往生净土”的教义，赋予了积极的政治内容，它使处于元朝黑暗统治下的苦难人民看到了光明，有了希望。过去幻想到西方净土去参拜弥勒佛，现在佛的化身明王就要来到人间，人民将会过上幸福的日子。韩山童的这一口号，争取了群众，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当时“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白莲教秘密广泛传播开来，信奉者越来越多，教徒布满中原。

南方白莲教的首领是彭莹玉，他原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南泉山慈化寺东村庄民家子，十岁入慈化寺为僧，十五岁开始以南泉山泉水为人治病，“疾者皆愈，以故袁民翕然，事之如神”，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他以行医疗病为手段，秘密传播白莲教。至元四年（1338年）他与徒弟周子旺曾在袁州起义，起义者背心皆书佛字，以为有佛字者，刀兵不能伤，有众五千多入，周子旺自称周王。这次起义，很快遭到元兵的镇压，周子旺及其母亲、儿子天生、地生皆被杀害。彭莹玉脱身逃往淮

西，在民间隐藏下来，有司虽严加搜捕，但当地人民多方掩护，“卒不能获”。在群众的保护下，彭莹玉继续在淮西一带秘密传播白莲教，为了逃避官方的追捕，他多次改名，故有彭翼、彭国玉，彭和尚等称号。为了传播白莲教，彭莹玉跑遍淮西各州县，江西、湖南、湖北许多地方，都有他的足迹，大江南北的白莲教徒都尊他为彭祖。他是南方白莲教的首领。在传教过程中，彭莹玉提出了“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的口号，这—口号对发动长江中游地区的农民参加武装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韩山童、彭莹玉经过十几年的宣传活动和艰苦细微的秘密组织工作，把黄河两岸、大江南北的广大贫苦农民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并且培养出了一大批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为元末农民大起义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第二节元末农民大起义的

爆发和初期斗争

一、韩山童、刘福通颖上首举义旗

至正十一年（1351午），元朝政府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发十五万民工修治黄河时，北方的白莲教徒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动，韩山童、刘福通等看到十几万民工聚到一起，这是发动起义的一个有利时机，于是便决定起义。

韩山童暗地里让白莲教徒到黄河工地上服役，以合法的形式将起义的骨干力量集中起来，并在河工中积极宣传“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又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同时，特地雕成一个独眼石人，在其背上刻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大字，暗中埋在即将掘开的黄陵岗黄河敌道上。当开河挖出了一只眼的石人时，河工们惊诧不已，奔走相告，轰动了整个工地。消息传出，大河南北，人心浮动，起义的条件成熟了。

至正十一年（1351年）5月，韩山童与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在颍上（今属安徽）集会，聚众三千人，“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准备起义，刘福通宣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他们还宣传南宋广王赵昺走厓山，丞相陈宜中逃亡日本，因而发布诏书，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现在要恢复宋朝。

“贫极江南，富称塞北”，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元朝的社会矛盾。

“贫极江南”，是说广大汉族人民在蒙古贵族的压迫剥削下纷纷破产，贫困到了极点：“富称塞北”，是原居塞北的蒙古统治者通过兼并土地和搜括财富，一个个成了大富翁。这一口号，把民族斗争和阶级矛盾密切地结合了起来，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但是，正当积极准备起义时，却走漏了消息，元兵前来镇压，韩山串被俘牺牲，其妻杨氏、子林儿逃亡武妥山（今江苏徐州附近）

中，刘福通等也逃出了重围。

5月三日，刘福通再次起兵，并一举攻占颍州，起义队伍主要由白莲教徒组成，他们头裹红巾，烧香拜佛，因而被称为“红巾军”，也称为“香军”。为了便于吸引更多的人入红巾军的反元起义，刘福通打出了“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明确地表示要打到大都去，推翻蒙古贵族的统治，恢复大宋汉族政权。这面战旗，吸引了更多的群众走上了起义道路，红巾军的队伍迅速扩大。

刘福通起义后，元朝政府命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领阿速军六千及

各路汉军，由河南行省徐左丞协助前往颍上，镇压红巾军。阿速军是由回人组成的军队，“素号精悍，善骑射”，但赫厮等人“但以酒色为务，军士但以剽掠为务”，因此不敢与红巾军对抗，“赫厮望见红军阵大，扬鞭曰‘阿卜!阿卜!（走!走）”临阵逃跑。后赫厮败死于上蔡，徐左丞也因损兵折将被先廷处死。刘福通乘胜攻占亳州（今安徽亳县），杀元徐州兵马使秃鲁。6月，攻占项城（今河南项城南）、朱皋（今河南固始北）、罗山（今属河南）、真阳（今河南正阳）、确山（今属河南）等城，并派兵攻舞阳（今属河南）、叶县（今属河南）等地。

赫斯的阿速军失败后，同年9月，元顺帝又令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卫王宽彻哥率领十万元军围攻刘福通起义军。12月，也先帖木儿攻占上蔡县城，农民军韩咬儿被俘牺牲。

至正十二年（1352年）3月，元兵又攻陷汝宁。闰3月，元廷以平章巩卜班为统帅，率侍卫汉军合爱马鞑靼军，合兵数万，屯汝宁沙河岸，但他不敢与农民军交锋，“日夜沉溺酒色，醉卧不醒”。刘福通夜来袭营，元兵大乱，自相残杀，四散逃命，巩卜班下落不明，天亮收尸，得其尸死人中。元军溃退数百里，一直逃到项城。巩卜班死后，元顺帝又任也先帖木儿为统帅，统精兵三十余万，“金银物帛车数千辆，河南北供亿万计，前后兵出之盛无如此者”，妄图一举扑灭红巾军。但是，在巩卜班败死之后，元兵已成惊弓之鸟，不敢与红巾军对阵，所以，当进驻沙河后，元兵便不敢前进了。相持不到两月，1日元兵夜惊，四散奔逃，粮食、军资、车辆丢弃如山积，也先“仅收散卒万人，直抵汴梁城下”。红巾军取得了反围攻的巨大胜利。

二、徐寿辉、赵普胜蕲州起义

刘福通颍州起义后，对南方的白莲教徒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们感到时机已经成熟，至正十一年（1351年）8月，在徐寿辉、邹普胜领导下，于蕲州（今湖北蕲春南）也发动了起义。徐寿辉，初名真一，蕲州罗田人，以贩布为业，往来于蕲州、黄州（今湖北黄冈）之间。赵普胜是一个铁工，经常为人打制生产工具，他们的职业为其联系群众提供了方便。赵普胜宣传“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在群众中很有威望；徐寿辉生得“相貌异众”，起义时被推举为首领。为破除封建统治者散布的天命论思想和坚定起义群众的胜利信心，徐寿辉也象陈胜、吴广起义“鱼腹丹书”、“篝火狐鸣”那样，起义时以神道设教的形式发动群众，“构圣人堂于多云山中，溪水日再潮，溪旁有巨石，状类舣舟，寿辉命筑一穴，判桅其上，祝之曰：‘天祚寿辉，石当扬飘出溪口’。石为行十余丈。寿辉遂决意反。”这一戏剧性的活动，不一定真实，但在当时却发挥了作用，它坚定了农民群众的胜利信心，轰轰烈烈的南系红巾军大起义在蕲州爆发了，他们也头裹红巾，称红巾军。

蕲州起义后，红巾军队伍很快扩大，9月，攻占蕲水（今湖北浠水），杀蕲州总管李孝先。元朝统治者获悉后，急令镇守武昌的威顺王宽彻普化前往镇压。宽彻普化与其子别帖木儿、答帖木儿率领王府亲兵

和新招募的士兵前往蕲水，结果在金刚台被红巾军将领倪文俊打得大败，别帖木儿也被生俘。初战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巾军战士的斗志。从此，他们以更大的革命热情和勇气，向元朝反动势力发动了更加猛烈的进攻。

10月，为便于领导南系红巾军的反元斗争和进一步号召广大群众，徐寿辉称皇帝，“颁万寿历，建元治乎，国号宋。”以蕲水为都城，后又改国号为“天完”，取压倒“大元”之意，图个吉利。天完政权的中央机构，从已发现的天完铜印来看，与元朝相似，中央有中书省，初称莲台省，设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中书省之下，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在中书六部之外，是否还有抠密院、御史台、翰林院等机构，限于资料不足，还不能完全证实。天完政府也象历代王朝一样，为对开国元勋表示尊崇，设置了三公等作为大官加衔，如赵普胜曾被封为太师，欧普祥为大司徒等；其地方行政机构，是以后随着占领区的扩大而逐渐建立起来的，最高机构为行省，从现在已发现的天完铜印和文献资料来看，曾经设立过江南行省、汴梁行省、陇蜀行省、江西行省等；省以下的行政机构，也仿效元朝制度，有路、府、州、县之设，但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天完的军事机构，是否有地方行枢密院之设，由于缺乏史料，也不清楚，但由实物与文献资料证明，它设有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管军千户所、管军百户所，设元帅、总竹、万户、千户、百户等职。天完政权机构的建立，使白莲教徒的起义逐渐脱去宗教的外衣，使南方各地进行武装反元斗争的教徒由分散行动逐渐走向统一指挥。

三、方国珍浙东起义

方国珍，又名方谷珍，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明史》本传称其“长身黑面”，“力逐奔马”，可见是一条健壮的汉子。至正八年（1348年），黄岩一带发生了蔡乱头为首的起义，“行剽海上”，元兵前往镇压，追捕不获，便株连平民。方国珍的冤家陈氏，借机诬他与蔡通，官府派人索捕，国珍大惊，乃向官府行贿求免，但“屡倾资贿吏，寻扑如初”，无济于事，国珍计穷，且无以自白，乃杀冤家陈氏，与其兄国璋、弟国瑛、国珉、侄亚初等聚集避难贫民数千人，逃亡海上，劫夺海运粮船，扣押海运官员，掀起了武装反抗先朝统治的斗争。

方国珍起义后，元顺帝诏江浙参政朵儿只班率舟师镇压，追至福州五虎门，“国珍知事危，焚舟将遁，官军自相惊溃，朵儿只班遂被执”。由于元兵自溃，起义军反败为胜，一举生俘参政朵儿只班，取得很大胜利。方国珍的起义，并非为反压迫，反剥削，乃系为私家报仇，实出于无奈，因此，他没有把推翻元朝统治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而一心追求的是官位、地盘。正因为如此，所以当俘虏朵儿只班后，他不仅没有杀掉他，相反还将其视为“奇货”，把他当作了向元廷讨价还价的法码。为了求得官位，方国珍迫使朵儿只班上书朝廷，让元顺帝下招降之诏。元朝中央感到无力消这运支起义力量，又怕切断海运，乃下招降诏书，授

他庆元定海尉。方国珍虽然接受了元朝官位，返回了家乡，但其起义军却并未解散，不久，方国珍又起兵反元。

至正十年（1350年）5月，“方国珍剽掠至大、小笛雪，宜慰司移檄元帅扈海，率万户孙昭毅等往捕，师溃于水澳”，元兵大败，连元帅扈海也成了俘虏。12月，方国珍更“烧掠沿海州郡”。至正十一年（1351年）2月；元顺帝诏令孛罗帖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会同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泰不华，夹击方国珍。

6月，孛罗帖木儿与泰不华合兵围攻起义军，孛罗帖木儿先期到达大闾洋，方国珍侦知孛罗孤军深入，乃“夜率劲卒纵火鼓噪，官军不战皆溃”，孛罗帖木儿被擒，其全军覆没，起义军取得巨大胜利。随后，孛罗帖木儿又“为国珍饰词上闻”，要求朝廷招安。元廷遣大司农达识帖木儿至黄岩招降，国珍登岸罗拜，被授予千户，其他兄弟也“授官有差”。

至正十二年（1352年）3月，元“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师守大江，国珍怀疑，复入海以叛”。方国珍再起后，泰不华发兵扼守黄岩之澄江（今福建灵江），又派王大用劝降。方国珍将王大用扣押，以小舟二百艘袭击海门，进占州港，攻马鞍诸山。泰不华率兵乘潮而进，船触沙，不能行，被起义军包围，激战中，泰不华被刺身死，被沉尸于海？其部下全部被歼。

孛罗帖木儿、泰不华两支元兵被歼，元廷大惊，急忙调兵遣将防守浙东。同年闰3月，升左答纳失里为浙省左丞，以吴世显为浙东同知元帅，与浙东添设都元帅章保同守温州，黑的儿为福建同知元帅，与浙省副帅也忒迷失同守台州。5月，又命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纳麟于台州招集地主武装，共同“夹攻方国珍”。6月，方国珍攻占黄岩城，复乘海船攻掠乐清、瑞安一带。8月三日，方国珍又攻占台州（今浙江临海）。方国珍降而复叛，不过是向元朝政府讨价还价的手段，因此，他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却依然不忘招安，为了求得更高的官位，他还派人潜入大都（今北京）贿赂朝中权贵。至正十三年（1353年）3月，元廷又命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儿，江南行台御史左答纳失里招降方国珍，经过讨价还价之后，二人代为申请五品流官，同年10月，元朝政府授方国珍徽州路治中，国璋广德路治中，国瑛信州路治中。至正十四年（1354年）复叛，拥有战船二千三百多艘，“据海道，阻绝粮运”，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南北交通，不时攻掠沿海州县。

四、张士诚泰州起义

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今江苏东台县境）亭人。

有兄弟三人，并以操舟运盐为业，缘私作奸利”，是运盐专业户兼私盐贩。运盐户经常受到官府和富豪的欺压，必须经常向他们送礼行贿，才能维持生计，如仓官，“凡遇纲船到仓，必受船户之贿，纵其杂和灰土，收纳入仓，或船户运至好盐，无钱致贿，则故生事留难，以致停泊

河岸”，使船只不能按期返回，枉费盘费，加重运户的负担。贩运私盐，是违法的，元朝规定，私贩者要“徒二年，决杖七十，财产一半没官。”夹带私盐，也属犯禁，因此，他们更必须向各地官员，富豪行贿才能混过去，自然，官员、富豪们就乘机对他们敲诈勒索。张士诚“常鬻盐诸富家，富家多凌侮之，或负其值不酬，而弓手邱义尤窘辱士诚甚”。封建官僚、地头蛇们的欺压，使张士诚逐渐产生了造反报仇的念头。刘福通起义后，他感到报仇的时机到了，于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士诚乃“帅诸弟及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起义，并灭诸富家，纵火焚其居”，发动了武装起义。

当时，“盐丁方苦重役”，张士诚稍加联络，他们便热烈响应起义，并共推张士诚为主，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上万人，几个月的时间，就攻占了泰州（今江苏泰州市）、兴化（今属江苏）、高邮（今属江苏）等城，并结寨于德胜湖。

张士诚一起义，就遭到当地地主豪绅武装的镇压。大地主刘子仁在丁溪阻击张士诚，激战中，士诚的二弟士义中箭牺牲，士诚带领起义队伍，“愤怒决战”，转败为胜，刘子仁仓皇逃入大海。元淮南江北行省获悉张士诚起义，派兵前来镇压，结果也被张打败。在军事镇压失败之后，元朝统治者又派出高邮知府李齐进行“招谕”，并许以官位。张士诚表示接受元朝政府所授“民职”，但随后他发现元朝兵力薄弱，便乘元兵不备，杀元淮南江北行省参知政事赵琏、知府李齐，复起。

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月1日，张士诚在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佑”，建立了政权。张士诚“出狱囚，蠲民逋”，解放了关在监狱中的劳动人民，免除了人民所欠赋税，平日欺压人民的官员，豪绅许多人被处死，高邮一带人民拍手称快，官僚土绅闻风丧胆。地主文人张蜕庵曾写诗描述当时的情形，“高邮自昔号铜城，一旦东门委贼兵。杀气仓皇迷野色，怨魂呜咽泣江声。广陵琼树春仍在，甓社珠光夜不明。白首故人悲赵李，临风唯有泪纵横”。表达了地主分子在农民铁拳打击下无可奈何，只能向隅而泣的情绪。

元朝统治者招降失败后，6月6日，元将达识帖睦迩又率兵来攻，结果被张士诚打得大败，“诸军皆溃”。元顺帝下诏令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佛家闾发兵相助，也无济于事，又为张士诚击败。9月，元顺帝见张士诚起义军的力量日益壮大，乃命“脱脱以太师、中书省右丞相总制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出征高邮”，一切军资、衣甲、器仗、粮食、柴薪等，均取自江浙。11月，脱脱带领数十万大军，水陆并进，到达高邮境内。张士诚率军迎击，激战失败，退入城内，元军包围高邮城，并分兵侵占六合。元枢密院判官董抟霄率领水兵随脱脱南犯，进占盐城，兴化，随后，张士诚的水军又在大纵。德胜两湖战败，十二个水寨，全为元兵侵占，不得不渡过淮河，转移到安东州（今江苏涟水）。元水兵尾追，又败，安东亦为元兵侵占，农民军损失很重，脱脱率领的元兵号称百万，还借来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军队，史称：“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元兵猛攻高邮，并一度爬上城墙，张士诚

指挥起义军日夜坚守，形势极为紧张。

正当高邮战役处于白热化的时候，由于元朝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书右丞相哈麻却使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等上书元顺帝，弹劾脱脱“出师3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结果以“坐视寇玩”罪，脱脱被“削去兵柄，安置淮安路”。脱脱撤职的消息传到高邮城下后，元兵大为震惊，顿时谣言四起，将领人人自危，各谋出路，无心再战，张士诚借机反击，元“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附者，多从红军”。元兵四散溃逃，许多人投入起义军。高邮保卫战取得了巨大胜利，使起义军转危为安。

五、其他农民起义

除上述几支义军外，其他地区还有一些起义军，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8月李二、赵君用起义；十—月王权起义；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孟海马起义；二门郭子兴起义等。

李二，邳州（今江苏邳县北）人，“值岁饥，其家惟芝麻一仓，尽以赈人”，从此人称他为芝麻李。刘福通起义后，他联络邻人，社长赵君用、樵夫彭早住等八人，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

8月10日起义。起义前他们作了周密的计划，四人“佯为挑河夫”，进入徐州城内潜伏下来，夜半，四人在城内放起火来，城外四人亦放火响应，顿时城内外火光冲天，喊杀声震地，他们夺取元兵武器乱杀，元兵遭此突然袭击，秩序大乱，在黑夜中互相攻杀，元官兵四散奔逃，他们很顺利地占领了徐州城。“天明，又树大旗，募人为军，从之者亦百万余”。许多贫民参军，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很快攻占了徐州周围的宿州（今安徽宿县），五河（今属安徽）、虹县（今安徽泗县）、丰沛（今江苏丰县、沛县）、灵壁（今属安徽），并西下安丰（今安徽寿县南）、濠州（今安徽凤阳）、泗州（今江苏盱眙）等地，队伍扩大到十万多人。

至正十二年正月，元顺帝令逯鲁曾为淮东添设元帅，统领两淮所募盐丁等三万多人，围攻徐州芝麻李起义军。9月，元丞相脱脱为取得战功以提高自己的身份，也来到徐州。元军以优势兵力合攻徐州，红巾军虽然进行了英勇抗击，但终因寡不敌众，9月21日，徐州城破。元军进城后，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芝麻李虽然突围，但一个多月后，他又被俘，“械送京师，脱脱密令人就雄州杀之”。徐州失陷后，赵君用、彭早住率领余部奔潦州，往依孙德崖、郭子兴。脱脱令元将贾鲁与月哥察儿围攻濠州，红巾军合力坚守。至正十三年（1353年）5月，因主将贾鲁死，元兵退去。潦州解围后，彭早住称鲁淮王、赵君用称永义王，二人反客成主，郭子兴竟为其所制。随后，彭、赵二王又互相火并，战士多死，早住亦亡，起义军削弱了自身的力量。

布王三，原名王权，因曾为布商，故人称他为“布王三”。

至正十一年（1351年）11月，他在邓州（今河南邓县）起义，12月，攻占邓州、南阳（今属河南），号“北琐红军”。随后，又攻占唐州（今河南唐河）、嵩州（今河南嵩县）、汝州（今河南监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市）等城。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孟海马起义，攻占襄阳，杀元总管柴肃，号“南琐红军，随后，又攻占房州（今湖北房县）、归州（今湖北秭归南）、均州（今湖北均县西）、峡州（今湖北宜昌）、荆门（今属湖北）等城。这两支红巾军主要活动于江汉流域，与刘福通的红巾军互为声援。自至正十二年（1352年）问3月开始，元朝统治者对布王三、孟马海为首的农民军也进行了大规模镇压，5月，答失巴都鲁攻陷襄阳，布王三被俘牺牲，北琐红军失败。北琐红军失败后，元军以优势兵力进攻南琐红军，因寡不敌众，孟海马一再失利，至正十四年（1354年）答失八都鲁攻陷峡州（今湖北宜昌市），南琐红军失败。

至正十二年（1352年）2月，濠州（今安徽凤阳）定远富豪郭子兴起义，占据濠州。郭子兴祖籍曹州（今山东菏泽市），后移居濠州，其父为术士，娶富户瞎女，家道日隆，至郭子兴辈，兄弟三人，已成为当地富豪。郭子兴“任侠喜宾客，会元政乱，子兴散家资，椎牛釃酒，与壮士结纳”，至正十二年（1352年）

春，集结群众数千人，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夺取濠州，并以濠州为根据地，不时攻打附近州县，成为淮水中游的一支重要反元武装力量。

另外，至正十一年（1351年），在郧县（今属湖北）有田端子起义；在陕西有金花娘子起义；在长山（今山东邹平东）有张虎山起义，聚众万余人；在邹乎县还有马子昭起义；至正十二年（1352年），在泸州（今属四川）爆发了王世昌的起义；至正十三年（1353年），在南海（今广东广州）有邵宗愚起义，并自称元帅，一度攻占南海城；至正十五年（1355年），东莞（今属广东）王成、陈仲玉起义。

这时，各地少数民族也纷纷起义。至正十二年（1352年），湖广苗民起义，一度攻占常宁（今属湖南）；钦州（今广西钦县）有僮族黄圣许起义，攻击钦州及灵山、安远二县；至正十四年（1354年），耒阳（今属湖南）瑶族人民起义，曾进攻衡州（今湖南衡阳市），杀元万户许脱因等。这说明，各少数民族也不堪忍受元朝统治，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各族人民互相支持，并肩战斗，他们为推翻元朝黑暗统治都作出了贡献。

第三节龙风政权领导的反元斗争

一、龙凤政权的建立

在河南行省战场上，当蒙古军被刘福通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的时候，两支地主武装却在这时崛起了，这就是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的所谓“义兵”。察罕帖木儿，畏吾儿人，其曾祖于元初迁居中原，为颍州沈

丘（今安徽临泉）人，察罕帖木儿原为沈丘探马赤军。李思齐，信阳罗山（今属河南）人，为罗山县典史。罗山被红巾军攻占后，他们纠集地主子弟，组成“义军”，袭占罗山县城。元顺帝对其进行嘉奖，封察罕帖木儿为汝宁府（今河南汝南）达鲁花赤，李思齐知汝宁府。这两支地主武装专门与红巾军为敌，附近州县的地主恶少和散兵游勇，也纷纷投到他们部下，“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其人数很快扩大。他们不断袭击农民军，许多城镇也被他们占领，对刘福通红巾军造成很大威胁。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元顺帝又调兵遣将，“命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洪丑驴守御河南、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述律朵儿只守御潼关，宗卫扎牙失里守御兴元（今陕西汉中），陕西行省参知政事阿鲁温沙守御商州（今陕西商县），通政院使朵来守御山东……闰（正）月，……命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塔失帖木儿领元管陕西兵马，守御河南”，从各方面加强河南的兵力，以答失八都鲁、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为机动部队，妄图对刘福通进行大包围，消灭河南地区的红巾军。但是，刘福通并没有被元兵的气势凶凶所吓倒，他巧妙地运用兵力，声东击西，以少胜多，打破了敌人的“围歼”计划。

为了团结各地起义军和进一步粉碎元兵的围攻，同年2月，刘福通将韩山童之子韩林儿由砀山（今属安徽）夹河迎至亳州（今安徽亳县），拥立为皇帝，又称“小明王”，建立了政权，国号宋，改元龙凤。“小明王”即白莲教宣传的“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意思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已经到来，人们将会过上幸福的日子。龙凤政权在中央建立了中书省、枢察院、御史台和六部等政权机构，以韩林儿的母亲杨氏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刘六知枢密院事，拆鹿邑县（今属河南）太清宫材料修建宫阙。在地方上，随着农民军占领地区的扩大，还陆续建立了行中书省和府、县地方行政机构；军事方面逐步设立了行枢密院，下统各地的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等，上统于中央沤密院，军职则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统军元帅等等。

龙凤政权的建立，大大鼓舞了北方的农民起义军，各支队伍团结到“小明王”周围，向元朝统治发起了猛烈攻击。

二、北方红巾军的三路北伐

龙凤政权建立后，元朝统治者十分惊慌，立即从各方面调集军队加紧镇压。至正十五年（1355）6月，元顺帝又任命答失八都鲁为河南行省平章，“统率太不花一应诸王藩将兵马，许以便宜行事”。9月，答失八都鲁进犯许州长葛（今河南长葛县东北），与刘福通展开野战，结果元兵大败。答失八都鲁收拾残兵，退往中牟，立脚未稳，刘福通率轻骑劫营，又败，辎重尽为红巾军所夺，其子孛罗帖木儿，也为红巾军生俘。但不久，农民军遭到元将刘哈剌不花的伏击，损失很大，辎重尽失，孛罗帖木儿也乘机逃跑了。刘福通乃以攻为守，派红巾军将领赵明远率兵攻下嵩州（今河南嵩县）、汝州（今河南临汝）、洛阳，并由孟津渡过黄河，11月，北破怀庆（今河南沁阳），黄河之北震动。元顺帝

急调察罕帖木儿防守河北，阻击红巾军，赵明远战败。12月，答失八都鲁向龙凤政权都城亳州，（今安徽亳县）进犯，刘福通在太康（今属河南）战败，元兵进围亳州，韩林儿迁都安丰（今安徽寿县）。至正十六年（1356年）3月，刘福通与答失八都鲁在亳州城下展开激战，“自己至酉，大战数合，答失八都鲁坠马，孛罗帖木儿扶令上马先还，自持弓矢连发以毙追者”，始得以逃命，红巾军大牲，元兵逃往陈留（今属河南），亳州转危为安。

亳州解围后，红巾军得以短暂的休整。刘福通看到河南元兵较多，为争取主动和分散元朝的兵力，至正十六年（1356年）9月，刘福通作出战略上的重大决策：打到外线去，分兵三路北伐。首先派李武、崔德率领一支红巾军西攻陕西；11月，又派毛贵带兵攻入山东。经过一段试探性进攻，山东一路进展顺利，攻占大片地区，陕西一路也取得了不少战绩。于是，至正十七年（1357年）6月，刘福通又派白不信、大刀傲、李喜喜等增援李武、崔德，西攻陕西；再派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等率领中路军北攻河北、山西一带。三路红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元政权发起了强大攻势，把农民战争推向了新高潮。

（一）西路军的战况

至正十六年9月，李武，崔德率兵西进，首先攻克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9月三日，大败元兵，杀参知政事述律杰，破潼关。5日，元豫王阿剌忒纳失里、同知枢密院事定住集中兵力来争潼关，经过一场激战，潼关又为元兵夺去。潼关是西进陕西的通道，在所必争，十9日，李武、崔德败元守将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家奴，又夺回潼关。阿剌忒纳失里复引元兵来攻，红巾军哉败，潼关又失。潼关的反复争夺，战斗激烈，双方损失都很大，红巾军为保存力量，暂时撤退，再占陕州、虢州（今河南灵宝）。潼关争夺战，使元朝统治者大为不安，他们深怕红巾军进入陕西，元知枢密院事、节制河南诸军答失八都鲁，企图消灭这支红巾军于河南，乃急令察罕帖木儿，李思齐西援陕州。在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的反扑下，陕州、虢州相继失守，红巾军乃北渡黄河，攻取平陆（今山西乎陆东南）、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但不久又遭到尾追而来的察罕帖木儿的袭击，损失惨重。

至正十七年（1357年）2月，李武、崔德领导农民军进行休—整后，避开元兵主力，从武关攻入陕西，破商州（今陕西商县），夺取天险七盘山（今陕西蓝田南），进据蓝田（今属陕西），前锋直至霸上，已经到达奉元（今陕西西安市）近郊。又“分道掠同（今陕西大荔）、华（今陕西华县）诸州，三辅震恐”。元朝统治者没有料到红巾军的行动会这样迅速，陕西的官员慌了手脚，“汹惧无言”，不知所措，守臣王思诚乃致书察罕帖木儿求援。

察罕帖木儿与李思齐率兵自陕州入潼关，红巾军战败，攻取奉元的计划未能实现。李武、崔德率领红巾军走南山，退往兴元（今陕西汉中市）。

至正十七年（1357年）10月，白不信、大刀傲、李喜喜等率兵进入陕西，攻占兴元、凤翔。察罕帖木儿、李思齐来攻，红巾军失利，南下退入四川。不久，红巾军又出四川，进入陕西，攻占秦州（今甘肃天水）、陇州（今甘肃陇县），占领巩昌路（今甘肃陇西），包围凤翔，但不幸中察罕帖木儿的内外夹击之计，红巾军“大溃，自相践蹂、斩首数万级，伏尸百余里”，遭受严重损失。随后，李喜喜等率农民军残部南撤武昌，投奔陈友谅。李武，崔德等转战于陕，甘地区，至正二十年（1360年）曾一度攻占宁夏路（今宁夏银川）、灵州（今宁夏灵武南）等地，但在元兵的不断围攻下，这支红巾军也日益衰弱，兵员得不到补充，粮食也很缺乏，处境十分困难。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5月，李武、崔德竟向李思齐投降了。

（二）东路军的战况

东路军是红巾军北伐的主力，其统帅为毛贵。毛贵原为徐州起义军赵君用的部下，至正十二年（1352年）9月，髓赵君用到濠州。至正十三年（1353年）6月，毛贵随赵君用离濠州，东攻盱眙（今属江苏）、泗州（今江苏盱眙北）一带，至正十六年（1356年）10月，赵君用攻破淮安路（今江苏淮安），杀镇南王孛罗普化，取得重大胜利。随后，龙凤政权设淮安等处行中书省，以赵君用为行省平章，从此，毛贵成为龙凤政权的将领。是年冬，毛贵奉命率军北伐。

至正十七年（1357年）2月，毛贵率起义军由海州（今江苏东海）入海，乘海船至山东半岛，27日攻下胶州（今山东胶州市）杀元佥抠密院事脱欢，3月12日，攻下莱州（今属山东），杀元山东宣尉副使释嘉纳。26日攻占军事重镇益都路（今山东青州市）、般阳路（今山东淄川），益王买努逃走。元朝统治者见山东形势紧急，乃调江淮行枢密院副使董抟霄为山东宣慰使，与元知枢密院事布兰奚一起率兵至山东，围攻红巾军，但均为毛贵击退。4月底，毛贵又攻下莒州（今山东莒县）、滨州（今属山东），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山东半岛大部分州县为红巾军占领。

髓后，毛贵又乘胜西进，“自南山来攻济南，望之两山皆赤”。

在红巾军的打击下，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裂，山东的一些地主武装纷纷向红巾军投降，如元朝防守黄河的义兵万户田丰，这年7月即向毛贵投诚，并挥兵攻占济宁路（今山东巨野）、东平路（今山东东平）、大名路（今河北大名）、东昌路（今山东聊城）等地，切断了元南北漕运通道——大运河。义兵千户余宝杀知枢密院事宝童，宣布起义，攻占棣州（今山东惠民）。至正十八年（1358年）2月29日，毛贵攻占济南，杀元守将爱的。至此，山东大部为红巾军占领，毛贵在山东的胜利，有力地支持了刘福通在河南的斗争。

为了进一步控制山东地区，龙凤政权设益都等处行中书省，以毛贵为平章。为了把山东地区建设成农民军北伐的根据地，毛贵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进行政权建设和发展生产。其主要措施有：第一、政治上，派遣官员建立地方政权组织。同时，为了收揽人才，设“宾兴院”，大量录用愿意为龙凤政权服务的人员，“以姬宗周等分守诸路”；第二、经济上，大兴屯田，发展生产。当时粮食奇缺，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和保证军粮供应，毛贵“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则陆运，夏则水运。”第三、军事上，置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加强设防，并在各地修建城池。据记载，平度州城、博兴县城、临朐县城、日照县城等，原皆残破不堪，毛贵组织人力进行重修，各城均高三丈，池宽一丈五六尺。通过上述措施，红巾军牢固地控制了山东地区。

至正十八年（1358年）2月底，毛贵由济南率兵继续北进。

进入河北地区后，首攻南皮，守将董抟霄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时已被提升为河南行省右丞，他还未来得及上任，便被毛贵北伐军包围于南皮县的魏家庄。困兽犹斗，这个双手沾满红巾军鲜血的家伙，虽已陷于绝境，但依然“拔剑督兵以战”，结果被红巾军乱枪刺死。随后，红巾军攻下清州（今河北青县）、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河间，据长芦镇。3月，毛贵“水陆并进，首尾相衔”，攻克蓟州（今天津市蓟县），前锋直抵漷州（今北京市通县境内）的枣林，柳林，杀枢密副使达国珍，离大都（今北京）只有一百二十里了。面对长驱北进的红巾军，各州县官员“惊惶四散，毫无斗志”，有的狼狈逃跑，有的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战。

元朝中央也一片混乱，有主迁都蒙古草原者，有主“迁都关陕者”，有主顽抗者……元顺帝急诏各地勤王，调兵入卫大都。

北伐形势大好，红巾军本可以乘胜前进，直取大都，但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毛贵却在战略上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没有直取大都，而采取了“固蒂自全”的方针，结果贻误战机，给敌人提供了调兵遣将的时间。当元朝精兵由河南赶来时，形势便发生了逆转，红巾军在柳林作战失败，中路军又迟迟未到，在力量对比上，农民军处于劣势，毛贵感到力量不支，退回了山东。事后，元朝官僚李士赡心有余悸地说：若红巾军“举全齐之众，乘破们之势，谕拙速之机，捣我无备，鼓噪长驱，则胜败存亡未可知也。”战略上的保守，失去了战机，导致整个战局恶化。

毛贵退回山东，河北州县尽失。不幸事件又接踵而来，至正十九年（1359年）4月，赵君用在淮安为元兵所败后奔依毛贵，毛贵以礼相待，但赵君用为了夺取最高权力，竟用阴谋手段杀害了毛贵。毛贵被杀，使山东红巾军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并导致了红巾军内部的分裂。正在远征辽阳的毛贵部将续继祖听到毛贵—被害的消息后，怒火万丈，7月，从海道回师山东，杀赵君用于益都。从此，赵君用部与毛贵部之间互相仇杀，益都、济南一带，陷于红巾军内部互相攻杀的混乱之中。

山东红巾军的分裂和内部的混战，不仅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而且给

元朝统治者提供了进窥山东的机会。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6月，元顺帝派察罕帖木儿率兵东犯，进攻山东红巾军，很快侵占冠州（今山东冠县）、东昌（今山东聊城）。8月，察罕帖木儿遣其子扩廓帖木儿及部将阎思孝、关保、虎林赤等率精锐五万自东阿（今属山东）南黄河上架浮桥，渡河攻东平，田丰部虹巾军二万人夺桥未成，元军得渡，长清失守，东平被围。察罕帖木儿“以田丰据山东久，军民服之，乃遣书谕以逆顺之理”，劝其投降，田丰见大势已去，竟投降了元朝。田丰降元后，升任山东行省平章，并大受奖赏。此后，田丰为先锋，又招降了驻守棣州的余宝、守东平的王士诚、守东昌的杨诚，“已而沿海登、莱、沂、密等皆降”，随即南陷太安，北陷济阳、章邱，进而包围济南。红巾军坚守济南三个月之久，后因叛徒刘硅降元，济南陷落。至此，山东大部地区为元兵占领，只剩下益都、莒州两座孤城，由毛贵部将陈猱头等坚守着。

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6月，田丰、王士诚等又杀察罕帖木儿，重新投归红巾军，加强了益都的守卫力量。但是，山东地区的元兵已大量集结，在力量对比上大大超过了红巾军，再加以山东发生蝗灾，粮食供应也十分紧张，这都为守卫益都带来了困难。为了摆脱困境，他们也曾向刘福通求援，但刘福通派出的两支授军在9月和11月都遭到元兵阻击，未能成功。这样，益都红巾军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坚守两个月后，元兵掘地而入，益都城失守了。田丰、王士诚被剖心处死，陈猱头等二十多位红巾军将领被押送大都杀害。关保也很快攻占莒州。至此，北伐东路军完全失败，山东又落入元兵之手。

（三）中路军的战况

北伐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即潘减）、冯长舅、沙刘二等率领。这支军队原归龙凤政权丞相盛文郁领导，主要在曹（今山东曹县）、濮（今山东鄄城一带）活动。至正十七年（1357年）9月，中路军北伐正式开始，他们越过太行山，进入山西，22日攻占陵川（今属山西），杀县尹张辅，26日攻下高平（今属山西）。闰9月，又占领潞州（今山西长治），指向冀宁路（今山西太原市）。元顺帝令察罕帖木儿率兵东调防守冀宁。红巾军进攻冀宁受阻，乃暂时退兵进入太行山休整。至正十八年（1358年）春，当时毛贵率东路军攻入河北，王士诚、续继祖等自益都出发，攻怀庆路（今河南沁阳），杀总管王德贞；3月，王士诚破晋宁路（今山西临汾市），杀总管杜赛因不花，这些战役牵制了元兵，支援了中路军。中路军这时也再度出击，分兵攻取绛州（今山西新绛）、沁州（今山西沁县）、冀宁、大同（今属山西）等地，进展很快，形势大好。但是，由于毛贵的东路军未能直攻大都而退回山东。这样，云集大都周围的元兵便把矛头集中指向了中路红巾军。5月1日，察罕帖木儿派董克昌侵占冀宁，5月八日，关保败红巾军于高平。6月13日关先生、破头潘等攻陷辽州（今山西左权），虎林赤率兵李夺，关先生向西转移，再次攻克冀宁路。9月，关先生攻保定路，不克，乃西破完州（今河北完县）。中路军由于受到元兵阻击，不能与东路军会师，乃北攻大同、兴和（今河北张北）等地。10月，关先生、破

头潘攻下大同后，进兵塞外，12月9日，攻破元上都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烧毁其宫殿。上都是元朝皇帝夏天避暑的地方，每年要在这里住半年之久，是元朝北方的政治中心，建有华丽的宫殿。红巾军攻占上都，对蒙古统治者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中路红巾军的胜利，鼓舞了草原上处在蒙古贵族统治下的各族人民，汪古部人民曾发动武装起义，响应红巾军，蒙古贵族赵王马扎罕吓得“微服遁去”。

至正十九年（1359年）正月，红巾军在上都停留7日后继续东进，攻破全宁路（今内蒙古昭乌达盟翁牛特旗），焚元鲁王宫府。13日，关先生、破头潘等又东破元辽阳行省省会所在地辽阳路（今属辽宁），杀懿州路（今辽宁阜新北）总管吕震。辽阳是元朝东北地区的政治中心，红巾军攻占辽阳，震动了东北地区。元左丞相贺太平奏请元顺帝，愿以其子也先忽都为总兵大将军，领兵取辽阳，他以为“关先生、破头潘自晋、冀、西京历上都，军常无留行，其破辽阳必不能守，可以取辽阳，则其子功成。至则关、潘军日治战马，一无退意。也先忽都畏之，缩迹不前，竟溃而归。”腐败的元兵不战自溃。

同年2月22日，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等红巾军将领致书高丽王，向他指出，红巾军：

“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梁，病者之遇药石，今令诸将严戒士卒，毋得扰民，民之归化者附之，执迷旅拒者罪之。”明确表示要进军高丽，解救处于蒙元统治下的人民。当时，高丽的统治者恭愍王与蒙古皇室通婚，关系密切，是元朝皇帝的忠实代理人，他们对元末农民起义军极端仇视，并曾派遣军队助元朝镇压张士诚。因此，红巾军进军高丽，也是为了进一步打击元朝统治。红巾军以辽阳为基地，积极进行出兵高丽前的准备工作，同时还派出偏师，攻占广宁（今辽宁北镇），4月1日又攻下金州（今辽宁金县）等地。

11月29日，红巾军前锋三千余人渡过鸭绿江，大败高丽兵。12月八日，平章毛居敬率主力四万多人，“冰渡鸭绿江”，攻占义州（今朝鲜新义州），杀其剐使朱永世等。9日，攻下静州，杀都指挥使金元凤，又破麟州、铁州。28日，红巾军攻占西京（今朝鲜平壤市）。红巾军的胜利进军，使高丽统治者“中外汹惧，京城皆为走计。”但是，这支红巾军是孤军深入，远离了后方，既缺少后备支援，又不熟悉高丽的情况，故难以持久作战，因此，当高丽王调集大兵进行反扑时，这支红巾军便逐渐由优势转为劣势。至正二十年（1360年）正月，红巾军在西京争夺战中失败，撤出西京，退屯龙罔、咸从一带。2月2日，高丽兵攻咸从，为红巾军击退。15日，高丽兵又来争咸从，红巾军杀开城知府辛富及将军李坚。红巾军损失亦重，大将沈剌、黄志善被俘，二万多人牺牲，红巾军退保甑山县，再败于古宣州，数百人战死，红巾军余部三百多人退回鸭绿江以西。3月，红巾军以战船七十多艘曾由海上进攻高丽西北沿海的丰州、凤州、黄州、安州一带，但均未得手。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10月20日，红巾军破头潘、沙刘二、关先生等十余万众再渡鸭绿江，攻朔州，11月，攻克抚州、安州，大败高丽兵，杀其上将军李荫、赵天柱，并发布檄文："将兵百十万而东，其速迎降"，要高丽王尽快投降。高丽王度不能敌，南逃利川，24日红巾军攻占王京（今朝鲜开城）

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正月，高丽将安佑、李芳实、黄裳、韩方信、李余庆、金得培、安遇庆、李寿龟、崔莹等率兵二十万反攻，17日进抵王京，18日攻城，红巾军力战，沙刘二、关先生战死，城破，破头潘率锁余众北道，渡过鸭绿江，返回辽阳。

高丽兵尾追，4月，红巾军在辽阳战败，破头潘被俘。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春，中路军余部尚有万人，在左李的率领下，西攻上都，又为孛罗帖木儿所败，损失严重，无力再战，降元。中路军至此失败。

红巾军的三路北伐，前后坚持了六七年之久，最后都失败了。

其所以失败，首先是由于缺乏统一指挥，三支军队各自为战，不能互相配合，这就分散了力量，终于被敌各个击破。其次，三支军队远离后方，千里往返，信息难通，他们长期在外流动作战少除东路军外，都没有建立起根据地，没有后方的支持，这样的战争是难以持久的，要取得胜利也是很困难的。再者，红巾军内部某些将领的自相残杀和叛变投降活动，也大大削弱了红巾军自身的力量，从而促使了失败。例如，赵君用之杀毛贵，续继祖杀赵君用，以及李武、崔德的投降和田丰、王士诚等人的叛服无常，都给农民军带来极大的危害，加速了北伐的失败。

三路北伐虽然失败了，但给蒙元统治者的打击还是沉重的。

红巾军的三路北伐，渡过黄河，东到朝鲜，西到陕、甘、北出长城，在纵横数千里的范围内向元朝统治者展开了殊死搏斗，上都宫殿为红巾军焚毁，大都也受到严重威胁，许多统治据点处在红巾军的包围之中，使元朝统治者惊恐万状，有人竟发出了"国破将如之何？"的哀鸣。可见三路北伐对元朝统治者的打击是何等沉重。

三、刘福通、韩林儿的最后失败

至正十六年（1356年），刘福通派出三路红巾军北伐后，元朝统治者不得不抽调一部分兵力阻击进入山东、陕西等地的红巾军，元主力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部因而都离开了河南。这样，刘福通为首的中央红巾军所受压力减少，从而便开始主动出击，攻占了河南一些州县。至正十七年（1357年）6月，刘福通以"复宋"相号召，进攻汴梁（今河南开封市），汴梁城高池深，未能攻下。同年8月，刘福通攻克大名路（今河北大名）、卫辉路（今河南汲县），败元河南行省平章答失八都鲁，占领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地区，形成了北取大都的态势，元顺帝急调知枢密院事答理麻失里率兵往援，刘福通在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大败元兵，杀答理麻失里。答失八都鲁一败再败，"力不能支，退驻石村"，

元廷疑其“玩寇失机”，一再催其进击，答失八都鲁心不自安，红巾军乃“诈为答失八都鲁通和书，遗诸道捣，使者果得之以进。答失八都鲁觉之，一夕忧愤死。”答失八都鲁死后，军队由其子孛罗帖木儿率领，由此军心动摇，一时尚未对红巾军构成威胁。刘福通抓住时机，经过一番准备，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5月，再攻汴梁，元守将失烈门度不能守，一夕逃遁，红巾军进入汴梁。汴梁是原宋朝的京城，红巾军政权亦称宋，刘福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乃以其为都城，将小明王由亳州迁到汴染，“造宫阙，易正朔，号召群盗。巴楚、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造成了一派大好形势。

红巾军的节节胜利，促使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这年7月2日，原河南行省平章怀庆路守将周全起义，加入红巾军，察罕帖木儿派兵镇压，周全大败元兵，杀其将伯帖木儿，率领部下南渡黄河，进入汴梁。刘福通派周全攻洛阳，元“守将登墉，以大义责全，全愧谢退兵”，刘福通大怒，将其处死。

后来，由于红巾军三路北伐的相继失利和远征塞外，元朝统治者得以腾出手来，调集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等主力部队到河南，摆出反扑汴梁的架势，河南形势发生逆转。至正十八年（1358年）10月，曹州：（今山东菏泽市）为孛罗帖木儿侵占，红巾军武宰相、仇知院牺牲。至正十九年5月，察罕帖木儿进占虎牢关，又攻陷归（今河南商丘县）、亳（今安徽亳县）、陈（今河南淮阳）、蔡（今河南汝南）等州，逐渐包围汴梁。陕西、山西一部分元兵也奉命来到汴梁城下，战船则浮于黄河，对汴梁发起围攻。由于大批红巾军远征在外，汴梁孤立无援，元兵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红巾军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同年8月城破，刘福通护韩林儿冲出重围，转移安丰（今安徽寿县），数万红巾军士兵及龙凤政权官员家属被俘。河南地区又落入元兵之手。

韩林儿转移安丰后，龙凤中央政权力量已经很弱，但名义上依然是北方红巾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因此，朱元璋等一些重要农民军将领的官位升迁，都仍是以小明王的名义发表的，而安丰的防守兵力虽然极为薄弱，但当战斗在山东的田丰红巾军遭到扩廓帖木儿的进攻而求援时，刘福通也依然派出了援兵。

继河南陷落之后，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11月，随着莒州的失守，山东地区的红巾军也失败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2月，已降元并占据濠州（今安徽凤阳）的张士诚乘人之危，派部将吕珍进攻安丰，当时安丰城内粮食奇缺，竟至“人相食，有尸埋于地而腐者，亦掘而食之。或以井底泥为丸，用人油炸而食之者”，形势极为严重。面对这一险恶局面，刘福通不得不派人向驻守集庆（今江苏南京市）的朱元璋求援。朱元璋不失为龙凤政权的将领，他力排众议，于3月1日亲率大军渡江北援安丰。朱元璋援军到达时，安丰已经失守，刘福通战死。朱元璋打败吕珍，找到了韩林儿，接回滁州，建宫殿以居，奉之甚厚。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12月，朱元璋派廖永忠到滁州，迎请小明王到应天

（元集庆改名），途经瓜步渡江时，将韩林儿沉入水中溺死，龙凤政权灭亡。

第四节天完政权领导的反元斗争

一、横扫东南

天完政权建立后，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和取得更大的战果，他们派兵四出，向各地元朝统治政权发起了进攻。

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11日，徐寿辉派丁普郎，徐明远率兵攻下汉阳，12日，杨普雄攻占兴国路（今湖北阳新）。14日，赵普胜率军攻武昌，武昌是湖广行省省城，城高池深，元守兵较多，城防严密，红巾军若猛攻硬拚，必定会有很大牺牲，于是，他们决定智取，先派二千人伪降，进入城内，随后，以大队人马攻城，里应外合，使敌人措手不及，帧利攻占武昌，元威顺王宽彻普化，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和尚狼狈逃窜。元人郭钰曾写诗描述武昌战役的情形，他写道："武昌兵甲雄天下，王孙节制何为者？白马将军飞渡江，壮士弯弓不敢射。玉船未过鹦鹉洲，红旗已筛黄鹤搂，美人散走东南道，一丝杨柳千丝愁!"16日，曾法兴率红巾军西进，破安陆（今湖北钟祥）、中兴（今湖北江陵）等城，杀安陆知府丑闾及山南廉访使卜里牙敦，并分兵攻取沔阳，杀推官俞述祖。

这年2月，彭莹玉，项普略率红巾军主力一部，万舟齐发，浩浩荡荡；东攻江西，直捣江西北方门户江州（今江西九江），元守将江西行省右丞孛罗帖木儿闻风而遁，21日，红巾军占领江州、南康（今江西星子），杀亢江州总管李黼。2月下旬，红巾军自江州南下，有众百万，"驱马扬尘，张帆蔽空"，很快包围南昌，当时，元江西平章道童胆小如鼠，一听红巾军打来，便抱着官印藏匿民间，但终究南昌城高水深，加以城内又有郎中普颜不花与左丞章伯颜等顽固分子组织元军和地主武装防守，因此，对于缺少攻坚装备的红巾军来说，却一时难以攻下，围攻五十多天不能破城后，便主动撤离了。

撤离南昌后，彭莹玉、项普略率红巾军继续东下。3月，攻饶州（今江西都阳），当地贫苦农民"齿木为杷，削竹为枪，截绯帛为巾襦，弥野皆赤"，积极支援红巾军攻城。元兵出战，"不能发一矢"，很快城破，俘杀元守将魏中立，并在这里建立政权机构，立"署如省府"，很快又攻占乐平、余干、浮梁（江西景德镇市北）、德兴、安江（今江西余扛）、信州（今江西上饶）

等城，俘杀元信州总管于大本。闰3月21日，攻徽州（今安徽歙县）、破婺源，俘守臣张士谦，械送江州处死。4月，又攻克休宁、黔县、歙县等城。红巾军"所过不掠民财，唯索丁壮为军"，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7月，彭莹玉、项普略率红巾军数万人由徽州东下，越昱岭关，10日到达杭州城下，元杭州守臣纷纷逃亡，红巾军由北门进入杭州城，杀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做，杭州路总管宝哥全家藏入西湖舟中，三日后，畏罪投湖自杀身亡。红巾军进入杭州后，纪律严明，"不杀不

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府库金帛，悉辇以去。”杭州是元朝的东南重镇，是江浙行省的政治、经济中心，攻占杭州，对元朝统治者是一个沉重打击。随后，元朝统治者从各地调集军队反扑杭州，农民军撤离。后彭莹玉、项普略又攻湖州、常州、宜兴、溧水、溧阳、丹阳、句容、上元、江宁，直逼集庆路（今江苏南京），形势一派大好。但是，后来元军反扑，红巾军的重要据点徽州失守，只好从集庆撤退，原先攻占的城镇又复丢失。元湖广行省平章也先帖木儿率兵来犯，项普略战败，率众退往广德。

至正十二年（1352年）4月，涂乙、涂右、童远等率领的一支红巾军，由江西宜黄、新城一带进入福建，很快得到福建人民的响应，建宁群众不堪压迫剥削，自己组织了武装，配合红巾军攻打建宁、泰宁。4月22日，红巾军进入邵武，“扬言‘摧富益贫’，以诱村虻从逆，凡窭者之欲财，贱者之欲位，与凡子弟之素无赖者，皆群起趋之，旬日间聚至数万。大掠富民家，散入山谷搜劫，无获免者”。这些记载，剔除其对农民军和农民群众的诬蔑之词，我们可以看出，红巾军所到之处，以“摧富益贫”的革命口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贫苦农民热烈欢迎红巾军，积极参加红巾军，向往日骑在他们头上的地主老爷进行了斗争。红巾军占领邵武后，又分兵进攻顺昌、将乐、万安和围攻延平、建阳，逼近浦城，松溪等城，福建震动。5月，元邵武路总管吴按滩不花反扑，顺昌失守。7月，吴按滩不花与元建宁路佥都元帅彭庭坚夹攻邵武，“设云梯、火炮，昼夜攻城。”邵武陷落，红巾军大将童远被杀，涂右被俘。

进入福建的红巾军，一部分在王善、康寿四、王二蛮的领导下，还攻入福建沿海地区。这年7月，攻下福安、宁德及福宁州，杀福宁州尹王伯颜，逼近福州。

在西线，天完红巾军也取得很大战绩。至正十二年（1352年）

3月，欧普祥（又称欧祥、欧道人）、陈普文率领一支红巾军攻破袁州（今江西宜春），留兵驻守，随后又攻占瑞州（今江西高安）。闰3月12日，破吉安，守臣四散奔逃，许多士绅被俘，他们争先向红巾军献财物，以“求免死”。4月，红巾军攻克宁都、兴国、会昌、瑞金等城，红巾军的革命烈火几乎燃遍了今江西全境。

总之，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内，江南各地“沿江郡县，皆望风奔溃”，在天完红巾军的扫荡之下，“西自荆湖，东际淮甸，守臣往往弃城遁”，很快形成了“东南无地不红巾”的局面。

二、元朝统治者的猖狂反扑

天完红巾军的兴起和在军事上横扫江南的巨大胜利，使元朝统治者十分恐慌，元顺帝下诏令南方各省大员奋力围剿。至正十二年（1352年）3月，更颁发“定军民官不守城池之罪”诏，对弃城逃跑的官员严加

惩处；闰3月，又“诏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以兵东讨荆、襄贼，复忠、万、夔、云阳等州；命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怜真班，以兵守江东西关隘……也先帖木儿与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讨南阳、襄阳贼……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与参知政事朵NB125讨江西贼……命江西行省右丞兀忽失、江浙行省左丞老老与星吉、卜颜帖木儿、蛮子淮海同讨饶、信等处贼……诏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怜真班、淮南行省萨章政事晃火儿不花、江浙行省左丞相答纳失里、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八失忽都及江南行台御史大吠纳麟与江浙行省官，并以便宜行事。”让他们可以跨越省界通力合作，迅速镇压红巾农民起义军。

在元朝中央的统一布署下，各地元军向红巾军发起了猖狂进攻，红巾军也奋起抗击，与元朝统治者进行了浴血奋战，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至正十二年（1352年）4月13日，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铁杰和万户陶梦桢攻占了农民军驻守的镇武昌和汉阳。被红巾军赶走的荆门知州聂炳反攻倒算，又占据了荆门。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也率兵东下，侵占归州（今湖北秭归）、峡州（今湖北宜昌市），5月7日，侵占中兴路（今湖北江陵），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面对敌人的猖狂反扑，天完红巾军毫不畏惧，立即组织力量反攻，很快夺回了武昌和汉阳；8月，经过广昼夜的奋战，歼敌七万多人，杀死聂炳，又夺回了荆门；9月5日，红巾军又大败元将咬住，收复中兴路，擒杀判官工都。但是，由于红巾军将领俞君正麻痹大意，结果中兴路又得而复失。这时，四川行省参知政事答失八都鲁也率四川兵侵占安陆府，控制了长江和汉水的上游对武昌又形成严重威胁。

地处长江下游的江浙行省，在接到元顺帝的诏令后，平章卜颜帖木儿也“募壮健三千人”，战船三百艘，自太平（今安徽当涂）溯江而上攻击红巾军。4月，江西行省平章星吉与卜颜帖木儿联兵进占池州，原驻武昌的蒙古威顺王也率军赶到。红巾军为保存力量，退出铜陵，撤围安庆，湖口、江州也相继沦陷。元军为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缺少后备兵源和军粮不足的情况下，继续西犯，追击红巾军。9月20日，红巾军进行反击，“大舶载苇蔽江而下，杜上下流，纵火夹攻”，在小孤山水域展开激战，结果元军大败，星吉被活捉。红巾军乘胜再克江州，复围安庆，元军向东溃退，形势又有好转。

战斗在徽州地区的红巾军，也遭到元军的围攻。这年7月，元军侵占徽州，但很快又被自杭州撤退的红巾军夺回。9月，元军乘红巾军主力向常州、湖州一带发动攻势的机会，又向徽州反扑，他们一进入徽州，就进行阶级报复，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11月，项普略在广德失利，损失严重，带领少数人马返回徽州？

休宁时，又遭到八忒麻失里与地主武装的伏击，不幸被俘牺牲①。

项昔略，又称项奴儿，项普威，是天完红巾军的重要将领，智勇双

全，先后攻占“郡、邑四十余所”，战功卓著。他的牺牲，是天完红巾军的重大损失。

11月底，元军占领徽州路的休宁、祁门、黟县，红巾军进行反击，“一夕奄至”，元军“无营栅，帅与吏、士、在邑之民皆遁焉。”元军退守淳安。湖口的红巾军也前来支援，众至五六万人，再败元军。红巾军决心要为项普略报仇，乃“大掠休宁境中，杀人满山谷，求执项奴儿者，灭其乡。”对杀害项普略的地主武装进行了坚决镇压。由于元朝统治者调集各省军队联合镇压，各地地主武装又积极配合，因此，红巾军在江浙地区损失很大，许多州县被元军夺去，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底，红巾军便由优势逐渐转为劣势，其余部在彭莹玉带领下转入江西。彭莹玉在江西与元兵和地主武装进行了殊死搏斗，于至正十三年（1353年）11月24日，不幸在瑞州（江西高安）战败被俘牺牲。彭莹玉是白莲教南系的首领，为白莲教的传播做了大量工作，发动了袁州起义。他虽没有参加蕲水起义，但天完政权建立后，他却作为一方主帅率领一支红巾军在江西、江浙两省与元朝统治者进行了浴血奋战，曾攻下许多州县，打击和削弱了元朝在江南的统治。他的牺牲，是天完农民政权的重大损失。

元军对天完红巾军的全面反扑是从至正十三年（1353年）春开始的。2月，江浙行省平章三旦八率元帅韩邦彦、镇抚哈密等攻占湖州、广德，三门，再次侵占徽州。徽州是通向江西的门户，所以双方对徽州进行了反复争夺，徽州的失守，打开了通向江西的道路。在地主武装汪同的协助下，元军于4月1日占领婺源州，汪同受到元朝统治者的嘉奖，封义兵千户，赏以金帛。4月16日，元军侵占浮梁，矛头直指饶州（今江西鄱阳）。这时，江浙行省左丞老老也率兵攻占信州（今江西上饶）。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怜真班与老老取道信州，元帅韩邦彦、哈迷取道徽州、浮梁，合兵攻饶州，汪同等地主分子也率“义兵”参战，5月1日饶州城破，红巾军“平章一人，万户八人”被俘。饶州失守，使红巾军又失去一个重要战略据点。随后，红巾军水师在望江、小孤山、彭泽、龙开河相继战败，很快江州也失守了。这样，天完红巾军的东线阵地便全部丢失，元军从东面完成了对天完政权的包围。

6月，知枢密院事失刺把都总河南军，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鲁总四川军，自襄阳分道南下，攻占安陆；7月，湖广行省参知改事阿鲁辉率兵攻占武昌和汉阳，至此，元军从西面也完成了对天完政权根据地的包围。在卜颜帖木儿的猛烈攻击下，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失守，红巾军元帅邹普泰被俘，形势更加恶化了。

十—月，江西行省左丞火你赤攻陷富州（今江西丰城）、临江（今江西清江西）、瑞州（今江西高安），红巾军将领况普天、闵总管等及其家属被俘牺牲。12月，元将卜颜帖木儿、蛮子海牙、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左丞桑秃失里、西宁王牙罕沙和湖广左丞伯颜不花等，分道合攻天完政权的都城——蕲水，城破，徐寿辉突围，天完将相以下四百余人被俘。天完政权的反元斗争从此进入低潮。

三、天完红巾军的重振和倪文俊叛变

至正十四年（1354年），天完红巾军的反元斗争进入低潮，以徐寿辉为首的天完领导核心离开城市，转入山泽之间，继续领导红巾军进行斗争，他们化整为零，采取小规模行动，在各地农民的支持下，力量又发展起来。1月，毛德祥攻占福安；2月，史普清攻占奉新；广欧普祥占据袁州（今江西宜春），并分兵攻占上高；李普臣、王普敬据华林山，并不时进攻瑞州。

长江中游的红巾军，也不断出击元兵。经过至正十四年一年的休整、联络，天完红巾军又逐渐壮大起来，这就为至正十五年红巾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年，刘福通、张士诚两支起义军也正在两淮及长江下游与元军激战，使元军无暇西顾，客观上支援了天完红巾军的恢复发展。

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20日，徐寿辉遣大将倪文俊攻取沔阳府，随后徐寿辉将天完中央机构迁移到这里。农民军攻占沔阳，对武昌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于是，镇守武昌的威顺王宽切普化害怕了，“命其子报恩奴、接待奴、佛家奴，以大船四十余只水陆并进，至沔阳，攻徐寿辉伪将倪文俊，且载妃妾以行。

兵至汉川县鸡鸣汊，水浅船搁不能行。文俊以火筏尽焚其船，接待奴、佛家奴皆遇害，而报恩奴自死，妃妾皆陷。宽彻普化走陕西。”这位骄奢贵族来势汹汹，却被英勇机智的红巾军一战击溃，落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3月，徐寿辉命扫地冯率红巾军由安陆进攻襄阳，城破，襄阳万户杨克忠走头无路，投汉江自杀。

5月25日，倪文俊自沔阳西进，再克中兴路（今湖北江陵），杀蒙古元帅朵儿只班。7月十9日，倪文俊又攻克武昌、汉阳：

9月，进围岳州路；11月再破饶州等地。这一年，天完红巾军在倪文俊的指挥下，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天完政权重新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

至正十六年（1356年）正月，随着长江中游形势的稳定，倪文俊在汉阳修治宫室，迎请徐寿辉入居，随后天完中央机构亦迁汉阳。红巾军在江浙战场上，也取得很大胜利，这年正月，攻占徽州城；2月，由徽州攻昱岭，元守将望风而逃，红巾军一度攻占于潜、昌化等城，逼近杭州。湖广战场上，3月，倪文俊又攻克常德，元总兵官俺都刺狼狈逃窜，5月攻占澧州，8月攻占衡州（今湖南衡阳），杀元将军阿都赤及元帅甄崇福。这年9月，红巾军还攻占兴国。12月，倪文俊又攻占岳州（今湖南岳阳），杀威顺王子歹帖木儿。至正十七年（1357年）2月，倪文俊又西克峡州（今湖北宜昌市），天完政权控制的地区更加扩大了。

至正十五年、十六年，天完红巾军在军事上的一系列战绩，主要是

在丞相倪文俊的指挥下取得的，因此，他在天完政权中的威望大大提高。随着威望的提高，他的政治野心也逐渐膨胀起来，恰在这时，元朝统治者由于军事上的一再失败，便在军事围攻的同时，对红巾军也采取了“招安”政策，在高官厚禄的引诱下，倪文俊动摇了，为了换取元湖广行省平章官位，他竟于至正十七年9月企图杀害徐寿辉，结果失败，逃奔黄州，后为其部下陈友谅所杀。

四、陈友谅篡夺天完政权

陈友凉，出身于沔阳渔家，他“少读书，略通文义”，曾为县吏，不得志，“欲图人事”，求富贵，乃参加红巾起义军。最初在天完丞相倪文俊部下为书吏，后以军功升为元帅。至正十六年（1256年），徐寿辉迁都汉阳后，倪文俊在天完中央专权，陈友谅对此颇为不满。至正十七年（1357年）9月，倪文俊背叛革命，陈友谅将其处死，为天完惩治叛徒，这是完全正确的行动，应当肯定。

但是，陈友谅杀倪文俊，并其军，自称平章，政事后，又逐渐控制了天完中央政仪。为了提高个人在红巾军中的威望和夺取更多的权力，他继续坚持反元斗争。当时，天完政权虽然控制了长江中游以武昌、汉阳为中心的洞庭湖、鄱阳湖周围，以及袁州等地，力量有很大发展，但总的来看，天完政权仍然处在元朝势力包围之中，周围有许多元军据点。为了确保武昌、汉阳的安全，陈友谅决心拔除先军控制长江中游沿岸的另一军事重镇安庆。安庆是红巾军一直想夺取的目标，曾多次发动进攻，但因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阙固守，一直未能得手。这年10月，陈友谅自沔阳发兵，“战舰蔽江东下”，败元将胡伯颜，11月2日，水陆并进，三日至城下。为了尽快攻下安庆，陈友谅还调来饶州的祝宗和驻守池州的赵普胜两支红巾军，三面夹击安庆，激战两个月之久。至正十八年（1358年）正月7日，赵普胜攻东门，陈友谅攻西门，祝宗攻南门，“四面并进，西门尤急。”城破，全歼守敌，余阙自杀，长江中游的元军据点至此全部拔除。

安庆战役后，陈友谅率兵攻入江西。江西的许多州县曾被红巾军攻占，受红巾军的影响较深，元军反扑后，红巾军化整为零，仍在坚持斗争，而袁州则始终在红巾军欧普祥部的固守之下，因此，江西的群众基础较好。陈友谅率军进入江西后，各地分散活动的小股红巾军立即配合作战，4月，顺利攻占龙兴（今江西南昌市），元江西行省右平章道童，左平章火你赤逃亡抚州。随后，瑞州、抚州、吉安诸路，也很快为红巾军攻占。8月，陈友谅围攻建昌（今江西南城），元守臣王溥降；9月廿9日，攻下赣州路，杀总管哈海赤。至此，江西诸郡大部分为陈友谅攻占。

在进占江西诸郡的同时，红巾军还向江浙行省用兵。至正十八年（1358年）2月，王奉国等举红巾军二十万攻信州（今江西上饶市）；5月，康泰、赵琮、邓克明等攻邵武路；11月，破汀州。至正十九年（1359年）3月，红巾军攻衢州（今浙江衢县）；6月，王奉国攻破信

州，元守将伯颜不花的斤自杀。11月，红巾军破杉关，兵分三路进入福建，很快攻占邵武路、延平路（今福建南平市）、汀州路诸县。至此，陈友谅在江浙行省的反元斗争达到顶点。自此之后，他便转入了争夺天完最高统治权和与朱元璋争夺地盘的斗争中去了。

随着反元斗争的节节胜利，陈友谅的个人野心也日益增长，为了夺取天完最高领导权，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残杀活动。天完大将赵普胜，善使双刀，别号双刀赵，是天完红巾军最早的将领之一，资历比陈友谅高，在反元斗争中战功颇多，在红巾军中威信很高，且手握重兵，是陈友谅要夺权的最大障碍，因此，陈友谅首先向他开了刀。至正十九年（1359年）9月，赵普胜为朱元璋所败，丢失潜山，陈友谅"乃诈以会军为期，自至安庆图之。

普胜不虞友谅之图己，闻其至，具烧羊迎于雁汊，登舟见友谅，友谅就执杀之，并其军。"陈友谅杀赵普胜后，更进一步加速了他的夺权计划，这年12月，徐寿辉决定将天完政权由汉阳迁都南昌，当他路过江州时，陈友谅暗中伏兵于西门外，假意出迎，"寿辉既入，门闭伏发，尽杀其部属。乃以江州为都，奉寿辉居之。友谅遂自称汉王，府立城西门，置官属。自是事权—归予友谅，寿辉但拥虚位而已。"但是，陈友谅并未到此为止，至正十年（1360年）闰5月，陈友谅挟徐寿辉东下，当攻占太平州后，他急于夺权，"乃采石舟中先使，人诣寿辉前，佯为白事，令壮士持铁挝自后击碎其首，杀之。寿辉死，友谅遂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舁庙中神像颠倒置门外，而僭位其中，国号（大）

汉，改元大义，仍以赵普胜为太师，张必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大尉。"完成了他夺取天完政权的全部过程，天完政权至此结束。

陈友谅建立大汉政权后，大量吸收地主士大夫分子参政，推行了一系列保护地主阶级的政策，逐渐转化为封建政权。此后，陈友谅控制下的南方红巾军也逐渐由反封建的农民战争转化为封建统一战争。

第五节朱元璋领导的反元斗争和江南根据地的建立

一、潦州起义

朱元璋，字国瑞，原名重八，又名兴宗，壕州（今安徽风阳东北）钟离太平乡孤庄村人，其父朱五四，是贫苦农民，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生活。朱元璋幼年曾为地主放牛，并从事农业辅助劳动，生活十分艰苦。

元至正四年（1344年）春天，淮河两岸先遭旱灾，又发生蝗灾，后又“疾疠大起”，瘟疫流行，朱元璋家里也染上了病。朱家人口本来很多，但由于无钱治病，他的父亲、母亲、大哥、二嫂、三哥、三嫂等相继病故，诺大一个家庭，只剩下了几个人，十七岁的朱元璋无法生活，只好进入附近的皇觉寺为僧，但“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飏”，朱元璋无家可归，又“百无所长”只好走出寺院“化缘”，在淮西一带云游，成为游方僧，实际上是在各地乞讨。云游三年之后，朱元璋又回到了皇觉寺。这时的皇觉寺，由于连年灾荒，僧众四散，已经是断墙残垣，杂草丛生，一片狼藉。朱元璋找到一间可避风雨的禅房住下，因无施主，只好又在附近云游。至正十二年（1352年）2月，郭子兴、孙德崖等在濠州起义，不久，朱元璋接到友人来信，劝他也参加起义，当时“既忧且惧，无可筹详，傍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乃与知已计议，又求神问卜，结果“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闰2月，乃前往濠州投奔起义军。郭子兴见其健壮，大喜，用为九夫长，从此，走上反元斗争的道路，时年二十五岁。

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元朝统治者从各地抽调军队，分路进行镇压。至正十二年（1352年）8月，丞相脱脱率兵攻徐州起义军，9月21日，徐州城破，芝麻李出逃，不久被俘牺牲，彭早住、赵君用突围，奔濠州，郭子兴、孙德崖以礼纳之。彭、赵二人力穷来投，后却反客为主，郭子兴，孙德崖“事皆禀命，遂为所制”。后来，孙德崖、赵君用合谋将郭子兴扣押，并欲加害，经彭早住、朱元璋全力营救，始得脱险。郭子兴对朱元璋十分钟爱，并以养女马氏妻之，马氏即开国后之高皇后。朱元璋善于团结部下，又身先士卒，所以每战多胜，屡立战功，在攻取怀远、安丰后，又于10月“破元平章月乞察儿营，克焦山陈章营”。12月，元兵在贾鲁的率领下，围攻濠州，朱元璋与郭子兴等拚力守卫，至正十三年（1353年）5月，贾鲁病死城下，元军退走，濠州始解围。

潦州久被围困，农民军伤亡很大，粮食奇缺，附近又有元兵驻扎，随时可能来攻，因此，濠州亟待解决军粮和补充兵员。对这一严重局面，朱元璋是有认识的，因此，他“以盐易米于怀远”，弄到一部分粮食，以救燃眉之急；6月，他又回原籍招兵，少年时的伙伴徐达、周德兴等都来投军，得七百多人，补充了兵员，郭子兴非常高兴，任命他为镇抚。但是，其他红巾军将领对形势却缺乏认识，认为元兵解围就无事了，郭子兴也缺乏长远目标，只想守住濠州一地，不愿向外发展。濠州红巾军内部的矛盾也很尖锐，彭早住、赵君用粗暴蛮横，其部下军纪败

坏，与元兵无别，郭子兴则势单力薄，难以与其相争。对于农民军将领之间的矛盾和磨擦，朱元璋虽然做了大量调解工作，但收效甚微，彭、赵不仅不听劝告，相反还想加害朱元璋。朱元璋感到，濠州不是久留之地，再住下去，不仅难成大事，还会有杀身之祸，因此，至正十三年（1353年）6月，朱元璋便辞别郭子兴，带领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离开滁州，南下定远，谋取独立发展的道路。

二、攻占集庆

至正十三年（1353年）冬，朱元璋南攻定远，中途因病返回濠州。至正14年6月，复攻定远，以计招降了定远张家堡驴牌寨地主武装三千人；又有秦把头者，聚众八百人，结寨于定远豁鼻山，朱元璋亦将其招降；定远人缪大享，集“民兵”二万人，被元授为“义兵”元帅，与张知院共屯横涧山，朱元璋派花云夜袭，大破之，缪大亨率众投降。从此，朱元璋军威大振。这时，赵君用，彭早住也攻占了盱眙、泗州，他们获悉朱元璋的队伍已扩大到二万人，便派人邀请他到盱眙去，朱元璋以赵、彭“二人粗暴浅谋，不可与共事”，辞而不往，以保持独立地位。定远人冯国用，冯国胜兄弟，聚众数百人，结寨自保，朱元璋进军定远，二人来投，朱元璋问计，国用说：“建康龙蟠虎踞，帝王都会，自古记之，幸而近我，其帅懦弱不任兵，宜急击下其城，踞以号召四方。事仿仁义，勿贪子女玉帛若群竖子者，天下不难定也。”朱元璋听后高兴地说：“此吾心也。”遂将他留在身边，时时参预机宜。朱元璋攻取定远后，7月，进兵滁州（今安徽滁县），定远士人李善长来投，朱元璋知其为里中长者，以礼待之，留为掌书记，参预军机。善长少读书，多智谋，因而策事多中。朱元璋曾问他：“四方战斗，何时定乎？对曰：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听罢大悦，决心以刘邦为榜样，取天下当皇帝。

7月，朱元璋攻滁州，花云为先锋，单骑前行，横冲敌阵，元兵惊曰：“此黑将军勇甚，不可与争锋”，四散奔逃，农民军顺，利攻占滁州城。朱元璋收集元残兵，补充军队，其队伍发展到三万多人。当时，彭早住，赵君用已屯驻泗州，彭早住称鲁淮王，赵君用称永义王，郭子兴亦被挟持到泗州。彭赵二人矛盾日益激化，终于酿成自相火并，彭早住死，赵君用“专兵柄，狠戾益甚”，又欲加害郭子兴，朱元璋以恩德相诘，又以唇亡齿寒相劝，赵君用畏滁州兵盛，郭子兴始得免，率所部至滁州。郭子兴到滁州后，朱元璋以礼相待，并将滁州兵交他管辖。郭子兴十分高兴，朱元璋也由镇抚升为总管。

11月，元丞相脱脱率兵包围高邮，并分兵攻六合。农民军六合守将求援于滁州，郭子兴与六合守将有怨，不愿发兵，朱元璋以“六合破，滁不独存，奈何以小憾而债大事”相劝，子兴乃发兵，诸将多不愿往，朱元璋亲自率兵援救。朱元璋与耿再成进驻瓦梁垒，逼近六合，元兵来攻，朱元璋力战，垒得不破，后计退元兵，胜利返回滁州。

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滁州乏粮，诸将议所向，郭子兴无远略，但欲据滁称王，朱元璋劝道：“困守孤城，诚非计，今欲谋所向，惟和阳可图”，郭于兴用其谋，遣张天祐、赵继祖、耿再成等攻占和州（今安徽和县）。郭子兴以朱元璋智勇出众，乃令其总兵，位在诸将之上。时军纪不整，有掠人妻女者，朱元璋召集诸将，喻之曰：“军无纪律，何以安众，凡军中所得妇女，当悉还之。”即令将所掠妇女放归，民众大悦。元兵十万围攻和州，朱元璋坚守三个月，大败元兵。3月，郭子兴病死，小明王任命郭子兴子郭天叙为都元帅，郭子兴妻弟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以统滁州之兵。朱元璋用龙风年号，成为北方红巾军的一部分。

和州城小，储备不多，养不了数万军队，5月，城中粮食已非常紧张，这时，朱元璋想起了冯国用的建议，乃决定南波长江。和州对岸的太平路（今安徽当涂）及太湖周围诸路，是粮食、的高产地区，渡江不仅可以解决军粮问题，还可以进而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以为根本。但是，朱元璋缺少船只，渡江遇到困难，适在这时，在巢湖结寨的水师李普胜、赵普胜、廖永安，俞通海“以水师千艘来附”，朱元璋十分高兴，亲至巢湖见李普胜等，并查看水道，利用大雨水涨的时机，避开元兵战船，由小港出巢湖。赵普胜中途变卦离去，西归徐寿辉。李普胜欲杀朱元璋吞并其军，结果反为朱元璋所杀，廖永安、俞通海等大部分水军归顺朱元璋。从此，朱元璋有了一支上万人的水军，这就为胜利渡江创造了条件。

6月，朱元璋以常遇春为先锋，水军自和州出发，渡江取采石，很快攻占太平路，俘元万户纳哈出，元总管赴水自杀。朱元璋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为知府，设太平兴国翼元帅府，朱元璋自为元帅，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史，陶安为参谋府事。当时，太平四面皆元兵，元右丞阿鲁辉等率水师截采石江面，“义兵”元帅陈埜先与元将康茂才等以数万兵来夺太平城，朱元璋派出主力徐达、邓愈、汤和出姑孰东迎战，又派兵出敌后，前后夹击，力战得胜，大败元兵；生俘陈壁先，阿鲁辉等败走，退驻峪溪口。太平保卫战，农民军取得巨大胜利。太平战役后，朱元璋乘胜又攻占芜湖、栗水、句容等城，并派兵驻守，对集庆逐渐形成包围之势。

朱元璋在太平巩固阵地后，下一个目标就是集庆了。冯国用早就劝朱元璋取金陵，这时陶安也说：“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抚形胜以临四方，何向不克？”于是，乃决定取集庆。7月，张天祐率诸军及降将陈垫先部众攻集庆，因城防坚固，不胜而回。9月16日，再攻集庆，郭天叙、张天佑率军由官塘攻集庆东门，陈茔先率军由板桥出发，攻集庆南门。17日，张天祐等至方山，破元兵左答纳识里营，陈整先却与元守将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福寿暗中勾结，围而不攻，后又设下奸计，俘郭天叙、张天祐，叛变降元。陈埜先的叛变，使农民军遭受重大损失，郭张二元帅牺牲，攻取集庆的第二次战役失败了。

至正十六年（1356年）3月1日，朱元璋亲率水陆大军自太平向集庆

进军，三日，首攻集庆外围江宁镇，破陈兆先营，降元兵三万六千多人，生俘陈兆先。10日，攻集庆，离城五里，诸军鼓噪而进，直逼城下，将士以云梯登城，元兵皆破胆，心无斗志，农民军破城，福寿战死，元平章阿鲁灰，参政伯家奴及集庆路达鲁花赤达尼达思等皆被杀，“水寨元帅康茂才、苗军元帅寻朝佐、许成、刘哈剌不花，海军元帅叶海撤及阿鲁灰部将完都等各率个降，凡得军民五十余万。”朱元璋进入集庆，召集官吏。

父老、人民，向他们表示：“吾率众至此，为民除乱耳，汝宜各安职业，毋怀疑惧。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居官者慎勿暴横，以殃吾民。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全城秩序井然，军民喜悦，互相庆慰。朱元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命赵忠为兴甲翼元帅，使守太平。朱元璋攻取集庆后，16日，任命徐达苎大将军，率军攻克镇江，斩元守将段武、平章鼎鼎，苗军元帅杨完者出逃。随后，又分兵攻占金坛、丹阳等城。十9日，朱元璋置淮兴、镇江翼元帅府，以徐达、汤和为统军元帅，汤昌为行军总管。4月，朱元璋攻取广德路，改为广兴府，以邓愈守之。

7月，小明王任朱元璋为枢密院同签，又置江南行中书省，以朱元璋为平章，在江南建立了政权。

三、建立江南根据地

朱元璋攻占集庆后，又分兵攻占镇江、金坛、丹阳等地。当时，朱元璋控制的范围仅限于集庆及其周围地区，而且西有徐寿辉，东有张士诚，南有元军据点，处于被包围的状态。为了确保集庆和建立巩固的江南根据地，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朱元璋看到，徐寿辉，张士诚力量较大，而且都是反元友军，由此，对他们决定采取睦邻政策，派杨宪去平江（今江苏苏州市），致书张士诚，表示“吾与足下东西境也，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古人所贵，吾甚慕焉。自今以后，通使往来，毋惑于交构之言，以生边衅。”；对徐寿辉也采取了尽量避免武装磨擦政策。

璋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为知府，设太平兴国翼元帅府，朱元璋自为元帅，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史，陶安为参谋府事。当时，太平四面皆元兵，元右丞阿鲁辉等率水师截采石江面，“义兵”元帅陈埜先与元将康茂才等以数万兵来夺太平城，朱元璋派出主力徐达、邓愈、汤和出姑孰东迎战，又派兵出敌后，前后夹击，力战得胜，大败元兵，生俘陈埜先，阿鲁辉等败走，退驻峪溪口。太平保卫战，农民军取得巨大胜利。太平战役后，朱元璋乘胜又攻占芜湖、溧水、句容等城，并派兵驻守，对集庆逐渐形成包围之势。

对东南元朝控制地区，则采取攻战方针。至正十七年（1357年）2月，朱元璋派耿炳文攻长兴州（今江苏长兴），元“义兵”万户蒋毅率所

部二百人投降。3月1日，改长兴州为长安州。设永兴翼元帅府，以耿炳文为总兵都元帅，刘成为左副元帅，李景元为右副元帅，率兵驻守。4月，朱元璋令徐达、常遇春率军攻宁国路（今安徽宣城）。元长枪元帅谢国玺弃城走，守将别不华、杨仲英顽抗，城小而坚，久攻不下，常遇春中箭。朱元璋大怒，亲临指挥攻城，元兵不能支，杨仲英投降，俘元“义兵”元帅朱亮祖及军士十余万，战马二千余匹，宁国路所属太平、旌德、南陵、泾县诸县皆下。7月，朱元璋命胡大海，邓愈率军攻徽州路（今安徽歙县），破其城，元守将元帅八思尔不花败逃，“义兵”万户吴纳兵败自杀。朱元璋改徽州路为兴安府，立雄峰翼元帅府，命邓愈驻守。7月23日，胡大海率军下休宁，进军婺源（今属江西），元江浙参政杨完者率兵十万向徽州反扑，胡大海闻讯回师，与邓愈前后夹击，大败元兵，杀其镇抚李才，杨完者狼狈溃逃。9月，朱元璋命费子贤率军取武康（今浙江德清西），杀其守将潘万户。10月，朱元璋命缪大亨攻扬州，元守将“清军”元帅张明鉴降，获其兵数万人，战马二千多匹，改扬州路为淮海府，置淮海翼元帅府，以张德林为元帅，李德成知府事，留兵驻守。扬州被围时，城中粮尽，元兵杀平民充饥，故城破时，居民仅存十八家。

至正十八年（1358年）正月，邓愈令部将王弼、孙虎及汪同、孙茂先等攻占婺源州，杀元守将铁木儿不花，歼灭元兵三千五百余人，俘三千余人。李文忠攻青阳、石埭、太平、旌德，皆下之。2月，李文忠败元将阿鲁灰于淳安县之万年街，又败苗军于潜、昌仁。3月，李文忠与邓愈、胡大海攻下建德路（今江建德），设德兴翼元帅府，元江浙行省左丞杨完者遣兵反扑邓愈出击，大败元兵，杀其将李副枢，降溪洞兵三万多人。4月，邓愈攻取淳安。6月，李文忠攻占浦江（今浙江浦江）。10月6日，胡大海攻占兰溪，俘元万户赵伯颜不花，廉访使赵秉仁等，歼敌千余人，获马、牛、羊万头，置闽越翼元帅府，分兵守其要害。12月，朱元璋亲率十万大军攻浙中重镇婺州（今浙江金华），败元处州（今浙江丽水）援兵胡深，俘其前锋元帅李肩章。婺州守兵内部不和，枢密同佥宁安庆开东门投降，婺州城破，杀元达鲁花赤僧住、浙东廉访使杨惠，俘南台御史帖木烈思、院判石抹厚孙等。朱元璋开设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分省、行枢密分院、金华翼元帅府，改婺州为宁越府，“于省门建立二大黄旗，两旁立二牌，旗上书云‘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牌上书云：‘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旗牌表明，朱元璋领导的农民军依然是北方红巾军的一部分，其军事行动虽然由自己决定，但他依然尊奉小明王，他主持的江南等处行省，依然在龙凤大宋政权的领导之下。

经过几年的用兵，今皖南，浙西地区的元兵据点大部分被朱元璋所占领，从而确保了集庆的安全，稳定了江南的阵地。

除军事行动外，朱元璋在政治上也采取了一些争取民心的政策。首先，禁止部下乱杀。朱元璋一向注意军队的纪律，随着军队的扩大，对纪律也更加重视，特别在攻取集庆后，更是三令五申，强调纪律。至正十六年（1356年）3月，以徐达为大将军率诸将攻镇江，临行前，朱元

璋“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尝妄杀，今汝等将兵往，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诸将皆顿首曰：‘谨受命。’”由于强调了军纪，所以镇江战役，做到了“1日克其城，兵不血刃”，敌人迅速瓦解。朱元璋攻取江阴，军队纪律严明，又倡导生产，因而受到人们的称赞，有人借江阴白头翁之口写诗称赞朱元璋的军队：“江阴城中头白翁，面皱腰曲双耳聋，手扶竹杖官道侧，向人欲语扪心胸。自言往昔承平日，老夫城中家富实，一从浙右干戈兴，官税民差日繁剧。大儿从戎行，小儿当赋役，纵有老夫存，连年避兵革。元戎既退海寇来，江阴城中生绿苔，人心汹汹乐变易，杀人何异除蒿莱。去年自逢吴总兵，与民为主民获生，官军不扰民乐耕，大开濠堑坚筑城。老夫甘分守困寡，不忘作诗歌太平。”朱元璋占领下的江阴，“未几，流寓复还，呻吟笑歌，田莱垦辟，人畜蕃息，租入有经，徭役平均，咸室家相庆曰：“吾徒获奠枕矣。”从而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另外，对当地一些有影响的元朝官员和知识分子，也一般都采取团结政策，争取他们到新政权内任职。攻集庆，元水寨元帅康茂才率兵三千降，朱元璋“笑而释之，仍许统所部兵从征。”康茂才降后，仍然带领原部下，立了不少战功，后又被任命为营田使，在组织恢复发展生产方面发挥了作用。朱元璋重用降人的政策，争取了不少持观望态度的元朝官员，他们有的对农民政权放弃敌对态度，有的开门献城，还有的在新政权中继续任职，对稳定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元前兵部尚书单安仁，驻守广陵（今江苏扬州），农民军攻镇江，他即率部投降，后守镇江；元江浙行省平章夏章降，对朱元璋稳定浙西局面起到很大作用。对一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更是极力收罗到新政权中来。朱元璋攻徽州时，“闻朱升名，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访问犬计。升进三策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十分欣赏他的见解，便将他留在身边，参预密议。元徽州路守将元帅福童，练兵修城，准备死守，朱升至城下，喻以祸福，劝其早降，“福童等素服升有先见，遂开城出降。”兵不血刃，占领徽州。朱元璋每攻占一地，即搜罗当地的知识分子，并授以官位，这对于争取士大夫阶层和安定社会秩序都起了积极作用。

再者，朱元璋在攻城掠地的同时，还很注意占领区的生产，并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至正十六年（1356年）3月，早在渡江之初，朱元璋即向将官申明：“听从开垦荒田，以为己业”，当时，无力向将官们发放俸禄，便号召他们自己开荒生产，以解决生活问题，这还只是一项临时性的应急措施。7月，随着江南行中书省的建立，又设置营田司，修筑堤防，管理水利，并号召各地官员注意招诱流民，恢复生产。至正十八年（1258年）2月，朱元璋任命元帅康茂才为营田使，并特别告谕康茂才：“今军务实殷，用度为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春作方兴，虑旱潦不时，有妨农事，故命尔此职，分巡各处，俾高无患干，卑不病涝，务在蓄泄得宜。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饰馆舍，迎送奔走，所至纷扰，无益于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由于朱元璋的倡导和组织，当时虽然战争激烈，但在控制的范围内，农业生产非但没有继续破坏下去，相反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有些地区还出

现了“四方小康”的局面，经济的恢复，支持了战争，使朱元璋站稳了脚根，建立了比较巩固的江南根据地。江南根据地的建立，对战胜江南群雄和北伐推翻元朝中央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六节张士诚、方国珍的反元斗争及其蜕变

一、张士诚迁都平江

至正十四年（1354年）12月，取得高邮保卫战的胜利后，张士诚乘胜反击，元兵溃散，许多溃兵投入起义军，占领区日益扩大。元朝统治者在战场上失败后，至正十五年（1355年）4月，又派翰林待制乌马尔、集贤待制孙NB141至高邮进行招安，他们二人进入高邮城后，说明来意，并“反复开谕”，结果被张士诚“拘之他室，或1日馈食，或间日一馈食”，用饥饿折磨之后处死，拒绝了招安。当时淮东大饥，起义军筹粮困难，张士诚看到“吴中富庶，可以立国”，乃决计南下，遣其弟士德率水师山通州渡江，进占福山港。至正十六年（1356年）正月1日，张士德攻入常熟。2月，攻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元平江路总管贡师泰、治中高安等带上家小，装载细软，弃城逃走，起义军顺利攻占平江，改平江为隆平府。3月，张士诚将都城由高邮迁至平江。

张士诚迁都平江后，采取了一系列打击豪绅地主、争取百姓和巩固政权的措施。首先，健全了政权机构，以李行素为丞相，张士德为平章，蒋辉、潘元明为左右丞，史文柄同知枢密院事。

地方上，府设太守，州设通守，县设尹，以周仁为隆平府太守。

同时，还对占领区的户口、田赋进行登记，着手建立地方基层组织，第二，打击元朝反动官僚和豪绅大地主。张士诚对官僚、豪绅、大地主采取了镇压剥夺政策。张士德到福山港时，“福山有曹氏，富甲县中，众（起义军）肆攘掠，一夕而空。”攻占平江后，“昔之吝财家户，破家剥床”，对大地主、大富户的家产进行了剥夺，往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官僚，更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反动文人写道“吴松之壤，东南奥区，岁在丙申，群寇突如，朱巾赭裳，陆梁恣睢，乃贼乃戕，乃毒乃荼。”剔除其诬蔑之词，可以看到官绅们被镇压的情形。第三，在其占领区城内，推行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张士诚一向重视农业生产，在其称王不久，即下令要所属官员务农桑，他说：“余起兵之意，诚欲出生民于涂炭，予所在以安全。食为民之天，农桑为民之本。有土有财，只在利导，既富且教，尤要提撕。令下之日，务曲体余衷，相机度宜，俾处处有生养之具，毋徒以文具相涂饰也。”要求他的各级官员都要重视农业，管好农业生产。在迁都平江之后，他又下令“悉免夙逋，赐今年田租十之四，赐高年粟、帛及贫人粥糜……设郡劝农使、县劝农尉，讲修水利”，免除了元朝统治时期人民所欠的赋税，并减轻田赋，救济贫苦农民，还设立农官，管理农田水利。这些措施，对恢复发展占领区的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张士诚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因此，受到了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他的起义军也被人民称为“红军”，松江一带有童谣说：“满城都是火，官府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表达了人民对元朝统治者的蔑视和盼望张士诚起义军到来的激动心情。当时，元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木儿为了镇压张士诚起义军而调来了由苗民组成的杨完者的一支“义军”，这支军队极为残暴，“所至杀掠无遗”，许多平民被杀害，“至贵家，命妇、室女见之，则必围宅勒取，淫污信宿，始得纵还。少与相拒，则指以通贼，纵兵屠害。”人民对其痛恨极了，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死不怨泰州张（士诚），生不谢宝庆杨（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张士诚迁都平江后，派兵四出，攻取江南州县，早在2月，起义军已占领昆山、嘉定、崇明、常州、无锡阳山、宜兴。4月，张士诚部将赵打虎攻下湖州，史文炳攻松江，元兵弃城逃走。7月，张士德率兵攻杭州，斩元江浙行省平章左答纳失里。

左丞相达识帖睦迩逃亡富阳。张士诚的占领区迅速扩大。

二、张士诚的蜕变

至正十六年春，张士诚破平江，西进攻占常州；朱元璋渡江取集庆，东进攻占镇江、丹阳。因此，这两支起义军的先头部队很快便相遇了。为了避免与张士诚部发生冲突，6月，朱元璋派儒士杨宪为代表，致书张士诚通好，信中说：

“近闻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吴郡。昔隗嚣据天水以称雄，今足下据姑苏以自王，吾深为足下喜。吾与足下，东西境也，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古人所贵，吾甚慕焉。自今以后，通使往来，毋惑于交构之言，以生边衅。”当时，张士诚正四出攻城掠地，踌躇满志，根本没有把朱元璋放在眼里，他拘留了杨宪，拒绝通好。这样，朱张之间的战争就难免了。

7月，张士诚以舟师攻镇江，被徐达击败，朱元璋亲率舟师追击，直至江阴。张士诚挑起战端，朱元璋令徐达统兵反攻，包围常州，汤和自北面，张彪自东南面，徐达自西北面，合力攻城，战斗异常激烈。张军数万来援，徐达离城十八里设伏以待，大败张军。

8月，张士诚令史文炳率水师数万攻嘉兴，元守将杨完者反击，大败张军，追杀四十余里，“斩首万七千级”，其元帅江东海投奔朱元璋。一连串的失败，使张士诚开始感到忧惧，10月，乃派其部下孙君寿持书向朱元璋求和，表示：“省己知过，愿与讲和，以解困厄。岁输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以为犒军之资，各守封疆，不胜感恩。”朱元璋复信责其挑起事端，诱引叛将，扣留使臣等，要张士诚每年输粮五十万石，归还使臣、叛将。张士诚得书不报。11月，朱元璋增兵两万攻常州，张士诚也再派援兵，徐达内外夹攻，张军又败，“城中益

困”。

至正十七年（1357？年）2月，朱军耿炳文、刘成败张将赵打虎，攻占长兴，获战船三百余艘，俘其守将李福安、答失蛮。3月四日，常州城内粮绝，守将吕珍出逃，徐达占领常州。5月，朱元璋攻占泰兴（今属江苏）。6月，攻占江阴。7月，攻常熟，张士德率兵往援，兵败被俘。士德有刃有谋，攻取诸城之役，其功最人，他的被俘，对张士诚是个沉重打击。常州、长兴、泰兴、江阴，常熟又被朱元璋夺去，形势对张士诚更加不利，朱元璋“得长兴，则士诚步骑不敢出广德，窥宣、歙；得江阴，则士诚舟师不敢拆大江、上金、焦……士诚侵轶路绝”。张士诚遭受这些重大挫折后，更感到无力与朱元璋对抗，为了保住地盘和避免两面作战，8月，乃再一次向元朝请降，元授士诚太尉、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枢密院事，“然士诚虽降，而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张士诚在战场上的失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政抬上的蜕变。在攻占平江后，张士诚开始了他急剧蜕变的过程。首先，张士诚领导集团热衷于子女玉帛，追求安乐的思想逐渐占了主导地位。士诚领导集团，多数出身于游民阶层，他们有反封建的一面，但也极易接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当他们的地位发生变化，有条件获得更多的财富时，就会很快蜕化变质。张士诚之所以渡江南下，一方面是由于江北发生粮荒，另一方面，也与元朝降官朱英对其“盛陈江南土地之广，钱粮之多，子女玉帛之富”是分不开的。攻占平江后，张士诚深居简出，不愿过问政事，整日酒色为务，俨然太平帝王；他的文武大员们，也是“凡有寺观庵院，豪门巨室，将士争夺，分占而居，了无虚者”，一个个都成了新的暴发户，蜕化成了新生的地主阶级，他们追求的是生活享受，自然战斗力也就减弱了。其次，在政治上，张士诚一心想当割据一方的土皇帝，逐渐放弃了反元目标。攻占平江后，为了争取地主士大夫的支持和健全各级官僚机构，设弘文馆，多方搜罗地主知识分子，“士有至者，不问贤不肖，辄重赠遗，与马居室，无不充足”。因此，许多失意官僚、地主士大夫分子，纷纷前去投靠，“美官丰禄，富贵赫然”。

这些人进入平江后，出谋划策，自然一切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对张士诚的蜕变有很大的影响。参军俞思齐等人，极力劝张士诚降元，因此，当他无力与朱元璋对抗时，对元朝政府便逐渐由妥协而投降了。第三，随着蜕化的加深，在军事上，张士诚则更加与红巾军为敌，他每年向大都送上几十万石军粮，还不断进攻红巾军，从至正十八年（1358年）开始，张士诚多次出兵，企图夺回常州、江阴，但都失败了。至正十九年（1359年）后，朱、张又在诸暨（今属浙江）展开争夺战，互有胜负，形成对峙状态。

当时，刘福通为首的北方红巾军主力正分兵三路北伐，两淮地区一度空虚，张士诚乃乘机向淮北扩张地盘，直至今鲁南一带。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2月，刘福通在河南为元兵所败，损失惨重，乃拥小明王退守安丰（今安徽寿县）。张士诚趁火打劫，以大将吕珍统兵攻安丰，占据庐州的左君弼也发兵相助，刘福通固守，但城中缺粮，伤员又多，

形势危急，小明王向朱元璋求援，朱元璋获悉后，不顾李善长等人的反对，亲率徐达、常遇春等往援，未至安丰，城破，刘福通牺牲。朱元璋赶到，救出韩林儿，迁往滁州居住。朱元璋退兵后，安丰又为元兵占领，至此张士诚已经完全蜕变为红巾军的敌人。

三、反复无常的方国珍

在反元斗争中，方国珍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起义反元，是红巾军的友军，但形势对他不利时，他即接受“招安”，向元朝投降，待形势好转，则又反元。从至正八年（1348年）起义以来，至至正十四年（1354年）间，已有三次降元，三次反元。

至正十六年3月，元政府因“方国珍复降，以为海道运粮漕运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其兄方国璋为衢州路总管兼防御海道事。”让方氏兄弟负责元东南沿海防务和海上运粮事宜。

至正十七年（1357年）8月，元政府又引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时张士诚已攻下平江，进占元朝粮食的主要产区常州、苏州、湖州等地，元政府深怕粮道断绝，乃命方国珍攻张士诚。方国珍以舟师五万攻昆山，张士诚“遣其将史文炳等御于□NB142□子桥，国珍七战七捷。”士诚不能支，再次降元，方张之间的对抗，也自然结束，两个叛徒握手言和，各守其境。方国珍虽已降元，但依然割据一方，占有庆元（今浙江宁波市）、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今浙江温州市）三路地盘，并分兵攻掠上虞（今浙江上虞东南）、余姚（今浙江余姚）等附近州县，不断扩大其占领区。许多元官对此不平，主张对其进行讨伐，但因“是时朝廷方倚重国珍，资其舟以运粮”，只好容忍姑息。

至正十八年（1358年）12月，朱元璋攻下婺州、衢州后，与方国珍的占领区直接接壤了，朱元璋乃派蔡元刚至庆元招降，“方国珍与其下谋曰：‘方今元运将终，豪杰并起，惟江左号令严明，所向莫敌。今又东下婺州，恐不能与抗，……莫若姑示顺从，藉为声援，以观其变。众以为然。”于是，于至正十九年（1259年）正月，“遣使奉书，献黄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织文绮百端”，表示归服，愿合兵共灭张士诚，3月，又表示愿意献出温州，台州、庆元三郡，并以其次子方关为质。朱元璋放还方关，并授方国珍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国璋福建行中书省右丞，国瑛福建行中书省参政，国珉枢密分院佥院，同时颁给官印。方国珍的投降，并非诚意，只不过为形势所迫暂时应付一下而已，“虽纳款，然其志尚阴持两端。”事实也是如此。至正十八年9月，刚刚接受朱元璋的任命，时隔不到一个月，方国珍又接受了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官职。

至正十九年冬，元顺帝“诏命士诚输粟，国珍具舟”，二人合作运粮至大都，从此，张士诚每年献出十万石粮食，方国珍提供几百只大海船，将这些粮食由海路运往大都（今北京市），缓和了大都的粮荒。因此，元顺帝对他大为赞赏，将他提升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赐爵衢国公。

另一方面，当朱元璋责问他时，则“阳为惶惧谢罪，以金宝饰鞍马献”，继续耍两面派。总之，方国珍的行动，已毫无反元意义，他已完全蜕变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第七节朱元璋的统一和建立明朝

一、朱元璋统一南方

（一）陈友谅的败亡

至正二十年（1360年）正月，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称大汉皇帝后，政治上，不仅放弃了反元斗争，还进而与红巾军的敌人、叛徒张士诚相勾结；军事上，他也不再对元残余据点用兵，而集中兵力进攻昔日的友军朱元璋；生活上，也十分腐朽，睡“镂金床”，玩珠宝玉器，妃嫔成群，他已蜕变为一个新生的地主阶级分子。因此，大汉皇帝陈友谅与朱元璋之间所进行的战争，不再只有反封建的性质，已演变为封建统一战争了。

朱元璋与天完红巾军之间的冲突是从至正十七年（1357年）

10月，双方争夺池州（今安徽贵池）开始的，天完大将赵普胜守池州，常遇春来攻，互有胜负。陈友谅杀赵普胜、徐寿辉称帝后，“将士皆离心”，力量有所削弱，但他却野心勃勃，联络张士诚，东攻朱元璋，扩大其势力范围。至正二年（1360年）闰5月，陈友谅自江州率兵东下，直取集庆（今江苏南京），朱元璋用康茂才致书陈友谅假降，设伏兵于集庆城外，大败陈友谅，其将张志雄、梁铉、喻国兴、刘世衍降，士兵战死、溺死者无数，生俘二万多人，获战船数百艘，陈友谅狼狈逃回江州（今江西九江）。朱元璋乘胜攻占安庆、太平、信州（今江西上饶）。

9月，徐寿辉旧将欧普祥以袁州（今江西宜春）降。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正月，小明王以战功封朱元璋为吴国公。5月，陈友谅反攻，派其将李明道取信州，7月，张定边攻占安庆。8月，朱元璋反击，夺回安庆，并攻占江州，陈友谅逃奔武昌。朱元璋又占南康（今江西星子）、东流、蕲州（今湖北蕲春）、黄州、广济、饶州（今江西波阳）、建昌（今江西南城），其守将纷纷以城降。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正月，大汉江西行省左丞相胡廷瑞以龙兴（今江西南昌）降。龙兴是江西重镇，得之可控江西全省，朱元璋异常高兴，亲至龙兴，对胡廷瑞奖勉有加，改龙兴为洪都。8月，陈友谅将熊天瑞攻占吉安，杀守将张本立，11月复为朱文正夺回。陈友谅的将领纷纷以城降，因而其“疆土日蹙”，处境日益困厄。

为了摆脱困境和侥幸打垮朱元璋，陈友谅派使者见张士诚，约其东西夹攻，张士诚虽应允，但“士诚欲守境观变，许使者，卒不行。”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4月，陈友谅气急败坏，在张士诚未出兵的情况下，率战舰数百艘，兵号六十万，向朱元璋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进行这次战役，陈友谅特造了大战舰，“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

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橹箱皆裹以铁”，十分坚固。当时，朱元璋正率领主力北援安丰，应天空虚，陈友谅认为必胜，故“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要进行战略决战。

但是，陈友凉却没有乘虚直攻应天，而以大军包围洪都（今江西南昌市）。洪都守将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他率众死守，陈军猛烈攻城，都被击退，各种攻城战术都用上了，历时八十五天，依然不能破城。这样一来，一方面使陈军锐气大挫，同时也给朱元璋提供了回兵救援的时间。朱元璋由安丰返回，在作好了东防张士诚的安排后，7月，便率冰师十二万西进，救援洪都。

陈友谅获悉后，离洪都入鄱阳湖，迎击朱元璋。由力量对比上看，陈军兵多船大，朱军兵少船小，陈军占绝对优势。但是，陈军也有许多弱点，首先是陈友谅弑主自立，大失人心，许多将士不愿为他卖命，军心离散，而朱军则上下团结一致，人人奋激，争立战功，在士气上大大超过了陈军；再者，陈军战船虽大，但用铁链相连，“艰于运转，朱军战船虽小，但机动灵活，进退迅速自如，在实战中反占优势；第三，在战术的运用上，朱元璋一开始就抓住了陈军的弱点，利用了火攻。这样，形势就大变了。

7月20月，朱军进入鄱阳湖，21日朱陈两军展开激战，徐达、常遇春、廖永忠率兵奋战，败其前军，杀一千五百多人，首战告捷，军威大振；俞通海又乘风发火炮，焚陈战舰二十多艘，士兵死伤很多，朱军大将韩成、宋贵、陈兆先等亦战死。22日战斗更加激烈，朱元璋命敢死士以小舟载火药、荻苇，点燃后乘风冲入陈军战舰群当中，火乘风势，战舰数百艘被焚，陈友谅之弟友仁、友贵及平章陈普略和许多将领被烧死，数千人被杀，“友仁者，即所谓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数，枭勇善战，至是死，友谅为之丧气。”又经过23日，24日两天激战，陈军大败，已不能支，乃收集残兵取守势，朱军挑战亦不敢应。陈友谅感到无力再战，欲退兵，但入长江的湖口通道已为朱军封锁。陈军进退失据，朱元璋乘机加强与论攻势，瓦解将士，又接连致书陈友谅，重申约他“同讨夷狄”的主张，并责其既启战端，又不敢决战，“无乃非丈夫乎？”陈得书大怒，“忿恚不能答”。陈军被围困湖中，欲出不能，欲守无粮，军心日益解体连陈友谅的左右金吾二将军也率众投降了朱元璋，“友谅失此二将，自是兵力益衰。”两军相持至8月26日，陈友谅已经绝粮，欲奔武昌，在湖口突围时，中流矢身死，其太子善儿，平章姚天祥等被俘。27日，其平章陈荣、参政鲁某、枢密使李才等率众五万余人投降。太尉张定边乘黑夜以小舟载陈友谅尸及其子陈理奔还武昌，朱元璋取得了鄱阳湖决战的胜利。9月，朱元璋马步舟师水陆并进，10月包围武昌，并分兵攻汉阳、德安诸州县。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1日，李善长率群臣劝进，朱元璋即吴王位。2月，经过长期围困后，朱元璋对武昌发起总攻。大汉丞相张必先自岳州来援，被常遇春败于洪山，张必先本人亦被俘。武昌城内粮

尽援绝，2月6日“陈理衔壁肉袒，率其太尉张定边等出降。”陈友谅大汉政权灭亡。

（二）张士诚的覆灭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2月，张士诚袭击安丰小明王，表明他已经完全倒向元朝统治者一边，坚决与农民军为敌。安丰战役后，朱元璋率军回救洪都，张士诚乘机再占安丰。9月，他自称吴王，要求元廷承认，未被批准，元廷向其索粮，他亦拒绝。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8月，为了进一步控制江浙，张士诚还逼迫元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让位于其弟张士诚。让位后，达识帖睦迩被软禁于嘉兴，不久，被迫饮鸩自杀。张士诚身为左丞相，但昏庸无能，只知寻欢作乐，政事全委黄敬天、蔡颜文、叶德新三名腐儒办理，政治极勾腐败，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丞相作事业，专用黄菜叶，一朝西风起，干瘪!”人民对他十分痛恨，洗他必亡。张士诚也日益腐朽，他“不理政事”，居深宫享乐，其部下将领，热衷于官爵田宅，“凡出兵遣将，当出者或卧不起，邀求官爵、美田宅，即厚肠之，始起任事。

至军则载妓女歌舞，日会游谈之士酣宴博弈，及丧师失地而归，士诚亦不问，或复用为将，其威权不立类如此，”因此，随着政治的腐败其军队的战斗力也大大削弱，已日益不能与朱元璋对抗。在朱陈大战期间，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9月，张士诚曾利用朱元璋的降将谢再兴进攻东阳（今浙江东阳），派大将李伯升率兵六十万攻诸暨（今浙江诸暨），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

10月，张士诚攻长兴（今浙江长兴），但均未得手。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2月，李伯升又率兵二十万争夺诸暨，也被李文忠、胡德济击退。

陈友谅灭亡后，朱元璋调兵东下，开始了对张士诚的大规模进攻。在战略上，朱元璋采取了“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士诚肘翼，然后转取浙西”的方针。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10月，朱元璋发布命令，指责张士诚“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启衅多端，袭我安丰，寇我诸全，连兵构祸，罪不可逭”，以徐达为总兵官，率常遇春、胡廷瑞、冯国胜、华高等马步舟师，水陆并进，攻取淮东、泰州诸处。11月，张士诚为分江北朱军之势，向宜兴发动进攻，为朱军击败。徐达攻高邮，高邮是张士诚的发祥地，势所必争，宜兴败后，张乃派左丞徐义率水师由海路进援高邮，但“义怨士诚，以为陷已死地，屯昆山之太仓，3月不进。”这就贻误了战机，使徐达得以顺利攻占高邮。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正月，张以舟师攻江阴等地，也为朱军击败，损失惨重。至4月，朱便全部占领了张士诚原有的苏北及两淮地区，从战略上完成了对张士诚的大包围。这时的平江，“政事纵弛，亲呢奸回，上下蒙蔽，民心离怨而费用无经，士卒困败而征调不息”，已经到了灭亡的前夕。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8月，经过几个月的休整之后，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二十万，向平江进发。发兵前，朱元璋在一篇安民文告中，虽然声讨了元朝和历数张士诚的罪行已但却都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的，文中竟骂红巾军“惟以妖言惑众，不能上顺天意，下悦民心”，表明此时的朱元璋，经背叛农民起义军，蜕变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他所进行的战争，从性质上看，已经变为封建统一战争了。

朱元璋对平江的进攻，也是采取了先剪羽翼后取巢穴的方针。战争进展顺利，至11月，已经攻占了湖州、杭州、绍兴、嘉兴等重要城市，张士诚的重要将领五太子、吕珍、朱暹、王晟、李伯升、张天骐、潘元明等也相继投降，士诚元气大伤，他的地盘也只剩下了平讧、无锡等几座孤城。11月，朱军包围平江城。徐达命各将分兵直抵平江各门下，并占据城外战略要地，四面筑围困之，“又架木塔，与城中浮屠对，筑台三层，下瞰城中，名曰敌楼。每层施弓弩、火铳于上，又设襄阳炮以击之”。

时张士诚外援断绝，城内粮草奇缺，但仍恃平江城固坚守。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5月，朱元璋作书招降，士诚不理，又派说客入城劝降，亦不答。6月，士诚自率精兵欲突围失败，退回城内，计无所出。24日，张士成督战城上，坐银椅，左右进桃，未及尝，中炮身死。9月，平江城内“资粮尽罄，一鼠至费百钱，鼠尽至煮履下之枯革以食。于时城中士卒登垣以守，多至亡没”，已失去了抵抗能力。八日，徐达等攻破平江，张士诚将全家焚死，又率余众巷战，兵败自尽，未死被俘，解送应天。朱元璋劝其投降，张闭目不答，后自缢而死。不久，无锡等城守将亦投降，张士诚政权灭亡。

（三）方国珍的归服

割据浙东沿海台州、温州、庆元三路的方国珍，在朱元璋对张士诚用兵的几年内，依然靠两面派讨生活，他既接受元朝的官位，又向朱元璋献白金、绢匹，但其内心则是倾向元朝的。因此，方国珍对朱元璋阳奉阴违，暗地里探视应天虚实，设兵把守险隘，以期久据三州之地。对此，朱元璋也是了解的，只是由于他正集中力量攻打张士诚，故未发兵浙东，仅遣使问罪而已。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4月，当张士诚的灭亡已成定局时，“方国珍既入贡，复阴泛海，北通扩廓帖木儿，南交陈友定。……屡假贡献觇胜败，为叛服计。”其不降之心更加暴露，朱元璋为书斥责，数其有十二大罪，谕其归服。方国珍得书不报。7月，朱元璋再次遣使，谴其“怀奸挟诈，阳降阴叛，数相愚弄”之罪，并令其贡粮二十三万石，否则将加兵三郡。方国珍惶恐不能决，“惟日夜运珍宝，集巨舰，为泛海计”，准备逃往海上。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9月八日，朱元璋攻灭张士诚，9月28日，即分兵两路攻方国珍，其一路由朱亮祖率金华、衢州（今浙江衢县）等卫马步、舟师等攻台州路，方国瑛败退黄岩，后又逃往海上，朱

亮祖克台州，进占仙居诸县。10月二自，朱亮祖自黄岩攻温州路，大败方军于城办，斩首六十级，获马八十余匹。方明善携妻子出逃厂城破，俘其员外郎刘本，分兵取瑞安。11月1日，“朱亮祖率舟师袭败方明善于乐清之盘屿，追至楚门海口。”另一路由征南将军汤和率领常州、长兴、宜兴、江阴诸军，10月10日出发，自绍兴渡曹娥江，攻占上虞、余姚。11月9日，攻破庆元，方国珍驱部下乘海舟入海，汤和率兵追击，败方国珍于海上，俘其副枢密使方惟益，元帅戴廷芳等。汤和回师下定海、慈溪等县，俘二千人，获战舰六十三艘，马二百余匹，粮食三十五万多石。11月17日，朱元璋又命廖永忠为征南副将军，率水师自海上助攻方国珍。24日，方国瑛遣其子向朱亮祖投降。12月9日，方国珍率其弟方国珉等向汤和投降，得步卒水师两万三千余人，海舟四百二十艘，粮十五万石。继而元昌国州达鲁花赤阔里吉思亦降。浙东地区平定。

（四）陈友定被俘杀

陈友定，又名有定，福州福清（今属福建）人，后迁居汀州清流（今属福建）。其家境贫寒，曾经商，破产后又为驿卒。至正十三年（1352午）红巾军进入福建后，他组织地主武装镇压农民起义，多次打败进入福建的陈友谅部厂还镇压过福建地区的其他小股农民起义军，以军功被元授为县尹，行省参知政事等。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元于延平（今福建延平）置福建行省分省，以陈友定为平章政事，于是，实际上“闽中八郡皆其所有”，统治了福建全境。

福建多山，交通不便，更加以农民起义在全国爆发，南北驿路隔绝，元朝政令不能及时到达福建，因此，陈友定实际上成为一个地方割据势力，福建的人事、甲兵、赋税得以独专。但他对元廷十分恭顺，在张士诚、方国珍停止向元朝运粮后，他却从福建运粮至大都。他北抗陈友谅、朱元璋，阻挡红巾军南下福建，他还北攻处州，杀朱元璋大将胡深，一直与农民军为敌。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11月，朱元璋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率兵南下攻陈友定，由杉关进入福建，很快攻占了光泽、邵武、建阳，逼近建宁（今福建建瓯）。12月，朱元璋又命汤和，廖永忠率水师自庆元由海道攻福州。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胡廷瑞下建宁，破延平，陈友定服毒未死，俘送应天被杀。延平既下，兴化、泉州、漳州等地守将也相继投降，福建平定。

福建平定后，今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一些元末割据势力，随后也相继被朱元璋统一。

（五）明升投降

元末割据四川的是明玉珍。明玉珍，随州（今湖北随县）

人，为人刚直，其“家世以农亩为业”，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后，被当地富豪推为屯长，组织地主武装，结寨白保。至正十一年（1351

年）冬，徐寿辉起义军发展起来，遣使招谕，明玉珍归服，被授为统兵征虏大元帅，率原部军马，镇守沔阳一带，至正十五年（1355年）春，徐寿辉令明玉珍率斗船五十艘入川筹粮，满载而归。至正十七年（1357年）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与左丞哈林秃守重庆，二人不和，12月明玉珍乘机攻占重庆，俘哈林秃，押送汉阳，徐寿辉以其功授陇蜀省右丞。至正二十，年（1360年）4月，明玉珍大败元兵于嘉定，杀完者都，进占蜀中各州县。至正二十年（1360年）5月，陈友谅杀徐寿辉，明玉珍怒曰："一吾与友谅同事徐氏，今友谅弑主自立，当整兵讨之。遂令莫仁寿领兵守夔关，不与相通。"三军缟素，为宋主发丧。"10月，玉珍自称陇蜀王。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正月1日，明玉珍称皇帝，改元天统，国号大夏，仿周制，中央设六卿，后改方中书省，枢密院等；地方府置刺史，州设太守，县曰令尹，并开科取士，明玉珍还实行屯田，"以赡国用"，又"颇尚节俭"，"赋税十取其一，农无力役之征"，蜀中人民"赖以初安"，获得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明玉珍曾命万胜领兵攻取汉中、云南等地，虽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其辖地没有扩大。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以后，明玉珍即转入防守，基本控制了今四川及贵州的北部地区。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2月，明玉珍病死，死前嘱群臣曰："汝等同心协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其子明升即位，年仅十岁，由其母彭太后垂帘听政，基本上继承了明玉珍的睦邻守疆政策，大夏成为地方性的割据政权。

明玉珍时期，大夏与朱元璋已建立通使关系，相互友好。明升即位后，依然与朱元璋保持联系。张士诚，方国珍灭亡后，明升日益孤立，大夏政权内部大臣之间也矛盾重重，国势日益衰落。明王朝建立并北伐灭元后，朱元璋当然也不会再允许这一割据政权的存在，洪武二年（1369年），乃招谕明升归顺，明升不从。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以汤和为征西将军，周德兴为左副将军，廖永忠为右副将军，率水师由瞿塘峡西上攻重庆，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顾时为左副将军，何文辉为右副将军，率步骑由秦陇攻成都。东路军汤和受阻于大溪口，北路军则进展顺利，很快攻占阶州（今甘肃武都西北）、文州（今甘肃文县）、绵州（今四川绵阳），汉州（今四川广汉），进逼成都。6月10日，东路军廖永忠绕道背后攻破夔州，18日，逼近重庆，明升大惧，22日投降。大夏灭亡。

二、朱元璋的转化和建立明朝

朱元璋出身于贫苦的佃农家庭，父兄死后，孤苦无依，当了和尚，成为游方僧，过着乞丐式的生活。红巾农民起义爆发后，他投入农民军队伍，由一名战士逐渐升为大将。在反元斗争中，朱元璋叱咤风云，发挥了他的智慧和才能，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但后来却又转化为封建皇帝。

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中的活动，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讨期，从至正十二年（1352年）至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是朱元璋进行反封建斗争和逐渐向地主阶级转化的时期，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

朱元璋称吴王，就标志着朱元璋完成了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转化，此后他所进行的战争，已经不再是反封建的农民战争，而是以建立一个新王朝为目标的封建统一战争了。

前一时期，朱元璋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逼迫下，走投无路，参加了郭子兴的起义军。参加起义后，如前所述，他“每遇敌，智勇奋出，身先士卒”，确实与地主阶级和元朝统治者进行了殊死搏斗。对人民群众，朱元璋则采取保护政策，每新占一地，即对贫民进行赈济，抚问疾苦，因此，朱元璋的军队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许多农民纷纷参加他的队伍，而一些地主、官绅则骂朱元璋的军队是“淮西寇”。在这一时期内，他尊奉小明王，用龙凤年号，称韩林儿的命令为“圣旨”；他以“复宋”相号召，与韩林儿、刘福通的政治口号是一致的；当安丰受到张士诚的围攻而向他求援时，他能冒陈友谅乘虚进攻应天的风险，不顾李善长等人的反对，亲自带领主力增援，救韩林儿于危难之中。这都说明，在这一时期内，朱元璋不愧为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

但是，也应当看到，朱元璋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攻占应天后，也加速了向地主阶级的转化，转化主要表现在：第一，保护封建生产关系，扶植新老地主阶级分子。朱元璋攻下应天后，即“悉召官吏，父老、人民谕之曰‘……汝宜各安职业，毋怀疑惧，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居官者慎毋暴横，以殃吾民。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让官吏、父老各安职业，就是保持旧的生产关系，允许他们占据原有土地，依旧过剥削生活，对老牌地主采取保护政策。另外，还扶植新生地主阶级分子，朱元璋一谓武官曰：‘听从开垦荒田，以为己业，’文官拨典职田，召佃耕种，送纳子粒，以代俸禄。”对作战有功的将领，朱元璋还经常赐田。这样，就扶植出了一批新权贵，出身于贫苦农民的起义军将领，很快成为新生的地主阶级分子。第二，招降纳叛，重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攻占应天后，由于朱元璋明确宣布“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因此，许多在元朝统治下失意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应聘投到朱元璋的门下，特别是刘基、宋濂、章溢、叶琛所谓“四先生”来到应天后，江南地主知识分子来投者更多，为此，朱元璋特设“礼贤馆”接待。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任用上，最初还比较警惕，不让他们掌握实权，对他们的建议，也不一定采纳，但渡江之后，“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朱元璋的感情便逐渐发生了变化，从而对他们也一个个加以重用，都安排到重要官位上。如李善长、宋思颜担任了江南行中书省的参议，陶安、孙炎、孔克仁、孙宪等充省官。李善长深得信任，“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善长。”秦从龙曾任元和林行省左丞、江南行台侍御史，后避兵乱在镇江闲居，徐达破镇江，朱元璋即令其寻访致意，后又以朱文正、李文忠为代表用白金、文绮往聘，秦从龙到应天时，朱元璋亲至龙江迎接，随后“事无大小，悉与咨谋，密书漆板问答，左右皆不知。上称先生而不名，……

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镇压过农民起义军的刘基也“侍帷幄，预机务”，备受重用；在地方上，则任用李习、许瑗、陶安、王宗显、吴去疾等一大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担任知府，掌握地方大

权。许多投降的元将领也受到重用，继续带兵。这样，朱元璋的政权便逐渐为地主阶级所掌握，其性质发生急剧的转化。第三，尊孔读经，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在封建儒生的影响下，朱元璋开始提倡尊孔读经，他新到一处，必亲谒孔子庙，又请儒生讲经，如在攻占婺州（今浙江金华）时，即请儒亡许元，叶瓒、胡翰、汪什山等十多人“皆会食省中，日令二人进讲经筵，敷陈治道。”大儒宋濂更是“恒侍左右”，不时为他讲解儒经，讲求“帝工人经大法”，他还设立儒学提举司，以宋濂为江南儒学提举，令各州县设学校，讲授儒经，培养儒生。对于寺院也采取保护政策，攻下应天后，太平兴国禅寺住持觉原，拜见朱元璋，言租种寺田的佃民参加起义，他担心导致寺田荒芜，还说寺院林木多为樵者砍伐等等，朱元璋即下令禁止，并“封一剑授师，曰‘敢有伐木者斩’”。对于那些顽抗到底的元朝将领、官员，朱元璋也大加表彰，誉之为“忠臣”、“义士”，或以礼安葬，或建祠纪念，如渡江破太平（今安徽当涂）时，元总管靳义赴水死；朱元璋说：“义士也，具棺敛葬之。”攻下应天时，元‘御史大夫福寿死之，太祖命于城中立祠，每岁祀之。”下处州，元将石抹宜孙死，朱元璋也“嘉其尽忠死事，遣使祭之，复处州民所立生祠。”对于那些已被生俘而不愿投降的元朝文武官员，朱元璋反认为是“为人臣者，各为其主”，不加勉强，将他们释放。从这些事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出，朱元璋的思想感情在发生急剧变化，封建伦理纲常已在他的思想中占了统治地位。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朱元璋在群臣的一再“劝进”下，称吴王，置中书省，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建立了一套封建官僚制度。朱元璋一登上王位，就对徐达等人说：“建国之初，当先立纪纲，……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把建立封建法纪作为建国之初的头等大事，可见这时的朱元璋，早已把小明王的龙凤政权抛到一边，已经以开国皇帝自居了。灭陈友谅之后，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在罗田县（今属湖北）爆发了兰丑儿起义，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在鄘县（今属湖南）爆发了饶一宁的起义，这些农民起义都遭到镇压，朱元璋对镇压起义的刽于手大加称赞，并“赐以绮帛，仍命中书悬赏格。”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8月，朱元璋攻张士诚，发布《平周榜》，公开咒骂红巾军：“聚为烧香之党，根蟠汝、颍，蔓延河、浴，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并向地主阶级作出保证：“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舍，仍前为主，依额纳粮，以供军储，余无科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室家”。这年12月，朱元璋令廖永忠迎韩林儿归应天，在瓜步将其沉杀于江中，连“龙凤”招牌也抛弃了。这都足以说明，朱元璋已经彻底背叛了红巾农民起义军，完全转化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所进行的战争，也不再为农民战争，而是单纯的封建统一战争了。

至正二十七年12月11日，是时南征北伐进展顺利，李善长等奉表劝进，朱元璋不允，明日李善长等再请，朱元璋令“斟酌礼仪而行”。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四日，朱元璋正式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国号大明，以应天为京师。朱元璋由农民领袖蜕变为开国皇帝。

三、朱元璋北伐和元朝灭亡

在消灭陈友谅、张士诚之后，朱元璋即着手北伐。当时的北方，元朝的军队，经过农民军十几年的打击，已经土崩瓦解；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崛起的几支地主武装，却发展起来，孛罗帖木儿驻大同，扩廓帖木儿据河南，李思齐，张良弼据陕西，王宜、王信父子在山东，他们分据北方各地。这些军事集团之间，为争夺地盘互相攻杀，战争连年，削弱了自身的力量。

元朝最高统治集团，也更加腐朽。元顺帝“怠于政事，荒于游宴”，日夜在宫中过荒淫腐朽生活；朝臣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斗争也很激烈，右丞相搠思监、宦官朴不花等支持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欲废顺帝立太子，御史大夫老的沙等则支持顺帝，反对废立，皇太子联络扩廓帖木儿为外援，老的沙则以孛罗帖木儿为后盾，两派斗争达到白热化。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7月，孛罗帖木儿派秃坚帖木儿带兵攻入大都，杀搠思监与朴不花，皇太子出走。顺帝乃以孛罗帖木儿为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老的沙为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总揽朝政。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3月，皇太子令扩廓帖木儿，李思齐等发兵讨孛罗帖木儿，孛罗战败。7月，孛罗被杀于宫中，老的沙、秃坚帖木儿出逃。9月，皇太于、扩廓帖木儿还大都，顺帝又任扩廓为右丞相，10月，加封河南王，代皇太子总制关陕、晋冀、山东等处牢马，便宜行事。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正月，李思齐、张良弼、脱列伯、孔兴等统兵将领自会于含元殿基，推李悥齐为盟主，与扩廓帖木儿相抗，扩廓发兵讨伐，战火不息，“两家相持一年，前后百战，胜负未决，而国家大事去矣。”总之，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倾轧、残杀和混战，元朝统治更加腐败不堪，上下解体，已经到了崩溃的前夜。

正当元朝统治者内部互相撕杀、倾轧的时候，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10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二十五万北伐，行前发布檄文《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以民族斗争相号召，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强调“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表示要“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要赶走蒙古人，重建汉族封建政权。檄文以大汉族主义，民族斗争相号召，这就解除了汉族地主的顾虑，争得他们对北伐的支持；朱元璋在檄文中还表明“蒙古、色日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仪愿为臣民者，与小夏之人抚养无异。”这一政策就把打击范围缩小到仅限于蒙古统治者和投靠蒙古贵族的少数汉族官僚，争取到了更多的人保持中立，起到了瓦解敌人的作用。对北伐军的纪律，朱元璋也很重视，他一再告诫诸将“今命尔诸将各率所部以定中原，汝等师行，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祸乱，以安民生。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口，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诸将皆表示谨守。

对作战方针，朱元璋也作下了明确规定，他指出："先取山东，抑其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天下形胜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町席卷山。"其后的整个北伐战争，也是按照这一方针进行的。

徐达、常遇春率北伐军沿运河北上，11月四日，经淮安至下邳（今江苏邳县南），摆出进攻山东的势态。当时，据守山东的是元淮南，淮北义兵都元帅王宣，徐达派使者至沂州（今山东临沂市），招谕王宣及其子王信，王宣父子表示投降。朱元璋派庸臣至沂州，授信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但王宣父子首鼠两端，表面虽表示投降，而暗中却募兵备战，并夜袭唐臣。徐达早已有备，11月10日急攻沂州，王宣自度不支，开门降，王信逃往山西。徐达杀王宜，进占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莒州（山东莒县）、赣俞（今属江苏）、日照（今属山东）等城。11月29日，徐达破山东军事重镇益都路（今山东青州市），元平章李老保降，杀元宣慰使普颜布花、总管胡浚、知院张俊，进占寿光、临淄、昌乐、高苑（今山东博兴西南）诸县。12月7日，徐达下济南，元平章达多尔济（达朵儿只）降。北伐军的偏师大都督府同知张兴祖出徐州北进，也顺利攻占东平、曲阜、兖州、邹县、东阿等地。徐达攻占益都、济南后，声威大振，各地元军望风瓦解，密州（今属山东诸城）守将邵礼、登州（今山东蓬莱）

守将董卓、莱州（今属山东）守将安然等投降。洪武元年（1368年）2月，常遇春攻克东昌（今山东聊城）。至此，山东全境平定，顺利实现了"先取山东，撤其屏蔽"的战略目标。为牵制元兵，在徐达进兵山东的同时，以邓愈为征戍将军，率偏师由襄阳北进，洪武元年（1368年）3月27日，攻克河南重镇南阳。

徐达平定山东后，按照朱元璋的部署，立即"移兵两河"，向河南进军。洪武元年3月29日攻汴梁，元守将李克彝弃城走，左君弼投降。4月，徐达、常遇春率军攻洛阳，与五万元兵战于洛水之北，常遇春冲入敌阵，大败元兵，梁王阿鲁温以洛阳降，李克彝奔陕西，河南州县相继归服。4月22日，徐达、冯国胜，康茂才攻占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逼近潼关，李思齐走风翔，张良弼奔鄜城（今陕西富县）。26日，冯国胜破潼关，西略华州（今陕西华县）。5月，徐达至陕州，增兵守潼关，李思齐、张良弼受阻于陕西，从而完成了"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的任务。至此，潼关以东，尽为朱元璋所有，大都已完全暴霹在朱军面前。

5月21日，朱元璋至汴梁，改汴梁为开封府，置中书分省于开封，以杨宪署省事，何文辉为河南指挥使，驻守河南。六川初，朱元璋正开封与徐达等议取大都。7月，徐达调凋益都、徐州、济宁之兵会于东昌（今山东聊城），进兵大都。闰7月2日，徐达率北伐上力山开封出发，北渡黄河，攻取河北州县，薛显、傅友德率兵取卫辉（今河南汲县），彰德、磁州、邯郸、广平相继攻下。徐达集诸将于临清（今属山东），12日，沿运河水陆并进。14日，常遇春攻克德州（今届山东）。当时，

扩廓帖木儿据太原，李思齐等据关中，正互相攻杀，元顺帝令扩廓出井陉以阻击明军，李思齐出潼关以收复河南，二人皆不理，大都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20日，徐达下长芦（今河北沧州西），趋清州（今河北青县），至直沽（今天津市郊），元守将也先望风而逃，大都震动。28日，明军克通州（今北京通县），顺帝大惧，知不能敌，乃携后妃、太子，百官夜半出健德门，由居庸关出长城，奔往上都（今内蒙正蓝旗东）。8月2日，徐达率兵进入大都，元朝灭亡。

元朝虽已灭亡，但其残余势力还分散各地，扩廓帖木儿据太原，李思齐、张良弼据陕西，纳哈出据辽东，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据云南，他们拥有相当数量的兵力，元顺帝还想卷土重来，这对新建的明政权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此，在攻克大都后，朱元璋对各地元朝残余势力继续用兵。洪武元年（1368年）12月1日，徐达克太原，扩廓败逃甘肃，山西平定。洪武二年（1369年）2月，徐达、常遇春进军陕西，3月攻克奉元（今陕西西安）、凤翔，4月徐达克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李思齐奔临洮（今属甘肃），明将冯胜围临洮，李思齐穷蹙，举城降，张良弼亦为扩廓帖木儿所杀。6月，常遇春、李文忠率步骑九万破上都，元顺帝北逃，次年死于应昌（今内蒙古达里诺尔西南）。随后，扩廓帖木儿仍不断侵扰大同，兰州等地。洪武三年（1370年）徐达、李文忠再征扩廓，4月，大破之，扩廓远逃和林，洪武八年（1375年）死去。洪武十四年（1381年）9月，傅友德、兰玉、沐英攻云南，12月，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兵败自杀，云南平。洪武二十年（1387年），纳哈出降，辽东平定。至此，全国为大明王朝统一。



远古战争史



目录

序
第一部分 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总论
第一节周王朝概述
第二节西周灭商的战争
第三节周朝的军政建设
第四节春秋战国主要国家的形势
第五节七国的革新与变法
第六节七国的建郡与长城
第七节七国的兵力与战争规模
第八节七国军制装备与军事学术的进步和发展
第二部分 周朝东迁前后的战争
第一节镐京战役
第二节葛战役
第三节齐鲁长勺战役
第三部分 春秋时期战争
第一节春秋列国兼并战争概述
第二节晋楚城濮战役
第三节晋楚战役
第四节晋齐鞍战役
第五节晋楚三驾战役
第六节吴楚柏举战役

序

中华民族生息繁衍于中华大地的历史源远流长，1927年发现的最早的北京猿人化石，距今已五十万年。丁村人、河套人距今十几万年，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距今也近两万年。母系氏族公社的形成，约距今四五万年。代之而起的父系氏族公社，距现在约五千多年。人类在进入父系氏族公社之前的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长期过着原始群落和原始公社的生活。他们没有典型的私有观念，没有阶级，没有压迫、因而也就没有发生典型战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

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人们制造工具能力的提高，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保障人们生活必需的物质财富也便相应地增加，人口的增殖加快，原始群落逐渐为氏族公社所代替。当我们的祖先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前后，似乎已经有了原始氏族部落争斗的痕迹。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村遗址来看，这个大的氏族居住村落的周围，环绕着一道壕沟，这是否就是当时用来防御其他氏族侵犯而构筑的障碍，还只是一个合理的推想。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的先人，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已经出现了氏族公社之间的原始争斗了。假如不算牵强附会的话，无疑，在这个时期前后，已出现了我国古代战争雏型。

氏族社会时期。生活在我国古代黄河流域一些氏族部落和生活在长江，淮河流域的众多蛮夷氏族部落，对我国太古时代的社会进步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共同创造着中华大地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根据传说和记载，贡献最大、发展较快的是“三皇、五帝”及其氏族部落。

黄帝轩辕氏部落在今陕西地区，发明了舟、车和衣服；同在陕西地区的炎帝神农氏部落，传播了播种耕耘作物的工具和技术；生活在黄河下游的太昊氏又称伏羲氏，发明结网捕鱼和八卦记事；生活在晋、鲁、豫交界地区的蚩尤九黎部落，可能创造了我国最早的冶炼技术；燧人氏继承了前人钻木取火的方法。这些优秀人物、由于对氏族部落的杰出贡献，被历史地推上了部落首领的地位，每当部落之间发生纠纷，他们就是统率部落征战的最高统帅，《国语·晋语》和《史纪·五帝本纪》都有黄帝率领氏族部落战胜蚩尤联盟部落的记载。但是这个时期部落酋长以至部蒋联盟的首脑都由推举产生并实行禅让制。尧帝禅让于舜帝，舜又禅让于治水功臣禹。《礼记·礼运》记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这种社会生活结构，还处于原始社会时期，因而，没有频繁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政治和经济需要。

根据传说我国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战争，是黄帝与蚩尤部落的“涿鹿之战”。这次战争发生于距今约四千多年前。当时蚩尤为黎苗族集团的领袖人物，他领导八十余个氏族击败以炎帝榆罔为首的的夏族集团后，自立为炎帝。夏族中的一个氏族领袖黄帝公孙轩辕起而领导夏族与蚩尤之黎苗部族进行作战，两军在现今河南中部地区接触后，蚩尤依仗优势兵

力和较先进的金属制兵器，节节北侵，深入到河北涿鹿一带地区。后来黄帝部落利用有利的气候和地势条件彻底打败并擒杀了蚩尤。这一重要战争的胜利，不仅使中原地区又为夏族及与其联盟的其他氏族部落所共有，而且为中华民族以后的繁衍发展打下了牢固的根基。

在黄帝战胜蚩尤后，据《尚书》、《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史书记载，尧、舜、禹又多次征伐黎苗各部族，使这些部族势力渐渐南移，对夏族在中原定居和发展具有不亚于黄帝打败蚩尤的重大作用。

奴隶社会时期，我国无阶级的原始社会传至禹时，在一些较为先进的氏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已彻底解体。约于公元前二千二百年建立的夏王朝，使中国跨入了奴隶社会。禹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启，开创了帝王世袭制的发端。从此，帝王成了自己统率下的地区和臣民的最高奴隶主，但是，从社会进化的角度看，由原始社会进入有阶级的奴隶社会。则是社会发展的一次飞跃。它既标志着社会生产、经济生活、人类知识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也标志着私有制度，阶级和阶级剥削已被确认并固定下来。

私有制的出现和发展，使夏朝不断发生战争。夏禹之子启继承王位后，先是有扈氏不服，与启交战，被启战败。启子太康继位，太康又传位仲康，再传给相。在此期间，先后又发生了夷族首领有穷氏后羿夺取夏政权，羿之将领寒浞杀羿并夺取羿政权，寒浞之子浇消灭夏的同族斟灌和斟两个氏族等等规模大小不同的撕杀与战争，至相的儿子少康时期，又重新联合起夏族的的一些臣民，消灭了寒浞之子浇和豷，才重新恢复了夏朝政权。少康死后，其子杼继位，这位很有作为的君王，多次向东征伐，征服了东夷各个氏族，遂巩固了夏朝统治。但是，当传位至夏桀时，由于夏桀的荒淫无道，终于被商汤发动的一系列讨伐战争所灭亡，从而结束了夏王朝历时四百多年的统治。

夏王朝的覆灭，并没有结束奴隶制社会，代之而起的商王朝，却进一步发展了奴隶制。在商王朝时期，军队数量已相当可观，卜辞记载有："五作三师，左、中、右"之词。每次作战可出动三千至五千人，最多时达到一万三千多人。军队的主帅都由王和大臣充任。作战中，以车战为主体，步兵与战车协同配合，商军把俘获的敌人，或充做奴隶，或活活杀死，有一次最多杀死俘虏二千六百多人。这表明当时的战争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商代前期仲丁曾征伐兰夷，河亶征伐班方。商王武丁一生征战五十余次，堪称战功赫赫的一代君王。武丁发动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一是征伐鬼方、土方之战。武丁经过三年苦战，终于打败了活动于今陕西北部和河套地区的鬼方部落。《易经》就记述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此外，商代还发动过征伐吉方、人方，湔方，基方，羌方，盂方，周人等方国和荆蛮等氏族部落的战争。这些战争有的规模也不小，战争的起因无从详细考证，可能多为奴隶主集团的争夺。

商朝传至它的末代统治者纣王时，由于纣王和整个统治阶级更加奢侈、残暴、荒淫无度，进一步激起了奴隶对奴隶主阶级的激烈反抗，预示着商王朝已走到了它的末日，终于经牧野一战即刻土崩瓦解。

纵观商代及其以前的历代战争，虽然由原始争斗逐渐具备了战争的基本形态，但就战略策略思想、军队的组织编制，作战的组织指挥等等方面来看，还处于战争的原始形态和初级阶段，既无详尽战争史料可供

研究考证，也无更多深奥的战争理论可供思索借鉴，故对这一时期的战争史从略简述。

第一部分　西周与春秋战国时期总论

第一节周王朝概述

我国西北泾、渭河间的邠(陕西彬县)、凤(陕西凤翔)地区，有一座岐山，山南有“东西横亘”、“肥美宽平”的周原。商小乙26年，邠地东北聚居的部族，在首领古公亶父率领下，从邠(豳)南移，迁于周原定居，并建立国家，国号为周。周原土壤肥沃，气侯适宜，加上周人勤劳勇敢，奋发有为，从古公，季历到姬昌(文王)，国势日益强盛，逐渐战胜和征服邻境的部落与小国，占领密须(甘肃灵台县)、邘(河南沁阳县西北)和黎(山西长治黎城一带)。邘、黎的占领，威胁殷朝首都朝歌的安全。殷纣王没有重视周的兴起，却派出大军对东方徐淮一带进行长期的战争，因而，商的军事力量随着战争的延长大为削弱。

约于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东征伐纣。牧野一战，商朝覆亡。由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到八世纪，我国进至西周时代。周取得全国政权后，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阶级矛盾趋向缓和，社会出现繁荣兴旺的鼎盛时代。但随时间的推移，初期军政措施，逐渐落后于形势的发展。阶级矛盾上升，统治阶级针对现实情况虽然作了些革新，一度出现“宣王中兴“的短期复兴时期。但是改革并不彻底，又没有坚持贯彻始终，这就难免走向没落。西周300多年间，经历了鼎盛、衰退、中兴到没落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不断发生战争，西周政权，最后覆没于犬戒入侵的“镐京之战”。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舍弃镐京，迁都洛邑，到公元前476年，我国历史经历了一个重要的时代——春秋时期。平王东迁后，重建的东周政权，无论政治、军事和中央政权“王室”所控制的伊洛等地，都远远不能与“山川四塞，形胜甲于天下”的西周相比，形成王室衰微，无力控制诸侯国的局面。诸侯国间互相征战，盛行兼并，战争频繁。强国并弱国，大国并二等国和小国。兼并的结果，使周初一千八百国，到春秋时期仅剩一百五十余个诸侯国。存在的较大国有晋、楚、齐、秦、吴、越、鲁、卫、燕、曹、宋、郑、陈、蔡等十四国，以晋、楚、齐，秦、越最为强大，燕乃后起。鲁、卫、曹、宋、陈、蔡、郑属于待亡的二等国。进入战国时代，原来作为全国大宗和共主的“东周”，已不再是全国的最高政治领导，而沦为不受重视的小国。西周时那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渐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所替代。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小国也就随之消亡。

国内食采邑的贵族大夫，彼此之间也是互相兼并，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有的废黜国君，另立为自己政治服务的傀儡，或干脆取而代之。有的分裂国土，自立为君。齐的田氏、崔氏，鲁的三桓，晋的六卿都是这样互相兼并的。韩、赵、魏三家分晋，废黜晋君，成为三个独立国。春秋时期的二等国和小国，也多数于这个时期被兼并。到了战国，

晋分裂出来的韩、赵、魏三国和秦、楚、齐、燕形成七雄并峙的局面。七国的领土疆域、政治和军事实力虽然也不平衡，但基本上旗鼓相当。兼并战争，随之更加频繁剧烈，范围也更加扩大，被称为“战国时代”。

第二节西周灭商的战争

周灭商朝战争，最关键的是牧野之战，其次是扫除商奴隶主叛乱的周公东征之战。

牧野之战大约发生于公元前1027年，即殷纣王三十三年。在这次战争中，周武王率军战胜了商纣王，从而结束了商朝的统治。中国社会进入了西周时期。

第一商朝的衰落

商汤击败夏朝最后一代君主夏桀，灭夏建立商朝后，共经历6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商王朝经历了由强盛至衰败的发展过程，自其第二十三位国王武丁死后，势力逐渐趋向衰落，在传位至第三十一位国王纣辛时，便走向了殷商王朝的末日。

据《史记》记载，殷纣王非但不是昏庸无能之辈，反而还是勇力过人，天赋聪颖、才思出众之人。他“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但他由于骄横暴虐，刚愎自用，挥霍无度，沉迷于酒色淫逸的生活；在政治上排斥忠良，妄杀贤士，重用奸臣；这就使一些有实力、有威望，有影响的诸侯臣属纷纷背离，殷统治集团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这些都引起殷贵族上下的不满与愤慨，加速了商王朝的覆亡。因此，尽管在牧野之战时，尚有相当强的实力，仍然彻底败在周武王五万军队的手下。

第二周王朝的兴起

周本为渭水中游的一个古老部落，居住于今陕西中部的一些地区，依靠丰盛的水草，肥沃的土地、适宜的农业气候，以自己长于耕种的技术，逐渐发展起来。周在商武丁帝时期是商王朝的诸侯国，周从周文王姬昌起，在政治上出现一批精明干练，文武兼备的当权人物，如文王、武王、吕尚，周公旦等等。据史料记载当时的诸侯已日渐依附于周，在经济上由于推行一些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农业措施，国力日强，开始积极向外扩张。它打败了西北方的犬戎(居住在陕西凤翔地区)，再伐密须(甘肃灵台)、邘(河南沁阳地区)，又伐黎(山西黎城县)等地后，进而夺取了商王的宠臣崇侯虎的崇地(河南嵩县北)，随之迁都于丰，(陕西长安县)。周扩地千里，声威大振。《史记》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周文王争夺天下共主的雄心和咄咄逼人的东进势头，震动了商王朝。然而，殷纣王并未从震动中清醒，以他为首的奴隶主统治集团，仍沉迷于“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的醉梦苑的生活之中。广大奴隶群众对商王朝早已恨之入骨。商王朝的统治已危在旦夕，摇摇欲坠。

第三牧野之战

周在文王时期虽已相当强盛，有众多诸侯归附，但鉴于有600多年统治根基的殷商王朝仍有强大势力，在他生前一直未敢进行夺取商朝政权的战略决战。周文王死后，其子姬发继承父位，号周武王，并把都城迁往镐(陕西长安县)。

周武王继位后，在姜尚和周公旦的辅佐之下，继续增强军事力量，广泛联络诸侯，更加积极地进行灭亡商王朝的战争准备。武王继位的第

二年，即亲率大军东进，观兵于孟津(今河南孟津县)，故史书称：“东观兵，至于孟津”。当时有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带兵前来相会，他们一致主张即刻向殷商王朝进攻。但周武王此次却没有发动进攻。

这次观兵，规模如此巨大，由镐京至孟津，长途跋涉，千里迢迢,且有那样众多的诸侯前来相会，这在古代交通不便，军队行动受到极大限制的条件下，可见周武王事前做了多么艰巨周密的准备工作。说众多诸侯“不期相会”或“不约而同”，并把这、次观兵行动说成是一次“侦察”的说法，按常识推断是不科学的。这可能是周武王第一次伐纣行动的夭折。之所以没有渡河进击的原因，或是征集力量的不足，或是渡河工具的缺乏被黄河滔滔大水所阻，或是周领导集团内部临近渡河之前，发生严重意见分歧。另外的原因还可能，由于殷朝方面担负军政重任的微子、箕子、比干，三大臣此时还健在，使武王感到无必胜把握，因而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不敢发动进攻。

周武王组织孟津观兵，虽未向殷发动进攻，但灭殷之势已如箭在弦上，终久必发。然而，这时商朝奴隶主阶级既未引起足够重视，更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由于统治集团变本加厉压榨人民，挥霍社会财富，更加激起广大奴隶的反抗，这就给周灭殷提供了更好的政治条件。周又经过近两年的准备，约到公元前1027年，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加之殷纣王杀王子比干，微子出走，箕子被囚以后，周武王找到了进攻的口实，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于是开始向殷发动进攻。周联合起微、、彭、濮、羌，庸、蜀、等部族，武王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沿渭水、黄河向东进发，十二月大会诸侯于孟津。全军渡过黄河后，即向殷商都城朝歌推进。二月癸亥，周军进至距朝歌约七十里的牧野附近时，与殷纣王的军队相遇。殷周两军战斗发生前的概略位置如下：

殷军：在牧野之东北；

周军：在牧野之西南；

周军区分为前后两军，后军(主力)由武王亲自指挥，前军由姜尚指挥。

公元前1027年二月甲子日凌晨，殷周两军于牧野附近展开战斗。周武王亲自指挥大军，“以大卒驰商纣师”，就是以戎车与虎贲甲士纣军冲击。这里地形较为平坦开阔，周军之戎车和虎贲甲士得以充分发挥战斗威力。而商军主力这时还远在东方与淮夷作战，一时难以调回。商王只好将大批奴隶与抓来的东夷战俘临时武装起来应战。他们痛恨商王朝，心无斗志，在周军的冲击之下，纷纷倒戈，配合周军攻打商军，因而商军在周军的冲击之下，迅即崩溃。殷纣王见大势已去，返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身亡。周经过牧野决战，终于灭亡了有600多年统治根基之殷商政权。

此次战役中商军的人数，《史记·周本纪》中说有七十万，这很难置信，因为在殷商奴隶制时代，组织起七十万大军决非一朝一日之功。但从史料记载来看，商军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则当无疑。《诗经·大雅》说：“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就生动地描述了商军众多的情景。商军所以一触即溃，是因为殷商政治腐败，刑罚残酷，广大奴隶群众极其痛恨殷商的残酷统治，所以在周军的攻击之下，纷纷倒戈，不战而降。

第四平定管蔡武庚之乱

牧野之战，周军虽一战而胜，但殷商之广大地区尚有强大的势力。殷商贵族无时无刻不在企图复辟殷商王朝。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后两年即去世。在周公旦辅佐下，其年幼之子成王诵继位。这时被封于原商都朝歌的纣王武庚，串通分封于邶，卫，鄘地区的武王弟管叔、蔡叔、霍叔，借机煽起叛乱。

《书·大诰》记载：武庚叛乱，声势很大，包括东方的徐、熊，奄、盈等较大之部族、国家。地区很广，大体包括今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的一些地区。同时周本土内也出现骚乱。这对新生的周王朝政权，无疑是生死攸关的时刻。因此，周公旦一方面说服王族内部反对东征的势力，一方面昭布天下联络和调集诸侯的力量，亲自率兵东征。东征战争虽然与牧野之战相隔二十三年，但却应看作是周灭商战争的继续与发展。这场战争由于叛乱方面的政治、民族等复杂关系，没有形成统一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抵抗周军的战争，但仍经历三年之久，周公才平定东夷各国与部族，杀了武庚、管叔、把商朝残余势力的反叛镇压下去，使新生的周政权得以巩固。周朝的疆域也扩展到现今的河北、山东、安徽的一些地区。

周王朝为了巩固自己东征战争的胜利成果，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它把殷商遗民中的顽固势力强行迁往洛邑地区(在今洛阳东)，筑成周城定居，并选拔周人编成军队，驻守于此，号称“成周八师”。另外，征集一部分被征服地区的人编成“殷八师”。成八师和殷八师两支军队，成为周代制服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东方各个部族的基本武装力量。

第三节周朝的军政建设

第一政治上采取的重要措施

奴隶主贵族和土地国有制(或称王有制)，构成了西周政权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就是这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本写照。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各种等级的诸侯、卿大夫等大大小小的贵族，由于占有封地的不均，与发展快慢的差别，特别是各部族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使得整个周代兼并、掠夺战争此起彼伏，异常激烈。这些情况使周朝统治者在政治上必须采取得力措施，才能稳定周朝的政权。

牧野之战，周战胜殷，以偏居西方的小国，主持中原政权，对原来商朝统治的地区，特别是为数多、具有很强实力的殷商贵族遗民，如何妥善统治是个关乎周朝政权稳定的要害问题。周武王曾就此征求他的重要大臣太公(姜尚)、召公和周公的意见，三公逐一向武王陈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太公的建议是：爱其人者，兼屋上乌。憎(恨)其人者，恶其余胥。咸留厥敌，使靡有余，意思是主张实行斩尽杀绝殷商遗民，实行大规模屠杀的镇压政策。这样的政策，肯定会给新建立的周政权增加更多敌人，导致长期战争。

召公的建议是：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这一主张虽然比太公屠杀政策略为高明，可以争取部分殷人的合作，但是那些反对和不满意周政权的殷民及其他民族，必然会有“以暴易暴”的感觉，仍有可能引起种族战争。

周公的建议是：使各安其宅，田其田，无变新旧，唯仁是亲，百姓有过，在于一人。周公这个建议的办法是维持殷人原来存在的社会现状，以缓和殷族对周族的矛盾。这就是让殷人“各安其宅，田其田”，同时也不容许殷人的反抗捣乱，谁反抗就消灭谁。对于安分守己的臣民，则采取友善团结的政策，以争取最后使殷族完全臣服于周族。

武王姬发综合三公意见，以周公建议为基础，决定了施政的方针政策，以期无须再费大力就可以“垂拱而治”。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封纣子武庚为殷侯，继续殷祀，治理殷都旧地；令召公释箕子之囚，闳夭封比干之墓，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派出管叔、蔡叔和霍叔的三监，担任监视殷侯；命南宫适发钜桥粟，散鹿台财，以济贫弱。

商朝的疆域远比夏朝为大。约据有今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山西、陕西、安徽之大部或部分地区。黄河下游则为“东夷”，和其它部族势力的范围。周战胜殷，统治新的广大地区，既须重视防范殷人可能的反抗，还必须对四周各民族有适当的政治措施和军事准备。东南除淮夷和荆蛮，都是周朝劲敌。北部北狄，西部西戎，也随时威胁着京畿的安全。周朝接管中央政权后，为着屏藩京畿，维护王室，扶植羽翼，采取建立属国，分封诸侯的方法，其战略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次分封诸侯国五十余个。其中几个诸侯国，在战略上是有重大作用和影响的。

周朝为着表示对黄帝、唐尧、虞舜三位皇帝的尊敬，以争取人心，

分封三帝后代：黄帝后代封于祝，在现今江苏赣榆南；唐尧后代封于蓟，在现今北京德胜门外一带地方；虞舜后代封于陈，在现今河南淮阳。同时，封神农后代于焦，在现今河南陕县南；封大禹后代于杞，在现今河南杞县。

纣王之子开庚封为殷侯，继续驻于殷商旧地，监督武庚的“三监”，也各分得侯国。姬叔鲜封于管(河南郑州市)，即历史上的“管叔”。姬叔度封于蔡(河南上蔡)，即历史上的蔡叔”。姬叔虔封于堆(山西霍县西南)，即历史上的“霍叔”。除“三监”外，另封姬叔康于卫(河南汲县)，卫国封地比一般诸侯国大，权力也最重。

武王尊敬姜尚，称为师尚父。西周初期的政策和军事行动的确定，多出自尚父。姜尚和周、召两公分封为侯国，对防御和威慑东夷以及捍卫北藩，巩固新扩大的疆土，融合黄河中游以及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起重要作用。太公封于营邱(山东临淄)国号齐，周公封于曲阜(山东曲阜)，国号鲁；召公封于燕(河北易县)，国号北燕。

周朝分封主要侯国的同时，还封叔振铎于曹(山东菏泽)，叔振武于(山东宁阳)，毕公高于毕(陕西咸阳)，文王姬昌之弟虢仲子虢(河南灵宝虢略镇)。武王另外封弟于原、雍、酆、郇。成王继位，封其弟叔虞于唐(山西太原营城)，后改国号为晋。周公的几个儿子，封于邢、蒋。其他姬姓亲属，也被封于魏、滑、耿、密，杨、贾、焦等地，共计分封七十一国，姬姓竟占五十三个。这五十三个侯国，有二十八个分布在宗周(镐京)、成周(洛阳)一带战略要地附近。这一措施确实可以起到拱卫中央屏藩周室的重要作用。同时这一带地区，黄河北来，转向东流，两岸经河水灌溉，土壤肥沃，既有重要经济价值，又有维护镐京、洛阳交通大道的战略作用，便于以镐京为政治基地，成周洛阳为战略枢纽，经营东方，防护北方，开拓南方，稳定西方，垂拱而治统一天下于一尊。

周朝分封诸侯的措施，在政治上也有它的缺陷，造成地方很大的独立性，尾大不掉，妨碍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武王姬发去世后，这个问题就立刻显现出来，担任监视殷侯武庚的三监和武庚一起发动叛变，经迅速平息，事态没有扩大。及镐京沦陷于犬戎入侵，在收复京畿、击破犬戎的战争中，原来第一批封侯的诸侯，起作用的只有晋与郑。

东周逐鹿中原的五霸，各有不同的处境。齐地偏东，仅短期称霸，秦则只限于西戎地区，宋根本谈不上霸主地位。主要的是晋、楚两国，后起的吴、越两国，只是春秋争霸的尾声。战国时代，姬姓各国，列于七雄的只有燕。最后并吞六国，统一全中国的，则为善于养马的嬴非子的后代。他当初被封于秦，只是一西陲大夫附庸小国，介于戎狄之间，以后逐渐在战争中成长壮大为强大的秦国。

第二军事上的基本建设

自古以来，经济就是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基础，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军队的建设自然也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状况。远在商代，我国社会就有了比较好的冶铜技术，并已出现了铜锡合金器具。到了周代，青铜的冶炼技术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铜制兵器的使用已发展到很高阶段。因而，军队的建设、编制装备等各个方面，已经有了后世正规军队的雏型。

一、军制

军政和军令：周朝初期，军事政治重要职务太师、太傅、太保，分由太公、周公、召公担任。太师主管军事。牧野之战，“武王使师尚父(姜尚)与百夫致师，以大卒(主力)驰帝封师”。当时周军由姜尚指挥虎贲勇士，先向敌人挑战和冲击，主力大军展开攻击。太师之外，另设司徒，形成周朝军事制度中军政和军令机构同时并存各有专责的形式。当时的司徒，主要负责军政范畴的军事行政。当时的太师，主要掌管军令范畴的作战指挥。

征兵措施：文王姬昌，实施裕民政策，并要平民服劳役和兵役。国家有战争，青壮年应征，执行“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任务。战争结束，则解甲归田，复为百姓。武王东征凯旋，大规模裁减兵员，“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墟)”。周公东征，经过三年，战争结束后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

精兵和选锋：周初军制，很注意选拔冲锋陷阵的勇士。武王伐纣，来会合的诸侯，声势浩大，担任主要战斗任务的是周军。而殷商征发调集的各方兵力，却完全是乌合之众。周军选拔精兵，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武王也亲临战场。周军上下齐心协力，奋勇作战，迅即击溃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殷纣军队。这种选锋制度，整个西周期间，一直沿袭下来。

二、编制

战略单位的形成：周公东征时，军队中有“成八师”和“殷八师”及“西六师”，由白懋父指挥，镇压那些敢于反抗周朝统治的民族。当时的“成八师”和“殷八师”没有准确的编制，但《周礼·地官·司徒》则把军以下建制叙述较为具体：“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军就成为当时战略单位。并曾规定天子和地方(诸侯)所保有军的数目为“天子六军，大国三军，中国二军，小国一军”。周朝东迁后，诸侯列国战争时，各国诸侯为保持和扩大势力范围，都尽量扩充军事力量，军作为战略单位，大体被固定下来。军的数目多少，表示力量强大或衰弱，此后随之便出现了自由扩大或自行缩减现象。如：

齐：桓公称霸，建立三个军，后以力量不足，改为两个军。

晋：文公时期，建立三个军，扩大为六个军，后减去两个，经常保持四个军。

楚、吴；各建立三个军。

秦处西陲，尚无力和关东诸侯各国作军事上较量和竞争，兵力约在三个军以下。

鲁、宋、卫、郑等国，也曾各建立三个军，限于国力，有时连一个军也拿不出来。

重要兵种：牧野之战，周军开始使用“革车”参加战斗。革车，通称为“兵车”，成为作战重要兵种。判断任何国家大小强弱，大都以作战能使用兵车多少为根据。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都是表示这个国家战斗力的强大，周初到东周列国，兵车配备的人员和兵器：

车上士卒三人，穿甲带胄，拿重武器(戈、弓矢，矛)，担任主要战斗。徒步兵卒七十二人，使用轻兵器(刀、斧)，并担任后勤杂务。

战车上的士卒，披甲执戈，战斗力强。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逐渐成为社会上所重视并受尊敬的“甲胄之士”。当时读书人，学习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射”和“御”特别受到重视。学会开弓射箭、驾驭车辆，才具备充当兵车战士的条件，才可成为“甲胄之士”。至于耕田的劳动农民，应征从军，只能充当徒步兵卒。

防护装备：有攻击武器，随之而来的也有防护身体的装备。周朝防护身体的甲、胄、铠、盾，比殷商更为进步，并且更华美，兼带有艺术性。

甲：犀兕与鲛皮革所制之甲坚固耐用，作为护身的甲。荀子说：“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如金石”。

胄：头盔，以贝饰胄，用朱绳连缀之。

铠：皮革制成的衣，保护胸膛、腹、脖和臂等处，多绘制凶恶形状的图文，以增加威武气氛。

盾：用手持，遮挡敌人刀剑。以犀皮做的为“犀盾”，用木板做的为“大盾”。步兵持刀用长盾，短盾则用于车上。

三、兵器

相传原始时代，发生战斗(格斗)，最初双方一般用石块当武器。后来有石刀、石斧、石矛、石镞，石球等石质武器形状，近年来中外发掘出土的文物中，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椭-圆形，腹前为凹入利刃，脊背为凸出利刃；三角形，前端为三面所成的尖，腹部为利刃；菱角形，尖端为三棱尖角，腹部三面为利刃；长刃形，类似现在使用的刀。

进到夏商，逐渐发展为铜制兵器，进入铜兵器时代。周承殷后，兵器制造既效仿殷商形式，同时又有所改进。有属于进攻使，用的长兵器、短兵器和远射兵器，以及防御使用的盾。在类型上区分为以下几类：

长兵器：分成戈、戟、矛，使用于较远距离战斗。

戈：勾啄敌，但无直刺能力。

戟：直刃刺杀，横刃勾啄，和勾刺并用，为戈矛结合而成的兵器。

矛：纯粹刺杀，效力很大，制造简单，到现今尚被人使用。

短兵器：分为刀、剑、斧，使用于格斗。

刀：殷商遗留的铜刀，后代发展的铁(钢)刀和美观华丽的弯刀。

剑：两面有刃，可刺可割，凭腕力直刺。

斧：刀锋与柄平行，侧看尖刀，对称角形。

远射兵器：主要为弓和矢，周初特别重视制造这些兵器，并且精益求精，牧野之战中就显示了很大威力。弓矢区分为“六弓”和“八矢”。弓矢的性能作用为：

六弓：王弓、弧弓—射击穿着甲革坚硬装备将士和兵车。

夹弓、庾弓—用于攻防战斗和射击豺狼野兽。

唐弓、大弓—使用于野战，车战和教练学习。

八矢：枉矢、絜矢—适用于射击守城和兵车战斗。

杀矢、镞矢—近距离战斗和田猎时使用。

矰矢、茀矢—游动性射击。

恒矢、痹矢—散射、零星射以及放射冷箭。

进入春秋列国后，弓发展为弩；射击速度快而强。使用的矢，则区分枉夭、杀矢、矰矢和恒矢，均为弓用的矢；镞矢，茀失、絜矢和痹矢，为弩用的矢。

四、军事战略思想

周朝初期在军队建设、作战指挥、治军、选将、战略策略等方面，颇得力于太公望吕尚(姜牙、姜子牙)的军事指挥才干。相传，吕尚的战略谋略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其所著兵书《六韬》里。其实，据史学界一些人士的考证分析，《六韬》并非吕尚所著，其成书大致在战国末期前后或秦汉之间。当然，在成书之前是否已有较成书粗略的部分内容口传于世，后经增补充实而逐渐成书，已无从考证。但它部分地反映出先秦时期的军事思想则当属可信。这部书共分六篇十六章，近两万字。全书是以太公与周文王和武王问对的形式编成的。

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篇文韬。主要论述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传、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等方面的主张。讲述了增强国家力量、作好战争准备、争取人心、一致对外、奋力作战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

第二篇武韬。主要论述发启、文启，文伐、顺启、兵道、三疑等方面的主张。指出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应把握对敌人斗争的策略，要熟悉敌我的长处和短处，以长击短，制服敌人。

第三篇龙韬。主要论述了王翼、论将、选将、主将、将威、励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徵、农器等方面的主张。指出作战要很好地选择将帅，要军纪严明，对发号施令、指挥调度要恰当地掌握，并注意天时、地利和军队的给养问题。

第四篇虎韬。主要论述了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方面的主张。集中地指出了在不同情况和不同地形条件下作战的行动要则。

第五篇豹韬，主要论述了林战、突战、敌强、敌武、乌云、山兵、泽兵、少众、分险等方面的主张，指出在狭隘的地形上作战，应当掌握的问题。

第六篇犬韬。主要论述了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车、战骑，战步等方面的主张。指出了步、车、骑各兵种要联合作战，以提高战斗威力。犬韬强调的将帅在作战中要懂得“十害”、“八胜”的叙述，不要说在秦代以前，就是用现代作战的观点衡量，也是相当精辟的论点。识别地形的“十害”和进攻战术的“八胜”如下：

十害

死地—能去不能回，能进不能退；

竭地—断绝道路，险阻超越；

困地—前易(开阔)后险(闭塞)；

绝地—陷进险阻，难出难动；

涝地—潮湿，有粘土，行走费力；

逆地一坡多岗多，左险右平或右险左平：

拂地一沼泽地区，敌草丛杂；

败地—战败地区，车兵掩护，才能撤退；

坏地—左(右)有深水，右(左)有急坡，后方有沟；

陷地—日夜霖雨，道路溃陷，前不能进，后不能退。

八胜

当敌人阵线还没有具体确定；

发现旗帜凌乱，人马不停移动；

上下前后左右纷纷移动；

防御工事尚未构筑坚固；

前进有所顾虑，忧疑，后退也有胆怯；

驻军宿营，发生夜惊；

临近黄昏，双方战斗，不分胜负；

远途行军，薄暮宿营。

犬韬指出：“明于‘十害’、‘八胜’，敌虽周围千乘万骑，我前驰旁驱，万战必胜”。

第四节春秋战国主要国家的形势

第一晋分裂为韩赵魏三国

春秋时代的初年，晋还是个小国，建都于翼(今山西翼城)。在春秋初期发生内乱，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公元前678年才由晋武公把全国统一安定下来，并逐渐强盛壮大。先后兴兵灭掉了耿(今山西河津)、霍(今山西霍县)，魏(今山西芮城)，虢(今河南陕县)、虞(今山西平陆)，疆域进一步扩大。及至晋文公时期起，晋国一跃而成中原的霸主。当时，晋国势力最大，有“晋国天下莫强”的声威。多次击退楚向中原的扩张，西秦亦被多次战败，其他二等国和小国更不敢有所违抗，愿为所属联盟成员。晋自春秋兼并战争以来，除灭掉上述五个国家外，还吞并了唐、韩、荀、贾、杨、焦、温、原、茅、邢、滑、邘、雍、黄、赵、微、沈、蓐、姒、冀等二十余国。晋国国势虽强，但由于国内阶级矛盾，尤其统治阶层内部矛盾时起时伏，尖锐剧烈，从晋文公以后，直到三家分晋，连续发生五次政变：

一、赵，狐争权：狐射姑被驱逐出国，狐氏势力被扫除净尽。随后赵盾铲除梁益耳等五大夫，最后晋君灵公也被杀于桃园。

二、胥、郤争权：胥童怀恨郤氏，强占他的田地，凭着厉公信任，杀了三郤。栾书、荀偃则合谋杀了胥童和厉公。

三、栾、范争权：栾氏掌握政权，引起栾、范之争。范宣子联合其他大族，驱逐栾盈出境，接着又于曲沃(山西闻喜县西北)发动反乱，消灭了栾盈而独掌政权。

四、六卿争权：狐、先、郤、栾被消灭后，晋国世卿势力相等的为赵、智(荀)、范(士)、中行(荀)、韩、魏六卿。六卿掌权，矛盾又激化起来。范、中行联合攻赵，赵则联合智、韩、魏兼并范、中行两氏，六卿只余四卿。

五、四家斗争：范、中行两氏被消灭后，势力最大的智氏与赵、韩、魏三家矛盾上升，智瑶联合韩、魏攻赵。战争延续了很久，赵仍未被征服。这对韩、魏开始感到赵灭亡后，本身也难免有被兼并的危险，而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赵无恤看出智氏和韩、魏间这一滋长的矛盾，进而联合韩、魏，消灭了智氏。

智氏被兼并，晋国只有赵、韩、魏三大家，晋君仅有两个县(绛、曲沃)。但为时不久，这公有的两个县也被赵、韩、魏三家所瓜分。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赵、韩、魏由周威烈王正式任命为诸侯，自此，晋国就分裂为韩、赵、魏三国了。

韩国：初都平阳，后迁宜阳，阳翟，最后都郑。西与秦为界，挡着秦函谷关东进大路。南接楚，东南为郑，北为魏，赵，东邻郑、宋。它的领土疆域，为现在山西的西南与河南的中部。并有成皋，宜阳，伊阙和太行等四大战略要地。商阪，武关也属韩境。苏秦所谓“韩北有成皋，巩洛之固，南有宜阳商阪之塞”即指该地区而言。

赵国：—初都晋阳，后迁都中牟、邯郸，东北与东胡、燕接界，东和中山，齐相邻，北与林胡、楼烦相连，南接韩魏，西与魏和秦交错。

领土疆域，为现在陕西东北部，山西中、东北、东南各一部，河南北端；山东西北一角和河北东南部。赵国的险要关塞为：

句注塞：在句注山中。它位于山西代县西二十五里，一名“西陉”。古称北方之险，《吕氏春秋》则称为“九塞之一”。

雁门塞：山西代县北三十五里，以雁出其间，形势最为险要。

高阙塞：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后联合旗西南。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循险山直下至高阙为塞。阙北进荒漠，阙口有城，跨山布局，称为“高阙戍”。

长城：赵鞅曾筑长城以备狄。武灵王也增修长城(由五原、河曲、东至阴山)。

魏国：初都安邑，后迁都大梁，国境与秦、赵、韩、郑、齐、卫等国接界。领土疆域为现在陕西华阴、韩城沿河一带，山西西南和东南部分地区，河南北部和黄河以南地区，河北大名、广平两地区及山东冠县、菏泽。以晋东南上党为战略交通要道。魏国西部、北部也建筑长城。及迁都汴梁，对齐、楚等国境增建城寨堡垒，更富有战略意义。

第二秦在西陲逐渐壮大

秦为周在西方一个附庸小国，周王室东迁时，因护送王室有功，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立国于戎狄之间，采用西戎风俗和制度。直到秦穆公(公元前659～621年)一度战胜晋国，领土才扩大到黄河沿岸。秦在兼并战争期间，先后灭掉了十多个国家，即召、毛，芮、毕、彭、酆、密、彤、郇、杜、亳、崇、梁等，同时还消灭了十多个戎族部落小国，土地开辟千里，成为西戎霸主。虽然称为五霸之一，仍被华夏诸侯所轻视，很少参与诸侯间盟会。晋与秦经常为争夺河西土地进行战争，战国初期，秦就以大国姿态出现，所属的领土和疆域，北、西两方与义渠、朐衍、獂、绵诸及乌氏等戎狄国交界，西南与巴、楚接壤，东邻大河与韩、魏、赵邻接。领有现在甘肃东南部，陕西中部，渭水沿岸。部分土地达到黄河沿岸和河南的灵宝等地。国都原在雍(凤翔)，后迁咸阳。地势险固，易战易守，被称“天府雄国”。关中四塞和其他险要地带，优于关东六国。

东有函谷关，关城在谷中，深险似函，地势十分险要，是通往关中的咽喉要道。

南有武关，秦、楚襟要，西接商洛、终南等山以达阡陇，东连熊耳、马蹬等山，与函谷有相等的战略价值。

西有散关，为川、陕战略交通要道。经此关可进益(四川)、梁(汉中)，图关中，自夏禹以来常为南北交通的咽喉。

北有箫关，襟带西凉，控制灵武的西北险要。

四关之外，还有长城、湖关、松柏塞等，都说明秦国险要地区很多，是个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优越地理条件的国家。

第三楚为南方唯一大国

春秋期间，诸侯互相兼并，楚吞并小国部族最多。总数达到六十多个，诸如：权、聃、鄀、谷、贰、罗、卢、鄀、郧、胡、应、唐、江、夔、吕、弦、沈、蒋、顿、康、舒蓼、六、蓼(固始县北)、庸、舒鸠、舒庸、赖(厉)、房、随、褒、濮、杞、畴、陈、蔡、许、麇、道、黄、柏、鑾氏，英、不羹、邓、息、申、蓼(庸河县东南)、州、轸、绞等等

国家和蛮夷部落。楚由于占领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从而使其地大物博，物产丰盛，不断向中原扩张，出兵北上，和晋国争霸。公元前606年，楚庄王观兵于周郊，并派人去向周王问九鼎之轻重，公然显示其吃掉周王朝的雄心。春秋末期，一度受到吴国打击。至战国初，兵力一度稍衰，遂将北进战略转而向东向南发展。楚威王于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攻占越国浙江以西和原来属吴各地，此前曾派兵西进滇境(未能占有其地)，是疆域最大之国。北与中原地区的韩、魏为邻，西接秦巴，南与百粤接壤。领土疆域，为现在四川东部，湖北、湖南、贵州、江西、浙江、安徽大部，河南南部，江苏大部；国都郢。其境内险要关隘有：

扞关：在今宜昌市西，属巫地，防御秦军。

江关：在重庆奉节的白帝城(即瞿塘关)。

昭关：在安徽含山县东北，砚山西，形势险要，捍卫合肥，凤阳，是吴楚间战略要地。

陉塞，春秋战国为南北隘道，在河南新郑西南。还有黾阨塞(平静关)，直辕塞(武胜关)，武阳关和符离塞等。

第四齐在东方的称霸

齐国三面临海，饶鱼盐之利，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均比较先进，自西周迄东周，都保持着东方大国地位。齐桓公时代，齐国的霸业处于顶峰时期，曾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兰考)，登上了中原霸主地位。由于齐国近邻都是些弱国小国，使它能顺利进行连续兼并，春秋时期，被其兼并的有：纪、莱、阳、障、任、谭、成、遂、郭、项、薛、介、夷、州(铸)等十四个主要国家。它多次参与诸侯盟会和联合作战等活动，保持着举足轻重之势。田和取代姜氏政权，政治有所革新，国势更强，所属领土疆域，东滨黄海，北隔渤海，与燕接壤。领有现在山东偏北的大部，河北的东南部，国都临淄，与秦远隔，没有共同边境线，受不到秦军事上直接威胁。国境内的险要关隘有：

穆陵关：沂水县穆陵山上，防备楚方的进攻。

阳关：博平县南，西临汶水，称作“阳关之险”。

博关：亦称博望关，在博平县西北；为齐与三晋之交通要道。

阳晋城，在曹县北，齐、赵交通线。

第五燕在北方奋起图强

春秋列国时代，燕国弱小，常受山戎侵略。齐桓公曾率兵攻灭山戎，进占戎地转送于燕，其领域才开始扩大，以后几百年中，陆续拓地千里。进入战国，燕昭王招募贤士，出兵破齐，一度成为北方强国。其领土东北有辽东与朝鲜为邻，部分靠海，与齐接界；北筑长城，与东胡、林胡、楼烦为界；西有云中；九原，与赵接壤。领有现在河北北部，山西东北的一角，和辽宁一部。国都于蓟(北京市)，又有下都(河北易县)。境内险要，主要为防备山戎、东胡修筑的长城。燕长城自选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北平、辽西、辽东郡。燕离中原遥远，遭受战祸最晚。长城筑成，燕军出击东胡，拓地千里。

第六郑卫鲁宋吴越陈蔡徐曹诸国之兴衰

郑：郑国系周宣王封其弟郑桓公友于郑地而建国。郑建国后曾吞并许，管、鄗、鄢、密和东虢等一些小国。郑由于紧靠周京洛邑地区，是

周王室的直接屏障，为战略咽喉要地。各诸侯国为争霸中原，在整个春秋时代都曾反复争夺郑地，因而，郑曾先后长期地臣服于一些强国。

卫：建国于周武王时期，都城为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建国后通过兼并战争灭亡了殷、、、南、凡、昨、邢、共、南燕等国。卫虽系中小国，但战略地位重要。它东与齐鲁、南与曹宋、西与晋、西南与郑毗连、北接京畿之地，是诸侯列国必争之地。因而卫经常遭受亡国之患，不得不紧急向附近大国告急，依靠它国的保护度日。

鲁：鲁系，周武王给周公旦的封地，建都于曲阜(今山东曲阜)。鲁虽在力量强盛时兼并项、极、单、鄟、郜、祝、、根牟、须句、颛臾等等小国，然而，由于其历代统治者信守周公之礼治，不主张扩张杀伐，所以使自己一直处于弱小国家的地位。

宋：宋建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系殷族后代，宋在春秋时期兼并的国家有郜、徐、葛、焦、曹、宿、萧、、逼、逼阳等等小国。宋西与郑卫，东北与鲁齐，西南与陈蔡等国接壤，是一个扼中原战略要地之国家。曾一度近乎挤身于强国之列，号称“五千乘之劲宋”。但毕竟由于长期处于二等国地位，所以，屡遭晋、楚等大国的争夺。公元前594年，楚国攻宋达九个月之久，才逼迫宋屈服于楚。

吴、越、吴、越两国在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一带。两国在春秋兼并战争中，曾吞并了巢、桐、徐、州来、钟离、钟吾、莒、郯等国。吴、越两国多次交兵，公元前496年吴越交兵，吴王阖闾战败负伤而死。两年后，吴王夫差替父报仇，夫椒之战，吴军战胜越王勾践。吴胜越后，曾北上战胜齐、鲁两国，晋又不敢与吴争雄，吴曾一度争得了中原霸主地位。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又灭掉了吴，也北上会齐，晋，当了一段时期的霸主。

陈、蔡、徐、曹等均属于三等以下之小国，它们地处今河南省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夹在晋、齐、楚、宋之间，成为晋楚争霸中原必然争夺之地。因而，这些小国在整个春秋时期，不属楚，便属齐、晋，有时还同时臣服于两个强国。

第七战国七雄兼并战争梗概

春秋后期，晋、楚、齐、越四大国对峙，形成“四分天下”的局势。小国则有宋、鲁、中山、代、郑、卫，蔡、曹、莒，邹、滕、薛、郯、任、曾等国，戎狄有匈奴、东胡、肃慎、林胡、昆明、瓯越、闽越、南越、淮夷等部族，以及巴、蜀、义渠、大荔、绵诸等国。进入战国时代，四大国变成楚、越、赵、齐、秦、燕、魏、韩八大国，后越为楚所灭，变为七大国。为着争城夺地，诸国之间展开频繁兼并战争。

秦：公元前461年，进攻大荔，夺取王城(陕西大荔县东南)，大荔戎国随之灭亡。公元前457年秦与绵诸交战，后被秦所兼并。公元前444年秦伐义渠，俘虏其国王，义渠兴师伐秦，深入到渭阳。到秦昭王时，灭亡义渠。公元前316年派兵灭亡了蜀国和巴国。从公元前316年起至公元前313年，秦多次攻取赵国的土地中部(今山西乡宁)、西阳(今山西平遥)、蔺(今山西离石)，攻占楚汉中地区。公元前288年秦昭王称西帝，公元前280年起，秦占据了楚国的大片国土。公元前260年秦夺得了长平大战的胜利。秦昭王末年，秦国已成天下莫敢为敌的最强之国。秦王政即位后，积极准备最后攻灭六国。公元前230年首先灭了韩国，两年后

开始灭赵，公元前228年攻占邯郸，赵王迁投降，公元前226年攻占燕，公元前225年灭魏，公元前224年秦发六十万大军与楚决战获胜，于公元前223年将楚国灭亡。公元前222年秦捉拿到了亡国之君燕王喜和赵公子代王嘉。公元前221年灭亡了齐国。从而结束了二百五十五年战乱不止的战国时代；中华大地第一次出现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楚：公元前447年灭亡蔡国，后二年灭亡杞国，到公元前431年又灭亡了莒国。公元前334年楚乘越国衰弱，夺取越浙江以西土地，后又派兵入滇(云南)，只是由于秦军取黔中，断绝楚军归路，楚未能占有其地。在公元前318年的“魏、赵、燕、韩、楚”五国合纵攻秦中，由于楚力量强大，曾被推举为纵约长。但自此以后，连续被秦、齐等国战败。公元前312年秦、楚丹阳之战(今河南浙川地区)，楚军惨败。公元前306年(楚怀王二十三年)，楚虽乘越内乱，灭亡了越国，但仍无法挽回军事上的颓势。公元前301年楚败于韩魏联军。公元前280年楚再败于秦。公元前279年秦攻占楚之鄢(湖北宜城县东南)，邓(湖北襄樊市北)等五城，公元前278年攻占楚都郢城，楚军节节败退，楚顷襄王逃至陈(今河南淮阳)，从此，楚江河日下，后为秦所灭。

齐：齐国自春秋初期齐桓公称霸以后，一直做为东方大国延续于世，在七雄兼并战争中战略上始终处于重要的地位。公元前412年齐攻取鲁国的莒和安阳(山东曹县东)，后四年又夺取鲁国的郕(山东泗水县西北)，次年又夺取卫国的贯丘(《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公元前301年，齐与魏、韩合兵在垂沙(今河南唐河县西唐河旁)战胜楚军，公元前296年齐与韩、赵、魏、宋“合纵”攻秦，逼迫秦让地求和。后来齐又大败燕军，攻入燕都，消灭燕军数万之众。公元前288年齐湣王称雄东方，号东帝。公元前286年发兵攻灭宋国。但连续征战，已使齐国力锐减，外强中干，公元前284年，被“燕、秦、韩、赵、魏”五国联军打败，公元前279年以后，虽然反攻败燕后复国，但昔日的强大已无力再现了。

魏：公元前413年，攻占秦国郑(陕西华县)，次年又攻占繁庞(陕西韩城市东南)，公元前409年，陆续攻占临晋(陕西大荔东南)、元里(陕西澄城县南)，郃阳(陕西合阳县东南)、全部河西地区。公元前408年派兵越过赵国，进攻中山，经过三年持续战争，终于灭亡了中山国。公元前371年攻取楚国鲁阳(河南鲁山县)，在黄河以南占有广大土地，为战国初期之最强国。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后，对宋、卫、韩、赵等国加紧进攻，公元前353年，魏进攻赵国之邯郸。公元前344年，魏王为逢泽之会“率十二诸侯，朝天子于孟津”，魏开始称霸天下。但自公元前343年以后，魏连续败于齐、秦，不得不与齐国平分霸主地位。

赵：公元前372年，赵国攻卫，夺取乡邑七十三个，后又攻占卫的鄄(山东鄄城县北)。赵地偏北，进占卫地，国力进一步强大。赵武灵王变法，“胡服骑射”，赵国更日趋强盛，“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到赵惠文王时，能与强秦匹敌，并于公元前270年之阏与战役中战胜秦军。但自公元前260年长平大战败于秦国后，国力锐减，几乎失去强国地位。韩：公元前385年，韩伐郑，攻取阳城(河南登封县东南)，又曾攻宋，攻到彭城，俘虏了宋君。此时郑已被楚、魏、韩三国分占，到公元前375年，魏、楚交战于榆关，韩就乘机灭亡郑国，并且迁都到

郑，领土大为扩张。但是，由于政治、军事上的种种原因，韩的力量始终没有发展到头等强国的地位，公元前318年，韩参加了魏、赵、燕、韩，楚合纵攻秦而失利，公元前314年，韩军又于岸门大败于秦军，公元前308年，秦军攻陷韩之名城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最后，终于在秦灭六国的战争中，成为首先被秦灭亡之国。

燕：在燕王哙暮年，由于太子平没能继承王位，引起了内乱，公元前314年被齐宣王派兵攻破首都。后来燕人不堪齐之欺压，起而反抗，驱逐了齐军，才得以复国。燕昭王励精图治，国力渐强，于公元前284年联合三晋、秦、楚大败齐国，燕一举占领齐国七十余座城池，一时更加强大。但昭王死后，齐军反攻，大败燕军，燕从此衰落，最后终于被秦所灭。

七国兼并战争期间，降为不为世所重视的周朝，竟分裂为东西两个小国，秦于公元前256年，进攻西周，压迫周赧王，把仅有的三十六个邑和三万人口，全部献给秦国，赧王于这年内去世后，挂名的周天子也不复存在。公元前249年，秦又把建都于巩的东周小国灭亡，剩下的只有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

第五节七国的革新与变法

第一三晋政治革新

社会的政治经济改革，任何时期都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春秋末期虽然奴隶主经济正逐渐被地主经济所取代，但进入战国初期，仍残留着相当大的势力。这种情况严重地障碍着地主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我国社会趋向兼并统一战争的进程。因此，各国为了顺应富国强兵夺取兼并战争胜利的历史发展潮流，都积极地改革政治、变法图强。

一、韩国政治革新

韩由晋分裂出来成为独立国，政治制度起了很大变化，所谓："晋之故法未易，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韩非子·定法篇》)。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申不害为相，实行政治改革，其要点是：

国君既要"无为"又要"独断"，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所谓"无为"既"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申子·大体篇》做到"独视"、"独听"和"独断"。"独视者渭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对群臣则讲"法"，曾说"明法正义"、"任法而不任智"。韩非子"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子·定法篇》。并限制官吏只能做职权范围内的事，不能越职办事，越职言事。

申不害加强国君统治权力，推行法治，结合当时中原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情况，增强了国力。当时韩国曾一度出现有强弓劲弩，带甲数千万之众，纵横于七国之间，被称为"天下劲兵处"的强盛局面。

二、赵国政治革新

赵建国后，相国公仲连向赵烈侯推荐牛畜、荀欣、徐越，赵王分别任为师、中尉、内史，这三人是当时的"贤士"，他们向赵主提出革新的建议：

牛畜的建议：行以仁义，约以王道。

徐越的建议：节财俭用，察度功德。

荀欣的建议：选练举贤，任官使能。

牛畜等三人的建议，就是在政治、经济方面实行法治，而在思想统治方面，则强调杂用主道。

赵推行政治革新虽然起了些作用，但效果究竟有限。及至赵武灵王为君，奋发图强。他鉴于中原内地已被齐、楚等国占据净尽，决心向北方扩张势力，于周赧王八年(公元前307年)，亲自由代北进登黄河岸边山峰，俯览河山雄壮形势，认为赵国要强盛起来，必须把现行规章制度大加改革，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即与重要大臣肥义商量，实施"胡服骑射"政策，教育全国。并对臣属表达其胡服骑射的宗旨说："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于是发出"胡服令"开展骑射。经过这样大变革，形成尚武风，国力强盛，到战国中期，六国尚能与秦对峙争雄的只有赵国。四十余年来，经过多次战争，有时还能在战场上给秦军以沉重打击，这就不能不归功于赵武灵王这次重大的政治改革。

三、魏国的政治革新

魏建国初期，文侯魏斯即以卜子夏为师，并尊敬田子方(子贡弟子)、段干木(子夏弟子)等人，每经过段干木的住所，必俯首为礼。风声所及，各方知名人士，纷纷来归，同时对晋国原有的政治大加改革，建立中央集权政权。中央设置可以任免的将相来统领百官；郡县设置可以任免的守令等官统治人民。先后任用魏成(文侯弟名成)、翟璜、李悝为相国，尤其李悝所著的《法经》，乃汇集各国法律之大成，成为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法典，形成秦汉以后法律的基础。李悝为相国时主持变革的主要措施如下：

(一)颁布《法经》六篇。这是一部比较系统的地主阶级法典，内容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

六法头两篇"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晋书·刑法志》)。所谓"盗"指对私有财产的侵犯。"贼"则为对统治阶级人身侵犯及包括杀伤等类。"囚法"，乃断狱的法律。"捕法"，乃逮捕逃亡的法律。"杂法"，是对其它类型犯罪行为的法令。"具法"，是根据事实，"以其律，具其加减"。李悝认为"盗"、"贼"两篇最为重要，它是维护统治、加强法制的要害法令。

(二)提倡勤耕。主张"尽地力之获"，勤劳耕种，每亩增产。

(三)实施平籴。认为粟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主张实行平籴。目的在于"使民无伤而农益勤""取有余以补不足"。借以调剂丰收与欠收的粮价，收到稳定民心，安于生产的社会效果。

除李悝主持变革的三项重大措施外，魏文侯尚能做到赏罚分明，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当？"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说苑·政理篇》)。并禁止淫佚，指出"奸邪由饥寒而起，淫佚由奢侈而发"。"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说苑·反质篇》)。魏由晋分裂成为独立国家，文侯推行政治革新最早，使魏成为战国初期富强之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齐国政治革新

齐国人士邹忌被威王任为国相，邹忌本着"谨毋离前，谨事左右。""请谨自附于万民"，"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和"谨修法律而督奸史"(《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对齐进行政治改革所采用的政策：

一、谨择贤才。邹忌推荐人才，威王重用，认为人才是"宝"，"将以照千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邹忌荐举人才，确实使齐集中了当时一大批贤能之士，齐王都对他们委以重任，对齐国的兴盛富强起了重要作用。如：

檀子：守南城，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攻)齐境。

盼子：守高唐，赵人不敢东渔于河。

黔夫：守徐州，燕赵徙从者，千有余户。

种首：治盗贼，而道不拾遗。

二、征求意见。齐威王根据邹忌的建议，注意征求各方意见，并下令于群臣吏民说：能当面指出王之过错的受上赏；上书言明王之过错者，受中赏；能在公开场合议论王的过错者，传到王知晓者，受下赏。命令下达后，群臣前来进谏，门庭若市，经数月后，进谏者成为偶然现

象，期年之后成为“虽欲言而无可进者”。齐策所述虽有些夸大其词，这样提倡群下进谏，对政治改革肯定会起到重要作用。为了革新政治，还特别奖励成绩卓著，不务虚名的即墨大夫，严厉惩罚阿谀奉迎的阿大夫。是非分明，气象焕然一新。由于政治革新，齐国政治、军事、经济出现一派强盛景象，成为东方的霸主。

第三楚国变法失败

战国初期，楚为当时最大的国家。对外虽然开辟疆土，但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复杂，政治腐朽，经济落后，军事上不强，多次受到挫折。楚悼王熊疑即位，受到新兴的三晋侵逼。周安王二年(公元前400年)，三晋伐楚，攻到桑丘。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391年)，韩、赵、魏又来进攻，楚军在大梁、榆关被击破，楚不得已用重礼送秦，托秦从中调解，才停战议和。楚悼王决心进行政治改革，奋发图强。这时，任魏国河西守的吴起，因遭到魏武侯的大臣王错、公叔向等的炉忌排挤，由魏入楚。楚悼王素闻吴起的声望，为防御韩、魏、任为宛守(今河南南阳市地区)，不久任为令尹，由吴起负担楚的变法重任。吴起任令尹后，首先审查楚国政治设施和法令规章中所存在的积弊，采取适应现实的变法政策：

从政治经济上剥夺旧贵族的特权，吴起认为楚“贫国弱兵”，是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这些大臣、封君“上逼主而下虐民”。因而主张，封君子孙三世而收禄爵，减削官吏禄秩(《韩非子·和氏篇》)，精简“无能”“无用”的官，裁汰不急之官(《战国策·秦策三》)，节省开支，用来供养“选练之士”。这个措施，目的在于革除世袭特权，精简政府机构，加强军事力量。并命令一些废免的贵族去开发边远地区，这就沉重地打击了贵族的特权和习惯势力。

整顿吏治，要求“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战国策·秦策三》)。禁止私门托情，并制止纵横家进行游说。

改变国都郢的建筑方法，开始建设壮观的新楚都。同时大力加强国防，选练士卒，富国强兵。楚国经过吴起的改革、变法，扭转了萎靡不振的形势，逐渐强盛，“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吴起列传》)。因而，扩展了许多土地，遂有洞庭苍梧，赵求救于楚，楚就救赵攻魏，楚军取得了吴起变法后的最大胜利，楚军进展到黄河两岸，各国都顾虑楚的强大。但楚的贵族大臣，大都怨恨吴起，反对变法。楚悼王去世，吴起立即遭到贵族的联合陷害，被杀死。吴起死后，变法的措施被全盘否定，致使前功尽弃。尔后，楚国虽然还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昭、景、屈三大家族手中，政治上腐败，军事上软弱，及至遭到秦军进攻，无力应战而覆没。韩非子说的“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用商君而富强”(《韩非子·向田篇》)，是对楚国中断变法而招至国家灭亡的恰当写照。

第四秦国变法成功

春秋末期，晋具有相当规模的铸铁生产，楚国已能炼制锋利的钢铁兵器，韩国冶铁手工业非常发达。农田水利工程开凿渠道，也有显著进步，与此相适应的手工业得到相应的发展，从而手工业和商业城市纷纷出现，大大地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冲击原来的旧制度，秦国这时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落后于山东六强。淮泗间的各国都以夷狄看待

秦，擯斥秦国。秦在各国社会经济文化飞跃发展的形势影响下，已经到了政治上不大加改革就无以图存的地步。

周显王七年(公元前364年)秦孝公发奋图强，下令求贤。这时在魏相国公叔痤家任中庶子的卫鞅于公叔痤死后由魏去秦国，向秦孝公陈述变法，富国强兵的道理，得到孝公的信任，决定变法。但是，变法之初也受到了旧势力的反对。

甘龙、杜挚代表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顽固守旧反对变法，商鞅则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应随着历史的发展变法。经过辩论，秦孝公同意商鞅的变法论点，任为左庶长，实行变法。

公元前356年孝公下令变法，推动了秦国政治大变革，所采取的措施：

(一)编组民户，严刑峻法，重新编组民户，不分民户和农奴，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在户籍基础上建立伍什，有互相纠察、告发奸人的任务和同罪连坐的制度。告发奸人与作战斩敌首者同赏，不告发奸人，经发觉与降敌同等受罚，伍什还负担连坐罪。

除连坐法外，还采取“以刑去刑”的重刑政策。除制定肉刑、死刑、腰斩、枭首、车裂等严刑外，还增加凿颠(凿穿顶盖骨)、抽胁(抽去胁骨)等酷刑，来镇压反抗者，贯彻所制定的法令，加强对广大农民的专制统治，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

(二)整顿官爵，奖励军功：军事官吏担任作战任务，行政官吏，战时也参加战斗。商鞅变法规定二十等官爵。军队中地位最低的兵，称为“小夫”，四级以下的行政官吏编入军队后，就都是兵，称为“卒”。带有官爵，则成为“步卒之有爵者”。军功以战场上斩获敌首级多少来计算，斩获敌甲士首级一颗赏给爵一级，官爵提升与斩获首级必须相称。按爵位高低授与耕田，奴隶赎身，减刑，享受食邑租税和担任官职等。对国君宗族的名位按军功重新区划，无功者，不得列入公族簿籍，不得享受宗族的特权。因而无军功的贵族失去特权，变为民户中的富户。有军功的贵族，最高爵位，不过封侯，收食邑内租税，不直接管理民事。

(三)崇本(耕织)抑末(商贾)：秦国地广人稀，所以商鞅把奖励开垦荒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之本。为着防止商贾兼并土地，变法令规定：“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鼓励垦荒，《商君书·垦令篇》列举了二十条具体措施，其中有抑商政策。

商人必须向官府登记厮、舆、徒、童的名字与数目，以便摊派徭役。提高市上酒肉税额，税额要高于成本。加重关卡。禁止私自贩卖粮食，防止垄断市场，牟取暴利。

(四)禁止游宦，杜绝私托，商鞅为了推行变法令，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篇》)，以打击一些人的复古思想。向时下令禁止游说之士的活动和私门请托的歪风。

商鞅的巨大变革，遭到贵族领主的反抗，以太子驷为首的贵族反抗最激烈。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为君嗣不便施刑，就把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处刑，“刑其傅公于虔。黥其师公孙贾”。结果第二天新法就行通了。新法执行十年，秦国境内出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国由于变法初步成功，对外战争不断胜利，成为第一大强国。

公元前350年，秦迁都咸阳，商鞅又实行第二次变法。它的基本要点是：

(一)重划政区，实行县制：归并各小都乡、邑、聚(村落)为大县。全国划分四十一个县，每县设置县令、县丞和县尉，县令乃一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二)按照户口征收军赋。商鞅曾下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种把大家庭分化为小家庭的政策，基本目的就是增收赋税和增派徭役。(三)废除井田制，开阡陌：用法律形式废除井田制，保护土地私有制，严禁对私有土地的侵犯，允许土地买卖，这对刺激当时地主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四)统一度量衡制：这是对统一赋税、俸禄制度和发展商业的重大贡献。现流传于世的还有商鞅当时所制的“方升”(存上海博物馆)。

商鞅在变法中，还制定了一些吸引三晋人民到秦国定居的政策，比如供给外来农民的田地、住宅，免除兵役，专力耕织等。秦民则服兵役，轮番出战(见《商君书·徕民篇》)。因而使秦既能征召大量兵员入伍，又有坚持生产的足够劳力，秦国的力量与日俱增。虽然秦孝公死后，商鞅被杀害，但变法已深入人心，终于为秦国统一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六节七国的建郡与长城

第一维护统一政权的建郡

春秋战国期间，社会形态由奴隶制转向封建制，各国在开拓疆域时，不再采用分封办法，于是郡县制应运而生。晋、楚、秦等大国，往往把新兼并的地方设为县。春秋初期，楚建县渐多。春秋后期，晋把县制推行到内地。县与卿大夫封邑不同，有一系列集权的政治与军事组织，特别是征收军实、征收赋税、征调军役制度，使国防力量增强，便于国君集中统治，同时又加强了边防。国土扩大，县的管理能力有限，于是在边境荒僻的地方又出现了郡。最初郡比县地位低，到战国初期，边境逐渐繁荣，于是，就于郡内划分成几个县，这样，郡就发展为大于县的行政区划单位。魏国上郡，竟有十五个县(《史记·秦本纪》)。赵国代郡有三十六县(《战国策·秦策一》)，韩国上党郡有十七县，燕国上谷郡有三十六县(《战国策·秦策五》)。郡县两级制开始于三晋，后来才推行于各国。郡县的形成、为新兴地主阶级推翻奴隶主阶级分封制起了决定性作用。

战国时代设郡于边境，主要目的为巩固边防，防备敌国入侵。但由于兼并战争激烈，各国在中原地区的边境也陆续设了郡。当时较为著名的郡有：

上党郡：上党是韩、赵、魏交界之处，又属于山岭险阨之地，韩、赵、魏都在上党设郡。

河东郡：魏失西河上郡，在河东设郡。主要目的是为了防御秦军的进攻。

云中郡、雁门郡、代郡：为赵国设置，以防林胡，楼烦和匈奴的入侵。

上谷等郡：燕国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以防御东胡。

陇西郡、北地郡：秦设置陇西、北地两郡，以防西戎的侵掠。

江东郡：楚灭越，设江东郡。

黔中郡、巫郡：楚所设，以防南方部族。

汉中郡：楚所设，主要是为防秦入侵。

郡担负保卫边境重任，郡长称“守”，被尊称为“太守”，都是由武官充任，“出军命将”和“边地任守”。郡守有征发全郡壮丁出征的权力，指挥郡兵作战。秦司马错曾征发陇西兵卒，带同蜀郡兵卒，攻楚黔中。

秦进攻六国，兼并土地，都必定设郡。及并吞了六国，郡县制也就推行于全国，并成为流传于后世的基本行政区划制度。

第二防御侵略的长城

春秋期间诸侯进行兼并战争，都以兵车为主作战，双方都尽量避免运动于困难的地区，战场多选在平坦开阔和两国封疆间的平原，也就是所谓“疆场”，所以当时人们把战争称为“疆场之事”。春秋列国期间，各国国境虽已建立关塞，但平时一般不派重兵戍守，到战事发生，才派军队去防守。到战国时代，不仅平时有兵驻守，还增建亭、障，有了望敌

情和预报警讯的烽燧设备。由于战争规模扩大，需筑大规模防御工程。这些工程，把城塞关隘连接成线，就逐渐形成了“长城”。战国初期，各国分别建筑的长城如下：

韩长城：周显王十四年(公元前355年)，兴建亥谷以南的长城，连接魏中原长城。

魏长城：为了防御秦人的进攻，魏在西边沿着洛水流域筑长城，南起于郑(陕西华阴)，越渭水、洛水，经过现今大荔、澄城、洛川等县，北上近于甘泉县，称魏长城。魏迁都大梁后，因防备秦军进攻，于周显王十一年(公元前358年)，从黄河边的卷(河南原阳县西)开始，经阳武(原阳东南)，再向西南至密(密县东北)筑长城。

齐长城：修筑较早，周显王十九年(公元前350年)又增筑“防以为长城，于是称为‘长城巨防’。齐长城西起自防门(山东肥城西北)，经五道岭，沿泰山西北麓，依沂蒙山脉，东止琅琊海岸。

楚长城：楚在东周初期即有长城，由鲁关(河南鲁山县西南鲁阳关)起，折向东，经犨县(鲁山东南)而东到潮水，再到沘阳(河南泌阳)。利用沘二水堤防，连结山岭地势筑成。战国时代，楚顷襄王时扩建长城，从鲁阳向西，东北接翼望山(栾川县南)，南达穰县(邓县)。

战国后期，秦、赵、燕北部，经常受到匈奴，东胡、林胡和楼烦等游牧民族侵扰。这些游牧部族，精于骑射，作战流动性大。燕、赵与秦于国境北部筑长城，以限制和防范胡骑的驰突和袭击。燕、赵、秦三国所建筑长城的概略轮廓：

燕长城：燕南部长城由易水堤防扩建筑成，当时即以“易水长城”并称。这条长城西自河北易县西南起，穿过北易水，沿着南易水东去，经过汾门(徐水县西北)，再沿南易水和秽水(大清河)走向东南。燕于北部还筑有北长城。现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红山北方沿西戛河北岸存有燕长城遗址。部分经过老爷庙、八家子、撤水波等村。

赵长城：赵对修筑长城也很重视，尤其是对防御北方的长城，赵武灵王破了林胡、楼烦之后即行构筑。北部长城有两条，一条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加河以北；一条从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向东，经过包头北，沿乌拉山向东，沿大青山，经过呼和浩特市北。卓资、集宁市南及河北张北县以南。赵国的南长城大约从河北省武安县西南起，沿漳水至磁县，到肥乡县南。

秦长城：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328年)，秦灭义渠西戎国后开始由陇西郡和北地郡建筑长城。西起临洮(甘肃岷县)，经过渭源县北、狄道(临洮县)、兰州市东北，进入宁夏。

燕、赵、秦三国建筑的长城，各以本国需要为前提，不相连接。秦统一全国后，以燕、赵、秦原来建筑的长城为基础，重新统一规划，增补改建，成为西起临洮、东北至辽东的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第七节七国的兵力与战争规模

周朝军制，以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管仲相齐，寓兵于民，“作内政以寄军令”，五家为轨，五人为伍，十轨为里，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二百人为卒，十连为乡，二千人为旅，五乡人为师，万人为军，国有三军。晋初建二军，文公争霸扩建三军，后扩大为六军。在几次大战中，城濮之战动用七百乘兵车，鞍之战动用八百乘兵车。

到春秋中期，周惠王二年(公元前676年)，楚国伐郑之役只出动六百乘兵车。齐在桓公全盛时期，也没有超过八百辆兵车，共三万人用于作战。春秋五霸，全军兵力都不及十万人，到了后期，由于郡县制的推行，经济的发展，人口繁衍，地主阶级取代旧奴隶主统治政权，束缚在宗族势力范围内的大量劳动人民，获得解脱，奴隶转变为农民，促进了社会的兴旺，各国兵力大增。晋有四十九个县，每县有一百乘兵车，共有四千九百乘兵车。周景王十六年(公元前529年)，治兵于邾南，有四千乘兵车，每乘以三十人计，就有近十五万的兵员，加上徒兵、厮卒，当不止这个数字。楚灵王时的楚国，兵车达到万乘，兵员有数十万人，出现了所谓“千乘之国”和“万乘之国”。到战国时代，大国兵力就更多了，从几十万到二百万之多。

战国七雄的兵力，通常是依据土地大小、人口多少而决定的，七国土地以楚为最大，韩为最小，人口以楚、魏为最多，楚约五百万，魏近四百万，秦、齐、赵各为三百五十万左右，燕、韩相等，各为三百万左右。按五人出一兵统计，各国的兵力：

楚：持戟(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

秦：带甲(奋击)百万，车千乘，骑万匹。

齐：带甲数十万。

燕：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

韩：兵卒三十万，用于防守边境关塞外，用于战斗的不过二十万。

赵：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

魏：带甲三十至三十六万，防守边境和辎重部队约十万以上。魏军全盛时代的兵力：武士(精锐)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冲锋)二十万，厮徒(徒卒厮役)十万，车辆六百辆；骑五千匹。

春秋至战国初期，使用于战场的兵力数量，通常在十万左右。《孙子兵法·作战篇》称：“驰车(轻车)千驷，革车(重车)千乘，带甲十万”，“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吴起用兵据说不过五万(《吕氏春秋·用民篇》)。马陵之战，魏军和齐军兵力都没有超过十万。战国中后期参加战斗的军队数量猛增，但军队的伤亡损失也随之成倍增长。

公元前293年，秦白起声破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公元前273年华阳之战，秦军击破魏军，斩首十五万。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秦军活埋赵军达四十多万。

公元前251年，燕军攻赵，燕军动用六十万大军，其中栗腹率四十万兵攻鄗，庆泰率二十万兵攻代(《战国策·燕策三》)。公元前225年，秦先派二十万人攻楚，次年王翦率六十万人再次攻楚才击破楚军。

战争使用兵力和斩首数字，虽然不免有些夸大，但从参加战争的兵员人数和伤亡数字，多少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特别是末期战争规模空前扩大的状况。

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战争剧烈发生的时代。既有各国相互之间的战争，也有东方六国对秦联合作战以及秦进攻各国的战争。这些战争，往往互有胜负，只有秦国才是战争的最后胜利者。比较重要的战争则有：

马陵战役：公元前369年，韩、魏两军作战，魏胜韩败。

怀战役：公元前369年，赵、魏两军作战，魏胜赵败。

元里战役：公元前354年，秦、魏两军交战，秦胜魏败。

邯郸战役：公元353年，赵、魏两军交战，魏胜赵败。

桂陵战役：公元前353年，齐、魏两军作战，齐胜魏败。

安邑战役：公元前352年，秦、魏两国交战，秦胜魏败。

马陵战役：公元前341年，齐、魏两军交战，齐胜魏败。

雕阴战役：公元前330年，秦、魏两军交战，秦胜魏败。

襄陵战役：公元前323年，楚、魏两军交战，楚胜魏败。

修鱼战役：公元前317年，秦与韩赵联军作战，秦胜，韩、赵联军败。

观津战役：公元前317年，齐、魏两军交战，齐胜魏败。

岸门战役：公元前314年，秦、韩两军交战，秦胜韩败。

蓟战役：公元前314年，齐、燕两军交战，齐胜燕败。

丹阳战役：公元前312年，秦、楚两军作战，秦胜楚败。

蓝田战役，公元前312年，秦、楚两军作战，秦胜楚败。

宜阳战役：公元前307年，秦、韩两军交战，秦胜韩败。

垂沙战役：公元前301年，秦、齐、韩、魏联合对楚作战，联合军胜楚败。

伊阙战役：公元前293年，韩、魏联合对秦战争，秦胜联军败。

临淄战役：公元前284年，燕、秦、韩、赵、魏联合对齐作战，联军胜齐败。

即墨战役：公元前279年，齐、燕两国交战，齐胜燕败。

鄢郢战役：公元前279～前278年，秦、楚两军作战，秦胜楚败。

华阳战役：公元前273年，秦、魏两军交战，秦胜魏败。

阏与战役：公元前270年，秦、赵两军作战，赵胜秦败。

野王战役：公元前263年，秦、韩两军交战，秦胜韩败。

长平战役：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军作战，秦胜赵败。

邯郸战役：公元前257年，赵、魏联合对秦作战，联军胜秦败。

鄗代战役：公元前251年，燕、赵两国作战，赵胜燕败。

宜安战役：公元前234年，秦、赵两军交战，赵胜秦败。

第八节七国军制装备与军事学术的进步和发展

第一军事组织的变化

一、常备军队的发展

春秋末期，各国已经有挑选训练勇士风气，晋世卿栾盈曾养育勇士州绰、邢蒯和力士督戎等。齐庄公选拔勇士，必须力举千钧，射穿七孔，有勇士殖绰，郭最等。吴王阖闾曾选拔多力五百人，快跑三千人，带甲执兵，一气跑三百里，才得休息，经过七年教练，战时充当前阵。越王勾践，也曾教练其勇士三年，担任冲锋陷阵。战国时代，各国于全国范围征兵的同时，选拔勇士训练，发展成为各国常备军：

秦：昭王时有锐士，虎贲八万。“魏之武卒，不可以直(当)秦之锐士”。

齐：“持戟之士”也称为“技击”、“五都之兵”。《吕氏春秋》记载：“疾如锥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五都之兵最强”。战时除用常备五都之兵外，还征发靠近燕国北地之众。

韩：被坚甲士，执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当时曾有：“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

魏：据《荀子·议兵篇》记载：魏国考选步兵时规定，身穿“三属之甲”，手操“十二石之弩”，背负“服(箙)矢五十个”，携带武器，并背三天的粮食，能在半天跑一百里路。

这样的人才能入选为它的正规武卒。

楚：吴起曾劝楚悼王。谗(裁)减百官之禄秩，损不急之技官，以奉选练之士”。楚王接受这二建议，使楚国军队发展成为一支疾如飘风之师。

各国选拔出的勇士，受到优待，免除徭役和田宅租税。战时由选拔训练出的勇士常备军队，担任对敌作战。

二、步骑地位的提高

春秋列国，交战双方都用兵车排成整齐车阵，然后战斗。战争规模，以出动兵车数目来决定。中原地区，各国边境存在戎狄部族，分别层山林、溪谷间，都用步兵作战。进攻戎狄，车行不便，晋、郑等国不得不毁车改用步兵。步兵大概是在进攻戎狄和镇压奴隶起义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成为单独兵种，独立作战。进入战国时代，由于社会冶铁技术进步，并大量使用于兵器制造，尤其强弓弩箭的发明和创造，加大了箭的射程，整齐密集的车阵，容易遭到惨重损失。如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05年)，三晋联合攻齐，禀丘一战，“得车二千，得尸三万”。这样大的损失，逼着各国放弃传统的车战，敌变为步兵野战，原来各国配合车战的“徒步匹夫”，改为步兵参加作战，在军队中的地位为之提高。

骑兵在春秋战国之间，还不能成为单独兵种，而是和车兵混合在一起的，赵无为着预防智瑶进攻，曾派延陵生带兵车和骑兵，先到晋阳布防。尔后虽然发展成为单独骑兵部队，还只是配合步兵担任冲锋或奇袭。战国时代，各国兵额，都是几十万至百万，骑兵则仅五千匹至万匹。燕、赵邻接胡地，胡人用骑兵作战，使人们看到了骑兵在野战中的

机动作用。至赵武灵王时，“胡服骑射”，转换成骑兵为作战主力。步骑兵的出现和发展，逐渐代替了以车兵为主先列阵而后作战的方式。

三、军队官职与指挥

春秋时期，各国军队均由国君和其亲信大臣、卿大夫担任统帅和重要将领。晋国六卿，平时为卿，战时就是元帅、将军。进入战国时代，各国政权范围扩大，官僚机构随之庞大复杂。加上征兵制实行，常备军的建立，战争兵力和战争规摸的扩大，使统治机构和各级官职日渐明确区分为文武官员两大类别，统率军队属武官系统。各国将帅的名称，虽然不尽相同，但均由春秋演进发展而来。

秦：将军、护军将军、国尉(大尉)和大良造。如秦名将白起就先后任左更、大良造和上将军。

楚：将军、上将军、大将军、裨将军和柱国、上柱国。上柱国是楚国最高的武官，为酬赏有“破军杀将”建特殊功勋的将领。

齐：司马、将军、上将军。如田单破燕有功，封为上将军。

赵：将军、大将军，周末又置前、后、左、右将军。廉颇、李牧都曾任大将军。

魏：犀首、将军、上将军、客将军、五乘将军。

燕：将军、上将军等。

由于战争兵力经常在十万以上，有时竟达百万之众，加之军队常远离京师作战，国君统帅将领，对下很难直接指挥，调动。因而需要有指挥调动的方法。魏国曾制定“虎符”用作国王授于臣属兵权统率调发军队的信物，这种虎符发展成为尔后朝代的“兵符”。魏制虎符规定将军国王各保存一半，重要指示、报告，分别盖上虎符印为“凭证”。魏军救赵，魏安厘王畏秦，不敢令晋鄙进军，魏公子无忌，就盗窃魏王保存的“虎符”，夺晋鄙军，前往救赵，“盗虎符”这段故事，直到现今仍流传于世。

第二兵器装备的进步

一、兵器方面的发展

春秋时期，战争使用的兵器，戈、矛、戟、剑、刀、弓矢等，一般用铜制造。进入战国时代，冶铁技术有显著进展，用于兵器的改革与制造，促进了兵器的发展。突出的为远战、近战和攻城、舟战等方面的兵器：

矛：矛头制造锋利结实。

戈：刃部成弧线型，装柄内侧有锋刃，绑扎用的“穿”(孔)也增多。

戟：戈与矛相结合而成的戟，起直刺和钩杀的双重作用。

箭：箭(矢)，镞由双翼变为三棱式，效力更大。

戈、矛、戟、箭遂由铜(青铜)改为铁制。据《荀子·议兵篇》记载，楚之铁兵器十分锋利，曾引起秦国重视。秦昭王曾说“楚之铁剑利”。《战国策·韩策一》记载说：韩之剑、戟，能“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吕氏春秋·贵卒篇》说：中山国的力士，穿着铁甲，手执铁杖，“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秦国也制造与楚、韩新兵器相类似的龙盾、杂矛、虎、定秦剑、西戎刀等兵器。

制造新的锋利兵器，同时制造成远射的弩。弩由弓发展而来，达射力强，“发于肩膺之间，杀人于百步之外”，使敌人不知从何而来。弩的发箭以弓弦拉动重量来计算，魏国武士有“十二石(云)弩”，即拉弦可以

拉动十二石的重量。韩国“强弩劲兵”都能“射六百步之外”，“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战国策·韩策一》说：韩兵之勇，被坚甲，蹠弓弩，带剑可以“一人当百”。

春秋战国间，攻城和防守器械也有相当的发展：

(一)攻城的云梯。《墨子·公输篇》为记载说：“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公输班这时所造的云梯，比春秋期间攻城使用的巢车有所进展。

(二)围城的地道。在城被围，攻守战斗间，双方逐渐使用地(坊)道战。并把冶铁鼓风设备，作为武器，使用于作战。鼓动“炉橐”把烟压到敌方地道内，以窒息敌人。《韩非·八说篇》，曾把“埋穴伏橐”和“强弩趋发”，视为重要的作战手段。

(三)舟战的钩拒。公输般游楚造云梯外，还为舟战造“钩拒”。《墨子·鲁向篇》记载说：“退者钩之，进者拒之”。敌舟师后退时，可以把它钩住，前进时把它挡住。

二、装备方面的改善

春秋期间有犀甲，兕甲和合甲。合甲由两层皮革合成，牢固程度较强。所谓：“合甲五层”即五排编缀而成，兕甲的牢固次之，犀甲之牢固又次之。各国装备类别：

楚：鲛革甲，肠夷甲、纽甲、被练。

魏：三属甲、兕鍪、盘领、髀裤。

韩：铁幕(铁制臂衣)、鞮鍪。

燕：铁胄、铁甲。现已有出土文物证明燕之铁甲已相当完善。

中山：铁甲。

第三军事学术的发展

经过春秋时期的战争。特别是进入战国后，人们通过以往战争的实践，已积累了相当多的战争经验，这就为产生更多的军事家、战略家和优秀军事将领提供了战争的客观舞台。他们的战争实践受到各国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竞相传诵和总结，《汉书·艺文志》曾对这个历史时期的军事家、军事思想、军事著作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一、军事家和军事学

春秋初期，已有讲述属于战争指导的“军志”，指出简要的军事原则诸如：“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有德不可敌”，“允当则归”、“知难而退”等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昭公二十年》)。从战国时期一些军事家的活动和言论以及当时的战争来看，这些军事家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兵权谋家：这一家的基本使命和主张是研究作战计划，“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着重于研究战略战术使用，兼收其他各派的长处。

兵形势家：这一家的基本特点是运用战略，活用谋略，重视行动。主张“雷劲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达到战争的目的。

兵阴阳家：利用间谍活动，无孔不入，蒐集有关军事上各方情报。

兵技巧家：讲究战术，范围有进攻、防御、奇袭、伏击、要塞设施和攻防训练等。

军事家通过实际作战，总结战争的实践经验教训，写出有关战争策

略上的运用法则，即所谓的“兵法”，“兵书”。这些兵法兵书，无论对中国的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和军事史均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后期，吴国将领孙武，对楚作战后所写著的“兵法十三篇”，成为后世兵学的鼻祖，又是我国古代辩证法的光辉著作。战国时代，兵法著作最多，各国将领和某些国君，也效法孙武写出不少的兵法，比较重要的有：

穰苴兵法：齐司马田穰苴所著，后世称这部兵法为《司马穰苴兵法》。据《史记》卷六十四记述称：这部兵法实际上是后人在古代《司马兵法》中附上，《穰苴兵法》而成，故称之为《司马穰苴兵法》。

吴起兵法：《汉书·艺文志》称：《吴起兵法》共有四十八篇，已经失传。现流传的有《孙吴兵略问答》，叙述吴起与魏文侯、武侯用兵方面的谈话。至于今本吴子六篇，系出于后人之手，并非原著。

孙膑兵法：大都根据孙武子兵法十三篇，结合对魏作战所得经验教训加以发挥。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孙膑兵法》共有八十九篇和图例四卷(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整理出版的《孙膑兵法》共三十篇)。

宣王兵法：齐宣王把孙膑原著，由所属宾客知兵之士加以修改、增补，改称《宣王兵法》，与孙膑原书变化不大。

惠王兵法：魏惠王也由臣属搜集些兵家学说，编成自己命名的《惠王兵法》，现已无资料说明。

魏公子兵书：魏公子无忌，善交各种类型朋友、宾客，由所进献的各种兵法，合编而成，被称为《魏公子兵法》，共有二十一篇，图例十卷。未传于世。

公孙鞅兵法：《汉书·艺文志》载：有《公孙鞅二十七篇》。为卫鞅至秦破魏收复河西之后所著，现其书已失传。

庞煖兵法：庞煖继廉颇后，担任赵将，打了很多胜仗，著有兵法，《汉书·艺文志》载有《庞煖三篇》，现已失传。

尉缭兵法：《汉书·艺文志》在兵形势家中，有《尉缭三十一篇》，现存二十四篇。宋朝王应麟说，“兵家之人(尉缭)，即今传于世之《尉缭子》，它和杂家(尉缭)并非一书”。

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法类书，共有一百八十二家，其中战国军事家占极大多数。兵法(军事学)是战争指导者和军事将领以及广大士兵的军事实践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成为当时最发达的学说，因而兵家在诸子百家中是相当活跃的一家。

二、当时兵家的谈兵

田单与赵奢的谈兵。田单率领孤城即墨人民战胜燕军，收复齐国失地，成为当时杰出的将领，赵奢是给秦军以沉重打击，获得“阏与”胜利威名鼎盛的将领。田单在齐因与齐王政见不合，奔往赵国，赵王闻其名望，任为赵相。赵惠文王三十年(公元前269年)，与赵奢谈论用兵问题。田单首先说：我并不反对将军的兵法，所不服者，为用兵数量太多，用众(多)使民不得耕作，粮食挽赁，不易供给，此坐而自破之道。又说：“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而天下服矣。今将军必负十万、二十万之众乃用之，此单之所以不服也”。赵奢看出田单的守旧思想，立即予以反驳，首先指出田单的论点说：“君非徒不达于兵也，又不明其时

势”。接着又说：“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薄之柱上而击之，则折为三，质之石上而击之，则碎为百。今以三万之众而应强国之兵，是薄柱击石之类也”，“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不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万，距此奚难哉。今取古之万国，分以为战国七，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齐以二十万之众攻荆(楚)，五年乃罢。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齐、韩两方，举国为攻，谁敢说我以三万救人，今千丈之城，而野战不足用也，君将以此何之。”(《战国策·赵策三》。赵奢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时代情况和作战经验所作的论述，当然是正确的，最后田单只有表示自己所见的局限性，佩服赵奢的用兵主张。

荀卿与临武君的论兵。荀卿的军事理论，为用“仁义”和“王道”完成统一主张。“论一相，阵一法，明一指”实行中央集权，做到“其法治，其佐(相国)贤，其民惠，其俗美”，并以仁义为主，武力为辅，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就可建成统一王业。认为当时秦国朝野虽奉公守法，但秦国的“锐士”不及齐桓，晋文公“节制”之师。而桓、文“节制”之师，又不可以对商汤，周武的“仁义”之师。

荀卿曾在赵孝成王前和临武君议论兵法。《荀子·议兵篇》记述有：“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的主张。就是遇到战争不可避免时，先要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着一个共同目的去作战，才是用兵的最好方法。《荀子议兵》还把军事理论原则作出区分。

(1)威：号令以威，庆赏刑罚。

(2)信：必定以信，处舍收藏。

(3)固：以固定徙举进退。

(4)重：稳重，不轻易动摇。

(5)速：注重速度，窥敌观变。

(6)深：表面深沉，使莫测高深。

五权：

(1)无欲将，而恶废。

(2)无怠胜，而忘败。

(3)无威内，而轻外。

(4)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

(5)虑事于熟，而用财欲泰。

三至：

(1)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

(2)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

(3)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

五无旷：

(1)敬谋无旷。

(2)敬事无旷。

(3)敬吏无旷。

(4)敬众无旷。

(5)敬敌无旷。

荀卿和临武君论兵，多属于军事理论观点，未多触及具体军事行动问题。荀卿的这次“论兵”由于说理充分，成为历来学者所重视的言论。

第二部分　周朝东迁前后的战争

周朝东迁前后，发生了镐京、葛、长勺三次战役。这三个战役，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影响深远。

周与犬戎镐京之战：发生于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晋襄公七年，卫武公四十二年，秦襄公七年，郑桓公三十六年。镐京在犬戎入侵战斗间，王室“六师”无力抵抗。危急中，司徒郑伯友奋勇力战殉国。诸侯联合部队虽然收复了镐京，王室不得不东迁洛阳，造成了政治上的巨大损失。周朝统治开始发生动摇。

周郑葛之战：发生于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郑庄公三十七年。周桓王姬林对郑发动进攻，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胜负不分。周桓王虽然争取到体面的撤军，却因此丧失了威信和控制各诸侯国的能力与尊严。

齐鲁长勺之战：发生于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齐桓公二年，鲁庄公十年。齐鲁两个诸侯国在长勺的战斗，最后以齐国的失败鲁国的胜利而告终。

第一节镐京战役

第一西周政权经过的阶段

武王十三年，牧野之战，周军大败商军，一举灭殷，定都于镐(今陕西西安市西南)，建立西周政权。武王和“三公”悉心规划，采取了一些较清明的军政措施，稳定大局。成王初期，虽发生三监叛变，很快便告平息。成王与康王两朝，部分地缓和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社会安宁，繁荣殷实，以至出现“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鼎盛局面，成为后人所称颂的“成康之治”。

昭王即位后，为消除南方诸侯的离心倾向，亲率大军远征荆蛮，竟至全军覆殁。当时镐京讳言其事，不发讣告，只略称昭王“卒于江上”，顾虑公布真象会影响周朝在所属诸侯国中的威信。后齐桓公称霸向楚进军，就把“昭王南征不返”列为楚的重要罪行。这是春秋列国对这次南征重大事件所持意见的集中反映。

穆王继昭王王位，热衷于“周行天下”，“车辙马迹无所不到”。他对现今西北甘、新、陕远征五次，共跋涉数万里。最后一次也行程三万五千多里。加上游巡豫、冀、晋、苏、浙、赣、皖、鄂等省，所走的路程就更多。西会王母于昆仑山的瑶池，东会各地诸侯于会稽，中原狩猎，捉猛虎畜养于汜水(在今河南)，定其名为虎牢。远征时阵容庞大，乘八骏马，由“七萃之士”护卫，还有祭公谋父率领的六师随行。穆王远征给当时社会带来极大的灾难，至有“北征西王，爰居其野，虎豹为群，鸦鹊与处，嘉命不迁，惟我帝天子”的诗句，表达了国人的愤懑情绪。

周厉王酷爱财货，独操专利，重用荣夷公横征暴敛，引起贵族阶层、百工庶民和各诸侯国的不满与反对，厉王采取残酷镇压政策，由卫国神巫担任监视，卫巫恃势任意抓人杀人，国人走路相遇都不敢轻易交谈。周朝统治阶层中的一些稍有远见的公、侯、伯勋爵也不敢提出大胆的批评建议。后来采用“诗谏”的办法，但未为厉王重视。国人受不了这种无止境的剥削压迫，爆发了有史以来的首次反抗。厉王被迫亡命于黄河东岸霍山脚下一个名叫“彘”的小城避难，太子静躲在召公家内，得免于难，国人推举共伯和为王，建立新政权。

共伯和为首建立的新政权，为时不久，被召公率领的势力所推翻。召公执政十二年，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厉王死后，姬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宣王内修政治，外攘夷狄，有振兴周朝的雄心。他“喻德教，举遗士”，做到“海内翕然向风，诸侯复向宗周”。接着“不籍千亩”，把王室公田分给奴隶，使“因民之则”的民，变成向奴隶主交租的农民。王室奴隶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其他奴隶主也不得不解放其私有奴隶，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提高了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在国力逐渐充实的基础上，开始对威胁中原的夷、戎势力采取军事行动。北方猃狁威胁最大：“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诗·小雅·六月》)。遂由尹吉甫率师北伐猃狁，南仲出征西北伐戎狄，军容雄壮，“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诗·小雅·出车》)，方叔南征荆蛮，同时派人经营江汉，“江汉浮

浮，武大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江汉荡荡，武大，经营四方，告成于王”(《诗·大雅·江汉》)。宣王也亲率军征讨淮北徐夷，战事均告胜利。经过宣王的经营，西周王朝出现中兴局面。但西北战争累受挫折。尹吉甫北伐猃狁，没有达到预定战略目的，担任进军西戎的秦仲战死于疆场。宣王召见秦仲五个儿子，给予人力物力支援，才击破西戎，解除对京畿威胁，公元前789年，宣王“御驾亲征”。千亩之战，败于姜戎，几被歼灭。后整军“料民”预备再战，但未实现，终未解除来自北方的威胁。

宣王中兴仅在东南方取得军事上胜利，西北尤其北方不但受挫，而且财力、物力的消耗也相当大。幽王继位，根本没有考虑这些情况，加上他自己的“暴戾”和“暗昧”，任用一批阿谀奉承、掩盖社会真象的臣僚，政治日趋腐朽，关中腹地泾、渭、洛三川干竭，岐山崩裂。虽然史官伯阳父提出“山崩川竭，亡国之徵”的警告，卫武公姬和等也作出“诗谏”，但丝毫无法改变幽王的昏庸态度。为博取宠妃褒姒的一笑，在烽燧台无故举烽戏弄诸侯，使各路诸侯从此对周天子信心动摇。周天子由此失去调动军队的威信，造成无法弥补的灾难性损失。周朝政权的没落，这也是一大关键。如果没有这场“烽火戏诸侯”的恶作剧，当戎狄入侵时，可能不至使镐京孤立无援而沦陷。

第二戎狄环伺入侵路线

周的北方和西北方，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游牧部族。他们长于乘骑，流动性大。在殷商时代，他们就不断向东南发展，其中以鬼方和猃狁部最为强大。文王时，曾于击破西戎后建国。武王灭商，定都镐京，接近戎狄。

犬戎：根据地在今青海的一些地区，大部渗进陕西凤翔府所属各县境内，势力最大。

大戎：分布于今陕西延安地区。

小戎：根据地原在今甘肃敦煌，大部移居今陕西洛川县境内。

骊戎：分布于今陕西临潼县东南。

康王二十五年，周为清除鬼方部族的侵扰，曾与鬼方发生一次大规模战争。鬼方大败，被俘去酋长四人，兵马一万三千多人，穆王时犬戎日益强大。懿王为着避免犬戎威胁，曾一度迁居槐里，宣王指定秦仲专讨西戎。周朝历代统治者，都密切注视戎狄对京畿的威胁，防御戎狄侵扰，成为周朝国防上的大事。

犬戎盘据凤翔以北山地，占有乘骑快速突击的优势。岐山之起伏山峦，陇之丘陵地带，渭河之水深流速，都限制不了戎骑驰突。镐京西北，周朝没有建立强有力的防御屏障，这就形成了犬戎以陇地区为基地，通过易于徒涉的渭河，作为侵入镐京的进军路线，向镐京进行突然袭击。

第三申侯与犬戎勾结侵镐

幽王继位后，政治上倒行逆施，引起王室内部两种势力的斗争。

郑伯友等人用诗的形式进谏，并未使幽王改变作法，政治上愈加混乱。郑伯友感到这样下去，有亡国丧身的危险，说“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史记·郑世家》)。他接受太史伯的建议，请求把封地改封于“独洛之东，河济之南”，积蓄力量，以备大局有变，能够继续为周政权作支

柱。

申侯善于奉迎、专嗜私利、又与握有重权的虢石父等相勾结，狼狈为奸。申侯原为宣王中兴时代的重臣，当幽王在虢石父等包围下做了许多坏事，弄得上下交怨、危机四伏时，申侯未曾进一言。可是当太子宜臼被废黜，自己由侯爵降为伯爵，私人利害受到损失时，他竟丧心病狂，勾引犬戎入侵，犯下滔天罪行。

犬戎盘踞陇地区，经常得到树墩域方面西戎人畜等的补充，势力比其他戎狄部落强大。它虽然也不断向外扩张掠夺，但其目的仅在于抢劫财物。同时，它慑于周朝的强大，对周朝统治中心镐京，本不敢贸然进攻。但在申侯勾引下，犬戎立即发动对镐京的进攻。申侯还出动申国部队，协同犬戎作战。

第四镐京沦陷经过

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申侯与缯侯招引犬戎大举入侵，镐京西北方向，竟无阻止敌军前进的任何设施，王室直接统率的主力“六军”，也未力战，致使戎兵长驱直达京郊地区，镐京被围。幽王把解围的希望寄托于诸侯的勤王部队，但因曾举烽火戏诸侯，而引起诸侯愤慨。因此，在镐京被围急需救兵勤王之时，诸侯认为又是王后的娱乐消遣，没有一路勤王之师来解救镐京。

镐京被围日久，勤王援军到达无期，幽王派负责军政全责的虢石父，指挥六军中百余辆战车出城，作试探性的攻击，希望获得胜利，振奋军民士气。虢石父率兵出城，与犬戎一经接战，戎将满也速等指挥戎兵，杀声震天，发动潮涌似的猛攻，很快就冲散周军的阵势，虢石父本非能战之将，被乱兵杀死。犬戎和申兵见周军溃散，又无人指挥，乘胜紧追猛打，蜂拥而进，翻越城墙，冲进城内。戎兵进城后，大肆野蛮屠杀无辜人民，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并放火烧毁宫殿和民宅。武王时期开始兴建的周朝政权中心镐京，历二百五十余年后，被犬戎野蛮破坏，化为一片焦土。后人凭吊这个被毁于战火的一代名城，不禁感慨地说：“瞻彼黍于故宫，而离离可叹，鞠茂草于周道，而堪嗟”。

犬戎冲进城内，幽王惊慌失措，司徒郑伯友于危急中，指挥所属将士奋勇力战，多次击退戎兵对宫廷的攻击，终因戎兵愈聚愈众，郑伯友感到再无力退敌挽回危局，乃于宫前点起火炬，吸引戎兵，另于宫后冲开一条出路，乘夜保护幽王、王后由北门突围而出。原拟到骊山行宫稍事休整，东奔郑国以图再举。到达骊山后令举骊山烽火，烽火台虽烟冲云霄，仍然没有一路诸侯之师前来援救，遂整队继续东进。终以老弱妇孺等非战斗人员过多，行动迟缓，被犬戎兵追及，层层包围。郑伯友率部左冲右突，刺死古里赤等戎将戎兵多人。郑伯友的英勇善战，连犬戎主也敬佩畏惧，不敢轻易接战，下令戎兵发箭射击。最后郑伯友在乱箭猛射之下中箭阵亡，幽王等被犬戎捕杀于戏水之上，王后褒姒被俘。

第五诸侯勤王会师

犬戎入侵，京都危急，再举烽火，诸侯仍认为幽王在行乐消遣，谁也不出师勤王。及至镐京陷落、司徒郑伯友战死、幽王被杀，诸侯们才知道烽火不再是游戏，乃起而积极地组织勤王之师。而郑伯友封地的郑国，举国上下义愤填膺，行动最快，大军很快开到镐京地区。

郑军在世子掘突指挥下，推进到镐京近郊。掘突激于君父战死的仇

恨，不待其他诸侯到达，即向盘踞于镐京的犬戎进攻。由于兵力悬殊，战斗失利，不得不撤退。正在这时，卫军到达镐京以东地区，晋秦两军也分别到达。此时，镐京地区各诸侯国军队和统率军队的诸侯如下：

卫军：卫武公姬和。

晋军：晋文侯姬仇。

秦军：秦襄公嬴父。

郑军：郑世子掘突。

诸侯勤王部队虽云集镐京周围，但由于周王室瘫痪，没有统一指挥各路诸侯的统帅，不但无法协同一致地对犬戎作战，且有被犬戎各个击破的危险。在此情况下，后经掘突的建议并得到晋、秦同意，一致推举资深望重的卫武公充当统帅，指挥收复镐京的战争。

第六收复镐京的作战

诸侯联军统帅卫武公姬和以及秦、晋、郑等国侯伯，鉴于犬戎历次侵扰的目的都在掠夺子女金帛，他们攻陷镐京抢到大量金银财宝，必得意忘形。决定利用夜间，分兵进攻镐京东、南、北三门，独留西门不攻，开放一条道路，另派兵埋伏于犬戎西窜必经道路的两侧，以期彻底歼灭犬戎于逃窜的路上。联军的兵力部署是：由卫、晋、秦军担任对镐京东南北三门攻击；郑军担任伏击西窜犬戎的任务。

诸侯军利用日暮，分别进入攻击发起位置，乘黑夜攻进城内与犬戎兵交战。卫、晋两军奋勇作战，但比较秦军则有逊色。秦襄公指挥的秦军，习惯于对戎战斗，因而给犬戎兵杀伤最大。最后犬戎兵在城内被诸侯军击败，乃由西门出城逃窜。但因掘突指挥的郑军兵力有限，加上兵车行动笨拙，缺乏机动灵活性，以致没能堵住西窜的犬戎。犬戎主和他的几个将领漏网，逃回陇，略事休整后，继续窜扰丰镐，危害王畿。镐京遭受两次战火，已残破不堪，失去了中兴时期都城盛景。这一仗虽取得了收复镐京的胜利，但由于没有歼灭犬戎的基本兵力，所以并未全部达到战略目的。

第七战后的重大措施

镐京收复，城垣残破，陇犬戎仍经常骚扰。面临这样的现实，周朝统治阶层对是否迁都洛阳的问题发生了争议。以新任王室司徒卫武公姬和为首的一批大臣和诸侯反对东迁洛阳。姬和指责申侯的借兵犬戎为“开门揖盗”。认为在京都残破之际，应当励志自强，节约爱民，练兵训民，俘彼戎主，湔雪前仇。“若隐忍避仇，弃此适彼，我退一尺，敌进一丈，恐蚕食之忧，不止岐丰”。姬和还强调说：“镐京左崤函、右陇蜀，披山带河，沃野千里，天下形胜，莫过于此。洛阳虽居天下之中，其地平坦，四面受敌。弃镐京迁洛阳，恐王室自是衰弱”。以王室大臣太宰周公喧为首的一批官僚赞成东迁洛阳。周公喧批驳姬和的说法“乃安常之论，非变通之见”。他说“宫阙焚毁，营建不易，劳民伤财，西戎乘隙，何以御之”。强调：“犬戎长驱，民心瓦解，误国之罪，谁能任之”。

被废黜的王子宜臼，于王室内部矛盾冲突斗争和镐京两次战争期间，都在申国避难，对申侯招引犬戎入侵的险恶场面没有丝毫感受，及幽王和太子伯服被杀与镐京收复后，被迎接即位，是为平王。他由申国回到战后的镐京，看见残破首都已非事变前豪华壮丽盛景，根本没有在艰苦环境中恢复创伤、重整王业的雄心壮志。而是畏难苟安，贪图享

受，同意周公喧等人迁都洛阳的建议，姬和的有政治远见的意见竟被否决。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周室决定放弃镐京，把统治中心东迁洛阳。这是在周朝统治时期内形成前后两个完全不同阶段的重大事变，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镐京战役评述

由周武王十三年(公元前122年)至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共历三百五十一年的西周政权，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声势赫赫的王朝。它的战争主要为武王伐纣之战，周公成王东征之战，宣王中兴时期对诸戎狄的作战。这些战争均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战绩。但最后却在镐京之战中大败于犬戎。

西周镐京之战的失败，在军事上的主要原因：一是没有对北方和西北方分封得力重臣，作为京师的屏障，加之有申侯和缯侯的部队做为内应，致使犬戎长驱直入；二是作为周天子的基本武装力量的所谓“西六师”，由于多年朝政的混乱，军无斗志，经犬戎一击，迅即溃散；三是周幽王把调兵遣将的烽火，作为取悦于宠妃的儿戏，失去了在紧急情况下作为调集军事力量的基本手段，这就使得犬戎轻易取得了夺占镐京的胜利。

在诸侯勤王反攻收复镐京阶段，各国诸侯虽也推举了卫武公姬和为联军统帅，但实际上姬和并未直接统率各路诸侯军队，因而诸军也只是一个松散的联军。更为失策的是担任伏击歼敌任务的郑国军队，兵力单薄，反应迟钝，既没有歼灭犬戎的主力，也没有擒杀犬戎的主要将领，使其基本上保全了有生力量，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战争的胜败对一个朝代的兴衰和覆亡只是外在的表现，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它政治和经济上的腐败与崩溃。西周也曾经历了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当政的兴盛时期。但好景不长，到了懿王时，西周政权便开始滑向不可逆转的衰败之途。尽管宣王中兴又燃起一点转向强盛的火花，但宣王既没有平定外来的侵袭势力，又因连年用兵，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农奴大批逃亡，土地荒芜，人民苦不堪言，社会的阶级矛盾又趋激化。

周幽王二年，关东发生的强烈大地震，使岐山崩裂，泾、渭、洛三川干竭。《诗·小雅·十月之交》记载说：“百川沸腾，山冢萃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严重的灾害使百姓流离逃亡，冻饿而死，加速了西周政权的崩溃过程。与人民的苦难生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幽王统治集团的荒淫无道、醉生梦死。幽王宠爱褒姒，废除了申皇后和太子宜臼，另立褒姒为后，并立她所生的儿子伯服为新太子。这加深了王族内部激烈的权力之争，加速了统治集团的分裂，成为申皇后之父申侯勾引犬戎入侵镐京的直接原因。

西周的没落，并不能泯灭它的光辉业绩。这个时代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史记载的古代一个最重要的朝代之一，是中华民族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的奠基时期，在我们民族和社会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块永远闪耀着光辉的里程碑。

第二节葛战役

第一东迁洛阳后王畿的屏藩

洛阳地处中原腹地，被称为“居天下之中”，同时又是“四战之地”，被兵家视为宜战忌守。

周武王对周公指出，洛阳形势“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伊洛”。周公经营洛阳，战略上专对东方新归附的部族，同时也把它作为诸侯朝贡交往之处，而不作为军政根据地。这和有渭、泾、洛三川和岐、陇、骊等山环抱具有优越战略形势的镐京相比，则又相形见绌。周朝东迁洛阳后，四面受敌，始终无法恢复西周时期的盛景。

周朝政权东迁后，作为王室屏藩的诸侯国有：

黄河以北的晋国；

京城以东的郑国；

新建于函崤险扼地区的西虢；

在南方防备荆蛮的申、吕。

这些屏蔽王室的诸侯国，初期虽然也起了一些作用，但是随着其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周室本身的衰落，作用越来越小。晋昭侯于周平王二十六年(公元前745年)，封其叔成师于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北)，从此分裂为两个敌对的势力，内战不休，国力大损。南方申吕，国势不振，需要王室派兵支援才能生存，否则有被荆蛮蚕食的危险。这就使周朝只有东郑和西虢两个诸侯国可以依靠了。

第二郑在东方的扩张

幽王九年(公元前773年)，郑伯友申请移封地于溱水等流经地区。后郑伯友死于犬戎入侵的骊山之战，世子掘突参与收复镐京，作战有功。周朝东迁后，掘突继任其父的司徒六卿要职，受到尊重和赞扬。郑国由于政治声望高，社会安定，生产发达，出现兴旺景象。后来郑庄公寤生继位，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凭借王室的政治关系，发动远交近攻战略，结交齐鲁，进攻陈宋等十四个诸侯国，并发动打击北狄的战争，积极扩张，成为周朝东面的强藩。

郑国于周桓王二年(公元前718年)派人向陈国提出结成友好的建议。陈侯因轻视郑国，未予理会。其弟公子佗主张接受郑方建议。认为“亲仁善邻，乃国之宝”。陈侯不听，他既不认真分析郑国建议的真实意图，也没有想到拒绝郑的要求后，可能招至的后果。次年五月，果然郑庄公以陈侯拒绝“友好”为由，派遣大军对陈国发动突然袭击，给以沉重打击。陈侯迫不得已，派主和的公子佗往郑国请和，接受郑方所提停战条件，双方才结束这次战争。

周桓王六年(公元前714年)，郑庄公30年，北戎发动对郑的进攻。郑庄公慑于戎骑长于驰突冲击，顾虑重重。郑公子突对戎狄特性和惯用战术素有研究，指出：“戎兵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和“先进见获必务进。进而遇伏必速奔，后者不救，败无继矣，可以逞”。针对戎军的这些弱点，他向庄公提出作战建议：(1)派遣轻装勇士，向敌挑战或接战，接战后，迅速撤退；(2)主力设三面伏兵，等待歼

敌。

十一月郑戎两军相遇，郑军前锋部队接战后按计划即向后佯撤，戎军大部逞勇猛进，遭到郑军伏兵攻击，惊慌失措，回头狂奔。郑将祝聃率兵乘势直插戎军纵列核心，与伏兵协同作战，全歼戎兵前锋部队。戎军后续部队也顶不住郑军的攻击，纷纷溃散，郑军大获而胜。

周桓王七年(公元前713年)，宋、卫、郑等国发生互相攻击的战争，齐国出面调停，郑则借口宋公“不共王戢”，即指责宋公没有和郑庄公同往朝见周天子，自称“奉周天子命，起兵伐宋”(《左传·鲁隐公·十年春》)。这时又恰值鲁国也和宋国发生争执，断绝了关系，郑就乘机与鲁联合，发动对宋的战争。结果鲁军击败宋军于管，尔后又进占宋国属地郜、防等城邑。

郑、鲁战胜宋军后，郑把攻占的宋国城邑，送给鲁国。宋不甘心军事上的失败，联合卫、蔡两国向郑反攻。郑军与宋、蔡、卫联军交战于戴，给宋、蔡、卫联军以歼灭性打击，获得全胜。由于郑军在战争中连续胜利，郑庄公气焰更为嚣张，认为惟郑独强，十分骄傲，甚至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

周桓王八年(公元前712年)，郑庄公三十二年，齐厘公十九年、鲁隐公十一年，郑联合齐、鲁攻许。七月，击破许军，围攻许都。郑将颍考叔挥舞郑伯的“蝥弧”旗，奋勇登城。但郑将公孙阏因曾与颍考叔争夺庄公的荣誉车而结有私愤，眼见颍考叔攻城又占首功，竟施放冷箭，颍考叔中箭倒于城下。郑军另一将领瑕叔盈举旗再度攀登，爬上许城，高呼“郑军登矣”！众将士纷纷登城，攻克许国。郑军虽然获胜，但却暴露了内部互相争功自相残杀的严重问题。

第三周郑矛盾的激化

郑伯友及世子掘突相继担任周室的重要职务。庄公继位，仍充任卿，主持国政。祖孙三代权倾当时，引起平王顾虑，致有权力再分配的想法和措施。“王式于虢”，由虢公林父和郑庄公同时为卿，以分散其权力。但事机不密，为郑所悉，便向平王提出质问。平王虽力图否认，但不能消除郑庄公的不满情绪，结果发生王室与强藩之间互换人质的离奇现象。周以王子孤质于郑，郑则以公子忽质于周，周郑交换人质助长了诸侯国对王室的离心倾向。

公元前720年平王去世，质于郑的王子孤还来不及承继大统，也随之死去，其子姬林继位，是为周桓王。桓王因其父死于郑，因而对郑深恶痛绝；但仍然顾及郑国势强盛，不敢免去郑庄公的卿士职位。当郑庄公再次获悉桓王欲操平王故伎，任命虢公杯父为卿士以削弱自己权势时，竟采取激烈的反抗行动，他命人强行收割王畿温地的麦与成周之禾。

周郑双方争执，郑国虽强，但仍然属于藩邦诸侯，不敢公然与当时诸侯心目中的最高统治者周王室对抗。桓王三年(公元前717年)，郑庄公希望能够改善这种恶化关系，亲到洛阳朝觐。桓王深悉郑的飞扬跋扈，拒绝以礼相待，庄公不悦。此时周公黑肩鉴于郑的强盛和王室的衰弱，向桓王建言：周朝东迁，依靠的是北晋，东郑。若“对郑不礼，郑不来矣”，郑不来朝，别的诸侯国也不会来。周公黑肩的建言没有被桓王接受。

周桓王八年(公元前712年)又与郑发生换田事件。这一年，周王室索取郑国的邬、刘、苏、邪等地的田，以苏忿庄的温原、、樊、阳城、欑矛、向、盟、州、、隤、怀等地的田与之交换。但苏忿生已经叛周，温原等十二邑不属桓王所有。这说明桓王要的是郑田，而给郑的只是一句空话，结果使郑进一步失去对周天子的敬仰。

第四周采取进攻战略

周朝东迁洛阳后，王城属地狭小，国力逐渐衰落，以致不能镇慑诸侯，诸侯有事，也无力支援。南面靠近荆蛮，还得派兵支援。由于申侯曾经勾结戎狄入侵，导致镐京沦陷，将士往申驻守，大都愤愤不平，作诗以表达不满情绪，军心士气自然难以振作。东面的郑国骄傲无比，咄咄逼人。桓王强忍十三年而不敢轻言声讨，顾虑军力不够使用，物资供应困难，事实上都在积蓄自己的力量，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周朝军事制度规定天子拥有“六军”，诸侯国大者拥有三军，小者只有两军或一军。天子六军归王室直接统率指挥，但是，镐京战事发生，证明天子的六军已形同虚设。东迁洛阳后，形势更加不利。周朝不仅无法维持六军兵力，甚至竭尽全力也只有三个军可供使用。如以三个军征讨拥有三军的郑国，力量相当，不占优势。桓王也清楚认识到这一点，但实在无法增加兵力形成优势，只得调动尚能听令的诸侯军组成联合军队。所以当郑庄公擅自攻占许国，并与鲁自行交换许田时，桓王忍无可忍，才撤销郑庄公在中枢的卿士，动员全部兵力，联合卫、陈、蔡三国部队，发动对郑国的进攻。

第五周郑两军作战序列

周军

统帅：周桓王姬林

将领：卿士虢公林父

卿士周公黑肩

大夫伯爰

兵力：兵车三百至四百辆。

郑军

统帅：郑庄公姬寤生

将领：正卿祭仲

大夫公子元

大夫高渠弥

大夫祝聃

大夫原繁

大夫曼伯

兵力：兵车二百五十至三百辆。

第六周郑两军作战策划

周军：周军和配属的诸侯军，到达葛附近，桓王与所属将领决定的作战策划和兵力布署是：

右军：卿士虢公林父指挥，附属蔡卫军；

左军：卿士周公黑肩指挥，附属陈军；

中军：桓王直接指挥。

郑军。郑庄公以周天子御驾亲征，大军逼境，情况紧急，立即召集

部将商讨对策。公子元根据对敌情的分析判断，认为“陈乱，民莫有斗志，若先犯之，必奔”。即陈国内部动乱，军心不稳，士无斗志，先攻陈军，它必然很快崩溃。并说：蔡、卫军支持不住，必然首先崩溃。因此，建议郑军应首先击破周左右军，然后集中兵力进攻桓王亲率的中军，“萃于王卒”，必定可以获胜。

高渠弥鉴于诸侯联军与北狄作战时，前锋步卒被击破，后续战车失去掩护，无法出击而失利的教训，提出改变以往车兵、步卒的协同作战方式，编成“鱼丽阵”以应敌。

先偏后伍：战车一队分为两偏。兵车五十乘，则二十五乘为偏：兵车三十乘，则十五乘为偏。

伍承弥缝：步卒五人为伍，以步卒弥补偏与偏之间的缝隙。

把战车摆到前边，步卒分散配置于战车的左右和后面，使战车步卒互相掩护，协同战斗，车上甲士一有伤亡，步卒立即填补上去，继续战斗。

郑庄公既同意公子元先打击陈、蔡、卫诸侯军，再集中兵力攻击周军的战略，又赞成高渠弥车步交织，编成鱼丽阵的办法，决定对周军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

根据高渠弥“鱼丽阵”的建议，采取加强两翼，“翼张其舒”，阵而后战的战法。

右距：大夫曼伯指挥，进攻周右军，首先攻击所属陈军。

左距：正卿祭仲指挥，进攻周右军，首先攻击所属蔡、卫军。

中距：大夫原繁指挥。

进攻信号“旗动而鼓”，击鼓而进。

庄公率祝聃等将领居中军，指挥左右两距的作战。

第七细葛战役的经过

第一阶段的战斗。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郑庄公三十七年，周郑两军相遇于葛附近，双方布成阵势。周桓王以郑军阵容严整，不敢先行攻击。郑庄公则首先挥舞旗帜发出攻击信号。郑大夫曼伯指挥右距，先向配属于周的左军一部陈军进攻，陈军果然兵无斗志，不久即战败退出战场，曼伯乘胜猛攻周左军，双方展开激战。周左军将领周公黑肩震惊于郑军攻势凶猛，指挥混乱，致使左军被击破溃走。郑右距随即进攻周中军。战斗中，祭仲指挥郑左军，向配属于周右军的蔡、卫军进攻。蔡、卫军击破后，祭仲立即转向周右军猛攻。周右军将领虢公林父沉着指挥，奋勇力战，击退郑军进攻，维护右翼阵容，掩护中军主力，战局才趋于稳定。

第二阶段的战斗。第一阶段战斗中，郑右左两军获得大小不等的胜利。郑庄公立即摇旗指挥原繁的中军向周中军进攻。郑右军击破周左军后，曼伯即向周中军侧面进攻，使周中军阵势出现危急状况。虢公林父不得不以一部对付郑左军，主力则参加中军方面战斗，击退郑军，扭转了危局。周桓王也亲自参加战斗，左肩被郑将祝聃射中一箭。虢公林父虽然暂时稳住了战场形势，但桓王以周公黑肩的右军已败，仅凭中、左两军，难以战胜郑军，遂命令中、右军作有秩序的且退且战，脱离战斗。郑军获得局部胜利，祝聃等建议立即追击。庄公鉴于周军秩序井然，追及未必能够获得更大战果，同时顾及自己在诸侯中的政治影响，

认为“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因而没有下令追击。周、郑“葛之战”告一段落。

第八战后周郑双方动态

郑于胜中求和。郑军虽然战场上获得胜利，但周天子威望尚大，郑庄公害怕引起其他诸侯的敌视，于战争结束的当夜，派祭仲为代表，到周营向桓王及其左右作礼节性慰问，借以平息周室因战败而产生报复之心，引起第二次战争。

周无力再战。祭仲带礼品到周营道歉陪礼，桓王和所属将士也乐于这样不分胜负地结束这场战争，实际上周政权也没有继续打下去的力量。葛之役对周朝统治政权的影响极大，从此王室更加衰微，益为众诸侯所轻视。

葛战役评述

葛之战，是周朝东迁后征讨诸侯国的第一战，也可以说是东周王室的奠基之战。打好了，会对周室的稳固产生重大的影响，失败了也必将带来无穷的后患。

郑庄公寤生，凭着三世卿士、两代勤王的政治威望，在国内平息了共叔段的政变阴谋，对东方诸侯实行远交近攻，联合齐、鲁打击陈、宋，击破北戎，消灭许国。这是它国势强盛和敢于反抗周天子的基本原因。

周朝东迁后，政治和经济力量已是江河日下，大不如前。它以自己的天子地位对郑这样的强藩作战，本当确有获胜把握时才可发动进攻，但周朝统治阶层缺乏远见卓识，竟轻率地对郑宣战。临到战场，又没有对郑军作细致分析研究，以便采取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战斗开始，左军和配属的陈军受到郑军攻击，很快崩溃，使中军左侧面暴露，桓王不得不亲自参加战斗，以致负伤。天子亲任主帅而又临阵负伤，无疑会对全军的斗志产生巨大的影响。危急中右军回转支援中军，战场形势才得以稳定，最后迫不得已而全军撤出战场。

任何战略战术的改革，和社会其他的变革一样，都不是天才统帅的主观臆造，而是真正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战争情况的必然结果。郑军这次采用的战术，是建立在对周军及其诸侯军做了深入具体的分析研究上，而且还记取了十二年前(公元前710年)，对诸侯联军作战“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的教训。那次作战，郑军徒兵在前，战车在后，徒兵被击溃，后面战车失去掩护，无法出击，以致战败，田地里禾谷，被诸侯兵抢走。这次改变战斗队形，把战车摆在前面，步卒分散配备于战车的左右和后而，编成鳞次式“鱼丽阵”，步卒战车互相掩护，协同作战，这在当时确是重大的战术改革。而当周军于战场撤退时，郑军适可而止，未行追击，及时派出代表到周营作慰问式求和，以结束这场战争。郑庄公这种有节制的行动，既维护了郑国的尊严，也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不失为有远见的决策。

第三节齐鲁长勺战役

第一齐鲁间曲折复杂的斗争

东周初期中原地区的形势。西周时为了便于统治黄河下游诸侯国，由召公经营洛阳，号为成周，它与宗周镐京形成强有力的政治轴心线，以统治全部国土。平王东迁，放弃根据地宗周镐京，只剩成周洛阳，形势每况愈下。东方诸侯，郑国独强，纵横中原，东周王室无力过问。葛之战后，各诸侯国对周室的离心倾向也与日俱增。地处中原和边远地区的一些诸侯国，就分别以中原或各自的邻国作为扩张与兼并的对象，展开了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其中以郑、齐、鲁，宋等国最为活跃。齐国濒海负山，据有今山东的大部地区，国土宽广，物产富饶，并兼有渔盐之利，势力日渐强大。齐桓公当政以后，不断向周围扩张，怀抱称霸中原的雄心。鲁国据有现今的山东东南部地区。由于它曾是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地，在诸侯国中有较高的政治威望，势力虽较齐国为弱，但同样怀有吞并周围小国的雄心。因而，齐与鲁明争暗斗。数世以来，时而联合，时而分裂，矛盾冲突，十分激烈。

齐鲁错综复杂的关系。齐与纪国为仇，纪国与鲁联姻；齐军进攻郑国，鲁又与郑国结成联盟。这就必然导致齐鲁两国的直接冲突。双方各自联合友邦，形成两个敌对阵营：鲁与纪、郑联合；齐与宋、卫、燕联合。

敌对双方曾进行过一次规模较大的战争，齐虽在战争中失败，但并未放弃吞并纪国的企图。以后，齐改变斗争策略，设法与鲁缔约和好，和约成功后，又加紧对纪进攻。纪不得已向鲁求援，结果齐鲁两军再次在奚地兵戎相见，胜负不分。周庄王三年(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十八年，齐襄公四年，齐、鲁两国国君握手言和。不料在和解的宴会中，齐竟不择手段，杀死鲁桓公，立其子姬同为鲁君。鲁庄公姬同初立，无暇对外，齐乘机攻占纪属邦、晋、部三个城邑，纪国更陷于危机，鲁虽打算出面联郑救纪，但郑国内部发生政变内乱而无能为力。鲁力量有限，不敢单独对抗齐国。齐国见纪国没有外援，就干脆派兵吞灭了纪国。

第二齐国政变与齐鲁乾时之战

一、齐国内部动荡

齐厘公对侄子公孙无知与王子诸儿同等待遇，早已引起诸儿的不满。后诸儿继位为齐襄公。他以公孙无知待遇过高为由，予以降低，“绌无知秩服”。引起公孙无知的不满，阴谋乘机生事。大夫连称、管至父因为出戍葵丘没有得到及时“瓜代”也怀恨在心，于是勾结公孙无知，密谋杀害襄公，拥立无知为齐君，这件事引起大夫管仲、鲍叔牙等人的不满。他们感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便分别拥戴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出奔鲁国和莒国避难。

周庄王十一年(公元前686年)，齐襄公到外地持猎时，被连称、管至父暗杀，立无知为国君，引起全国的反对。接着几位大夫杀死公孙无知，宣布迎接在鲁国避难的公子纠为君，并和鲁庄公会于，商定由鲁出兵护送公子纠返国。而往奔莒国的公子小白闻悉国内变乱，也在鲍叔牙

和莒兵护送下急忙返国，争夺政权。管仲闻讯后，于途次邀击，射伤小白，但被鲍叔牙机智营救，抢先赶回国都临淄，就了侯位，即为齐桓公。

二、齐鲁乾时之战

鲁军护送公子纠回齐，主要目的为着索取重大经济报酬。公子纠和管仲见国君位置被小白抢先夺去，只好仍回鲁国栖身。这使齐、鲁两国关系又趋紧张。

新即位的齐桓公小白，因为鲁国支持公子纠，对鲁非常不满。鲁庄公却以公子纠没有当上齐国国君，对齐极为仇视，便亲自率大军强送公子纠返国，进入齐境乾时地区。齐桓公即与鲍叙牙等商讨对策，决定“以兵拒之”。双方各以兵车三百辆投入战斗。齐军一举击破鲁左右军，继而包围鲁庄公所统帅的中军。鲁庄公把大旗改插在将领梁子车上，自己改乘轺车，化装突围，才免于被俘。鲁军惨败后，鲁庄公在齐军压力下，竟改变初衷，杀死公子纠，把管仲押送给齐国。

第三齐政革新与对鲁进攻

齐桓公为着齐国富强，竟能排除个人恩怨，接受鲍叔牙建议，破格任用政敌管仲为太宰，主持军政大事。管仲不负所望，针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提出了著名的“作内政而寄军令”的一体化军政措施，对政治、军事制度实行改革，规定：春季以“获”振族，秋天则以“弥”治兵，卒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禁止迁徙，世代定居，互相团结，同甘共苦。这样编组起来的军队，将知兵，兵知将。同时各级行政官员，也就是战时的各级指挥官，军政、军农一体化，其体制如下：

伍：每五人为一伍，每伍均出自一轨；五家为一轨，长官称为轨长；

小戎：五十人为一小戎，每戎均出自一里，十轨为里，长官称为有司；

卒：二百人为卒，每卒均出自一连；四里为连，长官称为连长；

旅：二千人为旅，每旅均出自一乡。十连为乡，长官称为良人；

军：一万人为军，长官称为帅。

管仲内政寄军令的军事化军政体制，符合桓公扩张势力的需要，加以不遗余力地推行。但桓公称霸心切，未待管仲的革新政策取得显著成效，就急于展开扩张活动。而管仲觉得当时形势尚不具备向外用兵的条件，齐国南有鲁、宋，北有燕、北狄，西有卫、曹等国。齐曾侵占邻国很多土地，他劝桓公退还给邻国，这是提高齐国在诸侯国中的政治威望，增强齐国霸主地位的较好措施，但这完全不符合齐桓公立即征战的意图，齐桓公认为可以首先征伐鲁。他觉得乾时之战，表明鲁军战斗力脆弱，又属邻邦较大之国，再度给以打击，对其它邻国将起很大的镇服作用。于是拒绝管仲“军政未定，未可用兵”的意见，决心发动对鲁的战争。

第四鲁国的备战

乾时战后，鲁庄公吸取失败的教训，加强军队训练，赶制各种兵器，疏浚曲阜以北的洙水，以防齐军进攻。与此同时，政治上也作了些取信于民的工作，所以当齐军逼近鲁境，鲁国北部形势紧张时，鲁庄公决定动员全国力量对齐作战。这时一位素不闻名但确有政治远见和军事

素养的人曹刿，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关心祖国安危存亡，他决心进见鲁庄公，陈述了自己对战胜齐国的策略，对庄公的战争指挥和鲁军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第五齐鲁两军作战序列

齐军

统帅：司寇鲍叔牙

将领：司马王子成父

大夫东郭牙

大夫宾须无

兵力：兵车三百辆。

鲁军

统帅：鲁庄公姬同

将领：曹刿

大夫曹沫

大夫施伯

兵力：兵车二百辆。

第六长勺之战的经过

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齐桓公二年，鲁庄公十年，齐军仗着兵强马壮，侵入鲁境。鲁庄公暂时避开齐军锋芒，采取战略退却，撤退到有利于反攻的地方长勺。齐国由于乾时战争的胜利，鲍叔牙以下将士都轻视鲁军，认为不堪一击，于是发起声势汹涌的攻击。鲁庄公见齐军攻击鲁军阵地，就要擂鼓下达应战的命令。曹刿立即劝阻说：齐兵势锐，我军出击正合敌人心愿，胜利没有把握，“宜静以待”，不能出击。庄公遂饬令鲁军固守阵地，只令弓箭兵射击，以稳住阵势。齐军没有厮杀的对手，又冲不进鲁军阵地，反而受到鲁军弓弩猛射而无法前进，只得向后撤退。经过稍事休整，鲍叔牙又下令展开第二次攻击，曹刿劝庄公仍然不要出击，继续固守阵地。齐军攻势虽猛，但和第一次一样攻不进阵内，没有和鲁军交锋，士气不免疲惫，再退回到原阵地。

齐军两次进攻，鲁军都没有应战，鲍叔牙和齐军将领都认为鲁军怯于应战，决定再次发动进攻。于是齐军声势浩大的第三次进攻，迅即出现于鲁军面前。曹刿看到这次齐军来势虽猛，但势头没有上两次大，认为出击时机已到，立即向庄公提出反击齐军的建议。庄公亲自擂起战鼓，发出攻击命令。鲁军将士闻令，士气高昂，奋勇出击，争先恐后，锐不可当，把齐军打的七零八落，溃不成军，纷纷败退，鲁军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鲁军战胜，庄公传令追击。曹刿认为齐乃大国，兵力素强，不容易判定是否真正失败，很可能会另有埋伏，阻止庄公下达追击令。他登轼而望，见齐军旗鼓杂乱，兵器倒曳，又下车观察到开车战车的车辙十分混乱，判定齐军是真正溃败，才向庄公提出大胆追击的建议，庄公令下，鲁军猛打猛追，给齐军以沉重打击，俘获大量甲兵和辎重，把齐军赶出国境，洗涤乾时之战所蒙受的耻辱，国势为之一振。

第七长勺战后两国动态

鲁军获胜后，庄公与曹刿论及战争胜负的原因。曹刿说：作战全凭勇气，“一鼓作气”(古代用兵“鸣鼓则进”，鼓声一响，勇气奋发)；“再而

衰”，再次击鼓，则勇气衰退；“三而竭”，三次击鼓勇气就没有了。“彼竭我盈”，敌三鼓气竭，而我初鼓气盛，所以能战胜敌人。至于追击问题，曹刿则说：“大国难测，惧有伏焉”，“吾视具辙乱，望其旗靡”，故同意下令追击。

齐军长勺战败，鲍叔牙没有认识到侵略鲁国是非正义行为，而把失败的原因推托为：乾时之战，齐为主所以胜；长勺之战，鲁为主所以齐败。齐国虽然失败，但没有放弃吞并鲁国的企图，进而采取联宋政策，准备继续对鲁作战。

长勺战役评述

齐鲁长勺之战，既没有武王伐纣的气势，也没有宣王南征的规模，是一次诸侯之间规模不大的战争。但它却在政略、战略和策略上体现了古代一些可贵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给人们以有益的启迪。这两次(乾时、长勺)战争，充分说明侵略与反侵略、正义和非正义之战，最后胜利总是属于正义之师。

同样是齐鲁两国交战，同样是鲁庄公、齐桓公，一胜一败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齐鲁第一次交战时，鲁庄公借口护送公子纠返回齐国为君为理由，把大军开到齐国腹地，乾时一战，遭到沉重打击，庄公化装才得脱险。齐国胜利了，保卫了自己国家的尊严和独立，但它却乘乾时战胜之声势，侵略鲁国，直趋长勺，轻视鲁军，骄横自满，结果总逃避不了历史的惩罚。

长勺战前，鲁军由于乾时的失败，庄公既能作复仇雪耻的战争准备，又能破例接待既无官职，又无名望的曹刿。并能开诚布公地和他讨论战胜敌人的战略，这是难能可贵的。战斗中又按照曹刿的意见，掌握有利于反攻和追击的时机，从而获得了胜利。

当代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齐、鲁长勺之战的战法给予过很高的评价，说战争中鲁国“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败了齐军，造成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战例”。曹刿论战所叙述的原则和长勺战例，成为我国后世“后发制人”防御战略思想的宝贵借鉴。

第三部分　春秋时期战争

春秋时期的战争，主要的是五霸间的战争，其次为南方吴越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中重要的战役如下：

晋楚城濮之战：发生于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五年，楚成王四十年，齐昭公元年，秦穆公二十八年，陈穆公十六年，蔡庄侯十四年，郑文公四十一年。战争结果，晋战胜楚，取得霸权，盛极一时。

晋楚邲战役：发生于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晋景公三年，楚庄王十七年，郑襄公八年。双方以争夺郑国做为争霸中原的焦点，战争结果，楚胜晋败，楚成为霸主。

晋齐鞍战役：发生于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年)，晋景公十一年，齐顷公十年，楚共王二年，鲁成公二年，卫穆公十一年。战争结果，晋战胜齐，使齐站到晋方，增强了晋与楚对抗的力量。

晋楚三驾战役：发生于周灵王九年(公元前563年)，晋悼公十年，楚共王二十八年，鲁襄公十年，宋平公十三年，曹成公十五年，卫献公十四年，齐灵公十九年。战争结果，楚被迫放弃争夺中原霸主，晋复为霸主。

吴楚柏举战役：发生于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九年，楚昭王十年，秦哀公三十一年。这是吴楚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吴军长驱直入，攻克楚都郢，为楚立国以来遭受的最大失败。

吴齐艾陵战役：发生于周敬王三十六年(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十二年，齐简公元年，晋定公二十八年，鲁哀公十一年。战争以吴胜齐败告终，吴成为中原一时之霸主。

吴越笠泽战役：发生于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年)，吴王夫差十八年，越王勾践十八年。越伐吴，前后历经六年时间，越国彻底灭亡了吴国。

第一节春秋列国兼并战争概述

周平王东迁后，王纲不振，周王朝的统治势力江河日下，各诸侯国在互相攻杀的兼并战争中，为了免被兼并，必须奋发图强，对内整修军备，对外“兼昧攻弱”，吞并弱国、小国。诸侯的兼并战，加在老百姓头上的是深重的灾难和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弱小诸侯国被兼并殆尽。春秋初期的一百六十多个诸侯，到春秋后期，只剩晋、楚、齐、秦、中山、吴、越、鲁、曹、卫，宋、郑、陈、蔡等十四个主要国家。这十四国中晋、楚、齐、秦、吴、越等国均是兼并战争中的强者，它们靠兼并扩张而强大，所谓“无兼并则无霸权”就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诸侯兼并以楚为最多，晋、齐等国次之。

楚兼并六十余国；

晋兼并二十五国；

齐兼并十四国；

秦兼并十四国；

吴兼并六国；

越兼并三国

鲁兼并十三国；

宋兼并十国；

卫兼并九国；

郑兼并六国。

春秋期间，虽然兼并战争如此众多，但最主要的却是所谓春秋“五霸”之间的争夺战和南方地区吴、越、楚之间的战争。所谓五霸即为齐桓公时期的齐国，晋文公时期的晋国，宋襄公时期的宋国，秦穆公时期的秦国，楚庄公时期的楚国。齐由于偏居东方，争霸时间较短，秦远在西方，宋夹在晋，楚两霸之间，都对争霸中原起不到关键作用。秦、晋、齐三国所以成为一时之霸主，除了三国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强盛之外，这三国的地理形势也占了很大的优势。“晋阻山河，齐负东海，秦因雍州之固，迭次为霸主”。这就形成了春秋前期齐、楚对抗，晋、楚争霸的局面。五霸中争霸中原为时最久、关系最大的则为晋、楚两霸之间的争夺战，时间长，联合的诸侯国多，波及的地区也比较广大。

楚在春秋为蛮夷之国，在兼并战争中逐渐扩大了疆土，增强了实力，不断向中原进逼，给中原各诸侯国以很大的威胁。它迫使陈、蔡成为附庸，又向郑、宋进攻。楚的锋芒接着指向曹、卫，有席卷整个中原之势。这不仅使当事国感到危亡迫于眉睫，而且使北方的晋、西方的秦和东方的齐、鲁也感到如芒刺背。到了春秋后期，我国南方出现吴楚、吴越、吴齐间的战争，中原地区的争霸战争反而退居次要地位。

春秋初期的军制，大体仍延续西周的编制，各级编制的大致情况如下：

军为一万二千五百人左右，兵车一百二十五乘。每军编为五个师；

师为二千五百人左右，兵车二十五乘。每师编五个旅；

旅为五百人左右，兵车五乘。每旅编五卒；

卒为一百人，兵车一乘。每卒编四两；

两为二十五人左右。每两编五伍；

伍为五人。

军的指挥官称“将”，师、旅的指挥官称“帅”，卒称“卒长”，两称“两司马”，伍称“伍长”。

春秋时期战争的规模是逐渐加大的。初期双方投入交战的兵力不过三万人左右，兵车也最多不超过三百乘。晋文公起初建立三军，城濮之战若干年后扩大到六军。城濮之战中楚出兵十余万。春秋中期各国武装力量进一步扩大，一次作战可出动兵车两三千乘。这时虽然战争规模增大，但战术运用仍然是呆板的兵车列阵。到接近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进一步增大，战略、战术的运用才出现较多的变化。

第二节晋楚城濮战役

第一城濮战前晋楚两国的概况

一、楚国概况

楚国本是南方小国，春秋时期才逐渐发展起来。它乘王室衰弱，诸侯互相兼并之机，不断地设法向外扩张。当时几个比较大的诸侯，莫不以楚国扩张涉及到本身的安危为忧。齐国政治家管仲辅佐桓公联合诸侯，组成联合阵线，目的是制止楚的扩张企图。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桓公统率宋、鲁、陈、卫、郑、许、曹、齐八国声势浩大的联合军队伐蔡，蔡军溃败，联军乘胜越过蔡境伐楚，军次于陉。楚成王因诸侯联军入境也发兵北进，并派遣使臣质问诸侯入侵原因，桓公接见了楚代表，进行了一番对话之后，进而夸耀联军威力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楚国代表屈完的答复也很强硬：

“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齐、楚两方阵前针锋相对，势均力敌，楚国顾虑诸侯联军军容的完整，不敢轻起战端，齐桓公也感到劳师远征，进入土地广大的楚国境内，难于很快获得胜利，于是停止进攻，与楚会盟于召陵。召陵之会，齐国取得了制止楚国向中原扩张的暂时性的胜利，楚则毫无损失。会后不久，楚国仍继续攻略小国，积极扩张。

周襄王九年(公元前643年)，称霸诸侯的齐桓公死后，诸子争位，发生政变，霸业衰落。宋襄公则急于充当盟主，争夺霸权，不顾宋是二等国，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都很脆弱，无法与齐楚相比的现实情况，而犯了“小国争盟祸也”的大忌，而穷兵黩武使齐伐曹，邀约楚、齐参与所召集的鹿上盟会，被楚成王当场逮捕。楚于是执襄公以伐宋，经过周旋，才被释放。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宋以郑伯往楚修好，而出兵伐郑，楚则伐宋以救郑。宋、楚两军遇于泓水。战前宋军已在泓水沿岸布好了阵势，在战略上处于有利地位，并握有对楚军“半渡而击”的良好战机。于是司马公孙固建议说：敌众我寡，应乘敌人尚未全部渡过河时，进行攻击。襄公说：不可。楚军刚渡过河，正在混乱之时，公孙固又建议立即攻击，再次被襄公拒绝说：“既陈而后击之”。就是说，等敌人列好了阵再攻击。结果，宋军因两次失去战机而战败。宋襄公腿部被刺伤，护卫“门官”被歼。楚军泓上的胜利，中原已经没有敌手，大有排山倒海之势，引起所有诸侯国的严重不安。

二、晋国概况

泓水战役后，中原地区诸侯国几乎完全被楚国所控制。其势力尚未达到的地方仅为东齐，西秦和北方的晋国。晋自武公以来奋发图强，先后兼并邻近小国和戎狄部族。拥有现今山西太原以南、陕西东部、河南陕州和豫北西部，横跨晋、陕、豫三省，“表里河山”，俨然北方大国。南有析城王屋，及崤函为屏障，西有姚林之险为支柱，战守咸宜，且有优越的战略形势。晋献公死后，里克发动政变，住在屈城的晋公子夷吾，返国为君，称为晋惠公。住于蒲的公子重耳则到翟暂住。秦、晋两国矛盾重重，发生韩原之战，晋惠公竟至被俘，经秦释放回国，仙顾虑

驻翟多年的公子重耳在列国间的声望，怕其回国夺权，欲密谋把重耳暗地杀掉。重耳闻讯，带着从人，奔往齐国。经过卫、曹、宋、郑，最后到楚。重耳这次周游列国，遭到卫、曹和郑的冷遇，而齐、宋、楚则热情接待。随着重耳周游列国的赵衰、狐偃、先轸、胥臣等都属于当时具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在各国周游期间，非常重视观察各国的形势。尤其到宋国，受到特别隆重的礼遇，自然而然地了解到泓水之战后宋国与楚国的动向和意图。他们到楚国后，也受到极为隆重的接待。当楚成王问重耳返回晋国，当了国君后，何以报楚的恩惠时，重耳毫不犹豫地说："若以君主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这就是说，如果将来我被迫与君作战时，我首先要退让三舍，以报答在楚受到的礼遇。重耳不卑不亢的答复，立即引起楚大夫成得臣(子玉)的不满，向楚王提出杀掉重耳和他的随行人员的建议。楚成王顾虑杀掉另一大国政治逃难的王孙公子，会在各国政治上引起不良影响，便拒绝了成得臣的建议，仍然待之如上宾之仪礼，并送往秦国。

秦、晋相邻，秦穆公派兵护送重耳返晋，就任晋君，即历史上的晋文公。文公在国外十九年(公元前655～636年)，周游列国，经历丰富，对各国的动向有所了解，特别是一些国家发生的政变给他教育很深。他主持政权后，考虑到反对阶层不会甘心失败，机警地平息以吕省、郤芮为首发动的政变，缓和了国内矛盾，并从富国强兵，争夺霸权的需要出发，开始着手军政改革。

文公以过去晋国多次事变均由于公族分权，树党相争，于是采取削弱公族权限，改为君主专政的卿(相)负责制。卿平时为行政首长，战时为三军元帅，卿的人选由国君择贤任用。

晋非常重视发展农业经济，自献公以来，就大力开发汾河流域，兴修农田水利，文公获得太行山南之河内沃壤，即以胥臣为司空，主持平治水土，农产品大增，粮食充足。其次为减轻赋税，通商宽农，鼓励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积累财富。同时提倡节俭之风，晋文公自己穿衣、吃饭都很注意简朴。因而，晋国不久便政治安定，国家富强，为晋文公争夺霸业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二晋楚争霸双方的战略

一、晋国采取的战略

晋文公周游列国十九年后，返国即位。他以继承齐桓霸业，领导中原诸侯，抗击荆楚向北扩张为目的。因而采取下列的策略战略：

(一)继齐"尊王攘夷"

齐桓公称霸"九合诸侯"，"尊王攘夷"为得力的号召口号。晋文公当政后，中原诸侯大部已被楚控制，周襄王又避难于外地。于是采取"求诸侯莫如勤王"的策略，并与秦协议兵临河上，由晋就近出兵，平定太叔带之乱。晋军进军神速，一路包围温(今河南温县)，擒杀了自立为王的王子带，一路迎救周襄王返回京都洛邑复位。周襄王感念晋勤王之功，重赏了晋文公一些土地。晋文公勤王之举，在王室和诸侯国之间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誉。

(二)控制战略要地

晋国地处太行山之西，南有黄河阻隔，进出中原，行动不便。周襄

王以晋文公勤王有功，赐给阳樊、原、攒茅之田。尤其河内阳樊为控制太行与黄河战略要地，晋得南阳黄河北岸一带地区后，就使郑、卫两国处于晋的直接威胁之下，从而在客观上起了制止郑、卫两国完全依靠楚的局面，对晋文公争霸中原构成了很有利的战略态势。

(三)联秦增加声势

秦穆公支持晋文公取得政权，文公表示与秦友好，于周襄王十七年秋，派兵支援秦军进攻楚国西部小国都(河南内乡县西)，攻克都国后，进而袭取商密。晋文公这一行动，既协助秦打通荆紫，武关道路，导秦南向楚国。又借秦的南进，牵制楚对中原诸侯压力，实为一箭双雕的战略。

二、楚国采取的战略

楚成王进攻中原诸侯的战略为亲善与镇压同时并举，以政治手段争取弱小国，用军事力量击破强国。进攻强国，先采取外交攻势孤立对方，然后采用武力。楚为控制中原诸国，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楚成王娶卫文公女为夫人，同时嫁妹于郑文公。从而与卫、郑联婚，紧接着联合曹国以兵支持鲁国，外交上孤立宋国。

由于陈国与宋通好，楚派兵讨伐陈国，解除后顾之忧，以保障全力攻宋，从而取得了泓水之战的胜利。泓水之战以后，中原已没有楚国的敌对力量，楚国实际已成为称霸南方控制中原的霸主。不与楚通盟友好的只有齐、晋、秦三国，楚对这三国依然是采取软硬兼施，政治军事并重的战略。

对齐：派兵进驻谷邑，拥立公子雍为齐君，伺隙而动，乘机进取。同时任用桓公子七人为大夫，以拢络齐人之心。

对晋：用隆重礼仪，接待晋公子重耳(即晋文公)的过境，使晋文公一直怀有感激之情。甚至城濮战事发生前夕，晋文公尚怀有“楚君之惠，未之敢忘”的感情。

对秦：则采取介于齐、晋两国之间的措施，派遣楚大夫斗克、屈御寇率兵戍守商密，阻止秦军东出，以巩固楚国西部。

第三晋楚整军与晋方的决策

一、楚国整顿军备

楚国自泓水交战获得胜利后，又采取联鲁对齐、交好曹卫、孤立宋国的战略。这一东方联盟的形成，压迫宋国不得不听从楚国的指挥。及晋文公复国，晋秦和好，宋为摆脱楚的羁绊，转换方向与晋接近。宋国态度的变化，使楚国感到不安，担忧东方联盟，会因为宋国转变而有全部瓦解的可能。因而，进攻宋国，压宋就范，成为楚国称霸的重大措施。进攻宋国需要充分准备，全力以赴。这个任务由负责政治军事责任的令尹子文来执行。子文是楚国负有盛名的大政治家，曾三次担任令尹要职。他虽然看出扩张政策会带来严重后果，但在成王的那种错误的扩张意图驱使下，也只有勉强从事。他校阅全军只用了半日时间，没有什么赏罚，“不戮一人”。子文消极和草率从事，为楚成王所不满。子文也看出了这个问题，就以年迈为理由，自动辞职引退，并推荐成王所信任而又是他家族中最得力的将领成得臣为令尹，出任楚军统帅。成得臣校阅全军，严格整顿，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还“鞭七人，贯三人耳”，显得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成得臣的积极表现，受到楚国统治集团中力主扩张

的所谓“国老”们的喝彩。他们纷纷向子文道贺，感谢他为楚荐举了“贤才”。在欢声笑语的气氛中，有一位少年贾表示出不同看法。他说子文推荐子玉不值得庆贺，子玉“刚而无礼，不可治民”，带兵不能超过三百乘，多了就只能失败，还说“胜而后贺，犹为未晚”。但是，对这些意见，楚国统治者认为是“孺子之见”而漠然置之。依然由成得臣推行预定的扩张政策。

二、晋国图霸的选将练兵

晋献公曾建立两军，兼并邻近小国，扩地千里成为大国。文公继位，图强称霸，决定扩建为三个军。三军统帅将领的人选，是关键性的大事，赵衰提出很多正确的建议。他向文公推荐郤谷任元帅，说郤谷知礼义，明诗书，有德性，是人才，请加以使用。文公接受他的意见，以郤谷担任元帅，并打算任命赵衰为六卿的卿统率下军。赵衰则不考虑个人地位，而是从长远着想，向文公提出“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推荐他们担任要职，狐偃也以有兄在前，让位于长兄狐毛，自己担任军佐，经过商量，正式确定：

郤谷将中军，郤溱佐之。

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

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

赵衰退居其次，担任司马(执军法)。晋方将领互相谦让的优良风气和楚方有显著的区别。将领决定之后，接着大规模练兵于披卢，元帅郤谷号令严明，先教后罚，宽严得体，上下悦服。晋文公选拔将领从全局着眼，不侧重于追随自己多年的人，以才干能力为主，原来不完全站在自己这方面的人如郤谷、栾枝也加以重用。而始终追随左右的胥臣等将领并未放到六卿之列。这就避免了国内大臣和国外随侍大臣间争宠的矛盾，全军团结一致，共御强敌。

三、楚军攻宋与晋方的决策

东方各国矛盾重重，齐、鲁相争，宋背楚亲晋。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年)，楚成王三十八年，宋成公三年，楚军进攻宋南要地缗邑。鲁则引导楚军攻占齐属地谷邑，由楚派兵驻守，建立政权。一年以后(公元前633年)，楚又联合郑、许、陈、蔡等国大举对宋进攻。宋国首邑被围，形势危急。宋成公派公孙固向晋告急求援。晋国君臣早对楚在东方的扩张十分关注。所以宋国求援代表公孙固一到晋国，上下即表示大力支持，分别提出具体的建议和对策。重要的是先轸、狐偃的意见，先轸说：“报施救患，取威定霸”，正是时机。狐偃说：“楚新得曹，初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狐偃认为晋无须直接派兵援宋。楚和曹友好，新近与卫联婚，我派兵进攻曹、卫，楚必然往救，则齐、宋的军事压力就可以解除。晋文公同意先轸和狐偃的说法，决定了援宋抗楚的策略。自此，晋楚两大国之间的胜负较量，成为春秋列国时期的大事。

第四城濮战前双方的作战活动

一、晋假道于卫以伐曹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五年，宋成公五年，卫成公三年，曹共公二十一年，正月，晋军出兵援宋，采取假道于卫以伐曹的战略。预定由卫的白马渡(滑县北)渡河。“假道”遭到卫国拒绝，晋军乃改

由南河(河南淇县南)渡河东进。袭占了卫重地五鹿，留军驻守，大军向东推进，集中于敛盂这个卫、齐、曹、鲁四国边界战略要地，晋军很快占据该地，严重威胁卫国首都楚邱(河南滑县附近)，晋军更加接近齐国，进一步方便了与齐交通来往。晋派遣使臣往齐修复与桓公时代的旧好。这时卫成公表示屈服，愿意与晋议和，但为晋所拒绝。卫转向楚告急求援，国人反对，进而驱逐卫侯到襄牛。同年二月齐昭公来会，齐、晋两国国君订立友好同盟于敛盂。更加增大了晋军的声威。鲁僖公见晋军兵力强大，齐、晋又举行联盟，形势对鲁很不利，鲁既想缓和与齐、晋的矛盾，又想不得罪楚国，于是鲁先派兵杀了担任戍守卫地的楚大夫公子贾以讨好于晋，同时又通知楚说守将公子贾是因为完不成任务，擅自撤退，所以被杀，以讨好楚方。

晋军由敛盂进入曹境，围曹都陶丘(山东定陶县西南)，曹军奋起应战。晋军攻城，死于城门前者众多。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三月十二日，曹军终因势孤力单，陶丘城失陷、曹共公被俘。晋军进城，晋文公立即公布曹侯罪状，和保护僖负羁家族安全以表示“报施”。晋军颠颉等将领反对这种措施，不满地说：对将士尚未进行论功行赏，报私人恩惠，有何用处。乘夜放火烧了僖负羁家。这把火使晋军的名誉扫地。晋文公为着平息民愤和诸侯间议论，决定对主犯给以惩罚，但另一将领胸部负伤尚能距跃、曲踊，不忍杀害伤者，只杀颠颉以整肃军令。实际曹人已饱尝晋军所给予的苦难。整顿纪律只不过是一种事后骗人的伎俩，对一些将领仅革职了事，不久就又恢复原官职。

二、宋再告急和晋的机动策略

晋军进攻卫、曹，原来计划是引诱楚军解宋围，北上与晋决战，但楚军不为所动，继续围攻宋国首邑。宋派遣大夫门尹般再度往晋告急。晋文公感到宋国告急，若置之不救，不但无以报宋襄公昔日恩惠，而且“舍之则绝”，失去宋国将对全局形势更加不利。救宋战楚，又违背引楚军于曹卫之野决战的战略。加上联合齐、秦还未成功，战胜楚国把握不大，有些犹豫不决。元帅郤谷又于此时死于敛盂军中，更使文公难下救宋战楚的决心。这时，新任元帅先轸向文公提出对楚战略的建议。(一)让齐、秦出面斡旋战事。“宋厚赂我，受赂而救，有何义焉！”“使宋舍我而赂齐、秦”，通过宋向齐、秦献厚礼求救，使之干预宋楚战事，调解楚宋战争，对我更为有利。(二)将曹、卫土地分给宋。我军占据曹、卫，“执曹君(共公)，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弥补宋都被围所受损失，藉以鼓励宋国军民斗志。(三)促使楚国陷入孤立。进行前两步骤就会出现下列情况：曹、卫两国是楚国的势力范围，楚国决不会同意齐、秦两国的干预。这样就会激怒齐、秦，加之宋对齐、秦贡献了厚礼，齐、秦必然会对楚恼怒，对宋友好，从而促使齐、秦很快与晋结成反对楚国的军事联盟，使楚国陷于更加孤立的境地。文公接受了先轸的意见，事态发展的结果恰如先轸分析的那样，从而对中原大局起了重要作用。

三、楚方和战的矛盾

楚军围攻宋首邑，战事相持日久。晋军侵曹伐卫进展迅速，卫降曹破，中原形势突变，楚失去救援之机，战事延续下去，楚军必与晋军发生直接冲突。楚国还没有与晋国作战的准备，秦兵有出兵救晋之讯，楚

成王顾虑申邑商密遭受，攻击其侧背堪虞，决定立即停止进攻，进行战略退却，等待时机有利时，再转为战略进攻，对晋作战。于是由驻地申，发出全军转移撤退的命令。驻齐国谷地由申叔侯指挥的楚军，把谷地交还于齐，与齐议和，撤兵返楚。命成得臣指挥围攻宋都的楚军和各路诸侯军，撤出围攻，各自返国。成王对成得臣刚愎自用的性格很不放心，特别指出：不要进逼晋军，晋侯在外十九年，备尝艰难险阻，尽知民情真伪"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并引述《军志》的话："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者不可敌"。意思是当敌我力量相等，有适当收获，就应满意而归。敌强于我，明知不能取胜，就应知难而退。有德的人不可敌。又说："此三志者、晋之谓矣"。告诫成得臣对政治修明、团结一致的国家不可与之为敌，同时也不要在不利的形势下作战。但成得臣对楚成王的训令没有正确认识，而是为着国内政治压力，从军事观点出发，认为旦夕可以攻克宋都，不应半途而废，因而拒绝执行撤军训令。同时派遣伯棼返申，向楚成王申述理由："非敢必有攻，愿以间执谗慝之口"。意思是说，他保证乘即将胜利的时机，可以一举攻下宋都，以堵住曾经当场讥讽他不能指挥大军作战的芜贡等人之口。并请增派部队，以便必要时与晋作战。成王对成得臣拒不执行命令表示不满，同时又存在侥幸取胜心理。因而，既没有再坚持让成得臣撤军，也没有完全按照成得臣请求的人数派遣兵力，而是"少与之师"，只派出西广、东宫、若敖之六卒等，由成得臣指挥。后来的事实说明，楚国在战与和的政策上产生的主要分歧，楚成王根本没有采取坚决措施，而是把矛盾下交，把责任完全推给成得臣。这是城濮战前，楚国内部勾心斗角的重要一幕，它对战争所起的影响和付出的代价是沉重而深远的。

四、晋军战略退却

楚军代表宛春到晋军驻地，向晋军通知说："请复卫侯而封曹，楚亦释宋之围。"狐偃斥之其无礼。先轸看出楚方阴谋，向文公提出对策说："楚一言而定三国"。如果，我们仅仅以楚无理一句话而拒绝楚的建议，我们就失了礼；如果我们同意楚的建议，又等于抛弃宋国，这样楚有三施，我受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暗中允许曹、卫复国以离间其关系，同时把楚方代表宛春扣压在卫国的五鹿，以激怒楚国。采取既战而后图之的策略。先轸的意见，得到晋文公的同意，于是立即派人通知曹、卫，"恢复其国"。曹、卫以国能恢复，当即派人通告成得臣，声明与楚断绝关系。晋国的两项措施给楚以沉重的打击。成得臣既愤恨宛春的被拘禁，又恼怒曹、卫的绝交，断然违背楚成王撤军回国的命令，他撤出围攻宋都的军队后，集结兵力转向曹国境内，准备直接向晋军进攻。

楚国撤出围攻宋国的军队，正符合晋方救援宋的战略目的，楚军全力转到晋军面前，声势赫赫，杀气腾腾。这时，晋军未作正面抵抗，而是举行战略退却。但是，晋军一些将领，反对敌前撤退。认为楚军长期转战，兵马疲困，楚师老矣，我不应退却。而应立即应战。同时，认为晋之国君躲避楚国一个臣子的进攻，是一种耻辱。但经狐偃解释说明了晋军退避三舍的意义后，晋军将领思想才得以统一，于是退却三舍。晋军退避三舍，所起的作用在于：取信于诸侯各国，实践晋文公在楚避难时提出的诺言；激励晋军和联合的诸侯军的士气，楚再进逼，则更加无

理，说明晋军别无它路可走，只有被迫与楚交战；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便于争取民心，取得道义上的胜利；避开楚军锋锐，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形，再来决战；接近自己国土，缩短补给路线，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

五、晋、齐、秦、宋会师

晋楚争霸出现晋、齐、秦三国联合阵营与楚、陈、蔡、郑、许五国联合阵营，后来，随着楚军解除宋都之围，使宋宰部分兵力和齐秦两军于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四月初三，与晋军在城濮会师，更加强了晋齐秦联军的力量。

晋方与楚方相比，虽然在总兵力上并不占据优势，但在许多方面却占有有利条件，但晋文公仍然顾虑楚军占领着城濮附近的险要地形，缺乏战胜楚国的信心。同时又听到士兵的歌咏“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意思是说：田里好庄稼密密层层，旧的丢开，新的经营。误认为指他忘记楚过去的恩惠，更加犹豫。狐偃、栾枝分别进谏文公放弃消极情绪。狐偃说：“战而捷必得诸侯”拥戴，“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意思说就是打不胜，晋国靠险要的地势，也不怕敌人来犯。栾枝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是不适当的，所以，“不如战”。晋军其他将领也同意狐偃、栾枝的意见，文公见大家斗志昂扬，战胜楚军的信念遂为之加强。

第五晋楚双方作战序列

一、晋方联合军

联合军统帅：晋文公(姬重耳)

幕僚：司马赵衰

护卫：车右舟之侨

御戎荀林父

掌旗祁瞒

晋军：中军元帅先轸

副帅郤溱

上军将领狐毛

副将狐偃

下军将领栾枝

副将胥臣

齐军：大将国归父

副将崔夭

秦军：大将小子

副将白乙丙

晋方联合军总兵力：约八至九万人。

二、楚方

联合军统帅：楚令尹成得臣

幕僚：大夫伯棼

楚军：中军元帅成得臣

将领斗越椒

小将成大心

左军将领斗宜申

右军将领斗勃

各国军：陈军大将陈越迭

蔡军大将公子印

郑军、许军均由大将统率

总兵力：约十一万人。

第六晋楚双方作战策划

一、晋军

晋军列阵于莘墟以北，全军兵车、甲士、及驷马皆披坚执锐，按照予定的作战任务需要准备完毕，整备齐全，阵容严整。晋文公登上有莘北墟，检阅军容壮威的晋军，兴奋地说：“少长有礼，其可用也”。当即与先轸决定进攻楚军的作战计划：晋上军附属齐军，向楚左军进攻；晋下军附属秦军，向楚右军进攻；晋中军以一部固守本营与楚军保持接触，控制一些机动兵力，策应各方面作战。

二、楚军

楚军追击晋军，到达城濮以南，依托丘陵地带，背城为营，列成横阵居高临下，直压晋军阵地。楚军元帅成得臣骄傲轻敌，认为这是楚宋泓水之战的重演，进而决定三军并列，齐头并进，正面进攻：左、右两军先展开攻击前进，左军进攻晋上军，右军进攻晋下军；中军则依左、右两军进展情况向前推进。

晋军每遇新情况，出现新问题，先轸总是先分析研究，提出方案，通过文公付之实施，做到谋定而战。楚军则不然，统帅成得臣凡是遇到和主观想象相反的情况时，往往固执己见，拒绝接受其他方面和部属的意见。进军和进攻从未就双方军队的全面情况作客观研究，决定适当对策，把以陈、蔡兵为主编成的右军独当一面，这样自然存在着漏洞，为这次楚军作战埋下了无可补救的致命伤。

第七城濮附近作战经过

楚军到达城濮附近的地区占据有利地形，立营扎寨。成得臣派斗勃往晋军营地送战书。极度轻视晋军说：“请与君之士戏(角力)，君凭轼(车前横木)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战书措词虽然简短，却充分显示出楚军傲慢轻敌的态度。晋方栾枝代表晋文公答复楚方说：楚君的恩惠，晋不敢忘，晋军现退避三舍，不敢与楚为敌，既然楚不停战，那只好明日战场上相见了。栾枝的答词不卑不亢、义正词严，压倒了楚方虚骄的气焰，表达了晋军严阵以待，以决胜负的气慨。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五年，楚成王四十年，四月四日晨，楚军在元帅成得臣“今日必无晋”的号令下，左右两军分别向晋军展开进攻，晋、楚双方城濮之战揭开了战幕。晋下军将领栾枝认为城濮附近为黄河冲积的淤沙区，土质松疏，春季干旱季节风起，沙尘扑面，有利作为蒙蔽敌人掩盖自己虚实的沙幕。胥臣则把驾车辕马，蒙着虎皮以壮大军威。楚右军进攻，先由秦军应战，两军一经战斗，秦军即向后撤退，栾枝则将树木拖于兵车后，车驰刮地，尘沙飞扬，使楚军看不清晋方后面有无军队，加之陈、蔡兵逞强，紧迫秦军。晋副帅胥臣指挥的大队兵车于鼓声中突然出现在楚军面前，驾车乘马都蒙着虎皮冲来。
陈、蔡军兵车辕马看见，以为是真虎，都惊慌回窜，驾车驭手，控制不住，阵容混乱，反转而冲乱了楚军斗勃指挥的右军。晋、秦两军乘机猛

攻猛打，击杀蔡将公子印等，斗勃也中箭负伤，带箭逃奔。楚右军死者伤者更多，进攻完全失败，把中军的侧面暴露在晋军面前。晋下军将领栾枝曳柴于车后，向北奔驰，掀起沙土飞扬遮天，楚元帅成得臣和左军将领斗宜申都以为晋军真败，力催左军前进攻击，晋上军应战，旋即向后撤退。楚军向高举大旗的兵车追击前进。先轸发现上军后退出现的危机，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重新改变部署：祁瞒虚举元帅军旗，坚守中军阵地，中军主力，向右旋回，攻楚左军侧翼。

先珍亲自指挥中军主力，从侧面突然攻击，把楚左军斩成南北两部分。晋军上军同时停止退却，返身复战。中、上两军互相呼应，协同进攻，经过战斗，郑、许之兵首先溃败，楚军支持不住，陷于重围，斗宜申率部突围，又遭到齐军堵击，车马器械，损失殆尽，楚左军陷于全军覆灭之境。

楚中军于左右军发起进攻后，紧接着向晋中军进攻，晋将祁瞒掌旗，惊慌失措，几乎波动阵势。司马赵衰立即斩祁瞒于阵前，并命大夫茅取代其职，才稳住阵脚。击破楚左军的晋之中军，回师立即参加战斗，楚左右军失败，中军两翼暴露突出。晋方上下两宰战斗胜利之后，也分别参加主力会战，对楚军形成合围。狂妄自大的成得臣见大势已去，在晋军合围态势未形成前，收兵撤退，脱出包围卷，未被全部歼灭，晋军获得整个战役的胜利。

第八战后双方的动态

一、晋国方面

献俘获于周王。齐桓公曾提出“尊周”“攘夷”的口号，而“尊王”成为诸侯图强称霸的重要政策。晋文公城濮之战战胜楚国，即献楚俘于周王。战俘有驷介(披甲之马)百乘，徒兵千各，以示对周王室的尊敬。当即获得王室的隆重赏赐和“以绥四国”“纠逖王慝”的权力。

盟诸侯于践土。晋方胜利后，郑、卫脱离楚和晋盟好，大会诸侯于践土。参加大会的诸侯各国有宋、齐、陈、蔡、郑、许、朱、莒等国。秦虽与晋联盟，由于地处西方，从未参加过中原地区的诸侯盟会，没有到场。曹、卫国君被囚禁，也没有参加。

癸亥(五月二十八日)诸侯会盟于践土，由王子虎卿士代周襄王主持，给晋文公加上了盟主的政治地位，超过过去齐桓公称霸时的盛况。城濮之战给楚军以歼灭性沉重打击，城濮战后，晋取得诸侯领导权，当上“盟主”，对制止楚的扩张，稳定中原大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晋军全军凯旋，对将领论功行赏。文公决定以狐偃为首功，以先轸为次功。在城濮战前，狐偃提出“必避楚勿失信”的主张，使晋获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先轸则侧重军事范围内出谋定策，指挥作战，获得战役战术上的重大战果。对战前派到河岸负责征集船只、管理运输的舟之侨，以放弃职责、自行弃职返同的大罪立即斩首，并昭示全国。在城濮战役全过程中杀了颠颉、祁瞒、舟之侨三个失职犯罪将领，做到赏罚严明，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楚国方面

楚军攻宋，联合陈、蔡、郑、许，鲁亦前来会师，声势浩荡。城濮战争失败，郑首先脱离楚，单独与晋会盟。鲁则早已倾向于晋。陈、蔡亦前往参加践土会盟。楚国原来打着联合军的旗帜，但扩张战争的本

质，难以真正调动各国的作战积极性，连被楚国兼并不久的申息也出现离心离德的状态。楚成王申斥成得臣说："其若申息父老何？"就是担心楚所兼并的诸侯国有可能步陈、蔡后尘发生更大的动荡与背离楚的危险。

对晋作战，楚国的文武大臣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战争失败后，当成得臣派人向楚成王报告自己的行动时，成王态度极其严峻地说：你要回国，何以对申息父老？因为申息子弟兵随军征战，死亡甚众。性格刚强的成得臣了解到成王的态度后，当走到连谷时，羞愤自杀。斗宜申被贬为商邑令。斗勃也受到相同的处分。城濮战役的失败，楚方联盟的解体，楚对一些败将的处理，使楚国扩张中原的势头受到很大的挫折，被迫不得不暂时收敛起扩张政策。

城濮战役评述

城濮之战，是我国春秋时代晋、楚争夺中原霸主地位的一次带有决定意义的大规模战役。

楚国在泓水战后，基本上征服了中原地区的诸弱小国家。中原地区除晋、齐、秦三国外，实际已成楚国的势力范围。因此，为进一步向中原扩张，楚一方面派兵防守商密，阻止秦国南下楚地，一方面派重兵驻守谷邑，虎视齐国。但是，正在楚国力图巩固霸业之时，宋国却背叛楚国，倒向晋国，既沉重地打击了楚国的霸业，又鼓励了晋文公赶走楚国，图霸中原的政治抱负。这就不能不使城濮之战成为牵动北方的晋、东方的齐、西方的秦对楚和中原诸国的一次多国大战。

城濮之战前，中原各国将楚国视为蛮夷，轻蔑敌视，所以，楚国的北进中原，普遍引起中原各国的不满，在民心向背方面居于劣势。而晋联合齐、秦、宋抗楚，则由此而带有一定的反抗外来势力、维护社会安定的性质，这是晋方之所以能够以相对劣势之军战胜强大楚军的基本因素。

战略决战关乎战争的全局，维系战争双方之命运。晋国对与楚决战进行了极为慎重的研究，权衡了双方的利弊条件，甚至对战败后晋国可能遭到的下场，也做了全面的估计，得出了可以靠"表里河山"之固，保全晋国的结论，这才定下与楚决战的决心。

决战前夕，晋国又确定恰当的战略与策略。诸如进攻曹，以牵动楚军，暗中允许曹、卫复国，促使曹、卫两国与楚国绝交，针对楚军统帅子玉的易怒骄狂的性格，扣压楚方使节宛春，以激怒楚军，使之急躁冒进，主动退避三舍，诱使楚军进入自己的伏兵阵地，然后集中力量先打楚方脆弱的左右两军，再集中攻击楚中军，指挥有方，调度分明，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终于战胜了优势的楚军。

晋文公流亡国外十九年，备尝险阻艰难。他深知各诸侯国和中原地区的形势，这对他改革政治，奋发图强，争夺中原霸业，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回国掌握政权后，首先平定吕、郤的一次未遂政变。他非常重视"教化"人民，争取人民的维护。对外利用齐桓公提倡"尊王攘夷"的口号，抓住周天子这张政治王牌，加强对诸侯的号召力。他善于利用齐、楚、秦、楚间的矛盾，争取齐、秦的合作，壮大自己，孤立敌人。对内晋文公重视选贤任能，所以在他周围聚集了一些将相之才。因而，担负实际战役战术指挥的中军元帅先轸和一般将士大都表现了高度的积极

性，以不到四年时间，国富兵强，战胜楚国，一跃而为中原霸主。晋文公打败强楚，建立霸业的进程说明：在剥削阶级专政的社会里，英明之君，同样对促进历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楚国在城濮之战前，已兼并江、汉流域许多国家，乘胜向淮河、黄河流域扩张，连续征服了陈、蔡、郑、许诸国，处于东方的鲁国也望风而降，楚进而威逼齐国，而对席卷中原的胜利局面，楚国统治阶层，甚至连向来有知人之明的楚成王也丧失了清醒的头脑。

楚成王一方面认为晋国强大，不象宋国，战胜晋国把握不大；一方面又怀着侥幸心理，没有坚决制止这次行动，但又不肯拿出全部兵力投入战争，把战争的胜利寄托在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上。楚军统帅成得臣做为楚方诸国的战略最高决策人，缺乏应有的战略和策略头脑，他过低地估计晋军力量，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骄傲轻敌，战前没有对战争作充分准备，战时竟主观地说出“今日必先晋”的妄语，这些矛盾和错误，成为楚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楚军在战役指挥上也有严重的缺陷。楚军战斗序列编组，右军以陈、蔡两国军队编成；左军可能以“东宫”部队和申息两地兵编成；中军主力则以“西广”和若敖六卒编成。成得臣采取这样的战斗编组，根本没有打算使用楚军主力，而是要这批附属国军队打头阵。打的好，中军续进，大功属楚；打不好，与楚无损。这样勾心斗角的联军，根本不会有真正的战斗力。成得臣身为统帅，战场指挥极其被动，没有采取适应战况发展的积极措施。当时战场范围并不大，右军被击溃，不能说统帅完全不知，左军前进被围也不可能一点不知道，而成得臣却毫无积极支援的行动。

楚军战斗力的中坚是中军，当左、右军进攻时，中军按兵不动，胜败快要成定局时才向晋中军发起进攻，进展也极为有限。当楚右军溃败，左军被歼，晋军分道合围而来，楚帅成得臣才发现中军孤立，有陷于重围被歼的危险，但已经为时过晚，难以扭转败局了。楚军在整个战争中呈现的这种呆板迟钝、互不协调状态，完全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导致了必然失败的结局。

第三节晋楚战役

第一晋国霸业出现中衰

晋国自晋文公称霸以来国势盛强，统治阶级中出现强大的异姓大夫贵族。其中尤以狐、赵、先、栾、胥等家族势力最大，他们都对晋国建立过功勋，因而多受国君赏赐田地，政治、经济均有雄厚基础。这些贵族控制着国家很大的统治权力，决定国家重要政策。赵氏本晋大族，赵衰时期政治地位并不高，赵盾经阳处父援引，当上正卿(中军元帅)，掌握政权。赵盾在政治上有一定的革新，重要的措施有：

(一)建立规章制度："创制常典，规定刑法"；(二)加强执行法律："治理罪狱，逮捕逃亡"；(三)整理财政经济："信用券契，消除旧污"；(四)重视选才用人："选才任能，修复旧官"。

赵盾的政治改革，推动了晋国的巩固和繁荣，同时晋国的政治也随之完全落入赵氏之手，这就不能不引起政敌的不满，多次发生政变。

狐、赵两大家的夺权斗争，起因于赵盾为正卿，把狐射姑压了下去。嗣君继位问题，狐、赵主张对立，各行其是，狐射姑又告失败，于是把仇恨集中在阳处父身上，采取暗杀手段，结果被问罪。狐射姑不得已达到狄国去政治避难，狐氏的势力被一扫而尽，狐射姑因此对赵盾有夏之日令人可畏的感叹。

嗣君继位的问题，引起秦，晋在令狐附近发生战争，秦兵被赶回国，秦，晋两国战起，楚国乘机于周顷王元年(公元前618年)向北扩张，举兵伐郑，赵盾急忙联合鲁广宋、卫、许救郑，但已来不及，郑被压服，楚移兵伐陈，陈也降服，蔡也迫于形势面附楚。次年楚穆王与郑、陈、蔡君会盟于厥貉(河南项城县)，进兵伐宋，宋孤立无援，也背晋降楚，楚势力又逐渐取代晋而进入中原。晋国内则又发生刺杀中军副帅事件，经查主谋是上军将领箕郑太等五大夫。赵盾分别将其镇压，才告平息，内部矛盾暂时缓和。秦为报复令狐失败之仇，又向晋进攻。秦、晋南军交战于河曲，秦军失败。赵盾又邀集鲁、宋，卫、郑，陈、许、曹结盟于新城。蔡拒绝出席，晋派兵进攻，另定城下之盟。这个阶段晋、楚势力时起时落，晋、楚两国力量尚能保持平衡。但周顷王六年(公元前613年)以后，楚国势力蒸蒸日上，晋国势力则日趋衰落。晋与宋、卫，蔡，郑、许、曹七国会盟于扈，两次都是为着解决帮助鲁国讨伐齐目的问题，但两次都由于受齐侯贿赂而罢兵，晋国因此而信誉扫地。诸侯都渐渐产生了轻视晋国的情绪和离心倾向，晋国的霸主形象，实际上已在一些诸侯国心目中不复存在了。郑穆公愤然地说："晋不可与也！"而与楚结盟。晋国更加孤立，郑和楚结盟后，合兵攻扰接近晋的宋、陈。赵盾率兵伐郑救陈、宋。楚则派贾率兵救郑。两军相遇于郑属的北林(郑县)，晋军失利退回。晋虽再次联宋攻郑，仍无收获，这时晋国力量已经劣于楚国而不能与其抗衡，国内又发生政变。赵盾奔往国外，尚未出境。族弟赵穿杀死晋灵公。赵盾由于"亡不越境，返不讨贼"，负了杀君罪名。国内统治阶层频繁的权力之争，使晋的国力进一步削弱。使晋在各诸侯国间的威望更加下降。灵公死后，成公(公子黑肩，文公少子)继

立，郤缺为卿。成公建立公族制，赐赵氏为公族大夫，嫡庶子授田，以缓和君卿间矛盾，郤缺则以晋受秦、楚夹攻，又有狄人侵扰，于周定王六年(公元前601年)采取如下的策略：联结处于秦国北方的白狄，以牵制秦；对东部赤狄潞子，结成婚姻关系，给以安抚。

郤缺采取这些策略，目的在于解除内部矛盾和后顾之忧，以便集中力量，进行中原霸权之争。

第二楚国势力再起

晋国内部动荡，楚国内部也不稳定，南北两个争霸的大国，均忙于自身的纠纷，都没有绝对压倒对方的优势力量。只能拼力保住自己原来的依附势力，熊侣继位，即楚庄王。初期在国内平息了令尹子孔、公子的争权斗争和斗越椒的叛变。国外打破庸国统率的群蛮百濮的进攻。起用政治家孙叔敖为令尹，积极加强国内军政建设。晋军将领士会对楚国当时政治军事说的极为具体：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改革规章制度)，军行，石辕，左追蓐，前茅(持茅旗为前锋)虑无(搜索敌情有无)，中权(主将居中制权谋)后劲(精锐部队为殿后)。百官象物而动(依照各种旗号指挥，而分别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其君之举也(选拔人才)，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贵族、世家)，举不失德，赏不失旁，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左传·宣公十二年》)。这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楚国富兵，夺中原霸主地位的雄心又起。楚为了集中打击晋国的势力，它西联秦国，东盟吴、越，结交鲁、曹，北攻郑、宋、陈、蔡。

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八年，晋成公元年，郑穆公二十二年，楚军在北林战胜晋军，压服郑国，又起兵进攻陆浑之戎，兵力直趋洛水“观兵周疆”，炫耀武力，威胁王畿，周定王不得已派大夫王孙满前往劳军，楚庄王竟雄心勃勃地企图迫周取而代之，问起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看出楚居心叵测，便答复说：“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庄王考虑到时机还未完全成熟，周王室仍凛然不可侵犯，便收兵南返。问鼎王室，虽然没有成为现实，但却将楚急欲称霸、甚至灭亡周天子的企图暴露无遗。

周定王七年(公元前600年)，楚起兵伐郑，陈和楚联合，晋派荀林父率兵救郑攻陈，击破楚军。此后楚第三次伐郑，压服郑国。楚军撤退，郑又与晋接近。同年，楚以郑始终站在晋国一边，又起兵伐郑。晋将郤缺率兵救郑，与郑军协同作战，在柳棼击破楚军。第二年(公元前598年)楚庄王亲率大军攻郑，进到栎地，逼郑参加在辰陵召开以楚为盟主的楚、郑、陈联盟大会。楚又一次取得伐郑的胜利。

辰陵会盟后，楚压服了郑、陈，又把锋芒指向宋国，为着侵宋指挥的方便，于沂城重新建城，以便作为前进的基地。正在楚大力准备侵宋之际，陈国内部发生变乱，楚军移兵对陈，郑又离楚，与晋会盟结好。楚平定陈变后，次年(公元前597年)举全力北进攻郑，讨其叛楚通晋之罪。晋为救援盟邦郑国，派荀林父统帅自己的主要兵力救郑。晋、楚两国于是爆发了“邲之战”这是继城濮战役后，晋楚两国间又一次大规模战争。

第三晋军战略上的被动

郑处中原要地，介于晋、楚之间，成为两霸战略上必争之地。楚国城濮战后，基本的战略措施是：主要以兵力压郑就范，进而封锁黄河，阻止晋国南下，以便囊括中原。晋国以郑为进入中原的重要通道是自晋文公以来一惯的战略方针，因而楚每次伐郑，晋必起兵力争。郑夹在其中，楚来则从楚，晋来则从晋。这时郑与楚结盟，又和晋联合。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十七年，郑襄公八年，晋景公三年，楚军围郑，经过十七天的战斗，郑势穷力竭，守城之男女士卒痛哭。楚军以为郑无力再抵抗，略向后撤，郑君襄公趁机修缮城墙，男女一齐登城巡守复共同战斗。楚军又展开进攻。在郑国奋力抗击楚国的战争中，晋国援军没有及时出动援郑抗楚，战事延续到三月间，郑军不支，国都被楚攻破，只得屈服于楚。晋方援军到夏六月，才到达黄河北岸的温县地区。摆在晋军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进军渡河，那就要与楚军发生冲突，爆发晋、楚第二次大规模战争；要么停止进军，待机而动。

晋军在这两种选择上发生分歧和剧烈争执。中军元帅荀林父认为郑已降楚，救援失时，战楚无名，徒劳扰民，没有用处，待楚军退走，我再进军，犹为未晚。上军将领士会赞成荀林父的主张说：用师只观衅而动，楚此时无隙可乘，孙叔敖任令尹以来，军政设施，德、刑、政、事、典、礼等方面取得了很重要的成就，做到国富兵强，已是不可征服的国家。又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但士会的正确建议遭到中军副将先谷的反对，认为：晋所以霸，师武(军队勇武)臣力(诸臣尽力)。今失诸侯(郑)，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战)，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并强调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大丈夫)，命为军帅，而卒(终)以非夫(不成丈夫)，惟群子(你们)能，我弗为也。先谷这些强烈主战主张没有被荀林父接受，他竟擅自率兵渡河前进。他的自由行动严重破坏晋军指挥系统。先谷渡河事件发生后，晋下军大夫荀首提出“师出以律”，否则，就很危险，司马韩厥提出建议说：“彘子(先谷字)以偏师陷(覆殁)，子罪大矣”。“师不用命，谁之罪也？失属亡师，为罪已重，不如进军。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士会的正确战略主张被先谷的自由行动破坏。荀林父犹豫不决，毫无主见，最后被迫下令全军在衡雍(河南原阳县西)渡河，晋军由此走上了被动之途。

第四楚军的决策

楚军攻克郑首邑，驻军于郔，封锁晋军南进渡口，向晋军示威，同时战胜郑、宋、陈、卫等国。及晋军由衡雍渡河，楚庄王、孙叔敖怕受晋军渡河的战略奇袭，立即从郔禀转移到荥泽以东地区，打算收兵南返，避免在不利形势下与晋军作战。可是和将领商讨“战”和“走”的问题时，出现嬖人伍参“主战”、令尹孙叔敖“主走”的分歧。令尹孙叔敖认为：郑未降服，应与晋战，郑已降服，何必寻仇于晋？全师而归，万气一失。伍参则极力主战。孙叔敖斥责他说：“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意即战事失利，虽食伍参的肉，岂能赎主战之罪。庄王同意孙叔敖的意见，由令尹发布南返的命令。但伍参比较了解晋军内部的实情，荀林父优柔寡断，诸将意见分歧，多不听令。便又向庄王陈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荀林父初任执政，难以号令三军。副帅先谷刚愎不仁，未肯用命，三军主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

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庄王感到收兵回国逃避战争是耻辱。于是断然推翻南返的决策，复转而向北前进，推进于管，以待晋军到达举行决战。

第五晋楚最后的摊牌

晋军进驻敖、鄗地区，楚军推进于管城附近，形成对峙状态，郑襄公看出双方战事不可避免，派出大夫皇戌向晋表示友好亲善，请晋战楚，并告知了楚军的情况和郑的态度，“郑之从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贰心。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而不设备，子击之，郑师为承(乘其隙而攻击)，楚师必败”。晋军将领对郑的劝战，也有两派不同主张：以先谷为首，赵同、赵括一派，力主决战；以栾书为首，赵朔、荀首一派，认为郑的劝战完全是从本身的利益出发，想早点结束战争，以便择强而附，主张不要听信郑的劝战言行。

先谷要求接受郑的劝战。下军副将栾书则提出相反的看法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认为楚、郑都以重要人员为质，关系密切。“来劝我战，我克则来，不克则往”，依我之胜负，决定郑国的依附，对郑的劝战不可接受，下军主将赵朔极力赞成栾书的主张。赵同、赵括则附合先谷说：“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克敌得属(国)又何俟，必从彘子”。荀首当即批评赵同，赵括说：“原(赵同)屏(赵括)咎(指即将获罪的先谷)之徒也”。荀林父犹豫于两派意见之间，难以作出决定。

楚庄王伐郑，开始并无对晋作战的企图，但以后改变企图，采取以派人求和探明晋军的真实意图再行交战的策略。如果向晋请和而被拒绝，然后交战，则曲在晋，而不在楚。于是派遣少宰为代表到晋营地，提出请和说：此行“将郑是训，岂敢求罪于晋”？晋士会代表荀林父答复说，晋、郑同受命周天子，辅佐王室，今郑怀有二心，特奉王命质问郑国，并无与楚对阵的意思。这番答复本来是讲和休战的正当理由，但先谷则认为有谄媚敌人之意，改派赵括为代表去拒绝楚国的提议。在些之前楚已派代表到晋议定和约日期，但尚未和谈，战争却爆发于敖、鄗地区。

第六晋楚两军作战序列

一、晋军

统帅：中军元帅荀林父

副帅先谷

将领：司马韩厥

大夫赵括

赵婴齐

上军主将士会

副将郤克

大夫巩朔

韩穿

下军主将赵朔

副将栾书

大夫荀首

赵同

兵力：兵车六百辆，步卒约四万人。

二、楚军

统帅：楚庄王熊侣

幕僚：大夫伍参

将领：令尹孙叔敖

潘党、乐伯。

王属部队：左广御者彭名

车右屈荡

右广御者许偃

车石养由基

中军：主帅沈尹

左军：主帅公子婴齐

右军：主帅公子侧

第七晋楚两军作战策划

一、晋军

晋军渡河推进到敖，鄗地区与楚军遥相对峙。战斗发生前夕，统帅荀林父无具体作战计划，副帅先谷竟妄自尊大，轻视敌人说：“多备何为！”这就影响到下军也无作战计划，上军士会则反对无计划的作战说：“有备不败”。也遭到先谷的拒绝士会乃断然与副师郤克等决定所属上军的作战计划：

(一)于鄗山前沿分别设置七处伏兵；

(二)郤克和巩朔、韩穿担任伏兵指挥。

由于上军战前者准备，有预定作战计划，战斗开始能够有秩序地打击楚军，主动进退，运用自如。

二、楚军

楚军战斗前派人到晋军和谈，谈判失败，决计进攻。

(一)左军向晋上军进攻；

(二)右军向晋下军进攻；

(三)中军和两广向晋中军进攻。

中军为主要进攻兵团，左右两军分向晋军侧翼进攻。

第八邲地附近作战经过

楚庄王根据少宰回报晋军意向和将领间意见的分歧情况，再派使者向晋卑词求和。晋荀林父渡河原非本意，乘楚再遣使求和，也就表示同意议和，晋军等待会盟时机。但楚却另行派遣将军乐伯、由许伯为御，摄叔为车右，突然向晋军进行连续挑战。乐伯所驾兵车与晋巡逻部队相遇，乐伯射中一人，俘获一人，回车而去。晋将鲍癸闻悉楚军挑战，即率兵车分三路追击。乐伯左射马、右射人，晋军左右两翼不能再进。鲍癸中路眼看就要追上，乐伯手上只剩一枝箭。这时，恰巧出现一只麋鹿，乐伯将它射倒，派车右摄叔下车送给鲍癸说：“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请从者”。鲍癸感到楚将以礼相待，不应侵犯，仍停止追击，各自回营。

晋将魏锜于鲍癸追击楚兵之际，要求单车向楚挑战，荀林父不同意，魏锜改称向楚议和，荀林父答应了。魏锜因求公族(任公族大夹之官)没有达到目的，希望晋军失利，以败荀林父之功。他到楚营，不提议

和之事，而是进行挑战。楚将潘党亲自率兵车，前来追击，追到荥泽，魏镝发现麋鹿六头，乃射倒一只，派车右送给潘党说："兽人无乃不给于鲜，敢献于从者"。潘党感到再追击显得无礼，于是停车而还，双方挑战与应战，揭开晋楚邲战役的序幕。

魏锜往楚营挑战时，赵旃也以同样理由前往楚营。魏锜被潘党赶走，赵旃则停车楚营门外，派士卒进楚营挑战。进入楚营的士卒，杀人放火，彻夜骚扰，造成混乱，待至天色黎明，楚庄王亲率左广驱逐赵旃，赵旃车逃奔松林内，屈荡下车与赵旃博斗，抓得赵旃的甲裳，而赵旃轻身逃脱。在荀林父派魏菏、赵旃往楚营请和时，为防止发生意外，另派荀莹率车前往接应。车带起尘埃，潘党以为晋大军到达，立即向楚庄王报告。令尹孙叔敖担心楚王追逐挑战的晋军，有被晋军包围的危险，赶忙饬令大军全部出动。楚庄王遥望北方尘埃高度有限，判断不是晋军主力。于是饬令全军迅速前进，车驰卒奔，蜂拥蚁附直冲晋军。面对楚军的突然进攻，晋军统帅荀林父手足无措，竟发出全军撤退、先渡河者有赏的命令。中军、下军向右移动，上军将领士会，因予有准备，已在敖山设伏，则拒绝元帅敌前撤退命令而巍然不动，楚将工尹齐指挥右军，驱逐晋下军，晋荀莹率卒营救赵旃的车；左参中箭先倒，荀莹遂为楚将熊负羁所俘虏。赵旃登上逢伯的车免得于难。荀林父，先谷混于败兵中逃奔，败将残兵汇集河岸，船少人多，渡河没有指挥，中、下两军争先抢渡，自相砍杀，引起更大的混乱，使军队遭到惨重损失。

楚军一方面以右军进攻晋中，下军，同时派潘党指挥中军的一部支援公子婴齐的左军对晋上军进攻。楚将唐狡，蔡鸠居和唐侯也参加战斗。晋上军预先配备了伏兵，由副将郤克指挥机动掩击(伏击)楚军，给以沉重打击，使公子婴齐等不敢再进。郤克此时决心转取攻势，遗其子郤錡(驹伯)向士会请示。士会根据当时的敌情，说明上军不便单独反攻的道理，士会说："楚师方壮(士气正盛)若萃于我(集中全力攻上军)，吾师必尽(有被消灭危险)，不如收而去之(兵无死伤，全师而归)，分谤生民(六师同退，借以分罪)，不亦善乎"。士会与郤克亲自殿后，指挥上军有秩序地向河北岸撤退，晋上军的井然转移，使楚军不敢进逼。

晋下军大夫荀首已到河岸，登上渡船，得到其子荀莹被楚军俘虏的消息后，立即离船登岸，集合荀氏族兵数百人，决定向楚军反攻，魏锜和荀莹私交很厚，也自动参加，荀首在下军素得兵心，许多上了船的士兵，闻讯也下船相随前进，士气反而比初期旺盛。荀首反攻前进中，适与楚军先头部队相遇，楚军将士正在掠取晋军遗失的车辆、甲仗等物品，混乱当中，不防荀首的兵车突然袭击而来，一个个张皇失措。荀首先射倒楚将连尹襄老，接着在魏锜协助下，活捉了公子谷臣，用战车载着襄老尸体和公子谷臣，急驰而去，荀首奇袭成功。荀首营救其子，奇袭规模虽然有限，给楚军的损害也不大，但实际上，却起到了为中下军渡河作掩护，使楚军不敢继续压迫渡河的晋军，从而保障了晋尚未渡河部队得于夜间渡过了黄河，次日拂晓完全移驻于黄河北岸。

第九战后双方的动态

晋国邲战的失败，并非楚军的特别强大，而是晋军内部将领意见分歧和荀林父统御无方所造成，晋军残部七月间回到绛都，荀林父没有回避责任，向晋景公请死。景公同意他的请求。士贞子则向景公进谏，不

要处死荀林父。并以城濮战后楚杀得臣而文公喜的往事为教训，认为今日杀林父是加重楚的胜利，并说荀林父平时能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而“失败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晋景公接受士贞子的意见，免除荀林父的处分，仍使他担任原职，晋国上下不甘心失败，积极整军经武，准备再战。

邲地战后，楚军推进衡雍。三十五年前城濮战后，也是在这个地方晋文公筑周天子行宫于践土，率诸侯朝见、献俘。楚庄王率楚军以战胜者姿态到达，将士中充满胜利后的骄傲气氛。潘党竞向楚庄王建议，收集战死者尸体，以为京观，示后世无忘这次武功。楚庄王拒绝潘党的建议，进入践土王宫，亲自祭河，并筑楚先君宫殿，告捷凯旋，既没有做出强烈的刺激晋人主举动，同时又洗雪过去城濮战败的耻辱，还保持了战胜晋军的胜利姿态。

战役评述

城濮战后，秦、晋发生崤函之战，两国关系破裂，晋陷于对秦对楚两面作战的不利处境。成公时期，郤缺执政，采取东和赤狄，西连白狄策略，晋西顾之忧减轻，腾出力量对楚。好在楚在这一期间，国内外也发生了一系列变故，晋、楚双方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楚庄王继位，逐渐解决了内部矛盾，整军备战，势力又趋强大，再次积极推争霸中原的战略意图。晋为着维持盟主地位，虽然在国力日渐衰落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起而与楚抗争。于是形成晋、楚两霸的重新竞争对抗，楚争陈攻郑，晋援郑攻陈。短时间内楚向郑发动六次进攻，晋援郑攻陈两次，并和楚发生两次规模不大的战争。此去彼来，大规模战争已经无法避免，邲战役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的。

战略上的审时度势，根据敌、我、友的具体战略态势恰当地决定交战的时机和方式，是关系战争胜负最重要的环节。晋军正是在这个要害问题上失算于一时，进而导致了全局的失利。本来，楚军围郑，晋国援军行动迟缓，到达河北岸温邑，郑已降楚，援救失时，荀林父的待楚军退后收复郑以及士会的兼昧攻弱，都不失为制楚服郑的有效战略，但被先谷的自由行动所破坏，战略上已处于不利地位。但晋军渡河选定衡雍，渡河后立即威胁楚军左侧翼，压迫楚军迅速“南辕返旆”，给晋军扭转战略上的被动局面而带来了新的转机。可惜渡河后将领间又意见分歧，统帅荀林父举棋不定，完全失去了战场主动权。请盟变为挑战，敌军进攻迫在眉睫，先谷竟毫无根据地反对准备应战，这些都是促成晋军失败的重要因素。

楚国在邲战中的胜利，虽并非完全出于战前对双方战略全局的详细分析判断，得出了胸有成竹的正确的战略与策略。但它却善于分析和掌握临战情况的发展变化，逐渐坚定了与晋交战的决心，并制定了相应的战略与策略。无疑，这对弥补楚军原先战略上谋划不足的缺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来在郑降服后，楚并无继续对晋作战的企图，但由于嬖人伍参对敌情的详细分析和判断，才使楚庄王改变了收兵卷旗的决定，并采取了巧妙的策略。战争前夕，两度派人向晋请和订盟，目的并非是真正请和，而是借机窥测晋的虚实。但却给各方诸侯造成了楚要和，晋要战，楚直晋曲的影响，政治上在诸侯国间占了上风。楚又通过挑战应战，由小战变为大战，迅速展开全军猛烈进攻，由于政治、军事配合密

切，所以获得了战役的胜利。但楚军在这次作战中，因在指挥上存在不少矛盾和缺陷，结果只获得有限的胜利，未能夺取更大胜利，教训是深刻的：

第一、楚军乘晋军主力渡河时发动进攻，虽然抓住了战机，但指挥不力，投入的力量不大，因而，没有给晋军以歼灭性的打击，使大部晋军渡河走脱。

第二、进攻晋上军，虽然加强了左军力量，但遇到晋军有组织的抗击后，反而不敢逼进，更谈不上进攻。这说明楚军战斗力并不比晋军强。而当击溃敌人的右军，部分楚军即在战地休息，没有参加左军方面协同战斗，这暴露了楚军在指挥上缺乏应有的统一性。

第三，将士都忙于抢掠战利品，没有敌情观念。所以荀首率领部分将士突然反击时，连重要将领王子谷臣都不得不束手就擒，连尹襄老被射死，这都是可以避免的意外损失。

楚军战役上的胜利，并不等于战略上的胜利。楚人说的“犹有晋在，焉得定功”的警语，一方面是教育楚军将士不要把局部胜利当成全局上的胜利，不要骄傲自大；另方面也是鉴于晋还强大、不结更大的仇恨于晋，同时也避免引起各国诸侯的警惕戒备。楚军的这种姿态，无疑是切各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策略。

第四节晋齐鞍战役

第一晋齐两国战前形势

晋自灵公以来，国内争权，政局不稳，尤其自邲战失败后，晋国势力江河日下。而楚国在南方与吴、越结盟，并与齐、秦修好，灭掉一些小国，扩地至淮泗地区，北上伐宋伐郑，晋在中原的势力大有被楚全部取代的趋势。就在晋、楚两霸斗争期间，齐也乘机夺取霸主地位，因此，齐顷公连续发动侵莒、伐卫、攻鲁战争，同时与楚结盟。齐国的这些行动，使中原诸侯联盟受到极大震动。晋景公继位后，颇感形势之严重，力图恢复晋国之霸业，景公在士会、郤克、栾书、韩厥等谋臣良将的辅佐之下，励精图强。并灭赤狄、攻驱白狄，消除侧背之患，向东南扩地至黄河北岸。与向东扩张的楚国形成势均力敌。加上国内生产发展比较快，战争创伤逐渐恢复。晋国认为，从全局上看，楚依然是主要敌人，齐虽然与楚联合，战略上还是可能争取的对象，因而联齐对楚，是晋统治者精心策划的战略。所以晋景公于周定王十五年(公元前592年)，派出中军副帅郤克为代表，到齐国邀约齐顷公前来参加晋方主持的盟会。在聘问期间，不料发生齐顷公纵容妇女嘲笑来宾的意外事件，郤克认为是对他有意的侮辱，愤怒地宣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意思是说此仇不报，就不再渡河而东。于是留下另一代表栾京庐等候齐国的答复，而先行返晋。齐国有识之士感到齐患必然从此开始。郤克回国即申请伐齐，晋景公与士会以崤函之战，秦、晋结仇的失策往事为借鉴不想出兵伐齐。郤克接着又提议用私属伐齐，又由于时机问题暂被搁起。主要是楚在中原南部，威胁着邻接晋境的郑、宋，对齐开战，会给楚造成进展机会，若楚与齐联合，形势就会更加严重。郤克遭受的侮慢毕竟是仪节上的次要问题。晋为着对付楚，就必须团结齐，但要做到团结齐，又必须打垮齐的威风，刹住齐向楚方倒的趋势，因而孕育着晋齐间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第二齐鲁卫三国战争

晋文公到景公，前后三十六年，晋国号召的诸侯盟会二十余次，齐国均未参加，而是屡次兴师动众侵鲁伐卫，占据鲁、卫边地，扩大自己领土。晋、楚争霸战争频繁，晋为着联齐对楚，派遣郤克聘齐，竟发生意外侮慢使者事件。晋景公于周定王十五年(公元前592年)，召开断道盟会，齐只派遣上卿高固大夫晏弱、蔡朝、南郭偃赴会。到了敛孟高固突然逃走，留晏弱等与会。晋与鲁、卫、曹、邾等国会盟于断道，齐侯没有到会，上卿高固又临时擅自逃回，各国诸侯认为齐没有诚意结盟，晋方于是逮捕齐国三大夫。这时士会告老退休，郤克继任，主持国政。次年(公元前591年)春，郤克怂恿晋侯联卫攻齐。晋景公乃会卫世子藏，两国出兵伐齐，联军进驻阳谷借以示威。齐顷公在晋国军事压力下，亲来与晋景公盟于缯，并遣公子强为人质于晋，会盟告成，晋军也由阳谷撤退。

周定王十七年(公元前590年)春，鲁以齐楚联盟，将对鲁不利，派遣臧孙许与晋景公盟于赤棘(在晋南阳附近)，同时加强战备。实行丘甲军

制以扩充军事力量，加强城郭防御设施。鲁为统一军民认识，向时下达明令说：“齐楚结好，我新与晋盟。晋楚争盟，齐师必至。虽晋人伐齐，楚必救之，是齐楚同(攻)我敢，知难而有备，乃可以逞”等语。次年(公元前589年)，齐与楚联合，齐为着占据主动有利地位，出兵对鲁国进攻，围攻鲁北部要地龙邑。由于鲁国在城内预有准备，奋起战斗，齐军虽占有很大优势，经过激战未能攻克。后来，齐顷公亲自击鼓指挥，经过三昼夜战斗，才将龙邑攻克。

齐军侵鲁，卫早已作好充分准备，齐军攻克龙邑，向鲁境内深入推进到巢丘，卫军则向齐军境内进攻。齐顷公不得不停止对鲁境进军，转移兵力，对卫作战。两军相遇，卫军将领意见分歧，斗志消沉，抗不住齐军的攻击，战斗顿挫，统帅孙良夫被围，幸有新筑大夫仲叔于奚率兵车赶到战场，奋力战斗，击退齐兵，救出统帅，回到卫国境内。

第三晋鲁卫三国会师

卫军退回新筑，统帅孙良夫感到战事失利，返回本国不光彩，乃留下石稷等统帅部队，守备新筑沿边要地，自己动身前往晋国请派援兵再战。孙良夫到达晋首邑，鲁国派遣请援的大夫臧宣叔也同时到晋。鲁、卫两位代表，通过晋执政中军元帅郤克，向晋侯提出请求。这时楚因楚庄王死去(公元前591年)不久，正忙于内部事务，无暇对外，南来威胁暂时缓和，晋为着稳定北方诸侯领导权，保持盟主地位，认为有必要抓住楚国无力北顾的机会，打击一下齐国的侵略扩张行为，因而对齐采取军事行动已经势在必行，所以，当鲁、卫派人请求援助时，晋落得做个顺水人情，立即决定出兵支援鲁、卫的抗齐战争。晋景公派出兵车七百乘，恰恰等于城濮战时使用的兵额。但郤克感到兵力不足，难以取胜。郤克向晋景公建议说，城濮之战有先君(文公)之明，与先大夫(先轸等)之肃，所以战胜敌人。郤克认为自己的才能，远远不如先人，于是，接着提出请求增加兵车为八百乘。郤克的建议为晋景公所接受。由郤克统率大军，救援鲁、卫。鲁国的臧宣叔充当向导，进入卫境，鲁上卿季孙行父率鲁军前来会师。于是晋、鲁、卫三国部队于卫地新筑附近会师，并由晋军统帅郤克担任联合军统帅。齐军发现卫国境内有晋、鲁两国军队出现，感到形势严重，乃向国内撤退，预备选定有利地形，再对敌人决战。于是经过莘邑向历城附近转移。晋军发现齐军撤退，乃紧跟齐军，经过莘邑，推进至靡笄山下与齐军在鞍地形成对峙状态。

第四晋齐双方作战序列

一、晋方

(一)联合军统帅：中军元帅郤克

将领：司马韩厥

车右郑丘缓

御戎解张

(二)晋军：上军将领士燮

下军将领栾书

(三)鲁军：正卿季孙行父

副卿叔孙侨如

(四)卫军：上卿孙良夫

将领石稷

兵力：晋军兵车八百辆。
鲁军，卫军务有兵车若干辆。
二、齐方
统帅：齐顷公(姜无野)
将佐：车右逢丑父
御戎邴夏
左军：上卿高固
右军：上卿国佐
兵力：兵车五百辆。第五晋齐双方作战策划
一、晋方
中军担任主攻。上下两军则为强大两翼，随主力进展钳攻夹击敌人;上军配属鲁军，向敌人侧面进攻；下军配属卫军，向敌人侧面进攻。
二、齐方
齐顷公直接指挥的中军担任主攻晋军左右两军的任务；左军担任对鲁军进攻；右军担任对卫军进攻。左右两军于中军进攻时，即向鲁、卫军进攻。
第六鞍战役的经过
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589年)，晋景公十二年，齐顷公十年，鲁成公二年，卫穆公十一年，晋齐两军对峙于靡笄山麓，齐顷公首先派人下战书给晋军。晋统帅郤克代表晋军应战，双方约定在战场上相见，齐晋两军已成箭拔弩张之势。在战斗即将发生时，齐上卿高固凭着个人之勇，乘着兵车，突然冲进晋军营内，桀石(举石块)投击晋军，打伤晋军兵车上甲(战)士。御者逃走。高固跳上这辆兵车，俘获伤兵，亲自驾车，驰回齐营，系于营前桑树上，传呼给齐军将士说：“欲勇者售余余勇”。晋军发现后追击，但已来不及了。高固闪电般袭击，获得兵车一辆，向齐顷公报告说：“晋兵虽众，能战者少，不足惧。”高固的鲁莽行动和对晋军的片面看法，更加助长了齐顷公的轻敌思想，给齐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高固偶然袭击的成功，使齐顷公更加狂热，盲目自傲地说：“余姑灭此而朝食”。说罢竟马不披甲，向晋军近攻。齐军势如潮涌似的猛烈直冲晋垒，鼓声震地，箭如飞蝗。晋元帅郤克右背受伤，血流及履，未绝鼓声，御者解张左肢和手都被矢射穿，拔箭御车鲜血流到车轮上。郤克伤重逐渐不支，解张反而劝勉他说：
“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若之何以病(伤)，败君之人事！环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解张说完，立即用左手挽辔以御马，右手代伤重的合克擂鼓。解张擂鼓，全军响应，鼓声震天。解张左手拉不住缰，马向前直奔，晋军将士认为中军已经获胜，奋勇争先冲杀，形成排山倒海之势。齐军抵抗不住，全线崩溃，将士纷纷奔走。晋军将领郤克负伤力战，御者解张、车右郑丘缓在战斗危急时英勇苦战，激起全军攻击勇气飞，终于战胜了敌军。
晋军摧毁齐军有组织的进攻后，司马韩厥代受伤的元帅郤克指挥晋军，向齐军追击。韩厥率自己部属，紧迫有金舆的兵车。齐项公退到华不注山下，晋军顷刻之间，把华不注山包围三层。齐将邴夏虽然射击紧迫的车上敌人，但并没有阻止晋军的进展。晋军兵车蜂拥而来，形势危

急万分，车右逢丑父立即和齐顷公换服装，换坐位，准备代君赴难。车至华泉韩厥乘车超过齐侯兵车，挡在前面，下车拉着马缰，对化装成齐顷公的逢丑父说：晋先派出群臣，为鲁、请求于齐，属当戎，无所逃隐。逢丑父伪装成口渴，饬齐顷公下车往华泉取水。顷公则乘机绕山奔走，遇到齐将郑周父所乘副车，才登上这辆车，由郑周父御车，宛茷为车右，载齐顷公急驰出险，免于被俘。战前骄傲自大、气焰不可一世的齐顷公，当战事遭到挫折时，竟失去保护，狼狈不堪，化装逃走。韩厥俘获冒充齐顷公的逢丑父，送到中军元帅郤克处。郤克认出不是齐侯、决定杀死逢丑父。逢丑父高呼：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克感到逢丑父以死代其君，是一个使人钦佩和值得人们效法的典范、于是决定赦之，以勉事君者。

第七晋齐双方的议和

鞍战失败的齐军，收拾残余向内地退却，战略要地徐关等处动荡不安。晋军向齐内地追击，通过丘舆大道，进攻齐首邑东南险要之地马陉。齐军新败，无力再战，首邑临淄陷于危急状态。齐顷公只得派出上卿国佐以纪国甗和玉磬与汶阳之田，向晋军要求停战议和。郤克以战胜者的姿态，盛气凌人，提出齐必须履行的三项条件：

(一)必以肖同叔子为质于晋。

(二)使齐境内田亩道路，“尽东其亩”，全部改为东西向。

(三)退回侵占鲁、卫地方。

齐代表国佐认为条件太苛刻，无异于亡国。史书对国佐回答晋国提出的条件，有多种记载，大体如下：国佐忍气吞声委婉地回答晋方提出的第一个条件说，肖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能分庭抗礼)，则亦晋军之母也，“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先王以孝治天下，质人母，即违先生之命，诗经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接着批评晋提出的第二个条件说：先王疆理(划分)以物产土质水源等，因地制宜。诗经说：“我疆我理，南东其亩，而曰‘尽东其亩’，惟吾子戎车是利，不顾土宜、其无乃百先王之命也”？国佐进而又说：“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经说：“布政优优，百禄是道，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最后则说，晋军到齐，齐军应战，“‘畏君之震，师徒桡败’，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主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余烬(残部)，背城借一战而胜，敝国之幸。战而不胜，再唯命是听”。国俭不卑不亢的态度，也使晋国有所考虑，同时再加上经过鲁、卫两国从中斡旋，晋国终于认识到，战争的目的已基本达到，如果继续打下去，彻底征服齐国，对晋国争霸中原也并非十分有利，同时还会加深齐、晋两国仇恨，使晋国的主要争霸对手楚国坐收渔人之利。因而，郤克权衡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利害，也就适可而止，与齐议定议和条约：

(一)齐侯向晋进朝(承认晋的盟主地位)；

(二)退回侵占鲁、卫田地。

晋方“以母为人质”“尽东其亩”两项改为齐承认晋的盟主地位；齐侯朝晋，退还侵占鲁、卫田地，都无损于齐的尊严。同时，还增进了晋盟主的声威，这是晋在战略止的重大成就。齐终于站到晋国一边，化敌为

友。鞍战对晋关系很大，尤其在邲战失利为时不久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郤克与齐代表国佐，订立盟约，结束了晋、齐双方的战争。

第八战后双方的动态

鞍战胜利，和议成功，鲁大夫离郑返国，迎接鲁君，与晋君相会于上鄍。鲁成公感谢晋要齐退还侵占的地方，赠送晋军将帅以车马服饰，以示慰劳。晋军凯旋返国，胜利回到首邑，士燮走在最后。其父士会问其原因，燮答：师有功，国人肯定相迎，先入必然属耳目，是代帅受名也，故不敢。仅此几句话，足以说明士燮居功不争的谦虚态度。郤克见晋公，景公慰问他说："子之力也夫！"郤克答："君之训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士燮见晋侯，景公同样予以慰问。士燮答："庚所命，克之制(指挥)也，燮何力之有焉？"栾书见晋侯，景公还是照样予以慰问，书也推功于人。晋军三将让功，表现了晋军团结谦让的良好作风，对后世有良好的影响。

战事结束，齐顷公往朝于晋，举行诸侯相朝，献玉圭礼。齐、晋两君相会，标志着两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阶段。

鞍战役评述

东周列国中期的重大政治问题，是晋、楚两霸争夺对诸侯领导权的斗争。晋争夺中原霸主地位的斗争，实质上代表着中原民族与南方荆楚蛮夷部族之间的斗争，是中原各族兴盛衰败的杠杆。城濮之战后，晋执牛耳。邲战之后，楚起称霸，纵横中原地区。这种局面，为晋所不安。晋虽表里山河，能战能守，但晋景公时期，已远非晋文公时期那么强大。且周围被秦、楚、赤狄等所包围，经常处于腹背受敌的威胁之中。然而尽管如此，但晋对退出中原政治舞台又不甘心，晋实力的衰落，威望的下降，从而造成齐顷公争霸的形势。齐联楚侵鲁攻卫，使晋的盟友受到震动，晋就不能袖手旁观。齐，晋双方注定了要爆发战争。但是齐是晋对东方诸侯所能争取的唯一的有政治影响的大国。而晋的主要敌人是楚，所以给齐一个沉重打击后，立即停战议和，既不挫伤齐的威望，又不增加两国的裂痕。晋军出兵标榜的是齐侵鲁、卫，"为鲁、卫请"。说明晋国在有限目的的战争中，政治、军事配合密切，所以获得战略战役的胜利。

齐国在齐桓公时代，曾出兵北伐山戎，救燕、救卫、救邢，吞并邻近小国。也曾联合诸侯大举南征，但并没有与当时比较强的楚军发生战斗，因此无法判断谁胜谁负的问题。桓公以后，也曾侵袭鲁、卫，但这些国家战斗力都很脆弱，所以也不能衡量齐军真正的战斗力。事实上，齐国对这些军备薄弱的小国进攻，只是侵扰式的，忽进忽退。所谓"强大"，只限于表面上和微小的胜利。加上没有与当时的大国晋、楚作正式决战，并不能说明齐国军事力量的强大。鞍战开始前，重要将领高固凭个人突击所取得的小胜(俘获兵车二辆)，就认为晋军"不足畏惧"，致使顷公有"余姑灭此而朝食"的妄想和"不介马而驰"的轻敌思想。因此，虽乘一时之勇，给晋军一定的损伤，但两军一旦进行大决战，战略上缺乏深谋远虑的齐军，就远远不是晋军的对手，及战事遭到挫折，顷公竟指挥羌方，而"贾余余勇"的高固，也没有表现出所谓的"勇"，而是和败兵一起逃走。战况危急当中，齐顷公化装逃脱，才免于被俘。

晋军打着"为鲁、卫请"的反侵略旗帜，在政治上师出有名，占了上

风。鲁臧宣叔为向导，经卫国境内，直趋莘邑，迅速推进到靡笄山下，压迫齐军被动应战。鞍战事发生，郤克负伤力战，解张则负伤代郤克擂鼓和御马直前，郑丘缓左手执盾掩护受伤的郤克，右手挥戈，奋力冲杀，激起全军攻击勇气，显示了晋军顽强的作战意志，终于击破了强敌。司马韩厥以郤克受伤，立即代行职权，指挥部属，担任战场外的追击，俘获伪装齐君的逢丑父。齐军溃不成军，晋军在追击中未遇抵抗。晋军在作战中以部分兵力绕过沂蒙一带山区，经过丘舆，进攻临淄以东的战略要地马陉，实际上形成一个东西对进，钳击齐国都城临淄的极为有利的战略态势，压迫齐国败中求和，达到联齐以对主要敌人楚国的战略目的。说明晋军鞍战的胜利过程，政略战略配合之密切。凯旋班师回国，郤克、士变，栾书的让功谦逊美德，给后代留下了典型范例，这自然更加提高晋军当时的声威，能够继续称霸中原。

第五节晋楚三驾战役

第一晋悼公图霸的军政措施

晋自文、襄以来，逐渐形成卿大夫权力过重，国君受制于卿的局面。厉公即位，感到诸卿权过重，有削弱臣权，重振君权的设想。麻燧、鄢陵两次战争胜利后，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嬖臣胥童、长鱼矫等怂恿厉公杀三郤。于是，厉公于朝会杀三郤，胥童则派甲士于朝中逮捕栾书、中行偃。长鱼娇请杀栾书、中行偃，厉公则以“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而拒绝。长鱼矫争辩说：“乱在外为奸，在内为轨，御奸以德，御轨以刑。不施而杀，不可谓德，臣逼而不讨，不可谓刑；德刑不立奸轨并至”。厉公仍不让杀，并立即释放栾书、中行偃，并饬令继续供职，另以胥童为卿。长鱼矫则出奔狄国，以避免祸及己身。栾书、中行偃获释后，反过手来乘厉公于幸匠丽氏家淫乐之时，击杀胥童，囚禁厉公，不久派遣程滑杀了厉公。

政变发生后，栾书等派遣荀莹，士鲂，往迎住于王畿的襄公曾孙周返国为君，周年仅十四岁，对国内重大事变的“杀君”之事也有所闻。到达清原，对迎接的卿大夫说：羁居他乡，不指望还乡，岂望为君？又说“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面不从，将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从君，神之研福也”。大夫、卿士都表示：“敢不唯命是听”，并结盟誓。周进入国都朝于武官(武公庙)，即位于朝。新君晋悼公为表未“君”的权威，首先处分了七个大夫。但对强宗大族的栾、荀等氏族，仍采用温和政策，不敢触动他们的权利。晋悼公以国内政治紊乱，影响争夺霸业，为着复兴晋国，对政治、军事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

一、政治措施

(一)始令百官：改革规章制度，因事设官，量德授爵，使人尽其才，各有专责。

(二)施舍己责(债)：施恩惠于民，除去劳役，除去债务。

(三)济鳏寡：惠及鳏寡孤独之人。

(四)振废滞：起用有德性之士，免除不称职之官员。

(五)匡乏困，救灾患：救济困穷的人，和受灾的地区。

(六)禁淫慝，薄赋敛，禁止铺张浪费，减轻各项赋税。

(七)宥罪戾，节器用卜宽宥犯罪，节用物品。

(八)时用民，无犯时：利用农隙兴工动役，不影响农时。

二、任官用人

(一)任用对晋国建有大功的一些家族成员为卿。诸如魏相(魏锜子)、士鲂(士会子)、赵武(赵朔子)、魏颉(魏颗子)。

(二)使(派)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训导卿子弟恭俭孝弟。

(三)以士渥浊为太傅，使修范武子(士会)礼教行政之法。

三、军政制度

卿平时不直接统御军队，另立军尉治军，担任训练，实际在于削减卿的权力，其任务：

(一)栾纠御戎，配属校正(戎为兵战备官，校正乃管马官)使训练诸御知义。

(二)荀宾为右，配属司士(车右在高级军官车上，司士在次级辇官车上)，使训练勇力之士时使(随时可用)。

(三)程郑为乘马御(主马政官)。

(四)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佐之，魏绛为司马，张老为侯奄(侦察之官)，铎遏寇为上军尉，藉偃为司马，使训练卒乘，亲(互相亲近)以听命。

晋悼公主政，弈书、荀偃、韩厥、荀莹等悉心辅佐，完成政治、军事革新，晋国出现复兴局面。这时的晋国“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

楚乘晋国内部革新期间，派兵消灭了舒庸，联郑攻宋，占据宋属要地彭城，安置从宋国逃奔楚国的鱼石等并调给军队，听其调动，严重威胁宋国，同时截断晋、吴间的战略交通路线。楚在中原地区步步逼进，形势日趋紧张，迫使晋国不能永远靠着“表里山河”置身事外而中立，需挺身而出对楚斗争。

第二晋楚争霸的长期战略和争夺的险要地区

一、长期战略

(一)晋国

悼公继承景公霸业后，由栾书、韩厥、荀莹等主持修正景公时代的方针政策，以适应于当前发展，变化的形势，主要的措施：

改变对中原诸侯政策，首先改变以霸主自居的高压政策，借诸侯间聘问、来往礼义以增加感情，凡诸侯朝晋者，晋都以聘礼答拜。

加强对吴联系。根据景公期间缔结的联吴政策，与保持密切关系，确保通吴之路，发挥对楚牵制作用。

对齐对秦策略。对齐采取以卖力为后盾进行联系交往，以免发生反侧。对秦则阻遏于泾水以西，以免引起后顾之忧。

展开对楚斗争。实行以上战略孤立楚国，展开与楚对中原地区宋、郑两国的争夺战。

(二)楚国

从成王、庄王以来图霸逞强，一贯与晋国争夺中原诸侯的控制权而战，所采取的政策：

控制郑、许、陈、蔡、进攻倾向于晋的宋国。

西联秦国，以增大对晋国西部的威胁。

争取齐、鲁，威胁曹、卫，阻碍晋、吴两国的联络。

限制晋国于黄河以北，变中原地区完全成为楚国的势力范围。

二、地理形势

晋国“表里山河”，东部拥有黄河以北的南阳与潞(山西省晋东南地区)，邢(河北省邢台县)，邺(今河北临漳县)，黄河南岸则有齐、曹、宋等友邦。有守则必固，攻则必克的优越形势。

楚国既有荆楚的国防地带，又控制郑、许、江(河南省息县)、舒(安徽省舒城县)、蓼(河南省固始县)、萧(安徽省萧县)，西据嵩山山脉，东迄淮泗流域，守由能固，攻则可以囊括中原。

晋、楚争霸有关的战略要地如下：

(一)虎牢(河南省荥阳县汜水镇)，南临嵩山北脉，难以逾越。北临黄河，又多悬崖断壁，形成东西必经的隘道。东有敖山与荥泽，山林险阻，芦苇丛生。“虎牢之险”为晋军占据，即可南进郑、许之郊，进逼楚国方城；楚方进占，则能阻止晋军南渡，封锁之于黄河北岸。

(二)宋国(河南省商丘地区)，襟带河、济，屏蔽淮泗，地势平坦，四战之地。楚军多次进攻，进占宋国，即可直趋曹卫，进逼齐、鲁，威胁晋国东部。晋每遇宋被攻，都全力支援。晋、宋联结，不仅屏藩齐、鲁、曹、卫，而且易于南临申、息。

(三)彭城(江苏省徐州市)，晋推行联吴政策，彭城为晋、吴两国交通联络要道，北则屏藩齐、鲁、滕，南为吴、越羽翼。楚占彭城则可切断晋、吴联系路线，进而威胁齐、鲁等国。晋争得彭城，晋、吴两国就能联结起来，包围楚国侧翼。

(四)逼阳(山东省邹县南)，城高而坚，占据其地即切断彭城与郏滕的联络，威胁宋国的侧背。

第三晋国对楚国的三条方针

一、联吴制楚

邲战结束后，晋不甘心军事上的失败，景公接受楚国投奔来的申公巫臣的建议，采取“联吴制楚”战略，扶植吴国新兴力量，进攻楚国侧，形成晋吴对楚钳制战略，并派巫臣使吴，执行这个任务。巫臣带着“两之一卒”适吴，他说服吴主寿梦与晋往来，“通吴与晋”。为着改编吴军，留其子狐庸和“偏两之一”射御武士教练吴军将士射箭、御马和乘兵车作战的新战术。狐庸另一更重要的任务是激发吴对楚的敌对情绪，引导吴把楚当作主要敌人，以配合晋国全局战略。

吴国军队经过革新逐渐强大，到周简王二年(公元前584年)，吴主梦寿二年，楚共王七年，吴开始进攻楚属的巢徐，同年八月攻占楚国淮上战畸要地州来。楚令尹公子婴齐闻讯，不得不由郑返国东进，对付从背后进攻的敌人。可是没有击退吴军，这一带属国属地完全失落于吴军之手，楚军一年之内七次疲于奔命，仍无济于事。吴国军事上的胜利，与晋联系更加紧密。晋为着抬高吴在诸侯间的威望，邀约了齐、鲁、宋、卫、郑、陈、曹、莒、滕、薛等国君与吴会盟于戚，巩固联合对楚的阵营。

二、和戎对楚

晋国北部赤狄、白狄曾两次侵齐袭晋，围困晋属怀邑、邢丘与抢割向阴禾苗，并受晋先谷引诱，出兵打到清地。晋先除内奸，杀了先谷，然后派兵进攻赤狄，消灭赤狄酋长潞氏和属于赤狄系统的甲氏、留吁、铎辰等部落，与卫国联合攻灭廧咎如，赤狄几乎全被晋国消灭。当时阳曲以北还存在许多种类狄与戎。北方戎族无终国看见赤狄被消灭，晋国强盛，戎主嘉父派遣代表孟乐带着虎豹皮等礼品，通过晋大夫魏纬表示愿意率诸戎与晋和好。但晋悼公认为：“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则提出建议说：“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进而提出和戎五利：

(一)戎狄荐居(随水草而居)，以货财为重，以土地为轻，可沟通往来，对晋有利。

(二)边境可无耸动可畏之事，便于农民耕种。
(三)戎狄事晋，四邻震动，诸侯畏威怀德。
(四)以德绥(抚)戎，师徒无须动用，甲兵不顿(损耗)。
(五)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近)安。
魏绛和戎建议，既可促成戎狄事晋，解除后顾之优，使晋免于腹背受敌，同时可使诸侯畏威怀德，巩固联盟关系，以对付称霸的楚国。晋悼公同意魏绛的意见，即由魏绛担任与无终诸戎议定和约的代表。无终戎主约邀山戎所属各部落(国)酋长，和晋代表魏绛歃血为盟，晋国北部边境从此缓和，腾出力量南进与楚争霸中原。
三、疲惫敌人
周灵王七年(公元前565)年郑简公1年，楚共王26年，晋悼公八年，郑国向蔡属进攻，俘获蔡公子燮。郑国为此胜利得意忘形，惟年幼的公孙侨(子产)认为："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来从楚，"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事实的发展，证明了这位年幼者的判断正确。同年冬月，楚以援蔡为名，令尹子囊率兵直逼郑国。这时郑国内部统治阶层权力最大的六位大夫分为亲晋、亲楚两派。
亲晋派：子孔、子娇、子展。
亲楚派：子驷、子国、子耳。
郑在得到楚国进兵的消息后，对从晋或从楚问题，两派展开激烈争辩，亲楚派占上风，与楚作降服式的和盟，于是楚军撤走。次年(公元前564年)十月，晋联合齐、鲁、卫、宋、曹、邾、滕、薛、杞、郳诸侯军伐郑，进入郑郊。郑以楚援不至，形势危急，乃向晋表示降服，晋将上军将领荀偃建议围郑以待楚救，而与之战，不然事必无成。统帅荀莹则不主张与楚军举行决战，认为：兵不可数动，数动则疲；诸侯不可屡勤，屡勤则怒。如允许与郑国结盟，晋军并三分四军，以一军牵制楚之全军，我能常来，楚军则难以常往，这样比举行决战为好。战则死伤大，且达不到战略目的。于是晋军乃接受郑国请和订盟的请求，订立盟约，晋郑议和成功，晋为实行疲敌战略。需要强大的人力物力作基础，回军国内，魏绛提出减轻劳役，改革经济的建议，推行以舌，国内出现了新气象。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公无禁利，亦无贪民，殷实富强，有了"三分四军"疲劳楚军战略的经济基础。
第四晋楚双方作战序列
一、晋军
统帅：中军元帅荀莹
将领：中军副帅士匄
司马魏绛
中军尉祁午
中军副尉羊舌赤
上军：将领荀偃，副将韩起
下军：将领栾黡，副将士鲂
新军：将领赵武，副将魏相
兵力：兵车约六百辆。
二、楚军

统帅：楚共王熊审

将领：中军统帅令尹子囊

左军将领无可考

右军将领无可考

兵力：兵车约五百辆。第五晋军作战策划

根据中军统帅荀莹“以逸待劳”疲敌战略，和“三分四军”的主张，以晋军为主体，联合各国军队轮番出动作战，要求速进速退，不以战胜为标准，规定第一次上军出征；第二次下军出征；第三次新军出征。

中军归统帅直接掌握，随时策应出征各军战斗。为着作战统率的便利，晋军与诸侯各国军队配合编组，编成了新的战斗序列。

第一军：晋上军配属鲁、曹、邾三国军队。

统帅：上军将领荀偃，副将韩起。

将领：中军副将士匄，担任支援策应。

第二军：晋下军配属齐，滕、薛三国军队。

统帅：下军将领栾原，副将士鲂。

将领；中军上大夫魏颉，担任支援策应。

第三军：晋新军配属宋、卫、郧三国军队。

统帅：新军将领赵武，副将魏相。

第六逼阳城的围攻战

周灵王九年(公元前563年)，晋悼公十年，鲁襄公十年，宋平公十三年，曹成公十五年，卫献公十四年，吴王寿梦二十三年，齐灵公十九年，四月一日晋悼公与鲁、宋、曹、卫、莒、邾、滕、薛、杞、小邾及齐世子光、吴王寿梦，会盟于相。晋将荀偃、士匄向荀莹提出：楚联合郑、陈攻宋，楚伐宋必经东道，我兴兵伐逼阳，一鼓而下，赠封宋向戌，以巩固宋国东部。荀莹不同意进攻逼阳，他说：“逼阳城小而固，胜之不武，弗胜为笑”。意思是打下这样的小国，算不得什么威武，打不下，就要为各方所笑。偃、匄继续坚持请求，荀莹仍然不同意荀偃，士匄的建议。晋悼公随军出征，荀偃、士匄又直接向晋悼公建议，悼公同意。于是指示荀莹出动兵力，由第一军进攻逼阳城，逼阳为夷族小国，当时附楚，国虽不大，国人都不甘愿屈服于晋的军事压力，鼓起勇气，对敌战斗。这是东周列国期间，最生动的小国敢于抵抗大国的战争。

逼阳军民奋起战斗，晋、鲁、曹、邢四国军队虽展开围攻，但城坚难克。担任进攻北门的鲁军孟孙蔑(献子)所属士卒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叔梁纥、狄虎弥和秦堇父三人被誉为“有力如虎”，但依然动摇不了逼阳人民坚定的战斗意志。经过二十四天的攻守战，攻者已疲，原来认为逼阳小国，可一鼓而克的荀偃、士匄此时不得不以夏季久雨，水淹将至为理由，向统帅荀莹提请“班师”。荀莹大怒，针对他们私向悼公请战之事，严厉申斥说：伐逼阳、封向戌两事，事成才告余。现在打不下来，又让我下令撤兵，悼公一旦追究打不下逼阳的责任，你们就会推在我下令撤兵的问题上。这样的罪名我受之不起。因此，荀莹命令荀偃、士匄说：七天之内，攻不克逼阳，必依军法从事。偃、匄照例对部属宣布克城日期，不能克城，先斩大家，然后自刎，以申军法。强攻逼阳的战斗又开始了。五月庚寅(四日)荀偃、士匄亲冒失右，鲁、曹等诸侯也参加战斗，经过五日激战，逼阳终于在孤军无援、苦战恶斗的情况下，于甲

午(八日)无力继续抵抗，而告沦陷。晋联合鲁，曹等国攻克逼阳，晋军不可能派兵戍守，于是做顺水人情，把逼阳送给宋国。

第七三驾战役的经过

一、一驾之役

周灵王九年(公元前563年)，晋悼公十年，鲁襄公十年，宋平公十三年，卫献公十四年，曹成公十五年，齐灵公十九年，九月，晋悼公会鲁、宋、曹、卫、莒、邾、滕、薛、杞、小邾诸侯，及齐世子光军伐郑。会师丰首(河南省通许县西北)。此时郑国发生政变，公子子孔执政。晋悼公令诸侯军增筑虎牢城，留兵戍守。晋军则进占郑属梧；制两城，由士鲂、魏绛担任守备，与虎牢成犄角之势，控制郑国。晋军在黄河南岸占据桥头阵地，形势所趋，楚令尹子囊也率军北上，支援郑国。十一月，晋中军元帅荀莹率上军及诸侯军到阳陵，楚军正在北进，晋军统帅荀莹认为还不是与楚决战的时机，决定按照疲敌战略的作战方案，作战略退却。并说："今我逃楚，楚必骄，骄则可与战矣"。上军将领栾黡反对敌前退却，他指出："逃(避)楚，晋之耻也，合诸侯以益(加)耻，不如死，我将独进"。栾黡的行动，导致了晋军全部前进。

己亥，晋军与楚军夹颍水列阵对峙。荀莹不能控制全军。以战略全局而服从和迁就栾黡的局部鲁莽行动，造成了晋军行动的被动。这一现象为郑国大夫公孙迈(子)所看穿，认为晋没有与楚真正作战的决心，晋军必将撤退。晋退，楚必围郑，反正晋要撤退，不如从楚促使晋军北撤。于是郑派出代表渡颍水与楚订盟。晋将领十分愤慨，栾黡主张移兵攻郑。荀莹认为不可。因为晋军只能出动一少部分兵力，难以与楚全军相抗，而且一旦攻郑，楚军一定相救，这样晋不但不能取胜，反而为诸侯所取笑，"不如还也"。于是，晋于丁未(十一月二十四)和诸侯军侵扰郑国北郊后，退出郑境，楚军也收兵返回本国。晋军在一驾战役中始终进退自如，掌握着主动权。

二、二驾之役

周灵王十年(公元前562年)，多年来受南北交侵的郑国，深为介于晋、楚两霸之间而忧虑。在权衡各种关系后，饬边境守军向宋国挑衅，激怒宋军对郑进攻，郑军随之向宋反击。郑、宋发生战斗，晋很重视，出动较大规模的兵力向郑进攻，荀莹率领的晋新军和齐、宋、卫军于四月己亥(十九日)，到达郑国首邑附近，各军占据的位置：

(一)晋荀莹指挥的新军，进抵郑西郊。

(二)齐太子光和宋向戌军先行侵入郑境，推进到东门外地区。

(三)卫孙林父军推进到郑北郊地区。

各国诸侯相会于北林，兵力集中后，向南扰前许属各地，企图引诱楚军出动，而击破之。旋即右转回军到琐，进围郑首邑，并于南门外举行大检阅以示威，郑以楚没有来援：而向晋屈服，并求和订盟。七月定盟于亳，提出的誓词如下：

(一)凡我同盟，毋蕴年(屯积收获)，毋雍利(专山河之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敌，同好恶，奖王室。

(二)违反盟约，司慎司盟、山川群神、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诛)之，失民，丧命，灭族，亡国。

赌咒式的盟词，限制不了形势的发展，很快成为一纸空文。楚军北

来进入郑境，郑又反过来否定盟约，迎接楚军。楚军到郑，晋军已离开郑境，楚军又扑了空，长途跋涉行军往返无所收获，战略上被动，将士疲困不堪，国力随之大为损耗。二驾之役，就此结束。

三、三驾之役

楚于第二次进军伐郑，也深知独力难以胜晋，乃遣使臣乞师于秦，秦国派遣右大夫詹率军助楚。楚令尹子囊军，于是年九月与秦会师，北上伐郑，按原来郑大夫公孙子展提出的："迎接楚军，借楚拒秦，导(引)楚伐宋，引晋前来。晋胜则降晋，楚胜则服楚"的策略，郑公决定请和于楚，又挑衅于宋，这样使大局迅速发生了变化。

(一)楚接受郑求和，谢绝秦国，锋芒指向宋国。

(二)楚、宋战争发生，郑派兵参加，东方兵连祸起。

宋向晋告急，晋军统帅荀莹判断：楚向宋借兵是因楚连年奔驰，疲劳不堪。我一岁之间再度出兵，楚岂能再来？故我应当表示出强大姿态，以坚定郑的向心力，于是采取措施：

(一)大会诸侯。

(二)全军出动，向郑进军。

晋联合各国诸侯军郑推进。郑则采取预定的一方面向楚求援，同时又向晋求和的两面政策。但往楚求援的大夫、太宰竟被楚无理扣留。往晋请和代表大夫王子伯骈，向晋表达了求和的真诚愿望。因为在三驾进军中晋悼公禁止侵掠，宽释郑俘，以示仁德，郑深受感动，表示归服。九月甲戌，晋派下军主将赵武为代表，进城与郑缔结联盟。郑子展代表郑公到晋营地与晋悼公订盟立约，郑完全站到晋方，荀莹三驾进苯获得战略上的全部胜利。楚则以南度被劫进军，疲于奔命，对晋方大会诸侯，出动全部兵力援郑，与郑订盟成功，已自感无力北进竞争。至此，楚之逐鹿中原的战略，因受到晋的抵制而暂时放弃。

第八晋楚双方战后动态

晋、郑和平订盟成功，于十二月戊寅(二日)在郑地萧鱼举行大会，除晋悼公、郑简公外，鲁侯、卫侯、曹伯、齐世子光、和莒、邾、滕、杞、小邾等君主也亲临参加。由晋悼公为盟主的萧鱼大会，成为城濮战后践土之盟以来，以晋为盟主的又一次盛大的盟会。

萧鱼大会后郑不再叛晋达二十余年，郑完全成为晋势力范围内的成员国。但楚仍然不甘心失败，于次年(公元前561年)冬令尹子囊又与秦庶长无地再度进军杨梁伐宋，以报晋争取郑国之仇，但对这时中原已经形成的大局，并未产生影响。此后楚因经受东南吴国之牵制，无力争霸中原，中原地区得以和缓，出现暂时安定局面。同时也是由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所取得的成效。这使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提供牺牲玉帛的郑和其他小国多年遭受的侵略欺侮局面也暂告结束。但由于大国争霸的情况仍然存在，这种局面难以维持长久。

三驾战役评述

晋、楚争霸，占春秋列国大部时间。每次战争都涉及郑、宋两国，其次为曹、卫、陈、蔡和齐、鲁等国，并以郑、宋为焦点。因为谁控制郑、宋，谁就可以称霸中原，执诸侯牛耳。这是晋、楚双方多年来处心积虑以求一逞的大事。晋军统帅荀莹策定的疲敌战略，起了重大作用。历史上称"三驾而楚不能争"，就是对"三驾战役"重大历史作用的充分评

价。它不但对当时形势如此，而且对后世的军事战略也有深远意义，不少军事家效法荀莹的疲敌战略而获得成功。

自古以来不战而屈人之兵，一向被兵家视为上策。因而在许多战争中很难产生积极歼敌的作战思想。晋国三驾战役中虽握有战争的主动权，但着眼点只在于屈敌，而不在于歼敌。荀莹的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的轮番行动，目的在于消极疲敌，使敌疲于奔命，而没有从歼灭敌人着眼，这虽是晋军战略指导上的不足，但也是很自然的。一驾进军，当栾黡提出与楚作战时，荀莹立即表示“我实不能御楚”，而举行战略退却。二驾进军同样出现消极退避态度，只有三驾进军大会诸侯，才全力以赴，但只在萧鱼开会了事，根本没有歼灭敌人的积极打算和部署。

坚定的战略指导是致胜的重要因素。晋第一军首次行动时，进攻目标并没有指向主要敌人楚军，而是把战略大方向，改为针对一个小国逼阳。荀莹虽指出“逼阳城小而坚，胜之不武，弗胜为笑”。但是毕竟没有扭转和制止这个行动，并在晋悼公压力下被动行事，而至影响战争全局。好在楚军统帅子囊愚钝无能，晋军迈阳攻城期间，楚军没有乘机向晋进攻，否则很可能由此而全局波动。

楚国在初期争取郑、许，以控制中原，对东方则联鲁攻宋截断晋、吴战略交通要道，活动尚属积极。及鲁转变态度站到了晋方，晋联合鲁、曹，进攻逼阳这个战略要地，战事形成了持久战时，楚军竟无所作为。等到逼阳被攻陷，晋、吴交通恢复，楚在战争全局的指导上己显示出十分低能与被动。晋军一驾进军，战斗力薄弱，双方在颍水对峙，楚竟不敢进攻。晋军撤退，楚军也随之撤退，虽采取联秦对晋策略，待晋二驾进军时竟未起任何作用。两度都随着晋军出动而出动，并随晋军撤退而撤退。往返奔波、疲惫不堪。所以当晋在“三驾”进军时，就无力出动大军与晋周旋。萧鱼大会，晋为诸侯盟主，楚只有在江汉地区，望中原而兴叹。这主要是因为战略被动，行动消极，所以难免招至一系列失败。

晋、楚两霸相争，许多小国遭受频繁入侵之苦。逼阳国内上下一致，竟不怕强暴威胁，奋起抗击晋方四国军队的进攻，孤军奋战一个月，多次击退敌人强攻。终因孤立无援，被优势敌人攻陷。逼阳军民的英勇气概，成为小国敢于对大国、弱国敢于对强国战斗的典型先例。

第六节吴楚柏举战役

第一柏举战前吴楚两国的连续战争

一、州来之战

晋楚邲战后，楚大夫巫臣奔晋，向晋景公提出请“通吴”合力以制楚的建议。经景公同意，派往吴国执行这项战略任务。吴主寿梦同意通吴于上国。巫臣就利用所带兵车教吴人学习车战和阵战。同时激起吴对楚的敌对情绪，并留其子狐庸为行人于吴，执行这个计划，吴国从此开始与诸侯各国一样编车战军队。

周简王二年(公元前584年)，吴王寿梦二年，楚共王七年，吴军进攻楚的巢、徐。此际楚军伐郑、晋、齐等国于马陵盟会，共谋援郑抗楚战争。八月吴军首次攻占了楚属淮上战略要地州来，楚侧背受到威胁，令尹公子婴齐不得不动用侵郑重兵，对付东方新起的危险敌人吴。这一年，属于楚的蛮夷部族，完全被吴占有，吴同晋、齐、鲁等国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使楚陷于两面作战极度不利境地。吴军进占州来，楚军被动转移淮上，双方围绕州来展开反复长期的争夺战。吴楚两军虽互有进退，但吴军终于在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进占州来，州来从此成为吴国的淮上战略要地。楚国在淮水流域的一些地区，由于失去州来，而始终无力收复。

二、鸠兹之战

周灵王二年(公元前570年)，楚共王二十一年，吴王寿梦十年，楚令尹子重(公子婴齐)，以精兵约两万伐吴，一举进占鸠兹，推进到衡山。当楚军进占吴属江上战略要地鸠兹时，吴世子诸樊认为楚军必然向境内入侵，立即饬令公子夷昧，余祭各率兵分别设伏于太湖以西扼要地区，自率主力迎击楚军。楚令尹子重到衡山后，派遣骁将邓廖指挥体强力大的组甲(漆甲成组文)战士三百，披练(练拖)勇士三千，向吴境内进攻。诸樊率部迎战。两军战斗发生，吴军纷纷向后退却，引诱邓廖进入伏击圈内，夷昧、余祭两部伏兵出击，形成四面包围，邓廖受伤力战，被俘不屈而死。楚军大部被歼，幸免逃回的只有组甲战士八十，披练勇士三百。吴军乘胜攻击楚军主力，子重因邓廖惨败，不敢再战，撤军回国。不仅放弃攻占的鸠兹，而且连大江以北的地方驾，也被吴军进占。楚国人士谈论这次战争说：“子重于是役也，所获不如所亡。”国人因而群加指责，子重感到内咎于心，不久病死。

三、庸浦之战

周灵王十二年(公元前560年)，吴王诸樊一年，楚共王三十一年，吴于秋季进军侵楚。楚将养由基急引军奔命应战。司马子庚率兵为后援，养由基与子庚商讨作战计划说：“吴乘我丧(共王病死)，谓我不能师也，必易(轻)我而不戒(备)，子为三覆(伏)以待我，我请诱之”。子庚同意，养由基诱吴前进，两军交战于庸浦，吴将公子党被俘，吴军败走。当时人士认为吴乘楚丧不吊而伐楚，应当受到惩罚。次年春(公元前559年)，吴向晋告急，晋会诸侯于向(郑地)，商议为吴谋楚。范宣子数述吴国的不道德行为，拒绝联合诸侯对楚进攻。同年秋楚军进驻于棠以伐吴，吴

军固守不战，楚将子囊以为吴军不敢应战，撤退时疏于警戒，吴军由皋舟娄隘伏击，楚军前后不能支援，全军战败，公子宜谷被吴军俘虏而去。

四、舒鸠之战

周灵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49年)，楚康王十一年，吴王诸樊十二年，楚为舟师(水军)伐吴，无功而还。吴为报复，号召舒鸠人叛楚，楚军推进到荒浦，派遣大夫沈尹寿前往质问，舒鸠主否认有叛楚事，并请受盟。楚令尹子冯；以舒鸠请盟，楚应“姑归息民”以待将来，撤军而返。不久舒鸠终于叛楚，投到吴国方面。于是楚新任令尹屈建率军伐舒鸠，大军进至寓城，吴军来救舒鸠。屈建指挥右军在前，子疆、息桓、子捷、子骈、子盂五将率左军在后，吴军插近楚两军之间七天。子疆提议：久将垫隘(士卒疲困在险隘中)，不如速战。请以私属诱敌，另选精锐到阵待我，我克则进，奔则亦视之(看形势而救助)，乃可以免。屈建同意后，子疆等五将以私卒先击吴军，吴军奔走金山，以望楚军，见无后援部队，回军驱逐楚军，突然遇到楚军精兵锐卒，击破吴军，进围舒鸠，舒鸠终于被楚所灭。

五、夏汭之战

周景王七年(公元前538年)，楚灵王三年，吴王余祭十年，楚会诸侯进攻吴朱方，以讨齐臣庆封，吴则反过来攻楚，取楚边境棘、栎、麻三邑而去。次年(公元前537年)，楚率所属诸侯及东夷伐吴，以报吴袭占楚边境三邑之仇。楚将沈尹赤、薳射指挥繁扬之师，到达夏汭，越将常寿过与楚军会师于琐，吴军出动薳启疆部迎击，仓卒之间，被吴军击败于鹊岸。楚军渡罗汭前进，楚将沈尹赤推进到莱山，薳射的繁扬之师先进入南怀，楚军主力跟进到达汝清，由于吴军防守严密，不能再进。

六、乾溪之战

周景王九年(公元前536年)，楚灵王五年，吴王余祭十二年，徐国大夫徐仪聘于楚，被楚拘留，徐仪设法逃走。楚担心徐国叛变，派薳泄率军伐徐，吴军救徐。楚令尹子荡率军攻吴军于豫章，军至乾溪，被吴军邀击于房钟，楚将尹弃疾被俘。子荡归罪于薳泄作战不力，杀之以示众，但却不敢对吴进攻，不光彩地收兵罢战。

七、长岸之战

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年)，楚平王四年，吴王僚二年,吴伐楚，两军战于长岸，楚司马子鱼奋勇当先，力战而死。楚军坚持战斗，击破吴军，俘吴王“余皇”号乘船，派随兵与后列部队环堑，列阵而守。吴公子光对部属说：“丧先王之乘舟，岂唯兜乏罪？众亦有焉！请藉取之以救死。”接着派遣长鬣者，潜伏船旁；预为规定信号，夜间吴兵高呼“余皇”，潜伏者纷纷应声，楚军搜杀应声人，造成混乱。吴军则乘机攻击，夺回“余皇”号船，胜利而返。长岸之战，楚军无所获而告一段落。

八、鸡父之战

周敬王元年(公元前前519年)，楚平王十年，吴王僚八年，吴军于进占州来后，旋即退出，楚军进驻，筑城戍守。楚大夫沈尹戎认为：“城州来以挑吴”是失策。因为州来为吴必争之地，但楚国看不到这一点，积极加强州来防御措施，吴军果然来攻。楚将薳越率楚宰相诸侯军急行军来救，两军相遇于钟离。此时楚令尹子瑕病灾，薳越以司马代理统帅，士

气消沉不振。吴将公子光向吴主建议：“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是以前来。”并对诸侯情况加以分析说，胡、枕之君幼而狂，陈大夫壮而顽，顿与许、蔡疾(不满)楚政，对楚军来说：楚令尹新丧，士气不振，“帅贱多宠，政令不一”。接着提出分兵先犯(攻)胡、沈、陈军，三国兵败，诸侯必然军心动摇。

吴、楚两军在鸡父发生战斗，吴方挑战部队或奔或停，参差离奇，沈、胡、陈三国军队出击，立即发生混乱，吴军突然展开声势浩大的攻击，三国军队抵抗不住，胡、沈两国君和陈将夏都被吴军俘获。吴军当场杀死胡沈两君及陈大夫，巧妙地释放胡、陈、沈三国战俘，命他们奔往许、蔡、顿等国君面前高呼：